马克思主义
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国家的消亡
至先锋队

SINCE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800余位学者为本辞典的编写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国家的消亡至先锋队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SINCE1897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1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俞可平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ISBN 978-7-100-16024-7

I.①马… II.①沃… ②俞… III.①马克思主义—词典 IV.①A8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0976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一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24-7

2018年5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47

定价：286.00元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itz Hau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1: Abbau des Staates bis Avantgarde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InkriT.

Colombe aux quatre profils entrelacés, 1951.
Pablo Picasso © Succession Picasso 2018

E-mail-Adresse der Redaktion (编辑部邮箱地址): hkwmred@mail. zedat. fu-berlin. de

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

郝　平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林建华　北京大学校长

顾　问：

于鸿君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　编：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编委会主任：

杨　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殿利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仰海峰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关海庭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杨　河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汪建成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法学院教授

沈红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译审

张文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张异宾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部：

主　任：倪宇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编审
副主任：佟　萌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办公室主任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之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图谱。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诞生后，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大量的反对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如果要有足够的知识力量，就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对于当代的学者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文献，首先是MEGA（*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其次便是HKWM（*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正如蒙蒂·琼斯顿（Monty Johnstone）所说：MEGA和HKWM互为补充[①]。《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概念的深度阐释，不仅凝聚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血，也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是迄今最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W. F. 豪格夫妇（Wolfgang Fritz Haug和Frigga Haug）、P. 耶勒（Peter Jehle）和W. 考特勒夫（Wolfgang Kuttlertf）等4位德国学者在编译G. 拉比卡（Georges Labica）主编的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titique de marxisme*）的基础上，发起编辑了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编纂时间最长，也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大辞典》原计划撰写1200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概念，后来逐渐增扩至1500个，卷次也从原计划的12卷扩至15卷，而且

---

① 蒙蒂·琼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互为补充》（"HKWM and MEGA Complement Each Other"），《MEGA研究》（*MEGA-Studien*），1995年第2期。

从第 6 卷开始，每卷均分为上下两册。这样，整个《大辞典》的规模实际上将达到 15 卷 25 册。截至 2018 年 5 月，已经出版德文版共 9 卷 13 册。另有 6 卷共 12 册尚未出版。

《大辞典》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除了规模大和时间长的特点外，《大辞典》还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跨学科性。《大辞典》所选录的 1500 多个关键概念，几乎横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法学、神学、伦理学、语言学、修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军事学，等等。相应地，这些关键概念的作者也分别来自上述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不同观察。第二，国际性。尽管《大辞典》的原文是德文，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际性的研究和出版计划。“迄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包括 8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国际性项目。”[①] 不仅有发达国家的作者，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作者；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为了突出其国际性，编者还在《大辞典》的每个德文词条上分别注上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的译名，甚至还包括中文译名。《大辞典》每出版一卷，就会有一些重要条目在英文版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发表。第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批判性。《大辞典》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一特征，将批判性作为贯穿于整个辞典的一条主线，并体现于《大辞典》的书名之中[②]。正如欧洲劳工研究所的乔恩·詹森（Jorn Janssen）在书评中所说，“《大辞典》旨在提供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③]。这里的“批判性”，主要是指理性的审视和独立的评判：既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也不屈服于世俗的利益，而是秉承客观的和科学的精神，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与判断。鉴于这种批判精神，丹麦的著名社会学家 G. 索邦（Göran Therborn）赞赏说：《大辞典》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百科全书”，是知

① 参见 P. 托马斯（Peter Thomas）：《〈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介绍》（“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 13 卷第 235 页。

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德文原文是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其中的 kritisches 译成中文本来就有“批判的”意思，但此处的“批判”不含有中文语境中的政治意义。

③ 乔恩·詹森：《〈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书评》，《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2016 年 2 月 15 日。

识分子“拒绝屈服的唯一榜样”[①]。

以豪格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大辞典》核心编纂团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榜样，也是所有严肃学者的榜样。《大辞典》的编纂计划始于1983年，那时“两德”尚未统一，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主要来自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这是一群独立的学者，他们既不是东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东德政府不可能支持他们；他们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西德政府也不支持他们，连德国的科学基金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也“拒绝资助这部辞典”[②]。他们把编撰《大辞典》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依靠社会捐助和自我奉献，坚忍不拔地开展工作。在过去35年中，他们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努力推动着一卷又一卷《大辞典》的出版。尽管困难比想象的更大，进度比计划的更慢，但他们丝毫不减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大辞典》第一卷的编撰出版，居然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从1983年开始，到1994年才得以面世。其间有些作者已经离开了人世，至少有7位作者“已不能亲历本辞典第一卷的出版”[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所有学者学习。

正是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的这种高尚的学术精神感动了我，促使我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的协调工作。我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研究重心转向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本来已经没有计划再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2017年10月，经德国友人推荐，豪格先生与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初次见面，他表达了出版《大辞典》中文版的热切愿望。回国后我专门向学校进行汇报，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担任《大辞典》中文版总顾问，于鸿君常务副书记、王博副校长任顾问，学校委托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了《大辞典》中文版编辑委员会，杨河教授兼任主任。

尽管据说全国有500多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机构，6万—7万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但懂得德语并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高水平专家却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公开向全国发出招聘高水平译者的邀请，

---

① G. 索邦：《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维索出版社（Verso）2008年版，第174页。

② 沃尔夫冈·豪格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德文版“前言”，第6页；见本书“前言”第7页。

③ 同上书，德文版“前言”第5页；见本书“前言”第6页。

最终有近30名学者加入到《大辞典》中文版的翻译队伍中。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这部高深而浩繁的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得以陆续呈献给中文读者。《大辞典》的德文版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作，其中文版也同样如是。幸赖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同仁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大辞典》的中文版才能顺利编译出版。作为《大辞典》中文版的主编，我对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专家学者、各界朋友和编辑部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可平

2018年3月11日

德文版主编序

九曲桥

恶鬼只知道直行，
就像意识形态家的
邪灵
在百花盛开的园中难寻我的踪迹。

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
1988 年于上海九曲桥

加拿大哲学家联合会（Canad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原主席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1994 年曾称这卷书的德文原版“具有世界历史的（world-historic）意义”。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北京大学用以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中译本为他的评价更增分量。现在，这部诞生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史时刻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中文不仅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语言，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引人瞩目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中心的国家的语言。在危机四伏的天空下，人类的前途已和这个大国的前途交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是对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补充，而后者本身就具有世界文化的意义，因为它将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和欧洲文明世界朝向解放、朝向革命的一面联结了起来。马克思不仅为人类留下迄今从未过时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组织上为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做出决定性贡献，而且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压迫、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批判，已经成为他所在的文明世界通往未来团结统一而且社会化的人类世界的钥匙。

人们常说，马克思历久弥新的现实性的秘密就隐藏在他的方法（Methode）之中。但是对于马克思（以及他之前的黑格尔）来说，除了“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

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论》第一卷，MEW 23，第 28 页）的一般法则之外，并不存在独立于待分析的现实的性质而抽象地自成一体的方法。回溯“方法”这个词的希腊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它的字面意思是“朝向……的路”。每处的地形和最终的目的决定了路的不同，篇首所引的诗人以九曲桥为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MEW 13，第 475 页）历史上成群的活动家一次又一次走上歧路，但这并不全然是坏事：走不通的路会给人教益。现在到了转变（Wendungen）的时候，而转变也正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诗人哲学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年）以虚拟的中国为背景、充满辩证教诲的小书《墨翟：转变之书》（*Me-ti–Buch der Wendungen*）的主题。

阐明这些转变及其背后理论上、现实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经验和分歧，是这部对概念加以历史考证（kritisch。该词兼有“批判”和“考证”的含义。——译者）的辞典肩负的主要任务。这个意义上的批判（kritik）并不来自外部，反而是站在被批判者的立场上，它面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和历史，应当是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年）所说的“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这个概念似乎是悖谬的，拯救和批判如何相容呢？拯救让人想到辩护，批判则让人想到判决。拯救性批判兼采二者，但它真正关键的要义则在于：从以往的瓦砾中拣取有生命力的成分，传递给子孙后代。行动和理论研讨中包含的经验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这些经验构成了针对改变社会的实践的理论。同时，拯救性批判粉碎了妨碍这些经验现实化的种种成见积习。因为马克思针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断，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件未成品（work in progress）。对一项正在向前迈进的事业来说，错误从来不是全然消极的，如果错误得到理解和具体地批判，就会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即便失败也是如此，布莱希特 1929 年说过，有些时候“需要的不是胜利，而是 / 赢得失败”。（GA 14，第 38—39 页）

因此这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会满足于做以往历史的档案。即便是马克思，无论他有多么根基性的意义，本辞典也必须用马克思来超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每个时期都要在变化无常的地区和国际条件下完成上述任务，还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不断重新完成。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通过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彼此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生产和再生产着我们的生命和生命条件，并建立了种种关系，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这些关系中激发出团结统一的社

会关系？这个革命之问，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源代码，它比任何体系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都更有意义。只要马克思主义能够干预关乎社会解放运动的所有问题，比如今天女性主义提出的性别关系问题和生态主义提出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它就会永葆活力。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本辞典将马克思相关的问题作为探针射向历史、当代和正在浮现的未来，几乎伸向了人类世界的所有领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等事物为我们留下思想素材，我们通过承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对它们进行加工，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素材，就无法批判地站在团结统一的立场上，从综合历史经验和科学认识的高度，全面地把握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用马克思的探针所射入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数码革命的世界、战争阴云笼罩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惊人的对立和矛盾，遍及全球的解放运动和武力镇压相交织，所有这一切背后还悄然发生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世”（Kapitalozän）的地球史变动，也就是步步逼近的“气候灾难”。

如果这支探针在它的探索之旅中，不仅就所谓早已测量清楚、研究透彻的历史关节点，而且就日常的生活现象，都能不断传回新的图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慰藉。翻开本辞典会遇到不少惊喜，无论是没有意料到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辞典里的概念，还是被认为已研究透彻的耳熟能详的题目，都会“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窗口”（罗莎·卢森堡，GW 1/II，第 364 页）。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2018 年 3 月

曹旸 译

前　言

一

根据计划对现有的资料进行翻译、修订和补充，从而编译出一册全新的辞典，这并非前所未有的尝试。关于启蒙运动最著名的参考书——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就源自一个翻译项目；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 Ritter）主编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则是源于一个修订计划。《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源于一个译本的增补本计划。1983 年德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的“前言”中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们的作用在于在原辞典法国学术烙印的基础上加上其他烙印，尤其是德国学术的烙印。当时，所有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学派的专家都被邀请来参加辞典的编写工作。在“两德”时期的德国，这个项目因教条主义的排斥及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对接触的恐惧而受到限制，它自身不得不国际化并尝试尽可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三大洲的学者进行合作。不久之后，由于外部原因，即该项目在规模上已经达到原辞典译本的好几倍，作为原辞典译本之增补本的形式就被打破了。

同时，该项目拥有新的开端也有其内在原因。一种新型的难题（*Problematik*）以广义上的危机领域和批判领域交织的形式出现了。“增长的边界”、新的社会运动所关注的其他生存问题、对高科技生产方式的运用都导致了问题的逐步转移。苏联的改革和苏联最后的解体、1917 年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西方反法西斯同盟取得的胜利所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终结，这些都促成了一次“认识论的转折”并对辞典项目向全新方向发展产生了一次历史化的推动。

正如就学术角度而言，《哲学历史辞典》树立了一个如此难以企及的榜样，同样值得思考的是将这两部辞典的知识范围并列起来加以比较而取得的这个经验：不仅两者几乎没有交叉，而且《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好像是在对着兴趣索然、

无精打采的沉默发声，这种沉默表明了《哲学历史辞典》的话语的资产阶级特征，正如打破资产阶级的沉默构成了编写马克思主义辞典的必要性一样。

II 在共产主义事业遇到曲折之后对它进行历史考证，站在时代精神的立场上看，至多是出于考古学的兴趣，仿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形形色色的科学的、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存在似的。但是，即使“马克思主义”看似真的遇到了曲折，它依然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及其引起的多种多样的对抗性的反应，我们无法想象 20 世纪的科学、文化和政治会如何发展。

关于共产主义已死亡的谣言被仓促地传播。但是，只要这一事业已经着手解答的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失去意义，那么这项尚未完成的事业就不会死亡。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与世隔绝的、宗派主义的现象。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这一思想总因其在实践中以及理论上对人类的社会化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对抗和危机的关注而产生并一直存续下去。这些问题关乎所有人。但它们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作为人类在“地球号宇宙飞船”上生存繁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难解性日益明确地被人们意识到，尽管我们尚不明确它们的涉及面有多广。

约阿希姆·里特尔在由他编写的词典的第一卷的“前言”中写道：“我们不能事先断言一个新的综合体的形态如何以及它是否能发挥作用。”这句话也适用于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也不能预测哪些具体的要素会在何种联结形式中被重新采用。

这些包含着内部分歧、充斥着种种对抗的知识带着它的洞见和盲点、它的自以为是与经验、它的受到反驳的观点和尚未完全挖掘出来的潜质，成为这部历史考证辞典一望无际的宏大资料库。不言而喻，这些知识无法被巨细无遗地，而总是只能以基于某一有限观点的按语的形式被展现出来。一刀切式的区分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与各种欧洲传统相关联，同时它与“资产阶级”知识之间的通道显然也是存在的，尽管这个通道经常被马克思主义知识和资产阶级知识两方面悄悄地过滤掉了。思维方式和概念工具的展示以及思考途径的描绘可以使各方之间的联系浮出水面，并且展现出揭示各种关联的可能性。

二

当今的历史局势对于编写《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既是有利的，也是不

利的。有利的是，国家马克思主义（staatsmarxistisch）对相关历史思考的审查已经放开。档案已经公开，理论无人控制。不利的是“胜利者”对历史的非历史的理解，在很多方面这等同于抹去社会记忆。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曲折的现状为本辞典标题中的概念“历史考证”增添了浓重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于对历史经验的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分析利用，另一方面在于对大量思想资料的学术考察、发现和考证式 III
的钻研。对错综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图书馆”进行历史考证可以使我们获得有益的清醒。通过钻研而保持的记忆能够使我们摆脱盲目重复的束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挫折首先留给人们的是对于积淀下来的历史的记忆。这一处境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努力与面对负面信息的痛楚都以冷酷的批判形式表现出来，以争取生存之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将具有启蒙意义的知识和有关社会的想象等人类财富成功地拯救出来。只有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才能如同挪亚方舟般将这些财富载向另一个时代。

这种形式的批判并不甘于对被批判事物采取缄默态度。它更多的是进入到历史经验中去。它通过自身关心这些历史经验，从而接纳这些历史经验。它并不认为自己总是有理，但它要打破由沉闷的缄默和毫无远见的胜利喜悦构成的混沌状态。

使被批判的事物获得历史的公正对待的必要尝试并不会每次都获得成功。但是，仍然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失败后获得的所谓更好的知识并不一定就是更好的认知。这常常只不过是无法改变的状态的另一种表现。在作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遭遇曲折之后简单地换边站，不过是一种对负责任的探究的逃避从而进入忘却记忆的状态。

没有社会记忆就没有经验可谈。在“历史断裂”（Geschichtsbruch）（彼得·格洛茨［Peter Glotz］）的时代，一部历史考证大辞典的意义就在于作为记忆机器去传播思想经验。这些思想经验来自于历史考证的“引用”——不仅是对辉煌成就的引用，也是那种对展现某些热衷于权力的思想所包含的理论空洞的引用。

三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在侧重于对实践的考证和对经验的传播之外，也着重强调语文学。各个词条都有谨慎的引用，并标明了出处，以供查阅者继续自主研究，并为大家在错综复杂的文献资料中指引方向。此外，它也提示大家哪些作品 IV
值得重新阅读，以避免神化历史。因概念在运用和内涵方面的多样性，概念发展史

能够对错误的确信和看似严丝合缝的思想大楼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一部概念型词典的结构恰好与以上这一思路对接：该思路指向的不是形成固定的世界观，而是导向开放的“工作场所”。百科全书的出发点在于囊括如链环般相互交错关联的知识圈，而词典则拿着锤子在思考 —— 它把思想圈敲碎成单个概念。涵盖整体性别的意义是不存在的。假想的这种意义的支配应该让位于对诠释学的整体性的解构。对“哲学语法”（philosophische Grammatik）进行理论加工能够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知识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启蒙的、新的现代性中；在这种现代性中，主体统一的神话和意义统一的神话都已破灭；正因为如此，社会批判理论的工程可以在实践视角下重新开始研究这一现代性。

四

本辞典编辑了 1200 多个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以及社会解放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概念。开篇首先是一些理论性或政治策略性的概念，它们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紧密相连的路线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辞典还收入了一些并不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甚至马克思主义传统所熟识的概念，或者至少它们还没有成为这些传统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概念表达了新型的历史难题或知识要求，或者它们促使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至今被忽视的方面受到重视，那么，这样做就是恰当的。

众多词目源于当代政治理论词汇，而且从未在类似的词典中被提及过。它们往往是新造词，反映出这个时代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危机时代尚未解决的问题：向跨国资本主义的高科技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因结构性的无能而不能参与这一过渡所导致的苏联的社会形态遭受挫折的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中显现出不再被“东西矛盾”盖住的“南北冲突”问题。新的社会运动 —— 特别是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 —— 也一同创造了新的词汇。

如果词汇并非新创，那么，在对其所做的解读以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为出发点时，这种解读就是新的。

历史事件、地理名称和机构名称都未收入 —— 除非它们演变为集中反映策略问题和相关反思的概念。在词目层面，人名仅以由它们发展而成的思潮或学派的名称的形式出现。

隐喻、图片、惯用语句、话语方式、关键词等，只在对理论政策表达有必要性 V
时才刊用。里特尔并不关注它们，尽管他从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的理论中明白，它们将向“思考的次结构延伸”。

概念有一个“分化”的发展史，在一些情况下它们有多种命名可能性，从而被录入两次。由此产生的视角的多样性也是符合预期的。它导向处于尚未完成的历史状态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区域。

五

制定方案、编排需要修订的词目、寻找合适的作者等工作，部分是通过公开的和发表出来的讨论来进行的，部分是在咨询各大洲众多学者后完成的。有些最初拟定的方案最后没有实现。

这部辞典的第一卷得以出版，是建立在十年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的。编辑组和出版人仔细编辑了所有文本。在“辞典工作室”里，我们深入地探讨文稿，并与作者进行沟通。

歌德（Goethe）曾说过：“相似能使我们平静，但不一致能让我们有创造性。”也许可以补充：不断增强的创造性也促进了不一致性。因此，也许我们应该将不同作者在对实事做了深入研究之后对一件事物秉持不同的观点视作这部作品的优点。正如在所有生机勃勃的学术和政治文化中，新的不一致性必须不断出现。不言而喻，这里没有出现任何形式的审查介入。最初为词条设定的范围不久就被打破了，否则就会变成削足适履。

如果说有介入的话，那么，这种介入就是在历史语文学层面上准确表述的建议，以及偶尔对繁多资料的压缩。概念分设的构思原则带来了概念重合交叠的危险，在最后的审校中，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完全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是无法实现的。技术层面的规格统一并没有削弱视角的多元性。

六

我们要感谢词条作者们已被过度消耗的耐心和他们的理解。特别是那些从 1983 年就参与其中的作者，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得知我们的时间计划已不能实现。还有一

些作者未能亲历本卷的出版：伊米莉亚·詹科蒂（Emilia Giancotti）、赫尔穆特·戈尔维策（Helmut Gollwitzer）、迪特尔·赫尔姆斯（Dieter Herms）、古德龙·克拉特（Gudrun Klatt）、卡尔·屈内（Karl Kühne）、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梅尔茨（Eduard März）。

我们要感谢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为本辞典项目和辞典工作室提供了众多工作上的便利。感谢论证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通过他们的努力分担了本辞典的基础资金筹措工作。经过十年的编排工作，该辞典第一卷能够与公众见面，要归功于所有参与者的献身精神。

VI 除了 1986 年和 1987 年这两年的工作岗位创造项目（ABM-Stelle）之外，我们并没有获得其他的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辞典仅靠献身精神是很难完成的。

编辑部和出版人不仅期待来自读者的良好反馈，也期待建议和共同参与。

培根（Bacon）曾说："真理是时间之女。"2000 年之前，本历史考证辞典是无法圆满完成的。本辞典区别于此前其他辞典之处在于，本辞典具有历史变革特殊时期的烙印，虽然这一世俗的变革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失望和沮丧，但是它也是一种可以被不受限制地批判的变革，而通过这种批判则会产生推动未来发展的动力。

柏林，1994 年秋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唐婧 译，李以所 校，秦明瑞 审校

关于第二版

第二版有一些细微的修正之处，最后一页附上勘误表。

一年多之后，尽管本辞典几乎还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关注，但是其再版已成为一件必要之事，这是振奋人心的。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近期呼吁英语世界的读者，不要一味等待译本，而应着手“使用德语原版出版物”。那些接受了德语的使用限于某些地区的事实的人，一定会惊讶于从英裔加拿大人的口中得到相关推介：“那些只是基本掌握这门语言的人将会对自己能够相对容易地理解这些熟悉的领域中的论题感到惊讶。”实际上，全世界对社会批判理论感兴趣的学者总会学习德语的原因并不在于洪堡（Humboldt）和歌德，而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这一语境中的黑格尔（Hegel）。

从这一卷第一次出版开始，就有 100 多位新工作人员加入了辞典的后续编写工作。这一项目的国际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这一前提下，我们编排的、正在写的词目已超过 1400 条。

其他的条件是很有限的。德国科学基金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拒绝资助这部辞典。此外，大学遇到的财政危机使基本的技术支持（复印、通信费用）成为难题。为了使这一项目继续下去，我们想到了民间社会并决定成立作为公益促进协会的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das Berliner Institu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InkriT]）。我们恳求大家帮助。更多的信息可以从编辑部取得。

1996 年 5 月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唐婧译，李以所校

编辑部通讯地址：柏林哈勃尔施维特大街 30 号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 Institut für Philosophie Habelschwerdter Allee 30, D-14195 Berlin），传真：+49 30 803 39 84

目　录

国家的消亡（Abbau des Staates）.....1
反映（Abbild）.....6
阿本德罗特派（Abendroth-Schule）.....20
脱钩（Abkopplung）.....28
推论（Ableitung）.....31
裁军（Abrüstung）.....34
国家的自行消亡（Absterben des Staates）.....39
抽象 / 具体（abstrakt / konkret）.....46
抽象劳动（abstrakte Arbeit）.....51
抽象活动（abstrakte Tätigkeit）.....59
猿（猴子）（Affe）.....60
非洲生产方式（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63
农业问题（Agrarfrage）.....68
农业改革（Agrarreform）.....74
农业商业（Agrobusiness）.....78
积累（Akkumulation）.....81
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91
行动一致（Aktionseinheit）.....104
一般劳动（allgemeine Arbeit）.....110
日常性（Alltäglichkeit ）.....123
日常生活（Alltag）.....124

日常生活研究（Alltagsforschung）.....130
常识（Alltagsverstand）.....140
古美洲生产方式（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144
另类经济政策（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152
阿尔都塞派（Althusser-Schule）.....157
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165
分析 / 综合（Analyse / Synthese）.....168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Analytischer Marxismus）.....173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Anarchie der Produktion）.....177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us）.....180
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kalismus）.....186
解剖（解剖学）（Anatomie）.....189
占有（Aneignung）.....200
承认（Anerkennung）.....216
开端（Anfang）.....227
雇员（Angestellte）.....236
忧虑 / 恐惧（Angst / Furcht ）.....241
直观的唯物主义（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251
对抗（Antagonismus）.....259
人类学（Anthropologie）.....269
反权威运动（antiautoritäre Bewegung）.....279
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hismus）.....285
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296
反殖民主义（Antikolonialismus）.....301
反哲学（Antiphilosophie）.....306
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309
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us）.....312
预先推定（Antizipation）.....319
应用（Anwendung）.....330
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中的麻木不仁（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336

辩护论（Apologetik）.....340
阿拉伯社会主义（Arabischer Sozialismus）.....342
劳动（Arbeit）.....352
工人贵族（Arbeiteraristokratie）.....370
工人运动（Abeiterbewegung）.....375
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 ）.....386
工人监督（Arbeiterkontrolle ）.....404
工人文化（Arbeiterkultur ）.....408
工人文化运动（Arbeiterkulturbewegung）.....411
工人政权、工农政权（Arbeiterregierung，Arbeiter- und Bauernregierung）.....419
工人自治（Arbeiterselbstverwaltung）.....422
工人国家、工农国家（Arbeiterstaat，Arbeiter- und Bauernstaat）.....425
工意调查（Arbeiterumfrage）.....430
劳动关系（Arbeitsbeziehungen）.....431
劳动教育（Arbeitserziehung）.....435
劳动力（Arbeitskraft）.....443
失业（Arbeitslosigkeit）.....448
劳动市场（Arbeitsmarkt）.....453
劳动组织（Arbeitsorganisation）.....469
劳动政治（Arbeitspolitik）.....476
劳动过程的讨论（Arbeitsprozeß-Debatte）.....481
分工（Arbeitsteilung）.....485
劳动时间（工作时间）（Arbeitszeit）.....500
工作时间的缩短（Arbeitszeitverkürzung ）.....509
建筑学（Architektur ）.....515
贫困 / 财富（Armut / Reichtum ）.....521
关节、划分、联结（Artikulation，Gliederung）.....526
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540
联合（联合会、联合体）（Assoziation）.....549
美学（Ästhetik）.....558
美学抽象化（ästhetische Abstraktion）.....579

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582
无神论（Atheismus）.....587
结构规划（Aufbaupläne）.....593
扬弃（Aufhebung）.....598
哲学的扬弃（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611
启蒙运动（Aufklärung）.....621
直立行走（aufrechter Gang）.....631
起义（Aufstand）.....633
剥削（Ausbeutung ）.....636
奥斯维辛（Auschwitz）.....642
表现（Ausdruck）.....647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652
自动化（Automation）.....661
艺术的独立性（Autonomie der Kunst）.....668
权威民粹主义（Autoritärer Populismus）.....673
权威（Autorität）.....678
先锋队（Avantgarde）.....690

缩 写.....698
勘误表.....722
译后记.....724

A

1 国家的消亡（Abbau des Staates）

国家的废除（Abschaffung）（本词常替代“消亡”［Abbau］一词使用）的问题是国家面临的较为普遍的难题，具有极大的困难性。为更好地领会该词的意义，我们需明白国家的消亡具备的两层含义，它们是形成种种混乱困境的诱因：（1）（通过暴力）**打碎**（*Zerbrechen*）资产阶级（或封建）国家；（2）（通过民主）使无产阶级专政**自行消亡**（*absterben*）。

第一个困难是这一含义划分并不明确；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详尽表述这一概念，正如列宁（Lenin）根据各文献中分散的提示所做的那样，必须进行自主阐释。从《共产党宣言》（*Manifest*）到《国家与革命》（*SR*），尚无其他关键词如“国家的消亡”这般引起争议和修正。

这一词汇的丰富内涵促使它具备（有时也加强了）“使某事终结”的两层含义：一层是突然的、粗暴的中断，另一层是一个渐进的、持久的过程。对于相关程序的疑惑（要采取哪些措施？是否需要有所区分？根据怎样的时间表，有哪些阶段，在哪些领域？）会增强对于对象的疑惑（哪个国家？）。在《哲学的贫困》（*Elend*）结尾处的论断是，“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政权消失的前提是“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MEW 4，第 182 页）《共产党宣言》更明确地指出：“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如果说无产阶级……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同上书，第 482 页）在前几页主要关于革命必要性的论述中，关于破坏（Zerstörung）的相关术语频繁出现。无产者必须“废除（abschaffen）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第 472 页）；他们“如果不摧毁……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第 473 页）；“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消灭（Aufhebung）私有制”（第 475 页）；“消

灭这种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本身”，“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私有制”（第476—477页；在这两页上“消灭”一词多次出现）；“消除（Aufhören）阶级性的所有制”（同一语句中，出现三次“消除”）；“消灭家庭”，“消逝”（fällt weg），“消逝”（Wegfallen），“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亡（verschwinden）而消亡”（第477—478页）；“消灭”（aufheben，动词），“去消灭”（aufzuheben，不定式），“消灭”（Aufhebung，名词），“废除”（abschaffen），“消亡”（verschwinden machen），“被消灭”（aufgehoben）（第478—479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第481页）；等等。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Ludwig Klugelmann）的信和《法兰西内战》（*Bürgerkrieg*）在直接提及巴黎公社时，对“决裂”（Brechen），“破裂”（Zerbrechen，或译为：打碎）和“破坏”（Zerstören）补充了“消灭”（Beseitigen）阶级统治（MEW 17，第338页），“摧毁”（Vernichtung）国家政权（同上书，第340页），“废除常备军”（第338页）以及上述的国家政权“已被废弃”（第341页）的事实。马克思于1852年3月5日写给魏德迈（Weydemeyer）的信件中定义“消灭一切阶级”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MEW 28，第508页），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Wohnungsfrage*）（MEW 18，第266页）中多次重新提到《共产党宣言》中提及的“废除”。他在写于1891年的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以“炸毁（Sprengung）旧的国家权力”（MEW 22，第198页）收尾，并唤起无产阶级的任务，即“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因此无产阶级在继承这一权力时必须“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同上书，第199页）。

在废除和自行消亡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模棱两可的空间，这会影响理论和实践的结果。根据前者的逻辑，在革命的过程中最紧迫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莫过于对国家的破坏。那么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在何处呢？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同巴枯宁主义者（Bakunisten）一样认为，打碎国家机器会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失、个人相对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同时出现吗？恩格斯极力解释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他认为国家会根据渐进的逻辑消失，正如国家曾经根据这一逻辑建立起来一样，这与阶级存在的逻辑也是一致的。国家与阶级一样，是历史的创造物，他也道出了与此相对的一面（例如MEW 21，第164、168页）：它们会一同消失，但是不会“一天之内”消失（*AD*，MEW 20，第262页）。

在《反杜林论》（*AD*）中有如下经

典的表述："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将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同上）因此，"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同上）。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Ursprung*）中也有类似的介绍："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MEW 21，第 168 页）同样的还有，"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Von der Autorität*，MEW 18，第 308 页）。这些论述不正是某些机会主义者所认定的，国家会呈现一个自行停止的内在现象或它会慢慢瓦解吗？他们认为，只需要夺取资产阶级国家，并让它为其他意志服务。后期，恩格斯关于和平过渡和通过议会取得国家权力（Einl. 1895 zu Marx' *Klassenkämpfen*，MEW 22，第 518—519 页，第 523 页及以下）的可能性的观点不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吗？社会民主主义不正处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具主义之间不可逆转的困境之中吗？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新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在准备这部著作的时候，特别是在著名的"蓝皮笔记"中（1916；参见 *Marxismus und Staat*）。列宁收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关于国家的文章，他对比、整理了这些文章，对它们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并兼顾了语言学角度（参见比如用 slomat' 和 razbit 来翻译 zerbrechen［打碎］；5. russ. Werkausgabe，Bd. 33，Moskau 1981，第 320 页）。当然，列宁自身也经历了一段不确定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他低估了"打碎"（Zerbrechen）或"炸毁"（Sprengen）的必要性，并将废除与自行消亡联系了起来——他与布哈林（Bucharin）是不同的，但之后他又结合了布哈林的立场。我们甚至可以在他关于"一篇关于国家角色问题的文章的提纲"的相关笔记中读到："自行消亡……为何不是废除或打碎［i. O. dt］"（同上书，第 331 页。这一论文提纲没有德文译本。法文译本见 *Le cahier bleu*，第 7—8 页）。

依靠这些工作，列宁理清了其中的意义，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对"自行消亡"的认识不清和机会主义对"打碎"（Zerschlagen）的处理不当。他在对《反杜林论》的引用页的评注中说："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

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自行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SR*，LW 25，第409页）如果人们认同的话，革命的过程或者程序是这样的：夺取权力——废除作为资产阶级专政之机器的国家（这是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借鉴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即“其实不再是国家的”（同上书，第432页，参见第477页）“半国家”（第409页），或者“地区制度”（第440页）来取代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自行消亡。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执行着国家的使命；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其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和剥削与国家一起都消失了，因此，正像列宁明确阐述的那样，这时“民主
5 的自行消亡”也开始了（同上书，第476页；参见第486—487、489页）。在此，我们已经触碰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权力和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的核心。列宁所得出的结论可以这样表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使我们同时思考打碎国家机器和国家自行消亡这两层含义成为可能。**

评释：

1. 如果国家的消亡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它的时间表是纯理论的，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表表明，能够以什么速度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SR*，LW 25，第489页），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第一次有意识地尝试，在实践中引入这种自行消亡。然而这一努力以及列宁在临近生命尽头时对“文化革命”（Kulturrevolution）的呼吁，都不能阻止苏联人自己走向衰落。早在1919年，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Thesen und Referat über bürgerliche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LW 28，第480—481页）列宁就似乎在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即：“苏维埃国家组织”能够保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第19条）以及“无产阶级民主”致力于“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第20条）这一理论同苏维埃组织并没有废弃议会制，尽管它“使劳动群众接近了管理机构”并分散了权力（第16条）这一实践之间的差距。**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罕见又出乎预料的概念——的建立变成了现实。而“自行消亡”却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比如关于“权”的自行消亡的讨论）。

2. 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的改革清晰地表明，这能走多远。他宣告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结束（实际上，这个阶段在苏联存在的时间和其他地方一样少），并提出（一个变异的概念）“全民国家”（Staat des ganzen Volkes），斯大林（Stalin）在他权力的巅峰时期对马克

思主义做了也许是他影响最为深刻的修正：他从自身的角度引用了《反杜林论》中的论断（Rechenschaftsbericht an den XVIII. Parteitag［1939］，见 FL，第 723 页），并进行以下修正："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普遍模式不能直接应用于特殊的、具体的案例，不适用于一个社会主义单独取得胜利，但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并且面临外部侵略威胁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组织完好的刑事机构以及强大的反间谍机关，以此才能拥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才有能力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不受外界的攻击。"（第 725 页）由此他认为自己发展了列宁的理论（第 725—726 页；参见 Labica 1986，第 71 页）。

3. 今天，国家消亡的问题显然不再只停留于怀旧的乌托邦里：现代国家发展为军事与工业的复合体，处处都显现出强化了"国家主义生产方式"（Henri Lefebvre）的统治地位。基于此，有如下两点关于当今趋势的考虑。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中呈现出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异的"国家消亡"的形式：政治进一步从属于作为国际市场"不幸的强制"的经济"准则"。在发挥黑帮削弱国家权力（比如在墨西哥和以前的苏联）的作用方面，自由主义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另一方面，新的政治空间得到发展，并且是国家领域之外（女权主义、生态学、反核或反种族斗争、非政府组织等），其中有一些被偶然地贴上了"共产主义因素"的标签，有一些表达了未得到满足的民主要求以及附带自治的要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接近）——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形式都充满着矛盾心理。尽管社会大众的这些努力与跨国企业的运作之间的对立很微弱，但它也可能成为新兴变革的工具。这一点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Berlin/W 1986; H. Lefebvre, *De l'Etat*, Paris 1977; W. I. Lenin, *Marxismus und Staat*, Berlin/DDR 1971; ders., *Le cahier bleu*, hgg. v. G. Labica, Brüssel 1977;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8; W. Radjavi,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et le dépérissement de l'État de Marx à Lénine*, Paris 1975; E. Wulff, »Farewell to Marxist Eschatology«, in: *Rethinking Marx*, AS 109, Berlin-Bagnolet-New York 1984, 182-185.

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撰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Thomas Laugstien）译为德文
唐婧译，梁爽校，张文红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archismus, Anarchosyndikal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räte, Arbeiterregierung,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er- und Bauernstaat, Beamte, Bürokratie,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zentralisierung,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Leitung, Pariser Kommune, Reformismus, Staat,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aatsmacht,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Utopie

7 反映（Abbild）

“反映”（Abbild）本身是一个形象化的表述，以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为依据，它还有一个近义词“反照”（Widerspiegelung）（参见 Kühne 1981，第 82 页）；二者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概念。该认识论被称为反映论（A-Theorie）或反照论（Widerspiegelungstheorie）。对于主张这一理论的人而言，重要的是探寻“哲学根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或多或少有意地转化哲学历史的材料并将其与常识（Alltagsverstand）的元素相融合。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这一理论；他至多偶尔蜻蜓点水般地使用过相似的表述。

1. 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思想传统中，真理被思考为相似性（*ὁμοίωσις*），即思想与其对象的相适合、知与物的符合（*ad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被解释为一种“物与对物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它等同于反映与原型的关系”（Nieraad 1971）。相应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思想“被称为‘反映’（Abbilder），……物被称为‘原型’（Urbilder）或‘被反映物’（Abgebildetes）”（Wittich 1976，第 57 页）。但是为何他们将“被反映物”称为“像”（Bild）（原始—形象［Ur-Bild］）？这种说法源于将物本身视为对原始形象（Urbild）的反映的思想。柏拉图（Plato）（*R* X，596b 及以下）认为：床和桌子有很多，“但关于这两种器具的理念却只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床的理念，一个是关于桌子的理念”。这个理念（*ἰδέα*）或相（*εἶδος*）（形态、概念）是由神创造的（*θεὸν ἐργάσασθαι*）；而运用材料对这一理念进行技术性的复制、制作从而产生出很多同类产品，这是工匠的工作；他们的产品又成为画家或摹仿者的样本（Mimeten）。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用“造物者（Wesensbildner）—制物者（Werkbildner）—摹仿者（Nachbildner）”来解释这几个

范畴，它们是按与真理距离越来越远的顺序排列的。后来，柏拉图将神 / 工匠 / 画家这个序列改造成了使用者的技术 / 制造者的技术 / 摹仿者的技术（*χρησομένη / ποιήσουσα / μιμησομένη*）这一序列（*R* X，601d）。据此，生产关系从错综复杂的神学背后突显出来：神从这一话语中消失，从而有利于富有而强势的委托人——消费者；消费者具备如何使用物品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并能以某种理念的样本形态给出指令，而制造者需要按照这一样本进行仿制（*R* X，602a）。因此，这是一项命令性的工作与一项执行性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了消费而发号施令的人如同使用生产资料般地使用制造者（参见对动词 *ὑπηρετέω* 的双重运用，*R* 601e）。相似性（*ὁμοίωσις*）学说使“使用者”代替“神”成为可能：“如果有人实际上将他的理解力（*διάνοιαν*）聚焦于存在者（*τοῖς οὖσι*）……观察排列有序的事物（*τεταγμένα*）和恒久不变的事物（*κατὰ ταὐτα ἀεὶ ἔχοντα*），这些事物互不施加不公或者也不会受不公待遇，而是根据一定的次序（*κόσμῳ*）和世界普遍规律性（*κατὰ λόγον*）行事，那么，他们是否也会摹仿（*μιμεῖσθαι*）这些事物并尽力照此型构自身（*μάλιστα ἀφομοιοῦσθαι*）呢？……哲学家与神性的事物和有序的事物（*κοσμίῳ*）打交道，也会在人可以做到的程度上变得有序和神圣（*θεῖος*）。”（*R* VI，500b 8 及下行）描摹是依从的。

柏拉图认为，对存在物最简单的描摹方式是随身携带一面镜子（*κάτοπτρον*）。由镜子和摹仿者传递的反映是“如其所显现而显现出来的物”（*τὸ φαινόμενον ὡς φαίνεται*）的反映。对我们而言，物的显现是有缺陷的：现象如同物本身的影子，而影子的反映如同幻象，而非真相。在《智者篇》（*Sophistes*）中，柏拉图区分了正确的和错误的仿制（*μίμησις*）或图像生产技术（*εἰδωλοποικὴ τέχνη*）：描图技术（*εἰκαστικὴ τέχνη*）基于范式（*παράδειγμα*）的对称性（*συμμετρία*）而工作；它生产映象（*εἴδωλον*），也就是图像（*εἰκός* [Bild]）。（*Sph*，235d-236a）与此相反，临摹技术（*φάνταστικὴ τέχνη*）（同上书，236c）——文学创作、雕塑和绘画（最后一项由于透视法的失真）属于此类——生产幻象（*φάντασμα*）（236a-b）。根据莱辛（Lessing）的描述：“因为哲学家说，诗的表述是对诗人自身概念的反映；诗人的概念是对物的反映；而物是对神性理解力中的原型的反映。因此，诗人的表述只是对反映的影像的反映，向我们提供的不过是最初真相的第三手信息。”（*Hamburgische Dramaturgie*，第 94 篇）莱辛又说，不过这仅仅是已经被否定的“貌似明智实则肤浅的论证（Vernünftelei）”，“因为诗人将个体的

一切均与本质相剥离”；由此，他追求“尽可能地接近神性的原型，以期直接描绘真相”。因此，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作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Po*，第9页）。

9 尼采（Nietzsche）视柏拉图从令人钦佩的受妒忌者到需要击败的对手，他在1871年的作品《悲剧的诞生》（*Geburt der Tragödie*）中将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学说与柏拉图关于“原型—反映”的神话相融合。他将反映翻译为“反射、重复、第二次铸造、镜像”。柏拉图“从他周围现有的事物中看到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理念的反映，相比这些理念，所见之物不过是朦胧的返照景象和手影游戏”（KSA 7，第349页）。与柏拉图不同的是，本质的东西不再是规律或原理（*λόγοι*），“因为当最内在的本质的映象是我们自己包括世界的时候，一个由词汇构成的符号如何与最内在的本质相符合呢？”（同上书，第360页）我们“只能通过形象的表述”来认识“最内在的本质”；不存在“任何一座直通的桥梁”（同上），以至于“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就是我们完全无法破译的事物的最普遍的显现方式”（第361页）。因此，我们应该“顺应不超出表象的强制性”（同上），而概念“原本也是一个影像（Bild），一个象形文字。也就是由一个**影像**代替一个物”（同上书，第238页）。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本身是一种被表象的认识**（*unsere Erkenntnis selbst ist eine vorgestellte*），仿佛一面镜子中的镜子”（第206页）。所有的一切都是反—映，“艺术的再现”“还会从自身中”造出“第二个镜像”（第335页）——“影像的影像的一个影像？”（第209页）——尼采说，他尝试着“用形象的语言”去接近它们的“奥秘”（第335页）。尽管问题错综复杂，“形象的语言”促成了具体的表述：1871年的普法战争促使尼采得出了这样的观点，“通过战争以及在军队中，一种反映甚或国家的原型出现在我们眼前了”（KSA 7，第347页）。

2. 在马克思那里，反映最多在如此意义上扮演着某种认识批判的角色，即某些关系自身呈现出的图像自发地显示着一些表面的特性——这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但可与其进行比较。“意识既能够反映，也无法反映。它能够反映的并非是看似被反映之物，而是**其他的东西**：它首先必须由分析找到”（Lefebvre 1976，第101页）。因此，马克思通过反映这一范畴以及其他可使用的范畴，首先考虑到的是不真实，而非真相；由此，他主要抓住外部现实中的一系列关系（比如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谈到伊壁鸠鲁（Epikur）提到的图像（*εἴδωλα*），

并未将它明确翻译为“反映”（Abbilder），也不像奥托·阿佩尔（Otto Apel）将其译为“影像”（Bilder［Idole］），而是译为“自然物体的形式，这些形式好像一层外
10 壳，从自然物体上脱落下来，并把自然物体移到现象中来”（MEGA I.1，第 50 页；参见 Diog. Laert. X，第 46 页）。（卢克莱修［Lukrez］在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诗意表述中将图像［εἴδωλα］描述为物像［*rerum simulacra*］［IV，第 34 页］，克内贝尔［Knebel］［1831］将其翻译为“物的影像”。正如偶像一样，拟像［Simulacrum，该词来自 *similis*，即：相似的］不是简单的“影像”，而是模拟的画像［Bildnis］，包涵了梦境影像、幻象、阴影图像、错觉，甚至幽灵和鬼怪。）当时仍是黑格尔信徒的马克思在 1841 年继续介绍道，伊壁鸠鲁认为图像（εἴδωλα）“侵入感官，从而使客体得以显现出来。因此，是自然在听的过程中听到它自己，在嗅的过程中嗅到它自己，在看的过程中看见它自己。所以，人的感性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犹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燃烧起来形成现象之光”。与此前的哲学史书写相反，马克思将伊壁鸠鲁置于德谟克利特（Demokrit）之上，他提出的根据是，伊壁鸠鲁将现象过程与它的消失一同考虑，即与时间一同考虑：因为物体“在自身之外有自己的感性作为另一种自然，……所以它们便解体并消失了”。——物体与它的影像，影像在形态和形式方面与物体相似，这是卢克莱修的一个概念游戏（**有我们称为物的肖像者存在着，这些东西像从物的外表剥出来的薄膜**［*Quod speciem acformam similem gerit eius imago / Quoius ... cluet de corpore fusa vagari*］；同上书，IV 第 49—50 页）。

与此相反，年轻的马克思只是在涉及制度准则与制度真实的关系——也就是“外在”现实内部的关系——时才谈到反映，因为与内外关系相比，他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更感兴趣。并且，“**法律**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只能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在**莱茵省**，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并没有分开。因此，除非法律宣布它自己无效，否则，它便不能颁布这种分开的法令”（MEGA I.1，第 259 页）。在此，反映与“表现”（Ausdruck）是同义词；只要法律是这样制定的，它就会被认定为“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或者说是对省现状的“**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同上）。“实际的生活权力”（社会力量与资本关系）与宪法法律上的反映 / 表述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关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与“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关系的问题的到来（MEW 23，第 393 页注释），这是一个

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即关于政治、法、宗教、哲学与生产和资源配置之状况的关系问题。在这一意义层面，
11 年轻的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MEW 40，第 575 页）与此相似，年轻的恩格斯理解了"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MEW 1，第 546 页）。——"反映"和"映照出来的表现"等在此属于批判性的范畴，因为一个未被意识之物甚或被否认之物由此被表达出来，它的提及即足以使它的"映照出来的表现"被彻底地怀疑。

为了区分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方向与认识论疑难问题的差别，我们必须回忆一下马克思是如何思考认识这一概念的：从生活实践中的必要性开始，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在通过国家形式表现的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化地被统治和社会分工所型构。我们可以从（残缺的、连恩格斯都不知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 57*）的方法论部分看到这种明确的认识论反思；最成熟的反思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中。如果说这一评论中马克思对差异在生活实践中的设定以及用语言记录它们很感兴趣，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关键词则是**通过思维中许多规定的综合而实现的再现**（*Reproduktion*）；并且，在涉及发生在生存必需的**学习**（*Aneignung*）基础上的**语言**与**再现**的结合时，马克思着手处理了恩格斯晚年已归为"反映"概念、后来又被这一概念所忽略的问题："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MEGA II. 1，第 36 页，第 33 行）或者"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第 36 页，第 36—38 行）。再—生产（Re-Produktion）是复—制（Nach-Bildung），是复—建（Nach-Bau），因而就是反映。但是，再现也是生产，是劳动，马克思将这些概念概括为一句话，以便重新表述"将观点和想法整合为概念的工作"（第 37 页，第 13—14 行）。与黑格尔的区别主要在于**反唯心主义准则**（*antiidealistische Regel*）：思维须作为再—生产来理解——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物质主体永远都独立于我们的大脑之外，大脑不过进行着思索性的、理论性的活动。在理论性的方法论中，主体，即社会必须作为前提条件出现在思考之中。"（同上书，第 37 页，第 17 行及以下）

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通过提及其被资产阶级接受的问 12
题来反思瓦格纳（Wagner）的方法。我

们须注意瓦格纳的表述，马克思将此作为研究材料；马克思的特点在于介入这些材料，而非这些材料本身。瓦格纳从价值概念着手，并且进行概念推导；马克思反对这些“逻辑上”的言语魔法，即词源学和话语反思，他将它们置入语言与社会性在生产联系中相互影响彼此的生成演化的框架之中（参见 MEW 19，第 362 页）。他认为，人类在用语言记录事物之前，就已经开始占有“某些外界物［瓦格纳的措辞］作为满足自己本身需要的资料，如此等等；然后人们**也在语言上把它们叫作它们**在实际经验中对人们来说已经是这样的东西，即**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料**”（同上书，第 363 页）。在人们将它们“在观念上标明为和确定为”（第 366 页）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时，他们并不能将这些物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各种范畴是根据实际的取用形成的，比如此后所谓的支配谓项（Dispositionsprädikate）确定了人在实践中支配的可能性，“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第 363 页）。

3. 从“马克思主义”首部受欢迎的著作《反杜林论》所掀起的论战开始，恩格斯对于“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MEW 20，第 20—21 页）进行了反思：形而上学将它们分割开并一成不变地进行思考，而辩证法理解“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出发（同上书，第 22 页）。在这一话语中，对杜林（Dühring）的否定随着对黑格尔的否定而增强，因为杜林指责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瘟疫”的侵袭（引自上书，第 29 页）：在黑格尔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的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同上书，第 23 页）。

问题是，杜林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已经有人“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MEW 20，第 5 页）。被求助的恩格斯在那些他自认为“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出来说话的领域里”（第 7 页），不得不跟着杜林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画面”（或者“总画面”）及其“观点”（或“见解”）是主导比喻。“原型”和“反映”在这一框架中获得了它们的意义。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种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意识的要素或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vorher bestanden*）了”（同上书，第 39 页）。这就意味着：思考某事就是尝试着正确地思考某事。这一分析句（没有人会自愿地错误地思考某事）包含着

一种艺术上的加工提高，因为它被写入了对杜林和黑格尔的双重的、完全不对称的否定中。如果在论战中将黑格尔的观点简化为“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Abklatsch）”（同上书，第 334 页），那么在对于这一荒诞立场的否认中，就要尝试解释观念是世界的摹写这一观点。（“摹写”的近义词是复印［Abdruck］、复制［Kopie］和反映等；这一术语来源于印刷语言，意为在铅字排版中印版上用以校勘的长条校样。）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F*）中写道，费尔巴哈（Feuerbuch）将黑格尔的颠倒观念倒转过来并认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MEW 21，第 292—293 页）。在这两个领域中的过程，即“现实事物”的过程和“反映”的过程，在这一安排中被认为“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第 293 页）恩格斯赋予辩证法的功能是：成为两个系列之相互联系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射”（同上）。

“反射”（Reflex）延续了阐明“反映”（Abbild）的术语系列。无疑，这一“只是”会引起迷茫：形容词“自觉的”隐藏着不少问题，有时候看似蛇穴。尤其是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它的党派的魅力为这个党派吸收了“启蒙因素”，即来自“一直是统治阶级的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跟他们尚未有过富有成效的合作，1879 年，在一封与马克思联合署名的通告信中，恩格斯敦促社会民主党的领导集体对他们严格规范以及必要时将他们排除在外（参见 MEW 19，第 164 页及以下）。“反映”这一术语在争夺一个党内的影响力的过程中打上了大众化的语言的烙印，采纳了人类健全的理解力的语言，从此，它发挥着“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标记”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讥讽“铁的工资规律”这个 14
表述一般。（MEW 19，第 25 页）

4. 在类似的境况（所在政党受到政治迫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在不合法者的合法圈子里行动时——施加的影响）中，列宁再次接纳了这一传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E*）中，关于内外世界的地志学占有主导的地位，而实践标准并不明晰地贯穿其中。针对一些理论上的吹毛求疵，这里强调物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LW 14，第 124

页）。列宁力求通过这些论断确保（党内）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联系处于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唯物主义**自觉地**把人类的‘朴素的’信念作为自己的认识论的基础。”（同上书，第62页）又一次出现了“只是”，尽管这里没有形容词“自觉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识只是外部世界的**反映**（*Abbild*）；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同上书，第61页）。如此等等，尽管每次都有新的变化。实践被赋予校正的功能，它“检验这些反映，区分它们的正确与错误”（同上书，第103页）。

乔治·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历史和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一书中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尽管没有直接指向列宁。对于非辩证主义的思维而言，“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对于历史的思维而言，这是一种物化的同一）是“不可解决的问题”：“思维和（经验的）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一方面造成了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处在一种反映的关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正确思维的标准只能到反映中去寻找。只要人采取直观—凝视的态度”，那么他把他自己的思维和物都当作是“由对立的现实已经造就了的东西。由于他只想认识世界，而并不想改造世界”。（W 2，第390—391页）“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F*）里所提到的答案在于使哲学变为实践。”（同上书，第390页）之后不久，葛兰西（Gramsci）在监狱中开始了对这一变化的研究工作。

当然，在列宁身后（1929—1930年；从1958年起补充进《列宁全集》第四版）发表的哲学选录和笔记中也存在着这个极端的对立：“也就是说：人的意识不仅可以反映客观世界，还可以创造它。”（LW 38，第203页）从此之后，认识论的话语发生在这两个极端——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工人和从事理论工作的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的繁复的解放努力在意识的创造性（Kreativismus）上着手，而大众则理解和被要求信奉相反的另一端，即反映—理论。关于这一理论，阿多诺（Adorno）曾针对列宁说道，它是认识论上对“官方唯物主义”辩证法通过行政命令跳过认识论这件事的“复仇”。（1967，第203页）

15

5. 从那时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讨论中始终潜藏着“这种两难的选择，如果不是背叛……，因为它的范畴囊括从世界观角度而言不确定的存在，同时这些范畴又是在哲学上没有价值和在意识形态上无用的”（参见Buhr 1978，第17页）。在“保护工人阶级始终并且全方位不受资产阶级认识论的攻击”（Wittich 1976，第65页）的努

力中，这个“意识形态的有用性”既不由科学成果的丰富性决定，也不由工人阶级在社会内部的某种立场决定，而恰恰是“哲学的国家功能——它……正好占据了与马克思通过不懈的努力所要论证的观点相反的极点”（Labica 1986，第 73 页），将反映概念教条化为其众多权力点中的一个。这一现实给话语强加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组成部分，即对界限的坚守以及使界限变得模糊；这根据它们在另一个权衡中的位置决定。维蒂希（Wittich）、格斯勒（Gössler）和瓦格纳于 1978 年出版的著作（第 86—93 页）称之为“认识过程的双重限定”等。在认识论方面，逻辑上必然得出的东西都必须表述为反映的特性。

针对符号的常规性（Konventionalität）这一命题（参见 Leist 1973，第 593 页），反映概念呈现为一个通过国家权力而贯彻的符号常规。根据这一官方常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概念（占有、作为许多经过分析得出的规定的总结的思维上的再生产、不能将认识客体还原为现实客体等，参见 Tagliagambe 1991 以及 Ghisu 1994）被归属于一个于它们而言相当陌生的框架内。我将反映表述为占有，或者将占有表述为反映，这不是一回事。为了消除与马克思理论的矛盾，必须对主导术语不懈地进行令人信服的解释，排除其中包含的来自日常语言的语义内容：“反映、**认识**（*Erkenntnis*）—反映并非字面意义上的镜像”（Pawlow 1973，第 239 页），“并非机械的镜子，不是摄影式的复制，不是被动的复印”（Kosing 1967，第 557 页）等。 16

“反映”本身就是一种形象化的用语。在日常意义之外，它涵盖不同的意义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数学、知识社会学、美学等。比如，当维蒂希（1976，第 63 页）——他的观点接近马克思的观点——说“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就其存在及其对现实的曲解方式来看，呈现为一种对特定社会关系的反映”时，就出现了一种向知识社会学领域的推移。在观念性和物质性之间，在感受性和行动之间都存在着对反映概念的运用。比如说，当从反映论角度将科学方法定义为“被‘置于’或‘运送至’人的意识的客观规律性”（Buhr 1973，第 722 页）时，那么，显而易见，这是在要求给具有定义权的机关以存在保障。将所谓客观之物即规律全然地“置于”或“运送”至意识，主要是针对“危险地”更加细分的立场。对于科沁（Kosing）（1967，第 557 页）而言，这是“一种将物质的东西翻译为精神的东西的复杂过程，是在意识中建立精神的形象和结构”。阿多诺（1967，第 203 页）批判反映论，认为它否认了“主体的自发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一种客观辩证法的动力”；冯·格赖夫（v. Greiff）（1976，第 39 页）补充道，反映理论将人自身视为“一个毫无参与感的自身观察者，一幅科学家的漫画像”，甚至是一个“人形的工具”。对此，科沁（1967，第 557 页）恐怕会指出，这些都不符合他对反映形成的理论化表述：“关于主体在此做出的主动行动，我们有理由称之为建构”。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 Klaus）（1965）就曾经发表这样的观点，“反映的所有较高级形式都是通过建构”产生的。鲁本（Ruben）（1976，第 25 页）尤其强调了认识主体的活动——这种活动被反映概念的建构主义阐释理论所重视。他认为，核心在于“解释反映源于塑造行为”。这里出现了一个话题的转移：“应该将画面的存在归功于塑造者”。但它原本不应该被作为形成物来处理么？在此，正如在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的思想传统中那样，反映的特性被作为**一致性**（*Übereinstimmung*）的问题而讨论。

格奥尔格·克劳斯（1965）认为，一致性的真理理论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我们将建构主义的问题放在一旁，思想“与现实也是完全不同的”。他通过跳进数学的解释来自圆其说：“在严格意义上而言，‘一致’就是现实的结构和思维的结构具有同构或同态性。”前提是存在一个“第三者”的立场，也就是旁观者的立场，并允许出于该立场将原型与反映进行比较。这一立场要求，“反映”是某种外部的东西，即不再是旧有图式中的某种认识论的数值（Größe）。与科沁的观点类似，他把认知的反映定义为“对客体、过程和关系等在理念上的**同构的**（*isomorphe*）或**同态的**（*homomorphe*）复制”（1967，第 571 页），又将同构定义为 M 和 M^1 两个集的关系，认为“*M* 集中的任意元正巧能够与 M^1 集中的一个元对应”，他将认识论的反映概念通过数学的“映射、函数”进行推导：在 y = F（x）中，将一个集映射到另一个集上，将“原像域”（Urbildbereich）映射到“像域”（Bildbereich）上，那么根据函数F，y 就是x 的“像”（参见 Kondakow 1978，第 10—11 页，以及 Dedekind 1888）。

当内涵被放到逻辑数学计算和理论模型中时，科沁的判断——反映是某种“外部世界在意识中的模型”——是错误的。正如在“意识中”并不存在电脑程序——尽管它们是通过“意识”生产的——那样，计算和理论的产物——我们将它们置入我们自身和环境之间，以求更好地对环境施加影响——也不存在于意识中。科沁用他的内部—外部世界结构拖拽着意识范式的枷锁，在他的这一结构中，反映概念应该保障外部世界的优先权。为了遵循《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避免客观主义并给予实践以能够彻底改造世界的“阿基米德”的地位，科沁反对从意识和物质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主体和客体关系。主体“本身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1967，第 573 页）。受叛变嫌疑的阻碍，这一思想朝着反映的“外在性”和“物质性”方向推进。正如观念在先前的英国经验主义中被认为是“之前被感知到的客体的被复制了的感知图像”那样，概念、见解和由这些元素组成的理论等就被表述为“语义上的映象”，它们记录着恒定性（同上书，第 580 页）；对于科沁而言，“在逻辑—抽象的反映和被反映的

18 客体之间”出现了**符号**（*Zeichen*）；对他而言，符号是普遍事物（或恒定事物）的“物质存在形式”，这些普遍事物（或恒定事物）“本身不能在认知的思维中存在”，而是必须通过语言或符号表示出来（同上书，第 581 页），符号被看作概念的“物质的、语言的存在形式”（第 585 页）。只有见解才可能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它们是对事实情况的描摹；语句是它们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等。孔达科夫（Kondakow）（1978）解释道：“反映的物质形式是**词**和不同的**符号模型**（*Zeichenmodelle*）。”

彼得·鲁本（Peter Ruben）最为清晰地说明，这些思维工具“**并非**原本就是**精神**现象”，“而是**物质的**事实关系，我们可以展示和把握它”。（1976，第 26 页）他举的例子是与位于巴黎的国际米原器相似的“标准器”，我们将这些标准器视为“表象的工具、像（Bildern）”，正如我们在陌生人前（鞠上一躬）**介绍**（*vorstellen*）自己时，将我们自己“**做成**供陌生人形成关于我们的表象的工具”一样。比如，我们用米原器“获得……长度在我们**思想中的**像”。鲁本将长度解释为“**像与被反映物之间的关系**”。但是，反映理论就由此暗自演变成了像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像是（分析的）认识**工具**”：为了“替换不能直接相互比较的物体”而使用的参照系。“可替换性”在此意为，所有的常规成像都是对原型的复制，即反映；根据鲁本的理论，也就是对特定使用价值的“无限制的可复制性”，即制造足够多的“复制品”。（同上书，第 38 页）反映这时就是“对自然事实状况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具有固定特征的模型的对象性劳动”。由于这是将“需要被科学认识的事实状况改造”成“普遍性的代表”，鲁本将这一活动定义为“普遍性的劳动”，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反射活动’”。（第 25 页）

列昂季耶夫（Leontjew）已经将它“向外”转移：“在使用一把斧头时，劳动对象的特性也已经被反映出来了”（1973，第 208 页）。被加工的对象因对

它进行加工的劳动工具的显著特性而被“实际地分析和普遍化”（第209页）。这个劳动工具因此就具有人类起源和发展学的意义：它成为“最初真实的、有意识的、理性的抽象化”和“普遍化”（同上）的载体。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从此入手分析了思维
19 模式：“它们反映了自然状况和协作—预防的生活保障之间的关系”，由“在行动、原因和结果之间被生产出的关系的**现实普遍性**（*reale Allgemeinheit*）”所决定；这就表明了产生思维模式的劳动可以被称为普遍性的劳动。（1983，第289页）但是，个体必须自己仿制这些“反映过程”：对于霍尔茨坎普而言，思维是形式上对思维模式中存放物的获取。“思维和语言模式作为普遍化—预防的生活保障的必需品”，“在个体思维中”是可以“被反映的”。（同上书，第286页）

这些创造性的例外同时更多地证实了一个准则，即反映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认识论障碍。一个荒谬的矛盾曾经是，要求对反映理论表明信仰，但同时又剥夺理论家们“反映”事实的权限。在艺术政策中，同名的理论在为某种画面的标准化服务，而这种画面应该违背事实地反映社会状况。这样，反映术语隐藏着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取得合法化时对榜样树立的要求。“若主体按照客体的机械的反照——它必然会导致客体中应被反映的东西被遗漏——而行事，而客体又只会在主体多样的丰富的思想中展现出来，那么就会产生整合性的管理中不安的精神沉默。”（Adorno 1967，第203页）

6.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体制遭受曲折之后，反映理论——它最初是在政治方面而非在学术上获得存在理由的——的重要性也受到削弱。科沁于1967年将认知的反映定义为“外部世界在意识中的内部模式的元素”（第571页），指明了“内部唯实论”的一个方面，它只允许在“内部”模式的框架中提出“外部”是什么的问题；面对社会主义的国家绝对主义的泛滥，桑德屈勒（Sandkühler）1990年（参见第884—885页）就退回到了这一框架。

追溯既往，可以看到另一些关联点，主要有葛兰西从对克罗齐（Croce）的批判中发展而来的对于所有可能的思维类型的反思。在克罗齐看来，“作为现代哲学的共有精神财产……，思维同行动一样工作，它并非现实的反映或容器，它不仅仅接收对现实的认识，因为它的作用在于提出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被动地接收”（1938 / 1944，第43页）。
20 与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点相关，葛兰西概述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能的结构：“显然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

主义的一元论，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人类的活动（历史），也就是被应用到某种确定的、被组织的‘物质’（物质的生产力），即由人改造后的‘自然’之上。”（*Gef* 3，第 493 页，H.4，§37）在修订过的本文（文本 C）中，葛兰西继续写道：“行动（实践、发展）的哲学，但不是‘纯粹的’行动，而是‘不纯粹的’的行动——在最平常和最世俗的意义上，这种行动是真实的。”（*Gef* 6，第 1479 页，H.11，§64）它不需要映象，而是需要概念，这种概念是布莱希特（Brecht）意义上的“抓手”，通过它们，物可以被抓住和移动。若对外部事物的反映是主观（因此这里疑似是“唯心主义”的）生产表象的“唯物主义的”相反极，那么，按照布洛赫（Bloch）的观点，就应该在“深造”的思想中寻找相关路径；这一深造会将不可舍弃的两极融于一体，并顺着事物自身的“发展方向”“超越”该事物。（*Tübinger Einleitung*，第 154—155 页；参见 *Experimentum*，第 60—63 页）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E. Bloch, *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WA 13; ders., *Experimentum mundi*, WA 15; M. Buhr, Nachwort zu Pawlow 1973; ders., »Erkenntnis-gesellschaftliche Praxis–Handeln«, in: Sandkühler (Hg.), *Die Wissenschaft der Erkenntnis und die Erkenntnis der 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78, 12-24; B. Croce, *Die Geschichte als Gedanke und als Tat* (1938). Einführung von Hans Barth. Bern 1944 (als Lizenzausgabe nachgedruckt in Hamburg o. J.); R. Dedekind, *Was sind und sollen die Zahlen?*, 1888; S. Ghisu, *Epistem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m Verhältnis von Historischem Materialismus und Psychoanalyse bei Louis Althusser*, Phil. Dis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1994; K. Gössler, »Das Verhältnis von Neurophysiologie und Erkenntnistheorie«, in DZPh, Sonderheft, 16. Jg. 1968, 45-61; B. v. Greiff, *Gesellschaftsform und Denkform. Zusammenhang von wissenschaftlicher Erfah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E. Hahn u. a. (Hg.), *Grundlag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DDR 1976;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G. Klaus, *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 Prinzipie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Theorienbildung*, Berlin/DDR 1965; N. I. Kondakow, Artikel »A., gnoseologisches« und »Abbildung, Funktion«, in ders., *Wörterbuch der Logik*, Leipzig und West-

Berlin 1978, 10f; A. Kosing u. a.,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Lehrbuch*, Berlin/DDR 1967; ders., »Karl Marx und die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 Abbildtheorie«, in: DZPh, Sonderheft, 16. Jg. 1968, 7-29;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München 1976

21 (Nachdruck Kronberg/Ts 1977) ; A. Leist, »Widerspiegelung der Realität–Realität der Widerspiegelung?«, in: *Argument*, 15. Jg. 1981, Nr. 81, 574-612;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W. Lorenz u. G. Wotjak, *Zum Verhältnis von Abbild und Bedeutung. Überlegungen im Grenzfeld zw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und Semantik*, Berlin/DDR 1977; T. Metscher, »Ästhetik als Abbildtheorie«, in: *Argument*, 14. Jg. 1972, Nr. 77, 919-976; J. Nieraad, Artikel »Abbildtheorie«, in: HWPh 1, 1971; T. Pawlow, *Die Widerspiegelungstheorie. Grundfragen der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3; P. Ruben, »Wissenschaft als allgemeine Arbeit. Über Grundfrag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in: *Sozialistische Politik*, 8. Jg., Nr. 36, 1976, 7-40; H. J. Sandkühler, *Praxis und Geschichtsbewußtsein. Studie zu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Erkenntnistheorie und Hermeneutik*, Frankfurt/M 1973; ders., »Erkenntnis/Erkenntnistheorie«, in: EE 1, 1990; M. Schlick, *Allgemeine Erkenntnislehre*, Berlin 1918; R. Schober, *Abbild – Sinnbild – Wertung*, Berlin/DDR-Weimar 1972; S. Tagliagambe, *L'epistemologia contemporanea*, Rom 1991; D. Wittich, »Widerspiegel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Praxis: Über zwei erkenntnistheoretisch relevante Widerspiegelungsbeziehungen«, in DZPh, Sonderheft, 16. Jg. 1968, 30-44; ders., *Über Gegenstand und Method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2]1976; ders., K. Gössler und K. Wagn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8.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Wolfgang Fritz Haug）撰
唐婧译，秦明瑞校，张文红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llgemeine Arbeit, Alltagsverstand, Analyse/Synthese, Aneignung, anschauen der Materialusmus, Ästhetik, Ausdruck, Bewußtsein, Camera obscura, Denkform, Dogmatismus, eingreifendes Denken, Erfahrung,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sform, Feuer-

bach-Thesen, 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Innenwelt/Außenwelt, Metapher, Philosophie der Praxis, Reflex, Reflexion, Schein, Subjekt/Objekt, Tätigkeit, Verdinglichung, Vermittlung, Wahrheit, Widerspiegelung, Wirklichkeit

阿本德罗特派 (Abendroth-Schule)

这是一个以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1906年5月2日—1985年9月15日）的姓氏命名的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其特征是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有积极的联系，并以促进工人运动为取向。它主要是通过阿本德罗特在1951年至1972年作为公法和政治学教授以及科学政治研究所主任在马尔堡大学（Universität Marburg）的学术和政治活动所建立的。有时也使用“马尔堡学派”这一名称，主要是考虑到除阿本德罗特之外，国民经济学家韦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社会学家海因茨·毛斯（Heinz Maus）等人也为与阿本德罗特的姓氏连在一起的马尔堡大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方向做出了主要贡献。另一方面，阿本德罗特派的学派创建者和追随者不一定都毕业于马尔堡大学。

阿本德罗特是联邦德国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唯一一个公开以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出现的高校教师。与其他作为高校教师而工作的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他并非来自资产阶级。除了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人的强大魅力之外，他创建学派的影响力首先建立在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政治和学术经验以及他在社会政治辩论中敢于斗争的态度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阿本德罗特派产生的影响最广泛。

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于1906年作为一个认同社会民主主义（Sozialdemokratie）的教师家庭的孩子出生在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其母来自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手工业者家庭。早在1914年前，这个家庭即已迁移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在这里，这个青年跟他姐姐一起通过家人的活动而加入工人运动，作为高中生即已成为工会成员、共产主义青年组织（kommunistische Jugend）的积极分子，并于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KPD）。在红色救助组织（Rote Hilfe）中的工作是他的政治活动的重点。在他被法兰克福大学法学院录取（他的职业目标是当律师）后，也还是如此。在那些年里，他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和工人运动中的政治争论。作为拒绝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点

（Sozialfaschismusthese）的“右翼和解派”（rechte Versöhnlerrichtung）的追随者，他在1928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随后参与组建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O）和**重新开始**（*Neu Beginnen*）小组。他终身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年）及亨利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1967年）视为自己的榜样和导师。

站在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政治立场上，他经历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在此，他既反对德国共产党中的宗派主义，又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调和和投降政策。随着法西斯主义者在1933年掌权，阿本德罗特被迫在完成其第二次司法考试前中断学业，也无法向其身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大学老师胡果·辛兹海姆（Hugo Schinzheimer）提交一篇快要完成的、关于一个劳动法主题的博士论文。直到1935年，他才在瑞士伯尔尼（Bern）以一篇研究国际法的论文补上博士学位。

从法西斯主义者掌权的第一天起，阿本德罗特就积极参与了工人运动中的反抗斗争。1937年，他被盖世太保抓捕、拷打并判处四年监禁。1943年，他被收入999号劳改队（Strafbatallion 999），后在希腊加入游击战并被英军拘留和监禁，1946年才被释放。

他去了他父母和他后来的夫人当时的居住地波茨坦（Potsdam），并入职勃兰登堡（Brandenburg）州的司法管理部门。在完成第二次司法考试后，他在他取得教授资格的萨勒河畔哈勒大学（Universität Halle / Saale）以及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和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任教。1948年底，他担心因保留了西柏林的社会民主党党籍——与他的很多来自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和**重新开始**小组的政治上的同志一样，他在战后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以及与此相关的与社会民主党东部办公室的联系而被捕，他偕夫人离开苏联占领区（SBZ）。1949年初，他接受了在威廉斯港和吕斯特西尔（Wilhelmshafen / Rüstersiel）新成立的“成人考试高等学校”（Hochschule des zweiten Bildungsweges）担任校长及公法和政治学教授职务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聘为不来梅州高级法院和黑森州宪法法院法官。1951年，他开始在马尔堡工作。从孤立的社会和学术立场出发，马克思主义者阿本德罗特在学校和社会上对复活军国主义和复辟进行了斗争。他的主要活动场所是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DGB-Gewerkschaften）各分会。如果主要没有奥托·布伦纳（Otto Brenner）、阿道夫·库默努斯（Adolph Kummernuss）、

威廉·格费勒（Wilhelm Gefeller）、维利·布莱谢尔（Willi Bleicher）等左派工会领袖——他与他们有过为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共同历史，因而保持着联系——的支持，这位“游击队员教授”（Partisanenprofessor）不可能在高校立足。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阿本德罗特积极参与了形成一个左翼社会主义派别的尝试，但该派别影响甚微。比如，他参与了由维克托·阿加尔茨（Victor Agartz）主编的《经济和社会科学通讯》（WISO-Korrespondenz），由格哈德·格莱斯贝格（Gerhard Gleissberg）主编的《区别报》（andere Zeitung），由弗里茨·拉姆（Fritz Lamm）主编的《星星之火》（Funken），由格奥尔格·荣克拉斯（Georg Jungclass）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Sozialistische Politik），由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SDS）主编的《新批判》（neue Kritik）等报刊的工作。当年的这些报刊为后来的（议院）院外反对派（APO），复活节示威游行等造就了一些重要干部。阿本德罗特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且与现实社会主义（Realsozialismus）保持距离，但因为赞同十月革命，他又对其具有批判性的同情，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在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和历史条件下克服它的蜕变。对以德国共产党为组织的、其时正经受着来自国家机器的异常压制的西德共产主义者，他也持有类似的态度。他的活动目标是形成一些具有阶级觉悟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核心小组”。他在高校的工作也是以此为取向的。

1957年12月，他在联邦法院针对维克托·阿加尔茨（1897—1964年）的叛国罪庭审中出庭辩护；这使他的公众影响达到了巅峰。在这起诉讼中，阿加尔茨不仅被指控，用东德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DGB）的统一订阅费支付了他所主编的杂志《经济和社会科学通讯》的开支，而且还被指控，在1956年禁止德国共产党的判决出台后尝试利用马克思主义从事犯罪活动。作为证人，阿本德罗特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性辩护，是阿加尔茨被判无罪的决定性因素。

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阿本德罗特主要参与了在当时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建立一个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派别。196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做出了一项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籍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成员资格不相容的决定；该决定也对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资助单位、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联盟（Sozialistischer Bund）——其主席是阿本德罗特——有效。此前不久，阿本德罗特带着一份左派社会主义的选择纲领参加了戈德斯贝格（Godesberg）的

党代会（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59年11月13—15日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党代会。——译者）。由于阿本德罗特将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团结看得比不相容决定更重，他于1961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此后，他一直无党派；但恰恰是因为他的不妥协态度和他的道德—政治上的正直，他成了20世纪60年代反对派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标杆。对通过他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包括青年社会主义者（Jungsozialisten）、鹰派成员（Falken）、自然之友（Naturfreunden）、工会青年联盟（Gewerkschaftsjugend）成员等在内的一代人来说，也是如此。

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Marxismus-Renaissance）和大学生的左倾化（Linkswendung），阿本德罗特发挥影响的可能性显著扩大。无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陷入了与反威权思潮的对立。更深层的差异构成了围绕斗争形式而出现的直接冲突的基础。对阿本德罗特来说，在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党派和工会构成了他发挥政治作用的关联点和平台。据此，他成了某种工会政治——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联合——的方针的倡议者和指导者；这一方针在70年代成了大量学生组织以及知识分子和高校群体的指导原则。这一做法与他从早期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坚持的基本立场的逻辑是一致的，在70和80年代也导致了他对与德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和思想领域建立合作关系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1972年退休后，他回到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继续他的学术、时事评论和政治活动，鼓励一些组织如民主法学家联合会（Vereinigung Demokratischer Juristen）、民主科学家联盟（Bund demokratischer Wissenschaftler）等从事活动，在“劳动科学院”（Akademie der Arbeit）作为教师发挥作用并逐渐扮演联邦德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左派公认的顾问和代表的角色。这些使命他一直承担到他1985年9月去世。

阿本德罗特的学术成就和兴趣是多样的。作为高校教师和政论家，他在不同的领域收录了男女学生，并且创建了学派。作为国家法和国际法学家，他首先主张对基本法做唯物主义的解释；这样，他有意识地站在他的多数学界同行的对立面。在此，他以魏玛共和国的法学理论家（奥托·基尔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赫尔曼·赫勒［Hermann Heller］、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思想为基础，将基本法理解为战后一种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烙印的阶级妥协的表述和结果。在此，对社会国家的解释以及对基本法应允许财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解十分重要。通过其作为法学家的影响，阿本德罗特使一整代年轻

法律学者能够将法律理解为阶级利益的斗争场地，同时，他认为有必要公开代表工人运动的立场。作为工会和民主组
26 织的法律顾问，作为不来梅和黑森高级法院的法官以及作为法律评论家，他在司法实践中表明了这些立场。除了工会权利问题以外，他感兴趣的还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主规范的维护，比如，在反对《紧急状态法》（Notstandsgesetze，指 1968 年 5 月 30 日由德国联邦议院审议通过的一些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第 17 次修改了德国基本法，从而形成了一部紧急状态宪法。根据该宪法，国家在紧急状态［如自然灾害、起义、战争等情况］下可以采取一些包括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如信件和电话保密权］在内的措施。该法受到了来自议院院外反对派的强烈抵制和抗议。——译者）、反对禁止德国共产党的判决和对组织在德国共产党里的共产主义者的压制的斗争中，就是如此。作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专家，他在联邦德国作为先驱和倡议者发挥过影响，首先是因为他将工人运动完整地——而不是像当时流行的排除共产主义者的做法那样——视为研究对象，从而帮助魏玛共和国工人运动中既不属于社会民主党，也不属于德国共产党的那些“中间群体”获得了他们应有的历史权利，并将工人运动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与社会史书写的唯物主义观结合起来了。在此，他作为“工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丰富的经验起了作用；尤其是在其晚年所出的几本访谈录中，阿本德罗特曾尝试将这些经验讲述性地传授给后辈；这使他成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工人运动“口述史”的代表人物。

作为唯物主义政治学家，他促使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理论根据在社会学的、当代史的和国际性的分析中获得了承认。在此，阿本德罗特反复证明了自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权力关系的大师，并因此可与其老师（布兰德勒、塔尔海默）相提并论。在他的分析中，工会、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运动、和平运动等占有核心地位。此外很突出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包括对西德高校法西斯主义经历的研究，这在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获得了特殊的影响力。作为政治学家，他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给一些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官员、积极分子提供咨询。在此，他在政治运作的知识掌握及其传授方面的出众才华得以表现。这种政治实践的亲身参与是阿本德罗特的政治和学派创建之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理论家，阿本德罗特一直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尤其对恩格斯有好感，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对他自己的立场形成来

27 说，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的著作起了重要作用。对他来说，工人阶级如何在对自身利益的认识过程中成为进步的社会改造的主体，这种战略思考具有关键意义。在此，他对新的经验、现实情况和其他见解都持开放态度。比如，他赞同欧洲共产主义（Eurokommunismus），并尽可能促进和支持它。但是，像西方学院式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那样，他拒绝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方法的基本原则的修正。对（比如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过度理论化以及他在变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正统观念和合法化公式中察觉到的教条式的限制，他都表示反感。与此相对应，他将一种有活力的列宁主义视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不能放弃的一个要素。这样一种立场必然会包容不同的政党和组织政治的选择。在那些将自己视为他的学生和追随者的人的不同政治归属上，这一点就得以显现。

提及阿本德罗特派，几代弟子必须受到重视。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阿本德罗特那里读过大学、做过博士和取得过教授资格的男女学者，可以被视为第一代弟子。当时，关于“中间群体”的研究项目很重要。在此，林克（W. Link）1964年、德雷克斯勒（H. Drechsler）1965年、提亚登（K. H. Tjiaden）1964年等的论文很出色。在这一时期，关于《紧急状态法》和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的发展的争端也已经展开。在此背景下，来自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及其周边的年轻一代法律学者开始追随阿本德罗特。其中有塞弗特（J. Seifert）、佩希（N. Paech）、勒默尔（P. Römer）、施杜比（G. Stuby）等人。在这些年间，与左派社会主义者如布拉克迈尔（H. Brakemeier）、哈尔贝施塔特（H. Halberstadt）等人或者年轻学者如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期，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马尔堡阿本德罗特那里获得教授资格。

那些在过去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中与阿本德罗特一起为马克思主义路线而斗争的“68年学生运动参与者”（68er），可以被视为第二代弟子。其中有德佩（F. Deppe）、鲍里斯（D. Boris）、菲贝尔特（G. Fülberth）、屈恩勒（R. Kühnl）、施泰因豪斯（K. Steinhaus）、德内（E. Dähne）、哈雷尔（J. Harrer），迈尔（G. Meyer）、彼得（L. Peter）、朗格（H. Lange）等人。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大学生联盟（Marxistischer Studenten Bund）——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和社会主义高

校联盟（Sozialistischer Hochschulbund）以及其他大学生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属于阿本德罗特派。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本德罗特及阿本德罗特派与《观点》（*Das Argument*）杂志、“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所”（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帕尔-卢根施泰因出版社（Pahl-Rugenstein-Verlag）之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

最后，在所有时期内，对阿本德罗特来说，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对其干部培养的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他去世后，很多工会官员仍然将自己视为阿本德罗特的弟子。在他去世后成立的（纽伦堡）阿本德罗特论坛的活动即为明证。这里尝试的是，在进步的工会政治与受阿本德罗特影响的和以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学术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在阿本德罗特于1985年9月去世的时候，社会主义划时代的低谷还无法被预见。无疑，它触及了阿本德罗特派的自我认识。事后，阿本德罗特可能会认为他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蜕变的批判得到了印证；但是，鉴于东欧复辟的群众运动取得成功，他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改革和取得成功的能力——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这一能力通过在戈尔巴乔夫（Gorbatschow）领导下启动的改革政治（Perestroika-Politik）得到过加强——的希望将会和其他男女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希望一样被毁灭。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派别一样，阿本德罗特派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处于批判性的自我检查过程中。无论在政治和学术上会出现哪些分化，以现实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为取向，估计都会继续是其不变立场。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Die deutschen Gewerkschaften. Wege demokratischer Integration*, Heidelberg 1954; ders. u. H. Sultan, *Bürokratischer Verwaltungsstaat und soziale Demokratie*, Hannover-Frankfurt/M 1955; ders., *Aufgaben und Ziel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Programmentwurf)*, Frankfurt/M 1959; ders.,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M 1964; d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M 1965; ders., *Antagonistisch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 Demokratie. Aufsätze zur politischen Soziologie*, Neuwied-Berlin/W 1967; ders. u. K. Lenk (Hg.),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Bern-München 1968; ders. u. W.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en des 19. und 20. Jh.* [1962], Berlin/W 1968; ders., *Ar-*

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fassung. Materialien zu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 Verfassungstheorie der Bundesrepublik, hgg. von J. Perels, Frankfurt/M 1977; ders., *Faschismus und Antikommunismus*, Berlin/W 1978; ders., *Ein Leb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Gespräche*, aufgezeichnet und hgg. von B. Dietrich und J. Perels, Frankfurt/M 1976; ders., *Wolfgang Abendroth im Gespräch. Friedensbewegung und*
29 *Arbeiterbewegung*, Marburg 1982; ders., *Die Aktualität der Arbeiterbewegung. Beiträge zu ihre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hgg. von J. Perels, Frankfurt/M 1985; ders.,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2 Bde., Heilbronn 1985; *Sonderheft VDJ-Forum* [im Gedenken an W. Abendroth, Ausgew. Aufsätze], H. 1, 1986; *Sozialismus* [Sonderheft Wolfgang Abendroth], Hamburg 1985; *Recht und Arbeiterbewegung. Zum Gedenken an W. Abendroth*, hgg. von D. Hensche und M. Kutscha, Köln 1987; D. Boris, *Krise und Planung. Die politische Soziologie im Spätwerk Karl Mannheims*, Stuttgart 1971; E. Dähne, *Untersuchungen zur Struktur and Entwicklung des tertiären Sektors in der BRD*, Marburg 1972; F. Deppe, *Verschwörung, Aufstand und Revolution. A. Blanqui und das Problem der Revolution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70; H. Drechsler, *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SAPD).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am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Mannheinm 1965; G. Füllberth, *Proletarische Partei und bürgerliche Literatur. Auseinandersetzung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der 2. Internationale*, Neuwied 1972; J. Harrer, *Primäre gesellschaftliche Ursachen und Triebkräfte in der mexikanischen Revolution*, Marburg 1970; R. Kühnl,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inke 1925-1930*, Meisenheim 1966; H. Lange,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Intelligenz. Neue Bourgeoisie oder neue Arbeiterklasse*, Köln 1972; W. Link, *Die Geschichte des internationalen Jugendbundes (IJB) und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Kampfbundes (ISK)*, Meisenheim 1964; G. Meyer, *Studien zur sozio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 Sowjetrusslands 1921-1923*, Köln 1974; L. Peter, *Literarische Intelligenz und Klassenkampf. »Die Aktion« 1911-1932*, Köln 1972; K. Steinhaus, *Soziologie der türkischen Revolution. Zum Problem der Entfaltung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n sozioökonomisch schwach entwickelten Ländern*, Frankfurt/M 1969;

K. H. Tjaden, *Strukturen und Funktion der »KPD-Opposition«*, Meisenheim 1964.

海因茨·荣克（Heinz Jung）撰
秦明瑞译，盛舒洋校
沈红文审校

参见：
Abrüstung, Aktionseinheit,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ntifaschismus,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bildung, Arbeiterklasse, Bewusstheit, Bildung, Brandlerismus, Bündnispolitik, Bürgerrechte,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ritter Weg, Eurokommunismus, Faschismus, Friedensbewegung, Geschichtsschreibung, Gewaltenteilung,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Intellektuelle, Intelligenz, Klassenjustiz, Kritische Theorie, Legalität, Neue Linke, Parteien, Parteilichkeit, Perestrojka, Praxis, Recht, Rechtsstaat, soziale Bewegungen, Sozialfaschismus, Sozialisierung, Standpunkt/Perspektive, Studentenbewegung, vergessen/erinnern, Wissenschaft

30 脱钩（Abkopplung）

作为摆脱不发达状况的战略，与世界市场脱钩的思想在发展理论的讨论中第一次出现在依附学派（Dependencia-Schule）的范围内。其中心人物——尤其是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75，1990）和迪特尔·森哈斯（Dieter Senghaas）（1977）——将“不平等的交换”和由此导致的“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视为资本主义边缘国家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并因此主张从国际合作和交易关系中（有限）退出。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首先要在国际贸易的古典（李嘉图学派的）理论面前进行辩护；按照这一理论，如果人人都只根据其要素配备（Faktorausstattung）（土地、资本、人工）所具有的比较成本优势来制造产品，国际贸易将使所有参与者受益。据此，基于低工资，世界市场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被分配给发展中国家——在脱钩理论家看来，此举只会为延续边缘地区（Peripherie）的技术依赖而服务。古典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它将要素配备视为准自然的、静态的事实；而它并非如此。在历史上，它是可变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廉价劳动力，这至少也与过去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有关。此外，当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产生竞争时，中心区的企业和跨国企业集团还具有这样的可能性：或者开发新的（劳动强度更小的）技术（这将抵消边缘地区的比较优势），或者将自己的生产转移到那里——这将破坏当地的企业并加速边缘地区经济的结构性蜕

变。因此，比较成本优势几乎发挥不了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作用。反过来，根据**不平等交换**理论，边缘地区和中心地区（Metropole）在工资水平上的差别导致财富持续地从彼地流向此地；高工资和低工资生产者之间的贸易必然会给前者带来额外利润，他们会用一份较少的劳动量换来一份较多的劳动量。如果所有这些观点都符合实际，如果进入国际
31 贸易关系不仅不能带来那些被承诺的好处，而是相反带来不利，那么，暂时脱离世界市场、建立一种不依赖它的经济并且更有利地安排自身的要素配置，看来就是明智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在经验性上，脱钩理论家列举了日本和德国的实例；在那里，这种情况真正发生过。在理论上，他们提醒人们注意具有封闭的、互相强化的经济循环的理想型资本主义模式（das Modell eines idealtypischen Kapitalismus）——它已经在所有中心地区得到实现，而同时，所有发展中国家至今都以有缺陷的经济循环（defekte Kreisläufe）、生产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为特征。在脱钩理论家看来，首先是行业之间的网络化（Vernetzung）或者格式化（Vermaschung）构成了边缘地区的发展障碍。技术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只存在于一个很小的、被外国企业集团控制的产业中；该产业只为出口而生产，而不是为本地的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产业提供廉价的投资产品。大众收入极低，这同时归因于工业不发达、被强加的等级结构以及自然经济（Subsistenzökonomie）的主导地位。没有大众收入就没有对大众消费品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是唯一能够给一种持续的、**内向型的发展**（*autozentrierte Entwicklung*）提供——在中心地区好像也提供过——动力的因素。脱钩旨在实现的是，生产一种基于中心地区模式的格式化。

关于具体的、用于实现这一切的措施，学者们却几乎未提供答案。谁应该是整个发展的担当者，以及其动机和利益应该是什么，也都相当含糊。未探讨的情况还有：预设的经济改制将意味着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包括剥夺在本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集团以及本土大地主和富豪的财产——这些集团和个人将不会情愿就范，以至于暴力和反暴力似乎可以预料。脱钩战略的理论基础似乎也较薄弱。目前，曾经的追随者甚至也批评不平等的交换和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不严密（例如 Menzel / Senghaas 1986，第 52—53 页）。即使它们是合乎逻辑的，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Schwellenländer*）——它们刚刚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完成了飞跃——的实例也证明，并不是**每一种**高工资和低工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都必然导致萧条——尽管 32

有一点毫无疑问地始终切合实际，即世界市场的结构普遍地对边缘地区不利，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在引起从贫穷国家往富裕国家的净财产转移（Netto-Werttransfer）。“四小龙”的实例肯定不能因此导致一般结论的得出。但是，它们以及相反的案例——波尔布特主义（Pol-Potismus）的和缅甸的脱钩实验（二者都以可以预料的暴力怪圈为部分条件）的灾难性结局，并且最后温和的坦桑尼亚模式的不幸失败，也都使得脱钩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未再被讨论。但是，它想回答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

参考文献：

S. Amin, *Die ungleiche Entwicklung*, Hamburg 1975; ders., *Eurocentrism*, New York 1989; ders., »‘Self-reliance’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ordnung«, in: D. Senghaas (Hg.) 1979, 317-336; ders.,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1990; A. G. Frank, *Kapitalismus und Unterentwicklung in Lateinamerika*, Frankfurt/M 1969; U. Menzel, *Theorie und Praxis des chinesischen Entwicklungsmodells*, Frankfurt/M 1978; ders., *Das Ende der Dritten Welt und das Scheitern der großen Theorie*, Frankfurt/M 1992; ders. u. D. Senghaas, *Europas Entwicklung und die Dritte Welt*, Frankfurt/M 1986; R. Preiswerk, »Kulturelle Identität, Self-Reliance und Grundbedürfnisse«, in: *Argument* 120, 22. Jg., 1980, 167-178; D. Senghaas (Hg.),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4; ders., *Weltwirtschaftsordnung und Entwicklungspolitik. Plädoyer für Dissoziation*, Frankfurt/M 1977; ders., »Dissoziation und autozentrierte Entwicklung. Eine entwicklungspolitische Alternative für die Dritte Welt«, in: ders. (Hg.), *Kapitalistische Weltökonomie. Kontroversen über ihren Ursprung und ihre Entwicklungsdynamik*, Frankfurt/M 1979; ders., *Von Europa lernen. Entwicklungs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 Frankfurt/M 1982.

格哈德·豪克（Gerhard Hauck）撰
秦明瑞译，李健审

参见：

Dependenztheorie, Dritte Welt, Entwicklung, Eurozentrismus, Extraprofit, Faktorentheorie,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Modernisierung,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Peripherie/Zentrum, Pol-Potismus, Schuldenkrise, Self-Reliance, Subsistenzproduktion, ungleiche Entwicklung, ungleicher Tausch

33 推论（Ableitung）

“国家推论”（Staatsableitung）用语的组成部分。西德的“国家推论辩论”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并且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在何种程度上法律国家是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必然的政治形式，即表现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形式。人们想从马克思《资本论》（*Kapital*）中的“推论”处理方法——就其特征，随即出现了无休止的争论——中获得回答这一问题的方法。但人们发现，马克思从未将其概念的处理方法以“推论”来命名，而是更多地以“发展”（entwickeln）或者偶尔以（“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aufsteigen）来命名。（参见MEW 32，第538页；*Gr*，第22页，MEW 42，第35页；以及MEW 41，第510页）但是，国家辩论的参与者喜欢以“推论者”的身份出现并非偶然。由此，他们表明了其对马克思理解的黑格尔论者的立场。比如，在黑格尔那里就写着：“在历史上，哲学体系的次序与逻辑推论中观念的概念界定的次序是同一种。”（*Gesch. d. Phil.* I，A. 2. c.）这一命题的结构又可以在这样一些学者那里找到，他们跟马克思一道用资本的界定取代“观念的界定”，从而将“推论”部分地理解为对现实的资本和观念的哲学（或者就是意识形态）的平行发展的断定，部分地相当“辩证地”理解为资本界定，但同时希望像在黑格尔那里的逻辑的界定所做的那样，让二者纯粹“概念性地”相契合。

与此相对立，马克思自己对“推论”用语做出的反应是独特的。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MEW 19，第355—383页）中，当他遇到一个“价值概念推论”的段落时，他首先就此说明：“按照瓦格纳先生的意见，从**价值概念**中，应该首先得出**使用价值**，然后得出**交换价值**，而不是像我那样从**具体的商品**中得出这两者；仔细地研究一下他的最新版《**基础**》（*Grundlegung*）一书中的这些**繁琐的言论**，是很有意思的”（第361—362页）。在阅读过程中，他开始嘲笑这一概念本身（瓦格纳“同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把这种绝妙‘推论’颠倒过来……”，第366页），以便最终得出结论：“所有这类**推论**的目的只是回避作者不能胜任的任务”（第367页）。第一个引言已经足够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对“这类推论”的理解是什么：在缺少附加的经验的（此处对“具体的商品”的）研究时，从一个“概念”（一个经验的、内容丰富的假设之缩写）跳转到另一个。无疑，“国家推论”的那些纯粹功能主义的变量都包括在这一批判中；这些变量在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为了能够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国家必须或者应该具有哪些特性。

34

为此，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其中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国家”，即功能分析的国家——比研究现实的国家更重要。在功能主义的推论中，也留有国家理论方面的经验知识的痕迹，但不可忽略的是，总体上得出的是一幅事先想好的并且经常极其不现实的国家图像；其中，作为国家理论的阶段性特征的折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结构可以被辨识。

这种阐释风格符合某种传统，而该传统的范式是由乔治·卢卡奇以其《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and Klassenbewaßtsein*）（1923）中的理论提供的；在此理论中，被思考的问题也只能是：鉴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阶级觉悟由什么因素引起——好像它并非同时受非经济的维度，比如宗教、党派、族群因素等的影响似的；而这些因素的理论意义是不能仅仅从对《资本论》的研究中看清的。也因为其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卢卡奇范式被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描写和评论为“用语关系”（Ausdrucksbeziehung）模式或者“富有表现力的整体性”（expressive Totalität）模式。（参见 *DKL* 1972，第 17 页，第 174 页及以下，第 188 页；关于 Luckács，尤其参见 Nenitz 1979）

当然，“从具体的商品（或者国家）中”这一说法还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它必须在认识逻辑上反过来与马克思的相关论证同时被特定化。因为无可争议的是，概念和假设——它们先于对“具体事物”的感知而存在，并且对其产生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总是构成了出发点。问题却在于，关于被感知到的内容的判断是否只是在重复那些最初假设，或者它是否在推移它们，即拓宽、细化、改变甚至取消它们的意义。马克思的意见可以重构为：这一做法以新的对象研究为前提。对这样一种概念推移的处理方法，马克思的用语“发展”肯定比“推论”用语更独到。在近代，“发展”隐含着“让新事物形成”的意义；与此相反，“推论”却在强调亚里士多德的起源思想（将某事物置于历史的和理想的理由的引导下，让其重现）。在马克思指责李嘉图（Ricardo）将“表现形式”——被解释物——“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MEW 26.2，第 100 页）时，处理方式的区别就令人信服地清楚了。这是单纯的概念推论；在此关联中，它被称为“‘形式的’‘抽象’，‘本身是虚假的’”（同上）。根据这一原则，比如，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的弟子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将葡萄酒的价格构成直接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却没有提出更多的——可以从扩大的对象研究，比如从对生产耗时的角色的研究中得出的——规律见解的尝试。“在

此，一般规律和继续发展的具体的情况之间的矛盾不应该通过中间环节的发现，而应该通过将具体物归属于或者直接适应于抽象物得以解决。”（第 83 页）我们因此可以总结：从“具体物葡萄酒”出发意味着从价值规律出发，并且找到和考虑“中间环节”（Mittelglieder）——通过它们，葡萄酒价格的规律会推移价值规律概念。

在此，人们必须明了，（“经验上的”）找到和（“理论上的”）推移分别会引起特殊的困难。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仅仅限于找到和研究那个对象——该对象会推动理论解释的链条因加入某个“中间环节”而得以拓展。然后，人们也会面对这个问题：理论上的拓展如何能够施行——是通过（为新的规律见解）添加新的、只是补充已经存在的旧概念的草图的概念，还是通过添加而改变草图和旧概念？葡萄酒价格一例属于第一种情况。马克思理论中主要的“中间环节”——剩余价值——的发现，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实例。因为马克思关注的不仅有交易所和会计室，而且，与李嘉图不同，还有工厂里——在工人和机器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一从经验中得出的新概念在理论上就是通过对现存的利润概念（由此当然也是对现存的利润和价值之关系的概念）的细化和改变而建构出的。这样，马克思指责李嘉图：“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 36
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MEW 23，第 546 页）

在此关联中值得一提的是，在写给恩格斯的、告知刚刚完成的剩余价值的发现的同一封信中，马克思表达了一个人所共知的观点：他很想有一天能够写写“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理性的**东西”（MEW 29，第 260 页）。这一点出现在同一张纸上并非偶然。此前，马克思写道：“不过，我取得了很好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Logik*）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方面帮了我很大的忙。”（同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恰恰是“发展”和“推论”之间的差异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区分开，尽管“发展”也有纯粹概念的一面，而且黑格尔在这方面为马克思做了准备工作。

换言之，马克思代表的并不是一种分析的，而是一种综合的科学逻辑（其中，多样的理论假设并不只是从公理中循环论证式地得出的），但同时又反对先验的综合判断的设想。与此相适应，一种并非单纯“公式化地—抽象化地”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可以由此得以辨认：基于其特有的经验性，它虽然

从资本概念出发，但首先推移、补充并且甚至也可能替换这些概念。

参考文献：

J. Hirsch, »Nach der ‘Staatsableitung’ – Bemerkungen zur Reformulierung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Staatstheorie«, in: *Aktualisierung Marx'*, Argument-Sonderband AS 100, Berlin/W 1983, 158-170; N. Kostede, »Die neuere marxistische Diskussion über den Staat«,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8/9, Frankfurt/M 1976, 150ff; L. Kuhlen, »‘Ableitung’ und ‘Verdoppelung’ in der neueren marxistischen Diskussion über den Staat«, in: H. Rottleuthner (Hg.), *Probleme der marxistischen Rechtstheorie*, Frankfurt/M 1975, 312-337; 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1923), in: Werke 2, Neuwied-Berlin 1968; R. Nemitz, »Ideologie als ‘notwendig falsches Bewußtsein’ bei Lukács und der Kritischen Theorie«,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rgument-Sonderband 40, Berlin 1979, 39ff.

米夏埃尔·耶格尔（Michael Jäger）撰

秦明瑞译，李健审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nalyse/Synthese, Anwendung, Ausdruck, Begriff, Dialektik, Erscheinungsform, Form,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Gesetz, Hegel-Kritik, Kapital-Logik, Klassenbewußtsein, Kritik, Mehrwert, Methode, Staatsableitungsdebatte, Verdoppelung, Wertform

裁军（Abrüstung） 37

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概念只出现在两篇发表在报纸上的，并且旨在评论裁军的幻想特征的文章中（1859，MEW 13，第306—307页，以及第477页）；在恩格斯那里，其作为词语则更晚（最著名的出处为《欧洲能否裁军？》[Kann Europa abrüsten?]，1893，MEW 22，第369—399页）、作为内容则最晚于1887年出现（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MEW 21，第344—345页）。恩格斯此后反复陈述的裁军设想并不意味着某种全面的和完整的解除武装，而是按照瑞士的模式用民兵体系中的全面的人民武装替代以普遍服役义务为基础的普鲁士军队（“首先实行这种制度的那国人民，会使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一倍同时还会使自己的军事预算

减少一半”，MEW 21，第 345 页）。这样，恩格斯将首先在《反杜林论》中为批判军备负担增加而发展出的暴力理论（Gewaltstheorie）依据用到了一种对立策略上（MEW 20，第 147—171 页）。此后，关于裁军的可能性和政治意义的问题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

工人运动开始以来，裁军一直是其特别重要的要求之一（在 1869 年的爱森纳赫纲领［Eisenacher Programm］中，“建立一支人民武装以取代现有的军队”被作为第四个要求提出；在 1875 年的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以及在 1891 年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中，关于军队和裁军的要求——在选举权要求和由人民立法的要求之后——均排在第三位）。在其《哥达纲领批判》（*Kritikdes Gothaer Programms*）（1875）中，马克思最多只是对“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会”展开了论战，“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作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MEW 19，第 24 页）。

除了一些支流之外，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具有绝对和平主义取向。其目标在于，清除统治阶级的军备及其后果（军国主义），并且通过——只需比以前更小的支出的——人民武装来保障社会的防卫。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消失，军队和军备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

在思想史上，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的讨论也具有深远意义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比如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孟德斯鸠［Montesquieu］）此前已将军备和战争政策排除在其民主化理论之外，并且，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宪章中表明的立场——宣战决定以后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只短暂存在过。与此同时，在启蒙运动的所有时期，都存在过另一种从未占主导地位的和平主义的传统路线——发轫于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Die Klage des Friedens*，1517），经不太有名的代表人物如伊梅里克·克鲁斯（Emeric Crucé）（*Der neue Kineas*，1623）——圣皮埃尔修道院院长（首先在卢梭［Rousseau］1756 年和 1761 年所做的摘录中被传播）——再到康德（Kant）（*Zum ewigen Frieden*，1795）。英国的发展（在美国具有和平主义取向的建国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以及功利主义者耶利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政治上更有影响。但是，在这一传统中，即使一般性的裁军要求也未被提出过。

在国际政治史上，19 世纪初以来一些政府的裁军建议值得一提。当时出现了两种对至今的裁军政治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建：（以前的国际政治闻所未闻

的）所有当事国的国际会议以及对所有参会国的军事潜力的共同摸底——外加对其缩减的建议。1816年，莫斯科提出了英国政府应同时减少各种武装力量的建议。作为答复，召开一种国际会议的对应要求被提出；在此会议上，各国的军力清单应被互相确认。与法国政府1831年的第一个动议一样，这一提议搁浅了。裁军政治历史还记录了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1863年、1867年和1869年的建议。此后，还可以列举来自不同政府的一连串的裁军动议（英国和法国在1870年至1871年战争前夜的动议、新统一的意大利1877年的动议、沙皇的多个建议、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的动议）。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辩论批判的是这些建议与事实上的扩军的同时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着这些倡议，并且指出，它们不是在为军备缩减，而是在为其他政治目的服务。类似地，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也对“海牙闹剧”展开了论战。此后，正在执政的政府的裁军政治构成了社会主义分析家的论战文章的参考点；他们
39 试图揭示的是，统治阶级想要实现的不是消除战争危险，而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的。

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军，在理论话语中，马克思主义者对军备的批判也在累积。在分析层面，罗莎·卢森堡的主要著作《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913）以论“作为资本积累领域的军国主义”一章结尾；在这章中，她阐明：“从全部资本的立场出发……作为新的销售领域……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在出现）”（GW 5，第404页）。在此情况下，裁军显得荒谬。

列宁关于裁军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十月革命前，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他将裁军评价为和平主义的幻想；其由资产阶级推动，目的也在于麻痹大众的和平渴望：“虚情假意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也许在做裁军梦。在世界上还有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时，我们必须追求的不是裁军，而是普遍的人民武装。”（LW 10，第42页）1916年，在关于这一话题的最详细的讨论中，他说：“只有在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后，它才能将所有武器扔在废铁堆上，而又不至于背叛它的世界历史使命。”（LW 23，第94页）

十月革命后，列宁认识到了裁军作为改善年轻的苏俄之安全的手段的价值，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21年年中以后，苏俄政治一直将裁军放在优先位置。1922年，苏俄外交部部长契切林（Tschitscherin）建议列宁（这一文件于1964年被公开）：苏俄“应以最广

泛的和平主义的纲领凸显自己”（引自 Mackintosh 1973，第 11 页）。同一年，列宁召集西部邻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开了一次裁军会议，并建议各方裁减四分之三（后定为四分之一）的武装力量。

在核武器时代，关于阶级斗争与军事装备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理论辩论结果重新偏向了裁军。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不同体制间）战争的可避免性论点被提出；它使苏联的态度有了一个新的基础。裁军甚至被评判为阶级斗争的手段；自此，对资本主义的摧毁不再应该通过无产阶级在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应该通过其他手段来实现。

40 在西方重新活跃起来的关于帝国主义之争的讨论（斯威齐［P. Sweezy］、马格多夫［H. Magdoff］），尤其是由“军事—工业的综合体”论点引起的垄断群体理论（Monopolgruppentheorie）的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裁军的前景继续做出了特别怀疑的判断。在这场辩论中，军备控制政治受到了尖锐的批判。

总的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裁军政治的三个行动层面。在军备控制（arms control［武器控制］/ 冯·鲍迪辛［v. Baudissin］：“合作的军备调控”）中，只是有限地出现了对军备发展的干涉。军备监督的目的在于更理性地规划军备发展，对其进行引导、避免其失控。在批判的视角下，军备控制最多只能算军备的有效化，而不是裁军。《施达特条约》（*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alks* [减少战略武器的谈判]）可以说是这一方案的新例证。第二个层面以深度干涉为特征，并且以军备竞赛的停止，即“冻结”武库为目标；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冷战”（Neuer Kalter Krieg）中，该层面决定性地影响了相关讨论。在和平运动中，这一方案尤其是决定性地影响了美国的辩论。更加激进的第三个层面追求普遍的和完整的裁军这一主导价值（UN Charta Art. 26）；它给欧洲 20 世纪 80 年代的和平运动打下了烙印。

特别是在东西方关系缓和（Ost-West-Entspannung）时期，所谓裁军谈判得出了一系列协定（1967 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1968 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1 年的《禁止在海底试验核武器条约》、1971 年的《禁止生物武器条约》、1977 年的《禁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这些协定可以归类于第一个以及最多第二个层面 —— 它们涉及的是军备控制，而不是裁军。而 1987 年的《中导条约》才能被评估为裁军协定，因为军备 —— 此处是一个完整的武器种类 —— 的缩减第一次实际上得以实施了。1990 年在维也纳形成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是非核武领域迄今最重要的裁军规划，并且

出乎意料地将军备生产能力的转换（军备转化）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因而，德国联邦政府削减军火存量的具体措施在于大量地出口（这使德国在1991年至1993年间成为第三大军火出口商）。随着1993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在巴黎签署，整个工业部门的军工产品被遗弃了。

东西方冲突结束以后，族群—民族的战争使和平的兴奋很快冷却了。1991年的海湾战争强化了一种努力，即：通过对联合国的一种变革来发展出其他的非军事的冲突解决模式，并由此缩减军备。存在争议的是，为此，应更多地争取建立地区性的（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还是全面的全球性的结构。

现在，裁军面临三个问题：（1）在最近的成果之外，一种在规划上更加深化的裁军政治的新开端是必要的，因为——与某些期待相反——军备控制没有表现为裁军进程中迈出大步的第一个阶段。（2）在质的层面，军备竞赛在最大广度上还在继续进行，并且使被期待的“和平红利”（Friedensdividende）无法实现。（3）裁军遇到了哪些主要的障碍，需要在学术层面足够地、在政治层面有效地得到解释。

乌尔里希·阿尔布雷希特
（Ulrich Albrecht）撰
秦明瑞 译，盛舒洋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ufklärung, Demokratie, Exterminismus, Friedliche Koexistenz, Frieden, Friedensbewegung, Imperialismus, Krieg, Militarismus, Militär,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r Komplex, Pazifismu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e

参考文献：

A. Bebler, »Die marxistischen Positionen zu Frieden und Abrüstung und ihre Veränderungen«, in: *Österr. Milit. Zeitschr.* 5/1985; W. C. Clemens, »Lenin on Disarmament«, in: *Slavistic Review* 23, 1964, 504-525; K. Liebknecht, *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Leipzig 1907], Ges. Reden und Schriften, Berlin/DDR 1958, Bd. 1, 249-456; M. Mackintosh, »Abrüstung«, in: *MiS, Politik 1*, 1973, 10-15; *World Armaments and Disarmaments*, SIPRI Yearbook, Oxford (jährl.); H. Magdoff,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E. u. W. Young, »Marxism-Leninism and Arms Control«, in: *Arms Control*, 1/1980

42 国家的自行消亡 (Absterben des Staates)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作为一种独特的统治方式，只在阶级社会才能长期存在。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战略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革命者如何脱离国家这个必然战场，并使他们的行为与国家的消失相适应。

以国家的社会化的历史临时性和必然性的认识为基础，建立起一个理论视角，用来划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权力的分析范畴。确定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标准，不在于认同无国家社会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而是取决于它是启发性地提出了富有成效的观点来支持国家自行消亡（PIT 1979），还是视为乌托邦予以拒绝（Harich 1975）；取决于它是绕过这个问题（正如苏联国家理论的某些部分，通过引入“政治体系”和“社会政治组织”等概念），还是对那些不可否认的反证持保留态度（Althusser 1977）。

1. 国家将会“自行消亡”一说源于恩格斯，也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未来将出现无国家的共同体的思想，英国和法国的乌托邦主义者已有论著。（Owen，Fourier）

1.1 马克思在这一定理中独到地提出了对左派黑格尔主义政治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双重批判。就像国家脱胎于资产阶级革命，正是通过“建立”国家才在资产阶级社会确立了私有财产关系一样，“政治解放”同样建立在国家之上。“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国家公民身份拿回来”，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社会力量因而不再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只有这时，阶级对抗和资产阶级社会 / 国家二者对立关系才能消除。（*Judenfrage*，MEW 1，第 370 页）

1.2 按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I*）中的原理，国家被理解为公有化能力的垄断者，通过分工、阶级统治和建立意识形态阶级三种方式来实现。（MEW 3，第 32 页及以下）在这个结构中，个体不能把他们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合作作为“自身统一的力量”使用，因为在国家中这种社会力量作为“异化的、身外的暴力”与个体对立。（第 34 页）所以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在这种对抗中活动，如同在民主制度中一样”，要在“夺取政治权力”（同上）的同时“推翻国家，以实现自己的个性”（第 77 页）。

1.3 结果是，根据历史状态和辩论语境的不同，焦点或者落在对国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失的期待上（例如 *Manifest*，MEW 4，第 482 页；MEW 7，第 288 页），或者落在必须主动去瓦解

国家的认识上。

首先是恩格斯的一个完全自我矛盾的说法，即虽然生产工具的国家化是“它作为国家的最后一个独立行为”，但国家并不随之消失：“国家暴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变得多余，然后自行停息。治理人们则被管理物品和引导生产进程所取代。国家不会被‘废除’，而是将**自行消亡**。”（*AD*，MEW 20，第 262 页）恩格斯在论证中驳斥了两个观点：针对社会民主派的国家崇拜，他强调随着革命的开始，国家的消失已经开始；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他使用“自行停息”和“自行消亡”做比喻，批判了国家瓦解的自愿性战略。

第二层次的问题由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到了极大补充。他们为实施“公社规则”采取的措施有（*Buergerkrieg*，MEW 17，第 339 页）：从地区选举城市委员会；变议会为“劳动实体”，“脱下警察的全部政治性外衣”；统一支付；向下负责制和官员的可罢免性。马克思将它们总结为“铲除旧政权的纯粹压迫机关”，从而“夺取旧政府那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法定的暴力职能，返还给负责任的社会公仆们”。（同上书，第 340 页）

1.4 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和“自我行动”（1890 年 10 月 27 日，恩格斯致 C. 施密特［C. Schmidt］的信，MEW 37，第 490 页）要求，必须采取强烈措施打破“旧的国家机器”（MEW 22，第 197 页），以防止上层扼杀社会革命。所以，恩格斯针对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民国家”的请求更加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压制他们的对手。一旦到了能以自由为目的之时，这种国家便不复存在”。此时，社会主义者更应该使用“集体”这个字眼，而非“国家”。（1875 年 3 月 18—28 日致倍倍尔的信，MEW 34，第 129 页） 44

在地方宪章中务必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最成熟的理论，同时还有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共同利益建立及其合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共产’的区别”的问题的解答。

2.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反对“国家盲目崇拜”时期（例如 Engels，*Einleitung zu Marx'Büergerkrieg in Frankreich'* [1891]），MEW 22，第 199 页），“国家盲目崇拜”在德国社会民主派一度盛行，“共产主义”和“无国家社会”已经成为工人运动领袖反抗专制国家压迫、准备建立社会国家模式的实践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

2.1 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国家自行消亡已不再被提及。考茨基（Kautsky）（1929，第 606 页）提议采用国家**职能转变**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任务甚至更多：教育、艺术和卫生事业。一

定程度的官僚主义是必需的。新国家是“工人国家或社会国家”（同上书，第 612 页）。德国法西斯主义当政的四年以前，考茨基提出：当前的国家“已不完全是原来的国家，但也还远不是那个新国家”（第 611 页）。考茨基的论著重点反对了那些地方自治主义和分离主义，支持了**民主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aten*），“这些国家无须任何压迫机构就能达到内部最紧密的团结，并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存续下去”（第 606 页）。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烈反对伯恩施坦（Bernstein）并把他归入倾向普鲁东的联邦主义。伯恩施坦提出“目前国家所执行的权力的最大部分被民主自治团体取代”的设想（1897，第 78 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之间有很大“不同”，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的社会，它的行政实体与当代国家之间，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同上书，第 73 页）。

45 2.2 国家消亡理论的再次全面重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为苏联十月革命做精神上的准备时提出的。他反对任何试图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过渡国家的观点。他认为“废除国家就意味着废除民主，国家的消亡就是民主的消亡。……民主就是认可少数服从多数制的**国家**”（LW 25，第 469 页）。只有当阶级对立被消除，且“当**所有人**将来都学会独立进行社会的生产时”（第 489 页），才谈得上国家消亡。取得国家权力后必须直接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并用武装的人民的国家取而代之。但这个必须性绝对不能与“所有人必须学会独立进行社会生产”混为一谈。

列宁赞扬了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的说法，认为“他不仅指出了这一过程的渐进性还指出了它的根本性”（第 476 页）。“资本主义剥削产生不计其数的恐怖、暴力、荒谬和卑鄙，从其中解放出来的人们”要“在那个被称作国家的**特殊强制机构不存在**的情况下……”学会“遵守那些从古代就已熟知，几千年来一直在所有条文中被宣扬的社会共同生活的基本规则”。毫无疑问，这个效果只有通过习惯能够达到。（同上）

早在苏联当局反驳考茨基的攻击时（*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Renegat Kautsky*，LW 28），列宁就坚决地指出：内部战争和对抗外国战争期间的压迫机构的力度，能够与“社会主义民主”协调一致，后者则为“国家自行消亡的开始”创造了可能条件。（*Aufgaben*，LW 27，第 263 页）

2.3 直到最后的几部著作，罗莎·卢森堡才似乎间接赞成了列宁对沙皇官僚主义残余和内部自生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严厉批判，和他其后关于紧急重组和扩建那些能够自下而上培养政治主

动性和防卫性的苏维埃民主形式（合作社和工人农民监督委员会）的建议。卢森堡对于其基本法和政治公开局限性的批判已经指向问题的核心：未来国家的自行消亡将会启动、促成或阻碍国家的哪些发展？针对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制”实践，她提出了“公共生活自身的教育、无限制的最广泛民主、**民意**（*Meinung*）”（*Zur russ. Revolution*，GW 4，第 362 页）。

3.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争议尚未结束，西方革命的战后行动便已遭受重挫，它们遭遇的最大问题是国家问题。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夺取和确立政权的问题是先于国家消亡问题的，所以由无政府主义者充当无政府社会的“背叛性”思想的纯粹代言人，本该更有说服力。关于这两种状态如何像在委员会共产主义（Rätekommunismus）中那样有力结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已经通过 1919 年至 1923 年的经历得到了“解决”。

3.1 下述一系列问题可以整体理解为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未完的争论史。斯大林分别在（农业集体化和战争经济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两个计划中，发现了建设苏联国家超级大国的理由，以及对它的“自行消亡”方式重新进行包装宣传的必要。他最终强制促使现实与宣传口号结合，从而在 1930 年把下面这个自相矛盾的理论上升为原则：“国家权力最大化发展，从而为国家权力的自行消亡做好准备——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模式。”（*Politischer Rechenschaftsbericht an den XVI.* Parteitag der KPdSU，W 12，第 323 页）

3.2 虽然斯大林独断并改造了马克思主义，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国家应首先被视为历史必然之祸，只有消除它存在的理由，它才会消失，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观点。有的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外部必要，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也是：FL，第 725 页），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的国家的说法（参见 T，第 342 页）；另一些人则在面对国家瓦解问题时迟疑不定，质疑国家尚未完成教育人们进行“自治”（列宁）的任务。

3.3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基于苏联新宪法草案提出了再次“通过工人夺取民主”（1936，第 167 页），并且参照列宁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提出当“成长为新的文化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无须强制就能自觉地适应并服从社会”时，国家暴力机构就将消亡（同上书，第 208 页）。教育主义的国家观念贯穿马克思主义始终，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认为：如果没有权威性强制，人类不可能与自然友好而自足地共处。“所以共产主义也永远无法

脱离国家的权威和制定的法律而实现”（1975，第 161 页）。

3.4 葛兰西认同国家作为民众的教育者的观点，但坚决反对把国家自行消亡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公民社会**（*società Civile*）和**政治社会**（*società politica*）之间的差异可以提供一个角度：正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强制职能由规制社会（或道德国家或市民社会）来履行，（可以）假想这些职能是在此程度上被瓦解了。（*Gef* 4，H.6，§88，第 783 页）这里的国家消亡可以假想为：（压迫性）政治机构被公民社会所取代，暴力为共识所取代；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霸权是夺取国家权力的前提条件。所以，在迈向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国家自行消亡的程序已经开启。

3.5 阿尔都塞（Althusser）对国家自行消亡定理的思考给予了重要启发。他要求放弃改良和技术性调整的设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暗含有国家是社会的**异化的共同体**（*entfremdete Allgemeinheit*）的假定，“国家把生活在其中的人群的普遍性以异化形式表达出来；所以识别它，然后将好的‘普遍性’以非异化形式实现，就已经足够：道路的最后是改良主义”（1979，第 44 页及以下）。此外，认为“国家的终结”会导致“政治的终结”的想法是错误的。在共产主义中，所有政策不会蜕变为纯粹的“事务管理”，如巴里巴尔（Balibar 1977）反对恩格斯时的观点；那里也不会被普遍的“透明”的关系所主导（Althusser 1979，第 49 页）。由于国家自行消亡后还存在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混乱和决策问题，所以必须要考虑一种“没有国家的政治”（同上书，第 50 页）。

3.6 普兰查斯（Poulantzas）将阿尔都塞在国家理论中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性再生产”概念进一步推进并得出结论：国家决定性的参与阶级关系的再生产，但并不只是以它为基础。按照他 48
的观点，消灭阶级**进而**将国家变得多余——特别要理解这一时间顺序，这样的准则不再适用。今天“将国家自行消亡置于全球视野之下”（1978，第 241 页），则普兰查斯的理论应理解为：不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它的两个基本元素，国家机关的双重统治和打破，而是采取国家机关的“激进转型”和开展直接民主（同上书，第 239—240 页）。对此，他认为需要满足以下前提：行政管理的政治化、政府机构的自我封闭以及反对国家之上的群众斗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志特征。（参见第 222 页及以下）

4. 关于新国家理论的论著，只要是没有追随高兹（Gorz）或哈贝马斯（Habermas）坚信国家的存在，便都集中在

国家瓦解时国家**权力**方面需具备的条件上，而这之前，占据中心位置的是国家**机关**的“打破”/转变。佩肖（Pêcheux）试图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指向“非国家”作为**去同一性**（*Ent-Identifizierung*）的主体和作为**去地域化**（*Ent-Regionalisierung*）的政治。（1984，2. Teil，第 65 页）耶格（Jäger）通过第三同盟政策对统治党体系进行**削权**（*Ent-Machtung*），这与佩肖（1983）如出一辙。

对于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解，理论中的思想分歧在于权力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集权主义的地方瓦解中看到了夺取政治权力与国家垮台之间的必然“冲突”的有力运动形式。建设社会主义迄今为止的经验，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布莱希特针对斯大林主义说道：“房子建起来了，但建房子的人不肯离去。在房子建好之前，我们不能搬进去；但是房子建好后，建房的人坐在里面，我们还是不能搬进去。对国家而言，不是一样吗？”（GW 20，67）难道“我们”不也属于那些建房的人，不能很快搬入新房子的一个小房间吗？这一问题针对的是那些不再误以为自己处于一个即将被占领的国家堡垒的假想外部的革命主体。有人将国家瓦解理解为构建起个体联合的行为能力，即所谓的“重新获取已疏散的公有化职能”（Haug 1987，第 17 页），那么他们必须要自问，如何才能避免那些能力“囤积”为一种心态，而这种上千年来伴随家庭与国家成长的心态，可能会演变为社会主义中“不受控制的二次国家独立”（同上书，第 175 页）。

与信奉“超我必将变成我”格言的左翼（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权思想相对立的，是同一性和“帝国主义自我主体不可能性”观点（Pêcheux，第 66 页）。追随福柯（Foucault）的这类权力批判，均打破了一个观念：国家必须存在，直到革命主体在历史的学习过程中重新获得基本所需。从社会科学重建的心理分析的立场本该回答的问题是：如果国家的自行消亡要被理解为现有国家的自我教育，必须的“主体形式的转化”（佩肖）是改变机构配置的效果，那么国家自行消亡就不能成为国家进一步内部化的假想转折点吗，就好比对父亲的挑衅只关系到男孩的男子汉气概一样？—— 权力批判的观点，如果还没有沦为过时的国家范畴的永恒化，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掌握国家政权瓦解与复活的辩证法，以及如何克服它以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公有化形式？

在这个充斥着扩张的国家的世界，国家瓦解的争论可能看上去深奥。然而，一切事物都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与它的关系却越来越少。基于这一经验，在东西方诞生了此起彼伏的社会主义运动，试图把国家在社会领域去除。

他们的经验本来应该（却没有能够）为想要进一步发展国家消亡定理的学者提供支持。这个明显不切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得到各种“国家危机”的反证，“国家危机”是对其中一般性**国家失灵**（*Staatsversagens*）的诊断总结（Jäenicke 1987）。有趣的是，还有人试图从新保守派那里借鉴**国家最小化**的概念，并在确定消除国家的具体步骤时加以运用（Kleger 1987）。确如拉布里奥拉（Labriola）所说：“科学的社会主义”确实比抽象的国家对手更能够“展示，国家是如何不停地对抗自我，并利用它的
50 必要手段（如庞大的经济、军事主义、一般选举权、发展教育等）为自己的坟墓准备条件的”。（*Ühm*，第 219 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Berlin/W 1977; ders. »Der Marxismus als endliche Theorie«, in: *Den Staat diskutieren*, hgg. v. E. Altvater u. O. Kallscheuer, Berlin/W 1979, 42-52; É. Balibar, *Über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s*, Berlin/W 1977; O. Bauer, *Zwischen zwei Weltkriegen*, Bratislava 1936; E. Bernstein, »Die sozialpolitische Bedeutung von Raum und Zahl« (1897), in: ders.,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Teil II, Berlin 1904 (4. Aufl.); ders.,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J.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1981;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W. Harich, *Kommunismus ohne Wachstum? Babeuf und der »Club of Rome«*, Reinbek 1975; W. F. Haug, *Pluraler Maxismus*, Bd. 2, Berlin/W 1987; M. Jäger, »Kommunismus kommt von Kommunal«, in: *Aktualisierung Marx'*, AS 100, Berlin/W 1983, 124ff; M. Jänicke, *Staatsversagen. Die Ohnmacht der Politik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Müenchen 1986; E. Kardelj, »Das System der sozialistischen Selbstverwaltung in Jugoslawien«, in: *Sozialistische Selbstverwaltung in Jugoslawien 1950-1980. Dokumente*, hgg. v. B. Bosković u. D. Dasić, Belgrad 1980, 9ff;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2. Bd.: *Der Staa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2. Aufl., Berlin 1929; H. Kleger, »Politik mit dem Sozialstaat als lernfähige Demokratie. Theorien und Thesen zur Minimalisierung des Staates«, in: *Staatsverständnis der Gegenwart*, hgg. v. d. Ak. f. pol. Bildung, Tutzing 1987, 55ff; M. Pêcheux, »Zu rebellieren und zu denken wagen«, in: *kultur Revolution*, 1984, Nr. 5, 61ff, Nr. 6, 63ff; Projekt Ideologie 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W 1979 ([3]1986);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8; C. v. Werlhof, »Zum Verhältnis von 'Staat' und 'Kapital' und 'Patriarchat', in: *Unser Staat?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13, 1985, 63ff; F. O. Wolf, »Diesseits und Jenseits der 'Staats-Politik'. Theoretische Fragen zur Aktualität des 'Absterbens des Staates'«, in: *Aktualisierung Marx*', AS 100, 171ff.

维兰德·艾尔夫丁
（Wieland Elfferding）撰
王艳柯译，梁爽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narchismus, Anarchosyndikal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räte, Arbeiterregierung/Arbeiter- und Bauernregierung,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er- und Bauernstaat,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zentralisierung,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oppelherrschaft, Etatismus, ideologische Mächt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Pariser Kommune, Reformismus, Staat,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aatsmacht, staatsmonopolistische Sozialismus, Utopie

抽象 / 具体（abstrakt / konkret） 51

这对概念有着复杂的历史。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被波爱修斯（Boethius）第一次用拉丁文abstractum（抽象）翻译的古希腊用语 *τὰ ἐξ ἀφαιρέσεως*，“指出了这种思维过程的技巧性特征，通过它，数学性的存在得以构成，出于同柏拉图主义争辩的意图，他强调它的本体论上的不独立存在性”（Aubenque 1971，第34页）；抽象的对立概念则标识出了整体（*σύνολον*），“它由质料和形式共同组成，只有它具备在自然界中独立存在的能力”（同上）。在柏拉图主义影响下，自中世纪唯名论以来，抽象（*abstracta*）也在理念性的、同质料分开存在的本质（*separata*）意义上，标明了普遍性，而具体则指向个别的、可感知的给予性。黑格尔回溯到最初本源性的概念，对他来说，抽象意味着简单性的事物，具体意味着复杂性的事物。认识应该从抽象简单的规定性出发，为了辩证地到达具体的、作为许多规定性总和的整体性，而继续进展。——在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性讨论中，抽象获得了一种否定性的意义，作为从具体中、从感性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看起来是作为具体的对立面而独立存在。“抽象意味着设立**自然之外**的自然的**本质**，**人之外**的人的**本质**，**思维之外**的思维的**本质**。”（*Vorl.*

Thesen z. Reform d. Phil.，1842，AS1，第85页）他因此批评黑格尔的哲学："通过他的建立在抽象性基础上的整体体系，把人自我异化了"（同上）。

1. 马克思早期延续了费尔巴哈的理解，当他指责黑格尔时，通过"把**抽象逻辑的**范畴"变成"主体"，从而以"独立存在的抽象"为出发点。（*KHS*，MEW 1，第213、215页）同样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仅仅用"一般抽象的公式"来理解它的理论对象（*Ms 44*，MEW 40，第510页）。然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到，费尔巴哈自己把"人的本质"理解成"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不是"在人的实践中"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6页）"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同上）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只是作为抽象性来批评那些把"主体"抽象掉的、"最后作为实体剩下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的经济理论。（MEW 4，第127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放弃了这种否定性的运用，然而还没有赋予抽象明确的内容。首先"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MEW 13，第620页），对于他来说是"合理的"的抽象（同上书，第617页）；然而由此还没有"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同上书，第620页）。这种合理抽象的可能性，是通过历史的发展而被决定的。例如，劳动必须"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的具体形式对于人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同上书，第635页）"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同上书，第636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著名的方法论章节，这个问题以别的形式出现了。经济学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比如人口；然而实际证明，只要构成性的规定和关系没被认识到，这还是在"空话"意义上的"抽象"。（同上书，第631页）通过分析，"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同上书，第632页）；一旦这些明显在前面所说的意义上成为"实践性的、真实的"抽象，"被确定

和抽象下来”，经济学就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这“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同上）

具体作为抽象的对立面在两个方向上概念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KrpÖ*）
53 中，具体劳动标示形成使用价值的特征，而劳动在所有生产方式中都具有这种特征；与此相反，劳动只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才具有作为抽象劳动标示的形成价值的特征。具体是一个普遍历史性的范畴，而抽象是具体历史性的范畴。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一般规律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做区分时（*TM*，MEW 26.3，第 83 页），两者都和资本主义特有的关系相关，其生产关系中较为复杂的形态是“具体”的，相比之下较为简单的形态是“抽象”的。在此，具体和抽象一样是历史性范畴。

因为在《资本论》中，抽象标示实际的和社会总和的作用关系，这种关系产生于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的社会化模式 —— 由此，不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只是间接地、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而被产生出来的 ——，作为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能够直接地、在孤立的作用中而被理解的；人们必须在总体上把握生产和交换过程，而不考虑直接可见的波动和偏差。“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K III*，MEW 25，第 839 页）由此赋予了抽象一种方法论上的含义。例如李嘉图只是碰到了总体社会关系的线索，而“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TM*，MEW 26.2，第 100 页）。

2. 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这个问题。而很多情况下都应当证明，《资本论》中的方法（是否）确实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列宁这样确定思维的普遍路径：“从活生生的直观到抽象的思考，并**由此到实践** —— 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道路。”（*PH*，LW 38，第 160 页）如果用“思想具体”代替“实践”（*Einl 57*，MEW 13，第 632 页），人们就理解了马克思方法的两个方向。这样马克思对于诺瓦克（Nowak）（1980）来说，就是通过观念化从具体到达了抽象，也就是为了把握纯粹的本质性规律而不考虑许多具体的因素。通过接纳把在观念化过程中放弃的具体因素，就是从抽象回到具体。科西克（Kosík）（1971）把这个出发点称作伪具体。这 54
个方法，从作为它本质性特征的抽象出发，使内在关系显示出来，并允许在具

体的位置上设立现实性的具体。（参见 Iljenkow 1971）

这种解释没有注意到，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用“上升”方法描述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发展。他没有明确地把这种方法说成是他自己的，尽管一些描述暗示了这一点。事实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绝不是为了把现实的决定性抽象掉而先“从现实”开始，而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和它的抽象出发——然而也不是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是为了把抽象批评性地转化和历史化。这种方法很难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当然《资本论》中这种理论的阐述，至少根据主流的理解可以这种方式来表述。马克思实际上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进展的：在表述被决定的（因素）之前，人们必须掌握决定性的——一般来说，就是从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形式”，到由此被决定的现象。尽管他从来没有把他的阐述方式称为一种“上升的方式”，却很容易发现相应的很明确的表述，例如当他评论到，“在一般规律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是通过“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而得到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寻找中介环节”。（*TM*，MEW 26.3，第 83 页）尽管如此，仍不能说马克思已经使用了《〈政治经济学〉导言》当中的方法，原因有如下两个。一方面作为出发点的范畴必须反映最高可能性的抽象。在《资本论》中作为开始的商品，首先却是“一种有用的东西”（*KI*，MEW 23，第 49 页）；他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它称为“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MEW 19，第 369 页，参见第 361—362 页）。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尚未完全清楚《资本论》中抽象的历史性特征。如果人们笼统地把商品理解成抽象，并作为阐述的开始，那么人们就忽视了它的资本主义特有性质。

把“上升”的方法，实际上是古老的伽利略的从**决定**（*resolutio*）到**构成**（*compositio*）的方法，作为所有科学研究普遍的辩证方法来推崇（参见 Wittich 等 1978，第 475 页及以下），这在马列主义的大众哲学性文献中普遍存在。由此会忽视，抽象对于马克思来说，是某种在资本主义当中含有特殊作用性的。把《资本论》的方法运用到例如前资本主义或者未来的社会主义形式，这是不允许的，对于资本主义特有领域的抽象来说，缺乏这些社会形式所具有的直接社会化特征的劳动。

自此还没有去尝试，让这对概念在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中变得富有成果化。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1972）的

尝试属于为数较少也不十分令人信服的例子，他将交换抽象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实际抽象，来解释抽象思维的形成。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Vorwort für die Leser von Buch I des 'Kapitals'«, in ders.,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West-Berlin 1973, 75-110 (»Avertissement aux lecteurs du livre I du *Capital*«, Vorwort zur französischen Taschenbuchausgabe von *K I*, Paris 1969); ders u. É. Balibar, *Das Kapital lesen*, Reinbek 1972; P. Aubenque, »Abstrakt/Konkrete«, in HWPh; Autorenkollektiv, *Kategorien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 Berlin/DDR 1960; Autorenkollektiv, *Geschichte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Berlin/DDR 1974; G. Bensussan, »Abstrakt/Konkrete«; in: KWM 1, 30ff; H. Brinkmann, *Die Ware: Zu Fragen der Logik und Methode im »Kapital«*, Gießen 1975; B. Echeverría, »Critique of Marx' 1857 Introduc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7. Jg., Nr. 4, 1978; R. O. Gropp, *Grundlag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DDR 1971; E. Hahn,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tische Soziologie*, Berlin/DDR 1968;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Köln 1976 (5. Aufl., Berlin/W 1987); E. 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Marx*, Berlin/W 1979; G. Klaus, »Abstraktes und Konkretes«, in: PhWb; P. V. Kopnin, *Dialektik – Logik –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0; K. Kośik,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Frankfurt/M 1971; J. Mepham, D. -H. Ruben (Hg.),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Bd. 1, Atlantic Highlands 1979; O. Morf,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Wien 1970; I. Narski, *Dialektischer Widerspruch und Erkenntnislogik*, Berlin/DDR 1973; A. Negri, *Marx oltre Marx*, Mailand 1979; P. Nowak, *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 Dordrecht, Boston 1980; S. M. Orudshew, *Dialektik als System*, Berlin/DDR 1979; J. Pröhl, »Das Aufsteigen 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 in: *DZPh*, 22. Jg, 1974, Nr. 4, 429ff; M. M. Rosental, *Die marxistische dialektische Methode*, Berlin/DDR 1953; ders.,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Berlin/W 1973; H. -J. Sandkühler, *Praxis und Geschichtsbewußtsein*, Frankfurt/M 1973; D. Sayer, *Marx' Method*, Hassocks 1979; A. Schmidt,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München-Wien 1971; W. Schwarz, *Vom »Rohentwurf« zum »Kapital«*, Berlin/W 1978; W. Segeth,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als Methode*, Berlin/DDR 1977;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M 1972; G. Stapelfeldt, *Das Problem des Anfangs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New York 1979; W. Tuchscheerer, *Bevor »Das Kapital« entstand*, Berlin/DDR 1973; D. Wittich u. a.,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8;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M-Wien 1973.

韦科·皮耶提拉
（Veikko Pietilä）撰
张雪亮 译，林芳芳 校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bstrakte Tätigkeit, allgemeine Arbeit, Analyse/Synthese, Anfang, Aufbaupläne,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mpirie/Theorie, Epistemologie, Forschung/Darstellung,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ethode, Oberfläche/Tiefe,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Totalität, Wesen/Erscheinung

抽象劳动（abstrakte Arbeit）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s 44*）（MEW 40，第 477 页；MEGA I. 2，第 208 页）中，为了描述异化的、片面化的劳动，而顺带地使用了这一概念，以此将黑格尔对抽象劳动的使用与分工联系了起来（*RPh*，§198；*Enz*，§§525f）。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Zur Kritik*）中，抽象劳动获得了新的内涵，从而成为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在这里首次区分了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因为后者“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也就“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从而被马克思描述为“**抽象一般的劳动**”。（MEGA II.2，第 109 页；MEW 13，第 17 页）此时的抽象劳动很大程度上还是“简单”劳动的同义词：“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这是每个平常人都能学会的**简单**劳动……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所有劳动量的绝大部分。”（同上书，第 110—111 页；第 18 页）

马克思在此联系到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的观点，即简单劳动作为价值尺度，这是现代工业所形成的结果。（参见 MEW 4，第 85 页）不过，马克思还没有区分开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由于抽象劳动和简单劳动被等同起来，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也被等同了起

来：一个过程是随着机械化的推进，必要的专业性劳动现在变成多余的了，这
57 也就是具体劳动方面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另一个过程是在交换中发生的抽象，即对各种具体劳动的产品所实际存在的不同的质的抽象。

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MEGA II.5，第 22 页；MEW 23，第 56 页）。但是直到第二版，抽象劳动才同简单劳动严格地区别开来。至此，马克思才在第一章开头使用抽象劳动概念。例如，他不再说，一个使用价值具有价值，“因为有**劳动对象化**在里面”（MEGA II.5，第 20 页），而是说，“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MEGA II.6，第 72 页；MEW 23，第 53 页）。

概念的批判性内涵。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批判，认为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做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MEGA II.5，第 48 页注释）但是，抽象劳动概念的批判性内涵绝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对古典的劳动价值论的说明，马克思在这种说明中并未增补什么（他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重大的差别。而对于后续的论述（例如价值形式分析）的核心内容而言，这种差别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借助抽象劳动，马克思把握住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社会**特性，这一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不具备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基于一种“真实价格”的存在而将劳动设定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Reichtum*，第 409 页）劳动在这里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个体性的、非社会性的过程，这种劳动由于其付出的辛苦而赋予商品以价值特性。与之相反，马克思强调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K I*，MEGA II.6，第 75 页；MEW 23，第 56 页）。它必须既要满足一种特定的社会的需要，又要满足其生产者的各种需要。而后者得以可能，“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
58 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同上书，第 104 页；第 87—88 页）。

如果说上述的第一种特性（满足社会需要）是每一种分工生产所共有的，那么第二种特性（作为抽象人类劳动而等同）则是商品生产所特有的，对马克思而言，它也就此构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独有的**社会特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体性**耗费的劳动并不**直接**就是社会性的，而是通过交换才具有了这种社会性："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Zur Kritik*，MEGA II.2，第113页；MEW 13，第21页）

由于古典经济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提供类似于抽象劳动的概念，因而也没能理解劳动的独特社会特性，它们对经济关系的观察也就停留于向个体化的个人视角的还原上：用个人的计算的理性来解释经济结构的结果，并以此作为个人行为的前提。

抽象劳动的历史性。抽象劳动，就其是对每一种劳动的生产性规定的抽象而言，也被马克思形容为"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耗费"（*K I*，MEGA II.5，第24页；MEW 23，第58页），而《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也"在生理学意义上"（MEGA II.6，第79页；第61页）谈到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的抽象人类劳动。这样的论述容易让人以为，抽象劳动概念只是表示一般的、对各种劳动耗费都适用的生理学特性。但是，在另一些地方，马克思表明，抽象劳动不是对自然特性的概括，而是指一种在社会中**被赋予的**特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曾提出"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MEGA II.2，第136—137页；MEW 13，第45页）。而在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时，他注释道："只有通过交换，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之后，不同的具体的私人劳动才化为这种相同的人类劳动的抽象。"（MEGA II.6，第41页）劳动的抽象不是进行反思的主体（完全脱离像交换这样的社会过程）通过比照不同的劳动就能得出的、劳动的最一般的规定性，而是在实践中发生的抽象，产品通过交换而均等化，从而抽象掉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不同劳动的特殊性。这种通过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而获得的抽象结果，不是一种生理学上的一般性，而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规定性。

抽象劳动的规定中的这种矛盾导引出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即抽象劳动是在一切生产方式中存在，还是只在商品生产中存在：作为生理学特性的概括，抽象劳动似乎是超历史性的；而作为一种特定的、通过交换而建构起来的劳动之间的联系的表达，它又并非超历史性

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未明确地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不过在他分析劳动过程时，即唯一的一处考察劳动过程的超历史性元素时，他没有提到抽象劳动概念。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抽象劳动的意义是明确的："劳动作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则相反，它是劳动的一种特有的社会形式。裁缝的劳动……生产上衣，但不生产上衣的交换价值。它生产后者时不是作为裁缝劳动，而是作为抽象一般劳动，而抽象一般劳动属于一种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由裁缝缝出来的。"（MEGA II.2，第115页；MEW 13，第23—24页）

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马克思不是把劳动本身，而是把抽象劳动规定为价值的"实体"：一种财物成为价值对象，只是因为有抽象劳动"对象化"在里面。（*K I*，MEGA II.6，第72页；MEW 23，第52—53页）这里并不是说，有一种类似于物质性的基质被放进了单个产品当中，进而表现为产品的价值存在，这一点通过马克思所使用的隐喻已经表明了。马克思把这种抽象劳动的对象性称为"抽象的对象性，一种**思维之物**"（MEGA II.5，第30页），"幽灵般的对象性"（MEGA II.6，第72页；第52页），"纯粹的想象的对象性"（MEGA II.6，第32页）。商品的价值存在之所以是一种想象的对象性，是因为在商品占有者面前，这种价值存在表现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事物的物性，但这种特征在这些物本身中却完全没有物性根据。这种价值对象性是一种在**社会中实际应用的有效关系**、一种在社会中有效的特征，但它不是有目的的交易的结果，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联系形式的**效果**。就像马克思在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段落所指出的，产品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事物的物性。不过，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抽象劳动的对象性只能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这凸显了它的"想象的"特性。在**单个**物中没有价值对象性，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修改稿中讲得最清楚：如果想要将上衣和麻布化为作为价值的对象化抽象劳动，那么就"忘记了，并没有**这样的价值对象性**，它们只有在作为**共同的对象性**的时候，才是价值对象性。在它们的彼此联系之外——它们在这种联系中等同化——就既不存在上衣的**价值对象性**，也不存在麻布的**价值对象性**"（MEGA II.6，第30页）。

马克思想要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价值的量，而计量劳动的尺度是劳动的

持续时间（*K I*，MEGA II.5，第 20 页；MEW 23，第 54 页），更准确地说，是在社会正常条件下，平均而言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MEGA II.6，第 73 页；第 53 页）。但这种规定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把同种具体劳动形式下的不同个体的耗费化为一种平均尺度。如果把它理解为关于价值量的衡量尺度的最终论断，那就不仅把具体劳动当成了抽象劳动的尺度，从而抹平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假定了，可以脱离交换来衡量**单个**财物的价值。可是，如果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能是其**共同的**价值对象性，即在交换关系范围内的价值对象性，那么价值的大小也就不能脱离这种关系之外来确定。而在交换关系中，当一种商品与作为价值的独立定在的货币发生联系后，它的价值才能被等价地表现出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这一点在论述该问题的一开始就被指出了，马克思强调，个人的劳动时间在价值中表现为“**一般劳动时间**”，而这种一般劳动时间必须在
61 一个“一般产品、**一般等价物**”（MEGA II.2，第 111—112 页；MEW 13，第 19—20 页）中表现出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价值形式和交换过程的篇章中详细论证了这种联系。成为价值尺度，这是简单流通中货币的第一个形式规定性。货币的这种价值尺度的功能不会因为劳动时间的计算（那么也就不会因为提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被取消，这在马克思同各种劳动货币理论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明确。（MEGA II.2，第 155 页及以下；第 67 页及以下；MEGA II.5，第 59 页；第 109—110 页）

对抽象劳动概念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还比较表面，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抽象劳动的概念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不仅在考茨基（1887）和卢森堡（Luxemburg）（*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1925］，GW 5）的通俗化阐释中，这一概念没有出现，而且在希法亭（Hilferding）（1904）针对庞巴维克（Böhm-Bawerk）（1896）的批判而为马克思价值理论所做的辩护中，以及在列宁那里，抽象劳动的概念也都没有特殊的地位。

在这一阶段对抽象劳动概念最详尽的阐释并不来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来自弗朗茨·彼得里（Franz Petry）（1916）。从李凯尔特（Rickert）对于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方法的区分（参见 *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Tübingen 1913，第 530 页）出发，彼得里相信，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可以发现一种自然科学的因果阐释与一种“社会的”观察方式的二重性。尽管这种重建对马克思著作的总体而言未必有充足根

据，但却推动彼得里想要阐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文化科学形态”（1916，第3页），从而揭示了马克思概念中的社会理论的特性。因此，他对抽象劳动的分析强调，这一概念不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类的概念，而是关于私人劳动的社会形式，不过他直接将这种社会性划归为作为法权主体的人的行为（同上书，第23—24页）。尽管希法亭（1919）在一篇长篇书评中对彼得里的新康德主义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但也没有注意到他对抽象劳动的阐释。对此，鲁宾（Rubin）的判断或许是适当的，他认为彼得里提出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们一度忽略的马克思理论的问题，但彼得里本人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28，第365页）

62 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出现了一场关于价值理论的热烈争论，这一争论的最有意义的成果当属鲁宾的研究工作。鲁宾详细阐释了抽象劳动概念，并区分了生理学的劳动、社会性的同等劳动和抽象性的一般劳动。（1924，第50页及以下，第100页及以下）不同于对抽象劳动的自然主义理解，他从对这一术语的“生理学”理解中跳脱出来，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指的是一种“特有的劳动均等化的历史形式”，它“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而且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同上书，第95页）在斯大林主义兴起之后，鲁宾较早成了受害者，这一讨论也随之中断了。

由于对抽象劳动概念的忽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主要被当作一种量化的交换关系的解析，而这又构成了论证剥削的前提，这样一来价值理论中的社会理论的意蕴就被简化处理了。这一点在斯威齐（1942）、米克（Meek）（1956）和多布（Dobb）（1977）的早期英语世界的马克思研究文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西德，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打上了批判理论的强烈印记，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和方法论意蕴得到了挖掘，然而并未深入到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中。只有阿多诺的学生克拉尔（Krahl）（1971）进行了一项这方面的研究，但抽象劳动在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而从巴克豪斯（Backhaus）（1969，1974）和莱希尔特（Reichelt）（1970）的研究开始，在关于“资本逻辑”以及抽象劳动的社会理论意蕴的思考中，出现了一场全新的价值理论的争论。

在产业社会学的研究中，抽象劳动有时被误解为可感的范畴，用来反映自动化进程中劳动过程变得机械化和去感性化。

在英语世界，鲁宾著作的翻译等推动了关于价值理论的热烈争论和对抽象劳动概念的研讨。（参见Itoh 1976和Elson 1979中的论文）但同时，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评也增多了。斯拉法

（Sraffa）（1960）基于一种经济体系的量化的再生产结构，发展出新李嘉图主义的生产价格计算的概念，有学者基于此而提出价值理论也是“可有可无的”，
63 因为生产价格的确定可以脱离先前对价值量的判断（Steedman 1977）。而价值的计算在新李嘉图主义的模型中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它把一种恒定的再生产的平衡状态设定为前提，另一方面，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被等同于先于交换而定量的用于生产的必要均质劳动。反对对马克思价值理论进行新李嘉图主义阐释的学者则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种理解错失了抽象劳动概念所针对的问题，即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DeVroey 1982；Ganssmann 1983）

一场新的价值理论争论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联邦德国。布伦特（Brentel）（1989）把劳动价值论解读成一种由马克思所发明的、针对经济社会的对象性的运作机制的理论。由于这种价值理论只有作为资本理论才能被理解（同上书，第265—266页），布伦特把抽象劳动理解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社会化的一个“可预见的总体性概念”（同上书，第124页）。布伦特想要重构马克思的理论创见，并针对各种误解做出辩护，但他只看到了解读者们的问题，却没有看到马克思的问题。海因里希（Heinrich）（1991）则提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内在问题：马克思的理论一方面是一场科学的革命，它冲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域，另一方面它又往往深陷于这一理论域中，两种话语的叠加引发了各种冲突矛盾。在抽象劳动概念中，也交叠着相互难以统一的含义：一种是“社会性”理解（抽象劳动作为不同质的劳动的社会强制的均等化的结果），另一种是“自然主义”理解（抽象劳动作为生理学规定的概括）。而贝伦斯（Behrens）（1993）主编的文集尤其从认识批判的视角出发，将价值理论的争论引向了深入。

参考文献：

H. -G. Backhaus, »Zur Dialektik der Wertform«, in: A. Schmidt (H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128-152; ders.,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1*, Frankfurt/M 1974, 52-77; D. Behrens (Hg.), *Gesellschaft und Erkenntnis. Zur materialistischen Erkenntnis- und Ökonomiekritik*, Freiburg 1993; E. v. Böhm-Bawerk, »Zum Abschluß des Marxschen Systems«（1896）, in: F. Eberle (Hg.), *Aspekte der Marxschen Theorie 1*, Frankfurt/M 1973, 25-129; H.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Studien zum Gegen-*

stands- und Methodenverständnis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Opladen 1989; M. DeVroey, »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 Critical Review«, in: *Capital & Class* 17, 1982, 34-59; M. Dobb, *Wert- und Verteilungstheorien seit Adam Smith*, Frankfurt/M 1977; D. Elson (Hg.), *Value.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bour in Capitalism*, London 1979; H. Ganssmann, »Marx ohne Arbeitswerttheorie?«, in: *Leviathan*, 11. Jg., 1983, H. 3, 394-412; M.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Hamburg 1991; R.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Marx-Kritik« (1904), in: Eberle, aaO., 130-192; ders., Rezension von Petry, in: *Grünberg-Archiv*, 8. Jg., 1919, 439-448; M. Itoh, »A Study of Marx's Theory of Value«, in: *Science & Society*, 40. Jg., 1976, H. 3; K. Kautsky, *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Stuttgart 1887; H. -J. Krahl, »Zur Wesenslogik der Marxschen Warenanalyse«, in: ders.,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M 1971, 31-81; R.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1956; F. Petry, *Der soziale Gehalt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Jena 1916; H.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M 1970; I. I. Rubin, *Studien zur Marxschen Werttheorie* (1924), Frankfurt/M 1973; ders., »Zwei Schriften über die Marxsche Werttheorie«, in: *Marx-Engels Archiv*, Bd. I, 1928, 360-369; P. Sraffa, *Warenproduktion mittels Waren. Einleitung zu einer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1960), Frankfurt/M 1976; I.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1977; P. M. Sweezy, *Theo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1942), Frankfurt/M 1970.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Michael Heinrich）撰
张义修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rbeitszeit, Arbeit, Ausbeutung, Bedürfniss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nkform,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infache Zirkulation, Fetischcharakter, Form und Substanz, Geld,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apitallogik, Kategor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ritische Theorie, lebendige Arbeit, Naturwissenschaft, Neoricardianismus, Produktionsweise, Sraffaismus, Stalinismus, Stoffwechsel, Wertform, Wertsubstanz, -maß, Wert, Zeit

抽象活动（abstrakte Tätigkeit）

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在他关于资本主义人格理论的论述中提出了这一概念。他类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概念，界定出了“精神产品”（1972，第 327 页）、“具体人格”与“抽象人格”（第 354—355 页）、人格发展中的“精神进步”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进步率下降的趋势”（第 368—369 页）、能力的“固定资本”（第 219—220 页）。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学习能力**和与之相关的**时间规划**（相当于“上层建筑”之基础意义上的“基础设施”；第 338 页及以下），后者可以在时间量的“有机构成”中被观察到，也构成“抽象”或“具体”人格的有益部分，或者说，与那些只是运用了能力的活动不同，学习能力本身表现为能力的增强（第 388 页）。由此得出的范式“相当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个性形式下产生的人格的一般拓扑学**的构想”（第 356 页）。

抽象活动概念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中人的异化的观点。塞夫对此的理解是：由于雇佣劳动者将社会劳动用于他人的、私人的用途，这种劳动就成为抽象劳动。劳动者不能从中学到任何东西，因为这种劳动和劳动者本人无关。而另外一些活动，例如在家中的活动则是具体的，如果这种活动和劳动者本人相关的话。但是，从这些活动中，比如从狭义的消费、非学习性活动中，劳动者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这里所谓的相关性，作为一个规定性范畴也是不充分的。但是这足以为下列观点奠定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者必然会产生分裂的人格。这种分裂产生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生产劳动的抽象性与私人活动的具体性之间。塞夫把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分析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个命题联系在一起：“抽象的活动性立即表现为异化的活动性。它屈从于外在的必然性，并且或多或少与具体人格的愿望相异化。但是个人也正是在抽象的活动性中，与发达的生产力及社会关系建立起联系，简言之，与人性的现实本质和主要传统建立起联系。这就是说，在**这种**活动性中，个人必须现实地占有人的本质。”（第 349—350 页）但是，如果没有在具体的、私人的领域有所补偿，社会活动的抽象性将阻碍从中可能形成的发展与学习效应——相反，本来可能有所学习的具体的、私人的领域，只会重演抽象的非学习性。发展将会被堵塞，而人格也可能受到损害。“具体人格和抽象人格的分裂导致了精神的活动性与人格自身的对立。这种分裂强加给精神的发展方式，把精神束缚于一个无法超越的局限之中。”（第 349 页）资本主义社会中，相对令人满意的生活保留在

65

66

一小部分研究者和艺术家身上。而在通常情况下，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生活是分裂的，它将力量从世俗中抽离出来，注入私人领域。最后，还存在着一种战斗性的生活，它推动着生活的具体化，比如，通过对工作的热爱，投入其社会性中。在这种方式下，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性的斗争的生活。

塞夫对马克思一系列概念的类比性运用，受到了乌特·霍尔茨坎普-奥斯特坎普（Ute Holzkamp-Osterkamp）（1976，第150—183页）等人的尖锐批评："这种假设认为，随着人已经获得的能力的增长，能力发展的进步必然会趋缓（塞夫类比的是经济学事实。即随着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增长，利润率会下降），这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主义的假设**，它把人在晚年发展动力减弱的真实的、具体的形成原因，藏在了一个非历史的、本质主义的标签背后。"（同上书，第177页）塞夫的类比以独特的方式挪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提到的东西。尽管如此，对开展关于人格与劳动的经验性研究而言，塞夫的构想还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参见PAQ 1978，第22页及以下）也有批评意见认为，不能完全用社会形式来解读人的本质。一项研究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时研究自然基础的社会形式，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U. Holzkamp-Osterkamp, *Motivationsforschung 2. Die Besonderheit menschlicher Bedürfnisse – Problematik und Erkenntnisgehalt der Psychoanalyse*, Frankfurt/M 1976;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Entwicklung der Arbeitstätigkeiten und die Methode ihrer Erfassung*, Berlin/W 1978; L. Sève, *Marxisme et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Paris 1972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Frankfurt/M 1972).

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撰
张义修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neignung, Bedürfnis, Befriedigung,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ntfremdung, Individualitätsformen,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rnen, Notwendigkeit, Ökonomie der Zeit,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Subjektwissenschaft, Tätigkeit, Zeithaushalt

猿（猴子）（Affe） 67

口语中表示动物的多义概念：（1）口语中"猿/猴子"一词指灵长目动物

所有非人类的物种；（2）在动物学分类中，只有灵长目人猿亚目——包括阔鼻小目、狭鼻小目和类人猿——的代表动物才能被称为“猿/猴子”；（3）这个概念常常限于指代类人猿（Pongidae）这一在物种进化意义上与人类最亲近的动物。由于此概念作为一般的动物概念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有各种变例形式，以区分灵长目与人类演化状况中的物种进化等级：“原猴”（Halbaffe）、“类人猿”（Menschenaffe）、“猿人”（Affenmensch［Pithecanthropus］）。口语中诸如“奇耻大辱”（Affenschande）、“无理取闹”（Affentheater）、“溺爱”（Affenliebe）等大量派生词都表明了这一动物概念的鲜活意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此概念来隐喻全部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群体。这一群体虽然一方面还属于自然界，另一方面却是物种进化意义上与人类最亲近的动物。因此，作为对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间联系的典范性说明，动物与人的对比通过具体描述猿与人的不同关系而得到了尤为准确的阐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DN*）中写道：“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MEW 20，第323页）对猿，特别是类人猿和此处提到的黑猩猩，与人的区分被用于论证人类特有的历史性，因此人类被与一个“异常高度发达的类人猿的种属”（同上书，第444页）相比较。“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同上书，第322页） 68

对人猿区别最重要的经验思考是恩格斯在1876年撰写、1896年首次发表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Der Anteil der Arbeit an der Menschwerdung des Affen*）中做出的。基本思想是：猿与人真正的区别特征是作为积极的改造自然与占有自然的劳动，除此之外，也指出了进食、行动方式与相对于人类劳动过程的生活方式的区别特征。一个中心思想是灵长目动物向前行走方式的变化是人类产生的自然史前提。“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缘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MEW 20，第444页）因此，恩格斯先于后来的灵长类学和人类学而对

以下三个解剖学基本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1）分成五部分的肢体作为所有灵长目动物的抓握工具对于人类后来使用手的功能意义；（2）从爬行的树栖生活方式过渡到人类祖先用两脚向前行走的陆地生活方式；（3）伴随着体轴垂直与由此产生的前肢退化的人类身体直立。“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运动。但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如此，并且非常笨拙。它们的自然的步态是采取半直立的姿势，而且用手来帮忙。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握成拳头的手指骨支撑地面，两腿收起，身体在长臂之间摆动前进，就像跛子撑着双拐行走一样。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用四肢行走到用两条腿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用两条腿行走。”（同上书，第 444—445 页）

目前存在着几种竞争性的假说，从不同的适应树栖生活的专业分工来解释直立行走与手的自由，从而解释猿与人的区别。此后，人类祖先以特定的方式适应了树林群落中的摆动四肢交替前行的爬行方式，这使恩格斯描述的双脚行走与身体直立成为可能，并随着适应草原群落的陆地生活方式将双脚行走作为典型的向前运动方式继续发展。恩格斯对“类人猿”的生活方式的说明更具浪漫色彩：“它们浑身长毛，有胡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同上书，第 444 页）现在，从猿到人的转变得到了古人类学、灵长类学、比较解剖学及其他专门学科的研究。

参考文献：

W. Angst, *Aggression bei Affen und Mesnchen*, Berlin/W-Heidelberg-New York 1980; G. H. Bourne (Hg.), *Progress in Ape Research*, New York-London-San Francisco 1977; I. Eibl-Eibesfeldt, *Die Biologie des menschlichen Verhaltens. Grundriß der Humanethologie*, München-Zürich 1984; P. H. Harvey, T. Clutton-Brock, »Primate home range: size and metabolic needs«, in: *Behavior,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2. Jg., 1977, H. 8, 151-156; R. H. Hinde (Hg.), *Primate Social Relationship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Chicago 1983; A. Jolly, *Evolution des Primatenverhaltens*, Stuttgart 1975; W. Köhler, »Psychologie der Schimpansen«, in: *Psychol. Forschung*, 1, 1921, 2-24; H. Kummer, »Schwerpunkte soziobiologischer Freilandforschung an Primaten«, in: *Verhandlungen der Dt. Zool. Ges.*, 68, 1975, 59-70; J. v. Lawick-Goodall, *Wilde Schimpansen. Zehn Jahre Verhaltensforschung am Gomte-Strom*, Reinbek 1971; D. Morris (Hg.), *Primate Ethology*, London 1967; J. R. Napier, P. H. Napier, *A Handbook of the Living*

Primates. Morphology, Ecology and Behavior of Nonhuman Primates, London-New York 1967; D. Premack, *Intelligence in Ape and Man*, Hillsdale 1976; G. B. Schaller, *The Mountain Gorilla. Ecology and Behavior*, Chicago 1963; V. Schurig, »Experimentelles Bewußtsein bei tierischen Primaten?«, in: P. Hejl, W. K. Kock, G. Roth (Hg.), *Wahrnehmung und Kommunikation*, Frankfurt/M-Bern-Las Vegas 1978, 63-179; ders.,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ol Behavior in the Chimpanzee«, in: M. Frese, J. Sabini (Hg.), *Goal Directed Behavior. The Concept of Action in Psychology*, Hillsdale 1985, 20-33; T. A. Sebeok, J. U. Sebeok, *Speaking of Apes*, New York-London 1980; F.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 Sex Among Apes*, New York 1982; F. de Waal, *Wilde Diplomaten. Versöhnung und Entspannungspolitik bei Affen und Menschen*, München 1993; S. C. Washburn, I. de Vore, »The Social Life of Baboons«, in: *Scientific American*, 204, 1961, 6, 62-71; R. M. Yerkes, A. W. Yerkes, *The Great Apes*, New Haven 1929.

福尔克·舒里希
（Volker Schurig）撰
胡晓琛 译，沈红文 校

参见：
Anatomie, Anthropologie, Arbeit, aufrechter Gang, Darwinismus, Kampf ums Dasein, Kopf/Handarbeit, Metapher, Naturgeschichte

非洲生产方式 70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此概念来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两种论断：站在地理学**常识**（*bon sens*）的立场上，第一种论断认为在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时述及非洲是荒谬的。第二种论断更具理论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典图式似乎无法被直接归类为非洲独一无二的社会经济模式。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方面以建立在集体生产活动基础上的农村共同体为前提；另一方面，这些共同体被总合成一个凌驾一切的统一体（参见 *Gr*，第 376—377 页；MEW 42，第 383—384 页），这个统一体能够以国家政权的形式强迫人民大众从事集体劳动：这种普遍化的奴隶制显示了一位既剥削也命令这些共同体的专制君主的最高经济指令权。国家由此证明自己是一位企业主，尽管技术水平很低，仍然可以实施巨大的工程：灌溉工程（近东两河文化的国家），军事设施（中国的长城），炫耀性建筑（金字塔）。

显然，这种最高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黑非洲是找不到的。即使有人可能将这一形式归类为非洲专制主义的确定形式，它也始终缺少推动因素，即那种一般的奴隶制。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这种奴隶制，也许例外是——但这只是一个假说，不断受到考古学家的质疑——在非洲南部石块建筑文化貌似巨大的建筑群（津巴布韦［Simbabwe］废墟，10 世纪至 14 世纪）中。

意识到这一差异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试图在非洲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变例：让·叙雷-卡纳勒（Jean Suret-Canale），不得不承认专制主义在字义上的缺陷，设法将亚细亚生产方式宽泛地定义成“建立在农业共同体基础上的生产机构……与……各种形式（然而始终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人剥削人共存的现象”（1964，第 21 页及以下）。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1969）在
71 区分“拥有巨大建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本来的形式）与“没有巨大建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引发了类似的不满。而且定义的特征似乎不令人满意，因为这个排他性的定义在生产领域本身切断了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从而确实避开了生产方式的推动因素。

因此，1969 年产生了规定一种特定的非洲模式的想法。当时还被人们视为亚洲模式变例的东西，后来被萨米尔·阿明（1976）更确切地理解为“贡赋性生产方式”的一个特例。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1）生产力水平极低；这些农村社会中的农业生产主要使用初级的技术；只有发展很不充分的分工（手工业稀少；大部分技术工人与特权阶层成员也以土地为生），交换关系始终是外围的（peripher）；存在着一种共同体组织，这种组织通常并且尤其在黑非洲不了解土地的私人占有；（2）社会被分成两个主要阶级，即在大多具有农村特征的小共同体中被细分的全体农民，与同样没有社会差异的占统治地位的贵族。贵族整合了政治权威与体现为贡赋收入的经济力量。但一般说来（并且在黑非洲普遍如此），贵族统治共同体时不直接干预生产条件。

到处攫取权力的国家首脑在统治阶级帮助下获取收入，这些收入事实上很少是压榨全体农民得来的。因为黑非洲正是世界上最没有能力通过农业产生剩余价值的地方（贫瘠的土地，容易进入干旱期，缺乏私有制）。似乎没有哪位统治者曾依靠农村生产而留存大量食物；统治者更满足于家庭型剥削的组织，由其夫人们（例如在达荷美［Dahomey］）负责，借助“家庭奴隶制”（Haussklaverei）的力量。无论一般的奴隶制还是古代的劳动奴隶都不能与之相比（生产中的奴隶制直到 19 世纪才随着

奴隶贸易的终结而富有意义）。

非洲的专制君主剥削自己的国民要
72 少于剥削毗邻的部落。被占有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来自异地贸易。有两种获利手段：战争与贸易。战争是**寄生性军事国家**（*parasitär-militärische Staaten*）的标志性生产方式，例如莫西（Mossi）王国或布干达（Buganda）王国。这类国家的国家机器等同于一家外向型的掠夺性企业，为军队领袖与最勇敢的战士获取战利品——奴隶、牲畜、奢侈品。尽管如此，一大部分异地贸易还是通过和平途径在两个互补的地区（例如中世纪的苏丹诸王国或17世纪至19世纪的阿散蒂人（[Aschanti]）之间完成的。最后，黑非洲诸王国的特征是侵略战争与异地贸易的结合。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把这种外源性的流通归结为一种生产形式，然而是一种没有中介的和表面的生产。这种生产被证实是退化和掠夺性的，因为人与商品只是从土地上穿过而已。

“贡赋”可能到处都存在，但从不是唯一的，而且共同体生活与国家政权并行组建，并不一定受到国家政权的干涉。因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的变例得以在同一个总体中共存，某些研究者将这一总体划分为同样多的生产方式：（1）一种与出身结合的生产方式（“门第生产方式”[mode de production lignager]），以农村共同体农业上的自给自足为基础，有时具备很强的统治力，以致使凌驾一切的政治权力被清除（不久前还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或“非国家的”社会；参见Rey 1971，第526—527页）；（2）一种蓄奴的生产方式，使劳动奴隶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19世纪末包括萨莫里［Samori］国、拉巴［Rabeh］国或上乌班吉［Ubangi］诸苏丹国在内的苏丹各社会形态；参见Meillassoux 1986）；（3）一种强大等级制社会的伪封建生产方式（沃洛夫［Wolof］王国，富拉尼［Fulbe］酋长国），社会中的政治领袖试图通过损害共同体来占有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与殖民统治建立联系并在其支持下，这种体制的特性普遍体现得更加明显（例如1900年英国土地法颁行之后的布干达王国，塞内加尔［Senegal］懋立兄弟会［die muridischen Marabuts］的宗教领袖们）。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是唯一的经济范畴：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已经清楚地表明，生产在非洲社会中被 73
融合进社会与宗教生活总体的程度有多高。毕竟经济基础与制度性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经验上”是无法区分的。在宗教占据着科学的地位的前科学背景下，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举个例子，人们既不能将播种与家庭这个生产与消费单位中的社会分工相分离，也不能将其与旨在确保一片肥沃的

土地定期降雨并取得丰收的赎罪仪式相分离。

也就是说：一种将“生产方式”归结为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概念是典型的西方概念，这种概念是与工业资本主义同时产生的。这种概念显然以对类型与力量的“笛卡尔式”区分为特征：涉及经济的事物能够与涉及法律、政治或宗教的事物孤立开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成为生产方式的原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下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研究了这种生产方式。从这种一般性论断出发，主要区别显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后者可以如阿明所述，被称为“贡赋性的”（tributäre）或“农业性的”生产方式。

不考虑其一般特征的话，这种区别不是无用的。它的优势在于强调了不可忽视的情况，即非洲与西方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与农业和前工业社会的特性有关。此外，那些显著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历史文化差异不应被贬低，例如西方个人所有权概念的意义，这一形式的概念在非洲不存在。相对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共性是，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生产资料是土地，生产单位存在于广泛意义上的家庭单位中（英语名称 *household* 更好，因为它面面俱到，并且包含了比家庭纯粹“生物的”方面要复杂得多的社会现实）。通过动态的、历时性地超越地理边界的区分方式，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对立就取代了不同文化圈（西方与黑非洲或亚洲的对立）之间的静态区分方式。

因此，只有当阐述一般模式的“生产方式”概念允许在种种具体案例之内建立统一性与联系时，它才是有用的。对黑非洲来说，这一概念在实践中出现了大体按时间排序的形式：（1）前殖民主义非洲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领域的特征是技术发展水平低下背景下人与土地的优先地位。在这一背景下，“私有制”概念的不存在尤其阻碍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个人土地买卖的出现。这一生产方式在生产关系领域的特征是建立在出身、地域与人身依附关系（包括庇护制与奴隶制）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变动总体；（2）在其西方语境上最为人熟知的、定义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殖民主义与之后的时期都作为外部的统治力量施加了影响；（3）相关的生产方式先后采取了两种形式，即首先出现的“殖民资本主义”与目前更个人化的“外围资本主义”。

这一模式没有局限于纯粹的要素“结合”——这些要素一方面来自前资本主义的（出身的、“家庭的”、“非洲的”、“贡赋的”，等等）生产方式，另

74

一方面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确切地说，它所涉及的生产（或非生产）关系尽管具有来自上文提到的几种生产方式的要素，却与服务于其他目的、遵循另一种逻辑的不同机制联系在一起。“庇护制”就不再与（不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关系与基于出身的生产方式有关，而是试图从“外围资产阶级”名流在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外围实现的利润出发，确保对零碎的利润（Brosamen）进行某种再分配。也就是说，只要明显依赖西方资本主义（它才使这种生产方式成为可能），非洲生产方式就是一种“外围的”生产方式。但非洲生产方式仍然是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因为它是一个连贯的总体，主要包含了“现代的”与非正式的领域之间的（而且不是一种二元结合）结构性共生。

75 **参考文献：**

S. Amin, *A quoi sert la réflexion sur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 Dakar 1976; C. Coquery-Vidrovitch, »Recherches sur un mode de production africain«, in: *La Pensée*, Nr. 144, 1969, 61-78; dies., »‘Mode de production’, histoire africaine et histoire comparée«, in: *Revue Française d’Histoire d’Outre Mer*, 65. Jg., 1978, 355-362; dies., »Modes de Production: les défis africains«, i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9. Jg., H. 1, 1985; M. Godelier, »La notion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et les schémas marxistes d’évolution des sociétés«, in: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1969, 47-100; C. Meillassoux, *L’esclavage en Afrique de l’Ouest*, Paris 1986; ders., *Anthropologie der Sklaverei*, Frankfurt/M-New York 1989; P. P. Rey,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Exemple de la Comilog au Congo-Brazzaville*, Paris 1971; J. Suret-Canale,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elles en Afrique tropicale et le concept d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in: *La Pensée*, Nr. 117, 1964, 21-42; ders., *Schwarzafrika, Geographie, Bevölkerung, Geschichte West- und Zentralafrikas*, 2 Bde., Berlin/DDR 1966 u. 1969.

卡特琳·科克里-维德罗维奇
（Catherin Coquery-Vidrovitch）撰
让·雷曼（Jan Rehmann）
译为德文
胡晓琛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nthropologie, Arbeitsteilung, Artikulation,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Ausbeutung, Bauern, Dependenztheorie, Dorfgemeinschaft, Erde, häuslich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ismus,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Privateigentum,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Sklaverei,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农业问题（Agrarfrage）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基础性著作中对农业进行了集中研究。1843 年，恩格斯提及了影响农业生产的三个要素：土地（土地的扩大是受限制的）、劳动力（可能伴随着收获量增长降低）与科学 ——“它的进步……是永无止境的”并且按几何级数发展（*Umrisse*，MEW 1，第 521 页）。马克思研究了农业生产率阶段并证明，农业生产率的发展走向不同于工业生产率的发展走向：一开始更快，然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时期”更慢。以后，“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然开始缩小，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增长得快。不过，这取决于与此相关的科学的发展和“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TM*，MEW 26.2，第 103 页）。

此外，马克思强调，他主要分析了具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农业。只有在这里发展才具有“典型的形式”（*K I*，MEW 23，第 171 页）。在实行小块土地制度与缺少机器与分工的法国，完全是另一种状况。除了详尽探讨地租之外，马克思还研究了农业生产的特殊条件。由于土地无法任意增加，而食物需求却在不断增长，因此必须耕种劣等地。它的生产费用随即决定了市场价格，从而产生了优等地的级差地租。（*Elend*，MEW 4，第 171 页）然而，原始生产者从新的发展，即资本流入农业领域中获利最少；这导致了“生产者的殉难史”，导致了“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K I*，MEW 23，第 528—529 页）空间上的孤立破坏了农业工人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马克思也将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视为“破坏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 —— 土地和工人。”（同上书，第 529—530 页）

马克思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对小农的剥夺（发生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中，也发生在普鲁士 1805 年至 1808 年的改革中）同时也是工业发展的前提，因为它提供了劳动力，建立了国内市场。不过他的说法不是农村劳动力外流（Landflucht），而是“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驱逐”（同上书，第 775 页）。他认为，

农村劳动人口减少及向“城市或手工业无产者”过渡是一个依赖于农业生产中的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他抨击了大土地所有制及其对小农与租地农场主常常是藐视性的剥削与驱逐，例如爱尔兰小农的贫困化与大规模外迁，小农场佃户（Crofters）（缔结一年期口头租地协议的苏格兰小租地农场主）的状况。不过他也发现，小农庄在别的地方没有完全消失，这是因为农民已经准备好放弃他们的一部分工资，因为他们贫穷，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具有生产性。

77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样分析了当时农业领域所有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问题——农业生产的特殊条件，地租，大土地所有制，爱尔兰农民与苏格兰租地农场主的贫困化，与工厂劳动及工厂工人的区别（分散化，困难的可组织性，但没有异化）。生态问题也得到了分析，例如“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与资本主义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及对人的过分损耗：不断更新的土地肥力的自然条件是衣食残留物向土地的回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城市越来越占优势，从而破坏着这种物质变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同上书，第 528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土地所有制这一基本问题上发现了土地从原始公有制——它规定了古老的农村制度，却无法利用新的科学认识——向私有制的辩证发展。这一点后来（在双重辩证意义上）再次被强调：“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同上书，第 791 页）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 B*）中研究了 19 世纪法国小农的特殊状况：农业改革使他们满足，分散化，与他们的阶级伙伴竞争，政治上无组织，没有自己的阶级代表。“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MEW 8，第 198 页——这一对比常常被作为证据引用，证明马克思对农民的否定态度，例如 Mitrany 1961）。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Bauernkrieg*）中将近代早期德国农民的阶级状况分析为他们革命立场的原因。剥削、压迫与无权状况使他们成为封建主的激进敌人。

2. 先是在第一国际（IAA）中，后来 78

在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几部短小著作中，就已经试图起草社会民主主义的农业纲领了。最重要的要求有：没收地主的财产，将大地产移交给在当地工作的农业工人共有，协作生产，小农联合为合作社，农业工人的结社自由。

19 世纪 80 年代末与 90 年代初，社会民主党开始在议会选举中取得成功，然而局限在城市工业中心与当地的工人中。为了拓展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基础，主要由于一个农业人口还占 70% 至 80%（丹麦）的时代，但也由于不平等的选举权，各党必须“向农村进发”。为此需要在农村进行鼓动与一份农业纲领。

马克思与恩格斯参与了持久的国际辩论。马克思询问了尼古拉-逊（Nikolai-On，即丹尼尔逊［Danielson］）对俄国特殊的农村制度（村社［*mir*］）的评价，即这种形式是否是合作制的，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结构的开端还是封建主义的遗迹。在长期的原始资料研究之后，马克思以便利的政治框架条件为前提，接受了前一种观点。这一答案始终有争议，并且后来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有内容错误。恩格斯 1894 年（MEW 22，第 483—505 页）对农业政策表了态。他认为，法国与德国同志们提出的不同纲领是可行的，并且认为，即便长期采用保护措施也拯救不了个人小农庄。但是，人们要给小农很多时间，还要给时间使他们相信自愿进行合作社协作的优点。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理地利用机械化与化学化的优势与进展。以儒勒·盖得（Jules Guesde）为首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采取了远比德国同志更亲近小农的立场。

在德国，农业问题是两大主要思潮聚焦的要点之一。这一问题有“战略”维度（农业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策略维度（在农村人口中赢得支持者）。1902 年，考茨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以农业领域也会有渐进的集中过程为出发点。考虑到有规律的发展，他认为特殊的保护措施，例如低廉的国家贷款与抵押，作用不大。相反，戴维（David）（1903 /1922）试图证明小农庄在依赖自然条件的生产中的优势。小农庄的机械化很难实现。小农庄在动物性生产中的地位也尤其不可撼动。劳务合作社将使小农得以在一切领域与大生产等量齐观。戴维以及特别是冯·福尔马尔（v. Vollmar）领导下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主张实施改良主义的政策以及具体的小农扶助。德国北部的同志更关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这些人由于三级选举权而在议会中任职人数偏高，并作为地主阻碍广大农业工人参与政治与工会活动。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就始终极为有限。

在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KapR*）中尝试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后来又修正了这一分析中的几点（*Das Agrarprogramm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ersten russischen Revolution 1905-1907*，LW 13，第 213—417 页）。他没有接受马克思对村社（*mir*）的评价。换而言之，他阐明了一个两阶段的纲领：首先，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必须把最进步的工人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权利斗争；然后，为了进一步斗争和革命要争取农民——“俄国劳动人口中庞大的一部分”成为政治盟友。农业问题成为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水岭，前者拥有众多农民支持者，后者在弱小的工人阶级反对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需要农民支持。1917 年革命中，他们最终接受了自身纲领中没有预计到的农民自发的占地与土地分配，尽管这些举动没有消除不公平的所有制结构，反而有时巩固了它。

农村阶级结构最重要的分析中也包括可能由陈伯达草拟的毛泽东的两部著作（1926，1927）。这些分析是为了制订合适的农业政策，使得广大被剥削的农民阶层能够与还很弱小的工人阶级结盟。恰好在农业社会中，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农民群众自愿而积极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除其他论据之外，这是反驳米特拉尼（Mitrany）关于共产主义者敌视农民观点的又一个论据。

3. 农业问题在革命之后产生了另一 80
个维度。如何开展农业改革以广泛满足土地渴望和平整所有制结构，却不妨害农业生产，并缩小农业生产中已经市场化的部分？为了社会主义，要争取哪些阶层，中立哪些阶层，剥夺哪些阶层的政治权力？上百万小农庄怎样才能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融合？它们能对计划的发展开端做出什么贡献？这一贡献程度如何？

所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在革命之后（确切地说，在用胜利和红军的进驻清除资本主义之后）都实施了激进的农业改革，从而广泛铲除了社会不平等，并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下一步，苏联随后实施了强制集体化。1945 年后，在主要由红军胜利，而非真正的革命所扩展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中，强制集体化作为苏联模式被实施。从大约 1950 年和 1951 年起，这一政策在南斯拉夫被放弃。卡德尔（Kardelj）遵循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种有成效的异端思想，在南斯拉夫实施了另一种社会主义农业政策，并开启了不再遵循苏联模式的不同的经济与农业政策。1956 年，波兰效仿了这个榜样，并放开实施了解散少数生产合

作社的办法。1956 年至 195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跃进”的高潮建立了人民公社，毛泽东宣称在奔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已经超过了苏联。1980 年后，这一尝试被撤回的同时，集中程度降低的协作形式与个体经济复苏。

农业领域对发展之初的贡献非常重要：它可以有不同的贡献形式。其程度在共产主义经济学家中始终有争议。如果过分要求农民受苦与放弃的决心，他们的动力就消失了；他们将被革命异化，从这一强制性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者转变成敌人。如果要素贡献过高，就会出现农业上的投资减少，损害其长期的生产力，成为计划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schenski）与布哈林提倡农业领域做出有节制的贡献，
81 对农业生产者提出适度的要求，而斯大林却在压缩到四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把这种贡献最大化。（有些苏联研究者怀疑，1929 年苏联的农业领域完全有能力做出要素贡献；参见 Bergmann 1984。）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农业纲领完全不一样，表现出可观的差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农业纲领在 1925 年党代会上获得通过，纲领相当程度上以“实用”农业政策上的社会主义长远目标为准。纲领规定，用多种途径支持乡村农业，使其从商业资本和累累负债中解放出来。农业工人的状况将得到改善。后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大林产与农业大地产的社会化。在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之后，剩余的财产一旦满足前提条件后就将被公有经济使用。农民劳动者的状况将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方式得到本质改善。随后，群众将会实践合作社思想，“并以此创造充分开展农业合作社事业的心理前提”。1911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农业纲领与之类似，尽管几乎没有提及农业大地产：“国有土地悬而未决”。实践的农业政策完全对农民有利，并以与农民协会结盟为目的。1927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农业纲领在党代会通过，毫无保留地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社会民主党的这一“积极的农业政策”在 1956 年被巴德（Baade）称为农业社会主义，尽管这一概念曾经是另一个意思。（Diehl 1911）

在亲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中，农业辩论由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而极为多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小农庄的作用与未来，过度生产，无产阶级化，失范与右翼极端主义受到重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受到分析的是农业运动、奋斗目标与改革，以及农村社会关系，此外还有国际化剥削的新方法，技术现代化的后果以及原始生产者的生产扩大，高科技的滥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农业生产者还只占从事生产者的少
82 数（低于 10%）；他们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极小。因此，社会主义政策在着

手变革农业领域时还需要很多耐心。然而，农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F. Baade, »Agrasozialismus«,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Bd. 1, 100-105, Stuttgart-Tübingen 1956; T. Bergmann, »Die Agrarfrage bei Marx und Engels – und heute«, in: W. Euchner u. A. Schmidt (Hg.),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M 1968; ders., »Probleme der Agrarpolitik in sozialistischen Ländern«, in: Bergman/Gey/Quaisser, *Sozialistische Agrarpolitik*, Köln 1984; L. Björlin, »Jordfrägen i svensk arbetarrörelse 1890-1920«, in: *Arbetarrörelsens årsbok 1974*, Stockholm; N. Boukharine (=Bucharin) u. a., *La question paysanne en URSS (1924-1929)*, Paris 1973; E. David,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Berlin/Leipzig 1903/1922; K. Diehl, »Der ältere Agrarsozialismus und die neuere Bodenreformbewegung in Amerika,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911, Bd. 1, 225-284; P. Gey, »Die Stellung des privaten Agrarsektors in der kubanischen Wirtschaft«, in: Bergman/Gey/Quaisser, *Sozialistische Agrarpolitik*, Köln, 1984, 232-257; A. Hussain u. K. 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London 1983;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tuttgart 1902; E. Kardelj, *Les Problèmes de la politique socialiste dans les campagnes*, Paris 1960; M. Kemper, *Marxismus und Landwirtschafteine Darstellung der Entwicklungstendenzen marxistischer Agrartheorie und Agrarpolitik*, Bonn 1929; H. N. Lahme, *Sozialdemokratie und Landarbeiter in Dänemar*, Odense 1982; H. G. Lehmann, *Die Agrarfrage in der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Sozialdemokratie*, Tübingen 1970; Mao Zedong, »Über die Klassen der chinesischen Gesellschaft« u. »Bericht über eine Untersuchung der Bauernbewegung in der Provinz Hunan«, AW 1, 11-20 u. 21-65;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ry*, New York 1961;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ry*, New York 1961; E. Preobraźhensky, *The New Economics* (Moskau 1926), Oxford 1965.

泰奥多尔·贝格曼
（Theodor Bergmann）撰
胡晓琛 译，李健 审

参见：

Agrarreform, Agrobusiness, Aufhebung,

Ausbeutung, Bauern, Bauernbewegung, Bauernkrieg, Besitz/Eigentum, Bodenreform, Destruktivkräfte, Dorfgemeinde, Erde, Genossenschaft, Grundrente, Indiofrage, Kleinbauern, Kollektivierung, Landwirtschaft, Latifundismus, Ökologie, Raubbau, Stadt/Land

83 农业改革（Agrarreform）

作为为了实际农业生产者改变土地所有制与/或支配与利用方式及随后再分配地租的措施的总和，农业改革事关改变一种根本性的经济力量状况，即政治权力掌控农村与农业人口的根基。如果这些措施在时间上迅速开展，在革命性斗争与变革进程中实施，那就是农业革命。农业结构的改变在人类历史上始终是必要的，因为众多要素自身在改变，例如人地关系，生产资料，土地与劳动生产率，土地职能，社会制度。

社会职能分工导致农业生产者被地主和贷放者（他们常常属于同一阶层或是同一批人）剥削。土地是唯一的生存基础与农业人口的劳动场所，争夺土地的斗争会成为剧烈社会斗争的焦点，群众在这些斗争中会充满革命精神，并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做出巨大贡献。除了经济作用之外，社会心理学作用也很重要。这样，小农对他们从前的剥削者的恐惧就消除了；他们得到了心理上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土地私有制与自由的支配权是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原始公有制之后产生，并将再度被生产力更高级的公有制所替代。（Engels，*Die Mark*，MEW 19，第 315—330 页；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Utopie*] 的附录发表）尽管农业改革这一概念在他们的著作中只是附带性地出现过（参见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的意见，“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MEW 27，第 314 页），马克思与恩格斯还是集中地研究了土地所有制关系必然的彻底改变，也承认了在历史进程中，另外还有被农业改革改变的农民的作用。恩格斯就在《德国农民战争》（*Bauernkrieg*）中分析了为反对封建主义而斗争的德国农民的革命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分析了 19 世纪满足的法国农民的保守立场。 84

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领导层（威廉·李卜克内西）要求进行彻底的农业改革，主要出自政治动机（破坏大地主的政治权力），然而他们自身也很清楚这样做的社会经济后果。后来，在分裂

之后，农业改革仍然很难赢得大部分农民的支持。德国北部和西部一些地区的小农在1933年之前亲近德国社会民主党，1945年后也是如此。英国工党的支持者中可能只是例外地有一些大农场主，他们对农村的影响只局限于农业工人。

在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发展初期通常会发生激烈的农业改革，其中有普鲁士（1805—1807年），瑞典（1785—1850年），日本（1946年），这些改革的内容通常也会包括没收小农的财产。这一阶层的大部分随后组成了工业工人阶级。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发生了更广泛的结构变化，土地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之手，从小型农业经营向副业经营过渡——其所有者接下来大多成了农民工人（Arbeiterbauer）（被误称为副业农民）。他们被无产化，却没有贫困化，至少在经济景气阶段没有，因为他们能够转向其他职业。这种“农业结构的改善”处于持久的经济压力之下，但在形式上是自愿的，从而被相关群众理解成独立做出的决定，与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驱动的集体化进程不同。由于人口稠密的地区与去中心化的工业聚居区的这些新工业劳动者常常留在其农村的居住环境下，并且有一些土地，他们因而有着分化的意识。在工业大企业中，他们从属于劳动环境，逐渐学会了必要的无产阶级团结。在他们的居住环境下，他们始终作为（小）土地所有者有意识地与农民联系在一起，数量很少的一部分人也会参与地产投机。

新的农业改革在这里变得必要，不再是为少地的农村穷人提供没有剥削的 85
生存基础，而是为了避免土地投机、土地滥用、土地误用，是为了使迫切需要的空间与住宅区规划成为可能，并终止过度的土地使用与圈地行为。通过现代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中单位面积生产力的提高，劣等（边际或边界）土地从生产中被排除，失去了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意义。然而当人口密集时，土地对于居住与休养目的的价值就会上升。在资本家阶级中便产生了资本强烈的需求，圈占具有高休闲价值的土地，禁止广大公众获取这些土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可能与1917年的苏联或中国（1935—1958年）的情况看起来不一样。因为大部分自己工作的农民是少数人，政治与经济上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才得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在农业上利用土地。相反，所有非农业的利用受到社会性的控制，阻止私人改作他用与投机盈利。

在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土地所有制问题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土地与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一个很大程度上寄生性

的上流社会，完全不在农业领域及他们的地产上投资，而是推进殖民地非生产性的资本外流，用他们无节制的剥削性要求阻止给农业生产者投资，从而阻碍农业生产迫切需要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一个无地的农民阶级，确切地说，是没有固定使用权的土地耕种者；其数量一直随人口增长而增长；但替代性的工作没有被提供给他们，因为农业剩余产品殖民与后殖民的扣除阻止了工业发展，并且还会继续阻止。为土地租约而相互竞争的农业生产者的谈判地位逐渐下降，土地所有者的谈判地位将会增强：租金与剥削提高，对土地的渴望增强，从而使农村的社会张力与争端，即“农业骚动”，成为此前重大革命的主因之一。

农业改革提出了很多政治上的分支问题：

1. 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生存必需的土地面积随着土地财产、家庭规模、生活标准的社会规范等因素而改变。土地所有制新的上限被设定得越低，成为革命敌人的农场主就会越多。上限被设定得越高，感到满意的无地革命农民就会越少。革命领导层的政治任务是制造尽可能少的不必要敌人，确切地说，要为革命赢得经济上重要的中农，或者至少也要使其保持中立。中农的待遇在苏联与中国都有争议。

2. 对没收土地的补偿：资产阶级农业改革一般会将补偿作为对所有权的承认包含在内。但这意味着农业领域的一项持续性的非生产负担，它由新的所有者承担，从而严重限制了他们的投资能力。因此，革命的农业政治家就会拒绝根据经济理由做出补偿。居泰尔曼（Gutelman）（1972）认为补偿程度是阶级斗争、社会力量状况与改革彻底性的一项指标。

3. 仅仅分配土地对改革受益者来说是不够的；他们作为一无所有的人还需要生产资料。无视这一基本需求必然会在农业改革后导致生产萧条，而不是现在独立的生产者缺少能力与勤奋。在农业生产关系的激烈变革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耽误了新生产资料的提供，这些生产资料可以提高生产力，从而使新生产关系完全发挥作用。

4. 所有渴望土地的人一般不会都得到满足。一部分人不得不寻找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工作。因此，工业发展（通过一部分被没收的剩余产品）必须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农业改革不是万灵药，只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

在旧社会制度框架下的农业改革一般不起作用，例如在拉美和印度大部分邦（美国在日本实施的农业改革是一个例外）。失败的原因是：（1）国家行政机关与大地主阶级有社会关联，因而没有能力采取彻底的措施；（2）下层的必

然压力会被阻碍或消除。农业改革在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和西孟加拉邦（West-Bengalen）取得了程度有限的成功，因为那里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支持下层施压，并且与立法机构联合。这迫使行政机构行动。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部分国家，还存在着原始的（部落）土地公有制；只是部分土地是由个人使用的。殖民统治广泛地，然而不是到处地打破了这种制度，并使土地成为商品，以此将当地生产者从优等的土地与最适宜的气候状况中驱赶出去。这一问题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反殖民抗争（例如东非的基库尤人［Kikuyus］与茅茅人［Mau-Mau］）。这提出了是否能从“原始”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现代”土地所有制，是否能越过个人土地所有制这一历史中间阶段的问题。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对此进行了仔细思考与分析尝试。这是他的“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

拉丁美洲众多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关系与此类似，但更复杂。那里还生活着大群印第安原住民，并且能部分维持他们的公有制（氏族公社［Ayllu］或后来的公社［Communidad］）。这些共同体被西班牙殖民者和后来的西欧、德国移民部分摧毁了。历史上，印第安人与移民的族群界线也是一条社会界线。原住民为自己生活，不参加反对西班牙的自由斗争与革命，他们对自由斗争与革命也不感兴趣（这也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改革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农业原住民。

农业改革大多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一旦改革集中进行，那么被没收者的反抗与改革的倒退就会被阻碍。而且改革受益者对新结构的适应也会变得困难，支持性措施——新生产资料的供给，新社会结构的建设——会有滞后。农业改革与农业革命不是二分的一对概念，不是相互排斥的。迅速而彻底的改革可以要求采取革命性措施来巩固自身，而革命性变革必须以改革的步骤实施或由此类步骤组成。革命的胜利为社会变革的不可逆转性树立了可见的里程碑。在此之后，革命者能够以改革的步骤顺利前进，就像在中国发生的情况那样。

参考文献：

T. Bergmann, »Agrarreformen und ihre Funktionen im Entwicklungsprozeß«, in: *Agrarpolitik im Spannungsfeld der internationalen Entwicklungspolitik*, München 1974, 173-195; P. Dorner (Hg.), *L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Issues and Cases*, Madison, Wisconsin 1971; M. Gutelman, »Le financement de la réforme agraire

comme rapport des classes«, in: *Études rurales* 48, Paris 1972, 7-38;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London; J. C. Mariátegui, »Das Problem des Bodens«, in: ders., *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 Berlin/W-Freiburg/Schweiz 1986; J. Nyerere, *Freedom and socialism*, Oxford 1968; J.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London 1975; E. H. Tuma, *Twenty-six Centuries of Agrarian Reform*, Berkeley-Los Angeles 1965.

泰奥多尔·贝格曼 撰

胡晓琛 译，李健 审

参见：

Agrarfrage, Antikolonialismus, Bauern, Bauernbewegung, Bodenreform, Entkolonialisierung, Erde, Grundrente, Indiofrage, Kollektivierung, Landwirtschaft, Latifundismus, Mariáteguismus, Revolution, Stadt/Land

农业商业（Agrobusiness）

这个从美国英语中借用的词是 1955 年在哈佛商学院产生的，用来命名作为生产部门的一种农业变革构想。（首次发表于 Davis / Goldberg 1957）这个词后来只是缓慢地进入日常使用领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都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过。（Frundt 1975）

1. 农业商业问题暗含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他在分析中以“农业从属于资本”（*K III*，MEW 25，第 630 页）为前提，即假设农业被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关系所渗透。就农业表现其他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代表性特征的程度而言，这些分析对于农业商业问题意义重大：表现方式是农业在经济上得到资本密集型的集中（垄断性），并且发展出集中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受到了英国经验的影响。这一经验展现了英国本土农业的衰落，英国随后利用了它的殖民制度与工业力量，用进口解决了食物供应问题。——马克思简述了这一发展，他发现“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K I*，MEW 23，第 475 页）——19 世纪 70 年代，马克思才为了准备《资本论》第三卷开始研究俄国农民阶级与俄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

相比农业生产及其劳动过程问题而言，恩格斯、考茨基与列宁更关注农民阶级这个与农业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阶级。他们主要对下列问题感兴趣：（1）乡村农业如何通过提供从农业中抽取并为工业筹集的剩余产品而完成资本积累；（2）农民阶级作为后备劳动力如何服务于工业并被无产化，抑或作为对地产具有小资产阶级取向的特殊阶级如何阻碍革命运动。（主要参见 Kautsky 的 *Agrarfrage*，1899；Lenin 的 *KapR*，LW 3，以及 *Die Agrarfrage und die 'Marxkritiker'*，LW 5，第 97—221 页）

2. 农业商业概念的发展开始于 1944 年以后。哈佛研究者的出发点是，1940 年后，大部分农业劳动过程分化为农业与农场（作为支配性的农业经营形式）。农场主以前“栽培植物与饲养牲畜，同时生产驮畜、工具、设备、肥料与其他生产资料，制造自己的生活资料与原材料，同时将大多数家庭需求的超额部分在共同体中出售”（Davis / Goldberg 1957，第 1 页）。随着农业从主要面向使用价值的生产活动转变为面向市场交换的生产活动，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便被联合起来：农业商业随即成为“包括所有农场产品生产与销售活动的总和；在农场进行的生产活动与农场商品及由其生产出的物品的贮存、加工与分配。农业商业以这种方式包括了 150 年前与农业一词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重要职能”（同上书，第 2 页）。

在一系列研究著作（Goldberg 1968；Arthur / Goldberg 1968；Arthur 等 1968；Goldberg 1974；Goldberg / McGinity 1979）中，并作为著作集《国内与国际农业商业管理研究》（*Research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gribusiness Management*）的编者，R. A. 戈德堡（R. A. Goldberg）与他人一起研究了农业商业概念的三条发展路线。首先，被使用的是“商品制度”（*commodity system*），以便能够规定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领域的经验边界。戈德堡认为，农业商业中的一个这样的领域包括“某种农场产品生产、加工与市场化的所有参与者。一个这样的制度包括了所有农场供应商、农场工人、仓储工人、加工者、批发商与零售商，他们参与了从初期投入到最终消费者的商品流动。这一制度同样包括了所有影响与协调商品流动前后相继的各个步骤的机构，例如政府、交易所与商会”（1968，第 3 页）。其次，哈佛研究者集中关注了对发展中国家农业制度的实证研究。戈德堡 1968 年撰写了关于美国小麦、大豆与佛罗里达橙子的著作，而像 J. E. 奥斯丁（J. E. Austin）（1974）这样的其他研究者则研究了热带环境与第三世界背景下的农业生产制度。最后，哈佛研究者强调了

管理作为农业商业的一个关键方面的意义，并且通过在分析时区分管理与（生产）劳动，突出了农业领域的阶级状况。第四条发展路线 —— 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研究多于资产阶级科学家 —— 强调了农业生产与分配的全球化，跨国食物与农业康采恩日趋增长的意义，第三世界的农业与世界粮食制度的一体化及其为第三世界食物供应带来的灾难性后果（Burbach / Flynn 1980；Feder 1977；Collins / Lappé 1977）。

3. 不考虑科学定义的话，农业商业一词在通常的语言应用中表现出几种不同的趋势：（1）经济集中，即大部分农业生产来自一小部分大型农业企业；（2）生产单位数目下降时的耕地面积增长；（3）农业中家庭经营的破坏，并被采用股份公司法律形式的生产单位代替；（4）大型非农业企业与农业生产的纵向一体化；等等。此外，农业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紧接着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规则之后对不断增长的数量规模的重点强调，尤其是通过用资本与资本投入替代劳动的方式 —— 和由此产生的朝向单一文化专业分工的趋势，这一专业分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广泛使用人工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形式的化学物质。这些应用的生态效应一直是环境保护者与政治“绿色运动”坚决批判的对象。

91

这样，农业商业在日常理解中具有了大农业单位的意义，这种单位表现出与其他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相同的特征。在美国，农业商业得到了技术上的发展，被基于农业的组织与共同体称赞为“现代的”与“进步的”；自称“**栽培者**”（*growers*）的大土地所有者自豪地使用这一概念，尽管他们从未参与农业生产的身体劳动。相反，这一概念在否定与贬低意义上，是作为斗争的请求被小农场主的民粹主义运动、左派与社会主义者以及环保运动所使用。

参考文献：

H. B. Arthur, R. Goldberg, *Identifying Management Problems of Agribusiness Firms*, Boston 1968; H. B. Arthur, J. P. Houck, G. L. Beckford, *Tropical Agribusiness Structures and Adjustments – Bananas*, Boston 1968; J. E. Austin, *Agribusines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74; R. Burbach, P. Flynn, *Agribusiness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1980; J. Collins, F. M. Lappé, *Vom Mythos des Hungers*, Frankfurt/M 1978; J. H. Davis, R. A. Goldberg, *A Concept of Agribusiness*, Boston 1957; E. Feder, *Strawberry Imperialism: An Enquiry into the Mechanisms of Dependency in Mexican Agriculture*, Den Haag 1977; H. J. Frundt, *American Agribusiness and U. S. Foreign Agricultural Policy*, Ann Arbor 1975;

R. A. Goldberg, *Agribusiness Coordination: A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Wheat, Soybean, and Florida Orange Economies*, Boston 1968; ders.,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 Latin America*, Cambridge/Mass. 1974; ders. u. R. C. Mcginity,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 Southeast Asian Corn System and American and Japan Trends Affecting It*, Cambridge/Mass. 1979; P. Krieg, *Der Mensch stirbt nicht am Brot allein*, Frankfurt/M 1984.

92

威廉·H. 弗里德兰（William H. Friedland）撰

库尔特·雅各布斯译为德文

胡晓琛译，李健审

参见：

Agrarfrage, Agrarreform, Akkumulation, Bauern, Bauernbewegung, Dritte Welt, Indust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Landwirtschaft, Management, Modernisierung, Neokolonialismus, Ökologie, Produktlinienanalyse, Rationalisierung, Raubbau,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积累（Akkumulation）

“积累”源自拉丁语 *accumulatio*，意为“堆积”，一方面与财富（*divitiarum*）连用，另一方面被用作园艺学的技术术语：老普林尼（Plinius D. Ä.）（*nat. hist.*，第 17 卷，第 246 页）要求园艺家把树木和葡萄藤根部周围的土壤堆成小堆：“auget，addit，accumulat”（增加、补充、堆积）（引自 Georges 1913，第 70 页）。作为堆积、聚集的过程和结果，积累出现在了 16 世纪的文学语言中。莎士比亚（Shakespeare）笔下的亨利八世因为红衣主教沃尔西（Wolsey）聚敛的财富数目而羡慕他：“他积累了多少财富？”（*Henry VIII*，XXXI，第 33 页）福尔土纳特（Fortunatus），16 世纪至 18 世纪最受欢迎的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明白拥有金钱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扩大金钱的数量；如果金钱不“存放在其他商人那里”的话，积累的财富会丢掉。（引自 Nerlich 1980，第 56 页）

国民经济学把积累理解为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并研究了这一增长的条件——它认为增长等同于发展。储蓄或投资率以及消费被认为是调节积累的形式。其中，社会经济关系似乎被暗示成是“属于自然史的东西”（Zinn 1987，第 20—26 页）。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把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条件的变化

作为对象化生产的结果来研究，它以此将积累——主要作为货币与资本的积累——归入经济再生产关系的总体之中，这些再生产关系的共同作用产生了各个经济体的历史趋势。

1. 在政治经济学史中，对积累范畴的研究始于对商业国家财富的来源、增
93 长与分配的思考。17 世纪，配第（Petty）就将英国的经济潜力与其劲敌荷兰与法国做了对比研究并且发现，尽管始终将积累纳入考虑，仍然要将这样的国家称为穷国，即无法将利润再次在本国投资，而是将其非生产性地消费掉的国家。（*Pol. Arithm.*，第 228 页）这里，积累的规定与生产性和消费性支出的差异联系在一起，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增长的一部分剩余额的运用。

配第始终没有提及积累过程的主动承担者，而魁奈（Quesnay）却毫无疑问地认为，富有的租地农场主为民族的权力与财富奠定了基础。富有租地农场主经营任务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确保其租地农场的盈利与竞争能力——被剥夺土地的半租地农场主就在农场上工作（*Pächter*，第 10—11 页）。用赚得的利润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并创造工作岗位。而且，除了富有的租地农场主之外，一些手工业经营者与商贩也能带来巨大的财富。魁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被积累和保留的资金”只要形成“堆积与障碍”，就会减小有效总需求；因此，（利润的）积累与流通和“国家收入与当年财富的再生产”的循环指标相互关联。（同上书，第 322 页）

斯密（Smith）在他的《道德情操论》（*Theorie der ethischen Gefühle*）中从生产商品的小所有者构成的经济体出发——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是由半商半企的经销资本家、银行家、地主与官员组成的上层结构——探讨了国民财富增加的起源与可能。每个人天然的自私心理滋生了始终要比别人更富有的愿望。它“催人勤奋并使人不断运动”，从而同时促进了共同体财富的增加。（引自 Anikin 1990，第 75—76 页）在斯密之前，曼德维尔（Mandeville）已经带有讽刺意味地阐明，贪婪、虚荣或其他不道德行为“虽然始终是遭到嘲笑的对象，却是贸易的真实动力”（*Bienenfabel*，第 28 页）。正如斯密所阐明的那样，在追求经济与社会提升的驱使下，分工的生产提高了劳动的熟练程度，并减少了机器的投入。此外，资本家还要提高预付资本，为增
94 加积累的必要性奠定基础。（*Reichtum II*，第 4 页）对于积累，斯密区分了经济自给自足、生产者所有劳动产品被消耗的“社会的粗野状态”（同上书，第 3 页）与现代的交换或市场经济。后者之中的雇佣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取决于工资基金

的升降，而工资基金为资本家和地主所有。斯密将资本的积累分解在工资基金的积累之中，从而假定了伴随着实际工资上涨、与资本积累并行增长的劳动市场需求。凭借着这种面对下等阶层生活状况所受影响的乐观主义，斯密在他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学说中做了补充论证。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性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投入。这样，社会总产品增加，一种普遍的过剩产生，这种现象必然会一直蔓延到人民之中。相反，非生产性劳动具有浪费积累的潜在缺陷，并从而错过财富增长的机会。

经历了工业革命期间人口数量与密度的变化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之后农业与手工业的剧烈萧条之后，李嘉图以资本积累与财富动力之间的联系问题为主题，从价值生产与资本生产本身出发的对积累的阐释没有成功。李嘉图发现了积累在土地耕种不断降低的生产率中不可避免的极限。工业与农业生产率之间不断增加的产量差异会提高雇用成本，并会降低利润率，这有利于地租。这样，“积累的动力”（*Grundsätze*，第265页）就消失了。然而，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既要求足够的利润率作为投资的鼓励，也要求超过自然水平的工资，以促进人口增长。

2.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一切都是依靠资本最终积累的财富，这些财富不断地重新作为工资报酬被耗费掉。对马克思来说，这一论题是一种需要被批判的自然化的范例。他指责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研究”（*K I*，MEW 23，第616页），在从个别资本的积累过渡到社会总资本的积累时中断了。在“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同上书，第617页）的地方，马克思说明了一种积累的强制，其结果使资本主义方式与实际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总是在增大。

在《资本论》第一卷（*K I*）中，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首先被作为工业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与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得到分析。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它被视为再生产过程，因此“它不断更新”（同上书，第591页）。这一过程的“起点”，即劳动力的物化与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存在，现在表现为“结果”。（同上书，第595页）数量占优的生产的连续以同样的规模进行，即“简单再生产”，“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同上）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与劳动之间交换（这一交换在流通阶段表现为简单的等价物交换）的经济内容得到揭示。工人始终在他人的所有制下生产他人的所有物，因为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他们已经把劳动力的使用权通过等价物让渡给了资本家。因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

不平等交换“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的占有”（同上书，第613页）概念中，马克思集中关注了“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同上书，第610页）。

由此出发才得以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过程，即“原始积累”这一主题。在自身之中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条件是“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同上书，第741页）。对于这一根本条件的起源，马克思一方面追溯了封建主义及其封君封臣义务制度的解体，另一方面追溯了殖民主义的暴力与掠夺史。

通过“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即“资本积累”（同上书，第741页），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变成了扩大的再生产。价值上表现为积累基金的追加资本，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同上书，第617—618页）或实际工资“在一定限度内”下降时，是“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同上书，第626页）的一部分。当早期资本主义中资本家的个人消费还要从资本积累中扣除时，其消费伴随着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同上书，第620页）。

当工业生产方式强占了“初级产品生产”的领域，即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剥削时，一种对象化的生产条件的特定的经济化就产生了。大规模的、由劳动生产力持续革命推动的采掘工业与农业首次为各种个体生产过程中再生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创设了物质前提（参见Krüger 1986，第146—149页）。“自然产品”降价又降低了加工商品的成本价格。“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K I*，第630—631页）

对资本积累来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价值与物质扩张之间建立的联系意味着，积累基金被赋予的价值量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而决定追加资本组成部分变动的数量。随着劳动生产率及与此相关的剩余产品的增长，在追加资本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同上书，第631页）。

已实现的剩余价值量在积累基金和个人消耗的收入中的分配，“积累率”（MEGA II. 5，第499页），是资本所有者的一种“意志行为”（*K I*，第618页）。但国家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同上）。“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同上书，第621页）

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引起了第一等的世界历史性转折，即

所有惯常的生产与生活关系的革命。资本是积累的、对象化的劳动，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中。然而，没有不断更新的社会劳动，物质财富就是僵死的。“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同上书，第198页）资本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主体”，因为社会劳动异化为雇佣劳动：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同上书，第329页）。这种“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倒置”（同上）暗含了一种倾向于自我毁灭的自我矛盾。劳动的社会化作为分工关系的深化与复杂化，被归结为生产资料的组成部分与规模的发展。在此前历史上最有成效的积累制度中，“现实财富的创造”总是较少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Gr*，MEW 42，第601页）

因此，这一积累类型长期以来成为失业的主要源泉。价值、剩余价值与积累的逻辑不可能是一种团结的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因为它在结构上否定了劳动者和自然。与这一逻辑相联系的是生存机会与生活条件的不平等分配：“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同上书，第675页）由于社会劳动是本质上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它必然在原则上使社会劳动主体得以将“资本的专制”（*K I*，第669页）打破（参见 Schmied-Kowarzik 1978，第150—154页；Jung 1986，第26—30页）。资本主义蛹化为变形的、否定的社会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了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与实现条件。在再生产图式中，他概要探讨了货物群的必要比例。一旦资本积累越过了某一阶段，消费便不再是积累的障碍，反而作为大宗消费成为以同样的大规模流通为前提的大宗生产的必要条件。为了平衡干扰，需要一种准备金，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段中的资本”（MEW 24，第90页）。准备金可以等同于“货币积累基金”（同上书，第82—83、89页），它在利润积累过程中的产生方式是这样的，即用于再投资的剩余价值必须达到一个最小数量，在发达的条件下被信用制度所补偿。

在从研究资本流通及其自身的相互纠缠向研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的过渡中，每个单个资本的流通显然取决于资本的总流通过程。这就产生了一个

问题，被总资本当年生产出来的表现为新价值的商品如何能够实现。在简单再生产情况下，这可以通过资本家的奢侈消费而实现。即使在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中，在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中被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转化为资本，其他部分作为收入以奢侈消费的形式被花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同上书，第 498 页）。只在生产资料生产的领域中积累是不可能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相互之间必须具有某种关系，视简单或扩大再生产的情况而定。（参见 Schmiede 1973，第 178 页；Rosdolsky 1968，第 528 页）

自 19 世纪上半叶起，资本积累周期性地被经济危机打断。危机源自对资本的一种"不适当"的利用，而后者要归因于突然出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危机表现为商品大规模滞销，导致积累的资本与现存的剩余价值之间出现差距。然而，现实的利润缺乏导致了进一步积累的中止。马克思将这种危机状态称为"积累过剩"（参见 *K III*，MEW 25，第 262、266 页）。积累过剩理论的做法（参见 Mattick 1959，第 72 页及以下；Hickel 1987，第 89—96 页）强调了由竞争过程导致的强制性利润再投资。积累自身随即主要作为合理化过程而实现，以得到竞争优势。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MEW 25，第 502 页）。随着信用与银行制度的发展，"虚拟"资本的积累（同上书，第 486、494 页）也形成了。一方面，公共债券（买家为此得到利息收入）表现为公共债务，不是真实存在的资本；另一方面，在股票市值中，除了起作用的社会资本之外，似乎还存在着另一种资本。 99

3. 对马克思积累理论的阐释是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实现、比例失调与危机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当一群人（Luxemburg 1913；Sternberg 1926；Grossmann 1929）把马克思的积累与危机理论主要理解成消费不足理论时，图甘-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i）（1901）与希法亭（1910）却把再生产图式当作证据，证明危机只能是由经济领域之间错误的比例关系引起的，并且可以通过计划消除。

3.1 正是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对发达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持续也做了清晰的阐明。对资本主义增殖过程来说，对非资本主义领域内价值的没有相应酬劳的占有，与《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经典资本主义通过有酬雇佣劳动的占有具有同等的决定性。

3.2 承接卢森堡的"并行积累"理论（Strehle 1991，第 109 页）——这一理论中，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交换过

程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女性主义经济学指出了一个事实，全球范围的劳动主要不是作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而是作为各种形式的不受保护的灵活家庭手工劳动由妇女完成。这是一个被称为“家庭妇女化”的过程（参见v. Werlhof等1983，第10页）。

4. 对于从1917年革命产生的苏联与随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关于合适的积累制度的问题被证明是关键问题。

4.1 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的不同派别围绕“社会主义积累”速度与发展形式进行了争论。争论首先围绕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剩余产品的形式与分配展开。“我们国营经济中的社会积累运转地没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积累那么成功”，“左翼”在1923年至1924年间宣称。（Trotzki，Preobraschenski 1923，引自Mandel 1992，第88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表述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他将“社会主义积累”称为“用剩余产品扩展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这种剩余产品是在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出来的……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1976，第531页）。相反，“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部分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同上）。由于国营工业领域中历史决定的积累不足，应当用一部分农业剩余产品来增加投资活动，以此刺激社会化领域的经济增长。为实施此种“供给导向的”经济政策，“左翼”要求对富农与新经济政策获利者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将积累的苏维埃黄金用于进口现代机器，并为党和国家机构减少开支。

4.2“右翼”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经济困难主要源自始终未能结清的“革命的额外开支”。十月革命与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内战必然会导致“再生产过程的停滞”与“城乡联系的断绝”。为了建设可以获利的与有效的工业，布哈林要求“通过发展商品销售”实现农业振兴（1990，第141页及以下）。对他来说，农业消费不足就是缺乏资本积累的另一种表达。富裕的个体农民、富农与小型集体农场应当让位给私人积累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对农民说：‘富起来，发展你们的农场’”，以使农民收入有效满足需求。扩大需求的政策会逐渐启动工业中的社会主义积累。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学观点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与个人发展动力的个人积极性与私有制，与总体经济积累的公开调控联系在一起。承继这一观点的是**市场社会主义的**（*marksozialistische*）观念与改革，例如赫鲁晓夫时代的利伯曼（Libermann）改革。（Libermann 1962，第67页及以下）

4.3“托洛茨基派”与“布哈林小

组”没有进行集体辩论。斯大林派完成了向扩张的、过快的工业化的转折。这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模式，这种经济始终“具有高负荷的特征”（Stalin，W 8，第 55 页）。它的前提是通过“剥夺富农”与强制集体化产生的农村中的价值创造组织，这一组织不以再生产为导向，既不再生产农业人口自然的生活基础，也不革新生产基础。斯大林 1929 年的命令，“使农业有能力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W 12，第 129 页），意味着解除列宁与农民缔结的同盟，并开始了对农业产品的恐怖调动，以利于发展自身扩张粗放的原材料工业与重工业。对农民生存资料的掠夺（导致了例如 1931 年至 1933 年乌克兰的饥荒浩劫）被考虑在内。斯大林在论证时考虑了主要在列宁那里也存在的将社会主义当成专政—官僚主义积累策略的理解，以及对俄国农民的意识形态丑化 —— 这些农民最习惯于“因循守旧”（LW 30，第 100 页）。

国家垄断及其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能够在它的大量“生产战役”中为整个商品生产调动物质技术的购置基金，用群众的热情将这一基金集中投入到某些首要目标上，此外还达到了 —— 与不发达的及边缘国家相比 —— 独一无二的积累速度。

与在复杂灵活的自动化与对原料技术的变革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积累相比，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积累最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耗尽了它的合理化资源。其国民经济处于深刻的增长与平衡危机之中，危机主要表现为货币基金与商品基金之间的比例失调，国家财政赤字，经济创新迟缓，固定资本物质上过度老化与生产者的冷漠。制度的积累能力受到质疑。造成此情况的原因是，斯大林模式从未产生与西方不同的生产力发展形式，也远未产生与西方不同的社会需求与消费模式。但主要的原因是，斯大林主义的积累制度在这一基础上不再能够转变成基于社会自主活动的制度。

5. 在对 20 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局面的讨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调节理论**（*Regulationstheorie*）一方分析成一系列对社会关系的历史—特定的调节。调节理论的中心观点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本身是政治计划、社会争论与妥协性的制度化过程的结果（参见 Lipietz 1992，第 9 页及以下；Demirović 1992，第 128 页及以下）。**积累制度**（*Akkumulation Regimes*）概念则指的是“系统分配与实际配置社会产品的模式”，这种模式长期“表现为生产条件的变化与依赖工资者的生活方式或日常生活的变化、消费者价值取向的变化之间的”一种相似关系，并因而增加了资本积累。（Krebs / Sablowski 1992，第 112—116 页）调节方式作为“制度形

式、网络与……规范的总体”（同上）确保了一种积累制度框架下行为方式的一致性。当积累制度与调节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了一种形态的稳定性时，这种稳定性也会在积累与调节解体时被削弱。按照泰勒—福特制的调节模式，20世纪末——期间发生了跨国资本主义危机与福特式“福利国家”的解体，贫困移民与全球性环境破坏增加——的激烈争论围绕着培养一种高科技生产方式下社会调节的霸权模式。没有出现的是一种全球性的调节，一种具有社会—经济导向的全球性积累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同等地制止“南方国家”的贫困化与对人类自然生存条件的破坏。

参考文献：

A. Anikin, *Der Weise aus Schottland. Adam Smith*, Berlin/DDR 1990; N. Bucharin,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Mit Randbemerkungen von Lenin*, Berlin/DDR 1990; A. Demirović, »Regulation und Hegemonie. Intellektuelle, Wissenspraktiken und Akkumulation«, in: ders., H. -P. Krebs, Th. Sablowski (H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ß*, Münster 1992, 128-157; K. E. Georges, *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 8. Aufl., Hannover-Leipzig 1913;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 1929; R. Hickel, *Ein neuer Typ der Akkumulation? Anatomie des ökonomischen Strukturwandels – Kritik der Marktorthodoxie*, Hamburg 1987;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Berlin 1947; H. Jung, *Deformierte Vergesellschaftung. Zur Soziologie des staats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 der BRD*, Berlin/DDR 1986; H. -P. Krebs u. Th. Sablowski, »Ökonomie als soziale Regularisierung«, in: Demirović u. a., 104-127; S. Krüger, *Allgemeine Theorie der Kapitalakkumulation, Langfristige Entwicklung und konjunktureller Zyklus*, Hamburg 1986; E. Libermann, »Plan, Gewinn und Prämie« (1962), in: *Die Wirtschaft. Ansichten aus verschiedenen Jahren*, hgg. von W. G. Afanas'ef, Moskau 1989 (russ.); A. Lipietz, »Vom Althusserismus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in: Demirović u. a., 1992, 9-54; E. Mandel, *Trotzki als Alternative*, Berlin 1992; B. Mandeville, *Die Bienenfabel oder private Laster als gesellschaftliche Vorteile* (1723), Berlin/DDR 1957; P. Mattick, »Werttheorie und Kapitalakkumulation« (1959), in: ders., *Kritik der Neomarxisten und andere Aufsätze*, hgg. von C. Pozzoli, Frankfurt/M 1974, 72-105; M. Nerlich,

Kritik der Abenteuer-Ideologie. Beitrag zur Erforschung der bürgerlichen Bewußtseinsbildung 1100-1750, Berlin/DDR 1977; W. Petty, »Politische Arithmetik« (1690), in: ders.,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hgg. von W. Görlich, Berlin/DDR 1986; E. A. Preobrashenskij, »Das Gesetz der ursprünglichen sozialistischen Akkumulation« (1926), in: *Die Linke Opposition in der Sowjetunion 1923-1928. Bd. III*, hgg. von U. Wolter, Berlin/W 1976, 525-582; F. Quesnay, »Pächter« (1756), in: ders., *Ökonomische Schriften. Band I, 1756-1759*, hgg. von M. Kuczynski, Berlin/DDR 1971; R.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Bd. 1, Frankfurt/M-Wien 1968; W. Schmied-Kowarzik,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Bd. 11, Frankfurt/M 1978, 118-181; R. Schmiede, *Grundprobleme der Marxschen Akkumulations- und Krisentheorie*, Frankfurt/M 1973; W. Shakespeare, »Henry the Eigth«, in: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hgg. von Sir Arthur Th. Quiller-Couch u. J. Dover Wilson, Cambridge 1926;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Berlin 1926; R. Strehle, *Einführung in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Kapital und Krise*, Berlin-Göttingen 1991; B. Tugan-Baranowski,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1901; M.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1904/1905); C. v. Werlhof, M. Mies, V. Bennholdt-Thomsen, *Frauen – die letzte Kolonie. Zur Hausfrauisierung der Arbeit*, Reinbek 1983; K. G. Zinn, *Politische Ökonomie. Apologien und Kritiken des Kapitalismus*, Opladen 1987.

君特·维林（Gunter Willing）撰

胡晓琛 译，仰海峰 审

参见：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neignung,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steilung, Armut/Reichtum, Bauern, Despotie des Kapitals, Entfremdung, Fordismus, Grundrente, Hausfrauisierung der Lohnarbeit, Hausarbeit, Hegemonie,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apital, Kapitalkonzentration, klassische bürgerliche Ökonomie, Kredit, Kreislauf, Krise, Krisentheorien,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ohnarbeit, Mehrprodukt, Mehrwert, Migration, Natur, Pächter, Pauper, primäre sozialistische Akkumulatio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duktivkräfte, Regulationismus,

Reproduktion,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talinismus, Surplus,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Verelendung, Vergesellschaftung, Wirtschaftskrise,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Wohlfahrtsstaat, Zins

104 股份公司（Aktiengesellschaft）

在19世纪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将资产阶级社会与股份公司相提并论并不少见。“如果这个社会不是一个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股份的股份公司，还能是什么呢？”梯也尔（Thiers）问道（1848，第355页）。使用这个比喻，要么是限定作为社会“真正股东”的有产者才有积极公民权，要么是为公民不同寻常的高额税收负担提出根据。这与马克思经常提出的观点形成了奇特的对比，即股份公司表现为导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点”，甚至简直就是一种“过渡形式”。（参见*K III*，MEW 25，第453—454、454、456—457页；MEW 29，第312页）

1.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通过摘录威廉·舒尔茨（Wilhelm Schulz）的著作《生产运动》（*Die Bewegung der Produktion*）（1843）而偶然触及了股份公司问题。舒尔茨强调了股份公司蔓延的社会后果：资本增多，资本家可以更容易地投身于多项事业，这样能够缓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截然对立”。但它也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MEW 40，第489页；MEGA I.2，第226、350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个准备稿中，马克思多次将股份公司作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主题提出，这一主题适合于他的“一般研究”：根据1857年至1858年准备稿（参见1858年4月2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MEW 29，第312页），对这一主题的叙述将属于第一分册《资本》（*Vom Kapital*）。在这一结构计划的各种变例中，股份资本始终在关于**竞争**（*Konkurrenz*）和**信用**（*Kredits*）的叙述之后出现：有时作为第四篇和最后一篇的主题——“**股份资本**（*Aktienkapital*）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同上）——，有时位于“资本作为信用”篇和“**资本作为货币市场**”篇之间。（*Gr*，第175、186页；MEW 42，第188、201页；MEGA II.1.1，第187、199页）在《资本论》第三卷（*K III*）恩格斯编辑稿中，残缺不全的第27章探讨了股份资本（Rolle des Kredits ...，MEW 25，第451

页及以下）。马克思意欲展现，“信用制度怎样生产出来联合的资本”（同上书，第484页）和这一点怎样持续性地改变或
105 还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这关系到资本家的“联合”，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有这个计划性叙述的片段。即便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也没有叙述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只有“简单地提一些事实”。（MEW 23，第654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可能熟知股份公司的组织与股票交易的细节。股份公司令他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和达到的水平的标志：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Gr*，第28页；MEW 42，第42页；MEGA II.1.1，第42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结果（*K III*，MEW 25，第453页）。他知道，这些奇特的产物恰恰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Gr*，第28页）出现。这些“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K I*，MEW 23，第328页）。因此，股份公司无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还是末期都存在着。

产生和发展。股份公司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久远。它的前身随着中世纪意大利贸易城市的海上贸易而产生。越来越多的商人联合起来——开始只在短期内——为某家企业募集必要的资金，分担风险，分享利润。这样的联合以合伙（*collegantia*）、**帮会**（*societas*）或**合约**（*commenda*）著称（参见 Weber 1889）。从中产生出了持久的联系——共担费用并以股份（*joint stock*）运营的贸易企业。真正的股份公司属于重商主义时期，是配有国家霸权（优先权或特许权）的早期现代国家贸易和殖民政策的工具，就像最大和最重要的两个例子——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和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年）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两家公司进行殖民贸易（主要是香料和奴隶贸易），征服并保护殖民地。因此，股份公司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例外现象，在特别法的保护下，并不着眼于长远。1612年产生了——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转变——第一家**常设**（*permanente*）股份公司，其股份能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自由交易。以这家公司为范本，随后 106
在17世纪和18世纪建立了许多国家垄断的贸易公司。这些公司由大资本家的小寡头管理；所持股份少于一定限额的股东在股东大会上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股东的表决权依其相应的股份大小而定；只有本身持有一定最低份额的公司股份的人才能成为董事或经理。因此，在这些公司的章程中，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始形式。其中，股份持有的不平等直

接被转化成一种结构清晰的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参见Steinitzer 1908，第24页及以下；MEW 12，第282页，第378页及以下，第524页）。“每股一票”的原则在19世纪编纂投资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法的进程中才得到普遍承认——但也并不是在任何地方（参见1908，第99—100页）。

起初，股票主要是一个投机对象。这个惊人的项目被投入市场——直到成为一家永动运营的公司——只服务于大量卖出股票并在短时间内尽可能高地推动牌价，直到骗局败露。本身理性的计划，正如18世纪末在英国的运河建设，常常导致一种建立股份公司的真正的狂热，这些股份公司大多寿命短暂。股票投机的发展要比大工业早得多——它对17世纪和18世纪的危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所有的大型危机都是投机危机，对贸易和手工制作的影响只涉及，染上投机热的企业主不只把他们的私人财产，还有部分运营资本投入到投机活动中，因此一旦一个更大的股票骗局再次败露，他们便排着队地走向破产。（参见 Oelssner 1949）最早的国家股票立法（例如1719年英格兰的泡沫法案）是为这种投机危机而设置的。为保护公众，英格兰在1719年至1856年间从法律上禁止了股份公司中的有限责任。

亚当·斯密对股份公司持有极大的怀疑态度。他把股份公司看作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要素（在《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第五编第一章有关国家支出的部分）。由于股份公司的董事们是在拿别人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去冒险，所以总是漫不经心、铺张浪费。没有国家垄断或特权，股份公司很难成功——而且只在企业主的首创精神非必要且只有习惯做法占统治地位的部门（银行业、保险业、运河建设）。在工业中的股份公司是斯密很难想象的。 107

到19世纪初，股份公司在英国——甚至在英格兰——还没有流行起来。在工业中——主导的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几乎没有，股份公司只出现在采矿业、运河建设、保险业中；英格兰银行长期以来是唯一一家的股份银行（国家垄断）。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铁路建设中，工业的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才开始大量流行起来。这种现象一直持续，直到股票成为交易所中最重要的有价证券。这需要一系列或多或少匆忙的“创始人阶段”，通常伴随着或大或小的“崩溃”，纯粹的欺诈企业在其中消失，直到股份公司作为日常企业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行业和部门中被接受。（参见 Steinitzer 1908，第42页及以下）

首先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转折点。因为对骗局的不信任依然强烈，而且各种法律障碍（强制许可、无限责任）仍然存在。这些障碍发生得较晚——在英

格兰，股份公司的成立自1856年起普遍被允许，也就是说无须国家的特别许可；有限责任也是在同年被禁止。第一次法国革命仍然禁止联盟和协会，包括资本家的，违者要受到刑罚（1791年的《谢普雷法》[*Loi Le Chapelier*]），在拿破仑（Napoleon）的统治之下才再度被承认，虽然是在严格的条件下（1806年的《商法典》[*Code de Commerce*]）。资本投资公司法和股票公司法的第一次大型冲突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1862年《公司法》[*Companies Act*]，1863年《德国商法典》[*Allg-emeines Deutsches Handelsgesetzbuch*]，1867年《公司法》[*Loi sur les sociétés*]）。然而例如在德国，1870年才取消了许可制度，并且在1884年才规定了股东的投票权。因此，当马克思在1858年指出，股份公司“还远没有为自己创造出适当的结构”（MEW 12，第573页）时，他完全是正确的。但还存在其他障碍：第一次进行**投资**（*Emissions*）银行实验的失败（比利时，1822年及以后；法国，1856年及以后）推迟了股份公司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蓬勃发展（参见Mandel 1969，第241—242页）。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充分的资本主义结社自由”；这些国家的商法典创造了资本家可以合法联合所参照的“完整的结社形式的样板”。（Renner 1904，第149页）在伦纳（Renner）看来，在这些结社中，只有股份公司是“完全明确地”以资本主义社团的身份出现的，因为股份公司的基础是全体成员的资本投入，以及所有权与企业主功能的清晰分离。（同上书，第152—153页）

工业股份公司。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了**工业**股份公司的重要性。资本家的这种结社形式完全属于大工业的**“当前时代”**（*DI*，MEW 3，第400—401页；MEW 12，第33—34页）；它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的原因之一（参见MEW 4，第48页）。马克思观察了大型铁路公司中的工业股份公司的起源（参见Notizen aus dem Economist von 1849，MEGA IV. 7，第9页；MEW 34，第53页，第372页及以下）。他研究了动产信贷银行——最早有计划地不断建立新股份公司的第一家现代投资银行（参见MEW 12，第22页及以下，第76页及以下，第202页及以下，第289页及以下，第434页及以下）。马克思分析了“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的“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欺诈公司（*Klassenkämpfe*，MEW 7，第95页；*18. B*，MEW 8，第168页）。投机热有时遍及所有阶级，特别是在第二帝国，政府的骗局计划促进了“交易所投机的普遍化”。（参见MEW 7，第422页；MEW 12，第76、78页；MEW 27，第202、303页；MEW 29，第238—239

页；也见恩格斯关于1871年后英国和德国滥设企业骗财现象的论述，MEW 17，第458页及以下，第553、595页；MEW 19，第169页，第173页及以下）投机大批地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并加速了资本的集中。

在《资本论》中，股份公司对于资本家之间不同的“结社”来说是以部分代表整体（*K III*，MEW 25，第129—130页；*K II*，MEW 24，第358页）；它只是众多“**结社资本的类型**”（*Arten assoziierten Kapitals*）中的一个，虽然是最重要的一个（MEW 35，第157页；参见MEW 12，第33页，MEW 21，第391页）。马克思没有研究**资本投资公司**（*Kapitalgesellschaften*）的法律形式，也不关注从“单独的”或“个体的”或“单个资本”转变为“联合的”或“结合的”资本的细节。（*K I*，MEW 23，第353、655页；*K II*，MEW 24，第236页）他只研究这一转变的必要性，研究转变的经济后果及其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代表性意义。

109 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掌握了物质生产的所有部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就达到“极高的发展”；这里还包括“资本……采取股份公司形式”。（*Gr*，第429—430页；MEW 42，第437页；MEGA II.1.2，第431页）这种形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组成巨大规模的资本。这样一来，单个资本家不可能建立的，或者说以前曾经是国有企业的那些企业，就可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企业。（参见*K III*，MEW 25，第452页）以“长时间大量的资本支出”为前提的生产部门，以及使缓慢和大规模的初始投资成为必要的风险企业，都能够由股份公司来运营。（参见*Gr*，第428页；MEW 42，第436页；MEGA II.1.2，第429页；*K I*，MEW 23，第328、655—656页；*K II*，MEW 24，第357—358、473页）马克思提到铁路的例子：还不存在股份公司，人们必须等到大量充足的资本额在单个资本家的手中聚集起来。（*K I*，MEW 23，第656页）然而，打破量的界限导致单个资本的**形式变化**：作为股份公司，资本包含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Gr*，第428页），也就是一种“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K II*，MEW 25，第452页）的形式。这种变化与资本所有权转变为“股票的形式”或者“以股票的形式存在”（同上书，第456页）有关。

由于“股票的形式”，资本所有权与执行职能的资本同时存在并彼此分离。因此，资本表面上**翻倍**了——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同上书，第484—485页）：除执行职能的（工业的或商业的）资本

外，还存在第二种虚拟的资本——与流通的所有权证书的虚拟价值相匹配的**股份资本**。马克思的论题——这种翻倍是假象——可以理解为价值理论的，——在他看来，股票的价值和土地价格一样是虚拟的。但是，所有权证书和利润证书有独立的运动；它们的市场价值本身、股票行情有大部分独立于“现实资本的价值运动”的运动。（参见上书，第484页及以下）早期，马克思分析股票行情的运动，既依赖于主要利率，又依赖于现实资本的“**预期**”利润。预期利润被“资本化”为主要利率，也就是说，表现为纯计算量的、“幻想的资本”的“利息收入”——这就是股票的**市场价值**。此外，股票实际的**市场价格**由交易所的供需关系决定。虚拟股份资本的虚拟价值（或者全部有价证券的虚拟价值，马克思称其为“名义货币资本”）是涨还是跌，不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财富所影响。（参见上书，第486页）

股份公司作为过渡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着迷于现代股份公司从发展的开端到成为占多数的企业形式，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例证，证明事实上“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同……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Vorw 59*，MEW 13，第9页；MEGA II.2，第100页）。发展显示，资本主义更加趋近于它的历史极限：凭借和通过股份公司，资本“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K III*，MEW 25，第452页）。因此，马克思将整个“股份制度”视作资本**社会化**的开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同上）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同上书，第454页）的一种形式，因此作为彻彻底底矛盾的现象。这种“旧形式的对立面”——旧形式中，特征上已经是**社会的**生产资料还表现为“个人财产”，表现为个体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就此宣告形成（同上书，第456—457页）；然而这个对立面还完全没有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被克服，而只是以“新的形态”、以重新“对立的形式”而形成（同上）。因此，马克思将股份公司与工人的合作工厂对比，将其看作是一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同上）。

财产与企业主职能的分离。社会主义者早就已经在股份公司中认识了一种向新经济形式的过渡。傅立叶注意到形成了一个即将随着股份公司的传播来临的新“工业封建主义”（1822，第37—40页；参见MEW 12，第34页）。马克思是如何谈到股份公司“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K III*，MEW 25，

第 277 页）？股份公司导致了资本家的彻底改变：他们最初是资本所有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也就是“工业领导者”和“指挥者”，履行在所有社会劳动过程
111 中必要的“监督和指挥”职能（参见 *K I*，MEW 23，第 350 页及以下；*K III*，MEW 25，第 397 页），现在则从生产过程中消失。财产和企业主职能的分离，一方面通过“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另一方面则通过“资本所有者……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K III*，MEW 25，第 401、452—453 页）所有“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都转移到一个“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身上，他们为自己的劳动取得工资并且丝毫没有他们使用或管理的资本的所有权。（参见上书，第 400 页及以下；*K I*，MEW 23，第 351 页）资本所有权转化为股份所有权，而它的“运动和转移”因此“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K III*，MEW 25，第 456 页）。由于股份的形式，所有人现在都可以轻松地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并成为资本家，而不必成为企业主。没有与企业的私人关系，这些人作为所有者的作用限于攫取股息，而他们的利益更在于他们的股票的虚拟价值，而不是企业的现实价值。由于股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很容易地卖出，对单纯的股东来说，他们持有哪家企业的股票并不重要——只要股票给他们带来股息或投机收益——正如对股份公司来说，谁是它的所有者同样不重要。（参见上书，第 276 页，第 452 页及以下，第 456 页）因此，股份公司将“职能……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必然成为多余的了。（同上书，第 453、400 页）

在别人的资本的纯管理者和单纯的股东这两端之间存在大股东和监事会的角色。后者至少名义上拥有代表其他股东行使的控制职能，并为此获得在马克思看来“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的“监督工资”。（同上书，第 403 页）前者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国王”的寡头政治，由于其持股的规模，他们相对于“大多数股东”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员”（MEW 12，第 33 页）。他们控制一个或多个股份公司，支配大部分属于其他（小）货币资本家的资本。（参见上书，第 33—34 页）

恩格斯把股份公司描述为一个“把大量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特殊“形式” 112
（*Utopie*，MEW 19，第 220 页）。他和马克思一样，强调股份公司的过渡性特征。通过资本的执行职能的人与单纯的所有者之间的分离，股份公司表明“资产阶级……不是不可缺少的”（同上书，第 221 页）。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发现，

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进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K III*，MEW 25，第 453 页）的形式。在同时代的卡特尔和特拉斯中，整个产业部门已经联合“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以此超越了传统“私人产业”或者说“私人企业”的限制。（同上书，第 454 页）

股份公司和利润率的下降。马克思一再强调在股份公司发展中的“经济上重要的事实”（*K III*，MEW 25，第 453 页）：它应当“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同上）。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是“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之一（同上书，第 250、453 页）。由于股份公司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其中包括许多高（远高于平均值）有机构成的大资本（例如铁路资本）——没有参与补偿过程，“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参见上书，第 250、273 页多处）。

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论证并不清晰。因为他在另一处承认，股息在量上可以表现得更多，即利息加上企业主盈利。（参见 *Gr*，第 428—429 页；MEW 42，第 436 页；*K III*，MEW 25，第 452 页）然后他又回到形式方面：利润在股份公司中“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K III*，MEW 25，第 452—453 页），因此，“仅仅提供利息的”（同上）资本主义企业仍然可以是股份公司的形式。——马克思在这里犯了双重错误：他把利息和股息放在一起，尽管他当然知道，固定利率的证券或年金证与股票之间是有区别的；此外，他混淆了股份公司作为产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银行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与在扣除税费、“企业主工资”（监事工资）和别人的资本利息后以股息的形式分配给股东的那部分利润。随后，他能够确定，股份公司的资本是“满足于获得利息”（*Gr*，第 429 页；MEW 42，第 436 页）的资本；因此，他最后还混淆了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虚拟的股份资本之间的区别。如果把股息看成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分配类型的一种，那么股份公司形式的增加就可能不会对收益率造成影响。只有人们认为，股份公司只遵循其股东所谓使用股份资本的红利，马克思所称的效果才会发生。但红利也不会简单等同于利息率，因为股份公司需要与他人竞争货币资本家的资本。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轻信马克思的观点（参见 Grossmann 1929，第 372 页及以下），那他们就要为马克思的这个突发的念头费尽心力（Hilferding 1910，也参见 Pietranera 1961，第 38 页；Itoh 1988）。

2. 在第 19 世纪的后 30 年，股份公 113

司的数量剧烈增长；同时，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的形式被找到了，这个观点广泛传播。

2.1 **民主化命题**。伯恩施坦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了这个观点，即他提出，“股份公司的形式”日益繁多是导致有产者或“经济状况更好的阶级中的阶层”绝对和相对增多而不是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1899，第 75、77—78 页）考茨基则一再反对。股份公司和股东的增多只意味着在有产阶级中单纯的有年金收入者的数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种人的数量增加了：他们的储蓄和财产不够独立形成资本，却被通过股票市场供大资本家使用并以此扩大大资本家的经济力量。（1899，第 98 页及以下；1927，第 560 页多处；参见 Lenin LW 4，第 193—194 页）

罗莎·卢森堡（*SoR*，GW 1.1，第 410 页及以下）指责伯恩施坦，他允许自己的一个“简单的庸俗经济学的纰漏”，因为他把股票持有者的数量的增多解释为“资本家”的增加。资本和货币财产是不同的两种，而股份公司的形成恰好意味着“许多小的货币财产联合成一个生产资本”，因此，股票制度的传播不过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的逐步社会化**”，是一个在大企业之后现在又遍及中小企业的进程（因此，在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中，成立资本的平均规模降低）。

布丹（Boudin）（1909，第 186 页及以下）认为股份公司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是**修正主义**的基础。但伯恩施坦没有弄懂他自己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资本采取股份公司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改变？列宁也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中抨击了民主化命题：小股份的准入（在英格兰，自 1867 年起，一英镑的股票获得准入）和小股东的增加只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手段（LW 22，第 232 页）。**国营企业私有化股份**（*Volksaktie*）的想法在许多社会改良主义者看来将是有效的（对**人民资本主义**［*Volkskapitalismus*］命题的分析参见 Kozlik 1968）。 114

2.2 希法亭在《**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1910，第 136 页）中首次着手于股份公司的理论（参见 Itoh 1988，第 278—279 页），不弄清这一点“就无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同上）。他“对股份公司的经济学观点”超越了马克思的草稿（同上书，第 146 页）；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参见 Sweezy 1942，第 203 页；Pietranera 1961，第 23、28、39 页）。马克思特别关注股份公司的“经济政治”影响；在他看来，**股息**还没有“特别的经济学范畴”，因此这种“在经济学范畴上自成一格”的**创始人利润**仍未经分析；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不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这一论

述，只是部分正确的历史评述。（1910，第 147、143 页）希法亭认为资本的**翻倍**——在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和虚拟的股份资本中——不是假象。因此，他立即与马克思发生争论。可以想象，历史上股东的股息实际上是被压低到纯利息的水平上，但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至少从一开始或者说在任何人那里都不会与股票发生竞争，以股息形式分配的利润份额则会在纯利息的水平之上。对于股东或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来说，“平均利息”可能足够了，但股份公司自愿放弃一部分利润并以**不能**给它带来最低平均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和“不可能的假设”，仅仅因为股份公司支付给其股东的钱不会超过平均利息。（参见上书，第 139—140 页）

希法亭借助**创始人利润**（同上书，第 143 页及以下）解释了这种在执行职能的和虚拟的资本中的**翻倍**（符合资本化股息权利的价格总额）。在交易所的资本募集中，发生了一种“形式转换”：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价值量转化为股份资本的价格大小。后者必然大于前者，因为预期的股息被“资本化”为主导的利息率，并永远低于利润率水平。这种差别只来源于“带有利润的转化为带有利息的资本形式”，是“创始人”在每新建或将现有企业转化为股份公司时能够获得的利润的来源。希法亭为（产业）股份公司提出了一个循环公式：

$$A \begin{cases} G_1 - W \begin{cases} PM \\ Ak \end{cases} \ldots P \ldots W' \ldots G'_1 \\ g_1 \end{cases}$$
$$|$$
$$G_2$$
$$|$$
$$A$$

发行股票（A）并出售而得的货币（G）分为两部分：执行职能的新资本 G_1，和创始人利润 g_1。股份资本的流通（$A - G_2 - A$）与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流通互相交替（$G_1 \cdots G_1'$）出现在股票市场上。股票的流通与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现实循环没有多大关系（参见上书，第 144—145 页）。

希法亭讨论了股息实现的方式方法，并探讨了决定股票行情的数额，特别是运动的因素。（1910，第 150 页及以下）研究股份公司的内部关系并探讨股份公司参股其他股份公司的新现象，由此发展出一套“彼此依赖的社会体系”和一个特殊的金融技术，来“保证”用“尽可能少的自己的资本掌握尽可能多的别人的资本”。（同上书，第 153 页及以下）通过众多股份公司的互相交织，形成了新的大资本家的寡头政治，他们作为大股东或监事会直接或间接控制大量股份公司。（同上书，第 1156 页及以下）同时，银行相对于剩余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同上书，第 157 页及以

下，第 169 页及以下）。

股份公司相对于私人企业（个人或家族企业）是有优势的，因为股份公司更容易筹集资本，但也因为它们占有竞争优势。（同上书，第 160—168 页）由于绝大多数股东是“拥有权力较少的所有者”，而他们的所有权被缩减到单纯的获利权上，（同上书，第 169 页）股份公司的领导者就有机会更理性地采取行动，更有力地参与到经营的“技术需求”或企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中来，并把所有者的盈利放到最后面（同上书，第 167—168 页）。然而希法亭同样也认识到，这种论述很难与大股东和（大）银
116 行的统治一致。（同上书，第 157、160 页）由于实际的主人有能力违背他人的，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行事，但他们不会忘记自己的利益。只有当希法亭刚刚驳斥的（同上书，第 161 页）“经理”能够不理会全体股东的利益并且自己没有盈利时，这种论述才是有说服力的。

希法亭被指责，把一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还有德国或者奥地利银行制度的特征一般化了，这是不容许的。（参见 Grossmann 1929，第 572 页及以下；Sweezy 1942，第 209 页及以下）相反，彼得拉内拉（Pietranera）认为，希法亭借助这种发展将一般发展趋势，即将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传播强调为一种类型，这是希法亭的优点。（1961，第 28 页及以下）

2.3 **股份公司与帝国主义**。列宁指出，在股份公司的形成中“分散的资本家……合成了一个集体的资本家”，逐渐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化”（*Imp*，LW 22，第 218 页及以下），银行在其中发挥了新的作用。集中导致出现大型“康采恩”，它们由大量相互交织的股份公司组成（由于特殊的“**参与制**”[*Beteiligungssystems*]，参见上书，第 231 页），而且不只集中了一个行业，而是集中了多个行业的企业甚至不同的资本形式（工业、商业和银行资本）。列宁认为，从中形成了一种双重权力结构：康采恩作为**垄断组织**（*Monopole*）在某些行业和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大型）银行通过康采恩控制了这些行业和市场；这些银行又相互交织，它们在所有重要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列席的代表形成了真正的“**金融寡头**”。（同上书，第 214 页及以下，第 224—225、229—230 页）布哈林在他的（1914 年写成，1918 年发表）帝国主义理论中阐述了，如何通过跨国“参与”外国股份公司或通过向其“投资”来形成跨国或多国康采恩。这些康采恩在全世界，或至少同时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运作，即**国际托拉斯**（*internationalen Trusts*）的新形式。（1918，第 45 页及以下，第 59 页及以下）

2.4 **股份公司和其他资本公司**。伦纳首次尝试系统阐述各种形式的“资本协

117 会”。由“全能资本家”领导下的私人企业发展成为股份公司，其中资本家的职能分布在不同的经济角色之下。任何形式的资本家公司都对应一种特定的利润分配方式。伦纳探讨了固定的法律形式——从作为最古老原始形式的公开贸易公司，到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直到现代的股份公司。（1924，第 192 页及以下）它们都用聚合而成的“股份资本”（同上书，第 191 页）运营，并以不同形式和程度实现了“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区分，前者使用公司的资本；后者贡献自己的股本，控制权被限制，并参与分配获得的利润。股份公司的形式使一群仍然由个人负责和参与的股东实现了“证券所有者的松散结合”，这些所有者互不相识，可能每天都在变动，控制权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他们对企业的兴趣仅限于股票行情和股息。（同上书，第 196—197 页）资本通过“股份形式”摆脱了私有制的一些限制——由于有了股票市场，社会总资本可以任意变为“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新的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能在任何时候以任意大小“犹如凭空产生的一样”被创造出来。（同上书，第 197—198 页）

2.5 **股份资本的社会性和所有制形式**。马克思的论点认为，资本在股份公司中不再由“私人所有”，而是“社会所有”。（*K III*，MEW 25，第 453—454 页）这一论点几乎没被研究过，虽然这里涉及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本支柱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资本公司是**法人**，**资本**按照法律形式就被置于**资本家**一旁。个人的私有所有通过股份公司形式“在法律上被废除了”，股东“在法律上也不再是”社会（实际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了。（Renner 1904，第 152—153 页）在股份公司中，单个的资本家也丧失了“对资本法律上的支配”（Paschukanis 1929，第 108 页）。留给他的是我们称为（私人）所有制的那“一堆权利”：对“一定额度的不劳而获的收入”的有条件的法律索取权（同上），一种有条件的共同决定权（投票权）和将这些权利或被记录下来的书面权利再度售出的权利。另一方面，那些 118
一个或多个股份公司的资本的**控制**者也绝不是这一资本的法定**所有者**。因此，“联合的资本”的所有者同时远远超过私人所有者，也远远比不上私人所有者。

3. **历史趋势**。此后，股份公司的重要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增加。股份公司的形式一般化了，“联合的资本”的其他形式没有消失。资本家不再只是能够将或多或少的资本占为己有并利用的人了。一个资本家主要是成功地除自己的资本之外也运用并且主要运用属于其他人的资本的人，即在一个股份

公司或一个股份公司复合体内部**控制**尽量多的他人的资本。这种对他人资本的控制如何进行，哪些人来进行控制，是政治经济学家——绝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研究的对象。（参见 Steinitzer 1908）1932 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试图阐明，大群股东是如何在违背股份公司民主章程的情况下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服从经理和/或大股东的控制。他们区分了股份公司中五种典型的他人资本的控制形式，并发现美国的 200 个大股份公司中，有一半多是由他们的经理控制的。特别是他们关于股东被所谓无所有权的经理支配的论点经常被反驳。（参见 Sweezy 1953，第 44 页及以下，第 159 页及以下；Mandel 1969，第 246—247 页，第 571 页及以下）他们关于控制他人资本发生或实现方式的观点得到了正确的批判（参见 de Vroey 1973）。在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复杂的支配关系的分析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等级统治——经理与（大）股东都从属于其中——的论点被证明是最可靠的。（参见 Sweezy 1953；Scott 1979）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恩格斯认为，其他“股份公司的潜力”充分展现出来：“控股公司”（Holdings）所做的无非是收购其他公司的股份并持有，发行自己的股票，为其股票交易融资，通过这种交易控制其他的股份公司；投资基金（投资公司）购买和出售其他公司的股票，作为投资项目和投机对象，他们股票的购买者就不再是自己投机了，而是获得了大规模（以所有形式）投机股票的公司利润份额的索取权。两种形式的股份公司也会进行组合：大型的跨国金融控股公司，参股了大量的投资基金——此外还在银行和经纪人（交易所经纪人）公司参股。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康采恩已成为企业的主导形式。 119

参考文献：

A. Berle u. G.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2), New York 1968;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9), Reinbek 1969; L. B. Boudin, *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arl Marx*, Stuttgart 1909; N. Bucharin, *Imperialismus und Weltwirtschaft* (1918), Wien 1929; Ch. Fourier,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1822;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Frankfurt/M-Wien 1968; M. Itoh, *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Basingstoke-London 1988; K. 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Stuttgart 1899;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7), Gekürzte Ausgabe, Berlin/W-Bonn 1988; A. Kozlik, *Volkskapitalismus*, Wien 1968; E. Mandel, *Marxistische Wirt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F. Oelssner, *Die Wirtschaftskrisen. Die Krisen im vor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DDR 1949; E. Paschukanis, *Allgemeine Rechtslehre und Marxismus*, Wien 1929; G. Pietranera, *R. Hilferding und die 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Sozialdemokratie* (1961), Berlin/W 1974; K. Renner, *Die Rechtsinstitute des Privatrechts und ihre soziale Funktion* (1904), Stuttgart 1965; ders.,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ß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J. Scott, *Corporations, Classes and Capitalism*, London 1979; E. Steinitzer, *Die 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Aktiengesellschaft*, Leipzig 1908; P. M. Sweezy, *Theo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1942), Köln 1959; ders., *The Present as History*, New York-London 1953; M. de Vroey, *Propriété et pouvoir dans les grandes entreprises*, Brüssel 1973; M. Weber, »Zur Geschichte der Handelsgesellschaften im Mittelalter« (1889), in: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88, 312-443.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Michael Krätke）撰
胡晓琛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ssoziation, Aufbaupläne, Aufhebung, Bank, Börse, Charaktermaske, Eigentum, Elemente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 Finanzkapital, Form, Handelskapital, Kapital, Kapitalismus, Kapitalkonzentration, Konzentration, Krise, Management, Marktpreis, Marktwert, Monopol, Privateigentum, Profit, Spekulation,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Zins

行动一致（Aktionseinheit） 120

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核心的革命理论问题，这个问题在反法西斯的斗争阶段才获得其范畴地位。它指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工人阶级的社会框架内的政治战略和策略。

历史上分为四个阶段。在《共产党宣言》（1848）至第二国际之后**构建**（*Aufbau*）政治工人运动的第一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角色的思想进程与建立各国间的“兄弟团结”（Bandes der Brüderlichkeit）（MEW 16，第 12 页）联系起来。这一任务标志着向后面各阶段——包括工人运动在组织上**分裂**的现实——的清晰转折。在国际工人运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裂（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第二阶段，其特征是尝试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统治地位下创建一支“统一的全体劳动人民的队伍”（*Arbeitereinheit*，第 67 页），后来是“工人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 der Arbeiter）（*Protokoll*，II，第 1025 页），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保持不变。

在法西斯主义进攻的前提下改变目标理念，这标志着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 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的到来。会上，“统一战线”（这一术语在 1945 年以后被“行动一致”所取代）在“统一党”（Einheitspartei）的组织形式中构成了“人民战线”（Volksfront）（*Weltkongreß*，第 90 页及以下和第 96 页及以下）的核心、一个反法西斯民主主义同盟（*Parteiprogramme*，第 199 页）的核心，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在第四阶段，由于苏联共产党（KpdSU）的统治权力导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和分裂问题（大约自 1960 年起：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欧洲共产主义），行动一致的概念被附加以革命性解放运动的独立要求，并重新表述为“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一致行动”。（*Intern. Beratung*，第 9 页及以下）

自《共产党宣言》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发点就在于，本地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斗争阶段必然被旨在夺取政治权力（MEW 16，第 12 页）的“行动一致”（MEW 18，第 14 页）所取代。考虑到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对“现代社会”的理论分析和处于实际矛盾中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无产阶级的国际威力”（MEW 18，第 439 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战略上革命成功的关键，被理解为“社会问题”（soziale Aufgabe）（MEW 16，第 14 页）。行动一致在这一国际革命理论框架下有两个实际的政治任务：“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团结”（MEW 16，第 14 页），也就是“工人阶级”（Gesamtarbeiterklasse）（MEW 18，第 439 页）形成一定程度的自觉和组织，以及“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MEW 16，第 195 页）联合战胜迄今为止的宗派运动，目标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MEW 17，第 288 页）。此外，“团结和联合的力量”（MEW 18，第 52 页）作为组织技能和革命意愿的一种效果是次要的，首先是

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化趋势的适合实践的表达。为了看到一个未来无阶级社会的真面目，工人的组织联合需要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MEW 17，第 441 页）。

列宁将革命之前阶段的不同革命组织的行动捆绑起来的尝试，完全是在奉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统一构想。从俄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这些组织尽管缺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仍被认为是革命性的组织，“准备好为自由而死，为斗争组织并武装起来”（LW 8，第 511 页）。缺乏统一是“散碎的、分裂的和迟钝的资本主义关系”（同上）的结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DAPR）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代表大会之间，鉴于 1905 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性事件，无产阶级在颠覆运动中的**政治统治地位**（*politische Hegomonie*）得到了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更清楚的强调。但这并不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正式的领导要求，而是党力求通过相应的要求和措施保护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的前景。鉴于国际工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呈现出的分裂，列宁彻底改变了由社会学前提产生出的“特殊、谨慎、得体并友好的行为”（LW 8，第 511 页）策略。

在列宁看来，不同于革命组织缺乏理论意识，第二国际中社会民主党多数的政策是基于对资产阶级**自觉的**拥护，并被评价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夺取政权。对整个工人运动来说，分裂的事实在接下来一段时间被证实是产生于 19 世纪的由“博爱”、“团结”和“统一”的价值构建的无产阶级身份的损伤破裂。在发生十一月革命之后，分裂的创伤和对传统价值的回忆首先在德国对统一的尝试中产生影响。其中，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PD），或者说第三国际发挥着矛盾的作用。一方面，工人运动的重建在攻击性革命运动阶段的最后变得十分必要（参见 LW 31，第 172—189 页），这种认识得到普遍接受。另一方面，德国共产党无法摆脱攻击理论，“从下面产生的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 von unten）被认定是直接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这一视角限制了行动一致的框架。因此，在卡普政变（Kapp-Putsch）之后，德国共产党中央首先要求其成员“对民主共和国袖手旁观”（*Arbeitereinheit*，第 61 页）。在这个阶段，直到反对法西斯主义失败之后，行动一致在德国都还只是一种**策略性的**措施，从概念上排除了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在组织上的联合（同上书，第 70 页及以下）并代之以“聚集在共产主义的红旗下”（同上书，第 62 页），也就是德国共产党力求在工人运动内部的统治地位。“统一战线”的概念

在术语上特别清晰地反映出行动一致在工人运动阶段的具体构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术语中，**传统的**统一设想与革命性起义的**新**战略（为“最后的战斗”调动全部力量）被联系在一起。

123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中丝毫没有表现出能够在行动一致的构想上获得半数以上票数的苗头——也没有考虑到扩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卡普政变期间，他们的统一号召就已经避开了具体阶级专用的称谓，而用了像“人民的全部力量”（同上书，第 56 页）、“共和国的战线”（同上书，第 99 页）等更普遍说法。这个态度与在卡普政变期间不断表达的工人的期望，即希望能够重建因分裂而受损的身份认同、结束“兄弟之争”（同上书，第 74 页）并凭借“把分裂的工人群众重新凝结在一起”（同上书，第 68 页）而赢回政治力量。1920 年总罢工的成功，尽管最后的影响有限，还是能够使行动一致成为历史神秘主义的一个基本形象，作为着眼于政治进攻的工人运动基本立场而不断浮现。

对德国共产党来说，在其革命战略的范畴内，1931 年的“反法西斯斗争首先是反德国社民党的斗争”（Heer 1975，第 113 页），而在 1933 年 12 月，“社会民主党……客观上［!］是法西斯主义不极端的羽翼”（Huster 1972，第 350 页）。在这里，行动一致是从一个“无产者”的阶级还原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概念中推导出的，只要与法西斯分子的逐个统一行动甚至变得有可能，那么“无产者”的概念就妨碍具体的政治分析能力。非无产阶级具有捍卫民主权利和社会成就以及维护和平的需求——正是这一认识（受到 1934 年在奥地利、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事件的促进）才引发对在共产国际 1935 年第七代表大会上正式实施的统一构想进行修正。“统一战线”——1935 年被用作“工人行动一致”（*Weltkongreß*，第 90 页）的同义词——考虑到长期的历史进程，这样的革命策略内部包含了另一个重要意义。它“早在多数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倒台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斗争团结起来之前”（同上书，第 91 页），就找到了作为“反法西斯人民战线”（antifaschistischen Volksfront）（同上书，第 95 页）的核心的理由。作为行动一致的最高形式，力求组织起一支“统一的政治性的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同上书，第 133 页）。

对于这支群众性政党来说，目标被定为“以苏维埃形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同上），预先对后续与社会民主党的争论和在反法西斯同盟运动内部的争 124
论做好准备。除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之外（*Parteiprogramme*，第 196 页），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统一构想主导着德国共产党 1945 年以后的政策。这一政策

在苏占区导致了德国统一社会党（SED）的建立，而在西部占领区则由于以传统改良主义重组的德国社民党而失败。

工人行动一致的再一次历史性失败是由德国共产党的错误判断造成的，即“发展会消除工人运动分裂的历史性原因”（*Geschichte*，6，第405页）。这一错误判断阻碍了工人的两种经验之间的复杂联系。其一，工人群众在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并因其失败方式而感受不到“民族的骨气”以及“人民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同上书，第511页），正如德国共产党在战争之后混淆了愿望与现实的要求。他们误认为，差异巨大的未来设想是从软弱无能的体验和战争的经历中产生的，并有条件地反映出分裂或统一。在实践中，由于德国共产党宣布马列主义为创建群众性政党的一般原则，因而否认了从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到工联主义的其他思潮的特性。其二，德国共产党认识到，社民党自《布拉格宣言》（Prager Manifest）（1934年）以来铭记“行动一致的伟大理念”（*Geschichte*，6，第388页），用其传统的“共和政体的”和反共产主义的构想回答了他们的历史错误，以至于“把社会民主主义大众带到正确的［!］阶级位置上”（Thomas 1967，第18页）这一共产主义战略撞上了与其相竞争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在之后的民主德国的建立，以及德国社民党在之后的联邦德国被工人阶级普遍认可，行动一致的问题在战后历史中越来越失去了政治意义。

相反，在其他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斗争导致工人组织的靠拢。最重要的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智利形成的“人民团结联盟”（Unidad Popular），在历史上能够被归入行动一致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出现了相似的发展，《左派纲领》（Programme Commun de la Gauche）作为“左派联盟”（Union de la Gauche）的预备阶段首先导致了工人组织（政党和工会）的特殊攻势，20世纪70年代末——尽管社会主义者密特朗（Mitterand）选举胜利，共产主义者暂时参与政府——在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后续权利斗争突然变为防守。

在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起为行动一致而做的努力中，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榜样模范始终表现出内部的团结。“列宁主义”——建立一致性并同时划清界限——在这个阶段被归结为内部统一的组织和思想原则。从“堡垒心态”（Festungsmentalität）（Althusser）中产生的自信明显被自20世纪50年代末呈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所动摇，与之相竞争的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主义”一起在一定时间段内首先在亚洲和非洲迅速获得影响。对大多数共产主

义政党来说，证实是向着一种独立的、反映社会变化的政策的多方面发展，被追随苏联共产党的党派解释为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基本原则的危害，因此苏联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和政治思想上的尝试，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与当前需求相适应的水平”（*Intern. Beratung*，第 50 页），也就是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如果还能够要求 1969 年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在签订文件时承诺无条件“捍卫社会主义”（同上书，第 28 页），并因此使行动一致能够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重新确立，那么随后就无须在涉及这一点的根本差异上进行协商了。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和政治运动（指妇女运动、经济运动和和平运动），没有听命于传统的行动一致的做法。——行动一致是一种政治形式，从历史上看，在社会主义体系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曲折之前，在传统的工会政治危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前就已经接近灭亡了。例如，将反排外的烛光抗议当作真正的“人民行动一致”，是荒谬的。这个概念和以
126 它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原型落败于反对派政策的分割和分散。特别是来自一个简单阶级原型的社会基础使行动一致的概念过时了。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M ²1969; L. Althusser,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Hamburg 1978; *Arbeitereinheit rettet die Republik*, Frankfurt/M 1970; J. v. Freyberg, *Sozialisten und Kommunisten*, Köln 1973;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 6, Berlin/DDR 1966; R. Griepenburg, *Volksfront und deutsche Sozialdetmokratie*, Marburg 1971; *Grundsatzerklär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üsseldorf 1969; H. Heer, *Thälmann*, Reinbek 1975; E. U. Huster u. a., *Determinanten der westdeutschen Restauration 1945-1949*, Frankfurt/M 1972; *Internationale Beratung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in Moskau* (1969), Hauptdokument, Berlin/DDR 1969; A. Kaden, *Einheit oder Freiheit. Die Wiedergrüdung der SPD 1946/1947*, Hannover 1964; E. Könnemann u. H. J. Krusch, *Aktionseinheit contra Kapp-Putsch*, Berlin/DDR 1972; F. Moraw, *Die Parole der »Einheit«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73; *Protokoll des IV. 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22)*, 2 Bde., Hamburg 1923; *Revolutionäre deutsche Parteiprogramme*, Berlin/DDR 1967; S. Thomas, *Entscheidung in Berlin*,

Berlin/DDR 1967; *VII. Weltkongreß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35), Frankfurt/M 1971.

克劳斯-米歇尔·博格达（Klaus-Michael Bogdal）撰
高杉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rbeiterbewegung, Aufstand, Bündnispolitik,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Weg zum Sozi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inheitsfront, Klassen, Klassenkämpfe, Klassenreduktionismus, Internationale, Linksunion, Maoismus, Mythos,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Revolution, Segmentierung der Arbeiterklasse, Solidarität, Spaltung, Volkseinheit, Volksfront

一般劳动（allgemeine Arbeit）

马克思将一般劳动规定为科学的活动——但只在《资本论》的准备工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大纲（草稿）》（*Gr*）中，以及在其死后发表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CTM*）中。这一规定中有大量模糊不清的地方。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使用了一般劳动的表述，自第二版起用来表达同一含义的是“抽象劳动”（abstrakte Arbeit），而不再有一般劳动的表述了。因此，一般劳动似乎算不上是马克思充分阐明并持续使用的概念。伴随着向高科技生产方式过渡的科技革命，其中“直接劳动的绝对优势被一般劳动的绝对优势所取代”（Brie 1990，第 65 页），为一般劳动的概念补充了新的现实意义。在计算机化和自动化的生产中，所有劳动倾向于成为一般劳动。由于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新的占有方式，一般劳动在私有制的框架中可能只是边缘性的，例如作为“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商品的自由生产——这是马克思预言的一种生产方式危机的一个方面，这种生产方式被“对象化”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所调节，同时使一般劳动急剧减少。

1. 马克思可能是在对黑格尔思想的改造中形成了一般劳动这个概念。

1.1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是“自在自为的全体”（*RPhil*，§317）。这延续了传统希腊哲学的思维规范。柏拉图认为，相关的普遍物只真实存在于物的每个具体种类中，个体都是普遍物的副本。（参见如 *R* X，597a-e）实用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划分了知识等级：面对个体的（*καθ’ ἕκαστα*）、可变的是技术经验知识，面

对普遍的（*καθόλου*）、不可变的是实际的理论实践。（参见 *Metaph*，Buch I，981a1-982b26 和 *EN*，Buch VI，1141a9-1141a20）相反，诽谤和污蔑希腊启蒙方向的一些诡辩家，特别是唯物主义者伊壁鸠鲁，则从个体感性出发。——就像思考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一样，这场争论贯穿基督教中世纪。直到在资产阶级理论哲学解放的进程中，蕴含的疑问（仍处于伟大斗争和理论家个人安危之下）才得以说明：（1）经验知识的**认识论**问题，（2）一个能达成共识的政体的**政治**问题。马克思将会阐明（3）战略上与生产关系相连的人类生活形态规模的**社会**问题，这种社会问题有其自己的科学和政治地位。

1.2 **认识论的普遍性**。黑格尔的一个基本思想，他常常变相重复并在其中延续了康德的思想："思考意味着使事物具有普遍性的形式。"（Hegel，*Phil Gesch*，Einleitung，第 225 页）相应地，恩格斯也强调在科学规律上的"普遍性的形式"（参见 MEW 20，第 501 页）。马克思也通过把这种普遍性仅仅局限在非现实层面上并揭示它与社会政治普遍性的潜在联系，从而强调了形式上的普遍性。

1.3 **政治上的普遍性**。黑格尔把**公共事业**（*respublica*）翻译成"普遍事务"（allgemeine Angelegenheit）（*RPhil*，§301）或"普遍物"（§303），作为**国家**的标签式命名。但他轻视经验的国家意识，并用"众人"（Vielen）的事物取代"经验的普遍性"（empirische Allgemeinheit），理由是"**总体**（*Allen*）首先指的至少不是女人和孩子等"。众人或人民再次被定义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群体。相反，国家官员（他称作在政府中供职的人，下同）在他那里享有崇高威望；这种"普遍等级"具有"以普遍物为其本质活动的目的"。（§30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HS*）中解释道，普遍物在黑格尔那里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MEW 1，第 231 页）。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普遍事务只是**形式的**"（同上书，第 268 页）。"普遍事务"必然在国家的某个地方表现为经验的，"应该在某个地方穿戴着普遍东西的王冠和长袍，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角色，一种幻想"，"一种**形式性**（*Formalität*）"和"一种**仪式**（*Zeremonie*）"。（同上书，第 267—268 页）黑格尔是从"**普遍**（*allgemiene*）等级'在政府中供职'"出发的。"他硬说普遍理性是'等级的和不变的'。"（同上书，第 274 页）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这和普遍在个体身上的每个化身一样是幻想的，"例如，在科学中'单个人'能完成普遍事务，而且普遍事务也始终是由单个人完成的。但是，普遍事务只有当它不是单个人的事务而是

社会的事务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普遍东西。这时不仅形式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第 267 页）。这一点在之前指向一般劳动，但还没有把它的“普遍性”（Allgemeinheit）局限为“现实的普遍事务”（wirklich allgemein）。

如果人们直接借用黑格尔的话，把对普遍的处理当成是描述一般劳动的特殊等级，那就会误认为，一般劳动在经验上多半作为处理**错误的**普遍事务而存在：将特殊利益统治在意识形态上普遍化的劳动。

2. 马克思通过重提认识论的普遍性和政治的普遍性的共同基础，而将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社会劳动的历史世界。

2.1 为了提前理解马克思把什么和“普遍”的概念联系起来，必须要了解一下相近的概念“共同体”。“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MEGA I.2，第 267 页）当如此年轻的马克思在“普遍意识”和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一种纯理论上的联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敏锐视角来看就得到了更清晰的轮廓。马克思在 1868 年 3 月 25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分享了《格林词典》第一卷的阅读心得：“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MEW 32，第 52 页）特别令他兴奋的这一发现——“德文和北欧文中的 *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 *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 Sondereigen（私人财产）。”（同上）在马克思看来，“一般”的概念在思想占有和所有制关系之间的对立中摇摆（参见 MEW 2，第 59—60 页，其中，马克思没有将一般的理论概念当作具体存在的“实体”所采纳）。

2.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在讨论“结合工人”时“附带”介绍了一般劳动的概念：“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MEW 25，第 113—114 页）

一大串问题都与这个概念相关：一般劳动是否应当表现为一种社会的形式规定性，是否消除了获取科学知识的实体特点，因此是否在“与地方分立主义对立的、直接的社会”意义上被“普遍”需要，这些都不清楚。一般劳动的产品是否为共有制？或者一般劳动能否接受雇佣劳动的形式（如果人们认为科学劳动和一般劳动是一样的，情况将会

怎样）？

在上下文中，马克思首先详细说明了作为间接协作的一般劳动（在这之后，
130 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将“协作”表述为所有接受以知识或工具为形式的前人劳动的产品）：“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MEW 25，第 114 页）但“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以人类特殊传统的不同形式）是否也更加不适合于资本主义对科学知识的利用？马克思指出了“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MEW 25，第 114 页）之间的巨大差别。开路先锋往往惨败。随后出现的是“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以及“大多数……最无用……的货币资本家”。（同上）“一般”（Allgemein）在这个意义上是科学劳动的产品，即一生产出来，便永久、到处且“普遍”可供使用，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开发出为自己创造性地使用科学知识的潜力。二项式定理的最初生产需要很多时间，而“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MEW 26.1，第 329 页）。（要补充的可能是，获得随后成为社会教育体系和普遍理解的问题）——相应的还有如今的软件，开发它是非常昂贵的，而复制它则几乎没有成本。这需要反对随时可能“普遍”获得的人为保护和法律屏障，这种矛盾在资本的语言中催生出“共享软件”的范畴。

对于霍布斯的引言（“真正的科学之母”是数学，而手工业者被认为是通过数学实现的发明的创造者，“就像助产婆被单纯的人民当作母亲”），马克思评论道：“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MEW 26.1，第 329 页）

“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MEW 23，第 382 页）的大工业，学习掌握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宝库中自己可利用的部分，就像掌握自然力一样。与大工业相适应的，是超过单个劳动力总和的“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这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也不费分 131
文。……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MEW 23，第 407 页）马克思在注释中补充道：“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别人的劳动一样，吞并‘别人的’科学。”（同上）“由于这些自然因素不费分文”，在马克思的一部手稿中这样写道：“所以要

在劳动过程而不是在价值增殖过程进行探讨。这些自然因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没有提高**产品价值……自然因素**的运用与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因素的**科学**的发展同时发生……科学含有成为财富的生产工具的使命”（引自 Jungnickel 1975，第 807 页）。

“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MEW 23，第 407—408 页）“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同上书，第 407 页）——一般劳动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在“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第 408 页）之中耗费的只有**使用工具**（*Anwendungsmittel*），而不是**使用**（*Angewandte*）。

然而被资本直接“供养的科学”（MEW 23，第 460 页）可以被认为是一般劳动吗？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别人的’科学像别人的劳动一样被资本吞并”，以活劳动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科学的雇佣劳动，那么科学就无论如何不再是无偿的了。是否因此就无法对科学活动的形式，即公共的学院研究和直接归属于资本的研究做出区分？一般劳动大体上意味着“公共劳动”，但科学劳动的特点也就因此消失了，只留下普遍可掌握性的规定，像精神产品一样：**在使用中不是被消耗掉**，而是会更加丰富。

2.3 **概念的发展**。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这一“未完成”术语的运用是不统一的。有些地方看起来一般劳动表现为一个不清晰的、但在思想战略上核心可感觉到的理论直观，而在有些地方马克思似乎将这一术语探索性地、经验地用在对其含义的寻找上。

2.31 在霍吉斯金（Hodgskin）摘录 132
（*Londoner Hefte* 1850-1853，MEGA IV. 8，第 549 页及以下）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如何促进使用后来的一般劳动的概念。霍吉斯金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所有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元素的科学。在这上面，正如马克思半介绍半摘录的，霍吉斯金区分了“两种劳动”（zwei species von Arbeit），“智力”劳动“观察和弄清，我们通过何种工具可以从物质世界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财富”，“而运用这种工具的劳动……则是用来执行”。（第 549 页；原稿几乎通篇英语，由 W. F. 豪格翻译）“两种劳动，尽管程度不同，都几乎被每个个体所实践。”马克思对来自霍吉斯金的历史事例做笔记：食用植物作为养殖产品，“轮船艺术的改善、地理、天文、造船的伟大技艺”，等等。（第 550 页）霍吉斯金也把语言称作“‘language’（因为它是思维的工具）”（第 552 页）。作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一般知识和能力条件的功

能联系和顺序，马克思从霍吉斯金那里得出："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了观察，这种知识与人口一起增长——我们的**意愿**则与此完全无关……**政治经济学证明了**（1）知识对生产力的影响**和**（2）自然法以知识的形式调整社会发展。……**现在，宗教、自由、媒体等影响历史发展。**"（同上）

2.32 为了避免歧义，要注意，马克思把一般劳动这一术语首先用在了价值实体上。"产品是交换价值，是**对象化的一般劳动**，虽然直接看来它只是个人的独立的私人劳动的对象化。"（MEGA II.2，第 53 页；*Gr*，第 908 页）货币（"对一般生产的权利证书"［Titel auf die allgemeine Production］，同上书，第 59 页）被他相应地规定为"一般劳动的直接对象"（第 53 页），同时也是被认定的全部商品被接受的"一般形式"，因为必须"证实私人劳动的产品是**一般**社会产品"，通过采取货币形式来证实它的"一般社会性"。（同上）"劳动一旦具有由社会联系所决定的内容——这就是物质的规定性和前提——它就表现为一般劳动。"（同上）（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在探讨马克思的劳动乌托邦时只认识一般劳动这个概念——参见 1989，第 43 页）马克思继续说道："劳动的一般性的形式，是通过劳动作为劳动总体的一个肢体，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现实来证实的。"（同上书，第 53 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也有这样对一般劳动的表述。商品"只是代表着交换价值、一般社会劳动……的独立存在，而黄金与商品相反，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MEW 13，第 102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般劳动开始被称为社会必要劳动，作为抽象的劳动构成价值。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货币"就形式上说，它是一般劳动的直接化身，就内容上说，它又是一切实在劳动的总汇"（MEW 13，第 103 页），那么这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就统一被明确地翻译成：等价形式的第二和第三个特点：具体劳动（生产等价物）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MEW 23，第 73 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的："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马克思从现在开始称为"一般人类劳动"（menschlicher Arbeit überhaupt）（MEW 23，第 74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则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MEGA II.5，第 24 页；参见 MEW 23，第 59 页）

2.4 马克思通过雇佣劳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和"这种劳动力出售时的一定

的社会条件”（MEW 25，第 831 页）从劳动的一般基础必要性中分离出去，获得了区别于“劳动作为一般生产要素”概念的一般劳动。一般劳动还要区别于“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MEW 23，第 531 页）的多部门的劳动过程。

此外，一般劳动还要区别于“劳动的普遍性”，一个社会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之后才更加接近于，“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MEW 23，第 552 页）

然而，这两种对一般劳动这一概念的规定之间有联系。因为劳动的普遍性是一般劳动从其特殊形式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条件，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MEW 42，第 601 页）。真正自由的是在这种满是双重空想意义下只作为一般劳动的劳动。其中存在“个人的自我实现”（MEW 42，第 512 页；*Gr*，第 505 页）。马克思在书中写的例子是一种艺术生产，即作曲（“非常严肃，极其紧张”[同上]）。“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同上）

2.5 在马克思预见到自动化劳动的地方，他勾勒出作为内在趋势的资本主义扩张：在这里，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MEW 42，第 596 页；*Gr*，第 587 页及以下）。资本的解体把**一般财富**和**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从其与**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直接劳动**相比对立的规定中解放出来：“**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MEW 42，第 601 页；*Gr*，第 593 页）财富的基础既不是人类的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

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同上）。“一般”在劳动身上有这样的含义，即劳动者连同其自身的社会性一起占有在历史中塑造出来的“一般能力”。与此相连的是**一般智力**（*allgemeinen Verstand*）和其与“一般社会知识”的比例的比喻：“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MEW 42，第 602 页；*Gr*，第 594 页）——要避免把“一般智力”理解成像卢梭的**普遍意志**（*allgemeinen Willen*）一样的政治神话：这个神话成了协调多数人的意愿（和行动）这一复杂任务的暗语，成了一个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找不到的策略性问题。

135

2.6 一些人指出，马克思在一般劳动的概念上，在公共利益中的和为了普遍收益的劳动上，也考虑到自己的理论劳动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自由劳动。他对弥尔顿（Milton）的意见（MEW 26.1，第 377 页），也可以是对他自己的意见：就像“蚕吐丝”一样，“作为**他**对自然的认可”，他对解密社会关系的贡献。另外，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大型研究，而“工资研究”也还没有开始。国家秘密研究（如战争技术）也还在萌芽之中。问题是，马克思是否会把科学的这种个别的、非公共的形式规定为一般劳动。马克思年轻时的一份笔记表明，他认为科学活动是孤独而自由的：“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MEW 40，第 538 页）材料是在大英博物馆普遍供人使用的文字，像语言一样在这里作为一般人类中介的化身起作用；无异于自己的产品供使用。马克思通过在这个方面比较科学和语言，认为科学（在难以解决的统治、所有制的抽象之下，表现为例如保守秘密或排除其他收益）是现实（或者说具体的可能性）中人类本质的基本要素。

3. 在后继者看来，一般劳动的概念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概念在工人运动史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上，为科学知识界赢得独立的合法性。 136
对此，一般劳动的概念十分合适，因为马克思认为科学活动不只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甚至还是越来越重要的一部

分，在自动化的前景中变化较小的“直接劳动”甚至是“次要的”。（参见上述引文，MEW 42，第596页）然而接受只是部分的（参见 Fogarasi 1955，第 107—108 页；Wolkow 1970，第 253 页；Kröber / Laitko 1975，第 165—166 页），而蒙受批评的是作为一般劳动的科学表述导致“反映论的物质基础”（Hörz 1974，第 43 页及以下，引自 Ruben 1976，第 23 页）的缺失。若在马列主义内部研究一般劳动的构想，那就必须加强反映论。

3.1 里林（Rilling）（1975，第 52 页）尝试，在与克勒贝尔（Kröber）和莱特科（Laitko）（1975）的争论中和在马列主义的内外模式或者说观念物质模式的界限中，把在科学工作上的“一般”理解为**物质**（*stoffliche*）特殊性；就这点而言，在分析中不考虑社会形式规定性。取代一般认识能力的特殊活动，他把科学劳动理解为“特殊认识能力的活动”。如果“通过消除对科学劳动与物质的和 / 或观念的劳动工具之间的区分，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确定科学劳动的角色”，那么其中（生产关系的）形式规定性的要素就再次显著下滑。然而，什么是“观念的劳动工具”呢？如果是表面的信息来源、计算总额这类，那就是物质的；如果是“内部的”，与能力同时发生并且无法与个体分离，那这种区分就不能被消除。相应的形式规定性在物质特点中具有其碰撞结构，但并不与其发生碰撞。

里林认为，科学劳动产品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物质特殊性在于被他规定为“客观现实或特定客观现实的研究对象在观念上的反映”（同上书，第 55 页）的**信息**的特点。它构成了“观念上的认识工具”：“深入劳动过程的认识基金（Erkenntnis fonds）”，“同时行使指导行为的功能的特殊方法（要求和指导原则）”。“基于这种认识工具在观念上的特征”，知识“在原则上是可以**被任何人普遍无限**（*überall / von jedermann / unbegrenzt*）使用的，因为现有的知识储备没有因社会交际的转达或者说使用而降低”。（同上书，第 57 页）——形式和物质方面的比例在这里像在客体与使用的对立中的反映特征一样模糊不清。鲁本在这里打断。 137

3.2 彼得·鲁本尝试对一般劳动的概念做最简洁的拟定，他毫不迟疑地解释了“马克思的科学（作为一般劳动）概念是黑格尔精神概念的嫡系延伸”，“众所周知”，黑格尔“把精神理解为卓越的**劳动者**”。（1976，第 16 页）“但是现在，黑格尔在劳动的概念和精神的概念之间强加上**等号**，而马克思则把这个等号删掉并把科学规定为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针对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的一般**要素**。”（同上）鲁本注意到“一个相较于社会科学的质的新发展阶段的阵痛”，在他看来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世界性过渡的反映”。（同上书，第 7 页）

在这个派系上，富尔特（Furth）等人用**智力**概念代替**一般**的概念：他们“把科学理解为劳动的智力要素的特殊形式”，后又理解成“工业生产的智力要素”。（1980，第 275 页）**经验**被他们视为以前的特殊形式；科学通过“把自然力转化为生产要素的普遍形式”（同上书，第 273 页）超过了经验。像“力”这样抽象成一般的概念是“以实际能力为前提的，相关的要素能够表现为尽可能多变地规定事物的特征”，例如“风力、水力、热力、核力等”（同上书，第 274 页）的推动。——尽管对鲁本的论断进行了修正，富尔特等人认为“修改马克思草拟的作为‘一般劳动’的科学的表述”是一件“要做还没做的事情”，理由如下：“如果一般的代表被具体的个体当作一种作为‘一般劳动’的劳动工具而表现为主客观统一的**物质**反映，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不止拒绝对反映论的机械减略，还真正超越了将反映理解为主被动要素统一的保证。”（同上书，第 272 页）鲁本提供了这种保证的关键。

鲁本认为一般劳动是对科学活动精准而有效的定义，在这里面，“发现”是客观的，“发明”是主观的表现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了“一般劳动在其中物化的产品”（1976，第 11—12 页）。在他看来，科学是“具体的一般劳动，而物质生产或者说使用价值的生产是具体的个体劳动。具体的个体劳动和具体的一般劳动构成人类具体劳动的两个要素，而对其条件和产品不同的使用方式则抽象成抽象的一般劳动”（第 12 页）。撇开劳动分工及其社会机构的特殊化不谈，鲁本在广泛的意义上表达“科学”：“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力之外的）自然力表现为生产要素，科学就变为现实——虽然完全独立于科学是否在社会上制度化……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力的客观存在反映了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科学的主观存在！”（第 14 页）

对此提出两点异议：（1）在这里，“一般”对于所有在生产中行使职能的作用过程来说是共同的基础，也就是自然规律；但是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力的客观存在”被认为是充分的规定，那这种规定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也适用于动物活动。（2）就像野蛮人抓起当作工具使用的第一块石头，资本主义者的这块石头自发地表现为资本，那么科学在这里也表现为科学。——相反，马克思对科学与工人的社会关系感兴趣，其中，科学完全被资本以体系化的形式用在生产过程中并被包括在资本形式之中：“因此，在生产中**使用的科学**与**直接劳动分离**，与此同时，限于早期生产阶段的认识和经验程度却与劳动本身直接相联系，却没有与劳动分离而发展成独立

的力量，因此也从未超过传统方法，而只是缓慢且小范围地扩大方法的收集。”（引自 Jungnickel，第 808 页）马克思继续把在这种条件下的科学权能描述成对
139 相应的工人无能的互补的对照。在这里，鲁本在这两者间是平静的：“这样一种科学的表达方式自然不是由科学的特征导致的，而是使科学成为现实的社会经济的条件。”（1976，第 15 页）私人所有制体现并实现了那种分离。鲁本反事实地宣称：“正如私人所有制的社会否定在对象化的社会条件上消除了工人的异化，同样也排除了其与科学的分离。”（同上书，第 15 页）

在鲁本为定义一般劳动而提出的马克思的表述中，“‘一般’一词表明了具体种类的不同，而‘劳动’一词则表明了相应的种类”（同上书，第 16 页）。“凭借科学作为一般劳动的定义，假定科学认识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要素**。因此，生产的**具体种类的**（*artspezifische*）特点恰好在于，独自具有生产的**一般性**（*Allgemiene*）的内容。”（同上书，第 15 页）

鲁本用“模型（Modelle）（包括所属的理论）”的概念规定了科学产品的特征。这些模型是“**判断**相应理论的**适用级别**……并且是我们耗费精神在理论中推行的一般性对象化的代表”（同上）。科学对一般劳动的规定，“使从环境中孤立出来的对象成为一般规定的模型”，是一个“精神在其中表现出来”（同上）的事实。平行于马克思的价值分析，鲁本也表达了这一过程：如果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被表现出来，一般等价形式或者说货币形式就被再生产为“物质的”、“表面的”东西。一般等价形式是衡量价值的**标准**。与此相似，一般标准在自然科学中行使职能。对此，鲁本在另一领域中移植了反映概念。科学劳动生产模型，也被他称为“‘原型’（Urbilder）或‘原样’（Originale）”的模型，就像他模糊表达的，是“特征的反映，可以被所有的复制品所替代”，由科学劳动生产的“在彼此等价的对象的阶级中的‘一般等价物’”。（同上书，第 25 页）正如巴黎人的“标准米”（Urmeter）在物质上表现长度的统一度量，一般等价物是“所指……种类的代表、典范、模型、反映”（同上）。

在鲁本看来，一般劳动**在其可控性的意义上**含有**劳动在事物一般“可交换性”**（*Austauschbarkeit*）**上的意义**。由于开门见山地解释了社会、异化成劳动主体的
140 共同体或一般性，他提到了他宁愿隐瞒的一般劳动的空想要求，他的结语为“科学转化为工人阶级的喉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第 40 页）。这是种幻想。

3.3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强调，科学作为一般劳动“在这

个意义上也［必然］是普遍的，按照普遍理解，科学的结果、认识的兴趣假定能够被占为己有……但属于一般性的还有别的东西：只要科学是一个社会等级的科学家的事情，它就不是真正普遍的”（1985，第 107 页）。只有像年轻的马克思所说，“不是单个人的事务而是社会的事务时……这时不仅形式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KHS*，MEW 1，第 267 页）。但这样的一般性以社会变革——运动为前提。除此之外，阿恩特继续说道，科学一直“缺少定义”。“由于认识的一般性获得指引行动的功能”，科学只有“成为运动喉舌和从中不只反映现实，还创造现实的机会”。（1985，第 108 页）一般性作为行动指南同时意味着：“科学作为一般劳动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是狭隘的，正如党用来反对狭隘化。”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威也不简单地开门见山地表现为一般性。“因此，理论权威与运动的关系就是批判性的干涉。”（同上）

3.4 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将一般劳动与**思维形式**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和鲁本近似）：“一般化的提供生活保证的**物质经济**基础……含有……必要的**认识结构**。”（1983，第 285 页）他引用了列昂季耶夫（1973，第 288 页）关于使用斧子的例子，借此“按照在工具中预先客观确定的特征来实际分析劳动对象并使其一般化”。因此，工具对列昂季耶夫来说，“成了第一个真正的、自觉而理性的抽象，第一个自觉而理性的一般化的承担者”（1973，第 288—289 页）。

4. 马克思对于一般劳动的论断，比起一个系统性概念的部分表现得更像一种直觉，在跨国资本主义及其高科技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需要新的转化。“科学”作为认知的或信息的或演算的生产力不只成为决定性的资源，在这后面还有对自然资源的控制；由于劳动在自动化上“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MEW 42，第 601 页；*Gr*，第 592 页），智力资源成了劳动产生和运转的媒介。对这个媒介的所有权不再是能很容易实现的，就像大量复制程序的权利是显而易见的一样。——马吉·皮尔西（Marge Piercy）在他复杂的科幻小说《他、她、它》（*Er*，*Sie*，*Es*）中吹捧了一个女数据盗用者的形象，她促使信息从康采恩的圈禁中解放出来：后资产阶级社会的先锋。——随后的非法盗版意味着在商品形式 / 价值形式界线上的**共享商品**（*share-ware*）。而所有埃及式的劳作受到高科技的资本主义及其“不发达的”环境的侵袭，因为随着在一般资源上的私人所有者的解放，资本主义也开始动摇，不能够把私有制带到全世

界。在这种情况的空想中，所有劳动趋于一般劳动，由此，正式和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界限也会同时被废除。

参考文献：

A. *Arndt*, *Karl Marx.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Theorie*, Bochum 1985; M. Brie, *Wer ist Eigentümer im Sozialismus? Rechts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Berlin/DDR 1990; B. Fogarasi, *Logik*, Berlin/DDR 1955; P. Furth (Hg.), *Arbeit und Reflexion. Zur materialistischen Theorie der Dialektik. Perspektiven der Hegelschen »Logik«*, Köln 1980; A. Gorz,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Vernunft*, Berlin/W 1989;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H. Hörz,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Berlin/DDR 1974; J. Jungnickel,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Naturkräfte in einem bisher in Deutsch nicht 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 von Karl Marx«,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23. Jg., Nr. 6, 1975; G. Kröber u. H. Laitko (Hg.), *Wissenschaft – Stellung, Funktion und Organisation in der entwickelten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5; H. Laitko, *Wissenschaft als allgemeine Arbeit. Zu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der Wissenschaftswissenschaft*, Berlin/DDR 1979;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R. Mocek, *Gedanken über die Wissenschaft – Die Wissenschaft als Gegenstand der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80; M. Piercy, *Er, Sie, Es*, Hamburg 1993; R. Rilling, *Theorie und Soziologie der Wissenschaft. Zur Entwicklung in BRD und DDR*, Frankfurt/M 1975; P. Ruben, »Wissenschaft als allgemeine Arbeit. Über Grundfrag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Wissenschaftsauffassung«, in: *Sozialistische Politik*, 8. Jg. 1976, Nr. 36, 7-40; G. N. Wolkow [Volkow], *Soziologie der Wissenschaft. Studien zur Erforsch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Berlin/DDR 1970.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高杉 译，沈红文 校

参见：

Abbild, abstrakte Arbeit, Aneignung, Arbeit, Arbeitsteilung, Automation, Bildung, disponible Zeit, Eigentum, Erkenntnis, Form, Freiheit, Gemeinwesen, Gesamtarbeiter, Hegelkritik,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formelle Wirtschaft, Kopf/Hand, Kooperation, Krise, Parteilichkeit,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ität, Produktivkräfte, Reichtum, Selbstverwirklichung, Trennung, Wert,

Wertform, Widerspiegelung,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Zeit

日常性（Alltäglichkeit）

尽管“日常生活”（Alltagsleben）一直存在，不过直到20世纪中叶，“日常的”（alltäglich）事物依然只存在于农村或城区的狭窄、特定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原来只有在节日才会发生变化的周围环境，开始四分五裂。取而代之的是**媒介化**（*Mediatisierung*）（影院，收音机，然后是电视）介入了日常事务（Alltägliche），更确切地说，媒介化的影响不仅仅是对私人家庭生活的外部干预，而且是像编程一样不断固定人们每天的时间安排。这些主要是通过“广告”（商品美学）来完成的，广告的作用在于影响需求，并以此来塑造相应的消费者和用户。进一步说，这些都是通过宣传来完成的，更广义上来说，是通过明智的“建议”来实现的：人们会被告知在特定的时间内应该做什么；于是接下来的生活就可以被预见，并且这些“建议”也将被接受；于是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通过这种方式所构建的社会，即所谓的“消费被引导的官僚社会”（简称为消费社会）。

于是在当代，一种表面上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日常性（Alltäglichkeit）就出现了；但实际上，这种日常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安排，具体是通过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和市场容量来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日常性进入了市场领域，进入了普遍交易的领域，更确切来说是进入了巨大的等价交易系统，换言之，日常性起到了规范所有交易的作用（比如确保交易双方的价值是相同的，等等）。日常性倾向于（要求）在所有领域的一致性。在社会和政治关系再生产（Reproduktion） 143
的这种“基础”上，基于（抽象的）**身份认证**（*Identität*）之上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婚姻状况的身份认证、特定机构的身份认证和社会组织的身份认证，这些都是由国家决定的。

但同时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其中一个迄今为止还没被认清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日常事务（das Alltägliche）自我再生产，自我封闭（即这种日常性的模板不会添加进新的特性。——译者）；但另一方面，日常事务却又对全球、行星、宇宙开放（这里应该是比喻，指的是日常性又对未知的可能性抱有开放的态度。因此作者所谓的矛盾，应该是指上述的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日常性应

该不能再具备新的特性，否则它就不再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了。——译者）。媒介化就包含着这种矛盾：一方面它替代了（原先）直接的、感性的、直截了当的事物；另一方面它召唤着一种新的直接性，召唤着“真实”在场的存在、亲身经历过的差异和明确具体的身份定位，感性地把握差异，而不是拒斥差异。（日常生活中）不见身体图像和声音，使得身体也成了困扰人们的问题，导致人们还是对看似透明的日常性产生了一种巨大的不适应感（Unbehagen）。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日常生活的批评就是从这种不适应感和这种不适应感的对立面去进行分析。一开始这种批评就尝试着去“表明，革命并不仅仅只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的改变，以及对权力阶层的更替；马克思主义层面上的革命应该是对生活的改变，是对日常性的重新塑造。……（因此）应该将日常事务当作是一种**事业**（*Werk*），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将其视为结果和**产品**”（Lefebvre 1974，第10—11页）。

参考文献：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3 Bde., Kronberg/Ts 1977 (1.Bd., 1945 geschrieben, 2., umgeschriebene Ausgabe: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Paris 1947). Mit einem Vorwort zur deutschen Ausgabe (1974).

昂利·列斐伏尔 撰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 译为德文

盛舒洋 译，曹旸 校

参见：

Alltag, Alltagsforschung, Alltagsverstand, Befriedigung, Bedürfnis, Film, Gewohnheit, Konsumgesellschaft, Kritik, Lebensweise, Massenkommunikation, Massenkultur, Massenmedien, Medienimperialismus, Revolution, Semiotik, Warenästhetik, Zeit

日常生活（Alltag） 144

在《格林词典》（*Grimms Wörterbuch*，1854）中，“日常生活”这个名词还被认为是“并不常见”的；像阿德隆（Adelung）的《语法考证词典》（*Grammat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1793）那样，它仅仅列出了与“日常性”（Alltäglichkeit）——例如“资产阶级的日常性”（bürgerliche Alltäglichkeit）——并列的组合词，如“日常服装”、“日常饮食”，其中包括具

有贬义的“常识”（Alltagsverstand）。只有1818年海因修斯（Heinsius）的《民俗词典》（*Volksthümliches Wörterbuch*）引入了作为“工作日”（Werktag）的近义词的“日常生活”（Alltag）一词。这个抽象的单数名词及其所表达的时代体验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世界与生活世界、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相分离的语境中才变得常见，这似乎不是偶然。如果这种社会现实不能用常识来理解，那么，“现实中的日常性”也就不能用常识来理解。（Kosík 1967，第76页）

1. 每天所做的事情、眼前的生活领域和那些不加思索的自明东西的领域，似乎不值得提及。而日常生活的日常性提出了针对特殊状况的问题，使日常生活得到讨论。

1.1“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一开始就基于这样的认识，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本身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DI*，MEW 3，第28页）。他一直对底层人群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感兴趣——从森林中的木材属于谁的问题开始（MEW 1，第109页及以下），到劳动阶级的劳动和居住状况（经济学批判的作品为此提供了大量材料）。马克思绝不会把生产简化为食品的生产。繁殖和由此产生的“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也被理解为生产。（*DI*，MEW 3，第29页）

只有辩护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毫无批判地”（*K I*，MEW 23，第559页）从日常生活中获取其范畴。由此出现了第二个观点：揭示被日常说法所遮蔽的功能联系的必要性。（参见对“劳动的价格”这一掩盖了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价值”的范畴的示范性批判。同上书，第559页及以下）基于对日常生活的批判，马克思确定了为认识内在联系而努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以“日常的偏见”（*K III*，MEW 25，第411页）为“活动基础”（*K I*，MEW 23，第561页）的庸俗经济学之间的区分标准。特别是在涉及“日常的竞争现象”（*K III*，MEW 25，第47页）的地方，马克思认为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同上书，第838页及以下）。因为这些都是“假象的形态”，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生产当事人“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并“感到很自在”。（同上书，第838页）马克思将这种“不合理的形式”及其相应组织的总体称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同上），由此把

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拜物教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1.2 恩格斯相比马克思更倾向于在日常现象**背后**寻找真实，这种倾向为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埋下伏笔。恩格斯用指明剥削关系来回应对剥削关系的屏蔽（参见恩格斯对“所谓住宅缺乏”的说法的批判，MEW 18，第 213 页）。“总体的视角”被简化为将所谓本质的事物和特殊事物等同起来，并将那些直接的形式——在其中，个体生活并体验着相关处境——解释为派生现象。

2. 废除资本统治的宏大愿景可能面临一个危险，即听任改良主义的小步改良政治。葛兰西将揭示，这里包含着自我贬抑为属下阶层（Subalternität，葛兰西描述从属性的、没有自主性的人群和阶级的术语。——译者）的因素（参见 *Gef* 5，H. 8，§158，第 1030—1031 页）。工人运动理论史所呈现出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图像是五花八门的，而且有些部分是互相矛盾的。

2.1 在列宁 1902 年与经济主义彻底决裂的《怎么办？》（*Was tun?*）中可以看到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更敏锐的意识。如果要激发出政治行动能力，就必须走出“狭隘的工厂生活范围”（LW 5，第 427 页）。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必须“能够评价**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并“辨别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同上书，第 426 页）因而“及时地揭露……大家按自己的观点在谈论着的东西”（第 426—427 页）就有了意义。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几乎必须沿着 1902 年从经济通往政治的道路退回到经济上。在这个备受战争和饥荒摧残的国家中，日常生活必须首先被当作经济问题考虑：“人们必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Wie soll man den wettbewerb organisieren?* 1917 年 12 月，LW 26，第 409 页）。现在，当事关每个个人的时候，一个新问题变得重要起来：“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同上书，第 407 页）成为最大的障碍。六年后，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内战获得了胜利，但革命还没有抵达日常生活。从这种非同时性中产生了文化革命的必要性：“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Lieber weniger, aber besser*，LW 33，第 475 页），才能算作已经实现的。在一个缺少铅笔而且还常常把地球认作一个圆盘的国家，日常生活在本质上表现为习惯力量的温床，而这种习惯力量阻碍着追赶性的发展。这个视角是反抗霸权的局势下的征候，在此局势中，布尔什维克徒劳地与现实状况做斗争。直到斯大林才将这些尝试整合成一种强力推行的工业化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列

146

宁的文化批判本身所谋求的。

2.2“人不只靠‘政治’活着”——托洛茨基修改了耶稣的话，作为他于1923年撰写的《日常生活的问题》（*Frage des Alltagslebens*）中一章的标题。他认为，那些确实优秀但“不关心政治的”（unpolitisch）工人不能通过政治，只能通过“生产和技术”来争取。（同上书，第27页）托洛茨基论证了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工作”上的必要性，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政治角色**的削弱”（同上书，第22页）。他相信电影院是能够彻底改变老习惯——尤其是喝酒和进教堂的习惯——的方法。文化革命缩减为一种替换：这里仅仅涉及“用社会主义国家与电影院的统一来填补教会脱离社会主义国家所留下的空缺”（同上书，第49页）。托洛茨基技术论地处理霸权问题，与斯大林关于社会的工程师式设想是共通的。

2.3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斯·赫勒（Agnes Heller）把日常生活理解为“个体再生产”的地方（1978，第26页）。她

147 认为年轻时的马克思是人格和个性的代言人，并将这种人格和个性的形成与冲破自然限制一样理解为共产主义的前提。（同上书，第56页）必须摧毁这种“异化的日常世界的伪具体性”（Kosik 1967，第82页），以重新获得改造世界的而不只是——像存在主义那样——改造“世界观”的前景（同上书，第83页）。

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鉴于大规模增长的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和娱乐产业，日常生活以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afklärung*, 1943 /1947）中的“文化工业”一章是1945年后批判理论的基础文献，所有后继的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皆受到了这一章的启发。批判理论与针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相互影响。而这种在苏联已成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只允许将生产劳动的日常生活呈现为凯歌高奏的图景。相反，针对经典马列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者，首先引用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Parise Manuskripte*）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两部著作看起来恰好用于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的异化证明给官方的必胜主义（Triumphalismus）看。对于1958年被法国共产党开除的昂利·列斐伏尔来说，“异化和‘完整的人’（totaler Mensch）的理论”构成了“批判日常生活的指导方针”。（1946，第87页）

融入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状况越是显得没有问题，“日常的……世界与哲学思维、哲学语言的世界之间的区别”（Marcuse 1967，第193页）就越是显得不可避免。随着社会对立在“议事程序”（Ordnung des Geschäfts）中趋向于被悬置，日常生活变成了某种“新极权主义”

（同上书，第 81 页）的庇护所。对于马尔库塞来说，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状况的批判一贯只有从某种“超越常识”（同上书，第 196 页）的立场出发才是可能的。在批判理论的总体化视角下，个体自己的行动、他们积极应对社会状况的努力被忽视；而在这种行动和努力中，葛兰西——尽管有些含糊——看到了改变这种社会状况的出发点。

3. 在认识把人整合在统治秩序中去的具体形式的方面，异化的解释范式显得有缺陷。个体每天也在自发地追求社会所期待的事物，这一点是意识形态的强势力量

148 永远不会停止的研究的对象。因此，日常生活看起来像“意识形态的自力更生（Do-it-yourself）之地”（Haug 1986）。

日常生活概念包含着极为异质的内容，因此，在分析层面上，它必须被分解成不同的维度。不同的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关注的是，对上级机关（Instanz）的自愿服从与用于个体再生产的日常必要活动中的行动能力是如何矛盾地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参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如 Willis 1979，以及柏林意识形态理论项目［Berliner Projekts Ideologietheorie］的研究）竞争关系的强制激发了大量的“常态化实践”（Castel 1979，第 304 页）；在这些实践中，个人作为自身幸福的打造者从事着各种活动；而在这些竞争关系中，个体的社会性作为“来自外部的”要求甚至是苛求而起作用。这些每天并且数百万次重复的实践构造了一种特殊的接受意愿，只愿接受体制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公告，这些意识形态的特殊力量因此才可以得到解释。哲学的道德基本问题——我们应如何生活？——是对“一个从资产阶级社会传出来的、多声部的、不可名状的问题的回声”（Haug 1986，第 109 页）。

日常生活史。历史的民间文化研究若不迷恋于民俗的细节并且不畏惧社会分析的辛劳，就会提高对文化霸权形成过程的精细结构的注意力。这类研究表明，通过对日常生活和节日、对统治秩序及其在狂欢节中富于象征性表现力的颠倒的互补性排列，社会凝聚力被释放出来；当权者尝试利用这种凝聚力实现自己的目的——但不总是成功。以《年鉴》（*Annales*）杂志为中心的法国历史学家集中关注了“物质文明”、**长时段**（*longue durée*）和“心态”（Mentalität）等型塑历史的力量，认为它们在重大政治转折之外决定着历史的大气候。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 15 世纪至 18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阐明了一种三元图式，它包括日常生存物质的生产（那种真正的经济基础，对 90% 的人口来说表现为直接的真实）、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以及跨国商业资本

主义（1985，第16—17页）。这种描述合乎逻辑地从“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在这里，日常生活意味着“物质生活”生产的“基础经济”的“模糊不清的区
149 域”（同上书，第8页）。汤普森（E. P. Thompson）曾研究过，劳动者是如何积极参与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形成的。“阶级”表现为一种必须被不断重新生产的“关系”（1963，第9页），但日常生活不再只是麻木重复的领域，而同时是人民的“道德经济学”（moralische Ökonomie）的教育领域：这种经济学是由习惯、规范、法律、对合法性和公正的看法构成的混合体，它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对于“没有生产就没有历史”这句话，汤普森补充道：“没有文化就没有生产”（1980，第314页）。尤尔根·库琴斯基（Jürgen Kuczynski）把他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和布罗代尔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参见Bd. 1，15），批判了传统工人史的书写单方面地关注无产阶级的“大型战役”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对真实情况不自主的写照：“一般情况下活动的是领导，而在节日和哀悼日活动的是工人群众，这就是真实。”（1984，第73页）

妇女运动。在1968年之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中，没有一场运动像新妇女运动一样，在如此程度上将日常生活理解为自己的战场。在日常的话语中，性别歧视也得到追踪和揭露。与此相应，开始了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改造：女性合租公寓，纯女性旅游，一种包括出版社、杂志和图书生产在内的真正的文化基础设施的形成——它是某种阅读运动出现的证据。在被宣布为具有政治性的私人领域背后，出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调控模式：用通过“身体的性别化”（参见F. Haug 1983）促成的在雇佣劳动和家庭劳动、国家和厨房上的相应的性别分配，实现公与私的分离。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u. M.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Frankfurt/M 1969; G.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1, München 1956; F. Braudel,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Bd. 1: *Der Alltag*, München 1985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Paris 1979); R. Castel, *Die psychiatrische Ordnung*, Frankfurt/M 1979; R. v. Dülmen, N. Schindler (Hg.), *Volkskultur. Zur Wiederentdeckung des vergessenen Alltags* (*16.-20.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84; N. Elias, »Zum Begriff des Alltags«,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20, Materialien zur Soziologie des Alltags, 1978, 22-29; S. Freud,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 GW IV; F. Haug (Hg.),

150 *Frauenformen*, 2 Bde., AS 45 u. AS 90, Berlin 1980 u. 1938; W. F. Haug, *Warenästhetik und kapitalistische Massenkultur (I). »Werbung« und »Konsum« –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Warenästhetik*, Berlin/M 1980; ders.,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Die Ideologie der gesunden Normalität und die Ausrottungspolitiken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AS 80, Berlin 1986; A. Heller, *Das Alltagsleben*, Frankfurt/M 1978; K. Kosík,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Frankfurt/M 1967; 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s Alltags des deutschen Volkes*, 5 Bde., Köln 1980ff; ders., *Ein Gespräch mit Jürgen Kuczynski über die Arbeiterklasse, Alltag, Geschichte, Kultur*, Marburg 1984;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1946, 1962], Frankfurt/M 1987; A. Lüdtke (Hg.), *Alltagsgeschichte. Theorien 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 Frankfurt/M-New York 1989;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Frankfurt/M 1967;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 1979; E. P. Thompson, *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Aufsätze zur engl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Berlin-Wien 1980; ders.,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1963), 2 Bde., Frankfurt/M 1987; L. Trotzki, *Fragen des Alltagslebens*, Hamburg 1923;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

彼得·耶勒（Peter Jehle）撰
郭胜大、秦明瑞 译，曹旸 校

参见：

Ableitung, Alltagsforschung, Alltagsverstand, Alltäglichkeit, Antagonismus, Apathie, Apologie, Arbeiterkultur,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steilung, Entfremdung, Erfahrung, Fetischismus, Frauenbewegung, Gewohnheit, Humanismus,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Lebensweise,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Kultur, Kulturarbeit, Kulturrevolution, Phrase, Religionskritik, Schein, Subalternität, Ungleichzeitigkeit, unpolitisch,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Volkskultur, Vulgärökonomie, Warenästhetik

日常生活研究（Alltagsforschung）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性认识。”（*Kritik*，第

153 页。原文为大写）昂利·列斐伏尔于 1945 年这样宣布了他依据马克思的研究计划。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了研究方案，其中反复参看了“现实生活的语言”、人类的“现实生活过程”、“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真实的人类”。“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
151 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MEW 3，第 27 页）他着重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同上）这个建议教导人们从发生学—重构的方向，而不是自上而下、客观主义地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总能不断找到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 ——关于住房、饮食、木材盗窃、酒精，等等；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列主义树立起来的官方哲学中，这种关联首先包含着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但这个原理本身没有被理解成转向对现实“存在”和“意识”的研究，相反对于经验的研究而言，倒不如说它起到了审查的作用，来抵御那些表现得不同于官方认为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 ——像酒癖、叛逆的青年文化、对牛仔裤的渴望，等等。

1. 和这些不寻常的标志一样，例如罗莎·卢森堡的劝告 ——把历史研究当作进行日常活动的人类的著作来书写 ——也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要求：“整体的人类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一部社会共同作用的著作，是一部群众的著作。”相反，官方历史“充满了古代英雄传说、个人功绩，从贤王、猛将、大胆的探险旅行家、天才的发明家、英勇的解放者的功绩发出回响。……一眼就看出所有的好坏，个人统治者或伟人的民族事业的幸福与困境。实际上是人民、是无名群众本身创造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痛苦”（GW 4，第 206—207 页，删除着重号）。金字塔是奴隶的作品，他们“建造了自己奴隶化的石制证明”（同上）。——卢森堡描述了一种“革命性的现实政治”，从人类的日常经验入手，将已知的矛盾按原貌揭示出来，供当事人重新体会。

卢森堡描述过一种奴隶，他们必须自己建立他们被奴役的合法性。彼得·魏斯（Peter Weiss）在他的《抵抗的 152
美学》（*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一书中

把这个形象解释成对帕加马祭坛雕像的一种新的解释。——布莱希特在《一个工人读书时的疑问》（*Fragen eines lesenden Arbeiters*）（GW 9，第 656—657 页）也采纳了卢森堡的生动建议："谁建筑了七座城门的忒拜城？……那些岩石，是国王们拉来的吗？……泥水匠们在万里长城建成的那晚 / 他们都到哪里去？"等等。在关于卢森堡的一部戏剧计划中——被布莱希特称作《关于日常斗争的对话》（*Gespräch über den Alltagskampf*）——关键的主题是在纯粹的概念抽象（比如卢森堡提到的她最初的专业——数学）和融入日常生活之间做选择。在这段时间，布莱希特写了有关"日常戏剧"（Alltägliches Theater）的诗作为新的任务："他们的艺术家，做他们的戏剧 / 在大大的房子中，在艺术的聚光灯下 / 在沉默的人群面前，有时 / 去剧院，有时在街头上演。这场日常的、演绎上千次的、不知名的 / 但却是那么生动的、诗意的、来自共同生活的 / 演给人们的戏剧，在街头上演。"（《买黄铜》［*Messingkauf*］中的诗，4，第 171 页）——批评是针对官方历史编纂的。然而区别于被后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传播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种历史撰写是将历史本身表达为群众的生产，而不是把日常人类的行为描述成个别有趣的，却发生在真正伟大的历史之外的事情。

尤尔根·库琴斯基对官方历史编纂的批判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往往也没有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两种阶级斗争：大型战场和日常斗争。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基本上专注于大型战场……然而关于日常阶级斗争，不论是奴隶不情愿的勉强劳动和对个别生产工具的轻度破坏，还是在服封建劳役时相对于在'自己的'土地劳动时较低的生产率，这些在我们的历史书中几乎都读不到。"（1981，第 13 页）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旁支再一次伸向日常生活，抱着研究和证明的目的，提出了批判的社会科学纲领，这是葛兰西、列斐伏尔等人反对经济主义的修正。

葛兰西的出发点是常识在一个矛盾的社会中的分裂状态。从他的《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的计划中可以辨别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批判性经验的研究指导思想："我们全都是某种或另一种顺从主义的顺从主义者，总是群中之人或集体之人。…… 既然人们的世界观并非批判的和融贯一致的，而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那么，人们就同时属于许多人群集团。性格的构成千奇百怪：既包含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的一切过去阶段的、地域层次的偏见，也同样包含对全

世界统一的人类的未来哲学的直觉。所以，世界观的自我批判，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个融贯一致的统一体，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所以，它也意味着对一切既往哲学之批判，因为它们在民间哲学中留下层层积淀。这种批判性的研究以对人究竟是什么的意识为出发点，以‘认识你自己’是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你身上留下了没有清单的无数痕迹——的产物为出发点。这样一份清单一开始就完成了。”（*Gef* 6，H.11，§12，第 1376 页）因此，“现实的人”能够在智力的屈服和从属中采取行动，同时遵循另一种实践，简言之：常识是矛盾的。他们至少有“两种意识”，一种来自于对自己来说确定的实践，一种是他们未经批判就从过去所接纳的。此外，有个别人认为“意识的矛盾状态不允许采取任何行动、任何决定或任何选择，从而造成道德上和政治上的消极状态”（同上书，第 1384 页）。个体从这样一种不可实行的瓦解（unlebbarer Zersetzung）和不相干（Inkohärenz）中解脱出来并成为明智的，即有行为能力的人，是有必要的。葛兰西把这称为“给自己的行为一个意识的方向”。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正如葛兰西的叫法——“哲学家”。对葛兰西来说，这意味着获得一种他们能够赞同的、和谐的世界观。这么做的唯一途径是一个集中在生活条件形态上的共同计划。由于从他们背后袭来的分裂问题也是一个结果，这些人是从这样一种情况发展形成的，即个体没有或者以屈从的形式——作为“属下阶层”（Subalterne）——参与社会计划。另一方面，这种情况还取决于“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准备好每个人都能成为知识分子的途径这个计划中的必要性。计划的任务不是“把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引进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来，而是对于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更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同上书，第 1382 页）。葛兰西不只把研究定位为与一种解放计划的联系，同时普通人还作为主体进入研究过程，而科学家的地位转变为提供他们的分析工具的、起辅助作用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地位。

许多这样的想法可以在昂利·列斐伏尔那里重新找到，即使和葛兰西没有明确的联系：“在工人的意识中——在他们个人实践经验的内容中——存在大量的思想元素，有根据的和虚构的，其中一些是残余性的（例如来自手工业者和农民），另一些基于资本主义的部分过时的客观条件（竞争资本主义中的‘自由的’雇佣合同，劳动斗争的传统形式），还有一些相反，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新的条件（与资本主义的独占形式相矛盾的新内容——垄断，工会行动和

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来源于社会主义，最后源自个人的限制或相关工人所属的团体的限制（合作精神、职业道德，等等）。如果我们完整地考察工人的生活，那就要把他们的劳动和劳动行为再次与全部社会实践、他们的全部经历、他们的业余时间、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希望，以及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除此之外，这种‘完整’还包括处于产生总体需求的一定社会发展和文明水平上的某个特定国家、某个民族的状况。我们再回到日常生活上。”（1977，第 96 页）列斐伏尔的计划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十分相似，写的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1945），他（1961）把这理解成矛盾的运动，理解为异化运动的场所和对此的斗争（1977，第 77 页）。他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计划。他将其理解为对研究日常生活的指导，揭示在日常生活中沉睡的和
155 颠倒的力量，使用批判作为革命的武器。**“这样，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就导致了对政治生活的批判，因为日常生活已经包括了这种批判并发展为：就是这种批判。”**（同上书，第 100 页）

列斐伏尔的核心概念是异化（Entfremdung）和占有（Aneignung）。二者都被他从历史哲学中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他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看出了公与私的分离，是的，私人生活本身作为颠倒日常生活的通用表达；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进入日常生活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同时进行的再生产。列斐伏尔着手分析报刊，并作为一般的研究假设表述了日常生活“[是] 现实**创造**在其中实现并依其实现的场所，[是] 那些人性的和在人性化的过程中生产人的：**行为和业绩**”（*Kritik*，II，1977，第 52 页）。日常生活必须是能被个体相关感知到的。

正如日常认识在葛兰西和列斐伏尔看来是与变化的实践联系起来的，一种社会变化的理论也与科学中的一种典范转移相联系。从人类实践中而来，传统的理论构建可以被解读为利益的反映、意识形态、投机活动。列斐伏尔遵循一种对社会化的人有用的科学，指明个体变化和社会变化的道路，使政治在日常中得以实现并以其为基础。他的研究把他带向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媒体分析，如对电影和戏剧这两项的研究（卓别林和布莱希特）。他研究在家庭和业余活动等中的变化的技术条件。但他的分析没有把普通人纳入研究框架本身之中。

秉承后来的卢卡奇并引用马克思的本质与现象这对概念，阿格妮丝·赫勒把对日常生活的研究转变为历史目的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因果性和目的性是必然彼此规定的社会本体论的事实。”（1978，第 5 页）她在这些规定中改变了这样的思路，即人们虽然改变了历史，

但却是在已有的条件下改变的。她不再把日常生活规定为社会关系矛盾的实践性再生产，不再当作日常的功绩和成就，而是消极的没有“价值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日常生活在它自己的意义上只够在**另一个媒体**中、在历史中、
156 在历史进程中作为社会实体。”（1978，第 86 页）按照她的观点，个别人在偶然的日常生活中、在无尽的过程中掌握类的力量（Gattungskräfte），从而把自己打造成“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后者完全是标准的想法，相应地需要一种道德来贯彻发展。赫勒也由此得出，日常思维是参差不齐的，但不像葛兰西把相关性的拟定表述为人本身的著作。她对通过宗教、哲学和科学为“灵魂”而做的斗争更感兴趣。“在类型适中的层面上提出的大的综合，不妨碍日常思维日复一日地产生部分综合。部分是原始神话，部分是日常经验综合的一般化（所谓的‘人民的智慧’，‘农民哲学’）。”（同上书，第 273 页）

如果日常生活在这里总归还是有发展可能的场所，那么以后 —— 在批判理论的延伸中 —— 在莱特霍伊泽（Leithäuser）看来就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牺牲场所：“日常全部的神秘化尽可能地排除理性。静止的日常环境把个体的感知和感觉当作不可变的预先设定。”（1976，第 181 页） —— 与批判理论的另一个联系在奥斯卡·内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1972 和 1981）那里。在穿越文化传统的景色中，他们揭示了对不良社会进行总体化滥用的反抗维度和执拗的抗议形式。

2.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生活方式和其与生产关系的联系的问题上爆发。日常的行为方式 —— 比如消费习惯 —— 处于与第三世界的剥削和环境破坏的直接联系中。政治变得日常实践化。

为重新使用日常生活来进行理论批判，需要政治性的妇女运动。首先需要在高校领域阐释，传统理论的构建曾经是、现在也是不包括妇女的。她们不只是理论的创造者，还是理论的客体。首先得出的结论便是，主流理论的构建排除了女性的**经验**（这些理论的构建也是没有男人的经验的，这重新成为后期理性批判的结论）。这种发现把目光放在制造经验的领域，一个完全不抽象的、立 157
刻被易懂地称为**日常生活**的领域。实际上，那种批判来自妇女运动，与一些科学学科普遍转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同时发生。

大约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起，转向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风气（Alheit 1983）。但这种风气从一开始就与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活动的批判相连 —— 它主张转向平凡并指责其余的研究不认真对待人的

生活。这里还出现了一些特点：由于日常现象与社会学至今为止所从事、强调并用另一种名称（平凡）描述的不同，这些现象同时被当作异国风情。对于现象社会学之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来说，“日常生活世界是……人能够影响并改变的现实宗教”（1979，第 25 页）。我们看到，转向日常生活也是“人”不能总体上改变世界的一种妥协。日常生活作为科学可能的客体，在对这一点的长期讨论中，大量缺失的是在日常行为和社会总体之间的媒介。此外，这导致了去探求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和规则）本身，而不是社会如何日常地再生产。重点是对劳动与居住关系、日常文化与日常知识关系的研究。对此，日常生活作为人类社会学和民族方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研究范围或研究领域，虽然贯穿社会学普遍的范围逻辑 —— 日常生活既在工业中、在家庭中，也在学校里，等等 ——，但其中有一套自己的逻辑，能够从外面观察并确定其中的制度。简言之，民族方法学将日常生活构建为它本身并不关心的一个领域。

在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进行的，例如由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所做的文化研究中，社会的日常再生产的问题被当作核心（Hall / Jeferson 1979，Clarke 等人 1979，McRobbie 1978，Willis 1979 等）。首先尝试开始研究的是偏离主流的青年文化的事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了与传统文化概念的一种断裂和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吸收。研究在方法上没有超越多人参与式的社会研究。虽然在威利斯“部分贯彻”的构想中透出葛兰西所指出的常识的不统一性，但丝毫没有（在威利斯 [Willis] 看来，最多是以一种事后讨论的形式）尝试将被考察者纳入认识过程本身之中。

在人类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哈贝马斯认为，当“交往的日常世界被体系结构所瓦解”，当出现一种“体系归纳的物化”（1981，II，第 212 页及以下，第 481 页及以下）而生活世界被“文化传统”（同上书，第 483 页）所阻断，那么日常生活之中就出现了断裂。“因此，通过日常实践的非形态化，静止的象征与荒凉的象征互相联系起来了。这种日常交往的片面合理化的因素，归结为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的独立化，这种媒体控制的下属体系的独立化，不仅是使生活世界的视野成为脱离规范的实在的原因，而且借助它们的命令，深入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另外一个努力继承活的传统的因素，归结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意味着特殊研究的因素的独立自主化，而且也意味着不值得相信的传统的分裂，这种分裂出来的传统在日常解释学的基础上，

158

在没有权力的自然发展中继续存在。”（同上）因此，哈贝马斯不像列斐伏尔等人认为反理性是在日常中确定下来的，而是相信主流的系统理性本身瓦解了我们通过熟悉和沟通确定的日常生活。

实质上，从人类社会学转向日常生活中得出的方式方法上的结论是，履历、传记、短篇小说及其结构都附加了观察和访谈的传统方法。

3. 从女权主义的立场来看，首先看到的是所有这些尝试的一个盲点。研究设计毫无例外地表达了，妇女的生活是不露面的。正如哈贝马斯认为的那样，瓦解是随着体系世界的侵入才开始的，取代生活世界及其场所，如家庭、隐私、私密和亲近本身，而被视作战场，征服、权力和统治的场所；最终会是探求日常生活的一般结构和相应的交往过程（Garfinkel，Schütz，Luckmann），这里似乎必然不会从预先确定的权力和统治过程，或者说征服过程出发，这种过程对有性别区分的日常行为和方法程序造成相应的后果。即使列斐伏尔不只把生产，而是把日常生活是斗争的决胜场所全面纳入这种概念，他自己在思考统治和征服时还是推测，问题只在异化和从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中的解放之间。

159

因此，由于妇女运动，在日常生活的问题上出现了最新的转折。“私人的”被宣布为“政治的”（另见 Rowbotham 1979），日常生活被认为是政治的战场，但也是知识的源泉，从中可以探知女性社会化、女性气质的建构、意识形态权力和统治的影响等各种隐秘的维度；同时也是从进行重建到另辟蹊径获取知识的场所。加拿大社会学家多萝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没有有意识地与葛兰西建立联系，没有重新接续马克思对活生生的人的现实活动的阐述，她把社会人类学所理解的体系和生活世界的各不相同的理性，阐发为性别关系的问题和对社会学认识及与此相关的体系和概念的普遍批判。从妇女运动的经验和妇女运动带来的颠覆性的快速学习过程中，她得出结论，即她作为女性在社会学中所经历的陌生和空虚，不是在自己的不足中，而是在妇女缺席于科学结构本身以及在她们的核心看法和概念中确定的。她在对舒茨的批判中写道：“进入科学理论的世界建立了在一种与日常劳动世界相分离的方法中的意识。‘我们’在其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特征，而事前和事后的范畴是由话语的时‘空’组织构建起来，而不是世界上主体的实体状态。”（1989，第 379 页）根据类似的思考，比如她广为人知的女性主义理性批判，她后来做了一个**妇女社会学**（*Soziologie für Frauen*）的计划。她的结论是：科学、国家官僚制度和社会机构的主流体系不

只使用了排除妇女的概念和体系，这种
160 概念或体系还在今后调整社会并对妇女生活施加影响。从社会学原理对妇女自己的日常生活来说所表现出来的陌生中，她拟定了一份源自经验的计划，研究妇女“以前的”一般实践经验和其他经验之间的这种偏差，内容包括随着社会调整的和固定在社会学中的概念以及由此确定的感知。目标是使相关的人——在这里是妇女——明白日常经验和社会调节层面（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这种方法有一个一般的适用性要求。范式转移涉及两个维度：（1）义务：使人明白世界是社会化生产的，也就是说，日常（alltäglich）促进人类的行为能力——这涉及科学的劳动观点，并且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的规划；（2）视线的转移：使文本——作为影响和调节人类生活的力量——被当作社会研究的对象，因为间接出现了关于文本的社会再生产。经验的研究在冲突中着手进行，寻找概念性的理解，并再次表述为在概念上总结出的和从中抽象出的不同经验。她表明了抽象是特殊的权力行为和转移行为，而概念是会使最早的女性行动者生活艰难的物质力量。建议必然是另一种概念和实践策略。

另一个女权主义的尝试——发展出一种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是**回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参见 F. Haug 1900）。妇女在她们的社会化中创造了不同种经验，能够使彼此陷入关于个体在感知和加工中的和谐与平衡上的矛盾。推动回忆工作的建议，假设了（像葛兰西）个别生活困难的参与人员的不相干。提问的方式尝试避免两个经验研究的问题：要么，所有都被认为并相应地强调为是限定的或确定并能够从社会环境中推导出来的，要么相反，太过主观的行为举止只在于个别人的喜好中。取而代之的研究对象是关于环境、从个体的社会中感知的**内容**与**方式**，这一研究对象被赋予意义并引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161
回忆不仅证明是社会化知识的宝库，还是意识形态、日常理论的混合——深入日常生活中的理论片段和健全的理智的混合——，包括有利于行为能力的高明的矛盾消除。

偏差、断裂、分裂——女权主义的介入有共同之处，即它的出发点是在统治和权力环境和关系下了解使个体受阻的危害。妇女被分裂，对自己的学识判断有误，看不到使她们沉默、使她们没有行为能力的权力。只要与解放计划联系在一起，深入的分析就能有效支持，让曾经沉默的人现在开口。因此，正如葛兰西所表述的，女权主义的学者被理解为妇女运动中的有机知识分子。与葛兰西具体的区别在于两性关系问题的影响。葛兰西的看法——获得一种与自己

的历史有意识的关系，并共同参与“社会未来”的社会计划——只从一种统治环境出发。他围绕着与自己的过去无意识地不同时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在社会参与中协调一致）的思想，扩大了对所有限定的生产关系的简单假设。但这里没有下述问题的空间，即妇女的屈服在这样的不同时性中属于常态，以及社会参与的计划同样有差别。由于成本高昂，妇女获得知识的可能性甚至愿望都受到限制，这使得她们必须在研究方法中将自我改变和社会变化联系在一起。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被理解为适应和常态化策略，保障或至少有助于保障和支撑社会的功能性。假如至今为止的学科共同形成或调节人类经验，但实际上并不是从人类经验出发，那么这些学科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P. Alheit, *Alltagsleben. Zur Bedeutung eines gesellschaftlichen »Restphänomens«*, Frankfurt/M 1983; Arbeitsgruppe Bielefelder Soziologen (Hg.), *Alltagswissen, Interak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2 Bde., Reinbek 1972; M. Baethge, W. Essbach (Hg.), *Soziologie: Entdeckungen im Alltäglichen*, Frankfurt/M 1983; J. Clarke u. a., *Jugendkultur als Widerstand*, Frankfurt/M 1979; H. Garfinkel, H. Sacks, »Über formale Strukturen praktischer Handlungen«, in: Weingarten, Sacks, Schenkein (Hg.), *Ethnomethodologie. Beiträge zu einer Soziologie des Alltagshandelns*, Frankfurt/M 1976, 130-176; E. Goffman, *Rahmen-Analyse. Ein Versuch über die Organisation von Alltagserfahrungen*, Frankfurt/M 1980; A.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Bd. 6 (Heft 10 und 11) *der Gefängnishefte*, hgg. v. W. F. Haug, Hamburg 1994; J. Habe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Frankfurt/M 1981; S. Hall, T. Jefferson (Hg.),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1976; F. Haug,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A. Heller, *Das Alltagsleben. Versuch einer Erklärung der individuellen Reproduktion*, Frankfurt/M 1978; 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s Alltags des deutschen Volkes*, 3 Bde., Köln 1981;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1946, 1962], 3 Bde., Kronberg 1977; T. Leithäuser, *Formen des Alltagsbewußtseins*, Frankfurt/M 1976; A. McRobbie, »Working-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 in: CCCS Women Studies Group,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1978; O. Negt, A. Kluge,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Frankfurt/M 1981; dies.,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M 1972; W. Röhr, »Alltag und

Herrschaft. Ein Bericht«, in: Bulletin der Berliner Ges. f. Faschismus- u. Weltkriegsforschung, Nr. 2, 1994; S. Rowbotham, *Nach dem Scherbengericht.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Feminismus und Sozialimus*, London 1979; A. Schütz,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Frankfurt/M 1979; D. Smith, *The Everz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Boston 1987; dies., »Eine Soziologie für Frauen«, in: E. List, H. 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rankfurt/M 1989, 353-424;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d. 1, Frankfurt/M 1975;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弗里加·豪格 撰
高杉 译，曹旸 校

参见：

Alltag, Alltäglichkeit, Alltagsverstand, Aneignung, Bedürfnis, Bewußtsein, Denkform, Dialektik, Empirie/Theorie, Entfremdung, Erfahrung, Erinnerungsarbeit, Erkenntnis, Feminismus, 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 Gebrauchswert, Gewohnheit, Hegemonie, Ideologiekritik, organische Intellektuelle, Kritik, Kulturforschung, Praxis, Reproduktion,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elbstveränderung, verändern, Vernunftkritik, Volk, Widerspruch, Wissenschaft

常识（Alltagsverstand）

对恩格斯来说（MEW 20，第 14 页），以下现象确定了思辨的形而上学结束以后哲学的一个持久的任务：“运用概念进行操作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随习惯的日常意识而存在的，而是要求基于真实的思维 —— 这样的思维同样具有一种漫长的经验性的历史”，即也必须相应地不断被研究。是葛兰西才将常识和受过科学训练的智识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具体问题，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常识、哲学。寻找这三种心智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他这样表述哲学和文化历史研究引论的纲要（*Gef* 5，H. 8，§204，第 1056 页；尤其参见 *Gef* 6，H. 11，§12）。在葛兰西动用源自古代的术语“常识”（senso comune），且其他罗曼语族和英语都能无碍地理解其意时，德语中却缺少一个不产生歧义的对应词。德国的启蒙运动者在“普通意识”（Gemeinsinn）、“人类意识”（Menschensinn）、“普通的”（gemeiner）或“健全的人类理智”（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健全的理性”（gesunde Vernunft）之间摇摆，或者干脆不加翻译地使用拉丁语的表述“**常识**”（*sensus communis*）。（参见 Maydell / Wiehl 1974）在“没有首都、没有共同利益的德语区”（Herder 1776），“常识”（consens）意味着上级长官的准许，这个概念首先就失去了那

无法译入德语的部分，也就是概念的公民性的内容及其“反对哲学家的理论思辨的声调”（Gadamer 1960，第 19 页）。在康德对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能力的分解中，记录了一种公民生活被压抑的情况：在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从属的地位上作为理性的主人而生活，并不断重新生产出那致使他们软弱的条件之一——与普通人的脱离。具有“被冠以共同意识之名”的“病态尊严”的“普通的人类理智”被贬低（*KU*，§40）；而作为作用范围，后者单独获得了被指派的美的保留域——此处，普通人是不会误入的。《格林词典》（1897）将此总结为：“普通——一个古老的十分重要的高贵词汇，但现在糟糕地衰落了。”

葛兰西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受到了维科（Vico）的影响，尽管他在《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n*）中没有直接援引维科《新科学》（*Neuen Wissenschaft*）（马克思在 1862 年 4 月 28 日写给拉萨尔［Lassalle］的信中提到，这是一本含有“大量聪明才智”的书，MEW 30，第 623 页）中的对“常识”（senso comune）的著名定义：“共同意识是没有任何反思的判断，它被一个完整的等级（Stand［ordine］）、一个完整的民族分支（Volksstamm［popolo］）、一个完整的民族（Volk［nazione］）或全人类所普遍感受。”（*Neue Wissenschaft*，Abs. 142）“没有任何反思的判断（giudizio senz'alcuna riflessione）”——这种生硬的表述强调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性思维的对立。在维科看来，常识（*sensus communis*）是一种前反思的能力，但是，正因为如此，对于“公民生活”（vita civilis）中的实际行动能力以及“公民智慧”（prudentia civilis）来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公民智慧”恰恰不是基于最高原则的知识，不是“哲学的真理（*verum*），而是符合习惯和意志的规则（*certum*）”（Auerbach 1936，第 70 页）——来说，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只有“不聪明的学者”（imprudentes docti）才“直接从普遍真理到具体个体”地操作，而不是像“智者”（sapientes）那样，“通过实践中的差异和不确定性而获得永恒的真理”。（参见 *De nostri temporis*，Kap. VII；奥托［W. F. Otto］用“资产阶级的”［bürgerlich］翻译了“公民的”［civils］。）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常识哲学（common-sense-Philosophie）中一样，在维科那里，“常识”（senso comune）也批判性地与抽象—理性主义的哲学思考相对。正是因为历史不遵循可预测的原则，所以把握偶然性，从偶然性中创造机遇，即培养社会行动能力的问题就获得了核心意义。

维科认为的给定事实被葛兰西当作矛盾地拼凑成的整体而分析。他将常识的“健全的内核”（*Gef* 6，H. 11，§12，第

1379 页）和“良好意识”（buon senso）的健全的人类理智相提并论，认为它没有被“伪科学的形而上学的苦思冥想和吹毛求疵所遮盖”（*Gef* 6，H.10. II，§48，第 1338 页）。“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常识’必须被高扬，因为那个时候存在着一种对于以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权威原则的反动；人们确实发现，在‘常识’中存在一定分量的‘实验精神’和对现实的直接观察。”（同上）但葛兰西同时揭示了对常识的此类反应中的辩证法。如果说在意大利语中，“唯心主义者”（Idealist）这一表达从“技术—哲学的意义”更多地转变到了“模糊性的崇拜者”，那么，这就涉及某种“常识对一定文化衰退的反应……，但恰恰是‘常识’本身将一种合理反应庸俗化和僵化为某种持续气氛……。‘健全的人类理智’做出了反应，‘常识’封存了这一反应，并从中发展出了一项‘理论的’、‘教条的’、‘唯心主义的’规则”（*Gef* 5，H.8，§28，第 962—963 页）。从
165 曼佐尼（Manzoni）的《约婚夫妻》（*Die Verlobten*）中，他摘录了一段话；在此，健全的人类理智与常识的关系被理解为社会的力量对比：那里用的是“良好的意识”这个词，良好的意识根本不相信“往井水投毒的人”是瘟疫的元凶这种主流的说法，但出于对“常识”（senso comune）的恐惧必须默不作声（参见 *Gef* 6，H.11，§56，第 1471 页）。

常识中的“物质要素”只是“原始感觉的直接产品，它……与宗教要素并不矛盾。情况恰好相反”（同上书，§13，第 1395 页）。因此，有必要对常识做批判性的研究。“既然世界观并非批判性的和融贯一致的，而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那么，一个人就同时属于许多人群—集团，自己的性格就会是奇怪地拼成的：其中同时包含着石器时代的要素和现代的、进步的科学之原理的要素。”（同上书，§12，第 1376 页）这就提出了知识分子与“普通人”（die Einfachen）的关系问题。只要常识的主要元素是由宗教提供的，“常识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就会比常识与知识分子的哲学体系之间的关系紧密得多”（同上书，§13，第 1394 页）。但是，如果“实践哲学”与天主教相对立，那不是因为无神论世界观的传播，而是因为教会力求“让‘普通人’滞留在常识的原始哲学中”（同上书，§12，第 1383 页）。

宗教、常识、哲学：在葛兰西将这三个要素互相转化时，它们已呈现为一个作用整体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分离和彼此陌生正好是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它们被编织进了大多数人被控制在从属地位上的社会统治关系。相反，葛兰西将常识表述为（“非哲学家”的）哲学，正如他将宗教称为“人类的童年

哲学”（同上书，第 1381 页）。反过来对于“专业哲学家”的系统哲学，则要探究其中包含的常识因素（同上书，第 1375 页）。这里，没有“正确的”意识与“错误的”意识的对立，被追问的只是知识分子与普通人、哲学与常识的相互关系：“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会获得‘历史的’特征、清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智识主义（intellektualistischen）要素而成为‘生命’。”（同上书，第 1381 页）由此可见，在《狱中札记》中常常使用的、被拉布里奥拉所采纳的表述 —— “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绝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句暗语。一种名副其实的“实践哲学”是“‘常识’批判”（同上书，第 1382 页），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在构造“一种‘哲学的’事实 —— 它远比某个哲学‘天才’发现的、作为知识分子小群体的遗产而存留的新真理要重要、要具有原创性”（同上书，第 1377 页）。实践哲学是对知识分子—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哲学）的批判。

对该文本的两个版本（文本 A 和文本 C）的比较表明了葛兰西提炼这个积极的哲学概念时的细心。如果以前对葛兰西来说，宗教、常识和哲学同样都是“智识秩序”（intellektuelle Ordnungen；*Gef* 5，H.8，§204，第 1056 页），那么，在经修订的文本 C 中则是：“哲学是一种

166

智识秩序，而宗教和常识都不可能是这样的秩序。”（*Gef* 6，H.11，§12，第 1373 页）只有当哲学与“良好的意识”（buon senso）并存时，哲学才是“对宗教和常识的批判和克服”。（同上）

葛兰西的常识概念排除了两种互补而对立的政治类型：片面的启蒙的政治类型，其注重的是将“正确的阶级意识”“灌输给”无产阶级；以及一种反智的政治类型，其通过对智识主义的批判而放弃“智识的”要素，并因此必然僵化在“相信群众”的修辞学中。如果读者来信在《狱中札记》中被作为“意大利的大众常识的最典型的文献之一”而被认真对待的话（*Gef* 1，H.1，§16，第 75 页），那么，这种认识就基于一种来自**新秩序**（*Ordine Nuovo*）时代的批判性实践：作为主编，葛兰西如此认真地对待工人读者的来信，以至于他从不把这些读者来信的编辑工作委托给其他人。

在德国对葛兰西的接受上，自克里斯蒂安·里歇斯（Christian Riechers）（1967）翻译第一本选集起，用“常识”（Alltagsverstand）来描述“常识”（senso comune）就得到了普遍认可。相对于恢复流传下来的翻译尝试，这样做的优势首先在于，尤其是在像阶级意识或“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识这样的概念显得不适用时，关注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被作为实践智慧的独立要素而认真对待。这

个译法无疑也存在一个劣势："常识"（Alltagsverstand）割开了存在于"常识"
167 （senso comune）与共意（Konsenses）这一霸权理论的核心概念 之间的语言学的联系，而后者可以是前者的字面翻译。

参考文献：

E. Auerbach, »Giambattista Vico und die Idee der Philologie«[1936], in: ders., *Philologie der Weltliteratur*, Frankfurt/M 1992, 62-74; H.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60 (^{3}1972); J. G. Herder, *Über die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 Fragmente*, 1767; S. Kebir, »Alltagsverstand, Kultur und Hegemonie bei Antonio Gramsci«, in: *Weimarer Beiträge*, 1986, H. 3, 430-451; H. -P. Krebs, »Führt die Philosophie ein geschichtliches Eigenleben? Gramscis Umgang mit Giambattista Vico und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n: *Argument* 182, 1990, 531-541; A. v. Maydell, R. Wiehl, »Gemeinsinn«, in: HWPh, Bd. 3, 1974, 243-247; G. Vico, *Prinzipien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Über die gemeinschaftliche Natur der Völker*, n. d. Ausgabe v. 1744 übers. v. V. Hösle und Ch. Jermann, Hamburg 1990; ders., *De nostri temporis studiorum ratione* (1708), Hamburg 1947.

彼得·耶勒 撰

高杉 译，秦明瑞 校

参见：

Alltag, Alltäglichkeit, Bewußtsein, 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 Hegemonie, Intellektuelle, Kritik, von außen

古美洲生产方式（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很少涉及古代美洲社会；而且除了易洛魁人的例子之外，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诸文明社会之上，而氏族社会却始终被忽视。

强调这一点很重要：马克思在最为详细地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本，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Formen, 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vorhergeh*）（*Gr*，第375—413页；MEW 42，第383—421页）中，明白地暗示了墨西哥与秘鲁（也见于 *Ein 57*，MEW 13卷，第634页）。马克思显然推荐了美洲文明的模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暗示了秘鲁和墨西哥，他在文中详述了北美洲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这一文本有两个问题：恩格斯遵循了摩尔根（Morgan）的观点，将阿兹台克人的发展阶段等同于易洛魁人的发展阶段，这一观点无论从何种标准来看都 168

是错误的；但最重要的是，由于被摩尔根的模式和术语所吸引，恩格斯放弃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思考，并且不再述及亚细亚生产方式。

为设法明确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古代美洲生产方式的前景，最可取的做法是，将提供丰富信息的最新著作与马克思提及一般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部段落进行对照，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此外还有《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Die Britische Herrschaft in Indien*）（MEW 9，第 127—133 页），分散在《资本论》中的说明（如印加国［Inkastaat］，参见 MEW 23，第 102 页；MEW 24，第 119、151 页；此外，“纳贡关系［Tributverhältnis］”和“纳贡国［Tribut empfangendem Staat］”参见 MEW 25，第 338 页；村社共同体［Dorfgemeinde］参见 MEW 25，第 346 页；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参见如 MEW 25，第 688—689、794—795 页），以及 1853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相关通信（MEW 28，第 246—247、251—254 页，第 259 页及以下，第 266—269 页）。克拉德（Krader）的著作为审视马克思的文本，特别是《人类学笔记》提供了指导。对马克思关于中美洲与南美洲的阅读材料参见 Harstick 1977，第 260—261 页；同上书第 22—38 页是马克思对科瓦列夫斯基（Kowalewski）论“美洲红种人”的摘录；此外还有《人类学笔记》中对摩尔根的摘录，特别是关于“南美洲印第安人部落”的一章，第 186—196 页。在最新的研究文献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最重要的著作是古德利尔（Godelier）、巴特拉（Bartra）与普拉（Pla）的著作。沃尔夫（Wolf）在他最近的著作中对氏族社会与各文明社会都提出了一般性的构思。

在欧洲人发现美洲之时，这片大陆上居住着状况、发展阶段与文化特征极为不同的族群。一般说来，并且预先给出结论的话，人们可以识别出两种社会类型：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社会与处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统治下的文明社会或“高等文化”（参见 Katz 1969，第 63 页及以下）（此外还是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

1. 在中部美洲（这是指墨西哥的中心与中部以及中美洲的一部分）北部与安第斯山周围从未发展出具有阶级类型或政治形态的社会。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居住着从事狩猎与采集的族群——大多以这两项活动之一为主（直接占有的经济）——与从事农业生产（过渡经济）的族群。在这两种情况中，是血缘关系调节社会劳动的组织与分配和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获取。在猎人与采集者群体中，人口统计学特性极其不稳定，从孤立的小族群直到大族群的联合都是如此。这种不稳定性是由狩猎或采集对象

的变动所决定的，并产生了重要的组织方面的后果：亲属关系随着族群利益而扩展，或按照劳动规模而缩小，这种规模对于使某一地理环境应对给定的技术设备是必需的。农业生产者的情况不一样，他们中一部分人持续性地向自然施加劳动，劳动给他们附加了“价值”。公社将积累性与跨越代际（Wolf）的劳动留作他用这一事实导致了对已加工环境的要求或权利的并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公社按照血缘原则倾向于排他性：它的发展壮大源自子孙后代，而很少源自新成员的加入。

还要强调一个区别。农业生产者群体通常对他们的环境的能力有更强的控制。他们对这一环境的加工改造越多，它的面积就越大。农业生产者因而拥有了某种防范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他们可以理性地安排剩余产品的消费，并使劳动力系统地适应各种生产与再生产条件。这里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例如易洛魁人居住单位的发展，或者巴西南岸的图皮人保持和扩大耕种区域的手段与军事策略的发展，以及这一农业民族与猎人和采集者相比在技术上普遍更高的复杂性。农业生产者生产力更大的发展对社会关系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一发展偶尔允许某种形式的专业化。

2. 古代美洲的一些农耕社会已经发展出了大体上可称为“转型阶段”的阶段，它介于原始社会和亚细亚形态之 170
间 。这个问题尽管具有重要性，实际上却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对美洲历史的研究的重视。不过，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家，例如瑟维斯（Service）——酋邦（*chiefdom*）这一高度成熟的概念要归功于他——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我们在美洲缤纷的社会图景中找到的这一可能的转型阶段的最好例证，是来自哥伦比亚的穆伊斯卡人（*Muiscas*）和安的列斯群岛的阿拉瓦克人（*Arawak*，因泰诺人［*Taínos*］而闻名）。当地的范例揭示了以下进程：形成了专业化规则或由村庄内一些家庭从事某些任务的优先性职业，甚至是由一个区域内的一些村庄优先从事的职业，而不用丧失维持生计的基础；但最重要的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完全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即便他们的数量确实很少。是酋长掌握的再分配功能使这一现象成为可能，酋长从他的村庄获得“馈赠”并具有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为建设仪式性场所而采取的合作形式，这一建设由酋长和他的亲信领导，而且要消耗很大一部分社会剩余劳动。最高首领的职位，即**酋长职位**，是终身制的，并且在父子或叔侄之间继承，也就是由同一属系的成员继承。

这一事态使原始贵族制的产生成为

可能：酋长分支或属系的成员比共同体其他分支或属系的成员地位更高，且后者与酋长亲属关系越近，威望越高。统治的职能是经由神圣化而得以合法化的，而统治者被视为天性比其他居民更尊贵的人。在这个时候所显露并在各文明中巩固的另一个进程，是在仪式背景下对劳动力的挥霍，例如穆伊斯卡人杀害儿童所表现的那样。

如果这一阶段被称为是暂时的，那并不意味着被提及的群体将在16世纪转向别的阶段；然而事实上，安第斯地区和中部美洲的各文明必须经历过类似的状况才能形成这类文明。

171 3. 16世纪，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区都存在着由国家形式结合而成的正规阶级社会。根据殖民时代的文献证据，我们对它们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这些社会形态的悠久年代由考古学确定：我们大概能够认为，从公元前800年起出现了与西班牙人所遇见的基本相似的社会（在中部美洲是奥尔梅克［*Olmeken*］文化圈，在安第斯山区是查文［*Chavin*］文化圈）。从那以后，霸权在持续几个世纪中先后出现；它们产生并失去了各自的权力中心。然而，国家的衰弱却没有引发根本性的变革。同一形式的复活从危机中一次又一次地产生。

为了解决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区生产方式的问题，我们将考察欧洲人对这两个地区被两个霸权国家统治时产生的印象，即中部美洲的阿兹台克文明和安第斯山区的印加国。

在这两个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共同体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卡普里（［*calpulli*］，纳瓦特尔语，阿兹台克帝国的语言）和阿伊鲁（［*ayllu*］，克丘亚语，印加帝国的语言）被定义为可以获取土地与表现为实际所有者的血缘共同体与氏族单位。组成这些单位的家庭拥有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此外还能获取他们的共同体可能拥有的其他资源，如森林或河流。土壤的内部分配和使用的调节由共同体通过一位有声望的成员依据传统的共同体法律来实施。即使在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国权势最强盛的时代，中央权力也从未干涉过共同体的内部组织。除了用已提到的小块土地维持生计之外，每个家庭都能通过家庭劳动满足其对所有器具、住宅和衣物的需要。一般而言，农业和建造住房的任务大部分属于成年男性人口，而妇女和老人则负责纺织和制陶劳动。儿童将按照性别逐渐加入劳动。

这些共同体的农业技术的特点是劳动工具发展水平低下：既没有牲口也没有犁或轮，金属——主要是铜——很 172
少使用，并且主要以奢侈为目的。木制的开槽和挖掘工具居多，有些有金属尖端——特别是在安第斯山区——也如

用来开垦和清理耕种土地的斧子这样的石制工具。农业收获量高，有些地区每年收获二或三次，可能要归因于集约型农业的土地耕种策略。在中部美洲和安第斯山区的斜坡上修建梯田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在许多地区，被降低或升高的田地被用来控制湿度，而且其他手段也被广泛使用：用水渠和水井灌溉，套种和轮作，温床和肥料。最重要的农作物有玉米、多种辣椒、苋菜、各个品种的南瓜，在中部美洲有菜豆，在安第斯山脉有马铃薯。不属于食物的作物还有烟草和棉花。

家庭单位是自给自足的单位，是构成共同体生存的第一阶段。这种生存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实现的。共同体无劳动能力的成员（盲人、残疾人）或家庭单位解散的成员（寡妇、老人）是由共同体在各个小块土地或属于受影响个人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的劳动所供养的。也有迹象表明存在着似乎是系统进行的平等合作形式。例如，各个家庭在帮助取得某一家地块上的收成时，是在所有参与劳动者的地块上轮流完成任务。最后，我们还发现了为了共同体整体的合作形式：一方面有改善集体环境的任务，特别具有标志性的是超出各个小块土地范围的水利兴修（修建蓄水设施或给每个地块小型灌溉渠道供水的大型渠道）；另一方面有为维系一些共同体成员生计的劳动，这些成员具有临时或永久性的特殊功能，如巫师或萨满（对于共同体的心态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与天象和一些想象的痛苦做斗争）和部落酋长，还有为共同体的宗教崇拜所进行的劳动（节日、寺庙，可能还有当地的一个小型圣地）。

173

看来唯一可能扰乱这些共同体自给自足的因素就是缺乏战略性产品，如盐，一种纺织纤维或适宜制陶的陶土。历史上，这一问题是通过与其他共同体进行直接交换解决的，并不依赖国家。还可以确定的是，中央权力机构有时会限制传统的实践，并通过使一部分有纳贡义务的产品退出流通的方式行使其再分配的权力。

从每个个体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这种社会类型和原始共同体的制度在此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安第斯山区和中部美洲——甚而在其他亚细亚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如果公有剩余劳动的规定被发现的话，就可以分辨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更高的，包罗万象的单位（马克思的表达方式），“亚细亚”国家。在这类国家内部，就中央统治者与族群酋长（中部美洲的特库特利［*Tecuhtlis*］和安第斯山区的库拉卡［*Curacas*］）的关系而言，共同体与“专制”政府之间建立了联系。拥有传统权威的族群酋长肩负着“输送”

其共同体贡赋的任务。贡赋在中部美洲由劳动和实物组成，在安第斯山区仅由劳动组成。这一区别没有改变基本关系，但仍然是重要的。例如，就农业生产而言，中部美洲的共同体将部分公有土地用于筹措以产品承担的贡赋份额，而安第斯山区的共同体却在分配给它的国有土地上进行耕种（这些土地常常是从同一个共同体中拿走的）。在后一种情况下，除了耕种土地的实物报酬之外，不需要缴纳其他东西。各共同体也为某些灌溉工程，为城市区域和仪式性建筑物的建设（例如中部美洲的大型金字塔），最后为战争贡献劳动力。

关于灌溉工程作为“亚细亚”国家主要权力来源的核心意义有很多论述。然而对美洲来说，这一点是有疑问的。因为共同体拥有技术和组织能力来实现其份地所必需的灌溉工程，而且政府的参与似乎不以改善总体生产条件为首要目的：在安第斯山区，政治权力命令建设的灌溉工程主要用于使国有土地准备生产或加强其收益能力。在中部美洲，阿兹台克时代的大型灌溉工程位于墨西哥的湖畔；其直接目的是建立和维持城市中心——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以及地方防御。可能有一些由国家行政当局实施的灌溉工程对农村共同体生产有益，但这似乎不是惯例，也不应该夸大其意义。

中部美洲文明的统治集团诉诸魔法—宗教的动机，为其统治奠定基础并赋予合法性。人民信仰最高统治者具有的与超自然事物沟通的能力，或直接信仰“印加人与统治他们的神灵”（Mariátegui，第 143 页），主要原因应当是对统治的接受。此外还有其他的思想手段，这些手段要求权力集团具有更强的领导能力，更高贵的品质和具有蒙选的特点。除此之外，武力手段仍然始终存在，经常被用于将贡赋国家的疆域扩展到一个新的部族，也被用于在危机时刻保持对事态的控制。

除了对灌溉工程的强调之外，在亚细亚形态模式下还有两种模范形式，马克思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对其进行了概要描述，而且似乎不符合美洲的情况。它涉及城市的作用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城市发展的原因是，每个手工业部门形成了专家群体，统治集团得以稳固，并且二者的人口都在增长。“专制君主”和他的“地方总督”（参见 MEW 42，第 385—386 页）的形象，以及“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同上书，第 391 页）这一想法与在美洲文明中能够观察到的发展是矛盾的。值得一提的是特奥蒂瓦坎文明（Teotihuacán）（350—650 年）的住宅区容纳了多达 15 万居民的时期。印加与阿

兹台克帝国各自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和库斯科，分别拥有 8 万与 6 万名居民。

175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需要剩余产品的国家政府与生产方式产生的公有制度之间的标志性对立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阶级制度，这不太符合美洲的情况。那里有数量庞大的贵族，是由统治者、祭司、税务员、司法人员和军人、大量的下级官员和所有这些人的家庭成员组成的。贵族不进行生产性劳动，以公社交付的剩余产品为生；贵族集中在城市里，并且促进了依靠再分配制度的专业群体的形成。贡赋关系是能够定义阶级的因素：一方面是剩余产品的受益人，另一方面是交付剩余产品的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必须对后者的起源和条件进行一些详述。贵族对手工业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了个人使用，权力中心的仪式性实践和积累），很快就超出了农民徭役劳动可以达到的极限。此外，与农民家庭生产的简单的消费品相比，这些奢侈品需要更高的专业化程度和并非每个村庄都能提供的原材料。其结果是形成了各种城市手工业者群体，加工金属、半宝石（如绿松石和玉石）、贝壳、羽毛、彩色和精心装饰的面料等。手工业者从城市的市场上得到这项劳动的原材料，或由国家仓库的管理方提供给他们。手工业者共同体的存在以他们放弃任何农业活动为前提，而这通过用他们生产的部分交换食物或通过中央管理机构直接供应是非常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有义务向国家纳税，向仓库交付制成品。在市场关系最发达的中部美洲，第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安第斯山区则是第二种形式。事实上，它清楚地证明，在中部美洲存在着专门从事交换的群体（针对奢侈品和制成品的原材料），这使基础性的阶级架构复杂化了。有专业经销商将交易品的一部分作为贡品上交并获得盈余，这使他们得以获得食物和其他物品，此外还能积 176
累奢侈品 —— 即便达不到贵族的程度。在安第斯山区存在与中部美洲同样的经销商的可能性仍然有待讨论，但中央集权并且对地方控制能力更强的印加国可能还是放弃了负责这类流通的群体。

最后，贵族的仆人必须算在城市人口中：家仆、搬运工、乐师、宫女、杂技演员、兽笼管理员、宫廷工匠……其中一些仆人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到了原来的共同体，并根据轮换原则被其他人替代；然而许多人已经背井离乡，并依赖国家管理机构保证他们用自己的全部劳动力交换生活资料。

最后还必须对美洲文明生产方式偶尔被阐释为封建主义萌芽进行探讨（例如 Katz 1956）。殖民地报告（中部美洲与安第斯山区）提到，上层的老爷们把土地给予他们的“附庸”（Vasallen），让

步条件包括位于农村的公社（纳瓦特尔语 *mayes*，克丘亚语 *yanas*）为老爷们劳动的义务。穆拉（Murra）或卡斯蒂略（Castillo）与洛佩斯·奥斯汀（López Austin）的研究表明，这种剥削形式没有实质的影响——它只影响到少数共同体——而且权利受益者获得的无非就是土地收成的一部分。这一现象似乎是其他适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明所共有的，值得引述谢诺（Chesnaux）的相关结论："存在着'伪封地'，其所有者通过其职位剥削国家对于村庄的权利，并取代国家征收盈余和劳役；然而，这种由私人受益者完成的对国家的替代没有改变农村生产的结构，并且也没有触动农村生产根本性的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R. Bartra, *Marxismo y sociedades antiguas. El modo de producción asiático y el México prehispánico*, Mexiko, 1975; V. M. Castillo, *Estructura económica de la sociedad mexicana*, Mexiko (UNAM) 1972; J. Chesnaux,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quelques perspectives de recherches«, in: *La Pensée* 114, Paris 1964 (wiederveröff. in: Cerm,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1969, 13-45); R. Girard, *Historia de las civilizaciones antiguas de America desde sus origines*, 3 Bde., Madrid 1976; M. Godelier, »Qu'estce que définir une 'form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l'exemple des Incas«, in: *La Pensée* 159, 1971; H.-P. Harstick (Hg.), *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 Vergleichende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Grundeigentums 1879-1880*,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F. Katz, *Die sozialökonomischen Verhältnisse bei den Azteken im 15. und 16. Jahrhundert*, Berlin 1956; ders., *Vorkolumbianische Kulturen*, München 1969; L. Krader,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ritique in the Writings of Karl Marx*, Assen/Niederlande 1975; ders. (Hg.),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Studies of Morgan, Phear, Maine, Lubbock)*, Assen 1972; A. López Austin, »Organisación política en el Altiplano Central de México durante el posclásico«, in: *Historia Mexicana*, XXIII, Nr. 4, Mexiko 1974; J. C. Mariátegui, *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 Berlin/W u. Fribourg (Schweiz) 1986; L.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1877 (*Die Urgesellschaft*, Stuttgart 1891); J. V. Murra,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the Inca State*, Chicago 1955; ders., *Formas económicas y políticas del mundo andino*, 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 Lima 1975;

A. Pla, *Modo de producción asiático y las formaciones económico-sociales inca y azteca*, Mexiko 1982; E. R. Service, *Primitive Social Organization: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1962; C. E. Welskope, »Probleme der Periodisierung der alten Geschichte: die Einordnung des Alten Orients und Alt-Amerikas in die welt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in: *ZfGesch*, Berlin/DDR 1957, 296-313; E. R.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1982.

高杉译，梁爽校

参见：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neignung,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Ausbeutung, Bauern, Bauernbewegung, Dorfgemeinschaft, Ethnologie, Feudalismus, germanische Gemeinde, geschichtslose Völker, häusliche Produktionsweis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ndiofrage, Mehrprodukt, orientalische Despotie,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Redistribution, Sklavenhaltergesellschaft, Subsistenzproduktion,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Verwandtschaft,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另类经济政策 178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1966年至1967年，在联邦德国出现了第一次战后危机。一年之后经法律程序成立了“全面经济发展鉴定委员会”(SVR)，委员会对危机所做的解释是：“如果有依赖性的雇佣劳动者在经济方面获得更多的保障，更多的自信，在社会关系中获得更多的尊重和尊严，在由增长所决定的结构调整中获得更多的希望和帮助，那他们对于我们生活的体制的赞同就会增强。在全面就业政策被发现之后，‘工业的后备军’渐渐减少——同时减少的还有资本积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情况具有一种社会政治革命的特点。”(*Jahresgutachten* 1967，第257号)以这种全面就业的标准来衡量，从1975年开始将会形成一次“社会政治的反革命运动”。一方面将出现持续的大量失业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的下降，并且伴有有目的地削减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经济政策的信号会出现全面的反转。人们不仅**不去**消除失业，反而会把它打造成一种有力的工具，来控制有依赖性的雇员，他们的工会政策，甚至改革政策。当相关人员的生存出现不稳定和困苦时，改造就会完成，这种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本来就依赖于个别的资本策略的雇员在经济和社会上

的依赖性无情地进一步加大。本来亟待发展的福利国家被搁置，让位于符合企业家利益的市场权力国家，这就是在出现就业、增长、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危机时新保守派给出的解决方案。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开始对这一转变进行理论上的准备以及宣传：削减工资，减少福利以及雇员的保障，尤其是放弃采用公共措施来改善就业情况。
179 与 1929 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时占主流的经济学状况相似，如今发生的危机也没有促使绝大多数信奉市场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去长时段地、批判性地考察他们宣讲的原理。失业成了精心呵护的教条的演武场，大家都认为应该在雇员的、他们的工会的以及福利国家的行为之中寻找失业的原因。经济学如果想发挥他们的启蒙作用，就应该阐明在各种理论及建议中所包含的利益。但主流的经济学恰恰避免这么做，他们的模型被宣传成“价值中立的”和“符合客观规律的”。但是与这些模型相关的建议，比如全面经济发展鉴定委员会的建议就是完全站在依赖于就业的雇员的对立面的。委员会的咨询工作的受益者是雇主，雇主们要求有或没有职位的依赖性雇员来做危机的牺牲者。

1975 年联邦德国（登记的）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了一百万，一群有批判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反对把意识形态加入经济学研究中的做法，他们成立了“另类经济政策工作小组”。他们的第一卷《备忘录》的标题就具有纲领性：“为了一种有效的和福利的经济政策”。从 1977 年起，每逢 5 月 1 日都出版一本《备忘录》（关于这个小组的理论基础的讨论，参见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1979）。这个“《备忘录》小组”的目标是，在描述经济状况、进行危机分析以及对于经济政策战略提出设想时，把依赖性雇员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这一方面是为了组织一个经济学方面的对立公共空间，与强大的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咨询者们相抗衡；另一方面是为了把经济学中另类力量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为了设计另类的经济政策，他们与关心时政的工会成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人很有远见并且在应对日常工作之外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力图用一种对立的方案来影响当下经济的发展。这些讨论对于设计工作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另类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发一套另类的经济政策需要四个步骤（这基本与大部分的《备忘录》的基本结构相对应）：（1）对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加以分析，这个分析以领取工资的劳动者或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为基准；（2）考察经济危机的原因，
180 通过这一考察来评判发展、就业以及环

境方面出现的问题；（3）对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政策咨询和实际操作的经济政策加以批判；（4）勾勒出一个“另类的发展模型”，其中的要素有**重新分配**以增加大众的收入、以需求为导向的**长期聘用计划**，在全面收入平衡的情况下**大幅度缩短工作时间**，尤其是经济的**民主化**——不排除通过把重要的生产领域社会化这种手段。

大量失业、新的贫困以及增长危机和环境危机是一段持续很长时间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其苗头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阶段性的增长之后会出现循环性的衰退，衰退时失业的人数较之前一阶段的水平有所增加。所有对于“2000年工作前景”的预测都表明，一个工作小时的劳动绩效（生产力）每年都会比经济增长多增加1%。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的落差”将一直存在。采用高科技的生产方式不会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这必然会导致工作总量的持续下降。通过就业政策以及缩短工作时间的政策有可能放慢这一过程。

尤其是1975年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显示，被很多人看好的“利润—投资机制”并不能——即使对工作时间进行了足量的缩减——在质性增长的基础上自动地实现全面就业。这种“经济复苏”政策反而阻碍了原则上可以充分挖掘的发展可能性。而这正给另外一种战略提供了出发点，这种战略把实施保障以及创造人性化的工作岗位与经济的生态转型以及缩减“军事—工业集团”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质性的全面就业政策。质性的全面就业政策代表了一个对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塑造的全面方案。其目标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创造就业岗位，而是要在有意义的个人及社会需求领域实施保障和创造就业岗位。这一政策同样关注工作条件的人性化，实现理智的收入对比，实行更短的工作时间。这一基本方案中所包含的单个措施既不应该被忽视，也不能被用来相互牵制。

收入的再分配。在一个另类的经济政策框架中，所有建议的措施的目标原则上都是可持续性的收入再分配。因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什么“资本短缺”，而是出现了过度积累，也就是资本过剩。这些过剩的资本却由于个体经济的利润优势而不能分流至缺乏投资的私人和公共需求领域中，无法起到创造就业岗位、缩短工作时间的作用。这种收入的再分配所追求的目标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新的生产结构以及供应结构，另一方面追求的是改变时间结构，也就是说将工作时间明显缩短。这种再分配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再分配，发展的潜力才得以充分发挥和实现。在今天的现实情况和“具体的乌托

邦”（Bloch）——可能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落差；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生活从质量上来说不是高于现有的水平，而是“低于现有的水平”。

从这一种重新分配的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到质性全面就业政策的几个重要支撑点：**增加实际纯收入**以及改善社会救助对象的基本保障。所谓的消费问题一般来说并不是“价值转变”的表现，而是国民收入过低的结果；只有保障国民收入才会改变消费行为，比如去利用高品质的服务，并且参与技术上有高价值的产品革新。人们需要的不是“纯粹的全面调控”，而是实施一个**长期就业方案**，这一方案通过政府采购计划来支持长期稳定的经济需求，并且使减轻对出口的高风险的依赖性成为可能。可以列入计划的方面有很多，比如在生态领域中善后和预防等公共生产、城市建设、交通道路、合理的能源供应，以及合理使用高价值的自然资源，还有地方基础设施，这些都是需求导向影响生产结构和供应结构的例子。通过不同的社会—生态运动将这些需求政治化，就可以看出，这些对于未来具有重要性的生产领域是个体经济的获利战略无法开发的，因此必须在经济领域之外加以开发。这些可列入计划的方面还包括一些生产领域，可以在裁减军备的战略框架下把如今在军事装备生产中的雇员（通过军转民）引导过来。实施保障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是与产业转型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转型是通过减少对生态和健康有害的生产机构以及面向军备的生产机构而实现的。

但是，即使是最好的质性增长政策也无法抵消高科技带来的大规模的削减就业岗位。随着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工人运动一直希望的前景有可能会实现，那就是减少依赖性的工作，扩大工作之外的时间。但是获利经济对新技术的使用方式并没有对这些机会加以利用。相反，社会的两极化加重了。因此必须在保证收入不减少的情况下持续地削减工作时间。另外我们还要认识到，需要对技术转化有全面的掌控政策——并且是在这一转化刚刚发生的阶段——这种政策应该是质性全面就业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

由此全面的**塑造维度**就变得十分重要。如今的危机问题的程度以及有利于个体经济的资本战略的特殊应对方式，其原因都存在于当今现实的资本主义之中，因此我们需要对经济进行一次民主的新秩序调整，在企业家、行业、地区以及整个经济的层面上都有必要实行民主化。鉴于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这种民主化的必要性就更加迫切。在固化的“依附权力的集团”（Poulantzas）的压力下，它的实现也就愈加困难。针对大量

失业所进行的斗争遭到了极大的反抗。因此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不应该纠结于哪种减少失业的方案是更好的，而是要关注社会应该朝哪个方向进行重新塑造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理解，为什么在实施保障和创造就业岗位的过程中，哪怕最小的步骤都会被“内阁和资本”联手阻碍。1943 年胡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经指出，人们利用工人对于失业的恐惧，促使他们“就范于雇主的权威”。这一说法目前仍然适用。

新保守主义的政策致力于加强企业
183 主的权力，这种做法只有在持续大量失业的情况下才能大行其道。货币上的福利削减使生存的适应压力增高。1985 年 5 月 1 日出台的所谓的《促进就业法》就是对迄今受到保护的“正常工作关系”进行进一步破坏的一个征兆。在危机的环境下，新保守主义进行的改造使人们认清了克服大量失业的斗争的政治意义。只有通过实现质性的全面就业，才能为进一步的改革政策创造更好的条件。相应地，“对创造就业岗位进行补贴”（Priewe / Hickel 1991，第 262 页）的思路也是另类方案在结构政策方面的核心思想，是“《备忘录》小组”面对 1989 年“德国统一”之后出现的经济危机提出的建议。努力去实现这一另类政策所提出的目标，本身就已经为遏制集中的经济权力以及相关政策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Methodologische Grundlagen. Analysen und Diskussion, AS 35, Berlin/W 1979; Arbeitsgruppe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Memorandum 94 – Wirtschaftsreform statt Standortparolen. Politik gegen Massenarbeitslosigkeit, Sozialabbau und Umweltzerstörung*, Köln 1994; M. Ernst-Pörksen (Hg.), *Alternativen der Ökonomie – Ökonomie der Alternativen*, AS 104, Berlin/W 1984; ders., »Neue Aufgaben für eine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in: Projektgruppe Grüner Morgentau (Hg.), *Perspektiven ökologischer Wirtschaftspolitik*, Frankfurt/M 1986; J. Priewe, R. Hickel, *Der Preis der Einheit.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Frankfurt/M 1991; dies., *Nach dem Fehlstart. Ökonomische Perspektiven der deutschen Einigung*, Frankfurt/M 1994; J. Robinson, *Das Problem der Vollbeschäftigung* (1943), Köln 1949.

鲁道夫·西科尔
（Rudolf Hickel）撰
潘璐 译，吕随启 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rbeit,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disponible Zeit, Dualwirtschaft,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eynesianismus, Krise, ökologische Modernisierung,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Produktivität, Produktlinienanalyse, Rationalisierung, Reformismus, Regulation, Rüstungskonversion, Sozialpolitik, Sozialstaat, Wirtschaftskrise, Wirtschaftswachstum, Wohlfahrtsstaat

184 阿尔都塞派（Althusser-Schule）

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年）以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正统为名建立了自己的学派。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打开了批判性思考的新视角，消除了教条化和正典化的做法，其影响范围大大地超出法国的范围。阿尔都塞派并不能简单地归于一种事后进行系统化的哲学（不能称之为“阿尔都塞主义”）；即使把它“评价为”一个能够适用于其他情况的“研究计划”也显得问题重重。阿尔都塞的哲学活动——包括其“能够成其一派的”维度——都应该作为一连串的哲学—政治讨论的倡议来分析，是对特定的情形进行思考的：比如有天主教特点的传统的“法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现实社会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国际运动”的危机，还包括预见性的“福特主义的现代性”的危机，这种现代性大行其道，使前两个阵营难以为继，这为阿尔都塞的哲学干预不断地提供新形式的素材。

阿尔都塞在《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难》（*Schwierigkeit, in der Philosophie Marxist zu sein*）（1975）和《马克思主义的危机》（*Krise des Marxismas*）（1978）两篇论述中，主要采用的不是当时已经成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而是用当代哲学中（尤其是法国哲学中）通用的工具。同时，他在研究对马克思的接受之外，还探讨了“法国传统”的局限性以及官方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的历史视阈，为此他回溯了近代欧洲哲学（就像在他之前普列汉诺夫［Plechanow］强调斯宾诺莎［Spinoza］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一样），并探讨了德国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Heidegger］），这些思考在他的著作中有部分显现（参见Derrida 1993，第110页及以下）。我们不应该被一个想象的阿尔都塞的形象所迷惑，而是要注意，他的著作，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政论性的，都带有口头话语实践的夸张。

阿尔都塞的思想曾经受到一种不断

自我更新的天主教统合主义的影响，从1940年他开始在战俘营中脱离这种思想。（Moulier Boutang 1993，Althusser 1992）尽管他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共产党，但他在学术机构中担任一个关键职位时（1950年至1962年他曾在精英大学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担任秘书，从1962年起担任副教授），作为法国共产党官方哲学的重要代表他表现得却很低调；然而在党内，面对大家更加广泛的理论好奇心，他却发挥了教育核心的作用。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倡的哲学思想达到了一种超越法国范围的“时代效果”，使得他提到的理论上相关联的思想（比如巴什拉［Bachelard］、拉康［Lacan］，还包括葛兰西、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对于西欧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左派，甚至一直到“新左派”，在政治和哲学上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在《矛盾和多元决定》（*Widerspruch und Überdetermination*，1962［*FM*，第52—99页］）与《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1965）中，阿尔都塞成功地从哲学上表达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崛起，而且远不止阿尔都塞派的范围（参见例如 Poulantzas，Buci-Glucksmann，Therborn，Hall）。他的哲学实践整体上是反对主流的反哲学态度，目标是对哲学进行理性的更新，使之成为“没有欺骗的实践”（参见 Lecourt 1982）。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Freud）之后当哲学家是困难的，谈论这个问题刚好有助于哲学的更新。现在看来，阿尔都塞的那些建议正是要感谢他在低调的那几年中所走的“弯路”，这条弯路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到斯宾诺莎的“想象的唯物主义”（参见 Elliott 1987），再到近代的政治哲学中“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阿尔都塞对于一种唯物主义的、但不是还原主义的认识论的纲领性表达（以物质性的方案、多元决定的矛盾、理论的实践和阅读为核心）开辟了在理论上与许多方面进行连接的可能性（参见例如 Hindess / Hirst，Rancière，Badot，Raymond）。这一表达的第一次实施就是重读《资本论》，对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引领作用。然后他又建议开创一个针对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理论和文学理论进行研究的领域（参见 Establet，Pêcheux，Faye，Plon，Ducrot，Henry，Thevent；R. Balibar；Ladeur，Kolkenbrock-Netz），这一领域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人道主义、修养市民阶层的影响，研究的主题主要有呼吁（*interpellation*）、话语过程的特殊的物质性、它的主导和屈从效果，以及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这些研究都远远超出了阿尔都塞学派的影响范围。另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政治理论的问题，从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可变性出发对“群众基础”

185

186

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Poulantzas，Balibar，Lock，Buci-Gluck-smann）。重读《资本论》和对政治理论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在对经济和政治的关联进行非经济主义的分析时发挥了作用，由这一结合中发展出了所谓的调节派的重要一支（Aglietta，Lipietz，Brunhoff），并且激发学者对于历史进程进行非限定的分析（Vilar，D’Amico，Stoianovich），促使他们在分析历史转型过程中不再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为工具（Balibar，Hindess / Hirst，Wolpe，Godelier，Stern，Meillassoux），而是逐渐转向对于心性变化（Mentalitätsveränderungen）的话语分析（Robin，Schottler，Postel-Vinay）。

阿尔都塞派由于这种引人竞相模仿的效果而成了一种“另类的正统”：阿尔都塞在法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结集为《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 [*FM*]），对强调整体的、动辄使用异化理论的“黑格尔主义”发动了进攻，阿尔都塞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黑格尔主义的倾向，不仅在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理论中，而且在苏联共产党第 20 届党代会（1956 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去教条主义者那里，比如亚当·沙夫（Adam Schaff）、法国的罗格·加劳迪（Roger Garaudy），另外还有表现不是那么明显的法国共产党的官方哲学家吕西安·塞夫。阿尔都塞利用当时社会科学中进行结构主义系统化，以及社会运动中以毛泽东主义为口号进行群体反抗的潮流，来攻击“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认为它们使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些形式屈从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斗争方式阿尔都塞在事后称之为“抛媚眼”（1975，第 64 页）（也是援引马克思的表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他自己对黑格尔的表达方式进行“卖弄”，MEW 23，第 27 页）。阿尔都塞另行设计了“另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种马克思主义指向（借用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这一范畴，用“结构性的因果关系”这一方案来提供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他用“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scher Einschnitt）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来自巴什拉和康吉扬（Canguilhem）的历史认识论，用来对马克思著作在创作过程中的科学阶段和前科学阶段加以区别。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发现历史科学”进行了哲学的分析，这一分析最终发展成了历史马克思主义范围广大的“自我批评”中的一个领域。1965 年，阿尔都塞在授课时发表了《读〈资本论〉》（与巴里巴尔、马舍雷 [Macherey]、朗西埃 [Rancière]、埃斯塔布莱 [Establet] 合著），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后应该鼓起勇气重读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要超越只对他

的著作进行引用的做法。这种“征候阅读”的目的并不在于“原原本本地”重构马克思理论，而是要把阅读本身看作一个不断积累的历史—话语过程的一部分，是近代哲学的一个批判性的时刻，也是在不同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力量的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这种非还原主义的阅读实践有别于以前的阅读，以前的阅读在方法上十分幼稚，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学理论（卢卡奇，戈德曼[Goldmann]）从“表达的完整性”这一错误判断出发的阅读方法。而新的阅读方法使人们可以把意识形态问题看作个人和阶级与他们“现实的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的关系”来加以理解（*FM*，第184页）。

在阿尔都塞提出的这些倡议中，哲学上的严谨和政治上的追求相结合，这种结合一开始显得很时髦，后来就显得教条化，变成了“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简单对立（参见Callinicos 1976，Derrida 1993）。阿尔都塞本人曾经多次批判过阿尔都塞派这一毫无疑问最成功时期的“理性主义”（1974；参见Rancière 1974对毛泽东主义的升级）。

出于理性主义的严谨，在设计追求正统的革命方案的过程中，阿尔都塞派一再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危机的那些不完整的和自相矛盾的回答拿来批评，当作他们进行重构的尝试的出发点。遭到批评的有列宁的革命理论公式“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这一说法被放到“矛盾和多元决定论”（1962[*FM*，第57页及以下]）的角度加以阐释。阿尔都塞派在这个讨论中发展了一种哲学实践的新方案，被他们表述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参见Althusser 1969）。这一方案后来超出了阿尔都塞派的影响范围，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参见Edelman，Linhart；Thévenin，Badiou；Labica，Lecourt，Macherey，Moreau，Raymond），影响一直延伸到《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

阿尔都塞曾建议，以“随机哲学”（1967）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1970）的方案为出发点，在认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领域中进行具体的哲学实践，但是这些工作都因他本人的疾病和1968年5月的历史事件而中断。这几年中，论著发表的过程总是十分曲折，清楚地表明阿尔都塞派之中出现了裂痕，阿尔都塞自己对早年的“理论主义”所做的自我批评也显示了这一点（1974）。这些自我批评表面上看主要是针对官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肯定自己是正统（参见与约翰·列维斯[John Lewis]的论战[1973]，以及在《保卫马克思》中对塞夫的批判），而内容上却尝试着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全面的重新表述（参见

Schöttler 1975）。阿尔都塞还对自己之前的观点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尤其是葛兰西路线以及全部的批评理论中的很大部分，为规模和影响力都急剧缩小的阿尔都塞派制定了一个有支撑力的哲学—政治的工作计划。在这一阶段（参见Resch 1992，第 208 页及以下）阿尔都塞关心的主要是哲学的实践，这种实践尤其意识到它在学校和党这些“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并没有陷入自我透明性的“主体幻象”之中（参见布迪厄［Bourdieu］对这一点的阐发）。阿尔都塞离开认识论，进行了“领域转变”，这被有些人抱怨为丧失了哲学的逻辑性（Thieme 1985，Elliott 1987），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做增加了政治和哲学上的说服力，并对其表示欢迎（Schöttler 1975）。

在具体研究的实施过程中，也在对法国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愈演愈烈的争夺中，渐渐显露出第一阶段的哲学基础是多么的薄弱。在阿尔都塞派的某些部分中，尤其在法国之外，应对这一情况的做法是教条化。（参见例如 Hindess / Hirst）针对英国相应的发展，E. P. 汤普森（1978）对所有脱离历史语境的孤立的理性主义进行了精彩的清算（参见阿尔都塞和英国阿尔都塞派不同。的回答，Andersons 1980，Benton 1984）在与阿尔都塞比较亲密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克服薄弱哲学基础的做法是扩大研究视阈，阿尔都塞派的许多卓有成效的论述都得益于此。（参见 Pêcheux，Plon，Raymond，Balibar，Lecourt，Linhart，Thévenin）

阿尔都塞在《关于葡萄牙革命的通信》（*Briefen über die portugiesische Revolution*）（1975）中批判了“康乃馨革命”中葡萄牙共产党宗派主义的政策，在他的亚眠答辩的提纲（1975）中，这种批判被明确地扩展到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复杂的关系使人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与它们的关系（参见阿尔都塞为勒古［Lecourt］分析李森科［Lyssenko］事件的著作所做的序，*Fall Lyssenko*，1976）。从莫利纳（Molina）和瓦尔加（Varga）在法国共产党内部的对话（1978 年），到阿尔都塞对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实践进行公开的批评（1979 年），实际上是阿尔都塞身边越来越小的团体在“争取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自由”的口号下完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直言与观点激进化的过程。比如在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理论范畴进行辩证的辩护时（参见 1968，Balibar 1976），这一过程的激烈性就显露了出来（参见 *dialectiques*，Nr. 15 /16）：正是因为他们要努力“紧紧抓住”，所以对于粉饰性的修改无法满意，催促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进行不断的改

变。在一次关于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意义的欧洲共产主义左翼大会（1977年）上，发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这一过程绝对的顶点。

在法国，左翼联盟虽然在1981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阿尔都塞周围的圈子试图在“左翼的民众”内部获得统治地位，以期有所突破。斯宾诺莎的哲学再一次被搬了出来：它是“第一个意识形态理论”，对任何一种试图表述先行的真理标准的“科学理论”都进行了先行的批判——真实的显现为真实，虚假的显现为虚假（*est enim verum index sui et falsi*）。（Epist. LXXVI，O III，第233页）另外，《马基雅维利的孤独》（Einsamkeit Machiavellis）（1977）也被当作榜样。倡议进行的研究工作（在不太引人注目地大规模继续进行）让位于对政治干预的准备和实施。已经缩小到一个小圈子的阿尔都塞派（巴里巴尔、勒古、布勒瓦［Blois］、佩肖等）在最后阶段的论述在理论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历史问题上更具有说服力。在西德，阿尔都塞派早期论述中的“理论主义”曾经遭到过坚决的拒绝，而对这些论述则展开了新的、更加积极的接受（参照“立场”小组以及同名的丛书）。

在法国，阿尔都塞派在法国知识分子界的统治地位（参见Derrida 1993）“以后现代的方式”逐渐瓦解，而在英国，人们却继续援引他们的被重新表述为“研究纲领”的观点（参见Resch 1992）。在受苏联影响的国家中，阿尔都塞派曾遭到官方长期的拒绝——而在文化学 190
等方面的关联中却受到颇有成效的接受——在最后阶段阿尔都塞派被贬斥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和南欧，阿尔都塞派在哲学上的统治地位让位于对尼采以及20世纪20年代德国“青年保守派”的后现代的重新解读。接受的条件发生了如此的逆转，促使人们去质疑阿尔都塞派在理论上延伸的可能性（Böke等1994），以及探寻阿尔都塞的方案内在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最好的论述目前都出自于从前的阿尔都塞派成员之手（参见Balibar 1993，Lipietz 1992，Lecourt 1993，Raymond 1992）。

阿尔都塞的哲学斗争与1980年他杀死妻子埃莱娜的悲剧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查明。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作为“作家”、作为“哲学主体”，实际上已经被宣布了死亡。他再也没有机会进行哲学上的干预。他死后出版的著作激发了人们对他的疾病和他的生平进行讨论（参见Moulier Boutang 1992ff，Balibar 1993）。这些讨论自成一派，与那些尝试在流派瓦解之后检视“阿尔都塞派遗产”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Kaplan / Sprinker 1993，Lazarus 1993，

Resch 1992 以及 Balibar 1991，Elliott 1987，Giacometti 等 1986，Böke 等 1994）。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Für Marx* (1965), Frankfurt/M 1969 (*FM*); ders. u. a., *Das Kapital lesen* (1965), Reinbek 1972 (*DKL*); ders.,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1967, veröff. 1974), Berlin/W 1986 (=Schriften 4, hgg. v. F. O. Wolf u. P. Schöttler); ders., *Lenin und die Philosophie* (1969), Reinbek 1974; ders.,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1970), in: *ISA,* 108-153; ders., »Antwort an John Lewis« (1973), in: *Was ist revolutionärer Marxismus?*, hgg. v. H. Arenz, J. Bischoff, U. Jaeggi, Berlin/W 1973; ders., *Elemente der Selbstkritik* (1974), Berlin/W 1975; ders., »Ist es einfach, in der Philosophie Marxist zu sein?« (1975), in *ISA,* 51-88; ders., *Carlas sobre la revolução portuguesa* (1975), Lissabon 1976; ders., »Geschichte beendet, endlose Geschichte«, in: D. Lecourt, *Proletarische Wissenschaft,* Berlin/W 1976; ders., »Die Einsamkeit Machiavellis« (1977), in: ders., *Machiavelli, Montesquieu, Rousseau*, Hamburg, Berlin/W 1987 (=Schriften 2, hgg. v. F. O. Wolf u. P. Schöttler); ders., »Wie es in der FKP nicht mehr weitergehen kann«, in: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Hamburg 1978, 80ff; ders., *Die Zukunft hat Zeit/Die Tatsachen. Zwei autobiographische Texte* (1992), Frankfurt/M 1993; ders., *Journal de captivité*, Paris 1992; ders., *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Paris 1993; ders., *Sur la philosophie*, Paris 1994; 关于阿尔都塞的参考文献见 *ISA*, 169-173, aktualisiert in Berthold 1992, 164-171; Elliott 1987, 342-351, erg. Balibar 1993; zur Schule: Thieme u. a. 1982, 165ff, Resch 1992, 393-409; komm. Bibl. Zur Sekundärliteratur in Böke u. a. 1994, 275-282; 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1980; É. Balibar, *Über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76), Berlin/W 1977; ders. u. a., *Ouvrons la fenêtre, camarades*, Paris 1979; ders. u. a., *Marx et sa critique de la politique*, Paris 1979; ders., *Für Althusser* (1991), Mainz 1994; ders., »L'objet d'Althusser«, in: Lazarus 1993; T. Benton, *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 New York 1984; J. Berthold, *Althusser-Lektüren*, Würzburg 1992; H. Böke, J. C. Müller, S. Reinfeldt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AS 228, Hamburg 1994; A.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1976; J. Derrida, »Politik und Freundschaft. Ein Interview mit Michael Sprinker«, in: Böke u. a. 1994, 103-162 (zuerst in Kaplan/Sprinker 1993); G. Elliott,

Althusser. The Detour of Theory, London 1987; M. Giacometti u. a., La *cognizione de la crisi*, Milano 1986; B. Hahn, P. Schöttler (Hg.), *Ein Denken in Grenzen* (=*kultuR-Revolution*, Nr. 20), Bochum 1988; D. Howard, K. Klare (Hg).,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London 1972; E. A. Kaplan, M. Sprinker (Hg.), *The Althusserian Legacy*, London 1993; S. Lazarus (Hg.),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dans l'oeuvre de Louis Althusser*, Paris 1993; D. Lecourt, *Lenins philosophische Strategie* (1973), Frankfurt/M-Berlin-Wien 1975; ders., *La philosophie sans feinte*, Paris 1982; ders., *A quoi sert donc la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de la nature aux sciences politiques*, Paris 1993; A. Lipietz, »Vom Althusserismus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in: A. Demirović u. a. (Hg.), *Hegemonie und Staat*, Münster 1992; P. Macherey, *Hegel ou Spinoza*, Paris 1979; G. Molina, Y. Vargas, *Dialogue à l'intérieur du part communiste français*, Paris 1978; P. F. Moreau, *Marx und Spinoza* (1975), Hamburg 1978; Y. Moulier Boutang, *Louis Althusser. Une biographie*, Bd. 1, 1993; J. Rancière, *La leçon d'Althusser*, Paris 1974; P. Raymond, *Dissiper la terreur et les ténèbres*, Paris 1992; R. P. Resch, *Althusser and the Renewal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Berkeley 1992; P. Schöttler, »Widerruf oder Berichtigung?«, in: Althusser 1975, 7-32; S. Smith, *Reading Althusser*, Ithaca 1984; G. Stedman Jones u. a. (Hg.),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8; K.-D. Thieme u. a., *Althusser zur Einführung*, Hannover 1982;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1978),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J. -M. Vincent u. a., *Contre Althusser*, Paris 1974; F. O. Wolf, *Umwege,* Hannover 1982; ders., »Zu kämpfen und zu wissen wagen!«, in: Thieme u. a. 1982, 94-118.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
（Frieder Otto Wolf）撰
潘璐 译，陈洪捷 校

参见：

Antiphilosophie, Ausdruck, Diskursanalyse, Diskurstheorie, Dogmatismus, Epistemologie, epistemologischer Einschnitt, Ideologie-Theorie,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Kapital-Lektüre, Krise des Marxismus, Orthodoxie, Problematik, Regulationismus, Strukturalismus, strukturelle Kausalität, Subjekt-Effekt, symptomale Lektüre, Überdeterminierung, Zitate

192 美国主义（Amerikanismus）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第一个提出完整的“美国主义”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把这一概念运用到资本积累的理论中。他写于1934年的《狱中札记》第二十二册（其中的条目都出自于先前的札记，大部分出自1929年至1930年的第一册）以“**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为标题，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国主义话语中的决定性的参照点。对葛兰西来说，美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程度的“福特化”。对于“落后的”欧洲来说，是要弥补现代化的不足，要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施加在欧洲帝国主义之上的竞争压力。美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可能以反美的姿态出现，表达了欧洲的社会阶级想要填平“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鸿沟的愿望（Haug 1986）。

葛兰西首先强调在“欧洲文化的物质基础”转型的过程中美国主义所包含的加速因素以及强迫因素：“问题是这样，美国将用它的经济生产的无与伦比的分量强迫欧洲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变革——它已经开始对欧洲实行强迫了——这种转变本来是会自发产生的，但是会以一种缓慢的节奏，现在看起来就像‘美国式的傲慢’的一种反作用，如果文明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很长远，因为在当今的时代一切都比从前来得更快）将导致现存的文明的变革，并催生一个新的文明。”（*Gef* 2，H. 3，§ 11，第340页）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美国用它的经济生产的无与伦比的分量（间接地）强迫或即将强迫欧洲变革它那老旧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本来会以缓慢的节奏自发产生，但是现在却显得像是对美国的霸权的回击）。如果欧洲文化的物质基础发生转型，那么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很远，因为在如今的时代一切都比从前来得更快），这将会使现存的文化发生形态上的改变，并且催生一个新的文化。”（*Q*，第2178—2179页）

葛兰西的美国主义的概念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以及共产主义的作者那里都获得了一致的赞同，但是这一概念对于葛兰西来说却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他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关于阶级的语境中来分析美国的挑战的。“美国化要求有某种环境，某种社会结构（或者是想要创造这种结构的强烈意志），以及一种特定的国家形态”（*Q*，第2157页；参见*Gef* 1，H. 1，§ 135，第181页）：有一个核心前提是一直被美国人忽视的，因为在他们那儿是“天然”存在的，那就是“‘人口的理性化’，也就是说，在美国并不存在人数众多的、在生产的世界中没有作用的阶级，也就是绝对寄生的阶级”（*Gef* 1，H. 1，§ 61，第130—131页；

参见 *Q*，第 2141 页）。在意大利则要通过人口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才能够创造这个前提条件。

就像美国主义带有一些表面上的过激反应一样，有些人对美国化的危险也发出了文化悲观主义的警告，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些在这样的社会理性化过程中将停滞不前的人："人们今天称之为美国主义的东西，绝大部分是社会慌乱的一种表现，旧的阶层解体、绝望，受到新的秩序的压迫。"（H. 3，§ 11，Bd. 2，第 341 页）葛兰西相信，无产阶级斗争的各派力量当时还处于前工业社会历史集团的文化霸权之下，而在一个美国化的社会中会找到更好的条件，以利于他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提升。

与葛兰西严谨的美国主义概念相反，19 世纪正在形成中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讨论美国的话题时并没有形成什么"主义"。随着英国作为经济上的先锋和社会文化引领者的角色逐渐被美国取代，美国这一话题也渐渐被人接受。19 世纪的后三十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欧洲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逐渐美国化。1879 年马克思写道："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1879 年 4 月 10 日致丹尼尔逊［Danielson］的信，MEW 34，第 374—375 页）1886 年恩格斯（在 *Lage* 的美国版的附录中）写道：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真正美国的毅力"，既然"大西洋彼岸事变的发展至少要比欧洲快一倍，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看到，美国将怎样在这方面也占据主导地位"（MEW 21，第 254 页）。

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出现美国这一概念，时间上正好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一轮新的积累过程的上升阶段相重合（有时候也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那时，工业生产的新的组织模式开始在美国得到尝试，这些模式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系统理论开始得到应用之前都是引领性的。工人运动的不同的代表人物在表述他们的主要思路时都会提到关键词"美国"。这个概念成了理性化、生产力、创新和进步的代名词。这种虚构的后果是，大家渐渐脱离了经验上可以客观化的现实。美国主义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现实中的"进步"进行模仿，另外一方面是以想象中的质量为导向。（这种情况恩格斯在 1888 年他的旅行印象中就已经指出过；MEW 21，第 466 页及以下。）

194 在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著作《社会革命》（*Die soziale Revolution*）（1904）中，社会民主主义未来社会的

乌托邦与“美国信念”之间有一种象征的关系：“如果没有发达的大企业，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89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中同样可以发现对于进步的美国科技和组织模式有很多模仿，列宁总是把“科学的”生产方法与由工人进行监督联系在一起，从而排除了技术官僚的视角：“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将苏维埃的权力和苏维埃的管理组织与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在俄国开始研究泰勒系统以及其中的理论，并对其进行系统的尝试和评价。”（*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 1918，LW 27，第249—250页）

195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形象尤其在社会民主运动内部拥有极大的魅力。在欧洲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社会主义的希望主要围绕着生产的科学化。1931年奥托·鲍威尔倡议采取一种工程师式的思维，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一种“在利用人类的生产力时使用物理学发明的‘思维机制’”。在《理性化和错误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 und Fehlrationalisierung*）中他写道：“按照美国的榜样，人们也开始尝试着在其他国家指出，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会损失多少能源、热量、人类生产力以及原材料，如果在方法上对工作方式加以改善则能够使其得到充分利用。”（WA 3，第857页）

随着美国上升为具有全球行动力的西方霸权，美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一个政治（外交）范畴，由此出现了语义上的分化。在这个概念周围一如既往地围绕着不同的意义成分。北约政治上的美国主义尤其遭到共产主义左派的强烈批评。除了这种“反美国主义”（即对高度扩军备战的帝国主义强权的批评）还存在着一种隐藏的美国主义（即面对“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国的技术水平而产生的赶超心态；参见1961年苏联共产党党纲）。直到1968年运动，人们才开始对美国的消费模式进行文化批判性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又是以“美国的”形式进行的，在用语上、交往形式上（比如在问候语中取消头衔），以及穿着上（如牛仔裤）等都接受了文化美国主义的某些成分和模式。20世纪末，曾经的美国主义意识形态在左派的内部开始褪色，美国这一概念在历史中曾经拥有的积极色彩也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消失殆尽。随着对葛兰西的接受的增加，他的精细的美国主义的方案又被重新发现，其创新潜力至今仍有待挖掘。

参考文献：

G. Baratta u. A. Catone (Hg.), *Modern Times – Gramsci e la critica all'americanismo*, Mailand 1989; Ch. Buci-Glucksmann, *Gramsci et l'Etat. Pour une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75 (*Gramsci und der Staat,* Köln 1981); M. Davis, *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the U. S. Working Class*, London 1986; W. F. Haug,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AS 80, Berlin 1986, [2]1987; ders., »Gramsci und die Politik des Kulturellen«, in: *Argument* 167, 30. Jg., H. 1, 32-48;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Frankfurt/M 1971; K. Kautsky, *Die soziale Revolution*, Berlin 1904.

196

雅可布·坦纳（Jakob Tanner）撰
潘璐 译，陈洪捷 校

参见：

Arbeitsorganisation, Faschismus, Fordismus, Fortschritt, Gramscismus, Lebensweise, Moderniserung, nachholende Modernisierung,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kräfte, Rationalisierung, Taylorismus

分析 / 综合（Analyse / Synthese）

1. 从传统上来讲，分析的意思是从既有的情况倒推到产生它的前提条件，而综合则相反，是从这些前提条件中导出这个情况，并且对其进行证明或解释。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这两个概念在证明论的意义上仅用于数学和逻辑学。到了中世纪晚期，它们才开始进入实用科学的领域（比如伽利略的物理学中的分解法和组合法）。在牛顿那里，这两个概念获得了一种很明显的解释论的意义，分析指的是给出观察到的效果的原因，综合是指从原因推导出效果。从那时起科学方法通常都被称为分析—综合的方法。按照康德的说法，分析是“从有条件的东西……到原理”，综合是“从原理到结论或者是从简单的到集合的”。（*Logik*，§117）在分析判断中谓项包含在主项之中，在综合判断中谓项则处于主项之外。分析判断不会给主项增加新的内容，而综合判断却会说出不包含在自己之中的东西，也就是扩展了我们的知识。黑格尔对此进行了批判的接受，他对有限的（即实用科学的）认识和绝对的（即哲学的）认识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在有限认识的领域里分析和综合是两种共存的方法，可以交替使用。（*Enz*，§§ 238—239）这种方法的对象对黑格尔来说就是逻辑范畴的自我发展。如果对这种方法的使用要求停留在对象之中，那这种方法就是分析的；如果一个事物借助自己矛盾的本质变成了另外一个，说出的东西比起初包含在其中的更多，那这种方法就是综合的。

2. 马克思把自己的做法称为“**分析**的方法”（*Randglossen*，MEW 19，第 371
197 页），并以此来反对使用假普世的、历史哲学的和唯逻辑性的方法对他的理论进行解读。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年轻的马克思首先把分析与教条主义的思维对立起来（参见 MEW 1，第 346 页），然后又与黑格尔所特有的方法进行对照，这种方法从“一切事物”中抽象出来，仅仅剩下“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Elend*，MEW 4，第 127 页）。但这里“谈的是抽象”，而“不是分析”。后来马克思开始将分析与庸俗经济学对立来看，庸俗经济学只“在表面现象上思考”它的对象，而不是“通过分析”批判地去挖掘它根本的“内部的联系”。（*TM*，MEW 26.3，第 445、490 页）

对于马克思来说，分析首先是为了掌握事物内部的关联。如果事物之中并存的特点无法清晰地加以区分，那就需要首先通过横向的、区别性分析来对它们进行区分。内部的关联是要通过纵向的、分解性的分析来发现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就有一个例子，首先马克思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进行了横向的区别和分析。然后他进一步对交换价值进行了纵向的分解性分析，这一分析显示出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Randglossen*，MEW 19，第 369 页）。在对价值形式进行分析时，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货币或者货币形式的“起源”（*KI*，MEW 23，第 62 页）。马克思开始就对“一种商品与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的价值关系进行了分析，因为这种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同上书，第 62、85 页）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这一段的结论部分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它是从一个纵向的分解性的分析得来的，马克思把货币形式一步步地分解为一般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和简单的价值形式。

但这一段的结构是相反的：它的开头是对简单的价值形式的分析。由于这种价值形式不能够进一步地分解，所以对它的分析只能是一种横向的、区别性的，也就是对包含在其中的特点进行分析：它们是如何相关联的，它们有哪些功能，等等。由于较复杂的形式是由较简单的组成的，所以对它们进行横向的分析是对它们进行解释性分析的前提。解释性分析这种形式是一种纵向的分析，它是综合性的，而不是分解性的。这一段的结构就是按照这种解释性分析来安排的。它是按照发展的步骤进行的，对每一种更为复杂形式的解释都建立在对较简单的横向的分析之上。

货币形式具有矛盾的特点，对这些特点必须进行横向的分析，只有这样才

198 能够解释资本的形式。这些矛盾是实践中的现实情况，这些矛盾是在它们运动的形式中（参见上书，第 118 页），根据实践中的必要得到解决。

人们很容易想到把这种解释性的、纵向的、集中的分析形式称作“综合”，但是看来马克思并没有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种表达，尽管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复杂的东西分解成抽象的特征称之为分析，但他并没有把相反方向的运动，把从这种抽象变为较为复杂的事物称之为综合。（参见 MEW 13，第 631—632 页）尽管他写道：“只要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时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Zur Kritik*，MEW 13，第 49 页；参见 *K I*，MEW 23，第 335 页），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一种从简单回溯到复杂的综合。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李嘉图的研究方法进行的批判中看出来。他首先批评李嘉图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TM*，MEW 26.2，第 100 页），也就是没有把纵向的分析做完整。其次，李嘉图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在把劳动价值法则用于“其他经济关系”时，“跳过了必要的中间环节”。（同上书，第 161—162 页）李嘉图没有使用纵向的、渐进的、集中的、解释的分析形式，而是尝试着把所有现象直接归入一个法则之中。

3. 恩格斯在本来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他曾指出，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AD*，MEW 20，第 39 页；以及 *DN*，同上书，第 491、496 页）。希腊人“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同上书，第 333 页）。自然科学使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同上书，第 20 页），这一点可以通过辩证法来克服。但是恩格斯在这个关联中并没有提到综合。

列宁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作马克思主义“最内在的本质和活的灵魂”（LW 31，第 154 页）。从认识论上看，他在阅读黑格尔时，希望能使分析 / 综合成为普遍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他把《资本论》当作范例。分析揭示了在 199
商品交换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所有**矛盾的萌芽）。其他的描述给我们展现了这些矛盾的发展（*PH*，LW 38，第 340 页）。对于辩证法的描述（研究）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同上书，参见第 316 页及以下）。综合这一概念在这里并没有出现，列宁提到了马克思使用的“**双重**分析”，一种是演绎的，一种是归纳的。（同上书，第 319 页）

4. 后来在对马克思的方法的不同阐释中通常都会出现这两个概念。一些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看作一位模式建构者，在他那里可以找到不同的分析工具。按照熊彼特（Schumpeter）（1946，第 39、47 页等处）的说法，这些工具主要是一些理论，比如劳动价值理论、社会阶级理论等；对于米克（1973，第 126 页及以下）来说，这些工具是由概念和范畴组成的，马克思把事实放入一个重要性列表中，用概念和范畴对其进行分析。这些解释实际上都误以为马克思的方法和他批判的李嘉图的方法是一致的。

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使用简化的假设，然后“逐步把一直被忽视的环节考虑进去”（Grossmann 1932，第 198 页），这是一种“渐进的具体化”（sukzessiven Konkretisierung），也可以称之为“近似法”（比如 Lange 1963，第 114 页及以下）或“接近”（Approximation）（比如 Dobb，第 155 页及以下）。固然马克思运用了这样的假设，但是把他的“分析方法”和渐进的近似法相提并论，恐怕没有考虑到分析方法的复杂性。在这些阐释中很少提到综合，熊彼特是个例外，他把综合看作“马克思建筑”的全部（1946，第 80 页），“是各种方法和不同的过程产生的结果的协调”（同上书，第 82 页），而不是从前提推导出某种既有的情况并给予解释。

更多从哲学角度对马克思的方法进行的阐释有时把分析看作研究，把综合看作描述。费彻尔（Fetcher）（1957）把《资本论》中使用的**研究方法**看作一种本来就在科学上使用的**分析的**方法；而**描述**在他看来是对获得的结果的**辩证的综合**。——还有许多关于马克思学说的手册都把分析看作是由（感性）具体的前进到抽象的，而综合作为描述则是指从抽象的上升到（思想上）具体的。（比如 Gropp 1971，Kröber 1973，Wittich 等 1978）马克思的方法和传统的分析—综合方法的区别在这些阐释中都被忽视了。 200

另有一些人认为，分析和综合同样都是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又应该被明确地区分。按照罗森塔尔（Rosental）（1973）的观点，分析在马克思那里指向的是事物中组成决定性矛盾的成分；综合是把它们联合起来。因此分析和综合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其具体的形式是“一个分析完结之后是一个综合环节，然后又是一个分析环节，紧接着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综合环节，等等”（同上书，第 447 页）。但是，如果一个事物被分解成了相应的部分，这些部分又在综合的过程中被重新统一，那怎么会产生“进一步的分析的新的可能性呢”（同上）？应该还是同一个事物啊。罗森塔尔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种被错误理解的综合。

对于伊尔扬科夫（Iljenkow）（1979，第 226 页）来说则相反，马克思的研究中的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它们“**同时**在认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一旦一个事物被分解为决定它的部分，那也就产生了一个联系这些部分的方案。伊尔扬科夫认为，准备性的、寻找性的研究和对由此获得的事实进行“最后的加工”（同上书，第 114 页）是有区别的。分析和综合是后一种研究形式的组成部分，这种研究形式也就是描述。但他并没有提到，从一个分析的和综合的思维活动是如何向下一个过渡的。伊尔扬科夫也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提到过被他错误理解的这种综合。

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分析明确地与描述联系在一起。研究是由“尝试和误会”组成的，研究开辟的“道路就在于研究的结果和对事物的认识之中”。（*DKL*，第 64—65 页）因此描述出现在“一个理论分析”的秩序之中，那是一种“把概念进行联系和综合的秩序，这些概念对于生产”《资本论》的理论来说是必要的。（同上书，第 62 页）阿尔都塞的阐释是片面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横向的、区别性的分析和纵向的、分解性的分析。另外，他认为综合是“概念的联系”（同上），但并没有说明，这种综合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区别何在。

参考文献：

Autorenkollektiv, *Geschichte der Dialektik von der Entstehung des Marxismus bis zur Leninschen Etappe*, Berlin/DDR 1974; V. -M. Bader u. a., *Krise und Kapitalismus bei Marx*, Bd. 1, Frankfurt/M 1975; C. Benedetti, J. Cartelier, *Actualité du marxisme*, Bd. 1, Paris 1982; P. Boccara, *Sur la mise en mouvement du »Capital«*, Paris 1978; G. Della Volpe, *Logica come szienza positiva* (1950), Opere 4, Rom 1973; H. Denis, *L'»économie« de Marx. Histoire d'un échec*, Paris 1980; M.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1937), London 1972; ders., *Wert- und Verteilungstheorien seit Adam Smith*, Frankfurt/M 1977; P. Dobias, »Zur Struktur des Marxschen Systems, in: Eberle (Hg.) 1973; F. Eberle (Hg.), *Aspekte der Marxschen Theorie 1*, Frankfurt/M 1973; I. Fetscher, *Christen oder Bolschewisten*, Stuttgart 1957; M. Godelier, *Rationalität und Irrationalität in der Ökonomie*, Frankfurt/M 1972; R. O. Gropp, *Grundlag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DDR 1971;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ders., »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1932), in: Eberle (Hg.), 1973;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201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W [4]1987; E. 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Karl Marx* (1960), Berlin/W 1979; P. Kopnin, *Dialektik – Logik –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3; G. Kröber, »Analyse«, »Synthese«, in: PhWb, 67-70, 1199; O. Lange, *Political Economy*, Bd. I, New York 1963; E. Meek; *Ökonomie und Ideologie*, Frankfurt/M 1973; L. Narski, *Widerspruch und Erkenntnislogik*, Berlin/DDR 1973; J. Robinso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I-IV, Cambridge 1951-1979; J. Roemer (Hg.),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1986; M. 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Berlin/W 1973; D. Sayer, *Marx's Method,* Hassocks 1979; A. Schmidt,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München-Wien 1971; J.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Bern 1946; ders., *Geschichte der ökonomischen Analyse* (1954), Göttingen 1963; W. Segeth,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als Methode*, Berlin/DDR 1977; L. Sève, »Méthodes en sciences économiques«, in: *La Nouvelle Critique*, 71, 1974; P. Sraffa, *Warenproduktion mittels Waren*, Frankfurt/M 1976; D. Wittich u. a.,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8;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M-Wien 1973.

韦科·皮耶提拉
（Veikko Pietilä）撰
潘璐 译，陈洪捷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nalytischer Marxismus, Anfang, Dialektik, Empirie/Theorie, Entwicklung, Erscheinungsform,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Gesetz, innerer Zusammenhang,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ethode, Schein, Theorie, Vulgärökonomic, Wertform, Wesen/Erscheinung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202
（Analytischer Marxismus）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学术群体，这些群体首先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并没有这个称呼，是在诸多讨论中形成的。（参见 Wright 1989）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观点，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并对其加以改造，将这种思维方式与传统的

分析思维对立起来。按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使马克思自己没有说过或想过，只要人们用分析思维的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总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一个意义，或者至少是这个意义的最重要或最好的部分。这并不是说要简单粗暴地放弃通常被称作“辩证法”的东西：对“现实的矛盾”的分析对精细运用分析思维提出了挑战（参见 Elster 1978，Kap.4-5；Elster 1985，Kap.2）。但是这里也暗含着，不应该把来源于马克思的研究计划与一种另类的“逻辑”或一种极端不同的思考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是要运用分析思维的最好的工具，来着手解决他的著作中包含的范围宽广的重要问题。

那些工具中的绝大部分都在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最为出色的有：（1）英美的**分析哲学**运用的典型手段，用这些方法可以卓有成效地解释马克思的基本概念的意义，他的著作中核心论述在认识论方面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的相互关系（参见例如 Cohen 1978）；（2）**形式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个人行为者也会有理性的行为”这一假定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战略博弈理论都曾经产生过这些模型（参见例如 Przeworski 1981）；（3）**经验的社会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在经验社会学以及计量经济学中得到运用（参见例如 Wright 1979）；（4）依照认真收集和阐释的历史数据来认真检验理论上的假设（参见例如 Brenner 1984）。运用这些工具并不意味着要全盘接受“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203
借助这些工具所得出的所有论断。相反，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如果能够在行地、有创造性地、批判性地使用这些工具，是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这样可以把论战进行到他们的领地里。

这样的方法运用显然并不是要对可能是马克思提出的某一特别的论断进行教条主义的辩护，而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些核心命题进行重新表述、细化、改变，甚至可能驳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领域包括封建社会的历史到社会主义经济，从哲学人类学到实证的阶级分析等领域。

他们进行的最为激烈的争论的题目有：（1）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述是否应该作为**功能性的解释**来理解，如果是，这样的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是否和在生物学中一样合理？（参见 Cohen 1978，Kap.9-10 和 1988，Kap.1-9；Van Parijs 1981，Kap.6；和 1993，Kap.1-2；Elster 1983，Kap.2 和 7；和 1985，Kap.5；以及 *Analyse und Kritik* 1982 和 Ball / Farr 1984 的多篇文章）（2）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可能或者甚至有必要把自己定性为**方**

法论个人主义——按照方法论个人主义，对社会状况的解释完全可以约减为关于个体的定理——还是有某些站得住脚的马克思的解释不能如此约减？（尤其参见 *Theory and Society* 1982；Elster 1985，Kap.1；Wright 等 1992，Kap.6）（3）降低利润率的理论遭到了激烈的批评，有没有一条道路可以拯救这一理论？如果不能，将会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马克思的经济批判方法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参见 Roemer 1981，Kap.4-5；Elster 1985，Kap.3；Van Parijs 1993，Kap.3-4）（4）劳动价值理论遭到很多诟病，还能为这一理论辩护吗？如果不能，将会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产生何种重大影响？（参见 Steedman 1977；Roemer 1981，Kap.7-8；Cohen 1988，Kap.11）（5）马克思是否为伦理论述留下了空间，还是应该把他归入坚决的非道德主义的立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
204 如何解释这种立场？（参见 Wood 1981，Teil 3；Geras 1984；以及 Cohen 等 1980 年的文章）（6）剥削的概念可以和劳动价值理论分割开吗？可以把这一概念的应用扩展到后资本主义社会吗？它可以作为阶级概念的基础，并富有成果吗？（参见 Roemer 1982 和 1988；Wright 1985；Cohen 1979；Van Parijs 1993，Kap.5-7）（7）马克思对于平等的热情如何进行严肃、合理的呈现？每一个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他自己，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马克思的平等观念相协调？（尤其参见 Roemer 1985；Cohen 1985）（8）有效率的、公正的社会主义这一理想目前还有发展的空间吗？（参见 Carling 1991，Kap.15-17；Roemer 1993）（9）福利资本主义可能借助激进的改革，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想法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有意义吗？如果有，这种过渡的政治前景如何？（参见 *Theory and Society* 1986；Van Parijs 1993，Kap.8-10）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明确的边界。它一方面关注构成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基础的很多值得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使用资产阶级思维提供的严格的方法，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定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那除了上文提到的作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作者也属于其中。但后者中大部分属于所谓的“九月小组”，这个小组是由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芝加哥大学）和 G. A. 柯亨（G. A. Cohen）（牛津大学）创建的，对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英美学术界的影响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纲领性的称谓之下有时也汇集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立场。

参考文献：

Analyse & Kritik, 4. Jg., 1982, H. 2, Sondernummer zu G. A. Cohens materialistischer Geschichtstheorie; T. Ball, J. Farr (Hg.),

After Marx, Cambridge-New York 1984; R. Brenner u. a.,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1984; A. H. Carling, *Social Division*, London-New York 1991; 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Oxford 1978; ders.,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cept of Exploitation«, in: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8. Jg., 1978, H. 4, 338-360; ders., »Self-Ownership, World-Ownership and Equality«, in: *Social Philosophy & Policy*, 3 Jg., 1986, H. 2, 77-96; M. Cohen, T. Nagel, T. Scanlon (Hg.),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Princeton 1980; J. Elster, *Logic and Society. Contradictions and Possible Worlds*, Chichester-London 1978; ders., *Explaining 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1983; ders.,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N. Geras, »The Controversy about Marx and Justice«, in: *Philosophica*, 33, 1984, 33-86; A. Przeworski,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1985; J. E.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New York 1981; ders.,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1982; ders., »Equality of Talent«,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y*, 1. Jg., 1985, H. 2, 151-187; ders. (Hg.),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New York 1985; ders., *Free to Lose*, London 1988; ders., *A Future for Socialism*, London 1993; *Theory and Society*, 11. Jg., 1982, H. 3, Symposium Issue on J. Elster, *Marxism,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15 Jg., 1986, 5. Symposium issue on R. J. Van der Veen, P. Van Parijs, *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 I. Steedman, *Marx After Sraffa*, London 1977; P. Van Parijs,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 Emerging Paradigm*, London 1981; ders., *Marxism Recycled*, Cambridge 1993; A. Wood, *Karl Marx*, London 1981; E. O. Wright,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1979; ders., *Classes. Methodologic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roblems of Class Analysis*, London 1985; ders., »What is Analytical Marxism?«, in: *Socialist Review* 89, 1989, 35-56; ders., A. Levine, E. Sober, *Reconstructing Marxism*, London 1992.

205

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撰

丹尼尔·巴邦（Daniel Barben）、米夏埃尔·克莱特克（Michael Krätke）译为德文

潘璐译，陈洪捷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nalyse/Synthese, Anwendung, Ausbeutung, Begriff, Dialektik, Empirie/Theorie, Epistemologie, Ethik, funktionelle Erklärung, Gesetz, Hegelkritik, Klassenanalyse, Leitfaden, Methode, Moral,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Umkehrung/Umstülpung, Wertgesetz, Widerspruch, Wissenschaftstheorie, Wohlfahrtsstaat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Anarchie der Produktion）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理论关系到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市场社会化过程的结构与效果，这一过程与私有化劳动分工的生产关系相关联，危机是其发展的形式。其核心是生产结构、劳动和财富分配的社会无计划性，其事后才在市场上在交换或买卖中显示的社会“必然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危机现象。

关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最早见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n*）。“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MEW 1，第 514 页）所以“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这一体系“每日每时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同上书，第 515 页）在此状态下，私有生产者不得不参与竞争，从而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入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理性的关系都颠倒过来。”（同上书，第 516 页）重要的是，这种生产和分配体系的“主权”将会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同上书，第 517 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说法第一次出现在批判蒲鲁东（Proudhon）的《哲学的贫困》之中，这里论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和限制之间的矛盾关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Elend*，MEW 4，第 97 页）“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转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销另一个极端。”（*Lohnarbeit*，MEW 6，第 405 页）

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理论架构主要关注市场，但我们也应该牢记，其问题不是仅从市场出发就可以阐明的，而是要把它和社会关系合在一起考虑，这种关系就是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自由的雇佣劳动之间相互补充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中包含着市场，这是一个被释放的、不再受到各种传统社会

结构约束的市场，它在社会中不断扩张，其中沉睡的各种潜力通过，而且为了资本积累得以发挥。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出发点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化，因此不应把它与特定的市场观念和市场政策如自由放任的政策（Laissez-faire）等相混淆。

关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进一步阐述，还见诸《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EW 19，第 215 页及以下）。在《资本论》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伴随现象“资本的暴政”得到进一步的阐述。这两种理论构想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重要场所，即市场和工厂彼此关联，揭示出关于劳动及其产品分配和分布的
207 根本不同的方式。（参见 *K I*，MEW 23，第 376—377 页）企业内部的合理化和为了优化剩余价值生产所进行的生产计划，在市场上却总是会面对实现剩余价值的根本性限制。这些限制在于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不对称，或来自价值的革命。这样，主宰市场的任意和无政府状态使得单个资本不得不依赖于社会，依赖于单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全体。（参见 *K III*，MEW 25，第 254—269 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理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主要是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积累理论。这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具有帝国主义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崩溃理论相联系。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对新的积累地区的追逐导致了“在世界舞台上经济和政治灾难连锁发生：世界危机、战争和革命”（*Antikritik*，GW 5，第 430 页）。对卢森堡来说，资本主义积累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发生扩张，不仅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表现，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有限性和必然崩溃的表征。“无政府状态是资本统治的生命所在，认识和承认这一点，也同时就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或者说，其存在无非是一个缓刑期。”（*Einfürh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GW 5，第 579 页）马克思也会如此说，“这是同一规律，今天的经济秩序为其消亡而做准备，他通过无政府的扩张而不断地威胁到社会的存在，造成一连串的毁灭性的经济和政治灾难”（同上书，第 591 页）。

与罗莎·卢森堡不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希法亭）认为，由于资本的集中化和中心化过程而形成的垄断和卡特尔会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认为已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较量已被“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计划性生产所取代，而且通过“民主国家”很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 208
即将崩溃的预言，还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会消失的假说都没有兑现。介乎两

种立场之间，出现了新的解释，一方面是市场的权力化，另一方面尤其是国家的经济调控以及劳动者的组织和参与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仍然作为一种基本操控机制发挥着作用。（参见 Huffschmid 1975）巴兰（Baran）和斯威齐更明确地指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生产和剩余吸收”（1973，第 17 页）的条件均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消费、投资和浪费形式，这些又伴随着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展（参见 Kap.4-7）。他们把这些发展的另一面描述成一个涉及所有生活领域的“非理性的制度”（特别参见第 320 页及以下）。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理论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口号发挥作用，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生产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也可以就其具体的历史特殊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社会力量关系进行分析，不断提高细化的批判能力和政治行动能力。如果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理论看作一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话语的抨击，这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与其所批评的观点在对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进行分析时都有理论框架含糊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笼统的、忽视复杂现实（比如制度化的调控形式和程度）的“市场”观念，二是神秘化的、无法应对多种多样困难和要求的“计划经济”观。阿尔特维特（Altvater）反对市场和计划的两分观，认为市场是“有效的社会化形式和方法的极好集合”（1992，第 75 页），其前提是市场经济要被安置在一个由政治、制度和道德规制所组成的复杂框架之中（第 84 页及以下）。而如果市场与“其他社会领域”相独立的话（第 339 页，即波兰尼［Polanyi］所说的“抽离”［disembedding］），其无政府状态则会无限制地扩散。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现实状况及其 209
消亡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生产无政府状态理论的有效性，原则上源于两个原因：一是资本主义已普遍化为世界体系，或者说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二是自然关系的组织化。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至今仍然适用：“资本的自我增长像是生产的起点和终点，本身就是生产的目的和全部意义。当资本主义生产成为世界生产时，这种情况的愚昧之处才更加显著……每一社会生产形式的基本目的，即通过劳动、满足其需求而维持社会，在此完全颠倒了，生产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获利，成为地球上通行的法则，绝大多数人消费不足、持续性的消费紧缺以及阶段性的无消费成为常规。”（*Einfürh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 GW 5，第 775 页）

积累的强制使得社会劳动及其创造的财富的分配模式基本上脱离了社会，

这一过程由于全球的债务机制而加剧，而这一机制本身也由于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脱钩而强化，这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也是社会占有自然物资和自然过程的核心所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其福利支出和生态支出大幅度外化，它虽然短期会有所成就，但缺乏凝聚社会理性的可能性。只有凝聚了社会理性，才可能协商一种社会公平的、生态友好的以及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同时，很有必要将全球的市场过程在一个世界内政的历史新高度上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Die Zukunft des Marktes. Ein Essay über die Regulation von Geld und Natur nach dem Scheitern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Münster [2]1992. P. A. Baran, P. M. Sweezy, *Monopolkapital. Ein Essay über die amerikanische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ordnung*, Frankfurt/M 1973; J. Huffschmid, »Begründung und Bedeutung des Monopolbegriffs in der marxistischen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Zur Theorie des Monopols. Staat und Monopole* (*I*), AS 6, Berlin/W 1975, 4-92.

丹尼尔·巴邦（Daniel Barben）撰

陈洪捷译，潘璐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neignung, Antagonismus, Arbeitsteilung, Despotie des Kapitals, Imperialismus, Konkurrenz, Konzentration/Zentralisation, Krise, Luxemburgismus, Markt, Monopol, Monopolkapital,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Planwirtschaft,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Profit, Regulation, Revisionismus, Surplus, Unterkonsumtion, Vergesellschaftung, Zusammenbruchstheorie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us）

“无政府主义”可以理解为“没有统治者”（*ἀναρχία*），这一概念出自古希腊，当时主要是负面的含义。“无政府主义者”一词出现于法国大革命，主要是贬义词，指称雅各宾派。（Lutz 1972，第80页）无政府主义在1848年之后发展成一种政治理论，尽管此前也有一些理论萌芽，比如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论政治正义》（*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1793）和施蒂纳（Max Stirner，即约翰·卡斯巴·施密特）的《个人及其所有》（*Der Einzige and sein Eigentum*）（1845）。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年）、巴枯宁（Michail Bakunin，1814—1876年）以及克鲁

泡特金（Petr Kropotkin，1842—1921 年）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主要理论家。这一理论的推广者包括米萨姆（Erich Mühsam，1878—1934 年）、兰铎（Gustav Landauer，1870—1919 年），他们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于 1908 年共同建立了社会主义联盟，以及奈特劳（Max Nettlau，1865—1944 年）、舒奇（Augustin Souchy，1892—1984 年）、罗克（Rudolf Rocker，1873—1958 年）、贝克曼（Alexander Berkman，1870—1936 年）和戈德曼（Emma Goldmann，1869—1940 年）。

无政府主义理论在 1870 年至 1914 年之间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影响甚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影响式微。当然也有例外，在中国影响至 1927 年，在西班牙到 1939 年。在许多国家，无政府主义与工会运动一起形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无政府主义影响再度升温，但主要是在国际性青年抗议运动而非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的女性主义讨论中

211 形成了新的“无政府女性主义理论”，并一度影响波及欧洲。无政府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艾立奇（Carol Ehrlich）、康奈格（Peggy Kornegger）、伊芙希尔德（Nancy Evechild）、瑞道（Margot Rideau）、亚当斯（Beverly Adams）和哈斯汀斯（Mary Hastings）。在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戈德曼的著作以及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无政府女性主义一方面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内部的父权主义结构和理论，另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划清界限，谴责他们不愿意突破任何一种统治权（Ehrlich / Kornegger 1979；*Scharzer Faden*，1988；Kamann 1991）。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西欧自治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对等级制组织结构的批评，或采取直接行动的形式。

尽管无政府主义理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共性。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所有人的自愿联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两项条件。**消极的**条件是彻底废除国家，或者用武力摧毁，或者通过无视（Nicht-Beachtung）的手段。**积极的**条件是在旧的社会中逐步建立起新的社会，所用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都将预示着所追求的自由联合体。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常发生变化。蒲鲁东以及早期无政府主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而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援引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关系的批判中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卡菲罗（Carlo Cafiero）等主张传播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后，无政府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分道扬镳，比如科内利森（Christiaan Cornelissen）著有批判马克思的大部头专著。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第二波的无政府主义浪潮中，也有个别人（如丹尼尔·格林）与马克思主义接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年）的极端个人主义进行了剖析，从而对自己的理论有了更明确的理解。在对其《个人及其所有》的批判中，他们获得了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对他们自己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建设性。（MEW 3，第101—102页；Labica 1983，第55—
212 56页）马克思对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MEW 4，第63—64页；MEW 18，第597—598页），但很少对无政府主义做出一般性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工人运动的早期病。马克思1871年指出："（巴枯宁的）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大发展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MEW 33，第329页）恩格斯1877年在论及意大利时写道："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小群年轻的律师、医生、著作家、店员等掌握了领导权。……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是最顺利不过的了。"（MEW 19，第91—92页）后来（1894年），恩格斯在论及无政府主义对早期工人运动影响时指出："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残酷至少不下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MEW 22，第460页）

就最终目标而言，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差别。"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也是一个"自由王国"，"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把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使"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可能。（MEW 25，第828页）

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第一个区别在于是否要废除国家。无政府主义认为这是一切其他进步的前提条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废除国家"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MEW 7，第288页；参见MEW 19，第7页）。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却正好相反："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

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做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
213 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MEW 19，第 344—345 页）

与此直接相关的第二个区别是，无政府主义主张原则上放弃政治参与，不参与选举和议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这种不参与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丧失权力。“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 ——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 —— 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MEW 17，第 416 页；参见 MEW 33，第 389 页）

第三个根本区别在于预想的组织形式。一个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注定会不断地走向失败。恩格斯写道：“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象把自己组织起来！……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MEW 17，第 477—478 页）“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么，它就会战胜资产者。胜利以后，我们可以随意组织起来，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拧成一股绳，并使这些力量指向同一个攻击点。如果有人向我说，没有权威和集中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是两种应当坚决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MEW 33，第 372—373 页）

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中的不同成分被不断 214
重复（比如列宁，LW 第 25、449—450 页）；并渐渐产生了一种倾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再是工人运动原有的组成部分，而被视为一种外来的、让人误入歧途的（小）资产阶级影响。普列汉诺夫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暗杀行为时，称无政府主义是“**堕落的乌托邦分子**，患了不可治愈的精神贫血症”，其行为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在无政府主义者中如果有工人真的认为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愿意为其美好的目标而献身的话，这显然是出于误会才进入了这个阵营。他们所

了解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传授的形式。给他们更多的启蒙，他们就会到我们这边来。”（1894，第 72、83 页）列宁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品”，产生于“被抛出轨道的知识分子或流氓无产者心态，与无产阶级无关”。（LW 5，第 334—335 页）

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分析，在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观点。布哈林对传统的观点补充了两点新的见解。第一，尽管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无国家的社会），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着重要的区别，共产主义追求“集中管理的计划性大型企业的生产，最终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组织化”，而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小公社，而小公社受其结构限制无法进行大经济生产，只是相互缔结‘协议’，通过自愿的合同关系形成的网络而彼此联系”。（1918，第 7 页）第二，布哈林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前革命**阶段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工人革命具有破坏和创造—建设的两面性。破坏性首先表现在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上……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他们从本质上没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能力。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随着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只能发挥负面的作用，他们所执念的疯狂的非组织化行动会干扰社会主义的建设”（同上书，第 14 页）。

葛兰西 1920 年对无政府主义也有一段细致的辨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抽象的、建立在一种“永恒”真理观之上的观念。“无政府主义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和专有的观念，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总是宣称‘胜利’和总是‘有理’的原因。无政府主义是一切被压迫阶级所拥有的一种基本的破坏性思想，也是一切统治阶级普遍的意识。由于任何一种阶级压迫总是体现在一个国家内，无政府主义便是一种基本的破坏性观念，会把被压迫阶级的一切痛苦都归咎于国家。”（*Discorso agli anarchici*，1920，*ON I*，第 398 页，参见 Z 1980，第 54 页）真正的革命不追求绝对的而是“**特定**的‘真理’”（una ‘verità’ *determinata*），因为实践的真理“体现于行动之中，能够让大众自身在当下的意识中燃起激情，并且转变为深入的运动和现实的成就”（同上书，第 397 页；第 53 页）。尽管如此，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仍然有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的抽象的真理概念中，还是包含着反叛的姿态。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对知识分子或者说“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和工人进行区分：“对知识分子来说，无政府主义是一尊偶像，是他目前的和未来的特殊工作存在的理由。在无政府主义鼓动家的眼里，工人国家将仍然是一个

‘国家’，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一种强制因素，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但是，对于追求自由的工人们来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武器，其革命的激情超越了意识形态。他们所反对的国家，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不是国家的观念。他们所要消灭的财产也并非一般的‘财产’，而是资本主义模式的财产。”（同上书，第 399 页；第 56 页）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之后，布哈林和葛兰西的观点被更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列宁的阐释所遮蔽；主流的观点仍旧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工人运动中“非本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一点似乎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无产阶级特征很少的新无政府主义身上得到了证实（参见 Frei 1971）。

参考文献：

M. Bakunin, *Staatlichkeit und Anarchie und andere Schriften*, hgg. v. H. Stuke,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2; N. Bucharin, *Anarchismus und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Hamburg 1918; A. Carter, *Die politische Theorie des Anarchismus* (1971), Berlin/W 1988; C. Cornelissen, *Théorie de la valeur. Réfutation des théories de Rodbertus, Karl Marx, Stanley Jevons et Böhm-Bawerk*, Paris 1903; A. Dadà, *L'anarchismo in italia: fra movimento e partito. Storia e documenti dell'anarchismo italiano*, Mailand 1984; C. Ehrlich, P. Kornegger, *Anarchafeminismus*, Berlin/W 1979; B. Frei, *Die anarchistische Utopie*, Frankfurt/M 1971; W. Godwi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1793), in: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Godwin*, Bd. 3 u. 4, hgg. von M. Philip, London 1993; E. Goldmann, *Das Tragische an der Emanzipation der Frau*, Berlin/W 1987; dies., *Gelebtes Leben*, Berlin/W 1978-1980; D. Guérin, *Anarchismus. Begriff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M 1967; ders., *Pour un marxisme libertaire*, Paris 1969; F. Kamann, »Der Anarchafeminismus als Radikalisierung des Feminismus«, in: H. J. Degen (Hg.), *Anarchismus heute. Positionen*, Berlin 1991, 91-101; F. Kool, E. Oberländer (Hg.), *Arbeiterdemokratie und Parteidiktatur*, Olten-Freiburg/Br 1967; P. Kropotkin, *Die Eroberung des Brotes* (1892), Bern-Grafenau 1989; ders., *Gegenseitige Hilfe in der Tier- und Menschenwelt* (1902), Leipzig 1904 (wieder Grafenau 1989); G. Labica, »Anarchismus«, in: KWM 1, 1983, 54-58; P. C. Ludz, »Anarchie«, in: GG, 1972, 49-109; G. Plechanow, *Anarchismus und Sozialismus*, Berlin 1894; P. J. Proudhon, *Oeuvres complètes*, Paris 1968-1976; *Schwarzer Faden*, Sondernummer Feminismus-Anarchismus, Grafenau 1988;

P.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London 1980.

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撰
陈洪捷 译，潘璐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archosyndikal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ssoziation, Autorität, Befreiung,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zentralisierung, Emanzipation, Etatismus, Feminismus, Fokustheorie, Frauenbewegung, Freiheit, Frühschriften, Gemeinwesen, Gewalt, Haß, Hierarchie, Individuum, Korsch-Linie, Linksradikalismus, Macht, Marxismus-Feminismus, Neue Linke, Pariser Kommune, Parlamentarismus, Revolutionstheorie, Selbstverwaltung, Sozialisierung, Sozialrevolutionäre, Spanienkrieg, Spontaneität, Staat, Studentenbewegung, Syndikalismus, Terrorismus, Voluntarismus, Wahlen

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kalismus）

无政府工团主义，指众多的、主要出现在许多欧洲和南美国家的、主张社会革命的工会运动，主要受到克鲁泡特金（Petr Kropotkin，1842—1921 年）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无政府工团主义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组织上和实际影响方面达到高潮。尽管在革命工团主义形成的过程中，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期间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某些元素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比如费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在法国的影响），但从今天的历史认识水平来看，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革命工团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

早在 1913 年秋，来自 12 个国家的大约 60 个工人组织在伦敦召开大会，筹备建立以社会革命为目标的工会国际，以区别于主张改良的国际工会联盟（IGB）。由于主张革命工团主义的法国劳工总工会（CGT）反对另立工会国际，同时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主张革命的工会未能联合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以南欧国家为主的主张社会革命的工会试图接续战前的努力，把建立于 20 年代中叶的、旨在与共产国际平行的红色工会国际（RGI）建成国际性组织。联合的过程始于 1919 年至 1921 年的协商，由于苏维埃俄国大量逮捕无政府工团主义成员，还由于德国和瑞典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推动，各国工会最终联

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既反对改良主义的国际工会联盟，也反对建于 1921 年的红色工会国际。

这个 1922 年底建立于柏林的组织继承巴枯宁第一国际的传统，取名为国际工人协会（IAA），直到今天仍然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交流平台。这一组织的罗曼语名称 AIT（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知名度更高。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员最多的国别机构是西班牙的全国工人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ónal del Trabajo，简称 CNT）和中南美洲 8 个国家建立于 1929 年的美洲大陆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所宣布的“原则
218 声明”由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1873—1958 年）撰写，他同时也是德国自由工人联盟 / 无政府工团者（FAUD / AS）纲领的主导者。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声明”（1922，第 421 页，第 1 条）称：只有无产者的经济组织能够“在自由的共产主义基础上重新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与现代的政治性的工人党派不同”，只有工人“作为社会价值的生产者和制造者”，才能胜利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国际工人协会反对资产主义社会的政治原则，反对议会主义、民族主义、集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同样也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从 1921 年以后更加坚定和强烈地批判马克思主义，称其为一种历史哲学思想，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政治党派的革命理论构想（包括其在苏联的实践）和组织形式。无政府工团主义比革命工团主义更坚定地认为，政党组织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治统治永久化的工具。

国际工人协会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试图带领加入它的国别组织建立工业联盟，将其作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组织基础，采取直接的行动，致力于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这一努力首先在西班牙的全国工人联合会范围内引起激烈的争议。由于北欧和南欧及南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也意见纷呈。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 1936 年至 1937 年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加泰罗尼亚建立的集体合作社（Colectiviades）可以看作是整个运动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自由的自主组织的行动能力的证明。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方面没有出现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深入系统的批评，这主要是由于俄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1920 年至 1921 年苏联通过政治打击和放逐工团主义者以解决冲突。因而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这一态度得到德国工团主义者组织德国自由工人联盟的加强，并成为 IAA 的主

流看法。共产国际初期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持斟酌考量的态度，将其追随者视为“动摇的革命者”，但同时批评他们导致“意识形态混乱”。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早期的共产国际中被认为比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进步一些，比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论的马克思主义要落后一点。面对“工人反对派”带来的不稳定影响和1921年3月的喀琅施达得水兵起义，列宁在苏联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将此运动定性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参见 LW 32，第249—261页）。他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核心错误在于，主张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就想把整个国民经济领导权直接交给组织成工会的生产者。但在目前，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是必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今天所追求的目标，只有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之后才能实现。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只有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有可取之处，原则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可以加以吸收。从其1919年的社会化纲领到1938年关于西班牙集体化运动的评论，他都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的生产者在生产场所实行的直接民主，是对国有化措施的一种补充和修正。另外柯尔施“在探索一种组织方式，能够给予自主活动、自发性和通过实践来学习的行为以足够的空间，以防止官员寡头政治的出现”（Gerlach 1969，第13页）。在他看来，历史上西班牙的CNT最接近这种形式。20世纪60年代末反权威的学生运动重新发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委员会形式，以及柯尔施对俄国革命进展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独裁者佛朗哥（Franco）死后的西班牙一度复兴，在联邦德国也有所回潮，其响应者不仅仅是工人，也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些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在许多欧洲国家的新社会运动中产生了反响。

参考文献：

H.M.Bock, »Anarchosyndikalismus in Deutschland. Eine Zwischenbilanz«, in: *IWK*, 25, 1989, H. 3, 293-358; ders., *Syndikalismus und Linkskommunismus von 1918 bis 1923. Ein Beitrag zur Sozial- und Ideengeschichte der frühen Weimarer Republik* (1969), Darmstadt 1993; W. L. Bernecker,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s anarchistischen Syndikalismus in Spanien«, in: *1999- Z. f. Sozialgeschichte des 20. und 21. Jh.*, 8, 1993, 12-39; E. Gerlach »Vorwort«, in: K. Korsch, *Schriften zur Sozialisierung*, Frankfurt/M 1969, 5-14; A. Lehning,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IAA).

Ein Beitrag zur Theorie und Ideologie der anarchosyndikal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in: *Intern. Tagung der Historiker der Arbeiterbewegung. 16. Linzer Konferenz*, Wien 1982, 76-99; »Prinzipienerklärun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IAA) auf dem Gründungskongreß 1922 in Berlin«, in: *Der Syndikalist*, 4. Jg., 1922, Nr. 25, wieder in: Bock 1993, 421ff; C. Regin, »Hausfrau und Revolution. Die Frauenpolitik der Anarchosyndikalisten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IWK*, 25. Jg., 1989, H. 3, 379-397; W. Thorpe, *The Workers Themselves.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d International Labour 1913-1923*, London 1989.

汉斯·曼弗雷德·波克
（Hans Manfred Bock）撰
陈洪捷 译，潘璐 校

参见：

Anarch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ssoziation,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International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Korsch-Linie,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Oktoberrevolution, Rätekommunismus, Reformismus, Selbsttätigkeit, Spontaneität, Studentenbewegung, Syndikalismus

解剖（解剖学）（Anatomie）

—

解剖学（来自希腊语 *τέμνω*，意为切割）首先是通过解剖获得生物体的组织和器官的内部位置以及构造的学问。作为普通生物形态学的一个分支，解剖学和生理学在19世纪下半叶是两个最重要的生物学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不同问题的论述中都经常援引。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解剖学本身是重点。他认为，通过人体解剖学的进步、“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DN*，MEW 20，第319页）开始产生的比较解剖学，以及达尔文（Darwin）（同上书，第489页）对于物种概念的表述，自然科学为“自然辩证法”的假设提供了证明。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解剖学则发挥着比较对象以及比喻中喻体的作用。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这样一个段落，由于它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所以在这里值得考察一下它的生物学内容：“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Einl 57*，MEW 13，第636页）尽管这个表述只是“隐喻性的”，用以比喻用历史的方法推演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但它也指出了历史的方法中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如何达到对更高级事

物的认识，一个研究事物向高级形态发展的理论应该有哪些前提条件，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测是否是可能的。

严格来讲，马克思的表述意味着历史发展也是可以重构的。这也为某些庸俗的想法提供了借口，那就是**后来**产生的东西同时也是**更高级**的。人体解剖学与猿猴解剖学在经验的发展史中的关系却显示了低级与高级、简单与复杂的关系要矛盾得多，包含着一种相对的和一种绝对的认识成分。如果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猿猴解剖学的历史进行回顾，马克思的论述的第一部分就会首先得到证实。从16世纪瓦萨里（Vesalius）创立解剖学这一医学的分支，直到19世纪下半叶，人类身体构造的知识一直是研究猿猴解剖学的实践和理论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关系，让人误以为人体的结构是更高级的，因此猿猴解剖学的发展史中也就充满了误会和错误的估计。1699年英国解剖学家泰森（Tyson）第一次解剖一只黑猩猩，并断定，它在解剖学上有48个地方比其他动物更像人类，有34个地方与人类有差异。他因此把黑猩猩看作是更低级物种和更高级物种之间的中间阶段，并把这种过渡形态称为“俾格米人”。瑞典生物分类学家林奈（Linné）尝试按照解剖学和形态学的特征对猿猴和人进行精确的划分，他在他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 naturae*）（1735）中把懒猴、猿猴和人类都归入“类人”的范畴。另一个经验上的难点是，类人猿有很多种。比如荷兰解剖学家杜普（Tulp）曾把17世纪第一只运到欧洲的黑猩猩当作褐猿，而1847年发现、1855年运到欧洲的大猩猩也曾被当成黑猩猩。

222

1868年，达尔文出版了关于人类起源的著作，海克尔（Haeckel）发表了他构想的第一批人类种族起源图谱，猿猴解剖学与人体解剖学之间的关系才开始在物种起源论的基础上获得了科学的基础。从灵长类学和比较解剖学的基础出发，却应该把马克思的表述反过来：**猴体解剖学中有理解人体解剖学的关键，**人类的形态被看作是灵长类形体典型结构的变种和特异化。人们不再从人类“倒退着”推演那些所谓的较低等的形态，而是对人类形态的特殊性比如两足、脑进化等做出了一种“进步的”解释，而这种特殊性是不能简单地用高等、低等来解释的。从动物系统分类学的角度来看，灵长类（包括人类）在解剖学上甚至是一种较为原初的形体结构，与以昆虫为食的动物接近，因为从解剖学上看，灵长类比啮齿类、食肉动物和有蹄类要相当缺少特异化。进化论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的比较解剖学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人类从自然史的角度并不像神学的世界观和拟人论的自我理解一

开始就误以为的那样是更高级的，而是恰恰代表了更低级的，或从解剖学的角度讲，没有特异性的类别。

马克思把历史的方法运用到猿猴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的关系上，这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个是受到科学史发展所局限的**相对的**部分，即认为人体解剖学是理解猿猴解剖学的**一种**关键因素，因为人体解剖学是发展最早、论证最充分的形态学。随着进化论赋予了它基础，马克思的运用中又出现了一个**绝对的**真理成分，那就是描述了灵长类—类人猿进化和哺乳动物进化之间真实的发展联系：人类的相对较低的发展史的地位，人类应归入灵长类之中，以及人类在哺乳动物进化中基本的种系的位置。“更高级”的定义也因此变得十分复杂：一方面，人类是灵长类中唯一可以把自己在自然中的地位用理论进行表述的物种；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又认为，人类从进化论的角度代表了一种原初的形态。

福尔克·舒里希 撰

潘璐 译，陈洪捷 校

223 二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MEW 13，第 8 页），自从马克思的这个表述之后，解剖这个概念作为隐喻就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盛行起来。它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 59*）的影响范围，成为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惯用语。

1. “实践哲学的奠基者经常使用图像和隐喻”（Gramsci，*Gef* 6，H. 10. II，§41. XII，第 1326 页）。它们不仅作为修辞上的装饰而引人注意，而且它们会反过来对“实体”的概念发挥作用。它们可以促进认识，并且 / 或者阻碍认识。葛兰西写道：“人们常常使用隐喻来表述一个新发现的概念或新发现的关系。如果我们研究这个隐喻的文化语言的起源，将会对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有所助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这个概念引回到它出现时历史上特定的文化世界之中。”（*Gef* 6，H. 11，§ 50，第 1462 页）另外对隐喻的研究还有助于“更精确地探明隐喻的边界，也就是防止把它物质化和机械化”（同上）。

接受隐喻的根本难点在于对隐喻的特点没有正确的认识。隐喻之所以能够扩展认识，原因在于，它的表语基本结构中所包含的“张力”不能取消。隐喻既是同一判断又是区别判断。隐喻性的表述“这个是这个”（Aristoteles，*Rh* III，2，第 10 页）从批判的角度看，总可以从字面意思上说“这个不是这个”（参见 Ricoeur 1986，第 206 页和第 238 页及以下）。隐喻是尝试用一种“脱离实际”的语言来全新地描述一个事物，它并不

总是一目了然的。一个想法因此会逃避到其他的隐喻之中，并由此发生变化。

2. 马克思是在对社会进行观察时使用解剖这一隐喻的，他把社会看作一个能够分解的“机体”。（*Gr*，第 28、189 页；MEW 42，第 41、203 页；马克思对身体、躯体等非隐喻性的使用参见 Scarry 1992）马克思的观察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传统不同，他们是借助社会与人的身体的相似性，使一种统治形式（通常是国家的或教会的）显得重要。（参见 A. Meyer 1969）亚里士多德曾用身体的图像来论证他的观点，即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
224 不成其为手足。”（*Pol*，I，1253a 19 及下行；参见 Hegel，*Ästh*，Bassenge，第 126 页）最著名的例子是梅尼乌斯·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的传说，他试图说服前往**圣山**的**平民**能够撤回城市，他用胃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打比方，来说明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来说的必要性。（Livius，2，32，第 8 页及以下）

2.1 马克思会觉得这种合法性的话语很乏味（MEW 23，第 381 页）。他认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个的主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冒险的”。（*Gr*，15；MEW 42，第 29 页）从对统治进行批判的立场来说——不仅在阶级社会——不应该把整体性看作前提，而应该对其进行质疑。尽管如此，马克思的有机概念仍然提供了一个思考模型，用以说明社会中功能关联的复杂性，说明“在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每一个经济关系都是另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关系的前提，也就是说每一个既有的关系同时也是前提”（同上书，第 189 页；第 203 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解剖是隐喻性的，是从分析的角度把社会这个躯体分解成它的器官。属于这个隐喻范畴的还有“分解”、“骨骼 / 构造”、“器官”、“细胞”等表达。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另外还有一些生理学的表述加以补充，如“生命过程”、“代谢”、“循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学”，等等。

2.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剖这一隐喻出现时，马克思是在总结他的经济—政治研究的过程。马克思在早期对黑格尔进行批判时，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MEW 13，第 9 页），然后他关心的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问题（MEW 13，第 8—9 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同样提到了“与物质前提相关联的物质生活过程”这一相似的说法（MEW 3，第 26 页）。首先应该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裂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MEW 13，第 7 页）。

但是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早已经描述过阶级的“经济的解剖学”（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MEW 28，第507—508页）。因此解剖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主要阶级的“经济的生产条件”（*Vorw 59*，MEW 13，第9页）做出分析，这一分析已经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了，然而并没有完全涵盖马克思自己的思路。

就像生物学家把解剖学看作是生理学的准备阶段一样，政治经济学也是马克思对其进行批判的准备阶段。方法论的意义上的批判只是针对那种分类的、割裂的但是并没有描绘经济—社会的生活过程本身的研究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接受和超越。因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把现状固化并自然化了，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展现的是，“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MEW 23，第16页）。

2.3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有机体的本质”在于它“在现实中的瞬间都是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解剖学意义上的各部分才有意义”。（*PhG*；W，第211页）因此黑格尔在他的社会哲学中采用了他的有机哲学的基本概念（参见 *Enz II*，§353；*PhG*，W 3，第196—225页），这些概念出自哈勒尔（Haller）的《人体基本生理学》（*Elementa Physiologiae corporis humana*）（Lausanne 1557—1566），一本介绍各器官功能的著作（参见Canguilhem 1979，第69页）。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RPh*）中，“国家”是“自为的神经系统”，它分成“家庭”和“市民社会”两个部分，家庭可比之于“感受性”，而市民社会可以和“感受刺激性”相提并论。感受性在这里意味着“最初的抽象的感觉，保留给自己，内心的一种模糊的冲动，再生产，内心的接近，生产和消化”（同上），等等。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有机的观察方式，黑格尔把政治的和社会的“机体”归入到抽象的“**机体的**理念”（*KHS*，MEW 1，第221页）之中，因此忽略了它的特点。这个隐喻使人以为，存在着唯一一个有机的逻辑，所有被称作有机的东西都应该按照这种逻辑发挥功能。黑格尔的这些表达失去了作为隐喻而应该具有的意义上的差异。其冒险之处在于，隐喻控制了被比喻的事物，而这种事物本来应该是经由隐喻才被人了解的。

2.4 恰恰是过程性的、运动的特点是解剖学的隐喻无法表达的。它让人联想起静态的，甚至是死亡的东西。因此，它与马克思期望的理论是无法对接的。马克思希望这种理论可以展示“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来”（MEW 23，第28页）。事实上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已经使

225

用了如“冲突”、“物质生活的矛盾”、“社会生产过程中对抗形式”等概念进行辩证的修正。（MEW 13，第 9 页）为了最终能够描述各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社会中最基本的再生产方式，马克思使用了另一个非解剖学的、能够清楚显现过程性的医学隐喻，那就是“危象”（MEW 23，第 28 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提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TM*，MEW 26.2，第 162 页）。这里指的是“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是与观察仅在“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相区别的。（同上）马克思承认李嘉图已经到达了“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的出发点”，可以去理解它“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同上）也就是说，他已经描述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都从属于经济这一基本规律”（同上书，第 166 页）。从这一点出发，李嘉图还成功地发现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而不是只在它的解剖学意义上，通过分类、肢解的方法——，并且看到，“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的根源在于经济之中”。（同上书，第 163 页）在李嘉图那里，这一出发点就是“**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第 163 页）。但是李嘉图“并没有考察价值形式……，而是只关心价值的大小”（第 169 页），所以他的研究无法深入下去。马克思正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他自己的科学创新，指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市民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K I*，MEW 23，第 12 页）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自己的分析方法比作“微观解剖学”（同上）。微观解剖学在当时在解剖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科学的革命，通过对组织进行显微镜下的分析，发现所有的器官都有普遍的细胞结构。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最重要的特点是，用这种方法可以“深入到一个有机整体的经济之中，又不会从根本上破坏这个整体的有机性”（Canguilhem 1979，第 82 页）。

细胞的隐喻标志着马克思追求的目标是，用价值形式找到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经济形式。但是如果超出了隐喻的隐含意义的适用范围进行推理，从中推导出所有的组合结构，那就会出问题。隐喻有它的界限。社会的“躯体”（不管它多么同质，也）不**是**一个真实的肉体。

2.5 解剖学对于马克思来说，首先是一个思考概念的隐喻，意思是借助“抽象力”（参见 MEW 23，第 12 页）来分析地解开一个复杂的关联。但是它也在不同的地方被当作“实体概念”来运用，比如在提到历史上的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就打过如下的比方：“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

226

227

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MEW 23，第 194 页）不是产品，而是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和“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同上书，第 195 页）然后对生产资料按照解剖学的范畴进行进一步的细分。“机械性的”构成“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那些“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构成“生产的脉管系统”。（MEW 23，第 195 页）为了使这一名词性的表述更清楚，马克思又更确切地说，人们可以这么来“称呼它们”（同上）。马克思在研究固定资本和循环资本的区别时也利用了解剖学以及生理学上的一些类似之处。他用它们再生产时间上的差异来解释资本循环出现的危机（1858 年 3 月 5 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29，第 296 页）。“这种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就像有机体中发生的这种变换一样。……此外，在身体中骨骼是固定资本，它不是和血、肉在同一时间内更新的。”（*Gr*，第 553—554 页；MEW 42，第 562—563 页）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还说道：“资本的周转，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会是徒具形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同上书，第 416 页；第 424 页）

2.6“如果可以相比”这句话显示了，马克思使用了一句在别处说过的话，来传达他自己的表述方式。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表述用于经济和社会原理之中，这种做法是有传统的。比如配第就援引培根（Bacon）的说法，“不仅医生需要解剖学”，而且“每一个有哲学思想的人士都需要”（1691，第 127 页），因此把自己对爱尔兰的研究称为一种“政治解剖学”。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人还有圣西门（Saint-Simon）也提到“社会的躯体”和“社会的生理学”。（参见 Meyer 1969）孔德（Comte）把生物学中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的区别与社会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相提并论，也就是说，“研究一个社会的存在条件”和“研究它不断运动的规律”之间的区别。（引自上书，第 232 页）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把他的意 228
图“还谦逊地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MEW 23，第 107 页；参见上书，第 221 页），而在马克思眼中却只是“教授式的折中主义空谈”。

马克思显然在业余时间认真地研究过解剖学和生理学，他很尊重这两个学科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性（1864 年 7 月 4 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9，第 418 页）。由于细胞的发现，生理学属于当时自然科学的先锋。但在对罗雪尔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批评中，马克思同时也对罗雪尔把隐喻性的话语运用于经济学这种做法表示怀疑。不管怎么说马克思并

没有把这种隐喻系统化，也没有给这一隐喻加上过重的实质的负担。他避免它的明晰性，并过渡到其他的隐喻，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又使用了基础、根源等隐喻，并由此来防止一个隐喻在语意上实质化（而实证主义批评者只会发现关于“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的“不确定的表述和图像”：P. Barth，引自 Mehring 1893，第 302 页）。

马克思不但提到过“内部的生理学”，也提到过“内部的系带”（1873，MEW 23，第 27 页），或者——就像黑格尔一样——用天文学来表述（*RPh*，§ 189）：“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与它们的“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说就像是感官感觉到的天体运动和它们“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之间的区别，这些运动只有天文学家通过计算才了解。（MEW 23，第 335 页）

就像在这里一样，马克思——除了几个例外（比如那个很著名的说法“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学”）——相比隐喻更喜欢用**比较**。比较没有表语的特点，不会让界限模糊，因为它明确地说出，这里指的就是另外的但是可比的东西，而隐喻只是暗含这种意思（这当然也使隐喻具有更大的修辞的魅力）。

2.7 在以“显微镜解剖学”做比较的分析的“为何之故”出现的地方，与解剖学的比较也发挥着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得以贯彻，其效果就像是对它内部的事物进行活生生的解剖实验一样。这种生产方式是“需要付出劳动者的代价才得以发展的”，“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做实验一样”，这也“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做试验”（MEW 23，第 481 页），在关于机器的那一章里引用的文献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实验”不仅是以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居住条件为代价，“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MEW 23，第 481 页）。 229

3. 只有一次马克思说道，在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社会的“物质基础”称为它的“组织机构的骨架”（*Gr*，30；MEW 42，第 44 页）。这一句话后来对解剖学隐喻的接受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马克思同时还加上了“gleichsam”（仿佛）这个词，表示他与这一表达方式保持距离。但是，对于骨架的联想还是在接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这一说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没有出现。在那里在解剖学语境中引入的基础（Basis）这一概念更加强了对僵化的联想。当这一概念后来又通过“上层结构”（Überbau）变成“底层结构”（Unterbau），引起的联想也离“骨骼结构”不远。

3.1 列宁的一段话在这个表述的效果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列宁反对对

《资本论》的经济约简主义的阅读方法，他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通常意义的‘经济理论’，尽管他**仅仅**从生产关系这个角度来**解释**相应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是他会随时探寻与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像骨架上边包着血和肉一样”（*VF*，1894；LW 1，第 132 页）。

拉布里奥拉的表述也与此相似，也是针对经济学家的（参见 1895，第 133 页）：“历史不仅仅是对经济进行解剖，而且包括所有包裹着、掩盖着这些解剖学特点的东西，甚至包括丰富多彩的联想。”（1896，第 154 页）拉布里奥拉“有机地理解历史”（1895，第 134 页），他试着把社会看作“一个纠缠在一起的整体”（同上书，第 126 页）。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同上书，第 134 页）进行全面研究却需要进行“抽象”。历史学家在连续不断的事件之中进行“切入”，却忽视了许多“前提条件”和“优先地位”，而是“把一个多层次的组织肢解、粉碎了”。（1896，第 177 页）对于“支撑整个社会”的“地下建筑”进行“解剖学的研究”是“经济学”的任务。（1895，第 103 页）拉布里奥拉坚决地摒弃当时流行的做法，那就是“像谢夫莱（Schäffle）（1875）一样”把“大脑、脊髓、感受性、感觉、意识和意愿等”放置到“社会的躯体”中。（1896，第 153 页）

列宁这句话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很久以来一直被用于表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比如参见 Bauer 等 1974，第 22 页）。但是这里有一个**实体化的词义偏移**。列宁指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骨架**”，这是他在分析“生产关系”的时候找到的。人们可以把列宁的隐喻看作一种尝试，他想用这一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描述《资本论》的“异质的”结构，也就是说在对不同范畴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具体的历史”插入这种结构——而结构中的这两种成分都是有建设性的。（参见 Haug 1974 和 Althusser 1977）

而对于鲍威尔（Bauer）等人来说，经济“基础”则成了每一个社会组织的“骨架”，上层建筑成了“包裹着经济结构这一骨架的‘血和肉’”。（1974，第 22 页）这一图像使人无法进行有说服力的思考。它诱使人去联想生与死之间的对立。为什么偏偏要把经济“基础”想象成没有生命呢？历史进程的动力正是用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才能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说法含有一种进一步建设的关系，而“骨架”、“肉”和“血”却不能构成认识论上的高低秩序。（其他评述参见 Haug 1979，第 87 页）

把用于思辨的成分实体化，这种做法有很长的传统。普列汉诺夫就曾把社会看作一个躯体，而经济是它的骨架。他把马克思原来的句子进行了一个微小

的修改，但是这里的图像却不成立了。马克思是想把注意力引导到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这一方面，它的成就是可以与解剖学相提并论的。而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却是指的社会和经济本身："'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结构'是由它的经济所决定的"。（1908，第 42 页）

3.2 在葛兰西时代就已经有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即社会的'解剖学'特点是由它的'经济'所塑造的"（*Gef* 6，H. 11，§50，第 1462 页）。葛兰西的贡献在于，他把解剖学这一隐喻的问题专门作为"'语言上的'问题"来看待，并且对其进行**批判**。首先他指出这一隐喻涌现的原因，其次他赋予了它一个可能的意义，另外，指出它的效果会阻碍认识上的发展。

3.21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对这一隐喻的使用是在修辞学中把两个不同的追求融合在了一起，一个是"通俗性"，一个是科学性。使用这一隐喻首先应该归因于"实践的哲学"，它的目的在于把文化上落后的社会阶层在智识和道德
231 方面进行改良。（*Gef* 6，H. 11，§50，第 1462 页）由于其历史悠久，这一隐喻早就属于流行的日常知识的积淀的一部分，因此是修辞学上一个很合适的连接点。同时，解剖学也属于知识阶层的日常理解范围，构成了一种"实验自然科学"的原型，而这在马克思的时代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又正是"一种模型"和"典范"。（同上书，第 1463 页）因此这一隐喻并不是认识的目的，也不是理论建构的出发点，而是一个修辞学的连接点。但它作为载体对于它承载的意义也发生了影响。

3.22 葛兰西自己也使用解剖学及其周边的隐喻，比如在批判克罗齐时，克罗齐曾认为马克思提出过"'上层建筑'都是表面现象和幻想"的说法。（*Gef* 3，H. 4，§15，第 475 页）为了阐明上层建筑是"客观的、发挥作用的现实"，而不是"历史的发条"，葛兰西就使用了"与人的身体进行比较"（同上书，第 476 页）的方法。他把结构比作"骨架"，上层建筑比作"皮肤"："如果有人认为人是通过皮肤，而不是通过骨架保持直立的，那他说的就是废话。但这并不是说皮肤是虚幻的、想象的东西"（同上书，第 475 页）。他想提醒人们对经济扮演的角色加以注意："人爱上一个女人，并不是因为她的骨架的形式，但是这个形式会对外形的普遍和谐，甚至对皮肤的情况都会产生作用，因此也是一种性吸引的元素。"（第 476 页）通过这种明显的异性恋男性的目光可以看到，即使是"伦理—政治的历史"也不能离开"历史集团"的方案，"在这种方案中，组织结构通过伦理—政治的形式被个人化和具体化，但是如果不通过它的'物

质的’或者实践的内容它是无法理解的”。（*Gef* 5，H. 8，§240，第 1082 页）如果放弃了这一方案，“那就像是”在“自然科学中回到了以皮肤、羽毛或皮毛的颜色来划分［动物］种类的时期，而不是按照它们解剖学的结构”（同上）。在这里提到比较解剖学是为了激励人们去“深化对于方法论和哲学的研究”，来凸显对经济结构加以分析的必要性。但是它也仅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历史不是自然科学，它的目标不是分类；因此对于自然科学的援引…… 只是一个隐喻”。（同上书，第 1082—1083 页）葛兰西不想在表述中排斥自然科学的隐喻，而是指出了隐喻形式上的问题（“这是这个，又不是这个”）。考虑到这一点，就可以把解剖学隐喻的“界限”，它同时出现的可转译性和不可转译性如此表述：在“人类的历史上……，‘皮肤的颜色’与解剖学的结构和所有生理学的功能构成了一个‘集团’，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去皮的’个体是一个真正的个体，也无法想象一个‘脱骨的’没有骨架的个体”（*Gef* 6，H. 10.1，§13，第 1252 页）。这正是克罗齐的政治—伦理历史书写中所出现的问题，他从反经济的目的出发，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忽略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好像描述了一些“脱骨的”、“没有骨架”的形象。（同上；参见 *Gef* 6，H. 11，§30，第 1435 页）

3.23 但是葛兰西知道隐喻的“界限”在哪里。他认为，对动物种类的解剖学分类虽然是“一个合适的隐喻”，可以使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想法被“普遍地”接受（*Gef* 3，H. 4，§15，第 476 页），但是它也是“一个简单化的隐喻。因为历史中会发生社会结构的激烈变化，而在动物世界里只会有特别缓慢的进化”（同上书，第 476 页）。

3.3 阿多诺坚决反对把解剖学运用到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在生物学上对于生理学的结构要素进行区分是与“生命”相关的，但是解剖学中却不是这样，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毫无用处。“社会学…… 仅仅与人之间的有生命的关联以及其衍生物——缓慢变化的社会形式有关。这些应该从人的关系之中推导出来，而不应该当作‘解剖学’来进行实体化。”（1961，第 223 页）这句话是针对孔德的，而不是针对马克思的。那个被当作“秩序”来看待的社会静力，实际上具有极高的动力，应该被看作是“危机”和“对抗”，而用“进步”来表述的动态则是解构。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Über Statik und Dynamik als soziologische Kategorien« (1961), in: ders.,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I*, Frankfurt/M 1979, 217-237; L. Althusser, »Marxi Denken

im Kapital« [1977], in: Prokla 50, 1983, 130-147; A. Bauer, H. Crüger, G. Koch, Ch. Zak, *Basis und Überbau der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4; G. Canguilhem,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und Epistemologie. Gesammelte Aufsätze*, Frankfurt/M 1979;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Hamburg ^{5}1989; ders., »'Ideologische Verhältnisse' in der DDR-Philosophie«,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W 1979, 82-105; A. Labriola, »Zum Gedächtnis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 [1895], in: ders.,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4, 73-138; ders.,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Präliminarien« [1896], in: ebd., 139-266 A. Meyer, »Mechanische und organische Metaphorik politischer Philosophie«,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Bd. 13, 1969, 128-199; F. Mehri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893], in: GS 13, 1961, 289-343; W. Petty, Die politische Anatomie Irlands [1691], in: ders.,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hgg. v. W. Görlich; G. W. Plechanow, *Die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1908], hgg. u. eingel. v. D. Rjazanow, Wien-Berlin 1929, fotom. Reprint, Berlin/W 1973; P. Ricoeur, *Die lebendige Metapher*, München 1986; E. Scarry, *Der Körper im Schmerz*, Frankfurt/M 1992; A. Schäffle,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örpers*, Berlin 1875-1878.

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撰
潘璐 译，陈洪捷 校

233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ffe, Analyse/Synthese, Artikulation/Gliederung, Basis, Bedeutung, Biologismu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Empirie, Evolutionstheorie, Form, logisch/historisch, Kritik, Krise, Leitfaden, materiell/ideell, Metapher, Methode, Naturdialektik, Oberfläche/Tiefe, Organismus, Sprache, Stoffwechsel, Struktur, Wertform, Wesen/Erscheinung, Widerspruch, Zelle

占有（Aneignung）

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中，“占有”都属于“关键概念”（Contten 1983，第 62 页）。需要注意的是，布尔和克劳斯（Buhr / Klaus）（PhWb）和里特尔（Ritter）（HWPh）对这个概念的讨论都很不详细，人们甚至“无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相关著作中找到这

个概念”（Röhr 1979，13）。马克思认为，占有不仅与所有权、作为使用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知识、个人学习与自我发展等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与最后在费尔巴哈的宗教评判中变得尖锐的异化及其扬弃问题紧密联系。这些联系为解放视角下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打开了领域。初看之下，在“对人类本质力量的占有”与“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中，“占有”一词的意思似乎是同样的。但占有概念的表述和适用范围，就像所有权的形式、主体和性质一
234 样，是多种多样的。马克思把**占有方式**（*Aneignungsweise*）的概念归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并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所导致的**剥夺财产**（*Enteignung*）的结果出发，分析了占有方式的资本主义形式。马克思认为，洛克对占有概念做了最重要的前期工作。

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Ms 61-63*）中，马克思援引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关于个人占有如何导致私有财产的论述（*Of Gorernment* [1689]，Kap.5：*Of Propertg*）。洛克认为，最初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是“给予全人类”的，因此没有人能够“对这些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行使排他而私有的支配力（*dominion*）”。在“自然状态”下，只存在一种（排他的）私人所有权：“每个人都归其本人所有”。这就是私有财产的最初萌芽：“他的身体和双手的劳动”就成了“他的私人权利”。洛克把这种活动称为**占有**，也就是**拨归私用**（*appropriation*）。洛克修辞性地问道：由于这种私人财产是“未经全体人类同意”而得来的，那么它们是不是要被算作掠夺（*robbery*）呢？洛克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某人”非要对此问题征求一致意见的话，他也许早就饿死了。紧接着，就像自由人自己的活动和他的马匹的活动之间不言自明的联系那样，异己的劳动（fremde Arbeit）就随之而来了：“我的马所啃吃的草，我的仆人所修剪的草坪，我在任何与他人共享权利的土地上所掘出的铁矿，都成了我的财产”。这段话的几页之后，**雇工**这个词就出现了，洛克并没有把雇工现象视作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突破自身劳动范围的标志。

马克思对此做了评论：“洛克的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更为重要的：他把资产阶级社会经典的权利概念表述与封建社会对立起来，此外，他的哲学为后世的整个英国经济学奠定了思想基础。”（MEGA II. 3.6，第 2120 页）沿着洛克的思路，拉郎德（Lalande）给出了占有概念更完备的定义（1968，第 73 页）：“占有是一种为了造就个人所有权而支配那些无人认领或属于他人的东西的行动。”

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在讨论“仆人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时，间接地回顾了洛克对于支配权的看法，他指出：“在此，**支配关系**是本质上的占有关系。尽管家畜从事劳作，但从根本上说，家畜、土地等无法通过占有形成支配关系。对于他者**意志**的占有，是支配关系的前提。没有**意志**的东西……
235 虽然也会劳作，却无法使它的所有者成为**主人**。”（MEW 42，第 408 页）马克思这段话的前提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公众意见——与洛克的看法一致——对**直接支配权**（*direckte Herrschaft*）产生了质疑。因而尼采对此表示强烈的肯定，并对其做了自然主义的解释：“生命在本质上是占有、侵犯、对异己和弱者的征服，是压迫、严酷，是将自身形式强加于人，是吞并，至少也是剥削。”（*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KSA 5，第 207 页）

2.1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着重地把扬弃私有财产的纲领称为“对**人类**生活的占有”（MEGA I.2，第 264 页）。同时，占有也被视作突破黑格尔意义上“整个**外化历史**（*Entäußerungsgeschichte*）和整个**外化之倒退**（*Zurücknahmender Entäußerung*）”的起始点（同上书，第 284 页），在黑格尔那里，“对已经变成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只能是一种在**意识**中……出现的占有，是把这些对象作为**思想**和**思想的运动**的占有”。马克思认为，早在《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中，黑格尔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小说”就已经成为某种实证主义、唯心论，以及用来与现存经验再度妥协的东西。（同上书，第 284—285 页）如果说“五种感觉的**培育**（*Bildung*）是整个此前世界历史的劳动”（同上书，第 270 页），那么这些感觉的活动就是“对**人类**现实性的占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想、直观、感觉、意志、行动、爱欲，简言之，人类个体性的所有器官……在**对待**（*Verhalten*）**其对象**时……都是对对象的占有。”（同上书，第 268 页）列昂季耶夫引用了这段文字，并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对人类而言，其个人发展的形式是一种占有过程（Aneignungsprozesses），这区别于导致物种变化的那种适应过程（Anpassungsprozesses）（1973，第 282 页）；在此，所有权的限制是作为对占有的阻碍（Aneignungshindernisse）而发挥作用的（同上书，第 278 页）。

2.2 费尔巴哈在其宗教批判中（马克思誉为“一切批判的前提”[MEW 1，第 378 页]），为一种批判的人类学奠定了基础，作为一门异化理论，这种人类学构成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部分”（Sève 1972，第 62 页），“1845 到 1846 年间，该理论无可争议地被马

克思和恩格斯所扬弃”（同上书，第 65 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标志着这个扬弃的完成，而且也是“清算我们以往哲学信仰”（*Vorm 1859*，MEW 13，第10 页）的一纸决裂书（Labica 1987，第 7 页），这种决裂并不是绝对的。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隐喻性地把工业史描绘为“**人类本质力量**的一本**打开**的书”（MEGA I.2，第 271 页），这一点
236 体现在第六个命题中，关于此命题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Labica，第 83 页）：对费尔巴哈而言，**种属**（*Gattung*）就是“寓于个人之中的人性（Menschheit）”（*Wesen*，第 37 页），马克思则事实上做出了哥白尼式的转变，他把人的现实性手段（Wirklichkeitsmedium）转向外部，使其变为“社会关系的总和”（*ThF*，MEW 3，第 6 页）。

在《逻辑学》第二版的前言中，黑格尔对精神的占有做了简短的说明：“语言已经侵入了［人类］所占为己有的……一切事物之中”。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真实的人应当进入“语言”之中，并把表象、符号秩序与宗教的领域占为己有。不过他没有意识到，“‘宗教情节’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个人，也都是从属于某种特定社会形式的”（第 7 页），他把人的本质仅仅理解为“‘种属’，也就是内在的、沉默的，从个体的**自然属性**（*natürlich*）中得出的普遍性”（第 6 页）。与费尔巴哈对于中立的（interesselosen）感性**世界观**（参见 *Wesen*，第 188 页）的激情相对立的，是作为组织的感官现实性的“**实践的**人类感性活动”（MEW 3，第 6 页）。在此，这个问题转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历史性的实现手段问题，另一个则是人类的实践问题。这个分野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纲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对我们西方哲学传统简明扼要的记录”（Labica 1987，第 5 页），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认为，它的历史意义“足以与笛卡尔的《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提并论”（引自上书）。

2.3 占有在个体成为人（Menschwerdung）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在该过程中，作为学习者的个体通过行动成功地使自身介入（Sich-Hineinarbeiten）了人类世界，介入了那使得工具使用和知识积累等得以实现的语言与文化。这种以形形色色的社会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占有活动，其在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界定**（*Individuation*）使得个人**结合成了社会**（*Vergesellschaftung*）。“社会关系的总和”过于复杂，以至于我们无法完全地占有它，出于这个原因，除了彼此自然属性

的差异之外，个人还要经历个体界定的过程。“哪些东西要被占有，以及占有在怎样的范围和层次上发生，这些在历史上都会因立场、阶级与出身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由此达到的人性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自主程度的高低以及是否克服了被给予性（Ausgeliefertheit）和外在决定性（Fremdbestimmung）来加以衡量。”（Frigga Haug 1991，第 32 页）

237

评释：

受阿尔都塞（1965）的启发，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1972）认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个命题反映出“在个人与心理形态方面，人类的本质上的外在性与（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说的话）疏异性（Fremdheit）”（Sève 1972，第 261 页）；个人拥有的本质“外在于其自身，如同偏心圆那样（außermittig）处于社会关系的世界中”（同上书，第 35 页），或者说“因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偏离圆心”（引自 Labica，第 89 页）。洛塔尔·屈内（Lothar Kühne）认同这个说法，他指出：“只有通过社会结合（Vergesellschaftung），个体才能成为具体意义上的人”，但这种转化“同时需要的前提是：个体展开了其实践生活的外化，从而超越与生俱来的关系属性，上升到经由个人实践而形成的关系属性”（1979，第 815 页）。——塞夫实际上略过了“在其现实性之中”这个插入语，而屈内则忽视了实现条件的外在性。塞夫把占有的适用范围设定得太窄，屈内却让这个概念承载了太多“全体”的色彩，他认为：“把社会全体作为某种个体来占有，总是只能接近成功而无法完全达成。处于个体边界之内的个人，也在不断地冲撞着这个社会全体的边界。”（1979，第 267 页；详见 Kühne w.u.）

2.4 个人通过积极的占有而实现的“人类本质”，冲撞着所有权与支配权关系所设定的限制与划分。与此相应，在马克思那里，占有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使个人具有能力的人格的建立，二是所有权的建立。“家庭占有关系（在其中妻子和孩子是男主人的奴隶）已经具有了所有权的萌芽与最初形式。”它的核心是“对异己劳动力的支配”（*DI*，MEW 3，第 32 页）。于是私有财产的世界将劳动排除在自身之外：这边是“生产力的全体”，那边则是“大多数的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MEW 3，第 67 页），而且，就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个命题所补充的那样，私有财产对于生产条件的排他性权力，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外在事物，而且也剥夺了其**人类本质的实现条件**。与生产力有着单一关联的雇佣劳动制，则“用摧残生命的东西来

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个人必须占有现有
238 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达到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的制约——也就是受到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MEW 3，第 67—68 页）——在哲学讨论中，马克思把这种占有视作劳动者的集合，也就是“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第 69 页）；但他对思辨的评判在此却带有显著的“反向思辨”色彩。

2.5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异化**问题与**所有权**问题的基础是那种通过具体的有用劳动做出的**生产性占有**。它是有计划地“为了人类需求而对自然物的占有”（MEW 23，第 198 页）。“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个体劳动者“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例如“抓住”、“放开”、“占据”、“影响”、“允许”，等等），并始终促使劳动资料（Arbeitsmittel）发展为自身与劳动对象之间“行使权力的手段”（Machtmittel），他发挥着“自身身体与精神的力量”的同时，也就在改变着“他自身的自然”。（同上书，第 192 页及以下）

反之，若要避免无谓的腐朽，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就需要被劳动者以现实和**功能性的方式**所占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 239
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MEW 23，第 198 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里和霍吉斯金的论争中，马克思把从中产生的过程分成继承与发展两个部分：“**积累**在这里就是把继承下来的、被实现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MEW 26.3，第 289 页）——而在他后期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问题的反思笔记的

《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学〉》里，马克思阐发了生产性的占有在人类发生学上的意义，他这样来阐述语言的发展等现象：我们的祖先“在生产过程中，即在占有这些物的过程中，彼此保持着并和这些物保持着劳动的联系，并且也很快必须为了这些物而同其他的人进行斗争”（MEW 19，第 363 页）。

2.6 按照《资本论》的论述条理，马克思首先把商品生产分析为资本的抽象，而后他入手探讨劳动过程的“简单抽象的环节”（*K I*，MEW 23，第 198 页）如何受到资本的支配而发挥作用的问题。洛克的范畴又重新出现了，但它们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Einl 57*，MEW 42，第 23 页）**社会形式**对应着特定的**财产形式**，后者则可视作**占有的形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同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一种私有财产形式的自然化是“可笑”的，因为对被排除在此外的人而言，这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剥夺财产的形式（同上）。

要理解上述批判的含义，关键在于认识马克思如何使用旧的法律用语来使这个概念变得更具灵活性，并使异化过程（*alienatio*，旧时“买卖”的说法）非实体化，通过这种方法，马克思使异化概念成为占有的互补形式，并将交换视作“通过自我异化来占有异己劳动产品的关系”（MEW 23，第 123 页）以及“通过外化自身的商品来占有异己商品的手段”（同上书，第 609 页），因此“产品的显现（Entäusserung）就成了其占有的必然形式”（*Res*，MEGA II. 4.1，第 28 页），这种关系最初通过“换出自身劳动产品和换进异己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MEW 23，第 127 页）被标识出来，而后在货币经济中“被买和卖的对立所分裂”（同上）。于是，流通就成为“这样一种运动，在其中普遍显现呈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又呈现为普遍显现”（*Gr*，MEGA II. 1.1，第 126 页）。

这里的“**占—有**”（*An-eignen*）在词义上应当理解为“**异—化**”（*Ent-fremden*）。马克思在交换关系的考古学中也觉察到了自身与异己的这种辩证关系：“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自身的’）的尽头，在它们与异己共同体接触的地方开始的”（MEW 23，第 102 页），于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彼此异己性就进入了原初的共同体。

2.7 随着商品形式在人类劳动力上的扩大，非对称的占有关系得以产生，在这种关系中，作为一方的“异化的”货币试图占有作为另一方的劳动力，也就是商品，这种关系束缚着劳动力所有

240

者（即贩卖者）的身体与灵魂，使其出卖自己的时间与活动：雇佣劳动者只能通过**自我**异化的方式占有生活必需品。

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重构了“在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的前提下，占有方式发生根本变革”（同上书，第 613 页）的过程：雇佣劳动者的生产性活动“不断物化……在异己的产品中，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了”（同上书，第 596 页）。对雇佣劳动者而言，这种过程具有“对立”（Zwickmühle）的结构（同上书，第 603 页），因为它“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同上）。因此，用于购买异己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同上书，第 609 页）。“对先前未支付的那些劳动的所有权，就成了如今愈来愈多地占有未支付的活劳动的唯一条件。”（同上）

对雇佣劳动者而言，这种劳动与资本相对立的占有方式意味着“经济上的隶属地位”（同上书，第 603 页），而这种占有关系下的交换形式也具有了虚伪的特征（同上书，第 609 页）：通过企业与雇佣劳动者之间不断重复的交换活动，“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同上书，第 613 页），这里隐晦地暗示了舍尔比利埃（Cherbuliez）的“loi d’appropriation”，马克思将其译作“占有规律” 241
（Appropriationsgesetz）（参见 MEGA II.2，第 47 页及以下，以及 Schrader 1980，第 170 页及以下）。在此，我们可以揭开洛克的意识形态小说背后的谜题：“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就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MEW 23，第 610 页）在为了这种关系的合法性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哲学等），而且资本家本身的**观念**也都青睐他们那种所有权和占有方式，这种建立在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之上的所有权和占有方式，在其进程中占有着异己劳动，他们把这种方式与另一种**生产方式**相混淆，在后者中，**直接生产者的私人财产**是反过来**以其生产条件**为前提的……因此，任何针对这种占有**形式**的抨击，也都可以视作**一种**针对以此方式获得的所有权——也就是**一切所有权**——的抨击”（*Res*，MEGA II.4.1，第 134 页）。

2.8 这种对劳动的剥夺的前提是在所谓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对“直接生产者的暴力剥夺”。（MEW 23，第 79 页）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和**法学**的意义上，**基于劳动的私人财产的意识形态**，不再

继续传递到那种基于**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的所有权之中。”（MEGA II.4.1，第 135 页）只要资本主义形成了其生产的规范形式，这个过程就继续发展为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复发式的剥夺（“集中”与“集中化”，参见 MEW 23，第 654 页及以下）。根据马克思的设想，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将变得无法统一，而“剥夺者也成为被剥夺的对象”（同上书，第 791 页）。与此相应，他在论巴黎公社的失败时说，那是“少数有产者与占大多数的大量劳动者”之间的对立（MEW 17，第 361 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异化的占有的辩证关系做了黑格尔式的总结：“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通过其自身的动力，这种生产与占有方式走到了它的历史界限，于是它的扬弃也就出现在可能的地平线上，“这不是要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MEW 23，第 791 页）。

242 2.9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补充了达成上述目标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的基础文献里，这些内容都在**占有**和**占有方式**的范畴中有所阐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将此称为“共产主义的占有和生产方式”（MEW 4，第 477 页）：“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同上书；参见第 472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这个目标表述为：“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MEW 20，第 260 页），“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同上书，第 261 页）。

在一份以法语编写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序言手稿中，马克思用法语“collectif”（集体的）一词对应于德语“gemeinschaftlich”（公共的）一词，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中并没有将其正确地译成德语：“集体占有只能通过生产者阶级的革命行动……得以实现”（MEW 19，第 238 页）。这里的“集体占有”与第三国际那种彻底归国家所有的集体主义（Kollektivismus）并不相同。

3. 对（部分）后马克思的研究者来说，占有概念下面这些扩展或许是有所帮助的。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中提到

了一种启蒙概念，这个概念旨在旁敲侧击地占有听众，因此它不是给出空泛的理论（Doktrin），而是“通过……对自身并不明晰的意识的分析”（MEW 1，第346页）展示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事实上在战斗，这种意识是它自身**必须**占有的东西，即便它并不愿意”（同上书，第345页）。在《共产党宣言》中，占有的范畴扩展到了教育，因为后者被视作“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MEW 4，第477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范畴：知识被视作对世界的一种占有，它与“艺术、宗教、实践—精神等对世界的占有”不同（MEW 42，第36页），而研究活动则是“思考着的头脑……占有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同上）。占有概念的这些维度，有助于它在具体科学中的接受和使用。

243　3.1 对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列昂季耶夫、霍尔茨坎普［Holzkamp］、奥斯特坎普［Osterkamp］、延森［Jantzen］）和框架理论（Rahmentheorie）（塞夫）而言，占有是个重要的概念。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在与列昂季耶夫的讨论中，主要关注的是“物化与占有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作用，经验的传递获得了基础性的意义（1973，第105页；Leontjew，第188页及以下），他还提出：人类的起源就是“**通过对于生活所得**（*Lebensgewinnung*）**的普遍化目标的变化和参与着的物化过程，从而达成的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积极占有**”（1983，第176页）。——借助占有概念，乌特·奥斯特坎普（Ute Osterkamp）把资产阶级所认为的那种社会化过程理解为**个人的物化**（1975，第306页），通过这种物化，“游戏、好奇与探索行为都在占有活动中被扬弃，而这种社会性单位的被历史规定了的生产方式的内容，也在占有活动中得以实现”（第309页）。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占有总是**自我发展，亦即自我教育**（第310页）。参与控制生活条件的可能性，导致“对社会知识的占有”（第310页），这同时也包括了“在必要分工劳动中学习”。与这种热情的总体观念相反的是，她也强调（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个命题的发展）指出：“相对于体现在全社会发展态势中的、外在于人并处于对象和社会现实内部的**人类本质**而言，个体变为人的过程作为历史上达成的人性阶段，**必定总是落在后面的**”，因为“个人对社会全体的占有，总是受到人类寿命和能力的不可克服的限制”，而她把这视作“在更高级的整体社会生产力中的扬弃”。（第311页）——吕西安·塞夫的论述重点有所不同，他把劳动分工视作“个体界定的最深刻和最具社会性的基础”（1972，第185页），它只允许

个人部分地实现那种人类本质，而“人类的社会遗产越是发展”，这种实现也就越不彻底。（同上）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如此，“独特性与社会性才得以重合”（第 286 页）。——与塞夫类似，奥斯特坎普认为，“人类占有方式的差异性”如今成了发展的催化剂，因此个体界定必定不再意味着“彼此隔绝意义上的差异发展”（第 312 页）；个人主义之所以对其加以批判，是因为在个人主义者看来，它所作为目标的那种“无关系意义上的隔绝，已经变得和未发展状态
244 （Unentwickeltheit）与低水平的个体界定意义相同了”。塞夫认为它“‘通过抽象去除了’（Wegabstraktion）人类的本性”，在人类的本性中，对社会异常因人而异的占有倾向是通过遗传植根下来的。（第 327 页）由于社会理论的单方面偏见，“占有的能力”成了“具体学科里的概念”。（第 331 页）尽管如此，通过以功能及历史的方式重构“从动物到人的学习与发展能力的上升过程……我们仍然可以把那种被总结为‘占有能力’的各种具体发展潜力的人类本性，从作为具体历史的社会实现的人类本性那里剥离出来”（第 332 页）。由于缺乏对人类本性的分析，对塞夫而言，个人的社会化就意味着“把社会关系投射到个人之上”；因此他以“类似经济范畴”的方式给出了对个人的建构。（第 333 页；参见 Sève 1972，第 308 页及以下）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之际，占有被进一步视作有性别差异的概念。乌苏拉·朔伊（Ursula Scheu）（1977）参考了列昂季耶夫等人的表述，把妇女的社会化视作对世界的一种特定的、受到阻碍的占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非占有。尽管这里的视角单方面关注了作为占有关系之受害者的女性，但关于因性别差异而采取不同立场的问题，也因此产生了内容丰富的女性主义研究。（参见 Frigga Haug 等 1980 / 1991）

3.2 尽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反映理论（Widerspiegelungstheorie）阻碍了占有概念的运用，但不少**艺术理论家**“认为可以在马克思的占有概念中找到提供理由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将为美学中的哲学主张奠定基础。（Franz 1989，第 33 页）莫伊塞·卡甘（Moissej Kagan）（1971）把**美学**视作“审美地占有世界的科学”。洛塔尔·屈内主要对占有方式的辩证关系以及对象性做了研究，并从“个人生活条件的自由占有”的视角，把通过对仍然有用之物的“随意丢弃”而达成的“自我占有”（1981，第 216 页）视作资产阶级“购买限制”的一个环节（同上书，第 245 页）。托马斯·梅切尔（Thomas Metscher）则试图通过对“艺术中对现实性占有水平”的差异，促成实在论概念的实践化。（1982，第 201 页

及以下）

3.3 在宗教理论中，宗教性的占有往往被作为“对客观实在性的幻想和幻觉式的反映”而受到轻视（Kosing 1985，第
245 451 页），之所以如此，有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为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把宗教与艺术归为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占有。因此尤格里诺维奇（Urinowitsch）在 1965 年指出，“宗教既不只是社会意识的形式，也不仅仅是反映社会存在，它还教育着社会存在”（引自 Gysi 1987，第 87 页），正如居西（Gysi）指出的那样（同上书，第 87 页），“这整个实践行为的体系”把宗教的规定性视作了一种先前世代要去占有的占有结果，“视作一种文化遗产，亦即人类这个种属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过程中的要素”（同上书，第 88 页）。因此，宗教性的占有对行动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参见第 90 页），因为它包含着“普遍意义上人类经验”的要素以及对原初共同体的回忆（第 93 页），因此它具有团结的潜力。

3.4 **马克思列宁主义**。东德学界有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就是按照不同占有方式（理论的占有、实践的占有和实践—精神的占有）的彼此关联来对其进行相互考察。（Seidel 1966，Fiedler / Seidel 1968）官方版本的反映理论对这种研究路径造成了阻碍，强行使后者接受了官方的措辞。——迪特·维蒂希（Dieter Wittich）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理论归因于这样一种状况，即：把知识理解为“对世界的精神占有的结果”，因此它一方面涉及“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又涉及关于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知识。（1976，第 13 页）“与现实相符的观念表述”成了理论追求的目标，因为它决定了行动的“可实现性”。（第 14 页）维蒂希感兴趣的是如何把这些“真命题”系统化为“科学的思想体系”（第 15 页）；占有概念在此仍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阿尔弗雷德·科沁（Alfred Kosing）把占有理解为这样的过程，“**首先**，世界上越来越大的领域成为人类活动的对象（恩格斯将此称为从物自体［Ding an sich］到为我们之物［Dinge für uns］的转变）；**其次**，……主体获得了自我发展；**第三**，它同时还是这样的过程，在其中，个人占有并进一步发展社会关系以及既有的社会生产力”（1985，第 27 页）。1979 年，维尔纳·勒尔（Werner Röhr）采取塞夫和屈内的研究路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占有概念做了系统化的演绎。他考察了“对社会关系的占有的独特之处”（第 87 页及以下）、占有与学习（第 117 页及以下）的区别，尤其是占有对于人格理论以及人格发展的意义，这种发展后来被理解为能够从反映理论的范式中解脱出

246 来的“**主体化过程**”（*Subjektwerdung*），它是社会关系的积极“环节”，并“作为个人的全体而［拥有］自身的结构，在社会关系的层面上，这种结构不存在任何直接对应于塞夫理论中那种人格与社会的“并置结构”一类的东西（Röhr 1979，第 120 页）。——彼得·鲁本以近乎反对的态度强调了（1976，第 20 页）“占有和所有权对于劳动现实性的基本意义”，他还顺带提及了对自然物质的占有问题所具有的生态学维度：我们在劳动中占有的“不是**整个**自然，而是……自然的**部分**，以便在改变了的状况中消费它，于是自然对象就作为消费的结果而复活了，造就出许许多多的‘生态危机’”（同上）。他指责传统的形而上学，认为那源于私人产权社会“对于占有的无知……和对所有权关系的冷漠”——它把被占有者和未被占有的对象相互交错地归入了对象的范畴。（同上）最后，他反驳了哈贝马斯（《劳动与互动》［*Arbeit und Interaktion*］）把交流（Komminikation）与劳动的意义相分割的做法：“法兰克福学派”把劳动归在工具性的范畴，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成立，即“生产者由于剥夺（异化）而**无法**对其产品的价值做出社会性的**判断**”（同上书，第 21 页）。当占有概念与共同体关联起来时，它涵盖的范围才得以完整，它的现实性就是**公有制**：“私有财产的生产以及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生产，是对公有制的摧毁，并因此也是对现实性中的共同体的摧毁，换言之，它将共同体转变为一种理想化的抽象物，让它如耶稣般升天，并通过在货币中的复活使其具有了神秘的对象性。”（同上书，第 22 页）

3.5 然而，至少在早期哈贝马斯的著作中，这两者是有关联的，哈贝马斯曾指出我们与我们的历史之间的劳动异化：“‘凿穿’物化关系的，不是那种自我寻求的意识，而是积极的占有本身。”理论的目标是实践（1963，第 211 页）。这个说法暗示着哈贝马斯对自己的保守派老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占有概念的评判。伽达默尔认为，对“流传物”（Überlieferten）的占有一方面把流传物作为“理性的新创造物”，另一方面，占 247
有也是对传统的一种悖论式的自我剥夺：“事实上，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Wahrheit*，第 261 页）。

西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中，迈克尔·毛克（Michael Mauke）（1970）对“社会劳动与地主的劳动”做了研究（Kap. 1.1）。——与此相对的是，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提出了“生产社会中”的一种“基于占有关系的社会形式”（1970，第 94 页；第 106 页及以下）。他“完全……在人与人之间或社会内部的意义上理解占有

概念……，也就是说，将其视作通过非劳动者（Nicht-Arbeitende）实现的对劳动产品的占有（Appropriation）”（同上）。根据他的看法，一切“占有关系的社会”都具有“通过某些活动而形成的社会综合体，这些活动在种类上纷繁多样，在时间上则被那些塑造占有对象的活动所分隔”（同上书，第 95 页）。通过与生产相关的那些含义而获得的占有概念，或许使这个字眼变得不再能被接受了。——克劳斯·图尔克（Klaus Türk）则讨论了“在支配和占有关系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并区分了这种关系的**实在**（物质）方面与**形式**方面。（1987，第 71 页）

3.6 关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理论占有方式的分析，阿尔都塞对其做出了影响广泛的知识论上的拓展（LLC，1967，第 49 页及以下；德文版 *DKL*，1972，第 52 页，其中把“自我占有”［s’approprier，sich aneignen］解释为“接近”［sich nähern］）。在反经验主义的意义上，阿尔都塞认为知识是用自身原材料的生产，是被生产的生产资料。

3.7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会提到一种特定的“占有法则”（1969，第 249 页及以下），不过，如何在生产中使贡献和占有相结合的问题并未因此得以解决。在东德末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米夏埃尔·布里（Michael Brie）——针对当时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的分配制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占有关系”（1990，第 43 页），因为这种关系能够有效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进步”**（同上书，第 108 页）：“任何其他形式的占有关系，无论是集体所有制、企业所有制、领地所有制、全社会所有制、国家或国际所有制等，一向关心的都是占有方式，个人的占有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发展问题却总是被忽视，因此这方面的探讨，将会促进所有这些占有关系的共同进步。”（同上书，第 108—109 页）在高科技生产方式中，劳动发生了从直接劳动到普遍劳动的转变（第 65 页），与此相应，占有关系中的主体，也由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反映不同发展趋势的成员 248
组成（参见上书，第 76 页）。因此布里指出，“作为国家所有制社会构想的社会主义，正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当代的历史趋势发生着对立”（第 115 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促使他对行政指令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做了分析。那种倾向于涵盖一切产品的**国家占有**以及接下来的**再分配**导致了这样的矛盾结果：国有的东西仿佛成了**无人的财产**，这些财产的个人占有按照个人的实际贡献来清偿，并且可以在类似的贡献之间进行转移（参见 W. F. Haug 1989，第 160 页及以下）；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占有可以通过欺骗、偷窃、腐化或者把分配作为

自主的东西与市场对立等方式来达成”（Kühne 1981，第 245 页）。只有当其积累的能力——亦即进一步进行全社会占有的能力被扼制之时，这种类型的社会才能回到正常状态。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Pour Marx*, Paris 1965 (*Für Marx*, Frankfurt 1968); ders. u. a., *Lire le Capital*, Bd. 1, Paris 1967 [1965] (deutsch [gekürzte Ausgabe]: *Das Kapitallesen*, Bd. 1, Reinbek 1972); M. Brie, *Wer ist Eigentümer im Sozialismus? Rechts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Berlin/DDR 1990; J. P. Cotten, »Aneignung«, in: KWM 1, 1983; 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1841), 2 Bde., hgg. v. W. Schuffenhauer, Berlin/DDR 1956; H. Fiedler u. H. Seidel, »Zum Marxschen Wissenschaftsbegriff«, in: *DZPh*, Sonderheft 1968; M. Franz, »Aneignungsfunktion und Sinnfrage«, in: *Weimarer Beiträge* 1/1989, 32-53; H. G. Gadamer, *Wahrheitund Methode*, Tübingen 1956; B. Gysi, »Religiöse Aneignung der Welt als kulturelles Erbe«, in: *Aktuelle Beiträge aus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hgg. v. d. AGW beim ZK der SED, Reihe A, H. 63, Berlin/DDR 1987, 85-104;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W 1963; F. Haug, Theorieteil, in: dies. (Hg.), *Erziehung zur Weiblichkeit. Frauenformen*, Bd. 1,3., veränderte Aufl., Hamburg 1991; W. F. Haug, *Gorbatschow –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1990 (v. a. Kap. 6.2: *Nutzlose Arbeit, niemandes Eigentum und das Reich der Simulation*);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 Historischer Ursp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Funktion der Wahrnehmung*, Frankfurt/M 1973; ders.,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W. Jantzen, *Psychologischer Materialismus – Tätigkeitstheorie – Marxistische Anthropologie*, Hamburg 1991; M. Kagan, *Vorlesungen zu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Asthetik*, Berlin/DDR-München 1971; P. Keiler, »Betrifft: ‘Aneignung’«, in: *Forum Kritische Psychologie* 22, 1988, 102-122 (identisch mit Artikel »Aneignung«, in: EE 1, 1990, 118-128); A. Kosing (Hg.), *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85; L. Kühne, »Zu Marx’ Bestimmungdes ‘menschlichen Wesens’ in der 6. Feuerbachthese«, in: *DZPh*, 27. Jg., 7, 1979, 803-817; ders., *Gegenstand und Raum – Über die Historizität des Ästhetischen*, Dresden 1981; G. Labica, *Karl Marx. Les »Thèses sur Feuerbach«*, Paris 1987 (*Karl Marx. Die Feuerbachthesen*, Ham-

burg 1995);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J.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1689), CH. V: *Of Property*, z. n. ders.: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hgg. v. Ch. L. Sherman, New York 1965; M. Mauke, *Die Klassen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 1970; T. Metscher, *Kunst Kultur Humanität*, Bd. 1: *Studien zur Kulturtheorie, Ideologietheorie und Asthetik*, Fischerhude 1982;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und ihre Anwendung in der DDR*, Berlin/DDR 1969; U. Osterkamp, *Grundlagen der psychologischen Motivationsforschung*, 1, Frankfurt/M 1975; W. Röhr, *Aneignung und Persönlichkeit. Studie über die theoretisch-method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Aneignungsauffassung für die philosophische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Berlin/DDR 1979; S. L. Rubinstein, *Sein und Bewußtsein. Die Stellung des Psychischen im allgemeinen Zusammenhang der Erscheinungen in der materiellen Welt*, Berlin/DDR [8]1977 (Moskau 1957); V. Scheu: *Wir werden nicht als Mädchen geboren, wir werden dazu gemacht*, Frankfurt/M 1977; H. Seidel, »Vom theoretischen und praktischen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r Wirklichkeit«, in: *DZPh*, H. 10, 1966;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Frankfurt/M 1972;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K. Türk,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e der Wirtschaft*, Stuttgart 1987; D. M. Ugrinowitsch,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r Kritik der Religion* (russisch), Moskau 1965.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梁爽 校

参见：

abstrakte Tätigkeit, allgemeine Arbeit,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tagonismus, Anthropologie, Arbeit, Arbeitsprozeß, Aufhebung, Aufklärung, Besitz/Eigentum, Bildung, Eigentum,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nteignung, Entfremdung, Epistemologie, Erbe, Erfahrung, Familie, Gewohnheit, Hermeneutik, Herrschaft, Konzentration, Korruption, Praxis, privat/gesellschaftlich, Privateigentum, Redistribution, Religionskritik, Selbstverwirklichung, Sprache, Tätigkeit, Totalität, Tradition, Universalismus, Vergegenständlichung, Vergesellschaftung

承认（Anerkennung）

1. 在黑格尔那里，“承认”这个表述有教育、法学和道德上的隐含义，它反映着自我意识的辩证关系，“后者必定被确立在其他主体的意识对我的反映之中”（Habermas 1968，第 13 页）：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只能作为承认”而存在（*PhG*，B IV A）。

250 黑格尔沿用了费希特（Fichte）对“承认”这个词的理解（Siep 1979；Wildt 1983），将其作为自主的资产阶级主体的构成概念。在费希特那里，这个词是在关于私有财产的非正式权利关系之契约理论的背景下使用的。“因此其财产权，也就是排他性的所有权，要**通过相互承认**才得以完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它就无法开展。”（*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1796，§12）与国际法中的“承认”概念相似，费希特把个人的独立性视作国家主权的衍生物，相应地，处于潜在战争状态的国家反过来确保着个人的财产状况。

在这个议题的更新变化中，米德（Mead）提出所有权上的个人主义的普遍化所面临的悖论式的初始问题。他认为：“倘若某人想把其财产保管在共同体中，此人是不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就成了更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人对自身立场的接受保证了自身财产得以被承认。”（1934 / 1968，第 243 页）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德国唯心论之前的社会契约理论那里。我们可以“在卢梭的著作中见到关于承认的最早论述”（Taylor 1994，第 35 页），在《致达朗贝尔的信》（1758）中，卢梭预见到共和派的革命节庆：“把观众放到了戏剧之中，使他们自身成为表现者，以便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和关爱，从而让彼此更好地团结起来。”这里呈现出的问题与近现代以来的个人主义直接相关，在这种个人主义中，（爱欲）“关系”的生产成了“内在身份教育的萌芽”（Taylor，第 26 页）。随着个人主义在私人占有的基础上的释放，随着个人社会化问题从接受预先形成的角色问题转变成了作为（有可能失败的）永久任务的“关系劳动”问题——这种新产生的任务是在特定的权利、道德、政治、宗教和哲学的领域中（重新）建立社会聚合力——现代关于“承认”的论述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形成。对此，青年黑格尔给出了范畴上的澄清：“人必然是被承认者，也必然是承认者”（*Systementwürfe III*，第 197 页）。

“承认”概念在社会哲学语境中的运用，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种思路。它们在互相对立的立场上强调了黑格尔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辩证法，据此，个人的意识与行动能力只有通过（两种意义上 251

的）他者的承认才能得以建立：只有当我**承认**他者是独立行动着的个体，并在其中**再认识**“我”时，我才能变成作为独立行动着的个体的“自我”。这种向“主体间”观察方式的转变，不仅为各种社会化理论所关注，而且在精神分析学中也获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性。

一种看法认为这种主体间的观察方式体现在道德哲学中：在其权威性的黑格尔讲座中，哈贝马斯（1968）认为“主体间性”是从作为理想的社会结合领域的承认的镜像关系（Spiegelverhältnissen）中产生的，在该领域中，个人“在那种不受拘束、自我生成的交互性（Reziprozität）的基础上，通过不受支配的相互作用”（同上书，第 15 页），把位于其上的关于普遍物的观点变成其自身的观点，从而使他们能够借助他者的眼睛观看。这种在“收窄的视角”中创造出社会身份的相互承认关系（第 13 页），最终是通过“普遍化的他者立场”而促成的（Mead）。

与此相对，第二种看法从对支配权的评判入手，强调承认中存在的自愿隶属关系的环节，只有在先前那种把普遍化的他者作为个人的承认的基础上，我才能承认和再认识到具体的他者：也就是说，只有借助那个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中象征着俄狄浦斯情节的他者（*l'Autre*），或者说在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那个（大写的）主体（*Sujet*），我才能承认和再认识到具体的他者。这种他者涵盖了由社会化权力（Vergesellschaftungsmächten）所创造出来的社会想象领域，在其中，社会化与个人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一种由更高本质达成的“承认”与“再认识”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获得贯彻。一旦这种“主体效应”为个人创造出了关于绝对自主性的想象，并且呈现出一种（在上帝之前）构成性的平等的假象（在这种假象的基础上，个人将自身的身份视作无可比拟的个体），那么这种社会依赖关系就如同其真实的（非理想化的）社会关系那样进入了他的无意识。

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体化过程，“承认”不仅构成了“再认识”中创造身份的维度（在法语中，这两个概念被表述为再认识 [*reconnaissance*]），而且也是一种积极的对现实性的否认，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阿尔都塞援引了拉康想出的那个文字游戏：“意识形态 = **再认识** [**承认**] / **误认**（*reconnaissance / méconnaissance*）”（*ISA*，第 149 页），认识 / 再认识和误认识。

尽管上述两种思路的范式未必能在 252
知识上相互参照，但两者之间具有某种互补性：只有当支配性的维度在视野中渐渐消失，人们才能通过关于承认的理论看到社会身份建构的解放性维度；反

过来说，支配性批判的视角则把每一个社会化过程视作是“在意识形态中”开启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把社会化过程视作承认过程究竟有多大意义？或者说，这究竟对谁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与个人对分类能力的占有相关；然而，通过传递以及附带的隐含义，表达本身似乎已经刻写在了话语实践中，这种话语实践调节着法学、教育、道德和规范等过程。

关于“承认”的话语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关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在此是受到阻碍的。尤其是列宁的思想促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对于更高真理的形式上的承认，是进入马克思主义知识领域的前提条件，这个观点被斯大林规定（并修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章。然而，真正使该话语保持常新的，不是后来这种关于自我意识的新辩证法的成果（“质料的承认”），而是马克思在这方面的零散论述，这些论述从社会变化的视角审视了黑格尔关于“承认”的学说。

2. 黑格尔用自我意识的辩证法重新表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契约理论。费希特则从承认关系中演绎出普遍意识与个人意识，他“找到了一个原则，该原则超出了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整个传统，据此原则，无论是‘完成的’个人，还是国家或者那种始终存在的‘普遍物’，都不是绝对的前提”（Siep 1979，第 22 页）。与此相应，在青年黑格尔耶拿时期的体系提纲中，“‘遗传’的承认原则”（同上书，第 25 页）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化的一个自然基础”（Honneth 1992，第 25 页），社会意识的形式与建制就如同已发展的个体所组成的积木那样，从这个原则中生成（无须霍布斯意义上的专制领主）。因此，黑格尔重新接受了康德关于“对抗机制”的观点（参见 Lippe 1975，第 27 页及以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被重新解释成**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对立关系、支配关系和依赖关系都被视作提升道德的驱动力，在其中，个人在生活的驱迫下， 253
达成了对更高想法的普遍化。

而黑格尔日益显著的权力实在论思想，使他把这种“主体间”的社会化过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以交换为媒介的交互关系。“虽然有契约能力和理性目标的行动着的主体，即便是‘资产阶级’主体，……其地位都来自那个寓于法定承认中的主体间关系，而这些主体在此之后的国家公民地位，则只能在与更高的普遍物——国家——的关系中得以规定。”（Honneth，第 102 页）在他者中的自我反思，从个人之间滑移出来，进入孤寂的意识，这种意识将外部的驱迫权力作为其自身的外化加

以再认识。不过，黑格尔只把“承认”这个词用于主体间的镜像关系，而并不将其用于超主体的范围。

青年马克思批判这是一种思辨的颠倒（spekulativen Verkehrung），在其中，形式化的承认关系并不被描述为解决冲突的形式，相反，这种冲突恰恰体现着那个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成形的交互关系。黑格尔把古代奴隶制作为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教育小说一个阶段的隐喻，因为冲突最后都在自身中得到了扬弃。“为了承认的斗争与向主人的臣服是这样一种**表象**，在其中，人类的共同生活作为**国家**的起始得以诞生。由于**暴力**的基础就寓于此表象之中，因此暴力并不构成**权利**的基础……。这不仅是国家的**实质原则**，而且是国家的外在和表象性的起源。”（*Enz*，§433）

马克思断然地把这个问题翻转了过来，他指出：“我们相互的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Auszüge aus James Mill*，1844，MEW 40，第460页）“我认为我的物品对你的物品所具有的权力的大小，当然需要得到你的**承认**……。但是，我们互相承认对方对自己的物品的权力，这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同上书，第460页）形式上的承认在此表现为冲突的手段及其中介，而非冲突的某种更高的目标，而“那**真正**的、在事实上实现的关系，只是彼此**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第461页）。

于是，那种经由承认所传递的相互作用，被马克思放到了费尔巴哈式的异化批判之中。“因此，我们彼此的产品是满足我们彼此需要的**手段**、**媒介**、**工具**、**承认的权力**。”（同上）马克思在此批判 254
的目标是承认的形式属性，它事实上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承认的权利规范，为了进入交换过程，每个个人都遵循这种规范。由于这种承认依靠金钱促成，因此自有它本身才是自己的信誉所在。而“一个人通过借贷某种价值而**承认**另一个人”（第448页），因此“人的个体性、人的道德……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于是，“那潜藏在道德承认的谎言中的秘密”（第449—450页），就在信用体系中真相大白了。

这种批判的局限在于：它本身就是借助道德的论证。马克思认为，与资产阶级（金钱）的虚伪道德相对立的，是一种“真实的”（wirkliche）道德，这种道德是对他者的未被异化的再认识：“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第462页），这是一种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我—你关系。以一种典型的方式，马克思在此指出：他者对我而言

不是理想化的人类榜样的象征，其本身并非像德国唯心论者认为的那样是承认的结果，而是社会化的产物。这种不带有法学、教育—道德潜台词的承认概念不再是思辨的，它与劳动概念的关系只是隐喻上的（“我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第 463 页）。在马克思主义中，这种观念往往与主流思想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参见 Brecht 的 *Me-Ti*，“作为生产的爱”，另见“尊重”的观念，或“在第三人中生活”的建议；GW 12，第 571—572、465、546 页）。如果一种想法认为在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Manifest*，MEW 4，第 482 页），那么这种想法中就不会存在任何人道主义理想了，因为这种观念只是要完成这样的论域转换，即：把被抽象思考的二元关系转化为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和生产构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做出了这方面的理论突破，他用对自我异化的思想关系的批判来反驳费尔巴哈，并指出：费尔巴哈“在经验中认识了‘真正的个体和肉体意义上的人’”（*DI*，MEW 3，第 44 页），而后再次使其成为不真实的抽象物；但他无非是“承认却错误地认识了现状”（第 42 页）。——阿尔都塞给“承认”概念添加了新的现实意义，但他对此的应用则延续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它‘承认了’**现状**”；*ISA*，第 130 页），但其中一个地方存在争议：他认为这里包含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上）。——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此用了二元的哲学暗码——也就是说，形式上的承认关系会带来对抗，但对抗构成了承认的基础，两者之间并不是如同表象与实存、真理与谎言这样的关系。这种构成性的冲突既不意味着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也不会像在费尔巴哈那里那样形成无法认识的谎言和欺骗。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上下文中，马克思所指的是那些职业“意识形态家”（第 49 页）对于实践的幻想，要把“……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和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同上）。作为意识形态活动的承认代表着那种“颠倒的”、被制度性地理解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一开始就思考着超验物”（第 540 页），并把共同体的象征作为理解和相互作用的基础。马克思把这种观念上的假想（“对于法律上私有财产的政治承认，就被视作私有财产的基础”）称为“错误的认识”，他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社会无意识的维度：这种观念中的劳动（劳动各部分的独立化、阶级的上升、国家形式的普遍化诉求），其社会经济学的整体条件必定是“被错误认识的”，因为通过对最高原则的承认，这种思考把自身视

255

作了实际事物的来源。——阿尔都塞学派在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其归入了“意识形态的主体效果”这个标题之下，这显然含蓄地预设了黑格尔式的前提。

仿佛是对资产阶级契约理论的半反讽式回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里再一次提到了承认的问题：“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才能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K I*，MEW 23，第 99 页）唯心论哲学家所认为的那种能够演绎出社会性事物的原则，在此以一种社会生成论的方式被重构出来：形式上的义务关系被视作一种基础性的、“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权利与意志关系”（同上），以及私人劳动分工的生产关系的一种“客观思想形式”（同上书，第 90 页）。构成此关系的那种平等的幻觉则有着这样的形式，在其中，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得以付诸实践。然而这并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的那种观念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实践，在此，对他者理想形象的再认识导致的自我异化（费希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人仿佛自我分裂，并和他自己进入了法庭”；见指定处，§ 12）受到的批判是相对温和的；其中甚至显现出了解放的维度：随着发达市场关系的贯彻与交往形式的形成，个人“成为彼此独立的人”（同上书，第 102 页），形式化的承认关系就会与个人的历史解放联系起来。一旦这种公民社会从“资产阶级”对私有性的偏执中解放出来，我们就无法再退回去了。

3. 列宁关于承认概念的说法，首先针对的是主体间的维度；这些论述主要与政治选项、结盟问题以及组织纪律相关。“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是那些把对阶级斗争的承认扩大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承认中去的人。”（*SR*，LW 25，第 424 页）对于自 1893 年以来就被社会民主党所“承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取代了它在历次政治斗争与辩论中所形成的那个服从权威的义务。这就给这场争论带来了某种直截了当的特定（“有些负责人对‘马克思的承认’仅限于他给所谓的米哈伊罗夫斯基［Michailowski］写过信”；Plechanow 1895，第 233 页），关于要承认的东西的争论越是激烈，这种权威就变得越无可争辩。康德派哲学家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1896，第 402 页）曾反驳恩格斯说：“那些把是否承认经验世界普遍可观察的规律性当作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区别的人，他们看不清这场争论的真正性质，因此就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规定性。”列宁对此补充道：因为他把“意识所反映自

然客观规律性的承认”当作了“唯物主义”的标准。（*ME*, LW 14, 第 150—151 页；参见第 16、125、127、240 页等处）

在列宁那里，承认关系从政治领域向认识领域的转移，遵循的是同样的消极辩证关系，但它还有这方面的因素，即要把无所事事的职业革命家在认识论上的争论引领到“生活和实践的立场上来”（*ME*，第 137 页）。但列宁并没
257 有“承认”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事实上使得生活受到党的纪律和实践的约束，并服从于那些超实践的原则（“唯物主义意味着承认那些独立于人类和人性的真理”；第 127 页）。——为了让理论服从于政治，斯大林取消了政治必然性理论的这种约束力。于是物理的存在物依赖于承认关系。在斯大林看来，“‘经济学家’与孟什维克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承认进步理论……在动员、组织和改造上的作用”。（*DHMat*，*FL*，第 662 页）——认识论上的讨论巩固了政治组织的权力，因为它用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替代了对于特定见解的“横向”（亦即经由讨论的形式）发展出的承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认识、承认和再认识形成了一个循环。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信念（*fides*）与坦白（*confessio*）的分裂以及内在说服与外在声明的分裂，也意味着集体对哲学的这顶盖斯勒帽子行礼（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瑞士地方总督盖斯勒［Gessler］下令将国王的帽子绑在柱子上，每个在此经过的人都必须对帽子鞠躬行礼以示对国王的尊敬。违背这条规定者，将被判处死刑。——译者）（“对物质的承认”），它的意义，即对思想的控制，体现在对系统性苛求的主体化的劳动中：“对任何人来说，唯物的一元论都是最难的承认问题之一”（Sandkühler 1975，第 606 页）。

4. 由于这些状况，目前对承认问题的主要讨论并不是由马克思的批判所引领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待重新发现；承认问题似乎更多是由于黑格尔耶拿讲座手稿的出版（1931—1932 年）而被提出的。哈贝马斯在讲义（1968）中指出，黑格尔在手稿中通过承认理论的“主体间性”转向，超越了意识哲学的界限。不过据柯耶夫（Kojève）的看法，不论是由此受到启发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还是以拉康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法兰西”学派，都以“主体间的”视角来看待黑格尔的理论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并不一致。

流亡的俄国哲学家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ève）曾说自己是“理解斯大林的哲学家”（Fetscher 1975，第 12 页），他在讨论黑格尔“对于生与死的荣誉之战”（1947 / 1975，第 25 页）时强调

指出：一种异化结构会使得个人的主体服从于其对承认的渴求，并且在历史上使得其进入“兽性的生活”。在柯耶夫的存在主义黑格尔讲座中，“人类本质”被规定为“一种依赖于那对他者的欲求之欲求的功能”，这种功能的最终目标是承认。（同上）

258 拉康的弗洛伊德讲座受到了这个思路的启发，拉康把人类特有的需求结构视作“对他者欲望的欲望”，亦即对作为他者欲望之所指的那种能指的欲望。他用一种三元关系取代了黑格尔那里的二元关系：在其中，具体的他者传达着我（对他者）的对象关系。这是俄狄浦斯情节的象征。“如果我说，对他者话语的无意识都伴随着高度的承认，那么它指的是这样一种地方，在其中对欲望的再认识（*reconnaissance*）与对承认（*reconnaissance*）的欲望结合在了一起。”（1966，第 524 页）

阿尔都塞在其意识形态理论中，以那个从（被存在主义解读的）黑格尔默默继承而来的承认学说为基础，对异化结构做了本体论的处理，并和拉康一起提出了在教化过程中的一种具有普遍支配权的、拜物化的承认形式，在其中，个人需要的是某种超越的“媒介”（Marx，MEW 1，第 353 页；40，第 446 页及以下）。在此，承认者与服从规范（被承认）的主体之间的分裂被视作人类社会学的基础条件。哈贝马斯提出的黑格尔讲座对“主体间”环节的强调，其目标似乎是要借助的个人相互之间无须以更高权力为媒介的社会化过程来克服这种分裂：在这种相互承认中，个人的个体性非但不会消弭，而且会得到发展。

哈贝马斯曾批评马克思“把交往行动做了工具性的还原”（1968，第 45 页），哈贝马斯认为：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个人的交往要以一种普遍物为媒介”才能得以保障，这种普遍物传统上被称为“精神”。（第 15 页）因此，以“主体间性”为媒介的相互作用，就被作为一个自主的社会化特别领域得到捍卫，并在形式上脱离了物质的生产。这个观点呼应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回溯到了那个作为资产阶级承认理论的组成部分的二元论思想。一边是形式上被承认的、具有协商能力（“话语能力”）的主体，一边是生产中处于主人或奴隶地位的经验的个人，二者的分裂在此得以维系。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强调了承认所具有的补偿性。“在关系的生产中对于自我实现方面所亏欠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只能在承认的形式领域中对个人加以补偿，亦即通过赞扬、报酬或者使其免于指责和惩罚。”（参见 Lippe 1975，第 243 页）

259 在社会改造的问题视角中，女性主义理论首先对承认理论二元结构重新

进行了讨论：塞拉·本哈比布（Seyla Benhabib）认为，被地位相当的人所“承认”的自我意识之中隐含着男权思想，在相互作用的那个“奇特世界”中，“个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成长了”，这个世界是男性团体自恋式幻想的产物，“他们必须要按照法律的样子来重建父亲的权威”。（1989，第 465—466 页）（法律）人（[Rechts-] Person）与具体个人、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裂，是建构形式交互关系的必要条件，这种分裂状态再造了父权制的排他逻辑。

因此，“承认关系就从具体的、主体间的维度转移到了作为男性生殖器象征的维度，在后者中，承认并非发生在主体之间，而是与理想相等同”（Benjamin 1990，第 129 页），承认被视作一种结构性的暴力关系，它的构造要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的更加复杂。妇女运动中则会陷入这种意识形态的陷阱，即：要在这种关系中进行“为了承认的斗争”（正如哈贝马斯学派所主张的：参见 Honneth 1992，Habermas 1993）。她们斗争的真正对象应当是在此意义上的“异化结构”（Benjamin，同上）本身。

形式化互动关系中的这种性别中立的抽象主体（亦即米德所说的“普遍化的他者”），是本哈比布批判的核心，他指出：“这种在想象里被移入他者立场中的、个人自己的静止的思考过程”（同上书，第 474 页），以归谬的方式表明了主体间意义上的承认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真正的差异中，对实在的他者的承认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它就不是那种必然否认这些（不仅仅是妥协意义上的）差异的形式上的承认。接受“具体他者的立场”意味着离开“主体间性”的立场（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整合了纯粹意识的中立媒介的话）；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在现实性中促成相互承认关系的那些东西，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承认”（“与此类似的同义词”有“证实的、被认为真、成立、知道、接受、理解、同情、采纳、容忍、珍视、明白、认识、指认、信任……爱慕，等等”；Benjamin 1990，第 19 页）。“西方的个体性类型”也受到了质疑，因为它没有看到“活生生的、真实的人，而只看到认知意义上被感受的对象”。“对他者的承认总是一种例外，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无辜的环节，是对失去的乐园的再发现。”（同上书，第 78 页）

不过，这种吸引人的想法仍然难以摆脱父权制承认关系的符号秩序，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秩序的产物。这就带来了社会哲学中关于“认同政治”（Taylor 1992）的问题，资产阶级国家社会中的形式承认关系导致了“对差异的盲目”以及个人主义，认同政治问题正是作为

它们的反应而产生的。对于那些被否认了差异性的人而言，这唤起了他们对于在集体身份中被“平等尊重”的诉求。“如今的女性主义者、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寻求民族独立的族群，或者那些想要在国际舞台为其文化的平等地位奔走的前殖民地，都在寻求实现这种诉求。”（Habermas 1993，第 149 页）正如泰勒（Taylor）所说，社群主义的认同政治意味着对少数族裔的保护权或者采取平等的措施，例如妇女运动的选票配额问题。哈贝马斯并不认为政治“在规范性上是成问题的”，他的理由与泰勒隐含地提出的“行政上的物种保护”的观点针锋相对（同上书，第 173 页）；尽管如此，哈贝马斯学派的学者则主张重新发现黑格尔对“社会斗争概念划时代的新理解”，“根据这种观点，主体之间在实践上的冲突可以被理解为道德的运动环节”（Honneth 1992，第 32 页）。因此，“为了承认的政治斗争也就随着妇女身份和两性间的关系而发生改变，并因此直接激发了男性的自我理解”，从而对“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既有的边界”提出了疑问。（Habermas 1993，第 159 页）这种思考对哲学家而言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显而易见的是，黑格尔式的讨论并没有关注结构性的暴力关系，在这种观点看来，如果此关系“在规范性上不成问题”，那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另一方面，认同政治也必定与承认关系的形式主义相关，这种形式主义产生了自身的辩证关系。例如，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承认其他的文化，但如果人们再认识的仅仅是自身对他者生活形式良好方面的看法，却对现实有着错误的认识的话，那么“差异的政治就会导致所有差异被同等对待”（Taylor 1993，第 68 页）：因为“人们会这样看待他者，即：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同上）。承认理论的实践性本质就在于：“通过与他者的争论，我们自身也经历着改变”（同上），这种本质由此也再次超出了形式承认的镜像关系。 261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W 1977; G. Amengual, »Anerkennung«, in: EE, 128-131; A. Bambey, *Das Geschlechterverhältnis als Anerkennungsstruktur*, Frankfurt/M 1991; S. Benhabib, »Der verallgemeinerte und der konkrete Andere. Ansätze einer feministischen Moraltheorie« (1986), in: E. List, H. Pauer-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eminismus und Kritik*, Frankfurt/M 1989, 454-487; J. Benjamin, *Die Fesseln der Liebe. Psychoanalyse, Feminismus und das Problem der Macht*, Basel, Frankfurt/M 1990 (*The Bonds of*

Love, New York 1988); I. Fe tscher, »Vorwort zur Neuauflage«, in: Kojève 1975, 11-19; J. 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in: 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ders., »Anerkennungskämpfe im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in: A. Gutman (Hg.), *Multikulturalismus und die Politik der Anerkennung*, Frankfurt/M 1993, 147-196; G. W. F. Hegel,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I: Natur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1805/1806), Hamburg 1987; A.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Frankfurt/M 1992; A. Kojève, *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 seines Denkens* (1947), Stuttgart 1958, Frankfurt/M 1975; J. Lacan, *Ecrits*, Paris 1966; R. zur Lippe, *Bürgerliche Subjektivität: Autonomie als Selbstzerstörung*, Frankfurt/M 1975; G. H. Mead, *Geist, Identitätund Gesellschaft* (1934), Frankfurt/M 1968; G. W. Plechanow (N. Beltow), *Zur Frage der Entwicklung der mon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895), Berlin/DDR 1956; H. J. Sandkühler, »Streitbarer Materialismus oder – Streit um den Materialismus?«, in: *Argument* 92, 17. Jg. 1975, 601-628; C. Schmidt, »Ein neues Buch 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in: *Der sozialistische Akademiker*, 1896, Nr. 7; L. Siep, *Anerkennung als Prinzip de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eiburg-München 1979; C. Taylor, »Die Politik der Anerkennung« (1992), in: A. Gutman (Hg.), *Multikulturalismus und die Politik der Anerkennung*, Frankfurt/M 1993, 13-78; A. Wildt, *Autonomie und Anerkennung. Hegels Moralitätskritik im Lichte seiner Fichte-Rezeption*, Stuttgart 1983.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 撰

王师 译，林芳芳 校

参见：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wendung, Autorität, Bewußtsein, Charaktermaske, Entfremdung, Erkenntnistheorie, Ethik, Gesetz, Gleichheit,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Ideologie-Theorie, Moral, objektive Gedankenformen, Parteilichkeit, Personifikation, Recht, Rechtssubjekt, Subjekt-Effekt, Unbewußtes, Zweifel

262 开端（Anfang）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提醒我们（MEW 23，第 11 页）。要理解这句话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难点：**阅读**的困难（对《资本论》“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是不够清楚的”）以及**研究**的困难（尽管价值形式“很简单而且缺乏内容”，“但两千多年来，人类精神对它的探究都是徒劳无功的”）。关于第一个困难，马克思已经建议读者先跳过开头部分，并从第八章开始阅读（参见 1867 年 11 月 30 日致库格曼的信，MEW 31，第 575—576 页）。路易·阿尔都塞“带着敬意却坚定地劝告读者”从第四章入手阅读（1969/1973，分别见第 13 页和第 88 页）。同时，他对《资本论》开篇在阅读和研究上的困难给出了解释：1867 年的时候，马克思还“受限于黑格尔式的科学观念”（“对黑格尔而言，只有哲学才能算是科学，而每一种真正的科学都必须以哲学的诉求作为开端的基础”——分别见第 19 页和第 97 页）。阿尔都塞的批判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应该重新编写《资本论》，以便使其开篇简单易懂（“**我们重写《资本论》第一节，使之不再‘艰深’，而是成为简单易懂的‘开端’**”——分别见第 22 页和第 103 页）。首先他提到了马克思在 1868 年 11 月 7 日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一句话：“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这句话是对《中央报》（*Centralblatts*）的评论家说的，这位评论家曾指责马克思没有“对价值概念给出说明”。阿尔都塞没有看到的是：马克思下面这句话真正指出了其中的困难之处：“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即便每个小孩都能理解劳动的必要性，那也是因为劳动的分配对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与劳动相结合的那个经济学机制，则非但“每个小孩”无法理解，即便对成年人而言，如果没有科学的帮助，也未必能够掌握。“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MEW 32，第 553 页）这正凸显了论述的开端问题：我们必须在避免**于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的前提下给出可行的开端，这种开端不仅应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要共同导向论述的主体。这种论述上的问题与事物本身的构造（Aufbau）问题息息相关，因为开端正是构造的一种功能。

1. 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曾在他的《笔记》（*Sudelbüchern*）中写道：“我并不以开端作为开端。”（1770，H. 40）对许多作者而言，写作中最难的莫过于

作品的开始部分，最棘手的也莫过于空白的第一页。让·保罗（Jean Paul）曾在其小说《菲贝尔传》（*Leben Fibels*）（1811）中写道："还没有作品如此经常地……被我一次次地开始和中断。"——黑格尔则对开端问题做了典范性的论述，在《逻辑学》中，他问道："是什么构成了科学的开端？"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原则"表达的是一个开端，这开端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是'一切事物'的开端"（*Logik* I，第 1 页）。此处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求关于精神发展之论述的开端，亦即被理解为呈现着的知识之基本形态的那种起始状态。这种开端首先必须是直接的。它不应是体现着知识与真理的辩证关系之先前形式的那种开端（参见 Daniel 1983，第 88 页）。只有具备了对整体结构的先行理解，我们才能选择其中的逻辑开端。这种开端与在"偶然方式中"所呈现的"开端本身"是有区别的（I，第 1 页）。开端标志着论述方式的起始步骤，它通过逐步扩展的对整体的率先把握，规定着具体的环节。开端是包含在系统所有环节中的元素。"通过这个进步过程，开端失去了它在这种完全直接和抽象的规定性中单方面所拥有的东西，成为被传达之物，而科学进步力的轨迹则因此完成了一个循环。"（同上）

政治经济学中的开端。在重农学派看来，开端并不构成理论上的问题。他们对此也缺乏全面性的论述，这方面的讨论只是零星出现在不同学者的著作中。而且大多数也只是为了记录政治经济上的大事件。——亚当·斯密首先从抽象的原理出发，试图以演绎的方式进行经济体系的建构。（参见 Rojas 1989，第 158 页）为了阐述《国富论》（*Reichtum des Gesellschaften*）的理论框架，他为书的第一、二卷加上了简短的导言，并把对国家财富性质、来源和分配"的说明作为头四卷的目标"（*Einl u. Plan d. Werkes*，第 7—8 页）。斯密首先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概念做了阐述，它是劳动生产率以及国家的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接下来，斯密区分了货币、价格及其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租金等概念。此后则是关于资本、储蓄、消费和投资的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Besteuerimg*）一书，把《论价值》作为第一章。与斯密《国富论》的开端相比，李嘉图这位机器时代经济学家选取的开端更为抽象。随着论述的展开，李嘉图提出了关于价值如何增长以及收入在不同阶级间如何分配的问题。在李嘉图的经济体系中，所有要素都是通过劳动而从价值的规定性中推导出来的。

2. 关于如何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系统的讨论，马克思做了深入的思考。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指出："实际上，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历史部分开始写）。"（MEW 34，第 307 页）《资本论》的一至三卷阐述的是基于更广泛的历史细节研究的普遍资本概念（参见 Ritsert 1973，第 21 页）。这种阐述"并不是关于知识的外部规定，而是关于知识的推导关系……。接着阐述的开端而来的是整个研究"（Haug 1976，第 48 页）。

2.1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研究顺序**。在此书中，马克思有意识地提到了他之前的历史性的集体思想，也就是"积累的"科学知识。从 1844 年起，《政治经济学批判》日益成为马克思学术活动的重心，此时他的书摘和笔记中就出现了大量相关的材料。他在 1843 年至 1845 年的《历史经济学研究》（*Historisch-ökonomischen Studien*），即《巴黎手稿》（*Pariser Heften*）（参见 MEGA IV. 2，第 428 页及以下）中，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对私有财产的辩护，而 1845 年《曼彻斯特手稿》（*Manchester-Hefte 1845*）则反映出他对人口理论、生产过剩的危机以及资本主义银行体系等问题的关注（参见 MEGA IV. 2，第 71—246 页）。1850 年至 1853 年，马克思则在《伦敦手稿》（*Londoner Hefte*）中记录了他对于英国货币、信用及银行政策、人口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状况、殖民体系的发展以及技术史的研究（参见 MEGA IV. 7，第 42—82 页；IV. 8，第 304 页及以下；IV. 9，第 9—109 页）。

商品被确定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始范畴"（Jahn 1978，第 66—67 页），这在很多方面与历史条件有关。客观地说，它必须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高的发展水平为条件："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MEW 23，第 89 页）此外，这还须以经济科学特定的发展阶段为前提。早在 17 世纪初，学者们就试图发展出政治经济的科学，他们是以人口、民族、国家等"混乱的整体概念"开始的（*Einl 57*；MEGA II.1.1，第 36 页；MEW 13，第 631 页）。关于分工、货币、价值等概念，他们成功地给出了较简明和普遍的规定性。"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同上书，第 632 页）"但是，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Zue Kritik*, MEGA II.2，

265

第 135 页；MEW 13，第 42—43 页）“因此，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化了的形式上进行探讨，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同上）

2.2 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研究纲领的开端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的时候，此时距他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已经过了 15 个年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给出了构想中的这部经济学著作的纲领，在其中，他打算在把“所有社会形式都或多或少具有的那种普遍抽象的规定性”（MEGA II.1.1，第43 页；MEW 13，第639 页）作为第一个研究阶段的开端。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放弃了这种开端的方式，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MEGA II.2，第 99 页；MEW 13，第 7 页）。在这份为六卷《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作的研究计划的开头，马克思也提到了资本，这个“资产阶级社会中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应当是分析的“起点和终点”（*Einl 57*；MEGA II.1.1，第 42 页；MEW 13，第 638—639 页），接下来马克思还提到了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制、国家、对外贸易以及国际市场及其危机。这种在方法上的思考，让人想起黑格尔提出的经济体系构 266
造中的那种循环的形式。在黑格尔看来，呈现着的意识的形态会被扬弃在最终的体系中，并且被带入其自身的意识，于是思想和存在就获得了同一；与此相反，马克思的出发点并不是对抽象概念的分析，而是对其他简单现实状况的分析，不过，从发展着的复杂整体状况的角度看来，这些现实状况的规定性仍然是抽象的。如果这种具体的整体状况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结果，那么马克思就远离了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即：具体的现实性是某些客观化的思想自我运动的结果（参见 Zelený 1968，第 56—57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资本”章中，马克思并不是很确定价值是否可以从商品中分离出来。他在一处注释中写道：“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MEGA II.1.1，第 190 页；MEW 42，第 193 页）一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末尾，马克思才在一个“重述的段落”中认识到：“**商品**是体现资产阶级财富的首要范畴”（MEGA II.1.2，第 740 页；MEW 42，第 767 页）。而这段话的标题也正是“（1）价值”。在 1858 年 11 月 29 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提到了《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商品”，认为这部分“完全没有按照初步计划来写”——他这里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MEW 29，第 372 页）。

“万事开头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这句开场白还涉及“实践问题”（Lange 1971，第 166 页），自 17 世纪末以来，实践就已经进入了经济学的视野，它主要研究的是那些加入国家财富储备的服务及物质产品的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MEW 23，第 49 页）由此出发，马克思简明扼要地做了进一步说明：在商品的两个规定性中，使用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最终的决定性，而交换价值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支配商品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系统理性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与此相应，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生产劳动的“双重特性”，并引入了“抽象劳动”的概念；接下来则是对使产品成为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分析，而在讨论商品—货币—流通问题之前，马克思在此重构了“货币形式的产生过程”（同上书，第 62 页），这种重构使我们得以把握从使用价值到货币的真正转变过程（参见 Stapelfeldt 1979，第 92 页）。

《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以“第一眼呈现的”形式（MEW 13，第 15 页），对资产阶级财富做了说明。后来马克思用了另一个说法：“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也就是“最简单的具体物”（*Randglossen*，MEW 19，第 369 页）。——从这种关系出发，马克思依次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其他概念。价值形式为开端论述的对象奠定了基础，其构成要素则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复杂经济形式，它还对起源学意义上的“第一物”做出说明，所有的构成物则是作为“后续”从中发展出来的。（参见 Haug 1976，第 193 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范畴，商品还带有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遗迹”（MEW 23，第 183 页）。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现了”（同上书，第 97 页）。我们应当区分两种过程，在其中一种过程中，“商品生产与发达的商品流通及贸易”构成了资本的“历史前提”（同上书，第 161 页）；而资本则经过这一历史前阶段之后的另一种过程，资本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并且不断地再生产着自身的前提。“商品与货币的流通”是“**资本形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与出发点**”（MEGA II.4.1，第 30 页）。

2.3 充分的范畴分析往往还具有起

源学重构的特征。因此与第一版不同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中，马克思强调了价值形式分析的起源学维度："简单价值形式与展开的价值形式，都只是现实价值形式的预备发展阶段。"（MEGA II.6，第 26 页）——阿尔都塞曾主张"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个看法忽视了历史研究与起源学研究的区别。（*DKL*，第 60—61 页；参见 Backhaus 1978，第 85 页）——事实上，晚期恩格斯认为，以"简单商品生产"（亦即《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段所提到的价值形式的作用）为条件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把产品转化为商品的
268 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 15 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K III*，MEW 25，第 909 页）

从流通领域进入那个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隐蔽的生产场所"（MEW 23，第 189 页），这背后的思路是：我们应当区分发达资本主义的结构关系与特定环节取得支配权的那些历史系列（MEW 42，第 36 页及以下；23，第 183 页及以下）。马克思的论述试图达成这样一点，在其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环节得以相互叠合："每个新的资本总是首先……作为货币……进入市场"（MEW 23，第 161 页）。的确，马克思优先考虑的是重构资本从流通中的增殖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资本工业资本的论述应该放在对交易资本的论述之后。为了理解商业资本，我们应该对剩余价值及其转化为利润的过程加以说明。马克思认为，商品与货币的流通是交易资本形成的决定性前提。虽然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似乎"是具有**特殊**功能的资本"（*K III*，MEW 25，第 339 页），但它"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同上书，第 342 页）。

"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一论点出发的"（*TM*；MEGA II.3.3，第 815 页；MEW 26.2，第 161 页）。不具备价值形式范畴的价值，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古典经济学认为，具有充分规定性的形式就是合格的形式，从这种形式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反向的过程来获得规定性，这些虽然从中派生，但也构成了它的条件。这种过程以"逻辑"的方式导出现实历史的结果（参见 Brinkmann 1975，第 176—177 页）。因此，以这种方式为基础的"第一物"就会被视作历史性的"第一物"和"个别物"。这就导致了"大大小小的鲁滨孙一类故事"（MEGA II.1.1，第 21 页；MEW 13，第 615 页）。"理性经济人"也就成了经济规律的出发点（参见 Helander 1923，第 35 页）。

3. 列宁在《哲学笔记》（*PH*）中寻找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共同问题时指出："讨论的出发点——那个最简单、最习惯、最大量的直接'存在物'：就是个别意义上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第319页）对列宁而言，开端的问题是在1916年出现的，当时他正在为"一本……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写作一篇通俗的导言"（Pokrowski 1969）。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Heften zum Imperialismus*）中，列宁试图把对"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基础**特征"（*Imp*，LW 22，第200页）的论述作为出发点。他在第一卷中计划先从对银行资本的论述入手（参见LW 39，第96页），但他最终决定把诸如"生产的集中、垄断和卡特尔"这些"基础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同上书，第231页；*Imp*，第200页）。他明确地将此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生产集中化理论相联系（参见*Imp*，第204页），并且强调自己与霍布斯理论的区别，后者对帝国主义的论述是以列强对世界的瓜分作为出发点的（参见1902，第4页），此外，列宁的论述也有别于希法亭，后者在《金融资本》（*Finanz Kapital*）一书的导言中扩展了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参见1910，第XLII—XLVII页）。在列宁看来，解释垄断无须诉诸那些用于把握帝国主义的范畴（参见Kumpf 1968，第98页）。相反，列宁认为垄断是与其他规定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银行资本、金融资本、资本的出口等，而且列宁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作"帝国主义战争（亦即一场抢夺和劫掠的战争）"（*Imp*，第194页）。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化的特征使其成为"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同上书，第307页）由此列宁得出结论认为，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269

考茨基的帝国主义分析的出发点是工业化产生的大都市资本主义与周边农业区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帝国主义意味着"支配与奴役农村地区"的"一种特别的政治企图"。（1914，第908、920页）但考虑到武器技术的毁灭世界的可能性，这种政策的后果变得难以预计，因此"每个目光长远些的资本家"（同上书，第920页）都有其他的想法。

斯大林曾暗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不存在市场（*ÖkP*，AW 2，第454页），货币的首要作用是计算货币（Rechengeld），消费品事实上会按政治标准进行分配，社会主义行政指令规定着经济实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政治局势的变动会是受经济规律影响的产物。这类观点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往往是以关于"波将金"号巡洋舰的炮击

270

事件的叙事开始的："'社会发展遵循经济规律'这个论题是入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部分"（Becher 等 1988，第 168 页）。因此通过给出定义，该理论主张"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与工农政权达成统一"，这种统一又以"逻辑和历史的方式"成为"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出发点"。（参见上书，第 184 页；Richter 1979，第 144—145 页）

鉴于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批判中对社会形式与经济范畴之间关系的新界定，以及他解释概念内容的方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逻辑不一致性也往往受到指责。政治经济学还没有"走出它们的初始期和试用阶段"（Heinrichs 1989，第 697 页），这点主要体现在其短暂的实效历史中。而鉴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只能逐步加以克服，我们不能"通过统一的科学抽象来把握其逻辑形式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反映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体系"（Pokrytan 1981，第 169 页）。

奥塔·西克（Ota Šik）早年曾认为："抽象法曾经是，而且也将继续是认识这种经济关系的方法，如果不借助抽象方法，这种经济关系可能会因为缺乏积极实践而长期不为人所知"（1967，第 27 页）。在西克看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端是要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既有的发展水平下，我们不可能把生产的成果直接在参与劳动的人之间自然地分配"。他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理论（同上书，第 27、95 页），正是这方面思考的结果。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u. É. Balibar, *Das 'Kapital' lesen*, Reinbek 1972; L. Althusser, »Avertissement aux lecteurs du Capital«, Vorwort zur Taschenbuchausgabe (Flammarion) von K. Marx, *Le Capital* I, Paris 1969 (dt.: »Vorwort für die Leser des I. Bandes des 'Kapital'«, in: ders.,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Berlin/W 1973); H. -G. Bachhaus,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11, Frankfurt/M 1978, 16-117; J. Becher u. a. (Hg.), *Lehrmethodik Politische Ökonomie*, Berlin/DDR 1988; H. Brinkmann, *Die Ware. Zu Fragen der Logik und Methode im 'Kapital'. Eine Einführung*, Gießen 1975; C. Daniel, *Hegel verstehen. Eine Einführungin sein Denken*,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2. überarb. Aufl., Köln 1976 (5. erw. A. Berlin/W 1989); W. Heinrichs,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Berlin/DDR, 37. Jg., 1989, Nr. 5, 695-711; S. Helander, *Die Ausgangspunkte*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Jena 1923;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Berlin 1947;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London 1902; W. Jahn, »Die Entstehung der Ausgangskategori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in den Vorarbeiten zu Marx''Kapital'«, in: ... *unsrer Partei einen Sieg erringen. Studien zur Entstehungs- und Wirkungsgeschichte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Berlin/DDR 1978, 66-79; K. Kautsky, »Der Imperialismus«, in: *NZ*, 32. Jg., 1914, Nr. 2, 908-922; F. Kumpf, *Probleme der Dialektik in Lenins Imperialismus-Analyse. Eine Studie zur dialektischen Logik*, Berlin/DDR 1968; O. Lange, »Die Bedeutung der Praxeologie für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in: R. Jochimsen/H. Knobel (Hg.), *Gegenstand und Method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Köln 1971, 166-174; M. N. Pokrowski, »Erinnerungen«, in: A. Reisberg, *Lenin – Dokumente seines Lebens*, Bd. 1, Leipzig 1980, 588f; A. K. Pokrytan, *Das Historische und das Logische in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81; J. Rancière, *Der Begriff der Kritik und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den 'Pariser Manuskripten' bis zum 'Kapital'*, Berlin/W 1972; H. Richter, »Zur theoretischen Analyse des sozialistischen Produktionsprozesses«, in: P. Hofmann/H. Richter/I. Tjulpanow (Hg.), *Theoretische Problem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DDR 1979, 142-156; J. Ritsert, *Probleme politischökonomischer Tbeoriebildung*, Frankfurt/M 1973; R. Rojas, *Das unvollendete Projek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Marx''Kapital'*, Berlin/W-Hamburg 1989; O. Šik, *Plan und Markt im Sozialismus*, Wien 1967; G. Stapelfeldt, *Das Problem des Anfangs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New York 1979;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Berlin/DDR 1968.

君特·维林 撰

王师 译，梁爽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e Arbeit, abstrakt/konkret, Arbeit, Arbeitsteilung, Aufbaupläne, Bewußtsein, Dialektik,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pistemologie, Geld, Handel, Imperialismus, Kapital, Kapitallektüre, Kategorie, kleine Warenproduktion, Kreislauf,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hrbuch(-marxismus),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ehrwert, Methode, Monopol,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

tionsweise, Profit,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ozialistische Warenproduktion, Spätschriften, Staatssozialismus, Tauschwert, Vermittlung, Wertform, Wert

272 雇员（Angestellte）

1. 被保险权利与社会权利所界定的雇员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奥地利（1906年）与德国（1911年）分别实施的雇员社会保险，体现了当时政治上的这样一种支配性的意愿，即试图阻止雇佣劳动者组建工会与参与政治的势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雇员”被用于泛指工人社会化晚期阶段所出现的那个群体，这个词并没有严格统一的用法。自从修正主义的争论以来，“雇员”一词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氛围与内部结构的讨论中就起着重要作用。

在其他许多地方，“雇员”和“工人”在法律意义上并不像在德语地区那样有显著区别，因此在这些地方，“雇员”往往指属于某个社会阶层的特定群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雇员与工业机械劳动的关系比较远，但在劳动和企业中发挥职能，这些职能在工业企业中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前、之间或之上（例如管理职能）的。在诸如商业资本的“服务业领域”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等工业领域以外的行业就职的雇员数量，直到今日都在持续增加。从社会历史上说，雇员这类职业的影响力既来自早期私人企业（如工匠、会计、工程师等）享有的受信任的地位，也来自他们相对有保障的职位，以至在19世纪末的德国，他们被称为“私人雇员”。

随着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化以及企业的差异化，“有职位”的雇佣劳动者的客规阶级状况、社会利益、政治性的意识形式以及实践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政党中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2. 关于“有职位”的雇佣劳动者地位的特别性，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中对此提出了几个本质特征。而后来所有关于雇员劳动呈现出的特殊性和习惯性的特征的讨论，在其一般意义上，几乎都与这几方面对主流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相关：“生产劳动”（主要参见MEW 23，Kap.14；MEW 25，Abs. IV；*Res*，MEGA II.4.1，第108页及以下）、商业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作用（MEW 25，Kap.17），以及“管理和监督性的劳动”（MEW 25，Kap. 23，第397页及以下）。我们往往会把诸如工程师、监工、会计和经理人等这些“高端”的工作视作现代雇员工作的当代例子。此前，马克思

曾指出“生产性”与“商业性”的雇佣劳动在经济作用上的本质区别。

2.1 随着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性的雇佣劳动群体**的内部结构及其在企业中的作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马克思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Resultate*）一文中对此做了讨论，此文并未收入在《资本论》第一版的第一卷中：“随着劳动真正地受到资本或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成为整体劳动过程中的真正工作人员的，不是个别劳动者，而是日益增长的社会组合劳动能力，……而且一方更多地用双手劳动，另一方则更多地用头脑劳动……，因此劳动能力的作用就日益被涵盖在生产性劳动的直接概念中，而这种能力的承载者也被涵盖在生产性劳动的概念中，这些劳动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并服从于资本的增殖过程。”（*Res*，MEGA II.4.1，第 109 页）

马克思对资本中的“长官”和“下层官员”表达了近乎讥讽的尖刻意见：对他而言，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界线并不等同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线，在日常理解中，后者往往被视作雇员与工人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资本购买并在企业中使用较高质量的劳动力，这种经济形式为雇员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2.2 还有一种较远离直接生产的群体也被称为“雇员”：这就是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或是在工业企业中由商人掌管的部门工作，或是从事与贸易和信用资本的相关的行业。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马克思做了如下说明：“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限制的。……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MEW 25，第 311 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精神和文化上“较高”品质的大众化，工资会逐步下降；而通过劳动分工的工业形式在商业领域的推广，商业劳动将会变为一种“平均劳动”。

3.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有职位的雇佣劳动“习惯上”的最初作用是：**它是一种量化的劳动、是资本所委任的管理活动，也是在生产之外的传递价值的商业劳动**。此外，他还简述了一种变化过程：随着大型工业，尤其是资本领域的发展，原先劳动能力的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下降。在资本主义所要求的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各劳动领域和劳动品质在职业形式上出现了差异化，而与此同时，不同职业作为资本的雇佣劳动，其经济地位却变得相同了。

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会如何塑造“新的”雇员工作的社会性质？而这又会对工人运动的实践提出哪些新的要求？早在20世纪初，这些问题就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中被加以讨论。这方面的争议的结果并不确定，而且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像“小资产阶级”和马克思所谈到的“新中间等级”这样的概念，反映了当时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种种新的差异，我们有必要进行阶级的分析工作。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场大规模的修正主义辩论的同时，雇员工作获得了快速的扩展，这个快速发展的局面，在雇佣劳动者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实践后果问题的争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经常未经明确指出。“雇员”既体现了旧的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又反映出阶级结构发生了某种改革式的变化；他们日益增长的数量，也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各自不同的社会民主式阶级政策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

3.1 德国和奥地利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往往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中间等级”的说法，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雇员来自独立商人与工匠这些“旧中间等级”，因此他们的社会意识中仍然长期保留着后者的阶级思想。其次，最早的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雇员工作（如会计、工程师、工头等），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往往介于两条战线之间。在手工工人和机器工人看来，雇员是有积极性、收入较高且站在雇主那边的人，雇主往往会不平等地衡量不同劳动的价值，或者任意克扣劳动报酬。无产阶级的这种日常经验，给工会与工人政党都带来了麻烦，使其难以对高水平的雇员以及（数量上日益增长的）较低水平雇员的**长远的**阶级命运予以关注。

因此，关于阶级结构转变以及雇员雇佣劳动者作用问题的理论探讨，对于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政策并没有多少实践上的效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人政党中把雇员视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还是少数（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参见 v. d. Goes，Woldt 和 P. Lange；奥地利工人运动的状况，参见 H. Deutsch 和 O. Bauer）。不无反讽意味的是，伯恩施坦试图提出一个较不激进的阶级政策，这种政策以一个新的、自视为“中间等级”的雇员阶层为基础，这个观点招致了批评，这些批评者往往用传统的眼光把雇员视作“小资产阶级”。由于直接照搬法国手稿中具体的阶级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个思想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走入了死胡同。方法上的批判表明：由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家顽固地低估了实在与意识之间的现实发展着的关系的复杂性，这限制了他们的论述与政治诉求，使得其中对新的雇员阶层的态度要么是不必要的急躁，要么是机

275

会主义式的殷勤，有时甚至是全然的无知。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一部“工人运动史”提到过雇员雇佣劳动者在组织上的问题。

3.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革命性剧变的时代，在普遍工人运动的背景下，人们有了新的把握雇员劳动之阶级特征的途径。在工人及其组织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统一”的观念获得了具体的形式。这种共同的工会和政治行动背后的驱动力，一方面来自个别大城市中的工人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来自工会中富有经验的雇员代表（例如保罗·朗格［Paul Lange］与西格弗里德·奥夫豪伊瑟［Siegfried Aufhäuser］）；他们在工人运动中都持左翼立场。在奥地利，奥托·鲍威尔在各个联合会（Verbands-kongressen）中向雇员宣传社会主义的目标；当时只有他（以及德国的保罗·朗格）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应该如何看待雇佣劳动者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在贸易、信用和保险方式上）相互矛盾的利益。1918 年之后，因俄国革命而两极分化的工人运动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这也阻碍了工会中的工人与雇员在组织上的直接统一。这种意识的历史状况对应的是自由工会中的工人与雇员联合会，而不是隶属于工人工会的雇员组织。

4. 尽管魏玛共和国末期，社会意识中对于“工人”和“雇员”的区分早已不再取决于“领线高低”了，但到了 1945 年之后，二者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差异又再次增强了。新的社会学思想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消灭了阶级社会”（Croner，Geiger，Schelsky）后重新评价雇员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基于这种消灭了阶级社会的判断，知识界展开了关于工业社会的普遍发展状况以及企业具体劳动条件问题的争论。有学者（Bahrdt）认为，由于其社会定位是不完备的，因此雇员阶层一直是不间断的社会均等化过程的对象。当然，从战后和平时期的社会人们的愿景看来，雇员与工人团体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多少社会意义上的依据。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繁荣的假象在政治经济上走到了尽头，关于是否重新恢复马克思的阶级范畴又成了备受争论的社会经济议题（Mauke，Beckenbach 等；东德参见 Steiner）。1933 年前后，并非社会学家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卡尔·德雷夫斯（Carl Dreyfuss）和西格弗雷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等学者各自将阶级范畴用于雇员问题。在他们充满辩证意味的论述中（这在本雅明那里最为显著），反思的主体“总是要克服自身的”小资

276

277

产阶级意识形态（GS III，第 227 页），这些论述对于今天仍然有启发意义。

5. 雇员问题在实践上似乎仍然遵循那个过时的“领线高低”的阶级分析，但从理论上说，只有当个别流传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惯性在所有的阶级和阶层中被加以思考，这个问题才能够被确定下来，也就是说，它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语境之中才得以被确定。只有承认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与意识既有的复杂关系，我们才有可能避免直接地把社会中依赖工资的群体的实践行为归结到他们社会阶级的归属关系。因此，围绕雇员的社会特征与意识的问题直到如今依然存在的争议表明：面对客观阶级地位之间在行动上的显著张力、差异化的社会利益，以及不同雇员群体对此的主观理解，无论是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理论，还是机械化的阶级理论都难以做出解释。一方面，中小雇员在意识中对于其客观地位的那种犹豫不决的个人主义式的反应，无法为其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建立本质上的标准，另一方面，它也无法通过阶级意识的发展，凭借其对工资（资本和国家）的依赖性，而被归到那个历史上被工人所信赖，但早已不再统一的形式之中。“雇员”既是反驳阶级理论的证据，也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无产阶级工人的助手和同盟军。无论那日益复杂的阶级结构中是否还存在“雇员劳动”的独特品质，也无论传统的“领线高低”的区分在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劳动形式中是否还能成立（它不同于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主义”中给出的新的区分，也不同于社会性别关系意义上的区分），围绕此问题的争论都还会持续下去，而如果没有马克思，这些争论都是无法想象的。

参考文献： 278

1. 1945 年之前关于雇员问题的理论与历史分析：

O. Bauer, »Vom rechtlosen Sklaven zum klassenbewußten Angestellten« (1927), W 7, 163ff; W. Benjamin, »Ein Außenseiter macht sich bemerkbar. Zu S. Kracauer, Die Angestellten«, GS III, 219ff;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7), Frankfurt/M 1962; H. Deutsch, *Qualifizierte Arbeit und Kapitalismus*, Wien 1904; K. Dreyfuss, *Beruf und Ideologie des Angestellten*, München 1933; S. Kracauer, *Die Angestellten. Aus dem neueste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30; P. Lange, *Die Privatangestellten im Wirtschaftsleben*, Berlin 1911; E. Lederer, J. Marschak, »Der neue Mittelstand«, in: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IX. Abt., II. Teil, Tübingen 1927, 320ff; H. Speier, *Die Angestellten vor dem Nationalsozialismus*,

Göttingen 1977 (Neufassung e. Ms. a. d. Jahre 1933, hgg. v. J. Kocka).

2. 1945 年之后关于雇员问题的理论、历史与工业社会学的讨论：

M. Baethge, H. Oberbeck, *Die Zukunft der Angestellten*, Frankfurt/M 1986; H. P. Bahrdt, *Industriebürokratie*, Stuttgart 1958; N. Beckenbach u. a., *Klassenlage und Bewußtseinsformen der technisch-wissenschaftlichen Lohnarbeiter*, Frankfurt/ M 1973; U. Berger, C. Offe, »Das Rationalisierungsdilemma der Angestelltenarbeit«, in: J. Kocka (Hg.), *Angestellte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Göttingen 1981, 39-58; P. Bourdieu,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Frankfurt/M 1982; F. Croner, *Die Angestellten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Wien 1954; T. Geiger, *Die Klassengesellschaft im Schmelztiegel*, Köln, Hagen 1949; U. Kadritzke, »Angestellte als Lohnarbeiter. Kritischer Nachruf auf die deutsche Kragenlinie«, *KZfSS*, Sonderheft 24, Materialien zur Industriesoziologie, hgg. v. G. Schmidt u. a., Opladen 1982, 219-249; J. Kocka, *Die Angestellt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850-1980*, Göttingen 1981; S. Mallet, *Die neue Arbeiterklasse*, Neuwied, Berlin/W 1972; M. Mauke, *Die Klassen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 M 1970; C. W. Mills, *Menschen im Büro*, Köln 1955; M. Oppenheimer, *White Collar Politics*, New York 1985; H. Steiner, *Soziale Strukturveränderungen im modernen Kapitalismus. Zur Klassenanalyse der Angestellten in Westdeutschland*, Berlin/DDR 1967.

乌尔夫·卡德里茨克
（Ulf Kadritzke）撰
王师 译，梁爽 校

参见：

Arbeiteraristokratie,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teilung, Beamte, Facharbeiter,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erkschaften, Ideologie, Ingenieure/Techniker, Interesse,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lassenanalyse, Klassenbewußtsein, Kopf/Handarbeit, Korporatismus, Lohnarbeiter, Mittelschichten, soziale Schichten, Segmentierung der Arbeiterklasse, Sein/Bewußtsein

忧虑 / 恐惧（Angst / Furcht） 279

“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启蒙遵循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把恐惧从人那里撷取过来，并将其设立为主宰。然而，那被完全启蒙了的土地却出现了灾祸凯

旋般的征兆。”在他们流亡美国时期的著作《启蒙辩证法》（1947，第 13 页）中，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将这句话作为开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源于启蒙主义的传统。马克思把宗教视作“被压迫生灵的叹息”（MEW 1，第 378 页），他这么说显然不是把“被启蒙的”意识放到压迫者的位置上去。事实上，马克思主张“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而这在实践上的目的就是：“要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MEW 1，第 381 页）

马克思主义作为启蒙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把人们从奴役和被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实际纲领，“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书，第 385 页），我们可以为这种关系再补充一个特点，即使人**忧虑**的。

关于忧虑 / 恐惧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1）对使人产生忧虑的关系本身的性质做出澄清，并加以意图不一的批判，从而获得或扩展我们的行动能力；与此相对立的是，在任何时代里统治者的那些有意和无意的辩护者，都试图把忧虑假定为形而上学的绝对物，亦即“作为我们绝对依赖性的证明”（Benz 1959，第 212 页；引自 Haug 1964，第 56 页）并且通过忧虑把人置于被征服者 / 臣民的地位。（2）十月革命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纲领，正体现出支配—启蒙理性与技术官僚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解放反过来成了统治的一部分，它在公开的恐怖时期造成了主体的堕落，并把镇压的恐惧置于由参与产生的共识之上。在此，那种不顾及这种辩证关系的继续启蒙与变革的热情被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阻止了。

1. 康德为此下了定义：“担心、忧虑（Angst）、害怕和惊骇属于不同程度的恐惧（Furcht），恐惧就是厌恶危险。”（*Anthrop*，§77）在反驳决定论的论证时，康德把忧虑和恐惧作为自由的证据：那些主张我们的自由意志无法支配诸如欲望和情感这些“规定自身意志的病理学基础”的人，是这样想的：即便在屋子前面竖起一个绞架，他自己在屋里还是会做自己所欲求的、能使自己满足的事，由此他认为自己无法抗拒这种欲望。如果他此时假定：为了某种令人满足的事在屋子前被绞死也是值得的，那么他就会在畏惧中发现自己放弃了的自由。尽管康德不认为面对危险时的这种情感具有客观知识的特征：感知判断“它们仅仅涉及感觉，而大家都知 280

道感觉仅仅是主观的东西，不能把它归之于客体，因而绝不能成为客观的东西”（*Prolegomena*，§19）。

黑格尔反讽式地把上述定义用在了康德自己的思想上，黑格尔认为，这种规定“通过关于对象的忧虑”，给“逻辑规定性”赋予了“本质上的主观意味”，因此它恰恰“困在了其所要逃避的对象那里”，“而物自体……则还是存留在超越于他的地方”。（*Logik*，Einleitung，Lasson，第32页）相反，黑格尔把主客体的同一视作“从意识的对立中的解脱”：它“把思想的规定性提高到那些忧虑、不完满的观点之上，并且自在自为地、作为纯粹理性者而观照自身”（同上）。

关于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克服，马克思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这种观点把“思想物”当成了真正的实在物，因此“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HF*，MEW 2，第204页）。不过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把历史引入了哲学。因此忧虑也具有了“辩证式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主—奴关系的章节以及对“外化”——“异化”和重新占有——的戏剧性论述中。在黑格尔那里，意义领域的分布与我们20世纪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恐惧是抽象的普遍物，忧虑是具体的个别物，它与某个特定事物相关。以一种独特的悬而未决的方式，黑格尔认为：统治权的急剧兴起正是意识上升到自我意识的隐喻的展示媒介（Darstellungs-Medium）。无论如何，这样的忧虑与恐惧并不被视 281
作全然主观，而是被看作暴力与主—奴关系语境中的一种面对危险的具体情感。“自我意识……只是被承认的”（*PhG*，Suhrkamp WA 3，第145页）：黑格尔用“生死斗争”的比喻表述了这个洞见（第149页）。在这场斗争中舍命相搏的人能够成为主人；而那些贪生怕死者就只能沦为奴隶。

然而，和主人相比，历史辩证法与奴隶的关系更大。因为奴隶的臣服使其成了**劳动**的主体，换言之，在欲望被强制推迟的情况下，他们成了对象性的“图像”的主体，而这些图像正是这些主体自己构造出来的。忧虑 / 恐惧塑造着劳动主体的否定性，因为他们“并不是对具体的一时一物感到忧虑，而是对其整个人生感到忧虑；他们惧怕死亡，惧怕绝对的主人”（第153页）。另外，“这种否定性的本质是外在于他的”。对主人臣服的意识自身发生了异化。“但它通过劳动回到了自身。”（同上）——《精神现象学》中这种戏剧性的辩证关系，最终使自我意识来到并试图跨过“对自身外化的忧虑”的门槛，从而上升到“绝对知识”，亦即具备“在外化中保持自身不变”的“能力”。（W4，第588页）——因此，主体不仅是忧虑的必要基础，而

且忧虑也是构成主体的权力和媒介。

2. 上面这种戏剧性的论述，被马克思以寓言式的方式反过来借用到实效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中，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历史哲学的论述往往都带着真实历史的问题。不过，他正确地把这种转用视作“破除神秘”的过程。历史会在现代雇佣劳动者那里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忧虑是带有阶级特征的：马克思认为，“外在的恐惧”是奴隶制的驱动力，奴隶的存在“虽然不属于忧虑，但却为忧虑**所保障**”，与此相反，雇佣劳动者的驱动力则是内在的，他们被自己的匮乏所驱使，“从事高强度的生产性”劳动，“他们及其家庭的存在都依赖于它”。（*Res*，第 57 页）——马克思还观察到了“在货币学说中流露出来的恐惧不安，以及在危机时期人们在实践上注视金银的流进流出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惊慌”（*Gr*，143 / MEW 42，第 159 页）。——至于统治阶层对人民的忧虑，
282 马克思则报以平民式的戏谑态度：这两种情形是危险的，“第一种情形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感到害怕，第二种情形则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没有感到害怕”（MEW 1，第 379 页）。——后来列宁指责社会民主主义者说：他们“由于害怕胜利”而阻挡了革命（LW 9，第 103 页）。

3. 意识形态上关于忧虑的意义的争论，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前半叶，也就是帝国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以及法西斯反革命斗争的时代。这是个充斥着迫害和动荡的时代，但其中也不乏改变世界的希望与热情。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这两个差异极大的阵营。

3.1 精神分析学中的忧虑理论最初就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一门关于本能以及对本能的压抑和抗拒的理论。弗洛伊德首先把忧虑视作一种变质的、没能达成目标的欲望（力比多），“就如同变酸的酒一样”（Wilhelmer 1990，第 136 页）。“儿童在这一点上和成人一样，当力比多无法被满足时，儿童将其转化成忧虑；而当未满足的力比多使成人变得神经质时，成人也会和儿童一样表现出忧虑，当孤独时——也就是说，当其认定爱自己的人不在场时——他们就会感到害怕，并且想要通过最孩子气的责骂来缓解这种忧虑。”（*Drei Abhandlungen*，1905，GW V，第 126 页）如果把忧虑看作是一种被转化的性刺激，那么可以认为“在忧虑中，情感投入（Besetzung）上升到了自我”（Federn 1956，第 146 页）。弗洛伊德在一次导论性的讲座中用了更谨慎的说法：“忧虑与对性的抑制是息息相关的”（GW XI，第 417 页）。“因此忧虑是一种通用的货币，当情感的思想内容受到压抑

的时候，一切情绪都（可以）转换成焦虑。”（GW XI，第 419 页）后来弗洛伊德还补充道，“本能上的追求之所以有内在的危险，只能是因为：满足这种追求会招致外在的危险，且内在危险表征着这些外在危险”（GW XIV，第 200—201 页）。

共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赖希（W. Reich）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压抑假说关系密切。他认为“力比多的积聚”（Freud）、“出生创伤”（Rank）以及“被压抑的攻击性”（Adler）是“最为人所知的忧虑的源头”（1926，第 423 页）。精神分析
283 学旨在获得“全部的生命潜能”（同上书，第 427 页），因此赖希宣称：青年工人的（同）性解放意味着从非理性的忧虑和逆来顺受中的解放。在 1933 年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一书中，他指出了压抑与忧虑的关系：“道德上对儿童自然性欲的抑制……导致了忧虑、羞怯、惧怕权威、服从，也就是在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听话或‘孺子可教’的性格；这使人失去了活力，因为这样一来，每个强烈的情绪都会被严重的忧虑所占据，通过对性的思想禁令，人们反抗的力量也受到了思想的抑制并且失去了批判的能力；简言之，它的目标就是制造那些适应私有制秩序，虽然贫困却逆来顺受的国家公民。”（1933，第 50 页）——在斯大林时期，赖希的学说遭到了厄运，因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恰恰属于它此前所指责的现象，而且该理论与当时对下层民众要求背道而驰。但是这个概念本身在许多方面也获得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 20 世纪的集权主义，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强调了忧虑在大众心理学上的作用，“大众会自己指派领袖，并盲目追随他”（1954，第 16 页）。其中的推理步骤是这样的：（1）“对本能的放弃……导致了忧虑”；（2）“由于操纵、身份的界定和虚假的具体性”，忧虑强化了以下五种类型的阴谋论：耶稣会、共济会、共产主义者、资本家和犹太人；（3）“当某个群体（阶级、宗教、种族）的地位面临威胁，并且无法理解那使其衰退的过程之时，他们的忧虑就会上升为迫害焦虑”；（4）这种迫害焦虑成为领袖的自我任务与身份认定；（5）“掌握权力的退步的群众运动，为了维持这种领袖身份，必须把这种忧虑体制化。这种体制有三个方式：恐怖、宣传，以及领袖追随者们的集体犯罪。”（第 42 页）

弗洛伊德在《大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1921）一书中给出了上述观点的论述基础，1933 年，他转而提出了欲望和忧虑的转变理论。在第 32 号讲义（新编号）中，弗洛伊德对“忧虑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做了讨论。例如，他认

为“忧虑神经质通常的原因是沮丧的情绪”（GW XV，第 89 页），不过他也否定了自己早先的观点：“忧虑不是压抑所导致的，其实忧虑先于压抑而存在，是忧虑产生了压抑！”（同上书，第 92 页）因此，忧虑不再被视作情绪状态的表型图（Phänographie），而是源于某种“与生俱来的范型”（第 101 页）。伴随着这个理论上的转变，弗洛伊德也强化了忧虑与危险的关系。自我是经由“孤独的忧虑行动”而被承认的（第 91 页），与此相应，精神上的自我—本我—超我的权力模型，使得三种主要的忧虑状态，即实存忧虑（Realangst）、神经质和良知的忧虑（Gewissensangst）分别与自我的三种依赖性，即对外部世界、对它者与对超我的依赖性相关联，由此，“忧虑彰显了……作为指示危险境况之信号的作用”（第 92 页）。这显然把“危险”投射到了社会现实之外，从而回到对过往童年的想象之中。诚然，男孩对于自身欲望的确感到忧虑，但这种忧虑之所以有内在的危险，只是因为它会唤起某种外在的危险：弗洛伊德将此称为“去势忧虑”（Kastrationsangst），它是“在异性面前对爱欲的忧虑，也显然是婴儿当母亲不在时感到的那种忧虑的范型”（第 94 页）。因此，忧虑或是导致退却，或是导致“反向情感投入”（Gegenbesetzung），“后者带着被抑制的情绪，作为症状、反应，或某种倾向的增强……而进入自我”（第 97 页）。——因此，就像黑格尔此前以另一种方式主张的那样，忧虑获得了决定性的主体化权力，它体现了“与入侵者的同一”（参见 Haug 1964，第 63 页及以下），并使得对秩序个体的亏欠作为一种负罪感而固定下来。不过，在福柯的《性史》中，性欲划时代地成为主导的力量，它反映着处于忧虑与罪责之间的个人所经历和贯彻的主体化过程，在其中，“性的对抗”成了“主体的训练场”（Haug 1986，第 137 页及以下），良知的忧虑主要是通过性欲表达出来的：“那败坏的奴隶孑然一人 / 在良心的雷鸣中煎熬 / 死的忧惧在软床上旋舞 / 那是欲望自己在操弄”（Hölderlin，*Die Nacht*）。

弗洛姆（E. Fromm）（1935）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相近，但把后者的论述放在特定的社会理论框架中加以考察，他把家庭视作社会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心理学上的行动者”（第 393 页）；弗洛伊德并没有讨论忧虑“现实有效的动机”问题，因为他认为社会禁忌是建立在生物和“自然”属性的基础上的（同上）。在弗洛姆看来，“被孤立并在社会上失去依靠的危险”会产生对失恋的忧虑：在危险消解于其中的这种忧虑中，弗洛姆看到了“最重要的压抑之源”（第 365 页）。在其关于《权威与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研究理论纲领的社会心理

284

285

学部分，弗洛姆转而论述了忧虑和爱在权威关系与领袖清洁的发展中所起到的特别作用（Horkheimer 等 1936，第 77—135 页）。

批判心理学把忧虑视作一种缺乏行动能力的情绪，就像此前的弗洛姆一样，忧虑也被视作无力感和无助的情绪。乌特·奥斯特坎普认为，情感具有引导行动的功能；理性则有具体化的冲动："例如，这体现在忧虑的情形中，理性试图给出忧虑的现实原因，并以此克服忧虑。"（1993，第 6 页）忧虑和侵犯都是"'批判'的情感……，它们体现在个人生存的不安之中……并且因此意味着对社会关系的批判"（同上）。但情感往往会被扭曲，因为"人们会否认情感与现实的关系，并将其还原为非现实性 / 非理性"或主体的某种属性（例如"生性胆小"等），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采取的就是这个做法，他认为"阻碍人类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对自由的忧虑"（Osterkamp 1993，第 7 页）。因此，这方面的问题也成了关于忧虑的哲学讨论的主要动力。

3.2 **存在主义哲学**：主要在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影响下，海德格尔提出了"畏（Angst）的基础存在论的现身情态"（*Kant*，第 215 页），他认为，"在隐藏的畏的基础上"，"此在在虚无中的被悬置状态（Hineingehaltenheit）"得以显现出来（*Metaphysik*，第 22 页）。后来海德格尔不无修辞性地问道："如今还有哪种畏比思想的畏更加可怕呢？"（*Holzwege*，第 66 页）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进一步凸显了这个论题，他们认为那是对自为之物本质自由的抽象普遍的存在之畏：畏是"可能性上的眩晕"（*Transcendance de l'Ego*，第 120 页），"我的自由畏惧成为价值的无基础的基础"（*L'Etre et le Néant*，第 76 页），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畏是我们自由的真正"直接所与状态"，我们无法抑制它，"因为我们**就是**畏"（puisque nous *sommes* angoisse，同上书，第 81 页）。德·波伏娃始终注意到儿童在这方面的特别地位，她指出，"儿童往往能逃脱对自由的畏惧"（*Morale de l'ambiguité*，第 53 页），但她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作为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恩斯特·布洛赫反对把忧虑（畏）的概念视作自由的情绪这种形而上学的说法。——布洛赫在 1935 年曾这样评论海德格尔：尽管他"那种学究式的悲痛宣泄"，这位"充满畏和烦（Sorge）的教授"同样是"令人振奋的"："海德格尔生存论中的'畏'，是小资产阶级状态的写照，他们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前景；而他的另一个范畴'烦'，指的则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事实上正像海德格尔的'人类总体 286

情境’所表明的那样，‘被排除在虚无之中’。”（*Erbschaft*，第 307 页）

霍克海默（1936）把这种扩大了的非理性忧虑视作“原子化过程”，即人类彼此孤立的个人化过程所产生的情绪。“孤立个人在其抽象性中，既是绝对自由的，同时也有绝对的责任，这样的个人在当代必定会受忧虑和不确定性的支配。”（第 359 页）因此，忧虑是“直接以既有的原子化原则为基础的内在贫困”（同上）。不过，这种界定仍然是普遍抽象的，因为它适用于一切私有制社会。1938 年，霍克海默在评论纳粹政权军火工业的景气状况时，也暗指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状况：“随着失业的消失，人类的孤独状态变得无法突破。于是，对丢失劳动岗位的恐惧就会被对国家的恐惧所替代，忧虑也原子化了。”（*Die Juden und Europa*，第 126 页）

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Prinzip Hoffnung*）一书的前言中就提出了忧虑的问题：“许多人感到纷乱。基础被动摇了，他们弄不清状况，也不知道原因。这个状态就是忧虑，如果更加确定一点，它就成了恐惧。”在回顾当年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时，布洛赫指出：“问题在于如何学会希望。……希望位于恐惧之上，它既不像恐惧那样是被动的，也不会困在虚无之中。……面对生活的忧虑和那种迂回包抄的恐惧感，我们能做的就是反抗它们的始作俑者，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指明的，而且我们在世界自身中寻找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东西，它们是可以被找到的。”当一个社会衰亡时，那些“无法摆脱这种衰亡过程的人，就会产生对希望的恐惧，这种恐惧抗拒着希望”（*Prinzip*，I，第 13—14 页）。海德格尔认为：“畏之所畏者的特征就是：威胁无处可在”（*Sein und Zeit*，第 186 页）。在布洛赫看来，这种“无处可在”（Nirgends）意味着不知压迫或危险位于何处：“海德格尔关于畏的‘诠释学’唯一剩下的，充其量就是一种强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态度，这种态度把畏视作一种毫不知情的状态。”（*Prinzip*，I，第 124 页）布洛赫的希望就是“消解忧虑的希望”（同上书，第 126 页）。

阿多诺后期的思想与此类似，不过，他从希望概念入手，通过对 20 世纪骇人历史的回顾，将其归结为辩证法的否定性：“人类孜孜不倦地要把忧虑与那种位于世界中的经验式的恐惧区分开来，但忧虑并不需要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它首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被束缚在对抗性社会中的社会化的人，不断感受到那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的威胁，且他不愿把这种威胁从整体到细节加以具体化。”（Adorno，*Jargon*，1963，第 379 页；在图书版中做了改动，参见 1964，第 32 页）事实上，忧虑是“世界中的灾难：它是

封闭的体系。忧虑如同一道禁令，使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状态永久化了，没有忧虑，灾祸就无法重现。……与忧虑及其基础相伴随的，或许还有冷漠。在普遍的冷漠中，忧虑是那些受其煎熬者所遭受的必然诅咒”（*Negative Dialektik*，1966，第 337—338 页）。

4.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把理想主义的“超越过程”（Verjenseitigung）回溯到忧虑的概念：“忧虑是一切理想主义学说的［古代］起点，这些学说试图在理想化的实践中寻求最高的幸福：其中既有对于一切生活关系之不确定性的忧虑，也有对于‘意外’损失、依赖性、贫困的忧虑，还有对于过剩、饱足，乃至对于遭受人或神嫉妒的忧虑。不过，关于幸福的忧虑促使哲学在美的事物和必然的事物之间做出了区分，在这两个分割的领域中，这种忧虑维持着对幸福的追求。于是，幸福便成了始终位于那里的一片保留地。”（*Affirmative Kultur*，第 61 页）——但存在主义则把忧虑视作一种超越的情绪，这种情绪只涉及存在本身的超越，也就是存在者对其命运的超越。对于幸运的保留则会被卷入对无意义的英雄主义式的坚持之中。加缪（Camus）提醒我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对他说，“在一个没有忧虑的社会中，我们很容易忽视死亡”；他自己不同意这点，并指出，“我们社会的真正问题”在于对死的忧虑已经成了“奢侈品”，“它更适合游手好闲的人，而不是劳动者，因为后者往往事务缠身”。（*Revolte*，第 212 页）

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认为这种说法是“幼稚地把死亡忧虑当成了最大的忧虑，并把长生不死的愿望当成了最高的愿望”（1965，第 22 页）。他诙谐地举例说明道：自己住院时曾和一位老太太聊天，那位老太太就觉得对迁移到陌生环境的忧虑是更严重的，因为相较于对身体死亡的忧虑，对社会死亡（例如失信、受排斥或被嘲笑）的忧虑要“更加致命得多”。（同上书，第 28 页）

关于妇女和犹太人所受的压制和迫害问题，学界的意见分为两派，尽管这两派在很多方面存在区别，但他们对以下这点是有共识的，即：“在人们看来，妇女和犹太人数千年来都并非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也是《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尽管她们有可能被消灭，但她们活下来了，她们的忧虑与软弱，她们因多年的压迫而形成的更亲近自然的属性，都构成了其生命的要素。这激起了强者盲目的愤怒，他们永恒地禁止忧虑，并通过高度的疏离把力量交付给自然。他们把自己视作自然，因为他们让受害者无数次地惨叫，这些惨叫是他们决不允许自己发出的。”（1947，第 135 页）

出于各种意图敦促忧虑者道出姓名和住址，就意味着让受害者的匿名性扬弃在哲学化的忧虑中：根据个人在性别关系所处立场的不同，对于忧虑的区分以及与性别相关的描绘也会有所差异。被要求的那种以男性为典范的支配方式，其给男性和女性个人带来的忧虑是不同的，后者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之中，因为她一方面要成为男性，并使自己符合普遍的社会期待，另一方面，她同时也是女性，她需避免将自己视作完全独立和自主的个体。于是，一种与性别相关的规范观念就诞生了，当（无论在真实还是想象意义上）不能遵循这种规范时，个人就会因对作为“不正常者”被逮住的忧虑而获得个性。同时，性别关系研究还表明：忧虑具有某种前社会的社会性：女性对男性的忧虑是被作为性别意义上的身体的忧虑而感受到的，这种忧虑体现在女性身体的生物意义上的功能中，也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即那个消除这种忧虑的文化，其本身在某些方面也是父权式的，因此在规范的意义上，它随时准备好了一种“前人类”的典范。当妇女（或者，以其他方式，处于支配地位的性别的个人）不敢打破这种典范时，忧虑就出现了表达上的双关——或者说辩证的振荡，从而使忧虑的作用呈现两极化：在被压迫者那里，忧虑使她们无法言说，或是被动适应，或是麻木不仁；但与此同时，事实也证明，当我们为了开启新生活而离开惯常的轨道时，忧虑的感觉就能够激发解放运动。（F. Haug / K. Hauser，1993）

Th.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in: *Neue Rundschau*, H. 3, 1963; ders.,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Frankfurt/M 1964;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G. Anders, *Philosophische Stenogramme*, München 1965; S. de Beauvoir, *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ité*, Paris 1947; E. Benz, »Die Angst in der Religion«, in: *Die Angst*, Studien aus dem C. G. Jung-Institut, Bd. 10, Zürich-Stuttgart 1959;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erw. Ausgabe (1935), GA 4, Frankfurt/M 1962; ders., *Das Prinzip Hoffnung*, 3 Bände, Berlin/DDR 1953, 1955, 1956; ders.,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Frankfurt/M 1961; A. Camus, *Der Mensch in der Revolte*, Reinbek 1953; P. Federn, *Ich-Psychologie und die Psychosen*, Bern-Stuttgart 1956; E. Fromm,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Horkheimer (Hg.) 1936, 77-135; ders.,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in: *ZfS*, 4. Jg., 1935, H. 3, 365-397; F. Haug, K. Hauser (Hg.), *Die andere Angst*, AS 184, Hamburg 1991, [2]1994; W. F. Haug,

»Warenästhetik und Angst« (1964), in: *Warenästhetik, Sexualität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72, 46-67; ders., »Theorien über Angst« (1965), in: ebd., 68-88; ders.,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Frankfurt/M 1967, 3. veränderte Aufl. Hamburg 1991; ders.,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Hamburg 1986 (2. A. 1987); M.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in: *ZfS*, IV. Jg., Paris 1936, 321ff; ders., »Die Juden und Europa«, in: *ZfS*, VIII. Jg., 1938, 115ff; ders. (Hg.),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H. Marcus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in: *ZfS*, VI. Jg., H. 1, Paris 1937 (z. n. der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 Frankfurt/M 1965, 56-101); F. L. Neumann, *Angst und Politik*, Recht und Staat, Nr. 178/179, Tübingen 1954; U. Osterkamp, »Hat der Marxismus die Natur des Menschen verkannt?«, in: *Weg und Ziel*, 51. Jg., Wien 1993, Nr. 3, 2-11; W. Reich, »Über die Quellen der neurotischen Angst. Ein Beitrag zur Theorie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in: *Int. Z. f. Psychoanalyse*, 1926, 422-431; ders.,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 Zur Sexualökonomie der politischen Reaktion und zur proletarischen Sexualpolitik*, Wien 1933; J. -P.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aris 1936/1937 (dt. 1964); ders.,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1943 (dt. 1962); B. Wilhelmer, Artikel »Angst/Furcht«, in EE, 1, 1990, 134-141.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林芳芳 校

参见：

Anerkennung, Antisemitismus, Apathie, Aufklärung, Auschwitz, Autorität, Bedürfnisse, Befriedigung, Charisma, Dummheit, Familie, Führung,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alt, Gewohnheit, Glück, Haltung, Hegel-Kritik, Herrschaft, Hoffnung, Hoffnungslosigkeit, Homosexualität, Juden, Kritik, Lachen, Liebe, Lust, Naturbeherrschung, Resignation, Sexpol, Sexualität, Subjekt-Effekt, Suizid, Tod, Unglück, Unterdrückung, verändern, Verzweiflung, Warenästhetik, Zivilisation

直观的唯物主义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直观的唯物主义“认为感性并非能

动的主体的作为，而只不过是对外部世界印象的被动接受”（Lenk 1978，第 21 页）。在古典原子论（留基伯［Leukipp］、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中，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时代（霍布斯）和法国启蒙运动（爱尔维修［Helvétius］、霍尔巴赫［Holbach］）的机械唯物主义中，并最终在德国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学说的形式登场的，实际上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同费尔巴哈决裂时创造出来的，而费尔巴哈此前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以极具独创性的逻辑一贯性”拟定了自己“整个的基本哲学观”（Korsch 1922，第 152 页）。文中他以对“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批判开始，因为它们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MEW 3，第 5 页）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能动的**方面”只是精神的方面，但它是从唯心主义生发出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个命题把特定思维的真理性问题表述为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即此岸性”问题，并指出这是“**实践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涉及的是“离开了实践的”思维（在马克思身后首次发表的版本即 1888 年版中，恩格斯弄错了意思，把这个短语改成了“同实践相脱离的思维”。参见 MEW 3，第 533 页），那它就会沦为“**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第九个命题宣称：“直观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同上书，第 7 页）与此相反，在第十个命题中，马克思将他自己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定义为“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同上）第十一个命题对世界观的表述变成了解释世界，并提出了改变世界。（同上）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可以被视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开始就从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MEW 3，第 20 页）中引申出了后来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在分工、家长制统治和国家的历史联系中，把“纯粹直观”解释为“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MEW 26.1，第 259 页）里的群体特定的实践形式，从而指明了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有效范围。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想到的是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从必要劳动中和从物质统治活动中解放出来，获得闲暇（*σχολή*），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哲学思考的前提条件；而直观的生活（*βίος θεωρητικός*）作为一再强调的

不必要的或非功用导向的思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第十卷中被视为最高级的生活形式，在被冠以**第一哲学**之名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中被归入对永恒的（“永远存在的”）物的真理的认识（第二卷，993b 20）。随着基督教神学的功能转变，直观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也变成了直观上帝。到了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这种立场在斯宾诺莎的对上帝的理智之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中，又进一步发展为精神的幸福公式。培根由于把旨在让生活更轻松的功用思维抬升到极高的地位，而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逻辑学》的序言（1812）里，黑格尔对那些“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福祉……沉思永恒的孤独的人们”发表了悼词，这意味着旧形而上学的消失。而在其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他宣称，“**和哲学**交往被视为**人生的星期天**”，因为哲学的“根本使命不是为了**有用**”。（W，X，第411—412 页）

在创造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时，马克思的直接出发点是批判费尔巴哈提出的纯粹接受性的、不经过实践活动中介的感性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感觉论和对“利益无涉的”直观的古老激情联系在一起：“人是为了**直观世界**而生的。”费尔巴哈之所以借用古典时代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话，是为了说明，眼睛是理论的象征，而理论又是“眼睛的盛宴”（*Wesen*，第40 页）。实践和功用的立场被说成是犹太式的立场，并且是同日耳曼—希腊式的利益无涉的欣赏立场对立并置的。（参见上书，Kap. 12）这里暗含着的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拯救了物，使其免于工具理性的妨害：“直观就是承认”（同上书，第 192 页）。100 年后，这一主题被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做了加工：对他们来说，功用导向的思维作为不幸历史的盲目元素是靠不住的；相反，他们恢复了沉思的思维的名誉：“对培根和路德（Luther）来说，从知识中得到 292
毫无结果的幸福是放荡的”（*Dialektik*，第 15 页）。跟费尔巴哈一样，阿多诺也把工具性思维和美学关系对立起来，使艺术成了劳动的对立型式。但令人奇怪的是，费尔巴哈似乎认为自然科学可以免于批判，例如，他曾说过“对自然的研究就是对自然的敬拜”，等等。（同上书，第 193 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费尔巴哈的错误在于“要是他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他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MEW 3，第 43 页注释）。尽管费尔巴哈和“‘纯粹的’唯物主义者”不同，他看到了人“也是‘感性对象’”，但他认为人“不是‘感

性活动’”。（同上书，第 44 页）与此相反，马克思提议，“应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同上书，第 45 页）（从字面上说，这至少被缩小到了被一些自然条件包围着的个人）。相应地，马克思批判了“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它“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具有反动的性质”。（同上书，第 40 页）

恩格斯使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成了实用主义的，甚至操作主义的思想。他把问题简化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MEW 20，第 498 页）。如果我们只是用直观（和观察）的办法获得知识，休谟（Hume）的怀疑论就是有道理的。“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做出验证**。”（同上）而且还有一点：活动而非单纯的直观对于**因果**观念来说是根本性的（同上书，第 497—498 页）。这样一来，论域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转移：和马克思不同，恩格斯树立了直观的唯物主义的问题样板，并且开始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回答，但在他这样做时，这些命题的意思已经改变了。

列宁指出：“生活的观点，即实践的观点，必须是认识论的第一观点和基本观点。”（LW 14，第 137 页）但是这种肯定性内嵌于一个关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关系的问题框架之中，这个框架最终认为，知识论的重点是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承认物质是第一位的。由此，在晚年的恩格斯之后，在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个命题的对立中，两个阵营理论——在哲学领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像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样——变成了教条。

紧随着列宁的两个相互矛盾的倾向 293
的，是各种截然不同的思潮。在 1917 年后的最初几年，这一点可以从卢卡奇和布哈林的关系中窥见一斑。用卢卡奇的话说，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程》（*Lehrbuch*）（1922）“近乎资产阶级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直观的）唯物主义”（W2，第 600 页）。（卢卡奇还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除开别人不谈，至少由梅林（Mehring）和普列汉诺夫做出的对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似乎“对布哈林来说是不存在的”。为了回应唯心主义派别的扭曲，布哈林将从唯心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切都给抹掉了。尤其是他并不把经济学和社会学现象归因于人们的社会关系。“理论保留了对错误的‘客观性’的强调；它是拜物教性质的”（同上）。它保持着一种“自然科学化的趋向”（同上书，第 604 页）。布哈林强调社会领域的可预见性，而卢卡奇则借用罗莎·卢森堡所推崇的**趋向规**

律这个马克思用过的概念（参见“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K III*，MEW 25，第 221 页及以下，特别是第 242 页及以下关于“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的部分），强调了“趋向性”和**实践**（第 606—607 页）。卢卡奇的结论是，“布哈林理论的全部哲学基础是坚持‘直观的’唯物主义”（同上书，第 607 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卢卡奇以同样的视角给资产阶级思想打上了无计可施的反映论的标签，突破了后来的马列主义的另一个教条。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即后来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卢卡奇说：“思维和（经验的）存在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一方面造成了它们相互之间不能处在一种反映的关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正确思维的标准只能到反映中去寻找。只要人采取直观的态度，他就得接受自己的思维和由相反的现实造成的事物的既定状态。因为他只想认识世界，而不想改变世界。”（*GuK*，第 221 页）

柯尔施（Korsch）将新康德式的伦理主义方案与考茨基式的经济主义等待论方案之间的（错误的）对立视为直观的唯物主义的结果。对于直观的唯物主义而言，“通过现实的人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完成的革命的想法……不再”有“物质的‘对象性’了”；对它来说，“实践的人的行动归根结底”停留在“非物质的彼岸”。（1922，第 162—163 页）卢卡奇和柯尔施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马克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 294
所提到的答案在于使哲学变为实践。”（*GuK*，第 222 页）然而，两人思想的材料都来自于 1918 年革命形势下产生的纷纭众说。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扬弃是和无产阶级向革命主体转变联系在一起的。卢卡奇认为，“任何一种直观的、单纯认识的态度归根结底和它的对象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关系之中”（*GuK*，第 222 页）。他的这一看法显然迟早会碰壁：只要转向一种与革命无产阶级的行为不同的行为，那就“必然造成一种新的概念神话学，必然倒退到马克思克服了的古典哲学立场上去”（同上）。从描述的意义上说，这个判断可谓非常正确，因为这种倒退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是，这个判断所依据的根本看法也是很成问题的，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对异化和物化的扬弃变成了对一切对象性的取消。

在斯大林主义中，革命狂热的去客观化（Entobjektivierung）与对布哈林提出的客观主义（Objektivismus）的粗糙化相向而行。客观主义看似是马克思对直观的唯物主义批判的延续，M. M. 罗森塔尔（M. M. Rosental）荒谬的主张就是一个典型：“与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反……，列宁证明了，……人类的知识……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由客观世界决定”

（1971，第 122 页）。这立即导致了这样一个主张，即与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反，列宁丰富了客观主义。但是，客观主义无非是直观唯物主义的另一面而已。

也许是为了回应这两者，即革命主义的去客观化神话和斯大林主义的客观主义，恩斯特·布洛赫在他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个命题的解释（*Prinzip Hoffnung*，I，第 277 页）中，把直观推到了对象的位置上，并将马克思的批判换成了这样的表述："直观'仅仅在客体的形式下'被理解。"但马克思认为，"直观"是把现实带进客体形式的思维方式，因为直观既不把这些也不把自身认作是由实践的作用来中介的。布洛赫谴责道：一切仰赖"骑术的科学"（equestrische Wissenschaft）来维持生计的东西，"高骑于马背之上"，装腔作势地把自身撇干净，实际上却"背离正义，与卑污的实践志同道合地勾结在一起"。（同上书，第 284 页）对这些东西来说，"静静映照的镜子，即这种对劳动概念的忽视"就用作了单纯的直观的图像（同上书，第 279 页）。他正确地指出，恩格斯在第十一个命题的"解释"和"改变"之间插入的"但是"一词（MEW 3，第 535 页）并不合适："对立是不存在的"；"但解释和直观是有亲缘关系的，而且解释也是由直观而来"。（*Prinzip*，第 303 页）他把马克思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对迄今为止一切哲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并试图窄化对"堕落的直观"（第 304 页）的批判来拯救哲学。"这种'否定'涉及由于其自身的缘故而包含真理的哲学，因而也就涉及自给自足的、直观的哲学，涉及仅仅以好古的方式解释世界的哲学，但绝不涉及某种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哲学。"（第 304 页）接下来的论述表明，这种对于马克思对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的修正和缓和，本身就带有斯大林主义的扭曲：布洛赫对其命题的论证建立在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哲学家"改变世界之上。尽管后来的版本不经解释就删掉了斯大林（参见上书苏尔坝普［Suhrkamp］版，第 326 页），但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根本错误并不是名单，而是哲学王在马列主义中充任了革命之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保证人。布洛赫是这样子继续陈述他的思路的：虽然哲学"不是关于其他科学的特别的科学"，但它是"所有科学中总体的特别知识和良心，是进步性总体的进步性意识"，而"这个总体不是作为事实存在，而是在巨大的生成关系中与尚未形成的东西打交道。……因此，哲学的变革最终主要发生在总的来说无法直观的、无法解释的，却大概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认识的未来视野之内"。（第 305 页）事实证明，这种假设的特惠境遇只不过是想象中才有的。

295

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葛兰西为自己翻译了它）的决定性影响一目了然。凭借记忆，葛兰西记下了“卢卡奇教授”的观点，即将辩证法限定在历史领域，在这里，他推测道，“不满意［布哈林的］《通俗教程》理论的卢卡奇陷入了互相矛盾的错误：历史唯物主义每一次转向庸俗唯物主义，并同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只能导致互相矛盾的错误”（*Gef* 3，H.4，§43，第 508 页）。特别是在第十一个笔记本中，他指出，对布哈林《教程》的批判变成了构建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努力，即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建立在对直观唯物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之上，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重新表述为实践的哲学。（*Gef* 6，H. 11，§§13-35，第 1393—1442 页）葛兰西将其批判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超越人的客观性”（或“规律”）主张上，他把这些主张称为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向形而上学的倒退：如果“客观”指的是“人的客观”，那它“不也就是**人的**‘主体’吗？”葛兰西试探性地把**客观**译为“**主体的全体**，也就是说，只要知识对于全部**历史地**在统一的文化体系中融为一体的人类是现实的，那么主体就认出了客观。据此，争取客观性的斗争就是争取人类的文化统一的斗争”（*Gef* 5，H. 8，§177，第 1042—1043 页；参见 *Gef* 6，H. 11，§17，第 1407 页及以下）。

在接下来的语境中，葛兰西为了阐发一种对实践和经验开放的对历史“事实”的解释，而重新表述了“语言学”的概念。他的思考“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它绕开了高高在上的直观的出发点，反之，它研究了语言学和批判的实践活动和尘世活动”（Buttigieg 1991，第 23 页）。这就是说，“在札记中，历史呈现为‘经验’而不是观察，不是直观的东西；而‘实践哲学所依据的经验也不能被弄成千篇一律的东西’（*Gef* 6，H. 11，§25，第 1423 页）”（同上书，第 25 页）。

不可思议的是，葛兰西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拥有很多共同点，但他们两位并不认识彼此。下述布莱希特的话也可能从葛兰西的口中说出来：“那些不能被思想所改变（不以我们为转移）的条件和事物不能被思考。”（GW 20，第 155 页）《戏剧小工具篇》（*Klein Organon*）反对纯粹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甚至唯物主义在我们这里也不再被视为一个观念了。”由于康托洛维茨（Kantorowicz）的秘书在《我们的时代》（*UZ*）杂志上谴责《三个铜子的小说》（*Dreigroschenroman*）是“唯心主义”（指的是非现实主义的），布莱希特在 1935 年初给贝歇尔（Becher）的信中坚称，这是一部“唯物主义的小

296

说”。为了解释这一点，他谈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既然解释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改变世界。既然我已经以这样的方式阐述了现实，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因和效果，因而也能够参与到原因和效果中去，那么我相信我为现实主义者写了一部小说。它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在其中也表现了现实。”（*Briefe*, Berlin / DDR und Weimar 1983，第 220—221 页）值得一提的是，布莱希特阐发了他的**参与式思考**（*eingreifenden Denken*）概念，用来反对直观的唯物主义。（例如可参见 GW 16，第 531 页）

297 **参考文献：**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3 Bde., Berlin/DDR 1960 (1953) u. Frankfurt/M 1959 (^{6}1979);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Hamburg 1922; J. A. Buttigieg, »Gramscis Methode«, in: *Argument* 185, 33. Jg., 1981, H. 1, 9-26; 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 2 Bde., hgg. v. W. Schuffenhauer, Berlin/DDR 1956;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1944), Amsterdam 1947; K. Korsch, »Der Stand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 in: der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hgg. v. E. Gerlach, Frankfurt/M-Wien 1966; K. Lenk,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und Wissenssoziologie*, Darmstadt-Neuwied ^{8}1978 (1961); M. 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i Karl Marx*, (Moskau 1955) Berlin/DDR 1969 (Nachdruck Berlin/W 1973).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张志超 译，林芳芳 校

参见：

Abbild, Alltagsforschung, Anerkennung, Antiphilosophie, Aufklärung, Bewußtsein, Camera obscura, Denkform, Determinismus,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Erfahrung, Form, Gesetz, Glück,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ologen, Innenwelt/Außenwelt, Materialismus, Metaphysik,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metaphysischer Materialismus, Objektivismus, Ökonomismus,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ekritik, Praxis, Praxisphilosophie, Tätigkeit,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Theorie, Vulgärmaterialismus

对抗（Antagonismus）

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指反对某个人的战斗（*ἀνταγωνίζομαι*），就是说行为者的对立冲突（*ἀγών*）或者说对立的行为。对抗者（在希腊语是 *ἀνταγωνιστής*），是指对手，如战争中的敌人、法庭上的对立方、竞赛中的竞争者。在剧院，对抗者是指和主角表演对手戏的演员。对抗也可以在引申的意义上使用，例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就谈到过“爱欲原则和现实原则（Lust-und Realitätsprinzip）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两者的和解则体现为典型的幸福。（1957，第 151 页）

1. 在马克思那里，对抗指的是建立在社会利益对立基础之上的冲突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关系到压迫和剥削，也关系到“社会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MEW 25，第 827 页）。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在国家方面被再生产出来的）阶级社会都是对抗性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MEW 13，第 9 页）因此，对抗首先是一种关系的活动形式和停息形式；对于这种关系，科莱蒂（Colletti）结合康德的说法称之为“现实的对立或‘没有矛盾’的对立”（1977，第 8 页）。对抗的基础，也就是促使对抗产生的东西，是利益的对立。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阶级利益，对抗就成了阶级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的现实化就是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预言，阶级对抗的极端化会导致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对抗，但这种看法还没有得到证实。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资产阶级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对抗。发生这些对抗的场合从非特定的资本主义关系，如买者 / 卖者和租赁者 / 出租者，到所有的（也包括卖者和出租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最后到雇佣劳动 / 资本。在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的基础上，由于国家结成联盟和社会内部的对抗向外转移，国际竞争关系得以形成，这些关系可能以民族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抗概念在圣西门主义的传统中形成，和**联合**概念是一对反义词。（参见 KWM 4，第 628—629 页的引文）在马克思那里，这个概念主要是在和“圣西门的门徒”伊萨克·贝列拉（Isaac Péreire）的争论中出现的。贝列拉写道：

“价值和交换的观念……表现了……个人主义和对抗……。产品价值之所以能够确定，只是因为存在着买卖，换句话说，存在着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对抗。”（1832；引自 MEW 13，第 76 页注释）马克思的看法和他相反：“资产阶级生产的对抗性质，在买者和卖者的对立上表现得还很肤浅、很表面，这种对立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中也存在，因为它只是要求人们彼此当作商品拥有者来发生关系。”（MEW 13，第 77 页）如果说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债权人/债务人的对抗决定了古代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和中世纪封建制度的灭亡，那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MEW 23，第 150 页）。

299

资产阶级的对抗在公共意识领域引起了对它的激烈否定。互相排挤对方的真实的行为人作为对抗者即科学分析的主角互相对立，宣布了庸俗经济学时代的来临。例如，美国经济学家 C. H. 凯里（C. H. Carey）斥责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说他们“分裂社会和发动内战，因为他们证明了：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中间引起一种必然的、不断发展的对立”。与此相反，凯里想阐明，地租、利润和工资“不是对抗和斗争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MEW 28，第 507 页）。

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阐述了对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工资”的张力开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MEGA I. 2，第 189 页）。这并非资产阶级社会唯一的结构性对抗，例如，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就决定于他本身“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敌对”（同上书，第 213 页）。

几乎与此同时（1845 年），恩格斯也以英国为例，刻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的基本特点：“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作死敌的人，那纯粹取决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最有利。没有人还想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和自己的同伴达成谅解，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自卫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个人都把别人看作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作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不过是已经包含在自由竞争中的原则的彻底实现。”（MEW 2，第 359 页）

后来，马克思在社会理论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对抗特点的刻画越来越丰富。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是“现
300 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MEW 4，第 473 页）。在《资本论》中，相应的说法是：“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MEW 23，第 316 页）但是，在经济情况变坏的时候，当涉及损失的分配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上升为“力量大小和狡猾程度的问题了，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MEW 25，第 263 页）。

劳动和资本的对抗是分析的中心。尽管企业内部的资本专制和工人反抗这两方面总是想装扮掩饰，但它们都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MEW 23，第 350 页）。

这种对抗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矛盾之间的关系在后来的学者那里引起了混淆。虽然任意一种对抗都表现了一种对立（Gegensatz），但并非任意一种对立都表现为对抗。虽然矛盾总是包含着对立，但并非一切对立都因此而构成矛盾（Widersprüche）。

马克思谈到过“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MEW 23，第 465 页），但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个范畴是同义的用法，就是错误的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性”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导致了一部分管理职能和监督职能的设立，这些职能因而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MEW 26. 3，第 495 页）这种对立不仅仅是“雇主和工人”（同上书，第 253 页）之间的雇佣的对立，而且是产品和财富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别人致富，却让自己作为无财产者和被奴役者进行再生产，以致“**已经实现了的劳动**表现为同自身的对立，同**活劳动**的对立”（同上书，第 271 页）。因此，如果消灭了资本而且“所有人都必须劳动”，进而，劳动“作为**可以支配的时间**的基础，获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自由的特点”，那么“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对立”也就消失了。（同上书，第 253 页）

这样一来，对立和对抗就变成了形式概念。现在，只要财富建立在贫困之上，就谈得上财富的“对立的形式”，或者说，只要贫穷制造的是他人的财富，就谈得上贫穷的“对立的形式”。（*Gr*，第 440 页；MEW 42，第 447 页）在**剩余劳动**概念上，所要求的区别能力也必 301
须证明自己经得起考验：“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MEW 25，第 827

页）在所有阶级社会中，对抗都是与强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第一，这里的强制一般是“物质性的”，是由交换关系中介的，因而，受财产关系“强制者”从个人角度来看像是自由人一样；第二，这里的强制开始有系统地转向积累，而这正是“资本的文明面之一”。当然，对抗导致的结果是，这种强制遭遇了危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并非就是需求，因为“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是受限制的。（MEW 25，第 254 页）作为形式概念，对抗性的概念涉及**化装**：根本重要的是管理活动如何“把生产资料和它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的能力。（MEW 23，第 635 页；参见 MEW 25，第 400 页）

马克思反对两种互为补充的曲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称，“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和摆脱了这一对立的这种形式本身一样是必然的”（26. 3，第 255 页），因为“纯粹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而不是**为了**工人的所有这一切”（第 257 页）是“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第 256 页）一致反对的。“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第 257 页）马克思称这一派别为“无产阶级反对派”（第 307 页）或者简洁的“反对派”（参见 *TM*，26. 3，Kap. 21：“反对政治经济学家”［Gegensatz gegen die Öekonomen］）。与此相反，欧文（Owen）提出了他的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合作社模型；其互为补充的对立典型是“为了摆脱尖锐形式的对立而想回到古老的对立形式”的西斯蒙第（Sismondi）（MEW 26. 3，第 50 页）。

在恩格斯那里，这个概念的应用范围就已经扩大了，从而也就丧失了具体性和特殊性。在《反杜林论》中，我们就已能看到还不成熟的形式，例如那里谈到卢梭的辩证观点的地方。这位不平 302
等的批判家认为，不平等的产生还算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MEW 20，第 130 页）。恩格斯的评论离开了这个一般性的例证，又找出了“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否定的否定”（同上书，第 131 页）。由此，具体性变成一般学说的例证了。

当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谈到“今天的对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些人有发布命令的权力，

而另一些人有执行命令的义务）时，他是反对哲学化的（1974，第365页）。在革命前的法国曾流行着一种错误的意见：一切痛苦都源于（国家和教会的而非社会的）专横。对于这个事实，拉布里奥拉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枷锁看起来并不是这样的关系或束缚，即这些关系或束缚中的人们处于……对抗性的从而不确定的、非直线性的历史进程的无可避免的作用之下。"（同上书，第197页）他的这样一种解释方法原则上与超历史的总体层面保持着很远的距离。

2.《卢森堡全集》的索引没有单列对抗条目，而是将其置于"阶级社会，对抗性的"条目之下。卢森堡对"对抗性的阶级社会"和阶级对抗做了区分。她认为，反对技术进步的工人个人的利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后者和个别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GW 1/1，第390页），以致各工会不得不应对各种互相矛盾的要求。

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至少按照较为接近它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它对与对抗相关的概念的形式化是很典型的。对抗等现在被视为一般的"辩证的"自然规律的应用场合。就此而言，《列宁全集》（Berlin / DDR 1964）的索引是典型代表：在"**对立（哲学的）**"条目之下标示要参看"**斗争与对立相统一**"，即另一个被奉为经典的一般规律；但"**对抗**"并没有因此就和"**矛盾（对抗性的）**"（*Widersprüche*，*antagonistische*）条目列在一起。"**矛盾（对抗性的）**"条目标示的各个位置也没有"**对抗**"这个词；大多数地方都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对抗有关，另外若干处和制度矛盾有关。例如，列宁竭力要求工人反对政治意识形态和自发和谐论，牢记"在这种制度下的阶级对抗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LW 1，第303页），以及后来的"勾结在一起的国际资本和国际工人运动之间的对抗"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LW 20，第404页）。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这种努力导致了其承担者的成问题的特殊地位："系统性的罢工……标志着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对抗的觉醒，但工人……对自身利益同当前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缺乏认识"，而这种"意识……可以从外面灌输给他们"。（LW 5，第385页）在《国家与革命》（1917）中，国家被理解为"阶级对立**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LW 25，第398—399页）；这个多次重复的命题是作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处文字的精髓而被引用的，在那里，国家被解释为"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MEW 21，第165页）。

简而言之，《列宁全集》的索引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才算是列宁著作的索引，它更多的是被斯大林系统化和庸俗化的“列宁主义”观点的索引，而列宁主义抹平了对抗和矛盾之间的差异。

毛泽东（《矛盾论》[Ueber den Widerspruch]，1937，AW 1，第 365—408 页；特别是第六部分“对立在矛盾中的地位”[VI. Der Platz des Antagonismus in den Widersprüchen]，第 403—405 页［此处参考的是另一个单行译本：Berlin / DDR 1958]）在斯大林修改了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在他看来，作为对立双方的斗争性和统一性的矛盾是一个涵盖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形而上学基本范畴。“对抗是对立双方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它的一般］形式”（此处在《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上是：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译者）。紧接着又被强调的是，“阶级的对抗”或者“两阶级的矛盾”是“对立双方斗争的一种特定的表现［一种特殊的现象］”（此处在《毛泽东选集》中文版上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译者）。“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这听起来有些武断。无论如何，当经验中的遭遇被拿来作为一般学说的例子时，就从具体的分析进入到一般学说的领域了。此外，这里还常常用一种浅显易懂的隐喻性说法。为了说明从旧统一体的分裂中 304
形成新事物的过程，毛泽东举了炸弹的例子。炸弹先是一个统一体，直到它被引爆为止。他还来不及想，在炸弹爆炸时并未形成新事物，就将其推而广之了：在自然界中也是一样，“新事物的产生最终都会采取”和旧事物“相冲突的形式”，新事物为旧事物的灭亡做好了准备。“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上书，第 403 页）要是打碎斯大林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枷锁，这种被讥讽为“伪辩证法”（Klimaszewsky / Thomas 1972）的东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早就变得更有说服力了。

无论如何，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许多思想运动中都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的讨论。正是一方面对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的区分，另一方面对矛盾和根本矛盾的区分，才使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矛盾成为可能。和往常的情形类似，自由表达这些想法的正是学者。例如，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早在 1965 年前后就把虚幻的（且本身就是攻击性的、引发冲突的）理想图景（即冲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会消失）归因于无法区分**对手**和**阶级敌人**从而无法区分对抗者和阶级对抗

者："对手而非阶级敌人将使得对立的、严肃的社会可能性具体化"（*Notate*，第50页）。切近的例证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抗。在这种情形下，个人按照接触权力的方式不同，被划分为两个方面，而不是"按照阶级被死死固定在一个方面，他们可以自由地来回转换。这种变动的矛盾首先是被长期的阶级对立的矛盾掩盖掉的"（同上书，第20页）。与阶级对立的矛盾相反，这些发生在其中的斗争未必是生死斗争的新对抗，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同上）。此外，布劳恩也像他的前辈布莱希特一样，强调了对抗对于戏剧的近乎决定性的意义："矛盾的这种对抗为戏剧提供了大量个性化的灾难，可以说，根本就是对抗创造了戏剧。"（第19页）

在民主德国理论家中，尤尔根·库琴斯基在1972年阐述了这样的区别，并利用它扩大了话语空间："剥削的取缔突然间消灭了对抗性的社会根本矛盾，但并未消灭**各种**对抗性的矛盾。"（1972，第1273页）相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arxistische Philosophie*）中写道："对抗性的矛盾对于对抗性的阶级社会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Kosing等1967，第482页）阶级社会的标志性特点是，"对抗性的矛盾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深入、尖锐、剧烈"（同上）。克利马谢夫斯基（Klimaszewsky）和托马斯（Thomas）贯彻了这个"越来越"句型：资本"也把对抗再生产出来"，并且达到了更进一步的水平，"一个阶级的力量的丰满和增强必然导致其他阶级遭受越来越多的贫穷、困苦和压迫"。（1972，第1222页）尽管福特主义让工人阶级感到生活水平提高了，尽管跨阶级决策、流通或出口为消解和缓和对抗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尽管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情况的变化，但是这样的论断仍然对此无动于衷。（例如参见PAQ 1981，第509页及以下）它们看不见管理主义（参见Hirsch / Häusler 1987）发现的必然性，即"管理方法必然使得资本主义有能力**把对抗程序化**"，以便相应地受管控的阶级斗争把这个制度再生产出来，而不是让这个制度受到威胁。（Haug 1987，第675页）

和谈论阶级对抗的主张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又一次把对抗推移到了政治层面。按照这本书的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雇佣劳动和资本表现得并无对抗性。"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地转化成了一个对抗性的矛盾。"（同上书，第483页）民主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又一次证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用一种对于非对抗性的矛盾来说具有典型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元素之间的矛盾"。

305

政治联盟体系、阶级对抗和社会结构的矛盾之间的层次差异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了。所以，比如说吧，E. P. 汤普森就指责阿尔都塞学派的追随者，说他们由于奉行马列主义，而把矛盾和对抗混为一谈："'矛盾'是对抗，是斗争的'发动机'；它不是一个能够对立共存的元素。"（1980，第165—166页；还可参见Colletti 1977）

更早一点的教科书（Kuusinen等1960）用如下的话划清了界线："'对抗与矛盾绝不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写道，'前者将要消失，后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依然存在'。"（第90页）因此，对抗性矛盾

306 将会以和平或者非和平的方式被清除掉。相应地，君特·克利马谢夫斯基（Gunter Klimaszewsky）和托马斯声称，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虽然同样存在着留待人们自觉去解决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绝不可能发展成对抗"。（1972，第1223页）

库琴斯基对于对抗将要消失的解释非常巧妙，因为他是把对抗消失和国家消亡的远大目标放在一起论述的：将要消失意味着还没有消失。教科书上的这些论断"不可以被这样曲解，即说它们忽视了还存在着大量别的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中没有一个和阶级**之间**的对抗有关"（1972，第1271页）。但是，库琴斯基列举的一些例子有时却忽略了对于对抗性概念很有意义的社会对立行为的方面：制度内在固有的目标冲突（如追求更多的利润反而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被解释为"一个阶级内部的对抗性矛盾"（第1272页），尽管这种矛盾的出现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丝毫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MEW 25，第275页）。此外，在库琴斯基看来，基督教伦理和追求利润"处于对抗性的对立状态中"。这样一来，他就利用那些包含在生产关系中的对立，把这种伦理对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补充**推升到了某个层面，却忽视了基督教伦理作为意识形态力量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跟所有"受吹捧的"意识形态权力机关一样，它也能为利益相反的立场所利用。（参见Haug 1993，第77页及以下）较为令人信服的是库琴斯基举出的关于民主要求和官僚主义之间以及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对抗的例子（1972，第1274页）。结合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来到世界上带有它脱胎于其中的旧社会的痕迹这一点（*Gotha*，MEW 19，第20—21页），库琴斯基区分了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对抗性矛盾产生的"基质的原因"和"外部的、历史性的原因"（第1274—1275页）：不得不进行违背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国防军备就属于外部原因这一类别（第1277页）。库琴斯基没有继续向前发展他的观点，提出废除现存制度，因为在没有出

现根本的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各种对抗性矛盾“并不受制于不断尖锐化的规律”（同上）。

3. 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的缘故，由苏联高层
307 来澄清对现实的错误看法已经不再有什么指望了。这个论断之所以没有失效，是因为这种对现实的感受本身仍然被幻想所包围。“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内部对抗性矛盾当然在把自己再生产出来”，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 11 月 4 日说：“然而，再生产经常是以另一种方式，以新的方式进行的。”（AR 5，第 412 页）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技术阶段”相对而言才刚刚开始，“而以资本主义方式将其投入应用的极为重要的下一步……还未发生。……绕过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加深这一惯常公式 —— 这也适用于各种对抗不断尖锐化的公式 —— 我们才隐约认识到了生产方式中的过程的本质，更别提政治判断了”。（同上）戈尔巴乔夫倡导把辩证法的立场作为“新思维”（Neues Denken），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他的斗争，**并且**与此同时，为了世界整体的形象及其继续存在而同对抗者一起负责任地行事。这也就是从可能导致人类灭绝的高度升级的国际化的对抗中撤退。这种对抗走向自己的终结，也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动力有关。

就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彼得·格洛茨（Peter Glotz）—— 从某个符合戈尔巴乔夫构想，但却是在现实的另一个层面上，基于不同立场的视角出发 —— 提出了工人运动和资本方之间的**对抗性合作**概念，取代了否认一切对抗的**社会伙伴关系**概念。他对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在根本利益之间的差异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的合作”（1984，第 183 页）。从分析的意义上或相近的描述的意义上讲，这个概念具有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兼容的优点。说起来，它当然是规范性概念，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基点是原则上的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双方的阶级对抗的胜负。鉴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抗的继续存在，以及关于这种对抗的“不可否认论”越来越甚嚣尘上，奥斯卡尔·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要求把**团结**视为一个“超越相互对立的利益的……基本概念”（1988，第 306 页）。他还把社会民主主义定义为一种本身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在各种对抗中充当中介的立场：“人民党的原则是，在社会内部的各种对抗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同上书，第 307 页）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联解体为止（1945—1991 年），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或者说**制度竞赛**从根本上决定 308
了国际关系。与此同时，在直接的或派生的阶级对抗的“另一边”，“全人类

的问题”，如具有威胁性的核武器、可能造成人类灭绝的全球生态条件的破坏，正越来越有影响。在家长制的（从而对抗性的）两性关系领域，追求解放的斗争也是一再地爆发，只不过形势不是停留在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的剧本《父亲》（*Der Vater*）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在夫妻的彼此隔膜中决出胜负的静态的两性战争，而是由各种对抗汇集而成的，像玛丽·梅勒（Mary Mellor）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那样的社会变革工程。自东西方对抗结束以来，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又增长了，但这些对抗相较于南北对抗显得黯然失色，而南北对抗又是由获得暴力支撑的、处于成长阶段的世界市场的动力再生产出来的。

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已经社会化却仍具有对抗性的社会”（Adorno 1963，第 379 页）发展了许多管理和整合对抗的技术。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修改了阿尔都塞学派的早期立场，引入了“否定性或**无主体的异化**”（*Entfremdung ohne Subjekt*）概念，以便能够“把结构性对抗作为某种不可调和的东西，即植根于不堪忍受的经验从而采取了‘激进’反抗形式的东西”（第 39 页）来考虑。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反抗起作用的方式和资本主义统治起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保持稳定性，不是直接因为“它内部的凝聚力或者它的生产率”，而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对抗获得社会的力量”，从而“在阶级斗争中成功地把各种对抗性力量用作自己的再生产工具”。（1994，第 37—38 页）利用这些对抗性力量的一种方式是对那些被估计为具有威胁性的对抗施行“关节截断术”，并且通过“阀门”把这些对抗释放出去。就此而言，事情经常是这样操作的：把社会内部的对抗和国际上的或者全球性的对抗叠加在一起，并使其在一定的情绪状态下发展成种族主义的对抗。确定所有这些对抗彼此之间和进一步的对抗彼此之间相应的具体关系，主要不是理论的任务，而是政治的任务。只要各支解放力量打破互相之间的对抗的藩篱，赢得制度性的统治地位，它们就获得了在全社会范围内采取行动的能力。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in: *Neue Rundschau*, H. 3, 1963 (in der gleichnamigen Buchfassung, Frankfurt/M 1964, verändert); É. Balibar, »Strukturale Kausalität, Überdeterminierung und Antagonismus«, in: H. Böke u. a.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AS 228, Hamburg 1994; V. Braun, *Es genügt nicht die einfache Wahrheit. Notate*, [Leipzig 1975] Frankfurt/

M 1976; L. Colletti,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Berlin/W 1977 [1974]; P. Glotz, *Die Arbeit der Zuspitzung*, Berlin/W 1984; W. F. Haug, »Nach dem Fordismus: Post-Fordismus?«, in: *Argument* 165, 29. Jg. 1987, 672-676;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J. Häusler u. J. Hirsch, »Regulation und Parteien im Übergang zum 'Postfordismus'«, in: *Argument*, 29. Jg. 165, 651-671; G. Klimaszewsky u. E. Thom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Dialektik oder maoistische Pseudodialektik?«, in: *DZPh*, 20 Jg., H. 10, 1972, 1208-1226; A. Kosing u. a.,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Lehrbuch, Berlin/DDR 1967; J. Kuczynski, »Gesell schaftliche Widersprüche«, in: *DZPh*, 20. Jg., H. 10, 1972, 1269-1279; O. W. Kuusinen u. a.,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Leninismus*. Lehrbuch, Berlin/DDR 1960; A. Labriola,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4; O. Lafontaine, »Der contrat social muβ neu gestaltet werden«, in: *Gewerkschaftliche Monatshefte*, 5/1988; H. Marcuse, *Eros und Kultur. Ein philosophischer Beitrag zu Sigmund Freud*, Stuttgart 1957; M. Mellor, *Wann, wenn nicht Jetzt! Für einen ökosozialistischen Feminismus*, AS 216, Hamburg 1994;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Automationsarbeit: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Bd. 2, AS 55, Berlin/W 1981; I. Péreire, *Leçons sur l'industrie et sur les finances*, Paris 1832;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张志超 译，林芳芳 校

参见：

Assoziation, Aufhebung, Ausbeutung, Charaktermaske, Dialektik, Gegensatz, Hauptwiderspruch, Klassengesellschaft, Klassenkampf, Negation der Negation, Revolution, Solidarität, Systemkonkurrenz, Umschlagen, Unterdrückung, Widerspruch

人类学（Anthropologie）

从词源学上讲，人类学的意思就是对人的探讨。希腊语中的 *ἄνθρωπος*（人）不仅具有肉体上的含义，也具有本体论上的含义；既是指特殊的人，也是指人类。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名义严厉批判了人类学的非历史形式。

1. 谈论“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遭到了马克思

的批判（*DI*，MEW 3，第 44 页；参见
310 第 42 页），因为这个在某种“最高的直观”意义上的概念省掉了这样的义务，即必须直观的是“比方说大批患瘰疬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同上书，第 45 页）。“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些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同上书，第 20 页）“经验的观察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同上书，第 25 页）“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KHR*，MEW 1，第 378 页）因此，人的本质既不能通过神又不能通过人在其个体性中表现出来的本质来解释，也不能通过某个一般的抽象来解释，而只能这样看待活生生的女人和男人：他们彼此之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联系也是自我生成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ThF*，MEW 3，第 6 页）

黑格尔创立了一套思想，这套思想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1868 年 3 月 6 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MEW 32，第 53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致力于炸毁形而上学的大厦，而在这个大厦里，人的本质被囚禁在其自身的观念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Ms 44*，MEW 40，第 574 页）“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然而马克思补充道，“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同上）“**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异化**……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同上书，第 572 页）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真正的枷锁”（*DI*，MEW 3，第 19—20 页）。“这种改变意识的要 311
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同上书，第 20 页）

与此相反，马克思确信，这些（抽象的）对立“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而“**理论的**对

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Ms 44*，MEW 40，第 542 页）“**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同上）“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同上书，第 542—543 页）因为“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同上书，第 543 页）。

因此，马克思的人类学观点首先是从对哲学的批判开始的。他的人类学观点超越了哲学的古典的反思性，因为它证明了，如果用如下的尺度来衡量，异化是内寓于这种思想之内的，即这种思想只是到理论中寻找解决理论矛盾的方法，它也不阅读这本已经打开了的工业的书，以便在那里即在人从事生产活动的场所，参与到实践中去。离开了生活、行动和参与（Eingreifen），科学探讨也就不存在了。

2. 不过，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受到了某种潜在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us）的影响。这种自然主义表现在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中。在 19 世纪，自然科学被视为认识的顶峰。关于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Arten*），马克思写道，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60 年 12 月 19 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0，第 131 页），而且他把它“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1861 年 1 月 16 日致拉萨尔的信；同上书，第 57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为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H. 摩尔根（Lewis H. Morgan）所着迷。摩尔根据说是用唯物主义的方式划分了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他们则吸收了摩尔根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自然主义观点。在唯科学主义（Szientismus）和自然主义之间，马克思对这种方法的推进导致了一种决定论的形成，这种决定论不再仅仅是历史决定论，并且提出了意识与革命行动在何处才能拥有自己的地位的问题。

312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是

向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它一方面关系到资本主义从而关系到当下，另一方面又关系到早期的各个社会。《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MEW 23，第 12 页）。而马克思研究的是主导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规律性，因而，这又是一项严格“科学的”事业。就此而言，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而“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同上）“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这“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同上书，第 15—16 页）“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同上书，第 16 页）

这个在《资本论》中显而易见的“科学”和政治行为之间的鸿沟促使一些学者将这部著作解读为“唯科学主义”。按照这种解读，马克思对科学理论的探究并不取决于革命事业。阿尔都塞相信，在马克思的各部著作中可以看出来的和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化概念）放到一种全然不同于《资本论》的关联之中的“认识论断裂”，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现。然而，马克思把他的经济学观点同不关心阶级对抗基本事实的古典作家做了彻底的区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的过渡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同上书，第 19—20 页） 313

虽然马克思无权声称他发现了社会阶级，但正是他把社会阶级同一种重要的经济事实即对劳动的剥削联系了起来。这样一来，源于这种剥削的对抗关系和伴随这种剥削而来的人们共同拥有的生活条件就被揭示出来了。他的著作用这种方式唤起了一种社会政治意识，这种意识能够让他们通过劳动和运用自己的来自于生活实践的聪明才智来克服异化，并在无须领袖和先知的情况下自主行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为了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劳动使得资产者和无产者互相束缚，并处于某种对立的状态中；他们不是来自“人的”统一性，而是成了对抗的社会的历史的人们。社会阶级的有机概念（就其必然的关系而言）是人类学工具，用于把抽象的“人”撕裂成那些在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范畴。借助于那些范畴，

人们才能够懂得是什么让他们联系在一起并彼此从属于对方的。

亚里士多德不能理解劳动的本质，因为他对奴隶的劳动漠不关心。和他的情形一样，资产者也对无产者的社会存在视而不见。**无产者**不是“人”，而只是人类边界附近的一种边缘存在。作为“抽象的”、可以交换的工人，他随时可以“溶解”在“过剩人口”里，消失在关于就业率的统计数字中。

由于**妇女**生产人的本质，她也生产寄寓于人的本质之内的力量，这种力量同她的命运紧密相关。妇女作为人的本质是屈从的，同时，她又是人的本质的再生产者。正如无产者的劳动力对资本家很重要一样，妇女对于无产者也很重要。恩格斯说，“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Urprung*，MEW 21，第 75 页），以此强调了妇女的双重从属地位。

“人”其实就是**所有者**，就是那个其功劳不应归于耗费掉的劳动时间而应归于他拥有的由无产者劳动提供的财产的
314 资产者。这能够实现，靠的是他直接地或通常情况下间接地利用社会组织强加给“劳动群众”的纪律，而正是这些社会组织瓦解了“劳动群众”的阶级。由于资产者的军队、他的警察、他的领导力量、他的官僚、他的知识分子和他的职业政治家，世界上的无产者才会在劳动上被固定、被掌握、被控制，或者在那些让资产阶级各个党派互相消遣的冲突中被说服和被消耗。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MEW 23，第 618 页）“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在马克思参与完成的法文版中说的是“captital fait homme”，译为德语就是“Mensch gewordenen Kapital”［生成为人的资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同上）

对于资产者来说，“人的”概念一如既往地存在着。人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世界，并且只能是他的世界。一般价值就是他的完全规定了的价值。由于资产者相信阶级是不存在的，并因而相信整个的社会流动是无产者的未来，所以资产者在自己的视野里只看得到自己。对于资产者来说，无产者的人类学就是“穷人”的人类学；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它却是“被剥削者”的人类学。（在“穷人”的人类学看来，）穷人要为自己的贫困负责；他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的个人缺陷，如目光短浅、相貌丑陋等，但主要是因为他不负责任地生育

太多，而这必然要遭到饥饿的惩罚。通过限制食物供应和监控私人性生活来控制人口——这些由马尔萨斯（Malthus）总结的教训，资产阶级是乐意吸取的。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为贫困做出的安排无非是施舍和灭绝相结合的解决办法罢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来说，贫困是剥削的结果。解决办法就是阶级斗争，也就是说，为了消除造成贫困的物质的、道德的和制度的条件，在政治上主动地和有意识地对那些让人陷入贫困的因素进行干预。

3. 人类学（为了突出和前文的区别，这里或可称为民族学［Ethnologie］）不
315 仅是指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规定性的哲学探讨，也是指关于各个人类社会的哲学探讨。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的研究涉及了人类远古时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文稿中都有民族学方面的评论，但最重要的文稿还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写作片断《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Gr*，第 375—413 页；MEW 42，第 393—421 页）和《民族学笔记》（*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不过，他们研究民族学的视角与其说是分析的，不如说是比较的；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进化论的；与其说是唯物主义的，不如说是自然主义的。

摩尔根（1877）把他在当时的某些域外社会里观察到的不同类别的亲属关系用语，应用到了以前的研究中常见的社会关系上。利用这种成问题的和未经证实的假设，他在同当时的优生学观点和道德观念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重建了同样是假设性质的各种家庭制度的顺序。他把这些家庭制度的进步规定为血缘亲属之间的性禁忌和婚姻禁忌的扩大。这样，通过诉诸血缘亲属关系的不同类别，人类历史被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其中一个时期建立在“血缘权利”的基础上，另一个时期建立在“土地权利”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学与假设的第一个时期有关，这个时期从人类起源直到“对偶制家庭”（Paarungsfamilie）为止。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人类在这一整段时间内都臣服于“自然选择”定律，而“自然形成的社会”朝着结束“血缘亲属”间性关系的方向的连续不断的进化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认为的。摩尔根和恩格斯从中看出了优生学意义上的进步，这一进步的“巨大影响”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证明，而氏族则构成了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Ursprung*，MEW 21，第 45 页）。摩尔根写道：“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

恩格斯补充道，因此，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同上书，第52页）。这种进步，“按照摩尔根的看法，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引自上书，第45页）。所以，“阻止近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同上书，第50页）。“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结果，只剩下一对……配偶。”（同上书，第52页）借助于巴霍芬（Bachofen）（1861），摩尔根把向个体婚制的过渡归功于妇女：“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同上书，第57页）一方面通过抢劫妇女和“购买”妇女来消除妇女的缺少，另一方面又要让她们有可能行使自己的意愿：这种不一致要归咎于这些想法的纯粹理论的性质。随着对偶制家庭的出现，“自然选择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于是，从这种对偶制中产生一种新的家庭形式，必然是因为另外一种“**社会的**动力”发挥了作用。（同上）

在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著名片断里，马克思勾勒了这种发展借助于假设的土地所有制演化次序来实现的过程。在这里，他设定的前提是，社会组织先于对客观生活条件的占有而出现：“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naturwüchsiges Gemeinwesen）。”（*Gr*，第375页；MEW 42，第384页）这简单说来就是指基于“血缘、语言、习惯等的共同性”而结为一体的家庭和克兰（氏族）。（同上书，第376；384页）在这里，马克思为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公有制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某种关系，把1845年和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坚持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颠倒了过来。所有制的具体规定性被他用作衡量不同社会**形式**的尺度。他认为，可以从这种法权标准出发，来区分这些社会形式。

因此，这种“史前史”阶段的进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是二重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使得人类社会离开了他们的两个被视为原始的制度，即亲属集团和土地公有制。这种民族学分析进路的缺点在于，为了自然科学和法权

316

317

而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旦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自然家庭**的观点，再生产就不再表现为社会问题，而是和繁殖混淆在一起了。一个普遍的生物学事实取代了使再生产成为社会过程的物质偶然性。保守主义做过这样的替换，它可以借此为制度的稳定性辩护；同样，“结构主义的唯物主义”（Strukturalistischer Materialismus）也做过这样的替换，它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找到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的办法（而结果只是让两者互相混淆而已）。

然而，马克思自己有时驳斥了这种在自然主义、优生学、达尔文主义和主流道德规范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下形成的纯理论的人类学。在他把达尔文的理论作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而接受下来十年之后，他为了“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历史地表现出来”，拒绝让历史从属于**生存斗争**这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规律（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MEW 32，第685页）。正如克拉德在评价《民族学笔记》时发现的，虽然马克思在达尔文的著作里发现了支持他的反目的论观点的证据，但这也驱使他“区分了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不仅是因为两种科学的情况，而且是因为现实中的人是和自然相分离的”（1973，第116页）。“最终，马克思在表述了这些想法以后，就把它们掩藏在自己的工作室中了。但是，即使是这些思想的未完成的形式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从对抽象的人的类本质的批判转向了对各个特殊的社会的经验研究。”（同上书，第117页）

4. 像往常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各个社会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人种学。这种人种学还一直在从“种群”中寻找某种操作性的范畴。我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找不到以种族的或人种的观点为基础的某种主张的痕迹，尽管这种看法在他们的时代非常有影响力，而且今天在古典人类学领域也还继续存在着。他们不是把妇女的被贬低归咎于某种天然的起源，相反，他们从历史的视角解释妇女的处境，并且证明，尽管作为妻子和女人，妇女从属于男人的利益和作为欲望的对象被求爱，但她们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实施自己的意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今天的人类学仍未逃脱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意识形态状况中艰难地摸索，有时也爬梳了人口学的因果性的意识形态状况，所以他们避免了另外一些虽已广泛传布但仍未占据上风的错误看法。恩格斯拒绝拿人的各种制度同动物群体（包括和人最相似的哺乳动物群体）中观察到的行为方式做 318

类比——我们在后者那里可以发现“性生活的一切形式”（*Ursprung*，MEW 21，第 40 页）。在他看来，乱伦禁忌不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不受时代限制的现象，而是一个在相对晚近的时期才发展起来的“极其宝贵的”发明（同上书，第 42 页）；他还把多个民族引以为例证，在他们那里，被我们视为乱伦的关系随处可见，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嫌恶。他还批判了“荒诞的，尤其在 18 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与文明时代几乎同时出现的专偶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围绕它而逐渐萌发起来的核心”（同上书，第 100 页）。

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远古时代的、所谓从属于“血缘权利”的社会的内部发展过程而提出的前提和假设是可疑的，但他们受学者 G. L. 毛勒（G. L. Maurer）的启发而开展的对“土地权利”主导的社会的分析，却证实他们比同时代人要明智得多，并且也具有现实意义。

可惜的是，由于迷上了摩尔根，他们从“自然规律”出发，不理解别的那些被他们拒绝的学者的尝试（例如亨利·梅恩的作品［Henry Maine 1861］）。同样可惜的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方法可以应用到非常奇怪地被他们剥夺了历史性的社会上去；而且他们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描述“生活的再生产的客观条件”和那些以社会再生产关系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而对于这些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全套有效的概念工具。我们要开展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那就既不能采取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前几章的自然主义观点，也不能单纯运用《资本论》中阐发的概念，而是必须发现新的观念 319
和概念。

5. 对那些域外社会可以用两种视角来观察。其一，观察原始组织的各种形式。这种组织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通过与西方社会的特殊接触而被弄得走了样。对它必须用一种历史方法予以重建。其二，分析这些作为从属社会的社会目前的状态。两种情况都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路。如果说一个从外部来感受的社会的语言本身被理解为它的特有状态，那么这个社会也只能被“理解”。来自研究者词汇用语的表达会把研究者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前提假设转嫁到被研究的社会模式上去。语言要被有效地表达出来，就必须重建被观察的那些个人的社会行为，也就是必须把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同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及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予以具体化。只有通过准确地分析这些关系及其物质内容（即包含某种劳动关系），社会中的个人才能被再次置于一种连贯

的语境中，才能表现出他们的主体性。“生产方式”是从这些分析中推导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应引入每种社会制度都内在固有的一个维度，即社会制度的再生产维度。从分析上说，这个维度同生产维度是有区别的。只是一种剥削制度而从来不是一种再生产制度的资本主义并不知道它所剥削的劳动力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再生产：一大部分利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个决定性特征为基础的。这个特征在对必须独自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域外社会的剥削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种剥削方式也直接涉及这些社会的转型。由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来自于那些在非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生和长大的人们的不断转移，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再生产才会看起来高枕无忧，因而在理论上得不到特别的重视。面对当前的发展，我们不能再忽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再生产了，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资本主义国家，也关系到那些“原始积累”在其中不断发生的领域。

320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杰出之处是这样一个（与其说是学术的，不如说是实践的）目标远景，那就是人们要从自身的造物——这些造物把自己树立为人们命运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不管这个造物是神灵、国王、战争、科学、危机、商品还是世界银行。这意味着这样的尝试，即为了让人们走上征服历史的道路，而把他们再次置于他们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位置上去。只要人们还没有从“思想的史前史”中走出来，只要他们不能如此预见和引导自己的集体行动，即他们不能单打独斗地沦为牺牲品，那么这就是他们让自己遭遇的和被给予的唯一的决定论。

参考文献：

J. J. Bachofen, *Das Mutterrecht.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ö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 Stuttgart 1861; F. Gendreau u. a. (Hg.), *Les spectres de Malthus. Deséquilibres alimentaires, déséquilibres démographiques*, Paris 1991; L. Krader, *Ethn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bei Marx*, München 1973; H. S.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 1861; G. v. Maurer,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 J. F. McLennan, *Primitive Marriage.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Edingburgh 1865; C. Meillassoux, »La lesçon de Malthus«, in: F. Gendreau u. a. 1991; L. H. Morgan, *Die Urgesellschaft. Untersu-*

chungen über den Fortschritt der Menschheit aus der Wildheit durch die Barbarei zur Zivilisation, Stuttgart 1891; K. Polanyi, C. M. Arensberg, H. W. Pearson (Hg.), *Trade and Markets in the Early Empires*, Glencoe 1957; E. Terray,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primitiv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1974; E. Westermarc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London 1891.

克劳德·梅亚苏
（Claude Meillassoux）撰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让·雷曼
译为德文
张志超 译，沈红文 校

参见：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neignung, Antagonismus, Antikolonialismus, Antizipation, Arbeit, Armut/Reichtum,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Ausbeut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Charaktermaske,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ritte Welt, epistemologischer Einschnitt, Ethnologie, Ethnozentrismus, Evolutionstheorie, Familie, Gattung/Gattungswesen, Gemeinwesen,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häusliche Produktionsweise, Klassenkampf, Menschenbild, Mensch-Natur-Verhältnisse, Patriarchat, Personifikation, Produktion,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Reproduktion, Selbsttätigkeit, Selbstveränderung,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Übervölkerung, Unterwerfung,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Verwandtschaft, Wesen des Menschen

反权威运动 321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它在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人政治运动中同各种反权威的自由思潮交手，并由此夺取领导权的问题。第一国际经历的所有分裂中再没有比“巴枯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更为危险的了（参见 MEW 18，第 3—51 页），并且它事实上也因此而解散（参见 Mayer 1975，Bd. 2，第 253 页及以下）。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恩格斯从原则上为作为集体行动能力条件的特定权威和纪律形式做了辩护，而且马克思也同样从原则上对巴枯宁主义秘密组织的权威组织实践开展了批判。

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同工人运动内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划清界限的立场，不仅妨碍了对如何理解多数人的组织和政治这一被排

除掉的问题的处理（参见 Balibar 1983，第 139—140 页），而且也多次导致了镇压政策的合法化：例如，在利用新的、仍然面临危险的苏维埃国家权力对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平息中；在德国处于多数党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在十一月革命中和“苏维埃”合作而不是致力于反对它们的无能上；或者，在对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katalanischen POUM）——在斯大林影响下的共产国际代言人看来，这个党威胁到了已经处于危境中的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能力——的肃清中。

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场从伯克利（Berkeley）到柏林再到巴黎，并且部分地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鼓舞而席卷全球的青年反叛浪潮中，“反权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再次爆发了争论。就此而言，埃内斯托·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关于在游击队的志愿纪律下培养“新人”的号召得到了远方的呼应——“革命者必须对自己革命”变成了广泛流传的口号，同样的还有毛泽东的“红卫兵”的官方革命口号“造反有理！”然而，居于中心位置的、“在群众中有影响力的”主要是如下这些风潮中的观点，如美国的亚文化运动（subkulturelle Bewegung），阿姆斯特丹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Provos）运动（参见 Kommune [2]1969，第 21 页及以下），也包括巴黎的“境遇主义者”（Situationisten）（其口号是“想象力当权”）或推动激进革新和把反资产阶级的波西米亚文化（Bohèmekultur）推向极致的西柏林“一号公社”（Kommune I）。

尽管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要么拒绝这种“集结”（参见法国共产党［FKP］面对法国 1968 年 5 月的“五月风暴”而采取的拒斥态度），要么从思想方面把反叛青年的倡议归结为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代表性的观点，参见 Helms 1969，Harich 1971），但在西德，大学生理论家们却采取了自觉的尝试：他们把巴枯宁的反马克思主义主张和马克思对权威政治形式（比如这些形式作为对 19 世纪秘密帮派组织实践的完全延续而被付诸各国共产党的实践）的批判用作一种以行动为导向的新读物。而这些读物又是基于批判理论，或者说也包括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理论，而从精神分析角度进行论证的权威主义批判。这样一来，一种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就初步形成了。它诞生于分崩离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悬而未决的危机中，并且针对这场危机，提出了一种独立的激进立场。这种立场试图在抛弃“被奉为超越了一切的列宁式政党范畴”（Krahl 1971，第 306 页）从而也避免堕入“反权威抗议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消遣过程”（同上书，第 306 页）的前提下存活下来。

与此同时，在广泛传播大学生思想的过程中被排挤掉的德语区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kalistisch）和自发主义路线传统遗产，通过对已有出版物的盗版、在自己的杂志（例如 *883*，*linkeck*，*charlie kaputt*）上发表或出新版而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其中的代表者，除了巴枯宁，主要是“阿姆斯特丹左派”、左派改良教育家和魏玛时代的精神分析家。“反复被引用的主要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三篇文章，即《权威国家》（Der autoritäre Staat）、《欧洲的犹太人》（Die Juden in Europa）和《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ang），它们构成了革命理论的来源”（Rabehl 1988，第 249 页）。特别是在主张日常生活革命的公社运动（参见 Kommune 2，1969）和中小学生自治运动（参见 Holzkamp 等 1971）中，这种“行动理论”（同上）同当时的一场在性政治方面也很激进的中小学生、学徒和大学生运动的那些推动因素产生了联系（例如参见 Amendt 1970，Gente 1972，Reiche 1968；对此的批判参见 Haug 1969）。

1967 年 7 月，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用“反权威阵营”这种说法来指称一个“议会外反对派”（APO）的派别（参见 1980，第 12 页）。这个派别“既不是斯大林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其目标在于发动“革命”，并通过革命“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唤起群众的自发活动”。（同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为把青年反叛运动的特定动机与批判理论的权威主义主张和文化工业主张结合在一起，强调反权威的“教育过程”对于新左派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这些在权威社会长大的人只有一个打碎我们权威性格的机会，那就是，当我们明白，自己是作为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中活动的，即这个社会属于这些人，只有现存制度的权力结构和统治结构才能让这个社会把这些人拒之门外。”（同上书，第 21 页）对杜奇克来说，这首先是指，通过对“凭借操纵手段控制群众的职能部门”采取有针对性的直接“行动”，从而通过例如宣传运动的方式将掌控媒体的施普林格集团没收，然后“顺势使少数成为多数”。（同上书，第 22 页）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和“反权威阵营”的关系，杜奇克使用了“反权威革命阵营”的口号。除此之外，他将另一个包含其策略纲领的口号表述为：“在制度中穿行的长征，是指出于颠覆的目的利用内在于和外在于国家—社会全套机器的各种矛盾和机会，以便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把它们都毁灭掉”（同上书，第 22—23 页）。在镇压性质的反动员的压力下——这种压力随着鲁迪·杜奇克在 1968 年复活节期间遇刺而达到了顶峰，这种“长征”（参见同名杂志，Berlin / W

1973 年起）如何才能保持反权威的、革命的激进性，还没有被作为问题提出来。

对于涉及政治中心法兰克福的学生运动中的争论产生了较大影响，并有时被人称为“反权威运动理论家”（Claussen 1985，第 410 页）的汉斯-尤尔根·克拉尔（Hans-Jürgen Krahl）所拒斥的，“不是合法性，而是对传统的政治制度化的一切参与，因为这些制度化具有一种扼杀所有解放性质的自发运动的功能”（1971，第 193 页）。为了不退回到“反权威意识自相矛盾”的“小资产阶级表现形式”中（同上书，第 304 页），觉悟的先锋队——列宁认为这是他所提出的政党概念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被“觉悟的组织”建立起来（同上书，第 155—156 页）。正如克拉尔 1969 年秋季在作自我批评时所说的，这种只是从非制度的方面或终究不过是从心理学的方面来探索的方案——这种方案“主要是指一种由反权威的感情激发的解放性的自发行动”（同上书，第 193 页）——的破产，必然会由于“绝对化的解放要求”而造成实践上的损失，或者导致走入“宗派主义的物化组织形式”的死胡同。（同上书，第 307 页）

在 1968 年 5 月的失利之后，法国的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和加布里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und Gabriel Cohn-Bendit）彻底放弃了杜奇克和克拉尔所着重论述的那个方案。总的来说，他们以一种极具创造性的写作方式提议把“左翼激进主义”作为治愈“共产主义老年病”的良方（Cohn-Bendit 1968）。但是，他们自己却并没有描述反权威的革命策略应该包含哪些要素，也没有提出相应的问题。

有一些人，特别是杜奇克，试图通过某种革新了的有组织的革命政治计划，在那些由于反权威的吊诡的推动力而产生的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中“巩固列宁的地位”（1974），并赢得某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这种立场远离权威社会主义，也无须到以前的榜样（毛泽东主义、格瓦拉主义）或者各种有歧义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托洛茨基主义）那里寻求不可靠的支持。尽管这种想法很有政治魄力，也不失知识分子的周延，但许多问题依然是没有涉及和悬而未决。就此而言，鉴于青年的集体觉悟和期望，反权威运动绝不仅仅处于一个理论问题的地位。“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一个地方提到：在革命时刻停止思考是对解放事业的最大威胁”，杜奇克在 1965 年写道。“现在我是为了‘理论的纯粹’而放弃革命的最后一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寻找一种多层面的工作方法。至于‘怎么做’，我还不清楚。”（1980，第 23 页）

20 世纪 60 年代，在联邦德国战后

的一代人中兴起了反对被避而不提的其父辈与纳粹的共谋的思潮，但这种思潮并没有因此转向民主德国的“官方反法西斯主义”，相反，批判理论的观点经过激进化，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主义批判，并同时转向了实践的层面。要说其中的典型，还要数赫伯特·马尔库塞。他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权威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断地作茧自缚：虽然这种批判关系到“采取毫不留情和毫无遮掩地反对两种制度的观点”，关系到“毫不妥协地反对两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1947），但是“各国共产党现在是并且仍然是唯一的反法西斯主义力量。对他们的谴责必定是一种纯粹理论性质
325 的谴责”（同上）。新的反权威主题是对日常生活关系的政治化。相较于只是退回到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左翼激进派的政治概念，这一主题包含的内容要多得多。和那些概念相反，它为法西斯主义分析和权威个性结构研究之间的耦合这一当前的新倾向提供了实践基础，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其科学研究中跃跃欲试的那样。源自美国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新运动形式，如“静坐示威”（Sit-in）、“宣讲会”（Teach-in）、“占领课堂”（Go-in）等，被吸收进来了。“有限度的打破规则”被确定为策略纲领。这样一来，新的反权威运动也开始反对它自身的权威性。“让社会主义的阁下们从他们的资产阶级逃避中解放出来吧”，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DS）的“女性委员会”如是宣告对反权威运动男性领导人的反对意见。

在这一基础上，西德兴起了一股反权威政治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自主联合的浪潮，其内在固有的分歧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抽象的反制度主义（Antiinstitutionalismus）和同样抽象的“政治现实主义”（Politikrealismus）的分裂中才明白无疑地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G. Amendt, *Sexfront*, Frankfurt/M 1970; É. Balibar, »Bakunismus«, in: KWM 1, 1983, 137-144; U. Bergmann, R. Dutschke, W. Lefèvre, B. Rabehl, *Rebellionder Studenten*, Reinbek 1968; F. Böckelmann u. a. (Hg.), *Thesen zum Selbstverständnis der antiautoritären Opposition*,Stuttgart 1969; ders. u. H. Nagel, *Subversive Aktion: Zur Entstehung der Studentenbewegung*, 1980; D. Claussen, »Hans-Jürgen Krahl: Ein philosophisch-politisches Profil«, in: Krahl 1971 (Neuauflage 1985); D. u. G. Cohn-Bendit, *Legauchisme – remède à la maladie sénile du communisme*, Paris 1968 (dt. Reinbek 1968); W. Dressen, *Antiautoritäres Lagerund Anarchismus*, Berlin/W 1968; R.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Berlin/W 1974; ders., *Mein langer Marsch*, Reinbek 1980; T. Fichter, S. Lönnendonker, *Kleine Geschichte des SDS*, Berlin/W 1977; P. Gente, *Marxismus, Psychoanalyse, Sexpot*, 2 Bde., Frankfurt/M 1972; W. Harich, *Zur Kritik der revolutionären Ungeduld*, Bern 1971; W. F. Haug, »Sexuelle Verschworung des Spätkapitalismus? Zur Kritik an Reiches '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 (1969), in: ders., *Warenästhetik, Sexualität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72, 130-154; H. G. Helms, *Fetisch Revolution*, Neuwied 1969; H. H. Holz, »Die schlechten Söhne Lenins Anarchismus einst und heute«, in: *Die abenteuerliche Revolution*, Neuwied 1976; K. Holzkamp u. a., *Schülerladen Rote Freiheit*, Frankfurt/M 1971;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dt.: *Über das Elend im Studentenmilieu*, Hamburg 1977); Kommune I, *Quellen zur Kommune-Forschung*, Berlin/W 1968; Kommune 2, *Versuch der Revolution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Individuums*, Berlin/ W 1969; H. J.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M 1971; B. Kuschey (Hg.), *Linke Spuren*, Wien 1987; R. Langhans, F. Teufel, *Klau mich!*, Frankfurt/M 1968; H. Marcuse, [unveröff. Ms., 1947], zit. n. R. Wiggershaus, *Die Frankfurter Schule*, München 1987, 432, 435; G. Mayer, *Friedrich Engels*, Bd. 2, Berlin/W 1975; J. Miermeister, J. Staadt (Hg.), *Provokationen. Die Studentenbewegung in ihren Flugblattern*, Neuwied 1980; B. Rabehl, »Die antiautoritare Revolte«, in: Bergmann u. a. 1968; ders., »Dutschke als Denker«, in: Kuschey (Hg.) 1987; ders., *Am Ende der Utopie*, Berlin/W 1988; R. Reiche, *Sexualität und Klassenkampf Zur Abwehr repressiver Entsublimierung*, Frankfurt/M 1968; H. Schoondergang, ... *en toen kwamen de kabouters*, Leiden 1971.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 撰

张志超 译，赵敦华 审

参见：

Anarchismus, Anarchosyndikalismus, Antifaschismus, Antipsychiatrie, Arbeiterbewegung, Autorität, Befreiung, Charisma, Disziplin, Emanzipation, Etatismus, Frauenbewegung, Freudomarxismus, Führung, Gegenkultur, Guevarismus, Handlungsfähigkeit, Herrschaft, Institutionen, Internationale, Kritische Theorie, Kulturrevolution, langer Marsch, Linksradikalismus, Manipulation, Maoismus, Metropolen, Neue Linke, Rätekommunismus, Rätesozialismus, Revolution, Selbstverwaltung, Selbstverwirklichung, Sexpol, Staat, Studentenbewegung, Terrorismus, Trotzkismus, Utopie

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hismus）

1. 反法西斯主义是对“20 世纪 20 和 30 年代主要在意大利和德国蔓延扩散的法西斯群众运动”的一种回应。共产党将法西斯主义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统治的恐怖形式和一种垄断资本、金融资本反动集团的公开独裁，这些都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社会民主党则认为保持和发展民主条件才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就是因为这些在反法西斯战略上的分歧和相互间的成见，导致最终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去阻止德国境内“纳粹分子”的掌权。在法国抵抗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策（Volksfrontpolitik）中，在西班牙共和国保卫战中，以及德国发动战争后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运动中，数百万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斗争。面对法西斯野蛮行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反法西斯主义汇聚了民主的、反
327 资本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宗教的与和平的主张。反法西斯共识的范围从共产主义者到保守阵营中的希特勒反对者（Hitlergegnern）。其中最基本的共同点和最高目标就是去消除在被占领国家中的法西斯外来统治和德国的纳粹政权。在此目标下形成了由不同方式和不同观念组成的、不断进行的坚定反法西斯联盟运动。

在与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反法西斯主义表现出一种对自由和平世界的期望，这种期望在 1945 年 4 月 19 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的誓言中得到体现：“我们在不同的国家同时进行着艰苦残酷的斗争，出现了不计其数的受害者。但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纳粹的旗帜还在飘扬，杀害我们同伴的凶手依然活着并逍遥法外。因此，面对法西斯暴行，我们向全世界宣誓：我们不会放弃战斗，直到国际法院审判完最后一个罪犯。我们的口号是纳粹的最终毁灭，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界。”（*Ernst Thapes Buchenwalder Tagebuch von 1945*，参见 Overesch 1981，第 658 页）

1945 年后，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依然长时间存在着一种超越党派界限的反法西斯共识。当苏联占领区（SBZ）/ 东德（DDR）将反法西斯主义作为宪法性要素时，当它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利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时，在冷战时期的西德，反法西斯主义概念遭到了否定。直到之后的学生运动在西德再次提出这个概念，并将其理解为一种抗议资产阶级国家的表达，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本身蕴藏着法西斯结构回归的可能性。

2. 在匈牙利白色恐怖后，以及在意大利通过与传统精英（来自国王和军队

方面）达成协议而上台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掌权后，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KKI）开始处理这些新现象。因此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提问道，要如何才能做到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还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打败法西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她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铁板一块无法分割，所以她认为应该去重新赢回被法西斯主义所掌控的社会阶级的支持，并提到让这些“阶级要么加入我们的战斗，要么
328 就在斗争中至少保持中立状态。这些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23，第723页）。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应该致力于去克服阶级统治最高级和最终的形式——法西斯主义，并同时为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铺平道路。（同上书，第727页）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关于列奥·施拉格特（Leo Schlageter）的讲话中提到了共产党人的任务，即在反法西斯的政治斗争中提出国家问题，并为“深受苦难、内心撕裂、寻求民族统一的德国民众寻找出路”（1923，第275页）。

“社会法西斯主义”口号。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关于法西斯的决议》（*Resolution über den Faschismus*）中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称为“是大资本主义专政的武器上的正反两面”（*Komintern und Faschismus*，第124页）。这种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Sozialfaschismustheorie）导致了一个狭隘的、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反法西斯战略，在这个战略中彻底排除了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因为它将社会民主党定位为“从来都不是无产阶级抗争法西斯主义的可靠盟友”。对于斯大林来说，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法西斯的组织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相辅相成（W 6，第252页）。总之，反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概念，其针对的不仅是法西斯党派和组织，而且也包括资产阶级国家和支持它的政治力量。在1930年9月14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纳粹党]）赢得选举后，德国共产党（KPD）所倡议的基于无党派、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反法西斯斗争联盟应运而生；1931年，该联盟已经有超过十万名成员。在反法西斯立场上的矛盾体现在了1930年8月24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德国民众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公告》中，该公告要求劳动者和纳粹主义进行彻底地决裂，即要求所有与“叛变的社会民主党”联系的工人们，来“和共产党人一起组成革命战线，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引自 Weber 1963，第64页）

正当纳粹运动不断扩张之时，反法西斯主义的定位，即想要发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一个近似于改良主义、法西斯主义专政的苏维埃式专政，

阻碍了一个广泛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共产国际（Komintern）强调了他们的上述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并在 1931 年以后继续否认资产阶级民主（bürgerliche Demokratie）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区

329 别。——在与纳粹分子的联合行动中，主要是指德国共产党（KPD）、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和头盔党（Stahlhelm）在 1931 年夏联合发动了旨在罢免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普鲁士政府的公投，以及在 1932 年 11 月柏林公共交通公司（BVG）的罢工中，旨在反对希特勒运动的行动（die gegen die Hitler-Bewegung gerichteten Aktionen）被中止并且声名扫地。相反，1932 年 5 月以来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士参与到了反法西斯行动中，形成了一种谨慎的无党派合作来反对不断壮大的冲锋队恐怖统治。（SA-Terror）

3. 当共产国际反复强调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时，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在 1926 年就已经看到反法西斯联盟的范围和有效性取决于能多大程度上接受其他盟友的利益（*Südfrage*）。然而，这种包括尊重盟友的独立在内的多元化观念却被忽略了，法国共产党曾对过度使用法西斯概念——在资产阶级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反动行为中过度使用法西斯概念——提出过警告。

由于社会民主党在“专制独裁有利于大资本”的认识基础上采取了“宽容的反法西斯政策”，使其无法阻挡布吕宁（Brüning）领导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崛起。（Abendroth 1976，第 122 页）面对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提出的要尽一切努力去扩大反法西斯阵线（即将所有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与法西斯有矛盾的力量统统包括进来）的劝告（1931，第 309 页），社会民主党（SPD）置若罔闻。由于共产党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也排除了和共产党的联合行动。而且，左翼社会民主党还明确质疑了德国共产党（KPD）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扮演领导者的角色（Gurland 1931，第 131 页）。社会主义工人党（SAP）指责德国共产党（KPD）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一种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路线（表现在建立共产主义方向的革命工会反对派［RGO］）。总之，一种希望建立民主共同防御的尝试在社会民主党那里遭到了失败，因为魏玛民主已经被其他党派所抛弃或者是遭到了反对，大家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全面的社会民主化。

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由于在 1928 年批评共产国际极左政策而被驱逐出德国共产党。他和亨利希·布兰德勒共同建立了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D-

330 Opposition）。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拿破仑三世波拿巴政权中形成的标准，来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和结构。由此他认识到，资产阶级已经放弃了政治权力（是为了继续维护在社会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要想在政治层面整合所有其他社会阶级，就需要一个新的反法西斯概念，通过这个概念能够将魏玛共和国中的、在逐步法西斯化过程中受到威胁的所有人包括进来。不过，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对这个“与改良派组织共建一个真正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引自 Wippermann 1981，第 116 页）的要求做出任何回应。另外，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等人也赞同将波拿巴主义模型作为分析法西斯统治结构的模型。

马克斯·霍克海默（1939）、恩斯特·布洛赫（1935）和威廉·赖希（1934）认为，只有不再局限于从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角度去分析法西斯主义，才可能实现一个成功的反法西斯战略。因此他们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如反犹太主义、法西斯宣传等问题元素，而是社会心理和国家心理层面所产生的影响。不过他们的政治影响非常小，他们既不是社会民主党员，也不是德国共产党成员。

在纳粹掌权后，德国共产党（反对派）认为当无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专政垮台”后，“资产阶级民主”将不会被重建。这一点和经历德国工人运动彻底失败后的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尤其吻合，他们呼吁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瓦尔特·罗文海姆（Walter Löwenheim）在其著作《新开始！法西斯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参见 Klotzbach 1974，第 81 页）中批评了在魏玛共和国中继续相信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他主张在法西斯主义倒台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并且有必要将所有政治权力集中到这个党内。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Friedrich Stampfer）也提到要用“革命的、反法西斯的专政”来替代“法西斯专政”。（Matthias 1968，第 193 页）

社会民主党的国外领导层（Auslandsleitung der SPD）也呼吁建立“一切反法西斯层面上的战线”，因为“工人阶级的统一”已经成了一种“威胁”（Zwang）（同上书，第 216 页），其已经在“创造自己的历史”。1935 年 11 月，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之间依然没有就联合行动达成协议，因为共产国际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而社会民主党则依然坚信自己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党”。（同上书，第 250 页）为了应对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社会民主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提出了战胜“在德国的法西斯极权国家”的政治革命和“重建民主 331

自由的法治国家”的政治革命。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保持社会民主党的自由性，并将所有德国的反对派集中到一起共同为恢复德国的欧洲文明而战斗”（Klotzbach 1974，第 308 页）。

希特勒掌权后，巴黎出现了一些地方性的倡议，旨在建立由两个法国工人党组成的共同反法西斯阵营，来阻止亲法西斯组织的扩展。在“火十字”和其他极端纳粹组织的大规模游行后，1935 年 2 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之后的自由激进民主党组成了一个防止法西斯夺权的统一战线。

直到德国、奥地利的工人运动以及法国人民阵线失败后，1935 年夏在第七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才对之前背道而驰的反法西斯政策进行了部分地纠正。格奥尔吉·迪米特罗夫（Georgi Dimitroff）致力于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人民阵线，以此来保卫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并预防新的战争发生。总之，共产党开始了重新战略定位。但由于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功能定位为“最反动的独裁，最沙文主义、最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要素”（1935，第 50 页），从而导致新战略定位的局限性。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将工作方向对准了包括冲锋队和党卫队在内的法西斯群众组织。他们希望通过全国性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口号和形式，来重新赢回追随纳粹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支持。

随后在莫斯科附近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会议（即所谓的布鲁塞尔会议），以及 1939 年初在巴黎附近召开的所谓的伯尔尼会议，进一步加速了上面这些调整。不过，广泛的“人民阵线”（Volksfront）概念与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后阶段出现的“人民革命”（Volksrevolution）概念（致力于建立“苏维埃式德国”）有着明显的区别。共产党的首要要求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公民权利的民主要求——组织和集会的自由、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宗教和信仰的自由。（参见 Mammach 1974，第 134—135 页）

当佛朗哥领导西班牙军官对马德里政府发动政变，并收到来自意大利和德国大量慷慨援助时，来自 54 个国家的 3 万多名志愿者共同团结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这个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在内战中被击败，因为得到意大利和德国大力支持的叛乱分子在数量和武器技术上占据了优势。但不只是这个原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群体不仅出现了内部分裂，还遭到了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派和反共主义者的迫害，这些都显示出共产国际青睐的、深受苏联领导层影响的人民阵线战略存在着根本缺陷。

法国流亡人士尝试联合不同政治阵营成员加入德国人民阵线运动的努力在 1938 年落空，因为德国共产党还没准备

好去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通过共产党实施了对左派社会主义团体的迫害，从而使得其他左派社会主义团体很大程度上心灰意冷。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最终结束了人民阵线政策。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谨慎，从而使法国抵抗运动变成了群众运动。直到1943年5月在**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Résistance*）中，包括共产主义组织在内的所有反抗组织才真正实现了联合。

20世纪30年代，来自意大利不同党派的反法西斯者在海外举行了代表大会，并对后法西斯时代做出了相应规划。意大利抵抗行动主要通过一个联合起来的抵抗组织来执行。尤其在国王和巴多格里奥（Badoglio）元帅罢黜墨索里尼后，反抗行动在许多省份促进了许多自发的、自我解放的群众运动。

4. 在德国反对纳粹的抵抗中，很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遭到不同政治阵营敌视的政治小团体聚集在了一起。在马丁·布罗斯策特（Martin Broszat）（1986）所写的《反政权的反抗共同体》中指出反抗共同体“重建了一个基督徒、保守派和共产党之间的共识框架”。而且其在1945年之后短暂地存在于自发组建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中，但很快被占领国宣布无效。因为，他们所支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思想并不符合战胜国的民主思想（参见 Niethammer 等 1976）。

早在波茨坦协议中，同盟国就已经明确了战后的规划，主要是战胜纳粹和重新开始构建民主。其中包括：彻底摧毁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社会基础，剥夺并惩办纳粹和战争犯，确保战后赔偿，以及确保民主的发展。苏联占领区则青睐于一种由苏联控制的反法西斯民主的秩序。总之第一阶段就是使不同阵营的政党重新展开工作。于是各个政党在反法西斯民主上达成的共识成功起到了清除纳粹主义表现形式、清除纳粹分子与战争犯和打扫战后废墟的作用。年轻人则在这次反法西斯合作中收获了相互信任和一种新的人生观。反法西斯主义成了一个道德制度，通过它可以表现出自己与纳粹时期彻底决裂的立场。

不过，一种民主合作的新政治文化，即能够包容分歧和拒绝采取镇压方式的政治文化，并没有产生。因为这种多元化机制和苏联的斯大林制度是不相容的。斯大林主义直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所实行的反法西斯主义不时地让人联想起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共产国际对外的敌对形象。

但反法西斯秩序所提倡的内容和重新开始的主张对从流亡中归来的知识分子

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许多移民返回到了东部，因为他们想参加反法西斯的社会革新。恩斯特·布洛赫、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斯蒂凡·赫尔姆林（Stefan Hermlin）、斯蒂凡·海姆（Stefan Heym）、汉斯·迈尔（Hans Mayer）、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阿尔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等对这种精神氛围的构建产生了影响，并对在纳粹时期长大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很多人都将其中的人道主义和反法西斯内容作为自己的准则（参见 Berger 1990）。反法西斯主义同时也包含了战后重建的概念和对反法西斯者、法西斯受害者的纪念。不仅如此，反法西斯主义还明确支持了社会改造，以此作为从德国错误道路中所吸取的教训。上述这些重大改革都体现了对纳粹主义灾难的回应。这种社会改革表明了对纳粹主义、战争犯罪和军国主义的坚决对抗。由此在苏联占领区 / 东德，反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构成要素，但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在任何时刻都将苏联政策作为自己反法西斯政策的目标。

20 世纪 40 年代末在苏联占领区，最初团结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措施变得越来越狭隘化和工具化。希特勒反对者如雅科布·凯泽尔（Jakob Kaiser）等人在冷战初期就被怀疑成了“法西斯主义者”（Faschisten），而且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反抗被认定是纳粹政策（NS-Politik）的一种延续而被取消资格。反纳粹共识在很长时间内被其他团体所拒绝，如受到禁止和迫害的耶和华见证人（den Zeugen Jehovas）、洛马和辛提人（Roma und Sinti）、同性恋团体（den Homosexuellen）、逃亡者和其他仍被视为法西斯受害者的群体。此外，一些西方移民者被怀疑为间谍，个别共产主义的抗联战士在 20 世纪 50 年代遭到了逮捕或者被剥夺了其职位。（Leo 1992，第 143—144 页）——50 年代中期，来自苏联古拉格的德国幸存者大多都来到了东德。他们以法西斯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社会地位，但不允许讨论斯大林的罪行。（Wittich 1991，第 657—658 页）

334

在西德，前纳粹分子开始再次进入公共生活，他们的声誉得到了恢复；对纳粹和战争犯的判决十分缓慢，对之前所犯罪行保持缄默。在上述种种背景下，反法西斯主义给生活在东德的、与纳粹政权彻底决裂的公民带来如下感觉，即他们所生活的德国地区已经从纳粹时期中吸取了正确的教训。纳粹和战犯在这个国家不再会有机会。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在这里不再可能复发，因为它们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被消除。

德国统一社会党不断利用反法西斯抵抗斗争来实现自己领导地位的合法化。因此，东德十分看重这段历史，并

335

通过和西德的鲜明对比来凸显自己作为西方对立面的身份。战俘营中的红色三角形成员（das rote Dreieck）（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共济会员、无政府主义者。——译者）和共产主义的抵抗被视为反抗纳粹政权的缩影，而其他抵抗组织和人员则很少被研究和肯定。1953 年初，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将纳粹体制受害者协会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组织，并将反法西斯抵抗战士委员会置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之下。在东德，对法西斯政权的反对，由原来作为批评政权的工具逐渐变成了实现统治和统治者合法化的工具。纳粹时代的巨大创伤，使得即使在东德的反对者中也能找到忠实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如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或者沃尔弗冈·哈里希。这些都使得，对既是反法西斯国家又具有斯大林主义结构的东德的研究就变得更加复杂。

法西斯时期一直以来都是艺术讨论的一个主题。作家如安娜·西格斯、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斯蒂凡·赫尔姆林、海因茨·波勃罗夫斯基（Heinz Bobrowski）、迪特·诺拉（Dieter Nöle）、麦克斯·瓦尔特·舒尔茨（Max Walter Schulz），画家如弗里茨·克里默（Fritz Cremer）、胡贝尔图斯·盖博（Hubertus Giebe）、海因茨·海西希（Heinz Heisig），导演如康拉德·沃尔夫（Konrad Wolf）、海涅尔·卡洛（Heiner Carow），音乐家如汉斯·艾斯勒、乌多·戚美尔曼（Udo Zimmermann），以及许多其他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的艺术家，并且他们的知名度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东德。除此之外，无数的纪念场所被开放，大量学校、街道和广场都以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名字命名。尽管其中很多行为带有政治工具化的目的，但所有这些还是都被公众所接受，被公共意识所接受。即使 20 世纪 80 年代（反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渐行渐远，反法西斯主义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民权运动的团体（Gruppen der Bürgerbewegung）再次采纳反法西斯主义的主题后，对东德右翼极端团体进行了分析，并质疑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反法西斯主义话语体系的垄断。在转折时期，主要旨在革新东德的新政治运动建立了反法西斯的目标。

5. 尽管已经将反法西斯的基本共识纳入到基本法中，但处于东西方对抗时期的西德还是将“反法西斯主义”视为 336
一个负面的政治范畴，认为有人故意利用这个概念来尝试瓦解当时的反共主义。当许多前纳粹分子尤其是精英，没有因为他们的纳粹罪行而被定罪，或者对他

们的审判进行了推迟和选择性处理时，纳粹政权的反对者却在冷战期间一次又一次地被送上了法庭，反法西斯组织如纳粹体制受害者协会就受到了宪法保卫局（VVN）的监视，并且在一些联邦州遭到了一段时间的禁止或被认为是应该要禁止的。

直到学生运动再次将反法西斯概念作为其主题来反抗父权制，并将其和西德的社会批判联系在一起。当时已经逐渐形成一种认识，即批判之前缄默历史的行为是了解当前世界的前提。于是出现了许多倡议，如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区域性研究和为纳粹时期的受害者建立新的纪念场所。艺术家们用他们的书籍、电影、图画、雕像和歌曲来反对缄默历史。彼得·魏斯的《抵抗的美学》（*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引发全社会对德国工人运动期间反法西斯主义缺陷的讨论。

对于资产阶级中所使用的“反法西斯主义”一词，其代表的并不是真正地去分析法西斯主义社会经济根源。W. F. 豪格（1967）创造出了“无助的反法西斯主义”（hilflosen Antifaschismus）一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当“纳粹主义”现象在很多场景下被视为“野蛮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有意忽视了纳粹主义的阶级基础和构成纳粹国家的利益联盟；尤其通过强调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标语来转移视线。

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 Weizsächer）在 1985 年 5 月 8 日的讲话中树立了自由主义的反法西斯主义标志。1986 年和 1987 年的“历史学家论争”证明，相对于正在形成的中间的民族保守势力，较左的反法西斯主义更具霸权（参考 Haug 1987，第 200—254 页）。

为了应对来自右翼极端政党和种族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的潜在威胁，反法西斯联盟（Antifaschistische Bündnisse）得以成立。尽管其反复明确表示对种族主义和新纳粹主义的反对立场，但还是未能及时发现这些主义对民主和民主发展所造成的伤害，直到事后才察觉。

为了摆脱反法西斯主义，反对者主要尝试了如下方式，对反法西斯抹黑（BMI 1990），或者集中攻击反法西斯的缺点和历史上的不足，以及不断减弱其历史性的地位，甚至宣称它是一个会招致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源（Grunenberg 1993）。

反法西斯主义将继续保持其在对抗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地位。这不仅关系到它的历史地位，还关系到其在当前世界的视角，即当前世界是一个被右翼民粹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所危害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不断增强的世界。

“一个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维度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反对法西斯主义。”（Haug 1993，第 349 页）为了捍卫普世人权和民主的公民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和民主共识。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Ein Leb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Gespräche aufgezeichnet und herausgegeben von B. Dietrich und J. Perels*, Frankfurt/M 1976; *Die Antifaschistische Aktion. Dokumentation und Chronik Mai 1932 bis Januar 1933*, Berlin/DDR 1965; C. Berger, *Gewissensfrage Antifaschismus. Traditionen der DDR-Literatur*, Berlin/DDR 1990; Th. Bergmann, *50 Jahre KPD-Opposition*, Hannover 1978;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WA 4, Frankfurt/M 1962; P. Brandt, U. Schulze-Marmeling (Hg.), *Antifaschismus. Ein Lesebuch. Deutsche Stimmen gege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Rechtsextremismus von 1922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W 1974; *Brauchen wir einen neuen Antifaschismus?*, Argument 200, 35. Jg. 1993; M. Broszat, »Widerstand«, in: *Süddeutsche Zeitung*, 22./23. 11. 1986; Bundesminister des Inneren (BMI), *Texte zur Inneren Sicherheit, Bedeutung und Funktion des Antifaschismus*, Bonn 1990; G. Dimitroff, »Die Offensive des Fasch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Kommunisten im Kampf für die Volksfront gegen Krieg und Faschismus. Referat auf dem VII. Weltkongreß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2. August 1935)«. In: *Gegen Faschismus und Krieg.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Leipzig 1982, 49-136; A. Grunenberg, *Antifaschismus – ein deutscher Mythos*, Hamburg 1993; A. Gurland, *Die proletarische Aktion. Das Heute der proletarischen Aktion. Hemmnisse und Wandlungen im Klassenkampf*, Berlin 1931; W. F. Haug, *Der hilflose Antifaschismus*, Frankfurt/M 1967 (wieder in: ders., 1987, 29-158); ders., *Vom hilflosen Antifaschismus zur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1987), 2., erw. Aufl., Hamburg 1993;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in: *ZfS*, 8. Jg., 1939, 115-137; K. Klotzbach (Hg.), *Drei Schriften aus dem Exil*, Berlin/DDR 1974; *Komintern und Faschismus 1920-1940. Dokumente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Faschismus*, hgg. v. Th. Pirker, Stuttgart 1965; A. Leo, »Antifaschismus und Kalter Krieg«, in: *Mythos Antifaschismus*, aaO., 143f; K. Mammach (Hg.), *Die Berner Konferenz* (30. 1.- 1. 2. 1939), Berlin/DDR 1974; E. Matthias (Hg.), *Mit dem Gesicht nach Deutschland.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sozialdemokratische Emigration*, Düsseldorf

1968; *Mythos Antifaschismus. Ein Traditionskabinett wird kommentiert*, Berlin 1992; P. Nenni, »Trotzki und der Fasch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1932, Nr. 1 303-309; 338 L. Niethammer, U. Brosdorf, P. Brandt (Hg.), *Arbeiterinitiative 1945. Antifaschistische Ausschüsse und Reorganisatio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Wuppertal 1976; M. Overesch, »Ernst Thapes Buchenwalder Tagebuch von 1945«, in: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29. Jg., 1981, H. 4, 631-672; W. Pieck, G. Dimitroff, P. Togliatti: *Die Offensive des Fasch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Kommunisten im Kampf für die Volksfront gegen Krieg und Faschismus. Referate auf dem VII. Kongreß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35*, Berlin/DDR 1957; K. Radek, »Leo Schlageter, der Wanderer ins Nichts«, in: K. O. Paetel, *Versuchung oder Chance? Zur Geschichte des Nationalbolschewismus*, Göttingen 1965; H. Weber (Hg.),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Dokumente*, Köln-Berlin/W 1963;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Frankfurt/M 1981; R. v. Weizsäcker, *Zum 40. Jahrestag der Beendigung des Krieges in Europa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herrschaft. Ansprache am 8. Mai in der Gedenkstunde im Plenarsaa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Bonn 1985; W. Wippermann, *Zur Analyse des Faschismus. Die sozialdemokra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Faschismustheorien*, Frankfurt/M 1981; B. Wittich, »Interdependenz von Antifaschismus und Stalinismus i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SED und der DDR«, in: *Geschichte Erziehung Politik*, 2. Jg., 1991, 657-667; C. Zetkin, »Der Kampf gegen den Faschismus. Aus dem Bericht auf dem Erweiterten Plenum des Exekutivkomite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20. Juni 1923)«, in: dies.,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d. Ⅱ (1918 bis 1923), Berlin/DDR 1960.

汉斯·科皮（Hans Coppi）撰
盛舒洋 译，张志超 校
赵敦华 审

参见：

Antisemitismus, Arbeiterbewegung, Auschwitz,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Bonapartismus, Brandlerismus, Bündnispolitik, Einheitsfront, Entnazifizierung, Etatismus, Faschismus, Finanzkapital, GULag, Hegemonie, Herrschaft,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Kalter Krieg, Legitimation, Nationalismus, Populismus, Putsch, Rassismus, Solidarität, Sozialfaschismus, Spanienkrieg, Stalinismus, Studentenbewegung, vergessen/erin-

nern, Volksfront, Widerstand, Widerstands-ästhetik, Zionismus

反意识形态（Antiideologie）

1896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入门”著作里宣称：“我们的学说已经一劳永逸地克服了一切意识形态视角。”这套学说从其创立的动机出发，完成了同意识形态的决裂。当然，这种决裂和拿破仑的决裂并不一样。拿破仑以被他贬称为知识分子中的“轻浮分子”的“意识形态家”（又译为“空论家”。——译者）的名义，迫害了对他的独裁指手画脚的行为，例如，当这些“意识形态家”批评他和天主教教会达成的协议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参见 Head 1985 和 Haug 1993，Kap.1）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理论问题的那一章里，马克思在意识形态概念中增加了两种意涵：社会现实的颠倒的表现和统治关系再生产的颠倒的表现。马克思的批判统治关系的整个社会分析工程必须在这两重意义上，被理解为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任何论述都不能够被解释为，只是要对各种意识形态形式中的内容进行替换，而是要在扬弃阶级统治及其再生产形式的过程中扬弃这些形式本身。就此而言，一切“正统”马克思主义“**从定义上说**”都必须是“反意识形态的”（Muñoz 1978，第219页）。

然而，在1889年7月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就提到了“我们的革命**意识形态**”（*Erbe* 8，第86页，引自 Jena 1989，第67页）。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认同不仅仅在俄国思想传统中被颠倒过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党内官方代表（不管是奥托·鲍威尔还是列宁）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意识形态。

俄国革命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解放了各种革命的（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思想倾向：无神论和（在自由恋爱和妇女全面解放条件下的）世俗家庭引起的神圣家族的倒台（Alexandra Kollontai），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反艺术，反说教。所有这些思想倾向都蕴含着反国家的萌芽。然而，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成了麻烦。列宁对复杂混乱的革命思想进行了纪律化整顿。

就在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官僚的世界里存活下来的各种原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而言，它们会在理论和艺术上表现出二重反意识形态：一方面以对抗的方式反对旧的意识形态权力，另一方面以改革的和内省—批判的方式

339

反对新的意识形态权力（参见哈费曼［Havemann］对“永恒真理总部”［简称为 HEW］的嘲讽，比尔曼［Biermann］在民主德国时代创作的歌曲，等等），直到渐渐不再相信政治官僚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有改良的可能性。

首先，作为戏剧作家和理论家，布莱希特出于马克思思想的反意识形态的
340 基本动机，发展了他的美学理论和实践。正如布莱希特借用《买黄铜》（GW 16）里的“舞台上的哲学家”形象所表现的那样，他的陌生化概念应当以反意识形态的方式改变戏剧意识形态权力的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布莱希特主要在平民的表达形式中发现了支撑点，他将这些表达形式同智识的反思联系起来了（比如在 *Flüchtlingsgesprächen*，GW 14 中）。他的也许最重要的素材——它帮助他完成了转变，他还从它那里学习了一种语言风格——是由格里特·赖纳斯（Grete Reiners）译为德语的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w Hašek）的小说《好兵帅克》（*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这个译本把布拉格犹太人的小城德语变成了一种同一切意识形态艺术相对立的平民艺术语言（参见 Brecht 的 *Schwejk im Zweiten Weltkrieg*，GW 5）。此外，布莱希特还塑造了文学形象“图伊”（*Tui*）（源自 Telle-kt-Uell-In［该词是布莱希特从 Intellektuelle 中转化生造出的。——译者］），即作为御用文人为统治权力和金钱效劳的意识形态家。（*Tui-Roman*，GW 12；*Turandot oder Der Kongreß der Weißwäscher*，GW 5）

汉斯·艾斯勒也属于同一流派。他作为勋伯格（Schönberg）的弟子，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把报纸上的广告用作所谓反歌曲（Anti-Lieder）的歌词。后来，艾斯勒凭他的“反笨蛋音乐”（Musik gegen die Dummheit），发展出了一种被视为反意识形态的音乐美学，尽管他并没有回绝表现国家美学的要求（指他创作了《民主德国国歌》、《列宁追思曲》）。“当我们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时，要像平民一样行事，也就是说，要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行事。”（*Gespräche*，第 101 页）他的一部被看作戏剧脚本的作品《约翰·浮士德》（*Johann Faustus*）——这部作品成为民主德国的国家歌剧，而其创作却遭到了党的意识形态家的阻挠（参见 Haug / Völker / Zobl 1978）——表现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他向“农民战争”中残忍的胜利者出卖了革命农民，从而也出卖了自己的思想。

为了突出平民反意识形态的态度，艾斯勒从木偶剧《浮士德博士》（*Doktor Faustus*）中提取了香肠汉斯（Hans Wurst）这个形象。香肠汉斯是英国的腌鱼赫林（Pickle Herring）和法国的肉汤让（Jean

Potage）的德国兄弟。从这类民间英雄的名字可以看出，香肠汉斯是一位平民英雄，他关注的是吃喝等尘世的享受。在德语中，“香肠”已经成为用于表达微不足道的事物的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它主要是为了说明比较高尚的价值，如祖国、战争、英雄气概等，对于一个人来
341 说只不过是“香肠”（即无关紧要的事物。——译者）。所以说，这种平民英雄是反意识形态的。他的智慧在于把向上帝的祈求变成俗世的事情，这通常意味着：变成区区小事。他依据实实在在的利益行事。艾斯勒现在证明，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抵抗统治关系的一个有局限的形式。那些妨碍香肠汉斯接受“高尚价值”的东西，也能让他远离社会纷争。这一点从原则上把哈谢克的另一种方式的反意识形态英雄帅克（Schwejk）同香肠汉斯区分开来了，但观众偶尔还是会简单地把两者混为一谈。香肠汉斯这个名字代表着一种颠覆性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尘世的种种享受就获得了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像帅克那样的情形，因为这些享受对于帅克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哈谢克作品里的人物自身而言的“没有意义”和对于布莱希特作品里的人物自身而言的“没有意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尽管其他思想流派创设了一种中立的意识形态概念（参见 Pietilä / Koivisto 1993），但这也同样涉及意识形态批判和意识形态理论。对批判错误意识的强调只是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才存在，而意识形态理论则把特定实践和行为安排的意识形态效应置于中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识形态理论工程”（PIT）在理论方面采取了反意识形态的视角，尤其是在其关于纳粹时期意识形态统治关系再生产的研究中。西尔克·文克（Silke Wenk）认为，纳粹主义的艺术—政治话语的主要特征，是以反—反意识形态作为突破的方向：“纳粹的目标是反对 20 世纪 20 年代的各种思想倾向，也就是说，反对理想化，反对艺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形式，反对艺术感受的神圣形式”；纳粹致力于把“作为反日常生活的‘艺术’嵌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以便在日常生活本身中，发出更高的意识形态主管机关的信号”，同时，纳粹对意识形态进行修整，使之变得现代化。（PIT 1980，第 274 页）与此相反，文克强调“要把各种反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尝试、‘艺术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并把艺术从社会的彼岸接回来”（同上）。罗尔夫·内米茨（Rolf Nemitz）指出，被设立为市民社会中的“青年机关”的青年运动却不能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理论来解释，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反意识形态不适用于“对家庭、学校和教会的自上而下的实践批判”（同

342 上书，第 158 页）。维兰德·艾尔夫丁（Wieland Elfferding）推论说："有效的补救只能来自于另外一种反意识形态的实践。"（同上书，第 226 页）《意识形态理论大纲》（*Umrissen zu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为这种观点铺平了道路，在那里，利益导向和意识形态表达被看作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转向回避利益的价值。"（PIT 1979，第 185 页；Haug 1993，第 55 页）这个命题后来被校正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关联内嵌于对抗性的互动——"对于每一方而言，转向意识形态价值不但绝不是说要回避它们自身的利益，反而恰恰是试图实现这些利益。每一方都试图让它的对手以某种方式为那些价值效劳，而这就意味着，让对手回避它自己的利益。然而，在这种对抗性的互动过程中实际产生的东西，绝不是纯粹单方面的，而是取决于力量对比，取决于一整套的文化的和政治的条件以及实践。无论如何，让一个人陷入意识形态网络的，只能是对利益的追求。"（Haug 1993，第 88—89 页）与此相反，让·雷曼（Jan Rehmann）（1986，参见第 113—114 页，第 116 页及以下）以认信教会的例子证明，正是像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神学那样的特别"敬奉崇高的"神学，才能承担起抵抗纳粹意识形态的重任。

"反意识形态的祛魅的表现形式可能表现为平民的自我意识。但要是说，这样的表现形式具有一种不可改变的、确定无疑的政治意涵，从而，比如，反意识形态元素一定是革命元素，那就未免有些轻率了。"（Haug 1993，第 86—87 页）实际上，就好像如今来自"争吵口角"或青年抗议文化中的各种平民的立场一样，平民的食欲和"冷漠"的一切表现也都是矛盾的，只能在它们的抵抗形式中走向统治关系的垮台。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他关于英国青年工人的研究中证明了一种与此相应的自我裁定。嬉皮士的"**要做爱不要作战**"之类的表达，按照他们最终要在物质的或精神的毒品那里找到归宿的本意，也被解释成了"**要做爱不要革命**"。具体的意义绝不是一劳永逸地给定的东西，而是从对抗性的表达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意识形态的美化功能的批判可能会获得截然对立的含义。例如，尼采揭开了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和道德——的超然的面纱，343 剥去了它们神圣的外表；他甚至升起了无政府的黑旗：**什么都不禁止，一切都可以**。与此同时，他又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美化"形式——不是作为生产统治关系的形式，恰恰相反，是作为防止统治关系激进化的因素，即统治关系保卫弱者和受损者的功能。尼采批判的意识形态是天堂的映象，而不是这种意识形

态的从上至下的社会化的核心形式，即**统治关系**。他以近乎绝望和病态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统治关系的赞成。这使得他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圣人。

在尼采之后，海德格尔（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完善了“实实在在的没有良心”的道德（参见 1957，第 288 页），完完全全符合希姆莱（Himmler）在种族大屠杀期间以有些粗俗的方式为他自己及其党卫军领导人主张的那种权利。维尔纳·克劳斯（Werner Krauss）在谈到德国民族主义时说，它不仅瞄准了自由国家制度的靶子，“而且引起了人内心的政变。它将自己的议会状态的问题，连同这个饱受质疑的良心机关（Instanz des Gewissens）一起消灭掉了”（*Werke* 1，第 396 页）。反意识形态的进攻无法避免的结局是，在元意识形态（Metaideologie）这种新型意识形态中被扬弃。这种意识形态，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抵抗住了旧意识形态权力的危机而存活了下来。一旦反意识形态的动机或实践同统治关系批判——它是使这些动机和这些实践统一成一个整体的关键——相分离，它们就会再次落入意识形态的窠臼。

反意识形态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反意识形态意味着，它能够击退全体意识形态权力以及这样一个因素：这个因素自告奋勇，敢于重现那些处于危境中的东西，并在这些东西的支持下重新恢复它们的旧权力。另一方面，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反意识形态策略为了解放一些力量，就把这些力量置于支撑意识形态中的特定因素的周围。

因此，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属下阶层”（Subalternen）的主体性在实践中生成的观点同“政治—伦理的”以及“大众—民族的”改革联系在了一起（参见他同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与此相关的争论，载于 *Gef* 6，H. 10）。反意识形态在这里被转义为从属下阶层到管理能力的自我爬升。这样一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便足以和反意识形态目标的片面性和可能的错误结论相抗衡了。

参考文献： 344

J. Hašek, *Die Abenteuer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b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Berlin 1993; ders., K. Völker, M. Zobl, *Der Streit um Hanns Eislers »Faustus«*, Argument-Studienheft 8, 1978; ders., »Das umwerfende Einverständnis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in :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7-69; R. Havemann, *Rückantworten an die Hauptverwaltung »Ewige Wahrheiten«*, München 1971; B. W. Head,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Destutt de Tracy and French*

Liberalism, Lancaster 1985;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27), Tübingen [8]1957; D. Jena, *Georgi Plechanow. Historisch-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DDR 1989; W. Krauss, »Nationalismus und Chauvinismus« (1946), in: Werke 1, Berlin/DDR 1984; A. Labriola,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3; J. Muñoz, *Lecturas de filosofia contemporánea*, Barcelona 1978; *Das literarische Erbe G. W. Plechanows*, Bd. 8, Moskau 1940 (russ.; zit.: *Erbe* 8); V. Pietilä u. J. Koivisto, Nachwort zu Haug 1993;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W 1979, [3]1986 (zit.: PIT 1979); dass., *Faschismus und Ideologie*, 2 Bde., Berlin/W 1980 (zit.: PIT 1980); J. Rehmann, *Die Kirchen im NS-Staat. Untersuchung zur Interaktion ideologischer Mächte*, Berlin/W 1986;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张志超 译，赵敦华 审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narchismus, Antagonismus, Antiphilosophie, Antipsychiatrie, Artikulation, Atheismus, 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 Auschwitz,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in der Musik, falsches Bewußtsein, Familie, freie Liebe, Hegemonie, Herrschaft, Ideologen,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deologie-Theorie, ideologische Form, ideologische Mächte,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Kritik, oben/unten, Plebejisches, Schein, subversiv, Tui-Kritik, Unbewußtes, Verfremdung, Zweifel

反殖民主义（Antikolonialismus）

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基础，是承认所有民族都有权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和其他国家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这种权利是新生的：1945 年联合国成立时，它才被宣告为普遍权利。对这种权利的承认意味着，历史上能够表达共同意志的行为人彼此之间承认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群体等的统一性。因此，这场讨论要求人们确立一些标准。按照这些标准，集体的统一获得了拥有自决权的民族身份；为了尊重国际体系的规则，它还需要准确描述一个民族必须满足的条件。

对一个族群、语言群体或宗教群体——无论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全体，还是在另一个民族中间的少数民族——

的压迫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罗马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尽管压迫往往同某种形式的劳动剥削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有时可能并不以剥削为转移。不过，同经济理论和劳动剥削论相比，压迫理论从一开始就存在。政治理论和一般权力理论也是如此。

从 17 世纪的商业中发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大规模的殖民扩张为基础的。殖民扩张采取了五种不同的形式，每种形式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功能。（1）作为欧洲人新定居的殖民地 —— 不管它是在无人居住的地区，还是在住人较少的地区，也不管它是不是通过对当地生活的人民实施灭绝行径才得到的（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然后是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都是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的产物。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困的农民被赶出农村，引发了这种移民运动。在殖民地，移民又建立了一种不受任何封建枷锁束缚的小商品生产制度。美国革命为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最光辉的榜样。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鼓舞下，移民们迅速发起了与宗主国之间的独立战争。（2）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由于欧洲的重商主义，大大减少但还未灭绝的原住民先是矿藏被剥削，继而又是农业被剥削。就像巴西的情况一样，19 世纪初期这里的反殖民主义独立运动对伊比利亚人（即克里奥人）出身的当地统治阶级来说是一个机会。旨在反对衰落的宗主国垄断的运动得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蒸蒸日上的强权 —— 英国的支持。（3）殖民化的第三种形式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殖民地，其含义与奴隶剥削制度对剩余价值的压榨有关（安的列斯群岛、北美洲南部、巴西东北部）。在这里，反殖民主义采取了奴隶起义的暴力形式，其最杰出的代表是和法国大革命同期的海地。（4）对人满为患的亚洲大片土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346
的殖民化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融入了新的资本主义体系，并在 19 世纪发展成为农业初级产品的供应来源和宗主国制造业产品的销售市场。（5）最后，英国的海上霸权 —— 法国仅次于英国 —— 促成了遍及全世界的海外贸易据点网络。

柏林最终议定书（Die Berliner Schlußakte）（1884—1885 年）是一次新的殖民掠夺浪潮的预演。若干年后，这次浪潮导致对非洲的瓜分。同时，古老的亚洲国家（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事实上已经沦为了“半殖民地”（Halbkolonien）。现代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这时已经成型。这种意识形态试图用西方的“文明开化使命”为自己辩护。

帝国体系受害者的反击并没有姗姗来迟：19 世纪末期就涌现了一些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对外反对

帝国主义，对内主张社会政治改革。经由这种运动的铺垫，现代反殖民主义诞生了。它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促成了对国际法的承认，在万隆会议（Konferenz von Bandung）（1955 年）之后又加快了整个去殖民化进程，特别是非洲的去殖民化进程。

可见，殖民是一些时期特有的现象。在这些时期，各个宗主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相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17 世纪和 18 世纪是英国和法国对抗的时代；从 1880 年到 1945 年则是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国家互相冲突的时代。与此相对的是，拥有霸权的强国在其真正运用这种霸权的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对英国来说是 1815 年至 1870 年之间，对美国来说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捍卫了对所有竞争者开放世界的原则（19 世纪时是自由贸易；今天则是自由企业）。这个原则是和对国家独立性的形式上的承认完全一致的。

因此，殖民主义同更具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的不平衡现象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以中心和边缘的两极分化为标志的。我们决不能把这种两极分化归结为它从 1880 年至 1945 年这段时间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式。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的现象，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发展阶段，从开始到现在。

尽管殖民形式看起来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它还存在于两种情况下：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定居运动的殖民化对这块土地提出了权利要求；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剥夺了非洲裔多数人的民族权利。这些形式之所以能存续下来，是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进帝国主义的全球策略中去了。 347

启蒙哲学生发了最初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国大革命走向激进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达到了同海地起义团结一致的地步。后来，欧洲的自由左派甚至工人运动（第二国际）的主流思想都放弃了反殖民主义。后者走得更远，居然为“客观上进步的”殖民化行径辩护。在这个层面上，列宁同第二国际的决裂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打下了基础，这种国际主义能够让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与边缘地区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联合起来。这个目标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任务。

针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原则上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的（antineokolonialistisch）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化和俄国在波兰的殖民化造成的腐败后果：“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解放自身。”（MEW 18，第 527 页）尽管后来第二国际转向了支持殖民主义的立场，但是列

宁在 1917 年提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Imp*，LW 22，第 189 页及以下）。在这个理论中，列宁把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垄断地位的形成同殖民瓜分、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工人贵族”的腐化联系在一起论述。在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1920 年 9 月在巴库举行）之后，第三国际开始号召西方的工人阶级同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各民族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指出，抵抗英国侵略的阿富汗埃米尔从客观上说要比在工党中组织起来的、支持其帝国主义统治者的英国工人更具有进步性。在万隆会议（1955 年）后，正是凭借着亚非解放运动和从这种解放中产生的激进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的各个国家的支持，苏联终于打破了它自 1917 年以来由于被西方列强封锁而形成的孤立地位。随着苏联的解体，历史的这一页也就翻过去了：在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新生的俄罗斯加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阵营。

348

狭义的殖民化体现为一定时期的特殊现象，而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对立却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从一开始就固有的现象。但是，对于这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世界两极分化的原因和机制及其对于政治活动的影响的分析，却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正如整个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历史唯物主义或许也低估了这种两极分化。它凭着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展望，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各国资产阶级将确保生产力的发展，并通过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使全世界达到同样的阶级斗争条件，从而完成其历史使命。与此不同的是，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阐述了这样一个主张，即资本的再生产要求资本向资本主义以前的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扩张。虽然列宁拒绝了这种理论观点，但他确认了发展存在不平衡，并按照他的“最薄弱环节”理论（Stalin，*FL*，第 32 页；参见 Lenin，LW 27，第 265 页及 LW 5，第 521 页），指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体系的边缘地区开始。

“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实践，必须按照刚才建议的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的分析，予以重新审视和批判。面对这种两极分化的不堪忍受的后果，各个处于边缘的民族响应号召，举行了抵抗活动，反对服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两极分化逻辑。在俄国革命之后，中国、越南和古巴提出了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毛泽东的“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理论（1940，AW 2，第 395—449 页）对这种策略做了系统总结。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想的另一极，1955 年后的苏联理论界致力于支持万隆时期

（1955—1975 年）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这种实践在一些人看来是机会主义的和没有效果的，例如，切·格瓦拉就认为，边缘各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不可能超过由世界资本主义强加的依附化（“买办化”[compradorisation]）。

349 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从世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必然同样是全球性的）过渡的整个理论。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属性是以创新的方式把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以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S. Amin,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Critique de la théorie de sous-développement*, Dakar-Paris 1970 (teilweise dt. in: *Neuere Beiträge zur Imperialismustheorie*, Bd. 1, München 1971); ders., *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 Essai sur les formations sociales du capitalisme périphérique*, Paris 1973; ders., *Classe 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et la crise contemporaine*, Paris 1979; N. I. Bucharin, *Imperialismus und Weltwirtschaft* (1915/1918), Berlin 1929; A. Emmanuel, *L'échange inégal. Essai sur les antagonismes dans l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ux*, Paris 1969; A. G. Frank, *Le développement du sous-développement*, Paris 1972; ders., *Abhängige Akkumulation und Unter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80,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1929), Frankfurt/M 1967; G. Haupt, M. Löwy, C. Weill, *Les marxistes et la question nationale 1848-1914. Études et textes*, Paris 1974;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1910), Frankfurt/M 1968; J. A. Hobson, *Der Imperialismus* (1902), Köln-Berlin/W 1968; I. M. Wallerstein, *Das moderne Weltsystem.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elt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86; ders., *Der historische Kapitalismus*, Berlin/W 1984.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撰
让·雷曼 译为德文
张志超 译

参见：

Abkopplung, Arbeiteraristokratie, Aufklärung, Ausbeutung, Bauernbewegung, Befreiung, Blockfreiheit,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ependenztheorie, Drei-Welten-Theorie, Dritte Welt, Entkolonialisierung,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Guerilla, Imperialismus,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ismus, kubanische Revolution, Macht, nationale Befreiung, Neokolonialismus, Oktoberrevolution,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Solidari-

tät, ungleicher Tausch, Unterdrückung, Vietnam-Krieg, Volk, Zentrum/Peripherie

反哲学（Antiphilosophie）

1.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第二版中，卡尔·柯尔施把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与革命性唯物辩证法理论”称为一种“本身仍富于哲理的‘**反哲学**’”。（第37—38页）柯尔施的这个辩证的命名自圆其说，而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

350 的附注中所批判的“黑格尔学派很大一部分人的非哲学的转变”与此形成对照（MEW 40，第327页）。“当他们从适应或类似的东西出发，简言之，**从道德上**来解释他的体系的这一或那一规定时”，他（马克思）就将其理解为**非哲学的**。（同上）马克思反对肤浅的、政治性的黑格尔批判：“一个哲学家由于这种或那种适应，会犯这样或那样的表面上首尾不一贯的毛病，是可以理解的，他本人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他意识不到的，那就是：这种表面上的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本身不充分或者哲学家对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确实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这里不是哲学家个人的良心受到了怀疑，而是他的本质的意识形式被构成了……从而同时也就超出了意识形式的范围。”（同上）在此语境中，观念转变为：哲学的实现就是对哲学的扬弃。哲学力求自我实现，也就转向了和历史现实的“非哲学”性质的对立。这种“同世界相对立”的转变又反作用于它自身：“它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同上书，第328页）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的立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是批判性、革命性的‘反哲学’”（1930，第38页）。事实上，柯尔施的这种评价可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找到最确凿的证据。但是在1922年至1923年柯尔施写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时，他大概对这个手稿的要点毫无所知。马克思以此句开始抨击黑格尔之后的左派：“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MEW 3，第18页）关于哲学的、法学的、科学的等占有形式与反映形式的独立性，他予以严厉批判：这些形式没有自己的历史，对它们的把握就必须采取彻底历史的观点，并把它们视为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

分。英德日赫·泽勒尼（Jindřich Zelený）（1968，第 214、226 页）把这些观点称为“原哲学的”和“反哲学的”（然而对此并无进一步的解释，可以说，苏维埃特色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总归没有缜密的分析）。

2. 柯尔施试图以术语反哲学加以命名的问题，表现在他自己对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故意模仿上。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与阶级社会的国家基础不同，在此意义上，如柯尔施所称，它必定是“本身仍具国家性质的反国家”。依柯尔施之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哲学开始走向终结，因而意识形态开始成为阶级社会与统治者的必然关联物。对柯尔施而言，马克思主义并非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科学，而是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并非是“用新‘国家’、新‘国家制度’取代迄今为止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一切成员”（1922，第 139 页）。

然而，依柯尔施之见，意识形态批判假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承认精神现实”。对他而言，这就意味着“宣告革命阶级兼具物质性、精神性、实践性与理论性的行动彻底摧毁并扬弃这些精神现实及其物质基础”（1930，第 31 页）。1922 年，他指责第二国际高层的理论家们“对意识形态现实”采取“抽象—否定的态度”，宣布它为“**虚假的现实**”（1923，第 119、121 页）进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起，他又对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同样的批评。他与葛兰西一样，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彻底历史化的接近社会现实，这种接近社会现实揭露任何不顾历史变迁的一般化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与革命工人阶级特定的、历史的具体实践同步的元素，是理论和实践的新型的统一。他指出，教条主义路线的特征是在“幼稚的现实主义”基础上把理论与实践、意识与存在对立起来（同上书，第 126 页）。

柯尔施并未超越意识形态批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归因于工人运动的时势：在他看来，非革命性的教条理论与非革命性的形势相应，革命性的教条理论与革命性的形势相应。因而，1917 年之后，最重要的理论任务首先在于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展开论战，重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其方法概要是“**把唯物史观也用于唯物史观自身**”（1930，第 34 页）。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革命历史主义，其观点引发了很多争论（参见 Lieber 1974；*A Történelem...*，1981）。多数参与讨论者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历史主义没有导致相对主义，没有导致诸如真理、普遍性、必然性等哲学范畴的消解。

柯尔施不同于多数同时代者，事实上，他恰恰把相对主义一切意识形态包括其哲学核心的消解与革命性相提并论，并且赞同这种消解。除后现代理论家之外，迄今无人步他这种激进见解的后尘。（参见葛兰西在其实践哲学中对该问题所做的重新阐述）

就此而言，柯尔施最初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哲学的反哲学，后来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些方面是彻底历史的和相对主义的，亦即是反哲学的并因而是革命的，最终于1950年得出结论：马克思只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先驱之一，而“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整体予以重建，并恢复其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最初功能……如今皆系反动的乌托邦”（*Zehn Thesen*，第385页）。柯尔施的理论纲领包含革命工团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这种立场本身对革命过程的政治领导持批判态度。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试图把“列宁主义”作为普遍有效的战略战术套用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上，导致德国共产党把1923年和1924年担任领导职务的柯尔施开除出党。在理论层面上，和反对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相应的是，他最终拒绝一般化的形而上学理论，强调彻底经验主义的批判立场。1934年，他不容辩驳地写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的**，而是**特殊的**。”（*Warum ich Marxist bin*，第8页）

在柯尔施眼中，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形势在某些方面和19世纪40年代类似。此时，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理论及其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彻底历史化相符合的是，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过程中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打破传统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随着战后革命危机的结束和斯大林出任苏联领导人，近在眼前的革命受到了阻碍。柯尔施并无理论倾向要恰恰在反革命和法西斯主义的条件下重新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他的纲领中的激进特征却依旧不减，似乎影响了布莱希特“参与式思考”这一用语。 353

3. 法西斯主义的经验和战后时期的经验改变了问题的重心：总的来说，并非资产阶级社会精神结构的变革，而是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社会化”的结构（参见PIT 1979）变成了讨论的主题，而柯尔施已不再参与这次讨论。在葛兰西的“霸权”观、阿尔都塞的“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和豪格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看法中，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各个方面得以进一步阐发。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Elemente der Selbstkritik*, Hamburg 1975; der.,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 1977; A »Tör-

ténelem és osztálytudat« a 20-as évek vitáiban, 4 Bde., Budapest 1981 (vollst. Reprint der Rezensionen und Aufsätze über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owie über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aus den 20er Jahren); B. Brecht, *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I*, Berlin/DDR und Weimar 1968;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Berlin 1993;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M-Köln 1975; der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in: aaO., 73-126; ders., »Der Standpunkt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1922), in: aaO., 137-164; ders., »Der gegenwärtige Stand des Problems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Zugleich eine Antikritik« (1930), in: aaO., 31-72; ders., *Karl Max*, Frankfurt/M 1967; ders., »Zehn Thesen über Marxismus heute«, in: ders., *Politische Texte*, Frankfurt/M-Köln 1974; ders., »Warum ich Marxist bin« (1934), in: W. Dreßen (Hg.), *Gegen den Dogmatismus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Berlin/W 1970; H. -J. Lieber (Hg.): *Ideologienlehre und Wissenssoziologie. Die Diskussion um das Ideologieproblem in den 20er Jahren*, Darmstadt 1974;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W 1979 (Hamburg ^{3}1986);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Berlin / DDR 1968.

阿尔诺德·舍尔策尔（Arnold Schölzel）撰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tiideologie, Antipsychiatrie, 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 Bolschewisierung, Camera obscura, Dogmatismus, eingreifendes Denken, falsches Bewußtsein, Hegemonie, Herrschaft, Historismus, Ideologiekritik,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Kritik, Marxismus, Metaphilosophie, Metaphysik, Notwendigkeit,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ekritik, Postmodernismus, Staat, Theorie/Praxis, Wahrheit

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ie） 354

一个流派，把心理疾病看成对“错乱的”社会生活状况的恰当反应，看成“意识拓展”，并且 / 或者看成只是社会归因的结果。该观点顺理成章地把精神病学界定成社会性的规范工具、调适工具与压抑工具。

反精神病学在欧洲的重要代表有罗

纳德·莱恩（Ronald Laing）（1969）和戴维·库珀（David Cooper）（1967，1968，1970）。二人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通过采用新型治疗策略（强化治疗师个人的责任心、让患者参与决定、集体治疗——马克斯韦尔·琼斯［Maxwell Jones］1952）来改革大型精神病院对青少年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却把各种疗法当作故弄玄虚而加以拒绝。他们在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的存在分析，后来部分程度上也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69）的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基础。他们所受的影响还有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73）关于“全控机构”的研究和托马斯·萨斯（Thomas Szasz）（1961）关于精神病是“神话”的命题。

对莱恩而言，精神病并非疾病，而是类似于吸毒致幻、旅行进入无人区，身边的照料者一心陪伴，如果旅人意欲返回，也给他提供方便。此类旅行偶尔也变成“超自然的经验”（Laing 1969，第120页）。“错乱未必是崩溃，也可能是突破，既极有可能是解放与更新，也很有可能是奴役与生存态上的死亡。”（同上书，第122页）——而库珀把有心理疾患者（如有色人种、同性恋者、遭受殖民者）视为受压迫的人群，认为应该释放其革命潜力用于与社会统治势力斗争。在此方面，他借鉴了赫伯特·马尔库塞，1967年，后者也在由莱恩和库珀在伦敦主办的“解放的辩证法国际会议”上发言（参见Kisker 1979）。库珀把社会规范过程与调适过程追溯至学校与家庭，也以此观点向“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化理论靠拢。 355

在德国，海德堡的“社会主义患者集体”（SPK）及其发言人沃尔夫冈·胡贝尔（Wolfgang Huber）是极端主义反精神病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患者自我组织、自助决定了情境，把“治疗”目标表述为认清心理痛苦的社会肇因、对致病的状况采取政治上好斗的直接行动：“某人扔进资产阶级指挥中心的石头和另一人所患肾结石可以替换。你们要防止肾结石！”（SPK 2，80）海德堡“社会主义患者集体”的几名成员于是也与红色军团（RAF）建立了密切联系，支持他们的武装斗争。反精神病学倾向的残余在德国仍见于少数几个有心理疾患者的自助组织如“多特蒙德自助”、“科隆社会主义自助”，等等。这些团体主要谋求给有心理疾患者以法律援助，致力于取消将心理疾患者强制送入精神病治疗机构。

应与反精神病学相区别的是欧洲激进批判性改革精神病学的不同思潮，它

们把社会状况与社会归因看成心理疾病重要的部分诱因，这些诱因却完全可以并入社会状况与社会归因之中。该观点在欧洲最重要的流派是意大利的“民主精神病学”（Franco Basaglia 和 Agostino Pirella，Antonio Slavich，Domenico Casagrande，Franco Rotelli 等）。

反精神病学孕育了精神病学中所有的批判性改革运动，激发它们关注社会状况在精神病治疗和“错乱”形成中的意义。反精神病学形式极端，却忽略了心理演变过程的物质基础，按照“不赞成我们就是反对我们”这种框框，冲动地把情感发泄到在部分程度上虚构的假想敌身上。最后，它或者走向挑战性的自我孤立，或者走向无法言传的玄奥经验。而激进的改革运动如民主精神病学
356 却能够在改善精神病治疗、落实有心理疾患者的民事权利、争取取消对他们的排斥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其条件是整体上有利于改革的政治、社会局面。

参考文献：

F. Basaglia (Hg.), *Die negierte Institution oder die Gemeinschaft der Ausgeschlossenen. Ein Experiment der psychiatrischen Klinik in Goertz*, Frankfurt/M 1968; Basisgruppe Medizin Giessen, *Dokumentation zum sozialistischen Patientenkollektiv Heidelberg*, 2 Bde., Gießen 1972 (zit. SPK); D. Cooper, *Psychiatry and Antipsychiatry*, London 1967; ders., *Psychologie und Geisteskrankheit*, Frankfurt/M 1969; ders., *The Death of the Family*, New York 1970; M. Foucault; *Psychologie und Geisteskrankheit*, Frankfurt/M 1969; ders., *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8; E. Goffman, *Asyle. Über die soziale Situation von psychiatrischen Patienten und anderen Insassen*. Frankfurt/M 1973; M. Jones, *Social Psychiatry. A Study of Therapeutic Communities*, London 1952; K. P. Kisker, »Antipsychiatrie«, in: ders., u. a (Hg.), *Psychiatrie der Gegenwart, Forschung und Praxis*, Bd. I. 1, Berlin/W-Heidelberg-New York 1979; R. D. Laing, *Phänomenologie der Erfahrung*, Frankfurt/M 1969; ders. u. D. Cooper, *Raison et Violence. Dix ans de la Philosophie de Sartre1950-1960*, Paris 1964; ders., H. Phillipson u. A. R. Lee, *Interpersonelle Wahrnehmung*, Frankfurt/M 1971; T. S. Szasz, *The Myth of Mentall Illnes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Personal Conduct*, New York 1961.

埃里希·武尔夫（Erich Wulff）撰
朱更生译，沈红文校

参见：

Ansgt/Furcht, Antiideologie, Ausbeutung,

Bedürfnis, Befriedigung, Demokratische Psychiatrie, esoterisch/exoterisch, Familie, Feind, Freudomarxismus, Geisteskrankheit, gesund/krank, Institutuion, Kampf, Menschenrechte, Schule, Subjekt-Effekt, Wahnsinn

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us）

反犹太主义并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在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中出现过。在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里，反犹太主义威胁到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的自我认识，因为反犹太主义的鼓动者不断尝试着去挖工人运动的墙脚，如在柏林的施特克尔（Stoecker）以及更有影响力的在维也纳的吕格（Lueger）及其追随者。1882年，恩格斯准确地描述道，“所谓‘反犹太人的运动’遭到社会民主党人最坚决的反对，在德国，特别是在柏林……正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它最终垮台了”（MEW 19，第313页）。在《反
357 杜林论》中，恩格斯多次提到了杜林的反犹太主义，杜林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叫作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MEW 20，第104页）。

反犹太主义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当时在西欧和中欧出现了政治性的、反犹太主义的、与工人党处于竞争关系的运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拒绝反犹太主义的。”（Massing 1959，第18页）仇视犹太人是欧洲基督教历史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比“反犹太主义”这个口号的历史要悠久得多。

1.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HF*）中写道，“刺，就像犹太精神在基督教世界中一样，从我生下来那天起就在我的眼中”（MEW 2，第93页）。在三月革命前（从1815年至1848年。——译者）以人类解放为主题的背景下，人们展开了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当然并不仅仅只涉及犹太人，对“德国状况”以及对维也纳会议后（德国）在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民主批评中，将犹太人在法律上的不公平作为了一个典型。

1844年，《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发表了马克思写的《论犹太人问题》（*Zar Judenfrage*），这篇文章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所写两篇文章的批评。在全人类解放的背景下，布鲁诺·鲍威尔在讨论“犹太人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他认为，只有当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中受歧视的犹太人首先放弃自己的宗教时，他们才能

被解放。在对鲍威尔的批评中，马克思没有将“犹太人问题”简单视为犹太人自己的问题。马克思讨论的出发点既不是从孤立的神学角度，也不是单纯从法治国家问题的角度，而是重新阐释了这个问题：隐藏在“犹太人问题”背后的是，三月革命前的民主公共领域模糊了纯粹的政治解放与“社会解放”（MEW 1，第 377 页）之间的区别。通过这篇为受压迫犹太人反对基督教国家所写下的文章，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政治上的直接干预。——但后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篇文章却被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原始文本（参见 Silberner 的文章以及 Claussen 1987，第 58 页及以下）。——马克思的立场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犹太社区的成员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请愿（参见 Hirsch 1968，第 334 页）。

经历了 1848 年至 1849 年的革命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将犹太人定位为
358 在任何情况下都被镇压的受害者，并将 1850 年以后兴起的反犹太主义宣传视为反动行为（MEW 13，第 355 页及以下和第 228 页），有时也将这种宣传视为一种伪进步（MEW 20，第 50 页）。尽管在公开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出现许多对个别犹太人的贬损言论，但并不能由此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持有反犹太主义态度的。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所嘲笑的是那些对犹太人的在宗教上的敌对攻击（参见 MEW 30，第 665 页）。《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记者在报道中记录了马克思在 1854 年表示对犹太人的同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遭受的贫困和痛苦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最肮脏的地区；他们经常遭到穆斯林的压迫和排斥，他们受到东正教徒的侮辱，受到天主教徒的迫害，仅仅依靠从他们的欧洲弟兄那里获得的微薄的施舍为生。”（MEW 10，第 176 页）

在对鲍威尔《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一文的批评中，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感兴趣的并不仅仅只是犹太人的解放，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民解放（allgemeine Emanzipation，也可以翻译为：一般性解放、普世解放。——译者），尽管这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解放。因此，一旦将犹太人的解放排除在外，那就不能称为全民解放了。另外，尤其是在宗教自由方面，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非国家性质的私人事务，并用美国的例子来阐明这种政治解放的基本维度。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回应，1844 年马克思将犹太教（的实际精神）定位为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参见 MEW 1，第 376 页）——这也表明了马克思早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产生

所起到的作用。他后来的经济学批判著作多次提到了犹太人在欧洲的社会史命运，他们被限制在商业贸易领域，离散的犹太人在历史上被视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业民族。（MEW 13，第 638 页）经济学批判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高利贷和欺诈视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往昔现象，欺诈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交易形式效果难以预测（MEW 22，第 265—266 页和第 316—317 页），高利贷则具有前资产阶级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MEW 26，第 526 页）。

2. 在 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犹太人同化的过程中，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论述开始消失在档案记录中，直到 1902 年才由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
359 重新出版，以作为**反对**反犹太主义运动的依据。不过人们在“犹太人问题”上的再次激烈的讨论，不再是关注于宗教或者道德上的问题，而是集中于社会问题。梅林的再版范式化地表现出后来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理性主义的立场：只有当世界变得合理，反犹太主义才不会再出现；所以没有社会革命就不能废除反犹太主义；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不可能出现犹太人的完全解放，因为在一个剥削的制度中，不会有普世的人类自由；评价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能太消极也不能太积极，而是要根据其在当时所处社会中的功能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倾向于反犹太主义，也不倾向于亲犹太主义。

这种理性主义对受迫害的犹太人采取的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萨特（Sartre）在 1944 年 8 月发表的文章《对论犹太人问题的评论》（Bemerkungen zur Judenfrage）中明确批评了这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经历“纳粹政权”后，人们更加意识到世界需要的不是冷漠（的理性），而是人类的团结。每个人都必须清楚认识到，“犹太人的命运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命运”（第 135 页）。因此，萨特指出，与其去等待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出现），不如去建立一个“针对反犹主义的犹太联盟”（1948，第 133—134 页）。

19 世纪末左右，西欧社会主义者开始借用反犹太主义在农民中，即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受到威胁的农民中去寻找追随者。政治反犹太主义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得到了有效地宣传，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必须要明确地将社会经济的真相说出来（而不是将问题归结为犹太人。——译者）（参见 MEW 22，第 501 页）。倍倍尔（Bebel）预测道：“只有当他们遭受到反犹太主义造成的严重破坏时，只有当他们亲眼见证反犹太主义代表在国会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那时就该轮到我们登台，只有那时才是

我们收割的时刻，而不是在此之前的阶段。”（*Protkoll des Kölner Parteitags* 1893，第 238 页；参见 Bebel 1894）在倍倍尔那句著名的、同样也被反犹太主义引用的话“傻瓜的社会主义”（参见 Bahr 1894，第 21 页）的背后，存在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洞察社会真相就会导致政治转向：人们只要相信客观的历史进程，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就会被打破。

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工人当中关于反
360 对反犹太主义的宣传是成功的。1899 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巴黎回声》（*Echo de Paris*）中自豪地提到：“应该要感谢我们打击了反犹太主义，都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努力，反犹太主义现在已变成一个垂死的党派，变成了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一小撮”。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眼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铁一般的逻辑”遗留下一系列问题，如与反犹太主义相关的问题，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在其中也就只有集中化和集权化显得有所价值。这就意味着要将犹太人同化到最进步的人群中去。于是在 1902 年俄国革命运动中，卡尔·考茨基将被沙皇帝国压迫的犹太人民视为唯一“真正的朋友”。1914，考茨基以“种族和犹太教”（*Rasse und Judentum*）为题写了一篇社会学文章，坚决否定了新兴的犹太民族运动和传统犹太教：“犹太人已经成为卓越的革命因素，而犹太教则成了反动因素。”（第 94 页）

在沙皇帝国中，犹太工人成为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核心。犹太知识分子是 19 和 20 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犹太工人总联盟**（*Der Allgemeine Jüdische Arbeiterbund*。Bund 一词，在中文版《列宁文集》中译为“崩得”。——译者）（参见 Bunzl 1975，第 54 页及以下）更是完全被视为俄国社会民主的核心。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DAPR）分裂过程中，致力于犹太工人“文化自治”的**联盟**（*Bund*）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发生了冲突，因为后两者都赞成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层面上的同化主张。列宁将犹太人视为俄国最受压迫的群体：“犹太工人在双重的枷锁下哀号：作为工人和作为犹太人。”（LW 20，第 166—167 页）在革命和内战中，反犹太主义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反革命分子组织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列宁通过当时最先进的联络方式来尽力阻止当时极其普遍的大屠杀并提到：“折磨并迫害犹太人的万恶的沙皇主义是可耻的，同样还有那些仇视犹太人和仇恨其他民族的人。”（LW 29，第 240 页）

从此，反犹太主义在苏联变成了一种公共的禁忌；但与此同时却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歧视行为。1927 年以后，反犹太的煽动行为经常以新名称一次次地出现，如反世界主义、反犹太复国主义。

最初，布尔什维克尝试着将来自老布尔什维克中的犹太裔联盟成员的抗议和左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统一为一个整体（来解决）。不过之后，布尔什维克转而向
361 犹太领土主义者在比罗比詹（Birobidjan）提供了自治区。1931年在西方的奥托·赫勒（Otto Heller）称赞了这个项目，并将其视为“犹太教的垮台”。在书中，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式为：要么去适应革命主流群体，要么在革命性的苏联内部以独立民族的形式存在。托洛茨基及托派分子对比罗比詹政策（Birobidjan-Politik）表示了怀疑。与罗莎·卢森堡一样，托洛茨基在考茨基革命同化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反对。卢森堡将俄国反犹太主义评价为沙皇的“避雷针政策”（GW 4，第325页）中“最受欢迎”的形式（她在1918年7月写道，“还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犹太人会不会充分利用大家对他们的同情”；同上），另一方面她对新兴的犹太复国主义表示了坚决的反对。

3.1945年以后同时出现了关于以色列建国的争论和在苏联兴起的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的运动，西方作者如希尔博纳（Silberner）开始质疑马克思著作中或许已经提到反犹太主义，希望以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犹太主义行为找到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且与此同时，（鲍威尔所著的）《犹太人问题》则被有意地剥离了和欧洲三月革命之前时期的历史联系，并被重新定位为专门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1967年以后苏联开始了一场国际性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时，苏联作家采取了一些批评马克思为反犹太主义者的论点，通过转化和加工，将其变成了证明马克思是第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论点。部分西方新左派人士采用了这种歪曲的观点，将它强加到马克思论述鲍威尔立场时出现的对“想象中的民族”（MEW 1，第348、375页）的评论中去。

基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1964年批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中的立场。罗斯多尔斯基将革命出版物中针对犹太人的充满矛盾的、不顾激起抵触情绪的评判，和恩格斯“无历史的民族”的理论联系了起来。恩格斯的“无历史的民族”对革命民族和“反革命民族”进行了区分，尤其指向中东欧地区的斯拉夫民族。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为了针对当时在民主主义者中广泛传播的大德国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直接将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宣布为德国人。恩格斯既不认同德裔波兰人也不认可波兰的犹太人是德国人（这点被德国用来向波兰提出领土诉求）。恩格斯

认为，任何理由都会服务于这一合法的
362 政治目的，甚至包括反犹的陈词滥调。（MEW 5，第 353 页；MEW 6，第 448—449 页）而马克思则是从其他角度出发，批评了犹太名流在面对“反革命头子”的政策时目光短浅，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统治阶级只有在危急时刻才会需要犹太人：“等不到胜利，就会把他们扔回犹太人区去的”（MEW 6，第 25 页）。

罗斯多尔斯基提到了《新莱茵报》（*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记者泰勒林（v. Tellering）的反犹太主义的报道。泰勒林在革命后抨击他的前总编辑马克思为“大拉比，耶稣会士般自大的犹太人和典型犹太人”（参见 Sterling 1969，第 214 页）。罗斯多尔斯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无法明确定位犹太人政治角色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有反犹太主义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卡在了“民族问题”的定位上。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拒绝了“民族重生”的意识形态，导致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经常忽视了被压迫的民族。——尽管罗莎·卢森堡反对了德国和俄国对波兰的“去民族化”，但她既没有明确支持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没有明确提出对另外两个国家统治阶级的反对。（GW 1/1，第 810 页及以下）

4. 在奥斯维辛遇害的年仅 26 岁的阿伯拉罕·莱昂（Abraham Leon），试图从“民族—阶级”的概念出发去探索散居犹太人的特殊社会、经济地位（1974）。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在《非犹太的犹太人》（The Non-Jewish Jew）中提出了更加复杂的观点，试图来重新定义犹太民族主义在奥斯维辛事件后，与反犹太主义、民族国家、革命、犹太传统的关系。奥斯维辛事件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大众依然认为不可能会再出现新的反犹太主义。

20 世纪 30 年代，霍克海默在反对学院社会学和哲学理论（即“传统理论”）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Parteimarxismus）的过程中建立了社会批判理论。该理论将传统马克思理性主义中（面对奥斯维辛）出现的反犹太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垄断过程到了“流通领域的清算”的时刻（参见 Horkheimer 1939，GS 4，第 325—326、328 页）。但是该理论则已经将纳粹的反犹太主义视为“新反犹太主义”。实证调查的结果是产生了反犹太主义形象上的分化：“与反犹太人的煽动者不 363
同，法西斯反犹太主义者的出现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具有清醒的智力；他们是冷血的、冲动的，应该算是最无情的。”（参见 Horkheimer 1943，GS 12，第 179—180 页）

在延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中，人们还尝试着去区分传统反犹太主义与现代反犹太主义。奥斯维辛事件后，社会研究所在美国以及之后在德国的实证研究中提到了一个新概念“民主的反犹太主义”。这个“民主的反犹太主义”不仅对奥斯维辛事件的表态“极其暧昧”（Ja，aber），并且还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更有甚者出现了对奥斯维辛事件的公然否定，这也成了右翼极端主义者的国际性特征。这种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西德的现象，其实是一种对由于奥斯维辛知名度不断提高而产生的亲犹太主义的回应。这种亲犹太主义是“克服过去”的道德教育的产物。

参考文献：

A. Bebel, *Sozialdemokratie und Antisemitismus*, Berlin 1894; E. Bernstein, »Das Schlagwort des Antisemitismus«, in: *Die Neue Zeit*, 11. Jg., 1892/1893, 247f; J. Bunzl, *Klassenkampf in der Diaspora*, Wien 1975; D. Claussen,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 ²1994; ders. (Hg.), *Vom Judenhaß zum Antisemitismus. Materialien einer verleugneten Geschichte*, Darmstadt-Neuwied 1987; I. Deutscher, *Die ungelöste Judenfrage*, Berlin/W 1988; I. Fetscher (Hg.), *Marxisten gegen Antisemitismus*, Hamburg 1974; W. F. Haug, »Antisemitismus und Rassismus als Bewährungsprobe der Ideologie-Theorie«,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209-232 (zuvor in: Strauss/Kampe 1985, 234-255); O. Heller, *Der Untergang des Judentums*, Wien-Berlin ²1933; H. Hirsch, »Karl Marx und die Bittschriften für die Gleichberechtigung der Juden«,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VIII, 1968, 229-245;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1939), in: GS 4, 308-331; ders., »Zur Psychologie des Antisemitismus«（1943), in: GS 12, 172-183; H. Huss u. A. Schröder,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65; K. Kautsky, »Rasse und Judentum«, in: *Die Neue Zeit*, Ergänzungsheft 20, Berlin 1914; A. Leon, *Judenfrage und Kapitalismus*, München 1974; P. W.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59; M. Postone, »Die Logik des Antisemitismus«, in: *Merkur*, 36. Jg., 1982, H. 1; M. Rodinson, »Antisemitismus«, in: KWM 1, 1983, 68-71; R. Rosdolsky, »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IV, Hannover 1964; J. P. Sartre, *Betrachtungen zur Judenfrage. Psychoanalyse des Antisemitismus*（1944), Zürich 1948 (Neuaufl. Reinbek 1994); E. Silberner, »War Marx ein Anti-Semite?«, in: *Historia Judaica* II, Nr. 1, 1949; ders.,

Sozialisten zur Judenfrage, Berlin/W 1964; ders., *Kommunisten zur Judenfrage*, Opladen 1983; L. Spira, *Feindbild 'Jud'*, Wien-München 1981; E. Sterling, *Judenhaß. 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in Deutschland (1815-1850)*, Frankfurt/M 1969; H. A. Strauss u. N. Kampe (Hg.),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New York 1985.

德特勒夫·克劳生
（Detlev Claussen）撰
盛舒洋 译，曹旸 校

参见：
Alltagsverstand, Antifaschismus, Auschwitz, Chauvinismus, Emanzipation, Faschismus, Feind, geschichtslose Völker, Juden, Judenfrage, Kosmopolitismus, Kritische Theorie, Nation, Nationalismus, Rassismus, Zionismus, Zirkulation

预先推定（Antizipation）

拉丁文 *anticipatio* 所依据的伊壁鸠鲁的概念 *πρόληψις*（抢先、先说先做）表示从知觉中获得的设想，它作为样板“成为合理探索或者发现的前提”（Diogenes Laertius X，第 33 页）。预先推定即指最为普通的能力，能先认识到未来之事，如目标般“预先”拥有之。它以此有别于乌托邦概念，后者指涉著述中的、多为与现实相反的文学性质的方案，因词义为“不存之地”而显得是一种抽象的与想象的否定这种思维方式。

在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语境下，预先推定指出关于一个更人性、更公正的未来社会的计划，关心的是自我解放的形象及其在日常冲突中的意义。在受马克思主义激励的工人运动史上，在该领域的对立也几乎贯穿始终：科学与乌托邦对立，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先锋主义与自发性，远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的敌对以及改革与革命的分裂。预先推定这一范畴指出一个关键问题：是否具有发展前途取决于批判与预先推定的联系。

1. 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K I*，MEW 23，第 193 页）。对迥异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此段文字是一种通情达理、以劳动为中心的预先推定概念的核心部分。（参见 Kröber，第 979 页；Holzkamp 1973，第 122 页；Mandel 1978，第 222

页）然而，马克思采用了康德的普通概念，而后者又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普通概念。（参见 *KU* I.1，2. Buch，§43）马克思的劳动概念隐含着对康德把“自由”与“本性”对立起来的做法的批判。如果使蜜蜂—建筑师的形象脱离该语境，只要“观念地”存在一种目的，排除预先推定与完成工作时感性经验的相互作用，该形象就显得过于理性。（参见 Sève 1972，第 110 页）此外，高等动物在活动时也已经“在思想上”先行认识到行为目的（参见 Schurig 1976，第 319 页）。女权主义批判与生态保护批判又把该形象解释成佐证男性的、旨在掌控自然的工程师眼光（如 Neusüss 1985，第 34 页及以下，第 132 页）。

1.1 不该在普遍的界定层面上，而应在具体的运用方式上把握马克思式预先推定的特点。首先遇上的是日常语言中的运用。比如金银助人创造世界市场，“因为金银在自己的货币概念中已经预示着世界市场的存在”（MEW 13，第 128 页），此语并未指出可作为理论的概念（参见 MEW 25，第 879 页；MEW 26. 3，第 303 页，以及恩格斯 MEW 20，第 491 页及以下）。《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有所不同，马克思以此范畴分析古典经济学的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个人摆脱了自然桎梏，他们虽然有倒退的“美学上的假象”，还是预感到了“市民社会”（*Gr*，第 5 页；MEW 42，第 19 页）。新事物的预兆披着旧事物形式的外衣。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此作为迄今为止预先推定的基本形象：“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的服装，1789 年至 1814 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MEW 8，第 115 页）对立面是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形象，这场革命只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同上书，第 117 页）。

另一项运用通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难点。罗马法发展出关于法人的规定进而发展出关于“**作交换的个人**”的规定，罗马法可以“预先推定”适用于正在形成的工业社会的法律。（*Gr*，第 157 页；MEW 42，第 171 页）马克思把这一论断考虑成生产关系与法律关系之间“不平衡的发展”，并推而广之考虑成物质生产与各级上层建筑之间的“**不平衡关系**”。（*Gr*，第 29—30 页；MEW 42，第 43 页）他由此得出结论，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他觉得尤其重要而且困难的是定义“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同上）。此处发现的不同时性 366

超出恩格斯著名的关于“相对独立性”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表达方式（MEW 37，第 490 页），因为此处一项上层建筑要素先于经济基础。

1.2 然而，马克思对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未来景象表态时，放弃了预先推定这一名称，并与之拉开距离。1844 年，他在《德法年鉴》中刻画的新方向的长处是，“我们并不想教条地预先推定世界，而是想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MEW 1，第 344 页）。“建构未来”与“竖立”教条主义的旗帜见于相同语境。对此，他拟订的纲领是“**无情批判一切现存事物**”，无惧批判的结果，也无惧与现存势力发生冲突（同上），旨在“分析神秘的、自己都朦胧不清的意识”（同上书，第 346 页）。呈现为反乌托邦之事，却披露了内容如此丰富的未来维度：“届时，情况会表明，世界早就具有对一个事物的梦想，为了确实拥有它，只需具有关于它的意识。”（同上）

事情并非只是批判“错误意识”，而是自觉吸取“梦寐以求之事”。青年马克思所做的宗教批判有别于费尔巴哈之处，并非证明“错误的世界意识”，而是有办法从“神秘化”的形式中看出统治与解放的维度：“真实的贫困的**表现**”同时是“**抗议**真实的贫困”，“受折磨者的叹息”。（MEW 1，第 378 页）从一开始，批判就不仅针对教派意义上的宗教，可以由反统治的预先推定得到解释，后者表现在一种激进人文主义的语言上：“对宗教的批判终结于**人是人至高无上的神灵**这一信条，也就是终结于**绝对命令**，要**推翻**人在其中是被侮辱、受奴役、遭遗弃、可鄙的生灵的**一切状况**。”（同上书，第 385 页）相似的是，367
《论犹太人问题》中对异化的批判与预先推定相连，马克思在该文中把宗教批判扩展至政治领域。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MEW 1，第 355 页），它把人与“同自己的**共同体**”分离（同上书，第 356 页），并把人分裂成自私自利的私人和国家公民这种有道德的人（同上书，第 355、370 页）。对国家正在异化的彼岸的批判意在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真正个体的人，使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同上书，第 370 页）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以思辨的普遍性的哲学语言表述预先推定：“人”作为类存在物处于中心，然而，1845 年和 1846 年，在费尔巴哈提纲第六个命题中被批判为“抽象概念”（MEW 3，第 6 页）。正如“异化”几乎使人持续脱离一切生活联系，“扬弃”异化让人与一种近乎无穷的总体性融为一体。所追求的不啻“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

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MEW 40，第 536 页及以下）

1.3 马克思兑现其要求，“跳出”哲学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MEW 3，第 218 页），连批判与预先推定也同样在改变。关于人的异化在一般范畴中受批判之事，现在就会具体化于对不同生产关系与统治关系的分析中。对未遭异化的人性的目标设定从“类存在物”层面移至公共社会关系层面：出现“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anifest*，MEW 4，第 482 页）。

近 50 年之后，恩格斯把 1847 年和 1848 年的这一表述用作一份日内瓦周刊的格言，谨慎置评：“若不耽于乌托邦式幻想或空话，就几无可能以寥寥数语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MEW 39，第 194 页）越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未来景象就越贫乏。在《资本论》第二版后记中，马克思拿批评取笑，说他“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MEW 23，第 25
368 页），而 1867 年，恩格斯在其评论中指出，关于未来社会，该书只给出“**十分**模糊的暗示”（MEW 16，第 216—217 页）。

在无产阶级社会中，“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存在关系，对此关系所做的著名的预先推定似乎与恩格斯的这种审慎态度相矛盾，依马克思之见，自由王国“在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开始。（*K III*，MEW 25，第 828 页）迥异立场把这种预先推定解释成一种末世论，有的是为了揭穿马克思的方案是“宗教”（或宗教替代品）（如 Jonas 1984，第 313、343 页及以下），有的持相反意图，要使马克思的方案与解放神学的倾向相兼容（如 Hinkelammert 1985，第 61—62、64 页）。神学解释却受形象化语言迷惑。马克思对自己所做区别的理解是反末世论的。他让人设定目的自身“超乎”社会劳动而开始，要求以公有制为前提时专注于设定目的自身的“根本条件”、缩短工作日。（MEW 25，第 828 页）

在“必然王国”那里，起作用的是生命再生产的强硬束缚，人只能在想象中脱离这些束缚。“自由”并非在于一种此类脱离，而在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MEW 25，第 828 页）。重点并非在于人类历史的一个“终极目标”，而在于缩短劳动时间、劳动安排与经济民主的联系。

要建立一个无统治社会的目标并未改变，但普罗米修斯式万能的姿态退居其次。理性地做必然之事，成为预先推定的“简朴”核心成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它原生而不知不

觉地在生产者背后得以实现（如 MEW 23，第 59、121 页；MEW 24，第 316—317 页；MEW 25，第 828 页），他预先推定一个社会，其中生产的联系并非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是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MEW 25，第 267 页；参见上书，第 197、271 页）。劳动分工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一种此类生产者民主如何能够舍弃市场和国家而运转，却依旧不明。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遭到曲折之后，“自由人联合体”这一目标规划进入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中心，自由人的
369 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MEW 23，第 92—93 页）。尤其是，马克思只字不提民主的中介形式这一问题，这件事成为在经济和政治中建立国家垄断的突破口。（参见 Haug 1993，第 119—140 页，尤其是第 36 页及以下）

1871 年，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Bürgerkrieg*，MEW 17，第 343 页）这就给策略的形成设定了严苛的界限，不过“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Vorw 59*，MEW 13，第 9 页；参见 *Gr*，第 77 页；MEW 42，第 93 页）。一个对立面是恩格斯早在 1850 年就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以闵采尔（Müntzer）为例分析的千禧年说类型的预先推定：平民集团必定“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但这种“超出”未来同样可能只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做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MEW 7，第 346 页）此处点出一种令人生畏的辩证法，也可能涉及俄国革命的命运和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的挫折：恩格斯认为在一个“未成熟”，也就是非霸权的局面下掌握政权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同上书，第 400 页），因为在激进目标与社会力量对比之间存在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同上书，第 401 页）

若不愿把马克思的预先推定作为坏的乌托邦而抛弃，则须区别一个无统治的社会的变化无常的景象和贯穿其中的“自我社会化”取向（参见 PIT 1979，第 180 页及以下）。社会运动超越社团主义的分配战，对每次此类运动而言，将其事务抓在自己手里，对行动至关重要。此外，还应区别反统治的目标设定各自的可行性与其启发价值。在对经济、国家与意识形态做分析时，马克思想象预先推定的社会作为异化批判、统治批判的立场与观点，由此可以区分受批判者

的不合理形式与合理内容。在此使“科
370 学的”预先推定有别于乌托邦式预先推定之事，是 W. F. 豪格刻画成“特定否定”的批判类型：“其否定并非来自外部，而是立足于受否定者。”（1973，第179 页）

2. 可以用预先推定这种视角把工人运动史解读成分裂、相互拆台的悲剧。在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的首次受损，使社会民主党失去了反统治激进性。

2.1 在工人运动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得到接受的，主要是“规律科学”与“进化论”。呼唤客观的亦即不依赖人类主动性的历史进程的“规律性”，不仅决定了早期社会民主党的自我认识，而且后来由马列主义的斯大林国家哲学所承袭。这样，恩格斯所宣布的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就归入把“客观”法则先验化之列。葛兰西发现这种决定论与一种消极宿命论的态度形影相随，把这种决定论分析为一种“宗教与刺激的形式”，虽有各种批评，他还是原谅这种形式，它在不利的力量对比之下“成为惊人的道德抵制、凝聚、耐心坚持的一种力量”（“我目前战败，但事物的威力长期有利于我”）；不过，一旦下属成为“历史人物”，这种形式就骤变成难以抉择和道德上的消极态度。葛兰西在此批判的“宗教”，是一种特殊的互不相干：下属按意志行动，披上“因信仰而行动”的外衣，用“狂热的目的论”的形式来表达，狂热的目的论代替了宗教的天意。不过，葛兰西即使那时仍把下属看成“领导、负责的”人物，“而关于部分的哲学始终先于关于整体的哲学，不仅作为理论上的预先推定，而且作为现实的必然性”。（*Gef* 6，H. 11，§12，第1386—1387 页；*Q*，第 1388—1389 页；参见 *Gef* 5，H. 8，§205，第 1057 页；*Q*，第 1064 页）

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悖论：一旦理论成为约定俗成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式的关于一个无统治社会的预先推定就退居其次。在社会民主党内，它或者遭放弃——早在 1891 年，在“马克思主义的”《爱尔富特纲领》中就已经不再提及“国家自行消亡”（*AD*，MEW 20，第 261—262 页），或者它以无约束力的“终极目标”形态移至遥远的未来，失去 371
了其以行动为本的意义。1903 年，为了把社会主义前景“兑换成当前政策的硬币”，罗莎·卢森堡创造了“革命务实政策”（GW I/2，第 373 页）这一范畴。她认识到，布尔什维克关于职业革命领导班子的先锋方案行将摧毁自我解放的创造潜力，在探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中央集权”时把民主问题置于社会主义预先推定的中心：1918 年，俄国推翻立宪大会后，她据理力争道，在受赞扬的

国家才开始实行民主，后患无穷，因为摧毁民主的自由权利必然“压抑”政治生活、使公众“懈怠”并使积极因素限于官僚机构。（*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GW IV，第 361、363 页）

可以把马克思的“蜜蜂—建筑师模式”获得的声望解读成关于可行性的意识形态的征兆，这种意识形态使预先推定的能力倒退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率理想：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中，未来景象不是围绕着关于全面消除统治的设想，而更多的是围绕着摆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束缚的、发动起来的控制自然。这种转移受惠于主要在恩格斯处凸显的特性，即用人对自然的统治这些范畴表达所宣布的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参见 *AD*，MEW 20，第 264 页）。即使令人印象至深的人类自我解放的景象也难免转型成关于一个自上而下调控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理想。奋起直追的工业化这种“斯大林化”项目把生产主义抬升成至高生活价值，故而以这种一刻不停地为生产而生产的拜物教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自我解放的观点。在主流工人运动中，预先推定留在一种专断的文明模式之内，这种文明模式片面地以人类发展和生态为代价推进生产力。（参见 F. Haug 1993）

1939 年至 1940 年，本雅明（GS I，第 699 页）指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只愿承认在掌控自然上有进展，不愿承认社会倒退”。他对关于进步的线性思维所做的批判源于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禁止叩问 372
未来，因为对它而言，每一秒都是“弥赛亚可能穿行的门径”（同上书，第 704 页；参见第 1252 页）。本雅明试图以当下弥赛亚主义的语言表达他对社会主义超脱尘世的长远目标所做的批判。针对将来“救赎”的导向，他确立了令人瞩目的一种关于当下的概念，这种当下已经包含预先推定无阶级社会。依据其中散布着弥赛亚主义碎片的一种“现时”对未来祛魅（同上）。

2.2 恩斯特·布洛赫复归青年马克思，试图重新确定分裂的先知先觉的内容并用马克思晚期作品中的严谨分析把它们聚合起来。以此也推断出“信仰”的程度，布洛赫对“信仰”所做的理解不同于宗教，是非超验的“态度”，“凭此态度，不仅掌握对未来的认识，而且也要知道未来之事并且顶着怯懦的或者短视的怀疑去知晓未来之事”（*Prinzip*，第 1511 页）。马克思主义具有“条件”科学与“对立”科学的品质，归功于善于分析的“寒流”，作为“热学”则是“归家的理论—实践”（同上书，第 240—241 页）。在此，预先推定得到人类学基本概念的地位，它基于希冀地

“描摹”梦寐以求的目标这种人类专属的能力，尤其基于希望是“**一切情感活动中最有人性的**”（同上书，第 83 页）。

布洛赫在探讨法西斯主义取得霸权和社会主义揭露策略未果时生发出这一范畴。纳粹胜出，是由于有效“偷师共产主义者”（*Erbschaft*，第 70 页）并保留“不同时的矛盾”，主要是资产阶级统治者与青年、小农阶层与职员之间的矛盾（同上书，第 118 页）。无须谴责法西斯主义保留的不同时性是“非理性的”，而须区别它们正在没落的残余和“尚未完结的”、未“清偿的”过往、“过往中的未来”。（同上书，第 61、119、122 页）在“多层革命辩证法”中，有能力吸收和变化的因素“应予去除……并……重组成其他语境中的功能”。（同上书，第 123—124 页）与此相应，布洛赫在《表现主义之辨》（Expressionismusdebatte）（1937—1940）中反驳卢卡奇的“客观主义的一自成一体的现实概念”，因为它在体系上不切合过往中预先推定的内容。（同上书，第 268 页）

373 在《希望这种原则》（*Prinzip Hoffnung*）中，这些倾向系统化成为“预先推定型意识”理论。与弗洛伊德内驱力理论的“力比多偶像”相逆，被视作预先推定的基本内驱力的是“以饥饿作为最明了的表示”来自保（第 71、74 页）。针对心理分析把潜意识归结为“回溯的潜意识”、“不再意识到之事”，布洛赫提出以白日梦为场所的“尚未意识到之事”概念。（同上书，第 70、130 页）弗洛伊德把白日梦视为“夜梦的核心与样板”（参见 GW XI，第 387 页），夜梦依靠往事，对布洛赫而言，白日梦是“想象力先下手、……抢跑、预先推定”（第 97—98 页），在它们之中，空想之事“凭借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形成（同上书，第 557 页）。

布洛赫由此实施马克思勾勒的破译人类梦史的计划。心理分析从安乐园烤熟的鸽子上升为社会乌托邦和所有权理论、文学创作、音乐和宗教，以便在其中塑造一个未遭异化的社会的“先兆”（*Tüb. Einl.*，第 236 页）。使材料开口说话的是对其中包含的解放性维度的敏感。与葛兰西一样，布洛赫重视接续常识中具有发展潜力的因素：与盲从相比，连最无知的痴心妄想也应得到优选，“因为它可以了解情况”（*Prinzip*，第 1616 页）。在此方面，预先推定这一范畴的功能是，调解私人白日梦与巨大的社会相反方案。“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用预先推定先说先做某事，涉及之事尚不存在、但有趋势。”（*Gespräche*，第 44 页）

这样解释“白日梦”时似乎隐去的是，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受主流状况塑造并遭意识形态化（参见 F. Haug 1984，第 692—693 页）。确实，布洛赫描述的

多数普通白日梦“没有真正的未来”而涉及“应该更值得的迄今为止的生活”（*Gespräche*，第 42 页）。“镜中理想”主要再现“统治阶级希望弱者有何愿望”（*Prinzip*，第 12 页）。布洛赫强调思辨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疏远材料，试图把希望论证成具有哲学上“尚未如此这种本体论”形式的“原则”。所以，从个体的特殊结构推导出预先推定作为人类学的常项，其中的悖谬是，个体的特殊结构以虚空之处为中心：一个“意欲自我充实的空洞之物”（*Tüb. Einl.*，第 14 页）。从不可能感知近在眼前之事这一证据（“灯塔脚下无光”；*Prinzip*，第 344 页），布洛赫推断“**经历过的瞬间的黑暗**”是哲学范畴（1923，第 17 页；*Prinzip*，第 338 页）。现状由预先推定出来的未来建立。布洛赫的人类学围绕“尚无人真正存在、生活这一怪事”（*Prinzip*，第 341 页）。哲学形式在此使事情与布洛赫的意图背道而驰：并非对预先推定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生活景象做想象，与未来生活相比，当下生活似乎降低为只是“前奏”。（同上书，第 1628 页）

374

2.3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生态保护运动与批判性社会理论由于回归批判理论的技术批判与文化批判而相遇。不过，这就继承了一种批判模式，其中放弃了预先推定与“特定否定”的关联。20 世纪 40 年代初起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撰写的《启蒙辩证法》试图解释，为何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扼杀主观上反抗的力量。受统治者自身坚持使他们沦为奴隶的意识形态：“民众以德报怨，还胜过当局的聪明。”（1944，第 142 页）“虽则一切改变，但无所进展。”（同上书，第 150 页）技术进步拓展了思维视野和行动视野，而对社会变化做预先推定的能力遭遇无所不在的“操纵大众”。“存在远离成果之事，甚至可能表达这样一种希望的言辞也被迫如此效劳。”（Horkheimer 1947，第 136 页）

批判理论是无预先推定的批判，方式是既形成其吸引力，也导致包含在它之中的阻止深刻实践：它表达一种占优的资产阶级霸权无可替代，同时在理论上对其加强。它明确支持那种怀疑，“一旦自由王国得以实现，是否必然显现为其对立面、社会及人类行为的自动化”（同上书，第 10 页）。它批判道，科学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融合成以工程师为象征的“工业主义”（同上书，第 144 页）。它以此指涉对所批判的进步乐观主义的一种抽象反对立场，采用具有负面征兆的蜜蜂—建造师模式。形成总体统治的印象是因为规定理论概念自身，任何目的合理性对自然的影响通过规定理论概念自身而显现为“工具理性”。

375

在卢卡奇那里，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物化”现在延展至人类学（同上书，第 47—48、164 页），这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远离实际的干预可能性。预先推定也须相应回撤：从政治上的相反方案后撤至发誓“独立思维”（同上书，第 123 页），从理论认识后撤至艺术（Adorno 1970）。马尔库塞（1967，第 265 页）得出结论，批判理论最薄弱之处是其“无力指明现有社会**内部**的解放性趋势”。

3. 在未来学之辩中，预先推定充当预后学的对立概念，预后学推断性地延长了当下。此概念在此几乎无所区别地描述一切要求“创造性地”超越对“强制下注”的适应之事，从另类发展直至“面向未来的哲学”。尤其将此表达成包含“善”或者“应然”的伦理价值（参见 Flechtheim 1980，第 201—202 页），可以解读为实际上无能为力。在“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中，预先推定应代替不再有时间留给它们的耗时经验过程（Peccei 1979，第 52 页）。以面向民主的、生态保护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批判性未来学主要因 O. 弗莱希特海姆（O. Flechtheim）所建立的“未来学”、R. 容克（R. Jungk）创始的“未来工作坊”而闻名。

必须把从事不可能之事作为“坏习惯”加以反对，布莱希特的《墨翟》中写道：“必须戒除去往行不能至之处。”（GW 12，第 514 页）对乌托邦的批判伴随着一种可以想象的预先推定升值。布莱希特把爱当作最为严肃的先做先说之一，他把爱领会成“产生一种高级秩序”，使它摆脱市民私人性的桎梏：“最优秀者能将其爱与其他创造完全和谐一致；于是他们的友好成为一种普遍的友好、他们的创新天性成为有益于许多人的创造性天性，而他们支持一切创造性。”（同上书，第 572 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GS 7, Frankfurt/M 1970; H. L. Arnold (Hg.), *Ernst Bloch*, Sonderband *Text + Kritik*, München 1985; G. Bensussan, »Vorwegnahme/Antizipation«, in: KWM 8, 1399f;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WA 4, Frankfurt/M 1985; ders., *Geist der Utopie*, Zweite Fassung (1923), WA 3; ders., *Das Prinzip Hoffnung*, WA 5; ders., *Tübinger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WA 13; ders.,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 hgg. von R. Traub u. H. Wieser, Frankfurt/M. 1980; M. Ebeling, »Antizipation«, in: HWPh 1, 419-423; O. Flechtheim, *Der Kampf um die Zukunft. Futurologie*, Bonn-Berlin/W 1980; F. Haug, »Tagträume – Dimensionen weiblichen Widerstands«, in

Argument 147, 26. Jg., 1984, Nr. 5, 681-698; dies., »Knabenspiele und Menschheitsarbei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als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in: *Eht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4. Jg. 1993, Nr. 2; W. F. Haug, »Die Bedeutung von Standpunkt und sozialistischer Perspektive für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ders., *Determinante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Situation*, AS 218, Hamburg 1993; F. J. Hinkelammert, *Die ideologischen Waffen des Todes. Zur Metaphysik des Kapitalismus*, Freiburg (Schweiz), Münster 1985;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Kronberg 1973; M. Horkheimer,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1947), Frankfurt/M 1967; M. Horkheimer,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4), Frankfurt/M 1969; H. 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Frankfurt/M 1984; G. Kröber, »Prognose«, in: PhWb, Bd. 2, 978-983; E. Mandel, »Antizipation und Hoffnung als Kateg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K. Bloch, A. Reif (Hg.), *»Denken heißt Überschreiten«. In memoriam Ernst Bloch 1885-1977*, Frankfurt/M 1978;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67), Darmstadt [22]1988;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oder Die Genossin Luxemburg bringt alles durcheinander*, Hamburg-Zürich 1985; A. Peccei (Hg.), *Das menschliche Dilemma. Zukunft und Lernen*, Wien-München-Zürich 1979;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 1979, [3]1987; H. J. Sandkühler, V. Schürmann, »Antizipation«, in: EE, 149-154; V. Schurig, *Die Entstehung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Frankfurt/M 1972; Th. Weber, »Glücklose Engel. Über ein Motiv bei Heiner Müller und Walter Benjamin«, in: *Argument* 198, 35. Jg., 1993, Nr. 2, 241-253; P. Zudeick, *Der Hintern des Teufels. Ernst Bloch – Leben und Werk*, Bühl-Moos 1987.

让·雷曼 撰

朱更生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neignung, Anthropologie, Arbeit, Arbeitsteilung, Assoziation, aufrechter Gang, Avantgarde, Bedürfnisse, Befreiung, Befriedigung, Demokratie, disponible Zeit,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Emanzipation, Entfremdung, falsches Bewußtsein, Fortschritt, Gattungswesen, Gemeinwes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etz, Herrschaft, Hoffnung, Hoff-

nungslosigkeit, Industrialismus, Kommunismus,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Naturbeherrschung, Notwendigkeit/Freiheit, Phantasie, Phrase, Produktionsweise, Religionskritik, Resurretkion,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tandpunkt/Perspektive, Überbau, Unterdrückung, Utopie, Zukunftswerkstätten

377 应用（Anwendung）

自从马克思试图确定其“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K I*, MEW 23，第31页）的“分析方法”，理论思考就专注于此方法的秘密。是否确实可言“应用”此法，相对较晚，成为问题，因为马克思转而相信一种普遍的世界观，“一以贯之”或者“创造性地”应用它预示着理解一切特别的问题情境，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都与这种观念做斗争。因而，阿尔都塞指出，“辩证法在其可能的对象面前的外表，亦即应用一种方法的疑问，提出一个前辩证法疑问，亦即严格说来对马克思而言不可能有意义的一个疑问”（*FM*, 第56页）。

然而，对这种率直说话方式的批评抛出双重问题。首先，这种率直说话方式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它对马克思还是有意义的吧？而由此提出哪个疑问呢？其次，虽不难引证“经典大家”以批判那种观念，即马克思主义作为“可应用的”学说而（先）存在。不过，人们以此**应用**这些言论，还用于所引证的（权威）作者根本无法想象的问题情境，以此给予这些言论以全**新的**意义。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以应用这一术语为工具的意识形态畸变，则又出现应用问题。还是阿尔都塞视“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马克思为理解马克思的绝对先决条件”（*FM*，第39页）。这种循环通向解释学，解释学教导我们：“理解并不怎么是认识的意识用以专注于所选择的对象的一种方法，……而是以置身于传承过程为前提”（Gadamer 1960，第293页），归根结底要求批判此方法。

1. 传统解释学中，**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 applicandi*）、应用，除了指称**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 explicandi*）、解释和**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 intelligendi*）、领悟外，还指称“完成领悟的方式”中的一个契机（同上书，第291页）。这一维度由虔敬主义加以发展，也许并非偶然，因为“修身养性的应用，如基督教宣布福音或者布道时《圣经》得到的应用似乎迥异于历史的和神学的理解”（同上）。伽达默尔（Gadamer）的《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试图建立的人文科学现代化的解释学却坚持解 378

释 / 领悟 / 应用三位一体寓于完成领悟之中；神学解释学与法学解释学中，应用的“规范功能”起主导作用，语文学解释学中，似乎只有领悟的“认知功能”在起作用，这些解释学之间在此方面也就不会有区别：关键始终是，“文本若要得到恰当领悟……，须在任何具体情境中得到新的不同领悟。领悟在此始终就是应用”（第 292 页）。“恰当”指的是为使法律文本再度取得其“法律效力”，圣经经文再度取得其“救赎功效”，还有可以用阿尔都塞的话加以补充，为使学术文本即使在变化的条件下也再度取得其“认识成效”。应用就会是“屈从于文本的支配性要求的”一种活动（第 295 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准确表述了此处表现出来的统治关联。“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MEW 3，第 539 页）此处“关于这些思想家”（第 405 页），应用必然归入扭曲性思辨的结构之中，在此结构中，这些思想家“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同上）。现实的动力因，劳动分工、阶级统治与国家形成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结构并未进入“‘概念’的生产者”（第 49 页）的意识。然而，此形式的“虚幻”不仅是颠倒的：马克思着眼于劳动分工上突出再现瓦解了的共同体。“法学家、政治家（一般的国务活动家）、伦理学家、笃信宗教者”把“一般”观点应用于生活的特殊性（第 539 页）是“通过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来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第 34 页）；（至少在他们的想象中）操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第 46 页）是再现“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同上）。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上”但并非在其存在方式上作为专门化的思维活动“超越这些关系”，它必然又染上这种幻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可能做批判，恰恰归功于摆脱了以文本解释为媒介再现的统治制度，在统治制度中，现实必定表现为应用较为高级的陈词滥调。对与这种意识形态形象决裂的表述贯穿于著作中。对马克思而言，这种表述在政治上适合一个阶级，“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所以，它“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Klassenkämpfe*，MEW 7，第 89 页）。这

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幻觉必定在无产阶级“自由历史运动”中烟消云散（同上）。恩格斯相应地抨击“杜林先生的方法”（*AD*，MEW 20，第88页），把此法看成“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同上书，第32页）。恩格斯用以驳斥杜林的原则是，对辩证法“不能……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第334页），并把发生学关联提升入意识：“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联系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同上书，第36页）

相比之下，马克思说到“《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K I*，MEW 23，第25页），似乎这种说话方式更加成问题，因为他实际上证明它是荒谬的，而按他自己的标准，他对这种方法的“个人的……运用”恰恰在于：不向这种方法提供事物外在的“逻辑”，而是发现并阐述事物内在的逻辑。“这点一旦做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阿尔都塞指出，“使用理论而将其公式（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公式）**应用**于先存在的内容上，结果不会相同”（*FM*，第108页）。

但按照阿尔都塞“使用理论”这一标准，又出现应用问题。难道它对马克思的确具有“合理的”但并非华丽地预先构造的意义？实际上，明确遭排斥的 380
关于“应用一种方法”之辞复归，表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曾考虑的问题，即应在意识形态意义建构过程中研究的“现实生活”至少令人不能直接获得其现实性：转道“传承语境”（葛兰西语）与流传下来的观念、解释、概念、方法做斗争，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结果会不足以“摒弃在应用辩证法形式时的教条主义并依赖既存的理论上的实践的**自发性**”（*FM*，第109页）。并非应用观念上的陈词滥调本身就是可鄙的，而是在解释学中确定的意识形态实践，它以所解释者作为过渡者把“普遍的”观点、“特殊的”情境两分。关键是这种意识形态实践的**辩证法**，使得对一种几乎永恒的方法的应用，没有采取从原则推导的形式。这令人对马克思所用的范畴“指导”（*Vorw* 59，MEW 13，第8页）感兴趣，指导从材料中获得，在运用于新事态时须探索性地经受考验。

2. 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理论家觉

得自己清醒面对解释学应用问题：此处是（通过党的决议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家”的权威，彼处是突变的资本主义新型阶段，这种资本主义抛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有何“可应用”。

对立观点同样利用马克思，形成的路线之争不同于以权威解释形式出现的那类怀疑。首先，可应用性疑问就不再是实际检验、讨论各项定理；它成为抉择一种普遍理论之问，应用这种普遍理论就保证取得革命成效。列宁在俄国革命前夜解释道，“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SR*，LW 25，第 471 页）确实，马克思拒绝“应用到俄国”，如果这种应用把俄国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
381 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MEW 19，第 111 页）

然而，《国家与革命》丝毫不亚于列宁一向要求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LW 31，第 154 页）：其实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笼统的言论“应用”于具体情况，以把列宁的路线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载入史册。反之，下一代阐述者将引证列宁的解释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续写为“列宁主义的”。

卢卡奇从“列宁主义”立场出发，抵制合法利用经典大家的语录。他认为自己的基础不再是可能变得可疑的马克思的“学说”，而是“一以贯之地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应用……于一个非凡过渡时代不断变更、新意迭出的现象”（1924，W II，第 548 页）。“但因为辩证法并非可以机械……应用的完美无缺的理论，而**只在这种应用中、通过这种应用作为理论而存在，辩证法**产生于列宁的实践……，**理论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同上）解释活动在此与政治实践融为一体，而反之，政治实践应把自己想象成对理论的应用，对生搬硬套应用作本身合理的批判，剥夺了理论讨论的权威，有利于政治领导人可以要求的特别解释权。

在斯大林处，应用变成一种“延展”，暗中把形而上学的立场引入马列主义之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DHMat*，*Kurzer Lehrgang*，第 131 页）但斯大林也利用在卢卡奇处预设的对学说的精神与字眼所做的区分，以“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不限于背诵马克思主义各项普遍原理，而是钻研马克思主义本质”（*Rechenschaftsbericht an den XVIII.* Parteitag，

1939，*FL*，第 725 页）。这加以合法化的就是，推断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恩格斯的笼统表达”，它“无法用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特殊、具体情况”（第 724 页），这把（在 1939 年的情

382 境下难以否认的）安全国家的必要性归入马列主义传统。这种表达所说的对理论的“创造性应用”在此加以合法化的是其反面、一种不应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文本要求具有意义的要求符合现实，颠倒了自己的意图。

按照精神应用理论而非生搬硬套应用理论，斯大林据此可以把制度上逐渐纷繁复杂的“永恒真理总管理处”（Havemann）中最高解释权抓到手里。举足轻重的理论家所应用的形式囿于马克思学说的原文，现在，对此做有根据的反对就使这些理论家自食其果，就此还是放弃了针对党和国家领导独占解释权的终极异议。斯大林的嘲讽会针对“教条主义者”，他们死抠比如马克思的字眼。国家指定的一帮解释者却只能遵循具有在观念上反映政治上所希望的解释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质”。文本批判语文学的监督机构遭整肃（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第一版及其领导梁赞诺夫［Rjazanow］的命运）。“创造性应用”理论在此方面也表明自己是花言巧语表现其对立面、众口一词重复规定的真理。

由此把认识的产生列入社会势力架构，却在“学者的自发哲学”（阿尔都塞语）中找到根据。设想方法性原则的定理或者一致的解释关联（“逻辑”），应用它们应该从一开始就应保证认识，这种设想是事后的幻觉，未及确证、试验性的实际研究过程产生此幻觉作为对自己的反映。如果哲学专家的讨论对此做跟踪，则系统性地把研究结果倒转成较高级的老生常谈，这种倒转事后又消灭了任何所获得的认识。所以，针对把辩证法规律应用于政治经济学，一种标准注解试图表明，“马克思如何应用辩证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在‘资本……是一种运动’这句话中表达的原则”（Rosental 1967，第 32 页）：在所引用的语境中，马克思论述的是，只能分析“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具有相应形式变化的资本（*K II*，MEW 24，第 109 页），而解释使之成为社会性会源于 383
此的一个概念逻辑过程：“运动、发展正是锻造因果关系链的那个巨匠造物主，一种经济形式内在的、内部必然的自我变化成其他形式受制于这种因果关系链。因此，在马克思处，运动和发展这一逻辑范畴是任何具体经济范畴的‘灵魂’。”（Rosental，第 35 页）在关于应用的幻觉中，理论的“流动”概念以此方式变成形而上学的固定真理，而理论上的实践受制于那些人的解释能力，用马

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DI*，MEW 3，第 405 页）。阿尔都塞断定，就此而言，关于应用的关系表明“某些哲学”在干预（1967，第 43 页）。

3. 卡尔·柯尔施表述了“把唯物主义史观也应用于唯物主义史观自身”这一要求（1923，第 34—35 页）。他断定，“当今主流的两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代表”将此要求“以可靠的直觉……谴责为**偏离公认的学说**”。（1930，第 32 页）自我应用的假设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而且对自己的兴起语境与作用语境必须做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因此，主攻方向在此是反意识形态的。

只要在此也把有待应用者又理解成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自身法律基础形式出现的非凡哲学（这不符合柯尔施的想象，但可能符合阿尔都塞一以贯之的对自我应用假设的应用），其中就会再度包含解释学循环之虞。“在我们宣布并应用我们的原则之前，应开始……客观地辨明它们”（*FM*，第25 页），针对阿尔都塞所引述的这种要求，只能提醒，只要这些原则不对现实斗争提出反证，而是从现实斗争中发展而来（参见 MEW 1，第 344 页及以下），也不再可能存在。依马克思之见，理论上的实践不可能以想象的而只可能以“现实的”基础为基础，在此事实与一种传统框架、定位框架的必然性之间似乎存在一种二律背反。一种把握其辩证法的**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 applicandi*）更加必要，以使其“克服文本遭受的意义异化”（Gadamer 1960，第 295 页）。

参考文献：　384

L. Althusser,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1967), Berlin/M 1987; H.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1960), Tübingen, 3., erw. Aufl. 1972;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2]1930), Frankfurt/M 1966; M. 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 (1967), Berlin/W 1973; G. Lukács, *Lenin. Studi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1924), W II, 548.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 撰

朱更生 译，梁爽 校

参见：

Ableitung, Anerkennung, Antiideologie, Antiphilosophie, Dialektik, Dogmatismus, Erkenntnistheorie, Forschung/Darstellung, Gesetz, Hermeneutik, Idealisierung, Ideologische Form, Illusion, Leitfaden, Methode,

Talmudismus, Philosophie, Theorie/Praxis, Verkehrung, Zitate

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中的麻木不仁（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jka）的理论家把对公共事务无热情、不主动这种蔓延甚广的习性称为麻木不仁（“无动力”，本义为“无感觉”、“迟钝”，来自希腊文 *πάθος*，即“情感”），并将这种蔓延甚广的习性理解成统治制度在主体身上投下的阴影，这种阴影一方面投在他们的劳动力消耗上，另一方面投在他们的政治责任心上。

1. 由于极权国家的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如同“麻木机器”（参见 Haug 1989，Kap. 5 和 6），因此，人们可以将其无意中的产物，即群体性的麻木不仁，理解成名副其实的“主观因素的瓦解”（Butenko 1988）。戈尔巴乔夫写道（1988a），这种基于命令、官僚行政管理的生产方式制度，使苏联社会遭受了“官僚主义、管理混乱、社会麻木不仁和不负责”的厄运。自 1983 年起，他的文章中愈益清晰地流露出这样的认识，即正是苏联的生产关系导致了该国的“停滞和漠不关心”（1987 年 11 月 4 日，AR 5，第 41 页）。超级大国中央集权制对生产和分配做行政命令式的规定，并把主动性逐入私人领域或者犯罪领域，这导致许多 385
干部对工作了无兴趣，害怕担责，持观望态度，心照不宣地向上汇报喜讯以邀功。酗酒蔓延为麻木不仁的享受方式。“工人缺乏纪律”（*K I*，MEW 23，第 390 页）和他们对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这些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形式似乎作为扭曲形象而死灰复燃了。下级对上级的平均主义报以漠不关心。由于缺乏刺激生产率的经济机制，领导一再遁入**唯意志论**，它（辅以斯大林治下的恐怖和集中营苦役制度，佐以他的继任者治下的监视和压制）以**运动**的形式动员群众。但是，降级成**无名小卒**和**受命于人者**（Brecht GW 16，第 649 页）、降格为单纯人力资源和附庸者的人们，以麻木不仁来做出回应。

集约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主义革新尝试，与“社会中郁积的麻木不仁”相冲突（L. Abalkin 1987，第 103 页），并且触动不了这种积习。取消压制力量时，并未出现预期的个人和团体的主动性。“麻木不仁却远强于忧惧。”（Batkin 1988，第 207 页）新安排的措施（合作社、租赁、合同制）依然未得到执行，或是并未依附在其他形式下得到利

用。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大多数人的特征（1988b，第 112—113 页）是“其消极态度、毫无国民特色、麻木不仁、思维不独立，这些是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的直接影响”。1988 年的第十九次党代会上，他重复道，“制动机制……将会一直运转，直到它成功消除社会中的麻木不仁、游手好闲、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和作为主要操控方法的管理方法”。

2. 在国家社会主义异化、停滞的麻木不仁症候群中，叠加着不同的决定因素，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偶尔得到分析。首先说到的是前现代的心态。这一意义上的麻木不仁概念出现在恩格斯处，它涉及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各阶层昏昏沉沉。恩格斯欢迎工业革命，并指出，它“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
386 （*Lage*，MEW 2，第 239 页）。这首先涉及农民“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MEW 22，第 485 页）。——具体的起源是屈服于暴政由来已久，引起“对劳动特定性质的漠不关心”，马克思发现它在俄国农民身上沉淀为“天生的素质”；在他看来，其根本决定因素，是“（他们）传统上被束缚在特定的劳动上，而只是外来的影响才让他们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Einl 57*，MEGA II，1.1，第 40 页；MEW 13，第 636 页）。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知识分子身上观察到一些互补的态度：19 世纪 80 年代，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遇刺之后，“挥之不去的无望时代降临俄国”，“心情压抑、心灰意冷”。“在这种麻木不仁、灰心丧气的气氛中，俄国知识界兴起形而上学潮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主义”和“托尔斯泰禁欲主义学说”：作为不抗恶的“社会消极态度理论”。（GW 4，第 326—327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由此导致的 1917 年革命，似乎恰好直截了当地把农民群众卷入历史，并动员知识分子热心投入。但鉴于勃列日涅夫（Breschnew）时代最后几年中的停滞与腐败的经验，似乎革命中产生的极权主义的资本积累制度的迟发后果，把俄国群众从历史中又赶回无历史感的麻木不仁。在征收富农财产——列宁明确拒绝这一做法（Butenko 1988，第 650 页提供了证据）——的过程中，暴力政权的遗产与一种粗暴的官僚制的机器般的功能主义融合成残暴支配人群的政策，这种政策恰是与冷漠的毁灭形影相随。

3. 如果说 1917 年革命把大部分俄国群众抛入历史，那么，在新的统治条件下重新推动经济与管理时，陈陈相因的漠不关心、夸夸其谈态度显效了。随着绝望情绪的滋长，列宁对这种“共产主

义的或者毋宁说俄国的奥勃洛莫夫作风（Oblomowtum）”症候表态了（LW 33，第199 页），它作为麻木不仁中的单纯幻想性活动而壮大。他用冈察洛夫（Gontscharow）小说中的人物奥勃洛莫夫（Oblomow）来抨击一种“俄国生活典型”，即惯于“一直躺在床上打造计划”（同上书，第 209 页），其“共产主义的”变体以“一直开会、组成委员会、制订计划——以至无穷”来消磨时间（同上）。在第十一次俄共（布）党代会开幕词中，列宁鞭挞道，“有多少奥勃洛莫夫作风仍潜伏在我们中间，人们还将不可避免地为此痛打我们”（LW 33，第 270—271 页）。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将会发笑：1917 年，获任为最高指挥官的克伦斯基（Kerenski）遭嘲笑为“头号煽动者”，但共产主义者举止如同“大空谈家”。（同上书，第 271 页）

387

不过，列宁因其关于国家、党派、工会各自角色的观点而无意中助推建立了行政命令式的消极抵抗安排。1921 年 1 月，在涉及工会是应成为党的抗衡力量还是工具时，他抨击“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LW 32，第 58 页）。托洛茨基意欲扩展强制，而布哈林则意欲允许抗衡力量。列宁把强制限于国家，但他贯彻的是作为中央权力“传动带”的工会概念。他将国家解释成“实行强制的领域……‘行政管理’和对事物的行政处理在此不可或缺”；党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执政的先锋队，是领导者。开除出党而非强制是保持纯洁和百炼成钢的特殊手段……”；他宣布工会是“国家政权的宝库，是共产主义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此地的特殊性……**并非**管理，**而是**‘中央的’（当然还有地方的）‘国家行政机构’、国民经济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同上书，第 89 页；单引号中的引文出自党纲）在关于工会的讨论中，领导层出现分化。通往国家多元权威模式的道路阻塞了。布哈林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或许更为有益。

4. 对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斗争贯穿整部苏联史，在此方面，一再可以观察到的，是席卷大部分人民的革命热情的爆发阶段。但行政命令式结构、暴力、官僚作风和不实宣传，均与热情相矛盾，这种热情要求有一种能动员群众主动作为的制度。自上而下组织的运动是要激起热情。但这使令人压抑的官僚主义勉为其难。强求来的热情留下双重的麻木不仁。尤其是运动常常源于随心所欲改变的方针。所以，即使是阶段性的改革项目也搁浅了。总体上，可以把麻木不仁理解成苏联型国家生产方式的主体效果。

388

正如列宁把奥勃洛莫夫这一文学人物用于抨击各种形式的麻木不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麻木不仁的形式，表

现在文学、戏剧和电影中。钦吉斯·艾特马托夫（Dschingis Aitmatow，应为Tschingis Atimatow，原文疑误写。——译者）在《一日长于百年》（*Der Tag zieht den Jahrhundertweg*）（1981）中创造了“无资格同志”这一人物，上级把这个“底下人”视为无资格者，让他一直无能。

直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制度本身是原因所在时，学术界、政治媒体和理论媒体才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分析在国家实际占有的情况下，只是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的病征。比如，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尚属“非法地”、米夏埃尔·布里已经“合法地”敢于清晰思考个中关联：统治机器所具有的作用是“扼杀一切主观积极性或是将之私人化”（Bahro 1977，第12页）。社会主义变身成专制国家，这导致“以总指标为标志的为生产而生产，导致漠不关心、草率从事、挥霍国民财产，导致盗窃与腐败”（Brie 1990，第41页）。

1991年的政变与反政变终结了戈尔巴乔夫改革，大多数人依然漠不关心，这就注定了苏联的命运。

参考文献：

L. Abralkin, »Wohin wir gehen«, in: J. Hufschmid (Hg.), *Glasnost/Perestrojka 1: Streiten für die Umgestaltung. Die sowjetische Diskussion*, Köln 1987, 97-107;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Köln-Frankfurt/M 1977; L. Batkin, »Erneuerung der Geschichte«, in: J. Afanassjew (Hg.), *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 zu Perestrojka: Glasnost, Demokratie, 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8, 202-247; R. Blum, »Entfremdung und Sozialismus«, i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hgg. v. d. AdW d. UdSSR, H. 1, 1989, 239-243; M. Brie; *Wer ist Eigentümer im Sozialismus? Rechts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Berlin/DDR 1990; A. Butenko,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Umgestaltung des staatlich-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in: Afanassjew (Hg.) 1988, 640-661; M. S. Gorbatschow, *Das Potential der Genossenschaften – für die Perestrojka* (Rede auf dem IV: Kongreß der Kolchosbauern), Moskau 1988 (a); ders., »Die revolutionäre Umgestaltung erfordert ideologische Erneuerung« (Rede auf dem ZK-Plenum vom 18. Februar), in: ders., *Perestrojka – Die zweite Etappe hat begonnen*, Köln 1988 (b);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1990); I. Narski, »Antwort an R. Blum«, i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1989, 243-249.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朱更生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neignung, Angst, Arbeitserziehung, Autorität, Bauern, befehlsadministrativer Sozialismus, Bewußtheit, Bür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isziplin, Dummheit, Engagement, Entfremdung, Enthusiasmus, Gebrauchswert, Genossenschftsbewegung, Gewalt, Gewohnheit, Gleichgültigkeit, Gleichmacherei, GULag, Herrschaft, Hoffnung, Initiative, Interesse, Kampagne, Kommandowirtschaft, Kompetenz/Inkompetenz, Korruption, Leistung, Leitung, Motivation, Neues Denken, oben/unten, passive Revolution, Perestrojka, Phrase, realer Sozialismus,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Staatssklaverei, Staatssozialismus, Subjekt, Subjekt-Effekt, subjektiver Faktor, Subjektwissenschaft, Totalitarismus, Volkseigentum,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Zentralosmus, Zwang

辩护论（Apologetik）

此概念（来自希腊文 *ἀπολογία*、“辩护”——参见 Platon, *Apologie des Sokrates*）源于基督教传统。辩护论意指一种观念上的活动，基督教借此驳斥攻击或者（在现代世界）应对它逐渐不受承认的状况。虽然从一开始，在基督教中就有辩护论，但直到 2 世纪辩护士才创造了这个概念。

马克思仿效启蒙运动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在贬义上使用辩护论概念。马克思一般以此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辩护尝试。在他的经济学批判著作中，他以此概念主要（不过并非仅仅）针对（资产阶级）科学，尤其是庸俗经济学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庸俗经济学推行这种辩护论的方法有二：一方面是制造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在试图辩护的过程中应用这种观念。在此意义上，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立。正是因资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而引发了新的阶级斗争，“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K I*，MEW 23，第 21 页）

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虽有其社会形式规定性，但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就是资本。由此就产生更为具体的观念，比如，资本家只“关心消费某些产品……，不关心增加预先存在的价值”（MEGA II，3.1，第 88—89 页），或者，

工人活着是资本的功劳，而非相反。如下观点也源于庸俗经济学辩护论，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K III*，MEW 25，第 402 页）。

“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K I*，MEW 23，第 461 页；参见第 668—669 页），马克思也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阶级斗争方面的这一重要观念称为“辩护的”。辩护论概念与阶级斗争的密切关联或许最为清晰地表现在三要素说的三位一体公式中，根据这一公式，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生利息，劳动产生工资。虽然马克思把以此为依据的思想统称为“辩护论的”（*TM*，MEW 26.3，第 445 页），但在源于该公式的观念中，只有处于中间位置的、同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联系最紧密的观念，才被明确地贴上了“辩护的”标签（同上书，第 484—485 页）。

马克思也在其他语境中言及辩护论。比如，他把马尔萨斯称为“反对无产阶级”的贵族辩护士（*TM*，MEW 26.2，第 110 页）。亚当·斯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把“意识形态阶层”中“非生产劳动者”（僧侣、律师和军官等）理解成非生产性的，马克思也多次把这些人的辩护要求称为辩护论。马克思还把反对斯密区别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斗争，当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出发的辩护”（*TM*，MEW 26.1，第 253 页）予以拒斥，此时，此概念只是间接地涉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阶级斗争：这就是说，占有权力的资产阶级获得如下经验，即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它在原则上需要此类非生产性阶层，这与它之前的封建政权并无二致。

马克思也用诸如“献媚者”（*K I*，MEW 23，第 669、788、793 页）、“良心安慰者”（*TM*，MEW 26.1，第 274 页）、“诡辩家”（比如 *K I*，MEW 23，第 635 页）等表达来代替辩护士这一表达。

总体上，对马克思而言，辩护论似乎是关乎行动的概念，辩护士通过这种行动自觉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观念之所以可以被称为辩护的，是因为对它们有意识的使用或者塑造（改造）有利于资本，因而不利于工人阶级。在此方面，（帕雷克［Parekh］等人的）如下断言是成问题的，即马克思一般（也就是在应用语境之外）是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歪曲的观念视为辩护论。比如他不说关于劳动价格本身的观念是辩护论，而是说“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K I*，MEW 23，第 562 页）**所依据**的东西是辩护论。也须提防把马克思所说的辩护论与意识形态等同。在他那里，这些概念表示不同现象；不

过，它们相互关联。

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也吸收了该词。比如，罗莎·卢森堡指责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通过放弃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而混淆了“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基础与资产阶级的辩护士”（GW 1 / 1，第 438 页）。又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成斯大林式国家社会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遭受指责是为“现实社会主义”停滞的合法性做辩护的教条体系。因而，奥斯卡·内格特（1969，不过他并未使用“辩护论”一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称为“合法性科学”（Legitimationswissenschaft）。

布莱希特在其《图伊小说》（Tui-Roman，GW 12，第589 页及以下）中深入安排了辩护论主题。图伊（Tui）（= Tellekt-Uell-In）是向强权者兜售根据的人，是滥用智力以服务于强权和金钱的知识分子，布莱希特也把“革命性的图伊”（Revtui），即出类拔萃的辩护士列入此类。

参考文献：

Brechts Tui-Kritik, AS 11, Berlin/W 1976; O. Negt, »Marxismus als Legitimationswissenschaft. Zur Genese der stalinistischen Philosophie«, in: N. Bucharin, A. Debo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69, 7-48; B. Parekh, *Marx' Theory of Ideology*, London 1982.

韦科·皮耶提拉 撰

朱更生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lltagsbewußtsein, Aufklärung,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Dogmatismus, falsches Bewußtsein, Fetischismus, Form, Ideologen, Ideologie, ideologische Stände, ideologischer Klassenkampf, Legitimation, Lüge, Mystifikation, Phrase, Stalinismus, trinitarische Formel, Tuismus, Vulgärmarxismus, Vulgärökonomie, Zweifel

阿拉伯社会主义 392
(Arabischer Sozialismus)

主流阿拉伯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自 19 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试图借以一方面在阿拉伯地区丰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定观念，另一方面试图把它们限定在西欧。1917 年之后东欧和 1949 年之后东南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及 1968 年之后欧洲共产主义这些观念有类似遭遇。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强调国家集中占

有、私有财产份额、西亚北非的自然历史特点和伊斯兰教。证明这点的是1945年之后30年间他们的国家做法，尤其是1952年埃及政权颠覆和1969年利比亚政权颠覆之后，在这些做法中，他们也通过泛阿拉伯主义而联合不结盟国家对付冷战中的东西方集团。这种国家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北非和西亚由民族主义军官支撑，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第一阶段非殖民化之后的）第二拨非殖民化中以单一民族国家的上层建筑形式代替殖民上层建筑形式。因1967年中东战争失利，阿拉伯社会主义在21个阿拉伯国家失去影响。“1917—1991年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伊斯兰社会主义开始改革。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地缘的或者宗教的社会主义概念如“基督教的”或者“德国的社会主义”（*Manifest*，MEW 4，第484—485页），而使用阶级分析的定语，以把他们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反革命的”（“封建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保守的（还有“资产阶级的”）或者乌托邦的形式相区隔。不过，他们因两类矛盾促进了“民族—地缘的社会主义”：他们在西欧获得的理论、做法的普遍要求与亚洲和非洲的不同情况之间的矛盾，还因思想史上、社会类型上与方法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大多触及他们著作中的次要方面，比如亚洲的生产方式。（*Gr*，MEW 42，第383—421页）

在北非和西亚阿拉伯社会主义杂烩观念中，此类矛盾使人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涉及西亚北非问题的历史以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MEW 28，第247页），论点有，宗教是“人民的鸦片”（*KHR*，MEW 1，第378页），还有《古兰经》宣布任何外国人均为敌人（MEW 10，第170—176页）；缺乏私人土地所有权是西亚北非政治史、宗教史的关键（MEW 28，第254、259页），这种历史显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MEW 28，第252页）；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MEW 28，第247、259页）；伊斯兰教的作用（“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伊斯兰教在“宗教起义”中是“周期性”反复的冲突的核心，在这些冲突中，“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同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在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宗教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摧毁陈旧的经济制度会令“世界向前迈进”（MEW 22，第450页）；西亚北非专制政体中的社会形式（MEW 9，第

393

127、132 页）和亚洲生产方式连同其巨大但有限的“在一个特定范围内的发展”，欧洲个人和社会“自由且完全的发展”与这些发展对立（*Gr*，MEW 22，第 394—395 页）；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全球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会通往无阶级社会（MEW 28，第 508 页）；“从印度到俄国的东方专制制度”中的改革与革命（*AD*，MEW 20，第 168 页），这些专制政体“从遥远的古代直到 19 世纪最初十年”（MEW 9，第 130 页）的停滞（MEW 28，第 267 页）和殖民大国如英国负有“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MEW 9，第 221 页），英国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MEW 9，第 132—133 页）；发达和不发达的民族的前景对资产阶级着迷，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Manifest*，MEW 4，第 466 页，参见 *Ursprung*，MEW 21，第 30—35 页）。

四项因素限制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做原原本本的接受：（1）缺乏文本基础；（2）他们涉及阿拉伯世界的言论零星分散，不加修饰；（3）特殊的障碍妨碍接受；（4）政治上的工具化。

1. 因缺乏合适的译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拉希德·巴拉维［Rashīd Al-Barāwī］才在开罗以阿拉伯文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连在原文中所表述的自我限制也未得到接受，如马克思明确指出，他把资本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MEW 19，第 111、384 页），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第 397 页），使得此处“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第 384 页）。在俄国（而且可以补充道，在西亚、北非）有远古形态并且在中央专制政体下，资本主义生产必定“相反地”把农民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第 397 页）

恩格斯同意此观点，他明确指出，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的阶级”（MEW 4，第 462 页），使得比如在阿拉伯直至 19 世纪欧洲殖民，可能较少有“对抗的阶级”生活于主要基于公有制的安于现状的自然历史环境中，因而缺乏适合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基础。此外，他修改了《共产党宣言》中“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的观念，他还是觉得“在西南部定居的阿拉伯人，

看来曾经是像埃及人、亚述人等一样的文明民族；他们的建筑物就证明了这一点”（1853 年 5 月 26 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28，第 246—247 页）。——“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同上书，第 247 页）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北非和西亚的意见其实是报章杂志上与信件中的争论，因为他们较少致力于这些宗教，也并未为了学术出版而深入阐述他们的概述。

3. 1826 年至 1831 年埃及派驻巴黎的首个考察团团长里法·拉菲·阿塔赫塔维（Rifā' Rāfiᶜi At-Tahtāwī）说，阿拉伯人依靠圣西门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起先还在诸如大不列颠、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殖民大国中依靠马克思主义人士。自犹太人从东欧前往巴勒斯坦的首拨移民潮（1882 年）起，面对
395 阿拉伯地区并且在其内部，世界大国、大国和地区大国的理论家和实干家日益把社会主义计划加以“阿拉伯化的地区化”，在犹太复国主义中，移民合作社社会主义在中东冲突中身份特殊。

在阿拉伯半岛，其他社会主义著作鲜为人知，它们因语言障碍而常常受到有选择性的注意：社会民主党人中有倍倍尔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化周期》（*Mohamedanisch-Arabische Kulturperiode*）（1884）、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1899）和《资本积累论》（1913）或者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1887）和《无产阶级专政》（*Die Diktatar des Proletariats*）（1918）及其校勘的《资本论》（1905—1910）。对俄国和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如列奥·托洛茨基（Leo Trotzki）、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接受几无二致。

1908 年派往欧洲各中心的 600 名埃及人就更直接地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观念，其中许多人在法国。而埃及大穆夫提穆罕默德·巴希特（Muhammad Bakhīt）在一份法律意见书中谴责“布尔什维克的反伊斯兰教道路”。1920 年，又有许多阿拉伯人前往欧洲研习，此次前往德国。除了经由阿拉伯人在北美、东欧和西南亚的学术活动而直接接受外，20 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观念与共产主义观念也通过共产国际（1919—1943 年）和社会党国际的活动而传到阿拉伯地区。

4. 社会主义观念有目的地传播：对其介绍（作为“科学”社会主义或者依据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Ho Chi Minh］、铁托［Tito］及其接班人的“个人”社会主义以及冷战期间在西欧、北美在欧洲共产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

者之间的东西之争中）自 1917 年起在东欧、1949 年之后在西南亚屈服于国家政策的考虑。

自 1848 年起，阿拉伯人接受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此过程中，埃及人、阿尔及利亚人、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与叙利亚人表现突出。词源上，*ishtirākīya*、（欧洲 19 世纪 30 年代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源于早在伊斯兰教时代之前就在阿拉伯半岛为人所知的阿拉伯语动词词根 *sh-r-k*：*shirk* 意为公共占有制或意为后来 7 世纪在《古兰经》和圣训（Hadīth）经文中的多神论。1861 年，一部英文—土耳其文词典首次把 *ishtirāk* 解释成“社会主义”。1871 年，黎巴嫩的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利姆·布斯塔尼（Sālim Al-Bustānī）把巴黎公社称为 *ishtirāk*：向往“人民群众分享社会财富”。欧洲一个社会主义党派的译名与此相似：*hizb al-ishtirāk al-ᶜām fī-l-māl* wa-l-aml*āk* —— 公众分享金钱与财产党。

396

1898 年，布特鲁斯·布斯塔尼（Butrus al-Bustānī）首次把 *ishtirākīya* 一词收入其阿拉伯百科全书。他指出分享财产原则，指出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直至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的乌托邦这些欧洲源头，指出围绕着巴贝夫（Babeuf）、圣西门、欧文、傅立叶、勃朗（Blanc）、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流派。1894 年，他把社会主义者称为 *ishtirākīyūn*，写道，*ishtirākīya* 是英文词“Socialism”的阿拉伯化。19 世纪末，在阿拉伯文著作中，愈益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ᶜumumīya*）这两个概念，社会主义常用于贬称反对私有制、私有财产的革命暴力，共产主义作为巴黎公社实践。后来，“社会主义”一词除了其早期伊斯兰教的内涵外，还开始显现为经改良而变迁这一欧洲观念。阿拉伯社会主义者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改造者，从社会变迁的内容、途径、目标着眼，分裂成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宗教性（如伊斯兰教）社会主义者。

进入 20 世纪以前，起先在阿拉伯地区出现匿名的社会主义著作，此后，如在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开罗的意大利人、黎巴嫩的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人这些少数派中，犹太移民（如约瑟夫·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于 1900 年）、1905 年以后是俄国流亡者在那里宣传其社会主义观念。1910 年起，由尼库莱·哈达德（Nikūla Haddād）、阿明·阿-里哈尼（Amīn Ar-Rihānī）、法拉赫·安通（Farāh Antūn）在纽约建立的首个阿拉伯社会主义学会的会刊鼓舞了阿拉伯人。1915 年前后，关于社会主义观念史的首批阿拉伯文著作出版，如埃及人穆斯塔法·哈桑尼·曼苏里（Mustafa

Hasanain Al-Mansūrī）的《改革目录》（Reformkatalog）。

1919年起，阿拉伯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在党派中立足，起初在巴勒斯坦。1921年，萨拉姆·穆萨（Salāma Mūsa）、曼苏尔·法赫米（Mansūr Fahmī）、阿齐兹·米尔胡姆（ᶜAzīz Mirhūm）和阿里·伊纳尼（ᶜAlī Al-ᶜInānī）从欧洲学成归来，建立了埃及首个社会主义政党。1922年起，有了受共产国际支持的共产主义政党 Husnī Al-ᶜUrābīs。萨拉姆·穆萨的约50部社会主义著作影响超越这个阿拉伯核心国家，1913年，他在其书《社会主义》（*al-ishtirākīya*）中要求伊斯兰教革新者兼对社会主义批评者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Muhammad Rashīd R'ida'）“把社会主义原则埃及化”。伊斯兰教社会主义者如贾迈勒丁·阿富汗尼（Gamal Ad-Dīn Al-Afghānī）并不把早期伊斯兰教中的社会主义视为西欧观念的结果，而是视为阿拉伯人的独立成就。

397 “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开罗由共产国际代表如约瑟夫·罗森塔尔和康斯坦丁·魏斯（Constantine Weiss）统领，20世纪20年代与“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这一般涉及后者反对 Husnī Al-ᶜUrabī，涉及赞同“革命形势”者，依照艾哈迈德·迈达尼（Ahmad Al-Madanī）的说法，1922年时，这种革命形势根本不存在，还涉及赞成参加选举、参加议会。民族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决定性地力争反殖民的民族国家独立主权，导致阿拉伯社会主义明确划分为社会民主主义圈子、民族圈子和伊斯兰教圈子。1936年之后，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开始尤其在军官中形成中流砥柱，对他们而言，共产主义者一直是影响不大的小团体。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埃及，以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īb）和阿布德·安-纳西尔（ᶜAbd An-Nāsir）（纳赛尔［Nasser］）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废黜国王，巩固了他们在新生共和国中的权力，阿拉伯社会主义在与东西集团的斗争中经历了全盛时期。60年代，埃及和叙利亚大规模国有化之后，连其他阿拉伯国家如也门和苏丹也转向东欧一党模式。这成为阿拉伯社会主义昙花一现的鼎盛时期。出于宗教与民族主义原因，“马列主义”却遭到拒绝，如1962年，埃及总统纳赛尔说：“兼做好穆斯林和好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可能。……共产主义必然包括共产主义政党对世界的某种控制。”

在开罗，自1954年起，阿拉伯社会主义者虽然将其目标定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他们在民族性上始终在“阿拉伯民族主义”（*qaumīya ᶜarabīya*）的称号下与东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1957年起，将其观念转为“民主的、合作的社会主

义”。在此意义上，艾哈迈德·赛义德（Ahmad Saʿīd）之书《阿拉伯社会主义》（*Der arabische Sozialismus*）（1959）出版之后，自 1961 年起，阿拉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用于与东欧“激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相区隔。“第三条道路”特征为：（1）逐级和谐发展而无阶级斗争、暴力和一个阶级的专政；（2）无强制性集体财产，而是保留私有财产和合作社财产作为发展的支柱；（3）根据阿拉伯人历史性个人倾向适度限制私有财产。

398 1961 年，颁布“社会主义七月法令”把国内外大企业收归国有之前，埃及领导人强调，先知穆罕默德是“社会主义者的领祷者”，早期伊斯兰教代表首个社会主义国家：伊斯兰教是社会主义的宗教，因为它要求共同占有牧场、水和土地。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中心文件、1962 年 5 月 21 日埃及的《国家行动宪章》（Charta der Nationalen Aktion）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充分满足需求、正义、多数人共决。

为此，1962 年 5 月 30 日，埃及总统纳赛尔解释“我们与共产主义的五项区别：（1）我们信教，相信天启；马克思主义否认它们。（2）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反动势力的专政转为一个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的专政；我们从反动势力的专政转向全体人民的民主。（3）（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保证全部土地国有化；我们赞成私人土地所有制。（4）（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信奉私有财产；我们依赖私有的、非剥削性的财产。（5）（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支持用暴力消灭‘反动的’资产阶级，主张血腥摧毁它；我们意欲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取消阶级的影响，但不想把个人清除出阶级。”1964 年 3 月 25 日的埃及宪法确定了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在经济上确定一种“社会主义制度，防止任何形式的剥削、保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自 1963 年起，艾哈迈德·本·贝拉（Ahmad Bin Billā）在阿尔及利亚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其继任者胡阿里·布迈丁（Houari Boumedienne）在 1965 年之后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略做改动。1976 年，阿尔及利亚宪法宣布：“阿尔及利亚国家是社会主义的。”1980 年，埃及基本法称其制度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的”。1965 年，也门国家宪法强调“科学社会主义进步、革命的观念”，这在 1969 年南也门路线调整后得到进一步发展。1947 年，米歇尔·阿弗拉克（Mīshīl ʿAflaq）、扎基·阿尔祖齐（Zakī Al-Arzūzī）和萨拉赫丁·比塔尔（Salāh Ad-Dīn Al-Bitār）建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复兴党（Baʿth）领导人如阿布德·萨拉

姆·阿里夫（ᶜAbd As-Salām ᶜArif）和哈菲兹·阿萨德（Hāfiz Al-Assad）奉行该党路线，他们分别于1963年和1970年接掌政权，声明拥护“自由、社会主义、统一”这一口号。在苏丹，杰弗尔·安-尼迈里（Gaᶜfar An-Numairī）于1969年宣布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在利比亚，穆迈尔·卡扎菲（Muᶜmar Al-Qaddāfī）于1969年夺取政权，他向埃及看齐，于1973年宣布人民革命，自1975年起，在其《绿皮书》（*Grünen Buch*）中创立“第三世界理论”。但整体上，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直不甚完善，使得政治家对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运用带有要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399

《绿皮书》概述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通向社会主义，并非利比亚、阿拉伯、伊斯兰教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应适合整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它将如《古兰经》所指引的那样，在生产和分配中实现公正。1977年，《关于建立人民政权的声明》中写道：“阿拉伯利比亚人民宣布坚持社会主义，以实现人民所有制。”整体上，阿拉伯社会主义内部表述一种“国际主义立场”，它跨出该地区，迈入第三世界。

“1917—1991社会主义时代”之后，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分裂成民族主义圈子、世俗圈子与宗教圈子。萨达姆·侯赛因（Saddām Husain）1979年在伊拉克取得政权，其纲领和手法被称为民族主义—世俗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范例。而在埃及（自20世纪80年代的转折开始）形成以开罗哲学教授哈桑·哈纳菲（Hasan Hanafi）为首的一个团体，自视为“伊斯兰教左派”，试图把社会主义与宗教集于一体。

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尤其有分歧：（1）应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如何接受他们的基本观念，如依开罗历史学家时里法特·阿斯-萨义德（Rifᶜat As-Saᶜīd）之见，他们的基本观念“源于世纪之交的欧洲而从未彻底埃及化”。（2）自由资产阶级、单一民族国家、古典与现代民主、资产阶级分权制这些启蒙观念是世界市场中欧洲的殖民舶来品吗？（3）人文主义、个人主义是西方的发现吗？在启蒙和工业化进程中政教分离未果或者鲜少本土化，也就是伊斯兰教不仅在宗教上，而且也在实际生活中设定日常规范，在这样一个地区，人文主义、个人主义是否西方发现有何精神后果和实际后果？（4）从国家领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经验和东欧社会主义模式式微的经验中得出何种结论？（5）伊斯兰教文化和社会主义观念可以协调一致吗？（6）国家财产仍应是中心的发展基础抑或应按市场经济加以私有化？

400 **参考文献：**

A. Abdl-Malek, *Ägypten: Militär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1; S. G. Al-ᶜAzm, *Unbehag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93; M. S. Ahmad, »al-watanī, al-qaumī, al-ummamī (Das Nationale, das Panarabische, das Internationale)«, in: *Qadāyā Fikrīya*, Kairo 1992, 11f; S. Amin, *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 Essai sur les formations sociales du capitalisme périphérique*, Paris 1973; ders., »thalāthūn ᶜāman min naqd an-nizām as- sūwītī 1960-1990 (30 Jahre Kritik am sowjetischen System)«, in: *Qadāyā Fikrīya*, Kairo 1992, 11f; M. T. ᶜAisa, »*atbāᶜ Sān Sīmūn: falsafatuhum al-igtimāᶜiya wa tatbīquhā fi misr* (Die Anhänger von Saint-Simon: ihre soziale Philosophie und deren Anwendung in Ägypten)«, Kairo 1963; L. ᶜAuwad, *tāa'rīkh al-fikr al-misrī al-hadīth min ᶜasr Ismaᶜil ila tharaut 1919*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ägyptischen Denkens: Von der Ära Ismails bis zur Revolution 1919), Kairo 1980; C. -H. Becker, »Der Islam im Rahmen einer allgemeinen Kulturgeschichte«, in: *Islamstudien*, Leipzig 1924, H. 1; Th. Bergmann, M. Kessler (Hg.): *Aufstieg und Zerfall der Komintern*, Mainz 1992; R. Büren, *Die Arabische Sozialistische Union*, Opladen 1970; ders., *Nassers Ägypten als arabisches Verfassungsmodell*, Opladen 1972; S. Botman, *The Rise of Egyptian Communism, 1939-1970*, New York 1988; B. Brentjes, »Marx zum Privateigentum an Grund und Boden im Orient«, in: *Jb. f. Wirtschaftsgeschichte* III, Berlin/DDR 1978; der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zur Geschichte des Orients«, in: *Wiss. Beiträge der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1983; S. P. Dunn, *The Fall and Rise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London 1982; M. ᶜAbid al-Gābirī, *naqd al-ᶜaql al-ᶜarabī* (Kritik der arabischen Vernunft), Beirut 1984-1992 (3 Bde. u. Suppl.); B. Ghālī u. a., *al-ishtirākīya ad-dīmūqrātiya wa-t-taᶜawūnīya* (Der demokratische und kooperative Sozialismus), Kairo 1960; Y.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1882-1948: A Study of Ideology*, Oxford 1987; H. Hanafī, *muqaddima fī ᶜilm al-istighrāb* (Einführung in die Okzidentlistik) , Kairo 1991; ders.: »mātā yaᶜnī al-yasār al-islāmī? (Was will die islamische Linke?)«, in: *Al-Yasār al-Islāmī*, Kairo 1981, 1; A. Hourani, *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 Cambridge 1991; H. -P. Harstick, *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E. Hobsbawm (Hg.):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 G. Höpp, »Traditionen der ägyptischen Revolution: Ägyptische Nationalisten in Deutschland, 1920-1925«, in. W. Schwanitz (Hg.), *Berin-Kairo: Damals und heute. Zur Geschichte deutsch-ägyptischer Beziehungen*, Berlin 1991; *ᶜIān ᶜan qiyām sultat ash-shaᶜb* (Proklamation zur Errichtung der Volksmacht), Sabha/Libyen, 3.3. 1977; R. Kössler, *Despotie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New York 1993; N. S. Hopkins, »Engels and Ibn Khaldun«, in: F. J. Ghazoul (Hg.), *Alif. Marxism and the Critical Discourse*, Kairo 1990; T. Y. Ismael, R. El-Sa'i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gypt 1920-1988*, New York 1990; C. Leggewie, H. Raich,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Göttingen 1997; B. Lewis, »Der Islam und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in: K. Michalski (Hg.), *Die liberale 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93; A. S. Saᶜd, *tā'rīkh misr al-igtimāᶜi al-iqtisādī fī dau an-namat al-asyawī lil-intāg* (Die sozioökonomische Geschichte Ägyptens im Licht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Beirut 1979; M. H. Al-Mansūrī, *tā'rīkh al-madāhib al-ishtirākīya*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Schulen), Kairo 1915; Kh. Muhī ad-Dīn, *wa-l-ān atakallamu* (Und jetzt rede ich), Kairo 1992; H. Mrūh, *an-nizaᶜāt al-islāmīya fī-l-falsafa al-ᶜarabīya ak-islāmīya* (Die islam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in der islamisch-arabischen Philosophie), 2 Bde., Beirut 1978f; Sh. ᶜAbd An-Nāsir, *thaurat ᶜAbd an-Nāsir* (Die Revolution des Abdel Nasser), Nikosia 1981; A. Noth, »Früher Islam«, in: U. Haarmann (Hrsg.),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Welt*, München 1991; R. Olson, *The Ba'th and Syria, 1947-1982*, Princeton 1982; M. Robbe (Ltg.), *Aufbruch am Nil*, Berlin/DDR 1976; A. M. Said, *Arab Socialism*, New York 1972; A. Saᶜid, al-ishtirākīya al-ᶜarabīya (Der arabische Sozialismus), Kairo 1959; F. Tökei,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Neuwied 1965; ders.: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sformen*, Budapest 1977; W. Schwanitz, »Karl August Wittfogel, das Fünf-Stufen-Dogma und die Ägypter Sādiq Saᶜd und Mahmūd al-Kurdī«, in: *asien, afrika, lateinamerika*, Bd. 20, 1992, H. 1; ders., »'Ana Bīrīstrūikī': Neues Denken in Ägypten? Zur arabischen Perestroika-Rezeption«, in: ebd., Bd. 18, 1990, H. 3; ders., »Zehn Schwächen im marxistischen Denken«, in: ebd., Bd. 18, 1990, H. 5, 932 f; ders., »Zwischen Einheit und Spaltung: Neues zur Geschichte der Linken in Ägypten und Israel«, in: *Orient*, Bd. 33, 1992, H. 1; H. Sharabi, *Neopatriarchy:*

401

A Theory of Distorted Change in Arab Society, New York-Oxford 1988; S. Wild, »'Das Kapital' in arabischer Übersetzung«, in: W. Fischer (Hg.), *Festgabe für Hans Wehr*, Wiesbaden 1969; M. M. Wahba, »The Meaning of Ishtirakiyya: Arab Perceptions of Soc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F. J. Ghazoul (Hg.): *Alif*, Kairo 1990.

沃尔夫冈·施瓦尼茨
（Wolfgang Schwanitz）撰
朱更生 译

参见：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Besitz/Eigentum, Blockfreiheit,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ritte Welt, Dritter Weg, Entkolonialisierung, Eurokommunismus, Islamischer Sozialismus, Nationalismus, Okzidentalistik, Orientalismus,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劳动（Arbeit）

马克思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第二版跋》（*Nachwort zu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中写道："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MEW 18，第570页）对历史唯物主义来说，劳动是人类发展的活的、动力性的基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理解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劳动"概念中，交汇着统治与解放、辛劳与享受、异化与自我实现、发展与不发展、必然与自由。在劳动中，既形成了人与外在于人的自然的关系，也形成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随着劳动在一定的对抗性场域中的发展，它既是人类发展的推动力，同时也成了人类发展的阻碍。在从福特制向高科技生产方式过渡中的"劳动危机"、在关于"劳动社会的终结"的讨论中对劳动的理论重构以及在"劳动社会的改造"计划中劳动的政治性，都与以下四个主要问题相关：（1）离开劳动，社会凝聚的实现何以可能？（2）如果不依据劳动（"贡献"），应当如何来安排社会福利的分配？（3）如果不再以劳动作为社会必要的质性活动，应当基于何种维度来建立身份的认同？（4）与之相关的问题还包括至今被忽视的、无酬的女性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新的理解和分配。

1. 马克思首先将劳动问题的哲学传统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他称赞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已经触

及价值形式的分析，不过当然，亚里士多德没能破解“价值表现的秘密”（*KI*，MEW 23，第 73—74 页）。对于亚里士多德没有能够将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认作“等同的”（“同等意义的”）劳动，马克思解释道，这是因为劳动在奴隶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这个社会“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同上书，第 74 页）。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马克思还发现了统治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思想：“倘若织梭能自动织布……那么工匠就不需要帮手了，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Pol*，1253b，第 39 页及以下）而将劳动与占有和所有权联系起来思考，这是马克思在洛克那里发现的。（参见 MEGA II，3.6，第 2120 页）而在曼德维尔那里，马克思发现劳动与贫困联系在了一起（1714/1724，第 232 页，参见 *KI*，MEW 23，第 643 页）：“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马克思还研究了黑格尔“作为人的自我生成的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一分为二的“作为外化的对象化”的思想（*Ms 44*，MEW 40，第 574 页）。从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马克思借鉴了魏特林（Weitling）关于合理分工的思想，以及傅立叶让劳动变得吸引人、发挥关于劳动的意义的论述：“宴会的喜悦、友爱的庆典和生产的竞赛将相互转化”（1808，第 242 页）。马克思从傅立叶的“‘和谐制度’之下一个富人的作息时间”（1829）出发，发展出了后来广受讨论的可以任选打猎、捕鱼、畜牧等的图景（参见 *DI*，MEW 3，第 33 页）。马克思的阐发也和孔西得朗（Considerant）的论述相似：“如果劳动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那么，人类只有将生产组织为这样的形式，即让劳动变得**吸引人**，才能获得自由。”（1845，第 229 页） 403

此外，马克思更重要的出发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弗格森（Ferguson）：劳动是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但是劳动也是穷人的活动，是艰辛与折磨，它消磨了人的活力，对许多人而言，劳动占据了生活；对于李嘉图制定的社会财富的规范，即“社会上注定陷入劳动奴隶制即从事强制劳动的部分尽可能地小”，马克思称之为“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点”。（*TM*，MEW 26.3，第 253 页；MEGA II.3.4，第 1388 页）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第一个实现了对“干脆就是劳动”或“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的思考，也就是说，斯密从范畴上把握住了一切生产活动所共有的东西。（*Einl 57*，MEW 42，第 38 页）马克思同时阐明，这种发现是以现实的发展为基础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

“‘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同上书，第 39 页）马克思进而借助与劳动的关联，破解了国民经济学的全部范畴。劳动由此成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键概念。

2. **作为异化的劳动**。马克思所用的异化并不像斯密那样，仅仅是描述财产的外化过程，而是像黑格尔一样，异化意味着本质而非所有物的外化。在这样的语境下，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劳动描述为异化的劳动。

2.1 劳动将贫穷与富裕连接在一起，是二者之间矛盾的前提。在这种冲突性的对立中，马克思首先将劳动定位到了统治的维度。在马克思关于工人解放的观点中，已经包含了一般的人类解放，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Ms 44*，MEGA I.2，第 373—374 页；MEW 40，第 521 页）。马克思将货币财富理解为统治一切（死的）劳动和（活的）劳动力的权力，它在市场中就是“对劳动的**支配权力**”（同上书，第 190 页；第 484 页）。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借鉴了黑格尔的范式，即对立的两极在运动中发生了**转化**：劳动的“现实化”成了工人的“**非现实化**”（意思是：“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成了对象的丧失或被对象奴役；占有成了异化和外化；工人生产的越多，他占有的就越少；他创造出的东西越强大，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强大；这个世界越富有，工人自身和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工人把他的生命投入对象，他的生命从此属于这个对象，不再属于他；“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因此“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而且“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意味着它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等等。（同上书，第 236—237 页；第 511 页及以下） 404

这种转化通过一种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而延伸进整个生活。由此，对类生活的生产性参与沦为单纯谋生的手段，而非类生活的实现。（参见 *Ms 44*，MEGA I.2，第 369 页；MEW 40，第 516 页）这样，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也就形成了如下著名的段落：“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

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MEGA I.2，第 238—239 页）伊威科维奇（Ivekovic）（1987）曾对马克思的这一图绘提出质疑，因为“在家”（zu Hause）作为一个不劳动的地点仅仅适用于男性，还有其他一些男性的隐喻被错用于人类的一般性。

2.2 在这些早期文本中，马克思还没有将劳动当成一种能力来加以分析，还没有清晰地区分开劳动的物质方面和导致劳动异化的经济形式。“劳动”范畴经常被当作**异化劳动**的同义词来使用，劳动也由此成了一个非本真性的形式概念，一切“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Ms 44*，MEW 40，第 542—543 页）。这种把劳动和它的异化的形式规定性混为一体的看法，导引出了**废除劳动本身**的观点。马克思在他关于李斯特（List）的评注中写道：“谈论自由的、人的、社
405 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引自 List 1982，第 459—460 页）然而“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现在应该“消灭**劳动**”了。（*DI*，MEW 3，第 69—70 页）

在青年马克思的文本中，一个与（异化）劳动相对立的概念是“全面的生产”，它是“按照美的规律”的一种“构造”。（*Ms 44*，MEGA I.2，第 241 页；MEW 40，第 517 页）那些在劳动的形式中异化了的东西，是人在创造活动中的自我实现。在这里，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另一面，而私有财产则是支配人的资本—权力。“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上书，第 376 页）。

马克思并不认为，劳动是在作为人与自然的生产性物质变换的意义上可以被扬弃的。他把劳动理解为生产活动发生“转化”后的结果，这就使他要去重建，在这种“劳动”形式中原本吸引人的东西，应该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东西：自由的生命表现、自我实现、生活的享受，对人类共同本质的参与，人道主义的需要的满足，爱的能力（参见 MEW 40，第 462—463 页），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本身的交往（*DI*，MEW 3，第 68 页），作为类本质的有意识的、自由的生命活动，等等（*Ms 44*，MEGA I.2，第 241—242 页；MEW 40，第 516—517 页）。马克思思考的重点在于**自由**或**自主活动**，在于类的特殊性。人是作为类

存在而彼此发生生产性活动的，这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共同本质和个人的发展。

马克思还在劳动观的范围之内理解“生活方式”（详见 *DI*，MEW 3，第 21 页）。他把劳动理解为一种共同本质下个人间的活动联系，它在这种联系中得到发展。生活无论如何都是**活动的生活**。在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中，生活被异化了。简言之，这种情况发生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劳动，对他人劳动的统治使统治者自己可以自主活动。“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
406 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DI*，MEW 3，第 67 页）

2.3 青年恩格斯也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使用劳动概念的（1845），但他的使用更加接近日常语境：“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的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Lage*，MEW 2，第346 页）恩格斯像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学家那样描述劳动，工业中现有的劳动不是作为负面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负面的劳动：“我们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紧张起来，不让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纯粹的无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厌倦的无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无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岁起整天整天地受无聊的折磨。……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视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说来是一种最残酷的苦刑。”（同上书，第 397 页）

3. **对劳动的分析**。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的形式规定性和自然必然性，实现了对劳动的全面分析。由于发现了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得以清楚把握劳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最后他还研究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劳动方式，并为社会地位的激进变革提供了基础。

3.1 **作为自然必然性的劳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这样谈论劳动：作为“有用劳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

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K I*，MEW 23，第57页，相似表述见第192页；几乎措辞相同的一处见 *Zur Kritik*，MEW 13，第
407 23—24页）。马克思强调，劳动无论在何种社会都永远是一个自然过程。劳动着的个人首先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运动起来，“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K I*，MEW 23，第192页）

因此，劳动始终具有一种人类学或人类基因学的维度：劳动着的个人通过“改变他身外的自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K I*，MEW 23，第192页）恩格斯后来认为，劳动的这种发展也推动了人手的进化：“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DN*，MEW 20，第445页）福尔克·舒里希（Volker Schurig）（1976，第273页及以下）进一步校正了这一观点，即作为劳动进化之结果的，不是手的形态上的结构，而是其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调节与控制。

3.2 **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劳动的异化现在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思辨，而是成为一种对劳动的要素、关联、功能与分配进行精细分析的对象。

3.21 马克思自认为，他对**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飞跃，一方面是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的付出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抽象人类劳动的耗费和商品价值的创造。劳动通过私人分工的形式，包含着“抽象—人类”的特性，劳动在这种分工形式中活跃着，这种形式也让产品成为商品，通过商品交换，不同的劳动成为等同的。

3.22 在早期文本中所提到的**交往**现在细化得更加具体，在形式上更加独特：“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Gr*，MEW 42，第487页）工人在工厂中的“联合”是资本的特定存在方式，而不是工人的特定存在方式，而且在工人面前，他们的合作似乎也是被资本所规定的。生产资料不是被工人所消费，而是在消费工人（参见*K I*，MEW 23，第329页），等等。

3.23 **活劳动和死劳动**。交往现在被理解为一种关系，即个人**当下**所付出的劳动和**之前**（由他本人或其他个人）所付出的劳动的产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用活与死来隐喻性地说明这一关系，这种描述一方面与吸血鬼的传说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基督再生的叙事有关。活的 408
劳动力被资本所吸收和累积，变成了过去的、死劳动的形态，它作为独立力量，在生产过程中不断面对新加入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

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K I*，MEW 23，第 247 页）。作为统治工人的力量，资本由此产生，即使它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产生这种统治的主体。“**资本家**……是与劳动相对立的……具有人格的劳动产物。”（*TM*，MEW 26.3，第 290 页）但是，作为屈服于统治的一方，劳动在物质层面具有战略性地位，因为它是资本的生活条件。“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K I*，MEW 23，第 198 页），诸如此类。“因为经济学家们把过去劳动同**资本**等同起来……所以，对他们……来说，强调生产的**对象**要素的重要性，并且同**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对象要素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TM*，MEW 26.3，第 271 页）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过高评价资本的批判，在关于新技术的讨论中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为了也**从技术上为特殊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关系被颠倒了，以致不是工人使用这些条件，而是这些条件使用工人）辩护，经济学家们赋予劳动的对象因素以一种和劳动本身相比虚假的重要性。”（同上）

3.24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生产性的劳动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化。马克思起初用“生产性”这一特征来标示一切具体、有用的劳动。在资本条件下这一概念“窄化了”：工人一般性的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不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是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K I*，MEW 23，第 532 页） 409

3.25 **扬弃雇佣劳动的观点**。既然是等同化的**形式**在交往中发生作用，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挣脱这种形式，以使劳动的主体得以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关系。而这也就意味着，活动的目的、行使的尺度将要在一种相互关系中形成，被外部决定的、让活动变得紧张的统治与屈从的秩序将要被终结。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充分发展的共同的自主力量的行使。这种思想将马克思早期与晚期的文本结合了起来。

4. **关于劳动的远景**。劳动不再仅仅是要被否定的东西，而只有“异化劳动”是要被否定的；劳动也不再被理解为笼统的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关系中被阐释为雇佣劳动。因此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种被形式所阻碍的活动，如何去改变其形式。同时可以看出的是，由于对每种统治形式而言，支配他人的劳动总是具有基础性意义，解放的命题也就必须从物质生活生产的过程着手。

4.1 人们对类的必要劳动活动的参与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雇佣劳动是其中一种形式，它突出了其他形式下劳动的“不自由”，而雇佣劳动的主体在形式上被规定为自由的。马克思通过研究特定的**社会劳动的形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性**，使得超越雇佣劳动的讨论成为可能。马克思的思考对于向高科技生产方式的转变而言是重要的，如果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制造单个产品的必要劳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缩减，那么一种通过劳动价值来校准的经济系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Gr*，MEW 42，第601页）。这样资本主义就必然碰到其历史的局限。在形式上始终是从属性的劳动成为机械性的生产链条之外的、处于监控位置上的自动化劳动；集体劳动将能力转移回到了劳动岗位上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与相关劳动者之间的阶层结构。由此可以看到劳动的另一种社会分配之可能性的基础。而这已经不是“技术”调节，而是向另一种社会化模式过渡。“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Bürgerkrieg*，MEW 17，第342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构建了这样的远景，劳动通过相应的活动的改变而成为发展个性的基础，这样，劳动的强制性就被剥离了。（参见MEW 42，第244页）高科技化使生产过程变成了一个物之间的“自然过程”；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同上）。其中决定性的是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被用于生产过程中。劳动由此成为一般性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个人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

成熟的马克思在这一意义上认为，至今为止的劳动的形式与物质性是可以被消除的，雇佣劳动连同由价值所建构的规则都会（在形式方面）消失，而具体活动将变成对一个生产过程的安排与监督，人们在这一过程中让事物（自动装置、不同的能动者）为自己“劳动”（参见上书，第244页）；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假想中的自主的“织梭”将成

为现实的远景。

4.2 **必然与自由**。作为共同的自主活动的物质生活生产——在马克思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依然保留着这一观点，这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什么区别。这一主张致力于消除生产方式中的统治，从而消灭作为社会管理原则的私有制，建立一种科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条道路——像培根已经指出的一样——超越生产力的发展，削弱了物质生活生产的必然性；它还超越了人类劳动的分裂和异化。异化劳动必须以这种方式被扬弃，从而使人最终占有他们所创造的生产力。那种极大地推动了人的类的交往的总的生产关系，让一切的发展、一切的财富与文化、对象性的劳动条件全都变成与工人相对立并且统治工人的力量的那种生产关系必须被改变。而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一个新形式的突现才能被解决。

411 根据这种观点，“自由活动”被理解为一个接近过程：物质生产中的必然因素越来越被倒逼着去促进自主活动的自由因素。在“必然王国”（MEW 25，第 828 页）中，由于生产力发展而改变了的劳动将成为一个分配问题，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不可扬弃的必要劳动中，而其理性的和最可能的合乎人性的形态，除了最小消耗之外，还被形容为在这一必然领域中的自由的边界。而在这种必然领域之外，在“自由王国”（同上）中，作为从直接物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的时间，这里的活动将是个人以自身作为目的的活动。

4.3 **作为生活需要的劳动**。不是消灭劳动，而是将劳动视为人类发展的手段——这一规定成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的参考点和批判点。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绘了一个共同体，其中劳动的交换被超越了，在那里“用在产品上的劳动”不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而是作为工作与消费的结合而发挥作用。（MEW 19，第 19—20 页）马克思相信，“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劳动对于个人将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同上书，第 21 页）

4.4 马克思论证的主线是：如果人能够借助合适的生产组织形式，从物质的必然与统治中解放出来，那么对人来说，物质生活的生产就将成为创造性的享受和对人的能力的发展。人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并就此实现人的存在。这包括了对分工的扬弃，而分工造成了作为社会形态之基础的人类劳动的分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男性劳动和女性劳动的分离；城市劳动和乡村劳动的分离，还有统治性的伪分工，即劳

动者与不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阶级分化。

马克思还更具体地批判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囿于资本主义统治劳动的情形。马克思在他对李嘉图等人的阐释中，已经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他们（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不**懂得**他们所论述的
412 矛盾。因此，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人物……也把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一切经济前提作为永恒的形式接受下来，只是希望消灭既是［这些前提的］基础而同时也是［它们的］必然结果的资本。"（*TM*，MEW 26.3，第 256 页）"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决心为了摆脱对立而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上产生的成果。"（同上书，第 257 页）

5. **工人运动史中对劳动的理解**。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98）的话来说，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表现为一部作为劳动之悲剧（Tragödie）的悲苦剧（Trauerspiel）"（*SPh*，第 363 页）。另一方面，就工会和社会政治性论战的日常实践而言，劳动的理解被窄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主要是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也就和这样一种观点联系在一起，即问题仅仅在于，消灭作为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布洛维（Burawoy）（1985）认为，这种将劳动岗位理解为统治与控制的场合的狭隘观点，导致其忽略了同时发生作用的独特政治性。也许与之相关的是，在工人运动史上，很少有人尝试再去创造一个劳动理论。当然，还是有一些有趣的重点和个别性的思考。

5.1 罗莎·卢森堡发展了马克思对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的区分，她将历史看作一个"新旧劳动密切交织"的过程（GW 5，第 41 页），从而一方面突出劳动社会的持续性，另一方面表明，斯密等人只看到了"资本与劳动的密切关系"（同上书，第 46 页），因而在规定价值的时候只是局限于新价值的年度性生产。这样一种重点的转移，让卢森堡看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由于必须向全球扩展、吸纳所有被耗费的劳动，将所有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首先表现为人民的贫困化，最终则被证明为一种"不可能性"（同上书，第 778 页）。资本主义需要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从中它可以以原始积累的形式推进剥削。卢森堡在谈论被她形容为天才的托尔斯泰（Tolstoi）时，强调了后者的一个想法，即劳动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需要，但是它"在我
413 们这个错误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最主

要是成了扼杀道德感知能力的手段”（引自 GW 2，第 250 页）。1916 年，她还像马克思那样批判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是从其孤立的个体劳动中发展过来的；她在拉萨尔那里找到这种观点的例证：“看看美洲丛林中的印第安人，他们手持弓箭，自己去猎捕生活资料。”（*Kapital und Arbeit*［1864］，引自 GW 4，第 205 页）

5.2 列宁理解劳动的重点也很有意思。为了从资本主义矛盾发展中探索“**社会秩序的更高级形式**”（LW 2，第 209 页），他强调了恩格斯关于工人在工厂中的贫困化的尖锐论述，同时勾画出这种形式中所蕴含的未来社会。工厂让工人变得丧失意愿、不再反抗、被机器所奴役（同上书，第 98 页及以下），但是通过同一个机械化的过程，工人才第一次被“联合起来、培训起来、组织起来”；通过对比，通过增长经验、商讨危机的机会，工人的能力和团结性将得到增强，最终使一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成为可能（同上书，第 87、95—96 页）：“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将用来满足工人自己的各种需要，用来充分发展他们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同上书，第 100 页）在本质上讲，这才是劳动的“社会化”（比如 LW 2，第 61、239、522 页）、“联合的劳动”（LW 19，第 7 页），它消灭了“农村的落后的家长制关系”（LW 2，第 182 页），“超越了家长制的、静止的社会”（LW 2，第 239 页）。而报刊作为“教育群众的工具”，必须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它要向群众介绍“如何按新的方式组织劳动”。（LW 27，第 193—194 页）

1917 年后，列宁思考的问题首要的是教育群众。在旧形式被推翻以后，群众不能马上就抛弃“权利准则”而“为社会劳动”。（*SR*，LW 25，第 481 页）面对一方面是理论假设与幻想方案之间几乎难以承受的张力，另一方面是让人绝望的建设的初始条件，列宁建议严惩偷奸耍滑者，包括监禁、让其打扫厕所、发放黄色身份证，甚至枪决。（LW 26，第 412—413 页）

与此相关的，列宁还把马克思对劳动 414
的观点和国家的消亡联系起来，后者要实现，劳动必须成为自主的。而劳动成为第一习惯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当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极大地提高，以致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SR*，LW 25，第 483 页）

列宁对劳动的一个重要思考是关于“自由”与“不自由”劳动的关系：由于苏联的诞生，俄国的劳动者“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

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LW 26，第 405 页）。马克思起先所描述的“异化劳动”，被列宁从一个不同的侧面，重新描述为“不自由的劳动”；这里不再那么强调所有人的关系的颠倒，而是表示简单的压迫，与之相对的，是同样可以被描述为简单的解放的当下状态，而这种状态实际上并未根本颠覆劳动的异化形式。这样的愿景并未完全脱离幻想：工人和农民阶级中有才能的人“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同上书，第 407 页）。

5.3 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多层次的阐述导致后人对其多样化的理解。由于早期苏联和东德对这一概念的线性接受，马克思所谓的直接劳动，被认为将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因此“对劳动之爱的教育”（Suchomlinski 1962）以至劳教所都成为教育学的命题（参见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东德实行的对劳动动力与劳动满意度的研究和讨论），同样被改变的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劳动属于“必然王国”，为了实现自由就必须相应地进一步限制劳动，以此确立未来的希望（参见西方例如高兹 1980 以及达伦多夫［Dahrendorf］1980 的讨论，而这些在最近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东德，自工业社会学诞生以来（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参见社会学学会自 1966 年起主编的社会学系列丛书，以及 1966 年起 AdW 的报告；相关的还有 Haug 1969）出现了这样一种尝试，即研究科学技术革命基础上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关系的变化，以及团队劳动（集体劳动、生产小组）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链接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其经验观察受到政治愿望的强烈影响，因此难以判断其实际的理论价值。 415

6. 因为雇佣劳动是一种特定的、异化形式的人类生存活动，仅与雇佣劳动相关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窄化，从而无法将马克思的见解推进下去；这样的理论在讨论为资本利益而进行的生产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同时，也就不断忽视掉了一切不以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起来的其他领域：妇女、失业者以及带有越来越多帝国主义色彩的第三世界国家劳动者的劳动。

6.1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辞典》（*LS*）中，弗布鲁巴（Vobruba）这样描绘马克思，他把劳动视为负担，致力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弗布鲁巴还和哈贝马斯一道主张向“劳动与交互行为”的转变，以对抗实证的工具理性。但是这样的方式无疑将人类劳动置于晦暗之中。描述劳动的词汇也从雇佣劳动转变为了“劳动力的供给”，其中的屈从性

被福利国家削弱了。

6.2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也出现了国际性的关于马克思的热烈阐释，特别是围绕其劳动概念。有人认为，马克思没有提及不具备雇佣劳动形式的女性劳动，这种劳动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性（在劳动力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没有被马克思识别出来，从而导致了女性受压迫地位的永恒化。关于家务劳动的这种争论，成为工人运动与妇女运动之间日益紧张起来的一个关键环节。有人愤怒地批判，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它将女性排除在外；马克思的劳动特指赚工资的劳动，因此家务劳动也就无法进入他的“生产劳动”的概念（参见比如Werlhoff 1978）；诺伊苏斯（Neusüss）（1985）也认为女性的劳动被马克思忽视了，劳动则被构想为男性工人的，为了反对前述马克思的观点，他强调，雇佣工人也是由他们的母亲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分析被解读为不妥的。一些批判者也正是由于解构马克
416 思的劳动观而引人注意。诚如他们所言，马克思不承认家务劳动的生产性，但这是马克思很清楚地从资本的行为的角度（而生产性在这一语境中对于工人而言也是不幸的）做出的一个判断。马克思还在异化劳动的论述中，准确指出了女性受压迫的地位：“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DI*，MEW 3，第32页）哈特曼（Hartmann）（1981）以“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婚姻”为题，在阐释这一论述的过程中，讨论了女性受压迫问题。所谓被完全忽略了的家中的劳动，在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再生产的讨论中（尽管只是以一个注释的形式）被论述为“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KI*，MEW 23，第417页注释120）。马克思的自由的集体活动作为人类存在之实现的观点，对于两性来说，难道不都具有足够的批判性吗？女性的地位，或许不是简单地马克思的理论建构中的一个盲区，而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然，马克思未能料想到的是，那些不受制于自主活动在社会上有效的异化形式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工人的人，也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与之相应的，他对社会力量的分析也很少关注那些“生产活动”以外的全社会的问题，后者并不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这两方面都应该得到发展，从而形成一种对资本主义之文明形态的批判。

6.3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联：批判理论。**马克思早期文本中关于内在与外在、自主与异化、对象化

与外化的对立的讨论，影响了批判理论乃至后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关于替代性生活方式的研究。此外，一种回应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发展了起来，比如赫伯特·马尔库塞，他以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乌托邦性质、关于自由活动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此在整体固执于相对抗的此在方式的经济—社会分工的扬弃，从独立的、空洞的实践以及从掐断人类实践完成领域的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转入到由这种领域出发统治着的、划定的、
417 完成的实践，是以下可能性的条件，即重新归还给此在它所固有的劳动，即劳动从异化和物化中解放出来并重新成为按其本质所是的劳动，亦即完整的人在他的历史世界中完全的、自由的实现"（1933，第47—48页）。埃里希·弗洛姆的生命哲学（1961）也在这一维度上与马克思的作品相关联，当然，他对马克思的运用并不像马尔库塞那样明确地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6.4 克劳斯·霍尔茨坎普（1985）和鲁宾斯坦（Rubinstein）（1972）、列昂季耶夫（1973）等前人一样，抓住了劳动与人格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时对其加以发展：生活的第一需要不是**劳动**，而是**行为能力**。这种看法可以对接关于此时此地之可行性的观点。行为能力这一概念所聚焦的是个体，似乎他们不具备社会性的本质，而是如此私人化，似乎资产阶级社会只是一种幻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闪现出很多向马克思的"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主张开放的东西。行为能力及其拓展当然是"自由活动"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怎样的关系之下，人们怎样才能如此赢得物质生活，以至于人们将其当作享受、发展和共同存在，而不是失去它？劳动和享受是通过分工而彼此分隔开的，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观点。（MEW 3，第32页）重新将二者合一，则是一种解放的主张，正如恩格斯在重述赫斯（Hess）（1844，第360页）的观点时所写的那样："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AD*，MEW 20，第273—274页）

显然，马克思在他的文本中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使用劳动概念。如果我们盯住这一词汇，我们会发现他的理解存在一个断裂：从取消劳动的言辞，转向认

定其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时包含这样一种希望，即能够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
418 合理的分配，限缩劳动在生命活动中的比例。毕德（Bidet）（1983）和泽尔伯协德（Zilbersheid）（1986）在《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KWM*）中看到了这种断裂。当然，从看到对象化本身包含着异化，到分析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这是对黑格尔主义观点的一种发展。而在一切的变化中，从早期到晚期的马克思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主张，免除劳动的折磨人的“颠倒”特性，解放劳动，使之成为带着享受的社会的自主活动。这种观点也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条主线。这关乎劳动力作为“正常的生命活动”（*KI*，MEW 23，第 61 页注释 16）来耗费的可能性，而不是如马克思批判的斯密所说的那样，劳动力只是作为雇佣劳动来耗费，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或者如内格特（Negt）（1984）所言：“在劳动获得了一种创造性之后，就不再有劳动与休闲和懒惰的抽象的对立。”（参见 Haug 1990）尽管马克思在其早期文本中，并没有注意到劳动力耗费与目的性活动的分裂，他在后来的研究中触及了二者的危机性的相互关系，而不再视之为一种颠倒，其中目的性活动占据着享受意义的地位。因此他才批评斯密，后者如其所是地看到了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在这里，马克思还补充了他替斯密所做的辩解：“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KI*，MEW 23，第 61 页注释 16）

后来关于劳动与自由时间的讨论，囿于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而没有联系上马克思关于必然与自由之对立的观点，并且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强调自由时间因而也是自由的增长，比如达伦多夫（1980）。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陷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中心，就其规定性因素被发掘的程度而言，理论分析的力量还是聚焦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上面。

6.5 还有一些马克思的阐释者聚焦于所谓“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而“作为系统概念的劳动”成了这种分析的核心。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用劳动概念替换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一种观点——即便不是最基础性的观点——是现在 419
开始尝试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去重建一种‘社会劳动的理论’。这样一种理论诉求是广泛的：如果这种重建能够成功，那么就能有助于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历史哲学的总体阐释联结起来。”（Rüddenklau 1982，第 211 页）因此，对于一种社会理论而言，这一概念成为基础性范畴，由此派生出其他全部的规定性。比朔夫（Bischoff）也基于恩格斯所

谓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人的说法（*LF*，MEW 21，第 307 页），提出："在劳动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找到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1973，第 323 页）。不过夸张一点说，马克思是从相反的一端出发的。他讨论的是那些社会关系，其中人的自主活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形式：这是对个人的限缩、劳动中最外在的异化、劳动的颠倒。关键是此处的分工。在统治的秩序中，这样的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相伴而生的是偶然的体能特征和一个人的一辈子绑定起来，以至于"自由活动"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这样的阐释中，**社会理论**所固有的**中枢**，连同劳动自身与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将陷入**危机**。这种理论从这样的**人类的生命活动**出发，它尽管是人本身的行为，却按照社会秩序（生产关系）而服从于他者的规定、遭受他者的颠倒。作为对这种马克思解读方式的回应，晚近的劳动概念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中心的退场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奥菲（Offe）（1982）和哈贝马斯（1981）的理论尝试，只有在预先想到，马克思通过劳动替换了精神的位置，从而勾勒出一个黑格尔式的社会理论的时候，才能得到完全的理解。例如哈贝马斯说："生产范式给予实践概念如此清晰的经验性意义，以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可预见的劳动社会的终结，是否已经失去了其可信性。"（1985，第 99 页，参见 Offe 1982 和 Dahrendorf 1980）就在他抛弃劳动概念的同时，他又将马克思称为"直接劳动"的东西作为永恒的生存条件而设立为前提。马克思极具预见性的关于直接劳动过程的高科技转变的观点，即劳动过程将成为一种物之间的"自然过程"，已经通过微电子生产 420
方式的形态变成了现实。诚然，由于其资本主义形式而带来了对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及人自身的破坏性影响，即便它被错认为是所谓"技术性"失业的厄运。但是，哈贝马斯很少看到这些，正如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中也很少看到这些，后者依然强调"劳动英雄"并坚持孔武有力的工人形象。二者是相通的。在"兵营式共产主义"国家普遍缺乏的、集体劳动的社会调节形式不发达的地方，人的自我决定的主体性也就要在劳动的领域之外来证明，而解放的主张便失落了。

哈贝马斯说，劳动乌托邦不再有用了，生活方式重新回到中心。与之相反，在马克思那里一贯的观点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要取决于生产方式。如果想要重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就会认识到这种区分是奇怪的。现在人们不那么重视物质生活的生产，即生活以及生活资料的生产了。据说社会理论不必再从这一基础出发。而在抛弃劳动的背后，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生活层面的解放仍然

受限，物质生活生产是否能在统治形式上保持可控，而人类的发展和幸福又是否可能。基于这种立场，很难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造还有可能，或者大规模的社会化是可行的。新的社会运动带着其替代性方案，似乎认同了在当时当地片段化地解决问题。国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瓦解似乎也说明，资本主义是别无他选之下的方案。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激烈的灾难性延展也表明，如果认为可以长久而大范围地存在一种未来，在脱离经济框架条件的情况下去过有意义的生活，那只能是一个带有幻想色彩的假设。

参考文献：

J. Bidet, »Arbeit«, in: KWM 1, 1983, 81-85; J. Bischoff,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als Systembegriff*, Berlin/W 1973; M.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1985; V. Considerant, »Kurzer Abriß von Fouriers Phalanxsystem« (1845), in: J. Höppner u. W. Seidel-Höppner, *Französisch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vor Marx, Band II: Texte*, Leipzig 1975; R. Dahrendorf, »Im Entschwinde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Wandlungen der sozialen Konstruktion des Lebens«, in: *Merkur* 34, 1980; C. Fourier, *Theorie der vier Bewegungen und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1808), hgg. v. Th. W. Adorno, Frankfurt/M-Wien 1966; ders., »Arbeitstag eines 'reichen Mannes' in der 'Harmonie'« (1829); 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dt. *Das Menschenbild bei Marx*, Frankfurt/M 1963);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J. Haberma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M 1985; der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M 1981; der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85; H. Hartmann (Hg.),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1981; F. Haug, »Soziologie in der DDR«, in: *Argument* 50, *Sonderheft Kritik der bürgerlichen Sozialwissenschaften*, Berlin/W 1969; dies., »In der Arbeit zu Hausesein?«, in: dies., *Erinnerungsarbeit*, Hamburg-Berlin/W 1990; M. Hess, »Kommunistisches Bekenntniß in Fragen und Antworten« (1844), in: ders., *Philosophische und sozialistische Schriften*, Berlin/DDR 1990, 359-368;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5; A. Honneth, U. Jaeggi, *Arbeit. Handlung. Normativität*, Frankfurt/M 1980; W. D. Hund, *Stichwort Arbeit*, Heilbronn 1990; R. Iveković, »Noch einmal zum Marxismus und Feminismus«, in: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AS 110, Berlin/W1984; F. Lassalle, *Reden und*

Schriften, hgg. v. F. Jenaczek, München 1970;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F. List,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41), Berlin/W 1982; B. Mandeville, *Die Bienenfabel oder Private Laster, öffentliche Vorteile* (1714/1724), Frankfurt/M 1968; H. Marcuse,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s« (1933), in: ders., *Kulturund Gesellschaft*, Bd. 2, Frankfurt/M 1965, 7-48; O.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M New York 1984;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oder die Genossin Luxemburg bringt alles durcheinander*, Hamburg 1985; K. Offe, »Arbeit als soziologische Schlüsselkategorie?«, in: J. Matthes,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82; E. Rüddenklau,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oder Arbeit und Interaktion?*, Frankfurt/M 1982; W. Schmied-Kowarzik, »Die Dialektik von gesellschaftlicher Arbeit und Natur«, in: *Wiener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Bd. X, Wien 1977; V. Schurig, *Die Entstehung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M 1976;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2; A. Sohn 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Frankfurt/M 1970; W. Suchomlinski, *Erziehung zur Liebe zur Arbeit* (1959), Berlin/DDR 1962; G. Vobruba, »Arbeit«, in: LS, 1986, 33-36; C. v. Werlhoff, »Frauenarbeit: Der blinde Fleck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H. 1, 1978; U. Zilbersheid, *Die Marxsche Idee der Aufhebung der Arbeit und ihre Rezeption bei Fromm und Marcuse*, Frankfurt/M 1986.

弗里加·豪格 撰
张义修 译，仰海峰 审

参见：422

abstrakte Arbeit, abstrakte Tätigkeit, allgemeine Arbeit, Aneignung, Arbeitsmarkt, Arbeitspolitik, Arbeitsteilung, Arbeitszeit, Armut/Reichtum, Aufhebung, Ausbeutung, Automation, Bedürfnis, Beruf, Bewußtsein, Dialektik, disponible Zeit, Disziplin,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Dritte Welt, Eigentum, Emanzipation, Entfremdung, Erfahrung, Fabrik, Fordismus, Form, Freiheit/Notwendigkeit, Gebrauchswert, Glück, Handlungsfähigkeit, Hausarbeit/Familienarbeit, Herrschaft,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Kapital, Kapitalismus, Kapitalverhältnis, lebendige Arbeit, Liebe, Lust, Markt, Mehrwert, Mensch-Natur-

Verhältnis,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privat/gesellschaftlich,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duktivkräfte, Schönheit, Spiel, Vergegenständlichung, Vergesellschaftung, Verkehrung, Ware, Widerspruch, Zeit, Zweck

工人贵族(Arbeiteraristokratie)

工人贵族概念作为分析范畴并不常见，因为它多用于共产党的论战性攻击，特别是针对社会民主党。人们试图以此解释工人运动的政治分裂，特别是第二国际失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导致的工人阶级内的经济差异。

1. 马克思没有具体发展这个概念的原理。在《资本论》里，工人贵族概念只出现了一次（*K I*，MEW 23，第 697 页），除此之外该词一般具体用来指称企业制度内的师傅、监工和管理者等职务（同上书，第 446—447 页）。其后，该概念是由恩格斯首先应用的。

早在 1858 年 10 月 7 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就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引入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MEW 29，第 358 页）。直到将近 25 年后，他才给出了更详细的理由：“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消失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弟兄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1892，MEW 2，第 647 页）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工人阶级”中只有两个部分能够长期改善其状况，这就是工厂工人和大工联的成员。恩格斯把后者称为“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MEW 22，第 274 页）。

2.1 对于列宁来说也是这样：“工人贵族”最初只存在于一个如英国这样的国家。（例如 LW 18，第 352—353 页；LW 19，第 361 页）直到 1914 年 8 月 4 日，列宁才在跨国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范畴。现在它应当解释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开始后的失败，并促成了第二国际的各

个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的分裂。（参见例如 *Der Zusammenbruch der II Internationale*，LW 21，第 197—198 页）现在，列宁还整合了恩格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从其原理出发得到的一些评论，如个别工人领袖的腐败（MEW 35，第 20、209—210 页），或者宣称“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MEW 35，第 357 页）——这一说法是针对所有英国工人的。

1917 年列宁系统分析了英国无产阶级的部分成员“资产阶级化”的原因和后果：“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Imp*，LW 22，第 289 页）列宁并不认为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是工人贵族，而是指个别阶层和个别领导人。“某一部门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把工人中的某些部分，有时甚至是工人中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收买过去，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其他一切部门或国家。……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同上书，第 306—307 页）对于列宁来说，这种情况自 19 世纪末至今在英国一直持续着，在法国、北美和德国虽也有所发展，但那里“能够被收买的‘工人贵族’阶层较少（与 1848 年至 1868 年间英国的情况相比较）”（*D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Spaltung des Sozialismus*；LW 23，第 113 页）。

恩格斯使用的工业垄断概念所说的仅是英国在当时实现了工业化，而其他国家则没有，我们不能将它与列宁提出的垄断概念随意等同起来。列宁认为，在 19 世纪的英国，整个工人阶级“被腐蚀几十年”的情况仍然是可能的。现在他不再认为这是可能的。由于有更多的国家争夺对“现代金融资本的垄断”，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被腐化。这个在“**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中组织起来的部分，在很多国家可能会长期存在。但同时，工人阶级的另一部分遭到了掠夺。因为“托拉斯、金融寡头和物价高涨等虽然提供了收买一小撮上层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对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打击、压迫、摧残和折磨却愈来愈厉害”（同上）。

在工人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及其政治组织之间，斗争一直在发展着。对于列宁来说，“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随后会成为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还是小部分，这还不一定。对于第一种情况，他预先提到：没有理由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把大多数无产者包括到组织中去”。此外，重要的不是“参

加组织的人数”，而是“这个组织所采取的政策的客观实际意义”。对于列宁来说，组织的政策是否“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至关重要。（LW 23，第 117 页）

2.2 列宁去世后，关于工人贵族的原理固化了，虽然有些损失，但多年来已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分析的基石。要将列宁上述原理在 1935 年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前、期间及之后的三个重要变化区别开：**此前**，这一原理被用来论证社会法西斯主义议题。与资产阶级一起，工人贵族也法西斯化了，他们被看成工人阶级中供资产阶级利用的工具。梅尔克（Merker）（1930，第 259 页及以下）指出：

425 “社会法西斯运动是一种准备和实现金融寡头的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就像国家法西斯主义（纳粹）运动一样。它的社会基础首先是工人贵族。他们在为金融资本的统治做辩护时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国家法西斯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后者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基础的，也是以无产阶级的存在为基础的。”这对工人贵族原理做了最宽泛的演绎。对于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尔克来说，整个社会民主党都是由工人贵族组成的。他只是在说到如下这点时才做了区分：“在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大规模迁移紧密关联的过程中，左派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性增加了”。

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准备阶段和进行期间，虽然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议题被取消了，但其中的工人贵族原理不仅被修改了，并且由于共产党的策略转向人民阵线，严格来说，它已丧失其意义了。

这一策略的基础是将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通常是社会民主党这部分——排斥在联盟之外。对它来说重要的是，要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区分并通过譬如工人贵族的原理以“阶级分析的方式”来表达这些区分。不太重要的则是谋求把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包括垄断资产阶级的非法西斯化的部分——并入联盟。这包括很多方面，如在资产阶级内部进行区分，并通过譬如非垄断资产阶级的范畴或垄断集团的理论来表达这些区分。

不过，对于要使整个工人阶级结为联盟或作为更大的联盟之核心的共产党策略来说，必须要对工人贵族原理做根本性修改。然而，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并未选择这一方案，而是采纳了远远超出无产阶级的人民阵线。工人阶级上上下下的统一战线只是其中一项因素，尽管它是重要的。因此工人贵族原理的实质性修改被搁置了。同时，这也意味着要对列宁的理论进行明确且大规模的修订。

因此，在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

共产国际受限于一种修正。福加拉西（Fogarasi）认为，从超额利润中获取贿赂的工人贵族依然存在。他们“‘向下’与广大合格的工人群众”相联系，“向上则与从他们中产生的工人官僚”相联系。（1935，第 341—342 页）他认为，“右翼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
426 的错误在于，他们只能看到合格的工人，而没有看到工人贵族。而“左派”共产党的错误在于，他们不再看到合格的工人，而只看到工人贵族。对他来说，真正的工人贵族有三种受贿的方式：在道德文化上，把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文化提升起来并将之纳入资产阶级社会当中。在经济上，保障更高的工资、供应和利润分享。在政治上，分配职位。在德国，正如福加拉西当时所说，重点正在从老工人贵族转向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人官僚。他在逐渐下降的超额利润和获得技能与丧失技能的过程中看到了原因。随着危机及其带来的贫困化的发展，工人贵族和他们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因此，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不能胜任”发挥自己作为资产阶级支柱的作用。被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肃清的老工人贵族将会被新的但影响力较小的工人贵族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分析社会民主党时没有明确提到工人贵族范畴，往往甚至不加分析地就在“右派领袖”和遭到背叛的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之间做出武断的区分，但思想上似乎进一步受到这一范畴的影响。有意思的是，共产党作家如米洛夫·德伊拉斯（Milovan Djilas）（1957，第 43—44 页）甚至挪用了这个原理来批评共产党自己的运动。

工人贵族的思想形象似乎超出工人运动之外具有了一种理智上的吸引力，虽然这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范畴的背景。例如马克斯·韦伯在 1895 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到，希望有一种“工人贵族”，这样，那支对于资产阶级的肩膀来说过于沉重的“矛”就可以放在更宽广的肩膀上。（1921，第 23—24 页；GA I.4，第 572 页）列宁多年后在贬义上使用的这一范畴，而在韦伯这里，则是对一种针对工人阶级的整合战略的积极成分（1924，第 409 页）。

3. 对这一原理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长期严重阻碍了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恰当分析。对于列宁的及其各种演变的版本，至少有五种反对意见：

3.1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 427
地把这个范畴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来阐述，因此它的含义仍然是模糊的。这使人们对它可以做出各种理解，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在经济和政治危机情况下，它被更广泛地用来解释，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仍然处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

下；而在平和时期则没有那么广泛的应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从如下这点获得支持：列宁不曾尝试在经验上证明工人贵族。他只是引用了恩格斯和马克思书信中的段落，该段落涉及的是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时期和另一种情况，之后他在跨国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原理。（参见 LW 31，第 218—219 页，LW 23，第 48 页）

这一范畴在分析上的弱点也表现为，它将不同的工资水平、技能水平和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等问题拼凑在一起。然而，理论上的思考必须在不同维度上将经验上相互交织的内容以分析的方式拆解开来。只有这样，理论才能帮助工人运动处理内部的分歧。

3.2 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抬头是一个复杂问题，列宁对此予以回应并试图解释这一问题。范畴的模糊遮蔽了如下这点：工人运动通过深化自身的分裂来回应资本的分裂战略。至少有一部分技能熟练的工人被推进了资产阶级阵营。

3.3 列宁认为，工人贵族的政治组织是社会民主党，而工人阶级中其余部分的组织是共产党。在经验上验证列宁这一观点的尝试有时会产生惊人的后果。弗莱希特海姆（Flechtheim）（1973，第 311 页及以下）就证明，在 1928 年，德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成员属于工人贵族。

3.4 从理论上，人们都试图用高工资将工人贵族与工人阶级的其余部分明确区别开。这样就可以确定工人贵族从哪个工资水平开始计算。然而，更成问题的是，工资水平的逐渐变化最终被解释为决定性的。与之相反，工人阶级的所有成员的实质共性（列宁并不否认工人贵族的大多数也是这样）是，工资作为他们的唯一商品即劳动力的价格，一 428
旦被确定，就被认为是次要的。此外，如下问题依然是有待解决的，即：为什么流通领域的差异应该永久地中立化或超过生产领域的相似性。只着眼于不同水平的价格（在购买商品时，价格可能用来支付劳动力）的视角没有考虑到，一定的（即所谓“工人贵族”的）工资水平，是工人有资格参与政治活动的前提。饥饿和无知的无产者（这是由于报酬低下和物质上完全贫困造成的）充其量能够发动不成功的起义。工人贵族原理的支持者完全不讨论每一工资水平的历史道德因素。如果人们要求将关注点从工人贵族转移到工人官僚上（如列宁之后发生的那样），那就还需要另外的论据来区分列宁主义的“职业革命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官僚”。

3.5 如果不想将其解释为一个简单的贿赂理论，那么工人贵族范畴就表现出了贫困理论的逻辑逆转。它可以简要表达为：“正如痛苦造就革命那样，改

善——无论是来自哪方面的改善——造就了反革命。”（Wagner 1976，第 31—32 页）这两种观点都是从阶级意识的机械主义起源出发的，最晚在葛兰西之后就变得成问题了。工人贵族原理是否——不同于罗伯兰（Robelin）（1983）认为的那样——不必像贫困化理论那样经历类似的、严格来说相对化的发展过程，这依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为此，韦尔纳·霍夫曼（1967，第 27 页及以下）描述了从绝对的经济贫困化到相对的经济贫困化，直到单纯的心理、思想和道德的贫困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M. Djilas, *Die neue Klasse* (1957), Wien-München 1976; O. K.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M 1973; A. Fogarasi,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9. Jg. H 4, November 1935, 341ff; W. Hofmann, »Verelendung«, in: *Folgen einer Theorie. Essays über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Frankfurt/M 1967; M. Merker, in: *Die Internationale*, 13, 8/9, Berlin 1.5. 1930, 259ff; J. Robelin, »Arbeiteraristokratiec« in: KWM 1, 1983, 90f; W. Wagner, *Verelendungstheorie – die hilflose Kapitalismus kritik*, Frankfurt/M 1976; M.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1921), Tübingen [5]1988; der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1924), Tübingen [2]1988.

汉斯·维利·魏因岑（Hans Willi Weinzen）撰

郭胜大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429

Aketionseinh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Arbeitskraft, Bündnispolitik, Bürokratie, Einheitsfront, Facharbeiter, Faschismus, Finanzkapital, Internationale, Imperialismus, Klassenanalyse, Klassenbewußtsein, Kommunismus, Korruption, Krise, Monopol, oben/unten, Opportunismus, Owenismus, Proletariat, Qualifikation, Sozialdemokratie, Sozialfaschismus, Verelendung, Weltkrieg

工人运动（Abeiterbewegung）

1. 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Lage*）（1845）中包含了较长的一节，题为“工人运动”（MEW 2，第 430—455 页）。这里提到了工薪阶层利益表现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也能再次找

到：从自发的个人犯罪行为，到共同的破坏机器活动，再到政治组织，这里是指“宪章运动”和与其有些区别的“社会主义”（被理解为政治方向而非生产方式）。现在，这个历史趋势已经被称为社会革命。在关于劳动关系和生活关系的描述里（在“工人运动”这一节之外）能够看到劳动者日常生活的详细信息。

1844 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KHR*）中引入“无产阶级”作为历史哲学的重大概念（MEGA I/2，第 182 页；MEW 1，第 390 页），而没有像恩格斯那样进行经验观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组织发展阶段的理论，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MEW 4，第 175—182 页）中的“罢工和工人同盟”一节和《共产党宣言》（1848，MEW 4，第 470 页）中得到了更新。这在关于组织化的史前史的描述中得到了经验的充实：“基本的”工人运动的现实可以在有关抵抗反应的介绍中找到。

在那里，党和工会几乎没有在概念上区别开来。特别是直到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党派”的意义上使用“党”这一术语。此外，在接下来的时期，对他们来说，党和工会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运动，它随着其任务的变化 —— 这取决于阶级斗争达到的阶段 —— 而改变其形式。

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会是劳动力商品在价格降低时保卫其价值的不可缺少的 430
手段。然而，它们一旦“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时，它们就不能完全达到它们的目的。（*Lohn*，MEW 16，第 152 页）当对抗具有一种政治特征时，无产阶级运动就会转变为政党，而关于政党的具体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做出有约束力的说明。

他们在 1847 年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对一个旧的组织即“正义者同盟”的革新，并为之补充了更多的功能，使得它在制度上由他们进行改组。创新仅在纲领的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考虑了当前的需要，没有提出任何超出这种需要的理论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的第二个组织是“国际工人协会”（IAA，后来它被称为“第一国际”，存在于 1864 年至 1876 年），他们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际工人协会是一个意识形态联盟，就像那些形式上十分不同的群体一样 —— 从英国工联，到法国蒲鲁东、傅立叶和布朗基（Blanqui）的拥护者者，再到追随俄国流亡者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尽管存在这些差异，马克思还是在少数确定的意义（在他看来，这意义在政治

组织领域中是典型的）上，赋予国际工人协会以十分明显的政党性质。针对巴枯宁要将他的追随者聚合成“国际”内的一个自治的专门组织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总委员会”的权利，但这不应被误解成根本上是关于一种“极权主义”的自白。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这是一种一定条件下的权宜之计的观点；另一方面，这是在与对立观点进行争辩时的导向，这种对立观点 ——巴枯宁的观点毫无疑问就属此列 ——不仅从根本上倡导去中心化的组织观念，而且也因此必然会表现为反对领导机关，因为他们的反对者占据了大多数。在德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 1863 年拉萨尔组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参见马克思致施韦泽［Schweitzer］的信，MEW 32，第 568—571 页）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的观点，此后他们始终认为它是必要的：国际主义。他们将他们的“党”理解为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来的。

431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 ——如他们自己所确定的 ——包含黑格尔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参见 *Utopie*，MEW 19，第 177—228 页）同时，它也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他们的组织观念受到了同时代的经验的影响：对于他们来说，工人运动就其本质而言，很少是按英国“宪章运动”或工会来组织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就是宣传协会，它们试图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但从未与工人运动一致过。这里还有法国工人运动提供的第二种组织类型。与其后的群众政党不同，它们经常作为秘密组织进行活动（这也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容纳了这两种组织形式。

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与工会并立的社会民主党的群众政党，同时它们与工会也有联系。对此，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方面，议会制在制定关于无产阶级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的法律时的意义增大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巩固使得革命在短期内不大可能爆发，同时长期内进行的政治活动也会建议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和与波拿巴主义争辩的背景下产生的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 ——特别是在法国发生的相关事件给他们造成的印象的作用下 ——认为，工人参加选举会适得其反。

之后观点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恩格斯 1895 年为马克思的《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一书所写的导言中。在这里，参加选举和议会以及其他形式的代理机构（如劳工法院，劳资双方都会在其中委派各自的利益代表）被理解为汇集并施展自身力量的手段。如德国帝国国会中的活动同时也被理解为对一个“讲坛”（MEW

22，第 519 页）的充分利用。

在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中，一个小
432 型的宣传机构一直保存着。恩格斯特别从两个方面对它的发展给予了强烈关注：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会员中的传播。在他与倍倍尔的通信中也多次表现出对改良机会主义危险的担忧。二是恩格斯高度评价党内民主，特别是机构组织内的不受阻碍的言论自由。为此，1891 年恩格斯特别明确地谈到马克思当年写下的、已于 1875 年出版的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参见 MEW 38，第 94 页及以下）

2.1 工业革命后，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表现出与民族国家日益强烈的联系，而在之前，它们在英国之外的影响范围多局限于地区性和区域性。由此似乎跳过了各个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国际主义导向松懈了下来。关税保护政策、帝国主义扩张和社会立法，构成了各国工人运动的固定框架。第一国际就是为此作为一个统一的组织而设计的。自 1889 年起，“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取代了第一国际，并与那些相互独立的组织展开了竞争。自 1900 年起，第二国际才建立了“社会党国际局”和“议会国际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历次代表大会的主题表明，强有力的国家行为如何规定了党和工会的反应和主动性：先是工人保护（特别是从法律上确认八小时工作日制度）。进入 20 世纪后越来越重要的话题则是战争与和平。

第二国际中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英国工联在 1893 年成立独立工党，后来工党也背离了这个传统，如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辛迪加主义者们那样，但还属于社会主义者运动。除此之外，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的工会。通过领导骨干及在各党纲领中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8 年海因费尔德纲领［Hainfelder Programm］）和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中得到了明显的传播和接受。不过，由此似乎被正式确立起来的党的革命观点，433 因日益巩固的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的发展而遭到质疑。从 1896 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开始阐述由此产生的疑问。他的“修正主义”不是将工人运动看作颠覆的工具，而是强调通过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利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政治和社会渗透（通过议会、地方政治、劳动权利、社会政策等）。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迅速传播的实践（特别是工会、地方政府的和合作社的政治家的实践），但在纲领层面却未能贯彻。在“修正主义之争”中，尤其是卡尔·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代表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进入 20 世纪之后，在非修正主义的多数派中产生了分歧：卢森堡试图将旨

在变革的概念应用到她所认为的前革命情境中，特别是通过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与之相对，考茨基没有看到现实的行动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种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放弃对直接的当下和不远的未来的革命战略的策划的结合，是改良主义与“集中制”的激进左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特征。

2.2 **布尔什维克主义 / 孟什维主义。**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发展是由沙皇帝国的特殊性塑造的，这种特殊性明显偏离了中欧和西欧的情况。这里正在发生着西方已经完成了的工业革命。政治制度是专制主义的，甚至与德奥的立宪君主制也是有所不同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是非法的，在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之前，已经有一些西欧社会主义的秘密团体在活动了。在 1903 年的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在流亡中举行的，先是在布鲁塞尔，然后是在伦敦）上，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于 1898 年在明斯克［Minsk］成立）发生了分裂。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派将党的成员限定为积极的骨干（“职业革命者”），并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决议和选举（这些必须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基础上，下级党组织有义务严格执行共同做出的决定，而且还要按照党的指示行事。（参见勘误表。——编者）与之相对，孟什维克派（阿克雪里罗德［Axelrod］、丹［Dan］、普列汉诺夫）坚持更加开放的组织形式。第三个差别点（在这一点上，正在形成的“布尔什维克”独具一格）是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列宁在 1902 年的《怎么办？》（*WT*）中提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LW 5，第 386 页）。与之相对，党的任务是分析整个社会关系，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引出由社会关系所产生的政治后果。“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工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同上书，第 436 页）列宁将仅限于工作时间和工资的斗争批评为“经济主义”。在他对社会地位意识和政治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规定中，列宁明确地提到了考茨基；他将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样板，虽然他特别提到该党的组织结构受到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1878 年至 1890 年）的打压，但对它的当前状态还是做了完全积极的判断。

对列宁的政党理论的尖锐批评来自罗莎·卢森堡：集中制将会“限制政党精神的活力及其扩展革命的能力”（*Organisationsfrage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GW 1/2，第 434 页）。她认为，在她所参与的 1905 年至 1906 年的俄国革命中，她已经发现了另一条原则：新的组织从直接的群众行动中产生出来。

这个观点首先是针对德国工会领导人的，他们还在担心，使用政治罢工会破坏他们的协会。

2.3 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工人运动的内部分歧。第二国际因支持战争——各国政府（除少数例外）通过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这种支持——而被证明是缺乏行动能力的，而且虽然它的组织还在，但是其实质已经不再存在了。随着战争的进展，社会民主党组
435 织内的和平主义反对派逐渐形成起来，它们有的依然是一小部分（德国），而有的则是将党的大部分消灭掉了（奥地利从 1917 年开始）。只有少部分人代表着在战争灾难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要求，如 1916 年在德国成立的斯巴达克团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这些分歧在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1915 年）和昆塔尔（Kienthal）（1916 年）的反战反对派国际会议上表达了出来的。列宁赞同斯巴达克团要求将战争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但依然与它的如下观点保持距离，即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和“国际”分离开。罗莎·卢森堡在她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1916，GW 4，第 49—164 页）中指出，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要以夺回工人运动作为组织目标。列宁宣称有必要将目前组织中的改良派和激进派区分开，因为它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这种观点是以列宁如下尝试为基础的，即确定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原因：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允许帝国主义“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即所谓的“工人官僚”。（*Imp*，LW 22，第 198、287—288 页）他们与“工人贵族”、渗透到工人运动当中的小资产阶级一起，共同构成一个与资本家阶级利益密切相关的阶层。革命的工人运动必须与之划分开来。在此，针对中间派，列宁更为明确地划出了分界线。至少在反战的反对派中，公开的战争支持者总是遭到批评。列宁认为，非常有必要与中间派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在尖锐的革命斗争形势中通过坚持自己特有的不抵抗主张的立场阻碍了革命。

列宁的立场的严格性来源于他的如下论点，即直接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为此，在论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他也试图证明：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是如此深入，以至于资本主义秩序只不过是一个必须——当然是用武力——被剥夺的外壳罢了。

2.4 随着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的执政党。在俄 436
国革命的境况下，国际工人运动最终分裂了。

1918 年，布尔什维克改称“俄国共产党”（KPR）。1918 年 12 月底，斯巴达

克团（自 1918 年起称“斯巴达克同盟”）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中分裂出来，并和其他小团体（比如“不来梅激进左派”）一起组成了“德国共产党”（KPD）。它认识到其任务在于，在德国也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在成立大会上，一直作为中心的斯巴达克同盟成了少数派，它所面对的是刚刚政治化了的、总是任意武断的代表们，尤其是来自士兵和非熟练工人的代表。1920 年，同样主张这一目标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加入德国共产党。在 1920 年的图尔（Tours）党代会上，法国共产党从法国社会党中分裂出去。在 1921 年的利沃诺（Livorno）党代会上，意大利社会党的极端左翼分裂出去，形成了意大利共产党：一个特别有争议的决定，因为起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其他人，都激烈反对意大利参与这场战争，要求置身事外。

1919 年，这些共产党联合成立了“共产国际”，它被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大多数新成立的共产党都还比较小。在俄国之外，除了法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只有挪威共产党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它不久就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了。

随着革命在西方国家的失败，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职能发生了变化。1924 年，斯大林宣称“在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这就是在苏联。现在西方的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在自己的国家进行革命（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而应是在新出现的制度对抗中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这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对于身在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层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追随者来说，战后独立起义的失败和苏联社会主义秩序的巩固导致了策略的改变。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以来，这种对任务的规定一直是由苏联共产党牢牢把握的。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核心。针对斯大林，列奥·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必须将世界革命进程的延续作为拯救俄国革命的唯一途径。他在 1927 年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930 年被驱逐，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他组建了“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相抗衡。但它的规模一直比较小。1940 年托洛茨基遭暗杀身亡。

在共产国际内部，各国“支部”比较统一。在 1929 年至 1933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他们看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正面突破的机会和必要性。而且这不仅涉及一个指导性的决定：对于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在世界经济危机造成贫困的情况下，在资本主义内他们别无选择。在此，在解决领导问题的过程中，社会民主党高层扮演着“社会法西

斯主义”的角色，而且这种抨击也再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怨恨，这在长期失业的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这种基础上，这种极左的转向是人们乐于实行的。随着权力转移到希特勒，这种转向成为不能实现的幻想。

法西斯主义的胜利——首先是1922年在意大利，然后是1933年在德国、1934年在奥地利（奥地利法西斯主义）、1939年在西班牙——也表明工人运动遭遇严重失败。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做出的剧烈反应，不仅是为了应对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也是为了应对资产阶级操控能力的萎缩，这在上述国家中尤为明显，它们的社会经济总是疲软的：或是由于之前的战败（德国，奥地利），或是由于在世界经济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总是因追赶工业化而产生摩擦（意大利，西班牙）。因此，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力量不仅针对共产党，也针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1935年）上，各国共产党转向建立包括资产阶级力量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政策。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当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后，德国占领区的抵抗运动大幅度增加。在这些被占领国家中，更多之前相对较小的共产党已经成为群众组织，如在法国和意大利。

在被苏联占领的欧洲国家中，共产党接管了政府。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反抗德国占领的武装斗争以及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获得大批民众支持的革命进展顺利。从1948年至1952年，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内的另一场“大清洗”被曝光。这一直影响着德国社会统一党（1946年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而成，是苏占区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和德国共产党（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境内）。冷战初期，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参加了政府，并在接下来几十年一直处于群众组织的对立面。20世纪60年代初，意大利共产党在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领导下小心地服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并试图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要求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点相结合，也对苏共的统治实践进行了批评。同时，西班牙和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并被法国共产党所接受。

2.5 随着1917年工人运动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也发生了变化，它们激进的社会主义联盟被削弱了。与“布尔什维主义”相反，社会民主党强调以遵守议会程序和保障个人与集体的自由为必要条件，不应把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作为目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斗

争，与它们的这种遵循相联系。这种目标的实现不再被理解为一蹴而就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时代再也回不去了），而是被理解为一系列改革的组合，在这些改革中，不平等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的平等领域（政策）能够通过如下手段不断增强其条件（尽管因社会关系是
439 可逆的）：职工代表的共同决定、平等主义劳动法的执行，还有劳动关系的立法。在从理论上论证这种策略时，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出现了变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第一共和国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试图将一贯的改良策略（特别是在维也纳市政政策方面的成功）与始终如一的革命要求相结合。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才正式偏离马克思主义，此前马克思主义一直被认为是这些政党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

政治性的工人运动的分裂也反映在各个国际组织中。1914年时，第二国际实际上是崩溃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有所恢复，但当时除了它与共产国际之外，还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塑造的特殊形式："第二个半国际"。它最初试图巧妙地调和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路线上的分歧，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AI），它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暂时胜利而灭亡。1951年重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际通过反对共产主义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除了政党之外，工会是工薪阶层利益的第二种典型代表形式。与合作社不同的是，它们直到现在一直具有实际意义。在1914年以前的德国和英国，它们是最强的协会。从作为政治性利益代表的英国工联中最终发展出了工党，而进入20世纪之后的德国工会越来越追求独立于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在依然是），在德国、奥地利、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工会被牢牢整合进阶级关系的调整当中（十几年来，工会在英国重要性日益减少），但在美国和日本，工会从来没有能够获得类似的重要性（暂时例外的是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

2.6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不同于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因为它发生在 440
工人阶级占人口少数的国家。这个问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中国、印度和古巴）的革命（这被理解为反帝国主义）中一再出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革命开启了工业化进程，而大量的无产阶级是在这些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这与欧洲那种有着悠久传统的工人运动的联系只是外在的和形式上的，是在高度政治化的意义上的。

3. 随着欧洲共产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的传播和80年代戈尔巴乔夫终止

制度对抗，再度实现工人运动之统一的期望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但与之伴随的是关于“工人运动终结”的讨论。这主要是如下这些现实发展造成的：（1）在历史哲学上将革命主体角色归于无产阶级的做法，遭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修正。就工人运动被理解为革命性的而言，一个迄今为止特别活跃尽管总是占少数的部分的消灭，很容易与整个运动的结束相混淆；（2）传统体力劳动的衰落，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变化尚未得到充分的组织形式的体现；（3）自马克思以来，“自在的工人阶级”（经济上的规定）和“自为的工人阶级”（关于一种“主观因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规定）之间的区别已经确定了。在工业革命的前几十年里，通常只首先形成了“自在的阶级”。此后，与此同时的倒退也是可能的。

如果人们看看工人运动在欧洲和苏联的发展，就会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如果把视野投向美国，就会发现，那里几乎没有摆脱“自在的工人阶级”的状态（如果有所摆脱的话，那也是在19世纪80年代和罗斯福新政期间）。日本工人运动的历史与欧洲的发展很相似。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在欧洲、苏联和中国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循环后，新的工人运动开始延伸
441 到一些以前不发达但现在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对它们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评判（就像对1971年至1973年的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和现在的南非共产党那样）。评判的范畴必须改变，以使其能够考虑到不同的现象，如20世纪90年代的巴西工人党（PT）和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工会在阿根廷庇隆主义中的位置。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Aufstieg und Kris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4. erw. Aufl, Köln 1978; d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M [14]1984; ders., *Einfüb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Band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33*, Heilbronn 1985;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9)*, Bonn-Bad Godesberg [7]1977; J.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3 Bde., Berlin/W-Bonn [3]1978; F. Deppe, G. Fülberth u. J. Harrer (H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Köln [4]1989; J. Droz (Hg.),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15 Bde.,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4-1979; O. Flechtheim, *Die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Frankfurt/M 1986; H. Grebin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München 1966;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Berlin 1947; W.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nd 20. Jabrbunderts*, 6., erw. Aufl., Berlin/W-New York 1979; A. Klönn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 Ziele, Wirkungen*, Hamburg 1989; ders. u. H. Reese, *Die deutsche Gewerkschaftsbewegung.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Hamburg 1984; J. Kocka, *Weder Stand noch Klasse. Unterschichten um 1800*, Berlin/W 1990; ders., *Arbeitsverhältnisse und Arbeiterexistenzen Grundlagender Klassenbildung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83; J. Kuczynski, *Die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Berlin/DDR 1963ff; S. Miller u. H. Potthoff, *Kleine Geschichte der SPD*, Berlin/W 1991; A. Rosenberg, *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Frankfurt/M 1987; E. P. Thompson, *Die Entsteb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1963), 2 Bde., Frankfurt/M 1984; H. A. Winkler, *Von der Revolution zur Stabilisierung.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8 bis 1924*, Berlin/W. Bonn 1984; ders., *Der Schein der Normalität.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24 bis 1930*, Berlin/W-Bonn 1985; ders., *Der Weg in die Katastrophe. 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30 bis 1933*, Berlin/W-Bonn 1987; H. Zwahr, *Zur Konstituier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Klasse. Strukturuntersuchung über das Leipziger Proletariat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Berlin/DDR 1978.

格奥尔格·菲贝尔特
（Georg Fülberth）撰
郭胜大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ktionseinheit, Anarchismus, Antikolonialismus, Arbeiteraristokratie, Arbeiterbildung, Arbeiterklasse,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kultur,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skraft, Arbeitszeit, Austromarxismus, Avantgarde, Berufsrevolutionär, Bonapartismus, Chartismus,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Einheitsfront, Eurokommunismus, Facharbeiter, Fourierismus, Gegenmacht,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Gewerkschaften,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Illegalität, Imperialismus,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e, Klassen, Klassenbewußtsein, Klassenkämpfe, Kleinbürger, Krieg, kollektives Handeln, Kommunismus, Kommunistisches Manifest, Linksradikalismus, Lohn, Lohnarbeit, Lumpenproletariat, Luxemburgismus, Marxismus, Massenbewegung, Mitbestimmung,

Nationalstaat, Ökonomismus, Operaismus, Opportunismus, Owenismus, Parlamentarismus, Parteien, Parteipresse, Pazifismus, Reformismus, Regulation, Revisionismus, revolutionärer Syndikalismus, Saint-Simonismus, Sozialdemokratie,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e, soziale Bewegungen, Sozialpolitik, Stalinismus, Streik, Trotzkismus, Ultralinke, Volksfront, Zentralismus, Zentrismus, Zimmerwalder

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

追随者和反对者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联系在一起。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和强调的那般，此乃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标志。难道马克思没有解释他的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人阶级持续的运动和与资本主义及其代言人的对抗吗？“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K I*，MEW 23，第22页）《资本论》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但是如果说历史上的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间的关系不大呢？如果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基于双方的误解呢？如果工人阶级的历史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之中长久以来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这些斗争不仅改变了它们的形式，也改变了其内容和目标呢？如果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彻底改变甚至消解，或他们获得了社会阶层的上升，从先前的无产阶级达到了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呢？如果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唯有这个阶级是社会革命的动力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生活条件中已得到了舒适的安置呢？ 443

在20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工人阶级的“市民化”令人感到惋惜。“告别无产阶级”由此经常被使用。历史的讽刺在于，大失所望的知识分子将“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归咎于以往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难道人们应该怪罪那些现代历史中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实验”下饱受苦难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成了让“现存资本主义”变得吸引人的原因？作为目标和社会模式的社会主义需要重新寻找“历史主体”。

1. 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和同时代的人一样，将工人阶级看作为“第四等级”，底层的“乌合之众”和“无产阶级”。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这一阶级。此

外，他们不属于市民社会。起先（1842年），马克思认为工人就是“穷人”或“一无所有的等级”（MEW 1，第106页），“**具体**劳动**的等级**”。（*KHS*，MEW I，第284页）他把现代的贫困化表述为，“工人贫困”在英国这个“**赤贫的国家**”是“**普遍的，而非个别的**”。也就是说，贫困不只限于工厂区，而且也扩展到了农业区。（MEW 1，第395、400—401页）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工人起义“反对私有制社会”，这使得他对“无产阶级”产生了兴趣。（同上书，第404—405页）

直到1842年，恩格斯仍然认为工人是苦难群众：他们试图在酒精和宗教里忘记痛苦（参见MEW 1，第417页及以下，第432页等处）。正如他所回忆的，他在曼彻斯特认识到“现代大工业的中心”（MEW 36，第697页）和现代工厂工人的状况。他从自己的切身经验而非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对“无产者关系的描述”中获得这些认识（例如Barton 1817，Ellis 1821，Buret 1840，Villermé 1840）。他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现代工业，造就了“无产者”（MEW 1，第454页），“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几乎一半的英国人属于这个阶级”。（MEW 1，第459页）但是，对于毫无工业发展的大陆而言，人们对这个新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还知之甚少，在那些地方也没有工人运动，这种工人运动表明“工人阶级开始觉悟起来”。（MEW 1，第461页）但“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穷苦和贫困却具有民族的和……世界历史的意义”，因为在英国发生演变的“工业革命”，会导致“社会革命”。（MEW 1，第555—556页等处）

初次接触同时代的社会主义之际，马克思便提出了关于工人阶级的哲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它具有如黑格尔赋予国家官员的特性。如果工人阶级获得统治权，工人阶级会实现“社会的普遍解放”，因为它“集中社会的所有缺陷”，使它们的废除“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KHR*，MEW 1，第388页）它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这个市民社会的阶级不能称之为一个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同上书，第390页）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这个强调概念所指的是一个甚至可能是**空集**的“逻辑上的阶级”。这个被构想的阶级与新的“绝对命令”相适应。“**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MEW 1，第385页）。不幸与痛苦，秩序的缺乏和人的

尊严的丧失——这些被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特征是马克思的兴趣所在。然而，对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还不甚明了。

在《神圣家族》中，不能消灭其生存条件的无产者这一哲学概念仍然占主导地位："没有消灭集中表现在工人阶级之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反人性的生活条件。"（MEW 2，第38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者首次被发现："**纯粹**工人群体"毫无资本及其他生活资料而且工作不能成为他们"有保障的生活来源"（MEW 3，第36页）。此外，工人阶级多次被提及："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第60页），"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
445 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第69页），"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第75页），"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第69页）。在《共产党宣言》（1847）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提出新的"现代工人阶级"的特殊处境及他们将要扮演的特殊历史角色。马克思的首次尝试后（*Elend*，MEW 4，第175—182页）出现了新的元素。它此后成为两者的中介：历史进程的简要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将发展为具有行动能力的集体主体，即社会"阶级"。它能够并且将进行有组织的"阶级斗争"。（MEW 4，第470—474页）

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尚未完成："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他们才能找到工作。"现代工人阶级"如同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MEW 4，第468页）剥削不是《共产党宣言》中分析的概念，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一直不甚明了。在现代工厂里，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自我异化便发生于此。工厂管理的专制、工作时间的延长和工作强度的加强、女工和童工的劳动，这是他们看到并强调的。（参见第468—469页）与之前相比，他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以新的论证："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对于现代工人而言，财产、家庭、法律、道德和国家都已经不存在。（第472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无法确保"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由两位年轻作者毕生精力所完成的著作主要说明：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发现并解释，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能够在资产阶级社会进行解放斗

争。（参见第 474—475 页）1875 年马克思再次强化了这一任务：因为社会财富及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工人为代价，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泛泛而谈”，而应该“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Gotha*，MEW 19，第 17 页）

2. **现代工人阶级的概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的存在条件后，他们如何在现代的意义上理解工人阶级？

2.1 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马克思就已经发现现代“工人阶级”这一概念以及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参见 MEW 28，第 504、507 页）。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对工人的理解与马克思没有差别，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MEW 25，第 892 页；参见第 632 页）。与同时代的慈善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家将无产者看作是概念出发点，“**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只靠劳动而且是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Ms 44*，MEW 40，第 477 页）。对此，马克思不能完全认同，他认为“不劳动的工人也是人”（同上）。他对“生活状况”的思考不像经济学家那样“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同上），他将其整合到政治经济学里。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同上书，第 478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也试图对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用合适的概念表达。这个概念超越了目前的偏见——贫苦大众牺牲的悲歌，工人被化约为工作中的“生产要素”——而且符合工人状况的矛盾性。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大量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间——工人是没有参与的第三方和牺牲品。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工人不再是被动的受难阶级，也不再是市场交换的单纯物品：工人“必须斗争”，不仅仅为了“物质的生活资料”，也为了工作。（同上书，第 473 页）工人因此获得了关键作用，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可以回溯到与“工业革命”相连的现代社会的源头。初次阅读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后，马克思便得出结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和没有财产的**工人**。”（第 510 页）

2.2 在《资本论》中，工人阶级被描述为特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工人阶级”（MEW 23，第 185 页）、“纯粹雇佣工人阶级”（同上书，第 734 页）、“工资工人阶级”或“雇佣工人阶级”（MEW

24，第 39 页）。因此，工人阶级的分析式概念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与雇佣劳动这一现代形式密切相关。“雇佣劳动”是表述**劳资关系的特定历史形式的关系概念**（*Relationsbegriff*）。因此，工人阶级的概念，若没有与其对立的关系（如资本家或生产资料所有者）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任何非资本家若想进行再生产，就必须依赖于与他们取得联系。正如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的阶级也都占有形式上独立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市场上可进行交易的私有财产，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原则上可以选择他们想要与之交易的对象；但他们不得不始终与其他阶层的成员发生关系，因为每一个私有财产的范畴都支配着他人的所需。在劳动力市场上他们相互对立为“买方阶层”和“卖方阶层”。（参见 MEW 6，第 400—401 页；MEW 23，第 181—182 页）

私人间——隶属于两个拥有私人财产的阶级——的交换关系提供或隐藏了某种依赖关系，从而再生一种剥削的关系——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想要解开的秘密。劳动力市场私有财产拥有者能对另一所有者加以定期剥削，这就说明在这一过程的最后为什么某个所有者变得更富有，而另一个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与之前保持同等水平：他维持了自己的所有，即“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MEW 23，第 352 页），但他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那里寻找新的买主。雇佣工人依赖“**买主阶级**”，尽管他们不属于某个资本家而且保留了更换“单个雇主”的自由。（MEW 6，第 401 页；MEW 23，第 599、603 页）“从社会 448
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MEW 23，第 598 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区分了个体雇佣劳动者的处境和“本阶级的生存条件”（MEW 4，第 473 页）。在《资本论》中，“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与工人阶级不同。（MEW 23，第 316 页）“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第 593 页；参见第 597 页），那么总量将需要分别被考察。比如作为社会总资本部分的**可变资本**，所有雇佣工人在某个时间段的社会总收入（工资收入），所有雇佣劳动者在消费品市场上所产生的总需求——以及某总量对其他总量的影响，比如市场价格水平或平均利润率对资金产生的影响。（参见 MEW 16，第 107、115 页；MEW 23，第 597—598、671 页；MEW 24，第 370—371、408—409 页，第 437 页及以下多处；MEW 25，第 198 页）

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借助工人阶级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中特殊的阶级，即

“现代社会的最下层”（*Manifest*，MEW 4，第 473 页），并将其理解为**政治现象**：19 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缺乏以下两项权利，即选举权以及获取贫困支持。这个阶级既不能参与国家的重大决定也不能提出要求（参见 Polanyi 1977，第 213 页）。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工人阶级也没有公民权利，甚至被贬为**二等阶级**。（参见 Zwahr 1978，第 120 页）在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活跃度很高且拥有大量的俱乐部、社团以及政治组织。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以往（和后来许多）的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未来的“统治”和政治上“社会支配”阶级——在某个时刻，他们的成员仍然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政治和社会压迫都属于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内，哪怕这些要素与工人并不直接相关。（参见 MEW 4，第 312 页）

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加以向上和向下的划分。向上划分的界限（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中产阶级，他们的等级高于单个的工人。如果他们有一定
449 的资本，确切地说，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债权人，使得他们实现“独立性”，经营“家庭作坊”或是进行有组织的“自我剥削”。一些人成功地晋升为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指出，仆人或“仆役阶层”、“有闲资本家直接雇佣的雇佣工人”（MEW 24，第 481 页；*Gr*，第 305 页）不断成为小资产阶级（MEW 26. 1，第 172 页），因为对于“主人”的代理需求而言，丰厚得体的薪水有些许储蓄成为可能。

向下也同样有个明显的边界，这就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如同寄生虫一样，“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救济（MEW 8，第 161 页）。“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Ms 44*，MEW 40，第 523 页），不再作为“正常工作的人（*Gr*，MEW 42，第 510 页），他们不再依附于资本和社会的依附关系。在工业后备军的边缘地带，**失去社会地位**（*Deklassierung*）的进程持续发生。在最终成为流氓无产阶级之前，工人陷入了“贫困化”的境地。因此，1845 年和 1846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描述了“已无力抵抗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者所沦落到”的最后阶段。当无产阶级正常的生存机会被剥夺而且“精疲力尽”，工人就变成了赤贫者（参见 *DI*，MEW 3，第 183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同样将贫困化表述为“死荷重”，即“工业化后备军的最底层”或“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MEW 23，第 673 页）

2.5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广义**和**狭义**的工人阶级概念。一般来说，他们把“无产阶级”的范围定得比工人阶级更窄。相反，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在最宽泛意义上是“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到

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MEW 10，第 648 页），比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要宽泛得多。“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 ”（MEW 22，第 209 页）包括所有那些依赖资本为生的雇佣工人。实际上他们以资本家或资本家工厂为生，他们的劳动力被购买而且被剥削。马克思有多种方式来进一步限定**广义**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概念限定在
450 剩余价值生产者或**生产**工人即雇佣工人之上，他们被特定的资本主义方式剥削而且他们本身作为单个的资本进行生产和利用（参见 die Andeutung，MEW 23，第 642—643 页）；我们也可以使得工人阶级接近无产阶级的概念从而排除掉雇佣工人。雇佣工人因资本之故在假定或是实质的意义上都属于企业的等级；或者我们可以将工人阶级限定在工业或者工厂工人的层面，作为个体他们对“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加以全面的亲身体验。

2.6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是**为特定历史所决定的概念**（*historisch spezifisch bestimmter Begriff*）。“劳动阶级”的形式并非总是存在的，它在一定的条件和社会状况下产生，与早期的无产阶级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引用西斯蒙第（*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1837）：“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MEW 16，第 359 页；MEW 23，第 621 页）。现代无产阶级与古代无产阶级的特定历史概念的差异也被马克斯·韦伯发现：这是“一个消费者无产阶级，一群去阶级化的小市民，而不是像现在的工人阶级，他们把生产扛在肩上”（1909，第 6 页）。此外，恩格斯在 1886 年也强调了这一点：古代的“自由无产者”“不是**劳动**无产者，而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对社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们没有什么坚强的力量”；现代无产者是劳动阶级，“社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依靠着无产者的劳动”，不可或缺。（MEW 21，第 497 页）

3. **现代的工人阶级从哪里来**？马克思于 1847 年写道：“经济关系……使人口大量转化为工人”（*Elend*，MEW 4，第 180 页）。历史的转变过程分阶段往前进展着；一旦第一批“出生”的工人在雇佣工人的家庭成长并也成为终身的雇佣工人，这个过程将是没有尽头的。“自由的工人阶级在怎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有了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K I*，MEW 23，第 185 页），这对于工资的上下浮动所依赖的正常标准非常重要。此外，对于工人阶级在某个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所扮演的社会和政治角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马克思把造就了现代工 451

人阶级的“历史运动”描述为**剥夺**（*Enteignung*）的双重进程：一方面，工人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MEW 23，第 743 页；参见 MEW 25，第 892 页）这种双重剥夺是多重政治的结果，也就是说，经国家权力的干预和决策，生存和生产资料等个人和集体现有的所有权会发生彻底的改变。16 及 18 世纪的英格兰**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s*），使得乡镇（农田）土地转化为畜牧业的牧场。农民和佃农变成了无地的“自由工人”——事实上的流浪汉和乞丐。这是马克思为这一进程所举的重要案例（MEW 23，第 744 页及以下；相关讨论见 Dobb 1967，Polanyi 1977，März 1976）。

阶级的形成进一步发展，“大批已变得无产的和自由的居民‘变成’自由的雇佣工人”，无产的自由者们，通过“纪律”变成雇佣劳动，“生活……成为纯粹工人的生活”。（*Gr*，第 655 页；MEW 42，第 661 页）“大无产者比流浪汉、强盗和乞丐更愿意当工人”（同上书，第 624 页；第 631、661 页）。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未占据统治地位，它就需要“国家强制，为了把丧失财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转变成工人”（同上）。“但这还不足以让他们自愿出卖其劳动力”，因此需要通过“教育、传统和习惯”使得“工人阶级……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K I*，MEW 23，第 765 页）

现代工人阶级有不同的来源：来自“流浪汉”以及更高的等级，来自封建社会任一阶层中的丧失家园和社会地位的人以及（被开除的）士兵和“游民”，来自过剩的农民、雇农和女佣，来自学徒期满但不能在专门作坊中立足，另立门户的工匠。雇佣工人的地位早已不被社会认可，毋宁说，它是一条（暂时的）出路，这就是“破产者”和“穷人”所处的全部处境。（参见 *DI*，MEW 3，第 24、183 页；MEW 23，第 761—762 页）破产的情形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仍继续发生着。与稳定的社会不同，在阶级社会无人是有保障的。“社会等级下降”对有产阶级的所有成员而言都是一个真实的危险。“由于中产阶级解体而产生的大众”（*KHR*，MEW 1，第 390—391 页），“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面临着大资本的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竞争压力，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MEW 4，第 469 页；参见 MEW 6，第 422 页）即使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庄园主也会失去其特殊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资产阶级”对

452

这些阶层进行降级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似乎它已经完成（尽管它几乎没有开始）："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的有偿雇佣劳动者"。（MEW 4，第 465 页）

工业革命成了这一进程的催化剂：一方面，它导致了"工人阶级新的形成元素"；另一方面，它彻底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特点。

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的这本书写于 1844 年到 1845 年，紧接着他近两年的英国生活并且根据"他自己的直观和最真实的材料"完成。如同 1845 年德语版的小标题所表明的，这是第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的试点研究。恩格斯全面探究了**状况**这一概念：不仅是企业里的工作境况、工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条件，而且包括营养状况、健康状况、住房关系、衣物、家庭情况、"非工作"时的行为、教育、习俗和道德观念等。他毫无畏忌地描述现代工人的社会特点以及他们的优缺点。在那个时代，科学研究文献表明（工厂）工人是"野蛮人"、低等物种以及"危险阶级"（例如 Buret 1840），他们之中不仅有酒鬼，玩世不恭者和妓女，甚至也有罪犯。于是，在《资本论》之中，"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参见 *K I*，Kap.13，第 23 页）。即使在英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工人的状况"差不多都是不清楚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所谓《蓝皮书》[*Blaubücher*] 报告指出了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这一材料在这里"才第一次为读者所了解"（MEW 16，第 365 页）。

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命运。亚当·斯密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手工工场）的工人会提高他们的物质水平，但精神层面更糟糕了：实际工资将上升，工人相对收入增加；与此同时，他们将成为沉闷、冷漠、无知的群体，不再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两个方面都与马克思的意见相左。他认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状况会不断恶化，而并非得到改善；但是，他们会更有自信、更有组织、更有效地进行政治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意斯密的观点，即现代工人不会太在乎国家，尽管他没有对爱国主义缺乏的担忧。他始终认为真正的风险在于工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可怜虫"，"不可挽救"（MEW 16，第 151 页），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中，他们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日益恶化而且没有反抗的可能。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23 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MEW 23，第 674 页）。事

实上，它也与工人阶级长期发展的状况有关。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它只是适用于特定的条件，“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同上）。实际上，马克思给出了两条互为补充的表达，第一个涉及“工业后备军”，第二个涉及在职工人的状况。准确来说，还有第三条规律，表达的是“贫困化”的增长。

规律的第一部分是说：随着资本的累积，“工业后备军的相对规模”也随之增加。（MEW 23，第 673 页）但是，与“现役劳动军”相比，工业后备军规模越大，后备军的各个部分的贫困也就越大。（第 673—674 页）马克思**没有**断言失业和半失业者的生活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绝对**会恶化。不过他认为必定会
454 有更多的工人处于不稳定的和悲惨的状况 —— 尽管工人阶级的状况（甚至包括产业后备军或某些特定的失业及半失业群体）本应有所提高。

第二部分是说：随着资本的积累，“现役劳动军的各阶层的贫困不断增大”（MEW 23，第 674 页）。资本积累越多，“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越是粗放和激烈，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工人们通过出售和转售劳动力而赢得的“生存条件”变得“更困难”。失业风险的增加导致工人生存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种不确定性是恩格斯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核心特征（*Lage*，MEW 2，第 344 页）。此外，工人群体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一切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以牺牲个体劳动者为代价”。至少这适用于大工业中有组织的企业劳动：他们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难 —— 紧张且劳累 —— 单调、内容空洞和低智力；他们的工作条件不断恶化（例如噪音、高温、粉尘、恶臭及事故风险）；工作中的监督和控制愈加紧密化和系统化，除了工作时间增加，女工和童工的数量也增加。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MEW 23，第 675 页）。因此，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恶化是**独立于工资**水平的，它也必然随着金钱和实际工资的增加而发生。

工业后备军的规模越大，第三类贫困化就越大，“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的规模就越大。（MEW 23，第 673—674 页）此外，无法成为“商品劳动力”的赤贫者阶层也在日益增长，明显压低了工人阶级总体的生活状况，尽管穷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再具有竞争力，也不影响一般的工资水平。此乃《共产党宣言》中有关“贫穷趋势”的一般性总结的首要意义：现代工人“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他变成了一个穷人，因为他不能作为雇佣工人进

455 行再生产。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统治，因为他们使得工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在人口中的绝对和相对数量陷入这样的境况："在那里资产阶级必须供养工人，而不是由工人供养。"（MEW 4，第 473 页）

马克思将他对"规律"的论说总结成公式：一方面，"资本或财富的积累"对工人阶级来说意味着"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MEW 23，第 675 页）。这份列举表明了他在此考虑的是受恩格斯影响的**广义**上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概念。这个普遍规律作为"贫困化理论"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及政治经济学历史之中。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它是否或如何贯彻，这对于马克思观点（一般情况下，解释实际工资长期及绝对的减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而言至今仍有争议。

无论如何，马克思把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状况的研究视为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者不变的任务。在国际工人协会的范围内收集"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计划（MEW 16，第 191 页）从未实现。恩格斯于 1878 年和 1885 年写过的关于欧洲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报道也指出（参见 MEW 19，第 119—120 页；MEW 21，第 191—192 页），他将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作为社会政治的第一基础并郑重地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及政治革命的"历史主体"。相反，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仅仅把工人阶级看作被监护人或社会主义的小人物。

5. **工人如何成为（社会）阶级？** 工人们首先形成人"群"，他们有"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Elend*，MEW 4，第 181 页），他们的"经济条件"、"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教育程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阶级对立（*18. B*，MEW 8，第 198 页）。因此，"这批人对资本来说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MEW 4，第 181 页）。只有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利益的同一性"形成"共同关系"、超越地区的（全国性的）"联系"及"他们自己的政治组织"（MEW 8，第 198 页），"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MEW 4，第 181 页）。

因此，马克思为后来的研究确立了 456
主题：现代的雇佣工人如何（借助不受他影响的公式）从"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1847 年，他使之成为历史研究的主题：无产阶级是如何从"形成为阶级"（als Klasse konstituierte）发展到"构成阶级"（Konstituierung als Klasse），与"探讨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这一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类似。（MEW 4，第 181 页）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

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估价”（同上）。

历史学家 E. P. 汤普森（1963）再次提出了这个旧主题。正如他所研究的，1830 年左右，在英国出现了一个为集体行为“准备就绪的”（fertige）且有能力的工人阶级，他们一同明确反对“企业家”（雇主）所主导的利益。他们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机构，而且有了共同的价值和规范体系的萌芽。这个新阶级是历史学习过程的产物，汤普森将 1780 年至 1832 年这一时期命名为历史学系过程，两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们组成了大量彼此相互关联的局部的社团和俱乐部，并且组织当地的甚至是超地区的、有效的、影响日常生活的“工人阶级社区”。与此同时，他们试验了不同的行动和反抗的形式并且找到可以成功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84，第 204、206—207 页）反驳道，阶级的形成过程从未完成，相反，它被看作是一种并非直线前进的永久的过程：它可以被打断。它也可以反转 —— 工人阶级可能或多或少退化成无组织的群体且失去集体的认同感。一次性形成的工人阶级可以得到合理发展且改变形象：英国 1880 年的工人阶级不再是那个 1830 年的了。经过这段时间，他们发展为占优势的工业或工厂工人阶级。新的工人阶级如铁路工人和矿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新的工业在产生且工人主要是男性，这与以往早期纺织业的工人主要是妇女不同；童工已经减少了大半 —— 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工业领域的、成年男性的。同时，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规范也得到发展（如足球作为无产阶级独特的体育运动）。

有人在方法论上继续推进，如威斯特（Vester）（1971）试图将现代雇佣工人的阶级形成的过程当作**学习周期**（*Lernzyklen*）的结果，在这种周期中经验是被以集体的方式取得和汲取的。阶级形成的过程在最近以历史比较的方法被观察（参见 Katznelson / Zolberg 1986）。

6. **工人阶级的结构**。恩格斯在 1845 年就已经区分了工人阶级中一系列大的“部门”或“阶层”：产业工人、矿业工人和农业工人。（*Lage*，MEW 2，第 253—254 页）在产业工人的范畴下，他将“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工人”与手工工匠或资本主义组织的家庭工业（在家工作）等雇佣工人区分开。（参见第 253 页，第 360 页及以下，第 408 页及以下）另外他还看到大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之间的差距（第256 页及以下，第473 页及以下）。他详细地概述了英格兰本地人和爱尔兰移民工人之间的差异和紧张关系，他们

在所有城市工业区中构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层”。（第320页及以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现代工人阶级的结构有清晰的概念——对工业进程中工人阶级所经受的变化也有清晰的概念：这一进程始于手工业时期形成的“将工人区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MEW 23，第371页）。在大工业中，“机器工人”和“纯手工工人”之间的“重大区别”取代了代表手工业特征的手工业者的“等级”。机器工人和纯手工工人之间经常发生转换，而且由于“局部技巧”和终身专业化的重要性下降，这种转换还在增强，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第444页），等等。这种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可以由工厂工人的分化得以完成，另一方面可通过利用所有前工业的工作和企业形式来整合并开设更多可以减少非工厂工人数量的生产部门得以完成。

工业时代的工人阶级由工厂工人、工厂手工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家庭劳动）工人构成。前三者在空间上集中且受资本的直接指挥，最后一种工人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地方并且只是间接地听从资本的命令（参见MEW 23，第485—486页）。这些群体依据剥削的等级和形式（家庭手工业比工厂手工业和工厂“更无耻”）或“工人竞争”的强度（在家庭劳动中是最高的，参见第486页）得以区分。此外还有大批农业工人、商业雇佣工人（在贸易和信贷行业）及由各种不同的仆人、侍从等组成的“仆役阶级”。根据工资种类与多少及就业周期，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进行了进一步区分（同上书，第666页）并发现不仅仅在“报酬微薄的”与“报酬优厚的”阶层间，而且在工人后备军的阶层间也有差别（参见第670页及以下，第684、697页）。

工人阶级在某个国家的同质及异质情况是怎样的，或者虽然老但是非常现实的“移民工人”的下等阶层（“次无产者”）的问题。马克思举了爱尔兰工人的例子，在英国“**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MEW 32，第668—669页；参见MEW 16，第388—389、416—417页）。对“真正”工人阶级的界定或对“非真”无产者的排除已被阐明，也就是说，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工薪族（“受雇佣的”）在劳动民众中的比重越高，怨恨就越多。哪些雇佣工人属于工人阶级这个问题与“历史使命”有关。这（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除了讨论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这一问题之外，或者说，除了讨论作为“子阶级”（“亚无产者”）的“移民工人”这个陈旧但又具有现实性的难题——马克思曾以爱尔兰工人和因他们而“**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的英

国工人阶级为例，探讨了这一难题——之外，人们一直还在反复探讨界定“真正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把“不真实的”无产者剔除出去，而且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薪族和打工赚钱的人（受雇佣者）在劳动人口所占份额越大，这种讨论就越激烈怨怒。

7. **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反对那些“在贫穷中只看到贫穷”的社会主义者（*Elend*，MEW 4，第143页），“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同上；参见MEW 16，第28—29页）。此概念在规范上的重要性基于以下两点：工人阶级——确切来说，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产物，而且它在现代政治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对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工人运动而言是一个合法化和动员性的表达形式。但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论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及许多同时代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所共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要素（参见Proudhon 1865）。

在马克思所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1864）里，此原则居于首位：“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MEW 16，第14页；MEW 17，第440页）。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怀疑劳动党的政治分歧点在于：“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MEW 19，第165页）人们不难想象，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基本原则受他们的影响（关心工人缺乏自我解放的能力）。

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目标造成了更大的困难。从所有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形式中解脱出来的“解放”便是困难之一。但是，为什么作为阶级的现代雇佣工人必须始终对“革命”保持兴趣呢？他们为什么必须过渡到没有阶级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他们为什么必须成为“革命”的阶级？为什么他们必须只能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中寻求解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描述的他们的生活的意义上，他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和道德权利来进行激进的反抗。但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是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以及维持自己的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努力解释，为什么工人不仅仅需要革命，而且需要进行社会革命。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结尾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不仅“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且“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MEW 23，第

790—791 页）“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将导致“否定之否定”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毁灭。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段落，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的“真正革命的阶级”（同上书，第 791 页）。

这个文本早在 1873 年就被杜林批评为是黑格尔派的。恩格斯在回复里声称这只是对历史证明的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创造了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AD*, MEW 20，第 124 页）。在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造和消灭的过程“部分确已实现，部分以后一定会实现”后，他又将其描述为“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尽管没有给以说明，他还使用了辩证逻辑的概念。（同上书，第 125 页）但是想要事先“证明”如此大规模历史过程仍然是一个问题。

460

在《资本论》里，工人阶级的“革命角色”仍然只是一个预设：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不能从自身或按照“辩证逻辑”的方式运动或扬弃，显而易见的是，最苦且能够集体行动的阶级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主要对手。关于这种运动的内容和目标，马克思也有所论述，他在 1871 年写道：“工人阶级知道”在这场行动中他们所能做的以及将要发生的（*Bürgerkrieg*，MEW 17，第 546—547、343 页），尽管当时参与起义的公社成员的工人阶级对此没有全部认识到。马克思撰文为备受诋毁的公社辩护。但是《资本论》的作者不能像他在 1844 年所写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HF*，MEW 2，第 38 页）作为政治家，马克思要求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MEW 8，第 600 页）；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知道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当矛盾的而且他们的经济行为充满了神秘色彩。

8. **补充和开放的问题**。马克思之后的第一代便开始了有关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未来前景的讨论。所谓的修正主义围绕着如下这些问题：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情况是如何变化的？是更好了还是更差了？由此我们必须或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们有关“历史使命”的论点已经受到质疑，直到现在也饱受各方争议。“告别无产阶级”的呼唤（Gorz 1980）不适用于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它适用于革命无产阶级所认为的神话。但在高度发达的、有组织的、民主的、享有国家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存在吗？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是否存在具有自我意识的、有政治组织的

461

“自为的阶级”？这个问题也值得人们长期思考。

自相矛盾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大疏忽之一便是他所命名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MEW 16，第 11 页）：除了少数例外（参见例如 Rühle 1970，1977），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的第二或第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再生产的特殊方式几乎不感兴趣。然而，在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商品的再生产可用一个循环公式来描述。在公式里，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消费品分配）构建了主要环节：

$$W_{Ak} - G, G - W_{Km} \ldots K \ldots W_{Ak}, W_{Ak} - G$$

工人如何在资本主义中生存——他们的（生存）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如何改变——这仅仅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忽略作为副业的小农或工匠及自然经济的所有（适度的）形式——为个人生计直接生产使用价值——上述循环公式给我们说明了“借助商品的商品劳动力的再生产”仅仅只是构成作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再生产进程的一部分。靠工资生活并不容易。除了工资高低，终身靠上下浮动且不规则的工资收入为生的现代雇佣工人生活状况的不确定性在此起着重要的作用：怎样才能“用周薪维系生活”？“随时可终止、从未安全保障的工资合同”如何维系家庭？卡尔·伦纳（Karl Renner）问道（1953，第 164 页）。

关于如何从历史调查中学习这一问题：工人阶级经济学包括不同的再生产形式，尤其是生产和交换的制度形式、信用和储蓄形式、贸易的和不太相关的保险的形式。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利基之地，家庭事务的纯粹私人经济学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参见 Stedman Jones 1971；Johnson 1985；Lebowitz 1992）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这个边界已经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的经济“发明”（如社会保险和自助商店）已经有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给首位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学起了模范作用。 462

阿利叶特（Aglietta）（1979）及其他“调节学派”的代表给出了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建议，改变雇佣劳动形式的结构并由此改变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的状况，以此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标准。她提出的“福特主义”这一概念便是以此为目标。

参考文献：

M. Adler, »Wandlung der Arbeiterklasse?«, in: *Der Kampf*, 26. Jg., 1933, 367-382, 406-414; M.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frz. 1976), London 1979; R. Ahlberg, *Das Proletariat. Die Perspektiven der Arbeiterklasse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74; F. v. Baader, *Über das dermalige Mißverhältnis der Vermögenslosen oder Proletairs zu den Vermögen besitzenden Klassen der Societät*, Leipzig 1835; J. Barton,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E.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u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Paris 1840; F. Castles, C. Kossack,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1973; M.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1946), London 1967; E. Ducpétiaux, *Budgets économiques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Belgique*, Brüssel 1855; W. Ellis, »Effect of the Employment of Machinery upon the Happi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es«, in: *Westminster Review*, 5, 1826;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E. J. Hobsbawm, *Labou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ur*, London 1961; ders.,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1870-1914«, in: ders., *Worlds of Labour*, London 1984, 195ff; J. Kocka, *Weder Stand noch Klasse*, Bonn 1990; P. Johnson, *Saving and Spending. The Working-class Economy in Britain 1870-1939*, Oxford 1985; I. Katznelson, A. Zolberg (Hg.),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1986;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Stuttgart 1892; ders.,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Berlin 1922; J. Kuczynski, *Die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Bd 1-38, Berlin/DDR 1960-1972; R. Lavollée, *L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Europe. Etudes sur leur situation matérielle et morale*, Paris 1894/1896; M. Lebowitz, *Beyond Capital. Marx'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92; F. Le Play, *Les ouvriers européens*, Paris 1854; A. Levenstein, *Die Arbeiterfrage*, München 1912; E. März, *Einführung in die Marxsche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Wien 1976; A. Marshall, *The Fu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London 1873; S. Mallet, *La Nouvelle Classe ouvrière*, Paris 1963; J. Mooser, *Arbeiterleben in Deutschland 1900-1970*, Frankfurt/M 1984; R. E. Pahl, *Divisions of Labour*, Oxford-New York 1984; P. J. Proudhon, *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Paris 1865, 1924;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 Wien 1977; K. Renner, *Wandl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Wien 1953; O. Rühle, *Illustrierte Kultur- und Sittenge-*

schichte des Proletariats, Erster Bd, Berlin 1930 (Neudruck 1970), Zweiter Bd., Lahn-Gießen 1977; K. D. M. Snell,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Cambridge 1985; W. Sombart, *Das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06; G. Stedman-Jones, *Outcast London*, Oxford 1971; G. Sorel, *Matériaux d'une théorie du prolétariat*, Paris 1919; L. v. Stein, *Geschichte der soc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Leipzig 1850; H. Steiner, *Soziale Strukturveränderungen im modernen Kapitalismus*, Berlin/DDR 1967;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Berlin 1926: ders., *Der Niedergang des deutschen Kapitalismus*, Berlin 1932; ders., *Anmerkungen zu Marx-heute*, Frankfurt/M 1965; P. Sweezy, »Marx und das Proletariats«, in: ders., *Die Zukunft des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67, 113-130;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1963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Frankfurt/M 1984); M. Vester, *Die Entsteh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Lernprozeß*, Frankfurt/M 1971; L. R. Villermé, *Tableau dé l'e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riers*, Paris 1840 (Neudruck 1979); M. Weber, »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 (1909), in: ders., *Ges. Aufsätz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sgeschichte*, Tübingen 1988, 1-288; L. Winter, *Das Proletariat in der Welt von heute. Wesen, Umfang, Strukturveränderungen*, Berlin/DDR 1982; H. Zwahr, *Zur Konstitutier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Klasse*, Berlin/DDR 1978.

米歇尔·克莱特克 撰
贺腾 译，郭胜大 校
仰海峰 审

参见：

Angestellte, Arbeit, Arbeiteraristokratie,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bildung,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kultur,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erregierung,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er-(und Bauern-) Staat, Arbeiterumfrage,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kraft,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markt, Arbeitsorganisation, Arbeitspolitik, Arbeitsvermögen,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Armut/Reichtum, Ausbeutung, Bourgeoisie, Chartismus, Distribution,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hernes Lohngesetz, Elend, Elite, Entfremdung, Fabrik, Facharbeiter, Fordismus, Frauenarbeit, Gemeinwirtschaft, Gesamtarbeiter, Gewerkschaften,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Heimarbeit, historischer Beruf,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apitalismus, Kapitalistenklasse, Kinderarbeit, Klassen, Klassen und Schichten, Krise, lebendige Arbeit, Lohn, Lohnarbeit, Lohnform,

Lumpenproletariat, Manufaktur, Markt, Maschinensturm, Massenarbeiter, Mehrarbeit, Mehrwert, Negation der Negation, Pauper,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letarisierung, Proletariat, Proletkult, Regulationismus, sekundäre Ausbeutung, Sozialismus, Sozialpolitik, Sozialstaat, Verelendung

464 工人监督（Arbeiterkontrolle）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作品中并没有提到该概念。在近代工人运动初期，工人监督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工人监督作为阶级斗争的战略口号在当时的工人阶级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当时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其成员已不再只是刚入厂的新人，并且他们之间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列宁就已经开始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从战前，到战争、革命，以及革命后的建设，再到西欧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借鉴，不同的使命赋予了工人监督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无论如何变化，其根本的想法始终是一致的：让彼此之间疏远的、同时又软弱无能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Rolle），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去争取他们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影响力。于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成为重大事件（Zäsur，可翻译为转折点。——译者）；没有进行革命的工业国家会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都将影响到工人监督的具体内容和目标方向。（而革命后的俄国必将为工人监督提供具体的内容和方向，所以这是重大事件 / 转折点。——译者）

列宁第一次系统阐述他的工人监督的想法，是在 1914 年 3 月对理性主义的泰罗制（Taylorsystem）的批评中（LW 20，第 145—147 页）。理性化生产针对的只是工人，却依然不能有效防止社会浪费。但该制度也为“下面这个时刻的到来做了准备，这个时刻就是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整个社会的生产，并任命自己的工人委员会，以便妥善分配和规范所有社会工作”。在来自远方的第五封信中（LW 23，第 355—357 页），他提出要让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贫农来“控制最主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并将此作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秩序革命的第八项任务。其中将充分用到在战争和通货膨胀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资本家破坏了日用品的分配。因此人们应该动员和组织起劳动人民，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生产的是什么产品，以及留意这些产品是如何被分配的。这个想法再次出现在他的“告别信”中，他在返回到革命的俄国前，在信中向瑞士的工人们阐述了自己的革命战略。

465 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工人监督的）这个想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 1917 年 4 月，列宁提出要求“对所有银行、保险公司和最大的资本主义集团实行国家管控”。这些措施“必须要由人民政权在当地的革命机构来实施”（LW 24，第 300—301 页）。为此“必须以万分的小心谨慎去赢得大多数人民和他们坚定明确的支持”，这些是现实中的前提条件。“工人、士兵、农民等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机构）”是最适当的机关；因为“这些机构的性质能够明确排除向警察国家（polizeilich-behördliche）转变的可能性，并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武装的群众和农民能够自由地参与到对自己的经济的管理中去”。（第 305 页）革命期间（应该指在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间。——译者），当因为世界战争的持续而导致经济持续下滑之时，列宁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工人监督的想法，并指出了苏维埃的具体任务（第 423—429 页）；但他并不认为工人监督是社会主义，而认为这只是一项“能够调动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第 517 页）的过渡性措施（第 439 页）。这些措施中还包括“废除商业秘密”。

临时政府垮台后的第一项公告中，提到了需要马上实行的四项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确保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监督。（LW 26，第 227 页）一份“关于工人监督的决议草案”（同上书，第 267—268 页）成了相关法规的基础。总而言之，列宁的工人监督概念还是很清晰的：强调通过以下途径来动员劳动人民，即紧密结合劳动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经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至今尚未开发出来的能力，用一直以来的阶级冲突和利益冲突来强调劳动人民和所有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强调在工作场所的民主应该作为整个社会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强调要为从日常斗争向以社会统治权为目标的最终斗争的过渡做准备。

革命胜利后，工人监督还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有效地去控制和防止个别资本家的反革命行为。“在所有国家层面的企业中”，监督委员会（Kontrollkommissionen）将和其他（还未被征收 / 没收的）所有者一起负责生产活动——这种形式也被称为双重统治的过渡期。（同上）

通过没收（Enteignung，也可以译为征收）和企业国有化的途径剥夺资本 466
家的经济基础后，又出现了新的任务：在过渡转型出现困难时，还要保持生产的继续；必须对企业负责人进行控制，避免他们任意行事；消除国家性的经济官僚作风，因为其妨碍了对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需求的正确理解。企业中的密切合作消除了异化，增强了对那些不再是私人性质的企业的责任感，以便让劳

动人民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可以领导工厂。（LW 26，第 362 页）由此必须要避免和打击经营不善、规划人员的狂妄自大、腐败、失衡，以及不良计划："群众充满活力的、充满创造性的行为是新的公共生活的主要因素。工人们想在他们的工厂和厂房中参与到对工人监督的组织安排。社会主义并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法令实现的。它的精神（所提倡的）是避免国家官僚的自动运行。充满活力的、充满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同上书，第 283 页）

在内战和战时共产主义的困难时期，工人监督还起到了打击大发战争财的奸商（Kriegsgewinnler）以及促进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力的作用。最初布尔什维克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工人监督实现在工业中的工人管理（LW 28，第 130 页）。但多方面因素证明了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内战结束和国家权力得到巩固后，工人监督被当作一种对工人和农民的审查制度（Rabkrin）。于是工人监督代替了人民委员部（Volkskommissariats）（即国家控制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liche Kontrolle］）。但这种制度并没有成为国家机器中的民主监督制度，而是成了斯大林手中的一种官僚机构。列宁直到生命的最后（在他的政治"遗嘱"）还在不断批评这种制度的规模和低效（LW 36，第 577—596 页）。

除了在苏联，工人监督还在德国共产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如在 1923 年的通货膨胀中，工人监督成了一个动员口号，用以动员挨饿的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妻子从企业家和利用通货膨胀的奸商手中重新夺回控制权。之后，工人监督成了德国共产党中党内争论的主题，即新成立的极左派领导层和德国共产党中被废除的"右派"之间的争论。极左派领导自 1928 年以后就不断提到，（当前的）革命形势非常尖锐，因此拒绝了这个（工人监督的）过渡性方案。而"右派"则致力于寻求能够实现罗莎·卢森堡提到的革命前提（即为共产主义吸引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的手段和道路。他们想根据德国的现状来有效地利用俄国革命经验。要达到此目的，他们必须要找到能够实现从工会的日常斗争过渡到彻底的社会改造的途径，找到将受改良主义影响的工人引导到共产主义的途径，找到从简单阶级意识过渡到更高级阶级意识的途径。过渡的口号就是为上述目的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监督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时共产主义者就可以去思考如何获取权力了，因为通过坚持不懈的说服工作，他们基本上已经赢得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在极左路线开始前，上述这个想法在最初几年占据了主流地位，包括在共产国际中。因此在《关于工会运动、工厂委员会与第三国际的指导原则》中写道："面

对工人们的尝试（通过原材料来控制工厂供给，控制工厂雇主的资金运作），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政府必将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工人阶级。于是导致了争取生产过程中的工人监督变成了工人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

工人监督起源于阶级冲突，并且工人监督将引发围绕工厂领导层和工作现场经济权力的斗争。工人监督与改良派经济民主的要求截然不同。改良派的出发点是资本和劳动的平等，并且对共同机构（如临时性的帝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中所占有的平等代表权而感到满意。但这种“成功”是不民主的，因为它赋予了极少数的大资本家代表与数百万生产者相同的权重和投票权。改良派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所抱有的经济和平的幻想，以及“过时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错觉。

工人监督与劳动人民的具体状况相联系，与劳动人民各自的利益和关切的事物相联系。要求工人监督的出发点主要有：工厂倒闭、大规模裁员、货物囤积导致基本需求价格昂贵和经济危机。当今还有其他原因：企业变卖、生产过程被迁移到低工资国家、企业拆分、环境危害。劳动人民已经感受到了传统工会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手段的不足，并开始自发寻找新的道路，如占领工厂、按规章工作、接管破产企业。不过，这种斗争形式的自发行动并不符合德国工人高度的组织意识和纪律性，但却符合罗马工人运动的状况和氛围。

参考文献：

M. Köhler, W. Bolze u. Peregrinus, *Aktionsprogramm, Produktionskontrolle, Übergangslosungen*, Berlin 1928; *Was will die KPD-Opposition – Plattform*, Berlin 1929; L. D. Trotzki, »Über Arbeiterkontrolle der Produktion« (1931), in: *Schriften über Deutschland*, GW 1, Frankfurt 1971; ders., »Arbeiterkontrolle und Zusammenarbeit mit der UdSSR«, in: GW 1.

泰奥多尔·贝格曼 撰

盛舒洋 译

参见：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rbeiterbewußtsein,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organisation, Demokratie, Doppelherrschaft, Entfremdung, Fabrik, Fordismus, Gewerkschaften,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Industriekritik, Lohnarbeit im Sozialismus, Mitbestimmung, Produktivität, Rätekommunismus, Rationalisierung, primäre sozialistische Akkumulation, Techniker, transitorische Notwendigkeit, Übergangslosungen, Ultralinke, Vergesellschaftung

工人文化（Arbeiterkultur）

19 世纪出现“双重自由工人”这个阶层以后，对该阶层社会文化的描述模型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恩格斯提到了这些特别的、有着明显不同于其他群体的无产者的生活状况，并称他们已经成为“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Lage*，MEW 2，第 351 页，参见 Metscher 1982，第 102 页）。几乎在同一时间，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在他的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用一种文学形象来描述这种状况。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资本主义导致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MEW 5，第 133 页）。

不过在之后的理论分析中，工人文化这个概念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分析资本运作规律的过程中和在政治革命运动中，文化和
469 “生活方式”（MEW 3，第 21 页）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里的法国小农中，MEW 8，第 198 页）才会出现。

尽管马克思考虑到了“文化状态”是决定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必须有时间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求，这种需求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同上书，第 246 页）或者表述为：“和别的商品不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含有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MEW 23，第 185 页）但不足的是，马克思没有去分析文化的内在动力。

从历史角度看，阶层（Klasse）形成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双重自由工人”阶层要想继续存在，只有先满足下列条件，即在工业体系的“过分要求”中，在他们（双重自由工人）自己的（受到传统观念塑造的）要过“体面生活”的想法中，在工业化和市场依赖所带来新的前景中，去形成一个稳定和可复制的生活形式。（参见 Vester 1970）特别是在庞大的“工业后备军”（industrieller Reservearmee）面前、在资质要求低并且能够确保供应的（大量）劳动力面前，资本往往会在生产过程中无情地“消费”工人群众，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寿命和家庭再生产的情况。这种行为只有在违背自身利益和 / 或违背强大的社会标准时才会被制止，即社会其他组成部分（如社会群众、政府、教堂）对这种剥削行为成功地进行了制裁；或者工人的生活水平被牢牢地镶嵌进社会文化之中，使它在没有重大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不会受到影响。随着优质劳动力的不断缺乏，以及资本出于确保自己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使得上述两种状况出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社会斗争就是为一种无产阶级生活

的永久形式（包括将家庭、孩子和技能获得等因素考虑在内）而逐渐创造条件的行为。越来越多的逐渐扩大的工人利益集团（工会、政党）在这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发展的一部分的社会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随着工人组织的实力不断扩大，使得工人能够拥有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自尊得到了发展，并拥有一定的“支付能力”来实现自己的消费和享受的基本权利 。组织和社会斗争的文化模式 ——“受人尊敬的”生活方式的逐步发展，以及从拥挤居住的半开放式家庭形式向保护隐私的过渡 ——（这种文化模式）已经成为对日常生活、生活方式和心理情绪的文化、社会层面的历史研究和人类历史研究中的组成部分。不过，还需要去探索这些社会文化的过程对家庭妇女社会工作的影响。

如果说社会利益集团通过提高“文化状况”已经延伸到文化领域中了，那么政治运动应该也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分支。早期工人组织都源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会，不过之后它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形式。这些工人组织的联合会一直都是塑造公共生活关系的文化机构。19 世纪 60 年代在德国的工人协会中，出现了第一批无产阶级的文艺产物（工人戏院）和无产阶级的体育文化（工人体育运动），这些都帮助工人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Rüden 1979；Barth 1978）这些工人联合会（Vereinen）将德国工人运动理解为是一场“文化运动”。结合法国大革命的纲领和德国古典的人文主义理念，这些联合会想要尽力实现的是，将“（塑造）成熟、自主的和自由的人”这种想法真正变成一种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生活方式 ——他们认为，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财产制度的转变。但是这种希望在所有核心领域形成一种明显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从未真正完全兑现过（同样也没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中，参见 Gorsen / Knödler-Bunte 1974）。

不论如何，工人文化依然是整个社会的文化的一部分。任何社会的（总体）文化都是由结构化的、相互作用的，甚至相互对抗的部分（文化）所组成的集合体。列宁将“两个民族”的表达模式应用到了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在**每个**国家的文化中都会存在一种（落后的 / 不发达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元素**，因为在**每个**国家中都会存在一批劳动的并被剥削的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一种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每个**国家中还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大多数情况下是极端保守的和教权的）文化，更确切地说这些文化不是以‘文化元素’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主流**文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的。”（LW，20，第 8 页；参见 Metscher 1982，第

97—98 页）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文化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关于具体组成部分的问题或是成为复杂文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参见 Vester 1970; Thompson 1980）。在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历史形势下，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将会对社会文化过程或者对该过程的一部分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阶层（并不是社会发展或者历史目的论的自然产物）具备了社会影响力和组织力，但同时在文化上缺乏或暂时缺乏有影响的制衡力量（Gegenmächte）。这种新的社会阶层或多或少会产生有效的社会创新（这种创新将为社会的未来、素质和生产提供有价值的形式、结构和方向或者方法）。受到工人和工人运动影响而产生的有质量的成就（如在艺术方面）和规范性观点（如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都属于工人文化。广义上可以将工人文化理解为，新兴阶层对文化过程的主动和被动的贡献的统称，因此工人文化成为新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存在的文化标志。

由于工人文化（正如市场社会中的一般文化过程一样）始终也是依赖于市场的，因此工人文化中还会有一种（容易爆发或者很快消失的）外力因素。工人不断提高的购买力是市场化过程的根基，这些市场化过程将会促进文化转变。进入 20 世纪之后不久，工人运动和工人文化运动尝试着采取新的策略来应对来自文化休闲产业和新媒体的竞争。于是就采用了看似合适的策略，即不再将关注点集中于（工人）自己的文化组织举办的活动，而是致力于寻求一种新的行为方式来对整体政策产生更强烈的影响（Maase 1984，第 26 页）。但随后，这种策略就需要面临工人运动政策的普遍困境：（一方面）工人运动政策主张无条件使用客观的方法或是强调客观地采取必要措施，但（另一方面却表示）只有“革命阶级”具备了极高的主观的奋斗意愿，才能推动相应的变革。

1945 年以后，工人文化的基本要素并没有被添加到西德的战后文化中去。而在东德，由于全球市场发展的不对称，（东德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够维护传统工人运动中人文主义构想的永久社会的尝试最终也失败了。 472

1945 年以后工人文化的瓦解，成为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中的一个（研究）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推动生活方式和信息化过程（Maase 1992）多元化的动力基本上都是非阶级特征的力量，而不是具体某一阶级推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是在地方（有时也包括州和联邦层面）的许多领域中，（无产阶级的、合作社式的）自助原则被公共活动所代替。在此背景下，不断扩展的公共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在文化领域的功能

（脱离了工人文化运动，“面向所有人的文化”的目标就显得不可实现）。并且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在文化领域的功能被文化产业非正式地接管了。不过工人文化与阶级命运相关的部分还是在整体文化里传承了下来：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人（不只是面对单个阶级）的命运的影响越是明显，对立的阶级文化就越是会被其他抗议运动所代替。

参考文献：

H. Barth (Hg.), *Zum Kulturprogramm des deutschen Proletariats im 19. Jahrhundert*, Dresden 1978; M. Friese, *Geschlechter, Klassen, Verhältnisse*, Bremen 1989; P. Gorsen, E. Knödler-Bunte, *Proletkult*, 2 Bd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74; D. Kramer, *Theorien zur historischen Arbeiterkultur*, Marburg 1987; K. Maase, *Lebensweise der Lohnarbeiter in der Freizeit*, Frankfurt/M 1984; ders., *Bravo Amerika. Erkundungen zur Jugend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n fünfziger Jahren*, Hamburg 1992; Th. Metscher, *Kunst, Kultur, Humanität*, Fischerhude 1982; D. Mühlberg, *Proletariat. Kultur und Lebensweise im 19. Jahrhundert*, Leipzig 1986; G. A. Ritter, *Arbeiterkultur*, Königstein/Ts 1979; P. v. Rüden (Hg.),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48-1918*, Frankfurt/M 1979; E. P. Thompson, *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Frankfurt/M 1980; M. Vester, *Die Entstehung des Proletariats als Lernprozeß*, Frankfurt/M 1970.

迪特·克拉默（Dieter Kramer）撰

盛舒洋 译

参见：

Alltag,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skraft, Bedürfnisse, Familie, Gegenkultur,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Hausarbeit, Humanismus, ldeologie, Kultur, Kulturindustrie, Kulturpolitik, Lebensweise, Massenkultur, moralische Ökonomie, Proletkult, Reproduktion, Sozialpolitik, Volkskultur im Kapitalismus, Volkskultur (vorkapitalistische), Wohnungsfrage

工人文化运动（Arbeiterkulturbewegung）

1. 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并未谈过工人文化运动这个概念，首先马克思就曾质疑无产阶级艺术或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他在 1875 年肯定地引用了哥达纲领草案的一段话，其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出了“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

（MEGA I.25，第 11 页；MEW 19，第 17 页）。马克思、恩格斯将文化和教育区别开来，教育在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狭义上指传授知识，广义上则是发展被压迫者自我解放的能力。有学者宣称：“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从上面来解放”（MEW 19，第 165 页）。马克思、恩格斯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类人开除出党。1875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此后德国工人政党的壮大，使恩格斯意识到，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能力与其本身的政治文化品质息息相关：“既没有报刊和集会，又没有俱乐部和政治同盟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去充当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属品，又能怎样呢？”（NEW 19，第 131 页；MEGA I.25，第 141 页）

2. 第二国际的政治家、思想家承续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无论就现有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言（参见 Bebel 1954，第 468 页），还是在艺术的意义上，都不存在工人阶级文化这回事。弗兰茨·梅林不仅反对创造一个无产阶级艺术，而且抵制在德国社民党知识分子圈子中影响深远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悲观主义、沉思静观，容不得战斗的、面向未来的立场。（GS 11，第 131 页）梅林从阶级斗争出发理解艺术批评，认为无产阶级在德国古典主义的遗产中（如席勒［Schiller］）找不到他们阶级意识的半点痕迹。

罗莎·卢森堡更为严厉地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席勒的理想化，认为这是“退回……到那种庸俗市民的见解，把 474
每一次……抗议都看成‘革命’，而罔顾抗议的内在倾向、社会内涵”（GW 1.2，第 534 页），因此她认为，社会主义的工人教育不是为了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文化遗产，反而必须将文化遗产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情感的世界里”（同上）分解、熔炼。卢森堡的思考基于她与修正主义论战的经验，她认为，在资产阶级仍然能够以“智力统治”保障其政治权力的时候，工人阶级是走不通文化道路的。“只要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继续存在，这个社会内除了**资产阶级**文化就不会有别的文化。”（GW 1.2，第 367 页）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因此她还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文化也是备受限制的。

针对工人运动中人民剧场（参见 GS 11，第 448—449 页）等文化艺术组织的意义，梅林的评价颇为谨慎，虽然他本人也间或亲自参与人民剧场的工作。他认为，只有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才有无产阶级艺术的可能。“**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MEW 8，第 225 页），这是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 1851 年政变得出的思考（参见 MEW 8，第 115—116

页；MEW 17，第 338 页），梅林把它用到了文化生活当中：“如果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不再能够创作伟大的艺术，那么正在上升的工人阶级也还创作不出伟大的艺术”（GS 11，第 225 页）。他反对高估艺术文化，强调无产阶级在日常生活中发展出了一定的气质和品德，远远超出以往的宗教教义和哲学学说，对未来“人类的文化”有着“无可限量”的贡献。（GS 2，第 704 页）

3.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的理解，来自于他在俄国革命中的经验，而且随着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前景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当他 1901 年至 1902 年期间谋划创建、巩固一个在非法环境下小而有力的党时，他反对政治上的经济主义和自发性崇拜。列宁认为，二者都会在自身力量弱小的局面下促生对无产阶级文化狭隘而奴性的看法——狭隘，因为大力宣传特定的工人读物，就会使工人忽略“学习领会一般读物”（LW 5，第 395 页注释）的必要性，
475 阻碍社会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奴性，因为自发性崇拜者幻想俄国工人运动只需从本国的泉源中汲取养分，这正好巩固了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思维方式比社会主义思想“久远得多”，经历过“更加全面的加工”，而且“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LW 5，第 397 页）。

1905 年俄国革命根本地改变了革命活动的条件，工人运动急需新的组织形式，必须比旧的非法政治小组“无条件地更广泛些”（参见 LW 10，第 18 页）。列宁开始强调“工会、阅览室、图书馆、各种工人文娱团体”（LW 17，第 464—465 页）等合法团体的作用，希望借此唤醒大众觉悟。1914 年中，基金、工会和社会文化组织共同组成了“相当机密的合法工人团体网”（LW 20，第 510 页），保卫着非法的社会民主工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钻研民族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LW 20，第 17 页）。现实中民族分裂为阶级，想象民族有一种文化统一就会给人以一种“幻觉”，遮蔽（阶级）文化事实上的统治局面。（LW 19，第 100 页）从统治者的立场看，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艺术创造构成了民族的、共同的文化；从无产阶级的立场看，民族文化不过是特殊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列宁再度改变了观点。与专家精英（工程师、职业军官等）合作变得至关重要，但他没有认识到“传统知识分子”（葛兰西）将形成一个新历史集团。普及统治阶级的知识、文化、技术，是内战中关乎革命政权生死存亡的任务，在这一形势下，列宁强调，党不可能如同激进左派理论上

要求的那样，或像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纲领那样，彻底砸碎旧社会的文化。“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LW 29，第 142 页）。列宁在 1919 年俄共八大上这样解释。而且“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
476 化”（同上书，第 55 页），首先就意味着**学习**。列宁再度尖锐地反对某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提法，1920 年，无产阶级文化派内有人企图“臆造无产阶级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在国家文化教育政策中施加更多影响，列宁对此提出了批评。（LW 31，第 308 页）列宁的无产阶级文化观既反对肆意建构工人文化，也反对理想主义地、精英地设想文化实践。同时他不容置疑地指出，无论是现有的无产阶级教育状况、生活方式，还是俄国的文化传统都不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坚实基础。他的文化观总是批判性的，实际上争论的核心则是能不能在俄国创造出社会主义的文明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通过认真学习，通过批判，通过加工改造社会中现有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才能缓慢建成。（参见 *Die Aufgaben der Jugendverbände*，LW 31，第 276 页）

4. 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新文化问题是改变生活方式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驳斥社会民主党中盛行的资产阶级文化观。“过去把文化崇奉为包罗万象的知识全书，而把人只视为容器，里面填充、装载着经验数据和生糙芜杂的事实，我们必须与这种看法决裂。”（Z 1987，第 8 页）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看，文化就是“取得本身的人格”（同上）。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革新的关联，划分了三个发展阶段：（1）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应该被视为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哲学的批判。马克思的思想“最初只能以抨击和批判的面貌出现，只能是对原先的思维方式、既存的具体思想（或既存的文化世界）的扬弃，因此必然首先是对‘常识’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哲学的（批判）”（*Gef* 6，H.11，§12，第 1382 页）。（2）资产阶级批评家克罗齐认为马克思忽视了伦理的、政治的历史，葛兰西捍卫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狱中札记》中指代马克思主义。——译者）的“最新发展阶段”正在于，“在纯粹的经济、纯粹的政治之外，‘高度赋予’文化现实、文化活动、文化阵线的必要性”。 477
（*Gef* 6，H.10，§7，第 1239 页）同时，他批评将“理论视为实践的婢女”的机械观点，也被视为批评苏维埃国家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Gef* 6，H.11，§12，第 1384—1385 页）。（3）要占据时代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就需要

“创造一种新的整体的文化，这种文化既具有宗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群众特性，又具有希腊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典范特性。这种文化……既是欧洲的，又是全世界的”（*Gef* 6，H.10，§12，第1248页）。

葛兰西将文化和艺术区别开来，就是为了突出日常文化。他认为，要为了争取一种新文化、新生活方式而斗争。（参见H. 23，§3，Q，第2190页）德国文化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认为单纯个人实现伦理提升就会改良生活，在葛兰西看来是“一个幻想、一个错误”，每个人个性中矛盾的因素虽然在个体身上融合，“但不可能不是在对外的活动中实现和发展的，其活动也改变着外在的环境”。（*Gef* 6，H.10，§48，第1342页）这种观点蕴含着工人运动的一种前景，即打破政党和社会文化组织间严格的职能界定，将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联结起来。

5. 历史上，工人文化这个概念，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社会民主党鼓吹“城堡和平政策”（支持本国政府参与战争。——译者）时，才在工人运动的政治理论中出现。当时还有更早出现的**工人教育**这个概念。威廉·李卜克内西认为工人教育的任务是传授知识、训练思维：“在我们的原则统治国家和社会之前，我们就必须在精神上占领和掌握世界。”（*Protokoll* 1874，第98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党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是一场“文化运动”（SPD-Flugschrift 1907，引自 Groschopp 1985，第236页）。20世纪20年代在德语区，工人文化（运动）的愿景部分地取代了工人教育的概念。

5.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带来了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夜校、党员活动中心、工人团体中的体操队、合唱团，都形成了有组织的工人文化的萌芽形态。争取缩短职业工作时间的斗 478
争逐渐为（男性）工人争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时间，这是开展交往、发展无产阶级团体生活的必要条件，而女性工人不仅由于法律，也由于积习（酒馆、男声合唱、体操队）长期被排斥在团体生活之外。

1878年出台的反社会党人法禁止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在工人运动中助长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即与非法政治活动没有关联的文化活动具有非政治的属性。1890年后，文化娱乐类工人组织相继建立，社民党党中央未做集中指挥，多数地方干部不仅不支持，而且警惕“社团热”对党的工作的妨碍。这其实是“党员的土法独创”（Langewiesche 1982，第2页），是对社民党被逐出资产阶级公共社会团体、政治团体（德国体操协会、德国红十字会等）的回应，同时又

复制了这些公共团体的形式。跨地区的联合会相继建立，如1892年多个工人歌手协会组建了乐曲联合会，1893年建立工人体操联盟（ATB），还有“团结”工人自行车手联盟。体操队员、自行车手、歌手的团体到1913年和1914年时共约有50万名会员（Groschopp 1985，第43页），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人阶级的大型文化组织。然而，社会主义“另类文化”（参见Lidtke 1985）并不存在有组织的、行之有效的普范框架。众多独立的工人文娱社团统称为“教育、体育、游乐或社交组织”（*Handbuch*，1914，第238页）。

随着工人社会文化社团影响的扩大，社民党也改变了最初对它的冷淡态度。1905年党代会就把不参加资产阶级社团当作党员的“光荣义务”，1908年后，党代会正式地号召党员加入工人体操联盟。社民党内左翼在文化领域发动攻势，为他们关于修正主义、关于大罢工的论战添一把火（Rüden 1979，第37页），按照他们的提议，1906年成立了中央教育委员会，试图将社会民主党周边的各类文化实践拧成一股绳。政治教育成了党和工会的任务。

5.2 革命没有“在西方”降临，使得所有夺取政治权力的构想，无论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都在1918年后遭到了批评。亨利希·舒尔茨（Heinrich Schulz）、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安娜·西姆森（Anna Siemsen）、亨利·德·曼（Hendrik de Man）、瓦尔丁·哈迪希（Valtin Hartig）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有过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经验，认为工人精神上和道德上的不成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尝试归于失败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1918年至1923年部分近乎内战的冲突迫使人们集中关注政治和军事，但革命者并没有解决夺权问题，因而在中欧和西欧的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需要全面的文化动员。在德国，文化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社民党收缩防御的务实政策一拍即合，因为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将革命愿景抛向彼岸，减轻了制定政策的负担。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政治和文化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意味着“既有利于党，党可以按照政治的逻辑搞政治……也有利于文化运动，本来为了满足政治需要而必然要被玷污、消磨的理想，得以继续保存”（Hartig 1925，第888页）。这种观点没有把文化活动当作一个整体的维度，而是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廉价替代物，遭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教育家安娜·西姆森、恩格尔贝特·格拉夫（Engelbert Graf）、保罗·弗兰肯（Paul Franken）、奥托·延森（Otto Jenssen）等人的驳斥。

工人运动中的文化实践，在1933年以前都是以特殊的、个别的形式发展着：

工人合唱团、人民剧场、工人体育、自然之友、无产阶级自由思想者（proletarische Freidenker）等，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团体“同舟共济”（Lösche / Walter 1989，第520—521页）的局面，但相对其他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团体，并不构成霸权优势。个别积极者，如1924年莱比锡工人文化周，希望将不同的文化实践的形式联结起来，使工人文化运动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推动力”（Schulz 1926，第896页），充分独立于（各）工人政党和工会。这种构想试图在实践中、在社民党周围创造出覆盖广泛的文化工作体系，却取得了相反的结果，即1925年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联盟。这个松散的总联合会自身毫无权能，而歌咏、体育
480 等重要社团并未加入此联盟。连接社会文化社团成为地方的“社会主义文化卡特尔”，没有取得多少实际意义。

直到1928年，德国共产党也一般都是德国各工人文化运动组织中的少数派，而且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1928年后分裂了这些组织。从1925年开始，德国共产党和德国共产党周围的知识分子秉持全新的文化观念，批评社会民主党主导的社会文化组织的活动，由此激化了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形式和内容的论争。汉斯·艾斯勒批评工人音乐运动中“醉心歌咏的中立立场”（GW 1，第58页），在工人音乐运动分裂的关键时刻，1931年，他指出德国工人歌手联盟（DAS）的“小市民教养”（GW，Addenda，第34页），20世纪20年代从这支队伍里没有产生哪怕一首流行的战斗歌曲。艾斯勒后来也批评了DAS反对派原先的分裂行为。亲德国共产党的文化组织始终都孤立无援，而且弱于社会民主党的文化组织。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文化运动中的碎片化、关门主义，以及工会退出工人文化组织中所有不仅限于工会的活动，都从内部瓦解了团结一致做文化工作的仅有的几次努力。而且，福特制大众文化的形成，自力更生创建的团体国家化、地方化的倾向，都腐蚀了工人文化运动，这些现象在德国比在奥地利出现得更早（参见Langewiesche 1982，第13页），而且在世界经济危机后迅速加剧。

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工人运动预先已形成紧密细致的社会文化网络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也相对更稳固，然而社会民主主义内向发展的社团文化并不具备夺取霸权的潜能。1933年至1934年，工人运动在德国和奥地利溃败，“民族共同体”（两次世界大战间甚嚣尘上，尤其是纳粹鼓吹的民族概念。——译者）的改造、公民社会的毁灭接踵而至。纳粹曾经把控的覆盖各个阶级的强制性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阶级格局

的彻底变化，都留下了文化断裂，有鉴于此，社民党和统一社会党尽管动机各
481 异，但都决定不再重建绝大部分无产阶级社会文化大众组织。在两极世界格局中，在阶级分裂演变为国家对立的冷战中，在西欧社会福利国家、福特制的调和政策下，工人文化运动作为指向社会解放的、群众影响深刻的阶级文化实践形式的总和，走向了消亡。

参考文献：

»Arbeiterkultur«, in: LS; A.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79), Berlin/DDR 1954; P. Franken, *Vom Werden einer neuen Kultur. Aufgaben der Arbeiterkultur- und Sportorganisationen*, Berlin 1930; H. Groschopp, *Zwischen Bierabend und Bildungsverein. Zur Kulturarbeit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vor 1914*, Berlin/DDR 1985; *Handbuch des Vereins Arbeiterpresse*, 3. Jg., Berlin 1914; V. Hartig, »Kulturbewegung im Sozialismus«, in: *Die Tat. Monatsschrift für die Zukunft deutscher Kultur*, 16. Jg., 1925, H. 12, 881ff; W. F. Haug, »Gramsci und die Politik des Kulturellen«, in: *Argument*, 30. Jg., 1988, H. 167, 32-48; D. Kramer, *Theorien zur historischen Arbeiterkultur*, Marburg 1987; D. Langewiesche, »Die Gewerkschaften und die kulturellen Bemühunge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und Österreich (1890er bis 1920er Jahre)«, in: *IWK*, 18. Jg., 1982, H. 1, 1-17; V. L. Lidtke, *The Alternative Culture. Socialist Labor in Imperial Germany*, New York-Oxford 1985; P. Lösche u. F. Walter, »Zur Organisationskultu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 Jg., 1989, H. 4, 511-536; *Protokoll über den Congreß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bgehalten zu Coburg 1874, Leipzig 1874; P. v. Rüden, »Anmerkungen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Beiträge zur Kul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1848-1918*, Frankfurt/M-Wien 1979, 11-42; H. Schulz, »Ziel und Inhalt sozialistischer Kulturarbeit«, in: *Die Tat*, 16. Jg., 1925, H. 12, 903ff; H. Wunderer, *Arbeitervereine und Arbeiterparteien. Kultur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1890-1933)*,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弗兰克·海登赖希
（Frank Heidenreich）撰
曹旸 译

参见：

Alltagsforschung, Alltagsverstand, Amerikanismus, Arbeiterkultur, Bildung, Bonapartis-

mus, disponible Zeit, Erbe, Fordismus, Gewohnheit, Hegemonie, Kompetenz/Inkompetenz, Kultur, Kulturrevolution, Kunst/Kultur, Kunsttheorie, Lebensweise, Massenkultur, proletarische Erziehung, Proletkult, Solidarität, Sozialdemokratie, Sozialstaat, Subalternität, Zivilgesellschaft, Zweite Kultur

482 工人政权、工农政权 (Arbeiterregierung, Arbeiter- und Bauernregierung)

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特征时有两个地方提到了工人政权，一是“作为一种工人政权，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Bürgerkrieg*，MEW 17，第 346 页）；二是“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权**，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同上书，第 342 页）。工人政权被规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其基本特点主要如下：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代表由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组成，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公职人员和法官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而且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警察和各行政部门的官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社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同上书，第 338 页及以下）。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到政权的实现形式问题，即在政权的形成过程中哪种过渡形式是可能的。工人政权被理解为在权力斗争中形成的统治阶级机关。马克思把工人政权看作是一个**工人的**政权，而工人阶级政党尚不存在。之后讨论的中心问题，即现有的（政党或工会）工人组织在无产阶级政权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时还未出现。

随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德国出现的强大的工厂委员会运动（Rätebewegung），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条件下（工人政治团体的存在以及工人运动的分裂）被提出。委员会运动中的一些理论家基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设计了通过工人自身以直接民主形式运行的政权模式，但并没有明确采纳“工人政权”一词。此外，委 483
员会运动没有说清楚新的工人委员会与传统的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政党团体和工会团体的对立。对领导机关的占领（在经过谈判按照比例代表制的政党选举后），和对该机关权力的剥夺（其中直接的工人代表形式即工厂委员会维持的时间最长），导致了委员会运动的失败。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采用“工农政府”的方式来发动革命。从 1917 年 4 月到 9 月，他们要求社会革命

党人和孟什维克，与自由党政府决裂，形成没有资产阶级参与的工农政府，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参与这样的政府。这种方式对准备发动1917年十月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从“工人政权”到“工农政权”的转变反映了俄国具体环境的变化，但同时也是一种充满冲突和妥协的方式，工农联盟带来的问题远比它解决的要多。（参见列宁的看法，LW 25，第3—15、48—51、87—88、95—98页等处）

关于工人政权作用和优点的一次详细讨论是在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在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召开，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革命浪潮的结束和欧洲资产阶级的相对稳定”（《资本的进攻》[Offensive des Kapitals]，来自拉狄克[Radek]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旨在评估和发展俄国经验和1921年采用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多数派（持反对意见的代表多数来自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参见*Protokoll*，第107页及以下，第115、164、167、360、374页）赞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向工人政权：（1）工人政权这个口号不像统一战线理解得如此普遍，而是仅适用于这样的国家和情况：“权力问题和政权问题无论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都提到了首要地位”（参见季诺维也夫[Sinowjew]的报告，同上书，第66页；参见*Protokoll*，同上书，第1015页）；（2）工人政权自身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可能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的一个阶段”（拉狄克的讲话同上书，第101页）、“前站”、“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出发点”（拉狄克的报告，同上书，第326、327页）；（3）工人政权最基本的任务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解除资产阶级反革命组织的武装，监督生产，把赋税的主要负担加在富人肩上，以及粉碎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反抗”（*Resolution*，同上书，第1016页）。只有依靠工人斗争中孕育出的群众力量，工人政权才有可能。 48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区分了“虚有其表”和“真正的”两种工人政权：前者包括“自由党”（如澳大利亚）和“社会民主党”（如德国）；后者包括“工人和贫农的政权”（比如巴尔干半岛存在这种可能），“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权”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政权，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名副其实地体现这种政府”。（同上书，第1017页；另参见恩斯特·迈尔[Ernst Meyer]的讲话，同上书，第75—76页）“真正的工人政权”是那种“决心至少为实现工人最重要的日常要求而同资产阶级进行严肃斗争的政权”（同上书，第1017页）：一个接受无产阶级革命主要内容的权力政权。共产党人只能参加这种工人政权。另一方面，“虚有其表”的工人政权仍然在资

本主义框架内。

然而，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了工人联盟政权（工人组织的政权），为了加快阶级斗争，主张支持“仅仅虚有其表的工人政权”（同上）。这反映了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的继续存在，以及在改良主义的大众影响下，如何实现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对发动工人组织的政权的争议，就是要回答社会民主党是否已准备好同资产阶级破裂，还是在所有条件下仍与资本主义体系有联系的问题。首先它应该能让劳动群众在斗争中回答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结论（参见拉狄克的讲话和报告，同上书，第101、325—326页）。

虽然关于工人斗争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群众机关的发展在这个讨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与马克思的**工人的**政府思想不同，这是一个以工人阶级**名义**运行的工人**组织**政权，该政权与人民群众的代表机关的具体关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485

这个问题在1923年10月得到了反映，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组建了所谓的“工人政权”。在这样一个阶级斗争高潮时期，该政权远不是一个工人政权，而是一个局限于工人**政党**的议会联盟。然而，总体而言这些经验仍然是零星的，不能形成认真评估工人政权历史效力的基础。随着共产国际在1927年和1928年进到“第三阶段”，工人政权不再在共产党政治中扮演任何角色。从1935年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始，共产国际以人民阵线的名义转向与部分资产阶级组成联盟，作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工人政权一词开始多次用于不同的政府，就像英国“工党”一样，背后隐藏着一个定位于社会改革的政府，因此这一名称的**具体**功能必须从其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来确定。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曾提出一个重要的政治策略问题，这在斯大林时期销声匿迹。只有左的和右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政治思潮）会涉及该问题，例如20世纪30年代对人民阵线的批评，以及70年代的左翼政府风暴（如1973年之前的智利，1974年之后的葡萄牙，1975年之后的西班牙，70年代后期的意大利）。

与20世纪20年代初的讨论相比，一些新的因素已经出现。其中包括：工人运动的进一步政治分裂；工人阶级社会构成的变化；妇女运动的自治作用；对直接民主决策形式（如市民组织）的体验。当问及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这些因素必须要考虑到。由于社会转型中主体的话语范式转变，工人政权或工农政权的概念只剩下了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Protokoll des IV. Kongresses der KI, Petrograd – Moskau vom 5. November bis 5. Dezember 1922, Hamburg 1923; D. Schneider, R. Kuda, 486 *Arbeiter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Ideen, Wirkungen, Dokumente*, Frankfurt/M ²1969; *Theorie und Praxis der Arbeiterräte*, Berlin/W-Frankfurt/M 1969; L. 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1931）, Frankfurt/M 1973.

沃纳·麦肯伯奇
（Werner Mackenbach）撰
王奎译，杨柳新审

参见：

Arbeiterstaat/Arbeiter- und Bauernstaat, Arbeiterbewegung, Avantgarde, Bürgerinitiativen,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inheitsfront, Frauenbewegung,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Internationale, Operaismus, Pariser Kommune, Spaltung, Volkseinheit, Volksfront

工人自治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很少关注工厂中的工人自治问题。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只是泛泛地提到“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第 482 页）。政治制度应建立在管理自己经济和政治事务的生产者自由联合的基础上。然而他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规划革命胜利后的未来。在 19 世纪有着强大的工团主义根源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经常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工厂。在德国，自拉萨尔以来改革派的兴趣更多的是消费者合作社和类似的自助机构，例外的是生产（建筑工人行会）。不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合作社将其中心采购公司 GEG（德国消费者协会采购部）附属于各种各样的工厂（从鞋油到自行车）。

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并不看好这种发展，认为会存在经济上的困难（参见 Luxemburg，*SoR*，GW 1/1），后来逐渐接受，并指出这将帮助众多小商贩走向独立，作为自治的训练，通过他们的经验和成功，工人的自信心将得到加强。事实上，很少有真正的自治，而是员工和众多持股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股东）非常有限的参与。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工人控制作为没收和国有化的大企业中工人自治的预备（LW 28，第 132—133 页；29，第 140 页）。第一次世界大 487
战和苏联内战的巨大破坏与生产力的损耗（负增长），国民经济事实上的重新

农业化，大量的年轻缺乏工业经验的幼小工人阶级的存在，这些都不允许实施工人自治。下一个尝试是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和工会秘书的三人组，就像三驾马车一样领导工厂并负责。这种尝试在1929年斯大林时期中断了，变成了由厂长全权负责，然而却由党委书记（而不是政党小组）实际控制。

新的观点出现了——在1948年被开除共产党情报局之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获得了独立，开始寻求更为民主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早在1950年，随着计划的去中心化、经济政策的联邦化、经济核算的出台，工人自治产生了。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厂长由员工选举产生。他（她）可以被撤换。在扣除所有强制性的缴款后，员工在公司或代表会议上来决定“工厂或工作集体最终结算后有效积累的分配情况”（Tito 1950，第17页）。其实为了防止蚕食或浪费工厂资金，对合理的不正义施加了很大的限制。员工还决定着投资和生产计划。

铁托在工人自治中看到了教育的双重任务：从农村来的新产业工人应该学会理解工业的本质及其对后果承担的共同责任，同时实践对工厂的领导权。这是为了防止“官僚传染病在经济中的蔓延”（同上书，第14页）。工厂委员会的相关规定须经上级经济机关批准。

1956年10月以后，波兰劳动人民政权做出让步，将工厂管理分为三部分：厂长、党组织和工会。这种制度大约从1958年开始摇摆以致逐渐被遗忘。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改革期间工人自治也开始被引入。后来戈尔巴乔夫又重新提出，他敦促“实现领导权的全方位民主化，加强劳动集体在工人自治中的作用， 488
在经济主体中赋予自下而上的控制、问责和公共性更大的比重”（1986，第50页）。从观点来看，戈尔巴乔夫和列宁都提到了“过渡‘到真正的人民自治’（LW 26，第98页）”（1987；参见Haug 1989，第187—233页）。

下面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是很明显的：（1）正如列宁指出的（《在革命纪念日的讲话》[*Rede zum Jahrestag der Revolution*]，1918年11月6日，LW 28，第132页），缺乏行业经验。（2）从长远来看，开明的劳动工人必须有兴趣维护和更新业务，以及使其社会的技术和文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但短期来看，他们的需求却很难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寻求最高的薪酬和利润分配，而对于长期的投资不感兴趣。生活水平越低，需求饱和程度越低，利益冲突就越严重。由于这些非对立的利益冲突，对于资本形成的税收和征税是不可或缺的。（3）还有另一个中央计划及国家政权与工厂之间的对比。中央计划需要高额税收，想要自下而上对地方工厂进行新的控制，

而不是削弱中央控制，以限制厂长的任意性。可以想象的是，管理层和员工会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样的工厂自我主义是有用的，但只在一定的限度内。必须通过执政党的教育工作来增强上级的利益。（4）个别公司可以利用垄断或其他有利条件谋取特殊利益，而不考虑一般利益，这将加剧区域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扶持落后地区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利益。（5）员工对初始资本形成和初始设备的掌握几乎不可能或是非常缓慢的。如果基础资本积累过度或强制执行，结果就会导致异化，这就抵消了工人自治的优势——劳动者对工厂认同。

中国通过人民公社解决了上述的部分问题，比如基础积累的问题，但是付
489 出了昂贵的官僚机构和劳动农民的某种异化的代价 。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z，希伯来语“团体”。——译者）也解决了基础资本形成问题——完全自愿和共同放弃消费。先决条件是贫穷的平等（穷人合作社）、强烈的社会认同和政治动机。

南斯拉夫的经验在该国出现了问题（参见 Matvejević 1975）。马提科（Mattick）总结了他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批评：“总之，在条件允许下，对经济的总量控制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尽管工人委员会掌握部分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后者不能影响政府的决定，但政府可以设定委员会运作的条件。”（1967，第 227—228 页）。科尔佩（Corpet）（1988，第 1167 页）断言工人自治是反列宁主义的说法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的确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改良主义者的目标是反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共产党人认为这是对斯大林过度集中、不民主的计划和官僚主义的纠正，显然是想回到列宁的思想（在更高层次上的丰富经验、成熟的工人阶级和多元化的经济结构）。法国理论家把工人自治定义为“**改变生活**的实用方式”（出自 Henri Lefebvre）。

参考文献：

J. Broz-Tito, »Die Fabriken den Arbeitern«, in: *Sozialistische Theorie und Praxis*, 2. Jg., 1975, Nr. 6, 3-19; O. Corpet, »Selbstverwaltung«, in: KWM 7, 1988, 1164-1171; M. Gorbatschow, *Politischer Bericht des ZK der KPdSU an den XXVII. Parteitag*, Moskau 1986; ders., *Die Rede. Ansprache vor dem ZK am 27.-28. Januar 1987*, Reinbek 1987;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H. Lefebvre, in: *Autogestion*, 1. Jg., 1966, Nr. 1 (zit. n. KWM 7, 1166); E. Mandel (Hg.),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räte,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Frankfurt/M 1971; P. Mattick, *Anti-Bolshevik Communism* (1967), London 1978; P.

Matvejević, »Selbstverwaltungim Lichte der Kultur«, in: *Sozialistische Theorie und Praxis*, 2. Jg., 1975, Nr. 6, 78-99.

泰奥多尔·贝格曼 撰
王奎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sorganisation, Assoziation, Bürokratie, Genossenschaft,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Dezentralisierung, Entfremdung, Jugoslawischer Sozialismus, Kibbuz, Perestrojka, Rätesozialismus, Rätekommunismus, Selbstverwaltung, Syndikalismus, Titoismus

490 工人国家、工农国家 (Arbeiterstaat, Arbeiter- und Bauernstaat)

1. 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国家”一词有时可用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同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参见 *Manifest*，MEW 4，第 473—474、481 页；*Gotha*，MEW 19，第 11 页及以下，第 28 页）。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他们勾画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一种较具体的国家政治学，其特点主要是权力下放，特殊专制机构的解体，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和直接民主的形式。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种背景下并没有使用“工人国家”这一术语，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赞成使用。（参见 MEW 18，第 635 页）

无产阶级并不是接管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是必须建立新的国家以取而代之（参见 MEW 7，第 511 页及以下；*18. B*；*Bürgerkrieg*，MEW 17，第 336、342 页；MEW 18，第 597 页及以下；MEW 22，第 197 页，第 225 及以下），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国家**（*Unstaat*），即对国家的否定：通过废除剥削的基础，阶级也被成功消灭，对特殊国家机构的需求就消失了；国家起着“革命和临时的形式”（Marx，MEW 18，第 300 页）的作用。就“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Manifest*，MEW 4，第 481 页）而言，国家不是一个工人名义上的机构，也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代表了工人自治。工人自治既是社会基础又是政治代理人。恩格斯认为，这个国家不再是一个阶级国家，而是历史上第一个“代表整个社会”（*AD*，MEW 20，第 262 页）的国家。

这个概念存在一定的先决条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工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被雇佣者”）；所有中间阶级，正如他们所看到的那样，倾向看作是无产阶级（例

如 *Manifest*，MEW 4，第 472 页；MEW 22，第 209 页）。因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工人国家第一次不是少数人而是多数人的统治，实现了民主的最大化。（参见
491 MEW 22，第 513 页；*Bürgerkrieg*，MEW 17，第 615 页及以下）同时也存在“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是在普选和现代大众民主还没有普遍接受的情况下。（恩格斯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成功的影响下阐发了其他政治观点；参见 MEW 22，第 513 页）

但即使在以上情况下这一观念仍然存在问题。首先，在术语的层面，“专政”（多数人的意志反对先前少数人的统治）所指的，“毋宁说是‘民主’的本来含义”（Haug 1985，第 101 页）。“工人国家”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也不是把它还原为一个阶级的特殊政治组织。（这也难怪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书信中曾建议用“社会”[Gemeinwesen] 来代替国家；MEW 19，第 6—7 页）进一步未解决的问题是，作为统治和领导阶级，工人国家通过何种形式来实现领导权，在哪一阶段国家能够消亡。最后，这些模糊性必须要解决，尽管坚持这一概念付出了痛苦的经验。

2. 在十月革命背景下，为了抵御德国民主党主要是考茨基（1919）的攻击，列宁和托洛茨基（1920）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辩护。列宁从消亡的角度来看待国家（*SR*，LW 25，第 393—394 页；28，第 94 页及以下，第 397 页及以下）；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不兼容，以及根据俄国形势通过武装工人革命暴力的形式转向共产主义宪法的民主道路（*SR*，LW 25，第 407 页及以下，第 430 页及以下，等处）。不过，即使苏维埃国家存在第一种措施，坚持这个位置需假定一个合法特征：剥夺工厂委员会的权力，解散非布尔什维克政党，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派别的压制，在布尔什维克不占上风的地方解散苏维埃政权（甚至是通过暴力）。这些临时的措施公开反对工人国家，然后在国家和党合并的过程中退化为“权贵阶层”（Nomenklatura）的纯意识形态统治的概念。

相比之下，与修正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相反，罗莎·卢森堡捍卫马克 492
思和恩格斯的核心概念：为了取代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必须采取社会主义；专政没有取消任何民主，而是对它之前形式的“扬弃”——包括资产阶级——以一种更加发达的形式，从“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GW 4，第 363 页）。她一方面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反对社会民主特色的国家主义，同时也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试图在西方议会民主制条件下进行思考。（参见她

关于立宪会议的作用和选举权的著名论战，同上书，第353—365页）这样，卢森堡在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分析中坚持“纯粹民主”、“人民的国家”、“自由国家”，认为这是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并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只是其中并没有使用统一的概念。（参见GW 1.1，第236—237页，第422页及以下等处；GW 2，第8—9页，第49页及以下；GW 4，第341页）

列宁在他的最后几年发展了“工农国家”概念，考虑到了过渡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他在对阵“工人反对派”（柯伦泰［Kollontai］）和托洛茨基的工会辩论中如此强调，后两者试图将传统的工人国家概念改造成为苏联。“但是这还不够。从我们党的纲领中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官僚过度的工人国家……人们就有了过渡的现实性。”（LW 32，第6—7页；参见LW 31，第416、418页；LW 32，第39页及以下）有了这个干预，列宁试图再次执掌方向舵。在经过七年的战争和内战背景下，他视无产阶级专政为历史的必然，包括“一系列新的过渡期”，“在过渡时期中的过渡期”（LW 32，第15—16页）——面对苏联现实没有对错误进行承认和对立场进行自我批评。列宁试图思考一个无产阶级占少数的国家如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远没有给出一个关于工农国家完整的解释（就像“人民民主”那样），而是强调一个例外，即工农国家并不适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参见LW 32，第216页）

493

3. 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条件下，葛兰西尝试解决无产阶级国家问题。从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经验中，他首先强调委员会的重要性，是“一个新的有代表性的系统”，“一个新的国家，工人国家”。（*Die Eroberung des Staates*［1919］，*R*，第33页）从明显的还原论立场出发，将“大型金属加工公司”的组织模式视为工人国家的模型（*Der Fabrikrat*［1920］，*R*，第67页），葛兰西通过《狱中札记》解决了这个问题。诸如“工人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以及在委员会运动斗争中夺取政权的构想，直接被克服和抛弃，权力的运行只是被理解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4. 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发展出官僚化的“堕落工人国家”（1938，第34页）概念，以此来分析苏联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作为工人阶级的工具实际成为……官僚控制工人阶级的工具”（同上书，第33—34页）。然而，新的统治阶层不能依赖自身的社会基础，而是利用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就：生产

资料归国家所有，外贸垄断和计划经济。所以托洛茨基认为这个新的阶级统治是不正义的。要么是官僚统治推翻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并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要么是官僚统治被无产阶级推翻并重新过渡到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个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存在是短暂的。——为了维持工人国家这一构想，托洛茨基必须建构和延续无产阶级对经济的统治权，并同时完全将其从政治权力上排除掉。这种矛盾不仅违背了马克思的立场，也违背了苏联的社会现实。这一矛盾导致他将生产和分配领域相分离，官僚统治只有分配和寄生功能。

托洛茨基生前没有预见到，“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存活下来并在国际范围扩展了影响力，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国家，这使得托派理论家汉森（Hansen）、科克伦（Cochran）、曼德尔（Mandel）提出了“变
494 态工人国家”的概念。这些分析基于托洛茨基（1939，第 1290 页及以下；1940，第 263 页及以下）的思路，即并不排斥红军占领区与苏联的社会结构强制同化，但总是以国家的合并形式进行的。托洛茨基的矛盾形式进一步发展：“变态工人国家”意谓并**不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国家，而是通过红军占领所有权完全发生变化，亦即全国革命或农民解放运动的胜利。因此，工人国家一词的解放意图被砍掉了：假装以工人国家名义采取行动，不仅压迫本国的工人阶级，也以外国压迫者身份对他国人民进行统治。

5. 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的成立，“工农国家”重新得到了探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理论家从 1976 年的党章开始：“在国家形态中，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联盟，共同实现政治统治。这就创建了工农国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引自 Schöneburg 1983，第 285 页）通过“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主要工具”（同上），国家消亡的观点转变成“人们‘自我组织’成国家”：国家不是消亡，而是“应该从人民自身获得增长……，从而开始消除人民和国家之间的资本主义异化”（同上书，第 279 页）。鉴于人民越来越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工农国家仅仅获得了纯粹合法化的形式。

评释：

不仅是 1989 年的剧变，还有十月革命的复杂情况和苏联早年的发展影响了工人国家的原始含义，并揭示了自身的矛盾。后来的纠正都失败了。任何基于马克思的理解和葛兰西新思路的尝试，将“政治过渡”的问题转变适用于今天的条件，都必须从根本上发展新的概念。

495 **参考文献：**

»Class Nature of Eastern Europe«, in: *Fourth International*, Nov.-Dez. 1951; I. Deutscher, *Trotzki*, 3 Bde., Stuttgart 1972; J. Esser, *Einführung in die materialistische Staatsanalyse*, Frankfurt/M 1975; 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E. Hennig, J. Hirsch, H. Reichelt, G. Schäfer,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Staatstheorie*, Berlin/W 1974; E. Jahn, *Bürokratischer Sozialismus: Chancen der Demokratisierung?*, Frankfurt/M 1982; K. Kautsky,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Berlin 1919; F. Kool, E. Oberländer, *Arbeiter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 Dokumente der Weltrevolution*, Bd. 2, Frankfurt/M Wien-Zürich 1967; H. Kremendahl, Th. Meyer (Hg.), *Sozialismus und Staat*, Kronberg/Ts 1974; *Marxistische Staats- und Rechtstheorie. Band 2: Historische Typen des Staates und des Rechts*, Köln 1974; R. Miliband, *Marx und der Staat*, Berlin/W 1971; P. Naville, *Le nouveau Léviathan*, Paris 1967;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1968), Frankfurt/M 1974; der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8; K. Radjavi, *La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et le dépérissement de l'Etat de Marx à Lénine*, Paris 1975; K. H. Schöneburg, *Errichtung des Arbeiter und Bauernstaates der DDR 1945-1949*, Berlin/DDR 1983;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Hg.),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73; dies. (Hg), *Class, Party, and State and the Eastern Europe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9; D. Staritz, *Sozialismus in einem halben Land*, Berlin/W 1976; »The Russian Question Today«, in: *Fourth International*, Nov.-Dez. 1947; M. van der Linden, *Von der Oktoberrevolution zur Perestroika. Der westliche Marxismus und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M 1992; L. D. Trotzki,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Hamburg 1920; ders., *Der Todeskampf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Vierten Internationale* (1938), Essen o. J.; ders., »Der Klassencharakter des Sowjetstaats« (1933), »Arbeiterstaat, Thermidor und Bonapartismus« (1935), »Die IV. Internationale und die UdSSR« (1936), »Verratene Revolution« (1936), »Bonapartistische Staatsphilosophie« (1939), »Die UdSSR im Krieg« (1939), in: *Schriften*, Bd. 1.1 und 1.2, Hamburg 1988; ders., *Verteidigung des Marxismus* (1940), Berlin/W 1973.

沃纳·麦肯伯奇 撰
王奎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archismus, Arbeiterklasse,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selbst-

verwaltung, Arbeiterregierung, Bolschewisierung, Bürokratie,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geschichtlicher Block, Hegemonie, Kautskyanismus, Pariser Kommune, Lassalleanismus, Reformismus, Revisionismus, Staat, Trotzkismus, Übergang,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Übergangsperiode, Volksdemokratie, Volksstaat

496 工意调查（Arbeiterumfrage）

在巴黎公社失败九年后和法国工人党成立一年后的1880年，马克思为《社会主义评论》（Revue Socialiste）写了《工人调查表》（*Fragtbogenfür Arbeiter*）（MEW 19，第230—237页），设计了有关劳动安全和保护、工作时间、女工和童工、工资、家庭预算、失业以及组织和斗争的形式等100个问题，在同年4月20日匿名刊登，并印成25000册单行本在法国发行。在此之前，社会调查从社会立法、慈善或反社会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在现有经济体系框架内工人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的程度。马克思突破了这一传统：通过“工意调查”，之前被研究的对象成为历史的主体。以直接（自我）调查的方式取代了传统借助权威人士的调查，使得这种调查成了“社会主义的教科书”（H. Weiss），其中（1）给出了关于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真实记录，（2）工人——通过一些应该引起反思的问题——他们的处境和社会状况，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消灭的方式，以及（3）通过归纳引向剩余价值理论，以此为“社会更新”做准备。（MEW 19，第570页注释，第150页）

该项目失败了（回报是微不足道的）。这不仅是因为法国工人阶级组织化程度低和意识落后，其中一些依然严重依赖救济，以及他们缺乏社交能力；而且问卷太长、太复杂、太详细；马克思没有考虑工人的教育程度，表达能力，缺乏动力，较少闲暇时间，以及可能涉及警察对实名制问卷不正当利用的担忧。

参考文献：

H. Weiss, »Die ‘Enquête ouvrière’ von Karl Marx«, in: *ZfS*, 5. Jg., 1936, 76-98 (wieder in: F. Fürstenberg [Hg.], *Industriesoziologie I*, Neuwied-Berlin/W ²1966, 127-146).

Y. Karsunke, G. Wallraff, »Fragebogen für Arbeiter«, in: *Kursbuch* 21, 1970, 1-16. W. Fuchs,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als politische Aktion«, in: *Soziale Welt* 21/22, 1970/71, 1-17.

阿娜贝拉·魏斯曼
（Anabella Weismann）撰
王奎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lltag,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losigkeit, Ausbeutung, Bedürfnis, Befriedigung, disponible Zeit, Elend, Emanzipation, Empirie/Theorie, Fabrik, Familie, Frauenarbeitslosigkeit, Frauenarbeit, Freizeit,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Interesse, Kinderarbeit, Klassenkampf, Lernen, Lohnarbeiter, Lohn, Mehrwert, Proletariat, sekundäre Ausbeutung, Wohnungsfrage

劳动关系（Arbeitsbeziehungen）

在德语区，劳动关系只是一个纯粹的名称，表示：（1）一个社会学概念；（2）历史上形成的解决冲突的机制；（3）（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一个学科及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1. 总体说来，劳动关系的概念是指称 ——按政府或非政府的方法标准解决的 ——经济交换过程和在一个企业、一个经济部门或一个国家内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利益代表之间的社会冲突关系，以及由活动人员的相互交流形成的、用于解决依赖雇佣关系的从业者的标准、协议和制度。**“劳动关系”**及**“劳资关系”**是20世纪60年代被从英语译成德语，引进西德的工业社会学，后被其他学科（法学、政治学和企业管理学）采纳的。人们不只是将它理解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伙伴关系）之间利益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委婉表达，也按照解决冲突的常规将它理解为“阶级对立的制度化”（Geiger），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还根本不知道它所表示的东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分析中，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核心制度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工厂制 ——正如早期的工人自助组织（工会）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他们很少是站在集体解决雇 498
佣劳动的售卖条件和应用条件的角度分析，而主要是立足于剥削、异化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及其对“资本暴政”的愤怒的角度。马克思和恩格斯视工人运动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MEW 4，第474页），而不是社会改革的力量。但是实际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平等地解决劳动关系的制度的助产士，从20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开始，大多是在政府的帮助下，该制度在所有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形成了独特的机制。

2. 劳动关系体系的兴起和发展要归功于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情况引起的冲突形势和社会动力。劳动集体和管理阶层、工会和雇主联合会之间围绕工资

条件和劳动条件进行的周期性利益斗争形成一种解决冲突的需求，它让劳动市场，包括政府机构的，学习能力强的活动人员对制度进行革新，其表现为相当坚固的妥协结构（浓缩的利益情况）。虽然制度化让这些在历史交叉点制定的规章制度对环境变化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原则上它们仍然依赖于活动人员的力量大小；重大变化通常也会改变规章制度。

“平等思想的胜利”（Neumann）是最重要的进化成就。它用双边规定取代了单边规定，用“联合监管”（Flanders）制度弥补了单边的冲突战略，这虽然没有废除劳资斗争，但降低了它的应用。劳动关系最主要的集体性规定包括物质标准和适用于集体的程序规则。个体的或集体的活动人员在制度范围内（比如劳资协定自主权或企业劳资法）以合同的形式制定它们。

上述这类机制划定资本和劳动之间冲突的范围；它们确定哪些形式、内容和活动人员是允许的，他们拥有哪些行动机会来解决特殊的麻烦。它们行使的
499 是“舞台”的职能，在这些舞台上，演员（活动人员）们不仅代表他们互相矛盾的物质利益，也努力改变现行解决方法和制度的框架条件，让它们对自己有利。

在劳动关系的体系里，政府机构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按照规定保障各种现行机制，依法批准磋商达成的标准。国家也可以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工资标准和劳动标准的制定进程，在为此进行的交流中让劳资联合会能够影响经济政策和就业政策（三边协调机制）。

下列一览表概括了联邦德国的劳资关系制度最重要的解决范围或舞台及其有关的活动人员和典型的解决模式。

所谓的“利益代理的二重制”就是核心范围：劳资协定自主权和企业劳资法。在**劳资协定自主权**的舞台上，虽然不仅仅是，但主要是由集体活动人员工会和雇主联合会谈判和约定劳动力的售卖条件，这就是说，一般都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及可以普及的框架规定。必要时利益冲突也表现为劳资斗争。在**企业劳资法**的舞台上，活动人员企业职工委员会和管理部门的任务是规定劳动力的 500
使用条件；这一般是“质的”、涉及具体工作条件的利益。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利益冲突只能通过和解—和平的处理程序来解决，而不是以劳资斗争的途径。在**劳动宪法**的舞台上，上司的单边规定遇到的是工作小组非官方的、调整劳动和效率行为的标准。因此，在“生产时点”（point of production），通过在劳动场所的共同决定和 / 或由管理层发起的参与典范（质量团体、小组劳动），双边的规定可以补充单边的规定。

3. 对劳动关系的科学理解做出贡献

联邦德国的劳资关系制度

解决范围 / “舞台”	活动人员	典型的解决模式
法定的机构范围	议院 劳动管理机构 劳工法庭	单边的
劳资协定自主权 （工业部门；产业性劳动市场）	工会 VS 雇主联合会	双边的
企业劳资法 （企业、工厂）	企业职工委员会 VS 管理部门	双边的
劳动宪法 （生产程序，劳动场所）	（直接地） 上司 VS 工作小组	单边的
三边协调机制 （政府的经济 / 就业 / 收入的政策）	高层联合会 （工会、雇主联合会和政府代表）	三方的

的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和社会改革家们；马克思主义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加强了对劳动关系的探讨。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期间，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还在激烈辩论改良主义和革命时（伯恩施坦—卢森堡之争、群众性大辩论），以社会改革为目标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就从历史和理论上探讨了工会早就在实行的改良主义了。在德国有“讲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政治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鲁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1844—1931年），在大英帝国有属于社会改良主义团体费边社的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年）与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1858—1943年）夫妇，在美国有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约翰·洛克斯·康芒斯（John R. Commons，1862—1942年），他们最早推出了对工会的（非革命性）方法和社会经济作用的分析和评估。

这些同情工会的工人运动的学者们有个共同点，他们拒绝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认识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因此认识到劳动市场上和企业里的雇员和雇主之间力量的不对称性，坚信工人能够通过有组织的行动和集体合约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

由议会发起的劳资斗争和劳资关系调查委员会在美英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及**劳资关系**这个独特的学科有利于这个领域的实践研究和理论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约翰·T. 邓洛普（John T. Dunlop）在美国，阿兰·弗兰德斯（Allan Flanders）在英国，先后提出 501

了分析劳资关系的理论方案，他们对这一理论分析影响至今。邓洛普从帕森斯（Parsons）的系统学萌芽出发，将劳动关系理解为“规则制定和管理系统”——这就是说，既是一个生成标准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规则和标准的网络，活动人员、环境条件（技艺、市场条件、力量对比）和活动人员分享的意识形态可以看作其变量。弗兰德斯是“牛津学派”最著名的人物，他将特殊的调查对象称作“工作监管机构”和“通过联合监管制定规则”。他想用“联合监管”取代韦伯引进的概念“集体谈判”。

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反对邓洛普和弗兰德斯的狭隘限定，主张除了“秩序和规定”，“冲突和混乱”也属于劳动关系。由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引起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劳动过程辩论，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纷纷参与了，这证明了劳动关系研究的唯物主义基础坚固深厚。

在联邦德国，社会科学家（首先是工业社会学家，其次是政治学家、劳动法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依靠较早的论文（布伦塔诺，布里夫斯［Briefs］，莱德勒［Lederer］/马沙克［Marschak］）和接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相关论文，开始探讨劳动关系的目标范围（请比较恩德鲁韦特［Endruweit］等，凯勒［Keller］，穆勒-延奇［Müller-Jentsch］）。通过资助研究项目（首先是德国科学研究会）——无数的出版物都有记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家研究的差距缩小了。另外，欧洲的统一进程也促进了对劳动关系的民族体系处理麻烦和冲突的能力的比较。《**劳资关系**》（*Industrielle Beziehungen*）是第一本致力于这个主题范围的德语刊物。

参考文献：

L. Brentano (Hg.), *Arbeitseinstellungen und Fortbildung des Arbeitsvertrages*, Leipzig 1890; ders., »Gewerkvereine«,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d. IV, Jena ³1909, 1106-1119; J. T. Dunlop, *Industrial Relations Systems*, New York 1958; G. Endruweit, E. Gaugler, W. H. Staehle, B. Wilpert (Hg.), *Handbuch der Arbeitsbeziehungen*, Berlin/W 1985; A. Ferner, R. Hyman (Hg.),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New Europe*, Oxford 1992; A. Flanders, *Management and Unions* (1970), London 1975; R. Hyman, *Industrial Ralations. A Marxist Introduction*, London 1975; *Industrielle Beziehungen. Zeitschrift für Arbeit, Organisation und Management*, 1. Jg. 1994; B. Keller, *Arbeitspolitik*, München ³1993; Th. A. Kocha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Homewood

(Illinois) 1980; E. Lederer, J. Marschak, »Die Klassen auf dem Arbeitsmarkt und ihre Organisationen«, in: *Grundriß der Sozialökonomik*, Abt. IX. Bd. 2, Tübingen 1927, 106-258; W. Müller Jentsch, *Soziologie der industriellen Beziehungen*, Frankfurt/M 1986; ders. (Hg.), *Konfliktpartnerschaft. Akteure und Institutionen der industriellen Beziehungen*, München ³1993; F. L. Neumann, »Die Gewerkschaften in der Demokratie und in der Diktatur« (1935), in: ders., *Wirtschaft, Staat, Demokratie. Aufsätze 1930-1954*, Frankfurt/M 1978; G. Schienstock, *Industrielle Arbeitsbeziehungen*, Opladen 1982; P. Thompson, *The Nature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Debates on the Labour Process*, London 1983; S. Webb, B. Webb, *Theorie und Praxis der Englischen Gewerkvereine (Industrial Democracy)*, 2 Bde., Stuttgart 1898.

瓦尔特·穆勒·延奇
（Walter Müller-Jentsch）撰
朱刘华 译

参见：
Arbeiterbewegung, Arbeitsmarkt, Arbeitsorganisation, Arbeitspolitik, Arbeitsprozeß-Debatte, Fabrik, Fordismus, Gegenmacht, Gewerkschaften,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Interesse, Liberalismus, Lohnarbeit, Macht, Management, Massenstreik, Mitbestimmung, Normen, Reformismus, Streik, Verelendung

劳动教育（Arbeitserziehung）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人提出将劳动作为教育原则，劳动教育作为教育任务（Comenius，Locke，von Rochow，Campe，Pestalozzi，Lepeletier）。自此，劳动教育被视作发展每个人对工作本身和对国家的“有用性”的决定性条件；劳动教育也被视为实现人格发展的有效措施和绝佳途径，确切地说，是对那些将会处于依附工作关系中的人而言。因此，劳动意愿、劳动道德、劳动能力、服从于等级所规定的任务、保护自己的工作能力免于过早损耗和团结，成了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竞争激烈的教育目标。

1. 相比于进步资产阶级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在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将教育和社会劳动联结起来，这个看法被称为“至今在劳动教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成就”（*Monumenta Paedagogica*，Bd. X，第 165 页）。马克

思将经济发展视作培养“总体”、“普遍”、“全面”发展的个人的重要前提，这样的人有能力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从事活动。（参见 MEW 42，第 95、395、607 页；MEW 3，第 67—68、424 页；MEW 23，第 512 页）除了劳动之外，他还尤其将参与社会变革视作一个重要的教育因素（比如 MEW 3，第 70 页）。马克思将科学，主要是数学、物理、化学和技术视为工业发展中生产的重要基础，所以他要求将讲授数学、自然科学和普通技术基础的理论课程作为劳动教育的中心内容。（*K I*，MEW 23，第 391 页及以下）马克思认为，手工业中专门的劳动技能的传授，在工场手工业中高度发展的同时又极端片面，它对劳动教育的意义，由于机器对劳动工具的操控正在丧失。针对工业中对工人和辅助人员身体的片面使用，马克思要求未成年人普遍进行“体育训练”，无论是体育还是军事训练，要成为劳动教育的一部分。在实践的“工艺教育”中应当指导学生使用和练习所有工种的基础工具。劳动教育的这一实践部分应该在生产劳动中进行（MEW 16，第 194—195 页；*K I*，MEW 23，第 511—512 页；相应内容亦见 Engels，*AD*，MEW 20，第 297—298 页）。

恩格斯描述了一种前景：劳动教育可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劳动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给予自己的成员这种机会，即“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Grundsätze des Kommunisimus*，MEW 4，第 376 页）。他的观点，“由整个社会共同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需要“能 504
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同上），将企业管理和国民经济联系了起来。

“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被马克思表述为理论的和实践的课程单元。“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MEW 16，第 195 页）马克思认为，一定要达到这种普及的全面的劳动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K I*，MEW 23，第 512 页）

与道德上的劳动教育的主流形式不同，马克思则希望课堂能够完全去意识形态化。1869 年他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中解释道："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不应该开设那些容许进行政党的或阶级的解释的课目。只有像自然科学、文法等这样的课目才可以在学校里讲授。"（MEW 16，第 564 页）其前提是对国家的影响加以最严格的约束："在不受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教育可以是国有的。政府可以委派督学，其职责是监督法律得到遵守，他们无权干预教育，就像工厂督察监督对法律的遵守一样。"（同上书，第 563 页）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反对将教育交付给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是不存在的；"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MEW 19，第 30 页）"年轻人应当在日常生活斗争中从成年人那里获得"道德教育（MEW 16，第 564 页）。资本是严厉的教师，其通过严格纪律促使"普遍的勤劳"作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Gr*，第 231 页；MEW 42，第 244 页），可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劳动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相应地对工厂里的童工劳动做出了评价："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 9 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MEW 16，第 193 页）然而必须将儿童的有偿生产劳动与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并按照年龄段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同上书，第 194—195 页；MEW 19，第 32 页）马克思将这种结合视为"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K I*，MEW 23，第 507—508 页）。他只在工业发展中发现了这些"未来教育的幼芽"（同上），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里的儿童劳动则完全是无耻的（同上书，第 486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教育既是以劳动为目标的教育，也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都应该在学龄就开始。

2. 在后来的讨论中，尤其在苏联和东德，以劳动为目标的教育并不意味着个人愿意直接参与劳动或胜任劳动，而是必须首先通过特殊措施受到劳动教育。学生的劳动不一定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也可以是家庭作业，这可以传授给学生目标的概念、达成目标的动力、有计划的使用工具、付出努力的决心和来自社会环境的认可。通过劳动而获得的教育则强调了社会劳动的教育作用，也就是让每个人全身投入，而且必须考虑组织

505

化的劳动过程所提出的要求。这些会教导学生整齐和清洁、纪律和勤奋、细心和客观、认真和自我批评、独立和负责。通过劳动而获得的教育在劳动小组里达到的效果最好，因为在小组中个人服从于一项现实存在的任务并融入一个有组
506 织的劳动环境，可以体验到社会义务、团结、认可和劳动需求。

在18世纪的后30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步，在教育系统中，生产劳动被与教育和课堂联系起来。然而手工劳动和课堂还处于并立状态，劳动不仅具有教育功能，而且还是学生向学校缴纳学费的方式（“工业学校”[Industrieschule]）。劳动可教导学生们要“工作勤奋”（Pestalozzi）。在此过程中，穷人应该能够通过勤奋来独立改善社会处境。这种以手工劳动为方式、以勤劳为目标的教育，与国民教育密不可分，在从封建割据状态到一个统一的德国民族国家的过渡过程中，国民教育发挥了支柱作用（Fichte，Fröbel，Schleiermacher）。19世纪初，劳动的教育意义在于职业培训。教育并没有专注于几个特定的职业，而是学生今后职业生涯的一般情况和要求。对这种普通的职业培训来说，社会劳动中的手工能力、智力能力和社会能力应该在“学生工坊”（Schülerwerkstätten）（C. G. Schubert）等地方得到锻炼。儿童们不仅在劳动中，而且在学习中的自主性，或多或少都是贯穿所有劳动教育尝试的教育理念，但是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手工劳动中施展机会十分有限。

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提出的爱尔福特纲领顾及了马克思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很多要点。其中的“学校世俗化”原则要求学校与宗教分离，但是国家的学校监管局能够通过公职教师将劳动教育，尤其是其道德教育的方面，转化为一种资产阶级的国民教育，生产劳动在此被解释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义务。

慕尼黑的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和苏黎世的宰德尔（Seidel）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提出了教育学的和学校的劳动理念：未来的学校应该是“劳动学校”（Arbeitsschule），其教育原则和授课方式均派生于教育相关的劳动社会的要求和前景。劳动教育不应再以新 507
人文主义为依据。“职业教育”和“一般的人的教育”应当组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就此成为全国现代工业发展的动力。职业教育被视为以手工劳动为目的的教育，其中也包含脑力劳动的内核，凯兴斯泰纳赋予了职业教育中心的地位：只有职业教育可以同时实现一般的人的教育和“有用的市民”的教育。高迪希（Gaudig）强调通过劳动学校培养人格，主要通过学生们在他们自由的劳动中确定目标、途径和工具的独立脑力劳动促

进人格的发展。在传授基础的文化技术和工作技巧之后，未成年人就可以独立适应职业、职场和集体生活。高迪希认为，通过有教育作用的劳动，可以获得人格发展。

劳动学校运动一方面促进了解决旧学校一直被诟病的“脱离生活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学校的教育目的赢得了广泛的公众认可。在魏玛宪法的起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将劳动教育与国民教育相结合，在学校里实施贯彻。魏玛宪法第 148 条规定：“国民常识及劳动课程为学校科目之一。”德国共产党也捍卫这一有关劳动学校的条款，但是同时要求对资产阶级的劳动教育进行改造：扩大普通和专门的劳动教育、废除职业教育中的反共产主义教育、扩大工业学科而非手工业学科。（v. Werder 1974，第 176 页）

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失业率持续增长，劳动营运动随之展开，“志愿劳动制”（der freiwillige Arbeitsdienst）也开始实施。教育家和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政党将聚集失业青少年在劳动营中劳动视为有价值的教育举措。社会把志愿劳动当作组织社会必要劳动的新原则，劳动营运动意在反抗这一悲惨的现状。在纳粹时期，这种志愿劳动制被改作为一种军队形式的组织，青少年要作为工兵在这个组织中服役。

对所有儿童进行平等统一的劳动教育是在封建农业社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议题。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产 508
生于沙皇俄国的教育系统被首先全面改造。列宁说道：“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LW 31，第 275 页）他尤其提到了自然科学的知识，年轻一代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掌握这些知识。（同上书，第 277 页）与之相反，主要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彼得格勒的代表提出的观点没有得到实施，就是将对工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技术学校转变成为在共产主义基础上新建立的教育系统。1918 年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了旨在建设苏联教育系统的教育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理念构成其基础。布朗斯基（Blonskij）、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ja）、卢那察尔斯基（Lunatscharski）、马卡连柯（Makarenko）、沙茨（Schazki）等许多人参与了激烈的讨论和许多具体的教育实验。这种新型的学校应当是一所统一的学校，也应是一所劳动学校，其以

内在联系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为特征。学生在经过从 8 岁到 17 岁在统一劳动学校的学习之后，应当能够完全准备好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学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一门或几门手工业做准备，而是传授基础科学知识，其中包括综合技术教育，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教授学生工业和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方法（克鲁普斯卡娅）。在第一个阶段，学生应掌握与自然和人类文化关联的百科知识。学生在第二个阶段应当大致上能够按照时间顺序整理这些知识，并将其与独立劳动相联系进行研究，以期达到了解劳动史和社会的目的。劳动教育始于集体，教师也在这些集体中。

马卡连柯基于其建立青少年劳动公社的多年经验，在理论上指出了集体教育的目标、联系和风格。他尤其强调教
509 育每个人对集体要自觉遵守纪律、有责任心，如果没有这些精神，社会建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学生在 17 岁之后一般会成为工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当他履行了这项主要义务之后，才可以享受职业培训，由于还有劳动义务，所以一般在工作时间之外参加培训（Bucharin / Preobrashensiki 1920）。设立这些统一劳动学校所必备的教师必须在师范学校接受教育，当时还尚未成立师范学校。十月革命 13 年后（1930—1931 年），才首先实现了针对 8 岁儿童的义务教育的普及，针对较高年龄段的义务教育在几年后才实现。另外，普通的综合技术教育不能满足本地各种行业的实际需求。1924 年起，农村设立了“农村青年学校”，其学制为三年，学校教授的主要内容为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中的现代技术，以促进集体农庄从小农农业到工业化农业的过渡。

使所有农民家庭的儿童都能够上学，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城市里设立了一批针对本地区行业需求的社区学校。与此同时，所有合适的企业也设立了理论教育和实践培训相结合的企业学校。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 1927 年写道：“我们在一系列的宣言和理论中，对这些以儿童和青少年通过学校组织参加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完整的教育提出了详细的观点。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非工业城市和偏远农村有大量学校，我们这个农业国家，并不能马上就达到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作的要求。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只有在几所专门为工厂工人子弟设立并很少招收其他学生的模范学校中，才能够很快真正建成理想的劳动学校，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学校。”（引自 *Monumenta Paedagogica*，Bd. XXII，第 214 页）

将以劳动为目标的教育还是通过劳 510
动而获得的教育作为重点，这个问题存在争议。布朗斯基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劳动学校的概念“生产学校”（Produk-

tionsschule）。他想在结构上将整个学校改造成为处于生产环节的工业技术劳动学校。生产劳动和工厂应当在教学和教育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样同时可以缓解学校的物资匮乏。马卡连柯基于其在青少年公社的经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生产之外，我想不到任何其他的劳动教育。……我现在坚信，一项不能生产看得见的价值的劳动在教育里没有任何积极作用；所谓的生产中的作业也要以劳动创造出的价值的概念为依据。"（Makarenko 1967，第 412 页）这个"生产学校"的概念失败在于，以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水平，在工业化的初期困难中难以实现面向未来的劳动教育。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尤其是在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后半的"文化大革命"中，赋予了"教育农民"重要意义。毛泽东在 1949 年写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AW IV，第 447 页）传播科学知识、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和培训专业人员被置于次要地位。通过进行"文化大革命"、建立"人民公社"希望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性飞跃，然而忽视了教育系统。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展生产力才被置于优先地位。中国为以下目标做出了巨大努力：将普通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提升到现代科技发展水平，扩大与之相关联的针对工人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专业科目，适应科技进步并且在质量上进一步发展（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511

从封建农业社会到社会主义工业社会的过渡中的巨大经济困难，导致了阶级矛盾消失、国家和政党消亡的共产主义图景的反面，建成了强大的、控制一切的党和国家机器，它将劳动教育直接与党和国家教育挂钩，很快又与国民教育结合起来。根据地方狭隘的实际需求定位和区分统一的劳动学校，国家对工作岗位和高等教育机构学习名额的分配，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培养和谐的、全面发展的和有责任感的人格的教育目标无法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相当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之前的讨论并按照苏联榜样建立了劳动教育的体系，然而几乎在所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久之后才开始重新对社会劳动、教育、培训和课程的关系进行讨论。这些初期的改革工作的起因是 20 世纪 50 年代年代末美国和西欧的"斯普特尼克危机"（Sputnik-Schock），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将由科技发展而明显产生的新的教育必要性带到了公众视野中。恢复对劳动教育的努力尤其在西德被社会的和意识形

态的争论所影响。德国教育制度委员会避免使用“劳动教育”这个词汇，而是使用“劳动学”（Arbeitslehre）。在那些后来改革成为职业预校（Hauptschule）的国民学校高年级（Volksschuloberstufe）中，劳动学是其七年级到十年级职业教育部分的教育重点，占据了最后一个学年三分之二的课程时间。保守力量极力反对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让青少年对今后成为依附性的职工预先有了社会批判意识，他们希望保持职业教育体系的独立性和保持企业对职业培训不受限制的影响，他们拒绝将国民学校和职业学校的课程科学化，也害怕职业预校失去
512 “普通教育的特点”。进步力量也反对这个概念，因为他们不希望职业预校有任何特定的科目，因为可能会与各种学校类型之间不设壁垒的规定相抵触，他们还担心劳动学会带来更大的社会适应压力。

目前，劳动学在德国各个联邦州以不同的形式进入到了职业预校和综合学校（Gesamtschule）里，并小范围出现在实科中学（Realschule），甚至也部分（职业选择课程）进入到了文理中学（Gymnasium）的课堂。其一个基本原则是培养独立性，主要通过“项目”（Projekt）这种课堂形式来实现。在项目的框架内，学生通过对企业的探访可以增进对社会劳动现实的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涉及技术、劳动的组织、资质以及企业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同时也会了解到个人和社会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劳动学引入校园，在过去的 15 年间给学校的学习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既引起了对劳动社会发展的批判，也产生了对这种发展自身的适应（参见 Zimmer 1987）。

参考文献：

P. P. Blonskij, *Die Arbeitsschule,* Paderborn 1973; W. Christian u. a., *Polytechn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Arbeitslehre’*, Frankfurt/M 1972; N. I. Bucharin, E. A. Preobrashenski, *Das ABC des Kommunismus* (1920), Hamburg 1921; B. Hackl, *Die Arbeitsschule. Geschichte und Aktualität eines Reformmodells*, Wien 1990; A. S. Makarenko – *Eine Auswahl*, hgg. v. A. Bolz, Berlin/DDR 1967; *Monumenta Paedagogica*, Band X,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serziehung in Deutschland, Teil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00*, Berlin/DDR 1970; dass., Band XI, *Teil 2: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DDR 1971; dass., Band XXII,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zu den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auf bildungspolitischem und pädagogischem Gebiet 1917-1933*, Berlin/DDR 1984; L. v. Werder, *Sozialistische Erziehung in Deutschland.*

Geschichte des Klassenkampfes um den Ausbildungssektor 1848-1973, Frankfurt/M 1974; G. Zimmer, *Selbstorganisation des Lernens. Kritik der modernen Arbeitserziehung*, Frankfurt/M 1987.

格尔哈德·齐默
（Gerhard Zimmer）撰
刘笑 译，曹旸 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teilung, Beruf, Bildung, Disziplin, Edukationismus, Erziehung, Fabrik, Kinderarbeit, Lernen, polytechnische Bildung, proletarische Erziehung, Qualifikation

513 劳动力（Arbeitskraft）

一

劳动力的概念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金如何转化为资本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因此也能理解生产过程如何同时生产使用价值和生产（附加）价值。劳动力是指为实现可消费的商品而启动的人类能量，因为这种能量本身已经转化为商品并成为买卖的对象。特别是作为一种商品，劳动力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特有的作为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工作过程中永恒且不可缺少的要素。

1. 劳动力这个概念，相对于它在马克思成熟的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在马克思著作中出现得其实比较晚。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预先使用了这个概念：“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MEW 2，第 436 页）但是这里的劳动力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土壤上生长的批判理论的框架内运作的，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样运用后来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基本概念（“劳动的价值”）。

就其实际含义而言，劳动力这一术语首先是在同义词**劳动能力**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引入的。作为一个与各种形式的所有权完全分离的工人，它是一种“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MEGA II.1.1，第 216 页；MEW 42，第 217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把劳动与资本交换的基础设定为物质财富的完全排除：从人与自然（作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整体）的绝对分离的角度来看，他在科学的意义上将**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中的
514 **劳动分工**概念重新表达出来。这个概念以人类中心的假设为基础，赋予马克思的早年思想以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色彩，马克思设想的“人类”（menschliche Gattung）（早在自身与自然分裂以前）就已经内在地自我分裂，以通过异化的、外在的方式重新自我统一。为了把劳动力而不是劳动这个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的和特定的商品，马克思必须重新阐发《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相对抽象化和拟人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科学上严谨地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形成前的各生产**形式**（MEGA II. 1. 2，第 378—415 页），也就是论述形成劳动力的历史先决条件。

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劳动能力的概念与劳动力的概念相结合并且变得普遍：“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MEW 23，第 181 页）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因为劳动就是资本家在生产体系中所**使用**的劳动力。马克思根本地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前者是普遍的、和所有实现条件分离的劳动活动的可能性，后者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由此揭示了剥削的产生和剥削的意识形态面纱。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获得劳动力，归根结底是按照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获得劳动力，但他可以在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后，将劳动力用于更长的工作时间：“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MEW 23，第 207—208 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劳动力作为价值和劳动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异来看，剩余价值率起源于资本对劳动力剥削程度的精确表达：

$$\frac{\text{剩余劳动}}{\text{必要劳动}}$$

只有劳动力拥有生产超过其内在价值的新价值的使用效果或能力，也就是生产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从而掩 515
盖了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作为市场比率关系还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如交换价值和货币之间的所有关系一样，都是等价关系。

使用劳动力使得生产过程成为可能，

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过程**（劳动对象转化为使用价值）和**利用过程**（通过剩余价值生产将货币转化为资本）。但为了理解这两个过程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是如何一致的，我们必须回到劳动从**形式隶属**于资本到**实际隶属**于资本的转变，这个转变表明**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质，是劳动力这个概念更适当的实现，因为劳动力不仅被“抽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被抽去了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占有（生产者无力建立生产资料）。

最后，正如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必须记住马克思用劳动力这个概念来解释古典经济学的同义反复，当谈到“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时，劳动价值的理论能够直接应用于劳动，而不是劳动力：但以这种方式，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即坚持认为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其中所包含的工作。“被经济学家看作‘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MEW 22，第 206—207 页）

2.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很清楚这种劳动力范畴的中心地位，他们从根本上批评了纯粹的经济和工会主义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仅满足于更合算地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就意味着把社会的资本关系本质上看作市场关系，也就是看作自由、对等的主体之间的交换，这就遮蔽了资本关系建立在生产和劳动的特殊组织（恰好是**使用**劳动力的组织）上，这种组织的目的是通过占有无偿劳动赚取剩余价值。因为他们恰当地理解了劳动力的地位，列宁和卢森堡批评政治斗争一方面削弱为单纯的工会斗争，另一方面削弱为单纯的议会斗争：因为这两种斗争形式都基于原子化的交换主体（在 516
经济市场上也要像在政治市场上一样被“代表”）而不是基于结构性的阶级差异，既不涉及所有权，也不涉及对劳动过程的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李嘉图学派或斯拉法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忽略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力范畴的重要性和意义：他们预设技术不变因而生产结构不变，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的实际内容是收入的分配，也就是工会的政治调解，是发生在生产之外的对立与和解，只以工资份额或利润率为基础。但这是某些人把生产过程简化为数量规模或仅仅是生产资料的技术组合的必然结论，他们没有理解马克思指出的，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和构成不变资本的生产过程其他要素之间的区别。

参考文献：

É. Balibar, »Über die Grundbegriffe des his-

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L. Althusser u. ders., *DKL*, 268-414; C. Napoleoni, »Vorlesungen über das VI. unveröffentlichte Kapitel des 'Kapital' von Marx«, in: ders., *Ricardo und Marx*, hgg. u. eingel. v. C. Pennavaja, Frankfurt/M 1974, 57-212; P. Sraffa, *Warenproduktion mittels Waren*, Frankfurt/M 1976.

罗伯托·菲尼利
（Roberto Finelli）撰
鲁埃迪·格拉夫（Ruedi Graf）
译为德文
宋珊译，曹旸校

二

马克思提出的其他概念几乎都没有像“劳动力”一样，进入一般的理论语言、政治语言，从这个词上面可以不断地看到马克思理论的新颖性和特殊力量。

波普尔（Popper）把劳动力与劳动的区别称为一个“极好的想法”和“一级理论成果”，在马克思成功地将“劳动价值理论暂时从破坏中”拯救出来的同时，在正式尊重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剥削理论”。（1958，第212—213页）马克思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完成者：这也被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他们捍卫所谓的价值论反击驳斥的企图。在新李嘉图主义的影响下，这个观点构成了1968年以后复兴的《资本论》接受中的重要路线之一。

本苏珊（Bensussan）在结合阿尔都塞（*DKL*）对同一问题的观点之后发现了相反的一面：“劳动力这个概念导致了真正的理论转型”，因为它引出了剩余劳动的概念和对剩余价值理论更细致的阐述，从而使资本主义剥削的具体分析成为可能。（1983，第100页）因此，这个词标志着马克思与他的先行者们分离开来的理论革命，而不是将他标注为他们的完成者。 517

上述相反的看法基于同一个证人，甚至同一个文本，即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二卷的前言。但在这里劳动力这个概念的地位更为平凡。虽然恩格斯确实描述了一场理论革命，但它是以剩余价值的概念为基础的（MEW 24，第23页）。马克思实际上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碰壁的难题。通过劳动力这个概念，马克思能够使“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相容”（同上）。但是，“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同上）。“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同上）

这样，重点转移到对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双重性质的分析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枢纽”，“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

纽”（*K I*，MEW 23，第 56 页）。恰恰是在这里，恩格斯的说明薄弱得有些奇怪：什么样的劳动才能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谈到生产商品的劳动，却没有谈到私有的、分工的生产关系，这就没有把握住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特殊性质，它与“劳动价值论”相反，是价值**形式**本身的生产关系理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不在于劳动决定价值，而在于产品的价值形式和产品中包含的劳动规定价值是私有的、分工的生产关系的结果和运动形式。理解了生产关系决定性的意义，生产力这个概念就不会是一个“一下子”解决了难题的、不可重构的词（马克思如何以及为什么得到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前人没有？），而是作为一个试图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条件的结果：生产者
518 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能力与实现劳动的条件的分离。

然而，与“神秘”的价值形式分析相比，劳动力的概念通过直接合理的方式描述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批判。1891 年，恩格斯使用这种更容易流行的方式，一反他早先主张的批判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必要性，为普及马克思理论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写了一篇基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导言。但是，原先认为是错误的概念——“劳动价值”，在新版中都替换为“劳动力”这个概念。虽然 1859 年以前出版的著作似乎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MEW 22，第 202 页），但现在马克思在认知方面的进步“都归结于一点”，即劳动力概念。替代的结果是用后期马克思的思维方式“翻新了”的早期著作，这样，早期著作就普及了与它相矛盾的后期理论。恩格斯认为，这会“大致有些像马克思在 1891 年写成的那样”（同上书，第 203 页）。实际上，这是一种奇特的理论混合体，到处都使人注意到单词替换不足以掩盖它对事物的理解是牵强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仍然缺乏对规定劳动力这一商品价值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的认识（MEW 23，第 185 页）：修订后的版本也坚持认为，劳动力是如同糖一样的商品（MEW 6，第 399 页），其价值确定最多存在这样的差异，“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中也应该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从而使工人种族能够存在”（同上书，第 406 页）。与之相反，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知道，“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MEW 23，第 185 页）。一

旦开启了这一视角，即劳动力价值大小的确定取决于各种关系间的斗争、建构需求和生活品位的斗争，那么性别关系的观点就不能排除——马克思本能地忽视了这一点，他将工人阶级的孩子称为
519 “替代者”（同上书，第 186 页）。一旦妇女运动抓住这一点，用全体再生产劳动问题和性别分工问题，将父权制批判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价值规定就一下子变得戏剧化了。

参考文献：

G. Bensussan, »Arbeitskraft«, in: KWM 1, 99-101; O. Negt u. A. Kluge, »Geschichtlich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svermögen«, in: dies.,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M 1981; K. R. Popper,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1944), Bern 1958, Bd 2.

库尔特·雅科布斯
（Kurt Jacobs）撰
宋珊 译，曹旸 校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neigunung, Arbeit, Arbeiterklasse, Arbeitszeit, Ausbeutung,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Form,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Gebrauchswer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Hausarbeit,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Kapital, Lohnarbeit, Mehrwert, Natur, Neoricardianismus, Patriarchat, Reproduktion, Sraffaismus, Stoffwechsel, Verwertungsprozeß, Wert, Wertform

失业（Arbeitslosigkeit）

1.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失业不过是“相对过剩人口”的一种表述形式而已。相对过剩人口是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它基于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使得越来越多的一部分人口结构性过剩。只要存在可能，重新刺激这部分人口中的至少一部分带来经济利润，失业人口就总会被当作“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K I*，MEW 23，第 661 页）。相对过剩人口有三种表现形式（潜在的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和流动的过剩人口），其中只有第二种由未就业的个人和被定义为失业的个人组成。对马克思的分析而言，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产生的劳动力“过剩”比特殊意义上的失业更为本质。

这一视角正是马克思分析的独创之处。为了理解经济发展进程对就业的影响，单分析失业的维度是不够的，更必须关注落后生产结构的变革所造成的过 520

剩人口所处的境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详细分析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连续过程，又在具有历史学品质的第24章，展现了这一部分人口最初如何产生，长期来看，他们的命运就是在工作和失业中做选择。在原始积累的进程中就出现了对土地“劳动力”的大量掠夺，贫困化是这个过程的主要结果之一，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尚未成熟，陷入贫困化的失业人口也失去了出路。波兰尼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失业开始于济贫法改革（*Poor law reforn act*，1834），他和马克思的分析可以互为补充。法律规定区分**值得救助的穷人**与**不值得救助的穷人**，区分需要帮助的穷人（孤儿、病弱的老人等）与不需要救济的有工作能力的穷人，因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失业者群体。

2. 显然马克思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非自愿的**结构性产物，是强加给无产阶级的处境，这正是马克思与那些把失业视为劳动力出售者的自由决定的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地方。失业的“自由”是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特有的观点，他们认为，各市场力量的自由竞争使得全社会实现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的最佳配置，如果劳动力没有被完全吸收，那是因为劳动力的价格太高。也就是说，失业是过高的工资水平导致的。

借助霍布森（Hobson）的研究（他在这个方面没有得到多少反响）和贝弗里奇（Beveridge）1930年的政治和学术著作，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首先在政治层面，然后才在科学和学术层面得到认可。贝弗里奇的工作揭穿了对失业者本人的指责，所谓失业者因自身的懒惰而无业，不具有任何科学上的合法性。贝弗里奇的解释具有双重的含义：他把失业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他称之为工业社会或者工业秩序）的本质联系起来；他重点强调社会干预的必要性，以减缓失业的影响。

凯恩斯（Keynes）对失业的结构性原因的分析虽然明显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之外，但仍须提及。凯恩斯和马克思一致认为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需求的特点和趋势，他明确引入非自愿失业这一概念，批判边际效用理论提出了他的分析。他也接受高工资与失业之间存在关联，他与边际效用论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评价工资（以及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对减少失业发挥的作用。边际效用论者认为，现实中只有降工资增利润才能减少失业，因为利润自然会用于新投资而且创造新岗位。凯恩斯认为这完全站不住脚，节约下来的工资会被积蓄起来，不会刺激投资以吸收失业者。凯恩斯认为，对就业岗位（包

521

括人为创造的岗位）的资助具有再分配效果，对经济体系有着刺激作用，其程度取决于劳动者收入用于消费支出带来的现实需求增长和激发的投资。为了避免或减少失业，凯恩斯的具体建议是对商品的需求的干预应该同对工资的干预一致，对商品量的干预应当同对商品价格的干预一致。

3. 在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上升本来总是伴随着危机和结构调整等阶段，但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大萧条的年代出现了真正的失业狂潮。绝非偶然的是，在这个年代，失业现象成了社会科学家最关注的问题，直到今天的调查研究中，失业者的境况仍一直是研究的对象。其中有至今仍然相当经典的两家研究，探讨失业引起的社会与心理代价：一派是英国的巴克（Bakke），他调查了“正常环境”下失业者的情况，在这个环境中失业是例外和非常规；一派是奥地利的雅荷达（Jahoda）、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采泽尔（Zeisel），
522 他们调查了“失业社区”，在这个环境中所有人实际上都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巴克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被调查者自尊的丧失，这也揭示了即便公共救济保障了物质存活，依然会出现严重的心理后果。雅荷达等人的玛丽谷（Marienthal，维也纳市郊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人聚居区。——译者）研究最具现实意义的结论是，丢失工作岗位以及普遍滋长的麻木不仁的态度，会造成时间观念的彻底丧失，随之而来的是社区全部社会生活的贫困化。这类话题自 20 世纪 30 年代末以来，在科学分析中逐渐失去了意义，直到 70 年代末福特制衰落，经济与社会形势急剧变化，失业呈现出迥乎以往的特点，有鉴于此，失业的心理和社会后果才得以重新讨论。

20 世纪 30 年代经历了将失业者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最有意义的实验，其间有共产主义政党的大力参与，同时这也是国家干预计划首次出现的年代，干预计划既有救助失业者的，也有创造劳动岗位的。后一类国家干预在美国比在欧洲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没有触及上层等级的利益，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在政治层面产生了消极影响。然而研究者普遍认为，不管在实施减少失业和失业救助政策的国家，还是在干预政策寥寥的国家，结果都并不乐观。30 年代的就业大危机的最终终结，与其说是干预政策，毋宁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扩军备战和战后大繁荣所导致的。

4. 在不同的历史与经济的背景下失业的结构与组成也各不相同。而且，失业表现出的特征，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表现为流动的形式还是凝结为潜在的形式。在

“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K I*, MEW 23，第 672 页）的时刻，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普遍化的时候，出现了第
523 一种类型的失业：未成为雇佣工人的男女劳动者的失业。然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最为人熟知的、研究最多的失业类型的代表，则是早已嵌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在反复出现的危机中被抛弃的男女工人。这类失业者，在危机时期呈现出群体庞大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条件下也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是社会心理学研究最多的对象。以上是第二种类型的失业，此外还有第三种——青年失业者，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成功找到一份工作或根本不具备一项技能。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尤其在西欧，失业又攀升到了很高的水平（失业率经常超过 10%）。美国的失业率在 80 年代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也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所未有的规模。苏联解体以后，失业率的重新急剧膨胀也深深影响了中欧、东欧的大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有社会的质变和工业领域的工作岗位的大量削减。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机制发生了急剧改变，也不意味着商品生产量的减少。欧洲国家工业的衰退，首先意味着工业部门岗位减少和工业结构急剧改变的历史现象，而且逆转了 19 世纪的主导倾向，依赖大工厂、倾向于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岗位的人数减少了（“福利国家”福特制时代工人阶级的中坚），而资本积累灵活、分布广泛的小企业的工作人数却呈上升趋势（尽管不成比例）。结果，不仅职业结构出现了改变，失业人口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

劳动需求的新趋势造成了当前的职业结构最显著的特点，即不定期岗位、
524 棘手岗位或兼职岗位的增长，这经常发生在一般所谓的非正式经济部门中。当前引人注目的，一方面是特定群体的长期失业，另一方面尤其是暂时性的失业，后者反映出青年和女性为主的劳动者在不断交替变换是属于就业市场还是属于劳动岗位。**激进经济学**（*Radical Economics*）一派的劳动市场研究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运用二元模型，指出工人阶级的大半部分在垄断领域有着稳定的工作，小半部分在竞争领域工作，工作不稳定且棘手，后者的特点是严重的就业不足。90 年代初工业衰退，大企业劳动需求结构性下滑，工资没有保障的“第二劳动市场”中的男女劳动者数量持续攀升。如果要用马克思的范畴来说，那就是停滞形式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显著增长。

劳动者的失业、就业不足，或青年一再的工作中断，在不同的国家，其

程度也各不相同。这两种现象目前不仅在危机时刻出现，在繁荣期也会出现，其根源一般而言在于资本主义结构无力做到使人各有业，而且，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长期以来也没有转化为劳动时间的缩减（8小时工作日的高墙半个多世纪以来未受触碰）。因此，一些国家的工会提出了相应的诉求，并不是偶然的。（1984年德国五金工会组织了争取35小时工作周的斗争，参见Haug 1985）

随着20世纪80年代失业的加重，失业又成了激辩的话题。一些研究者强调，福利体系的扩大缓和了工作岗位减少的后果，而且工作在当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正在动摇。然而无论有怎样的新情况，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发现的失业带来的心理后果（自尊、面向未来的态度、安全感的丧失等），仍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最近的医学文献也指出，失业对于轻度精神疾病等方面也有影响。最后，必须强调资源浪费严重的社会意义，它导致个体从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把个人的负担转移到了公共福利体系上。

525

参考文献

C. W. Bakke, *The Unemployed Man*, London 1935; W. Beveridge, *Unemployment: A Problem of Industry*, London 1930; S. Constantine, *Unemployment in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1980; S. Fineman (Hg.), *Unemployment: Person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ondon 1987; D. Fryey, P. Ullah, *Unemployed Peopl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1987; D. Gordon,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deremployment*, Lexington 1972; W. Hannington, *Unemployed Struggles (1919-1936)*, London 1979; W. F. Haug, »Arbeitszeitverkürzung als Gebot der elektronisch-autom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1985, 242-248; M. Jahoda, P. F. Lazarsfeld, H.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1933)*, Allensbach-Bonn 1960; M. Jahoda,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1982; K. M.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1957 (dt. Wien 1977); H. Schindler, A. Wacker, P. Wetzels (Hg.), *Familienleben in der Arbeitslosigkeit*, Heidelberg 1990; G. Therborn, *Why Are Some People More Unemployed than Others?*, London 1984.

恩里科·普格列瑟（Enrico Pugliese）撰
彼得·耶勒 译为德文
曹旸 译

参见：

Akkumulation, Arbeit, Arbeitskraft, Arbeitsmarkt,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Armut/Reichtum, Fordismus, Grenznutzentheorie,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informelle Wirtschaft, Pauper, Radical Economics,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Wohlfahrtsstaat

劳动市场（Arbeitsmarkt）

古典经济学学者、经历“自由劳动市场”制度化的同代人，都意识到劳动市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他们都知道，“劳动这一商品”明显与别的商品不同，“特别在于它具有**暂时的性质**，不能把它**蓄积起来**，它的**供应**不能像其他产品那样容易增加或减少”，这是马克思于1847年对约翰·威德（John Wade）《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1835）的论述所做出的总结。（MEW 6，第537页）

526 约翰·威德的论述曾尝试证明，“劳动”可轻易购买与出售。就“生产要素”而言，劳动市场的功能并不比其他市场逊色（例如资本市场及地产市场）。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新古典经济学派大师”，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始终清楚劳动市场的特质，甚至清楚卖身的工人所必须考虑的劳动市场的特殊缺陷。因此，在“制度主义学派的”（institutionalistische）经济学者中，劳动市场学说一直充满争议，直到最后广泛认同了人力资本理论。现在主流的劳动市场经济学说纷纭不一：微观经济学认为，任何个人所做的工作都得到均衡价格；宏观经济学则认为，存在不均衡价格。微观经济学展示出，只要卖方接受一定的低价，任意量的劳动可随时出售。宏观经济学的论述与此相反，劳动的最低价格预先就已外在确定（除此之外，这两种说法在今天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更多地表现为各经济主体针对其他主体行为的多种多样的“预期”的形式）。这两种学说在很多方面的应用都只涉及市场整体（Marktaggregaten）的机制，而该市场整体非常奇怪，只严格从**个人的**行为模式和决定推导出来。而且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劳动市场更有一些古怪，它的特点表现为劳动供应曲线的“逆向”运动，令经济学家们颇为费解：工资增加，劳动供应却不增加；工资减少，劳动供应迅速大量增加，这明显不符合普遍有效的“市场规律”。除此之外，亦有其他偏离常规的**反常现象**（*Anomalien*），难以通过主流的经济学说得到理解，例如固定工资、固定的工资结构、缺乏流动

性的劳动力、地方垄断、买卖双方的组织（企业联会及工会团体）。当然，主流经济学说只是将这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现象归因于失业等劳动市场的弊病。人们总说，如果一个市场如教科书所述般运作，就不会出现上述不良现象。

1. 马克思认为劳动市场不与其他市场相似或并立（MEW 23，第 183 页），而是与其他所有市场都不同（MEW 24，第 32 页；*Res*，MEGA II.4.1，第 89 页），“不同于产品市场……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Gr*，第 420 页；MEW 42，第 427 页）。在这里交易的劳动力是“虚拟商品”（fiktive Ware）或近似商品（Quasi-Ware），如“作为商品的土地”，或“作为商品的资本”。因此，劳动市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虚构市场”（fingierter Markt）（Polanyi 1977；马克思未采用这个术语）。劳动力进入所有其他商品的生产，因此是一种“基本商品”（Basisware）（Sraffa）。尽管劳动力是通过人的（教育和供给）劳动生产的，但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除了蓄养奴隶的情况）。劳动力只能被持有人和使用者**当作**（*als ob*）商品使用，这个“**当作**”才构成了劳动市场。劳动市场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的核心结构，只有具备了成型的劳动市场，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商品生产才有可能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参见 *Gr*，第 566 页；*Res*，MEGA II.4.1，第 28 页；MEW 25，第 650、886、889 页）包括“国有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tisch）在内的非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即“自由雇佣劳动者”）只是边缘现象甚或根本不存在。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的所有者和购买者都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完全按照**自由劳动市场**的逻辑行事。

1.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理论上预设了一个成熟的劳动市场，首先只指出了劳动市场以及雇佣劳动这一与之互补的范畴所带有的“历史痕迹”（MEW 23，第 183 页；参见 MEGA II，3.1，第 33 页），把劳动市场留到后面关于历史的一章论所谓原始积累时才细加讨论（*K I*，MEW 23，Kap. 24）。这些“痕迹”既漫长又血腥。潜在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在流通内部**找到**自由的工人”，这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MEGA II，3.1，第 33 页）这种发展要清除一系列阻碍，尤其要切断将劳动者束缚在特定的职业上、地区里、权威下的法律的和传统的纽带。（参见 *Res*，MEGA II.4.1，第 88 页；MEW 25，第 206 页；*Gr*，第 25 页；MEW 26.3，第 437 页）历史地、结构地看，是资产阶级国家废除了行会制度，确立了迁徙自由，让“自由市场”的竞争自行调节工

527

资和工作条件，它在“无产阶级化”和人类劳动力向商品的转变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自由劳动市场”是**政治上被制度化**的，没有任何“自然生长”的痕迹。（参见 Polanyi［1944］1977，第 97、105—106 页）国家制度化的强制劳动，长时间支配着资本主义的历史。“丧失财产的人宁可成为流浪者、强盗和乞丐，也
528 不愿意当工人”（*Gr*，第 624 页；MEW 42，第 631 页），因此必须被“强制接受雇佣劳动”（*Gr*，第 655、661 页）。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直到 19 世纪用尽一切手段（如对流浪汉的“血腥立法”，对新获得自由的奴隶的“黑人法令”，将工人方面的任何违约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加以特殊刑事处罚，具有阻吓效力的济贫法，限制工人流动的迁入迁出禁令）将失去财产的人驱向劳动市场并将他们固定在那里，也就是“把大批已变得无产的和自由的居民变成自由的雇佣工人”（*Gr*，第 655 页；MEW 42，第 661 页）。当代的劳动市场的前提自然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MEW 25，第 206 页）。但这类流动，至少民族国家内的流动，只有通过政治决定才最终得以实现，因为过多的自由会诱导潜在的劳动力出卖者离开劳动市场，只要他们除了在劳动市场上出售自己以外还有别的现实选择，这种风险就会始终存在。

只要美国还能在“西部荒野”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那里的劳动市场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那里，资本用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劳动市场往往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陷于空虚的情况。”（MEW 16，第 149 页）英国殖民政府早已尝试为劳动市场关上门闩，用尽一切办法“对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借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MEW 16，第 150 页；参见 MEW 23，第 798—799 页）。国家不但采取直接的强制措施，还善用经济压力，以影响劳动力所有者表面自由的决定。国家在这方面所做的和未做的，都会塑造劳动市场在不同国家呈现的特殊形式。但马克思只探讨已建构完成的劳动市场，没有考虑其民族差异。当时先进工业国家的劳动市场的各种特殊形式，如法国的**劳动交易所**（*Arbeitsörse*）、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会**职业介绍所**（*Arbeitsvermittlung*）、后来工会的和国有的职业介绍所、招募季节工等工种的地区性市场、集体工和派遣工等形式，这些情况在马克思的“一般 529
研究”中没有论及。

1.2 结构完善的劳动市场中的交换活动，形式上一如其他商品市场（*Gr*，第 566 页；MEW 26.1，第 374 页），实质上由于所交换的商品种类的使用价值，

它们并不相同。

什么东西在劳动市场上买和卖？马克思指出，这个东西不可能像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裔）所想的那样是“劳动”。一项劳动一旦完成，就不可能是劳动本身，而只有劳动的产品被拿来交换。劳动要属于劳动者本人以外的另一个人，就必须预先作为将来的劳动被转让。这样的劳动以各个具体个人的劳动能力、这些人的主观存在所包含的劳动素质和劳动可能性的形态存在，而且这种劳动只作为这些潜在劳动者愿意在一定的、协议好的条件下为另一个人劳动的承诺和意愿声明而存在。因此，在劳动市场交易的，就是对他人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使用他人劳动力的权利，或者说，对劳动力所有者允许另一个人使用其劳动力的承诺的权利。（*Gr*，第 193、201、946 页；MEGA II，3.1，第35 页；MEW 26.1，第291、373—374 页；MEW 26.3，第 109 页；MEW 6，第 597 页）

“自由”的劳动市场是针对“自由”劳动者的市场，不是奴隶市场。每个参与者都被预定为“自由人”，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并“把它作为商品来支配”。（MEGA II，3.1，第 32 页）人不通过交换的中介就不会拥有另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因此，每个人只能出售自己的劳动能力，劳动力是唯一一件必须“将自己”带到市场的商品。劳动力所有者必须“**亲自**把他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去［亲自］出售”（MEGA II，3.1，第 32 页）。

劳动者本身不被承认为“自由人”，只有到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阶段，才可能存在对他人（比如对一般认为“不成熟”的儿童）的劳动力的买卖。父母实际可以成为自己的孩子的劳动力贩卖者。马克思就工厂童工这一新历史现象评论道：“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MEW 23，第 418 页）童工（不论是在工厂还是在家庭工业工作）“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MEW 23；第 603 页；参见 MEW 23，第 419 页）。但有别于奴隶制“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他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MEW 24，第 475 页），成年自由工人原则上可以自行决定参与劳动市场与否，只要他还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如抢劫、乞讨、流浪、移民等这种或那种经济独立的方式。因此，每个想使用“自由工人”的劳动力的人，都可以与作为“自由人”和自身物品卖主的工人商定买卖合同，从而占有劳动力。只有总是将自身劳动能力在有限时间内的支配权出卖给别人，也就是将“支配权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出让，才能一直是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由占有者。（*Gr*，第 530

193 页；MEW 42，第 207 页）通过按时间出卖，劳动力所有者保留了对他一部分生命时间（并非巧合地叫作“自由时间”）的支配权，同时，劳动力所有者有机会寻找其他买者，特别是能开出更好条件的买者。（*Gr*，第 193、201 页；MEW 23，第 182 页；MEW 26.1，第 109 页；MEW 26.3，第 291 页）因为每个人只占有自己那一份的“劳动力这一商品”，劳动市场上每个人的行为理论上也都是只为了自己。劳动力出卖者相互竞争，一如劳动力购买者。

与其他商品市场不同，买卖双方在此不可互换。仅就交易过程的观察所得，卖者相对于买者是同样的人，是“平等者”，“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Gr*，第 194—195 页；MEW 42，第 209 页）但是，出卖其劳动能力的人，通常不会购买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权。反过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购买他人劳动力的人，通常也不会成为其自身劳动力的卖者。尽管他们作为私人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两种角色分属不同的阶级。在劳动市场上一群人只能和只想卖，另一群人只能和只想买，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如同劳动市场本身已通过政治途径被制度化了）生产者和所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分离或隔绝造成的。（*Res*，MEGA II.4.1，第 89 页；参见 MEW 23，第 183 页）一无所有只剩自己的劳动能力却缺乏自己的生产资料而无法发挥劳动能力的人，缺乏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无力获取自己的生产资料甚至不能将自己再生产出来的人，丧失财产失去信用的人，都有可能出卖其劳动能力的支配权，通过交换来 531
换取金钱，好进入食品市场。（*Gr*，第 195、199—200 页）相反，占有或能够购买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多于其自身消耗的人，有可能获取对其他许多人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从而得到生产除劳动力这一商品以外的所有种类的商品的机会。就是说：对一群人来说，让其他人为其工作从而多半会致富的可能性，对另一群人来说，则是勉强维持其生活的必然性，或（几乎最重要的和唯一的）可能性。这对劳动市场上的卖者来说“关乎生存”，对买者来说关乎可能的利润（或损失），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关乎生存。（MEW 6，第 542 页）出卖者必需出卖，而且必须不断重新出卖（*Gr*，第 193、201 页；MEW 42，第 207—208 页）；卖者无法等待更有利的劳动市场行情同时囤积其商品；卖者更无法按照他们的意愿来生产或者按照他们的市场估算来减少他们各自的、可供出售的商品的质和量（参见 MEW 6，第 537、542 页）。相反，买者无论如何都不必只在同一个范围购买，他们可以退出劳动市场，“等待”并同时将其金钱贮藏、花费或作为货币资本投资。

马克思因而认为，劳动市场是一个市场形式的体制化的权力结构，其中经济上和社会上不平等的人作为形式上平等而自由的人彼此产生关系。劳动力出卖者所面临的强制卖身，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通过“雇主的经常更换”，通过“契约（自由的劳动合同）的法律拟制（fictio juris）”，以及通过“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等不同因素“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MEW 23，第 599、603、642 页）

即使许多或大多数卖者和买者都在劳动市场顺利完成了交易，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都绝异于其他所有的交换关系。因为“劳动能力存在于主体本身的生命力中”，“只作为工人活的机体内的本领、才能、能力”，和人不可分离地生长在一起。因此交换将买者提升为另一个主体的一段生命和最重要的生命
532 活动之一的暂时的主人（参见 *Gr*，第 946、193 页；MEGA II，3.1，第 45 页；MEW 6，第 597 页）。每份劳工合同都会令买者必须支付一定的价格，以获得对他者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的使用。（MEW 26.1，第 370 页；参见 *Gr*，第 201 页；MEW 42，第 207 页）然而使用权和支配权的内容始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被出卖的劳动能力的使用空间、时间及素质都有界线。然而，界线内永远是买者的活动空间。买者甚至可以满足于对他人劳动能力的“单纯支配权”，“不让工人实际劳动”。（*Gr*，第 193、228 页；MEW 42，第 207 页）另一方面，即使出卖完成以后，也总是工人自己继续占有其体力和脑力；买者首先得让工人服从自己的意愿，却在作为人的工人这里寸步难行。因为劳动能力与其载体不能分割，而这一载体保留着他本身的财产——作为人的自由，所以，定义模糊的买者使用权与劳动力所有者的所有权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劳动合同在劳动市场结束了交易，却制度化了一种“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MEW 23，第 249 页）。在这类的冲突中，雇主寻求维护“作为买者的权利”，工人寻求维护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卖者的权利”。（同上）双方通过长期争执不断界定了各种冲突情形，法律和（或）集体合同确立了最低劳动条件和正常劳动条件，并不断更新细化。（参见对“**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的论述，MEW 23，第 249 页及以下）

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的手稿中尝试用公式把握劳动市场上进行的交换的独特之处。这种交换分解为“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程”。首先是对劳动能力支配权的正式让渡，工人得以赚取金钱，之后，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才开始买

者的使用。这意味着，当“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启动时，商品与货币的相互转换在此情况下才得以完成。（MEW 42，第 199—200 页；*Gr*，第 185 页）而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把资本和劳动**
533 **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区别开了**”（MEW 42，第 200 页；*Gr*，第 186 页）。但是马克思马上发现，第二个行为是“**在质上与交换行为不同的过程**”，因此只是遭到滥用和误解时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MEW 42，第 201 页；*Gr*，第 186 页）在随后的手稿中，便没有再对劳动市场中特殊的交换形式做出描述。

另一个独特之处是，这一商品的买者“只是在他消费了劳动之后，才对劳动支付代价，而其他商品则在消费之前就得到了支付”（MEW 26.1，第 290 页）。只有在卖者真正为买者劳动之后，这一商品才算被转让。在所有资本关系发达的国家，“只有在劳动能力本身发挥作用之后，才付给工人劳动能力的报酬”（MEGA II，3.1，第 46—47 页）。因此和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对，不是作为买者的资本家，而是作为卖者的工人在预付，他预付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给买者以（商品）信贷。（参见 MEW 26.3，第 110 页；MEW 23，第 188 页多处）马克思强调，在所有危机时期可以看到，“工人的信贷并不是空话，因为他们得不到报酬”（MEGA II，3.1，第 47 页）。马克思认为，劳动工资的事后支付是“关系的本质规定”（*Gr*，第 185 页；MEW 42，第 200 页）。虽然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卖者不仅必须给出，也完全可以得到商品信贷（为此当然还得支付利息，例如消费品市场上的分期支付形式），但是劳动合同的性质 —— 劳动承诺换取支付承诺 —— 始终不变。工资预支这种相反的情况是“不自由的”雇佣劳动形式的标志（债奴制、苦力制），这些工人被迫“做工偿还”预支的工资，从而长期地失去了作为劳动力卖者的行动自由。

1.3 劳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斯密、萨伊（Say）、马尔萨斯、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视本国人口增长为决定劳动市场供应量的最重要的外在因素。他们的人口理论假定父母是理性算计的，根据后代在劳动市场的机会调节自己的生育和抚养行为 —— 这在童工盛行的地方（如工业化早期的英国或今天许多“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地 534
区）也不无道理。这种观点认为劳动供给者自己通过繁殖决定着劳动市场的供给，马尔萨斯和同时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鼓吹这一理论的实际应用 —— 节制性欲，以尽可能限制劳动市场的供给。马克思多次批判了这些论调（参见 MEW 6，第 546 页及以下；MEW 23，第 648—649 页；MEW 25，第 228—229 页；MEW

26.1，第 271—272 页；MEW 26.2，第 108 页及以下，第 112 页及以下；MEW 26.3，第 30、46—47 页；MEW 42，第 506 页及以下；*Gr*，第 499 页及以下多处）。相反他努力证明，不仅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劳动力的供给都首先是由资本积累运动决定的——这一修正的意义不可估量。如果马克思是对的，那么所有形式的失业都不是外在决定的“劳动供给”和内在决定的“劳动需求”之间有“缺口”的结果，而是众多资本家在和劳动力卖者不可避免的长期斗争中采取的多种雇佣策略的结果。（参见 de Gaudemar 1976，第 183 页）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是他劳动市场理论的一部分，一如“失业”这个新的历史范畴完完全全属于“自由市场”的时代。首先，为了能够劳动必须出卖劳动力的现代雇佣工人才可能失业；然后，马克思讽刺地评论道：“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MEW 23，第 187 页）。劳动能力就总是一件而且是唯一一件其占有者能出卖且必须出卖的商品。只有作为找工作的失业者，即作为寻找其劳动能力的买者的失业者，现代雇佣工人才会完完全全按劳动市场的逻辑行事：只要他的商品劳动力没有卖出，他就什么都不是，无法劳动，做不了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商品卖不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他的商品的买者，并努力为了潜在买者保持他的商品新鲜诱人。劳动市场对于现代雇佣工人而言是中央市场，只有在劳动市场周期性卖身，他才能获得金钱、信用和商品，从而进入其他情况下（除非他盗窃或领取施舍）对他关闭的现代商品市场。因此卖者知道要听从劳动市场的信号，并适应潜在或实际的买者的心意。

从买到的一定时间的劳动力的既定量中得到的劳动量，可以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内变动，这对于劳动力买者十分有利。因为“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在一定（完全可变的）程度上总是独立于“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MEW 23，第 323、571 页）。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劳动量增加，即使没有新技术，也绝不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MEW 23，第 665 页）马克思根据这一“基本规律”（MEW 23，第 323 页）提出他的“劳动供求规律”（MEW 23，第 668 页）。这就简要地说明，资本的扩张与收缩会调节劳动的供求（MEW 23，第 666 页）。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需求取决于资本的大小和“有机构成”，根据资本是否和如何增长和（或）资本组成的变化情况而增减（MEW 23，第 640、668 页），这是十分明显的。困难的是解释供给方面，马克思承认，这里实际上是绝对大小或“增长着的工人

535

数量”即劳动力卖者阶级起决定作用。（MEW 23，第 641、669 页；*Res*，MEGA II.4.1，第 126 页）这个数量绝不取决于人口，或者说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部分的“自然”再生产和增长。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其“特有的人口规律”（MEW 23，第 660 页），因而在资本积累中就包含了“创造雇佣劳动者”（*Res*，同上处）。

资本家如何影响劳动市场的供给？第一，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商品生产，在竞争中击垮非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进入原先个体劳动和自给自足生产的“非资本主义的”地盘。这两种途径都一再迫使新的非雇佣工人转变成雇佣工人。第二，资本家经常把一部分现有的劳动人口变成“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MEW 23，第 658 页）。为达到以上目的，资本家不断发展并在各处运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毫无顾忌地根据纯粹的经济算计将人类劳动力当作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处理，随时随地凡可能都推广节约劳力的理性化和技术升级。尤其是工业生产中机械设备的推广和不断升级，各种机器和工具——就像取代了人类劳动力的东西（机械化和自动化）一样，它们的运转不依赖于人类劳动力的动机、才智、耐力和手工技能——的使用，导致雇佣量相对于资本大小和生产规模而减少。（参见马克思对反对上述观点的所谓“补偿理论”的批判：MEW 6，第 421—422 页；MEW 23，第 461 页及以下；MEW 26. 2，第 554 页及以下；MEGAII，3.6，第 2058—2059 页）结果是，即使工人人口，可支配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没有增长，劳动市场于经济景气的短暂阶段内也总是出现无业者和就业不足者供过于求的情况。（MEW 26. 2，第 562 页）需求与供给绝“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相反，资本通过系统地降低劳动需求，使得劳动力供给长期过剩，“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MEW 23，第 669 页）

这样，资本不单独立于“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MEW 23，第 661 页），还控制了“自由劳动市场”及其行情。结果持续产生“过剩的工人人口”，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其必然条件。（MEW 23，第 661 页；参见上书第 664 页，第 666 页及以下，第 796—797 页；MEW 26. 2，第 562 页及以下；*Gr*，第 302—303、503—504 页）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产业战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如马克思早在 1849 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写的，“**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争，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MEW 6，

第 421 页）。结果，“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MEW 23，第 796 页）。

过剩劳动力既然是可流动可变化的，也就是说，它能运用于许多地方的不同职业和领域，于是它就为资本组成了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MEW 23，第 661 页）。因此马克思清晰地区分了“过剩人口”和“后备军”，又辨析了劳动市场储备的流动的、潜在的、停滞的“存在形式”。（参见 MEW 23，第 670 页及以下）不是所有“释出的”、“过量的”工人都可以受所有资本家的支配和使用。为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做（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的假设（劳动供给的同质性）。马克思试图呈
537 现“自由的雇佣工人”如何历史地，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获得了“流动”和“可变”的特质。因为雇佣工人作为自由的私人个体没有主人，不从属于任何集体，因为他必须出卖自己，因为他任何一次成功的劳动力出卖都不保证，将来哪怕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继续出卖自己，所以他学会了流动。他倾向于养成强大的适应能力，以及一种面对不停变换的工作岗位、职业和活动的普遍态度，马克思将这种普遍态度称为“对劳动的特定内容无所谓的态度”（*Res*，MEGA II.4.1，第 104 页）。这样的雇佣工人完全听命于劳动市场，可以以最“无所谓的态度在极其不同的劳动部门中”（同上书，第 104 页）转来转去，完全根据哪里答应了“较好工资”（同上书，第 89 页），或仅仅由于哪里有工作。资本主义大工业越发达，工厂劳动越丧失任何特殊的、“技艺的性质”（*Gr*，第 204、584 页；MEW 42，第 218 页），机器带来的、已在各个工厂内使工人个人变得可替代的“各种劳动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越发展，雇佣工人群众的工作就越简单（MEW 23，第 442 页及以下）。

然而，由于科技革新或理性化而“游离”出来的雇佣工人的个体劳动能力不会按照命令改变，任意改变，或按照劳动力需求改变。毋宁说，雇佣工人因教育、传统、习惯而形成的劳动市场定位表现在，每一代新工人总是先找工作赚取工资，继而才寻找特定的职业。相反，熟练和培训充分的工人必须懂得每次付出短暂的时间和他们可承受的代价，利用他们在战略性交易中的唯一优势，即他们在空间、岗位、职业和领域上的当下和一贯的流动性。（参见 MEW 25，第 206 页）由于普遍的劳动“去资格化”的趋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出来的——对工人而言，劳动变得简单了，因为大工业倾向于将所有（工厂）劳动降为“简单”劳动。根据这一设想，劳动市场上对“简

单劳动力”，即对“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MEW 23，第 59 页）的需求将增
538 长。工厂部门的趋势是“将所有劳动能力降低为**简单**劳动能力，将所有劳动降低为简单劳动”（MEWA II，3.6，第 2053、2016 页），马克思认为，劳动市场“自由竞争”的先决条件，正是“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MEW 25，第 206—207 页；参见 MEW 16，第 150 页；MEW 26.3，第 437 页）。只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才是一个劳动以及一切与劳动相关的事物都由劳动市场支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马克思于 1857 年写道：这种状况“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最为发达”（*Gr*，第 25 页；MEW 42，第 38—39 页；参见 MEW 23，第 212 页）。

就工业周期的问题，马克思也对古典人口理论做出了进一步反驳。如果说劳动供给的增长或减少取决于成年工人有多少子女，希望和能够养育多少子女，而这又取决于工资；即使采取了童工最极端的形式，劳动供给的增长也从来不能赶上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工人下一代长大之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MEW 23，第 666—667 页）。马克思认为，当代工业资本无论如何都绝不会等待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

1.4 劳动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一个世界市场、一个环绕世界的资本市场和一个“世界劳动市场”的类似物，其中的劳动力后备军就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或多或少无产阶级化了的人口。同时，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工人人口开始或者先于资本流向殖民地国家（参见 MEW 23，第 482—483、599—600、639 页），或者追随外流的资本流向国外（MEW 23，第 670 页）。可以说，“每年……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MEW 23，第 639 页）。人群的大迁徙运动便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色，他们随身带走 539
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意识到了这个发展的苗头，虽然他们研究的主要是被驱赶的爱尔兰农民移民到英国、美国、澳洲和欧洲无产阶级移民到美国等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参见 MEW 16，第 388 页；MEW 23，第 731 页及以下，第 799 页及以下；MEW 32，第 668—669 页）他们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在殖民地和在欧洲“宗主国”的企图，时而用系统的迁出限令，时而用

系统的迁入政策，竭力“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MEW 23，第 800 页）。他们还清楚看到，世界劳动市场。在欧洲以外的地方绝大部分仍是（奴隶或苦力的）“不自由劳动”的市场。（参见 MEW 23，第 779、787 页；MEW 24，第 475 页；MEW 38，第 470 页；MEW 39，第 298—299 页）

2. 罗莎·卢森堡第一个提出，非雇佣工人向雇佣工人的转变是一个持续的、全球的进程，这一进程因为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空间”挺进而必然发生。（参见 GW 5，第 316 页及以下）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地依赖于“资本主义的雇佣无产者的自然繁殖”所无法提供的“追加的劳动力”；“令劳动力‘自由’游离和强迫劳动力为资本劳动”，是资本在“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持续扩张的动力之一。不仅在“原始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摧毁了各地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吸纳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人口作为国际劳动市场的后备劳动力。因此正如奥托·鲍威尔指出的，资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其核心国家的人口增长（WA 7，第 1039 页）。

弗里茨·施特恩堡（Fritz Sternberg）是 20 世纪 20 年代系统研究世界劳动市场上过剩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和过剩人口成因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休猎期”（Schonzeit）理论的基础是，区分从前资本主义空间和资本主义不发达地区吸纳的“外生”过剩人口，和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雇佣工人人口中吸纳的“内生”过剩人口。他又将过剩人口分为“内在的”和“外在的”。施特恩堡认为，资本输出在非资 540
本主义的领土上制造了外在的、外生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存在越久，对资本输出国的劳动市场压力就越大。（参见 1926，第 32 页及以下，第 46 页）施特恩堡用“休猎期”形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内部过剩人口被消化、外部过剩人口还未露端倪的阶段。在此期间，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雇佣工人享有相对有利的劳动市场环境。（同上书，第 39 页及以下，第 68、75—76 页）

3. **劳动市场的分裂与分化**。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一样，理论上将劳动市场视为一个“自由竞争”统治的市场，不仅在每个工业部门、每个职业、每个地区内部，而且在部门、职业和地区之间都存在自由竞争。（参见 MEW 6，第 542 页；MEW 25，第 206 页）因此马克思只认识到劳动市场会分化出特殊生产部门的或地方的局部劳动市场（MEW 23，第 668 页）。而他认为，由于雇佣工人对工作岗位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对劳

动力的双重竞争，这种分化不会造成劳动市场的持续分裂；相反，工人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流入流出会使工资和劳动条件不断得到平衡，从而趋向于达到“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在一般研究中，马克思预设“一般的剩余价值率”是给定的，为简便起见没有考虑任何可能“会造成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的实际阻力”。（参见 MEW 25，第 184 页；MEW 23，第 668 页）他也十分清楚种族和民族因素在工人运动中对劳动市场的分裂（参见英格兰工人与爱尔兰工人在英国的矛盾，MEW 6，第 542 页；MEW 16，第 388—389、416—417 页），只是他论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时给人以这种印象，仿佛单独的国家是彼此相对长期隔绝的国民劳动市场，每个劳动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特定的“国民平均水平”和各自的国民工资水平。而“各个国民工资的同一时期的差异”的前提是，（潜在的）雇佣工人跨越国界的国际流动尚未发挥重要作用。（参见 MEW 23，第 583 页及以下）

3.1 现在流行的劳动市场**分割**、劳动市场**部门**、“第一”、“第二”或“第三”劳动市场等说法，马克思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谈到过。20 世纪 20 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断言，从一个（地区的或部门的）局部劳动市场转入另一个，虽然花费金钱和时间，但原则上完全是畅通的，因此职业和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别不可能长期居高不下。（参见 Bauer，WA 4，第 683 页及以下）马克思认为技能差异会被不断拉平，因此没有重视劳动市场出现的分割趋势。（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 Braverman 1974）而且，他在《资本论》中恪守抽象的方法论，只探讨资本和劳动的“一般关系”，因此他没有考虑到讨论“劳动市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工人竞争”（MEW 23，第 486 页）的诸多形式（技术工对非技术工、男工对女工、童工对成年工、职工对失业者等），尽管他偶然提到并说明了工人“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竞争的几个断面（参见 MEW 23，第 496、668—669 页；MEW 25，第 98 页；MEW 26.1，第 91—92 页；MEW 26.3，第 302—303 页等处）。在《资本论》中没有提到“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MEW 23，第 668 页）《资本论》第三卷将工人在各生产部门之间流入和流出的运动的结果假定为既成的，之所以这样简化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工人之间的竞争是一个依赖于资本家的竞争的变量。然而，资本“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MEW 23，第 571 页）这一事实正是在理论上探讨工会的出发点（参见 MEW 16，第 196 页；MEW 23，第 669 页）。

541

3.2 现在的劳动市场理论绝大多数聚焦于一个劳动市场向多个局部劳动市场的**分割**，各个局部劳动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流动性。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更深入地研究了劳动市场，将它视为**构造**特殊的市场，这与或多或少仅认识“完美”市场的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迥然不同。整个劳动市场，以及各个局部劳动市场本身，都裂解为一个“内部”劳动市场和一个“外部”劳动市场。（参见 Kerr，1950）“内部”劳动市场处在企业之内，小心地隔绝了所有“局外人”的参与，各部门之间在一个（大）企业的等级体系内对
542 工作岗位、“位置”和地位的竞争，被限制在那些（长期）职工里的“骨干”或“核心”当中。对工资更高、作用更大、更舒适的工作岗位和职务的竞争，则有企业领导和长期职工协议好的相当固定的规矩可循（比如企业等级体系中的升迁资格标准、裁员时的老员工优待政策）。这种“内部”劳动市场隔绝于“外部”劳动市场的无序竞争，其建构和维护都是现代企业管理者重要的统治手段，尤其是在大企业（和跨国康采恩）中。（参见 Doeringer / Piore 1971；Burawoy 1979）

3.3“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美国等地接续“制度经济学派”的工作，发展了劳动市场分割的理论，以解释雇佣工人人口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双重（或二元）劳动市场”理论把劳动市场**分割**为两个部分 ——“主要”劳动市场和“次要”劳动市场。沿着这一思路，70 年代初又在主要劳动市场中细分出两个部分 ——“独立”工作和“从属”工作。主要劳动市场提供工资更高的、体面的，特别是稳定的、有升迁前景的工作，次要劳动市场只有低工资、低技术的、没有升迁前景的工作。（参见 Doeringer / Piore 1971，第 55、165 页；Edwards 1985 等）每个部分中各有独特的流动形式：在主要劳动市场，工人大多致力谋求公司、企业内的职业前途，就会留在一个职业群体内，“独立”工作和“从属”工作的不同则在于各自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形式的不同。在次要劳动市场，工作岗位、活动、职业和地点频繁变动，职业前途和追求大多仅限于更高的工资。主要和次要劳动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流动，因 543
此劳动市场的分割对应着工人阶级（包括相应的“后备军”）的分裂。

大多“激进经济学者”倾向于认为，导致劳动市场这一结构的，主要是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和公司的组织策略和调控策略，不过（有组织的）雇佣工人的防御性市场策略（隔绝某些局部劳动市场向新人和外来者开放）也具有一定作用。（参见 Reich 等 1973；Edwards 1985; Gordon 等 1982）奥菲（Offe）和欣里希

斯（Hinrichs）尝试立足于劳动力买者的劳动市场策略展开解释（1977，第 10 页，第 32 页及以下）：劳动力所有者的不同群体的出卖机会愈发不等，以至于导致了劳动市场的“分裂”，因为仍具“劳动市场之外的其他选择”的劳动力卖者，或者说劳动力买者认为具有这些选项的劳动力卖者，和那些别无任何选择的劳动力卖者，或者说劳动力买者不愿令其离开劳动市场另择别路的劳动力卖者相比，会得到劳动力买者截然不同的对待。雇佣工人如果在劳动市场以外有“另外的角色”——如女性是家庭主妇，青年人是学生或学徒，老年人同时领退休金，移民工人在故土有别的身份——劳动力买者就会考虑到劳动力流失风险高，按市场理性只向上述工人提供廉价的低端工作岗位、短暂的适应时间和低招聘工资（同上书，第 37 页），即使这么做劳动力流失的风险更高。相反，只有不考虑“自愿”退出劳动市场的工人，才会得到高薪工作岗位以及与之相连的企业内部培训、教育、长适应时间。这也就说明了，资本家如果既不能用机器也不能用其他工人取代某些雇佣工人，缺乏“严厉”的监管技术而只能依赖这些工人的积极性，就会小心地对待他们，以把劳动力流失风险降到最低。

3.4 研究“专业化”现象的理论则相反，它关注劳动力供给者的策略。（参见 Johnson 1972）所有算是专业工人的群体，都竭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特殊的局部劳动市场，既隔绝开广大的非技术工人，也隔绝开其他种类的专业工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组建了特殊的“职业群体”，自行监管职业准入，也即 544
专业资格的申请。长时间培训、各种考核等，都旨在系统地限制职业准入，防止劳动力大量供给形成竞争。然而，劳动力买者完全有可能反制这种垄断局部劳动市场的企图：他们可以向相近的职业群体开放工作岗位，以挑起竞争；他们可以用各种本企业特有的、必须在本企业才能掌握的资格抵制该职业群体规定的“资格”；最后他们还可以尝试采用机器以摆脱对特定类型的专业工人的依赖。因而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有整个职业一起消亡，不过分工的深入又总是重新提供专业化和新职业群体形成的机会。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Arbeitsmarkt und Krise«, in: M. Bolle (Hg.), *Arbeitsmarkttheorie und Arbeitsmarktpolitik*, Opladen 1976, 48-67; H.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g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London 1974 (dt. 1982); M.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1979; P. Doeringer u. M. Piore, *Internal Labou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Lexington 1971; R. C. Edwards, *Herrschaf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t/M 1985; J. -P. de Gaudemar, *Mobilité du Travail et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Paris 1976; S. Gensior, B. Krais, »Gesellschaftstheoretische Erklärungsmuster von Arbeitsmärkten«, in: M. Bolle (Hg.), 1976, 92-114; D. M. Gordon, R. C. Edwards, M. 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1982; T. Johnson, *Professions and Power*, London 1972; C. Kerr, »Labor Markets: Their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Jg., 1950, 275-291; C. Offe u. K. Hinrichs, »Sozialökonomie des Arbeitsmarktes und die Lage benachteiligter Gruppen von Arbeitnehmern«, in: Projektgruppe Arbeitsmarktpolitik, C. Offe (Hg.), *Opfer des Arbeitsmarkts. Zur Theorie der strukturierten Arbeitslosigkeit*, Neuwied-Darmstadt 1977;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Urprünge von Gesellschaften und Wirtschaftssystemen* (1944), Neuausgabe Wien 1977; L. Potts, *Weltmarkt für Arbeitskraft. Von der Kolonisation Amerikas bis zu den Migrationen der Gegenwart*, Hamburg 1988; M. Reich u. a., »Dual Labor Markets. A Theory of Labou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Jg., 1973, H. 2, 359-365;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1926), Frankfurt/M 1971.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撰
曹旸 译 郑芷萍 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teilung, Arbeitszeit, Automation, Beruf, Betrieb, Dritte Welt,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Fabrik, Facharbeiter, Fordismus, Frauenarbeit, Gewerkschaften,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Gleichgültigkeit,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inderarbeit, Lohn, Lohnarbeit, Migration, ökonomische Konjunktur, organische Zusammensetzung, Proletarisierung, Qualifikation, Radical Economics, Rationalisierung, Segmentierung der Arbeiterklasse, Sklaverei,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Überbevölkerung, Weltmarkt

劳动组织（Arbeitsorganisation）

劳动组织并非马克思发明的社会科学或政治学概念。然而，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分析在马克思这里得以重构；马克思对国有劳动组织的批判中很大程度上缺少这种组织分析。

1.“**组织**”。市民社会是组织产生的历史前提。在政治学语境中，组织概念的引入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组织”起初指有计划地建立和重建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千差万别的国家措施：宪法改革、行政改革、军事改革、机构设置、法律诉讼、对资源和人口进行的有目的的调动。该术语随着与法国大革命相联系的变革在欧洲非常迅速地传播开来。圣西门及其追随者在使用该概念时对意义进行了扩展：**劳动的组织**在他们看来主要是指**生产**的有计划的变革和管理。这一概念被纲领性地放在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的对立面。

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组织概念才在管理学讨论中和在十分不同的社会构成如军队、国家行政机构、工业企业、政党和工会的学术讨论中使用，此时竞争性的概念继续被使用（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指的“团体”，*WuG*，1921，第26页及以下），而且组织的概念经常作为官僚机构的同义词使用。如今，**组织**是指一个持久的、目标导向的行动联系体。行动者是组织（也许只是表面上）自愿的成员，他们的行动遵循组织规则。前提是组织成员拥有合法的 546
自我支配权和公民自由。组织的概念不再针对全社会，还只针对看似有计划的单独的行动联系。

当马克思提到劳动组织，通常情况下他指的仍是劳动的总社会组织。（参见*K I*，MEW 23，第377页）社会学致力于科学的组织概念。在马克思的问题体系中，劳动组织概念的重构着眼于社会学上的组织概念。

2. 资本主义企业的意义在于通过工业生产的手段将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组织受在其中起作用的行为理性的强制影响，被确定为这种作为**增殖工具**的目标结构。通过以增殖为目的的工具化，劳动组织获得了一个高度抽象和有效公开的定位——钱应该产生更多的钱，而且是连续不断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服务于一个具体、个别有用性的体系，相反，“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了“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Gr*，第313页；MEW 42，第323页）

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组织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商品化、货币化、无产阶级化和合法化。这些也正是这种

劳动组织的结果。这些社会条件的再生产使劳动组织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度化**的一个主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生产被纳入总资本的再生产中，不过，是作为独立的私人劳动制度，以单个资本主义的形式分开组织的。结合与分割单个资本主义生产和总资本再生产的这种形式，同时也使以下现象制度化了，即资本所有者在社会上就像他在劳动组织中一样能比以工资为生的人更好地获得自身利益（权力不对称性）。以工资为生的人只能通过与单个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或“理想的”总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劳动组织终究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赤裸裸的经济利益
547 促成了这一关系，将诸如“妇女、男女青年和儿童”排除在外的等级规范和其他传统规范废除了（*K I*，MEW 23，第514 页），这使得劳动组织与传统生产中的“共有”的关系形式区分开来。关于“制度化的会员”的劳动生产力，正如组织社会学所言，联合起来的以工资为生的人不再是那些“单个的独立劳动者”（同上书，第 354 页），而是社会的集体力量。“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第 349 页）然而，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协会**，因为这一关系形式的社会化是异化的社会化：是资本将生产者联系起来，用他们进行生产，而不是这些生产者自己联合起来进行生产。（同上书，第352 页及以下，多处）

3. 马克思是从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劳动组织的，它遵循的是矛盾地展开的危机性发展概念（*K I*，MEW 23，第512 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潜在的矛盾关系，以及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在劳动组织的百年发展中留下了典型冲突的印记。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被规定为**协作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以及**权力过程**的冲突又矛盾的统一体。劳动组织的这三重规定似乎与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视为劳动过程与增殖过程统一体的标准表述相矛盾，然而它们是从马克思关于管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讨论中得出的。

“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组织生产，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同上书，第 350 页）马克思认为这种职能属于每一个协作生产过程。然而，作为资本的职能，它同时也成为“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同上），因此“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同上书，第 351 页）。最后，它独立成为指导性的、有纪律的

指挥棒（参见第 351—352 页，第 445 页及以下；*K III*，MEW 25，第 397 页及以下）。在不断变化的表述中——资本的专制、“资本家的权威”（*K I*，MEW 23，第 351 页），“资本统治劳动”（同上书，第 386 页），工厂是温和的监狱（Fourier，同上书，第 450 页），机器是“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第 459 页），雇佣工人是“劳动奴隶”（第 471 页）等——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第三重特征的意义即
548 权力的结构化存在得到了强调。劳动组织这些矛盾因素的冲突恰恰将它分析拆解为同向和反向两个阶段：

3.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同向运动。** 劳动组织的资本主义工具化，通过生产过程废除或明显推迟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限制，将生产力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生产对自然的依赖减轻了，对有限人类劳动行为、“人力限制”（第 398 页）、人的技艺（第 403—404 页）以及“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第 407 页）的依赖也减轻了；与此同时，依据等级规范的社会缔结撤除了这些限制。这对破坏传统社会形式和传统技艺有着负面影响。从正面影响而言，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在计划性、社会性、科学化、工艺简单化、活动和会员的普遍化方面表现突出（参见第 351、510、512—513、514、526 页）。马克思将此归于资本的文明一面。这里集中了强制价值增殖、权力结构化和强制协作：生产过程的工具化是以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我工具化为前提的，并要求工人服从资本所有者的指挥（“统治”）。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准备好了条件，将生产劳动从工人的阶级属性中解放出来。

3.2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反向运动。** 尽管劳动组织的技术基础和社会构成不断变革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生产力的发展却仍然受限。因为根据商品生产的法律，资本所有者只需为所使用的雇佣劳动支付报酬，但不需为获得的剩余劳动支付报酬，所以当投入生产的技术的价值低于生产所使用的要被技术替代的劳动的价值（必要劳动加上剩余劳动）时，他们对技术投入并不会感兴趣，而当技术的价值低于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时，他们才会对此感兴趣。“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K I*，MEW 23，第 414 页注释 116a）资本作为生产的技术化界限，与一个共产主义 549
社会的社会生产相比较，而共产主义社会迄今为止只存在于马克思有条理的科学预见中。第二个决定性的限制之所以产生，在于劳动组织是以单个资本的方式被制度化的，私人分散的决策体系看不到总资本的循环。这导致劳动组织的自然前提和社会前提有被损坏的趋势，并（由此重叠地，但在分析上有区别地）

导致生产力的毁灭。马克思写道（第529—530页），资本主义生产损害所有财富的来源：土地和工人，因为这对被“损害的”单个资本不造成任何费用。大工业及其权力结构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不顾工作普遍化的技术基础，将雇佣工人贬低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第508页）。单个资本的生产不考虑需求的支付能力和有支付能力者的需求结构（积累过剩和不平衡问题），这也导致了生产力的毁灭。

这种冲突局面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第512页），以确保工业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第526页）。然而马克思认为“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就比如劳动力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第512页），这种危机局面只有在“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才可能瓦解（同上）。

3.3 从克服其专制形式的角度来看，刻画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组织的理论与对国家机器的官僚组织进行的批判是一致的。对于社会活动的两个领域，即社会劳动的组织和社会成员共同事务的组织，马克思建议将地区性协会的组织形式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先导。协会在这两个领域中均以高水平的劳动“平庸化”（Gorz）为基础。马克思坚决反对管理、警察、军事或生产活动 550
的职业化（参见 *Bürgerkrieg*，MEW 17，第339—340页）。社会劳动的合作社组织（参见上书，第342页；*Gotha*，MEW 19，第19—20页）和地区性的公共管理应遵循自我管理的观念，这要求废除管理职能在职业上的独立化。它以“劳动的变换，从而……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KI*，MEW 23，第512页），废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等为基础，简言之，生产劳动和管理劳动都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参见 *Bürgerkrieg*，MEW 17，第342页）。

4. 第三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政治纲领继承了马克思对社会生产组织的替代性想法，但却狭隘得多。

4.1 他们的狭隘之处在于，主张监督资本指挥家的管理劳动（工人监督），并由工人力量接手这一管理。（参见 Lenins *SR*，Gramsci in *ON*，Trotzkis und Radeks Reden auf dem IV. Weltkongreß der KI）他们着手研究劳动简单化这一思想，甚至还用它来赞扬泰勒制（Lenin，*Aufgaben*，LW 27，第249页及以下）和福特制（例如 Trotzki，*Europa und Amerika*，1926，第56页）。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可以在部分领

域一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分析。在此期间，特别是在所谓的对劳动过程的讨论期间，组织社会学的一些成果（比如统治的客观化或“组织文化”的意义）以各自的方法成功实行。（参见 Braverman 1977；Burawoy 1979；Edwards 1981）

4.2 在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组织类型，它既不符合地区性协会的组织形式，又不具备资本主义企业个体经济的合理性。作为受政治操控的经济工具，它是为具体形成的、特殊的有用性服务的。这种组织类型 —— 也许还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组织类型 —— 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其重大的社会功绩是使雇佣劳动普遍化，并将经济活动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这种
551 控制提升了国家权力，并以此提升了官僚机构的国家权力，如果人们撇开名词汇编中的国家阶级，没有一个新的社会阶级需要教育。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它除了建立以经济利益为指导的关系模型外，还同等重要地建立了政治关系模型。这种新的组织类型使我们注意到，马克思的组织分析缺乏比较的视角：其他领域比如政治领域的行为理性，其对立面或依赖性属于组织概念范畴。

5. 马克思的组织分析不仅在政治上被缩减和歪曲了，而且抛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一再重现的理论问题。一些问题可以按以下方式产生：各种劳动组织和其他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关系，因此要系统性地考虑面向他人的行为的意义中介性和这种纯粹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即行为是以社会关系的意义为导向的。（参见 Weber，*WuG*，1921，第 13—14 页）

5.1 因此，关于劳动概念，也本应将其视作社会关系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来进行系统地观察。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首先从“纯粹个人的”人与自然关系出发（MEW 23，第 192 页及以下）。马克思认为，协作是自“行业手工业”起现实的归类方法（同上书，第 341 页），因此它首先是作为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工具化的社会附件出现的（参见上书，第 350—351 页），尽管作为对比，他讨论了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古代的亚洲人……的庞大建筑，显示了……巨大作用”）和“在人类文化初期……的协作”（同上书，第 353—354 页）。直到第 14 章，马克思才开始论述“结合劳动人员”（第 531—532 页）。 —— 在有些地方他提出了以下观点：人类劳动借由其资本主义工具化从目标明确的活动转变为死的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的受刺激操控的行为（参见上书，第 445—446 页等处；具代表性的此类论述另见 Braverman 1974；IfS 1981）。社会劳动的

意义中介性和主体间性被如此特别歪曲地介绍。

5.2 马克思没有充分阐述社会结构的建立和转换。马克思一再提到社会结构的压迫，以解释“在通常的情况下”工
552 人的行为。（参见 *K I*，MEW 23，第 765 页）但是如果要放弃那些政治上也令人讨厌的不可避免的空话，那就不仅要研究社会结构的那些限定性（非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要研究它的导向性作用。（“资产阶级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Manifest*，MEW 4，第 474 页；“无产阶级不可避免的胜利”——*K I*，MEW 23，第 790—791 页）

5.3 然而，马克思和对讨论产生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理解过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权力结构，他们只是改写并通过把问题推给结构性压迫来跳过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权力问题。比较新的劳动过程的讨论，已经尝试借助监督概念来研究权力关系（例如 Braverman 1977，Edwards 1981）。对劳动组织和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的总的反思必须深入研究这一或许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实，即以工资为生的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不仅仅由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所决定。从葛兰西的名言——工业社会条件下**霸权源自工厂**（*Gef* 1，H. 1，§61，第 132 页）；他关于企业家是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群众的组织者”和“‘信任’的组织者”行使职能——的阐述（*Gef* 3，H. 4，§49，第 514 页）；还有从他对福特制的激励策略和与劳动力相关的调节主义策略的兴趣（参见 H. 22，§3，*Q*，第 2150 页）可以看出，他已经朝着这一方向进行研究了。

参考文献：

G. Bechtle, *Betrieb als Strategie. Theoretische Vorarbeiten zu einem industriesoziologischen Konzept*, München 1980; G. Brandt, »Marx und die neuere deutsche Industriesoziologie« (1984), in: ders., *Arbeit, Techn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Aufsätze 1971-1987*, Frankfurt/M 1989; H. Braverman, *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engl. 1974); M.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t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London 1979; M. Crozier u. E. Friedberg, *Macht und Organisation*, Königstein/Ts 1979; R. C. Edwards, *Herrschaf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engl. 1979); J. Ermanski, *Theorie und Praxis der Rationalisierung*, Berlin 1928; S. Herkommer, H. Bierbaum,

Industriesoziologie-Bestandsaufnahme, Kritik, Weiterentwicklung, Stuttgart 1979; IfS (Hg.), *Gesellschaftliche Arbeit und Rationalisierung. Neuere Studien aus dem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Opladen 1981 (*Leviathan* Sonderheft 4); U. Jürgens, »Die Entwicklung von Macht, Herrschaft und Kontrolle im Betrieb als politischer Prozeß – Eine Problemskizze zur Arbeitspolitik«, in: ders. u. F. Naschold (Hg.), *Arbeitspolitik. Materialien zum*
553 *Zusammenhang von politischer Macht, Kontrolle und betrieblicher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Opladen 1984 (*Leviathan* Sonderheft 5); C. Littl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ur Proces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Organization in Britain, Japan and the USA*, London 1982; N. Luhmann, *Funktionen und Folgen formaler Organisationen*, Berlin/W 1964; S. A. Marglin, »Was tun die Vorgesetzten? Ursprünge und Funktionen der Hierarchie in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in: F. Duve (Hg.), *Technologie und Politik*, Bd. 8, Reinbek 1978; F. Naschold (Hg.), *Arbeit und Poitik, Gesellschaftliche Regulierung der Arbeit und der sozialen Sicher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85; C. Neusüss,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Arbeiterbewegung und Schranken sozialer Emanzipation entwickelt anhand der Rätediskussion und der Rationalisierungsdebatte der 20er Jahre«, in: *Prokla*, 8. Jg, 1978, Nr. 31, 75-113; C. Pozzoli (Hg.), *Spätkapitalismus und Klassenkampf. Eine Auswahl aus den Quarderni Rossi*, Frankfurt/M 1972;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Ein Handbuch*, Berlin/W 1987; K. H. Roth, *Die »andere« Arbeiterbewegung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Repression von 1880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1974; W. Schluchter, *Aspekte bürokratischer Herrschaft. Studien zur Interpretation der fortschreitend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1972), Frankfurt/M 1985; M. Schumann, E. Einemann, C. Siebel-Rebell, K. P. Wittemann, *Rationalisierung, Krise, Arbeiter.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der Industrialisierung auf der Werft*, Frankfurt/M 1982; L. Trotzki, *Europa und Amerika*, Berlin 1926; K. Türk, »Organisationssoziologie«, in: G. Endruweit, G. Trommsdorff (Hg.), *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Stuttgart 1989.

乌尔里希·穆勒（Ulrich Mill）撰
林芳芳 译

参见：
Antagonismus, Arbeit,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markt, Arbeitspolitik, Arbeitsprozeß-Debatte, Arbeitsteilung, Assoziation, Ausbeutung, Automation, Bürokratie, Despotie des Kapitals, Destruktivkräfte, Disziplin, Fabrik, Fordismus,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Herrschaft, Hierarchie,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Kooperation, Leistung, Leitung, Macht, Management, Maschine, Maschinerie, Operaismus, Organisieren, Produktionsplanung, Qualifikation, Rationalisierung, Selbstverwaltung, Staatsklasse, Taylorismus, Technikentwicklung/technische Revolution, Überakkumulation

劳动政治（Arbeitspolitik）

作为20世纪70年代使用的术语，劳动政治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研究中具有一种自动校正的意义：不同于将社会劳动的发展简化为纯粹由经济和技术决定的观点，这一术语强调社会劳动离不开政治的干预。研究视角从系统性逻辑的冥府中推移到组织、发现规律、解释和再解释规律的过程上，也推移到这一竞技场中，在那里参赛者利用变化的阵营、联盟和策略，在斗争与妥协中决出胜负。这些参赛者不仅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也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生产者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 劳动政治的修正观点表示：马克思只能揭示资本的集聚与集中等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但却未对“生产的政治”进行任何理论建构（Burawoy 1985，第255页）；或者说，马克思忽视了这种困难，即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能力时会产生冲突关系，因而他也忽视了政治内含性的困难（Ortmann 1990，第51页）。对以上观点可以提出异议，因为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作为那种对自然进行加工的活动，也总是与一种批判的解放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劳动政治本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想要马克思去对一个较晚发展阶段上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政治进行反思是没有意义的。纳硕德（Naschold）和杜尔（Dörr）（1990）认为劳动政治的历史是随着工厂制度、泰勒制—福特制工业体系、灵活自动化生产模型的各个阶段而发展变化的：一方面，从劳动保护政策到有效的关税政策和国家调控的人本政策，以及从防御—补偿性的到进攻—预防性的劳动体制设计形式；另一方面，劳动体制

设计从企业的“私事”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与技术性系统风险全球化进程中的公共话题。

在这种历史化视角下，马克思对工作日正常化斗争的分析（*K I*，MEW 23，第 245 页及以下）也可以说是在劳动政治上做出了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功绩。它将正常工作日理解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同上书，第 316 页），并将工厂立法概括为“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反作用”（同上书，第 504 页）。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争取更高工资和更短劳动时间的斗争是无意义的，
555 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开始对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采取政治行动。知识教育应该为政治实践培养能力。马克思在他 1880 年的**工人调查表**中将这一联系带入了劳动者的视野：调查表遵循的理念是劳动者“知道如何独立熟练地描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能独立地，而不是在某个救世主的启示下，使用……对抗社会贫困的资源”（Weiss 1936，第 91 页）。由此产生的“劳动手册”应该成为“为社会更新做准备”的过程中，在“社会民主”方面的重要一步。（同上）

2. 劳动政治的特殊功绩在于：第一，在不断蔓延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决定论诱惑 —— 倾向于将非政治的经济和过于政治的国家作为统治政策的保证 —— 前树立了一块警告牌；第二，推动人们为解决一系列迄今尚未解决或解决欠佳的劳动研究问题做出积极贡献；第三，促进理论建构独立地开始实际生成 —— 劳动政治不仅分析了关于劳动的政治，而且还使它成为现实。

2.1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倾向于将生产去政治化，并将政治仅仅限定在国家层面。就像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努力将其决策的政治内含性隐藏在私法合约、实际技术困难和市场机制中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经济系统逻辑的理性面纱，这种系统逻辑不依赖于主体意志而发挥作用。作为科学确立的经济规律的执行机关，国家政治在效力上是无懈可击的。

与此相反，劳动政治在劳动合约与劳动过程实际的不确定性及其不同的元素中找到了实证养料：即使是技术性的规则也并未完全地规定其具体的应用形式。劳动合约和劳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漏洞必须通过（比如往往具有制度化标准化形式的）协商、讨论等进行填补。作为“劳动政治中的转化问题”，人们讨论了产生于马克思对劳动力和劳动的区分中的这一结论，即劳动力商品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并不是通过购买它而最终被确定的：“当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他买的，一方面是潜在可用 556

的商品，但另一方面是最终由一个独立的、往往敌对的意志所决定的商品。”（Friedmann 1977，第 78 页）生产者不仅是劳动力，也是价值概念和意义模型的承担者，他们不总是绝对确定的，也不是完全不容改变的，而是也能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被改造。企业管理学和劳动心理学尝试以引导计划和激励计划来解决劳动能力在劳动中的转化问题，而“激进经济学”和劳动过程讨论这方却将劳动监督的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进行了研究。

此外，女权主义的劳动研究关注了劳动合约的另一个特征，即它包含了（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一样，它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带有两则附加条款的隐性性别合约，这两则条款相互支撑：一则家庭条款，一则劳动场所条款。男性，或者说企业主、工人及其工会，通过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和低酬的雇佣劳动在两性关系中同时建立起了依附与统治。女权主义的研究者把对一些私人事实构成的理解作为政治事实构成纳入了分析，如生育力、性、身体认同。相反劳动政治不是无性别的，相反，隐瞒劳动中的性别特征是为特殊的性别政策服务的。（参见 Hartsock 1985；Cockburn 1991）

劳动政治表明行为者的行为是有理性限制的，这一限制来源于其他各个行为者的同时作用。此外，不管是管理决策，还是生产者的绩效执行，都不是只由各自策略性的理性权衡或不同行为可能性的成本效益均衡决定的，而是也由非策略性的标准（对劳动的兴趣、关于合理的绩效与工资关系的传统观点等）决定，更不用说依势而定的即兴创作、特别的决定和破例了。但是，这也表明劳动政治有一个特殊问题：把政治理解为一个遗留范畴。劳动政治也必须给自己树块儿警告牌，避免陷入看不到自身界限的唯意志论的危险中，避免“政治主义”。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由政治调节的，而且除了政治调节方式外，还有经济和文化的调节方式。另外，不仅经济和技术有自身的规律，政治也显示出其独特的物质性和非偶然性。（Naschold 1985，第 43、25 页）当然，迄今为止除了概念上的系统化萌芽外，还没有制定出一个牢固的劳动政治理论。

2.2 劳动政治的积极作用在于，借助来源完全不同的概念，打破了劳动研究的那些传统局限和简化，如将政治概念局限于国家行为（和国家机关等）或将劳动概念简化为生产技术的理性化和经济的价值增殖。

一方面，劳动政治不仅在劳动过程这一微观层面（**微观政治学**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汤姆·本［Tom Burns］在其

组织社会学中提出的概念），也在国家这一宏观层面（以及居中的主管机关这一中观层面），将生产中的政治和政治中的生产维度同一起来。布洛维认为，劳动政治要研究劳动过程和生产机器的意识形态作用与政治作用，就像反之，要关注意识形态作用和政治作用在建立它的斗争中、在生产中，也如在国家中的形成（改造）一样，因而还有二者的关系及其相互干涉与限制。国家有（这一点继承了普兰查斯）自己的劳动过程和机器，在其中少量商品作为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服务和调节形式被生产出来。国家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也有自己的基础；反之，经济是有自己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因此，劳动政治与生产政治有关，也与国家政治有关。“生产政治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中的关系的斗争，也是由生产机器调节的斗争。”相反，国家政治并非关于一系列特殊生产关系的斗争：“国家最突出的是其整体性特征，是它作为整个社会形态的团结因素的职能。国家不仅保障特定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能保证所有其他机器存在的那种机器。作为核心，国家政治包含了政治的政治。”（Burawoy 1985，第 254 页）

558 另一方面，劳动政治使这一意识更为清晰，即企业中人们的行为在任何规则下都不是遵循“纯粹的”、清晰的逻辑或策略，而不如说是一种矛盾的混合物，它往往植根于人们以各自的发展节奏长久以来所适应的企业劳动文化中。在劳动者层面上，作为对企业和社会的统治关系的政治回答，这种赞同与反对、接受与拒绝、团结其他劳动团体与同它们划清界限的混合物的解释是可行的。于是，权力概念成了劳动政治分析的核心：权力是社会关系中不可避免和不可撤销的一个维度。有一种权力概念，它将权力看作对相关不确定性区域的控制，与其他组织成员或作为整体的组织相关。（Crozier / Friedberg 1979）它使反对管理全能和工人无能的思想得到强化，这一思想认为，权力也可以在没有压迫和反抗的情况下展开：以共识为基础。没有共识，权力结构的持续和稳定是不可想象的。布洛维区分了合法性与共识：“不能将共识简化为使统治具有合法性的一种意识状态、态度和信念，也就是说，共识不只是合法性……赞同一种制度就要积极地追寻其目标。”（1989，第 72—73 页）

与吉登斯（Giddens）的“控制辩证法”将权力关系同时理解为依附关系与独立关系相似，女权主义者指出了权力概念的生产性特征和建构社会的特征。他们反对大多数人将权力理解为统治，并试图强调这一概念的其他意义：能量、能力、权能。南希·哈索克（Nacy

Hartsock）认为，这些对权力观念的替代性理论化是为了逃避这一问题，即干涉性的、改变社会的行为可能使人们受到伤害，或者是想要转移人们对现存统治关系的注意力。“按照马克思对非异化劳动的粗略构想，一个女权主义权力理论的发展必须准备应对这一挑战，即在这些形式中创造出解放的可能性……，在这些形式中以性别为基础的分工塑造了女性的生活，通过取消这种分工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1985，第259页）

559 3. 劳动政治发现了不同的、部分对立的行为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了他们斗争的领域，发现了在劳动过程中对其行为进行调节的机器，因此，劳动政治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能，去阐发劳动的问题，并为一种关于劳动的政策提出以解放劳动为目标的战略。劳动政治谈论了“不同的机构、组织和文化的机制与影响，并因此在其论域内探讨了社会运动中完全不同的、先前并非是最后可确定的女性主体承担者”（Wolf 1990，第719页）。它从策略建构的一种形式中解放了出来，这一形式被裁剪成**一种**集体主体（如**那种**劳动运动），并要求一切力量和团体适应和顺从集中、统一规定的行为目标和道路。与上述形式相反，劳动政治确立了主体和运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它们关注的是一种对社会有用且能令个体满足的劳动。劳动者的不同团体并不能毫无准备地形成一个统一体。它们总是相互对立，维护和巩固它们之间的界限：核心员工针对边缘员工，二者共同针对失业者，专业工人针对非熟练工人、外国人、妇女，职员针对工人，脑力劳动者针对体力劳动者，某些企业和行业的劳动者针对本地人等。这些界限的防御工事不能通过强行统一劳动者来拆除，即强迫某物成为它不是的东西，而只能通过对差异的相互承认以及尽可能广泛的同盟内部的协商来瓦解。如果对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在社会劳动的范围内实现解放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并且如果将来要修正错误的劳动政治，如女权主义的，就要避免男性的普遍化，这样一来，劳动政治可能成为由尽可能多的和不同的团体组成的联盟进行协商的那种形式。

参考文献：

M. Burawoy,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1985; ders., »Marxism without Micro-Foundation«, in: *Socialist Review*, 1989, Nr. 2, 53-86; C. Cockburn, *In the Way of Woman. Men's Resistance to Sex Equlity in Organizations*, Houndmills 1991 (dt. 1993); M. Crozier, E. Friedberg,

Macht und Organisation. Die Zwänge kollektiven Handelns, Königstein/Ts 1979; A. Friedman, *Industry and Labour*, London 1977; N. C. M.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oston 1985; F. Naschold (Hg.), *Arbeit und Politik*, Frankfurt/M-New York 1985; F. Naschold, G. Dörr, »Arbeitspolitk«, in: *WZB Mitteilungen*, 1990, 12-15; G. Ortmann, *Computer und Macht in Organisationen. Mikropolitische Analysen*, Opladen 1990;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 1987; A. Przeworski, »Class, Production and Poitics: A Reply to Burawoy«, in: *Socialist Review*, 1989, Nr. 2, 87-111; Ch. F. Sable, *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 Cambridge 1982; H. Weiss, »Die 'Enquête Ouvrière' von Karl Marx«, in: *ZfS*, 1936, 76-98; F. O. Wolf, »'Arbeitspolitik' und soziale Bewegungen«, in: *Argument* 183, 32. Jg., 1990, 709-722.

韦尔纳·范·特雷克
（Werner van Treeck）撰
林芳芳 译

参见：

Arb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umfrage, Arbeitsbeziehungen, Arbeitskraft, Arbeitsorganisation, Arbeitsprozeß-Debatte, Arbeitsteilung, Arbeitszeit, Automation, Basis, Befreiung, Determinismus, Disziplin, Fabrik, Feminismus, Fordismus,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Hausarbeit, Herrschaft, Kampf, Kapitallogik, Konsens, Macht, Management, Ökonomismus, Politik, Produktion, Radical Economics, Regulation, Staat, Struktur/Superstruktur, Subjekt, Taylorismus, Überbau, Voluntarismus

劳动过程的讨论（Arbeitsprozeß-Debatte）

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为了再生产自身，人类必须将具有某一特定用处的对象改造成具有其他用处的对象，即将现存的使用价值改造为新的使用价值。这就是劳动过程，它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础，并根据社会形态而有所不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即拥有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和产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的双重规定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为了理解这一过程的动力学，必须特别重视新技术的引进。新技术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同时，它也变革了劳动者完成使用价值改造的条件。

在马克思逝世后，这一观点被确立下来，即应用于生产的技术是阶级中立的：科技根据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因此不带有由它所推动的那一社会的阶级内容。但有些时候某一特定的科学和技
561 术形式也因此有可能会被滥用，而不是服务于劳动者和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只要取消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家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以及作为阶级的资本家自身就足够了，而现存的劳动过程（以当时的技术和相应地由技术决定的分工为基础）将被保留，以利用科学、技术和更一般的生产力来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而服务。列宁关于泰勒制及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适用性的观点就是以这一技术视角为基础的。

这一观点忽视了马克思所说的将劳动真正地（而非表面上）纳入资本之中（参见 MEW 23，第 533—534 页），即由表面上生产了所有商品的个体工人向总体工人转变，总体工人包括大量的个人，其中每人只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或者甚至只是间接地参与生产（MEW 23，第 531 页）。由此，人们会忽视，劳动过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且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被拆解为分工劳动，因而对于单个劳动者来说，发展自身、通过生产活动展开其个性的一切（而不仅仅只是一些）方面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仅必须取消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剥削），而且也要大大地改变劳动过程及其内在的技术性分工。

这一前言对于理解关于劳动过程的讨论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十分重要。因此，对于反威权的社会运动来说，重新发现这样一种潜能是决定性的，这种潜能不仅为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属于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分析。这是自哈里·布雷弗曼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劳动》（*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1974）出版之后，这一研究领域能再次让人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著作重新揭示了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理论里的中心地位，并同时提供了一种非技术性的分析框架。布雷弗曼严格遵循马克思关于手工业技能受机器技术引入的影响而低质化的原始分析，并将它上升到新的高度——他不仅将这一过程的分析引入了工厂，也引入了办公室。可见，该书的副标题名为“20 世纪劳动的退化”并非偶然。此外，他拓宽了关于监督的管理策略维度的分析。他认为，泰 562
勒制不仅十分重要，而且事实上还是垄断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管理方法，它的结果是劳动阶级的低质化和受监控。根

据布雷弗曼的观点，泰勒制本质上不仅是观念与其执行之间的分离，即精神劳动和身体劳动之间的分离，也是关于劳动过程管理的知识垄断。同时，他认为劳动过程的改变与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构成的改变有关，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化这一过程。

布雷弗曼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方面。同时，他也在四个方面受到了深刻批判。第一，可能是最相关的批判——在刻画劳动过程时没有考虑到劳动者的反抗。（Elger 1979）关于这一点的异议是互相联系的，不仅是布雷弗曼，还有其他那些将低质化作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加以强调的人，他们不仅将注意力集中于手工业者，而且还将他们理想化。（Cutler 1978）技能的丧失不一定就意味着劳动者丧失了反抗资本统治的能力。最新的历史表明，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都能成为工人起义的领头羊。最后，人们必须看到，低质化是一个趋势，但不是一个绝对的规律。那些不能满足现存工作要求的力量，同时也能创造出具有新的技能要求的工作。（Carchedi 1975）

第二条批判线索集中于管理和监督的形式。布雷弗曼将科学管理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联系起来，至今还有人对这种尝试表示支持，但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表示泰勒制只是监督形式的一种，它设计出管理模式，使劳动服从安排。（Edwards）例如，弗里德曼（Friedman）就表示异议，统治工人的主要形式不是直接监督，而是一种负责任的自治，或是工人对企业目标的认同，同时相应地将对工人的直接监视减到最小。（参见 PAQ 1981，第 505 页及以下，主要是第 509 页）其他的例子还有劳动人性化和质量监控，但是弗里德曼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够，即直接监督仍是统治劳动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无论如何，辩称一种监督形式具有对其他监督形式的绝对统治地位是不可能的。资本设计出监督形式，根据不同的情境，分别应用于劳动场所内外。而且，激励性的管理方法和直接监督的方法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同时使用。

第三条批判线索集中于布雷弗曼对“组织同意”的忽视。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布洛维（1979）。他认为，是劳动过程本身（而不是如意识形态这样一些非常外在的因素）创造了同意。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与其说是作为某一阶级的成员，不如说是作为个体被建构的。简言之，劳动过程既生产了商品又生产了同意。在布洛维看来，布雷弗曼的错误并不在于将劳动者的反抗排除在外；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或者说没有解释，真正的阶级意识得不到发展不能归因于劳动过程以外的因素，而只能在这一过

程本身找原因，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布洛维涉足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但他却建构了一个片面而不充分的理论框架。如果不是从生产中来，那么，劳动者（以不同的形式和强度）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这种真实反抗究竟是从哪来的呢？也许这样一种分析是有效的，考察一下那些妨碍对抗性意识形式产生的结构性因素，例如资本职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Carter 1985）而且，宣称外在因素（例如教育体制、大众媒体等）只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起着相当有限的作用，似乎是不明智的。1981 年布洛维将他的分析发展成一种生产政策的建议。他试图将最新的国家理论和劳动过程的讨论结合起来，以此克服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裂，分析地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政治。

最后一条批判线索是女权主义的。他们的批判不仅针对布雷弗曼，而且首先针对马克思及其概念系统。他们认为，作为低质化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结果，劳动的同质化被马克思过分强调了，因此他无法认识到，针对男人和女人出现了相互分离的劳动市场、劳动力分配和薪酬体系等。在强调不同性别的劳动分工方面，布雷弗曼比马克思走得更远，但他仍停留在概念系统的理论界限内。例如，布雷弗曼认为，妇女日益提高的参与度是劳动同质化过程的一种继续扩大。家庭在劳动力生产中的作用依然未被讨论，而且劳动过程的视野也并未扩展到家庭活动的分析上。相当概括地说来，女权主义批判有两个分支。第一派原则上拒绝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而第二派主张，有可能以改良的形式使用这些范畴（如“产业后备军”），来分析劳动的“女性化”。（概述参见 Neusüss 1985）由于女权主义的批判要求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有限的核心领域，于是在分析家长制关系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表现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没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视而不见。

尽管布雷弗曼使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过程的兴趣死灰复燃，但他的著作和以下的讨论仍然充满了漏洞。第一，他没有发展和使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来理解劳动和劳动过程。实际上在这一讨论中，所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绕开了实证性社会研究中的辩证法问题。第二，缺少对马克思所说的资本职能、资本职能的不同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对特别的生产代理人范畴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第三，缺少对精神劳动的研究，不管是在一般意义上，还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类型中。（Carchedi 1987）承认这些领域的分析的基础性作用及其与劳动过程讨论的融合，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现代社会关系分析的重要前提，不管这一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真正社会主义”的。

参考文献：

H. Braverman, *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M 1977 (New York 1974); M.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1979; ders., »Terrains of Contest. Factory and Stat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in: *Socialist Review*, 11. Jg., H. 4, Nr. 58, 1981, 83-124 (gekürzte Fassung dt.: »Fabrik und Staat i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in: *Argument* 140, 25. Jg., 1983, 508-524); G. Carchedi,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Economy and Society*, Feb. 1975, 1-87; ders., *Class Analysis and Social Research*, Oxford 1987; R. Carter, *Capitalism, Class Conflict and the New Middle Class*, London 1985; A. Cutler, »The Romance of Labour«, in: *Economy and Society*, 7. Jg., H. 1, 1978; R. Edwards,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79; T. Elger, »Valorization and De-skilling: A Critique of Braverman«, in: *Capital and Class*, Nr. 7, 1979; A. Friedman, *Industry and Labour: 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London 1977;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oder Die Genossin Luxemburg bringt alles durcheinander*, Hamburg-Zürich 1985;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Automationsarbeit: Empirie*, Teil 3, AS 67, Berlin/W 1981.

古列尔莫·卡尔凯迪
（Guglielmo Carchedi）撰
弗里加·豪格 译为德文
林芳芳 译

参见：

Arbeitspolitik, Arbeitsteilung, Aufhebung, Automationsarbeit, Dialektik, Empirie/Theorie,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Gesamtarbeiter, Hausarbeitsdebatte, Ideologie, Kopf/Hand, Lohnarbeit, Management, Monopolkapital, realer Sozialismus, Taylorismus, Verwertungsprozeß

分工（Arbeitsteilung）

565

分而治之（*Teile und herrsche*）同样也适用于物质生活的生产：分工（专门化和分配）是所有政权和地方自治的更复杂形式的关键起点。私人的分工生产是必要的商品生产。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得到发展的同时，一个分裂的、客观上是依赖关系的体系也被创造了出来，这

个体系将彼此间疏远的工人包括了进来。在这种对立框架内，马克思重构了分工的发展，他将男人与女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脑力与手工之间的分工称为**大分工**。他以此来区分将社会总劳动分解为各个不同部门的划分和企业内部的分工。因此他的观点是对大分工的扬弃以及将劳动生产力在数量和质量上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 —— 允许个人改变生产方式和能够在自己的时间范围内自由选择（工作时间），以及实现工人的分配不再与他的社会等级相挂钩，并推动所有劳动逐渐变成一般劳动的趋势。

1. 除了提到专业化提高生产力的效用外，古典哲学在分工方面特别强调了社会效益和统治结构。色诺芬（Xenophon）
566 的《经济论》（*Οἰκονομικός*）“就像是一个对指挥艺术的全面分析”（Foucault 1986，第 196 页）。此外性别上的分工（配偶）取决于具体的空间 —— 内（室内）和外（在田地，政治以及战争中）—— 从而获得不同的指挥权。——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Πολιτεία*）中，苏格拉底（Sokrates）从满足需求的所有条件有哪些这个问题出发，在正义讨论的框架下提出了城邦（*πόλις*）的社会构建的标准。他将分工视为发达的高质量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并且区分了基本必需的分工和奢侈品需求的分工。从分工的差异性和其带来的潜在冲突中，他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统治和军事装备的必要性。分工在这里代表的是经济部门、职业、阶级和统治权力的不能分割的总体。哲学维系着它们之间的联系，而这一切的起点又都是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工对于社会（*κοινωνία*）—— 被视为一个政治团体的共同体 —— 来说是决定性的：“因为共同体并不是由两个医生组成，而是由医生和农民组成的，根本上来说是由（彼此间）有区别和（彼此间）不相等的人组成的；这一点也必将［在其交换关系中］得到补偿以实现平衡”（*EN*，1133a17 及以下）；在分工体系中采取给予和索取之间的互惠形式而达到的平衡，是城邦凝聚的关键要素：“在相互性的基础上产生了统一”（*τῷ ἀντιποιεῖν γὰρ ἀνάλογον συμμένει ἡ πόλις*）（*EN*，1132b34）。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从分工中首先得出领导的必要性，然后是统治的必要性：“在所有艺术和专门的知识中，人们称赞更多的是知道如何去领导别人的那些人，而不是那些在外界领导下有良好表现的群体。”（*De regimine principum*，I.9）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筑师在字面上就是指将专业化的子技术组装起来的主要组装者。*Suum cuique*—— 意为对适当物品的分配 —— 被作为对公正的定义。在宇宙中就反映出来了公正的（gerecht）分工和分配：“世界的每个

部分都被分配了不同种类的事物：繁星被分配到了天上，鸟儿被分配到了空中，鱼被分配到了水中，其他动物被分配到了陆地上。”

早期资本主义城市资产阶级推进了分工的专门化。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找到与它相适应的理论表达。——大卫·休谟提出了“职业分工（partition of employments, Arbeitsteilung）”，以此来区分“力量联合（conjunction of forces, Kooperation）”，于是当他
567 们可以通过个人成就来满足需求时，就会产生更多需求：“通过力量联合，我们的力量得到了增强；通过职业分工，我们的能力得以提升；以及通过互相援助，我们降低了遭遇意外和事故的几率。”同时他还注意到通过以分工为前提的专门化，使得个人的发展能力成为可能。（1740，Vol. Ⅲ，p. Ⅱ，Sect. Ⅱ）

亚当·斯密被杜尔凯姆（Durkheim）视为是第一个尝试着从理论上去掌握分工“法则”的人，并且是他“发明了这一词语”（1903，第83页），他在《国富论》（1776）中通过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这个问题，展开了相关的阶级描述，并且他将此视为分工的**成果**，而不是**目的**。他提到了针头制造厂的例子（马克思也曾引用过这个例子），与个体手工的生产力相比，在厂内实现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针头制造商的生产率高出了20倍。他解释了选择针头制造商作为案例的原因是它所提供的相对较小的空间，由此能让一个**旁观者**在单一的空间内直接观察到分工，而这种观察在大工业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大工业已经被分解到了不同的大厅、工厂或者甚至更具体的行业中去了。斯密还将分工的范围和市场范围关联起来。他还指出分工生产是商品生产，在此过程中，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将会被边缘化，具体表述为：“**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商人**，确切地说**社会**也变成了一个**商业社会**”（Kap.4）。于是分工废除了基于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模式，而人们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必将采取“从他人劳动中获取”的方式。于是突然这就变成了关于对（他人的）劳动的命令（Kommando）问题：“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取决于他能够**命令**或者能够**购买到**多少劳动力”（Kap.5）。在这里，对别人劳动的支配被隐藏在了自制产品的对等交易之下，于是斯密将分工和交换都同样视为达成社会共识的条件，具体的表现形式是对本质为反社会的利己主义进行社会化：别人提供我们必需品，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很容易理解的个人利益。

2. 阿里·拉坦西（Ali Rattansi）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观点是一种带有幻

想性质的观点，即他强调对所有分工的无条件扬弃，因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将分工和阶级“混为一谈”，于是他将阶
568 级社会的扬弃和分工的扬弃视为是同一件事。（1982，第 56 页及以下多处）当然重新追溯到这些联系是值得的，因为青年马克思除了那些幻想性质的观点外，还展现出了他的批判潜能，这些潜能帮助他能始终保持着对人类能力的不足，以及对既定分工体系中的统治再生产的清晰洞察力。

2.1 这种幻想观点首先是基于他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1843 年至 1844 年马克思在李斯特的摘录中找到了一个关于分工的盲点：“李斯特先生认为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值得争取的理想目标。他非常重视分工，更确切来说是重视生产力的分配……，但却避开不谈对享受的分配，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区别。他区分了城市周边的农田和城市偏远地区的农田，但却没有将工人和雇主区分开来，而雇主是不应该算在其内的（应该是指雇主不应该算在生产者之列。——译者）。他将分工视为是一种统一的事物，这种观点忽略了代表不同劳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关系。而他却只满足于‘社会劳动’这个**单词**。”（MEGA IV. 2，第 529 页）

与此相反，马克思则尽力去关注这种“代表不同劳动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对立关系”。按照拉坦西的观点，通过专业化而划分出来的各个具体领域的劳动，它们之间的并列关系，被马克思视为是一种彼此间相互对立的关系（Gegeneinander），以此作为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性回应，从而马克思从统治批判的立场开始接触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问题的分析也是按照这种逻辑来展开的：“分工只有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MEW 3，第 31 页）这里的分离意味着“分裂”（参见第 33 页），上级和下级，统治和敌对。这里的前提是横向的分工、阶级冲突（阶级矛盾）和国家前提。

2.2 马克思和恩格斯概述了三种主要社会劳动分工之间的联锁关系（具体生产功能的水平分化并不是主要关注点）。当然这个分析还不够完善，还有许多需要从相关背景中推导总结出来。第一次“自然的”大分工是“生命的产生”（第 29 页）（男人和女人）；其他两个分别是城乡分工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第 31 页）。并且他们还暗示了上述两者之间的强烈联系：“物质 569
和精神劳动的最大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第 50 页）

2.21 **性别分工**。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略性出发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认为，分工“最初只不过是性行

为的分工，之后才变成劳动的分工，即由于自然的结构设置（例如体力）、需求、意外等而自然而然地对劳动进行了分工”（同上书，第 31 页）。此外这里还提到了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删掉的尖锐观点，即认为父权是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统治。马克思在这里同时看到了导致奴隶制的统治元素。“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第一财产，这也完全符合了现代经济学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这个财产就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同上书，第 32 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又重申了这一思想：历史的“最初的阶级压迫”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MEW 21，第 68 页）因此，性别的分工也被打上了统治的印记。

在对资本主义劳动的详尽分析中，性别分工还只是位于边缘地位。在这方面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女性——通常与儿童一起被提及——是如何被卷入到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例如 *K I*，MEW 23，第 665 页）。他关注的重点是，资产阶级是如何嘲弄自己的崇高原则，资产阶级是如何摧毁虚伪的神圣家族，等等。（参见上书，第 212、261、285、501 页，等处）在此马克思似乎是赞同工人运动中的主流观点，即男性工作者应该为自己和家庭的再生产而工作，并获得相应报酬。马克思还认为，尽管家长制家庭的消失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可怕方面，但传统的家长制家庭的消失——由于妇女在工业领域中拥有大量工作岗位——还是成了一场两性关系的彻底变革：“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传统家庭的解体显得非常可怕和令人厌恶，尽管如此解体创造的大工业——为女性、男女青年和儿童提供了家务活之外的、处于社会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的空间——最终为新型家庭和新型两性关系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同上书，第 514 页）在他看来，性别分工最开始是作为一种“纯生理基础”上的分工，其 570
通过交换而处于相互依赖的领域中。（同上书，第 372 页）在这一点，他没有深究在这些领域中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起到重要影响的布置和安排，就像他之后也没有去探索，如何处理那些不属于工业发展的劳动（如对人类后代的培育和照顾）。——在他生命最后阶段的笔记《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显示出了他对于两性关系的微型社会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在乡村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

2.22 **城市与乡村**。在他对蒲鲁东的批判中（*Elend*，MEW 4，第 145 页及以下），马克思将城市与乡村的分离描述为“第一次重要意义的分工”。“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同上书，第 145 页）——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他分

析了农村生产方式对农民的作用：使农民彼此隔离，“而不是相互交往”（MEW 8，第 198 页），并导致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阶级政策：“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参见 Volker Brauns 的著作 *Großer Frieden*，Texte 5，第 262 页：“他的劳动把他隔离起来，使他变得扭曲；他将木头插入土地中，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一日复一日；他谁也不认识；他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农民不能代表自己。”）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不仅在于地面上的分散分布（指农田位置的分布。——译者），还在于企业内部分工的缺乏。“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18. B*，MEW 8，第 198 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反驳了城乡对立是一种天然性的概念，他强调了农业和工业活动的片面性，以及回忆了傅立叶以及欧文所要求的“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MEW 20，第 272—273 页）。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阐释了和工业劳动分离的纯农业劳动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两者都生产社会必要产品；两者都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MEW 25，第 646 页及以下）它的基本利益就在于下面这种联系中，即农产品向商品的转变增加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力。 571

2.23 **脑力与手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了持久统治的产生（即以一种发达的形式：国家性再生产的阶级统治）和“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在此情况下，“分工才是真正的分工”。（MEW 3，第 31 页）——在《资本论》中，分析范围扩大到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扩大到了有关工作组织的问题。控制维度的一个层面是手工和脑力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已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是在与专业知识分子的出现，以及国家性再生产后的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有关方面中，成为核心。（参见 MEW 3，第 31 页）这一过程贯穿于社会结构的所有领域和层面：“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同上书，第 46—47 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统治阶级和阶层中，这些思想

家在“行动者”中占据了优势；实际中的情况经常与此相反。

另一方面，在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精神”功能通常同样也是**决定性的**，“物质的”**执行**（*exekutive*）功能，并且，不同于早期著作，在《资本论》中用不同分工对应的不同功能来分析不同的具体层面之间的共生性，这就是“监督和指挥的劳动”所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其出现在以下这些地方”，即协作——尤其是分工的协作——发生在更大的范围内，并且其无论统治关系如何，都能作为“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的指挥，“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另一方面，“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的监督劳动都有其类型和范围，“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
572 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K III*，MEW 25，第 397 页）因此为了让功能承担者能够继续作为过程的指挥，必须要将他从资本主义的领导形式中脱离出来，先是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之后是通过具体实践来完成。

执行劳动和监督劳动之间的分工也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问题：“监工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生产者，而是他们自己阶级的逃兵”，恩格斯在早期这样写道。（*Lage*，MEW 2，第 393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以资本家为对象进一步研究了具备领导职能的团体的发展脉络，从而得出下面这种严密的解释：“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MEW 23，第 351 页）在差异化的指挥体系（Leitungssystem）中，统治和内部分工发生了重叠。

3. 在发展和统治的矛盾中，在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占据主要地位的前提下，马克思分析了工业劳动及其发展前景。

3.1 早期的恩格斯认为分工是“三大杠杆”之一（除了水力或蒸汽动力，以及机器），“借助这些杠杆，使得工业可以”把世界从其缝隙中解脱出来。（*Lage*，MEW 2，第 254 页）他将企业分工的过程视为一种实现平衡化过程或者说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方式，以及机械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从手

工制造业向大工业的过渡中："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也被挤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了。"（同上书，第 250—251 页）

3.2 **内部分工**。马克思将这些观察结合进入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先进的理论框架中。在企业分工的手工业升级方面，他从各个具体工序上的专业化着手，并将其总结为"系统"的分工（与传统工艺的自然分工相反）。（参见 MEW 23，第 357 页）工作活动会被逐渐缩小到"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同上书，第 359 页）。"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MEW 23，第 358 页）——机械化的实现，消除了生产过程中的手工业基础，并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能够进入生产当中："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MEW 23，第 485 页）后者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条件下给工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不熟练的（廉价的）劳动力成了分工中的一个独立分支，并且要和熟练技术工竞争："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同上）

3.3 **纵向和横向的分工**。为了整体观察所有工作部分的组合，马克思在"集合起来的工人，其成员或近或远地接近工作对象的处理"（*K I*，MEW 23，第 531 页）的意义上引入了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的概念。从而可以把彼此间相互隔离的功能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这种趋势也同样适用于教育或者家务劳动，不过它被排除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观点之外，从而使马克思也无法对其进行描述。——在资本主义管理中，水平分工的职能被置于统治职能之下，由此演变为对统治的意识形态去称呼化，其被伪装成垂直分工。（批判可参见 W. F. Haug 1993，第 98 页多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政治领域理解为统治分工的表达。当"迄今为止的分工革命必将通向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时"，他认为，"消除了分工的"无产者将最终战胜政治制度。（MEW 3，第 364 页）那句名言的产生就是基于这种看法之上："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必须推翻国家。"（同上书，第 77 页）

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解读的一个重大转变，出现在埃米尔·杜尔凯姆

（Émile Durkheim）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将统治掩饰为工作》（*Verkleidung von Herrschaft als Arbeit*）中。从所有分工的道德功能中，他总结出了明确的反经济思想的结论，并借此平衡和协调了所有的分工：分工创造了团结，没有这种团结就没有社会。其中的范例就是将性别分工作为“婚姻团结的来源”（*Arbeitsteilung*，第 103 页）。分工“是建立一种自成一体的（*sui generis*）社会和道德秩序。个人被相互联系在了一起，否则就成了独立的。他们不是分开发展，而是把他们的努力团结在一起。他们是团结一致的”（同上书，第 108 页）。分工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前提。

3.4 **分工发展的历史趋势**。马克思还考察了分工的发展对个人产生的后果，即片面化的病理学和作为应对措施的多样化和转化（Wechsel）的可能性。

3.41 **分工的病理学**。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先关注的是由于机器发展而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工人个体之间的片面化：“就像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压在了机器之下，并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躯壳。”（MEGA I.2，198）（1965 年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的剧本 *Die Kipper* 采用和改编了这番话语和情景）由于分工把工人变成了一台“机器”，使得他和机器成为竞争对手。（MEGA I.2，第 200—201 页）他将这种交互作用称为资本的累积（同上书，第 197 页）。简言之：“**分工**是对异化内部的**劳动社会性**的国家经济的表达……将人类活动的**疏远的、异化的**设置作为一种**真正的生物活动**或者是作为像生物一样的人类的**活动**。”（同上书，第 429 页）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Auszügen aus Mill*）中将文明的进步和异化的分工作塑造为“人类劳动的**统一**”持续的对立面（MEW 40，第 455 页；MEGA IV.2，第 456 页）。

3.42 **资本主义中分工的矛盾：片面的 / 多面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他在早期作品中提到的异化、分工、人类活动的贫困化的全球平等性往后推延，以便于能在分析中将这些与资本主义驱动的机械发展结合在一起，并坚持“工作普遍性”的观点，以及个人实现的工作类型的转变不是出于人的愿望，而是 575
出于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动力，因此资本主义也创造出了自己的发展动力：“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用

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MEW 23，第 511—512 页）马克思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同上）。

3.5 **分工的扬弃观点**。对于马克思而言，一种脱离相应分工结构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不能实现的。战略维度，即认为统治分工不同于横向分工的这种战略维度的内容为：非工人（例如业主、有年金收入者［Rentiers］、制造商）对工人的统治；以个体工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总劳动的发展；在缺乏相应的意识和缺乏与总劳动力相应的政治行动下，去构建一个工作的全面社会化。所有这些都可以从根本上理解为是决定和执行活动的分离和等级化所带来的结果，并且所有这些也结合了对抗性的拨款条件（Aneignungsverhältnissen）：简言之，由此马克思将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称为核心维度。

3.51 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们设计了分工的扬弃观点，确切来说就是：将个体归入这个观点中，“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反而支配着人们。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那句名言（继傅立叶之后）继续流传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DI*，MEW 3，第 33 页） 576

3.52 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其实现条件的分析，傅立叶的这个观点得到了论证。马克思针对的是在日常工作分配中的个人流动，以便在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实现“个人的自由活动，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的最大化。（*K I*，MEW 23，第 552 页）

3.53 基于对傅立叶和欧文的支持，以及对杜林的反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道：“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

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AD*，MEW 20，第273—274 页；MEGA，I.27，第 455 页）

评释：

马克思在许多地方都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灵活性，包括在分工的具体形式方面。在高科技条件下管理策略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取消等级制分工和支持个体工人的发展，这被马克思视为是转型的酵母。当然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这种发展，是在与世界市场有关的自发性的、对抗性的和充满危机的带有束缚的条件下产生的，并以增加结构性的失业为代价。

与此同时，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也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以至于新的生产方式允许和强制在一些主要领域的分工延迟。尤其是在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的分离，以及男工和女工的分离中。微电子在生
577 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中的应用，再次引发了有关分工的热烈讨论。由于所有工作都逐渐变成一种信息化处理的活动，使得所有工人也逐渐成为“脑力工作者”，以致关于控制和统治的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参见比如 PAQ 1987）。分工在企业各个层面中受到了冲击（在工业社会学中甚至提到了“分工的终结”——Kern / Schumann 1984）。企业内部的等级关系被重新洗牌；工作类型的转变和不断扩大的个人私属使用时间变得十分常见，就像工人的一般培训一样普遍。

来自工人的抵抗可能会增加取消分工的困难。不过，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由各部分和谐组成的整体，相反，各个工人团体之间是相互隔离的，甚至一些小团体在文化上是相互对抗的；这些分裂有助于社会总体工人实现再生产，在一种等级秩序下、凭借着旧分工和对工人阶级的划分。通过工人的行为，分工实现了自我调节；所有这些都必须要它自己完成，并自行调整。（参见比如 Willis 1979；PAQ 1987；Brosius / Haug 1987；Cockburn 1988）

4. 列宁延续了马克思的对立逻辑，同样也将手工业分工的毁灭视为进步（LW 2，第 182 页）。作为实践政治家他将重点转移到了来自工人行会和工会的反抗上。“资本主义必然给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的、长期形成的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种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年复一年地才能发展成而且一定会发展

成比较广泛的、行会气味比较少的产业工会，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这种尝试，想在今天提前实现未来才能实现的成果，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LR*，LW 31，第 34—35 页）

20 世纪俄罗斯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城乡分工。列宁在不同的著作中 —— 在对马克思关于出现内部和外部市场的解释的加工之上（*K III*，MEW 25）—— 都指出了具有家长制性质的自然经济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农业中的转型（参见比如 *KapR*，LW 3，第 25 页及以下）。列宁调查研究了“中农是如何逐渐变成更
578 加强大的个体和家庭的”（LW 1，第 111 页）。他援引了一篇以自然科学基础开篇的报告：身体强壮并且健康，许多儿子；不需要下地干活的家庭成员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中的共同家庭财产；出资人的独立性；逐渐将贫困农民招聘为“家庭工人”；将原本为了满足家庭需求而进行纺织的家庭女性成员的工作时间解放出来，而去生产市场所需的针织花边产品。（同上书，第 112—113 页）

4.1 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之后的发展，饥荒，以及 1930 年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都显得不适合去实现取消分工和取消与分工对应的社会安排 —— 赖纳·兰德（Rainer Land）认为接下来发展的关键，就是列宁领导下的苏联领导层已经做出的决定，即立即以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的形式着手初步工业化。这就推进了“生产工作要具体到规范化专业化的工作，即所有工序必须同时完工和对高级工程师或者同等职位的领导进行绩效总结”（W. F. Haug 1993b，第 128 页）。—— 几乎在两代人之后，上述的这种结构调整发现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主观因素”的问题。为了对抗僵化的分工体系所带来的后果，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宣布：“将**构建一个不间断教育的统一体系**添加到议程上。”（引自 W. F. Haug 1989）

4.2 **在社会主义文献中的分工**。即使在国家社会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其他的“分工”在这一领域成了热烈讨论的焦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分工，“授权者”和“未授权者”之间的分工，“负责任者”和“不称职者”之间的分工。—— 鲁道夫·巴罗 —— 紧随恩格斯之后 —— 就这个问题敏锐地写道：只要工作还需要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时间，那么要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交通范围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就只能通过增加分工 579
才可能实现，这种分工的前提是，提供简单体力劳动（手工劳动）的大众和在指挥工作、从事贸易、国家事务和艺术与科学事业上有着优先权的群体之间的大分工。由此必须要有一个从实际工作

中解脱出来的特殊阶级，因为实际生产者根本没有时间去担心这种社会的总体事务”（1977，第164页）。——在1989年剧变中，曾短暂出现过或许可以实现这种“分工”的扬弃的可能性。

5. **女权主义批评分工**。对性别分工的批评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妇女运动，并且一直持续存在着。——玛丽罗萨·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将一种社会分工进行了丑化，在这种分工中两性（异性恋）之间的关系必须是作为一种纪律行为而存在，因为在工作中的性别差异体现在了体力上的区分，因此不能建立一种人道关系。这被她称为“分工的同性恋（Homosexualität）”（1973，第38页）：“但这种同性恋一般也同样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中：在家中的女人和在工厂、办公室的男人——他们在整整一天中都是处于分离状态的；或者是一个拥有1000名女性和10名男性领班的典型工厂；或者是一个（配备了打字员的）为50个从事学术写作的人服务的写作办公室。所有这些情况已经是一个同性恋式的生活环境了。”（同上）——继马克思和黑格尔之后，多萝茜·史密斯（1989）强调了女性工作的不可见性是作为理解“无形”科学的关键。因此正如黑格尔所提到的，在主人的意识中肯定会认为，仆人就是为主人的再生产而劳动的，因此同样，对于男性科学家而言，身体的日常工作就是他们工作的前提，因此就不会去考虑男女之间由于身体结构而造成的在日常工作上的差异。这种分工在最近学术女权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关注，并在《身体的诞生》（Kopfgeburten）（Neusüss 1985）一书中成为对男性的理性概念的批判（比如 Conrad / Konnertz 1986；List / Studer 1989）；另一方面，对这种分离的思考方式的文学加工不断出现，尤其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比如 Monika Maron 1986；Helga Königsdorf 1988；Irmtraud Morgner 1976；Christa Wolf 1987）——总而言之，关于性别分工及其后果的问题，已经成了妇女运动的核心要素，以及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所关注的是妇女 580
在双重工作中的特殊资格（Anke Wolf-Graaf 1981；Regina Becher-Schmidt 1983）。双重负担成为工会指导思想和行为的关键词，关于妇女“差异”的讨论还涉及了诸如在分工塑造其他社会地位时，有关妇女社会地位的讨论。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强调了这种分工与以下几方面的关联性：脑力和手工的分工，不断重复出现的妇女压迫的政治基础和个人基础的分离，性别关系。（Frigga Haug 1991）将性别分工作为妇女压迫理论的基础，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乌尔苏拉·贝尔（Ursula Beer）（1984）和希尔德加德·

海泽（Hildegard Heise）（1986）。

6. 马克思的关于工作日、机械和大工业的章节（*K I*，MEW 23，Kap.8 及 13），以及他的众多来自工厂报告的案例，都被选入了国际工业社会学当中。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学科，以至于有个方面往往被人所忽视，即每一个手工劳动中其实都包含着脑力劳动的元素，因此工作思路也应该被包括在分析中。

关于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的想法在学生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发展；这引起了相对较大的影响力，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后期作品《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1970）就被列为左翼知识分子著作。他的主要论点是，工作类型的这种分离已经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一种生产方式的逻辑，在其中，精神劳动由于“商品交换的分配方式”（1970，第 95 页）而独立于人工劳动。索恩-雷特尔的分析建立在泰勒主义（Taylorismus）的基础之上：“其借助机器功能而在操作单位上产生的力量使得连续劳动过程中的人工劳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在这种程度下构建了与科学思维方式一样的高水准。”（同上书，第 160 页）计算机辅助下的快速发展的生产已经超越了索恩-雷特尔的论断。

尽管马克思从后备军和人口过剩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最近还是出现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分工：在工人与那些没工作，甚至都无法成为所谓“工业后备军”的人群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规则地贯穿全球经济的分裂；而且失业大军和那些在社会发展中被抛在后面、被边缘化的人群显得（在西方工业化社会的总数中占了三分之一，在世界人口中约占三分之二）不再有什么作用，不过会根据经济状况而将一些人重新召回到生产过程中 —— 但依然还会存在长久的“剩余”。此外还有世界第一国家和南方、东方的贫困国家之间的“分工”。—— 对旧分工体系提出激进挑战的是女权运动。女权主义者认为，人类最大的问题 —— 生态问题、生产力的非理性增长和破坏力、浪费自然资源、地球破坏，这些都应该归因于生产方式，这种基于性别分工的生产方式只进行开发和生产以获取利润，却经常忽视或者边缘化妇女，她们对自然和人类生活至关重要。不仅要将女性纳入到经济和公共事务中，而且还要将男性纳入到再生产劳动中（包括社会和生态领域），这是对人类生存和维持可居住地球的长期保护。

参考文献：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Frankfurt/M 1977; R. Becker-Schmidt u. a., *Arbeitsle-*

benLebensarbeit. Konflikte und Erfahrungen von Fabrikarbeiterinnen, Bonn 1983; U. Beer, *Theorien geschlechtlicher Arbeitsteilung*, Frankfurt/M 1984; G. Brosius u. F. Haug (Hg.), *Frauen/Männer/Computer*, Berlin/W 1987; C. Cockburn, Die Herrschaftsmaschine, Berlin/M 1989; J. Conrad u. U. Konnertz, *Weiblichkeit in der Moderne*, Tübingen 1986; M. Dalla Costa, »Die Frauen und der Umsturz der Gesellschaft«, in: dies. u. S. James (Hg.), *Die Macht der Frauen und der Umsturz der Gesellschaft*, Berlin/W 1973, 27-66; E. Durkheim, *Über soziale Arbeitsteilung. Studie über die Organisation höherer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1988; M. Foucault, *Der Gebrauch der Lüste (Bd. 2: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Frankfurt/M 1986; S. Harding, *Femin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W 1991; N. Hartsock, *Money, Sex and Power*, New York 1983; F. Haug, »Zur Aktualität von Marismus-Feminismus«, in: *Sozialismus in Europa*, Essen 1990; dies., »Ökonomie der Zeit, darin löst sich schließlich alle Ökonomie auf. Neue Herausforderungen an einen sozialistischen Feminismus«, in: *Das Argument*, 32. Jg., 1990, Nr. 184, 879-895;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Berlin/W 1989; ders., »Arbeitsteilung und Ideologie«,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91-115; ders., *Determinanter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Situation*, AS 218, Hamburg 1993 (zit.b); H. Heise, *Flucht vor der Widersprüchlichkeit.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und Geschlechterbezieh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86; D. Hume, »Of the Origin of Justice and Property«, in: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Vol. Ⅲ, 1740; H. Kern u. M. Schumann, *Das Ende der Arbeitsteilung?*, München 1984; H. Königsdorf, *Lichtverhältnisse*, Berlin/DDR 1988; R. Land, »Fordismus plus Planwirtschaft«, in: M. Brie, E. Böhlke, *Rußland wieder im Dunkeln*, Berlin/W 1992, 49-59; E. List u. H. 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eminismus und Kritik*, Frankfurt/M 1989; M. Maron, *Die Überläuferin*, Frankfurt/M 1986; I. Morgner, *Leben und Abenteuer der Trobadora Beatriz nach Zeugnissen ihrer Spielfrau Laura*, Berlin/DDR 1976; dies., *Amanda. Ein Hexenroman*, Berlin/DDR 1983;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87;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 1987; A. Rattansi, *Marx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1982; L. Sargent (Hg.), *Women and Revolution*,

582

Boston 1981; D. Smith, »Eine Soziologie für Frauen«, in: E. List u. H. 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rankfurt/M 1989;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Frankfurt/M 1979; C. Wolf, *Störfall. Nachrichten eines Tages*, Darmstadt 1987; A. Wolf-Graaf, *Frauenarbeit im Abseits. Frauenbewegung und weibliches Arbeitsvermögen*, München 1981; K. Young u. a., *Of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London 1981.

弗里加·豪格 撰

盛舒洋 译

参见：

Agrarfrage,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markt, Arbeitspolitik, Arbeitszeit, Ausbeutung, Automation, Bauern, Beruf, Bildung, Dialektik, Disziplin, Doppelbelastung,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Fabrik, Facharbeiter, Familienarbeit, Fordismus, Frauenarbeit, Frauenemanzipation, Freizeit,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Genuß, Gesamtarbeiter,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erkschaften,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ideologische Stände, Imperialismus,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Intellektuelle,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Klassen, Kooperation, Kopf/Hand, Leitung, Lohnarbeit, Management, Nomenklatura, polytechnische Bildung, Qualifikation, Reproduktion, Stadt/Land, Taylorismus, Technikentwicklung,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Zivilisation

劳动时间（工作时间）
(Arbeitszeit)

1. 关于劳动时间的讨论，马克思收集了借助时间支配及时间控制与安排的政治形式来获得统治权的理论。在生产和雇佣劳动形式的层面，他的理论在原则上是现实的。尽管马克思对“时间”的思考——“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真正人类的发展，就是以这种时间的多寡为转移的”（MEW 2，第52页）——以及他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反思是全面理解劳动时间的前提，且在有关劳动时间支出的特殊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时间关系加以观察。凡是在理论上包含生产及再生产活动的形式都在社会必要劳动的范畴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批评劳动时间的

还原关系：在《神圣家族》中他们指控“以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政治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虽然此观点辨别了所有人类活动的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同上）另一方面，他们也系统关注了作为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的雇佣形式的劳动（女性的）家庭及再生产劳动（参见，对“家庭劳动必要消费”的探讨及资本的撺掇，*K I*，MEW 23，第 417 页注释 120）。

恩格斯对于劳动时间的研究最早见于 1839 年的《来自乌柏塔尔的信》（*Briefen aus dem Wuppertal*），他在书中描绘了因过度劳动引起的工人悲惨的健康和社会状况（参见 MEW 1，第 417 页）。1843 年至 1844 年间，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反驳了人口理论家将劳动市场的不稳定归因于“人口过多”这一解释。相反，他在竞争法规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及人类劳动力关系的原因。结果便是，要么人类劳动力一部分被过度剥削，一部分无事可做被迫饿死，要么所有工人轮替工作或挨饿直至死亡。（参见 MEW 1，第 517 页）恩格斯在建议中提及了迄今仍存在的关于劳动时间的问题：他援引了欧文的集体主义生产方式，并在 1845 年主张借助社会性劳动分配的新型组织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加以干预。由此他认为：“人类社会拥有极其丰富的生产力，这些生产力只要合理地组织起来，妥善地加以调配，就可 584
以给一切人带来最大的利益。”（MEW 2，第 545 页）“公正地分担社会活动……我们可以设想……由于利用了现在完全没有利用的或者利用得不够合理的劳动力，每个人的一般工作时间就会比现在缩短一半。”（同上）

马克思将劳动时间概念化。它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对人的统治及解放等的分析密切相关。他做出了如下区分：劳动时间首先是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数值，其目的是使得使用价值的生产在所有的时间能够被使用且使得人们始终对其感兴趣。（参见 *K I*，MEW 23，第 86 页）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一般来说被迫的——为剩余产品的形成所决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通过剩余价值形成的过程且作为社会性的（概念）被加以讨论。经分析，马克思将工资形式掩盖下的（再生产）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相分离。此外，他也分析了为工作日时长而进行的历史斗争的原因和运动形式。

在作为价值标准的劳动时间这一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导向里找到了劳动时间的无标准延长和集约化的原因（参见 MEW 16，第 544 页）。在封建主义中，通过区分在自己

的土地和他人土地工作的方式，自我再生产的必要时间及给封建领主的剩余价值都是总体工作日中的可感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样的区分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价值和剩余价值、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因社会表达方式与感知之故融合在了一起（参见 *K I*，MEW 23，第 230—231、251 页）。建立在价值上 —— 确切来说剩余价值而非使用价值 —— 的资本主义生产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参见上书，第 250 页）。除了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来提高单位时间段内生产力的支出，也就是说，增加劳动时间并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结合起来。（参见上书，Kap.10 及以下）

在马克思的时代，满足“对剩余劳动的饿狼般的贪欲”（同上书，第 280 页）的尝试发展出了强制性的劳动时间延长。此外还通过引入晚间劳动和某种资本主义策略的“换班制度”。这种策略试图通过在不同的工厂投入工人的方式来绕开对工作时间法定的限制（参见上书，第 296 页及以下）。马克思将英国工业黄金时代的开端描绘为无底线的剥削，它“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同上书，第 285 页）

585 工作日的绝对长度，如同两个部分的相对关系中，在为了劳动时间的长度而进行的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被重新规定。（参见上书，第 251 页）—— 罗莎·卢森堡在《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中对马克思的报告补充道，“工资也……同工作日一样，自身没有任何确定的界线”（GW 5，第 747 页）。—— 在研究设想里，马克思提供了超越他所处时代的关于时间的政治分析。此外，他将阶级斗争界定为资本家们和工人敌对状况的集中化与组织化、国家干涉、权利规定的来源和效果以及不同的对手和联盟之间的复杂动力。

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组织方式和竞争的法则里，马克思分析出了获取局部保护规定的泛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大工业中，某甲不能任意确定自己的劳动时间，因为某甲的劳动，如果没有企业的一切其他的某甲和某乙的合作，那就没有什么作用。这非常清楚地说明英国的厂主为什么顽固地反对 10 小时工作日法案。他们都很清楚，减少女工和童工两小时的劳动时间，必然也会引起成年工人的劳动时间的缩短。大工业的性质就要求所有人的劳动时间都完全一样。”（MEW 4，第 104 页）相反，资本主义竞争却导致了剥削及保护条件的一体化。在工作日范围的周期里，通过打破“昼和夜的界限”（*K I*，MEW 23，第 294 页）而建立的某种平衡激发了竞争 ——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

要的人权”（同上书，第 309 页）——而且使得 10 小时工作日得以延长，以及其他诸如地域的、性别的以及年龄相关的保护条件的扩张。理论上来说，劳动保护问题给劳动时间的数量维度上增加了质量维度。——后来，保护法规的法律实践批判中，列宁着手研究了这一问题，
586 企业家们的处理方式被指出来了。（参见 LW 2，第 274 页）

“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K I*，MEW 23，第 286 页）生产的分支部门不仅仅在形式上，而且也是真正地以资本主义的形式被组织起来的，在其中，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影响着相应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统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同上书，第 315—316 页）最后成功地以法律和检察机关（工厂监察员）的形式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合法化。马克思在 1855 年还只是对这种发展抱有部分怀疑的态度，因为“法律上对工作时间的限制绝不能证明社会发展的水平很高。但是，我们认为祸根不在于法律，而在于使得法律成为必要的那些条件”（MEW 10，第 608 页）。

9 年之后，马克思为“十小时法案”而欢呼，10 小时工作日是开创性的进步。他在这里看到了“重大的有争议的问题”，“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MEW 16，第 11 页；另参见 Engels，*Die englishe Zehnstunden-bill*，MEW 7，第 233 页）

2. 为了执行 8 小时工作日，1889 年巴黎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宣布 1890 年 5 月 1 日是国际斗争的节日。11 年后，耶拿人的蔡司工厂（Zeisswerken）第一次将其推广。1918 年，经动员部门的规定，德国普遍劳动时间缩短为每日 8 小时。与此同时，8 小时工作日的执行标志着在工作时间的斗争上——实现每周 48 小时工作——出现了一个新的、有争议的时间参考。8 小时工作日的需求及贯彻实施可以视作新的原则。“标准工作日”与之前的工作日缩短具有质的差别：借助“8 小时工作—8 小时休息—8 小时自由支配”（参见 *Der Gewerkschafter*，1983，第 9 页），确定了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僵持状态。

关于劳动时间争论中还有一条重要 587
的线索“企业关于工作日中休息的要求、控制和组织得以形成……在争取标准工作日和缩短劳动时间斗争的大背景下，多次被废除”（Sperling 1987，第505 页）。休息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的休养时间。此外，实践的经验指出对休息的辩护

“不只是关涉个人与集体的组织与行动，还可能建立其对抗经济和心理计算与盈利逻辑的社会逻辑”（同上书，第 511 页）。此外还关涉对抗资本的个人时间逻辑的空间。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工会的时间政治挑战形成了新的问题：将再生产劳动纳入到全体的劳动时间之中的要求；持续增长的失业者的数量；因移民和国际劳动分工而不断增长的劳动时间斗争的国际化以及劳动时间的灵活化。

工会斗争的出发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指在社会化生产的正规部门中活动的男性雇佣工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贯彻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的政治宣传（“礼拜六，父亲属于我！”）时，仍然排除了女性职业劳动这一特殊问题。对于女性来说，职业—家务两者是充满矛盾的，我们从工会缩短劳动时间的传统规划中便可清楚看到。

就结果而言，越来越多的男女工作者没有或仅仅只是部分处于社会无组织状态；非职业形态的劳动将成为斗争中的盲点。相反，因劳动而分裂的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工会而言是个难题。在不断增加的失业者和更加灵活的劳动时间的前提下，劳动时间的减少不仅仅让策略性转变成为必要，而且要求工会斗争将其他在政治上独立于企业利益的社会组织招揽进来。此外，通过将生产企业转移到劳动时间更长、酬劳更少的国家，确切来说，通过从更高生产力国家进口产品——更长的劳动时间也隶属于此，工会的时间政治陷入压力之中。最终从“标准劳动时间关系”偏离的大量的劳动时间形式暗中破坏了工会所建立的统一劳动时间。 588

3. **部分劳动时间**。作为全部劳动时间对立面的“部分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关系包括所有协议种类，它们根据劳动时间的持续和衰减及社会保障程度而在兼职工作这一概念下得以区分：呆板的、经典的、灵活的兼职工作，缩短了年限的劳动时间，以生产能力为导向的可变劳动时间（“随时呼出劳动制”[Kapovac]），自由的框架订单合同、加班合同 / 补休合同，自由的抵押协议，工作分享及细微的工作。（参见 Peter 1988，第 5 页及以下）因此，部分劳动的时间关系是最为不同的：部分劳动时间在自我规定的每日流程的可能性、生活规律及兼职失业之间变换。这种工作被人看不起、报酬微薄、高强度体力、有损健康、缺乏社会保障，且仅可以补贴部分家用或实现个人供给。

从兼职劳动的形式我们便可以看到两大社会问题的个体的出路。只有在普遍化的劳动时间缩短的前提下，这两个问题才能被全面地解决：其一是家庭分工的新秩序，其二是工作者愈加短缺的

劳动时间的新分配。“始终占优势的家族式的劳动分工影响了工作领域中兼职工作的性别化需求”（Kurz-Scherf 1985，第 662 页），就欧洲的平均水平而言，女性占兼职工作人数的 90%。

兼职工作指的是半天的工作而非 8 小时工作的一半。工作及执行的要求被浓缩在更短的时间上（参见 Flieger 1988，第 265 页）。对于资本而言，兼职工作有较为长远的吸引力，便于改善工作条件，比如处理有害健康的工作职位或在重复的活动中提高效率。（参见 Peter 1988，第 12 页）更短的劳动时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全职工作，兼职工作意味着更低的旷工时间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因为“在持续的工作日中
589 有疲劳的时刻，相反，兼职工作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劳动时间，即在‘自由时间’休息”（同上）。因此兼职劳动相对而言更廉价：这里节省了雇主的社会保险费。一种更低的组织程度给企业利益代表和相应的批判立场带来困难，而这与工会对抗兼职工作息息相关。

对他们的反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兼职者接受易疲劳的、伤害健康的且更加单调的工作，此外他们被纳入到企业合理化的企图中。因此，他们增加了工作岗位的保障、重新培训以及维持工作岗位的斗争压力。兼职工作与“工会所提出缩短工作时间与（病假津贴与实得）工资（间的）差额补偿的劳资协定要求是对立的。此外，兼职工作对工会及企业的利益也造成了潜在危害”（Kurz-Scherf 1985，第 659 页）。

以 1993 年大众公司的大量解聘为契机，有关兼职工作和劳动时间缩短的争论发生了新的转变：在“支出代替头脑”的口号下，每周四天 28.8 小时工作制被推广。以进修为目的的培训团体得以建立，并且以接力赛跑式的方式增长。借助增加或下降的兼职使得老员工逐步退休得以可能。皮特·哈茨（Peter Hartz）——大众工厂董事会的工作经理将广告同下面的主题计划结合起来，“对个人来说，新的解决方式的合理妥当是未来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1994，第 12 页）。为了帮助“雇主和雇员实现结构转型、就业及创造力”，大众企业工会在这一模式中发现了新的路径。（Peters 等 1994，第 171 页）尽管存在大量的失业情况并且大众工厂有积极反响，这个模式作为少数的且有时间限制的协议在以目标为导向的工业里仍然是缺乏竞争力的。

4. **失业中的时间**。20 世纪 30 年代（Jahoda / Larzarsfeld）以来，玛瑞萨镇研究（Marienthal-Studie）研究了因（大量）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心理后果并指出“被改变了的时间体验”（1960，第 80

页）；生活“摇摆”在两周一次的救济金里，不再处于工作和悠闲的交替里。只要他们能够生存，便对其他的活动不感兴趣。“并非如预想的那般，失业人口会利用他们的时间进修。如果人们仅看到自己的空余时间而无其他，那么他们会对阅读兴趣的减少感到吃惊。”（同上书，第 40 页）——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佐耳（Zoll）的研究证明了经济保障条件下的失业情况给“自由”时间的有价值地利用带来了困难。失业者面临着“去结构化时间”（1988，第 11 页）的问题。

590

5. 1982 年以**“劳动社会的危机”**为主题，第 21 届德国社会学者日讨论了“因职业工作而带来的民众生活时间的”的持续下降及变得不确定的充分就业（Matthes 1983，第 44 页）。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着手研究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后者认为“劳动以劳动社会为出发点”（1983，第 30 页）。相反，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批评“将劳动领域中的生活关系总和构建为主观意义的统一的尝试”，因为这“由于劳动的时间结构和劳动经历持续增加而变得绝望。……工作经历的中断和劳动时间在生活时间之中所占比例的逐渐缩小应该一并使得劳动成为‘在其他之外’的事物，此外，使得它的职能对个人的和社会认同的构建更有针对性”。（1984，第 30 页）

根据事实经验，奥菲基本没有发现什么矛盾。然而，当他尝试证实“劳动”范畴在根本意义上减少且将这一关键范畴从社会学排除出去时，就遇到了持续的矛盾。（参见 F. Haug 1990，第 244 页）劳动不再以规定的形式被理解，并且有关人类生活的非统治性形态的想法也是不可设想的。——奥斯卡·内格特也为“（活跃）劳动”的“历史—基础”范畴做出辩护（1987，第 175 页）。“历史—基础”是“人与自然间不可扬弃的新陈代谢过程的条件（包括已形成的次生的、社会的本然［zweite gesellschaftliche Natur］）”。因此，内格特必定控诉“劳动的乌托邦内涵”（同上）。他认为，“代替使得我们变得愚蠢和片面的市民职业劳动系统的其他可能性，……不是扬弃劳动的幻想式唯心主义，而是争取劳动社会认可形式的复制和扩展的斗争，这将有益于个人生产和自我实现”（同上）。

591

就劳动社会的终结这一话题而言，对性别特点的影响和处理方式的忽视遭到女权主义的批判：“劳动的‘其他’形式虽然不断升值”（Eckart 1983，第 661 页），但这种带有性别特点的分配方式仍然保留着（参见 Janshen 1983，第 642 页）。在当今这个变革且价值变迁的时代，

对于全体必要（及性别分配）劳动的新组织、新的分配及评价而言，是否有或何处是新的起点，在被男性所支配的讨论中，这个问题未曾被提及。

这一批判也适用于高兹和内格特，尽管他们还介绍了其他重要的政治观点。高兹在其关于另一种劳动及劳动和生活时间的新分配的观点中论证了——与自动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方式具有社会和个体的关联且因“行将就木”的资本主义而变得“不可能”——劳动和工资的分离。在《消除劳动的时代》（Zeitalter der Beseitigung der Arbeit）（1983，第 53 页）中，“工业化的意识形态与伦理的基础”（同上书，第 56 页）被削弱——为了维持统治关系，全职工作作为假定的原则会被保持。然而，大量灵活的劳动或非劳动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作为“离开资本主义的出路”（同上书，第 66 页），高兹建议将一生所需要完成的劳动时间定为两万个小时，以此反对终身的最低收入（参见上书，第 69 页）。

内格特还提出了时间结构和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相对而言，“在 150 年来有组织的争取劳动时间缩短的劳动运动的历史之中，每周 35 小时的要求是实质性的转折”（1987，第 32 页），因为它第一次采取了 8 ： 8 ： 8 的时间分配，“同时也符合了比例关系的本性”（同上书，第 33 页），有利于“人类”休息时间的增加。企业家们的反抗并非针对每天少去的一小时工作时间。“他们的争论在于，他们担心每周 35 小时工作制会堤坝决口般地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此外，它涉及‘重大争论问题’的裁决：通过将负担转嫁到在现存职业系统中仍有一席之地或已被这一系统淘汰的人民头上，资本主义危机的克服机制是否能在今后继续发挥作用，抑或这种神话是否会通过一种互相联系的集体组织的生产者的团结行为而被突破？”（同上书，第 35—36 页）必须避免从事职业者与非从事职业者的社会性分离。“这不是……两种文化，而是两种相互对抗的现实，伴随而来的还有相应的现实认知……思考形式、时间观、感知的特殊逻辑、客观世界以及同样的自我感知和行为指导。这种现实中的分裂比旧的阶级分裂范围更大，这都归因于新的部门。”（同上书，第 69 页）内格特认为，“作为结果的劳动时间政治存在于社会和政治规定的条件下……如果它们也能够被视为政治权力斗争，不仅仅是现有劳动的平衡分配的斗争，而且是涉及劳动的社会组织原则的斗争”（同上书，第 13 页）。

参考文献：

R. Anzinger, »Arbeitszeitgesetz. Erfolgreich zum Abschluß gebracht«, in: *Bun-*

desarbeitsblatt, 1994, H. 6, 5-9; F. v. Auer, K. Geissler, H. Schauer, *Auf der Suche nach der gewonnen Zeit*, 2 Bde., Mössingen-Thalheim 1990; R. Dahrendorf, »Wenn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die Arbeit ausgeht«, in: Matthes(Hg.) 1983, 25-37; C. Eckart,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Welche Krise findet statt?«, in: Matthes (Hg.) 1983, 641-662; J. Flieger, »Teilzeitgeteilte Zeit«, in: Zoll (Hg.) 1988, 253-266; *Der Gewerkschafter*, 1983, H. 7; K. Geissler, »Bessere Zeiten-Ergebnisse der Zeitakademie«, in: Auer u. a. (Hg.) 1990, Bd. 1, 13-30; ders. u. U. Pfau, »Frauenförderung mittels Arbeitszeitverkürzung – Ein Modell der positiven Diskriminierung von Eltern im Erwerbsleben«, in: *WSI-Mitteilungen*, 1989, H. 7, 383-390; A. Gorz, *Wege ins Paradies,* Berlin/W 1983; P. Hartz, *Jeder Arbeitsplatz hat ein Gesicht. Die Volkswagen Lös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94; F. Haug, »In der Arbeit zu Hause sein?«, in: dies.,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228-248; M. Jahoda, P. F. Lazarsfeld, H.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1933), Allensbach-Bonn 1960; D. Janshen,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Welche Krise findet statt?«, in: Matthes (Hg.) 1983, 641-662; I. Kurz-Scherf, »Zum Stellenwert der Teilzeitarbeit in einer emanzipatorischen Arbeitszeitpolitik«, in: *WSI-Mitteilungen*, 1985, H. 11, 659-668; J. Matthes(Hg.),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Verhandlungen des 21.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Bamberg 1982*,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O.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Frankfurt/M-New York 1987; C. Offe, »Arbeit als soziologische Schlüsselkategorie?«, in: ders. (Hg.), *'Arbeitsgesellschaft'. Strukturprobleme und Zukunftsperspektiven*, Frankfurt/M-New York 1984; G. Peter, *Frauendiskriminierung durch Teilzeitarbeit*, Frankfurt/M 1988; J. Peters, H. Schwitzer, K. Volkert, W. Widuckel-Mathias, »Nicht kapitulieren – trotz Krise und Rezession. Der Weg zur Sicherung der Beschäftigung bei Volkswagen«, in: *WSI-Mitteilungen*, 1994, H. 3, 165-171; H. Sperling, »Pausen: Zur Innenansicht der Arbeitszeit«, in: *Argument* 164, 29. Jg., 1987, H. 4, 505-511;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2 Bde., Frankfurt/M 1978; R. Zoll(Hg.), *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ung von Zeit*, Frankfurt/M 1988.

皮特拉·多布内（Petra Dobner）撰

蒋迪译，贺腾校

参见：
abstracte Arbeit, Arbeit,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kraft, Arbeitsmark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Ausbeutung, disponible Zeit, Familienarbeit, Gewerkschaft, Hausarbeit,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Konkurrenz, Mehrarbeit, Ökonomie der Zeit,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Regulation, Reproduktion, Übervölkerung, Wertsubstanz/-maß, Zeit

工作时间的缩短（Arbeitszeitverkürzung）

一

工作时间的缩短既包含客观的、与产品相关的方面，又包含主观的、与雇佣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相关的方面。工作时间缩短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一些核心原理相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史前史”进步的主要动力、相对剩余价值的问题和对“可支配时代”的希望，也就是说，拥有不断增长的自由时间是未来“自由王国”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中发展了他的工作时间的概念，以便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中进一步确定这个概念，“就像运动的量的存在是时间一样，劳动的量的存在就是**工作时间**”（MEW 13，第 17 页）。工作时间并非是物理的量，而恰恰是一个在规定的时间中所付出劳动的规定劳动量。此外，工作时间是灵活的。与物理时间或者是与可用表衡量的时间不同的是，工作时间可被缩短，同样也可被延长或者被扩大。（*K I*，MEW 23，第 246 页）

如果劳动是为了生产出以人类再生产为目标的使用价值，那么工作时间或者劳动量就需要根据商品或使用价值的量加以缩短或延长。使用价值指的是在 594
给定的诸条件下为了特定的需求应当且能够被生产的（东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有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它们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同上书，第 552 页）就像人总是对扩大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量或者工作时间感兴趣一样，他们也总是感兴趣，如何缩短投入在“生产物质生活本身”（*DI*，MEW 3，第 28 页）的日常劳动中的工作时间。

在与产品相关的意义上，工作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减少生产任何一个物品的必要工作量；工作时间的缩短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后果。故而，凭借等量

的辛苦劳动可以得到比以往更多的使用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K I*，MEW 23，第 55 页）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只有（通过理性化和集中化）超出规定限度、超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看到了促使社会朝着更高形式过渡的且具有决定性的推动力：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都随着财富的发展，或者可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Gr*，438；MEW 42，第 445 页）。

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在不同产品中所投入的工作量不断减少，一方面意味着原初的稀缺性，另一方面意味着为不同的社会阶级所拥有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本身就是有限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产品相关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增加了被资本家占为己有的**相对剩余价值**。随着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必要工作时间的缩短 —— 对额外利润的无限追求是其动力 —— 为生产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的商品而投入的社会必要工作时间也会随之缩短。工人生存资料的不断贬值意味着必要工作时间份额的缩短，对于资本家阶级而言，相对
595 剩余价值在此特殊的情形下产生了。（参见 *K I*，MEW 23，第 331—340 页）

然而，在与原始稀缺性进行斗争的史前时代，如果工作时间的缩短出现在客观物质财富绝对增长的条件下，那么稀缺性的克服将会完全颠覆这种表现形式。只要人类大规模地发展其自身的生产力，“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Gotha*，MEW 19，第 21 页），那么工作时间的缩短将不再表现为一个且同一个工作日内生产的使用价值的绝对增长，而是表现为主体相关意义上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工作日的持续缩短，也即自由时间的产生。“但是自由时间，**可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TM*，MEW 26.3，第 253 页）

马克思把工作时间的缩短与此视角相关联：“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也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

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Gr*，第 593 页；MEW 42，第 601 页）

第二、第三国际中的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继承马克思对劳动的批判，他们仅仅只是强调形式一进步意义以及劳动所特有的与人相关的特点。由于劳动概念扩大到人类活动最多样的、最异质的形式——从政治与宗教到艺术与科学——便有了对劳动的颂扬，这样的劳动必须被从“异化”中“解脱”，获得“解放”且不会被扬弃。——马克思对此已有论述。虽然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仍然把劳动与异化等同（“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MEW 3，第 186 页）；但是在成熟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却把劳动理解为人类生存的普遍历史条件。人类生存仍被包含在一个不可被扬弃的（仅仅是理性化和人性化的）“必要性的王国”中（参见 MEW 25，第 828 页）。此外，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谈及“现实的自由的劳动，比如谱曲创作”（第 505 页；MEW 42，第 512 页），马克思“转喻”意义上的劳动概念便有语义上的歧义。

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劳动极端批判派只有少数的追随者。除了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为《懒惰的权利》（*Das Recht auf Faulheit*）（1887）的辩护及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的著作里对劳动的性质与未来以及自由和尺度的讨论外，对工作时间的缩短所具有或可能具有的意义的追问没有引起马克思主义过多的反应。自自动化及相应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发生以来，这样的问题以新的方式被提出。

卡罗斯·安东尼奥·阿圭雷·罗雅斯
（Ca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撰
彼得·耶勒、鲁埃迪·格拉夫
译为德文
朱谕阳 译，贺腾 校

二

目前对工作时间缩短形式的讨论不能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利益分离，以便能够更加灵活地投入劳动力。在既有尺度之外的生产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分离（特别是夜班和轮班工作制）以及对劳资双方与劳动立法间的僵化的时间安排进行必要的反干预，都有助于获得劳动力潜在的时间性资源（参见 Sementek 1991）。

在运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经济学迫使对活劳动力的生产性消费不能中断。通过企业之间竞争或国家及国际层面上的资本竞争，雇主组织的相同的灵活化策略得以形成。这个组织产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中，旨在应对“35 小时工作制”的工会目标。雇主以及新保守经济政治和社会政治的代表们不仅指出了激烈的竞争条
597 件、“德国环境”的安全以及可能减少的就业风险，而且指出了就业者及择业者们已改变的时间偏好和需求。对更多“时间主权”与尽可能的协调职业和家庭的愿望——被看作是女性的特殊问题（参见比如 Bäcker / Stolz-Willig，Quack，Stolz）——时间资源的持久性利用以及“以生产能力为导向”来平衡因市场与季节而波动的需求，可以满足以上的需求，并且减轻企业家的压力。

通过这种方式，经典的工业时间安排（Deutschmann）以及在福特的积累制中所贯彻的“正常劳动关系”在两个方面陷入了压力（Hinrichs，Schmidt）。“时间安排”是资本与劳动间暂时的妥协，以“正常”工作日为目的的斗争结果。人们把“正常劳动关系”理解为“一种稳定的、有社会保证的、依赖性的全职工作，其框架条件——工作时间、工资、社会福利——根据集体合同以及劳动或社会权利被控制在最低的水平，借助有统一趋势的代表权及统一的工会组织”（G. Bosch 1986，第 165 页）。

在一个可预见的“后福特式”生产方式中，随着对古典时间安排及其内在的“男性事业模范”（Hinrichs 等 1991，第 22—23 页）的腐蚀，必然会形成工作时间安排及其规范性和偏差的新形式。问题在于，“正常的劳动关系如何在经验的层面上被改造，以使得它符合就业者业已改变及特殊生活阶段发生变化的时间需求，同时保持它的规范效用及其集体保护功能”（Bauer / Schiling 1993，第 218 页）。

除了工会的传统任务，即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条件，组织功能也落到了工会身上。除了工资政策，若工会把工作时间政策作为其活动的中心，它能保持其优势并且实现其社会政治职能。工会“没有其他的行动参考，就像时间一样，它作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空间和运动形式与当前所有的挑战具有关联。这就是说，工会不拥有其他别
598 的手段如激活他们自己的工作时间政策那般来重新激活有关社会改革的讨论”（Kurz-Scherf 1993，第 77 页）。

为了确保就业者与择业者的支持，工会必须在复杂且彼此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来提供集体性和个体性的原则。无须放弃集体合同的惯例原则，工会必须维护单个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规划且形塑他们的个人生活。工会必须放弃对不同时间模型及所有行业的税率规定的观望态度。根据古典的时间安排失效的原因，我们不能普遍地推论出强制时间安排的失败。（参见 Herkommer / Mühlhaus 1994）“不是劳动关系政策的任务，而是它的进一步发展被公布”（Däubler

1988），进一步的发展在于，模范工作时间的多样性以及在作为“被保证的选择性”的不同工作时间形式中的就业者权利得以规范化。

作为可测量标准意义上的规范，可以用来确定或协商，雇佣劳动者（男性和女性）为了——作为最低条件——在历史形成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养活自身，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对孩子及进一步培养的支出**可能**包含在普遍的框架中；如果其他的、社会业已协定的规则（转移支付及免职）存在，这些支出并非是必要。

如果大规模失业——不受当前危机的影响——减少，而且女性与男性之间的真正平等得以实现，那么正常工作持续时间的**长短**必定会在今天流行的每天8小时或每周约38小时之内。同理，经集体协商的上限规定也必然地属于时长规定的规范化。因此，避免加班也成为工作时间缩短的一种形式。

工作时间的**状况**也将得到规范化。出于自然及历史的原因（一方面是生物节奏，另一方面是业余时间及社会活动的文化模式），正常的标准将是与夜间及周末休息连在一起的日间工作和周安排。因不健康和非社会的工作时间而产生的个别的劣势，关于这些可能的差别及相关的弥补，必须在“围绕—时钟—社会”中（Rindersprachter），根据因夜间工作的需求来加以协定。

如果工作时间在更大的时空**分配**的视角下被调整，那么变化将会成为一种新的规范，这是最困难且最重要。在以取货为生产性导向的劳动——工厂根据日常的、季节的或劳动工作量的情况来动用现存劳动力的量——和劳动力提供者的自由选择可能性之间，很多规则形式是可设想的。这些规则形式依赖于多样化的生产利益、劳动市场的情况及不断改变的需求。正如当今流行的同时性原则（参见A. Bosch等1986）可能建立时间账户，此外，选择权——自我选择的目的（更多的时间陪孩子，进一步的培训等），阶段性兼职工作或长时间的离职，与对现状的重新接受及诸如此类的约定联结在一起。（参见Seifert 1993）

别种的时间结构将会超出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时长、状况以及分配的维度而创造出规则需求：工作性质的变化与劳动机构新形式、“系统理性化”的原则、“准时制”及“精益生产率”（Schumann等1994；Sauer / Döhl 1994）要求工作时间“去密度化”（Rindersprachter）。与借助对部门操作的分离和定时的集中劳动方法（最终使工作变得抽象）的泰勒—福特式相反，“精制企业”的新的生产形式和管理形式为更加独立自主地设计时间流程提供了前提。矛盾的是，准时原则也为计划创造性和发展创造性提供

599

了灵活化的可能性。从对现代企业的生产性角色的理解出发，迄今仍著名的休息规则的形式能够通过设立**时间岛**（*Zeitinseln*）的方式被解除或者被补充。在时间岛中，只要这些形式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是必要的，那么空间就是解决问题和解决冲突的合作形式。因此，人性化概念和共同决定的概念包含一种新的融合的方式。

600

最后不应该被忽视的是，工会的时间政策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在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产生影响（参见 Garhammer 1994）。如果社会的基础设施不会起阻碍作用，那么工作时间的灵活化以及被确保的选择能提供更多的时间自主权以及更符合需求的、更理性化的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如果商铺、官方机构以及文化机构、公共交通、卫生系统、教育和培训机构等的开放时间没有成为社会规范的对象，即个人和社会可以以民主的方式决定可支配时间，那么时间日益缺乏这一盲目的过程会仍然存在。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不可逆转的。

参考文献：

G. Bäcker, B. Stolz-Willig (Hg.), *Kind, Beruf, Soziale Sicherung*, Köln 1994; F. Bauer, G. Schilling: »Zur Reform des bestehenden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ses«, in: *Arbeit, Zs. für Arbeitsforschung, Arbeitsgestaltung und Arbeitspolitik*, 2. Jg. 1993, H. 3; A. Bosch u. a., »Wieviel Zeitautonomie ist gefragt?«, in: *WSI-Mitteilungen*, 1986, H. 3; G. Bosch, »Hat das Normalarbeitsverhältnis eine Zukunft?«, in: *WSI-Mitteilungen*, 1986, H. 3; W. Däubler, »Deregulierung und Flexibilisierung der Arbeit«, in: *WSI-Mitteilungen*,1988, H. 8; C. Deutschmann, »Der Normalarbeitstag«, in: H. König, B. v. Greiff, H. Schauer (Hg.), *Sozialphilosophie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 (=Leviathan-Sonderheft 11), Opladen 1990; M. Garhammer, *Balanceakt Zeit*, Berlin 1994;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S. Herkommer, M. Mühlhaus, »Jenseits der 'Normalarbeitszeit'?«, in: *Sozialismus*, 1994, H. 3; K. Hinrichs, »Zur Zukunft der Arbeitszeitflexibilisierung«, in: *Soziale Welt*, 1992, H. 3; ders., W. Roche, C. Sirianni (Hg.): *Working Time in Transition*, Philadelphia 1991; I. Kurz-Scherf, »Normalarbeitszeit und Zeitsouveränität«, in: Seifert (Hg.), aaO.; P. Lafargue, *Das Recht auf Faulheit*, Hottingen/Zürich 1887; S. Quack, *Dynamik der Teilzeitarbeit,* Berlin 1993; J. Rinderspacher, *Gesellschaft ohne Zeit*, Frankfurt/M 1985; D. Sauer, Y. Döhl, »Arbeit an der Kette«, in: *Soziale Welt*, 1994, H. 2; V. H. Schmidt, »Die

Erosion des Normalarbeitstags«, in: U. Berger u. a. (Hg.), *Neue Technologien – verschenkte Gelegenheiten?*, Opladen 1991; M. Schumann u. a., *Trendreport Rationalisierung*, Berlin 1994; H. Seifert (Hg.), *Jenseits der Normalarbeitszeit*, Köln 1993; M. Smentek, *Arbeitszeit-Flexibilisierung*, Hamburg 1991; B. Stolz, *Vereinbarkeit von*
601 *Beruf und Familie als Herausforderung für Gewerkschaften und Sozialstaat*, Diss. FU Berlin 1994.

瑟巴斯提安·赫尔科莫（Sebastian Herkommer）撰

朱渝阳 译，贺腾 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kraft, Arbeitszeit, Aufhebung, Automation, disponible Zeit, Extraprofit, Faulheit, Freiheit/Notwendigkeit, Freizeit, Gewerkschaften,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Kapital (variables und konstantes), Mehrwert, Ökonomie der Zeit, Produktivkräfte, Reichtum, Vorgeschichte, Zeit

建筑学（Architektur）

建筑学是这样一门艺术，它最直接地介入实践生活过程中，把实践生活过程结构化，特别是临摹实践生活过程。自古以来，社会乌托邦就一直和建筑学的理想城市规划结合起来，和“模仿一个更好世界的建筑结合起来”（Bloch 1953，第 273 页）。

建筑学对艺术以外的因素（建筑材料、技术、建筑主人和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的依赖性比仅仅是模仿的艺术走得更远。在唯心主义美学以及源于黑格尔的建筑学理论中，建筑学在诸种艺术中的位置最低，因为在建筑学中，物质的组成部分（从静力学直到对某个建筑物的实际需求）无法被完全扬弃在艺术的塑形过程中。仅仅当建筑学成功地超越了这些条件以及实践目的的限制时，它才算是一门艺术。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建筑学理论家一直强调：在生产和分析建筑学时，必须考虑到物质要素和观念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只能在与建筑学的实际功能相关的语境下思考美学问题。他们关于建筑学的讨论，几乎都是从建筑学能够满足物质需求的功能开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专门把建筑学作为艺术研究的文本。建筑学仅仅被考虑为社会过程的媒介。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工厂时，他一般是在“工厂体系”意义上说的。只在一处关于“小屋工厂”的论述中，他才提到由几排

"小屋"围起来的工厂建筑。(MEW 23，第484页）此处马克思对工厂建筑的兴趣仅仅在于，他将其视作机器的容器以及通过机器才得以可能的劳动组织的容器。建筑学特别是城市规划间接地被表述在马克思关于城市化的观点中，城市化必然地与工业化同步并且使社会进步成为可能（MEW 23，第371页及以下；MEW 4，第466页）。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Gutnow）的规划概念仍然秉持着这个思路，这些规划概念摒弃了那些旨在解决大城市问题的西方城市建筑概念。

这方面最重要的文本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EW 2，第225页及以下）以及《论住宅问题》（MEW 18，第209页及以下），在这两篇文本中，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工人的居住状况以及工人街区的规划。在此，首先令人感兴趣的也是建筑学这个环节，该环节构成了工人必然再生产的前提。恩格斯批判了住宅和院落中卫生条件、供水和通风的缺乏，空间狭窄拥挤，几乎无法居住。恩格斯没有论及建筑学以及城市规划中的美学。但恩格斯对既有关系的批判内在地包含着某种正面的反例。当恩格斯说到无计划的、随便组建的单层小屋的混乱状态，说到无秩序的一群三四层房子，说到迷宫式的、陷入死胡同的走道和通道，说到弯曲而狭窄的街道时（MEW 2，第256页及以下），他旨在把这种状态与那种理性有序的建筑学规划相比较，自19世纪以来，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人）所构想的这种建筑学规划往往在专制统治之下得以推行。

602

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和城市规划正是从上述史前史中产生的，它始终以对经过周密计划的建筑物的要求为出发点，其目标正在于：战胜与社会主义目标相反的、资本主义大城市中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并确保所有人都具有同样的居住条件都可以进入同样的生产场所和娱乐中心。

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这种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概念才有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基础。俄国构成主义试图给出一种与革命任务相适应的"新建筑"的观念，20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包豪斯"（Bauhaus）所代表的新阶段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念（El Lissitzky）。对建筑工业化及使用现代建筑材料的强调和肯定、建筑物中以自我为目的美学的摒弃（也就是放弃有花纹装饰的结构）、"机器膜拜"、建筑学家作为工程师和设计者而非建筑艺术家的自我评价，以及生活状况和居住状况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新建筑学的诉求，这些诉求既体现在构成主义者中，也体现在西方的功能主义者中。建筑艺术不应当再是装饰，而应当是生活状况的直接结构化，因此建筑艺术应投入到日常文化之中。在此，建筑学显示

603

出了与无产阶级崇拜的共同之处。

对于苏联来说，通过新的建筑方式来明显改善居住环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居住状况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时候被应用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意义上。参见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呼吁："建筑艺术或者革命"，1923）是一个革命性地调整大众生活状况的机会。凭借主要是技术上的优势，功能主义式的建筑方式和规划在苏联最先获得了推广。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始，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却日益受到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批判。在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对功能主义问题批判已经成为进行建筑学理论讨论的唯一原因。也正是在关于功能主义的争论中，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的轮廓得以凸显出来。

受到功能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鼓动，瓦尔特·本雅明研究了先锋派建筑学的先驱者，还研究了在19世纪挤入城市分布区域的钢结构建筑（火车站、商场、通道），以及与这些建筑物相符的游手好闲之人的理智。在这种打破古老生活方式的建筑方式所表现出的敌视传统的趋势中，本雅明还看到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进步潜力。本雅明把新的建筑类型及建筑方式与大城市建筑使用者的新的感知和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这使他的理论超越了那种从任何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资产阶级建筑学分析。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下这个问题受到了重视，即：（以实用需求为唯一考量的）功能主义建筑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目标相适合的建筑方式？人们只认识到功能主义以扩大生产力为基础，而没有将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布洛赫指出：这种建筑方式的"技术中立性"被高估了。这种"均衡的、卫生的居住"本身并非针对无阶级社会，而实际上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中新形成的中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社会民主模式突出了功能主义的合理性。功能主义建筑立面的无装饰性毋宁说是一种"坏的装饰"，它标志着对资产阶级关系的克服。（*Erbschaft dieser Zeit*，第218—219页）功能主义"美就是有用"的口号也被布莱希特（*Über die bildenden Künste*，第83—84页）、拉斐尔（Raphael）等人视作资本利益准则的体现，并因而有损于社会主义建筑。

与此相反，自20世纪30年代始，马克思主义阵营在苏联的大型建筑项目中要求的是另一种美学，这种美学一方面要超越功能主义的反美学，另一方面则要排斥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资产阶级美学的倒退，那种美学把建筑学的艺术方面从其实践功能中分离了出来。人们追求一种纪念碑式的建筑学，它应当表达"集体的力量"，并要为新诞生的苏联生活方式的统一性服

务（Nizan，Lurcat）。苏联越是在压迫下捍卫革命，建筑学的理论探讨就越是单方面地集中于这个问题，即：建筑学如何能够传达意识形态环节和社会主义的象征，“苏维埃的建筑风格”又如何才能发展出来？马克斯·拉斐尔（Marx Raphael）对于这方面讨论的深刻分析超越了其他理论家，他发现了当时的代表性建筑项目，即“苏维埃宫”在规划和建筑任务规定中的缺陷，但他却没有正确注意到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状况。

同样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将本国的建筑传统，特别是古典主义风格运用到设计中的做法，被称为建筑和规划中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建筑的风格应该受国家规定，且建筑的内容应当是社会主义的。

壁画也被包含在关于建筑学—美学形态意义的讨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基础出发，壁画在多个国家中发展成为一种公共艺术。首先是自 20 世纪以来，由墨西哥艺术家群体创作的墨西哥革命壁画（*murales*），它被社会主义国家，有时候也被美国看作典范。（参见 *Kunst der mexikanischen Revolution*，1974；Charlot 1967；Edwards 1966；Sandberg 1956，第 284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德国也出现了关于建筑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建筑师们希望能够重拾被法西斯主义所压制的先锋派和功能主义的建筑方式，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们也受到更古老的古典主义传统的约束。（参见 B. Flierl，载 Henselmann 1978，第 26 页及以下）布莱希特为新委托人的这种决定做了辩护（*Über die bildenen Künste*，第 189—190 页）。只有社会主义的建筑艺术才有可能使民族特性在建筑学中得以表达。布莱希特主张社会内容和民族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认为这是新设计方式发展的推动力。他并不将其视作僵化的历史主义。

随着对历史性风格要素的这种规范性指令的撤销，建筑美学中的现实主义如今意味着（参见 Kagan 1971，第 731 页）在艺术造型和设计的帮助下，将建筑物实用性和结构性的基础变为一种表现。美学并不否定那些外在于它的目标，它不是从外部被添加到对象建筑上，而是将艺术之外的功能组织为艺术性的形式。

建筑学的社会功能不再仅仅被功利地视作满足基本需求。建筑学的功能日益普遍地被理解为对空间（亦即不属于艺术的空间、空的空间）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开始反思从建造单个建筑物向塑造环境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艺术的空间组织与实用的空间组织也被认为是一体的。（Rubzow 1981）

正是在西方国家中，对晚期功能主义建筑物单调性的批判日益增长，功能主

义忽视了美学的观点以及居民的额外需求，这种批判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持的对艺术造型的要求。西方建筑学分析的符号学研究进路，特别是在建成环境中对格式塔导向符号的要求（Barthes 1970 / 1971，第 153 页；Lynch 1968），产生了可观的成果（Ikonnikow 1973；Rubzow 1981）。与对功能主义的后现代批判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通过否定有计划的建造来处理环境破坏与城市空间荒废的问题。布莱希特反对在一种无计划无政府的建筑方式中冀求一种偶然的美，他指出（*Über die bildenden Künste*，第 218 页），要合乎计划地建造美的建筑，换言之，要避免僵化的规则性。

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近来寻求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社会结构以及对城市空间的社会需求的动态发展和变化问题。布莱希特建议建筑学家们对这些发展抱有信心，并且使其设计的建筑具有可变化性。（同上书，第 221 页）亨瑟尔曼（Henselmann）研究了（并致力于）这个建议并且新近主张一种公开的、不被特定目的所严格限制的建筑学，这种建筑学让空间具有变化性并具有未被预见的新用途（1978，第 150 页及以下，第 153 页及以下，第 160 页及以下，第 168 页及以下；参见 Rossi 1978，他是在与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相同的意义上摘引并且赞同汉斯·施密特的思考）。在最近的讨论中，他将试图把这种必然性与对历史结构之意义的尊重联系起来（与西方后现代美学不同，后者为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提供的不仅仅是形式美学上的、新发现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主要是在生产美学的视角中形成的，因此它与具体的建筑计划紧密相连。与此平行的是，在艺术科学中也发展出了一种历史建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种分析把建筑形式理解为“意识形态”的象征形式，并且同时从建筑的实践功能角度来解释这种形式。（参见 Möbius 1968；Kimpel / Suckale 1985）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1968 年后形成了一种或多或少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建筑学批判的论证，这种建筑学批判超出了对建筑作品的美学和功能分析。它首先询问当前建筑活动的经济条件以及对建筑实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决策。此外，它还试图在规划时考虑建筑学使用者的利益和需求，从而达到对建筑目的的理解。这种理解以这些利益为导向，而不是——就像它是完全的实践一样——从资本主义的理性思考中推导出来的。（*Architektur Extra*，Battisti 1975；Blomeyer / Tietze 1980；Ragon 1977；Tafuri 1978）

606

这里还要说说关于建筑实践和建筑学理论的一种女性主义视角，这种视角不仅要求提高女建筑师及其设计方案的

获选机会，而且还批判分析了目前的住宅规划及其传统，并指出其中对于妇女解放的阻碍（Torre）。此外，它将注意力转向传统的女性空间（比如厨房），这些女性空间的形态和分析往往是被马克思主义建筑学理论所忽视的。——然而，涉及建筑物质材料和空间形态的（*Ökologisches Bauen*）马克思主义生态建筑概念则尚未形成。

607

参考文献：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8.11.1935, 96ff; *L'Architecture Vivante*, 1933 (été); *Architektur Extra. Architektur und Stadtplanung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1; R. Barthes, »Sémiologie et Urbanisme«, in: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1970/1971; E. Battisti, *Architetura, ideologia e scienza*, Milano 1975; L. Benevolo, *Geschichte der Architektur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2 Bde., München 1978; W. Benjamin, *Paris, die Hauptstadt des XIX. Jahrhunderts*, GS V 45-59;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7)*, Frankfurt/M 1962; ders., *Das Prinzip Hoffnung*, Bd. I, Berlin/DDR 1953; G. R. Blomeyer, B. Tietze, *In Opposition zur Moderne. Aktuelle Positionen in der Architektur*, Braunschweig, Wiesbaden 1980; B. Brecht, *Über die bildenden Künste*, Frankfurt/M 1983; J. Charlot, *The Mexican Mural Renaissance 1920-1925*, New Haven, London 1967; E. Edwards, *Painted Walls of Mexico*, London 1966; A. Gutnonv. u. a., *The Ideal Communist City*, New York 1968; H. Henselmann, *Gedanken, Ideen, Bauten, Projekte*, Berlin/DDR 1978; A. W. Ikonnikow, *Architektur der Stadt. Ästhetische Probleme der Komposition*, Berlin/DDR 1973; M. Kagan, *Vorlesungen zu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München 1971; D. Kimpel, R. Suckale, *Die gotische Architektur in Frankreich*, München 1985; *Kunst der mexikanischen Revolution*, Ausstellungskatalog, Neue Gesellschaft für bildende Kunst, Berlin 1974; E. Lissitzky, *Rußland. Die Rekonstruktion der Architektur in der Sowjetunion*, Wien 1930; G. Lukács, *Ästhetik*, Teil I, 2. Halbband,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Neuwied 1963, 402ff; A. Lurcat, »L'homme et la techniqueet l'architecture«, in: *VH* 101, 1937, No. 7-8, 203ff; K. Lynch, *Das Bild der Stadt*, Gütersloh 1968; F. Möbius, *Westwerkstudien*, Jena 1968; P. Nizan, »Du problème de lamonumentalite«, *VH* 10l, 1934, No 7-8, 206ff; Umweltbundesamt (Hg.), *Ökologisches Bauen*, Wiesbaden, Berlin 1982; M. Ragon, *L'Architecte, Le Prince et la Démocratie*, Paris 1977;

M. Raphael, »Das Sowjetpalais (1933-1934)«, in: ders., *Für eine demokratische Architektur*, Frankfurt/M, 1976, 53ff; A. Rossi, »Hans Schmidt und das Problem der Monotonie«, in: *Werk-Archithese*, 1978, 17-18, 10ff; A. Rubzow, »Die Architektur im System der Künste«, in: *Kunst und Literatur* 29, 1981, H. 10, 1026ff; H. Sandberg, »Diego Rivera und die Initiative«, in: *Bildende Kunst* 1956; M. Schütte-Lihotzky, *Soziale Architektur. Zeitzeugin eines Jahrhunderts*, Ausstellungskatalog, hgg. v. P. Noever, Wien 1993 (mit ausführlichen Literaturhinweisen); M. Tafuri, »Die Kritik der Architektursprache und die Sprache der Architekturkritik«, in: *Arch*$^{+}$ 37, 1978, 4ff; ders.,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London 1980; S. Torre (Hg.), *Women in American Architecture: A Historic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New York 1977; *VH* 101, No. 7-8, 1972.

尤塔·赫尔特（Jutta Held）撰

朱渝阳 译，王师 校，张文红 审

参见：

Antiideologie,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Avantgarde, Dummheit in der Musik, Form, Formalismus, Fourierismus, Funktion, Ideologie, ideologische Form, Industrialisierung, Kunst, Lebensweise, Metapher, Planwirtschaft, Postmoderne,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letkult, Rationalität, Raum, Realismus, Schönheit,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Städtebau, Symbol, Tradition, Utopie, Wohnungsfrage

贫困 / 财富（Armut / Reichtum）

在罗莎·卢森堡的《国民经济学导论》中，她使我们注意到“什么是财富？”的问题是“西欧雄心勃勃的市民阶级”的“新问题”，是“新的国民经济学”的对象，这种新的国民经济学于16世纪首先在意大利，然后在英国和法国发展。（参见 GW 5，第 583—584 页）不久，这门科学认识到，社会财富是通过劳动被创造的，并且之后也看到，市民社会的财富是以贫困为基础的。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托马斯·卡耳佩珀（Thomas Culpeper，1578—1662 年）已经从即将出现的贫穷法中采用了“劳动贫民”这一表达（*K I*，MEW 23，第 788 页），并且在一篇关于 1677 年羊毛出口的文章中明确表示，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同上书，

第 596 页）。

在系统的关联中，在贝尔纳德·德·曼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那里出现了贫困 / 财富这对概念，这对概念在 18 世纪初《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中表明："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根治则未免愚蠢。"紧接着"可以知道，在……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引自 *K I*，MEW 23，第 643 页；参见 Mandeville［1714 /1728］1957，第 173、269 页）。

1. 马克思在他的"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K I*，MEW 23，第 15—16 页）的科学计划中，接续了李嘉图所编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同上书，第 20 页）。马克思不是把这种对立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同上书，第 675 页），而是从研究商品形式出发，把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揭示为这种对立的最内在原因：因此，生产资料占有者阶级和劳动力占有者阶层之间处于一种被设置的敌对关系。

1.1 这种敌对关系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劳动力占有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单纯的交换关系作为纯粹的事实关系出现。作为事实上的生产关系，它反而证明自身是人的剥削关系，是异化创造性活动形式之下的人的劳动，是一种生产"抽象财富"（*K I*，MEW 23，第 167 页）的创造性活动。这种"异化劳动"同时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同上书，第 595 — 596 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已经开始了上述对贫困 / 财富这对概念的理论阐释，将"绝对贫困"定义为雇佣劳动的本质特征，指出了雇佣劳动所包含的绝对贫困和财富的一般可能性之间的矛盾。"**非资本**本身的劳动……**从否定方面看**"，也就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

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劳动”，是“**绝对的贫穷**”，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同时这种劳动“**从肯定方面看**……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和主体，“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活的源泉**”，也“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MEW 42，第 217 页）与此相反，与劳动相分离的“一般财富”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于资本中，存在于和全部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中。（同上）

610 1.2 就像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敌对机制一样，财富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是静止的关系，而是一种运动的、发展的关系，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总是更加确切地表述这种关系。（参见 *Ms 44*，MEW 40，第 510—522 页；MEW 6，第 406—423 页；*K I*，MEW 23，第 640—744 页；*K III*，MEW 25，第 257—270、630 — 631 页，参见 Engls，*AD*，MEW 20，第 239 页）这种关系的起源在于“所谓的原始积累”（MEW 23，第 741 页），因此这种关系内在形式的发展是由资本的增长过程引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资本内在发展的必然性描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Kap.23）。之后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就像它通过资本被强迫一样）产生了一个与资本增长相对的、加速增长的“相对人口过剩或产业后备军”（第 657 页），这又反过来激化了剥削关系。同时整个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恶化（第 673 页及以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第 673—674 页）

因此，贫困 / 财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对立的两极”（第 725 页）：“规律……，总是保持相对人口过剩……与积累的规模和能量平衡，……决定了一种与资本积累相符的贫困的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第 675 页）

在同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确定，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尖锐的敌对关系，对“更加不平均地”分配不断增长的社会财富普遍地产生影响，并且把“工人的社会地位……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了一级”（MEW 6，第 414 页）。甚至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下述事实，即“工资的任何显

611 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而资本的“迅速增加，就要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等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MEW 6，第412 页）。

雇佣劳动的社会状况普遍相对的恶化（这一恶化涉及生产和消费领域），此外还与不断增长的贫困相区别，后者是资本积累给剩余人口、产业后备军以及包含于其中的赤贫的“拉萨路阶层”（Lazarusschicht）中特定的雇佣工人阶层带来的。这种贫困使特定的雇佣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下降到工人阶级正常生活水准的平均线以下，一直下降到物理生存最低限度区域中的绝对贫困水平。

1.3 所以，如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敌对生产关系在剥夺资本主义私人财产中终止一样（参见 *K I*，MEW 23，第 790—791 页），贫困和财富的敌对性也应该失去其物质存在基础，“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MEW 42，第 601 页）。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随着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克服，作为雇佣劳动的人类劳动，所规定的绝对贫困与财富普遍可能性之间的特殊对立也能被扬弃。

在此基础上，“一切财富的源泉”，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之下被“破坏”（*K I*，MEW 23，第 530、558 页）的土地和工人能无障碍地流动。以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抽象财富，自身能转变为“现实财富”；也就是说，转变为这种财富，即它“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 612
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K III*，MEW 25，第 828 页）。基础就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同上；参见 MEW 42，第 395—396 页，以及 Engels，*AD*，MEW 20，第 261 页）。

2. 对于考茨基、列宁和卢森堡来说，关于贫困形式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贫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贫困与财富之间尖锐的敌对关系而产生——这

种贫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能被减弱，也不能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政治被消除。在否决由爱德华·伯恩施坦以及其他反对马克思的人提出的，对一种隶属于劳动者阶级的绝对贫困理论进行批判时——简短地说，“贫困理论”或者“贫穷理论”——考茨基和列宁，在证实马克思的论述的同时，通过强调无产阶级贫困的“社会”特征，也就是说，通过阐述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特征，开始把贫困的形式具体化。（Kautsky 1899，第 114—128 页；Leninn，LW 4，第 191—196 页，LW 1，第 428—429 页；参见 Luxemburg GW 5，第 751—762 页）罗莎·卢森堡论证，“只有人把生活状况在既定时间的以及同一个社会的其他阶层的关系中来评价，每个人和每个阶级的生活状况……才能被正确地评价”。她还指出，通过生产的进步，自身保持不变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能与无报酬的增长的剩余劳动，能与尖锐的剥削同时发生。（GW 5，第 757 — 756 页）

同时，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也已经特别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界限领域”。对此列宁解释道：“就资本主义的‘界限领域’（Grenzgebiete）而言，贫困增长的话语最终包含其完全的正确性，其中人们必然不仅是在地理的意义上（国家，在其中资本主义同样开始渗透，此外，资本主义时常不仅导致物理的贫困，而且也导致人民大众的直接饥饿），而且也在经济意义上（家庭手工业以及一般国家经济学分支，在其中还包括落后的生产方式）来理解界限这个词。”（LW 4，第 196 页；参见 Luxemburg，GW 5，第 736 页）

恰好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 613
社会关系时，贫困 / 财富这对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直到今天还表明自身是有用的分析工具。（参见 Altvater 等 1987；Laaser / Wendt 1988 或 Aguilar / Carmona 论墨西哥资本积累的社会后果的论文 1981）

参考文献：

A. Aguilar, F. Carmona, *Mexico: riqueza y miseria*, Mexiko 1981; A. Altvater, K. Hübner, J. Lorentzen, R. Rojas (Hg.), *Die Armut der Nationen*, Berlin/W 1987; K. 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Stuttgart 1899 (wieder Berlin/W-Bonn-Bad Godesberg 1976); U. laaser, K. E. Wendt (Hg.), *Schuldenkrise und Armut in der Dritten Welt*, Berlin/W 1988; B. de Mandeville, *Die Bienenfabel* (1714/1728), Berlin/DDR 1957.

玛格丽特·特贾登·施泰因豪尔（Margarete Tjaden-Steinhauer）撰
朱渝阳 译，曹旸 校，张文红 审

参见：

Akkumulation, Aneignung, Antagonismus, Arbeit, Arbeiterklasse, Arbeitskraft, Arbeitslosigkeit, Ausbeutung, Bedürfnis, Befriedigung, Eigentum, Enteignung, Entfremdung, Entwicklung, Erd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apital, Klassen, klassische bürgerliche Ökonom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ohnarbeit, Mehrarbeit, Pauper, Proletariat, Proletarisierung, Reproduktionstheorie, Verelendung

关节、划分、联结（Artikulation, Gliederung）

Gliederung 首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中被使用的，这一表述被翻译成罗曼语及英语中的“articulation”等，其意义得到了丰富，此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它又以“Artikulation”这一表述回到德语当中。——在拉丁语中，*articulus*（缩写为 *artus*，即希腊语中的 *ἄρθρον*），最初既指踝骨，也指将节连接起来，同时还指植物的结节（因此，*articulatio* 最初是指树长出新的结节）。在转译的意义上指的是“环节、部分、分部”，特别是指言语的分节（Georges）。在语言学上，Artikulation 指的是“语链分成音节，也可以指把意链分成意义单位；德语的 gegliederte Saprache 正是就这个意义来说的”（de Saussure 1916，第 12 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与上述双重含义相应，Artikulation 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划分 / 结合”（Gliederung / Verknüpfung）；另一方面是指“明确表达的语言措辞”。（Haug 1981，第 159 页注释 4）

1. 如果人们不再把传统哲学中的 614
“理念”、“概念”、“观念”，而是把“诸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MEW 3，第 20 页）作为理论出发点，那么就会提出“社会划分”（Gliederung der Gesellschaft）（*DI*，MEW 3，第 23 页）的问题。需要掌握的是个人的“相互作用”（第 37 页）和他们由此而产生的“关系”（第 23 页）。在这个问题被提出之前，有这样一种理论，即认为在“社会机体”中——如在每一有机整体中那样——“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MEW 4，第 131 页）。在应对这一复合整体时，马克思的解决方法包括三个元素：对“人的实践”（*ThF*，MEW 3，

第 7 页）的援引、社会划分思想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原理。只有这三个元素**一起**才构成了马克思的进路。**实践**与社会关系物化相对，**划分**（*Gliederung*）与总体的实体化相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Basis-Überbau*）的话题形成了一个假说，用以在被划分的整体中进行分析的和实践的权衡。

马克思并没有在术语学的意义上细化划分概念。一个整体的“环节”（Glieder）（MEW 3，第 20 页）、“方面”（Seiten）（同上书，第 38 页）或者“因素”（Momente）（同上书，第 21 页）等这些表达是被当作同义词使用的。所有这些表达都起源于黑格尔的语言材料。与“社会划分”不同，对“总体的各个方面”的谈论恰恰没有触及马克思使之成为难题的东西：差别和统一要在一起加以思考，由此统一就不是前提；把社会的“整体”作为非—同一的局部过程的效果来理解，这些局部过程各自遵循各自的逻辑，它们的特别之处同时也是由它们的相互依存的效果构成的。

1.1 此外，马克思同两个方面划清界限。“经验主义者”在面对联系时所做的仅仅是“僵死的事实的汇集”（第 27 页），而“思辨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无疑是把“统一”预设为“理念”。马克思扬弃了这两种进路：他是从“经验主义”的立足点出发，把社会看作是划分了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政治国家看作机体”（*KHS*，MEW 1，第210 页），看作“划分了的权力”（第 215 页），这是“前进了一大步”。不过，黑格尔是把这个权力想成与“机体”相类似，他从后者中抽象出了“**机体的**理念”（第 221 页）。“政治国家的基本规定就是国家各个因素的实体性的统一，即国家各个因素的**理想性**（*Idealität*）。……各个因素的这种理想性正像机体的生命一样。” 615
（*RPh*，§276 及“附录”，引自 MEW 1，第 221 页）机体的理念说的是，“确实不同的各种”因素“不再仅仅是相互关联的和相互作用的**部分**（*Teile*），而是**环节**（*Glieder*）：这就是说，它们不再是孤立的自为存在着的，而是只有在其理想的统一性中才有真实的存在。只有在这种有机的划分中，理想的概念统一性才寓于诸环节之中，它才是诸环节的载体和内在灵魂”（*Ästh*，Bassenge，第 123—124 页）。

就像“有机的划分”、“**理念**的存在”、“自然的理念”一样（同上书，第 124 页），国家机体是政治的“理念”的实现。如马克思所注意到的，黑格尔消除了概念的理想统一性之中的真实差别，为的是将这种差别归摄于概念之下，从而使他关于国家机体、关于“任何机体”（*KHS*，MEW 1，第 212 页）的说法是

有效的。“这里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理念”（第 210 页），这理念是主体，从其“发展”中产生了“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现实性”，在这里就是权力的划分。但是，从“机体的一般理念到国家机体的特定理念”的桥梁是“永远”架设不起来的（第 212 页）。与此相反，应当从“现实的差别”出发，并提出如下问题，即什么使这些差别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环节，或者如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语言所说的：“有机的东西正是**差别的理念**（*Idee der Unterschiede*）”（第 210 页）。

黑格尔把“国家材料”划分为政治的、亲属的和经济的再生产圈，划分为“国家的**事务**（*Geschäfte*）、家庭和市民社会”。（MEW 1，第 205 页）在马克思看来，后两者是“国家的前提”，这些前提产生了作为其实践活动结果的国家，因此，“思辨”颠倒了这一关系，并使之成为国家“理念”即其“现实精神”的一种行为，这种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RPhil*，§262；引自 MEW 1，第 205 页）因为黑格尔只涉及“这些领域本身的**本质的关系**”，所以他不会谈到不同实体之间的经验的“冲突”、它们的不相符和危机。（第 204 页）只要它们“成为理念的某一生命环节的某种体现”（第 241 页），它们的规定就被创造出来了。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把黑格尔的逻辑概念应用到经济学，因为这种应用将经济范畴（市民体系被划分为这些经济范畴）当作互相产生的、单个的、前后相继的阶段，“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Elend*，MEW 4，第 131 页），并且“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 616
系的大厦 ”。这“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不能解释所有社会关系的同时性和相互作用（同上）。

1.2 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状态要在其相互联结中”被研究（MEW 27，第 451 页）。“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划分和政治划分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DI*，MEW 3，第 25 页）。由此，“生产”就绝不会被实体化，不会被设定为不可透视的出发点，因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当然，“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同上书，第 21 页）。

首先出现的是一个三重划分，“生产”、“社会划分和政治划分”（MEW 3，第 25 页）；这是一种**对划分的划分**，因为这些环节中的每一个本身都可以再次划分，为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开篇几页中引入了这些概念。生产划分包括以下环节：生产力、与一定的

“生活方式”（第 21 页）紧密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的运作方式”）、分工。社会划分包括以下环节：个体彼此之间的社会“交往”、统治关系和财产关系。政治划分依赖于各个时代的“交往形式”相互联系的特殊方式（参见第 62 页）。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划分的根据是“国家”（第 62 页）以及“其他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第 36 页）中的“统治阶段的各个组织”（第 27 页），这种上层建筑是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的。与这一三重划分相交叉的，是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参见第 32 页）最后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 20 页），马克思本人将这理解为历史性的：对生活的生物意义上的再生产的社会管制以及“人的生物特性”及其“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第 21 页）

但是，这种由各自相互支撑的关系，由自然关系、性别关系、生产关系、统治关系以及政治关系所构成的复合关联，如何在理论上进行划分呢？对于这个复合的社会划分，人们不能从某个零点出发展开它的下级划分并再将这些下级划分还原到这个零点。但必须要有一个认识论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不是任意的，而是事实上自证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第一个劳动假说。“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是**出发点**，但绝对不是终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原理的还原主义版本就是如此认为的），由此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国家的活动来描述，同时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MEW 3，第 37—38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将这一思想明确表达为如下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MEW 13，第 8—9 页）。对他的批判者（这些批判者想通过指出宗教在中世纪的统治地位和“政治”在古希腊罗马的统治地位，来使这一观点仅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这样简明扼要地回复：“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K I*，MEW 23，第 96 页注释 33）——难点是随着这个问题出现的，即应当如何准确地规定社会关系。“制约、符合、相互作用”这些概念具有假设的性质，

并且只有在具体的分析中才能被准确地阐明。

在划分关系类型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处理了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同经验主义的和思辨的立场划清界限。经验主义的立场把这些范畴中的某一个当作独立领域来处理，并“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Gr*，第 10 页；MEW 42，第 23 页），而“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它们“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同上书，第 15 页；第 29 页）。——针对前一种立场，马克思提出，人们应当“在一定的社会划分中”（同上书，第 18 页；第 31 页），即在历史上的不同的生产关系中理解生产，而不是将之理解为“永恒真理”（同上书，第 18 页；第 32 页）。之后表明的是，“分配的划分完全决定于生产的划分”（同上书，第 16 页；第 30 页）。因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生产工具的分配”和“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划分，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同上书，第 17 页；第 31 页）——另一方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是“同一”的，而是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这里，一种一定的生产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并且“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同上书，第 27 页；第 40 页）“当然，生产……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同上书，第 20—21 页；第 34 页）

由此产生出了“叙述”问题：“各种经济关系”既不是在其**历史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也不是在其“‘理念的’顺序（Proudhon）”中，而是在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划分中”被叙述的。（*Einl 57*，*Gr*，第 28 页；MEW 42，第 41 页）马克思在这一语境中起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规划，最初要求陈述“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划分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同上）。这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上的内部划分的叙述，应当遵循“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最后是世界经济的结构”（参见 *Gr*，第 28—29 页，MEW 42，第 42 页）。

2. 对于这个马克思用划分概念所思考的特殊关联，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通过援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导

言》做如下总结："一种关系类型被称作划分，在这种关系类型中，两种过程交织缠绕成一个'复合的整体'，这两种过程包含各自的特性并且服从各自的存在条件。因此，这个整体是'很多规定'的结果，在这里，一个过程的存在条件并非恰好与另一个过程的存在条件相一致（政治不与经济相一致，流通不与生产相一致），**即便**前者是后者的'确定效果'；因为政治和流通也有其自身内在的'诸规定'"（1989，第 45 页）。

619 由于受到那些导致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冲击，马克思的结构分析在影响史上很晚才具有重要作用。在认识论方面，首先出现的是结构主义以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它们通过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再次）变得"可见"。路易·阿尔都塞的将社会当作"复合的结构化整体"（参见 1968，第 137 页及以下，特别是第 146 页及以下）的原理起了重要的推动。

2.1 对此的问题意识在之前就已出现。如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曾谈到"拆解人的生活"（1896，*ÜHM*，第 157 页），并且简述了"民族"的各种要素，"民族"作为一个"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复合体"，被拆解成这些要素，并且这些要素之间是相互区别的：亲属关系、领土、自然资源、分工和阶级划分，生产资料、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社会凝聚的形式——诸如暴力、习惯、风俗、权利、国家（同上书，第 145—146 页）。

认识论上更为有趣的是拉布里奥拉的学生克罗齐所做的推进，这正是葛兰西所要研究的。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黑格尔不能就不同社会要素的特性来思考这些要素，而仅仅是把它们当作"比喻"来思考，因为对于黑格尔来说，问题仅仅在于："把实现了的理念的**意义**（*Bedeutung*）加之于任何一种经验的存在"（MEW 1，第 241 页），所以，克罗齐认为，黑格尔在"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的不同实体之间所建立的"对立"，"仅仅是本体论上的，因为这些对立从来没有作为差别……存在"（1909，第 74—75 页）。类似地，阿尔都塞把"黑格尔的整体的概念"，当作一个"表现性总体"的概念来批判，在这种整体中，"每个部分都是整体的一部分（pars totalis），它将寓居于它之内的整体直接表达出来"。（*DKL*，第 17 页）在黑格尔那里，整体虽然"被划分为各个领域"，但"不是事实地"，而只是表面如此，因为所有的"差别只是为了被否定才被设定的"。（*FM*，第 150 页）

2.2 与克罗齐的"差别辩证法"的精神哲学取向相对，葛兰西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要求"，即"以批判的方式进

一步发展”这种辩证法（*Gef* 3，H.4，§45，第544页）：“把差别的概念引入到实践哲学中”（*Gef* 5，H. 8，§61，第979页）。就像克罗齐“在精神的诸活动之间做出了一种‘差别’那样”，也应
620 当将“一种辩证的活动和差别过程引入……历史集团当中”，同时又不会再次落入二元论，这种集团是由结构和超结构（Superstruktur）组成的，它们是“克罗齐哲学中的‘精神’的对应物”。（*Gef* 4，H.7，§1，第862页）

从“政治—经济的优先性”（*Gef* 3，H. 4，§45，第544页）出发，在思考以此为基础的诸实体时，应当考虑到它们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这是一种与经济主义相对的思考方式，在经济主义中，上层建筑实体没有自己的内容，而仅仅是表达出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超结构通过结构而实现的“机械的作用”，应当被“辩证的作用”取代。（同上）——使用葛兰西对“差别辩证法”的翻译就是重新把“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Gef* 6，H. 11，§59，第1472页）为了能规定“政治活动的辩证地位”（*Gef* 5，H. 8，§61，第979页），必须要把政治活动放入它自身的逻辑中来看待。理论的支点是“领导权”（Hegemonie）概念，它不仅被设想成“政治”基础，而且也被设想成“经济”基础。（参见 *Gef* 3，H. 4，§38，第499页）因而，葛兰西的“政治—经济”的概念，具有了一种集成性的、在领导权理论和政治理论上扩大了“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与此相关联的是，葛兰西试图把“超结构的整个系统”理解为“政治的差别”。（*Gef 5*，H. 8，§61，第979页）

葛兰西的第二个重要步骤是，也在“差别化的划分”（differenziell artikuliert）的意义上来思考个人。在此，他扩展了马克思的两个思想。（1）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的问题，转变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问题，即这种本质的“现实性”的问题。（*ThF*，MEW 3，第6页）这一问题置换为个体理论准备了一个新的基础。（2）马克思把这些关系的改变思考为人的“自我改变”（*ThF*，MEW 3，第6页）。——葛兰西评论道：“这些关系不是机械的。它们是活动的、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这些关系与单个人具有的一个更高或更低的理解力的等级相符。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将变成其他人，每个人都是在改变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些关系的总和……，每个个体都处于这些关系当中”，“每个个体都是这些关系的联结中心”，并与其他人一起“改变”。（*Gef* 6，H. 10. II，§54，第1348页）

在此，同一性在两种意义上被规定：作为个体意识中的社会意义的结

合（个体意识是通过这种结合才构成的），以及作为共同行动中的与其他个人的实践结合。这种双重结合总是同时要求符号的和社会的关系网的结合，在这个关系网中，个体总是相互结合着的，因为“人总是群体人或者集体人”，并且问题是：“人们所隶属的从众主义（Konformismus）、群体人，是哪一种历史类型？”（*Gef* 6，H. 11，§12，第1376页）因此，需要批判“自己的世界观……，使这种世界观具有统一性和内在相关性”（同上）。

621

2.3 在强调“**上层建筑特殊效用的理论**”方面，除了马克思和列宁之外，阿尔都塞认为“只有葛兰西”是先驱。（*FM*，第82页）一种（多半不具有黑格尔知识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考这一点。因为黑格尔只认识到一个总体，在其中，“这个总体的可见的‘领域’（市民社会、国家、宗教、哲学等）……不过就是简单的、内在的原则的异化的‘因素’”（*FM*，第149页）。取而代之的不是“将统一性献祭在‘多样主义’的祭坛上”（*FM*，第147—148页），不是把这种统一性转变成一个单纯的“无关联的差别性的清单目录”（Jameson，第35页），而是坚持认为统一性是“**复杂性的统一性**”，它具有一个特殊的“组织方式和划分方式”（*FM*，第148页）。

因为要把统一性当作复合的划分来思考，所以阿尔都塞一方面要坚持“**生产方式的归根结底的**规定作用”，同时也要考虑到“**超结构的相对自主及其特殊的效用**”。（*FM*，第79页）结构和超结构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被想成是机械性的（如果A，那么B），也不能被想成是表达性的（上层建筑作为形式，经济基础的内容在这种形式中表达出来）。因此，阿尔都塞引入了“结构因果性”的概念。之后不仅形成了“每个结构的本质性划分”，也形成了结构的“普遍划分关系”、“同样多的复合整体本身的生存条件”。（*FM*，第151页）划分是自主的，它们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经济的“生产方式”规定的。这种生产方式不是决定其他实体的内容，而是赋予其他实体在复合整体中的功能性地位。因此，关于宗教在中世纪的规定性作用，或者政治在古代的规定性作用，巴里巴尔说：“在有些结构中经济是规定性的，因为它决定了这个社会结构的实体，而这个实体遵从决定性（统治性）地位。”（*DKL*，第299页；参见Lipietz 1992，第19页）因此，阿尔都塞谈到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划分的结构**”（*FM*，第148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自身”最终占据的地位，不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是统治性的（参见Balibar，*DKL*，第299页）。

622

关于一种划分的结构的思想使得阿尔都塞有可能重新表述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区分还被主要用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解决“妇女问题”和生态问题。因为“次要矛盾”构成了“主要矛盾”的“存在条件”，就像“主要矛盾构成了次要矛盾的存在条件”那样（*FM*，第151页）。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LW 31，第154页），阿尔都塞将此理解为一种要求，即“在整体结构的划分之间来观察互相存在条件的复杂关系”（*FM*，第153页）。据此，每个意识形态现象都有经济的存在条件，就像反过来也一样，每个经济现象都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存在条件。社会矛盾通过每个特殊的结构划分而获得其意义。每个“矛盾在自身中（在它与其他矛盾特殊的不平等的关系中以及在它的两个方面之间的特殊的不平等关系中）[反映着]在复合整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构……，矛盾存在于这个整体之中”（第154页）。对于这种相互关联，阿尔都塞引入了**多元决定论**（*Überdeterminierung*）的概念。

在阿尔都塞看来，与划分的思想一起，能**特地**（*eigens*）思考“政治实践”（*FM*，第150页）所冒的风险，总体上并不低于马克思主义的规划，这种实践能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除此之外，阿尔都塞在1963年已经把注意力转向生产方式和生态问题的相互关联。“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例如‘**对自然的关系**’（*Verhältnis zur Natur*）是‘存在条件’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主要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主要术语之一；这种关系，就像它们的存在条件一样，反映在整体及其关系的‘次级’矛盾中：生存条件是一种事实上绝对的东西，复合整体的存在总是给定的，这个整体反映着生存条件的结构——这对黑格尔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拒绝并抛弃了结构化的复合整体及其存在条件，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给出了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内在性。因此，例如黑格尔认为，在对自然的关系中，每个人类社会的存在条件都只扮演了一个偶然给定的角色”（*FM*，第154—155页）。 623

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在《读〈资本论〉》（1965）中，把与划分一概念一起给出的关于基础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一种生产方式的理论。“社会存在的层次”被理解为不同实践形式的场域：“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科学的（或理论的）实践。”（*DKL*，第77页）这些不同实践形式的特殊“内容”通过“它们的特殊结构”而被规定，这种结构一直是“一种生产的结构”。（同上）为了思考这些实践形式之间存在

着的“依赖关系和划分关系”，必须要想到它们的各自的“非依赖性程度”，这种非依赖性程度又是通过它“对‘归根结底起规定作用的’实践即经济实践的依赖情况来确定的”。（同上）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68 和 1978）使阿尔都塞的进路更加精致，因为他表明，应该把一种**具体的**社会构成自身理解为对**更多的**生产方式的划分，在这里，一种生产方式统治着其他生产方式。（参见 Demirović 1978）

2.4 如果说阿尔都塞在某些方面准确地表述了马克思的进路，那么在另一些观点上，他是落后于马克思的。他跟随恩格斯，特别是列宁，把“每个”社会（*ISA*，第 113 页）的结构都以图式化的方式还原到三个实体上：社会存在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本体化了（*FM*，第 182 页；参见 *ISA*，第 113 页）。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实体总是已经被分析为独立的，而从未被分析为是从社会生命过程中产生的并相对于生命过程而独立的”（PIT 1979，第 108—109 页）。如果说阿尔都塞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时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本身……是以有机的方式成为每个社会总体的部分**”（*FM*，第 182 页），那么，从马克思的历史—批判概念来看，这将成为一种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语言（参见 *DI*，MEW 3）或许是具有这种地位，不过这种地位取决于，要强调社会经济以及统治理论的形式规定性（诸如宗教和哲学的思想形式）。

其次，如果说阿尔都塞在《资本论》的叙述形式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体系**自身中概念的等级化结合的划分的发展”（*DKL*，第 91 页），那么，马克思就将重新回到体系哲学。阿尔都塞等人反对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ík）对马克思所做的“人道主义的”解读，科西克不 624
同于阿尔都塞，他在批判“庸俗的进路”时，保留“一种相对的权利”：“社会存在不是呆滞的或者动态的实体，也不是先天的实体，它不依赖对象化实践，而是**依赖于生产过程以及社会现实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依赖于人类的历史实践及其对象化的形式**。”（1963，第 193 页）由此，“在经济范畴及其划分中……不包括社会‘存在’，而毋宁说社会存在是**固定的**”（同上书，194 页）。因此，理论分析要想“在经济范畴的体系”中揭示社会存在，就必须消解其“固定性”，并把其理解为对人类**对象化活动**的表达，理解为对人类的**社会**关系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之间的关联的表达”。（同上）

因此，理论叙述必须——就像理论叙述的对象一样——是被多元决定的，必须互相一起划分出更多的形式。（阿尔都塞后来曾简述过这一观点；参见 1977）

莫里斯·古德利尔试图更加确切地把它规定为“假设的—演绎的”以及“辩证的”方法的“划分”。(1966，第155页及以下)

阿尔都塞的理论倾向于功能主义。社会实体的划分看似总是不成问题地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事实上，再生产的实现一直是一个困难的、潜藏危机的过程。在此，开始出现了调节理论(关于理论历史的发展可参见Lipietz 1992)。就像约阿希姆·赫希(Joachim Hirsch)表明的那样，再生产的实现依赖于是否能够调节“社会对抗”，也就是使趋向于摧毁社会的对抗“既不会直接地，也不会在其关联中表现出来”。(1992，第221页)这种调节可能会失败，并且，在其形式中，它并不是完全由增殖与积累过程决定的；相反，这个过程也依赖于“利益和力量关系的制度化与形式化”(同上书，第219页)：两者处于一种“划分—关系”中(第220页)。

3. 联结(Artikulation)概念之所以在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理论领域中得到应用，主要原因是**语言学转向**延伸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中。

3.1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将联结作为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中心概念(1981)，之后，他进一步把意识形态理论扩大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话语理论(1985)。在这里，连接点不再是马克思，而是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s)的语言理论和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德·索绪尔那里，语言是“联结起来的领域”(1916，第34页)，并且通过“任意性”和“差异化”的基本原则被规定：“语言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一个小的分支，一个**关节**(*articulus*)，在其中，思想被固定在声音上，并且声音成为一种思想的符号”(第134页)。更确切地说：符号构成了“能指”(Signifikant)和“所指”(Signifikat)的结合。结合两者的纽带却是“随意的”(第79页)。通过联结形成的统一体虽然是“一个肯定的事实”(第144页)，但是，构成这个统一体的“单个环节”只是“不同的和消极的”(第144页)，并不具有自为存在的“实体”(第146页)。“在语言中，就像在每一个语义学系统中一样，一个符号只有通过能够自在地进行区分的东西才会形成。只有特殊性才会表达出属性，就像特殊性也形成了价值和统一体那样。”(第145页)在语言中就像在国际象棋中那样，问题不在于被使用的棋子的外观和材料，而是取决于它不同于其他棋子的功能和地位(它们的“价值”)。(参见第131页)

通过总结索绪尔的思想，拉克劳把

625

差异性联结（*differentiellen Articulation*）的概念应用到意识形态理论领域。这个概念被用来反对一种“还原主义的‘上层建筑’概念，根据后者，政治和意识形态是从社会行动者的阶级本性中推导出的必然形式”。（同上）与此相反，拉克劳认为，“孤立地来看，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必然具有阶级内涵，而这种内涵首先是这些因素在一个具体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的联结结果”（1981，第 87 页）。此外，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联结原则”（第 139 页），根据此原则，每个阶级不仅把“并不专属某个阶级的矛盾和诉求包含在其阶级话语之中”，而且使在其对立的阶级话语中联结起来的因素**瓦解**（*desartikuliert*），并且使这种因素在自己的阶级话语中**再次联结**（*reartikuliert*）。（第 141 页）——在此，如果“生产关系，也就是阶级”，依然是“历史过程中归根结底起规定作用的实体”（第 139 页），并且它的再现问题适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那么，拉克劳后来认为，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自身的维度是以话语的方式建构的，是如下尝试的结果，即确定不可一确定的东西（das Nicht-Festlegbare）（含义、意义）。“划分的实践在于……建构联结点，这些联结点部分地确定了意义；这种确定的局部性质来自社会的开放性，是话语领域的非封闭性造成的每一种话语都持续泛滥的结果。”（1985，第 113 页）

3.2 拉克劳认为，一种话语中的诸因素的结合是随意的——在索绪尔本人那里，任意性论题包含一种平衡力量，这种平衡力量是通过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的“相对动力”原理实现的（参见 1916，第 158 页）——与此相对，斯图加特·霍尔指出，“一定话语的联结凭借具体阶级的实践可以得到长时间的确保”（1982，第 116 页）。这些“有倾向的调整”（tendential alignments）既不是概念逻辑意义上必要的，也不是无可避免的或者一直确定的，但是这些调整规定了“阶级斗争历史领域的给定性”。（1984，第 117—118 页）如果“**不必然相符**”（*nicht notwendigen Entsprechung*）的概念被翻译成“必然不一相符”（notwendige Nicht-Entsprechung）的概念，那么，把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想成“非一同质性”（Nicht-Homogenität）的尝试就会颠倒为它的“**极端反面**”（*extremes Gegenteil*）。因此，从一个“相对自主”的概念中产生的是单纯的“自主”（1989，第 54 页，gegen Hirst）。与此相反，马克思思考的是“一个社会形式的**复杂统一性**……（在此，**复杂性**和**统一性**是同等重要的）”（Hall 1989，第 55 页）。

在同样的进攻方向上，霍尔将批判的目标指向福柯。“如果人们把弓绷得过紧，并且在绝对的多样性中寻找解脱

之道，那么，真实的理论应用就将面临被丢失的风险，这个理论应用是从对差别、话语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非—本质、多义性的性质的认识中推导出来的”（1989，第198页）。在福柯那里，“权力概念的彻底**溶解**（*Auflösung*）”（因为权力是被“到处”分配的）使理论意图颠倒为其反面，并且使自身再次成为“本质性的”。权力围绕着现实问题，围绕着“微观物理学”（Mikrophysik）和**宏观物理学**（*Makrophysik*）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围绕着“文明社会和社会关系中的水平力量同国家以及政治关系中的垂直力量之间的联系问题”；权力的许多分散了的“规训”同“任何一个像**国家**一样的压制中心和联结中心”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同上书，第199页）就像霍尔对泰勒制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独裁的民粹主义”的真实力量在于，把更多的异质性话语组合成一个“自身矛盾的结构，这个结构一方面由市场和私
627 人占有的逻辑构成，另一方面由有机的保守主义的逻辑构成”。“这种如此这般形成并保持着的矛盾统一体”，它“占统治地位——并且不仅仅是多样性的秩序”。霍尔看到福柯的如下缺陷：福柯有一个关于“差别”的概念，但却没有一个关于“联结”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没有领导权概念的权力概念”。（Hall 1989，第200页）

3.3 借助于拉克劳“差异性联结”的概念，1981年，W. F. 豪格起草了一个关于“左翼领导权”概念的新表述，而此时的情况已完全不同于葛兰西的时代，此时，“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不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领导者”（第170页）。一种“没有阶级领导者的领导权结构”，即一种“结构性的领导权”应当取代缺失了的领导主体。（第172页）这种领导权可能不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而是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相互“结合”的结果。（第170页）这一点的前提是，这些力量不是相互试图“领导”对方，而是在它们的结合中“按其本身得到承认，并且保持为自主的”。（第170页）——与葛兰西一样，豪格将“外在的”秩序与“内在的”秩序放在一起思考——在阿尔都塞那里，由于他对“历史主义”持保留意见，这种思考被中断了。“就像力量的联结将会是决定性一样，个人的‘内在’多重联结（Mehrfachartikulation）在单个群体里也是决定性的。他们是被‘多元决定的’或者是被‘多重联结的’（例如工会女成员或者是妇女），这将关系从一个极端无望的还原主义的机器中带了出来”（第184页）。问题在于，“要将这个巨大的问题领域联结起来，从而使得各种解决方案是互相结合的”（第184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1963), in: ders., *FM*, 100-167; ders., »Vom 'Kapital' zur Philosophie von Marx« (1965), in: ders., u. E. Balibar, *DKL*, 11-93; ders., »Marx' Denken im Kapital« (1977), in: *Prokla* 50, 1983, 130-147; E. Balibar, »Über die Grundbegriff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KL*, 268-414; B. Croce,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Hegels Philosophie*, Heidelberg 1909 (Bari 1907); G. Della Volpe, *Rousseau und Marx. Beiträge zur Dialektik geschichtlicher Strukturen* (1956), Darmstadt u. Neuwied 1975, bes. 181-196; A. Demirović, *Nicos Poulantzas*, Berlin/W 1987; ders., H. -P. Krebs, Th. Sablowski (H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ß*, Münster 1992; M. Godelier, *Rationalität und Irrationalität in der Ökonomie* (1966), Frankfurt/M 1972; S. Hall, »Popular-demokratischer und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in: W. F. Haug u. Welfferding (H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Berlin/W 1982, 104-124; ders., »Ideologie und Ökonomie – Marxismus ohne Gewähr«,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Philosophie – Ökonomie – Wissenschaft*, AS 84, Berlin/W 1984, 97-121;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amburg 1989; W. F. Haug, »Strukturelle Hegemonie« (1981),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158-184; J. Hirsch, »Regulation, Staat und Hegemonie«, in: Demirović u. a, 1992, 203-231; K. Kosík,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Eine Studie zur Problematik der Menschen und der Welt* (1963), Frankfurt/M 1986; F. Jameson, *Das politische Unbewußte. Literatur als Symbol sozialen Handelns* (1981), Reinbek 1988; E. Laclau, *Politik und Ideologie im Marxismus* (1978), Berlin/W 1981; ders., u. Ch.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1985 (dt. Wien 1991); A. Lipietz, »Vom Althusserianismus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in: A. Demirović u. a., 1992, 9-54; M.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Paris 1975; ders., »Über die Rolle des Gedächtnisses als interdiskursives Material. Ein Forschungsprojekt im Rahmen der Diskursanalyse und Archivlektüre«, in: M. Geier u. H. Woetzel (Hg.), *Das Subjekt des Diskurses*, Berlin/W 1983, 50-58;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1974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 Paris 1968); der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

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1977), Hamburg 1978; F. de Saussure, *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1916), Berlin/W 1967.

托马斯·韦伯 撰
朱渝阳 译，侯振武 校，张文红 审

参见：

Anfang, Arbeitsteilung, Aufbaupläne, Ausdruck,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Basis, Bedeutung, Determination, Dialektik, Diskursanalyse, Diskurstheorie, Ebene, Forschung/Darstellung, gegliedertes Ganzes, Genese, Haupt-/Nebenwiderspruch, Hegemonie, Ideologie-Theorie, Ontologie, Produktionsweise, Regulationismus, relative Autonomie, Semiotik, Struktur/Superstrukturen, Sinn, Sprache, strukturelle Kausalität, Totalität, Überbau, Überdeterminierung, Zeichen

亚细亚生产方式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1. 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根据欧洲探险家F. 贝尔尼埃（F. Bernier）和J. 塔韦尼埃（J. Tavernier）18世纪游历波斯、印度、莫卧儿王国以及邻近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游记、英国驻印度总督M. 韦尔克斯（M. Wilks）和G. 坎伯尔（G. Campbell）的报告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R. 琼斯（R. Jones）和J. 穆勒（J. Mill）的文章（参见Krader 1975，Kap.1-4），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1857年至1859年，马克思阐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意义及将其运用到社会历史分期上的可能性（*Gr.* MEW 42，第383页及以下；*Zur Kritik*，MEW 13，第9页）。在这一时期，他给这个历史概念命名并且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世界范围内的现象来研究。在接下来的著作中，马克思继续研究这一生产方式，却并没有使用这一名称。（关于印度和秘鲁的印加人，参见*K I*，MEW 23，第102页，以及*K III*，MEW 25，第884页）他区分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生产方式以及封建生产方式，也将它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在对柯瓦列夫斯基（Kovalevskij）关于共有地产的著作（1879）所做的笔记和摘录中，马克思对能否将“封建主义”作为印度历史的范畴提出了质疑。（参见Krader 1975，第202—203、383页）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更早的时代，但在近代却仍然可以找到它歪曲的或衰败的形式：“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

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Gr*，MEW 42，第 39—40 页）

2. **特点和历史**。在平民社会和国家的最初阶段，社会劳动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受约束的；它被传统限制在对村庄所尽的义务当中，被法律束缚在主人（奴隶制）或土地上（封建主义）。因传统而受缚于村庄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阶级社会——平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就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经济基础的；它之所以被这样称呼，是因为它首先在印度、中国、伊朗和中亚地区得到了认同。事实上，这种社会和经济形态也出现在了古代秘鲁、古代埃及（*K I*，MEW 23，第 535 页及以下）、非洲的部分地区、古代地中海地区和古代墨西哥。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生产资料是诸如此类的劳动工具：锄头、铁铲和犁，挽畜和驮畜，水、引水渠和排水渠，粪便和其他肥料。通过土地登记调查、记录土地份额、为运输和灌溉工程修建大规模的水道，国家控制着一部分生产资料。通过分配单个家庭用于耕种的地产、协调地产纠纷、通过单独地或者由几个村庄在一个地区内实施的小规模的灌溉、排水和疏浚的工程，村庄既控制着耕地也控制着水。

社会再生产的单位是村庄。人不断 630
地在土地上定居，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每个村庄都为国家及其管理机构、为宗教和军队的维持提供一部分剩余。土地由村民共同管理和控制；它并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家庭，但是，作为村庄的成员，他们却拥有长期的占有权。必须区分的是地方产权和个体对土地的占有。生产单位基本上与消费单位是一致的；它负责交纳社会的剩余产品。出自村庄的剩余具有租金的形式；其经济实体是物品和由村庄居民实施的劳动。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区分私人租金和公共税收，不包括私人对土地的占有、商人阶级和在这些条件下平民生活的私人领域。

平民生活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是由公元前一千年的罗马共和国的记录所证实的；而古代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没有这样的区分，并且比这种区分早出现了几千年。在古代东方社会、非洲部分地区以及秘鲁，君主和统治阶层是无法区分的，他们既是公众人物，也是个人。统治既是宗教的，又是世俗的；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剩余以不可分割的宗教和世俗的租金的形式被征收。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后期，在印度、中国以及后来的伊斯兰地区，出现了作为私有关系和私人利益的地产与公

共领地的区别，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接下来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中，古罗马法中的一些范畴比如**公共事务**（*res publica*）、**国有土地**（*ager publicus*）可以被用作范例。在古罗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是暂时的；在封建主义中它们是未分离的，但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里，它们是被明确区分开的。

村庄是由邻居或亲属组成的共同体，或者是二者在氏族村落共同体（中国的**井田制**，古代印度的**兄弟关系**，印加帝国的**阿伊鲁**［*ayllu*］，古代墨西哥的**卡尔普力**［*calpulli*］；类似的形式还出现在古埃及、克里特岛、约鲁巴［Yoriba］、贝宁［Benin］、马塔贝勒［Matebale］等）中的结合。然而，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村庄仅仅是形式
631 上拥有耕地和水的共同体，而其他的生产资料则归家庭所有。村庄在形式上是一个王国或者帝国的一部分，而它的成员则臣服于一位君主或者一个教士阶层。（*Gr*，MEW 42，第 389—390 页；*M 1861-1863*，MEGA II. 3.1，第 116—117、233 页）在社会分化成经济阶层之前，亚细亚生产方式将社会关系带入了社会阶级和国家形态的时期，并且将这些早期的共同体关系作为没有实体的形式加以保留。就此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是矛盾的。村庄生活的实体关系是社会中的劳动关系，是一种社会剩余的生产，以及由国家机构造成的它与直接生产者的疏离。在这些情况下，村庄生活在形式上是共同体的，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和反社会的。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社会阶级关系的历史；因此，我们粗略地谈及（根据剩余产品的产生）社会分化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剩余劳动。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最初的形式中，可以找到这种分化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和阶级对抗：劳动阶级的意识还具有地区单位的宗教神秘的特征；统治者似乎是神圣的国王，他的臣仆就是他的礼拜者（古埃及、印加帝国等）；以这样的方式，社会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实体经济过程同政治、法律与宗教形式的关系被神秘化了。因此，阶级斗争的迹象很少出现；资本构成和雇佣劳动的过程对于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不被考虑。实体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在其实现过程中以宗教和政治的形式为中介，在这些条件下，这些形式就是现有社会实体的实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处于这种宗教的、政治的和其他观念的神秘化之外。（*Ms 61-63*，MEGA II. 3）

国家是作为扩大了的共同实体出现的，它超越了现实的政治实体，并作为主要的土地所有者（*Gr*，MEW 42，第 385 页）；由此，国家权力便传递到了神

灵、神权国王、神职国王或者神职阶层身上。与此相反，在法律体系中，**实际**
632 **上**被判定给村民共同体的地产被**抽象**判定给了作为国家的共同体。然后，财产在君主身上、在一种神秘的代表身上，并且以宗教的形式被人格化，他们没有以他们实际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普遍的地产所有者。在这些条件下，国家是核心机构，它占据了一切社会权力——政治的、法律的和宗教的权力，因为它本身与这些权力相适应，并由此分享和分配这些权力。由此，在其最初形式中，国家就是以其本来面目出现的，即作为统治阶级统治劳动阶级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现象和实质是互相吻合的。

村庄的生产率低下，每个村庄的年生产总值也是如此；剩余的总量只有在社会包括许多村庄时才会较大。村庄的技术、艺术和科学得到了发展，劳动的组合和分工、任务和功能的专门化也是如此；因为尽管规模很小，但它们却是有成效的。因为村庄都是自给自足的，所以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一个整体：村庄消费它生产的产品，也生产它消费的产品。交换和贸易虽然存在，然而却并不十分发达。尽管如此，还是既有近程的、也有远程的贸易存在，有专人负责地区和国际规模的货物运输和交换，这些贸易在合作社、社会等级和商业行会中被组织起来（关于它们，在古代中国、印度、埃及、中美洲、秘鲁等都有记载）。村庄之间互相展开交换，无论专门的商人参与与否。市场——交换、交易中的价格、极小规模的商品和货币流通——已经发展了起来。然而，商人却并没有构成社会阶层，而是这样一种社会阶层的雏形。

持续的城市中心和持续的村庄定居同时存在。因为工业没有发展，所以城市作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其宗教、政治、法律和军事的表现中发挥着作用，也作为市场和贸易的中心，而不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发挥着作用。在利用土地的程度和强度方面，在为国王的宫廷和礼拜活动生产库存产品的专门化上，城市劳动和乡村劳动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并没有那么明显。因此，在乡村劳动和城市劳动之间，或者在城市利益和乡村利 633
益之间并没有任何发生冲突的迹象。城市工业和乡村生产与城市生产之间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度（古典古代和其他地方的）和封建主义中，社会劳动关系在形式和实体上都是不自由的；而自由的形式与其实体相分离，以至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雇佣劳动按照形式是自由的，而在实体上是不自由的。按照形式，阶级社会是平民社会（古代的和现代的）。它的历史就是土地和其

他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的历史。所有制的历史开始于作为主要生产资料和“最初的劳动资料”（*Gr*，MEW 42，第 393 页）的土地所有制。就像它们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所显示的那样，在其早期，所有制既不是私人的，也不是公共的，**在具体意义上**和就其特殊性而言，是村庄公有制，**在抽象的意义上**和就其普遍性而言，是国家的公有制。

评释：

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只有少量的土地私有制，而在工业中几乎没有私有制，因此，有人会认为，在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这是将旧的经济与政治实践同现代实践及其在中国的类似情况混淆了。对于国家的早期历史来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立并未得到发展是典型的特征；这种对立是后来同社会经济阶层与其意识形态的表现之间的明显的和自觉的对立一起出现的。

3. **接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认为这个范畴是具有说服力的，然而，在他们 20 世纪初进行的关于其可应用性的争论中，他们却产生了分歧。两个人都区分了两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一是作为可与过去的历史产生联系的理论构造，二是作为现实议事日程要点，这个要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以及反对沙皇专制的政治斗争中是具有具体意义的。列宁主张将土地国有化作为一个纲领要点，这与俄国农民的追求相吻合。普列汉诺夫则担心由此会重建“旧有的亚洲秩序”；国王占有所有土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会被重新唤醒。无论是列宁还是普列汉诺夫都认为，中世纪蒙古对他们国家的占领和统治引入了一个类亚洲或半亚洲的时代以及相应的生活条件。普 634
列汉诺夫质疑列宁国有化的要点是“亚洲的经济”，并且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不需要中国人的经济”。（1907）他主张为农民将土地“地方化”，其中地方的自治机构管理登记的地产。它们必须对上级机关和农民负责（1906）。列宁虽然承认，蒙古的占领把一种亚洲元素带进了俄国的历史，但却不同意普列汉诺夫 1906 年的主张。在列宁看来，俄国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主要的敌人是资本家阶层，而并非一个从前的亚洲统治者阶层。（LW 10，第 279—289、328—349 页，特别是第 332 页）由此，他摒弃了这样的观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可以应用到俄国的现实问题上。它对于印度和中国可应用性问题由此被搁置，因为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说俄国是边缘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革命问题重

新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及其是否可应用到古代历史和现实革命目标设定上的双重问题。共产国际中产生了不同观点。经济学家和斯大林的顾问E. 瓦尔加（E. Varga）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历史范畴是有效的，可以应用到中国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上，这个统治阶级并不代表私有资本，而是代表了对于生产资料的管理控制。（1930；参见1968）在共产国际中担任官方职位的G. 多布罗夫斯基（G. Dubrovskij）（1929）完全摒弃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无论是在它适合过去还是现在的问题上。与他相同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另一位代表人物E. 伊奥尔克（E. Iolk），以及M. 哥德斯（M. Godes）（1929）。在涉及古代中国历史时，M. 科金（M. Kokin）、G. 帕帕扬（G. Papajan）（1930）和L. 马格雅尔（L. Magyar）（1928）都坚定地捍卫这一理论；马格雅尔站在瓦尔加一边，支持可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20世纪亚洲革命运动问题上的观点。即使是D. 拉扎诺夫（D. Rjazanov）（1925，第370页及以下）也大致赞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20世纪3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意义和亚洲革命的现实性都有所减弱；当时，许多争论的参与者都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消失了。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939—1941）和《柯瓦列夫斯基笔记》（载 *Sovetskoe Vostokovedenie*，1958，Nr. 3-5 和 *Problemy Vostokovedenjia*，1959，Nr. 1）这两部在其逝世后出版的 635
著作（但前者由于战争实际上在1953年重新出版后才得以被接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改变了这种讨论。这两部著作都没有质疑这一概念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并且将它与历史分期联系在了一起。马克思首先是明确地、继而通过提出问题含蓄地认为，这一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和革命运动的现实具体问题关系甚少。然而，它却解释了由殖民主义行为造成的农民已有的共同财产的畸变和歪曲（参见 *Gr*，26；MEW 42，第39—40页；参见 Krader 1975，Teil II）。

在战后，瓦尔加（AS 3，第332页）依然认为，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就其可应用性和重要性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都具有相同的现实意义。“亚细亚”这个表达并不能从地理意义上来解读，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当然是局限在推行灌溉经济的干旱地区。K. A. 维特弗格尔（K. A. Wittfogel）（1957）将这一观点推向了极致，认为对于水的控制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据此，通过对供水的控制，对人口的控制就掌握在了国家的手中。维特弗格尔将这种绝对控制应用到了中国、印度、印加帝国以及苏联，他的这一表达意指“东方的专制政体”。国家的官僚扮演着

统治阶级的角色，他将这一点看作所有这些国家和王国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将这种政治关系看作讨论生产方式的基础。——如果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在当前语境中没有被夸张地描述，那么这是有可能的。维特弗格尔夸大了特定的生产资料在同其他生产资料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水在同可耕地的关系中的重要性，并混淆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它还包括生产与消费连同分配和交换的相互影响。（*Gr*，MEW 42，第 19—34 页）交换的第四个因素，具体而言就是货币流通，对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很重要，然而，它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来说却几乎没有意义，因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几乎没有货币流通。

与维特弗格尔类似，R. 巴罗（R. Bahro）（1977）也将苏联或者民主德国的体制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显然，这一归类的标准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

F. 托克尔（F. Tökel）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并将它定位在古代东方社会中。他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与历史分期有关，但却将我们时代的现实问题与亚细亚的范畴分割开来。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即日耳曼的范畴（1969，第 47 页），并将它与亚细亚和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古代相提并论。其分期的原则是以所有制形式为依据。尽管托克尔关注的是生产方式，但在其分类原则的框架下，他研究的主要是土地所有制问题。所有制体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参见 *Gr*，MEW 42，第 23 页）。公社所有制处在文明的门槛上。此外，如马克思所言，公社所有制是“原始形式”，不仅是在俄国人和斯拉夫人那里普遍如此，而且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和赛尔特人（Kelten）那里也是如此，尽管“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但还可以在印度被找到。“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Zur Kritik*，MEW 13，第 21 页注释）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再度出现（MEW 23，第 92 页）。要点是，公社所有制不仅出现在原始公社中，而且也出现在国家形式的阶级社会中。当它在印度还没有以“只留下残迹”，而是以有生命力的形式存在的时候，阶级和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因而它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种现象。（在关于斯拉夫人等的“哈克斯特豪森摘录”中，马克思也说过相同的话，参见

Ethnol，第 349、355 页）因为托克尔的原则与应用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基本经济学因素明显不同，所以在目前的语境中就无法继续讨论了。维特弗格尔、巴罗和托克尔都使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保留了马克思的历史范畴的名称，但在实质上却改变了这个范畴。

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讨论遗留下来了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科金、帕帕扬和马格雅尔都提到了在古代中国租金和税收的重合或者无法区分的问题。租金是私人领域内支付土地费用的一种形式，税收则是公共领域内支付土地费用
637 的一种形式。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这些领域是相互区分的，但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历史上的租金 / 税收问题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只在一种具有普遍特征同时更加具体的理论里才相互联系。（Krader 1979，Einl.，Kap. 3）

马克思阐明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在世界范围内有效的。但是，过去却有一种不加批判地将它应用于世界各地的趋势，完全不考虑地方和区域的差别。因此，安第斯山地区、中美洲和非洲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与亚洲的生产方式的类比中谈论安第斯山地区、中美洲（或者包括二者的古代美洲）和非洲的生产方式。无论使用何种术语，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历史时期的统一性都是被明确断定了的，并在这种统一性中再去确定那些区域的、大陆的和地方的差别。

国家和政府形式的因素，无论是专制的还是独裁的，都被纳入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之中。因此，谈论的话题是“东方的专制政体”或者新近在讨论的“国家的生产方式”。但是，与亚洲在地理位置上的关系所提出的问题，即它与全球性的应用相抵触，却并没有通过“国家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表述而得到解决。国家专制、对水供给的控制、殖民主义的残忍暴行，这些因素都属于非经济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分析经济社会形成和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却不是从诸如国家和政治这样的非经济力量开始的。“国家的生产方式”这样的表述是有争议的，因为它使古代亚洲的生产体系和苏联的生产体系之间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并且似乎是在建议将二者合而为一，因为它们都被国家官僚机构所控制。工资、储备、工业生产、生产力、资本及其积累、资本主义和苏联体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就被遮蔽了。国家官僚机构的角色属于上层建筑，而不属于社会基础。上层建筑在经济学当中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但却并非根本的或者首要的功能。

自从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开

始以来——这个讨论可以追溯到17世
638 纪并由马克思做出了决定性的总结，重点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和土地**所有制**，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作为其化身的国王的所有制。然而，后来的关键问题已不是土地所有制，而是国王及其代理人对水的**控制**。土地和水都是生产资料。这些术语所描述的秩序是重要的，这也适用于古代东方——生产资料被作为村庄的共同体、被作为扩大了的共同体的国家占有和控制，而后者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和生产资料的控制之间的差别是关键问题；这个差别被错误地追溯到了更早的时代。

参考文献：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Frankfurt/M 1977; G. Dubrovsky, *K. voprosu o suščnosti »asiatskogo« sposoba proisvodstva*, Moskau 1929; R.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Über den halbasiatischen Weg zum Sozialismus. Lenin, Lukács und die Dritte Internationale*, Berlin/W 1974; M. Godes, E. Iolk, »Obščestvo Marksistov-Vostokovedov«, in: *Diskjussija ob Asiatskom Sposobe Proizvodstva*, Moskau 1929; H. P. Harstick,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sweisen*, Frankfurt/M 1976; M. Kokin, G. Papajan, *Čžin-Tjan'. Agrarnyj Strij drevnego Kitaja*, Moskau-Leningrad 1930; M. M. Kovalevskij, *Obščinnoe Zemlevladenie. Pričiny chod i posledstvie ego razloženija* (Gemeinschaftlicher Grundbesitz. Ursachen, Verlauf und Folgen seines Verfalls), Moskau 1879; L. Krader,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ssen 1975; ders., *Treatise of Social Labor*, Assen 1979; L. Mad' jar (Magyar), *Ekonomika sel'skogo khosjajstva v Kitae*, Moskau-Leningrad 1928; G. W. Plechanow, »Ob Agrarnom Voprose v Rossii«, in: *Dnevnik Sotsial'-Demokrata* 1906, Nr. 5; ders., in: *Protokoly Ob editionel'nogo sezda Rossiskoj* Sotsial'-*Demokratičeskoj Rabočej* Partii (Stockholm 1906), Moskau 1907; D. Rjasanow, »Karl Marx über China und Indien. Einleitung«, in: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I, 1925, Nr. 2; F. Tökel, *Zur Frage der asiatischen Produktionsweise* (Budapest 1965), Neuwied-Berlin/W 1969; E. Varga, »Letter to the Editor«, in: *Problemly Kitaja*, 1930, Nr. 4-5; ders., »Über d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 *Jb. f. Wirt. Gesch.*, Berlin/DDR 1967, IV, 181-204 (wieder in: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3, 341-356); K. A. Wittfogel,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 (engl. 1957), Köln 1961.

洛伦斯·克拉德
（Lawrence Krader）撰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 译为德文
马剑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Basis, Bauern, Besitz/Eigentum,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orfgemeinschaft, germanische Gemeind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Kolonialismus, orientalische Despotie, Periodisierung der Geschicht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Sklaverei,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urplus,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Überbau,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639 联合（联合会、联合体）（Assoziation）

第一国际（I. Internationale），即**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这个名称就已经暗示了这一概念的重要性。联合会，常常与“协会”（Verein）或者“联盟”（Vereinigung）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它（和 *societas* 一样）出自拉丁语的 *socius*，其含义是“伙伴”；*Association* 也就相应地表示伙伴们所组成的团体，即**合作社**（*Genossenschaft*）。19 世纪的工人运动与这一最初并不具有特定含义的结伴形式结合了起来。他们的联合会是一个团结互助的联合会。《共产党宣言》强有力的语言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MEW 4，第 482 页）

1. 在认识论和心理学中，联合指的是将现象或者思想自发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提到了休谟，后者将因果性的观念归因于人们借助**习惯**将现象的“恒常的联合”“最终误认为客观的”（*KrV*，B 第 127 页）；与此相反，康德将一种先验的意识功能看作“对杂多的联合的可能性根据”（A 第 113 页）或如下规则的根据，即“一物若没有它总是跟随其后的另一物先行于它，它就永远也不会产生出来”（A 第 112 页）。

作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个体之团结的“联合”概念——与同它互补的对立面即“敌对”都——受到了圣西门学派的影响：“**联合**精神的进步和**敌对**的相对衰落最广泛地代表了人类的发展”

（*Exposition* 1831，第 162—163 页）。在此之前，维克多·孔西得朗（Victor Considerant）便将联合与共产主义对立了起来：共产主义是平均主义的，而联合则促进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他向上的追求”。1842 年，威廉·韦尔特林（Wilhelm Weltling）把联合这个概念引向了左派：“好！非常好！由此可以得到帮助。这个手段是革命的”（第 244 页）。韦尔特林当然看到，联合本身仅仅指的是形式：每个兵营都是一个联合体，而谈论“和谐的联合”的傅立叶还了解阶级的状况。（第 245 页）韦尔特林的回答存在于**平均主义**的联合中（第 247 页）。

2.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接受了这个概念：“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平等”等；土地不再是买卖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自身的财产”。（MEW 40，第 508 页）

640

2.1 在对蒲鲁东、欧文和傅立叶的研究中，马克思在阶级斗争领域重新解释了联合概念。对于将“联合”同样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口号加以研究的蒲鲁东，马克思反驳了他的论据并指出：“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Elend*，MEW 4，第 161 页；列宁 1897 年引用了这番话——德文版本将联合翻译作了 *Vereinigung*，并以此为依据，为的是针对不切实际的倒退的资本主义批判来强调市民社会的潜力，即它能够并在竞争的基础上强迫“社会的各个部分和阶级联合起来”；参见 LW 2，第 210 页。）——在对巴师夏（Bastiat）和凯里（Carey）的摘录（1857/1858，MEW 42；MEGA II.1.1）中，对“社会形式或联合体形式”的讨论相应地比较中立（参见 MEW 42，第 9 页及以下）；同样是在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笔记中，他写道：“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同上书，第 513 页）。

在内容上完全代表工人运动立场的联合与阶级对抗——不同于“社会伙伴关系”和圣西门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强调的那样——并不同步：“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等的美妙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Gr*，405；MEW 42，第 413 页）工人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合作还远没有把这个企业变成合作社——工人的“联合会”或者“联合体”，“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是由资本及其存在决定的；在这里，与单个的工人

有关系的是“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同上书，第 479 页；第 487 页）

合作工厂是另一回事，就像欧文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就是说“在旧形式内”，但却作为“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建立起来的那样；它们意味着，尽管对立在企业**内部**被消除，但是，外部对立的继续存在却只可能导致“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MEW 25，第 456 页）

641 2.2 在马克思看来，在**工人联合体**（*Arbeiterassoziation*）这个概念中，不同覆盖面的含义彼此联系：（1）消除工人的竞争和分散；（2）合作社形式；最后，（3）对一种“联合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展望（参见 MEW 25，第 456 页）。

2.21 **消除工人的竞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谈到了工人们如何充分利用“自由联合会的权利”，寻找针对资本主义专制的“一种新的反抗形式”，以取代那种随意的非法破坏机器的行为。（参见 MEW 2，第 432—433 页）联合会同时是工人们消除其竞争的最初尝试（同上书，第 436—437 页）。恩格斯将它描述成了推行工厂制的结果。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思想被再次强调：“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MEW 4，第 473—474 页）

2.22 **合作社形式**。在 1867 年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给代表的指示》中，合作运动被承认为实现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的动力之一。（MEW 16，第 195 页）与此相反，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似乎更多是在策略意义上，以及必需的“过渡点”（MEW 25，第 453 页）的意义上，对“合作工厂”感兴趣。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被理解为合作社的、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共有财产基础上的社会。（MEW 19，第 19—20 页）然而，公有制却并不意味着合作社所有制。1872 年，马克思表示反对“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如果整个社会都成为没有阶级和国家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那么就不允许“使社会仅仅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的支配”。（MEW 18，第 62 页）

2.23 **联合的生产方式**。马克思不愿将合作社当作土地或普遍意义上的生产资料的“私有者”来使用——因为在他看来，土地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MEW 23，第 193 页）和“一般的劳动资料”（同上书，第 195 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设想的目标中，合作社并非联合起来的参与者。“**生产**

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MEW 18，第 62 页）马克思并没有解释，国家的解体和自由的联合体同“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该如何相互配合。需要说明的是：（1）联合本身会以复数的形式出现（就是说并非一个单独的集中的联合会）；（2）个体在其联合体中应当是“自由平等的”（没有等级制度和从属关系？）；（3）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就像计划——无论在单个的联合体还是在所有联合体的层面上——得到实现时那样；（4）至少具有误导性的是，马克思在后文中称与此有关的运动为“经济”活动。

642

实际上，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联合的生产方式**就已经出现了，在其中，共产主义的特点被确定如下，即社会关系及其自然的、由历史创造的前提条件应当服从于“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力量”（MEW 3，第 70 页），服从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同上书，第 72 页）。

《哲学的贫困》（1847）以这一视角的准确阐释收尾：“工人阶级……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MEW 4，第 182 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了这句话，LW 25，第 413 页，但并没有评价联合体概念，为的是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在 1850 年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即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不久，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被规定如下：“**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MEGA I.10，第 258 页）作为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过渡性要求，必须提出，“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同上书，第 262 页）。

在**联合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机器成了“联合的工人的财产”（*Gr*，第 717 页；MEW 42，第 729 页）。对于巴黎公社，马克思强调，“它曾想把生产资料……变成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Bürgerkrieg*，MEW

17，第 342 页）。

643 如果在这个角度上生产资料不再作为资本发挥作用，那么劳动就不再作为雇佣劳动发挥作用。正如《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充满激情地宣布的那样，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MEW 16，第 11—12 页）。

马克思将这些想法与一个“合作社所组成的联合体”、社会的目标设想联系在一起（Brie 1990，第 105 页），在其中“所有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MEW 17，第 343 页），并且它是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Über die Nationalisierung des Grund und Bodens*，1872，MEW 18，第 62 页）。

为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马克思设定了那个从历史角度来看仍然非常简单的、乌托邦式的构想，即“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他们的物质生产过程“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MEW 23，第 93—94 页）这种控制将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MEW 25，第 828、456 页）的团结在一起的、“集体的理性”的产物（参见上书，第 267 页）。这些规定都与具体的模式相去甚远。它们只是清楚地描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构想的“联合的”、从自由个体出发的特征。

2.24 联合体作为自由实现的形式。自由之所以包含在马克思的作为目标概念的联合体当中，不仅是因为它被想象成“自由的”，即自愿的联合；而且正是如此建立起来的联合体的计划和创造能力使它成为个体自由的实现方式：“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MEW 3，第 74 页）——然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一个“自由的王国”却在生产范围“之外”建立了起来，而联合体作为自由的条件则被限制在作为“必然王国”的生产领域当中：“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 644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统治自己。”（MEW 25，第 828 页）

3. 在晚年恩格斯那里，联合概念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失去了乌托邦式的潜力。最初，他的观点与马克思没有太大区别，“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MEW 19，第 104 页）。这里，联合代

表了**参与**生产和管理的普遍化。在出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个片断中，“联合”作为社会化形式的另一种说法出现，而“未来的联合体”则是为社会主义所起的清楚的名称。（MEW 21，第 391 页）后者将“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务实性与旧有的连带原则联系在一起（同上）。当恩格斯写道容克地主的大规模地产能够“在联合体中耕种”（MEW 37，第 448 页）时，生产合作社这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便显露了出来。

4. **国家社会主义**。1863 年，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第一次”（Bernstein）谈及了联合体，而且是在他对“舒尔采（Schulze）的自助性联合体”，即舒尔采-德里奇（Schulze-Delitzsch）的信贷、原料和消费协会的分析（第 417 页）中谈到的。拉萨尔这样描述他的规划：“**以最和平的、最合法的、最简单的方式废除企业家的赢利，**即工人阶级通过自愿的联合将自己组织成自身的企业家，……这是……对于工人阶级地位的唯一的**切合实际**的改善。”（第 429 页）拉萨尔的评价是：没有比这更加远离所谓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第 431 页）。与此相对，拉萨尔坚定地呼吁必要的（事实上完成了的）“国家干预”（第 432 页）的实例。

国家社会主义对抗作为生产者联合体的社会主义——这是拉萨尔与马克思的对立。后者给在历史上即将来临的事物命名，而前者则是讲出了内容。在俄国革命之后，以国家为中心并依赖于国家的集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中——在民主德国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体的乌托邦式的火花在国家的生产方式下被扑灭，尽管它们在另一方面发展出了共同生活和劳 645
动的形式，由这些形式，不仅贫困和对工作岗位即“物质生存”的担心消失了，而且人们开始尝试缩小城乡的文化差距（文化之家）——当然经常是在生产率相对较低和个体发展机会受限的情况下。

5. 鉴于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以及资本主义的后共产主义的界限的打破，**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这个目标构想似乎过时了。但是，正应了阿多诺的那句名言：“过时的永远都是那些不成功的东西，是未能实现的对新事物的承诺。”（1951，1964）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比成熟的马克思的联合思想更加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中制和“直接共产主义”。米夏埃尔·特乌尼森（Michael Theunissen）直截了当地在这一点上指责了马克思的联合概念，他批评道，马克思从个体出发随意地思考社会关联，而

非在严格的普遍性上构思社会关联形成的道德和制度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刻板谈论仅仅透露出，细节把他带入了一种已经变得无语的尴尬状态，而来自歌德时代的人格意识形态的活动布景正糟糕地对这种尴尬状态加以掩饰，在此，有效的是将其社会关联全部表现出来，它比正在出现的基础的数量还大。"（1978，第 484 页）与此相反，人们可以反驳，马克思恰恰相信这些"正在出现的基础"、个体，甚至是在极端民主的意义上相信无限的社会化能力。然而，特乌尼森想到的也许是马克思具体的制度化的社会构想的空白点。正如尼科斯·普兰查斯所强调的那样，也许恰恰是马克思表述的质朴和空白留下了一个能够被一种集中制填补的真空，这种集中制将整个社会看成一座唯一的工厂。比如，"集体的理性"这种说法更多地掩盖了达成一致意见和做出决定的问题，而并不代表它已经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于是，在斯大林主义中，从个体的自由联合中产生了他们在行政命令意义上的归属，从他们的"集体的理性"中产生了上级官僚机构。民主德国短暂地发布的口号：**一起工作，一起计划，一起治理**！——这个口号看似非常符合马克思的联合观念的精神——由于绝对垂直的决定、控制和强制，听起来就像一个笑话。

6. 与之相对，无论是在共产主义还是在资本主义的改革中，马克思的联合概念都保持着新的现实性。 646

6.1 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中，自愿的联合体或者协会属于**公民社会**的范围，它是"社会私人组织的整体"（*Gef* 3，H. 4，§49，第 515 页），或者是"在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意义上，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一个社会团体，是国家的道德内涵"（H. 6，§24，第 729 页）。他的切入点是黑格尔针对君主立宪制提出的"关于政党和协会作为国家的'私人组织'的学说"（*Gef* 1，H. 1，§47，第 117 页：*Hegel e le associazioni*）。由此他坚定地认为，"对于国家，人们除了把它理解为统治机构之外，还必须把它理解为'私人的'霸权机构或者公民社会"（H. 6，§137，第 816 页）。他的最终问题涉及"下层阶级"获得解放的可能性条件，为此，首先"并不是［形成］一个联合体：它的历史被交织进'公民社会'的历史当中，是后者的一个破碎的部分"（*Gef* 2，H. 3，§90，第 410 页）。葛兰西追溯了这种联合体的形式脉络：在内部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向外部发散，从局部开始的东西必然或多或少有向普遍发展的趋势。"如果一个联合体不是由某些特定的道德原则所承载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由于内部的稳定性和均

质性，联合体自身将这些原则赋予其各个部分，对于目标的实现来说，它们是必要的。”（*Gef* 4，H. 6，§79，第 770—771 页）也就是说，葛兰西将联合体的问题植入到了历史上底层和霸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植入到了公民社会和国家（狭义上的）的关系中。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霸权，那么也就没有联合体。这远远超出了马克思——进入到了马克思思想的空白当中。联合被看作政治和道德的潜力，国家不再被物化，而是被看作权力关系的联结点。政治被辩证地“理解为一个归属于道德的过程，就是说被理解为在趋势上归属于一种共同生活的形式的东西，在这种形式中，政治以及道德都被克服（扬弃）了”（同上书，第 771 页）。

6.2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国家社会主义改革和重建的尝试中，人们发现公民社会问题是个关键问题。（参见 *Die Entdeckung der Zivilgesellschaft* 这一章，载 Haug 1989）人们将“工厂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解为经济停滞和腐败的根源。“等级的从属关系的体制必须被遏制”，叶甫盖尼·阿姆巴尔祖诺夫（Jewgenij Amarzumow）解释道（1988，第 115 页），“以便被马克思看作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的基层组织的自治的**联合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现在，即使是列宁晚年将社会主义视为“文明的合作社制度”（LW 33，第 457 页）的观念也被重新发现了。在民主德国向高科技生产方式过渡的改革的视角上，米夏埃尔·布里将自由的个体性和自由的联合看作新出现的“生产力类型”的“两个对立的进步的主体”。（1990，第 65—66 页）由此，他区分并补充了汉斯·瓦格纳（Hans Wagner）1981 年着重强调的命题（第 52 页）：“在生产过程中，这种联合就在‘其自己身边’。”（参见上书，第 55 页）

7. 对于未来民主社会主义形式的思考来说，只要人们没有寻找具体的方案，马克思晚年的联合观念就为一种“市场社会主义”（Marktsozialismus）即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我管理”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1963 年，尤尔根·哈贝马斯将生产者的联合看作向一种对人有益的生产方式过渡的可能的条件，然而，他却令人产生误解地将这种生产方式表述为“向简单再生产的回归”：在特定的财富水平上“可能会出现一种解放的客观可能性，这种解放向个体提供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必要劳动和定向消费的生活的富足”；然而，只要劳动过程始终服从于价值增殖过程，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联合的生产者限制积累的自觉的决定”。（1963，第 198 页）1992 年，雅克·毕

德（Jacques Bidet）尝试在后共产主义局势的条件下以一种世界政府的视角，即对于生活（再）生产的“红—绿”掌控的视角继续思考哈贝马斯，对于他来说，联合是除了**个人之间的**契约性和**核心的**契约性之外的三个基本概念之一。在“现代”的两个同样“必不可少的形式”，即**市场**（个体的“社会契约”领域）和**国家计划**（核心的“社会契约”）的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之内**，联合代表了以人的方式优化这些关系的社会主义的规划。“因为根据这个规划，这种**联合**的机构、这些集体合作的空间能够始终超然于所有契约性而被同等地思考和实现，它们将会成为我们人类的杰作。”

648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Berlin/W-Frankfurt/M 1951; J. Ambarzumow, »Über die Wege zur Vervollkommnung des politischen Systems des Sozialismus«, in: J. Afanasjew (Hg.), *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 zu Perestrojka: Glasnost, Demokratie, 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8, 106-129; F. Bastiat, *Harmonies économiques*, 2. Ausg., Paris 1851; *Exposition de la doctrine saint-simonienne*, Paris 1831 (z. n. É. Balibar, KWM 4, 628f); J. Bidet, »Kapitalismus, Kommunismus, Marxismus, Sozialismus«, in: *Sozialismus* 1/1992, 59-64; M. Brie, *Wer ist Eigentümer im Sozialismus? Rechts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Berlin/DDR 1990; V. Considerant, in: J. Höppner, *Von Babeuf bis Blanqui*, Bd. 2, Leipzig 1975; E. Fuchs u. a., »Assoziation«, in: *Lexikon der Soziologie*;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 1963;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1990); F. Lassalle,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Komité« (Zürich 1863), in: ders., *Reden und Schriften. Neue Gesammt-Ausgabe*, hgg. v. E. Bernstein, Bd. 2, Berlin 1893;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J. P.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Paris 1846 (dt. *Philosophie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 bearb. v. K. Grün, 2 Bde., Darmstadt 1847); M. Theunissen, *Sein und Schein. Die kritische Funktion der Hegelschen Logik*, Frankfurt/M 1978; H. Wagner, »Zur Einheit von methodologischen und theoretischen Fragestellungen bei der Verallgemeiner-

ung praktischer ökonomischer Erfahrungen der Gestaltung der entwickelten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in: *Methodologische Probleme der theoretischen Widerspiegelung ökonomischer Gesetze*, Berlin/DDR 1981; W.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1842), Berlin/DDR 1955.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马剑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ktiengesellschaft, Antagonismus, Arbeiterbeweg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Eigentum, Freiheit, Gemeinwirtschaft, Gemeinschaft, Gemeinwesen, Genossenschaft, Genuß, Gleichheit, Gleichmacherei, Internationale, Klassenkampf, Konkurrenz, Kontraktualismus, Kooperation, Macht, Marktsozialismus, Organisation, Perspektive, Plan, Selbstverwaltung, Solidarität,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Zivilgesellschaft

美学（Ästhetik）

一

一般属性。人类在生产中、在对外界的感受中接触自然现象、接触具体的空间的生活条件，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身的社会关系中，感知形态、塑造形态，对各种关系做出美丑庄谐等多样的评价，以上的人类生命活动和有意义的感性经验，自远古以来，就是理论反思的对象，它们被概括和理论化为美学实践，这种实践兼具反映（Reflex）和创作（Agens）的性质。 649

美学作为理论，作为历史上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分支学科，在18世纪中期由鲍姆加滕（Baumgarten）命名，并已取得与逻辑学、伦理学并立的独立地位——作为**感性认识的理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反思了“美学”，黑格尔的体系则将美学阐发为“美的艺术的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法国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前身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的研究对于美学判断——尤其是他们时代的艺术实践及其与以往文化艺术的关系——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影响。这开启了哲学理论发展的一支脉络，这种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第三国际则将其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其后，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形成了并行的“唯物主义美学”。

1. 作为激进的、批判的社会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的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清晰地反映在理论史上：（1）将“资产阶级”美学不同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本质的方面，批判地加以考察。反过来，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就“这种”马克思主义美学给出了越来越多总体高水平的回应。（2）相对亲近倾向于改变现有权力关系的政治组织，尤其着眼于艺术生产，着眼于组织艺术关系。（3）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集体性”：20 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形成了多种“话语”，各种话语的代表人物限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体制条件，其兴趣范围、关注方向、潜在影响也各不相同。

相比于“资产阶级”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方向则是**批判美学**。批判美学很大程度上以“实践”为导向，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思想流派，其中有环境导致的差异，但主流的研究方向仍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化而产生的相对一致的方法论。这个相对宽泛的思想流派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发展壮大，尽管遇到一些短暂的挫折，但有了越来越多的分支。因此从来不曾存在过作为一个界限分明的整体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美学，尽管许多基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思想家都这么称呼他们的思想成果，他们的批评者在这一点上也沿用他们的说法。此外，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美学屡屡被误认为艺术社会学，原因在于，要与“唯心主义”美学划清界限，重新思考艺术和社会的联系，那么就首先要尝试用唯物主义解释艺术史的一些问题，就会认为美学有社会学（社会理论意义上的，而非经验的社会学）的开端。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也自然会受马克思主义美学文本和文艺政策的影响。卢卡奇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家（v. Beyme 1973）。

20 世纪下半叶集中爆发了多次激烈论辩，聚焦谁代表了和谁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参见对阿多诺、布洛赫、加洛蒂［Garaudy］、费舍［Fischer］的抨击），随之产生了历史上的各分支流派。要理解这些论辩，就要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形成所基于的诸多体制条件和体制层面。

650

2. **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诸体制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美学的论述构成了第一个层面。这些只是从方法论和**政治**的基本问题出发的次要论述，并没有产生“系统的”美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论述都属于此类，政治运动中涌现的爱好艺

术、修养深厚的其他政治领袖，他们关于美学的见解也属于此类，比如普列汉诺夫、梅林、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蔡特金（Zetkin）、葛兰西、马里亚特吉（Mariátegui）、毛泽东等。

第二个层面由**理论家**关于美学的论述构成。这些理论家作为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为依据，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马克思研究颇具独创性，比如卢卡奇、迈尔滕（Märten）、考德威尔（Caudwell）、本雅明、布洛赫、阿多诺、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加洛蒂、马尔库塞、威廉斯（Williams），他们中有的人加入了工人运动组织，有的人与之相对保持距离，有的则对其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因而也遭到严厉的抨击。

第三个层面见于**艺术家**关于美学的论述。这些艺术家趋向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思想，他们将相关的美学实践理论化、纲领化地概括总结为“艺术家美学”，比如阿尔瓦托夫（Arwatow）、梅耶荷德（Meyerhold）、杰亚考夫（Tretjakow）、爱森斯坦（Eisentein）、维尔托夫（Wertow）、马雅可夫斯基（Majakowski）、贝歇尔、彼得·魏斯、安娜·西格斯、克里默（Cremer）、诺诺（Nono）、曼佐尼（Manzoni）、隆巴迪（Lombardi）、亨策（Henze）、克里斯塔·沃尔夫、提奥多拉基斯（Theodorakis）、菲曼（Franz Fühmann）、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卡特勒（Cutler）、郭贝尔（Heiner Goebbels）、伯默尔（Konrad Boehmer），只有布莱希特例外地拒斥体系。

第四个层面是“**学院**”美学代表的相关论述。哲学和各艺术科学领域都涌现了众多杰出人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及“唯物主义”美学产生了多个中心，他们一直活跃到20世纪80年代末。其间在美学史上做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优秀论著和研究成果的学者包括：莫斯科的利夫席茨（Lifschitz）、聂多希文（Nedoshiwin）、奥夫相尼科夫（Owsjannikow）、布罗夫（Burow）、巴拉巴什（Barabasch）、鲍列夫（Borew）、万斯洛夫（Wanslow）、库里科娃（Kulikowa）、季斯（Sis）、斯卡捷尔希科夫（Skaterstschikow）、鲁金（Lukin）、马卡洛夫（Makarow）、阿法斯希耶夫（Afashijew）、卡尔亚金（Karjagin）、诺维科娃（Nowikowa），列宁格勒（彼得堡）的卡冈（Kagan）、法布施坦（Farostein），塔尔图的斯多洛维奇（Stolowitsch），索菲亚的巴甫洛夫（Pawlow），布达佩斯的老年卢卡奇、赫勒（Heller）、佐尔泰（Zoltai）、马洛提（Marothy）、乌法鲁什（Ujfalushi），华沙的莫拉夫斯基（Morawski）、利萨（Lissa），布拉格的沙波克（Sabouk）、音乐美学家西赫拉（Sychra）、伊拉内克（Jiranek）、沃

651

莱克（Volek）、波莱德尼亚克（Poledniak），柏林的科赫（Koch）、贝森布鲁赫（Besenbruch）、海泽（Heise）、普拉赫特（Pracht）、雷德克（Redeker）、屈内（Kühne）、于尔希克（Jürschik）、克伦茨林（Krenzlin）、迈尔（Meyer）、弗兰茨（Franz）、希尔迪纳（Hirdina）、雷施克（Reschke）、罗斯纳（Roesner）、佩特鲁沙特（Petruschat）、梅（May）、特赖贝斯（Trebess），莱比锡的约翰（John）、雷曼（Lehmann），德累斯顿的莱其（Letsch）。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还有：西柏林的汤贝格（Tomberg）、豪格（Haug），西德的梅切尔（Metscher）、赫尔姆斯（Helms）、吕克（Lück）、比尔格（Bürger）、普罗科普（Prokop）、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伯克尔曼（Böckelmann）、克赖迈尔（Kreimeier）、海斯特（Heister）、舒尔特-萨斯（Schulte-Sasse），阿姆斯特丹的伯默尔（Boehmer），维也纳的费舍，美国的西格迈斯特（Siegmeister）、克林根德（Klingender）、杰姆逊（Jameson）、所罗门（Solomon）、赫尔曼德（Hermand）。在各门艺术科学内也形成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民主德国在美学理论和美学史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文艺学有克劳斯（Kraus）、吉尔努斯（Girnus）、魏曼（Weimann）、瑙曼（Naumann）、施伦施台特夫妇（D. u. S. Schlenstedt）、朔贝尔（Schober）、考夫曼（Kaufmann）、绍尔茨（Scholz）、米滕茨威（Mittenzwei）、图恩（Thun）、施台克（Städtke）、特莱格尔（Träger）、哈瑟（Hase），艺术史有菲斯特（Feist）、奥尔布里希（Olbrich）、弗里尔（Flierl）、劳姆（Raum），音乐学有施坦尼茨（Steinitz）、迈尔、克奈普勒（Knepler）、戈尔德施密特（Goldschmidt）、西格蒙德-舒尔策（Siegmund-Schultze）、比姆贝格（Bimberg）、布罗克豪斯（Brockhaus）、利波尔德（Lippold）、薛恩菲尔德（Schönfelder）、埃尔斯纳（Elsner）、克鲁格（Kluge）、迈尔、里纳克（Rienecker）、施奈德（Schneider）、威克（Wicke），戏剧学有舒马赫（Schumacher）、慕茨（Müntz）、费巴赫（Fiebach）。 652

第五个层面是**政治机关**在美学方面的指示和文献，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文化部门、艺术家协会的会议和决议，这无关科学研究，主要是政治家在政治上评价艺术的发展形势，要求学者和艺术家酝酿、解释、论证文艺政策和管理措施，以推动或压制现实艺术生产、艺术遗产的处理、美学教育培养中出现的某些趋势。这里多见的是“归顺”（Bekenntnisse），鲜有艺术家有勇气提出**批评**。

3. 美学研究与美学“话语”的语境、

强度和结论，在五个层面上千差万别。即使比较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和列宁的论述，也明显可见其重点和指向的不同。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艺术格局中，在他们的兴趣视野里，“现代派”还无足轻重。对于列宁来说，党组织和文学的联系有着实践的政治的紧迫性。列宁面对现代派艺术的种种表现形式，曾表示力不从心，没有做出笼统的评判。

后四个层面基于各自的现实政治语境以及理论发展的一般情况，都要回头援引第一个层面。“经典作家”对重要美学遗产的继承也各有偏重，人们最初主要是相对抽象地借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后来才认识到恩格斯晚年关于艺术美学，尤其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书信的理论意义。同样，马克思早期著作，确定了对美学对象的占
653 有本质上和感性相联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才得到美学界普遍充分的发掘。

尤其在第四个层面上，20世纪中期以来，建构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和学术交流自成体系的范式，产生了大量的博士论文、专著、文章、会议论文集等。7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后左转的影响）出现了不少青年一代学者，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成就斐然——重新接受阐释马克思、发掘20世纪初遭到严重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遗产，批判旧权威。

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论批评意见是否能够起到作用，内部总是不断有分歧，有主流意见与其批评意见的对垒。后四个层面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变动不定，有相互团结、紧张、斗争、影响等可能。第二到第四各个层面和第五个层面的关系也各有亲疏远近，“哲学家”、艺术家、“学院派”的美学中的某些议题和概念，有时和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家”的美学相去甚远，相对不受影响，比如，美学史的研究者可以做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事现实主义历史的研究，或者做科学理论上的考察（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文学反映”现象的理论发展）。但是，文艺政策这个层面对艺术家的美学纲领的理论建构，对学院层面的美学作为科学的发展，却有着持久的负面的影响。执政党或相关政党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通过学术政策的杠杆，长期推行单一的准则，阻碍甚或压制某些问题和领域的研究。行政命令划定的古典文化遗产研究导致了狭隘的古典主义，强制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美学和艺术做斗争，使得针对这类美学对象的科学研究成为禁 654
忌，使得党的辩护士的视野狭隘到令后世不可思议的地步。这都不是科学的应

有之义。

最后要强调，政治层面上对已取得成绩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制定计划陷入幻想，即对唯物主义的背叛，这些毛病尤易见于对此不抱批评态度的美学家，但即使批评者也不能免于误判和幻想。关于艺术的本质、前景、艺术在个人修养方面起到的作用，关于美学教育的意义的许多论述中，都有空想的成分。

4. 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在发展中，由于研究兴趣对象和阐释方式的不同，出现了若干主要的重心，发生了数次重心转移。

4.1 马克思（和列宁）开创的、对历史中变化的现实关系不断做出反应的美学，过去和现在都是**以艺术为中心**的，过去和现在都清晰地承续着黑格尔的脉络，本质上仍然是一门“美的艺术的哲学”。黑格尔几乎注意到了美学相关的全部问题，但是将“自然美”排除在美学的对象之外，并且指出，由于美学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自然美的领域“太**不确定**又没有**标准**”（*Ästh*, Bassenge，第 15 页）。因此他关注价值更高的、更接近精神和真理的艺术美。针对艺术领域以外的美学活动，最初也没有理论反思，尽管后来越来越多地提出了这方面的假定，但是对它在理论上的实现则是犹豫不决的。不过，对美学对象的理解毕竟开始渐渐拓展了——从艺术美学到**基础美学**（*Basisästhetik*）。

4.2 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主要表现为**作品美学**（*Werkästhetik*），**艺术家—现实—作品**的关系占据着核心地位。在此，“确定”下来的领域和“标准”的领域体现得更加显著：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和艺术的联系、艺术和思想教育的联系、艺术家介入政治运动（承认、批评、压迫）等视角下。相对较迟地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相对狭窄的作品美学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相互作用下，开放为**接受美学**（*Rezeptonsästhetik*）。接受美学以实证研究所证明的下列经验为基础：对艺术的利用有着极为不同的形式；不同时期和 655
国家的艺术现象在不同人那里会得到积极或消极的评价，甚或根本不被注意；与艺术相关的社会体制，或多或少会影响艺术的接受过程，因为这里起作用的人本身不是艺术家，他们根本上决定着艺术创作如何在这个社会中发挥作用。因而可以看到，每每片面地作为政治议题受到关注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艺术家及其作品——也就是那些资产阶级现代派的作品，他们无非只是更庞大、更多元的总体联系的一个环节；艺术不是按照预期的方式发挥艺术家所企图的、修养人格的作用，其接受过程还要取决于接受者的态度和价值取向，接受者并

不仅仅是艺术家和艺术政治家们启蒙和教育的客体，他们本身就是完全具有本人兴趣和倾向的主体。

马克思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总体联系，视为一个形态特殊的整体之中的诸个环节。人们从方法论上回溯马克思的系统分析，提出了**艺术关系和艺术过程**等范畴，以解释文学写作和阅读之间的复杂过程。**体制**在艺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体制艺术”（Institution Kunst）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也因而成为探讨的话题。

4.3 基于马克思学说的艺术美学基本**以文学为中心**，这一点与其他美学并无二致。文学不仅是资产阶级社会艺术文化的核心，随着识字的普及也走进了大众的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口头的和书面的语言都是鼓动宣传的基本工具，无论是革命理论家，还是想把理论付诸实践的人都可以使用它们。其中亦不乏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形式洗练、通俗易懂的部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也可以借此表达他们的经验。而且，高度发展了的文学形式也不像其他艺术种类、艺术体裁那样高度依赖体制条件，比如音乐中声乐器乐的协奏、歌剧、芭蕾等。戏剧和博物馆也远不及书面文字贴近普罗大众，最重要的是，书面文字不像非语言表达的艺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那么含混多义，因此，作家从来都比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更受共产党干部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思考不只在文学学科，同样，学术界也产生了针对其他艺术门类，如针对视觉艺术、建筑艺术、应用艺术、音乐、戏剧、电影的“美学”。这不仅拓展了艺术美学的对象，也使得原来单纯从文学得出的、“遮蔽”了其他艺术种类的那种针对艺术、现实主义、真理等问题的一般论述，有了更普遍的基础和更强的说服力，而且相对纠正了学院派美学的文学中心主义。但是文学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从其他艺术出发的美学研究成果，很少反映到美学的哲学论述中去。哲学美学的代表，和立足于各艺术科学的美学的代表之间，也一直存在着紧张，前者会被批评为纯粹思辨、疏于实证经验和对历史对人物的细节掌握，而后者会被批评为欠缺哲学修养，容易陷入去意识形态化的、狭隘的经验主义。

4.4 基于马克思学说的艺术美学基本**以现实主义为中心**，其主要兴趣在于现实主义艺术（尤其是文学、美术和雕塑）的历史表现形式，在于概括和系统阐释社会主义导向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各种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勾勒出了不同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概念的轮廓，这一概念将艺术置于其革命性的历史关系、社会关系的语境中进行复

杂的反思和评价，因而有别于19世纪的各色现实主义纲领（Heise 1957）。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首先是对其同时代的现实艺术（文学）的反映，其次，在对此前基于唯心论的艺术史论述的社会历史修正的意义上说，这种现实主义在历史上是建立在对不从属于某一阶级、不具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和艺术”（Mehring，Plechanow，Lukács）的分析之基础上的。这一研究路径在学院
657 艺术美学的发展中得以大大扩展和深化了（Heise，Weimann，Städtke，Naumann，Thun，Müntz，Feist 等）。

苏联从1932年起，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作为“本阶级”艺术的纲领，一方面狭隘地、古典主义地尊奉现实主义艺术以及“人民艺术”这一谱系的传统；另一方面，与现代派，尤其是与20世纪早期、参加过苏联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现代派艺术家全面划清了界线（清除“无产阶级文化派”）。认为社会进步和艺术进步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到更高的社会主义、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到更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机械地将二者联结起来，将陷入危机的、走下坡路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和艺术中的颓废现象二者平行并列来理解，抽象地、形式地在美学上看齐“生活的形式”，以上种种都在学院美学中导致了对社会主义艺术极为古典主义的理解，导致了“本阶级”艺术的概念本质上是前工业时代的、平民主义的。卢卡奇主要从18、19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以及从20世纪的现实主义（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中总结出的准则，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为学院美学所遵循。“本阶级”艺术的概念，在文艺政策的层面上大大简化为教条地搬用“社会主义党性”、“联系群众”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几个抽象的基本标准，导致实际上总体抬高了一批宣教式的、风格保守的、审美水准平庸以至低劣的作品。反过来，社会主义国家中倾向社会主义的艺术家，如果不否认他们和“现代派”的关联，而要坚持在自己的创作中独立取舍“现代派”的最新表现形式，那么他们就不仅会被“批判”为“形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还会遭到谩骂和打压，“艺术法官”审判过的作品也要被逐出官方的艺术编制。作品见逐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政治上进步活跃的现代派艺术家的身上，但他们的创作和影响力，并没有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同行那样受到那种美学和文艺政策的阻碍。在“现实社会主义”（realer Sozialismus）国家，直到20世纪60年代，20世纪的全部现代派艺术都被放逐到官方的艺术活动之外。在理论上、政治上教条地曲解马克思的方法，导致这一时 658

期不少“学院派”美学家，将他们卓越的或平庸的才华，都致力于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机械对立作为历史和理论上的“基础”。不过即使在教条主义盛行的时期，科学地继承“古典遗产”的研究者也相对跳出了现实“斗争”、跳出了历史上学者的局限，批判研究当时资产阶级文化遗产理论尊奉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提出了新问题，并将历史联系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当然，文艺政策及其所派生的极为空洞的美学教条，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糟糕的时期内，也没有覆盖统治艺术实践、艺术关系的全部领域，到60年代以后，就只能“掌握”越来越少的人了。尤其在七八十年代，实践和理论上都不断细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在多方面得以完善提升，也发展出了针对现代派艺术的理论。同一时期，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现代派理论也有相似的发展。

4.5 基于马克思学说的艺术美学**以高雅艺术为中心**。艺术理念的建构，片面地依据“伟大现实主义”（主要是文学以及美术）的杰作。集中关注经典作家，集中关注已经被资产阶级艺术观从艺术史抽取出来置于艺术和美学的核心位置的卓越作品，而且要捍卫经典作家作品，以抵抗“资本主义同艺术的敌对”，抵抗对古典的崇高品格的叛卖，抵抗过去高度发达的传统技法在现代资本主义艺术中的所谓沦亡，并让它在社会主义中重焕新的光彩，这些都使得“高雅艺术”成为关注的重点和价值的标尺，不仅适用于美术史，也适用于当代艺术的准则和评判：否定“颓废”文艺，肯定“本阶级”文艺。艺术的二元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中“高雅”体裁和“低俗”体裁、“高雅趣味”和“低级趣味”的艺术、“艺术”和“媚俗”、“艺术”和“娱乐”制度化的分离都只有十分片面的理解，积极评价高文化修养群体的“高雅艺术”，相反，对低文化修养的群体的“低俗艺术”和流行艺术则一概贬低，由此产生了文艺界的家长制。不同形式的娱乐文艺，尤其是现代新科技媒体所孕育的广泛传播的所谓“大众文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社会“没落”的直接表现，在遵循马克思学说的美学家眼里一文不值，也不值得做严肃的分析和理论探讨。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资产阶级美学家的代表倒没有分歧。在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产品在大众传媒上的影响不断增强，不仅令共产党干部，也让受过“高雅”艺术教育的学院美学家们反应过敏。艺术的概念既是古典主义的，又是平民主义的，艺术要全面服务于工农群众的解放，开始是群众的扫盲，其后是将要塑造全面发展的新人，这两点就必

然要求填平艺术和人民、艺术和生活以及艺术和娱乐之间的“鸿沟”。这种观点在“占领文化高地”这句口号中体现出来，它本质上属于有教养的资产者，而且联系着发展社会主义自己的、新形式的、高品质的通俗文艺的愿景，但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通俗文艺仍要受高雅文艺样板的极大的限定。基于马克思学说的艺术美学，在这一问题上是片面的。

随着愈加认识到艺术关系的复杂性，随着青年中流行的、具有社会批判性和美学活力的新娱乐形式（如摇滚乐）的兴起，尤其随着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将他们关于新娱乐形式的切身经验以及新形式对文化工业的运用，当作建构社会学以至美学理论的对象，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和美国，以及在其后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美学都拓宽了它们所理解的对象。而且，保守者感到，针对青年文化的新形式的攻讦在文艺政策上越来越收效甚微，因而不再像以往那样加以一概贬斥或行政压制，这要归功于思维务实的文艺政策官员、艺术家美学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以及“西方”和“东方”的无数青年学院美学家。

4.6 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研究重点的位移，反映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的拓展和方法论体系的细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家追踪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尤其是认识论、价值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人格理论、一般符号理论最新发展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人尝试总结马克思主义和美学的关系、系统地呈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比如民主德国的科赫、约翰、普拉赫特，苏联的卡冈、奥夫相尼科夫，保加利亚的巴甫洛夫，匈牙利的卢卡奇。

二

艺术美学（*Kunstästhetik*）。1. **一般的艺术概念**。1.1 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当时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论战中，确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关系，关于艺术的论点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只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决定。在社会革命的时代，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Vorw 59*，MEW 13，第9—10页）。马克思阐明的这层关系，指出了思考的方法方向：“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

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同上书，第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为基础，与德意志古典美学，如康德的天才论，彻底决裂。艺术的参照系在**客体**方面不再是以往的自然，而是（亦不同于黑格尔的）社会，因而不是抽象的，而是在方法论上作为社会关系的具体历史的、具有特殊形态的联系来加以把握，这里的社会关系可以细分为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由其派生的、为其决定的意识形态关系。

艺术的**主体方面**也在历史中具体化。个人被置于他与他所来自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社会群体、阶级的联系中加以考察。将个体纳入阶级（尤其是阶级的“觉悟的先锋队”也就是党）的集体主体性中，长期严重低估了个体主体性的意义。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阶级斗争时期却被摒除。取而代之的是将个人的利益和需求，置于阶级的利益和需求之下，也就是组织性和“党纪”。这种主体观对艺术美学产生了长期负面的影响：艺术家个体的主体性在把握艺术特殊性上的重要意义被完全无视，这对现代艺术则带来更加致命的后果——因为现代艺术的参照系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体性。从资产阶级社会萌生发展出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终结人类社会史前史的物质条件，这个论断预示着变更社会意识形式、变更艺术形式的历史前景，宣告着根据历史规律，全社会的科学意识将取代私有财产的枷锁对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扭曲。

661

1.2 艺术就这样被纳入以科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受制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科学话语表达的无产阶级立场，艺术的成果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理论以及党的决议（作为社会科学的应用）来衡量。艺术因而是低一等的认识形式，作为图像思维次于概念思维，以致长期导致这样的结果：艺术家的世界观（如他们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被认为与其艺术表现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早期从马克思出发的艺术美学，以及后来狭隘的教条主义，都存在这种机械主义和决定论的简单化现象，完全无视社会意识的不同形式的特殊性。与之相对，马克思关于基础的经济活动和艺术发展的联系的论述，却没有引发多少关注。

662

1.3 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形式，被阐释为再现、反映物质关系、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马克思主义导向的艺术理论根据最基本的定义，提出了一种与“形式美学”截然不同的“内容美学”。“内容美学”探讨艺术的一般对象，探讨表现对象、艺术塑造的“主

题”，作品形式结构中对象化的“内容”、“论断”，其方法论基于“内容”和“形式”的辩证法。长期以来，人们主要从艺术家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出发，推断其作品内容，如果是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作品就经常被当作他的宣言书，因此产生的结论往往是抽象的、表面的，形式上特殊的联系本具有的特质不是被忽略，就是被严重低估了。这一情况随着学院美学内部的细化，随着不同美学学科发展出了文本分析、接受美学分析等新方法，吸收了符号理论的思考模式，才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所改变。艺术具体的“认识对象”得到更细致的考察，“内容的辩证法”的差异得以揭示。不仅在主体中心的语义学视角下，而且在句法、艺术素材、历史“物质条件”等视角下，都可以观察到形式上特殊的联系内在的差异，由此扭转了长期以来基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家所尊奉的刻板成见——再现是作品作为镜子的本质，是单纯地呈现客体或单纯地表达。针对美学上、艺术上重要的反映和认识，有了

663 越来越合理的理解：从参与艺术的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和他们的合作关系加以考察，因而融入交往和评价的环节，不再仅仅限于生产美学、作品美学，也基于现实中的实践关系、生活关系加以考察。和一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样，人们区分了对象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反映过程、评价过程的决定作用。在区分了“被呈现客体”（“素材”、“主体”）和艺术的一般认识对象（时代特有的、受物质条件所决定的生活问题、历史意义结构）之后，不受任何被表现客体左右的非语言的造型结构（如音乐）的再现，才能得到说明：个体主体性和集体主体性在上述结构中自我“对象化”，阐述这些结构的意义，要注意“物质条件”的具体社会性、多义性和“物质条件”在作品中的构造和作用，因为塑造结构和样式导致产生了与之相符（或相违）的固定范式，这些范式要在历史生成的语义场的框架内，在所有个人的变量中找到不变量加以语义学的检验。这种可以由阐释所检验的再现内容联系着一般认识对象，才能评价它与认识、与“真实”是否匹配。学院美学多年讨论的结果是：艺术表现的“真实”不是一劳永逸地给予作品的性质，不是固定现实和固定内容交叠重合所产生的，而是一个集体的继承过程的社会历史结果。（Schlenstedt 1981，第 167 页）

有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将艺术理解为反映现实的形式，这种观点过去和现在的核心都是对“艺术真实”的探究，这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核心问题”（Heise 1982，第 113 页）。离开这个问题，“现实主义”就无从谈起。艺术家在其作品中以特殊形态感性展现出

一定关系，接受者、阐释者会在完全不同的历史影响条件下将其比照社会现实，
664 比照形成、发展个体主体性的可能性和阻力所组成的张力场，“现实主义”就是对这种关系品质优劣与否的评判。只有在布莱希特谓为“摧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即只有将社会历史基本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可以改变的，反对无视矛盾，反对沉湎于和谐的幻觉，反对粉饰现有形势，才能谈得上真正的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和“真实”。这样，在布莱希特看来也能够克服“形式主义”这个概念的错误，教条主义者将这个概念视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对立面，而这个概念恰恰掩盖了根本的质的区别。

在“艺术真实”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导向的哲学家和美学家之间曾有过多次论辩。相对具体的、深受自然科学影响的真实概念，和相对抽象的、唯理论的哲学认识论的真实概念，都坚持真实是陈述语句才有的性质。但是有哲学家指出，艺术作品，尤其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艺术作品，不包含陈述语句，不能从陈述语句的角度把握，因而怀疑、否认“真实概念”适用于美学；相对地，美学家则强调艺术家长期以来追求“真实”的历史传统，力求对真实概念有更宽泛、更细致的理解。（Franz 1984）这么做的关键在于纠正一种片面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现实的“重现”、再生产。卢卡奇将“现实的诗化再生产”视为“几乎所有伟大作家的目标”。（1954，第 203 页）为了反驳他的基本论点和他对反映论的理解，有人举出了马克思所区分的艺术的双重性质：艺术既是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又是生产的特殊方式。即使表演艺术也不例外：“任何呈现，即使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呈现也必然包含对现实的偏离：虚构现实材料，过度解读、过度强调某些现实符号，夸大可见的发展倾向，构思将现实、可能、愿望相结合，营造一个充满意义的整体（作为经验现实的对立图景）等。”（Schlenstedt 1981，第 171—172 页）

这一语境区分了“真实”的不同变 665
体：“可能真实”、“结构真实”、“意义真实”。为了细致讨论反映中的不同问题，文学美学像一般认识论一样，指出了艺术反映中的双重决定作用：认识者与对象现实的关系，意识形态体系，特别是根本影响着艺术品功用的艺术关系体系。前者涉及艺术再现，后者则是说，反映要在观念上符合文学活动以及体制文学（Institution Literatur）在社会实践、社会关系中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集体的观念中，作为反映的基础和规则起着作用，本身却不会作为对象。后者正是“文学属性的社会决定”，但要注意两者有重合之处。（Schlenstedt，同上）

1.4 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所谓的恩格斯晚年书信中的思考，比很多后续者细致得多。马克思曾偶然地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基础的发展和艺术的发展具有不同时性，注意现代科技发展必然改变艺术形式，注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完全会有令人瞩目的高度发展的精神、哲学和艺术成就。恩格斯曾明确批评将唯物主义思想简化为庸俗社会学，用辩证决定论反对机械决定论——不是此为因，彼为果，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辩证法，恩格斯批评他们的简单化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MEW 37，第 463 页）经济发展对空中高悬的领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种至上权力“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
666 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MEW 37，第 493 页）这里关于哲学的论述，使得不断细化的美学在艺术上有了具体化的论证，取代了庸俗的教条主义。“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同上）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在自 19 世纪末以来的发展中，多次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MEW 37，第 465 页）。然而，各个因素之间的中介、经济因素的中介的根本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而且越是将单个的因素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仔细区分，这个问题也就更加不确定。批评马克思主义导向的美学的人不无道理地指出，对最终决定因素的强调大多数时候都是抽象的断言，即便这一说法在 19 世纪成立，在 20 世纪也行不通了（例如 Dahlhaus 1977，第 218 页）。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就像在“经典作家”的时代一样，经济角度已经近乎完全从美学中剔除出去。再追问这个问题，就等于是承认所谓“陈旧过时”的历史唯物主义了。但考虑到经济联系对艺术关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许还是应该“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MEW 37，第 465 页）。

1.5 美学的艺术概念首先是评价性的还是描述性的，这个问题主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引发过讨论（Hirdina 1986）。从不同的经验出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必须将艺术从唯意志论的预期、从外部

决定中解放出来；捍卫艺术在其美学特性中无可替代的发现；不带偏见地重建艺术的现实，而不是用评价性的艺术概念剔除劣等艺术，剔除艺术和非艺术之间的中间地带，窄化艺术美学的对象。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既在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技和媒介在各类艺术和全体艺术中带来的改变，也在于
667 以极端和越界为基本特征的先锋派的艺术概念有了愈发不同的理解，相关内容请参见《先锋派艺术——未尽的篇章》（*Künstlerische Avantgardeein unabgeschlossenes Kapital*）。这种美学的元理论反思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艺术活动中的许多变化，使得艺术美学里历代相袭的基本概念、五大艺术的传统体系，经历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和讨论，人们试图在某些危机时刻，改换长期有效的术语的含义，或用其他术语取而代之。（Barck 1986；Schulte-Sasse 1988）

三

现状和展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实的国际局势巨变。几乎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瓦解，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形态社会的学说普遍深陷危机。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几乎全面溃败，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得出的纲领性论断也遭到了怀疑，被判为错误的、有历史局限的、不再适用于新时代的。

而且，人类看似势不可挡的沉沦，正毁灭着生存的必要条件，“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统治全球的组织形式，仍无可撼动地延续着统治，更加剧了沉沦的进程。有鉴于此，理论思想界及艺术界对人类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应“历史的终结”的后现代论点，就有“人性的终结”（Bolz 1994）的论点，以及“后历史美学”（Kamper 1988）和“美学的现实繁荣”（Welsch 1992）等论点。有人从激进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观察生命活动各个领域的加倍美学化（和反美学化）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现实完全可以“通过美学把握”（Schmidt 1992），它是一个美学结构，相应地美学在这里是一种“新的主导科学”（Bolz 1994）。这种说法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极端对立。这一派（还有其他派别）尤其在媒介美学的领域中取得了“整个话语的硬通货”（Seel 1993）形式，对它而言，不可能再有新选择，也不再寻求新选择，以替代资本主义，因而，资本 668
主义批判是陈旧过时的（Bolz 1994）。电子媒介中的“数码革命”带来深远的社会影响，可以与历史上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转折相提并论（Vief 1991），它让一些人兴高采烈地宣告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他们却全然抛弃了资本主义批判、生态学的自我省视和对科学的作用的恰

当理解（Youngblood 1991）。

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处在急剧变动的环境中：现实社会的深刻变化给原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教学研究、本国和国际研讨、青年学者培养、出版等活动原先所依赖的机构遭到大量削减。同时人们开始自我批判地探究自身与美学对象、与哲学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先的基本原则、与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的关系，但也遭到了恶化的条件的限制。这些探究也是对美学思想中的反唯物主义路线的不断清算。后者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分化一无所知，将其一概斥为陈旧过时的学问。

随着批判分析和哲学理论急剧转向全球人类危机中基本的生存矛盾，将其作为批判和理论的对象，美学中也出现了强大的动力，推进了紧扣时代又源自马克思学说的资本主义批判，推动了生态学转向，而且给出了各自迥异的诊断，得出了各式各样的策略，如美学的抵抗，或发展新的、共营共享的、另类的生产、建设、生活模式。总之，反抗对生存危机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掩饰、美学掩饰，反抗“末日颓废”（Hickethier 1992），消灭幻想，汇集各不相同的倡议和经验，以规划一种更简朴的、有意义的生活形态。

这样一种反抗美学，由于现实和它的基本立场，一直是介入政治的，对它而言，非艺术领域的美学和艺术美学一样可以不断细化，在现实相关的各个美学门类中，比如劳动美学、政治美学、游戏美学、运动美学、性美学、广告美学、设计（元设计）美学、数码媒体美学、货币美学等，美学不断分工发展，相似的趋势也表现在各类艺术的美学、创新形成的艺术美学新形式（行为艺术等）中。随着新艺术形式中兴趣点的转移，历史遗留下来的美学形式和迄今的美学史书写的价值也有了变化。虽然今天期待一种全面的美学理论的希望比任何时候都要渺茫，但是面对极为多样的对象、切入点、路径、表现方式，这绝不意味着放弃追求兼收并蓄的解释模式、切合实际的改造模式，放弃追求崭新的、有意义的、合乎审美的、有生气的未来。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 1970; B. Arwatow, *Kunst und Produktion*, München 1972; K. H. Barck, »Geschichtlichkeit der Künste. Überlegungen im Blick auf interdisziplinäre Perspektiven«, in: *Weimarer Beiträge*, 1986, H. 4, 631-642; ders., »Materialität der Wahrnehmung-Perspektiven einer anderen Ästhetik«, in: *angebote – Organ für Ästhetik*, Inst. f. Ästhetik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Berlin, Nr. 4, 1992, 108-120; ders., D. Schlenstedt, W. Thierse, *Künstlerische Avantgarde.*

Annäherungen an ein unabgeschlossenes Kapitel, Berlin/DDR 1979; ders., M. Fontius, W. Thierse (Hg.), *Ästhetische Grundbegriffe. Studien zu einem historischen Wörterbuch*, Berlin 1990; G. Baum, *Humor und Satire in der bürgerlichen Ästhetik*, Berlin/DDR 1959; W.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Frankfurt/M 1969; W. Besenbruch, *Zum Problem des Typischen in der Kunst*, Weimar 1956; ders., *Dialektik und Ästhetik*, II. Theoretische Konferenz des Instituts für angewandte Kunst Berlin/DDR, 1958; K. v. Beyme, »Kunstsoziologie«, in: *MiS, Soziologie*, Bd. 2, 1973, 46-85; K. Boehmer, *Das böse Ohr. Texte zur Musik 1961-1991*, hgg. v. B. Söll, Köln 1993; H. Boehncke, »Überlegungen zu einer proletarisch-avantgardistischen Ästhetik«, in: Lüdke (Hg.) 1976, 166-189; N. Bolz, *Das kontrollierte Chaos. Vom Humanismus zur Medienwirklichkeit*, Düsseldorf-Wien 1994; B. Brecht,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 2 Bde., Berlin-Weimar 1966; J. Borew, *Über das Tragische (russ.)*, Moskau 1961; ders., *Über das Komische*, Berlin/DDR 1960; P. Bürger, *Theorie der Avantgarde*, Frankfurt/M 1974; A. I. Burow, *Das ästhetische Wesen der Kunst* (1956), Berlin/DDR 1958; C. Cutler, *File under Popular.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Writings on Music*, London-New York 1991; C. Dahlhaus, *Grundlagen der Musikgeschichte*, Köln 1977; H. Eisler, *Musik und Politik, Bd. I: Schriften 1924-1948, II: 1948-1962; III: Addenda*, Textkritische Ausgabe v. G. Mayer, Leipzig 1972, 1982, 1983; A. Farbstein, *Realismustheorie und Probleme der Musikästhetik*, Berlin/W 1977; M. Franz, *Wahrheit in der Kunst*, Berlin/DDR-Weimar 1984; W. Girnus, *Zukunftslinien –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Berlin/DDR 1974; H. Goldschmidt, *Um die Sache der Musik. Reden und Aufsätze*, Leipzig 1970; ders., »Cantando–sonando. Einige Ansätze zu einer systematischen Musikästhetik«, in: ders., G. Knepler (Hg.) 1981, 125-152; ders., u. G. Knepler, *Musikästhetik in der Diskussion*, Leipzig 1981;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10]1990); ders., »Die Einräumung des Ästhetischen im Gefüge von Arbeitsteilung, Klassengesellschaft, Staat«,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136-150; W. Heise, »Zu einigen Grundfragen der marxistischen Ähstetik«, in: *DZPh*, H. 1, 1957, 50-81; ders., »Hegel über das Komische«, in:

SuF, H. 6,1964; ders., »Zur Grundlegung der Realismustheorie durch Marx und Engels«, in: *WB*, 1976, H. 2,99-120, u. H. 3,123-144; ders., *Realistik und Utopie. Aufsätz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zwischen Lessing und Heine*, Berlin 1982; ders., *Die Wirklichkeit des Möglichen. Dichtung und Ästhetik in Deutschland 1750-1850*, Berlin 1990; H. -W. Heister, »Die Musikbox. Studie zur Ökonomie, Sozialpsychologie und Ästhetik eines musikalischen Massenmediums«, in: ders. u. a., *Segmente der Unterhaltungsindustrie*, Frankfurt/M 1974, 11-65; ders., »Kadenzierte Interjektion. Taugt Hegels Formel als Allgemeinbegriff für Musik?«, in: ders. u. a. 1974, 11-19; ders. u. a. (Hg.), *Zwischen Aufklärung & Kulturindustrie*, Hamburg 1993; H. W. Henze, *Musik und Politik, Schriften und Gespräche 1955-1984*, erw. Neuausgabe, hgg. v. J. Brockmeier, München 1984; K. Hickethier, »Bildschirmwelten, virtuelle Realitäten und individuelle Lebensperspektiven«, in: *angebote 4*,1992, 67-87; H. Hirdina, *Gestalten für die Serie. Design in der DDR 1949-1979*, Dresden 1988; ders., »Funktionalismus, ästhetischer«, in: EE, Bd. 2, 214-219; K. Hirdina, *Pathos der Sachlichkeit. Tendenzen materialistischer Ästhetik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Berlin/DDR 1981; Dies., »Kunstbegriff der Ästhetik«, in: *WB*, 1986, H. 4, 622-630; dies., »Hat materialistische Ästhetik eine Chance?«, in: *angebote* 4, 1992, 135-153; F. Jameson, »Verdinglichung und Utopie in der Massenkultur«, in: P. u. C. Bürger (Hg.), *Zur Dichotomie von hoher und niederer Literatur*, Frankfurt/M 1982,108-141; ders., »Zur Logik der Kultur im Spätkapitalismus«, in: A. Huyssen, K. Scherpe (Hg.), *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1986; R. Jürschik, *Ästhetische Beziehungen*, Berlin/DDR 1976; E. John, *Probleme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Bd. 1: *Kunst und Wirklichkeit*, Halle 1976; M. S. Kagan, *Vorlesungen zu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1971), Berlin/DDR [4]1975; ders., »Künstlerische Tätigkeit und künstlerische Kultur«, in: *WB*, 1972, H. 1; D. Kamper, »Nach der Moderne. Umrisse einer Ästhetik des Posthistoire«, in: *Wege aus der Moderne*, hgg. v. W. Welsch, Weinheim 1988, 163-174; F. D. Klingender, »Marxism and Modern Art«, New York 1945; G. Knepler, »Versuch einer historischen Grundlegung der Musikästhetik«, in: Goldschmidt, Knepler (Hg.) 1981, 62-89; ders., *Geschichte als Weg zum Musikverständnis*, Leipzig 1982; ders., »Ästhetik und Menschwerdung«, In: *WB*, 1988, H. 3,365-400; H. Koch, *Franz Mehrings Beitrag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DDR 1959; ders., *Marxismus und Ästhetik.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Wladimir Iljitsch Lenin*, Berlin/DDR 1961; ders., *Marx, Engels und die Ästhetik*, Berlin/DDR 1983; W. Krauss, *Literaturtheorie,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hgg. v. M. Naumann, Berlin-Weimar 1984; N. Krenzlin, *Das Werk 'rein für sich' – Zur Geschicht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Phänomenologie, Ästhetik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rlin/DDR 1979; J. Kuczynski, W. Heise, *Bild und Begriff. Studien über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erlin-Weimar 1975; L. Kühne, *Das Ästhetische als Faktor der Aneignung und des Eigentums*, Habil. -Schrift, Humboldt-Univ. 1971; ders., »Ornament – 'Poesie der Erinnerung' und Ästhetik kommunistischer Praxis«, in: *WB*,1977, H. 1, 89-125; ders., *Gegenstand und Raum – Über die Historizität des Ästhetischen*, Dresden 1981; ders., *Haus und Landschaft*, Dresden 1985; J. Kulikowa, *Die müde Revolte oder Wie modern ist der Modemismus*, Berlin/DDR 1983; G. K. Lehmann, *Phantasie und künstlerische Arbeit – Betrachtungen zur poetischen Phantasie*, Berlin-Weimar 1966; M. Lifschitz, *Karl Marx und die Ästhetik*, Dresden 1960; ders., *Krise des Häßlichen. Vom Kubismus zur Popart*, Dresden 1972; D. Schlenstedt (Ltg.) u. a., *Literarische Widerspiegelung*, Berlin-Weimar 1981; W. M. Lüdke (Hg.), »*Theorie der Avantgarde«: Antworten auf Peter Bürgers Bestimmung von Kunst und 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6; ders., »Die Apori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Ästhetik – kein Ausweg«, in: Lüdke (Hg.) 1976, 27-71; A. Lunatscharski, *Vom Proletkult zum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Aufsätze zur Kunst der Zeit*, hgg. v. A. Jermakova (1975), Berlin/DDR 1981; G. Lukács, *Essays über den Realismus*, Berlin/DDR 1948; ders.,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Ästhetik*, Berlin/DDR 1954; ders., *Wider den mißverstandenen Realismus*, Hamburg 1958; ders.,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Neuwied 1963; der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Ein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Formen der großen Epik*, Neuwied-Berlin/W 1963; ders., *Kunst und objektive Wahrheit. Essays zur Literaturtheorie und -geschichte*, hgg. v. W. Mittenzwei, Leipzig 1977; L. Märten, *Wesen und Veränderung der Formen der Künste. Resultate historisch-materialistischer Untersuchungen* (1924), Weimar 1949; dies., *Formen für den Alltag. Schriften, Aufsätze, Vorträge*, hgg. v. R. May, Dresden 1982; K. Marx,

F.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hgg. v. M. Lifschitz, Berlin/DDR 1948; M. Owsjannikow (Ltg.) u. a.,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Ästhetik*, Berlin 1976; J. C. Mariátegui, »Der Prozeß der Literatur«, in: ders., *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 (Lima 1928), Fribourg-Berlin/W 1986, 195-305; G. Mayer, *Weltbild und Notenbild. Zur Dialektik des musikalischen Materials*, Leipzig 1978, Frankfurt/M 1978; ders., »Zur Bestimmung der ästhetischen Funktion von Musik«, in: Goldschmidt, Knepler (Hg.) 1981, 30-61; ders., »Neue Medien-Neue Ästhetik?«, in: *angebote* 4, 1992, 48-66; ders., »Visionen 21. Jahrhundert?«, in: *Argument* 207, 36. Jg. 1994, H. 6; Th. Metscher, »Ästhetik als Abbildtheorie«, in *Argument* 77, 23. Jg. 1972, 919-976; ders., »Tendenzen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Ästhetik in der BRD«, in: W. F. Haug (Hg.), *Warenästhetik. Beiträge zur Diskussion, Weiterentwicklung und Vermittlung ihrer Kritik*, Frankfurt/M 1975; ders., *Kunst und sozialer Prozeß, Studien zu einer Theorie der ästhetischen Erkenntnis*, Köln 1977; ders., »Form/Inhalt, ästhetischer«, in: EE, Bd. 2, 1990, 81-88; ders., »Widerspiegelung, ästhetische«, in: EE, Bd. 4, 1990, 844-855; ders., *Pariser Meditation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Befreiung*, Wien 1992; ders., »Modell und Deutung von Welt. Für eine Mimesistheorie der Künste«, in: H. J. Sandkühler (Hg.), *Repräsentation und Modell. Formen der Welterkenntnis*, Bremen 1993; ders., »Kunst als epistemische Form«, in: Heister u. a. (Hg.) 1993, 235-257; W. Mittenzwei, »Über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Sinn und Form*, 1967, H. 1, 235-269; ders. (Hg.), *Dialog und Kontroversemit Georg Lukács. Der Methodenstreit deutscher sozialistischer Schriftsteller*, Leipzig 1975; F. Mierau, *Erfindung und Korrektur. Tretjakows Ästhetik der Operativität*, Berlin 1976; M. Naumann (Ltg.) u. a., *Gesellschaft, Literatur, Lesen. Literaturrezeption in theoretischer Sicht*, Berlin-Weimar 1973; L. Nono, *Texte. Studien zu seiner Musik*, hgg. v. J. Stenzl, Zürich 1975; T. Pawlow, *Aufsätze zur Ästhetik*, hgg. v. E. John, Berlin/DDR 1975; E. Pracht, *Abbild und Methode. Exkurs über den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Halle 1974; ders., »Aktuelle Aufgab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in der DDR«, in: *WB*, 1974, H. 3, 5-39; ders. (Ltg.) u. a., *Ästhetik heute*, Berlin/DDR 1978; ders., »Selbstbefragung einer Wissenschaftsdisziplin«, in: *WB*, 1981, H. 6; ders., W. Neubert (Hg.),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Positionen-Probleme-Perspektiven*,

672

Berlin/DDR 1970; ders., J. Barabasch (Ltg.) u. a., *Ästhetik der Kunst. Fragen der Ästhetik und Poetik*, Berlin/DDR 1982; G. W. Plechanow, *Kunst und Literatur*, Red. u. Kommentar N. F. Beltschikow (1948), Berlin/DDR 1955; H. Redeker, *Geschichte und Gesetze des Ästhetischen*, Berlin/DDR 1959; ders., *Abbildung und Aktion. Versuch über die Dialektik des Realismus*, Halle 1966; ders., *Abbildung und Wertung. Grundprobleme einer Literaturästhetik*, Leipzig 1980; U. Roesner, *Kunstwissenschaften. Orientierungsversuche in einer »Wissenschaftsregion«*, Diss. B., Humboldt-Universität Berlin 1989; D. Schlenstedt, *Wirkungsästhetische Analysen. Poetologie und prosa in der neueren DDR-Literatur*, Berlin/DDR 1979; S. J. Schmidt, »Wissenschaft als ästhetisches Konstrukt«, Referat auf dem Kongreß *Die Aktualität des Ästhetischen,* Hannover, 2. -5.9.1992; J. Schulte-Sasse, »Von der schriftlichen zur elektronischen Kultur. Über neu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Mediengeschichte und Kulturgeschichte«, in: H. U. Gumbrecht, K. L. Pfeiffer (Hg.), *Materialität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M 1988; R. Schober, *Abbild-Sinnbild-Wertung. Aufsätze zur Theorie und Praxis literarischer Kommunikation*, Berlin/DDR-Weimar 1982; M. Seel, »Vor dem Schein kommt das Erscheinen. Bemerkung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Medien«, in: *Merkur*, 47. Jg., H. 9 u. 10, 1993, 770-783; A. Seghers, *Über Kunstwerk und wirklichkeit*, 3. Bde., Berlin/DDR 1970/1971, 1979; W. Senff, *Materialismus und Ästhetik. Kritisches zu zwei theoretischen Konferenzen des Instituts für angewandte Kunst*, Berlin/DDR 1959; M. Solomon, *Marxism and Art. Essay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Detroit 1979; K. Städtke, *Ästhetisches Denken in Rußland. Kultursiluation und Literaturkritik*, Berlin-Weimar 1978; L. Stolowitsch, *Der ästhetische Wert* (1972), Berlin/DDR 1975; ders., »Über das Kriterium des ästhetischen Werts«, in: *Kunst und Literatur*, 1973, H. 5, 459-471; G. Thomson, *Marxism and Poetry*, Bombay 1953; F. Tomberg, *Mimesis der Praxis und abstrakte Kunst. Ein Versuch über die Mimesistheorie*, Neuwied 1968; ders., *Politische Ästhetik*, Darmstadt-Neuwied 1973; K. Träger, *Studien zur Realismus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Leipzig 1972; B. Vief, »Digitales Geld«, in: *Digitaler Schein. Ästhetik der elektronischen Medien*, hgg. v. F. Rötzer, Frankfurt/M 1991, 117-146; R. Weimann, *Literaturgeschichte und Mythologie*, Berlin/DDR-Weimar 1971;

ders., *Shakespeare und die Tradition des Volkstheaters*, Berlin/DDR 1975; ders. (Hg.), *Realismus in der Renaissance*, Berlin-Weimar 1977; W. Welsch, *Ästhetisches Denken*, Stuttgart 1990; G. Youngblood, »Metadesign. Die neue Allianz und die Avantgarde«, in: *Digitaler Schein*, aaO., 305-321.

君特·迈尔（Günter Mayer）撰

曹旸 译，王师 校

参见：

Abbild, Arbeitererkultur, Arbeitererkulturbewegung,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ästhetische Theorie, Autonomie der Kunst, Basisästhetik, Bedürfnisse, Brecht-Linie,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in der Musik, Erbe, Erhaben, Film, Genuß, Gestalt, Gestus, Häßlich, Ideal (ästhetisches), ideologische Formen, Ironie, Kitsch, Komisches, Kunst, Kunstverhältnisse, Kultur, Kulturindustrie, Kunstpolitik, Kunstsoziologie, Massenkultur, Materialästhetik, Medien, Medienästhetik, Moderne, Modernismus, Musik, Parteilichkeit, politische Ästhetik, Popularkunst, Postmoderne, Produktästhetik, Proletkult, Psychologie, Realismus, Satire, Sinn, Sinnlichkeit,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Tragisches, Unterhaltung, Wahrheit, Warenästhetik, Wertkategorien, Widerspiegelung, Widerstandsästhetik

美学抽象化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1. 这一概念产生于1970年出现在商品美学的批判理论框架中："美学的抽象把事物的感性与意义从事物本身中剥离出来，并使其得以被分开来支配。"（Haug 1970，第24页）其出发点首先是《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于价值抽象和交换抽象的分析（参见MEW 23，第51页），这一分析的发展引发一个还未引起注意也未解决的问题：一个商品对于销售者是确定的，也就是它所展现出的价值必须被实现。而购买者用于交换商品的货币考虑的是其使用价值。然而这一实现过程是必需的，它"只有在使用中实现自身"（同上书，第50页），一般来说（除了"试用样品"的情况之外）这只有在购买之后才能够开始。购买和使用在大部分时间和空间里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导致一个循环：购买行为的前提，亦即真实的使用价值，恰恰就是购买行为的结果。"商品自身必须在它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之前……作为价值被实现。另一方面在它自身能够作为价

值实现之前，它必须表现为使用价值。”（同上书，第 100 页）

马克思没有去解决这一难题，而是将这一问题推向更进一步的矛盾之中，这一矛盾在于，每一个商品所有者仅仅为了自己而交易，同时仅仅为他人而生
674 产。“然而这一过程并不能同时顾及仅仅是个体的，同时也是普遍的社会的商品所有者。”“但同一个过程，对一切商品所有者而言，不可能同时既是个体化的又是普遍社会化的。”（同上书，第 101 页）马克思解决第二个难题的方法是：将“一般等价商品”这一概念视作货币的起源性预备阶段。一般等价商品在形式上始终具有直接的可交换性，并体现为私人产品的社会性。

然而第一个难题该如何解决呢？“日常语言给出了答案……：购买者买下了特定的商品，是因为这一商品许诺了他所期望的使用价值。”（Haug 1980，第 44 页）购买（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就是**使用价值**的许诺。这就显示出两个极端：主观的积极性和客观的表现与料（Erscheinungsdaten），后者驱使着了前者，并且其阐释也可能受到主体间的额外影响（例如，通过“推销谈话”）。在交换关系呈现敌对状态的这一程度上，所有物界限起着过滤器的作用，如同一扇陈列窗那样，透过它只能看到特定的信息和感觉与料（Sinnesdaten）（外观）。直接触发购买行为的不是“存在”而是“表现”，这个经验迟早必将使得“从其实在性中抽象出来的使用价值之表现”被确定为劳动的对象与目标。（参见上书，第 48 页及以下）“更广义的美学意味着：感性的表现与使用价值的意义从事物中被剥离出来。对于这种美学的掌握和被分离的生产将成为货币目的之工具。”（Haug 1970，第 14 页）

作为使用价值许诺的承担者，美学的抽象化以许多同销售相关的技术为基础：例如，商品物体的外观塑造、包装表现以及广告图像的布景等。因此，商品的美学抽象化成了产品美学特殊性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商品生产者的财产权得以提高。这就建立了一种“美学的使用价值垄断”，即周期性“美学创新”的前景。（参见上书，第 18—19 页；1971，第 26 页及以下；1980，第 114 页及以下）

2. 伴随着这种美学抽象化产生的，是通过交换而完成的对于使用价值作为自身虚假对立面的抽象，美学抽象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实现功能的承担者，且它不受这种生产的限制。我们对表象进行掌控，并借此来给异己的感性留下印象，并以这种方式掌控（“操纵”）异己的意志，这种掌控关系在动植物的世界中有多种类似的对应

物，并且对于消除人类的对抗性有着策略上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感性的技术统治**中（参见 Haug 1970，第 21 页及以下；1971，第 55 页及以下），意识形态的诸权力和交换关系进行着相互竞争。

675

在某种意义上，一切被特别区分出来的美学都得益于某种美学抽象化。资产阶级的体制化使得“美学”成了特定的学科和被社会所承认的实践形式，于是美学抽象化就被赋予某种假想的投影屏幕的含义。被如此建立起来的“自主艺术”能够形成一个领域，并使那在经济领域中被撕裂和物化了的社会在“美好的假象”中获得和解。“这种美学是社会性的方式，也可以说是社会性的美学抽象化。”（Haug 1993，第 148 页）

瓦尔特·本雅明分析了第二个层次的美学抽象化，它建立在艺术作品的“技术化再生产”的基础之上；本雅明还考察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表演，亦即群众如何促成了那种为其带来“权利”的“表达”（GS VII，第 382 页）。——鲍德里亚（Baudrillard）借助**模拟**（*Simulation*）这个概念，将那伴随着视听媒介的再生产技术的数字化视作美学抽象化的高科技阶段，他认为在此阶段，抽象成了绝对之物，而现实则会被消解。在《三个铜子的歌剧》（*Dreigroschenprozeß*）中，布莱希特做了类似的表述：“你将不再通过味道认识水果。”但这的确也是真实的经验，后现代主义对现实性的消解，与其说是对美学抽象化之形式和功能的分析，毋宁视作一种基于媒介效应而做出的尝试，它试图通过语义抽象来超越真正的美学抽象。

参考文献：

J. Baudrillard,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Paris 1981; W.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GS VII; W. F. Haug, »Zur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1970), in: ders., *Warenästhetik, Sexualität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72; ders.,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10]1990); ders., *Warenästhetik und kapitalistische Massenkultur (I): »Werbung« und »Konsum«.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Berlin/W 1980; ders., »Die Einräumung des Ästhetischen im Gefüge von Arbeitsteilung, Klassenherrschaft und Staat«,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136-150.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

参见：

Abstraktion,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Basis-Ästhetik, Gestalt, Imaginäres, Manipulation, Medienästhetik,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Schein, Schönheit, Warenästhetik,Wesen/Erscheinung

676 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

1. 马克思并没有针对美学理论进行专门的理论建构；但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评论、大纲、争论和批判性的注释等。从这些内容中整理出的论述片段，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中对这些片段的利用都可以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和谐而自身融贯的美学观念体系”（Kagan 1975，第 40 页）。同这种对马克思理解的“经典”思路相对立的，则是这样一种美学思想，这种思想以各种方式考察 20 世纪的社会变革以及伴随而来的美学感知上的变化。这些思想是多种多样的：从艺术家美学、构成主义纲领、1917 年之后俄国先锋派的形式主义，到阿多诺的《美学理论》（*Äthetischer Theorie*）。在 1920 到 1930 年期间，布洛赫、本雅明、布莱希特、艾斯勒（Eisler）等人就已经在讨论借助法西斯主义美学实现一种美学纲领，这一纲领试图让先锋派艺术表达方式中的那种独特的现代性（对传统艺术概念的破除，电影、摄影和工业现代化所带来的感知方式的变化等）与一种介入政治与社会的文艺政策联系起来。布洛赫和艾斯勒就曾这样问道：“社会最进步的意识如今是否已和最进步的美学结合起来了，还是相反？”（1937，第 400 页）

2. 在马克思那里，关于“美学”的问题论域可以划分为三个表述层面，各层面之间界限并不固定，它们分别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为背景的作为唯心主义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日常用语中使用的美学概念，以及作为感性知觉的美学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代的美学理论主要源自黑格尔《美学》中的观点，例如，恩格斯就将这种美学思想的形态看作一种无法通过效仿再现的规范，马克思则为这甚少使用的“美学”概念及其派生词带来了一种反讽的贬义：“审查机构……是一个施行外科手术的唯美主义者：我身上的东西只要它不喜欢的，它就认为是多余的，它认为不顺眼的地方，就都除去”（MEW 1，第 59 页）；“神秘的思辨和思辨的美学都还需要第三个 677
因素，需要**具体的、思辨的统一**，即需要把房屋和房屋主集诸一身的**主客体**”（*HF*，MEW 2，第 177 页）。“多么勇敢地在美学的大海中游泳！”（*DI*，MEW 3，第 475 页）

形容词“审美的”则带有更多日常语言上的含义（文艺的，容光焕发的，美丽的），但它同样有着微妙的、带着论辩式反讽色彩的贬义潜台词：“**科苏特**（*Kossutb*）当时同样在美国为革命求乞，**哥特弗利德**（*Gottfried*）在同他公开会面时，颇为文雅地（ästhetisch，即‘审

美地'。——译者）说：'赠送的自由，即使来自执政者您的纯洁之手，对我来说也是一块干硬的面包，我将用**我的羞愧的眼泪**来湿润它。'"（MEW 14，第669页；参见 *HF*，MEW 2，第171页）"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TM*，MEW 26.1，第363页）并且：金和银的"天然审美特性"，"那种使它们成为华丽、漂亮、辉煌的材料的特性，也使它们成了过剩的直接形式，成为满足超出日常之需求的手段，也成为这种需求的赤裸裸的自然必要性"（*Urtext*，第899页）。这种特性体现的不是价值，而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MEW 13，第16页）。此外，这个形容词还带有一种乌托邦式的、不真实的理想化含义——例如"大大小小的鲁滨孙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Einl 57*，MEW 13，第615页）。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纲挈领地概述了有别于更狭义美学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超越了以艺术为中心的体系美学，历史地确定了对于一种感知理论概要的描述——一方面是工业革命背景下自然科学的实践，另一方面则参照费尔巴哈的感觉论，以及以傅立叶为代表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于感性的社会具体化理论。（参见 *Ms 44*，MEW 40，第539页及以下）在这里艺术既不是顶峰，也不是审美感知的**唯一**形式，相反，艺术的具体表现构成了审美感知的普遍形成史的一个部分。感性的形成史必须被视作一部"关于迄今全部世界历史的著述"。马克思的评论指的是将艺术美学整合到一种支配性的美学理论之中，美学不仅是"五种感觉的"历史，而且还是"所谓的精神的"、"实践的感知的"历史。（同上书，第541—542页）

3. 1933年，在卢那察尔斯基指导下， 678
利夫席茨（M. Lifschitz）和席勒在莫斯科编辑出版了带有导论的文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文艺》（*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这部文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研究的一部经典文献，它首次关注了马克思遗留手稿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1936年之后，该文集的译本陆续在法、奥、意、美以及印度等国出版，并从1945年起推广到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此文集1948年德文版的出版动机，克劳斯（W. Krauss）曾评论道："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学说，因为这种学说并不存在，并且根本不可能存在。只有那种善意的、但却非常严重误解，才会惊叹于在这多方面的

兴趣中体现出的多才多艺的天赋。而折中主义的教育观念则只能领会服从于自身的野蛮思想。”（1949）该文集旨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学问题论述加以通俗化和整理利用，从而建立一种与日丹诺夫（A. Shdanow）（参见 1934，1951）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此外，这部经典文集事实上导致了“古典主义者”的工具化，它奠定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苏维埃艺术中的新古典主义与教条的现实主义概念，并由此构成了对抗和排斥西欧（尤其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俄国）现代主义和国际先锋派艺术的依据。（参见 Lunatscharski 1965，第 15 页）因此，工人阶级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艺术新鲜血液”，应当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关系中的艺术的普遍衰落进行“否定”，一方面则要“重新年轻化”并走向更高基础上的“再生产”，从而为“古典传统进行辩护”，正如利夫席茨（1933，第 143、145—146、15 页）在其《卡尔·马克思和美学》（*Karl Marx und die Ähetik*）一文中针对苏维埃文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那样。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散见于文集各处的美学论述进行编辑整理，构成了 1945 年后东欧和前民主德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研究的核心：这些论述有的涉及文化与艺术进程社会历史局限性，例如艺术所处的特定时代、其被接受的状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等，有的是关于特定文学艺术作品的、带有个人偏好和倾向的评论（参见 Kliem 1967，第 1、19、26 页），还有的则涉及同时代文学的趋势（所谓的西金根辩论、现实主义概念等）。卢卡奇在其《美学》（*Ästhetik*）（1963）一书中对此做了如下评注：“自从米哈伊尔·利夫席茨（Michail Lifschitz）关于马克思的美学观做出了富有见解的研究，自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美学问题的分散论述做了仔细收集和系统化处理，人们对这种思想进程的整体性和融贯性便不再有怀疑了。”（W 11，第 17 页） 679

4. 卢卡奇、布洛赫或阿多诺的哲学美学突出了批判基调：在其中，艺术被视作与异化的社会化之总体性相对立的（所有）他者的进入现象的过程（In-Erscheinung-Treten）。

4.1 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内部的和谐封闭姿态形成对比的是，布洛赫将现实性的过程开放的特征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艺术视作“在向着目的驱动的前表象的呈现方式中发生的，对于其对象之趋势与潜性的解释”（*Pinzip Hoffnung*，GA 5，第 947 页）。因此在他那里，现实主义始终是“符合潮流的、乌托邦的现实主义”，亦即“内在的预见”（同上书，第 950 页）：“每一种好的艺术无疑

都是在其质料的那种塑造性的美中完成的，艺术传达的是寓于这些美好表象中的事物、人物与冲突。”（同上）19 世纪的现实主义被卢卡奇提升为一种与各流派先锋艺术相对抗的唯一标准，但无论是该段时期在艺术审美上的成就，还是其中展示的关于这个与 18、19 世纪大不相同的世界的全新经验，都无法为这种做法提供依据。在卢卡奇看来，作为一种诗意的原则，“现实主义”描绘和反映着那潜藏在表象之下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只有在美学的反映中……才会产生一种工具论，它能够使那潜藏着的、由人们自身创造出来的生活之意义上升为感觉的明晰性。”（W 12，第 831 页）阿多诺的作为否定辩证法的美学理论则是卢卡奇美学的对立类型，在其中，一种总体化的诉求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艺术将它那尚不存在的乌托邦掩盖起来，因此乌托邦在艺术的一切传述中都始终是一种回忆，就如同对灾难性的历史做出想象的补偿那样，这些回忆构成了对抗现实的可能性。”（*Ästh. Theorie*，GS 7，第 204 页）

4.2 本雅明那个结合了技术与美学的感知理论延续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统，本雅明借助同时代技术领域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技术变革，战争乃至社会性群众运动等方面的经验，扩充和发展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另一种美学的纲领。他的灵晕（Aura）概念就是建立在感知历史和感知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人类集体的整体生存方式也改变着其感性知觉的方式。人类感性知觉的组织方式——亦即感知得以形成的媒介——不仅仅是自然的，而且是以历史为条件的……。而如果把同时代的感知媒介的变化视作灵晕的没落，我们就能对这种变化的社会条件加以阐述了。”（GS I.2，第 478 页）

布莱希特的美学也有着类似的视角，他在其唯物主义美学理论的开篇就说道——这是为了“科学时代的孩子们”，他们的“欣赏方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但与本雅明不同，布莱希特的“愉悦”教育纲领既是诊断性的，同时也是预测性的。该理论源于 1945 年之后解放资本主义社会的愿望。在布莱希特那里，感觉成了“实践者”，成了一种可以感知事物的“科学的”探测活动，它以基于实验的自然科学的方式，经验并揭示着社会关系的全体。“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艺术将从新的生产力中创造娱乐，它会使我们的娱乐就能够得到极大的改善，一旦无所阻碍，它自身就能成为带来最大的愉悦。”（GW 16，第 667—668、670—671 页）

20 世纪 70 年代初，W. F. 豪格在《商品美学批判》（*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理论路向，它延续了

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思路，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论域扩展到对日常现象的社会学精确分析和反思。在此书中，豪格讨论了腐化堕落的“感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的“命运”（1971，第 7 页）。在之后的著作中，他主要从事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批判相关的美学领域的研究。（参见 1993，第 136 页及以下）

4.3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艺术”的范式为导向的（参见 Kühne 1985，第 147 页及以下）。艺术的任务在于：将全体—他者作为异化世界之总体性的对立面加以把握（参见 Holz 1990，第 1 页，第 53 页及以下）。无论是卢卡奇及其后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参见 Heise 1976 和 1991），还是阿多诺和布洛赫那种受到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的美学理论，这些论述尽管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具有以黑格尔艺术哲学为样板建构乌托邦的倾向。因此在晚期的马尔库塞看来，“美”又重新成了“自由观念的感性显现”（1972，第 137 页）。这一思想或多或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以及陷入了历史的死胡同的整个“被管理”的世界。由于这种意识带有马克思对于全面社会解放的诉求，并且它强调诸如“主体”或“全体”这类概念，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意味着一种思想形式的终结。（参见 Lyotard 1979）上述这些 20 世纪美学理论之间是否可以相互比较，或者它们应当如何相互比较 —— 例如，美学是否保留哲学维度的问题、美学的历史性问题、社会与艺术史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于解放以及替代性思想的诉求问题等 —— 直至 20 世纪末，这些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

681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1970), GS 7; W.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1936), in: GS I.2; E. Bloch u. H. Eisler, »Avantgarde-Kunst und Volksfront« (1937), in: H. Eisler, GW III.1, 397-403; B. Brecht, »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 (1948), in: GA 16;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10]1990); ders., »Die Einräumung des Ästhetischen im Gefüge von Arbeitsteilung, Klassenherrschaft und Staat«,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136-150; W. Heise, »Zur Grundlegung der Realismustheorie durch Marx und Engels«, Teil I u. II, in: *WB*, 1976, H. 2, 99-120, u. H.3, 123-144; ders., *Die Wirklichkeit des Möglichen*, Berlin/W 1991; H. H. Holz, »Ästhetik«, in: EE 1,1990, 53-70; M. Kagan, *Vorlesung zu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Berlin / DDR 1971; M. Kliem (Hg.), *K. Marx und Fr. Engels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 2 Bde., Berlin/DDR 1967; W. Krauss, »Das Goethebild von Marx und Engels« (1949), Typoskript im Werner-Krauss-Nachlaß, o. S.; L. Kühne, *Gegenstand und Raum. Über die Historizität des Ästhetischen*, Dresden 1981; ders., *Haus und Landschaft*, Dresden 1985; M. Lifschitz, *Karl Marx und die Ästhetik* (1933), Dresden 1967; G. Lukács,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1962), W 11/12; A. Lunatscharski, »Vom Erbe der Klassiker« (1930), in: ders., *Das Erbe*, Dresden 1965, 5-16; F. Lyotard, *Philosophie und Malerei im Zeitalter ihres Experimentierens* (1979), Berlin/W 1986; H. Marcuse, *K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e* (1972), in: *Schriften* 9, 11-128; T. Metscher, *Pariser Meditation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Befreiung*, Wien 1992; E. Pracht (Hg.), *Ästhetik der Kunst*, Berlin/W 1987; A. Shdanow, »Rede auf dem 1. Unionskongreß der Sowjetschriftsteller« (1934), in: ders., *Über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erlin/W 1951;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3 Bde., Frankfurt/M 1975ff.

约格·海宁格（Jörg Heininger）撰

王师 译，李以所 校

参见：Abbild, Ästhetik, Antizipation,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utonomie der Kunst, Basisästhetik, dialektisches Theater, Denkform, Dummheit in der Musik, episches Theater, ideologische Form, Film, Formalismus, Gestus, Imaginäres, Kunst, Literatur, Literaturtheorie, Materialästhetik, Musik, Phantasie, politische Ästhetik, Postmodernismus, Realismus, Schein,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Utopie, Warenästhetik, Widerstandsästhetik

682

无神论（Atheismus）

在发展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理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在中学时代有对自然神的想象（MEW 40，第 591 页及以下），19 岁时作为一名大学生他试图把“新的神”安置在尘世的中心（同上书，第 8—9 页）。撰写博士论文时，他又受到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提出了自我意识的无神论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接受之后）进行自我理解的结果，他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自白，它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同上书，第 262 页）

放在论文的序言里。除了对启蒙时期无神论的思想遗产加以接受之外，马克思还把宗教批判纳入到他对黑格尔的全面批判之中（*KHS*，*KHR*，*Ms 44*），并在对基督教的普鲁士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颠倒的现实”进行批判时，穿插有宗教批判的内容。宗教批判是人追求全面的、社会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马克思瞄准宗教的“精神”中“缺乏精神的状况”，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对宗教的认识，即宗教是异化中的反抗，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MEW 1，第 378 页及以下）因为他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反抗是虚幻的、是像鸦片一样让人颓废的，所以他把无神论看作是革命者的精神武装的重要部分。他认为对宗教进行的理论批判至少在德国已经完成了，因此他后来做出的评判都是针对宗教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比如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MEW 4，第 3 页及以下）。

但是马克思反对那些试图把世界观上的无神论宣传当作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的做法，他在 1842 年对恩格斯等人（MEW 27，第 412 页），1871 年对巴枯宁都表达过这样的看法（MEW 18，第 19 页；参见致波尔特［Bolte］和李卜克内西的信）。只专注于否认神的无神论无法摆脱与神学的瓜葛。而真正的目标应该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MEW 40，第 546 页）。只盯着宗教现象的无神论很容易忽略世俗形式的偶像崇拜。宗教批判是所有批判的前提，不是因为它把无神论的世界观当作教条来看待，而是说它的方法也可以用来针对世俗的偶像崇拜。到处都存在宗教，也就是说“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Judenfrage*，MEW 1，第 353 页）。比如在“无神论的”民主国家中，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同上）比如在拜物主义中，在对铜臭和暴力的信仰中，还有在“日常生活的宗教”（MEW 25，第 838 页）中，商品、金钱和资本成了统治一切的兴妖作怪的中间人。通常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世界观没有能力进行这种批判，因为它自己难免犯空想臆测的毛病。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重要注释中马克思就把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与“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相比较，这种方法不是“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而是“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MEW 23，第 392—393 页注释 89）这句话中还包含的意思是，狭义的宗教批判还并没有完成。需要对每一种宗教、它们产生和发挥影响的“现实生活关系”进行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683

恩格斯和考茨基对基督教做过个

别的历史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吕特格瑙（Lütgenau）和库诺（Cunow）曾尝试把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的宗教史研究和民俗学的材料重新加以利用来进行宗教批判，但是这一支的影响十分有限。而另外一支，即恩格斯倡导的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行表述和传播的做法却取得了更大的效果。恩格斯出生在笃信基督教的伍珀塔尔（Wuppertal）。他早年很虔诚，后来通过很大努力才超越了他的宗教信仰。恩格斯认为宗教的原因主要是无知。因此他想从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出发，借助现代科学，给工人运动提供一个坚实的无神论的世界观，来取代宗教和唯心主义，并对此投入了巨大的热情。（*AD*，*LF*）“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能把各种神或者上帝相继的从各个地方撵走。”（*AD*，MEW 20，第 582 页）

684 世界观的这一支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得以延续。对于列宁来说，宗教批判已经由早几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完成了。他自然而然地继承了别林斯基（Belinski）、赫尔岑（Herzen），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Tschernyschewski）的无神论，这几位思想家都受到费尔巴哈以及后来的唯物主义者的影响。列宁追随普列汉诺夫的做法，借鉴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为针对宗教和唯心主义展开毫不妥协的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黑格尔的研究使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做了一些修正，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对辩证法有了更深的认识，这使他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对国家和革命的分析更加富有成果，但是他并没有由此而认识到，宗教在阶级斗争中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发挥作用，并不一定天然就是由统治阶级牢牢垄断的。

曾经上过神学院的斯大林几乎对宗教和无神论没有发表过任何官方的言论。列宁格勒的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是相关研究的中心。无神论宣传、镇压，以及用极权手段强加于人的替代性崇拜是当时世界观方面的主旋律。在偶像去世之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54 年决定，通过更加深入地研究宗教以及加强宣传来推动“科学无神论”。1959 到 1964 年间开展了一场坚决的、官方的反宗教运动。科学无神论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单独的分支，并且（从 1964 年起）被列为必修课程。目标是从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方面证明宗教是虚幻的、非科学的和反革命的，并建立一个积极的、无神论的世界观。但如果在完成第一个任务时只允许人们在宗教之中发现虚幻、迷信和反革命，那第二部分的任务也将很难取得成功。

高尔基（Gorki）和卢那察尔斯基就已经提出“造神”（Götterbauertum）的思想，主张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继承宗教，

这一方面是呼应左派中宗教的复兴（别尔嘉耶夫［Berdjajew］，布尔加科夫［Bulgakow］），另一方面是注意到宗教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但直到 1968 年，布洛赫才将宗教传统中一直被忽视的维度挖掘出来，并进行了彻底的探讨。他从无神论—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上帝的拟人化”，即统治者上帝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他也发现了宗教之中已经有将上帝的秘密进行拟人化的做法，比如在摩西、众使徒以及耶稣那里。他们希望救世主的出现，希望在尘世中能出现上帝的王国，这些都应该继承，但不要
685 继承其中仰望的姿态。捷克人加德夫斯基（Gardavski）（1968）强调，在基督教传统中存在着人的主体性和超验性，存在着能超越死亡的爱，以及游戏中的创造等价值。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应该接受这些价值，来抵制庸俗无神论所造成的真空中的替代性偶像崇拜。加德夫斯基并不把上帝看作是所有未满足的愿望的投射，而是人类所有可能性的总和。罗格·加劳迪在他与基督教的对话中（1969）也获得了相似的认识。布拉格哲学家米兰·马科维奇（Milan Machovec）在他的“对话无神论”中也从人道主义无神论的角度吸收了宗教对于生命的意义的追问。他呼吁并推动全球范围内与各种宗教的对话，以建立一种人道主义的无神论，以此来抵制消费社会中无意义的大众无神论以及僵化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东德作家弗朗茨·菲曼（Franz Fühmann）也进行了相似的工作。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挖掘了印度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还开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问宗教唯心主义的传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中暗含着对宗教和无神论的新导向；出现了比如对圣经的文化价值、对于俄罗斯皈依基督教的进步意义（1988 年千年庆典）的公开讨论，以及关于无神论能否在道德方面完全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的讨论。

在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在无神论和宗教方面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宗教是否具有鸦片的功能以及革命的潜力。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曾经多次表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与基督徒结成战略的联盟。在他与贝托（Frei Betto）的谈话以及其他表述他的宗教观点的出版物中，他都不断地阐明这个思想。瑞士马克思主义者康拉德·法尔纳（Konrad Farner）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现在重新又在个别地方的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情况：信教者也可以成为共产主义者。解放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和佩雷斯-艾斯克拉林（A. Perez-Esclarin）在马克思这个宗教和资本的批判者身上发现了一个同盟者，他可以和他们一起与宗教和世俗中的关于死亡的怪力乱神进

行斗争。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从先知和耶稣的角度进行批判，他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在马克思眼中是虚幻的。

目前迄待解决的问题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不言自明的无神论是否像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以及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声称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并且未来仍然是 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者正在用实践反驳这一点。赫尔穆特·戈尔维策尔（Helmut Gollwitzer）、浩达（Houtard）等人提出了以下的论点：无神论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从历史的角度讲是合理的，从逻辑上看却不是他的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批判性的信教者从长远的角度看并没有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信仰之间有什么矛盾，更多的是志同道合。他们十分关注从宗教批判的角度来揭露宗教的意识形态作用（参见先知），他们也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并不把“神”当作阐释的基础（方法上的无神论）。但他们与世界观上的无神论的区别在于，面对整个的、或多或少得到了科学解释的现实，他们提出的关于神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这个现实的意义的问题。针对从马克思开始到加德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无神论，他们指出，在信仰实践中神和人并不像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视为前提的那样，是竞争的关系，而是同盟者。神不必是把普罗米修斯捆绑起来的朱庇特（Jupiter），也不必是吞噬人牲的莫洛赫（Moloch）。然而，神作为反对所有奴役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到底是一个基于现实的信仰表白，还是一个虚幻，这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者和神的信仰者之间尚未回答的问题。除了这一点之外，这些信教者都可以归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左派。由于他们的信仰并没有造成他们与无神论者分道扬镳，另一方面这又绝对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就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传统所希望的那样，所以只要左派中还存在这样的人，关于神的问题就仍然会留在议事日程上。

686

参考文献：

F. Betto, *Nachtgespräche mit Fidel*, Freiburg 1986; E. Bloch, *Atheismus im Christentum. Zur Religion des Exodus und des Reichs*, GA 14, Frankfurt/M 1968; G. Brakelmann u. K. Peters, *Karl Marx über Religion und Emanzipation*, 2 Bde., Gütersloh 1975; H. Cunow, *Ursprung der Religion und des Gottesglaubens*, Berlin/W 1913; E. Dussel, *Philosophie der Befreiung*, Berlin/W 1988; K. Farner, *Theologie des Kommunismus?*, Frankfurt/M 1969; G. P. Frantsov, Nauchnyy ateizm, Moskau 1972; P. Frostin, *Materialismus Ideologie*

Religion. Die materialistische Religionskritik bei Karl Marx, München 1978; F. Fühmann, *Erfahrungen und Widersprüche*, Rostock 1975; R. Garaudy, *Marxismus im 20. Jahrhundert*, Reinbek 1969; V. Gardavsky, *Gott ist nicht ganz tot. Betrachtungen eines Marxisten über Bibel, Religion und Atheismus*, München 1968; G. Girardi,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 warum?*, Stuttgart 1979; H. Gollwitzer, *Die marxistische Religionskritik und der christliche Glaube*, München 1965; ders., *Christentum, Demokratie, Sozialismus* Argument Studienhefte 39 u. 40, Berlin 1980; J. L. Hromádka, *An der Schwelle des Dialogs*, Berlin/DDR 1964; K. Kautsky, *Vorläufer des neueren Sozialismus*, 2 Bde., Berlin ^{2}1909; N. Lash, *A Matter of Hope. A Theologian's Reflection o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1981; A. Th. v. Leeuwen, *Critique of Heaven*, London 1972; ders., *Critique of Earth*, London 1974; H. Lübbe, H.-M. Sass, *Atheismus in der Diskussion. Kontroversen um Ludwig Feuerbach*, München 1975; F. Lütgenau, *Natürliche und soziale Religion*, Stuttgart 1894; A. V. Lunačarskij, *Religiya i sotzialisma*, Moskau 1908; M. Machovec, *Marxisten und Christen – Brüder oder Gegner?*, Gütersloh 1978; A. Pérez-Esclarín, *Atheism and Liberation*, New York 1978; J. Rehmann, B. Kahl (Hg.), *Muß ein Christ Sozialist sein? Nachdenken über Helmut Gollwitzer*, Hamburg 1994; M. I. Schachnowitsch, *Lenin und die Fragen des Atheismus*, Berlin/DDR 1966; B. Wielenga, *Lenins Weg zur Revolution. Eine Konfrontation mit Sergej Bulgakov und Petr Struve im Interesse einer theologischen Besinnung*, München 1971; ders., *Introduction to Marxism*, Bangalore 1984.

巴斯蒂安·威尔兰格
（Bastiaan Wielenga）撰
潘璐 译

687

参见：

Aufhebung, Aufklärung, Bakunismus,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ogmatismus, Entfremdung, Ethik,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Glaube, Humanismus,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llusion, Konsumgesellschaft, Kritik, Liebe, materialistische Bibellektüre, Moloch, Reaktion,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Spekulation, Subjektivität,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Tod

结构规划（Aufbaupläne）

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结构规划”这个术语，但是当他关注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布局**和**分篇**、经济学范畴论述的**次序**、《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的**计划**时，他实际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通常的情况是，每当他结束了研究阶段，便开始考虑合适的陈述方式。——结构规划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所有编者来说都意义重大，因为它提供了文本编排的线索。如果对比马克思的结构规划和他亲自出版的经济学著作就会发现，只有对照无数的笔记、摘录和批注，才能读懂出版了的作品。

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回溯了“经济学体系”的历史，他借此指出，成熟的经济科学的出发点
688 是“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抽象的一般的关系”。而“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就旨在揭示“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复合概念（MEGA II. 1.1，第 36 页）。——从这一最初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全面的“分篇”规划：首先是所有生产方式都具有的“（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其次分析“（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的范畴”，即“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再次“（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以及“‘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而后是“（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入和输出。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同上书，第 43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延续了这个“分篇”规划，由此，他使读者能够简要概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并借此使这一结构更为有效地在思维中再生产出一种复合的现实：“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MEGA II. 2，第 99 页；MEW 13，第 7 页）

这个六册的计划是长年经济学研究的结果。马克思在 1843 年至 1845 年的《巴黎笔记》（参见 MEGA IV. 2）中对斯密、李嘉图、萨伊和约翰·穆勒（J. Mill）的交换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利润理论、工资理论和地租理论很感兴趣，《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次尝试概括私有财产的经济法则。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马克思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并吸收了李斯特、配第、重商主义者、斯密和李嘉图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经济学思想，集中关注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货币体系、信用体系历史的

文献。（参见 *Manchester Hefte*，MEGA IV. 4）1845 年初，马克思同德国列斯克出版社（Leske）签订合同，约定尽快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k und Nationalökonomie*）（参见 MEW 27，第 447 页；Kliem 1970，第 171 页）24 册的《1850—1853 年伦敦笔记》（*Londoner Heften 1850-1853*）中关于银行史、经济危机的历史、地租理论、人口理论和科技发展的摘录和笔记标志着一个崭新的经济学研究阶段。

689 1851 年 4 月，马克思终于着手“修正经济学”。（MEW 27，第 228 页）1851 年 11 月，马克思向恩格斯抱怨，一家法兰克福的出版社在出版计划中偏偏要求首先付印“经济学史”：“这样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MEW 27，第 370 页）马克思显然一直希望，首先从他对“经济学批判”的修正开始，继而阐述“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Elend*，MEW 4，第 126 页）恩格斯认为马克思设想的问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拿出一部巨著在公众面前登台，最好是丝毫不伤人的东西，如历史。”（MEW 27，第 374 页）早在 1844 年（此处有误，该信写于 1845 年 1 月。——译者），他就已经敦促马克思：“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同上书，第 5、16 页）被催促的马克思一再请求耐心一些，他必须首先把该写的东西准备就绪，以便在写作过程中直接取用。

1859 年提出的六册规划如果完成，则它应当破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并尝试展现社会的历史趋势。这个计划按环形构建，它的每一环（范畴）彼此相扣：“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MEGA II. 1，第 151 页；MEW 42，第 154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将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同上书，第 42 页；第 41 页），他尝试将“资本一般”和“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这相互竞争的两者区分开来（MEGA II. 1. 2，第 359 页；MEW 42，第 362 页），此外他还讨论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生产价格以及商业资本等主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是继《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1939—1941 年第一次出版时加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后多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本书亦然。——译者）之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二稿，它大大完善了后者所提出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这三个基础性环节划分。（参见 MEGA II. 3. 5，第 1861—1862 页）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

一般本质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中，也就是说，存在于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具体形式中，这些形式是在结构一起源的意义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1863年1月的草稿中，除了论述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外，马克思还着重谈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概念、工业利润、地租和利息等概念。（参见Boccara 1982，第27—34页；Otto，Bisschoff等1984；Müller 1983，第15页；Jahn 1991，第51—54页）

690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五部分的标题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意在历史地“回顾”在“I）资本生产过程”这一篇中提出的剩余价值范畴。马克思想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证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完全就是从经验向理论的逐步过渡（参见Jahn，Marxhausen 1983，第44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三稿是《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它从《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册写起，这一稿只保留了第六章，即“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MEGA II. 4. 1，第24—130页）。这里概括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的内容，同时过渡到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的最后是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1857年至1865年间写下的第三册的不同草稿，各自有不同的标题：《第三篇：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MEGA II. 1. 2，第619页；MEW 42，第637页），《第三章：资本与利润》（MEGA II. 3. 5，第1598页），以及《总过程的各种形式》，这些反映了对资本分析的最初规划的改变。（参见Bischoff，Otto 1993，第7—13页）

2. 作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编者，恩格斯是独一无二的《资本论》解读者。他对马克思分析的解读明显将规律性和历史发展联系了起来，范畴的次序不再如马克思那里“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MEGA II. 1. 1，第42页；MEW 42，第41页），而是像恩格斯1859年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书评所写的那样，“逻辑的研究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MEW 13，第475页）。片面地突出资本的历史发展趋势，而不考虑为这些趋势奠基的规律性，这样历史化地解读《资本论》，最终会忽视书中的某些关系，比如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以及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于是就会认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展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缩减成了资

691

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终结”（MEW 20，第 255 页），这就成了第二国际的广为流传的《资本论》解读的理论基础。第二国际认为，越来越尖锐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终将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做好准备，这是铁一般的必然性。（参见 Paul 1978，第 51 页及以下）

考茨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编者，将这部作品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恩格斯曾计划出版这个部分以替代《资本论》第四卷”（1903，XVIII）。考茨基把《剩余价值理论》看作附录，而不是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参见 Marxhausen 1990，第 98 页）考茨基并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的结构规划，因而试图将《剩余价值理论》辑为编年完备的学说史，这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随着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的框架下按计划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献，格罗斯曼（Grossmann）开始探讨“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初结构规划”（1929，第 9 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的六册写作计划的意义，由此在马克思研究中提出了“结构规划”的概念。格罗斯曼认为，马克思在 1859 年至 1863 年间按照最初的规划写作，直到他构想再生产范式的时候才意识到，“**按照**资本在其循环中所行使的**功能**来划分经验材料”才是正确的，而不是“按照每个局部领域的经验材料：资本、地租、信用、对外贸易、雇佣关系等”。（同上书，第 17 页）

3. 贝伦斯认为，1859 年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分为六册，遵循的是“之前经济学的传统划分”，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时就放弃了这种划分。贝伦斯认为，这首先是“在方法论上批判斯密和李嘉图，导致了《资本论》变更结构规划”（1952，第 44 页）。施特恩堡（Sternberg）认为，六册规划中的相当一部分在《资本论》各卷中“虽然偶尔被讨论，却没有得到系统分析”，因此他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未完成的作品”（Torso）。（1955，第 338 页）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提醒注意那种“基于对马克思著作结构的误解的、浅薄的反对意见”（1968a，第 16 页），比如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的著名指责，他声称马克思忘记了将可 692
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同价格结合起来，这是因为他不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抽象层面。马克思前后的结构规划各有不同，彼此对立，一般认为他的“最初规划”随着研究的推进已经被放弃。（参见 1968b，第 45 页）

科冈（Kogan）考察了《资本论》各卷如何在完善剩余价值理论的同时，研

究了土地所有制（比如 MEW 25，第 269、627—628 页）、雇佣劳动（比如 MEW 23，第 565 页）、国家（比如 MEW 25，第 117、143、663 页）、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比如 MEW 24，第 113—114、254、466 页；MEW 25，第 120 页）。根据这些散见各处的大量评论，他重构了马克思按 1859 年的结构规划准备的材料，马克思原想据此完成关于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等的独立“学说”，但最终没有实现。扬（Jahn）、伽朗德（Galander）等人（1986）补充道，从全部遗著可以知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必然有 1859 年最初的结构规划中所说的那么广博。然而这种重构工作很少回顾马克思理论工作中的一个要点，即马克思总是有意识地将理论分析看作非封闭的，因为考虑到具体的经济总体，对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的现实的概念重构，总是处在变动不居当中。（参见 Boccara 1982，第 9 页）

参考文献：

F. Behrens, *Zur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52; J. Bischoff, A. Otto, *Ausbeutung. Selbstverrätselung. Regulation. Der 3. Band des 'Kapital'*, Hamburg 1993; P. Boccara, *Studien über 'Das Kapital'*, Frankfurt/M 1982; H. Grossmann, »Die Änderung des ursprünglichen Aufbauplans des Marxschen 'Kapital' und ihre Ursachen« (1929), in: ders., *Aufsätze zur Krisentheorie*, Frankfurt/M 1971, 9-42; W. Jahn, U. Galander u. a., »Zur Entwicklung der Struktur des geplannten ökonomischen Hauptwerkes von Karl Marx«, in: Ma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Hg.), *Arbeitsblätter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11. Jg., 1986, Heft 20, 6-127; W. Jahn, Th. Marxhausen, »Die Stellung der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n de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Kapitals'«, in: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urg (Hg.), *Der zweite Entwurf des 'Kapitals'. Analysen Aspekte Argumente*, Berlin 1983, 42-77; K. Kautsky, *Karl Marx' Oekonomische Lehren*, 8. Aufl., Stuttgart 1903; M. Kliem, (Hg.), *Karl Marx, Dokumente seines Lebens 1818 bis 1883*, Leipzig 1970; A. M. Kogan, *V tvorčeskoj laboratorii Karla Marka. Plan ekonomičeskih issledovanij 1857-1859 gg. i 'Kapital'* (Im schöpferischen Labor von Karl Marx. Der Plan der ökonomischen Forschungen in den Jahren 1857-1859 und das 'Kapital'), Moskau 1983; Th. Marxhausen, »Kautskys Herausgabe der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n: *Karl Kautsky. Referate und Beiträge der*

halleschen Konferenz anlässlich des 50. Todestages, hgg. v. W. Kowalski, Halle 1990, 92-101; O. Otto, J. Bischoff u. a.,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Zweite Entwurf des 'Kapitals' (MEGA)*, Hamburg 1984; H.-H. Paul, *Marx, Engels und die Imperialismus-Theorie der II.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78; R. Rosdolsky, »Einige Bemerk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Marxschen 'Kapital'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heutige Marxforschung«, in: W. Euchner, A. Schmidt (Hg.),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M-Wien 1968a, 9-21; ders.,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Der Rohentwurf des Kapital 1857-1858. Bd. I*, Frankfurt/M 1968b; F. Sternberg, *Marx und die Gegenwart. Entwicklungstendenzen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Köln 1955.

君特·维林 撰

曹旸 译，侯振武 校，张文红 审

参见：

Anfa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okratie, Erbe, Erscheinungsform,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Geschichte, Grundrente, Handelskapital, Kapitalistenklasse, Kapital, Kapitallektüre, Kategorie,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lassenherrschaft, Klassen, Kreislauf, Kris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Lohnarbeiter Lohnarbeit, Marxismus, MEGA, Mehrwert, Methode, Produktion, Rekonstruktion, Reproduktionsschemata, Seminarmarxismus, Spätschriften, Vermittlung

扬弃（Aufhebung）

在传统哲学中，“‘扬弃’（*ἀναιρεῖν*, *tollere*）这一术语——作为‘设定’（setzen）的对立概念——仅仅‘主要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被言说着（HWPh 1，第 619 页），而黑格尔在他的思辨的辩证法观点框架内、同时也许是在同费希特争辩的过程中，将这一术语改造成表示否定和肯定之统一（它是一个更高整体的一部分）的概念。黑格尔将术语在从某一发展阶段向下一破坏与保留的更高阶段的过渡中使用上的多义性（Mehrdeutigkeit）总结为扬弃。马克思在他对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框架中，给这一概念赋予了经验的—实践的内涵。自由派黑格尔主义抛弃了扬弃概念，而它却因马克思所赋予的

意义而被“普遍地意识到”（HWPh 1，第 620 页）。——弗里德里希·富尔达（Friedrich Fulda）以一种德国中心论的态度说道：“在‘较少以思辨的方式言说的’语言中，它只能勉强翻译如下：‘sublate，absorb，superseding’（英语），‘enlèvement，suppression，dépassement’（法语），‘soppressione，superamento’（意大利语）”（同上）。

1. 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解释道：“**扬弃**和**被扬弃的东西**……是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是到处决然反复出现的基本规定。”它的语义矛盾使得这一表达 694
特别合适：“**扬弃**在语言中有双重意义，它既意味着保存、**保持**，又意味着停止、**终结**。”（*Logik* I，Kap. 1.3，Anm.）他继续说道，这两个对立的规定可以“引用为字典中的这个字的两种**意义**”，但是，他更愿意将这种反义（Gegensinn）理解为这个词本身就具有的“思辨意义”，因为这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用**环节**（*Moment*）概念来把握被扬弃的东西的地位：“某物只在与对立物统一时才被扬弃：它在较细密的规定中，作为被反思的东西，可以适当地称为环节。”被扬弃的东西变成它的反义的环节，因而它是被否定了，但却并未被毁灭，黑格尔认为这就是扬弃了它的直接性，“因为要保持某物，就要去掉它的可以受外来影响的实有”。

这一意义的雏形可以在费希特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中找到，在这里，“对立物的统一”是凭借扬弃概念建构起来的。为了不走向毁灭，扬弃必须限于对扬弃者（Aufzuhebenden）的规定，扬弃者因此被理解为“可分的”：“通过设定一个非 A，A 被扬弃了的同时又没有被扬弃。因此它只是被部分地扬弃了”（I，第 111 页）。局部的 A 是**限制**（*Beschränkung*）（I，第 108 页）。进而，**改变**（*Veränderung*）“存在于**本质上的对立与真实的扬弃的同一中**”（I，第 182 页）。

黑格尔批判费希特，认为他关于对立与扬弃之间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为了被理解为原初统一的，它们必须是全然对立的。由此，扬弃就变成了系统中既是方法上的又是实质上的基本概念。”（Fulda，HWPh 1，第 620 页）在黑格尔的《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Differenz des Fichte'schen and Schelling'schen Systems*）一文中，绝对（Absolute）概念作为一种关于“对立物的统一”的观念显露出来，这一概念超出了费希特。绝对一直是前提。“只有通过理性把意识从限制那里解脱出来，理性才产生绝对；扬弃限制是受作为前提的无限性的制约的。”（Meiner-Ausgabe，第 16 页）相应地，黑格尔将反思视为“有限”变成无限的“能力”：反思和“同

它对立的无限在理性之中被综合……。反思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就此而言，它的最高法则就是它的毁灭。这法则是理性提供给它的，由此，它成为理性”（第 19 页）。反思将它的扬弃作为“自
695 我破坏”来执行（同上）。

在《百科全书》（*Enzyklopädia*）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从一开始就将辩证法与反思划分开来。反思超出了孤立的规定性，因为它将这种规定性放置在关系当中，但又保留了这种规定性本身，而“**辩证的**环节是这些有限规定固有的自我扬弃，是它们向它们的对立面的转化”（*Enz*，§81）。在这里，尽管之前的统一也是前提，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唯心主义的、思辨的）哲学是由这种统一构成的，但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这一公式是不够的，因为这里“没有明确说出有限已经**被扬弃了**”。（§95，附释。原文误写为 §96。——译者）“像碱与酸化合而失去其特性那样”，人们确实应当添入代表着无限者的酸，“否定性的东西同样在他物中会变得失去活力”。“但是，真正的无限则在其性状中不单纯像这种片面的酸，而是能保持其自身；否定的否定并不是一种中和；无限是肯定的东西，只有有限才是被扬弃的东西。”（同上）

对于黑格尔来说，整体是真实的；所有片面的东西必须以分类的形式被填充成环节。片面性的标志是矛盾，这是它与自身相对抗引起的，并促使具有虚假自主性的片面性被克服。“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到著名的**扬弃**（*sublation*）原则：随着辩证的展开，任何片面的洞见都不会丢失。”（DMT，第 122 页）罗伊·巴斯卡（Roy Bhaskar）将扬弃的双重效力规定为黑格尔哲学中辩证进展的效力：这里明确要求的，是那种被包含着的但却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匮乏、一种不充分得到了弥补。由于考虑到了体系化的关系，每一发展就都能被理解为先前尚不发达的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这些阶段的必然真理或完成。（同上）

在批判地继承德拉·沃尔佩的基础上，卢西奥·柯莱蒂（Lucio Colletti）看到了与黑格尔相对立的路向，这一路向在康德那里，更确切地说是在他的《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Versuch, den Begriff negatiren Größen in die Weltweisheit einzuführen*）（1763）的第一章中。在这里，康德区分了逻辑的对立（这是一种矛盾）和真实的对立（这没有矛盾）。康德用“真实的对抗”这一概念来把握对一物具有反作用的力量：如同一个星球上离心力和吸引力的作用那样，当它们处于平衡时，星球就处于“静止”状态。尽管没有矛盾，“但这仍然是真实的对抗”。在这

696 里，康德引入了扬弃概念："因为一种趋势单独作用时所规定的状态，会被另一种趋势扬弃"（*Vorkritische Schriften*，II，Berlin 1968，第 171 页）。科莱蒂评论道，"因而，在真实的对抗中也有否定、扬弃，但这与矛盾是完全不同的。真实的对立不像矛盾那样否定自身，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对他者的否定……否定仅仅存在于如下这点当中，即它们在它们的作用中相互扬弃。简言之，在……这种对立关系中，这两极是肯定性的，尽管一极被标示为另一极的否定性的对立面"（1977，第 9 页）。康德区分了"否定"的数学表达和理论表达：单独的减号不会起到减少作用，－4－5＝－9是一种增长。"但是，+9－5＝4 就意味着减少，因为，通过这种方式，这种对立的符号表明一者在另一者中扬弃了与自身相等的部分。"（*Vorkritische Schriften*，第 173 页）在理论上，负值是被看作肯定性的。康德继续说道，如"资金是否定性的债务，而债务则是否定性的资金，因而，我们可以根据数学家的方法，将消失称为否定性的产生，将下降称为否定性的上升，将后退称为否定性的前进"，为的是防止将"对立关系"错认为矛盾的关系。（第 175 页）科莱蒂强调，在恩格斯、普列汉诺夫（Plechanow）、列宁、卢卡奇和毛泽东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中，康德关于真实对抗和矛盾的区分并未起到作用，尽管斯大林去世后在民主德国出现了从柯尔施经德拉·沃尔佩到逻辑学之争的对立路向。不过，科莱蒂自己（不同于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结构中看到了一种辩证的对立概念的应用案例（第 28 页及以下）。需要研究的是，这对于马克思的操作性的辩证扬弃概念意味着什么。

2. 只要操作步骤及其前提没有搞清楚，如下这些问题就会引发学界的争论：马克思的扬弃概念的哪些内容要归功于黑格尔的扬弃概念，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具体的差异。不过，首先需要考察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有关批判。

2.1 马克思对黑格尔扬弃概念的批判。在批判黑格尔国家形而上学的颠倒（即由上而下来思考，并将产生者设定为被产生者）时，马克思讽刺黑格尔对柏拉图主义的应用："现实的理念之所以下降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有限的领域'，只是为了在扬弃它们的同时享有自己的无限性并重新产生这种无限性。"（*KHS*，MEGA I. 2，第 9 页）在他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Kritik der Hegelschen Dialektik und Philosophie überhaupt*）（1844）的草稿中，马克思抨击了"**扬弃**"在黑格尔那里所起的"独特的作用"，即"把否定和保存即肯 697

定结合起来”。因而，例如，在《法哲学原理》（*Rphil*）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在现实中……［它们］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Ms 44*，MEGA I. 2，第299页；MEW 40，第581—582页）。由于意识知道它们是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因此对黑格尔来说，“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而马克思在扬弃的这种闭合中看到的，是“思辨的一切幻想”以及“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同上书，第298—299页；第580—581页）呈现在纯粹理论当中。这种批判主义“只是虚有其表的”，因为它的“扬弃”停留在“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上，“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同上书，第300页；第582页）因此，黑格尔扬弃的，并不是现实的宗教，而是宗教的教义学，也就是作为知识之对象的宗教。唯心主义的闭合凭借抽象的无内容性，将扬弃囊括进“思维形式”的领域当中：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自我意识，所以被异化的东西＝“无非就是**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就是异化的**抽象的**……表现，即**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同上书，第302页；第584—585页）。

根据费尔巴哈，“现实的批判主义”是这样规定的，即它不再将宗教仅仅“扬弃”为绝对精神的环节：“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也就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属于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同上书，第299页；第581页）所以，马克思认为，“**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是“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在这里，无神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同上书，第301页；第583页） 698

在这里，与黑格尔相比，扬弃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真实状况；它以如下方式被置于世界之中，即唯心主义的扬弃

回溯地呈现为意识形态的环节。由此，马克思也认为，黑格尔只是外在地适应普鲁士国家和教会的统治权力。“因此，现在不用再谈关于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的适应了，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同上书，第299页；第581页）该原则在于，“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表述。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就是在自身中。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同上）。简言之，黑格尔凭借他所说的扬弃，将“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变成了“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同上）

2.2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扬弃概念。**首先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之后是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可以“在劳动时”观察到扬弃概念。在没有对之前的黑格尔批判做任何削减的同时，马克思使用了通过对辩证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转换而获得的“元语言”（Metasprache），为的是能够将经济学批判的素材从其凝结状态中溶解出来，并能够从变化和功能性关系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运动出发来理解这种素材。这种元语言起着如酶一般的作用，一旦同化成功，它就变得可有可无。在《资本论》的成熟表述中，它消失得只剩下很少的残余。

扬弃首先代表着一种认识—问题：在经验现象中，“**媒介**”大多“**被扬弃了，完全被消除了**”，这一观点见于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第1章所写的手稿中。（参见 MEGA II. 4. 1，第143页）这一语境涉及的资本，按照它的“隐德来希”（Entelechie）来说，是“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作为**被实现了的**”资本。（同上书，第142页）“**在这种转化的形式上，最初的具体形式，从而它的特殊差别消失了。**这样，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容不同的具体形式无影无踪地消失了。”（同上书，第143页）没有“中间环节”（同上），价值增殖就不会与前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形式区分开。相应地，马克思试图在微观层面将在过程中起作用的各主要因素之间的博弈及其联系彻底表达出来。马克思在结构起源的意义上感兴趣的是，**以回溯的方式**将初始条件扬弃进资本本身所设定的条件当中，**以前瞻的方式**设定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条件。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追踪的是，以形式上将手工劳动归摄于资本之下为基础，一种特定的、因新生产力而出现的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这就会出现完全的

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MEGA II. 4. 1，第 129 页）

关于扬弃的这种双重维度（即事实维度和潜在维度）的观点，使另一种现实性显露出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怎样同时生产出使这种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同上）。扬弃在这里发挥了三方面作用：第一，否定的（“生产出使这种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这种关系作为……**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被消除”）；第二，潜在肯定的（“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第三，在规定的否定的意义上的（“扬弃……对立形式的生产方式”）。

2.21 在资本中被扬弃了的历史前提。那种对于资本具有建构性的扬弃（它将在其更高的形式中被“扬弃”），“建立在**剥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建立在消灭**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同上书，第 134 页）。那种具有建构性的扬弃被表达为一种**互补性分离的体系**：一方面，“劳动同它的对象的存在要素的分离”（*Gr*，MEGA II. 1. 1，第 275 页；MEW 42，第 281 页）；另一方面，“这些生产资料的”通过资本家而“**人格化的**”、“自我坚持的、具有自己头脑的存在，它们与劳动的分离”（*Res*，MEGA II.4.1，第 80—81 页）。资本家自己劳动的情况属于过去的历史，“绝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这作为资本“形成的前提之一，在资本存在时被扬弃了”。（*Gr*，MEGA II. 1. 2，第 368 页；MEW 42，第 372 页）这就导向了“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同上书，第 400 页）。

2.22 生产过程中的建构性分离在自身框架内的扬弃：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分析了这种分离是如何“在实际上**被扬弃**的”（MEGA II. 4. 1，第 80—81 页），更准确地是在它自身的界限内被扬弃的。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对象的存在环节——工具和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

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这种分离的扬弃……资本并不支付报酬。这种扬弃也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当前的劳动**，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环节。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Gr*，MEGA II. 1. 1，第 275 页；MEW 42，第 281 页）。扬弃的思想表达了起死回生的宗教景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同上）

2.23 生产性消费。在这一点上，生产工具“被消费的仅仅是同劳动无关的、处于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这就意味着，“**被劳动消费的**（被扬弃的）恰恰是它们的**易逝性**。真正被消费的只是工资”。（同上书，第 277 页；第 283 页）因此，生产性消费表现为“消费本身的消费；
701 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Setzen*）”（同上书，第 220 页；第 222 页）。

2.24 被扬弃为资本职能的货币。货币是资本的一个前提，这一前提通过资本而被“扬弃”：因而，资本的流通形式（Zirkulationsform）就表现为“货币借以扬弃自身”的形式：“货币作为只是消融在流通（Circulation）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的一些要素。”（同上书，第 178 页）从资本的立场上看，货币作为“独立的东西”是一种障碍。因此，资本力求把货币仅仅变成“一种流通环节的代表”，也就是要“扬弃货币的传统的直接现实性，把它变成一种只由资本**设定的**同时又由资本扬弃的纯**观念的**东西”，因而“赋予它一种和资本相适应的最适当的形式”。（MEGA II. 1. 2，第 553 页；MEW 42，第 572 页）

2.25 作为工资的货币。在这里，货币“只是作为铸币来用，即只是”一种关系的“自行扬弃的、转瞬即逝的媒介”，在这一关系中，工人通过出让他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来换取生活资料。（MEGA II. 1. 1，第 207 页；MEW 42，第 209—210 页）

2.26 流通和信用货币。流通不可能是“创造价值的积极环节，因为它的扬弃——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它的否定等于资本生产率的最高肯定”（MEGA II. 1. 2，第 515 页；MEW 42，第 530 页）。价值增殖过程的完备的连续性将会假定的是，循环时间“被扬弃了”；另一方面，流通

时间又是必要的。马克思首先是将这一个问题当作亟待扬弃的矛盾来处理：只有通过信用来“扬弃和克服这种矛盾”，因为信用允许将中断（Unterbrechung）连接上。（同上书，第446页；第453页）

2.27 通过扬弃中断而实现的中断普遍化。如“货币扬弃物物交换的限制，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普遍化……，下面我们将看到，**信用**扬弃资本价值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具有最普遍的形式，把生产过剩时期和生产不足时期确立为两个时期”（同上书，第510页；第524页）；被个别地扬弃了的紊乱作为普遍危机再次出现。

2.28 为了一切人的自动化劳动和潜在时间。在这里，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同上书，第585页；第605页）。由于它直接地（＝社会地）是**被扬弃的、个别的**劳动，它就趋向于变成**普遍劳动**。“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malgré lui），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但是，它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同上书，第584—585页；第604页）“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MEGA II. 1. 1，第308页；MEW 42，第315页）马克思将这种分歧理解为发展着的矛盾，它坚决要求的是那种能够使生产方式整个地超出其限制的扬弃。

2.29 资本的“自我扬弃”。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MEGA II. 1. 2，第441页；MEW 42，第449页）。“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是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同上书，第369页；第373页）

3.“黑格尔的扬弃术语在意味着取消的同时，还带有如下含义，即以一种内容的真实形式来重建该内容”（Marcuse 1962，第258页），对这一术语的使用是否不必被理解为向历史哲学思想的倒退？这一问题——就像所有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关系相关的问题那样——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争论。当马克思说“所有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Gr*，MEGA II. 1. 2，第403页；MEW 42，第407—408

702

页）时，他所依靠的是关于历史进程的知识。但是，如果这种知识不能通过对事物的分析得到证明，那么马克思就是采取了“历史哲学的”处理方式。在这里，马克思证明了，奴隶制萌生于家庭当中的父权制统治。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认为，异化是“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的“必然的过渡点”（同上书，第 417 页；第 422 页）。马克思的这句话并不是指实现某一特定事件，而是指创造一种不再具有对抗性的生产方式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创造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是可以观察到正在实现着的。

703　如果我们借助罗伊·巴斯卡，（1）将完成了的唯心主义，（2）将精神一元论和，（3）将内在目的论理解为黑格尔本体论的关键参数，那么马克思同黑格尔及历史哲学的断裂就显示在这三个方面上：（1）对同一性哲学中的“绝对”的拒斥；（2）对差异性和复杂性的坚持（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以及经验的、非思辨的总体性观点（如德拉·沃尔佩所指出的）；（3）马克思将目的论限定在人类实践上，并且例如称赞达尔文的著作是，“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1861 年 1 月 16 日致拉萨尔的信，MEW 30，第 578 页）。

马克思有时候会表现出试图靠近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不过，他是颠覆性地使用它们。在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特征做了彻底批判之后，他就暗自以用这种“虚假的”特征来描述资本主义的功能关系为乐。因而，大概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在讽刺地模仿黑格尔的字里行间，同时隐藏着一种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以及与黑格尔相对立的理论构思：在这里，当资产阶级财富表现为**媒介**，即“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媒介”时，它就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归根到底，这个中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环节，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 —— 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 —— 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Gr*，MEGA II. 1. 1，第 246—247 页；MEW 42，第 250 页）马克思简单讨论了相关媒介 —— “在它表现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的人格

化——的整个系列，直至“作为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媒介的金融家”（同上书，第247页；第251页）。

在《资本论》的那些经常被引用的、“历史哲学”负担尤为明显的段落中，情
704 况又有所不同，在这里，马克思借助黑格尔的对事物的否定之否定概念来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对“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而出现时，它就在不断社会化和资本集中化（这些是与现代工人阶级相对立的）过程中，产生出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MEW 23，第791页）这一论述明显超出了马克思给自己划定的界限：它不再指向可能性条件，而是暗示出资本主义的扬弃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

关于这类问题，科莱蒂看到，德拉·沃尔佩大概是抓住了一个“标示着马克思解释史的困境。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变化的**科学**理论时，它至多是一种‘崩溃理论’，但却不是革命理论；相反，当它是一种革命理论时，它就有可能面临将自身呈现为关于一种乌托邦主体性的规划的危险，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1977，第31页）。当然要找到保证。科莱蒂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思考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借助异化和拜物教等概念，在重建这一现实的视角下，将它看作崩溃的统一：因此，马克思有两副面孔，即科学家的面孔和哲学家的面孔。尽管在马克思这里，指向这一方向的论述是存在的，但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内核却不能这么来理解。对历时性的和共时性的扬弃关系的分析，是进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入门条件，这种科学——在最佳的意义上——将哲学“扬弃”在自身之中。扬弃意味着“变”，这是一种**规定了的否定**，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意味着覆灭，而是在强的意义上意味着破坏以往的统治地位并解放被统治者。在弱的意义上则是意味着断裂中的连续性。布莱希特也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扬弃概念。“为什么在过去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艺术作品总是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过这一问题），布莱希特补充说道：“无阶级社会可能将会在双重意义上‘扬弃’重要的历史结构的基础。”（AJ，3.3.48）

4. E.v.哈特曼（E.v. Hartmann）（1868） 705
和A.特伦德伦伯格（A. Trendelenburg）（1870）——如马克思先于他们在《黑

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所做的那样——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并未确保概念规定的“内在进展”，并因此依然受缚于矛盾逻辑。富尔达赞同将如下情况归因于此：“黑格尔辩证法在欧洲黑格尔学派、欧洲文艺复兴的术语学和扬弃的技巧中不再起作用。”（HWPh 1，第 620 页）贝奈戴托·克罗齐在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时，消除了破坏性的环节，并似乎是将它驯化成一种“差异辩证法”（Dialektik der Unterschiedenen）：“一个有矛盾的概念会被它的对立面扬弃；如下这句话适用于它：彼之亡，吾之生（mors tua, vita mea）。”与此相反：“一个有差异的概念是前提，并存在于以理想顺序跟随着它的另一概念当中。”（1909，第 9 页）

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这种对扬弃的抛弃表达了自由派向消极革命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出于对民众的恐惧。克罗齐想要的，似乎是一个“没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黑格尔……，也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最紧张的历史时期的黑格尔，在这一时期，所有以往关于自行实现的现实性的观点最终都遭到了批判”（*Gef* 3，H. 4，§56，第 544 页；参见 H. 10. I，§7，Anm. 0b，*Gef* 6，A 562—563 页）。结果就是一种“革命—复辟理论，一种被驯化了的辩证法，因为它‘机械地’假定，反题必须由正题来保存，这样辩证过程才不致被破坏，它也因此被‘预见’为无限机械重复的过程。与此相对，在现实的历史中，反题总是力求摧毁正题：结果是一种扬弃，不过，人们不能像在一种由协议所规定的斗争‘圆圈’中那样，先天地‘测定’节奏。反题越是不可阻挡地发展，正题也将会越发展，这意味着，它将会证明它所有的存在可能性（克罗齐的立场和《哲学的贫困》中被批判的蒲鲁东的立场是一样的：被驯化了的黑格尔主义）”（*Gef* 5，H. 8，§225，第 1075 页；参见 MEW 4，第 125—144 页）。与之相对，作为实践的哲学能够重新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它“在开始的时候，不得不呈现出一副论战的和批判的态度，把自己表现成对以往思维方式和现存的具体思想（或现存的文化世界）的扬弃。因此，它首先是对‘常识’的批判（这是在它得到了常识的支持之后进行的，它之所以要获得这种支持，为的是证明‘人人’都是哲学家，而且不是为了要将一种科学重新引进到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中来，而是要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使之成为‘批判的’），然后是对知识分子哲学的批判。就知识分子哲学是个人的而言……可以认为它标志着常识所造成的进步的‘制高点’，或至少是社会中比较有教养的阶层的常识，由此也就是大众的常识”（*Gef* 6，H. 11，§12，第 706

1382 页）。在这里，扬弃不具有思辨的意义，但仍然保留了破坏、保留和提升这三重意义，因为它是作为**批判**出现的，并显示出同本雅明的**拯救的批判**的联系点。在同破坏和保留相结合的过程中，这些批判被理解为扬弃的一种形式。“唯物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中的解构或者批判环节，在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中起到了作用，历史对象最初是凭借这种作用建构起来的。”（GS，V.1，第 594 页）在这里，本雅明是将“解构环节”理解为“对一种危险态势的反应……，它既威胁着传统，也威胁着传统的接受者”（同上书，第 594—595 页；参见 GS I，第 1242 页）。——葛兰西思考的是非同一般的难题，即在现实的历史中几乎不可能践行扬弃。这一思考是在与如下断言的争辩中提出的：“如果没有创造，人们就不能破坏”；“说‘破坏’，总有人想破坏，是不合适的。破坏和创造一样，都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涉及的不是破坏物质性的物，而是破坏‘关系’，关系是不可见的、不可把握的，尽管它是隐藏在物当中的。破坏者—创造者破坏旧东西，是为了揭示新东西并使其发扬光大，这种新东西是‘必然’形成的，并且无可辩驳地抵进历史的门口。因此人们可以说，只要人们进行创造，就会有所破坏。很多假想的破坏者都不过是‘失败了的驱逐的肇事者’，根据历史的刑法典，他们被判有罪。”（*Gef* 4，H. 6，§30，第 734 页）

非常讽刺的是，自 19 世纪末期以来，扬弃概念（或者它的等价物）出现在不少宣称已经扬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或文章的标题中（参见 de Man 1929，及他在意大利的接受情况）。——富尔达认为，在扬弃通过马克思具有了“实践地消灭不再符合合理的社会要求的那些现状”的意义之后，“如果它还应当是辩证的扬弃，那么就需要一种标准来确定，对一种过时的状况的消灭，是保留了还是抛弃了内在于这种状况当中的理性”。（HWPh 1，第 620 页）在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往往是理性变成荒诞、善行变成灾祸，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尝试暴力地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将后者的大部分民主成就抛弃了，虽然如此，但尚不明显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理论—实践形式，保留了内在于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理性。在富尔达的评论中插入了一个未曾说出的问题，这就是：如果一个变得过时的历史形态不能被扬弃，或者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如果“不愿死去的旧东西和想要存活的新东西之间的”（*Gef* 4，H. 6，§139，第 817 页）斗争转变成旧东西已经死亡，但新东西却不能产生出来，情况又会如何。在 20 世纪，现状的“自我扬弃”依然是明显的，但可能 707

已经放弃了马克思几乎没有怀疑过的、向着更好方向进步的承诺："总体社会化客观上酝酿了它的对立面，至今也不能说，这究竟是灾难还是解放。"（Adorno，*Negative Dialektik*，GS 6，第 340 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u. a., *Das Kapital lesen*, 2 Bde., Reinbek 1972; R. Bhaskar, »Dialectics«, in: DMT, 1983, 122-129; L. Colletti,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1974), Berlin/W 1977; B. Croce, *Lebendiges und Totes in Helgels Philosophie* (deutsche, vom Verfasser vermehrte Übers. v. K. Büchler, Heidelberg 1909 [*Ciò che è vivo e ciò che è morto della filosofia di Hegel*, Bari 1907]); G. Della Volpe, *Logica come scienza positiva*, Messina-Florenz 1950; F. Fulda, »Aufheben«, in: HWPh, 1971, 618-620; E. v. Hartmann, *Über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1868; H. de Man, *Il superamento del marxismo*, 2 Bände, hgg. v. Alessandro Schiavi, Bari 1929; H. Marcuse,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Heg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1941), Neuwied-Berlin/W 1962; A. Trendelenburg,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3]1870.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侯振武 译，宋珊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lltagsverstand, Antagonismus, Denkformen, Dialektik, disponible Zeit, Entfremdung, Fetischismus, Gegensatz, Grundwiderspruch, Hegelianismus, Hegelkritik, Kritik, Lüge, Moment, Metamorphose, Negation der Negation, passive Revolution, rettende Kritik, Schranke, Spekulation, Sprache, Sprung, Standpunkt/Perspektive, Teleologie, Umschlagen, Unmittelbarkeit, Vermittlung, Vernunft, Widerspruch, Zerstörung

哲学的扬弃
(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离开"哲学的基地"（*DI*，MEW 3，第 18 页）。他们是如何得出这样的观点的？20 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对待这个论题的？

1. 关于哲学的终结以及"扬弃"或"实现"的说法，是从黑格尔留下的情况开始的：他自诩已经"完成了哲学"，因为他自认为扬弃了以往的哲学体系。（*GeschPhil*，W 20，第 454—462 页）

在黑格尔之后，知识界的反对派在

德国出现了，这是因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几无可能。这种反对派形成了一场文化上的、针对教会和宗教的思潮，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形成了这一思潮的高峰。他们批评黑格尔与宗教的和解，并认为由黑格尔哲学所期待的、“概念本身所设定的现实”（*RPh*，§1，W 7，第29页）和事实上的“普鲁士”的现实是相互偏离的，因而理论与实践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需要通过**批判**来克服。这种批判被认为是哲学的实现。不久之后，它就获得了一种明确的政治特征。在指出一种作为宗教派别或哲学派别的“政党”概念的起源时，古斯塔夫·迈尔（Gustav Mayer）（1913，第9页）总结了如下这些发展：“在我国，政党制度逐渐由观念变为了现实。这一发展是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进行的神学革命（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超越了他）开始的；这是在黑格尔哲学自行解体的过程中展开的，是在整个世界观的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同时受到法国的影响）完成的。”

2. 马克思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MEW 1，第344页）。他所要求的这种批判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它的**内在性**。这不是教条地期待另一个世界，“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同上）。批判者必须“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 709
（同上书，第345页）。马克思批判政治国家，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它包含着理性的要求，并假定已经实现了这种要求）陷于其理想规定与现实前提之间的矛盾当中。因此，马克思认为如下一点是可能的：“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同上）与此相应，马克思向《德法年鉴》建议如下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做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第346页）

因而，这涉及内在批判，即批判的哲学，它是“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的分析，其目标是“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这种“批判的哲学”显然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青年黑格尔派意义上的“新哲学”。因为马克思看到，“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在于将“**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

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KHR*，MEW 1，第 379 页）然而，德国的状况限制了这种“批判的哲学”的实施：“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同上书，第 383 页）这种相较于英法而言的非共时性，在马克思的批判策略或哲学策略中也有所体现：“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同上；参见 Labica 1976，第 15 页及以下）

对于马克思来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虽然一方面只是“梦想的历史”，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因这种双重性，它对于他来说具有一种重要的地位。

市民社会 / 国家与德国哲学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内容，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通过反
710 思更近的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马克思认识到，国家只能在想象中扬弃市民社会的分裂。在他看来，市民 / 公民这对概念，标示着市民社会内部不可扬弃的矛盾。他从一种更为激进的视角出发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认为它“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MEW 1，第 370 页）。在国家中，“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充满了一种非现实的普遍性。（MEW 1，第 355 页）马克思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划清界限的基础在于，这种哲学是在理论领域内更新了资产阶级关系，并试图通过一种唯心主义所论证的社会的国家形式及相应的“道德”或“伦理生活”，在想象中解决真实的矛盾。在此，哲学对道德或伦理主体的建构工作，受到了社会化的国家形式（它对于市民社会来说是特殊的）的规定，也就是说，对道德主体的建构同时就是对国家主体的建构。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是积极意义上的扬弃的批判。对于德国最先进的因素，也就是哲学，马克思不想放弃。毋宁说，他试图使哲学从一种“观念的补充”（参见 *Judenfrage*，MEW 1，第 384 页）转变为一种在现实中奋力向前的力量，它将参与到“将一切理性化”这一许诺的实际兑现中。马克思从哲学的这种特殊地位，即作为“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种“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胚芽出发，得出了如下著名命题：人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扬弃哲学”；“不扬弃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的想法是一种幻想。

（同上书，Herv. getligt）

摩西·赫斯（Moses Hess）在其《欧洲的三头政治》（*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1841）中，已经大体提出了如下思想：不同于英国（“经济上的进步”）和法国（“政治上的进步”），在德国，将是由哲学及其实践化来开启进步。尽管恩格斯从未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到哲学当中（不过，他对哲学，如谢林哲学，也做过深入研究），但他也接受了哲学在德国具有特殊地位的观念。在他 1843 年于英国的工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Social Reforms on the Continent*）中，他不无讽刺地建议要从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表达德国的遗产：“我们的党应该证明：从康德到黑格尔，德国哲学思想的全部成果不是毫无裨益，就是比毫无裨益更坏；再不然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就应该是共产主义。”（MEW 1，第 495 页）这种从哲学出发的做法，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711

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最初相遇更是以哲学为中介的。摆在他所追求的彻底的德国革命面前的难题是，要为批判的哲学寻找“**物质**基础”（MEW 1，第 386 页）。对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文献的研究，以及同法国和德国工人的接触，使得马克思注意到了无产阶级。由于其具有“普遍性质”（MEW 1，第 390 页），它应当能够克服市民 / 公民或市民社会 / 国家的分裂。在这里，马克思是含糊地以“普遍苦难”来论证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而没有更为彻底全面地处理生产问题。

马克思将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构想如下：“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MEW 1，第 391 页）在这里，哲学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哲学被设想为解放的出发点；第二，依凭费尔巴哈的哲学概念，哲学被设想为一种“成为人”的解放形式。

马克思后来否定了这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久 —— 在马克思经历了真实的社会斗争之后 —— 就被宣布为远离生活的思辨。与费尔巴哈的联盟持续了更长的时间：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哲学开始了恩格斯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就已经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然而，这种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参与战斗性的工人政治的经验，使得他必须放弃费尔巴哈人类学的基地。社会关系的划分、社会斗争是新的领域。也正是在这些领域中，哲学问题被重新提出了。

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 712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了“哲学的基地”（MEW 3，第 18 页）。他们认为，哲学首先不应被当作一种观念建筑或观念体系，而应被当作一种社会实践，它与其他实践相互关联。在这里，以往那种向现实的思辨性转变，以自我批判的方式翻转为对哲学思辨的社会现实的研究。据此，就是要在考虑到社会所约束的**哲学活动**的情况下，来理解**哲学观念**。哲学产生的一个决定性条件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这使“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得以成为可能。（MEW 3，第 31 页）不过，他们是在一种更为全面的情况中来看待脑力劳动的发展的。他们的研究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概念的当前发展是同步的，这些概念包括：生产 / 再生产、生产方式 / 再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生产力。为了研究人们在不同社会阶段的相互地位，他们又引入了私有财产形式、阶级等概念。

由于阶级社会中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MEW 3，第 33 页）为了特殊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瓦解了共同利益，并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MEW 3，第 34 页）。这种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的政治分化 —— “虚幻的共同体”（MEW 3，第 33 页） —— 意味着，统治阶级（或夺取统治权的阶级）必须声称它的利益就是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在这里，一个阶级的“概念上的意识形态”起作用了（参见上书，第 45—46 页）。

此后，这种对脑力劳动的真实的—想象的独立性以及“哲学在社会划分过程中的地位”（Haug 1984，第 19 页）的分析，在总结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成为如下这点的背景：马克思将哲学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之一种，社会斗争是在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中进行到底的（MEW 13，第 8—9 页）。为了推进内在批判，马克思必须离开哲学。对于他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辩证法不是哲学，而是科学实践中的“指导”（MEW 13，第 8 页），并且，作为这种实践中的劳动工具，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辩证法不能从科学知识生产的“质性控制”（Suchting 1986，第 34 页）中取消掉。 713

因此，马克思对哲学的“解构”，从根本上提出了哲学作为制度化的实践形式的问题。旧的提问方式的基地被放弃了；这不是使问题保持原状，而是通过重新拷问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基础来对问题做一再表达。“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MEW 3，第 27 页），失去它以往的干预基础。

走向一种新的“批判的哲学”的道路，变成了这样一条道路，它已经驶出了哲学，但哲学的位置并未被新的东西占据。哲学在社会划分中的位置（这种划分导致了它的真实的—想象的独立性）、对竞争性的社会关系中的脑力劳动进行复杂规定的结果，都被忽视了。对于一位脑力劳动者（他对自己的生产条件有要求并愿意参与社会关系的互助性重组）来说，争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势在必行的。在马克思这里，这一点是在他所称的“批判的”或“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发生的，这种社会主义不同于其他的，特别是空想的或专制的社会主义方案。（参见 Pelger 1980；Schieder 1980）在历史上，这一社会主义计划被冠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及马克思去世后（参见 Haupt 1982），它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遭遇了损害。

4.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中，恩格斯回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的哲学批判，并最为明确地写下了他关于哲学的“终结”或“扬弃”的看法。在将哲学定位为“意识形态力量”（MEW 21，第 302 页）的语境中，对黑格尔所强调的哲学的体系特征的批判，形成了（正如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那样）介入点，它同时也是哲学的终结点和哲学成为一种新态度的转折点。这种批判织成了一条线，这条线有助于我们走出由哲学形成的“体系的迷宫”（MEW 21，第 270 页）。在这里，批判的主要对象不是这种或那种个别的哲学体系，而是作为“体系”的哲学本身。哲学的这种“体系必然性”往往只 714
能是虚幻地实现，只能通过“强制性的结构”（MEW 21，第 269 页），即通过“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MEW 21，第 303 页）——这是一种社会中独立化了的意识形态——来实现。哲学的“体系”特征表现在如下这点上：“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MEW 21，第 270 页）这既可以在他们对其他体系的武断和缺陷的批判中看到，也可以在如下观点中看到：真正的哲学最终会实现理性和真理。

如康德（他将形而上学看作“自然天性”）那样，恩格斯在哲学体系的游戏的背后，看到了“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MEW 21，第 270 页）。根据恩格斯的解释，每一哲学体系都承诺要去满足的，正是这种需要。但是，这种承诺未能实现，而这又为新的“体系承诺”创造了空间。

这种“哲学的”需要在它自己的领

域内是不会被取消或扬弃的。但是，恩格斯认为，人们在涉及哲学时，可以采取一种外在于“体系的迷宫”的立场。通过这种立场，人们也能够反对向“体系的迷宫”的倒退。这种立场意味着“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完结了”，它与“对世界真正的切实的认识”合而为一；我们是在“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中遇到这种立场的。（同上）

5.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哲学的扬弃或终结不再是核心议题。这些哲学完全不谈论扬弃或终结的论题，它被遗忘了或是被弃置一旁，极少公开出现或是被明确放弃了。这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论题的接受，是不全面的或是有选择性，从而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中既重要又隐秘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通过对如下两个不同领域的分析性区分来阐明这一结构：

哲学作为与各种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生活领域有关的自发的活动，作为**哲学研究**。这些反思就其本质而言是偶然的、片断的，它们不会形成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这些哲学研究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由布莱希特（philosophische Haltung）和葛兰西（Jedermanns-Philosophie，参见 *Gef* 6，H.11，§12）、在“理论上的推进”中由阿尔都塞（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呈现了出来。葛兰西和布莱希特将对这样一种哲学研究形式的支撑性、一致性的批判，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哲学作为**制度**，作为理智行为和社会思想管控的学院化形式。这涉及的是一种制度结构（研讨班、会议、杂志、出版社等，还有对经过国家考试担任某项职务的准入控制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元素也被嵌入到或者说是被“吸收到”这种结构当中——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以及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哲学。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和尼采）在制度之外进行定位的努力，依然是一种处于边缘的现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从批判的科学的立场，从他们所指向的科学思想的新的发展阶段出发，要求一种活生生的、批判的哲学研究意义上的彻底反思和质疑的过程，为此他们离开了制度。与之相对，在同一个问题上，人们可以通过一种变革来解决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的认同危机，虽然这种变革表现为回到“丰富的”哲学（“回到康德”）。

从时间次序上来说，哲学史的演进是哲学对自身危机最早的回答。这里表现了对危机的承认：“尽管我们不再拥有哲学，但我们依然拥有哲学史。”哲学史的撰写，就其方法和本质（地位）而言，

可以被理解为普遍的文化史或观念史的一部分。

关于哲学本身，将认识理论表达为哲学的焦点，这形成了十分重要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认识理论被视为对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和所有后康德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此而言，它与康德或现代经验主义、理性主义是一致的，它在它所撰写的哲学史中开始将它们称
716 为认识理论。也就是说，它开始将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战胜，描述为它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在其“认识理论”计划的框架内（除了哲学价值理论的选择之外），恰当地解决具体学科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特别关注人类意识正在探索的、脱离了新哲学的具体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

自世纪之交以来，向科学理论或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转型成为认识理论的核心趋势。与这种发展相反，有人考虑建构本体论和哲学人类学。不过，在 20 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间里，科学理论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领域；它的提问方式或多或少地控制和修正了其他哲学领域的问题与答案。我们可以将这种从认识理论向科学理论的过渡描述为：关于“人类认识”的问题被关于“科学认识”的问题所取代。这种过渡和现代形式逻辑的产生与发展紧密相关，而且还涉及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一种日常的或技术的意义上语言，既取代了形而上学的“存在”，也取代了认识理论的“意识 / 知识”。这又意味着与探究语言的不同维度的具体科学相关的张力 —— 以及最近的与探究哲学语言本身的意象、叙述结构或话语结构和策略的方式相关的张力。同样的张力复现于科学理论研究当中：哲学的科学理论对抗具体科学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对待这一发展？这大体上可以描述如下：这种“新东西”基本上被卢卡奇看作是虚幻的，看作是“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倒退甚至是解体，或者是被看作是“根本毫无新意的东西”。第三种观点承认这种新东西是新的，甚至承认它是哲学中的进
717 步，并开始批判地借用和改造，如布莱希特在同美国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关系中所做的那样。

特别是这最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必然会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理论或科学理论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自行 —— 完全不谈及它们同哲学 / 具体科学之关系问题的联系 —— 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辩证法（例如“自然辩证法”或“辩证逻辑”）的问题（可参见德拉·沃尔佩学派［der Schule Della Volpes］的工作）。关于所

有这些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哲学内部从来没有达成过一致。马克思的分析中可能的规范性维度、一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可能性与特征，同样也都成了具有争议性的讨论对象。

总之，对于制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一种“被动的”和“反应性的”建构是典型的。如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等哲学流派已经得到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这些回答中，所谓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异议重生了。一种哲学回答的相同构型，是根据不同的（如结构主义的）方法或理论——精神分析、符号学和语义学——来确定的。另一方面，正是将各种相互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为“资产阶级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企图，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认同的建构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条通往更为主动、更具生产性的工作的道路，是通过如下这点发现的：人们使批判的科学和日常中与科学中自发的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中心，为的是在哲学内部及与哲学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能被当作一种制度化了的“意识形态力量”来对待。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Lenin und die Philosophie*, Reinbek 1974; ders., »Ist es einfach, in der Philosophie Marxist zu sein«, in: ders.,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W 1977; ders.,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Berlin/W 1985; K. Baynes u. a. (Hg.), *After Philosophy. End or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1987; P. Bourdieu, *Die politische Ontologie Martin Heideggers*, Frankfurt/M 1976; C. Buci-Glucksmann, *Gramsci et l'état. Pour une théorie matérialist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75 (*Gramsci und der Staat*, Köln 1975); W. Goldschmidt, L. Lambrecht, »Von der Philosophie zur ‘reellen Wissenschaft’. Thesen zur Erforschung der Genesis des Marxismus«, in: *Dialektik*, Nr. 6, 1983; J. Habermas, »Die Philosophie als Platzhalter und Interpret«, in: ders., *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83; W. F. Haug, »Orientierungsversuche materialistischer Philosophie«, in: *Argument* 128, 23. Jg, 1981, 516-532;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e-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Philosophie-Ökonomie-Wissenschaft. Drei Bereichsstudien von Stuart Hall, Wolfgang Fritz Haug und Veikko Pietilä*,

718

AS 70, Berlin/W 1984; G. Haupt, »Marx and Marxism«, in: E. J. Hobsbawm (Hg.),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 1: Marxism in Marx' Day*, Brighton 1982; J. Koivisto, »Umkämpfte Philosophie. Marx, Labriola, Gramsci«, in: *Argument* 182, 32. Jg., 1990, 519-529; S. Kratz, *Philosophie und Wirklichkeit. Die junghegelianische Programmatik einer 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Konstituierung der Marxschen Theorie*, Diss., Bielefeld 1979; G. Labcia, *Le statut marxiste de la philosophie*, Brüssel 1976; ders., »The Status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S. Hänninen, L. Paldan (Hg.), *Rethinking Marx,* AS 109, Berlin/W-Bagnolet-New York 1984; ders.,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H. Lefebvre, *Metaphilosophie. Prologemena,* Frankfurt/M 1975; S. -E. Liedman, *Das Spiel der Gegensätze*, New York-Frankfurt/M 1986; J. Mader, *Zwischen Hegel und Marx. Zur Verwirklichung der Philosophie*, Wien-München 1975; G. Mayer, »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Radikalismus im vormärzlichen Preussen« (1913), in: ders., *Radikalismus, Sozialismus und bürgerliche Demokratie*, Frankfurt/M 1969; L. Mehtonen, »Von der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e als 'ideologischer Macht'«, in: *Argument* 137, 25. Jg., 1983, 20-26; ders., »Über die 'Nicht-Philosophie' in Feuerbachs Reform der Philosophie«, in: *Annalen der internationalen Gesellschaft für dialektische Philosophie Societas Hegeliana*, IV, hgg. v. H. H. Holz u. J. Manninen, Köln 1988; T. Oiserman, *Die Entstehung der marx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80; H. Pelger, »Was verstehen Marx/Engels und einige ihrer Zeitgenossen bis 1848 unter 'wissenschaftlichem Sozialismus', 'wissenschaftlichem Kommunismus' und 'revolutionärer Wissenschaft'? «, in: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und Arbeiterbewegung. Begriffsgeschichte und Dühring-Rezeption*,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Nr. 24, Trier 1980; W. Schieder,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vor 1914«, in: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und Arbeiterbewegung...*; W. Suchting, *Marx and Philosophy. Three Studies*, Hampshire 1986; F. O. Wolf, *Umwege*, Hannover 1980.

尤哈·科伊维斯托（Juha Koivisto）、劳里·梅赫托宁（Lauri Mehtonen）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ntiideologie, Antiphilosophie, Antizipation, Arbeitsteilung, Artikulation/Gliederung, Aufheb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Camera obscura, Della-Volpe-Schule, Dialekt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pistemologie, epistemologischer Bruch, Erkenntnistheorie, Ethik, ethischer Sozialismus,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deologische Form, ideologische Macht,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deologische Stände, Ideologietheorie, Kritik, Leitfaden, Logik, Marxismus, 719 Marxismus-Leninismus, Metaphilosophie, Naturdialektik, Neukantianismus,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ekritik, philosophisches Volkstheater, Praxisphilosophie, Religionskritik, Ungleichzeitigkeit, Universalismus, verändern, Vernunftkritik,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

启蒙运动（Aufklärung）

尽管“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启蒙运动形成了一种全面的解释传统”，但维尔纳·克劳斯和汉斯·迈尔还是在1955年指出，“这场运动的时间跨度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VII）“思想史”的时代概念本身的基础就是不确定的，其中包含着多层次和对立的历史过程，对此，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会感到惊讶。随着知识分子由前资产阶级的权威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解放性力量，在他们——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中，18世纪往往被视作“启蒙的世纪”（siècle des lumières）或“哲学的世纪”（siècle philosophique），因此18世纪与启蒙时代这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似乎不分彼此。（Krauss 1963，第21页）马克思主义文学史无法绕过启蒙运动，它正是从对启蒙时代的这种支配性的自我理解的特别视角出发来把握启蒙运动的。（参见Krauss 1963和1973，Schröder 1974）——然而在更广泛的理论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这个概念意味着一个与统治和解放的历史密不可分的解放纲领，作为一种理论批判，启蒙运动涵盖了一切领域，并将它们从形而上学体系驱逐到经验之中。（Schalk 1971，第622页）正如施罗德（Schröder）关于启蒙运动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针对资产阶级解放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的批判，我们就不可能确定这个纲领的意义和历史地位。（EE 1，第276页）——“启蒙是人类摆脱其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的出发点”，康德在1784年给出了

这样的解释（《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ärung?*]）。但是“人类”和“咎由自取的不成熟状态”仍然完全属于非历史的范畴，而“摆脱这种状态的出发点”也没有被找到。面对那个尽管探讨着无可辩驳的（伪）问题却仍陷于崩溃的形而上学，康德把启蒙运动转向了先验的领域，他希望“许多有才能的人能利用一切好机会，为不断前进的理性的共
720 同利益而工作”（*Prolegomena*，Anhang，Akademie，第380—381页）。因而这就与信仰的合理化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把那些真实的、具有意义的世界现象冒充为只是某个隐藏在底下的思想世界的**象征**（像斯维登伯格［Swedenborg］那样），这就是**迷狂**。反之，在体现那属于密切关联到一切宗教本质的道德……时，把智性的象征物（宗教仪式）这种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是有用和必需的**外壳**，和事情本身区别开来，这就是**启蒙**。因为不这样，一个**理想**（*Ideal*）……就会被一个**偶像**（*Idol*）所替换……”（*Anthrop*，§38）康德还坚持“公开”的重要性，并认为，对公开的（在日常政治上日益现实的）禁令给人民的进步带来了阻碍。（*Streit der Fakultäten*，II，第8页）——尽管克劳斯和迈尔1955年对于启蒙运动的评论带有想象成分，施罗德在其1990年的《启蒙运动》（Aufklärung）一文中还是以此作为开篇：“启蒙运动的历史自我规定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本质特征，相形之下，此前的一切历史都沦为了单纯的史前史。”（VII）这一表述借用了马克思的提法，在马克思那里，启蒙运动的概念上升为一种无阶级的、自治的世界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仅仅把启蒙运动视作思想史的某个时代，而是将其视为一场在历史上自我表达的、从那无理性且不经公众话语传达的统治形式中脱离出来的精神觉醒运动。对他们来说，启蒙运动主要是一个在资产阶级社会化及其古代前期形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道德纲领，启蒙运动把自然和理智作为其唯一承认的权威，并反对一切形式的迷信和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纲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同时也放弃了一部分想象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有必要去追问启蒙运动与其历史基础之间的关系，追问它所针对的统治形式，并且追问体制与实践中的哪些“硬核”为其历史实现的尝试提供了基础。

1. 一个时代的哲学用理想化的方式表达着该时代的特定倾向，并使得许多个体的行为趋于一致；但《共产党宣言》指出，哲学并不是主体：“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721 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MEW 4，第480页）但这个“不过”并不意味着对哲学价值的贬低。卢格（Ruge）认为，对于仍持左翼黑格尔思想的青年马克思和他较年长的朋友鲍威尔和科本（Köppen）而言，“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联系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标志性特征”（Mehring，GS 13，第8页）。后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但与启蒙运动本身不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条件，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我们既看不到像启蒙运动那样过多的想象特征；也没有后者那种理想化的理论路径；他们虽然反对反启蒙，但也承认启蒙批判具有相对的正当性。——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巅峰是唯物主义（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为代表），而在德国，它的巅峰是唯心主义，首先是康德批判哲学的唯心主义，而后是黑格尔的历史辩证唯心主义。青年（“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直接把握了这条思想路线。他于1842年7月14日在《科隆日报》（*Kölnischen Zeitung*）发表的社论中证实了启蒙运动的广泛含义。哲学在18世纪几乎成了启蒙运动的同义词，而马克思则通过科学“生产力”的概念消解了这种等同关系：“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了……先是马基雅维利（Mchiavelli）、康帕内拉（Campanella），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MEW 1，第103页）他反驳了那些想要回到旧权威的保守派：“现代哲学只是继承了赫拉克利特（Heraklit）和亚里士多德所开始的工作。因此，你们反对的不是现代哲学的理性，你们是反对永远新颖的理性哲学。”（同上）1842年，马克思用论证驳斥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解体被归咎于启蒙运动，但这种解体首先是以道德自我消解的形式从旧制度中发端的；与这种纯粹消极的、腐朽的解体相对立，马克思称赞了法国国民议会所体现的创造 722
性解体原则：“解体则表现为**新精神从旧形式下的解放**，因为旧形式已不配也不

能容纳新的精神。这就是**新生活对自身力量的感觉**，新生活正在**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MEW 1，第 80 页）因此，就如同“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一样，我们也有理由把历史法学派视作“旧制度的**德国理论**”。（同上书，第 80—81 页）

“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去思考世界并协调社会的体制结构，这个纲领要比“哲学的世纪”（siècle philosophique）的话语更加广泛，因为前者允许讨论诸如古代的启蒙运动等内容。这方面最勇敢的代表，就是因对抗一切宗教而备受指责的伊壁鸠鲁。伊壁鸠鲁结合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旨在将人类“放归到可以掌控自身生活方式的位置”，“他的论证所包含的激进排斥目的论的启蒙冲动，其系统含义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获得了全面的重新认识”。（Kimminich 1993，第 29 页）马克思指出：就连斯多葛派也相信神灵，“正因此作为启蒙者的伊壁鸠鲁才反对他们”（*DI*，MEW 3，第 123 页）。“怀疑论派把人们对事物的理论关系归结为**假象**，而在实践中让一切保持原状，同时他们顺应这种假象完全像别的人顺应现实一样；他们只是改变了名称。伊壁鸠鲁则相反，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么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因此卢克莱修歌颂伊壁鸠鲁是最先打倒众神和脚踹宗教的英雄；因此从普卢塔克（Plutarch）直到路德，所有的圣师都把伊壁鸠鲁称为头号无神哲学家，称为猪。也正因为这一点，亚历山大里亚的克雷门（Clemens）才说，当保罗激烈反对哲学时，他所指的只是伊壁鸠鲁的哲学。”（*DI*，MEW 3，第 125 页）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就致力于恢复伊壁鸠鲁的名誉。他从黑格尔哲学的立场出发，考察了伊壁鸠鲁思想的成就与局限，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思想固然是自我意识的哲学，但它仅仅是抽象个别的哲学。因此“由于在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个别性，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科学当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对于人的意识来说是超验的东西，因而属于想象的理智的东西，也就全都破灭了”。相反，斯多亚派“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MEGA I.1，第 57 页；MEW 40，EB 1，第 304—305 页），马克思接着援引了卢克莱修的诗句：“人们眼看尘世的生灵含垢忍辱 / 在宗教的重压下备受煎熬 / 而宗教却在天际昂然露出头来 / 凶相毕露地威逼着人类 / 这

723

时，有一个希腊人敢于率先抬起凡人的目光 / 面对强暴，奋力抗争 / 无论是神的传说，还是天上的闪电和滚滚雷鸣 / 什么都不能使他畏惧 /……/ 如今仿佛得到报应，宗教已被彻底战胜，跪倒在我们脚下 / 而我们，我们则被胜利高举入云”（*Von der Natur der Dinge*，I，第62—78 页；年代不详，卡尔·路德维希·冯克内贝尔 [Karl Ludwig von Knebel] 译，1831）。

在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古代启蒙运动带来的只能是受教育者的“世俗宗教”，正如弗兰茨·梅林 1901 年所说，“这种宗教被社会的阶级斗争所攫取，并被彻底改造成了相反的东西”：“他严格的品德并不能阻止其学说成为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一副哲学面具，用于美化最可耻的感官享乐；同样，他对一切宗教的仇视也没能阻止伊壁鸠鲁主义成为穷困者皈依基督信仰的重要催化剂。”（GS 13，第 18—19 页）与古代相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与其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因此，马克思将现代启蒙运动广义地理解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道德准备，古代则没有与之相对应的阶段。

鉴于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基础，及其在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中表现出的对社会经济实现条件和限制的盲目性，马克思自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之后，就一直在探讨各种形式的启蒙批判以及反启蒙运动，例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启蒙批判（参见其中“启蒙与迷信的斗争”一章）。马克思在“启蒙运动的最后结果”（MEW 3，第 394 页）中看到了“一只手洗另一只手”的功利主义意象（Suhrkampf WA 3，第 416 页），与黑格尔完全相反，马克思把这个意象用在了激烈的反驳中：只要霍尔巴赫将功利关系理解为相互剥削，他的理论就是“一种**启蒙**，它揭示了披在封建剥削上 724
面的政治、宗法、宗教和闲逸的外衣的世俗意义”（同上书，第 395 页），也就是说，随着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揭示出语言甚至爱情所掩盖的对他人的剥削关系，他们也使得依赖于这种伪装的旧式剥削关系无以为继了，这为释放个性的资产阶级形式带来了益处。但除了这一优点之外，启蒙运动还存在弱点。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18 世纪的预言家们”时，他指的是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他们“不是作为历史的结果，而是作为历史的出发点”（MEW 13，第 615 页）。关于被自己视作反动派的兰盖（Linguet）的启蒙批判，马克思指出：“他的一句反对孟德斯鸠的话：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就表明了他的见解的深刻。”（*ThM*，26.1，第 320 页）然而，对启蒙的反作用并不仅仅把私有财产视为基础，而是突然开始研究资本主义之前的公有制形式了，

正如马克思不无喜悦地写道："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1868 年 3 月 25 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2，第 51 页）马克思还揭示出传统的货币符号理论的代表人物如何"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与牧师的谬论很相似，只是前者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试图通过还原论式的、仓促得出结论的批判来弥补其对于社会的盲目："这是 18 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MEW 23，第 105—106 页）但直到真正的"陌生物"在危机中显现："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同上书，第 152 页）

2. 当晚年的马克思将日益减退的精力投入到经济批判和人种学时，恩格斯则在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上升期承担起了理论推广的任务。在这种背景下，18 世纪启蒙运动与它在法国的形式——亦即哲学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凸显了出来。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最初为了法国读者出版的关于《反杜林论》节录中，恩格斯用资本主义的经验来解释"现代社会主义"的具体内容。"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 18 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MEW 19，第 189 页）恩格斯接着向法国读者指出了那些"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观念："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同上）然而，启蒙运动的想象成分恰恰就是这种想当然的普遍性和绝对理性，也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

725

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同上书，第 190 页）“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同上书，第 192 页），在这番澄清之后，一个灾难性的辩证法的时机就成熟了，这个辩证法似乎预示着此后的俄国革命：“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同上）因此，“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在其实现之后，就沦为了“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同上书，第 193 页）——晚年恩格斯则给了启蒙运动一个更加消极的讣告，他在其中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变为“俄国外交的耶稣会”的过程。（MEW 22，第 20 页）“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 18 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所有不清楚自己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同上书，第 21 页）

3.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启蒙批判，这一批判被视作启蒙运动的最佳传统。而从中产生的问题，也预示着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始终对工人运动以及建立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起着指导作用（并且在大多数时候占据优势）。这是自上而下的启蒙教育论的尝试，它以理性极权国家的“开明专制”为榜样，在历史上，它摧毁了民间信仰、巫术和治疗术，并代之以各种有职能的意识形态阶层（如医生、律师等）以及官僚机构。在针对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教育传统的第三条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这种从（主要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继承的“关于改变和教育的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

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MEW 3，第 5—6 页）。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其文稿中发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
727 手稿，并于 1888 年首次公开发表，但他却划去了“自我改变”这个词（参见 MEW 3，第 533—534 页），这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俄国 19 世纪末的“启蒙主义者”大都受到西方的影响（参见 Lenin，LW 2，第 537—538 页）。所谓字面上的启蒙精英（aufgeklärte Nomenklatur-Elite），只拥有字面上的法律知识，却自以为能够教育民众，因为他们自恃总是知道什么对于民众是好的，这种方式造就出许多下层民众，这部分民众最终成了布尔什维克政党。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思考了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条提纲，并在论述中反复提及，但葛兰西所了解的这条提纲只来自恩格斯整理的版本。（参见例如 H. 7，§29 u. Anm. 0a，*Gef* 4，第 884 页，A390；H. 8，§156 u. Anm. 1b，*Gef* 5，第 1029—1030 页，A465）

4. 行政指令式国家社会主义面临的失败，表现出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相似的特征，即便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官僚的控制倾向也产生出极权式的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种状况提出了**启蒙的辩证法**，此后这方面的思考就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议事日程中占据一席之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同名著作以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开始：“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启蒙运动……始终追求的目标是消除人类的恐惧，并让其成为主人。但完全启蒙的大地却闪耀着巨大的不祥之兆。”（1947，第 13 页）在他们看来，那个旨在征服自然的“世界的祛魅”纲领，实际上是反过来对人类施加了一道无法穿越的“诅咒”。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观察到，随着统治思想的独立倾向与一种经济的彼此趋同，理性的非理性化过程出现了强化，而这种经济的系统特征在于从人的目标中独立出来（更确切地说，其特征是有选择性的、蜕变了的服务），其结果则是对人与自然的双重“掠夺开采”——同样，米歇尔·福柯也把启蒙的“哲学的世纪”视作一种包含 / 排除的行政体系——亦即监狱系统和精神病学——的建立过程。17 世纪中叶，疯癫在社会中的关系“发生了骤变；疯癫的世界变成了被排斥的世界”（1968，第 104 页）。启蒙的“自然之光”将一切与之对抗的东西排除在外。与此相应，克劳斯·德纳（Klaus Dörner）也认为自己对精神病学发展过程的重构，有助于阐明“一切现代科学在兑现启蒙所承诺的人类解放诉求与对
728 现有社会的整合与理性化作用两者之间

的辩证关系”（1969，第 9 页）。——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纲领，则以新近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冲动为基础，并结合了阿尔都塞、福柯，特别是葛兰西的思想，对 17、18 世纪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霸权机构”发展，也就是作为资产阶级“内部国家”（Gottsched）建立阶段展开了研究（PIT 1987）。此外，对于“主体构成”问题、“审美对象进入劳动分工、阶级统治和国家结构”问题，以及对“道德对意识形态的形式规定性”等问题的探讨也遵循了同样的研究路径。（Haug 1993，第 116—174 页）

启蒙运动的自我批判，必须和启蒙批判或者反启蒙的立场同时加以分析，后两者旨在消除启蒙运动高涨的解放冲动。海德格尔把“启蒙”视作晦暗，“它使思想的本质之源变得晦暗”（1954，第 127 页）。因为它积极地思考事物，而不是让它“[去] 显示自身”的存在及存在方式，启蒙意味着“退化”，它迫使事物“远离了其存在论的本源”。（*SuZ*，第 334 页）汉斯·利普斯（Hans Lipps）在 1936 年（第 338 页）指出：“存在主义哲学无意做出澄清”。同年，阿诺尔德·盖伦（A. Gehlen）则主张“成人对于选择和逃避的本能的当下性”，他认为：“对于那些和我们的利益相一致的事物，我们就会持一种”如同布雷克（Breker）的雕塑般“急切准备接受的态度；而对于不想要和不愿接受的事物，我们则被训练成对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切被允许进入意识之物，……都必定受这样的控制，否则此人就是知识分子或启蒙者”（第 37 页）。

尽管“后现代主义”认为自己代表了启蒙运动的终结，并且在这个标签下从多种不同的立场提出了拒斥启蒙的批判和理论，但后现代主义者盲目的活力以及彼此间令人捉摸不透的冲突，都再一次表明了启蒙运动及其实践运用的必要性。于是人们开始思索批判理论所指的那个“不祥之兆”，并试图在实践上避免它，这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纲领，这个纲领旨在把劳动问题与民主、生态和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辩证的基础上进行一场“开明的”启蒙运动。这个纲领也包括对“现代性文化代码”中出现的理性和性别的人类中心主义表述的批判（List 1993，第 193 页及以下）。然而，鉴于“德国灾难性的发展”，而且“从革命的失败与共和国本身的动荡看来，启蒙批判至今仍然无法打消一种怀疑，即：欧洲的启蒙哲学是肤浅而草率的”（Heinrich 1964，第 72 页），因此这种启蒙批判几乎总是有助于启蒙的到来。在后法西斯时代的德国，霍克海默缓和了先前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致力于“使那个在德国经由康德

而达成其最高理论意识的启蒙运动，第一次真正地为人所接受”（1974，第 206 页）。受学生运动的激发，人们开始对启蒙运动的遗产做出更广泛的重新评价，这就是“所谓的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旨在对过往的资产阶级解放观念给出当代的诠释和补充，至今尤尔根·哈贝马斯仍然参与其中”，前民主德国的温弗里德·施罗德（Winfried Schröder）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从历史上看，新启蒙运动无非是用‘巫术’来解决当代问题的一种尝试”（EE 1，第 284 页）。然而，只要不考虑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灾难性辩证法，任何对启蒙的批判就都是无力的。因为正是这种灾难性的辩证法，使得启蒙运动成了统治者行使绝对行政权力的工具，从而使革命倒退回了旧制度。由于启蒙的意识形态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它也没有能力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我批判。

参考文献：

K. Dörner, *Bürger und Irre. Zur Sozial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ssoziologie der Psychiatrie*, Frankfurt/M 1969; M. Foucault, *Psychologie und Geisteskrankheit*, Frankfurt/M 1968 (*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Paris, 1954); A. Gehlen, »Vom Wesen der Erfahrung«, in: *Blätter für deutsche Philosophie*, X, 1936 (wieder in: ders., *Anthropologische Forschung*, Hamburg 1961);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AS 203, Hamburg 1993;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27), Tübingen 1976; ders., *Was heißt denken?*, Tübingen 1954; K. Heinrich, *Versuch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nein zu sagen*, Frankfurt/M 1964;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M. Horkheimer,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M 1974; D. Kimminich, *Epikureische Aufklärungen*, Darmstadt 1993; W. Krauss u. H. Mayer (Hg.), *Grundpositionen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Neue Beiträg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1, Berlin/DDR 1955; W. Krauss, *Studien zur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Neue Beiträge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16, Berlin/DDR 1963; ders., *Die Aufklärung in Spanien, Portugal und Lateinamerika*, München 1973; S. N. H. Linguet, *Théorie des lois civiles*, London 1767; H. Lipps, »Pragmatisme et philosophie de l’existence«, i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VI, 1936/1937; E. List, *Die Präsenz des Anderen. Theorie und Geschlechterpolitik*, Frankfurt/M 1993; F. Mehring, »Zu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 GS 13, 5-29;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Der innere Staat des Bürgertums.*

Studien zur Entstehung bürgerlich Hegemonieapparat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AS 111, Berlin/W 1987; F. Schalk, »Aufklärung«, in: HWPh, 1, 1971, 620-633; W. Schröder, *Französische Aufklärung. Bürgerliche Emanzipation, Literatur und Bewußtseinsbildung*, Leipzig 1974; ders., »Aufklärung«, in: EE, 1, 1990, 276-285.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

参见：
Angst, Atheismus, Autorität,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dukationismus,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Emanzipation, Enzyklopädie, Erbe, Fortschritt, Freiheit,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ohnheit, Gleichheit, Glück, Hegemonieapparate, Herrschaft, Ideologie-Theorie, Intellektuelle, Irrationalismus,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Materialismus, Metaphysik, Moderne, Naturbeherrschung, Öffentlichkeit, Postmodernismus, Rationalität, Raubbau, Religionskritik, Selbstveränderung, Subjekt, Universalismus,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Vernunft, Vernunftskritik, Zensur, Zivilgesellschaft, Zivilisation

直立行走（aufrechter Gang）

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1859），苏格拉底关于人类的本质的问题发生了由空想到科学的决定性转折。在他们证明人类即是自然的选择过程的结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这种“观点”的“博物学基础”（MEW 30，第 131 页）。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起源于猿猴的人类的直立行走，它使得到自由的双手生产和使用劳动工具成为可能：“**手已经变得自由**，现在可以用来获得新的技能”，恩格斯于 1876 年由此得出结论。（*DN*，MEW 20，第 445 页及以下；MEGA I / 26，第 89 页）1861 年马克思在写信给拉萨尔时就已经这样说：“达尔文的文章非常有意义，于我适合作为历史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它却不仅给予了自然科学的‘目的论’以致命的一击，而且它的理性意义与经验主义是完全脱节的。”（MEW 30，第 578 页）

由顺应自然发展的直立行走的人类得知，这种改变是为了在新的、质的过程中融入历史之中。这一“所有历史的基本条件”（*DI*，MEW 3，第 28 页），即工具的“生产”以满足直接的生活需求，是“通过身体的组织协调来决定的”（同上书，第 21 页）。人类从其早期的动物历史中“直立行走着”摆脱出来（参见

Schurig 1976，第 104—114 页），所以在历史上直立行走也被用来比喻资产阶级的解放（参见 Warneken 1990）。

最初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 年）将直立行走比喻成社会解放。“直立行走是用来描述动物的，并不是对于人类。它本身也只是作为愿望，能够没有剥削和主人的生活。”（WA 5，第 1618 页）在这里，“自然的法则表达出了对于道德的矫正，简短地说，对于依赖、卑躬屈膝等行为的摒弃的形成，使人们走出了在地平面的生活的、沮丧的或者说下跪式的状态，开始了直立的生活”（*Gespräche*，第 123 页）。

布洛赫将这一概念引入到 1960 年的马克思主义辩论，为了抵制将其视为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乌托邦的经济低估分析。直立行走的含义与马克思所力争达到的社会关系的意识觉醒接近，“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类的本质一直是自卑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和受轻视的”（*KHR*，MEW 1，第 385 页），为了从中自我解放并且从人类自我实现的意义上来说能够自我改变。布洛赫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做。乌托邦证明了这点。“虽然转向乌托邦方向的面孔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同的，但这与它们本身看上去每一个都是独立不同的是一样的。与之相反，**方向**看上去是历史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幸福、自由、不异化、黄金般的时代、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国家、不朽的女性、费德里奥中的小号节奏……有这么多不同价值的证人和图片，但是所有人都是围绕着自己说话而设定，而且依然保持沉默。”（WA 5，第 1627 页）只有“共产主义作为完美的自然主义—人文主义”，年轻的马克思这样写道，“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真正解决……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物种之间的冲突。它是历史已经揭开的谜底，而且知道自己即是答案”（MEW 40，第 536 页）；它就是每个人原则上都会的直立行走。

让·罗伯特·布洛赫（Jan Robert Bloch）警告说直立行走是一个神话般的伪装，因为在“斯大林主义的谋杀时期”（1989，第 81 页），最终“直立行走已经从下面的团结一致转变为上面无法无 732
天的命令”（同上书，第 77—78 页）。依照鲁迪·杜奇克（1979）的名言形成了所谓的“弯腰的共产主义者”作为直立行走的反面。但这种弯腰就像布莱希特写的那样（“与其成为橡树不如是竹子”；J. R. Bloch，同上），也可能是一种狡猾的抵抗。

参考文献：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3 Bde., WA 5, Frankfurt/M 1973; J. R. Bloch, »Wie können wir verstehen, daß zum aufrechten

Gang Verbeugungen gehören?«, in: *Bloch-Almanach*, 9. Folge, Ludwigshafen 1989, 73-113; R. Dutschke, »Gekrümmt vor dem Herrn, aufrecht im politischen Klassenkampf: Helmut Gollwitzer und andere Christen«, in: A. Baudis u. a. (Hg.), *Richte unsere Füße auf den Weg des Friedens. Helmut Gollwitzer zum siebzigsten Geburtstag*, München 1979, 544-577; H. Gollwitzer, *Krummes Holz – aufrechter Gang. Zur Frag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München 1970; V. Schurig, *Die Entstehung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B. J. Warneken, »Bürgerliche Emanzipation und aufrechter Gang: Zur Geschichte eines Haltungsideals«, in: *Argument* 179, 32. Jg. 1990, 39-52; R. Wiesner u. H. Traub,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 Frankfurt/M 1975.

卡琳·魏因加茨-佩尔舍
（Karin Weingartz-Perschel）撰
宋珊 译，沈红文 校

参见：
Affe, Anatomie, Antizipation, Befreiung, Darwinismus, Emanzipation, Ethik, Ethik im Sozialismus, Freiheit, Geschichte, Glück, Haltung, Hoffnung, Menschenbild, Metapher, Naturgeschichte, Novum, Resurrektion, Selbstveränderung, Subjekt-Effekt, Subjekt-Objekt, Unterdrückung, Wesen des Menschen, Widerstand, Utopie

起义（Aufstand）

作为革命或尝试革命的初始阶段，起义具有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派都试图分析其各自所在时代的革命特征，并从其各自的经验中汲取一般性的经验教训。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与了1848年巴登州的起义。恩格斯这样定义到："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MEW 8，第95页）"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Danton）（同上），概况了它的特征："**勇敢，勇敢，再勇敢！**"（*de l'audace, de l'audace, encore de l'audace*）。恩格斯也为起义总结了一些明确的规则，这与之后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及游击队的论述相似：决心、攻势、对敌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每天取得一点小成绩、道义的优势等。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n in Frankreich*）所作的引言中对不断变化

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军事扩张作为捍卫城市——无产阶级革命企图的手段，并指出资产阶级军队的政治分解是起义成功的前提条件："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起义者方面的全部问题，在于用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或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的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如果这一点做成功了，那么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弄得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做不成功，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武装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战斗力量有计划运用和遵守纪律等优点的作用。……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开始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起来，并且能指靠部下士兵的时候，就都以起义遭受失败告终。……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MEW 7，第520—523页）社会民主党改良派断章取义，以拒绝任何革命，并将自己的发展道路限制在议会斗争之上。

1906年罗莎·卢森堡从苏联的第一次革命（1905）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起义能够为政治做准备，它只是"今天的革命中一个最突出的点"（第22页）："因此，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 734
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街垒战，即同国家武装力量的公开较量，从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在今天的革命中只是一个最突出的点，只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瞬间。这里，由伯恩施坦、戴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们像先知般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和温和化，也在这种新的革命形式中实现了。当然，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所向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与温和化，是指把阶级斗争只局

限于议会斗争，街头革命干脆废弃不用。历史在一种稍微深刻、稍微巧妙的方式中，也就是在革命群众罢工的出现中找到了答案：当然，群众罢工绝没有取代直截了当的残酷的街垒战，也没有使它成为多余的，而只是使它缩小成漫长的政治斗争时期的一个瞬间。”（GW 2，第148—149 页）

在 1917 年 10 月以前，列宁将武装起义视为“一种政治斗争的**特殊**形式，并受特殊法律的约束”。他阐明了“这一艺术的重要规则”（LW 26，第 166—167 页）。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篇短文中他明确了起义的政治前提：“为了取得成功，起义不应依靠一场谋反或者政党，它必须依靠最先进的阶级。这是其一。起义必须依赖于**人民高涨的革命热情**。这是其二。起义一定是以革命兴起的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转折点**为基础的，在其中冲在最前面的人民群众的活动是最突出的，在其中敌人队伍的**波动**以及革命中那些**弱者、犹豫不决的朋友的行列**是最强的。这是其三。正是通过这三个条件可以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对起义问题的不同看法。”（LW 26，第 4—5 页）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及 1917 年至 1921 年国内战争的领先的军事战略家，早在 1905 年在彼得格勒就已经积累了经验。1922 年，在胜利后不久，他就与考茨基（1919）论战并捍卫了革命暴动及作为其延续的“红色恐怖”，他认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统治阶级的抵抗都是以这两者为 735
基础的：“革命在‘逻辑上’不会要求恐怖主义，如同它‘逻辑上’不会要求武装起义一样。这是一种多么有前途和希望的平庸啊！但革命却要求革命阶级，以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如果需要的话 —— 通过武装起义，如果需要的话 —— 通过恐怖主义。通过手中的武器夺取政权的革命阶级有义务去做各种尝试来夺取政权，并同样利用手中的武器去镇压。”（1923 / 1924，第 63 页）“威慑是政治的、国际以及国内的有力工具。战争与革命一样都源起于威慑。按照一般的规律，大获全胜的战争只能摧毁战败军队的无足轻重的部分，剩下的部分被吓退并摧毁他们的意志。革命的影响与之相同：它只会使个别人丧生，却吓退了千百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恐怖原则上与武装起义并没有什么不同，武装起义是他的直接延续。”（同上书，第 64 页）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对于起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朗格（1927）虽然并不认为“军事方面是武装起义的主要问题”。但军事方面仍保留了相当大的空间，并为其创造了各自的军事系统。

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改造之路并非

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也不只是借鉴以往成功的革命。每一次的革命都需根据其特殊的条件，要根据社会力量对比以及到目前为止的统治阶级的抵抗的强度重新制定（但不是发明）。

参考文献：

A. Blanqui, *Instruktionen für den Aufstand*, hgg. v. F. Deppe, Frankfurt/M 1968; K. Kautsky,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Ein Beitrag zur Natur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 Berlin, 1919; A. Langer, *Der Weg zum Sieg. Eine theoretische Erörterung über Marxismus und Aufstand*, Zürich 1927; L. Trotzki, *Die Grundfragen der Revolution*, Hamburg 1923; ders., *Vom Bürgerkrieg*, Wien 1924.

泰奥多尔·贝格曼 撰

宋珊 译，王师、李以所 校

参见：

Befreiung,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friedlicher Weg zum Sozialismus, Gewalt, Guerilla, Massenbewegung, Massenstreik, Militär, Militärputsch, Putsch, Reformismus, Revolution, Streik, Terrorismus

剥削（Ausbeutung） 736

“剥削”一词起源于资源提取为铁矿、煤矿等资源的工序，时至今日仍含此意。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此概念有其自身的发展史。一般来说，剥削这个术语一直用来表述人与人之间或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不公正”或是“不平等”关系的实质。剥削通常被理解为对有益事物的不公平利用。显然，剥削具有标准的基准点。与其说它是一种状态，毋宁说它是从对无剥削、“公平”、“公正”或是“无统治”的关系之中推导出来的。

在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里，这个概念首次得到了严格的科学处理，并在李嘉图的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9世纪的反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文献里，剥削已经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被用于批判某一人群（资本家）以不公正的方式把其他群体（工人）的产品据为己有的关系。尽管李嘉图学派已经形成了相关的思想，对私人财产的批判于19世纪也已蔓延开来（参见圣西门到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但是剥削理论经过马克思的改造才首次变得科学有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指出，在以法国革命为根基的现代市民社会里，尽管废除了农奴制并提倡主体间的自由平等权，以剥削为特

点的经济历史仍然存在。市民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市场的社会化，这也波及劳动力（市场）。强制劳动借助劳动力市场代替了奴隶制社会及封建社会的体系，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制度上的创新之处。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自愿进行，个人的交易行为遵循着公平的原则：商品的交换根据价值进行。价值可以理解
737 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对象化的量。平等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劳动市场。然而必须存在使得平等原则得以执行的“地点”，否则资本主义就不存在剥削。这个“地点”就是资本主义企业。为了证明男工和女工受到的剥削——性别在这里无关紧要，马克思除了价值这个概念之外，还需要另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将工人的劳动力和工人（每天）完成的劳动区分开来。工人在劳动市场卖给资本家的商品（每天、每周，等等）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他们的价值也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生产他们的必要的劳动时间而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维持）。马克思认为，上述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生产工人所消费的一系列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当工人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长于对他个人的再生产而言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他便完成了无酬的剩余劳动。“工人只要劳动例如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维持全日生活；……资本家通过占有整个工作日……创造了剩余价值。”（*Gr*，第 239 页；MEW 42，第 252 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工作日被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人为自己的再生产所需的工作，另一部分完成了剩余劳动。（MEW 23，第 231 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占有构成了剥削的基本事实。剥削预设了两种劳动量在时间上的差别：工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工人完成的活劳动。如果工人的工作时间长于他们可以用工资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必要时间，就意味着他们被剥削了。剥削量可以通过一天的劳动时间与每天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直接的差额加以测量，剥削**程度**可以通过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来测量。马克思也将其理解为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中的对象化的剩余劳动）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或是无酬劳动与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上述所有的表达都是等价的（Morishima 1973，第 46 页及以下）。

马克思对剥削的剩余劳动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的精确表达以及对剥削的量化分析是他的首要理 738
论成就。马克思将剥削的事实与经验观察得来的经济行为者或行为组织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当行为者被剥削且另一行为者负有责任时就意味着剥削关系已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剥削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而不是工

人和地产所有者之间（“第二级剥削”）。

剥削的核心在于直接或是借助劳动产品对劳动时间加以不平等的占有以及资本主义对（工人得不到等价报酬的剩余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建立在未支付酬劳的劳动上，但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借助持续的工资支付形式而被掩盖。对于马克思而言，科学的任务在于揭露工资支付形式。未被支付的剩余劳动或者在商品之中的剩余价值构成了金钱测算的利润“来源”。马克思由此解开了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竞争经济之中何以产生利润这一谜题。必要的前提在于，“市场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这个商品是“价值的来源”。（MEW 23，第 181 页）准确来说，它能够以商品的时间单位增加价值，甚至超过他们（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以时间单位折算）。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状态造成了这样的差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要么通过提高工人的消费品，要么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对于剥削而言，必要且足够的前提在于劳动时间长于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借助劳动产品对私人财产和剩余价值加以不平等的占有。

由于剥削与劳动时间的转移有关，故对剥削的理解不应该与“压迫”或者“异化”等同。然而，经济交易双方的对抗必然带来“异化”的因素，剥削才由此从劳动时间不平等的转移中产生。所谓的占有劳动的“他者”，并非某个任意的第二主体，而是另外一个阶级的成员。故而，阶级的概念并非是从剥削推导而出，相反，剥削概念预设了阶级概念。如果不预设对抗的关系，那么但凡劳动时间无偿地从一个活动者转移到另一个活动者，即便典型的亲密、团结的关系，也可以说成是剥削关系了。举例而言，那么人们或许可以宣称，由于只存在单方面教育时间的转移，孩子们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剥削了父母。 739

马克思对剥削概念的理解以及他所宣称的资本主义之中的剥削的存在一直以来饱受批评。有的人意图否认剥削的存在，有的人尝试用一个更普遍的剥削理论框架来完善马克思的剥削观念，消除马克思的剥削观念所特有的价值理论痕迹（Holländer 1982；Roemer 1982a）。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工人运动的概念。其他的剥削概念则可以想见，比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当工人工资低于工人劳动的边际产量时，才存在剥削（参见 Gerster 1973）。利润是时间偏好和风险的补偿，剥削并非建立在此。森岛通夫（Morishima）（1973）在置盐信雄（Okishio）（1963）早年一篇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证明。证明表明了以下等式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是正值的时候，资本

主义经济里才存在正值的价格利润。在森岛通夫的书出版后，紧接着出现了针对如下的问题的讨论，对于更加复杂的情形，比如联合生产以及不同等级资质的工作，所谓的“**马克思基础理论**”（参见附录）是否仍然是有效的；一些人试图说明，马克思的理论的有效性也只是前提假设，不能用它来证明剥削。一方面，剥削与利润是因果关系并非是平等的关系（马克思：剥削是利润的原因或是“源头”）；另一方面，所有的剥削的证明都是在森岛通夫承认了生产技术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生产技术保证了每个产品每年所生产的多于所消耗的。萨缪尔森（Samuelson）（1971）试图
740 证明并非剩余价值率而是生产技术导致了利润率。但是此批判是错误的，因为并非生产技术而是劳动时间的规定造成了剩余。工人的工作时间被规定为必须长于他们生产他们自己的生存资料（或等价物）耗费的时间（参见 Elster 1985，Kap.4）。

另外的问题在于，剥削的事实是否可以还原到再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实际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马克思对剩余劳动的定义（每天的劳动时间减必要的劳动时间）也许可以接受这个解释。如果工人消费品所需劳动时间短于工作日，虽然剩余价值率是正值，但是剩余价值率假定了剩余劳动为资本家们所有。仅仅只有在此预设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才可以还原到两种不同工作时间的差异上。在没有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的“理想”社会，这样的差异可能还会存在；在没有剥削的社会，差异可能消除，因为要么分配的公平意味着工资基于工作的成果（无劳动的收入被取缔），要么生产者自己享有产品的使用权。

从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出发导向了一个新的讨论：剥削是否也说明了劳动市场以外的关系。自列宁开始，剥削在马克思的帝国主义理论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因不平等交换的机制被富有的、工业发达的国家剥削。（以马克思为开端：MEW 23，第583 页及以下，MEW 26.3，第 101 页；参见 Emmanuel 1972；批判：Schmidt，1979）华勒斯坦（Wallerstein）批评了国际贸易之中不平等交换的前提，即资本主义核心国与其他国家的剩余交换：“资本主义乃中心国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对国民经济剩余（盈余）的占有”（Wallerstein 1979，第 47 页）。悬而未决的是，基于怎样的因果机制，富国能够占有穷国的剩余价值。由于发达国家间的商品 741
交换在国际贸易中占更大比重，此理论没有太多经验支持。

在女权主义的讨论中，家务和家庭被视作男人或是资本主义以间接的方式

对女性的剥削（参见 Folbre 1981）。马克思所论的薪酬平衡指的是薪酬与市场上的劳动力消费品等价，但是没有提及家庭内的劳动力再生产。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将资本主义剥削（对剩余劳动的剥夺）看作是普遍剥削的一个案例，它基于不平等的资源配备。（参见 Roemer 1982b）他们试图在没有价值理论的前提下重新思考剥削概念（Roemer 1982a；另参见 Holländer 1982）。在剥削的博弈论式的理解中，罗默（Roemer）没有把劳动价值，而是把（广义的）所有制关系列为剥削理论的核心概念。罗默把经济设想为各有特定支付规则的“博弈”。如果各种博弈的规则决定了，被剥削者可以另选出路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果被剥削者“离赛”，同时会给剥削者带来不利影响），那么个人或个人所组成的群体则受到了剥削。如果个人或群体通过法律的解放改善自己的处境（同时保留财产差异），那就是封建的剥削；如果个人或群体全都依靠让渡产权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如果个人或群体通过拉平已有的资格和技能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那就是“社会主义”剥削式的“经济博弈”。

附录：

在文献之中可以找到各种形式上互相偏离的有关剥削的证据。所有文献指出，尽管剩余价值率的水平取决于商品价值以及工人的消费，在方程式组里，剩余价值率是正值，当且仅当对均衡价格而言所决定的利润率是正值。以森岛通夫的理论为基础的证明提纲在复杂的数学证明中具有优先权，因为它预设了基本的矩阵运算的知识。

下面两个方程组，可以完整描述利 742
润率相等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生产、生存工资等所有领域：

（1）$\mathbf{p} = (1 + r)(\mathbf{pA} + w\boldsymbol{l})$

（2）$wT = \mathbf{pB}$

p 是均衡价格的行向量，**A** 是投入系数 a^{ij} 的矩阵，指明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商品 j 需要多少个单位的商品 i，$\boldsymbol{l}$ 是直接劳动投入的行向量，**B** 是工人每天消费的列向量，r 是（价格）利润率，w 是名义酬劳，T 是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工作日的长度）。根据 **p** 展开方程（1）：

（1’）$\mathbf{p} = w(1 + r)\boldsymbol{l}[\mathbf{I} - (1+r)\mathbf{A}]^{-1}$

两边同时乘以 **B**，wT（方程 2）取代了 **pB**，两边同时除以 wT 得到

（3）$1 = (1 + r)\boldsymbol{l}[\mathbf{I} - (1+r)\mathbf{A}]^{-1}\mathbf{B}/T$

如同方程（3）所指出来的，当且仅当不等式（4）成立时，方程（3）所确定的利润率才是正值：

（4）$\boldsymbol{l}(\mathbf{I} - \mathbf{A})^{-1}\mathbf{B}/T < 1$

若 r =0，方程式（3）就成为 1= *l*（**I** − **A**）$^{-1}$**B** / T。要满足（4）的条件，必须保证 r>0。为了理解，这个条件的实现就是剥削，必须进一步观察在方程式（4）中的表达 *l*（**I** − **A**）$^{-1}$。这个表达是商品价值方程组的答案

（5）$\lambda = \lambda \mathbf{A} + \boldsymbol{l}$

λ 是商品价值的行向量，A 是资本输入的行向量（马克思概念之中的“死”劳动）

根据 λ 解开方程式（5）得到：（5’）$\lambda = \boldsymbol{l}(\mathbf{I} - \mathbf{A})^{-1}$

借助方程式（5’），不等式（4）变成

（6）$\lambda \mathbf{B} / T < 1$ 或者 $\lambda \mathbf{B} < T$

所以，当且仅当工人消费中所包含的劳动量（λ**B**）小于工人一天中付出的劳动（T），利润率才会是正值。如前所述，最后这个条件等价于剩余价值率为正值。

参考文献：

A.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1972; J.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N. Folbre, »Exploitation Comes Home: A Critique of the Marxian Theory of Family Labour«, 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2, Bd. 6, 317-329; R. Gerster, *Ausbeutung. Agonie ein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 Zürich 1973; H. Holländer, »Class Antagonism. Exploitation and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Economic journal* 92, 1982, 868-885; M.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 1973; N. Okishio, »A Mathemati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 in: *Weltwirtschafiliches Archiv* 91, 1963, 287ff (dt. in: H. G. Nutzinger u. E. Wolfstetter, *Die Marxsche Theorie und ihre Kritik*, Bd. 2, Frankfurt/M 1979); A. Reeve, *Modern Theories of Exploitation*, London 1987; J.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1982 (a); ders., »New Directions in the Marxian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in: *Politics and Society*, H. 11, 1982(b), 253-287; P.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1, Bd. 9, 339-431 (dt. in: Nutzinger/Wolfstetter, aaO.); A. Schmidt,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oder ungleicher Tausch. Kontroversen über den Handel zwischen Industrie- und Entwicklungländern*, Frankfurt/M-New York 1979; J. Wallerstei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s kapitalistischen Weltsystems. Zur Grundlegung vergleichender

Analyse«, in: D. Senghaas (Hg.), *Kapitalistische Weltökonomie. Kontroversen über ihren Ursprung und ihre Entwicklungsdynamik*, Frankfurt/M 1979, 31ff; ders., *Der historische Kapitalismus*, Berlin/W 1984.

约翰尼斯·伯杰
（Johannes Berger）撰
贺腾译，曹旸校

参见：

Analytischer Marxismus, Aneignung, Antagonismus, Arbeitskraft, Arbeitsmarkt,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isponible Zeit, Distribution, Eigentum, Entfremdung, Familienarbeit, Feudalismus, gerechter Lohn, Gerechtigkeit, Hausarbeit, Herrschaft, Kapitalistenklasse, Klassen, Markt, Mehrarbeit, Mehrwert, Normen, Privateigentum, Produktion, Reproduktion, sekundäre Ausbeutung, Sklaverei, Surplus, ungleicher Tausch, Unterdrückung, Wertgesetz, Zentrum/Peripherie

奥斯维辛（Auschwitz）

奥斯维辛（波兰语：Oświęcim）是位于波兰卡托维兹和克拉科夫之间的一个小地方。在奥斯维辛有1940年建造的最大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1941年10月，苏联战俘在附近建造了比克瑙死亡工厂（Brzezinka）。1942年夏主要在莫诺维茨建立了劳教所，作为IG法本公司的橡胶工厂。在这里，按照“最终解决方案”框架实行了“劳动灭绝”。

奥斯维辛同时成了集中营和纳粹“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同义词。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多次提到奥斯维辛的地方是在关于纳粹独裁和它的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功能的论述中。国家历史学家则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事件，常见的描述是将奥斯维辛描述为波兰或者犹太人的“国家殉难”。学者和媒体人主要是用“大屠杀”来定位奥斯维辛，并认为纳粹的大屠杀政策大多来自反犹太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和官方的共产党纪念政策中忽视了纳粹主义中犹太人的特殊受害者身份。直到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前，都没有出现描述奥斯维辛和反犹太主义之间联系的学术作品。 744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不足和它在处理反犹太主义的不足，在于它只拘泥于功能性的解释方式。因此它系统性地忽略了奥斯维辛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过程中，目的—手段之间的关系被打乱了。沃尔弗冈·海泽（Wolfgang Heise）认为，“是

人类促进了灭绝制度的产生……直接根源是来自剥削关系。种族主义等词语掩盖了一种更深层次的现实，即一种只把工人当作达到资本目的手段的体系，这种体系在巩固和扩展后就变成了人类灭绝制度”（1961，第1439页）。之后库尔特·佩茨沃德（Kurt Pätzold）修改并扩展了这种解释：“探查在帝国主义总目标基础上形成的根本利益（包括大规模屠杀所带来的好处）就是在反击每一个粗俗物质主义的、只关注经济的畸形的扭曲。并且这种探查避免了对意识形态相对独立作用的影响。”（1984，第25页）但这些只是起到了意识上的限制，并未在奥斯维辛事件中（反犹太主义一直以来的目标）起到作用。“反犹太主义是剥削阶级用来稳定和扩大权力地位的最残酷的武器之一。”（Mohrmann 1972，第11—12页）

将具体历史现象归纳为社会统治的理性表达的做法，在需要找罪魁祸首时，这种做法就反过来变成了主观主义和个人化。佩茨沃德提到了“政治犯罪”。为了实现在历史政治中的持续性（从帝国—魏玛—纳粹主义—联邦德国），付出的代价就是去剔除纳粹的灭绝政策和反犹太主义的特征。最初，纳粹分子凭借着政治上的反犹太主义传统（如基督教对仇视犹太人的合法化传统）将反犹太主义带入了现实社会中。纳粹将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形态和反革命暴力的行为混合在一起，这种方式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自由军团。而希特勒（Hitler）本人则试图将纳粹从反犹太主义运动的传统形式中分离出来。1919年以来他明确提出对“感觉上的反犹太主义”的反对，而大力宣扬一种“理性的反犹太主义”，其含义是对犹太人进行更加严谨、全面的驱逐和歼灭。如果撇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俄国十月革命和德国十一月革命，人们是很难理解纳粹政策和在战争、内战中组织起来的武装组织的极端性。

直接动员群众去反对犹太人的做法，效果十分有限——这种做法主要存在发生在1933年到1938年所谓的“帝国水晶之夜”发生之前，换言之，这种做法存在于——通过官僚和行政方式组织的大屠杀——之前。自希特勒政府成立以来，国家政策中出现了对犹太的公开孤立和羞辱（包括纽伦堡法、种族亵渎法、公务员恢复职务法、犹太人被迫使用特殊名字和佩戴黄星，等等）。在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管理下，1933年以后产生了一种集中营制度，即将政治犯、罪犯（职业罪犯），以及社会上的非主流其他团体（同性恋者、《圣经》研究者）等关进集中营，对其囚禁和恐吓。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达豪集中营。之后的灭绝营的工作人员就是从这些集中营的卫兵中

招募的。医院中的医务人员也已经开始为“消灭微不足道的人”而做准备，具体就是将医疗目标定位对智障人员的安乐死，1939 年开战后德国已经系统性地使用这种安乐死方式，直到在 1941 年发生的抗议尤其是教会的抗议后，其使用得到限制。

入侵波兰后，犹太人开始被集中到了犹太聚集区（Ghettos），并通过“突击队”对犹太人进行了有组织的屠杀。这些“特殊行动”往往会和对特定人群（如波兰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枪毙一同进行。 德国入侵苏联后，实现了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主义在意识形态、实践上的结合。“委员会的命令（Komissarbefehl）”中做出将共产党干部和犹太人视为同一类杀害目标的决定。“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被嵌入到了“德国以东”（deutschen Ostens）的殖民概念中，具体内容有根除共产主义和犹太教，大规模打击和征服斯拉夫民族。

746 在柏林万湖会议（1942 年 1 月 20 日），按照“最高指令，海德里希（Heydrich）提出了对犹太人的集中化；并开始将犹太人大规模向奥斯维辛驱逐。甚至当德国军队出现运输能力不足的时候，同时还用上了牛车来运输。向奥斯维辛行进过程中，很多虚弱的人因此丧命，他们原本就已经在犹太区受到了饥饿和病痛的生命威胁。在灭绝营中，屠杀方式由原来的击毙（如“突击队”所做的那样）改成了使用毒气和“劳动灭绝”的方式。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集中营的行径被公之于众，举世震惊。苏联在外交上改变了对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定居项目的态度，转而支持以色列建国。1947 年苏联特使葛罗米柯（Gromyko）面对国际舆论说道（引自 Frei 1965，第 160 页）：“事实上，没有一个西欧国家有这样的能力去确保犹太民族的基本权利，没有能力去保护其免受法西斯刽子手的暴力行为。……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表达了想要建立自己国家的意愿。……否认犹太民族的这些权利是完全不合理。”但与此同时，在苏联又兴起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又以国际性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Antizionismus）的形象出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犹太受害者被算入了苏联的人口损失中，但并没有特别提到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和苏联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出境。

奥斯维辛事件迫使马克思主义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批评者开始反思原先的批评观点。其中以伊萨克·多伊彻为代表，他开始质疑是否还能用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流行的理性主义去解释奥斯维辛：“对于想了解犹太人大规模灭绝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一可怕行径的

绝对唯一性。……我相信就算一千年后也没有人能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地理解希特勒、奥斯维辛、麦达内克（Maidanek）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1977，第104页）

批判理论试图用认知心理学去理解反犹太主义。这么做不是为了在心理学上将反犹太主义更加学术化，而是试图去解释意识形态和潜意识是如何在人脑中运行的。继霍克海默之后，阿多诺在1966年提出了“绝对命令”的概念，
747 即“通过规范思维和行动以确保奥斯维辛不再重演，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Negative Dialektik*，第358页；以及Schweppenhäuser 1993，第185页及以下）。奥斯维辛事件非常明显地突出了在此之前所有对反犹太主义解释的局限性。因此不能单从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或利益去理解奥斯维辛的产生。在国际史学界，这个问题的提出成了“意向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点（参见Kershaw 1994）。

再次出现的反犹太主义行为和成见使得“永恒的反犹太主义”再次回归，尽管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德国可以看到对它的公共禁忌化。或者也正可能是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公共禁忌化导致了反犹太主义的回潮。马克西姆·罗丁森（Maxime Rodinson）对“永恒反犹太主义”理论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莱昂·波里亚克夫（Léon Poliakov）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驳。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学者能够在很多相似现象中发现具体差异的能力。“启蒙辩证法”就能很好地避免“现代矛盾”理论（Bauman 1992）所带来的歧义之处。尽管有着想要全面批判集权主义的明确愿望，但鲍曼（Bauman）在其理论的结尾中，并没有采取汉娜·阿伦特那样历史分层的方式，而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犯罪”论点一样以希特勒大屠杀结尾。于是奥斯维辛被概括为“世纪之营”。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同名电视剧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大屠杀**”（*Holocaust*）这个名字已经取代了奥斯维辛的含义。同时大众传媒开始将纳粹的战争政策和灭绝政策，与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犹太人在欧洲散居地的历史混为一体。不过也有人对“大屠杀”提出了批判，因为这个单词在基督教含义中代表的是燔祭，因此其语义不明。从犹太民族的角度出发，其更倾向于使用单词**浩劫**（*Schoah*），尽管这样就意味着将奥斯维辛事件纳入到了“犹太人连续的历史”中，但同时这也有助于去剥离犹太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联系。相比上面的种种情况，只使用奥斯维辛这个单词则显得更加简单明确了，因为上面这些名词都希望借助这个事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促使某事情的合法性。总之，

使用奥斯维辛这个名词，能够凸显其时空的独特性，能够明确指出德国纳粹在追求世界权力时所犯下的罪行，能够保证不漏掉任何受害群体，以及能够明确地将作为纳粹灭绝政策和集中营体系代名词的奥斯维辛和与古拉格群岛体制相分隔开。

748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in: GS 6; H. Arendt, *Elemente und Ursprünge totaler Herrschaft*,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5; Z. Bauman, *Dialektik der Ordnung. Die Moderne und der Holocaust*, Hamburg 1992; D. Claussen,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Zur gesellschaftlichen Genes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87, 1994; I. Deutscher, *Die ungelöste Judenfrage*, Berlin/W 1988 *(The Non-Jewish Jew 1977)*; B. Frei, *Israel zwischen den Fronten*,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5; W. Heise, »Antisemitismus und Antikommunismus«, in: *DZPh*, 9. Jg., 1961, 1423ff; M.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in: *ZfS*, 8. Jg., 1939, 115-137 (wieder in: GS 4, 308-331); ders., u. Th. W. Adorno, »Elemente des Antisemitismus.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1944), in: dies.,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dorno, GS 3, 192-234); dies., Vorwort zu Massing, *Vorgeschichte des politisch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59; I. Kershaw, *Der NS-Staat, Geschichtsinterpretationen und Kontroversen im Überblick*, Reinbek 1994; W. Mohrmann, *Antisemitismus*, Berlin/DDR 1972; K. Pätzold (Hg.), *Verfolgung, Vertreibung, Vernichtung*, Frankfurt/M 1984; L. Poliakov, *Vom Antizionismus zum Antisemitismus*, Vorw. v. D. Claussen, Freiburg 1992; M. Rodinson, »Mito dell' eterno antisemitismo e realtá giudeofobe«, in: *Per un Palestinese*, Mailand 1979; ders., »Quelques thèses critiques sur la démarche poliakovienne«, in: M. Olender (Hg.), *Le racismemythes et science*, Brüssel 1981; R. Rürup, *Emanzipation und Antisemitismus*, Göttingen 1975; G. Schweppenhäuser, *Ethik nach Auschwitz. 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 Hamburg 1993; W. Sofsky, *Die Ordnung des Terrors. Das Konzentrationslager*, Frankfurt/M 1993; A. Sohn-Rethel, *Class Structure of German Fascism*, London 1978.

德特勒夫·克劳生 撰

盛舒洋 译，贺腾 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ntisemitismus, Destruktivkräfte, Deutsche Misere, Faschismus,

GULag, Irrationalismus, Juden, National-sozialismus, Rationalität, Rassismus

表现（Ausdruck）

“表现”这一思想若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得以澄清，便可呈现自莱布尼茨（Leibniz）开始，经由黑格尔、洪堡（Humboldt）再到狄尔泰（Dilthey）的哲学发展脉络。（据此）思想与行为方式可以还原为整体的部分，这一做法往往是被批判的对象。受卢卡奇的启发，阿尔都塞使用“结构的因果性”来反对莱布尼茨的表现模式。他认为，还原的做法是“为了理解整体对部分要素的作用”且支配了“黑格尔的全部思想”。（*DKL*，第 251 页）此模型预设“整体可以还原
749 到统一的内在原则上，即**内在的本质**（*inneres Wesen*），且以其要素作为现实的表现形式。内在本质在每一时刻以某种方式成为现实，借此使得‘要素’（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学、文学以及宗教的要素）等同于‘整体的内在本质’”（同上）。

《表现整体的批判》（*Kritik der expressiven Totalität*）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的沃洛希诺夫（Vološinov）、布莱希特和本雅明。虽然马克思对此没有明确的概念讨论，但是他在与黑格尔哲学及其跟随者对战的过程中注意到且处理了这个话题。

1. 表现问题的功能和效果不能与精神哲学的前提分离开来。黑格尔对历史与社会的理解业已范式化。世界历史被看作是“自由精神及其实现的意识发展”。由此出发，他将每一阶段的历史与文化的本质原则视作“特殊的民族精神”。“（精神）具体地表现出自己的意识、意志以及全部现实的方方面面”：“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体系、习俗、科学、艺术以及技术的熟练等共同体的对话均源于表现。特性需要从整体的特性以及民族的独特原则出发加以理解”。（*PhilGesch*，W 12，第 86—87 页）此方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要素理解为**整体的部分**（*pars totalis*）：每一个部分都是作为基础本质的整体的直接表达。如果还原到简单原则会导致经验的贫瘠化以及对特殊性与复杂性的削弱，那么借助“表现”来构想这一难题的想法在黑格尔纲领式的本质主义里尚未出现。黑格尔并非只是将不同的社会的实践领域仅理解为以机械的方式互相连接的组织，而是认为它们具有内在的秩序。尽管基 750
于他理想的立场，此问题仍然属于还原的表现难题之内，他所讨论的“共同体的对话”展示出了过度决定的问题，即

不同元素所构成的整体内的支配关系问题。另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本质并非可以无条件地从现象中得以解读。与自发给予物保持一定距离以及先在的知识能力都是必要的前提。黑格尔举例道，开普勒用几何学知识来构建科学定律。“那些没有普遍原则的知识，无论他们观察多久的天体与星辰的运动，都无法认识这条定律。”（同上书，第 87 页）黑格尔在历史研究所使用的类比关系值得怀疑，他将“已经获悉的理念”（同上）预设为分析的前提。必然需要批判追问的就在于“表现”被掩盖了并且在奠基性的精神实在性中得以构想。

2. 除了表现与认识论的关联，马克思的术语“表现”还具有其他的意义。（1）“表现”作为语言术语的同义词：“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 ……”（*K I*, MEW 23，第 559 页）（2）“价值表现”具有人类行为学的意义（参见上书，第 63 页及以下）。商品交换必须在平等交换的前提下才能表现出来。（3）“虚构的用语”（同上书，第 559 页）以比喻的方式借用了数学语言。“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的表现是“劳动的价值与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同上书，第 562 页），于是“虚构的用语，就像说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同上书，第 559 页）。表现是“虚幻的或是不合理的”（同上书，第 561 页），因为它“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同上书，第 562 页）。由于它作为“客观的思维形式”（参见上书，第 90 页）在既有的实践之中具有根基，所有不能仅仅简单地视作是无意义的，在主体化的范围内现实地起着作用。（4）作为象征或标志：“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MEW 1，第 378 页）（5）青年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表现思想是充满歧义的。对黑格尔的批判以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在黑格尔主义的思想中已经体现出来了。他批判了市民经济学仅仅只是从“人们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MEW 40，第 510 页）。经济法则必须从“私人财产的本质”（同上）中产生。这个批判以对现实关系的充足理解为目标，对于二元论（外在 / 内在、本质 / 现象、表层 / 深层）的接受，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双重化还会余音缭绕，现实仅仅会被理解为深层次的必然性的容易逝去的表现形式。 751

在《哲学的贫困》（1846—1847）一

书中，马克思批评了蒲鲁东的格式塔理论中也出现过的表现思想。“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MEW 4，第 130 页）蒲鲁东对确定不变的市民经济学范畴不甚满意，与此同时，“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同上书，第 549 页）。他认为，这些范畴具有“逻辑”次序。马克思反对他把表现概念与表现思想对立。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发展不是逻辑的表现，相反，“逻辑”是现实发展的表现：“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发展，既然我们只希望在这些范畴中看到观念、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在纯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同上书，第 126 页）马克思的认识理论与此相对：他避免了精神哲学的过度决定，后者认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同上书，第 128 页），他转向了“现实个体、行动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研究（*DI*，MEW 3，第 27 页）。在《资本论》中，本质—现象的比喻被使用以便提出感性知识的框架及知识概念与自发未经反省的认识之间的区别。马克思强调，“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K III*，MEM 25，第 324 页）。还原到“内在”的现象运动是值得怀疑的；这并非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于现实的二分有关，两个不同的认识方式应该以一种且是同一种方式被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将科学的理性置于那种未经批判的观念的背后，后一种观念仅仅只是感性的或是意见的呈现，科学理性在现成之物和它自身的影响中重构这些所予。 752

3.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教程经典文本。他使用了“全体的角度”（Gesichtspunkt der Totalität）。此方法的本质在于全体的范畴，即全面的、规定性的整体对部分具有统治权。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而且原创性地转化为全新科学的基础（*GuK*，第 39 页）。这个方法的重点在于标记了朝向“机会主义的社会民族理论以及革命自由发展”的政治进步，被表达为“黑格尔主义的‘辩证诡计’的解放”以及“对‘事实’‘朴实’、‘无偏见’的研究”。（同上书，第 17 页）这里的引号所标记的不是与伯恩施坦的理性

立场相对的批判式的理解。卢卡奇的革命乐观主义将此托付给了事实的世界，反对了辩证的话题（关系的思想、物质中的矛盾、结构变化的可能），而且穿上了黑格尔的外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还原的方式被理解。“整体的统治权”表明“部分在整体中找到它们的概念和真实”。（同上书，第 22 页）社会关系总体的复杂性以及个体实践的特殊性将被还原到“所有对象形式的原像”上：“因为不存在人性的发展阶段这一问题，最终分析也不能加以解释，在商品的**结构**之中也找不到答案。”（同上书，第 94 页）

753 卢卡奇的立场被阿尔都塞以及他的同事们在《读〈资本论〉》之中批判为表现总体的观点“完全还原到另外的、更为绝对的基准点结构，正如原文和诸多翻译之间的关系”（*DKL*，第 335 页）。在卢卡奇看来，理论实践隶属于双重的神话；理论家们的工作消失了且无法让人理解。一方面，他谈及了“现实的自我认识理论的功能”（同上书，第 29 页）以及“现实内在的意义总是从自身发出更强的光芒”（同上书，第 38 页）。另一方面，历史过程的本质通过无产阶级得以自我表达。若借用黑格尔的精神类比，它可被构想为“自身知识的主体和客体”（同上书，第 34 页）。无产阶级依赖于（掌握了）必然性的执行者。“如同黑格尔（对人民的理解）所正确理解的那样，带领人类向更高的阶段发展的使命感建立在‘现有的、发展的等级作为直接的自然原则’的基础上，属于‘作为自然原则的契机’民族（阶级）加以执行。”（同上书，第 38—39 页）

4. 沃洛希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arxismus und Sprachphilosophie*）（1929）一书中进行了对表现理论的批判。总体的框架是批判将意识形态相关的现象纳入意识之中。通过这样的术语转移（不同于马克思所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通过非个性化的共性处理剥夺了意识形态概念），他论证道：“意识形态的创造，物质与社会的事实会在个人意识的范围内留下印记。另一方面，个人的意识若失去了现实中的支持，便会成为一切或者虚无。”（第 58 页）他认为表现理论和意识哲学一样，持有内在与外在之分的二元论。表现的两个元素的关系“表达（Auszudrückende）（内在）以及它外化的对象（äußere Objektivation）”，如此被理解，以至于“表现能够以某种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和存在”。（同上书，第 143—144 页）这样的立场预设了内在的确定的优先权，因为“每一个客观化（表现）的行为都自内向外地运动……所有的本质都是内在的，而且外在的仅仅只是内在的器皿，精神的表现”（同上书，第 144 页）。沃洛希诺夫批判了唯心

754 论的二元论，“没有符号的体现就不存在生活经验。因此，根本不存在内在与外在的本质差别”（同上书，第 145 页）。另外，“表现的外化为具有外在的条件，尤其是**直接的社会状况**”（同上）。于是便为语义—社会学开启了“日常意识形态”的领域（同上书，第 152 页）。这与卢卡奇的黑格尔式的—总体的观点有所区别，日常生活的态度和意见比“建构的意识形态更有活力且不安分”（同上书，第 154 页）。这样的倾向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是不能实现的。然而，在列宁的解决方式之中可以看到国家垄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LW 32，第 73 页）。这个句子的意思是，“政治是必然地对经济有优先权”（同上）。此外，列宁还将其与先锋队理论联系起来，就这点而言，整体的解释借助中央机关而预先形成。列宁知道“由多个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同上书，第 4 页），里面不同元素的结构与它们之间的要求（政党、苏联、工厂，不同的阶级，它们因为不同的利益、教育程度而不同）。他所说的“传输”（同上）不应该服从纵向的决定逻辑。然而，列宁的选择“以革命的目标为根据”反对“形式上的民主”。列宁坚信，政党的团结会加强行动能力（公开性会产生新的问题）。然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事实却反驳了此观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党内领袖的政治本质主义，领袖每一次的战略改变都被看作是社会的客观规律。

5. 物质美学（布莱希特、艾斯勒、皮斯卡托［Piscator］、哈特菲尔德［Heartfield］）以及本雅明受到苏联早期批判的影响，他们以此反对表现美学。《作为生产者的作者》（*Autor als Produzent*）不再是传统的、内在的表现主体。“特莱·杰亚考夫（Sergej Tretjakow）以及由他所定义和代表的‘创作’中的作者”（同上书，第 686 页）与本雅明的思想很相似，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使命是干预文化政治， 755
以便能够“展现当代文学活力”（同上书，第 687 页）。“生活关系的文学化”（同上书，第 688 页）不仅仅变革了艺术的形式，而且也变革了文化的竞争关系。报纸项目的范式化 —— “不再是以往小说的内容，其内容也不再是固定的”（同上书，第 687 页）。“文学权限不再建立在特殊的而是在多技术的教育背景之上，共有的精神财富也是如此。”（同上书，第 688 页）与传统文化机构的关系被理解为是功能转化。这就意味着“不用提供生产设备，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的意义上加以改造”（同上书，第 691 页），因此，艺术技术的领域获得了新的意义。对于艺术的评价应该基于形式上的新意，“这样的新意应该被描述为艺术的方法，而不仅只是天才的表现形式”（Brecht，GW 19，第 287 页）。除了

对主体表现的批判，“不仅只是”还意味着“绝对”。现实的书写方式的特变不在于“幻象，表现的愉悦（新的表现、个体的表现）”（同上书，第 296 页）。

6. 对表现思想的主要批评在于经验的贫瘠以及借助这样的思维方式将新的事物在新的关系之中加以观察和分析的不可能性。理论的前知与经验的研究将被构想为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将在不同的模式中进行。“在解释性的思想”中，“现实被理解为直观、预先被想事物的说明”。（PAQ，第 54 页）这种“指示性思想”将分析数据的关系整理为“简单的因果关联”。“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人们不能获悉人们提前并不知道的现实。此外，资料的选择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基础仅仅在于研究者的任意而并非是事物自身的运动。”（同上书，第 55 页）最后，这些“基本思想将变化看作是‘目标形式’的‘基础’、微型图”（同上书，第 59 页），行动者却消失了。所有的研究路径“总是忘记行动者们自己制造着他们的生活，他们具体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于矛盾的解决既不服从精准的法则，也不能通过理论加以推导”（同上书，第 60 页）。问题在于：“对新的事物的发现使得人们追问，为什么人们事先没有此思想？”（同上书，第 61 页）对表现思想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将此“困境”视为缺陷。

参考文献：

W. Benjamin，»Der Autor als Produzent«（1934), GS II.2, 683ff;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Automationsarbeit: Empirie 1*, AS 43, Berlin/W 1980; V. N. Vološinov, *Marxismus und Sprachphilosophie*, Frankfurt/M-Berlin-Wien 1975.

蒂洛·威特（Thilo Witt）撰

贺腾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lltag, Alltagsforschung, Artikulation/Gliederung, Denkform, Dialekt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 Erscheinungsform, Hegelianismus, Hermeneutik, Ideologie, Kompetenz/Inkompetenz, Materialästhetik, Oberfläche/Tiefe, objektive Gedankenform, Reduktionismus, Schein, Semiotik, Sprachphilosophie, strukturelle Kausalität, Totalität, Überdeterminierung, Wesen/Erscheinung, Zeichen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

从 1900 年左右所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派（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

法亭、卡尔·伦纳、奥托·鲍威尔）的出现到1934年二月革命失败，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中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理论和实践流派，这就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在1908年由美国社会主义者布丹创造出来；它的支持者和批评者都没有为它下过明确的定义。1927年，鲍威尔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特点描述为：以非教条主义的方式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和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革命期间，这个学派在内部的派别斗争中解体了。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赞同林茨纲领（“第三条道路”）。这个纲领把冷静的现实主义政策和革命的热情相结合，并由此把工人运动两大主要流派的要求合而为一。

757 1.“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处理马克思的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特色，首先在1898年到1914年之间关于修正主义的讨论中体现出来。在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争论中，后者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但是对于伯恩施坦提出的批评，人们也持开放态度。在围绕党纲（1901年）的新文稿而展开的讨论中，在“青年学派”的带有麦克斯·阿德勒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烙印的理论作品中，这一点变得明晰起来。这一理论作品发表在《马克思研究》（*Marx-Studien*）和《斗争》（*Der Kampf*）（维也纳版）杂志上。尽管这两家期刊的主张对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DAPÖ）的思想面貌起过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1918年之前，它们的立场不被视为党的官方立场。

由于在维也纳大学的“学术土壤”中成长，（未来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同例如梅林和潘涅库克（Pannekoek）有着不一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和思想方法同整个现代精神生活有意识地结合起来”（Adler / Hilferding 1904），才能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即将迈入20世纪之际，维也纳是科学创新和艺术革新的中心（国民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说、精神分析、物理学和马赫［Mach］的认识论、维也纳现代派）。对于每一种形式的科学思想可能带来的知识进步的开放态度，使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避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即将陷入的那种自我孤立的境地。

对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领袖的思想形成历程来说，在社会科学学者中间展开的、关于同自然知识相区别的历史的、社会的认识（门格尔［Menger］、施莫勒［Schmoller］、文德尔班［Windelband］、李凯尔特、狄尔泰、施塔姆勒［Stammler］）的可能性与

特殊性的激烈讨论起了决定性作用。为了捍卫作为一门揭示客观因果律的科学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考茨基），他们不仅在问题的提出上（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的必然性），而且在思想材料和方法论上（新康德主义的和马赫的认识批判）批判性地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这些争论的成果全都被发表在《马克思研究》上，其中包括麦克斯·阿德勒发表于1904年的《科学争论中的因果论与目的论》（*Kausalität und Teleologie im Streite um die Wissenschaft*）、鲍威尔发表于1907年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Sozialdemokratie*）和希法亭发表于1910年的《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等著作。这些著作很快招来了批判，被指责在认识论方面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受新康德主义的方法论讨论的影响，麦克斯·阿德勒及
758 其圈子还是提出了一种对于“从黑格尔到马克思都运用过的辩证方法”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他们的时代而言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并启发了各个学科的研究。（参见 Adler 1907）同样，他们在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意识也远远超前于同时代那些哲学唯物主义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概念抽象的本质，客观性存在的理由，等等）。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拒绝把自然科学思想（机械因果论）套用到对社会的认识方面，并不就是说，它否认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产生普遍有效的认识，而是说要探索其特殊性。基于对康德和马克思的综合，麦克斯·阿德勒强调主观经验以及以规范、目标和动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客观的、社会的因果联系的各种形态。“把价值世界和自然必然性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是很奇妙的，这样一来，社会生活领域的因果律就不再是盲目的起效了，……而是被其内在固有的、指向特定方向的形式关系所决定的。……人类的因果律就是……通过价值评估而产生的动机。”（1913，第13—14页）在坚持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同的基本看法（社会主义是客观的历史的必然，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制度具有阶级性）的基础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在麦克斯·阿德勒的影响下，努力献身于这样一桩事业，即让人们比考茨基的正统论更为注意他们所承认并主张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历史进程的意志和意识的方面——这个方面对考茨基的正统论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知识分子又努力与伯恩施坦和新康德主义者（柯亨［Cohen］、纳托尔普［Natorp］、施塔姆勒）的“伦理社会主义”（ethischer Sozialismus）严格划清界限。这样一来，社会主义便不至于在应然中即在对某种伦理理想的永恒追求中丧失自身，而是

不仅坚持了它的合规律性，又兼顾了它的可实现性。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哲学和社会理论上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种纷乱而迷惑的接受，直至这种接受变成了这样一种指责，即这些观点已经背弃了关于探究因果联系的社会科学的思想（*Filosofskaja enziklopedia* 1，第 19 页），但在这种接受的过程中，和许多“修正主义”命题的分歧也得到了强调（*Dizionario dei termini marxisti*，第 202 页）。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共同性就被打破了。鲍威尔疏远了康德主义，开始亲近哲学体系的社会学演绎（1916 年）；弗里茨·阿
759 德勒（Fritz Adler）致力于马赫的实证主义（1918 年）。但是，他们的拥护者却由于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开放和对考茨基的敬仰而继续团结在一起。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殊性有时也体现在（列宁和斯大林激烈反对的）民族问题解决方案中。这个方案的目的是在接受奥匈帝国君主制的“跨民族”国家联合的前提下保留文化自治权（伦纳、鲍威尔）。在受众中对这个方案有两种评价：有人说它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PhWb 1，第 179 页）或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Filosofskaja enziklopedia* 1，第 19 页），也有人说它是一份开启民主解决道路的历史宣言（KWM 1，第 128—129 页）。1918 年，没有国家承担的各民族的文化自治没有阻止多民族国家的崩溃。此后，鉴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多民族国家设想在苏联和其他地方尤其是在南斯拉夫遇到困难，鲍威尔的观点才得以再次获得现实意义，因为重新觉醒的民族国家思想不可能解决民族问题。

2.“学派”（除了伦纳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推行的考茨基方针（帝国主义理论，不仅拒绝社会爱国主义的保卫祖国方案，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战争为内战的方案）在战时还属于少数派的立场，到了 1917 年却作为党的多数派立场予以贯彻了。自 1917 年和 1918 年以来，这个方针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打造了一个——用鲍威尔富有个性的说法来说——“中派”的形象（PhWb 1，第 179 页；Wilczynski 1981，第 28 页）。有时（1914 年至 1917 年和 1927 年至 1934 年），这个派别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右派（伦纳）主导，马克思主义左派（麦克斯·阿德勒）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多亏党在实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持之间的联系只是有限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才阻止了奥地利工人运动的重大分裂。这可以被视为进入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继罗莎·卢

森堡提出她的论断之后（参见 GW 1/2，第 442—443 页），鲍威尔（1927 年）也在工人运动的分裂中看到了“清醒的现实政治”与“革命的热情”在组织上的独立化。他认为，这种独立化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日常政治利益和历史利益之间的对立，必须由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居间进行调停。1936 年，流亡在外的鲍威尔认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重新）打造这种统一，也就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整体社会主义”。（WA 4，第 296 页）

760 在从 1918 年和 1919 年革命到 1934 年教士等级的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的这段时间里，最有影响的要数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设想了。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这一构想力图在民主的议会制度和被这些制度合法化了的社会主义领导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转型。尽管就欧洲共产主义而言，第三条道路被当作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先驱而饱受赞赏（KWM 1，第 127 页），但它当时在各国要么遭到拒绝，要么受到打击（PhWb 1，第 180 页）。以此为基础的鲍威尔的国家观拒绝（在奥地利）实施少数人统治的苏维埃国家构想；它把议会制度看作一种国家类型。借助于这种国家类型，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能进行（阶级）统治，或是在“阶级力量均势”的情况下共同进行统治。（1923，第 214、242—245 页）只有用暴力攻击议会民主制，才会使工人阶级以专政的方式而非社会主义领导权的方式确立其统治。（1920，第 113—114 页）

卡尔·伦纳赞成那些被视为普世的、阶级中立的、越来越使社会生活“国家化”（durchstaatlichen）——在凯尔森（Kelsen）反对这些观点的意义上——的国家制度；他还主张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参与资产阶级政权。与此相反，左翼社会主义者麦克斯·阿德勒在遵循列宁的传统分析了社会及其议会制度的阶级性后，提出应把在国家消亡之前的过渡阶段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民主的多数原则结合起来（1922 年）。

1926 年，在经过激烈争论之后，由鲍威尔首创的第三条道路设想写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林茨纲领》，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指导思想，从而也就不仅同维护体制的改良道路，而且同在俄国的条件下形成的布尔什维克道路划清了界线。与葛兰西对于“游击战”和“阵地战”的对立或者各霸权集团的重要性的洞见相比，该纲领对俄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的不同构造的分析要领先一步（Albers 1983，第 19—22、38—51 页）；不仅如此，这个分析还解释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社会主义实验的特殊的既批判又团结的态度。在实践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既未能实现多数派的社会主

义领导权，也未能走上（与资产阶级达
761 成）“历史性的妥协”以抵制法西斯独裁行径的道路。

1926年纲领威胁说：如果民主阵地被资产阶级抛弃，那么为了保卫这个阵地，不得已时也要使用暴力。在1927年7月被挑起的骚乱中，这番威胁并没有得到落实，这让《林茨纲领》在朋友和敌人面前都颜面尽失。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在1927年7月和1934年2月的只不过是被动反应式的克制行为，更是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断遭到其批评者批判的观望立场暴露无遗。1927年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不再作为积极活动的力量出现在人们面前了：1934年奥地利工人的二月起义只不过是一次自下而上的绝望的行动，标志着其作为有组织的运动走到了终点（Bauer 1939，第83、102页）。关于《林茨纲领》在那个时候是否可以实现的讨论，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但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自动表明理论站不住脚。“也许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构想是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由那些因为太软弱而无法将其贯彻下去的人制定出来的。不过，它还没有失去吸引力。只要社会主义、团结和民主等概念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可能方案得到人们的认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就还会找到党内的拥护者。”（Pfabigan 1989，第11页）

相形之下，汲汲以求的“清醒的现实政治和革命的热情”的综合的第二面更为成功。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维也纳的时代，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社会政策（教育事业的民主化、社会住房建设、对工人的培训）取得了成功，其成果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世界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所破坏，但并没有被完全抹杀。

3. 接受史总是围绕着许多这样的问题而展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原初立场的创造性的继续发展，还是其变形或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否有重大突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是对更为统一的运动还是互相矛盾的、无法协调的各种立场的反映？

就社会民主党人的接受而言，用非马克思的思想工具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张产生了分裂的效应。伯恩施坦和他的追随者（坎普夫迈尔［Kampfmeyer］）感到受了打击；福伦德（Vorländer）和康拉德·施密特等康德主义者认识到，阿德勒的康德主义虽然反对马 762
克思主义的伦理化，但又对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持怀疑态度。像潘涅库克和梅林这样的正统派则把历史方法统统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否认其具有“逻辑”基础。对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被政治立场相左的学者如布鲁姆（O. Blum）和库诺用各种

各样的理由拒绝了，却又越来越为互相对立的思想家如马克（Marck）、布劳恩塔尔（Braunthal）、莱希特（Leichter）、克斯特（Köster）和布罗赫（Broch）所接受。在整个理论框架是否应被归入“伦理社会主义”范畴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也是不统一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马克、马尔托夫［Martow］、赛德维茨［Seydewitz］）赞成阿德勒和鲍威尔在国家问题上的看法（这解释了它们在左翼社会主义者中很受欢迎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又不同意这些看法的康德主义前提（森德［Szende］、罗纳伊［Ronai］）。

当时来自共产党的批判家（卢卡奇、德波林［Deborin］、塔尔海默［Thalheimer］、福加拉西、托洛茨基、布哈林、武尔姆［Wurm］）认为，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行列中主要是这样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拒绝苏维埃专政，并且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在马列主义的工具书中，这种看法被调整为这样一种批评，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在用“左的套话”掩盖反革命的改良主义。（*Filosofskaja enciklopedia* 1，第 18 页；PhWb 1，第 181 页）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及其揭示的部分真理几乎无人赞赏；个别学者的观点被转化成了整个学派的主张；政治—实践的立场和哲学—方法论上的立场被直接归并到了一起。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透过“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它将左翼社会主义、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Fogarasi）——的棱镜做出的批判不但丝毫没有赞赏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反而把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盟友拒之门外，而在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个盟友又一次成了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1945 年后，在冷战的影响下，共产党人受众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主要是：它是修正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一种危险而又善于伪装的形式。由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整个地归并到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即“伦理社会主义”）之下（里希特［Richter］），所以它一般不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归类法后来引起了一些争议（H. 克莱因［H. Klein］、莱尔克［Lerke］、默克尔［Möckel］），但也总有人持这样的看法（Kirchhoff 1974，第 1057 页；Kosing 1985，第 325 页）。

1945 年后，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受众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起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诺贝特·莱泽（Norbert Leser）运用麦克斯·阿德勒著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元素，来反对鲍威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伦纳（以及 P. 巴特［P. Barth］和伯恩施坦）的观点则被用于探

究鲍威尔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马克思主义主张的背景。如果说莱泽把他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径直等同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么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由阿尔弗雷德·法比干（Alfred Pfabigan）所首创的批判性分析就可以说追求的恰恰是相反的目标，那就是，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失败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形态的理论区分开来。

大概与此同时，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努力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时遇到了奥托·鲍威尔的理论著作，由此开启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德语区的多种多样的“复兴”，这种“复兴”也在马列主义派别内部引发了理论侧重点的转移和另一种批判。林茨的路德维希-波尔茨曼工人运动史研究所促进了对理论史和社会实践的整理；在《未来》（*Die Zukunft*）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spw*）等杂志上出现了关于鲍威尔的现实意义的争论，而在社会民主党之外，欣德尔什（Hindels）、阿本德罗特（Abendroth）、因格劳（Ingrao）等理论家在《观点》上和一系列关于鲍威尔的研讨会和会议上也发起了同样的讨论。讨论的成果，尤其是关于《林茨纲领》第三条道路设想的讨论的成果，被写入了青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赫尔福特论纲：论社会民主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1978，1981）。在这个背景下，德特勒夫·阿尔贝斯（Detlef Albers）由于他的研究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研究就是，通过对鲍威尔和葛兰西的比较分析，提出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构想。

参考文献：

F. Adler, *Ernst Machs Überwindung des mechanischen Materialismus*, Wien 1918; M. Adler, »Marx und die Dialektik« (1907), in: *DZPh*, 38. Jg. 1990, H. 9, 849-858; ders., *Marxistische Probleme* (1913), Berlin-Bonn-Bad Godesberg 1974; ders.,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1922), Darmstadt 1973;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on A. Pfabigan und N. Leser, Wien 1981; ders. u. R. Hilferding, »Vorwort«, in: *Marx-Studien*, Wien 1904, Bd. 1, VIIf; D. Alb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Marxismus*, Berlin/W 1983; ders. u. a., *Otto Bauer und der »Dritte Weg«. Die Wiederentdeckung des Austromarxismus durch Linkssozialisten und Eurokommunisten*, Frankfurt/M-New York 1979; O. Bauer, »Das Weltbild des Kapitalismus« (1916), in: WA 2; ders., »Austromarxismus« (1927), in: Pfabigan (Hg.), 1989, 14-17; ders., *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 Wien 1923; ders., *Bol-*

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ders., »Zwischen zwei Weltkriegen« (1936), in: WA 4; ders., *Die illegale Partei*. Aus dem unveröffentlichten Nachlaß, Paris 1939; C. Butterwegge, *Austromarxismus und Staat*, Marburg 1991; *Dizionario dei termini marxisti*, a cura di E. Mascitelli, Mailand 1977; A. Fuchs, *Geistige Strömungen in Österreich 1867-1919*, Wien 1978; H. Glaser, *Im Umfeld des Austromarxismus*, Wien-München-Zürich 1981; J. Hindels, *Einführung in die Ideen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Vorträge, gehalten in der Parteischule der SPO-Wien, Wien o. J.; R. Kirchhoff, »Revisionismus«, in: PhWb 2, 1974, 1057; M. Klein, »Austromarxismus«, in: PhWb 1, 179; A. Kosing, »Austromarxismus«, in: ders., *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85, 60f; P. Kulemann, *Am Beispiel des Austromarxismus*, Hamburg 1979; N. Leser, *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Der Austromarxismus als Theorie und Praxis*, Wien 1968; G. Marramao, *Austromarxismo e socialismo di sinistra fra le due guerre*, Mailand 1978; C. Möckel, *Sozial-Apriori: der Schlüssel zum Rätsel der Gesellschaft. Leben, Werk und Wirkung Max Adlers*, Frankfurt/M-Berlin/W-Bern-New York-Paris-Wien 1993; A. Pfabigan, *Max Adler.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2; ders. (Hg.), *Vision und Wirklichkeit. Ein Lesebuch zum Austromarxismus*, Wien 1989; ders., »Es war einmal: der Austromarxismus«, in: ders. (Hg.), 1989; K. Renner, *An der Wende zweier Welten. Lebenserinnerungen*, Wien 1946; H. J. Sandkuhler, R. de la Vega (Hg.), *Austromarxismus. Texte zu »Ideologie und Klassenkampf« von Otto Bauer, Max Adler, Karl Renner, Sigmund Kunfi, Bela Fogarasi und Julius Lengyel*, Frankfurt/M-Wien 1970; *Von der Klassengesellschaft zur sozialen Demokratie. Die österreichische Sozialdemokratie im Spiegel ihrer Programme 1889-1978*, Wien o. J.; V. Turok, »Avstromarksizm«, in: *Filosofskaja enciklopedia*, Bd. 1, Moskau 1960; J. Wilczynski, »Austro-Marxism«, in: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Marxism,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Berlin-New York 1981.

克里斯蒂安·默克尔（Christian Möckel）撰

张志超 译，杨佳 校

764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bstrakt/konkret, Anwendung, Arbeiterkultur, Dialektik,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eterminismus,

dritter Weg,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theorie, ethischer Sozialismus, Gesetz, Grenznutzentheorie,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integraler Sozialismus,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lassengleichgewicht, Kausalität, Methode, Objektivität, Revisionismus,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e, Stellungskrieg/Bewegungskrieg, Zentrismus

自动化（Automation）

1. 人们早就对 *Αὐτόματα*，即无须外力而自行运动的物品着迷不已。这是作为一种神圣能力被创造出来的：《伊利亚特》（*Ilias*，V.368 及以下）的第十八章描述了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的
765 *Αὐτόματα*，它们以器具或人的形式出现；它们首先具有的是促进神圣生命的服务性功能。神的发明是作为礼物（德墨忒尔［Demeter］的农耕）或通过盗窃（通过普罗米修斯而来的火）给予人们的，以使他们增强力量，超越极限。后一种获取方式遭到了神的事后惩罚：赫西俄德（Hesiod）在《工作与时日》（*Werken und Tagen*，V.60 及以下，另参见《神谱》［*Theogonie*］，V.571 及以下）中讲述了宙斯（Zeus）委托赫菲斯托斯创造了潘多拉（Pandora），她后来打开了装满灾厄的罐子。因此，艰辛、疾病和战争来到人间，而能够免于这些祸事的希望却被封存在罐子里。

在潘多拉的形象中，一种令人厌恶的女性特质的结构变得明显了，这将控制自然的过程与父权制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人类创造者（homo faber）在神话中突破了自然的和社会的障碍，并表现着狡猾和傲慢、大胆和挫折的相互交织。这是增强力量和辛苦劳作之间、自我发展和统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类劳动和劳动工具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其动力的：人通过开发自己的力量来使自己获得独立、成为“自动”的，这是所有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在这种发展中，人们希望摆脱劳苦和统治。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Politik*）（1253b）中所说的，“如果所有工具都能完成自己的工作，服从并预见命令……如果织梭能自动织布，琴拨能自动拨弦，那么工匠就不需要帮手了，主人也就不需要奴隶了”。

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MEW 23，第 430 页），并从对机械的分析中得出自动体概念，这与当时的技术发展阶段是相应的。他谈到“机械自动机”（MEW

23，第 442 页，参见 Engels，MEW 18，第 306 页），谈到形容词意义上相关的“自动的机器体系”、“自动工厂”或“自动生产”。马克思不是将它们理解为确定的状态，而是理解为“提高机器的自动性”的过程。（*TM*，MEW 26.2，第 558 页）

自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一直关注技术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 1851 年，他做了内容广泛的摘录（参见 *Tech Exz*）。他在 1863 年 1 月 28 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二者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 18 世纪把自动机（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Vaucanson）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MEW 30，第 321—322 页）“勇敢的沃康松，普罗米修斯的对手”（伏尔泰如此称呼他），不仅因他的音乐盒自动机而著名，而且他还关注“可利用的机器”，正如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说的那样：“例如，他在 1749 年就已经将机器用于卷丝，1751 年又将另一台机器用于转丝……1776 年时他还计划建立一座制丝工厂”（1835，第 11—12 页）。

在“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发展”（MEW 23，第 455 页）方面，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中解放和奴役之间的矛盾运动。尤尔——马克思称他是“自动工厂的品达（Pindar）”——一方面将自动工厂描写成“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另一方面又将之描写成“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互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引自 MEW 23，第 441 页）马克思评论道：“这两个术语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同上书，第 442 页）

766

在尤尔那里作为“庞大的自动机”的工厂，并未因此被设想为无人的，而
767 是被设想为“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之间的结构化联系和尽可能的连续运动。不过同时，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MEW 4，第 157 页）及《资本论》（MEW 23，第 455 页）中以批判性赞同的方式所援引的，尤尔认为：“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经济动机与一种统治动机紧密相关：摆脱工人的固执和反抗。基于对“自动运行的机器”的描述，尤尔惊呼：“它可以用来警告工人，并向他们证明，科学在资本的呼救声中如何能够摧毁任何非法的工人协会。”（1835，第 35 页；MEW 23，第 460 页中引用了类似的说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也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自动机”一词，也就是说，在将宇宙（自古代以来）、身体（自笛卡尔以来）和国家（自霍布斯以来）比喻为机器、钟表和自动机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将社会化劳动纳入到机器、钟表和自动机这些比喻传统当中。自 17 世纪以来，人们可以在与规范性的秩序方案的贯彻的关联中来解释这种比喻的繁盛，这些方案针对的是“前机械主义的文明腹地”（Sutter 1988，第 15 页），针对的是人类的本性和固执。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是批判地使用了机器比喻和自动机比喻。不过，它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统治之无耻的不可改变性的总体化观念。“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Engels，MEW 18，第 306—307 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预见到，当“自动的机器体系”在社会生产力框架中达到了某一发展阶段，它就会反抗社会关系的束缚并
768 能够被用作解放的引爆器：“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

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MEW 42，第 601 页）

3. 要想遏制或组织好这个“必然王国”，生产者就要有意识地共同调整他们的劳动，并在这个基础上自由地发展他们的生产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一种现在被称为“自动化”的新的生产力水平回忆起了上述愿景：在社会劳动中，自动化能否成为实现解放的生活这一乌托邦的前提？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1956）第一次在德语语境中对自动化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他认为，“自动化”是“美国语言中的新词”，它的创造要归功于企业顾问约翰·迪博尔德（John Diebold）和福特汽车公司副总裁 D. S. 哈德（D. S. Harder）。波洛克将自动化这一新词用于区分“新的生产方式”和“借助‘自动机’的生产，自动机也就是自动的机器，它是基于机械原理（如自动织机）来设计的”（1956，第 15 页），并这样来定义自动化：“自动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播开来的生产与信息技术，它通过利用反馈原理和电子计算机……在物理与精神功能上以机器来代替人的劳动力，而这些机器本身又是由机器来控制的。”（同上书，第 28 页）这一规定的实质内容当然不容忽视，不过它（至少）有两个局限：（1） 769
将自动化还原到它的技术维度。技术本身，如马克思所说，揭示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MEW 23，第 393 页）。像所有技术那样，自动化技术不仅仅是技术：它是社会关系发展的要素，并且只能在这种关系中来理解。（2）自动化组织起一种关于社会劳动的历史观，社会劳动本身在这种历史观的视角中被取消了。不过，将一个无人工厂视为一台巨大的自我调节的机器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像所有的技术那样，自动化技术也以关于技术、自然与社会联系的建模为基础，而这些联系相较于对它们的模型化理解来说，是更广泛的、更可变的、更易受干扰和更加矛盾的。

如果自动体的确可以被理解为所有技术发展的基本趋势，那么，被标识为自动化的新生产方式就的确意味着与之前所有的技术发展的断裂。这种断裂可以从如下这些方面来理解：（1）新技术的几近普遍的适用范围和适用灵活性：有计划的操作条件顺序（例如这种顺序可以运转一台蒸汽机）是被固定地设计在其结构中的，在这里，机器是程序；

与之相对，计算机的核心特征是它的自由编程能力，借此它成为构建许多不同（用户—）机器的基础，在这里，程序是机器。（2）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关系的翻转，在这一关系中，前者不再仅作为控制元件被嵌入生产过程当中，而是成为高阶的问题解决者：它进行设计和规划，并在机器程序出现问题时实施干预。（3）劳动中科学化的推动，这不仅涉及知识的逻辑—数学形式和新的工程科学形式（计算机科学），而且基于将自动过程嵌入人类活动当中这一点，也需要反思其他知识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翻译问题。（4）人类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在此，个人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具有了质上新的重要性，福尔克·布劳恩认为："但不是电子数据处理、核能等，不是**这些**将成为这场技术革命的本质：而是人，是人进行了这场革命，并凭借它**改善**自身。真正的变化是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使数百万人能够**为了所有人**而采取有意识的行动。"（1976，第 69 页）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争论中，自动化的这些规定是有争议的：它是一场革命、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变革？与此相关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它打开了什么样的潜力，应当对之采取何种政策？马克思主义者们参加了这场关于自动化的争论：他们试图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有助于理解企业和社会中的行为取向，并有助于这些取向的发展，而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的这些贡献也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首先涉及的，是自动化劳动干预社会劳动发展的可能性。澄清这一点是出于实际的利益，因为由此可以论证社会政策、教育政策、关税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制定的后果。

第一种分析是将自动化劳动纳入历史的三阶段图式的框架中——这大体上包括乔治·弗里德曼（1946 年）、进行雷诺研究的年轻的艾伦·图灵（Alain Touraine）（1955 年）或提出"新工人阶级"概念的塞尔日·马利特（Serge Mallet）（1963 年）：在手工工业阶段（在此阶段，职业上自主的手工业者利用工具和通用机床来生产）和批量生产阶段（在此阶段，分工上碎片化的和失去专业性的劳动力使用的是专门化的单个机器和流水线技术，而这只是刚刚超出"机械化的权宜之计"）之后，自动化为"劳动重组（récomposition）阶段"铺平了道路，在此阶段，干预形式从直接采取行动转变为生产监控和"次要"的活动，例如准备和维护，这与一种再培训认证紧密相关。"现代工人越是在集体层面获得职业自主（在劳动的机械化阶段，他丧失了这种自主），生产过程的引导和控制趋势就越会发展。今天，现代生产条件为如下一点提供了客观的发展可能

770

性，即生产和经济中的主力，处处都有权支配生产和经济本身。但这些可能性同样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的冲突当中。”（Mallet 1972，第 46 页）

第二种分析是将自动化劳动当作人类劳动向资本关系不断屈服过程中的一
771 个阶段（这大体上包括哈里·布雷弗曼或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计算机研究）：凭借自动化，资本发现了真正将劳动归摄于其下的技术上充分的形式——在计算机程序的逻辑—数学形态中，劳动变得抽象了；活劳动被从生产过程中淘汰掉了，或者说是退化为残余功能；所有的生活条件都服从于自行普遍化的资本统治，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从事劳动的人丧失了能力。格哈德·勃兰特（Gerhard Brandt）认为，以上这些要素所构成的发展过程不是线性和不可逆转的，而是矛盾的和政治上断裂的。“凭借真正归摄原理而假定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的发展逻辑”，与“它的现实的实现过程”并不是一回事，它不能针对反抗和拒绝形式而被模型化。（Brandt 1990，第 207 页）

第三种分析是将自动化劳动当作社会劳动在私人关系中的矛盾运动（这包括**自动化与认证培训项目小组**）：因劳动的社会化过程而增大的个体劳动行为效力要求生产者能力的不断发展，而对这些能力的占有，同时和他们在规定经营目标与建立社会关系上的无能紧密相关。由于包围着自动化劳动者的干预必然会造成深远的后果，生产过程中的干扰和停滞状态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所以，一种由主动性和责任构成的态度，的确变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态度，**就好像**劳动者本身是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与生产相关的信息无须管理者的中介就能逐渐累积时，需要做的决策就会越来越多；而且问题往往只能通过协作来解决，在这种协作中，工人相互依赖于如下这点，即为了一项共同任务释放出每一个人的力量，而不会为了个人利益相互竞争。凭借集体性策略和运营架构（它们挫败了传统的等级制），管理层试图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调动与整合的效果。马利特已经指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寻求“社会主义技术”的庇护，以便与能够“提供发达的生产力”的那些要求达成妥协。（1972，第 42 页） 772
使得自动化得以发展的一个矛盾，是它奠基于国家保障的军事研究和军事生产当中，这推进了自动化，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量，另一矛盾是自动化被纳入世界市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它在北半球资本主义大城市和某些新兴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聚集的地区的发展，同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的不发展、剥削和依赖是一致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尤尔根·库琴斯基否认资本主义能够“充分执行”自

动化，这是预留给社会主义的。讽刺的是，从那时起，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借助与自主相联系的个体性形式和准社会主义的社会策略，自动化获得了快速发展；然而，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中，尤其是因为缺失的个体性形式和专制的官僚的社会策略，自动化的发展是迟缓的。20 世纪 60 年代在联邦德国进行的关于生产力发展特征的讨论（企业家代表谈到的是对工会担忧的拒绝和“技术变革”的诉求，而工会代表则对革命性特征表示反感）被奇怪地推迟了，但它以类似的形式在民主德国开展起来，在那里，人们以有利于“科技进步”（而不是“科技革命”）这一说法的方式做出了决定，如此，任务的意义和难度就被弱化为既有关系的框架。这并不是说，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关于如下必要性的问题意识 —— 对关系进行新的革命化，变革社会制度，为个体的与集体的利益和主动性解绑，这种问题意识是自动化推动生产力的条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的那场改革（Perestrojka）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向高科技社会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关于此可参见 Haug 1989，第 103—126 页）但是，僵化的命令式管理结构的惯性力阻碍了转型的苗头，而它自身也随着苏共倒台而崩溃。

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同对发展的调整之间的关系，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自动化争论当中是清晰的，但是，当对自动化的理解缩减为一个技术发展阶段并且仅限于企业应用范围时，这一关系就会一直是模糊的。不过，同时代关于劳动的其他争论 —— 如关于人性化劳动形式、新的生产概念或企业文化的争论 —— 也被理解为政策，在它们中并借助它们，不断向前推进的自动化的影响遇到了挑战。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不威胁统治结构的行为自主的可扩展性问题，生产者在其中表现为准所有者并且不会质疑所有权关系的那些企业的可辨识性问题，不会使不平等发展过程的差异转化为冲突的非自动化劳动的形成问题。

773

参考文献：

G. Brandt, *Arbeit, Technik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90; V. Braun, *Es genügt nicht die einfache Wahrheit. Notate*, Frankfurt/M 1976; H. Braverman, *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ß*,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G. Friedmann, *Der Mensch in den mechanisierten Produktion* (1946), Köln 1952;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1990); J. Kuczynski, »Kann die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s staats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 durchgeführt werden?«,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11, 1972, 1691-1699; S. Mallet, *Die neue Arbeiterklasse* (1963), Neuwied-Berlin/W 1972; F. Pollock, *Automation*, Frankfurt/M 1956 (Neuausg. 1964);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 1987; A. Sutter, *Göttliche Maschinen*, Frankfurt/M 1988; A. Touraine, *L'évolution du travail ouvrier aux Usines Renault*, Paris 1955; A. D. Ure, *Das Fabrikwesen in wissenschaftlicher, moralischer and commercieller Hinsicht*, Leipzig 1835.

韦尔纳·范·特雷克 撰

侯振武 译，杨佳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Arbeitsteilung, Arbeitsorganisation, Arbeitspolitik, Arbeitsprozeß-Debatte, Destruktivkräfte, disponible Zeit,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Fortschritt,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formatik, Kompetenz/Inkompetenz, Maschine, Maschinerie, Naturbeherrschung, Patriarchat, Produktivkräfte, Technik, Technologie,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艺术的独立性 (Autonomie der Kunst) 774

艺术的独立性是唯心主义美学的范畴，还不算是真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汇。为了能够对散布于全集里的艺术理论及美学方面的评论做出相应的评价，我们先得介绍一些历史前提。

1. 在中世纪末期，艺术在形式、内容和组织方式上都变成了独特的产品。早在 14 世纪的意大利宫廷里，造型艺术家和建筑师们就为他们的职业赢得了一种**自由艺术**（*ars liberalis*）的地位，他们与人文主义者们一起，阐明了有关他们的活动的特殊地位的一系列信条：独特的个性（还不是主观性），自由创造，不从事雇佣劳动和体力劳动。（参见 Warnke 1985）早在艺术家们因资助者和宫廷的贵族行家们而摆脱奴役状态、并通过“沙龙”机制——“沙龙”由经济和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力的城市贵族主持——进入自由市场**之前**，许多后来一般被归于 18 世纪的美学独立性的内容就已经被阐明了。

2. 只有当“独立性”表现为政治—法律斗争概念——它与资产阶级解放进程相关——表现为商品生产的范畴，从而事实上表现为**他治**的时候，艺术才增

加了一个任务，它导致在理论学说上提升艺术的独立性。康德认为，作为理性存在物，只有超越了不可逾越的自然和自由的鸿沟，即以主观上确定的审美表现为媒介，人的经验视域才会增多。审美判断必须是“不带任何利害的”，也就是说它不具有“与欲求能力的关系”。（*KU*，§2，B5，WA 10，第116页）于是，“美”脱离了那些适用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规定，在“有用性”和使用的语境中**独立地**设定自身：“对美的愉快”“绝不在任何方式上是实践的”。（同上书，§12，B37，WA 10，第302页）席勒认为，在艺术里“感性的独立性”高于“有用性”和“任何严格的实用性”。（*Kallias-Briefe*，Werke 8，第291页）“人类本性（**人性**）的美的整体”是
775 公民在分工式单独实践中被剥夺了的，这只有“通过一种高级艺术”才能恢复（*Ästh. Erziehung*，同上书，第578页；参见第6封信全文，第570页及以下），因为艺术家“明确宣布放弃对现实的所有要求”（同上书，第664页）。因此，美不是“行为上的自由，而是表现里的自由，是表现里的独立性”（*Kallias-Briefe*，同上书，第285页），这给席勒招来了政治寂静主义的指责。事实上，认为人性、自由和自我实现只存在于美学表现（“游戏”）范围内，即在改变状态的彼岸的观点，其背后也是对法国大革命进程的失望。

3.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EW 21，第281页）里写道：“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没有给艺术的独立性的发展提供空间，因为艺术被辩证地理解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进程里的因素，其“现实内容”是社会劳动。（同上书，第286页）在著名的“艺术终结论”中，黑格尔断言，哲学“超越了美的艺术”。（*Ästh，Einl*，I，W13，24，第24页；参见上书，第140—141页）虽然可以希望“艺术不断上升，臻达完美”（同上书，第142页），但它摆脱了历史哲学的负担。在19世纪，人们对美学的实质兴趣逐渐消失，转向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此时一种关于艺术的**相对**独立性的理论建构起来了。

4.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对艺术的考虑仅是次要的。重点不在于黑格尔所说的艺术是提高了的真理之地的进化特点，而在于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TM*，MEW 26.1，第257页）。只要艺术家不

从事服务于企业家的“工厂劳动”，他就是一名“成功不多的劳动者”，他实现的就不是社会的“本性”，而是自己的“本性”。（同上书，第377页）但是，认为艺术与其商品形式存在不兼容的倾向，艺术注定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工具，这一观点并没有将艺术的独立性解释为单纯的表象。批判的对象首先是以意识形态形式表现出来的对艺术的独立性地位的反思，在此，除了天才崇拜和美丽外观之外，还有那个“资产阶
776 级的一斤斤计较的文学关系”（Lenin，*Parteiorganisation und Parteiliteratur*，LW 10，第32页），在其中进行的是“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马克思，*DI*，MEW 3，第46页）。但是，就像艺术属于上层建筑一样，随分工出现的精神劳动独立化的**可能性**（同上书，第31—32页），只能有保留地被诠释为对艺术的独立性的客观批判：“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可能会造成职业的艺术活动的“局限性”，这一观点也必须在如下背景中来评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构思过程中，对分工的批判具有了另一个范畴框架。

5. 与宗教相反，马克思认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Einl 57*，MEW 13，第640页；MEW 42，第44页）出现，就是不可撤销的。他关于“吸引人的劳动，个体的自我实现”（*Gr*，第505页；MEW 42，第512页）的说法表明，物质生产在其社会规定的前提下虽然能够包含真正自由的劳动的特征，但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才开始了（*K III*，MEW 25，第828页）。这样，从未来的角度看，艺术根本就不会升华为“劳动”的一种高级形式，而是保留了其物质的、通过相对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差异而定义的独立性。希腊艺术“在某些方面成了标准和不可达及的典范”（*Gr*，第31页；MEW 42，第45页），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颇有争议，它甚至让马克思接近了美学的独立性。席勒也强调，“那些作品的”不朽范本“在所有政治腐败中保持了纯粹和纯洁”（*Ästh. Erziehung*，GW 8，第583页）；凭借其对历史的压迫形式的“绝对豁免权”，艺术得以建立起与现状相对的对立形象。当然，马克思既不想达到一个超验的目的，也不维护一种与历史无关的形式主义：“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Gr*，第31页；MEW 42，第45页）无论如何，这个艺术的独立性的基本主题的萌芽，亦即在疏远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和解的艺术形态的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决的，它没有得到继续论述，而

是局限于一种解释学的提问方式上。

777 6. 商品生产的条件很快就破坏了艺术的独立性的和解特征可以直接实现的希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在一种权威的、政治—宗教信仰上被挤缩的“目的艺术”的经验之下，就形成了不同的策略，其中之一经由唯美主义汇入**为艺术而艺术**（Gauthier）的论战措辞。在这一“独立的”之外也形成了一种“趋势性”艺术（Balzac），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是以它为指导的，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为新闻写作而牺牲美学形式的独立性：“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HF*，MEW 2，第 174 页）。后来提出的党的文学必须转而从事历史写作（Bredel）的要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里也鲜有依据，这种要求就像肤浅的写真现实主义一样。

7. 因此，如果艺术的独立性的制度性地位允许有截然不同的学说的话，那么，20 世纪西欧社会矛盾的激化就将广大的艺术家阶层逼进了个体状态。由此造成的对目标领域的限制、与艺术传统和观众期待的决裂等，恰恰使人们意识到，在社会危机时代，艺术的独立性并不会产生实际后果，这还激起了一种针对独立性地位本身的反向运动。历史上的先锋运动，比如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生产艺术**、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都纲领性地通过消除“艺术”和“生活”的差别促进世界的人性化。然而，艺术的独立性这一核心假定的这种转向失败了，因为它依然受到它所反对的终极目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且没有与作为接受者的工人阶级取得联系。鉴于法西斯主义全面的文化占领，马尔库塞重新说明了为什么有必要通过将文化转到物质生活过程中来取消它的“肯定特征”——以及艺术的独立性（1965，第 97 页）。后来，他在席勒的意义上撤回了这种设想（参见 1977）。本雅明在他关于“复制”论文中，将大工业中劳动对象的资格失效与先锋派的艺术方法（例如剪辑技术）直接对应起来，而没有为了无产阶级阐明来预期的“美学政治化”，由此，他就为“上层建筑”做了马克思为“下层建筑”所做的事。（GS 1，第 471 页）布莱希特在如下一点上赞 778
同本雅明：政治趋势的进步必须与艺术技巧的进步相适应。他用来“打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艺术工具——“异化”——虽然同样借用于先锋派的剪辑原则，但这一政治功能并不包含艺术的独立性的平均主义化：“艺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虽然绝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领域。”（《劳动报》，1949 年 8 月 24 日）阿多诺将“真实的”艺术既规定为“**社会事实**”也规定为独立的：在他治生活

中，“它将通过它对社会的相反立场成为社会的，只有这样它才会是独立的”（1970，第 335 页）。因此，废除艺术的独立性的思想是可敬的，但这种独立性依然是“不可撤销的”（同上书，第 9 页）。在以激进的方式塑造审美现象的过程中，艺术家超越了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手段和目的，亦即什么都不“参与”，由此，他们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体的总督”。（1953，第 126—127 页）

8. 阿多诺关于艺术的独立性的说法的成败无疑取决于这样一种历史观，这种观念直接从自然统治中推断出社会统治，并将社会现状理解为完全密封的。这样，艺术的独立性是否已经凭借它与“物质生活过程”的物质的和制度的差异而必须成为后者的对手，这就是个政治问题。在这里，决定它们的相互作用的模式的，主要不是关于艺术的直接用处的问题，而是在艺术技巧的进步和政治倾向的进步之间是否存在功能依赖性的问题。随着彼得·魏斯的长篇巨著（*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1975—1981；另参见 1981）的出版，这个问题重新有争议地得到了讨论。那部巨著用艺术先锋派的手段塑造了 20 世纪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经验域界。有的人痛斥将这种“素材”作为艺术品的素材是不敬，有的人试图将这部长篇小说当作“党的历史创作”来阅读，而作者本人自然是极力反对这样做的。如果说，如今在对魏斯的接受过程中经常谈到相对的艺术独立性，由此“艺术”和“生活”的美学貌似得到了承认，那么，阿多诺从中得出的后果却是骇人的。针对社会实践的矛盾而进行的审美媒介批判活动的思想 —— 它曾在“独立经验的无目的形式”这一标题下以对艺术的独立性的要求为基础 —— 就其唯物主义的形式而言，在历史上尚未被超越。艺术应该继续将它的“固执”具体化，但又希望它能摆脱深奥的形式，在保持其独立性的情况下，将它的认识潜力富有成效地用于合理塑造生活关系。但这不必“由外界”决定 —— 更不必由国家方面决定。 779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Der Artist als Statthalter« (1953), GS 11, Frankfurt/M 1974, 114-126; ders., *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M 1970; M. Müller, H. Bredekamp, B. Hinz, F. -J. Verspohl, J. Fredel, U. Apitzsch, *Autonomie der Kunst. Zur Genese und Kritik einer bürgerlichen Kategorie*, Frankfurt/M 1972; M. Fontius, »Produktivkraftentfaltung und Autonomie der Kunst«, in: G. Klotz (Hg.), *Literatur im Epochenumbruch*, Berlin/DDR-Weimar 1977, 409-530; H. Freier, »Ästhetik und Autonomie. Ein Beitrag zur idealistischen Entfremdungskritik«, in: B. Lutz (Hg.), *Deutsches Bürger-*

tum und literarische Intelligenz 1750-1800, Stuttgart 1974, 329-383; R. Grimminger, »Die ästhetische Versöhnung. Ideologiekritische Aspekte zum Autonomiebegriff am Beispiel Schillers«, in: J. Blten (Hg.), *Schillers Briefe über ästhetische Erziehung*, Frankfurt/M 1984, 56-101; M. Hofmann, »Ästhetische Erziehung und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Kunstautonomie und Engagement des Kunstwerks bei Schiller, Marcuse und Peter Weiss«, in: *WB*, 37. Jg., 1991, 819-837; H. Marcus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i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 Frankfurt/M 1965, 56-101; ders., *Die Permanenz der Kunst. Wider eine bestimmte marxistische Ästhetik*, München-Wien 1977; W. Müller-Seidel (Hg.), *Historizität in Sprach-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Sekt. X: Zur Autonomie der Kunst), München 1974; F. Schiller, Werke hgg. v. o. Dann u. a., Frankfurt/M 1992; M. Warnke, *Hofkünstler. Zur Vorgeschichte des modernen Künstlers*, Köln 1985;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3 Bde. Frankfurt/M 1975-1981; ders., *Notizbücher 1971-1980*, Frankfurt/M 1981.

尤尔根·弗莱德尔
（Jürgen Fredel）撰
朱刘华译，侯振武校

参见：
Abbild,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Arbeit, Arbeitsteilung, dialektisches Theater, eingreifendes Denken, ideologische Form, Freiheit/Notwendigkeit,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ritische Theorie, Kultur, Materialästhetik, Parteilichket, Proletkult, Realismus, Selbstverwirklichung, Spiel, Subjekt, Überbau, Utopie

权威民粹主义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斯图加特·霍尔（1978，1982，1985）在分析新兴的撒切尔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权威民粹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旨 780
在解释“人民”在对权威的危机管理进行认同时的矛盾过程。在这个概念形成过程中，有三个理论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尼科斯·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和厄尼斯特·拉克劳的话语理论。

葛兰西将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现代危机”中其中一个方面称为“权威危机”（Autoritätskrise）：“当统治阶级失去人民的认同时，就不能再被称为‘领导’（führend）阶级，而只能被称为使用纯

粹的强制力‘进行统治’（herrschend）的群体。这就意味着大众已经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不再相信他们自己以前所相信的东西。危机恰恰就是基于这种现实中而出现的，即在旧事物已死，而新事物还没有形成的时候。”（*Gef* 2，H. 3，§34，第 354 页）换言之，危机就是，“上层”没有能够匹配“下层”的其他对应选择，于是使得认知的对象转移到了统治阶级的重新构建和霸权机构的重建。呈现趋势的政治社会化导致了国家行为的进一步延伸。国家在新的权力集团的形成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葛兰西区分了两个平行的领导层面，一个是权力集团中的主导派系，另一个是超越自己阶级的阶级霸权。在随之而来的“阵地战”中也相应出现了两种类型的人民同意，一种是更被动的、更具变革性的同意，另一种是更积极的、更有机的同意。在“被动革命”的情况下，国家取代了领导阶级，即“**统治**（胁迫）超过**领导要素**（霸权作为构建共识的组织）”（Buci-Glucksmann 1977，第 21 页）。与此相反，一个“有机的同意”则是建立在一个阶级能够使自己更加普遍化和控制经济、企业层面的能力之上。葛兰西进一步阐述道，第一种情况是一种基于霸权理论上，波拿巴主义的变形体；第二种情况下则更接近霸权主义和民主，即促进“被领导团体向领导团体的过渡”（*Gef* 5，H. 8，§191，第 1049 页）。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人民同意往往都是不稳定的平衡，甚至是岌岌可危的。如果从资本角度出发，这种“转型”（*Gef* 2，H. 3，§119，第 423 页）就是对利润率下降的暂时性应对产物，因此在国家扩展中存在一种工人阶级的转型战略。

与垄断资本主义一起出现的是扩散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国家行为。这种国家 781
行为的扩散根本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经济层面之间的不对称和相对分离。普兰查斯（参见 Demirović 1987）认为，这种分离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生产关系和再生产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政治（体制），其确保了在生产、剥削过程的同时还能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征服关系的再生产。这种设计创造了一种应对冲突的运动模型，资本主义通过这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再生产。国家是社会力量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因此社会斗争总是发生在国家内部，具体而言，这些斗争主要发生在国家的战略领域，并共同构建了国家战略。因此国家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导致了国家和“人民”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对立，这也是社会斗争的结果。在代表关系（Repräsentationsbeziehungen）中也存在着一种非同步性，即统治阶级和行政阶级之间可能存在着

差别。普兰查斯认为，权力集团内发生的这些分裂将导致一场非革命性的政治危机。“权威国家主义”的特点是“加强了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干预，随之而来的政治民主制度的急剧衰落，以及对（被国家称为）‘形式上的’自由进行严厉、多方面的限制。只有当人们失去时才会去珍惜这些自由”（Poulantzas 1978，第 185—186 页）。国家既是这些普遍危机要素的产物，也是对这些要素的回应，所以说国家既是强大的又是虚弱的。其特征有权力集团的异质化，国家干预的延伸和合法性赤字的扩大，不平等的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和对民族国家政策的破坏，不过最主要的特征却是国家在不断扩大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危机。国家机构和主流政党之间的双向渗透导致了一个平行的国家网络，在其中模糊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差异，并且政府变成了一个实际的政党。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逐步法西斯化的过程，相反，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弱化将带来一个开放的局面，即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使得国家转型成为可能。社会再生产方式的变化可能将产生新形式的社会决策组织，从而使得国家政治这种形式变得多余。

拉克劳从通过意识形态要素来确定阶级属性的这个问题出发，分析了庇隆式拉美民粹主义。他认为这些民粹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或象征学上的核心，而是通过构建一种话语语境来获得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重要性。于是，作为具体意识形态话语产物的阶级内涵就产生了。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直接的“阶级斗争”只发生在生产关系的抽象层面；在具体社会形态层面上，其阶级斗争（Klassenkampf）经常被“斗争中的阶级（Klassen im Kampf）”所掩盖。（Laclau 1981，第 93 页）拉克劳将这些层面（只有理论分析时才能分开的层面）的具体表现称为“大众民主斗争”（同上书，第 145 页），认为这才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领域。只有当统治阶级霸权权力集团将这些阶级属性不明的要素纳入到自己的阶级话语体系中、并以此来消化潜在的对抗时，这个权力集团才能继续维持其地位。此外，社会矛盾是来自于双重的冲突：阶级斗争，以及权力集团和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导致了政治话语的双重表达——人民和阶级。统治阶级认为，大众民主表现出来的战略就是去反对统治集团意识形态。于是就有了统治阶级的民粹主义和被统治阶级的民粹主义之分（同上书，第 151 页）。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民粹主义出现的前提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出现了危机，换言之就是要么是权力集团发生了分裂，要么就是出现了转型危机。因此结合阶级理论，阶级的存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是否能将大众呼声整合到自己的阶级话语体系中。因此，实现霸权只能通过大众民主的呼声这种表达形式来完成。

霍尔借助葛兰西的转型概念去分析权力关系出现的危机，概念中提到了“去赢得无党派人士的力量。通过波拿巴——恺撒式的家长制，这些无党派人士被政府牢牢地控制住了”（1982，第106页）。于是，民主问题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在大众民主斗争的战略领域，右翼和左派
783 力量相互交织在了一起。灵活的右翼战胜了执着于国家概念的左翼力量，于是胜利方通过非正式的代议表决建立起了一个逐渐蔓延的权威主义。霍尔将这种国家权威主义（staatlichem Autoritarismus）和大众同意的特殊组合称为权威民粹主义（autoritärer Populismus）。这个概念不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普遍存在于每个层面，而是存在于一个历史特定的、需要描述的层面。（参见1985，第536页）

权力集团的分裂在国家机构中留下了一个平行的国家网络，以及一个没有获得人民同意的领导层。其结果是实际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出现了某些意识形态的衔接或者分离，这些意识形态分别位于相互对立的权力集团和人民中的一方。为防止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借助新的权威式的表达，将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政治化的主题，如种族、法律和秩序、性解放和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等塑造成一种“‘以人民名义’的‘道德权威主义’”（Hall 1982，第114页）。所以说，权威主义采取了民粹主义的动员形式，由此使得基于霍尔“专制国家主义”之上的普兰查斯概念无人问津。（1985，第535页）权威民粹主义的特征在于，国家干预的加强，以及政治民主、制度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急剧衰退。一个相互对立的新政治形式由此产生，即在意识形态的表述上是反国家的，但同时在实际中却又以国家中心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干预为主。其中实现权威民粹主义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将大众的不满（*popular discontents*）转化为大众的同意（*popular consent*）。人民群众的不满被转化为对一个追求霸权的权力集团的支持力量，由此起到中和那些反对力量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些民意中的战略要素被纳入到了霸权项目中。其产生的效果就是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朝着阶级政治更加民主化的权威方向的运动，其根源就是“对群众不满进行的‘转化’（葛兰西的概念）”（同上）。霍尔想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应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1982，第123页）。另一方面，毕西-葛鲁斯曼（Buci-Glucksmann）则提出了“消极的反革命战略”（1977，第34页），可以说，这就

是不指望形成新的人民同意。

对权威民粹主义概念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其概念上的模糊（参见 Jessop 等 1985）。具体而言就是质问，权威民粹主义到底是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的转型问题还是根本性的质变，这个问题至今还未有明确的答案。此外还有当权力集团
784 得到进一步巩固后，反国家的政策要素又将采取何种行动？这是否意味着又创造了一种社会霸权的新类型，并且这种类型将用权威民粹主义的方式去构建各个公民社会领域？这些问题引发了在“媒体社会（Mediengesellschaft）”的广泛讨论。

在苏联式社会解体后，当地的新旧精英试图在政治上引入资本主义条件。与此相关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转变，以及新权威主义和贫困民众之间的紧张矛盾，又将形成一种倾向于权威民粹主义的趋势。

参考文献：

Ch. Buci-Glucksmann, »Über die politischen Probleme des Übergangs: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passive Revolution«, in: *SoPo* 41, 1977, 13-35; dies., *Gramsci und der Staat*, Köln 1975; A. Demirović, *Nicos Poulantzas. Eine kri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Berlin/W 1987; St. Hall, »Populardemokratischer und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in: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104-124: ders.,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in: Argument 152, 27. Jg., 1985, 533-542; B. Jessop u. a.,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Zwei Nationen und Thatcherismus«, in: *Argument* 152, 27. Jg., 1985, 521-532; E. Laclau, *Politik und Ideologieim Marxismus. Kapitalismus-Faschismus-Populismus*, Berlin/W 1981;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1968, [2]1980; der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汉斯-彼得·克雷布斯（Hans-Peter Krebs）撰
盛舒洋 译，朱刘华 校

参见：

Antagonismus, Artikulation/Gliederung, Autorität, Bonapartismus, Etatismus, Demokratie, Diskurstheorie, Faschismus, geschichtlicher Block, Hegemonie, Herrschaft, ideologischer Klassenkampf, integraler Staat, Klassen, Klassengleichgewicht, Kräfteverhältnisse, Krise, Macht, Manipulation, Monopolkapitalismus, oben/unten, passive Revolution, Paternalismus, Populismus, Rassismus,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taat, Staatsklasse, Staats-

tätigkeit, Stellungskrieg/Bewegungskrieg,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Transformismus, Volk, Wohlfahrtsstaat, Zivilgesellschaft

权威（Autorität）

“权威”的概念出于有待认定的原因，拥有双重含义，即对他人意志的服从，以及由个体组成的集体服从于中央管理而形成的独立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思想的发展中常常讨论到“权威”，但从未全面对其进行批判地评价。
785 所以对于“权威”的理解就以不同方式被局限在了以下解释中：按照启蒙运动时代留下来的解释，“权威”是人类未成熟状态下的历史转折点，并通过对工业生产过程的分析得出明晰的领导结构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结论。在启蒙运动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的理论权威、权威机关的建立和由引文组成的论证，几乎没有明确地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被讨论到。

马克思在激进民主的、革命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到，“权威”是“官僚主义”明确的“知识原则”，马克思当时将“官僚主义”称为各种实际的幻觉的交织（MEW 1，第248—249页）。这个理论中的“权威”作为“虚假的知识”与“**真正的**科学”相对立，就如同“崇拜权威”实际的官僚主义思想与真正的“国家”也就是“社会的唯灵论实质”相对立。（第249页）马克思主义对“权威”批判的早期形式将自我思考的和有批判性的主体自主性的动机（参见Hannah Arendt基于此对马克思的阐释，1982，第52页）以经典的启蒙方式，与公民社会从贵族统治中的解放相结合。

马克思没有将“权威”问题舍弃，也没有止步不前。政治讨论的具体需求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多次对每个角度下的，尤其是在政治实践中“权威”的作用进行仔细分析。问题常常在于，如何在资本主义竞争和工厂生产组织的条件下找出统治阶级共同行动能力的前提条件。

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权威”问题被取代，并产生了肯定的转变。（“权威”：*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Soziologie*，Köln，^{2}1978）关键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实践理解的“未思”（Ungedachte）。

1. 蒲鲁东尝试将父亲的家庭权威作为“权威的想象综合征”（参见Adorno等1951，第759—762页）的起源，马克思在关于蒲鲁东的讨论中批评其学说，“工厂和机器”在“分工之后将**权力原理**带入社会”（*Elend*，MEW 4，第150页）。

马克思以一条普遍的规则来反驳："社会内部的分工愈不受权力的支配，作坊内
786 部的分工就愈发展，愈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力。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力和社会上的权力是**互成反比**的。"（同上书，第151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同样的思路对"资本家的权威"的物质基础进行了分析（MEW 23，第351页），雇佣工人"作为他人意志的权力"与资本家对立，"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同上），也就是"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同上书，第350页）。根据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中协作和管理的二重关系的分析（*K I*，MEW 23，第351页及以下），特别是在资本中资本主义的和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的多重对立（MEW 23，第353—354页），管理是协作的前提，对于革命性工人运动政治组织的形式和战略来说不会产生独立的战略后果。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与巴枯宁的追随者们的论战中，在产生行动能力的"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意志"（Engels，*Von der Autorität*，MEW 18，第305页）方面，将"权威"用作一个发生积极转变的斗争概念："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1872年1月14—15日，恩格斯致泰尔扎吉［Terzaghi］的信，MEW 33，第37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将《共产党宣言》的命题具体化，即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应将国际工人协会（IAA）作为"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真正的和斗争的组织"，为了革命团结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他们坚持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权威"，也就是坚持其法定权能和临时许可，在必要的情况下要解散一些国家的"支部"。同时他们也努力借鉴"半国家"的历史经验，如同对被认定为失败的巴黎公社实验进行反思。（参见 Avineri 1971，第240页及以下）

与之相反，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则在积极鼓吹一个在第一国际内部与之竞争的组织，这个组织代表了"永恒原则"（Marx，MEW 18，第299—300页），特别是他们拒绝"权威原则"（1868年8月10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MEW 32，第134页，参见 Engels，MEW 33，第365页），这一点适合充当他们的名字："反权威主义者"（Engels，MEW 33，第614页）或"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的会
787 员"（MEW 33，第5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与巴枯宁主义者公开产生冲突之前，就已经对其**内部的权威手段**和趋势进行了批判，这些手段和趋势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大相径庭。（参见 Avineri 1971，第238—239页）一方面，巴枯宁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Allic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e）的章程的文章中抨击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太习惯于规则了，不管是哪一种权威自上而下制定的规则，同时他们对于混乱的现象和人民生命力自由和自然的表达怀有巨大的恐惧”（*Sozialpolitischer Briefwechsel*，第 464 页）。另一方面，巴枯宁在同期的致俄国军官的呼吁书中要求，成员应“完全彻底”地将自我交给组织，就像耶稣会教徒一样“放弃个人意志”（第 471—472 页），“把他所有的全部精力、才能、知识和生命都无须偿还地献给组织”（同上书，第 472 页），巴枯宁还主张一种“铁的、无条件的讲纪律”（同上书，第 473 页）并且明确表明了一个秘密“独裁”的领导机构的正确性（同上书，第 473 页）。

巴枯宁在其彻底反对任何对外权威的观点和对待其追随者同样彻底的权威要求之外，还表达了“革命的激情”的思想，激情使领导者和追随者在伟大事业面前变得同样渺小。（第 454、472 页）然而巴枯宁也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概念，即专家权威（参见 Maximow 1953，第 253—254 页）。马克思曾这样形容过巴枯宁，马克思的论战在这里遇到了一片思想上的混沌：“他的头脑里是一片无政府状态，那里只容得下一个明确的思想，即巴枯宁应该当第一提琴手。”（MEW 32，第 380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草的关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MEW 18，第 3 页及以下）的通告指出，巴枯宁在其创立的秘密组织中实行“专制暴政”（第 15 页）并指责总委员会为“权威主义”（第 27 页）。巴枯宁的追随者们的目的是“在我们的工人居民中创办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学校”（第 42 页），这意味着“以一种秘密科学的献身者的身份出现在工人群众面前”（第 43 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批判的主要主题（参见 MEW 32，第 380—381 页；MEW 33，第 655 页及以下和第 426—427 页）。或者，就如恩格斯在更为尖锐的观点中明确表达的那样：“有些人总指责总委员会有 788
权威主义，……正是这些人组织了一个‘按教阶制’建立起来的、不仅实行权威主义制度，而且实行不折不扣的独裁制度的秘密团体；……他们力图依靠这个秘密组织把巴枯宁先生自己的和正统的学说强加于国际”（MEW 18，第 117 页；参见第 121 页，第 140 页及以下，第 155、168—169、174—175、194—195 页）；“在这个公开同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同盟，它又处于一个更加秘密的国际兄弟同盟——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的领导之下”（同上书，第 337 页；参见第 346 页，第 426 页及以下）。

“旧的等级制度”被“新的”所取代（MEW 17，第 643 页；关于巴枯

宁，参见 MEW 18，第 601—602 页）：可能通过对政治对手镇压的“权威行动”（MEW 33，第 374 页），也可能通过对被他们称为“权威主义者”的人的依赖（1871 年 12 月 21—22 日，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Ludwig und Gertrud Kugelmann］的信，MEW 33，第 688 页），最终也可能通过巴枯宁主义者秘密结社的组织方法（MEW 33，第 458—459、488 页）。而这些也正是巴枯宁谴责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的内容（参见 *Sozialpolitischer Briefwechsel*，第 46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内的领导地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避免了此类自相矛盾，还有待研究。至少他们在和巴枯宁追随者们的论战中，没有机会从他们的角度来对一个有行动能力的政治组织的前提条件进行反思，同时这个政治组织不会沉溺于他们普遍认为的启蒙运动对他治的批判中。

巴枯宁仅在语言修辞上激烈地反对所有的权威原则，尤其将工人协会的组织称为“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MEW 18，第 43 页），对此的反驳主要由恩格斯所写成，他在一篇为《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 per l'anno 1874*）撰写的文章（*L'autourità*，MEGA I.24，第 82—83 页；MEW 18，第 305 页及以下）中反对巴枯宁的观点：巴枯宁对所有“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否定作为一种对现有“政治现状”的间接承认，也是一种“权威”，因为巴枯宁不能解释出如何做到不采取政治和权威的行动，而“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MEW 33，第 656 页；参见第 389 页）。这明显对于第一国际的组织工作来说，是一种做出突破的准备：需要 789
一个授权机构有约束力的决策力。这不仅是为了阻止第一国际内部出现“警察的或者敌对的支部”，而且也为了阻止“游民宗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也可能钻进协会……在代表大会上以数量的优势压倒工人”。（1872 年 3 月 21 日，马克思致拉法格的信，MEW 33，第 439 页）

恩格斯首先谨慎地表达了观点：“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权力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1872 年 1 月 14—15 日致盖尔特鲁黛的信，MEW 33，第 374 页；参见第 383 页），他也坚持“国际**章程的权威**”（1872 年 2 月 18 日致贝内代蒂的信，MEW 33，第 406 页；参见第 337 页）。在这个背景下，恩格斯在总体上反对“‘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的“滥用”（MEW 33，第 374 页；参见第 365 页）：“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Engels，MEW 18，第 307 页）。恩格斯的论证构成了一

个肯定的论点："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MEW 18，第 308 页；参见 MEW 33，第 374、372 页）另一方面，恩格斯提到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生产的分析："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那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请试试看，在船上废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1871 年 12 月 30 日，恩格斯致 P. 拉法格的信，MEW 33，第 366 页）。恩格斯的观点最终将"权威"视为是每个"联合活动"和每个"组织"的必要因素（MEW 18，第 305—306 页）。

在反对国家权威的社会环境中，反权威主义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容易陷入社会主义早期阶段的宗派运动形式（参见 MEW 18，第 32—33 页）。在与反权威主义的论战中的恩格斯的观点下，马克思思想中的启蒙部分显得有些苍白：对一切"个人迷信"的厌恶和对"迷信权威"实际的批判，拉萨尔尤其应当注意这一点。（187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致布洛斯的信，MEW 34，第 308 页）恩格尔的核心观点为，对于非口头而是在真正意义上对政治权威关系的反抗来说，必须要以与社会变革相符的权威为前提。（参见 Avineri 1971，第 239 页）恩格斯为了使其观点不要"权威地"被他人接受，有意识的反措施有些含糊：一方面他承认"自治论者"，如果他们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MEW 18，第 307—308 页）另一方面，他也坚持兼顾这一点，"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第 308 页），这个简短的看法接近于，"政治权威"不再因为"生产条件"而不能避免，这就没有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性别关系和资本主义机制"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 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K I*，MEW 23，第 459 页）的统治成效的观点。

2. 这个对恩格斯的简短提纲过于严苛的解读，却发生在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别内。考茨基在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Katechismus der Sozialdemokratie*）（1892，VI）中将观点集中于："在现有的社会组织中"，"仅有一个拥有必备的规模，……，来在同样情况下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社，这就是现代国家"（同上书，第 119 页；参见第 123 页）。考茨基对于"个人的立场"的批判仅停留在其不可避

免的肤浅上（第 133 页）。他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也较为平淡，“工人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工作的自由”和“多人一起按照计划劳动”是“不可协调的”，这种自由仅仅是以“小工厂”为基础的“小市民”的理想（第 167 页），目的是“通过劳动自由……达到自由的生活”（第 173 页）。

考茨基对“权威”问题事实上的无视，根植于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深刻的不同：工人运动组织的历史任务已经部分完成，工会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一国际组成了考茨基思想的起点，其中并不包括建立政治组织的实践的问题。他的人类学观点受到过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说过个体“什么都不是，群体才是一切”，和“绝对的个体自由”是“与人类天性相矛盾的”。（1881a）因此，在无产阶级组织内部建立相对的“权威”，并且这个“权威”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特定目的获得集体行动能力相关，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那样，这成了对组织的绝对义务：“我们全身心都属于党，我们对党只有义务，没有权利，除了一样：平等。”（Kautsky 1881b）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权威”的范畴内，对在有组织性的政治活动发展过程中的个人从属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个问题在第二国际内显然完全转化成了一个次要的讨论，即关于在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工人运动中所要求的纪律。比如罗莎·卢森堡在关于党纪的文章中对纪律的表述与恩格斯对“权威”的工作定义几乎完全相同（参见 GW 4，第 15 页）。

3. 列宁作品的目录中同样没有“权威”的字样，但是有很多关键词如“纪律”和“党纪”。列宁在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分析中，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权威”进行描述，而是满足于这一论点：“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其以“不懂得社会的发展”为基础，尤其是“大生产的作用”或者说“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Anarchismus und Sozialismus*，1901，LW 5，第 334 页）列宁甚至在对文化领域等创造性领域的集体行动能力的阐述中，纪律和机关依然是重要的关键词。（LW 29，第 58 页及以下）

第二国际持有同样的基本观点，要在政治组织内部解决个人的从属或者领导地位的问题。1905 年俄国革命失败以后，在期待第二次革命高潮的热情中，无政府主义被再次讨论。年轻的斯大林在他的第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教学总结中，一开始就给这对反义词“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下了定义，使得恩格斯还讨论过的“权威”根本无法呈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

为基础，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W 1，第 259 页）。

第二国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而产生危机，在建立有组织性的工人运动的独立共产主义分支的准备阶段，个体从属地位的建立和条件问题再次部分陷入讨论之中，这绝非偶然：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以之后的德国共产党没有考虑过的独特的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他对“种姓、等级、阶级、职业、性别和个体之间的依赖关系”（1922，第 190 页）的研究不仅仅在于其拥有多少“真正的社会功能关系”和依靠“暴力”的程度，同时也关注“暴力”关系对于“社会发展”有何种程度的帮助或者阻碍（第 194 页）。他特别对使用暴力的条件提出问题，由于对“客观团结的认识”，和在出于“社会必要”而使用暴力的情况下，“使用暴力的必要性失去效力”，“错误”是其“第二个决定因素”。（第 195—196 页）

卡尔·柯尔施强调，“权威”在列宁的作品中作为一个功能性概念拥有中心地位：“因为每个机械化的大工业都是有组织的劳动，而有组织的劳动就意味着所有劳动者持续从属于领导者的一致的意志。”（GA 2，第 179 页）奥托·鲍威尔却对这一观点持批判态度：他对“苏联政府工作的非经济性”（WA 3，第 902 页）进行了解释：“苏联政府对于那些他们必须赖以管理工厂的工程师极其不信任。他们对工程师实行了各种控制……这些控制机构打击了工程师的积极性，增加了他们对于政府的憎恨。这些机构摧毁了工程师在工厂里的权威，同时也破坏了工厂纪律。”（同上书，第 901—902 页）

19 世纪 30 年代形成的斯大林主义理论经典著作也鲜有提及“权威”，甚至在明确排斥这个词汇。然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在反殖民运动的语境中，“权威”问题以一种延后的方式重新回到了辩论场：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散漫”是“党内错误思想”的来源，对此纠正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工作”。（*Über die Berichtigung falscher Ansichten in der Partei*，1929，AW 1，第 123、127 页）之后，他还非常明确地就“教条主义”进行了阐释，这个说法尤为尖锐：“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Dialektische Methode in der Frage der Einheit der Partei*，1957，AW 5，第 584 页）毛泽东还有如下主张：“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

793

团结。”（第 585 页）“辩证法”于是被要求作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同上）。

4. 共产主义运动在面对法西斯主义时遭遇了初期的失败，葛兰西对共产主义危机展开了新的讨论：对他来说，消除“团体”里领导者权威的“卡尔多纳主义”（cadornismo）是“政治”的一个基础问题（Heeger 1975，第 218—219 页）；因此他可以根据他对意大利的历史雅各宾主义的分析（同上书，第 150 页及以下），并且完全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的讨论，对“权威”进行全新解释：他没有明确地将“个人和自由”和次要问题“纪律的事实”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首要问题“权力的来源”相联系，在此权力“规定了纪律”。葛兰西还对民主的“权威”和“来自外界或外化的命令”的“专断”进行了分辨，其中民主的“权威”拥有“专业的技术性功能”，并且“要在一个社会上（或者民族上）同质的人群中实行”。（*Gef* 7，H，14，§48；Q，第 1706—1707 页；*Ri*，第 372—373 页）

794　就在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取得暂时胜利之前，在重新建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统一组织的构想下，奥托·鲍威尔于 1937 年着手研究意大利的非法社会党人（Lombardi，Saragat），他支持与“权威的布尔什维主义”相对立的“自由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Diktatur und Freiheit in der Ideologie der Illegalen*，WA 9，第 810 页），并通过对从马克思、第二国际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观察，思考反国家主义革命理念的自由主义传统，他期望法西斯国家的非法社会党人能停止这些活动，即“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权威独裁，应该与之相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权威独裁”（第 814 页），而不应如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战略所说，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权威的中心主义的”独裁的必要性，转向成为“小范围干部的秘密学说”，“在大众宣传中要通过庸俗民主主义的和庸俗民族主义的口号来代替和掩盖”（第 816 页）。同时，鲍威尔依靠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反权威主义的观点，主张在“暴力革命过程中”，斗争的无产阶级有必要“暂时地赋予其机关特殊的无限制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暂时明显地限制个人和社会中小圈子的自由”。（WA 9，第 821 页）这种观点与一种真实的危险相关联，即“通过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僚主义而得以实行的无产阶级独裁，可能会演变为官僚主义对无产阶级，乃至于对整个社会的独裁”。鲍威尔针对这个危险提出了一个主观的解决办法：他要求“工人阶级自身和领导政党拥有向往自由的强烈意

志”，他将这种约束只视作是一个牺牲，“这是为了完全自由而做出的牺牲，必须要比必要的牺牲不多出丝毫，比不能避免的时间不多出片刻”。（同上）

与鲍威尔同时，批判理论的研究者们在西欧的流亡生涯中尝试深入研究“权威”问题：他们将“增强对于始终要有上下之分的信仰”批判地视为“至今的文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Horkheimer 等 1936，VIII）他们以两个观点看待至今的马克思主义问题：首先，马尔库塞明确地以康德哲学为依托（也以法国大革命的真实过程为依托），对“权威关系”进行了分析，处于互相矛盾的联系中的“自由与不自由，自治和他治”汇合在了“权威主体的一人”（1936，第 85 页）；另外，如霍克海默阐明的那样，他们全部的研究计划将“权威”问题置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即“资产阶级家庭”所处的环境。尽管“权威”问题在两个方面得到了扩展，他们依然能够重新研究“现实的个体自由”（Marcuse）的物质条件，目的是为了理解反权威趋势作为一个制度的补充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与非透明的权威关系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权威”之于马尔库塞是一个在必然的困境中还有待克服的要素，对霍克海默则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影响下的单方面“趋势”：“通往权威国家的方向一直都被资本主义时代的极端党派预先规定。在法国大革命中，之后的历史仿佛被压缩了一般。按照这个趋势，法国大革命是集权主义的。”（GS 5，第 299 页）因此，霍克海默无疑将斯大林主义视为集权主义最一贯的形式：“完整的国家主义或者国有社会主义”是“权威国家最一贯的特性。……工厂的规章会扩展到整个社会”（同上书，第 300 页），而不会发生据称在法西斯统治下典型的“摩擦”（参见第 318 页）。在这个视角下，“即使权威国家的敌人不再考虑自由”（第 318 页），霍克海默将“权威国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镇压体系，“其中‘敌人到处和无处’可见”，只有对“人类的侵害”（第 319 页）的抽象希望仍存在。

马克思主义批评者们针对斯大林主义提出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将在斯大林主义中达到顶点的政党和国家的独立看作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其可归因于生产力的低下和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政策。（参见例如：Trotzki 1936，Kap. 9；Guevara 1988，第 29 页及以下）1956 年之后，“解冻时期”（Tauwetters）的大部分东欧斯大林主义批评者们在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政治问题的视角上，有些落后。他们向人文主义规则发出道德的呼吁（Schaff），重建真正的“具体的辩证法”（Kosík），信任将“科学科技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领导体系”的改革推动

795 796

力（Richta-Report），这些观点并没有涉及“权威”这个特殊的问题。他们在“布拉格之春”之前至少提出了一个目标，即要超越“传统的、权力政治的、行政的手段”的“有限的政治形态”（Richta 1971，第 295 页），希望达到“一种社会的自我规范”，在这里“创造性的共产主义活动的程度和普遍性”就会成为成功标准（第 296 页）。即使在卢卡奇对“社会主义民主化”问题的敏锐的回顾中，存在普遍对“群众自发性”与斯大林统治下的“先行的官僚主义操纵”相抗衡的恳求。（1987，第 99 页）

5. 在行动主义的转型中，霍克海姆关于“权威国家”的思想成为之后 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德国“反权威阵营”的连接点。克拉尔是其中一个主要的理论代表，他再次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巴枯宁之间根本的冲突，但只是在唯意志主义和形势客观成熟关系的角度下：“无产阶级必须得到自由，是革命不可缺少的条件。按照规律已处于其自然历史的终点的资本，却在改变着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1971，第 220 页）

1968 年，联邦德国的战后第一代开始反叛他们作为纳粹共犯的父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框架下，对法西斯主义和父权家庭结构的精神分析的结合，赋予了他们一个直接的政治身份上的意义：在某一情景下，在儿童商店和社区内，日常政治的一个新层次开始打开。克拉尔是一个广泛的“反权威阵营”（Dutschke 1980，第 12 页）的代表人物，他在 1968 年于西柏林召开的国际越南会议上呼吁，要通过“具体的国际合作”来对抗“从权威统治的庞大机构到反应灵敏的法西斯强制性力量”，要充分考虑到“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解放的任务早已写上日程”（Krahl 1971，第 148 页）。为了使“成熟群众的被启蒙的独立性”能够构成“社会民主”的基础，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党采取了直接立即的民主形式（第 153 页）；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至今仍屡见不鲜，为了对抗这个“倒退的历史进程”，克拉尔认为，“学生解放运动和其代表的部分学生和青年工人现今虽没有合法性，但是必须拒绝与传统政治机构合作，因为这些政治机构的官僚主义和行政会扼杀所有解放的自主活动”，换句话说，“要首先建立具备反权威敏感性的解放的自主活动”（第 193 页）。

克拉尔和杜奇克（Dutschke）既要求对列宁的思想遗产进行合乎时代的更新，也要求学生、犹太反抗者等战后一代有战略地进行自发的“反权威爆炸”，这两者之间的平衡无疑需要高超的技巧。杜奇克 1965 年写道：“马克思曾这样说

过：在革命的时候停止反思，对于解放来说是最大的危险。现在我是最后一个为了‘理论的纯洁性’而放弃革命的；我们必须尽量采用一种多层次的工作方法，至于应该‘如何做’我还没有很清楚。”（1980，第 23 页）值得注意的是，科恩-本迪特兄弟（Brüder Cohn-Bendit）（1968）尝试将“左翼激进主义”作为治疗“共产主义的老年病症”的良药，但没有重新认真展开对马克思与巴枯宁论战的讨论。

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和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失败的革命觉醒构成了一次新的讨论基础，其中也涉及了“权威”的范畴。普兰查斯采用了基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观点，以期在西欧诊断出一个酝酿中的“权威国家主义”。（1978，第 185—186 页）与此同时，意大利“工人自主论”的理论家们（Tronti，Panzieri）提出设想，面对所有政党和工会，工人运动要严格地进行“自主”活动。在法国共产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讨论中，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重新表述了“权威”的问题：一方面，在有组织的活动中，“权威”是“共产党员的自由”的前提，这句话在有意识地使用路德的表述方式（1978），“权威”也是表述“其他政治活动”的出发点（参见 Lecourt 1982，第 167 页）；另一方面，“权威”是一个主体的可识别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而不是由自我服从产生的结构（Althusser 1970）。巴里巴尔就上述第一点着手重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应该指出，“**自治和权威**……不是绝对的原则，不像善和恶那样抽象地处于**道德**上的对立关系”（1983，第 139 页），而应该将其理解为在一个革命的阶级中发生的“转换的辩证法”（同上）。但对巴里巴尔来说，在这个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政治理论教育的内在界限”是可以辨认的。（第 139 页）

6.“权威”问题的分裂和碎片化，和其他的处理不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的概念一起，造成了历史斗争中更多的黑暗。一方面，集体行动能力和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各个层面中的参与能力拥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在有效的实践活动中个体的自主的参与也有不可逾越的必要性，这两个方面的必要性标记出了在全面的历史进程中的组织和干预之间的紧张地带，在此以“纪律”和“忠诚”作为对参与者行动能力的次要要求是不够的。找出旨在对抗而非复制政治统治和阶级统治的政治实践的具体差异，对在这些政治实践中使用过并得到发展的能力和定位的主观起源

798

进行反思，这二者都是必要的。

799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的“鸿沟”中（LW 10，第 69 页；MEW 39，第 229 页），在不会陷入巴枯宁对独立的中心和网络的隐喻而产生的幻象中的情况下，进行批判性思考。这有助于理解与那些“将国家形式化”的实践不同的“政治的另一个实践”（Balibar 1983，第 144 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E. Frenkel-Brunswik, D. J. Levinson u.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1 (Teilübers. in: Adorno, *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 Frankfurt/M 1980); ders., »Zum Verhältnis von Soziologie und Psychologie« (1955), in: ders., GS 8, 42-85; L. Althusser, *Freud und Lacan*, Berlin/W 1970; ders., »Wie es in der KPF nicht mehr weitergehen kann«, in: ders.,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Hamburg 1978, 80-146; H. Arendt, *Das Urteilen* (1970), hgg. v. R. Beiner, München-Zürich 1982;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71; M. Bakunin, *Sozial-Politischer Briefwechsel mit Alexander I. Herzen und Ogarinow* (1895), Berlin/W 1987; E. Balibar, »Bakunismus«, in: KWM 1, 1983, 139-144; G. u. D. Cohn-Bendit, *Linksradikalismus-Gewaltkur gegen die Alterskrankheit des Kommunismus*, Reinbek 1968; R. Dutschke, *Mein langer Marsch*, Reinbek 1980; E. Che Guevara, »Gegen den Bürokratismus«, *Ausg. Werke in Einzelausgaben. Aufsätze zur Wirtschaftspolitik*, Köln 1988; A. Heeger, *Ideologie und Macht. Eine Analyse von Gramscis Quaderni*, Uppsala 1975; M. Horkheimer u. a.,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Lüneburg 1987; ders., »Autoritärer Staat« (1940/1942), in: GS 5, 293-319; K. Kautsky, »Freiheit«, in: *Der Sozialdemokrat*, 1881(a), Nr. 31; ders., »Klassenkampf und Sozialismus«, in: *Der Sozialdemokrat*, 1881(b), Nr. 40; ders.,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eil erläutert von Karl Kautsky*, Stuttgart 1892; K. Kosík,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Frankfurt/M 1967; H. J.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1971), Frankfurt/M ^{4}1985; D. Lecourt, *La philosophie sans feinte*, Paris 1982; K. Liebknecht, *Studien über die Bewegungsgesetz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1922), Neuausg. hgg. v. O. K. Flechtheim, Hamburg 1972; G. Lukác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sierung*, Frankfurt/M 1987; A. S. Makarenko, »Von der elterlichen Autorität«, in: ders., Werke 4, Berlin/

DDR 1970; H. Marcuse, »Studie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1936), in: *Schriften* 3, 95-185; W. Maximow (Hg.),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Scientific Anarchism*, London 1953; R. Richta u. a.,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eingel. v. O. K. Flechtheim, Frankfurt/M 1972;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R. Sennett, *Autority*, New York 1980; L. Trotzki, *Verratene Revolution. Was ist die Sowjetunion und wohin treibt sie?* (1936), Frankfurt/M 1968.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 撰

刘笑 译，郭胜大 校

参见：

Anarchismus, Anarchosyndikal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ssoziation, Aufklärung, Bürokratie, Charisma,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Disziplin, Emanzipation, Etatismus, Fabrik, Führung, Handlungsfähigkeit, Herrschaft, Irrationalismus, Jakobinismus, Kritische Theorie, Leitung, Macht, Operaismus, Pariser Kommune, Staatsmacht, Studentenbewegung, Subalternität, Totalitarismus, Unterwerfung, Zweifel

先锋队（Avantgarde）

先锋队原本是军事术语（在法语中表示先头部队、先遣队）。在圣西门和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早期的法国乌托邦主义者那里，它已经在起某种作用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它又有着特殊的历史（不同于20世纪初开始的先锋派艺术革新运动）。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论起，它就在（1）政党理论，（2）领导权理论，（3）联盟政策理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苏联解体后，在急剧变化的条件下，又有与此相关的新问题被提了出来。

1. 在《共产党宣言》（这里并未出现先锋队概念）中，共产党人的特殊角色被归结为："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相反，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MEW 4，第474页；参见上书第492—493页；MEW 8，第399页；MEW 21，第343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联盟政策和领导权的问题尚未浮现。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中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力量（Revolution in Permanenz；MEW 7，第254 页），其目标是为社会主义斗争创造条件。他们认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将会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因此并不存在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基础的阶级联盟问题。因此，问题就归结为，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发展为“自为的阶级”，即
801 意识到他们的历史使命：“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Manifest*，MEW 4，第 472 页）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反对拉萨尔的如下结论，即与工人阶级相对，其他所有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此时，他是直接指向了同革命的中间阶层达成阶级联盟的问题（MEW 9，第 22—23 页）。

2. 在变化了的情形下（特别是“中间阶层”力量的壮大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分化），考茨基似乎是以正统的方式坚持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提（如无产阶级化与贫困化命题）。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实现变成了对未来的承诺，而现实则是政党成了建构主体的主管机关。（考茨基的教育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在于此。此外参见 Laclau / Mouffe 1991，第 54—67 页）

与之相对，卢森堡尝试回应变化了的条件，为此，针对经济决定论，她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应当开展政治斗争和进行一般政治任务（参见 *Mass*，GW 2，第 91—170 页；此外参见 Laclau / Mouffe 1991，第 40—53 页）。

3. **阶级**联盟与联盟**政策**的问题，是在俄国革命中才第一次充分呈现了出来（因为农民占压倒性多数）。尽管关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特征是有分歧的，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革命派的回答还是明确的：只有通过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合，并且由作为社会的 / 文化的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革命才能成功。列宁的政党概念的基础是这种“无产阶级的领导角色”以及他对“革命的现实性”的理解（参见 Lukács 1924，第 7—8 页，第 12 页及以下；参见 *SR*，LW 25，第 417 页）。同这一概念及由此引出的实践紧密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实践矛盾，是规定着 20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1917 年发生的俄国组织之争，就是这一概念的前史。

3.1 自 20 世纪初俄国组织之争以来，讨论中所呈现的任务，不同于《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布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是进行一场普遍的民

802 主斗争的条件，是在一个非无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矛盾前景的条件，并且还处于工人运动第一次大范围的政治分裂和产生了相互竞争的工人政党的背景下。紧随而来的是，先锋队概念完全不理会各种分歧，变成了关于独立组织起来的革命政党的特殊功能及其同整个阶级的关系的规定（例如参见 Rosa Luxemburg 和 Leo Trotzki）。

3.2 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列宁坚持主张，由工人阶级中最自觉的那部分所构成的独立政治组织必须成为“先遣队”，成为“强大的工人群众的领导者”（LW 6，第 501 页），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SR*，LW 25，第 416 页；参见 LW 5，第 355 页及以下；21，第 162—163、184、334 页；Luxemburg，GW 1/1，第 780 页；GW 1/2，第 512 页；GW 2，第 7、143、280 页；GW 3，第 209 页，第 252 页及以下；GW 4，第 514 页；Trotzki 1904，第 57 页）。

列宁深受考茨基的影响，主张将阶级意识“灌输”给工人阶级（LW 5，第 385 页），同时，他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同无产阶级的**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LW 7，第 386 页）。列宁的这些观点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受到卢森堡和托洛茨基的批评。

3.21 卢森堡反对“有组织的先锋队和工人阶级的其余群众是严格对立”（GW 3，第 309 页）的这种非辩证观点，她将“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看作“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具有伟大创造性的、试验性的、常常是初级的阶级斗争行动的结果”（GW 1/2，第 432 页），并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本质”在于“群众不需要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导者’，他们自己就是领导者”（GW 3，第 42 页）。这涉及的是，“领导权”日益被“**剥夺**，群众成为领导者，同时也成为**执行者**，并创造出自觉的群众行动的工具”（GW 1/2，第 396 页；参见 GW 1/2，第 429 页；GW 3，第 425 页）。

3.22 类似地，托洛茨基反对“**代替**无产阶级**思考**”，反对“在政治上**替换**无产阶级”（1904，第 68 页），因为这必然导致以党组织取代政党，以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最终以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同上书，第 73 页）；社会民主党“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而不是受无产阶级委托来影响政治生活”（同上书，第 70 页；参见第 99—100 页，第 113 页及以下，第 125 页，第 240 页及以下）。

3.23 1918 年，在对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特征的批评中，卢森堡 803
质疑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育主义和极端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少数领导人的工作”；GW 4，第 363 页，参见第 358 页及以下）。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各种改良主义的

群众性政党的继续存在，这一争论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根据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是“先锋队，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切阶段上……都是起领导作用的无产阶级先遣队”（*Leitsätze* 1921，第 106 页）；鉴于工人运动的分裂，争论的中心转向了策略问题，这些策略将能够消除改良主义的影响并使革命的先锋队赢得工人群众。

3.3 先锋队政党概念指向的是政党与阶级的关系，即先锋队与群众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不断重新实现、不断变化的关系，如卢卡奇所说，“政党……**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1924，第 35 页）。同时，它还包含着对阶级的平均意识与它被赋予的历史使命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冲突性的，更确切地说是被掩盖在这一概念当中了。卢卡奇试图将先锋队概念的这一方面体系化，在这一尝试中，他对政党角色的理解，差不多是一种机械论的、准元历史性的（quasi metahistorisch）（正像卢森堡对考茨基和列宁的批评那样）：“共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组织存在，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直接看到自己的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同样，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事件中，整个阶级的利益所要求的观点才能够得到每一个工人能懂得的明确表述。最后，整个阶级才有可能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1923，第 495 页）

3.4 随着斯大林化（Stalinisierung），这种关于领导权的理解被物化了。斯大林在 1926 年时就已经指出：“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在**这个**意义也可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FL*，第 149 页）

3.5 由于将政党与国家合一了，“领导角色”就变成了由国家（在宪法上）保障的垄断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PhWb，第 822 页）最初的诉求变质了——阶级的先锋队最终替代了阶级。与此相伴随的，不仅仅是前面引自《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被奉为经典，成为支持一党政治实践之合法性的政党理论文本。而且，对于作为承担者的、以个体与集体形式行动的人们来说，这种实践常常同英勇的牺牲和行动准备紧密联系着（并且先锋队越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这将最初军事意义上的先锋队概念再次呈现了出来，并呈现为作为心理辩护机制的自我升华形式。在卢卡奇关于“每一个成员无条件地、

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实践”的命题中，这种先锋队被理解为“**人和历史之间的具体中介**”（1923，第 486、484 页）。（20 世纪 70 年代的学生“先锋党”明确诉诸这种理解并一直受限于此）

3.6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无产阶级“领导角色”的概念被“苏维埃模式”法典化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角色此时依然是教条，在此，工人阶级的领导只能由（此时已经斯大林化了的）共产党“代为执行”，在实践中，这种教条几乎不包含其他完全不同的、由其他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或下级组织（例如可与中国和中南半岛的革命相比较），并且几乎不允许改变自己的形态。

4. 1920 年，葛兰西第一次触及俄国的争论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表达”（*ON*，9.10.1920；*Ri*，第 87 页；参见 *Die Partei des Proletariats – ON*，1.11.1924；Z 1980，第 111—112 页）——并试图将其前提转换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

4.1 自 1929 年起，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能够实现一种“新的、同质性的、经济—政治的、历史性的集团”（*Gef* 7，H.13，§23，Q，第 1612 页；*Ri*，第 318—319 页；参见 *Gef* 4，H.7，§ 21，第 876 页；*Gef* 6，H. 11，§67，第 1490 页；此外参见 Haug 1985，第 151、158、163 页），“现代的新君主”（*Gef* 7，H.13，§21；Q，第 1601 页，*Ri*，第 300 页；参见 *Gef* 3，H.4，§10，第 470 页），即政党，就只能创造“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同上）。这提出了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之承担者和前提的社会与文化联盟的问题，并且与关于领导权的讨论紧密相关。 805

葛兰西从无产阶级“承担起领导阶级之责任”（*Ri*，第 86 页；参见 *Süd-frage*，第 44—45 页）的必要性出发。然而，他相信，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它拥有各种意识形态机构和分化了的公民社会）中的“阵地战”（参见 *Gef* 4，H.6，§138，第 816 页）的条件下思考这种阶级领导权时，不能忽视“上层建筑的特殊角色”，也不能高估“群众的现实状态”（Buci-Glucksmann 1981，第 237 页）。葛兰西对领导权概念的扩展反过来影响了先锋队概念。这不再涉及单纯的阶级联盟和作为“经济规律”之转化的上下级组织体系。由于工人阶级被理解为“一种历史性集团的链接性核心”（Laclau / Mouffe 1991），一种文化—社会统一体的问题，即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性集团之前提的共同意志的问题就成了焦点 ——由此而来的问题还有，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新的结合、相互对抗的集团的脱节、全民的意义以及知性的特殊角色。这为在西方公民社会的

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创造了新的领域（参见上书，第 109—137 页；Buci-Glucksmann 1981，第 165—188、232—291 页；Anderson 1979，第 10—60 页；Kramer 1975；Mouffe 1979；Priester 1977；Schreiber 1982）。

4.2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大部分……被整合进体系当中”（Marcuse 1975，第 161 页），加之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1968 年运动中的讨论是围绕着关于新的“革命主体”、“先锋队”的规定展开的：这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少数群体……他们处于物质生产过程之外或其边缘”（同上书，第 162 页），或者是农民，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认为，在殖民地，只有农民才具有革命性（1969，第 47 页）。因切·格瓦拉（die Guerilla…als Avantgarde des Volkes；1986，第 43 页），特别是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Ohne bewaffnetten Kampf gibtes Keine eindeutige Avantgarde；1967，第 133 页），先锋队概念再次接近其最初的军事意义。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由这些概念出发，有大量关于新“先锋队”的论文发表（从“被边缘化人群”，到“具有群众性的新先锋队”，再到作为新的“革命主体”的、也处于大城市中的“第三世界”），但所有这些文章依然限于局部现象，并且有的还限于经济现象。

4.3 与此相对，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起（部分是依据葛兰西），欧洲共产主义开始探索在大城市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意识，不仅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担保的（在其他时期，它曾垄断了这种意识），而且是由劳动与文化的力量整体担保的，是由相当广泛的社会危机担保的”（Carrillo 1976，第 120 页；参见 Haug 1985，第 169 页及以下）。——同一时期登场的“新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女性运动明确反对先锋队概念。

5. 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Laclau / Mouffe 1991，第 37 页）的讨论已经放下了先锋队概念。在此呈现出了三条基本线索：（1）完全“放弃作为一种统一的……实体的主体范畴”，而是沿着社会范畴进行定义，并“认识话语上的分散性，在这种分散性中，每一个主体位置都是被建构的”，而且只是一种（政治的）“链结实践”的结果（同上书，第 155、228 页）；（2）“告别无产阶级”（Gorz 1980）并寻找新的主体，这些主体 ——部分是依据马尔库塞 ——将取代无产阶级，出现在“新的社会运动”、“公民社会的制度化的新网络”或“非工人的非阶级”（Nicht-Klasse von Nicht-Arbeitern）中（同上书，第 62 页；Hirsch 1990，第 144 页，第 148 页及以下；参

见 Touraine 1980）；（3）最后，试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思考“传统”主体与“新”主体之间的关联，豪格将之称为“结构性领导权的集合体”（1985，第 183 页；参见第 171—172 页）。

随着苏联和中东欧发生剧变，执政的共产党（因运动的压力）放弃宪法赋予的唯一领导地位并过渡到多党制，以至共产党最终下台并解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概念最后是落空了的。然而，随着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终结，西方的讨论在比之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提出了如下问题：在资本主义“大胜”的条件下，进行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与政
807 治形式可能是什么？“是否可以设想一种不以工人政党的领导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权’集合体？”（Haug 1985，第 163 页）。这一问题必须补充以如下问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终结之后，是否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集合体，它能沿着哪种坐标系发展起来？

参考文献：

P. Anderson, *Antonio Gramsci.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Berlin/W 1979; H. Böhringer, »Avantgrade-Geschichte einer Metapher«,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1978, Nr. 22; C. Buci-Glucksmann, *Gramsci und der Staat. Für eine materialistische Theorie der Philosophie*, Köln 1981; S. Carrilio, »Rede im Juni 1976«, in: *Konferenz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Europas. Dokumente und Reden*, Berlin/DDR 1976; R. Debray, *Revolution in der Revolution*, München 1967;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Reinbek 1969;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ders., *Wege ins Paradies*, Berlin/W 1983; L. Gruppi, *Gramsci. Philosophie der Praxis und die Hegemonie des Proletariats*, Hamburg 1977; E. Guevara, *Guerillakampf und Befreiungsbewegung*, Dortmund 1986; 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Kultur*, Bd. 1, Berlin/W 1985; J. Hirsch, *Kapitalismus ohne Alternative?*, Hamburg 1990; P. Ingrao, *Massenbewegung und politische Macht*, Hamburg 1979; ders., »Probleme der Zusammenarbeit in der westeuropäischen Linken«, in: D. Albers u. a. (Hg.), *Perspektiven der Eurolinken*,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17-39; M. Johnstone,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Party*, London 1967; A. Kramer, »Gramscis Interpretation des Marxismus«, in: *Gesellschaft-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4, Frankfurt/M 1975, 65-118; E. Laclau, »Diskurs, Hegemonie und Politik.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in: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6-22; ders., u. C. Mouffe, »Socialist Strategy – where next?«, in: *Marxism Today*, 1981, H. 1; dies., *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 Zur Dekonstruktion des Marxismus*, Wien 1991; »Leitsätze über den organisatorischen Aufbau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über die Methoden und den Inhalt ihrer Arbeit«, in: *Thesen und Resolutionen des III. Welt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21; *Lenin. Revolution und Politik*, Aufsätze von P. Mattick, B. Rabehl, J. Tynjanow u. E. Mandel, Frankfurt/M 1967; H. Marcuse, »Scheitern der neuen Linken?« (1975), in: *Schriften* 9, 159-170; J. Molyneux, *Marxism and the Party*, 1978; C. Mouffe (Hg.),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London 1979; K. Priester, »Zur Staatstheorie bei A. Gramsci«, in: *Argument* 104, 19. Jg., 1977, 515-532; dies., *Studien zur Staatstheorie des italienischen Marxismus: Gramsci und Della Volpe*,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U. Schreiber, *Die politische Theorie Antonio Gramscis*, Berlin/W 1982; A. Touraine, *L'aprèssocialisme*, Paris 1980; L. Trotzki, *Schriften zur revolutionären Organisation* (1904), Reinbek 1970.

沃纳·麦肯伯奇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lltagsverstand,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tikulation/Gliederung, Autorität, Berufsrevolutionär, Bolschewisierung, Bündnispolitik,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dukationismus, Eurokommunismus, Frauenbewegung, Führung, geschichtlicher Block, Guerilla, Guevarismus, Hegemonie, Jakobinismus, Kader, Kaderpartei, K-Gruppen, Klassen, Lukácsianismus, Luxemburgismus, Massenstreik,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Ökonomismus, Partei, permanente Revolution, Randgruppenstrategie, Revolution, revolutionäres Subjekt, Segmentierung der Arbeiterklasse, Stellungskrieg, Studentenbewegung, Trotzkismus, von außen, Zentralismus, Zivilgesellschaft

808

缩　　写

1. 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Benseler　《本泽勒希腊文—德文词典》（*G. E. Benselers Griech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A. 克吉（A. Kaegi）修订，1990 年莱比锡第 19 版

DMT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T. 博托莫尔（T. Bottomore）编，1983 年牛津版

EE　《欧洲哲学与科学百科全书》（*Europäische Enzyklopädie zu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H. J. 桑德屈勒（H. J. Sandkühler）编，1990 年汉堡版

Georges　K. E. 乔治斯（K. E. Georges），《拉丁文德文详解小词典》（*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两卷本），1913 年汉诺威—莱比锡第 8 版

GG　《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7 卷本），O. 布伦纳（O. Brunner）、W. 康策（W. Conze）、R. 科泽勒克（R. Kosellek）编，1974—1992 年斯图加特版

HWPh　《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J. 里特尔（J. Ritter）、K. 格林德尔（K. Gründer）编，1971 年起在巴塞尔出版

Kl Pauly　《小保利古典学辞典》（*Der Kleine Pauly. Lexikon der Antike*），1964 年斯图加特版

KWM　《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8 卷本），G. 拉比卡（G. Labica）、G. 邦叙桑（G. Bensussan）编，

	1982 年巴黎第一版，1985 年第 2 版；德文译本（*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W. F. 豪格（W. F. Haug）编，1983—1989 年柏林版
Lalande	A. 拉郎德（A. Lalande），《哲学术语与批判辞典》（*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1988 年巴黎第 16 版
LS	《社会主义辞典》（*Lexikon des Sozialismus*），Th. 迈尔（Th. Meyer）等编，1986 年科隆版
MiS	《马克思主义系统比较》（*Marxismus im Systemvergleich*），C. D. 克尼希（C. D. Kernig）编，1966 年弗赖堡版（多次重印）
PhWb	《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两卷本），M. 布尔（M. Buhr）和 G. 克劳斯（G. Klaus）编，1974 年莱比锡增订第 10 版
RGG	《历史与现实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6 卷本，附索引卷），1957—1965 年图宾根版

2. 期刊

Argument	《观点》（哲学与社会科学杂志）（*Das Argumen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1959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Blätter	《德国与国际政治报》（*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56 年起在科隆出版
DZPh	《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53—1989 年在东柏林出版；自 1990 年起在柏林出版，加了副标题“国际哲学研究月刊”（*Monatszeitschrift der internationalen philosophischen Forschung*）
Grünberg-Archiv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卡尔·格律恩贝格（Carl Grünberg）编，1911—1930 年莱比锡版
IWK	《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der Arbeiterbewegung*），1964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KZfSS	《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48 年起在科隆出版
Leviathan	《利维坦 —— 社会科学杂志》（*Leviathan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1973—1974 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975 年起在奥普拉登出版
NZ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Prokla	《阶级斗争问题》（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杂志）（*Probleme des Klassenkampfes. Zeitschrift für politische Ökonomie und sozialistische Politik*），1971 年起在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明斯特出版，副标题改为“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en*）
SoPo	《社会主义政治》（批判的社会科学机关刊物）（*Sozialistsiche Politik. Organ kritischer Sozialwissenschaft*），1969—1978 年在西柏林出版
spw	《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杂志》（*spw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1978—1989 年在西柏林出版，1990 年起在科隆出版
SuF	《意义与形式》（文学论丛）（*Sinn und Form. Beiträge zur Literatur*），1949—1950 年在波茨坦出版，1951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WB	《魏玛文丛》（文学、美学与文化学杂志）（*Weimarer Beiträg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Ästhetik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1955—1991 年在魏玛—东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维也纳出版
ZfG	《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53—1991 年在东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柏林—海德堡出版
ZfS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2 年在莱比锡出版，1933—1938 年在巴黎出版，1939—1941 年在纽约出版

3. 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 B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1852），MEW 8，第 111—207 页；MEGA I. 11，第 96—189 页

AD　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1878），MEW 20，第 5—303 页；MEGA I. 27，第 217—538 页

AMI　《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机器与工业的摘录笔记》（*Karl Marx, Exzerpte über Arbeitsteilung, 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历史考证版，R. 温克尔曼（R. Winkelmann）改写并编辑，198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Bauernkrieg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50），MEW 7，第 327—413 页；MEGA I. 10，第 367—443 页

Bürgerkrieg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1871），MEW 17，第 313—365 页；MEGA I. 22，第 179—226 页

DI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1845—1846，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¹]. Werke, Schriften, Briefe.*），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委托 V. V. 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j）主编，第 5 卷），MEW 3，第 9—530 页

DI, Hiromatsu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 1 篇新编辑版）（*Die deutsche Ideologie. 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Abschnittes 1 des Bandes 1 mit textkritischen Anmerkungen*），广松涉（W. Hiromatsu）编，1974 年东京版

DN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1873—1883，首次发表于 1925 年），MEW 20，第 305—620 页；MEGA I. 26

Einl 5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eitung« zu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7），*Gr*，第 3—

	31 页；MEW 42，第 15—45 页；以及 MEW 13，第 615—642 页；MEGA II.1.1，第 17—45 页
Elend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1847），MEW 4，第 63—182 页
Erfurt	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1891），MEW 22，第 225—240 页
Ethnol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Karl Marx: 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L. 克拉德（L. Krader）编，197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ormen	《卡尔·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H. - P. 哈尔斯蒂克（H. -P. Harstick）编，197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otha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1875，首次发表于 1890—1891 年），MEW 19，第 11—32 页；MEGA I.25，第 3—25 页
G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首次发表于 1939—1941 年），1953 年东柏林版，1983 年新版见 MEW 42，第 47—768 页；MEGA II.1.1-1.2，第 49—747 页
HF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1845），MEW 2，第 3—223 页
Inauguraladresse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 3—13 页；MEGA I.20，第 3—12 页（英文版），第 16—25 页（德文版）
Judenfrage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1844），MEW 1，第 347—377 页；MEGA I.2，第 141—169 页
K I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1867，引文参照 1890 年

德文第4版），MEW 23

K II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Das Kapital*.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F. 恩格斯编，（1885，引文参照1893年德文第2版），MEW 24

K III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ß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F. 恩格斯编（1894），MEW 25

KHR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1844），MEW 1，第378—391页；MEGA I.2，第170—183页

KHS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1843，首次发表于1927年），MEW 1，第203—333页；MEGA I.2，第3—137页

Klassenkämpfe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1850），MEW 7，第9—107页；MEGA I.10，第119—196页（第1—3部分）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ag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1845），MEW 2，第225—506页

LF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1886），MEW 21，第259—307页

Lohn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Lohn, Preis und Profit*）（1865，首次发表于1898年），MEW 16，第101—152页；MEGA I.20，第141—186页（英文版）；MEGA II. 4.1，第383—432页（德文版）

Lohnarbeit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1849），MEW 6，第397—423页

Manifest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1848），MEW 4，第 459—493 页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1975—1989 年东柏林—莫斯科版，1992 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国际马恩基金会编辑，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出版
ME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arx-Engels Werke*），第 1—42 卷，1957—1989 年东柏林版；第 43 卷，1990 年柏林版
Ms 44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首次发表于 1932 年，MEGA I I.3），MEW 40，第 465—588 页；MEGA I.2，第 187—438 页
Ms 61-6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e 1861-1863]），MEGA II.3.1-6
Ms 63-67	马克思：《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7），MEGA II.4.1 及 II.4.2
NRhZ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上的文章（1848—1849），MEW 5，第 11—457 页；MEW 6，第 5—519 页
Randglossen	马克思：《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79—1880），MEW 19，第 355—383 页
Res	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第 3 稿第 6 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5. Das Kapital, 3. Entwurf, 6. Kapite: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ctionsprozesses«）（首次发表于 1933 年），MEGA II.4.1，第 24—135 页
Statuten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Provisorische Statut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 14—16 页；MEGA I.20，第 13—15 页（英文版），第 54—56 页（德文版）

Tech Exz　《卡尔·马克思技术史笔记》（*K.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历史考证版，H. -P. 穆勒（H. -P. Müller）改写并编辑，198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ThF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1845，首次发表于 1888 年），MEW 3，第 5—7 页

TM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1862—1863，由 K. 考茨基［K. Kautsky］编辑，首次发表于 1905 年至 1910 年），MEW 26.1，26.2，26.3；MEGA II.3

Umrisse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1844），MEW 1，第 499—524 页；MEGA I.3，第 467—494 页

Ursprung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1884），MEW 21，第 25—173 页；MEGA I.29

Urtext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片断》（Fragment des Urtextes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8），*Gr*，第 869—947 页；MEGA II.2，第 17—94 页

Utopie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1880），MEW 19，第 177—228 页；MEGA I.27，第 583—627 页

Vorw 5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ort«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7—11 页；MEGA II.2，第 99—103 页

Zur Kriti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3—160 页；MEGAII.2，第 95—245 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

Briefe　《书信》（*Briefe*），10 卷本，1967—1976 年东柏林版

Im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Der 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 des Kapitalismus）（1917），LW 22，第 189—309 页

ImpHefte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Hefte zum Imperialismus），LW 39，（1915—1916）

KapR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ßland*）（1899），LW 3，第 7—629 页

LR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Der »linke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im Kommunismus*）（1920），LW 31，第 1—91 页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40 卷和两卷补遗，1953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ME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1909），LW 14，第 7—366 页

ökInh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r Volkstümlerrichtung und die Kritiken in dem Buch des Herrn Struve*）（1895），LW 1，第 339—528 页

PH 《哲学笔记》（Philosophische Hefte），LW 38

SR 《国家与革命》（*Staat und Revolution*）（1918），LW 25，第 393—507 页

Taktiken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Zwei Taktik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1905），LW 9，第 1—130 页

VF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as sind die »Volksfreunde« und wie kämpfen sie gegen die Sozialdemokraten?*）（1894），LW 1，第 119—338 页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Akku 《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913），GW 5，第 5—411 页

Briefe 《书信集》（*Gesammelte Briefe*），6 卷本，1982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 6 卷，1993 年柏林版

GW 《全集》（*Gesammelte Werke*），5 卷本，1970—1975 年东柏林版

Krise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1916），GW 4，第 49—164 页

Mass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1906），GW 2，第 70—91 页

SoR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1899），GW 1/1，第 365—466 页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B, Bochmann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笔记》（*Notizen zu Sprache und Kultur*），K. 博赫曼（K. Bochmann）编，1984 年莱比锡—魏玛版

Briefe　《狱中书简》（*Gefängnisbriefe*），4 卷本考证版，U. 阿皮奇（U. Apitzsch）、P. 卡默勒（P. Kammerer）、A. 纳托利（A. Natoli）和 M. P. 奎尔乔利（M. P. Quercioli）编，1994 年起在汉堡出版

CPC　《共产党的建设》（*Costruzione del Partito comunista*）（1923—1926），1971 年都灵版

Gef　《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基于 1975 年葛兰西研究所委托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所编版本的考证版全集，在 K. 博赫曼（K. Bochmann）和 W. F. 豪克（W. F. Haug）的学术指导下的德国葛兰西项目（Deutsches Gramsci Projekt）编，1991 年起在汉堡出版

INT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1949 年都灵版

K, Kebir　《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文学》（*Marxismus und Kultur. Ideologie, Alltag, Literatur*），萨比娜·凯比尔（Sabine Kebir）编译，1983 年汉堡版

LC　《狱中书简》（*Lettere dal carcere*），1965 年都灵版

LVN　《文学和民族生活》（*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1949 年都灵版

MACH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1949 年都灵版

MS　《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1949 年都灵版
ON	《新秩序》（*Ordine nuovo*）（1919—1920），1954 年都灵版
Opere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作集》（*Opere di Antonio Gramsci*），1947 年起在都灵出版
PP	《过去和现在》（*Passato e presente*），1949 年都灵版
Q	《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葛兰西研究所 4 卷本考证版，V. 杰拉塔纳（V.Gerratana）编，1975 年都灵版
Ri, Riechers	《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Chr. 里歇斯（Chr. Riechers）编译，196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F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新秩序》（*Socialismo e Fascismo. L'ordine nuovo*）（1921—1926），1971 年都灵版
SG	《青年时期著作集》（*Scritti giovanili*）（1914—1918），1958 年都灵版
SM	《防波堤下》（*Sotto la mole*）（1916—1918），1960 年都灵版
Südfrage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Alcuni temi della quistione meridionale«，德文译为：»Einige Gesichtspunkte der Frage des Süddens«）（写于 1926 年，1930 年首次发表），载《共产党的建设》（CPC），第 137—158 页。E. 萨莱夫斯基（E. Salewski）译，载《安东尼奥·葛兰西 ——被遗忘的人文主义者？》（*Antonio Gramsci – vergessener Humanist?*），H. 诺伊贝特（H. Neubert）编，1991 年柏林版，第 41—68 页
Z1980	《关于政治、历史和文化》（文选）（*Zu Politik, Geschichte und Kultur. Ausgewählete Schriften*），G. 扎米什（G. Zamiš）编，198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Z1987	《对文化的思考》（*Gedanken zur Kultur*），G. 扎米什（G. Zamiš）编，1987 年莱比锡版

其他出版物和著作标题

阿多诺（Th. W. Adorno）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20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编，1973—198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阿尔都塞（L. Althusser）	*ISA*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1977年汉堡版
	LLC, DKL	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8年巴黎版。德文译本：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1972年赖因贝克版
	PM, FM	《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年巴黎版。德文译本：《保卫马克思》（*Für Marx*），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	*Cat*	《范畴篇》（*Categoriae*）
	Ph	《物理学》（*Physica*）
	Oec	《经济学》（*Oeconomia*）
	EN	《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
	Int	《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
	Metaph	《形而上学》（*Metaphysica*）
	Po	《诗学》（*Poetica*）
	Pol	《政治学》（*Politica*）
	Rh	《修辞学》（*Rhetorica*）
鲍威尔（O. Bauer）	WA	《文集》（*Werkausgabe*），9卷本，1975—1980年维也纳版
本雅明（W. Benjamin）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7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和H. 施韦彭霍伊泽（H. Schweppenhäuser）编，1972—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伯恩施坦（E. Bernstein）	*Voraussetzungen*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1899年斯图加特版
布洛赫（E. Blo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20卷本，1969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WA	《文集》（*Werkausgabe*），20卷本，198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布劳恩（V. Braun）	Texte	《按时间排序的文章》（*Texte in zeitlicher Folge*），10卷本，1989—1993年萨勒河畔哈雷—莱比锡版
布莱希特（B. Brecht）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20卷本，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A	《文集》（*Werke*），1989年起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出版，大开本
	AJ	《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1938—1955）。
迪米特罗夫（G. Dimitroff）	AW	《选集》（*Ausgewählte Werke*），3卷本，M. 亚尔泽瓦（M. Jarzeva）总编，197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艾斯勒（H. Eisler）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民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委托S. 艾斯勒（S. Eisler）、M. 格拉布斯（M. Grabs）主编，系列三，1972年起在莱比锡出版
	Gespräche	《与汉斯·邦奇的对话：进一步了解布莱希特》（*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GW 7，1975年莱比锡版
费尔巴哈（L. Feuerbach）	AS	《人类学唯物主义》（*Anthropologischer Materialismus*），《文选》（Ausgewäh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主编，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19 卷本，W. 舒芬豪尔（W. Schuffenhauer）编，1967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 19 卷，1993 年在柏林出版
	W	《著作六卷本》（*Werke in sechs Bänden*），E. 蒂斯（E. Thies）编，197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Wesen	《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
弗洛伊德（S. Freud）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按时间排序，17 卷本，1946—1952 年伦敦版
	SA	《研究读本》（*Studienausgabe*），A. 米切利希（A. Mitscherlich）、A. 理查兹（A. Richards）和 J. 斯特雷奇（J. Strachey）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戈尔巴乔夫（M. Gorbatschow）	AR	《演讲与文章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1988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黑格尔（G. W. F. Hegel）	*Ästh*	《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1835 年第 1 版，1842 年第 2 版）
	Bassenge	《美学》（*Ästhetik*），两卷本，基于 1842 年 F. 巴森格（F. Bassenge）编辑版本的第 2 版，1955 年东柏林—魏玛版及以后各版
	Enz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17 年第 1 版，1830 年第 3 版）
	GeschPhil	《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19—1828，出版于 1833—1836 年）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Rheinisch-Westfäl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编，1968 年起在汉堡出版

	Logik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
	PhG	《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 年第 1 版，1831 年第 2 版）
	PhilGesch	《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der Geschichte*）（1837 年 第 1 版，1840 年第 2 版）
	RPh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1 年第 1 版，1833 年第 2 版）
	SW	《全集》（*Sämtliche Werke*），G. 拉松（G. Lasson）编，1917 年起在汉堡出版；新考证版《全集》，J. 霍夫迈斯特（J. Hoffmeister）编，1955 年汉堡第 5 版
	W	《著作二十卷本》（*Werke in 20 Bänden*），在 1832—1845 年《文集》（*Werke*）的基础上重新编辑，E. 莫尔登豪尔（E. Moldenhauer）和 K. M. 米歇尔（K. M. Michel）编，197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和 G. 施密德-内尔（G. Schmid-Noerr）编，1985 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康德（I. Kant）	*Anthrop*	《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 年 第 1 版 = A，1800 年 第 2 版 = B）
	KpV	《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KrV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 年第 1 版 =A，1787 年第 2 版 = B）
	KU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年第 1 版 = A，1790 年第 2 版 = B）

	Prolegomena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
	WA	《著作集》（*Werkausgabe*），12卷本，W. 魏舍德尔（W. Weischedel）编，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柯尔施（K. Kors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受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汉诺威大学政治学研讨班的委托，M. 布克米勒（M. Buckmiller）编，1980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拉布里奥拉（A. Labriola）	*GkM*	《纪念〈共产党宣言〉》（*Zum Gedächtnis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1895），载《唯物史观论丛》（*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C. 波佐利（C. Pozzoli）和A. 阿斯凯里-奥斯特洛（A. Ascheri-Osterlow）编，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73—138页
	ÜHM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备工作》（*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Präliminarien*）（1896），载上书，第139—266页
	SPh	《社会主义和哲学》（*Sozialismus und Philosophie*）（1898），载上书，第267—414页
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	GRS	《演讲与论文集》（*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德国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编，1958年东柏林版
卢卡奇（G. Lukács）	W	《文集》（*Werke*），17卷本，1962年起在新维达—柏林出版
	GuK	《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年增订版）

	Zerstörung	《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1954）
毛泽东（Mao Zedong）	AW	《毛泽东选集》（*Ausgewählte Werke*）第1—5卷，1968—1978年北京版
	T	《毛泽东著述文稿与演讲谈话》（*Texte. Schriften, Dokumente, Reden und Gespräche*），H. 马丁（H. Martin）编，1979—1982年慕尼黑—维也纳版（汉—德对照本）
马尔库塞（H. Marcuse）	Schriften	《马尔库塞著作集》（*Schriften*），9卷本，1978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里亚特吉（J. C. Mariátegui）	*Sieben Versuche*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1928），附K. 福赛尔（K. Füssel）写的“导言”和W. F. 豪格（W. F. Haug）写的“跋”，1986年西柏林—弗莱堡（瑞士）版
梅林（F. Mehring）	GS	《梅林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11卷本，1960年起东柏林出版，1971年东柏林第2版
尼采（F. Nietzche）	KGA	《尼采著作集》（*Werke*），考证版全集，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972年起在柏林出版
	KSA	《尼采全集》（*Sämtliche Werke*），考证研究版，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5卷本，1980年慕尼黑—西柏林版
柏拉图（Plato）	*Cra*	《克拉底鲁篇》（*Cratylus*）
	Grg	《高尔吉亚篇》（*Gorgias*）
	Prt	《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R	《理想国》（*Respublica [Politeia]*）
	Smp	《会饮篇》（*Symposium*）
	Sph	《智者篇》（*Sophista*）
	Tht	《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Ti	《蒂迈欧篇》（*Timaeus*）
大卫·李嘉图（D. Ricardo）	W	《大卫·李嘉图著作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rdo*），11卷本，P. 斯拉法（P. Sraffa）和M. 多勃（Dobb）编，1951年起在剑桥出版
	Grundsätze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der Besteuerung*）（1817），P. 塔尔（P. Thal）编，1979年东柏林版
亚当·斯密（A. Smith）	*Reichtum*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Wesen und die Ursachen des Reichtums der Nationen*）（1776），3卷本，P. 塔尔（P. Thal）编，1976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斯大林（J. Stalin）	W	《斯大林全集》（*WerKe*），13卷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译，1950年起在东柏林出版（1947年起在莫斯科出版俄文版）
	AW	《斯大林选集》（*Ausgewählte Werke in zweri Bänden*）两卷本，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派编，1979年多特蒙德版
	FL	《列宁主义问题》（*Fragen des Leninismus*）（1938），1947年莫斯科第11版
	ÖkP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1952年柏林版第1版，多次再版
	Sprachw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Der Marxismus und die Frag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1951年柏林第1版，多次再版
	DHMat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Geschichte der KPdSU[B]*），1938年莫斯科版；又载于 *FL*

托洛茨基（L. D. Trotzk）	GW	《托洛茨基文集》（*Gesammelte Werke*），两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7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riften	《托洛茨基著作集》（*Schriften*），两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88 年和 1990 年汉堡版
马克斯·韦伯（M. Weber）	GA	《马克斯·韦伯全集》（*Gesamtausgabe*），受巴伐利亚科学院社会经济史委员会委托由 H. 拜耳（H. Baier）、M. R. 勒普修斯（M. R. Lepsius）、W. J. 蒙森（W. J. Mommsen）、W. 施鲁赫特（W. Schluchter）、J. 温克尔曼（J. Winkelmann）编，1986 年起在图宾根出版
	WuG	《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纲要》（*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1921），J. 温克尔曼编，第 5 版修订版，1976 年图宾根版

4. 常用缩写

AdW	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GW	社会科学院（Akademie der Gesellschaftwissenschaften）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O	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oin）
AS	《观点》特辑（Argument Sonderbnd）
Benseler	G. E. 本泽勒（G. E. Benseler）
Br	书信集、通信集（Briefe）
BR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西德（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SP	国民生产总值（Bruttosozialprodukt）
CCCS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irmingham]）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CERM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巴黎）（Center d' 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Paris]）
CGT	法国总工会（Conféde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NT	全国总工会（Confederación de Los Trabjadores）
DC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
D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GB	德国工会联合会（Deu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iaMat	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KP	德国共产党（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MT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T. 博托莫尔（T. Bottomore）编，1983 年牛津版
EKKI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ite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AZ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
FDGB	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Frei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FDP	自由民主党、自民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GA	全集（Gesamtausgabe）
Gef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基于 1975 年葛兰西研究所委托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所编版本的考证版全集，在 K. 博赫曼（K. Bochmann）和 W. F. 豪克（W. F. Haug）的学术指导下的德国葛兰西项目（Deutsches Gramsci Projekt）编，1991 年起在汉堡出版
GG	《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7 卷本），O. 布伦纳（O. Brunner）、W. 康策（W. Conze）、R. 科泽勒克（R. Kosellek）编，1974—1992

	年斯图加特版
GS	文集、著作集、著述集（Gesammelte Schriften）
GULag	古拉格（苏联劳动改造集中营管理总局）（Glawnoje Uprawleenije Lagerej [Hauptverwaltung des Straflagersystems der UdSSR]）
GW	文集、著作集（Gesammtelte Werke）
Hg	编者（Herausgeber）
hgg	编、编辑、编纂、编写（herausgegeben）
HWPh	《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J. 里特尔（J. Ritter）、K. 格林德尔（K. Gründer）编，1971 年起在巴塞尔出版
IAA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iation）
IfS	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GB	工会国际（Internationaler Gewerkschaftsbund）
IISG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Amsterdam]）
IMSF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 [Frankfurt/M]）
Jh	世纪（Jahrhundert）
KGA	考证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I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l Pauly	《小保利古典学辞典》（*Der Kleine Pauly. Lexikon der Antike*），1964 年斯图加特版
Kominform	各国共产党情报局（Kommunistische Informationsbüro）
Komintern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P	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KPCh	中国共产党、中共（KP Chinas）
KPD	德国共产党、德共（KP Deutschlands）
KPD (O), KPO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德共（反对派）（KP Deutschlands [Opposition]）
KPdSU	苏联共产党、苏共（KP der Sowjetunion）

KPF	法国共产党、法共（KP Frankreiche）
KPI	意大利共产党（KP Italiens）
KPR (B)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共（布）（KP Rußlands [Bolschewiki]）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 Ökonomie）
KSA	考证研究版（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KSZ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KWM	《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8卷本），G. 拉比卡（G. Labica）、G. 邦叙桑（G.Bensussan）编，1982年巴黎版，1985年第2版；德文译本（*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W. F. 豪格（W. F. Haug）编，1983—1989年柏林版
KZ	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Lalande	拉郎德（A. Lalande），《哲学术语与批判辞典》（*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1988年巴黎第16版
LS	《社会主义词典》（*Lexikon des Sozialismus*），Th. 迈尔（Th. Meyer）等编，1986年科隆版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40卷和两卷补遗，1953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1975—1989年东柏林—莫斯科版，1992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国际马恩基金会编辑，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出版。
MEW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第1—42卷，1957—1989年东柏林版；第43卷，1990年柏林版
MiS	《马克思主义系统比较》（*Marxismus im Systemvergleich*），C. D. 克尼希（C. D. Kernig）编，1966年弗赖堡版（多次重印）
ML	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Marxismus-Leninismus）
ND	《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
NÖP	新经济政策（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S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
PDS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hWb	《哲学辞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两卷本），M. 布尔（M. Buhr）和 G. 克劳斯（G. Klaus）编，1974 年莱比锡增订第 10 版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RGG	《历史与现实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六卷本，附索引卷），1957—1965 年图宾根版
RGI	红色工会国际（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SAP (D)	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
SBZ	苏联占领区、苏占区（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SDAPÖ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
SDAPR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Rußlands）
SDS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I	社会党国际（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U	苏联（Sowjetunion）
SW	选集、文选、著作选（Sämtliche Werke）
UN (O)	联合国（组织）（United Nations [Organisation]）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USPD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民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W	著作集、文集、文选、全集（Werke）

WA	著作集、文集、全集（Werkausgabe）
Z	期刊、杂志（Zeitschrift）
ZK	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5. 译者姓名首字母

BK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Barbara Ketelhut）
DB	丹尼尔·巴邦（Daniel Barben）
FH	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
JR	让·雷曼（Jan Rehmann）
MK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Michael Krätke）
NB	娜娜·巴登贝格（Nana Badenberg）
PJ	彼得·耶勒（Peter Jehle）
RG	鲁埃迪·格拉夫（Ruedi Graf）
TL	托马斯·劳格施泰因（Thomas Laugstien）
WFH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勘　误　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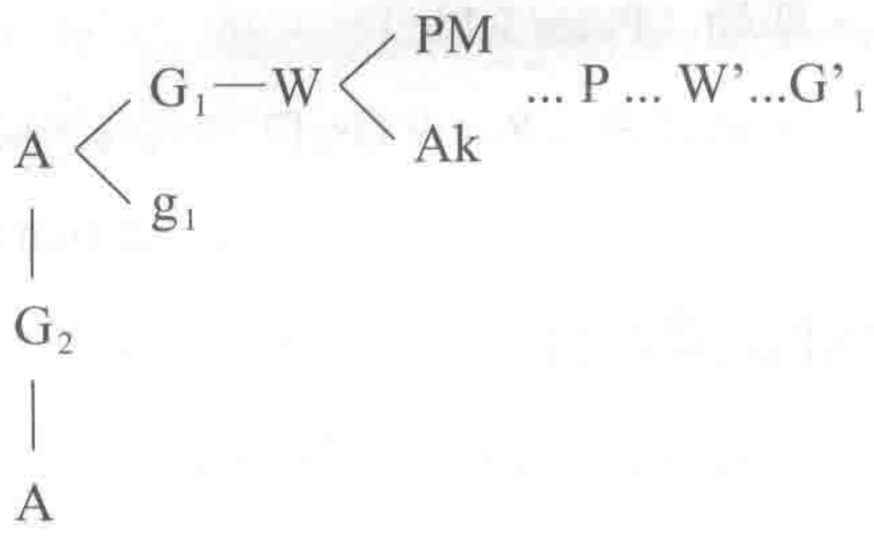
第 5 栏，最后一个自然段：1961 年赫鲁晓夫所提出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全民国家”。

第 7 栏，第 1 自然段，第 16 行：“εἰδος”改为“εἶδος”。

第 8 栏，第 13 行：“κόσμω”改为“κόσμῳ”。

第 20 栏，第 14 行：“1497”改为“1479”。

第 115 栏：公式的正确表达形式应为：



第 126 栏，参考文献，倒数 5 行：“1921”改为“1922”。

第 224 栏，第 3 行：“Menius”改为“Menenius”（梅尼乌斯）。

第 287 栏，倒数第二自然段末尾改为“（*Revolte*, 212）”。

第 289 栏，参考文献，在 E. Fromm 处增加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in: *ZfS*, 4. Jg., 1935, H. 3, 365-397.

第 337 栏，倒数第 9 行：“Priker”改为“Pirker ”。

第 364 栏，第 2 行：“πρόλεψις”改为“πρόληψις”。

第 366 栏，最后一行：“被侮辱”改为“被侮辱、被奴役……”。

第 371 栏，第 13 行：“1917”改为“1918”。

第 433—434 栏：民主集中制不是布尔什维克在 1903 年接受的组织原则，而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 1905 年接受的组织原则。

第 436 栏，倒数第 19 行：“1923”改为“1924”。

第 535 栏，第 1 行：“劳动力出售者”改为“劳动力购买者”。

第 556 栏，第 31 行（第 2 自然段倒数第 5 行）：“纳入……，以及相反。劳动政治不是……”改为“纳入……。相反：劳动政治不是……”。

第 604 栏，第 20 行；第 607 页，参考文献：“Lurčnat”改为“Lurcat ”。

第 640 栏，第 2 自然段，第 12 行：“回译”改为“翻译”。

第 693 栏，参考文献中增加：Th. Marxhausen, »Kautskys Herausgabe der ‘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 in: *Karl Kautsky. Referate und Beiträge der halleschen Konferenz anlässlich des 50. Todestages*, hgg. v. W. Kowalski, Halle 1990, 92–101.

第 731 栏，第 3 自然段，第 8 行：“被奴役、被蔑视的”改为“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

第 807 栏，参考文献：“Johnston”改为“Johnstone ”。

译 后 记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中文版第一卷，经过编译者和出版者八个多月的共同努力，终于问世了。这是《大辞典》中文版编委会献给马克思二百周年诞辰的一份厚重礼物。

本卷辞典之所以能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感谢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和社会科学学部的大力支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通力合作，感谢所有参与本辞典工作的译者、编者、校订者和出版者。

《大辞典》中文版第一卷译自德文版第一卷第二版，共有 99 个词条，在编译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尊重原著、质量第一的原则。为保证翻译质量，大部分词条都经过初译、校译、专家审读等多重核校。在编译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难点和分歧，在此摘其要者，做一说明：

1. 原著词条中大量出现马列原著引文，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保证经典的统一性，直接引用或者参阅了国内已经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但限于版式和篇幅，未注明出处。对于被引用的句子或段落，我们对原译者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2. 《大辞典》德文版中每个词条都有中译名，一般情况下我们直接采用。本卷个别词条我们参照了中文已有的经典译法。比如，第一个词条德文版的中译名为“国家的削弱”，中文版译为“国家的消亡”。“国家的消亡”已经是重要理论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其他词汇重新翻译，否则将可能在理论界引起歧义和混乱。又如德文版中的“劳动教养”词条，我们改译为“劳动教育”，这是因为在中文语境中“劳动教养”有特殊的含义，而该词条的内容更接近“劳动教育”的含义。类似的有“劳动政策”改为“劳动政治”，“职员”改为“雇员”，“美国风”改为“美国主义”等。

3. 德文版夹注中的书名、文章名等的缩写，中文版一律保持原貌，同时我们翻译了缩写索引，附在中文版的最后。其中有个别的缩写翻译有特殊性，比如，

KrpÖ 有的地方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各版手稿、文本，有的地方指马克思曾经构思过而未完成的同名写作规划。

4. Gr 这个缩写，有两个译名：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文版主要采用前者，后者只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

5. 关于勘误表。《大辞典》第一卷（德文版）附有勘误表，中文版在编译过程中，已根据此表在正文中做了相应修订。在此期间，我们收到德文版主编豪格先生的来信，增加了几处勘误，中文版也一并做了修改，并且把所有勘误附于缩写表之后。

6. 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文，中文版将德文版的栏码（页码）在相应位置标注为边码。

《大辞典》中文版第一卷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共有 26 名译者参与其中，他们是（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　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
王　师　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王　奎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艳柯　德国弗莱堡大学法学博士
朱刘华　自由译者、副译审
朱更生　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朱渝阳　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刘　笑　德国美因茨大学翻译学院研究生
杨　佳　北京洪堡德语学校教师
宋　珊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德法教研室主任、讲师
张义修　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张志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
张雪亮　德国班贝格大学哲学学士
陈洪捷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林芳芳　北京大学德语系毕业，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实习员
胡晓琛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

侯振武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贺　腾　德国波恩大学在读博士生
秦明瑞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胜大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
高　杉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
唐　婧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
曹　旸　北京大学德语系在读硕士生
盛舒洋　德国行政学院政治学在读博士生
蒋　迪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潘　璐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本卷辞典的编译工作在俞可平主编及编委会杨河主任的领导下展开；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张志刚教授、赵家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段忠桥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沈红文译审、张文红研究员，在本卷辞典的编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给予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李以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柳新副教授、李健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杨军副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梁爽，香港城市大学郑芷萍女士等，参与了若干条目的审校；还有很多学者同仁也为本卷辞典的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在此不一一列举。谨对各位的帮助和支持深表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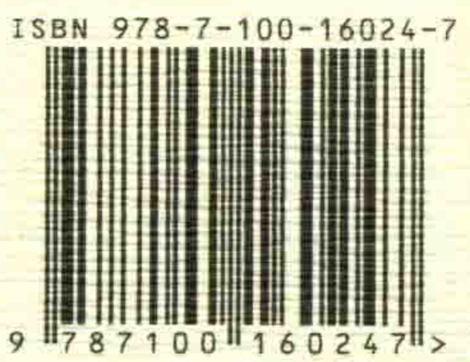
《大辞典》内容丰富、引证广泛、思想深邃，翻译难度极大，加上时间紧迫和水平所限，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7 日

上架建议：马克思主义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6024-7



定价：286.00元

马克思主义
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二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银行
至音乐中的愚蠢

商務印書館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800余位学者为本辞典的编写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二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银行至音乐中的愚蠢

商務印書館
創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itz Hau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2: Bank bis Dummheit in der Musik

© The Commercial Press, 2021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InkriT.

Colombe aux quatre profils entrelacés, 1951.
Pablo Picasso © Succession Picasso 2018

E-mail-Adresse der Redaktion (编辑部邮箱地址): hkwmred@mail. zedat. fu-berlin. de

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

邱水平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郝　平　北京大学校长

顾　问：

于鸿君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　编：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主任：

张　静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社会学教授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鸿君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于殿利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仰海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哲学教授

关海庭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　河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汪建成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法学院教授
沈红文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主任
张文红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研究员
张异宾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编辑部：

主　任：倪宇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编审
副主任：佟　萌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办公室主任

德文版第二卷工作人员名单

编辑部：

丹尼尔·巴本　弗里加·豪格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罗尔夫·黑克尔

库尔特·雅各布斯　托马斯·劳格施廷　扬·雷曼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

托马斯·韦伯　冈特·维林

学术顾问：

乔治·巴拉塔　特奥多尔·贝格曼　玻利瓦尔·埃切韦里亚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乔治·拉比卡　斯文-埃里克·利德曼　君特·迈尔　韦科·皮耶蒂拉

海因里希·陶特　维尔纳·范·特里克　巴斯蒂亚安·维伦加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

统筹协调：

托马斯·韦伯（主管）

托马斯·劳格施廷　霍尔格·莱地希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

外语校对：

艾尔克·施瓦尼茨（阿拉伯语）

蒙蒂·约翰斯通　丹加·维雷希斯（英语）

杰拉德·邦苏桑（法语）

特蕾莎·奥罗斯科　何塞·玛丽亚·里帕尔达

欧亨尼娅·埃拉索·梅特尔西芬（西班牙语）

冈特·维林（俄语）

柯兰君　南因果　殷叙彝（汉语）

翻　译：

纳娜·巴登贝格　丹尼尔·巴本　乌尔里希·布卢门巴赫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米夏埃尔·豪普特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

克里斯托夫·克尼斯特（古希腊语）　托马斯·劳格施廷

赖因哈德·马克纳　冈特·维林

姓名索引：

乔治斯·李尔普罗斯　沈勇玉（Yong-Ok Shim，据韩语音译）　卡米尔·乌鲁达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之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图谱。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诞生后，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大量的反对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如果要有足够的知识力度，就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对于当代的学者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文献，首先是MEGA（*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其次便是HKWM（*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正如蒙蒂·琼斯顿（Monty Johnstone）所说：MEGA和HKWM互为补充[①]。《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概念的深度阐释，不仅凝聚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血，也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是迄今最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W. F. 豪格夫妇（Wolfgang Fritz Haug和Frigga Haug）、P. 耶勒（Peter Jehle）和W. 考特勒夫（Wolfgang Kuttlertf）等4位德国学者在编译G. 拉比卡（Georges Labica）主编的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marxisme*）的基础上，发起编辑了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编纂时间最长，也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大辞典》原计划撰写1200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概念，后来逐渐增扩至1500个，卷次也从原计划的12卷扩至15卷，而且

---

① 蒙蒂·琼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互为补充》（"HKWM and MEGA Complement Each Other"），《MEGA研究》（*MEGA-Studien*），1995年第2期。

从第 6 卷开始，每卷均分为上下两册。这样，整个《大辞典》的规模实际上将达到 15 卷 25 册。截至 2018 年 5 月，已经出版德文版共 9 卷 13 册。另有 6 卷共 12 册尚未出版。

《大辞典》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除了规模大和时间长的特点外，《大辞典》还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跨学科性。《大辞典》所选录的 1500 多个关键概念，几乎横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法学、神学、伦理学、语言学、修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军事学，等等。相应地，这些关键概念的作者也分别来自上述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不同观察。第二，国际性。尽管《大辞典》的原文是德文，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际性的研究和出版计划。“迄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包括 8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国际性项目。”① 不仅有发达国家的作者，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作者；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为了突出其国际性，编者还在《大辞典》的每个德文词目上分别注上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的译名，甚至还包括中文译名。《大辞典》每出版一卷，就会有一些重要条目在英文版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发表。第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批判性。《大辞典》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一特征，将批判性作为贯穿于整个辞典的一条主线，并体现于《大辞典》的书名之中②。正如欧洲劳工研究所的乔恩·詹森（Jorn Janssen）在书评中所说，“《大辞典》旨在提供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③。这里的“批判性”，主要是指理性的审视和独立的评判：既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也不屈服于世俗的利益，而是秉承客观的和科学的精神，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与判断。鉴于这种批判精神，丹麦的著名社会学家 G. 索邦（Göran Therborn）赞赏说：《大辞典》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百科全书”，是知

① 参见 P. 托马斯（Peter Thomas）：《〈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介绍》（“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 13 卷第 235 页。

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德文原文是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其中的 kritisches 译成中文本来就有“批判的”意思，但此处的“批判”不含有中文语境中的政治意义。

③ 乔恩·詹森：《〈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书评》，《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2016 年 2 月 15 日。

识分子“拒绝屈服的唯一榜样”[①]。

以豪格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大辞典》核心编纂团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榜样，也是所有严肃学者的榜样。《大辞典》的编纂计划始于1983年，那时“两德”尚未统一，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主要来自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这是一群独立的学者，他们既不是东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东德政府不可能支持他们；他们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西德政府也不支持他们，连德国的科学基金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也“拒绝资助这部辞典”[②]。他们把编撰《大辞典》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依靠社会捐助和自我奉献，坚忍不拔地开展工作。在过去35年中，他们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努力推动着一卷又一卷《大辞典》的出版。尽管困难比想象的更大，进度比计划的更慢，但他们丝毫不减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大辞典》第一卷的编撰出版，居然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从1983年开始，到1994年才得以面世。其间有些作者已经离开了人世，至少有7位作者“已不能亲历本辞典第一卷的出版”[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所有学者学习。

正是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的这种高尚的学术精神感动了我，促使我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的协调工作。我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研究重心转向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本来已经没有计划再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2017年10月，经德国友人推荐，豪格先生与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初次见面，他表达了出版《大辞典》中文版的热切愿望。回国后我专门向学校进行汇报，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担任《大辞典》中文版总顾问，于鸿君常务副书记、王博副校长任顾问，学校委托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了《大辞典》中文版编辑委员会，杨河教授兼任主任。

尽管据说全国有500多家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研究机构，6万—7万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但懂得德语并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高水平专家却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公开向全国发出招聘高水平译者的邀请，

① G. 索邦：《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维索出版社（Verso）2008年版，第174页。

② 沃尔夫冈·豪格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德文版“前言”，第6页；见中译本第一卷“前言”之“关于第二版”。

③ 同上书，德文版第一卷“前言”第5页；见中译本第一卷“前言”第6页。

最终有近 30 名学者加入到《大辞典》中文版的翻译队伍中。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这部高深而浩繁的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得以陆续呈献给中文读者。《大辞典》的德文版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作，其中文版也同样如是。幸赖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同仁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大辞典》的中文版才能顺利编译出版。作为《大辞典》中文版的主编，我对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专家学者、各界朋友和编辑部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可平

2018 年 3 月 11 日

德文版主编序

九曲桥

恶鬼只知道直行，
就像意识形态家的
邪灵
在百花盛开的园中难寻我的踪迹。

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
1988年于上海九曲桥

加拿大哲学家联合会（Canad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原主席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1994年曾称这卷书的德文原版“具有世界历史的（world-historic）意义”。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北京大学用以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中译本为他的评价史增分量。现在，这部诞生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史时刻的著作译成了中文，中文不仅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语言，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引人瞩目的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中心的国家的语言。在危机四伏的天空下，人类的前途已和这个大国的前途交汇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是对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补充，而后者本身就具有世界文化的意义，因为它将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和欧洲文明世界朝向解放、朝向革命的一面联结了起来。马克思不仅为人类留下迄今从未过时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组织上为奠定现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做出决定性贡献，而且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对压迫、剥削和阶级统治的批判，已经成为他所在的文明世界通往未来团结统一而且社会化的人类世界的钥匙。

人们常说，马克思历久弥新的现实性的秘密就隐藏在他的方法（Methode）之中。但是对于马克思（以及他之前的黑格尔）来说，除了“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

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论》第一卷，MEW 23，第 28 页）的一般法则之外，并不存在独立于待分析的现实的性质而抽象地自成一体的方法。回溯“方法”这个词的希腊词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它的字面意思是“朝向……的路”。每处的地形和最终的目的决定了路的不同，篇首所引的诗人以九曲桥为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恩格斯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MEW 13，第 475 页）历史上成群的活动家一次又一次走上歧路，但这并不全然是坏事：走不通的路会给人教益。现在到了转变（Wendungen）的时候，而转变也正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诗人哲学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 年）以虚拟的中国为背景、充满辩证教诲的小书《墨翟：转变之书》（*Me-ti–Buch der Wendungen*）的主题。

阐明这些转变及其背后理论上、现实政治中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经验和分歧，是这部对概念加以历史考证（kritisch。该词兼有“批判”和“考证”的含义。——译者）的辞典肩负的主要任务。这个意义上的批判（kritik）并不来自外部，反而是站在被批判者的立场上，它面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蓝图和历史，应当是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 年）所说的“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这个概念似乎是悖谬的，拯救和批判如何相容呢？拯救让人想到辩护，批判则让人想到判决。拯救性批判兼采二者，但它真正关键的要义则在于：从以往的瓦砾中拣取有生命力的成分，传递给子孙后代。行动和理论研讨中包含的经验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这些经验构成了针对改变社会的实践的理论。同时，拯救性批判粉碎了妨碍这些经验现实化的种种成见积习。因为马克思针对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断，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件未成品（work in progress）。对一项正在向前迈进的事业来说，错误从来不是全然消极的，如果错误得到理解和具体的批判，就会是有益于现实生活的。即便失败也是如此，布莱希特 1929 年说过，有些时候“需要的不是胜利，而是 / 赢得失败”（GA 14，第 38—39 页）。

因此这部《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会满足于做以往历史的档案。即便是马克思，无论他有多么根基性的意义，本辞典也必须用马克思来超越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每个时期都要在变化无常的地区和国际条件下完成上述任务，还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不断重新完成。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通过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彼此之间的社会物质变换，生产和再生产着我们的生命和生命条件，并建立了种种关系，问题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这些关系中激发出团结统一的社

会关系？这个革命之问，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的源代码，它比任何体系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都更有意义。只要马克思主义能够干预关乎社会解放运动的所有问题，比如今天女性主义提出的性别关系问题和生态主义提出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它就会永保活力。

为了解决这个任务，本辞典将马克思相关的问题作为探针射向历史、当代和正在浮现的未来，几乎伸向了人类世界的所有领域。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等事物为我们留下思想素材，我们通过承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继续对它们进行加工，如果没有这些思想素材，就无法批判地站在团结统一的立场上，从综合历史经验和科学认识的高度，全面地把握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用马克思的探针所射入的当代世界，是一个数码革命的世界、战争阴云笼罩的世界，其中充满了惊人的对立和矛盾，遍及全球的解放运动和武力镇压相交织，所有这一切背后还悄然发生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资本世”（Kapitalozän）的地球史变动，也就是步步逼近的“气候灾难”。

如果这支探针在它的探索之旅中，不仅就所谓早已测量清楚、研究透彻的历史关节点，而且就日常的生活现象，都能不断传回新的图景，那将是我们莫大的慰藉。翻开本辞典会遇到不少惊喜，无论是没有意料到会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辞典里的概念，还是被认为已研究透彻的耳熟能详的题目，都会“打开一个全新世界的窗口”（罗莎·卢森堡，GW 1/II，第 364 页）。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2018 年 3 月

曹旸 译

德文版前言

在第一卷出版后的 6 个月中，本辞典颇受欢迎，订购数接近 1000 册。最初的一些评论体现出，对经典篇章以及援引这些经典篇章的传统进行历史考证，引入新社会运动中的概念和相关问题，以及“将历史境况的多义性作为认知机遇去利用”（托马斯·巴尔富斯 [Thomas Barfuss] 在苏黎世《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 的评论）的尝试，得到了理解和赞赏。

本辞典如此受欢迎是之前未能料到的。在 20 世纪末，几乎无法想象比《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更少受到时代精神支持的项目。很多 1968 年前后投向新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及更多的官方马列主义的代表，从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项目中撤离出来。但组织力量崩塌以及知识分子时髦转变之时，也正敲响了反思的钟声。在自我封闭于历史的死角与跟着主流（*mainstream*）随波逐流之间，反思意味着选择更有创造性的道路：在传承，而且远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濒于中断的历史断裂时刻，它将改革式的考证与文化记忆的功能相结合。

正是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新事物自我酝酿着。依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对一个“完整自足的世界观”的重塑在现如今已然不属于新事物，而对一种包含各种声音且开放性辩论的、向前进步的经验的“非完整的完整性”（萨特）的接纳才是新事物。若不进行回忆以及不钻研回忆起来的事物，那么就无法把握这种完整性。“新的论题必须涵盖旧的论题，”布莱希特（Brecht）指出，“若不联系旧的论题，则新的论题就无法融入经验。”（GA 21，第 427 页）即使个别文本显露出权威阐释学的传统或“普世大公”的天主教式幻想的迹象 —— 想要一把掌握住总体，这些文本也会在其他词目所传承的、所继续构筑的分支细密的论证网络中得到扬弃。

在相关评论和读者来信中，有人提到了缺少一份人名索引，并请求获取更多关于作者的信息。本卷考虑了这两点要求，它包含一份涵盖前两卷的、整合为一的人名索引。在作者列表中也已附上他们的出生年份、所在地或国家以及所在的科研机

构。柏林也区分了东部和西部，这样，德国作者是来自旧的联邦州还是新的联邦州就一目了然了。

II 64 位男性作者以及 12 位女性作者为本卷做出了贡献。76 位作者中 12 位来自东德，48 位来自西德，16 位来自其他国家，比如埃及、澳大利亚、中国、英国、芬兰、印度、意大利和美国。本卷整理了 101 个词目，其中 6 个各配有两篇文章。这些数字所展示的结果完全体现不出巨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争取女性作者以及东德作者参与合作时的困难。

文本结构在形式上基本没有变化；为便于阅读所做的细微调整，附录中做出了说明。

我们同时欢迎批评性的建议与合作的意向。恳请各位指正错谬，以期在勘误表中纠正。

感谢所有为了促成本卷的诞生而做出巨大自我牺牲的人。在第一卷与大家见面之后，本卷能够如此之快地完成，也是源于本卷收入了原本为第一卷准备的另一部分材料。

柏林，1995 年 5 月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唐婧 译，曹旸 校

德文版编辑部通讯地址：

柏林马耳他骑士路 74-100 号，L 幢 511 室

HKWM-Redaktion, Malteserstr. 74-100 / L 511, D-12249 Berlin, Deutschland

hkwmred@zedat.fu-berlin.de

凡　例

一、本辞典为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的中译本。德文版 1983 年开始编纂，自 1994 年出版第一卷以来，已经出版九卷十三册，另有六卷十二册尚未出版。全套十五卷辞典拟收录词目 1500 条，词目按照德文字母先后次序分卷册顺序排列。德文版辞典自编撰伊始，累计 800 余位学者参与撰稿和编辑工作，辞典中文版各卷依据德文版，附有该卷撰写者简介和编辑名单。

二、本辞典中文版于 2017 年立项，由北京大学资助并组织编译，设有中文版编辑部，计划每年翻译出版一至二卷。第一卷于 2018 年 5 月出版。中文版的编译总体沿用德文版的卷册及词目编排，对于词目及个别词目内容的选录和删减，中文版编委会有决定权。

三、本卷（第二卷）条目录自德文版第二卷（总第二册），含德文首字母 B—D 之词目，即从“银行”（Band）至“音乐中的愚蠢”（Dummheit in der Musik），共计九十九条。

四、辞典词目使用中文、德文两种文字书写；本卷另沿用德文版成例列出其他五种语言的译名，置于中文德文词目之后。五种语言分别以字母 AEFRS 代表，其中 A 代表阿拉伯文，E 代表英文，F 代表法文，R 代表俄文，S 代表西班牙文。

五、中文版词目的编辑体例基本沿用德文版的格式。兹说明如下：（1）词目名称以中德两种文字书写，德文置于括号中。（2）德文版正文中以斜体字表示的重点词，在中文版中均改用黑体字表示。（3）正文中括注内的文字（个别词目附有评释），除引用文献的标题或缩写（在“参考文献”和“附录”中可找到文献的详细信息及全称）及篇章序号保留原文外，其余内容均翻译为中文。（4）每个词目末尾德文版均设有“参考文献”和“参考”两项，分别列出词目相关的参考文献，以及可与该条相参照的其他词目，中文版原文照录，不作翻译。（5）辞典中文版边栏处用阿拉伯数字标识的边码，为德文版原书的页码。

六、对于辞典德文版的词目中文译名，中文版依据义理和译界长期形成的主流翻译进行了修订。本卷修订词目包括：（1）词目“占有 / 所有权”，原译为“占有 / 所有”；（2）词目“觉悟（自觉性）”，原译为“觉悟”；（3）词目“形象（图像）”，原译为“形象”；（4）词目“教养”，原译为“教育、文化”；（5）词目“革命的失败主义”，原译为“失败主义，革命性的”；（6）词目“资本专制”，原译为“资本的专制”；（7）词目“德国的鄙俗气”，原译为“德国的困苦”；（8）词目“话语分析”，原译为“商谈分析”；（9）词目“话语理论”，原译为“商谈理论”；（10）词目“配置”，原译为“装置、布置、部署”，经过征求专家意见，本卷译为“配置”；（11）词目“二元经济”，原译为“双重性经济”。

七、辞典中文版标点符号的使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目　录

B

银行（Bank）……1
纸币（Banknote）……20
基础（Basis）……25
基础美学（Basis-Ästhetik）……45
基层小组（Basisgruppen）……59
农民（Bauern）……61
农民运动（Bauernbewegung）……68
农民战争（Bauernkrieg）……72
官员（Beamte）……74
意义（Bedeutung）……86
需要（Bedürfnis）……105
行政命令制度（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116
命令式经济（Befehlswirtschaft）……121
解放（Befreiung）……123
满足（Befriedigung）……130
概念（Begriff）……139
职业（Beruf）……145
职业革命家（Berufsrevolutionär）……149
职业禁令（Berufsverbot）……152

占有 / 所有权（Besitz/Eigentum）……154
规定的否定（bestimmte Negation）……159
规定、决定（Bestimmung, Determination）……170
运动（Bewegung）……174
觉悟（自觉性）（Bewußtheit）……181
意识（Bewußtsein）……191
形象（图像）（Bild）……203
造型艺术（bildende Kunst）……216
教养（Bildung）……221
生物主义（Biologismus）……227
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231
集团（Blöcke）……234
不结盟（Blockfreiheit）……239
土地改革（Bodenreform）……245
布尔什维克化（Bolschewisierung）……249
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252
交易所（Börse）……259
资产阶级（Bourgeoisie）……269
布兰德勒主义（Brandlerismus）……295
布莱希特派（Brecht-Linie）……298
布哈林主义（Bucharinismus）……322
联盟政策（Bündnispolitik）……327
公民倡议行动组织（Bürgerinitiativen）……329
内战（Bürgerkrieg）……333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336
市民（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340
资产阶级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355
公民权（Bürgerrechte）……360
官僚制（Bürokratie）……364

C

暗箱（照相机）（Camera obscura）……386
（性格）面具（Charaktermaske）……390
卡里斯玛、卡里斯玛的领导（Charisma, charismatische Führung）……405
宪章运动（Chartismus）……418
沙文主义（Chauvinismus）……422
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425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429
基督教的社会主义（Christlicher Sozialismus）……432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437

D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441
革命的失败主义（Defaitismus, revolutionärer）……445
定义（Definition）……448
德拉沃尔佩派（Della-Volpe-Schule）……456
民主（民主主义）（Demokratic）……461
民主/无产阶级专政（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466
民主精神病学（demokratische Psychiatrie）……480
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484
民主集中制（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497
思维（Denken）……506
思维形式（Denkform）……514
依赖理论（Dependenztheorie）……524
资本专制（Despotie des Kapitals）……530
专制社会主义（despotischer Sozialismus）……533
破坏的力量（Dekstruktivkräfte）……536
决定论（Determinismus）……545
德国的鄙俗气（deutsche Misere）……559

分散化（Dezentralisierung）……569
辩证法（Dialektik）……574
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607
辩证图像（dialektisches Bild）……617
辩证戏剧（dialektisches Theater）……626
无产阶级专政（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631
话语分析（Diskursanalyse）……638
话语理论（Diskurstheorie）……652
可自己支配的时间（disponible Zeit）……657
配置（Dispositiv）……664
持异议者（Dissident[inn]en）……672
分配（Distribution）……677
纪律（Disziplin）……693
教条主义（Dogmatismus）……705
双重负担（Doppelbelastung）……712
劳动的二重性（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714
两个政权（Doppelherrschaft）……720
双重斗争（doppelte Militanz）……722
村落共同体（Dorfgemeinschaft）……726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Drei-Welten-Theorie）……730
第三世界（Dritte Welt）……734
第三条道路（dritter Weg）……741
二元经济（Dualwirtschaft）……746
愚蠢（Dummheit）……752
音乐中的愚蠢（Dummheit in der Musik）……769

附 录

词目及作者……777
本卷作者简介……780
德文版编写体例……787

缩 写……789
第一卷、第二卷名词索引……813

中文版第二卷译后记……855

B

1　银行（Bank）

A: bank, maṣrif. – E: bank. – F: banque.

R: bank (банк). – S: banco.

银行的权力是资本主义批判中一个主题。银行具有一种谜一般的**货币权力**（*Geldmacht*），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银行大厦就是这种权力的外在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经常描述银行家和金融家的权力。（MEW 4，第 210 页；5，第 438 页；7，第 12 页；10，第 104 页等处）马克思称他们为“金融男爵”或“银行男爵”（MEW 5，第438 页）、“金融贵族”（MEW 7，第 12 页）的一部分，或者是“银行贵族”（第 24 页；MEW 12，第 225 页），这些人与大的“交易所公爵”都是一丘之貉（MEW 7，第 12 页；8，第 29—30 页；19，第 173—174 页）。这些人仅仅依靠攫取“他人既有的财富”为生（MEW 7，第 14 页）。他们是“**流氓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层面的再生**”（第 15 页），是一个“寄生阶级”（MEW 25，第 560、454 页；MEGA II. 3. 5，第 1547 页）。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分析了银行的作用，拒绝肤浅的银行批判。因为银行资本作为用不易识破的手段让钱生钱的资本，最接近那种认为资本就是“大量货币”的流行观点，并且成了“庸俗社会主义者”的“肤浅的批判最容易的”和“最直接的攻击点”。（MEW 26. 3，第 458—459 页；新近的论述，参见 Pfeiffer 1993）

起源和概念。起初，在意大利和佛兰德地区的商业城市里出现了一批在行会里组织起来的**货币兑换者**（货币兑换者的行会是最富有的行会之一）。这些货币兑换者是负责查验铸币的公职人员，必须宣誓之后才能就职。他们是唯一掌握足够的知识和技术、能够检验货币的真伪和纯度并对铸币进行定期调换的人员。早在 12 世纪的热那亚就有所谓的银行家（*bancherii*）——得名于他们在城市中心广场设立露天的货币兑换点（被称为 *tabula* 或 *bancum*）。中世纪法语称这些人为摆摊人（*tafletiers*），荷兰语也称为设立摊位者（*tafelhouders*）。直到今天还有一些特定的银行业务如外

同货币和银行券的买卖在银行柜台进行，它们在银行业行话里被称为**柜面业务**（*Tafelgeschäfte*）。

积累和保存大量的货币财富最初只是国王和教士才拥有的特权。国库和寺庙金库是“最初的银行”（*Gr*，第141页；MEW 42，第156页），而看管金库这一公共职能则落到了**货币经营者**手里。在英国，金匠们似乎早就垄断了货币经营权。他们手中贵金属的交易是“一种原始银行业务的基础”（MEW 25，第617—618页）。因此，这些人才会反对17世纪末开始出现的真正的银行。当然，之前早就存在有钱的放款人，不过他们主要涉足和国际（远程）贸易有关的信用业务，从事那些初级的“公共信用”（给世俗或者宗教性的诸侯借款，通常以税收为抵押）。直到18世纪，银行业务还等同于货币经营。波斯尔思韦特（Postlethwayt）所著的《商业贸易大辞典》（*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称银行业务是“通过文书传递人员和票据，把货币从一个地方流通到另一个地方而进行贸易”（词目“银行业”[*Banking*]，1757年，第1卷，第193页）。直到约19世纪末，人们才普遍认为银行业务是聚集货币并从事借贷，或者说便利借贷资本的流通。（参见Palgrave的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Bd. 1，1894，词目“银行业”，第91—92页）

自从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商业城市在12和14世纪首先建立公共信用机构后（主要是为满足城市共和国自身的信用需求），银行这个名词就开始被采用。后来到了16、17世纪，在一批商业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汉堡也成立了公共存款中心或者“兑换银行”。现代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汇票、纸币、支票等现代信用和支付工具的发明和发展。在17和18世纪，以银行为核心制度的现代货币市场开始成形。**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也是第一个有“充分发展的银行业”的国家。（MEW 13，第137页；参见MEW 25，第615页及以下）

现代银行和特定的信用工具一样，都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试验了各个银行类型和银行业务的各种形式后被发明出来的。马克思称其为“资本的信用发明和信用设施”（*Gr*，第551页；MEW 42，第560页）以及“有机创造物”（MEW 25，第617页）。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无数公共（包括教会）或者私人建立的银行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是在欧洲几个主要商业城市如热那亚、威尼斯和汉堡等城市共和国成立的公共兑换和存款银行（参见van Dillen 1934），所以银行长期被视为**共和制度**的机构。马克思就描述过英国托利贵族反对建立银

行的努力。（MEW 25，第 616 页；参见 Law 1992，第 144 页）银行比工厂更早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制。既然银行业务的组织方式和运营方式关系到每一个财产所有者，尤其关系到国家（既是贷款者也是征税者）本身，而且银行触及了现代国家最古老的垄断权力——货币垄断权力，所以国家参与其中也就不足为怪了。由于银行不仅管理货币，而且能够“制造”货币，如负责一些种类的货币的生产，以及“创造货币”，让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增加，因此银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私有的”机构。它们必须接受国家监管，其业务经营要遵守一系列法规，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的银行资本。许多重要的银行都是国家或者城市建立的，在公共信贷方面扮演核心角色，尤其是在国家信贷方面。（参见 MEW 8，第 183 页；MEW 23，第 783 页）一旦国家向银行让渡出部分货币垄断权，银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半国家机构”（MEW 25，第 557 页）。

银行既是私人企业，又是公共（货币和信用）机构，这种双重身份让银行很早就吸引了事业家（Projektemacher）和社会改革家的关注。国家关于银行的立法成为各个时代主流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的重要检验。“以错误的货币理论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的利益强加于国家的错误的立法”（MEW 25，第 532 页），迫使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服从“实际的实验”（第 564 页）。皮尔银行法（1844 年）使得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货币危机更加严重（参见 MEW 12，第 316—320 页；MEW 25，第 507、532、541 页），它多次失败的“实验证明情况正好”与李嘉图（Ricardo）和**通货学派**的观点相反（MEW 25，第 580 页；参见 MEW 13，第 158 页；MEW 23，第 157 页），并证明了这些法律“使金融巨头受惠”（MEW 12，第 225 页），是为了帮助他们获得更高的利润而量身制定的（参见第 224、236—237 页；MEW 25，第 532、574—575 页；MEW 29，第 223 页）。

社会主义的银行改革措施。圣西门主义者幻想着未来的工业社会有一种“新的银行业组织”（MEGA IV. 8，第 40 页）。他们认为银行应该成为“工业银行”，把各个阶级中无所事事的有产者的资本提供给“工业从事者”（包括企业家和雇佣工人）。这些银行应该处于一个“中央银行”的领导之下，这个中央银行就成为“物质意义上的政府”（参见 Enfantin 1905）。“有组织的**银行制度**”就是他们的理想。（MEW 40，第 448 页）他们想把银行变成掌管生产活动的教皇。（*Gr*，第 73 页；MEW 42，第 89 页）圣西门（Saint-Simon）的学说“对

银行家的吹捧”（MEW 26.3，第 459 页）使其在银行家中拥有了不少追随者（参见 MEW 11，第 558 页；MEW 25，第 618—619、621—622 页）。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则主张用交换银行作为中介，实现无货币的以物易物。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 1830 年建立了第一个**劳动交换银行**。但是和后来所有试图实现一种无货币的、以劳动为基础进行平等公平交换的乌托邦的尝试一样，这个尝试也迅速失败并带来了巨大损失。（参见 *Elend*，MEW 4，第 105 页）这种交换银行的理想在左派李嘉图主义者那里依然保留着。（MEW 42，第 696、753 页）蒲鲁东（Proudhon）也推崇交换银行。（参见 1848 及 1850）1849 年，他在巴黎以自己的名义开办了一家“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以图实现他的理想，但是银行两个月后就破产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蒲鲁东发明的“无息信贷”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小资产阶级愿望”，纯粹是“招摇撞骗”。（MEW 25，第 49 页；MEW 27，第 309—310、371 页）所有“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没有认识”（MEW 25，第 621 页；参见 MEW 4，第 105 页；MEW 16，第 30 页）。马克思 1857—1858 年手稿一开头就彻底地批判了蒲鲁东主义的“流通把戏”（*Gr*，第 42 页；MEW 42）。这些“流通魔术师”不懂得，银行这样的流通机构和信用机构究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不明白“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Gr*，第 53 页；MEW 42，第 69 页）。资产阶级社会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个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一套理性的货币和信用制度。（参见上书，第 42—43、52—53、58 页，第 68 页及以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构想是法国现代资本主义银行和信用制度发展不够充分导致的“理论病”。（参见 MEW 26.3，第 459 页，第 512 页及以下）

自 18 世纪末以来，**储蓄所**也繁荣发展起来。马克思批评这个“小人物的银行”的方案，为了“改善工人境况”“最喜欢提出的建议”之一，是“暴政的三重机器”：教育人们“储蓄”意味着让劳动者的支出“永远不要超出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取消一切生活中的享受，把自己“变成资本家的记账机器”，甘当一种卑微的、保守的人。（MEW 6，第 545 页；参见 MEW 2，第 210—211 页；MEW 6，第 540 页及以下）通过“官方储蓄所的存钱罐”（*Gr*，第 198 页；MEW 42，第 212 页）把劳动者节省下来的每一枚硬币交给银行，再交给中央银行，再借给资本家和国家（MEW

6，第 540、545 页）。而劳动者能得到的回报仅仅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同上；参见 *Gr*，第 168 页；MEW 42，第 212 页）。“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都被拴在了这样一根货币的链条之上（参见 MEW 6，第 540、545 页），少数幸运者可以把存款存在正确的银行里，但是也要冒着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失去一切的风险（参见 *Gr*，第 198 页；MEW 42，第 212 页；MEW 25，第 524 页）。不过，大部分工人其实根本没有存款，也没有贷款——除了在当铺以外。**当铺**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仿照中世纪帮助穷人的**公典制**（*montes pietatis*）建立起来，结果“正好走向它的反面”，不但没有保护穷人免于高利贷，反而成了穷人无耻的剥削者。（MEW 25，第 614—615 页）

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最初计划（参见 MEW 4，第 481 页；MEW 5，第 4 页；MEW 16，第 435 页；MEW 27，第 309—310 页；MEW 32，第 687 页），是把银行**国有化**（*nationalisieren*），建立一个属于国家的、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系统。在《资本论》（*Kapital*）中，马克思也赞扬信用制度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有力杠杆”（参见 MEW 25，第 621 页；参见 MEW 16，第 30 页）。他认为，现有的银行系统已经实现了“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层级之间的分配”，但也“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MEW 25，第 620 页）既然如此，为何不利用这个形式来服务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希法亭（Hilferding）在 1910 年曾强调，“在过渡时期”对一些大银行实行国有化将“极大地使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第 504 页）。即使是对银行改革计划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者也相信，银行制度对于一切**社会化**（*Sozialisierung*）有着战略意义。（参见 Parvus 1919；Schum-peter 1920/1921）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者对银行表现出“神圣的尊敬”（MEW 17，第 622 页）。巴黎公社满足于对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进行监督，只借用了极少数的贷款——而该银行同时毫无障碍地给巴黎公社的敌人提供了高出许多倍的贷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MEW 18，第 266 页；MEW 17，第 622 页）。如果把法兰西银行没收，那么就足以迫使当时的凡尔赛政府就范。（参见 MEW 22，第 196 页；MEW 35，第 160 页）与之相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化”进程也惨淡告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才对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

《政治经济学批判》（*KrpÖ*）**中的银行资本**。自 1852 年以来，马克思就写

了许多关于“金融”和“货币市场”的文章，评价英国（MEW 9，第 306 页及以下；MEW 11，第 228 页及以下；MEW 12，第 314 页及以下，第 320 页及以下，第 539 页及以下）和法国（MEW 12，第 222 页及以下，第 236—237 页）的银行业立法，关注 1852 年创办的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这种既专门为工业生产提供长期投资贷款，又专门参与大规模的股票投机的新型银行的发展（MEW 11，第 557—558 页；MEW 12，第 20 页及以下，第 32 页及以下，第 76—77 页，第 202 页及以下）。马克思还研读了当时与银行技术有关的文献，尤其是在他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期间。（参见 MEW 24，第 11 页和 *Londoner Hefte* [1850-1853]，MEGA IV，第 7—10 页；以及 MEW 30，第 145 页；MEW 32，第 39、58、60、204 页）

银行资本作为现代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研究范畴。青年马克思认为，“银行业”是资产阶级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完善的表现”（MEW 40，第 448 页）和“隆重的完成”；银行作为市民社会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艺术作品，交织着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是“国家在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Areopag*）”（第 450 页）。货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银行存在之前就存在了”（*Gr*，第 23 页；MEW 42，第 37 页），但是没有银行，货币和信用就无法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完善的形式；正是由银行产生了主要的货币形式（如转账货币、银行券）和信用工具（如银行账户、支票、往来账户、票据贴现、即时结算）。“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生革命吗？”马克思质问满鲁东主义者，如果“没有这一新的流通设施”，难道可能出现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现代货币市场吗？（第 41—42、57—58 页）这些“现代信用机构”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第 43、58—59 页）各个银行发展成为**银行体系**，这个体系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MEW 25，第 620 页）。马克思认为，银行作为“交换机构”的一部分，可以归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的成果”。（MEW 19，第 389、398 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系统，进而是“信用机构”和“支付机构”，也都比其他地方获得了更加完善的发展。（*Gr*，第 52 页；MEW 42，第 68 页；参见 MEW 16，第 114 页；MEW 26.3，第 441 页）

对银行的论述属于“信用理论”的一部分。（MEW 13，第 158 页）马克思最初计划把信用制度、股份资本和货币

市场分别用专门的章节加以阐释。（参见 *Gr*，第 28—29、175、186 页；MEW 42，第 42、188、201 页；MEW 29，第 312 页）1864—1865 年的写作大纲则把这些题目都放到了较长的第五章里面，冠以总标题“生息资本。信用制度”（参见 MEW 32，第 74 页）。关于信用的部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份未完成的草稿（MEGA II. 4. 2，第 411—664 页）和一个由恩格斯修订的稿本（MEW 25，第 350—626 页），主要是这部分的写作推迟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发表。这个部分带来了“最大的困难”，因为它研究的对象是全书里最为麻烦的一个。（MEW 25，第 12 页）恩格斯抱怨说，尽管马克思已经“足够清晰地提出了主要原则”，但是要想理解马克思的阐述，读者必须事先了解有关这个主题的主要著作，比如托克（Tooke）和富拉顿（Fullarton）的著作。（MEW 37，第 243 页；参见 MEW 36，第 566 页；MEW 38，第 233 页，第 504 页及以下；MEW 39，第 31、36、48、252 页）恩格斯把草稿整理成为一个分为 16 章的（第五）篇，并撰写了补充注释和评论。他在对《资本论》第三卷（1894）的介绍中称“信用与银行”是新的重要主题。（MEW 22，第 436 页及以下）

有关信用和银行的内容同时也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鲜为人知的部分。对他来说，生息资本是在“银行家经济学”中被重新发现的“一切荒谬形式的源头”。（MEW 25，第 483、481 页；参见第 461—462 页；MEW 31，第 145 页；MEW 32，第 39 页）“十分奇怪的是，在货币市场上这种有关信用的费解的行话中，政治经济学上的一切范畴，都获得了另外的含义和另外的形式”（MEW 25，第 513 页）：债务变成了商品，资本就是货币，而信用就是资本，利息是“货币的价格”，等等。对于这些在货币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必然整个弄颠倒了的”错误观念（第 325、874 页），马克思打算“在以后的著作中”进行批判（MEW 31，第 145 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手稿中，他只是说明了这些在关于银行的文献中再次出现的、关于银行世界的歪曲了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参见 MEW 23，第 75 页；MEW 31，第 58 页；MEW 32，第 60 页）。

货币经营资本。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开始就使用的、介于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之间的概念。它一只脚踏入商业，另一只脚跨入信用。“货币业务”与商品交易不同，它把货币看作与其他商品不同的一种特殊的商品（*Gr*，第 69 页；MEW 42，第 85 页；MEW 37，第 489 页），并且包含一系列特殊职能，这些职能的内容产生于货币或者货币资本的特定职能和“规定性”（MEGA II. 3. 5，

第1576、1698—1699页；MEW 25，第329页）。“把货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起源于“货币兑换业务”（MEW 25，第331、329页），那时，货币兑换商人深谙流通中的各种不同货币。他们检验各种货币的真伪和纯度，并且进行兑换（参见MEGA II. 3. 5，第1578页；MEW 25，第329—330页）；他们把“地区性货币”变成了“世界货币”，在执行世界货币功能的贵金属交易中充当中介者。铸币兑换和金银贸易（条块贸易）就是“货币经营业的最原始的形式”（同上；MEW 25，第331页）。货币经营者中介了货币的纯技术性运动：对一定货币额的收款、放款，还有记账。除此之外，账目清算，即通过偿付现款来支付应收账款和清偿余额，也需要全面详尽的记账手段。即便是简单的“出纳业务”也需要有一定的“货币贮存”，也就是要保有现金，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操作。（MEW 25，第328页）货币经营者从中又开发了一项新的业务，他们不仅不用为别人交给他们保存的货币（和其他贵重物品）提供利息，而且还从客户手里收取费用，以代替客户承担保管大量货币的责任。在充当支付手段的过程中，又同时出现了为资本家管理货币储蓄基金的职能，而这一职能又进一步扩展为保存和管理大量分散的小额货币资本——不管其职能限定为“补充资本”、“分期偿还基金”、“保险基金”，还是“积累基金”。（参见MEGA II. 3. 5，第1699页及以下；MEW 24，第87—91、112、178、181—182、364页；MEW 25，第118—119页，第493页及以下，第842页）保存大规模的货币带来持续详尽的簿记，导致货币经营者必须搬进坚固的、保障别人委托的大量财富安全的建筑。所有这些职责构成了“货币经营业务”（MEGA II. 3. 5，第1578页），货币经营确立为维持资本家“整个阶级的货币机制”良好运转的“特殊业务”（MEW 25，第329页），“又衍生出不同的分支”（MEGA II. 3. 5，第1578页）。

如果（货币）资本占有者仅仅进行上述那种业务，那（货币）资本怎么会增殖呢？纯粹的货币经营者不会向外贷款，所以也不会收取利息，因此他们的收入不属于**银行利润**。（参见第1701页）他们为自己的客户所做的所有必要的货币工作都是需要付出劳动的，但却并不能给货币增添一丁点价值。（参见MEW 25，第328页）他们只是充当了货币形式变换、地点变换和转手的媒介，但是却不参与价值的转换。他们至多可以这样来获益，即铸币或纸币的某种地方形式比其他形式更受人欢迎，因此要得到这种形式的货币，就需要付出额外收费（贴水），而做货币兑换中介的货币经营者就可以截留一部分收费；或者他

们利用汇率的时间和地区差异来获利。马克思解释说，货币经营者的利润和商品交易商类似。货币经营者也需要自己拥有一些资本（参见 MEGA II. 3. 5，第 1578—1579、1697 页），用于投入货币经营，这样他们就能从其他资本家的总利润中分得一部分与自有资本相匹配的数额。其他资本家之所以允许货币经营者赚得一部分利润，是因为货币经营者可以帮他们免去大量繁杂的货币流通成本。通过货币经营，货币流通的技术性操作被“集中、缩短和简化了”，出纳处必须保留的现金和闲置的货币资本可以被降低到“其经济上的最低程度”（MEW 25，第 333 页），结算则得到优化和加速（同上）。马克思显然认为，给货币经营者支付的佣金和手续费总额小于不通过货币经营者的中介而由所有资本家承担的费用。在这些条件下，货币经营才成为一桩生意。

历史地看，“同信用业务相分离”（MEW 25，第 334 页）的纯粹的货币经营几乎不存在（参见第 332 页）。一旦货币贮存职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货币经营者就可以拿出一部分货币用于发放贷款，从而收取利息。这种做法持续不了多久，拥有货币的资本家就会要求从中分一杯羹。货币经营者就这样成了货币贷出者，例如在英格兰，金匠同时也是黄金和货币经营者，因此也就成为最初的银行家。（参见第 330 页）随着信用业务的比重不断上升，货币经营资本最终也获得了“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形式”（MEGA II. 3. 5，第 1701 页），也就是成为取代它的银行资本。

银行资本是生息资本，同时也是（货币和信用）商业资本。它作为商业资本的特殊性与特定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货币和资本的特点有关。马克思既不同意传统英国学派的观点，即认为银行就是**创造货币**的机构（例如 Bruhoff 1983，第 145—146 页就持此种看法），同时也不认为银行是**信用代理机构**（*Kreditsubstitution*）（例如 Gilbart 1835），或者主要是**信用创造者**（Macleod 1855/1856）。然而，发达的银行制度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好像银行的信用取代了一切其他信用，银行最终创造了信用一样。同样，在高度发达的币制中，可能银行显得是真正的**货币创造者**，因为信用货币最重要的形式都是通过银行而产生的或者通过银行而进入流动过程的。（参见 MEW 24，第 410 页及以下；MEW 25，第 522、546—547 页等处）相应地有一种幻觉：国家这个居于银行背后并高于银行的监管者和掌控者，实际上才是**货币创造者**，而银行只是国家的执行机构。

信用是一个更广泛的、更上一级的概念，即使没有任何银行的中介，在

银行的中介的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信用关系了。银行只是信用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机构，它把信用中介独立出来，使其变成了居于特殊资本类型之下的一个特殊的业务部门。“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MEW 25，第 417 页）；因此银行资本是这样一种资本，它通过经营各种可能的形式的信用来使自身增殖（参见 MEW 25，第 332、416 页）。信用经营的基础在于，货币和闲置的货币资本被作为一种“潜在的资本”而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商品”（MEW 25，第 351 页；*Gr*，第 225、353 页；MEW 42，第 238、362 页；MEGA II. 3. 5，第 1547 页），这种商品有价格，即利息——一种和工资一样的“不合理的形式”（参见 MEW 25，第 366 页）。银行资本就是用这种特殊的“**资本商品**”（MEW 25，第 351 页）开展业务的。

11

也正是银行创造了这种资本商品。从本质上来讲，任何一个拥有货币的人和任何一个拥有暂时闲置的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一样，都可以成为货币贷出者。货币经营者也时不时地向外借钱（用出纳的结余放贷）。银行只不过更进一步：它们在存款中聚集了工业家和商人的职能资本中暂时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未进入运营的零零散散的部分——从各种储蓄基金到分期偿还基金和积累基金（参见 MEW 24，第 89、123、254—255、322—323、349—350 页等处；MEW 25，第 416—417、490、501、620 页）——把零散的部分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统一的借贷资本基金，提供给所有需要再生产的资本家使用。这就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对所有人都开放的借贷货币资本。这样一来，“资本就变成了商品”（MEW 26. 3，第 457 页）。用同样的方式，银行也聚集所有可以聚集到的个人财产和“储蓄”，聚集“所有阶级暂时闲置不用的资金”（MEW 25，第 374、416 页），并将其转化成商品，也就是变成资本。这类资金不仅包括所有可能的货币储蓄和货币财富，也包括各个阶级的人们的收入的一部分，因为这些收入不是一次性付清的，而是逐步付清的。（参见 MEW 13，第 114 页；MEW 25，第 416、505、519—520、620 页；MEGA II. 3. 5，第 1700 页）银行不仅把闲置的货币资本转化成为借贷资本，而且把不用的货币转化成了借贷货币资本，马克思强调，这种转化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MEW 25，第 416 页）。

银行经营它作为货币和资本聚集处不断创造出来的商品。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把信用即借贷资本不停地从一个形式转化为另一个形式，并使其功能也不断发生变化。它们既可以把收入（现金储备或储蓄）变成职能资本（在资本信用的情况下），也可以把货币资本变成

收入（在消费信用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因为银行的出现让所有信用关系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恰如同商业资本的出现让一切交换关系增长了一倍乃至两倍一样。正如在发达的商业中，人们几乎不会再从其相应的商品生产者手中直接取得商品一样，在十分成熟的银行制度下，人们也几乎不会脱离银行的中介而直接得到贷款。银行家们，即“专业的货币贷出者”（MEW 25，第 495 页；MEW 26.2，第 116 页）总是充当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把几乎所有的借贷关系都变成了贷款人、借款人和中介机构——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MEW 25，第 416、495—496、522 页）。银行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对借贷资本的支配权；于是，银行好像就成了独立的、相对于工业家和商人的“最高级的中介”（*Gr*，第 237—238 页；MEW 42，第 250—251 页）。它们在需要货币或者货币资本的人面前是“所有货币贷出者的代表”，而在货币和货币资本的所有者面前，它们又代表了所有的借债人，因为他们同时向所有的工业家和商人借贷。总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MEW 25，第 416 页）。

银行也可以作为中间人参与“商业信用”，把借贷资本直接提供给具体的人。商业信用就是马克思所称的支付和“流通信用”，是工业家和商人们之间互相给予的。（参见 MEW 25，第 413 页，第 496 页及以下）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汇票信用”（Wechselkredit），也就是商人们用可转移的汇票创造了信用货币的一种特有形式，可以在商业世界里直接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参见 de Roover 1953）这种形式的信用加速了流通，但是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参见 MEW 25，第 463—464 页，第 496 页及以下）银行可以直接从商人、专门的中介人、汇票交易商（bill-brokers）（参见 MEW 25，第 501、514—515 页）手中收购流通中的汇票，支付给他们现金或者自己的信用货币（银行货币），如银行券，从而使得商业信用得以简化和扩展。票据贴现时，不是商人或工业家借入货币资本，而是他们对第三方的货币索取权“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转化为现实的货币”（MEW 25，第 443 页）。为此，他们需要支付利息，而对于银行来说，汇票信用（即更宽泛意义上的商业信用）的中介就成了一种专门业务；对工业家和商人来说，一切“商业信用”都变成了某种银行信用的纯粹预备的阶段。

最后，银行还承担了货币经营的职能。它们成了工业和商业资本家的“出纳员”，它们手中集中了货币流通的技

13 术操作和所有资本家的货币储备基金。（MEW 25，第 416 页；参见 MEW 13，第 114 页；MEW 23，第 160 页）银行之间也会互相借贷，维系着地方分行组成的整个网络；这两者都是货币汇兑“集中化”的前提。（MEW 25，第 419—420 页）它们成为为各个“流通领域”和各种类型的资金之间持续的互相转换提供中介的流通枢纽。只要工业家和商人拥有银行账户，所有的支付就都通过支票和汇款的方式借助银行来实现。银行则努力通过记账和相互拆借来实现这些支付行为（参见 MEW 25，第 488—489 页），为此还兴建了专门的**票据交换所**（例如 1775 年成立的伦敦银行家票据交换所，参见 Born 1977，第 313—314 页）。如此一来，汇兑就变得更加快捷和便宜——银行就能支配手中存储的货币准备金的更多一部分用于信用业务。（参见 MEW 25，第 451—452、488 页）

在银行积累的货币资本中，资本一般，即处于“**一般形式**”的或者“**作为资本的元素形式**”的资本，本身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存在”。（*Gr*，第 353 页；MEW 42，第 363 页）在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面前，银行家代表有着货币形式的“总资本”。（MEW 26.1，第 297 页；MEGA II.3.4，第 637 页）银行控制了“社会的货币资本”（MEW 25，第 316 页）以及“所有社会阶级的一切货币积蓄”（第 374 页），成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第 416 页）。银行自身不能使货币资本增殖，它们只是为货币资本在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提供中介（参见 *Gr*，第 353 页；MEW 42，第 363 页；MEW 25，第 522 页；MEW 26.2，第 208、483 页），这种分配就是银行的“特殊职能”（MEW 25，第 620 页）。银行不停地把当时可用的社会货币资本重新分配——因此这一资本显得是许多个人资本之外的“**阶级的共同资本**”（第 381 页）。银行制度的中介使货币资本获得“一种社会性”（第 401 页），失去其“私人性质”（第 620 页）。这样一种把一大部分社会货币资本不停地进行再分配的机制“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就含有一种“对资本自身的扬弃”。（同上）

银行利润。如同在任一其他种类的资本那里的情形一样，要想回答“银行资本由什么组成”（MEW 25，第 481 页）即其构成其机能的成分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要回答它是如何增殖的，银行家的利润从何而来（MEW 25，第 481 页）。这一问题——和讨论工业资本一样——离不开银行资本的整体运动即其“周转”如何进行的问题。就像关于商业资本和 14
生息资本的部分（参见第 280、352 页）一样，如果马克思完成了准备付印的信用部分的稿本，他在里面大概也会给出

一个银行资本的循环公式。

银行资本由**货币**或者**信用**组成，其运动也就是货币和信用的运动。这就意味着要确定货币和（或）信用作为银行资本的元素所具有的各种形式规定和职能规定。马克思评论说，就经营而言，和商人一样，银行所推动的价值额远远高于它所调动的微小的“活劳动”（即银行职员）。（MEGA II. 4. 1，第 300 页；MEW 26. 1，第 198 页；MEW 26. 3，第 327 页）银行的不变资本主要是“流动资本”，而固定资本占比极少。（参见 MEGA II. 4. 1，第 299—300 页；MEW 26. 3，第 327、385 页）银行资本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银行家的自有资本还是借来的资本组成的，对银行资本的形式规定和职能规定是无关紧要的。（MEGA II. 3. 4，第 1580 页；MEW 25，第 481—482 页）既然所有的银行都把它们获得的货币资本重新借出去，那么银行的资本绝大部分就不是由**货币**组成的，而仅仅是由**货币索取权**组成的。从形式上看，这种资本只是“对价值的权利”，是“资本索取权”和“货币索取权”。（MEW 25，第 525 页；参见第 481、488 页；MEW 24，第 349—350 页）其中也包括作为可转让债权的汇票。在银行系统内，这些债权已经变成了“可以转卖的商品”（MEW 25，第 494 页）。除此之外，银行资本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国债券）：它们是用纸面表示的已借出的资本，但和简单的债权不同，这些证券在其流通中显示了自己虚拟的“价值”（MEW 24，第 349—350 页；MEW 25，第 481—482、487、494—495 页），最后，银行资本还包括银行自己发行的货币，也就是银行券（MEW 25，第 481—482 页）。在功能上，马克思只区分了两个概念，发挥职能的借贷资本和银行**准备金**，后者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中执行职能的准备资本”（第 487 页）。这一基金既用作兑付和信用往来的准备金，也用来为可兑换的银行券提供“担保”。它只有一部分是由现金（黄金和中央银行的纸币）组成的，其余大部分是汇票（参见第 487—488 页）以及对其他银行所拥有的货币债权，而它被借给其他银行是为了换取利息（第 491 页）。

银行家的利润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货币经营资本产生的利润，另一个是真正的银行利润，即银行在信用经营中产生的利润。后者和前者一样是从剩余价值中提取的一部分，但因为抽取自利息，所以是二级提取，这里的利息产生自银行贷出的他人的资本。总的来说，这种 15
利润来源于银行“支付的利息低于其索取的利息”（第 416、519 页），也就是源于利息差。银行还通过创造货币从而创造不耗费其任何东西的追加信用，得到不用和任何人分享的额外利息收益。（参

见第 557、560 页）此外，各种有价证券交易过程中的利息差也可以带来利润。

银行资本和货币流通：货币的创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流通**”演化成了“**货币循环**”。（MEW 24，第 343 页）在“以银行业为中介的流通”（*Gr*，第 101 页；MEW 42，第 117 页）中，“大量流通中的货币”都处于“被银行有组织地、集中分配的货币资本的形式”（MEW 24，第 411 页）。于是，货币的循环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所有货币都由银行投入流通，并且不断流回到银行手中。（参见 *Gr*，第 101、109 页；MEW 42，第 117、125 页；MEW 24，第 411 页；MEW 25，第 463、547 页；MEW 26. 1，第 297 页）作为货币流通的中心，银行可以调节正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第一，由于银行的存在，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广泛的支付通过转账和银行间的结算等非现金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完成同等数量的支付所需要的货币（铸币和信用货币）越来越少。（参见 MEW 16，第 114 页；MEW 25，第 418、525、532 页，第 536 页及以下）第二，规定用作流通准备金和支付准备金的货币份额显著减少了。由于从趋势上看，所有的货币储蓄都会集中在银行手里，银行就可以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重新投入流通。（参见 MEW 13，第 114、123 页；MEW 23，第 160 页；MEW 25，第 452、470—471 页）第三，银行加快了货币流动——主要通过“简单的信用转移”中介或完成货币的流通职能，凭借信用交易做中介，同样数量的货币在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多得多的流通次数。（参见 MEW 25，第 516—517、451—452 页；MEW 16，第 114—115 页）第四，银行还大规模地用“银行货币”也就是它们——不同于商业资本家的信用货币，汇票——自己创造的信用货币代替货币。（参见 MEW 25，第 532、588—589、617、621 页）银行货币作为银行券、作为记账货币或转账货币而存在。除了纸、油墨和记账，银行货币不花费银行什么东西。

银行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MEW 25，第 621 页）

银行资本和积累：信用的创造。由于银行的存在，现实积累和货币积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货币积累越来越表现为银行“借贷资本的积累”。（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现实积累被加速了，因为每一个个体资本家都可以利用银行聚集起来的全体资本家的积累基金。现实积累同时也大大扩展了，因为借贷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资本家的货币积累相分离。（参见 MEW 24，第 322—323 页；

MEW 25，第 493 页及以下，第 519—520、523—524 页）现实积累有的通过“纯技术手段”（如银行业的集中化，以及减少储备货币量：MEW 25，第 512 页）而实现：有的来源于银行利润重新转化成的借贷货币资本（第 519 页），还有的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级的货币收入和货币财产增长了，并反映到银行的借贷货币资本上（第 416、519—520 页）。正是银行使得现实积累可以超出当时生产的限度，远超所有再生产资本家的一定剩余价值的积累。

但是，银行发放的贷款多于它们可支配的借贷货币资本：它们通过银行货币“创造信用和资本”（第 558 页），也就是说，贷出“纯粹的信用”而非“真正的价值”（第 468 页）。马克思描述了两种创造信用的主要方式：发行无担保的银行券，以及创建无需以存款为基础，也不需要发行纸币的账面信用（往来账户）。（第 466—467、557、474、489 页；关于通过汇票操作来创造信用，参见 MEW 12，第 571 页及以下）

约翰·劳（John Law）称赞银行是让货币增加的“最好途径”（1992，第 43 页）。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恰恰是银行的危险力量；他们希望通过把纸币信用与票据贴现严格搭配（斯密[Smith]）或者把纸币发行与信贷业务完全分离（李嘉图）来遏制这种力量。（参见 Wagner 1937，第 23—24、27—28 页）但是马克思与**通货学派**不同，他不仅看到了银行存款的货币职能，也看到了创造“追加信用”的可能，因此他把银行创造信用的行为总体上视为“过度积累”加速的原因，过度积累完全有可能导致所有阶级的消费下降（后来所谓强制储蓄或强制积累的情况），而且无法通过给银行业制定伦理的或者法律的规则加以遏制。因为这样的追加信用是银行不花本钱的赚钱买卖。（参见 MEW 25，第 557—558 页） 17

银行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银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银行本身的发展（和银行资本的集中）构成了集中过程的“一个环节”。（*Gr*，第 42 页；MEW 42，第 58 页）它们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超越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MEW 25，第 620—621 页），因为它们使**信用**处处排挤**货币**（参见第 588 页），因为它们使个人资本有可能借助信用超越本身积累的界限，因为它们减少了部分社会资本的闲置，也加速了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并最终推动了私人资本向股票资本形式的转化。银行资本的发展，**股份银行**的形式战胜各种各样的阻碍而前进的过程，主要在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些补充中得到了探讨。（参见 MEW 25，第 402、453—454 页，第 917

页及以下）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derding 1910）的贡献通常概括为“银行统治工业”论（第98页）。他描述了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的四种结构性变迁。第一，银行的业务重心从中介流通信用和支付信用转向了资本信用。（第114页及以下）当银行的业务主要还是汇票信用时，它们还要依赖于借款人偿还（私人）商业汇票。在“资本信用”成为“主要事务”后，银行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其提供信贷的范围，而工业和商业资本家则越来越依赖于银行给予他们的贷款。这样，银行家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优越性”（第115—116页），随着资本家们依靠广泛的资本信用享受更大的竞争优势并获得超额利润，因而努力扩展其银行信用，银行家的优越性更加增强。

第二，资本信用内部的重点也在转移：银行不仅为流动资本预付资金，而且（用长期投资贷款）为固定资本融资，再一次改变了“银行相对于工业的地位”（第118页）。因为不同于支付信用或流通信用，银行不再只是关心客户暂时的偿付能力，而且也关心企业的发展。同时，银行对那些它提供长期投资贷款的企业的影响增加了。希法亭认为在这种长期信用关系中，银行取得“压倒优势”有两方面的原因：在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下，唯独银行还拥有足够数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而工业家可用的（储备）货币资本越来越少。因此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工业家也越来越依赖资本信用。银行凭可支配的巨额货币资本也可以击败工业资本家。一个（大）银行通常同时和许多工业家发生信贷业务，个别的信用业务对于银行来说不是决定性的，而对于工业家来说，很可能是生死攸关的。（第118页及以下）

第三，信用关系种类的变化也大大加强了已经由（与银行的各种功能相关的）“银行运营的技术本身”引发的集中的趋势。银行规模越大，就越能够更好地完成其各项职能，并取得更多的利润，尤其是在汇票和发行股票方面，但在储蓄业务方面也是一样。（参见第120页及以下）此外，各家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竞争主要是规模之战——银行可支配的借贷资本的规模和银行的组织规模（第241—242页）——而“银行运营技术的差异的影响很小”（第242页）。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大银行尤其倾向于互相之间减少竞争，它们达成协议划分货币市场或者单个业务领域。（第243页，第256页及以下，第306—307页）所有这些都导致工业资本对银行资本或多或少有强烈的“依赖性”，虽然依赖的程度随占据主导地位的银行类型和银行组织的不同而不同。（第308

页）针对这种不同资本种类之间——不一定也是不同资本家群体之间——新型的依赖关系，希法亭创造了**金融资本**这一概念。（第 309 页）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再次深化了希法亭的这一观点。最初他怀疑："说'金融资本＝**银行**资本'，还不够吗？"（*ImpHefte*，LW 39，第 335 页）他有时把金融资本视为一个集合概念，有时又当作独立的现象。（第 180、185—186 页）但无论如何，"统治全世界"（LW 25，第 18 页）的银行的（万能）权力都归于金融资本。然后，列宁未作更仔细的论证，便越过希法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指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为一体"（*Imp*，LW 22，第 271、218、226 页等处）。
19 相应地，银行家和工业家也构成了一个新的"金融寡头"。列宁强调要把大银行以及与工业资本融为一体的银行资本作为**垄断**的一种形式来理解。（第 214、230、304—305 页）但是在直接的政治论辩中，列宁仍坚持把不同资本类型各自的功能区分开来：银行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神经枢纽；要想有效地控制它，就必须首先把银行**国有化**。（LW 25，第 338 页及以下）另一方面，列宁又强调，"**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LW 26，第 89 页）。最重要的是，大银行作为一种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簿记和计算的全面的"机器"，这个"机器""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某种**骨架**"；人们只是必须接管这一机器并将其置于无产阶级的（民主）监督之下。（第 89—90、389—390 页）

希法亭关于银行统治地位的核心论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常常引起争议。但他描述的现象却是无可争议的。不过反对者认为，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但适用于英国或美国——或者总的来说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Grossmann 1929，第 574 页；参见 Sweezy 1959，第 210 页）所谓"工业对银行的依赖性"（Hilderding 1910，第 308 页）随着"自我融资"的增加而消失不复存在，因为"自我融资"主要使大型企业摆脱了对银行融资贷款的依赖（参见 Braunthal 1924，第 94 页及以下；Grossmann 1929，第 576 页及以下；Sweezy 1959，第 212 页；Pietranera 1974，第 54—55 页）。

伦纳（Karl Renner 1924）认为银行在各种形式的"虚拟资本"（有价证券）交易中起到一种新的中介作用。（第 233 页及以下）原来处于"主导地位"的私人银行越来越被股份银行所取代，而对于后者来说，有价证券业务和股票发行业务越来越重要。（第 279 页及以下，第

287 页，第 317 页及以下）同时，各个银行内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也日益深入细化。在国家的干预下，形成了一个等级严密的银行体系，其中，中央银行通过垄断国家货币发行权而处于最高地位。（第 298 页及以下，第 310 页及以下）这样一来便几乎产生了银行资本的“民族统一”；但是由于银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随着货币和信贷业务集中于少数几个“国际中心”，最早在银行业中形成了不仅跨国界阶级团结的意义上的，而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组织机构”的“资本的国际性”。（第 315—316 页）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国际化运营的银行早在 15 世纪就出现了。那时，国际银行业务主要是为几个大的贸易中心（贸易城市）之间的汇兑提供中介，集中在意大利几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手上，它们同时也是国际化运营的贸易公司。在马克思尚在世的 19 世纪就诞生了**国际银行，电报**的使用极大地加快了这些银行在伦敦或巴黎的总部与其世界各地的分行之间的联系，使这些银行在国际商业和信用往来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它们（就像意大利的**商业银行家**[merchant bankers] 一样）为国际贸易和国债融资，促成大规模资本输出。在资本的输出、输入中，即为大规模国际工业借贷融资以及为大规模的国家借贷提供资金时，多个国家的大银行会系统地开展合作，并往往为此成立国际银行辛迪加垄断集团或者专业的银行财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市场的金融领域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等新的政治安排重新组织起来。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出现了一个**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例如最初的所谓欧元市场），国际银行在该市场上占据着关键地位。这一市场脱离了一切被称为民族国家的国家的控制，在各大银行和保险集团之间的交易（银行间交易）中运行。其中最大、资本实力最雄厚的银行和保险集团本身就是国际或者跨国集团。这些国际银行在所有重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都有几千个分支机构、几万名员工，与几千家小型的合伙人银行或者通讯银行有着联系，是国际支付和信用往来的主要中介者。除了国际证券交易公司外，这些银行也是今天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交易所同时进行的有价证券贸易（当然也包括各种形式的投机活动）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在所有跨国的公司并购、收购和兼并中它们都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实际上，今天正是跨国银行或国际银行（这通常本身又是银行和各个其他金融机构的跨国联合体）在全球聚集

可用的、寻找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然后再把这些资本提供给各国的资本家们——其经营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任何民族国家的银行法和银行监管机构的控制。由于可以最方便地掌握国际货币和资本的流动情况，并且在这方面拥有最直接的获取手段，这些银行在全球运营的康采恩组建跨国“战略联盟”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K. Born, *Geld und Banken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77; A. Braunthal, Struktur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Der Kampf*, 17, 1924, 89-97; S. de Brunhoff, »Bank«, in: KWM 1, 1983, 144-146; N. Bucharin, *D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16), Berlin 1926; J. G. van Dillen (Hg.), *History of the Principal Public Banks*, Den Haag 1934; P. Enfantin, *Die Nationalökonomie des Saint-Simonismus* (1830/1831), Leipzig 1905; B. Fritsch, *Die Geld- und Kredittheorie von Karl Marx* (1952), Frankfurt/M-Wien 1968; J. W. Gilbart,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Banking*, London 1835; K. Gossweiler, *Großbanken, Industriemonopole, Staat*, Berlin/DDR 1971;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L. A. Hahn, *Volkswirtschaftliche Theorie des Bankkredits* (1920), Tübingen 1930;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1910), Frankfurt/M 1968; J. Law, *Handel, Geld und Banken*, Berlin 1992; H. D. MacLeod,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London 1855/1856; J. R. McCulloch, *Geld und Banken*, Leipzig 1859; Parvus, *Die Verstaatlichung der Banken und der Sozialismus*, Berlin 1919; H. Pfeiffer, *Die Macht der Banken*, Frankfurt/M-NewYork 1993; G. Pietranera, *Rudolf Hilferding und die 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74; P. 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Paris 1850;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ß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R. de Roover, *L'évolution de la Lettre de Change*, Paris 1953; J. A. Schumpeter,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8, 1920/1921, 305-360; ders., *Das Wesen des Geldes*, Göttingen 1970; F. Somary, *Bankpolitik*, Tübingen ²1930; P. M. Sweezy, *Theo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1942), Köln 1959; Th. Tooke,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London 1844; P. Vilar, *A History of Gold and Money 1450-1920* (1969), London 1976; V. F. Wagner, *Geschichte der Kredittheorien*, Wien 1937.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Michael Krätke）撰
张丰野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22 Akkumulation, Aktiengesellschaft, Aufbaupläne, Banknote, Börse, Finanzkapital, Geld, Geldarten, Handelskapital, Kapital, Kapitalismus, Kredit, Owenismus,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udhonismus, Saint-Simonismus, Sozialisierung, Staatsschuld, Steuerstaat, Weltmarkt, Wucher, Zentralbank, Zins

纸币（Banknote）

A: maṣrifiya, waraqa naqdīya. – E: bank note. F: billet de banque. – R: banknota (банкнота). S: billete de banco.

什么是纸币？很显然，它是一种货币，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货币呢？是纸做的货币？信用货币？还是一种有价值的纸制品？**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争论分歧就在于此，这两个学派将19世纪40年代英国政治经济学分为两大货币理论阵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论战是19世纪初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关于金条（*Bullion*）的争端的延续（参见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1809），并且对于英国货币银行法律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持续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论战也是马克思发展其自身的信用货币尤其是纸币理论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对两个学派都持批判态度。对于通货学派，他指责其混淆了国家发行的固定汇率纸币与信用货币的区别，从而把一般纸币流通的规律与银行纸币流通的规律混为一谈；而银行学派在马克思看来则没有能够区分不同种类信用货币之间的差异，因此他们把汇票流通与纸币流通当成了一回事。但是，在为纸币发行制定法律的问题上，马克思是鲜明地站在银行学派一边的。

纸币代表着真正的货币，并且以银行信用为基础行使货币的职能。纸币的前身，即中世纪银行的信用证明或储蓄证明（金匠券［*goldsmith's notes*］——国家认可的黄金交易商手中所持有的金条或者金币），还几乎不拥有货币的职能，它们主要是为了便利货币的运输或者用来证明持有人的支付能力，只是偶尔被用作支付手段。马克思将这种纸币视为一个历史过渡阶段，这种以黄金为担保，可以完全兑换（成金币）的纸币，在他看来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银行汇票，但是也不算是通用的支付手段，不能随时随地完全代替金币（等价的金属货币）。马克思所认识的银行纸币与今天的这种纸币——可兑换的中央钞票形式，而且在本国范围内到处都可以用作法定支付手段——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在形式上也

已经十分相近了。最初的纸币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债务凭证，（比如德国长期以来使用的）那种手写的、金额任意的、签字后才生效的“纸条”，后来就慢慢发展成为固定的表格，直至变成大量印刷的、有固定额度的纸币。为了防止伪造，这些纸币的制作方式通常十分复杂，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称赞纸币是“绘图艺术作品”。纸币与硬币一起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在威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纸币上印制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理论上的“国父”头像作为装饰。

马克思对纸币产生过程的解释与银行学派类似。纸币作为“本质上的信用货币”并不从货币流通中产生（硬币和货币符号的流通），而是从商业汇票的流通中产生。（*K III*，MEW 25，第 413 页）纸币最初实际上是“银行家的汇票”（同上书，第 417、461 页），这些汇票有一定的有效期限，金额可以不限，而且有多倍的利息。这种汇票在**贴现**（*diskont*）的过程中被从银行汇票换成商业汇票，起初也仅仅作为商业汇票在债权人之间通过签字背书的方式转让流通。许多私人银行都发行这种纸币，因此就出现了许多种不同形式的纸币，而且每一种纸币的**资质**（*Qualität*）都和商业汇票一样参差不齐——不同纸币发行银行的信誉好坏决定了这种纸币可以传播使用的范围大小，尽管其传播范围只限于在资本家内部。商业汇票和纸币的区别最初仅仅在于商业汇票是关于已售出的商品的债务证明（*K I*，MEW 23，第 153 页），而纸币则是关于已售出的债务证明（商业汇票）的另一种债务证明。逐渐地，纸币褪去了汇票的形式，成为“流通的信用符号”（*K III*，MEW 25，第 417 页），越来越摆脱有价证券的作用，越来越成为货币的替代品。纸币没有有效期，没有利息，有标准固定的金额，不需要签字证明就可以从一个人转手流通到另一个人手中，因此比汇票更加易于流通。至于人们是否能够用它来支付，支付的价值有多大，却依然取决于发行纸币的银行的信用，或者取决于银行给予纸币持有人的承诺。可转换性即是银行的义务。假如银行承诺随时可以按照纸币所有者的愿望把纸币兑换成足值的黄金，那就是最为可靠稳定的对纸币的价值承诺。这种可以完全兑换的纸币不仅受到工业、商业资本家的承认，而且被用于银行与银行之间乃至国与国之间的结算。纸币作为“大规模商业中的硬币”（同上），在资本家之间的大宗商品交易活动中作为支付手段促进流通，同时也作为银行家们和其他资本家们之间的“信用传递手段”发挥作用（第 466 页）。

只要纸币持有者不全都同时要求把

纸币兑换成黄金，那么银行为了应付兑换要求而储备的黄金就不必达到已发行纸币的票面价值总额那么多。所以已经发行的纸币中只有一部分有货真价实的黄金来背书，绝大部分纸币实际上是依靠银行的信用来流通。因此，当银行的信用受到动摇，只有一部分流通中的纸币可能会贬值。马克思认为，可转换纸币永远不能像国家发行纸币一样超发，然后像国家货币一样的贬值，在他看来银行纸币的通胀和国家纸币的通胀不是一回事。（参见 *Zur Kritik*，MEW 13，第 147—148 页；MEGA II. 2，第 232 页及以下，与李嘉图不同）只要纸币可以随时被兑换，银行就不能随意超发纸币。纸币的数量必须“符合资本家们对交易的需求量”，因为纸币总是会定时流回到发行银行手中，而银行必须接受它们。（*K III*，MEW 25，第 539—540 页）如果纸币以汇票贴现的方式发行，那么贴现汇票的票面价值最晚在汇票过期之前就会重新回到银行。（参见 *TM*，MEW 26. 1，第 303—304 页；MEGA II. 3. 2，第 641—642 页；*K III*，MEW 25，第 471—472 页）不过，马克思很清楚，银行也可以向私有资本家发行信用货币，完全不依赖于资本家们自身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这种纸币发行方式对于银行来说“只需要开动印刷机”就可以（*K III*，MEW 25，第 461 页），但是却可以扩大银行的实际借贷能力。这样，银行发行纸币却不需要真的付出货币，而是把纸币作为一种可以流通的信用工具。这种通过发行信用货币创造信用的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也不会带来纸币通胀，因为在发达的信用体系里面，每个资本家都在银行拥有一个可以生利的账户，所有他暂时不用的货币和信用货币都会被存进这个账户。由于银行发行的纸币总会迅速回流到银行手中，银行就可以拥有比实际占有的货币更多的货币资本，且不必将流通纸币的数量增加到同等规模。（参见上书，第 465 页及以下，第 471—472、536—537 页）因此马克思批评英国 1844 年的纸币银行法，该法律武断地要求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额度要与其储备的黄金挂钩，却没有考虑纸币的“实际流通”过程。这导致从工业和商业资本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可理喻的对央行信用政策的限制。（参见 *Reflection*，MEGA IV. 8，第 229—230 页；*K III*，MEW 25，第 447 页及以下，第 562 页及以下）

随着央行纸币逐步变成当前的常规形式，纸币经历了巨大的职能转换。它从汇票交易中脱离出来，逐渐从“大规模商业贸易领域”退出来（*K I*，MEW 23，第 154 页），而进入“日常流通”（*K III*，MEW 25，第 417 页），把足值的（金币、银币）硬币完全驱逐出了市场。在货

币流通中，仅剩下了硬币和央行发行的纸币，而绝大部分的交易实际上都是在“无现金”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银行纸币到底是信用货币还是国家发行的有固定价值的纸币？抑或两者都不是，而是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货币类型？银行纸币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流通至少有三个机构性前提：

1. 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授予几家私有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力（纸币特权），通常是授予那些能够给国家发行贷款的银行。逐渐地，货币发行权会集中在一个银行手里，这个银行发行的货币就成为该国唯一流通的货币。

2. 央行的货币被提高到法定支付手段的地位（德国是在 1909 年），也就是说国家和所有其他流通中的主体都承认并接受该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这一义务最初只适用于国家自己和国家的债权人。央行的兑现义务法律上早有规定，后来，央行逐渐被授权也发行小额的标准面额纸币（德国 1906 年才出现 50 马克和 20 马克的纸币），以便可以用纸币支付工资，从而进一步打入日常普遍流通领域。

3. 这些纸币的发行不单靠黄金储备来背书，也要靠信用和有价证券来背书（如国债券或私人汇票），遇到危机或者战争时，央行往往不得不取消纸币的兑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央行发行的货币都不再是可兑换的。法律规定了这些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汇率或者是它们与主要货币（金本位的）美元的汇率。这样，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就成为除黄金和有价证券外最重要的货币发行基础。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央行货币之外的其他货币形式。此外，马克思时代货币的另一个职能，即满足大规模商品交易的职能，也被其他形式的信用货币如汇款所代替（包括支票、转账等形式）。所以，现代的不可兑换的央行货币的主要职能是用于日常流通，它们取代了金币或者以往其他形式的国家货币，而自己又被转账货币所取代。

马克思曾经称英国银行的（可兑换的）纸币是银行自己生产的信用货币。（*K I*, MEW 23，第 783 页）这种信用货币最开始只出现于“公共信贷”领域，也就是国家与银行之间的债务领域，后来开始与其他私人银行发行的货币一起服务于大规模商品交易。恩格斯指出，不可兑换的纸币要想成为普遍支付手段，必须要国家信用来背书，“如此一来，纸币就要遵循不可兑换的公债券货币的规

律”（*K III*，MEW 25，第 539—540 页）。马克思说，当英国银行发行实际上不可兑换的纸币时，“它们其实是在制造价值符号”（第 557 页）。如果法律也规定不可兑换（例如在 1797 年到 1817 年间），那就“纯粹依靠国家信用”来担保了，
27 银行依靠这一担保发行信用，资本主义企业依靠这种信用在未来创造价值（同上书，第 558 页）。

希法亭认为，央行发行的纸币是介于公债券和信用货币之间的一个阶段。（1910，第 77 页）只要它不能兑换，而且汇率固定，就和国债券没有区别了，即便它还可以继续行使一些信用货币的职能。（同上书，第 103 页及以下）这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关于多数派观点，参见 Sanio 1978，第 97 页）不过也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尽管央行发行的纸币外形都是统一的，但是还是有不同的职能存在，有充分理由可以说至少部分银行纸币构成了一种新的、独立的信用货币类型，尽管总体来讲它更接近公债券货币而非银行汇票和可兑换的私人银行/央行发行的纸币。（关于少数派观点，参见 Erdös 1971，第 75—78 页）这一职能性的划分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有说服力：（1）中央银行纸币的价值取决于央行和国家的信用。（2）央行纸币不只是像公债券货币那样用于流通，而且还作为支付手段和普遍的契约商品（*K I*，MEW 23，第 154 页）来行使其职能。（3）央行纸币始终用于信用的传递和作为创造信用的手段。

参考文献：

S. de Brunhoff, *La monnaie chez Marx*, Paris 1973 (engl. 1976); dies., »La pensée monétaire de K. Marx au XIXième et au XXième siècle«, in: dies., *Les rapports d'argent*, Grenoble 1979; P. Erdö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Money; Business Fluctuations and Crises*, Budapest 1971; B. Fritsch, *Die Geld- und Kredittheorie von Karl Marx*, Frankfurt/M 1968;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Frankfurt/M 1968; D. Ricardo, *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 London 1809; E. Sanio, *Geld und Währung. Aktuelle Probleme aus der Sicht der marxistischen Geldtheorie*, Frankfurt/M 1978; E. Varga, »Das Geld. Seine Herrschaft in Friedenszeiten und sein Zusammenbruch während des Krieges« (1918), in: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1918-1964*, Bd. I, Berlin 1982, 1-69; V. Wagner, *Geschichte der Kredittheorien. Eine dogmenkritische Darstellung*, Wien 1937.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撰
张丰野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Bank, Geld, Geldarten, Gold und Silber, Kredit, Staatsschuld, Weltgeld, Weltmarkt, Zeichen, Zentralbank, Zirkulation

28 基础（Basis）

A: qāʿida. – E: base, structure.

F: base, structure. – R: bazis (базис).

S: base, estructura.

“基础”（Basis）（希腊语为βάσις，意即“脚步、踩踏”；源于βαίνω，即“走、去”）是个外来词汇，德文中与之相对应的是“Grundlage”（基础）和“Ausgangspunkt”（出发点），马克思主要就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在许多时候，他对这个词的使用还带有建筑的隐喻（例如建筑物的基础、柱子或柱墩的基座等），在少数情况下还带有数学含义（例如幂的基数）。这个表述往往用于在两个或更多的概念之间建立基础关系。作为专门的关系性概念（xRy：“x是y的基础”），“基础”概念并不包含任何特定的事实性内容。

1.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个表述在两个论题语境中的使用体现了其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基础地位：首先，在向作为**历史之基础**的“物质”活动转变的意义上，这个概念成了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的**唯物主义**革命”的“标志”（Labica 1983）；其次，在社会理论方面，这个表述则揭示出“经济结构”对于社会其他结构（主要是“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基础关系（*Vorw 59*，MEW 13，第9页）。马克思为此使用了“基础”与“上层建筑”（Überbau）的隐喻（MEW 13，第8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I*）中（MEW 3，第36页），后者也被称为“Supersturktur”。

1.1 在英文以及各拉丁语言中，这对概念往往被译作“结构”（Struktur）与“上层结构”（Superstruktur）（尽管在德文中使用的是“基础”一词）。这个术语避免了一种还原论的解读，就是仅仅把经济视作实在和有效的，而认为上层建筑无非是某种副现象（Epiphänomen）。这种还原主义解读或许与马克思所采用的某些隐喻有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会在相同的思想脉络中使用语义上完全不同的表述，而这些表述所属的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相矛盾的。这些表述不仅包括以下概念：比例次序（Relata-Ordnungen）、关系（Verhältnisse）、结构（Strukturen，Gliederungen）、形式（Formen）、内容/形式、形式/内容、“运动”等

（参见 Marx，*Elend*，MEW 4，第 128 页；Engels，MEW 39，第 490 页），还包括这样一些关系：对应、表现、规定、以……为条件、依赖于、植根于、以……为前提、是……的原因、是……的起点等等（部分参见 *DI*，MEW 3，第 50—55 页）。

29 因此，正如《哲学词典》（PhWb）所指出的那样，“基础”这样的表述并不具有“哲学范畴”的地位。

1.2 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表述是非常通行的。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最初使用或许源于黑格尔（Hegel）（参见 *RPh*，§§258 及 265）和费尔巴哈（Feuerbach）——黑格尔在“权利”的“基础”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宪法”中发现了“一切事物”都应当“以之为基础”的东西（*PhilGesch*，转引自 Korsch 1938，第 163 页，注释 3）；而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人的自然属性被视作人的基础，是独特、普遍的最高对象”（W II，第 315 页）。马克思的观点事实上更接近圣西门，后者的理论出发点就在于把劳动视作“社会组织的‘基础’”（参见 Jaeck 1978，第 61 页）。最后，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提出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概念似乎是马克思“社会的经济基础”概念的先声，马克思曾在《剩余价值理论》（*TM*）第三卷中（MEW 26.3，第 405 页）引述过前者。——卢霍·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曾主张马克思与“浪漫主义历史学派”之间有共同之处，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见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 1893，第 294—299 页）以及恩格斯对此所持的否定立场（MEW 38，第 480—481 页）。

1.3“是否有可能把经济基础隔离出来考察？我们对此又应当注意哪些事项？”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很合理的。（1983，第 150 页）甚至可以说，我们需要一整部的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才能真正透彻地揭示出这个概念的含义。

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F*）表明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革命，在第六条中，“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被视作“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 6 页），而第八条则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MEW 3，第 7 页）。这两个洞见涵盖了马克思的所有思想（参见 Haug 1993，第 48 页），由此我们应当从人类的**社会**实践入手来把握这些思想。

2.1 **历史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物质”活动“当然”是个人活动的“基本形式”，“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DI*，MEW 3，第 71 页）“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即“衣、食、

住以及其他东西”（第28页），必须首先得到满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MEW 42，第297页。经查应为该书第397页。——译者）。不过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不言而喻的
30 事实才获得了历史理论的地位。“过去的一切历史观”都“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DI*，MEW 3，第39页）除了英国和法国的少数理论家“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之外（第28页），“历史的东西”往往都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第39页）。这种“普通人的生活”（Leben der Gemeinen）就与“日常生活”（gemeine Leben）一样不具备历史性，因为它只能认识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同上），而那些作为“自然”和“史前史”（第39页）的“世俗基础”（第28页）以及“对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第40页）则不在其视域之中。与此相反，马克思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第39页）问题入手，凸显出自然与历史的矛盾；就与人的本性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具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第29页）。在生产过程中，人们“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Lohnarbeit*，MEW 6，第407页）。既然这种与自然的关系是由社会所规定的，那么社会就始终是生活的自然基础的中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也就是“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DI*，MEW 3，第21页）——我们在一百多年之后所遇到的那些环境问题，马克思在此都已经给出了解决的基本路径，虽然他只是粗略地提及。

与那些“认为宗教、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MEW 3，第19页）的想法或者对“永恒原则”（MEW 4，第135页）的笃信相反，如同蒲鲁东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指出了（同时期以及任何时期的）“最初的历史的关系”（*DI*，MEW 3，第30页）：“所处的自然条件”（第21页）：“生活本身……的生产”（第40页），也就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繁殖（»*Familie*«；第29页）；这样一种需要，其满足能够“产生新的需要”（第28页），两种需求都可被视作“历史过程”（第71页）；“生活资料的生产”（第40页，参见第28页）；语

言以及（它所表述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生产作了进一步区分：（1）个人“进行物质生产”的“一定的方式”（第25页），“生产方式或工业阶段”（第30页），以及“经营方式”（第22页）；（2）生产方式不仅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相关，而且始终关系到“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第21页）；（3）生产总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第30页）；（4）社会“生产力”。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谓“共同活动的方式”主要是指“交往形式”（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它应当包括“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更确切地说，是包括了“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MEW 3，第36页）由此，马克思得以作出以下的区分：“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第68页）、“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第70页，参见*K III*，MEW 25，第628页；以及Engels，*Utopie*，MEW 19，第208页），以及“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TM*，MEW 26.3，第437页）。在较晚的文本中，马克思主要使用的则是“生产关系”这个表述。（参见*Elend*，MEW 4，第130页）因此从狭义上说，它指的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同上）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认定的那样，这在本质上是由“劳动分工”和特定的“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而所谓所有制形式，指的就是“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22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生产关系”的概念还包括了交往形式（交换关系）甚至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是同义词，它们都指“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K I*，MEW 23，第334页）。

所有这些概念都体现了一种“制约又被制约”（bedingte Bedingende）的特点，它们在复杂的脉络中形成了相互的依赖关系以及相适应/不相适应的关系，在此，它们的这种非对应关系形成了历史动力的一个方面。——生产方式也就是“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的“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MEW 3，第71页）另一方面，需求与生产方式也制约着（必然总是某种形式呈现的）人们的共同活动（“交往形式”，第30页），它总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第71页，参见第423页）。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决定了“人们物质交往”（第36页）的可能性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一处还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也就是“交往形式”（第30页）——但结合此处的上下文表明，这里指的并不是仅仅是生产力的总和，而且也指生产

力的种类和质量。反过来说，生产关系的功能之一，就在于调节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由此，所有制形式连同“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第23页）就被规定为各阶级与功能团体（Funktionsgruppen）。——那在形式上受生产制约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第21页）也“反过来”规定着“生产和需求”（第423页）、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以及对生产力的占有（第36页）。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第30页）

为了弄清这种复杂结构的起点和方向（“线索”），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各种不同的尝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将这种结构视作“整个历史的基础”（MEW 3，第36页），它是决定着“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的“真实基础”（第311页）。历史学家的研究方针应当“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第30页）交往形式的问题不仅有助于对“生产方式”的分析（第36页），而且进一步关系到生产力，因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Elend*，MEW 4，第130页）显然，我们应当把这些说法视作某种经验观察，而非对于概念的逻辑分析。类似地，在一封写给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Pawel. W. Annenkow）的书信中，马克思指出：与“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相适应，“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1846年12月28日，MEW 27，第452页）。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概念，与自然环境基础、需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概念有着相互关联；在资本主义中，这个概念的“核心”是由“作为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的生产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 33
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K III*，MEW 25，第799—800页）

2.2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表达了一个基本想法，在他的晚年手稿中，这个想法仍然没有改变，马克思认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之间的矛盾。”（MEW 3，第 73 页，参见 *K III*，MEW 25，第 891 页）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 59*）中，他也作了类似的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MEW 13，第 9 页；参见在制造业的发展中，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爆发”，这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前身，MEW 42，第 418 页；参见 *Res*，MEGA II. 4. 1，第 101 页）。“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MEW 13，第 9 页；参见与“私有财产”的关系，MEW 3，第 338 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展中的矛盾”就构成了这种枷锁：它一方面持续地缩减着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在剩余劳动中把由此产生的**可支配**时间转化为自身。（*Gr*，MEW 42，第 605 页）因此，生产力也就具有了**破坏力**（*Destruktivkräften*）的形式。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类似，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中的说法也存在演化论—客观性的模棱两可。社会形态构成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适应阶段，在其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互适应，直到达成一定的成熟状态，亦即衰落。“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新的基础上开始。”（MEW 42，第 446 页）

与此相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Elend*）中，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在唯物主义革命理论的语境下加以讨论的，因此它们往往被明确地与阶级斗争放在一起思考，这些方面内容在前述的文本中只是潜在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它只是被视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概念本身含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前者代表了个人的社会发展**可能性**的物质条件，后者则代表了资源的分配方式。

尽管生产力概念有着特别的理论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马克思理论中享有某种先于社会的排他性地位，也就是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的看法不同，生产力并不是所谓“基础的基础”。它曾被视作人类社会关系的“存在条件”之一：其他方面还包括“人们的需求”、“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等等（*Elend*，MEW 4，第 135 页）。在其他许多场合，这个概念则被视作一种社会关系，因为如前述引文所表明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它是衡量“个人发展”的尺度。（MEW 42，第 446 页）统治是生产力的负面度量。它不能被还原成技术

或其他的层面：我们不应将其视作某种事物，而应视其为人类自由的潜在程度。我们所说的“生产力”，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等等方面生产力的简称。这种种的生产力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和重构创造了回旋余地。

“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Elend*，MEW 4，第 140—141 页），马克思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明确指出，这里的“必然性”既不是逻辑意义上的，也不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同上）在此，“必然性”（Notwendigkeit）应当理解为**必要性**（*Not*）。不过，“粉碎”旧社会并“创造新社会”还与一些可能性条件密不可分：“就是说，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需要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DI*，MEW 3，第 38—39 页）

“革命要素作为阶级的组织”（*Elend*，MEW 4，第 181 页），这意味着把阶级作为**政治性的东西**建构起来（第 143 页），马克思认为，阶级在政治上的能力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此并没有表明这也会导致**阶级组织**的解体）。生产力一方面构成了阶级组织的中介，另一方面则是借以超越那些居于支配地位的关系的材料。生产力需要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第 143 页）的程度，否则革命的目标就会沦为空谈和虚无缥缈的乌托邦。阶级无法外在于这些条件——它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内容（而只拥有一种潜力），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话说，它本身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革命实践”中的“自我改变”的一部分（MEW 3，第 6 页）。因此马克思才可以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MEW 4，第 181 页）

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联与阶级斗争之间仅有**分析上**的区别。“革命”是“历史的驱动力”（*DI*，MEW 3，第 38 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第 73 页）则构成了革命的“基础”（第 74 页）。它总是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第 73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指出，这些冲突只不过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各种附带形式”（同上），因此马克思在后来作了一个重要的澄清：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借助它，人们“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MEW 13，第 9 页）——而就如第一处表述所推论的那样，一切其他东西都是

"附带的"：正是在这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形式中，"物质生活的矛盾"（同上）体现出了历史的有效性。

2.3 **经济基础 / 上层建筑。**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最显著的论述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在探寻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自明性方面，这份《序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效果史上的一部主要文献。马克思在多个文本中曾完整并大多不加评论地引用了《序言》中的理论段落，也就是说，他认为那是不言自明的。在马克思自己看来，这些文本和表述带有某种启发式的合理性。（参见 MEW 13，第 8 页以及 MEW 3，第 27 页）

2.3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马克思"简述"了他自 1844 年以来的思想变化，其中提到自己的关
36 注点从黑格尔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他对"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作了简要的概括，这番概括中，马克思在两个地方使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其中一处是关于结构分析的论点（第一论点）："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MEW 13，第 8 页）另一处说的则是关于过程分析的（第二论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另一种是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冲突在这个领域中得以完结。（第 9 页）

这些表述中的一部分容易引起误解。**一种存在论上的**误解认为：经济基础是"实在的"（real），而上层建筑则只有相对较低的现实性。然而，"实在"这个词在此只是用于表达强调的修辞手法，而不是要赋予经济基础某种和"非实在"（irrealen）相对立的地位。与这个观点相反，另一种看法误解了生产关系的含义，并且把法律或者国家当作社会和历史的"基础"。马克思的看法其实正相反，他认为国家和法律的具体形式是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加以"解释"的。

功能主义还原论的误解认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在**任何时候**都"与特定的社会的"一切"意识形式相适应"。反过来说，在这个观点看来，理论的任务就在于发展出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意识形式。马克思的第二论点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基础冲突完结于意识形态形式的领域之内。但这个说法是一种形式上而非内容上的分析。它既不是说该领域

中的一切产物（内容）都是这种冲突的结果；也不是主张它们都要被还原到这种冲突中。（参见 *TM*，MEW 26.1，第 257 页中论艺术的部分）这个论点赋予意识形态形式一种与经济基础相关的特别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可以被这个功能所穷尽。

唯心主义的误解则再次试图从经济生产条件的“物质”变革与“意识形态”加工形式的区分中得出后者的某种“非物质性”；从结构分析上说，意识形态的加工形式在社会体制和机构方面都具有物质性。因此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应通过社会意识形式中体现出的自明性来对物质上的变革作出判断，而只能“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MEW 13，第 9 页）。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首先将后者确定下来。——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同上）它。

37

唯科学主义的误解则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例如在列宁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视作“自然的知识向人类社会的知识”的扩展。（*Drei Quellen*，LW 19，第 4 页）但马克思那所谓的“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只是一种隐喻，它无非是要强调事实性并表达一种不属于意识形态形式及其启发式论述的立场。（也正因此，格拉姆斯基 [Gramsci] 才主张用“语文学方法”这个表述来取代“自然科学的精确性”，*Gef* 6，H. 10. I，§8，第 1241 页。）——此外，马克思的第一论点往往会导致**唯技术主义的**误解，也就是认为生产力不属于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第二论点对此作了修正。（参见 2.2）

马克思上述两个论点的语境引发了一系列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本应指明理论的路径，却引发了新的问题。在简述其早期主要针对黑格尔思想的论述时，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第 8 页）几句话之后，马克思作了又一个表述，这个表述似乎体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批判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想法：“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第 9 页）结合语境中的其他二元对立的表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幸的联想链：社会存在＝经济基础＝物质 / 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观念物（参见 Fleischer 1970，第 93 页），在其中，前面的系列完全**决定**了后面的系列。这个理论路径可以归结如下：社会存在不仅包括经济，而且包括各种精神性的东西（见生产力），意识（Bewußtsein）不能被还原为意识形态（Ideologie），后者显然也具有物质性的存在方式；因此，各种社会实践之

38

间具有“相互作用”。（可参见 Kautsky 1927，第 812 页）实际上，这个联想链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变得荒诞不经，而且它相当于使马克思的思想自我削弱了，因为它模糊了我们对于解放斗争所采取的形式之有效性的注意力。

不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所表达的含义恰恰在于，它从改变社会的意图出发，对经济实践和形式与政治之间的整体联系作出了追问。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MEW 13，第 8—9 页），我们不能将其视作逻辑或机械决定论，而应把它理解为个人社会实践的实际“界限、前提和条件”（*DI*，MEW 3，第 25 页）。

2.32 蒙格（W. F. Haug）区分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三个维度。在“**起源学意义上**”，像国家之类的上层建筑“是从社会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地“用社会遗传学来把握它们”。（1977，第 171 页）在此，**上层建筑具有了**“一种具体含义，这就是以暴力机关为中介的上层秩序”（同上）。“**功能意义**”强调这些上层建筑是从“维护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中“**必然地**产生出来的”（同上）。而“**经济意义**”则表明，“剩余产品的存在是这类上层建筑产生和延续的**条件**”（同上）。

这种三重含义理论不仅对于具体研究具有启发性，而且为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参照。它表明了这样一个意涵，即：马克思那里的社会 / 历史概念是**开放的**。他把社会视作一个不断运动着的、错综复杂的整体。社会正是一种不断地由“人们的相互交涉”（MEW 27，第 452 页）所重新生产出来的“产品”，反过来说，“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Gr*，MEW 42，第 608 页）。在这种生产和再生产的行动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第 402 页）。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假说主张： 39
我们应当通过“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各种具体的组织形式来把握社会。《德意志意识形态》曾对这个研究纲领作过简要的描述。我们应当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生产过程”，并把握与之“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从而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它们，然后由此出发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然后“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MEW 3，第 37—

38 页；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假说的进一步讨论，主要参见 MEW 4，第 130 页；18，第 139 页；23，第 96 页，注释 33；25，第 351—352 页，以及第 629 页；26.1，第 256 页及以下；27，第 452 页；42，第 170 页）

与那种基于意识形式的单纯的社会诠释学相反，马克思关注的是对于意识形式本身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是还原性的，它并不是要寻求（似乎可以在经济领域中发现的）终极真理，而是要从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出发，作出起源学意义上的重构。

那种还原论式的过程，正是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地方。费尔巴哈“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而不是“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它。（*ThF*，MEW 3，第 6 页）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DI*，MEW 3，第 26 页），而是从“个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第 20 页）出发的。“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第 26 页）在此“地上”被视作“天上”的基础。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再次提到了这种研究路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MEW 23，第 393 页，注释 89）——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及他关于哲学意识**形式**以及更普遍的**意识形态形式**的解释，都遵循着这个进路。（参见蒙格对此的理论阐述，Haug 1984 及 1993）

2.33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联系是**必然的**。经济条件“必须表现为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DI*，MEW 3，第 339 页）。“必须表现为”并不意味着存在某种“必然的表现”，至少两者并不能互换。的确，上层建筑是在两个方面被规定的：“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TM*，MEW 26.1，第 257 页）不过马克思知道：“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K III*，MEW 25，

第 799—800 页）——而“必须表现为”的意思则是：生产方式无法在没有上层建筑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也就是后者在某种功能性的意义上在基础中发挥自身的作用；由这个基础所造就的“规则和秩序本身是一切生产方式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第 800 页；参见 Engels，MEW 20，第 82 页）。这并不能被视作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因此，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并不适用于规则理论。

3. **恩格斯与“归根到底”**。针对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各种曲解，晚年恩格斯作了反驳（关于恩格斯本人对此理论的表述，主要参见 *Utopie*，MEW 19，第 208 页，以及 MEW 37，第 463 页）。对于还原论的解读（无论是为该理论辩护的，还是批判它的），恩格斯在一封书信（由伯恩斯坦 [Bernstein] 公开）中强调：“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MEW 37，第 436 页）如果有人把这句话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第 463 页），那么这就是“荒诞无稽”的。“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第 463 页）——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是一致的。但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因为“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第 490 页） 41
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在历史中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因素”（第 463 页）。

柯尔施（Korsch）对于恩格斯这种追加的“自我批判”持反对意见（1938，第 198 页），柯尔施认为这是“一切修正主义……‘改良者’”的思想根源，他们试图通过“扩展唯物主义的图式”（第 195 页）来把握“交互作用”这个概念，并“试图通过弱化原先革命性观点的方式，来使他们的新学说显得科学合理”（第 194 页）。因为正如柯尔施正确指出的那样，“交互作用”的思想早已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进路之中的。（第 190 页；参见 *K III*，MEW 25，第 800 页；*TM*，MEW 26.1，第 256—257 页，*Einl 57*，MEW 13，第 629—630 页）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式的理解，才造就了这种“补充”的需要。与此不同，对于其他方式的理解而言，它们需要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间的交互作用遵循着一种“启发式的原则”，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假说已经提供了这样的原则。这种“想当然的片面性”（第 194 页）恰恰使其具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用处”（第 195 页）。柯尔施认为，关于“第一”（经济基础）和

"第一"因素（上层建筑）的说法，以及把经济视作"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第196页），导致了"马克思经济唯物主义的解体"（第189页）。——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试图通过**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概念从理论上把握恩格斯的晚期思想。（FM，第81页）

4.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一种路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它从存在与意识的二元对立出发；另一种则主要以葛兰西（Gramsci）的论述为代表，它的出发点是经济结构与其他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形式"之间在实践与功能上的关联。

4.1 **列宁、斯大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那里，马克思起源学式重构的路径以及实践理论变成了一种还原论和**客观主义的**（*Objektivistische*）理论。在其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简述中，列宁指出："把社会关系还原到生产关系，并把生产关系还原为当时的生产力状况"，马克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把社会的构成和发展解释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LW 1，第132页；参见MEW 23，第16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客观主义，这个批判也适用于列宁自己。于是，作为社会基础冲突之完结形式（Austragungsformen）的意识形态形式便全然成为基础冲突的反映："就如同人们的知识反映着独立存在的自然，也就是反映着那自行发展着的物质，人们的**社会知识**（亦即各种关于哲学、宗教、政治等的直观和学说）也反映着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第5页）——在列宁的论述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表述处于较次要的地位；而"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才是列宁那里真正的"基本概念"。（参见Küttler 1978）

此后，上述列宁主义的论述便一再被采用，并在斯大林那里成了所谓的正统学说。布哈林（Bucharin）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1922）给出了这种论述的早期形式。（参见Negt 1969）布哈林接受了扩展论——他要阐明"自然科学的普遍规律如何能以某种特别的……形式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第61页）——以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即"阐明物质为什么从根本上是精神之母"，而"社会性的物质，首先是物质生产"又如何构成"社会'精神文化'"的"基础"（第59页）。因此，布哈林把"基础"这个概念限定在了作为阶级关系的生产关

系范围之内。他还进一步将那可被还原为“社会性技术”（第 148 页）的生产力从它们的经济—社会关系中隔离出来，并赋予前者一种先于“基础”的地位。

斯大林也接受了列宁的扩展论（*DHMat*，*FL*，第 647 页）并把它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论述结合起来。斯大林一般性地指出：“自然、存在和物质世界［是］第一位的……，意识和思想则［是］第二位的，［是］从前者派生出来的，……是客观实在的镜像”（第 658 页），接着他说“社会的物质生活，其存在同样是第一位和根源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则是第二位和衍生性的”（第 658—659 页）。因此，那可以被还原为“生产工具”层面的生产力（第 665 页），便在“物质生活”中占据着特别的地位（参见第 667—668 页）。这就使得人不仅成了“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是生产工具的尺度和操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Sprachw*）中，斯大林明确地把生产力从一系列“经济基础”概念中分离出来，并认为它和语言类似，“并不偏向于某一阶级”（第 26 页）。换言之，虽然“经济基础”被还原为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并不是讨论的焦点。早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HMat*）中，斯大林就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在此加速”发展的结果（*DHMat*，*FL*，第 674 页）。——这个说法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竞争为背景的；苏联的体制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恰恰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忽视，结合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认为，苏联的体制只在形式上采用了这种关系，却没能使实际所有制关系发生有利于直接生产者和劳动分工形式等方面的变革。

在理论层面上，与上层建筑的次要地位的观点相对应的是公民社会的封闭化。斯大林的确把上层建筑视作一种积极形式，但这是在功能的意义上说的：“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产生，但这不意味着它仅仅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和中立的反映，不随着阶级命运和制度特征的变化而变化。相反，一旦上层建筑被建立起来，它就具有了非常积极的力量，它对于其经济基础的形成和稳固起着积极的作用，它会采取一切举措来支持新秩序，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第 24 页）因此，斯大林实际上摒弃了马克思关于矛盾和冲突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完结的论述。

民主德国关于“意识形态关系”的讨论（参见 Haug 1979）大体上遵循着斯大林的方针，并未与前者有根本的矛盾。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联及其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基础的概念相关（沿用斯大林的定义，

其中援引了 *DHMat*，*FL*，第 665—674 页的内容）。赫尔曼·东克尔（Hermann Duncker）等人持较小众的立场，他质疑了斯大林的三分法（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但这些立场是被主流拒斥的。（参见 Heppener 1979，第 486 页）生产力变成了“对一切社会生活起最终规定性作用的基础”（同上书，第 482 页；后续批判，参见第 530 页）。“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人的发展”被认为是由上而下通过教育实现的。公民社会诸形式的地位让位于国家政党及其周边组织网络，后者“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人格发展上发挥着社会主义领导的作用”（第 506 页）。“党、国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视作“主观因素”（参见上书，第 507 页），而物质的生产力则是客观因素。

44

4.2 葛兰西对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或 Struktur-Superstruktur-）理论的解释主要来自对克罗齐（Croce）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布哈林教科书的讨论。克罗齐首先批判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还原论解释（参见 *Gef* 3，H. 4，§19，注释 7，第 A 227 页），他不赞同历史唯物主义，并仅仅从表面上理解这些还原论的内容（1932，第 33 页；参见 *Gef* 6，H. 10. I，§7，注释 1a，第 A 563 页）。他在“经济基础”（Struktur）中发现“‘隐藏了的上帝’概念”又重现了（*Gef* 6，H. 10. I，§8，第 1240 页），而上层建筑（Superstruktur）则退化成了“单纯的表象和幻觉”（*Gef* 6，H. 10. II，§41. XII，第 1324 页；参见 H. 7，§1，第 862 页）。由此，克罗齐（即便在学术讨论中）作出了一种“庸俗唯物主义的解释”（*Gef* 6，H. 10. II，§41. XII，第 1325 页），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的错误恰恰在于：（1）“把意识形态解释和规定为与经济基础截然不同的东西”，“认为意识形态无法改变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改变意识形态”；（2）“认为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单纯’的无用、迟钝……的表象”（*Gef* 5，H. 7，§19，第 875—876 页）。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基础不是“不变和绝对的”，而是“在现实中不断运动的”（第 1309 页）；而上层建筑也不是单纯的表象，而是“客观和有效的实在”（第 1325 页）。“现实过程的统一性”（第 1309 页）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在实践的哲学中，存在与思想、人与自然、活动与物质、主体与客体，都是不可分割的”。（第 1448 页）由此，（完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说）葛兰西拒斥一切诸如存在 / 意识、物质 / 精神等的二元对立，他认为这些二元对立都是进行“无意义的抽象”的“宗教”形式（第 1448 页），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也属于这类二元对立。

作为“现实过程的统一性”的环节，我们应当通过“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和必然的相互作用”来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发展。（第 1308 页）葛兰西多次提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条中所说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借此阐明“人对于经济基础的积极反作用中的必然关系”。（第 1309 页）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种“交互作用”中，葛兰西看到了“现实的辩证过程”（第 1045 页），也就是社
45 会现实性的辩证法。而正是“通过辩证法”，像（葛兰西所批评的）布哈林那样试图从物质中寻找“终极因”的努力才“一无所获”。（*Gef* 3，H. 4，§26，第 483 页）

根据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并不存在任何处于人类实践之外的、超验的客观性。“实践的哲学就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思想绝对的世俗化和在世性（Diesseitigkeit），也是历史的绝对人文主义。”（*Gef* 6，H. 11，§27，第 1430 页）因此，实践哲学不是哲学上的（形而上学的和机械论的）唯物主义，相反，我们应当将其视作扬弃“唯心主义”并将其转化为历史—实践的过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马克思反对唯物主义的客观主义的立场，对唯心主义作出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后者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尽管这种发展只是“抽象的”，而非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MEW 3，第 5 页），而葛兰西则在“上层建筑理论”中看出了马克思的一个特别思路，即他“用现实主义的历史主义概念转述其对于主观现实性的理解”（*Gef* 6，H. 10. II，§6，第 1259 页）。

一般地说，葛兰西认为经济基础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其中，现实的人作为各种客观条件的总和工作和活动着”（*Gef* 6，H. 10. I，§8，第 1241 页），更具体地说，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第 1045 页）。它构成了“实践变革的客观条件”（同上）。与此相对，上层建筑则“构成了人类活动、斗争和获得关于自身地位的意识的领域”（*Gef* 5，H. 7，§19，第 876 页），这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类似。把上层建筑视作单纯的表象，无异于一种社会性的自我剥夺。因为上层建筑的效能恰恰在于，它构成了这样一种形式，在其中，个人、团体、阶级等等都在社会关系的交往中获得了权力。葛兰西也将此称为“经济基础在人的意识中上升到上层建筑的过程”、“从‘客体到主体’的上升”以及“从必然到自由”的上升。（第 1259 页）因此，对于被动的、外在于人的和压抑人的权力而言，它的基础会“转变成为自由的中介，成为创造一种全新伦理—政治形式的工具，并且成为全新个体的起源”（同上）。

从阶级理论上说，“阶级在生产世界中的功能构成了阶级建立自身的基础：
46 阶级的发展以及争取权力和保持权力的斗争造就上层建筑”（H. 4，§12，第 472 页），正是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阶级首先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权力而建立自身。对作为上层建筑要素之一的政党而言，这意味着它们“不仅是阶级本身的机械和被动的表现，而且反过来影响着对后者的发展、巩固和普遍化”（第 422 页）。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一个必然和性命攸关的联结”（第 1326 页），葛兰西借用了索莱尔（Sorel）的概念，称其为“历史联合体”（geschichtlichen Block）（第 1309 页等处）。对于这种联结中若干要素的忽略，将会导致“经济主义”或者“意识形态主义”。（第 494 页）葛兰西的后一个指责针对的是克罗齐，克罗齐的伦理—政治概念事实上突出了上层建筑的阶级霸权地位，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他“把历史联合体的概念抽象化了，从而使其社会—经济的内容与伦理—政治的形式……变得一模一样”（*Gef* 6，H. 10. I，§13，第 1251 页）。诚然，“霸权”总是“政治性的，但它同时也是经济性的，其决定性的功能需要物质基础，使其能够在经济活动具有决定性地位的核心地带中发挥霸权式的组织作用”（第 499 页）。

5. 路易·阿尔都塞以功能主义的方式明确了这一进路。他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解读为马克思与黑格尔决裂的标志，因为它迫使我们思考社会中“实在而显著的领域”（1975，第 81 页），而非像黑格尔那样通过“……的真理”之类的理论构造来扬弃它们。——在黑格尔看来，“法律”作为建立“宪法”的“机制”而成为“国家的坚实基础”，通过法律，国家得以被作为相对于家庭和市民社会而言的“更高的权力”而建立起来。在此，“基础”（Grund）又一次出现了，“但这些机制的根据和最终真理是精神，它是它们的普遍目的和被意识到的对象”（*RPh*，§263）。——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总是‘在上’”的，它并非“经济的‘真理’”。国家并不处于“‘真理’关系”中，而是行使着“一种神秘化的关系”（第 81 页），也就是说，它“通过在国家机构中（包括压迫性的国家机构 [RSA] 和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机构 [ISA]）行使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ISA*，第 123 页）。尽管 ISA 是多种多样的——家庭、权利、政党、工会、媒体和文化等等（第 120 页），“彼此并不协调的 ISA 制度”之所以具有统一性，是因为它们都“促成了同样的结果，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第 127 页，对于此概念功能主义 47

的批判，参见 PIT 1979 以及 Hall 1984，第 103 页）。从这个方面说，无论与生产的距离多么遥远，ISA 都带有间接生产关系的特征。因此巴利巴尔（Balibar）才会说，阿尔都塞无意“在既有的经济基础（structure）理论中加入关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理论，恰恰相反，他要通过表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最初都依赖于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条件，从而改变经济基础这个概念本身”（1994，第 66 页）。于是这个理论进路——至少其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相关的部分——就使得“‘上层建筑’这个隐喻被完全放弃了”（同上）。

尼克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赞同这个后果，因为他认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图景中，我们无法思考“社会现实的各分支”里的表述关系和构造关系：“生产关系以及组成它的各种关系（经济上的财产 / 所有物）都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密不可分，其合法性受到后两种关系的认可。这些关系自身不仅加入了既有的生产关系，它们对既有关系施加的反作用也不仅仅是外在或滞后的，事实上，它们已经在生产关系的构造中对所有形式的生产方式施加着影响。”（1978，第 24 页）

资本把自身视作“资本主义规则中……‘决定性的核心’”，“总是必然地嵌入到社会中，并受到社会的调控”，面对这个事实，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提出了“整体经济”（integralen Ökonomie）的概念（1992，第 234 页），这个概念与葛兰西的（由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组成的）“整体国家”（integralen Staats）概念有相似之处。雅索普认为整体经济由“积累式政权和社会的积累结构”（同上）组成。在调控中，“资本生产”以及“与个人和集体交往相关的体制性与规范性形式”被视作“相互矛盾又彼此联系的社会化形式”。（Hirsch 1990，第 19 页）因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具备属于自身的社会领域或区域”，它们无法通过“空间”和“建制”加以规定。不过它们仍然具有某种社会实在性，“尽管它们不具备任何在建制上可以本地化的场所”。“像工厂、家庭或国家这样的建制同时既包含‘经济基础’，也包含‘上层建筑’。”（同上）——莫里斯·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已经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不应视作“建制或机构之间的区别”（1983，第 944 页），而应当视作“能够体现在不同建制中的**一种造成差异和等级化的功能**……”（1990，第 211 页）。例如，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士绅社会中的亲缘关系就发挥着生产关系的功能，因为它维持着占有生产

资料的特权：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属于”该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

尽管我们有着上述种种不同的具体解读，但它们都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并且最终来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思想图景。如果不拘泥于字面理解的话，这个概念仍然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似乎应当像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那样把这个隐喻加入**黑名单**：“**基础、上层建筑**——这种最原始的划分把历史的整体境况分成地窖和阁楼”（1982，第 133 页），**与此同时**“又把这个假说作为依据，自己**制造发现**”（Thompson 1980，第 218 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Elemente der Selbstkritik*, Berlin/W 1975; G. Anders, *Ketzereien*, München 1982; J. P. Arnason, »Basis und Überbau«, in: I. Fetscher (Hg.), *Grundbegriffe des Marxismus. Eine lexikalische Einführung*, Hamburg ²1979, 33-41; É. Balibar, »Das Nicht-Zeitgenössische«, in: ders., *Für Althusser*, Mainz 1994, 52-81; A. Bauer, H. Crüger, G. Koch, Ch. Zak, *Basis und Überbau der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4; *Die Bedeutung der Arbeiten des Genossen Stalin über den Marxismus und die Frage der Sprachwissenschaft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en*. Protokoll der theoretischen Konferenz der Abteilung Propaganda beim ZK der SED vom 23. bis 24. Juni 1951, Berlin/DDR 1953; B. Croce, *Geschichte Europas im 19. Jahrhundert* (1932), Frankfurt/M 1993; E. Engelberg, »Theorie und Praxis des Formationswechsels (1846 bis 1852)«, in: ders. u. W. Küttler (Hg.), *Formationstheorie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Untersuchung vo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 im Werk von Marx, Engels und Lenin*, Berlin/DDR-Vaduz/Liechtenstein 1978, 91-153; H. Fleischer, *Marx und Engels.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inien ihres Denkens*, Freiburg/B-München 1970; M. Godelier, »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in: KWM, Bd. 5, 1983, 941-945; ders., *Natur, Arbeit, Geschichte. Zu einer universalgeschichtlichen Theorie der Wirtschaftsformen*, Hamburg 1990; S. Hall, »Das ‘Politische’ und das ‘Ökonomische’ in der Marxschen Klassentheorie« (1977), i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amburg-Berlin/W 1989, 11-55; ders., »Ideologie und Ökonomie – Marxismus ohne Gewähr«, in: PIT 1984, aaO., 97-121; W. F. Haug, »Zur Dialektik von gesellschaftlicher Basis und politischem Überbau im Sozialismus« (1977),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2, 169-188; ders., »‘Ideologische Verhältnisse’ in der DDR-Philosophie«, in: PIT 1979, 82-105;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PIT 1984, 9-95;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S. Heppener,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s

Verhältnisses von Produktivkräften und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in: *Zur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in der DDR. Von 1945 bis Anfang der sechziger Jahre*, Berlin/DDR 1979, 479-549; J. Hirsch, *Kapitalismus ohne Alternative?*, Hamburg 1990; H.-P. Jaeck, »Die materialistische Erklär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Formationsprozesses. Zur Entstehung des Kategoriensystems der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n: Engelberg/Küttler 1978, 19-90; B. Jessop, »Regulation und Politik«, in: A. Demirović, H.-P. Krebs, Th. Sablowski (H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ß*, Münster 1992, 232-262;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2 Bde., Berlin 1927; K. Korsch, *Karl Marx* (1938), Frankfurt/M 1967; A. Kramer, »Gramscis Interpretation des Marxismus«,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Bd. 4, Frankfurt/M 1975, 65-118; W. Küttler, »Lenins Untersuchung des russischen Kapitalismus als Weiterentwicklung und historische Konkretisierung der Kategori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in: Engelberg/Küttler 1978, aaO., 360-443; G. Labica, »Basis«, in: KWM 1, 1983, 147-150; F. Mehri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893), GS^2 13, 289-343; O. Negt, »Marxismus als Legitimationswissenschaft. Zur Genese der stalinistischen Philosophie«, in: A. Deborin, N. Buc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69, 7-48;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1979), AS 40, Berlin/W^{3}1986; dass.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Philosophie – Ökonomie – Wissenschaft*, AS 84, Berlin/W 1984; R. Rossanda, »Basis und Überbau«, in: dies., *Über die Dialektik von Kontinuität und Bruch*, Frankfurt/M 1975, 76-84;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Frankfurt/M 1980; F. Tomberg, »Basis und Überbau im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ers., *Basis und Überbau.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Darmstadt-Neuwied 1969, 9-92; R. Williams, »Zur Basis-Überbau-These in der marxistischen Kulturtheorie«, in: ders., *Innovationen*, Frankfurt/M 1977.

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撰
王师 译，张义修 校

参见：

Ableitung, Anatomie, Artikulation, Ausdruck, Bedürfnisse, Bestimmung, Bewußtse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nkform, Destruktivkräfte, Determinismus, Fordismus, geschichtlicher Block,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egemonie, Hermeneutik,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ologiekritik, ideologische Formen, integraler Staat, Klassenkampf, Notwendigkeit, Ökonomismus, Philosophiekritik,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kräfte, Regulationismus, Spekulation, Staatstheorie, Struktur/Superstrukturen, Überbau, Überdeterminierung,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Wechselwirkung

50 基础美学（Basis-Ästhetik）

A: ʿilm al-djamāl al-asāsī.

E: basis aesthetics.

F: esthétique de base.

R: bazisnaja ėstetika (базисная эстетика).

S: estética de base.

这一概念首先展露的，是谈及美学之“广泛对象”时所意指之物：并不是对日常艺术行为的反思，而是分析艺术领域之外的审美所获，即“审美之物”（Das Ästhetische）几乎不可遍览的多样性。这就是带着价值判断的美学创造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形式，以及对形象充满意喻的感官知觉；二者都关涉人类，以及人类日常行为中物质性与空间性的生存条件。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美学中，这些领域极少为人所关注。马克思偶尔对作为奢华、装饰与富丽堂皇之材料的贵金属所作的论述（*Gr*，第 898—899 页），或对钻石的功用所作的评论——“是审美的或机械的，戴在轻浮女人胸前或攥在磨镜工人手里”（MEW 13，第 15—16 页），无法形成一种基础美学。但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却能找到其开端。与他对异化工作及对人与动物“创造形式”的不同方式所作的反思紧密相连的，是常被引用的评论，即人不同于动物，“懂得按照各个种属的尺度去生产，并到处为对象加上其内在的尺度”，其结论便是：“人按照美的法则创造形式。”（MEW 40，第 516—517 页）这里就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基，“这种美学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艺术，而是试图在生命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中去探索审美因素的作用”（Kühne 1981，第 41 页）。

这一思路起初并未得到进一步阐发。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美学领域成为社会问题与社会决策领域，因此对此的研究情形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例如在早期苏联，艺术美学激进地转向“生产的艺术”（Arwatow 1972）；或是在国际新建筑与新造型运动中（包豪斯建筑学派 [Bauhaus]、荷兰风格派运动 [De Stijl]；Taut 1929；El Lissitzky 1930）；

抑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此外，美学问题作为1968年社会运动的后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美学家所批判分析的对象，例如在被称作“商品”的领域中（Haug 1971；1980）。

51 许多研究都对以下经验作了反思：依照仍有前工业时代烙印的艺术所制定出的规则，不仅无法再有意义地运用到审美创造那随着工业变化而不再是纯艺术的现实关联上去，而且阻碍了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Kühne 1985，第147页）由此，同时也随着对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艺术美学之发展所出现的对作为科学的美学之对象、方法和基本概念的反思，普遍的哲学性与理论性关联就得到了探讨。（参阅 Pracht 1978，第193页及以下）这里所讨论的一方面是“审美之物”与“艺术之物”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审美评判相较于其他（实用、经济、道德、宗教、政治）评判所具有的特殊性。这样，作为科学的美学之基础问题就以新的方式被提出，而理论构建中的上述层面就被称为“基础美学”。

在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中，“审美之物”中非艺术的领域被视为“前美学”或曰“基础美学”现象（例如动物、植物、晶体），在手工业及建筑领域则被称为“次生美学”现象。它们并没有得到严肃的理论分析，因为在艺术中所有“前美学”及“过渡现象”一并被扬弃。（Pawlow 1975，第41页）但由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化不断进步，导致工作与生活条件中的美学实践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上述那种立场并不能继续成立。而长久以来为了普遍的理解对象而对美学所作的典型循环定义，即美学就是审美现象的科学，或美学是美的科学，也同样不再成立了。

1. **美的地位。**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远景意识追求古典主义理想，即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追求实现真善美一体的古老理念，在美学（以及伦理学）理论发展中就产生了一种潜在的理想化与美化倾向。例如斯托洛维奇（Stolowitsch）写道：“在共产主义中，社会之美将会成为人类之美的源泉；而人类之美也会成为社会之美的源泉。”（1975，第150—151页）这样一来，在美的价值范畴中，美学就成了带着宣言要求而言之无物的辞藻。

52 而在建之于激进建构主义之反唯物立场上的“后现代”美学复兴当中，存在着——毫无理想主义的前瞻性——类似的空洞的绝对化，以至于出现了一种荒谬的论断，认为现实从根本上必须以美学把握，美学需成为“引领性科学”，甚至科学本身应理解为美学构造

物。（Welsch 1990；Schmidt 1992；Kamper 1993；Bolz 1994；对其之批判参见 Seel 1993）

2. **唯物主义的方案。**历史唯物主义的意图，总归暗示了一种努力，想要发现如此受主体性质影响的美学现象中所含的主观而独立的合法则性。在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特别是在苏联，曾存在两种互相矛盾、互相取代的趋势：

2.1 所谓的“自然理论”论证说，只要现实世界在人类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审美之物（“美”）就必须被视为客观实在、存在于自然的物质特征之中。这些特征会被意识所反射。相应地，人们就在物质世界的物理、生理、化学与生物之合法则性中去寻找作为其固有特征的审美之物（“美”）之本性。为了从历史上论证这种“拜物主义”（Gimus 1974），不少过去的艺术理论被当作旁证而征引，包括对于物质性状的陈述，也被置于与美相关的语境中加以审视：规律、对称、有组织、简约、和谐、完整、大小和秩序（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澄明、完满、比例（阿奎那 [Aquino]），形式、外形之纯净、有限性、多样性、多样中的统一性（奥古斯丁 [Augustinus]），等等，不一而足。据此，美学判断或美学意识乃是现实存在的美学之物的临摹。

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美学家之间的讨论中，认为上述方案不过是一种粗鄙的唯物主义，不过是“极为复杂的事实弄巧成拙的扭曲”（Gimus 1974，第 25 页）之观点，很快便占了上风。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在这里并不是主客体之辩证关系的调节者，而仅仅是记录者；而此处所声称属于审美之物（“美”）的标准，同样也适用于非审美的对象，例如可怖之物。最后，“悲剧性”、“戏剧性”等审美范畴，并不能简化成自然法则。（Kagan 1971，第 35—36 页）此外，这种理论并不能解释阶级社会中美学价值和价值判断的变化、对立和共同之处，即无法阐释其历史性。

2.2 对所谓的“社会理论”（Redeker 1959；Koch 1961；Kagan 1971；Stolowitsch 1975）而言，社会实践才是理论之匙。重要的指导性观点包括马克思对“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表述，以及他对“自然的人格化”和人在历史的学习进程中方成为人的论点。（*Ms 44*，MEW 40，第 541 页）于是人们便由此出发，试图阐释自然特征的审美相关性。由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所启发，美学价值被理解为一种关系特征（Rammler 1978），其客观性则通过回溯至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方式来奠定。人们担心，从主体中心主义的论断出发，会落入唯心主义的境地。

然而，人类生命活动的对象对人类

的意义业已历史化，但对其之证明在这里却仍在很大程度上是抽象的。此外，在经济、道德等价值判断上，对一个对象的评判同样是根据其对人类的意义作出的。如果说，在“自然理论”中，审美之物的特性在自然中消失不见，那么，在“社会理论”里，这些特性则消解在社会的合法则性中。

卡甘（Kagan）的系统分析将人类行为划分为四个种类（工作、交通、认知与价值判断），但即便是在其中，价值判断仍然未得细化。对于从此种基础美学中所得出的结论，即艺术行为乃是四种人类活动的合题（Kagan 1972，第10页及以下），以上观点也依然适用。

2.3 在关于基本问题——何谓审美？——的辨析与讨论中，马克思对于“内在尺度”的论述获得了特殊的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类懂得将这种尺度加诸相对应的“每一个物种”及每一个对象之上（*Ms 44*，MEW 40，第517页），而对这一观点的阐释则几乎是自然主义式的：“美的法则”不过是每一物种中已被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对其的提炼则体现在人所创造的产品中，即通过对自然对象的“本质化”（Redeker 1959，第21页及以下）。但屈内（Kühne）严词拒绝了这种想法：“人类通过劳动加诸自然对象之上的‘内在尺度’，并非对象自身原本的尺度，而是对象经劳动所成为的新对象之尺度。只有当对象本身存在的尺度一同进入变化的过程时，变化的尺度才能通过对象得以实现。这样看来，‘内在尺度’既不属于对象，亦不属于主体，而是带着一种合题的特征；不过，其本质核心仍然是由主体来设定，而非被对象所决定。”（1971，第82页）然而，即便是在“内在尺度”的这种“社会化”中，依旧无法清晰地区分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也没有对尺度概念的定义。仅仅指出审美对象与实践和技术对象之不同在于其还受心理因素的制约，尽管引入和辨析了“形象”概念，却依旧让审美之物过度地停留在不确定的空间中。

3.“**柏林方案**”。顺着屈内和其他将审美之物定义为“关系”的尝试，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对价值理论作出细化区分的强烈要求（Pracht 1978，第175—340页）——其中也兼顾了其他学科中对认知对象之基本矛盾的认识论反思（参见 Sève 1972；Holzkamp 1973）。同时，对于将审美之物作为矛盾关系来把握的尝试，也出现了若干回应。

对于决定审美关系的基本矛盾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是“实在”与“理念”之间的矛盾（Kagan 1971），或者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Krjukowski 1965），又或者是“完满”与“非完满”之间的矛盾（Schestakow

1973）。卢卡奇（Lukács）将审美之物集中到位于“个体”与“普遍”之间张力场域中的“特殊”之上（1969）。那些仅停留在认识论式的哲学理解之层面上的论据，也可以用来阐释其他的价值关系；与之相比，“柏林方案”——例如普拉赫特（Pracht）等人——则强调了其他指导性的元素：

第一，个人物质—具象的、目标导向的生活行动中的主客体辩证关系，特别关注目的—手段辩证关系，以及能在历史上观察到的目的之逐步变化，即从直接的、物质—实际的（如交互的）、片面的目标设定，向更复杂的人之“自为目标”的转变，也就是使用方法之细分化的过程。普列汉诺夫（Plechanow）早已对实用与美之间的关系，对如何从实用性中历史性地导出美等问题进行过反思。

第二，是由此得以可能的、对个体审美价值判断之条件所作的更好分析，并结合对这一价值判断中感性—精神活动所作的进一步强调和细分，即：作为一种既是实践的又是理念—交际的特殊关系。而在其中所涉及的是塑造形象（即根据材料独特的造型）的过程，以及对形象的感知和解释。因此，对于审美关系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使用价值（Gebrauchswert）与形象价值（Gestaltwert）之间的矛盾”。

在目的渐趋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每次都有一种特别的评判性行为成为可能与实在；在其中，对象的感官性质在其潜在的表意功能之复杂性内，同时也在其“如此而非他”的存在中变得尤为重要；这种相对无目的（在人类自为目的的框架内）的行为，会反过来作用于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对象之生产上，也会作用于专用审美交流的对象之创作中，而每一次则都会涉及结合这种美学用途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之建立。

从形象概念的细分中可以得出，并不是所有的对象在美学上都能有同等的相关性，而只是那些具有现实而醒目的形象的对象才是如此，且其形象并不会消耗始尽，而是在使用中长存。在此视角下对各类对象的分野便与人类感官在这方面的区分相契合：并不是所有的感官在美学上都同等重要，核心的只有视觉、听觉和触觉。

这一观点虽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中颇受争议，但鉴于后现代的趋势却应加以强调。这种后现代趋势将所有的感觉体验简单地称为审美的或“麻醉的”（Welsch 1990，1993），这样一来，种种区分均告失效，而审美的概念也失去了其认识论价值。而“柏林方案”则与之相对，追求细致的区分：

与其他目的—手段关系及与之相应的价值判断不同，审美关系只在暂时或

持续地忽略物质或交互作用的直接形式时才得以实现，即：作用于特定对象的简练形象之上的感官活动。无论是在创作还是接受中，形象价值都将自身建构并表现为表达价值与自我价值的矛盾统一体。一个形象的自我价值意味着，它作为享受的对象脱离了单纯的工具性使
56 用，作为交际中的特殊对象成为（相对的）自我目的；通过自我反思来掌握。而自我价值则通过表达价值取得内容上的确定性。表达价值的含义是指社会在形象中的自我展现。这样一来，表达价值中就包含了形象所特有的表达关联，即：作为以主体为中心的统一体，以及非语言和语言符号间在各个历史性的符号总目（物质状态）之语境中的交互关系。物质将成为符号，而符号也将成为物质。重要的是主导权交替的经历。所有的现象无论以任何形式，或在使用的任何阶段具有形象，就能在美学上发挥功用（有不少就是专门为此而保留或创造的，例如首饰、艺术品等等，其他一些日常琐碎就进入占主导性的美学运用之关联中），例如杜尚（Duschamp）的小便池（即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于1917年展出的“实物艺术”之一，以一尊瓷质的小便池作为艺术品，命名为“泉”，引起轩然大波。——译者）。而反过来，如若对象屈从于一种主导性的目的—手段联系中，那么人们将不会对它作出美学评价；其他的价值判断将居于首要地位。这种情形也可能出现在专门的审美对象之上（例如一尊人物形象雕塑被当作武器，或书籍被当作燃料等）。

因此，在物质的事实与审美的课题之间必须加以区分。审美并不应被理解为物体自身的性质，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审美判断时才以一种特别的主客体辩证关系显现。若要历史地把握一件未曾变化之物的变动了的评判，对主体中心主义的认识就必须对审美对象之定义产生影响。毕竟在审美判断中，也同样会对主体、对他的感知、对他的社会敏感性得出若干结论。而这就是在此一关系中自我认识与自我满足的重要契机。

如此一来，对审美价值之客观性的追问，就得以被确证为在由历史所生成的主客体关系中，相对于对主体之独立性的各契机所作的追求。在这种主客体关系中，不论是物质的事实，还是个体的交往与接受能力，都同样地受其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普遍联系之影响，而相对地独立于个体的种种接受活动。这些接受活动植根于历史及文化的总体关联中，而此一总体关联则在自然法则性的、生物的、根本性的尺度与社会的制度间构建起了一个具体的整体。赋予、感知、 57
评价形象的各种标准，就受此影响并在此框架内变化。因此，能在多大程度上

相对地远离直接设定目标的统治性地位，就并不取决个体的意志。作为个体的主体之多样性，可供其发挥的空间是历史性地产生的。对象的特定物质形状，例如规律性、对称性等，尽管时有矛盾或变化，但却在各不相同乃至互相对立的社会阶级或群体中得到审美上相同的正面评价，是由于这些社会阶层在需求、利益与经验上的不变性，而这种不变性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才能展露出来。

4. **批判审视**。屈内，这位“在理论上最为前后一致、在社会中最积极投入、引领了将美学从艺术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家”（Flierl 1986，第 1548 页）激烈地批判了上述方案。在他看来，就上述观点的基本倾向而言，审美之物被框定在了沉思性之内：只有单单一种类型的行为才被视为关乎审美，而这种类型则又在大体上由艺术接受的形状所标明。假若认为审美关系只有在脱离工具性使用之统治的相对自由中才能实现，那么就会因为这种论断而导致“实践的生命过程……与审美国度的分离”（Kühne 1985，第 150 页）。与直接的目的规定之统治相对立的相对自由，其思想的理性内核在此不仅仅呈现出错误的形式（因为即便是审美之物也可以通过欲望来把握，并作为目的直接地被规定），而且沾染上了荒谬的内容形式——尖锐地说：面包对于将其吃掉果腹的饥饿者而言，并没有审美价值，“而是只对于单纯观赏着的已得温饱者而言（才有审美价值）”；但对于这些人，“审美上有价值的并非那块简单的面包，而是那烘焙店的艺术品蛋糕”（同上）。

与之相应，装饰便成了审美价值所必要的特征：也就是以下设想，即认定对象必是以某种技艺建构起来并现实存在，然后被塑造。如若审美不被理解为实践本身的特性，就必须被转移运用到实践对象上去（通过从实践的统治中解放的方式）。“但没有审美的形象之鹄，就无法塑造任何实践的对象。审美的造型能力与思维能力一样，都是一种生产条件。”（Kühne 1985，第 153 页）——此处讨论的方案还包括对审美享受的种种形式所作的论断，而这些形式都以实践为依据：“对于以功能性为导向的产品而言，通过静心凝视所获得的审美享受，只有当这种享受中也包含了对于其使用功能的感性把握时，才是公正的。”（Pracht 1978，第 551 页）

对于显著形象的着重导向，其基础依旧是对审美之物的感性层面所作的一种理性主义理解，其结果便是审美之物中感性与情绪性的复杂性就在对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强调中遭到了忽视。“在人类对身体与运动的知觉中存在一个审美的维度；这个维度之所以应当受到关注，

不单是为了阐释风格发展中的重要契机或结构状态的变化。个体不仅会对形象凸显的现实作出美学回应，更会首先回应他们的处境：个体存在的命运之多样性就概括在其中。”（Kühne 1985，第151页）这样就突出了一种先前被低估了的思维方向，即：人类学对感性、其身体性以及对——“消逝着的”——感官之统一性的全新思考。（Plessner 1980；Kamper 1984）

在对价值理论上的细分之尝试所作的批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唯物论的基本方案在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一种抽象人文主义的、先验哲学的概念体系中。通过特别针对形成过程与不同阶段的具体历史分析以具象化基本范畴，也几乎不能超脱欠缺之处。因此，社会策略的导向也是“不现实”的。对于作为科学的审美，也对于基础美学（其目标便是向着广泛的美学实践的开放）而言，这种位于系统性理论的抽象高度与社会实践，或与弱化概念的美学实践主义之间的冲突状态，恰恰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美学的外扩倾向也表现在托马斯·梅切尔（Thomas Metscher 1975）将审美理解成“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全面的文化学之一部分，其特定的对象存在于人类与社会情势之整体系统所协调的审美活动，以及这种活动的文化客观化之形式当中”。

在对于基础美学之基本问题的争论中，屈内做出了可能是最重要的贡献。美学远离现实、消解在最一般性的问题理论（Binas 1985）或文化历史主义的进化论之中的危险尚未克服：这里可理解为自然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契机，被引向“审美文化”这一更宽泛的概念，被定义为“空间—对象之生命条件、实践与实践—精神之学习方式及外观形式之总汇……，在其中分别历史地规定了的个体性客观地反思自身，而个体则必须针对这一总汇发展出一种特定的共鸣体系”（Flierl 1986，第1556页）。

5. **拓扑学定义**。豪格在1983年找寻了另一种进路：从屈内的形象理论之定义出发，他发展了一种“将审美归入社会分工、阶级统治和国家的框架中去”的模型。每条创造空间的边界分别划归了特定的能力，而在由这些边界所构成的社会建筑中，豪格将审美之物的空间定义为了特殊空间：排除私人利益，但包括由感性调和的对于某种共同之物的参与，通过与相邻空间相对立的政治、法律及道德空间来建构；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依托于周遭空间的组合，同时也制约着他们。这里涉及的是“审美之物的辩证法”，并不是认识论的，尤其是接受、认知和价值理论的研究问题，

而是一种对“审美”之特性的拓扑学、结构—功用性的重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审美”已被预设为“被人所熟知”。

6. **历史的维度**。在生物交流与神经生理学研究，以及对如音乐及舞蹈等艺术门类中“源自生物性”的契机所作的追问，产生了新的结果。伴随着对这些新成果的回溯，产生了定义“审美”的新进路：“审美之物曾是一种生命的必要性。人之为人却无审美的行为与创造，是不可想象的。”（Knepler 1988，第372页）这样一来，基因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就被展露了出来，又随着审美实践的历史过程和艺术的专业化分工而不断细化，却作为美学“知识”得以在其中留存：“此处关涉的始终是感性—对象化的行动（无论媒介是多么不同……），关涉的是交际过程，在其中个人始终将自身联结到一个‘整体’（随后会成为那个‘整体’）；人类主体能力（即特定的感性—精神的‘禀赋’）的运用（和发展）始终在游戏中进行——且始终会建构‘世界境遇’。”（Metscher 1993，III，第240页）

7. **符号学**。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对于符号学的争论也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当中引发了多种独特的概念化尝试。例如，米夏埃尔·弗兰茨（Michael Franz）就在与三阶符号理论的争辩中发展出了一套五层的理论模型，既用于设计（1980）又用于艺术。“审美的符号形象就其本质而言并非传统的符号（象征），而是存在于客体依存性与客体独立性之间的张力场域内的交际性形象。也就是说，审美形象凭借其……形象的性质进行描绘。而与传统的符号不同，这种形象性质对于意义和内容而言绝非是纯粹外在的。但是，意义并不局限于形象之显明上，而是恰好相反，形象会在其确证中指向那些不显著的，亦即并不仅凭感官把握的联系。”（1978）这样一来，就能从符号学上区分这些意义的作用，并在考虑到“内涵之辩证”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指向功能视为分析的各个层面，从范畴上加以区分。（1981；参见 Brockmeier 1986）

8. **价值范畴**。对诸多价值范畴的思考是将其作为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在某种意义上带着两极分化：美与丑、崇高与低俗、悲剧与喜剧。在20世纪50年代，**典型**（das *Typische*）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语境中首先成为某种中心范畴。（Besenbruch 1956）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之关联的日益衰落，**美**（das *Schöne*）便尤其受制于以下两种倾向，即在具象中的辩护性美化以及在哲学

抽象中的幻想式迷信。而与之相对，丑（das *Häßliche*）则代表着衰落的市民阶层的美学本质，代表着历史上已被克服之物，代表着“老旧”，最后还有通过真正的艺术造型化为艺术之美的现实之丑。这一类观点（也包括对于艺术真实与艺术之美之间关系的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遭到了沃尔夫冈·海瑟（Wolfgang Heise）的批判（1957年对Besenbruch的批判）。

在论及“自然之概念”与“社会之概念”的论文中，“美”因其与自然美，与人类、物质世界与艺术实践中之美的联系，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艺术的层面，在现代（只是作为现代主义被拒绝的）艺术与“丑”之间仿佛存在一种近乎法则的关联。（Lifschitz 1972）但在不少论及美学历史的文献中，理想美的
61 历史性、各式绝对要求的相对性，都并非不含深意地在深入、具体且历史性的分析中被一一证明。（例如Heise 1982，1990）同时，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了对于下述观点的批判，这种观点认为美“乃是至高或唯一的审美范畴，就其地位而言与真相符合。其他的范畴，例如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等既不能从美当中演绎出来，也不能融入美中，更无法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由美到丑的刻度表来确定其数值”（Heise 1957，第77页）。自然，这种批判并未对后续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

在《当代美学》（*Ästhetik heute*）中，美也成为所有其他价值评判的参照值，“因为美不是别的，而正是在个体与社会的生命塑造中可具体经验与感受到的感官富足。但是，若从其他经验与体验出发，从根本上将丰富的、人性化的感官要求之满足视为一种幻想，那么美的价值判断就失去了对象，而其他所有价值也同时失去了它们普遍的、在世界观上有根据的参照价值”（Pracht 1987，第334页）。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挑战、社会主义世界运动陷入危机、几乎无法阻止的环境破坏以及不断蔓延的宿命论等背景下，上述论断就获得了一种在写作时无法预见的现实性。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长期被忽视的“崇高”范畴（参见上书，第288页及以下）在后现代主义中如此具有现实意义，或许正是与此相关。

9.**“细分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生产美学”（产品形式、劳动美学）、“商品美学”、设计美学，以及对时尚、消遣与游戏文化（特别是在新媒体以及由此形成的闲暇时间中）、体育等事物的重新关注，美学这门学科的对象越来越宽泛，以至于对这些新对象之共同点的追问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更明显的还有那个问题，即还能在何种程度上谈论作为统摄全体之中

心的唯一一种美学。随着美学的“细分化”——也在对艺术的变化，对艺术总汇在质上的重组之回应中，包括随着向艺术的技术可创造性之过渡——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工作就越来越被视为紧迫必要，但却仍在起步阶段，即转向文化理论、社会学和媒体理论。（Roesner 1989）

62 “日常美学”的不同领域更频繁地被置于“审美文化”的范畴中加以反思。这种“审美文化”在20世纪初就成型，即：作为对美学价值标准在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出的“庸俗之物”面前失效所作出的回应。（Meumann 1914）旭内于1967年重新引入了这一范畴，以描写审美习得实践中所出现、从社会主义与技术革命之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变化。

特别是对“商品美学”的分析，以及对机械与审美文化之关联的历史研究，都具有“基础科学的意义”（Metscher 1975），因为在这些研究中，美学与一般的文化现象以在其中发挥效用的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为导向，得到了批判性的分析；而从由此确立的审美之历史性之中，还同时得出了若干关于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之功用的推论，包括一般性的（Haug 1971；Kühne 1981）和更专门的分析（涉及媒体的研究见Enzensberger 1970；Kreimeier 1972；涉及音乐的研究见Cutler 1984）。围绕这些研究，产生了不少与审美相关的新理论开端，论及工业形式及产品造型（Kelm 1971；Letsch 1985；H. Hirdina 1988）、现代派及庸俗（Ueding 1973；Kühne 1981，1985）、序列及标准（Kühne 1981；Juretzka 1988）、媒体和大众文化（Prokop 1974；Baacke 1974；Heister 1974；Jameson 1982，1986；Hanke 1986，1990；Mayer 1986，1987，1992；Willis 1991；Hickethier 1992；Krenzlin 1992）、流行音乐（Wicke 1987；Mayer 1991）。此外，审美性与艺术性之间关系的方法论维度也成为不少论著（和讨论）的研究对象（包括Kühne 1967；Kagen 1975；Lehmann 1976，1978；Pracht 1978，第341页及以下）。

随着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巩固，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这些社会中矛盾的不断激化，对于那些源于资本主义国家、正作用于人们所追寻并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特色美学文化的种种影响之追问，就导向了不同的研究以及“内部”争论：甚至批判性地探讨了“趋向一致”理论及与“大众文化”的对立。（Pracht 1978，第77页及以下；Haible 1993）在针对这些对新媒体革命现象的负面回应的论战中，很明显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社会化”之后必须接上审美的“媒体化”（Mayer 1992）：“社会主义革命”与其所瞄准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并未能取得突破、站稳脚跟，但“数字革命”正 63

如火如荼展开，造成了全球化的变革，包括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审美实践中，也是如此（Schulte-Sasse 1988；Vief 1991；Bolz 1994 及其他）。通过分析此类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促成的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美学家对于基础美学（以及对于美学本身）的论著，就能对促进针对即将来临的生态危机的生态保护运动做出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B. Arwatow, *Kunst und Produktion*, München 1972; D. Baacke, *Kritische Medientheorien. Konzepte und Kommentare*, München 1974; W. Besenbruch, *Dialektik und Ästhetik*, Zweite Theoretische Konferenz des Instituts für angewandte Kunst, Berlin/DDR 1958; E. Binas, *Zur Problemstruktur der ästhetischen Aneignung*, Diss., Berlin/DDR 1985; N. Bolz, *Das kontrollierte Chaos. Vom Humanismus zur Medienwirklichkeit*, Düsseldorf-Wien-New York-Moskau 1994; J. Brockmeier, »Vermittlung und Sinn. Über die Aneignung der ästhetischen Bedeutung«, in: H. W. Henze (Hg.), *Lehrgänge. Erziehung in Musik. Neue Aspekte der musikalischen Ästhetik III*, Frankfurt/M 1986, 272-316; C. Cutler, *File under Popular.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Writings on Music*, London-New York 1991; H. M. Enzensberger, »Baukasten zu einer Theorie der Medien«, in: *Kursbuch*, H. 20, 1970; Th. Flierl, *Ästhetik der Aneignung*, Diss., Berlin/DDR 1985; ders., »Der Widerspruch ästhetischer Kultur und die philosophische Fassung des Ästhetischen«, in: *WB*, 1986, H. 9, 1548-1561; M. Franz, *Zur Einführung zeichentheoretischer Grundbegriffe in die Ästhetik*, Diss. A, Berlin 1978; ders., »Designsemantik«, in: *form+zweck*, 1980, H. 2; ders., »Semantische Konsequenzen der ästhetischen Zeichensituation«, in: H. Goldschmidt, G. Knepler (Hg.), *Musikästhetik in der Diskussion*, Leipzig 1981, 229-241; W. Girnus, *Zukunftslinien – Überlegungen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Berlin/DDR 1974; W. Haible,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Massenkultur. Zur kulturtheoretischen Diskussion der massenmedialen Unterhaltung in der DDR seit den siebziger Jahren*, Mainz 1993; H. Hanke, »Bemerkungen zum Thema: Massenkultur, populäre Künste, Unterhaltung«, in: *Informationen*, Beilage zur Zeitschrift 'Unterhaltungskunst', 1986, Nr. 1; ders., »Fü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nur für einen 'Umbau'. Eine Streitschrift in Thesenform«, in: *WB*, 1990, H. 2;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ders., »Standpunkt und Perspektive materialistischer Kulturtheorie«, in: ders, K. Masse (Hg.), *Materialistische Kulturtheorie und Alltagskultur*, AS 47, Berlin/W 1980, 6-26; ders., *Warenästhetik und kapitalistische Massenkultur (I)*, Berlin/W

1980; ders. »Die Einräumung des Ästhetischen im Gefüge von Arbeitsteilung, Klassenherrschaft und Staat«,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136-150; W. Heise, »Zu einigen Grundfragen der marxistischen Ästhetik«, in: *DZPh*, 1957, H. 1, 50-81; ders., *Realistik und Utopie. Aufsätz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zwischen Lessing und Heine*, Berlin/DDR 1982; ders., *Die Wirklichkeit des Möglichen. Dichtung und Ästhetik in Deutschland 1750-1850*, Berlin/DDR 1990; H.-W. Heister, »Die Musikbox. Studie zur Ökonomie, Sozialpsychologie und Ästhetik eines musikalischen Massenmediums«, in: ders. u.a., *Segmente der Unterhaltungsindustrie*, Frankfurt/M 1974, 11-65; K. Hickethier, »Bildschirmwelten, virtuelle Realitäten und individuelle Lebensperspektiven«, in: *angebote – Organ für Ästhetik*, Nr. 4, 1992, 67-87; H. Hirdina, *Gestalten für die Serie. Design in der DDR 1949-1979*, Dresden 1998;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 Historischer Ursp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Funktion der Wahrnehmung*, Frankfurt/M 1973; F. Jameson, »Verdinglichung und Utopie in der Massenkultur«, in: P. u. C. Bürger (Hg.), *Zur Dichotomie von hoher und niederer Literatur*, Frankfurt/M 1982, 108-141; ders., »Zur Logik der Kultur im Spätkapitalismus«, in: A. Huyssen, K. Scherpe (Hg.), *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1986; Chr. Juretzka, *Ästhetik und Standard. Zu ästhetischen Grundfragen massenkultureller und massenkünstlerischer Prozesse am Beispiel der Filmentwicklung und ausgewählter populärer Genrefilme*, Diss., Berlin/DDr 1988; M. S. Kagan, *Vorlesungen zu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Ästhetik*, Berlin/DDR 1971; ders., »Künstlerische Tätigkeit und künstlerische Kultur«, in: *WB*, 1972, H. 1; ders., »Über das Buch 'Ästhetik heute'«, in: *WB*, 1978, H. 7; D. Kamper, »Blickwende. Die Sinne des Körpers im Konkurs der Geschichte«, in: ders., C. Wulf (Hg.), *Das Schwinden der Sinne*, Frankfurt/M 1984, 9-17; ders., »Erinnern, Wiederholen, Durcharbeiten. Über prähistorische Wahrnehmungsmuster in einer Ästhetik des Posthistoire«, in: Welsch (Hg.) 1993; M. Kelm, *Produktgestaltung im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71; G. Knepler, »Ästhetik und Menschwerdung«, in: *WB*, 1988, H. 3, 365-400; H. Koch, *Marxismus und Ästhetik. Zur ästhetischen Theorie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Wladimir Iljitsch Lenin*, Berlin/DDR 1961; K. Kreimeier, »Grundsätzliche Überlegungen zu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Theorie der Medien«, in: D. Prokop (Hg.), *Massenkommunikationsforschung 1: Produktion*, Frankfurt/M 1972, 413-419; N. Kreuzlin (Hg.), *Zwischen Angstmetapher und Terminus. Theorien der Massenkultur seit Nietzsche*, Berlin 1992; N. I. Krjukowski, *Die Logik des Schönen* (russ.), Minsk 1965; L. Kühne, »Sozialismus, technische Revolution und ästhetische Kultur«, in: *Bildende*

Kunst, 1967, H. 11; ders., *Das Ästhetische als Faktor der Aneignung und des Eigentums. Zur Bestimmung des gegenständlichen Verhaltens*, Habil.-Schrift, Berlin/DDR 1971; ders., *Gegenstand und Raum – Über die Historizität des Ästhetischen*, Dresden 1981; ders., *Haus und Landschaft*, Dresden 1985; G. K. Lehmann, »Die ästhetische Kultur und ihre soziologische Erforschung«, in: *WB*, 1976, H. 2; ders., »Sozialistische Lebensweise und ästhetische Kultur«, in: *WB*, 1978, H. 5; H. Letsch, *Plädoyer für eine schöne Umwelt*, Berlin/DDR 1985; M. Lifschitz, *Krise des Häßlichen. Vom Kubismus zur Popart*, Dresden 1972; G. Lukács,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Neuwied 1963; ders., »Über die Besonderheit als Kategorie der Ästhetik«, in: *Probleme der Ästhetik*, W 10, Neuwied 1969; El Lissitzki, *1929 Rußland. Architektur für die Weltrevolution*, Berlin/W 1965; G. Mayer, »Überlegungen zu einem Konzept sozialistischer Massenkultur«, in: *Informationen*, Beil. Zur Zeitschr. 'Unterhaltungskunst', 1986, Nr. 1; ders., »Massen – Künste – Medien«, in: W. Heise (Hg.), *Brecht 88. Anregungen zum Dialog über die Vernunft am Jahrtausendende*, Berlin/DDR 1987, 77-124; ders., »Bausteine zu einer Theorie der populären Musik«, in: ders. (Hg.), *Aufsätze zur populären Musik*, Berlin 1991, 9-21; ders., »Neue Medien – Neue Ästhetik?« in: *angebote*, Nr. 4, 1992, 48-66; Th. Metscher, »Tendenzen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Ästhetik in der BRD«, in: W. F. Haug (Hg.), *Warenästhetik. Beiträge zur Diskussion, Weiterentwicklung und Vermittlung ihrer Kritik*, Frankfurt/M 1975; ders., »Kunst als epistemische Form«, in: H. W. Heister u. a. (Hg.), *Zwischen Aufklärung & Kulturindustrie*, Hamburg 1993, 235-257; E. Meumann, *System der Ästhetik*, Leipzig 1914; T. Pawlow, *Aufsätze zur Ästhetik*, Berlin/DDR 1975; G. W. Plechanow, *Kunst und Literatur*, Red. N. F. Beltschikow (1948), Berlin/DDR 1955; H. Plessner, *Anthropologie der Sinne*, Frankfurt/M 1980; E. Pracht (Ltg.) u. a., *Ästhetik heute*, Berlin/DDR 1978; ders., (Ltg.) u. a. *Ästhetik der Kunst*, Berlin/DDR 1987; D. Prokop, *Massenkultur und Spontaneität*, Frankfurt/M 1974; M. Rammler, »Ästhetischer Wert als Verhältniskategorie«, in: *WB*, 1978, H. 9; H. Redeker, *Geschichte und Gesetze des Ästhetischen*, Berlin/DDR 1959; U. Roesner, *Kunstwissenschaften. Orientierungsversuche in einer 'Wissenschaftsregion'*, Diss. B, Berlin/DDR 1989; W. P. Schestakow, *Die Harmonie als ästhetische Kategorie* (russ.), Moskau 1973; S. J. Schmidt, *Wissenschaft als ästhetisches Konstrukt*, Referat auf dem Kongreß »Die Aktualität des Ästhetischen«, Hanover 2.-5.9. 1992; J. Schulte-Sasse, »Von der schriftlichen zur elektronischen Kultur. Über neue Wechselbeziehungen zwischen Mediengeschichte und Kulturgeschichte«, in: H. U. Gumbrecht, K. L. Pfeiffer (Hg.),

65

Materialität der Kommunikation, Frankfurt/M 1988; M. Seel, »Vor dem Schein kommt das Erscheinen. Bemerkungen zu einer Ästhetik der Medien« in: *Merkur*, 47. Jg., 1993, H. 9 u. 10;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2; L. Stolowitsch, *Der ästhetische Wert* (1972), Berlin/DDR 1975; B. Taut, *Die neue Baukunst in Europa und Amerika*, Stuttgart 1929; G. Ueding, *Glanzvolles Elend. Versuch über Kitsch und Kolportage*, Frankfurt/M 1973; B. Vief, »Digitales Geld«, in: F. Rötzer (Hg.), *Digitaler Schein. Ästhetik der elektronischen Medien*, Frankfurt/M 1991; W. Welsch, *Ästhetisches Denken*, Stuttgart 1990; ders., (Hg.), *Die Aktualität des Ästhetischen*, München 1993; P. Wicke, *Rockmusik. Zur Ästhetik und Soziologie eines Massenmediums*, Leipzig 1987; P. Willis, *Jugend-Stile. Zur Ästhetik der gemeinsamen Kultur*, Hamburg 1991.

君特·迈尔（Günter Mayer）撰

毛明超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neignung, Arbeiterkultur, Architektur, Ästhetik,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ästhetische Theorie, Autonomie der Kunst, Bedeutung, Befriedigung, Bild, bildende Kunst, Brecht-Linie, Film, Genuß, Gestalt, Idealisierung, Kitsch, Kultur, Kulturarbeit, kultureller Materialismus, Kulturindustrie, Massenkultur, Materialästhetik, Medien, Medienästhetik, Musik, Populärkunst, Proletkult, Realismus, Schönheit, Semiotik, Sinn, Sinnlichkeit, Warenästhetik, Wertform, Widerstandsäthetik, Zeichen

基层小组（Basisgruppen） 66

A: madjmūᶜāt qāᶜidīya. – E: basis-groups.

F: groupes de base.

R: nizovye gruppy (низовые группы).

S: grupos de base.

基层小组这个概念和现象，产生于1968年联邦德国议会外反对派（APO）和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DS）的分裂，发展成新左派（Neue Linke）的反权威运动中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派别之一。反权威派根据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认为工人运动不再是社会解放（唯一或主要）的主体。基层小组所坚持的理想组织原则，如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所说，“不是按照思想，而是按照兴趣/利益（Interessen）组织起来”，这和内部意识形态整齐划一的集中制的“共产主义小组”（K-Gruppen）相反，后者主要是大学生推动的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预备组织。

虽然第一批基层小组是大学内形成的“自发（ad-hoc）小组”，但是他们类似于俄国民粹派的“到民间去”运动，产生了更为成功的社会基层小组，比如区小组、企业小组、学徒小组等等。他们开辟了反主流的公共空间以抵制舆论操纵，通过以经验加工（Erfahrungsansatz。内格特阐发的教育、学习方法，利用劳动者生产生活中的感性经验材料，向他们分析阶级和社会现实，揭露其中的意识形态幻象，重建理论和经验的生动联系。——译者）为基础的集体学习，进行了大量启蒙工作。他们希望通过在培训、教育、中小学、文化、媒体等领域建立基层小组，实现再生产部门的政治化。人的需要和主体性，应当作为政治因素，在反资本主义实践和个人解放的结合中重新加以定义。（参见 Krahl 1997）

社会基层小组可以视为不久以后发展出来的公民倡议运动的萌芽。从 70 年代的大学基层小组中发展出了文化影响深远的“非教条主义左派”，他们除了做启蒙工作、“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追求新型国际主义之外，尤其致力于宣传苏维埃民主制的自治模式。在多元的左派基层小组中，混合着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和左翼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以及反官僚主义、一定程度公开敌视组织性的情绪。松散联结起来的“基层”在理论上受到一系列思想家影响，如卢森堡（Luxemburg）、柯尔施（Korsch）、布洛赫（Bloch）、克拉尔（Krahl）、杜契克（Dutschke）、布吕克纳（Brückner）、内格特、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有选择地接受列宁的著作（*Aprilthesen*，LW 24，第 3—8 页；LW 36，第 419—420 页），也援引马克思的某些关键段落。除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人的完整性”），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Bürgerkrieg*，MEW 17，第 339 页；MEGA I. 22，第 201 页）也是他们关键的阅读经验，重新激活了“强制委任（imperatives Mandat）的基层民主”作为直接民主的理想。基层小组理论上的共同点有拒绝接受权威的马列主义、批判苏联的社会模式，他们否认苏联模式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一部分基层小组在 80 年代早期并入绿党。共产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立场的批评者，曾责备基层小组把个人的利益和解放，同社会范畴的解放混为一谈。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曾善意地告诫，将大学基层小组作为社会自治的样板的诉求，是直接民主的“意识形态神话”。（Marković 1968）

67

参考文献：

H. J.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M 1977; K. H. Lehnhardt u. L. Vollmer,

Politik zwischen Kopf und Bauch, Bochum 1979; H. Marcuse, *Das Ende der Utopie*, hgg. v. H. Kurnitzky u. H. Kuhn, Berlin/W 1967; ders., *Versuch über die Befreiung*, Frankfurt/M 1969; M. Marković, *Dialektik der Praxis*, Frankfurt/M 1968; O. Negt, *Keine Demokratie ohne Sozialismus –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Politik, Geschichte und Moral*, Frankfurt/M 1976.

韦尔夫·施罗特（Welf Schröter）撰

曹旸 译

参见：

Anarch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utorität, Bürgerinitiativen,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manzipation, Eurokommunismus, Frankfurter Schule, K-Gruppen, Marxismus-Leninismus, Neue Linke, Rätesozialismus, Selbstverwaltung, Selbstverwirklichung, Sowjetkritik, Spontaneität, Studentenbewegung

农民（Bauern）

A: falāḥūn. – E: peasants. – F: paysans.

R: krest'jane (крестьяне). – S: campesinos.

农民与农场、土地、季节更替紧密相连，也会第一个感受到上述因素的变动带来的影响："疟疾、盗匪、休耕地、糙皮病、文盲、移民。"（Gramsci, *Gef* 2, H. 2, §79, 第294页）然而农民是土生土长的，"不愿意离开他所属的地方。他想要在他的土地上获得自由，也只想在他的土地上获得自由，并且拥有土地的时间越长，这种想法就越坚定"（Bloch, GA 9, 第365页）。农民在经济上依赖于土地的位置，但对于政治变革几乎没 68
有影响。当农民在政治中发出声音，比如参与农民起义或农民暴动，或者参与到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中，甚至加入党派，那么主要是因为税收和债务的负担压倒一切，并危及农民家庭的生存。

I. 在1848年革命前夕，由于"他们的财产状况"，恩格斯否认了农民的任何历史首创性："我们这里所讲的农民仅仅指小农户、小租佃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而言，不包括短工和雇农。农民和小资产者一样，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阶级，不过他们有一点胜过小资产者，即他们比小资产者有勇气。可是在历史上他们完全不能从事任何首创活动。甚至他们从农奴制的铁链下解放出来也只是在资产阶级的保护之下实现的。"（MEW 4, 第48页）《共产党宣言》（*Manifest*）甚至宣称农民是反动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

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同上书，第472页）尽管恩格斯在1848年1月既已区分，一个时代即将到来，“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到那时无产阶级会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向资产阶级宣战”（同上书，第499页），但在工人运动中，农民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残余的观点得以加强，他们无法得到工人的信任。

然而在随后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具体且细致地从事于研究法国、英国、德国农民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又加上俄国。1869年，第一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导致德国和瑞士党员之间激烈争辩，恩格斯看到了其中的进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创造了真正的奇迹。自拉萨尔（Lassalle）开始他的鼓动以来，它第一次迫使德国的那些家伙们思考问题，而在此以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完全多余的。……不过，人们忘记了，除了大土地所有制这个主要问题外，还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农民：（1）佃农，对于他们来说，土地属于国家还是属于大地主都是一样的。（2）土地所有者：第一是大农，应当唤起短工和长工反对他们的反动本质；第二是中农，他们也会是反动的，他们的人数不很多；第三是负债的小农，他们由于抵押借款可能被吸引。此外，可以说，无产阶级在目前对于提出小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不感兴趣。”（MEW 32，第382页）这样就形成了这种表述的开端，根据该表述，部分农民将作为工人阶级的盟友而被争取。

巴黎公社的结论是对农民的重新评价。马克思认识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缺乏联盟。他认为公社的任务在于，“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MEW 17，第550页）。在《法兰西内战》（*Bürgerkrieg*）的草稿中，马克思探讨了这一联盟的前景：“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使用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

地对它产生信任。”（同上书，第 552 页；MEGA I. 22，第 62 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这类段落中，能够经常看到马克思关于农民生产合作社的想法，即在工人阶级政治权力下集体工作的农业社会主义生产者。马克思后来多次使用一个“合作社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MEGA I. 25，第 13 页）的措辞来描述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所著（由马克思审定）的《资本和劳动》（*Kapital und Arbeit*，1876）一书第二版中提到了一种“合作社的生产方式”（MEGA II. 8，第 784 页）。

自从他第一次进行经济研究以来，马克思一直关注不断发展的分工以及资本积累给农民带来的社会后果。农业分工、机械在耕种中的使用和土地集中导致农村人口外流：“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Elend*，MEW 4，第 152 页）“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佣他们或以廉价雇佣他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摆脱压迫他们的贵族的避难所一样。”（*DI*，MEW 3，第 55—56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MEW 23，第 744 页；在第一版中这里为“工人”，参见 MEGA II. 5，第 576 页）密切相关。将农奴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属于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强制驱逐农民离开土地：“‘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或者像德国所说的‘圈地’（Bauern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 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MEW 23，第 760—761 页；MEGA II. 5，第 589 页）

这种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瓦解和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出现的过程揭示了不同国家在各个阶段的差异。然而，“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同上书，第 744 页；第 576 页）。在法语版本（1872—1875）中，马克思修改了这一段落，将其限制在了西欧国家（MEGA II. 7，第 634 页）。1881 年，在提及这段文字时，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ulitsch）向马克思提出请求，请他对俄国的乡村在社会主义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意义发表意见。马克思在研究了论述俄国农业生产形式和方法的最重要的作者和统计数据，如契切林（Tschitscherin）、

70

波克罗夫（Pokrovskij）等，尤其是成为他研究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的最重要来源之一的柯瓦列夫斯基（Kovalevski）的《公社土地占有制》（*Obščinnoe zemlevladenie*，1879）一书之后，依据这一俄国研究写了回信。他写道："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马克思在结尾时说，"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是"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MEW 19，第 243 页）

71

然而这条道路并没有被采纳。即使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仍继续关注俄罗斯的事态发展，他在 1892 年写给丹尼尔逊（Danielson）的信中说："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MEW 38，第 305 页）《资本论》第一卷 1883 年的第 3 版，为了说明剥夺的过程，举了苏格兰高地从土地上驱逐农民的例子。（MEW 23，第 756 页及以下；MEGA II. 8，第 683 页）马克思后来的这些更为谨慎的言论指出，农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从历史和国家的角度加以区分和评价。

2. 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农民问题被列入正在形成的第二国际的议事日程。在法国和德国，强大的工人政党在农民群众中寻找可能的追随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计划评论中警告说，并非所有其他阶级相对于工人阶级都是"**反动的一帮**"（*Gotha*，MEW 19，第 22—23 页），"**农民和小资产者**"作为"个人所有者"不宜与"资产者和大土地占有者"相提并论（*Erfurt*，MEW 22，第 231 页）。

恩格斯为 1894 年 11 月出版的《新时代》（*Neue Zeit*）杂志所撰写的《法德农民问题》（*Die Bauernfrage i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一文提到了关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农民纲领的讨论的重要性。即使已经证明农民作为"政治力量因素……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恩格斯认为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并敦促这个政党，"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MEW 22，第 485—486 页）同时他要求对农村人口进行差别化的评估，小农还提供了解决党与农民关系的整个问题的"关键"（第 488 页），因为一方面他因债务而日益陷入贫困，另一方面他具有明显的财产观念。因此，他在购买机器等方面应得到支持，由此他的小农财产得到保护和维持，以抵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对于小农的任

72

务不在于“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必然灭亡”。相反他认为，“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够多的办法，使小农慎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第 499 页）。恩格斯反复强调参与的自愿性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形成的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推动（接受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贷款可以是机器、人工肥料等，土地的继续分配，参见第 500 页）。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看法是“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分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同上）。

这些与小农利益相关的思想后来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强制集体化（首先是 1929—1930 年在苏联，1960 年在民主德国作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春天”）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实施。（虽然在民主德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中，一些农业生产领域有效地促进了给养的供应，并为农民开辟了作为“合作社农民阶级”的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参见 Groschoff 等 1984。）

3. 考虑到俄国的特殊具体情况，列宁在起草他的《论合作社》（*Über das Genossenschaftswesen*）（1923）一文时继承了恩格斯的观点。在自愿的基础上，农民应该联合起来组建合作社，“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LW 33，第 454 页）合作社应由国家配备“纯粹资财上的优待”（第 455 页）。——瓦尔加（Varga）在第一届世界农民大会（1923 年）上制定的标准试图与农民的分化相符合：“在我们看来，农民是在自己的或租赁的土地上为了自己的收入而劳作的劳动者。在我们看来，我们不能将一小撮富裕的土地所有者算作农民等级、农民阶级，虽然他们自称农民，实际上却是剥削者，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经常使用其他劳动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所谓的中农算作农民，他们虽然也会经常或者在一年的某些时间会使用些帮手，但是至于说他们的收入以及生活方式，与其帮手水平相当，且首要是他们在土地的耕种方面会亲自参与体力劳动和劳动创造。”（1924，第 5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在集体化的背景之下，这项政策被停止了，农业经济中的每一个小型和大型私有者都被强制剥夺财产。布哈

73

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zenskij）等人反对此举，他们要求发展个体农民经济，让大农民或者说富农（Kulaken）参与社会主义发展。他们被指责修正列宁主义，并且1930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辅助措施》（*Über das Tempo der Kollektivierung und Hilfsmaßnahmen*）的决议，加速了农村一定程度上的灾难性的发展。

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和勃列日涅夫（Breschnew）在苏联进行了各种农业改革，但他们并没有和苏联农业政策的根本弊端决裂。只有戈尔巴乔夫（Gorbatschow）要求将土地归还给农民，因为他们并“没有紧密地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建议，“通过集体的、家庭负责的绩效合同和租赁合同，使人能够更有保障地直接获益”（1987，第120页），鉴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俄罗斯农业的灾难性现状，结果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4.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秘鲁现实的实际情况，即占国民人口五分之四的印第安人按传统和习惯是农民。尽管立法旨在实现土地所有权的个人私有化，没收有利于大地产的旧地，但它并没有成功地使印第安人成为个人主义者：“共产主义是印第安人唯一的防御手段。除了在自由竞争体系之外，个人主义既不能繁荣，也不存在于现实中。印第安人从来不会比他们孤独时感到更不自由。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坚定而顽强的合作与团结习惯依然存在，这是共产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尽管共同财产的联系与共同劳动的习惯早已在家庭之间消失。”（*Sieben Versuche*，第76页）由于印第安农民的生活方式与现有的封建主义农业之间的矛盾，土地所有权被证明是“秘鲁资本主义发展”、“促进财富和进步的最大阻碍之一”。（同上书，第89、91页）但是对马里亚特吉来说，在秘鲁社会主义只有作为**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第一步是“废除……封建主义”，即土地改革，消灭大地产制，并考虑到印第安“村社”（comunidad）的继续存在。（同上书，第49页及以下）

5. 在西欧，自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数量锐减**（*Bauernsterben*）。1960年，欧共体的六个成员国的农业就业人数为1520万，而1987年为520万。在同一时期内，农场数量从640万减少到480万。（*Eine gemeinsame Agrarpolitik*，1989）随着1992年单一欧洲市场的建立，“必然还要作出进一步调整，以消除妨碍欧洲农业一体化进程的所有障碍”（同上书，第5页）。根据预

则的发展，左翼政党一直致力于维护农民的利益。

联邦德国在原东德地区奉行扼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策：1991 年，食品工业、批发商和连锁店通过控制市场准入，促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上毁灭。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尤其反对现代的圈地。而且就连德国社民党在其政党纲领（1989 年）中也表示："农民必须摆脱经济的强制，不再过度使用化肥和外部能量导致生产过剩而滞销，不再使土壤负担过重、污染空气和地下水。土地使用和畜牧业的集约化既不值得也

75 不必要。农民的家庭生产经营也是一种适宜生态的企业形式。我们将通过设定牲畜存栏量的单位面积上限，以保护我们的农民免受工业化农业中大规模畜牧业的冲击。"

生态保护运动和绿党也寻求农业经济发展的其他途径，这有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及恢复，即"生态重建"（ökologischer Umbau）。

6. 农民和农民文化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中被经常探讨。1926 年，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将资本主义侵入乡村生活描述为"黑暗的进步"（düster-progressiv）或"进步的黑暗"（progressiv-düster）："1789 年带来了这样一系列后果，农民不仅从他们的封建领主那里解放出来，还从他们的旧习惯、旧民俗、纺纱间、歌曲、舞蹈和节日中解放出来。无论在童话故事和传说中，还是在滑稽故事和笑话，以及奇怪、可怕或神奇事件的讲述中，曾经长期繁荣的叙事艺术也和纺纱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Hebel, Gotthelf und Bäuerisches Tao*，GA 9，第 368 页）这些发展也在社会批判小说中有所描述。对于法国，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在他的《土地》（*Die Erde*，1887；Berlin/DDR 1973，第 578 页）一书中表示，他"（打算）将所有农民都纳入其中，包括他们的历史、风俗和地位"，他想"提出关于财产的社会问题……每当我着手调查，我都不可避免地迈向社会主义"。

在俄罗斯，有丰富多样的反映农民的文学作品，列夫·托尔斯泰（Lew Tolstoi）有《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Wieviel Erde braucht der Mensch*，Berlin/DDR 1980），瓦连京·拉斯普京（Valentin Rasputin）将农民问题首先表现为妇女问题；乌克兰有经典农民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chewtschenko），以及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chael Scholochow）的关于集体化的史诗《被开垦的处女地》（*Neuland unterm Pflug*，1932/1959）；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必须提到钦吉斯·艾特玛托夫（Tchingis Aitmatow）等。在德国，亚当·沙勒（Adam Scharrer）的

《鼹鼠——一部德国农民小说》（*Maulwürfe. Ein deutscher Bauernroman*，1933）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视角的第一部乡村小说，叙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纳粹攫取政权的这段时间。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Erwin Strittmatter）的《赶牛车夫》（*Ochsenkutscher*，1950/1951）和《丁柯》（*Tinko*，1953）讲述了民主德国农村的社会变迁，两部作品都以民主制下的土地改革为背景。《蜜蜂脑袋奥勒》（*Ole Bienkopp*，1963）与农业合作社在农村的建立有关，还有赫尔穆特·萨科夫斯基（Helmut Sakowski）的电视小说《农村之路》（*Wege übers Land*，1968）。

76 参考文献：

Eine gemeinsame Agrarpolitik für die neunziger Jahre. Europäische Dokumentation, Brüssel-Luxemburg 1989; M. Gorbatschow, *Umgestaltung und neues Denken für unser Land und für die ganze Welt*, Berlin/DDR 1987; K. Groschoff (Ltg.) u.a., *Stadt und Land in der DDR. Entwicklung-Bilanz-Perspektiven*, Berlin/DDR 1984; J. Kuczynski, »Bauern und Landarbeiter«, in: *Zum Briefwechsel zwischen Engels und Marx*, Berlin/DDR 1976, 119-129; E. Varga, *Das Joch der Bauern. Referat auf dem I. Weltkongreß der Bauern in Moskau 1923*, Berlin 1924; K. A. Wittfogel, »Die Bauern«, in: *Handbuch des Weltkommunismus*, hgg. v. J. Bochenski, Freiburg/B-München 1958, 421ff.

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撰

宋珊译，曹旸校

参见：

Agrarfrage, Agrarreform, Agrobusiness,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Bauernbewegung, Bauernkrieg, Bodenreform, Dorfgemeinschaft, Enteignung, Erde, Genossenschaftsbewegung, Grundrente, Indiofrage, Kleinbauern, Kollektivierung, Landwirtschaft, Latifundismus, Ökologie, Pächter, Pariser Kommune, Stadt/Land

农民运动（Bauernbewegung）

A: ḥaraka falāḥīya. – E: peasants movement. F: mouvement paysan. R: krest'janskoe dviženie (кресть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S: movimiento campesino.

1. 农民运动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事实上，他们没有把农民阶级看作一个主体、一个独立的活动者。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资本主义发展全部过程的

基础”（*K I*，MEW 23，第 744 页）。这个过程绝没有随着所谓的原始积累而结束：“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同上书，第 776 页）那些在农业中剩余下来的人越来越多地因过度负债陷入“资本的奴役”，如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 B*）中所描写的法国小农阶级一样。（MEW 8，第 201 页）但他也没有把这些农民看作能动的革命的力量；在他看来，他们是无法变成“自为阶级”的“自在阶级”的典型范例，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将使他们互相隔离”。（第 198 页）马克思据此推断“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同上），这通过波拿巴主义“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同上）幻想地实现。为了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第 202 页）。

77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Breif an Vera Sassulitsch*）中，回答了关于农民阶级在资本主义中命运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关于在西欧之外的其他发展可能性的问题，基于俄国农村公社他承认，他的研究使他“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MEW 19，第 243 页）。然而这封信的草稿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信念终归建立在对俄国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联系的认识和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之上。俄国农村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它“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第 390 页）这封信的草稿中也未谈及独立的农民运动。对于俄国的农村公社来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第 389 页）。

2. 列宁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评价比马克思的更为负面。（卢森堡同意列宁的观点：对她来说，这种公社只不过是一种沙皇税收政策的残酷且有效的工具，参见 GW 5，第 679—687 页。）列宁激烈地否认可能存在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及其所有苦难、通往社会主义的俄国特殊道路。他在批判民粹派时，尤其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ßland*）中强调并详细阐释了主要反对观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展及其深远，超越了任何可以想象的特殊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无处不在；它在乡村，在农村公社也占主导地位，尽管

存在一些封建残余。但资本主义剥削在农村公社“是零散的、不发达的，而工厂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集中的”（LW 1，第 303 页）。“工厂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关系体系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成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战士。”（同上）“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农夫……最广义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是这样想的。代表俄国未来的人是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是这样想的。”（同上书，第 302—303 页，注释）

于是这里也就没有空间可以承认农民运动是一支独立力量。但 1902 年，尤其是 1905 年俄国人民起义中，农民暴动比城市中的起义持续的时间长得多，这清楚地表明，农民阶级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列宁懂得将这些经验纳入他的纲领之中。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在一个阶级政党内独立组织起来的问题”（*Das Verhältnis der Sozialdemokratie zur Bauernbewegung*，LW 9，第 231 页）。“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同上书，第 233 页）“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同上）

列宁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导致他再度将重点转移到更强烈地肯定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他现在强调“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并且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各殖民地和一般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之间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LW 31，第 137 页）。农民运动可以“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但即便如此，农民阶级只是革命的真正承担者、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盟友。列宁不会想到，农民阶级可能变成“革命先锋”。然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

3. 毛泽东将农民阶级称为“革命先锋”，这一说法早在 1927 年 3 月，即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合作破裂之前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已经出现。湖南的农民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表现在“十四件大事”（AW 1，第 34 页）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37 个县的大约 140 万人）；通过农会及其组织的“挨户团常备队”在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地主武装力量；废除封建特权；最后在“经济上打击地主”（这里不能理解为没收

78

79

财产，而是“禁止囤积居奇”等，参见上书，第40—41页）。1927年4月，国民党在上海发动了对共产主义工人的屠杀政变，随即摧毁了一般的城市共产主义运动之后，与湖南相类似的农民政权地区，成为幸存的共产党人唯一的重要避难地区和潜在行动基地。毛泽东尽一切努力主张保存并扩展这样的“红区”，他强调，要在这些地区的特定形势中生存下来，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和一支常规的“红军”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共产党人1934年撤离中国东南部的红区并被迫向西北进行“长征”，但撤退到农村的策略证明是成功的。

早在长征期间，特别是最终扎根在陕西后，都可以看到红军在农民群众当中得到的支持以及农民的战斗性在持续增长，这对革命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毛泽东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极其温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大地主被剥夺，而不是富农；即使后者受到波及，他们也可以保留他们自己耕种的土地。为了不使自己与列宁的“农村无产阶级的特殊组织”的路线相距太远，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于土地革命来说，“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AW I，第32页）。但是“农村无产阶级”与“贫农”不同：根据毛泽东的调查，“贫农”占农村人口的70%，其中20%完全没有土地，50%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地，要么是租赁的，要么是自己的财产。（同上）因此，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红军在农民比重增加的同时始终保留着一部分的城市无产阶级。

4. 中国的发展，以及法农（Fanon）、武元甲（Giap）、格瓦拉和德布雷（Debray）的思想，与1968年学生运动相结合，在西欧的左派中经常产生出一种突出的农民游击式的浪漫主义。格瓦拉的战略在拉丁美洲的失败，以及非洲和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中农民革命的落空，使这种想法受到质疑。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被迫学术地）所提出的问题，不再是农民阶级是否是革命性的，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他们］会变成革命性的”（Alavi 1972，第3页；参见Wolf 1969）。 80

参考文献：

H. Alavi, *Theorie der Bauernrevolution*, Offenbach 1972; R. Debray, *Revolution in der Revolution*, München 1967;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Reinbek 1969; E. Guevara, *Schafft zwei, drei, viele Vietnam*, Berlin/W 1967; R. Kössler, *Dritte Internationale und Bauernrevolution*, Frankfurt/M 1982; E. Snow, *Roter Stern über China*, Frankfurt/M 1974; Vo Nguyen Giap, *Nationaler Befreiungskrieg in Vietnam*, Berlin/W 1973; E. Wolf, *Peasant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1969.

格哈德·豪克（Gerhard Hauck）撰

宋珊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grarfrage, Agrarreform, Avantgarde, Bauern, Bonapartismus,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orfgemeinschaft, Drei-Welten-Theorie, Dritte Welt, Langer Marsch, Revolution, Revolutionstheori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农民战争（Bauernkrieg）

A: ḥarb al-falāḥīn. – E: peasant war.

F: guerre des paysans.

R: krest'janskaja vojna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война).

S: guerra de los campesinos.

自从 14 世纪以来，我们见证了农民战争以及现代农民无法忍受剥削而发起的社会革命。实际上，20 世纪所有成功的社会革命都发生在农业国家，而不是工业国家。成功的革命政党（俄国、中国、越南）正确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和农民的社会分化，同时也不免个别的错误和误判。

在《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50）中，恩格斯分析了德语区 15 和 16 世纪之交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农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军事和政治冲突历程。该书呈现的真实的社会力量比《共产党宣言》所能反映的更详细。1500 年左右的德国农民就是“全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的最底层（MEW 7，第 339 页），“可是要叫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第 340 页），因为他们散居各地，惯于顺从，被无情地剥削以及受地域的限制与约束。在宗教战争的幕后隐藏的是物质的阶级利益，这其实是阶级斗争。甚至激进的革命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也必须以宗教的形式伪装他的战略和计划，但他实际想要的是革命。他指出农民阶级具体的意识状态并发现与他组成一派的“只是起义群众的极少数”（第 358 页）。“对于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第 400 页）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困境，并试图通过“扩大和组织运动”（第 402 页）来克服它。因为农民战争是一场阶级战争，因为最终农民的要求挑战了旧政权，所以统治者以一切残暴手段和诡计去对付他们。“德国人民进行的最

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第 409 页）

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中，恩格斯再次提及德国农民战争对各个社会阶级与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论述了它持久的意义。（参见 Mehring 1908 及 1919 年的导言）恩格斯认为，具有封建依赖性的小农很容易“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MEW 16，第 399 页）。小型自雇佃农也是如此。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农民负债累累，只有工人阶级将抵押债务国有化，他们才能摆脱棘手的事实的依附关系。在中等地产和大地产的地区“**农业工人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第 399 页）。与此同时，恩格斯提出了工人阶级战略的实际应用，他们在 1870 年“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第 398 页），因此还需依赖于盟友。——恩格斯的阶级分析应该在双重历史背景下解读。该分析针对当时在封建主义和政治上邦国割据的条件下的农民。它写在革命浪潮的退潮中，从而审视了历史性的失败，并从新兴的工人阶级及其正在开始的觉悟中看到了希望。

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争论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1）具体分析农业人口的社会分层。界线的划分比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划分要困难得多。因此，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以及到与工人阶级的政治合作的道路会更漫长，更矛盾重重；这条道路的前提是放弃农民是统一整体（这种统一虽然在空间中存在，但在社会中不存在）的假定。农业人口中哪个或哪些社会阶层最有可能进行革命性变革？（2）如何在有组织力的城市工人阶级、农业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以及难以组织的、被剥削的农业下层阶级之间建立联系？答案必须根据具体的国家来确定。比如在印度的所有关系中，恩庇关系（Klientelverhältnisse）非常普遍，社会控制非常严格，农村各阶层之间流通不畅。鉴于最低阶层受到的严厉剥削及巨大的身体痛苦，一些人认为，只有“中农”（按印度标准）才能引发社会变革。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与之相反，“底层农民”群众和大庄园主之间的社会差异非常明显。20 世纪末期在南亚及东亚地区暴发了农民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革命潜力以及利用自身力量进行全国组织的困难就同时体现出来了。

参考文献：

H. Alavi, *Theorie der Bauernrevolution*, Stuttgart 1972; Th. Bergmann, *Structural Change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Peasantry*, Saarbrücken 1976; ders. u. R. Hanisch, »Bibliographie zu den

agrarischen Bewegungen in der Dritten Welt«, in: *Verfassung und Recht in Übersee*, 10. Jg., Bd. 2, 319-351, Hamburg 1977; E. Bloch, *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e der Revolution*, Berlin/DDR 1960; *Comparative Politics. Special Issue on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76; H. A. Landsberger (Hg.), *Latin America Peasant Movements*, Ithaca-London 1969; W. J. Lewis (Hg.), *Peasant Rebellion and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1974; J. C. Mariátegui, »Das Problem des Indios« u. »Das Problem des Bodens«, in: ders., *Sieben Versuche*, 35-48 u. 49-92; J. S. Migdal, *Peasants,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 Toward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1974; B. Moore, *Soziale Ursprünge von Diktatur und Demokratie. Die Rolle der Grundbesitzer und Bauern bei der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elt*, Frankfurt/M 1969; T. K. Oommen, *From Mobilization to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Dynamics of Agrarian Movement in 20th Century Kerala*, Bombay 1985; J.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Export Agriculture in the Underdeveloped World*, New York 1975; E.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1969.

特奥多尔·贝格曼（Theodor Bergmann）撰
宋珊译，曹旸校

参见：
Agrarfrage, Agrarreform, Arbeiter- und Bauernstaat, Bauern, Bauernbewegung, Bodenreform, deutsche Misere, Dorfgemeinschaft, Genossenschaft, Indiofrage, Klasse an sich/für sich, Klassenkämpfe, Kleinbauern, Kollektivierung, Landwirtschaft, Latifundismus, Liuismus, Revolution, Stadt/Land

83

官员（Beamte）

A: muwaẓẓafūn. – E: civil servants, officials.

F: fonctionnaires.

R: činovniki (чиновники).

S: funcionarios públicos.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是官员国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官员”的时候，他们说的总是**国家官员**。这是19世纪的语言用法。当时已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公共职务”和现代的职业官员逐渐产生，（文职的和武职的）“军官”（Offiziere）或者“王公的仆人”以及后来的“国家公仆”指的是所有由国家给付薪资和为国家而工作的人。在18世纪的普鲁士/德国，“官员”是对王公领地的租地农民的称呼，这些农民也享有当局的权力。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Das Allge-

meine Landrecht）第一次正式提到了“国家官员”，而非王公的仆人或国家的仆人。自三月革命前的时期以来，官员被定义为为国家服务的官职拥有者。

1. 每个政治实体都有一些必须委托给不同的个人来承担的公共职能，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职位”（Beamtung）。（*AD*，MEW 20，第 166 页）一切**政治统治**（*politische Herrschaft*）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同上书，第 167 页）。“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经常有关的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Ursprung*，MEW 21，第 95 页；参见第 164—165 页）因而，我们也可以依据下面的标准来区分国家的各种历史形式：公共权力（*öffentliche Gewalt*），即与所有社会阶级并列又凌驾于它们之上的“第三种权力”，分别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它采取了哪些形式；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体现为公共权力从起始阶段到资产阶级国家的一系列“各种形式的更替”。（同上书，第 107 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些思想刚开始显现出来，却没有被详细阐述。不过，恩格斯在其对国家起源的简要勾勒中强调了这样一种视角：公共权力是如何形成的，其承担者是如何招募的，公共权力又是如何被行使的？（参见上书，第 95、125—126、139、165—166 页）

1.1 在古代雅典，警察职能是由奴隶履行的；罗马人大量使用国家奴隶和来自职业军人的常备雇佣兵；而中世纪的王公们则借助于奴隶和被释奴隶（获得自由身份的人。——译者）或农奴（家臣）来维持统治，并和他们的封臣分享统治权。在现代国家，官吏“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他们“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特殊的身份，“由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MEW 21，第 166 页）

1.2 关于“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MEW 12，第 553 页），即中国清朝官员的物质存在基础，魏特夫（K. A. Wittfogel）是这样描述的：这个“处于统治地位的官员阶级”（1931，第 729 页）在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中拥有几个关键的位置：官员是所有“公共工程”特别是必要的水利工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这些工程一部分是用徭役工建造的，一部分是用国家手工匠人和士兵完成的；官员是国家手工工场的领导者；他们也是地主（尽管按照律条，他们不能在任职的省份拥有土地）；此外，官员还是最重要的货币放贷者或**高利贷资本家**，他们把自己的钱投入到地方上的当铺、银号和抵押贷款中。（参见上书，第 410 页

及以下，第730页及以下）因此，清朝的官员是一个受教育并占有土地和货币的阶级，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这些官员不是国家的雇佣工人；那些被迫为国家劳动的人在官员的监督下以劳动换取报酬。（参见上书，第618—619页）

1.3 现代官员体系的历史开始于中世纪的繁荣时期：在西西里王国首次出现了以世俗的、受过专业教育的、由俸禄供养的、讲求纪律约束的职业官员为基础的国家。被誉为“现代官僚的出生证书”的《梅尔菲宪章》（Konstitutionen von Melfi）在1231年禁止租赁官职，引
85 入了固定薪俸和官阶晋升制度，规定贿赂行为要受到处罚。据此，官职的分配应当每年进行调换，官员原则上不在他们出生的省份履职。此外，还第一次专门为培训官员建立了一所高等学校，这就是那不勒斯大学。

建立“绝对”君主制以及用国家官员来取代封臣和被选举出来的治安法官的这一首次尝试并没有获得长久的成功。在争夺霸权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欧洲的王公诸侯（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和各个城市越来越依赖非贵族出身的“受雇博士”（大多数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法学家）和雇佣军。由于周期性的财政困难，**出售官职**（以及出租官职）的机制应运而生，并在16世纪以后的法国成为典范，这一机制改变了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形势。官职的可出售性和可继承性打破了贵族在获取官职上的特权，使得国家行政部门成了具有支付能力的资产阶级的领地。官职所有者成为和封建贵族并列的官职贵族（*noblesse de robe*）：他们独立于君主，和他做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不是充当他的仆人。但富有的资产阶级对国家权力的逐渐占有还没有使国家成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根本没有“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们都在努力创建一支自己的官员队伍，其中的官员应遵行旨意，随时可以解雇，物质上完全依赖于他们从而直接由他们来给付薪资（如国王的地方经理官和全权专员）。

1.4 **官员身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首次将现代国家官员的产生过程引入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官员掌握着一个公共职位，但这个职位和行政设施都很少属于他。因此，韦伯从分析的角度把现代官员体系（不要把它和官僚化混为一谈）的形成描述为官员同职位权力和国家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分离，而这个过程则以对许多原来占有这些东西的个人持有者的剥夺为内容。韦伯强调，这个过程同“原始积累”过程是“完全类似的事”，马克思为“原始积累”的过程创造了“生产者和生产资

料分离的过程”（MEW 23，第 742 页）这一公式（参见 *WuG*，主要是第 161—162、704、1045—1046、1048 页等处）。与这些不同的是，对公共职位的私人所有者的剥夺过程只能以政治革命来进行。

86 对职位权力的去私有化或者国家化将职位权力的拥有者降低到或多或少具有特权的国家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构成了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内容”（Gerstenberger 1990，第 448 页）。1821 年，黑格尔把这个基本原则表述为：“国务和权力……不能是**私有财产**。”（*RPh*，§277）

在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职能都是由这群特殊种类的雇佣劳动者来履行的。他们行使着职务，却不再**专有**（*besitzen*）职位，从而也没有将该职位作为**收入丰厚而不费力的职位**（*Pfründe*）来利用的权利。这种身份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一切阶级中的“有才之士”都可以自由竞争这一身份，同样，大幅摒弃直接的强制劳动（循役义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必须和所有私人的劳动力购买者展开竞争。然而，为国家而工作的雇佣劳动有着许多的形式和层次：从按日计薪的工种（例如林业工人、筑路工人），到各种形式的按件计薪的季节工（如在办公室工作的雇佣抄写员，他们直到 19 世纪还是按照抄写的页数或文件数来给付报酬的），再到**终生受雇的官员身份**，这只是在 19 世纪才予以制度化。

官员身份不同于简单的雇佣劳动者（在国家公务领域亦是如此），特别是就终身职位、供养要求、多级培训和考核体系、等级制度和晋升体系而言。国家雇佣劳动者的“公职录用”（Verbeamtung）并非各国处处都是一样的；普鲁士/德国是建立了现代职业官员体系的传统国家。特殊的“官员特权”是历史危机时期和过渡时期的产物——在这些时期，官员利用暂时的力量对比关系巩固了他们相对于政府高层和立法机关的地位。普鲁士的官员在 1807—1810 年间设法推行了官员**不可免职**（*Unabsetzbarkeit*）的规定，1820 年又将**退休养老**确立为自己的权利而非国王的恩典。自那时以来，他们便成了国家政权中的一股势力。（参见 Kehr 1970，第 35—38 页）不可免职决定了一种特殊的**官员权利**的发展：解雇只是适用于渎职行为的（最严重的）纪律惩罚，而且应由官员仲裁法庭给予判决。固定薪俸和退休养老金也使得不占有财产的官员获得相对于政府专断和私人利益既得者的独立性；**贿赂**也可作为**腐败**来遏制。实际上，随着专门追捕受贿官员的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建立，到处都出现了创办现代官僚集团的尝试。官员的新型“社会保障”包括为进入仕途而设置的培训体系和考试体系。国家教育证书体系引发了围绕职位和职务而 87

展开的“业绩竞赛”。它在为官员灌输团体精神的同时，也使官僚国家合法化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员既不是一个阶层（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也不是（有产）阶级，而是一批“知识和业绩精英”。

2. 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国家官员都是一个很小的，但由于其身份而与社会存在明显区隔的群体，而且也是唯一穿制服的群体（包括邮差在内的文职官员也穿制服）。在一些国家（法国、普鲁士），包括职业军官在内的官员数量巨大，无处不在，而在另外一些国家（瑞士、美国）却几乎不存在。（参见 MEW 22，第 197 页）专业官员和职业官员，特别是法学家，是一个受教育的精英群体，是不折不扣的“有教养的阶层”，这个阶层对知识的垄断通过国家考试体系即“官僚政治对知识的洗礼”（*KHS*，MEW 1，第 253 页）来保障。

2.1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官僚体系抱持同情态度，尽管马克思在 1867 年能够确信，他们自己对普鲁士“‘有教养’的官场”的影响并非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比对庸人的影响要大些”（MEW 31，第 290—291 页）。马克思更偏爱谈论“寄生机体”（Parasiten）或“国家寄生虫”（Staatsparasiten）（参看 MEW 8，第 150、196 页；17，第 544、609 页）或“寄生赘瘤”（Schmarotzer）（MEW 17，第 540 页等处）。

这些用语蕴含着另一种意思：官员腐败，即官员剥削市民社会和国家。正如恩格斯在谈到沙皇俄国时一再强调的（参见 MEW 18，第 256 页；MEW 22，第 16 页等处），该国的官员“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而不是靠薪俸”来维持生活的（MEW 18，第 567 页）。即使是最忠实地履行义务的官员也会成为一种在经济上“寄生的”存在，因为让他赖以为生的是对他人的劳动产品征收的税款。（参见 MEW 4，第 348 页；8，第 202 页；19，第 30 页）

2.2 对官员和军队这个“可怕的寄生机体”（*18. B*，MEW 8，第 196 页）的系统分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是没有的。在马克思看来，官员没有形成为特殊的阶级（参见 MEW 25，第 893 页）；他把他们归入到“‘意识形态的’阶层”（*K I*，MEW 23，第 469 页），并称之为“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18. B*，MEW 8，第 202 页）。在这里，像阶层和等级这些概念都是作为日常语言而使用的，并不涉及对于特定阶层成分或等级成分的考察。不过，马克思在 1843 年批判了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RPh*）中对于（普鲁士）官员的描述。“关于官僚政治，黑格尔给我们作了一番

经验的描述，其中一部分符合实际情况，一部分符合官僚政治本身对自己存在的看法。”（*KHS*，MEW 1，第 247 页）对黑格尔来说，官员构成了“**中间等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人民的“受过教育的智识和法权意识”，首先是教养和国家观念，“就集中在这一等级中”。（*RPh*，§297）**普遍等级** ——这是黑格尔对官员的称呼 ——的道德品行（§§205、291、303 等处）应当防止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辅之以国家考试、固定薪俸和普通高等教育。（参见§§291—297）马克思对此不以为然：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些实际上是在为官员在市民社会里的特殊地位辩护，但他却把官员等级的特殊品德视为意识形态。（参见 MEW 1，第 252 页及以下）

2.3 **作为“非生产劳动者”的官员。**亚当·斯密（Adam Smith）让许多他那个时代的人感到气恼的是，他把国王的文武官员乃至国王本人称之为“非生产劳动者”。马克思在这方面追随斯密。（参见 MEW 24，第 453 页；MEW 26.1，第 145、189、223 页；MEGA II.3.5，第 1719 页）非生产劳动者从事的劳动不是为了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官员只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或者“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才有必要存在的。（*TM*，MEW 26.1，第 145、261 页）既然他们参与了国家权力，他们就能够“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第 145 页）。非生产性的服务“是可以强加于人的”，官员的服务就是这样的一个主要例证。（第 380 页）“从事政治的非生产劳动者”取得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中的份额不是靠出售自己的服务，而是靠“将这些服务强加于人”。（第 145、189 页）因此，马克思对于工业资产阶级的目标抱持着充分的同情，后者“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等等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限度**”（第 261 页）。更何况，他们产生的一部分影响“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第 145 页）。

有时，马克思把“政治家”视为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向国家出售“自己的全部劳动能力”以换取“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薪水”。（*Gr*，第 427—428 页；MEW 42，第 435 页）由于这样的国家雇佣劳动者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关，尽管其劳动关系在形式上“和雇佣劳动”类似，但“本质上是和它不一样的”。（第 428 页；第 436 页）马克思没有去研究这种劳动关系具体呈现出何种形态，也没有研究这些国家雇佣劳动者 ——他们跟“普通士兵”一样（第 371—372 页；第 380 页）只是被支付了其劳动力再生产费用 ——是否以及如何遭受了国家剥削，而这样的问题，他在

研究受资本雇佣的非生产雇佣劳动者时是作了充分调查的。在国家邮政或铁路以及在乡镇或地区的能源、公共事业和垃圾处理企业等特殊岗位工作的雇佣劳动者从事着必要的、对社会有益的、在物质的意义上创造了使用价值的劳动，而对于这些，马克思除了略微提及之外（例如 MEW 26. 1，第 155 页），并没有作过研究。

马克思说官员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MEW 17，第 609 页），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资产阶级之所以对保留大量的官员感兴趣，是因为它试图在国家机器中安置他们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18. B*，MEW 8，第 151 页），因而，他们最终是靠用税收来剥削下层的阶级获益的，其方式是通过税收国家来支付他们当中多余的人与身份相当的生活费用。正是在位高权重者身上，马克思看到了“傣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MEW 17，第 544 页）。所有“国家机器中的肥缺”无论如何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此，它们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争夺的”一个受人喜爱的“对象”。（同上；参见第 540、593 页）为虚假的工作支付的与身份相当的极高薪资“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增加了“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同上书，第 540 页）。马克思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多重传递的剥削的错综复杂的途径，但他还是指出，任何在生产方式造成相当数量的“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的地方，都产生了把国家的官职塑造为“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MEW 8，第 202 页）的趋势。

此外，关于下层阶级还有一种“擒王效应”（Köpfungseffekt）：就实际工作而言，官员等级也收罗了“群众中的知识分子”即下层阶级中有才能的人，以便他们在所有国家机器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自己。（MEW 17，第 544 页；参见 25，第 614 页）

2.4 无官员的社会主义？“打碎国家机器”的公式也有“扬弃职业官员”的意思。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说它已开始把公共职能从官员等级的职业秘密和仪式中剥离出来（MEW 17，第 544 页），并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手中取回国家的“理应属于自己的职能”，以便把它们转交给新型的官员来承担（第 597 页）。根据他的描述——这些描述更多地反映了愿望而不是现实，公社的职员，他们拿着固定工资（第 530 页），通过选举获得职位，随时可以被免职，在“公共监督”下做工作，并且得到的报酬不应高于普通的“有文化的工人”（第 544、596 页）。

3. 跟晚年的恩格斯一样，列宁也严厉抨击了沙俄官僚这一沙皇政权主要支柱的“特权地位”和“人民的完全无权”。（LW 2，第 339 页）在他看来，这是腐败的庇护所。特别是就俄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总是处于“出卖其反政府的和革命的狂热”来换取“官家俸禄”的危险之中。（LW 2，第 338 页）沙俄官僚是从有义务为国家服务的贵族中、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上等阶层中招募的，偶尔甚至是从农奴中招募的。国家机器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他们“居于人民之上”。（*SR*，LW 25，第 420 页）通过生活方式和财产占有，并且由于可以转换到私人企业中的高薪酬职位，（高级）官员同资产阶级保持着联系。（同上书，第 381、447、465—466 页；*Imp*，LW 22，第 241 页）在革命和国内战争中，列宁认识到，这种“资产阶级官员”（LW 28，第 247、377 页等处）就其作为专业人士和专家而言，是不可能被仍然处于狂热状态中的工人苏维埃取代的。如何打碎“官僚的政权”却又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新的行政管理而赢得这些“难于取代的专业力量”呢？瓦尔加提出了苏维埃政府面临的这个政治问题。（1920，第 74 页）

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zki）的建议，苏联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了“专家”的专业知识和政治可靠性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即以前的沙俄文武官员得到的薪资远远高于有文化的工人的“平均工资”，这显然背离了“公社的原则”；不过，他们必须服从（通过苏维埃或特派专员来施行的）严格的“工人监督”。（参见 LW 27，第 237 页及以下；28，第 217 页及以下；29，第 162 页及以下等处）正如瓦尔加所见，监督只能是政治监督：如果专员拥有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那么专业官员就成为多余了；如果专员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无法有效监督官员。（1920，第 74—75、78 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忠诚问题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解决：在红军中（正如在法国革命军中已经发生的那样），士兵和下级军官中的军事人才很快获得了提拔，取代了沙俄军官。在民事管理和国有工业中也是这样。当然，这种精英替换的代价是极高的。

4. 葛兰西认为，每一种社会和政治结构“都有其官员问题，有其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都有需要培养的适合自身的官员类型”（*Gef* 7，H. 13，§36；*Q*，第 1632 页）。在资产阶级国家，一种“为从事（文职的或武职的）官僚工作而经过技术培训的‘职业官僚’类型”发展起来了；新的政治形式也为“新型官员”（同上）创造了条件。在经济方面，葛兰西认为官员是非生产性的，因

为他们是提供“服务”的（参见 *Gef* 5，H. 8，§108，第 1003 页）；国家管理是“绝对寄生虫的来源”，因为（完全未过 40 岁的）“年纪较轻的人”“不再献身于任何生产劳动，而是拿着或多或少的较为丰厚的年金饱食终日”（H. 22，§2；*Q*，第 2143—2144 页）。

与此类似，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把“以货币为俸禄的官僚”视为与常备军和稳定的货币税收系统并列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特征。（WA 1，第 327—328、137 页等处）这种国家把官僚打造成了一个“出卖精神劳动力以换取货币工资”的阶级。（同上书，第 121 页）在韦伯之后，考茨基（Kautsky）也强调了现代国家的产生与职业官僚和专业官僚之间的关联。固定薪俸和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允许越来越多的官员是从“下层阶级”中招募进来的（1927，第 296—297 页）；然而，为了在原则上使这些阶级和高等职位之间保持较远的距离，考试制度和培训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选择的作用（同上书，第 479、488 页）。最近，瑟伯恩（Therborn）也是这样来解释资产阶级事实上仍然继续垄断着当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高级公职的。（1978，第 74 页及以下）

5. 官员社会学。5.1 尽管在同时代人眼中，官员的人数可能显得已经很庞大了，但国家雇员却是自战争时期以来在福利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才形成相当规模的。1930 年，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从事公职的就业人口也没有超过 4%—6%；作为例外，这个数字在德国是 8.5%（1925 年）。尤其是在 1945 年后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由国家雇用的劳动者数量剧增；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富裕”而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荷兰、奥地利）中有 10%—13% 的就业人口和高达三分之一的“非独立雇员”（abhängige Beschäftigte）在公共部门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 德意志分别只有约 1.8%、2.4%、2.5% 和 3% 的非独立雇员；高达 80% 的国家雇员是士兵和警察。）在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一个世纪的进程内（1880—1980 年），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对规模翻了五番和十番，其中最有力的增长发生在 1960 年以后。在高素质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雇佣劳动者中，这种增长是最强劲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由国家雇佣的。当然，这种国家雇佣劳动者并非全部是严格公务员法意义上的官员。但在所有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稳定的、原则上终身的聘用关系和供养保障的国家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绝对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有显著增长。（参见 Rose 1985）

5.2 **官员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可能有这样几种进路。(1) 有人断然将官员作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是不涉及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的特例，也就是说，官员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参见 Poulantzas 1975，第 331 页及以下)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使用一种双重的，即部分经济上、部分政治上特定的社会差异性结构，并且还必须解释，官员（和其他国家雇员）的“非阶级性”同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是怎样的。(2) 有人试图将其与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阶级状况类比，然后要么把它归类到这些阶级中的一个（如工人阶级或中等阶层中的一个），要么使其分属于这些阶级。(例如 Geiger 1932，第 59 页及以下；Robinson 1981) 这可能会导致纯资本主义领域中的阶级结构在国家领域中再现。(参见 Carchedi 1975；Poulantzas 1978，第 142—143 页) 在持这种立场的布哈林看来，社会等级与生产等级或企业等级与国家机器等级之间存在着（几乎）完美的同质性。据此，“高级公职人员”和“将军”的地位与资产阶级差不多相当，“中级公职人员”和“(少尉以上的) 军官”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知识分子”，而“下级公职人员”(和从事国家公务的劳动者) 以及士兵的地位则差不多相当于无产者。(参见 1920，Kap. 3，Tafel 6) 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或生活方式有相似之处，或者像卡尔凯蒂 (Carchedi) 所说的，他们拥有相似的职能。(3) 有人把国家雇员理解为自成一类的阶级，他们也许区分了许多这种服务于国家部门的特殊阶级的状况。(参见 Armanski/Penth 1977；Hoff 1985；Wright 1985) 潘涅库克 (Pannekoek)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尖锐地表达了这种立场：“**官僚是有着特殊利益的特殊阶级，他们甚至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利益。**”(1909，第 86—87 页)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德的争论中有一种让人印象深刻的看法，即官员是“从事雇佣劳动的”和“靠工资来过活的”特定中间阶级。其理由是，国家雇佣劳动者 (包括官员在内) 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不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且从“衍生收入”(税收) 中取得工资。(Projekt Klassenanalyse 1973；Armanski 等 1976；Armanski/Penth 1977) 这个理由有双重缺点：第一，它也适用于大量不是由国家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第二，它预设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一种对于阶级关系来说关系重大的剥削形式，即资本主义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关于阶级斗争中关于可能的敌人和盟友的政治问题，因而也就是关于国家雇员的忠诚性问题。(参见 Poulantzas 1975，第 244 页及以

下；Armanski 等 1976，第 23 页及以下；Jung 1982，第 381 页）每一种阶级分析的中心问题，即国家的雇佣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遭受国家的剥削，他们是否以及如何从他们的角度剥削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国家的雇佣劳动者是否以及如何剥削彼此，一如既往地没有得到解决。（参见 Jung 1982，第 382 页及以下；Hoff 1985）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要从经济上理解官员概念。在这一方向上的尝试同官员向国家“出售”其劳动力的“方式和方法”有关。（Varga 1920，第 76 页）谁一成为官员，就会退出“自由劳动市场”。他原则上在有生之年向国家出售对其劳动力的支配权，来换取终生的生活费用。只有劳动合同的形式而非内容还带有雇佣劳动关系的印记。为了这些特权，官员放弃了其“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国家对其行动能力的兴趣促使其严厉惩罚其官员“自由雇佣劳动者”的行为方式（如禁止各种形式的罢工）。

5.3 **官员工资**。劳动收入同个人的劳动绩效和劳动市场的景气程度是相脱离的。在多数国家，官员的名义工资随着“工龄”的增长而增长。在薪资方面，“与等级相应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官僚自身的招募机会极其重要的培训费用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称其为工资用途的“历史—道德要素”）。根据国家机器的特定“部门”和等级阶梯而产生的官员薪资的等级差异几乎不能保证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获得“他们的劳动力价值”相符的工资（参看 Armanski 等 1976，第 25—26、178 页）。当我们考虑到自身的招募的“等级”因素，即使官员薪资的平均水平有时较高，那也可以由其总的来说较高的技能水平和公职人员中受过大学教育者所占的较高比重来充分解释。（参见 Dammann 1977，第 96—97 页）处于等级体系低层次的官员生活贫困，他们不具备特殊的职业训练以及技能（即官员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绝非奇谈怪论。

5.4 **官员工会**。官员的自我组织从低层级开始，其组织程度不亚于一般雇佣劳动者的自我组织。其工会的斗争性不逊于私人部门中的雇佣劳动者工会。不过，就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而言，等级代表的因素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几乎到处都有中高级官员的特殊组织，此外在国家事务的各分支也有其特殊组织（如警察工会、邮政工会和铁路职工工会）。

参考文献：

G. Armanski, B. Penth, »Klassenbewegung

und Staat«, in: dies. (Hg.), *Klassenbewegung, Staat und Krise. Konflikte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Westeuropas und der USA*, Berlin/W 1977; dies. u. D. Pohlmann, *Lohnarbeit im öffentlichen Dienst der BRD. Staatstreue oder Klassenkampf*, Berlin/W 1976; N. Bucharin,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0), Reinbek 1970; G. Carchedi,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State Employees«, in: *Social Praxis*, Vol. 3, 1975, Nr. 1/2, 93-120; K. Dammann, »Gewerkschaftliche Organisierung und Kämpfe staatlicher Lohnarbeiter in der BRD«, in: Armanski/Penth 1977; P. Fröhlich, *1789 – Die große Zeitenwende. Von der Bürokratie des Absolutismus zum Parlament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57; Th. Geiger,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Stuttgart 1932; H. Gerstenberger, *Die subjektlose Gewalt. Theorie der Entstehung bürgerlicher Staatsgewalt*, Münster 1990; M. Göhring, *Die Ämterkäuflichkeit im Ancien Régime*, Berlin 1938; O. Hintze, *Der Beamtenstand* (1911), Darmstadt 1963; J. Hoff, »The Concept of Class and Public Employees«, in: *Acta Sociologica*, Vol. 28, 1985, Nr. 3, 207-226; H. Jung, »Zur Klassenund Sozialstruktur der Staatsbeschäftigten«, in: *Der Staat im staatsmonopolistischen Kapitalismus der Bundesrepublik* (Beiträge des IMSF 6/II), Frankfurt/M 1982;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d. 2: *Der Staa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Berlin 1927; E. Kehr, »Zur Genesis der preußischen Bürokratie und des Rechtsstaats«, in: ders.,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Frankfurt/M 1970, 31-52; R. Miliband, *Der Staat in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2; A. Pannekoek, *Die taktischen Differenz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 1909; N. Poulantzas, *Klassen im Kapitalismus-heute*, Berlin/W 1975; der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9; Projekt Klassenanalyse, *Materialien zur Klassenstruktur der BRD*, Erster Teil, Berlin/W 1973; J. G. Robinson, »A Class Analysis of State Workers«, in: URPE, *Crisis in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1981; R. Rose (Hg.), *Public Employment in Western Nations*, Cambridge 1985; G. Therborn, *What Does the Ruling Class Do When it Rules? State Apparatuses and State Power under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London 1978; E. Varga, *Die wirtschaftspolitischen Probleme der proletarischen Diktatur*, Wien 1920; 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E. O. Wright, *Classes*, London 1985; B. Wunder, *Geschichte der Bürokrati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86.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撰
张志超 译，唐婧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smarkt, Bildung, Bürokratie, Elite, ideologische Stände, Intelligenz, Klassen, Klassenanalyse, Lohnarbeit, Mittelschichten, Nomenklatura,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letarisierung, Staat, Staatsklasse, Staatstätigkeit, Steuerstaat

意义（Bedeutung）

A: maʿna. – E: meaning. – F: signification. R: značenic (значение). – S: significado.

意义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在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事物”与“环境”对人们的需求及其满足而言总是具有特定的相关性。（参见 Marx，MEW 19，第 363 页）海德格尔（Heidegger）提出了人类实践的“作为结构”（Als-Struktur）。在“与某物相关”（Zu-tun-haben）中，“所因”（Womit）已经被有所“意指”（be-deutet）。（GA 21，第 144—145 页）意义（客体）与解释（Deutung）（主体）在此结合。正是通过隐含在实践中的意指（Be-deuten），我们才能理解关于世界的**显性**（*expliziten*）意义。在其“解释的辩证法”中（1980，第 420 页），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质疑了意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能力是对于必要性的回答，我指的是：在一个被遮蔽的世界里，没有任何生命能够生存哪怕‘几秒钟’。”（第 421 页）

这种“指”（Be/Deuten）的意涵早已出现在**意指**（*bedeuten*）这个词的最初意义中，即：用手指出自己想让人注意的东西；在古高地德语和中古高地德语中，这个词是“*diuten*”，它有着“清晰的东西”、“使明亮”、“放到光中”等意思。此外，与此相关的日常实践（例 96
如从自然征兆中预测天气的情形）往往还带有预测和预言的色彩（例如，当前的 x 意指将要到来的 y，对于预兆的解释等）。而当这个词与外来语发生接触，语言的反思就随之而来。例如哥特语言中的 *piuda* 和古高地德语中的 *diota diot*。它们的意思是“理解德语的民族可以解释”（Grimm，*Deutsches Wörterbuch*，Leipzig 1854）——这与作为教会语言的拉丁语有特别的关联。这个概念的名词化和实体化，似乎首先出现在对“神圣文本”的翻译和重构的理智活动中（“意义”首先出现在 15 世纪，当时被用来翻译 *significatio* 这个拉丁词），此外，它还出现在对古希腊作家原初文本的重构中，这些 5 世纪亚历山大港的文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Lyons 1971，第 9 页）这也是语义学的起源，到了 19 世纪末，语义学作为“关于意义之科学”

（M. Bréal）发展为语言学、符号学和心理学的一部分。

对于意义的追问构成了“20 世纪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核心问题”（Schaff 1968，第 7 页）。奥格登 / 理查兹（Ogden/Richards，1923，第 218—219 页）把科学以及哲学的解释分为 16 类。所有这些解释都基于斯多葛学派的三分法：τὸ σημαίνον（“能指”[Bezeichnende]，符号的物理实体 [Entität]）、τὸ σημαινόμενον（“所指”[Bezeichnente]）以及 τὸ τυγχάνον（“外部的存在者”；指称 [Referenz]：对象，事件，行为）。——随着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提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并试图重新关注此前被长期忽视的“社会因素”（HWPh），理论似乎朝着马克思的方向发展了，但学界始终有意避免提及这点：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意义问题关注的只是“那组织性诠释的网络及背景脉络”，“作为诠释者和被诠释者，我们有限的存在从这个网络中出发，并回到那里”。（Abel 1993，第 281 页）

在马克思主义中，意义问题被视作社会理论和对统治的批判理论。社会制度塑造了基础的符号系统，统治便从这个系统中产生并获得再生产。意义问题谈论的不是“语言的统治”（MEW 3，第 433 页），而是统治的语言。因为意义始终与符号的物质性密不可分，故而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研究关注的是社会语义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符号学的问题。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进路在一系列领域取得了成果，其 97
中包括：科学理论（A. Greimas）、意识形态理论（L. Althusser；J. Kristeva；Projekt Ideologietheorie）、商品美学（W. F. Haug）、话语理论和话语分析（M. Pêcheux；E. Laclau；J. Link；U. Maas）、文化符号学（J. Lotman；U. Eco）、艺术符号学（J. Mukařovsky）、文学理论（F. Jameson）等。这些研究大都源于马克思的关于语言的思想，但许多并未对马克思的文本作明确的援引。

1. 在马克思看来，意义问题并不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从属于他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也没有使用任何关于意义的专门术语，因此对于意义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文本的翻译问题所引发的语言意识的产物。需要澄清的是，习惯、日常、现实层面的意义（或曰 Sinn[意义]、Inhalt[内容]），与哲学、科学和历史层面的意义（或曰 Sinn[意义]、Inhalt[内容]）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如果不是特别提及语言能力或语言系统的话，那么“语言”这个词主要指的就是语义的维度。

此外，“意义”也可以指某个事物在实践、科学或社会斗争方面所具有的

相关性、有效性、级别、重要性和后果等等（例如 MEW 3，第 395 页）。通过把统治问题纳入到意义理论之中，马克思的语言理论与他所借鉴的思想家有着显著区别，后者包括霍布斯（Hobbes）、黑格尔、洪堡（Humboldt），以及当时在此问题上作出深入研究的格林（J. Grimm）。（参见 Erckenbrecht 1973，第 161 页）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的语言理论及其语言批判分析中的“唯物主义语义学”（Ellerbrock 等 1976，第 65 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1.1 现实生活的语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语言问题就已经成为马克思对于思辨意识哲学之批判的核心问题。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MEW 3，第 30 页）。语言是“意识”（个人的意识）的社会形式，语言可以通过社会“交往”的必然性（应理解为需求和必要性）加以解释，并被视作一种实践形式，它的必要性首先是经由物质再生产和外在于人的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调控问题等方面的要求而产生的。反过来说，只有借助关于社会形式的意识，“为我自己”的意识才能得以存在。至少可以认为，产生语言的要素总是存在于历史的阶梯中。

和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类似，在语言中被表述的“观念和表象”以及具体的话语也都应当视作“现实生活的陈述”（第 433 页）。而马克思关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第 26 页）这样的表述则是一种转喻的用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第 390 页；参见 *K I*，MEW 23，第 88 页）这里第一个分句针对的是关于私人语言的假设，第二个分句主要指出语言存在于一切人类共同体中，第三个分句则表明：语言反映了相应社会的状况。因此，意义问题就指向了个人“交往”与“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关系。（MEW 3，第 22 页）

1.2 语言在哲学中的独立性。于是，马克思几乎与从柏拉图（Platon）直到洪堡的整个语言哲学的传统背道而驰了。在传统的语言哲学中，物的世界与名的世界是对立的。例如柏拉图就曾问说（*Cra*，383a 及以下）：赋予事物相应的名称，究竟是人们任意规定的，抑或是因为语词通过某种方式模仿了（即成为自然的摹本）事物的本质使然。后一种可能性的某种形式演变为中世纪关于共相的争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关于反映

98

论的争议也与此相关，参见 Pêcheux 1975，Kap. 1）。马克思在实践理论中提及了这个争论，并对它作了意识形态理论上的分析——马克思还参与到其中，他对唯名论持同情态度，并称其为“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MEW 2，第 135 页）。“哲学语言的秘密”就是，它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MEW 3，第 432 页），并以非历史和外在于社会的方式看待语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这是“劳动分工”（同上）、国家的建立以及阶级分化的结果（Haug 1984）。哲学在思考语言的同时，也受着语言的误导。一旦“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它就脱离了其所源出的社会生活，成了“意味着语言灭亡的语言”。（MEW 3，第 433 页）由于这种分离，（语言）哲学就面临着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那些“不会明白自己在想象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第 435 页）而言，“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第 433 页）显得尤为紧迫。后来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往往并不试图在理论上弥合这种分裂，而是主张消解这种与现实性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要么试图“最终摆脱这个致命的指称问题”（Eco 1977，第 149 页），要么像柏拉图那样，试图在某种本质直观中寻求一种超越语言介质的知识。

1.3 回应黑格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语言理论的表述显然是对黑格尔的回应。马克思认为语言是“实践的，也是为他人存在的意识”，黑格尔则认为语言首先是“自我意识”的“存在”，从而“对他人而言存在”（*PhG*，Kap. VI. B. I. a.；W 3，第 376 页）；马克思认为语言是“现实生活陈述”，属于一种显现（Manifestation）；黑格尔认为语言是“内在”的“陈述”（V. A. c.：第 235 页），因而是一种表达（Expression）；马克思认为语言是“共同体的存在”，黑格尔认为语言是“精神的存在”（VI. C. c.：第 478 页）。——马克思不仅把黑格尔的思想转向了外部，而且打破了后者的理论秩序。因为黑格尔把二元的符号关系（符号、表象 / 意义、事实）（*Enz*，§462）进一步分解为同一性哲学意义上的二元关系。思想“不再有任何意义”（§464），它“就是事实”本身（§465）。理智“知道一切被思想的东西都是存在的；而一切存在的东西，只要它是思想，就只是存在”（§465）。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思想只能存在于语言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 57*）中，思想被视作通过生产和再生产达成的“对世界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以精神和语言对“直观和表象”的“加工”为形式的，在其中，“实在主体”作为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和对象，“仍然是在头脑之

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Gr*，第 22 页；MEW 13，第 632 页）

在科学和哲学寻求如何达成“正确的述说”（参见 *Gr*，第 23 页）的过程中，上述这种非同一性使得意义成了其中的重要因素。从根本上说，这个过程是没有止境的——某个符号所指为何，只能通过其他的符号作为（皮尔斯 [Peirce] 意义上的）“解释项”（Interpretant）加以澄清，而解释后者的所指又需要另一些解释项，如此以至无穷——不过从语用上说，这个过程是有限的：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边界是由符号的目的及其形式、它们的权力关系、约定俗成以及习惯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1.4 语言的产生与意义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语言理论的最重要论述是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中作出的。瓦格纳（Wagner）在两个方面损害了价值形式分析的社会形式规定性：他不去分析实践形式，而是把推理建立在自然化的价值概念上，并将其转变成了意识哲学关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论述：“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用来满足他的需要的……外部的资料对他的需要的关系”，因而“外界物被赋予了价值”。（转引自 MEW 19，第 362 页）在马克思看来，瓦格纳所谓的“给事物赋予价值”并不是独立的意识过程，而是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目的，对自然对象的“占有过程”。随着该过程的不断重复，事物的属性就在“头脑中”留下印记，人们也就学会了“首先区分出”那些有用的东西。语言命名的一个基本功能就在于使这种区分可以复制和交流。“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这是从存在语言这一点必然得出的假设〕的需要服务的。”（第 363 页）（由此出发，马克思还对语言的功能作了进一步区分，并将其视作“精神的”生产力；参见 MEW 18，第 620 页。）

名字本身是任意的，但它的意义则不是：它“用来表明，他们在实际地利用这些产品”（MEW 19，第 363 页）。因此，名字是对此的简称（关于作为简化的抽象过程的语词，参见 MEW 20，第 20、503—504 页；27，第 457 页；4，第 130 页；*GR*，第 237 页）。故而马克思指出，命名过程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物化（Verdinglichung），也就是人们只注意“这些产品对他们有用，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第 363 页），尽管这只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使用方式而作出的。在特别的命名过程中，意义本身并不是实体概念，而是一种实践上的关系和行

为概念。名字对事物进行了描述和认定，它的意义则将事物置于一种社会关系之中："好"意味着一种有用的**关系**，一种实用物（Praxem），也意味着人们"实际上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在与此全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中，皮尔斯提出了类似的"关系逻辑"概念，参见 Eco 1987，第 43 页。）

在此，马克思对瓦格纳语言研究的分析就到了尾声。瓦格纳把政治经济学中叫作"使用价值"的东西"改称为'价值'"，又试图从这个"**概念**"中得出"使用价值"。"做到这一点，只要在'价值'这个词的前面重新加上原先被省略的'使用'这个词就行了。"（第 364 页）通过列举各种替换的尝试（例
101 如可以把瓦格纳论述中的"价值"一词替换为"财物"、"价格"，或"财宝"），马克思表明瓦格纳的论述只是换汤不换药的说辞："**内容**并不因为这种说法的**改变**而改变。这始终只是**在观念上标明或确定**作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所以，事实上只是认识和承认一定的外界物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资料。"（MEW 21，第 366 页；参见 4，第 111 页）

1.5 语言意义作为语言中阶级斗争的组织过程。瓦格纳那种"误导人的论述方式"（第 365 页）没有任何科学上的用处，不过它的确有策略上的含义，它表明：没有"私人资本家"参与的"社会生产过程"是不可想象的（参见 MEW 21，第 359 页）。马克思认为能指的"价值"就是所指的**使用价值**，从而给短暂的形式赋予了永恒的价值。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在生产和占有使用价值；与此相反，价值则用同时代的政治经济语言描述了这样一种形式，在其中私人劳动分工生产出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作用。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对于使用价值（亦即事物的自然形式）的抽象过程对价值形式而言是建构性的，因而瓦格纳实际上试图通过把"价值"作为"高级别的表达"，从而令"使用价值"从"价值"的反义词（Antonymie）变成它的下位词（Hyponymie，即指概念上内涵更窄的词，例如"红花"是"花"的下位词。——译者）。（Lyons）

在这方面，马克思也向词源学寻求帮助。他对瓦格纳所援引的贝利（Bailey）和罗德贝图斯（Rodbertus）的观点作了考察，并通过自身的词源学研究，发现事实上，"value，valeur，Wert"（分别是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价值"一词。——译者）"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 Wert

=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MEW 26. 3，第 291 页；也可参见 19，第 373 页）

1.6 **意义领域的霸权化**。因此，“价值”这个词的意义转变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的普遍化这个经济转变分不开的，意义层面与实际的支配关系有着对应关系：价值形式支配和调控着使用物的生产和流通，这在语义层面就体现为：“价值”的表述也被用于不具备价值形式的关系中（例如伦理、爱、使用“价值”等）。于是“意义”概念便产生了某种隐喻的双向性，这种双向性使得价值形式的语义领域——其核心是“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第 359 页）——和来自人类普遍领域的所指发生了重叠，反过来说，后一领域具备了前一领域的形式。

《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探讨了经济意义的这种高级地位问题。功利主义（如霍尔巴赫 [Holbach]）剥夺了“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的“特有的意义”，并将其视作“第三种关系即**功利关系或利用关系**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功利主义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exploitation de l'homme par l'homme，人剥削人）”。（MEW 3，第 394 页）在社会结构上，这种特定的意义被人格化为“资产者”（Bourgeois）。“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第 395 页）甚至当他无法成功这么做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也就是说，他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语言劳动来做到这一点。“金钱”构成了这些语言劳动的物质基础，“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同上）。如果我们既反对把一切个人活动都归结为功利关系，同时又不愿放弃功利关系这个概念本身，那么我们就应当对“意义”概念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1.7 **义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为“义释”（Paraphrase）（MEW 3，第 280 页）或“义同词异的解释”（*Umschreibung*）（第 394 页）——它“只不过是把一种关系改写成另一种关系的存在方式而已”（第 280 页）。义释的一种手法就是使用模棱两可的用语（Äquivokationen）（《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到的“同义语”[Synomymik]，其实与现代语言学中的同义词概念相反：后者说的是意义相同的不同能指）。义释的目的是“把经验的关系变成思辨的关系”（第 257 页）——正如施蒂纳

（Stirner）对于同音词“Spekulation”（兼有商业投机、哲学思辨的含义。——译者）所做的一样，他“大叫大嚷地反对哲学思辨，他认为这样一来他也就取消了他一窍不通的商业投机了”（第 258 页）。（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把黑格尔意义上的“Wechsel”［变换］，即“现象的规律”混淆为经济范畴中的“期票”概念，同上。）或者把诸如“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的特定阶级关系变为“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从而削减其语义上的力量，也如同施蒂纳“玩弄例如 Geld（金钱）和 Geltung（效用）、Vermögen（财产）和 vermögen（有才能）等等之间的字源上的联系”（同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从整体上进一步分析了意义对表象的作用：没有事实联系的修辞“转变”（Übergänge），对应当有多种规定性的概念强行消除歧义的做法，“细微的区别”和“良心学”（Quästinculis），“青红皂白一律不分”，建立“同位语的链条”，通过意思、字源和发音上的相似性使实际无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以及“等式”（Gleichung）诸如此类。（第 253—262 页）

103

1.8 **阶级语言**。统治关系构成了各意义领域中语言霸权的基础。反过来，语言霸权也为统治关系奠定了基础。“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 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 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价值）；commerce，Verkehr（商业、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MEW 3，第 212—213 页；关于“资产阶级的语言”，参见 MEW 8，164 页；MEW 3，第 284 页；MEW 26.2，第 273 页）

为了认识这些模棱两可的用语本身，我们有必要考察它们与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具体状况之间的联系。作为不同意义之整体的共同能指表明了语言的分裂。这也体现了具体意义整体所特有的阶级和形态。“私有财产不仅夺去人的个性，而且也夺去物的个性。土地与地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机器与利润没有共同之处。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土地只有地租的意义，他把他的土地出租，并收取租金；土地可以失去这一特性，但并不失去它的任何内部固有的特性，不失去例如任何一点肥力；这一特性的程

104 度以至它的存在，都取决于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都是不依赖于个别土地占有者的作用而产生和消灭的。机器也是如此。”（第212页）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把黑格尔的反思理论解读成唯物主义，而是用阶级理论消解了它。黑格尔认为，“人对事物言说，将其视作属于自己的，并生活在精神的自然之中，即在他的世界中，这就是对象的存在。精神则表现自身”（*Jenenser Realphilosophie* II，第183—184页）。马克思把这里的“人”替换成了社会阶级及其不同的意义。为了分别规定它们，马克思在拥有特定形态的意义和不具备特定形态的意义之间作了普遍的区分。（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的向来属我性”[Jemeinigkeit]以及“存在者和存在之间的区别”[ontisch-ontologische Differenz]，则可以视作此后消解阶级理论和形态理论上的区别的一种尝试。）

1.9 **概念的文化。**伴随着“个人的生产关系”在劳动分工中分化为“政治和法律关系”，并获得了相对于个人的独立性，马克思也分析了这种“独立”过程对语言的影响。“概念”不再如“普通的意识”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现实关系的“表现”，相反，“分工的结果使政治家和法学家注定要崇拜概念并认为一切实际的财产关系的真实基础不是生产关系，而是这些概念”（MEW 3，第347页）。只有以“概念”批判的形式入手讨论现实关系问题，哲学家才能正确把握它，概念是“神秘力量”，它似乎有着自身在语言上的生命。（同上）因此，施蒂纳把“私有财产”变成了“‘财产’的抽象概念”，以便利用“财产”（Eigentum）与“自有”（eigen）概念之间的字源学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所以，对施蒂纳而言，共产主义取消私有财产的观点是矛盾的，不必“就现实的私有财产说一点什么”（第211页）。如果哲学家要谈论现实的私有财产，那么他们就必须通过某种自我批判的诠释学，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第433页）。“财产”与“独自性”（Eigenheit）之间的字源学联系体现出了一种分裂：“实际上，我只有在有可以出卖的东西的时候才有私有财产，而我固有的独自性却是根本不能出卖的物品。”（第211页）因 105
而私有财产的标准就在于对“他人劳动”的“支配”。（第212页）

1.10 **历史意义。**语言在哲学中的独立主要体现在：字源学联系不是被用来澄清问题，而是被用来替代对事实的分析。这个状况的根源在于把语词的“字源学意义”和它的“历史意义”混为一

谈（MEW 21，第 73 页），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并没有按照当时刚刚出现的科学字源学的方式（F. A. Pott 的 *Etymologische Forschungen*，1833；另外，马克思参考了 H. J. Chavée 的 *Essai d'étymologie philosophique*，Brüssel 1884；参见 Mew 26. 3，第 291 页；MEW 30，第 414 页），通过语言柏拉图主义的路径考察所谓“真”概念，而是对意义作了历史性的分疏。

首先应当批判两种相反的误用情况：（1）把一个词的初期意义固定下来，将其视作该词的真正含义，并使后来的意义受其支配——除了前面提到的“价值”和“财产”的例子，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论述也属于这类：“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宗教一词是从 religare 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被认为是宗教。（MEW 21，第 284 页）（2）把某些词语，例如“资本”、“资产阶级社会”等，当前具有特定形态的意义反过来投射到以前的时代中去，而在那个时代，该语词并不具备，也就是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意义。（参见 MEW 28，第 382 页；20，第 194 页；25，第 795 页；*Gr*，第 168—169 页以及第 412 页）

历史意义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对古代共同体的描述中。在讨论“希腊人的氏族”宪法时（*Ursprung*，MEW 21，第 98 页及以下），恩格斯批评“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βασιλεύς）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第 103 页），并把这个词翻译为“国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用这些名字描述社会结构立场的社会职权机构时，这种意义上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第 104 页），但与“国王”不同，他“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第 105 页），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出现。但无论如何，从字源学的观点看，把 βασιλεύς 翻译成“国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önig’（Kuning，国王）是由 Kuni、Künne 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思”（同上）。

1.11 **翻译到另一话语过程中的意义变化**。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为“翻译”问题的意义问题指的并不是不同语言中词汇的翻译，而是不同话语之间的翻译。“德国的文学家”去除了法国文学的“所有直接实践的意义”，并将其转变成了哲学。“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

106

的统治的废除’等等。”（MEW 4，第486页）“把法国文学的发展变为哲学上的空话”是以占有语境的变化为基础的。法国文学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一种文字表现”，而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第485页）“实践意义”意味着从实践的观点，尤其是经济关系（作为其批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此试图把对意义的分析与对意义之重要性及其社会动机的分析结合起来。

1.12 **意义、含义、真理。**马克思多次提到了语词，也就是语言的表达（主要可以潜在地区分为表达的物质与内容）与“含义”（Sinn）之间的区别。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见到诸如“无含义的符号”、“没有含义的”、“非理性的”和“空想的表达”之类的话。（MEW 16，第130、134页；26.1，第373页；23，第559页）意思相近的还有“空话”、“谈论方式”、“单纯的语言形式”等。（参见MEW 3，第280、433页；19，第15页）这类用词或语句固然是有意义的，但由于它们无法被理解，因此是没有“含义”的。可以认为，它们缺乏“与现实性的关联”（MEW 3，第435页），或者说“不存在”所说的“这种东西”（MEW 16，第130页），还可以说：这些表述仅仅包含一部分特定的含义“条件”，但人们并未对其加以思考（MEW 19，第15页）。如果某些词语和句子的意义要求对语言之外的现实性进行判断，那么徒有这些词和句子便也是没有含义的，因为这意味着：“不存在”这些谓词所描述的“这种东西”。

当然，我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思考现实关系，确定事实的存在，以及陈述的为真条件——这是一种“同义反复”（*Or*，第22页）。它假定了语言具有能够“从语言和思维的王国引到现实生活中去”（MEW 3，第433页）的神奇力量。一个语词“仅仅是一个词”，除了标示客体之外，它与“其所标示的客体”无关（参见第435页）——它不是要反映客体，也不具备自身的存在。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与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交织在一起或与其密切相关的实践，但它不会上升到前面两种实践。（参见上书）只有当反映实践时，思想才拥有“含义”，而至于思想究竟是空洞的逻辑，抑或是理论，亦即关于对象的“客观真理”，都不是仅仅通过理论就可以决定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MEW 3，第5页）

2.1 马克思著作中体现出的那种建

立统治理论语义学的热情，在后来的思想家中并没有延续下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意义问题的理论指针，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E*）在350页篇幅中仅仅援引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一处理论论述。（LW 14，第97和132页）列宁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解读是反映理论，因此“‘客观真理’的意义**无非**是对象的**存在**（亦即‘物自体’），它可以**正确地**被思想所反映”（第98页）。因此，关于“客观真理”的问题应当由知识，而非实践所决定。由于担心“对外部对象的存在可能引发怀疑”，列宁摒弃了符号理论而采取了反映论。（LW 14，第233页）

只有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符号理论和知识理论经历了**语言转向**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认知反映只能以符号和符号体系之意义的方式存在。”（*Marxistische Philosophie*，1967，第584页）此后，符号实用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结构语言学等逐步被学界所接受，但也往往因为其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而受到批判。正统的反映论研究范式则与其同时并存。

2.2 雷斯尼科夫（Resnikow 1948）试图通过在“价值”与“意义”之间建立相似关系，给出意义的社会理论界定。（俄语中的“意义”一词也有“尊严”的含义，并且字源学上和“价值”相关[参见上文马克思的论述]。）“作为事物的可见自然属性的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它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中介得以实现； 108
与此类似，作为语词的可见自然属性的意义，从根本上说也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它通过语言的中介而得以实现。”（1977，第132—133页）这种试图把意义问题放在“社会交流的过程中”（同上）讨论的做法同样会导致客观主义。“语词的主要内容（意义）是概念，而概念是对客观现实性的**抽象化和普遍化**了的反映。”（第148页；参见第184页）资产阶级意义理论往往会被刻板地认为缺乏“语言和现实性的联系”（第149和185页），从而受到指责。

2.3 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 Klaus）批评了“新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语言哲学”（第30页），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第44页）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克劳斯也试图把这种语言哲学的成功吸收到“唯物主义的反映理论中”，并阐明“反映理论的符号学，即语义、句法和语用的维度”（VII）。从这个兼容并蓄的立场出发，克劳斯提出了“现代唯物主义基础研究的符号学”（第42页）的方针，他认为这将给出“语言建构的理想化图景”——有希望应用于机器语言的开发。“逻辑

语义学”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功能”，也就是符号和“反映”（亦即“概念”或“陈述”；第 40 页）之间的关系，一切社会语义的方面都可以视作符号学的子学科：“语用学”研究“符号”和（心理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关系；而“符 像 学”（Sigmatik。Sigmatik 是克劳斯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目前国内似没有适用的译法。参考这个概念在克劳斯理论中的定义［符号与对象之间基于图像的关系］，译者现暂译作“符像学”。——译者）处理“反映与被反映的客体之间的关系”（第 42 页），从而提供了符号学的“物质基础”，此外的其他一些概念如何建立，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理论”（参见 Reschke 1965）的任务。不过，克劳斯没能始终坚持这种划分。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中，人们不受剥削”这句话“在语义上为假”；但同时他也主张这句话“不符合事实”（第 159 页），按照克劳斯的术语，这就构成了“符像学的”（sigmatische）基础。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自洽，是因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真理问题是处于支配地位的，相比之下，意义问题往往并不被讨论（它被认为在语义上为假）。反过来说，这种对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其实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能涉及意义问题。客观主义并不试图把真理带到自己这边，相反，它总是臆测自己处于真理的那一边。但这只有在 109
争取意义的过程中才会发生（这里批判性地暗指对于陈述的证实 / 证伪的科学标准）。只要知识是由语言构成，那么它就具有社会性，因此其中也就包含了意义中所积淀的统治问题。与它的资产阶级反对者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倾向于把统治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霸权问题）从语义学中排除出去。“党性”（Parteilichkeit）的概念为此问题的讨论提供了补充并使其得以可能，在克劳斯看来，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句子语用分析的对象。（第 161 页；参见 1964）

此后，“对意义结构的研究”明确了研究对象，实践的维度大多被从中剔除（参见 Wotjak 1971），充其量只有修辞上的作用（同上书，第 51 页）。“但物质对象或事件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变为符号，即：当它们与将其当作符号加以使用的人，与同它们存在某种关联（比如作为名字、图像等）的现实性，与它们在其框架中发挥作用的某种符号体系，比如语言，处于一定的复杂关系之中时。”（Schaff 1961，第 243 页）

2.4 列宁还提到了一种建构论的路径：“人的意识不仅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而且也创造着客观世界。”（*PH*，LW 38，第 203 页）这个论述成为维戈茨基

（Wygotski）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理论出发点，这种心理学试图在对象互动行为的语境中，通过行为理论来研究意识问题，并通过意义理论研究精神活动的问题。列宁的这个论述还被认为与马克思蜜蜂筑巢的例子相关，其主旨在于把语言符号视作精神活动的工具。（参见 Jantzen 1991，第 90 页等处）总的问题在于："外在"活动是如何经由"意义"从而作为凝结在语言中的社会—历史经验而得以"内化"（interiorisiert）的？（参见 Wygotski 1934，第 283 页及以下；A. N. Leontjew 1984，第 19 页及以下；Lurija 1982，第 156 页及以下）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不仅是时空上的，而且还涉及"意义空间"的感知，在语言体系中，"意义空间"具有客观的存在形式。（A. N. Leontjew，转引自 A. A. Leontjew 1987，第 134 页）由于"客观的"意义"在个人的意识系统中发挥功能"，因此它们不仅作为主观的意义"实现"自身，而且作为"体现于它们之中的个人含义——具体主体的自为存在——的运动""实现"自身。反过来说，这种内化过程与"个人含义在充分意义中的重构"相对应，该意义则必须在集体中得以维持。在戏剧中，当"个人含义"无法"在充分的意义中表述"时，这种重构过程就可能陷入危机。（A. N. Leontjew，转引自 Krüger 1990，第 480—481 页）

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四个"反映层面"："对象意义"、"工具意义"、"活动意义"，以及（单数形式的）"自我意义"，这些层面总是体现在个人和社会中。（根据 Jantzen 1991，第 69 页）与此相反，莱昂季耶夫（A. A. Leontjew，1987，第 134—135 页）根据各自的"存在形式"，区分了语词意义、对象意义和角色意义。语词意义"作为特定的系统准对象（符号）"存在于"**语言的感觉基础之上**"，语词意义的运作带有"某种'外在'的所与性"。和语言意义不同，对象意义位于"**感知反映**（也就是对感知、记忆、幻想等的反映）**的感觉基础之上**"（第 135 页），它"先于现实对象（以现实和表象形式）的'在场'"（这种意义的存在形式由 Holzkamp 在 1983 年提出）。角色意义（如社会规范等）则"存在于**活动本身之组成部分的感觉基础之上**"。

3.1 布莱希特（Brecht）的研究进路

在许多方面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使用理论'"颇为相似（Fahrenbach 1986，第 48 页），但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单纯地描述日常语言使用，并仅仅对哲学语言的使用展开批判"（第 48 页）不同的是，布莱希特体现了更多"参与的意图"（第 50 页）。布莱希特回到了列宁最初那个"语言本身就是行动"（LW 9，第 58

页）的观点。“那正在形成和构造出的句子必须在这样的地方理解，在其中它们作为行为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反映、表达和反射。”（GW 20，第 173 页）此外，他还反对客观主义（参见 GW 20，第 69、147、173 页；19，第 529—530 页），并提出了一种辩证的原则。“诗人们把语言视作行动的工具，于是当他可以与自身对话时，他就知道如何向他人言说了。”（GW 12，第 458 页；参见 16，第 689--690 页）为了对（哲学）语句进行批判性的意义分析，布莱希特发展出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寻求所给句子能够出现的那些场合。”（GW 20，第 157 页）“它会出现在对话的哪一方？它又是因为怎样的目的而被说出来的？”（同上）“在新百科全书中查找句子的解释”：“1. 谁使用这个句子？ 2. 它对哪些人是有用的？ 3. 它要求什么？ 4. 与之相应的实践是什么？ 5. 它会导致哪些句子？它又是由哪些句子支持的？ 6. 它在怎样的场合被言说？它被谁言说？”（GW 20，第 174 页）

111

3.2“新语言学”的创立者马特奥·巴托里（Matteo Bartoli）研究了葛兰西关于意义的思考，葛兰西关注的问题是：下层社会集团（Subaltern）为什么不仅获得了生产能力，而且也获得了语言能力，并拥有社会化过程进行自我规定的调控的手段？作为“特定关系和概念的整体”（*Gef* 6，H. 11，§12，第 1375 页），语言不仅是一种语法形式，而且也是民众得以维持下层地位的中介，以及克服下层地位的工具。关于“语言的问题以及作为‘技术问题’的语言”，葛兰西富有洞见地指出：“哲学”应当被视作“对世界的把握”，尤其应当被视作“改造人民‘思想’的文化斗争”。（H. 10，§44，第 1334 页）为了“有组织地参与”（*Q*，第 29 页，§3，第 2345 页）这场斗争，我们需要“关于语言现象的批判性和历史性的概念”（H. 11，§24，第 1427 页），葛兰西洞见了语言现象从根本上具有隐喻的性质：“整个语言就是隐喻，这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被标示的‘东西’（亦即可通过感觉感知的物质对象）的隐喻，另一方面，它也是意识形态意义的隐喻，这种意义是在先前文化时代中赋予词语的。”（*Gef* 4，H. 7，§36，第 892 页）第一个方面的隐喻是**批判性的**，它表明了两重的差异：语言表达既不是被标示的东西，也不仅仅是这些东西的名称。第二个方面则是**历史性的**，它表明了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差异，两者都不享有（实体化的）特权（布加林在讨论“内在”概念时也作过类似表述，参见 *Gef* 3，H. 4，§17，第 476—477 页）：“语言是有生命的，同时它还是以往生活的化

石博物馆。”（第 477 页）“意义的历史”（葛兰西在上下文中提到了它的创立者布雷厄尔 [Michel Bréal]）也具有“文化史的维度”（同上），因为我们应当把语言“视作社会产品，视作特定民族文化的体现”（*Gef* 4，H. 6，§ 71，第 760 页）。

因此，以解放为意图的语言政策，它的目标不是要像雅各宾派那样强行颁布新语言，而是要和传统建立有机的、批判性的联系（*Q*，29，§3，第 2345 页），并进一步推广葛兰西关于语言隐喻性的观点，通过隐喻的方式掌控自身的语言，从而使语言变得透明。葛兰西曾有这样的想法：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杂志中开设“语法学—语言学”，在其中“语言……[必须] 被视作对世界的把握，视作对这种把握的表达”；“我们可以对表达作技术上的完善，并在量上（即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质上（即获得意义更精微的方面，以及更完整的句法和风格秩序）对世界及其历史的把握进行深化和扩展”。（*Gef* 5，§131，第 686—687 页）葛兰西反对把意义实体化，并将其抽象地固定在词典中的做法，他提出了百科全书的设想（这个观点在符号学中也有影响，参见 Eco 1985，第 77 页及以下），也就是说，他计划对概念的使用方式进行历史性和批判性的反思。在他的《狱中札记》（*Gef*）里就有一栏名为“**百科全书式的概念**”，其中

112

的研究内容包括意义的解释、联系和甄别，不同语境和历史中说话方式的差异，以及对字源衍变的考察等。

3.3 最早的明确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理论，是由梅德韦杰夫（Michail Bachtin von Pavel Medvedev 1928）和沃洛西诺夫（Valentin Vološinov 1929）等人提出的（Friedrich 1993）。该理论以“意识形态科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遵循着以下三个指导原则：“（1）意识形态不应与符号的物质现实性相分离……。（2）符号不应与社会交流的具体形式相分离……。（3）交流及其形式不应与其物质基础相分离。”（Vološinov 1929，第 68—69 页）

“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从洪堡到克罗齐）把语言视作在个体言语行动中实现的“意识过程”，它是一种现实（*energeia*）（第 99 页），相反，在“抽象的客观主义”（从笛卡尔 [Descartes]、莱布尼茨 [Leibniz] 到索绪尔 [Saussure]）看来，语言体系（*langue*）是“言语”（*parole*）的社会性的部分，它与“个人”是相对的（第 112 页）；与此二者都不同，沃洛西诺夫试图把语言表述视作“**一种纯粹社会性的结构**”（第 163 页），并认为语言体系“**始终处于变化过程中**”，“它是通过说话者在社会中的语言互动而得以实现的”（第 162 页）。这里有两个环

节对于语言行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它们就是语言行动所处的阶级斗争和体制形式。各个阶级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符号材料。“这就使得**每个意识形态符号都有了不同的侧重点**。符号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第 71 页）

113

沃洛西诺夫认为，在各阶级话语的表述中所呈现的“符号的社会性多重点化”（第 71 页），可以为后来的话语分析和社会语言学提供一个研究领域，即：内容和主题“被实现”（例如被判断、被表达、被经历、被思考等）的**“语言交流的形式和类型”**（第 67 页）。沃洛西诺夫把这些陈述形式称为“言说类型”（Redegenres）（同上），它是被“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结构所规定的”。需要阐明的问题是：“等级式的交流组织对这种陈述过程产生了哪些强有力的影响。”而“语言礼仪”、“言说行动”等，则作为“陈述过程对等级式社会结构的适应”而发挥着作用。（第 68 页）

因此，沃洛西诺夫的“意义科学”（第 166 页）的出发点不是语词，而是“陈述”。后者构成“主题式的统一体”（第 163 页，注释 1）。“主题”（Thema）正是“成为符号之对象的那种现实性”（第 70 页）。它依赖于“具体的历史情境”（第 164 页），究其本质，主题“是一次性而不可重复的”（第 163 页）。与主题不同，沃洛西诺夫把其他各种“**可重复和始终自我同一的**”陈述因素称为陈述的“意义”（第 164 页），陈述的意义是“其所包含的语词、语词的形态学和句法学联结，以及问题意图等因素的意义”（同上）的再结合。因此，意义是**“实现主题的机构”**（同上）：“意义本身并无所指，它只拥有一种潜力，即在某个具体主题内部的意义可能性。”（同上）但这也意味着，某一串复杂的语音或词位（尽管它们可以唤起某些内涵，但并不是信号）无非是语言学家的“虚构”（第 139 页），它们并不具备“唯一固定不变的意义”（第 165 页）。实际上，**“多义性”**（同上）正是语词的特征。哪种潜在的意义（主题）会被实现，取决于“语境”和外在于语言的“情境因素”（第 164 页）：“有多少种语境……，就会有多少种意义。”（第 138 页）

语言学家虽然了解这一点，但他们往往“单纯地用并列的方式”来考察语境（第 139 页），而不是“从社会—语言的立场出发”（Bachtin 1933/1934，第 167 页）重新分析它们。沃洛西诺夫和巴赫金（Bachtin）对此提出了“语言的辩证法原则”（第 166 页）；对此原则的忽视将会导致对单义性的虚构以及对意义的“实体化”（Vološinov，第 139 页）。在翻译某个外语词汇时，我们寻求的是它的同义词；与此相反，在理解“语词”时，我们寻求的则是说话者语词的“反

114

义词”。“我们在陈述中每一个要理解的语词之上都加上了一串自己的回应词（Antwortwörter）。这些回应词愈是丰富和精炼，我们的理解也就愈是深刻……”（第 167 页）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梅德韦杰夫和沃洛西诺夫的意义理论才开始渐渐被西方学界所接受。他们后来都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中，斯大林禁止在语言学领域从事任何与阶级斗争有关的语义研究（对此的历史语境，参见上书，第 69—84 页），同时他还用“‘阶级’语法学”这个说法驳回了对此的质疑（关于苏联语言学的发展，参见 Eschbach 1977 以及其中给出的参考文献）。

沃洛西诺夫的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前瞻性（关于其理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符号学中的位置，参见 Threadgold 1986）：（1）他的“辩证式理解”的思想与皮尔斯的解释项理论很相似，而后者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语言转向**中促成了实践转向。皮尔斯认为，解释项不仅在原则上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辩证过程，而且它还是一个**社会性**过程。（Bernstein 1975，第 24 页）哈贝马斯试图在一种无统治的话语理论的语义上解读皮尔斯的“最终选择”（final option）概念，并认为它是“一个反事实的概念……，是一种在理想条件下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来自内部的倾向”。（1992，第 30 页；关于对哈贝马斯解读皮尔斯的批评，参见 Bernstein 1975）（2）他对主题与意义的区分，对语境和情境选择的关注，以及对意义潜在性而非实体性的论述，都预示了后来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 1985，第 108 页）那个颠覆了传统研究路径的指令语义学（Instruktionssemantik）。3. 沃洛西诺夫认为“符号是阶级斗争的战场”，并且区分出了“言说类型”，将其视作语言的社会化形式，这个思想则是佩舍（Pêcheux）的话语理论的先声。（参见 Demirović 1988）

参考文献：

G. Abel, *Interpretationswelten. Gegenwartswelten jenseits von Essentialismus und Relativismus*, Frankfurt/M 1993; G.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2: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ünchen 1980; M. Bachtin, *Das Wort im Roman* (1934/1935), in: ders., *Die Ästhetik des Wortes*, Frankfurt/M 1979, 154-300; E. J. Bernstein, *Praxis und Handeln*, Frankfurt/M 1975; A. Demirović, »Redegenres und soziale Praxis. Zur politischen Intervention des Redens«, in: *kultuRRevolution* 17/18, 1988, 71-77; U. Eco, *Zeichen*, Frankfurt/M 1977; ders., *Semiotik und Philosophie der Sprache*, München 1985; ders., *Lector in fabula*, München 1987; J. Ellerbrock,

u.a., »Ansätze materialistischer Sprachtheorie«, in: *Argument* 95, 18. Jg., 1976, 44-69; U. Erckenbrecht, *Marx' materialistische Sprachtheorie*, Kronberg/Ts 1973; A. Eschbach, »Einleitung«, in: Resnikow 1977, 7-54; H. Fahrenbach, *Brecht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1986; E. Fischer-Lichte, *Bedeutung. Probleme einer semiotischen Hermeneutik und Ästhetik*, München 1979; J. Friedrich, *Der Gehalt der Sprachform. Paradigmen von Bachtin bis Vygotskij*, Berlin 1993; 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Frankfurt/M 1992;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84, Berlin/W 1984; M. Heidegger, *Logik. Die Frage nach der Wahrheit* (1925/1926), GA Bd. 21, Frankfurt/M 1976;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W. Jantzen, *Psychologischer Materialismus, Tätigkeitstheorien, marxistische Anthropologie*, Hamburg 1991; G. Klaus, *Semio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63; ders., *Die Macht des Wortes*, Berlin/DDR 1964; H.-P. Krüger, *Kritik der kommunikativen Vernunft*, Berlin/DDR 1990; A. A. Leontjew, »Existenzformen der Bedeutung. Die Bedeutung als allgemeinwissenschaftliche Kategorie«, in: W. Maiers, M. Markard (Hg.), *Kritische Psychologie als Subjekt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87, 128-147; A. N. Leontjew, *Tätigkeit – Bewußtsein – Persönlichkeit*, Köln 1982; ders. u.a., *Grundfragen einer Theorie der sprachlichen Tätigkeit*, Berlin/DDR 1984; A. R. Lurija, *Sprache und Bewußtsein*, Köln 1982; J. Lyons, *Einführung in die moderne Linguistik*, München 1971; M. Marković, *Dialectical Theory of Meaning* (1961), Dordrecht-Boston-Lancaster 1984;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Lehrbuch*, hgg. v. A. Kosing, Berlin/DDR 1967; P. Medvedev, *Die formale Methode i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28), Stuttgart 1976; C. K. Ogden, I. A. Richards, *Die Bedeutung der Bedeutung*, Frankfurt/M 1974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23); M.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Linguistique, Sémantique, philosophie*, Paris 1975; Ch. Peirce, *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 hgg. v. K. O. Apel, Frankfurt/M 1967;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W 1979; M. Reschke, »Semiotik und marx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in: *DZPh*, 1965, H. 1, 87-101; L. O. Resnikow, *Zeichen, Sprache, Abbild*, Frankfurt/M 1977; A. Schaff, *Einführung in die Semantik* (1961), Reinbek 1973; ders., *Essays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Sprache*, Frankfurt/M-Wien 1968, 26-45; T. Threadgold, »The Semiotics of Vološinov, Halliday, and Eco«,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4. Jg., 1986, H. 3-4, 107-142; V. Vološinov, *Marxismus und Sprachphilosophie. Grundlegende Probleme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i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1929), Frankfurt/M 1975; G. Wotjak, *Untersuchungen zur Struktur der Bedeutung*, Berlin/DDR 1971; L. S. Wygotski, *Denken und Sprechen* (1934), Berlin/DDR 1964.

托马斯·韦伯 撰
王师 译，杨柳新 审

116 参考：

Abbild, Ausdruck, Basis-Ästhetik, Begriff,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Bewußtsein, Bild, Bourgeoisie, Brecht-Linie (II),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nken, Diskursanalyse, Diskurstheorie,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rkenntnistheorie, Hegemonie, Hermeneutik, Ideologie, Innenwelt/Außenwelt, Interpretation, Kommunikation, Lernen, Metapher, Objektivismus, Öffentlichkeit, Parteilichkeit, Phrase, Rhetorik, Semiotik, Signal, Sinn, Sprache, Sprachkritik, Standpunkt, Symbol, symptomale Lektüre, Tätigkeit, Übersetzung, Verhältnisse, Verschiebung/Verdichtung, Wahrheit, Zeichen

需要（Bedürfnis）

A: ḥādja. – E: need. – F: besoin.
R: potrebnost' (потребность).
S: necesidad.

“需要”这个词在18世纪进入普通用语，它既意为主体需要某事物的那种状况，也意为主体所需要的对象。如果说主流意见起初把需要等同于相关对象（如恩格斯说：“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MEW 2，第343页；参见MEW 1，第503、506页），此概念不久就包含紧张关系自身。“需要、内驱力是目的最明显的例子。它们是在鲜活主体内部发生、人所感觉到的矛盾，从事否定之否定的活动。”（Hegel，*Enz*，§204）马克思表示：“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Randglossen*，MEW 19，第363页；参见MEW 40，第452页；2，第127页）

马克思的介入把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观念与黑格尔联系起来，把它们移入生产和消费的运动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来看，他不仅接续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RPh*，§§189及以下），使其摆脱单纯“有限知性”的束

缚（MEW 42，第 45 页），而且相较于黑格尔，还提出了扬弃需要和劳动二者的“劳动的体系”（*RPh*，§ 189；*Gr*，第 193、322—323、434、768 页；MEW 43，第 197、310—311 页）。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幻想，只要“理解”生产和消费的“真正的**本质**”就足以恢复二者“自在”存在的统一。马克思讽刺了这种幻想（*DI*，MEW 3，第 503 页），坚定不移地探究这个问题的“合理核心”，20 年后他写道，生产和消费二者“**自在地**不可分离”，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使得“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它们的对立来恢复”。（*TM*，MEW 26.1，第 255 页）分析
117 这种对立是马克思的毕生工作，他亦以此领悟革命起义的回声。他在《神圣家族》（*HF*）中强调，“**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从“他们的合作”中“意识”到“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MEW 2，第 55 页）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就像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一样），工人们在联合会中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同上）：“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Ms 44*，MEW 40，第 554 页）

因此，马克思在致费尔巴哈的信中引用了一本傅立叶主义著作中的片断“人完全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l'homme* est tout entier dans ses *passions*），他推断“自然界的主要动力与社会的主要动力一样”是“**热情的**、**不反射的引力**，并且‘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总和，这种力的总和同这些存在物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tout être ... a reçu une somme des forces en rapport avec sa mission dans l'ordre universel）”（1844 年 8 月 11 日，MEW 27，第 426 页）。傅立叶（Fourier）“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ézamy）、盖伊（Gay）等人”，把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HF*，MEW 2，第 139 页）其中共同之处是肯定感性。（同上书，第 138 页）依德尔巴赫之见，“身体的需要”要求“较之于幻影会更受优待的实物”，“我们用它们敷衍自己的精神”。（1770，第 79 页）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S 44*）中写道，“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MEW 40，第 578 页；参见 MEW 2，第 127 页）第一个结论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DI*，MEW 3，第 28 页）。针对这些对象的，主要是马克思所称“凭经验的”、“必要的”、“身体的”、“迫

切的”、“直接的”或者“应绝对满足的”自然需要和生活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就克服了如爱尔维修（Helvétius）（“人的唯一动力”是“身体的感受力”；Helvétius 1777，第84页）或霍尔巴赫（人作为“必然性手中的被动工具”，同上书，第63页）所持的狭隘决定论观点。与德萨米的接触也引发了对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批判，德萨米把“幸福”规定为自由地、“全面地发展我们的本性”，“完全满足我们一切需要”。（1842）

马克思在上述信件中言及“法国人和我们德国人对立的特性”，尤其是柏林的“批判家”，他们只承认“**理论**批判的需要”是“**现实的**需要”，鄙视全人类是“怠惰的群众”。（MEW 27，第426—427页）他同时获悉，工人们在11至12小时的工作中不仅被“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Ms 44*，MEW 40，第478页），而且不得不接受“自己妻女的卖淫”是“额外的劳动时间”——明显验证了傅立叶的命题，“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可以看出，“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同上书，第535页）。马克思同样严厉谴责异化劳动，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这种劳动本身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第514—515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登峰造极地揭露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后果”（第520页）、单纯“**拥有**”（第540页），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的**牵线人**”（第563页），而“**直接的**、自私自利的需要”（第459、547页）是主观上有针对性地表达（Zweckausdruck）全部“支离破碎状态”。消极情绪如憎恶在解放运动中的意义越大，这些情绪就越可能有策略地妨碍解放运动。因而，问题是，马克思在“私有财产”方面的判词近乎绝对，这是否阻碍了他所要求的对私有财产作“**积极的**扬弃”（第536页及以下）以及他后来所作的区分（*K I*，MEW 23，第789页），而且在意识形态上给国家社会主义的绝对化（把全部小企业收归国有）提供了理由。

生产/消费。《德意志意识形态》把生产与消费之关系的促成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及其“工具”造成了这种新需要——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MEW 3，第28页）这就既承认了主动预想需要，也含蓄地承认了**生产**需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

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第 30 页），马克思理解的“生产方式”不仅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而且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第 21 页）——此外“宗教、家庭、国家”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MEW 40，第 537 页）。“生命的生产”显现为“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因为作为“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它受制于生产力和需要并且又产生生产力和需要。（*DI*，MEW 3，第 29—30 页）马克思经常强调生产力—需要这种关系。（同上书，第 54、61、417、423 页；MEW 4，第 104、135 页；7，第 221 页；23，第 535 页；25，第 828 页）两者作为“自然力”（MEW 23，第 192 页）也包含生物促成之事，如同“由社会本身产生的需要”（*Gr*，MEW 42，第 323 页），而同时“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同上书，第 314 页；亦见于 MEW 19，第 15 页；23，第 534—535 页）。“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MEW 3，第 71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刻画了生产、消费和源于它们的运动的需要这三者的矛盾性统一，他所作的观照显露出“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MEW 42，第 373 页）。他由该视角解析性地回顾现有对抗和历史局限，把“经济学家的材料”周密考虑成“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Elend*，MEW 4，第 126 页），在这种生活中包含着物化 / 占有、吸引 / 扭斥、同化 / 异化这些过程。鉴于这种“理性的抽象”（*Einl 57*，MEW 42，第 20 页）不考虑任何对立，可把此处探讨的需要关系理解成勾勒未来的“自由生产者协会”。需要关系的活力也说明了这点：生产和消费相互渗透，彼此过分倚重；两种根源性的需要同样如此，因为“真正的”、“个体的”消费型需要呈现创造性的、关涉社会的特征，生产型消费却呈现尽情享受、充满愉悦的特征。彼得·哈克斯（Peter Hacks）依循马克思和布莱希特的传统强调：“消费是怎样的创造性事物。”（1983，第 219—220 页）“尽情享受地占有物质的和精神的现实是发挥……人的一切能力……。晚期资本主义……以错误的方式生产和消费，人与剩货和广告共存。”生产的“消费”性质与此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把“自愿的生产活动”称为“最高的享受”。（*Lage*，MEW 2，第 346 页；参见 MEW 40，第 454 页；3，第 417—418 页；20，第 274 页）若无这种内在的创造欲，非人的生产关系绝不可能长久维持。

生产和消费自身尤其产生需要，生

产是“实际的出发点……，其中又发生全过程”；就此而言，（相对独立的）消费显
120 现“为生产的因素”。（*Einl 57*，MEW 42，第 29 页）消费给生产供料，同时给它提供“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随后的例子是借助“手、指甲和牙齿”或者通过“刀叉”来解饿（同上），马克思可能受费尔巴哈的文字游戏“人吃什么成什么”启发（*GW* 11，第 26 页及以下）。此外，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因为生产通过对需要的“知觉”需要而刺激需要：“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MEW 42，第 27 页）

尽管如此，马克思仍认为需要的主要来源是消费。除了反作用于成功的生产（或者失败的生产，如国家社会主义中“计划出来的”滞销品），正是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同上）“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同上；参见 *Ms 44*，MEW 40，第 461 页）此外，“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完美的程度”；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MEW 42，第 28 页）由于马克思把“目的”和“需要”视为同义词（“〈个体〉的需要——个体的目的”，MEGA Ⅱ. 1，App.，第 812 页），在建筑师 / 蜜蜂这一比喻上（*KI*，MEW 23，第 193 页），“需要”也可以代表多次被谈及的“目的”。

需要由此获得基于观念上的方向感，同时具有物质基础的**期待力**的性质、预设目标的性质，贫困的主体借助反馈回来的对所做之事的批评积极接近该目标；亦即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关于主动性的构想取代了霍尔巴赫、休谟（Hume）、A. 斯密等人所持的见解，即认为需要只是“从背后”起推动作用的动力。这基于马克思需要理论的一个关 121
键概念，即“生产消费”概念——马克思也言及“‘生产消费’的秘密”（MEW 23，第 597 页，注释）。此概念就消除了经济学家“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MEW 42，第 26 页）的消费观。马克思也把自己的脑力劳动称

为“‘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MEW 34，第 371 页）。

产生/发展。马克思把需要的从忍受到行动、到扭转内外困境、到解放的行为和满足的行为的发展理解成“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HF*，MEW 2，第 38 页）。对个体而言，“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同上书，第 127 页）。鲁宾斯坦（Rubinstein）把本文开头提到的需要的双重特征刻画成“**依赖**”和“**追求**某事”，其时，“意志和情绪（情感、激情）……的共同原因在于需要”。（1959，第 572—573 页）而布洛赫说：“真正辩证的动力是需要；只有它作为永不餍足的需要……始终是根源性、爆炸性矛盾。”（*Prinzip Hoffnung*，第 137—138 页）所以，需要包含形成期间显现的重重矛盾。人并非始终认识到矛盾的第一阶段。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毫无例外地把需要刻画成“体验到的”、“感受到的”、“实际的，因而感到特别迫切的需要”，刻画成“渴念”、“预想”等等（MEW 1，第 33、119、292 页；2，第 43、109 页；3，第 287 页；4，第 74、154、157 页；29，第 28—29 页；32，第 332 页），常常也改写成“热望”、“欲望”、“刺激”（MEW 3，第 177、237—238、246 页；42，第 28 页；MEGA II. 1，第 768、812 页）。从感觉到的“困境”到“扭转困境”的必要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列宁谈到“物质转化成意识”即“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PH*，LW 38，第 271、106 页），还指出“群众的自发高潮越增长”，“对于……自觉性的需要”（*Was tun?*，LW 5，第 408—409 页）就越会越迅速地增长起来，这些都预示着工人阶级从受苦客体转变成斗争主体。

需要（近乎）无意识地产生，使其有别于**利益**，利益一词部分程度上来源于经济、金融（英语为 *interest*，法语为 *interêt* = 利息），已经包含有意识领会对象之意。与此相应的是，与利益轮廓较为清晰相比，需要更为漫漶，较之于利益大半关涉社会性（“阶级利益”）（如 MEW 3，第 325 页），需要则部分源于生物性（“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DI*，MEW 3，第 423 页）。尽管尤其是苏联心理学家研究潜意识（Bassin）、态度（Usnadse）、情绪（Simonow）等，威权的社会主义却闭口不谈该阶段的需要，或者在马列主义中按教条主义、唯理论把它歪曲成“非理性主义”。“觉悟（自觉性）”拜物教也妨碍人洞察 1989 年岁末发生之事的“自发”征候。

限定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受形形色色限定的需要大多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也源于人口增长（MEW 4，第 25—26 页；3，第 23、30、53—54 页等处；16，第 147—148、223 页；19，第 263 页；23，第 185 页），此外，还“由社会”产生（MEW 6，第 412 页）或者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MEW 23，第 246 页）。需要反作用于“现存生产力的相互结合”（MEW 3，第 61 页），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立刻就会“游离出”“新的需要”（MEW 43，第 187 页）。这些规定以及对生产活动“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MEW 42，第 29 页）这一事实所作的强调，在尔后以马克思理论为依据的关于需要的研究中导致两种绝对化。如加齐耶（Seev Gaziet）几乎是唯一试图钻研“‘生产消费’的秘密”的人（他关于马克思的章节是“消费——马克思理论中一个遭误解的关键概念”[Konsumtion – ein mißverstandener Schlüsselbegriff der Marxschen Theorie]），他仅把需要称为“人道生活客观上必不可少之事”（1981，第 10 页）。他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搁置限定性问题，民主德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则又滥用了此问题。“客观方面”连同作为决定者的“物质生产”（Döbler 1969，第 59 页）成为“一贯的唯物主义立场”的生搬硬套的范式（Steitz 等 1984，第 7 页），依此立场，需要同样应专注于“占有此环境”（同上书，第 33 页）。这正是以格勒泽曼（G. J. Gleserman）为蓝本的奇怪的折中主义，他虽然在心理学上承认（此处与需要近似的）利益有“指向性”，在社会学上却拒绝这点，因为这会用主观主义代替“唯物主义解释”。（1969，第 114 页）

无论被动还是主动，**需要的载体**始终是个体；既无“作为主体的社会”（MEW 3，第 37 页）或作为“人”的社会（同上书，第 187 页），亦无零星的鲁宾孙。个体总是在社会组织结构中（部落、宗族、部族、等级、阶级等）：“个体是社会存在物。”（*Ms 44*，MEW 40，第 538 页；参见 *ThF*，MEW 3，第 6 页）许多需要理论家倾向于人的构想，而在威权的社会主义中，虽有细化分析（如 Irene Dölling），仍把个体性简化成社会性。连这也可能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依据，他们认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MEW 3，第 449 页）。如果把此疑难问题重新表述成“一个**实践的**问题”（*Thf*，MEW 3，第 5 页），此问题涉及必然从受苦转到行动，需要问题便近乎赋权问题：始终因主张**群众需要**而发生改变生活方式的历史骤变；问题是，面对当今全球困境，如何能通过全新的群众需要

达成变革。若无群众需要，地球的未来显得黯淡。一如既往适用的是："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KHR*，MEW 1，第381页）

需要的对象。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自我批评道，不应说"满足物质需要"，说"用物质来满足需要"会更恰当。（GW 5，第531页）阿多诺（Adorno）在其《关于需要的命题》（*Thesen über Bedürfen*）中告诫人勿要"建立需要的等级"，因为"需要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无法分解成次要、首要"。（1942，GS 8，第392页）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建立了越来越完美缜密的等级制度并提出成对的反义词：从基本的/机体的需要相对于发达的/人的需要（Sève 1972，第323页）和感性的/性命攸关的需要相对于创造性的需要（Holzkamp-Osterkamp 1976，Ⅱ，第23页及以下）到肉体的/社会的存在的需要（Diliganski等1977）和生物发生的需要相对于社会进化的需要（Engels 1989），直至简单区分的物质的需要相对于精神的（及精神—文化的）需要。在西方左翼中，此事的基础是强调生产及其"社会性"的"统摄"性质（Sève 1972，第34—35页）而同时贬低"需要仅有机体形式"（Holzkamp-Osterkamp 1976，第35页），在东方集团国家，为了维持"基本问题"的特权，基础是优先设定"物质性"。因为把物质性简化成"肉体存在"（Steitz等1984，第31页）并臆想会有赞同消费—感性和相应的要求、意识形态这种危险，在马列主义中就又简直顶礼膜拜般地拔高精神—文化—社会性，致使伊雷妮·德林（Irene Dölling）嘲讽地问道，究竟该如何想象这些需要是"超越生理的"、"自由飘浮的，是'水上的精神'？"（1986，第197—198页）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谈及这种非感性化的现实基础，她怀疑，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需要是否确实让人类全面发展，其实得到发展的只有那类需要，那类需要的原因在于对时间和相应的产物作合理化解释的逻辑而非在于让所有感官得到施展。（1993，第276页）

面对此难题（恩格斯嘲讽地表述道，"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MEW 21，第282页），似乎应该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眼中重要的需要对象。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Ms 44*，MEW 40，第574页）他批评亚当·斯密，因为后者没有看出，"一个人'在通常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的需要"（*Gr*，MEW 42，第512页），马克思否定了傅

立叶的意见，即劳动可能“不过是一种娱乐”，辩证地说：即使“吸引人的劳动（travail attractif），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即无剥削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同上）。这里隐藏着生产性消费的“秘密”，即生产和消费两个因素的统一，正是由此个人的、“真正”的消费才可能是“生产性的”。（MEW 23，第 597 页及以下；42，第 221—222、228、577 页）

马克思、恩格斯以此表明，究竟是什么使得人类产生、发展：充满欢乐和痛苦的劳动需要、创造需要。它们尤其在劳动者把创造具体使用价值的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MEW 23，第 193 页），在协作性接触中可以感觉到、受益于“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同上书，第 345 页），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Ms 44*，MEW 40，第 544 页）的时候起着作用。这一切表明“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Gotha*，MEW 19，第 21 页）。——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并不把劳动，而是把“行为能力”视为“……人道生存最一般的总体条件”（1985，第 243 页）。但两者并非相斥，因为马克思在这点上以自由联合的，也就是获得解放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者为前提。而且，恰恰对有意义的工作的需要是消除“人的贫困”、克服“忧惧、不自由和屈辱”的决定性力量。（Holzkamp，同上）与此相应，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抵抗的美学》（*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把劳动描述成“创造性原则、人类的本质”（1975，第 351 页）。 125

除了纯粹实用性，似乎不宜把最后提到的需要分成物质的、观念的等等。加齐耶体验到他所说“基本需要”的“交织”，他在其中觉察到（1981，第 284 页及以下）：**一切皆同时**，是综合，就是反映一种“四分五裂”的现实及对其“预想”。他觉得生理性与社会性密不可分，表现在从充饥（此时，社会性体现出负面效果）直至圣餐所象征的精神—灵魂—身体的综合中。若不对感性—活力进行生产型消费，则尚未完成如此抽象的作品：若爱因斯坦（Einstein）不演奏小提琴，相对论会是什么？若无《咖啡康塔塔》，巴赫（Bach）的赋格曲会是什么？而布莱希特针对爱这种生产力写道：“最优秀者使其爱与其他生产完全协调一致；其独创性则……成为有益于许多人的一种特性，而他们支持一切创造性事物。”（*Me-Ti*，GW 12，第 572 页）

存在破坏性需要吗？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除了提及“社会主义”中“人的需要的**丰富性**”（MEW 40，第 546 页），马克思也提及“这种异化

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第548页）。连需要也是相对的，取决于社会，（与享受本身一样）受制于条件，在危机和萧条时尤其严重，与危机和萧条相连的是“造成的生产力”，尤其是“活的”生产力“毁灭”了。（*Manifest*，MEW 4，第468页）1955年，米勒-黑格曼（Müller-Hegemann）继承《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力“成了破坏的力量”这种相应说法（MEW 3，第424页），与马克思、弗洛伊德（Freud）意见一致地推断道，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心理都“充满攻击和忧惧”（1955，第46页）。如果说明显的忧惧在情绪上表示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因“个人遭合作式生活过程的孤立”而起（Holzkamp 1985，第216、242页），那么在此类生存态的“绝境”中，就可能滋生暴力——盲目的破坏性需要，而且“出手力度空前”（Müller-Hegemann 1955，第48页）。

行动这一终极阶段常等同于满足，在实施和结果上灵活/可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共产主义者追求一种组织，“那里他们可以实现正常的，也就是仅限于需要本身的一切需要的满足”（MEW 3，第239页）。连需要意外地产生或消失时，感性活力和社会性也构成综合，比如在出于迥异信念而艰难地放弃时，在革命斗争中，在绝食或性罢工（*Lysistrata*）中，或者在任何野生动物都不会有的自尽时。——依恩斯特·菲舍尔（Ernst Fischer）之见，“预想劳动产品”、先行“想象之事”以及允许预先享受的“推迟满足”在人身上是“新性质的幻想”（1966，第182页），它们形成一种见解，它也作为理性核心包含在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中。在生产性消费行为过程中，幻想就始终可能产生新需要和目的，在满足行为过程中还可能漫无边际。所以，人究竟是否会“实现”需要很成问题，正如常有人抱持的自稳态理论在这点上效力有限。与此相矛盾的就是必然突破“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Gr*，MEW 42，第322页）。“需要及主动能力与旧的存在形式相抵触，所以，它们具有震撼力，它们注定拥有未来，这成为下一个扬弃矛盾”并重新加以设定的“阶段”。（Bloch，*Prinzip Hoffnung*，第137—138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Thesen über Bedürfnis« (1942), GS 8, 392-396; F. W. Bassin, *Problema bessoznateljnowo*, Moskau 1968;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3), Frankfurt/M 1968; Th.

Dézamy, *Code de la Communauté*, Paris 1842; G. G. Diligenski, »Probleme der Theorie der menschlichen Bedürfnisse«, in: *Sowjetwissenschaft*, 1977, H. 3; M. Döbler, *Triebkraft Bedürfnis*, Berlin/DDR 1969; I. Dölling, *Individuum und Kultur*, Berlin/DDR 1986; H. Engels,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Bedürfnisentwicklung in der Freizeit«, in: AdW der DDR, *Beiträge des III Internat. Symposiums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und des 4. Berliner Bedürfniskolloquiums*, 2, Berlin/DDR 1989; L. Feuerbach, »Das Geheimnis des Opfers oder der Mensch ist, was er ißt«, in: GW 11, 26-52; E. Fischer, *Kunst und Koexistenz*, Hamburg 1966; S. Gaziet, *Menschliche Bedürfnisse. Eine theoretische Synthese*,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G. J. Gleserman,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69; P. Hacks, *Essais*, Leipzig 1983; F. Haug, »Knabenspiele und Menschheitsarbei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als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in: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4. Jg., 1993, H. 2, 215-224, 272-282; A. Heller, *Theorie der Bedürfnisse bei Marx*, Berlin/W 1974; C. A. Helvétius, *Vom Menschen* (1777), Berlin/DDR 1976; P. T. d'Holbach, *System der Natur* (1770), Berlin/DDR 1960;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5; U. Holzkamp-Osterkamp, *Grundlagen der pyschologischen Motivationsforschung 2: Die Besonderheit menschlicher Bedürfnisse – Problematik und Erkenntnisgehalt der Psychoanalyse*,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D. Müller-Hegemann, *Zur Psychologie des deutschen Faschisten*, Rudolstadt 1955; S. L. Rubinstein, *Grundlagen der allgemeinen Psychologie*, Berlin/DDR 1959;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2; P. W. Simonow, *Widerspiegelungstheorie und Psychophysiologie der Emotionen*, Berlin/DDR 1975; L. Steitz (Ltg.) u. a., *Bedürfnisse und Interessen als Triebkräfte unseres Handelns*, Berlin/DDR 1984; H. Taut, *Zur Dialektik von Arbeit und Bedürfnissen im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Habilitationsschrift, Inst. f. Marxismus-Leninismus der Humboldt-Univ. zu Berlin, 1967; ders., »Methodologisches zur Bedürfnisproblematik heute und morgen«, in: *Wiss. Zeitschrift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Reih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38. Jg. 1989, 375-390; D. N. Usnadse, *Eksperimentaljnye osnowy psychologii ustanowski*, Tiflis 1961;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d. 1, Frankfurt/M 1975.

海因里希·陶特（Heinrich Taut）撰
朱更生 译，沈红文 校

参见：

Anelgung, Angst, Antizipation, Arbeit, Armut/

Reichtum. Befriedigung.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Bewußtheit, falsche Bedürfnisse, Faulheit. Genuß, Glück. Interesse, Kommunismus, Konsumtion, Lebensweise. Liebe. Phantasie. Produktion. Produktivkräfte. Sexualität. Sinnlichkeit, Überfluß, Unbewußtes

行政命令制度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A: niẓām al-idāra al muṭlaqa.

E: administrative command system.

F: système de commandement administratif.

R: administrativno-komandnaja sistema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командная система).

S: sistema de administración dirigida.

自 1988 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苏联的政治经济文献里面增添了一个新的术语：**行政命令制度**。它不但不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连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在东欧发展起来的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也对此感到陌生。除了“行政的”（*administrativnyj*）和“命令的”（*komandnyj*）这两个词之外，其他形容词也可以组合到这一术语中：“指令的”（*prikaznyj*，*prikaz* = 指令、官方指令）、“威权的”（*autoritarnyi*）、“官僚主义的”（*bjurokratičeskij*）、“指导性的”（*direktivnyi*）。不过，最常见的表达形式还是“行政命令制度”这个形式。（参见 Haug 1989，第 135 页；*Očerk*，1989，第 168 页）该术语最初看似仅针对经济领域的领导方面，后来又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到最后它成了对整个斯大林时期 —— 在赫鲁晓夫时代已经被定义为个人崇拜的时期 —— 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统称，后一段时期如今一般被视为发展停滞（*zastoj*）时期，停滞的主要原因正是归于“行政命令制度”。就这样，苏联 60 年的现实都被概括在这个笼统的贬义的判断中，而其中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都被忽略了。 128

这一组合词当中的两个形容词（“行政的”和“命令的”）在苏联的词汇表中并不陌生，特别是第一个：对“行政方法”的批判在过去很普遍，戈尔巴乔夫自己在过去的多个场合都一再重提这一点（例如在苏共二十七大上以及 1987 年 6 月召开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全会上）。新的地方和概念上的创新在于使用了“制度”这一术语。这标志着与苏联过去对自身历史的阐释的彻底断裂：从此以后，苏联的过去就不再是一种归咎于某个具体个人及当时环境的社会主义的**变形**，不再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暂时损害（赫鲁晓夫时期宣布的观点，随后被

收入苏共党史手册），不再是一个特定的、虽然为数不少且掌握实权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干部构成的阶层所带有的官僚主义观点和错误行为（自列宁之后的每位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Tschernenko]，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启用“制度”这一术语隐含着更为全面的指向，要据此来理解和解释从个人崇拜到官僚主义以及其他所有被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严厉批判的负面现象：无论是经济方面（“刹车机制”、“停滞”、粗放式的增长模式、短缺经济、技术落后、“软”计划、浪费、低效率、低生产率、产品劣质等等）、政治领域（损害合法性、威权主义、缺乏民主、压迫性的警察国家的统治、党和国家机器对社会的独裁），还是社会领域（领导者逃避责任、群众的麻木不仁和消极被动、对自由创造力和主动性的限制、腐败、酒瘾）。所有这些现象都要被理解为一个结构化的复杂本质的短暂或持续的表现方式，这种本质被赋予了独立生命体所具备的能力，并能够不依附于个别历史偶然事件、个别人和权力集团而自我再生产：这就是一种**制度**。废除这一制度，戈尔巴乔夫宣布，就是**第二次苏维埃革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129

尽管对行政命令制度的评价总体上有一个笼统的负面的评价，但是不管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文献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对导致这一制度形成的阶级成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多种原因，给出清晰的定义。戈尔巴乔夫倒是用马克思的概念（参见 *Vorw 59*）论证了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要的革命特征：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必须被打碎。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参见 1987 年 6 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讲话和 1989 年 11 月对学生的讲话）——尽管有一些摇摆——解释行政命令制度等同于提倡**社会主义的变形**。最初他将自己规定在 60 年代经济改革坐标的框架内，60 年代经济改革企图引入完全的经济核算，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过度的集中阻碍了上面这两点。当时已经形成了僵化的、非常不灵活的制度，它既不能满足密集再生产的需求，最主要的是，也不能满足人的需求。自上而下的命令以及**行政的而非经济的**标准主导着经济的领导部门。

1989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理论手册》（Handbuch Theorie des Sozialismus）（在斯米诺 [G. L. Simirnow] 的领导下由博戈莫洛夫 [Bogomolow]、布坚科 [Butenko]、基斯勒夫 [Kiselew] 等合作完成）在主要

问题上也秉承上述观点。行政命令制度的特点被描述为僵硬的集中主义，对责任范围和工作方式作出事无巨细的限制，制订种种指令准则。该手册认为，这个系统在最初几年克服落后状态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之后就逐渐与集约式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求产生了矛盾（参见布尔拉茨基 [Burlackij] 在莫斯科所作的关于更新社会主义观念的报告）。这表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要求与**官僚主义化的、极度集中化的**制度在试图有效地回应技术进步要求时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之间形成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用集中的计划掌控一切的企图，阻碍了企业的主动性和自主能力，也动摇了计划的权威，引发实践中对计划的任意改动。领导和计划领域的极度集中使所有制关系变形，导致支配国有生产资料的权力都集中在各个部委手中。这意味着社会的利益被置于部委机关的利益之下。企业、合作社和劳动者被剥夺了支配生产资料和实现利润的机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不再是生产活动的主人，他们被疏远于社会财富，这使得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有意识地、主动地参与生产过程，越来越不关心生产的成果，于是就导致了经济的停滞。全民所有制开始被视为无人所有制。（*Očerk*，1989，第 168—169 页；也参见 Butenko 1988a）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部编写过的一篇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理念”的文章也同样提到了社会主义的变形。（*Radikal'naja*，1990，第 25 页）但该文很明确地把重点放在了戈尔巴乔夫在 1988 年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经济联系上：社会主义民主的变形不仅与权力滥用相关，而且植根于行政命令制度中。这些作者写道，当国有制占据垄断地位，不受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挑战，那么，尽管之前的剥削形式被消灭了，但是在这一种所有制内个人自由所必要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却是缺失的：无论是个人崇拜、权力篡夺还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集权政府形式都植根于国家所有制形式，这些所有制形式强化了个人对国家在经济上——并由此在政治上——的依赖。该文勾画了一种社会主义的设想，在这种设想中各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并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股份公司、混合形式），然而集体所有制依然要发挥主导作用。这篇文章仍处于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的设想中（其最坚定的代表者是布坚科），改革的任务即把单纯**法律上**的社会财产（它的支配权事实上掌握在国家机器的手中）转变成真正的社会财产。但是这里对于国有制原则上消极特征的强调为一部分提倡改革的知识分子转变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领域提供

了一个过渡支撑点：经济和政治上的威权制度建立在暴力清除私有制、清除私有制所决定的市场的基础上，并随之产生了国有制的极度暴力。据此，行政命令制度就不再被定义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变形，而是废除私有制的要求必然导致这一制度。从这个视角来看，马克思似乎要成为真正的责任人了。（参见 Zipko 1990，第 61 页，论断如下："没有市场的经济，即垄断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只能走向贫穷和军营一般的生活。"）对应这一观点的是"休克疗法"，即对经济的仓促的私有化，国家从社会福利政策中抽离出来。

这样的结局当然不是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然计划的，但也没有必然被排除。这项改革计划实际上有歧义。这种歧义性已然可以从行政命令制度这一表述中看出来，自公布之日起，这一表述就在政治目标上成功地把那些推动改革的不同力量（和改革计划）团结了起来（包括利加乔夫 [Ligatschow]），然而在当时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指出这一制度的缺陷时，却是要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造（改革）。

在苏联的传统里，尽管行政（*administracija*）并没有负面含义，但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办事"（*administrirovat'*）的表述就是贬义的，因为通常不用它来描述管理工作，只有当领导方式既形式化又官僚主义的时候，通过命令方式忽视群众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一表述才会被使用。（参见 *Slovar'*，1984）命令主义（*administrirovanie*）是行政的一种变体。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这一术语固定具有贬义色彩。在这层意义上，列宁就曾批评皮达可夫（Pjatakow）"太偏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办事"，批评托洛茨基"过分倾向于纯粹的行政措施"。（LW 36，第 579 页）在列宁看来，行政措施（*Administratorskij*）从根 132
本上缺乏政治意识，是自上而下的脱离群众而采取的措施，也没有尝试说服群众，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发挥领导权的职能。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措施就是官僚主义的。不过，如果这个术语和经济事务相对立起来，它就有了一个另外的含义。例如斯大林在 1927 年苏共十五大上的政治工作报告中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经济上把富农孤立起来。他批评那些主张通过"行政的（*administrativnyj*）手段，通过苏维埃秘密警察"（W 10，第 270 页）清理富农的人：他认为必须用经济措施打击富农，而不能代以行政手段。——戈尔巴乔夫的语言风格也具有"经济的"与"行政的"相互对立的特点。1990 年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也把行政的和经济的作为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来分析。

"行政的"一词作为贬义词有两种

含义：（1）与“政治的”相对。表示用外力去强迫而不是发动群众以获取他们积极的共识；这一语言用法目的在于对从经济到政治的所有社会领域的民主进程产生积极影响，让人相信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的全新版本的口号：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群众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统治。（2）与“经济的”相对。苏联的经济理论在两种观点间摇摆：一种经济的概念一般地将经济作为所有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生产、分配等过程（参见 Abalkin 1982，第 46 页）；另一种经济观隐蔽地与价值范畴相关。尽管戈尔巴乔夫的一些言论体现的是经济的第一种含义（参见 1987 年 1 月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但是改革时期提到的经济大部分都侧重于第二种含义，由此引申出结论：“行政的”制度就是忽视以价值范畴为基础的经济计算的制度。在接下来的辩论中，以下论点就占据了主流：只有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样板的、充分发展的市场才能有助于真正的经济方面的计算。在这一结论与整个苏联和东欧经济学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所有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它同时埋葬了葛兰西在《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n*）中设想的一个由社会主义所有制所“决定的市场”的前景。（参见如 *Gef* 6，H. 10. II，§23，第 1275 页）

在政治领域首先提出了一种“混合经济”的设想：1989 年 11 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Ryschkow）提议把国有制的比例大幅下降到 30%，同时他的观点是，市场只有在不同所有制共存的条件下才能产生。（*Izvestija*，1989 年 11 月 18 日）

“命令”（*komandnyj*）——“行政命令制度”这一表达形式中的成分，与上述“行政的”一词的第二种含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术语也暗指自上而下地委派任务、不尊重经济规律的做法。但是这一术语在苏联的文献中使用得很少：它从英文表述“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翻译而来，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新自由主义学派（Barone，v. Hajek，Mises）就已经使用这一表述对（在私有制和市场缺位的情况下）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根本的可能性进行了**预防性的**批判（在纯理论的层面，并没有涉及苏联的历史经验）。接受这一术语就暗示着，苏联经济和政治制度改革在语言上（也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附庸。

行政命令制度这一表达形式的歧义不仅是语言上的特征，而且也反映出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推动改革后所包含的两种可能。由“共产主义平台”为 1990 年苏共二十八大起草的文件指出了当时的局势所带有的现实的歧义：

"威权和官僚主义的社会解体，释放出了许多社会力量，其中一部分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或者半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而另一部分则希望迎来真正社会主义理念的复兴。"（*pravda*，1990年4月16日）

Florenz 1990.

安德里亚·卡托内（Andrea Catone）撰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译为德文
张丰野译，唐婧校

参考文献：

L. Abalkin (Hg.), *Ėkonomičeskaja politika KPSS*, Moskau 1982; ders., A. Aganbegjan u.a., *Političeskaja ekonomija – učebnik dlja vysših zavedenij*, Moskau 1990; F. M. Burlackij, »Problemy razrabotki koncepcii sovremennogo socializma«, in: *Voprosy Filosofii*, 1988, Nr. 11, 31-42; A. P. Butenko, »O charaktere sobstvennosti v uslovjach real'nogo socializma«, in: EKO, 1988a, Nr. 2; ders., *Vlast' naroda posredstvom samogo naroda*, Moskau 1988b; ders., »O social'noj prirode sovetskoj vlasti«, in: *Filosofskie Nauki*, 1989, Nr. 2; A. F. v. Hajek (Hg.),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1935;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²1990); *Očerk teorii socializma*, Moskau 1989; B. N. Ponomarjew (Ltg.), *Istoria Kommunističeskoj Partii Sovetskogo sojuza*, Moskau 1982; *Radikal'naja ėkonomičeskaja reforma*, Moskau 1990; *Slovar' inostrannych slov*, Artikel »administrirovat'«, Moskau 1984; A. Zipko (Cipko), *Le radice della perestrojka · dimenticare Marx*,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utorität, Befehlswirtschaft, Bür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zentralisierung, Entstalinisierung, Funktionär, gemischte Ökonomie, GULag, Hegemonie, Konsens, Mangelwirtschaft, Nomenklatura, Perestrojka, Personenkult, Selbstverwaltung,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Zentralismus

命令式经济（Befehlswirtschaft）

A: iqti ṣād al-idāra al-muṭlaqa.

E: command economy.

F: économie de commandement.

R: komandnaja ėkonomika (команд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S: economía dirigida.

把苏联模式的国家生产方式，即从

1930年起开始形成的指令型、集中化、行政化和统揽一切的计划经济体系当作命令式经济或指令型经济（Kommandowirtschaft），最初并不出自西方的苏联学文献，而是出自反共产主义的攻讦和宣传，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的冷战时期。也许正因为如此“命令式经济”没有作为关键词出现在著名的国家学说、社会学和政治学手册与词典中，也没有被《苏联体制与民主社会》（*Sowjetsystem und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Freiburg/B 1966年起）收录。

尽管这一关键词的使用具有攻讦的目的，它仍然让我们注意到了苏联模式的经济架构中按照经验真实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同时还让我们注意到理论上具有重要性但构想上远未得到解决的、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奠定社会基础、构建有效机制的问题。

鉴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的表述，具有分散性、最一般限定以及并非他们重要表述的特点，它并没有明确预示某种形式的命令式经济。但是依据命令式经济所特有的制度规则和运转问题，追问是否存在并非主观意愿，但客观隐含的结论，并非不合情理。这个问题应该分别针对命令式经济的含义所包含的两个不同方面提出。一方面是确定经济决定的主体。这一主体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命名为“社会”和“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等（例如MEW 4，第370—371页；23，第92—93页；25，第828页），它提示我们经济目标、优先事项、行动方式等将由平等的、基于共识的形式和程序来确定，这将替代统治者对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的支配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是命令式经济的对立面。

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目标导向、决策导向、实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示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在使用价值方面的）利益相当明确地具有概念上的优先权。（MEW 4，第375页及以下；18，第62页；20，第288页）这就回绝了各个小范围内的生产单位决策和占有的自主性；因此推论它们面对整个社会的决策必须服从指示，也并非过度阐释。就此而言，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定中隐含命令式经济的因素，或者说留下了命令式经济的可能性。

这一因素是否影响到、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列宁构想中的和1930年起斯大林主导下推行的计划经济工业化实践中的指令性中央集权的开端，难以准确地作出定论。但毫无疑问，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更大，比如政客与经济学家之间达

135

成广泛共识，基于资源全面而显著的稀缺，资源需要集中并根据优先权进行使用和控制，又如那些绝未完全扫除的沙皇时期的官僚作风的死灰复燃。

从攻讦的意图出发对命令式经济这个概念的使用——不总是被清晰地阐释出来——针对两个核心的批判要点：这种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方式既专制又无效。从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本质规定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固化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差异，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属性一样被粉饰涂抹掉了。与之相反，被强烈谴责的第二个方面包含了社会经济的基本事实情况。很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总是拒斥这一事实：在宏观经济占优先地位的决策和行动导向上，宏观经济单位与微观经济单位的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结构性地必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无视中央机关基于资源投入的经济效益和基于宏观经济效率的行动指示。此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生俱来的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经济考量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计算价格和成本的那些指标和测定方法，这些指标和测定方法是竞争带来的、不断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的效益所必不可少的决策参数和行动参数。只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发展出并使用适合本身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的目的指标、决策指标和评估指标，它就几乎不能抵御“命令式经济”概念所包含的针对经济效率低下的指责。

汉斯格奥尔格·科纳特（Hansgeorg Conert）撰

唐婧、罗梓丹 译

参见：

Assoziation,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ürokratie,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Gebrauchswert, Perestrojka, Planwirtschaft, realer Sozialismus, Selbstverwaltung, sowjetische Gesellschaft, Sowjetkritik,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解放（Befreiung）

A: taḥrīr, taḥarrur. – E: liberation.

F: libération.

R: osvoboždenie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S: liberación.

1. **马克思。**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KHR*）结尾论述了解放。“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MEW 1，第391页）这种解放理论包含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

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第385页）。之所以能说这种理论是**伦理道德的**，是因为它关于解放的**地区**策略是从**普遍**视角来论证的，并且据此观点，“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克思完全把 Befreiung 和 Emanzipation（解放）用作同义词，因此，Befreiung 也没有单独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各版马克思著作的索引中。马克思把具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解放（Emanzipation 或 Befreiung）这一术语用来描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远景。“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MEW 23，第92页）马克思将无阶级从而无统治的社会的概念理解为“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市民社会阶级”的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个阶级“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总之，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MEW 1，第390页）依马克思之见，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阶级才会朝着普遍人道的国际主义方向消除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压迫关系，这个阶级以其所受的苦难缴纳民族国家的代价：这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辩证观点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强调解放的主观因素在实践中独立自主的地位，一方面反对生产力发展似乎就自动预示着解放之类的任何客观化的发展逻辑，另一方面反对任何自发地降低政治组织的意义的做法。解放的思想作为号召工人阶级作为“历史主体”超越一切党派纷争而统一行动的口号，反映在众多政治的和文学的表述中，始于第一国际的章程，“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MEW 17，第440页）。这句话略作改动后又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中：“争取劳动阶级解放的斗争……”（I. 2）后来它又出现在布莱希特的《统一战线之歌》（*Einheitsfrontlied*）中：“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的事业。”（GW 9，第653页）没有人像彼得·魏斯那样强调伦理道德因素对批判地理解社会事物所具有的意义。他回顾历史，质疑解放的概念在战争的破坏性面前（而且由于工人阶级的组织遭法西斯主义摧毁）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回首往昔，瞬间未来的前景也充满了大屠杀，关于解放的思想无法穿透它。”（1988，第14页）

只由无产阶级实现解放这种认识，长期以来无论对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政治视野都具有决定意义。但是早在1876年，马克思本人就在《资本论》法译本中就谈到了这种视角狭隘化的问题，随后又于1881年

在回答维拉·查苏利奇的问题时加以详述，马克思在复信中肯定了村社作为实际解放中一个阶段的意义。“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MEW 35，第167页）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关于雇佣劳动产生的理论——进而与此合一的还有仅依托无产阶级的解放构想的策略——局限于西欧，在“解放”（Emanzipation）的解释学视域面前，解放（Befreiung）的“非正统”策略的迥异道路进入视野，它们把世界体系边缘各国的解放运动、妇女运动和生态运动等运动提上了日程。

2. **解放哲学**。从一种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Wallerstein）的欧洲、北美中心来说堪称异域的视角出发，正如维拉·查苏利奇的异议视角对于马克思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拉美“解放哲学”运动将其话语阐发为从世界体系边缘的视角出发的关于解放的哲学理论。生成这种哲学话语的关键因素至少有以下的语境条件：依附理论的（社会）科学因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背景下天主教会接近世俗化社会这一“现代化”（Aggiornamento）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古巴革命的政治因素。（Fornet-Betancourt 1992，第90—91页）

除了社会科学的依附理论，欧洲公众主要熟知的还有解放神学的立场，解放神学最出类拔萃的代表古斯塔沃·古铁雷兹（Gustavo Gutiérrez）表述的纲领如下：“神学是在圣言的光照下对历史实践作批判性反思。”（1979，第19页）这一纲领性的倡议，浓缩于“为了穷人和受压迫者的选项（Option）”的公式中，用伦理道德上的“选项”概念将解放的主观因素定为主题，完全契合马尔库塞的思想和他对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政治化接受。“我建议用‘特定选择’（bestimmte Wahl）这个表述，以强调自由侵入历史必然性；这个表述概括的定律只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给定条件下。”（Marcuse 1967，第233页）

解放神学把**上帝子民**视为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改变的实践主体。上帝子民指穷苦的和受压迫的人民，也就是劳苦大众连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他们统一在布洛赫所说的社会乌托邦倾向和自然权利倾向的综合里。上帝子民还指与教阶制度相对的广大教友。上帝子民的原型是烧砖的埃及奴隶，他们冒险出埃及迁入“流奶与蜜之地”（2. Mose 3.8）。他们的乌托邦，直到马克思的包含“集

体财富的一切源泉”（MEW 19，第 21 页）的“自由王国”（参见 *K III*，MEW 25，第 828 页）仍在回味。

“解放”概念在拉美却远远超出教会范围，成为寻求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部自主的真实可靠根源的支配性关键词。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寻求政治自主的奠基纲领时，秘鲁人奥古斯托·萨拉查·邦迪（Augusto Salazar Bondy）和墨西哥人莱波尔多·塞亚（Leopoldo Zea）围绕拉美是否可能有真实可靠的哲学纲领展开哲学辩论。萨拉查·邦迪接受了萨特（Sartre）的真实性思想，严厉反对迄今流行的崇欧哲学和科学的统治地位，他彻底否定在拉美有真实可靠的哲学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在政治自主基础上才可设想符合真正自我发展意义的真实可靠性，但依赖理论充分表明，拉美不存在这种政治自主。塞亚驳斥这种立场，支持具有语境合理性的哲学纲领，指出文化伦理资源超乎政治经济异化而完好无损。

140 在 1971 年阿根廷科尔多瓦第二届全国哲学大会上，阿根廷人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开启了这场辩论中的第三种立场，他与塞亚一样主张可能有哲学合理性的理论，但他与萨拉查·邦迪一样认为这种理论的实践基础是争取解放的政治斗争。所以杜塞尔的立场可以沿用阿多诺的名言来解释，在错误之中没有正确的生活，除非能否定错误，但否定错误“总还”以至少是直觉上的对正确的洞见为前提条件。

在杜塞尔的理论干预下，当时形成一个名为“解放哲学”的非正式团体，其代表人物包括：斯坎诺内（J. C. Scannone）、阿迪莱斯（O. Ardiles）、阿斯曼（H. Assmann）、福尔纳里（A. Fornari）、卡萨利亚（M. Casalla）、帕里西（A. Parisi）、德桑（J. de Zan）、库施（R. Kusch）、普罗（D. F. Pro）、吉略特（E. Guillot）、塞鲁蒂－古尔德贝格（H. Cerutti-Guldberg）、鲁伊格（A. Roig）、克鲁阿托（J. S. Croatto）、桑托斯（M. I. Santos）和杜塞尔。1974 年拟就的《萨尔塔宣言》（*Manifesto Salteño*），还有 1975 年墨西哥会议的进展证明，该团体主要因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在政治上的失败而瓦解为一个“平民主义”流派和一个“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主要分歧在于确定，究竟谁能成为解放的历史主体：人民还是阶级？

在这方面，杜塞尔的立场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他从平民主义观照方式走向一种最终构想是承接葛兰西的观点把人民看作受压迫者的“社会集团”（Dussel 1990，第 291 页）的观照方式。尤其因此缘故，以解释学为宗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把“解放哲学”这一称号作为相对于阿尔都塞结构主义

纲领时的另一种选择而与杜塞尔的哲学概念相提并论。

3. **恩里克·杜塞尔的解放伦理学。**恩里克·杜塞尔的“解放哲学”的认识旨趣与“发展主义”（desarrollismo）基于发展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完全对立，甫一开始就旨在穷人和受压迫者的自主，他们身为社会造成的压迫的牺牲品，力争成为主体。杜塞尔动态的自由概念的关键词是 Befreiung 而非 Emanzipation，因为解放哲学恰恰也对现代自身的历史过程所产生的压迫关系作根本性批判。

杜塞尔的解放哲学自我定位为解放伦理学，亦即“从……作为人的……绝对尊严……视角对‘道德’作先验批判”（1990，第 431 页）。解放伦理学建构一种伦理规范，以此为依归批判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惯例和道德。杜塞尔以“外在性”概念界定这种伦理规范性的先验核心，此概念字意大致为“外表”（1988，第 55 页）或“域外”（1979，第 64 页）。关涉之事虽然标在主体的地图上，但是却在根本上外在于自我。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位于其外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 6 页）

杜塞尔从生活于法国的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处接受了外在性概念，后者则在其对大屠杀经验所作的反思中接续了对话哲学的传统。列维纳斯的出发点是：“在为他者的生存中，我的存在不同于在为我的生存中，此情况是本真的道德性。”（1987，第 382 页）由于始终把个体考虑成关涉他者的异己个体，列维纳斯对道德性的理解把主体概念极端化。按列维纳斯的说法：“作为他者的人由外向我们走来。”（1987，第 421 页）但因为只有通过对我而言异己的他者的承认，才形成我作为主体的身份，我的自我之在基于他者的异在。主体之在因此意味着先天责任：“我作为给他者的人质而成为我。”（1992，第 253 页）

141

杜塞尔的解放伦理学在第一步中支持列维纳斯，在人类学层面把外在性概念解释成他者的相异性或者他异性。相异性首先意指单个人的不可归约性，“也就是他可能逾越体系”（Kosik 1967，第 95 页）。外在性概念把人的本质考虑成相对的相异性，亦即考虑为主体间关系。他者是非我，一个总是受团体或社会限定的他者，他在其总体性中建构我所成为的主体。

依杜塞尔之见，相异性的极端形式是超乎或者在任何生产集体或者交际集体之外受斥之在的他异性、异在的他异性，这种他异性在质询这种语言行为模式中堪称典范地表达出来了：“我饿，我

就要求公正。”（1990，第 120 页）杜塞尔在第二步中借助“探询式请求”或者“请求式探询”的质询语言行为作为把抗议和呼吁加以综合的模式（亦请参见把“质询”作为“吁请”这种意识形态因素的用法，个人因这种意识形态因素而成为主体，见于 Althusser，载于 *ISA*，第 142—143 页），出于对穷人和被压迫者成为主体的兴趣，超越列维纳斯构想的框架，按功能主义把人类学上的他异性解释成穷人和受压迫者在经济上的非在。

杜塞尔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参见 Ober 1994；Fornet-Betancourt 1993），对马克思所有指向《资本论》的著作所作的评注有三卷之多，提出“人类学上的马克思”这一命题（1993a，第 59 页；参见 1990，第 436 页），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出“活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总体性的先验条件。人的劳动物化成主体在产品中的活劳动，主体包含在产品中的对象化劳动作为交换价值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剥夺主体的财产，并使资本增殖。因此，从外部向我走来的他者就是穷人，其“贫困机体”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排斥。

杜塞尔在外在性概念中整合了人类学层面和经济学层面，把他者的外表界定成贫困的他异性，规定为“……具体机体、人不存在时这种现实的确定性”（1985，第 17 页）。解放伦理学把列维纳斯和马克思如此不同的理论拟设加以综合，关键前提是形式实用主义的合理性概念。与（阿佩尔［Apel］的）先验语用学或者（哈贝马斯的）普适语用学的拟设大体相似，杜塞尔建构一种先验对话，它关于虚拟外在性的“综合的”先天性是对言论作任何理解的必要前提条件。因为若无形式——程序上的普遍规则，归根结底不可能把利益普遍化，也就不可能结成霸权同盟。

杜塞尔将其普遍性规则构想成主体重新采用他者的“外来视角”（1985，第 365），后者作为他者的“外部视角”而对主体。“这意味着，在先验层面或者普适层面上，合理性作为批判理性也会包含在可能的他者意义上的每个个人、团体的每个参与者的虚拟外在性作为合理性概念的必要因素。这关涉的并非作为理性的他者的他者，而是作为他者的理性的他者。”（1992，第 107 页）只有作为他者的理性的他者，采用外在性的外部视角，才促成主体总体性的内部视角采用批判合理性的形式，用此形式才可设想解放。

杜塞尔的解放哲学甫一开始就自我定位成现代的批判理论，杜塞尔用“合理解放”（1993，第 193 页）这一关键词概括其内涵。除了“其解放的合理内核……还形成了现代的第二项因素，……非理性的受害者神话”（1993a，第 382—383

页），这导致非理性却后果广泛的暴行，这种暴行始于1492年这一纪元年，给“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了基础。杜塞尔的哲学把现代这一课题重构成变动过程，这种哲学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变动过程具有使人得解放的理性的潜力。“我们的解放意图是……跨现代的：它是从现代的外在性视角及其（印第安人、非洲人、亚洲人等的）‘反观’视角对现代作合理批判，批判针对殖民地、针对边缘资本主义、针对‘南方国家’的这种非理性暴力神话。”（1993a，第386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 1977; H. Cerutti-Guldberg, *Filosofia de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 Mexiko 1983; E. Dussel, *Para una ética de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 Buenos Aires 1973 (Bd. I u. II), Mexiko 1977 (Bd. III), Bogotá 1979 (Bd. IV), Bogotá 1980 (Bd. V); ders., *Método para una filosofia de la liberación. Superación analéctica de la dialectica hegeliana*, Salamanca 1974; ders., *Philosophie der Befreiung* (1977), Hamburg 1989; ders., *La producción teórica de Marx. Un comentario a los Grundrisse*, Mexiko 1985; ders., *Hacia un Marx desconocido. Un comentario de los Manuscritos del 61-63*, Mexiko 1988; ders., *El último Marx (1863-1882) y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 Un comentario a la tercera y cuarta redacción de »El capital«*, Mexiko 1990; ders., »Die Vernunft des Anderen. Die `Interpellation` als Sprechakt«, in: R. Fornet-Betancourt (Hg.), *Diskursethik oder Befreiungsethik?*, Aachen 1992, 96-121; ders., *Las metáforas teológicas de Marx*, Estella 1993a; ders., *Von der Erfindung Amerikas zur Entdeckung des Anderen*, Düsseldorf 1993b; ders., *Apel, Ricoeur, Rorty y la filosofia de la liberación. Con respuestas de Karl-Otto Apel y Paul Ricoeur*, 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1993c; R. Fornet-Betancourt, *Estudios de filosofia latinoamericana*, Mexiko 1992; ders., *Ein anderer Marxismus? Die philosophische Rezeption des Marxismus in Lateinamerika*, Mainz 1994; G. Gutiérrez,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München-Mainz [4]1979; M. Jay, *Marx and Totality*, Berkeley-Los Angeles 1984; K. Kosík,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1967), Frankfurt/M 1986; E. Lévinas, *Totalität und Unendlichkeit*, Freiburg/B-München 1987; ders., *Jenseits des Seins oder anders als Sein geschieht*, Freiburg/B-München 1992;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67), Schriften 7; C. Ober, »Enrique Dussels Entwurf einer Transzendentalökonomie im Anschluß an Marx«, in: *Argument* 203, 36. Jg., 1994, 67-78; A. Peter, *Befreiungstheologie und Tranzendentaltheologie. Enrique Dussel und Karl Rahner im Vergleich*, Freiburg/B 1988; A. A. Roig, *Teoria y crítica del pensamiento latino-americano*, Mexiko 1981;

G. Sauerwald, »Zur Rezeption und Überwindung Hegels in lateinamerikanischer Philosophie der Befreiung«, in: *Hegel-Studien* 20, 1985, 221-245; H. Schelkshorn, *Dialogisches Denken und politische Ethik. Untersuchungen zur Relevanz personal-dialogischen Denkens für eine Gesellschaftsethik bei Friedrich Gogarten, Emil Brunner und Enrique Dussel*, Wien 1989; ders., *Ethik der Befreiung.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Enrique Dussels*, Wien 1992; I. Wallerstein, *Das moderne Weltsystem.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86;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Frankfurt/M 1988.

彼得·彭纳（Peter Penner）撰
朱更生译，金建校

参见：

Althusser-Schule, Anthropologie, Antizipation, Armut/Reichtum, bestimmte Negation, Dependenztheorie, Emanzipation, Ethik,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Freiheit, geschichtlicher Block, Moderne, Populismus, sexuelle Befreiung, Subjekt,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Vernunftskritik, Weltsystem

满足（Befriedigung）

A: irḍā', sad. – E: satisfaction.

F: satisfaction.

R: udovletvorenie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е).

S: satisfacción.

I.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政治层面，“满足”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各尽所能，按需分配”（MEW 19，第21页）这句话将一个社会政治的重要目标——满足所有人的需求——用一个具有行为导向的、具体的乌托邦似的概念表达了出来。然而，“满足”这个概念——不同于其所指向的“需求”这个概念——却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充分展开。“满足”作为一种主观状态指的是什么？这种主观状态——不同于需求的主观状态——怎样作用于对意义的认知和人类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它与占有、消费、享受、欲望、幸福，还有愿望以及社会组织的劳动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些，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很少提及，使得人们在对理论的接受中，本来很少的内容变得更模糊不清了。在三卷本《资本论》的索引中（MEW 23—25），关键词“满足”与在198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的总索引中一样很少，

145 在 K. 霍尔茨坎普所著《心理学的基础》（*Grundlegung der Phychologie*，1983）的主题索引中也很少。“当一个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他就对自己的需要，因而也是对自己本身，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MEW 19，第 363 页），这句话与其说帮助人们理解“满足”，不如说帮助人们理解未被满足的、受到挫折的需求。未被满足的需求似乎成为人类历史的发动机，成为一个驱动力，它将矛盾演绎出来，它推动着人类不断进步，并最终导致了革命性的变革。这种片面的看问题的方式是有其传统的，在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uast*）中已表现出来，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延续到布莱希特。与此相对应，对需求的“满足”的概念内涵及其所作用的对象却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要么不需要，要么不可能，或者是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解释。

2. **阶级社会中的需求—满足**。马克思认为，“满足”是指向需求的。这两个概念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历史的范畴。所有生物都遵循依据环境而产生自身变化的自然历史（由自然选择所主导的）法则，之后又服从于本能机制。需求 / 愿望以及满足 / 实现之间关系的自然史还包括一些生理节奏：（比如从细胞层面而言）心脏收缩与心脏舒张所带来的激动与松弛、紧张与放松、饥饿与饱食、活动与静养、觉醒与睡眠。人类则用社会历史的发展及其法则对这种自然历史的进程进行补充，而社会历史法则最晚在新石器时代占据了统治地位。（Schurig 1976，第 204—214 页；Holzkamp 1983，第 179 页及以下）相应地，需求满足的可能性实现与否，其形式亦是由社会历史性决定的。需求满足的形式因此总是包含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及与此相连的阶级矛盾与斗争中，也包含在这个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目标与计划中。被压迫阶级的主要目标是将不能实现的满足的可能性重新实现，而统治阶级则努力为保持其优先满足的可能性 —— 以其独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享受的形式 —— 而斗争。

3. **满足可能性在金钱中的抽象化**。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的分析出发，指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它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MEW 23，第 49 页）而“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第 50 页）。“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 146

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同上）“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第 52 页）

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几乎所有的满足可能性都通过交换价值来表达和实现。越来越多的“满足”可以通过金钱获得，同时，它也越来越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比如身份特权，参见第 55 页）或是“天然”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么，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第 145 页）“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第 146 页）

相应地，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围绕满足可能性的斗争——与之前的历史阶段不同——首先是围绕着争取更高的利润还是争取更高的工资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依然占支配地位，在此关系中，第三世界国家被迫以其资源和产品进行不平等的交换，同时，这也限制了其大多数居民满足的可能性。生态运动进行的保护和再生产自然资源的斗争，目的是不损害后辈的满足可能性。这里不再仅仅是一个阶级问题，还是一个“全球”的人类问题。

所有满足可能性越来越多地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自己（比如美丽的风景、性的吸引力、魅力以及和谐的态度等），这使得满足可能性逐渐非人格化，同时也将其逐渐抽象化，这一过程是通过将满足可能性从具体的时空中分离出来而完成的。满足成为一种个人经验，这种经验的社会制约性却越来越取决于资本关系及其日益一般化的交换价值关系。如果我有足够的金钱可以持续地满足我生命的诸种需求（Holzkamp-Osterkamp 1978，第 23 页），如吃穿住行，除此之外依然还有多余的金钱，我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何地以此来满足我的何种需求……以及，我以何种方式满足我的生命（生存）需求——（奢侈的饭店或是黄油面包）。但交换价值关系的一般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金钱的形式使得满足可能性抽象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满足可能性：对“金钱攫取”的满足，这通过马克思对吝啬鬼的描述典型地展现出来，“为了金偶像”（Goldfetisch）而牺牲了“自己的肉体享受”（MEW 23，第 147 页），以及与金钱攫取相反的另一种满足形式，即“金钱的浪费”，即对购买行为本身的满足（对购买的商品是否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毫不考虑）。“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

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Kolumbus，1503 年从牙买加寄出的信，转引自 MEW 23，第 145 页）

4. **相近的概念。**4.1 **消费。**从到目前为止的讨论来看，满足似乎是人类与外部自然——原有的“自然”以及社会生产出的自然——之间物质交换中的一个占有过程的主观方面，而它的客观方面则用“消费”这个概念来表达最为恰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消费都可以得到主观上的满足（比如，我可以吃那些我不喜欢吃的，甚至是我讨厌的食物），同时，也不是所有的满足都具有消费特征——至少从第一眼来看是这样。被消费的是食物、享乐品、饮用水、衣物等等。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书籍、唱片、录像带等等或许也属于消费品。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占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占有物——确切地说，是它的物质性基础——随着日益增多的占有也越来越多地被消耗。消费概念包含耗尽消费品，以及耗尽消费品的消费行为。相反，图画、美妙的身躯、想法等等，严格地说，并不能被消费，而是“未被消耗地”占有，喜欢它们，就是享受它们。随着交换价值关系的不断发展，几乎所有的事物，包括那些无法消耗之物也以单位时间的形式被“出售”，如（度假区的）美丽的风景、美妙的身躯等。美景无法被直接消耗，但为欣赏这种美景而购买的时间本身被消耗了，因此被“消费” 148
了。交换价值观念扩展到美和魅力等领域导致了一种次生的过程，如美丽风景的凝固化（Zubetonieren）使得它自身最终也可以被“消耗”。

4.2 **享受。**“享受”可以理解为带有积极的感情—情绪色彩的消费或不消费的占有过程的主观方面。在此，并非仅仅是消费或不消费地占有享受的对象，还要体会这些对象的各种不同的感官的或精神的品质。我欣赏优美风景中色彩与形状的和谐，欣赏美妙身躯中的轮廓、精巧的手、浅色或是深色的眼睛，欣赏美酒中的芳香，欣赏羊奶酪中的浓郁香味与松脆，等等。享受的本来目的首先是指向对象及其特质，并试图将其进一步区分，去发现其中新的特质，最大限度地将这些特质清晰化。因此，享受本身具有一种对象反思的因素，这种因素指向区分与精致化。同时，享受往往还有如下倾向：将自身作为一种状态再次反思性地显现在个人意识中，并由此将这种状态对象化。

4.3 **欲望。**与通过外在轮廓与内在区分来清晰地体验对象的享受不同，对欲望的体验以更强烈、更直接的方式指向自身的状态。这种体验是强烈的、积极的，但品质的差异却并不总是被体验出来。欲望还包含着对自身不断升级的

需求。它虽然——如同享受一样——也指向一个客体（如在性欲中的“欲望客体”），但相比于享受，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客体的区分与精致化，而是欲望体验的强度在不断增加。相应地，欲望的反思性也少于享受：它更直接、更具有自发性，当然它有的时候作为强烈的欲望体验也能够对享受的“对象”进行反思。——如同享受一直追求新的、“更精致”的品质，欲望也一直追求着更剧烈的强度，追求着自身的增强。通过这种方式，纯粹的欲望体验也容易陷入成瘾性的、渴望不断重复与增强的漩涡中——尤其是当欲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满足的时候。

149 4.4 **幸福**。幸福是一种感受状态，而非愿望意外满足的结果。它与欲望一样，有着主观对自身状态体验的剧烈性与直接性，亦与享受一样——但与享受不同的是没有反思性——有一种对象相关性，它可以超越单个对象扩展到现实的总的状况，甚至可以扩展到整个世界。对对象以及对状态的体验在幸福中是天平平衡的两端。不同于欲望，幸福并不追求不断增加的强度；不同于享受，幸福也不追求对单一品质的不断精致化与区分。在幸福中，一切——在我内心中以及在我之外——的存在都是美好的。幸福是一种对实现过程以及已实现的状态的体验，一种积极的主观感受的顶峰，以及一种和谐，一种对自身及所追求的对象、所处环境，乃至整个“世界”的肯定。不同于欲望与享受，幸福永远伴随着满足而产生，虽然它并非全然等同于满足。与纯粹的满足不同，幸福还呈现出一种指向未来的特性：并不仅仅是现在的一切都好，而是一切都应当一直保持这种美好状态。

5. 作为“**该做的都已经做了**”（*Genug-getan-Haben*）**的满足**。从这个角度出发，满足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理解。在罗曼语以及英语中，满足的意思就是人针对某件事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或者说对这件事已经心满意足（比如法语“satisfaction”的字面意思就是“Genugtuung”）。此事目前的状态即是好的，而且可以持续地保持这种状态。满足也包括终止与放弃由需求驱使的有目的的关系的能力这种特性。在满足的状态中，人们除所有之物外一切都不需要。相应地，人们在此时也无需为了获得他物而多做什么。

通过其中所蕴含的与“做”（作为“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的联系，满足这个概念亦体现出耗尽与占有、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结点。它表明，为了达到满足，即一种无须再多做什么的状态，必须做点什么，或是从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说，必须“生产点什么”。反过来说，

在满足中，针对对象而投入的需求性的兴趣以及在此之上付出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的，指向对象的意义意向（Bedeutungs*intention*，作为希望或是行为意义）——无论如何在某时——会在满足中实现。（Husserl 1929，1948）

6. **满足与肯定**。在智力活动（*intellektueller* Operation）的层面，与生产相关的满足需要一种形式作为前提，即一种肯定的、赞赏的判断。（Aristoteles，*Int* 4，17a 2；5，17a 22；6，17a 25，转引自 Menne 1971）在这种持续的认知过程中，会有一种暂时的、结论性的肯定的判断，一个认知对象会在既定的时刻展现出如其所存在的那样，亦如其现在向“我”展示的那样。随之而来的是，“我”无论如何会在某一时刻与所有进一步揭示认知对象的活动相分离，这是由于对这个对象——在此期间——已有足够的认知，由此——从认知的角度考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通过已经满意了的肯定在判断中插入的这个停顿，认知对象才获得了其最终形态。它的运动——暂时——会终止，从而进入一个静止状态。（Wulff 1993c）

为了使这样一种认知过程能够开始，必须在构成其基础的判断中肯定：某物在某时终究会呈现出这种状态，如同它向“我”所展示的那样，如同它自身所显示的那样。对此唯一的标准是，它向**我**所展示的，正如它向**他人**所展示的那样，也就是说，展示的东西也是跨主体的、“社会化”的对象。一朵玫瑰对我而言是一朵玫瑰，对你而言也是一朵玫瑰，对他而言也是玫瑰，对她也是玫瑰，对我们也是玫瑰，对你们也是玫瑰，对他们也是玫瑰。（Wulff 1992a）这种基础性的、通过上述同义反复创造出身份认同的肯定，是对跨主体的、社会化的认知的可能性的肯定，它在一种满足形式中找到自身的根据：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满足成为所有由全社会中介的谋生方式的基础，就能使认知的社会化成为可能。

尽管这种基于肯定的满足形式对于任何一种由全社会中介的谋生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满足形式蕴藏着一种危险，即人们为了迎合他人的观点而放弃进一步探索认知对象，并由此使认知过程过早地终结。在阶级社会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他人”的观点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观点。

7. **在分工的社会中的满足**。对于人类这种生物而言，其特点就是个人满足的可能性是通过全社会调节的生产与分配实现的。生产出的东西不再是由生产者自己或是在其家庭、部落内部直接在其被生产出之后消费，也不再等到受本能调节或是与季节相关的延迟之后再消

费，以实现满足。在那些生产是由社会组织的地方，产品多半纳入一种潜在的满足所有人的可能空间中。在这个可能空间中，与行为对象的分离已经伴随着满足而产生：行为对象的希望的意义与行为的意义转变为满足的意义。（Wulff 1989，1992a．1992b，1993a）这当然需要一个前提，即：我知道，我可以通过公正的物品分配获得可能空间中相应的一部分。

最终，生产资料的生产本身也伴随着满足而出现：如工具，以及使生产得以进行的知识—概念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曾指出，一个对象不仅仅“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而且还“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MEW 23，第49页）满足人们的需求。

8. **分工的生产与审美。**因为满足所有人的可能性的生产越来越多地以分工的形式出现，所以伴随满足的是自身行动过程的成功终结，而不是整体行动过程的终结——这意味着某件产品的完成：当我将满足所有人的可能性的生产中**我的那一部分**完成，当我可以将劳动对象交给下一个劳动者让其继续加工时，我已经满足了。这样一种满足形式只有在以下条件实现时才能出现，即我可以信任他人——或是信任整个社会关系——将劳动对象真正从我手中对接并对其进行继续加工，以及我亦相信我可以通过我的劳动过程在满足可能性的“池子”中获得相应的一份的权力——全社会生产的产品最终都将进入这个池子之中。在分工的生产中，满足实现的那一时刻，正是人们将满足所有人的可能性的生产中他的那一部分完成的时刻。它同时也是我将我的劳动对象交接、放弃以及中止的时刻——当然只是暂时的。它——至少是暂时的——让我不再关注下一步的、不断变化的行动。相反，我可以将它——正如它现在所展现的——在它的暂时重新获得的直接性中，作为从其愿望的、意识的、行动的逻辑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客体，同时也作为一幅具有深思性与审美性的“图画”，被我被动地接受。（Wulff 1993a，第168页）因此，《圣经·创世纪》中的上帝在六天的创世之后开始休息：“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 Mose 1，31）

因此，在全社会中介的谋生的情况下，最终的物质消费满足层面会通过由自身劳动过程的终结中产生的、沉思性的、审美性的满足的层面来补充：通过同时对事物可能性形式的满足。不断具有审美性的实践意义渗入这种“生产性”满足的时刻，成为一种“基本品质”（Lévinas 1971/1992，第141页），它渗透了“我所有的感官”、我的感觉、我的身体，它在这里安顿下来，发展为一

种肌肉运动知觉，并最终成为自身的“审美的”图像，成为我出现和“存在”的方式（Wulff 1993b）。

在阶级社会中，这种与生产关联的满足形式不仅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是具有欺骗性的。这种形式的满足——如同直接的消费一样——自身也会被剥夺。如果我只是通过权力与暴力剥夺他人的劳动成果，而自己不付出任何劳动，我就能从“已经完成的劳动”中获得这种审美性、沉思性的满足：比如那些拥有奴隶的种植园的主人，他们在别人付出艰苦劳动之后，在落日的余晖中欣赏自己繁荣的庄园之美。当我不能分得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当我的劳动完全由他人所决定，那么在自身劳动过程结束后获得满足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只要生产者无权控制其生产过程及生产的产品，这种在满足体验中由篡夺形成的异化会持续存在。

9. **审美的满足形式与商品审美。**不仅仅是由消费产生的直接享受可以达至满足：“消耗或是使用已经完成”的状态（或是进入下一个加工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有审美预期的满足形式。这种形式在劳动产品中通过丰富多样的，首先是视觉，也包括听觉、触觉以及嗅觉的特性展现出来。因为人类视觉感官是最发达的远距离感官，因此所见之物将其他感官特征（气味、松脆、轻巧、坚硬等等）符号化了。一件物品的外观预示着它背后所隐藏着的品质，这种品质会影响人们对它的享用——或者是使用或消耗。因而，物体的外表也预示着它的使用价值。（Haug 1980，第 81 页及以下）由此，“所有商品生产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使用价值的展现”（Haug 1971，第 16—17 页）。这种说法不仅仅适用于工业产品，亦适用于农业产品，如苹果、西红柿、黄瓜等等。对按照其自有逻辑生产出来的表象的“审美的抽象”（同上书，第 58 页及以下），通常并不含有它预示的东西：在极端情况下，它具有一种“陷阱的意义结构”（Haug 1980，第 175 页）。设计与广告将具有审美期待的满足可能性以商品审美的使用预期的形式生产出来，它们成为资本主义中一种经济与社会的巨大权力。它们不仅提供购买建议（却往往由于“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第 174 页］而令人失望），而且通过“作为一种预示着满足的商品美观的外表”起作用，或是通过使交往满足构成广告中预示使用价值的最一般的内容（Haug 1980，第 171 页），也改变着大众需求以及引导人们的感官（Haug 1971，第 113 页及以下）。因此，商品审美可被认为是对消费的一种有诱惑力的挑逗，它永远在预示着超出其内容的东

西，但却从未让人完全满足，为此人们需要不断地重复消费。只要这种状况没有改变，或是消费者没有学会将美丽的外表仅仅视为单纯的外在表象，期盼审美的满足形式就会在对物品的表面观感中保持欺骗性。

10. 展望。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应该涉及与消费和生产相关的满足形式的发展历史，也应该突出用历史发展较晚时期的满足形式扬弃较早时期的满足形式这种矛盾。从这个角度出发，精神分析学中对力比多理论的探究（Freud, GW VII，第 139、149 页；IX，第 119 页；X，第 333 页；XIII，第 382、424 页；XIV，第 326 页及以下，第 483、571 页；XVI，第 5 页）必须涉及谋生形式、保障形式与行动形式的历史，同时也必须涉及
154 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从而把它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对满足形式的理论分析的忽略导致了一些政治后果。在阶级社会中过分强调欲望和享受的满足形式导致在意识形态上掩盖了满足可能性的局限与阶级特权，如果这点正确的话，那么同样也应当留心满足体验——首先是生产性的体验——预期的刺激感官的功能。（Gottschalch 1974，第 10—23 页）政治斗争以及塑造个人生活的努力方面必然出现的不足，可以通过满足体验中的学习与实践得到平衡。

参考文献：

W. Gottschalch, Beitrag in: D. Kerbs (Hg.), *Die hedonistische Linke*, Wien 1974;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ders., *Warenästhetik und kapitalistische Massenkultur (I): »Werbung« und »Konsum«.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Berlin/W 1980;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U. Holzkamp-Osterkamp, *Motivationsforschung*, Bd. 2, Frankfurt/M-New York 1978; E.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Halle ⁴1928; ders., *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Halle 1929; ders., *Erfahrung und Urteil*, hgg. v. L. Landgrebe, Prag 1948; ders.,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ßtseins*, Tübingen 1980; E. Lévinas, *Totalité et Infini* (1971), Paris 1990; A. Menne, »Anerkennungstheorie«, in: HWPh, Bd. 1, 1971, 300f; V. Schurig, *Die Entstehung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E. Wulff »Überlegungen zur Produktion von Wahnsinn versus sinnbezogener Vernunft«, in: *Jb. f. Psychopathologie und Psychotherapie*, XI, Köln 1989, 114-138; ders., »Zur Konstitution schizophrener Unverständlichkeit«, in: *Forum kritische Psychologie* 30, 1992a, 6-28; ders., »11 Thesen zum Allwissenheitswahn«, Vortrag auf der Jubiläumstagung der DGPN in

Köln, 26.-30. 9. 1992b; ders., »Sich-selbst-durch kreuzende Intentionalität. Wahnsinn als Aushebelungsversuch aus Gesellschaft und Geschichte«, in: *Argument* 197, 35. Jg., 1993a, 91-104; ders., »Bemerkungen zur wechselseitigen Reproduktion von Bewußtsein und Unbewußtem«, in: B. Andresen, M. F. Stark, J. Gross (Hg.), *Psychiatrie und Zivilisation*, Köln 1993b; ders., »7 Überlegungen zur Dialektik von Seinlassen und veränderndem Tun«, Vortrag auf dem Symposion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Interpersonalität« am 18.6. 1993(c) an der psychiatrischen Klinik der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L.

埃里希·武尔夫（Erich Wulff）撰
刘梦岳译，沈红文校，俞可平审

参见：

Aneignung, Anerkennung, Arbeit,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Basis-Ästhetik, Bedürfnis, Bedeutung, Bild, Erfahrung, Gebrauchswert, Genuß, Glück, Konsumtion, Kritische Psychologie, Lust, Manipulation, Schein, Sexualität, Subjektwissenschaft, Tauschwert, ungleicher Tausch, Warenästhetik

概念（Begriff） 155

A: mafhūm. – E: concept. – F: concept.
R: ponjatie (понятие). – S: concepto.

1.1 如果概念不同于“术语”而是表示一个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必须在认识论的反思上面能够应用到自身。鉴于“……批判方法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方法知道评论现在、判处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MEW 23，第 528 页），马克思发展了自己概念化科学认知理论的要求。首先马克思“关于‘概念’的概念”（Zeleny 1968，第 62 页）主要是以批判继承黑格尔为特征的。黑格尔把真正的现实发展当作是概念的发展进而概念化了。“除了概念本身所设定的这种现实性以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是暂时的**定在**（*Dasein*）、外在的偶然性、私见、缺乏本质的现象、谬妄、欺骗，等等不一。”（*RPh*，§1）因此，黑格尔理解概念和现实的一致性最终在于概念和概念实现的统一性。在年轻的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概念和现实的关系、概念和人的关系“头尾倒置了”；黑格尔使“观念成为主体 / 主词（Subjekt）”，而“原本实际的主体 / 主词……变成了谓词（Prädikat）”；在黑格尔那里，“实质的现实性在真实意义上指的是**概念**”。这是

"露骨的神秘主义"（*KHS*，MEW 1，第209、213、216、242页）。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和——在经济领域中的——蒲鲁东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把现实消融在逻辑范畴和概念中。这些概念作为现实的本原起作用并（为自身）设立现实。（*HF*，MEW 2，第62、76、88、97—98、145页，第203页及以下；*Elend*，MEW 4，第126页及以下，第136—137页，第144页及以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这种设想的社会状况被称作意识形态。（MEW 3，第18页及以下；参见Haug 1984，第9页及以下）

虽然年轻的马克思经常使用黑格尔式的语言——比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原始共产主义已经"理解了它的概念"，或者"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换了"（MEW 40，第536、566页）——但是对马克思来说，所涉及的始终是那些已经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概念。（*KHS*，MEW 1，第296页；参见第210—211、216—217页）比如他强调，他是"从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出发"，然后"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MEW 40，第518页）

因为一切关系"表现在语言里只能是概念"（*DI*，MEW 3，第347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生产/再生产、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流通形式、生产力、劳动分工等。经济范畴或概念不是自主独立的原则（现实关系也不是这种原则的"道成肉身"），而是理论的"表达"、"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因而如同生产关系一样"也不是"永恒的。（*Elend*，MEW 4，第130页） 156

这也表现在对社会批判的理解上，黑格尔主义是把"实际存在按照观念"，也就是按照概念来衡量批评。（*KHS*，MEW 1，第257页）与其"教条化地带着一个新的原则"面对世界，马克思更愿意"从现实存在的自身形式发展出它的真正现实性，作为它的应当和最终目的"，这"不是通过教条，而是通过分析"做到的。（MEW 1，第345—346页）由此和这种说法一致："共产主义的理论"不是建立在编造的观念之上，而"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Manifest*，MEW 4，第473页）

1.2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世界"作为"自我孕育的概念"的产物来理解，而实际上"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是通过"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所产生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上的"再现"。（MEW

13，第632页）马克思自我批评地评价道："……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Gr*，69；MEW 42，第85—86页）他也对其在《资本论》中的方法论作了相应的理解，因此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对瓦格纳的批评答复道：他不是"从'概念'出发，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而是从作为"最简单的经济的具体物"的商品出发。（MEW 19，第368—369、364—365页）

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说法：事物根据它的概念是怎样的。例如货币按照它的概念是"普遍的交易媒介，一般商品"，即使这个概念是"作为世界货币才实现"的。"作为一般商品的概念"是从这种现象中抽象出来的。（*Urtext*，*Gr*，第878、881页；参见第885页）资本"就其概念而言"是"生产和使用"的统一；货币，"通过同活的劳动进行交换而增殖"。（*Gr*，第318、494页；参见第584页；*Urtext*，*Gr*，第944页）"从它的一般概念来看"，资本含有一定的趋势，获得"独立的现实性"，"只要它实际上表现为许多资本"。（*Gr*，第494页）这也包括竞争。"概念上看，竞争就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和本质规定"，由此，"被设定为个别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同时也和资本的本性……、概念相对应"。（同上书，第317、544页；参见第545页）但是这个"和它的概念相对应的"资本，绝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作为这个概念或者随便某个概念的具体实现。（参见*Gr*，第945页）

在后来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手稿中，这种谈论方式很少出现，如"金和银按其概念是一般商品"（*Zur Kritik*，MEW 13，第127页），或者货币"首先是作为世界货币……才符合概念"（*K I*，MEW 23，第156页）。相应地，马克思这么描述他的工作方法：在"普遍的研究"中不考虑干扰性的障碍和"摩擦"，而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K III*，MEW 25，第152页；参见第199、638页）。如果人们看到马克思的这种方法的话，这种"一般类型"或者"概念"是一种按照结构分析和行动逻辑重构的模型。

马克思因此在"范畴"和"概念"之间作出了区分："范畴"是作为实际关系总体的思想性表达，而在"概念"中关系被理论化表达出来。"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因此是私有劳动分工的生产关系的"客观思维形式"。（*K I*，MEW 23，第90页）"在'劳动的价值'这个

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第559页；参见*K III*，MEW 25，第826页）它们“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采用了这些范畴，从而“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第561页）

马克思偶尔也把这样的范畴和形式称为没有概念的，比如公式：货币—货币'，“创造了更多货币的货币”，作为“资本的非概念化形式”。因为它“仅从自身”是无法解释的，并且引发了最多样关于更多的货币怎么产生的想象。（*K III*，MEW 25，第404—405、826页；*K II*，MEW 24，第51—52、66页）无概念性来自于一切颠倒着“出现在竞争中”（MEW 25，第219页）；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由于缺乏一种彻底考虑的价值理论，
158 “竞争”这个范畴就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没有概念的一切东西”（第873页）。

2. 对于恩格斯来说，“事物的特征”不能从“概念”中推导出来；更确切地说，“概念”必须是“事物”的“思维图像”。（*AD*，MEW 20，第20页及以下，第89页；参见*DN*，MEW 20，第370、491页；*LF*，MEW 21，第275、292—293页）然而他也指出，尽管概念是回溯到客观事务和关系，这种建立概念并运用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也有长期的经验的历史”（*AD*，MEW 20，第14页；参见第129页），也必须总是进行重新研究。

列宁也认可恩格斯的观点，尽管概念自身也不断变化，概念“只是独立于人的客观现实”的图像。（*ME*，LW 14，第183页；参见第93、103、108、182页）在《哲学笔记》（*PH*）中他继续强调，概念应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来理解。（LW 38，第183页；参见第100、137、156、168、172、198、220、242—243、246、522页）然而“完成”一个事物的“概念”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对世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反映，只能通过创造抽象、概念、法则来无限的接近”。（同上书，第172页）按照黑格尔的想法，“概念”——列宁翻译成“人”——是“**推动力**，……自己通过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给予自己现实性，也即自我实现”，然而他这样结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也创造客观世界，也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这个世界，因而通过行动改变它。”（第203—204页）

3. 在后来的传播过程中，概念的问题经常在受黑格尔影响的关联中来讨论，这个影响被有些人视为灾难性的。“不管事物在现实中如何表现，只要我们离开

可确定事实的经验性地板……，我们就陷入了推理出来的概念的世界，当我们循着黑格尔设立的辩证法规则时，在我们察觉之前，我们就又处于‘自我发展的概念’的圈套中。”（Benstein，*Voraussetzungen*，第 53 页）自此，尤其是在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中出现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很遗憾地使用了“黑格尔式的表达方式”（Schumpeter 1946，第45 页），当然，像熊彼特（Schumpeter）至少承认，在此，“实证科学没有陷入形而上学”（同上）。

159　考茨基在他的伯恩施坦评论中，否认马克思“纯粹辩证地从概念中构建……他的观点”（1899，第 29 页）而没有进一步深入问题本身——和卢卡奇不同，卢卡奇反对佛兰德（Vorländer）代表的观点：马克思仅在一些地方“‘炫耀地’使用黑格尔式的概念”，卢卡奇认为：“整整一系列总被应用的关键方法论范畴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Guk*，第 9 页）这种看法也出现在新近的、由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开始的对《资本论》表述方式的解释中，这种解释认为《资本论》的表述方式是“作为范畴的辩证表述”（Reichelt 1970，第 91 页等处）以及“范畴式的表述方式”（Schwarz 1978，第 10 页等处）。但是，由于很少较为准确地规定范畴和概念相对于现实的实践必要性处于什么关系之中，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假象，仿佛《资本论》处理的是概念辩证法。

卢卡奇和黑格尔的批评者阿尔都塞，批评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部分时还停留在黑格尔的轨道上，他又自相矛盾地赞扬马克思“发现了概念体系（因此发现了科学理论）”，使历史知识成为可能：这种夸奖把事实的概念转向到了概念的事实，概念的体系决定了理论。这种概念被阿尔都塞称为本质的抽象，在此抽象代表了一种本质关系的“不可见性”：“‘不可见’，因而抽象。”汤普森（E. P. Thompson）引用恩格斯的一句话来回答道：“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MEW 37，第 494 页）他补充道：“然而不是作为辩证的‘法则’来运行，而只是一种对流动的、充满矛盾的发生的理解形式。”（1980，第 165 页）对于汤普森来说，“通过对各种事例进行逻辑的普遍化而得出的概念，不是作为一种‘模式’，而更是作为对历史原材料的‘期望’而突出出来”（同上书，第 90 页）。即便他有理由反对阿尔都塞，他自己也再次陷入一种经验性概念理论的批评，也就是，通过“对多样化的事例进行逻辑的普遍化”来产生概念。

像阿多诺强调的，内在批评必须“把从事物外部引入的概念转换成事物本身固有的，事物自身想成为的，直接面

对事物本身所是的”（1957，第 197 页）。“事物此时此刻确定的僵化性，消融在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相互张力中。”（同上）概念意味着它不是随意编造来衡量事物的，而是依赖于对事物的分析——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它不只是描述存在的事物，而是表露出在事物内部存在并向外推动事物发展的矛盾。（参见 Marcuse 1962，第 269—270 页）批判理论的几位代表人物强调了这种意义上的概念和传统的理论对立，在传统理论那里，概念是为“对事物最可能详细的标识”以及“对存在事物连续的复制”服务的。（Horkheimer 1937，第 162、170 页）

W 1962; H.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M 1970; R.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M 1968; J.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Bern 1946; W. Schwarz, *Vom 'Rohentwurf' zum 'Kapital'*, Berlin/W 1978;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Zur Produktion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Frankfurt/M 1980; J. Zeleny,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Frankfurt/M-Wien 1968.

维伊科·派特利（Veikko Pietilä）撰

张雪亮 译，王师 校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1957), GS 8, 196-216; L. Althusser, »Vorwort für die Leser des I. Bandes des 'Kapital'« (1969), in: ders.,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Berlin/W 1973; W. F. Haug,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70, Berlin/W 1984; M.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GS 4, 162-216; K. 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1899), Berlin/W-Bonn-Bad Godesberg 1976; K. Korsch, *Karl Marx* (1938), Neuausgabe Frankfurt/M 1967; H. Marcuse,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Neuwied-Berlin/

参见：

Abbild,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nalyse/Synthese, Analytischer Marxismus, Bedeutung, Bestimmung, Denkform,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Genese, Geschichte, Gesetz, Hegel-Kritik, Idealtypus, Ideologie, Kapitallogik, Kategorie, Kritik, Leitfaden, Oberfläche/Tiefe, objektive Gedankenformen, Theorie, Vulgärökonomie, Widerspiegelung, Wissenschaft.

职业（Beruf）

A: mihna, hirfa. – E: profession.
F: profession. – R: professija (профессия).
S: profesión.

今天，职业被看作是种种活动和资质（各种认知、能力、技能）的类型化的组合与划分，它以更为专业的、标准化的形式约束权利和义务，并在测试中证明工作能力，构成了一种个体能够获得并且持久“保持”的特定劳动力模式：人们从事某种职业谋生，是通过在市场上独立工作或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借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并通过依赖于企业的、有组织的工作关联为社会的经济利益做出贡献。（参见 Beck/Brater/Daheim 1980）这种对职业的常见理解排除了所有社会的重要活动和行为能力，这些活动和能力并非针对当前或未来的收入（比如家庭主妇的工作、志愿者工作、公民自发倡议的政治工作、大学学习），而是发生在无保护的，法律、物质和社会方面受损害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比如说长期不固定的辅助工作），其中主要涉及的是女性。

1. 出于劳动者从其隶属的劳动分工制度下解放出来及其“全面”发展的角度，马克思批判地看待职业体系：他还假设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发展正朝着这样一种方向迈进，即需要科学和现实中多才多艺而又灵活的参与者。

1.1 在傅立叶之后，年轻的马克思将职业理解为一种暂时的形式，其中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产生的分工转变为日益增长的个体片面化。“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DI*, MEW 3，第 33 页）因此，职业成为分工的“自我舍弃”，成为一种形式，不仅越来越多地将个人固定在其发展中，而且使他们远离彼此，相互对立，并带来社会的不平等。“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上书，第 273 页）假定废除了工人的职业形式。这应该被抨击，如果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分工“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同上）。

161

162

1.2 对此马克思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城市/农村、男性/女性、脑力/手工）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Elent*，MEW 4，第 157 页；参见 *AD*，MEW 20，第 271—272 页），并导致个体职业的出现和倍增，“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手工工场内的第一分工形式“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K I*，MEW 23，第 380 页）。“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第 381 页；参见 *AD*，MEW 20，第 272 页）单方面发展的职业行为能力，与独立的农民或工匠相比“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第 382 页）

马克思认为，在手工工场时期，尽管“手工业活动的分解”一方面“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另一方面“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是这种趋势由于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他们出于嫉妒保持较长的学习时间，即使这对于实际所需的技能并不是必要的。（第 389 页）

1.3 直到伴随着大工业机械的普及，男工的反抗才“消失”。（*K I*，MEW 23，第 389 页）在工业中，这些活动被简化为简单、单调、易于学习的操作技巧，越来越不需要特殊培训。“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同上书，第 446 页）这就使得在工厂中使用不熟练的女工和童工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针对机器的开发、设计、安装和维护，形成了大量不同的专业领域，这些专业被区分为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这会导致工人行为能力的分散，使他们相互对立并将他们置于等级安排中；这种分散表现为同类职业的相互隔绝与等级化。

马克思认为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性的”；它“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

部个人”（*K I*，MEW 23，第 511—512 页）。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需要废除劳动力的职业形式。

2. 列宁把工会的保守立场看作去职业化的障碍：“资本主义必然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有的、长期形成的职业和行当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各工种的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经过许多年才能发展成为而且一定会发展成为规模较广而行会气味较少的产业工会……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和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LW 31，第 34—35 页，Herv. getilgt）

3. 从历史上看，工业化对于迄今的手工业职业的结构与内容的重铸过程并没有导致职业的普遍结束，而是产生了工作和能力的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新浪潮。（Beck/Brater/Daheim 1980，第 19 页）工业和手工业中的许多技术职业，工业、商业和银行业中的商人职业，技术、社会和法律的服务性、管理性和科学性职业正在兴起。

3.1 在自动化时代，职业化仍在继续，未完成职业培训的就业人员的比例在下降。他们越来越被排除在就业之外。与此同时，学习和从事有专业技能的职业的女性比例正在增长。特别是在电子数据处理的发展背景下，在制造领域和使用领域创造了许多新的职业。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技术开始了现有职业的结构和内容的重铸过程。

3.2 然而，伴随着自动化而来的除了职业化的趋势之外，同时还存在职业普遍化的趋势。例如，“与设备打交道的安装人员和监管人员面临着大幅扩展其工作和能力范围的要求，甚至涉入了维修人员的传统工作领域。但这不是对于他们的简单排挤，而明显是要形成工人群体之间特有的合作关系，他们作为不同生产实践的‘专家’，必须具备可互通的知识能力与工作能力”（PAQ 1983，第 93 页）。没有一个世界会随着发展的趋势对所有的工人都提出类似的要求，而从两个主要方向共同具有的普遍性出发则更容易理解：“一方面，发展是在各自的世界之中针对有限知识和干预的强加与内化的所有倾向的抵制；另一方面，发展是对一种狭隘和越来越不易相处的自动化的世界相互分离的所有倾向的抵制。”（同上书，第 94 页）由于相互对立的劳动关系和迫在眉睫的失业，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工人们彼此奢望把对他们过程控制和环境控制碎片化，由此，他们在社会劳动的发展基础上，在第一次有可能使他们的活动能力得到普遍发展的情形下，妨碍了他们自

己（的普遍发展）。此外，职业普遍化的趋势也反映在培训职业数量的显著减少上——在联邦德国，由 20 世纪 60 年代的超过 600 个降至 90 年代的大约 370 个。通过普遍职业的发展，个人全面发
165 展的乌托邦出现了新的亮点，并获得了新的基础。

3.3 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在传记《时间表》（Zeitplan）中看到不同职业的次序，基于综合技术的基础教育并充分利用日益增加的业余时间，这是个人普遍发展的关键。作为一种“社会工作的共产主义组织形式”，它旨在形成一种能够使“能力相互渗透与互相交叉——包含实践意义与理论反思，艺术才能和社会责任等”的形式，使个体发展的“进步速度”“通过时间表的变化不断增加，个体的活力保持在较高水平”。（1972，第 381 页）在个人可观察到的对其人格“分裂”的抵制中，正如资本主义通过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离而持续强迫他们一样，他认识到“对职业的热爱”，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它必须始终保持不满，成为工人运动的斗争需求的情感基础。（第 384 页）

4. 职业的形式总是与统治有关。理性主义职业结构的发展及其中的单一职业是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的表达和调解者。一种职业界定了社会对发展和确认个人生产能力的要求，并开辟了一个与社会相关的发展可能性。同时，该定义限制并引导了个体发展的可能性。职业是成年人社会化和人格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形式。（Groskurth 和 Volpert 1975；Heinz 1980）

4.1 职业划分和职业规定为从业者提供了一定的竞争保护，但同时限制了他们应对工作要求变化的灵活性。由此产生的不灵活性会带来长期失业的风险。职业的变更、再培训和继续教育可以重新获得灵活性。

4.2 视线仅聚焦于技术—组织基础，就很容易忽视男女工人之间的差异。虽然男女之间的教育差距有所减少，一部分妇女还实现了反超，但就业妇女的比例增长缓慢，男女职业的性别集中程度 166
几乎没有下降。相反，随着服务业的扩大，女性对于与之相符的职业的集中度似乎还在增加。（Ostner 和 Willms 1983；Krüger 1987）

4.3 私人—非正式的或者国家—正式的（经司法确认）职业禁令的可能性清楚地表明，就业人员不能轻易地扩大或超过职业权利和义务的限制。职业禁令不仅对职业成果的接受者具有保护作用，他们并不能自己评价这一切，而且特别有助于对保障政治权力结构的约束和制衡。

参考文献：

U. Beck, M. Brater, H. Daheim, *Soziologie der Arbeit und der Berufe. Grundlagen, Problemfelder, Forschungsergebnisse*, Reinbek 1980; P. Groskurth u. W. Volpert, *Lohnarbeitspsychologie. Berufliche Sozialisation: Emanzipation zur Anpassung*, Frankfurt/M 1975; W. R. Heinz, »Berufliche Sozialisation«, in: K. Hurrelmann u. D. Ulich (Hg.), *Handbuch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Weinheim-Basel 1980, 499-519; H. Krüger, »Qualifizierungsoffensive – neue Chancen für weibliche Arbeitskräfte?«, in: K. A. Geissler, H. J. Petsch, S. Schneider-Grube (Hg.), *Opfer der Qualifizierungsoffensive*, Tutzing 1987, 45-62; I. Ostner u. A. Willms, »Strukturelle Veränderungen der Frauenarbeit in Haushalt und Beruf?«, in: J. Matthes (Hg.), *Kris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Verhandlungen des 21.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Bamberg 1982*, Frankfurt/M- New York 1983, 206-227; Projektgruppe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Zerreißproben – Automation im Arbeiterleben.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Teil 4*, Berlin/W 1983;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2.

格哈德·齐默（Gerhard Zimmer）撰

宋珊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markt, Arbeitsteilung, Automation, Berufsverbot, Bildung, Facharbeiter, Frauenarbeit, Gesamtarbeiter, Herrschaft,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Kopf/Hand, Massenarbeiter, Persönlichkeit,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kräfte, Technikentwicklung

职业革命家（Berufsrevolutionär）

A: thaurī muḥtarif.

E: professional revolutionary.

F: révolutionnaire professionnel.

R: professional'nyj revoljucioner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

S: revolucionario profesional.

这一（承载了“空头革命家”、“宗派主义者”、“官僚主义者”、“机关干部”等负面意义的）名称，在当今关于政治组织问题的严肃讨论中还有任何意义吗？——在见过这个名称在 20 世纪工人运动中如何被糟蹋，又见过各式各样的职业政治家们越来越多的名誉扫地之后。

职业革命家的概念历史上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组织机构的争论中列宁的观点最为密切相关；提出这个概念当时主要是出于论战

的目的，但也不仅仅停留在论战的层面。它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条件（借鉴了考茨基著名的“从外面灌输”理论，Kautsky 1901/1902，第 79 页；LW 5，第 385、394—395 页）和关于建立相对于阶级整体独立的革命者组织的必要性的理论的组成部分。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降，列宁在一系列著作和同俄国民粹主义者、经济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激烈论战中演绎出以《怎么办？》（*Was tun?*）为标志的“列宁式组织计划”，这通常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诞生的起点。（1897，LW 2，第 351 页及以下；1899，LW 4，第 215 页及以下；1900，LW 5，第 355 页及以下；1902，LW 6，第 223 页及以下；参见 1895—1902 年书信，LW 34，特别是第 94 页及以下）

列宁为适应反沙皇制度斗争不合法的现实条件和秘密作战的必要性，主张设立一个全俄的报刊作为“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以及“集体的组织者”，围绕报刊要建立一个“代办员网”（LW 5，第 11 页）：成立一个全俄的政党作为“职业革命家”组织（参见 LW 5，第 466 页）。列宁明确了该组织与工人组织的区别：“第一，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第二，它应当是尽量广泛的组织；第三，它应当是尽量少带秘密性的组织……。相反，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同上书，第 468 页）工人组织首要的是领导工会和经济斗争，革命家组织则负责领导反抗专制制度的真正政治性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斗争。

是否必须指出，这种构想自身带有哪些隔绝群众和包办替代主义的危险？它首先立刻受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其他派别最为激烈的批评，特别是主张无产阶级的行动应局限在经济上并服从资产阶级领导的“经济主义者”。罗莎·卢森堡 1904 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Organisationsfrage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一文中批评了列宁的集中制，并形成了党作为运动的产物的观点。（参见 GW 1/2，第 422 页及以下）托洛茨基 1904 年、1907 年批评列宁，针对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在反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特殊战术任务、无产阶级的独立自决和自发活动是否有利于革命者为了无产阶级的行动和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行动，两者的区别提醒人们注意（革命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性质上的差别。 168

此刻，列宁已经开始在关键问题上修改自己的观点。在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Ein Schritt vorwärts,*

zwei Schritte zurück，1904）中，除了革命家组织以外，工人组织也作为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LW 6，第 490、499 页；LW 7，第 197 页及以下，尤其是第 257 页及以下）随着 1905—1906 年运动的兴起和合法化可能性的增加，列宁进一步认为：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LW 10，第 16 页），“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极大地把这种自发性变为自觉性”（同上书，第 18 页），这就必然导致其组织上的变化。他在 1907 年提出“吸收无产阶级分子来扩大党”是最终克服小组习气的唯一出路。（LW 13，第 97 页）

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之中，才诞生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构想（直到 1912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才彻底分裂）。其后有观点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出现是列宁 1902 年“计划”的直接实现，还机械地把这种计划搬用于完全不同的情形和国家。恰恰相反，列宁自己也指出，这个时候职业革命家政党的构想已经过时。（同上书，第 96 页）

“一元化的战斗性的党”（*Kurzer Lehrgang*，1938，第 55 页）的神话，同斯大林主义的上台和必须以“列宁主义”的名义排除所有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内不同派别的事实紧密相关。即便是没有直接参与这一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纷纷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早期派系斗争中列宁对组织问题的观点理想化：其中代表如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他把职业革命家的党等同于干部的党（参见 1919，1924 和 *Guk*）。

正是卢卡奇的这一论调，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被西德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所继承，用来将他们漫画式的先锋诉求合法化。不仅在他们那里，列宁最初的职业革命家的概念获得了广泛认可（例如 Rabehl 1970，第 47 页及以下）。可是，自命（通常是大学生）的所谓“职业革命家”经常无业，以个人灾难告终的同时，他们也从政治视野销声匿迹。 169

所以，职业革命家的概念已经毫无现实意义。如果要严肃探讨政治组织问题的话，其关键点还是葛兰西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人来维护一个党派的持续性和整体性，充当党的“核心凝合剂”，那么任何运动都无法存在。（*Gef*，H. 14，§ 70）在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专业化和普及化的时代，不是更加如此吗？

参考文献：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Bolschewiki. Kurzer Lehrgang, Moskau, 1938; K. Kautsky, »Über den Entwurf des neuen Programms der österreichi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Die Neue Zeit*, XX, 1901/1902,

I, Nr. 2, 68-82; G. Lukács, *Die moralische Send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1919, dt. 1920), in: W 2, 105-111; ders., *Lenin* (1924), W 2, 519-588; B. Rabehl, »Zur Methode der revolutionären Realpolitik des Leninismus«, in: *Lenin, Revolution und Politik*, Frankfurt/M 1970; L. Trotzki, »Unsere politischen Aufgaben«, 1904, in: *Schriften zur revolutionären Organisation*, Reinbek 1970, 11-134; ders., »Zur Verteidigung der Partei«, 1907, in: ebd. 212-252.

维尔纳·马肯巴赫（Werner Mackenbach）撰
王艳柯译，曹旸校

参见：
Avantgarde, Beamte, Bewußtheit, Bolschewismus, Bürokratie, Funktionäre, K-Gruppen, Kader, Kaderpartei, Lukácsianismus, Luxemburgismus, organisieren, Spontaneität, Trotzkismus, von außen

职业禁令（Berufsverbot）

A: man' muzāwalat al-mihna.

E: prohibition of profession.

F: interdit professionel.

R: zapret na professii (запретна профессии).

S: prohibición de ejercer la profesión.

职业禁令这个德语术语已经被很多语言接受纳入，它指由于政治动因剥夺在公共事务中从事职业的权利：强制远离公共事务，以及禁止雇佣和思想审查。直到1985年4月，联邦德国内部至少还有6689项职业禁令以及2639058项思想审查。职业禁令的根据是（萨尔州自1985年起停止适用的）德国各联邦州的州长1972年1月28日的一项决议。根据这项决议，作为在政府看来"敌对宪法"的政党的成员，这一身份"一般"就能够充分证明，当事人是否会"随时支持自由民主基本制度（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FDGO）"——实际上狭隘化为认同社会经济的现状——是值得怀疑的。对1968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DKP）实行的禁令被视为不合时宜，职业禁令决议是前者的政治替代方案，这一决议伴随着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政府的"新东方政策"一道出现（与之相反的是，当1956年宣布禁止德国共产党[KPD]时，1951年颁布的同样企图实施职业禁令的《阿登纳法令》[Adenauer-Erlaß]就随之失效了）。这突出体现职业禁令政策的针对方向：遏制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的接受和实践方面的实现，生产和教育领域内出现的矛盾推动着这一趋势，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的苗头也反映了这一点。

联邦宪法法院对于裁定一个政党违反宪法（Verfassungs*widrigkeit*）的垄断权，随着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可以裁定一个政党敌对宪法（Verfassungs*feindlich-keit*）而被损害。众州长的决议几乎可被任意地阐释，相应地，职业禁令是根据政治局势、政府构成等在不同的广度和强度上施行的一种灵活的威慑及压制手段。凡是引发各届政府或所在当局注意、要被——根据实际情况——剥夺法律权利的各种派别或组织（特别是，但并不限于议会外反对派），其代表人物都要面对入职禁令。比如随着和平运动的不断增强，投身于该运动中（部分与北约的方针政策相关）会越来越受职业禁令的影响。

个人面对职业禁令的遭遇，向事实上的或——在大得多的范围内——仅仅是可能的受害人显示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受欢迎，会带来对他们的思想或正直、对他们未来的行为无法消除的怀疑。从持续的风险评估到自我审查和将自我审查在理论、科学上程式化，都是对于法律不确定性深思熟虑之后的不同表现，这些做法的客观功能在于，让个人通过放弃履行民主权利从而一同参与到对民主权利的削减。社会民主党发起职业禁令的人后来把它归为“错误”（Willy Brandt）和“告密风气”（Horst Ehmke）的诱因，职业禁令通过其筛选功能，使得政治动因的挑选在生产领域中也显得民主合法。 171

“投机主义”的算计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凭经验是无法解答的。同时也很难判定，团结抵制针对特定政治观点的行政方面的（*administrative*）检测，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针对这些观点的效力所进行的逻辑推理方面的（*diskursive*）检测。随着削减民主权利和削减社会权力相互的影响愈演愈烈，德国工会联合会（DGB）下属各工会也参与到不断公开抵制职业禁令的行动中。1979年成立的海涅基金会（Heinrich-Heine-Fonds），组织实施在物质上团结支援深陷困境的受害人。在早前——这可以联系到反法西斯传统，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有关——这种抵抗就已经有着国际的维度。一些国际组织也纳入过这个议题（比如欧洲议会多次就这一议题进行磋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87年2月23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鉴定，其中认定职业禁令政策违背了第111号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邦政府已于1958年签署加入）确立的歧视禁令。

随着政府中多数派的更迭，由于对重要的反对派进行威慑的必要性和/或适当性的评估的变更，而且基于随着失业率增长（求职者“滞销”）而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引人注意的筛选功能，个别联邦州减缓或中止了职业禁令的实施——这反映了这种压制和威慑工具灵

活性的一面，它可以随时根据现实情况而更新。

zialismus, Zensur

参考文献：

Autorengruppe des IMSF, *Berufsverbote*, Informationsbericht 42, Frankfurt/M 1985; H. Bethge u.a. (Hg.), *Der Kampf gegen das Berufsverbot*, Köln 1973; dies., *Die Zerstörung der Demokratie durch Berufsverbote*, Köln 1976; D. Bongartz, *Chronik einer Dienstentfernung*, Frankfurt/M 1985; Initiative »Weg mit den Berufsverboten«, *Rundbriefe*, 1985, 1987, Nr. 66, 67 und 72, Stellungnahme vom 21. 11. 85; *Zur Situation der Menschenrecht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3. Internationales Russell-Tribunal, Berlin/W 1978; Komitee für Grundrechte und Demokratie (Hg.), *Ohne Zweifel für den Staat*, Hamburg 1982; M. Kutscha, *Verfassung und »streitbare Demokratie«*, Köln 1979; P. Voegeli, *Völkerrecht und »Berufsverbot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76-1991*, Berlin 1995.

莫鲁斯·马尔卡德（Morus Markard）、
加比·明茨（Gabi Minz）撰
唐婧、罗梓丹译，曹旸校

参见：

Bürgerrecht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Meinungsfreiheit, Opportunismus, Rechtsstaat, Sicherheitsstaat, Wissenschaftlicher So-

占有 / 所有权（Besitz/Eigentum） 172

A: milkīya/ḥiyāza. – E: ownership/property.

F: possession/propriété.

R: vladenie/sobstvennost' (владение/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S: posesión/propriedad.

虽然从常识上说，“占有”（Besitz）和“所有权”（Eigentum）之间的区别似乎微不足道，但从历史和透视的视角来看，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却至关重要。正视这种差别使我们能够讨论以下主题：前法律条件下共同所有权的各种形式、法律条件下区别性或对抗性地使用与支配占有和所有权的各种法律条文形式，以及必须对共同所有权和共同占有进行革命性重构的各种形式。

1. 黑格尔关于所有权的论述始于对占有和所有权的区分。“占用（Besitznahme）一部分是通过物质的直接拿取实现的，一部分是通过塑形（Formierung）实现的，一部分则是通过单纯的标示（Bezeichnung）实现的。”（*RPh*，§54）当我们在一块土地上狩猎、放牧或作其他

用途时，我们就是在身体上把握这块土地。“塑形”意味着对土地进行加工，在其上种植作物或驯养牲畜。而标记则是对此在思想和记忆上的帮助。通过取得占有，事实得到了“……是我的”这个谓词，在最初的共同体中，**我的就是你的，是我们的，但不是你们的**。只有当他者把占有作为一种权利加以承认之后，占有才变成了所有权。

本身就受过法学训练的马克思沿用了占有和所有权的这种区别，他写道：“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这是对的。”（*Gr*，第 22 页；MEW 42，第 36 页）不过马克思认为，存在两种占有的概念，一种表明了法的关系，另一种则与法的关系无关。第二种占有概念先于第一种，而且也先于所有权的概念。后起的那种占有概念是在法律制度中和所有权概念结合在一起的。占有 / 所有权的制度首先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在古代的萌芽时期，并在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家庭和部落关系产生之前，占有是不存在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占有制度和所有权一起出现在资产阶级社会时期，也就是法的关系被引入我们的制度的时期。“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Gr*，第 22—23 页）随着家庭—部落关系的发展，最初的占有关系也转变为一种占有 / 所有权的制度，它是由资产阶级关系中的一系列法的关系构成的。 173

2. 作为内在于权利体系中的一种权利，所有权概念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改变的。占有和所有权最初的结合发生在土地和耕地上。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的历史阶段，它们是相互对立的概念。家庭占有牧场和耕地，而氏族、部落、村庄等则拥有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又是被氏族、部落、村庄中的各家庭所分享，他们共享所有权的方式就是：把土地分为若干小块土地，并在或短或长的时期中（例如一年或多年）分别占有这些小块土地。有的时候，分配由许多人实行。（参见 *Ethnol*，第 349—355 页）如果某些小块土地被荒废或无人耕种，那么当初被分配到这些小块土地的人就失去了对它的占有权。土地的所有权制度并不是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

的产生而一下子出现的，相反，它是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表现形式中，土地和耕地所有权体现为共同所有的形式。个人不是土地的所有者，而更像是分配给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者。（参见 *Gr*，第 378 页；MEW 42，第 387 页）共同所有权出现于文明的萌芽期；它在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中继续存在了相当一段时期，并且在国家和社会阶级产生很久之后才最终消亡。在亚细亚，尤其是印度，共同所有权的残余直到马克思的时代还仍然存在。（MEW 13，第 21 页；MEW 23，第 92 页）在印度的历史上，国家、社会阶级及其对立持续了数千年。而凯尔特、日耳曼、拉丁、斯拉夫等的所有权制度，都是从古印度的共同所有权形式中派生出来的。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派生的所有权形式**指一种具体的历史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指的是历史上后来出现的其他变体形式，这些形式之间没有具体的关联。例如，印度和秘鲁的共同所有权制度是资产阶级社会早期的共同体或部落所有制的变体；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具体的历史关联。在东方，共同体成员往往共享土地和耕地的共同所有权，这和前资产阶级阶段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相同的。古罗马时代的城市本身就拥有所有权。贵族在其所属的共同体组织，即氏族（*gentes*）中拥有权威，并且有权使用氏族的土地，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是通过家臣（Klienten）行使的。除了凯尔特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实践之外，欧洲历史上还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土地 / 耕地的私有权——而不仅仅是占有。（参见 *Gr*，第 380 页及以下，第 396—397 页；MEW 42，第 389 页及以下，第 404—405 页）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土地的私有权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土地所有权往往与封建领主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区分了三种土地所有权制度，它们分别是：亚细亚、古罗马和中世纪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同上；参见 *Vorw* 59，MEW 13，第 9 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土地所有权的主要形式是土地私有权。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也就是新的占有者拥有土地私有权，而直接生产者则丧失土地所有权——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K III*，MEW 25，第 820 页）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农奴制度是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形式，而对土地的剥夺就消除了这种联系。“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

市场。”（*K I*，MEW 23，第 744 页）“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同上，注释 189）不过，在 15 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破坏了意大利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 14 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同上书，第 744 页）这
175 种事实上（de facto）的消失与法律上（de jure）的消失是不同的，前者具有实质性，后者则体现了从农奴制解放的形式化过程。这在法国的历史上体现得最为显著，法国也发生了同样的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实质解放过程，该过程直到 17 和 18 世纪才宣告结束，但资本、资本家以及农奴的实质解放过程是彼此分离的，而且它们也都不同于资本家和农奴从封建依附性中的形式解放过程，后面这个过程直到 1789 年的大革命才得以完成。

马克思区分了四种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地租，其中也提到了占有和所有权的意义。资本主义地租的形式包括：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和分成制。（参见 MEW 25，第 798—816 页）劳动地租出现在封建制中，直接生产者为地主和自己劳动。因此，为地主的劳动是无酬剩余劳动（劳役）；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利润的萌芽。直接生产者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劳动者对土地的占有与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之间的区别，也体现在产品地租和货币地租的制度中。在所有这些制度中，土地的所有权都属于那些不在土地上劳动的人。而在分成制中，占有 / 所有权的制度发生了改变：那些在特定土地上生活和劳动的人，在性质上并不属于劳动者，而是他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是一部分劳动工具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K III*，MEW 25，第 811 页）。

3. 历史上，土地私有权还有一个更早期的形式。资产阶级社会等同于私有权，这个看法无异于一个流传甚广的神话。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中，直到工业化生产取得支配地位之前，土地一直都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无论在亚洲、非洲、欧洲还是南北美洲，共同所有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初期普遍存在，而私有权则是共同所有权消亡的结果。

在 1881 年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书 176
信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了土地共同所有权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马克思写道：“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

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接着他引用了摩尔根（L. H. Morgan）的话：“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MEW 19，第 386 页）古代类型的社会既包括前资产阶级社会，也包括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前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共同体性质的，但到了资产阶级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就只剩下了形式。土地所有权正是与社会形式和社会内容的这种转变和矛盾相适应的。

随着共同所有权向私有权的发展，社会也发展到了较高级的形态。从后来较高级的社会形态的角度看来，之前的社会并不存在所有权，它们有的只是“和土地的深厚联系”。在追求自身管辖地区的所有权的国家看来，就如同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占有着他们狩猎和采集的地区一样，后来的农村公社也无非是耕地的占有者。公社的所有权后来转变为私有权；这是现代资产阶级法学思想中一个误解的根源，这个误解就是仅仅把公社权利视作一种较深刻的占有权。这也与现代思想中的另一个错误看法密切相关，这种看法认为，最初的和真正的所有权就应当是私有权。而我们已经指出，在早期阶级社会中，所有权是被村庄、国家这些支配性的共同体所共同持有的。所有这些形式都与占有截然相反。

无论是占有者还是所有者，他们对于一块土地的使用和享受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因此从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视角看来，私有制无非只是对土地（以及其中出产的产品）较长时间的占有。对此，马克思曾给出过一个独一无二的规范性论述：“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K III*，MEW 25，第 784 页）共同所有权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不存在阶级所有权；社会阶级刚刚出现的时代，所有权体现为国家和村庄的共同所有权，它不同于单纯的占有；所有权最后将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目前我们尚未达到。

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撰
丹尼尔·巴本（Daniel Barben）译为德文
王师 译，张义修 校

参见：

Aneignung, Anthropologi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orfgemeinschaft, Eigentum, Enteignung, Erde, Familie, Feudalismus, Gemeinwesen, germanische Gemeinde, Grundrente, Herrschaft, Klassengesellschaft,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Privateigentum,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Recht,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Verwandtschaft

规定的否定
(bestimmte Negation)

A: nafī mu'ayyan.

E: determinate negation.

F: négation déterminée.

R: opredelennoe otricanie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отрицание).

S: negación determinada.

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指出的，马克思将向“一个不同的、非压制性的社会”的过渡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定的否定**”。(1954，第370—371页)“资本主义如何能够这样被积极地否定？这一对马克思而言的原初问题包含着必须保留的东西和必须克服的东西之间的差别。”(Krüger 1990，第202页)由此带来的辩证的疑难，导向了对批判理论与变动中的实践在手段、方法与根本态度上的深入研究。出发点之一是如下对常识而言显得悖谬的认识，即在规定某个东西时，总要将之表达为某种不同的东西。

1. 斯宾诺莎（Spinoza）实际上已经思考过规定的否定，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表达。真理是对错误的规定的否定：真理既是自身的标准，也是错误的标准（*est enim verum index sui et falsi*）。（*Epist*，Nr. 76，O III，第233页）这是他的如下观点在认识论上的运用，即每个肯定的规定（以及定义或界定）作为对界限的划定，都以排斥（Ausgrenzungen），也就是以否定的规定为基础：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negatio est*）。（同上书，Nr. 50）——黑格尔赋予了这一命题“无限的重要性”，他将之改写为“一切的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此后，这一命题主要是被归于斯宾诺莎。（可参见 Theunissen 1978，第156页）黑格尔将之解释为：“规定性是被设定为肯定的否定性。”（*Logik*，W 5，第121页）正如托伊尼森（Theunissen）以唯灵论的方式所说的那样：黑格尔将否定动态化为“纯粹的过程性（Prozessualität）、一种实施（Vollzug），它无需任何基底，而是从自身中取得展开过程的力量”(1978，第173页)。

在《逻辑学》（*Logik*）的导论中，黑格尔在探讨“什么能够是哲学科学唯一的真方法”时，引入“规定的否定”这一术语，因为它是“事情本身的进程”。（W 5，第 49—50 页）他首先以《精神现象学》（*PhG*）为“这种方法的范例……在这里，那就是意识的诸形态，其中每一形态在实现时，本身也一同消解了……并从而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形态”（第 49 页）。他将关键的认识，即“**为了争取科学的进展**唯一的事”，解释为“对逻辑命题的认识，即否定的东西同样也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的否定；于是，在结果中，本质上就包含着结果所从出的东西”。（同上）只有“由于这个产生结果的东西，这个否定是一个**规定的**否定，它才有了一个**内容**。它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比先行的概念更高、更丰富；因为它由于成了先行概念的否定或对立物而变得更丰富了，所以它包含着先行的概念，但又比先行概念更多一些，并且是它和它的对立物的统一”（同上）。所以，规定的否定尽管是一种方法，但却“与其对象和内容并无不同；——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在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第 50 页）。规定的否定就这样支配了逻辑的范畴顺序与架构。“本质”（Wesen）作为“存在”（Sein）向“概念”（Begriff）的过渡，就这样在与存在的关联中将自身规定为“一种**规定的**否定”（2. Buch，Kap. 1，第 8 页）。

在区分作为（**纯粹的**）**存在**之对立面的**无**（*Nichts*）和作为**某物**（*Etwas*）之对立面的无时，黑格尔将规定的否定发展为一个操作性的概念。后一种无是“一个规定的无”，因此并不表现为“抽象、直接的否定性……无关系的否定”。（W 5，第 84 页）所以，譬如寒冷和昏暗就是“规定的诸否定性”。“它们不应该是一般的无，而是光明、温热等等的无，是某种规定物、某一内容的无；它们可以说是有规定的、有内容的无，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一个规定性，也包括光明或者温热的规定性，反过来“自身就是一种否定，所以它们是否定的无，但是否定的无，自身就是某种肯定的东西”（第 108 页）。健全的人类知性错误地将质看作直接的既定性（Gegebenheit），因为“在作为质的**实在**之中，所强调的是一个**存在着的**实在，这就掩盖了实在也包含规定性，即也包含否定”，质因此“只被当作是某种肯定的东西”。（第 118 页）是如此的东西便是如此，而不是别的。因此，如果不同时思考一个规定了的他者，便无法思

考某物的规定性，某物与这个他者相区别，而且，只有在这一区别中并通过这一区别，某物才将自身突出为规定了的东西（Bestimmtes）。与此同时，这个他者“被设定为”对一个规定了的存在者的“否定性、界限、限制”，且不失其自身的规定性。“因此他者的存在（Anderssein）不是在其之外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是其自身的环节。”（*Enz*，§92）

2.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将规定的否定这一思想，从精神的思辨之诗中解放了出来：规定的否定不再被担保为向一种“更高”形式的过渡，它变成了关于可借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并且面临着失败的风险。但是，通过这种此岸化（Verdiesseitigung），规定的否定获得了实践与理论的意义。马克思不但明确承认斯宾诺莎关于每一个规定的持续否定性（Negationshaltigkeit）的命题（参见 NEW 42，第 26 页；MEGA II 1. 1，第 27 页），而且将之置于其非思辨的理论观点的根基上。这体现在占有与异化之间的指引关联（Verweisungszusammenhang）中，或是体现在资本的如下规定中，即它是“少数人的所有权（Eigentum），其形式与功能以多数人的非所有（Nichteigentum）为基础”（Haug 1972，第 175 页）。当纳索·W. 西尼耳（Nassau W. Senior）用“‘节制’（‘节欲’）一词”代替“被视为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1836，第 309 页）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不仅指出庸俗经济学“用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而且在第二版中添加了一个附注：“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MEW 23，第 623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通过如下矛盾建构起来，即“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MEW 25，第 274 页）。只有通过这些否定，虚假开支（*faux frais*）才会出现，它是一种“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MEW 23，第 522 页）的成本。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学，“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的局限”，它 180
“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MEW 26. 3，第 255 页）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对立中，马克思将规定的否定塑造为对工业社会劳动的对抗性的职能化的否定，这种否定将工业社会的劳动一般化了，因而扬弃了资本主义的限制。因此，马克思确信，在这里，“生产转化为社会生产，尽管是以异化的形式”，这是旧社会中的新社

会的基本要素（MEW 26.3，第309页），因而，在受到私有制限制的生产社会化过程中“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Gr*，第365页；MEW 42，第373页；MEGA II. 1. 2，第369页）。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旧社会的变革要素”同时也是“新社会的形成要素”（MEW 23，第526页）。

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在被批判对象本身当中，发现了它据以建构的差别。马克思认为，他所运用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MEW 23，第28页）。它在对资本的肯定中发现了否定，即竞争和危机趋势。“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第790页）资本“发展为它的同时也是普遍的限制：它对自身的肯定转入对自身的否定。……人们可以将限制（Beschränkung）理解成规定（Determination）这个词。否定是对资本的规定，它是资本自身当中产生出来的”（Haug 1972，第176—177页）。这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许多概念具有了规定的否定的结构：“这是社会生产的视角，该视角为私人商品生产提供了概念。这一点凝结在这些概念的结构中。它们是被否定地规定了的。这意味着，它们是从社会生产思想出发的，并在如下方面中来理解私人商品生产：它否定这一思想，它是非社会性的生产。”（第159页）

2.1 从规定的否定的立场出发，得出的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它强调的恰恰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性，尽管其只具有一种历史的—暂时的本性。（参见 *Gr*，第715—716页；MEW 42，第721—722页；MEGA II. 1. 2，第697—698页）作为规定的否定，《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MEW 23，第791页）上。由于它在这种成就上来否定对立，所以它是“否定的否定”（参见上书）。由于它坚持资本主义以对立形式发展出来的东西，坚持资本主义从它的对立性的界限中解放出来的东西，所以，马克思的规定的否定的批判，同那种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果实一起丢弃的否定是对立的。后一种否定指的是马克思之前的某些社会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也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MEW 26.3，第257页）因此，后者表现为“禁欲主义者”（同上）。——但是，规定的否定的规划和实际操作的

批判可能是相互分离的。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业资本部分，马克思对工业劳动作了部分批判，以至于他似乎是从手工劳动出发来否定工业劳动，因此助长了工业社会学中基于去技术化命题而展开的关于贫困化的讨论。（参见 PAQ 1987，第 11 页及以下，以及 Frigga Haug 1983，第 110 页及以下）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规定的否定，意味着如下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努力，即将占统治地位的个别部分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基础切割开来，后者就如同是社会生活的实体和主体。属于此列的，是质料上的被购置者（Besorgten）和形式上的购置方式（Besorgungsweise）之间的分析性差别，为此，马克思提出了形式规定性的概念和形式分析的方法："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MEW 25，第 260 页）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时也是内在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在意识形态上模仿规定的否定，将资本主义表达为"福利国家"里的"消费社会"。这些称号虚幻地翻转了结构，因为它们将被给予的补偿当作统治性的，而将统治当作服务性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始终将自己作为规定的否定，"其立足点是普遍的东西或确实经受了普遍化的东西。特别是劳动将它的普遍化推向了反面，因为劳动的普遍化缩短了劳动，并使其从它的对立形式中摆脱出来"（Haug 1972，第 183—184 页）。"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MEW 23，第 552 页）让他人为自己工作，这是不可普遍化的，因而这就被普遍化否定了。马克思援引了维吉尔（Vergil）《警言诗》（*Epigrammen*）中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VOS，NON VOBIS）（MEW 26.1，第 197 页），这句诗可以被译为"你们劳动，但不是为了你们自己"，在这里，"不是"（NON）表现出了特殊利益的统治。 182

2.2 **讨论**。这种解释首先遭到了米夏埃尔·沃尔夫（Michael Wolf）的批评。他否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总是使用'规定的否定'这一方法论工具"（1974，第 100 页）。不过，他自己陷入了一种矛盾当中：一方面，他将资本立足点解释为马克思的"主导角度"，在他看来，"'客观的'状况由此自行建构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从"劳动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极"出发，"破译了资本的神秘状况"，但它们"只是被偶尔提及"，"因为它们没有建构起资本主义经济的进程"。（第 99 页）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

述是否不同于“对资本的神秘状况的破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难道不正是努力对资本主义的状况作一种叙述，而且通过这种叙述他不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状况作出了批判吗？因此，这种批判不是外在的，它是对肯定之物的有组织的否定。马克思采取了变动的普遍者的立场。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的”立足点与劳动的立足点是一致的，因此沃尔夫可以说，“它不能被进一步地肯定规定，因为它以一种**不同体制的碎片式**论述为基础，这些论述之间的关联是**被期待的**”（同上）。“提到社会主义时所依据的模式总是一样的。只要当时提供的分析能够实现，那涉及的就是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状况，之后努力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所引起的限制与特点，再通过推测出一种社会化趋势，来对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结构作出浅尝辄止的讨论。”（第 99—100 页）——这种“撇开限制”的思路是有问题的。最后，这里的关键是对一种阶级对抗的扬弃，并且这接近了一种阶级立场（“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参见 MEW 23，第 22 页）。

实际上，如果不分析塑造了这种形式之产物的生产关系，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和价值形式。反过来，这些关系又只能被理解为社会的关系。这意味着，它们表现出康德（Kant）在理解（市民社会中的）人时所说的“非社会的社会性”。而这又意味着，尽管 183
在这些关系之中的这种非社会性（私人性）占据统治地位，但仍被当作否定的东西来处理，而它必须总是以肯定的方式趋向社会化。正如否定内在于这种社会性的私有制形态当中那样，这种对它的理论叙述的否定的否定，并不处于一种“先验”形态的社会主义立场当中。与沃尔夫假设的相反，关键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立场，它的各个具体方面总是被以投射的方式结合为一个体制，之后又被投射回具体的资本主义的状况及其分析上”（第 100 页）。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视角”被当作“规定的否定”，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的不是别的，正是坚持如下三重基础——劳动、它的物质生产力及其直接的社会特征——来反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私人化”（Haug 1972，第 179 页）。针对这种观点，沃尔夫提出了反对意见：“规定的否定从自身出发是希望标示肯定的规定”；“与之相反，马克思援引的不是‘规定的否定’，而是‘现实的运动’”。（1974，第 100 页）后者是无可置疑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如何**思考“现实的运动”的，并且他的批判应当如何来理解？规定的否定是与一种认为“对于否定性的否定来说，辩证过程的发展和目标被逐渐承认和/或证实”

（同上）的历史哲学紧密相关的吗？这针对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参见 MEW 23，第 789 页及以下）的讨论。在这里，沃尔夫看到了一种“客观主义的历史观”。他将“规定的否定”理解为“**机械论**，即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单线视角”，并且认为，“‘历史运动’……逐渐地将这种视角交付给了选择”。（1974，第 100 页）然而，这里忽视了批判的活动和对活动的批判，“历史运动”就其自身而言是一种“客观主义的”设想。规定的否定恰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实践主体性。

3. 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Konspekt zu Hegels »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列宁对“规定的否定”概念一笔带过。（参见 LW 38，第 89、97 页）——托伊尼森对黑格尔《逻辑学》几乎是一句一句地解释，但奇怪的是，他同样没有提到这个概念（参见 1978，第 157 页，在这里，他接近了这个概念并引用了黑格尔“否定即是**规定**”的表述）；他感兴趣的是“否定之否定”概念。他将黑格尔所说“否定”与“否认”（Verneinung）分隔开，并将黑格尔关于“否定”的理解追溯到如下这点，即黑格尔不仅将否定理解为活动，而且还理解为活动一般：“黑格尔一早就确信，活动首先是**分解**（*Scheiden*）或**分离**（*Trennen*）。”（第 175 页）为了支持这一点，他援引了《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关于“否定的巨大力量：这是思维的能力”的段落，由此得出如下命题：“分解活动就是**知性**的力量和工作。”（W 3，第 36 页）

马尔库塞在他关于黑格尔的著作中呈现了这一概念，为的是将其应用于马克思提出的在理论和实践上扬弃资本主义的观点，而这样做，却导致了这一观点陷入了危机。由于马克思指向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解放，而且还指向“人自身的解放：消除他因他的劳动工具而被奴役的状况，并因此完全重估一切现存价值”，这适用于马尔库塞：“只有这种‘大多数’才能将量转化为质，并带来一个不同的、非压制性的社会，它是对资本主义的**规定的否定**。”（1954，第 370—371 页）根据马尔库塞，这一观念的基础是，无产阶级被预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的否定”（第 371 页）。“自由的前提和自由的实现之间的历史联系”，就是以这一预设为基础的。解放预设了自由：“它指的是摆脱了统治和压制的需要与利益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利益就会被“拖进”新的社会当中。（同上）但是马尔库塞认为，因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的继续发展，正是这一预设变得成问题了。“革命前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之间

关系的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是在马克思去世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才暴露出来的。这一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它规定了苏联社会的命运，使其发展为一种压制性生产力的新体系。”（同上）和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的危机管理的理论（这种管理是通过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us］而变得可能的，并借助盈余吸收［Surplusabsorption］技术）相呼应，马尔库塞勾画了“使后工业文明能够吸收其否定性……的一些主要因素”：“渐进的管理”使个体“变成他们的社会的总体对象。意识的发展变成外在者的危险的特权”。（第372页）

185 除此之外，还有基于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操纵的、负责生产与分配的新官僚机构。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不再能够被预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绝对的否定”。“劳动阶级在经济和文化上被收编的过程，与其传统武器的老化过程是相辅相成的。”（第373页）

由于这一观察在经验上似乎相当有说服力，被投射回来的无产阶级观念就变得可疑了。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来说，这意味着不结合实践地指向某种东西，它可以说是与一切现存的东西“完全不同”的。阿多诺解释说：“没有确定的标准能够将对意义的规定的否定和对无意义的坏的肯定划分开。”（1962，第426—427页）类似于马尔库塞的否定的总体化（例如，在关于个体变为其社会的总体对象的命题中，见上文），阿多诺将否定设想为总体的“魔力”（参见1966，第264、335页），它不再能够被规定地否定。因而，阿多诺以贝克特（Beckett）范式的名义反对布莱希特范式。由于他承诺了这一范式的荒诞主义，因此他打开了“一种甚至不曾想到的真理的可能性”（1961，第319页）。批判理论由此得以维系，它以这种不真实的可能性的名义“转入了荒诞主义的阵营中”（Haug 1966，第31页）。

毫无疑问，批判理论的各个代表人物是不同的；说由《社会研究杂志》（*ZfS*）时期的霍克海默（Horkhmeimer）（及其编辑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为代表的奠基期和主要由阿多诺为代表的西德后期之间所谓的同一性实际上是一种假象。胡伊森（Huyssen）说到，阿多诺“拒绝将规定的否定作为历史哲学的关键概念”，而且他“坚持将否定性和拒斥当作一种现代美学的关键要素”。（1975，第3页）对于胡伊森的这些观点，列奥·洛文塔尔表示反对：“我们群体中的几乎每位成员都不仅信任黑格尔哲学与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方面，而且始终强调‘规定的否定’是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Schriften* 4，第68页）这可能适用于他，但并不

适用于后期的阿多诺。不过，阿多诺也是将规定的否定规定为批判，这种批判知道，“如果人们将一个否定的被认识之物与另一物对立起来，那么被否定之物就必定会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包含在另一物之中”（转引自 Schweppenhäuser 1993，第 169 页）。

186 阿多诺观点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手和对象。——他批评尼采（Nietzsche）“**抽象地否定**了道德”：“对道德的规定的否定……不应当是废除道德。毋宁说，他想要指出的是，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道德本身必将变成非道德的。”（Schweppenhäuser，第 168—169 页）在 1964 年与布洛赫的谈话中，阿多诺使规定的否定这一概念发挥了作用。布洛赫将“对现存事物的批判”规定为乌托邦的“本质功能”，并补充道：“当我们还没有超越限制时，我们就不会觉得它们是限制。”阿多诺回复说：“的确，从本质上来说，乌托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处在规定的否定当中的，处在对如下东西的规定的否定中，这种东西是单纯的，并且通过将自身具体化为一种虚假的东西，来指向它的应当所是。”因此，对虚假的东西的认识包含着一种相对于对真理的认识的优先性，斯宾诺莎的关于真理作为自身及虚假的东西的指示器的命题，被阿多诺翻转为 *falsum index sui et veri*。（关于此可参见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1947，第 36 页，在这里，规定的否定被等同于辩证法，因而可以理解的是，从每一种形象中读出了“对它的虚假性的承认”）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布洛赫开始接受规定的否定这一表述，并以此来区分希望和单纯轻率的信心：它被“危险所包围，它是对危险的意识，同时也是对总是使希望之对立面成为可能的东西的规定的否定”（*Gespräche*，第 70—75 页）。

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批评阿多诺在 1968 年的社会学大会上的开幕词是“禁止实践的理论”，它将僵化的世界双重化为总体分析，它提供了“一幅具有某些历史必然性的图景”。（1968，第 91 页及以下）与之相反，阿多诺赞扬学生运动是“对盲目适应的反抗，合理选择目标的自由，对作为眩晕与表象的世界的厌恶，对改变的可能性的纪念”（1968，第 24 页）。然而，他给出了一个“绝望的”辩证观点：“摆脱这一禁令，使人们参与实践，这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但实践同时也是强制性的，因为对禁令的实践也一同增强了，实践变得枯燥、狭隘、狡黠。”（1969，第 763 页）

与这种无实践性（Praxislosigkeit）相反，马尔库塞在学生运动中看到了一种新的革命主体的诞生。他现在不是寄希望于工人运动，而是寄希望于“边缘群体”。现在，像马克思所提出的那种

基于社会矛盾的批判性概念遭到了拒斥："随着工业社会的日益整合"，这些概念"逐渐变成描述性的、迷惑性的或操作性的术语"。（1976，第16页）从内部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如今，规定批判、规定旨在改变的实践的，不再是内在性（Immanenz），而是超越性（Transzendenz）。"马尔库塞反对规定的否定，而在规定的否定中，人们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他建议用'规定的选择'来取代规定的否定。"（Haug 1968，第106页）

187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其反对一切思辨和历史哲学的论述中，将规定的否定的内容提升为关于正确行为的学说。对资本主义的规定的否定已经是认知上的必需："如果人们看不到一种不同，那么是不能阐述这个社会系统的。"（*AJ*，25. 7. 1938）基础性的是："在认识过程中，理智除了有组织经历或（最初进行的）经验的功能之外，它还有使过程变得显明的功能，在其中，理智自身与一种被设想的否定相对立。'它就是如此'（Es ist so）令人惊异地被视作'它并没有什么不同'。因而人们几乎总是只得到相对的真理。"（GA 21，第410页；GW 20，第136页）他似乎是将一种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表达为坚定的扬弃："以资产阶级方式规定的人类，要想保持为人类，就必须扬弃资产阶级性。"（GA 21，第415页；GW 20，第159页）

因此，规定的否定不仅意味着在新事物中包含着某些旧事物，意味着其他东西被否定了，而且意味着一种态度和定向活动。健全的人类知性认识到了问题（"人们不应当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说"不"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它可以变成毁灭和自我毁灭，就像克劳斯·海因里希（Klaus Heinrich 1966）所指出的那样。规定的否定的关键，是在各种状况中区分出需要保留的要素和需要否弃的要素的能力，这当然不是以机械论的方式并立起来，而必须也是对这种并立的扬弃，这是在被批判的状况中运用"否定"，这就像资本的作用不仅有剥削，而且还有"促进生产"。与指向"完全不同之物"的抽象的总体否定相反，规定的否定趋向于布洛赫的客观可能性概念和具体乌托邦概念，这些概念虽然无法实现，却颇具启发性，它们是包含在现存状况中的对一个更好世界的具体期待。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Versuch, das Endspiel zu verstehen« (1961), GS 11, 281-321; ders., »Engagement« (1962), GS 11, 409-430;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GS 6; ders.,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1968), GS 8, 354-

370; ders., »Marginalien zu Theorie und Praxis« (1969), GS 10. 2, 759-782; P. W. Baran u. P. M. Sweezy, *Monopolkapital. Ein Essay über die amerikanische Wirtschafts- und Gesellschaftsordnung* (1966), Frankfurt/M 1967; R. Dahrendorf, »Herrschaft, Klassenverhältnis und Schichtung« (1968), in: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Verhandlungen des 16.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Stuttgart 1969, 88-99; *Gespräche mit Ernst Bloch*, hgg. v. R. Traub u. H. Wieser, Frankfurt/M 1975; F. Haug, »Verelendungsdiskurs oder Logik der Krisen und Brüche? Marx neu gelesen vom Standpunkt heutiger Arbeitsforschung«, in: *Aktualisierung Marx'*, hgg. v. D. Albers, E. Altvater u. W. F. Haug, AS 100, Berlin/W 1983, 101-119;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Frankfurt/M 1966 (zit. n. der 3., veränderten Aufl., Hamburg 1991); ders., »Das Ganze und das ganz Andere. Zur Kritik der reinen revolutionären Transzendenz«, in: J. Habermas (Hg.),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M 1968 (zit. n. Haug 1973, 94-122); ders., »Die Bedeutung von Standpunkt und sozialistischer Perspektive für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Argument* 74, 14. Jg., 1972 (zit. n. Haug 1973, 143-186);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K. Heinrich, *Versuch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Nein zu sagen*, Frankfurt/M 1966; A. Huyssen, in: *New German Critique*, Herbst 1975, Nr. 6, zit. n. L. Löwenthal, *Schriften*, Bd. 4; H.-P. Krüger, »Zur Differenz zwischen kapitalistischer und moderner Gesellschaft«, in: *DZPh*, 1990, H. 3, 202-217; H. Marcuse, »Nachwort« (1954), in: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Heg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Schriften 4; ders.,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67), Schriften 7;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Ein Handbuch*, Berlin/W 1987; G. Schweppenhäuser, *Ethik nach Auschwitz. 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 AS 213, Hamburg 1993; N. W. Senior,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E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36; M. Theunissen, *Schein und Sein*, Frankfurt/M 1978; M. Wolf, »Individuum, Subjekt, Vergesellschaftung der Produktion«, in: *Ästhetik und Kommunikation*, 5. Jg, 1974, Nr. 15-16, 83ff.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侯振武 译，王师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ntizipation, Arbeiterbewegung, Artikulation, Aufhebung, Begriff,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Darstellung, Definition, Dialektik,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Empirie/Theorie, faux frais, Form/Formbestimmtheit,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kritik, Kapitallogik, Kritik,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

nomie, Kritische Theorie, Methode, Negation der Negation, Objektivismus, Ökonomismus, Proletariat, Randgruppenstrategie, rettende Kritik, Standpunkt, transitorische Notwendigkeit, Widerspruch

规定、决定 (Bestimmung, Determination)

A: taḥdīd, ḥaun.

E: determination, destination.

F: détermination, destination.

R: predopredelenie, determinacija (предопределение, детерминация).

S: determinación, destinación.

涉及规定或决定的活动包括：发现、限定、归类、确定、决意、导致、注定等——而“决定论”（Determinismus）则是一种成体系的因果思想。（参见 Lalande, *déterminer* 词目及其上下）由于“规定”概念具有显著的多义性与基础性，它似乎“注定”要具备某种基本的反思范畴的功能。在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重新拾起“规定”概念之前，这个概念有着漫长的学术史前史（参见 HWPh, *Bestimmung* 词目），到了 20 世纪，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将其视作存在论上的“基础范畴”：哈特曼区分了“两种规定的范畴：普遍性和决定性（Determinationscharakter）”（1964，第 39 页）。“决定（Determination）是所有一者对另一者的规定性（Bestimmtsein）”，在其中，被规定者处于“依赖”的地位（第 282 页）。——在马克思那里，规定这个范畴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往往是在“形式规定”（Formbestimmung）或“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theit）这样的复合词中出现的。

1. 规定“是黑格尔思想中的基础概念；因为世界的进程就被解释为‘纯粹概念’的自我规定”（HWPh，前引词目）。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规定或规定性（或是自身独立的，或是多者复合的）是个无处不在的“技术性”基本概念。关于“规定”概念，人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思想的规定”（或者“思维形式”、“范畴”、“环节”；第二版前言，W 5，第 23 页）。它造成了“思想王国”中的差异（同上书，第 19 页）。对规定概念的研究有助于“从表象、想象、渴求、欲望和意志的具体兴趣等的质料中抽象出来，而思想的决定正是隐藏在这些质料中的”（第 23 页）。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日常理解的“自然逻辑”（第 13 页），或者就像托伊尼森（Michael

Theunissen）说的那样，是“自然未曾感知到结构的、想象中的思想”（1978，第157页）。黑格尔认为这种自然逻辑对于“范畴的使用”是“无意识的”。（第13页）而在有意识使用范畴时，我们必定会认识到：一切“规定性”总是“包含了否定”，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否定的规定或“被规定的否定”。（W 5，第49页）一切被规定者都包含着特定的非他者（Nicht-anders）。“正是作为一种边界，规定才成为引起概念的‘颠覆’并使辩证法生效的因素。”（HWPh，前引词目）

2. 马克思大多数时候将“规定”用作有力的认识论基本范畴，它是对构成事物本身的各环节的分析和抽象。因此思想或概念的规定所要求的是：把握事物的真实的功能规定性或者形式规定性，以及此外的其他“决定因素”。《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所谓商品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上的两种规定，就应当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使用价值”在思想中确定了该商品是“可以消费和使用的”，“交换价值”则“决定了它们是用来交换即买卖的”。这两个例子表明，规定同时既是人们实践中的目的论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某物意味着用积极改变的方式将其规定为使用的东西），也是私人劳动分工关系中的一种功能范畴（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某物意味着为了交换，将其规定为商品）。此外，“商品的‘价值’只是一切社会形式内都存在的东西的一定的历史形式”（*Randglossen*，MEW 19，第375—376页）。“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享共同的产品界。”（*Gr*，MEW 42，第10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Zur Kritik*）中，马克思区分了“抽象的形式规定性和隐藏着像资本、Revenue（收入）等等更具体的关系的货币的规定性”（MEW 13，第160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分析为资本家“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MEW 23，第164页）。他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批判了“经济学家粗俗的唯物主义”，它也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因为他把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下的某物的规定视作“某物的自然属性”。（MEGA II.2，第567页）——因此，“规定”概念包括以下多个维度：各个关系的功能结构、实践活动、由此形成的客观属性，乃至思想对这些不同方面的分析。

作为可操作的理论概念，规定和形式规定性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几乎

随处可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规定的理论框架：在此，他把抽象理解为“单方面”的思想规定，它使得“规定性的……关系”或“规定性”或“个别环节”“固定下来”。规定“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MEGA II. 1. 1，第36—37页）。分析性的抽象过程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从“最简单的规定”出发，将其作为“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并通过“对规定进行概要”从而达成“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同上书，第36页）——正是这种回归的路径使得“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第39页）。“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
191 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如此。（同上）

从其普遍性上说，这种关于规定的理解并不算是马克思主义所独有的，它实际上属于亚当·斯密的那种分析还原过程。与此相反，马克思采用的是起源学重构的方法：他把形式规定视作实践形式，并在其历史的形式规定性中把握各种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他把规定辩证化了。于是规定同时也应被理解为其自身的矛盾。

3. 由于规定概念并非直接对事物言说，而是对“对事物的言说”（Zur-Sache-Sprechen）而言说，因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个源于必然性的，涉及“特定种类的知识占有”的“理论之理论”或者“元理论”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基于日常行为的：“凡是有规定性的地方，首先就有非规定性；这正是规定之必要性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规定意味着，或者至少可以意味着：被某种最初未知的东西所界定。”（Haug 1974，第58页及以下）诸如“植物分类图册”（Pflanzenbestimmungsbuch）之类的书籍，就表明了规定在日常语言实践上的意义。在此，规定表明了一种以特征为逻辑的（merkmallogischen）事物定义。

“规定”在日常生活中还有进一步的含义。在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中（如经济和政治行动），“谁做决定”就意味着谁“做出规定”。因此才有了诸如依赖（Fremdbestimmung）、自决（Selbstbestimmung）和共同决定（Mitbestimmung）之类的概念。此外，与权力问题密切相关的决定首先就是对非规定者的规定：它的核心就是决定人力与物质资源的生产与分配。规定概念不仅包含了认知上的界定与实践上的目标规定，而且还包含了对自然和人的两种意义上的统治。而像“命运的决定”这类和注定天命相关的神秘想法，则同时体现出统治的含

义与实践上的目标规定。

4.《哲学历史辞典》（HWPh）为“人的规定”（Bestimmung des Menschen）写了专门的词目，并将其内容“规定”为：“人之存在的意义、目的和目标，但凡没有因为虚无主义而否认它们（例如施蒂纳 [M. Stirner] 认为：‘人没有规定和义务’），人们就会基于各种形而上学、历史哲学或人类学，对它们作出不同的把握。”《哲学历史辞典》甚至单独把这个表述作为“规定”一词的第一个意义：“人之存在或某些对象（也就是其存在）
192 的意义、目的和目标。”（*Bestimmung* 词目）这个观点基于一种传统上的形而上学虚构，即认为存在、意义、规范或事实都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所“规定”的。康德认为，人“自身的最终目标”就是“去做他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所自发做出的、能做出的或应当要做的事”（*Anthrop*，前言），这意味着他与前批判时期传统的决裂。黑格尔则作出了一个有歧义的表述：“人之规定就是思想着的理性”（*Logik*，W 5，第 110 页），在对于“人之规定”的思考的意义上，这个观点又回到了康德之前。如果说商品的规定在于被买卖，那是因为它们是被人制造出来的。一旦“创造”（Schöpfung）的观念不复存在，规范性、目的论意义上的“规定”的观念也会不复存在。

《哲学历史辞典》掩盖了那个似乎是康德有意造成的断裂，这个断裂体现在一种实践哲学中，这种哲学从物质性的角度思考了费尔巴哈第六提纲中的过程。（参见葛兰西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反思，*Gef* 6，H. 10，§54，第 1346—1349 页，在关于卡尔杜奇 [Carducci]、海涅 [Heine] 和黑格尔的讨论中，葛兰西提到康德的批判哲学与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策之间的相似性，参见上书，H. 11，§49，第 1460 页）——马克思在对“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分析中指出（参见 MEW 25，第 221 页及以下），原因和“起反作用的原因”（第 242 页及以下）相互重叠并相互决定，葛兰西借这个例子运用“趋势规律”的概念，把“特定的（bestimmt）市场”解读为被政治或企业社团所“管控”的市场（参见 *Gef* 6，H. 10. II，§9，第 1262 页，以及注释 2a，第 A572 页）。——各规定之间的矛盾斗争，阿尔都塞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解释为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

参考文献：

N. Hartmann. *Der Aufbau der realen Welt* (1939), Berlin/W ³1964;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W-Hamburg ⁵1989; M. Theunissen, *Sein und Sein. Die kritische Funktion der Hegelschen Logik*, Frank-

furt/M 1978.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张义修 校

参见：

Abstraktion, Analyse, Aneignung, Artikulation, Bedeutung, Begriff, bestimmte Negation, Definition, Denkform,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ispositiv, Distribution, Form/Formbestimmtheit, Funktion, Genese, Herrschaft, Method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Sinn, Teleologie, Überdeterminierung, Umschlagen

193 运动（Bewegung）

A: haraka. E: movement.

F: mouvement. – R: dviženie (движение).

S: movimiento.

一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辩证论者赫拉克利特（Ηράκλειτος，公元前540—前480）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基本性质，从而把这个概念提升到哲学原理的地位。他的名言 πάντα ρεῖ（一切皆流），说的就是一切事物都在永恒的流变之中。黑格尔继承了这个观点，将它置于其辩证法的核心位置。辩证法的推动力是矛盾，也就是“无”与“同一”之间的斗争，更具体地说，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斗争。“本质的东西是：每一不同的、特殊的东西之与他物不同——不是抽象的与任何他物不同，而是与它的对方不同。”因此“主观性是客观性的对方”，“……是它的对方，而在这个中恰恰有着它们的同一性。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伟大原理”。（*GeschPhil*，I，1. Teil，D，W 18，第327页）“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同上书，第320页）但与赫拉克利特相反，黑格尔把物质的运动视为过程，也就是那驱动最简单的事物向具有更高存在的质的事物变化的世界运动。这个世界进程的“造物主”（Demiurg）不是上帝，而是“绝对精神”，亦即“世界精神”，思想着和劳动着的人类无非是这种精神的工具。（*Enz*，III，§551，W 10，第353页）尽管黑格尔的思想带有“思辨的原罪”，早期马克思仍然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看到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HF*，MEW 2，第205页），也就是把历史过程解释为实践的历史和真实人类活动的结果（MEW 40，第574页）。

产生历史和社会物质的运动的，是人的那种“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的“活生生的”、个体化的“本质的力量”。（*HF*，MEW 2，第135页）正如马克思

评论培根（Bacon）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运动是“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这里所说的运动不仅是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趋向、生命力、紧张，或者……物质的痛苦［*Qual*］……它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同上）。那感性的、为了自身生存而活动着的个人，终究会使他们社会存在的发展超越资产阶级关系。

1873年的马克思还自视为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K I*，MEW 23，第27页）运动形式不仅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抽象，而且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相适应。（*Gr*，MEW 42，第37页）每个历史阶段都会产生自身的矛盾，这种矛盾则推动历史的变化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DI*，MEW 3，第35页）。

卡琳·魏因加茨-佩舍尔
（Karin Weingartz-Perschel）撰

二

与静止和实体相对，各种具体形式的运动是多门科学中的研究对象；从范畴上说，运动最准确的规定是：实有的（daseiend）矛盾。黑格尔曾写道：“某物之所以运动，不仅因为它在这个‘此刻’在这里，在那个‘此刻’在那里，而是因为它在同一个‘此刻’在这里又不在这里，因为它在同一个‘这里’同时又有又非有。我们必须承认古代辩证论者所指出的运动中的矛盾，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由此没有运动，而倒不如说运动就是**实有的**矛盾本身。”（*Logik* II，Abschn.，2. Kap.，C，注释3）。恩格斯在论及黑格尔时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AD*，MEW 20，第112页）

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给出的对世界的最初理性解释中，关于普遍运动、不断流变的 ἀρχή（始基）的想法就占有一席之地。在埃利亚学派那里，运动概念的问题成了讨论的主题之一。运动问题主要体现为思想、感觉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始终都构成了运动问题的核心。（参见 Wahsner 1981；v. Borzeszkowski/Wahsner 1989）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与通行的解读不同，运动问题并非完全属于自然科学或自然哲学的问题，它实际上属于更普

194

遍的哲学问题，甚至可以说它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借助他们发展出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埃利亚学派得出了运动问题的两个解答，第一个解答是自然科学的（它使得对运动的测量和计算成为可能），第二个解答则是哲学的。（参见，例如 Szabó 1954）哲学的解答被归结为两个极端的构想。其中之一把运动视作可以产生和衍生出物质的东西；另一个想法则把运动视作从属于和外在于那些原始、自在而“迟钝”的物质的东西。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基于原子论的基本原则成为科学的出发点，该原则把运动分解为本来不能分开的、可把握的环节，并假设这些环节是独立的存在，从而使得运动变得可以设想；得益于动力理论家对此问题的讨论，以及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开普勒（Kepler）乃至伽利略（Galilei）和牛顿（Newton）的科学研究，该原则产生了可以对运动（某一类运动）进行测量和计算的理论。自 19 世纪以来，把这个原则向外推广到经典力学甚至物理学领域之外的可能性（也就是可能性条件）也成为讨论的议题。

总的说来，马克思之前的运动概念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古典时代的世界图景把运动的对象视作实体，对象则是被客体化的属性。近现代的世界图景则把运动本身看作实体，也就是一种被客体化的行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运动究竟如何能被设想为客体化的运动？

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中，整体首先被视作其各个矛盾方面的运动，因为运动构成了整体的存在。（参见 *HF*，MEW 2，第 36 页）只有经由运动才能有物存在，产品只能经由生产而存在，事物只能经由运动而存在。但运动不仅造就事物，它还能产生关系。（*Elend*，MEW 4，第 130 页；MEW 27，第 458—460 页）所谓“辩证的运动”，指的是同时存在着的对立面的冲突。（MEW 4，第 133 页）因此，运动也可以被视作矛盾的实现和消解，也就是矛盾变动的形式。（*K I*，MEW 23，第 118—119 页）

在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能力与客观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论述，这个论述对于**运动概念**以及其中的对象与行为关系问题都有着基础性的意义。马克思阐述了行为与对象在这个社会中的真实分裂：他指出劳动能力与它的对象，即客观劳动条件，在这个社会中实际上是分裂的，劳动能力被作为对象加以买卖，从而显得是自主的。马克思表示反对，他认为只有和资本结合时，劳动能力才是现实的，“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Gr*，

MEW 42，第 193 页）。劳动能力，亦即“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在实际上，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这种使用价值［也就是劳动能力］只有在资本的要求和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同上书，第 192—193 页）。从概念上来说，上述社会经济学的讨论表明：只有客观的运动才是现实的运动，换言之，只有当运动着的对象作为重要的，而非微不足道的因素被加以把握时，只有当对象并不归属于运动之下（也就是不被消解为行为）之时，这样的运动才是现实的。非客观的运动本身就是行为，它只是可能的运动，它本身的客观性来自外部运动的实体。

与上述关于对象与行为的范畴关系的规定相反的则是这样一个主张（它早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出现了端倪）：我们无法根据孤立个体的原则来设想现实的运动，而只能在集合个体的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它，这个集合个体是某种由个体或物体的对立组成的更高秩序或体系。（MEW 40，第 304 页；对此详见 Wahsner 1992）这也就意味着，一旦把（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排除在其对象领域之外，那些旨在认识和规定现实物的科学（可以是用于计算和测量的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精神科学，即社会科学或科学哲学）就失去了基础。

因此，根据事物或对象与运动的关系以及行为和运动的关系，任何规律（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经济规律或辩证法的普遍规律）都只能被理解为运动规律，而不应视作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东西。

马克思旨在“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纲领在本质上意味着：不再孤立地看待运动，而是将其视作主体和对象的运动，并把关系理解为彼此行动着的主体的产物。（*Elend*，MEW 4，第 126 页及以下；MEW 23，第 27 页）但这个纲领只实现了一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趋向，就是要把**主体**、**个体**、**具体**和**个人**等视作相同的概念。（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忽视康德的认识论转向并且趋于存在论和机械论的概念——比如将时间规定为运动的量的存在。参见 *Zur Kritik*，MEW 13，第 17 页。）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运动被明确地视作普遍关系（*AD*，MEW 20，第 11 页）和总的变化（*DN*，MEW 20，第 513 页），它几乎被认为是“历史性”的同义词（例如 MEW 21，第 279 页）。由此，辩证关系也就成为关于普遍运动规律的科学。（*AD*，MEW 20，第 11 页；MEW

21，第 293 页）恩格斯曾多次提及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将此描述为一个上升过程，最初（古典时代）是对普遍相互作用和一般联系的把握，而后则必然发展为从整体中选取和固定具体联系的新阶段（这是为形而上学和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根据恩格斯，我们把僵化、限制和静止的东西固定下来，同时必然再次扬弃人类思维的这个阶段，从而思考世界全体及其发展。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寄予希望，并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由于没有清晰地区分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必然的）认识论地位——也就是基于测量和计算的学科；另一方面则是哲学。因此人们往往希望自然科学能够解决那些实际上只有哲学才能回答的问题。这样导致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对康德先验时空观，乃至康德认识论转向的抽象否定。（*DN*，MEW 20，第 334 页）于是运动也就如同时独立存在的实体那样，被认为是在时空中进行着的东西。

恩格斯运动理论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他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实存方式（Daseinsweise）。（MEW 20，第 55 页）运动不仅被视作物质的属性（同上书，第 575 页），而且实际上既没有无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无物质的运动。黑格尔把运动视作一种关系，恩格斯对此作了调整：运动是彼此行为着的物体之间的关系；是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第 349、355 页），单一物体是不会有运动的（第 514 页）。根据黑格尔的概念，在对象或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中，对象或物质虽然是必要的，但它是会消失的因素；与这个概念相反，恩格斯认为，两个因素都是不会消失的，我们实际上只能而且必须把运动理解为对象的运动。“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中，在运动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对象。”（1873 年 5 月 30 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33，第 80 页）如果把运动视作实有的矛盾（参见 *AD*，MEW 20，第 112 页），那么上述理解就会给“矛盾”这个概念带来影响深远的理论后果，但目前这种后果的影响尚未被充分研究。 198

作为物质之实存方式的运动概念与一种还不如康德的知识概念相结合，恩格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等级式的运动形式概念，并以此为依据，对各门科学进行了分类。（*DN*，MEW 20，第 509 页）在许多人看来，这个等级式的运动形式观为恩格斯提供了扬弃形而上学概

念建构的工具和手段（关于从一种运动形式到另一种运动形式的上升过程，可以参见 MEW 20，第 61、349、468 页及以下）。

作为运动的基础形式，通常被视作自然科学概念的“运动环节”也往往在哲学上被解释和讨论，但无论是这个概念的认识论前提条件，还是使其得以建构的理论，都没有受到关注。（有时恩格斯的讨论会偏离这个问题，例如他会认为力这个概念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它是测量运动的手段，参见 MEW 20，第 541 页。）

在国有社会主义的官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如教科书一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运动概念被机械地作了存在论上的解释，也就是说，那些尚值得批判的论点往往被直接提出和接受。这就使得人们试图在这种被机械地理解的物质的基础上，给出辩证的运动论述，于是那作为最普遍运动规律之科学的辩证法，便不免沦为一种存在论上的反映概念了。

不过，在官方的教科书和其他公告材料之外，个别哲学家和团体的研究工作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运动概念密切相关，它们的出发点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论述。

从社会理论上说，对马克思、恩格斯运动概念的扭曲可以追溯到伯恩施坦那个被广为接受的论述：“运动才是一切，目标什么都不是。”（*Voraussetzungen*，第 190—212 页）国有社会主义的官方政策对此作了事实上的抽象否定——它用这样的口号回应这个说法：“目标才是一切，运动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只要有崇高的目标，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

哲学上的运动概念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能否用唯物主义扬弃黑格尔的辩证法，但与此同时避免将其误解为某种关于事实、实体或句子的理论？我们又可否借助唯物主义的概念，将辩证法首先作为思想规定性的运动以及运动学说加以把握？（Fulda 1981，第 83 页）

在迄今为止关于自然科学运动概念的认识论地位的研究中，那些不满足于物理主义或经验主义解释的，往往通过阐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运动概念之间的关系和差异（以及各自运动概念的认识论规定性），从而对运动概念的认识论地位得出了肯定的回答。考虑到运动被规定为实有的矛盾，那么这种差异和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究其本质，可计算和可测量的矛盾从来都不是哲学上具体的、辩证的矛盾。然而，如果思维无法遵循那些可计算和可测量的矛盾，并以哲学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质料，那么

我们就无法完全把握辩证的矛盾。与那些试图通过分析来扬弃辩证矛盾的方法（比如系统理论）相反，基于测量学的扬弃方法并不对矛盾中对立面的差异进行抽象。（v. Borzeszkowski/Wahsner 1989; Wahsner 1993）

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涉及进一步的问题：古典和近代运动概念的那种特征上的区别产生的条件是什么？各自的运动概念又分别有怎样的范畴基础？为什么有必要和有可能在测量和计算的自然科学中对客观运动的概念作隐性的把握，并在哲学意义上（而非如其表面显现的那样）接受它？一种把握运动的客观性的哲学理论又会带来怎样的理论后果？

参考文献：

H.-H. v. Borzeszkowski u. R. Wahsner, *Physikalischer Dualismus und dialektischer Widerspruch. Studien zum physikalischen Bewegungsbegriff*, Darmstadt 1989; E. Cassirer,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r Erkenntniskritik*, Berlin 1910; F. Fulda, »Dialektik in Konfrontation mit Hegel«, in: *Dialektik 2. Hegel: Perspektiven seiner Philosophie heute*, hgg. v. B. Heidtmann, Köln 1981; F. Kaulbach, *Der philosophische Begriff der Bewegung. Studien zu Aristoteles, Leibniz und Kant*, Köln-Graz 1965; H. Reichenbach, »Die Bewegungslehre bei Newton, Leibniz und Huygens«, in: ders., *Gesammelte Werke*, hgg. v. A. Kamlah u. M. Reichenbach, Bd. 3,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79; P. Ruben, »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und ihre Grundgesetze«, in: *Gesetz–Erkenntnis–Handeln*, hgg. v. A. Griese und H. Laitko, Berlin/DDR 1972; Á. Szabó, *Zur Geschichte der Dialektik des Denkens*, Act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Tom. II, Fasc. 1- 2, Budapest 1954; R. Wahsner, *Das Aktive und das Passive. Zur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Begründung der Physik durch den Atomismus-dargestellt an Newton und Kant*, Berlin/DDR 1981; dies., *Prämissen physikalischer Erfahrung*, Berlin 1992; dies., »Was bleibt von Engels' Konzept einer Dialektik der Natur?«, in: *Argument*, 34. Jg., 1992, H. 194, 563-571; dies., »Gott arbeitet nicht. Zur Notwendigkeit, Karl Marx einer optimalen Messung zu unterziehen«, in: *Initial*, 1993, H. 3, 25-38.

雷纳特·瓦斯纳（Renate Wahsner）撰
王师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ntagonismus, Arbeitskraft, Aufhebung, Begriff,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ntwicklung,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theorie, Genese, Gesetz, Hegel-Kritik, Lehrbuch, Marxismus-Leninismus, Materie,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Metaphysik, Naturdialektik, Raum,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ubjekt, Substanz, System, Totalität, Trennung, Wechselwirkung, Wertformanalyse, Widerspiegelung, Widerspruch, Zeit

觉悟（自觉性）（Bewußtheit）

A: ʿawa'ī, fahm. – E: awareness.

F: haute conscience.

R: soznatel'nost, osoznannost (сознательност, осознанност).

S: condición conciente.

1. 觉悟（自觉性）所包含的难题与下面的问题相关：工人阶级是否、如何能与其盟友以《共产党宣言》所勾画的途径改造社会？在每个答案的历史语境中，觉悟（自觉性）这一术语既是兴奋剂，又是咒语；既是要求暴力行为的命令，也是怀疑分析的对象。恩格斯在1895年写道，每涉及一项任务时，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MEW 22，第523页；第二版中删去“流血牺牲”[Leib und Leben]，参见注释433）。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觉悟以中心地位，但他们通常只把该术语用作形容词、副词，没有在理论上加以完善。在“前马克思主义”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意象——哲学抵达无产阶级，如同“思想的闪电”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和纲领原理——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之中，主流思想从外部进入群众。（MEW 1，第385、391页）

1844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形成自我意识的因素和起因。（MEW 2，第55页；1，第404页）他们的观点是劳动者和平地自我解放，“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MEW 4，第493页；17，第643、652页；18，第160、308页；23，第40页）。特别自1879年发出《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起，他们就反对“博爱的大小资产者”，这些人认为，力量不足以自我解放的工人阶级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MEW 34，第412—413、408、405、403页）作为“有意识、有计划的”觉悟（自觉性）最常出现在对共产主义的预期中，但通常事实表明，行动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希望达到的”相反。（MEW 23，第92页及以下；19，第22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觉性通过三种异质因素形成：“自觉的阶级仇恨……正是社会变革最可靠的保证”（MEW 13，

201

第 487—488 页；33，第 333 页）；“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MEW 4，第 22 页；7，第 566 页）；最后，斗争行动，尤其是争取普选权、工会权等权利的斗争，以及获得的经验本身。

但也有另一条路线：在伯恩施坦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命题置于一旁之前不久，恩格斯于 1894 年称“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MEW 39，第 332 页）。虽有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主要通过选举而壮大；因此，1895 年恩格斯说，“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选民人群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MEW 22，第 523 页及以下），同时确保了“革命权”。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在理论上维持既定的基本观念，比如“大工业”既是“对抗之母”也是这种对抗的终极解决之道，工人阶级是革命力量，等等（MEW 23，第 511 页及以下，第 790—791 页；26.3，第 414—415 页），他们似乎始终相信“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车轮”不能“长期地”倒退（MEW 33，第 125、328 页；22，第 513 页及以下）。

若把觉悟（自觉性）理解成直接转入革命实践的那种意识状态，那么问题就是，觉悟（自觉性）对于主要从事学术分析的劳动者，和对于直接投身于群众运动或朝这个方向积极努力的人，意义是否不同。所以 1871 年失败之后，马克思认为觉悟显然首要地是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MEW 17，第 343 页）后进一步发展的事情。因而他和恩格斯都觉得，“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之后”，密纳发（Minerva）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Hegel，*RPh*，序言），比如，马克思就 1870 年前后的危机说道，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MEW 34，第 371 页）。虽然两人高度热忱，以至于在一些危机时期认为“有朝一日就会爆发革命”（MEW 35，第 186 页；29，第 153、211、225、304 页；31，第 375 页），不过，他们觉得比“革命行囊”更重要的还是“纯理论”，“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的希望（MEW 31，第 227、418 页）。

2. 列宁的情况则不一样，他 1905 年就梦想“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街头数以千计的工人大会上，在俄国农夫的自由集会上”讲话。（LW 8，第 280 页）他和罗莎·卢森堡一样，代表将“思维运动”（Haug 1993，第 79 页）与社会运动密切结合的一类革命者。理论著作在这点上主

要表现为刺激觉悟（自觉性）的手段。所以，列宁“宁愿”称呼自己是政论家而非理论家。（LW 9，第 41 页）因而密纳发的猫头鹰在此只具有次要作用：觉悟（自觉性）的实际原生态（Status nascendi）及其着手行动的可能性保持优先地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来研习。（LW 5，第 456 页）

2.1 觉悟（自觉性）作为名词 1886 年出现于列宁当时 20 岁的兄长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Uljanow）处。他在自己起草的民意党的恐怖主义派别的纲领中写道：只有发展一定的经济，“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要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和自觉性的增强”，这可以通过“为经济利益”斗
203 争而产生；与此相应，借助俄国村社（Obščina）“直接过渡至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组织的可能性”就悬而未决。（*Familie Uljanow*，1998，第 189—190 页）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体现了列宁 1901 年刻画的为了唤醒群众而把（均由怀疑而生的）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结合起来，可能“把革命工作同工人运动结合成一个整体”（LW 5，第 432 页）。亚历山大行刺沙皇未遂，于 1887 年 5 月 8 日受绞刑而死；从此，在很多警察报告中，弗拉基米尔·列宁都带有修饰语：“被绞死的政治犯之弟”（*Lenin Dokumente 1*，第 119、124 页）。纵有万般分歧，兄弟情谊犹存，如在《怎么办？》中：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同那些……深受……敬重的人决裂”（LW 5，第 538—539 页）。

2.2 从一开始，列宁就对觉悟（自觉性）这一范畴加以完善，反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套用到俄国：马克思的理论绝非“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LW 4，第 205 页及以下；参见第 165 页及以下）这一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多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比毛泽东早表述 50 年，是在威权的社会主义中闭口不言或者遭歪曲的列宁的观念之一。列宁指出，俄国社会党人有“同样的**基本**任务”，决不应该忘记俄国的特点，他纲领性地提及“反对资本主义前的宗法制度的一切残余的斗争”和这一斗争“所引起的对农民问题的特殊提法”。（第 229—230 页）列宁说，这一切“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同上）——他至少预感到“新思维”，这种新思维的基本观念与列宁的觉悟（自觉性）概念颇为相关（Gorbatschow 1987，第59—60页）。为了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LW 5，第383页），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举起**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LW 4，第230页）。正是“领导权”和“阶级观点”要求“无产阶级把一切民主运动**推向前进**”。（LW 5，第530页）因而有必要为**每个**斗争阶段建立“一个巩固的、集中的革命家组织”，这因为“运动的群众性质”而成为义务。（第324页）

19世纪90年代以来，“千百万……‘自发’起来斗争的”群众——即使作为工人，他们还是和农村保持着紧密联系，“遍及新的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强大力量”（第404页），支持着列宁及其战友，促使他前进，激励他在不断的口头讨论和政论中探讨新事物和所预感到的新事物，以图务实地、常常是至为冷静客观同时前瞻性地使散漫的运动作到定位自觉、组织有效，以图调控运动，必要时刹停运动（第402、409—410页）。监视列宁的警方看守提醒在西伯利亚的上司，“他总在写作，总在著文论述”（*Lenin Dokumente I*，第186页），这位追随沙皇的奥赫雷恩（Ochrane）“希望把此人与革命团体隔开，而且要从速”（第288页；Lenin Briefe I，第106、114页；Deutscher 1990，第59—60页；Krupskaja 1986，第103页）。列宁力求“使群众的自发的破坏力量同革命家组织的自觉的破坏力量**接近起来并融为一体**”（LW 5，第532页），这也在之后三次革命中发生了，他“平生”也与劳动人民相结合，从他很客观化的著作中也可读出许多东西。

2.3 列宁认为，**自发性**同自觉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普遍的关注”，尤其是为了克服经济主义。（LW 5，第384页及以下，第322、404、406、408、459、532、539页）一方面，自发性显现为历史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深入群众、根深蒂固因而“不可避免”（LW 26，第14页；5，第322页；9，第186页）；因此，社会民主党“是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汲取全部力量的”，运动的“‘物质因素’……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自觉的领导者**”却落后于这一发展（LW 5，第323、462页；参见LW 4，第212、368页）；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发性是基本运动特有的意识属性，首先是本能的、不自觉的、情绪化的：“愤怒的增长”（LW 6，第7页）和“**自觉性的萌芽状态**……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

205 （LW 5，第 385、429 页，注释 450）。不同于后来在威权的社会主义中的教条化，自发性和自觉性在列宁处并未界限分明，更未处于对立。列宁肯定自发性是群众性革命活动的特征，也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LW 5，第 322 页）。恩格斯早就研究过俄国群众意识的无条理：“在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的你们的国家里，在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里，出现各种最不可思议的和离奇古怪的思想，是不足为奇的。”（MEW 39，第 417 页）现代工业与远古遗物重叠，1880 年前后“负载”的矛盾就包含着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爆炸力，靠“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Engels 1875，MEW 18，第 567 页）专横的“东方专制制度”支撑起来，产生出西欧同样再也难以想象的苦难：12 至 16 小时工作时间，包括女工和童工劳动、许多夜间劳动，至少 50%—75% 的文盲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痛苦，尤其是屈从于多重父权的妇女们，还有日益受苦难洪流裹挟的几十万因困顿而流浪的农民（LW 5，第 86 页；LW 6，第 369 页）。1901—1903 年，这一切就在欧洲经济危机过程中爆发为猛烈的颠覆行动：20 万工人参加而遭军方扼杀的巨型抗议罢工、武装示威游行和反抗（针对“异族”、犹太人、革命者的）“黑帮大暴行”、农民起义连同纵火、（常有约 3 万参与者规模的）全俄大学生罢课、没收资金用于游击战、清除密探等等。（LW 8，第 446 页；11，第 205—206 页）

虽说列宁也承认“各种各样……自然而然产生的……斗争形式”，认为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如后来 1905 年和 1917 年“自行自发建立苏维埃”——但是他还是清晰地看到盲目自发性的危险。马克思主义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如游击战，但同“任何学理主义方法”不相容；通过“对自然而然产生的形式……加以概括”并始终“向群众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对群众实践加以“组织，并赋予其自觉 206
性”。任何单独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LW 10，第 240—241 页；LW 11，第 202—203、211 页；参见 Taut 1966，第 1328—1329 页）；否则它们会受高于或低于无产者的那些阶层的影响，“如果听其自然发展下去，那就会散漫放荡，腐化堕落”，变成“分散的和盲目的斗争”，可能作为“野蛮的骚动”，“很容易造成极大的危害”（LW 11，第 211 页；15，第 268 页；8，第 563 页；24，第 194 页）。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如巴枯宁（Bakunin）“兵营共产主义”的极端主张，“不劳动

就死亡”的格言，还有/或者他的口号“摧毁欲是创造欲”，在列宁眼中它们都是“**绝望的产物**”。（LW 5，第 334 页；MEW 18，第 425 页；*Unterhaltungen*，1991，第 336 页）

2.4“列宁主义”这一术语 1903 年由马尔托夫（Martow）创造（参见 LW 7，第 411 页，注释），1905 年被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Menschewiki），之后被斯大林采纳（W 1，第 94 页），它把各种变体的“机会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取消主义等等）视为最大的危险，因为机会主义倾向于把革命运动出卖给沙皇专制（LW 20，第 493 页；21，第 255 页）。按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列宁具有“‘正统本能’的力量”（参见 *Lenin Dokumente 1*，第 276—277、218 页），列宁对“机会主义”激烈的批评尤其可以这样来解释，即在列宁眼中，“机会主义”歪曲了他的自觉性概念的两个能量极：把“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斗争”变成只求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在这方面向最落后的阶层看齐；把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青年”的“竭力”接近工人变成孤立小组的活动，让“那些装备精良的奸细、暗探和宪兵队伍”手到擒来，使得“工人群众简直失去了所有的领导者”并且“不相信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LW 5，第 386、458 页）。所以，不熟悉“秘密工作的原则”的鼓动员“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往往使组织遭到破坏）。（第 455 页及以下，第 460 页）这种“**领导者落后于群众的自发高潮**”的冲突，正是列宁主义者试图克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第 462 页）

那些领导者仅关注直接需要，“迎合不开展的工人”（LW 5，第 428 页），而列宁所针对的需要，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的需要，是“工人群众的自发的觉醒，趋向自觉生活和自觉斗争的觉醒”内在的需要（第 385—386 页）。如果需要能够“无比迅速地”得到满足，“在理论工作、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巨大的自觉性的要求也就增长起来（第 408 页）：这指的是“对政治知识和政治教育的最迫切需要”，社会主义著作和秘密书刊远远供不应求（LW 5，第 10、408—409、434—435 页；4，第 316 页）。1900 年前后“监狱和流放地已有人满之患”，不仅对著作的需求，而且对“形成特定组织”的需要（LW 4，第 348—349 页），包括对“专制制度的国家里”不可避免的“密谋组织”采用“秘密活动的技术”以领导群众的需要（LW 5，第 492 页及以下）都增长了。这种在西欧早已过时的秘密活动的技术，在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上文理中学时

就已经成为其第二天性。在给同志们的建议中，他论述了秘密分工活动的12种详细职能，“要有极大的耐心，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因为要求“把全副精力贡献给一种不显眼的、单调的工作”，要求“和同志们断绝来往”，要求革命者服从“枯燥和严格的规定”，舍此就“不可能在现代的俄国展开革命活动”，“我们在长年经验中得出”此结论。（*Wolodja*，1980，第27页及以下；LW 2，第352页及以下；5，第492及以下）所以，各种需要都指向自觉性：从理论直至“获取和分发武器……直接领导武装起义”（LW 8，第364页）。

2.5 列宁要求，“赋予自发的工人运动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理想，把这个运动……同争取民主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有步骤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并且“要把这种自发运动同革命政党的活动结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LW 5，第322页；4，第211页）在这方面，经由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维拉·查苏利奇等）共同编辑的地下全俄报纸《火星报》（*Iskra*）指导，主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全新“类型”的政党的建设。通过《火星报》，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的“工业无产阶级独立产生的运动”能够在持续交流中呼应“我国知识界”。（LW 4，第348页）这种接近群众是列宁的觉悟（自觉性）的本质要素，归根结底源于一再重复的对劳动群众创造力的信念。（LW 10，第240—241页） 208

将布尔什维克党称为“知识界少数革命派”的创造（Ruge 1990，第29页）的流行说法，最多只符合一半的事实。一个全新政党能够在三次民主革命中战胜最强大的欧亚压迫政权，只有重视该党的两个平等的能量极，才能理解其建党史。虽有各种秘密活动，建党史还是凸显了“公开性”的因素，这也是列宁式觉悟（自觉性）的特征：为了达成联合各派的党纲，“公开展开论战”是必要的，能弄清“各种意见分歧的深度”，有利于与大家“不可避免的走极端现象”作斗争。（LW 4，第352页）

社会主义者必须帮助“自觉性的**萌芽状态**”这种不自觉、只是有所感觉的状态，列宁善于小心谨慎、坚持不懈地为此提供表达和行动上的帮助。（LW 5，第385—386、400、427页）所以列宁主义者对自发性是否导致解放行动这一广泛讨论的问题的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如果通过自觉性和向最勇敢者看齐从而助人并自助，则肯定；如果堕入经济主义，则否定。同时，任何帮助均既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可操作：行动指导，分析问题，下定义并设定目标。在这方面要顾及基本准则“实践的辩证

法”和“对革命的适宜性”：为了重新掌控局面而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LW 2，第 341 页；38，第 267 页；32，第 40 页）这符合翻译成革命政治语言的节约时间的规律。

恰是马尔托夫 1903 年在伦敦提出了建党的口号：“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列宁补充道“正是如此”，他得出结论：“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LW 7，第 272—273 页）曼德尔（Mandel）观察到，列宁在这方面“从未真正表述完全连贯的关于党的构想”，却似乎“逐步沿着此方向前进”，面对各派别的巨大变动，始终注意增强其他派别。他寻求“阶级的自我活动和先锋党角色的辩证统一”，建立了职业革命家的“经常性秘密机构”，此时“领导运动”的应该是数量尽量少的由富有经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组，参加运动的应该是各阶层中数量尽量多、类型尽量多种多样的小组。（Mandel 1992，第 92、97 页，注释 30、99；参见 LW 29，第 498 页；6，第 240—241 页）这需要最大限度的“集中”……“尽量分散”是为了了解情况和对党负责而对集中所作的“必要修正”，“这种分散无非是分工的另一面，这种分工……为我国运动中一种最迫切的实际需要”。（LW 6，第 241 页）

209

2.6 列宁的自觉性概念的一个重要维度与农民问题相关。1907—1908 年列宁写道，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LW 13，第 431 页）。他克服了把真正的同盟者农民排除在外、固执于无产阶级 / 资产阶级关系的二元论：通过把农民纳入其中，自觉性获得了“立体性”。背景是斯托雷平（Stolypin）1905 年土地改革暴力消灭村社，这一改革导致农民集体破产。（LW 13，第 449 页）较之于有纪律的工人行动，自发的斗争形式显得无政府主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胆战心惊，引起普列汉诺夫（和少数派）“害怕农民革命”，产生“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对人民的革命主动性的恐惧”。（LW 8，第 239 页；13，第 25 页；10，第 237 页及以下，第 342、259 页）俄国农民备受折磨的各阶层自发暴动的迥异形式——纵火、针对地主的各类暴力、起义、没收财产等等，可谓村社自治正在瓦解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的反面——对应着“观念上”的种种倾向：反封建的、村社共产主义民粹派的、宗教教派的、哥萨克沙皇专制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托尔斯泰主义社会乌托邦的等等。

在这点上列宁也善于衔接常识。他对辛比尔斯克（Simbirsk）、萨马拉（Samara）这些牲口“在阔绰的厩房里比在茅屋里的庄稼汉生活得还好”（LW 12，第266—267页）的“真正的俄罗斯”省份的分析也是自传性的；他在1893—1902年的著作（LW 1—5）有半数以上致力于农民问题（LW 8，第450页）。他早就知道采访过他的美国时事评论员沃林（W. E. Walling）所写的“农民无以复加的求知欲”，农民派遣“代表进城”，“以求助于学生”。（1908，第195页）

210 2.7 与在俄国不同，1918年之前列宁的思想在德国是这样的，后来因1924年起的“斯大林—列宁”这种权力共生而进一步遭歪曲。列宁对孟什维克主义“心理”的批评（比如LW 7，第284、359、371、408、410页；9，第157页；Briefe I，139）大多局限于俄国境内，而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批评，如“无所不知的中央机构”，“官僚集中制”，“把革命者变成办公室主任、粗人、庸俗者”，“压制个人首创精神”，等等，通过西方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通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欧洲尽人皆知。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和1918年三四月间，列宁最后提及觉悟（自觉性）。十月革命后不久，他自豪地断定，“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LW 26，第246页）。1918年三四月间，消灭封建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似乎结束了；列宁关注“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建设“新社会”。（LW 27，第230页）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听出忧虑：“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第230—231页）他似乎预感到总体上和平的十月革命会因帝国主义列强的介入而变成牺牲七百万人的三年血腥内战，但几乎同时也说道：“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Falin 1993，第428页；LW 30，第160、201页；27，第135页）列宁激发并领导了最大的民主革命，但他和他的接班人均未完成“实现充分的民主”的、“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LW 22，第145页）

3. 根据“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的差别”来确定人们觉悟和积极程度的差别、确定人们的最高觉悟和最高积极性（LW 7，第257页）的说法隐含着一些问题。首先是革命农民（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和职业革命家的觉悟有区别。如果说职业革命家更多具有“整体”倾向，革命农民则只心心念念于重获遭掠夺的

土地，（后来）念念不忘和平，以图能当农民。因而在所有以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为短期目标结成的联盟中（参见 LW 8，
211 第 286 页及以下），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领导权都是决定性的。“先锋队”被看成觉悟的主要体现者，因而产生了包办替代主义、垂直型统治形式的风险。在垂直型统治形式中，自上而下地灌输觉悟。曼德尔指出了列宁的“往复式运动”：在革命蓬勃发展时强调“民主”；在群众活动退潮、疲乏无力、“降级”等情况下更多地“以党代阶级”。（1992，第 73 页，第 96 页及以下）

对列宁“灌输社会主义觉悟”这种说法的批评（参见 Sauermann 1993，第 86 页及以下）多半掩盖的是，人类任何借助语言的交际行为均系“灌输”行为要求，关键在于何人在何条件下把何事“灌输”至何处。“经验”和“灌输”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均属必要。政治斗争条件改变时，亦须寻求觉悟（自觉性）的新形式及其形成的新途径。无论如何，觉悟（自觉性）概念中所含的负责地塑造未来这一问题仍具现实意义：“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MEW 32，第 53 页）

参考文献：

I. Deutscher, *Stalin* (1966), Berlin/DDR 1990; V. Falin, *Politische Erinnerungen*, München 1993;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r Sowjetunion (Bolschewiki). Kurzer Lehrgang*, Berlin/DDR 1995; *Familie Uljanow. Acht biographische Skizzen*, Berlin/DDR 1988; M. Gorbatschow, *Oktober und Umgestaltung: Die Revolution geht weiter*, Moskau 1987; ders., *Über den Verlauf der Realisierung der Beschlüsse des XXVII. Parteitages der KPdSU und die Aufgaben bei der Vertiefung der Umgestaltung. XIX. Unionskonferenz der KPdSU*, Berlin/DDR 1988; W. F. Haug, *Determinante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Situation*, Berlin 1993;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N. K. Krupskaja, *Das ist Lenin*, Berlin 1970; *Nadeshda Krupskaja. Eine Biographie*, Autorenkollektiv, G. D. Obitschkin (Ltg.), Berlin/DDR 1986; *W. I. Lenin. Dokumente seines Lebens*, hgg. v. A. Reisberg, Bd.I. Leipzig 1980; E. Mandel, *Oktober 1917*, Köln 1992; W. Ruge, *Stalinismus*, Berlin 1991; H. Taut, »Bewußtheit, Spontaneität und Emotionalität im Sozialismus«, in: *DZPh*, 14. Jg., 1966, H. 11, 1322-1344; E. Sauermann, »Das ‘Hineintragen des sozialistischen Bewußtseins’ – eine antimarxistische Position«, in: *Forum Kritische Psychologie* 31, 1993, 86-105; H. Scheler,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Spontaneität und Bewußtheit«, in: *DZPh*, 5. Jg., 1967, H. 1, 16-39; L. Thomas, »Wladimir Uljanow Lenin«, in: *Kremlchefs*, hgg. v. I. Köhm, Berlin 1991, 9-39; *Unterhaltungen*

mit Bakunin, hgg. v. A. Lehning, Leipzig 1991; V. Vygodski, »Überlegungen zu einigen Dogmen der Marx-Interpretation«,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Folge*, Hamburg 1993, 212 107 - 121; W. E. Walling, *Rußlands Botschaft an die Welt*, Berlin 1908; A. R. Williams, *Ein Amerikaner im revolutionären Rußland*, Berlin/DDR 1982; *Wolodja. Unser Bruder und Genosse*, Berlin/DDR 1980.

海因里希·陶特 撰
朱更生 译，金建 校

参见：
Anarchismus, Arbeiterbewegung, Aufstand, Avantgarde, Bauern, Bauernbewegung, Bauernkrieg, Berufsrevolutionär, Bewußtsein, Bolschewisierung,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Disziplin, Dorfgemeinschaft, Glasnost, Massen, Neues Denken, Opportunismus, Ökonomie der Zeit, Ökonomismus, Sowjetische Gesellschaft, Spontaneität, Sozialdemokratie, Unbewußtes, von außen

意识（Bewußtsein）

A: waʿī, idrāk. – E: consciousness, F: conscience. – R: soznanie (сознание). S: concienca.

对于经典的资产阶级主体的自我解释来说，意识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时代的“哲学中真正的柏洛托士（Proteus）”（Cassirer 1954，第 57 页），也可能是现代思想中“最不言自明”的范畴，它的意义似乎是直接且明晰的：作为行动者的内在表征，它意味着，某个东西是以及如何是**为我们存在于此的**（*für uns da ist*），这其中包括我们的自身（selbst），而我们是将我们的自身同这种东西区分开的。海德格尔依据这一关联，用**此在**（*Dasein*）取代了意识，萨特则是用**自为**（*Für-sich*）取代了意识。这回应了尼采对哲学的地位以及“意识”的权能的攻击（“某位哲学家的绝大多数有意识的思维，是受其本能秘密引导的”，*Jenseits*, Aph. 3），作这个攻击本身则是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回应，尼采可能是通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认识到这些观念的。——首先是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在意识地位方面的自我理解，对此阿尔都塞（1976，第 35 页）作了如下总结：“人类主体被解中心化了，不过这一点也是由一种同样不具有‘中心’的结构建构起来的——除非是在对‘自我’（Ich）的虚幻的错误认识中，也就是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在其中，自我达成了对自身的

'承认或再认识'。"

1. 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明确地打断了关于意识的哲学话语:"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MEW 3,第27页)这针对的是"意识"的范畴地位,针对的是哲学的文法。要想突破这种文法,就要用一种复合的操作,对"意识"作起源上的重构和社会性的定位。一种新的范畴框架出现了:生产方
213 式、再生产与生活方式、生产力、分工与交往形式或生产关系(第21、25页)、所有制形式及与之相关的"劳动的……经营方式"、以之为基础的阶级关系(第22页),以及最终对其进行再生产的国家(第27页)。在关于历史性的"基本事实"(生活资料的生产、新的需要的产生、家庭、与"共同活动方式"相应的生产方式),它们被看作是"原初的历史的……方面"或"因素",而不是被"看作不同的阶段"(第28—29页)的叙述中,意识处在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位置上的——在这里,意识的实现被理解为**语言**。"只有现在……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第30页)语言和人们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宪法共同体(Konstitutionsgemeinschaft)。"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第30—31页)

由国家再生产出来的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限制着——并且受限于——精神活动的特定定位。那么可以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第31页)。手稿的一个简要边注暗示出,在这种"才开始"将人们区分开的"分工"是什么意思:"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同上)因而这涉及统治权再生产的制度,恩格斯后来将之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参见MEW 21,第302页)。这种"分工"也与另一种区分相关,这种区分就是,"享受和劳动……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MEW 3,第32页)。在这一**超出社会**的位置上,"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

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第31页）。在“赋予过去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之后，“整个历史就可以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第69页）但是，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九和十条所暗示的资产阶级特殊性，马克思才将之强调为私有制的统治［参见第65—68页］），“内”与“外”这种二元编码才产生了，它给意识分配了其范畴位置。这里需要对此作一番回顾：

2.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人的现实性散置于一种等级化的、多项的不同主管之间的游戏（Instanzenspiel）中，这种游戏同时复现了父权制的性别关系和奴隶制，并将之合法化。从感官知觉（αἴσθησις）、记忆与经验的组合关系出发，从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共同具有的关系出发，《形而上学》（*Metaphysik*）将诸范畴编排在有雄性意味的形式原则 εἶδος 和有雌性意味的质料原则 ὕλη（988a）之间，这类似于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木料不能自成床榻……而某种其他东西才是变化的原因。”（984a）在这一思想世界中，有表示自指性的知识的概念（参见 Diemer 1971，第889页），但是，这里既没有一种统一的概念，也完全没有一种与外在相对立的、具有建构作用的内在位置。

到了现代资产阶级那里，关于意识的话语才得以继续展开。“按照通常的理解”，意识概念“是由笛卡尔建构起来的”，并使之成为“具有中心地位的人类学概念”，成为“人的本质的组成部分”。（同上书，第890页）——虽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1642年时还没有使用统一的术语——他谈到 *cogitatio*（思维）、*res cogitans*（思维着的实体）、*mens*（精神）、*conscius esse*（被意识到），并且只是偶尔谈到 *conscientia*（意识），但是他把内在的统一结构和掌管者作为能动的原则创造出来，并使得自我（*Ich*）成为（与外部的身体世界相对的）行动者，笛卡尔的后继者将之理解为意识概念。形成这一概念的那种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二元论，则只有在系统性地忽视实践时才能得以贯彻。

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从这些关于意识的讨论的基本条件出发，从定义上开始他对笛卡尔思想的陈述（1663）：“我将在我们心中或者说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都概括在思维这一概念之下。”他解释道：这“也许是意志、知性、想象和感觉的全部作用方式”。“直接”这个词应当具有如下意义：“排斥那些由思维而来的东西”，即

行动、实践（*Tätigkeit*，*Praxis*）。精神包含着它的对象，即身体。

18世纪初，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引入了名词性的“意识”（1719），不过还不固定，还有四种写法。（也可参见 Mayne 1728）此后，康德的《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1798）理所当然地从意识开始：意识使人类成为**自我**和人（*Person*），因而不同于“人们可以任意处置和支配的、诸如无理性的动物之类的**事物**（*Sachen*）”；“人能够具有自我的观念，这使人无限地提升到地球上一切其他有生命的存在物之上……。因此，他是一个人”。如果说，在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拥有意识意味着拥有“这种”人的与众不同的物质性本质特征的地位，那么，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1787）中，这就意味着拥有一种基础性的思维必要性：先验的“意识的统一”（B版第137页）或“自我意识”的统一（B版第132页）保障了对象关联（Gegenstandsbezug）和客观性，因而“知性的可能性也是以这种统一为基础的”（B版第137页）。“按照经验性概念的综合统一”是完全偶然的；“如果这些经验性的概念不是建立在这统一的某种先验基础上，那么就可能有一大堆现象充斥我们的心灵，却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中形成经验”（A版第111页）。“所有各种经验性的意识都必须被联结在一个唯一的自我意识中，这个综合命题是我们一般思维的**绝对**第一的综合原理。但不可忽视的是，**自我**这个单纯表象在与一切其他表象（它使这些表象的集合的统一性成为可能）的关系中是先验的意识。”（A版第118页）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意识“通过概念的运动而在它的必然性里包括了意识的整个客观世界”（*Vorrede*，第31页），因为“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Einl*，第67页）。该书的第1章也是从**意识**、**自我**和**对象**开始的。要求是，“通过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凭借意识自身当中既有的尺度，因而通过**内在批判**，发现从意识的一种形态到下一种形态的**过渡**轨迹，并因此贯穿意识的“整个序列”，直到达致“绝对知识”这个点，即最终的思辨同一性状态，在这里，意识“揭穿了它的假象，摆脱了……异己之物的牵累”。（*Einl*）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黑格尔的如下批评摧毁了上述程序：“个人首先转变为‘意识’，而世界转变为‘对象’，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等等。（MEW 3，第137页）大约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时，马克思写下了关于 216

黑格尔的四个准备性提纲，并冠以“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Hegelsche Konstruktion der Phänomenologie*）这一标题（第536页）。第一条提纲列出的是一种类基性的**颠倒**：“自我意识代替人”；第二条提纲列出的是由上述颠倒造成的**事物差别的意义的丧失**，因为这种差别只被理解为意识的主体—实体的“自我区别”；第三条提纲指出，黑格尔由此将“扬弃**异化**等同于扬弃**对象性**”；第四条提纲指出，黑格尔将“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的扬弃“等同于……对和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的扬弃”。（同上）

上述对黑格尔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批评者费尔巴哈的批判。费尔巴哈虽然以唯物主义的方式确定了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依然停留在意识哲学的理论领域中。在《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中，他从“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开始，这种意识甚至被视为通往科学，最终通往“纯粹”哲学的能力，并且简单粗暴地将之与实践用处相对立，这种实践用处被归因于“犹太人”与“希腊人”的对立。（Kap. 12）“但是，自我肯定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优异性、完善性、幸福、善，这就是意识。”（Kap. 1）相应地，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意识”（MEW 3，第42页），他不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ThF*，MEW 3，第5页）。

3. 马克思对意识哲学话语及其理论

“文法”的批判并未消除意识概念，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地位。“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MS 44*，MEGA I. 2，第240页），而不是如直到费尔巴哈的现代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意识。意识概念用于概括观念性的活动和功能，它们是在“物质”实践同生产**劳动**的必要核心的交织中，在“物质”实践同预期与所得经验的交织中被理解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MEW 3，第26页）但是，“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 217
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生产“也是这样”。即便所有这一切都是“倒过来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同上），只不过，这一过程不仅是以分工的方式区分开的，而且首先也是由统治的上下级秩序及其意识形态再生产形式决定的。

为了表达意识的这种决定性，《德意志意识形态》使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术语，但又通过一系列的替换摧毁了它：“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第一个替换），“而人们的［被

意识到了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第二个替换）；这里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同上），他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关系中实际活动着的人。

如果忘记了这种实践的中介性，那么对意识优先性的否定（“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就会沦为机械决定论。相反，如果从实践出发思考人类的观念，这种阐释就会被排除掉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第27页）由于“生活”包含有意识的活动，所以“意识”在这里指的是意识形态的超然的、独立化的意识。

意识的超然性（Abgehobenheit）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地位的效果，这就排除了一种纯粹精神史的做法。《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一种看起来显然矛盾的方式表达出这一点：“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没有历史，没有发展。”（第26—27页）不过，这并不是说，没有宗教史，没有哲学史，等等，而是说，宗教、哲学等“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并且它们的“历史”必须在“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中被扬弃。

《共产党宣言》发展了这一思想：“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MEW 4，第48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提出异议道：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的内 218
容虽然是不断改变的，但它们本身“在这种不断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终被再生产出来的。《共产党宣言》根据全部阶级社会的共同点来回答这一异议：“因此，毫不奇怪……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意识形式。”（同上）

这里的关键不再是意识范畴或观念范畴，而是一定的、**历史的意识形式**和“各种观念形态”（MEW 3，第38页），这由意识形态理论和知识社会学（虽然是以消解了的形式）部分地完成了。这里也附加了分析性的方式，为的是思考**不同步的情况**：一方面是观念的长达数百年的**回响**（*Nachwirken*），它“拥有一种传统权力”；另一方面则是预示的可能性：“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等等。（第72—73页）

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重建一定的意识形式和意识内容的路向是有很

多研究方向的。例如，拉布里奥拉（Labriola）在与伦理的关系中表达了相应的见解："如果在这方面应当涉及科学，那么，科学所能够解释的就不是与意识的伦理联系，而是必须理解这种意识是如何形成的。"（*ÜHM*，第 233 页）此外，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奥托·鲍威尔、弗兰茨·柏克瑙（Franz Borkenau）等学者也作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中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支流是**意识形态批判**，它的核心概念是"（必然）虚假的意识"（可参见 Sohn-Rethel 1971，第 9 页及以下，他在另一处谈到了"意识的上层建筑"：1970，第 7 页）。J.-F. 克拉洛（J.-F. Corallo）认为，"对假象的分析"形成了"不同马克思主义流派讨论意识问题"的框架（1983，第 166 页），并且国家和雇佣形式被当作具有典范性的问题。这使得"经典的意识范畴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现象领域"：（1）作为对假象之阐述的意识形态；（2）对摆脱假象的条件的分析，这种分析认为"应当在狭义上保留意识这一表述"（同上）。——尽管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中具有决定性的部分，即与意识哲学的理论文法的决裂在这里被淡化了，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个见解对于一定的意识形式而言仍然具有局部的正确性。

4. 意识能够表示对客观现实的一定洞见（例如："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MEW 3，第 69 页）——或者表示客观现实的缺失或对客观现实的拒斥（如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KI*，MEW 23，第 377 页）——并且，在马克思后来的写作中，主要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意识概念的。一种文化的精神性的教养世界（Bildungswelt）倘尔会与意识概念联系起来理解，《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是这样，在这里，马克思将欧洲的教养世界与美洲的教养世界相对照：欧洲世界是由"阶级教养发达、具备现代生产条件、拥有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塑造的——与之相反的是美国，"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物质生产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MEW 8，第 122 页）

4.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既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形式与运动形式的分析，同时也是对由这些形式所中介的意识形式或者说拜物教化的形式的分析，在其中，"资本……存在于其承担者即资本家的意识中，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TM*，MEW 26.3，第 474 页）。在此可以区分出（伴随着既定关系的）附带意义和（呈现在

问题中的）强调意义。附带意义可以是指，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只是在**危机时期**才由于切身利害关系而形成这种意识”（*Gr*，第277页），或者是指，不同于金融资本家，在作为代理人的资本家那里，剥削关系是“被他们意识到”的（MEW 25，第835页），等等。

4.2强调的意识。在“无意识”和“有意识”之间的张力中，马克思是作为启蒙者而工作的，因为他发展了社会科学的思维工具（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单纯改变意识的做法的论战并不矛盾）。1843年，这一主旨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尽管在关于意识范畴的结论部分可以看到，这涉及的是1845年**转折之前**的文本，此时明显依然受费尔巴哈的后来才遭到批判的宗教批判的影响：“意识改革”在这里还是“口号”，并且这种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意识改革……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MEGA I. 2，第488页）。凭借这一要求，分析者即我们是与“世界”对立的：“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同上）在这一语境中需要补充的是，在这一用法中，**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出版是一种必需的、可操作的（而不是形而上学中实体化了的）意义上的意识：“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KHR*，MEGA I. 2，第173页）此后所说的不再是“世界”，而是现代无产阶级。关键在于使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意识。”（*Gr*，第366页）

5. 对马克思关于意识讨论的批判的接受史，长期以来是一种不接受或颠倒。因为这种颠倒的结果是在精神上起规定作用的，所以这一过程本身几乎没有被研究过。

5.1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了不起的意识”（enormen Bewußtsein），在这种意识中，工人认识到，对象性的财富世界是他们从自然材料中创造出来的，“工人阶级意识形式”的成问题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前提”：“马克思的理论所表达的历史变革的前提就是：马克思的理论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式，并成为历史本身的组成要素。”（GW 1/2，第377页）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已经阐明，社会世界就是

对立的世界和阶级斗争。“由此，以往社会形式中意识与存在之间的、人的意志与社会行动之间的、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必然的错误关系，第一次得到了解释。”（第 371 页）

5.2 **阶级意识**概念是第三国际相关讨论的主要特征，而此前，像卢卡奇与柯尔施等“激进左派”对此也已进行了讨论。对这个概念的巨大兴趣（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过这一术语，参见 MEW 23，第 21 页）可以在这一路向中来理解，当然这是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功能化的覆盖和支配的。——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解释道，“意识与它的对象之间的”对立“因这种辩证的观点而被完全扬弃了”（1923，第 126 页），他还
221 宣布，“**这种意识与现实的协调一致**，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来说具有典型性”（第 128 页）。但是，这削减了活动的中介作用并重新陷入思辨的同一性哲学当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第 403 页）中，格奥尔格·卢卡奇解释说，“意识到社会同时就意味着能够领导社会”，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第 404 页）卢卡奇在恳求这一主体时所拥有的充沛感情，来自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他将这些范畴引入社会当中，并将马克思的计划倒译回这些范畴。“围绕社会意识的斗争”（同上），大致上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说的围绕领导权的角力和奥托·鲍威尔所说的“围绕头脑的斗争”是相应的（参见 Albers 1983）。但是，“头脑”不同于“意识”，后者已经将个人再次变成一种哲学范畴。

5.3 1920 年葛兰西写道，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革命进程往往在工厂的黑暗中，在无数群众（资本主义用它的法律征服了他们）的意识的黑暗中，以地下组织的方式发展”（*ON*，第 124 页；参见 *Ri*，第 65 页），在此，他是外在地将对工厂（人们看不透它）和个人（人们不能阅读其思想）的看法作了类比，并将二者与资产阶级关于“无数群众”的看法相叠加，由此构成革命进程的秘密“黑箱”（*Black box*）。葛兰西突出的是“这一构成的要素”：“情感、决心行动、习惯、主动与习俗的萌芽。”（同上）当时处在监狱“黑暗”之中的葛兰西对这些要素的形成条件进行了全面研究。领导权需要的是客观手段与组织形式（“领导权的配置物”）、行动者（“有机的知识分子”）、实践形式（“批判”、“活的语言学”）等所构成的整个游戏，在这些要素中，与旧秩序的决裂作为一种“分离”过程而获得了准备，从而驱使人们摆脱下层阶级（Subalternität）意识形态的桎梏，“这意味着关于自己的历史性人

格的意识的不断获得，意味着分离的精神，必须努力将这种精神从先行阶级扩展到潜在相关阶级：这一切都要求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工作，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去认识”人们想要摆脱的“那个……领域”。（*Gef* 2，H.3，§ 49，第374 页）相应地，葛兰西感兴趣的是意识和语言之间的不同步和不一致，并通过二者的异质性的组合破解了不同集体之间的一致性。（*Gef* 6，II.11，§12，第1376 页）——把一切重新归结为意识（在卢卡奇那里，就是归结到“意识性”的激情中［参见 *Guk*，第 460 页］），意味着把社会斗争的戏码还原为“被意识到”。回过头来重新表述古代哲学（以及德尔斐神谕）所主张的“自我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而让新的实践、行动者与主管所构成的整个世界回到哲学范畴当中，这个过程也具有了神话般的性质。

222

5.4 恩格斯把这种协调一致放在了世界观问题的讨论中。如同马克思那样，恩格斯在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的一个片断中抨击了二元的基本结构，他将这种结构与起到改变作用的活动相对立：“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MEW 20，第 498 页）然而，在这里，改变了自然的状态的“活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体的自我活动**。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这一问题“只有在那种不会明白自己在想象中脱离生活的性质和根源的哲学意识看来才是合理的”，MEW 3，第 435 页）经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F*）之后，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需要的。

5.5 左派所幻想的对立概念的影响下，并且为了满足当下的政治用途而不惜对理论进行简化和粉饰，使得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被淹没了。为了努力地进行澄清，并且终结搅扰不安的知识分子之争，也就是为了将持异议的知识分子驱除出党，列宁以《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Zehn Fvagen an den Referenten*）（因而是向实践的知识分子提问）武装他的追随者（这一文本六次援引恩格斯，但没有一次援引马克思！），其中第三个问题具有典范意义：“报告人是否承认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是承认外部世界及其在人脑中的反映？”（LW 14，第 5 页）。需要对一种承认作出承认。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克制的批评，因为他们忽视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背后的历史的—辩证的内容。（参见第 241、333 页）这

223 里的论证是分裂的。虽然列宁强调了实践，但实际上却限制了实践的范围。不过，由于认识论领域被接受了，结果是前马克思派别的内容得到了恢复："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哲学信徒的基本区别在于：唯物主义者……把人的意识看作是客观实在的映象。"（第 267 页）——在他关于黑格尔的研究中，当列宁强调意识也"创造"世界时（LW 38，第 203 页），他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当中。

5.6 当斯大林断言"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时，这是马克思主义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生活的语言"这一前提的扭曲复制。（*DHMat*，*FL*，第 660 页）"条件的映象"取代了马克思那里的"现实生活"、实践活动的中介性，在斯大林此处套用的命题（见上文）中，这种映象恰恰意味着一种将这些条件淡化了的看法。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斯大林将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变成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第 659 页）。凭借"意识的……源泉"这一庸俗唯物主义的地位，物质显露了出来，在这里，意识"是次要的、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映象"，因此"思维"是"物质的产物"。（第 655 页；恩格斯为这些观点埋下了伏笔，他在他关于《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 的笔记中将意识规定为物质的运动形式，参见 MEW 20. 第 325 页。）

5.7 这些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落实所导致的后果（大部分是适得其反的），（共同）规定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意识问题的论述。这里不讨论这些结果。在布莱希特的理论反思中，暗含着针对这一点最尖锐的评价。福尔克·布劳恩（Volker Braun）认为，"通过纯粹'劝导'来提升意识的希望"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希望已"再次将意识当作一种自在的东西，一种有待拥有和给予的东西。但是，意识通常是一种……实践之事。只有通过在政治过程中更强有力的实践参与，观念上的参与才会变得更有力。国家意识只有在共同支配国家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好的发展。……因而，要抱怨的不是政治意识的停滞，而是群众政治行动的停滞"。（1976，第 30 页）与此同时被提及的，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开展如下计划的困难：作为学生运动（1964—1970 年间）之目标的广泛的意识觉醒（*Bewußtmachung/-werdung*）。

5.8 长期在莫斯科教学的格鲁吉亚哲学家梅尔哈伯·马马达施威利（Merhab Mamardaschwili）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对马克思的意识分析进行了反思。"意识只是广泛的、多维度的整体的一种蜕变，是冰山的一角，并且需要在与它的不可见部分的关系中，即在它对 224

这些部分的依赖中来观察它。”（1987，第 141 页）这些部分可能是指“社会机制、无意识、文化的符号系统等”层面，同时也指历史性的分层。（同上）如果其中可能涉及因果性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系统性的因果性。在他关于价值形式（它经常同时被理解为意识形式）的分析中，马克思已经发现了“意识的现象学本质”，即“它的实际上准客观的特征”（第 144 页），就像“眼睛不是视网膜上的主观映象，而是对‘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MEW 23，第 86 页）的感知”。在与人的经济上的特征面具相同的意义上，马克思已经指出了“人的典型的‘意识面具’”。面具既是指明又是遮掩，意识面具也是如此，人在其活动中实现了这种面具。“文本虽然来源于社会，但却是固定在个体当中的。”（第 147 页）“交织、转移、倒置、压缩等”过程是在清晰的意识之前的，这种过程“以表面的、准客观的形式取代了实在”，就像价值形式那样。（第 148 页）这些反思的历史性标志的特征是，它们以对社会系统的思考为结尾，在这种系统中，“规范功能”被打乱了，在这里，“关键在于一种社会历史情境，在此情境中变得清晰的是，这些社会体系必须被打破”。（第 154 页）对于这种视角来说，“马克思的著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上）。

6. 批判心理学（特别是 Schurig，1976）并没有考虑与意识范畴在范畴上的表述相关的问题，而是重构了经验上以意识范畴为标记的东西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人类学起源中心理的，特别是历史的多种参数的相互依存（包括直立行走与方向感；手、操作与大脑发育；工具使用与工具生产；交往、语言与传统；社会秩序等；以及进一步的神经生理学研究），该理论的主旨是：我们不应孤立地、仅在精神意义上来理解“意识”。

参考文献：

D. Alb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Marxismus*, Berlin/W 1983; L.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1967)*, Paris 1974 (dt.: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Berlin/W 1985); ders., *Freud und Lacan*, Berlin/W 1976; V. Braun, *Es genügt nicht die einfache Wahrheit. Notate*, Frankfurt/M 1976 (Leipzig 1975); E.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Teil 3 (1929), Darmstadt ²1953; J. F. Corallo, »Bewußtsein«, in: KWM 1, 1983, 166-168; A. Diemer, »Bewußtsein«, in: HWPh, Bd. 1, 1971, 888-896; W. F. Haug,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in: Projekt Ideologie 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70, Berlin/W 1984;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Frankfurt/

M-Wien 1966; M. Mamardaschwili, »Analyse des Bewußtseins in Marx' Werken«, i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hgg. v. d. AdW d. UdSSR, H. 2, 1987; Z. Mayne, *Über das Bewußtsein* (1728), hgg. v. R. Brandt, Hamburg 1983; F.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and Böse*, KSA 5, 9-243; V. Schurig, *Die Entstehung des Bewußtseins*, Frankfurt/M 1976;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ders., *Warenform und Denkform*, Frankfurt/M-Wien 1971; W. P. Tugarinow, *Philosophie des Bewußtseins*, Berlin/DDR 1974; Chr. Wolff, *Vernünftige Gedanken von Gott der Welt and der Seele des Menschen, auch allen Dingen überhaupt* (1719).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撰

侯振武译，王师校

参见：

Abbild, Aneignung, Anerkennung,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tiideologie, Antiphilosophie, Antizipation, Arbeitsteilung, Aufhebung, 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 Aufklärung, Bedeutung, Bewußtheit, Brecht-Linie (II), Camera obscura, Charaktermaske, Denken, Determinismus, Empirie/Theorie, Erfahrung, Erkenntnis, falsches Bewußtsein, Genese,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Hegel-Kritik, Hegemonie,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nnenwelt/Außenwelt, Klassenbewußtsein, Kritik, Kritische Psychologie, Materie, Praxis, Spontaneität, Sprache, Subjekt, Unbewußtes, Ungleichzeitigkeit, Vernunftkritik, westlicher Marxismus, Widerspiegelung, Wissen

形象（图像）（Bild）

A: ṣūra. – E: image. - F: image.

R: obraz (образ). - S: imagen.

1.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图像和符号在神话式的文化与交流形式中的那种最初的统一性，在去神话（Entmythologisierung）的过程中（广义地说，该过程可以视作贯穿多个历史时代的整体启蒙过程）发生了不可逆转的解体。科学把语词视作符号，而在艺术中，语词则被分开来视作声音和图像。一旦图像退化成了摹本（Abbild），艺术就必然“再一次成为世界”，成为意识形态的增强器和循规蹈矩的复制品；而一旦符号退化成了计算，科学最终就会沦为脱离现实的符号组成的体系，并且失去任何超越这个体系的意图。（1944，第 34 页）这些论述主要思考的是符号在形式化和表达上的作用，人们可以有意义地使用符号而无需解释符号本身。形式化的观念特别显著地体现在数学和逻辑演算的历

史中。为了摆脱繁重的解释工作，我们的理智熟悉了一种“符号机器”。这个说法如何理解？“这有两个象征性的含义。第一个含义：这些机器并不是真正存在，而只是一种象征……。第二个含义：这些机器唯一做的就是转化符号串。”（Krämer 1988，第2—3页）由此带来的历史后果塑造了我们今日的生活：“从原则上说，每一个可以被视作符号机器之运作的过程，也都可以经由某个现实的机器加以实现……。计算机就是那种能够模拟一切符号机器的机器。”（第3页）

我们如今置身于一个符号的场域之中，这个场域正是通过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向而被标示出来的。一方面，得益于计算机化，形式化过程获得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属性。另一方面，标志—指示性的符号给出的各种新形式，在“技术图像”的结构中得到了增强，弗鲁瑟（Vilém Flusser）认为它们的功能在于“把那些由于被抽象为点元素（Punktelemente）而坍塌的世界重新拉回到具体事物之中”（1989，第32页）。“技术性的图像体现了两种尝试：一是试图使我们身边和我们意识中的点元素在表层聚拢，从而填补它们之间的间隙；二是试图同时把诸如光子、电子之类的元素同时视作信息位元和图像。”（第17页）然而，经由技术实现的符号机器是有界限的：“机器属于一种无法超越自身的系统：由某个机器产生的语句无法同时指涉该机器本身。我们固然可以对机器中的程序进行无限的修正，但这些修正总是需要在程序中才能进行。因此，那种脱离系统和程序的能力，始终只能是我们的幻想。”（Krämer 1988，第180—181页）相反，艺术恰恰就“生活”在这种能力之中，这种能力同时也激发着艺术：而一旦艺术被固化在一种与文化符号潜力的发展相脱离的图像地位中，它就不再具有这种能力了。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的两位作者认为，图像与符号的分裂是注定的。它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因为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无法扬弃的差异进入了我们的意识，也因为各种文化陈述对于有效性的追求是相互增强的。但这种分裂也适用于图像性的思维和交流形式，这些纷繁的形式出现在多种媒介中，并不仅限于视觉媒体。在神话中，图像和符号是统一的，与此相反，在这些形式中，中介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而图像思维也开始分化成为符号思维。那在公元前5世纪仍属于新想法的形式化的观念，也体现在了关于形式和形式关系的艺术思想中。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t）赢得了塑造的自由，因为他把人类解剖学的事实分解成了形式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参考内容只有在

结构（Gefüge），也就是σύστασις中才得以展开。形式化从来都不是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特权。作为形式的结构，它所标示的无非是一种特别的建构式的形式关系。同样，雕塑家对于那个出自本身的规则的遵循，在很大程度上无需依靠形式要素给出解释，他们并不是在用某种计算或算法来改变世界。

阿多诺开启了关于图像问题的现代争论。针对列宁主义的反映论，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n Dialektik*）中提出了无形像的唯物主义（bilderlosen Materialismus），它拒绝“对乌托邦进行肯定性的描绘”（1966，第207页），这个主张可以视作神学上禁止偶像崇拜的世俗化版本。在《哲学术语》（*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讲义中，阿多诺解释道：“由于一般地说，哲学语言并不像各门科学那样有直接指涉的对象，因此它总是被迫用夸张或形象的方法言说它真正想说的东西。”（1973，第67页）这种夸张和形象的说话方式容易让人误解，它会使人过分看重图像所带来的意义，并轻易相信所说的事物，从而形成过于事物的神话式表象；但要消除这种说话方式，我们就只能消除语言本身，并代之以纯粹的符号。哲学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把握其对象，即：“朝着对象飞奔过去，使其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对象。因此，哲学的这种形象的或比喻的本质本身就是不可或缺的。”（第68页）在《美学理论》（*Ästhetischen Theorie*）中，阿多诺把集体历史的经验内容视作附着在形式结构上的表达内容，并由此认为，现代艺术的高级建构同时体现出了图像和符号的特征：“艺术品的精神附着于它的形式之上，但只有当它超越这个形式时，它才能成为精神。”（1970，第137页）在阿多诺看来，作为没有模仿性（Abbildlichkeit）的图像，高级艺术作品是一种特别的符号图像：“其中那看起来生动而素朴的东西，它那和谐、连续而又直接抒发自身的方式，都来自它的中介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艺术品才能具有符号性，它们的要素才能成为符号。”（第217页）

228

2. 在神话的思维和交流形式中，作为文化人造物的图像重新退回到了“所与的形式之中”（Cassirer 1925，第32页），而“符号思维”颠倒成了一种“物质的现实关系”（第65页）。古希腊人的符号反思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摆脱了符号拜物教的早期形式，但他们仍然执着地发展出了功能性的修辞术，并将其作为民主辩论文化的工具。尽管如此，图像概念仍然具有双重含义，其主要的含义体现在εἴδωλον（Eidolon：图像、分身。——译者）这个词中（次要地体现在εικών[形象、图像。——译者]中）。这

种状况已经体现在荷马（Homer）史诗中，他用形象化的叙述世界的方式描绘了阿基里斯（Achill）的盔甲，并对上面的图形纹样（Eidolon-Motiv）作了相当具体的构想。在《伊利亚特》（Ilias）中，阿波罗（Apollo）用一个像（Eidolon）来替代被迷住并身处险境的埃涅阿斯（Aineas），受到欺骗的希腊人为此耗费了更多气力。品达（Pindar）叙述了宙斯（Zeus）硬是给了伊克西翁（Ixion）一幅自己妻子赫拉（Hera）的像（即 Nephele[涅斐勒]。——译者），以便使他受赫拉的诱惑。当伊阿西翁（Iasion）追求得墨忒耳（Demeter）时，他必定是更偏爱后者的像。在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图像神话中，一个反讽的地方在于：不带疑心的凡人总是被众神的分身或者像所蒙骗。而这种“像”（Eidolon）所采用的质料，大多数时候都被描写为 νεφέλη 或者 νέφος（云、烟、雾）。这是一种“云像”（Wolkengebilde；εἴδωλα νεφοποίητα）。它们是具有雌性本质的分身，并且具有人的各种生理功能，这个说法似乎受到了涅斐勒神话的影响，涅斐勒本身就是一种属神的存在。在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戏剧《海伦》（*Helena*）中，神话中海伦形象情感矛盾，通过具有艺术色彩的复制，分裂成了埃及海伦和特洛伊海伦：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其实是为了一个“εἴδωλον νεφοποίητον”（云像）而彼此残杀。这样的幻象（Trugbild）成了诗歌中的一个范式，它不仅表明战争的爆发毫无意义，而且也暗示着意见（Doxa）和真理（Aletheia）之间的关系是成问题的。

柏拉图在讨论图像的显著性时重新拾起了这个传统。同时，他把图形纹样视作图像的一种，并借此把一切与经验相关、模棱两可并且随语境变化的东西都贬低为纯粹理形（Eidos）的幻象。于是智者们被指责为在所有可能的事情上展示 εἴδωλα λεγόμενα，即语言的幻象。（*Sph*，234c）在《克拉底鲁篇》（*Kratylos*）中，柏拉图结合图像是否可以和客体完全相同的问题，解释了“分身”和“形象”的区分。在其中，苏格拉底（Sokrates）问克拉底鲁（Kratylos）道：“让我们假定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克拉底鲁，另一个是克拉底鲁的形象。我们还要进一步假定，某个神在刻画克拉底鲁的形象时，不仅像画家那样使它有外形和颜色，而且也创造出像你的内脏一样的内在组织，也有同样的热度和柔软，并使之能够运动，把和你一样的灵魂和心灵输入其中，简言之，模仿你拥有的一切性质，造就另一个你。在这个时候，你会说这是克拉底鲁，那是克拉底鲁的形象，还是会说有两个克拉底鲁？”克拉底鲁回答说：“我会说有两个克拉底鲁。”（*Cra*，432b-c）形象不是客体的分身，而

229

是一种表征，它要唤起影像，要使其成为事物本身，它用某种方式隐藏了自身的符号本性；这些首先注定了它要作为幻象（柏拉图选择了 φάντασμα 一词）而发挥作用。“符号的图像唤起了符号不再成为符号的诉求，它要把自身装扮为自然的直接性和所与性（也就是要使那些相信它们的人认为，它们满足直接性和所与性的标准）。”（Mitchell 1990，第 55—56 页）柏拉图认为这是可耻的事。由此，柏拉图把塑造形象的艺术和技艺（εἰδωλοποικὴ τέχνη）分为两种：模仿的技艺（εικαστικὴ τέχνη）和影像的技艺（φάνταστικὴ τέχνη），前者的准则位于原形（παραδείγματος συμμετρίας）之中，后者则不具备现实存在的关系，而只是对应着观察者心中对于美好事物之印象的表征。

本质上说，图像概念的以下各种区分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1）图像作为语言表征之外的一种独立表征形式的图像；（2）表示图像也能印入灵魂这个事实的图像式表象（φάντασία），当图像式表象成为表征时，它作为感知与意见的统一，就拥有了真或假的性质；（3）作为语言表征之维度的图像性，当图像式表象可被语言媒介（如噱头、比喻和神话）所表征时，这种图像性就来自图像式表象的可能性；（4）图像式的知识（εικασία），就认知可能性上说，它们总是与表征形式结合在一起的：εικασία 不仅是错觉的源头之一，而且同时也是达成知识（亦即对世界纯粹本质的把握）必不可少的阶段。但在柏拉图看来，图像的认知可能性总是受到表象在场时所具有的那种欺骗效应的影响。 230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它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关系：德谟克利特（Demokrit）基于原子论的认知理论在伊壁鸠鲁学派（Epikureismus）中造成了许多误解，但前者在构想该理论时为什么可以很自然地使用 εἴδωλον 一词呢？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了列宁主义的反映理论中，阿多诺对此曾指出：“思维不是事实的摹本——这只是一种伊壁鸠鲁式的唯物主义神话，认为物质发出图像——而是关于事实本身的。”（1966，第 205 页）不过，德谟克利特恰恰指出知识是受限的，他也从未否认认知者的自发性。一方面，Eidola（图像、分身）的构想把古希腊关于图像的一般看法视作一种准唯物主义的现象。德谟克利特那里的 Eidolon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可以四处游走的分身，“虽然不可捉摸，但却有足够的物质性，因此可以显现出来”（Simon 1992，第 50 页）。另一方面，德谟克利特也在唯一一处提到“对客体形式的保持”（第 48 页）。εἴδωλα 的本意是东西的模型，而伊壁鸠鲁（Epikur）认为它是 τύποι

ὁμοιοσχήμονες（大意是：形态相同的模板）（*Brief an Herodot*，第 46 页），是认知的基础，但在德谟克利特那里，这个概念缺乏事物的原子结构，因此它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可感知属性。由此可见，Eidola 不仅仅是摹本，而且是一种需要解释的、无指示性的符号。德谟克利特区分了“两种知识形式：真者和晦暗者。以下所有这些都是晦暗者：视觉、听觉、嗅觉、味觉、感觉（触觉）。而其他所有不同于这些的都是真的”（Diel/Kranz，Fr. B 11）。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晦暗者不再能通过看、听、闻、尝和触摸来感知极小者，而对这些细小的东西的研究却还必须继续，那么真的东西就到场了。”（同上）德谟克利特强调了 Eidola 的多义性，它同时有益处和害处。而且在古代关于德谟克利特的叙述中，众神也被视作 Eidola：他们“从过去直到现在，众神始终给人类带来善。相反，众神并不带给人任何邪恶、
231 有害和无用的东西，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都不，它们本身都来自心灵的盲目和无知”（Stobaios，2，9，4）。德谟克利特还通过对感觉和心灵关系的论述，强调了感觉接触以及把 Eidola 解释为自然符号的双重必要性：“可怜的理智，你从我们这里拿到证据，然后就把我们打倒吗？你的胜利同时就是你的失败。”（Galen，*Fragment aus den Schriften über die empirische Ärzteschule*）

德谟克利特所谓真知识和晦暗的知识，并不是后世建立的那种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等级（这种等级的观念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而是无限制的指号过程（Semiose）中的连续统（Kontinuum）。伊壁鸠鲁学派把 Eidola 理论变成了一种指示性符号理论，这种理论使得我们有可能通过严格的条件控制，由显明的东西推出不显明的东西。伊壁鸠鲁并没有试图指出：所与之物（Daten）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多出来的假定所污染；认知者对所与之物的获取（Zugriffen；ἐπιβολαί）构成了表象和判断，也构成了欺骗和错误本质上的基础。

3.1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Ms 44*，MEW 40，第 586 页），因为它最终还是留在了抽象当中：“抽象思维者在他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第 587 页）与此相对的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MEW 3，第 6 页）马克思还提出了实践与理论感性的一种全新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图像在其作为符号方式上（也就是在语言表述形式和不仅限于

视觉的非语言表述形式中）和认识论的意义上被理解为一种“特别的生产方式”（*Ms 44*，MEW 40，第 537 页）。作为用于比较的第三者，这个占有概念使我们可以考察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的差异和联系。

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这个理论进路才体现出成果，即：它区分了对复杂世界的精神占有的各种建构性方式。假定马克思所理解的占有概念（无论又怎样的调整）指的是个人“支配力”（Dispositionskraft）的增强，那么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讽式地使用
232 诸如现实冲突（作为真正“原型”）的“理想化的模仿者”这种说法，显然更加凸显了这个定义中意识形态批判的意味。各种精神的占有方式不仅能扩展我们的知识，而且也有着情感和动机上的意义，实践—精神的占有这个术语显然不仅指的是一系列艺术概念，它还带有宗教（和道德）意味。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感性占有的概念，它是感性需求、感性意识和感性行动三者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占有的图像形式**的概念，这种形式是从感性—实践的基础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比较典型的是，历史上一般把标志符号的产生过程视作一种劳动形式向另一种劳动形式的过渡过程。与此同时，宗教、道德、艺术和科学中的占有的图像形式也会产生差异。

3.2 就如同总的来说，具体历史现实中实践的生活占有不能被视作一切异化过程的纯粹对立面一样，图像占有也未必都体现在异化的形态中。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后来克服了那个最初的倾向，即：通过感性占有的概念把占有和异化的对立（作为金钱占有的纯粹替代物）绝对化。没有与“九霄云外的理论王国”相分离的图像占有形态获得了一种异化了的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幻象（Phantasien）生产”。（*DI*，MEW 3，第 40 页）这也表明了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 Eidolon 的那个原始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了作为“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的“虚幻的用语”，它们是事物颠倒的表现。（MEW 23，第 559 页）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虚幻的用语已经体现出发现“事物的真实状况”的尝试，但这只有通过科学才可能做到。（第 564 页）本质关系首先是在“流行的思维形式”中找到虚幻用语的，而表现形式则在这种思维形式中得以自发地再生产。（同上）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别，那么科学就会是多余的（MEW 25，第 825 页），这种区别作为“虚幻形式”所体现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我展开，这种对立就是如同云雾缭绕

一般潜藏在“虚幻形式”中的（MEW 23，第 86 页）。商品拜物教是 Eidolon（分身、图像），也是幻觉，它是价值抽象的社会基础关系作为物化关系表现出 233
的，但并非其真正所是的东西。这也体现在马克思所用的“神秘的纱幕”（第 94 页）这类表述中。无论如何，马克思并不把 Eidolon 解释为“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是 18 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第 106 页）马克思使 Eidolon 这个概念超越了在实践中形成的被神话的关系，而成为一种“在生产者背后的”（第 59 页）社会过程。因此可以说，马克思把“经济上的神秘化”客体化了，使其成为一种“假象”。（MEW 25，第 838—839 页）

但图像形式的占有会释放出多少批判的潜力，这仍然是一个未定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以下这个看法：“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式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式打交道。”（第 838 页）对马克思而言，除了美学—艺术理论领域之外，本质和现象的区别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占有的图像形式产生作用似乎并不是问题所在。

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思想研究领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种忽视图像占有的认识论价值的倾向。这方面一个值得讨论的典型例子，就是克劳斯·霍尔茨肯普的《感性知识》（*Sinnliche Erkenntnis*）一书。霍尔茨肯普认为，倘若矛盾首先是经由感性才可把握的话，那么矛盾从来都不可能是现实的组成部分。（1973，第 333 页）“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客观矛盾，在直观型思维的诺斯替阶段（gnostischen Stufe）就已经以组织的感性经验的方式被基本消灭了，从而完全不在意识之中；在解决问题型思维的诺斯替阶段，它们往往被视作只有思维中才能解决的、单纯的主观逻辑矛盾，人们武断而片面地指责它们缺乏现实性；而在理解型知识的诺斯替阶段，它们则能够被思考和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现实矛盾。”（第 392—393 页）由此，“理解型知识”就上升为批判实践中具有决定性的“意识环节”。如果一种表象的具体物能够在抽象过程中蒸发为简单和抽象的环节，并最终转变为一种 234
思想的具体物，那么图像的占有是否可以被还原为这种表象的具体物呢？马克思并没有假定感性具体性和精神具体性之间存在任何不可调解的矛盾；与此相应，与数十年来的通行解释不同，马克思说的并不是对世界的艺术、宗教和实践精神上的占有，他谈的只是“艺术、宗教和实践精神上的占有”（*Gr*，MEW

42，第 36 页）。

作为感性乃至精神占有的一种特定方式，图像式结构可以被理解为精神秩序的一种感性具体物；感性具体物不仅与其感性的理解和描述方式相关，而且在首要的意义上也关系到其现象的内在价值（Eigenwert）：精神秩序不仅是在语义学和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在句法和形式语言结构意义上的，在精神秩序中，一切指称的潜力都得以被组织起来。

3.3 在马克思的劳动占有概念中，图像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洛克（Locke）、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的传统中，劳动占有概念是以（由需求导向的）对自然物资也就是原材料的加工为基础的。在《资本论》对劳动过程的阐述中，占有目的被视作对预期加工结果的支配，而其支配的方式——用卢卡奇的话说——就在于仅仅给劳动一种目的论的规定。不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提出的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中，这种对目的概念的片面阐述被相对化了。生产的对象不仅被生产者所规定，而且在本质上也受到消费者观念上的规定。但这种观念上的规定无法还原为目的论的规定，而是“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MEW 42，第 27 页）的。

3.4 在马克思那里，想象物不仅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出现，它还具有某种创造性的潜力。马克思提及想象物的现实权力，主要是在他关于古希腊的阐述中：“德尔斐的阿波罗不是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的一种真正力量吗？”（MEW 40，第 370 页）较为著名的还有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把希腊神话视为“希腊的幻想以及希腊（艺术）”（MEW 42，第 44 页）的表现和土壤。关于神话，马克思提到了其中的两个因素：在其中“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了”，因此，人们通过想象，并且在想象中克服、掌控和塑造着自然力。马克思让神话伴随着对这些力量的现实支配一起消失，同时他也强调：这些不可重复的早期艺术辉煌时代绝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第 44—45 页）。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与古代的差异仍然是决定性的，这已经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HS*）导言中对想象与神话同一性的论述中了：“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KHR*，MEW1，第 383 页）

4. 关于图像的这种创造性潜力，近来的学界中出现了富有新意的论述，其中以卡斯托里亚迪（Cornelius Castoriadis）的彻底想象物（radikalen Imaginären）的理论为代表。马克思认识到一切历史和社会过程和形成过程中都包含想象的部分，但他低估了这些想象物的作用：马克思强调了想象物的功能，但与此同时也忽视了它们的实际效果是超过其功能的。“马克思知道，‘德尔斐的阿波罗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的一种真正力量’。在谈及商品拜物教并指出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功能的意义时，马克思显然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考察方式，他认识到了想象物在其中的作用……。无论如何，马克思赋予想象物的这种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从功能的角度说，它构成了‘经济’链条中的一个‘非经济’的环节……。马克思很可能认识到了人的想象性创造……所拥有的力量，但在他看来，这种力量无非是人在现实中那种无力感的镜像。”（1990，第226—227页）卡斯托里亚迪把商品拜物教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整套由实践产生的神秘化关系解释为某种“自主想象物”的形态（175页），它们强行地要为主体给出现实性和欲望的定义。由此，卡斯托里亚迪清晰地区分了两种想象物：次要、派生性的想象物和彻底的想象物，后者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创造过程。这个区分并没有消除想象物的多义性：创造过程与异化过程共同拥有一种基本能力，也就是“表象不存在的东西的能力，这些东西既不位于感知中，也不呈现在已然建构好的理形思维的符号串中”（第229页）。

卡斯托里亚迪认为，这种彻底的想象物源于心灵的一种本能表征，它一方面体现在表象过程的接受性和自发性中，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能指引想象过程的情感中。卡斯托里亚迪“从幻觉对于心灵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幻象（Phantasiebildung〈*phantasmatisation*［幻觉过程］〉）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出发”，解释了“想象在弗洛伊德那里的本质作用——尽管后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仅仅用了‘想象’这个词”。（第468—469页）与此同时，彻底想象物也构成了匮乏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s Mangels）的对立面。在谈到拉康（Lacan）的想象物概念以及其他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路径时，卡斯托里亚迪认为：“在所有这些情形下，想象物所承担的任务都在于，对主体必然的展开、分裂和匮乏分别进行填充、堵塞和覆盖。”（第479页）根据卡斯托里亚迪的基本论点，“无论匮乏是不是当前‘实在’的”，它都无法作为任何东西的理由，而他的彻底想象物概念则可以为一种过剩人类学（Anthropologie des Überschusses）奠定基础。

236

我们只能通过和马克思论述的对照来说明这种过剩人类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简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MEW 13，第 8—9 页）卡斯托里亚迪则把这句话颠倒了过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解决现实的问题，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1990，第 230 页）。作为"一种基本的、无法被进一步还原的能力"，想象物能够唤起那些不在感知中呈现的图像，它"是对形态/形式/图像等的持续且本质上不确定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对'任何东西'有所言说的基础"。（第 12 页）在卡斯托里亚迪看来，彻底想象物意味着图像潜力的过剩，这种潜力在永恒的形态建构、形态变化和形态解体的过程中得以释放，它是一种可收回的、始终更新着的图像宝库，在其中，我们为集体提供着保证。不过，"当它创造出的图式和形态始终停留在表象之流的无规定性中时，当它自身没有在抽象—物质的'载体'——符号——中'固定'和'稳定'下来时"（第 555 页），彻底想象物也有可能完全不成为思维。想象物与符号物是交织在一起的——卡斯托里亚迪认为这是一种法律化和体制化了的符号过程，因为否则的话，社会自身就无法"聚集"、建构、稳定和结构化；想象物还与经济的功能密切相关，因为否则的话，社会就无法幸存下来。想象物与经济行动在这样或那样的感官中相结合的可能性也是同样敞开的。正是在无符号的自发性与依赖符号的中介性之间的边界处，想象物凝结成了一种"想象的意义"，这种意义已然是附着在符号之上的。在卡斯托里亚迪看来，想象意义是一种意义范式（Sinnparadigmen），它最初并不具备实在的参考点。它必须寻求参照（指称）点（Referenzpunkte），但它又不能够消解在参照点中。指称意义必须反过来被想象意义所占有，否则的话它就会失去一切驱动力。

然而，想象物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的加工从而达成从想象到具体形式的飞跃呢？如果我们不假定形象（figuralen）环节和运思（operationalen）环节之间存在功能互动的话，那么这种以理形（Eidos）的构造为顶点的飞跃就只能说是一种奇迹了。皮亚杰（Piaget）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指出了视觉和触觉—动觉的图像创造在前运思期（präoperational）的源头，他的研究表明：在某个特定的阶段中，图像与运思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主要伴随着语言思维而发展起来。与此相应的是，皮亚杰区分了前运

思图像和有运思参与的预见（antizipatorische）图像。“早在理智发展的最不起眼的起始阶段，运思功能在知识的形象维度之结构化的方面就已经起作用了……因此，我们各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预见图像只有在运思的辅助下才具有建构作用，另一方面，对被试者知道甚至是熟悉的运动和变化而言，预见性图像对这些运动和变化的表征性再造则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表明：某种逻辑和数学性的运思框架不仅对于给定感知的概念性解释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通过图像唤起这些感知也是必要的。”（Piaget/Inhelder 1979，第 509 页）因此，
238 如果彻底想象物无法内在地具有形象和运思的功能互动，那么它就无法确立新的结构。而运思在此是否涉及逻辑—数学的行动，则是很有疑问的。更确切地说，这里涉及的是在可表象物的中介里的一种自由的构造可能性，这种构造可能性能够自发地表演下去，而其表演的布置则是不断变化的。

5. 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现代化和符号学改造，他们对图像的构造潜力给予了关注，格奥尔格·克劳斯就是该领域的代表人物。克劳斯用尚可商榷的方式区分了标志型摹本和语义型摹本，但这种区分同样也是相对化的，因为他把“构造性的图像”视作一种同时能够包含“本质上的虚构环节”的标志符号。（1965，第 68 页）克劳斯还指出了该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即：“它最终表明，把认知过程分解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的观点是错误的。”（第 79 页）克劳斯打破了教条的壁垒，在哲学中引入了启发式的虚构：“哲学式的启发模型是一种虚构，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构造性的图像共同作用。它为寻找、尝试以及实验性的建构提供了指引。在它的帮助下，思维的可能性获得了更全面的尝试。”（第 293 页）克劳斯不仅关注标志符号在建构上的可能性，而且也讨论了它的情感和动机的维度。克劳斯提到了和弗洛伊德的关联，但没能引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论述，后者恰恰在对电影媒介的图像对于扩展知识的功能的阐述中提到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参与到对来自“自身存在最深处的无意识的视角”、“真实地活过的生活”的梦的内容进行的造型和对象的视觉显现之中（GS VII. 2，第 792 页），参与到宣泄的“无意识的爆炸”（GS VII. 1，第 377 页）以及“视觉的无意识”的驱离之中（GS II. 1，第 371 页；II. 3，第 1136 页）。“带着对于现实生活的开放性，以及对于那几乎无法用言语传达的东西的开放性，这种图像能够克服可言说的边界，并穿越交流的神经学‘围栏’（II. 3，第 1285 页）。”（Wagner

1992，第 95 页）

克劳斯全面地把标志符号引入了符号的游戏中，只有脱离模仿功能，这种游戏才能最好地进行下去。因为只有如此，它
239 的“符号体系才能获得最大的可能性并拥有任意的表征性的潜力”（1965，第 60 页）。受皮亚杰的影响，弗里哈特·克里克斯（Friedhart Klix）于 20 世纪 70 年代回到了形象和运思的合作关系问题，并将与“表象世界中的转换”的创造潜力放在一起理解，这是因为“即便在现实性无法通达的地方，记忆中的转换也是可逆的”。“认证规则应用条件的削弱以及其到形象—转换的运思的转移，开启了一种可能性，即：无需经验（或尚未经验）而与认知结构的现实性建立参照关系。语义配置上的这种可能性，为幻想或思辨在生成性思维过程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1976，第 41 页）

长期以来，我们至此才第一次洞察到了经验（亦即感性所与）对于理论的依赖性，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迈出下一步：这就是重新发现一切理论对于生成性图像思维的依赖性。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GS 6; ders., *Ästhetische Theorie* (1970), GS 7; ders., *Philosophische Terminologie*, hgg. v. R. zur Lippe, Bd.1, Frankfurt/M 1973; ders. u. M.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4), GS 3; E.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Teil 2: *Das mythische Denken* (1925). Darmstadt 1987; C. Castoriadis, *Gesellschaft als imaginäre Institution*, Frankfurt/M 1990; V. Flusser, *Ins Universum der technischen Bilder*, Göttingen 1989;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Frankfurt/M 1973; G. Klaus, *Speziell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65; F. Klix, »Über Grundstrukturen und Funktionsprinzipien kognitiver Prozesse«, in: ders. (Hg.), *Psychologische Beiträge zur Analyse kognitiver Prozesse*. Berlin/DDR 1976; S. Krämer, *Symbolische Maschinen*, Darmstadt 1988; W. J. T. Mitchell, »Was ist ein Bild?«, in: V. Bohn (Hg.), *Bildlichkeit*, Frankfurt/M 1990; J. Piaget u. B. Inhelder, *Die Entwicklung des inneren Bildes beim Kind*, Frankfurt/M 1978; G. Simon, *Der Blick, das Sein und die Erscheinung in der antiken Optik*, München 1992; G. Wagner, *Walter Benjamin: Die Medien der Modeme*, Berlin 1992.

米夏埃尔·弗朗茨（Michael Franz）撰

王师 译

参见：

Abbild, Alltagsverstand, Aneignung, Antizipation, Ästhetik,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ästhetische Theorie, Aufklärung, Ausdruck, Bedeutung, Denken, Denkform, dialektisches Bild, Erfah-

rung,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sform, Ideologiekritik, Imaginäres, Kritische Theorie, Kybernetik, Montage, Mystifikation, objektive Gedankenformen, Oberfläche/Tiefe, Phantasie, Schein, Symbol, Teleologie, Widerspiegelung, Zeichen, Zweck

240 造型艺术（bildende Kunst）

A: al-funūn al-tashkīlīya. – E: fine arts.

F: beaux arts.

R: izobrazitel'nye iskusstva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ые искусства).

S: bellas artes.

1.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艺术的时候，通常所指的是审美创造的各种形式的集合概念。他们偏爱的范例是文学，在文学中会讨论诸如上层建筑的从属、现实的塑造、思想内容和世界观以及概念限定困难等问题（参见 MEW 39，第 206 页）；而造型艺术（绘画、雕塑、版画、工艺美术）则很少成为讨论的主题，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在一种生产方式或者经济社会形式的背景下、在与探讨个体手工技艺的关联中被提及的。因此，他们反对施蒂纳的“虚构”，即“拉斐尔（Raffael）的绘画跟罗马当时的分工无关”，他们认为，这位艺术家“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DI*，MEW 3，第 377—378 页）

由这个含蓄地包括了一种地方风格理论的表述可以读出，造型艺术同样作为典型的范例可以被用于个人能力的确定、用于独特性和天才。如果说这里体现了个性和主体性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归纳的开端，那么，简而言之，由此也提出了一种解释模式，针对唯心主义的天才美学连同其艺术的特殊成就的不可追溯性的设想，这一模式提出了反驳的观点，即“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是“由于分工”。（第 378—379 页）“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在其中，“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第 379 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由分工得以实现的艺术的独特成就的反面被认为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同某些精神生产部

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MEW 26. 1，第 257 页）。年轻的马克思认为，只有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才得以全面发展。（*Ms 44*，MEW 40，第 540 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以能够快乐地把握物质世界为目的的感官的解放是艺术的根本特征；因此，它扮演着“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乌托邦的角色，这个社会给所有的人提供机会“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Engels，MEW 4，第 376 页）

2. 从十月革命之后直到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当人们尝试着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时，先锋派艺术的代表们，尤其是俄国立体未来主义的代表（马勒维奇 [Malevič] 等）就看到了能够将他们的审美原则直接付诸政治文化实践的机会。基于马里奈蒂（Matinetti）的全盘否定历史（作为“通灵体”）及其对机器的热情，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新的艺术和文化必须与生产力的最先进的状态保持完全一致。生产自身应该具有美感，工人们的集体艺术活动应当与工作过程合而为一。由于被泰勒的设想所吸引，A. K. 加斯泰夫（A. K. Gastev）宣布了作为理想的那类参与机器、汽车、枪支和火炮的系列而规范的大规模生产的工人。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现代机械主义的全部创造力”（转引自 Lorenz 1969，第 59 页）。F. I. 卡利宁（F. I. Kalinin）最坚决地拒绝了遵循过去的艺术形式。V. T. 基里罗夫（V. T. Kirillov）在他的诗作《我们》（Wir）中宣布：“以我们早晨的名义，我们烧毁拉斐尔 / 毁掉博物馆，踏碎艺术的花朵。”（第 78 页）

除了生产的艺术——在其中造型艺术的构成要素与音乐的机械节奏和哑剧式的舞蹈运动形成了融合——之外，一种吸引大众注意力的街头艺术连同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的醒目的信息也被视为最重要的任务。海报采用以结构主义方式简化为象形文字的图像语言（参见马雅可夫斯基 [Majakovski] 的《罗斯塔之窗》[Rosta-Fenster]），这种语言要直接传达甚至是文盲也可以理解的行动动力。P. M. 科尔岑塞夫（P. M. Keržencev）将房屋正面的一种“风格一致的”市政规划的新设计看作造型艺术的一个新的活动范围，例如通过对颜色的突出，以使“赋予城市的整体印象一种特定的特征”（第 165 页）。

列宁拒绝了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理论家们（波格丹诺夫 [Bogdanov] 等）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文化并非从天而降，它并不是那些自诩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们的一个发明”，而是“必须作为那些知识的有规律的继续发展，这些知识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公务员社会的桎梏下获得的”。（LW 31，第

276 页）早在 1919 年，他就称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家是“市民知识界的后裔，它一再把农民和工人的重新创造的教育机构视为其私人幻觉的最佳领域，在这其中，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对全新事物的最愚蠢的歪曲，将古怪的、荒唐的废物作为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艺术和无产阶级的文化呈现出来”（LW 29，第 324 页）。

3. 本雅明的艺术理论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特列季亚科夫 [Tretjakow]、阿尔瓦托夫 [Arvatov]、布里克 [Brik]）的影响，却并没有毫无保留地分享未来主义对于技术的热忱。本雅明也要求视觉艺术的一种新的类型和“行动的”艺术家。他拒绝了市民美学以仪式为基础的那些范畴，比如“创造性和天赋、永恒价值和秘密”。（GS 1，第 435 页）他的核心概念是技术（即制造手段），这一概念克服了形式—内容的美感。在《艺术作品》（*Kunstwrek*）这篇文章中，他断言了大众的一种新的接受形式，它必须成为进步艺术的标准：“消遣”的艺术。它与“知觉工具的深刻变化”（第 464 页）同时出现，不必再与以“无法接近的”光环为基础的“沉思”、孤独的冥想的接受形式协调一致。大众的这种新的感知方式通过新的媒介诸如摄影、电影、报刊产生。绘画“与现实”保持着“一种自然的距离”，电影“深入到了现实的组织当中”，不再把现实表现为“一幅完整的”画面，而是“支离破碎的”画面。（第 459 页）绘画无法像电影和那以后的建筑艺术一样构成“一种同时的集体接受的对象”（第 460 页）。在对建筑艺术的接受中，使用的视角始终都盖过了感知的视角，对建筑的视觉把握深受其实际可感的使用的观念的影响。（第 465—466 页）

4. 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家 —— 比如普列汉诺夫、梅林或者卢卡奇，他们都主要以文学为例阐述其命题 —— 不同，布洛赫在其《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中则给造型艺术留下了大量的空间 —— 主要是因为其与梦境和白日梦相关的形象性。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的话“绘画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在第 40 章中被引用为格言。布洛赫认为，造型艺术不能仅仅由其塑造功能决定，对于他来说，它也表达出了被和谐地转换的情感，这些情感乌托邦式地超越了现实。在其中，颜色扮演了一个重要的情感角色（“五颜六色本身看上去就令人愉悦”，II，第 378 页），它在绘画的行为中赋予了事物一个新的质量。令布洛赫感兴趣的尤其是描绘出来的愿景（比如华多 [Watteau] 的《向发西苔岛》[*Einschiffung nach der Insel der Cythera*]）；即使是在荷兰的风俗画（维

米尔 [Vermeer]、梅特苏 [Metsu]、德·霍赫 [de Hooch]）中，他也认识到了一种超越其无障碍的静态的幻想的渴望。愿景表现了一种“真实的图像中的特点”，社会主义的艺术也必须反映这种特点。（II，第 418 页） -种“内容上物质的艺术连同其理论”甚至不得不成为“一种并非被包装的、 --种包含愿望的艺术”，“一种在发挥到极致的最锐的方法中出现的、对其对象的趋势和隐藏的描绘”。（II，第 387 页；参见 I，第 229 页及以下）

布洛赫与造型艺术的关系是哲学外行的关系；这表现在他对比较古老的艺术史流行文学惯用语句的接受上，这种文学早在写下《希望的原理》时在学术上就已经部分地过时了。即使是阿多诺，在其强调艺术作品的单元特色及其在社会对抗中的吸收和抗拒元素的《美学理论》中——其中它研究了各种艺术流派（关于立体主义，参见第 447 页）或者造型艺术——也几乎没有依据研究文献。阿多诺部分地采用了阿诺德·豪泽（Arnold Hauser）的解读，后者从 1915 年建立的，以卢卡奇、曼海姆（Mannheim）、贝拉奇（Balázs）、安塔尔（Antal）等为首的“布达佩斯周日团体”中脱颖而出，始终受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封·马丁 [von Martin]）和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的特定立场的影响（比歇尔 [Bücher]、桑巴特 [Sombart]、马克斯·韦伯）。他的作品的其他灵感来自狄尔泰（Dilthey）的“理解的心理学”，狄尔泰在艺术的客观描述中看到了在日常经历的过程中积累的个别经验的一种普遍化，另外还有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他希望从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心理学的立场出发彻底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西美尔在各种文化、社会 244
和经济的范围内发现的同源性的原理以及曼海姆“思想的存在联系”的理论贯穿了无论是豪泽还是弗里德里克·安塔尔（Frederick Antal）对艺术风格的分析，这些风格被理解为阶级特有的意识形式。

在英国，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市民唯心主义的反转，两位被法西斯分子驱逐流亡的匈牙利作者——除了弗朗西斯·克林根德（Francis Klingender）之外——向在数量上虽然很少，但在 20 世纪 40 年代相对富有影响的英国艺术学的左翼传播了他们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次转换。类似的开端也可以在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和艺术批评家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那里找到。盎格鲁马克思主义对于造型艺术的一份特殊的贡献是史前史学者 V. G. 齐尔德（V. G. Childe）所作的关于艺术创造起源的研究，卢卡奇和恩斯特·菲舍尔在其后期的美学著

作中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在美国，迈耶尔·沙皮洛（Meyer Schapiro）尝试着展示“抽象的风格如何由出自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和思维方式所决定”（1937，第310页）。——对于先锋派来说，一个含蓄地积极的立场，恰恰被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更加批评性地评价。（参见 Caudwell，第262页；Raphael，第8页及以下；表现主义论争）

彼得·魏斯在他的《抵抗的美学》中，描绘了一种相较于艺术史的“客观主义”，强调实际掌握造型艺术的主观因素的解读——作为对压迫者在神话中隐讳的反抗的破译和赋予现实斗争一种视角的历史的回忆工作。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Ästhetische Theorie*, GS 7; F. Antal, *Die Florentinische Malerei und ihr sozialer Hintergrund* (1948), Berlin 1958; ders., »Remarks on the Method of Art History«, in: ders., *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 London 1966; L. Baxandall, *Marxism and Aesthetics*, New York 1968; W.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in: GS 1, 431-469 (Erste Fassung);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3), 3 Bde., Berlin/ DDR 1959ff; A. Blunt, *Artistic Theory in Italy 1450-1600* (1940), London 1962; B. Brecht, *Über die blidenden Künste*, hgg. v. J. Hermand, Frankfurt/M 1983; C. Caudwell, *Bürgerliche Illusion und Wirklichkeit. Beiträge zur materialistischen Ästhetik*, München 1971 (*Illusion and Reality*, London 1937); V. G. Childe, *Der Mensch schafft sich selbst* (1936), Dresden 1959; D. D. Egbert, *Social Radicalism and the Arts*, New York 1970; E. Fischer, *Von der Notwendigkeit der Kunst*, Hamburg 1967; A. Hau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Kunst und Literatur*, München 1953; ders., *Soziologie der Kunst*, München 1974; ders., *Im Gespräch mit Georg Lukács*, München 1978; F. D. Klingender, *Ar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47; ders., *Marxism and Modern Art*, London 1942; K. Lorenz (Hg.),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Sowjetrußland (1917-1921). Dokumente des 'Proletkult'*, München 1969; G. Lukács, *Ästhetik*, Neuwied 1963, W 11 u. 12; H. Paetzold, *Neomarxistische Ästhetik*, Teil I: *Bloch, Benjamin*, Teil II: *Adorno. Marcuse*, Düsseldorf 1974; G. W. Plechanow, *Kunst und gesellschaftliches Leben*, Berlin o. J.; M. Raphael, *Arbeiter, Kunst und Künstler. Beiträge zu einer marxistischen Kunstwissenschaft*, mit e. Nachw. v. N. Schneider, Frankfurt/M 1975; H. Read, *Art and Society*, London 1947; M. Schapiro, »The Nature of Abstract Art«, in: *Marxist Quarterly*, I, 1937, 77ff, 310ff; ders., *Modern Art*, London 1978; N. Schneider, »Kunst und Gesellschaft: Der sozialgeschichtliche Ansatz«, in: *Kuns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hgg. v. H. Belting u.a., Berlin/W

1986 (mit Bibliographie);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3 Bde., Frankfurt/M 1976, 1978, 1981; O. K. Werckmeister, *Ende der 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诺伯特·施奈德（Norbert Schneider）撰
马剑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bbild, Arbeitsteilung, Architektur, Ästhetik,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ästhetische Theorie, Autonomie der Kunst, Basis-Ästhetik, Bild, Erbe, Erinnerung, Expressionismusdebatte, Futurismus, Gestalt, häßlich, Illusion, Interpretation, Kitsch, Kunstverhältnisse, Kulturindustrie, Modernismus, politische Ästhetik, Popularkunst, Produktästhetik, Proletkult, Realismus, Surrealismus, Schönheit,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Warenästhetik, Widerspiegelung, Widerstandsästhetik

教养（Bildung）

A: tarbīya, takwīn.

E: education, formation.

F: culture, éducation, formation.

R: obrazovanie, sozdanie (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оздание). – S: formación.

教养有着教育（Erziehung）和发展（Entwicklung）的双重含义，是一个特别德意志的概念。它具有与意大利语 cultura 和俄语 prosvestschenie 类似的含义，但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却找不到对应的词汇，尽管在英语中偶尔会谈及 enlightment 或者 edifying。（Inglis 1985）它与人格的塑造、培养、文明化有关。它提供了一种教育学（Pädagogik）的哲学，在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过程中，将个体与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1. 这个难题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展开的、对不断扩大的劳动分工的结果的研究。政治经济学家比如弗格森（Ferguson）和亚当·斯密（被马克思称为“宿命论者”）的观点是，技术、社会以及思想的进步都建立在专门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它就必然会使人的发展的可能片面化，将社会分化成若干阶级，并通过弱化社会责任趋向于削弱社会秩序。这些“宿命论者”接受个体的贫穷，从而转向研究阶级和社会秩序的问题。德国观念论关注为了生活方式和人格所付出的专门化的个体代价。（Pascal 1962）法国大革命之后，自由主义的德国资产阶级努力通过创造一个道德社会来避免革命与反革命，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克服

劳动分工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人、人格和心理的发展与公民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而公民会反作用于社会和政治的秩序，以图改良公民自我塑造的先决条件。教养以这种方式把教育学与政治联系了起来。

教养的自由主义实践建基于哲学修辞学的古典传统、经过教育的“塑造”过程（获取知识和态度）和呈现过程（表达知识）。这个教育的塑造过程包括：（1）通过创造材料、理念和词语之间的一种关系限定可知的事物；（2）通过一种阐释学的研究学习掌握不同思想传统的表达方式；（3）发现和公开地表达理解，传统上通过向一个对手在公开的对话中陈述论据。（Smith 1988）个体积极地投入一个客观化的、“超越个人”的领域，这一个体教育的过程提供了教养的一个辩证的含义，黑格尔把这个含义与教养的第二个含义，即被规定的能力的目的论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在这里，个体的和社会的教养是理念自我产生过程中实现人的理性的本质的工具。

第三个含义出现在19世纪。作为民族教育的意识形态，教养将德意志国家及其官僚机构制度化为民族文化的代表，从“官员”（Mandarinen）中提携出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的中间阶层。（Ringer 1983）强调学习者和客观化了的文本之间的积极关系的教育过程现在被视作文本的一种更加被动的、重复的记忆，而这些文本则是由一个“价值饱和的人格”创造的。（Ringer 1989）教养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职业的、强加给学习者的培训；它成为一种每个阶层按照民族的设想构建的外在的权力。（Sorkin 1983）

在18和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思维中可以看到教养的三个含义：（1）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积极地领会和掌握一种被客观化了的领域；（2）发展被规定的能力的内在过程；（3）用一种外力完成一种特定的塑造。

2.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这三个含义中的第一个，但却在其他情况下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决裂。对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来说，人的异化和意识到这种异化是正题和反题，它们可以通过作为哲学合题的“教育”（bildend）运动得到扬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它们是一个可以通过实践的辩证法来解决的矛盾。教养的自我塑造的实践是一个环节，是在改变社会的全面实践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的实践”。

实践的辩证法首先建立在一个新的、既非唯物主义也非唯心主义的问题的基础之上。它以“人的感性活动”（*ThF*，MEW 3，第5页），而不是意识和抽象的理念作为出发点；它的前提条件是“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

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DI*，MEW 3，第 20 页）。第二，实践的辩证法建立在主体的分散、摆脱主客体二元论的基础上，主体的再次集中则以人改变现实的活动为根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Gr*，MEW 42，第 402 页）实践是超越历史的动力，它创造了历史和人类，但是，它只有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这些条件是由之前的几代人的改变的活动确定的，实践也再次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由此出发，认为在历史上“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DI*，MEW 3，第 38 页）。

从这个视角出发，“分工”这一自由主义的抽象可以得到重新解读——它关乎资本主义的分工的特殊历史条件。一种饱受商品生产和利润率制约的实践会导致社会的人转换为片面发展的“个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Gr*，MEW 42，第 404 页）由此，人的完全发展的目标缩减到了获得欲、“拥有”的感觉（“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Ms 44*，MEW 44，第 540 页），这种感觉又反过来服务于商品生产和盈利。马克思对通过教养（作为教育学和政治的联系）自由地追求社会和谐和个体的自我实现提出了反驳，即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和异常只能通过一种实践来消除，这种实践将阶级社会转化成一种新型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ThF*，MEW 3，第 7 页）。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是所有人的能力的一种完全解放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的著作始终坚持人的所有能力的完全发展这一理想。区别早期著作（1845 年以前）和后期著作的“认识论断裂”（Althusser，*FM*，第 34—35 页）可以标志着一种人本学人道主义的终结，

但是，主体的离散并没有导致一种完全的反人道主义。马克思虽然在《资本论》里谈到了作为经济学范畴化身的、作为阶级关系和利益载体的个体，但这些却更多地具有一种方法论限定的意义。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他肯定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全发展的人性的可能性。“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MEW 42，第395—396 页）对于资产阶级的教养来说至关重要的教育过程得到了保留，但它却获得了积极的改变，被证明是一种解体和更新的建构的运动，建立在“人的感性活动”基础上。

然而，实践和个体改变之间的这种联系却使认定一种专门的教育实践变得困难，因为个人的发展既不能与社会的发展，也不能与历史分开。关键的问题是，教育实践是否始终只是普遍实践的一个方面，以至于个体和社会的改变只能自发地通过历史进程来完成，或者是否能够存在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它改变社会的存在和那些历史进程，就是说，能够自己推动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新的、非剥削的社会组织。假如能够存在这样的实践——那么，又怎么教育“教育者本人”（*ThF*，MEW 3，第 5—6 页）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革命实践解体，更新的动力才能够改变社会存在和意识以及社会组织。这种有教育意义的运动消除了适应个体教育的自由教养的抽象化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概念，后者将人的发展解释为转变的条件和抚育的结果，但无法将正在转变的环境或者对教育者的教育解释为人的劳动的产物。然而，相信劳动有改变社会作用的信念，由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侮辱而遭到质疑。如果没有一种教育计划去力争“清理学过的”（entlernen）或“荒废学过的”（verlernen）压迫，陷入困境的劳动又如

249

250

何能够具有政治意识，并将参与者革命化呢？（Sherover-Marcuse 1986）

马克思关于政治教育的表述没有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他强调“劳动学校”和自由劳动替代必要劳动对于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意义。这些主题在他关于学校教育的零散的评论中会找到回应，在这些评论中，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劳动比游戏更重要，并且将生产劳动的价值与学校的价值相提并论。综合技术的教育被描绘为一种理想，它可以消除诸如脑力—手工、理论—实践、劳动—游戏等两重性构建的学校教育的局限，并通过加剧矛盾加快社会的改变。（Small 1982，1984）然而，马克思在这些关于政治教育的构想中寄希望于来自外界的教育者，希望他们使教育过程成为可能或者积极地参与其中。（Adamson 1978）

3. 一种特殊的教育实践的问题在第二国际那里变成了社会主义战略争论中的一个视角。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是，无产阶级意识会通过实践自发地建立起来，比如在一次由一个产生自工人运动的、组织松散的政党领导的总罢工当中。与此相反，列宁则拒绝了自发性，倾向于来自外界的教育力量。随着欧洲革命的爆发、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出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确定性丧失了。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使何为可以促进社会改变的教育实践这一问题多次消退，并取而代之地引发了具有更普遍的教育性质的问题。

一种特定的传统将教育活动作为一种机理来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机理，资本主义尽管遭遇周期性危机和革命的挑战，仍得以自我再生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意识形态、美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内部和其下的个体主观性的建构。（Held 1990） 251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兴趣更多地远离了唯物主义教养的问题并转向了学校的课程，研究正式教育的大型机构如何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Althausser, *ISA*，1977；Bernstein 1975；Bowles/Gintis 1976；Bourdieu/Passeron 1970）

在这条研究主线上，可以发现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指向区别现实和象征的二元论的研究。比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就假定了两个不同的分别具有各自逻辑的活动范围——由工具理性主导的劳动和包括交流的行动在内的推理的实践。第二，在教育社会学中，有一个趋势特别明显，就是将教育视为加诸个人的遭遇，使个人屈从于压制性的社会秩序。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学校的贫困化命题首先遭到了非议：个体并非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反抗主体。（Willis 1979）就是

说，再生产理论让位于反抗理论，后者重新强调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并且导致这一讨论在庸俗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毫无成果地摇摆不定。福柯（Foucault 1976）、一部分后结构主义者和哈贝马斯都指出了摆脱这种概念对立性的出路，然而他们的出路大多要牺牲作为复杂整体的社会构成的概念，牺牲作为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变革计划。

安东尼奥·葛兰西对罗莎·卢森堡关于改革和革命的对立性的观点提出质疑，他的著作着眼于改变社会，提出了论证得更精彩的教育实践。社会改变要求一种阵地战连同一种反抗霸权的实践，这种实践会解体和更新现有的社会组织，因为它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civiltà*）建立起来。教育的反霸权实践的目标是，在这种文化工作中组织和指导解体和更新的动力，通过将批判的观点推进到更具关联性的世界观或者哲学思想中，从而支持人的脑力和实践的工作，将现有的社会秩序作为可反驳的霸权机器揭示出来。

此外，这样改变的实践还可能催生一种有机的教育的引导，因为正是文明作为教育者教育我们所有人，它表明了一种被商品生产和利润欲统治的社会秩序是如何生产出不公、剥削和屈从的，又是如何限制和扭曲社会组织和社会存在的发展的。文明产生和维护了 cultura（教养），即解体和更新这样脑力上和实践上的改变工作，它打破了社会组织的旧的结构并以新的方式重构。“凭借教养的概念，人们提出了教育过程的反题：它首先总是不经中介的。教育是被施加的……，与此相反，教养却将自身理解为摆脱了约束的自我行为，理解为已经完成了的解放。具有教养的人将自身理解为自己的创造者，他们知道那些划破皮肉的枷锁是由人设置的，知道存在扯碎枷锁的希望。”（Heydorn 1979，第 10 页）

参考文献：

W. Adamson, »Beyond ‘Reform or Revolution’: Notes on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ramsci, Habermas and Arendt«, in: *Theory and Society*, 6. Jg., 1978, H. 3, 429-460; B. Bernstein,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Bd. 3: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al Transmissions*, London 1975; P. Bourdieu, J. C. Passeron, *La réprodu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e l'enseignement*, Paris 1970; S. Bowles, H. Gintis, *Pädagogik und die Widersprüche der Ökonomie. Das Beispiel USA*, Frankfurt/M 1978; M. 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Frankfurt/M 1976; D. Held,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Berkeley ²1990; H. J. Heydorn, *Über den Widerspruch von Bildung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79; F. Inglis, *The*

Management of Ignorance.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Curriculum, Oxford 1985; F. Lilge,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in Hegel«,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2. Jg., 1974, 147-165; R. Pascal, »'Bildung'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German Studies*, London 1962, 14-28; F. K. Ringer, *Die Gelehrten*, Stuttgart 1983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Mass. 1969); ders., »Bildung: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 Context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0. Jg., 1989, H. 2, 193-202; J. Schmidt,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and Lukács' Concept of Proletarian Bildung«, in: *Telos*, 24. Jg., 1975, 1-40; E. Sherover-Marcuse, *Emancipation and Consciousness: Dogmatic and Dialect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Early Marx*, Oxford 1986; R. Small, »Work, Play and School in Marx's Views on Education«, i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ought*, 16. Jg., 1982, H. 3, 161-173; ders., »The Concept of Polytechnical Education«, i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32. Jg., 1984, H. 1, 27-44; J. H. Smith, *The Spirit and its Letter: Traces of Rhetoric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Bildung*, Ithaca 1988; I. Soll, »Hegel as a Philosopher of Education«, in: *Educational Theory*, 22. Jg., 1972, H. 4, 26-33; I. Sorkin, »Wilhelm von Humbold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 Formation (Bildung) 1791-1810«,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 Jg., 1983, H. 1, 55-74;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特里·塞东（Terri Seddon）撰
乌尔里希·布卢门巴赫（Ulrich Blumenbach）、托马斯·劳格施廷（Thomas Laugstien）译为德文
马剑 译，张义修 校，陈洪捷 审

参见：

Arbeiterkultur,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serziehung, Arbeitsteilung, Bewußtheit, Emanzipation, epistemologischer Einschnitt, Erziehung, Hegemonie, Hegemonieapparate, Hermeneutik, Humanismus, Intellektuelle, Kultur, Kulturarbeit, Kulturindustrie, Lernen, Massenkultur,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Selbstverwirklichung, Selbstzweck, Spontaneität, Zivilisation

生物主义（Biologismus）

A: al-ittidjāh al-bīyūlūdjī. – E: biologism. F: biologisme.

R: biologizm (биологизм). – S: biologismo.

生物主义指试图以生物范畴来思考社会行为或者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1）以生物原因解释社会现象（如以“强势”男性先天的攻击性解释战

争、犯罪和男性统治地位，或者以遗传智力缺陷解释成绩不佳）；（2）比较社会现象和生物现象（比如比较个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角色和细胞作为有机体一分子的意义）。

第一种形式的特点是，把人的外部显性特征与生物决定因子联系起来。此类特征常关联种族观念，如“颅相学”的结果；也常优先考虑两性差别（体型、脑重）。若为辨明社会现象而利用其与生物现象的表面相似性，则有第二种形式。多数生物主义履行的职能是把社会发展过程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为即使并非不可能，也难以改变自然的状况，所以可用生物主义来应对政治改革的关切，提出异议说改变是违反自然的因而徒劳。

生物主义思维在其历史上，尤其是作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后果，特征迥异。17、18 世纪和其他时间里，以“白人”和“黑人”不同种来为奴隶制辩护，以此方式应付宗教和道德上人对人的所有权的怀疑。19 世纪早期，测颅证明，非洲人的头颅相较于欧洲人的头颅原始而似猿猴。拒绝女子就读更高级别的教育机构，不给她们选举权，其论据与此类似——认为她们的头颅不成熟，似孩童。19 世纪末，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论成为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合法化的工具。20 世纪初，优生学就使重见天日的孟德尔遗传法则成为一种主张的基础，即某些种族、民族或者社会群体属劣等，所以，应阻止其繁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学术上现代化了的生物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Neo-Malthusianismus）比较人口和实验室中受试有机体（果蝇、细菌、粉螨）的发展曲线，以此为基础提出命题，即第三世界的饥饿和贫困是出生率高的结果。黑人和白人平均智商有别，源于遗传引起的智力差别，该主张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关于弱智可遗传的新版遗传论出现。自 1975 年起，新创的“社会生物学”代表人物试图证明，许多人类行为方式（如利己、利他、攻击、女子育儿、同性恋）受遗传支配，经自然选择作为适应策略而得到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心理问题（如精神分裂症）和犯罪的遗传基础论获得新生。

在分析达尔文及其与马尔萨斯主义的关系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生物主义问题。马克思很早就看出达尔文的物种选择说和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的实践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

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
255 会。”（1862 年 6 月 18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MEW 30，第 249 页）恩格斯于是强调，谬论在于把社会隐喻套用到自然上，倒过来把社会性看成源于自然性：“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DN*，MEW 20，第 565 页；参见 MEW 34，第 170—171 页）

恩格斯并非一心否认达尔文理论的学术价值，而是必须把“**生存斗争**”这一词语“……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发生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某些发展阶段上”，“把这种斗争同下述情况严格分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灭绝，新的更发达的种会取而代之”。（第 563—564 页）他有意甚至“**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也就是不基于过度繁殖定律来思考物种起源问题，而重拾海克尔（Haeckel）的概念“适应和遗传”。（第 564 页；参见 *AD*，MEW 20，第 64—65 页）这就解释了，为何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达尔文为进化论所立功勋，同时批判他的生物主义以及未明言的、内在的向马尔萨斯（Malthus）的靠拢。

19 世纪众多生物主义中，没有一种像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中提出的人口规律那样激怒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些规律，（1）人口增长趋势超越生活资料增长，亦即以几何级数增长（数列 2、4、8 等）的趋势，而食物供给仅以算术级数（2、3、4 等）增加；（2）饥馑、瘟疫和战争是对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但同时给具有理性、节欲的人提供较为人道的手段来防止人口过度繁殖。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这些规律的核心只是把稀缺这一国民经济定理升至自然事实级别，把资本主义引起匮乏和贫困解释
256 成是自然规律，进而是不可改变的规律。（参见 *Lage*，Mew 2，第 311—312 页；*K I*，MEW 23，第 657—670 页）但还应注意，马尔萨斯不曾说明，哪些数据来源使其推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和食物供给以算术级数增长。

应与生物主义相区别的是马克思对

社会联系作（自然）科学上的精密研究这种理想，比如，他把商品的价值形式与19世纪生物学颠覆性发现联系起来，称其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的细胞形式”（*KJ*，MEW 23，第12页），也一再言及该社会的“解剖学”。启发式地把生物学中形成的概念用于研究社会进程，有别于把社会进程归因于特定的自然过程。人自身是自然的一分子或曰源于自然。作为生物，他们与一切有机体一样服从同样的普遍规律。科学分析基于人的这种物质现实，但这种现实包含人有学习并改变其行为与环境这些强大的能力。与此相对，生物主义的解释表现为基于不确的关联和联想所作的臆想。若犯罪有遗传原因这种解释基于对单卵双胞胎所作的比较研究，则此处显出统计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比较并不能说明因果。

乌特·霍尔茨坎普—奥斯特坎普（Ute Holzkamp-Osterkamp）以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的行为研究为例指明，如何把选择这一进化论概念“超越社会状况的类比生物学的说话方式”从自然史时期的思维套用到文化“时尚”时期（1975，第344—345页），而把动物行为套用到人类行为如何缺失了历史沿革和两者的特征。例如洛伦茨（1973）从现存的动物形态的认知功能“突现”（Fulguration）（“某事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直接推导出“抽象思维”，虽然这些动物形态与人自身一样是演化过程的结果。“整体看来，在这方面不把人际关系理解成吃苦耐劳、有认知能力者在其中通过对象化劳动再现其社会生活的那些历史状况，而是显现为‘习俗’的古怪杂烩。”（Holzkamp-Osterkamp 1975，第342页） 257

参考文献：

U. Holzkamp-Osterkamp, *Grundlagen der psychologischen Motivationsforschung* 1, Frankfurt/M 1975; R. Levins, R. Lewontin, *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 Cambridge/Mass. 1985; K. Lorenz, *Die Rückseite des Spiegels. Versuch einer Naturgeschichte menschlicher Erkenntnis*, München 1973; Th. R. Malthus, *Das Bevölkerungsgesetz*, München 1977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798); W. Petersen, *Malthus*, Cambridge/Mass. 1979; H. Rose, S. Rose, »The Problematic Inheritance: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ural Sciences«, in: dies. (H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ience*, London 1976.

加兰·E. 艾伦（Garland E. Allen）撰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Barbara Ketelhut）、赖因哈德·马克纳（Reinhard Markner）译为德文
朱更生 译，金建 校

参见：

Anatomie, Anthropologie,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Dritte Welt, Entwicklung, Eugenik, Evolutionstheori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setz, Grenzen des Wachstums, Lamarckismus, Lyssenkismus, Malthusianismu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tur, Rasse und Klasse, Rassismus, Reduktionismus, Sexismus, Übervölkerung, Zelle

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

A: marksīya al-sūd. – E: Black Marxism.

F: Marxisme noir.

R: blak-marksizm (блак-марксизм).

S: marxismo negro.

此概念其实表示黑人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对话，而非一种可以毫不费力地融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鲜明思潮。虽然黑人马克思主义注重非裔美国人之根，与泛非主义有所重叠，祖先大陆的历史同样曾是、仍是它反思的对象，但是黑人马克思主义的地理中心位于加勒比、北美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美洲和加勒比黑人最初大规模争取自我组织的努力，此前，他们中的数十万人从仍具农业烙印的美国南方迁入北方的工业密集区。由马库斯·贾维（Marcus Garvey）领导的全球黑人促进协会（*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既不受马克思主义推动，又不持反资本主义态度，但作为非裔洲裔，其拥护者增长的自我意识和动员程度，引起 1919 年建立的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注。所谓“黑人问题”（Negerfrage）从此进入共产国际会议的议程中。不同于贾维转向非洲，共产国际的口号是美洲大陆黑人的自决 258
权，登峰造极于（美利坚民族内部的）“黑人民族”（schwarze Nation）这种论点，提出他们应分离出来独立建国。与“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密不可分的还有殖民问题，是故，与世纪之交兴起的泛非主义类似，红色工会国际在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领导下既争取非洲工人也争取非裔美国工人，对此机关刊物《黑人工人》（*The Negro Worker*）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文献佐证。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20 世纪 30 年代众多黑人加入北美的共产党队伍，产生了黑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文本之一、杜波依斯（W. E. B. DuBois）研究内战期间和其后美国黑人的境况和自我发现的伟大著作《美国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杜波依斯描述了奴隶

和贫困白人大量逃离南方、18 万黑人在联邦军一方参战，称之为总罢工。他认为这种左右战争的功劳没有得到报偿，因为战败的种植园主与白人下层随后结盟，以阻止土改并继续压迫黑人。一旦南方各州的经济得到控制，黑人与北方支柱性经济界势力，与激进共和党人的联盟即分崩离析：这是一种徒具形式的“重建”。而且此后，“随着废除美国奴隶制，资本开始从白人国家输入奴隶制实际上绵延不绝的黑人国家……若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再也筹集不到原料，那就到工商业、手工业专政并且不存在白由农民的热带和半热带去”（1935，第 48 页）。杜波依斯以此证明其基本论点，即奴隶劳动不仅是南方各州种植园经济的基础，而且根本就是美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条件，奴隶制并非历史歧途，而是在结构上锚定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殖民地中的劳动具有强迫性质，军事上征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居民，这些同样受益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杜波依斯也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持保留态度，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对抗是根本性的，它以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主体为出发点。黑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一再坚持，面对各领域的工人阶级，剥削机制运行方式并不相同。如此拒绝把种族主义视为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中的次要矛盾和子范畴，黑人马克思主义在战略上就接近了女权主义理论，后者用要求妇女运动独立、平衡性别因素代替了传统的工人运动中的“妇女问题”。

引人瞩目的是，许多最初的“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是工人运动或者黑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是他们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名人的共同点，同时使他们有别于中欧、西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的理论构思远离政治实践。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联系以及历史解释潜力，也影响了一系列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反殖民斗争发展到某一特定时刻，通常都会结合马克思主义，这常常恰好发生在气氛宽容的殖民帝国大都会中。马克思主义用于在理论上解释这种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归入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在此语境中，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对一代人极具政治化作用，堪比西班牙内战对欧洲左翼的影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其实仍是辅助科学，在个案中是否适用于非洲状况，有待检验。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就曾批评那种“历史随着‘阶级’进而‘阶级斗争’现象的发展才”发端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会意味着，把所有时期和“亚非拉不同人群[猎人、采集者、近乎定居并务农的氏

259

族]在他们身陷帝国主义枷锁时，视为无历史或者生活于历史之外的"。(1969，第95页)

研究历史也是黑人马克思主义另一关键人物詹姆斯（C. L. R. James）多方面成就的一个方面，他的道路并不典
260 型，因为他其实由（托洛茨基主义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反帝国主义，而非反之。詹姆斯关注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角色、革命领袖和群众的辩证法以及黑人奴隶的文化特点，在这几点上他认同杜波依斯。"人创造自己的历史，而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的黑人雅各宾派正在书写的历史将会改变千百万人的命运，使三大洲的经济潮流改道。"(James 1963，第25页）这是图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领导下的海地奴隶起义史《黑人雅各宾派》(*The Black Jacobins*）中的关键句。在按惯例编纂法国大革命历史时，这场起义的篇幅几乎不多于一条脚注，这句话既蕴含这场起义的世界史意义，又暗示奴隶也上升为历史的积极活动者，不再无助地听天由命。

虽然与托洛茨基主义渐行渐远，詹姆斯终生仍坚信，结构一如既往错综复杂的无产阶级具有历史使命，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这使他有别于时人如帕德莫尔、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或者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他们因对把种族问题作为工具感到失望而背离共产主义。但这也把詹姆斯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隔开，它是"黑人民族主义"真正的继承者，虽则詹姆斯在北美校园是受人追捧的演讲者。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导人物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和詹姆斯、贾维、帕德莫尔或者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一样均来自加勒比，突显了该地区重要的知识分子传统。

随后，美国大学开设黑人研究学科（Black Studies），连黑人马克思主义也在部分程度上得到重视，虽有各种口头上的激进主义，它却由此与多数学院马克思主义同命运，与社会运动脱节。詹姆斯最后一位杰出学生、圭亚那人瓦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把革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1980年遇害。

参考文献：

P. Buhle, *C. L. R. James*, London 1988; A. Cabral, »The Weapon of Theory«, in: *Revolution in Guinea*, New York 1969; J.-U. Davids. »C. L. R. James«, in: H. Heuermann u. B. P. Lange (Hg.), *Contemporaries in Cultural Criticism*, Frankfurt/M 1991; W. E. B.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1935), Cleveland 1969; P. J. Hountondji, »Marxism and the Myth of an 'African Ideology'«, in: S. Hänninen/L. Paldan

(Hg.), *Rethinking Marx*, AS 109, Berlin/W 1984; C. L. R.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1938), New York 1963 (*Schwarze Jakobiner*, Köln 1984); G. Padmore, *Pan-Africanism or Communism?*, London 1956; C. J. Robinson, *Black Marxism*, London 1983; W. Rodney, *Afrika. Die Geschichte einer Unterentwicklung* (1972), Berlin/W 1975; E. Williams, *Capitalism and Slavery* (1943), New York 1966.

汉斯·古斯塔夫·克劳斯
（Hans Gustav Klaus）撰
朱更生 译，曹旸 校

参见：

Biologismus, Ethnizität, Frauenbewegung, geschichtslose Völker, Hauptwiderspruch, Imperialismus, innerer Kolonialismus, Internationale, Jakobinismus, Klassen,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ismus, Marxismus, Marxismus-Feminismus, Massen, Migration, nationale Befreiung, Rasse und Klasse, Rassismus, Sklaverei/Sklavenhaltergesellschaft, westlicher Marxismus

集团（Blöcke）

A: kutal. – E: blocks. – F: blocs. – R: bloki (блоки). – S: bloques.

1. 1989年以前人们通常说“西方”和“东方集团”之间存在“集团对峙”。若将这一概念理解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针锋相对，则无法为分析提供什么实质上的新意。但如果把双方集团视为“超级大国”，把它们的共存视为对世界的共同统治，情况就不同了。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者就会面临一个特殊的战略问题：不针对一方敌人，而是针对两敌对垒（*Kampf zweier* Gegner）的政治解放斗争是何种模样？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在这一模式中思索。对资本主义大城市的内部政治斗争其实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问题是：国内政治集团的对立，即右翼和左翼民众及其党派之间的对立，是否必定要在1989年后走向瓦解？因为随着外部政治集团对立的结束，国内政治一个关键性的支柱可能就此消失了。（见下文）

撇开危机时期和危机因素不提，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都多少涉及多党派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分两大阵营，一方执政，另一方是反对派。即使存在“铰链党派”（Scharnierparteien）（如德国的自由民主党[FDP]），它们时而加入这个阵营，时而又加入另一个，即使在“协商民主”（瑞士、荷兰）模式之下，

两大阵营长时间结盟，两大阵营却始终存在。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中，多党派体制得到清晰凸显，在简单多数制选举下，
262 多党派体制可能会在议会选举前期有所体现，例如美国的“初选”，然而议会式程序却每每简化，只保留一项且始终相同的方案，可应对各类议会主题。

那些最常见的非马克思主义解读并不具说服力。双边阵营（Lager-Dualismus）既不是彼得·格洛茨（Peter Glotz，1984）所定义的对于问题尖锐化的一种认知行为结果（否则一有各种政治问题，就会频繁有各种阵营诞生），也不同于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86）所指出的以下状态的反面：长期仅有一个政府，以至于只有一个支持它的议会多数派以及一个与之对立的少数派（“协商民主”甚至不需要一个反对党的存在；此外［此理论也不包含危机时期和危机因素］：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即政府与由三个少数派组成的议会相对立，所以，不能说两派制议会是因为一个政府的存在而产生的）。在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有一种理论可以继续深入，这种理论在系统的两派制中看到了一种匿名的分离机制，根据这一机制，相互竞争的阵营主要关心自身，而不再质疑作为国家行政机构的政府：谁攻击政府只为接任其职责，那么其自身也是认同国家的。（Lipset 1962）

在“双集团体制”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一方阵营主要依靠工人阶级的支持，另一方则更多受到“市民阶级”选民即传统中产阶级成员的拥护，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此处可引入关于“市民和工人”之间阶级斗争的论述。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80年西德联邦议院选举中就是这样使用“阶级选举施密特对阵施特劳斯”（Klassenwahl Schmidt gegen Strauß）的口号。奥托·鲍威尔的“阶级平等”理论早期立足于这样的设想：工人与市民之间的对立及左翼集团与右翼集团之间的对立基本上是异体同形的。类似中国的超级大国理论，也可将这一双集团体制看作资本主义政权再生产的产物。因为可以观察到，两大阵营的精英人士（在德国包括基督教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精英）在所有政治日常问题中都以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为先决条件，并且以此为行动的导向。用遵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话来说，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都属于“增长型党派”，它们关于增长利润的分配虽意见不一，关于利润的实现却是一致的。（Brügger 1993）

2.“双集团体制”概念可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些分析要素中找到支持。这些要素在葛兰西的理论中相互没有什么联系：（1）将党派削减至党派机关的做法不可行；一个政党的历史在最

高层面（letzte Instanz）将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Gef* 5，H.9，§64，第 1121 页）。（2）资产阶级不建立自己的政党，而是通过利用现有党派相互竞争，从而获得实际统治权。（*Gef* 7，H.15，§2；*Q*，第 1750 页；*Ri*，第 307 页）它在农村和“工业集团”中进行选择。（*Stimmrecht*，第 16 页及以下）这一“建立阶级集团”的政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上）（3）资产阶级不会与“敌对”党派联合。（*Gef* 7，H.15，§2；*Q*，第 1750 页；*Ri*，第 307 页）（4）部分党派代表某个阶级的方法是，使该阶级的发展依附于它联合或对立阶级的发展。（*Gef* 3，H.4，§10，第 470—471 页）（5）政治统治制度只要未被“经济主义式”缩减，则必须作为“历史集团”来理解。（*Gef* 6，H.10. II，§ 41. XII，第 1326 页）如果将最后一点与前文联系起来，可以产生的结论是（虽然葛兰西没有如此表述）：这一“历史集团”从高往低呈分割状态，但是尽管如此，甚至恰恰因此，资本主义政权得以稳固。而后也可以说，其统治不是通过一个“权力型政治集团”再生产的（Poulantzas 1975），而是通过“双集团体制”。

关于资本主义统治再生产的以上观点的起源，还有待考究。例如，罗莎·卢森堡就强调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是第三大力量，而不是第二大力量的一部分。她在 1912 年社会民主党决选以及罢工潮讨论中都坚持这一立场，她这样描述“投机主义倾向”：“我们在议院同政治家们一起制定重大政策，我们和中产阶级党派达成一致，我们建立一个大型左派集团；但是，当无产阶级者的东西停滞不前，工人便会跑到街道上进行大规模罢工抗议。……是对罢工的一个错误的、不应该有的态度的例子。”“跟大集团政治挂钩”的罢工潮，结局“只能是失败”。（GW 3，第 261 页）

列宁曾提及“历史上因为数百年来的经验而被神化的、对剥削者异常有利的‘两党’制（剥削者的‘两党’制）”（*LR*，LW 31，第 70 页）。这一“体制”似乎过于显而易见，因此似乎不需要特定的理论分析。关于“建立阶级集团”——葛兰西对此则说，它是世纪之交才得到推动的——马克思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一比葛兰西推测的更要“无名”的策略，马克思显然没有给予厚望。他还提出，单方面将选举权延伸至工人阶级会给政权再生产带来威胁，因为被统治阶级多数直接成为议会多数。（*Klassenkämpfe*，MEW 7，第 43 页）

从双集团体制的理论出发可能难以解释的是：“剥削者的两党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才刚刚被采用，关于它的学识就神秘地消失了。然而，也许这正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规律，这一规律下，

264

剩余价值存在学说（William Petty）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初期也早早衰竭，直到后来依附于马克思一个设想式且十分抽象的理论观点，才得以再度回归。（参见 MEW 25，第 790 页及以下）在内政斗争的简单双元制模式中嵌入整个工人运动这一做法，在历史上随着斯大林的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策略而走向失败（也就是当斯大林提出针对“社会法西斯主义”政治的替代方案时），其原因为何，也还需要深入探究。

3. 如前文所述，这里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双集团体制是否已经处于瓦解之中，并且朝着某种新型议会制过渡？它从没有成为一种形式的议会制度。它从未成为**真正的**议会制度。因为始终有其他议会形式存在，例如当议会划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以变换的多数执政（在爱尔兰实行），或是自由派人士的理想议会，仅由一群个体主义者所组成，它既不是党派集团，也不是党派，不承认**党团**（至少有悖于魏玛共和国宪法）。

265 很多左翼激进派或生态基要主义的“议会”评论者在批判各类现象时因噎废食，因为这些现象不应归咎于议会，而应该归咎为议会制**双集团体制**。

但是，当集团间的政治差异消失，这一体制就会自动瓦解。在德国，1989 年后可以看到表明“政策消失”的一些现象。此时下理论推断还为时过早，但是可以尝试三件事：展示此类“消失”**概率**的可信性，给出问题**决策**的理论工具，以及讨论“消失”后存在哪些**替代**方案。

“消失”的可能性依据有：虽然处于领导地位的左翼党派代表着全然异于东方集团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政治构想，但国内政策的双集团体制在内容上必定与对外政策的集团对抗具有相关性；因**其纯粹存在**具有权力共振的特点，不仅面向莫斯科导向的党派，而是**所有**左翼党，因为从“市民阶级”来说，他们相较于东方集团社会主义略显优越，或者多少影响社会主义。甚至“市民阶级”党派都时常认为，必须使用一种贴近社会主义的**言语**（在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社会市场经济”纲领中有所体现），利用这一言语，不只能够给左翼党制造竞争，同时还具有巧妙的辅佐作用。

除此之外，苏联不仅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而且还是欧洲外交传统及其国家政治概念的维护者。这一政治概念无论其内容如何，都是以**跟竞争对手的冲突和周旋**为导向（用列宁的话来说即“共存”），然而却与来自美国的一种新趋势针锋相对（1989 年开始渗透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核心理念在于将国家法律问题与人权问题相混合，对于那

些政治矛盾越来越多地只用标准来衡量，只用“犯罪”的术语来讨论。苏联对公共法的理解也为一个类似的内政敌对概念作了铺垫，这里指“政治”敌对，也指“右翼”和“左翼”的敌对。

266 要检验内政集团的交锋在哪些方面带有政治敌对特征，以及在哪些方面正朝向某个准则进行调整，我们必须对集团语言的发展加以分析。如果说，在德国由社民党领导的左派集团善于系统性使用“是的，但这也是”（Ja, aber auch das）之类的话去回答右派政策，而由基民盟领导的右翼集团却根据“是的，但并非如此”（Ja, aber nicht so）模式来表述观点（Jäger 1986a 和 b），那么双集团体制的结束在语言上会这样呈现：对立的集团突然不再在“是”（Ja）后面加上“但是”（aber），又或者，“这也是”（auch das）和“并非如此”（nicht so）模式忽然随意地出现在两个集团中，也就是说没有区分标准了。

双集团体制的替代方案并不一定是一党制的单个“权力集团”。（Nart 1997）更加可能的是一种可以被称作方程式国家（*Gleichungs-Staat*）的模式：国家有分成两派的议会，两派在领导体系中互为替补（若一个政府退居幕后，那么另一个政府就会登台，倒不是因为它是另一个选择，而是因为它即是替补）。然而也可以想象，现有的双集团体制被某个其他的双集团体制所取代，其政治上的中心矛盾的内容变得有所不同，例如遵循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与此相关，敌对状态的表现形式也可能不同。两个体制也许会长时间相交于某个三集团体制，其执政管理立足于变动的多数派。要提前预知各类方案选择，则必须考虑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双集团体制可能尤其以“福特主义调节方式”（Häusler/Hirsch 1987）为基础。若是如此，那么要回答双集团体制之后是何种议会制的问题，得看福特主义危机的结果，同时这一结果也受到制约。

参考文献：

O. Bauer, »Das Gleichgewicht der Klassenkräfte«, in: H. J. Sandkühler u. R. de la Vega, *Austromarxismus*, Frankfurt/M-New York 1970, 79-97; W. Brüggen, »Neue Wege zur gesellschaftlichen Alternative«, in: *Argument* 197, 35. Jg., 1993, 11-29; P. Glotz, *Die Arbeit der Zuspitzung. Über die Organisation einer regierungsfähigen Linken*, Berlin/W 1984; J. Häusler u. J. Hirsch, »Regulation und Parteien im Übergang zum ‘Postfordismus’«, in: *Argument* 165, 29. Jg., 1987, 651-671; M. Jäger, »Parteiensystem und Machtstruktur«, in: E. Jurtschitsch, A. Rudnick u. F. O. Wolf (Hg.), *Grünes und alternatives Jahrbuch 1986/1987*, Berlin/W 1986a, 150-167; ders., »Versöhnen als Spalten. Analyse des Diskurses von

Johannes Rau«, in: *Argument* 160, 28. Jg.. 1986b, 858-871; S. M. Lipset, *Soziologie der Demokratie*, Neuwied-Berlin/W 1962; N. Luhmann, *Ökologische Kommunikation. Kan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sich auf ökologische Gefährdungen einstellen?*, Opladen 1986; W. -D. Narr (Hg.), *Auf dem Weg zum Einparteienstaat*, Opladen 1977;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²1975.

米夏埃尔·耶格尔（Michael Jäger）撰
焦燕屏 译，李之 校

参见：

Blockfreiheit, Drei-Welten-Theorie, Dritte Welt, Fordismus, friedliche Koexistenz, geschichtlicher Block, Hegemonie, Klassengleichgewicht, Klassenkampf, Metropolen, Parlamentarismus, Parteien, Politik, Spaltung, Supermächte, Systemkonkurrenz

不结盟（Blockfreiheit）

A: ʿadam al-inḥiyāz. – E: non-alignment.

F: non-alignement.

R: neprisoedinennost' (неприсоединенность).

S: no alineación.

基于19世纪在欧洲和西方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当时关于冲突和战争的语言使用的是联盟（Bündnis）和中立（Neutralität）等传统概念和观念。世界的其余区域被视为笼罩在殖民统治和非独立的阴影之下，只具有微弱的意义。核心国家，即处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和瓜分非洲时期（1815—1880年）之间的欧洲，才是概念、理论、意识形态愿景、战略和社会政治斗争的起源地。

不结盟的历史却与此相反，多起源于被殖民统治和不独立大洲上民族、组织或国家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是19世纪初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建国过程。这种斗争有三个主要变种：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和民族革命，后两种通常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

1.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东方的民族运动力求通过中心地带的武装冲突受益。通常情况下，它们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方站在同一战线（德国和日本对抗英国、法国及其同盟）。1917年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巴库（Baku）1920年召开的东方人民代表大会（Kongreß der Völker des Ostens）标志着新的层次：西方霸权主义中心开始分裂，亚洲和东方主要国家

新成立的共产党开始有能力将解放斗争推上新的高度，并将国际革命运动的矛头切实指向帝国主义前线。在1917—1920年和1945年间，主要的趋势是在先进国家的新兴社会主义力量和殖民地非独立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之间找寻多样化的结盟形式。

早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形成之前，推动不结盟运动形成的力量就已经存在，其促因是正式认定西方中心地位的联合国体系（1945年）和反共且由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7年），这导致了1949年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产生。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期，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重心都在于独立。一度亲近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体制及其相应进程。以下是两种主要的推动力量：

1.1 脱胎于过去反殖民斗争的反帝国主义（即纳赛尔[Nasser]1954年定义的“积极中立主义”），因其在1945—1952年后民族运动中的主战倾向而明显区别于“中立主义”。为争取活动空间，类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已经独立的国家都力求获得国际承认。活跃在联合国外的阿拉伯—亚洲国家集团，以亚洲英联邦国家（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尼西亚）所谓的科伦坡计划（Colombo-Plan）为出发点，在埃及的推动下发展为亚非运动并促成了历史性的万隆会议（1955年4月）。围绕着周恩来、尼赫鲁（Nehru）、苏加诺（Sukarno）、纳赛尔、吴努（U Nu）这些主要领袖人物，在日本、埃塞尔比亚、土耳其、泰国、菲律宾、沙特阿拉伯及其他虽亲西方但已开始筹谋未来的国家参与下，在15世纪西方登上霸权地位后，第一次有东方主要国家共同议事，以图拟定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道路。

尽管万隆会议宣告着东方的再度觉醒，但其意义却几乎不被理解。然而，它为联合国的很多激进决议铺平了道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960年）、承认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使用武力的权利（1965年）、由吴丹（U Thant）促成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1974年）。在此基础上，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所激励的解放战争在更广阔的前沿阵地向前挺进。

1.2 另一种潮流认为，深化和平线路方针是避免与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最有效方法，这种对抗在朝鲜、越南、非洲南部和古巴达到了顶峰。亚非运动的主导成员国之一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从甘地哲学出发提出主导方针，铁托（Titos）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和苏伊士运河危机后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也纷纷效仿。

一系列会议开始为不结盟运动赋形：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有25个国家

参与，大会显示出尼赫鲁倾向的温和派和苏加诺、恩克鲁玛（Nkrumah）反帝国主义主战派的分歧；开罗会议（1964年）有47个参与国，大会倾向于和平共存；卢萨卡会议（1971年）有53个参与国，大会为经济独立斗争奠定了“集体自力更生”（*collective selfreliance*）的理念，并为运动的持续性作出了规定（大会三年一期；大会主席的责任；设立一个秘书处）。

尽管大会存在意见分歧，哈瓦那会议（1979年，95个参与国）仍然加强了反帝国主义的倾向，大会的三大洲宣言将万隆会议原则扩展到了拉丁美洲。这种激进化倾向在阿尔及尔第四次峰会（1974年，75个参与国）上达到了极端。不结盟运动，此时已扩展到了“77国集团”（得名于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决议的签署国），致力于反对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并自我定位为三大洲所有发展中国家整体。在当时，由于1973年十月战争后石油输出国组织不断增长的石油产量，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似乎已经伸手可及。

270 1.3 不结盟运动和集团的关系可归结为独立、解放或建国和两大超级大国间的辩证关系。不结盟运动诞生于第一次冷战（1947—1956年）之后，并在“和平共存”时期及之后的缓和时期（1956—1989年）得到主要发展。在“和平共存”时期，万隆会议的发起成员，同时在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加入下，试图寻求和苏联集团建立更紧密关系，这就导致了结盟（尤其是和埃及、印度、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埃塞俄比亚）。西方同盟中的不结盟国家（东南亚条约组织）试图利用它们的地位，在不直接对抗苏联集团的情况下从西方盟国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这种近似结盟的主导模式在缓和时期和赫鲁晓夫对不结盟运动政策灵活期间得到了增强。新的区域组织——首先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由此诞生，它们和超级大国的冲突保持距离，并拥有自治地位。1973年的十月战争、越南的解放、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中国经济登上世界舞台（1978年起）以及不结盟运动在拉丁美洲和联合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都对此起到巩固作用。

新冷战的开始（1976年）和苏联集团的解体（1989—1990年）标志着另一个新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不结盟运动——此时几乎囊括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三大洲和未签订协议的国家——延伸到了处于世界范围转型中的核心国家。新右派的攻势和内在的固有弊病导致了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同盟的剧变。与此同时，国际组织体系致力于加深边缘地带对霸权主义中心的依赖性。

核心地区冷战的终结使“南方”取代了“邪恶国家”的位置，后者是美国总统里根给苏联起的绰号。然而南方，尤其是不结盟运动如此弱小，怎么会被评价为有威胁性呢？

2. 自 1990 年和“历史终结”的胜利宣言起，历史继续被推入不可预料的轨道上。两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解体的原因和三大洲（不结盟）区域的意义和角色——随着资本主义中心日益可感的危机，已经接近了资本主义中心的文明事业的死胡同。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转型、新世界逐渐形成的时刻，纵览不结盟运动及其反对派，直面的是民族问题在现代政治思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争议史。

2.1 不结盟运动尽管有共同的行动但仍然有内在的差异。总体上的类型包括：（1）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不乏前国家阶段的、多种族的类型，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大洋洲。（2）民族独立的国家主要采取资本主义模式，范围涵盖从农业为主的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它以由国家资本主义部门主导、私人资本主义部门逐渐扩大的混合经济为基础，超越了由本国资产阶级主导的“独立民族国家”。（3）从以苏联为鉴的黄金时代到第二次冷战期间，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独立国家（比如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亚）。（4）形式上独立、实际长期依附的买办型国家，长期依附导致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的劳动群众的软弱无力。（5）民族解放运动和选择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6）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越南、朝鲜。（7）被定义为正在腾飞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新兴发展中国家（“小龙”），现在越来越和两次海湾战争后所鼓吹的新世界秩序拉开了距离。

制定系统性、长期性战略的困难是明显的，这不仅限于不结盟运动（对比西欧和苏联）。即使卡斯特罗（Castro）1985 年建议的集体终止债务难以实现，但仍然存在现实的、有意义的政策来维持独立自主和可行的发展模式（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或马来西亚发起的东南亚经济论坛）。就此而言，核心地区和主导力量都在亚洲。

2.2 不结盟运动发展和自我表达的最重要的行动领域和理论问题，要在至今仍被忽略的内在视角中寻找（相对于轻视贬低地将它们列入“第三”和“第四”世界等范畴）。如果反思不结盟运动的历史道路，可以说，就已经把从世界转型到构建新世界的过渡的普遍问题

271 272

提上了日程。这在政治方面涉及权力、霸权、依附、独立、相互依赖关系等概念正在改变的意义；经济方面涉及人类和社会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的问题；哲学和文明方面涉及原教旨主义和一体化政策的矛盾，民族文化认同和世界主义全球化的矛盾。

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把南—北的辩证法理解为一种互补的辩证法，而非对抗、战争和不可阻挡的毁灭。不结盟运动可被评价为为人类新世界做出了极其积极的贡献，尽管它总是缺乏决定性行动的可能——而决定性的行动，始终存在霸权主义思想的专家们则寄希望于21世纪初（围绕中国和日本）。

2.3 两极对抗终结后，不结盟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发展空间，更何况它正是以这种空间为出发点进行有意义行动。由于联合国和其机构都牢牢处于西方控制下，不结盟运动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尽管代表着120个国家，同时自身也是世界第6大国的首脑，在东京发达工业国家的G7峰会（1993年）上甚至没能获得一次作为观察员的机会，就南北合作发表演讲。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重心也发生了位移——从西太平洋区域移到了亚太区域，特别是中日带动的东亚地区。中国作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最快的国家走在前列，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在印度的影响下紧随其后，拉丁美洲也跟在后面。亚洲——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其后的拉丁美洲依靠原材料资源、创纪录的增长率、人口资源的配合，为不结盟运动提供支持，在西方继续存在的军事战略优势下争夺主动权。

这种经济振兴将世界很大范围内空前的增长速度、稳定性和指数趋向彼此结合在一起，使人注意到经济振兴背后的哲学、文明维度。涉及的国家——首先是东方国家，还有些拉丁美洲国家——在组织架构上都是以集体为主，而非个人；集体社会性格在民族文化的框架条件下突出集体团结性，它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被定义为和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并肩同行的“儒家精神”的多种表现。

集体精神和集体社会性格增强了国家形式、权威政治体系和文化特色。政治稳定性和以指数增长的经济从客观方面为不结盟运动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亚洲中心——替代由单极霸权主义统治的通过大众媒体和领先科技带来的“地球村”。这一中心以不同的名义参与到区域组织中，以加强独立自主行动的地区潜力。独立自主的行动分为不同的层面，但不处于上下隶属关系（比如和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相对的计划中的东亚经济论坛）。

273

这种主要在不结盟运动核心区域展开的全面进程达到了追逐霸权以外另一种选择的阶段。不同于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社会经济模型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这就可能建立起两种迄今完全对立的经济体制之间的连接，为新世界充满创造力的创新指明道路。在哲学、文明的层面可以看到，集体精神或集体社会性格和社会主义的实质——社会正义的理想相接近。

3. 从不结盟到新世界形成时期朝向新文明方案的最初几步——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不结盟运动在正在改变的时代中的意义，以及霸权主义覆灭后我们人类的文明理想。

274 问题的核心就在正在改变的权力辩证法中。军事战略类型保持不变，还是经济、技术因素优先？此外可能需要修正历史辩证法的精神维度，重新评估在核力量平衡终结以后大行其道的胜利主义学说。当西方中心在美国的带领下前所未有地拥有霸权之时，不结盟运动中心的“东风”日益增强，这与阿米尔·赛义德（Amir Sayed）、苏丹·阿里（Sultan Ali）和毛泽东预见的模型并非不同。不结盟本身在三大洲形成了非霸权力量迄今最大的联合，其核心地带东亚领导起了此前 5 个世纪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首创进程。

迄今为止，转型在全世界范围都是一种摩尼教式的暴力对抗。很明显，转型在全球范围不可能毫无摩擦。然而，不结盟和不结盟运动——从万隆会议到东亚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塑造新世界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非对抗地处理辩证矛盾以达成互补。

参考文献：

A. Abdel-Malek, *La Dialectique Sociale*, Paris 1972; ders., *Sociologie de l'Impérialisme*, Paris 1971; ders., *Rih al-Sharq* (Ostwind), Kairo 1983; S. Amin,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Paris 1970; ders., »Was ist aus dem Konzept der Blockfreiheit geworden?«, in: *Argument* 160, 28. Jg., 1986, 835-843; A. Benningsen, C. Lemercier-Quelquejay, *Sultan Galiev, Le père de la révolution tiers-mondiste*, Paris 1968; J. Berque, *L'Orient Second*, Paris 1970; A. Bozem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1960; H. Bull, A.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84;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Reinbek 1969; P.-M. de La Gorce, *Requiem pour les révolutions*, Paris 1990; D. Jankowitsch, K. P. Sauvant (Hg.), *The Third World without Superpowers. The 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Non-Aligned Countries*, New York 1978; G. H. Jansen, *Afro-Asia and Non-Alignment*, London 1966; V. G. Kiernan; *Lords of the Human Kind*, London 1969; P. Lyon; *Neu-*

tralism, Leicester 1963; ders., »Non-Alignment at the summits. From Belgrade 1961 to Havana 1979«, i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 Jg., 1980, Nr. 1; A. Mazrui, *Towards a Pax Africana*, Chicago 1967; G. A. Nasser, *Philosophy of the Revolution*, Kairo 1954; ders. (Hg.), *The Charter of National Action*, Kairo 1964; J. Nehru, *Speeches*, Bd. 1 1953-1957, Bd. 2 1957-1963, New Delhi 1958, 1964; K. Nkrumah, *Autobiography*, London 1957;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London 1953; E.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1993;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The Institute of Diplomatic Studies (Kairo), *Bandung: 25 Years of World Transformation (1955-1985)*, Kairo 1985 (unveröff.); Zhou En-Lai, Ausgewählte Werke, Peking 1969.

阿努阿尔·阿卜杜勒-马莱克
（Anouar Abdel-Malek）撰
托马斯·劳格施廷译为德文
李之译，曹旸校

参见:

Abkopplung, Antikolonialismus, Arabischer Sozialismus, Blöck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ependenztheorie, Dorfgemeinschaft, Drei-Welten-Theorie, Dritte Welt, Entkolonialisierung, Eurozentrismus, friedliche Koexistenz, Gandhismus, geschichtslose Völker, Hegemonismus, Islamischer Sozialismus, Jugoslawischer Sozialismus, Kolonialismus, Kubanische Revolution, Maoismus, Nation, Nationale Befreiung; Neokolonialismus, Neue Weltwirtschaftsordnung, Nichtkapitalistischer Weg, Nord-Süd-Konflikt,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Pol-Potismus, Self-Reliance, Supermächte, Titoismus, Trikontinent, Übergang, Unterentwicklung, Vierte Welt, Zentrum/Peripherie, Zivilisation

土地改革（Bodenreform）

A: iṣlāḥ zirāʿī. – E: land reform.

F: réforme agraire.

R: zemel'naja reforma (земе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S: reforma agraria.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在农村和城市创造从根本上全新的土地所有关系和使用关系。在所有历史时期，社会如何处理土地，都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生产技术的基本挑战与矛盾冲突的焦点。焦点在于土地的重要性（作为自然循环，特别是物质循环的调节器，也作为生产资料、原材料和建筑用地），以及污染、过度损耗和投机所造成的土地永久性损害。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的土地所有制

和使用规定，也围绕土地问题发生着冲突，从而构成了各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先通过对重农主义（比如杜尔哥 [Turgot] 和魁奈 [Quesnay]，参见MEW 26. 1，第12—39、354—362 页）以及资产阶级立场的批判（比如配第 [Petty]、斯密、李嘉图或者罗德贝图斯的观点，参见 MEW 26. 1，第330—340 页；26. 2，第 7—160、304—374 页）提出了他们对土地问题的见解；他们将土地所有制置于资本关系的发展中进行了历史的分析（MEW 23，第 741—803 页），把地租理论归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MEW 25，第 627—821 页），还进行了具体的政治研究（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lage*]）。简言之，马克思认为："地产 —— 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MEW 18，第 59 页）然而，土地改革 276
这个概念既没有出现在经典作家的文章里，也没有出现在迄今各版作品的标题索引和内容索引中。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作品里一直都把彻底消灭私人使用权和支配权看作根本的社会主义社会变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基本承接着激进土地改革家的传统，比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或者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K III*，MEW 25，第 784 页）

早在 1847 年，恩格斯就已经在《共产主义原理》（*Grundsätzen des Kommunismus*）中具体阐释了土地改革的设想，其中提出"一部分用……竞争的方法，一部分用赎买的方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耕地的土质"，"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结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还有"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等要求。（MEW 4，第 373—374 页）这些观点也在《共产党宣言》中加以重申（第 481—482 页），经修改后，又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中强调。按照这些观点，首先要消除封建压迫，并且把封建制度下的土地变为国家所有。此外，人民直接向国家而不是所有者进行抵押和支付租金。（MEW 5，第 3—4 页）

最初，经典作家们还不认为土地的全面国有化是绝对必要的。二十年后，马克思才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和历史都表明土地改革既是必然的，也是迈向社会福利和民主的前提："未来将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MEW 18，第 62 页）

277 就此而论，马克思明确表示，如果不同样地国有化其他生产资料，仅仅靠土地国有化是不可行的，或者说马克思反对仅仅将土地转交给某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比如农民或者农业工人。在 19 世纪末日趋激烈的关于土地改革的辩论中，恩格斯也重新表述了他的思想。在农村地区，他提出没收大地产，把小农产业和小农占有的土地集中到合作社，"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MEW 22，第 499 页）。他认为自己的建议也有助于消除城乡差距。首先在城市中实行土地国有化，剥夺占有住房的出租者，然后由国家合理地分配这些足够的现存住房。然而，没有彻底的社会变革，住房问题就不能得到圆满解决。（MEW 18，第 226—227 页）

严格意义上的土地改革者们，比如 1900 年前后的达马施克（Damaschke），大多却与此相反，强调他们的税赋和法律要求是独立的，不用依赖根本社会变革去实现。在争取土地改革的政治斗争中，德国迄今的主导看法仍然是主张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向小土地占有者倾斜，或者通过税赋改革和收入改革，消除从土地所有权或房屋所有权中获得的附加利润。这些努力集中体现在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州宪法中关于土地改革的条款，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西德尝试制定的社会土地法上。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在民主德国则相反——通过土地改革进行彻底的再分配，国有企业占有 8% 的土地——城市和农村的土地都主要由私人所有，但是受制于严格的使用规定，也就是合作社的管理。在 1990 年德国统一的协议中，1949 年之前土地改革中对土地的没收得到了承认，然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逐渐遭到否定。

国际上，社会主义者和现存社会制度内部的改良者，从最初就展开了对土地改革的讨论。（Diehl 1911）1868 年，第一国际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达成的决议，将土地转变为整个社会的公有财产 278
（参见 Liebknecht 1870），在 1870 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特别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起了很大争议。1917 年，布尔什维克宣布苏联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财产。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土地改革的努力收效甚微，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是尤其重

要的原因。

中国革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国家队伍不断扩大，给土地的所有制关系和使用方式带来了重大而又多样的影响。比如在中国，城市土地是全民所有，而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在南斯拉夫，居住区的土地都社会化了，但是农民的私有土地可以保留至多 10 公顷。而波兰私人所有的土地可以达到 100 公顷，因此大部分土地都由私人使用。即使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反殖民斗争中，土地所有制和使用关系的改造也是政治改革中的重中之重，一直是农业改革措施的根本环节。古巴政府分阶段把 67 公顷以上的土地和居住地的所有权都收归国有。在尼加拉瓜，政府也尝试了有利于合作社经营的广泛的土地改革。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部的改革尝试走向了土地所有权的局部再私有化。尝试失败以后，不仅土地改革的不同成果为了有利于私有化而被取消，而且这种趋势本身也可以看作瓦解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核心因素。

当时，土地问题的矛盾再度激化：不仅有土地投机和房产投机，即所有权分配损害社会公益这个老问题，而且有环境污染日益加重的问题。

参考文献：

Th. Bergmann, *Agrarpolitik und Agrarwirtschaft sozialistischer Länder*, Stuttgart 1973; H. G. Bohte, *Landeskultur in Deutschland*, Hamburg und Berlin 1976; P. Conradi, *Für ein soziales Bodenrecht*, Frankfurt/M 1972; A. Damaschke, *Die Bodenreform*, Berlin 1907; K. Diehl, »Der ältere Agrarsozialismus und die neuere Bodenreformbewegung in Amerika, England und Deutschland«, in: *Grünberg-Archiv*, Bd. 1, 1911, 225-284; W.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Berlin/W-New York 1974; H. Immler, *Natur in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Opladen 1985; J. Jansen, »Zweihundert Jahre Bodenreformbewegung«, in: *Blätter*, 1973, H. 7, 727-742; W. Liebknecht, »Die Grund- und Bodenfrage« (1870), i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Leipzig 1976; D. Schneider, *Selbsthilfe, Staatshilfe, Selbstverwaltung*, Frankfurt/M 1973.

赫尔穆特·阿诺尔德（Helmut Arnold）撰

罗梓丹 译，曹旸 校

参见：

Agrarreform, Bauern, Besitz/Eigentum, Enteignung, Erde, Grundrente, Kollektivierung, Landwirtschaft, Raubbau, Reformismus, Stadt/Land, Vergesellschaftung, Wohnungsfrage

布尔什维克化
(Bolschewisierung)

A: balshafa. – E: bolshevization.

F: bolchévisation.

R: bol'ševizacija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я).

S: bolchevización.

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在共产国际（Komintern）及其分支的官方语言中，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与苏联共产党（KpdSU）的规范保持一致，当时苏联共产党已经取得并维持了国家政权又建立了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一种误称。因为布尔什维克（Bolschewiki）最初并不是适合政治含义的概念，它不是起源于一部纲领、一种理论、一个政治目标。1903年在伦敦召开的国外党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群体偶然地构成多数，他们称自己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而称另一方为少数派（孟什维克[Menschewiki]）。因此之后数十年中，苏联共产党的正式名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KpdSU[Bolschewiki]）。

从任何角度看，布尔什维克化都是一个不同于列宁式的概念。斯大林时代之前的、见多识广的那些领导干部能够相对客观地理解苏联革命胜利的意义，并认为苏联是一个落后国家。兄弟政党应当制定符合本国关系的战略和战术。源于胜利革命的经验是可以使用的，但只能选择性地使用，即在把普遍性从特殊性中分离出来之后。尽管共产国际是由各个分支组成的，但它们之间是权利平等的；国际主义是理所当然的义务，但也意味着需要考虑每个工人阶级的“国家的”利益。工人运动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苏联官员也意识到了。在战后的革命浪潮中，人们对苏联革命的榜样效果寄予希望是有着实际背景的。

1924年起逐渐形成的斯大林领导班子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寄希望于先进工业国家的进一步革命似乎只是徒劳的；运用所有力量“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唯一现实的目标设置并且是可行的，尤其是在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大国的资源的情况下。所有力量还 280
包括其他国家和政党的共产主义者。这些人的国家任务就变成次要的了。所以，这些任务就成为无法解决的，最终也没有被解决。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共产党（KPD）。

这一概念最早于1924年初出现在德国共产党中。在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中心（Brandler-Thalheimer-Zentrale）被废黜后，“左派”成为党内领导。布尔什维克化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很多：调整党的工厂支部（Betriebszellen），一个负责全面纪律的官员对应每个党员，采用苏联

的组织方法（斯大林式特征），对革命进行组织，加强党内一体化，绝对认可共产国际的领导，重新更替干部，高度集中化。

后来成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和中央委员会政治书记的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在1924年撰写了第一本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小册子：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派被认为是在所有斗争中领导全部阶级、亲自组织这些斗争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重要的是表明与党内“错误”观点作斗争，从而出现了反对卢森堡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不过，在布尔什维克化的初始阶段，不同观点仍然在德国共产党的媒体阐述和党内讨论中出现。

露特·菲舍尔（Ruth Fischer）在1924年首次谈论布尔什维克化：必须要牢牢掌握党及其工厂支部，并通过他们来实现在各自工厂的布尔什维克化。具体任务将由上级单位直接布置。1925年，斯大林在与德国共产党党员威廉·赫尔佐克（Wilhelm Herzog）的谈话中，使用了布尔什维克化这一表述。其中提到领导干部问题是关键。共产国际（KI）“五大”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升为一个主要口号：共产国际应当据此给各党布置具体任务。除了大约从1925年底至1927年底的短暂停滞外，德国共产党被不断地布尔什维克化了。在民族保守主义的精英们将希特勒（Hitler）推上了权力的前台和德国工人运动遭遇失败的三个多月后，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3年5月强调指出，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但同时也指出了“进展不足的布尔什维克化”，即“没有使党的领导层的重要决定和工厂成为党的工作的真正政治中心和统一战线的基础，在实践中，只是不充分地得以贯彻”。

费尔南多·克劳丁（Fernando Claudin）注意到，斯大林式的共产国际领导班子认为，通过成功的和只能追随的十月革命已经解决了革命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而就只专注于战略—战术形式和组织形式：“于是就忽视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政治表述越来越偏离社会科学，而且总体上也偏离了其应当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领域的文化水平。”（1970，I，第104页） 281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更是一针见血。在1925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KKI）的一次会议上，她引用了列宁的观点并说道：“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明确的看法。因此，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承认行动的一致……因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未来是否还要继续用这种排斥和谴责的机械方式来工作？”（*Protokoll*，第313—315页）。在当时不

允许发表、直到 1989 年后在柏林中央档案馆中找到的两份文件显示，塔尔海默（Thalheimer）在 1925 年共产国际五大之后和 1928 年六大之前就对布尔什维克化持批判性的态度了。早在 1925 年，他就警告道，布尔什维克化在共产国际中的执行将会导致“支离破碎”。（参见 Becker 等 1989 和 Thalheimer 1993）

在以“国际主义”任务为优先的背景下，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也都发生了改变。位于莫斯科、很大程度上由苏联资助的共产国际机构——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得以强化，通过特使、公开信和邀请相应国家的干部到位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高了它对各国党的影响力。地区书记领导这些党。逐渐地，苏联共产党内胜利派的需求和苏联外交的需求都被灌输到各国党中，不切实际的分析和战略在莫斯科制定并被执行，领导干部也被重新任免。1925 年 3 月 25 日，蔡特金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茹尔·安贝尔-德罗兹（Jules Humbert-Droz）的信中写道：“在这个体系中，我感到了完全的孤立和不自在。在这里，生机勃勃的政治有机体被改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机械装置，其作用就是：接到俄语写的命令，就马上原封不动地用不同的语言将命令发送出去。”（初次引用见于 Wieser/Traub 1976，第 5 页）

这些党变成了斯大林领导班子和苏联外交的延长分支和执行机构，这一职能转变是有其独特逻辑的。最好的、最有经验的干部被罢黜，被大量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顺从的傻瓜”，党被分裂，被清洗，被布尔什维克化，“新型革命政党”被创造出来。越是适应苏联的需要，他们就越是失去自己的力量和实际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他们最后对苏联也没有价值了。斯大林在 1943 年单方 282
面寻求解散共产国际的行为，就是布尔什维克化导致共产国际毁灭的这种逻辑的最终结果。之后取代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也最终在 1956 年 4 月 17 日被解散。

在布尔什维克化运动中，很多流派都被排除在党外。右翼人士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派（IVKO），要求废除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已经过时的领导垄断并要求“从头到脚的改革”。当这一流派认识到共产国际的衰败并发现共产主义的原则也被抛弃后，他们要求将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性革命政党作为长期目标。托洛茨基主义者在 1938 年建立了第四国际。

通过南斯拉夫、中国、古巴和越南的独立革命，一个党在国际上的霸权资格被历史性地打破了。陶里亚蒂（Togliatti）在 1964 年提出了国际运动多中心主义的要求。在多次国际会议上

(1956年11月在柏林，1964年在布达佩斯)，都正式表达了要苏联共产党放弃在各个领域的领导权的要求。

参考文献：

J. Becker, Th. Bergmann, A. Watlin (Hg.), *Das erste Tribunal – Das Moskauer Parteiverfahren gegen Brandler, Thalheimer und Radek*, Mainz 1989; Th. Bergmann, *Gegen den Strom – Di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Opposition*, Hamburg 1987; ders. und M. Kessler (Hg.), *Aufstieg und Zerfall der Kominтern – Studien zur Geschichte ihrer Transformation (1919-1943)*, Mainz 1992; F. Claudin, *Die Krise der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2 Bde., Berlin/W 1977; O. K. Flechtheim, *Weltkommunismus im Wandel*, Köln 1965; H. Neumann, *Was ist Bolschewisierung?*, Berlin 1925; *Protokoll der erweiterten Exekutive der K I, März-April 1925*, Berlin 1925; A. Rosenberg, *Geschichte des Bolschewismus. Von Marx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32; A. Thalheimer, *Programmatische Fragen. Kritik des Programmentwurf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I. Weltkongreß)*, Mainz 1993; H. Weber (Hg.), *Völker hört die Signale – Der deutsche Kommunismus 1916-1966*, München 1967; ders.,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Bde., Frankfurt/M 1969; H. Wieser u. R. Traub, »Die Volksfront – Zur Entstehung, Geschichte und Theorie«, in: *Kursbuch* 46, 1976, 1-32; U. Winkel, »Parteikonzeption und politische Demokratie«, in: *Schlaglichter*, 1983, H. 1, 9-26.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盛舒洋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Brandlerismus,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Einheitsfront, Funktionär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ismus, Luxemburgismus, nationaler Weg zum Sozialismus, pluraler Marxismus, Pluralismus, Renegat, Revolution in einem Land, Sowjetische Revolution, Sozialismus in einem Lande, Stalinismus, Trotzkismus, Weltrevolution

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us） 283

A: madhhab Bonapart, būnāpārtīya.

E: bonapartism. – F: bonapartisme.

R: bonapartizm (бонапартизм).

S: bonapartismo.

1. 除了对于当时的政治分析的作用之外，波拿巴主义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理论著作的范围内也具有重要意义。对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的区分，它

们暂时分离的命题和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命题，阐明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辩证观。

1.1 马克思在研究 1848 年二月革命后法国阶级斗争的发展时，拟定了他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主要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n*，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和《法兰西内战》（1871）中，他分析了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政权的社会基础、社会功能和政治机制，并由恩格斯的一些著作作了补充。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批判性地援引了资产阶级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家的著作，这些著作探讨了恺撒（Cäsar）、克伦威尔（Cromwell），特别是拿破仑一世（Constant 1813/1814；Tocqueville 1840；Stein 1850）和拿破仑三世政权（Hugo 1852；Proudhon 1852；Lassalle 1859）。

随着路易·菲力浦（Louis Philippe）的下台和 1848 年临时政府的成立，阶级联盟解体了。这个为了反对金融贵族的统治而结成的联盟促成了二月革命的胜利。（*Klassenkämpfe*，MEW 7，第 30 页）国民议会对无产阶级的要求宣战；1848 年 6 月的工人起义遭到绞杀；一切阶级和党派在拯救“**财产、家庭、宗教、秩序**”的口号下，团结成了“**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18. B*，MEW 8，第 123 页）。资产阶级背弃了它自己的“**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同上书，第 182 页），也就放弃了其政治统治：“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迫使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同上书，第 154 页）。同时，无产阶级还只能“在**主观**上，在**想象**上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Klassenkaempfe*，MEW 7，第 30 页；参见 MEW 22，第 512 页）。

因此，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的兴起归结为“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Bürgerkrieg*，MEW 17，第 338 页）这样一种境况。它是两个社会主要阶级虚弱的力量均势的特有表现。（参见 Engels，MEW 8，第 224—225 页）波拿巴主义在政治上的主要表现是行政权的独立化，凭着它，“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18. B*，MEW 8，第 197 页；参见 MEW 17，第 313 页及以下）。“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第 198 页）一方面，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支持者既有广大保守的小农群众——这些小农彼此隔绝，没有民族联系，没有政治组织，没有形成为阶级，没有以自己的名义提出的阶级利益，

不能代表自己，而只能被代表（第 199 页）；也有流氓无产阶级这个“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第 161 页）。另一方面，波拿巴主义维护着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基础，而“既然它保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因而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第 204 页）。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波拿巴主义称为“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作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Bürgerkrieg*，MEW 17，第 338 页；参见 *18. B*，MEW 8，第 135 页）。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波拿巴主义理论的元素来分析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发展。他们尝试以此来把握我们称之为德国的“特殊发展道路”和“后发模式”的现象：虽然德国资产阶级发展成了欧洲最有力量的社会阶级之一，但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取得胜利。与日渐壮大的无产阶级及其阶级组织相对立的，是和各旧阶级结盟的资产阶级。（Engels，MEW 7，第 538 页）早在 1848 年 6 月，他们就强调，“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Engels，MEW 5，第 65 页；参见 Marx，MEW 6. 第 102 页及以下）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恩格斯主要论述了在德国发展的关键阶段出现的普鲁士—德意志波拿巴主义：从 1859 年民族联盟的建立，到同年的军队改革方案，再到 1866 年普鲁士政府关于在普选权的基础上成立德国国会的建议，直到把威廉二世（Wilhelm II）在俾斯麦（Bismarck）下台后的统治也描述为波拿巴主义。（参见 MEW 21，第 405 页及以下）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同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和被他们斥为“半个波拿巴主义者”和“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MEW 30，第 258 页；以及 Lassale 1859 和 Hess 1863）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政治争论。 285

1.3 波拿巴主义理论的一些观点也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沙皇统治、亚细亚专制主义、当时西班牙的发展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发展的著作中。（参见 Wippermann 1983，第 112—140 页）在这些论述中，他们特别强调了国家政权作为表面上的独立力量在落后国家为奠定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发挥的作用。

2. 在第二国际内部的讨论中，波拿巴主义理论并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它受了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机械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是它越来越把国家作为具有中立

性的、需要去占领并基于自身的利益去改造的制度来理解。不过，在卢森堡、列宁和葛兰西的著作中，却出现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波拿巴主义理论的重要引文。

2.1 罗莎·卢森堡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国的著作，分析了1898年后法国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德雷福斯事件以及社会主义者米勒兰（Millerand）第一次作为部长进入资产阶级政府的事实。在她看来，和拿破仑三世时期类似，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军队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是“既存社会腐坏”的表现（GW 1/1，第265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类似的是，她也认为出现这种趋势的前提是各支社会力量的相对均势状态，而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腐坏，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失权”（第266页），使得小资产阶级在表面上成了政治统治力量。

不过，卢森堡并未忽视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三世之间最重要的差别：这一点关系到第三共和国面临的新的内部矛盾：“这些基本矛盾之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议会统治基础上的共和国和一支庞大的同殖民政策和世界政策相适应的常备军”连同“常备军显而易见的等级精神”和“成为一支独立的、同国家整体只有松散联系的力量的倾向”之间的矛盾。（GW 1/2，第19页）在此，卢森堡已经提出了关于军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现代”理论的萌芽；后来，在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的讨论中，这一理论又得到了发展。

2.2 早在1901年，列宁为了描述沙皇专制政策，就曾拿俄国的情况同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和威廉二世政权进行对照。（LW 5，第74—75页）他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以便分析1905年革命后俄国第二个反革命时期的特点——这个时期开始于斯托雷平（Stolypin）的“农业波拿巴主义”（LW 15，第266页）、1908年第三届杜马（Duma）的组建以及随之而来的1912年第四届杜马的选举（LW 18，第414、334—335、410、486—487页）。在列宁看来，波拿巴主义是拥有强大专制政权的经济落后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得到普遍认同的整个时期所采取的一种典型的政治统治形式。（LW 15，第319页）

面对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力量对比，列宁试图把握落后国家的阶级斗争在由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阶段的发展状况。在克伦斯基政府中，他看到了“一个向波拿巴主义迈出头几步的政府”（LW 25，第222页），这个政府体现了新的阶级力量格局：“以军阀（军队中的坏分子）为盾牌的国家政权在大致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和敌对力量之间看风使舵。”（同上：

参见 LW 25，第 260 页）因此，这个波拿巴主义政权是环境的产物，“那时，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SR*，LW 25，第 404 页）。与 1799 年和 1851 年法国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相比，这个波拿巴主义政权脆弱得多，因为它不可能获得社会各阶级的支持。（LW 25，第 224 页）

2.3 葛兰西在其《狱中札记》里又采用了马克思本想清除的恺撒主义概念（参见 MEW 16，第 359 页），并试图将波拿巴主义理论一般化：恺撒主义或波拿巴主义体现了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彼此斗争的各支力量处于危急的势均力敌状态，而它们的势均力敌竟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继续斗争下去，只有各方同归于尽方告休止”（*Gef* 5，H. 9，§ 133，第 1178 页）。葛兰西区分了进步的恺撒主义（如恺撒、拿破仑一世）和倒退的恺撒主义（如拿破仑三世、俾斯麦），并指出，即使没有伟大人物，也可能会出现恺撒主义的解决办法。这也适用于——这一点同卢森堡形成对照——议会制度。（第 1179 页）最后，他警告说：“另外，‘恺撒主义’现象主要是一个论战—意识形态的公式，而不是一个历史—政治的公式。”（同上）这个假说“还必须变得更加具体，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具体的历史现实”（第 1181 页）。

3. 主要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以来，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与法西斯主义的论战中开始追溯波拿巴主义理论。（参见 Wippermann 1983，第 8 页及以下，第 201 页及以下）在塔尔海默、托洛茨基以及右翼和左翼的共产党反对派那里，这一理论又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3.1 塔尔海默一方面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经过一系列波拿巴主义政权而逐步法西斯化的过程（*Gegen den Strom*，1930a，第 66—67 页），但他另一方面也改造了社会均势和行政权独立化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型为公开独裁的模型（同上书，第 32—33、48—49、66—67 页）。在这个模型中，他事实上是把波拿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资本的公开独裁。其表现形式都是行政权的独立化、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垮台和其他所有社会阶级对行政权的政治服从。”（1930b，第 28 页）基于此，他在比较拿破仑三世政权和德国法西斯主义政权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波拿巴主义的类型学。（第 31 页及以下）在他看来，这两种统治形式之间的区别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的变化”（第 34 页）：法西斯主义政策“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并且，“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基础和手段”

287

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第 34 页及以下）因此，塔尔海默把前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政权向法西斯主义的过渡视为行政权的独立化程度的增大。（第 38 页）

3.2 在托洛茨基那里，波拿巴主义概念内含于法西斯主义理论。这套理论基于对资产阶级社会三个主要阶级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来推论相应的政治统治形式。直接引领法西斯主义的波拿巴主义的统治形式是与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特定阶段相对应的，其标志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达到了一种脆弱的均势状态。（GW 1，第 351、439 页）

跟蒂兰西类似，托洛茨基也认为这种均势是灾难性的："两个强有力的阵营彼此对立，毫不妥协。用议会的办法，任何一方都无法获胜。……这样一种社会分裂状态预示着内战即将爆发。在统治阶级中，内战的威胁引发了对仲裁人和主人即恺撒的需要。而这正是波拿巴主义的功能。"（同上书，第 341—342 页；参见第 351 页，第 423 页及以下，第 439、503—504、678—679 页）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进一步的力量变动，即工人阶级的无法逆转的失败，为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胜利创造了条件。相对于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新的特点。（同上书，第 57、182、194、357、364、425、477、578—579、681、721—722、735 页）如果法西斯主义运动同波拿巴主义相反，能够通过对小资产阶级进行动员和军事化而击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它里面，法西斯主义运动把内战制度化了——那么攫取了权力的法西斯主义一定又会退化为一个波拿巴主义政权，并丧失其社会群众基础。（同上书，第 232—233、353 页等处）

3.3 不论塔尔海默的立场和托洛茨基的立场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托洛茨基多次批评塔尔海默，参见上书，第 104 页及以下，第 277 页，289 页及以下，第 418、542 页，第 742 页及以下；另参见 Griepenburg/Tjaden 1966 的批评），他们两位都在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之际提出了工人运动内部最富有远见的分析，特别是他们都得出了应在工人运动内部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结论，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国际灾难性的官方方针，其表现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社会法西斯主义论"）。

4.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将波拿巴主义理论的一些要素转用于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领域研究的是随着第一个工人国家即苏联的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居于政治原子化的社会之上，依赖警察和军官团的支持并且不容许对自己进行任何监督的斯大

林体制”下，他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波拿巴主义”。（Schriften I. 2，第 978 页）据此，在苏联也出现了“热月”。苏维埃官僚机构的功能是消除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工人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在这个社会基础上，一种“官僚集中制”形成了。官僚机构越是独立和强大，这种集中制越是向波拿巴主义发展。托洛茨基比较了“苏维埃波拿巴主义”和拿破仑一世的波拿巴主义：与后者捍卫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类似，前者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不仅反对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而且也反对无产阶级群众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而作出的努力。（Schriften I. 1，第 568 页及以下和第 581 页及以下；关于对其的批判，参见 Deutscher 1972，第 296 页及以下）

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波拿巴主义理论的一些内容被多次用于分析一系列政治体制和历史局面。例如，它们曾被用于分析佛朗哥（Franco）时期的西班牙、庇隆（Perón）当政时期的阿根廷、卡斯特罗在古巴的作用、戴高乐（de Gaulle）和巴黎五月风暴的关系以及葡萄牙革命，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就此而言，波拿巴主义理论似有变成普世公式的趋势：通过对这个公式的机械套用，千差万别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政治统治形式都被等量齐观了。但是，波拿巴主义理论不能取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只能被理解为分析复杂社会现实的初步进展，只能被看作对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初步把握。

289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Hg.),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Theorien über die sozialen Ursprünge und die Funktion des Faschismus*, Frankfurt/M 1967; L. Basso, *Gesellschaftsformation und Staatsform. Drei Aufsätze*, Frankfurt/M 1975; B. Constant, »Vom Geist der Eroberung und der Ursurpation in ihrem Verhältnis zur europäischen Zivilisation« (1813/1814), in: ders., *Politische Schriften*, Werke III, Berlin/W 1972, 231-406; I. Deutscher, *Trotzki*, Bd. 3, *Der verstoßene Prophet, 1929-1940*, Stuttgart ²1972; R. Griepenburg, K. H. Tjaden, »Faschismus und Bonapartismus«, in: *Argument* 41, 8. Jg., 1966, 461-472; M. Hess, »Rechte der Arbeit« (1863), i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Köln 1962, 343-365; V. Hugo, *Napoléon le petit*, London 1852; G. Jungclas, *Die Formen des kapitalistischen Staates*, Hamburg 1972; F. Lassalle, »Der italienische Krieg und die Aufgabe Preußens« (1859), in: *Ges. Reden u. Schriften*, Berlin 1919/1920, 13-148; E. Mandel, »Trotzkis Faschismustheorie«, in: Trotzki, GW 1, 1971, 9-52; K. Marx,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in:

Studienausgabe, hgg. v. H. J. Lieber, Darmstadt ²1975; R. Miliband, *Marx und der Staat*, Berlin/W 1971; N. Poulantzas, *Faschismus und Diktatur.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Faschismus*, München 1973; der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²1975; P. J. Proudhon,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 L. v. Stein,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Leipzig 1850; A. Thalheimer, *Beiträge in Gegen den Strom*, Jg. 1930 (a); ders., »Über den Faschismus« (1930b), in: Abendroth 1967, 19-38; A. D. Tocqueville, *Über die Demokratie in Amerika (1840)*, Stuttgart 1959; L. 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73; W. Wippermann, *Die Bonapartismus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Stuttgart 1983.

维尔纳·马肯巴赫（Werner Mackenbach）撰
张志超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Bauern, Bourgeoisie,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Bürokratie, Einheitsfront, Faschismus, Herrschaft, Kapitalistenklasse, Klassengleichgewicht, Kleinbauern, Kleinbürger, Krafteverhältnisse, Lumpenproletariat, Militär, Militärdiktatur, passive Revolution, Proletariat, Reaktion, relative Autonomie, Sozialfaschismus, Staat, Stalinismus, Überbau, Unterentwicklung

290

交易所（Börse）

A: burșa. – E: stock exchange.

F: bourse. – R: birža (биржа). – S: bolsa.

马克思、恩格斯曾屡屡抨击这个一群地道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K I*，MEW 23，第 783 页）鼠一窝的“输赢以几百万、几千万计”（MEW 19，第 289 页）的“财神庙”。在交易所里的赌博里，资产阶级社会达到“不道德的顶点”（*Umrisse*，MEW 1，第 515 页），这个“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使资产阶级社会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MEW 39，第 14 页）转变为自己的反面，“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K III*，MEW 25，第 456）。社会主义者应该抓住“交易所的诈骗行为”，把它如实地描绘成“资本主义盈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简直变成了盗窃”。（MEW 35，第 430 页）——交易所里发生的事

情令很多社会主义者感到费解。“没有人，”布莱希特写道，“能把小麦交易所里的事情向我讲得明明白白……直到我现在读了马克思。”（GW 20，第 46 页）

马克思、恩格斯熟悉交易所的运作。恩格斯曾作为纺织工业家在曼彻斯特棉花交易所活动，曼彻斯特是当时世界领先的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其棉花交易所是“英国工业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Lage*，MEW 2，第 273 页）。马克思偶尔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投机，收益不定。（参见 MEW 7，第 296 页及以下；12，第 31 页及以下；30，第 417、665 页；32，第 652—653 页；35，第 352—353 页）恩格斯认为，一个人可以个人完全做一个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MEW 35，第 444 页）。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从自己的敌人那里把钱夺回来”（MEW 30，第 665 页；参见 35，第 425 页）。马克思被迫移居英国首都之初，开始第一次全面研究交易所事务的机制。（参见 MEGA IV. 7，第 52 页及以下，第 131 页及以下）但是马恩二人都觉得，“交易所的证券投机”“没有理论上的意义”（MEW 32，第 58、60 页）。在他们看来，交易所经纪人是资本主义所颠倒的世界的极端表现。（参见 MEW 37，第 488 页；*K IIII*，MEW 25，第 325 页）

291

但是二人明显有意识地与流行的对交易所（及“交易所犹太人”）的漫骂划清界限。第一，交易所“只改变从工人身上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本身而言，起初可以说是无所谓的”（MEW 35，第 428 页；参见 39，第 13—14 页）。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可以且应该静看剥削阶级的不同集团在交易所里争夺分配额，而不要错抱了同情态度。（MEW 35，第 430 页）第二，交易所的作用，在“历史意义”（MEW 39，第 13 页）上，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变得清楚起来。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交易所。就这一点，恩格斯 1895 年撰写了《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但是只有一个七点的提纲。（MEW 25，第 917 页及以下）马克思的《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Ms 63-67*）论信用的章节也零星谈道，“交易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MEW 25，第 917 页）。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构规划中，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曾设想写作一篇《资本作为货币市场》（*Das Kapital als Geldmarkte*）。（MEW 42，第 188 页；MEGA II. 1. 1，第 187 页）这一章应该放在计划中的《资本论》的结尾，因为“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

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泉**”（同上书，第 201 页；第 199 页）。相应的几章始终没有动笔。恩格斯也希望在他计划写作的增补中，简要勾勒交易所 1865 年出现以来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地位的变化。

交易所是特别有组织且“集中的货币市场”（*K III*，MEW 25，第 528 页），它最初不过是从事专门货币业务的商人的联合会，他们开办了非对外开放的特
292 殊市场并为此制定了特殊的交易规则。今天大部分的交易所依然是形式上封闭的市场，虽然受国家针对有价证券及其他交易所商品颁布的法律约束，但是只由交易所成员及其委任的代理人自行管理、监督。一些交易所（在马克思的时代在伦敦、巴黎，今天在纽约、东京、伦敦）起着国际货币市场中心的作用（参见 MEW 34，第 371 页），国际上的货币和有价证券交易，很大一部分在大型世界交易所中进行。

货币交易（及货币交易资本）和商品交易（及商品交易资本）分离，前者有“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MEW 37，第 489 页）。货币交易扩大到信用交易，也就是生息资本的交易，依靠特殊信用工具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到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交易。交易所里的活动纯粹是“买空卖空”，货币在其中流通，但是这里的货币流通不表示任何“实际商品交换”。（*K II*，MEW 24，第 344 页）证券交易所是一类特殊的商品，即有价证券流通的市场。

有价证券自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品，至多是**虚拟商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交易所里即使**资本**本身也要**当作商品**来交易。这里资本以证券形式流通，化为不同种类的利息证书、利润证书。（参见 *K III*，MEW 25，第 487，494—495 页）这种商品的“价值”和土地价格一样是**虚拟的**，纯粹由于利息或利润的资本化而产生，对利息或利润的所有权由证券确定下来。这种虚拟价值只能作为“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而存在，也就是作为这种证券每一次在交易所正式成交的价格，这种“价值”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第 494 页）行情的变化取决于利息率的涨落，取决于收益或收益期待的变动，尤其取决于交易所贸易特有的投机。（参见第 494—495、510 页）

投机。马克思将投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因素，但它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他多次写到这样一种直到今天也屡见不鲜的情况——工业企业家将其资本的相当一部分从生产中抽出，投入到股票和商品交易所的投机中。（参见

293 *K I*，MEW 23，第 206 页，注释 14；*K II*，MEW 24，第 109、317、322 页）此外他指出了“投机买卖的普遍化”的趋势，这导致大量的非资产者也被卷入投机当中，由此失去了他们的积蓄。（MEW 12，第 78 页；参见 7，第 95、422 页；17，第 459 页）交易所崩盘使得投机浪潮停顿，巨量“想象的财富”化为乌有，给破产的资本家以及参与投机的小资产者、雇佣工人造成切身的冲击，在马克思看来只是每一次周期性大危机的正常环节——没有哪一次危机不发生货币（市场）危机。（参见 *K I*，MEW 23，第 152 页；7，第 107 页；34，第 463 页，第 371 页及以下；35，第 156 页）

但是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交易所崩盘并不一定总是工商业的普遍危机的开端或顶点。1879 年的危机中，伦敦货币市场迥异于之前的历次危机，出奇地稳定，这个“例外现象”，马克思用“法国货币”（MEW 35，第 156 页；参见 34，第 371、463—464 页）大量流入来解释。但是他认为，投机一般而言遵循工业的周期起伏。“危机一般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为日趋严重的积累过剩提供“暂时出路”。危机一般“首先爆发在投机领域中”，后来才波及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只不过是作为生产过剩征兆的过分投机。”（MEW 7，第 421 页）

正如马克思早已明确指出的，投入“交易所下投机事业”（*K II*，MEW 24，第 341 页）的绝不仅仅是暂时用不上的货币资本；相反，通过银行和有价证券交易商，货币资本被大规模贷出，无节制地参与投机。因此交易所行情的震荡完全可能引发货币危机：大量货币被贷出，用于收购有价证券或支付之前购买的有价证券。同样，货币危机也会导致交易所崩盘：大量有价证券被抛售，以换取现金到手用来支付。（参见 *K III*，MEW 25，第 528、544—545 页）在传统的危机中，利息率暴涨，有价证券价格下跌，那些还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抢到”（第 373 页）一大笔虚拟资本。

在危机中，虚拟资本既会大量地化为乌有，也会被重新分配。投机的某些 294
形式会影响到繁荣周期的进程。马克思详尽写到过（交易所之外的）投机诈骗活动的几种形式，尤其是“汇票投机”，不过它在今天只能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了。（参见第 421 页及以下，第 507 页、第 529 页及以下，第 556 页）但是（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货币资本、凭借纯粹的投机活动攫取他人的货币资本的“骗子”一类的人物（参见第 505、531 页），正在交易所中起着重要作用的。

交易所的地位转变。恩格斯1895年写到交易所的角色转变：一开始交易所还一直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次要的要素”，“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是国债券。股份制（17世纪初以来）相对少见，更不常用于“直接生产”的企业或银行。股票投机扩大规模，主要发生在需要巨额投资的企业。（MEW 25，第917页）交易所的首要职能还是公共信用，是“资本家们互相夺取他们积累的资本的地方”（同上）。交易所业务，至少盈利的业务，主要是国债券。交易所经纪人首先是国家债权人（食利者）或国家信用的中介人（金融家），本身就完全是一支政治力量。（参见MEW 7，第12页及以下；MEGA I. 10，第119—120页；MEW 8，第121页；MEGA I. 11，第105页）

恩格斯指出，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货币资本的持续积累过剩。“为了便于这样流来流去的大量货币资本得到使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创造出了新的企业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或改变现有的企业形式，以便于资本家将多余资本投入到其他企业中，不承担本企业风险的同时让自己的私人财产分沾利润。股份公司的形式在工业中迅速扩展开来，占领了所有工业部门和商业，最后甚至占领了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于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巨量”新股票都涌入了交易所。（MEW 25，第918页）产生了纯粹的金融信托公司，它只买卖以股票为主的有价证券，本身的组织形式也是股份公司，自己的股票也在交易所中交易。（参见第488页）产生了一种真正的“股票上层建筑”，它使所有资本主义所有权或可利用的所有权都取得了一种纸质的特殊存在形式。银行成为抵押土地的持有者，连同地产抵押银行的股票一起，“地产的实际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所手中”（第918页）。

因此货币经营业、有价证券交易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资本主义生产、贸易、交往方式、信用“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交易所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第917页）于是交易所经纪人取得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中越来越多部分的“直接统治”（MEW 37，第489页）。产生了一批资本家，他们的“社会活动”就是“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交易所投机”（*AD*，MEW 20，第259页；MEGA I. 27，第443页）。因为越来越多的资本家进入交易所，社会资本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被卷入“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MEW 19，第222页）的交易所投机，所以交易所从纯粹的寄生物、附属物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杠杆。交易所（不可避免的投机）交易虽然只改变现有资本

和财产的分配，但是它“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MEW 35，第 428 页）。交易所“正在把所有完全闲置或半闲置的资本动员起来，把它们吸引过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第 450 页）。交易所成为“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MEW 37，第 413 页），同时是“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MEW 39，第 14 页）的重要力量。只有证券交易所才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巨量资本，因此交易所是“蒸汽机那样的革命因素”（MEW 35，第 428 页）。

交易所和政治。大型国际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参见 *Klassenkämpfe*，MEW 7，第 24 页；MEGA I. 10，第 130 页），甚至“绝对君主制由于……国债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MEW 4，第 340 页）。无论国家形式如何，现代国家中总存在“政府和交易所的联盟”（*Ursprung*，MEW 21，第 167—168 页）。一方面每一个政府都需要交易所，另一方面“国债的大债权人和大投机者”至少有一点共同利益，即金融上“国家政权的稳定”，这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18. B*，MEW 8，第 182—183 页；MEGA I. 11，第 164 页）“金融贵族”对“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有着直接的影响，后者是交易所投机的二流人物，早就注定是职业投机客手里的牺牲品，他们的利益在于便捷的投机、高额的回报、上涨的行情，尤其在于一个能够且愿意支付的、充分商业友好的稳定政府，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Klassenkämpfe*，MEW 7，第 78 页；MEGA I. 10，第 181 页）为金融贵族所共有、所代表。每一个政府，如果在其执政期间生意景气，就会享受到交易所的信任；资产阶级的商业利益会压倒任何政治信条。“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 1850 年写道，“（即）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MEW 7，第 434 页）

但是二人丝毫没有妖魔化交易所投机者的力量。英国和法国尤其有一种流传甚广的看法，认为“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有交易所和商人”。恩格斯对这种（小）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标准公式，只有嗤之以鼻。（参见 MEW 39，第 255 页）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论交易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开启了对交易所及其功能的分析。希法亭（1910）和伦纳（1924）将交易所视为市场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资本本身在其

中以各种证券形式作为商品而交易。交易所和银行一样，是现代信用体系的组成要素，是组织程度高的、国家调节的虚拟资本的市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尝试，根据每次所交易的特定“商品”的种类来区分交易所业务和交易所类型，系统地区分了价值证书和剩余价值证书。（参见 Hilferding，第 173—174 页；Renner，第 246 页）货币、货币证书、商品证书和剩余价值证书（利润证书和利息证书）是交易所特有的商品。相应地有（通常没有特殊细分的）有价证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多数特别针对特定的世界贸易商品，以原料为主）和黄金交易所；外汇交易通常与有价证券交易合为一体。交易所，作为证书交易者的官方联合会，将证券检验之后按照规定的标准形式，集中地、大笔地投入到正式交易中，每次确定证券的实际市场价格（交易所正式牌价）。于是，
297 各种证书通过交易所获得了特殊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不再表明个人资本家之间个人的交易，而只代表货币和盈利。

这类证券作为交易所商品，和个人资本家的个人信用相脱离，是“这个恶劣的资本主义世界里所可能有的最好的证券”（Hilferding，第 175 页）。因此购买这类证券等于投资：它们永远不会消费掉，只会短暂地退出流通，又随时可以重新返回。于是依靠交易所，借贷资本家的借贷资本成了始终可转让的商品，而且他们还可以从这种商品的价格波动中获利。交易所里交易的商品（即使商品交易所里交易的标准的世界贸易商品）都纯粹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代表，交易只促进投资，因此表现为投机的特殊形式。投机是“交易所的特殊活动”（第 178 页）。

在交易所投机的人是谁？希法亭（第 211、181 页）和伦纳认为，形成了一个“资本家自己的阶级”，即“投机者”或“投资资本家”，他们只把（自己的和/或别人的）资本用于投入交易所商品，根据差额利润决定买和卖，也就是干投机（Renner，第 247、249 页）或者说中介交易所商品的交易。除了这些纯粹的投机者，银行（商品交易所里的大商户）是交易所交易中最重要的玩家，因为银行把所有资本家此刻寻求投资机会的货币资本以及资产阶级社会所有阶级的货币资产和积蓄集中投进市场。最后，交易所总需要一个由所有阶级的货币占有者组成、通过银行和/或交易所代理商买卖有价证券的“公众”（Hilferding，第 213 页）。他们由所有阶级的货币占有者组成，通过银行和/或交易所商人来买卖有价证券。没有公众就没有投机，因为投机利润总是差额利润，也就是说，一帮人的投机利润总意味着另一帮人的损失——一群人必定最

终要蒙受损失，才使其他人（通常是职业投机者和银行）可能得到盈利。（参见第 180 页及以下）

虽然希法亭认为，“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交易的技术，而是交易的内容”（第 192 页），但是投机产生出特殊的买和卖的形式，使得交易所的交易同普通商品的交易判然有别。交易所的
298 机制允许迅速、非正式地达成交易，有利于定期确定、公布牌价和定期支付清算。绝大多数投机交易都用信用办理，交易所交易的各种特殊形式也都以信用为基础，比如在期货交易中，无论买者和卖者在达成交易的时刻实际上是否占有货币或证券，都可以不受影响地买卖有价证券或其他交易所商品。（参见第 194 页及以下）

信用扩大了投机者和投机的范围。同时，信用的交易者即银行取得了交易所交易中的关键地位。银行通过特殊的信用形式（例如抵押贷款、延期交割）参与到众多投机当中，或受到银行客户的委托，或自行投机，将公众的货币资本以不同形式提供给职业的交易所投机者。作为信用的交易者，作为“证券批发商”，作为一系列交易所交易的中介者和货币、信用的贷方，银行能够有力影响到“公众”在投机中买和卖的决定。银行依靠其资本力量和信息优势，通常都是投机的盈利者。（参见第 183 页及以下）

马克思亲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几次著名的“欺诈繁荣季”，情感上完全倾向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而厌恶“不正常的投机”。（*K II*，MEW 24，第 109 页）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交易所和投机是非生产性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又是必要的。（参见 Hilferding，第 179—180、185 页；Otto Bauer，WA 4，第 666—667 页）交易所投机促进资本所有权的集中，促成并加速了股份公司的发展。（参见第 186、190—191 页；第 637 页，第 666 页及以下）证券交易所执行着“动员资本”的根本职能。用于生产或贸易的资本是难以流动的，而且资本的运转周期越长，固定资本的比例越大，流动程度也越低。将资本从生产或贸易部门转移到其他部门，时间和经济成本高、风险大。投入虚拟资本的货币资本则相反，能随时退出交易所再变回货币资本，能通过购买其他剩余价值证书投资到别处。资本既作为工商业资本起作用，同时又是虚拟资本，这样双重存在的资本越多，通过资本所有权证书市场的买卖所完成的这种资本转移也就越有效率。这种资本转移有其本身的风险，风险来自于虚拟资本特有的“价值 299
运动”和投机的影响。但是交易所只能动员那些能够进入流通的货币或交易所商品：货币资本和降低为利息索取权或股息索取权的纯粹的资本所有权。（参见

Hilferding，第186—187页）资本所有权本身变得机动，因为交易所“对资本家个人来说，通过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化，赋予产业资本以货币资本的性质”（第191页）。

但是另一个论点，即利润率通过交易所，或依靠银行拉平为平均利润率，是有问题的。（Hilferding，第188页；Renner，第248页）即使交易所在每次现有货币资本（其中一大部分是剩余价值的积累）的分配和重新分配中发挥关键作用，有价证券行情的波动也至多拉平投资资本家个人的投机盈利和损失，而不会减小利润率的实际差距。商品交易所则相反，希法亭认为，它首先起节约费用的作用：使工商业资本家得以缩短资本流通时间，降低建立储备的费用，减少后备货币资本。而且交易所式的（投机）商品交易，使商业资本的一部分商业职能得以转移到（银行）生息资本上。商品交易所也就降低了社会资本的流通费用。（参见第208页及以下，第228—229页）

交易所的功能转型。恩格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交易所的作用会急剧增强。马克思有一些简略的评注，比如他提到有价证券的数量长期增长、“货币资本家”人数和财富都在增加（参见*KIII*，MEW 25，第527、522—523页），也令人产生相似的看法（参见Renner 1924，第249—250页）。布哈林（1926，第2页及以下）着重强调食利者阶层的增长，而这个阶层内部又根据其有价证券占有情况而有着区别。相反，希法亭对交易所长时段的功能转型有更细致的观察。他认为，交易所最初最重要的职能是（商业）支付信用和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之间的中介，也就是票据交易。这一功能，包括银行之间的国际支付交易的中介，都从交易所转移到银行。交易所真正的活动领域变成了有价证券交易。（参见1919，第177页及以下）

交易所交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核心 300
的交易所中。（参见第191—192页）银行本身也成为有价证券的交易者，最初主要受银行客户的委托，后来逐渐自行交易。银行业集中的趋势不断增长，大银行作为有价证券交易者的作用随之增强。银行取代了交易所的一部分职能，自己在交易所外办理越来越多的有价证券销售业务。同时，银行在交易内的权力、支配交易所的权力、作为投机活动中的债权人和大投机者的重要性也增强了。（参见第199—200页）

列宁吸收了希法亭的这一论点。他尖锐地指出，“旧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绝对需要交易所作为自己的调节器”，而在“新的”垄断资本主义中交易所不再占有核心地位。因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也表现在

"交易所作用的降低"上面。(*Imp*. LW 22，第221页及以下）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激烈反对列宁这一观点。他认为，交易所和投机起着为过剩积累提供出路的功能——一种"资本对内输出"的功能，资本输出和投机是一对"平行现象"。(1929，第536—537、543页）既然过剩积累长期增长，交易所的作用就肯定不会减弱。格罗斯曼举出投机规模在繁荣周期进程中不断波动的事实作为例证，并指出，交易所成交额实际在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银行信用（抵押贷款和延期交割）也和投机紧密相连。(第537页及以下）

跨国资本主义中的交易所。虽然很多人认识到，不深入分析信用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就难以相应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参见例如Culter等1978，第94页及以下；Harvey 1982，第273页；Frankel 1983，第129页及以下），但是研究交易所在其中作用的著作却不多。交易所贸易进一步地集中化、国际化了，实际参与交易所贸易的资本也跨国界流动。交易所的职业经理人大军中，绝大部分是商业界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全部或部分地以佣金为工资。依靠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世界范围的投机的速度和规模都大幅增长。同时交易所贸易和投机也进一步专业化。出现了几乎只经营期货和期权贸易的交易所。每年在世界贸易中买卖的商品，会在投机中数度流通。所有大企业，而绝不仅是（大）银行，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商品、外汇和有价证券的投机。现代股市不仅有职业投机者，还产生了"证券企业家"，他们通过手头的大宗股票建立、扩建康采恩，业务只限于重新分配现有的资本财产以及成立新的资本公司。对他们而言，投机收益和买卖股票的利润，重要性不亚于工业和商业的利润。 301

跨国资本主义中，社会资本最重要的部分以虚拟资本的纸质形式存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大）资本家能免于每日围绕所有权重新分配的争夺。大部分人能做的，只剩下参与投机，使自己的财产免遭其他投机者剥夺。但是投机会波及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不能参与投机的。大银行和大交易所经纪公司是国际投机的主角，国际投机的规模、范围和速度，产生出了一种"赌场资本主义"(Strange 1988），其中自发的和自觉的理性活动，比如外汇期货交易（曾经有利于国际贸易融资）成了动荡和不稳定的长期根源。1987年10月19日的交易所大崩盘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交易所崩盘"(Mandel/Wolf 1989，第30页）。原先的神话，已形成世界网络、全部电子信息化、组织程度高的交易所不会再发生1929年10月"黑色星期五"那样因

际范围的交易所崩盘或恐慌，也理所当然地就此破产。

参考文献：

N. Bucharin,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Rentners. Die Wert- und Profittheorie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1919), Wien 1926; A. Cutler, B. Hindess, P. Hirst, A. Hussa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2 Bde, London 1977/1978; B. Frankel, *Beyond the State? Dominant Theories and Socialist Strategies*, London 1983;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1982;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Frankfurt/M-Wien 1968; P. Lafargue, »Die ökonomischen Funktionen der Börse. Ein Beitrag zur Werttheorie«, in: *NZ*, 15. Jg., 1897, Bd. I, 612-645; E. Mandel, W. Wolf, *Cash, Crash & Crisis. Profitboom, Börsenkrach und Wirtschaftskrise*, Hamburg 1988; K. Renner, *Die Wirtschaft als Gesamtprozeß und die Sozialisierung*, Berlin 1924; S.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Oxford 1986.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撰

曹旸 译，杨柳新 审

参见：

Aktiengesellschaft, Bank, Finanzkapital, Geldarten, Handelskapital, Kapital, Kapitalismus, Kredit, Konkurrenz, Markt, Staatsschulden, transnationaler Kapitalismus, Weltgeld, Weltmarkt

资产阶级（Bourgeoisie）

A: būrdjūwāzīya.

E: bourgeoisie, middle classes.

F: bourgeoisie.

R: buržuazija (буржуазия). – S: burgesía.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因为“随心所欲地”将“德语中‘Bürger’这个词……一会儿解释为‘citoyen’（公民），一会儿解释为‘bourgeois’（资产者）”而被批判。（*DI*，MEW 3，第 184 页）虽然该词在词源学上与“资产阶级”出处相同（Canard 1913，第 32 页；Riedel 1972，第 672 页），但是其内涵意义的发展却不同。马克思经常采用法语概念或者有意识地谈“政治市民”（*politischer* Bürger），用以与“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相区分。（MEGA I. 2，第 87 页；MEW 1，第 281 页）对“Citoyen”（公民）作的“St-

aatsbürger”（国家公民）的翻译1789年出现在维兰德（Wieland）主编的《德意志墨丘利》（*Teutschem Merkur*）（参见Feldmann 1904/1905，第339—340页）中，但只是一种辅助设计。德国的“Bürger”（市民）介于“Bourgeois”（资产者）——作为一种指向经济要素的地位名称——和本质上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定义的“Citoyen”（公民）之间。

这种意义上的“市民阶层”（Bürgertum）在语义学上的所指比“资产阶级”要宽泛，并且没有后者那么适合于指称一个通过经济利益和地位而定义的阶级。比如，一个共和国的“公民”（Bürger），即“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在享有相应的权利时就可以是无产者。在法国革命中，“资产者”（Bourgeois）这一表述从法律术语转变成了阶级名称，并且获得了一种贬义的内涵意义。（Meschke 1952；Militz 1979，第199—200页）

在英语中，这一翻译问题恰好要反过来看。法语的*citoyen*（公民）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公民）；而在指称“资产阶级”时，却往往使用中等阶级（*middleclasses*）这一名称。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前言中，恩格斯倡导了一种语言规定，将“*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即和所谓的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MEW 2，第234页；比较Marx，MEW 8，第35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的主编因此说明，这一“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用英语撰写的著作中经常被使用的词语中等阶级”是“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译作资产阶级的”。（第XV页） 303

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中，“资产者（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出现在就黑格尔（尤其是在*RPh*，§§182—256）的市民社会概念展开的争论中。这一争论引出的问题是：资产者（*bourgeois*）、公民（*citoyen*）和人（*homme*）——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情况下——处于何种关系中？黑格尔承认，市民社会中个体的行动是自利的。他们“作为这种国家的市民来说就是私人，他们都把自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187）。对他来说，“**市民（资产者）**”在“整个市民社会中”构成了对象；相反，从“需求的观点看”，“具体的观念，即所谓人”则是这种对象。（§190）“市民社会和国家彼此分离，”马克思在其批判中写道，“因此，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原文缺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此处含有的‘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据该书补。——译者）。作为一个

真正的市民，他处在双重的组织中，即处在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国家的，即不触及市民及其独立活动的行政权在外表上和形式上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但是在后一种组织中，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处在国家之外的；这种组织和政治国家本身没有关系。”（MEGA I. 2，第 86 页；MEW 1，第 281 页）

在《论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中，马克思为宗教信仰自由作了辩护，称其为人权和私事。其论点是，虔敬的人，“某个特殊宗教的信徒”，跟自利的人即资产者一样处于与公民的同一种矛盾中。（MEGA I. 2，第 149 页；MEW 1，第 355 页。参见 Haug 1993，第 211 页；Claussen 1987，第 69 页）就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那样，与公民的对立在此还是核心问题。（MEGA I. 2，第 159 页，MEW 1，第 366 页）在黑格尔通过私利来规定资产者时（“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RPh*，§ 182），《德意志意识形态》却加入了一种新的规定：“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关系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MEW 3，395）已经在此处，但首先是在《共产主义原理》（MEW 4，第 361—380 页）和《共产党宣言》等政治纲领论著中，资产者—无产者这对对立概念占据了核心位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资产阶级这一术语最终越来越多地 304
隐退到了“资本家阶级”这一功能分析概念后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评论中，这一概念仍然在被使用；在此，它首先在描述历史变迁方面发挥着描写性的作用。（参见 *Die englische Bourgeoisie*，MEW 10，第 645—649 页；*Die Bourgeoisie und die Konterrevolution*，MEW 6，第 102—124 页；*18. B*；*Klassenkämpfe*；*Die Republik in Spanien*，MEGA I. 24，第 130 页及以下）在此，一个广义上的资产阶级概念，“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MEW 10，第 648 页），与一个狭义上的、通过与小资产阶级相界定而定义的资产阶级概念并列在一起了。相应地，如果“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的，它的产生是由于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由竞争和财产集中”（MEW 4，第 44—45 页），“小商贩”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

在与小资产阶级相界定时，资产阶级获得了其作为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利益、握有更多财富、更坚决果断的阶级”（Engels，同上）的社会特征。“资产者代表世界贸易、全世界范围内商品的直接交换、银钱业、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大工厂工业……。小资产者代表的是地方利益，资产者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小资产者发现，只要他能在间接影响国家立法的情况下直接参加省政机关，同时又做自己本地市政机关的主人，那他的处境就十分安全了。资产者如果不直接地、经常不断地控制本国的中央行政机关、对外政策和立法，就无法保障自己的利益。”（第45页）

明显地，为了让英国读者能够读懂，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中补充了一个定义：“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MEW 4，第462页）将资产阶级限定在现代资本家当中，虽然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但却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一限定并不包括比如食利者，并且并未说明在国有的或其他法定的所有制形式——如股份公司——作为所有者取代个体所有者时，谁属于资产阶级。（参见Macherey 1983，第182页）如果在两分的思维模式中——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的主要阶级——封建等级和阶级在经验上的持续存在要得以分析，就会出现其他问题。

从等级到阶级。在早期著作中，偶 305
尔会谈到“市民等级”（参见MEW 1，第299页）和“城市等级”（MEW 1，第65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等级”和“阶级”还是同义词（MEGA I. 2，第180页；MEW 1，第390页）。在有了关于封建的城市市民阶层到资产阶级的转型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形成过程而实现的这一认识后，这些术语就消失了。“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决定性的转型随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而来，而这种分离是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MEW 1，第284页）“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MEW 4，第181—182页，注释）

马克思区分了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旧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Elend*，MEW 4，第181页；参见第346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作为这种“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的起源追溯到“中世纪的农奴”：“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产生于他们中间，而这些自由居民又构成

了“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Manifest*，MEW 4，第 463 页）

在此过程中，多种因素起了作用：（1）发展中的城市间新的交通结构的形成（参见 MEW 3，第 53 页）；（2）作为某种货币和商品交换基础的欧洲以外地区的殖民化，这种交换“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MEW 4，第 463 页）；（3）“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同上）所排挤，而后者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开始解散了，此时，“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第 469 页）；（4）自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以来，持续发展生产力的强制（第 465 页，参见 *KI*，MEW 23，4 Abschnitt）。大工业使“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的统领，即现代的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第 463 页）。

在对欧洲内部情况的比较中，《共产党宣言》在政治—经济层面延伸了“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其地位在“公社”里，“在法国形成的城市里”或者在“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如“在意大利和德国”有了转变，并成为“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资产阶级成了“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所处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取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第 464 页）

“文明使命”与野蛮。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些直截了当地赞美资产阶级的著名表述，它们将资产阶级描写为“非常革命的阶级”（第 464 页），甚至描写为真正的革命主体。“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这些表述描绘了这种进步的两面。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第 466 页），将“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第 464 页），并且“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同上）。它“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第 466 页），由此创建世界市场和“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

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同上）——马克思越来越将这一现象中所包含的欧洲中心论的视点视为问题，就像他越来越将为了进步而赞美进步视为问题一样。《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Die künftigen Ergebnisse der britischen Herrschaft in Indien*，1853）使马克思发问，资产阶级是否“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MEW 9，第 224 页），正如“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第 225 页）。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在接受史的层面上，《共产党宣言》的二分模式发挥过最大的影响。在《神圣家族》（MEW 2，第 37 页）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一模式就已经出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基于其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恩格斯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比作“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间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间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MEW 2，第 351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归因于一个双重的形成过程。在“市民等级”自身形成阶级而“与封建体系割断联系”时，就有了“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即无产阶级的形成。（MEW 3，第 76 页）

《共产党宣言》将这种阶级对立的双极性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形态与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的特定的差异，因为在以前的社会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阶层。……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MEW 4，第 462—463 页）。

这一抽象的二分可能与《共产党宣言》的宣传鼓动旨趣有关，但是，在思考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时，它却会引起质疑。比如，一种反对意见是，如果人们不提出在主要阶级之外存在过渡阶级的假设，不区分阶级成分，就很难恰当地分析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

(Giddens 1979，第 34—35、122 页）但是，在涉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Klassenkämpfe*，MEW 7，第 21 页）——他们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第 33 页）——的政治作用时，这一两极模式并没有妨碍马克思在具体的分析中对阶级成分进行区分。不能孤立地理解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这一认识进一步支持了这一两级模式。只有在其与“无产阶级的发展阶段”的辩证的交互关系中，这一过程才能得到理解。(Zwahr 1980，第 20 页）先是局限于区域和个体层面，“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
308 间的冲突”（MEW 4，第 470 页）。在此，“工人群众的团结”被解释为“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因为“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经不得不发动……整个无产阶级投入运动”。（同上）但是，资产阶级并不仅仅是跟无产阶级在进行一场“或多或少隐蔽的国内战争”（MEW 4，第 473 页），为了保住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它在“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总是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第 471 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资产阶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资产阶级概念本身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新版《雇佣劳动和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中，晚年的恩格斯一贯地用“资本家”取代“资产者”一词和用“资本家阶级”取代“资产阶级”。恩格斯的理由是，这里涉及的“不是以马克思 1849 年撰写的，而是以他 1891 年大概会撰写的形式来出版这本小册子”（MEW 6，第 594 页）。并且，尽管恩格斯将《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这一章称为“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MEW 37，第 493 页），但资产阶级概念在这一章中并未出现。

在《资本论》中——除了来自《共产党宣言》和《哲学的贫困》的三处引文（MEW 23，第 511、675、791 页）中出现过资产阶级概念，在第二版前言中为区分政治的和经济的行动者而使用过一次（第 20—21 页）和在《资本论》第三卷（MEW 25，第 403 页）中的一处出现过该概念外——它在重要的段落中只在分析资本积累过程时出现过。“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对马克思来说，“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MEW 23，第 621 页；MEGA II. 7，第 533 页）

这样，《政治经济学批判》再一次

更新了《共产党宣言》将“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视为“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的历史哲学的图像。（MEW 4，第 473 页）“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引文中漏掉了‘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一语，特补。——译者），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第 465 页）两位年轻的作者从中看出了“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MEW 4，第 473 页）的情况。其结论是：“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即无产阶级，“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第 474 页）

事实上，晚年的恩格斯还认为，在（1889 年 8 月到 9 月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自己把自己的使命推给了工人”（MEW 21，第 386 页）。在注意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兴起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时，他不再将这一事件归因于贫困化，而是归因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的结构变化。在具有新维度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的情况下，资产阶级被认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Utopie*，MEW 19，第 228 页）

无论是否多余：“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具有一些破坏性的潜能，但是，不像《共产党宣言》所认为的那样（MEW 4，第 473 页），它只是这一进步的无意志的和无力抵抗的担当者。这一点构成了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存在的决定因素。虽然资产阶级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第 474 页）——葬礼却暂时被推迟了。

参考文献：

M. Canard. »Essai de sémantique: Le mot ‘bourgeois’«, in: *Revue de philologie française et de literature*, 27. Jg., 1913, 32-47; D. Claussen,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Zur gesellschaftlichen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87; W. Feldmann, »Geflügelte Worte«, in: *Zs. für deutsche Wortforchung*, Bd. 6, 1904/1905, 339f. u. Bd. 13, 1912; A. Giddens, *Die Klassenstruktur fortgeschrittener Gesellschaften* (1973), Frankfurt/M 1979; O. de Gouges, »Erklärung der Rechte der Frau und Bürgerin« (1792), in: *Kritische Justiz*, 20. Jg., 1987, H. 1, 145-149; D. Diderot,

309

Art. »Bourgeois, Citoyen, Habitant«, in: *Encyclopédie II* (1751-1780), Édition critique et annotée, hgg. V. John Lough u. Jacques Proust, Paris 1976; U. Gerhard, »Menschenrechte – Frauenrechte«, in: *Sklavin oder Bürgerin.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und Neue Weiblichkeit 1760-1830*, Frankfurt/M 1989, 55-72; W. F. Haug, »Antisemitismus und Rassismus als Bewährungsprobe der Ideologie-Theorie«, in: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209-232; G. Herre, *Verelendung und Proletariat bei Karl Marx. Entstehung einer Theorie und ihre Quellen*, Düsseldorf 1973; P. P. Jaeck, *Die französisch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789 im Frühwerk von Karl Marx*, Berlin/DDR 1979; W. Küttler u. G. Seeber, »Forschungsprobleme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ürgertums und der deutschen Bourgeoisie«, in: *ZfG*. 28. Jg., 1980, 203-222; P. Macherey, Art. »Bourgeoisie, Bürgertum«, in: KWM, Bd. 1, 1983, 182-189; W. Meschke, *Das Wort 'Bürger'. Geschichte seiner Wandlungen im Bedeutungs- und Wertgehalt*, Phil. Diss., Greifswald 1952; H. M. Militz, »'Bürger' im Französischen. Zur Geschichte der Bezeichnungsgebung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Bürgerlichen Revolution«, in: *Linguistische Studien* 59, 1979; K. Obermann, »Zur Genesis der bürgerlichen Klasse in Deutschland 1830-1840«, in: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16. Jg., 1977, 33-69; P. Rétat, »Citoyen-Sujet, Civisme«, in: *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Frankreichs 1680-1820*, München 1988, 69-105; M. Riedel, »Bürger, bourgeois, citoyen«, in: HWPh, Bd. 1, 1971, 962-966; ders., »Bürger, Staatsbürger, Bürgertum«, in: GG, Bd. 1, 1972, 672-725; J. Seifert, »Karl Marx und die Freiheitsrechte«, in: Ossip K. Flechtheim (Hg.), *Marx heute*, Hamburg 1983, 202-219; H. Zwahr, *Proletariat und Bourgeoisie in Deutschland. Studien zur Klassendialektik*, Köln 1980; ders., »Klassenkonstituierung der deutschen Bourgeoisie«, in: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18. Jg., 1978, 21-83.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Florian Schmaltz）撰

秦明瑞 译，沈红文 校

二

现代世界的神话和传说中真正的主角是资产者。对有些人来说，他是英雄；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流氓；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一个能够启示人的和引诱人的人物。他造就了当下，破坏了过去。

“资产者”这一用语于1007年以拉丁文的“**城堡居民**”（*burgensis*）的形式出现，并于1100年被法语以“**城堡人**”（*burgeis*）的形式借用：该词描写的是某个**城堡**（*bourg*）内的，也即某一城区的居民，而这一城区的居民被认为是“自由的”（Matoré 1985，第292页）；相对

于各种义务的自由，这些义务构建了封建体系中的社会黏合剂和经济的内在联系。资产者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农奴，但他也不属于贵族。

这样，资产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非正常的和有歧义的人物。这种非正常性在于，资产者在封建主义的等级结构和价值体系中没有逻辑上的地位。他处于三种古典的等级之外，而这些等级本身正是在资产者概念问世的时候形成的。（参见 Duby 1984）而歧义在于，“资产者”这一用语（今天仍然如此）同时表达着某种恭维和某种谴责。人们说，路德维希十一世（Ludwig XI）曾经为“伯尔尼市民”（*Bürger von Bern*）这一光荣称号感到自豪。（Canard 1913，第 33 页）但是，莫里哀（Molière）写了一部名为《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homme*）的尖刻的讽刺剧（1671），并且，福楼拜（Flausbert）说过一句话：“我称所有低级地思维的人为资产者。”（转引自 Forster 1978，第 15 页）由于这一中世纪的资产者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农民，他们最终被视为一个处于二者之间的阶级，即中等阶层的成员。这一点构成了另一种歧义的基础。到底所有城市居民都是资产者还是只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资产者？手工匠是资产者，或者只有某个小市民（*petit bourgeois*）才是资产者，或者他们都不是？在这一用语开始流行时，它在实践中被与某类相应的收入水平挂上了钩——一个资产者“收入丰厚”，其具有某些消费能力（某种生活方式）和投资能力（资本）。

此后，这一用语的使用沿着消费与资本这两条线而发展。一方面，一个资产者的生活方式可以与一个贵族的生活方式或者也与一个农民或手工匠的生活方式对立起来看。与后者相比，他往往与舒适、优雅的举止和整洁联系在一起。与贵族相比，他却与某种程度的奢侈的缺少和在社会行为方面某种程度的不自信联系在一起（比如，这种不自信在暴发户这一名称中得以体现）。在城市生活获得了多样的和丰富的表现形式后，一个资产者的生活方式就也能够与一个艺术家的或者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相区分了；资产者此时成了秩序、社会风俗、正派和市侩习气的代表，并因此成了所有那些被视为自发的、无拘束的、愉快的和智慧的行为（并且今天被称为“对立文化”）的相反极。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个无产者在不接受资本家的经济角色时也能够形成一种伪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一现象被贴上了“资产阶级化”（*embourgeoisement*）的标签。

如果资产者现在以“巴比特”（Babbit）（参见葛兰西关于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笔记）的人物形态处于现代性的文化话语中心，那么，作为资本家的资产

311

者则处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话语的核心点上。资产者是将生产资料资本化和招雇了雇佣劳动者的人，而雇佣劳动者则生产用于在市场上销售的物品。在来自销售的收入超出生产成本（含工资）时，就产生了利润，而利润是作为资产者的资本家显然在追求的目标。这一社会角色的美德被赞美过——很多人认为资产者是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同样，这一角色的不道德行为也被诅咒过——很多人认为资产者是寄生的剥削者。但是，赞扬者和批判者通常一致认为，资产者——作为资本家——至少从19世纪以来，很多人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一些人甚至认为更早以来曾经是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动力。

正如“资产阶级”概念描写的是介于贵族/地主和农民/手工匠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资产阶级时代（或者“资产阶级社会”）从两个观点出发被定义过：与过去相关联时作为相对于封建主义的进步，而与未来相关联时作为社会主义预言的对立面（或者威胁）。对19世纪来说，这一定义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因为19世纪恰好自认为是资产阶级成功的世纪，是资产阶级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它的全部和真实。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持这种观点。

这样，资产者在文化和政治—经济维度上的现实被19世纪的三大意识形态流派——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明显相似的方式描写过。这涉及他的职业作用（以前他通常是一个商人，但后来他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并且雇有主要从事货物生产的雇佣劳动者），他的经济动机（利润最大化、资本积累）和他的文化特征（他谨慎，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拉布鲁斯（Labrousse）却怀疑能不能有某种普遍有效的定义：“定义资产者？我们永远不会达成一致”（1955，第365页），他要求从近处观察经验真实，并且尽可能扩大观察范围。但是，一切迹象表明，学术界没有接受这一挑战。

下文将考察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语境，在这些语境中，资产阶级概念以某种引起不快的方式被使用。通过分析这种不快，可以找到跨越概念和真实之间的鸿沟的手段和路径。

1. 在历史科学中，经常有一种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贵族化”的现象被描写，根据鲁尔达（Roorda）的观点，这一现象是17世纪在尼德兰的联合省出现的。（1964，第119页；氏著，1967，第196—197页）

在官职买卖的促进下，在法国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中出现了“权贵”（*noblesse de robe*）体系，这一体系实际上呈现了该现象的一种制度化。这里涉

及一些被托马斯·曼（Thomas Mann）
313 在《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中描写的事件，涉及对一个富有家族来说典型的社会行为模式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大企业主巩固了他的经济帝国，并最终成为艺术资助者和——在当下——成为颓废的放纵生活的人或者享乐主义一理想主义的避世者。这里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为了获得某种“贵族的”地位，一个资产者会在某一确定的时期放弃他的文化和他的政治一经济地位。然而，19 世纪以来，贵族地位并不一定与某个贵族头衔联系在一起，而只是简单地与被人们称为“世代相传的财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这一现象的传统符号是土地的获取；这个符号描写的是从资产阶级的工厂主和城市居民到贵族的地主和庄园主的过渡。

在 11 世纪至 20 世纪，在涉及社会地位和文化话语时，从未被质疑的是，做一个贵族比做一个市民“更好”或更值得追求。出于两个原因，这一点值得注意。首先，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是，资产者（从 19 世纪、16 世纪或者更早起）就（曾经）全然是我们政治一经济生活中的活跃人物。一个人为什么要淡出公众视线而苟且于社会场景中的某个古旧的角落？更进一步，在其意识形态的描绘中，封建主义（或者封建秩序）赞美过贵族，但资产阶级生产出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处于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的不是别人，而是资产者。作为支配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是在最近的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间形成的。尽管如此，《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故事在继续着，并且，即使在今天的大不列颠，一个被授予终身的贵族头衔也被视为荣耀的表彰。

2. 一个重要的挑衅性的概念——它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比较常见，但不仅仅限于这种文献——出现在资产阶级对其历史角色的“背叛”这一说法中。这一概念涉及的事实是，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区域的/民族的资产阶级脱离了其“正常的”或被认为是正常的经济角色。取而代之的是资产者成了大地主或者食利者（Rentiers），即“贵族”。但是，这种贵族化超出了某种个人生涯所包含的观点，并且涉及某种集 314
体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这关系到这种角色变换的正确时点的选择，而这一时点应该遵循某种民族日历。如果以某种关于发展阶段的暗含理论为前提，资产阶级应该在某个确定的时点接过国家机器，创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将国家工业化，并且通过这些措施作为集体而积累可观的资本总量——也就是走大不列颠所开创的道路。

在此之后，如果有几个资产者热衷

于贵族化，将无损大局。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这一时点前，那么，集体的民族的转型即使不会变得不可能，也将会变得困难得多。在20世纪，这类分析为某种原则性的政治战略提供了有力依据。第三国际的政党和它们的后继组织将这类分析作为为它们的“民族革命的两个阶段理论”所作的辩护而运用过。这一理论表明，社会主义政党不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进行（第二阶段）负责任，而且在“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的进行中也必须扮演重要角色，因为这种革命——人们在此是这么论证的——是历史必然的，并且必须与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背叛”他们的历史使命的情况相适应地由无产阶级来完成。

然而，这一见解在两方面完全是值得质疑的。令人惊讶的首先是这么一种思想：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既具有接过另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义务，在社会上又具有这种可能性。（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一战略是列宁——或者至少是在他首肯后——提出的，但它具有浓烈的道德主义的意味，这种道德主义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诟病。）而出自资产者自身立场的“背叛”想法则显得更加奇特。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要“背叛”其历史角色？如果它扮演这一角色，不就可以赢得一切吗？并且，因为所有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一致地解释，资本主义的资产者时刻都在追求其自身利益，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在此情况下显然又不能察觉到自身利益？事实证明了这一想法的荒谬性：被诉病为“背叛”了其历史角色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总数事实上包含了各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

3.“资产阶级的贵族化”的说法主要关涉到16至18世纪欧洲国家的事件，“资产阶级的背叛”的说法主要被用于描写20世纪欧洲以外的地区的事件。但是，还有一类首先关涉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发生在北美和西欧的事件的第三种话语。 315

1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指出了现代经济企业的结构史中的一个趋势，他们称之为“财产和控制的分离”。他们将这一现象理解为从一种情形——其中，一个企业的合法的所有者同时也是它的管理者——到一种结构的过渡，而这一分割了两种职能的结构是现代企业的典型结构。在现代，有很多（大部分情况下分散的）合法的所有者，他们除了投入货币资本外并无更多的工作要做；而具有经济决定权的管理者形式上只是领工资的雇员。正如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20世纪的这种现实与19世纪提供的（自由主义的或

者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资产者经济角色的描述不一致。

这一新的企业形式即企业集团的兴起也促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马克思在19世纪曾预言，随着资本的集中，阶级的两极分化也会逐渐加剧，直到最终只剩下一个数量极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数量巨大的无产阶级。（参见*Manifest*，MEW 4，第469—470页；*K I*，MEW 23，第790页）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点在实践中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农业中的独立的小生产者和独立的城市手工业小企业——会通过某种二重过程而消失：一些人会转变成大企业家（也即资产者），大多数人则会成为雇佣劳动者（也即无产者）。虽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没有转而接受这类预言，但是，马克思的预测是完全能与自由主义的论点协调一致的。保守主义的代表如卡莱尔（Carlyle）认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并因此感到不寒而栗。

事实上，马克思的预言是正确的，并且，这两个群体的成员数量在过去的150年内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减少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学家发现，随着这两个阶层的消失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如今，这一认识已成为共识。人们谈论的是“旧中等阶层”的消失和一个由收入丰厚的专业人才构成的“新中等阶层”的同时形成（参见Mills 1951），这些专业人才因为具有一些在大学里获得的能力而在企业集团中担任经理或其他领导职务。这些专业人才起初主要是“工程师”，后来是法学家和医学家、市场营销专家、电脑专家等。这一“新中等阶层”会（像11世纪那样）构成一个中间阶层，但这一中间阶层现在位于“资产阶级”（“资本家”或者“高级经理”）和“无产阶级”（“工人”）之间。资产阶级在11世纪曾经是中间的阶层，但是，在20世纪的术语中“资产阶级”这一用语却被用来描写最高阶层——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人还认为存在三个不同阶层的时候。这种混乱在20世纪60年代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当时有人尝试将“新中等阶层”转换成“新工人阶级”，并且以这种方式将三个阶层还原为两个。（参见Gorz 1967）

这一名称变换首先由于其政治含义而得到支持，但它也暗示了另一种变化：在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方面，专业工人与上文提及的专家之间的差别缩小了。

除此之外，这些“新中等阶层”已经很难用19世纪的范畴来描写了。评价“资产者”的一些标准适用于这些“新中等阶层”：他们收入丰厚，支配着一定数额的货币，这些货币他们可以（首先用于股市和证券）投资；他们显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

316

他们与雇佣劳动者更有可比性，因为他们的收入首先来自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工资支付（也即并不归因于来自占有物和财产的收入）。在这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特征。最后，他们的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经常与清教的限制相矛盾，而这些限制被与某种资产者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他们具有“贵族阶层的”特征。

4.“新中等阶层”在第三世界有一个对应阶层。在第三世界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时，一个很重要的阶层的兴起即已露出端倪。这指的是受过专门教育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在非洲，由于几乎完全缺少其他富裕的
317 人群，这些干部与其他民众相比显得特别突出，因而，他们被一个新生产出的概念描写为“行政机构的资产阶级”。就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而言，这一阶层在完全传统的意义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大多数政体的基础，这种程度使法农认为，非洲的一党制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关于作为欠发达国家中“行政机构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角色，法农写道：“由于在经济上无能为力，并且无法创建连贯的、以他们的阶级统治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选择的是对它来说最简单的方案：统一党。”（1966，第140页）这种统一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现代形式，这一形式没有面具，没有化妆，是无耻的和恶意的”（第141页）。

但是，这些国家官员没有接受资产阶级的传统的经济角色，在这点上他们当然不是资产阶级。他们不是企业家，没有雇用雇佣劳动者，没有引进新的生产资料，不承担经济风险，不追求利润最大化。法农写道，民族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中介活动”（第153页），这个观点当然并不完全正确。行政机构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曾经常扮演这些经典的经济角色，但他们在此情况下并没有被赞扬，而是必须忍受“腐败”的指责。

5. 在还存在的第五个领域中，资产阶级概念和（或）中等阶层概念接纳了一种混乱的，但同时具有核心意义的角色，这一角色出现在对现代世界中国家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中。在这方面，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国家机器的政治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会使一个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成为必然。这一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简短而准确的描写：“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MEW

4，第 464 页）辉格党的阐释的核心出发点是，历史上，人对自由的追求在政治
318 和经济层面上是同样地实现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以代议制民主或者至少以一种议会统治形式为基础。而且，保守主义者抱怨的如果不是冷酷的现金支付占优势地位与传统制度的衰退——这种衰退首先在国家的结构层面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呢？如果保守主义者谈论复辟，那么他们想到的是重建君主制和贵族特权。

当然，也有一些坚定地反对这种主张的声音。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也是在资产阶级成功的阶段及其鼎盛发展时点上，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英国宪制》（*English Constitution*，1864）中指出，在维持使一个现代国家和一种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存续和发展的条件时，君主制度的作用绝对没有发挥完。对马克斯·韦伯来说，世界的官僚政治化——他视其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中的关键过程——在政治系统的顶端根本无法实施。（参见 *WuG*）而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断言，鉴于资产阶级不能接受白芝浩的警告，其政权大厦将不可逆转地倾塌。由于坚持维护其政权，资产阶级在为它自身的灭亡作准备。（参见 Schumpeter 1950，第 213—230 页）所有三位学者的观点都是，将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国家等同起来会比看上去复杂得多。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国家理论，即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基础理论是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一点首先在尼克斯·普兰查斯（1974）与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1972）的辩论中显现出来了。（参见 *New Left Review*，Nr. 58，59，第 82 页和 95 页）

“国家的相对自主”的说法成了一种陈词滥调。实际上，这一说法只是建立在一种基础之上，即在这期间出现了如此多的对“资产阶级”或者“中等阶层”的定义，以至于无法确定哪一个小团体事实上在《共产党宣言》中那句话的意义上在控制国家。并且，这些团体的组合看来也不能拼凑成一个统一的阶级或群体。

这样，当它从中世纪初期开始，经过在旧制度的欧洲中的体现，一直传承到 19 世纪工业主义时代，“资产者”概念似乎在 20 世纪的世界中几乎不能再以 319
确定的方式被应用。更困难的显然是，将这一概念作为解释现代世界的历史发展的阿里阿德涅线团（Ariadnefaden）来使用。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不愿意完全抛弃这个概念。没有一种对我们的现代世界所作的历史的解释可以放弃资产阶级概念或者它的另一个选项，即中等阶层。一些重要的理由在支持这种做法。人们要讲故事的话，不可能不提故事的主角。然而，如果一个概念显得

与现实长期不相符合——这一点对所有重要的、互相竞争的意识形态的解释都有效，那么，就该检查这个概念，再一次质疑它的主要特征了。

6. 思想史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伴随着资产阶级概念。有一种事实扎根于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即无产阶级（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者群体）并非呈现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历史现象，而是逐渐被生产出来的。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其间，世界上的大多数劳动力都是农业生产者，他们的收入有不同的来源，但很少是以工资的形式得到的。如今，全球劳动力的大部分（甚至越来越大的部分）都住在城市，并且在以工资的形式获得劳动报酬。这种转变被一些人称为“无产阶级化”，而另一些人称之为“工人阶级的构造”。（参见 Thompson 1963）关于这一过程存在很多理论：这一过程是各式各样的研究的对象。

同样地，我们也知道（当然较少强调），人们可以（根据某种定义）称为“资产者”的人的百分比现在比以前高了很多。毫无疑问，大概自 11 世纪，肯定自 16 世纪起，这一百分比持续增加了。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谈论作为一个与“无产阶级化”过程平行发生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也没有人写一本关于“资产阶级构造”的书；如果有人写的话，那么更多地会写关于“作为征服者的资产者”的书。（Morazé 1957）

显然，资产阶级发挥过机械降神的作用。“资产阶级/中等阶层”概念的最重要的使用方式见于对现代世界起源的解释中。据神话传说，从前有过封建主义或者一种不遵循商品交易和专业化 320
原则的经济。当时有贵族和农民。然后（偶然地？）有几个城市“市民”，他们经由市场而进行自己的生产和交易。中等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拓展以货币为中介的金融交易领域并由此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奇迹。

换一种方式，但基于同样的想象来表达：资产阶级不仅完成了在经济舞台上的兴起，而且因此也敢于在政治舞台上起义，以期消灭贵族的统治。为了使这一神话获得意义，资产阶级或者说中等阶层就必须是某种直接的存在。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形成过程的某种分析会使这一神话的解释能量受到质疑。因此，人们尽可能避免了进行这种分析。

以这种方式，一个真实的行动担当者即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市民”被物化和变换成了一种未经探究的本体，即征服现代世界的资产者。与这种物化随之而来的是对资产者的心理或者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人们假定资产者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又是一致的。所有三个思想流派的出发点都是，与过去的各个时代不同（并且，尤其是如同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那样，与未来不同），社会中有一个关心自己（并且只关心自己）的主要的行动担当者，即资产者—企业家。他没有社会义务感，不遵守（或者只遵守很少几种）社会规范，并且不断地按边沁的对乐趣和痛苦的数学计算而行事。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将这种行为方式定义为自由权的行使，并且为一种有些神秘的理据辩护，即这种行为会对所有人有利，如果所有人都全心全意地这么做的话。这样就不会有输家，而只会有赢家。19世纪的保守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联合拒绝了这种观点，并且因为自由主义者在道德方面的麻木而愤怒，而具有社会学方面的疑虑。自由主义者视为“自由权”的行使和人类进步的来源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通向“无政府主义”的道路，而长远看来，这种无政府主义将会分解所有将社会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321 不可否认的是，在现代思想中有过一股强大的“个人主义”潮流，其影响在19世纪达到了高潮。也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思维方式——作为原因和效用——在现代社会中一些重要的社会行动担当者的社会性的行为中得到了反映。但是，必须提醒的是要注意论证中的一个逻辑跳跃：个人主义肯定是社会真实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由此却不能得出它是**唯一**重要的并且对现代世界、资产阶级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的结论。

主要问题寓于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的设想中。因为资本主义需要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所以有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完全**自由的流动（或者资本家至少希望如此）。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需要的和资本家希望得到的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流动。因为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借助基于供给和需求的市场机制而运行，所以占主导地位的设想就是，一个以竞争为取向的市场是被需要的或者被渴求的。真正被需要的或者被渴求的却是那些可以同时被利用和被绕过的市场，是那些为一种适度的竞争和垄断的混合提供保障的经济形式。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给那些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以回报的体制，所以人们认为，这类行为方式的普遍流行是被需要的，是资本家希望得到的。而事实上，要求和愿望的发展趋势是，无论资产者还是无产者都形成了一种包含着鲜明的反个人主义取向的心态。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依法确立的所有权基础上的体制，所以人们认为，私有财产已被神圣化，并且其权利会扩展到越来越大的社会互动领域。而事实上

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是以所有权的持续减少，而不是以它们的持续扩展为特征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家总是维护从经济动因出发作经济决策的权利的体制，所以人们认为，资本家对任何影响其决策的政治措施都过敏。而真实情况却是，他们一直尝试利用国家机器，并且他们赞同过政治优先观。

322

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概念的缺陷在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真相被歪曲了。如果说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什么的话，那么它是一种建立在**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上的体制。这种无止境性才是这一体制被赞美或者被诅咒的普罗米修斯精神。（Landes 1973）根据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 1897）的观点，失范显现为这种无止境性的持续的对立面。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41）声称，这种无止境性正是我们所有人试图逃避的状况。

7.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中，马克斯·韦伯描写了加尔文主义的命定论的社会含义。假如上帝是万能的，并且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灵魂的救赎，那么人们就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将属于这部分人。假如他们有这个能力，那么他们将决定上帝的意志并因此夺去他的万能。但韦伯指出，这种说法虽然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是在心理—逻辑上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从这一逻辑中可以得出心理学的结论：由于一切都被预先确定了，任何行为就都是被允许的。同样，由于在涉及唯一合法的目标设想即灵魂的救赎时所有行动都显得无济于事，所以人们可能会变得沮丧，并且放弃任何行动。韦伯声称，一种与心理—逻辑陷入矛盾的逻辑不可能延存，因此必须被纠正。加尔文主义者给命定论原则添加了（至少负面的）预知可能性：尽管我们不能通过我们的行动来影响上帝的行为，但是，某些负面的或者邪恶的行为方式可以被视为我们没有享受恩赐的迹象。此时，在心理学上一切都可以被接受了。我们被温和地强迫做出正确的行为，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行为会是上帝放弃了我们的迹象。

与韦伯的分析相对应，下文将对资本主义伦理的逻辑和心理—逻辑进行区分。如果所有行动的战略目标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那么，艰苦的劳动和自我克制在逻辑上就是被规定的。正如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工资规律存在那样，也存在一种牢不可破的利润规律。人们因迁就自己而浪费的一分钱就是从投资过程中，并且因此从后续的资本积累中抽走的一分钱。但是，尽管这种牢不可破的利润规律表明了一种无可厚非的逻辑，其心理—逻辑却

323

并不严密。如果根本没有个人回报可以预期，人们为什么要做资本家、企业家、资产者呢？在此情况下这显然是不值得的，并且没有人会想成为资本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但逻辑却要求人们这么做，即放弃回报。所以这一逻辑必须被纠正，因为不然的话资本主义体制将无法运行。而它却已经运行了一些时间。

就像上帝的万能和命定之间的联系通过预知被改变（并最终被埋葬）了一样，资本积累和储蓄之间的联系也通过租金被改变（并最终被埋葬）了。古典经济学家将租金描写为利润的直接对立物。实际上租金是利润的化身。古典经济学家的出发点是，有一种从租金到利润的历史发展出现过，这种发展在我们的历史神话中表现为贵族统治被资产阶级推翻。但是，一方面，这段历史的时间范围只包括短时间的而非长时期的延续，另一方面，这一发展是朝相反的方向行进的。每一个资本家都试图将利润转换成租金。每一个“资产者”的优先目标都是成为“贵族”。这一看法并不关涉**长时段历史**（*longue durée*），即长时期的发展，而是关涉一个较短的时段。

在狭义的经济学的意义上，租金是一种收入，它来自对真实中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环节的控制，而这个环节的存在不是由其占有者创造的，并且也不是他自身（比如作为企业家的）劳动的成果。一块位于一条河流的浅滩附近的土地的占有者对所有想跨过这个浅滩的人收取费用时，就在获得被称为“租金”的收入。一个土地占有者在允许其他人在其土地上自主经营或者在属于他的一栋楼里居住并且因此得到货币时，被称为“食利者”（或者房东 / 出租者）。在 18 世纪的法国，食利者在文献中被描写为“靠其收入像贵族那样生活的资产者”。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商人，并且没有从事某种职业。（Taylor 1961，第 954 页；也参见 Vovelle 和 Roche 1965；Forster 1978）

然而，根据这些事例，不能说食利者没有为保住给自己提供租金的那个有利条件做任何事情。食利者具有获得某些所有权的远见或者运气，这给他提供了合法的收取租金的可能性。构成获得这种所有权的基础的“劳动”具有两个特征。其一，这种劳动发生在过去而不是当下（经常甚至在久远的过去，也就是说是某一个前人完成的）。其二，这种劳动需要一个政治权威的许可；少了这种许可，它在当下就不能带来收入。这样，租金＝过去，并且，租金＝政治权力。 324

租金为已经存在的所有者提供着收入，但对追求通过额外的实在的劳动投入来获得财产的人来说却并非如此。因此，租金总是会受到抨击。而由于政治总是给租金提供保障，租金也就总会面

对政治上的抨击。成功的抨击者自己后来也会获得财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会基于自身利益而捍卫租金的合法性。

租金是一种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利润率可以提高到超过在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取向的市场上能够达到的比率。在过河的例子中，这一关系呈现为以下情况。假设在一条河上只有一处狭窄到可以在那里修一座桥。那么现在有多种选项。国家可以宣布，所有土地都是潜在的私有财产，并且，偶然地占有河流最狭窄处位于对面的两块岸边地的那个人可以建一座私人桥梁，收取一种使用费。在只有一种过河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这个人占有垄断权并且可以收取很高的费用。这可以是从所有必须运过河的货物链的剩余价值中压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的一条路径。作为取而代之的选项，国家可以将位于对面的岸地划为公产。在此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其他的理想型的可能性。其一，国家可以用公款建一座桥并且不收费或者只收取一种用于抵消成本的费用。在此情况下，从相应的货物链中不会被抽走剩余价值。其二，国家可以允许互相竞争的船主为运输货物的目的而使用岸地。在此情况下，激烈的竞争会将这类服务的价格压到如此之低，以至于船主们只能实现一种很低的利润率。因此，他们从运输的货物链中收获的剩余价值份额也极低。

在这个例子中，租金看上去（几乎）与垄断利润相等。“垄断”这个用语描写的是一种情景，其中，一笔生意的做成会因为竞争的缺少而带来高额利润。在一种垄断情景中，通过整个货物链而生产出的剩余价值的很高的一个份额可以被扣留，而被垄断的环节又构成了这个货物链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利润率增长的程度与一个企业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环节进行垄断的成功程度是一致的。并且，市场情景越具有竞争取向，利润率就越低。历史地看，实际的竞争情景与低利润率之间的这种联系是为自由的企业主体制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的一种。遗憾的是，资本主义从未在全部意义上认识这样一种体制，并且未认识的原因在于，为了积累尽可能多的资本，资本家寻求实现最大的利润。因此，他们不仅具有追求垄断地位的动力，而且在结构层面也被迫如此行动。而且，他们尝试通过那个使持续的利润最大化得以可能的主要代理处——也就是说，通过国家——来实现这个目标。

可见，这里描写的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资本家想要的不是竞争，而是垄断。他们不是想通过利润，而是想通过租金来积累资本。他们想做贵族，而不是资产者。并且，因为历史上——也就是说从 16 到 20 世纪之间——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深化和扩

展了，现在就有了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垄断，有了更多的租金（而更少的利润），有了更多的贵族（而更少的资产者）。

8. 在这一图像中，我们认不出我们的世界了。我们所熟悉的来自一些研究的对历史现象的解释也显得并非可信。这种异议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一半被忽略了。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静态的体制，而是一种历史的体制，该体制是通过其内在的逻辑和内在的矛盾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长期趋向，同样也有周期性的节奏。尤其是在涉及研究对象即资产阶级时，这些长期趋向——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被描写为“资产阶级化”的长期过程——必须被关注。这个过程大概是以以下方式展开的：

326 资本主义的逻辑需要一个（狄更斯[Dickens]小说中的）吝啬鬼类型的节制的清教徒，这个吝啬鬼甚至认为基督教的博爱都太费钱。在资本主义的心理—逻辑中，金钱倒不如说是恩宠（和信用）的标准，而不是权力的标准：这一逻辑要求财富被展现出来，也要求赎买声望。为了不让这个矛盾被撕开，资本主义体制将两种驱动力分配给了一种世代次序，这样就出现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现象。在每一个有成功的企业家聚集的地方，我们都会碰到类似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人。比如，17世纪后期荷兰的贵族化就是如此。如果这种现象作为滑稽插曲在重复，那么它可以被描写为对资产阶级的历史角色的背叛——比如，在20世纪的埃及大致就是如此。

这里涉及的也不只是资产者作为消费者的行为问题。他对贵族的生活方式的偏爱也可以在其作为企业家的最初的行事方式上看出。进入19世纪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资本主义企业在劳动关系方面模仿的是中世纪庄园的模式（今天也还带有这种残迹）。企业主以父亲的形象出现，他照顾他的雇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某种社会保障，不仅关心他们的劳动道德，而且还关心他们其他方面与道德有关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却走向了积累过程。这是追求垄断、竭力谋求打败各自的竞争对手的后果。这个过程进展很慢，因为有很多持续地破坏那些近乎一垄断局面的运动出现。尽管如此，企业结构变得更加完整了，并且，财产与控制也与此相关地分离了。这是父权制的终结，是企业集团的兴起，并且也因此是（那些）新中等阶层的形成。在“企业”事实上属于国家并且名义上不是私有财产的地方，新中等阶层大部分会具有一种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的形式。（这种情况尤其出现在边缘地区而且特别是半边缘地区的比较弱小的国家。）随着这一过程的继续推进，合法的

所有者角色越来越多地成为配角，直到其最终仅为跑龙套的角色。

在概念上如何理解新中等阶层——由工薪领取者构成的资产阶级——呢？在涉及生活方式或者消费时，他们肯定是资产者。他们是剩余价值的领取者，这个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涉及所有权或者资本时，他们不是（或者只在很低的程度上是）资产者。也就是说，这些中等阶层的成员将利润转换成租金，因此将自己贵族化的能力比“古典的”资产阶级要弱很多。他们靠他们自己在当下创造的有利条件生活，而不是靠——作为过去的遗产而赐予他们的——特权生活。他们同样不可能将当下的收入（利润）转化为未来的收入（租金）。也就是说，他们将不会在有朝一日呈献出让其子女赖以生存的过往。不仅是他们自己生活在当下，他们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也将必须如此生活。资产阶级化的意义正是寓于这种情景中——资产阶级化意味着贵族化的可能性的终结，为未来而建构过去的可能性的终结；它意味着注定要生活在当下。

327

值得注意的是，在何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是与另一个被描写为“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同步展开的。一个无产者是一个在市场上除了其劳动力以外什么也不能提供，并且不占有他可以动用的资源（也即不占有过去）的人。他靠他在当下挣得的收入生活。前面描写过的资产者不再占有资本（因而也没有过去），也在靠他在当下挣得的收入生活。当然，他在关键的一点上与无产者有区别：他生活得好很多。这个区别似乎与财产或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完全无关（或者只有很少的关系）。尽管如此，这个作为资产阶级化的产物的资产者在以某种方式得到作为无产阶级化的产物的无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那就是说，如果不是财产或者对生产资料的控制，那么，必须会有其他东西是资产者有别于无产者而控制的。

9. 在20世纪80年代，另一个类似的概念形成了，即“人力资本”概念：新资产阶级的成员过多地占有人力资本，无产者却缺少它。但他们在哪里获得这种资本呢？答案众所周知：在教育机构中，其功能在于培养新中等阶层的成员，也即私有和国有企业的那些专家、技术人员和领导，而这些企业构成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经济要素。

世界上的教育机构真在生产人力资本吗？它们在帮助人们获得一些价值很高的、在经济方面为一份更高的收入提供依据的技能吗？也许人们可以声称，那些高水平的机构在（并且它们也只是部分地在）承当这项任务，而剩下的机构被委以其他功能，致力于那些以后将

328

成为中等阶层成员的人的社会化、临时保姆工作和挑选工作。由于太多的（而不是太少的）人有工作能力（至少有足够的进入中等阶层的工作能力），所以，如果人们考虑所有条件的话，挑选程序必然会相当随意。

大多数人会竭尽全力地避免某种随意的挑选。他们会尽可能利用他们的影响为自己打开通向特权之门。而那些在这方面具有优势的人会有更多的影响。新中等阶层虽然不再有过去传给后代（这样的冒险至少会越来越难），但他们可以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进入“更好的”教育机构的享有特权的通道。

因此，教育和（在最广泛意义上的）修养的游戏规则属于政治斗争中的关键立场，就不足为怪了。重新回到国家话题时，可以确定，国家越来越无力回报过去的成就、维持特权和为租金谋得合法化基础——这种状况仅仅表明，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财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然而，从中却不能得出国家从屏幕上消失了的结论。无论如何，它不用荣誉头衔回报过去的成就，却可以用工作绩效报酬来奖励当下的成就。因为在我们的那些由收入可观的、在职业方面具有高水平的非—所有者构成的资产阶级中，“自由通道向有才能的人”开启；作为前提的和需要记住的事实是有太多的人才，因而必须有人作出谁能干、谁不能干的判断。尤其是在区别很细小时，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框架条件内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不过，现在使用的这个标签所描写的特征却与中世纪的商人——资产阶级这一名称来自对他们的描写——只有很少的相似性。同样，它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者——对他们的描写使今天的社会科学所定义的资产阶级概念开始流行——也只有很少的共性。非本质的表象在迷惑人们，而寓于游戏中的那些意识形态在有意转移注意力。尽管如此，作为剩余价值的接受者的资产者是资本主义间剧中的主角，却是真实的。但他一直像善于扮演经济角色那样善于扮演政治角色。所以，认为资本主义因此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的体制，因为只有它将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隔离开了，这一论据似乎是对真实的一种巨大的误判，而这种误判同时呈现为一种有效的防护的主张。

10. 至少在资产阶级看来，21世纪的绩效社会这个资产阶级特权的最后化身中隐藏着一个问题，也即这个社会建立在最脆弱的基础上，并且因此最难保卫自身。被压迫者也许可以忍受那些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权的人的统治和收取他们的酬报。但是，如果特权仅仅建立

在以更大的精明为基础的精英统治主张（此外，这一主张值得怀疑）之上，他们如何忍受这种统治？被这样的人统治并且给他们酬报，实在是无法忍受的。意识形态的面纱越来越透明，剥削越来越显而易见。工人现在没有沙皇和没有父权主义的工业巨头为其减少麻烦，他们会更加情愿地接受一种关于对他们的剥削的和关于其他的与他们相关的不幸事件的利益取向的解释。这是白芝浩和熊彼得的论题。白芝浩还对维多利亚女王（Königin Viktoria）抱有希望。晚一些出生的、来自维也纳而不是来自伦敦因此更加明智的哈佛教授熊彼得则悲观得多。他知道，自从资产者不再具有成为贵族的可能性，这种局面不会如此延续多长时间了。

参考文献：

W.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864), London 1964 (*Die englische Verfassung*, Neuwied 1971); A. A. Berle u. G.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1932; M. Canard, »Essai de sémantique: Le mot 'bourgeois'«, *Revue de philologie française et de littérature*, 27. Jg., 1913, 32-47; G. Duby, *Die drei Ordnungen*, Stuttgart 1984; É. Durkheim, *Der Selbstmord* (1897), Neuwied-Berlin/W. 1973;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Frankfurt/M 1966; R. Forster, »The Middle Class in Western Europe: An Essay«, in: J. Schneider (Hg.), *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Wirtschaftskräfte und Wirtschaftswege*, Bd. 6, Stuttgart 1978, 13-36; E. Fromm, *Die Furcht vor der Freiheit* (1941), Frankfurt/M 1966; L. Gall,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3 Bde., Berlin 1989; A. Gorz, *Zur Strategie der Arbeiterbewegung im Neo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67; H.-G. Haupt, *Nationalismus und Demokratie. Zur Geschichte der Bourgeosie im Frankreich der Restauration*, Frankfurt/M 1976; J. Kocka (HG.), *Bürger und Bürgerlichkeit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1987; E. Labrousse, »Voies nouvelles vers une histoire de la bourgeoisie occidentale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 (1700-1850)«, in: *X. Congresso Internazionale di Science Storiche, Roma, 4.-11. settembre 1955. Relazioni, IV. Storia Moderna*, Florenz 1955, 365-396; D. Landes, *Der entfesselte Prometheus*, Köln 1973; Th. Mann, *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 Berlin 1901; G. Matoré, *Le vocabulaire et la société médiévale*, Paris 1985; R. Miliband, *Der Staat in der 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2; C. W. Mills, *White Collar*, New York 1951; Ch. Morazé, *Les bourgeois conquérants*, Paris 1957 (*Das Gesicht des 19. Jahrhunderts.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Welt*, Düsseldorf-Köln 1959);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1974;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er innere Staat des Bürgertums. Studien*

zur Entstehung bürgerlicher Hegemonieapparate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AS 111, Berlin/W 1987; D. J. Roorda, »The Ruling Classes in Holland in the Seventheenth Century«, in: J. S. Bromley und E. H. Kossman (Hg.),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Bd. 2, Groningen 1964; ders., »Party and Faction«, in: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1967, H. 2, 188-221; J.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1942), Bern 1946; W. Sombart. *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 München-Leipzig 1913; G. V. Taylor, »The Paris Bours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 Jg., 1961, H. 4, 951-977; K. Tenfelde, H. -U. Wehler (Hg.), *Wege zur Geschichte des Bürgertums*, Göttingen 1994;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1963), 2 Bde., Frankfurt/M 1987; M. Vovelle u. D. Roche, »Bourgeois, Rentiers and Property Owners: Elements for Defining a Social Category at the End of the Eitheenth Century«, in: J. Kaplow (Hg.),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1965; M.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Ges.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Bd. 1, Tübingen ^{3}1934, 17-206; H. Wienold, »Die herrschende Klasse in der Bundesrepublik. Zur Theorie und Empirie der Bourgeoisie«, in: ders. u. H. -C. Thien (Hg.), *Herrschaft, Krise und Überleben*, Münster 198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撰
迈克尔·豪普特（Michael Haupt）译为德文
秦明瑞 译，沈红文 校，杨柳新 审

参见：

Akkumulation, Arbeitsteilung, Aktiengesellschaft, Angestellte, Antagonismus, Anthropologie, Arbeiterklasse, Ausbeutung, Bauern, Besitz/Eigentum, Bildung,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Bürgerkrieg, Bürgerrechte, Bürokratie, Despotie des Kapitals, deutsche Misere,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Feudalismus,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Gleichheit, Hegemonie, historischer Beruf, Ideologie, Imperialismus,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apitalistenklasse, Kapitalismus, Klassen, Klassenanalyse, Klassenkämpfe,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leinbürger, Liberalismus, Manufaktur, Mehrwert, Menschenbild, Menschenrechte, Meritokratie, Mittelschichten, Monopol, nationale Bourgeoisi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letariat, relative Autonomie, Staat, Verrat, Weltsystem

331

布兰德勒主义（Brandlerismus）

A: madhhab Brandler. – E: Brandlerism.

F: Brandlerisme.

R: Brandlerizm (брандлеризм).

S: Brandlerismo.

布兰德勒主义是对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集团的笼统称呼，得名于亨利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1967）。他在1919至1923年间曾属于德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D-O）的创建者和活跃领导者之一，是其刊物《反潮流》（*Gegen den Strom*）的出版人之一。

1. 布兰德勒主义是共产主义当中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或者说政治集团。它在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即德共和共产国际推行极左路线之后最终形成，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者反对派阵营内联合起来。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斯巴达克同盟和德国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和创建者，其中的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1884—1948）是德国共产党反对派最重要的理论家。

按照俄国派别称谓的习惯，反对派被轻蔑地叫作“右派”，因为共产国际1928至1933年间相信德国处于一种“激烈的革命形势”。于是“右派”的含义等同于失败主义、反革命。

随着布兰德勒、塔尔海默被免去领导职务，布兰德勒主义这一概念大约于1924年出现在德国共产党内。在1925年春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克拉拉·蔡特金“坚决抗议德国党内产生的一种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把斯巴达克同盟的老成员视为‘右派’，不认可他们的价值也不给他们权力”（*Protokoll*，第174页）。右派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组织的部分，致力于彻底修复和改革共产主义运动，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再次转变，开始极右路线。这次大会上德共、法共和西欧其他共产党彻底转向，停止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坚决斗争，即曾经所谓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转而积极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也包括德国的）建立同盟。

“右派”发扬独立自主的德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卢森堡主义），特别是在民主和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工会团结、对苏关系等问题上，而且预见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由斯大林式的中央集权（Monolithismus）向陶里亚蒂式的多中心主义（Polyzentrismus）的实际结构变革。他们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共产主 332

义，认为它适应了各民族不同的基本条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是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否定。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多样性是革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取得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2.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确定共产主义的战略战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2.1. **民主和法西斯主义**。塔尔海默与朋友合作，在 1928 年末就提出了第一个全面论述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在德国资产阶级将权力移交给纳粹的四年之前，他从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分析出发，准确地分析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内政、外交目标及其手段。同时，他还强调了魏玛共和国新的社会变化进程和政治力量。（参见 1930 和 *Was will die KPD*，第 11 页）塔尔海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最佳的斗争土壤，在这种政治秩序中，共产党人必须说服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才能推动革命。（参见 *Was will*，第 47 页）如果不采取攻势地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它就会转变为法西斯主义，但它是不同于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统治形式。法西斯政变导致这种转变。（参见第 11 页）

2.2. **社会法西斯主义论 vs 统一战线**。德共的官方论点宣称，社会民主党是首先要打击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的支柱、“法西斯主义客观上的温和派”、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Stalin，W 6．第 252—253 页）这个混乱的理论之所以出现，也许是因为社民党领导人反对共产主义，因为社民党动用国家机器对抗共产党的组织。但是这个理论忽视了所有无产阶级组织的生存都同样面临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社民党领导人通过将德共称作“共产纳粹”（Kommunazis）等等予以回应。德共反对派论证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内容是站不住脚的，主张无产阶级各派力量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相应地，德共反对派认为自由工会是统一的阶级组织，是共同的经济斗争所必不可少的，共产党员必须参与其中，以讲纪律、有耐心、指引方向的共同工作，争取工人的大多数。（参见 *Was will*，第 56 页及以下）相反，德共从 1928 年开始建立自己的“红色联盟”（rote Verbände），致使其成员在自由工会中失去信任，遭到会员群众的孤立。德共反对派反对这种新策略，继续推行原先行之有效的工会工作方式。

为了引导为日常需求而斗争的工人摆脱改良主义幻想，将日常斗争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层面，德共反对派要求提出“过渡口号”，如“工人监督生产和分配”、“工农政府”（参见 *Was will*，第 40—43 页）这些要求只有在革命斗争高涨、旧

秩序崩溃的形势下才有可能实现。

2.3. **对苏关系**。德共反对派肯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历史意义，但是拒绝苏联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垄断。（参见 *Was will*，第 75 页）应当代之以所有共产党权利都平等的关系，自行规划各自的战略战术，同时进行国际合作并团结一致。这一立场早在 1928 年就已经提出，当时苏联共产党正主导共产国际，并开始要求与统治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集团保持一致。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应当民主地组织起来，保证在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充分的讨论自由和自下而上的决策。（*Was will*，第 38 页）针对德共“机械的操练机制”导致“党的精神生活陷入瘫痪”（同上书，第 71 页），德共反对派认为，只有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才能自愿地遵守战斗纪律。

2.4.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共反对派预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Was will*，第 13—14、19 页），战争将在新的力量对比中决出胜负：苏联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分裂为法西斯主义的“不饱和”国家和民主的“饱和”国家。因此，新形势不允许一成不变地照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不加区分地运用于所有参战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者即使在战争中也要继续推进阶级斗争，加速法西斯势力的失败，保卫苏联。

3. 德共反对派没有能够阻止德国工人阶级 1933 年的失败和德国法西斯主义“可以阻挡的发迹”（Brecht）。查登（Tjaden 1964，第 197 页）认为德共一反对派“逐渐失去作用”，库卡茨（Kuckartz 1978）也持类似观点。因为其组织上的自我限制 ——拒绝建立一个新党，却维持自己的干部组织 ——是错误的。贝格曼（Bergmann 1987）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德共反对派的两难困境更类似于德国农民战争中托马斯·闵采尔所面临的局面：“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Engels，MEW 7，第 400 页）贝格曼进一步指出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德国工人传统的组织纪律、1931 年秋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SAP）遭遇的失败，尤其是德国社民党、全德工会联合会（ADGB）、德共等大型组织的消极作为，不仅未能阻挡 1933 年的灾难，反而是它的帮凶。

批评、自由探讨问题是任何一种可能的共产主义的前提。未来将表明，后来人是否会回忆起布兰德勒主义、布哈林主义、铁托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刘少奇主义（Liuismus）、欧洲共产主义等批判性流派，并从他们在马列主义之外另辟的构想中汲取养分。

参考文献：

R. J. Alexander, *The Right Opposition: The Lovestonei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Opposition of the 1930's*, Westport/Connecticut 1981; Th. Bergmann, *50 Jahre KPD (Opposition)*, Hannover 1978; ders., *Gegenden Strom – Die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Opposition*, Hamburg 1987; R. Griepenburg u. K. H. Tjaden, »Faschismus und Bonapartismus. Zur Kritik der Faschismustheorie August Thalheimers«, in: *Argument* 41, 8. Jg., 1966, 461-472; J. Kaestner, *Die politische Theorie August Thalheimers*, Frankfurt/M 1982; U. Kuckartz, *Der Aufstieg des Faschismus und die kommunistische Arbeiterbewegung in der Endphase der Weimarer Republik*, vervielf. Ms, Aachen 1978; *Protokoll, Erweiterte Exekutiv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Moskau 21. März-6. April 1925*, Hamburg 1925; A. Thalheimer, *Um was geht es? Zur Krise i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1929; ders., »Über den Faschismus« (1930), in: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hgg. v. W. Abendroth, Frankfurt/M 1967, 19-38; K. -H. Tjaden, *Struktur und Funktion der »KPD-Opposition« (KPO)*, Meisenheim/G 1964; *Was will die KPD-Opposition?*, Berlin 1929, [3]1930; H. Weber, *Die Wandlung des Kommunismus*, 2 Bde., Frankfurt/M 1969; K. P. Wittemann, *Kommunistische Politik in Westdeutschland nach 1945 – Der Ansatz der Gruppe Arbeiterpolitik*, Hannover 1977.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曹旸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 und Bauernregierung, Bolschewisierung, Bonapartismus, Bucharinismus,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sziplin, Einheitsfront, Eurokommunismus, Faschismus, Gewerkschaften, Internationale, Kommunismus, Liuismus, Luxemburgismus, Parlamentarismus, Sowjetkritik, Sozialfaschismus, Titoismus, Übergangslosungen

布莱希特派（Brecht-Linie）

A: ittidjāh Brecht. – E: Brecht School.

F: Brechtianisme.

R: linija Brecht (Линия Брехт).

S: línea de Brecht.

—

1.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左派艺术家及20世纪先锋艺术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剧作家和戏剧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身上。他上演戏剧的方式，在欧洲内外的戏剧史

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7—1918年革命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危机，坚定了他的信念，即阶级社会的矛盾和不义并不是永远存在的，而是可以改变的。1926年，他开始阅读马克思（特别是《资本论》），20年代末开始阅读列宁。他与社会学家弗里茨·施特恩贝格（Fritz Sternberg）、哲学家卡尔·柯尔施一起探讨对马克思著作的阅读体会。此外，他还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一个“团队”（Mittenzwei），这其中包括埃尔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格奥尔格·格罗茨（George Grosz）、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伊丽莎白·豪普特曼（Elisabeth Hauptmann）、斯拉坦·杜饵（Slatan Dudow）、E. 奥特瓦尔特（E. Ottwalt）。他们辩论着一种展示世界之可变性的新艺术的可能性与任务，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付诸实践。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追寻不同的、切实的反映，其目标更在于改变观众接受艺术的方式。受到马克思影响的哲学新思想，直接与美学创新联系到了一起。

布莱希特在他的教育剧（Lehrstück）和教育剧理论中，最坚定地追随着这些观念。他意图在其中取消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分界。演员必须学会熟练地掌握辩证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有益的。带着这些戏剧，布莱希特进入无产阶级小团体的反公共空间中，这些小团体还有部分是煽动性的宣传团体。他必定发现，他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尖锐批判，例如在《三分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1928）和《马哈戈尼城的兴衰》（*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1930）中所表现出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美食一样被市民阶级的观众所享用。布莱特把教育剧理论和“大生产”以及“从一切桎梏中解放一切人的生产力”这两个革命的社会目标联系在了一起（*AJ*，7. 3. 1941）。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学生面前将教育剧称为未来戏剧的草图。

336

看到魏玛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布莱希特继续发展了他的戏剧美学。他与作曲家汉斯·艾斯勒一起，根据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i）的小说《母亲》（*Die Mutter*）创作了一部戏剧。这出戏剧由海伦娜·魏格尔（Helene Weigel）等职业演员和恩斯特·布什（Ernst Busch）等职业歌手搬上舞台，探讨了工人运动的具体问题（联盟问题、改良主义、对于宗教的态度），讨论了革命者在非法斗争中的态度。历史叙述的姿态与艾斯勒那动员性的歌谣相结合，把演出变成了希特勒上台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戏剧的高潮。

1933年，布莱希特被迫流亡，“换藏身的国家比换鞋子还要频繁”。除了少

数几段例外的经历，比如在苏黎世剧院，他总是与剧院隔绝地工作。他的“团队”人各一方，与志同道合之士的交流也少之又少。但他仍与鲁特·贝尔劳（Ruth Berlau）、玛格丽特·斯特芬因（Margerete Steffin）、汉斯·艾斯勒、库特·魏尔（Kurt Weill）、瓦尔特·本雅明以及卡尔·柯尔施保持着交流与合作。除了那些可由流亡的小剧团上演的实用作品——例如《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Furcht und Elend des Dritten Reiches*）或《卡拉尔大娘的枪》（*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中的若干场景——之外，还诞生了流亡时期的重要剧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伽利略传》（*Leben des Galilei*）和《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以及其他重要的诗歌与散文。同时，布莱希特还继续发展了他的“叙事剧”和“辩证戏剧”的理论，特别是在理论对话集《买黄铜》（*Messingkauf*）中。这是为“科学时代的戏剧”（参见 GA 22.2，第 702 页；GW 16，第 656 页）所做的草图——这种戏剧将世界及其中的矛盾展现在观众眼前，交给他们评判，并将观众以这样一种方式置于世界之中，这种方式使他能够理解社会机制、为自己发现行动的可能。叙事剧的原理包括**陌生化**（*Verfremdung*），也就是将习以为常而不再被追问的状态（例如依赖关系）、行为模式和价值判断变得陌生：在**姿态性**和**指示性**的表演中，演员脱离他的角色，而不是与之完全同一；表演艺术继续发展，不再刺激观众深深入戏，而是促进他们的辩证的和以自己的行动能力为导向的感知，不再作为口腹之欲一类的享受被体会。既为了克服先前自身的片面性，也为了批驳误读（将其理解为反感性），布莱希特将他对戏剧的美学维度之理解作了更精确的阐述：重要的是运用一切戏剧手段，将世界通过戏剧艺术的反映呈现在观众面前，以供他实践，并恰恰以这种方式为他提供愉悦。

布莱希特戏剧的不同寻常之处，政治革命与美学创新要求，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便遭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代表人物，如格奥尔格·卢卡奇、阿尔弗雷德·库雷拉（Alfred Kurella）、尤利乌斯·海伊（Julius Hays）等人的猛烈批判。尽管恩斯特·布洛赫将布莱希特称为“舞台上的列宁主义者”，卢卡奇却将他归入颓废主义。为了反驳卢卡奇的观点（例如卢卡奇要求现实主义地呈现鲜活的人类命运），布莱希特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现实主义的笔记，但为了不破坏反法西斯同盟，他并未将其公开发表。这份笔记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付梓，而这场布莱希特与卢卡奇之间所谓的现实主义之争，作为规模最大的争论之一，被写入了马

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

当布莱希特于1949年回到苏占区（即之后的民主德国）时，他获得了与“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由海伦娜·魏格尔任剧院经理）共同创建属于自己的剧院，并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戏剧方法的机会。他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不少演员、导演、布景师，包括特蕾莎·基瑟（Therese Giese）、莱昂纳德·施特克尔（Leonard Steckel）、艾里希·英格尔（Erich Engel）、贝托尔德·菲尔特（Berthold Viertel）、特奥·奥托（Theo Otto）和卡斯帕·内赫尔（Caspar Neher）。他还将年轻人引入自己的工作中，包括伊贡·蒙克（Egon Monk）、本诺·贝森（Benno Besson）、彼得·帕利茨奇（Peter Palitzsch）、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Manfred Wekwerth）、安吉丽卡·胡尔维茨（Angelika Hurwicz）、萨宾娜·塔尔巴赫（Sabine Thalbach）。当布莱希特去世时，柏林剧团已上演了超过20部新剧，在国际巡演（包括在巴黎和莫斯科）中拓广了它的传奇声誉。然而，还有一些在文化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党内干部坚持拒绝的态度，一系列演出，包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母亲》、《浮士德原本》（*Urfaust*）以及由保尔·德绍（Paul Dessau）作曲的歌剧《卢库卢斯的审讯》（*Das Verhör des Lukullus*）遭到了猛烈的批评，《浮士德原本》和《卢库卢斯的审讯》（首演于德国国家歌剧院）甚至遭到裁撤。这些剧作与遵循苏联的，特别是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j Shdanow）的现实主义与遗产观念的文化政策相冲突。

布莱希特也投身于涉及其他艺术家的艺术政治论战之中。他积极参加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辩论，为遭受批评的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及其作品，也为汉斯·艾斯勒的歌剧脚本《约翰·浮士德》（*Johann Faustus*）辩护。对于一般的政治问题，例如1953年6月17日的东德政治风波，他的立场也绝不含糊，只是他辩证的观点只有部分被公开。1953年夏天，布莱希特创作了《布珂哀歌集》（*Die Buckower Elegien*），将他那个时代的矛盾特征——过去的负担突兀地闯入现在，和新事物的种种矛盾一同缓慢地显露——化作诗意的形象。与20世纪50年代的批判不同，从后世的视角看，应当说布莱希特当时远远高估了观众意识的变化，高估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真正展开：童话式的、归根结底是幻想式的超越现实（参见他的《高加索灰阑记》[*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于1954年的演出）的种种要素今天已无法视而不见。

2.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青年剧作家——特别是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及彼得·哈克斯——就已经开

始接受布莱希特的辩证方法，并因此回溯到东德现实的素材，例如米勒的《压低工资者》（*Der Lohndrücker*）和《修改》（*Korrektur*），以及哈克斯的《忧虑与权力》（*Die Sorgen und die Macht*）和《莫里茨·塔索》（*Moritz Tassow*）。他们因此陷入批评，并在之后与布莱希特分道扬镳。哈克斯将布莱希特称为工会剧的作者；米勒则在1981年发表的《法泽尔-科伊纳》（*Fatzer-Keuner*）中表述得更辩证："运用布莱希特而不同时批判他，是一种背叛。"

当布莱希特于苏共二十大几个月后溘然长逝后，他的同事与学生们就不得不在继续他戏剧的同时发展自己的导演风格。本诺·贝森1957年的《四川好人》获得了有争议的成功。之后，他离开了柏林剧团，于60年代先后在德意志剧院和人民剧院（均位于东柏林）大获成功，又于70年代前往法国工作。彼得·帕利茨奇和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则将布莱希特的方法运用于其他作家（W.维什涅夫斯基[W. Wischnewski]和M.拜尔[M. Baierl]）的戏剧上。

第二代学生（特别是曼弗雷德·卡尔戈[Manfred Karge]和沃尔夫冈·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f]）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布莱希特之夜"崭露头角；之后，他们在德语区的许多大型剧院执导。

在海伦娜·魏格尔去世后，鲁特·贝格豪斯（Ruth Berghaus）试图突出布莱希特戏剧中的实验性—先锋派特征，但却既未获得观众支持，亦未得到文化领导机构的认同。1977年，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成为剧院经理。他力图重塑布莱希特的标准，邀请不同导演前来合作，在接下来的10年中扩展了剧目（增加了包括克莱斯特、米勒和塞德尔的戏剧），并将迄今未在柏林剧团上演过的布莱希特作品（《巴尔》[*Baal*]和《法泽尔》[*Fatzer*]）搬上了舞台。

3. 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莱希特在欧洲得到了普遍接受。一批导演，例如G. 施特尔勒（G. Strehler）、P. 察戴克（P. Zadek）、P. 施泰因（P. Stein）、H. 布克维茨（H. Buckwitz）、R. 朗巴卡（R. Langbacka）、J. 鲁比莫夫（J. Ljubimow）和B. 索贝尔（B. Sobel）或是排演了布莱希特的戏剧，或是运用了他的方法。在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中，第三世界（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剧院发现了布莱希特的教育剧，并将它们的民族文化经验与这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经验相结合。在此期间，布莱希特被归为现代派的遗产，作为诗学人物在彼得·魏斯的《抵抗的美学》第二卷中与读者见面。这个文学形象所代表的，是社会革命与美学革命携手并进的乌托邦理想。1973年，后现代哲学家弗朗索瓦·利奥塔

（François Lyotard）已开始怀疑布莱希特与权力勾结，并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宗教。与布莱希特或围绕布莱希特的争论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之终结或未来的争辩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Brecht 83: Brecht und Marxismus. Protokoll der Brechttage 1983, Berlin/DDR 1983; G. Klatt, »Zwischen Alltagserfahrung und 'eingreifendem Denken'. Vom Umgang mit Brecht in den 80er Jahren«, in: *Brecht 85*, Berlin/DDR 1986, 105-116; G. Lukács, *Écrits de Moscou*, hgg. v. C. Prévost, Paris 1974; W. Mittenzwei, »Marxismus und Realismus.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Argument* 46, 10. Jg. 1968, 12-43; ders., *Der Realismus-Streit um Brecht*, Berlin/DDR-Weimar 1978; ders., *Des Leben des Bertolt Brecht oder Der Umgang mit den Welträtseln*, 2 Bde., Berlin/DDR 1986; H. -J. Schmitt,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furt/M, 1973; R. Steinweg, *Das Lehrstück. Brechts Theorie einer politisch-ästhetischen Erziehung*, Stuttgart 1972;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3 Bde., Frankfurt/M 1975, 1978, 1981; ders., *Notizbücher 1971-1980*, 2 Bde., Frankfurt/M 1981; M. Wekwerth (Hg.), *Theater nach Brecht. Baukasten für eine Theorie und Praxis des Berliner Ensembles in den neunziger Jahren*, Sonderausgabe der Theater Arbeit 1989, Berliner Ensemble.

古德伦·克拉特（Gudrun Klatt）撰

毛明超 译，曾旸 校

340

二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布莱希特发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布莱希特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做出的贡献——“可能是德语区在1930—1950年间最伟大的贡献”（Haug 1980，第72页）。另一方面，直到1986年，还不能说布莱希特“这位——如此不为人所知的——纯正血统的哲学家”（Labica 1986，第114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已充分地为人所知，乃至于他在本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领域的意义已得到承认”；至少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历史书写中还没有找到一席之地”（Fahrenbach 1986，第13—14页）。随着1965年格言集《墨翟》（*Me-ti*）、1973年《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的出版，这种忽视不再可能是由于无法接触到文本的缘故。这两部文稿对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将布莱希特在字里行间所表达出的哲学—智识态度作为榜样。1967年，平装的20卷版文集（GW）的出版，在德语读者的接受史中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学生运动中，这套文集

必须不断重印，并激起极大反响，正如这场运动在布莱希特的作品中寻找到了一种普遍的精神视野。布莱希特成了这一代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导师。

而较早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既无法接触到《工作日志》、《噩梦》或《买黄铜》，也不知道布莱希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的笔记。布莱希特像是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据点一样，在那一代人中间零星地发挥作用。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曾精确地描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宗教式的颠倒（参见 1962，第 24—40 页；1978，第 30—47 页）：而当马列主义一方面沉淀为常识，一方面又成为玩世不恭、只动嘴皮的信仰时，布莱希特的思想便作为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在东西德均发挥了作用。在莱比锡人恩斯特·布洛赫身上可以观察到，布莱希特是如何鼓励对“粗鄙唯物主义在时下的保护神们”的反抗：“无论如何，布莱希特把这群人——悲伤地念及他们对本源的距离乃至背弃——只称为‘马虎厮主义者’（Murxisten，将‘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en]改动一个字母新创的词，应是取德语‘Murks’[草率马虎、粗制滥造]之意。——译者）。”（1955，第 324 页）的确，布莱希特在 1933—1934 年间就已记下：“马克思主义那种广为流传的‘马虎厮主义’之形式，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将一头蠢驴在辩论中变得不可打倒。”（GA 22.1，第 33 页）本雅明在 1938 年 6 月写道：“布莱希特谈起他深深扎根的对神父的仇恨。他让人清楚地看见，那些将马克思理论教义据为己有并加以加工的人，将永远是一群神父式的阴谋团体。马克思主义恰恰特别容易遭到‘阐释’。”（1966，第 128 页）批判神父的主题时常（或至少同样地）针对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官样文章出现在更普遍的历史视角中：“‘精神’在卑躬屈膝的地位中，比身体更容易沾染上奴才的姿态。这里正发生着真正的、彻底的变卖……因此，真的有一些低下之物附着于精神之上，特别是当精神变得像神父一般的时候；而在卑躬屈膝中，精神就会变成这种模样。教会从来都是奴才式的。它只阐释。不过，它并不仅仅为它的主子们而蒙骗世人，而也同时蒙骗它的主子们。甚至那些知道天气的人，将每一场雨都归功于自己：这雨是听了他的命令。”（GA 21，第 428 页）这里也可听出图伊批判（见下文）。 341

相比于对官方的“背弃”及教士化之批判，布莱希特对另一种不同的理论—实践视野之勾勒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谈论**马克思主义中的布莱希特派**，因为这一派以一种特殊的姿态、方法论和对理论与实践的理解，

区别于其他传统的派别。布莱希特派不仅与官方手册的意识形态相对立，还特别与格奥尔格·卢卡奇在知识上品位更高、起初更具影响力的思想相对立。（参见 Mittenzwei 1968）

1. 布莱希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导师是卡尔·柯尔施。他在马克思主义工人学校（MASCH）的课程“马克思主义中活着的与已死的内容”，让布莱希特获得了不少启发，并立刻将之运用于自己的草稿中。（参见 GA 21，第 507 页及以下，以及注释）自然，正如二人的通信所显示，布莱希特是一位渴求知识的学生，不仅教师可向他学习，他也以他的方式胜过教师；但这并不能作为理由，将布莱希特在柯尔施那里的学习归入一种“市民的柯尔施传说”之领域。（Mittenzwei 1976，第 130 页；与之相反：Buckmiller 1973，Müller 1977）布莱希特虽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柯尔施的著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但仍将其评价为“有些形式主义。非常注重一成不变的结构，以及所总结出来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却并未在其运用中得到展现”（*AJ*，2.1939；GA 26，第 328 页）。

瓦尔特·本雅明曾在 1934 年 9 月 27 日写道，布莱希特对于叙事剧的反思，在《尝试集》（*Versuche*）的注释与导论中“不得已……找到了一种固定的形式”。但“自从这种反思一方面与对列宁主义的学习，另一方面又与经验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倾向相结合之后，就从那种局限的框架中脱离了出来。数年来，它被归入不同的关键词下，以至于非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行为理论、新百科全书、对表象的批判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布莱希特工作的中心。种种不同的工作在思想中汇聚，成了一首哲学的教育诗”（1966，第 125—126 页）。卢克莱修（Lukrez）为古典时期唯物主义所做的那种贡献，布莱希特也希望为现代历史唯物主义做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塑造成形，并使之可为大众所使用，这项工作绝不能完全交给职业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342

维尔纳·米腾茨威（Werner Mittenzwei）曾于 1976 年提到“布莱希特的哲学著作”（第 135 页）。这一提法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参见 Knopf 1980，第 57 页）1967 年出版的 20 卷本文集（GW）中并没有什么“哲学著作”（Philosophische Schriften）的标题。之后，在克诺普夫（Knopf）参与编辑的《柏林法兰克福大型注释版文集》（GA）中，自然更没有“哲学”著作，因为这套文集将有关的著述都分散在不同的作品名目如“散文”、“随笔”和“日记”当中。在这些术语汇编中，引人注目的恰是“理论”以及“**哲学**”等名词的空缺。文集（GW）第 20 卷到底还收录了布莱希

特的理论笔记，“将其归入易引起误解的‘哲学及社会论文集’之标题下，因为该标题偏离了其内容的普遍理论性特征”（Haug 1980，第 74 页）。维尔纳·赫希特（Werner Hecht）在后记中为“理论”和“哲学”概念的缺席作了辩护：“人们如何能够在脱离文学作品情况下理解理论文本！”他还补充警告道：对理论文本的“孤立观察在其自身中就隐含着误解的种子”（1967，第 51* 页）。在这种观点下，理论仅仅被视为文学与戏剧实践的评论。

如此一来，布莱希特对于**主流**而言就成了这样一种诗人，其理论笔记——例如《政治与社会论文集》（*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中所呈现的——“显然首先是为了自我理解而服务”（Müller 1977，第 25 页），那么作品与诗人的自我理解就反驳了这种观点。“令人惊讶的是哲学，或者说对于哲思的某种构想在其中被赋予的中心地位。”（Fahrenbach 1986，第 17 页）《戏台上的哲学家》（*Philosoph auf dem Theater*）（GA 22. 1；GW 15，第 252 页及以下）一文标题就已经毫无掩饰地将其表达出来，而在《买黄铜》（GA 22. 2；GW 16）中则仍表达得较为隐晦：正如一柄小号使旧金属商人感兴趣的是其金属价值一样，使布莱希特笔下的剧院哲学家感兴趣的是剧院对于其哲学的质料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在于剧院提供了“人类之间种种事件的图像”（GA 22. 2，第 696 页；参见 GW 16，第 507 页）。在汉斯·迈尔（Hans Mayer）看来，上述出发点点出的“倒不如说是荒诞剧而非辩证剧的观点阐明”；金属商人感兴趣的并非是小号的形式，而布莱希特笔下哲学家的兴趣“多于也不同于对质料的兴趣”。（1971，第 247 页）但若剧院如迈尔所言，是在“有计划地引起并再产生情感”（第 246 页），那么美学的质料概念必然意味着这一实践应被运用于新式的哲学目的。 343

布莱希特笔下的哲学家将剧院工作“变成了一种哲思的习惯”（GA 22. 1，第 512 页；GW 15，第 252 页）；与“作哲学思考的剧院人士”不同，他将自己理解为一位“从事剧院工作的哲学家”（GA 22. 1，第 518 页；GW 15，第 254 页）。他将这种改变了功能的剧院（Theater）称为“Thaeter”（GA 22.2，第 761、786、779 页；GW 16，第 508 页）。剧院实践则与自然科学中用于教学目的而演示的实验相等同：它应成为一种哲学示范实践。当然，应当关注“在作家布莱希特和作为艺术形象的哲学家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张力”（Hans Mayer 1971，第 245 页）。虽然布莱希特在《卖黄铜》中通过哲学家发声，但却并非简单地借他之口说话；哲学家只是诸多对话元素中的一个，尽管是“引领性的”元素。

布莱希特通过将自己置于诗人—哲学家的传统之中，以便为了这个“科学的时代”革新这一传统（参见 GA 22.2，第 702 页；GW 16，第 656 页；GA 23，第 87 页），包括以马克思主义重构了古典与道家（参见 Tatlow 1971）观点和形式的功能：“哲学教导正确的行为。”（GA 21，第 562 页）这里所必需的“姿态被展现在感兴趣的矛盾这一教义之中。这一教义处理的是传统认识论的种种问题”（同上）。

与葛兰西的理解一样，以上观点同时意味的并非哲学的复原回归，而是哲学的重新发明；这种再发明试图顾及由柯尔施所发展的哲学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哲学”，但却并未止步不前。在对哲学—理论能力的要求中，隐含着对政治能力的要求。对马列主义而言，这一诉求与“受权机构”对垄断性的要求相矛盾；在马列主义之后，它始终是市民社会的一桩政治丑闻。布莱希特只是作为“诗人”被尊敬，被保存；布莱希特的批评者阿多诺曾对这种分离予以毁灭性的抨击。于是，人们必须横跨版本政治，从《全集》的零散材料中找寻并组合起哲思的理论家布莱希特。

2. 布莱希特和葛兰西之间之相似令人惊讶：对一种新文化和新生活方式的追求；将个人理解为同时属于不同的集体；新论点中必须包含旧观点的洞见； 344
不断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从实践的立场辩证地重述哲学和政治的问题；等等。和葛兰西一样，布莱希特也是因为经历了法西斯主义才开始重新思考。鉴于 1933 年的经历，“没有一位更好的革命者……会放任他的观点不受审视”——这条笔记接下来带着嘲讽，针对那些谈论着“下一代”的形成不可避免之来临的那些人。现在仿佛是再下一代了。（GA 22. 1，第 48—49 页；GW 20，第 93 页）——布莱希特再一次与葛兰西一样，从列宁那里得到了重要启发；他从列宁那里获得了不少经验，观察列宁在既定的力量关系中的策略性转向和干预，并将之普遍化。（参见 Mittenzwei 1976，第 146 页及以下；Haug 1980，第 75—76 页）然而（或恰恰是因此）却无法设想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马列主义教条大厦差别更大的对立。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布莱希特和葛兰西几乎同时重构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哲学概念，以表明“所有人都是哲学家”，因为对于“自发的哲学”之要素，人们或是以完善的形式通过“语言”加以吸收，或是作为态度与看法有意地加以塑造。（*Gef* 6，H. 11，§ 12，第 1375 页）布莱希特则从这一问题出发，即：当“人民”“认为某人具有哲学姿态”时，究竟意指为何？（GA 22. 1，第 512 页；GW

15，第253页）布莱希特与葛兰西并未在此出发点上停步，而是为了大众哲学之要素的展开而工作，想要将之从从属性与内在不连贯中解放出来。他们二人并不因各自不同的职位（党的领导与戏剧作家），而是因各自接受这项任务时所身处的不同维度而相互区分。葛兰西发展出了一套人民中的“自然有机的知识分子”及其功能的概念，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将一种平民的立场加以推广，使之能够占据霸权地位；布莱希特则在他运用的不同体裁与媒介中充分实现了这种功能。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美学—文化生产的特定领域中，他的立场在很多国家的确都成了“霸权”。（关于法国的情况，参见 Gisselbrecht 1973）但相似点并未因此而穷尽：两人都以对经济至上主义之批判的理论反思为起点，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从实践出发，以实践为目标，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不过布莱希特对例如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等美国式的倾向，葛兰西对新理想主义的实践哲思都作了批判性的接受，并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表述。对于理论反思，两人都主要使用了笔记这种精炼的形式，并注重材料的分析。在布莱希特那里，物质美学与作为行为准则的哲学合而为一，让他能分门别类地思考这种形式；布莱希特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反思则与葛兰西在他不断更新的单篇笔记中所展开的理论实践产生富有成果的联系。

客观主义批判与实践哲学。“自然主义者在他们的‘阶层’中所崇拜化的那种劳动人民的社会关系，应被完全展露出来。”（GA 22.2，第921页）如葛兰西一样，布莱希特也摒弃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客观主义”：“对于那些可由某种特定的行为来纠正的句子，例如‘伟人决定历史’，不要像客观主义者一样与之斗争，也就是说，不要使用无法通过特定的行为来纠正的句子，例如‘存在无法克服的（社会）趋势等等’！”（GA 21，第575页；GW 20，第69页）布莱希特将现代物理学上的非决定论以及“测不准原理”——也就是“被研究者由于研究本身而被改变”（GA 22.2，第730页；GW 16，第577页）——运用到了行动的领域。如果说，“实用的定义”是这样一些定义，它“允许对被定义的领域进行操控”，那么“在决定性的种种因素中……总包含着定义者的行为”。（GA 21，第421页；GW 20，第168页）他批判了作为事件之不可避免性的“必然性”这一概念。“在现实中却有着相互矛盾的趋势，在斗争中得到确定，这才更不具有（必然性）。”（GA 21，第523页；GW 20，第156页）

真理。“一种断言或表现只有当其能

允许对将来进行预言时，才称得上是真理。但在作这种预言时，预言者必须作为行动者登场。他必须作为对其所预言之事的降临不可或缺的人物登场。”（GA 22. 1，第 96 页；GW 20，第 190 页）真理“不仅是一个道德范畴（刚正不阿、热爱真理、正义）……同时也是一个能力范畴。真理必须被生产出来。因此也就存在真理的生产方式”（GA 22. 1，第 96 页；GW 20，第 189 页）。真理并不是虽“‘自在地存在’，却必须先被发现之物；而是从这种境况或这一人格之可变性的证明中生长出来的。并且这种可变性并不是天生的可变，而是能让境况与人格屈服于其下的那种可变性，即
346 从作为大众的观众之角度出发。因此，真理是一个实践问题”（GA 21，第 360 页）。布莱希特就这样解读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二条。他辩证地消解了对于真理的物化理解：“关于某一事物的真理决定了关于其他种种事物的真理。因为一件事物只有在与另一件事物的联系中才变得真实，而与之相联系的事物愈多，它就愈加真实。真理绝不能用一句话说清。每一句话的真理都依赖于其目的。”（GA 21，第 428 页）而反过来，“虚假是……一个过程，而非可能的与可信的无稽之谈的总和；虚假早已穷尽了所有的表达方式，并没有在问题面前停步”（GA 21，第 585 页）。——布莱希特将他的方法称为**介入性的思考**。

布莱希特谴责官方马列主义把辩证法扭曲为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存在论，并从辩证法的实践相关性出发来加以理解，即将辩证法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不如说是多种智识方法的环环相扣，使人能够消解某些僵化的观念，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实践奉为圭臬”（GA 21，第 519 页；GW 20，第 152 页）。奇怪的是，按克诺普夫的理解，辩证法仿佛在这里“作为一种思考及言说的方法……凭借自身就能确保变革的到来”（1980，第 65 页）。他忽略了辩证法“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实践奉为圭臬”功能，也忽略了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形式。此外，布莱希特运用了“辩证”的另一种含义，不是“实验性的思考”，而是将业已凝结的观念重新流动化。这里所关涉的并非原理，而是煽动颠覆一种束缚人的秩序。这样一来，“认识”就依照古圣经的语义，从理念的抽象中得出：树木以自己的方式“认识”我们，当它们“吸入”我们的二氧化碳时，正如我们吸入它们的氧气。布莱希特几乎是斯宾诺莎式地使整个存在充满动力，并将存在与意识联结在一起：“所有存在者都在反抗不再存在时进入了意识；这种反抗是存在者在自身内践行的努力，而同时也是形成其他各种结合的努力。”（GA 21，第 425

页：GW 20，第 172 页）

布莱希特与葛兰西在思想上的另一处交汇是在语言领域。不过，葛兰西从语言学出发，而布莱希特则接受了语言分析哲学的启发并“改变了其用途”：“认识论必须首先成为语言批判。”（GA 21，第 413 页；GW 20，第 140 页）这里，布莱希特同时反对阐释学及其对意义的假定，这种假定敦促人们这样对待观点，“仿佛人们在某些情况下竟要将
347 之同化入自身”（GA 21：第 520 页；GW 20，第 152、142 页）。他让笔下的墨翟说出反阐释学的建议，即将哲学家的语句从前后文中剥离开来。“他说：一个体系内的句子互相依靠，就好像犯罪团伙中的各个成员。人们一个一个地对付它们才更容易。因此，人们必须将其相互分开。人们必须将每一句话单独地与现实相对照。”（GW 12，第 471 页；参见 GA 22. 1，第 89 页）布莱希特的哲学呼吁破坏规则，而他则将规则变为认识：“人们不应将任何事物‘从语境中剥离’而只是为了将之归入现实的语境。”（GA 22. 2，第 701 页；GW 16，第 655 页）他建议在哲学家批判他人时对其尤其仔细地观察，目的也指向同一方向，也就是将哲学家视为“相当没有廉耻的建筑师，不是发现者，而是无中生有之徒”（GA 21，第 564—565 页；GW 20，第 142 页）。对这里的所有情况都适用的是：“粉墨登场或精心构造的（综合概括的）句子必须在其作为行为发生效力时被把握，即不能片面地将其理解为对照、表达或反射”（GA 21，第 525 页；GW 20，第 173 页），此外还必须将句子置于语言行为与真实行为之间的张力或分歧之中（GW 20，第 153 页）。他自己的“语言方式……既有修辞义显自然”，同时又“将行为带入句子”，布莱希特称之为“姿态式的”语言方式。（GW 12，第 458 页）

与马列主义完全相反，同时也和葛兰西有所不同的是，布莱希特“反对构建完整的世界图景”（GW 12，第 463 页），反对“世界雕塑家”，同时要求：“你不应绘制世界的图像而只是为了这图像本身。”（GA 21，第 349 页；GW 20，第 50 页）他要求思想应联系具体的实用性，而这种联系会让人们把论据理解为雪球，并非为了永恒而存在。（参见 GW 12，第 451—452 页）对于认识论上的反映论，他以在语言上仅存在细微分别，但在事实上却截然不同的对可作用于实践的反映之要求加以反对。后一种反映伴随其实践导向，也展露出其“主观性”的立场。布莱希特推动了从灵知学到知识论的领域更替。

与葛兰西不同，布莱希特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方式几乎总是与马克思相同。也就是说，当他自己谈论意识形

态时，几乎总免不了是批判性的。他也决绝地拒绝一切唯道德论。君特·安德斯曾在1962年讲到，他在流亡美国期间曾尝试向布莱希特指出其中的矛盾，即布莱希特在语言中否认道德，却在行为和作品中践行道德。布莱希特断然拒绝了他的论点，因为他并不将批判与义愤视为自始至终均为“规范性”的行动。葛兰西可能会通过改变领域来调停这场
348 争论：布莱希特应当承认，他在伦理—政治领域侵入了霸权性的力量状况。他本可以通过以自己的方式思考“霸权”，更轻松地实现这一点：“正如属于被压迫阶级的人可能会倒向压迫者的理念一样，属于压迫阶级的人也会倒向被压迫者的理念。在特定的时代，两个阶级为了人类的领导权而斗争，而称为先驱、领导人们向前的欲望，在那些没有完全堕落的人中极为强烈。”（GA 23，第291页；GW 16，第703页）鉴于这种霸权争夺，布莱希特在理论和实践中使用了一种伦理概念，虽与古典理念相联系，但为了科学时代的大众重新改变了其用途。（参见他“运用资产阶级伦理并创建无产阶级伦理”的项目，GA 21，第577页；GW 20，第116页）在堕胎问题上，鉴于“数以y千记的被统计数字捕捉到的女性，没有被忏悔神父追责的天主教女性，没有被迫害的犹太女性，堕掉了数以x千记的纳粹，堕掉了高等种族的胎儿”，布莱希特反思了这些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是否可以建构一种哲学，在这里充当调和的体系？”他颠覆了尼采的话语，继续说道：“现实的奴隶起义。伦理应由何种材料做成才能加以调和？”（GA 21，第582页）

知识分子。如果说葛兰西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功能，那么他在这里与布莱希特的相似性也同样令人惊讶。布莱希特在复杂的“图依”（Tui，Telleki-Uell-In的首字母缩写，布莱希特根据“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新创的词，用来批判那些将浅薄的观念售卖给普通民众的所谓“知识分子”。——译者）问题上所作出的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常常遮盖住了这种相似性。在这里，葛兰西发展出了“洛里亚主义”（Lorianismus）的概念，而布莱希特则将“无产阶级为何需要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答案放置到了对苏维埃马克思主义的毁灭性批判当中：“为了继续发展那种纯粹的理论。”这一点之所以必要，是出于下述原因：“苏俄的党因为自身的孤立，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构建一种理论，作为其经济基础的自然的上层建筑。但这一基础却已经病入膏肓。”（GA 22.1，第150页，GW 20，第54页）

实验性思考。布莱希特从培根的《新工具》中借用了《戏剧小工具篇》

（*Organon*）的标题，并非偶然。二者在对臆测的拒斥上有诸多共同之处，从积极的意义上可将之总结为“实验性思考”这一概念。通过试验，起草与摒弃得以互相调和。主体的行为获得了关键性的地位，但通过对马克思之实践标准的实
349 验性运用，主体行为仍然出于主观主义的对立面。对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而言，实验作为“新生产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实践性整体之新形式的第一个细胞”同样具有范式性意义。工人与科学家在（社会）事物上相互依赖：“科学—实验家［同样］是一名工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家；他的思考会持续地受到实践的管理，而反之亦是如此。”（*Gef* 6，第1441页）

3. **接受**。3.1 文学形式和国际影响力保护生活在民主德国的布莱希特晚年不受压迫。赫希特曾警告不应严肃对待作为理论家的布莱希特，而他的警告不仅让官方理论免受布莱希特的挑战，也让对布莱希特的接受免遭官方理论家的迫害狂热。不过在1988年，问题到底还是在《德国哲学杂志》（*DZPh*）中出现了，即这位一流作家是否也在哲学上具有重要性。（参见Gross）正如布鲁诺·弗莱（Bruno Frei）所洞见的一样，这一问题并不符合实际的接受情况：“说到底，还是布莱希特使作为观察方式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那些希望被认真对待的艺术家与批评家而言具有了强制性”（1973，第725页）；自然不是按照教科书亦步亦趋，而是如布莱希特在《工作日志》（*AJ*，22.1.1942）中所记，作为一种可能性，“使人能够驾驭充满矛盾的统一体”。

因此可以说，在官方哲学之外，人们走得更远。米腾茨威曾于1976年的著作中——或许是在估算各种力量之相互关系时——将布莱希特的辩证思想与占统治地位的马列主义之间的颠覆性对立“大事化小”（参见上书，第126页）。布莱希特的哲学著作乃是“将列宁主义引入哲学与艺术理论的伟大尝试的一部分”（第137页）。他将布莱希特的立场描述为“辩证的决定论”（第127页），同时至少将之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继续发展”（第128页），而这一提法自然要多于通常所承认的那种从属性的“运用”。《墨翟》敦促人们“审视行为，传递历史与个人经验，但切勿全盘接受指导性原则”（第122页）。“《墨翟》以这种形式确确实实地成了唯物主义思想高等学府中的练习册。”（同上）米腾茨威批判了“片面的提问”，同时警告要当心布莱希特哲学笔记中的“矛盾之处”。（第144页）此外，他还将布莱希特对斯大林的批判负面地称为“不加分别的”。米腾茨威删除了布莱希特立场中受情况

制约的细化区分，也删除了斯大林与列宁之方法的决裂，特别是当他宣称：对于布莱希特而言，从来“只有唯一一条道路”.“即列宁走过、之后由斯大林在关键领域所继承的道路”。（同上）

在民主德国晚期，布莱希特纪念日成为对国家正统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所存在的种种欠缺取得批判性一致认同的媒介。在1985年的会议记录册所记载的各种互不相同的立场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出现了消解的迹象。米夏埃尔·格拉贝克（Michael Grabek）在将布莱希特与葛兰西相联系时，几乎毫无遮掩地描绘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前景。他用葛兰西的方式解读了出自布莱希特之《墨翟》的“人民统治意味着论据的统治”（GW 12，第530页）这句话：“一种褪去意识形态形式、避免任何图依主义的精神领导将会成为新式统治的一个建构性契机。”“共识不再会强制形成，而只有强制地信服。”（1986，第338页；同时参见 Kebir 1986）

沃尔夫冈·恩格勒（Wolfgang Engler）将“布莱希特的问题”描述为“作为大众历史性的自为统治的那种由下自上的集体化”（1986，第289页）。他在其中看到的是布莱希特几乎“前现代”的局限性。“资产重新分配越来越多地指向整个社会，指向一种普遍交流的机制，而非直接指向攫取资产的机制。”如果社会是“相互不可约减的各部分关系之关系化的总体概念”，那么它必须“从参与其中的集体之立场出发成为其能力的盈余”。（同上）对于恩格勒而言，并不存在那种如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中所表述的对贮藏于国家中的或通过资本所获取的能力之再分配。（参见 Haug 1993，第132—135页等处）

这里已显现出，对布莱希特的运用并非是为了从官方的马列主义中重新赢得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是为了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之大计。这一点也体现在汉斯-彼得·克吕格（Hans-Peter Krüger）身上。他所依据的是“后阶级社会”中“社会化个体”的理性潜能，而这种“社会化个体”“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是一个“多层级的大众现象”。（1986，第237—238页）对于布莱希特笔下身处旧制度的伽利略而言，“缺乏一种超越统治秩序的社会历史运动”（第242页）最终使他大难临头；而这一形象也成了反思身处国家正统社会主义中的知识分子之处境的范式：“所谓‘英雄’随着故事的深入，失掉了他实实在在的脊梁。他从集体所经历的神话中成长起来，在宗教的天启中用彼岸来批判此岸的人类，在普遍人性的、铿锵作响的旗帜下被引入了阶级的纪律，最终却逃入了他有限生命的凡俗之中。”（第235页）在克吕格

看来，布莱希特的一个强项在于，“不会为了历史的英雄尺度而牺牲未来”；但当布莱希特击碎了伽利略机会主义式的自我肯定时，他也遭到了克吕格的批评，因为他在此处又重新陷入“积极英雄之幻象的禁锢”（第 242 页）当中。“从这种两难境地中，或许只能引出一种当下的素材，而其前提则是对我们这个世纪所缺乏的解放性联盟所作的批判性的现状分析，正如彼得·魏斯在他的《抵抗的美学》中所开启的那样。”（第 243 页）克吕格最后说道：“如果我们现在不留下这种时间，它就再也不会到来。”（同上）

当苏联宣布改革（Perestrojka）时，君特·迈尔运用了布莱希特对于广播理论的思考，起草了民主化“改革广播、电视，将之从一种分配装置改变为公共生活的一种真正的交流装置”，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它也是塑造一种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中心”。（1987，第 283 页及以下）若以现实为标准来衡量，这自然是一个乌托邦，但却是一个具体的乌托邦。媒体在民主德国解体过程中的空前繁荣证明了这一点。东德的政治动荡始于 1989 年 11 月 4 日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举行的、由布莱希特的柏林剧团的工会团体所发起的抗议。“贯穿始终的对话”和“团结与集体在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化”（同上书，第 282—283 页）仿佛触手可得。在行将消亡之际，民主德通过“圆桌会议”创造了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假象。

3.2 在德语地区之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布莱希特由于文本原因并不作为理论家为人所知。同时，卢卡奇范式的强势立场也阻碍着对理论家布莱希特的承认。但作为戏剧家，布莱希特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与布莱希特一样，都追求一种哲学性的大众剧院的理念。他在 1955 年（在不知道布莱希特的《政治与社会论文集》的情况下，因该书法文译本于 1970 年才正式出版）将他与布莱希特那种“事关革命性否定的涉士比亚式戏剧”（第 53 页）之间的差异表达得简单明了。即“在已部分神秘化了的人群面前，人们不仅可以信任批判性的反应”，同时也应当“为这一群人提供针锋相对的神秘化”（第 49 页）：“理想的情况就是同时‘展现’与‘触动’。”（第 53 页）萨特对《高加索灰阑记》中士兵的去人格化（通过面具）提出了尖锐的“人道主义”批判，“这样一来，人们会说，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解，例如相信在劳动市场上工人是抽象的，而到最后市场才是绝对具体的”（第 104 页）。根据萨特的理解，“马克思决不会想要这样表达——这是黑格尔

而非马克思的观点，而恰恰是工人，不管是否遭到了彻底的剥削或异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保留了他的人性现实”，而即便布莱希特想要将对民主德国领导层的批判搬上舞台，大约也只会通过一个“被理解的人”来实现。（同上）

但卢卡奇的批评者路易·阿尔都塞却对布莱希特究竟如何反对那种被萨特称为“人之神秘化”感兴趣。阿尔都塞在布莱希特身上仿佛发现了他理论的完美先驱，因为布莱希特力图以他的剧作击碎“**再认识**”（*reconnaissance/méconnaissance*）的意识形态怪圈（1965，德文译本 1977 年，第 207 页），并且“拒绝以自我意识的形式阐述一部剧作的意义与内涵”（第 199 页），而是让自我艺术的自发性意识形态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及“无连接的结构”（第 240 页）之框架内出现在其自身实在的存在条件——“因为这一抽象之物是实际上的具象之物”——之基础上，并令其支离破碎（第 202 页）。自然，阿尔都塞的论文“几乎未曾入过真正的布莱希特研究之法眼”，尽管“在 70 年代所取得的对布莱希特的新认识，例如与作为审美建构的描摹问题相关的一切，就其事实而言”已在其中铺好了基础。（Klatt 1986）——布莱希特以陌生化效果来反对意识形态的主体效果；而这种陌生化效果应当如赫尔伯特·马尔库塞所言，“实现这种分离，让世界能在这种分离中成为它原本所是的那种样子”（1967，第 86 页）。

3.3 布莱希特与批判理论的带头人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

阿多诺 1951 年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一书中的名言：“错误的生活无法过得正确”（第 18 则），与布莱希特对哲学作为正确行为之教义的理解，并不能通过两位主角本人互相调和。尽管汉斯·迈尔认为“布莱希特在严肃对待辩证法的同时，也悟到了**一种否定性辩证法的纲要**”（1971，第 251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布莱希特如恩斯特·布洛赫所讲述的，曾和年轻的阿多诺有过来往，而这种交往“在当时让阿多诺受益良多，他觉得自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随后到来的就是那段法兰克福岁月。这段时光让另一个阿多诺，也就是他身上的妥协性，开始发挥效用。他与曾经最为尊敬的布莱希特分道扬镳，陷入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挂靠于法兰克福大学，但在机构与财政上均独立的理论研究机构，创办于 1923 年，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发祥地。阿多诺、哈贝马斯等著名社会学家均曾供职于此。——译者）的金主们的影响之下”（1977，第 51 页）。在流亡美国时期，布莱希特与同样流亡的法兰克福研究所的代表人物

见了血，其中便又有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理论的理解，以其态度与理论的生产方式为基础；但布莱希特看待他们，就仿佛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看待黑格尔左派并在《神圣家族》中大加讽刺一样：将之视为20世纪的“批判的批判”（参见*HF*，MEW 2）。尽管他的朋友瓦尔特·本雅明和汉斯·艾斯勒与特奥多尔·W. 阿多诺有着成果丰硕的合作，布莱希特仍不能就事论事地对待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构思精巧的逃避现实之举，不能认真地对待被布洛赫称为“假学究做派和故弄玄虚的幌子”（1977，第51页）。布莱希特将其作为讽刺的模型，运用在那些身处权力与金钱的关系中，在形式上混乱不堪而内容上唯唯诺诺的知识分子身上。——在1935年5月，布莱希特就开始创作“一部喜剧，我在其中要揭示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观念的市场上，是如何兜售那些为布尔乔亚所喜欢的意识形态的”（GA 22.1，第929页）。当他和汉斯·艾斯勒于1942年“在霍克海姆家吃午饭”时，“艾斯勒建议《图依小说》（*Tuiroman*）的情节可采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历史。一个年老的富人（小麦投机商威尔[Weil]）要死了，对世上的不幸感到深深不安。他在遗嘱中捐了一大笔，要建立一个研究世上痛苦之来源的研究所。这个痛苦的来源当然就是他自己”（*AJ*，15.2.1942）

与君特·安德斯和赫尔伯特·马尔库塞不同，阿多诺用最刻薄的批评报复了布莱希特的讽刺，与此同时也点出了70年代末脱离布莱希特的关键词。这种与布莱希特的背离伴随着当时普遍的趋势转向而发生。在东西德所推行的分离作为诗人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布莱希特；而阿多诺则与之相反，认为布莱希特的艺术“不屑于那种等价交换（quid pro quo）：他的艺术虽自认为是教条，却在同时出于自身美学形象的考虑，免除了其所教导之内容的强制性”；但阿多诺这样说的目的，只是为了从理论上审判布莱希特：“这却让他背负上了证明其所明确企图之物的理论正确性之责任。”（1962，第416页）阿多诺用一种极为实证的方式理解这种“明确企图之物”，即从其质料价值上理解布莱希特的寓言，而忽略在接受中完成的翻译、积极协调与补充成果。例如阿多诺对《阿图罗·魏》（*Arturo Ui*）的批判：“这里登场的并非强力支配者的阴谋，而是一个傻里傻气的匪帮‘花椰菜信托’。”（第417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阿多诺对戏剧内容的删减令人瞠目结舌，固执己见，又在其中取消了剧院寓言西式的维度，即他对于霸权关系的干预。他对布莱希特历史剧的评论，就仿佛意味历史学家评论一本出自与之竞争的学派

354

的历史著作。但他自己对“强力支配者”（同上）或战争的“真正获利者”（第421页）的谈论，却只是带着疑似套话的外形，展开了一张空荡荡的投影平面。他承认了布莱希特作品的“力量”（第419页），却同时声称作品毫无影响力（第418页）。20世纪30年代，布莱希特曾受弗里茨·施特恩贝格启发（参见GA 21，第443页），在《三分钱歌剧》（*Dreigroschenprozeß*）（GA 21，第448页及以下；GW 18，第139页及以下）中阐述了不可由感官描绘的社会现象之复合功能的理念；但奇怪的是，阿多诺却将此视为一种不情愿的妥协：“正如布莱希特之后不得不承认的”，“感性直观……无法作用于那被极端地调节了的，即社会本身”；“那种作为客体之运动法则而进入客体之物，必然地被现象的意识形态形象所遮盖，而正是此物会规避”感性直观的准则。（1966，第206页）

亨利·列菲弗尔将“对布莱希特既可怜又可笑的误解”归咎于，布莱希特的戏剧所制造的那种典型偏向性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典型被混为一谈，尽管布莱希特的戏剧恰恰是后者的颠覆性反面：舞台上的叙述“创造了一种与实践的变化相类似的变化：探究各种可能性，从可能过渡到行动再到决定。最后的答案就是判决……剧情倒不如说是在观众心中而非在舞台上发展”（1977，第31页）。恩斯特·布洛赫在这种戏剧模式中发现了“舞台上的理论—实践操作”，在其中“主题随着自身的实施，也经历了一些东西”（1938，第254页）；或者像布洛赫于1968年与杜契克的对话中所说，这是一个“舞台一样的实验室”，带着“布莱希特搬上了舞台的革命实验。一种模型在这里得到试用，任其行动直至终了，在此之前则有不少其他可能从头到尾地试验了一遍”等等（GA 11，第395页）。

阿多诺似乎将自己与这一过程全然隔绝，只是决绝地将舞台上的言语当作他要彻底谴责的东西：“这位反意识形态的作家却准备将自己的教条降格为意识形态。”（1962，第418页）阿多诺针对布莱希特所提出的视角似乎呈现出一种灵智学特征，或如阿多诺自己所担心的，像是“挖空心思想出来”似的：“每一种为了世界的投入都必须昭告天下，才能满足‘入世的艺术作品’这一理念，满足理论家布莱希特所设想的那种具有争议性的陌生化；但他越是献身于社会化的人性，就越少地践行这种陌生化。”（第425—426页）

后现代主义利用了阿多诺反对布莱希特的论据，但除此之外却为大多数被阿多诺针对争辩过的东西正了名。这样，阿多诺就随着布莱希特，一同从时代精神的图像中消失不见了。从后世的角度看，阿多诺的激进思想经过瓦尔特·本

雅明和恩斯特·布洛赫思想的调和，或许在安东尼奥·葛兰西之观念的启发下，与布莱希特的思想发生比起二人在此时更富有成果的联系。

在《关于奥德赛和K先生的延伸阅读》（*Exkurs über Odysseus und Herrn K.*）中，克劳斯·海因里希将主人公的姓名“考伊纳”（Keuner）解读为自带含义的名字“无人”（*Keiner*）：主人公通过“降人无名无姓”来自救的努力最终失败。（1964，第54页）与之相反，多罗西·索勒（Dorothee Sölle）在1964年想要说明，考伊纳故事的来龙去脉并不能从其标题人物的形象中得到解读，而应被阐释为“对于变化的教学与学习，辩证法的辩证”（1964，第125页）。——奥斯卡·内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在其1981年的著作中（第511页），延续了布莱希特通过“功能”坐标补充水平与垂直坐标的努力，增补了“非理性的、想象的、革命的”坐标；他们将“功能”坐标阐释为他律的坐标，而这种他律“仍然是虽然本末倒置，但依然自我实现的对人类本质力量之运用的一个维度，也就是异化了的工作、颠倒了的生活、错误的意识，包括它们的物化与更高层面上的扩展”。——汉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与赫尔穆特·雷腾（Helmut Lethen）则认为，布莱希特“这位唯物主义者谜一样而独有的特性”，正在于他将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启发联系在了一起；“人们在布莱希特那里认识到主体受社会决定，认识到主体的分裂、复数化以及其由欲望驱使的阴暗面，而这种认识的前提”必须感谢那几位思想家。（1980，第157—158页）

4.“雾月十八和老子相遇，二者互相阅读，互相保存”，这句话出自布洛赫为纪念布莱希特逝世于1956年8月14日所写的《墓志铭》（*Epitaph*）中：布莱希特的作品将始终让新一代人感到惊讶。至少，“布莱希特式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与实践哲学”在后现代经验之后重新获得了现实性（Fahrenbach 1986，第10页）：更重要的时候，官方马列主义在东德失败之后，布莱希特保留了新起点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而只有一种不带批判的拙劣模仿才能阻碍这新的开始。356
自然，人们若是像引用自成闭环的教条一样引用布莱希特的哲学笔记，假装其中不存在张力、矛盾、发展、受制于阶段的片面性和“不负责任”的试验性表达，那就会犯下错误。布莱希特哲学笔记的不完整性与葛兰西的笔记并无二致，也并非是缺点，只要人们不忘记：“学习的人比教条更加重要。”（GA 21，第531页）以及：“谁若是不打算学习，就不应该教学；谁要是教学，就应教人学习。”

（GA 23，第 139 页；GW 16，第 728 页）本雅明在《单行道》（*Einbahnstraße*）中曾有一句名言："确信结不出果实"（GS IV，第 87 页），而布莱希特的以下笔记正让人想起这句话："谁若是从事哲学，就不应想着说服。"（GA 21，第 316 页）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Engagement« (1962), GS 11, 409-430;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GS 6; *Aktualisierung Brechts*, AS 50, hgg. v. W. F. Haug, K. Pierwoss und K. Ruoff, Berlin/W 1980; L. Althusser, »Das 'Piccolo', Bertolazzi und Brecht. Anmerkungen über materialistisches Theater«, in: K. Barck und B. Burmeister (Hg.), *Ideologie – Literatur – Kritik. Französische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DDR 1977, 187-208; G. Anders, *Bert Brecht. Gespräche und Erinnerungen*, Zürick 1962; W. Benjamin, *Versuche über Brecht*, hgg. v. R. Tiedemann, Frankfurt/M 1966; E. Bloch, »Ein Leninist der Schaubühne« (1938), und »Epitaph, 14. VIII. 1956«, in: *Erbschaft dieser Zeit*, erw. Ausg., GA 4, Frankfurt/M 1962, 250-255; ders., »Universität. Wahrheit, Freiheit« (1955), in: *Philosophische Aufsätze*, GA 10, Frankfurt/M 1969, 317-330; ders., »Liegt es am System?« (1965), in: *Politische Messungen. Pestzeit, Vormärz*, GA 11, 1970; ders., *Tagträume vom aufrechten Gang. Sechs Interviews mit Ernst Bloch*, hgg. v. A. Münster, Frankfurt/M 1977; *Brecht 83. Brecht und Marxismus*, Berlin/DDR 1983; *Brecht 85*, Berlin/DDR 1986; H. Brüggemann, *Literarische Technik und soziale Revolution. Versuch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Kunstproduktion, Marxismus und literarischer Tradition in den theoretischen Schriften Bertolt Brechts*, Reinbek 1973; ders., »Überlegungen zur Diskussion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Brecht und Korsch.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Werner Mittenzwei«, in: Buckmiller (Hg.), *Zur Aktualität von Karl Korsch*, Frankfurt/M 1981, 137-149; M. Buckmiller, »Marxismus als Realität. Zur Rekonstruktion der theoretischen und praktischen Entwicklung Karl Korschs«, in: *Jb. d. Arbeiterbewegung*, Bd. 1, 1973, 42ff; H. Claas, »Brechts 'Buch der Vertagungen'«, in: *Argument*, 16. Jg., 1974, Nr. 85, 220-227; ders. u. W. F. Haug (Hg.), *Brechts Tui-Kritik. Aufsätze, Rezensionen, Geschichten*, AS 11, Berlin/W-Karlsruhe 1976; H. Eisler,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Hanns Eisler im Gespräch*, hgg. v. H. Bunge, München 1970; W. Engler, »Kollektivität und Distanzierung. Stichworte zur Dialektik von Einverständnis und Negation in der Dramatik Brechts«, in: *Brecht 85*, 279-292; ders., »Brechts Stellungnahme zur philosophischen Kontrovers um die Krise der bürgerlichen Vernunft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in: Heise 1987, 70-81; H. Fahrenbach, *Brecht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1986; B. Frei, »Brechts 'Arbei-

tsjournal'«, in: *Argument*, 15. Jg., 1973, Nr. 82, 725-734; A. Gisselbrecht, »Brecht in Frankreich«, in: *SuF*, 20. Jg., 1968, H. 4, 997-1007; M. Grabek, »Brecht, Gramsci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Intellektuellen«, in: *Brecht 85*, 332-338; M. Gross, »B. Brecht und die Philosophie«, in: *DZPh*, 1988, H. 3, 213-221; W. F. Haug, »Nützliche Lehren aus Brechts `Buch der Wendungen'«, in: *Argument*, 10. Jg. 1968, Nr. 46, 1-12 (wieder in: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70-93); ders., »Brechts Beitrag zum Marxismus« (1980),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72-86;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W. Hecht, »Zur Ausgabe der Schriften«, in: Brecht, GW 20, 1967, 51*-57*; ders., *Sieben Studien über Brecht*, Frankfurt/M 1972; K. Heinrich, *Versuch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nein zu sagen*, Frankfurt/M 1964; W. Heise (Hg.), *Brecht 88. Anregungen zum Dialog über die Vernunft am Jahrtausendende*, Berlin/DDR 1987; ders., »Einleitende Gedanken«, in: ebd., 1987, 7-22; G. Irrlitz,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 Quellen Brechts«, in: *Brecht 83*, 148-167; R. Jost, *»Er war unser Lehrer«. Bertolt Brechts Lenin-Rezeption am Beispiel der »Maßnahme«, des »Me-ti – Buch der Wendungen« und der »Marxistischen Studien«*, Köln 1981; ders., »Vom aphoristischen Philosophieren oder: Wie die Sprache der Wirklichkeit folgt. Brechts 'Me-ti/Buch der Wendungen'«, in: *WB*, H. 10, 1984, 1743-1751; S. Kebir, »Brecht und Gramsci«, in: *Brecht 85*, 339-350; G. Klatt, »Zwischen Alltagserfahrung und 'eingreifendem Denken'. Vom Umgang mit Brecht in den 80er Jahren«, in: *Brecht 85*, 105-116; J. Knopf, »Eingreifendes Denken als Realdialektik. Zu Bertolt Brechts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in: *Aktualisierung Brechts*, 1980, 57-75; ders., *Brecht-Handbuch. Lyrik, Prosa, Schriften*, Stuttgart 1984; L. Kofler, »Zum Verständnis Bert Brechts«, in: ders., *Zur Theorie der modernen Literatur*, Neuwied 1962; H.-P. Krüger, »Brechts Dialektik-Konzept in `Me-ti'«, in: *Brecht 1983*, 203-211; ders., »Galilei als Held und gesellschaftliches Individuum«, in: *Brecht 85*, 235-243; ders., »'Postmodernes' beim jungen Brecht?«, in: Heinse 1987, 147-170;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H. Lefebvre, *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Paris 1962 (dt. von B. Schwibs, mit unausgewiesenen Auslassungen und Veränderungen: *Einführung in die Modernität*, Frankfurt/M 1978); ders.,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Kronberg/Ts 1977; H.-T. Lehmann u. H. Lethen, »Verworfenes Denken«, in: *Brecht-Jahrbuch 1980*, hgg. v. R. Grimm u. J. Hermand, Frankfurt/M 1980, 149-151; K.-H. Ludiwg, *Bertolt Brecht.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und Implikationen seiner Dramaturgie*, 1975;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1967), Schriften 7; G. Mayer,

»Medien – Massen – Künste. Rückgriff auf Ansprüche und Ansprüche auf Vorgriffe«, in: Heise 1987, 270-285; H. Mayer, *Brecht in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M 1971; W. Mittenzwei, »Marxismus und Realismus.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Argument*, 10. Jg., 1968, Nr. 46, 12-42; ders., »Der Dialektiker Brecht oder Die Kunst, 'Me-ti' zu lesen«, in: Claas/Haug 1976, 115-149; K. D. Müller, »Der Philosoph auf dem Theater. Ideologiekritik und 'Linksabweichung' in Bertolt Brechts 'Messingkauf'«, in: *Text und Kritik, Sonderband Bertold Brecht I*, 1972, 41-71; ders., »Brechts *Me-ti* und di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Lehrer Karl Korsch«, und »Anmerkungen zur 'Korsch-Legende'«, in: *Brecht-Jahrbuch 1977*, hgg. v. J. Fuegi, R. Grimm u. J. Hermand, Frankfurt/M 1977, 9-29 u. 184-187; ders., *Brecht-Kommentar zur erzählenden Prosa*, München 1980; G. Müller-Waldeck, »Die 'Große Produktion' und das alltägliche Glück. Zu Aspekten der Wertbildung bei Brecht«, in: Heise 1987, 23-37; O. Negt u. A. Kluge,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M 1981; W. Rasch, »Bertolt Brechts marxistischer Lehrer«, in: *Merkur* 188, 1963; M. Riedel, »Bertolt Brecht und die Philosophie«, in: *Neue Rundschau* 82, 1971, 65-85; H. J. Rosenbauer, *Brecht und der Behaviorismus*, Bad Homburg 1970; K. Ruoff, »Tui oder Weiser? Zur Gestalt des Philosophen bei Brecht«, in: Claas/Haug 1976, 17-52; dies., »Das Denkbare und die Denkware«, in: *Aktualisierung Brechts*, 1980, 75-84; J.-P. Sartre, *Mythos und Realität des Theaters*, Reinbek 1979; A. Schölzel, »Korsch, Brecht und die Negation der Philosophie«, in: *Brecht 83*, 32-44; D. Sölle, »Dialektik und Didaktik in Brechts Keuner-Geschichten«, in: *Brecht heute – Brecht Today. Jb. d. int. Brecht-Ges.*, hgg. v. R. Grimm u.a., 2. Jg., Frankfurt/M 1972, 121-130; C. Šubik, *Einverständnis, Verfremdung und Produktivität. Versuche über die Philosophie Bertolt Brechts*, Wien 1982; ders., »Nietzsche und Spinoza als Lehrer Brechts«, in: *Brecht 85*, 293-300; ders., *Philosophieren als Theater: Neue Versuche über die Philosophie Bertolt Brechts*, Habilitationsschrift, Klagenfurt (Ms.); A. Tatlow, »China oder Chima?«, in: *Brecht heute – Brecht Today: Jb. d. int. Brecht-Ges.*, hgg. v. R. Grimm u.a., 1. Jg., Frankfurt/M 1971, 27-47; D. Thiele, *Bertolt Brecht. Selbstverständnis, Tui-Kritik und politische Ästhetik*, Frankfurt/M 1981.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毛明超 译，曹旸 校

参见：

Alltagsforschung, Antiideologie, Antiphilosophie, Ästhetik,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Bild,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ngagement, episches Theater, Epistemologie, Erbe, Faustus-Kontroverse,

Frankfurter Schule, Gestus, Haltung. Hermeneutik, Ideologie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Materialästhetik,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ekritik, philosophisches Volksthcater, Realismus,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Theater, Tuismus, Umfunktionieren, Verfremdung, Weisheit

布哈林主义（Bucharinismus）

A: madhhab Bucharin, būkhārīnīya.

E: Bucharinism. – F: Boukharinisme.

R: Bucharinstvo (Бухаринизм).

S: Bujarinismo.

从 1925 年起，布哈林主义指一个由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的松散小组。这些年轻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向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charin，1888—1938）学习过社会科学，其中许多人还是红色教授学院（Rote Professur，存在于 1921—1938 年间，是苏联第一所新型高等院校，以研究马克思社会科学为主。——译者）的学生。伊萨克·多依彻（Isaac Deutscher，1963）将布哈林主义者视为布哈林的政治伙伴结成的团体。1929 年以后，斯大林集团在苏共和共产国际中把“布哈林主义”作为骂人的词。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布哈林集团，被斯大林本人称为“我们党内所有政治集团中最令人讨厌和最卑劣的一个”（转引自 Löwy 1969，第 343 页；参见 W 11，第 285 页及以下）。在 1938 年的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布哈林连同其余 20 名布尔什维克老党员被指控为“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集团”的领导人，在斯大林命令之下被判处死刑，同年 3 月执行。据奥古斯特·塔尔海默猜测，这次审判旨在让苏联年轻的一代中没有人再知道布哈林。“只要谁知道他，就会明白”（指控是毫无根据的）。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曾多次尝试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消除党内历史空白点的运动中，苏联从 1986 年起开始重新评价布哈林。两年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和司法上为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恢复了名誉，并恢复其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同时，“布哈林主义”用以概括布哈林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上所做出的贡献。

359

至于布哈林的作品，我们只能从中简略地提及最重要的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des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1922）一书中布哈林探讨了阶级的定义等问题，发展了平衡论（Gleichgewichtstheorie）和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1）布哈林认为，在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即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一种（短期的）相对团结，比如因为帝国主义时期对殖民地经济剥削获取特殊利益，或阶级意识还未得到充分发展。从长期来看，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时期得不到半点的好处，相反却要在世界大战和其他战争中背负上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们会产生砸碎帝国主义锁链的意愿。（2）在社会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外在的平衡关系，社会存在于自然之中。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流动平衡，在不断被干扰之后，通过适应，一个更高的基础得以重建。这一平衡通过人类劳动得以实现。如果新的平衡基于一个较低的基础而重建，则建于其上的社会就会崩溃。此外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平衡关系，这种平衡由于矛盾冲突同样处在运动中。在国内战争中这个平衡关系才会最终被毁灭，被“扬弃”。这两种平衡关系是相互联系的。（3）上层建筑涵盖所有的社会现象，社会现象高于经济基础，它依赖于经济基础，又有部分自主性，无论作为推动力或阻力，都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360 与此相关的是布哈林对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观点：“理论是累积的、浓缩的实践。只要理论将物质劳动的实践一般化，在质上表现出物质劳动的一种特殊延续，那么理论本身在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实践，一种通过思维得以形成的实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总是利用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本身是理论的。”（*Theory and Practice*，第 13 页）科学知识是“物质劳动”（自然科学）或“管理和阶级斗争”（社会科学）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延续。（第 20 页）平衡论也是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通过后者，他完成了 1917 年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思想预备工作。

布哈林把革命党视为“先进阶级内部的先进分子的组织”（1921）。革命党可以比所有其他（政治）领域都建设得更加民主，比如在军队中军事命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布哈林要求最为广泛的工人民主，应该让哪怕最落后的、文盲的成员，也有可能主动参与党的建设、党内生活、对所有问题的讨论和决定。他反对任命的方式：所有委员会都应该自下而上地选举出来，有汇报工作的义务，受成员监督。既然工人阶级内部并不是完全同质的，相反会根据特殊利益“分裂”成若干团体，因此工人阶级需要一个进行领导的党，但这个党的领导地位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当阶级意识达到更高的层次时，进行领导的党或将不再必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 年）上由布哈林参与制定的党内派别禁令原本只适用于特定的，尤其是紧急的历史条件。

在经济学领域布哈林主要致力于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曾写过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边际效应的文章，研究过帝国主义时期的世界经济。在《过渡时期经济学》（*Die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1922）一书中，他处理了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的特殊经济问题，其中包括“革命的社会成本”问题。战时共产主义将大量资源消耗于国内战争之中。战后，布哈林等人一起制定了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主张动员一切力量用于重建，其中也包括小商品生产者和资本家的力
361 量——而所有这些力量必须受到监管，并且要逐步使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力量占优势地位。革命胜利之后，为了不让百姓和国民经济负担过重，布哈林认为措施放缓是明智的。工业建设应该放缓，农民合作社的成立应该遵循自愿、渐进的原则。经济计划应该始终限制于把控经济命脉。独立的、不剥削他人的中农应该争取过来参与合作。

布哈林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而且长期参与制定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因而他的理论著作要置于历史语境中考察，也就是注意它与苏共政策当时的问题，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研究和认识水平的关系。除了冷静的分析，在他那里还可以看到对未来热切的设想。因为革命者不仅想要“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还想要改变世界，通过把理论介绍给大众，使理论变成“物质力量”。所以对布哈林正如对每一个革命理论家一样，要区分开他们短期的日常工作、乌托邦式的构想和基础的分析。

对于布哈林的评价见仁见智，充满争议。列宁认为布哈林理论中有点烦琐哲学的东西，大概从来没有理解辩证法，但仍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全党喜欢的人物”。（*an den Parteitag*，LW 36，第 579 页）葛兰西对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非辩证的客观主义作出过一个全面的批判。（参见 *Gef* 6，H. 11，§13—35）卢卡奇在接受勒维（Löwy）采访时，称布哈林是一个内心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受到外在潮流裹挟，“从极左摇摆到极右”（1969，第 109 页）。布哈林本人评价自己：“在自我批评的火焰中，从儿时起的幻象灰飞烟灭，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事实之间的联系裸露出它们全部的阴暗面，而无产阶级政治具有有时缺乏情感，却务必稳重的性质，无产阶级政治紧紧依靠现实又改变现实。从这个视角看，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表明了我们幻象的破灭。”（转引自 Löwy 1969，第 110 页）在致给列宁的悼词上，布哈林也自我批评地说自己有“知识分子的短视、书生习气和 362
纯理论者的专家作风”（1924）。内格特

(1969) 把布哈林的思想描绘为非历史、非辩证的，将他列为斯大林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施特尔（Stehr 1973，第 23 页）坚决反对内格特的观点。他在布哈林的理论著作里看到了对那个时代矛盾的反思，因而布哈林的理论具有时代和地域的特殊性。（同上书，第 87 页）尽管如此，施特尔尝试发掘布哈林多方面理论著作的内在联系，将他的著作呈现为一个体系 —— 虽然是一个不完整的体系。

如果要反思对计划经济僵化教条的、过于极端因而有害的理解，那么布哈林的经济著作对于制定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来说意义深远。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将有必要检验，布哈林的哪些理论仍行之有效。他著作的相当一部分在 20 世纪 90 年代莫斯科档案公布于众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即使收录了 1715 个条目的第三版布哈林著作目录（Hedeler 1993）仍然是不完整的。布哈林在被处决前身处监狱的一年中仍笔耕不辍，这些重要的作品之后才逐渐公开发表。卡恩（Kan 1993）还披露了至今各种布哈林传记均未涉及的他用斯堪的纳维亚诸语言写成的作品。

布哈林主义的理论构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刘少奇主义相比，正如布哈林和刘少奇这两位伟大的革命者的命运也显示出相似之处。布哈林的传记作者科恩（Cohen）——他认为布哈林主义一度是“党的官方意识形态”（1975，第 213 页）——把布哈林主义本质上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概括为三句话：阶级合作（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国内稳定（代替斯大林主张的“社会主义胜利后阶级斗争尖锐化”）和“平衡的、渐进的（经济）增长”。（第 333 页）

布哈林主义表明，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不是同义词，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其他的选择，本可以避免斯大林时代开始的错误发展方式。“那些认为当时的一切做法都‘适合’当时情境，若干年后‘不再适合’的人，恰恰低估了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蕴藏在每个历史进程里和每个社会体系之中。”（Afanassjew 1987）

参考文献：

J. Afanassjew, »Nicht alle Aspekte unserer Realität sind sozialistisch«, in: *Moscow News*, 13. 9. 1987; N. Bucharin, »Die Partei der Arbeiterklasse«, in: *Russische Korrespondenz*, Jg. 2/II, 1921, 7/9, 795-799; ders.,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Hamburg 1922 (neu hgg. mit Lenins Randbemerkungen von W. Hedeler und R. Stoljarowa, Berlin/DDR 1990); ders.,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Hamburg 1922; ders., »Lenin kak marksist«, in: *ATAKA*. Moskau 1924, 242-284; ders.,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Renters. Die Wert- und Profittheorie der österreichischen Schule, Wien-Berlin 1926; ders., *D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Wien-Berlin 1926; ders., *Imperialismus und Weltwirtschaft*, Wien-Berlin 1929; ders.,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Science at the Crossroad*, London o. J., 11-33; ders., u. E. Preobraschenbskij, *Das ABC des Kommunismus*, Hamburg 1923; ders., u.a., *La question paysanne en U. R. S. S (1924-1929)*, Paris 1973; A. Butenko, »Breaking Mechanism: What Is it and How to Combat it? «, in: *Moscow News*, 43, 25. 10. 1987; S. F.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88-1938*, New York 1975; I. Deutscher, *Trotzki*, 3 Bde., Stuttgart 1963; I. Fetscher, *Der Marxismus – seine 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Frankfurt/M 1973; D. Gluckstein, *The Tragedy of Bukharin*, London 1994. W. Hedeler, *Nikolai Bucharin Bibliographie*, Mainz 1993; ders., u. R. Stoljarowa, »Ein unbekannter Brief Nikolai Bucharins an Josef Stalin vom Dezember 1937«, in: *IWK*, 29. Jg., H. 1, 20-25; S. Heitman u. P. Knirsch, *Bucharin*, Bibliographische Mitteilung des Osteuropa-Instituts der FUBerlin, Bd. 1, Berlin/W 1959; A. Kan, *Nikolai Bucharin und die skandinavische Arbeiterbewegung*, Mainz 1993; P. Knirsch, *Die ökonomischen Anschauungen N. I. Bucharins*, Berlin/W 1959; A. G. Löwy, *Die Weltgeschichte ist das Weltgericht-Bucharin: Vision des Kommunismus*,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9; R. Medwedew, *Das Urteil der Geschichte. Der Stalinismus – eine vergewaltigte Utopie*, Berlin 1992; O. Negt (Hg.), *Nikolai Bucharin, Abram Debo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69; T. Pirker (Hg.), *Die Moskauer Schauprozesse 1936-1938*, München 1963; M. Schatrow, »Weiter ... Weiter ... Weiter! - Die Ergeignisse vom Oktober 24. 1917 und was danach geschach, aus der Sicht des Autors«, in: *Neue Zeit* 1-3, 1988; U. Stehr, *Vom Kapitalismus zum Kommunismus – Bucharins Beitrag zur Entwicklung einer sozialistischen Theorie und Gesellschaft*, Düsseldorf 1973; A. Thalheimer, »Nicolai Bucharin«, in: *Clarté*, Nr. 3, 2. März 1938, Kopenhagen; D. Wolkogonow, »Das Phänomen Sta-lin«, in: *Blätter*, 33 Jg., 1988, 222-225.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虞皓然 译，曹旸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grarfrage, Bewußtsein, Entstalinisierung, Erkenntnistheorie, Finanzkapital, Geld, Gleichgewichtstheorie, Grenznutzentheori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mperialismus, Kaderpartei,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Kollektivierung, Kommandohöhen, Kreigskom-

munismus, Liuismus, Mangelwirtschaft, Monopolkapital,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Objektivismus, Planwirtschaft, Revolution in einem Lande, Rote Professur, Russische Revolution,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taatsmacht, Stadt und Land, Stalinismus, Stoffwechsel. Theorie/Praxis, Überbau, Weltkrieg, Weltwirtschaft

364 联盟政策（Bündnispolitik）

A: siyāsat al-ta ḥāluf.

E: policy of alliances.

F: politique d'alliances.

R: politika sojusov (политика союсов).

S: política de alianzas.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设定的革命是由人民运动推动的**政治性**政变，它所界定的联盟，仅仅只是工人“革命运动”的**战术**支持，是从加速按照规律构想出的历史进程的层面而言的。“雾月政变”（18. Brumaire）的教训，即受到工人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使得从革命**战略**角度出发对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更加重视。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此时农民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MEW 8，第 202 页）。反而在此“中等阶级”似乎仍然是资产阶级秩序的最强大支持者，按照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他们不适合进入联盟。（第 204 页）

随着德国工人运动在组织上的巩固和斐迪南·拉萨尔的政治效应的彰显，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一些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状况，这就要求对战术和战略上联盟的地位作出原则性的澄清。恩格斯于 1865 年提出与资产阶级结成革命战略的目标性联盟来对抗专制的封建国家，并以此来反对拉萨尔主义者的权力政治算计，即通过与普鲁士的封建上层结成联盟来实现工人的普遍选举权和社会方面的改善。（“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是“工人的胜利”，MEW 16，第 70 页。）但这一联盟的主要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性辩论前把德国的历史沉积的废墟清除出去：“但是只有在它们是单独地对立的时候，这一斗争才能进行到底。”（第 76 页）

直到 1905 年总罢工的讨论之前，在社会民主党内的争议都围绕一个问题：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到底是盟友还是“反动派”？这原则上的困难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按照主流社会民主的版本）基础上不相矛盾地结合。尽管恩格斯重复地进行理论干预，意图引导社会民主党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农民问题上采取有所区别的联盟政策，但他最终还是倾向于对政 365

治联盟这个不断扩散的问题通过对历史规律进行一般性的导向来作出回答："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像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MEW 38，第 189 页）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希望，将帝制和资产阶级推出历史进程的必要联盟发展为自然的阶级联盟。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联盟这个概念的意思已经从普遍革命理论性质转变为具体政策性质。发展成为现代政党的演变——不受"历史联盟"问题的影响——使它具备了组织方面的联盟的能力。（参见 Stephan 1981，第 189 页）这种政党形式发展为合法形式，这一合法化使得工人政党在与其他组织结盟时以**权利主体**的身份出现成为可能，这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合同的性质**。

自此，马克思主义的联盟政策不再仅仅以区分工人阶级与其他社会阶级的**战术**联盟和**战略**联盟为特征，同时也以区分**历史进程**中占有革命理论行动模式地位的**"有机"联盟**和组织之间的**以法律形式结合的联盟**（同盟）为特征。列宁所构思的"无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盟'"属于"有机"联盟这种形式。（LW 26，第 329 页）相反地，对于同资产阶级组织可能以法律形式结合的联盟，列宁将其定性为"非'真诚的同盟'"，"因为阶级利益根本不同"。（同上）

葛兰西的**历史性联合体**的构想目标在于，在西欧工人运动失败的时期，略过战术和战略联盟，推行"有机"联盟；而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西班牙、法国和德国，反法西斯—民主同盟却日渐趋向于以法律形式结合的联盟。该构想尤其在德国共产党 1945 年以后的"联合体政策"上得以实现——这一政策尽管在理论上构想的是"工人阶级联合所有劳动阶级、阶层和民主力量的联盟"，在实践中却在民主德国成为以"国家前线"（Nationale Front）命名的"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下"的各组织的同盟（1949 年 10 月 1 日德国社会统一党全体党员大会的决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各个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新的长期的危机源和危险的出现（全球战争的危险、生态）导致共产党基于传统联盟设想产生的理念在实践中的失效，这些理念曾经见证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的失败（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共同计划"的失败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历史性妥协"）。 366

参考文献：

W. Elfferding, »Ist ein Parteienbündnis ohne Vorherrschaft möglich?«. in: *Argument* 148. 26. Jg., 1984. 849-863; G. Labica, »Bündnisse«, in:

KWM 1, 1983. 192-197; H. Neef (Hg.). *Programmatische Dokumente der Nationalen Front des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 Berlin 1967; K. J. Scherer, u. F. Vilmar. *Ökosozialismus? Rotgrüne Bündnispolitik*. Berlin/W 1985; C. Stephan, *»Genossen, wir dürfen uns nicht von der Geduld hinreißen lassen!« Zur Theoriebildung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862-1878*, Frankfurt/M 1981.

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
（Klaus-Michael Bogdal）撰
王艳柯 译，唐婧 校

参见：
Aktionseinheit, Antifaschismus,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Bauern, Bauernfrage, Blöcke, Bonapartismus,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inheitsfront, geschichtlicher Block, Hegemonie,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Linksunion, Mittelschichten, Strategie/Taktik, Volkseinheit, Volksfront

公民倡议行动组织（Bürgerinitiativen）

A: mubādarāt ahlīya.

E: grass-roots initiatives.

F: comités d'initiative.

R: graždanskie iniciativy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S: iniciativas ciudadanas.

1. 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和结构相似的团体）由政治、社会和民族及文化背景各异的人员组成，他们为阻止或实现（多在与其直接相关的基本政治生活领域中）关乎当下的具体计划而联合协作。这种开放并一定程度上不受约束的特点，对于某一焦点动因的专注以及一再有待恢复并坚守的不沦为党派政治工具的独立性，这些特点可能方便许多人，也包括先前不热衷政治者在个案中参加团结一致的行动，在这点上不限于选举议会议员（民意代表）。

至于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延续性和可靠性（还有可预见性），一方面，投身于其中具有自发性质，时间上受制于特定的“运动繁荣期”，暗藏很大程度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许多人参加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活动意味着开始（也是长期）参与到对政治施加影响的过程中。随着与国家机构和经济势力集团过招时经验的积累，省思和由此产生的更加自觉的行动也随之出现，参加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活动也就可能变成了政治学习的领域。 367

2. 政治行动中的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可能以迥异名称出现：专门小组（ad-hoc-Gruppe）、倡议行动圈、城区居民小组、委员会等等。只要不必把行动小组视为由地位稳固的组织（党派、联合会、工会）发起并操控的群众运动，20 世纪 50 年代反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诸委员会和 60 年代争取民主和裁军的复活节示威游行运动就堪称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先驱。

作为并非在其他国家也以其他名称出现的一般行动方式，而是归纳为“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在概念上的集中表述，这种共同政治行动的形式和名称是德国作为一个拥有迟缓而被间断的公民社会发展历程和民主历史的国家特有的现象。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形成于政治文化变革阶段的“旧”联邦德国，即战后保守独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统治的国家和 20 世纪 70 初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改革插曲（“敢于尝试更多民主”）之间的变革阶段。

公民倡议行动组织之名最初作为受反对威权的学生运动的推动和影响却不同于“革命”学生群体的，并自觉地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行动的，主要来自于中间阶层的具有改革倾向的公民的自称。他们注重以积极有为的行动和努力弥补在教育、社会和住房领域中基础设施上的缺陷，或者宛若辩护者致力于改善（别人从自己的社会地位出发称为“边缘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境遇。20 世纪 70 年代，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以及环保问题凸显。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在院外反对派势力式微之后整合后者中的部分人员，同时招募新的阶层和年龄组成员，这些人并未参加 1967—1969 年围绕紧急状态法、高校改革和越南战争的讨论。 368

因为这些行动动因（核电站、机场扩建、企业关停）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活跃同时又混乱——由于根底上无法计划和缓冲——的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后果，参与者迟早会开始意识到这些结构性的关联：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变得政治化了。虽然单一议题动因有独立性，但各倡议行动组织趋向于探究全社会的发展趋势（能源问题、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民主权利、世界秩序和世界经济）并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成因和关联的解释。完成厘清的过程和拓展议题范围，方式是参加出现相似问题的异地游行示威和集会；国家相关当局的反应自相矛盾（一方面展示警察的权力，另一方面宣布“与公民对话”），迫使参与者在地区会议和联邦会议范围内剖析公民社会抵抗运动各自肇因在结构上有何关联和在政治上如何促成。通过专家、学者的协作，在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已拟定不限于阻止当地政府的干涉的替代方

案。因此，除了对国家和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本能地）抗议这方面，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内部拟定的自身构造设想以及因此获得的认知和规划能力都得到了传播。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环境保护公民行动联盟**（*Bundesverband Bürgerinitiativen Umweltschutz*[BBU]）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表达了公民倡议行动组织运动的自我定位（超党派、非暴力、不集中），这种定位集聚了反资本主义、反工业化的视角。不同于党纲，此类共识对各成员团体并无约束力，而是经历持续的协商过程后达成的。有特定政治观及世界观的人士试图在此过程中提出各自的政治取向和推进方向；其影响还
369 取决于其社会政策的普适性及理论是否恰当和具有说服力。——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起先苛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形式提供恰当而深入的推动力。这促进了普遍性的自然和物种保护议题在公民倡议行动组织中占上风，它们与社会组织形式无关。

多数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特别是生态领域内的公民倡议行动组织，自视为“新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参加议会选举，先是通过“彩色”（bunte）、“选择”（alternative），再是通过“绿色”清单（“grüne”Listen）等选举组织促成了形成具有针对若干社会问题的政治平台的党派雏形的尝试。由此发展而来的绿党起初自我定位为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在议会中的分支；随着选举获胜以及社民党和绿党联盟的框架之下对政治政策影响的可能性增大，议会工作和议会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吸收了公民倡议行动组织活跃的核心潜力。

伴随绿色—选择组织在议会中的地位渐稳，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活动随之减弱，大家意识到，若无独立的院外以及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基层倡议行动组织和自发组织的项目（如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存在，则国家机构中进步党派的变革力就将面临消弭的危险。正如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般，（当时的）共产主义党派得以自我更新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并且绿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政策也保持“亲民”，这需要党外政治领域在内容上和人员上的创新力。在由社会结构推动的个人化时代，社会主义的、激进民主的团体和传媒缺乏政治视野以及令人信服的纲领使得社会基层中政治参与的环境受到了损害。

3. 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种幻想般的亢奋中，20世纪70年代部分左派认为在公民倡议行动组织中产生的自我表达的潜力是巩固现行体制的修正主义而加以摒弃。参与者在贯彻政治要求

以外为了完成再生产任务而自发组织的活动，也被认为是减轻国家真正的任务而遭到了谴责。当今受马列主义鼓舞的相关分析把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定位成主要是新老中等阶层的“公民”的集体反应形式，他们如今受社会“全盘资本主义化”的裹挟，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归位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中。

基于他们自身的教育水平以及对民主和社会政策的期待日益增强的背景，这些群体敏锐感知到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也最早表达现代劳动力的再生产要求，现代劳动力被要求在空间上和技能上具有流动性以及具备相应的适应能力。在应对这些社会经济变动的过程中，这些群体成为在其他可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框架内个人“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新的社会文化要求和需求的代言人。与党派相绑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很难脱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种等级制度的观念：它把公民倡议行动组织提出的再生产议题（两性关系、家务劳动、居住、教育、环境）置于归结为企业冲突以及常常归结为工资问题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之下。起初，这导致对这些运动方式和表达方式的轻视。无人领会这些倡议行动组织成为社会运动组成部分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对形成可供选择的体系目标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在群众行动出现无法估量的发展之后，就是对倡议行动组织作马后炮式但仍自以为是的探讨。事实上，工会和社会主义力量更多是对生态和女权主义这些焦点问题作出反应，而非它们自身提出并拟定这些议题。

在此方面，尤其是德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要求起了阻碍作用。根据（一直未见成效的）任务的归派，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应该专注于有限而具体的关切，而由“中央组织化的革命工人党”独自制定社会政策的选择性方案和行动策略。

对此应予辩驳：公民倡议行动组织的表达和行动方式，尽管“只是”锚定于具体生活领域的问题现状以及虽各有不同，但在趋势上很大比例的社会成员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之下的反映和如同借助地震仪测量般的精准表现——同时，在这些表达和行动方式中开始表现出任何变革都不可或缺的各个社会群体的自我塑造力和创造性。公民倡议行动组织和类似行动小组从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生活领域形成对社会进程做局部自控的经验和行动潜力。除了党派组织形式和工会抗衡力量，人从利润的统治下自我解放的政治进程还需要对各形式的自主集体行动和自我组织的有意识地推动（而非操纵）。诚然，只有形成一个文化—社会网络，它——不存在霸权，至多有“结构性霸权”（Haug 1981）——把单一议题的不同运动和旧的社会运动

370

371

联结起来，使得它们的自主性得以保障，每项运动都能获得各自的行动能力，以此才能使力量对比关系得到改善。

参考文献：

B. Guggenberger, *Bürgerinitiativen in der Parteiendemokratie. Von der Ökologiebewegung zur Umweltpartei*, Stuttgart 1980; G. Haufe u. K. Bruckmeier (Hg.), *Die Bürgerbewegungen in der DDR und in den ostdeutschen Bundesländern*, Opladen 1993; W. F. Haug, »Strukturelle Hegemonie« (1981),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158-184; 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 (Hg.), *Keine Startbahn West! Protestbewegung in einem überlasteten Ballungsraum*, Frankfurt/M 1981; R. Jungk u. N. R. Müller, *Zukunftswerkstätten – mit Phantasie gegen Routine und Resignation*, München 1993; F. Karl, *Die Bürgerinitiativen, Soziale und politische Aspekte einer neuen sozialen Bewegung*, Frankfurt/M 1981; A. Mohl, *Die neuen sozialen Bewegungen. Eine Formanalyse ihrer emanzipatorischen Praxis*, Frankfurt/M 1992; R. Roth, »Notizen zur politischen Geschichte der Bürgerinitiativ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ders. (Hg.), *Parlamentarisches Ritual und politische Alternativen*, Frankfurt/M 1980, 74-96; D. Rucht, *Von Wyhl nach Gorleben. Bürger gegen Atomprogramm und nukleare Entsorgung*, München 1980; ders., *Die Bürgerinitiativbewegung*, in: P. Grottian u. W. Nelles, *Großstadt und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Bd. 1, Basel 1983, 57-82; ders. U. R. Roth (H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M-New York 1987.

弗雷德·卡尔（Fred Karl）撰
朱更生 译，唐婧 校

参见：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Basisgruppen,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Demokratie, Engagement, Gegenmach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erkschaft, Hauptwiderspruch, Modernisierun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Ökologie, Parlamentarismus, Partei, Selbstverwirklichung, soziale Bewegungen, Studentenbewegung, Widerstand, Zivilgesellschaft, Zukunftswerkstätten

内战（Bürgerkrieg） 372

A: ḥarb ahlīya. – E: civil war.

F: guerre civile.

R: graždanskaja vojna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S: guerra civil.

内战在传统观念（1989 年以前）里，

指在单个国家之内进行的武装权力斗争，它发生在起义者（叛乱者、反政府武装）和统治者之间，或发生在作为政治、宗教或社会的少数派为争夺一国的政权而相互敌对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内战的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或掌权者保卫政权，有时（如美国南北战争）则是建立一个新国家，更罕见的是合并多个国家。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内战。《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明确指出，内战是阶级斗争最高、最激烈的形式："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MEW 4，第468页）《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3月）直截了当地提出："武装全体人民。"（MEW 5，第3页）工人、农民和小资产者应当在革命斗争中武装自己，用革命军取代常备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要保障成果、继续向前推进，武装全体人民就是必要的一步。

恩格斯更是继续研究了武装起义："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MEW 8，第95页）恩格斯（绰号"将军"）指出，内战中最重要的规则就是坚决行动，采取进攻，出其不意袭击敌人，保持最初胜利所带来的优势，迫使敌人退却，最主要的是勇敢。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一书的导言中强调，现代的武器、交通运输的新发展和城市（尤其大城市）建设的新规划，都改变了革命运动内战的条件。

列宁多次谈到过内战的本质："过分地扩大内战这个概念极为有害，因为这样就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雇佣工人反对本国资本家的战争。"（1915年夏列宁致亚·米·科伦泰［A. M. Kollontai］的信，LW 35，第176页）1905—1907年俄国革命前夕，列宁具体阐发了武装全体人民的口号：未来的战争将是大众的战争，这使创建一支用于内战的革命军队成为可能。这支军队将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作为本阶级组织起来的先锋队，以及部队中拥护革命的部分共同组成。

类型和发展。内战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动用武力，改变一个国家的统治结构；第二种是分权，分裂或合并国家。当社会集团、政治集团或者不同的文化集团，就各自应得的生存条件或就国家的统治结构陷入矛盾时，第一种类型的内战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是，"在任何阶级社会

里，内战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LW 23，第 74 页）。近期，族群歧视甚至种族歧视（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布隆迪 1972、1994 年的动乱），引人瞩目地成了内战冲突焦点的决定性标志。第二种类型的内战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主流，大型国家联盟如苏联、南斯拉夫联邦瓦解的重要原因在于，个别族群追求民族自决权，却遭到以主体族群为首的其他集团的暴力镇压。

1945 年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内战在地域上主要发生在第三世界，多为反殖民倾向的军事武装反抗欧洲强权的游击战争。1989 年世界政治剧变后，内战也在欧洲频繁发生，如巴尔干和苏联南部，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内战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源远流长，从罗马内战（公元前 88—前 82 年、公元前 53—前 45 年）、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 年）、查理一世和克伦威尔的战争（1642—1653 年）、美国内战（1775—1783 年、1861—1865 年）、中国内战（1916—1927 年、1945—1949 年）、俄国内战（1918—1922 年），直到今天的战争。在全球近 5000 个族群中，约 270 个具备一定军事力量，提出了民族主权的诉求。

内战通常表现为彻底无序的战争，无视适用于两国间战争的国际法规则。尤其保护平民免遭军事行动侵害，基本变成一纸空文，平民甚至会成为敌方军事人员的首选目标（“种族清洗”、灭绝或驱逐其他民族的所有成员、有指令地集体强奸妇女以打击敌方男性）。第三方势力介入支持内战的一方也屡见不鲜。

法律上的内战。法治首先建立在理性、共识等原则上，故而内战在法律体系中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国际法的经典理论家格劳秀斯（Grotius）、瓦泰尔（De Vattel）、布隆赤里（Bluntschli）通常将将内战视为犯罪行为。直到今天，国家法总要将每次内战中的一方判为叛国者。国际法则将内战视为一个国家的内政。内战被定义为多个集团充分动用武器武装其拥护者、战斗超出地方界限、烈度和时长都明显超出最低限度的暴力冲突，以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暴力冲突（哗变、骚乱、劫持人质、帮派火并）。暴力冲突的很多其他变种（政变、暴动、叛乱、起义、人民战争、革命战争、游击战）与内战相近，有时难以确定二者的界线。1949 年 8 月 12 日缔结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四部公约）的第 3 条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都包含了针对内战的基本原则（保护战俘和伤员、保护平民）。反政府武装如果不断巩固和壮大势力，在国际交往中也可以被承认具有“交战权”。

参考文献：

D. Bangert, »Civil War«, in: T. N. Dupuy (Hg.),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nd Defense Encyclopedia*, Riverside/NJ 1993, 511-514; I. Fetscher, »Bürgerkrieg«, in: D. Nohlen u. R.-O. Schultze (Hg.), *Politikwissenschaft. Theorien-Methoden-Begriffe*, Bd. 1, München 1985, 101f; T. R. Gurr,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 C. (US Institue of Peace) 1993.

乌尔里希·阿尔布雷希特（Ulrich Albrecht）撰

曹旸译，胡晓琛校

参见：

Antikolonialismus, Aufstand, Bauernkrieg, Dritte Welt, Entkolonialisierung, Ethnizität, Gewalt, Guerilla, Imperialismus, Kampf, Klassenkämpfe, Militär, Militärputsch, Nationale Befreiung, Revolution, Spanischer Bürgerkrieg, Völkermord, Volkskrieg, Widerstand

375 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A: al-taṭauwur al-madanī li-ālmāntyā.

E: bourgeois development of Germany.

F: développement bourgeois de l'Allemagne.

R: buržuaznoe razvitie Germanii (буржуаз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Германии).

S: desarrollo burgués de Alemania.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并没有使用一个固定的概念来描述德国的资产阶级，但他们一生中都不断强调德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之处，尤其是德国资产阶级的特殊之处，并且与最发达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大不列颠和法国相比较。1844年，马克思指出了德国的“**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并认为这种缺陷应当成为德国资产阶级承担革命先锋角色的出发点，因为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KHR*，MEW 1，第387—391页）恩格斯第一次在1845—1847年间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德国情况的观点，认为德国的相对落后应该归因于中世纪领地诸侯的独立以及1525年革命（“农民战争”）的失败。1893年恩格斯仍然认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MEW 4，第346页）使德国历史成了一部不间断的“苦难史”（MEW 39，第99页）。

德国的落后“现状”（Status quo）在19世纪40年代也阻碍了共产主义者“向资产阶级进攻”（MEW 4，第42—43页）。“从10世纪以来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一切等级和阶级”以及相应的各种生产方式

在德国“肩并肩地存在着”。（第 50 页）贵族尽管在经济上开始衰落，并逐渐资产阶级化，但是仍然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他们与代表纯粹“**地方**”利益的小资产阶级达成统治上的妥协，来保持这种影响力：官僚进行管理，“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MEW 2，第 581 页；MEW 4，第 44—45 页）。

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与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是相矛盾的。但是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之前，他们受到正在兴起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威胁，这又让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胆怯的资产阶级”（MEW 18，第 291 页）。他们并不坚持自己的政治斗争，而是在 1848 年后向反动
376 势力屈服，自 19 世纪中叶在德国开始的迅速的工业化使资产阶级在社会的这一经济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实惠，也使“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MEW 36，第 231 页）。

作为两个德意志大国中较为现代的国家的代表，俾斯麦身为德国的波拿巴和“自上而下的革命者”，把普鲁士的国家利益和资产阶级的民族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1866 年的普奥战争，普鲁士的扩张和北德意志邦联（1871 年德意志帝国的雏形）的建立，无异于“一次真正的革命”（MEW 36，第 238—239 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地方割据的最恶劣的影响将会消失”（MEW 31，第 241 页）。就这样，以“波拿巴主义”的形式，普鲁士这个半封建半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在社会功能方面开始转型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君主制国家，这是 1848 年以来“最大的进步”（MEW 7，第 538—539 页），同时，容克（Junker）也变身成为“某种类似英国乡绅的东西”（第 539 页）。

1871 年建立的帝国的政治统治，按照 1875 年马克思的描述，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Gotha*，MEW 19，第 29 页）。按照恩格斯的分析，1883 年的德国“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MEW 36，第 54 页）——因为它处在一种双重的均势之中，符合旧专制君主制度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以及符合波拿巴主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MEW 18，第 258 页）。

在俾斯麦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恩格斯再次强调了德意志帝国的资本主义特点，“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却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MEW 22，第 252 页）。但是资产阶级与大土地占有主“这个只靠人工维持的阶级”（MEW 21，第 450 页）结成了“联

盟”，这种联盟在德国东部保存了“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MEW 19，第 82 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恩格斯都希望能够夺取容克的权力，从而结束“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MEW 22，第 504 页）。由于在德国想要建立一个稳固的资产阶级统治已经为时过晚，
377 工人阶级“必须清除本国资产阶级早就应当消灭的封建制度和宗法式专制制度的残余”（MEW 21，第 383 页）。

这些对于德国的特殊情况的评价对弗朗茨·梅林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影响，这些研究从唯物主义角度对德国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进行了阐释。另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 1914 年之前的策略也受到这种评价的影响。“修正主义之争”中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都指出过德国的封建残余、军国主义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特别强势。尤其是卢森堡认为，“整个政治—行政的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从半封建或全封建的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机制”（GW I/1，第 424 页），资产阶级的各种力量组成一个阵线，站在社会民主党人的对立面（考茨基也与她的观点相似）。伯恩施坦则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中间阶层能够将政治自由主义重新复苏，而且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成为结盟的伙伴。列宁着眼于俄罗斯，一方面他强调俾斯麦“自上而下的革命”以及从中产生的秩序的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政治—社会的“改良”保留了一大批“中世纪的残余”，实行这种改良方式“对于工人来说是**有最大的弊端的**”。（LW 17，第 222 页）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问题视角并没有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首先把反共和国的行为与前资产阶级的结构因素联系在一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强调魏玛共和国具有民族特点的发展中的进步要素，而不是反动要素。比起其他西方民主政权，魏玛共和国也确实赋予了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较强的权力地位。

1933 年后，关于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独特性的讨论重新获得了重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希特勒独裁统治的根源上。马克思主义者一方提出了“德意志特殊道路”的思路，这一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斯特·布洛赫和卢卡奇。对布洛赫来说，德国“是一个典型的非同时性国家，……包含着未被克服的旧的经济和意识的残余”（1935，第 113—114 页及以下）。卢卡奇认为，民族社会主义是 378
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社会和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发展

在 1871 年的帝国中造成了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的“矛盾”（包括向非理性主义、臣仆心理和沙文主义发展的倾向）。（*Zerstörung* I，第 37 页及以下、第 59 页）

西德的某些社会科学学者如莱因哈德·屈恩尔（Reinhard Kühnl）也赞同这样的观点。然而从 70 年代开始，另外一些学者（黑尔佳·格雷宾 [Helga Grebing]、米夏埃尔·古格尔 [Michael Gugel]、洛塔尔·马赫坦 [Lothar Machtan]/迪特里希·米勒斯 [Dietrich Milles] 和大卫·布莱克本 [David Blackburn]/杰夫·埃利 [Geoff Eley]）的论述从理论架构以及实证的层面上对 19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成经由特殊道路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德国资产阶级最终对普鲁士强势的国家作出了政治妥协，是出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考虑，所有事后对他们提出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的要求都是一种“规定性的要求”，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Grebing 1974，第 72 页）

在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也对德国资产阶级提出了批判，认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背叛了“人民的民族利益”。（Bartel 1968，第 1161 页）这种批判模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是压倒多数的声音，这一观点将德国资产阶级的各派力量（一直回溯到 16 世纪初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的反动传统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它与人民群众所代表的一脉相承的进步传统对立起来。背叛说后来也受到了批判，与特殊道路的构想相比，那个时期的民主德国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倒不如说是唯意志论的，而不是宿命论的，更具有爱国主义的，而不是反民族国家的特点。20 世纪 60 年代末，民主德国的历史研究开始尝试跳出民族历史的局限来分析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这些分析更加客观、细化，去除了简单化的做法。这样做的一个原因也在于，面对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家开始认识到特殊道路论点中隐含的辩解成分。布莱贝尔（Bleiber）如此写道：“认为消极的历史传统是德国帝国主义特别残暴的决定性因素，这终将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推卸责任。”（1977，第 319 页）尽管如此，1789 年到 1871 年德国的“资产阶级变革”之中的特殊问题（容克阶层的霸权角色，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融合，改革、自下而上的革命和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具体的辩证法，等等）直到 80 年代仍是关于“德国道路”的研究中的核心问题。（LW 34，第 402 页）

总的来看，特殊道路论点的支持者以及这一论点的批评者都能够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某些段落，只是他们各自都将其进行了片面的强调。与他们相对的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的研究者，他们将“经典作家”（包括列宁）的

说法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条中间的路线。与关于理论构想的争论文章不同，在80年代的一些篇幅巨大的研究综述中，社会史导向的、大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西德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德历史学家的观点之间反而有了一些接近。

参考文献：

H. Bartel, »Die Reichseinigung 1871 in Deutschland – ihre Geschichte und Folgen«, in: *ZfG*, 16 Jg., 1968, 1161ff; D. Blackbourn, G. Eley, *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848*, Frankfurt/M 1980 (erw. u. überarb. engl. Ausg., Oxford 1984);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Frankfurt/M 1962; *Bourgeoisie und bürgerliche Umwälzung in Deutschland 1789-1871*, hgg. v. H. Bleiber unter Mitwirkung v. G. Hildebrandt u. R. Weber, Berlin/DDR 1977; P. Brandt, »Die Entwicklung bürgerli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in der Interpretation des Marxismus. Zur Diskussion über den 'deutschen Sonderweg'«, in: *spw*, 12. Jg., 1989, 228-235 u. 367-375; H. Grebing, *Aktuelle Theorien über Faschismus und Konservatismus. EineKritik*, Stuttgart 1974; R. Kühnl, *Formen bürgerlicher Herrschaft. Liberalismus – Faschismus*, Reinbek 1971; G.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1954), 3 Bde., Darmstadt-Neuwied 1973; L. Machtan, D. Milles, *Die Klassensymbiose von Junkertum und Bourgeoisie. Zum Verhältnis von gesellschaftlicher und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Preußen-Deutschland 1850-1878/1879*, Frankfurt/M 1980.

彼得·勃兰特（Peter Brandt）撰

潘璐译，胡晓琛校

参见：

Bonapartismus,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Bürokratie, Chauvinismus, deutsche Misere, Feudalismus, historischer Beruf, Irrationalismus, Klassengleichgewicht, Kleinbürger, Militarismus, passive Revolution, Reaktion, Revolution, Verrat

市民（资产阶级）社会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380

A: al-mudjtam^{c} al-madanī.

E: civil society/bourgeois society.

F: société civile/société bourgeoise.

R: graždanskoe obščestvo/buržuaznoe obščestvo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буржуа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S: sociedad civil/sociedad burguesa.

1.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西德有这样的说法，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

sellschaft）这个概念“已经过时了”，“只还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在论战批判的意义上”使用。（Braun 1984，第 26 页）东欧的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们开始使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概念，他们试图在国家机器之外为政治行为谋求一个空间。在英语世界里这一概念是众多出版物中的共同话题。（参见 Keane 1988 及 1988a，Cohen/Arato 1992）这一概念在（左翼）自由派民主理论的框架中描述了“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非国家的和非经济的联合与联盟”（Habermas 1992，第 443 页），是“众多行动空间中的一个行动空间”（Walzer 1992，第 79 页），“围绕着家庭、信仰、各自的利益和某种特定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的整体，这种关系网充满了这个空间”（第 65 页）。有批评的意见认为，这样的建构中包含着一个潜在的“反经济主义”，并对此有一种（非自愿的）的赞同的趋势。（参见 Heins 1992）赞同这种构想的人却希望，这个概念可以给西方的民主一个“内在规定性的批判标准”（Dubiel 1994，第 96 页）。

为了把这一概念图景与较早的加以区别，80 年代末在德语中通行的做法是使用“公民的社会”（ziviler Gesellschaft）或“公民社会”（Zivilgesellschaft）这两种说法，把先前具有军事社会学色彩的表达（参见 Bredow 1972，Simon 1980）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参见 Bobbio 1969；Cohen/Arato 1992，第 142—174 页）移植到哲学的术语之中（参见 Anderson 1979，第 10—11 页；Haug 1988）。另外一些人则倾向于使用“市民社会”。（Bürgergesellschaft）（参见 Gall 1975；Roth 1985；Dahrendorf 1992）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应该忘记，在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之中，包含着复杂的欧洲概念传统，这一传统中也有使用德语的学者的贡献，因为他们从 18 世纪早期开始就开始使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说法。

2. 由于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抱怨“市民社会”这一概念“轮廓的不确定和模糊”（Dietzgen 1886，第 24 页），因此就 381
有了第一次将这个概念进行纯净化的尝试：复辟时期的理论家哈勒尔（Haller）曾经想“把那个从古罗马的语言中溜进来的市民社会或 societas civilis 的说法，完全从科学中驱逐出去”（Haller 1820，1，第 461 页），但新的、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概念并没有由此产生。一百五十年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它“划归到表述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秩序的较为精确的概念”（PhWb 1，第 235 页），这次又是翻译中产生的难题带来了契机。

1846 年 12 月 28 日，在一封用法语写给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用一句

话”把总是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的组织”概括为“市民社会”（société civile）。（MEW 4，第 548 页；德文见于 MEGA III. 2，第 71 页）这段话产生的背景是马克思一年之后完成的对蒲鲁东的批判。但是在《哲学的贫困》中，“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不是一个结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指的是被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超越了的封建秩序（参见 MEGA² I. 6，第 226—227 页），而蒲鲁东自己则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拿破仑法典所指的企业形式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个词（参见 1846，第 276 页）。

在英语中同样有选词的问题。海伦·麦克法兰（Helen Macfarlane）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译本中有时译成“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有时译成“中等阶级社会”（middle-class society）。（参见 MEGA I. 10，第 605—628 页）后面这个译法也被威廉·皮佩尔（Wilhelm Pieper）用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的译文中。恩格斯则认为“这从语法和逻辑的角度严格说来是不对的，就好像把‘封建社会’译成‘贵族社会’（nobility society）一样”（1852 年 9 月 23 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28，第 139 页）。“应当说：资产阶级社会，或者根据情况说：商业和工业社会，并且可以加一个注：我们理解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指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统治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建议用‘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业和商业社会’这样的说法来表示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虽然前一种说法更多地是指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不同于它取而代之执政的那个阶级（封建贵族），或者不同于它使之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农民等等），——而‘商业和工业社会’这个说法更多地是专门指这个社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同上）由此恩格斯给他自己翻译马克思的文章订立了一条语言规则：同年 8 月他还使用了 civil society（MEGA I. 11，第 319 页），现在变成了 Bourgeois society（同上书，第 346 页）。同样，他也把由他审定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本（1888）中的用词统一为“资产阶级社会”。（但是 1885 年恩格斯在他的批判文章《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How not to translate Marx] 中又建议选用 civil society 这个词，其意图是为了用这个引进的术语来对不确切的说法进行批判。）

马克思则相反，即使在二十年之后，他仍觉得使用英语中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在关于《法兰西内战》（1871）的第一稿中，他形象地描绘了被集中起来的国

382

家权力“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现在则（“像蟒蛇……样”，MEGA I. 22，第 53 页）“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在第二稿中，他写的是“新兴中等阶级”（nascent middleclass society）和“现实社会机体”（the real social body）（同上书，第 100 页）。在发表的版本中，马克思放弃了思考的第二部分以及蟒蛇的意象，但是却保留了“新兴中等阶级”（同上书，第 137 页），尽管恩格斯在这之前对于这种说法已经表示出疑虑；马克思在其余各处都使用了“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同上书，第 139 页），而恩格斯负责的德文译本中相应的也是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MEW 17，第 336 页）。

3.1“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gesellschaft）这一被返译到德语中的术语从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被偶尔使用（参见 *DI*，MEW 3，第 194 页），它显示了马克思赋予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重要转折。对于这一概念的历史和前历史（详细参见 Riedel 1975）应该对照各自的相反概念来看。对于亚里士多德以及以他为导向的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传统来说，城邦共同体（κοινωνία πολιτική）以及（西塞罗 [Cicero] 翻译成拉丁文的）**公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是与家庭的世界（οἶκος）相对立的。

公民的共同体（πόλις）中只包括男性，而且是男性中的自由人，这一点即使是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家也都没有表示质疑。对于他们来说，市民社会就是用（结束了自然状态的）社会契约所创建的共同体。“如此形成的联合体被称作 civitas 或者 societas civilis 或者 persona civilis。”（Hobbes，De cive，Kap. V；赖因哈德·马克纳译）霍布斯提供的这些同义词显示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洛克采用了“*Common-wealth*，即拉丁文中的 *Civitas*”（*Leviathan*，Kap. 17）这一译法（*Second Treatise*，§133），并将其当作“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Political, or Civil Society）的同义词来使用（§89）。普芬道夫（Pufendorf）的代表作《论自然法与万民法》（*De jure naturae et gentium*，1672）1711 年被翻译成德语，此处的市民社会也还是指 civitas。（Riedel 1975，第 739 页） 383

但是经济范畴与政治范畴的对立对现代概念所起的决定作用早早地就开始显现了，因为对“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理论家们（Macpherson 1967）来说，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自我保存的动机和保有财产的动机是一致的。霍布斯认为，“没有普遍的权力”就“没有财产，也没

有统治，也就没有确定的‘我的’和‘你的’”（*Levathan*，Kap. 13）。这一观点在洛克那里得到回应，在《政府论》（*Theatises of Government*，1689）下编中，“财产”概念起着核心的而又两重的作用。财产首先是占有的东西，就像卢梭（Roussdeau）《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1755）第二部分开篇所描述的一样，“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市民社会的奠基者”（Moses Mendelssohn 译本，第 97 页）。随着社会财富日益增长，财产这一问题为英国经济学家所关注，他们把“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Smith，*Wealth of Nations*，1776，1，Kap. 2），即 gesittete Gesellschaft（德文译本 1776 年，第 20 页），看作“人类进步”的结果，尤其是劳动分工不断进步的结果，与之对立的不是被建构的自然状态，而是更原始的社会形态，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中正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1767，III，第 2 章）。

3.2 马克思有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的法文版（参见 MEW 4，第 147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市民社会概念史的分析明显指向弗格森：“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 18 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MEW 3，第 36 页）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关注始于他对黑格尔的法哲学（1821）进行研究之时。黑格尔早年就熟悉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契约理论中的意义（参见 GW 1，第 339 页；Lukács 1948），在法哲学中他赋予这一概念在客观精神哲学中具有系统意义的地位。在客观“伦理” 384
（而不是主观的“道德”）的框架中，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并且是后来加入的，因为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是“以国家为前提”的。（*RPh*，§ 182，补充）

黑格尔一方面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家庭（οἶκος）和城邦（πόλις）的对立——主要的出发点是，只要女性还被规定应该在家庭里实现自身，就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公民。（§164，补充）另一方面，他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作为一对固定的矛盾，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加以分离”，这一点也得到了马克思的认可。（*KHS*，MEW 1，第 275 页）“中世纪的精神”，“市民的等级和政治的等级的一致”作为“市

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一致性的表达**”在黑格尔看来“已经消失了”。（同上）市民社会被定义成“个体作为独立的人在形式普遍性中彼此之间的相对关系的相对整体”（*Enz*，§517），它包括三个因素，经济方面的“**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保障财产**”，“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把特殊利益作为公共利益**加以维护”（*RPh*，§182）。主体之间的关系完全是表面的：在一个“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183）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182，补充）。

黑格尔虽然吸收了曼德维尔和斯密的思想，认为个人和他的自利，“自私目的的实现”（§183，参见§19）也会促进“社会福利”，但也同时看到了作为劳动分工的经济之结果的贫困化的出现：“如果市民社会的活动不再受限时，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限制**也加强了，与之相伴，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243）

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保留态度以及市民社会新旧概念的不同，可以用霍布斯的名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参见比如MEW 1，第356页；2，第123页）来概括，马克思认为霍布斯的观点“非比寻常”（MEW 1，第243页），后来又和恩格斯一起多次重新启用霍布斯的这句话。霍布斯对被社会契约结束了的自然状态的描述，在黑格尔那里正好是市民社会的特征。（*RPh*，§289，注释）黑格尔同意霍布斯而反对卢梭，对他来说自然状态就是一种“暴力的、不合理的状态……唯一能说的就是要摆脱这种状态”（*Enz*，§502），而市民社会需要国家的约束，需要受到“具体自由的现实”的约束（*RPh*，§260）。因此马克思总结道：“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Ms 44*，MEW 40，第581—582页）

4.1 马克思计划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对其中与市民社会相关的第182—256节进行评论，但都没有完成，因此在马克思的未完成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市民社会处于它的扬弃的状态。“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正出现在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界定中：“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MEW 1，第206页）因此，要分析黑格尔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语法，就要按照费尔巴哈建议的方法，“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

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GW 9，第244 页）。

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Ms 44*，MEW 40，第 574 页；参见 *RPh*，§ 189，注释），他理解的市民社会，就像我们看到的，“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第 557 页）。这一点马克思大概是赞同的。但黑格尔其他的用于解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关系上的分离的观点，不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MEW 1，第 285 页），而是追求同业公会作为中介，这些都是马克思要拒绝的。简单地说就是：“**等级要素是市民社会的政治幻想。**”（同上书，第 265 页）“‘警察’、‘司法’和‘行政’”被马克思看作是“国家用于管理自己、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第 252 页）这也就解释了黑格尔把这些因素系统性地归入市民社会的做法，为什么没有被马克思用于他的概念使用中，也没有被马克思提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只是指出，“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把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市民社会’”。（MEW 13，第 8 页）

4.2 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阐明了，黑格尔的概念一方面是以“政治的”，也就是法国革命为前提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这三驾马车不是偶然地第一次出现在 1792 年荣-施蒂令（Jung-Stilling）和施律泽尔（Schlözer）的论述中（参见 Riedel 1975，第 753—754 页）；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又落后于革命，因为“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并且“**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MEW 1，第 368 页）。在此处以及这篇文章的其他几个地方，“市民社会”都被标注为“旧的市民社会”（第 367 页；参见 ancienne société civile，*Misere*，MEGA[1] I. 6，第 227 页），仍旧是“17、18 世纪的政治理论中的‘societas civilis’不断要面对的意义”，即“封建等级社会的真正的称谓”（Riedel 1975，第 740 页）。“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MEW 1，第 367 页）

这种社会形态已经过时了，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却存留了下来，用以描述“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第 369 页），“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 citoyen（公民）不同的 *homme*（人）”的生存场境（第 370 页）。“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国家公民，归结为法人。”（同上）关于“**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的关系**”（第

352 页）的问题，得到的第一个原则性的解答是，克服在 1791 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中规定的分离，即“现实的个人”要“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第 370 页）。第二个政治角度的解答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才能获得“**人的完全回复**”。（第 390 页）

由此，迄今为止关于市民社会的思考，哪怕是最进步的，都被马克思超越了。“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ThF* 10，MEW 3，第 7 页）从这个高度来看，即使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即“发达的**市民社会**”（MEW 2，第 123 页），也不过是“**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同上书，第 129 页），就像在《神圣家族》（1845）中所说。马克思赋予它一个稳固的结构性的定义，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同上），这个定义他在 15 年后仍在使用（参见 MEW 13，第 46 页）。

4.3 相比之下，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界定的工作更加活跃，这些尝试在《神圣家族》中得以延续，尤其在关注法国的发展时一再被提到。在理论的层面上，马克思又一次不指名地针对黑格尔明确地写道：“原子论体系”（*Enz*，§ 523）不是由国家，而是被它的成员的利益聚合在一起的（参见 MEW 2，第 128 页）。他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法国革命的阐释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按照他的阐释，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市民社会的生活浪潮”迅速高涨起来，资产阶级“自己的统治”才真正开始了。（同上书，第 130 页）拿破仑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代表，却“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这次革命所公开宣布的市民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的体现”（同上）。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中，拿破仑被与雅各宾派相提并论，但马克思强调的是他们共同的催化剂作用：“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丹东（Danton）、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圣茹斯特（St. Just）、拿破仑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市民社会**。”（MEW 8，第 115—116 页）

通过对法国状况的进一步观察，马克思得出结论：国家的力量得到了贯

彻，“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独立于市民社会，并奴役它”（MEGA I. 11，第179页。按照首版，后来的版本及马恩全集中有改动）。新的君主统治指挥着一个超过“五十万的官僚大军”，一种新的、比极权时代更严峻的情况出现了，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重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小的生活表现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生活止”。（MEW 8，第150页）在开头引用过的《法兰西内战》（1871）中关于集中的国家权力统治市民社会的思考继续了这个思路，最终得出帝国制度的定义，它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MEW 17，第338页）。

4.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强调过，国家虽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但实际上“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
388 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MEW 3，第62页）因此，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应该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第36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第62页），这是因为在那里市民社会得以无条件的、无阻碍地发展，国家“从一开始就从属于市民社会，……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1857，MEW 42，第4页）。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强调，“在现代市民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MEW 3，第394页），这实际上是一种“剥削关系”（第395页）。在《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1849）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指出“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市民社会”都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从而对生产关系这一概念作出了解释和补充：“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MEW 6，第408页）如此，才有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勾勒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MEW 13，第9页）的总结，而资本则是“市民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第638页）。它的概念的理论空间得到了有效的描述。就像在解剖学中，人作为人类学对象，其概念不再被不断重新思考一样，马克思由于早就开始了“在政治经济学中寻找市民社会的解剖学特征”（第8页），应该也把这个概念当作前提加以接受；与紧接着进行的《资本论》的准备工作相比，这一概念在《资本论》完成的部分中并不常见。

5. 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这一概念“从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中消失了”，就像阿尔都塞所作的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Anderson 1979，47；参见 *FM*，第 76—77 页）更应该观察的是它在列宁的著作里基本是缺失的（参见 LW 2，第 148 页），列宁从一开始就更倾向于使用“资本主义社会”（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这个表述。我们可以推测，列宁这种用词的选择更适合俄国的情况，因为那里市民阶级的政治参与和经济的结构变革不能同步进行，而他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Entwurf eines Programms unserer Partei*，1899）中论及西方时，则把两个概念看作是同义的。（参见 LW 4，第 236 页）与他相反，恩格斯眼中的俄国在 1894 年仍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MEW 22，第 429 页），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1875）中不断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指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参见 MEW 19，第 28 页）。

389

在对其他纲领性文本进行比较时能看到，考茨基的社会民主党的《埃尔福特纲领》（Erfurter Programm der SPD，1891）、1903 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都把小作坊的没落（参见 LW 2，第 93 页）和隔绝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无产阶级的兴起看作市民社会的发展，而 1919 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海德堡纲领》（Heidelberger Programm，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布拉格宣言》（Prager Manifest，1934）都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参见 *SPD*，第 188、202、216、227 页；*KPdSU*，第 115 页）。

6. 比概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争论，到处都预言市民社会的衰落（参见 Louis 1923），也出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派”即将衰落的预言。正是在 1918—1919 年革命期间，执掌政权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都被要求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他们与国家这一机构的关系。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念》（*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1922）的文章中试图批驳科尔森（Kelsen 1920）从法哲学角度的批判，而海因里希·库诺夫（Heinrich Cunow）则在他的横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Marxschen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1920/1921）中，对考茨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加以批判，考茨基则对此极力反驳（参见 Kautsky 1923）。卡尔·柯尔施在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的评论中表示，考茨基在他的这一主要的、晚期的著作中重新反驳库诺夫对他的批判，正好是证明了这些

批判的正确性。考茨基在他的两卷本巨著中只聊聊数次提到这一概念，其中两次还显出“完全错误认识这一概念的特征”（Korsch 1929，第 223 页），考茨基显然“两次都把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放到与其他‘社会’和‘公共事务’的关系这一**更大的范围**中”（第 224 页）。其中一处说道，市民社会将在世界贸易以及“国际劳动分工”（Kautsky 1927，Bd. 1，第 289 页）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与人类一致起来”（第 290 页），这一说法，就像柯尔施认可的那样，与马克思的表述还是比较一致的（参见 390 MEW 19，第 28 页）。差别更严重的是另外一节：“在共同体中可以形成不同种类的小的组织。在它们之上是‘社会’，这个社会有别其他较小的社会，也被称为‘市民’社会，la societé civile，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Kautsky 1927，第 712 页）在柯尔施面向英语读者所著的《卡尔·马克思传》（*Karl-Marx-Monographie*，1938）中，第一部分对“市民社会”作了详细阐述，比起那位第二国际领衔理论家混乱的表述更为扎实。

7.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里设计的政治理论，其核心也是市民社会的方案。他的思路既远离这些**德国问题**（*querelles allemandes*），又与市民社会的一般概念史相去甚远。有观点认为，他援引的“不是马克思，而是直接来自黑格尔”（Bobbio 1969，第 86 页），这让人很容易理解，因为“市民社会”这一说法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3 年在《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发表的两篇文章开始，一直到葛兰西写作的时间，都被译成 società borghese（资产阶级社会）（参见 MEGA 1，第 24、82、106 页）的，葛兰西本人在尝试翻译时也遵从了这一传统（参见 *Q*，第 2357 页），甚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援引黑格尔和其前人，即“生活在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MEW 13，第 8 页）的地方，葛兰西也使用了 società borghese（参见第 2358 页）一词，后来才进行了修改。尽管如此，葛兰西本人提示的他对黑格尔的援引却让人迷惑（参见 *Gef* 4，H.6，§24，第 729 页），他所说的 società civile 可是明确地位于国家和经济**之间**（参见 *Gef* 6，H.10. II，§15，第 1267 页），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则涵盖经济结构。也许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葛兰西的概念不应该归于基础，而更应该归于上层建筑之中。（参见 Bobbio 1969，第 85 页）它描述的领域在 20 世纪 20 年代革命的进攻策略遭到一系列反击之后，正是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政治上的、智力上的“阵地战”的地方。（参见 *Gef* 4，H.6，§138，第 816 页，及 H.7，§16，第 873—874 页；另

参见 Anderson 1979，第 86 页及以下）因为已经显示出顽强生命力的资产阶级霸权并不仅仅建立在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国家强制手段的支配上，而且还包括对思想的统治——这曾经是（天主）教会的领地，20 世纪则被克罗齐这样的自由主义先驱占领了，而克罗齐正是被葛兰西称作“某种业余教皇”（1931 年 9 月 7 日致塔特娅娜［Tatjana］的信）。在这种反经济主义的意义上，葛兰西把
391 广泛（“整合”）意义上的国家称作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同上），国家可以操纵的“公共舆论”则占据了从属性原则即权力和共识相交的位置（参见 *Gef* 4，H.7，§83，第 916 页）。法西斯主义的“舆论一律”政策，金蒂勒对其进行了理论上的准备，最终使“霸权和专政……毫无区别”。（同上书，H.6，§83，第 718 页）。

尽管葛兰西的思路受到对墨索里尼政权的印象的影响，但他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之一——法团主义——却几乎没有涉及。（参见 *Gef* 8，H.14，§74）而奥托·鲍威尔则不同，1934 年他针对陶尔菲斯（Dollfuß）政府的阶层国家的设想，认识到在“法西斯的法团中……并不是企业主和工人的共同组织，而是国家统治两个阶级的统治架构”（WA 9，第 352 页）。鲍威尔一方面着眼政治浪漫派的传统，另一方面着眼经济的现实，并指出，法团作为在“完全的”国家中塑造社会的手段，既很现代，同时作为乌托邦又是过时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把法团因素看作法西斯社会中的政治幻想（参见 MEW 1，第 265 页）：“**联合宪法**（*Ständeverfassung*）是一种新的、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这种幻想来自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时代。”（WA 9，第 356 页）

8.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跨学科研究也关注了自愿与强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从利用其他手段延续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方面：“法西斯主义不是反对市民社会的，而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它的一种坚定的形式。”（Horkheimer 1938，GS 4，第 278 页）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理论的核心内容被引入 40—60 年代的社会分析中。1959 年霍克海默写道，市民社会的辩证法在于，它“将融入未来涵盖一切的暴力中，并没有把它的原则，即个人，救赎到彼岸”（GS 6，第 291 页），它作为“威权社会”培养出了与自己相适应的去个性化的人格。“工业无产阶级”是被“半排除在社会之外的”（Adorno 1968，GS 4，第 358 页），像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描述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毋宁说“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变成了市民社会的一个阶级”

（Marcuse 1972，第 14 页）。在西方世界
392 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中，资本和有组织的工人的欺骗性的和解把曾经的对手变成了盟友，淡化了所有的对立”（*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第 14 页）。这种出于国家利益得到促进的“去对立化”的结果就是“单向度的社会”（第 21 页），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就连“异化的概念也会变得可疑”（第 29 页）。

9. 索莱尔（Georges Sorel）早在 1908 年就指出，通过工会运动的成果，“无产阶级将融合在资产阶级之中”，“马克思主义将会消解”。（德文译本 1930 年，第 42 页）但是，之后随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产生了一种愿景，即市民社会即将成为历史。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以及更倾向于思想史的雷欧·科夫勒（Leo Kofler）的著作中（被德国统一社会党干脆指责为“最漂亮的历史唯心主义”）对市民社会就是这样描述的，并且把马克思作为“市民社会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加以仿效；研究对象主要是“市民社会的起源和发展”。（Wittfogel 1924，第 17、21 页）恩格斯的《农民战争》（*Bauernkrieg*，1850）已经是一本关于“萌芽中的、现代的市民社会”（MEW 7，第 338 页）的历史著作，现在，在更新的概括视角下，市民社会成了“与近代的生成史关联最为密切的研究领域”（Haltern 1985，第 106 页）。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中的历史意义使它在当下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讨论中的价值有所降低。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它是“一代人期待从中得到启发和引导”的“公式”之一，到了 90 年代，则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大词废墟”（Großwortruine）。（Konersmann 1993）但 50 年代巴特（Barthes）的分析则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市民阶级被定义为**不想被点名的社会阶级**。”（1964，第 124 页）今天，市民阶级和市民社会的“无名性”（第 127 页）在许多，有时是批判性的称谓中表现出来——能效社会、市场社会、消费社会、业余时间社会、交际社会、富余社会、后工业社会或是风险社会——或者干脆借用英语的表述。（参见 Michalski 1991）如此一来，市民社会就可以“作为无名社会”（société anonyme）（Barthes 1964，第 123 页）隐姓埋名地继续存在下去了。

参考文献：

M. Adlex,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Ein Beitrag zur Unterscheidung von soziologischer und juristischer Methode*, Wien 1922; Th. W. Adorno, »Spätkapitalismus o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Einleitungsvortrag zum 16. Deutschen Soziologentag« (1968), in: GS 8, 354-370;

393 P. Anderson, *Antonio Gramsci. Eine kritische Würdigung*, Berlin/W 1979; R. Barthes, *Mythen des Alltags* (1957), Frankfurt/M 1964; N. Bobbio, »Gramsci e la concezione della società civile«, in: P. Rossi (Hg.), *Gramsci e la cultura contemporanea.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gramsciani tenuto a Cagliari il 23-27 aprile 1967*, Bd. 1, Rom 1969, 75-100 (engl. in: Keane 1988a, 73-99); E. Braun, »Was ist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Argument*, 26. Jg., 1984, 26-39; W. Frhr. v. Bredow, »Die Armee ohne Eigenschaften. Probleme des Selbst- und Umweltverständnisses der Bundeswehr«,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13. Jg., 1972, 39-63; J. Cohen, A. Ar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Mass.-London 1992; 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lehre*, 2 Bde., Berlin 1920/1921; R. Dahrendorf, »Die Zukunft der Bürgergesellschaft«,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24.1. 1992, 14; J. Dietzgen, *Sozialpolitische Vorträge*, Hottingen-Zürich 1886; D. Dowe, K. Klotzbach (Hg.), *Programmatische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W-Bonn ^{2}1984 (zit. SPD); H. Dubiel, *Ungewißheit und Politik*, Frankfurt/M 1994; W. P. Eichhor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in: PhWb, Bd.1, 234f; A. Ferguson, *Versuch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hgg. v. Z. Batscha u. H. Medick, Frankfurt/M 1986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 L.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1843), in: GW 9; L. Gall, »Liberalismus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Zu Charakter und Entwicklung der liberal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975, Bd. 220, 324-356; A. Gramsci, *Briefe aus dem Kerker*, hgg. v. G. Roth, Frankfurt/M 1972; R. O. Gropp, »Unmarxistische Geschichtsdeutung«, in: *Einheit*, 4. Jg., 1949, 572-574; J.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Neuwied-Berlin/W 1962; der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M 1992; M. Hahn, *Historiker und Klassen. Zur Grundlegung eine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6; C. L. v. Haller,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Winterthur ^{2}1820; U. Haller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Sozialtheoretische und sozialhistorische Aspekte*, Darmstadt 1985; I. A. Hartig (Hg.), *Gebur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789*, Beiträge von E. Labrousse, G. Lefebvre, A. Soboul u.a., Frankfurt/M 1979; W. F. Haug, »Gramsci und die Politik des Kulturellen«, in: *Argument*, 30. Jg., 1988, 32-48; V. Heins, »Ambivalenzen der Zivilgesellschaft«, in: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33. Jg., 1992, 235-242; M. Horkheimer,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1938), in: GS 4, 236-294; ders., »Notizen 1949-1969«, in: GS 6, 187-425; K. Kautsky, *Die Marxsche Staatsauffassung im Spiegelbild eines Marxisten*, Jena 1923;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2 Bde., Berlin 1927; J.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Predicaments of European Socialism,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Controll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Power*, London-New York 1988; ders. (Hg.),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New European Perspectives*, London-New York 1988a; H. Kelsen, *Sozialismus und Staat*, Leipzig 1920; L. Kofler,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ersuch einer verstehenden Deutung der Neuzeit*, Halle 1948 (Berlin 1992); R. Konersmann, »Donquichottesk«, in: *Die Zeit*, Nr. 39, 24. 9. 1993, 79, K. Korsch,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Karl Kautsky«, i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4. Jg., 1929, 179-279; ders., *Karl Marx* (1938), hgg. v. G. Langkau, Frankfun/M-Wien 1967; L. Krader, *Dialectic of Civil Society*, Assen 1976; P. Louis, *Le déclin de la société bourgeoise*, Paris 1923; 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en von Dialektik und Ökonomie* (1948), W 8; C. B. Macpherson, *Die politische Theorie des Besitzindividualismus. Von Hobbes bis Locke* (1962), Frankfurt/M 1967;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1967), *Schriften* 7; ders., *K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e* (1972), in: *Schriften* 9, 7-128; B. Meissner (Hg.), *Das Parteiprogramm der KPdSU. 1903 bis 1961*, Köln 1962 (zit. KPdSU); K. Michalski (Hg.), *Europa und die Civil Society. Castelgandolfo-Gespräche 1989*, Stuttgart 1991; P.-J. Proudhon,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1846), *Œuvres complètes*, hgg. v. C. Bouglé, H. Moysset, Bd. 1, Paris 1923; M. Riedel,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69; ders.,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 in: GG, Bd. 2, 1975, 719-800; J. J. Rousseau, *Abhandlung von dem Ursprunge der Ungleichheit unter den Menschen, und worauf sie sich gründe* (1755), übers, v. M. Mendelssohn, Berlin 1756; W. H. Riehl,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1851),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6; R. Roth, »Auf dem Wege zur Bürgergesellschaft? Argumente und Thesen zur politischen Kul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G. Koch (Hg.): *Experiment: Politische Kultur. Berichte aus einem neuen gesellschaftlichen Alltag*, Frankfurt/M 1985, 10-25; U. Simon, *Die Integration der Bundeswehr in die Gesellschaft. Das Ringen um die Innere Führung*, Heidelberg 1980; A. Smith, *Untersuchung der Natur und Ursachen von Nationalreichthümern*, Leipzig

394

1776; G. Sorel, *Die Auflösung des Marxismus*, Jena 1930; M. Walzer, *Zivile Gesellschaft und amerikanische Demokratie*, hg. v. O. Kallscheuer, Berlin 1992; K. A. Wittfogel,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on ihren Anfängen bis zur Schwelle der großen Revolution*, Wien 1924.

赖因哈德·马克纳 撰
潘璐 译，张义修 校，俞可平 审

参见：

Anatomie, Aufklärung, Assoziation, Bedeutung, Bourgeoisie,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Bürgerrecht, Demokratie, Etatismus, Familie, Faschismus, Feuerbachthesen,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errschaft, Imperialismus, Institutionen, integraler Staat, Klassengesellschaft, Staat, Zivilgesellschaft

资产阶级革命（bürgerliche Revolution）

A: al-thaura al-būrdjūwāzīya.

E: bourgeois revolution.

F: révolution bourgeoise.

R: buržuaznaja revoljucija (буржуаз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S: revolución burguesa.

这一概念明确地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有少数几次，第一次是在1847年10月28日的一篇报纸文章中。（MEW 4，338等处）马克思之前曾把反封建的革命批判为“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KHR*，MEW 1，第338页），而把反封建革命的社会功能进一步精确地描述为：“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MEW 4，第181—182页，注释）贯彻资产阶级法权秩序和“代议制”使得国家上层建筑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MEW 3，第356页；4，第368页；23，第74、189—190、492页）

1. 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少从四个层面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区域进行了区分：（1）持续数个世纪并以“工业革命”（*Lage*，MEW 2，第237页等处）为顶峰的，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革命”（*Zur Kritik*，MEW 13，第9页；MEW 19，第227页）的经济基本过程，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接替了封建的生产方式。（2）从中世纪直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权”（*NRhZ*，MEW 6，第124页）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解放斗争和政治解放斗争——在这一被当作国际进程的运动中，恩格斯于1892年区分了“三个重要

的、决定性的战役”：德国的宗教改革、17 世纪的英国内战以及 1789 年“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它第一次战斗到“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MEW 22，第 300 页及以下）（3）上述单个的历史事件或者 1861—1865 年间美国的南北战争都被看作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MEW 15，第 346 页）。（4）“从上层进行的革命”，它是天然资产阶级革命的替代形式，在 1851 年之后决定了整个历史“进程”（MEW 7，第 517 页）并首先使解决意大利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民族统一，成为可能。“革命仍然是革命，不管由普鲁士国王完成还是由锅炉修补工完成。”（MEW 21，第 201—202 页）

当英国资产阶级首先在经济方面展现出“现代资产阶级的类型”（*Elend*，MEW 4，第 78 页）时，政治上却被纳入一种同“从前的封建大地主”（MEW 22，第 301 页）的历史妥协之中，这一历史的妥协使上层沉湎于“统治的假象”（MEW 4，第 500 页），而法国大革命则实现了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主义”（*NRhZ*，MEW 5，第 283 页）。法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发展，至少持续到 1851 年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的政变，呈现为政治—社会斗争层面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例。其中，雅各宾派与平民派也发挥着作用，即通过他们的激进主义来确保第一个温和革命阶段的成果。（MEW 22，第 514 页；参见 4，第 338 页）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促进文明的活动并没有随着封建主义的垮台而终止，“无产者”（MEW 19，第 195 页）就不可放弃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推动作用。“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并且在斗争中，资产阶级不得不呼唤无产阶级。（*Manifest*，MEW 4，第 471 页）无产阶级从他那方面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同上书，第 352 页）。对民主共和体制的要求，包含着不仅要支持最好的、最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利益的资产阶级统治形式，而且要支持民主的自由。就此而言，“没有这个要求，工人……绝不能获得他们的解放”（MEW 16，第 68 页）。尽管具有 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反民主行为的历史经验——对于产生一个强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反应，这使恩格斯在 1866 年推测，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MEW 31，第 208 页），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MEW 8，第 122 页）的民主共和国的方向仍然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积极的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1850 年期间在新闻评论方面亲自介入整个欧洲的，尤其是德国的

资产阶级革命进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致力于推动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自身的革命进行到底之后，他们自 1848 年秋——当妥协政策加强了资本主义阵营中的反革命倾向的时候——宣传一种“**社会—共和的**”革命或者“人民革命”（*NRhZ*，MEW 6，第 124、233 页），当民主小资产阶级在帝国宪法运动中（1849 年春）失败之后，他们将革命的领导权赋予无产阶级（MEW 7，第 196、244—245 页）。除了 1850 年短暂支持过在他们的阐释中有争议的口号“不断革命”（MEW 7，第 254 页）之外，“人民革命”的概念一般并不意味着摒弃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而是要否定资产阶级在其中的统治地位。

2. 列宁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道路”，为此他以“1789 年革命类型”反对“1848 年革命类型”（LW 8，第 248—250 页；参见葛兰西反对雅各宾主义和意大利统一运动，*Gef* 1，H.1，§ 44，第 101—116 页及 *Q*，H.19，§ 24，第 2010—2034 页），并把社会民主党人在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中的角色确定为“雅各宾派”。“同无产阶级的组织结合得更紧密”（LW 7，第 386 页）。资产阶级革命“一般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向前进”（LW 10，第 128 页），因此这关系到社会民主党促使“民主革命在这个词的直接的狭隘的意义上”（同上）胜利实现。和孟什维克一样，布尔什维克直到 1917 年也认为，“我们的革命，按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LW 12，第 329—330 页）。但是，大部分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只有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才是可能的，而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核心在于这一观点，即面对积极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在俄国无法完成其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并实现土地改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阶级身上。（*Taktiken*，LW 9，第 1 页及以下）取得胜利的“人民革命”（同上书，第 95 页）的政治形式只能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们——自身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框架——有能力使“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第 44 页）。

397

罗莎·卢森堡在 1905 年把俄国革命称为一次“在内容和方法上……全新类型的革命。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上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是一种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形式**”。（GW 2，第 9 页；参见 GW 1/2，第 556 页）托洛茨基走得更远，通过其“不断革命”论，他宣称，解决资产阶级民主的任务所必需的、得到农民阶级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

基于——也是国际的——活跃的阶级斗争，恰好在落后的俄国已必须转为社会主义的任务。（Trotzki，*Ergebnisse*）鉴于国家历史引起的限制资产阶级—民主的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任务，列宁、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革命特征以及关于政治解决可能性（至少是暂时的）的理论在1917年非常接近。不同于托洛
398 茨基20世纪20年代后半叶的普遍化的不断革命理论，共产主义的世界运动已对此坚持认为，南半球的“国家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的论战中能够扮演一个进步的角色，并且欧洲的革命进程和1936—1939年间的西班牙内战以及（首先是20世纪30年代末）1918—1919年间的德国十一月革命也应该被定义为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

3. 在马列主义历史编辑学的革命研究中，特别是在民主德国（位于莱比锡的“近代革命史比较”[Vergleichende Revolutionsgeschichte der Neuzeit]研究小组），系统地区分资产阶级改造之间的不同“道路”是核心问题（LW 9，第38、236—237页等处），其中——分别在经济—工商业的层面、经济—农业的层面和政治的层面上——两种主要类型，大多被称为“革命的”和“改革的”道路，被划清了彼此的界限。类似的重要概念（同样起源于列宁）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周期”（LW 16，第201页），这个概念也具有一个国际的—世界史的维度。在上述的研究小组（Kossok 1982）中，一个手册形式的论文集研究了近代25种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推动力、领导权、阶段划分、结果和历史地位。把“在封建主义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比如法国1789年）、“在资本主义时期支持资本主义的革命”（比如法国1830年）和“通往资本主义道路的革命”与针对资产阶级变革（比如德国1848年）“道路”的决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决定（比如俄国1905年）进行区分。（Kossok 1981，第10—11页）

4.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的作者之间，尤其是在法国，首先讨论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国家史意义和世界史意义，其中主要是索布尔（A. Soboul）维护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解释，反对各种批判的异议，特别是反对以结构史学为导向的历史学家菲雷（F. Furet）和里歇（D. Richet）。菲雷和里歇在1792—1794年间的平民和农民组成的统治权中，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临时“脱轨”，并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和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之间去除了社会的连续性，与他们相反，索布尔坚持人民大众干预资产阶级变革的必然性和进步性。（IMSF 1979）法国

399 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模式”（Kossok 1974，第 199 页）。

与此相反，尼克斯·普兰查斯恰恰强调“**资产阶级无法在公开行动中实施其自身的革命**源于他们的阶级构成”（1980，第 180 页）。英国 1640—1688 年间的革命在资本主义大贵族的领导之下“**特别的成功**，以至于这次革命使英国社会形态之内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优于其他生产方式的公开支配地位成为可能”（同上书，第 170 页），而法国资产阶级却失败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在与小生产者的联盟中，政治上所取得的胜利确保了对这些经济上保守的社会群体的长期决定性影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强调道路问题、区分不同层面（领导权、推动力和结果等等）、考虑国际的和时代的关联时，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范畴辩护的论据是清楚的。而他们把社会政治的极端性，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深远的民主化影响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转型的历史贡献的证据时，则是没有说服力的。相反，对此的考察反对在分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变革时，把政治民主、人民运动以及资本积累除了在时代上前后相承之外再作更多的联结。

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们致力于，在与经济—社会的基础和国家以及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关系中来研究结构的动力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不去定义一个核心问题，一些自称为非独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要通过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普遍地限制在经济基础过程中而解决这一核心问题：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要求一次上层建筑的革命性跳跃？虽然法制和政治制度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是强制性必要的。但是，这种适应在一部分发展成了一个资本主义阶级派别的先前的封建阶级的领导下，而且/或者在特定情形下，通过相对自主、原本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也许可能以改良的方式完成，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但是与其把这一“道 400
路”确定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变种之一，倒不如把它确定为原本政治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替代方案，或者用葛兰西的话说，称为**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

参考文献：

P. Brandt, *Di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 Genesis der Moderne*, in: *Sozialismus*, H. 10, 1987, 35-45; R.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I, II, London 1974, 1984; 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 (IMSF) (Hg.), *Theorie und Methode II: Bürgerliche Revolutionen.*

Probleme des Übergangs vom Feudalismus zum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9; M. Kossok, *Studien zur vergleichenden Revolutionsgeschichte 1500-1917*, Berlin/DDR 1974; ders. (Hg.), *Revolutionen der Neuzeit 1500-1917*, Berlin/DDR 1982; ders., *Vergleichende Geschichte der neuzeitlichenen Revolution. Methodologisch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sprobleme*, Berlin/DDR 1981;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²1980; R. P. Sieferle, *Die Revolution in der Theorie von Karl Marx*, Frankfurt/M 1979; A. Soboul, *Die Groß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2 Bde., Frankfurt/M 1973; L. Trotzki,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Die treibenden Kräfte der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67.

彼得·勃兰特 撰

朱渝阳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Feudalismus,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Hegemonie, Herrschaft,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Jakobinismus, Marxismus-Leninismus, nationale Bourgeoisie, passive Revolution, permanente Revolution, Revolution, Risorgimento, Russische Revolution

公民权（Bürgerrechte）

A: al-ḥuqūq al-madanīya. – E: civil rights.

F: droits civiques.

R: graždanskie prava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права).

S: derechos cívicos.

I.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以“国家公民权”的形式引入了公民权的概念，他把国家公民权定义为“只能在与别人一起的共同体中所行使的政治（*politische*）权利……的总体”（MEW 1，第 362 页；MEGA I. 2，第 156 页）。此外，马克思还区分了公民权（droits du citoyen）和人权（droits de l'homme），前者表明国家公民的参与权利，后者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MEW 1，第 364 页；MEGA I. 2，第 157 页——涉及法国 1793 年宪法第 6 条）

1.1 分析黑格尔对国家和社会的区分以及他在 *citoyen*（国家市民）和 *bourgeois*（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私人）之间的划分，为人权和公民权（*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的辨析奠定了基础，人权与公民权对发展宪法理论中和国家理论中的自由概念具有建构性意义：“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

已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MEW 1，第354—355 页；MEGA I.2，第 148—149 页）

这样一来，人就显现为双重存在物：一方面是自由的精神化的国家公民；另一方面是实施压迫并且屈服于压迫的物质化的市民。马克思在市民国家中发现的市民生活反映为虚构的普遍利益与实际的个别利益之间的矛盾：“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 *citoyen*（公民）的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MEW 1，第 370 页）

政治人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抽象。扬弃这种抽象是人类解放的意义和目的，在马克思看来，“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相分离的时候”（MEW 1，第 370 页；MEGA I.2，第 162—163 页），人的解放才能实现。对于马克思来说，克服**市民**与**公民**之间分裂的前提，就是在市民社会中战胜结构性的利己主义，或者说是战胜引发利己主义的个人分裂。马克思对于不完全自由的批判和对于由“精神化民主国家”所保证的虚构满足的批判，没有仅仅停留在单纯的否定上。他既不想把作为自然权利产物的公民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担保，当作战术的考量，也不想把它们当作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毋宁说，对马克思而言，公民权和政治上的自由担保超越了这些，是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共同体服务的目标概念。这一事实表明，他在政治和社会的解放之间建立了联系，尤其是借助于公民身份的形象。相反，人们能从恩格斯那里听出 402
工具化的意义与公民权的关系，他在 1871 年反对工人应该放弃选举权（弃权）的“革命”口号时阐明：“政治自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MEW 17，第 416—417 页）

1.2 青年马克思关于国家公民权和自由权意义的观点，以及关于自然权利解放形式意义的非工具化的观点贯穿到他后来的作品之中。只有那时马克思的

见解才以这种方式发生了改变，他的批判兴趣不再是被人分裂为国家公民和有财产市民的问题所激发的，而是专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这一批判企图摧毁这一假象，这一假象表明了在自然权利解放中所要求的自由和平等体系的规范标准与处于市民社会之中的、通过以生产为中介的交换所表达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并不想因此把也包括公民权和基本自由的自然权利范畴理解为从历史中脱离的资产阶级解放的一种抽象的理念。自然权利范畴与其理论的相关性源于这种方法具有内在性地批判市民阶级的功能，而市民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对等价交换体系的意识形态，其批判的力量恰恰是源自那些自然权利理念，这些理念也同时是公民权和人权的摇篮。（参见 Wellmer 1979，第 26—27 页）

然而这意味着，当马克思建构的无统治权的共产主义社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时，它才只能从其批判的相关性中充分地得以说明，以至于资产阶级宪法所具有的解放的意义结构与克服敌对领域的私人利益必须同时产生。（Baratta 1971，第 116 页及以下）

因此，政治自由和社会自主的相互分离是不可想象的；它们功能性的连接才使得自由权利的实现成为可能。如果个人自由的效用谱局限在支配一个被分隔的个体领域中，那么寓居在国家公民权之中并且促使个体积极参与未来的目标，将被还原为培植私人的利己主义。把人从自身和从他在私人占有社会中的同类中分离出来，同样会减少人的社会发展机会。

通过这种批判地扩大公民权利地位的进路，马克思补充并纠正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概念，因此，民主的—参与的自我规划的要素得以保证。与此相对的是人权规则中所具有的个人自由权被进一步忽视了。恰好通过法哲学的和宪法哲学的范畴，在公民和市民之间所置入的私人及其完全也是由政治上激发的一个个人的，而不是一个个体占有的、私人的保护区的主权愿望落入了马克思的思考之中。在这里出现了国家理论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原因也许是因为，马克思在黑格尔（*RPh*，§§ 117、183、209、229）的影响之下，把安全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最高概念，……理解为利己主义的保证”（MEW 1，第 354 页），并且他通过把那种形式的个人自由权功能性地与财产以及与财产的相关机构进行关联而摆脱了这一认识。因此，这个缺口还表现为，其忽视了保障个人自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

2. 因缺乏对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解放关联性的反思，这个由马克思所留下的空白，即关于公民权的角色、效用

以及影响范围的研究，在马克思的后继者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列宁和风格化为神话符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响之下，公民权反复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发挥作用然后又被中止，并被统治机器吸收。1906 年，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的视角强调（并多次通过再版重复这一思想）："专政这个科学的概念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不受任何事物限制，绝对地不受任何法则和规则约束的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LW 10，第 244 页，也参见第 211、241 页）宪法概念和诸如自由或者平等的权利机构因此被交付到一个自我关联的、决定主义暴力的监护之中。在第三届共产国际会议上，全部思想清晰地表达为："只要没有出现普遍的、最终的结果，令人恐惧的战争状态就会再持续。并且我们要说：'我们没有承诺自由和民主。'"（LW 32，第 518—519 页）公民权、少数权利、政权操控或者代议制的全部问题，永久地处于一个普遍地引发战争的和一个使战 404
争权利合法化的背景之中。

对此，罗莎·卢森堡提出她的著名的格言予以反驳："如果自由只是相对于一个政府的追随者，相对于一个政党的成员——尽管成员为数不多——就不是自由。自由总是他者思考的自由。"（GW 4，第 359 页）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社会主义是一场充满生命力的历史运动，这个历史运动要求一次精神变革并且需要不受限制的公共批判可能性以及对个人的自由保障。

恩斯特·布洛赫继承了这一点，他把罗莎·卢森堡的政治要求变成一个法哲学的和宪法理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让自由权利只在一个不是由对抗机制所调整的社会形式中发生效用。布洛赫在《自然法与人的尊严》（*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中的结论是关于"卢森堡主义的"假设的纲领性原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GA 6，第 232 页）在建立社会新秩序和权利自我规定的功能性关联中，布洛赫看到了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王国"的基础。在自然法中发展的自由担保，对于个人而言形成了受个人控制的，参与未来规划的安全的法律保障。对于布洛赫而言，社会始终将自身置于一个明确的自我制度化的运动之中。他反对形成一种受管制的自发性社会状态，或者是通过扬弃异化而使人的原初好的本性再次恢复生机，或者是通过客观的社会条件和主体的严格训练允许在个体的社会灵魂状态中完全吸收制度。布洛赫论证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其中，正义的问题始终是悬而未决的，在其中，一个共同体能够为自身提供由自身实践产生的知识规则。

在列里奥·巴索（Lelio Basso）那 405

里可以找到具有可比性但却没有得到详尽阐释的法哲学议题，他主张在市民权利秩序中使用文化中的遗产，也主张激活市民权利秩序的理性权利的潜质，他把这种潜质表达为人权和公民权（1973，第 239 页及以下），或者像诺伯托·博比奥（Noberto Bobbio）那样，他追溯到“不能遵守诺言的民主”（1973，第 12 页），并且在与自然法传统的有意识地关联之中，要求“一个新社会契约的计划”（第 138 页），以便建立一个以人权和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A. Baratta, »Gedanken zu einer dialektischen Lehre von der Natur der Sache«, in: Kaufmann 1971, 111f; L. Basso, »Die Rolle des Rechts in der Phase des Übergangs zum Sozialismus«, in: *Kritische Justiz*, 6. Jg., 1973, 239-263; N. Bobbio,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Berlin/W 1988; A. Kaufmann (Hg.), *Rechtstheorie. Ansätze zu einem kritischen Rechtsverständnis*, Karlsruhe 1971; A. Wellmer, *Praktische Philosophie und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Konstanz 1979.

哈特穆特·瓦格纳（Hartmut Wagner）撰

朱渝阳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Besitz/Eigentum,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tum,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manzipation, Freiheit, Gemeinwesen, Gerechtigkeit, Gleichheit, Hegelianismus, Hegel-Kritik, Individuum, Luxemburgismus, Macht, Menschenrechte, Naturrecht, Recht, Rechtsstaat, Rechtssubjekt, Reich der Freiheit, Staat, Verfassung, Zivilgesellschaft

官僚制（Bürokratie）

A: al-bīrūqrāṭīya. – E: bureaucracy.

F: bureaucratic.

R: bjurokratija (бюрократия).

S: burocracia.

官僚制似乎是现代社会主义绕不开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说，每一种“理性的社会主义”都必须“直接采取”官僚管理的现代形式——这种形式正是由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共同创造的——甚至还在“自我加强”。（*WuG*，第 165 页）社会主义还可以意味着，整个政治和经济力量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参见 1958，第 331 页及以下）如此说来，人人平等的“无统治的”社会思想从一开始就要

颜面扫地：一切“社会主义”似乎被下了诅咒，要以更为彻底的官僚制统治而告终。如果存在这样一种规律，即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后必然要走向新型

406 的——并且这次还是无与伦比的——官僚统治，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即无阶级的社会的理念，就只能是一个幻想了。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有许多零散的观察，它们主要关注**国家官僚**和被称为**官僚制**的现象。没有可以和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基本概念**具有可比性的某种马克思主义官僚制理论。（参见 Bobbio 1977，第 28—29 页）从规范的意义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官僚制的反对者。在他们看来，官僚制是对所有民主体制的威胁，将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产生特殊的危害。他们非但不像马克斯·韦伯那样坚信一切社会主义的努力将都无法避免地走向官僚化，反而把官僚化视为危险，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来克服“国家官僚主义”（以巴黎公社为例）。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在“苏维埃实验”开始之后也一再绞尽脑汁地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中推行民主制来反对官僚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虽然偶尔也提及官僚制，但并非**组织**概念。只要（国家）官员构成与市民社会各阶级并立或者居于它们之上的一个特殊等级或一个特权阶级，那么，他们用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即是（**国家**）**官员的统治**这一现象。官僚统治（其含义有二，即国家官员的统治和借助于国家官员的统治）的前提和结果是它们的主旨，而非官僚组织的特点。就这一点来说，他们自己也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一直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官僚制是一种在例行公事中变得僵化起来的，对于庞杂的行政管理中的公式主义、阴谋诡计、文牍主义和无能傲慢的总称；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官僚制是“理性”、有效、专业的行政管理组织的同义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只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制进行研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越来越关注工人运动组织内部的官僚统治问题。从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建立，到其巩固直至解体，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官僚制的特质问题（如他们是否是新的统治阶级？）主导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这一尝试的特质及成功前景的辩论。与此相反，撇开一些例外情况不谈（例 407
如可参见 Otto Bauer，WA 3，第 819 页及以下），资本主义大企业里的工业官僚制的发展却远远没有得到关注。

官僚制（起先也写作 *bureaumanie*）这一表述是由 18 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

先驱者提出来的。杜尔哥的老师文森特·德·古尔奈（Vincent de Gournay）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以此来指涉一种特定的政府形式和国家形式。尽管官员还是一个相对而言很小的群体，但对**官僚主义者**（*bureaulist*）及其统治欲望的抵制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很常见了。若忽略论战的色彩，**官僚制度**（*Bureausystem*）是通常的提法。这个词指的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形式。19世纪初期，在消除**合议制**（*Kollegialsystem*）和引入严格的官职**等级制**、清晰的**职权划分**和官署之间越来越书面化的、**公文形式的**往来后，这种国家行政管理形式在普鲁士/德国形成了。卡尔·海因岑（Karl Heinzen）——他有段时间是党派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与其展开论战（参见MEW 4，第309页及以下，第331页及以下）——撰写了最早的一批反官僚制的论战著作中的一本，即1845年出版的《普鲁士的官僚制》（*Die preussische Bureaukratie*）。这本书在恩格斯看来是一本“蹩脚的书”（第310页）。当时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厌恶官僚制，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了解的。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著作中，又出现了关于官僚制的自由主义的教条，即官僚制既是专业的，又是无效率的。像自由派莱茵兰人一样，他们有时也咒骂“万能的官僚”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MEW 12，第616页；5，第324页多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现代官僚制不仅包括职业官僚，而且也包括特定形式的“官僚和军事组织”。马克思以拿破仑行政管理改革后的法国为例描述了这种组织：官员们构成了一架“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MEW 8，第196页），其活动“就像工厂里一样进行分工和集中”并根据统一的、“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计划”来组织（第197页；MEW 17，第336页）。正因为这种组织，现代国家才获得了一种“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极其敏捷、极其灵活的力量”（MEW 8，第150页），这种力量使得国家胜过了市民社会的多数力量，成了政府的“驯顺而有力的工具”（第30页）。不过，国家却经受着过度集权之苦，这种状况部分是历史造成的（第204页；MEW 17，第336、539页），部分是国家活动的扩展和行政管理方面越来越“大规模的分工”的结果（MEW 8，第197页；MEW 17，第539页）。而且，随着官员职位的连续扩张，集权也不断膨胀。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从“官职”谋求物质利益和“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不断争夺职务和职位的必然结果。（MEW 17，第336页）

尽管马克思（跟马克斯·韦伯一样）

确信国家官僚的行政管理与（授予）荣誉和贵族的业余管理相比是有优势的，但他有时也认为“常设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关”的行政管理是多么烦冗、耗时、昂贵和无效，例如他曾以英国的殖民管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MEW 9，第185页）由于殖民官员对所在国并不了解，他们在当地的活动便发展成了一个相当灵巧的技术，他们造出了一架“巨大的打字机”。（参见上书，第186—187页）在马克思看来，对官职的谋求使得官僚制变得很低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把这一想法拓展成了一种对于官僚组织自我麻痹的解释，这种解释自此之后常常被提及。（参见Robert K. Merton 及畅销书《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Gesetz*]）马克思在1843年写道，官僚机构易于“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目的变成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或者行政办事机构的目的变成国家的目的”（MEW 1，第249页），因此，官僚机构必定处处和国家目的处于冲突之中，并且因为它只汲汲于自身的利益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切合这些目的。因为官僚制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MEW 1，第248—249页）官僚机构发展了官僚行政的“形式主义”，使“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变成了国家机器的真正内容和目的。正因为这种颠倒——官僚们作为“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像屈服于职业病一般——官僚机构把国家看作某种只是由于官僚组织的联系才得以存在的东西，而世界上的其余事物对它来说，只不过是官僚活动的“对象”。（参见上书）即使官员们怀着最善良的意愿，**官僚**行政管理也无法改变它和市民社会之间颠倒了的关系，因为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第189页）。官僚关系，即官僚机构同它自身及其环境的关系，导致它发展成一个倾向于封闭的体系：“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Hierarchie des Wissens*）。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第249页）

409

官员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代国家的官员称为“阶层”，有时称其为“等级”，在极少数时候也称之为“阶级”（参见MEW 4，第44页）：这些说法全部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家公仆”怎样才能统治现代国家并通过它来统治市民社会呢？他们怎样才能

侵夺传统的或现代的“统治阶级”并让自己取而代之呢？首先，他们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既区别于其余各阶级并和它们相分离，又达到了足够同质的程度以便能够形成自己的利益。马克思在1843年提出反对黑格尔的理由时说道，官员完全把国家具体化了，但并没有把“普遍物”具体化。它们使得国家又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社团”。（MEW 1，第248页）尽管市民社会中的各等级土崩瓦解了，但官员仍旧是“政治地位和市民地位吻合一致的真正等级”（第284页）。不过，只有当高级的、担任领导的官员“完全靠其官薪过活”并且其社会“等级和地位完全仰赖政府”的时候（MEW 12，第642、678页），（而不是像比如说普鲁士的县长或英国的治安法官，他们仍然绝大部分由活跃的［大］地主充任，而且只是作为兼职官员）官员这个等级才会变得同质化。在论述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情况时，恩格斯对“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独立性”（MEW 18，第258页）的说明是，这个等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自身存在和经济独立不断受到威胁的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中招募的（参见MEW 4，第44页）。国家公职和官员生涯变成了文官世家和武官世家的家族传统。（参见MEW 8，第30页）现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政策绝不是从它们自己“祖国的子弟”中，而是从很多族群的成员中选取其文武官员，并且往往系统性地把他们“从帝国的一端”派遣到“另一端”。这样做的结果是，（高级）文武官员不是属于任何民族的，而只是或者首先是属于官员体系的一个特殊官员团体。（参见MEW 12，第678页；MEW 18，第559页）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它们）总是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职业文武官员以牺牲各种各样的封建“特权”的代价来执行统一的法律，推行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推广统一的官方语言。（参见MEW 8，第197页；MEW 17，第336、539页）由于这些官员完全依靠国家生活，所以他们“对国家……的存在”也始终有着显而易见的“利害关系”。（MEW 18，第559页）“强有力的政府”，即威权体制之下的“大群富贵豪华的官僚”（MEW 8，第202页）——这种体制需要许多拥有官职者和谋求官职者——正是官员们所中意的国家理念。由于他们自己的利益系之于国家这个他们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来源，他们努力在国家中建立“专制”（第197页），以便对抗各个掌权者和市民社会的各个阶级。

只有在市民社会各阶级没有能力独自进行政治统治时，官员才能够掌握统治权。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论能够为官僚统治给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

解释。这同样也显示了其官僚制理论的特点：对他们来说，官僚统治始终与一种在原则上非同寻常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格局有关，它并不只是从官僚例行公事的日常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并且恰恰或者只能以此来证明的东西。正好相反，当前的官僚统治的行事方式完全是“非官僚的”，而在国家内和对于国家（因而也对于官僚）的最面易见的阶级统治却可能隐藏在极其“官僚的”行事方式和决策方式之后。不过，当组织内部的知识和相应的经验都已具备时，“官僚的”行事方式只是权力手段，人们只能学会与这些行事方式好好相处。借助这种权力手段，“常任的官员们”才能长期摆脱监督。就此而言，他们同官僚组织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因为官僚组织庇护他们并把现实权力交由他们使用——这正是马克思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管理为例所说明的问题。（参见 MEW 9，第 180—185 页）

直到 19 世纪，德国资产者还没有成为一个阶级，由于其“没有共同利益，只有分散的小眼小孔的利益”，他们只能无力地遭受着其他国家的较发达的、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德国才出现了国家的“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强化的独立性”（*Dl*. MEW 2，第 178 页）。正如恩格斯 1866 年鉴于普鲁士 / 德国的情况而写的，这样一来，可能“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MEW 31，第 208 页）。然而，一旦现代工业发展起来，官僚统治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就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现在，资本家阶级需要直接的政治影响力，以便利用国家的行政管理为自己服务。（参见 MEW 4，第 53—56 页）官僚和军队必须根据应当被正确理解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把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MEW 6，第 253 页）。然而，“旧官僚不甘沦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资产阶级的专横导师”（第 8—9；参见 MEW 4，第 353 页）；因此，（高级）国家官员通常属于每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痛苦反对者。马克思指出，在议会制共和国，资产阶级是这样做的：它使贵族和君主的大臣们丧失了影响力，把国家大事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将官僚体系变成了自己的“工具”（MEW 8，第 197 页；17，第 336 页），或至少把对政治的积极参或多或少地限定在有产阶级的范围之内。

但即使在一个拥有统治能力的资产阶级发达国家，也可能会出现官僚统治。对于这些情况，恩格斯提出了阶级力量“势均力敌”的公式。（MEW 18，第 258 页）这种势均力敌一度被视为必经阶段，被视为“工人阶级统治”的政治准

411

备阶段，“那时，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MEW 17，第 338 页）后来，作为一系列不规则的例外，“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任何一方都不再有统治下去的能力。（MEW 21，第 167 页）这种“势均力敌”的划分基础是不同的时期，它们跟先前提到的、最后总是又一次回到资产阶级统治复辟的那种情况不同。马克思举了重大失败后的士气低落对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例子。他还援引了经济危机的例子：这些危机使工人阶级大部分陷入挣扎求生的境地，也让资产阶级在党派斗争中分崩离析。（参见 MEW 8，第 153 页及以下，第 185 页及以下，第 192—193 页）但在这些情况下，官僚也
412 并非不费吹灰之力就自动得到了统治权。他们必须要懂得抓住有利时机，一跃而成为“调停人”，巧妙地教唆各个阶级互相争斗，为它们的彼此对立添油加柴，并至少短时间地被各方看作“行善者”。（参见上书，第 204 页及以下；MEW 17，第 337 页及以下；21，第 167 页）但是，即便在由官僚统治的国家，它“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也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MEW 8，第 206 页）所以，恰恰只有在官员统治的时期，例如在 1870 年后的德意志帝国，才会让“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让他们遭受同等的欺骗”（MEW 21，第 167 页）。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官僚统治总是件坏事。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尽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容易被误解的说法，但他们仍然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总是考虑把官僚置于监督之下的可能性。议会首先必须保留“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是说，它能够任命和撤换政府，以便通过对它负责的阁员来监督“官僚权力”。（MEW 8，第 150 页；参见 6，第 619 页）一个议会如果不“简化国家管理，尽可能缩减庞大的官员，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MEW 8，第 150 页），那它很快就会丧失其影响力。

无官僚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把在巴黎公社反官僚的措施中发现的东西上升为工人运动的纲领。基于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特殊的”和适宜的代议制民主形式（MEW 22，第 235 页；参见 17，第 545 页）有如下特别的措施：（1）“**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MEW 22，第 235 页），而人民代议机关“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MEW 17，第 339 页）。（2）用“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把国家组织起来

（第545页；参见第340—341、595页）：各个市镇、专区和省效仿美利坚合众国和被拿破仑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取代之前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798年），实行“完全自治”，而不要效仿瑞士各州政府的办法实行官僚的居间统治（MEW 22，第236页；参见7，第252—253页；18，第634页）。（3）一切官员，包括法官和警察在内，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以便“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MEW 17，第339—340、544页）就此而言，“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MEW 19，第6页）。（4）一切官员应当转变为从公社“领取固定的工资”的职员（MEW 17，第530页），公务应当“用工人工资来购买”（第339页）——其水平应当同专业技工相当（第544页）。这样一来，就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第624页）。恩格斯在1891年还称赞最后两项措施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两个正确的办法”。（MEW 17，第624页）评释：

这个措施清单包含着一个名为“巴黎公社的神话”的好剧本：实际上，巴黎市镇代表绝不是随时可以调离的；他们的工资虽然相对微薄（限定在每年6000金法郎），但仍然相当于一个专业技工工资的四倍，是一个国民卫队士兵薪饷的十倍。著名的行政职能和立法职能的联合体（议行合一的机构。——译者）是迫不得已而出现的，并以市镇代表超负荷地加班为代价来维持运转，这些代表必须充任自己的行政官员，负面效应比正面效应更胜一筹。正如恩格斯后来所作的限定，马克思曾“把公社的不自觉的倾向当作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MEW 36，第79页）。

自1848年民主革命失败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必须打碎“官僚军事机器”，至少“在大陆上”做到这一点（MEW 33，第205页），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同乡镇自治或地区自治的纲领作斗争，反对联邦制，并主张集中政治权力，尽管这是“更高”形式的集中，“打碎”官僚国家机器可以为这种形式创造空间。（参见MEW 8，第13、72、204页；7，第87、252页，第411页及以下；28，第508页；31，第241—242页）由于巴黎公社的影响，他们的看法发生了反转。恩格斯在1885年指出，他们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在法国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整个行政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MEW 7，

413

414 第252—253页）。自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来，他们一直都主张“完全的自治”（MEW 22，第236—237页）。

工人官僚。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在政治上进行统治这个问题被长久搁置。由于工会、合作社和政党迅猛地发展为实际的群众组织，社会主义者遇到了他们自己队伍中的官僚问题。马克思早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尤其在德国，那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MEW 32，第570页）。因此，在工人运动中，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是灾难。

工人运动中官僚的增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再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相比，德国覆盖广泛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被很多人视为榜样，这种组织有时也被嘲讽为“国家的大众普及版”（Victor Adler）。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之际，列宁在斗争正激烈的1903年宣告，“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LW 7，第400—401页）为此，列宁遭到了罗莎·卢森堡的严厉批判，后者恳切地警告要防止“极端集中制”和列宁为党的领导人所要求的“**消极**性质的绝对权力”。（GW 1/2，第433—434页）在1906年**关于群众罢工的争论**中，卢森堡是最早认识到（德国）工人运动可能成为其组织成果的牺牲品的人之一。随着工人运动的增长，出现了一个以党和工会的工作谋生并由此而成为正规“职业专家”的“正规……官员阶层”。他们是“历史上必要的恶”。之所以说他们是恶，是因为他们造成了**官僚主义**。这种态度原则上把组织利益置于优先地位，却期待“有组织的”群众只是“消极地服从”。（GW 2，第163页及以下）不久，早年拥护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后又为之感到失望的追随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发表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把工人组织的官僚化描述为从“无产阶级精英”到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的社会上升的必然过程。（1906，第121页及以下）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社会学》（*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中，米歇尔斯以德国工人运动为例，说明了所有现代大型组织中必然导致组织官僚统治的“寡头统治铁律”。在他看来，这个研究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补充而非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他的**定律**无论好坏全数列入阶级斗争学说，因为“政治阶级学说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是无可辩驳的”（第366—367页）。不过，工人运动凭借其组织上的成功必然导致无产阶 415

级精英上升为某种官僚，这又导致由组织官僚组成的领导团体对整个组织的统治：正是这一证据促使米歇尔斯得出了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即“社会主义者会……取得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会取得胜利”（同上）。尽管这本书有点离经叛道，但它使马克思主义者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中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工人运动和未来的工人国家将会成为官僚化过程的牺牲品，正如基督教在4世纪变成国教时所遭遇的那样。社会主义运动也必定会建立提供“某种党和工会职业官僚”的“常设机关”，而这个群体可能会彻底变成一个“新贵族”。（参见1923，第499页）然而，考茨基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普遍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和旧分工的消失为防止官僚统治提供了保障。（参见第501—502页）

马克斯·韦伯。广受赞誉的韦伯官僚制理论可以划分为许多相当矛盾的成分。韦伯以中国清朝官员为例，（在其《宗教社会学》[*Religionssoziologie*]中）阐述了“官僚制精神”。这些官员是由具有自己的“等级伦理”（儒家学说）的官职拥有者组成的一个特殊等级。除此之外，他试图（在其《政治社会学》[*Politische Soziologie*]中）提出作为组织形式的某种特定的官僚制概念，即“官僚独裁的、以公文形式进行行政管理”的理想类型。在政治著作中，韦伯致力于阐明威廉时期德国和沙皇统治俄国的官僚统治的条件，并思考在现代国家中如何有效地限制职业官员的权力。

韦伯基于一系列特征描述了“官僚组织结构”的理想类型，这些特征一方面涉及这种组织的行为原则（如固定的权力划分、清晰的上下级关系），另一方面关乎“内部和外部的身份”，也就是组织成员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地位。在分工和严格等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组织，依据抽象的、一般的规则来行事，受过专业教育的职业官员济济一堂：这就是韦伯的官僚制理想类型。他的核心论点是：这种现代官僚制可以普遍安置，在技术上胜过所有其他的组织形式，因而是不可阻挡的。基于这种信念，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无法逃避不断官僚化的趋势。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官僚制分析后来常常遭到质疑。（参见Schluchter 1985）

然而，韦伯认为政治意义上的官僚统治（像俄国或德国的那样）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札记中，他最切近地处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问题。韦伯以威廉时期的德国为例，主要从产生了半吊子政府和无能议

会的“伪立宪主义”的特征出发，阐发了官僚的政治统治。为了打破官僚统治，他建议引入普遍而平等的选举权，建立一个强势的、“工作的”议会。关于国家机器的组织，他提到了“间接民主化”，它将会导向一种可能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的“官僚化的民主”。（参见Schluchter 1985，第97页及以下）对韦伯来说，除了职业官僚以外别无他法。

列宁与十月革命。由于俄国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反对俄国第一个共和国的议会主义的斗争（1917年）中，列宁变成了官僚制的激进反对者。社会主义需要的不是“更换阁员”，而是彻底改造“整个旧的国家机构”（*SR*，LW 25，第380—381页），创建一个“逐步使所有公职人员成为多余”的国家机构（第438页）。官僚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他们履行着“特殊职能”。（第502、439页）旧官僚可以被简单免职，而新官僚的产生可以通过三个措施来阻止：（1）所有官僚必须由选举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2）其薪金应当限定在“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3）所有官僚的职能应当由所有人“依次”行使。（第496页等处）列宁在1918年制定的一个革命目标是，每一个“劳动者”（当然也包括俗话说的已经变成“家庭主妇”的妇女）应当（在每天八小时的生产劳动后）去“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亦即参与行政管理。（LW 27，第264页）他认为这（至少从长远看来，并且从缩短劳动时间的角度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他把“监督和计算”同所有其他的“纯粹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职能作了区分。前者已经大为简化，以致每一个精通读写和算数的人都能履行这些职能，而其余的职能还要暂时地分配给“技术员”和“专家”。（LW 25，第439、487—488页）迄今为止由国家公职履行的多数职能已经变得如此简单，以致“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第465页）。 417

不过，就在写下这些的同一年，列宁就承认，专家对于组织、监督和簿记是不可缺少的，苏维埃国家只有支付给专家的薪资高于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才能让他们服务于苏维埃国家。（参见LW 27，第238页及以下；LW 29，第166—167页）不仅如此，官僚制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复活了。列宁发现“旧长官”（LW 25，第438页）又回来了，并且注意到了专家和官员高工资的“腐化作用”（LW 27，第240—241页）；他还发现，沙皇时代的旧官僚有一部分重新占据了官署的“旧职位”。苏联的整个行政管理显而易见地官僚化了。对此，列宁尝试给出的解释是，完全参与管理的“无

产阶级先进阶层”“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参见 LW 29，第 164、168—169 页）。苏联正快速奔向一个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列宁认为，可以立即开始革除这些弊病，因为它们是由纯粹的破坏活动引起的。（参见 LW 32，第 7 页多处）与此相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却要漫长得多，因为这里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文化落后、俄国资本主义的欠发达状态、构成人民群众的“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和受压制状态”。（LW 29，第 164、168—169 页；LW 32，第 365—366 页）克服这些需要文化、教育和“广大群众”经常参与管理。（参见 LW 30，第 234 页；32，第 51、213—214 页等处）

苏联试图利用特殊的监督机关来反对并非来自工人运动的拥有官员身份的专家：设立**委员**（*Kommissaren*）和**工农检查院**（*Arbeiter- und Bauerninspektion*）。首先需要作的是扩大这个极重要的“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LW 33，第 476 页）。（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时曾作过类似的尝试，他们试图设立“副委员”[Beigeordneten] 来对旧帝国内阁大臣级别的官僚进行严密监视：由此卡尔·考茨基才进入了外交部。）但对于列宁来说，最重要的解决方案是并且仍是人员的替换，因为他相信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不会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过，他发现了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即使是最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一旦被录用进机关，也会“官僚化”。（参见 LW 33，第 57 页等处）

1919 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职干部不到七百人，并且他们都是由选举产生的。经过列宁的批准，选举制被任命制取代。1922 年，干部的人数超过了一万五千名，并且全部由党中央任命。1923 年，干部薪资已经相当于产业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倍；党的干部在物质方面的特权制度得以建立，并不断扩大。（参见 Mandel 1922，第 72—73 页）1917 年提出的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目标已几乎被遗忘：“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LW 32，第 47 页）（问题的）重点已经完全转移了：更多落在了维持共产党的政权上，而为此目的，党内民主基本上已经被破坏殆尽。由于任命和安排党、国家、工会和经济方面的重要干部的政策是通过上层即党的组织部门决定的，因此，党的组织部门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核心支柱。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政权也越来越正式地等同于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苏维埃，这个为使广大人民群众接近国家管理的最重要的机关，被剥夺了权力。头等大事成了“改善”机关，战胜“腐败”、“无能”、“懒散”和“粗

418

暴”，这类似于创造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官僚机构。从革命原初的反官僚统治的动机中留下的唯一东西是向新型的名利追求者即向工人或适宜的人开放进入官僚机构的门径。

1922年，列宁在生命最后关头发表的公开意见中勾画了一幅特别昏暗的图景：共产党员虽然占据着“指挥部的职位”，但在苏维埃国家的表面形式下，
419 官僚机构早已复辟。官僚主义的触角伸到了各个行政管理部分的分支里，“共产党员已经变成官僚。如果说有什么能把我们毁了，那就是这个”（LW 35，第527页）。在《遗嘱》（这是一封写给1923年4月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当时被党的最高层雪藏了）中，列宁又一次试图让全党支持他出于策略性考虑而婉称为“改善”机关的建议：虽然已经建立了“新的国家类型”，但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根本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接过来的旧机关”。（LW 36，第581页）他最后的文章（写于1923年1—3月）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如何才能改善“毫不中用”的新国家机器？作为监督机关的工农检查院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没起到作用。列宁无计可施，只好再次提议：为了“清洗”党和国家机关，应当录用更多纯粹的工人参加领导委员会，并建立一个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新的最高监督机关，它终将开展清理工作。（参见LW 33，第468页及以下，第474页及以下；36，第577—578页）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还是认为，这里涉及的问题主要应归咎于旧制度的“残余”，而通过输入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再假以时日，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纠正。

别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brashensky）在《共产主义ABC》（*ABC des Kommunismus*）中发现了“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政权内部部分复兴”的危险，对此，共产党不得不通过教育和培养，尤其是通过“逐步让全部劳动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予以抵抗。（1921，第183—184页）在1921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试图反驳米歇尔斯的寡头铁律。他指出，长远看来，“本行专家的权力”将变成一个无害的“支配机器的权力”，而不是统治人的权力，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被米歇尔斯引以为出发点的“群众的无权能”将会不复存在。然而，在过渡阶段可能会出现“一种‘蜕化’趋势，也就是说，可能会以某种阶级萌芽的形式分化出来一个领导阶层”。但是，这种趋势可以通过两个“起相反作用的趋势”来阻止，那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垄断的消灭。（1922，第364、365页）他认为，防止官僚主义蜕化危险的最重要的保障是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新的“干部”（即专业人士和官员）。（参见1923，第

44—45 页）

420 托洛茨基可能是对资产阶级“残余”神话和“工人干部”纯洁性提出质疑的第一人，当时是 1923 年，他在围绕“新道路”而展开的争论中谈论到官僚制问题。然而，他的批判仍然小心翼翼地局限于“弊病”，局限于党的领导层的过度寡头化，局限于“官僚主义”，即在机关中掌权的“老干部”对大批党员的不断管束，局限于官僚反动的“危险”，即在党的寡头领导下发生“热月政变”。（参见 Ahlberg 1976，第 37 页及以下）这种局限性有两个简单的原因：第一，反官僚主义的话语属于列宁的遗产，它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就连斯大林偶尔也会对官僚主义大发脾气。第二，托洛茨基也和他之前和之后的一切反对派一样，无非是要招徕机关内部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冒险去尝试动员党内的特定阶层或苏维埃官僚派别、国家、经济界、军队去反对别人。在这类斗争中，反官僚主义的话语是一个受欢迎的手段，因为官僚们总是咒骂别的官僚们是“官僚”。

评释：

反官僚主义的不满情绪被证实是一切官僚体制的有效统治手段：只要领导人能够发动反官僚主义的清洗运动，并且个别官僚的牺牲——尤其是当这些人如同苏联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一样大部分还是来自于旧体制时——对于维护整个官僚体制的权力是极为有用的，那么官僚个人可能就从未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在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一些政府部门和地区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全部撤换（忠实于既定路线的告密者相应地获得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从这次运动开始，再到共产党执政的其他国家与此相对应的运动，针对“官僚主义成分”的斗争说辞总是作为党派斗争中的合法化证明，而这从来不针对“官僚军事专政”（Bauer，W 9，第 563 页）本身。（参见 Mandel 1992，第 141 页及以下）

托洛茨基：“新阶级”。从 1929 年被驱逐出境以来，托洛茨基一直致力于研究苏维埃官僚的问题。在被逐出党内（1927 年）后，他便确信，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了官僚专政。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在研究它是如何沦为这般境地和这将产生什么结果的问题。落后的基础加之非同寻常的贫困导致苏联社会严重的且由于国际封锁而愈加激化的阶级对立，托洛茨基认为，大量官僚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参见 1968，第 52 页及以下）然而，直到 1940 年被谋杀为止，他始终坚信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按照他的理解，大恐怖时期的斯大林政权是“一种新型的波拿巴主义”，它的基础是“被有组织的、掌握武装的苏维埃贵族和没有武装的劳动群众之 421

间的对立撕碎的工人国家”。（1936，第269—270页）尽管他从1933年起就一直相信，苏维埃官僚应该在“第二次革命”的道路上被剥夺权力，但他却认为，把他们的专政看作阶级统治是错误的。这种拒绝把苏维埃官僚和**干部职务名称表**（*Nomenklatura*）之类的东西里所列的人员视为“新阶级”的态度，也在追随者中打上了托洛茨基式立场的保守的烙印。（参见Mandel 1992）托洛茨基论证说，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属于官僚机构，但作为个体的官僚们却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国有”生产资料中获得个人财产权，更不用说个人继承权了。只要官僚仍然把国家财产当作其权力基础的主要部分来捍卫，他们就仍然一直在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功能。（参见1936，第242—243、246—247页）

几十年后，曼德尔还是用同样的论证来为这种观点辩护：只有当成为资本家阶级，成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时，“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1992，第29页及以下）其他人——其中有很多人是以前的托洛茨基分子——无所畏惧地得出了与马克思思想的逻辑恰好相符的结论（参见Draper 1977，第560页及以下），尽管这个结论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神话相悖：国家财产只要处于官僚团体的专属监督之下，就会变成剥削工人阶级的新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机构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所得的支配权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它监督着国家和其他所有大型组织。（参见Rizzi 1939；Shachtman 1962；Voslensky 1987）不想把官僚视为“统治阶级”的那些人所持的相反的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官僚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群体”（Hilferding 1940，第293页）；作为个 422
体的官僚，即便是最高级的官僚，也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者（这无非是说，“统治阶级”只能被视为由独立的小私人所有者组成的**资本家**阶级）（Bucharin 1925，第34页及以下；Trotzki 1968，第110页及以下）；官僚机构，甚至包括干部职务名称表在内，绝不是固定的和封闭的，它是会被来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晋升者不断更新和补充的（这个观点也适用于一切**统治阶级**）（例如可参见Mandel 1992，第30页及以下）。

西欧马克思主义者论社会主义与官僚。考茨基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之一，即俄国革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在那里，官僚机构作为各种官僚的集合体，将占据新统治阶级的位置。（1919，第289页及以下）他多次抨击自己的社会民主党朋友和批评者（阿德勒、鲍威尔、丹[Dan]、阿布拉莫维奇[Abramovich]），说他们不想承认苏联出现了“新的阶级划分”、“新

贵族”，即按照等级划分的“官僚贵族”占据了其领导层。（参见 1935，第 190 页）罗莎·卢森堡（在其 1918 年在狱中撰写并在 1922 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中）批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俄国革命**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时，还不像考茨基走得那样远。但她明确反对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压制措施，因为如果丧失了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就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压制一切形式的民主会导致政治生活僵化成“只剩官僚作为活动要素”的“伪生活”。最终将会是官僚的（党的）小集团的统治，而“工人中的精英”有时可能会为之鼓掌喝彩。（参见 GW 4，第 358、362 页）对她来说，官僚在专政中的统治地位是“任何政党都无法逃脱的客观规律”（第 362 页）。

一些西欧马克思主义者利用 1917—1921 年革命时期的经验，特别是和**苏维埃运动**有关的经验，重新检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药方”。马克斯·阿德勒问道：怎样才能使“职业官僚的必要性”同（社会主义）民主协调一致呢？如果没有“职业相关的教育”、专业化和“同等效力的兼任的职务”，组织和管理就无法完成。（1922，第 175 页）然而，通过政治教育和群众教育以及当今中央集权国家分散的自治机构网络，我们就可以防止专业管理人员向“官僚等级”转变。（参见上书，第 177 页及以下，第 186—187 页）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阿德勒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官僚自身、社会及其民主机构的强弱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而，应当强化“社会民主”来摆脱官僚统治。（参见 Kautsky 1922，第 460 页；Neumann 1942，第 110 页）考茨基强调，普遍选举权、自我管理和政治教育就此而言要比列宁坚信的、作为无产阶级民主的精髓的三个措施更为重要。（1922，第 121 页）列宁关于职业化管理专业人才的工作设想简直太天真了，正因如此，他才会认为从马克思那里流传下来的公社的要求（职务可撤换、根据工人工资付薪水）是可以付诸实践的。考茨基指出，取消官员特权，并最好让所有工人普遍享受今天还作为官员特权的社会保障——并且作为“社会的义务”，而不是单个企业的义务——显然是可能的。（同上书，第 122、216 页）只要国家和社会化的企业必须同私人资本竞争技术人员和组织管理者，即竞争有文化的人才和专家，那么按照工人工资来确定一切官员的工资这个要求就是根本无法实施的。（第 122—123、211—212 页）随时可以撤换所有官员（这是一切独裁体制的理想）的要求一是为滥用职权打开了方便之门，二是由于现代民主的群众组织能够对各个代表和当选官员进行有效而不间断的监督而已

经变得“完全多余了”——假如组织内部的民主起到作用的话。（参见第 125 页及以下）考茨基反对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分权。他认为，立法组织由于其规模的原因，无法既迅速又内行地作出大量个别的决策。对于执政组织而言，一个一再推翻决策的长期反对派是碍事的，但对于咨询和监督组织来说它却是必要的。最后，行政职能和立法职能（议行合一）的机构只会自己监督自己，这也达不到监督的目的。（参见第 129 页及以下）

奥托·鲍威尔在论述奥地利的“官僚专制主义”时提出了“彻底消除官僚统治”（WA 1，第 37 页）的目标。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一是需要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利（第 369—370、454—455 页），二是需要反对官僚统治阶层的行政管理民主化（第 454—455 页；WA 8，第 130 页）。统治和管理旧奥地利的是（高级）文武官员（WA 1，第 334—335 页；8，第 434 页等处），他们是一个超越民族的特殊阶层，是从“有产阶级”，即小贵族、（大）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中招募的（参见 WA 1，第 37、336 页；2，第 757、937 页；8，第 103—104 页等处），因而也受到这些人的影响。1867 年以来，在君主立宪制下，国家统治大权之所以会或短或长地反复落入官僚之手，是因为在多民族国家奥地利有不少于八个民族资产阶级在争夺统治地位，而他们既做不到由其中一个来统治其余几个，也做不到共同进行统治。由于他们争斗不休，议会这个以团体选举权（Kurienwahlrecht）为基础的各民族有产者的代表总是瘫痪无力，以致官僚作为唯一超越民族的群体维持着局面。因为所有有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成为议会的主导力量，他们便“在掌权的官僚的统治地位之下”统一起来了。（WA 2，第 944 页；参见 1，第 351 页；8，第 409、781—782 页等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哈布斯堡王朝的崩溃，尤其是军队的溃散，为社会主义者减轻了一部分工作。因此，1918 年后，鲍威尔把精力集中于研究这样一个任务，即怎样避免只能用“官僚专制”来代替资本统治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并建立起工人自治。（WA 2，第 711 页；参见第 129 页）为此，国家应当没收而不是去管理“成熟的”企业。社会主义化的企业需要的是“既非资本主义的，也非官僚主义的”新形式。（第 712 页；参见第 96 页及以下）鲍威尔建议成立一个由当选的生产者代表、消费者代表和国家代表组成的三方等权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基于专业资质和可用时间来任命领导官员。（第 97—98 页）如何既给予这些官员足够的自由决策空间，同时又仍将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组织问题”之一，

424

而这一问题在苏联尚未得到解决。（WA 3，第 901 页）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鲍威尔认为，苏联最初的无产阶级专政向“党的全能官僚的专政”转变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WA 4，第 176、165—166 页；9，第 561 页等处）尽管他把“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所得”的支配权归于官僚（WA 4，第 178 页），但他已不再认为官僚机构及其特权阶层可能形成“新的统治和特权阶级”是一种“危险”（WA 9，第 708 页）。

425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多次深入探讨了米歇尔斯的理论。（参见 *Gef* 2，H. 2，§ 75，第 284 页及以下）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问题的背景下研究官僚制的。葛兰西认为，1848 年后，特别是由于“广泛的国家官僚和‘私人’官僚（即政党和工会的政治官僚和私人官僚）的形成”，“现代政治的‘技术主义’……已经完全改变了”。（*Gef* 5，H. 9，§ 133，第 1179 页）对于现代政治而言，“第一重要”的事实是，“为（民事和军事方面的）行政机构工作而接受了技术培训的‘职业’官僚类型已经发展起来了”。（*Q*，H. 13，§ 36，第 1632 页；*Ri*，第 349 页；参见 *Gef* 5，H. 9，§ 21，第 1097 页）为了理解现代的政治危机，我们决不能忽略“给军事元素和官僚元素分配适当的地位”（*Gef* 3，H. 4，§ 66，第 549 页），因为官僚，包括党的官僚和工会官僚在内，构成了“最危险的常规权力”（*Gef* 4，H. 7，§ 77，第 913 页）。葛兰西顺便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官僚制概念：“自由主义虚弱无力”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分权的制度化，产生了“领导人”的独立化和“固定化”的趋势，而领导人则利用强制力从某一时刻起变成特权阶层。（*Gef* 4，H. 6，§ 81，第 772 页）因此，他坚决主张采取一系列反官僚主义的措施（参见上书，第 773 页），并警告要防止危及工人国家的“官僚集中制”危险（*Gef* 5，H. 9，§ 68，第 1124—1125 页）。

作为马克斯·韦伯的学生和朋友，格奥尔格·卢卡奇极为信赖并经常探讨韦伯的著作。在描述官僚制现象时，卢卡奇也信赖韦伯，但是他认为，“现代官僚制问题”应放在“物化化”的语境下讨论。（*GuK*，第 110 页）他把官僚机构视为类似于工厂的工人组织，单个官僚及其典型的行为方式（如“小心谨慎”、“实事求是”）类似于工厂工人，只不过工厂工人专业化和片面化、形式化、合理化行为方式的习得需要比官僚更高强度的培训。（参见 *GuK*，第 110—111 页）后来（1940 年），他把“官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根本发展形式”（W4，第 420 页及以下）。就此而言，他追随韦伯阐述的官僚制特征，并试图阐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官僚 426

制精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同上书，第 426 页）

法西斯主义群众运动采取了一套反官僚的话语。但它们只有使自身官僚化并同现有的（国家的、民事的、军事的和私人的）官僚相妥协，才能维持权力。分析法西斯主义政权体系内各式各样“旧”官僚和“新”官僚的作用，是弗兰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 1942）的研究成果之一。由于（在里齐 [Rizzi] 和沙赫特曼 [Shachtman] 等人的著作里一般省略了或只是稍微提及的）法西斯主义，官僚制概念才有它今天的可怕模样：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是凭借官僚的冷静和效率来策划和实施的。书桌前的大屠杀罪犯作为官僚的一种类型登上了历史舞台。

20 世纪 50 年代初，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作了最初的一些尝试。他们将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官僚统治新现象放置在它的历史语境中并同其他历史形式的（如中国帝制时期的、欧洲近代早期各绝对主义国家的）官僚统治进行了比较。（参见 Kofler 1952；Frölich 1976）结合特定生产方式的结构从而分析国家官僚统治的第一次系统性的尝试，是由魏特夫（1957）进行的。虽然有批评者证明，“治水经济”和“东方专制主义”并非总是处处都携手并行，但早在 1877 年就由恩格斯提出的基本思想——“职位”和社会职能的“独立化”及其承担者在阶级和统治关系的形成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参见 MEW 20，第 165—166 页）——并没有丧失有效性。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性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没有“自由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资源的有效配置在理论上也是可能达到的。1937 年，随着争论的暂时结束，奥斯卡尔·朗格（Oskar Lang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现实的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非不能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第 109 页）。然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官僚化的危险也是早已存在的。（同上书，第 110 页）

到了后斯大林时期，人们才又一次尝试着重新开始解决怎样才能建立一种没有全能国家官僚的、包括各种形式的生产者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问题。（例如，参见 Brus 1971，1975）关于苏联官僚机构性质的旧争论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仍在继续，最后一次重新发起这场争论的是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选择》（*Alternative* 1978）。关于国家的争论集中于研究资产阶级国家问题，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普兰查斯在尝试重述 1968 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时也研究了官僚制问题（参见 1975，第

329 页及以下），在此，他向韦伯致敬（第 323 页）。他区分了国家工作人员意义上的官僚制和组织形式或国家职能方式意义上的官僚主义。（第 330—331 页）在普兰查斯看来，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被视为一个“阶级”或“阶级派别”；官僚是具有自己“阶级归属”的“特殊社会范畴”（参见第 331 页及以下），并“没有自己的政治权力”（第 334 页）。它究竟是什么，仍旧是悬而未决的，这尤其是因为普兰查斯常常把这个问题往后推，并试图用官僚主义来解释官僚制的特性。但他又想把官僚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意识和国家结构的后果。（参见第 342 页及以下）

理想状态与尚待解决的问题。超政治化的、在很大程度上被打断的马克思主义官僚制研究传统无疑有一个优势：它的追随者总是在宏大社会冲突和（统治）结构的语境下处理官僚统治问题。但它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其核心观点的含义始终是不清晰的。除了一些概要和片断之外，还一直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从现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语境下关于官僚制发展史的系统论述。（参见 Fetscher 1967，第 165 页）关于**正式组织**的合理理论还没有出现，更谈不上对于**官僚**组织自身动力学的分析。（参见 Wright 1978，第 213 页）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奥托·鲍威尔、布哈林、列宁、考茨基）偶尔呼吁新型的**组织学**以及受过相应教育的专家。事实证明，对于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理论的发展不利的是，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之一波格丹诺夫（Bogdanow）是列宁的反对者。他关于“普通组织学”（Allgemeinen Organisationslehre）的纲要虽然得以于 1921 年以俄语出版（1926 年以德语出版），但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一些人注意到（例如，参见 Fetscher 1967，第 167—168 页），马克思主义者 428
用了很多精力去研究极为发达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中的官僚权力，认为它们有着强势的、“工作的”议会和成熟的监督机关。尽管有的地方还谈不上官僚统治，但从议会本身开始，官僚机构在政治权力中心里就非常重要。

总有人提出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的批评，但证明这些批评具有同义反复的特性是一件容易的事。普遍流行的错误结论，如专家＝官僚、计划＝中央政府的计划＝官僚统治、理性化组织＝官僚组织等等，是没有说服力的。（参见 Mandel 1992，第 37 页、第 181 页及以下）但是不能由此证明，一种可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可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不需要官僚”而正常运转。即使是极度充分的自治，也必须被组织化和制度化，它也有“公共职能”或者“职务”，而这些只适宜由那些在

这方面有专业资质的人来承担或担任。我们怎样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即本来从民主的角度来说，所有公共职务应当交由所有（国家的公民）担任，但至少对于这些职能中的一些而言，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总是存在有资质者（即“专家”）的垄断？如何看待官员的“选拔”和“不再任”，既然由此产生的是不同于众所周知的竞取高薪职位和赞助机会的政党和派别争斗之事？怎样使对专家的监督——这种监督只有在它是由其他同样有资质的专家进行的时候才会是最有效果的——“民主化”，也就是说，把最终决定权交给非专家人士的大多数？对此，改良派共产主义者（例如，Hegedüs 1981，第 86 页及以下；Horvat 1982，第 301 页及以下多处）建议汲取苏联的经验作为最为重要的前车之鉴。

参考文献：

M. Adler,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Ein Beitrag zur Unterscheidung von soziologischer und juristischer Methode*, Wien 1922; R. Ahlberg, *Die sozialistische Bürokratie. Die marxistische Kritik am etablierten Sozialismus*, Stuttgart 1976; R. Baluro, *Die Alternative*, Frankfurt/M 1978; Ch. Bettelheim, *Die Klassenkampfe in der UdSSR*, Bd. 1, 1917-1923, Berlin/W 1975; N. Bobbio, »Gibt es eine marxistische Staatslehre?«, in: *Sozialisten, Kommunisten und der Staat*, Hamburg-Berlin/W 1977, 15-36; A. Bogdanow, *Allgemeine Organisationslehre. Tektologie*, Berlin 1926; W. Brus, *Funktionsprobleme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 Frankfurt/M 1971; ders., *Sozialisierung und politisches System*, Frankfurt/M 1975;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Hamburg 1922; ders., *Karl Kautsky und Sowjetrußland*, Wien 1925; ders. u. E. A. Preobrashensky, *ABC des Kommunismus*, Hamburg 1921; H.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I: State and Bureaucracy*, 2 Bde., New York-London 1977; I. Fetscher, »Marxismus und Bürokratie«, in: ders.,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 München 1967, 163-181; P. Frölich, »Beiträge zur Analyse des Stalinismus. Zwei unveröffentlichte Beiträge aus dem Nachlaß«, in: *Jahrbuch Arbeiterbewegung*, Bd. 4, 1976, 141-158; A. Hegedüs, *Sozialismus und Bürokratie*, Reinbek 1981; R. Hilferding, »Staatskapitalismus oder totalitäre Staatswirtschaft« (1940), in: C. Stephan (Hg.), *Zwischen den Stuhlen oder über die Unvereinbarkeit von Theorie und Praxis*, Berlin/W-Bonn 1982, 290-296; B. Horva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Oxford 1982; H. Jacoby, *Die Bürokratisierung der Welt. Ein Beitrag zur Problemgeschichte*, Neuwied-Berlin/W 1969; E. Kamenka u. M. Krygier (Hg.), *Bureaucracy. Career of a Concept*, London 1979; K. Kautsky,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1910), Stuttgart 1923; ders.,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Ber-

lin 1919; ders.,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Wien 1921; ders.,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Stuttgart-Berlin 1922;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d. 2, *Der Staa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Berlin 1927; ders., »Gedanken über die Einheitsfront« (1935), in: P. Lübbe (Hg.), *Kautsky gegen Lenin*, Berlin/W-Bonn 1981, 181-200; L. Kofler, *Das Wesen und die Rolle der stalinistischen Bürokratie*, Köln 1952; O. Lange u. F. 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1937), London-Toronto 1964; G. Lukács, »Volkstribun oder Bürokrat?« (1940), in: W 4, 413-455; E. Mandel, *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London 1992; R. Michels,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906), in: ders., *Masse, Führer, Intellektuelle*, Frankfurt/M-New York 1987, 99-131; ders.,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oligarchischen Tendenzen des Gruppenlebens* (1911), Stuttgart 1970; F. Neumann, *Behemoth. 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4* (1942/1944), Frankfurt/M 1977;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1968), Frankfurt/M 1975; der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B. Rizzi, L'URSS, *Le collectivisme bureaucratique, la propriété de classe, la bureaucratisation du monde* (1939), Paris 1976; W. Schluchter, *Aspekte bürokratischer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85; M. Shachtman,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1962; L. Trotzki, *Verratene Revolution. Was ist die Sowjetunion und wohin treibt sie?* (1936), Frankfurt/M 1968; M. Weber,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Tübingen 1958; K. A. Wittfogel,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 (1957), Köln-Berlin/W 1962; E. O. Wright,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ders.,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8, 181-225.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 撰
张志超 译，唐婧、李牧今 校
俞可平 审

参见：
Arbeiterbewegung, Beamte,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onapartismus,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Eigentum, Elite, Faulheit, Funktionäre, Gewaltenteilung, Herrschaft, Hierarchie, Kader, Klassengleichgewicht, Klassenherrschaft, Korruption, Legalismus, Legitimität, Pariser Kommune, Parteien, Planwirtschaft, Rationalisierung, Servilität, Spezialisten, Staat, Staatsklasse, Verwaltung

C

431 暗箱（照相机）（Camera obscura）

A: kāmīra ubskūra. – E: camera obscura.

F: camera obscura.

R: kamera obskura (камера обскура).

S: cámara obscura.

这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隐喻。暗箱原本是摄影技术早期的一种器材（参见 Gernsheim 1955），是一种反向的简易幻灯机（Laterna magica），可以呈现“外部世界”虽然是反向但却是真实的图像。暗箱其实与人眼的原理相同。新康德主义者朗格（F. A. Lange）指出，米勒（J. Müller）在其《面部器官生理学》（*Physiologie des Gesichtssinnes*, 1826）和《生理学手册》（*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2. Bd., 1840）中将认识论问题与下列现象挂钩：“根据光学原理，图像与其对象在视网膜中呈现一种颠倒的关系。”（转引自 Lange 1875，第 413 页）其后，“有生命的暗箱”（1868 年 2 月 16 日，尼采致格斯多夫［Gersdorff］的信）以及“具有生命和意识的感光板”（Überweg，转引自 Lange，第 415 页）的概念便在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与新康德主义的唯心主义之间频频出现，成了一种思考意识运行的标准范式。从这一角度出发，关于外界事物现实的想象似乎成为“一种奇异的巨大想象”（Lange，第 415 页）。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部分中一个关键地方运用了暗箱这一形象，用以描述意识形态家们及其特殊活动与社会结构和统治制度的关联：“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Camera Obsura）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MEW 3，第 26 页）这一隐喻将两种矛盾的因素联系起来，即实际的图像和颠倒。暗箱提供的是现实的图像，但正反和上下是颠倒的。

这一图像的核心要素是，形象在暗箱 432
中是“头足倒置的”。这个隐喻本身也累

积了异常丰富的含义。康德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开天辟地将其事业头足倒置。黑格尔也曾说，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GeschiPhil*, Kap.13）。马克思创造了一个相反的说法，即“将头脑立于双脚之上”或者说“颠倒回来”，这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更具有“象征”的意义。（Labica）这一说法的使用从此非常频繁（参见如 v. Oertzen 1983，第 186 页），马克思不仅想修正错误颠倒的观念，更是要提出一种革命性变革，使那些在阶级社会中被“头脑”所统治的生产者得到解放，成为社会的自我管理者。在马克思这里，暗箱不是像新康德主义者使用的一个表示意识的图像，而是指作为一种统治制度再生产形式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对生产者社会关系的物化与人眼的成像方式进行了比较：“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K I*，MEW 23，第 86 页）但马克思又立刻推翻了这一例子：“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同上）而这里关注的却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同上）。马克思用暗箱效果来说明这种关系就像“一切意识形态”：统治秩序为身陷自身之中的人生产出“意识统治”（ideokratisch）映射，也就是说，生产出既真实又虚幻的“观念的统治”。这里出现了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第 649 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先从劳动分工、宗法制性别关系、阶级区分和国家等多个维度来重构统治秩序，然后使用了暗箱这一隐喻。这里，在社会的上层，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家们”出现了，他们带着自己特殊的思维模式，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现存的分工”（MEW 3，第 50 页）出发，他们的幻想顺理成章。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家们的幻想是幻象，但他们正是把这种幻象性理解为“**现实生活的语言**”（第 26 页），即其特定的生活的语言。暗箱这种装置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把实际的生活条件向想象之物的转化。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

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第 405 页）。暗箱的图像在这里作为一种象征发挥作用，应该被用于对这些表现形式进行症候解读时。

2. 暗箱比喻的多义性和光学机械学的来源总是带来认识论上的障碍，误用马克思的这一形象思维。伊格尔顿（Eagleton 1991，第 76 页）认为，“这一隐喻的唯经验主义（empirizistisch）的历史，保存在马克思对这一隐喻的使用背后：人的精神如同一架照相机，记录外在世界中被动的对象”。其他的隐喻，比如意识形态的“迷雾”，也同样为了整体性的颠覆思维（Umkehrdenken，或译为“头足倒置”。——译者），追求一种“完全的不同”，因此牺牲了其经验性。其实在马克思的思路中，关注国家再生产的阶级统治结构中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中的“脑力工作”（Kopfarbeit），把这种脑力工作的地位和功能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引导性问题来思考，经验性是存在的。

恩格斯其实已经把暗箱的意义转回到了意识理论领域，尽管他是在批评虚假的意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历史现实的“一幅歪曲的（因为和它的现实的基础脱离）、头足倒置的映象，正如在凹面镜上的映象一样”（*AD*，MEW 20，第 89—90 页）。在这里，重点是颠倒的想象，而不是统治秩序的分析。这种理解在晚年的恩格斯那里更加凸显。他把未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理论讨论的基础，他在 1890 年 10 月 27 日致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的信即是一例。马克思的思想本想突破意识论，但却被推回到意识和无意识的问题之中。“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MEW 37，第 488 页）恩格斯这里所讨论的是对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感知与生产过程的关系。“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同上）恩格斯把这种颠倒的效果与“单独的劳动过程”（第 489 页）相对应。相应地，他论述了国家的起源（第 490 页），还有法律：“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

434

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第491—492页）在卢森堡的著作中，马克思关于头足倒置隐喻的理论意义也完全变得含糊不清，“如果理论是外界现象在人的大脑中的映射，那么根据伯恩施坦（最新的）理论我们必须补充说明，这些有时是头足倒置的映射”（*SoR*，GW 1/1，第373页）。

由此也就无需惊讶，为什么后来人们把暗箱理解成了错误意识的一个图像。这一解释忽视了其中对统治制度进行批评这一核心所在。“头足倒置式的错误意识，即从上往下的思维，无论是由于神化还是理想化，存在于所有的意识形态之中，意识形态对意识起到组织的作用，但对于理论和实践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效果。”（PIT 1979，第202页）但在同一本书关于马克思的章节中，暗箱的理论价值被忽视了，文中说道：“在应该提供其产生的证据的地方，使用了机械论的隐喻，而这些隐喻并未能展示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或道德的产生过程。”（第8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MEW 3，第13页）。科夫曼（S. Kofman）等人指出，马克思的暗箱图像“是以一个根本的真理为基础的，而这一真理由于后来被置入一个黑暗的空间（暗房）而被掩盖了”（第32页）。马克思的暗箱概念意在揭示“实际生活”的结构，应该解读那些“影像”，因为这些影像是表达这种生活的“语言”。这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完全相反，不是对一种真理的权威性传达。

参考文献：

T.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91; H. Gernsheim, *The History of the Photography – From the Earliest Use of the Camera Obscura in the 11th Century up to 1914*, London 1955; S. Kofman, *Camera obscura de l'idéologie*, Paris 1973; G. Labica, »Umkehrung/Umstülpung«, in: *KWM* 8; F. A.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Bd. 2 (1875), Leipzig [8]1908; P. v. Oertzen, »Historisch-politische Möglichkeit bei Marx und Max Weber«, in: O. K. Flechtheim (Hg.), *Marx heute. Pro und contra*, Hamburg 1983, 171-186;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W 1979, [3]1986; dass.,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70, Berlin/W 1984.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陈洪捷 译，曹旸 校

参见：

Abbild,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Bedeutung, Bewußtheit, Bewußtsein, Bild,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sform, falsches Bewußtsein, Fetischcharakter, Herrschaft, Ideologen, Ideologie, Ideologie-Theorie, Illusion, Imaginäres, Innenwelt/Außenwelt, Kopf/Hand, Metapher, Neukantianismus, oben/unten, objektive Gedankenform, Religionskritik, Schein, Selbstverwaltung, Sprache, symptomale Lektüre, Unbewußtes, Verdinglichung, Verkehrung

（性格）面具（Charaktermaske）

A: qanāʿ. – E: character (mask). – F: masque.

R: maska charaktera (маска характера).

S: máscara teatral.

“（性格）面具”作为“人格化”的互补性概念，是马克思用于把握个体行动者之结构性决定的诸多概念之一。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只是这样处理了这个结构性的决定论，即“当它……承担了特定的阶级关系与利益”时。对于后者而言，“让个人担责”毫无意义。（*KI*, MEW 23，第 16 页）当个体某种程度上表现为面具时，他们就成了“文本与角色的囚徒，而又不可能称为文本与角色的作者。因为这一场戏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出没有作者的戏”（Althusser/Balibar, *DKL*，第 260—261 页）。

“（性格）面具”（Charaktermaske）是由“*Charakter*”（希腊语中意为“印记、印章、刻印”，最后也可解释为印刻的文字）和“*Maske*”（由意大利语的 *maschera* 经由法语传入德语，或许可追溯到阿拉伯语的 *mashara*，即“嘲讽、丑角”之意；*Duden Etymologie*，1963）两个词组成的。希腊剧院中所使用的面具，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persona*。而人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词源，即 *per-sonare*（“穿透—作响”），是靠不住的。“词语和事情本身或许是通过阿特拉剧（Atellana）传入罗马”（Kl Pauly，4，第 657 页），而阿特拉剧则是一种产生于古罗马阿特拉（Atella）城的传统平民滑稽剧，带有脸谱化的形象（1，第 675 页及以下。参见尼采论《阿特拉剧中的面具》[Die Charaktermasken der Atellane]，III. 3；KSA 7，9. 35）。可以说，这些面具以及古希腊形式的面具：“它们全都是一种类型，完满地展现人类本性的特定一面：它们始终如一，和起初一样，不会由于其经历而变化，而只会因此而开始展露其特征。”（Bethe 1924）通过宗教剧与职业剧团（Commedia dell’arte），这一结构得到传承。面具在这里（区别于幻想的面具）意味着一个舞台形象的整体外观，

通过典型特征从外部标记出佩戴者的阶层、职业和性格。（Wilpert，第 130 页）在西塞罗那里，*persona* 被升华成“面具的含义，即某人借此出现在他人面前”（IfS 1956，第 42 页）。

而性格（Charakter）和面具（Maske）合二为一却是德国的特殊现象。《资本论》的翻译展示了这一点。当马克思谈论到“面具……，人们在其中互相对立”（MEW 23，第 91 页）时，他不得不认可法语译者约瑟夫·罗伊（J. Roy）将之表述为“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戴的面具”（MEGA II. 7，第 58 页）。由让-皮埃尔·列菲弗尔（J.-P. Lefebvre）和其他译者于 1983 年所完成的法语新译本（Éditions sociales）则将之译为“人们戴着以互相面对的面具”（第 89 页）。穆尔（Moore）和艾威林（Aveling）在恩格斯的监督下完成的英译本则将此句译为“所有饰演的部分”（MEGA II. 9，第 67 页），本·福克斯（B. Fowkes）则将其译为“不同的角色”（New Left Books，1976，第 170 页）。曼纽尔·萨科瑞斯坦（M. Sacristàn）（OME 40，Grijalbo，Barcelona etc. 1976）译为“性格特征的面具”（第 207 页），而佩德罗·斯卡罗（P. Scaron）（Siglo XXI，México etc. 1975）则译为“人们在饰演各自角色时所戴的面具”。德里奥·坎蒂莫里（D. Cantimori）的意大利语版本（Editori riuniti，Rom 1964）则完全突出了原文与剧院的关系：“人们在这剧场中所佩戴的面具。”（第 109 页）

阐释依赖于翻译。当穆尔和艾威林将德语原文中“资本主义者的经济面具”（MEW 23，第 591 页）翻译为了“资本主义者的经济伪装”时，面具比喻的意义就被确定为“伪装假面”；列菲弗尔在名词索引中也相应地加入了“面具（伪装）”的概念。——概念上的此种状况必然带来误解和沟通的问题。

1. 虽说（性格）面具一词的组合是德语所特有的，但《德意志语言词典》（*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词条目：1976 年的《杜登大词典》完全忽略了这个词（无论是 1967 年还是 1933 年出版的《布洛克豪斯大百科》中也同样找不到）。——迈尔（Meyer）于 1844 年出版的《会话辞典》（*Conversations-Lexikon*）将（性格）面具解释为“一种剧院戏服，展示出某一个阶层借以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服装”（第 7 卷，第 1115 页）。1907 年的版本删除了区分功能，并为此增加了与“幻想面具”的比照。（Bd. 6，第 882 页）在 1965 年版的《赫尔德大辞典》（*Großen Herder-Lexikon*）中，面具被彻底地肤浅化，成为“模仿某些阶级或人物的戏服”。——《格林词典》（Bd. 2，1860，第 612 页）只在一个地方提到了“（性格）面具”—

437

词的出处，即让·保尔（Jean Paul）的《美学》（*Ästhetik*）。但在让·保尔那里，这个词写作“**性格—面具**”，而他则以此来描写“面孔或外表，这隐藏的自我的性格——面具”。（II，第 58 页）而反过来，真正的性格又作为“意志之光的折射和颜色”：性格因此“不只由唯一的特点，也不由多种特点，而是由其程度与相互间的混合关系而决定的；但那隐秘而充满生机的灵魂之点却要经历这一切，尽管万物均是围绕着这一点诞生，而它也按照万物吸引或排斥”（第 57—58 页）。这一过程意味着“不可把握的创世之选，从数不尽的世界中选出了这一个世界”，因为“在每个人中都存在着人类的所有形式、所有性格”，这就让我们尽管有自己的特殊性，却能够理解他人。（第 58—59 页）面具在这里就是遮盖性格的面具。

而宗教仪式的面具则完全不同：它的意义恰恰不是遮盖本质，而是让本质之物显现于当下，“来‘代表’通过面具所展现的存在，亦即将之带入仪式行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当下”（RGG，3. A.，第 792 页）。面具的用途被归于那种能改变其佩戴者的力量。“这种‘变形’或‘代表的文化’在宗教的全球史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它们似可称为仪式戏剧的原处形式。”（第 793 页）面具就这样通过仪式进入了古希腊的剧场。

在戏剧语言中，面具的概念比可摘卸面具的使用时间更为久远，并转义成了“化妆面具”，正如“化妆师”（Maskenbildner）一词所指的那样。——这种持存的原因存在于社会事件的功能之中，这些社会功能要早于宗教—神话的组织布置。它们也说明，自古希腊剧院之建立以来，“戏剧性”始终作为基础性的比喻——从爱比克泰德（Epiktet）那种斯多葛式的自我关爱，到《神曲》（*Divina Commedia*）与《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再到马克思，最后到晚期市民阶级的角色理论——能够保存的原因。

2. 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是第一个“从人的心理角度阐释希腊语中的‘性格’（χαρακτήρ）一词”的哲学家。（Steinmetz 1970，第 96 页）他的《人物素描》（χαρακτῆρες ἠθικοί）（作于公元前 319 年）带着讽刺，描摹了从一切社会条件中抽象出来（家庭、阶级、政治力量等等）的 30 个人类“弱点”的典型。这部作品在创作中受到了喜剧的影响，却在之后被称为喜剧题材的来源。——尽管《人物素描》的影响在古罗马得到了延续，但其第一个拉丁语译本却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出现。在 17、18 世纪，“性格”成了重要的主题。“在英格兰，描写性格的作家在 17 世纪开始自成一派。”（Steinmetz，第 102

页）在法国，拉布吕耶尔（La Bruyère）于1688年发表了《泰奥弗拉斯托斯的品格论，译自希腊语，附本世纪的道德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des Théophraste, traduits du grec, avec Les Caractères ou les Mœurs de ce siècle*），获得空前成功，乃至有不少人想通过模仿它而从中分一杯羹。“启蒙时期的道德教化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被性格心理学所统治……。根据泰奥弗拉斯托斯和拉布吕耶尔的范例来描绘性格或道德个性，是当时颇受追捧的习惯”——这种热潮甚至延续到了音乐中，产生了不少“个性小品”曲。（Maurer/Stroh，II，第37—38页）由“性格”所构成的合成词在当时迎来了大繁荣：性格角色、性格演员、性格舞蹈——“而歌德与席勒（Schiller）作品中的‘性格面具’就属于这个类别。”（Mehelin 1969，第339页；参见 Goethe，Hamburger Ausgabe，V，第300—301页，以及XI，第510页；Schiller，Säkularausgabe，9，第143页）

在莱辛（G. E. Lessing）的《汉堡剧评》（*Hamburgische Dramaturgie*）中，“性格”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允许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同归于一个整体性的话语体系。在对狄德罗（Diderot）和胡尔德（Hurd）的批判而不失尊敬的论证中，莱辛要从法国古典主义的圣化中重新赢回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并使之有益于建立市民社会的写实主义“民族剧院”这一伟大工程。而为解决普遍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莱辛认为不应“追求一种性格的人格化理念，而应追求有个性的人”（第95则剧评）；他称赞莎士比亚（Shakespeare），因为莎翁笔下的角色“无论个性多么鲜明，在其角色的绝大部分场景中，言行举止都与旁人完全一致，而只是当周遭环境自然地引发了一两句感叹时，才偶尔显露出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本质特征”，而这一点只是由于“莎士比亚忠实地临摹自然”（第93则剧评）才得以实现。莱辛在尼德兰画派中发现了“经验主义的极端”，即“从现实生活的过多情境中……拼凑出”具有个性的人物（第94则剧评）。

黑格尔虽充满敬意地将莱辛与狄德罗、歌德和席勒相提并论（*Ästh*，Bassenge，第1050页），但仍批评莱辛容忍寓言作家通过动物来展现一种抽象的性格——例如借列那狐来表现阴谋诡计等——尽管“动物的形象始终是一个面具，就其**可理解性**而言是阐明意义，但同样也**遮蔽**了意义”（第385页）。此外，黑格尔继续努力将莱辛分散的契机整合为一种完满的个性，虽然在哲学建构上仍有不同，但却借此表达出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心态变化。尼采之后会写下，时至今日，人们会将泰奥弗拉斯托斯和拉布吕耶尔笔下那种“只严格表现出一

种性格”之人视为病态，或是认定其对某个挥之不去的念头着了迷。（KSA 2，第 657 页）

狄德罗已经注意到了对性格抽象的扬弃。他对多尔瓦（Dorval）说：“在人类的天性中，最多只有一打特点鲜明的真正喜剧性格”，随后又回应道，人们“不应再把性格，而是应将阶层搬上舞台。之前的喜剧都以性格为主要成就，而阶层只不过是其中的偶然之物”，但现在应将其颠倒过来。如果性格的塑造有所夸张，那么不能让观众感觉说的是他们自己。“但人们不可否认的是，演员所表现得阶层就是观众的结成；观众
440 绝对不会认不出自己的责任。”（I，第 221—222 页）其中的例子包括：“学者、哲学家、商人、法官、代理人、官员、市民、大领主、总督”；他们多数来自较高的、被马克思称为“意识形态阶层”的社会层级，并且全部是男性。狄德罗让他笔下的多尔瓦补充了亲属关系：父亲、丈夫、姐妹、兄弟。随后，接着说：“您必须考虑到，每天都会产生新的阶层……而没有什么会比它们更让我们感兴趣。每个人在市民社会中都有其特定的阶层，每个人都与来自各个阶层的人们打交道。”从中总是可以获得新的细节、新的故事、新的情境等等。“同时，在阶层中不正像在不同的性格中一样，也存在着反差和对立吗？”但这还不够精确：没有反差就没有性格，或者说性格**就是**反差。正如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中写下的那样：“只有对立才造就特性。”（参见 Janz 1978，第 102 页）

人们可以在康德那里观察到，法国大革命在两性关系（个体 / 自主）以及家庭功能变迁（“工作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分野”）领域所带来的挑战，是如何在“性格”概念的帮助下得到处理，重获稳定的：康德的著作首先“将‘性别的性格’发展成了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加以运用”（Hausen 1976，第 372—373 页），因为家庭 / 世界的两极对立（第 377 页）被视作和谐的互补，并从单方面的统治形式中被剥离出来。在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对“妇女”的阐释仿佛是在处理一个阶层社会中的位置概念——在同一语境中，登场的不仅有学者、佣人和牧师，在儿童之外还有“妇女”，此外还有作为“她的天然监护人”的丈夫。在这里，性格一词有时作为描述性概念（“性别性格”），有时又作为规范性概念被使用，而第二种意义却将女性（和诗人、大众与犹太人一样）排斥在外（“做一个有原则的男人”就等同于“有确定的性格”）。

因此，“男人”和“女人”就并非（性格）面具，但从父权的两性关系中却产生了男性和女性的（性格）面具，它们

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还有待仔细探查。恩格斯将这些（性格）面具历史化。“随着个体的婚姻，出现了先前不为人所知的两种等级社会的性格形象：女性的贵族情夫和戴绿帽的丈夫。”（*Ursprung*，MEW 21，第70页）

441 3.“（性格）面具”这一表达可能最早出现在马克思为准备博士论文时撰写的论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在那里，他提到了那些历史性时刻，“哲学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不再尝试去理解，而是像一个实践者一样，仿佛在谋划什么针对世界的阴谋”（MEW 40，第214页）。当他继续书写的时候，马克思在脑海中想到的是狂欢节的假面游行：“这就是哲学的狂欢，不管它是像犬儒主义者一样穿上狗的装束，还是说像亚历山大城的居民穿上祭司的服装，又或者是像伊壁鸠鲁派那样穿上飘散着香气的春天的服饰。对哲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带上（性格）面具。”（同上）

这种性格描写源于哲学“与世界”一同所进入的实践关系，而这恰恰是马克思把（性格）面具的概念——或许是出自戏剧美学——引申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时，所要保留的那个契机。这一引申与《资本论》各个章节的“戏剧化样式”相得益彰。（Naumann 1979，第27页）“我们的戏剧人格的面相”（MEW 23，第191页），来自对其在特定关系中的行为形式之分析，同时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学手法，包括对话（例如第8章）的形式，得到展开。但在马克思那里，戏剧世界的图像并不首先服务于对现象的描写，而是用于表达一种深层分析。这种深层分析可以在揭示市民社会交往形式的同时，一并展现宗教与美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根系。这需要将（性格）面具理解为基于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的个性形式的表达，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之物”的人格化呈现。其前提是两个互补的行动：物化的自然主义必须被打破，而社会形式规定性的不具名化必须被扬弃。“但在经济学家那里总被称为物（thing）之性质（property）的，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资本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只要它表达的是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产品之家的特定关系。”（MEW 26.3，第266页）与社会的物化相符合，亚当·斯密所谈到的“工作过程中”具体对象及个体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性格）面具”之中，尽管斯密在此之前并未分析过其形式和功能。（MEW 24，第388页）

马克思将（性格）面具的辩证法用于他的分析，但属于这一辩证法的，首先是它们只有在与对立面的反差中才能 442
获得的自己的“性格”。“个性”源自那

种特殊的、决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对立。前市民社会中的经典基本形式就是主奴关系，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中描绘了这种关系在晚期封建社会的形式，而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主奴关系的辩证法表现为通向自我意识的过渡。这就是一种两极化性格描述的雏形，当对立面，即互补的反面不复存在时，这种性格描述也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性格）面具在马克思那里就相应地意味着一种形式，个体在这种形式中通过在特殊的统治关系中的排列，在相互间确定立场并被刻画为相互对立的性格。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决定性，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作为两个互补的（性格）面具之间的关联出现的，例如“农奴和地主、封臣和领主、平信徒和神父”（MEW 23，第 91 页）。当然，这些社会关系在一个方面彻底地区别于市民社会的（性格）面具：“个人的依赖性不仅描绘了物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也同样描绘了在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生活空间。……因此，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性格）面具，人们总是佩戴着它们，针锋相对地登场，而个人在工作中的社会关系也总是表现为其私人的关系”，但在市民的或曰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则恰恰相反，人际关系“伪装成从属于物的，即劳动成果的社会关系”（第 91—92 页）——在这里，产品仅仅披上商品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换的双方还没有得到相互对立的性格描写。然而，一旦商品的价值获取了金钱的形式，这种性格描绘就会立马实现。商品的流通形式以“买”、“卖”两个阶段构成。“在任意一个阶段，都是同样两种物的因素相对立，即货物和金钱——同时也有两个个体佩戴着同样的经济（性格）面具，即买方和卖方。”（第 163 页）

马克思不仅反对历史性形式决定论的自然主义化，同时也反对过于普遍化的异化理论，即反对将这种异化的规定与假定的纯粹个性对立起来。拉尔夫·孔内斯曼（Ralf Konersmann）发现，“浪漫精神叛逆的角色批评”在这里经历了一种极端的转变：然而，他认为这种批评在马克思那里“已被‘科学的’洞察所取代，（性格）面具——无论它们此刻想要表现的是什么——在其经验的存在之外，始终在历史与进步的委托而行动”（1994，第 157 页），却未免操之过急了。马克思对（性格）面具的观察要更加精确，也背负着更少的历史哲学重担，他将面具视为个性实现的历史条件：“无论将‘买方’和‘卖方’这一对市民经济的角色视为人类个性的永恒社会形式有……多么古怪，将其视为个

种特殊的、决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对立。前市民社会中的经典基本形式就是主奴关系，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Jacques le fataliste*）中描绘了这种关系在晚期封建社会的形式，而黑格尔则在《精神现象学》中将主奴关系的辩证法表现为通向自我意识的过渡。这就是一种两极化性格描述的雏形，当对立面，即互补的反面不复存在时，这种性格描述也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性格）面具在马克思那里就相应地意味着一种形式，个体在这种形式中通过在特殊的统治关系中的排列，在相互间确定立场并被刻画为相互对立的性格。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决定性，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作为两个互补的（性格）面具之间的关联出现的，例如“农奴和地主、封臣和领主、平信徒和神父”（MEW 23，第 91 页）。当然，这些社会关系在一个方面彻底地区别于市民社会的（性格）面具：“个人的依赖性不仅描绘了物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也同样描绘了在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的生活空间。……因此，无论人们如何评价（性格）面具，人们总是佩戴着它们，针锋相对地登场，而个人在工作中的社会关系也总是表现为其私人的关系”，但在市民的或曰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则恰恰相反，人际关系“伪装成从属于物的，即劳动成果的社会关系”（第 91—92 页）——在这里，产品仅仅披上商品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交换的双方还没有得到相互对立的性格描写。然而，一旦商品的价值获取了金钱的形式，这种性格描绘就会立马实现。商品的流通形式以“买”、“卖”两个阶段构成。“在任意一个阶段，都是同样两种物的因素相对立，即货物和金钱——同时也有两个个体佩戴着同样的经济（性格）面具，即买方和卖方。”（第 163 页）

马克思不仅反对历史性形式决定论的自然主义化，同时也反对过于普遍化的异化理论，即反对将这种异化的规定与假定的纯粹个性对立起来。拉尔夫·孔内斯曼（Ralf Konersmann）发现，“浪漫精神叛逆的角色批评”在这里经历了一种极端的转变：然而，他认为这种批评在马克思那里“已被‘科学的’洞察所取代，（性格）面具——无论它们此刻想要表现的是什么——在其经验的存在之外，始终在历史与进步的委托而行动”（1994，第 157 页），却未免操之过急了。马克思对（性格）面具的观察要更加精确，也背负着更少的历史哲学重担，他将面具视为个性实现的历史条件：“无论将‘买方’和‘卖方’这一对市民经济的角色视为人类个性的永恒社会形式有……多么古怪，将其视为个

性的扬弃而为之落泪也是同样颠倒。它们只是个性在社会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之基础上所采用的必要表现形式。”（*Zur Kritik*，MEW 13，第 76 页）

因此，将（性格）面具在这种强意义之下解读为对真正个体的遮蔽，是没有意义的，即便这种遮蔽可能从属于（性格）面具的组成部分。例如，准备进行交易的货物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承认自愿的关系（参见 MEW 23，第 100—101 页），那么在策略上重要的就是对决定他者（自由）意志的理由发挥作用，使用桑巴特所说的、以“外部自由”为前提的“内在的强制工具”。在买卖中，双方“对手”的行动，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是不对称的：“两个（性格）面具首先表达的，都是对他们各自立场的否定（反面）。卖方大谈商品的用途，买方则对商品可能的损坏指指点点，还抱怨要是付了卖方所要求的高价，他自己就该破产了。”（Haug 1980，第 99 页）“我知道，”布莱希特让他笔下的伽利略如是说道，“他们要卖驴时，就指驴为马，要买马时，就指马为驴。”（GW 3，第 1256 页）需求（根据使用价值）常常“让人疑心重重，寡言少语；而以金钱为导向则恰恰相反，可以放飞针对需求的演讲，使之成为一曲真正的诗歌”（Haug 1980，第 99 页）。

但是，即便一个特定的（性格）面具只有通过遮蔽才能自我实现，这也恰恰是它的一部分，正如所有参与者心知肚明的一样；但这种遮蔽并不一定属于（性格）面具本身，正如封建领主的（性格）面具——它们装点着种种象征暴力的纹饰面对农奴——或者工厂主的面具所展现的那样。——但马克思在谈论（性格）面具时，偶尔也将其用作代表欺骗的比喻，正像在让·保尔那里预先成形的那样。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描绘了波拿巴是如何躲在巴罗（Barrot）内阁身后，“貌似缩成了一团，将统治权力交到了秩序党手中，戴上了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时期报纸的责任发行人常戴的谦卑的（性格）面具，即冒名顶替者（homme de paille）的面具。现在他把假面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个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 444
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MEW 8，第 149 页）。

当买家只是作为“未来金钱的代表”出场，立刻买下但之后另行付款时，“卖方”就成了“债主，而买方则成了负债人”。（MEW 23，第 149 页）这种对立的（性格）面具就是“新的印章”，给所有参与者盖上了流通之形式变化的烙印。“首先就是一边在消逝，一边却又被同一批流通参与者交替着扮演的角色，例如买家和卖家的角色。”（同上）但

这一矛盾却能激起可怕的暴行（参见注释 97），同时“可以形成更大的结晶”：在此语境中，马克思概述了主要以此种形式展开的古代时期的阶级斗争。

人们常常将（性格）面具的概念与“人格化”的概念相混淆，尤其是马克思曾绝对地阐明，“个人的经济面具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作为经济关系的承载者互相对立”（第 100 页）。人们只需明确，个体正是在各种特殊的经济范畴（例如资本、商品或劳动力）之持续的人格化过程中，不断地更换自身的（性格）面具。资本主义者和工资劳动者分别是资本和供出售之劳动力的人格化，但首先是作为金钱或商品的拥有者，以买方和卖方的（性格）面具对立地出现。“他们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个体缔结协议。”（第 190 页）然而，他们的“外貌”随后就发生了变化：“先前的金钱所有者大踏步向前成了资本家，而劳动力所有者则紧跟着他，成了他的工人：他们一个意味深长地暗笑，充满经营的干劲，另一个则畏畏缩缩，很是抵触，就好像一个人拿着自己的皮肤去市场上叫卖，等待的不会是别人，只有——制革厂。”（第 191 页）如果说资本家的“外貌”在这一过渡中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之后还将多次变化，那么这恰恰是因为他分毫不变地代表着他的资本的人格，资本利用的过程让他依次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也就给他安上了不同的（性格）面具。“资本家的经济（性格）面具之所以牢牢依附在一个人身上，只是因为他的金钱持续地作为资本发生功用。”（第 591 页）但这些常量却决定了“性格形式”（*Res*，MEGA II. 4. 1，第 51 页）的陡然变化。倘若企业主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像是人权的真正化身，那么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在生产中“就形式而言是专横的”，即便他就内容而言至少部分地发挥了那些不依附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功能。（MEW 23，第 350—351 页）

马克思在这里完成了第二个比喻，即将（性格）面具的概念从个人转移到功能（最终转移到生产工具）之上——例如协调和引导的功能。“所有直接的社会性……工作或多或少地要求一种领导，这种领导……实现了普遍的功能。”（第 350 页）但对于工资劳动者而言，“他们工作的相互联系……在理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上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一个陌生意志的力量与他们对立，让他们的工作屈从于他的目的”（第 351 页）。“号令”及“资本家在生产的战场上的命令”就成为资本下的领导功能的“特殊性格标识”。（第 350 页）而管理者就在这里登场。他们有着双重功能，一方面执行在所有情况下都必不

可少的普遍功能，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施行剥削和竞争功能。正如指挥家不必非成为乐团所有乐器的所有者一样，管理者也不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高级领导层的工作与资本的所有权完全分离，只在大街上游荡”（MEW 25，第400页）。

正因为（性格）面具表现的是个体或群体之间受统治关系所决定的关系形式，这一概念就可以转而引申到鲜活而瞬时的工作与过去的（已死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上去。后者“是工人过去的、未获酬劳的工作，却以异化于工人的形式……，以资本的形式”在资本关系中发挥作用。（MEW 23，第635页）在生产资料的具象形式中，资本对于统治的要求就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更重要的是，这种统治要求还成为神秘的价值源泉以及对盈利的合法要求。“时至今日，相互对立的社会（性格）面具彻底地粘连在生产资料上，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践代理人以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巧舌如簧的说客，则完全无法将生产资料从这些面具中剥离出来思考，正如奴隶主无法将工人从奴隶的角色中剥离开来思考一样。”（同上）——同样地，他们也无法将领导权与自己的资本主义（性格）面具相区分。主张在领导的必要性中就蕴含着企业主的必要性，实际上就意味着人们“无法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怀抱中所发展出来的、与其对立的性格相区分并从中解放出来的形式”（MEW 25，第400页）。当资本所有者一方面与银行资本，另一方面则与职业经理人相对立时，“只剩下了干部，而资本家则成了多余的形象，从生产过程中消失”（第401页）。

自然，资本家还远未从历史中消失，而是再一次更换了他的（性格）面具。马克思用“干部”这个名字来指称并非资本所有者的经理人，但“干部”一词却将在工人组织和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中开创新的时代，它将与从属同志一起构成新的一组特殊的（性格）面具。福尔克·布劳恩在其借狄德罗的主奴小说（即《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译者）所创作的小说《辛策与孔策》（*Hinez-Kunse-Romen*）中，将这对面具永恒定格。施特里马特特则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中相关的（性格）面具：**官僚作为革新者或正直的共产主义者**之对立面，而后者又与**机会主义者**相对立，诸如此类。

4. 马克思主义的“（性格）面具”之概念虽从未流行过，但其内容却十分流行。概念本身只被零星几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接受并探讨过。马克思从美学和心理学中获得了这个概念，又通过社会理论予以改造，而这一概念又带着

其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重新回到艺术史、文学研究、商品美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角色理论中去。但在其中，它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转义与阐释斗争。

“‘经济（性格）面具’这一非常重要的范畴”首先于1923年出现在卢卡奇的论述中。（*GuK*，第62页，注释1：W 2，第224页）卢卡奇未作过多的分析，就将之与他自己关于“归类的阶级意识”的思考联起来，把它理解成“生活情况”的“基本形式”，“其本质特征由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之类型所决定”。（第62页/第223页）与马克思相比，卢卡奇在此将（性格）面具的意义作了两次迁移，即一方面将这一概念的运用限定在资本家身上，而另一方面则仿佛将一个关系的、分析的范畴变成了一个经验的、本质性的范畴。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曾“将资本主义者描绘为……纯粹的（性格）面具”，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者“不行动，而是行动的对象，他的‘行为’只不过是正确的观察和对计算社会的自然法则所产生的客观影响”。（第147页/第312—313页）但马克思却从未将经验的资本家等同于其（性格）面具。马克思是在面具的变换中展现资本家的，因此单纯地将资本家与面具画等号是行不通的。实际上，马克思将（性格）面具描绘成一种受制于情况的特征，但具体的个体却并不会在其中穷尽自身。

447

拉尔夫·达伦多夫——正如在他之前的罗伯特·K. 梅尔顿（R. K. Merton）所提到的“对每个角色所指定的、结构性定义的期待”（1949，第110页）一样——也曾顺手将（性格）面具带入社会学的领域：他发现马克思将作为个人的个体与作为“经济范畴”之人格化的个体“相区分”，但他却将由此得出的（性格）面具与“社会角色”，即一种被强制规范的行为领域，混为一谈。（1962，第22页，注释18）然而，他为这种社会角色赋予了深度，将其描述为社会之物，就好像“一片阴影，逃离它的始作俑者，只是为了作为其主人重新归来”（第34页）。尤塔·马茨内尔（Jutta Matzner）则意见相反地批评道，（性格）面具在马克思那里构建了“在社会存在与意识形式中的整个个体——而不仅仅是其存在的一个领域”（第136页）。马茨内尔认为，（性格）面具已证明自己“可能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关键范畴”（第130页），并与卢卡奇一样，将“阶级中的个体和（性格）面具作为异化的范式”（第131页），与“个人的个体”（第136页）相对立。但她坚持认为，马克思不仅这样理解资本家，而且也这样理解处于各自特殊的异化存在中的无产者。“面具的比喻所指向的超越了既有社会形式，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社会中未被异化的人类，而共产主义社会的

实现则已在无产阶级的意识中被提前认识到了。”（第 134 页）在卢卡奇那里则恰好相反，“‘面具’所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意识现象：（性格）面具在这里意味着市民阶级在面对无产阶级那种指向全体性的阶级意识时，所必然具有的‘错误意识’”（第 134—135 页）。而为反对达伦多夫，马茨内尔指出：“‘个人的个体’并非类似某种未遭异化的残余隐藏在面具之下。它超越了现存的社会；（性格）面具只有在对阶级社会的否定中才能‘摘下’。”（1964，第 136 页）

因此，（性格）面具就必须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中的分析性基本范畴。但紧随着这场辩论的，却只有一幅遭到多处扭曲和约简的图像进入了社会学的词典：（性格）面具“是马克思对阶级社会中异化了的人之称呼。因为个体的个性在阶级社会中受到各种不同的阶级关系之制约与决定，人们互相之间完全‘作为商品的代表，因此即作为商品的所有者’而存在。因此人们仅仅作为社会关系的承载者相互出现，而（性格）面具则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人格化”（Rülcker/Rammstedt 1973，第 114 页）。——同样不正确的还有菲切尔（Fetscher）的表述，他认为（性格）面具与人格化“完全符合”：“作为卖方、买方或资本家，这就是人类的（性格）面具，而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个性，则完全无关紧要。让人感兴趣的并非个性，而是比如它所贩卖的商品。”（1976，第 281 页）——但若顺着马克思的思路，则可以将（性格）面具的历史生产力解读为“个性的必要展现”（MEW 13，第 76 页；见上文），尤其是这种个性在市民阶层的上升过程中，在新的边界内激烈地释放着主体性。例如，在 16 世纪初的乌伦施皮格尔（Ulenspegel，又名捣蛋鬼提尔 [Eulenspiegel]，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小丑式人物。——译者）故事集中，主人公“一个接一个地戴上了所有从属于简单的商品流通的（性格）面具”：“他比任何人都清晰地发现了由交易法则所产生的新社会关系之严酷和冷漠。因此，他就更激烈地把握施展主体性和形式上之自主权的机会。”（Haug 1976，第 18 页）当捣蛋鬼提尔“成为下人或仆人……，重点就时常放在了工作协议以及对协议解释的争论上了，也就是说，卖方的面具在这里也依旧潜在：即作为自身劳动力的卖家”（第 11 页），但故事在这里也展现了在新式的，即不以暴力形式为主，而是通过“客观的”交易关系所决定的那种针锋相对的条件下，对个体的历史性征服。

在法国的马克思主义中，由于语言学的限制，代替（性格）面具位置的主要是诸如“经济性格”或“社会性格”这样的词汇。吕西安·塞夫认为，结构

主义对马克思的阐释想要摆脱除了精神分析与人类生物学之外的“人”和心理学（1972，第71页），他们批评这种阐释将个人类似地缩减为他的经济性格面具，亦即个体在马克思那里仿佛“只是作为**经济关系的承载者**发挥作用”（119；参见Althusser等，*LLC*，I，第163—170页；II，第62—63、242—251页）。为了避免这种缩减，塞夫提出了他的理论，即将社会的个性形式作为心理学的社会理论框架：“个性在既定社会形式内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那种“给个体打上客**观决定的社会性格之烙印的必然的**活动矩阵”。（第267页）这种矩阵包含（性格）面具，也比后者的维度要更具体。

而在奥托迈尔（Ottomeyer）那里，（性格）面具表示“个人的个体与偶然的（阶级）个体在后者对前者的统治下之分离”（1976，第73页）。为证明这个观点，他引用了马克思关于逃跑了的农奴的一句话，即“这些农奴将他们迄今为止的农奴身份作为一种对于其个性而言纯属偶然之物”（MEW 3，第76页）来对待。奥托迈尔在其中看到了那种“对个体的感性—具体的性质与需求……之普遍陌生”的例子，这种陌生在资本主义中为了与“物的暴力”相适应，被升格、去人格化，不再按照规范准则运行，因此也就无法通过一种研究符合规范准则的行为的互动理论加以把握。奥托迈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了主体的双重概念：（性格）面具与自我的身份。（第76页）（性格）面具的基础是作为表象主体或类主体的资本（通过颠倒反转）。因此，（性格）面具表现的就是“僵化的反转形式”，个体在其中仅仅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互相对立。（第82页）奥托迈尔发现，这些形式根据关系的不同（买方、卖方、企业主等）会发生极端的变换，但个体却不会“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停止成为其（性格）面具的承载者”（同上）。在政治心理学领域，奥托迈尔最关心的，就是同一个（性格）面具会对个体提出相互矛盾的要求：“这一自相矛盾的行为结构中的若干方面，应在政治的习得过程中加以强调，并用于摧毁（性格）面具，尽管这些方面曾是（性格）面具的契机。”（第87页）在这里，奥托迈尔（第90页）将他的分析与《商品美学批判》（*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Haug 1971）联系在了一起。后者关于卖方自相矛盾的冲动论述道：“属于他的……（性格）面具的包括——作为对其交换价值之实现的深深忧虑上的亢奋的表面——在售卖的对话中所展现出的、对其商品使用价值的激动。”（第77页）奥托迈尔揭示了如何由此出发，为社会学上所观察到的“角色行为”奠定理论基础：只要买卖双方的交互是由其（性格）面具所决定的，怀疑和相互预判便会为

其打上烙印；这就在交流中导致了那种“无螺旋”，即将自己带入对方角色而假定对方也会将自身带入自己的角色，这就是一种“无限回归”（regressus ad infinitum），正如 R. D. 拉因（R. D. Laing）在他对于破裂婚姻的分析中所观察到的那样。（第 93 页）

通过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1981），（性格）面具的概念进入了伦理学的讨论。由于英语中的“角色”（*character*）一词易与德语的“性格”（Charakter）概念相混淆（德语译本将“社会角色”[social character] 错误地译为“社会性格”[Sozialcharakter] 而非“社会的［性格］面具”[gesellschaftliche Charaktermaske]），就需要关注理论的建构与翻译情况，才能发现“这位年长的马克思专家麦金泰尔在多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性格）面具之概念为依据”（Reese-Schäfer 1994，第 60—61 页）。麦金泰尔解释道，他取用（性格）面具（或英语中的“character”）这个专有名词是由于它“让戏剧与道德联想相互联结”（1981，第 26 页）的方式。他提请注意古老的戏剧传统，“拥有一组定型的角色，能让观众一眼认出”（同上）。在社会的每一个文化时代，他都发现具有这样一组核心的（性格）面具，其普遍可辨识性允许个体摆正自身位置，并采取合适的行为模板。同一个体可在不同的（性格）面具之间变换。与马克思相比，他改变了所强调的重点，将核心的（性格）面具（在当下是富有的美学家、经理人和治疗医生，参见第 29 页）作为道德理念的化身来把握，但这些面具却是“从外部被带到”其佩戴者面前的（第 28 页）。麦金泰尔分析了下述社会的“官僚式个人主义”，这种社会通过二元裂变（英语为“bifurcation”）为一个与组织相适应的领域和一个个体的领域来实现自我复制，并指派个体在其自身之中拧合两个领域。麦金泰尔在与（性格）面具对立的极点发现了作为从属于（性格）面具的另一个极端，即没有社会位置或历史标志的抽象自我（而正是这种缺失成为其位置与标识）。他指责批判理论以其对官僚的批判方式“毫无意识地作为合唱队，在当代的戏院中共同演出”（第 29 页）。

在批判理论的践行者那里，（性格）面具就像是在逐渐消散的对马克思的回声，是“从系统功能角度”观察下的个体。（Lohmann 1991，第 311 页）（性格）面具在这里被磨平的尖锐性，在 15 年前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n*）中虽然未被认清，却至少遭到了误解，对其怀疑程度之深，从以下表述中可见一斑：谁要是提到（性格）面具，

就看不见面具之后的人——并且马上就会将其谋害（K. Reumann，*FAZ*，1977年9月8日）。这是对10年前“学生运动”所带来的“恐惧”的回响：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动荡的历史时刻，（性格）面具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大众集会中，即当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在柏林否认“舍内贝格市政厅里那些（性格）面具”的合法性时。——因此，马克思的（性格）面具概念的影响史并不可能就此终结。自然地，人们无论何时将概念分析置于其比喻性的源头之后，忘记了“修辞的暂时性”，就有引发“理论崩溃”的危险。（Konersmann 1994，第157页）

451 **参考文献：**

E. Bethe, »Die griechische Dichtung«, in: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Potsdam 1924, Kap. 4, 272-275; R.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Köln-Opladen [4]1964; D. Diderot, *Ästhetische Schriften*, hgg. v. F. Bassenge, 2 Bde., Berlin/Weimar 1967; I. Fetscher (Hg.), *Grundbegriffe des Marxismus*, Hamburg 1976 ([2]1979); F. Haug, *Kritik der Rollentheorie*, Hamburg [5]1994;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10]1990); ders., »Die Einübung bürgerlicher Verkehrsformen bei Eulenspiegel«, in: *Vom Faustus bis Karl Valentin – Der Bürger i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AS 3, Berlin/W-Karlsruhe 1976, 4-27; ders., *»Werbung« und »Konsum« –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Warenästhetik*, Berlin/W 1980; K. Hausen, »Die Polarisierung der ‘Geschlechtscharaktere’ – Eine Spiegelung der Dissoziation von Erwerbs- und Familienleben«, in: W. Conze (Hg.), *Sozialgeschichte der Familie in der Neuzeit Europas*, Stuttgart 1976, 363-393;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fS), *Soziologische Exkurse*, Frankfurt/M 1956; C. P. Janz, *Friedrich Nietzsche. Biographie*, Bd. 1, München 1978; R. Konersmann, *Der Schleier des Timanthes. Perspektiven der historischen Semantik*, Frankfurt/M 1994; G. Lohmann, *Indifferenz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91; A. MacIntyre, *After Virtue*, London 1981 (dt.: *Der Verlust der Tugend. Zur moralischen Kris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M 1987); J. Matzner, »Der Begriff der Charaktermaske bei Karl Marx«, in: *Soziale Welt*, 15. Jg., 1964, 130-139; F. Maurer u. F. Stroh (Hg.), *Deutsche Wortgeschichte*, Berlin [2]1959/1960; U. H. Mehelin, *Die Fachsprache des Theaters*, Düsseldorf 1969; R.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Glencoe 1949 ([3]1957); M. Naumann, »Literatur im ‘Kapital’«, in: *WB*, H. 4, 1979, 5-40; K. Ottomeyer, *Soziales Verhalten und Ökonomie im Kapitalismus. Vorüberlegungen zur systematischen Vermittlung von Interaktionstheorie und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Gießen [2]1976; J. Paul, *Vorschule der Aesthetik*, Teil II, Saemmtliche Werke, Bd. 42, Berlin 1827; W.

Reese-Schäfer, *Was ist Kommunitarismus*, Frankfurt/M 1994; C. Rülcker u. O. Rammstedt, »Charaktermaske«, in: *Lexikon zur Soziologie*, hgg. v. W. Fuchs u. a., Opladen 1973;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Frankfurt/M 1973 (Paris 1972); P. Steinmetz, Nachwort zu Theophrast, *Charaktere*, Stuttgart 1970; G. Wilpert, *Sachwörterbuch der Literatur*, Stuttgart, ⁷1989.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毛明超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rakte Tätigkeit, Antagonismus, Entfremdung, falsches Bewußtsein, Fetisch, Fetischcharakter, Gleichgültigkeit, Individualitätsformen, Kritische Theorie, Metapher, Personifikation, Rolle, Studentenbewegung, Verdinglichung, Warenästhetik

452 卡里斯玛、卡里斯玛的领导 (Charisma, charismatische Führung)

A: kārīzma, qiyāda mulhama.

E: charisma, charismatic leadership.

F: charisme, direction charismatique.

R: karizma, rukovodstvos karizmoj (харизма,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 харизмой).

S: carisma, dirección carismatica.

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一概念的演变和它在日常语言、宗教和社会学中的含义多样性相关。它的“恩典之赐”（Gnadengeschenk）这一层含义来自神学，并由马克斯·韦伯引入到支配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Herrschafts- und Religionssoziologie）当中。此外，它还有一个更一般的含义，即和不同方面的人格吸引力有关。卡里斯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一个空白：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历史推动力和卡里斯玛式领导者（拉萨尔、倍倍尔 [Bebel]、列宁、卢森堡、毛泽东、卡斯特罗）的作用之间的矛盾未被考虑。

1.1 词源学追溯到宗教背后的含义：基本的古希腊词语是**查丽斯**（χάρις）——在圣经翻译中被译作**恩赐**（*Gnade*），意味着“所有令人感到愉快的东西”（Benseler），一个生命体的友善力量或者光芒四射，一个美人的“魅力”或者“有意识进行的赠礼与回礼的交换”。（Dörrie 1981，第 322 页）在这些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就是由成比例的服务回报联系起来的”（τῷ ἀντιποιεῖν γὰρ ἀνάλογον συμμένει ἡ πόλις）（*EN*, V 8 1132b 34f）。“出于这一原因，城邦也在道路中间建立了一个恩赐圣地，以便相互赠予

(ἀνταπόσις)。”(同上书，1133 a2ff) 查丽斯的三重形象本身应当表达的意思是，“善物彼此传递，在循环中回到赠予者手中”(Deichgräber 1971，第 56 页)。因此，查丽斯最初也意味着相互关系中的水平联系。

在国家性质的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查丽斯的含义延伸为主人对雇农劳动的“恩惠”。这是转变为宗教意义上神恩的出发点。从这一背景出发，保罗(Paulus)发展出了他的“恩宠”(χαρίσματα)概念。具体而言是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如何对待“分配恩宠……，服务……和力的作用中
453 的差别”(1. *Kor* 12，6)？也就是关于工作分配与能力分配的规则。“恩宠”在这里意味着能够担任领导岗位的各种特殊“天赋”。其标准和保罗的支配地位本身一样是有争议的，不确定的；统治关系的制度化直到世纪之交时才得以贯彻。(参见 Meeks 1983，第 135 页)

1.2 马克斯·韦伯从新教教会法家 R. 索姆(R. Sohm)那里接过了这个概念。(参见 Weber 1922，第 482 页；*WuG*，第 655 页)索姆根据早期基督教中的卡里斯玛试图证明，每一条教会法规都是“天主教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非基督教的”，因为它有“平等主义的”和“民主的”特性。在这一斗争中，卡里斯玛代表了一种许可，即在一个“上帝所希望的上级和下级”的框架中“权威”地宣布统治。(Sohm 1923，第 26—27、29 页)其所要求的是顺从，但这种顺从却是基于爱的对卡里斯玛的自愿承认。(第 27 页)

韦伯对卡里斯玛概念的接受潜在地在社会学中引进了新教文化的神学：在同“传统型”和“法理型”统治划清界限时，卡里斯玛标志着“一个人超乎寻常的……品质，……他因此被当作……‘领袖’”(*WuG*，第 140 页)。卡里斯玛型的统治在于“对于统治者的情感奉献及其恩赐(卡里斯玛)……而非因其所处的地位或者传统的显赫身份”(1922，第 481—482 页，参见第 485 页)。因此，这个分析预先假定垂直领导是一个不可被推演出的出发点。对韦伯而言，过去最重要的卡里斯玛型领袖一方面是巫师和先知，另一方面是军阀、匪帮头目和雇佣兵队长。特别地对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来说，则是城邦的自由“煽动者”和西方宪政国家议会内的政党领袖。(*WuG*，第 823 页；GA I. 17，第 161—162 页)在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中，个人权威、“非理性”取向和“革命性”动力等不同含义融汇成为一个统一体。不是在“从外部”改变生存环境的意义上，而是在“从内部”重构行为导向的意义上，卡里斯玛是“革命性的”。(*WuG*，第 142 页)基于海尔帕赫(Hellpach)的理论，韦伯认为，“所有的民族学经验”表明，决定性的新秩序总是由个人的卡里斯玛带来

的。通过领袖“指示”和被领导者“体会”的相互作用，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从中能够出现与‘赞同’相应的内容”（第189页）。因为在“前理性化时代”，几乎所有的行为导向都被区分成传统的和卡里斯玛的，卡里斯玛代表了彼时唯一的“革命性力量”。（第142页；参见GA I. 19，第122页）因此，卡里斯玛获得了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地位。

在韦伯的历史辩证法中，卡里斯玛标志着宗教统治或政治统治的“典型开端现象”（*WuG*，第147页）。在成功的保护和扩张情况下，它可以转变成传统型统治类型或者理性官僚的统治类型。这种“卡里斯玛日常化”的主要动机是想要长期保持自身地位的管理部门的需求，其形式是“将统治权**占为己有**，对追随者或者弟子进行笼络”。（第143、145页）在卡里斯玛似乎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取代之后，现在这种确定性再次通过经济得以实现：日常化是对经济条件的适应，“作为一种持续生效的日常权力。在此经济是领导者，而不是被领导者”（第148页）。在卡里斯玛运动中，妇女通常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但是，在社会生活的日常化中却出现了一种针对她们的倒退，“现在她们的精神现象被认为是无序的和病态的”（第298页）。日常化伴随着卡里斯玛的一种内在转变：传统化将其与遗产制度结合（“绅士卡里斯玛”），而西方的官僚理性化则将卡里斯玛从具体的人身上推到制度中，并将其“实体化”，因此成为“职务卡里斯玛”。（第144页）卡里斯玛与人的分离，及其与职务的关联是将教会建成“机构”的条件。从这时起，“没有任职的、具有个人卡里斯玛的奇迹创造者被怀疑为‘异教徒’或‘巫师’”（第693页）。

“恺撒主义”或者说“波拿巴主义”是“领袖型民主”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全民表决的方式获得承认。（*WuG*，第155页及以下，第665—666页）早在1895年的**弗莱堡就职演说**中，韦伯就批评了俾斯麦的“恺撒主义”，因为这种威权主义会留下一个没受过政治教育、没有领导能力的市民阶层，他们会渴望一个新的领袖的出现。（GA I. 4，第569页，参见I. 15，第449—450页）卡里斯玛的范畴在这里起批判性作用，它在官僚主义—批判的语境中采取了反民主的取向，“促使德国民众从内心里情愿为一个领袖欢呼，就这一点而言，也包括为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欢呼”（Mommsen 1974，第437页）。在对1919年魏玛宪法的建议中，韦伯要求，不是要加强国会，而是要加强“依据直接选举获得革命合法性的帝国总统”，作为对联邦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衡。（GA I. 16，第127页）其依据是不

可能实现的想法，即能够通过某个领导人的卡里斯玛遏制在经济、国家和政党体系中日益危险的官僚化进展。“但现存的只有选举：拥有‘机器’的领袖型民主或者没有领袖领导的民主，这就是说：没有职业的‘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内在的卡里斯玛品质，而正是这种品质使他们成为领袖。”（*Politik als Beruf*，GA I. 17，第 224 页）按照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观点，卡里斯玛的概念可能是韦伯所有概念中最成问题的一个，因为它“给每一种成功的，所谓的个人统治一种宗教的仪式感”（1972，第 80 页）。

1.3 最初是 R. 米歇尔斯（R. Michels）从韦伯那里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工人运动上。他用“卡里斯玛党”来描述这样一种政党类型：它依赖于一个个人的权威和对这个人的信仰。他认为卡里斯玛型政党相对于利益型政党和纲领型政党的优势在于激情的力量，而它的劣势则在于这种动力的短暂与脆弱。（1982，第 517 页）卡里斯玛型领袖最显著的表现是，早期的工人组织是用他们领袖的名字来命名的，比如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法国的布鲁斯主义者（Broussisten）、阿勒曼主义者（Allemanisten）、布朗基主义者（Blanquisten）、盖德主义者（Guèsduisten）和饶勒斯主义者（Jaurèsisten）。（第 514 页；参见 1925，第 61 页）米歇尔斯在拉萨尔那里发现了一份纲领：他于 1864 年呼吁他的追随者将他们的意志“锻造成一把锤子，将这个锤子交到一个人的手中”（转引自 1925，第 168 页，参见第 58—59 页）。倍倍尔和饶勒斯（Jaurès）——米歇尔斯将他们视作相互对立的卡里斯玛类型——一定是考虑到，大众需要一个集权的形象，而领导集体的竞争使得个人的独裁成为不可能。（1928，第 515 页）在卡里斯玛的日常化机制中，米歇尔斯看到了“寡头政治的铁律”（第 351、369 页）。只有很少一部分成员才关注触及整个组织生命线的党的内部问题，而大众只在有一个伟大演说家出现的时候才会到来。（第 48—49 页）由于政党组织的复杂性，成长起来的是这样的阶层，对于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既作为‘商品’成为一种信仰，或者也出于某种信仰成为商品”（第 115 页）。这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突出的货币化倾向，也包括低收入工作的货币化倾向，它将这个政党转变成无产阶级的保险公司，它消耗了最初的激情，通过“物质的黏合剂”维持团结。（第 119 页）在官僚化的过程中，领袖从传教士类型转变为“受益者”（第 114 页），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转变是隐而不显的：“领袖将自己的转变……仅仅看作是对环境转变的反映。因为对于他来说，时过境迁了，需要一种新的手段

和新的理论。”（第 206 页）

米歇尔斯想要证明领袖模式是“每一种社会生活的必然现象”（第 369 页）。卡里斯玛型统治不是从功能—历史上被重构，而是通过大众的“领导需要”、“崇拜需要”和“礼拜需要”而被自然化了，是以领袖的“自然权力欲”为基础的。（第 46 页及以下，第 57 页及以下，第 68、200 页）描述性的内容必须为一种领导思想服务，其中记录着从工团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变迁。

2. 恰恰是在德国，“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1868 年 10 月 13 日，马克思致施韦泽 [Schweitzer] 的信，MEW 32，第 570 页，参见第 162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观察和批评工人运动中的卡里斯玛早期模式。

2.1 大多数对卡里斯玛的考察是同竞争型领袖论战的一部分。这首先涉及非常受人欢迎的拉萨尔。他被批评“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和有“夸夸其谈的习气”（MEW 31，第 451、453 页），而且他的举止“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MEW 30，第 340 页），还有他徒劳地想让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为自己写一首赞美诗（第 350—351、369 页）。马克思推测，德国工人已经由于 1848 年之后市民对反动派的容忍而“‘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MEW 31，第 453 页）马克思还在路易·布兰克（Louis Blanc）的追随者那里看到了对于“某个小可爱的上帝”的要求。不仅仅是他们把自己的领袖抬得过高，而且由于领袖也把他们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领袖也在吹捧他们。因此可以推断，卡里斯玛领袖所发挥的作用——超越了领袖的魅力——成为彼此加强的循环：“只要他用手指一示意，他们就祝贺，只要他们一祝贺，他就公开向他们表达动人的谢忱。”（MEW 27，第 19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自己并没有对大众施加什么“诡计”：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竞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1877 年 11 月 10 日，马克思至布洛斯 [Blos] 的信；MEW 34，第 308 页）。因此，马克思“当时就不想当领袖，“‘因为赶驴子的人总是被驴子憎恨的’”（MEW 31，第 504 页），而恩格斯证明自己和其他“不幸的共产党人……对此完全不适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透这全部欺诈勾当，嘲笑这种功名组织，并对成名感到一种几乎是犯罪似的厌恶”（MEW 29，第 636 页）。他以这一态度奚落了歌咏协

会，该协会想请他在1891年71岁生日时进行演讲（MEW 22，第264页；38，第231页）；对于他来说，1893年要在柏林公众面前“炫耀”是难堪的；他更想将“人们为我准备的盛大欢迎”转让给“议会活动家和演说家，这和他们的作用更加适称，和我的活动则未必相称”（MEW 39，第131页）。这样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个盲区：尽管竞争性领导的魅力和权威被批评为某种个人的浮华和宗教狂热，但是这种自我描述本身就会诱发某种纯粹的实际权威的想法。有两种情况依然不明朗，即吸引力和说服力如何相结合，又用哪种领袖技能来证明自己。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卡里斯玛的支配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他们将它同“宗派”的范畴联系起来，将其视作“无产阶级运动的童年”（MEW 18，第34页；参见32，第287页）。由此他们试图理解各种不同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整体的运动”（第33页），“工人阶级的历史的、自然形成的组织”（MEW 16，第390页）的结束。在战略上涉及这一鸿沟：为了自身目标而使下属工人加入的资产阶级和一个宗教性的、无政治能力的团体之间的鸿沟。（参见MEW 32，第620—621页；34，第476页；36，第58页）比如，在拉萨尔主义者的语境中，“宗派组织”意味着主席的“独裁权力”（MEW 16，第391页）；在无政府主义者方面，则意味着分裂成知情人和外行的秘密团体（MEW 18，第142页），以及一种意识形态的泛滥，正如在巴枯宁的无理要求中所表现的那样，即把无神论—唯物论强加于国际工人协会（MEW 33，第656页；参见17，第473页）；而“福音教派”则被认为是广大苦难者的万应灵药（MEW 22，第515页；参见32，第569页）；其他特征包括理论认识被某种激情所支配（MEW 22，第515页）以及信仰对思想的支配（MEW 16，第329页）。1894年到1895年间，恩格斯在宗派中发现了工人运动和早期基督教的一个共同点。他通过早期必然松散的大众思想和“先知最初尚在扮演的角色”之间的相互配合来解释两者的模糊特征。（MEW 22，第460页）那么，组织模式大概是：“单干的人，而支持他们的却是……一些乌合之众。”（MEW 36，第58页）马克思在1880年担忧地写道，迄今在法国，“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MEW 34，第476页）。宗派概念抹去了封闭的团体和开放的“先知式”运动之间的区别。 458

卡里斯玛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体现在马克思1854年忙于“独特的”、难以

解释的西班牙革命英雄和摄政王 B. 埃斯帕特罗（B. Espartero，1793—1879）的意义时候："一个民族的想象力愈大……他们用体现革命的人物来对抗体现专制的人物的愿望就愈强烈。"（MEW 10，第 384 页）这种解释能够被转化成意识形态理论上的问题，即为什么革命的卡里斯玛取决于敌人的形象。

2.2 如果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缺乏对领导问题的理论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归责于争论，那么它在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就是系统空缺。考茨基批评道（1927，第 480—481 页），韦伯的卡里斯玛概念把讨论引入一条"神秘的道路"。他认为，此概念的合理内核就在于"获得信任和声望的简单能力"。但这种能力却没有被分析，而只是简单地被表述为"人格"、性格强硬、聪明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第 486 页）这种理解会带来这样的错觉：在民主中，某个人仅仅通过"他人的信任"就能取得领导地位。（第 482 页）——和考茨基类似，卢卡奇也批评卡里斯玛概念，认为它将"我们引到了对知识无能为力的惊叹上，因此也就是某种非理性东西、一种假的概念"（*Zerstörung*，第 79 页）。对于他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即在相应阶级斗争条件下的"领袖和大众之间的交互作用"（第 79—80 页）。在考茨基对"人格和阶级斗争"（第 697 页及以下）之间关系的解释中透露出一种摇摆，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同流派。其出发点是如下对立："是否大众只是被动接受的质料，而突出的人格才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第 692 页）与"纯粹的人格历史书写"（第 706 页）相对，胜利好像是容易取得的。但政治领袖的迫切问题又转回到了"历史学家的立场"和"当下立场"之间的分裂：尽管客观的规律性在"历史"中起作用，但对于"当下的实践活动"来说，领导人格的特质和力量有"更大的意义"。（第 694—695、706、708 页）

对于罗莎·卢森堡来说，个人的追求"就好像仅仅是人类历史外在的花裙子"，实际上创造历史命运的是"籍籍无名的大众自己"。（1916，GW 4，第 207 页）她坚持，中央机关只是执行工具，是政党意志的喉舌，而无产阶级大众才是"自己的领导"。（1911，GW 3，第 38、42 页）这与她曾经热情地将拉萨尔的"革命性的能量"、"热烈的鼓动"、"精力充沛的意志"、"勇敢的前驱者"描述成"创造性的力量"相矛盾。（GW 3，第 182 页，第 208 页及以下，第 220—221、223 页）最后，领袖问题看上去被迫转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根据卢森堡的观点，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革命的"大众，而完全在于他们的领袖的"软弱性"。（GW 4，第 517 页

及以下，第 522、536 页）

由于这件事引起的不适，把卡里斯玛放在领袖需求与个人领导能力的相互作用中作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理论反思被放弃了，这种放弃为通向不受控制的领袖，直至极端的个人崇拜打开了方便之门。

2.3 葛兰西从米歇尔斯那里接过了对卡里斯玛的思考。他将卡里斯玛问题与政党的原始阶段联系起来：政党还不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的基础上，而“只是靠着由感受和情绪支持的零散混乱的意识形态”（*Gef* 2，H. 2，§75，第 286 页）。对大众来说，政治教条是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它需要一个不会犯错的教皇，以便能被解释并且适应环境”（同上）。与米歇尔斯的个人主义解释相反，葛兰西将卡里斯玛重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波拿巴主义分析方法进行解释，将卡里斯玛视作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的一个环节（参见 MEW 8，第 225 页）：“在特定的‘永久无政府’环节中——它为斗争的各方力量的静态平衡所维系——某个人展现‘秩序’，这就是说，用不同寻常的工具与死寂的平衡决裂，建立起小资产阶级‘胆小鬼’、‘恐水的绵羊’一样的联盟：但总是有一个纲领，即使是一个一般的纲领。”（*Gef* 2，H. 2，§75，第 287 页）另一个解释尝试将卡里斯玛解释成过时的随大流行为类型，它与生产的不发达社会阶段相关：卡里斯玛由上至下地产生某种直接呼唤“英雄”的集体意志，“但这种集体意志将自己归因为外在事实，并持续地一边建构一边消解自己”（*Gef* 4，H. 7，§12，第 870 页）。而现代的潮流则相反地体现在福特式的大公司里，“建立在在生产世界中所取得的集体地位的基础上”。由此，个别领袖可以消失得更快更多，而“黏合起来的水泥不会崩塌，大厦也得以保存”（同上）。

在葛兰西的政党理论中，卡里斯玛是一个否定性的概念，针对这个概念，葛兰西提出了“有机”领袖的概念。（*Gef* 4，H. 6，§97，第 791 页）如果有威胁性的危险导致某个政治—历史的行动具体到某个特定的人身上，那么它几乎总是某种不长久的“复辟”活动。在“有机”领袖方面，葛兰西则相反，提出了“批判性感受和讽刺……能摧毁领导人的‘卡里斯玛’特质”（*Gef* 5，H. 8，§21，第 956 页）。卡里斯玛领袖是坏的蛊惑民心者，他“将自己装扮为不可替代者，在自己身边创造一片沙漠，系统地排挤甚至清除自己的异己者，想要直接与大众建立关系”。相反，一个想要“完成某种建构性东西”的领袖，会创造“可能的‘竞争者’，并且更换大众的精英阶层，将他们提升、塑造为能够替代他进行领导的元素”（*Gef* 4，H. 6，§75，第 790 页）。葛兰西并非出于某种抽象

的平等假设来批评卡里斯玛的领袖概念，而是在他的民主化设想中考虑到了领导能力的差别和实际存在的领导功能。在葛兰西看来，在政党中建立尽可能多的“中层”是意义重大的，这个中层可以提升人民的地位，并且防止“领袖在极端危机时刻偏离方向”（*Gef* 2，H. 2，§75，第 289 页）。取代卡里斯玛型领导将其“转化为观念和词句的力量”的直觉的是，出现了“‘同舟共济’，通过直接的个体性经验，通过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活生生的语言学’的体统，出现了‘主动而清醒的参与’。如此，在大众群体、政党、领导集体之间就建立了紧密的联盟，非常复杂的整体得以作为‘集合的人’共同运动”（*Gef* 6，H. 11，§25，第 1424 页）。

461 葛兰西将米歇尔斯的政党社会学视作有趣的“原材料的堆积”（*Gef* 2，H.2，§75，第 290 页），他拒斥了卡里斯玛型领袖这个概念，认为它是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复制品（*Gef* 6，H. 11，§26，第 1427 页），就像给“古老的、对知识进行描述和外在分类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披上了“从内部把握事实的方法论”的名头一样（*Gef* 2，H.2，§75，第 291 页）。

3.1 葛兰西也陷入了这样的危险中：忽视作为领导理论范畴的卡里斯玛型领导概念的重要性。如果人们退回到与统治问题紧密关联的字面含义，那么就会发现一个不能在历史语境中完全消除的含义。韦伯也将卡里斯玛视作赋予生命发挥作用的“精神”或者“魔法”。（*WuG*，第 246 页）在这个含义上，它非常类似于被索莱尔描述为“神话”的英雄“战斗图”（*images de bataille*），在它的帮助下，社会运动能够“保证它们事业的胜利”，例如基督的光荣重临或者辛迪加的大罢工。（1908，XXVI；1928，第 24 页）如果一个理念成为“物质的力量”（MEW 1，第 385 页），也就是说，越出了知识分子圈子，将自己扩展成大众的“信仰”和“道德意志”（*Gef* 6，H. 10，§§5 及 31，第 1233 页，第 1281 页及以下），那么，光芒四射和精力充沛的个人就在运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神灵般的作用能够合理地用领导能力来解释。保罗在他的目录中除了提到演说天赋和治疗天赋之外，也提到了可以移山的信仰与“能产生强力效果的行动”。此外还有“精神的分离”，在领权理论中，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产生有效极化的能力和立场的凝聚。（1. *Kor* 12 及 13）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将重点放在取得完满事实的决心上：没有什么能够长久地保证把王爷崇拜当作一项“不同寻常的事业”，在其中，“大事件”如此快速地接连发生，以至于没有人去

思考相反的战略，共同的期待被紧紧地绑缚在终点上。（*Von Fürsten*，Kap. 21，GS 2，第 90—91 页）当然，根据他的观点，共和国也应当一人统治，因为这样能更好地发挥不同的领导能力。（*Discorsi*，Ⅲ. Buch，Kap. 9，第 314—315 页）

列宁继承了恩格斯，将起义理解为“技术”（MEW 8，第 95 页）并在十月
462 革命前夕将这种技术具体化为运用“转折点”的能力，在这个转折点上，革命的高潮也就意味着革命对手的最大动荡（LW 26，第 4—5 页）。这可以被视作卡里斯玛型领袖的一个契机，即认识到危机中的“最佳时刻”并将它置入有效干预的动议之中，正如列宁所能作的，反对他的党中央委员会，将工人、农民和士兵的需求压缩到三个口号之中：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一切权利归苏维埃。（参见 LW 26，第 42—51、67、227 页）

3.2 如果人们将卡里斯玛视作普遍现象，塔克（Tucker 1968，第 736 页）在列宁的提示下注意到，无条件服从的特征并不能持久。社会学上对卡里斯玛概念的主要批评是它并不适用于谱系学的解释，必须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来解释。（Wilson 1973，第 499 页；Worsley 1983，第 395 页；参见 Ratnam 1964，Oommen 1967，Wolpe 1968）倾向于韦伯的大部分理论都试图通过吸纳社会的诞生条件克服他的垂直主义出发点。分析重点从人转移到了“卡里斯玛的需求”（Wilson 1973，第 499 页）、“卡里斯玛的环境”（Mühlmann，1961，第 251 页及以下）、“运动”（Tucker 1968，第 738 页及以下；Ebertz 1987，第 29 页及以下）和“互动”（Rustow，1970，第 20 页；Götze 1977，第 14 页）。沃斯利（Worsley）强调，“公告”的特权以及领袖的首要象征意义是“关系系统的连接点”。只有当领袖具有“催化剂人格”，将潜在的团结性转化为活跃的仪式和政治性行动的时候，他才是卡里斯玛型的。（1983，第 393、395 页）适用于卡里斯玛型领袖的历史环境是这样的：其中各种痛苦和绝望交汇在一起（Tucker 1968，第 742、745 页），或者还有社会处于一种潜在的“反常”的状态中（Lipp 1985，第 208 页）。

利普（Lipp）从污名这一对立一极的边界情况推导出卡里斯玛在特定条件下，在被污名化的人物中会发展出对立力量，他们将污名“最终翻转过来，变成积极的含义，赋予其卡里斯玛的特征”（1985，第 76 页）。引发从污名到卡里斯玛的“跳跃性变化”的是某种“自我污名化”（表现狂、煽动、禁欲或者极度兴奋），这种污名化充斥行动领域，以至于越轨行为成了某种新的团结的开端。（同上书，第 82、204 页）通过“卡里斯玛化”的进程，罪行的标签成了奇迹的

标志，罪成了恩赐。（第 204—205 页）在
463 此，卡里斯玛型领袖不是在新词语形成过程之外的单纯操纵者，而是由关联效应和意义效应共同产生的东西：关于符号的积极含义的实践行动会反作用于行动的承受着身上，并塑造他们。（同上书，第 266 页；PIT 1980，第 66—67、72 页）

“卡里斯玛型互动”不仅包含了创造性的元素，而且纳入了与传统文化中的相关神话相关联的能力的作用。这一点缓和了韦伯所认为的它与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之间的绝对对立。（Willner 1968，第 73 页；Götze 1977，第 14、290—291 页）为了分析卡里斯玛维度是如何将自己与非卡里斯玛维度联结甚至融合的，施韦泽提出了“协同型卡里斯玛”概念。（1984，第 312 页及以下）拉库蒂尔（Lacouture 1970）和托特（Toth 1981）的观察也对理解卡里斯玛的日常化进程非常有帮助，他们认为，在成功的运动中，通常第一个“革命性”卡里斯玛会和第二个卡里斯玛形成“内在巩固”，并且/或者被他取代（耶稣—保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格瓦拉[Guevara]—卡斯特罗）。

心理分析理论想要尝试，从被领导者与领导者之间的力比多联系出发去理解卡里斯玛的特征。（参见 Downton 1973，第 222 页及以下；Schiffer 1973，第 173 页及以下）在 1921 年弗洛伊德在《大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Massenpsychologie und und Ich-Analyse*）中按照“热恋”模式分析了这种联系，自恋的力比多流溢到对象上：它取代了“自身的、没有实现的理想自我”。人们热爱它，“因为其完美，人们曾为了自我而追求过它，现在为了满足自恋想要通过间接方式去实现它”（SA IX，第 105 页）。诸多个体成为大众，他们用同一个对象取代理想自我，并能够在其中将彼此同一化。（同上书，第 108 页）这样的话，卡里斯玛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症候，即能够与意义重大的理想自我实现对话，并将各理想自我集中到一个人身上。这里，只要领袖能够代表大众个体的典型特质，并且创造一个具有“更多力量和力比多自由”的形象就足够了。（同上书，第 120 页）赖希（W. Reich）在它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1933/1942）中尝试从家长制家庭中的“情感基础”去揭示力比多的领导联系：它对于自我管理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焦虑，这种焦虑粉碎了任何形式的摆脱压迫、获取自由的社会主义向往，迫使革命运动驶入国家的航道。（同上书，第 71 页及以下，第 226—227 页）

3.3 卡里斯玛所描述现象的异质性 464

要求从不同的维度去对待这个概念。马克思在分析波拿巴主义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卓有成效的，他用这种方法解析了拿

破仑三世在其社会生存条件下表面上的一人统治。一方面他把它放到国家机器相对于社会日益独立的世俗化进程中（*18. B*，MEW 8，第 196—197 页）；另一方面，他用小自耕农的分离去解释它，这种分离迫使阶级利益必须用统治关系来表达："他们的代表人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像一个权威在他们之上闪烁，作为一个不可限制的统治权力，它保护他们免于其他阶级侵害，自下而上给他们阳光雨露。"（第 198—199 页）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中的"个人崇拜"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和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占据支配地位相关（农民涌入斯大林的共产党，例如毛泽东、波尔布特 [Pol Pot]、齐奥塞斯库 [Ceausescu]）？

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解释是，领袖的卡里斯玛已经将自己"证明为无处不在的无线电广播"（1944，第 168 页）。在这个视角下，个人魅力消解在万能的科技里；和卡里斯玛一样，本雅明的"光芒"看上去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是因艺术品可以进行技术复制而被摧毁的。（GS I，第 440 页）问题是卡里斯玛的工业媒体化是如何改变其作用方式的。在图像可以进行电子创作的电子时代，它还有什么意义呢？

参考文献：

K. Deichgräber, *Charis und Chariten, Grazie und Grazien*, Müchen 1971; H. Dörrie, »Gnade«, in: *Reallexikon für Antike und Christentum*, Bd. 11, Stuttgart 1981; J. V. Downton, *Rebel Leadership*, New York-London 1973; M. N. Ebertz, *Das Charisma des Gekreuzigten. Zur Soziologie der Jesusbewegung*, Tübingen 1987; D. Goetze, *Castro – Nkrumah – Sukarno. Eine vergleichend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zur Strukturanalyse charismatischer politischer Führung*, Berlin/W 1977; M. Horkheimer,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1944), Frankfurt/M 1969;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2. Band: *Der Staa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enschheit*, Berlin 1927; J. Lacouture, *The Demigods: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1970; W. Lipp, *Stigma und Charisma. Über Soziales Grenzverhalten*, Berlin/W 1985; G.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Bd. 3: *Irrationalismus und Soziologie*, Darmstadt 1974; N. Machiavelli, *Vom Fürsten*,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in fünf Bänden*, hgg. v. H. Floerke unter Zugrundelegung der Übersetzungen von J. Ziegler und F. N. Baur, Bd. 2, München 1952; ders., *Discorsi. Gedanken über Politik und Staatsführung*, Stuttgart 1966; H. Marcuse, »Industrialisierung und Kapitalismus« (1965), in: D. Käsler (Hg.), *Max Weber. Sein Werk und seine Wirkung*, München 1972; W. A. Meeks, *The*

First Urban Christians.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Apostle Paul, New Haven-London 1983; R. Michels,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oligarchischen Tendenzen des Gruppenlebens*, Stuttgart 1925 (1970); ders. »Les Partis politiques et la contrainte sociale«, in: *Mercure de France*, Bd. 203, 1928; W. J. Mommsen, *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 Tübingen 1959, ²1974; W. E. Mühlmann, *Chiliasmus und Nativismus. Studien zur Psychologie. Soziologie und historischen Kasuistik der Umsturzbewegungen*, Berlin/W 1961; T. K. Oommen, »Charisma,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An International Quaterly*, Bd. 10, 1967; Projekt Iedologie-Theorie (PIT), *Faschismus und Ideologie 1*, AS 60, Berlin/W 1980; K. J. Ratnam, »Charisma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Political Studies*, Bd. 12, 1964; D. A. Rustow (Hg.), *Studies in Leadership*, New York 1970; W. Reich, *Die Massenpsychologie des Faschismus* (1933/1942), Köln-Berlin/W 1971; I. Schiffer, *Charisma. A Psychoanalytic Look at Mass Society*, Toronto 1973; A. Schweitzer, *The Age of Charisma*, Chicago 1984; R. Sohm, *Kirchenrecht*, Bd. 1: *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lagen* (1892), Berlin ²1923;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dt.: *Über die Gewalt*, Innsbruck 1928); M. A. Toth, *The Theory of the Two Charismas*, Washingtong 1981; R. C. Tucker, »The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 in: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97, 2. 1968, 731-756;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1922), hgg. v. J. Winckelmann, Tübingen ⁷1988; A. R. Willner, *Charismatic Political Leadership. A Theory*, Princeton 1968; B. R. Wilson, *Magic and the Millennium: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us Movements of Protest among Tribal and Third-Word Peoples*, London 1973; H. Wolpe, »A Critical Analysis of Some Aspects of Charisma«, in: *Sociological Review*, 16, 1968, 305-318; P. Worsley, *Die Posaune wird erschallen. »Cargo«- Kulte in Melanesien*, Frankfurt/M 1973.

杨·雷曼（Jan Rehmann）撰
阿思汗译，张文红校，俞可平审

参见：

Autorität, Bonapartismus, Faschismus, Führung, Herrschaft, Irrationalismus, Kompetenz/Inkompetenz, Lassalleanismus, Maoismus, Massen, Massenbewegung, Mythos, Parteien, Personenkult, Persönlichkeit, Pol-Potismus, Religion, Sektierertum, Stalinismus, Subalternität, Urchristentum, Voluntarismus

宪章运动（Chartismus）

A: kārtīyā. – E: chartism. – F: chartisme.
R: chartizm (чартизм). – S: cartismo.

宪章运动被称为“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ipie zur Wissenschaft*] 英文版导言，Engels 1892，MEW 22，第306页），“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Lenin，LW 29，第298页）和“在很多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准备，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奏’”（LW 30，第485页），它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逐渐形成的工人阶级之间不断加剧的矛盾。宪章运动基于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Bill*）的选举权改革和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Bill*），其中体现了贵族特权和工商业财产复杂交织的情况。

宪章运动是“旧激进派运动的天然继续；旧激进派运动由于改革法案而平息了几年，从1835—1836年度起又再次出现，而且声势更大，参加的群众空前团结”（Engels 1844，MEW 1，第528页），它主要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Lage*，MEW 2，第445页）。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开始（参见卡特赖特[Cartwright]少校的要求）历经18世纪末英国雅各宾派运动以及工人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在改革法案上的共同斗争之后，伦敦手工业者成立了一个团体，其中包括激进分子、欧文主义者和工会成员。1836年在威廉·洛维特（William Lovett，1800—1877）和亨利·赫瑟林顿（Henry Hetherington，1792—1849）的领导下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London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这个协会发起了一场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这场运动得名于《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a*），宪章要求：“（1）一切有健全意识和没有犯罪行为的成年男子均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为议员支付薪金，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避免资产阶级的贿买和恐吓；（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Lage*，第444—445页）

虽然这“六点”只针对下议院的组成，但正如恩格斯提到的，这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第445页）。恩格斯引用了卫理公会教派牧师斯蒂芬斯（Stephens）的话，指出宪章运动涉及的是一个“饭碗问题”——宪章许诺了“住得好，吃得好，工资高，

工作日短”（转引自第446页）——并且
467 它坚信，通过普选取得的工人政治统治能够改变社会状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法国“以政治的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英国人则认为政治只是为利益、为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直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第441页）。这些斗争一度是“用和平方式”进行的，进而导致“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它“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同上）

根据马克思的判断，虽然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但其成果将“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因为英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其中“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1871年9月25日，纪念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的讲话，MEW 17，第432页）“1848年普选权在法国被理解为全民团结的口号，而在英国却被理解为战争的口号。”（MEW 11，第269页）

该运动第一阶段的高潮是1839年2月4日在伦敦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人民议会”），其在5月7日将拥有125万份签名的请愿书提交到了议会，但在7月12日遭到议会否决。作为回应，工人们展开了示威游行和罢工。但内部分裂的宪章派代表大会解体了。当人们试图在约克郡和南威尔士发起暴动以及试图发动一场总罢工之后，领导这一运动的宪章派人士于1839年底纷纷被捕。

“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Lage*，MEW 2，第446页）为此他们依托曼彻斯特工厂主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1838年创立的自由贸易联合会**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Law league*），这个同盟把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的要求与降低工人工资和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的目标结合起来。结果是“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因为工人们很快明白了他们在其中不会得到任何东西。（同上）

在宪章运动的第二阶段，菲格斯·奥康瑙尔（Feargus O'Connor，1794—1855）1840年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全国宪章协会**（*National Charter Association*，NCA），一个有着付费会员、地方团体、一个执行委员会和周期性代表大会的组织。全国宪章 468
协会1842年再次向议会提交请愿书（有330万人签名），这个请愿书补充了提高工资、工会权利、10小时工作制和劳动保护法等工人的社会要求。在废除谷物法和“公平工资”（“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的要求下，1842年开始出现大量罢工和暴动，但是很少是在全国宪章协会领导下发生的。当这些被镇压后，

该运动开始萎缩：尤其是资产阶级那部分从中分离了出去。“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同上书，第450页）工人和手工业者将事务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其中也包括如奥康瑙尔所推动的工人回到农村居住地这样的乌托邦式计划，这些计划由于人们对土地的渴望而广受欢迎。与社会主义者相比，宪章派“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第453页），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寄希望于将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合并为一个新的政党，从而提高工人运动的质量。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是《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由奥康瑙尔在1837年建立，并于19世纪40年代开始由乔治·朱利恩·哈尼（George Julien Harney，1817—1897）和乔舒亚·霍布森（Joshua Hobson）担任编辑——恩格斯在1845—1848年也是该报的工作人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份报纸的评价为“真正值得大陆上的民主主义者阅读的唯一的英国报纸”（*Grußadresse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Kommunisten zu Brüssel an Herrn Feargus O'Connor*，MEW 4，第25页）。

受益于1847—1848年经济危机和1848—1849年欧洲革命前夕一触即发的政治局势，宪章运动迎来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潮。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将进行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促使民主主义获得胜利，欧洲各国求得解放”，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激烈”。（MEW 4，第417页）1847年议会会议开幕时，由于奥康瑙尔有可能赢得一个议会议席，宪章运动到伦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第三份全国性的人民宪章请愿书和两份宪章派土地共用社请愿书。然而，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计划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肯宁顿（Kinnington）集合，然后游行至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递交请愿书的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宪章运动正当它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Engels，*England 1845 und 1885*，MEW21，第191页）

除了经济复苏之外，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内部的分裂。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NRhZ*）上写道：“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瑙尔和他的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MEW7，第446页）在朱利恩·哈尼、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8—1869）和作为“宪章运动的教师”及《贫

民导报》（*Poor Man's Guardian*）编辑的詹姆斯·布朗特尔·奥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1805—1864）领导下的“革命派则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的要求以与这种地产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使土地仍归国有”（同上）。此外，“道德”力量的支持者和暴力的支持者之间也存在着冲突。

当取得如1842年《采矿法》、1844年《工厂法》或1847年《10小时工作法案》等成就后，该运动在1848年9月，即在500多人被捕之后，被中断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该运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50年代，亲身经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性地指出该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由奥康瑙尔和他的“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所领导的“还留在该派里面的小资产者”的“纯民主主义”派，以及由哈尼和琼斯领导的属于“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的“革命派”。（同上书，第445页）正如恩格斯于1892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的，人民宪章——尽管不断被议会所否决——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以前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本国的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MEW 2，第644页）

作为改变英国社会结构的工人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已经成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中的一部分，尽管经常有人尝试着去将19世纪末确定为英国工人运动的起点。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从各自角度出发都看到了自己和宪章运动传统的联系，但对于宪章运动失败的原因则各有各的判断。萨维尔（Saville）：国家暴力是不是真正中断宪章运动的原因？汤普森：和今天两党制的现状相比，选举权对英国19世纪工人的意义是什么？哈拉兹蒂（Haraszti）：宪章派领导人不同的政治观点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鲁德（Rudé）：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中，英国和宪章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

参考文献：

M. Beer,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England*, Stuttgart 1913; J. Droz (Hg.),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Bd. 2: *Der utopische Sozialismus bis 1848*, Frankfurt/M 1974; E. Haraszti, *Chartism*, Budapest 1978; E. Hobsbawm, *Europäische Revolutionen*, München 1978; C. D. Kernig, *Sozialismus. Ein Handbuch*, Bd. 1: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Kommunistischen Manisfest*, Stuttgart-Berlin/W 1979; J. J. Lecercle, »Chartismus«, in: KWM, 210-212; A. L. Morton, G. Tate, *Die briti-*

sche Arbeiterbewegung, Berlin/W 1960, Teil II, Kap. 3 u. 4; E. Royle, *Historians and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1988*, Halifax 1989; G. Rudé, *The Labouring Class in Early Industrial England*, London 1986; J. Saville, *The British State and the Chartist Movement*, Cambridge-London-New York 1987; G. Schilfert, *Die Chartistenbewegung*, Leipzig-Jena 1956; H. Schlüter, *Die Chartistenbewegung*, Stuttgart 1922;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2 Bde., Frankfurt/M 1987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

伊迪莎·克罗斯（Editha Kross）撰

盛舒洋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rbeiterbewegung, ethischer Sozialismus,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lassenkämpfe, Owenismus

沙文主义（Chauvinismus）

A: shūfīnīya. – E: chauvinism.

F: chauvinisme. – R:šovinizm (шовинизм).

S: chovinismo.

沙文主义（源自法语 *chauvin*）描述的是过度的民族主义。这种过度的民族

主义将本民族的利益与要求置于其他民族的利益与要求之上，为达到此目的而煽动民族自大情绪，鼓吹文化上甚至基因遗传、“种族”上的优越性，并偏好军事暴力政策。沙文主义尤其在战争之前以及战争期间盛行于统治阶层，以达到动员民众和军队奉献乃至牺牲的目的。沙文主义为针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殖民剥削进行辩护。罗莎·卢森堡尤为深刻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文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功能。（参见 *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GW 4，第 51 页及以下）沙文主义的顶峰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策。其政策将邻近民族尤其是各斯拉夫民族和犹太民族看作低端民族，以此“论证”自身的统治、对其他民族的压迫甚至消灭。季米特洛夫（Dimitroff）因此将沙文主义纳入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中。（*Ausgew. Schriften* 2，第 525—526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作品和政治工作中经常就国际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一贯将沙文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拒斥。晚年恩格斯更是描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沙文主义特征”（MEW 37，第 128 页）。他认为，应该在国际范围内领导受剥削的劳动者的抗争，因为面对超越国家边界的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和军事扩张力量，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同时马克思和恩格

斯完全没有误解和忽视建设民族国家以驱除外来剥削的需求。这一需求在欧洲大的民族国家产生期间广泛流行，虽然当时的许多民族国家都试图通过军事和其他的理由将本民族边界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纳入本民族国家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问题的立场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利益和对下述问题的看法，即民族问题的哪种解决方案对促进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最有益。

1844 年恩格斯称赞地提到，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层全然不同的是，法国工人在 1844 年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丝毫没有民族偏见……他们知道全世界的 ouvriers——工人——具有共同的利益而都是盟友”（MEW 2，第 507 页）。但是一代人之后马克思在给佐尔格（F. A. Sorge）的信中写道：“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MEW 34，第 477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MEW 3，第 445—472 页）对德国资产阶级及其作家中弥漫的令人尤为厌恶的沙文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评。恩格斯在 1847 年将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最显著”的特征描述为与沙文主义截然相反：“应当否定本国的历史，应当拒绝对充满贫困、暴政、阶级压迫和迷信的过去负任何责任。”（MEW 4，第 428 页）1874 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序言中呼吁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新进展，无论这些进展来自哪个国家。”（MEW 7，第 542 页）恩格斯在《波河与莱茵河》（Po und Rhein，1859）中阐述了他对有意义的边界设置的设想：“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MEW 13，第 267 页）类似地，马克思也于 1859 年批判地探讨了德国建立军事上安全的边境（在波河 [Po]、埃施 [Etsch] 以及其他地方）的要求。（第 28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谴责德国沙文主义为领土扩张欲望辩护，伴随这种欲望德国企图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第 228 页）。1870 年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参战双方的沙文主义（MEW 17，第 105、271—279 页），并呼吁跨国界的无产阶级团结。

反对沙文主义完全不意味着这是某一民族实现其民族要求所要完成的任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非常认同地、详尽地引用了巴黎工人中央委员会的论述：“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défailliances*）和叛卖行为，已经懂得（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

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MEW 17，第 558 页）法国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政府得以拯救。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统治）是法国复兴的前提。他认为政治无能并且道德衰朽的资产阶级应承担法国灾难性失败的责任，他们必须被解除权力。马克思引述中央委员会的评论以反对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MEW 17，第 558 — 559 页）

473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够在资产阶级的失败中有意义地——同时也是在国际层面的互相理解意义上——解决民族问题。恩格斯特别称赞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普遍的民族激情中“（他们）一刻也没有被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MEW 18，第 515 页）。马克思认为，德国工人的态度在他们的法国同志中间引发了非常好的回响。（同上书，第 535 页）1875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载于社会民主党的《人民国家报》（*Volksstaat*）的文章中写道，恢复波兰的独立自主是“国际的工人政党”的目标，波兰的民族解放是内在发展和社会问题重新得以涌现的前提。（MEW 18，第 572 — 575 页）

1879 年恩格斯清晰地预见到，沙文主义将在德意志帝国对抗俄国和法国的两线作战中达到高潮并且将“使我们的运动受到好多年的摧残”（MEW 34，第 105 页；相似论述也见于 MEW 37，第 171 页）。这一预言在 1914 年得到了验证。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与向沙文主义的转向是紧密相关的，这导致了第二国际崩溃于其接受考验的时刻，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之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派在当时将上述立场称为社会主义沙文主义，即社会民主党人的沙文主义。欧洲工人运动的领导层的绝大部分转向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们协助煽动沙文主义狂热，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深刻的、长期的分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得不忍受“沙文主义”的狂热。“他们不止一次地被那些甚至处于革命者阵营中的沙文主义者描绘为**那两个德国人**。”（Labriola，*Sph*，第 307 页）列宁经常地、非常坚定地反对导致侵犯少数民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LW 36，第 591 页及以下）这种反沙文主义之后保留在文本中，但是同时被掏空内涵。这一点也体现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n Wörterbuch*）的一篇关于沙文主义的短文的最后一句话中：“沙文主义的反面是世界主义。”

（Heyden 1974）世界主义这一概念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来说，是贴给各种类型的偏离正统者的贬损性标签。这些偏离正统者包括批判性的犹太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政策的批评者。——在反对“北京的毛泽东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Honecker 1971，第 103 页）的论战中，沙文主义这一概念变成了任何一方都可以针对另一方使用的谤词。

474 即使在民族主义兴起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也保持国际主义并与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作斗争。

在当代，仇外情绪经常作为沙文主义的后继者出现。现代女权主义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针对女性的敌意并称之为“男性沙文主义”（Chauvitum）。

参考文献：

G. W. Dimitroff,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d. 2, Berlin/DDR 1958; G. Heyden, »Chauvinismus«, in: PhWb, Bd. 1, 1974, 212; E. Honecker, *Bericht des ZK an den VIII. Parteitag der SED*, Berlin/DDR 1971; A. Labriola,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4.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蔡廷建 译，曹旸 校，杨河 审

参见：

Antisemitismus, Auschwitz, Befreiung, Defaitismus (revolutionärer), Ethnozentrismus, Faschismus, Imperialismus, Kolonialismus, Kosmopolitismus, Militarismus, nationales Interesse, Nationalismus, Nationalstaat, Pazifismus, Rassismus, Sozialimperialismus, Weltkrieg, Zimmerwalder

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 487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A: al-masīḥīyūn liṣālih al-ishtirākīya.

E: christians for socialism.

F: chrétiens pour le socialisme.

R: christiane za socializm (християне за социализм).

S: cristianos por el socialismo.

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运动 1971 年产生于智利。1973 年起同名运动也在北美、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展开，但它们在组织上彼此独立，只通过几次世界会议彼此联系。在拉丁美洲，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更像是由解放神学家，特别是牧师和修会人员组成的小型团体。他们来自天主教左翼，60 年代末以来受到城市雇佣工人和无地农民的贫困的触发，从中产生了不同的团体（“第三世

界牧师”[Priester für die Dritte Welt]、“新教会”[Iglesia Joven]、“戈尔康达团体”[Gruppe Golconda]、“八十人团”[Gruppe der Achtzig])。与拉丁美洲不同，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在欧洲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兴起，是此前长期介入工会和左翼政党的结果。这里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曾是拥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组织，它将成员团结在地区性团体中，在地区性团体的建设中摒弃了左翼天主教和社会天主教运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限制。在联邦德国，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更具有新教的色彩而且主要来自中产阶级。相应地，他们没有在
488 工人运动的组织，而是在新社会运动里发挥作用，并在教会里引进了对新社会运动的议题（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团结运动等）的讨论。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运动还存在于联邦德国、英国、荷兰和比利时，比利时驻有运动的国际局“国际联合教会中心”（Centre Oecumenique de Liaisons Internationales）；还有其他许多国家的小团体，它们本身没有发展为运动，而是在政党、工会和社会运动中进行合作。

与“宗教和平会议”（Christliche Friedenskonferenz）不同，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的自我认知并非完全受到东西方敌对关系的影响，而是——相应于他们的形成史——更受到解放神学对“北方”帝国主义批判的影响。不仅在拉丁美洲而且在欧洲，投身社会主义的基督徒建立自己的组织都源于两方面的动力：其一是清楚地表明神学立场，以图打破自身在教会内部边缘化的处境；其二是反对教会的反共产主义和教会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不可调和的主张。

尽管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运动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形成史，但是智利圣地亚哥创始会议的决议文件（Abschlußdokument）中的下列论纲可以视为整个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运动的纲领。

1. 承认政治活动具有特殊的合理性：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尤其在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借此反对政治的最终合法性在宗教或教会里的前解放的政治理解。对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而言，政治解放的意义存在于其自身中，它遵循自身的合理性。此论点在天主教国家一方面针对政治上极具影响 489
的教权主义，另一方面也针对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左翼流派，后者只是用道德神学推导出政治责任，而不将政治责任奠基在信仰本身之上。

2. 承认阶级斗争是可以解释社会经济现实的事实：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关于剥削条件和革命实践条件的、需要不断发展

的理论”（*Abschlußdokument*），将中心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分析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借助依附理论将南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解释为**依附性资本主义的**，依靠无产阶级对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克服必然通向社会主义。由此产生了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的双重责任。一方面他们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人组织中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认识到，教会将敌对的阶级整合到自身队伍中的能力，恰恰被用于稳定统治关系，被用于设置意识形态障碍，联合基督教民主主义与右派阻碍政治改变。故而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揭示教会的阶级属性和教会上层的阶级局限性，实施“打破宗教残余的反解放形式的延续性”（Mate 1974）的宗教批判。

3. 以解放穷人为中心的信仰的激进性与以解放无产阶级为中心的政治介入之间的一致：正是对体制化宗教的意识形态批判、宗教批判研究使得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清楚看到，教会所谓的政治中立不仅掩盖了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关系，而且遮蔽了基督教的颠覆性传统。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将与受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受歧视者之间的团结置于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的核心，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践定为政治行动的合宜道路。而且这绝对既非为了政治介入而将信仰工具化，又非将基督教的救赎观降格为政治解放，而是坚信社会的改变是实现基督信仰的条件。

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以上述鲜明的内容，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成功地在体制化的教会与资产阶级的霸权集团中打开缺口，打破了宗教与“资产阶级宗教”看似理所当然的一致性。他们由此给左翼基督徒争取到了——尽管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自觉的——在教会内部存在的权利。这一权利一方面使教会遭遇合法性难题，迫使针对阶级立场、帝国主义理论或解放策略，针对武装反抗的合法性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实际上壮大了欧洲的左翼组织和特别是拉丁美洲、南非与菲律宾的解放运动。

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开启了——在保罗协会（Paulus-Gesellschaft）更具哲学色彩的对话之后——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关系以现实政治标准为导向的第二阶段。

但这样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诉诸“实践的革命性力量”（Mate 1974）而搁置理论探讨为代价换来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运动在欧洲日渐衰弱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搁置理论探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教会显而易见的分析解释力，阻碍了对争议问题的批判研

究，如历史主体问题、基督教的先验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邻人之爱的伦理与阶级斗争。

对上述问题的避而不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肯定的、非批判的理解，这种理解阻碍了细致地把握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和批判地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在南欧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那里尤其严重，他们意义的不断减弱，与共产主义政党的危机密切相关。但是拉美的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不是这样：由于那里的左翼政党，除了智利的例外，很少发挥作用，所以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很早就融入了人民运动，而且依据依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葛兰西、马里亚特吉，发展了解放神学。上述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斗争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公共领域中具有重要作用。

491 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基督徒在欧洲面临双重的难题：如何形成一种神学的鲜明特征和自我理解，证明自身既能在教会内部发挥政治影响，又能参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的再制定？

参考文献：

»Abschlußdokument der ersten Kontinentalversammlung der CfS in Lateinamerika«, in: *Internationale Dialog Zeitschrift* (IDZ), H. 3, 1974, Wien-Freiburg/Br-Basel; G. Arroyo, »Die internationale Lage, die Kirche und die Christen«, in: ebd.; F. Castillo, *Das Evangelium gestattet keine Resignation*, Freiburg/Br 1988;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Hg.), *Geschichte-Theorie-Praxisberichte*, Münster 1992; K. Füssel, *Sprache, Religion, Ideologie*, Frankfurt/M 1982; G. Girardi,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warum?*, Mainz 1976; R. Mate,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n Spanien«, in: IDZ, 3/1974; M. Ramminger u. a., »Die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n Lateinamerika und Westeuropa«, in: D. Schirmer (Hg.), *Kirchenkritische Bewegungen*, Bd. 2, Stuttgart 1985; P. Rottländer (Hg.),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und Marxismus*, Münster 1986; D. Sölle, K. Schmidt (Hg.),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 Mainz 1975.

米夏埃尔·拉明格
（Michael Ramminger）撰
贺腾 译，胡晓琛、曹旸 校

参见：

Armut/Reichtum, Atheismus, Befreiung,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Dependenztheorie, Dritte Welt, Emanzipation, Engagement, Ethik,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Glauben, Gramscismus,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ologischer Klassenkampf, Imperialismus, Institution, Mariáteguismus, Moloch,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religiöse Revolutionsbewegungen, revolutio-

näres Subjekt, Solidarität, Spätkapitalismus,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Widerstand

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A: al-masīḥīyūn wa'l-marksīya.

E: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F: christianisme et marxisme.

R: christianstvo i marksizm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марксизм).

S: cristianismo y marxismo.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展并经由其他思想家进一步加工的理论和方法，本身从一开始就被它的代表们理解为基督教会及其学说，乃至宗教的一切形式的对立面，因而它也相应地遭到对立面的消极评价和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自视为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和欧洲社会的世俗化的彻底实现，超过了它的先行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它自视为近代科学进步的结
492 果，近代科学排除了任何求诸超验存在以解释世界进程的做法。根据这种一贯内在化的世界解释，宗教只不过是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且宗教根源上所受制的历史条件，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解释。在各种宗教里可见的此岸与彼岸的区分、世俗实体与神性实体的区分、世界与超世（Überwelt）的二分，只可能是异化的结果。只有对于人类意识才是直接给定、确定、具体可感的现实发生异化，异化由妨碍人和自我本身统一、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得到满足，使人需要一种彼岸的满足的社会条件所导致。如果扬弃异化的需要从而扬弃异化是用一种指导理论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愿景，那么宗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可超越的时代的附属品，作为前科学的世界观能通过科学的进步而超越，作为异化所造成的一种需要的表现，能通过迈进全面满足人的需要的社会状态而超越。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就必须自己在意识里将宗教当作“颠倒的世界意识”（MEW 1，第 378 页）而超越。所以，反宗教的启蒙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之一。宗教虔诚者可以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不得阻碍这一启蒙工作，而且要被视为尚未达到必要觉悟高度的队友。这是明显的非此即彼的关系。用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话来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如同水和火那般。”

各宗教和各基督教派对上述评价相应地具有消极的回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少数人不带偏见地探究马克思主义宗教判断的正确性，探究马克思主义与基督信仰相融贯的可能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霍霍夫 [Wilhelm Hohoff]）。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情况则大为改观：

欧洲展开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对话最初旨在交流争论的理由、了解双方的诉求和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欧洲之外的地区推进得更远：一方面佛教徒（缅甸、日本）和基督徒（“解放神学”）大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吸收了宗教的元素，后者正是在革命的人民群众中看到了宗教在当代强大的力量，不得不自省，他们对宗教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和片面，反宗教的鼓动是否不必要地妨碍了革命的鼓动。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打破了，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有许多人行动上是宗教虔诚的，政治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度，宗教团体成员以公民身份在国家体制内参与合作和官方对各宗教的宽容态度推动了双方关系的改善。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的“消亡”其实不应（像在阿尔巴尼亚）通过铲除宗教而加速，而应有待于共产主义实现了的时代（参见MEW 4，第481页；20，第294—295页；23，第94页）；此外人们必须考虑到，即使在改变了的社会条件下宗教仍有惊人的活力。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Lenin），那么对宗教的否定也不能是教条，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评价行动上宗教虔诚的人士在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参与，肯定他们的积极作用。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年轻的马克思不仅把宗教表述为“人民的鸦片”，而且同样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MEW 1，第378页）宗教批判必须限定为对阶级社会中宗教的历史功能的批判，不能扩展为针对宗教本质的理论。此外，人们必须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时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局限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针对欧洲的基督教及其保守传统发展而来。出于上述原因，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布洛赫、加达夫斯基（V. Gardavsky）、卢卡奇、马霍维奇（M. Machovec）——顺应一些基督徒不带偏见的态度，对宗教传统也采取不带偏见的态度，而且将反宗教的固化立场视为马克思主义僵化的原因之一。

对于上述基督教团体和思想家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批判反而成为基督教自我批判的动力：认识到自君士坦丁大帝承认教会（公元325年）以降教会与国家权力的交织关系，从基督教自身的源头出发批判历史上的基督教，克服教会反对革命的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证明自己不仅对批判地考察教会历史，尤其对重新评价异端运动，而且对圣经解读（“唯物主义的圣经读本”）都极有助益。如果辩证唯物主义不满足于只是一种综合近代科学的理论，也就是说要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图像，足以取

代所有宗教的世界观，那么它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一种试图取代宗教的受时代限制的理论，必然本身要担负起宗教对人的意义，这将是对这种理论的过度要求，迫使其走向教条化并强制执行。

主要问题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能否摆脱无所不包的、终极的诉求，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旨在克服阶级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否脱离世界观上的非分要求即教条主义的无神论。如果能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应该被理解为在经验层面上可讨论的、永远向新的修正敞开的、纯粹内在的、世俗的理论，不会论及神和作为整体的世界，没有立义的意图（Sinngebungsabsicht）。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视信仰为上帝的礼物而非人类的产物、出于信仰走向革命实践的基督徒，就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地运用，作为分析和改变社会的工具。也许应当指出，上述情形正是马克思的本意。

参考文献：

E. Bloch, *Atheismus im Christentum. Zur Religion des Exodus und des Reichs*, Frankfurt/M 1968; ders., *Das Prinzip Hoffnung*, Frankfurt/M 1959; P. Frostin, *Materialismus, Ideologie, Religion. Die materialistische Religionskritik bei Karl Marx*, München 1978; V. Gardavsky, *Gott ist nicht ganz tot*, München 1968; H. Gollwitzer, *Die marxistische Religionskritik und der christliche Glaube*, Hamburg 1974; ders., *Umkehr und Revolution. Aufsätze zu christlichem Glauben und Marxismus*, 2 Bde., München 1988; F. Hinkelammert, *Die ideologischen Waffen des Todes. Zur Metaphysik des Kapitalismus*, Freiburg/Schweiz-Münster 1985; E. Kellner (Hg.),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heute. Gespräche der Paulus-Gesellschaft*,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6; ders. (Hg.), *Schöpfertum und Freiheit in einer humanen Gesellschaft. Marienbader Protokolle*,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9; M. Machovec, *Jesus für Atheisten*, Stuttgart, Berlin/W 1972; J. Rehmann,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in Perestrojka-Zeiten. Zur Wiederaufnahme der Marienbader Gespräche«, in: *Argument* 174, 31. Jg., 1989, 235-249; P. Rottländer (Hg.),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und Marxismus*, Münster 1986.

赫尔穆特·戈尔维策尔
（Helmut Gollwitzer）撰
贺腾译，曹旸校

参见：

Angst, Atheismus, Aufhebung, Aufklärung, Befriedigung,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Dogmatismus, Elend, Entfremdung,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Fortschritt, Glück,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Hoffnung, ideologische Mächte, Leid,

materialistische Bibellektüre, Marxismus, Moloch,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religiöse Revolutionsbewegungen, Sinn,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Tod, Urchristentum, wissenschaftliche Weltanschauung

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A: al-ishtirākīya al-masīḥīya.

E: Christian socialism. – F: Socialisme chrétien.

R: Christianskij socializm (Христиан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S: Socialismo cristiano.

I. 威廉·霍霍夫（Wihelm Hohoff，1848—1923）神父奠定了德语区对社会主义的天主教式理解路径，他是首位试图将世界观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分离的天主教徒。霍霍夫（1908）区分了他归为“经济历史理论”的科学方法的“资本主义批判”和具有非科学、非理性起源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盲目信仰”）。霍霍夫接受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它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主张只有劳动创造收益的价值学说是“本质相同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只属于劳动。为了实现这一诉求，霍霍夫辩护称，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合乎道德的正当防卫行为”。他开启了德语区天主教艰难接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道路，这一接受进程随着奥雷尔斯（A. Orels）的《永恒的经济》（Oeconomia Perennis，1930）一书达到顶峰，并对福格尔桑（Karl v. Vogelsang）建立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的“维也纳社团”（Wiener Kreis）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

在奥地利，20年代的梅斯纳（J. Messner 1924）和70年代的克诺尔（August M. Knoll 1968）以“旧逻辑”为基础指出霍霍夫的社会浪漫主义的解释的矛盾。在德国，主要有神学家施泰因比歇尔（Theodor Steinbüchel，1888—1949）和迪克斯（Walter Dirks，1901—1991）批判地接受霍霍夫——一方面认可他为基督教社会主义所做的“先锋工作”，另一方面也摒弃了他哲学思维方法的“僵死轨道”（Steinbüchel）和“狭隘的经院哲学视野”（Dirks）。施泰因比歇尔（1921）填补了天主教在观念论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方面的空白。迪克斯自1924年起担任天主教中央党左派报纸《莱茵美因人民报》（Rhein-Mainische Volkszeitung）的编辑，他通过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完全如同霍霍夫等经院哲学道德决疑论者所总结的，是僵化的“客观主义的”学说体系，它更是历史进程

中的主客体之间相互辩证作用的“方法的正统”（Lukács），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迪克斯对马克思的批判接受使他更接近后来持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而非社会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或宗教社会主义者的同盟，后者在迪克斯看来把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成了“信仰决定”。迪克斯与他的同路人米歇尔（Ernst Michel，1889—1964）在天主教内部推动了一种“启蒙后的”对马克思的理解：认可社会主义是从有责任的信仰产生的“世俗事物”，不对资本主义作基督教或宗教的“妖魔化”。他们与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一样，批评宗教社会主义要求上帝允诺尘世之内的运动。

迪克斯推动在“中央党内部”接受社会主义——中央党作为天主教一派的政党，完全能够表达和整合天主教内社会主义化的无产阶级；而米歇尔却在党外投身于天主教社会主义者所办的《红色报》（*Das Rote Blatt*，1929/1930）小组等活动，他为此报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论述基于天主教所阐发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迪克斯和米歇尔的朋友默滕斯（Heinrich Mertens，1906—1968）在社会民主党资助的《红色报》出版的两年内是该报的发行人。他的两位朋友经常公开表达对“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怀疑，默滕斯则竭力在党内站稳脚跟，作为虔信的天主教徒又在教会内代表社会民主党。他将他与迪克斯、米歇尔在理论上的共识投入实践，就像巴特1915年决定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但他后来又加入了——与巴特不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Katholische Sozialisten）。这个团体，据默滕斯的说法，仅限于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1929年底作为独立的工作小组并入了“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Bund der Religösen Sozialisten）；同时《红色报》自1930年起由宗教社会主义者的出版社出版，一年后与《宗教与社会主义杂志》（*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 und Sozialismus*）合并，合并后依然由默滕斯领导。《红色报》在第一年出于前述的世俗启蒙的动机没有接受霍霍夫的影响，而在第二年，即加入“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之后，重印了四篇霍霍夫早年的文章——也许是（无意识地）向天主教对社会主义过度经院哲学式的理解路径的妥协。正是借助这种理解，霍霍夫的学生默勒（Vitus Heller，1882—1956）20年代末成功地将一些天主教徒从中央党招引到他的“基督教社会帝国党”（Christlich-Soziale Reichspartei）。1928年该党获得12.8万张选票，却未得到国会席位。该党最后甚至与德国共产党达成选举协议，因此被中央党骂成是共产党员的加热器。实际上一部分天

497

主教工人从中央党的外流有利于德国共产党，而非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徒选民的流动令社会民主党感到不安，认识到默滕斯可以在天主教徒和社会民主党之间搭建桥梁。但更大的选举胜利并没有出现，社会民主党迫于党内无神论势力，放弃了天主教社会主义者。1933 年社会民主党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都遭到纳粹禁止，被迫转入地下。

天主教社会主义，无论基于经院哲学还是批判的资产阶级立场，都要归于道德神学领域：天主教徒从具体的表现形式出发，经验归纳地推出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在现实（异化劳动）与劳动价值的应然原则的对比中发现了矛盾。于是社会主义作为道德观念发展出来（Steinbüchel）。天主教徒中的另一个派别与此目标一致，但提供了另外的途径：社会主义是从“上帝之国”的时代有意识地迈向世俗化，天主教徒在教会外逐渐成熟，摆脱教士监护而加入世俗化。迪克斯后来提出了“出于基督教责任的社会主义”（Sozialismus aus christlicher Verantwortung）的概念。这里交汇了一部分左翼天主教徒的路线与巴特的辩证神学及其社会主义拥护者的路线。

498 2. **福音派**宗教社会主义的动机与天主教的完全相似，基于道德义愤，依循目的论的希望：正义的事物必将永葆正义并取得胜利；这一信仰高于一切实证主义的科学（Leonhard Ragaz，1868—1945）。新教对社会主义的解释首先是系统神学或者说教义学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上帝之国神学（Reich-Gottes-Theologie）的组成部分，就其方法而言是从终末论的角度出发针对具体历史情境演绎而来。布鲁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1842—1919）区分了“上帝之国”和它在寓言（Gleichnis）与符号（Zeichen）中的预示降临，前者是人、自然和社会来自上帝的彻底更新。上帝之国早已出现在人类历史内的寓言中——类似于卡尔·巴特后来将文化作品视为期望中的拯救的符号和上帝恩典的寓言；但是不能将这些符号与所指之物混淆。布鲁姆哈特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思想视为我们当今时代的上帝之国的寓言，但他没有将上帝之国等同于社会主义。他正面评价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上帝之国的暂时形式”，将它归于基督的拯救希望之下。拉加茨（Ragaz）用对照法（antithetisch）继续推进上帝之国思想的线索。上帝之国出奇地远又惊人地近，它侵入到我们自己的现实中（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垂直轨迹）。但接下来，和辩证神学相反，不是两个世界相互并列或相互重叠，而是一个唯一的新的现实作为新天和新地延展开来。

这一上帝之国的设想使得拉加茨能

够同时对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加以批评。基督教宣告了新天但忘记了新地，社会主义宣告了新地却忘了新天。基督的事业和小人物的事业像一枚指环一样分裂成两部分，它们必须被重新接合起来。这种共生，拉加茨称为“宗教社会主义”；它在世纪之交已由布鲁姆哈特和拉加茨在南德和瑞士地区做出了榜样，应该在战后的德国由政治和组织层面实行。

但是卡尔·巴特在坦巴赫会议（Tambacher Konferenz，1919）上的主旨报告
499 打击了专程前往图灵根州的宗教社会主义团体和人士的乐观期待。巴特完全借鉴布鲁姆哈特和柯特（Kutter，1863—1931），在论辩上和内容上严格地区分“上帝之国”和“属人之国”（Reich des Menschens）；他认为社会主义属于后者，而不属于“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人作为“基督徒”可以参与社会主义（正如巴特在1915年所作的那样）。巴特演讲的影响和它的内容一样是辩证的：宣称上帝作为“完全他者”的主权，对于有些人是迷人的；拒绝用连字符将神学同任何事物连接，包括拒绝宗教社会主义的外衣，对于另一些人是失望的。全国范围的宗教社会主义组织的统一因此延迟数年，直到1926年才在梅尔斯堡决议通过。

在埃克特（Erwin Eckert，1893—1972）牧师担任主席的五年内，“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作为教会内部的成员（参与1926年巴登的教会会议选举，部分地区赢得了超过25%的选票），作为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组织地方小组和州内联盟，拓展联盟机关报《劳动人民周日报》[Sonntagsblatt des Arbeitenden Volkes]的受众，该报1931年一期发行1.7万份），作为两个工人政党的征募场所，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工业村庄的有宗教信仰的工人和中等阶层中的征募场所，都繁荣发展。全国范围的成员数量估计在一万至三万之间。联盟站在社民党和共产党一边，支持关于无偿没收诸侯财产的全民公决。针对社民党米勒领导的政府修建装甲巡洋舰的决议，埃克特在《周日报》（Sonntagsblatt）上持反对立场，这引起了社民党的激烈反应和联盟内部的争论。埃克特的左派反对派立场使他在1931年最终退出德国社民党转而加入德国共产党，这也导致他退出教会和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埃克特所开启的联盟的反法西斯主义路线由他的继承者卡佩斯（Heinz Kappes，1893—1988）发展和深化。对杂志和联盟的禁令、对领导成员的囚禁和职业禁令是纳粹1933年上台后的回应。

宗教社会主义运动——从保罗·蒂利希（Paul Tilich，1886—1965）的历史神学角度来看——特点就是经历了多次失败：191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和面对法西斯主义“民主”实验的完全失败。但正是在如此极端的深渊经验中，社会改造的呼声召唤着先知的人和运动。“宗教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觉悟的运动”，它处于无条件的要求下，质疑教会、社会、经济中一切有条件的事物。受到犹太教基督教关于恰当历史时刻的“时机”（Kairos）意识的推动和鼓励，不断有新的宗教和社会运动侵入到有条件的事物之中，追问这些事物并且使创造性的新事物成为可能。如果说蒂利希早年（1932 年）仍然乐观且坚信无产阶级是改变社会的主体，那么战后他根据失败的经验，认为所有对“当代社会的邪恶势力加以先知性批判”的团体，都是具有时机意识的主体，不必追求“宗教社会主义者”的名号，就已是宗教社会主义者。就此拓广的含义而言，战后的教会批判运动都属于“宗教社会主义”。

3. 宗教社会主义在 1945 年后以“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合作组织”的形式继续存在。新的名字避免了此前将“宗教”或“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用连字符相连的误解。1947 年的决议以蒂利希、巴特和米歇尔的认识为基础，由迪克斯执笔：社会主义是世俗事物，所需要的宗教依据不比其他的政治和社会组织更多或更少。“我们也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与上帝之国等同的观点。”跨地区的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合作组织建立之后，宗教社会主义者联盟却在 1948 年重建，但作为亲社民党的老一辈新教徒团体毫无起色，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波鸿的大学生团体及其导师埃瓦尔德（Günter Ewald）重新振兴。宗教社会主义者作为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会反对派的组成部分，在“基层教会”（Kirche von unten）里发挥着作用并参与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和平运动。

参考文献：

F. -M. Balzer, *Klassengegensätze in der Kirche. Erwin Eckert und der Bund der Religiösen Sozialisten*, Köln 1973; ders. u. K. U. Schnell, *Der Fall Erwin Eckert*, Köln 1987; Bensberger Kreis (Hg.), *Anti-Sozialismus aus Tradition?*, Reinbek 1976; *Christ und Sozialist. Blätter des Bundes der Religiosen Sozialisten Deutschlands*, Herford; W. Dirks, K. Schmidt, M. Stankowski (Hg.),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II*, Stuttgart-Berlin/W-Köln-Mainz 1975; S. R. Dunde (Hg.), *Katholisch und rebellisch*, Reinbek 1984; G. Ewald (Hg.), *Religöser Sozialismus*, Stuttgart-Berlin/ W-Köln-Mainz 1977; W. Hohoff, *Die Bedeutung der Marxschen Kapitalkritik*, Paderborn 1908; A. M. Knoll, *Katholische Kirche und scholastisches Naturecht*, Neuwied-Berlin/W 1968; K. Kreppel, *Entscheidung für den Sozialismus. Die politische Biogruphie*

500

501

Pastor Wilhelm Hohoffs 1848-1923, Bonn Bad Godesberg 1974; J. Messner, *Wilhelm Hohoffs Marxismus*, München 1924; E. Michel, *Politik aus dem Glauben*, Jena 1926; A. Orel, *Oeconomia Perennis*, 3 Bde., Mainz 1930; D. Sölle, K. Schmidt (Hg.), *Christentum und Sozialismus I*, Stuttgart-Berlin/W-Köln-Mainz 1975; M. Stankowski, *Linkskatholizismus nach 1945*, Köln 1976; Th. Steinbüchel, *Der Sozialismus als sittliche Idee*, Düsseldorf 1921; P. Tillich, *Die sozialistische Entscheidung* (1932), mit e. Vorwort v. K. Heinrich, Berlin/W 1980.

克劳斯·克莱佩尔（Klaus Kreppel）撰
贺腾译，胡晓琛、曹旸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theismus,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Ethik,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Glaub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Kritische Theorie, materialistische Bibellektüre, Moral, Subjekt-Objekt,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Verändern, Weltanschauung, Zeichen

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A: al-ḥiwār baina'l-masīḥīyīn wa'l-marksīyīn.

E: christian-marxist dialogue.

F: dialogue marxiste-chrétien.

R: christiansko-marksistskij dialog (христиansко-марксистский диалог).

S: diálogo entre cristianos y marxistas.

对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全面的世界观之间关系的追问不能脱离其历史载体，即脱离工人运动和教会而进行考察。也就是说需要注意，两场运动皆是历史性运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历史观，正如同基督教不只是信条的单纯集合一样。此问题首先针对的是活动者而非教义，与其说它是世界观的问题，毋宁说是政治的问题。

1. 马克思主义者与基督徒的关系的最初阶段的特点是双方互有偏见，显得针锋相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宗教批判认为宗教是“给人民（*für* das Volk）的鸦片”（而非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的［*des* Volks］鸦片”，MEW 1，第378页），而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谴责马克思主义，包括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各流派是无神论的，因 502

而与基督教义中人的形象无法共容。这种几乎彻底的相互谴责根源于19世纪，整个20世纪前半叶实际上仍继续存在。双方都自认为是不可改变的正统教义而互相反击，他们忘记了，并非关于上帝的问题，而是对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不同判断引发了他们的分歧。

然而自19世纪以来，两场运动内部就已经有代表人物相对于关注教义问题，更加致力于同各自的对手展开实际合作（尤其是布鲁姆哈特父子［Johann Blumhardt和Christoph Blumhardt］，他们在宗教社会主义者中占有核心地位；参见Buess/Mattmüller 1986，第11—47页）。克里斯托夫·布鲁姆哈特（Christoph Blumhardt）和拉加茨早就赞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批判。马克思主义方面应该提到威廉·魏特林（W. Weitling），他尤其重视共同斗争在实践上的优先性。此后出现了各不相同的批判宗教和教会的著作（Labriola 1897，第371—397页；Luxemburg 1903；Bloch 1935；Bauer 1927；关于葛兰西，参看Portelli 1974；Mariátegui 1986，第139—166页；后期有Farner 1984）。而合作的传统长期被遮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许多国家浮现出来。

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最先带来了基督徒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联盟，或者说迫使二者结盟。在这条脉络上，还有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国家安全”（Nationale Sicherheit）和种族主义的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结成的联盟（参见Sölle 1986，第221页；Castillo 1986，第28—30页）。

2. 直到1945年后，尤其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基督教才意识到圣经之中的革命传统。庇护十二世（Pius XII）和斯大林去世后，教会中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僵化教条主义各自开始解冻，使相互之间的评价有了缓和的可能。1958年建立的“基督教和平会议”（Christliche Friedenskonferenz）、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eltkirchenrat）的倡议组织“教会与社会”（Kirche und Gesellschaft，1968年），特别是“保罗协会”（Paulusgesellschaft，1964—1968年）等不同的倡议组织都促进了对话。双方重要的理论家都曾就“生命的意义”、“无神论”、“人本主义”和“历史与未来”等主题发表过意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有恩斯特·布洛赫、加洛蒂（R. Garaudy）、马霍维茨、沙夫（A. Schaff）和隆巴尔多-拉第斯（L. Lombardo-Radice）。基督教的代表有拉纳（K. Rahner）、梅茨（J. B. Metz）、吉拉蒂（G. Girardi）、福格里姆勒（H. Vorgrimler）。这一对话阶段对于减少偏见、创造互信氛围具有根本的意义。理论挑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主要在伦理学领域，对基督徒而言主要在于理解理论的历史性、理性

和党派性。但是对话也有其边界，这主要是因为对话被限制在理论层面，双方的政治实践和实践主体并未登场。对话在双方的权力中心没有组织化地固定下来，是政治形势导致对话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在“布拉格之春”终结和党内斗争过程中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受到处分的形势下。至迟 1974 年《国际对话杂志》（*Internationale Diaglog Zeitschrift*）的停办，已表达了教会上层对于对话的厌倦，这同时标志着这一对话阶段的正式结束。（参见 Castillo 1986，第 26 页及以下）

政治实践层面的接近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南非和菲律宾，在这些地方理论对话的方案证明是不够的，因为任务在于具体地融入共同的政治进程中。出现了新的运动，如“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徒”；新的合作前景，如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所构想的“战略同盟”。双方的接近乃至统一的最突出的形式，无疑是桑地诺革命（die sandinistische Revolution），它带来了一种桑地诺主义、基督教、马克思主义的身份认同。（参见 *Erklärung* 和 Borge 1984）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对话取得了新进展。贝托（Frei Betto）与菲德尔·卡斯特罗 1985 年的对话（德文译本 1986 年）尤其引发了长久的讨论。拉丁美洲和南非的经验（参见 *KAIROS-Dokument*）以及（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对解放神学的不同判断（例如 Buhl/Klohr 1987）为进一步的成功合作开启了新的路径。

3. 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 1989 年的崩溃彻底改变了国际关系以及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框架。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和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面对意图一劳永逸地驱逐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猛烈的媒体话语，相反的公共空间很少有机会展开。这场危机还与左派内部的争执有关。而教会方面，尤其是天主教会，贯彻实行更加权威的结构。这也导致教会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然而，还是有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小型团体和社团一道合作克服理论分歧，探寻理论和实践的新路以反对资本主义新形成的积累方式和调节方式。

参考文献：

O. Bauer, *Sozialdemokratie, Religion und Kirche*, Wien 1927; F. Betto, *Nachtgespräche mit Fidel*, Freiburg/Schweiz 1986;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GA 4; T. Borge, *Die Revolution kämpft gegen die Theologie des Todes*, Freiburg/Schweiz-Münster 1984; Th. Buhl, O. Klohr, »Der revolutionäre Prozeß in den Ländern Lateinamerikas und die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in: *DZPh*, 35. Jg., 1987, 933-942; F. Castillo,»Die Christen und der Marxismus. Ein Problem mit Geschichte«, in: P. Rottländer (Hg.),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und*

Marxismus, Münster 1986, 23-26; »Erklärung der Nationalen Direktion der Sandinistischen Befreiungsfront zur Religionsfreiheit (24. März 1981)«, in: *Nicaragua: Revolution und christlicher Glaube*, Frankfurt/M 1981, 171-176; K. Farner, *Theologie des Kommunismus?*, Zürich 1985; *KAIROS-Dokument*, in: Ev. Missionswerk im Bereich der BRD und Berlin West (Hg.), *Christliches Bekenntnis in Südafrika*, Hamburg 1987, 3-39; R. Luxemburg, »Kirche und Sozialismus« (1903), in: dies., *Internationalismus und Klassenkampf*, Neuwied-Berlin 1971; J. C. Mariátegui, *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 Berlin/West-Freiburg/Schweiz 1986; H. Portelli, *Gramsci et la question religieuse*, Paris 1974; J. Rehmann,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in Perestrojka-Zeiten«, in: Argument 174, 31. Jg., 1989, 235-249; H. Rolfes (Hg.), *Marxismus-Christentum*, Mainz 1974; D. Sölle, »Christentum und Postmarxismus«, in: *Argument* 156, 28. Jg., 1986, 215-225.

库诺·菲塞尔（Kuno Füssel）、
伯恩哈德·瓦尔彭（Bernhard Walpen）撰
贺腾译，胡晓琛、曹旸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ktionseinheit, Atheismus, Befreiung,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Glaube, Regulationismus,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D

505 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

A: madhhab Darwin, dārwīnīya.

E: Darwinism. – F: Darwinisme.

R: darvinizm (Дарвинизм). – S: Darwinismo.

达尔文主义指的是对进化论的规律和原理在方法论和世界观上的普遍化。达尔文主义随着1859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出版而产生，在两个层面上起作用。

1. 在19世纪后半期的生物学理论形成过程中，作为达尔文思想影响的结果，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后来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者”的达尔文的追随者，另一方是其他发展理论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发展理论如环境主义、拉马克主义、定向演化概念，部分首先是作为对达尔文主义的物种起源解释的反应而表达出来的。第一代达尔文主义者在英国包括赫胥黎（Huxley）、华莱士（Wallace）和罗马尼斯（Romanes），在德国有海克尔和格根鲍尔（Gegenbaur）。华莱士，作为进化论的共同创立者，直到1889年才开始使用“达尔文主义”这个概念来阐述自然选择的后果。自此以后，严格说来，在生物学的理论建构和科学发展上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就是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作为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一方面建立在新拉马克主义对自然选择思想进行的批评上，因为达尔文主义必须在大量的对物种形成和发展的竞争性解释理论面前推广自己；另一方面也建立在生物学内普遍缺乏理论解释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在阅读达尔文的著作之后，通过论证的事实逻辑成了“达尔文主义者”。恩格斯对达尔文主义的高度评价体现在：他把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同发现能量守恒定律和施莱登（Schleiden）、施旺（Schwann）提出细胞 506
理论并称为19世纪最重要的发现，这些发现使人最终克服了自18世纪以来占支配地位的机械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参见*DN*，MEW 20，第467—468页）进化论在生物学内部带来了从描述性科学到理论性科学的过渡，这样，进化论的建立和作为达尔文主义方法论的普及，总

体上奠定了生物学思想的科学化。

总之，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功能，在于把生物学解释的进化论标准作为科学的尺度来贯彻。因为大多数生物学家自己都是达尔文主义式地思考，所以严格说来，经典的达尔文主义失去了它的论战功能，成了核心的研究方法，它的基本假定一再被严格检验和精确化。

2. 第一代达尔文主义者如华莱士，与后继者（包括海克尔）相反，拒绝把自然选择理论转用到社会和伦理问题上。在生物学理论建构问题之外，达尔文同时代人也已将达尔文主义理解为达尔文的思想在自然概念、人的自身理解以及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等世界观问题上的影响。在这种普遍的意义上，达尔文主义绝不是像经常被误解的那样是进化论的核心理论，正好相反，进化论是达尔文主义的核心，达尔文主义将进化论思想启发式地、思辨地并且以意识形态功能来普遍化了。恩格斯在1873—1883年间（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已经多次评论了达尔文、达尔文主义者以及（使用这个字眼的）达尔文主义者的理论功能。他对达尔文和杜林（Dühring）的评价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自吹自擂的杜林相比，极为谦逊的达尔文显得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不惜贬损他自己的荣誉，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的前辈是微不足道的。" 507
（MEW 20，第576页；MEGA I. 27，第73页）尽管恩格斯在广义上是达尔文主义者，他自己也多次对一些特殊的适应和遗传问题，以及普遍的受进化论影响的发展思想问题表达了看法。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作用首先建立在精确表达了自然界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关系上，达尔文主义克服了把这种关系仅仅作为自然描述的较低评价。

1859年以后，生命学说的生物学成为法则科学，这种学说的基本假定是达尔文借助于从比较解剖学、动物地理学和宠物研究等领域的事实获得的证据：物种相互起源，由此相互处于一种分层级的亲缘关系。由单纯的自然史成为后来被海克尔称为生物种系发生史的、合乎规律运行的动态过程。恩格斯对个别特殊的问题是完全批评的，如作为起源学的结果引出的"原始哺乳动物"的假定，因为这种假定的引入复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静态的发展理解。（*DN*，MEW20，第519页；MEGA I. 26，第399页）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反对机械发展理论家和唯物主义者如福格特（Vogt）、摩莱肖特（Moleschott）、毕希纳（Büchner）的"相互的保险"（第472页；345

页），更不用提杜林平淡乏味的、在有生命的大自然中的目的论想象。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达尔文主义影响的通信中表明的，对达尔文之所以评价很高，是因为达尔文让每一种方式的目的论都丧失掉了理论基础。“另外，对达尔文……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859 年 12 月 11—12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MEW 29，第 524 页）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即达尔文主义被理解为承认自然选择的唯一作用的话，那么恩格斯和达尔文一样，并非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前面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很多片段，把后天获得的特征的遗传论证为进一步的发展机制。尽管对达尔文主义的思想的贯彻持捍卫态度，恩格斯，和他的同时代人海克尔一样，在具体的生物事实问题上，同样经常也偏爱新拉马克主义的想法。对自然选择原则普遍起作用的假定，是魏斯曼（Weismann）的新达尔文主义的产物，新达尔文主义自从 1900 年以来同拉马克主义的发展思想的融合最终破裂了，并由此带来了进化论思想的新阶段。魏斯曼的“选择的全能”符合恩格斯预见的偶然和必然性对生物进化的因果理解的意义。此外，恩格斯在达尔文观念的影响下，多次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类精神的史前史”。在此方面，最具有建设性的、直到今天还产生影响的贡献涉及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Anteil der Arbeit an der Menschwerdung des Affen*，1876，MEW 20，第 444 页及以下）中预见到的对意识的生物种系进化出现的准确说明。不过，恩格斯洞见到自然选择作为偶然和必然的特例的普遍意义，却并不能防止倒退到直线的机械的发展观，比如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过渡，与此相反，在进化中还存在大量对这种直线上升的偏离。对此包括退化的演化或者寄生方式的出现，进步和向上的发展同时也和机能的简单化相联系。然而，恩格斯和达尔文主义的争论并不局限于自然解释的作用，而且还特别针对世界观问题和由达尔文主义带来的价值重估。

508

3. 达尔文主义的公式“生存斗争”，通过它的图像般的形象性，首先引起了一种自然选择思想的迅速传播，同时带来了意识形态扭曲的根源，这得到了恩格斯恰如其分的批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

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
509 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DN*，MEW 20，第565页；MEGA I. 26，第537—538页）目前“生存斗争”这个概念只是一个与科学史背景相关的隐喻。在生物学的范畴建构中这种概念是一种拟人，可被技术术语“自然选择”代替。对于它在人类史中的转用也适用恩格斯的批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同上）对进化论促使自然史科学化的正面评价，应同这种作为达尔文主义分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评论区分开来。

参考文献：

R. Alexander, *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 Seattle 1979; R. C. Bannister, *Social Darwinism: Science and Myth in Anglo-American Social Thought*, Philadelphia 1979; P. J. Bowler,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 Anti-Darwinian Evolution Theories in the Decades Around 1900*, Baltimore 1983; C. D. Darlington, *Darwin's Place in History*, Oxford 1959; C.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59; ders., *The Descent of Man*, London 1871; J. S. Gould, *Darwin nach Darwin. Naturgeschichtliche Reflexionen*,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84; M. C. Grene, *Dimensions of Darwinism*, Cambridge 1983; V. Kellog, *Darwinism*, New York 1907; E. Mayr, »The Nature of Darwinian Revolution«, in: *Science* 176, 1972; M. 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Chicago 1979; A. R. Wallac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London 1870; ders., *Darwinism. An Exposition of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with Some of It's Applications*, London 1889; A. Weismann, *Über die Berechtigung der Darwinschen Theorie*, Leipzig 1868.

福尔克尔·舒里希（Volker Schurig）撰
张雪亮 译，金建 校

参见：

Affe, Anatomie, Anthropologie, Biologismus, Entwicklung, Evolutionstheorie, Kampf ums Dasein, Lamarckismus, Lyssenkismus,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Menschwerdung, Metapher, Natur, Naturdialektik, Naturgeschichte, Natur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Materialismus, Pawlowismus, Physiologie, Sozialdarwinismus, Zelle

510

革命的失败主义
(Defaitismus, revolutionärer)

A: inhizāmīya thaurībya.

E: revolutionary defaitism.

F: défaitisme révolutionnaire.

R: revoljucionnoe poraženčestvo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пораженчество).

S: derrotismo revolucionario.

“革命的失败主义”这个概念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概括了社会民主党分裂过程中国际主义派的政治战略。革命的失败主义宣称：谁想要在1914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继续做一个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谁就必须在战争中为革命作准备；为此，就必须接受自己（祖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军事失败；失败很可能是革命胜利的有利前提条件。这一立场是在长期的国际争论中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谈到过这个概念。不过“工人没有祖国”的原则，决定了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战争的态度。《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EW 4，第493页）这意味着全体无产者的国际团结，而不是和本国统治阶级的民族团结。马克思、恩格斯按照战争的阶级目标和战争结果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判断战争性质，因此他们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位帝国议会议员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70—1871年间发表的声援巴黎公社、抵制侵略战争和战争国债的声明（1870年7月21日声明，转引自 Luxemburg，GW 4，第65页）。《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Zweiten Adresse des Generalrates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1870）结尾写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义务：“**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义务，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领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MEW 17，第278页）但是恩格斯也完全设想到了另一种革命战争形势：如果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就有义务抵抗“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保卫“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是和平的进军运动”。（MEW 22，第256页）在这种情况下，则要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国家干涉复辟旧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世界形势已发生变化，众多庞大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所有主要参战国及各国的统治势力争夺

帝国主义利益，尽管他们以文化和自由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如法国抵抗野蛮的普鲁士，德国抵抗野蛮的俄国）。站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列强都是一丘之貉，它们的战争目标都应该加以抵制。战前的国际争论已经达成决议，全世界社会主义者要共同抵制战争。1907 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的关键段落如下："只要存在爆发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劳动阶级及其议会代表就有义务……尽其所能，动用最有效的手段阻止战争爆发……如果战争仍然爆发的话，他们的义务是迅速结束战争，尽全力利用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人民，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Protokoll* 1907，第 66 页）

罗莎·卢森堡可能是在 1907 年斯图加特会议上提出这一关键思想的第一人。她没有满足于结束战争的要求，而是进一步要求"利用战争加速推翻整个阶级统治"（第 79—80 页；GW 2，第 238 页）。然而在这次争论中，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腔调依然不时作响：德国比俄国文明，俄国的军事胜利会毁灭德国工人运动取得的成就。一些右翼社会主义者认为保卫祖国是合法的。即便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奥古斯特·倍倍尔，也绝没有摆脱这种倾向。

随着 1914 年战争爆发，民族主义狂热达到顶点；第二国际的大部分党的大部分改良主义领导人开始追随各自帝国主义政府，宣称保卫祖国是无产者的第一义务。反战者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匈帝国都是少数派，在俄国、塞尔维亚和一些中立国家则占多数。多数派内部也充满分歧，这反映在社会主义反战者 1915 年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和 1916 年昆塔尔会议上。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提出的国际战略，可以概括为"革命的失败主义"，包括在各国反对战争，抵制战争国债，在军内、在后方进行反战宣传，与敌方的无产者士兵友好往来，加强阶级斗争哪怕削弱"国防力量"（实际上是进行战争的力量），利用社会危机和军事失败革命推翻政权，抵制参战政府鼓吹的"国内和平"（Burgfrieden）政策，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非法组织。军事失败和革命在这一战略中密不可分，争取革命的斗争很可能带来军事失败，军事失败使资产阶级更加摇摇欲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那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就是理所当然的答案。

列宁 1915 年反驳论敌时强调："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LW 21，第 273 页）"战时的革命就是国内战争，而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遭到挫折（'失败'），会有

助于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努力实现这种转变也就不能不促使政府失败。”（第 274 页）

罗莎·卢森堡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指导原则》（*Leitsätze*，1915）谈到国际主义者的任务：“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须首先集中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无产阶级来说同时也是争取国内政权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决定性的斗争”。（GW 4，第 45 页）因此首要任务在于使无产阶级国际团结起来，“使无产阶级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同上）。

革命的失败主义建立在三个前提条件上：（1）参战的各国（西欧列强 + 俄国、中欧列强）在其阶级统治上没有本质区别；（2）社会主义者拒绝在政治上许入（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拒绝在国家机器内进行合作，拒绝联合政策；（3）国际主义和革命的失败主义适用于每次交战的每一方。

513

社会主义者对战争采取什么态度的争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考茨基也提到过：“我们的党分裂为两个极端，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NZ*，1915 年 11 月 26 日）反战的左派当中，争论依然在延续。布尔什维克、斯巴达克同盟、不来梅激进左派和一些瑞典人形成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左翼，与占与会者多数的和平主义者相对立。社会党国际的堕落和没落，促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主张并预备“重建”（第三）国际。（参见 Lenin 1915，LW 21，第 325—333 页）——革命的失败主义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势，比如中国最初由资产阶级军队领导的解放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以遵循同样的革命失败主义战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只有法西斯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以此为准则，对于被法西斯占领国家的劳动者以及其后的反希特勒同盟来说，再抱这种立场就是不理智且错误的。法国的战败和被占领，明显恶化了工人运动的斗争条件。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敷衍反法西斯战争，盟军消极履行对苏联的援助义务，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可能无条件、无批判地进行合作，而是要主张变反法西斯战争为革命战争。只有苏联劳动者才谈得上卫国战争。鲍威尔、丹、齐罗姆斯基（Zyromski）在《共产国际和战争》（*Die Internationale und der Krieg*，1935）中总结道：“全世界无产阶级在战争情况下的政策必须根据三点来确定……打击德国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战争夺取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Bauer，WA 4，第 33 页）

514 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的立场不可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一成不变，而是要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根据战争的历史属性，根据参与战争的国家的阶级属性来决定。

参考文献：

K. Kautsky, »Die Sozialdemokratie im Kriege«, in: *NZ*, Nr. 1, 2. Oktober 1914, 1-8; W. I. Lenin u. G. Sinowjew, *Sozialismus und Krieg*, Genf 1915 (vgl. LW 21, 295-341); *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en-Kongresses zu Stuttgart*, Berlin 1907; *Protokoll des Außerordentlichen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enkongresses zu Basel*, Berlin 1912; G. Sinowjew, *Der Krie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ismus*, Wien 1924; L. Trotzki, *Der Krieg und die Internationale*, Zürich 1914.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曹旸 译，杨河 审

参见：

Abrüstung, Austromarxismus, Bürgerkrieg, Chauvinismus, Frieden, Friedensbewegung, Impe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ismus, Kautskyanismus, Krieg, Militarismus, nationale Befreiung, Nationalismus, Pariser Kommune, Pazifismus, Supermächte, Volkskrieg, Weltkrieg, Zimmerwalder

定义（Definition）

A: t'arīf. – E: definition. – F: définition.
R: opredelenie (определение). – S: definición.

该术语（拉丁语 *definitio*，希腊语 ὁρισμός，原义“圈起”[Umgrenzung]）主要指规定某个对象或概念的语句，以及构造和检验这些语句的规则。对于马克思来说，赋予本质和概念以固定定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可能考虑不到对象之间相互的动态依存，并且无法胜任对它们进行辩证的分析。例如，马克思反对生产资料的“经院式的定义”。“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而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MEW 24，第228页）他认为，在给出形式和功能的规定性并对事物进行起源重构的过程中，研究进程确定着自身。因此，一种对定义确定的理解可能会成为障碍。就概念具有历史性和过程特征这一点来说，尼采的想法与他类似：“一切在符号上囊括整个进程的概念，都不可定义。只有没有历史的事物是可以定义的。”（KSA 5，第317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恩格斯批判了一种“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

515 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MEW 25，第 20 页）。

为了防止定义可能造成事物已定形，并独立于实践的假象，布莱希特首先在尽力寻求“可用定义”（praktikable Definitionen）（GA 21，第 422 页）。——拉比卡则追问，马克思的思想作为辩证且原则上反对教条的思想，是否能与“细究起来显然也是教条的定义技术”相一致（KWM I，第 12 页）。他眼中的解决方法是，“确定来自马克思主义领域的那些范畴，在历史和逻辑中形成的过程。这样才能应对一个矛盾的任务，即给出一系列不能算是定义的定义”。定义的此种状况也体现在了《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KWM）中：这个关键词没有独立的词目，而是在引文中加以阐释的。

1. 杜比斯拉夫（Dubislav 1931）和戈尔斯基（Gorski 1967）提出的基本论述，定义可以作如下几种理解：（1）把所定义对象的本质，纳入各本质普遍秩序中的手段（亚里士多德、黑格尔）；（2）阐释一个概念内容的手段（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康德）；（3）对某个已经在语言中使用的术语的意义，进行确定和细化的方法（霍布斯、帕斯卡尔[Pascal]；这个观点与符号逻辑的发展有关）；以及（4）在某种科学理论的语言中，确认新引入的术语和符号意义的方法。传统上，对实在论定义（Real-Definition）和唯名论定义（Nominal-Definition）的区分较为常见，这种区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有雏形，不过在对共相问题的争论（Universalienstreit）中才得到全面论述。霍布斯是第一个始终为定义的唯名论理解辩护的近现代作者，按照这种理解，定义就是“规定被定义名称的意义，以及该意义和其他所有意义的区别”（*De Corpore*，德文译本第 70 页）。与他相似，洛克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反对实在论定义的观念，后者在《逻辑学体系》（*System of Logic*，1843）中就已对定义进行论述。

与这些讨论线索冲突的是，各作者对于定义在科学和哲学中的价值，有不同的表述。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在他们以数学为认识典范的框架中，特别是斯宾诺莎在他借自几何学的阐述方式中，都赋予定义构建体系的基础作用。 516

康德则与他们不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写道：“哲学中充斥着不完善的定义。”（B 版第 759 页，注释）定义过程应当“将一物的详尽的概念在其界限

内本源地描述出来”；根据他在注释中做出的标注，“详尽”在这里的意思是“特征的清晰性和充分性；界限是指精密性，即这些特征不超出属于该详尽概念的东西；本源地则是指这种界限规定不是从任何东西那里派生出来……这种情况将会使被认为的解释不能在对一个对象的一切判断中处于最高位置”（B 版第 755 页）。而这意味着，“定义在哲学中作为一种经过估量的明晰，更应当完结，而不是开始一部著作”（B 版第 759 页）。——黑格尔**分析的方法**（*analytische Methode*）则要求，“将给定的具体事物分解，把它的区别抽离出来，并且给予它们**抽象普遍性**（*abstrakte Allgemeinheit*）的形式；或者保留这个具体事物作为**根基**（*Grund*），并通过剔除看上去非本质的特点，突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属（*Gattung*）……”（*Enz*，§227）。**综合的方法**（*synthetische Methode*）则要将对象纳入“**理智规定好的概念**”的形式中。（§228）这样，定义指的就是将认识客体“整体”纳入“某个所规定概念的形式中”，“借此确立它的属以及普遍的**确定性**”。（§229）他也如此解读传统上用来定义“定义”的公式：*definitio fit per genus proximum et differentia specifica*（孔达科夫 [Kondakow] 的翻译：“用最接近的属，还有种之间的区别规定概念”［即人们常说的“属加种差”。——译者］，WdL，第 118 页）。在“普通逻辑学”中，人们认为，定义“包含的不是仅仅指向认识主体的规定，而是包含对于对象的规定，它构成了对象最根本、最特别的本质”（*Logik*，Einl.，SW，Lasson，第 32 页）。“当用给定的规定推导其他规定时”，对应的规则也适用。因此，“定义”同样是“理解对象”的形式之一。（同上）对于一种辩证的、融合主客体的理论来说，定义只有次要的、暂时的意义。

2. 尽管恩格斯和列宁多少有意识地赞同实在论定义的观念，马克思却从早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直到晚期的《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从历史和实践的角度思考定义的地位。他在认识论上主要关心的，是发展出对于分析的规定，并在具化的思考中概括它们。（参见 *Ein* 57，MEW 42，第 34 页及以下）对于定义的问题，他对非历史的、脱离实践的或看似客观实则片面的定义，作过简单扼要的驳斥。 517

2.1 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发现，黑格尔进行定义时的论证没有说服力。黑格尔在第 289 小节写道：“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最高

的观点和规定冲突的舞台。因特殊领域的合法性而产生的集体精神，本身也同样转变为国家精神，因为国家是它用来维护特殊目的的工具。这就是市民爱国心的秘密之所在：他们知道国家是他们自己的实体，因为国家维护他们的特殊领域——它们的合法性、威信和福利。”马克思评论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被说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MEW 1，第 243 页），他还提到，黑格尔将不相容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人们会觉得，黑格尔应当把‘市民社会’和‘家庭’说成对国家中每一个人的规定，并将晚近各种‘国家的特质’也当成对国家中一般个体的规定。”然而在黑格尔那里，并不是同一种个体“对自己的社会本质进行重新规定的。那所谓的自己对自己展开规定，其实是意志的本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整体性概述中，马克思给出了黑格尔论证中出现这种断裂的原因：“黑格尔给**他的逻辑提供了政治的形体**，但他并没有提供**政治形体的逻辑**（第 287 小节）。”（第 250 页）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绝对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道，它以流于表面的方式使用定义，而没有去探究对象本身：“最后，它同时把‘**精神**’、‘**进步**’这个方面和‘**群众**’这个方面变成**凝固不动**的本质，即变成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作一种永久不变的极端相互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HF*，MEW 2，第 88 页）对于布鲁诺·鲍威尔的说法：“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他们评论道，“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实际的群众了，它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同上；参见第 100 页及以下）而当施蒂纳“把无产者（进而也）把共产主义者变为‘游民’”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此进行了类似的批驳：“他在第 362 页上替他的‘游民’下定义为‘只有空想财富的人’。”（*DI*，MEW 3，第 213 页） 518

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克思批判的目标类似。马克思强调，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即使在谈它的‘使用价值’时，我们也没有立即联系到‘资本’的定义，当我们还在分析商品的因素的时候，就谈资本的定义，那纯粹是荒唐的事”（MEW 19，第 371 页）。他认为，瓦格纳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同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毫无共同之点”（同上）。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摒弃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实在论定义，这种定义被他

分解成动态的、历史的关系，比方说“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做人的食物”（第363页）。

在《资本论》的注释中，马克思强调了定义具有历史的特点，它对一个特定时期来说既是典型的，也是现实的且是想象的：“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MEW 23，第346页）

2.2 尽管主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了规定术语（商品、价值、劳动、资本、科学）常使用定义的方法，但他并没有特别地反思这个方法的基本特点。和恩格斯不同，他并没有表述过抽象概念在存在论中的地位，而是围绕着方法和语言进行论证。马克思以批驳的方式，要求那些他批判的作者重新展开分析，而恩格斯则以不同的定义来替代已有的定义。

青年恩格斯试图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中用一个“正确的、从事物的发展得出的，因此也包含一切实践的定义”去替代“两个片面，因而只完成了一半的定义”。（MEW 1，第510页；参见第511页：“资本的定义”）1846年他试图给共产主义一个“十分简单”（MEW 27，第61页）的定义。莫泽斯·赫斯曾编写过共产主义教义问答（第98页），赫斯被排斥之后，恩格斯在1847年完成了《共产主义原理》。该书采取了问答手册的形式，作出的大多都是简短的定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奴隶、农奴等），它“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第107页）。恩格斯自己也提出，要用一个共产主义宣言替代问答手册：“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同上）

3.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杜林应用了“数学的方法，……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使用定义。这种对定义的表述造成了“要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已有一部分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MEW 20，第172页）。一个例证是杜林将财富定义为“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恩格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反驳：“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当财富在阶级社会中包含了对人的统治时，它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MEW 20，第173页；关于数学中的定义方法参见*DN*，第521页）。 519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作出如下定义：“**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等等。（MEW 20，第75页；此外参见Brecht，GA 21，第417页）他对这个定义问题的反思方式不无问题，因为这种

方式的目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本质的完整："我们的关于生命的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方便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无能为害。"（MEW 20，第 77 页）相反，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中，他则不容置辩地写道："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MEW 20，第 578 页）

4. 列宁同托洛茨基还有布哈林在 1921 年进行了关于工会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所起作用的论辩，列宁在其中的表述对之后苏联理论家的讨论形成了特别的结果。他确信，两人都"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错误的折中主义定义"（LW 32，第 75 页）。列宁同时还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区别作了极为简化的描述，这个论述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学派。列宁认为，只有辩证地发展出来的实在论定义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过他视作对立面的并不是唯名论的定义，而是一切形式逻辑的定义。他指责布哈林持有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LW 32，第 84 页）。"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身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和变化中来考察事物。……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LW 32，第 85 页） 520

卢卡奇的重点有所不同，他重新又更多采取了马克思以方法为导向的思考方式。他在 1922 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前言中讲道："概念与其说是通过定义，不如说是通过它方法上的作用得到正确的意义。这种作用将概念当作扬弃了的要素，保留在整体中。"（W 2，第 168 页）

这与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

理论》（*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1930）中对二者进行区分的论证相符。“传统理论的最高原理定义了普遍的概念，”他写道，“它们涵盖了这个领域的一切事实。”（GS 4，第 198 页）批判的、反抗的理论同样由普遍的基本概念导出对现实状况的陈述，不过，“独立地看理论的各个部分所产生的矛盾……，并不是因为错误或者被忽略的定义，而是由于该理论的对象自身随历史变化，这个对象尽管是分裂的，却又是同一的”。这个理论构建了“发展中的整体图景，即包含在历史中的存在判断（Existenzialurteil）”（第 212—213 页）。

5.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逻辑学家和科学理论家，都试图寻找通往定义问题的新路径。它们延续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逻辑学向数学靠拢的趋势。例如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Alexander Sinowjew）的学派所持的观点认为，在逻辑学中除了唯名论定义以外，不可能存在别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实在论的定义可以描述成“一个唯名论的定义和它相应的、有根据的存在判断（Existenzbehauptung）”（这个判断需要“用逻辑学以外的手段证明”；Wessel 1976，第 49 页）。彼得·鲁本（Peter Ruben）总结道：“通过一个所谓的实在论定义（即对等性［Äquivalenz］），我们具体地给出了一个分析的概念（这是黑格尔发现的）。通过完成对它的抽象化，这个实在论定义被转化成一个所谓的唯名论定义……。一种经常出现的形而上学的脱节（metaphysische Entgleisung）情形就是：人们不幸地将**价值**（*Wert*，即抽象概念［Abstraktum］）与**感官对象**混淆起来。”（1978，第 136 页，参见第 145 页，注释 32）

正如《哲学历史辞典》对马克思对定义的批判全然不知一样，在科辛（Kosing）1985 年出版的《哲学词典》中，也很难找到该批判的更多线索：现代逻辑学意义上的实在论定义，被看作以等式（Gleichung）形式为结构（定义项＝被它定义的项）的“逻辑过程”，通过它，“某个对象的本质……以这样的方式被规定，即：将适用该对象等的属概念（Gattungsbegriff）和构成种的差异（artbildende Unterschiede）统一起来”（第 103 页）。

6. 在副标题为《一个社会学实验》（*Ein soziologisches Experiment*）的《三分钱歌剧》中，布莱希特发现，定义可以同时表达和预判（präjudizieren）法律地位（Rechtspositionen）和支配关系（Verfügungsverhältnisse）。托马斯·曼曾将电影定义为“用音乐加料的视觉娱乐”，电影集团就曾利用这个定义规避作者布

莱希特的参与权："曼从一个似乎静止不变的方面来描述这个现象。在阅读这类描述时，人们会觉得仅仅是读到了定义而已，只要它们没有包含明显错误的或者说矛盾的东西，人们自然会遵循惯例接受它们。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定义是一种将事物放置在特定系统中的操作；当人们省略或者预设了这些系统时，定义就会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固定下来。因此人们是在用每一个新的（需要初次定义的）事物来辅助旧事物，因为我们总是用后者来定义前者。比如说，曼对电影的定义帮助了它所取自的小说。但是电影本身和这个虚假的定义无关。"（GA 21.1，第 511 页）布莱希特的"介入式思考"（eingreifendes Denken）的学说继承发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对来自实用主义的启发进行了改造。从中他发展出了"可用定义"的概念：这个概念"允许我们使用被定义的领域"，"定义者的行为总会出现在决定定义的诸要素中……"（GA 21，第 422 页；GW 20，第 168 页）由于反对了马列主义中的"经院哲学"倾向，布莱希特的思想在"官方理论"中没有得到更多探讨。不过他的批评同时也针对在晚期恩格斯那里已经出现的趋势。它仅仅直观地（"在世界观意义上"）认为，人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并且在消亡之中。尽管通这种演化论式的阐述打破了永恒的假象，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人力无法转移的假象："然而在现实中它们经由我们形成，并经由我们灭亡，或者说，是经由与我们和他人类似的人。一个事物总在消逝或者形成，这句话只有在引发争论时，才能够介入现实。"（GA 21，第 524 页；GW 20，第 172 页；参见 12，第 469 页）

参考文献：

J. Dölling, »Die Bedeutung von Definitionen in der Philosophie«, in: *DZPh*, 1975, H. 12; W. Dubislav, *Die Definition*, Leipzig 1931; D. P. Gorski, »Über die Arten der D und ihre Bedeutung in der Wissenschaft« (1964), in: *Studien zur Logik der 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 Berlin/DDR 1967; Th. Hobbes, *Vom Körper* (1655), Leipzig 1948; J. S. Mill, *System der induktiven und deduktiven Logik*, Baunschweig 1862-1863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1843); A. Sinowjew, H. Wessel, *Logische Sprachregeln*,Berlin/DDR 1975; P. Ruben, »Prädikationstheorie und Widerspruchsproblem«, in: ders., *Dialektik und Arbeit der Philosophie*, Köln 1978; G. Tamás, *Die wissenschaftliche Definition*, Budapest 1964; H. Wessel, *Logik und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76.

阿诺德·舍尔策尔（Arnold Schölzel）撰

刘宇辰 译，王师 校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nalyse/Synthese, Anfang, Anwendung, Bedeutung, Begriff, Bestimmung (Determinatio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Idealtypus, Logik,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ethode,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Rekonstruktion, Verdinglichung, Wissenschaftstheorie

德拉沃尔佩派 (Della-Volpe-Schule)

A: madhhab Della Volpe.

E: Della Volpe School.

F: école de Della Volpe.

R: škola Della-Volpe (Школа Делла Волпе).

S: escuela de Della Volpe.

加尔瓦诺·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 Volpe，1895—1968）自1938年起在墨西拿（Messina）大学教授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由于秦梯利（Gentile）的现实论（Aktualismus）与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及自由主义之间分歧的加大，加之德拉沃尔佩和同代许多知识分子共同意识到的“国家和欧洲的危机”（O VI，第519页），导致他的这种倾向不断发展，并促使他1944年在光复的西西里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不同于许多同时代人的“速成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意大利南部黑格尔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的唯心主义，而是果断重起炉灶，试图在方法论视角下整理马克思的成就。

德拉沃尔佩依循了马克思用方法论批判黑格尔的态度，并且使用艰深的术语与克罗齐、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仿浪漫主义”（Romantizismus）论战，（这些特点）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他在战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被孤立的原因。一方面，他的立场与陶里亚蒂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意大利历史主义的遗产不一致，这种解释在克罗齐和葛兰西之间建立了连续性；另一方面，德拉沃尔佩的立场因专注于认识问题而不属于葛兰西的路线。

德拉沃尔佩身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始终把政治热情与政治讨论分开。他这一流派的成员还有伊尼亚齐奥·安布罗焦（Ignazio Ambrogio）、卢乔·科莱蒂（Lucio Colletti）、翁贝托·切罗尼（Umberto Cerroni）、亚历山德罗·马佐尼（Alessandro Mazzone）、尼古劳·默克（Nicolao Merker）、罗科·穆索里诺（Rocco Musolino）、朱利奥·彼得拉内拉（Giulio Pietranera）、马里奥·罗西（Mario Rossi）、朱塞佩·瓦卡（Giuseppe Vacca）（参见Fraser 1977，第14页及以下），该派形

成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共产党和左翼总体处于险境时，但他们在政治上几乎不发声，这使得德拉沃尔佩在1961—1962年的辩论中难逃摘宗派主义的非难。他介入政治并非首先是意共党内策略讨论的结果；他得以介入政治，是因为他的理论反思在两个观点上与这场讨论趋同。

第一个观点涉及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这个观点来源于和诺伯托·博比奥关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的状况和文化独立（1953年）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苏共第20次党代会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这些想法系统化地展现在了国家理论的代表作《卢梭和马克思》（*Rousseau und Marx*，1964）中。第二个观点涉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关系。在这点上，德拉沃尔佩的著作干预了辩证唯物主义瓦解的过程。他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Logikals positive Wissenschaft*）首版（1950）中用方法论阐释马克思的路径在出版十年之后才有人作原则性讨论。

用方法论阐释马克思。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消除了思辨上对理性和物质的混淆，这种混淆使物质差异成为逻辑—辩证法矛盾的因素。康德坚持“现实的矛盾”是反形而上学的原则，马克思坚持“对抗”，即各种力量的彼此抵销是反形而上学的原则。不同于康德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却并不导致假设原则上无法认识 524
的外部现实，而是承认这种假设或者概念统一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这种差异性和多元性并非起因于二元辩证法，而是起因于二元推理辩证法，二元推理辩证法通过“实验性判断”把形形色色的物质纳入自己的逻辑结构之中。而《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1950）的结论先声夺人，说出了哈里希（Harich）和林克（Linke）在《德国哲学杂志》1953年开场辩论中所主张的结论（连同它们在Ajdukiewicz 1958 和 Klaus 1959 中的反响，参见 Colletti 1977，第19—23页）。

《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出版时，意共报刊对其置之不理。德拉沃尔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就开始翻译、编选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尤其是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并不在官方马列主义和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书目上。在1956年的危机之后，意共中也跟随出现了斯大林正统观念的危机，导致知识分子退党，这场危机过后，德拉沃尔佩的思想才获得一定的影响空间。阿利卡塔（Alicata）延揽其加盟党刊《社会》（*Società*），在1962年停办之前，德拉沃尔佩派有一些重要文章发表于该刊。正是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德拉沃尔佩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意共知识分子，他们后来几乎

都各走各路（虽然多数人与科莱蒂不同，留在党内）。德拉沃尔佩的思想代表反黑格尔主义立场，科莱蒂主要利用这种反黑格尔主义立场来激进地批判苏维埃的辩证唯物主义，他为列宁的《哲学笔记》所撰写的引论（1958；载于 Colletti 1976，Bd. I）和随后与杰拉塔纳（Gerratana）的通信是 1962 年大辩论的序幕，在这场辩论中，德拉沃尔佩的追随者和历史主义者争论马克思的方法、矛盾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Cassano 1973）虽然这场辩论不分胜负，但长期看来，它是德拉沃尔佩主义的十字路口：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理论统一在这些争议点上渐渐分崩离析。

德拉沃尔佩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以及实证具体性给不同的阐释路径提供了空间。是“实践”还是“现实”、“经验”还是思维的语义形态？（Fraser 1977）在马克思的科学抽象问题上，从现实出发这一前提与思维从简单到复合的途径相融合，把具体性再现成观念的具体名词。（Prestipino 1979）因此，德拉沃尔佩的循环法（“抽象—具体—抽象”）是不恰当的。因而，也有人责难它用自然科学来论证社会科学。（Badaloni，载于 Cassano 1973，第 181 页）但德拉沃尔佩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中就不把事实（Datum）称为实证事实（Faktum），而是称为成问题的当下。成问题的当下根源于历史前因，历史前因以有助于解释当下并解决当下的特殊问题而有别于“年代先例”。（O VI，第 273—274 页）对马克思主义作特定的抽象是历史抽象，因实践有变而失效。德拉沃尔佩就这样维护了唯物主义原则，但是在概念形成的形式中，有些东西又从他所反对的事物中再次回归了：代替历史哲学的历史主义的是“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后者倾向于把历史还原成社会实验场，把历史行为还原成认识。按他自己的描述，他的“逻辑—历史法”提供了一种“基于推理的历史”（histoire raisonnée）。（O V，第 237 页，德文译本 1975 年，第 100 页）

美学（《趣味批判》[*Kritik des Geschmacks*]，1960）开辟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它阐明了逻各斯中语义本质的基础前提（IV，第 286 页），并把这种前提准确表达为思维和言说的相互依赖。认识论化为了语义学。德拉沃尔佩身为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创造性地研究了索绪尔和哥本哈根语符学。虽然他低估了语言学价值概念的重要性（参见其翻译理论和对诗歌中语音元素的拒斥），但他还是把语言（*langue*）系统学用来纠正了唯心主义的表达理论。他几乎没怎么关注莫兰西，却与其类似，把日常语言看成学术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原料。然而，他的经验主义/心灵主义也在这点上妨碍着主导权论：学术语言、艺术语言和

525

日常语言被理解为精神内容的语义—技术样式，而不是矛盾的实践模式。（Modica 1978）

政治理论。这个理论把作特定抽象的方法和“逻辑—历史前因”的方法用于现代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导致拒绝德拉沃尔佩称为“减损的自由”（libertatcs minores）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而是导致在“更多自由”（libertas maior）中实质性实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的祖师爷是卢梭，他的人民主权不能被代表的原则消灭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传统中的形式主义。使得卢梭有别于其他契约论者，并使他能与马克思，以至与列宁一脉相承的地方在于，他坚持权威要民主平等，坚持权威要超越个人自由权利和资产阶级财产。德拉沃尔佩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未充分利用的这种平等是一个后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历史前因”。

526

这种理论，特别在1956年危机之后，为填补意大利社会主义方式的内容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强调民事权利和民主政体的政治制度之间具有连续性，这是为意共的议会政治策略作辩白，而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旨在恢复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这种连续性。陶里亚蒂估计，意大利宪法（在首条中把共和国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可能成为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基础，这就与德拉沃尔佩的愿景趋同，即逐步合宪地实现个人报酬（劳动）的“逻辑—历史前因”，借此把“有产者”的资产阶级民主转型成“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O VI，第278页）

德拉沃尔佩在政治上持专注于议会制度的渐进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把国家理解成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形式。正是国家通过压制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并创造了平等的条件。援引苏维埃宪法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合法性这一问题，苏维埃宪法在维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减损的自由”的情况下，在劳动群众的权威中实现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德拉沃尔佩由此把葛兰西的完整国家归约成法律—政治形式，排除了关于国家主导权的所有中心主题：阶级、党派、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些问题。

N. 默克为德拉沃尔佩的立场辩护并在自己的哲学史著作（参见1968）中对其加以发展。在围绕电影符号学的讨论中，美学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穆索里诺对其加以延展（1971）。切罗尼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参见1976和1982），其前提是德拉沃尔佩的认识论，这就把德拉沃尔佩的政治理论与下层的政策元素结合了起来。切罗尼认为工人在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的组合中实现了自治，这种组合依旧依靠国家制

527 度。在围绕这种政治中介的讨论中，他阐释了历史妥协和意共党内关于历史妥协的后续讨论。（1978，第109—134页）

参考文献：

G. Della Volpe, *Opere* I-VI, hgg. v. I. Ambrogio, Rom 1972/1973; dt. Ausgaben: *Für eine materialistische Methodologie*, Berlin/W 1973; *Rousseau und Marx. Beiträge zur Dialektik geschichtlicher Strukturen*, Darmstadt-Neuwied 1975; *Kritik des Geschmacks*, Darmstadt-Neuwied 1979; K. Ajdukiewicz, *Abriß der Logik*, Berlin/DDR 1958; F. Cassano (Hg.), *Marxismo e filosofia in Italia 1958-1971*, Bari 1973; U. Cerroni, *Introduzione alla scienza sociale*, Rom 1976; ders., *Crisi del marxismo?*, Rom 1978; ders., *Logica e società. Pensare dopo Marx*, Mailand 1982; L. Colletti, »Introduzinoe ai quaderni filosofici di Lenin« (1958), in: ders., *Il marxismo e Hegel*, Bd. 1, Bari 1976 (nicht in der dt. Ausgabe: *Hegel und der Marxismus*,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6); ders., *Ideologia e società*, Bari 1970; ders.,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7; J. Fras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oughts of Galvano Della Volpe*, London 1977; G. Giannantoni, »Il marxismo di Galvano Della Volpe«, in: *Critica marxista*, 1974, Nr. 6 und 1975, Nr. 1; G. Klaus, *Einführung in die formale Logik*, Berlin/DDR 1959; N. Merker, »Galvano Della Volpe als Theoretiker des Marxismus«, in: Della Volpe 1975; ders., *Die Aufklärung in Deutschland* (1968), München 1982; M. Modica, *L'estetica di Galvano Della Volpe*, Rom 1978; R. Musolino, *Marxismus und Ästhetik in Italien* (1971), Dresden 1977; G. Prestipino, »La scuola di Galvano Della Volpe: Filosofia e concezione dellostato«, in: *Critica marxista*, 1971, Nr. 4, 49-69; ders., »I valori etico-politici e il metodo di Galvano Della Volpe«, in: *Criticamarxista*, 1979, Nr. 3, 15-43; K. Priester, *Studien zur Staatstheorie des italienischen Marxismus. Gramsci und Della Volpe*, Frankfurt/M-New York-Berlin/W 1979; M. Rossi, »Galvano Della Volpe: Dalla gnoseologia critica alla logica storica«, in: *Critica marxista*, 1968, Nr. 4/5, 165-201 und Nr. 6, 89-124; G. Vacca, *Scienza, stato e critica di classe. Galvano Della Volpe e il Marxismo*, Bari 1970.

吕迪·格拉夫（Ruedi Graf）撰
朱更生译，李牧今校

参见：

abstract/konkret, Antagonismus, Aufhebung, Ausdruck, Bedeutung, Demokratie,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theorie, Frühschriften, Hegelianismus, Hegelkritik,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Historismus, Liberalismus,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arxismus-Leninismus, Methode, Moment,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Sprache, Widerspruch

民主（民主主义）（Demokratie）

A: dīmuqrāṭīya. – E: democracy.

F: démocratie. – R: demokratija (демократия).

S: democrácia.

“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MEW 1，第 231 页）这些加了着重标记的关于民主的评论，是马克思于 1843 年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及在研究黑格尔哲学中的“谓语同主语的颠倒的关系”时提出来的。早在其《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Debatte um die Pressefreiheit*）（MEW 1，第 28 页及以下，第 50 页；MEGA I. 1，第 121—122、143—144 页）中，马克思就把公共意志的形成视为对抽象普遍性的平衡，并由此阐明了他关于民主的最初的一些想法。（参见 Demirović 1988，第 849—850 页）但正是他对黑格尔国家哲学观的批判性研究才令他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的批评所针对的是，现实的主体，即单个的人，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普遍“神秘”实体的谓语。（MEW 1，第 224 页）实际上，普遍物只是作为单数而存在的东西的特征，而真正的主体总是有限的。对黑格尔来说，单个的人是国家存在的从属的和主体的形式，而“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第 231 页）。照此来看，马克思想从理论上把一切政治制度都归因于它们的现实的人的起源。同时，他还想让现实的国家从属于人的各种需要，揭掉它具有不依赖于其作为经验个人工具的功能的独立自主价值的外观。民主的口号是改革国家，使之成为人的工具，因而也就是对政治制度的利用。一个国家，只有当它就是自己存在的形式，而不是一个和它自己疏离的团体时，才是一个现实的国家。

在马克思眼中，黑格尔哲学认可这样一种骗术，即说国家是公共福祉的化身。虽然马克思同意黑格尔的论断，即社会生活分裂为两个独立的领域，也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作为各种歧异而特殊的利益的复杂总和，刻画了个人在其中勉强维持他们的私人生活的经验日常的特征，而人则作为国家公民参与国家的制度现实。不过，黑格尔的观点是，市民社会的支离破碎在更高层次的国家意志中找到了它的解决办

法。与此相反，马克思提出，两个领域的分离虽然确实存在，但综合起来却是不可消除的。由这一点出发，他进一步指出，可以这样来说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基本矛盾：政治国家作为市民社会对自身的抽象，将会退回政治社会的统一之中。（参见 MEW 1，第 275—276 页）

对黑格尔“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批判使得马克思把民主视为从现实的主体出发的政治现实。尽管他在规范的层面上指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神秘化背景，但他在此基础上继续指出，在一种“民主制中，国家制度在这里毕竟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构成］国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MEW 1，第 231 页）。民主指的是统一的社会整体，这个整体不应再被区分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而应当构成政治社会的统一体。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民主是“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同上）。

然而，在消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之后，应当怎样完成对普遍事物的讨论和决定呢？从下面的这些话里，我们可以追溯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国家的普遍事务就是国家的事务，是作为现实事务的国家。讨论和决定就是有效地肯定国家是现实事务。因此，全体国家成员同国家的关系就是同他们的现实事务的关系，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社会存在就已经是他们实际参与国家。他们不仅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且国家也是他们的一部分。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有意识的一部分，就要有意识地掌握它的一部分，有意识地参与它。”（MEW 1，第 323 页）

据此，对马克思来说，社会存在和对国家制度化的现实参与是同一个意思。不过，这并没有回答民主形态塑造的过程如何具体进行的问题。对民主的社会组织问题缺乏考虑的麻烦，在他写下如下这些话时仍显得很棘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代表机关的立法权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第 325 页）恩斯特·米夏埃尔·朗格（Ernst Michael Lange）问道（1986，第 113 页），马克思在保留非代表形式的立法职能时——且不管这种职能是如何组织的——怎么会没有看到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威胁呢？马克思关于立法职能必然要“稳定化”的提示 530
留给人们的，确切地说，乃是束手无策：“立法的职能是一种不表现为实践力量而表现为理论力量的意志。在这里，意志不应代替法律起作用，它的作用在于发现和拟定现实的法律。”（MEW 1，第 325 页）由于认为法律是某种可以发现的事物，青年马克思以特有的方式让自

已同普赫塔（G. W. Puchta）的概念实证法学理论和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 Ihering）早期的自然历史法学派理论发生了联系。

随着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内，马克思深化了关于国家和社会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的认识。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阐述了他对国家公共职能问题的看法。在这里，巴黎公社以特殊的方式表现为一种能够保障人民自我统治的民主制典范："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MEW 17，第 543 页）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 336 页）。与此相反，公社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适合社会共和国的组织形式。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第 339 页）。对马克思来说，重点不是要废除承担作为社会的政治决策中心职能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他在委员会制度中发现了人民监督的有效行动形式和组织形式。他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剥夺了社会的公共职能，以便接下来把这些职能安排进统治阶级的工作。"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第 340 页）

马克思希望国家的那些起压迫作用的职能消失，而单单把"合理的职能"保留下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写道："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MEW 19，第 27 页）恩格斯借用圣西门勾画的未来图景，将这些思想概括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取代对人的统治。（MEW 20，第 262 页）不过，就此而言，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安排以便为这个社会自治过程提供结构保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从受压迫的市民社会中获得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得到宪法效力担保的参与形式并且——从利益导向的目标中解放出来——将其作为探查需要的民主形式而首先在社会领域展开，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531

在其著作中的多个地方，马克思似乎仅仅把民主共和国视为市民社会的最后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形式的基础上，阶级斗争将决出胜负；与此相应，

他似乎还提出了一种同民主的法治国家制度的更为工具性的关系。因此，尤尔根·哈贝马斯批评他“未给自由的制度化留下只言片语”，就此而言，“他关于为‘过渡阶段预先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想象”还远远不够。（1990，第179页及以下，第190页）

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专政”概念表明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1852年，他在一封信中将其理论的要义概括为如下几句话：“（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MEW 28，第508页）需要认清的是，马克思不是在国家法的一规范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学的一分析的意义上使用专政概念的。（参见 Seifert 1981）在这个语境下，专政只是意味着，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后者又会向着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方向前进。由于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统治实质上是通过国家来体现的，所以他指出，“过渡阶段”的国家就是“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MEW 19，第28页）这种说法并不包含对阶级统治在其中得以实施的国家法形式的理解。因此，恩格斯才会指出，“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定形式”。（MEW 22，第235页）

显然，马克思对民主问题的态度有点模糊。所以，作为一个没有被异化的社会的组织原则，“对物的管理”这一惯用概念把预想的对民主式冲突调节的需要压缩为社会成型过程中的一个无法测度的量。但无论如何，它还是提供了一些积极的、解放的理论萌芽，正如从他对于公民权利和基本权利的态度中引申出来的那样。这尤其适用于罗莎·卢森堡和恩斯特·布洛赫的构想。他们已经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必要通过固定的协商对统治权进行监督；他们还致力于从理论上寻求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即在组织集体意志形成过程中，当出现有争议的决策时，协商式的参与应当采取何种形式。

卢森堡直截了当地抨击了列宁的看法。她写道，无产阶级专政“涉及利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要取消民主”（GW 4，第363页）。她还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中更加明确了社会的民主组织的必要性。关于这一点，她写道，通过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逐步地为将来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准备条件，可以说这就是国家对于社会的职能的复归……。而且，马克思无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工人首先就是要在其社会生活过程中自觉地干预‘社会’”（GW 1/1，第395页）。

布洛赫在《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1961）中提出了一种源自马克思的理论并遵循古典天赋人权基本原则的新社会的调节结构。在这个新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将根据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主导思想来塑造，并通过民主秩序在主体的自我组织中寻找回应主体需要的答案。“在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消失，斗争权利非但不会变
533 得稍逊活力，反而会变得更加积极：它们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在团结互助的目标框架下的严格实事求是的、实际干预的批判权利。据此，社会主义的团结互助意味着，拥有人权的人不再是自私自利的个人，而是社会主义的个人。根据马克思的预言，这些人‘自己特有的力量’已经转化成为社会—政治的力量。这样一来，来自抽象—道德的彼岸的公民——他们还生活在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便被召回社会化的人性的此岸。”（GA 6，第 204 页）

布洛赫坚信，即使在一个从资本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里，仍然需要对个人之间的交往形式的民主调节。而且，这样一种调节产生的条件是，把源于天赋人权的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团结的需求作为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基本规范（这些规范把人权和基本自由作为法律规范的塑造媒介来参考）与源于经济关系批判的、对结束剥削和生存困境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规定方向和目标的、起调节作用的、批判的规范统一。

参考文献：

E. Angehm, G. Lohmann (Hg.), *Ethik und Marx. Moralkritik und normative Grundlagen der Marxschen Theorie*, Königstein/Ts 1986; E. Bloch. *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Frankfurt/M 1961; A. Demirović, »Marx und die Aporien der Demokratietheorie«, in: *Argument* 172, 30. Jg., 1988, 847-860; O. K. Flechtheim (Hg.), *Marx heute*, Hamburg 1983; J. Habermas,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90; E. M. Lange, »Verein freier Menschen, Demokratie, Kommunismus«, in: Angehrn/Lohmann 1986, 102ff.; J. Seifert, *Karl Marx und die Freiheitsrechte*, in: Flechtheim (Hg.) 1981, 203ff.

哈特穆特·瓦格纳 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lltag, Antizipatio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recht,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Gesetz, Gewalt, Kommune, Mehrheit/Minderheit, Menschenrechte, Moral, Öffentlichkeit, Pariser Kommune, Parlamentarismus, Pressefreiheit, Rätekommunismus,

Rätesozialismus, Recht, Repräsentation, Selbstverwaltung, Staat, Trennung. Unterdrückung, Verfassung, Verwaltung, Volk, Zivilgesellschaft

534 民主 / 无产阶级专政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A: dīmuqrāṭīya/dīktātūrīya brūlītārīya.

E: democracy/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 démocracie/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R: demokratija/diktatura proletariata (демократия/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S: democracia/dictadura del proletariado.

1.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后来被描述为向着帝国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德国工人运动取得政治成果，（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的威胁得以解除；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开始朝着帝国主义发展。这些迫使工人运动及其理论家重新反思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的关系。随着公认的权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895 年逝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各种立场之间的对立迅速爆发了。

1896 年，爱德华·伯恩施坦（Edward Bernstein）在《新时代》上发表的系列文章《社会主义问题》（*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Eigenes und Übersetztes*）拉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在这些文章及其出版于 1899 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中，伯恩施坦从形势的新发展中推导出一个完整的“宝库”，反对在迄今的基本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在这里，他主要反对考茨基所持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小企业的失败，小企业将受到巨型大企业的排挤，生存面临着愈来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将导致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从中无疑将会推导出工人阶级必须争夺政治权力的结论。这种观点是 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的基础。

在 1898 年 10 月写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一封信中，伯恩施坦提出，他反对这样一种见解，即“我们面临指日可待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应该根据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来确定自己的策略**”（1899，第 V 页及以下）。尽管否认了小企业破产的自然必然性，但伯恩施坦另一方面又以民主的不断发展为出发点。民主对他来说，是“**工人阶级就其智力成熟程度和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有多大能力实行自己的统治，民主就在多大程度上是**

工人阶级的统治”（同上）。伯恩施坦反对暴力文化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他看来，民主是一种社会状况，“在其中任何阶级都不能享有同整体对立的政治特权”。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它“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即使它还不是阶级在事实上的消灭”（第 35、126—127 页，第 122 页及以下）。显然，伯恩施坦的出发点是，由于经济矛盾的缓和，在现存政治秩序的范围内进行斗争是唯一可能的同时也是唯一有望取得胜利的道路。

考茨基在同伯恩施坦的主张进行的论战中，主要把精力集中在经济领域，并为自己的“崩溃论”进行辩护。他的著作《土地问题》（*Die Agrarfrage*，1899）侧重于证明大企业在农业领域也占有优势。在其同年出版的著作《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Eine Antikritik*）中，考茨基针对伯恩施坦的攻击，捍卫了辩证法、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作为变革的前提的生产力的成熟（根据恩格斯观点）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在政治领域，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分歧不太严重。考茨基早在 1893 年就写道，暴力，特别是军事上的暴力，有可能占据上风，但经济的、立法的和道义上的压制更有可能取得优势。“在有着稍许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前进运动的特点，既不是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时期所获得的那种惊人的胜利，也不是它所遭受的那种惨重的失败。”（这些论述在 1909 年被逐字引用：参见 *Der Weg zur Macht*，第 44 页及以下）

在民主理论这一领域，真正的争论是由罗莎·卢森堡——这位跟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不同的另一代人——在其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9 年）中发起的。她主要反对的是伯恩施坦关于民主将不断向前发展的观点。她指出，“在他看来，正如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一样，民主制是一般历史发展的巨大的基本规律”（GW 1/1，第 422 页）。与此同时，她可能是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化作出批判性反应而不是仅仅捍卫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第一人。各个阶层人民参与政治生活，即作为民主成果的“人民国家”，虽然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但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创立了各种政治形式，“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可以给它充当跳板和支撑点”（第 432 页），而民主制，正如她后来写的，将使得国家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Dem Andenken des »Proletariat«*，1903，GW 1/2，第 318 页）。

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最终是无产阶级的自决。因此，早在 1904 年，她就反对受到列宁称赞的工厂纪律。她尤其反对对群众采取家长制作风："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Organisationsfragen*，1904，GW 1/2，第 444 页）她主张整个无产阶级的专政，并认为可以把利用民主制度作为达到这种专政的手段，但在 1905 年俄国革命之后，她愈来愈倾向于大规模罢工的办法。（GW 2，第 153 页）因此，卢森堡反对党的机构的官僚主义，主张保持"组织核心和人民群众之间生气勃勃的血液循环"（GW 3，第 252 页，参见第 40 页）。

2.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关于无产阶级民主不断发展的一切猜想成为泡影。资本主义的矛盾，包括民族主义的力量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整合力，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卢森堡和列宁在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中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了确证。在反对沙皇统治及其盟友的斗争中面临的问题不是选择民主还是反动，而是选择战争还是革命。（GW 4，第 111 页及以下）不过，革命的先决条件是在俄国最先形成的。在那里，人民除了世界大战的负担之外，还要承受沙皇制度、大地主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痛苦。在准备俄国革命时，列宁的民主观发挥了决定性影响。

列宁认为，在沙皇统治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高度集中的政党是绝对必要的。相对于机会主义者的民主主义原则，官僚主义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Ein Schritt vorwärts*，LW 7，第 400—401 页）与此同时，他还想给 1905 年俄国革命打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主要求的印记。"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Taktiken*，1905，LW 9，第 102 页） 537

在列宁眼中，农民的革命潜能第一次赋予俄国无产阶级越过资本主义通向民主革命的可能。（参见 LW 10，第 79—80 页）民主对他来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利益的实质性问题，而不是民主制度问题。革命的胜利"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LW 9，第 44 页）。大半年后，关于这个阶段的阐述变得更加坚决果断了。专政被定义为"不受限制、不顾法律、依靠强力（就这个词的最直接的意义讲）的政权，这就是专政"（LW 10，第 241 页）。对列宁来说，革命的

民主性质取决于多数人即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取决于他们的亲身参与，而不是取决于特定的形式，更谈不上资产阶级议会制形式了。这种观点应归因于即将垮台的沙皇统治的性质以及从战争向内战的过渡。

这些思想也确定了关于革命胜利后的政治秩序的看法。其榜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模式而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在《四月提纲》（April-Thesen）中，列宁主张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废除警察和军队，使一切官员的薪资不超过优秀工人的平均工资。权力不是来源于法律，而是直接的接管。这样的一个国家已经不再是本来字面意义上的国家。（LW 24，第 4—5、22—23、71 页）在革命前夜写成的《国家与革命》中，这个构想又被详细改写。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果无非是“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LW 25，第 474 页）；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在用武力扩大穷苦人的民主的同时限制资本家的自由，因此，这里也适用这样的原则，即“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第 475 页）。

538 革命刚刚结束时，在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被证实是绝对必要的。1918 年 4 月，列宁提出了一份纲领，拟定用国家的行政命令、国家所有制连同最严格的簿记和监督来取代市场的基础力量。他主张“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LW 27，第 259 页）。革命的辩证法、个人斗争的辩证法、因战争而变得衰弱而残破的国土、抗击内外敌人导致了权力的极端集中，大大压制了苏维埃政权进而压制了方兴未艾的人民自治的进行，逐步赋予新生国家那种由列宁在俄国的条件下多次指出有必要实施的“不顾法律的统治”，这种统治不仅针对资产阶级，而且针对同资产阶级并肩作战的一切阶级。

革命的胜利及其反响，即奥匈帝国和德国日益激化的对立，促使考茨基发挥了他的理论影响力。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形势下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恰当的，但仅限于在这样的形势下。与此相反，他试图证明，把这些措施套用到西欧是危险和无意义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对立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两个派抱着同样的目的，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Die Diktatur*，第 28 页及以下）然而，只有民主的手段，才可能达到这个社会主义的目标。

考茨基真正的愿望是向那些朝左转的德国工人证明——尽管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继续沿着德国党开创的道路前进将一如既往地必要，而且

最重要的是，这条道路必将获得成功，因为“无产阶级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民主的进步也是不可阻挡的，因为这种进步产生于同样的经济根源，即大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不断进步”（同上书，第71、39页；1921，第27页）。1927年，考茨基宣称：“资本家在经济上变得愈来愈强大，而无产者在政治上变得愈来愈强大……。虽然资本的经济权力不断增长，但西欧大国即英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几乎独占了国家权力。”（第578页）

539 对于考茨基来说，民主就在于“一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平等”。这种平等受到官僚制的威胁，但普选权和议会的监督提供了制衡的手段。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来说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可惜的是，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他对这种专政的构想是什么样的。“从字面上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当然，从字面上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Die Diktatur*，第65页，第39页及以下，第48、47页）三年后，在同托洛茨基的论战中，考茨基宣称，基于各种原因，“不要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1921，第84页）。

考茨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一如既往地占据着的重要地位鲜明地体现在，列宁尽管工作负担极其繁重，还是立即在《真理报》上对考茨基这本论述专政的书作出回应。（参见LW 28，第94—103页）这里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在内战战火重燃和世界大战仍在持续的条件下，如何保卫新生的俄国政权。列宁呼吁西方进行革命，因为在他眼中，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俄国政权的长期存续提供保障。考茨基所说的截然相反的两种办法，即民主和专政，都遭到了他的拒绝。“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对比、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对比的问题。”只要各个阶级还存在，就谈不上“纯粹民主”，而只能谈论阶级民主。重要的是民主的实质，而不是民主的形式，但其实质就是阶级性。（LW 28，第230、240页）这引起了对形式法学观的严厉批判。由此，列宁很快就利用了考茨基关于专政的“字面”含义的话，并结合自己早期的思考把专政定义为“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第234页）。

把一切政治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哪个阶级的专政？**从而把无产阶级民主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把资产阶级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的著作中就是这样安排的。在俄国内战的条件下，这个问题表现出其最为激化的形式。然而，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列宁的著作也还是多次提及消灭国家权力的目标，并进而达到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540 因此，“要吸收劳动者的群众组织，使其经常地和无条件地参加国家管理”（LW 28，第481页）。

列宁看到了实质和形式之间的矛盾，却未能详细阐述这一点。尽管他意识到了问题，甚至谈到了问题难以解决的悲剧，但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还是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从暂时的、痛苦的必然性提升到历史成就的行列。1919年，在和考茨基的争论中，托洛茨基声称，强迫劳动是创造性的，或许可以说，人是相当懒惰的。劳动义务原则已经取代了自由择业原则：“工人根本不跟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他对国家负有义务，并**全面从属于它**，因为国家就是存在。”（*Terrorismus*，第117—118、109—110、113、141页）

罗莎·卢森堡为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特别是为其试图把困苦变成理论上的美德，而感到深深的忧虑。（GW 4，第363页）在她看来，革命是“世界大战的最强有力的事实”（第332页），但她还是（在一本后来才出版的著作中）主要批判了限制甚至广泛消灭民主形式的措施。这关系到制宪议会的解散，也关系到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集会权利的取消。“在自由受限的情况下，国家公共生活之所以如此可怜、如此贫乏、如此僵化、如此徒劳无功，是因为把民主排除在外后，一切精神富足和进步的活的源泉也就被堵塞了。”（第360页）专政是必要的，但这里的专政并不是指少数政治家的专政，而是指工人阶级的专政。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森堡也看到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必要性。托洛茨基曾写道：“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从来都不是形式民主的崇拜者。”卢森堡回应道：“诚然，我们也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第363页）“我们总是把社会的实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与形式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表区别开来”，但这不是为了把这些丢弃掉，而是为了用新的社会内容来填充它们。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民主来取代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同上）。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进行了极为深入的争论。他不想质疑列宁的不朽功勋，但他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 541
践，即把“由空前的历史偶然性引起的例外情况”解释为适用于一切革命和国家的原则。（1921，第116页）俄国的苏维埃制度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现。对阿德勒来说，民主要么意味着在资产阶级中得到实现并最终阻碍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意味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胜利才能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1926，第33页）在阶级国家里，只可能存在政治民主。在

人民统治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才是可能的。（1921，第126—127页）因此，对他而言，政治民主由于始终是一种阶级统治形式，没有专政是绝无可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完全不再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物。尽管它还是以政治民主的形式存在，但它已经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资产阶级专政。”（1921，第191页）然而，跟布尔什维克的看法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是让变为多数的工人阶级取得政治权力。“这种专政就是民主专政。”（1932，第76页）

阿德勒在委员会的作用中发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关键区别。委员会首先应当承担监督行政管理的职能，使官僚服从自己，并最终代理国民议会。（1919，第39页）1926年，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林茨代表大会上，阿德勒关于把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纳入党的纲领的要求没有实现。对此，奥托·鲍威尔从另一方面阐述了他的看法：阿德勒“出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防止歪曲共产主义的原因，希望把这个概念纳入纲领，然而，这可能在公众那里引起概念混乱”（WA 5，第423页，参见第415—416页）。1927年，在党的维也纳代表大会上，鲍威尔补充说，承认专政会导致农民向右转。“在俄国，工人和农民结盟的尝试恰好可以通过专政来实现。在奥地利，工人和农民达成谅解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在专政的基础上。”（第485页）鲍威尔把通过纯粹“民主的手段”获得政治权力看作直接的任务。“暴力只能充当防御性手段。”（第410、418页；也可参见 Katsoulis 1975，第270页及以下）

3. 在1924年之前的几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的战后革命危机走向终结。显然，苏联将在较长而又不确定的一段时间里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处于被孤立和隔绝的状态。列宁和其他许多人关于在西方发生一场革命的期望并没有实现。苏联领导人面临的异常复杂的任务是，为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并由于战争和内战而遭到巨大破坏的国家的生存提供保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并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进攻做好防御的组织工作。围绕苏联发展道路特别是新经济政策而展开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并最终以斯大林设想——最大限度地加速工业化，并伴随以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空前集中——的胜利而告终。

斯大林的著作不久就被抬高为整个苏维埃学术界乃至很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必须遵守的标准。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理论以这些著作的形式发展起来了。它不仅排除了对当

下的理解，而且还同时堵塞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如果说列宁在其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阐明了大量还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那么现在所有的问题表面上都得到了解决。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财富被限定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范围内，即它们在列宁确定的一些问题和继续发展中得以继续，其中尤其是列宁的那些本来应当归因于十月革命及其历史条件特殊性的主张却被接受下来并进而被绝对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Über die Grundlagen des Leninismus*，1924）和《列宁主义问题》（*Fragen des Leninismus*，1926）等著作中，早已忽略了列宁的晚年思想，并援引《国家与革命》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因此，它不是所有人享有的民主，而只能是受剥削的多数人的民主。（*FL*，1947，第44页及以下）

只要把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套用到最简单的公式里，那么在对专政的理解上就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了。从这种观念出发，关于内在矛盾的分析是不可能的，特殊的民主问题也没有存在的空间；现存制度就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等同于无产阶级民主，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群众和自己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以及每一个人的自由问题；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只有不一致，没有一致性，实质和形式的矛盾已经消除，理论不再是策略的前提，而是策略的辩护。 543

一方面，西欧反动势力增长，法西斯主义分别于1922年在意大利、1933年在德国攫取了政权；另一方面，斯大林体制在苏联形成；这些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的一场新争论。1945年之后，东欧看到了通往社会主义新途径的机会。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法西斯的监狱里，试图分析西欧各国的形势及其同俄国发展的区别。对葛兰西来说，关键是在发达的市民社会条件下，“对于社会解放……没有捷径”（Demirović 1991，第44页）。如果“国家被理解为同市民全体［collettività］相脱离的事物”，葛兰西写道，那就“不存在现实民主和现实的民族集体意志，并由于个人的这种消极性而产生多少伪装过的官僚专制的必然性”。（*Gef* 4，H. 6，§ 79，第771页）“只有在大量的个人首创性的基础上才会形成集体意志。”（Demirović 1991，第44页）葛兰西或许发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整合力，然而他却把市民社会看作霸权形成领域和政治权力的基础。这意味着要争取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领导权（霸权），

作为赢得政府权力的前提。（Heuer 1989，第 257 页及以下）由此，就打开了一个看待机构、媒体、政治的演员和实践形式之整体的新视角。（参见 Haug 1988）

在尽可能地克服了左翼激进主义——其救世主式的宗派主义（messianischer Sektiererтum）——之后，格奥尔格·卢卡奇在一份以《布鲁姆提纲》（*Blum-Thesen*）之名而著称的提纲草案中，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路线转而尖锐反对了社会民主党，但同时又说资产阶级民主是无产阶级最适合的斗争场域，并要求一种民主的专政，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而又同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调和。尽管这份提纲原则上没有被采纳，但卢卡奇却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探索，并提出官僚机
544 构同“民主的社会化”即“公共生活对国家机关的经常性监督”互相对立的看法。（1943，第 412 页）对于卢卡奇来说，关键的是让“国家的—社会的现实和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叛达成极其伟大的和解”之间的“第三条道路”（tertium datur）。（第 414—415 页）在卢卡奇看来，何牙利 1945 年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民主概念使激进的革命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建立了必然的联系。民主必须成为劳动人民的现实统治形式，首先需要真实的直接民主元素。对卢卡奇而言，“人民民主”——正如他后来所确信的——是“从民主中生发出来的社会主义”。（1985，第 188 页）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权利的延续性也会规定未来的社会主义。这一看法见于 1968 年写成但直到卢卡奇逝世很久之后才出版的著作《民主化的进程》（*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中他自己所作的总结。（也可参见 1985a，第 363 页及以下）

在恩斯特·布洛赫那里，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关系也是一个常量：“过去一百年的形式民主产生的影响从今天起已经完全不那么正常了，而是近乎矛盾了。……难怪在自由主义者弗赖塔格（Freytag）和拉伯（Raabe）那里，反犹主义同老金汤，但不可思议的是，一个阶级社会居然能容许这么多的自由和光明，而对它来说，希特勒就像帖木儿（Tamerlan）一样是无法想象的。……自由竞争的原则就足以解释环绕着个体的自由主义光环和环绕着人民权利的民主主义光环了。”（1938a，第 163—164 页）对布洛赫来说，“首先重建资产阶级自由并在其运动过程中推动**实质的、无阶级的**自由是社会革命的一个策略性的目标。……社会主义只有在这样的程度和范围内才能取得胜利，即它把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赢得的自由纳入自身，并接着不懈地改变它的职能，使之成为实质民主，而不是把它取消掉”（1938b，第 202—203 页）。20 多年后，他就一度变得革命化的自然法写道：“消除一切人

与物在其中一起被异化为商品的关系，他们不只是成了商品，而且成为自我价值的否定。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公式，它决定着未来。”（1961，第232页）

对于依循共产党传统的亚瑟·罗森堡（Arthur Rosenberg）来说，发源于莫斯科的国际帝国主义和改革后的社会
545 民主之间的斗争在1923年就已经结束了，结果是民主的全线溃败，首先是在俄国本土的溃败。他把拒绝阶级斗争并借助妥协来寻求平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区分为三种形式：通过大国和帝国政治为这种平衡创造手段的帝国主义民主，通过强权和暴力政治的废除以及和平和自由竞争来为这一点提供保障的自由主义民主，建立在“自由”国家的存在基础上的殖民主义民主。罗森堡把社会民主和这些对立起来。他指出，社会民主虽然保留了私有制的基本原则，但致力于“让劳动群众参与国家统治，并同封建上层和资本主义上层进行斗争”（1938，第322、338页）。

新兴的法西斯主义曾使社会民主党的宪法学家赫尔曼·黑勒（Hermann Heller）越来越倾向于把法治国和专政对立起来。1925年4月，在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次青年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黑勒在和马克斯·阿德勒的争论中，就拉萨尔问题提出了反对否定国家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消除。尽管今天的国家具有阶级性，但德意志共和国仍然是迈向社会主义目标的极为重要的一步。（1925，第532页）黑勒把民主描述为人民的统治，而这种统治就体现在代表人民统治的代表的共同委任及其管理性的、非主权性的职位上。对黑勒来说，关键问题是怎样“才能维持”如今“这种已经陷入极其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种族对立的民主”（1928，第428、429页）。面对着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和“法治国还是专政”的抉择，社会民主只能是指“实质法治国思想向劳动秩序和商品秩序的扩展”（1929，第451页）。

同黑勒的想法相关的是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他把民主定义为“按照其本质，所有人都拥有同等权利参与制定关于共同任务的公共规定”（1975，第26页）。这既涉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同一性，又涉及所有人都拥有同等的机会，包括在经济方面。阿本德罗特由此推导出为联邦德国基本法而斗争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基本法是民主主义者的武器。法律，尤其是宪法，塑造了一种和平秩序，它使得社会各阶级都受到停战状态的约束。尽管这种状态不是阶级和平，但也排除了物质

546 上的暴力："如果发生了物质上的暴力，那么极有可能终结的不只是今天的文明，还有我们自己……。因为在这种物质上的暴力结束以后，更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是敌人。"（1977，第 191—192 页）

奥斯卡·内格特重复了布洛赫的说法。他指出，民主早就"不再是应该去实现的理想：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和被迫处于欠发达状态的国家，民主都已成为一种触及每个人生活实质的日常需要"（1976，第 461 页）。当然，自发的活动需要集中的协调和组织。然而，这却是"人们为之奋斗以及在必要情况下为之自我牺牲的目标，因为已经在这个社会中的他们想知道，符合基本特征的新社会会是什么样的面貌"。和阿本德罗特不同的是，内格特在法治国问题上得出了这样一个成果，即"对于已经固化为冲突调节机制的民主来说"，能够表述其特征的是，实体化的制度和规则需要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效力保障（Bestandssicherung，又译作祖父条款。——译者）。"民主在多大程度上降格为规则体系，在实质意义上被规定的异议就在多大程度上归结为形式上的、方法上的干扰元素。"（1974，第 208 页）

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cnkel）从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帝国的历史中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在这个共和国的最后一年，他还写道："如果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交替掌控国家机器，那么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政治过程基本上哪怕一丁点的东西都改变不了。"魏玛共和国是开明的发达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形式，"它不是要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个极端，……而是要减轻它们的对立"。弗伦克尔提出了辩证民主的理想，指出这种民主只要为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的存在提供保障，它就有可能实现。（1932，第 148 页及以下）多年以后，他又把多元主义观念的基本设想定义为，如果人们追求并且达到了一种客观上满足了公正社会秩序的最低要求并且主观上也没有被任何一个重要的团体视为强加的东西的平衡，那么共同福祉就是"从当时的经济力量、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平行四边形中产生出来的"结果。（1968，第 28 页）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分别于 1968 年和 80 年代中期再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提出了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民主统一起来的任务。一个社会只有"消灭了一国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活的源泉，并继续前进，直至清除一切已经丧失其合理性的压迫工具……"，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存在。"这意味着向一切人开放自由和民主权利。"否则，"社会主义的蓝图"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为没有民主及其发展的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Aktionsprogramm der KPC*，1968，

547

载于 Bernbach/Nuscheler 1973，第 274—275 页）

在苏联，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的计划一年比一年激进。自治不应当再遵循国家的指示，而应当补充和监督国家。积极影响整个政治体系特别是国家机关的工作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转变政治文化的要求愈来愈急迫。就像曾经的人造卫星（Sputnik）这个词一样，公开性（Glasnost）和经济改革（Perestrojka）这些词也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惯用语。凭借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观点多元主义，公开性即大众媒体的功能的不断扩展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自治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随之而来的是“民主调查机制以及所有阶级和社会群体的民主的利益和意志形成机制连同自治的表决和实现”（Gorbatschow 1988，第 66 页及以下，第 39 页及以下）。应当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在权力分立上和自由主义法治国家是一样的，但又和后者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那就是，“人民……参与所有领导过程。如果我们朝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前进并试图让自己接受这种自由主义的‘价值’，那么这就是一场倒退的运动”（Gorbatschow 1988，转引自 Haug 1989，第 450 页）。

随后，苏联陷入了愈来愈急剧的变革漩涡；公开性变成了政治生活的固定特征，经济出现衰退。最终，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向资本主义过渡成了主导政策。

4. 虽然社会主义在东欧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并非注定是要发生的，但却是无能的苏维埃型体制的必然结果。这种体制是将国有财产予以真正的社会化，并伴之以相当于或者高于资本主义的效率以及经济和政治民主化。它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没有失业、没有经济危机、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平等、广泛消除了实质贫困的社会。与此同时，愈来愈显而易见的是，这套秩序虽然满足了特定的一些需要，但愈来愈不利于满足那些在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新需要。尤其是在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方面，它的劣势也愈来愈突出。 548

国家垄断型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迅速废除国家的看法是危险的错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国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社会的国家化达到了高潮。这一政权的基础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官僚制变成威胁政治体制的主要危险。随着中央创新能力的下降，国家陷入了停滞，民众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事实证明，国家的优势并不能取代私有制的优势。

革新能力的缺乏尤其要归咎于执政党无改革能力。只要一个政党垄断了国家特别是一个拥有过多权力的国家的领导权，从生产上解决民主问题并发展社会的民主潜能就是不可能的。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缺乏发达的民主，没有提供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

在社会主义崩溃后，主要思潮转向了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利用和改革政治民主的可能性的研究。（参见 Deppe 等，1991，第 55 页及以下，第 34、27、206、213 页）这可以追溯到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关的一些思想。（对此参见 *Argument* 206/1994）这些思想的出发点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家之外发展出了一个广阔的市民社会领域，这一领域必须在一方面反对经济垄断权，另一方面反对国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障和扩大。在这个领域，恰恰有可能在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影响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反对资本的对抗力量。（参见 Cohen，Keane，Kebir）勒德尔（Rödel）、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g）和杜比尔（Dubiel）也在市民社会的发展中看到了回答民主问题的真正途径：当马克思主义者（在此不算葛兰西）在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制度中首先发现了为资本利益而扭曲人民意志的工具时，保守派却把这些制度视为抵御未经过滤的人民意志的堡垒，它涉及一种对政治的理解，“据此，现存制度提供了开放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才能展开人民的民主自治的计划”（1989，第 17 页）。这样一来，民主便不被视为制度化的规范图景，而是被视为一种“不带有方向性的且极为冒险的计划”形态。（第 44 页）

尤尔根·哈贝马斯试图证明，权利即使不是实现其关切——在经济的和国家的权力面前，保护自由和权利平等的对话、不被操纵的公共舆论空间——的唯一手段，至少也是不可替代的手段。法治国家理念被解释为这样一种要求：“把由权力代码来导控的行政系统同具有立法作用的交往权力相联系，并使之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也就是摆脱特权利益的事实性实施能力。”（1992，第 187 页）然而，这个法治国家必须是民主的。它必须不仅为私人自治而且还为意志形成过程提供保障。“没有自治权，就没有民主的实现。”（第 599 页）因而，这里不再涉及所有制关系的改变了，而是仍然停留在“没有征服意图的围攻”（第 626 页）。

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景，提出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公有制和市民社会能够协调一致吗？还是说资本主义是市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代价？这也同样适用于法治国家和权力分立的问题。有着高水平劳动生产率和发达分工的社会，在根本没有国家的情况下，

可能存在吗？民主理论方面的这些关键问题是由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的失败提出来的，对它们的回答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们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全球性危机把人类置于不选择社会主义就要选择野蛮的境地；另一方面，目前还看不到哪些现存的或可以实现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化形式具有击败资本主义的希望。（Fülberth 1991，第 144 页）

550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Demokratie als Institution und Aufgabe«, in: ders., *Arbeiterklasse, Staat und Verfassung*, Frankfurt/M-Köln 1975; ders., Beitrag in: *Der Kampf um das Grundgesetz*, hgg. v. P. Römer, Frankfurt/M 1977; M. Adler, *Demokratie und Rätesystem*, Wien 1919; ders.,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Wien 1921, ders., *Politische oder soziale Demokratie*, Berlin 1926; ders., »Die historische Funktion des Linkssozialismus«, in: *Der Kampf*, 25. Jg., 1932; U. Bernbach u. F. Nuscheler (Hg.), *Sozialistischer Pluralismus*, Hamburg 1973;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E. Bloch, »Demokratie als Ausnahme« (1938a), GS 11, 159-166; ders., »Der Intellektuelle und die Politik« (1938b), GS 11, 198-205; ders., *Naturrecht und menschliche Würde*, Frankfurt/M 1961; J. L.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Amherst 1982; A. Demirović, »Zivilgesellschaft, Öffentlichkeit, Demokratie«, in: *Argument* 185, 33. Jg. 1991, 41-56; F. Deppe u. a., *Eckpunkte moderner Kapitalismuskritik*, Hamburg 1991; E. Fraenkel, »Um die Verfassung« (1932), in: F. Nuscheler und W. Stefanie (Hg.), *Pluralismus*, München 1972; ders., *Deutschland und die westlichen Demokratien*, Stuttgart 1968; G. Fülberth, *Sieben Anstrengungen, den vorläufigen Endsieg des Kapitalismus zu begreifen*, Hamburg 1991; M. Gorbatschow, »Demokratisierung – das ist das Wesen der Umgestaltung, das Wesen des Sozialismus«, in: ders., *Perestrojka. Die zweite Etappe hat begonnen. Eine Debatte über die Zukunft der Reformpolitik*, Köln 1988, 9-87; J. Habermas, *Faktizität und Geltung. Beiträ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M 1992; W. F. Haug, »Gramsci und die Politik des Kulturellen«, in: *Argument* 167, 30. Jg., 1988, 32-48; ders., *Gorbatschow*, Hamburg 1989; H. Heller, »Staat, Nation und Sozialdemokratie« (1925),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 Leiden u. Tübingen 1971, 527-542; ders., »Politische Demokratie und soziale Homogenität« (1928), GS 2, 421-433; ders., »Rechtsstaat oder Diktatur« (1929), GS 2, 443-462; U.-J. Heuer, *Marxismus und Demokratie*, Berlin/DDR-Baden-Baden 1989, ²1990; I. Katsoulis, *Sozialismus und Staat. Demokratie, Revolution und Dik-*

tatur des Proletariats im Austromarxismus, Meisenhain am Glan 1975; K. Kautsky, *Der Weg zur Macht*, Berlin 1909; ders.,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18), in: P. Lübbe (Hg.), *Kautsky gegen Lenin*, Berlin/W-Bonn 1981, 29-77; ders., *Von der Demokratie zur Staatssklaverei*, Berlin 1921;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d. 2, Berlin 1927; S. Kebir, *Gramscis Zivilgesellschaft*, Hamburg 1991; J.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New York 1988; G. Lukács, »Über Preußentum« (1943), in: ders., *Über die Vernunft in der Kultur*, Leipzig 1985; ders., »Über aristokratische und demokratische Weltanschauung«, in: *StF*, 1985(a), H. 2, 361-381; ders., *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 (1968), Budapest 1985; O. Negt, »Rechtsordnung, Öffentlichkeit und Gewalt«, in: H.-R. Buk (Hg.), *Demokratie – Studientexte*, München 1974; ders., *Keine Demokratie ohne Soz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U. Rödel, G. Frankenberg, H. Dubiel, *Die demokratische Frage*, Frankfurt/M 1989; A. Rosenberg,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Amsterdam 1938; L. Trotzki, *Terrorismus und Kommunismus. Anti-Kautsky*, Hamburg 1920; ders., *Verratene Revolution*, Essen 1990; *Zivilgesellschaft, Ethik und Staat, Das Argument* 206, 36. Jg. 1994, H. 4-5.

乌韦-延斯·霍伊尔（Uwe-Jens Heuer）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endroth-Schule, Absterben des Staates, Arbeiterstaat, Bedürfni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okratie,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ritter Weg, Elite, Gewaltenteilung, Glasnost, Hegemonie, Herrschaft, Integraler Staat, Legalität, Marxismus-Leninismus,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Öffentlichkeit, Parlamentarismus, Perestrojka, Rätekommunismus, Recht, Revisionismus, Selbstverwaltung, Staat, Stellungskrieg/Bewegungskrieg, Zivilgesellschaft

民主精神病学
(demokratische Psychiatrie)

A: Ṭib nafsānī dīmuqrāṭī.

E: Democratic psychiatry.

F: Psychiatrie démocratique.

R: demokratičeskaja psichiatrija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сихиатрия).

S: Psiquiatria democrática.

产生于意大利的极端的精神病学改革运动要求精神病人以及其他边缘群体人员完全地重新融入社会，同时这一社会应该朝着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方向发展。在被排斥者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民

主精神病学也看到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那种从特别机构设置中重新带回“普通领域”的“疯狂”应该被视为“传动器中的沙子”起到——对资本的利用不可缺少——被社会普遍期望的，激发对系统中结构性暴力反思的作用。曾经的“特别机构中的病人”重新回归到外部世界中，这完全可以公开地否定这个系统所期望的单一性世界。由此仅仅由于它的存在就会带来对整个系统的质疑。（Basaglia，1968/1971，第367页）

民主精神病学的思想根源有葛兰西的公民社会理念、马尔库塞的边缘群体革命理论、戈夫曼（Goffman）的机构批判思想、福柯对排除疯狂（Ausgrenzung des Wahnsinns）的“非理性”分析，以及英国的反精神病学（Laing 和 Cooper）。巴萨里亚（Basaglia）强调在主导体系中其精神病学研究场景中所存在的必要矛盾：“机构（die Institution）在被我们同时否定与掌管；我们一方面将疾病当作插曲但又在应对它；我们会同时拒绝但又实行治疗性的措施。”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一种新学问的形成”才能解决，“这种新学问——通过否定其本身的机构才能得以扬弃——不再致力于确保统治阶级的价值”。（Basaglia，1968/1971，第364页）

作为**系统性汇总**（*organisatorischer Zusammenschluß*）的民主精神病学于1973年10月8日由佛朗哥·巴萨里亚（Franco Basaglia）以及其他11位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建立。这11位学者中的大部分是巴萨里亚曾经的助手。在此之前，他们曾经试图以一座精神病院——戈里齐亚（Gorizia）——为样本，使其内部保持开放，并取消之前的站不住脚的管理权力（Violenza gratuita——Franca Ongaro-Basaglia，1987），使病人能够参与医疗性的决定（Prinzip der therapeutischen Gemeinschaft，M. Jones，1953），同时将医疗管理的层级设置为小型的、透明的团队以进行去中心化改革。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都致力于使原来被迫沉默的病人有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以及不满，并且第一次使病人作为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体而受到重视。然而精神病院面向内部的开放还是因为走入了死胡同而结束，根据法律规定，病人被允许进入外部世界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常常是不可能的，此外，离开精神病院，相应的关照和治疗的手段都有所欠缺。因而民主精神病学作为系统性汇总为自身设定的任务便是成为精神病人的政治说客，以使法律上和行政上的变革得以实现。

首先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是，民主精神病学成功地动员了一些（其中大多数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主导的区域性政府和议会，促使其在部分城市和省份中，首先是在阿雷佐（Arezzo）、佩鲁贾

（Perugia）和的里雅斯特（Triest）创造替代性的关照结构（Betreuungsstrukturen），特别是工作和住房保障以及门诊式的危机干预中心（ambulante Krisenintervention-
tiouszentren）。在这些省份中设立的精神病院使得病人数量在很短时间内显著地减少了。通过公共运作以及对几乎所有政治性党派 —— 包括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DC）的左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以至极端左翼团体 —— 施加影响，民主精神病学派于 1978 年成功地通过 180 号法案，阻止了精神病院收纳新的病人。在民主精神病学派的设想中，治疗机构中只保留最小规模的床位（少于 15 张
553 床）、门诊式的危机干预中心，而住房以及工作机会都应具备。这种去中心化理念通过 1978 年的医疗改革（第 833 号法案）得到补充，通过改革，能够覆盖五万到二十万居民的地区性公共卫生中心得以设立。这些地区性公共卫生中心拥有自己的、得到市镇和地区财政支持的议事机构。在公共卫生和门诊式的精神疾病关照上，它们可以获得持续性的财政预算，并且它们可以在合理范围内自主决定预算的分配。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的立法措施促进建立了众多替代性精神病的咨询、护理和治疗设施，意大利南部则主要出现了对病人的大规模疏散，但是没有为其提供进一步关照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过于急速推进的改革也造成了困难，由于民主精神病学派在公共领域的运作未能达标，民众准备等着这些数百年以来一直被隔离在收容所中的“疯子”（Verrückten）（Foucault，1969）重新出现。总的来说，在意大利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由民主精神病学派发动的意大利精神病学改革都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在这些地区，改革推动了管理机构、政治家以及企业（部分的）之间的合作与善举。某些精神病院 —— 比如在的里雅斯特 —— 可以完全关闭，病人被疏散到他们的亲属或者某处住所、小型宾馆或者旅店中。但在其他地区却引发了民众大规模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被保守的政治家所利用，用以呼吁修改第 180 号法案。

佛朗哥·巴萨里亚的去世（1980 年）对民主精神病学派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巴萨里亚在不到一年之前刚刚接手了拉丁姆（Latium）大区罗马市精神病学公共服务的组织工作。不同个人和群体在关于取消固定的精神病院的激进程度和速度上的争论变得越来越多。在整个意大利领土上实现精神病院改革的努力也宣告失败。但是内部已经分裂的民主精神病学派的支持者仍然成功地阻止了修订第 180 号法案的努力，而这一修订可能使旧的精神病院模式重新回归。

民主精神病学尤其在瑞士和法国的

当地改革运动中获得了支持，而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当地的改革运动。德
554 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精神病学审查（Psychiatire-Enquête）（*Deutscher Bundestag*, 1975）实质上借鉴了英国式的改革精神病学，但是民主精神病学派在德国却被众多的保守派以及部分改革精神病学家等视为反精神病学，这种等同视之的做法可能是出于无知，也可能是为了更有力地与民主精神病学进行争论。与之相反的是，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会（DGSP）、皮内尔协会（Pinel-Gesellschaft）和“德国—意大利精神健康协会”致力于在德国传播民主精神病学的思想。布兰肯堡—不来梅修道院（Kloster Blankenburg-Bremen）和在居特斯洛（Gütersloh）（K. Dörner）的慢性病患者部门的取消表明，这一思想也在德国的公共服务实践中——即便目前仍处于边缘位置——得到了实施。

参考文献：

Amministrazione provinciale di Arezzo, *Tetti rossi. Dal manicomio alla società*, Mailand 1978; F. Basaglia (Hg.), *Die negierte Institution*, Frankfurt/M 1968/1971; ders. (Hg.), *Befriedungsverbrechen. Über die Dienstbarkeit der Intellektuellen*, Frankfurt/M 1980; ders. u. F. Ongaro-Basaglia (Hg.), *La majorité déviante. L'ideologie du contrôle soical total*, Paris 1976; ders. u. P. Tranchina, *Autobiografia di un movimento 1961-1979: Dal manicomio allo Riforma Sanitaria* (Fogli di Informazione, Psichiatria Democratica, Critica delle istituzioni), Florenz 1979; Deutscher Bundestag, *Bericht über die Lage der Psychiatr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r Psychiatrischen und psychotherapeutisch-psychosomatischen 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Bonn 1975; M. Foucault, *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 Eine Geschichte des Wahns im Zeitalter der Vernunft*, Frankfurt/M 1969; E. Goffman, *Asyle. Über die soziale Situation von psychiatrischen Patienten und anderen Insassen*, Frankfurt/M 1973; Istituto Gramsci (Hg.) *Psicologia, psichiatria e rapporti di potere*, Rom 1971; M. Jones, *The Therapeutic Community*, New York 1953; R. D. Laing, *Phänomenologie der Erfahrung*, Frankfurt/M 1969;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Neuwied-Berlin/W 1967; ders., »Ist die Idee der Revolution eine Mystifikation?«, in: *Kursbuch* 9, 1967, 1-6; F. Ongaro-Basaglia, *Manicomio perché?*, Mailand 1982; dies., »Die psychiatrische Vernachlässigung«, in: W. F. Haug u. H. Pfefferer-Wolf (Hg.), *Fremde Nähe. Festschrift für Erich Wulff*, AS 152, Berlin/W 1987; A. Papuzzi, *Jetzt bringt mir den, der singt. Prozeß gegen einen Psychiater*: Mit Beiträgen von A. Pirella und E. Wulff, Frankfurt/M 1982; Piro, »Entwicklung und Bewährung psychiatrischer Versorgungsformen in Italien«, in: A. Thom u. E.

Wulff (Hg.), *Psychiatrie im Wandel. Erfahrungen und Perspektiven in Ost und West*, Bonn 1990; *Psychoanalyse im Rahmen der DP*, Bd. I und II (Veröffentlich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nalytische Psychotherapie), Zürich-Kreuzlingen 1987; H. Red (Hg.), *Auf der Suche nach dem gemeinsamen Grund. Psychoanalyse und DP im Austausch*, Bd. I, II und III, Zürich 1993; P. Tranchina, *Norma e antinorma. Esperienza di psicanalisi di lotte antiistituzionali*, Vorw. v. A. Pirella, Mailand 1979; E. Wulff, »Zum Tode Franco Basaglias«, in: *Argument* 124, 1980, 862-865.

555

埃里希·武尔夫 撰
蔡廷建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ntipsychiatrie, Geisteskrankheit, gesund/krank, Normalisierung, Wahnsinn

民主社会主义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A: al-ishtirākīya al-dīmuqrāṭīya.

E: democratic socialism.

F: socialisme démocratique.

R: demokratičeskij socializm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S: socialismo democrático.

民主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一方的政治—战略概念。这支力量在1917年后反对带有列宁主义印记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主张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无可消除的联系。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这是1917—1989年分裂的工人运动中共产党一方和社会党一方的分界线。（参见Grebing/Meyer 1992，第29－30页）然而，自从各国原来的共产党把自身重建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这一概念便丧失了其作为派别符号（Schibboleth，又译为士播列。——译者）的含义。

在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民主运动一部分的初期，它还是理所当然地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作为目标的。早在1845年，卡尔·格律恩就曾提到过“民主社会主义”（第82页；转引自Conze 1972，第886页）。1849年，蒲鲁东在其《一个革命家的自白》（*Bekenntnissen eines Revolutionärs*）中写道：“路易·布兰克主张从权力出发的政府社会主义，我主张由人民进行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转引自Sotelo 1987，第443页）在同一部著作中，他提到未来的党是“民主—社会主义党”（1969，第7页）。

最初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正如蒲

鲁东所定义的那样，在历史上曾经既为第二国际的国家主义（Etatismus）也为第三国际的国家主义让路。在国家社会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主义转型战略不再被当作目标之后，曾在无政府主义和委员会民主理论中找到过一席之地的自由派传统后来为民主社会主义的重新提出发挥了重要作用。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关于民主的看法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他们“针对当时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临机作出”反应。（Harrington 1975，第60页）1848年以前，他们就参加了民主运动；恩格斯在1847年这样写道：“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MEW 4，第317页；参见第372、392、502页）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那些年，“年轻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便开始“同古老的穷苦大众的民主分道扬镳了”（Rosenberg 1938，第48页）。随着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农民和小市民的阶级联盟的瓦解（第127页），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分裂了。“民主”概念“走进了有产市民的阵营”（第286页）和资产阶级左翼自由主义的阵营。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描写共和国时涉及农民的状况：“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MEW 7，第84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专政概念的运用涉及的是双方。对此，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 1975，第66页）引用了S. 胡克（S. Hook）1933年的著作，其中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出现国家的地方，总是出现专政。”接下来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甚至最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专政，以致经济财富和富人的权力同一切公民理论上的政治平等相矛盾。”（同上）

556

虽然马克思描述了政治的相对自治（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但并没有将其一般化，他的一位学生——卡尔·考茨基——走向了刻板地重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对承认抽象的民主概念。而列宁能够借助这个僵化的“无产阶级专政”（MEW 19，第28页）公式，推动革命苏维埃国家专断的准合法化。

对于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它并不认为，除了资本主义“崩溃”后的革命期望之外，这种关联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作出的理论构想。直到修正主义论战时，民主问题才成为主题。随着1917年后工人运动的分裂，民主变成首要问题。

在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修正主义论战中，社会民主

党内部互相对立的立场暴露出来。前者宣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Voraussetzungen*，[2]1921，第178页），政
557 治民主是“阶级统治的消亡”（第180页），后者则对“社会的实质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GW 4，第363页）作了区分。在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中，立场的对立达到最激烈的程度。这些观点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内部的渐进主义改革策略、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战胜资产阶级民主的革命策略和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策略之间的区别。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ozialisten- und Arbeiterinternationale*）在其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宣布，社会主义可以“不在压制民主中追求其任务；它的历史任务不如说是使民主得到充分发展”（*Bericht 1920*，第37页）。在（1920年11月4—5日会议的）《对工人宣言书》（*Manifest an die Arbeiter*）中，该组织更加果断地指出，“它将开展斗争‘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奴役，另一方面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暴虐专政’”（转引自 *Protokoll Parteitag Gorlitz 1921*，第45页）。

当那种以前不言自明的东西受到质疑时，它就一定会被突出出来：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也是这样。在1921年党的格尔利茨代表大会上，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Friedrich Stampfer）为社会民主党邀功，说它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拯救出来：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德国拥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拒绝布尔什维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转引自上书，第305页）。接着，他便不加区分地把国家和社会民主党等同起来：“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党属于同一整体。”（同上）

这种实体化的国家观同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合法地位是相符合的：主要由弗里茨·纳夫塔利（Fr. Naphtali）捍卫的经济民主概念取代了针对资本主义崩溃的等待态度。其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看法：可以渐进地、随着公有制经济的扩大而达到社会主义，或者由此准备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在资本主义中贯彻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鲁道夫·希法亭在1927年社会民主党基尔代表大会上如是说，*Protokoll*，第168页）。

作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渐进模 558
式，弗里茨·纳夫塔利的经济民主概念认为如下的民主化步骤是不可缺少的：（1）教育事业的民主化，消灭教育特权；（2）劳动权利的民主化（企业民主）；（3）经济自治团体，同时伴之以国家的预先规定；（4）公共企业、合作社和工会公有制经济的扩大。

如果经济民主的支持者确实看到了“按计划生产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就同劳动分配的社会计划混淆在一起了。（参见 Huster 1977，第 437 页）在资本的阶级政治行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现实中，这种构想破碎了。

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纲领性讨论（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击败资本主义）与各邦和帝国议会的现实政策以及政府的行为之间的裂痕就已清晰可见。这种分歧产生于帝国时期，并且从那时以后，以前被认为是属于同一整体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走向了分裂。罗伯特·米歇尔斯在 1911 年提出了政党形式如何使社会运动适应议会制的问题；尽管他具有经验印象主义的风格，但是他对于他现在“附带”感受到的从前的激进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信念的褪色的描述却一再赢得现实意义。

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分离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察觉了改良主义的失败，它从魏玛共和国即将到来的灭亡，从布吕宁（Brüning）的紧急状态国家（Maßnahmestaat）得出了悲观的结论：“借助民主和议会制的手段，工人既不能掌权，也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保罗·弗勒利希[Paul Fröhlich] 在原则声明中如是说，转引自 Drechsler 1965，第 223—224 页）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相关问题的（徒劳无功的）理论争论中倒向了列宁一边，认可了他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

奥托·鲍威尔的调和尝试。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其著述中所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中间立场。奥托·鲍威尔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确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特权的根源。正如带有鲍威尔印记的 1926 年林茨纲领（das Linzer Programm）中所说的，这种特权“通过他们的经济力量，通过传统的力量，通过报刊、学校和教会使人民的多数处于他们的精神影响之下”（WA 3，第 1022 页）。他称资产阶级民主是“借助资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多数政府而实行的大资产阶级的少数人统治”（WA 9，第 208—209 页）。因此，基督教社会党人（Christsozialen）和大德意志党人（Großdeutsche）都是以“人民党”的面目出现的（WA 2，第 209 页）。

根据鲍威尔的观点，“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作为特权的选举权上的旧时的君主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过渡阶段。在旧时的君主制下，大资产阶级不仅垄断了集中的财产，而且垄断了政治权力；在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劳动人民不仅将拥有组织政府的政治权力，而且将拥有对于集中的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的经

559

济权力，而每一个政府都有赖于这一权力的运转”（WA 9，第 209 页）。

林茨纲领认为如下做法是适当的，即：在遇到资产阶级以暴力方式抗拒社会主义多数派政府时，工人阶级可以“使用防御性的暴力”，以便“用专政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抵抗”。（WA 5，第 448 页）然而，在使用以民主方式取得的国家权力时，应当“采取民主形式的手段并且为民主提供万全的保证”，特别是“要保护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因为“保护各种民主的自由权利首先就是保护无产阶级自己免于这样的风险，即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的统治变成对它的统治”。（第 449 页）

鉴于法西斯主义的经历，奥托·鲍威尔在流亡著作中再度强调了传统模式。彼时，他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Zwischen den Weltkriegen*）中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教条”时说，不可以“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无法调和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专政无非是无产阶级取得的一种既强大又持久的政权，它是以凭借其社会主义的政权变革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国家政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取决于历史状况……”（WA 4，第 210—211 页）。

鲍威尔在他的流亡著作中，基于革命失败的经验，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归于这样一种功能，即“把民主斗争的伟大遗产交给革命的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伟大的遗产交给改良主义……。必须使工人群众懂得，只有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摧毁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统治手段……。它必须在这种历史观下，使民主社会主义的伦理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激情达到更高水平的统一”（WA 4，第 306 页）。然而，鲍威尔并未因此就作出重大转变，即成为想利用民主手段来获取权力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显然，民主是“纯粹的形式；至于这种形式是被填入资本主义的、农民的还是无产阶级的内容，则取决于社会的权力因素”（WA 2，第 346—347 页）。鲍威尔还提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遗留给实体化的革命主体“工人阶级”的重要问题：“如果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能够……让城市和乡村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联合起来，并让工人阶级赢得和它走得近的小农、小市民和知识分子作为朋友，那么社会民主工人党就赢得了多数人民。”（WA 5，第 446 页）

然而，社会民主党从未实现这种同质化。早在 1899 年，罗莎·卢森堡就以另一种形式提出了这一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

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高更牢固。”（GW 1/1，第 400 页；也可参见 N. Leser，载于 Spatzenegger 1991，第 102—106 页）在 19 世纪下半叶由于军事斗争手段的发展——除了 1917—1918 年三个帝国的解体这一例外——革命的期望不是已变得不现实了吗？（参见 Rosenberg 1938，第 104 页）在世纪之交，官僚组织的“活生生的机器”不是已提供了“未来的那种依附的坚壳”吗？马克斯·韦伯对此曾说道：“有朝一日或许人们自己就得像古埃及国家的农民一样被迫无力地去适应它，如果它是一个纯粹技术上的好东西的话，这就是说：理性化的官僚管理和官僚服务是最终的、唯一的价值，这个价值应当决定官僚管理和官僚服务涉及的事务的领导类型。”（*WuG*，第 1060 页）在 20 世纪 20 年代，除了“现代工商业劳动的钢铁般的坚壳”（同上）外，扁平化的大众文化的兴起、不同阶级的利益及其社会环境的差异化限制了社会发展的转型机遇。

56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各国共产党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同的是，社会党国际（SI）于 1951 年 7 月 3 日在法兰克福成立代表大会上宣布认同观点的多元主义：“社会主义是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Ziele und Aufgaben*，第 613—614 页）

为了同共产党政权的专政划清界限，社会党国际宣布：“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完成，而民主制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完全得到实现。”（第 614 页）这个宣言的经济政策部分要求，生产必须是“为人民的整体的利益而计划的”。“这种计划化同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是不相容的。它要求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第 615 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1959 年哥德斯堡纲领（das Godesberger Programm）同样提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不同来源，指出它“植根于欧洲的基督教伦理、人文主义和古典哲学”（Dowe/Klotzbach 1990，第 351 页）。仿效莱昂纳德·内尔松（Leonard Nelson）为伦理社会主义所作的科学辩护，维利·艾希勒（Willi Eichler，1972）也在基本价值中发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正如后来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所列举的那样，这些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Dowe/

Klotzbach 1990，第 351 页）这些基本价值尽管高高耸立在道德理念的云端，但已经统摄了“责任伦理学家”的政治实践。所以，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根据“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只有社会主义才会履行民主”的原则形成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表述：“自由竞争和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
562 的重要因素”（第 357 页），它们使得基本价值从属于市场力量的需要。

民主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础过去和现在都来自于马克思式的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MEW 1，第 385 页；参见 v. Oertzen 1980，第 92 页）显然，这个基础已经意识到了合法的价值观和经济统治结构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禁止像价值哲学那样从“基本价值”中推导政治纲领（同上）。

我们可以把哥德斯堡纲领中的段落理解为为人民利益而计划生产（1951 年社会党国际如是说）的旧要求的微弱的反映：“有效的公共监督必须阻止经济方面的权力滥用。它最重要的手段是对市场主导力量的投资监督。”（Dowe/Klotzbach 1990，第 358 页）

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情况（特别是在 1972 年大选后，可进一步参见 1977），克劳斯·冯·拜梅（Klaus v. Beyme 1975，第 20 页）注意到：“可以这样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它不是要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权，而是要组织成委员会民主的—多元主义的形式。与此相反，要是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仅满足于被些许的国家干预削弱了的市场经济，那就根本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概念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希望从中期的角度把纲领所要求的那种民主的社会福利国家视为历史上必要的妥协，但不想把它宣称为‘社会主义’，也不想超出意识形态的词汇范围而使用‘瑞典社会主义’或‘阿拉伯社会主义’之类的词来称呼自己。”

自哥德斯堡纲领的转向以来，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同资产阶级政党的相应政策不再有原则性的区别。虽然人们从社会主义的、哲学的传统的理论基础（伯恩施坦的复兴、批判的理性主义、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双重策略）出发讨论了改良主义的理念，但并没有在实践中找到途径。对于从哥德斯堡纲领直至社会民主党内阁政策的计划亢奋症的这个时代而言，可以断定的是：“取代那种从趋势上看会危及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危机频发的资本主义的，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名义下提出的一套技术至上的计划资本主义模式构想。据 563
此，资本主义既能够照顾到领薪者的利

益，也有利于政治民主。”（Bergmann 等 1975，第 138 页）

这种对于“社会自由合一的改良主义”来说很常见的社会图景（Fülberth/Harrer 1974，第 17 页）不同于诸如彼得·冯·厄尔岑（Peter von Oertzen）所主张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希望经过颠覆制度的改革而建立另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得以实施的当然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图景”。维利·勃兰特对此曾指出：“尽管在工人运动的早期，社会化构成未来愿景的核心，但到目前为止，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的指导思想却是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干预。”（1986，第 122 页）因此，毫不令人奇怪的是，1977 年社会民主党作家以自我批判的口吻说：“目前还不存在前后一贯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Zur Einfiihrung*，第 16 页）

北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funktionaler Sozialismus）的纲领。这一立场最著名的代表阿德勒-卡尔松（G. Adler-Karlsson）认为，无须对社会进行完全的社会化改造，只对一些所有权职能进行社会化就足够了。他指出，在瑞典，“对所有权没有进行完全的社会化，而只是对我们称之为所有权的一些最重要的职能进行了选择性的社会化。我们已经限制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利，以便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利用他们的财富”（1973，第 46—47 页）。不过，在上述著作德语版的跋语中，阿德勒-卡尔松以一种听天由命的口吻补充说：“我并没有在实践中发现某种更好运行的制度。毋宁说，职能社会主义似乎也是不能运行的。”（第 155 页）

尽管社会党国际在 1989 年称民主社会主义构想是一种“对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世界范围的民主化”（第 3 页），并且就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模糊地指出，“社会对经济的监督却是一个要根据时间和地点而采取十分不同的经济措施才能实现的目标”（第 13 页），但阿德勒-卡尔松写道：“对我来说，针对改良主义的最主要的异议之一似乎是，只要我们允许私人经济生活继续存在，它就会比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能够实施的必要改革更快地造成新的问题。”（第 155—156 页）

564

与北欧和中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其渐进主义转型战略不同的是，“西欧地中海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战略是以同资本主义逻辑决裂的理论为基准的。据此，只有在对关键行业进行法律形式的社会化之后，在建立占主导地位的公共部门并确立有约束力的国家计划指标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另一套唯一可以使用社会主义名义的逻辑”（Meyer 1992，第 27 页）。例如，法国社会党在接管政府之后不久并没有侵夺社会权力，

面是重新定义了概念："现实政策与预先宣告的纲领性构想之间的关联是如此之少，以致法国社会主义甚至被视为被迫改变了话语。在1981年以前，'社会的社会主义转型'一直是关键概念。法国社会主义者今天追溯的核心概念叫作'现代化'。它既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传统，也没有标榜任何特定的社会主义内容。"（Sotelo 1987，第454页）正如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所说的，基于"决裂逻辑"的策略是否由于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而颜面扫地，看起来，在社会民主党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改良模式失败之后，这一点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奥西普·K. 弗莱希特海姆（Ossip K. Flechtheim）批判了带有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对他而言，这个概念是用或多或少的社会政策来装点的新资本主义。（1978，第248页）与此相反，他主张一种继承了"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就这个词的英文意义而言）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人道社会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第249页）他把"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东维埃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改良共产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自由至上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为社会变革的承担者。（第276页）弗莱希特海姆认为，变革的基础存在于上层建筑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各种制度里："在'边缘领域'的解放，比如从家庭开始，经过学校、艺术和科学，到司法等领域，也会有助于培育新人类，然后这些新人类也会更成功和更自觉地克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剥削与压迫。"（第277页）跟赫伯特·马尔库塞（1973，第25页及以下；1978，第9页及以下；1980，第26页及以下）一样，弗莱希特海姆认为变革的主体在社会运动之中，特别是在妇女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运动之中。 565

当然，事实已经证明，对于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立场来说，在个人的需求文化和消费文化上的一场变革将是必要的（参见F. O. Wolf 1991，第40—46页），一场社会共识的变革，这关乎对资本主义有用的那些价值（竞争、生命的意义在于消费物质财富、由追求个人利益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并且要把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数囊括在内（v. Oertzen 1980，第91页）。这样的一种变革将会导向一个有着新需要的社会："这样的需要将会体现在彻底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中以及完全不同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中：团结互助取代竞争性斗争，感性取代压抑；粗暴、粗俗及其语言的消失；长期和平状态。"（Marcuse 1969，第189—190页）

与把个人解放只是当作国家和经济的结构性变迁的衍生结果的政府社会主

义相反，奥斯卡·内格特提出的任务是，“要发展一种积极的、主动进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概念，它不仅能够触及人的理智，而且还触及他们的感觉、他们的解放想象、他们的直接利益，从而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被理解为对现存统治关系的直观替代”（1976，第462页）。和尼克斯·普兰查斯（1978，第234页）相似的是，内格特选择了参与乐观的而非官僚化的党和国家机关作为苏维埃乌托邦的具体形态。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在组织问题上的核心原则。内格特反对集权，主张“集中化的基层行动和集中的组织化之间的辩证法”（1976，第468页）。

普兰查斯曾把社会民主党的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传统称作“两块暗礁”，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必须避开的”。（1978，第229页）作为分裂的工人运动的两个派别，其“特点是……根本不相信直接的基层民主和群众首创精神”（第233页）。“国家崇拜”（Statolatrie）、“国家神话”的相反图景——纯粹的基层民主，当然也有变为专制或某种专家独裁的危险：“通向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的根本问题是，在把自由权利和代议民主制度的扩展及深化（这些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项成就）同直接民主形式和自治中心的发展结合起来的时候，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彻底转型。”（第234页）

与内格特和弗莱希特海姆相似，普兰查斯也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在于让“国家网络内部分散的群众抵制中心”发展起来（同上书，第236页），以便在国家层面形成现实权力的中心。内格特指出，早在社会主义的政策目标被普遍化之前，地方的基层首创行动就试图追寻“一份个人的解放”，比如在生态冲突中，在反对企业停工的集体反抗斗争中，以及在青年为了自己的集体生存空间而开展的斗争中。这些都是反抗主体性毁灭的表现形式。这样，在“无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意见多元中包含的政治自由权利便广泛地融入社会主义民主之中。

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同自治的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这句名言中内格特（1976，第491页）吸收了自由至上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传统资源，这些资源也在新社会运动中再度复兴：这种思路继续自上而下地统摄着现已失败了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的“一切照旧”。资产阶级民主用一个以等级制、分工和阶级社会来损害人的组织取代了封建社会。（Treiber 1980；Löscher 1988）

由于社会主义不会因为简单接管了国家机关和在经济上集中化了的权力机器就自动实现，而是只有当群众准备“把自治组织的广泛基础作为其直观上

能够把握的资本主义统治制度的替代方案来捍卫"时才会产生（Negt 1976，第490页），所以，重要的是主体性问题或者主体性文化革命的变革（Bahro 1977，第299页及以下）。在"长治久安的短暂美梦"（Lutz 1984）惊醒之后，不仅国家社会主义失败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各政党的政府社会主义也处于危机之中。

这样一来，"在通过有组织的国家权力实现其目标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允许人民以直接行动的形式来贯彻其计划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间"（Sotelo 1987，第443页）便被区分开来。当然，"无产阶级"、"人民"或者"群众"不再作为行动主体而实体化地存在了：民主和个人解放殊途同归。（Negt 1990，第44页）

567

参考文献：

G. Adler-Karlsson, *Funktionaler Sozialismus*, Düsseldorf 1973; D. Albers u.a. (Hg.), *Otto Bauer-Theorie und Politik*, Berlin/W 1985; ders. u.a., *Otto Bauer und der »dritte Weg«*, Frankfurt/M 1978; d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Berlin/W 1983;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Frankfurt/M 1977; ders., *Die Logik der Rettung*, Stuttgart 1987; *Bericht vom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enkongreß in Genf 31. Juli bis 5. August 1920*, hgg. v. Sekretariat der Sozialisten- und Arbeiterinternationale, Brüssel 1921; J. Bergmann u.a., *Gewerkschaf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M 1975; K. v. Beyme, *Ökonomie und Politik im Sozialismus*, München-Zürich 1975; J. Bischoff u. J. Kreimer (Hg.), *Sozialismus für Italien*, Berlin/W 1977; W. Brandt,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in: LS, Bonn 1986, 120-123; ders., B. Kreisky u. O. Palme, *Briefe und Gespräche 1972-1975*, Frankfurt/M 1975; J. Braunthal,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 Hannover 1971; C. Buci-Glucksmann u. G. Therbor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 Staat*, Hamburg 1982; W. Conze, »Demokrati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I, Stuttgart 1972, 821-899; D. Dowe u. K. Klotzbach (Hg.), *Programmatische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90; H. Drechsler, *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Meisenheim/Glan 1965; J. Droz, *Le socialisme démocratique 1864-1960*, Paris 1966; W. Eichler, *Zur Einführung in den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Bonn 1972; P. N. Fedoseev u.a.,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 Ideologie des Sozialreformismus*, Berlin/DDR 1980; C. Fenner,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Frankfurt/M 1977; F. Fetjä, *La social-démocratie quandmême*, Paris 1980; I. Fetscher, *Demokratie zwischen Sozial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Stuttgart 1973; O. K. Flechtheim, »Die Anpassung der SPD, 1914, 1933 und 1959«, in: KZfSS 17, 1965, 584ff.; ders., *Von Marx bis Kolakowski*, Koln 1978; G. Fülberth u. J. Harrer,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1890-*

1933, Darmstadt 1974; A. Gorz, *Und jetzt wohin?*, Berlin/W 1991; H. Grebing u. T. Meyer (Hg.), *Linksparteien und Gewerkschaften in Europa*, Köln 1992; K. Grün, *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Darmstadt 1845; M. Harrington, *Sozialismus*, Stuttgart-Zürich 1975; H. Heiman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91; ders. u. T. Meyer (Hg.), *Reformsozial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80; U. J. Heuer, *Marxismus und Demokratie*, Baden-Baden 1989; E.-U. Huste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F. Neumann (Hg.), *Handbuch politischer Theorien und Ideologien*, Reinbek 1977, 416-460; T. L. Jarman, *Socialism in Britain*, New York 1972; R. Kalivoda, »Demokratisierung und kritisches Denken«, in: *Nachrichten aus der CSSR*, Frankfurt/M 1968, 126-145; O. Kallscheuer, »Marxismus und Sozi-
568 alismus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in: I. Fetscher u. H. Münkler (Hg.), *Pipers 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deen,* München 1986, Bd. 4, 515-588; K.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Wien 1918; E. König, *Vom Revisionismus zum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Berlin 1973; K. Korsch, *Arbeitsrecht für Betriebsräte*, Berlin 1922; J. Kuron u. K. Modzelewski, *Monopolsozialismus*, Hamburg 1969; W. Leonhard, *Die Dreispaltung des Marxismus*, Düsseldorf 1970; R. M. Lüscher, *Henry und die Krümelmonster. Versuch über den fordistischen Sozialcharakter*, Tübingen 1988; B. Lutz, *Der kurze Traumimmerwähren der Prosperität*, Frankfurt/M 1984; H. Marcuse, *Das Ende der Utopie*, 1980; ders., *Ide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9; ders., *Konterrevolution und Revolte*, Frankfurt/M 1973; ders., *Zeit-Messungen*, Frankfurt/M 1978; T. Meyer (Hg.),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 Geistige Grundlagen und Wege in die Zukunft*, München 1980; R. Michels, *Die Roll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Demokratie*, Leipzig 1911; O. Negt, »Der gebrochene Anfang«, in: F. Blohm u. W. Herzberg (Hg.) *»Nichts wird mehr so sein, wie es war«*, Frankfurt/M 1990, 19-44; ders., *Keine Demokratie ohne Soz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D. Obermdörfer, »Die sozialistischen und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Frankreichs, Italiens, Spaniens und Griechenlands«, in: ders. (Hg.),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Parteien in Westeuropa.* 1: *Südländer*, Opladen 1978, 7-34; P. v. Oertzen, *Thesen zu Strategie und Taktik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 1974; ders., »Eine marxistische Grundlegung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Meyer 1980, 81-105; A. Pelinka, *Sozialdemokratie in Europa*, Wien 1980;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Hamburg 1978 (*L'é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 Paris 1977); *Programme und Statuten sozialdemokratischer und sozialistischer Parteien Westeuropas*, Bonn 1990; *Protokoll*

der Verhandlungen des 13. Kongresses der Gewerkschaften Deutschlands, Berlin 1928;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in Görlitz vom 18. bis 24. September1921*, Berlin 1921; P. J. Proudhon, *Bekenntnisse eines Revolutionärs* (1849), Reinbek 1969; A. Rosenberg,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Amsterdam 1938; H. Rühle u. H. J. Veen, »Einführung«; »Gouvernementaler Pragmatismus und programmatische Radikalität«, in: dies. (Hg.),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Parteien in Westeuropa, 2: Nordländer*, Opladen 1979, 7-34; M. Schneider, *Das Ende eines Jahrhundertmythos*, Köln 1992; K. T. Schuon, *Politische Theorie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Marburg 1986; I. Sotelo,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in: Fetscher/Münkler 1987, Bd. 5, 437-454; ders., *El socialismo démocratico*, Madrid 1980; *Sozialdemokratischer Parteitag 1927 in Kiel. Protokoll mit dem Bericht der Frauenkonferenz*, Berlin 1927; *Sozialdemokratischer Parteitag in Leipzig vom 31. Mai bis 5. Juni im Volkshaus. Protokoll*, Berlin 1931;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XVII Kongreß. Prinzipienerklärung*, Stockholm 1989; H. Spatzenegger (Hg.), *Das verspielte Kapital*, Salzburg 1991; S. Stojanovic, *Kritik und Zukunft des Sozialismus*, München 1970; J. Strasser, »Was ist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in: *Forum DS* 1, 1976, H. 1, 13-35; H. Treiber, *Die Fabrikation des zuverlässigen Menschen*, München 1980; F. O. Wolf, »Warum ist die Durchsetzung eines alternativen Konsummodells so wichtig – und so schwierig«, in: *spw* 2, 1991, H. 58, 40-46; R. Wranke, *Die Konzeption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in der SPD*, Leipzig 1986; *Ziele und Aufgaben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Erklärung der SI*, in: Braunthal 1971, Bd. 3, 612-618; *Zur Einführung in die Theorie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Frankfurt/M 1977.

罗伯特·莱德勒（Robert Lederer）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ntizipation,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Bürokratie,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ritter Weg, Emanzipation, Etatismus, ethischer Sozialismus, Grundwerte, Hegemonie, Massenkultur, Ökosozialismus, Reformismus, Reformkommunismus, Revolution,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民主集中制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A: al-markazīya al-dīmuqrāṭīya.

E: democratic centralism.

F: centralisme démocratique.

R: demokratičeskij centralizm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ализм).

S: centralismo democrático.

这个术语主要被各国共产党用来描述其党内组织形式。在苏联、中国等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民主集中制也被视为正式的国家组织原则。它要求把党和国家决策时的民主讨论与执行政策时的集中统一辩证地综合起来。至于侧重点是放在这个对立统一体的民主的一极还是集中的一极，在不同的党和不同阶段有时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各国党内部以及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中大多会引用列宁的话，这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为了现时的目的去强调他丰富而复杂的遗产的这个或那个方面，可能还会将其绝对化。

1.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民主集中制这个术语，但早在1847年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拟定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就已经把民主元素和集中元素结合在一起了。(*Bund der Kommunisten*，1970，第626—630页)对此，恩格斯后来写道："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MEW 21，第215页；参见Marx，MEW 34，第308页)在领导第一国际的过程中(1864—187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革命后曾开展斗争反对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追随者，以"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Marx，MEW 18，第160页，参见第52—53、205页，第439页及以下，第687—688页)。与此相反，他们批判了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J. B. v. Schweitzer)在全德工人联合会(ADAV)中推行的"严密的组织"(1868年9月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MEW 32，第161页；参见Marx，第570页)，后者把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报》(*Social-Demokrat*)称作"民主集中"的(1886年10月7日；此处似乎是这种表述的首次现身)。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尽最大可能保持党内民主。当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准备采取严厉行动对付"青年派"团体时，同样也压抑这个群体的恩格斯在1890年8月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F. A. Sorge)的信中写道：

570

"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MEW 37，第 440 页）由于担忧革命反对派被丹麦社会民主工党开除，他在 1889 年 12 月 18 日致格尔松·特里尔（G. Trier）的信中写道："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MEW 37，第 328 页）巴枯宁提出的由自封的"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组成的小型"秘密组织"来实现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斥责为"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Perinde ac cadaver*（像具死尸一样）"。(MEW 18，第 346 页）

2.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 1905 年首次提出。广为流传的看法，即列宁在其撰写于 1902 年的小册子《怎么办？》中就已提出这个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列宁反对"经济主义者"，坚持认为有必要创建一个实行严格集中制的干部党；在其中，由于当时处于上风的沙皇的镇压，实行民主组织原则的前提条件还不具备。(LW 5，第 494—495 页）"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第 476 页）"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事情"，在"专制"的密谋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第 495—496 页）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903 年），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倾向于反对列宁的建议，即要求每一个党员"个人加入一个党组织"。1904 年，列宁批判了马尔托夫，说他具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LW 7，第 400 页）。 571

与此同时，列宁的"极端集中制"遭到了列夫·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的猛烈攻击。托洛茨基指责列宁"替代主义"。他的组织方法将会导致"党组织取代党自身，中央委员会取代党组织并最终导致中央委员会的独裁；进而言之，这些方法会导致由（党的）各委员会制定和废除'方针'，而人民却没有发言的机会"（1970，第 73 页）。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主义集中制的类似批判更加频繁。然而，在 1917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他却宣布自己在组织问题上曾不正确地反对列宁。(1930，第 50 页及以下，第 75 页及以下）和其他所有人不同的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1921 年）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坚

决地捍卫的，恰恰是他以前警告要避免的“替代主义”。他坚称，党拥有“维持独裁”的“权利”，“即使在这种独裁有时同工人民主的暂时舆论相矛盾的情况下”。（*Destjatyj s-ezd RKP [b]*，1963，第350页）

罗莎·卢森堡指责列宁，说他支持“让一切党组织连同其最细枝末节的活动都盲目隶属于一个中央权力，而这个中央权力单凭自己为所有人思考、做事和作决定”。她认为，这样的一种“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同“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是对立的。后者“无非是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相对于其各个团体和各个成员的意志的强制的综合，……是一种‘自我集中制’”（GW 1/2，第429页）。列宁拒绝接受卢森堡关于他支持一种“不顾一切的集中制”的说法。他声称自己是在既定的情况下捍卫“任何一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基本原则”（LW 7，第480页）。

这一争论要在各国不同的形势下来看待。卢森堡正在开展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机关的官僚保守主义的斗争，并因此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自发的和“独立的群众运动”（GW 1/2，第427页）。与此相反，在列宁看来，俄国此时的主要任务是，在当时非法活动的条件下，把“各地方党组织（即所谓委员会）的无定形的堆积体”建设为“一个真正统一的党”。（LW 7，第485—486页）在1905年革命中赢得的短暂自由赋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过渡到更加广泛的民主的党的组织结构的机会。（参见LW 10，第13—23页）正如马尔托夫（1926，第150页）本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在这一时期，“两派的代表积极地将选举原则引入各个部门，以使党组织民主化”。最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多次会议，双方都赞成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组织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这个原则被吸收进在1906年4月至5月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党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新组织章程。（参见*KPdSU in Resolutionen*，I，第117、163页）同年5月，列宁批判由孟什维克派占据多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份决议。根据这份决议，党员不得在政治性的群众集会上进行违反党的决定的鼓动。这份决议“是违反……党章的。民主集中制和地方机关自治的原则所表明的正是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只要不因此而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它也表明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LW 10，第447页）。1907年，在伦敦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作为被承认的派别，一个面对15万名成员的群众性政党，结

果前者赢得了微弱的多数票。之后，列宁便停留在他原来的立场上，即“没有各种倾向之间的公开斗争，不向群众介绍党的哪些活动家、党的哪些组织正在采取哪种路线，那就不可能有群众性的政党、阶级的政党”（LW 13，第 154 页）。1909 年，他宣称，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LW 15，第 432 页）。在列宁还认为同孟什维克的组织统一合乎在俄国建立一个有效革命党的目的的时候，他抱持着这种宽泛的民主集中制概念。在 1912 年 1 月的布拉格会议上终于分裂之后，列宁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民主集中制形式必须保持在比旧式的、广泛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更为狭窄的范围内。此后重要的一点是，列宁在 1914 年写道：“无条
573 件地反对一切‘派别’实行联邦制或权利平等的原则，只承认少数忠诚地服从多数的原则。”（LW 20，第 529 页，参见第 328 页及以下，第 361 页）

3. 在沙皇政权倒台后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堡 [Petrograd]，1917 年 7—8 月）上通过的党章首次规定：“所有党组织都要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Resolutionen*，II，第 265 页）。列宁早在《国家与革命》里论及国家时就提到过民主集中制。在那里，他把“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对立起来。（LW 25，第 443 页）在苏维埃政权的初级阶段，列宁主要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成分。他在 1917 年 12 月写道，“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和民主集中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苏维埃国家的榜样是巴黎公社，因为它展示了“怎样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LW 26，第 412 页）。多党制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尽管其影响由于 1918 年 1 月制宪议会的解散而受到了限制。然而，就在制宪议会解散后不久，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使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LW 26，第 498 页）。在这些情况下，国家领域里的民主集中制和一个政党内部的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政党是出于自由选择而加入的，其成员承担着相应的义务。

然而，由于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喀琅施塔得（Kronstädt）起义，一党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将越来越多的权力集中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手中，而这同列宁早期的“公社国家”概念是相悖的。此外，党的职能和国家职能

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尽管这种结合早在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份决议中）以及后来都遭到了徒劳的批评（*Resolutionen*，III，第65页；IV，第3页及以下，第43页）。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3月）召开之前和召开期间，由于各种“纲领”的竞争，在党的各个组织里和报刊上爆发了关于工会作用的争论。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只要是“在共产主义的范围内”，“各个不同的派别联合起来（特别是在代表大会之前），自然是可以允许的（追求选票也是允许的）”。（LW 32，第37页）列宁区分了比如托洛茨基“发表纲领”的“无疑的权利”和在苏维埃俄国处于极端紧要的关头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第30页）无法将其实现的状况。因此，在党的代表大会爆发关于工会的争论之后，列宁促使其通过了一份“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这份决议禁止在党内进行“一切派别活动”，“即产生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一派并规定内部纪律的集团”。（*Resolutionen*，III，第183—184页）但列宁强调：“这次代表大会对下次代表大会的选举，不能加以任何约束……。可能，那时又得按不同的纲领来进行选举了。”（LW 32，第267页）在一份“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同一次党代表大会宣布，现在必须以“党内的工人民主制”连同“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广泛实行的选举制”来取代在内战和国际干涉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实施的“党组织的**军事化**”。（*Resolutionen*，III，第166—182页）用任命制而非选举制来选拔干部的普遍办法早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就遭到了支持“民主集中制”的反对派团体即“民主集中派”的严厉批判。（参见Kool/Oberländer 1967，第126—157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违背连续召开的几届党代表大会决议的做法继续存在，受到了在20年代活动的所有共产党反对派团体特别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攻击。（例如*Das Programm der »linken Opposition«*，参见Lieber 1963，第240—241页）

574

4. 派别禁令并没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结束苏联共产党内部关于民主的讨论。但在自内战结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党制框架下，这一禁令被斯大林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压制一切异议。党内公开的争论一直持续到1927年。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是最后一次争论。在这次大会上，对总书记及其路线的批评还可以表达出来。当卡门内夫（Kamenew）在会上宣布他决心放弃一切反对派活动并执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时，斯大林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坚持，卡氏还必须为此公开地、毫无保留地发誓放

弃自己的观点。（*Report*，1928，第80—82、119—124、159—162页）党和国家
575 的独裁时代开始了。在10年的时间里，这个时代就让卡门内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的审判中招认了自己的罪行。

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1934年）通过了一份新党章，确认了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定义后来被世界各地的共产党所采纳。该定义的内容是：“（1）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3）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4）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有贯彻上级机关决定的绝对义务。”党的代表大会被称为“党的最高机关”，“自由地、实质性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被确定为“党员的不可侵犯的权利”。（*Resolutionen*，IX，第122、124、133—134页）

其中的问题在于，这些虽然严肃但是民主的表述与真实的现状完全相悖。同年，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开始启动。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千百万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在任意专断的恐怖统治下挣扎求生，其中包括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一半以上的代表和在大会上当选的70%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民主集中制的口号下，在党、国家和社会组织（工会、共青团等）中，首先是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以及后来在其他实行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的国家，开始了党的官僚的并且最终是其中央领导机关中的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统治。

5.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chail Gorbatschow）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年6—7月）上宣称，不仅在斯大林统治下，而且直到80年代，“为苏联共产党的建设和活动提供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多次被代之以官僚集中制”（参见*Prawda*，1988年6月29日）。“在行政命令体制的条件下”，“党的机器掌管着一切”。（Schlußwort Gorbatschows，载于ND，1988年7月4日）一种严格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任命制度为此做出了贡献。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阶段（1990年），那些相对立的纲领20年代以来第一次在党的媒体上 576
公开了。虽然代表大会保留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但少数派也获得了这样一种权利，即“在党的集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执行和监察机关的会议面前，在党的大众媒体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及作出补充的陈述”。尽管党章不准结成派别，但它承认“共产党员有权在讨论纲领的过程中联合起来”（*Partijnaja Shizn'*，1990，第17—18页）。早在1991年8月的政变行动之前，事情就已经差

不多完成了，以致集中制的实践没有剩下很多东西。在自发发展起来的多党制框架下，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法律上没有得到确认（宪法的第6条被废除）；在选举的过程中，党员在国家选举中互相竞选，并在苏维埃中分属于不同的派别。在党内存在着常设的、互相斗争的团体和派别，它们基于特定政治的和民族的以及民族主义的纲领而结成。党的某些纪律几乎无法再贯彻下去。在政变未遂以及1991年8月随之而来的反政变之后，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共和国）被取缔。不过，它在苏联解体之后获得了俄罗斯宪法法院的授权，可以作为俄罗斯共产党进行活动。

6. 在“激烈的内战”阶段新成立的共产党应当远离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机会主义——这一要求确定了极其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这一形式构成了加入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的内容。这21个条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通过，后来成了斯大林独裁共产国际的开端。尽管在国际刚成立的几年里还有过生动活泼的争论，但从1924年开始，“统一的世界党”的构想得到了贯彻：它绝对“不允许派别、思想流派和小团体存在”，要求“铁板一块”。（*Komintern*，1986，第164页）在斯大林时期，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独裁不仅是作为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某种得到高度评价的苏维埃模式的模仿，而且有时也是通过共产国际代理人和指示而进行的直接干涉而被引入自己的制度中。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之后，虽然苏联共产党继续被承认为国际上起领导作用的党，但在国际层面上已不存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义务。不过，在各国共产党内部，民主集中制仍按照其斯大林主义的形式被解释和实践；当然，在那些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和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577

7. 虽然从很多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在独立于莫斯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在它身上也产生了类似于苏联共产党的现象。1949年以前，这个主要由农民构成的国家在大多数时候处于战争状态，文化水平也比较低，限制了民主的发展。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对此也有一定的作用。毛泽东在1942年批评说，“一部分同志”不“懂得”民主集中制，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AW 3，第45页）在毛泽东看来，“阶级矛盾”也反映在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AW 1，第404页）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现为“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或

者“资本主义的”路线。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Ninth National Congress*，1969，第71页）。这构成了毛泽东在一些带有鼓动性的口号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此，“两条路线的斗争”找到了一种残酷的、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带有灾难性的表达方式。在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确认，“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Resolution*，1981，第32页）。

8. 特别是自1956年以来，葛兰西的遗产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
578 发展过程中带有方向性的重要标志。在《狱中札记》里，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党作为“集体知识分子”来看待。为了实现其领导和教育的作用，党员应当参与党的“知识分子生活”。只有在群众和领袖之间存在一个“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中间阶层”——他们有能力提升群众的水平并“防止领袖在激进危机的时刻出现偏差”——时，这一问题才可能得到解决。（*Gef* 2，H. 2，§75，第289页）葛兰西在“民主的”和“官僚的”集中制之间作出的重要区分（参见*Gef* 7，H. 13，§36）暗含着反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元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这些元素在一场由陶里亚蒂发起并不断扩大的讨论中发挥了作用。包括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委员会里进行的争论得到了报道，相关的速记稿也得以出版。贝林格（Berlinguer）于1983年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对外通告》（*Foreign Bulletin*）上（第64页）写道，意共领导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成为一种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内部生活方法”的不太严谨的观点的常规组成部分。

这样的讨论在1990—1991年意大利共产党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和召开期间的争论中达到了高潮。该党以三分之二多数决定转变为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缩写为PDS）。左翼民主党否认有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义务。各种倾向的竞争是新政党的一个持久特征。

9. 从1956年开始，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影响，各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看法逐渐分道扬镳。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特别是后来被称为“欧洲共产主义”的那些共产党，也像意大利共产党一样，开始对斯大林版本的民主集中制产生了疑问。另外一些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仍保留了原来的官僚体制和做法，但已经没有了斯大林时代恣意专

断的恐怖统治了。在1968年的冲突中导致五国人侵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ČSSR）和改良共产主义遭到清算的一个重要元素，是杜布切克（Dubček）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决定修正新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办法：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拟定了一份新党章，其中把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各种观点和对各种建议的研判意见之间的对抗”（Pelikan 1969，第148页）。

579 10. 多数在1989年中东欧剧变后从各国旧执政党的残骸中产生的政党在其党章中都告别了民主集中制。西方的一些共产党也被建议照此办理，因为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的经历已让民主集中制颜面扫地。另外一些党，如日本共产党，则坚持认为，因为这种名义而背负不良声誉的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假托民主集中制名义的官僚集中制。

不论是否使用了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问题仍然是，对于一个多元主义的、否定独占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行动能力来说，民主和集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也适用于党章中不再包含民主集中制这一术语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不过，正如该党时任主席格雷戈尔·居西（Gregor Gysi）所说的，党认识到必须“使党内的多元意见和共同行动之间协调一致”（ND，1990年5月10日，第10页）。民主集中制绝非一个既定的原则或者封闭的制度，而是——用葛兰西的话说——“一个灵活的公式，可以表现为许多不同的形式”（*Gef* 7，H. 13，§36：*Q*，第1635页）。其两个互相矛盾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必然是运动中的平衡。在某些问题上产生的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意见一定会形成具有自己的纪律的长期派别。重要的是，一方面，成员要广泛参与决策，这需要关于领导机关中包括意见分歧在内的各种争论的充分信息；另一方面，一个革命党要能够尽可能有效地从而统一地按照其多数人决定的政治路线来行动。政治过程中的矛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E. Berlinguer,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er italienischen Kommunisten*, Stuttgart 1978;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Bd. 1, Berlin/DDR 1970; N. S. Chruschtschow, »‘Geheimrede aus dem Jahre 1956’«, in: *Horizont*, 1990, 1-4; *Desjatyj s-ezd RKP (b) Marta 1921g.*, stenografičeskij otčet, Moskau 1963;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des 28. Parteitags der KPdSU*, Moskau 1990; *Foreign Bulletin of the PCI*, Bd. 1, Rom 1983; R. N. Hunt, *The Political Ideas of Marx and Engels*, Bd. I, London 1974; *Komintern und revolutionäre*

Partei, Berlin/DDR 1986;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r Sowjetunion in Resolutionen und Beschlüssen der Parteitage, Konferenzen und Plenen des ZK*, 1889-1960, Bde. 1-14, Berlin/DDR 1954-1960; F. Kool u. E. Oberländer (Hg.), *Arbeiter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 Olten 1967; H.-J. Lieber u.a. (Hg.), *Der Sowjetkommunismus. Dokumente*, Bd. 1, 1963; Mao Zedong, »Den Arbeitsstil der Partei verbessern«, AW 3, 1-69; ders., »Über den Widerspruch«, AW 1, 365-408; ders., »Über die richtige Behandlung der Widersprüche im Volke« (1937), in: ders., *Vier philosophische Monographien*, Peking 1968, 89-147; J. Martow u. Th. Dan,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1926; *The Ni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ocuments*, Bejing 1969; J. Pelikan (Hg.), *Panzer überrollen den Parteitag*, Wien 1969; *Partijnaja Shizn*, Nr. 15, Moskau 1990; *Report of the XV. Congress of CPSU*, London 1928; *Resolution zur Geschicht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1949-1981)*, Peking 1981; L. Trotzki, *Die permanente Revolution* (1930), Frankfurt/M 1968; ders., *Schriften zur revolutionären Organisation*, Reinbek 1970; P. Vranicki,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Bd. 1, Frankfurt/M 1972; M. Waller,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Manchester 1981.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eraristokratie, Arbeiterregierung,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olschewisierung, Bonapartismus, Bürokratie,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ezentralisierung, Entmaoisierung, Entstalinisierung, Führung, Gramscismus, Hegemonie, imperatives Mandat, Internationale, Kaderpartei, Kampf zweier Linien, Kritik, Luxemburgismus, Maoismus, Mao-Zedong-Ideen, Massenlinie, Massenpartei, Mehrheit/Minderheit, Neues Denken, Nomenklatura, Parteien, Perestrojka, Personenkult, Rätekommunismus, Reformkommunismus, Revolutionstheorie, Sowjetische Gesellschaft, Sozialdemokratische Sowjetkritik, Staatsklasse, Staatssozialismus, Stalinismus, Theorie/Praxis, Trotzkismus, Vulgärdemokratie, Zentralismus

蒙蒂·约翰斯通（Monty Johnstone）撰

思维（Denken）

A: fikr, tafkīr, tafakkur. – E: thought. F: pensée. – R: mysl' (мысль). – S: pensamiento.

1. 思维（以及思想 [*Gedanke*]）这

个词属于德语最古老的一部分，在古高地德语里具有一个广泛的含义：*gidank*（和希腊语的 νοῦς）指的是“完整的、思考的、了解的和感知的自我”（*Trübners Deutsches Wörterbuch*，词目“思想”），这体现在比如 *Dank* 或者 *Andacht* 的构词中。这也符合思维这个词今天的含义范围。它摇摆于一种个人的、伴有感情的意会（思虑）和一种目的理性的、类似算法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之间。

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开启了近代哲学。显现在他面前的是一门精彩的科学——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它按照度量和数字把握世界并且由此使
581 人可以掌控它。在他的早期作品《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Regeln zur Ausrichtung der Erkenntniskraft*，1628/1629）中，他就已经构想了**方法论的**、由规则指导的思维，这种思维将世界按照**各种问题**来建构，这些问题逐步地被精确化并且最终能够通过数学的方式解决。流传下来的、直到今天仍广泛传播的观点，即思维与（形式）逻辑联系紧密，就是在这里补充进来的（尽管笛卡尔认为当时的经院哲学的逻辑学毫无创见：*Discours de la méthode*，1637，2. 6）。笛卡尔只能在设想两个本质上被分开的实体的情况下构想新的科学：*res cogitans*，即精神或者思维，和 *res extensa*，即通过其广延而得到刻画的物质，其中他将后者——因此也包括自然——按照机械（主要是钟表装置）的范式理解为没有意识的、严格地被规律所决定的。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主义者们反对将人作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精神生命的观察方式。于是，医生拉美特利（La Mettrie）在其争议著作《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1747）中——以心灵毫无争议地依赖于身体，尤其是思维依赖于大脑为出发点——论证了人“不是由”比动物“更贵重的黏土”捏合而成的（德文译本 1990 年，第 77 页），“心灵只是一种运动的原理，也就是大脑的敏感的物质部分”（第 111 页），“思维只是一种感觉能力”（第 119 页）。拉美特利甚至不畏惧这样的设想，即猴子可以被教育并且能够学习语言（第 49 页）。

费尔巴哈也拒绝了笛卡尔的二元论。与黑格尔相反，他坚持认为，通过思维本身是无法认识自然的，为此需要感性：因此，黑格尔的体系在从“逻辑”向自然过渡的过程中有一个无法修补的裂痕。（参见 Schmidt 1973）确切地说，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必须是有血有肉的感性的个体。在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们使思维完全归属于自然（即使是作为其最高级的发展产物）的同时，费尔巴哈却在研究思维的人的特性。“因此，属于哲学家的不仅有思维的纯粹活动（actus purus），而且还有激

情、感官的领悟力的非纯粹活动（actus impurus），这种领悟力将我们单独地置于真实事物的普遍的洪流之中。”“思考的是人，而不是我，不是理性。”（转引自 Schmidt 1973，第 76—77、170 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一种**历史**科学之
582 后，现在提出的问题是，从**活动**中，即从对自然的改造中去理解思维。在这个视角中，思维并不完全是由自然决定的认识的一个过程，而是既作为**劳动**的前提条件也作为它的产物。

2. 在如此确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基础上，更晚近的对思维的研究，即认知理论和心理学的研究又得出了什么结果呢？恩斯特·布洛赫用一句话概括了一个核心的视角：“思维意味着超越。”（*Prinzip Hoffnung*，1960，第 14 页）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方面，思维（在费尔巴哈的意义上）植根于感性、愿望、白日梦；另一方面，它又（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不是作为“只是观察、接受事物此时的状态的知性”的活动而发生，“而是作为参与的、接受事物发展，也包括能够更好地发展的知性”的活动而发生的。（同上）

这样的思维被理解为辩证的运动：它从已发生的事物的发展中理解它们，试图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它可以接受其中展现出来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而不是用合理化的方式消除它们。然而，没那么清楚的是，更准确地说，并非没有争议的是，辩证的思维在形式意义上也包括逻辑思维。这一结论源自这样一种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人的本质力量（因此也包括思维）本质上是在与**生产的活动**、劳动的**联系**中发展出来的。《资本论》中对于劳动过程的分析在有名的动物与人的比较中表明了思维对于**劳动**的作用，这种比较研究了一种传统的、哲学的思维形象（参见例如 Kant，*KdU*，§43）：“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MEW 23，第 193 页）这个说法不应当被错误地解读为描述思维中特殊的人性的特征：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只是描述了与劳动有必然联系的、处理一个固定目标的**目的理性的**思维的特点。

劳动同时意味着对对象的加工：“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第 195 页）由此，劳动也意味着**思维**的“对象化”，技术越是发展，社会生产的知识就会越 583

多地在产品中，尤其是在生产资料和过程中物质化。尤其是在机器生产的阶段上，得到了计算机程序的加强，（从前活的）思维变成了机械的、随意可重复的过程。

人的生命进程不能被理解为一个表面的过程：不如说它包括了——从上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得很清楚——对于自然现实的有意识的接受和对于其变化的预知，就是说人给自己提出或者接受任务。这种任务构成了活动的基本结构。一些任务的完成遇到了一种起初无法克服的困难（难题）的阻碍，这些任务构成了**一个问题**。在问题中，活动的流动被打断，思维被清楚地唤醒，解决**问题**的过程开始。在这个中断中，人会追问**方法**，在此范围内，思维本身变成了观察的对象。这种观察的结果是目的理性的思维方法，这也就是思维的技术或者**作为技术的思维**。这在本质上就是上面概括的笛卡尔的科学理念。它通过莱布尼茨和现代数学发展成了算法认识方法的理论。在执行作为计算机程序的启发式算法时，思维作为技术的方面变得最为清楚明了。（参见例如 Newell/Simon 1972）

一种以马克思为出发点的思维理论必须吸收思维的**两个要素**：思维在“超越”和特定目的下的解决问题之间摇摆。马克思的思维本身在这里就可以被视作范例：它以人类对于幸福生活的梦想为基础（例如，就像它们在早期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里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另一方面，在其辩证的运动中它也包括目标明确的解决问题（参见 Seidel 1976）；人们进一步观察到，马克思的分析还具有形式逻辑和数学的特征（参见 Zeleny 1962/1973，特别是 Kap. 8，以及马克思的数学草稿 [*Mathematische Manuskripte*]，Endemann 1974）。

3. 为了理解以马克思为基础或者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的关于思维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方法，必须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心理学的发展。构成其中重点的是教育心理学，因此，对思维的研究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参见 *Ergebnisse* 1958/1969，XII，以及 Budilowa 等 1966/1973，第 7—8 页）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在认识论中普遍流行一种机械唯物主义，依据的首先是当时闻名世界的俄国生理学家 I. 巴甫洛夫（I. Pawlow）的条件反射理论。“整个学习存在于短暂的联系（即条件反射）的构成之中，这些是想法，这就是思维。因此，这是基础，是联想。”（Pawlow 1934，转引自 1972，第 166 页）联想首先是**综合**，第二点是**分析**的一个过程，依据是“我们的神经末梢的分析能力，然后是同样在大脑皮层中完成的联系的拆解”（第 170 页）。按照巴甫洛夫的观点，

代表着人的特性的语言也可以被理解为“第二个信号体系”，它也纯粹作为大脑皮层的反射的产物。（参见 1936，转引自 1972，第 214—215 页）就是说：“头脑在思考”，费尔巴哈已经反驳了这一点。——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维戈茨基、列奥切夫（Leontjew）和卢里亚（Lurija）开始着手完善“一种新的科学的方法，以便研究人的心理过程”，这种方法“一方面不应当是理想主义的，另一方面也不应当简单地只是条件反射（Lurija 1977，转引自 1993，第 51 页）——这就是**文化历史学派**。

对于维戈茨基来说，思维和语言（也是他 1934 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的标题）构成了理解意识的关键。在进化论上，思维和言语的起源不同，发展的道路也不一样。直到在人的层面上，它们才汇集到了一起。与此相对应，思维和语言在孩子身上的发展首先也是分开的。“在某个点上，两条线彼此相交，思维可以用语言来表达，语言成了智能的内容。”（1934/1974，第 90 页）

就像人的劳动不能仅通过其目的，而要同时通过使用的**工具**才能够得到解释一样，“所有较高级的心理功能也包括共同的特征，即它们是传播的过程，就是说，它们在结构上包括**使用一个符号作为主要手段**，以便操纵和掌控心理过程”（第 111 页）。**概念**在认识和智识当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脱离了语言思维，概念性思维是不可能的。”（第 117 页）其中标志就是“**作为构成一个概念的手段而出现的词语**，之后就是它的符号”（第 111 页）。维戈茨基这样解释本质和现象相脱离的普遍概念：发展了的形式中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并不是简单地在经验上，在其现象形式中反映客体，而是表达出了客体的本质。这同时意味着，概念与现实的关系也包括了概念与其他概念的关系。这表明了概念的**被意识到的含义**（超越了自发的使用）。其结果是，“概念只有在一个体系中才能被意识到和受意识支配”（第 207 页）。需要说明的是，维戈茨基对这里概述的观点在多个方面进行了修改。（参见 Bruschlinski 1966/1973，Keiler 1991；关于接受，参见 Wertsch 1985）

和马克思接近，A. N. 列奥切夫（A. N. Leontjew）重构了心理因素的进化，将其作为动物与周围环境有效应对的产物。（*Abriß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1947，转引自 1971）在第一个阶段，即**简单的感受**，环境的特征通过对于单个生命攸关的刺激的反应表现出来。当这种能力与活动的形式和环境条件陷入矛盾的时候，就会来到第二个阶段，即**感知心理**：动物能够实现对客观现实的“对象性反映”。第三，在**智力**阶段，动物（比如黑猩猩）能够“应用此前获得

585

的方法和操作”（第 154 页）。活动现在已经不再是无法区别和整体性的，而是被分成了两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和完成阶段。

在这个动物阶段的基础上，随着向制造工具的人的进化的过渡，意识出现了。“为了有意识地把握一个行动的目标，……有必要反映出这一行动所针对的对象，而且（和在动物身上不同）这并不依赖于主体在瞬间与对象形成的联系。”（第 172 页）同时，在使用工具中，被加工的对象的客观特征也会展现出来（例如：斧子验证了硬度的特征）。由此，工具便成为第一种有意识的抽象和概括的载体。“就思维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我们用它来描述现实在其客观特征、联系和关联中的有意识的反映。”（第 173—174 页）其中的特点是，即使是无法用感官直接接触的客体也可以被认识（比如紫外线辐射）。但是，以思维和语言为形式的、专属于人的意识的表现又是如何产生的？最初，在 —— 始终是社会的、合作的 —— 劳动中，劳动行为和社会联系在整体上互相联系。随着更加复杂的劳动形式，比如基本的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的这些组成部分彼此分离，这就产生了思维和语言的不同的功能。

列奥切夫的推导 —— 面对各个点上所有的概括和难题 —— 统一了对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和历史的研究，同时与列宁的反映理论相适应。除了特殊的主题之外，总的来讲，他对动物的意识的最初形成的重构非常重要：假如缺少这样的中间环节的可信的图景，消除笛卡尔精神和物质二元论的要求就始终是一个空洞的假设。

文化历史学派的“活动理论”的方法尤其是在批判心理学中（见下文），以及以跨学科的方式（教育学、心理学，参见 Hildebrand-Nilshon/Rückriem 1988/1989）得到了继续发展和修正。

在推行斯大林主义的过程中，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以来对文化历史学派理念的压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心理学深受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S. L. 鲁宾斯坦（S. L. Rubinstein）在其著作《存在与意识》（*Sein und Bewußtsein*，1957/1962）中，将反映理论与反射理论联系了起来：“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 —— 大脑皮层 —— 中，反映……以反射行为的形式出现，其产物就是感知能力。”（第 11 页）“巴甫洛夫的学说可以被用作新的［辩证］决定论的范例。”（1957/1961）在鲁宾斯坦看来，主要的问题是分析和综合这样的操作（参见巴甫洛夫上述对思维特征的描述），他从认识论（1957/1962）和心理学（1957/1961）的角度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及其与抽象和概括这样的推导过程的联系中研究这些操作。在这个去历史化的

方法中，思维虽然被看作“**主体的**”一个“**活动**”，以及“**存在的反映**”（参见1957/1962，第98页），但是，主体的认识活动却只能被理解为逻辑操作的发展——其中，对历史性的理解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和综合已经被莱布尼茨（大约1680年，参见*Phil. Schriften* Ⅳ）作为普遍化了的思维方法清楚地研究过了。

在文化历史学派的著作基本上在人类学的层面上探讨意识的同时，与西德学生运动有关而产生的**批判心理学**（*Kritische Psychologie*）也在生产关系的具体中研究意识。以思维在活动中的功能为出发点，崔尔茨坎普（1973）得出了三个“诺斯替主义级别”的结论：最基础的阶段是在所处的生存世界中**定位**（*Orientierung*）；纯粹定位的认识——“直观思维”的阶段，始终深受感知的原则和界限的影响。在第二个阶段上，即（只是）“解决问题的思维”，认识通过有意识的抽象，通过分析关联、计划和策略等的制定来完成；但是，这种只是针对孤立的个别问题的思维对于历史现实来说仍然并不适合，就像这些问题貌似自然地在毫无争议地被接受的现实中产生一样。一种“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表象性、矛盾、错误、混乱的运动的理解”（第360页）只有通过“理解的认识”，在第三个阶段上才是可能的。这里，“会被理解的是，通过**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中介，认识主体与其他人的**联系**，不仅是情境化的，而且也是基于**需求**、**利益**、**目标**、**特征**……，它们具有相同的社会起源”（第370页）。在崔尔茨坎普的“理解的认识”中，传统的对“矛盾”与“逻辑矛盾”的等同被扬弃了：在这里，在各个方面被强调的是，以何种方式社会的真实矛盾能够在思维中被反映出来，在何种意义上思维在逻辑上的无矛盾性才是思想重构和超越真实矛盾的前提和内含。（1973，Kap. 8）此外，批判心理学还聚焦于在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的关联中挖掘出避免反抗和冲突的策略的各种形式，通过这些策略，主体为了得到短暂的安全以及保持与统治者的和谐一致，会无意识地伤害其自身的生活利益——由此，社会—主体的视角同时就应该“在此之外”成为可见的东西。（参见Ute Osterkamp 1976及1995）

587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认识哲学和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地关注了思维的技术方面。在这方面的标志一方面是在形式逻辑领域里的深入的接受和研究（参见Weissel 1972）；比如，逻辑在《哲学词典》中占据的广阔空间进入人们视野，其中即使是单独的因素也被列为独立的概念词。在这个关联中，有人尝试通过一种“问题理论”（Vogel 1972，Parthey 1970）扩展马列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创造性逻

辑”（Loeser/Schulze 1976）扩展逻辑。另一方面，在那个时期迅速发展的控制论（*Kybernetik*）的理念被接受。按照利布舍尔（Liebscher）的观点（PhWb，第
588 702 页），“控制论按照其本质是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同时也适合帮助使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范畴（比如反映、相互作用、矛盾等）更加精确”，格奥尔格·克劳斯等人（1972）详细地论证了这些内容。算法的操作也为了教学而得到了具体的考虑（Landa 1966/1969）。在这段时间里，心理学在认知领域顺利地向“西方”心理学过渡，并将注意力放到了作为目的理性认识条件和机理的心理功能上（对此具有代表性的是 Klix 1971）。

控制论在本质上是计算机模式化的初级阶段，这——无论是作为思维（表现为程序）的事实的对象化，还是作为思维的清晰的复制——都是意识在技术方面的前后一贯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恰恰能够对于“人工智能”的现代发展、计算机模拟和关于诸如机器“思维”问题等的讨论做出很大的贡献：面对思维的机械化，并将它与作为“超越”的思维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Bd. 1, Berlin/DDR 1960 (1953); A. W. Bruschlinski, »Die 'Kulturhistorische Theorie' des Denkens« (1966), in: Budilowa u.a. 1973; E. A. Budilowa u.a., *Untersuchungen des Denkens in der sowjetischen Psychologie* (russ. 1966), Berlin/DDR 1973; R. Descartes, *Regeln zur Ausrichtung der Erkenntniskraft* (*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 1628/1629), übers. v. L. Gäbe, Hamburg 1972; der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 Hamburg 1960; W. Endemann (Hg.), *Karl Marx: Mathematische Manuskripte*, Kronberg/Ts 1974; *Ergebnisse der sowjetischen Psychologie* (russ. 1958), Stuttgart 1969; M. Hildebrand-Nilshon u. G. Rückriem (Hg.), *Proceedings of the 1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Activity Theory*, Bd. 1-4.2, Berlin/W 1988/1989;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Frankfurt/M 1973; P. Keiler, »Gegenständlichkeit, Sozialität, Historizität – Versuch einer Rekonstruktion der Feuerbach-Wygotski-Linie«, in: *FKP* 27, 1991, 89-168; G. Klaus, *Kyberne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2; F. Klix, *Information und Verhalten*, Berlin/DDR 1971; J. O. de La Mettrie, *L'homme machine* (1747), übers. v. C. Becker, Hamburg 1990; L. N. Landa, *Algorithmierung im Unterricht* (russ. 1966), Berlin/DDR 1969; G. W. Leibniz, *De synthesi et analysi universali seu arte inveniendi et iudicandi* (1679-1685), *Phil. Schriften*, IV, Darmstadt 1992;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russ. 1959), Berlin/DDR 1971; F. Loeser u. D. Schulze, *Erkenntnistheoretische Fragen einer Kreativitätslogik*, Berlin/DDR 1976; A. R. Lurija, *Romanti-*

sche Wissenschaft, Reinbek 1993; A. Newell u. H. Simon, *Human Problem Solving*, Englewood Cliffs 1972; U. Osterkamp, *Motivationsforschung* 2, Frankfurt/M 1976; dies., *Rassismus als Selbstermächtigung*, Hamburg 1995; H. Parthey (Hg.), *Problemtypen bei der Hypothesen- und Prognosenbildung*, Rostock 1970; I. Pawlow, *Die bedingten Reflexe*, Studienausgabe, München 1972; S. L. Rubinstein, *Sein und Bewußtsein* (russ. 1957), Berlin/DDR 1962; ders., *Das Denken und die Wege seiner Erforschung* (russ. 1957), Berlin/DDR 1972; A. Schmidt, *Emanzipatorische Sinnlichkeit – Ludwig Feuerbachs anthropologischer Materialismus*, München 1973; R. Seidel, *Denken – psychologische Analyse der Entstehung und Lösung von Problemen*, Frankfurt/M 1976; *Trübners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3, Berlin 1939; H. Vogel (Hg.),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roblemtheorie und Einzelwissenschaften*, Rostock 1972; J. Wertsch,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Vygotskian Perspectives*, Cambridge 1985; L. S. Wygotski, *Denken und Sprechen* (1934), Frankfurt/M 1974;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k und »Das Kapital«* (tschechisch 1962), Frankfurt/M 1973.

赖纳·塞德尔（Rainer Seidel）撰

马剑译，张义修校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nalyse/Synthese,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tizipation, Arbeit, Arbeitsteilung, Artikulation, Bedeutung, Begriff, Bewußtsein,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theorie, funktional-historische Methode, Genese, Kooperation, Kritische Psychologie, Kulturhistorische Schule, Kybernetik, Logik,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Methode, Problematik, Sprache, Subjekt, Tätigkeit, Technik, Unbewußtes, Utopie, Vergegenständlichung, Wechselwirkung, Widerspiegelung, Widerspruch, Wissenschaft, Zeichen

思维形式（Denkform）

A: shakl al-tafkīr. – E: thought form.

F: forme de pensée.

R: obraz myšlenija (образмы шления).

S: forma de pensamiento.

思维形式或者意识形式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地再阐发的形式概念之一，尽管他并没有把它们专门变成研究的对象。他赞扬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 的第五卷中）“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K I*，MEW 23，第 73 页），于是，其中也就表达了这样的要求，即在一个

全新的基础之上开展这样的分析。

1. 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形式是自发的、下意识的意识形式，它们源于特定的关系中的实际行为，并与特定的实践形式相一致。就其结构性地，即“客观地”被决定而言，马克思也称其为“客观的思想形式”（参见 *KI*, MEW 23，第 90 页）。——通常，在马克思那里，思维这个概念是在如下的应用模式中出现的，比如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
590 “**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即到当时为止的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现实的基本形式，被当作一种思维的形式加以批判，这种思维是“离开实践的思维”（MEW 3，第 5 页；恩格斯把这一表述转换为：“脱离了实践的思维”，参见上书，第 533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这一批判打下了基础：在以国家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分工的阶级统治的结构中，思维的无意识的定位，即它的“社会存在”决定了这种意识；这种语境涉及“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MEW 3，第 26 页）。

马克思看到，这些意识形式获得了一种制度的稳定性，并且还能够深刻影响其对立面。于是，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这样谈论哲学，认为它“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MEW 26.1，第 22 页）。他将这种思维形式的过度决定与一种与之相对立的东西相对照，即正如资本主义的生产“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暂时还只能给这个封建社会本身以资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它本身的形式”（同上）。在《资本论》中他这样谈论“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MEW 23，第 564 页）

2. 由此，马克思抓住了一个术语，在 1787 年这个术语第一次以德语的形式在蒂特尔（G. A. Tittel）那里出现之后，它“在 19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在刻画思维的形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蒂特尔抨击康德范畴学说中的纯粹的知性概念是“在头脑中纯粹臆想出来的概念”（Meier 1972）。1799 年，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的反批判》（*Metakritik zur Kritikder reinen Vernunft*）中，赫尔德（Herder）提出并解释道，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式连同“其纯粹的先验的直观和思维形式是一部没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参见 *Werke* 37，1853，第 123、131、310—311 页）。——费希特在康德所描

述的那些“较低级的”思维形式中看到了一种绝对的、应当为“所有其他的理解”奠定基础的思维形式：他希望“将思维的形式构思为‘物的形式’，将物作为思维的产物来理解”。（参见 *Nachgel. Werke* 1，1834，第 132、136—137 页）对于克鲁格而言，逻辑意味着“思维的学说”。——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来说，“真实的、不可改变的、最初的”思维形式也构成了“理性的基础低音”。（*Werke* 2，1938，第 566 页及以下）

591 这个术语有一个实体性的前史，特别是在斯宾诺莎那里，他将诸如“最终原因”、“善 / 恶”一类的纲领表达成了**意识的样式**（*modi cogitandi*）（*Ethica*，IV，Praef.），它们可以被翻译成“思维形式”，通过把人格化的观念想象成源自社会调节，这些思维形式的功能正是将自然形象从其中解放出来。例如，恶或者罪孽的概念只能在一个统治的群体里表达（*peccatum itaque non nisi in imperio concipi potest*）：因为在这里每个人出于共同的决定或者共识来行动（*ex communi decreto vel consensu agit*）。（*Tract. pol.*，Kap. II，§19）就是说，恶的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斯多葛派的一个观点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就像人不会制定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一样，”爱比克泰德的《手册》（*Handbüchlein*）里这样写道，“恶的天性也并不是在宇宙中产生的（οὔτως οὐδὲ κακοῦ φύσις ἐν κόσμῳ γίνεται）。”（Aph. 27）

在唯心主义的路线上，思维形式终于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那里通过其与存在形式的一致获得了一种真实性保证的功能，以至于“知识的总体”与“存在的绝对统一的真实性”相符合。在 20 世纪，这个问题在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那里演变成了**知识形式**（*Wissensformen*），在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那里变成了**象征形式**（*Symbolische Formen*）。在尼古拉·哈特曼的《真实世界的建造》（*Der Aufbau der realen Welt*）再次以本体论的方式为思维形式奠定基础、将其看作“把握世界的意识”的形式和“见解和世界观的形式”之后，这种潮流完全停滞下来，以至《哲学历史辞典》能够宣布：“目前，‘思维’这个术语已不再拥有概念上精确的表达了。它会没有批判性地被用于表明不同类似的事实，首先用于描述思维风格、思维态度、思维技巧或者思维方法。”这是在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关于**商品形式和思维形式**的观点发表之后的两年，对此，《哲学历史辞典》知之甚少，正如它对马克思实现的思维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也是知之甚少。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这个概念。后者为范畴结构的历史化作了准备，

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的第二版的前言中，黑格尔用可以扩充的概念“思想状况”表述了这个结构。它的元素就是思维形式：“通行于各种特殊科学之中，并构成其材料的最后支柱的**思维形式，以及观点和原则**并不是它们所特有的，而乃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教育**（*Bildung*）所共同具有的。”（*GeschPhil.*，Einl.）它们决定了意识，却不在意识当中，就像“一个网，网罗着或把握着……一切具体材料……它的结
592 在我们通常意识里是沉没在多层性的材料之中”，以至于意识虽然在这些思维形式**中**认知，“但却不**知道它们**”。（同上）——当然，这种历史化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历史化，因为黑格尔认为——就像他在1812年《逻辑学》第一版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通过这种方式去把握纯粹本质的永恒的荫蔽，把握“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甚至“就是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以前是怎样的”。然而，在1831年第二版的前言中，黑格尔却将强调思维形式解释为其**逻辑学**的目的，在这里，**语言**成了主题：“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它们“本来自身就是一般的东西”。因此，无论如何，人不能说，思维形式“服务于我们，是我们拥有它们，而非它们拥有我们”。——读到这个句子时，列宁在他写于苏黎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补充道：“客观主义：思维的范畴不是人的工具，而是自然的和人的规律性的表述。”（LW 38，第83页）列宁并没有关注思维形式即语言的视角。他并不了解马克思的批判。他始终把思维形式看作成熟的思维工具。令他感兴趣的是黑格尔的假设，即“形式……”应该“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第84页）：“必须……**引申**出范畴（不是任意地或机械地搬用）（不是‘叙述’，不是‘断言’，而是**证明**）。”（第86页）如果自身一成不变，思维形式无非就是“没有生命的骨骼”，那里急需“活的生命”。（第81页）列宁将历史化看作变化，它不会被社会形式的非连续性所磨灭。于是他思考：“思想史＝语言史？”（同上）

3. 青年马克思批判的恰恰是黑格尔臆想的“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抽象形式**”、作为异化的人的“僵化的精灵”的“逻辑范畴”。（*Ms 44*，MEGA I. 2，第303—304页）在马克思看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于社会生活关系的实际占有和塑造未尝不会改变这些“僵化的精灵”。在《资本论》中，他批评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其范畴。（MEW 23，第559页）在马克思那里，思维的概念被写入了一种这

样的批判的纲领当中。思维形式——就像被吕西安·塞夫理论化了的“个体性形式”——是在社会形成中建立起来并
593 通过行动引发的。因此，马克思的思维形式概念不应被混同于在思维风格或者思维方法论的意义上对该术语的其他使用方式。

早在恩格斯那里，这个含义就已经向这个方向改变，他解释道，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它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DN*，MEW 20，第330—331页）。他将思维与认识方式相提并论。人们可以期待辩证的思维解除异化的人的“僵化的精灵”，因为它——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前言中所说——对于“每一种……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的。（MEW 23，第27—28页）而将辩证法作为思维形式来理解，会产生一种错觉，即能以一组“僵化的精灵”或者固定形式的形态来使用辩证法。

4. 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将“意识形式”这个术语和“表象方式”作为同义词来使用（1922，第273页），这是一个被马克思看作生产方式的平行概念的概念：“表象方式”是“当前时代意识形态的‘风格’，即那些对于当前时代来说典型的理念、思想、感情和形象的那种特殊的结合”（第268页）。布哈林一定是透过拜物教和等级制度来看资本主义时代的：“从这两个‘构成性原则’的组合中也会产生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表象方式’的基本风格。”（第276页）

令卡尔·柯尔施——其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被看作可以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相提并论——感到愤怒的是，在（斯大林主义之前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虽然法律和国家的现实性和其革命改变的必要性普遍得到了承认，但“时至今日，非常多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却从没有抽象地承认过社会意识形式、精神的生活过程的现实性”（第121页）。在当前的社会意识形式下，他像布哈林一样列举了**物神/拜物教的特征**（*Fetischcharakter*）。然而，“意识形式”的地位在他那里却是另一个样子：根据希法亭的观点，他说，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被普遍承认的是，它同时也是对意识形式的批判。他将这种批判理解为意识形态批判，因此，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就变成了所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如果说在柯尔施那里，意识形式扮演着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思维
594 形式的角色，那么，在另一方面——和

卡西尔的“象征形式”类似——它也扮演着根本性的文化的实践形式的角色：“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般术语，能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的，只有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哲学的意识形式，而它们——如我们所见——也无需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第 123 页）

如同一次从尼古拉·哈特曼思想的回归，民主德国《哲学词典》的规定是这样的：“人们称思维形式为概念、说法、理论等等，在其中物质世界的现象作为内容被反映出来。”（第 409 页）——在沃尔夫冈·泽格特（Wolfgang Segeth）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用学的文章中，思维形式指的也并非在社会上建立起来的思维形式，而是在形式上可以描述的思维的要素和功能，比如概念、说法、问题、要求（“在面对人的行为时直接发挥主导功能的思想的写照”，1974，第 9 页）。

1986 年，金德里希·泽勒尼（Jindrich Zeleny）回归到了“黑格尔的康德批判和思维形式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化”。后者的意思是，“将一个研究的对象包含到真正的事实的发展关联中，其中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时空进程被看作思维形式的运动和结构的基础”（第 29 页）。

5. 1961 年，阿尔弗雷德·佐恩-雷特尔在洪堡大学以这样的解释开始了其后来著名的演讲：“人的思维形式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1971，第 101 页）他认为，“像这样的意识形成的问题……”并没有“构成马克思主要著作的首要部分”，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却赢得了关键的意义。（1970，第 14—15 页）他的两个彼此互相联系的主要主题是：“社会的综合”（就是说，通过市场暗中形成的生产的全部关联），作为“中介环节，通过它在发达的商品生产时代中来决定某些主要的意识形式”的商品和交换的抽象。（1971，第 103 页）针对阿尔都塞坚持认识是一个“**完全发生在思维中**的过程”（*LLC*，I，第 51 页），佐恩-雷特尔将马克思的以下观点解释为决定性的，即交换的抽象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实在抽象**（*Realabstraktion*），它“并不是思维创造出来的，其起源并不在人的思维中，而是在他们的行动中”，然而作为抽象却“没有单纯的含义”（1970，第 34 页）。“到马克思为止，形式，特别是概念形式，无论如何无法从时空中推导出来，这一直被看作哲学思维中的不可置疑的原则”（第 105 页），他将这归因于拜物教。但是，对范畴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推导却意味着对它们的否定。康德的知性概念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因为尽管这些概念‘属于我们’，也就是说它们是社会产物而非自然产物，但它们却并

不是由我们创造的。”（第126页）它们是暗中产生的结构的效果，因为“产生它们的抽象是商品流通，即人的行为而非人的思维的看似盲目的功能”。与此相反，人造物则是这些形式的“反映”，然而，对于它来说，思维形式“始终都是以成熟的形式被预先规定好的”（同上）。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产生于交换抽象的思维形式分别变成了世界观和自然观的“构成材料”，其区别在于，在近代相应的抽象，无论是对于生产还是对于意识形态的统治变革都是重要的。佐恩-雷特尔将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及其客观性模式带向了极端的形式，它“以商品的形式”表现“自然”。（第129页）

佐恩-雷特尔的第二个想法是这样的命题：“在所有的社会形态中……在社会上必要的意识形式以可演绎的方式被社会综合的功能所决定，这些功能对于这种社会形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1970，第95页），也就是说，被体制特有的社会化模式所决定。此外，“商品形式和思维的秘密的同一性”（第9页），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统治阶级迟早总是会支配它所需要的精神劳动的特殊形式”（第15页）。——至于社会综合在与参与者的意识的关系中的定位问题，佐恩-雷特尔1961年在泰罗制（Taylorismus）中看到了关键的转机，因为他将综合放到了生产当中。他提到了“对这种资产阶级的企业经济加以批判的任务，其目的是揭示其中被掩盖的现代劳动过程的社会综合的形式元素”（1971，第130页）。他期待着在这里“也会找到后古典主义的机理的基础。因此，在一个按照这些形式元素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从工作岗位出发，对于一种训练过的意识来说，就可以理解社会联系的原则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形式基础”（同上）。就国家社会主义的条件而言，这就等同于一种“工程师社会主义”的建议，而它却忽视了那些被泰罗制所盘剥的工人。

后来，带着更多的理由，理希塔报告（Richta-Report）和后来的自动化与鉴定项目使人们注意到了在高科技的生产方式条件下由自动化劳动引起的思维方式的新型的潜力，因为由泰罗制产生的、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工程师和领导层那里集中起来的“综合”能力现在部分地转移回到了单独的工作岗位上。

博多·封·格赖夫（Bodo v. Greiff）与罗伯特·沃尔夫冈·米勒（Robert Wolfgang Müller 1977）相似，都希望接续佐恩-雷特尔的观点证明，“对于客观的认识形式的经济学的推导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1976，第92页），经济学的推导并非像格奥尔格·克劳斯所认为的，只体现了一种“头脑的自然形式”，“头

脑的自然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按照达尔文主义解释为基于更强的适应性而选择的结果。这就抓住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的思想。客观性是一种在历史上特定的思想形式，“只有一个社会将其成员变成相同种类的单独的样本——人，变成个体，在其中才能产生这种思维形式”；但是，使一种在抽象上相同的“个体意识在人身上产生”的东西，却是“商品形式”。（第97页及以下）使用价值的抽象为主观的抽象奠定了基础，对·格赖夫将使用价值理解为“商品的纯粹主观的意义”。就是说，将商品作为价值来处理“会产生以相同的方式评价日常需求的事物的能力，就像科学家评价认识对象一样——学术的评价仅仅是那种客观的评价形式的一个特例，一旦商品交换变成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这种评价形式就会成为普遍的形式”（第99页）。对·格赖夫在其中看到了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的理性核心；即使他无法从物种起源学的角度将它推导出来，并且“还不了解一方面是‘主观’、另一方面是‘社会’的区别”，他还是接近了社会的起源，其中他从“先验的意识”中推导出了认识的条件，“一个既不存在于个体也不存在于自然中的单位”。（第90页）——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 1991）强调，思维形式的命题“并非理论结果的一种直接决定”，“而是各种话语的建构的一般形式”；由社会化形式会“自然地产生某些一般范畴，它们会建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观念”；他把这些“范畴”解读为马克思的**客观思想形式**的概念，它们建立起了“一个特定的理论场”以及“合理性的一种特定的形式”。（1991，第20页）——佐恩-雷特尔及其学派的“商品思维形式”（Brandt、Sandkühler等1976，第47页）首先受到了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因为它破坏了一种合理的意识形态的客观主义和唯科学主义，并将它们引向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自我应用。抛开这些在历史上自行澄清的批判动机，可以断定的是，这种思维方向倾向于“社会学主义”（Soziologismus），即把自然融入社会。

6. **批判心理学**。在乌特·奥斯特坎普看来，“社会的思维形式”意味着“在每一个历史上特定的阶段，在与自然和社会状况的双重的反映关系中社会上可能出现的法律观点，在这些状况中，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既被认识又被掩盖或者被排除在外”（1975，第300页）。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个体对于思维形式的掌握**在人的认知过程中”相应地被区分（第302页）。思维和“思维方式”在这里被毫无区别地使用。奥斯特坎普假定

了思维方式从原始到科学发展的一个历史的结果；而“原始的”思维形式也出现在市民社会里，这被理解为由社会引起的、阻碍发展的时代错误。然而，由此却忽视了马克思在“思维形式”下作为主题讨论的东西：例如，商品拜物教就不是时代的错误，而是资本主义当前时代的基本形式——尽管它作为思维形式，自马克思对它的批判以来，已经具有了反对自身的理智良知。

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在他的《心理学基础》（*Grundlegung*）里将思维和一般劳动的对象化联系起来：他在形式上把思维看作对思维形式中记下的内容的掌握。恰恰是这些“作为普遍地预先准备的生活保障的思维和语言形式能够在个体的思维中‘被塑造’”（1983，第286页）。例如，对象是在技术上可以利用的规律性，即“在中间含义中被对象化了的（在语言交流的‘实践的概念里’有代表性的）、普遍化了的可用性，行动以对它们的预知来进行调整”（同上书，第287页）。比如，因果关系在这些个体的思维必须实现的思维和语言形式中产生。这里，思维形式包括了一个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中间位置：对非历史的恒定性的探究是依托历史来完成的。但是这里却忘记了马克思对于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关联的分析——意味着一种极端历史化的东西禁止将“客观的”认识简单地看作它们的要求，而是将“客观性”本身理解为由历史—社会决定的思维。

7. 商品形式—思维形式的争论发展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思维形式分析的实际的重要性被无视。如果人们想象一下葛兰西将日常的理智连贯起来的规划（参见 *Gef* 6，H. 11，§12），那么清楚明了的是，这是以持久地批判思维形式的能力为前提条件的。在缺少对由社会形式引发的基本的思维形式的理论和分析的情况下，希望摆脱受到错误束缚的行动能力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无法实现的。例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关于右派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分析（例如参见1982）。他展示出，撒切尔的话语（Thatcher-Diskurs）是如何建立在超市的购买者（选举自由）和家庭经济（自身劳动）的思维形式的基础上的，又如何用右派民粹主义的方式能够将政治和常识如此这般地彼此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对于父权制的两性关系的批判也必须分析由其具有性别特点的实践形式引起的思维形式，并将其“置于意识之前”。（撇开许多其他人，参见 Nancy Hartstock 1991 和 Frigga Haug 1991 关于男性和女性形式的分析）

被结构上既定的实践形式所规定的思维形式能够区别刻板观念和这样的观

598

念，它们由大众传媒和操纵所中介。作为由行动者的关系引起的解释模式，思维形式被经验所充实，因为它们由行动所中介。在其中，这些关系仿佛自动地作出了解释。重要的是复数：在其背后隐藏着多种行动范围，它们对行为的苛求和最面易见的事实不必彼此协调一致，而是能够互相如此尖锐地对立，就像使用和交换价值的立场，或者在同一个个体身上以工资为导向的冷漠和专业工人的自豪。与此相反，诸如**态度**（*Haltung*）和**举止**（*Habitus*）之类的概念却强调了互相矛盾的苛求的不断提出的整合，由此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群体按照习惯以特定的规范稳定下来。

历史唯物主义在出现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打破常识的显而易见之事的错误的自明性，使个体可以支配一些盲
599 目的指令。通常，思维形式是思维没有想到的事情，解释模式是自身没有解释的东西，视角则是自身不可见的事物。思维形式指的是在社会形式中的意识，而它又并不具有对这种形式的意识。借助于它，思维尝试着好像是自己越过后脑去窥探。因此，它不会导致无限的倒退，因为它是关于在“一般劳动”的双重意义的条件下，在实践形式朝着“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关系改变的视角上的一个架构。因此，思维形式的概念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它们将塑造能力的界限推向了社会现实的自觉地逃避的事物，以便将更多的目前的盲目必然性变成自由。

参考文献：

P. Brand, N. Kotzias, H. J. Sandkühler, H. Schindler, F. Schumacher, W. van Haren, M. Wilmes, *Der autonome Intellekt. Alfred Sohn-Rethels »kritische« Liquidierung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und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6;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Hamburg 1922; B. v. Greiff, *Gesellschaftsform und Denkform. Zum Zusammenhang von wissenschaftlicher Erfah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Entwickl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St. Hall, »Popular-demokratischer oder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in: W. F. Haug u. W. Elfferding (H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104-124; N. Hartsock, »Nullsummenspiel der Ehre«, in: *Argument* 187, 33. Jg., 1991, 335-348; F. Haug, »Eintritt der Frauen in den Krieg«, in: ebd., 349-360; W. F. Haug, »Bürgerliche Privatform des Individuums und Umweltform der Gesellschaft«, in K. H. Braun u. K. Holzkamp (Hg.), *Bericht über den 1. Intern. Kongreß Kritische Psychologie*, Bd. 1; *Einführende Referate*, Köln 1977; M.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Hamburg 1991;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 hgg. v. E. Gerlach, Frankfurt/M-Wien 1966; G. Kröber, C. Warnke, »Form«, in: PhWb, 409-412; H. G. Meier, »Denkform«, in: HWPh, 2, 1972, 104-107; R. W. Müller, *Geld und Geis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Identitätsbewußtsein und Rationalität seit der Antike*,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U. Osterkamp, *Grundlagen der psychologischen Motivationsforschung*, Bd. 1, Frankfurt/M 1975;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 1987; R. Richta u.a.,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und 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2; M. Scheler,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Bern-München ²1960; W. Segeth, *Aufforderung als Denkform. Vom Wissen zum zielgerichteten Handeln*, Berlin/DDR 1974;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ders., *Warenform und Denkform*, Frankfurt/M 1971; J. Zeleny, *Dialektik der Rationalität. Zur Entwicklung des Rationalitätstypus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Berlin/DDR 1986.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马剑 译，张义修 校

参见：

Abbild, Abstraktion, allgemeine Arbeit, Alltagsforschung, Alltagsverstand,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ssoziation, Automation, Bewußtsein, Camera obscura,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iskursanalyse,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Feuerbachthesen, Form, Gleichgültigkeit, Habitus, Haltung, ideologische Formen, Individualitätsformen, Kritik, Logik, objektive Gedankenform,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Sprache, Taylorismus, Überdeterminierung, Vergesellschaftung, Wertform

依赖理论（Dependenztheorie）

A: naẓarīyat al-tabʿīya. – E: dependency theory. F: théorie de la dépendance. R: teorija zavisimogo razvitija (теория зависи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 S: teoría de la dependencia.

600 依赖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被视为第三世界激进的发展理论最重要的基础。它逐渐发展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发展理论的批判，美国学者罗斯托夫（W. W. Rostow 1960）的观点就是后者的一个典型代表，同时也是对机械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批判，这种

观点往往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是经济和社会落后的原因。同依赖理论紧密相关的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首先是它们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问题，同这些国家自己社会的“内部”的联系较少。同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中心地位相联系，它们处于一种“边缘”地位。破除这种“边缘”和“中心”、“卫星国”和“中心国”或者说依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在依赖理论的传统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地位予以批判的，既有来自南方的学者与政府，也有来自北方的发展政策积极参与者。

许多依赖理论的代表学者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统之中。（参见 Mandel 1972，第 318—343 页）他们主要援引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印度、爱尔兰及波兰的著作（参见 MEW 9，第 220—226 页；23，第 730—740 页；5，第 319—363 页）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中的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研究（参见 *Imp*，LW 22，第 258—269 页）。早期的依赖理论可以追溯到 1948 年建立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CEPAL）发布的战略文件，这份文件是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 1950）的积极推动下才得以出版的。此外，在来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圈子的经济学家保罗·亚历山大·巴兰（Paul A. Baran）的文章（1957）中也可以找到关于依赖理论的早期提法。

依赖理论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迎来了突破。当时，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同时发现了针对不发达问题的新的逻辑连贯的解决办法。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有：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 1964）、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waldo Sunkel）、费尔南多·卡多佐（Fernando Cardoso）、恩佐·法需托（Enzo Faletto 1969）、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eotonio Dos Santos 1969）和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 1969）。通过与智利依赖理论支持者（dependistas）合作的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 1967）和深受法国特别是关于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 1961）和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 1964）的讨论影响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70）的努力，依赖理论获得了其最精确的形式。这一理论还传播到了加勒比海（Rodney 1973，Thomas，Girvan）和非洲东部地区（Rweyemamu，Shivji 1970，Leys 1977），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步发展成了适合当地国情的形式。在印度，甘地（Mahatma Gandhi）和马克思主义者罗伊（M. N. Roy 1921）也已经依据印度的国情状况提出了适合印度的依赖理论。

601

依赖理论想要解释什么？弗兰克对这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他的三大看法：（1）资本主义体系在上个世纪不断扩张，甚至渗透到不发达国家的最偏远地区。因此发展落后这一问题的本质原因不在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持续存在或者是资本的匮乏。恰恰相反，发展落后这一问题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而造成的。（2）那些处于“从属”或者“边缘”地位的国家只有当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最弱的时候，它们的经济发展状况才最好。当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重建了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纽带，并使这些国家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之后，欠发达地区最初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就会被扼杀，同时，自我再生产这条发展之路也被阻断。（3）当下，世界上发展最不充分、看起来最封建的地区在过去都是与经济发达地区联系最紧密的。它们早期参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事实却带来了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健全，这一点也是制约他们独立自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依赖理论，“不发达”并不代表落后与贫穷。萨米尔·阿明（1970）认为“不发达”具有下列结构特点：在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生产与收入的不平衡。因为缺少为大众消费生产工业品的国内部门，所以经济发展是片面的、互相分离的。经济过于依靠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本。不发达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持续增长的部分人口的边际化。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被掩埋。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失去曾经的经济依靠的民众无法融入以自力更生的民族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新社会之中。只有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彻底脱离，才能实施**自我依存**（*self-reliance*）的政策，实现真正的发展。（参见 Nyerere 1967）对此，阿明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就是这种成功的发展策略的最杰出的范例。

依赖理论与国际剥削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剩余产品从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区流入中心区域已经是普雷维什和巴兰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鉴于普雷维什的理论，南部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这一事实被视为“不公平的原材料价格”的例证，南北收入转移和“不平等交易”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这种方法也是所有依赖理论中关于南北关系分析的出发点。（参见 Massarrat 1992，第 1482 页）埃马纽埃尔（Emmanuel）1969 年在自己的“不平等交易”的理论中强调，国际剥削造成发展不平衡，并非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不同的收入流失。埃马纽埃尔认为，相对于贫困国家中多数未能实施工资政策的收入而言，富有国家的收入就特别

高，这导致了一种系统的、巨大的收入转移，这加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降低不平等交易，贫困国家应该减少或取消与那些高收入国家的贸易往来，努力使本国经济结构多样化并且创立自己的出口卡特尔。

依赖和剥削的形式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变迁，尽管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将殖民地囊括进商品交易的过程导致工业生产国和原料供应国之间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紧随直接领土侵略的是更加间接的新殖民主义统治。大型跨国公司在维持和扩张帝国主义结构版图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依赖理论而言，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国际分工非常明显。因此，一些国家专注于一些需要很多素质较低、报酬较低却又守纪律的工人的工业生产。一种全新的依赖体系便占据了统治地位：技术型依赖。

603

依赖理论中存在一个影响特别广泛的见解：不发达国家参与世界贸易导致了其国家的长期贫穷。在一系列试图摆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中，包括中国在内，民族发展的困难明显突然增加；与此同时，一些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在弥补型资本主义发展中取得了成功，这在20世纪70年代初削弱了依赖理论的结论的政治吸引力。在这种意义上，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取得的经验也起到了作用——通过进口替代策略来实施的“民族”工业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参见 Little/Scitovsky/Scott 1970）没有出现系统的努力，将作为独特生产关系的跨国资本的影响同“本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区别开来。（与 Morawetz 1977，第40—41页观点相反）依赖理论受到全盘批判，也失去了很多学术支持。这一理论被指责为同义反复的论证，不被许可的对经验观察的普遍化以及对一种演绎理论的脆弱依赖（参见。Booth 1988，第15页）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理论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之中。（参见 Spraos 1983）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关于《拉美地区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Feudal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Lateinamerika*，1971）的研究文章经常被视为克服依赖理论问题的第一次重要的尝试。他证明了，弗兰克在其早期的研究中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概念混淆了生产领域与交换领域，并且最终赋予了流通以因果优先权。这不仅与认为交换应服从于生产过程的马克思相背离，同时也造成了对现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毫无贡献的不发达理论的产生。自17世纪以来的经济世界体系被视为从属于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各要素的组合。在这一过程

604

中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商业资本的渗入重组，而不是消除。

作为“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辩护人，比尔·华伦（Bill Warren）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持有一种与依赖理论极端对立的观点。他研究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取得了巨大飞跃。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及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最终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增长的背景下，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附纽带越来越松弛了。（1980，第9—10页）马萨拉特（Massarrat 1978）阐述了，何以所有用“不平等交换”从价值理论方面来解释收入从南向北转移问题的尝试迄今为止都走进了死胡同。在“依赖理论家”群体内部，也随之出现了对依赖理论的原初观点的批判。

依赖理论有着很深刻的理论和政治影响力。它促成了50年代到60年代的发展乐观主义（Entwicklungsoptimismus），也是对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激进要求的理论基础。从菲德尔·卡斯特罗向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83）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依赖理论持续的影响力。此外，依赖理论与法国的年鉴学派一同直接推动了瓦勒施泰因影响深远的世界体系概念（1974）的产生。匈牙利经济学家托马斯·森特斯（Tamás Szentes）认为，依赖理论持续的贡献在于，它展现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是不能单纯用“经济不发达”这一个概念来理解的，它们的内部状况不是不参与发展或一种在进步背后的倒退的体现，而是一种特殊发展的结果，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且由其导致。（参见 Szentes 1971）

参考文献：

S. Amin, *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Critique à la théorie du sous-developpement*, Paris-Dakar 1970; P. Baran,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wirtschaftlichen Wachstums* (New York 1957), Neuwied-Berlin/W 1966; Ch. Bettelheim, *Planification et croissance accélérée*, Paris 1964; D. Booth, »Marxismus und Entwicklungssoziologie. Der Weg in die Sackgasse«, in: *Prokla*, 18. Jg., 1988, Nr. 71, 13-48; F. H. Cardoso, E. Faletto, *Abhängigkeit und Entwicklung in Lateinamerika* (Mexiko 1969), Frankfurt/M 1976; F. Castro, *Die ökonomische und soziale Krise in der Welt. Bericht an die VII. Gipfelkonferenz der Nichtpaktgebundenen*, Dresden 1983; H. Dietrich,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in Lateinamerika. Inkareich, hispanoamerikanische Kolonisation und kapitalistische Entwicklung. Zur Kritik der Dependenztheorie*, Giessen 1977; T. Dos Santos, »El nuevo carácter

de la dependencia«, in: J. M. Mar (Hg.), *La Crisis del Desarrollismo y la Nueva Dependencia*, Buenos Aires 1969; A. Emmanuel, *L'échange inégal. Essai sur les antagonismes dans les rapports économiques internationaux*, Paris 1969; T. T. Evers u. P. v. Wogau, »'dependencia': lateinamerikanische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Unterentwicklung«, in: *Argument* 79, 15. Jg. 1973, 404-454; A. G. Frank, *Kapitalismus und Unterentwicklung in Lateinamerika* (New York 1967), Frankfurt/M 1969; ders., *Abhängige Akkumulation und Unterentwicklung* (New York 1978), Frankfurt/M 1980; C. Furtado, *Dialéctica do desinvolvimento*, Rio de Janeiro 1964; ders., *Akkumulation und 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84; E. Laclau, »Feudal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Lateinamerika« (1971), in: ders., *Politik und Ideologie im Marxismus*, Berlin/W 1981, 16-45; C. Leys,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Critical Notes«,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Bd. 7, 1977, Nr. 1; I. M. D. Little, T. Scitovsky u. M. Scott, *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1970; E. Mandel, *Der Spätkapitalismus. Versuch einer marxistischen Erklärung*, Frankfurt/M 1972; R. M. Marini, *Subdesarrollo y Revolución*, Mexiko 1969; M. Massarrat, »Der Süd-Nord-Einkommenstransfer und die Fiktion des Freihandels. Dependenz, Weltmarkt, Dumping-Preisbildung am Beispiel Kaffee«, in: *Blätter*, 37. Jg., 1992, Nr. 12, 1481-1494; D. Morawetz, *Twenty-Five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0-1975*, Washington 1977; J. K. Nyerere, »Die Politik der Eigenständigkeit (Self-Reliance)« (1967), in: D. Cwienk u. J. R. Klicker (Hg.), *Lernen von Afrika*, Wuppertal 1982, 91-95; F. Perroux, *L'économi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61, 3. erw. Aufl. 1969; R.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50; V. G. Rastjannikow, »Die Periphe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wirtschaft. Widersprüche der Mehrsektorenwirtschaft und Strategie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 in: *Probleme kapitalistischer Entwicklung in Entwicklungsländern Asiens. Berichte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6. Jg., 1986, Nr. 4, 48-58; W. Rodney, *Afrika. Die Geschichte einer Unterentwicklung* (Dar-es-Salaam 1973), Berlin/W 1975; W. W. Rostow, *Stadien wirtschaftlichen Wachstums. Eine Alternative zur marxistischen Entwicklungstheorie* (Cambridge 1960), Göttingen 1960; M. N. Roy, *India in Transition* (1921), Bombay 1971; I. G. Shivji, »Tanzania –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 in: *1s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Provis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Dares-Salam 1970; J. Spraos, *Inequalising Trade? A Study of Traditional North South Specialis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rms of Trade Concepts*, Oxford 1983; T. Szentes,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Entwicklungsländer* (Budapest 1971), Frankfurt/M-Köln 1974; I. Wallerstein, *Das moderne Weltsystem.*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 (New York 1974), Frankfurt/M 1986; 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1980.

扬·奥托·安德森（Jan Otto Andersson）撰
冈特·维林（Gunter Willing）
译为德文
肖瑶译，金建校

参见：

Abkopplung, Antikolonialismus, Armut/Reichtum, Artikulation, Ausbeutung, Blockfreiheit,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ritte Welt, Entkolonialisierung, Impe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ismus, Maoismus, Marginalisierung, Metropolen, nationale Befreiung, Nationalstaat, Neokolonialismus, neue Weltwirtschaftsordnung, Nord-Süd-Konflikt, Postmarxismus, Produktivkräfte, Reproduktionsbedingungen, Tausch,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ungleicher Tausch, Unterentwicklung, Weltmarkt, Weltsystem, Weltwirtschaft, Wertgesetz, Zentrum/Peripherie

资本专制（Despotie des Kapitals）

A: istibdād rā's al-māl. – E: despotism of capital. F: despotisme du capital. R: despotizm kapitala (деспотизм капитала). S: despotismo del capital.

这一词语与其补充性词语“工资奴隶制”一样，首先是工人运动语言的一个元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K I*，Mew 23，第 765 页）统治着“双重意义上的自由工人”（第 183 页），迫使雇佣劳动成为他们人生的宿命，即一种实现他们人生的形式，那么它反之对资本来说意味着在屈服于资本的企业中实现自我统治的形式的可能性。这两个术语还以其时代通俗易懂的方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但这种基于前现代的表达方式，与那些将劳动力市场的缔约人之间的自由合约形式视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论表述有所冲突。

“资本专制”一词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一节中成为一个概念，用于分析企业的制度。正如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确定为二重的，具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双重性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管理功能也具有二重性。“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

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MEW 23，第 350 页）他先将“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比作“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
607 命令”，又将“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协调个人的活动”比作一个乐队的指挥。（同上）“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功能就成为资本的功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同上）于是社会劳动过程的管理功能，同时成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功能（同上）：“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第 351 页）。

“因此，如果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同上）关于这种“专制主义”可以确定，“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同上）。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形式，马克思首选用军事语言来表述：“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第 352 页）同时，“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同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作小组的职能”被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他们作为“工业上的军官……和军士……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第 351 页）在创建一种“兵营式的纪律”的时候，“完整的工厂制度”（第 447 页）的形成也考虑了技术和社会的因素，例如“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第 446 页）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第 446—447 页，参见 MEGA II. 3. 1，第 303 页）。

马克思强调，有两个对资本专制的效果产生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的重要因素：首先是机器，机器一直被视为“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为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的最 608
强有力的武器”（MEW 23，第 459 页）。相应地，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 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同上）。其次，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

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第669页）

在马克思看来，特殊的工厂内部世界与市民阶级的公共世界迥然不同，堪称工闱。“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第447页）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如何理解“资本专制”呢？如果人们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管理功能和管理形式的产生和实现的历史变化，就可以联系到马克思对此概念提出的限定因素——二重性的内容、资本主义管理的专制形式及其特殊形式的发展。因为资本的专制并不是一个历史上不变的存在，不是生产过程和生产者根据统一的逻辑构建和安排的，或者企业的统治者按照统一的模型执行的，所以，下面具体且明确的观点并不能看作关于资本主义统治永恒不变的法则的陈述，资本的专制也不能固化为普遍贫困的隐喻，看作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背面：“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第674—675页）

资本专制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应当被理解为一个理论性概念，用以在社会制度、生产力和社会力量构成转型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分析统治与服从在企业化组织的生产领域中的复杂而矛盾的性质。这样，工人运动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为瓦解或终止资本专制的历史。然而，这一过程的形式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甚至差异巨大：比如在德国形成了“私人企业职工参与管理法”（Betriebsverfassungsgesetz）或劳资协议权利（Tarif-

vertragsrecht)。或者，一些重要的生产力进步可以被看作是对专制式管理形式的一种侵蚀过程，有利于形成新的激励和问责形式，例如在组织管理系统中形成从个人化向匿名化转变的领导机制。

这些变化使资本主义的表面发生了变化，并没有消除其制度所包含的规律。尽管发生了种种形式上的变化，但是资本专制并没有消失。在种种调节形式，或者说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软化专治的种种社会制约的背后，终归存在着“让你自由”的危险，即解雇的可能性。

丹尼尔·巴本 撰

金建、肖瑶 译，陈洪捷 审校

参见：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rbeiterbewegung, Arbeitspolitik, Arbeitsprozeßdebatte. Ausbeutung, Autorität, Charaktermaske,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ntlassung, Fabrik, Herrschaft, Kommandohöhen, Kooperation, Leitung, Lohnarbeit, Macht, Management, Personifikation, Regulation, Verelendung, Zwang

专制社会主义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610

A: al-ishtirākīya al-istibdādīya.

E: despotic socialism.

F: socialisme despotique.

R: despotičeskij socializm (деспо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S: socialismo despótico.

该概念首次出现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于1920年发表的著作《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中。虽然鲍威尔了解恩格斯曾使用过“东方专制主义”的表述，但他的这个概念与“东方专制主义”以及亚洲的生产方式并无直接联系。鲍威尔认为，在特定的国家与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并不一定与(完善的)民主体制相联系。这种观点在德语区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尚属首例。

在鲍威尔看来，专制社会主义是俄国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并非源自布尔什维克的预先构想，而是源自引发了社会革命的俄国社会状况。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俄国农民尚未成熟到适应政治民主，俄国工人尚未成熟到适应工业民主。(WA 2，第293页)

鲍威尔一方面认为在俄国诞生了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夺取了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并且自己组织起一套有计划的、直接社会化的劳动与劳动收益分配。但在另一方面，鲍威尔又认为这个政权是专制的。因为它并非意味着无产阶级大多数的专政，而只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这个政党仅仅只是俄国上亿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它只是“**无产阶级观念的专制**”（第290页及以下）。鲍威尔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与（苏维埃）专政是彼此对立的两面。（第345页及以下）他对俄国的专政作出以下评论：“它掌握了……最可怕的权力工具。整个的工业、矿产、交通以及产品分配组织都在其控制之中。它亦将企业置于军事纪律之下。它掌握了恐怖武器，令所有反对者、质疑者生畏……这是一个新的、可怕的专制主义，它就是如此产生的。”（第291—292页）在这里，从事劳动的人民无法占有劳动工具，亦无法自行安排生产过程，而是一个无限制的国家暴力动用其一切强迫手段使全体人民服从其劳动计划。（同上）专制社会主义作为“文化落后”的产物，是由俄国特殊的环境导致的：落后的工业、不成规模亦未受教育的工人阶级，以及庞大的农民群众中成片的文盲。这与中欧、西欧的社会、经济、文化情况有着巨大的差异，不能做他们的样板。因此，对鲍威尔而言，对专制社会主义的认可无异于对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同路径的认可。（第292—293、301页；参见*Der Weg zum Sozialismus*，1919，WA 2，第131页）

最初，鲍威尔质疑专制社会主义在苏维埃俄国的生命力。他期望那里的农民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并最终引导着俄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这种社会体制将来有多少（国家）社会主义或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性，鲍威尔认为，这取决于世界范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战胜资本主义。（WA 2，第300—301页）到1925年，鲍威尔才抱有希望，认为俄国可以证明“即便没有资本家也能一切正常运行”（第393页）。1931年，俄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使鲍威尔对其前景充满乐观，但同时他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正如他对专制社会主义的评价一样：“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种幻想、一个乌托邦……然而，当资本主义制造的痛苦将人们推向苏维埃之后，人们却发现他们面对的是极低的生活水平、巨大的物资匮乏、残忍的暴力统治、流血的恐怖。”（WA 3，第893页）鲍威尔认为，这种内在的矛盾在斯大林时代依然存在：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血腥的专制主义依然统治着这个社会。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不断发展的生

产力才能创造民主化的物质基础，以及推动民主化的力量。（第907—908页）这是一个“生成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它的经济基础不断完善，但针对社会上层建筑的革命以及对全能的政党官僚的削弱尚未实现。（*Zwischen zwei Weltkriegen?*，1936，WA 4，第175—176页）

鲍威尔的这个概念在同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讨论中并未得到承认。尤其是考茨基（1920，第262页）认为这个概念太主观武断了，并未真正把握住客观事物的发展。延森（Jenssen 1931，第56页）虽然在其他方面与鲍威尔意见一致，但也否认专制社会主义存在的

612 可能性，而且在俄国也不可能，社会主义只有与民主发展联系起来才能成为可能。而曼申-海尔芬（Mänchen-Helfen，1932，第18、29页）则采取了一个中间立场。他认为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了鲍威尔于1920年对专制社会主义的论断。但这个概念在1932年便不再适用了，因为苏联劳动群众的意志已经无足轻重，官僚的意志决定着一切。鲍威尔还得到了阿德勒（1932）以及德国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团体“阶级斗争小组”（Klassenkampf-Gruppe）的支持。（*Unsere Stellung*，1931）

鲍威尔关于苏维埃社会的分析与理解，最终被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艾伦斯坦（Jean Elleinstein）在其著作《“斯大林主义”的历史》（*Geschichte des »Stalinismus«*）所接受（他并未明确提出，但在事实上确实接受了鲍威尔的观点）。对于他而言，“斯大林现象”意味着两个事物辩证的纠缠关系：在专制形式下发展社会主义。斯大林主义虽然提高了生产力，并对社会进行了激进的改造，但同时又生产出一种阻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生产关系。正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社会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1977，第83、109、189页）

一系列历史事件不断的充实着鲍威尔对专制社会主义的分析，这包括：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左翼社会主义者与欧洲共产主义者为代表对“‘古典奥地利马克思主义’（klassischer Austromarxismus）的复兴”（Abendroth 1980）、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以及之后苏维埃体制在不同社会中遭受到的曲折。（参见Schöler 1987/1991；Albers 1979，1985中的一系列作者；Gärtner/TrautMann 1985）

参见文献：

W. Abendroth, »Renaissance des ‘klassischen Austromarxismus’«, in: *spw*, 3. Jg., 1980, Nr. 8, 97ff; M. Adler, »Zur Diskussion über Sowjetrußland«, in: *Der Kampf*, 25. Jg., 1932, Nr. 5, 215ff; D. Albers, J. Hindels, L. Lombardo Radice (Hg.), *Otto Bauer und der »dritte« Weg*, Frankfurt/M-New

York 1979; ders., H. Heimann, R. Saage (Hg.), *Otto Bauer: Theorie und Politik*, Berlin/W 1985; J. Elleinstein, *Geschichte des »Stalinismus«*, Berlin/W 1977; H. Gärtner, G. Trautmann (Hg.), *Ein dritter Weg zwischen den Blöcken?*, Wien 1985; O. Jenssen, »Bolschewismus oder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in: *Marxistische Tribüne fü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1. Jg., 1931, Nr. 1, 55ff; K. Kautsky, »Eine Schrift über den Bolschewismus«, in: *Der Kampf*, 13. Jg., 1920, Nr. 7, 260ff; R. Kösslcr, *Despotie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93; R. Löw, *Otto Bauer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Wien 1980; O. Mänchen-Helfen, *Rußland und der Sozialismus*, Berlin 1932; U. Schöler, *Otto Bauer und Sowjetrußland*, Berlin/W 1987; der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oder »Staatssklaverei«? Die theoretische Verarbeitung der sowjetrussischen Entwicklung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 und Österreichs (1917 bis 1929)*, 2 Bde., Hamburg-Münster 1991; *Unsere Stellung zu Sowjetrußland. Lehren und Perspektiven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Berlin-Tempelhof o. J. (1931).

乌利·舍勒（Uli Schöler）撰

刘梦岳译，曹旸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erkontrolle,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erregierung,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Ausbeutermarxismus, Bauern, befehlsadministr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Bürokratie, Demokratie/Dikatur des Proletariats, Dikatur des Proletariats, dritter Weg, feudaler Sozialismus, Kriegskommunismus, Nomenklatura, Novemberrevolution, orientalische Despotie, Perestrojka, Personenkult, Produktivismus, Staatsterrorismus, Stalinismus

破坏的力量（Dekstruktivkräfte）

A: quwa takhrībīya. E: destructive forces.

F: forces destructives.

R: destruktivnye sily (деструктивные силы).

S: fuerzas destructivas.

613

I. 该词出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与“生产力”这一范畴同步出现：“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MEW 3，第 60 页；参见第 424 页）此词把生产发展的毁灭性方面理解成对抗。

1.1 构词源于两重对立：针对“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的“德国的批判”（第 1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第 30 页）。

在这种对哲学的批判中，他们重拾自亚当·斯密起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心范畴之一的劳动生产力这一经济学概念。针对经济学家，他们却在对私有制的批判中，强调对多数个人而言他决的生产力发展的对立形式："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第67页）对个人而言，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
614 持他们的生命"（同上）。生产力发展的片面性源于他决的形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确定"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得出以下的结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第69页）

尽管如此，该词在这点上既无涉武器和武器系统（或者恩格斯后来在《战争短评》[*Über den Krieg*]中所表述的"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MEW 17，第12页），亦根本无关生产的技术——生态性质问题或者使用价值性质问题。确实，1846年的工业生产在这方面还主要是民用品生产，关键部门首先是棉花，然后是煤、钢和铁路业。约自1870年起，在过渡至帝国主义时，生产开始军事化，此前，这种民用性质确实可能是对生产劳动作批判性定义的背景，这种定义专门针对国家机器和军事机器。在殖民大国兼世界海军强国英国，亚当·斯密把旧社会的支柱算作生产中（应尽量避免的）额外开支。"可以把统治者连同其司法官吏、军官还有陆军和海军的活动均视为非生产性的。他们均效力于国家，依靠其他人经年累月勤奋工作而创造的收益中的一部分而生活。"（*Reichtum*，第273页）马克思后来指明，正是"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对于这一批人来说，被说成只是寄生者，绝不是一件愉快的事。（*TM*，MEW 26.1，第145页）生产劳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同上）。

破坏的力量这一范畴涉及生产的方式方法：在民用品生产中，工作地点自身成为"战场"。1845年，恩格斯写道，"社会战争"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是斗争的"武器"。（*Lage*，MEW 2，第258

页）不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饿死或者摧
615 毁健康、致残、致命的“强制劳动”（第346页等处），涉及个人的教育和发展时，则意味着“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第397页）。新工业的史书中关于进步的语段，“每一页上都讲到日新月异的改进”（第360页）。对工人而言，“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进……只能产生不利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带来失业、匮乏和贫穷”（第364页）；“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第409页）。他给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下的结论是：“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第429页）

1.2 在《共产党宣言》中，暂停了对破坏的力量所作的批判。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使用该词勾勒新工业的彻底变革和革命性作用，《共产党宣言》则重复这种勾勒，而且还更加严厉地表述变革的毫无顾忌性、破坏性。但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MEW 4，第465页），则表明其间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第464页）。受破坏者是旧关系，正是“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同上）遭到破坏。西斯蒙第（Sismondi）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并“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第484—485页），与这种社会主义不同，《共产党宣言》“按其实际内容来说”看重“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发展突破“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同上）。

在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与“旧的社会”的对立（MEW 4，第485页），而非分析生产关系及其矛盾。鉴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这种分离和其中所含对政治经济学无恶意的批判，显得惊人，其对“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这一概念影响深远。确实，在此语境中，关注“片面发展”就变成关注绝对发展：资产阶级“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第465页）。还有补充，说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 616
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同上），则“完全不同”一词并非强调历史统治关系的形式特征和特殊性，而是指出量的比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467页）这篇文章使人在与旧状况的决定性对立中欢欣鼓舞，它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非特定的关于现代化的讨论的关键证人，党的同路人和对手同样传唤其作证。

与这场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同步产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生产主义问题，并

非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介入才表明其特性——虽则这种理论介入有助于人们学会再次看见：比如《共产党宣言》所称的“整个大陆的开垦”（MEW 4，第 467 页）并非开发、开垦无人的自然空间，而是资本主义对这些大陆既有经济形式，尤其是“对任何历史形式的自然经济”的“歼灭战”（*Akku*，GW 5，第 317 页）。确实，马克思也早有此类批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Rede über den Freihandel*）与《共产党宣言》一起列入“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MEW 13，第 10 页），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涉及破坏的力量这一问题时，他的说法截然不同。1848 年 1 月，马克思参加自由贸易代表大会（这是正与发轫的英国工人运动结盟反对地主而所向披靡的曼彻斯特自由党人），对“技术进步”的态度不同于 1848 年 2 月党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号召。若按（1835 年包令 [Bowring] 博士在下院）的自由贸易演说，“技术设备的进步……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转引自 MEW 4，第 452 页），马克思补充道，“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余的人说来，是从较好的处境向较差的处境的转变”（第 454 页）。他认为国家对抗重现于世界市场：“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第 456 页）伴随国际分工而凸显的是使用价值生产的问题：“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两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同上）

19 世纪 50 年代的演说和政论文章兼具两件事：其一为嘉许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种嘉许常带来不加批判的关于现代化的讨论之虞；还有生产的对抗性发展这一概念。在关于印度的文章中即如是。一方面，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对印度产生的灾难性影响”中看到了“资本集中的破坏性作用”，就是说一种经济体系的运作模式，同时，由此“资产阶级文明的极度的伪善和与之不可分离的野蛮……就毫不掩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MEW 9，第 225 页），而且他提出了“人类进步”的问题，这种进步“不再像那些异教神灵一样，只能用被杀戮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饮下美酒琼浆”（第 226 页）。另一方面，他看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同上），问道，“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

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第133页），并在预言中宣告，“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毕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同上）。正是这第二个历史哲学的表达从胜者立场把破坏的力量这一概念用来为殖民统治关系作“历史的辩护”：那是“从历史观点”有关“使命”和“权利”的讨论，在此讨论中，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把遭毁灭的文化叙述成“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第132页）

在1900年前后围绕帝国主义列国殖民政策的辩论中，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围绕苏维埃工业化的辩论或者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生态讨论中，举凡重拾这些文本之时，皆有后来人的补充，说其中可见成熟的黑格尔派马克思的判断：或者在探索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概念时缺乏自信，有缺陷，与之相连的是批判性的马克思跟历史哲学的马克思的分水岭。马克思本人后来标明了这一分水岭，他反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MEW 19，第111页），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上认为可能“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第243页）。

618

1.3《资本论》所作的理论探讨给生产发展这一问题带来两项决定性革新：作为工业发展的决定性目的和驱动性动机的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和生态问题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决定了“机器和大工业”一章的结构。如果说经济学基本问题，以及启蒙事业最终的基本问题，是改善并减轻劳动，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提出了这一基本问题，他认为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马克思的“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以引述穆勒的这句话开篇，随即说明，穆勒的问题仅适用于不靠他人劳动过活者，而且恰恰还问错了，因为它已经落入为资本主义生产辩解的陷阱：“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MEW 23，第391页）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同上）。

机器正是如此，因为机器有助于“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同上）。而机器间接如此，它是争取控制生产的手段，是使劳动过程的既有形式屈从于资本的增殖偏好的手段：因为机器使生产不依赖手工业的熟练、工人的生产知识。在此方面，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

619 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第459页）。

手段这一概念现在吸收了对抗之意。“生产”的“资本主义转化”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第528—529页）。马克思现称“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K* I、MEW 23，第430页，注释154）。只有从生产的对抗性质才能解释“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不过，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第430页）。后来的生态讨论中出现的关于生产力“转变”成破坏的力量这种观念，原因在于“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第674页）。

但不同于早前的语用习惯，马克思现在放弃了“生产力”概念，此概念的确可以表示绝对的“生产力”（在此意义上列举《共产党宣言》认为由资产阶级“创造”的事物和过程，参见MEW 4，第467页）。周密替代此概念的是劳动生产力概念（包括作为“一般劳动”产物的科学）和土地生产力概念，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和土地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参见MEW 23，第538和634页）新的语用习惯指明资本“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第630页）。他同时回应了李比希（Liebig）对掠夺式开采的批评所传达的对生态问题的察觉：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破坏工人身体健康的同时，“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第528页）。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李嘉图的地租定义中的措辞“土地不可摧毁的力” 620
就引起了马克思的注意。“关于这一点在本章末尾要作个注”，即“土地并没有‘不可摧毁的力’”（MEW 26. 2，第244页），这一打算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兑现了，相连的动机是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只要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导致持久的土地肥力这些自然条件出现“破坏过程”，现在的结语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EW 23，第529—530页）。

2.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中兴起，破坏的力量这一范畴因征服自然这

种必胜论而黯然失色。“生产力”这一概念对人在自然中的地位这一问题具有普遍世界观意义；在进化论语境中，认为发展生产是“人战胜自然”。在对马克思的接受中，这造成的效果是，专门从马克思针对“大工业”的阐述中淡化批判。奏效之处甚至在马克思明确探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何解决矛盾的章节，他指出，“经济学辩护论”以“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来反驳“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把工人运动变成进步之敌的运动、“社会进步的敌人”。（MEW 23，第 465 页）马克思的回答告诫勿把“愚蠢”加诸己身，还有“杀人犯比耳·赛克斯（Bill Sikes）的道理”的故事，此人想让陪审官裁决的并非谋杀，而是刀的有益性：“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第 465—466 页）

如果说在接受马克思的过程中，审理这起谋杀案变成马克思关于刀和“机器本身”是否有益的声明，则考茨基对《资本论》的普及在这方面举足轻重。这种普及造成“我们”可以“与机器和大工业体系修好”的感知（1883，第 184 页）：简单调整材料，在概念上复归早期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并把一种进化论强加于人类，这种进化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矛盾所作的分析读出“新的更高级文化的萌芽”（第 180 页）。普及性复述“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不像在马克思处那样，结尾是大工业的对抗性质激化、着眼于生态问题，而是把“机器生产”神化成“产生一个新世家的基础，……一个世家，和谐发展，是地球和自然力的主人，友爱地包括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同上）。 621

恩格斯试图反对必胜论，这种尝试表明进化论范式影响甚巨，尤其在自然科学地位上升的背景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MEW 20，第 452—453 页）恩格斯随后列举生态破坏迟发性后果的例子，在认知问题时值得注意，不过，这些举例也意在略去一切社会特性而指出“人”的短视经济行为和“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上的问题。如此提出问题，就把问题淡化了：“我们”必须学习；在此情况下是学会自然规律。“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特别自本世纪

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同上）毫无问题地假设一天天地学会，与其说在批判，而毋宁说是相信，相信进步与19世纪末自然科学地位上升同步。虽然指出有破坏，“破坏的力量”这一概念在此并无立足之地。

如果说破坏的力量这一概念消失了，卢森堡则作为例外而证实了常规：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这一概念（最剧烈形式的破坏涉及资本与非资本主义历史环境作斗争中的毁灭性过程），她还同时复述了在“不间断的进展”中发展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文化发展巨梯上的一级”这种观点（*Einführung in die Nat. Ök.*，GW 5，第772—773页），这种阶梯的延展可能性“本身……并无界限，因为技术进步进而还有地球的生产力并无界限”（第777页）。

622

1940年，本雅明把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概念视为它在经济观念上“顺应时势”。“它是后来崩溃的一个原因。没有什么像德国工人随波逐流这种看法更腐蚀他们了。”（GS Ⅰ，第698页）作为对策，本雅明以“面向过往的”“历史的恩格斯”的形象表明历史是破坏过程：“我们面前出现一连串事情时，他看出唯一的灾难，这种灾难不断把废墟堆叠起来，把它们甩到他脚下。”（第697页）唤醒死者并接合破碎之事物，这种动机在这点上同样是另选一种非破坏性发展过程，如同这样一种劳动的观念，“它不会榨取自然，创造出可能蕴藏在自然怀抱中的事物”（第699页）。然而，着眼于“创造”同样是步马克思后尘，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源于傅立叶，像他那样忽略了利害之辨。

布莱希特作了“芝加哥小麦交易所运转流程研究”，把他引向马克思主义，他如此开篇：“我见到这些人全靠为害/而非造福为生。/此乃我见之状，只由犯罪/维持，因为对众人极为不利。/理性、发明或发现/凡有成就/亦只会增益痛苦。”（*Als ich vor Jahren* ...，GW 9，第568页）对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布莱希特的反应是，立意把一种社会性自然科学的想法写进《伽利略传》（*Galilei*）的结尾，这种科学并非仅关注发明和“争测天之风云”，而且可用于“罗马家庭妇女争奶喝”。“科学……关乎这两种斗争。”致力于为知识而积累知识，“可能使科学致残，你们的机器只能意味着新增痛苦折磨……，你们的进步……只会是离开人类而取得进展。有朝一日，你们与人类之间的鸿沟会大到人人惊呼来回应你们对某一新成就的欢呼”（GW 3，第1340—1341页）。

623

3.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马克思的这一新创词一直不引人注目，直至1932年出版之后，才在部分程度上

通过赫伯特·马尔库塞（进而间接通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概念“破坏驱力”）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词汇。1968年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复兴，这一新创词时髦如“打破搞垮你们之事”这句口号。20世纪70年代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和后来新和平运动就能以破坏的力量这一范畴和“骤变”这一观念（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 1973年如是说）开场。但在此期间，该词充满来自技术政策、军工复合体、军事凯恩斯主义、军备生产这些领域的意义。末儿，灭绝主义（Exterminismus）这一问题和死亡地带这种现实就参与铸造词义。

现在增加了两项要求。其一，也要考虑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中生产主义的灾难。代表这点的首先是对破坏的描写，它们在改革（Perestroika）中获得解放的契机，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党的首脑当时称咸海为“我们痛楚的象征，数十年掠夺式开发的结果”，并从材料工业角度历数生态上的失误。（Nischanow 1988，第314页）但这就使破坏更多归责为个人犯罪而非运转方式、某一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规则。其二，应考虑技术系统易出故障这一问题，它不可能用对管理进行社会性组织来加以消除，部分具有危害和破坏性后果，它们就像在核技术上一样超越人类—历史思维的时间视野。“故障”大于可预见的最坏情况，不能归约成哪怕对故障推波助澜的施政状况。描述性干预倾向于通过纯属攻击性归咎而放弃概念对统治的批判性质，而第二种干预指出批判的界限，即批判不得掩盖技术原则上不可控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D. Albers, »Natur, Technik, Sozialismus«, in: ders., *Sozialismus im Westen*, Berlin/W-Hamburg 1987; C. Antunes u.a., *Für eine grüne Alternative in Europa*, Berlin/W- Hamburg 1990; B. Commoner, *Confronting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London 1973; H. Conert, *Ökologie und Gesellschaft*, Hamburg 1984; H. M. Enzensberger,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logie«, in: *Kursbuch* 33, 1973; J. Fetscher, *Überlebensbedingungen der Menschheit*, Neuausgabe Frankfurt/M 1985; W. Harich, *Kommunismus ohne Wachstum?*, Reinbek 1975; M. Kaldor, *Rüstungsbarock. Das Arsenal der Zerstörung und das Ende der militärischen Techno-Logik*, Berlin/W 1981; K. Kautsky, *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 (1883), Berlin/W- Bonn 1980;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oder Die Genossin Luxemburg bringt alles durcheinander*, Hamburg 1985; R. Nischanow, Diskussionsbeitrag auf der 19. Unionsparteikonferenz der KPdSU, in: *Offene Worte*, Nördlingen 1988.

库尔特·雅各布斯（Kurt

Jacobs）撰
朱更生译，金建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ntagonismus, Aufklärung,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ourgeoisie, Dorfgemeinschaft, Erde, Entwicklung, Eurozentrismus, Exterminismus, Fortschritt, Gebrauchswert,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dustrialismus, Industriekritik, Kolonialismu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r Komplex, Militärkeynesianismus, Modernisierung, Naturbeherrschung, Ökologie, Perestrojka, Produktionslinien, Produktivismus,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Raubbau, relativer Mehrwert, Technik,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Tschernobyl, Umschlag, Vernunftkritik

决定论（Determinismus）

A: ḥatmīya. – E: determinism.

F: déterminisme.

R: determinizm (детерминизм).

S: determinismo.

—

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决定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表明了因果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行动和行为的方式和动机，这种有效性都是适用的。因此，决定论反对自然的一切偶然性和人类行动的一切形式的自由意志。必然性和可预测性构成了其中的本质因素。与决定论相对立的理论被称作“非决定论”（Indeterminismus）。这两个概念的应用范围涵盖了哲学和物理学。有时人们会不太确切地把决定论称为宿命论（Fatalismus），这主要指的是那种对于外力施加的必然秩序所采取的被动接受的态度（针对作为“宿命论”的决定论的批判，参见 Gramsci，*Gef* 5，H. 8，§205，第 1056—1057 页）。

1. 作为专门术语，“决定论”第一次出现在 18 世纪的康德著作中，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一书中，康德把决定论定义为“通过内在充足理由对意念的规定”，并由此将其和“预定论”（Prädeterminismus）区分开来，“根据预定论，意念的行动是被此前时间中的理由所规定的（这些理由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在这个语境中，康德引入了“非决定论”的概念，用于表明一种缺乏决定行动的动机的状况。（Ak. VI，§§ 49—50，注释）

1.1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提出了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他认为自然过

程和人类行动在严格意义上是决定论的。在事件和现象因果链条中的这种必然秩序的观念，也体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中。到了近代，霍布斯及其理论的主要继承者斯宾诺莎最早对决定论作了合规律的理论阐述，尽管他们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在霍布斯的自然哲学中，因果性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自由概念则被否定性地定义为事件发生（或行动施行）之阻碍的缺失（*Leviathan*，I，Kap. XIV），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霍布斯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而他把自由与必然等同的做法，则是与这个理论框架完全相容的："**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比如水顺着河道往下流，非但是有**自由**，而且也有**必然性**存在于其中。人们的自愿行为情形也是这样。这种行为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为。但由于人的每一种出于意志的行为、欲望和意向都是出自某种原因，而这种原因又出自一连串原因之链中的另一原因，其第一环存在于一切原因的第一因——上帝手中，所以便是出于**必然**的行为。所以对于能看到这些原因的联系的人说来，人们一切自愿行为的必然性就显得很清楚了。"（同上书，II，Kap. XXI）

1.2 不过，近代哲学关于必然性问题的真正理论家，当属斯宾诺莎，他对自然事件发展过程的模态性作了如下规定："每个个体事物或者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事物，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而且这一个原因也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如此类推，以至无穷。"（*Ethik*，I，Lehrsatz 28）斯宾诺莎那里的"原因"概念包含两个含义，原因通过经验引发结果，而当结果**可以**从原因中**推导**出来时，原因就构成了**理由**（*Grund*）。他的《伦理学》（*Ethik*，I，L28）所阐述的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现象，而且也支配着人类 626
的行动，后者完全是被决定的。实体—上帝—自然从来不是以自由意志行事的；恰恰相反，必然性是它们自身本质的规律。无限的实体与（作为实体存在方式的）有限的事物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有限的事物总是被其他的某些东西所决定，也就是说，它们被实体所决定，而实体则被自身决定。对人类而言，自由与对支配一切现象的必然规律的意识是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也和理性行动密不可分，后者则与对必然规律的意识相适应。

1.3 在莱布尼茨那里，作为理由的原因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莱布尼茨认为，因果性原则体现为充足理由律："一切事物都有原因，或者至少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une cause ou du moins une rai-

son déterminante，*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 44）。不过，如果据此把莱布尼茨当作前述的广义上的决定论理论家，对他似乎是有欠公允的。

1.4 自然事件的可预测性原则构成了基于牛顿定律的经典力学的一个重要因素。19 世纪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有数学家拉普拉斯（P. -S. de Laplace）、生理学家伯纳德（C. Bernard）以及哲学家孔德（A. Comte）。在《概率分析理论》（*Théorie analytique des probabilités*，1812）一书中，拉普拉斯提出了因果决定原则，它与前述的斯宾诺莎的定义很相似："我们可以把宇宙现在的状态视为其过去的果以及未来的因。"拉普拉斯由此得出一个假说：假若一位智者会知道在某一时刻所有促使自然运动的力和所有组构自然的物体的位置，假若他也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则在宇宙里，从最大的物体到最小的粒子，它们的运动都包含在一条简单公式里。对于这位智者来说，没有任何事物会是含糊的。这种对于绝对可预测性的理想，也体现在他纳德的论述中："实验科学的绝对原则就是一种必然的决定性……某个结果和特定的原因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它不依赖于经验，它是数学意义上不可避免的，是绝对的。"（*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icine expérimentale*，1865）孔德把原因定义为"因素之间不变的次序和相似关系"，并认为原因的功能在于促使对现象的预测达成可用性（Nutzbarmachung）的目的，因此它是对自然的干涉。（*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I，Kap. I，§ 2）在孔德看来，原因原则和可预测性概念的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础性的启发式工具。 627

2. 把自由视作对必然性的意识那种斯宾诺莎式的观念，经过黑格尔进一步发展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决定性概念的理论演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解释道："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MEW 20，第 106 页）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原则，黑格尔的辩证法应当加以彻底的解构和重构，唯物主义史观的基本思想在于：历史的主体不是精神，而是具体个人的社会性存在——它是由个人为了满足需求而进入的那种生产关系所建立的——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

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MEW 3，第 25—26 页）

同样的思考还体现在马克思另一处著名的论述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他补充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MEW 13，第 8—9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个基本原则指出了“决定”的两种形式：一方面是人类的物质生存条件对于其行动的决定，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决定。由于人类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共产主义”是能够自发地实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产主义被规定为“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它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MEW3，第 35 页）；而人们的主观干涉则似乎只有次要的作用。换言之：这是一种演化论形式的经济决定论。对同一个文本（乃至其他文本）的另一种解读则体现了不同的看法，这种解读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并据此对上述那个程式化的解读作出修正。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全面变革”需要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是现有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则需要“不仅反抗旧社会的某种个别方面，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MEW 3，第 38—39 页）。

后期的恩格斯就对此问题与政治相关的方面作了澄清。在 1890 年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

628

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MEW 37，第 463 页）

3. 在物理学中，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尤其是 1927 年海森堡（W. Heisenberg）**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因果性原则的普遍有效性被重新评价。原子级别的现象所遵循的量子力学，其本身依据的运动概念和经典力学的运动概念有着根本区别，它排除了因果性原则普遍和必然的有效性。不确定性原理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不改变另一个与其相关联的物理量的前提下，完全准确地确定特定物理量的大小。在海森堡看来，我们对自然的日常描述，尤其是“关于自然过程严格合规律性的观念，都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我们有可能在不影响某个现象的同时，对该现象进行观察”（*Die physikalischen Prinzipien der Quantentheorie*，［1930］，[4]1944，IV，§3，第 48 页）。与确定的可预测性观念相关的是可能性的观念，后者适用于在微观物理领域描述基本粒子的运动。1932 年，冯·诺伊曼（von Neumann）否认了在宏观物理领域通过实验证明因果性原则的可能性，并认为不仅因果性原则和量子力学无法统一，我们也无法证明因果性在自然中是存在的。（*Mathematische Grundlagen der Quantentheorie*，Berlin 1932，IV，§2）此外，马克斯·普朗克（M. Plank）认为我们不应把严格的决定论作为前提（*Der Kausalbegriff in der Physik*，1932）；德布罗意（De Broglie）则指出必然因果性是无用的，他认为绝对意义上的决定论已经过时，并引入了一种“弱的”或“不完全的”决定论，在其中，原因概念被条件概念所取代。

参考文献：

R. Bhaskar. »Determinism«, in: DMT, 117ff; M. Galcerán Huguet, »Determinismus«. in: EE 1, 539-544; H. Fleischer, »Zum Problem des ‘ökonomischen Determinismus’«, in: ders., Marx und Engels, Freiburg-München 1970, 94-103; H. Hörz, *Der dialektische Determinismus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1; P. Lafargue, *Le déterminism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 (1909), Paris 1928; A. Tosel, »Determinismus«, in: KWM 2, 235ff; R. Williams, »Determinism«, in: ders., *Keywords*. London-New York 1976.

埃米莉亚·吉安科蒂（Emilia Giancotti）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考：

Antizipation, Basis, bestimmte Negation, Bewegung, Bewußtheit, Denkformen,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Freiheit, Gesetz,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ologie, Indeterminismus, Instanzen,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Naturdialektik, Naturwissenschaft, Notwendigkeit, Reflex, Sein/Bewußtsein, Wechselwirkung, Zufall

630 二

决定论在合乎规律的预定发展的意义上，是由“马克思所创立、恩格斯和考茨基所通俗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LS，第128页）。因为历史决定论忽视人的行动和行动的人，在第二国际时期助长了“革命者的观望等待”，在权威社会主义具有确认合法性的作用，因此它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已声名扫地。由于物理学的变革（“不确定性”原理），源自古典力学因果思想的自然科学决定论也遭到了质疑。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攻击“马克思的社会学决定论”（1958，第102页）不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立足于因果解释模式，“毕竟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学者都这么做”。波普尔指责的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把科学决定论“混同”为“历史预言”，“粗线条地向我们讲述社会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第107—108页）当然，这一判断更适用于庸俗马克思主义，而非《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作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实践的立场出发，针对的正是历史问题中的客观主义（以及机械的因果律）。

1. 马克思认为，决定论的观念通过“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体现出来，即“现实……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ThF* 1，MEW 3，第5页）恩格斯沿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脉络，将决定论视为一种脱离实践的、停留于观念中的世界观。“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今天清晨四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这一切都是由一条不可移易的因果链，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简言之：“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摆脱出来。”（*DN*，MEW 20，第487—488页）事物的“必然性”纯粹是一种“观念”，实际是“一句空话”和“一种可怜的安慰”。（第489页）

与之相应有布莱希特的评判：“‘世界是完全被决定的’是一句空话，因为这句话不适用于人，而且实际上只是在说，如果我们能找到原因，就总能找到原因。”（*AJ*，23. 3. 1942）借由语言批判，布莱希特将决定论思想“直观”的 631

维度本身连同对它的批判理解为一种行动："不要像客观主义者那样反对'大人物创造历史'这种可以用特定行动纠正的说法，客观主义者会摆出'存在着不可阻挡的社会趋势'这种无法用特定行动纠正的说法！"（GA 21，第 575 页；GW 20，第 69 页）

马克思所开启的立足于"活动、实践"（*ThF* 1，第 5 页）立场的批判，并没有使得决定论问题失效；"新唯物主义"（同上）将问题转向了决定因素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布莱希特认为，"掌握尽可能多的决定过程、将人变为可利用的"（GW 12，第 568 页）是必要的。这正是"自然科学家的活动"（同上）。自然科学的范式，主要是在以马克思、恩格斯、布莱希特和阿尔都塞等名字为标志的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脉络中，有着普遍的意义。晚年恩格斯将自然研究的实践同它的"机械的决定论"区分开，机械的决定论"一般地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以便在每一个特殊情况下实际上承认偶然性"（MEW 20，第 489 页）。因为特定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无法思辨地探究，只能在实验中发现。"**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第 497—498 页）

20 世纪物理学世界观的变革契合了这一洞见：如果研究改动了对象本身，那么独立于行动起作用的因果性观念随之就变得可疑。布莱希特发现，物理学家"承认了因果律以后，仍然将原则上已不能成立的假设轻蔑地呈交给玄学家"，而哲学家则坚持"人能够想象他所不能想象的原因"。（*AJ*，18. 3. 1942）他将不确定性原理引入他的"介入性思维"（eingreifendes Denken）概念中："定义者的态度永远是决定因素之一"，这里指的是旨在"使处理被定义物得以可能"的"实用的定义"。（GW 20，第 168 页）

2. 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决定论地思考决定论问题？这个问题被从两个方向解释。阿尔都塞学派从认识论角度追问概念形成的"科学"和"意识形态"维度。 632
与之相对，如果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出发，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将"实践"作为变革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如何与不受影响的决定论设想相容？南斯拉夫实践哲学的代表人物因此断定："马克思的概念包含了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作为自由本质、作为创造者的原则，另一方面则是自然和自然历史发展受到决定。"（Vranicki 1972，第 229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先出现的关于决定论的论点是那句著名的颠倒式的格言："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MEW 3，第 27 页）这

一论点总体上反对那些想象的没有前提条件的更高原则，因此也反驳了弗兰尼茨基（Vranicki）“人作为自由本质的原则”（参见第 26—27 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任务始终是，反思自命为“自由本质”的主体所无法意识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将意识、自主、自由等等建构为观念。历史唯物主义所关心的就是之前的唯物史观中的无意识。马克思批评自主观念是“幻觉”，通过社会分析重建了行动、个人和实践在形式上所受的决定（**意识形态的形式、面具**等），这些形式通过交往方式为物质生活过程所“制约”或“决定”。——这个问题经由心理分析的理论和语言学的理论重新激活，被转而用来分析主体作用（Subjekteffekt）。

颠倒唯心主义对“存在和意识”的排序有着论战的意义：理论上这意味着从“抽象的人”到“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第 26 页）的场域转换。如果这一论点只满足于颠倒的形式，那么对决定论问题的思考就将依然费尔巴哈式地停留在唯物主义哲学的传统中；但这一论点已经存在于对费尔巴哈批判的语境中。遵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路，关于“人”是什么的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针对现实的人的问题，即“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他们是如何活动的”（第 25 页）。这一问题的转换拆解开了哲学中的决定论问题：行动是自由的还是被决定的？“人”是创造者还是木偶？以上问题被以下事实所取代：行动要基于一定的条件；行为在一定环境中才会发生；意识只能 633
是“活动的人”的“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第 26 页）

这一简单的事实引出了理解行为“局限性”的概念的总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结构、上层建筑等等。如果说这些概念不应被理解为“决定论”的，即不与行动处于二元结构的对立中，那么问题就在于，根据实践中“起决定作用的”行动条件构造出理论上的决定。（参见 Haug 1974，第 58—64 页）这些概念不能作为封闭的思维建筑，要求有权利“决定”经验活动；这些概念在生活实践中的重要性在于，使介入的、改造的行动得以可能（即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这些概念可以具有实际的，而非“绝对的”约束力，因而是可检验的。于是决定论问题便让位于关于调节和塑造社会进程的知识的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决定”（bestimmen）、“制约”（bedingen）或“取决于”（abhängen）等动词概念处理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避免名词化导致的实质化。著名的表述“归根到底（in letzter

Instanz，字面意思是‘最终审判’。——译者）决定论”，在国际的论争中不幸成为一个选边站队的问题，但原话实际并未见于晚年恩格斯。恩格斯——反对科学决定论和康德主义的自由—决定二分困境——力图寻找的是“历史过程中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MEW 37，第463页），历史的“前提和条件”（同上），“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或“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MEW 39，第206页）。从国际讨论回译的德文中包含名词“决定”（Determination）等概念，在语言上就和宗教或哲学色彩浓厚的决定论问题难以区分。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其本质而言是否是决定论的，这个备具争议的问题聚焦于**必然性**这一核心问题。恩格斯将必然性理解为具有决定作用的**基础**（*Basis*），谈到这种基础时认为它是“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恩格斯的表述仍出自决定论的词典，因为这种表述隐含着一种从最终原因出发进行推导的单一原因思维。既然马克思的解释并非还原的，而是发生学的、重建的，就不可能存在这种“归根到底”**作为解释的理论原则**。阿尔都塞虽然看到了这一点（“最终审判的钟声不会单独敲响”；*FM*，第81页），但仍将生产阐释为“决定的因素”（*FM*，第79页）。马克思则相反，正如施米德-科瓦齐克（Schmied-Kowarzik 1981，第97页）所强调的，他说的是生产的“支配”（Übergreifen）地位：“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分配、消费］……一定的生产决定了……**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作为要素之一］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Gr*，第20页）因而不能说，马克思将决定因素理解为独立自存的审判者。解构主义者的批评没有击中他。（“解构实质的、原则的、起源的、终极原因的事物，就总是意味着解构对‘最终审判’的上诉”；Derrida 1994，第129页。）由此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视角中的最终决定因素，实际上只能具体化为社会状况的结构，这一结构制约行动又以特定的方式实现并修正行动。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著作《神圣家族》中认为，无产阶级的“目标”和“历史使命”已经“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必然要“被无法再回避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实现：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而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MEW 2，第38页）如

果将此理解为“实践的”必然性，那么这里所说的至多是一种历史趋势；未能进一步给出一个预先确定的目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决定论的世界观是一种职业“意识形态家”的思辨活动；马克思的批判旨在揭示出，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实践条件必然会在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思维活动中遭到“错认”，人们的思考固着于想象出来的决定因素。马克思在论述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受职业制约所必然具有的“幻象”时指出：“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MEW，第 39 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决定论第一是受生活实践“决定”的；第二是作为观念社会化的形式发挥作用；第三是作为单一原因的、从想象的原则出发的还原论思维。

635

在决定论观念中，上述视角不仅只是认识上的（“错误”）意识而有着重要意义。这一视角经由葛兰西重新焕发出生机。葛兰西认为流行的宿命论是属下群体自甘被动的“毒品”，同时又是他们的“内在力矩”。这导致决定论这一概念包含着不同的、不可化约的现象。决定论“高等的”、哲学的形式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对象，不同于流行的、平民的诸种决定论，后者的诸种决定论同哲学的诸种决定论结合起来，可以造就推动历史的集体力量。

3. 根据《资本论》的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MEW 23，第 791 页），波普尔批评道，马克思屈从于“错误的信念，即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基于严格的决定论”（1958，第 107 页）。不过存疑的是，这种科学的决定论是否真的与历史的决定论观点相联系。将所有可观察到的过程都视为有其缘由，排除副作用和反作用，或者在方法上可控，这种实验安排对实践经验科学意义非凡。实际上，弄清楚“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尝试（MEW 23，第 789 页）似乎是受到了“自然科学的精确性”（MEW 13，第 9 页）这一主题背景的引导。马克思将它们放在假设的基础上，并将其从经验约束和反作用趋势中抽象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用制定“趋势定律”的理由和必要性来反抗对决定论的指责。（参见 Gramsci，*Gef* 6，H. 10. II，§ 36）

基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人们可能会问，马克思是否没有退回到“直观的唯物主义”。这一看法忽略了以下事实，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

史问题涉及特定条件下的、通过经验而不是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行为。此外，还应该考虑到阿尔都塞（的观点），“这种”实践（行为）并不存在，并且“理论实践”必须构成认知对象；直觉或许是学者在
636 其中发挥作用的形式。现代物理学的经验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批评，在研究实践中，对象只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结构性地隐藏自己，并且“经典物理学代表了我们对世界或一部分世界（而不是我们自身）的理想化描述”（Heisenberg 1959，第 39 页）。这是“假设——还是应该说：一种客观描述的——……幻觉？”（第 38 页），它是马克思对科学理想的未曾间断的建构。布莱希特看到：“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也表现出这种与个人有关的模糊。”（*AJ*，26.3.1942）本雅明的论文将历史唯物主义视为“装置”中的隐藏神学形象，“装置”通过“镜像系统”产生幻觉，即它是“四面八方的”（GS I，第 694 页），在非决定论问题上有其理性的核心。

波普尔的历史主义批评在这点上似乎是有用的，通过研究实践本身并使用这种直觉的（哲学）意识形态，它区分了科学决定论与阿尔都塞作为学者的“自发哲学”。在论战中，马克思以错误的普遍主义的接受形式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论证，而随后他越发认识到，“物理学或天文学上的科学预言与严苛的历史预言容易发生混淆”（Popper 1958，第 108 页）。这一点可以从法文版《资本论》的变化看出。马克思拒绝将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MEW 19，第 111 页）。

4. 它与工人运动的“科学世界观”不同。在这种话语表述中，人们对命运的普遍信念是“科学地”表达出来的，而社会分析的、抽象的作用背景则被表达为“历史规律”。从葛兰西的笔记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和“普通”党员之间存在特定联系，因为“决定论的、宿命论的，机械论的要素是实践哲学直接的、意识形态的‘气氛’，……它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其正当性通过某些社会阶层的‘次要’特征得以指明。如果一 637
个人在战斗中没有主动权，而斗争本身最终也被视为一系列的失败，那么机械决定论就会成为道德反抗和道德团结的惊人力量”（*Gef* 6，H. 11，§12，第 1386 页）。

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义上进行了“修正”，他强调，新唯物主义在对抗广泛作用的唯物主义大众哲学上“很有效”（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他还回顾了唯心主义的相

关成就（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它们几乎无法触及（工人）运动的生活实践的神经。“可理解的”是在这种接受的语境中，“归根到底”和“相互作用”这些概念在与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蔓延开来，并获得了新的含义。

通过介入这一讨论领域，康德立场的修正主义使决定论与自由相对立，正统的历史观察与出于道德动机的自我决定形成鲜明对比。葛兰西试图通过一种道德激励代替社会主义信仰者的期望，以此来战胜道德政治的行动能力——要使议会主义在舞台上从胜利走向胜利，这在运动中有历史必要性。伯恩施坦在1899年指出，看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影响会大得多，……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措辞中解放出来，并且看到他们当下的真实情况：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党。”（*Voraussetzungen*，第16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修正主义”甚至是对马克思的回归：“哲学或科学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第4页）关于辩证法，伯恩施坦写道，这种决定论模式，“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发展所要导致的结果”（第117页）。

它在政党官方话语中引起的动荡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科学的和大众宗教的决定论与党内知识分子和普通成员相关联，“科学社会主义”的组织结构就会受到威胁。第二国际的领导人都是“决定论者”，都试图从思想上想象决定论和主观自由。列宁保证，“决定论不仅不以宿命论为前提，而且恰恰相反，它为明智的活动提供基础”（参见 *öklnh*，LW 1，第435页），他讽刺“这套傀儡之类的胡说”。“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冲突完全是米海洛夫斯基（Michailowski）先生因担心（而且是不无根据的）决定论会推翻他所酷爱的小市民道德而捏造出来的。”（*VF*，LW 1，第151—152页）看来考茨基似乎本能地同意了葛兰西提出的见解，即决定论是以异化形式改变现实的实践（“一种强有力的、自惭不足的……意志活动”；*Gef* 6，H. 11，§12，第1386页）；与伯恩施坦不同，在他看来，对于已改变的斗争条件，似乎没有必要释放“道德政治的”行动个体。“挣扎中的无产阶级对社会发展抱有极大的信心，对自己的发展也充满信心，他们不惧怕战斗。他们只需要一个战场……民主国家提供了这个战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最后的关键斗争最有可能在那儿进行。”（Kautsky 1911，第125页）在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战场上，这种信心消失了。

638

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列宁严格制止知识分子退出流行的决定论，“把决定论局限于‘研究’的领域，而在道德、社

会活动领域中，则‘主观地’来评定一切……把理论和实践割裂开来”会发生什么？“在我的工作室里，饱学之士说，我是决定论者；而只字不提的是，哲学家必须考虑基于决定论的、统一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世界观。”（*ME*, LW 14，第 188 页）出于这些考虑，葛兰西在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即苏联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中，宣布了这种努力的结果。他建议，“为了限制科学活动并在群众的低水平上保持统一”，并且为了实现“群众知识进步”，就不应肯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的接触要求”。（*Gef* 6，H. I. §12，第 1383 页及以下）决定论可以“作为大众的幼稚哲学……内在的力量元素”，“如果它被提升为知识分子的反思的和连贯的哲学，则会带来消极性，是愚蠢的自满”。（第 1387 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试图用“一种新的决定论观念代替机械决定论，不仅保留了它的决定性核心问题，而且使它在自然、社会和思想的各个领域得到一致实现”（参见 PhWb 1，第 266 页）。基于**辩证决定论**，每一个巧合都被认为是必要的，非合法的被当作是合法的，并且矛盾的原则“在现实的所有领域中都不矛盾地贯彻”（第 267 页）。不必从机械上解释所有因果关系，就可以在修辞上坚持以“客观法则”的适度形式来运作“更确切的”法则。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物理学的革命被整合进了客观主义的“世界观”。（Hörz 1971）

布莱希特将非决定论重新转化为一项原则：“即便有人已经指出界限所在，原则上描述方法也将无法再‘改善’，描述可能性的问题对那些哲学家来说仍然存在，而他们的写作因此（不是无中生有地）得以维持。”（*AJ*，17. 3. 1942）另一方面，他看到这个（由阿尔都塞阐述的）问题，即哲思式的物理学家通过“哥本哈根解释”为这一问题提供支持，并提出警告，“反驳自然现象的确定性或被物理学家反驳”（GW 12，第 568 页）。在阅读马克斯·普朗克（1938）的论文时，他认为**决定论或非决定论**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希望的”（*AJ*，23. 3. 1942）。这又退回到了二元论的世界观，在原则上一切还是墨守成规。“不可动摇的必要性让人联想到它的抽象对应物——自由；决定论对抗非决定论：‘存在’的封闭链条对抗‘应存在’的开放的和无前提的视角。”（Colletti 1971，第 37 页）

5. 阿尔都塞试图用**多元决定**概念来非决定性地思考革命行动的条件，这是基于精神分析和语言学提出的一个概念。（*FM*，第 152 页）它并非单因派生思维

639

("经济主义"), 而是一种结构和实例关系的思想, 相互矛盾的规定交错其中。阿尔都塞假设结构效应中的"最终命运由经济来体现"(第 161 页); 也就是说, 决定性的矛盾可以以转移的方式表达, 也可以激化成主要的对抗。

这个概念又在两个阶段被批评为决定论的。继萨特之后,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认为, 它"将活人交给了社会制度的僵化逻辑"(1969, 第 209 页)。奇怪的是, 阿尔都塞反对"经济"思想的决定论, 受列宁影响, 他试图确定对立领域中革命行动的条件。一个很要害的批评可能是, 阿尔都塞从"直觉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转向了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实践的观点, "他们的科学决定论因无法将自己确定为决定论而捆浅"(第 211 页)。

640

受阿尔都塞启发的话语理论家和解构主义者对"归根到底"进行了持续的批评, "我将'归根到底'的整个企图视为形而上学的停滞"(Derrida 1994, 第 129 页)。实际上, 阿尔都塞设想不在场的原因来确保"复杂整体的统一", "只要创建统一原则只对于思想是必要的, '归根结底'从不单独起作用"(*FM*, 第 81 页)。但问题是在布莱希特的寓言中: "黄河是真的存在, 还是仅存在于头脑中?"尚无定论, 因为黄河发大水冲走了"所有大会参会者"的讨论(GW 5, 第 2212 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Widerspruch und Überdeterminierung« (1962), in: *FM*, 52-99; ders., »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1963), in: *FM*, 100-167; ders.,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1967), Berlin/W 1985; W. Benjami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1940), GS I, 691-704; L. Colletti, *Bernstein und der Marxismus der Zweiten Internationale* (1968), Frankfurt/M 1971; J. Derrida, »Politik und Freundschaft. Ein Interview mit Michael Sprinker« (1993), in: H. Böke u.a.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AS 228, Hamburg 1994;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W ^{5}1989; H. Heimann, »Determinismus«, in: LS, 128f; W. Heisenberg, *Physik und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59; S. Hook (Hg.), *Determinism and freedom in the age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H. Hörz, *Der dialektische Determinismus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1; K. Kautsky, *Parlamentarismus und Demokratie* (1893), Stuttgart 1911; G. Kröber, »Determinismus«, in: PhWb 1, 263-267; M. Planck, »Determinismus oder Indeterminismus?«, in: *Europ. Revue*, Nov. 1938; K. Popper,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II: Falsche Propheten* (1945), Bern 1958; ders., *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 (1944/1945), Tübingen 1965; A. Schmidt,

»Der strukturalistische Angriff auf die Geschichte«, in: ders. (H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W. Schmied-Kowarzik, *Die Dialek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Zur Genesis und Kernstruktur der Marxschen Theorie*, Freiburg-München 1981; P. Vranicki,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1961/1971), Frankfurt/M 1972.

641

托马斯·劳格施廷 撰
曹旸、李牧今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bleitung, Althusser-Schule, Basis,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Charaktermaske, Denkformen, Diskursanalyse, Form/Formbestimmtheit, Freiheit/Notwendigkeit, Frühschriften, Gesetz, Instanzen,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Notwendigkeit, Ökonomismus, Personifikation, Reflex, Sein/Bewußtsein, Subjekt, Überdeterminierung, Unbewußtes

德国的鄙俗气（deutsche Misere）

A: al-taᶜāsa al-ālmānīya.

E: german misery, german wretchedness.

F: misère allemande.

R: germanskaja niščeta (германская нищета).

S: miseria alemana.

这个恩格斯使用过、梅林论述过、直到卢卡奇方才更广泛、更系统地运用的概念，概括了诸多母题的一种形态，这些母题所体现的德国历史相较于英法历史的特殊性，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解为一种劣势与优势之间的矛盾关系。

恩格斯在对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Über Goethe vom menschlichen Standpunkt*）的评论中首次运用这一概念（MEW 4，第 232 页），并不是为了新造一个历史学范畴，而只是顺笔提到。他对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席勒（“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与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刻画，一方面当然可以说承接着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经斯塔尔夫人（Modeme De Staël）一直延伸至黑格尔、海涅及古茨科（Gutzkow）的，将德意志的悲惨现实和伟大的德意志思想进行对比的传统，另一方面承接着莫泽斯·赫斯对德国与法国、英国所作的比较（1841）。赫斯用这个概念论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成熟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过分成熟导致的后果：“德国的资产阶级似乎该为此遭到诅咒：在德国的鄙俗气的平静海面上，他们在恐惧和希望之间摇摆不定如此之久，直到西边突然爆发风暴，无产阶级

的巨浪呼啸而上，一举吞没了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Deutsche Bruesseler Zeitung*，1847 年 11 月 11 日）

青年德意志时期的恩格斯在《英国状况》（*Die Lage Englands*）系列文章中将“当代史上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进行对比，论述了一种预测：英国会经历一
642 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MEW 1，第 552 页），相对于信仰唯灵论的德国人经历了哲学革命，信仰唯物主义的法国人经历了政治革命；青年黑格尔派时期的马克思则相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强调了德国现状的“时代错乱”（第 379 页）是超越（法国式的）政治解放的（在德国）人的解放的前提，没有使用“德国的鄙俗气”这个概念，他认为德国现状的“卑劣事物”（第 380 页）的特征一方面体现为利益的“狭隘性”（第 389 页），另一方面体现为“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第 384 页），人的解放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第 391 页）对于马克思来说，一方面，“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第 381 页），另一方面，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两者都源自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前提：“在德国”，“全部自由”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第 390 页）。

马克思追随海涅的观点，既将宗教改革理解为“德国的革命的过去”（第 385 页），也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对比法国大革命（恩格斯 1888 年曾强调这一点，MEW 21，第 265 页），为的是将德国的思想家视为“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MEW 1，第 383 页）。然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他凭借无产阶级将哲学付诸现实的构想中，德国政治、经济上的落后却成了——恩格斯 1874 年写道——德国“理论感”的“优越之处”：“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MEW 18，第 516 页）在 1873—1874 年写下的《关于德国的札记》（*Varia über Deutschland*）里，恩格斯简要地指出：“摆脱贫穷不堪的现实，这就是后来德国人在理论方面（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占优势的基础。”（第 590 页）1888 年恩格斯在谈及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时写道：“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MEW 21，第 269 页）

这种形态的诸多母题贯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但只有恩格斯将

它们概括为“德国的鄙俗气”这个概念：（1）市侩与天才、狭隘与激昂、具体论（Konkretismus）和抽象结合在一起，
643 （2）区分“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的“三次大决战”（MEW 22，第 300 页），将德国视为宗教改革和古典唯心主义的精神革命的代表，以及（3）“经常彼此进行比较”并“向其他国家学习”（MEW 23，第 15 页）的“大民族”（“法国人、北美洲人、英国人”）（MEW 3，第 426 页）与“躲到不可比性这个挡箭牌后面去”的“小市民”（MEW 3，第 426 页）所组成的民族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描述了这一教训：“在（工厂以外的）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MEW 23，第 12 页）

恩格斯在各不相同的语境里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的鄙俗气”所描述的诸多母题的内涵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德国只不过是一个粪堆”（MEW 2，第 566 页）的图景已是矛盾性的，因为恩格斯在《德国状况》（*Deutsche Zustäden*）中仍将文学视为“好转的唯一希望”（第 567 页）；同样的矛盾也贯穿在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杰出著作中，因为其中传达的“反抗与叛逆的精神”（同上）要用法国革命加以衡量，而“好心的理论家”面对法国革命“实际上产生的后果”，“便宁肯保持自己那古老的安宁的神圣罗马粪堆，而不要人民的令人战栗的行动了”（第 568 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康德哲学与法国人的政治革命以及英国人的工业革命形成了对照：康德哲学“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鄙俗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MEW 3，第 177 页）：“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同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种情况出发推论出了国家官僚机构“异乎寻常”的角色和“在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过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意识”。（第 178 页）

1850 年，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毁灭革命的狭隘性，在 1525 年和 1848 年之间进行了类比，同时又强调两者的差异：“1525 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1848 年的革命……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MEW 7，第 413 页）
644

恩格斯将俾斯麦“从上面实现德国革命”（MEW 21，第 451 页）视为“对法国革命早在 70 年以前就已做过、其他一切文明国家也早已实现的事情进行了非常非常不及时的和不完全的模仿”（第 435 页）。不同于同时代德国人的论断，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宗教改革作为德国革命的欧洲意义，另一方面则强调当时尚未完成的“清除”“封建制度和宗法式专制制度的残余”的任务。他并不期待“愚蠢又胆怯”（第 383 页）、“怯懦又软弱”（第 451 页）的德国资产阶级完成这一任务，而是期待工人阶级完成这一任务。他在理论和民主进程的领域都见证了“资产阶级的让位”（第 383 页）：“随着 1848 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第 306—307 页）

然而恩格斯看到了德意志帝国踏上“这样一条道路：使它可以赶上在政治上遥遥领先的西欧其他国家，最终摆脱封建主义的最后残余，摆脱那种在官僚当中仍然很盛行的雇人传统”（MEW 21，第 453 页），“只有这样做才能把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成果逐步地移植到德国的土地上来，简言之，只有这样做才能剪掉德国的过长而又过时的辫子，才能有意识地、最终地把它引上现代发展的道路，才能使它的政治状况适应于它的工业状况”（第 454 页）。

1892 年形成的判断，德国的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乃至法国的工人运动，则产生了两个修正：“四百年前，德国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同样成为欧洲无产阶级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MEW 22，第 311 页）然而恩格斯在同年给马克思的女儿劳拉（Laura）的信中这样写道：“一个国家，经历了像德国的 1648 年至 1848 年那样的两百年，即使在工人阶级身上也不能不留下些微市侩的痕迹。我们 1848 年至 1849 年的革命太短促，而且远未完成，以至不能把这种痕迹完全消除。”（MEW 38，第 545 页）因此，在 1874 年，他的断言，即理论的作用使得“欧洲最具理论修养的民族”（MEW 18，第 516 页）的工人运动成为欧洲工人运动的“前锋”（第 517 页），终究与“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肩膀上发展起来的”（第 516 页）这一提醒，以及“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一警告联系起来了：“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第 517 页）

1883 年，恩格斯在一个注释中通过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

政治关系”纠正了一个所谓的“笔误”：1882年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只有“在德国”才可能产生，而他在1883年版中以“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的表述替换了“本质上德国的产物”（MEW 19，第187页）这一表述。

如果说恩格斯赋予普鲁士“特殊的命运”，“它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在1808年至1813年间开始了的，并在1848年前进了一步的资产阶级革命”（MEW 18，第513页），那么列宁则将资产阶级改造作为普鲁士道路和法国道路对立起来，而未使用“德国的鄙俗气”这个概念；他强调了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LW 9，第236页；16，第201页）对工人阶级的民主任务造成的后果：“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80年中间，无产阶级大约有四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LW 19，第402页）

梅林在其《莱辛传奇》（*Lessing-Legende*，1891/1892）中援引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1834），将恩格斯“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的说法，发展成了将“古典文学”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开展的解放斗争”的构想，这种斗争“由于此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 646
落后状况……唯独凭借他们精神上的些许进步才能够抵达理念的高度”。（GS 9，第46页）

随后，恩格斯对格律恩的评论经由魏特夫、卢卡奇注释后首次翻印，于1932年作为一篇“不著名的论文”刊登在《左转》（*Linkskurve*）杂志的《歌德特辑》（Goethe-Sonderhefte）上。这篇文章意在反驳梅林，更确切地说，反驳富克斯（Fuchs）和德国共产党反对派理论家塔尔海默出版的梅林的文学史论著。梅林认为恩格斯的评论出自马克思之手，但没有将它收入他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对于魏特夫和卢卡奇来说，“批判地审查梅林文学批评的遗产”（*Die Linkskurve* 4，1932，第13页），就意味着整个“第二国际的观点”，尤其是梅林对于歌德和席勒的“分析和评价”，“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恰好背道而驰”：“他不想也不能承认德国古典的理想主义的枯萎。”（第12页）卢卡奇和魏特夫针对“歌德，德国最伟大的诗

人——德国的‘鄙俗气’的牺牲品”（*Dierote Fahne*，1932年3月22日）这种说法予以了最尖锐的批评，但卢卡奇对歌德这一“西方人”进行辩护，反对将歌德归入法西斯主义的和被视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民族主义的“本土性”（Bodenständigkeit）范畴，已预示着他后期对鄙俗气概念的研究的某些要点。

卢卡奇强调，尽管“歌德不理解并排斥法国革命，但却一直支持拿破仑，支持英国，概言之，支持当时进步的‘西方’的资产阶级文明，歌德青年时期的发展受到伏尔泰（Voltaire）、狄德罗、卢梭等人决定性的影响，年届高龄的歌德对‘本土’反动的德国文学不屑一顾时，对巴尔扎克（Balzac）、司汤达（Stendhal）和梅里美（Mérimée），对拜伦（Byron）和司各特（Scott），对雨果（Hugo）和贝朗瑞（Béranger）还表现出强烈的喜爱”（*Linkskurve*，前引书，第39页）。魏特夫将被德国的鄙俗气压垮的歌德普遍化为一个不仅仅属于德国文学史的符号：“德国资产阶级，欧洲经济发展的晚生子和继子，1800年左右还没有诞生，1848年左右则再也没有能力……正式开展他们自己的革命，取得革命的成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法国、英国、美国诞生的伟大小说，在德国不可能出现，或只是作为畸形儿，作为自视风雅的游戏，作为局外人的实验而出现。”（第7—8页）

卢卡奇在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条件 647
下，将“鄙俗气”概念普遍化以概括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以来的德国历史，此时他援引的却是梅林在1893年7月14日得到恩格斯赞同的话（“在研究德国历史时——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MEW 39，第99页）。“1848年革命的失败终结了所有缔造自由德国、摆脱德国鄙俗境况的努力。”（1945，第20页）这是卢卡奇1945年首次出版的提纲《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Fortschritt und Reaktio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的立论出发点。由于卢卡奇将1848年的失败确定为“德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失败“证明了先前整个文学、意识形态上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同上），他就不仅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找到了解释，也为在战后德国要开展的改造教育确定了重要标志。

对比《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的两份未付印草稿和其中的相关章节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反希特勒联盟时期，尤其在集中营“揭穿”了“德国人民受毒害之深”（1970，

第 50 页）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榜样意义愈发清楚地为人所理解；另一方面，在恩格斯和梅林那里已经埋下的歧义变得愈发含糊不清。德国精神上的优势——哲学和文学方面体现于黑格尔和歌德——相较于英国、法国，表现为“落后状态积极的背面”（1933，第 79 页），落后状态主要在于缺乏革命民主传统，缺乏的原因，卢卡奇解释为资本主义“迟到”的发展未能克服“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残余”（1941，第 78 页）：“德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德国人原先就成了统一的民族，但政治上却不是一个现代民主的民族。”（1970，第 63 页）卢卡奇将其后果从社会心理学（多次援引托马斯·曼的说法“受权力保护的内向性”）的角度，描述为德国的鄙俗气中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后来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结合。他将德国的鄙俗气等同于普鲁士性，普鲁士性“未能实现民主的社会化和公共生活对国家机器持久的监督，个体完全外在于政治事务，与那些有机发展而成的现代社会截然不同”（第 34—35 页）。于是“在每一个个体德国人心中，诉诸公共意见并与公共意见紧密相关又时常敢于逆流而上的个人独立性”都“残废”了。（第 65 页）

卢卡奇的综合性概念一直致力于将经济、阶级斗争、政治、观念史、文学史分开，却与同时代更趋同的模型有着共同之处，不仅和“范西塔特主义”（Vansittartismus，20 世纪上半叶英国外交家范西塔特 [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 所提出的对德国对外政策的解释模式，认为扩张性的对外政策是德意志民族性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分。——译者）都持民族性格的说法，而且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权威和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1936）或普勒斯纳（Helmut Plessner）的《迟到的国家》（*Die verspätete Nation*，1935）在社会心理或思想史问题上也有相同观点。布洛赫将德国界定为“与英国，甚至法国都迥然不同的非同时的古典国度”（1935，第 113 页）符合卢卡奇的“鄙俗”概念对经济的现代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反现代性的强调。而阿多诺后来的回应《答何为德意志》（*Auf die Frage: Was ist deutsch*），再次触及了卢卡奇提到的精神革命和野蛮之间的矛盾，他在启蒙辩证法的框架下作出这样的解释：“如果实际上在整个早期资产阶级历史的漫长阶段，文明之网的网眼——资产阶级化——在德国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编得那么紧密的话，一种自然的力量就会难以置信地储存下来。它同样会产生精神毫不动摇的激进主义以及开历史倒车的永恒可能性。”（1965，第 695 页）

战后卢卡奇通过“自我检查”进行

改造教育的纲领（1970，第 63 页）对阿布施（Alexander Abusch 1946）、科夫勒（1948）和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 1947）产生了影响，并经由他们扩大了影响力。即便布莱希特（以及恩斯特·非舍尔）反驳对艾斯勒的《约翰·浮士德》和柏林剧团改编的《浮士德原本》的批评，他的反驳仍遵循着卢卡奇的概念所限定的框架："若有人……谈论德国的鄙俗气是为了同它作斗争，那他自己就属于……那些不允许将德国历史说成唯一的鄙俗状态的人。"（Brecht，GW 19，第 535 页）

"德国的鄙俗气"这一概念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力求实现德国的再次统一和在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民族乐观主义，与之后的"历史胜利者"的口号所集中体现的历史意识，无法相协调。从布莱希特徒劳地抗议统一社会党祛除这一概念（1952—1953 年）起，就产生了一条传统脉络——首先主要在民主德国的戏剧界——经由彼特·哈克斯、海纳·米勒一直到托马斯·布拉施（Thomas Brasch），至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描写普鲁士权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民主德国的流毒成了文学的常见主题。文学界没有参与从 70 年代起在历史学和传媒领域开始的、明确与梅林和卢卡奇的观念决裂的对普鲁士的高度评价。

649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中将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有批判性的公共领域在"英国发展的典型情况"（1963，第 69 页）与德国的落后状态对立起来，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联邦德国"鄙俗气"的概念以"德国的特殊道路"之名得到讨论。通过达伦多夫的《德国的社会和民主》（*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1965）一书，非马克思主义者也秉持的核心论点，即"德国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所谓失败或全然缺席"（Blackbourn/Eley 1980，第 7 页），还影响到国际上的讨论，如穆尔（Barrington Moore）和普兰查斯。布莱克本（Blackbourn）和埃利（Eley）反驳了德国资产阶级具有"特殊的"、"权威的特征"的论点，因为这个论点一方面隐含"自由主义目的论"，即"资产阶级……在政治观念上'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是自由主义的"（第 12 页），另一方面误导了研究者"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高估"为研究对象并高估"解释方案中的'前工业时代的传统'"（第 33 页）。

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书写中，布莱克本和埃利主张相对地看待"特殊道路"概念所确立的英国榜样，得到了之后在"史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中涌现的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诺尔特（Ernst Nolte）和施蒂默尔（Michael Stürmer）将"特殊道路"概念一概攻击为反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尤其攻击卢卡奇"意识形态

日的论”的影响。（*Deutscher Sonderweg*，1982，第67页）参与争论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将“特殊道路”的概念修改为限于“1914年精神”（Idee von 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某些拥护战争的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构想：德国拥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应走一条德意志的特殊发展道路。——译者）的“特殊意识”，这种“特殊意识”推动了德国人对（限于1933至1945年的）“特殊道路”的选择。

历史讨论中的规范化限定，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德国的鄙俗气”概念在“文学文化政治论争”中特有的泛化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斯·迈尔（Hans Meyer）在“反分裂德国”理事会（Kuratorium Unteilbares Deutschland）1978年在文化界的奠基活动上发表演讲，将两个德国的文化发展视为革命和启蒙失败了的证明。此后，“鄙俗”这一概念得到认同，“鄙俗”被理解为德国历史一再重演的结构：“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形势催生不敢进行的（只是设想的）或不成功的（被打断乃至扭曲变形的）‘革命’。”（Klussmann/Mohr 1982，第3页）由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把“鄙俗”等同于“文化民族的统一”的证据，这种等同蕴含着“民族认同”和“再次统一”的主题，所以这个概念也为保守主义者所占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卡尔·阿诺德基金会（Karl-Arnold Stiftung）1979年为其“民主德国的文学和日耳曼文学”（*Literatur und Germanistik in der DDR*）工作坊组织的年会命名为“‘德国的鄙俗气’作为当代文学的主题”。1986年2月14日，《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社论以“德国的鄙俗气”为题，警示人们“分裂”所引发的、被其他臆想出来的痛苦所“排挤”掉的“巨大的德国灾难”。

纵使这一惯用语作为联邦德国“统一全国”（Nationalisierung）话语的一部分，已经为合并民主德国奏响了前奏，但确切地说，“统一”的进程，还是要理解为对无法摆脱的“德国之痛”（Leiden an Deutschland）听天由命地另一种解释的确证，既来自“统一”的西德反对者（米夏埃尔·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也来自“统一”的东德支持者（延斯·赖希[Jens Reich]）。与之相对的是，哈贝马斯反对——海纳·米勒和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等人代表的——这一论点：“对在两个分裂的德意志国家各自占统治地位的世界大国的心态和文化的适应”，使“这两个分裂的国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清除了先前统一的德国文化的传统潜力”。（Wolf 1944，第144页）哈贝马斯提出，阿多诺和卢卡奇各自在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参与制造了一

种“自洁式的自我反思”（第 147 页），一种“体验为解放的朝向西方的定位”（第 146 页），即“不仅要和纳粹政权的政治遗产决裂，而且还要和更为深刻地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惯于点头称是的德国‘满大人’做派（Mandarinentum）及其含糊不清的德国精神的根源决裂”（第 145 页）：“纵使为了学会看清德意志传统里普遍主义、启蒙性、颠覆性的特征，也必须首先认识到德意志传统中敌视文化的成分。”（第 147 页）

参考文献：

A. Abusch. *Der Irrweg einer Nation*, Berlin 1946; T. W. Adorno, »Auf die Frage: Was ist deutsch« (1965), GS 10.2, 691-701; W. Berthold, *Marxistisches Geschichtsbild. Volksfront und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Zur Vorgeschicht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DDR und zur Konzeptio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Berlin/DDR 1970; D. Blackbourn, G. Eley, *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von 1848*,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80;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Frankfurt/M 1962 (GA 4); R.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65; *Deutscher Sonderweg – Mythos oder Realität?* (Kolloquien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Wien 1982; A. Dorpalen, *German History in Marxist Perspective. The East German Approach*, London 1985; E. Fromm,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M. Horkheimer (Hg.) 1936, 77-135; J. Habermas,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Neuwied-Berlin 1963; M. Hess, *Die europäische Triarchie*, Leipzig 1841; M. Horkheimer (Hg.),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P. G. Klussmann, H. Mohr (Hg.), *Deutsche Miesere einst und jetzt. Die deutsche Misere als Thema der Gegenwartsliteratur. Das Preußensyndrom in der Literatur der DDR*. Bonn 1982; L. Kofler,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1948), Berlin 1992; J. Kuczynski, *Die Beweg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1800 bis 1946*, Berlin 1947; G. Lukács, *Skizze eine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deutschen Literatur* (1945), Darmstadt 1964; ders., *Marxismus und Stalinismus. Politische Aufsätz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IV, Reinbek 1970; ders., *Wie ist die faschistische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entstanden?* (1933), Budapest 1982; ders., *Wie ist Deutschland zum Zentrum der reaktionären Ideologie geworden?* (1941), Budapest 1982; der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Der Weg des Irrationalismus von Schelling zu Hitler*, Berlin/DDR-Weimar 1954; H. Marcuse, »Ideengeschichtlicher Teil«, in: M. Horkheimer (Hg.) 1936, 136-228; H. Mayer, »Literatur heute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 in: W. Link (Hg.), *Schriftsteller und Politik in Deutschland*, Düsseldorf 1979; ders., *Das unglückliche Bewußtsein.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

chte von Lessing bis Heine, Frankfurt/M 1986; F. Mehring, *Die Lessing-Legende* (1891/1892), GS 9, Berlin/DDR 1963; I. Münz-Koenen, »'Johann Faustus' – ein Werk, das Fragment blieb, und eine Debatte, die Legende wurde«, in: dies. (Hg.), *Werke und Wirkungen. DDR-Literatur in der Diskussion*, Leipzig 1987; H.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1935), Stuttgart 1959; K. Sontheimer, »Der 'Deutsche Geist' als Ideologie. Ein Beitrag zur Theorie vom deutschen Sonderbewußtsein«, in: M. Funke u.a. (Hg.),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Geist und Gestalt politischer 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onn 1987; W. Wippermann, »'Deutsche Katastrophe' oder 'Diktatur des Finanzkapitals'? Zur Interpretations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in: H. Denkler/K. Prümm (Hg.),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Dritten Reich*, Stuttgart 1976; C. Wolf, *Auf dem Weg nach Tabou. Texte 1990-1994*, Köln 1994.

赫尔穆特·派奇（Helmut Peitsch）撰
江唯译，胡晓琛校，俞可平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ufklärung, Bauernkrieg, Beamte, Bonapartismus, Bourgeoisie,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Faschismus,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Gebildet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rrationalismus,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Kleinbürger, Lukácsianismus, nachholende Modernisierung, Nationalismus, passive Revolution, preußischer Weg, Reformation, Servilität, Ungleichzeitigkeit

分散化（Dezentralisierung） 652

A: lāmarkazīya. – E: decentralization.

F: décentralisation.

R: decentralizacija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я).

S: descentralización.

I. 与它的对立概念集中化（Zentralisierung）一样，分散化也涉及社会中国家政治领域的建立和组织方式。马克思的理论不认为这个领域对社会构成的典型特征具有决定性，因为它既取决于社会运作和再生产的条件，也取决于在每种特定的对立社会关系中，确保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取得了政治权力的（欧洲）资产阶级接手了专制制度集中化的国家权力，并首先用它来遏制自己的贵族阶级反对者，之后又转向其无产阶级反对者。（参见 MEW 8，第 196—197 页；17，第 538—539 页，第 592 页及以下）维持和加强市民阶级政治权力的集中化，是资本集权化进程的

结果（参见MEW 4，第153、498页；6，第279页；9，第192页），这个过程同时也加强了无产阶级形成的社会因素和主观因素（参见MEW 4，第503页）。依此，对国家权力集中还是分散的评判，取决于它们各自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这种评价展望的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它正在终结阶级统治这个普遍的历史阶段。（MEW 7，第137—138、246页；17，第339、361、623—624页；18，第635页；22，第235—236页）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有意识、有组织地发展自己阶级的力量，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在取得胜利后，他们也需要集中化的国家权力（1848年前后，他们对它的理解还处于市民的形式；在经历了巴黎公社之后，他们则强调创造一种独有形式的必要性），以达到对阶级反对者在经济上的驱逐和政治上的压制。（MEW 4，第374、397、481页；7，第252页；16，第66页；22，第235页；32，第252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国家权力的分散化本身在“共产主义的较低级阶段”，同样不值得追求；在实现了社会平等的前提下，他们不认为中央国家的组织形式和民主之间存在矛盾。（参见比如MEW 5，第43页）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较高阶段”，即国家消亡以后，此种意义上的分散化也就失去其对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体上概述性地确定了共产主义中社会关系的构成，由此可以猜测，他们没有意识到，即使在“对物的管理和生产过程的领导”取代了“对人的统治”（MEW 19，第224页）以后，对于集中化还是分散化的抉择，在社会意志的形成、决议的实施、职务的指派以及资金和产品的分配等事务中，还有持久的意义。 653

2. 在公民阶级的和倾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一个问题尚有争议，那就是列宁在1901和1904年之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DAPR）制定的集中化组织原则（主要参见*Was tun?*，LW 5，第355—551页，以及*Ein Schritt vorwärts*，LW 7，第197—430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政治（即政党形式的）决策过程的显著集中化，并在十月革命后加强了国家决策执行和政权保卫机关的集中化。这些组织原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第二次党代会中获得了多数支持，并在1906年的第四次党代会中，作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写入了党章。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存在和行动条件处于地下活动的时期，且党内倾向在学理上进行长期探讨的知识分子占支配地位，这些似乎表明，集中制的权威原则是正确的。然而另一

方面，革命以后事态的发展，却以惊人的程度印证了先前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列宁批判者的观点和预言。（*Organisationsfragen der russischen Sozialdemokratie*，1904，GW 1/2，第422—444页；Trotzki 1904）随着行政权力集中在一个日益缩小的政党领导层，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也同时伴随着其机构影响力的减小，受到了限制。这使得当1920—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胜利在望时，就出现了来自党内和来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势力的反抗。尽管在这些反对派团体的论辩中，分散化这个概念同样仅居于次要的位置，但他们在事实上，其实就是想贯彻这个概念的另外一层含义，即扩大，甚至是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的决策，加强他们的机构（即苏维埃）和所作决议的约束力，并通过所有组织层级的工人代表会议机构，对行政权和从属的行政机构进行广泛而有效
654 的监督。（Daniels 1962，Kool/Oberländer 1967，Hillmann 1967，Kap. I）

3.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欧洲的执政共产主义政党中，是第一个着重宣传要对集中于政党领导层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的权能进行分散化的政党，而且它至少通过了实施相关措施的决议。（Bošković/Dašić 1980）（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剥夺广大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进行批判，并迫切地提醒人们：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念，尤其在结合他对巴黎公社的阐释时，具有解放的动力；这些都必须算作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们，特别是他们多年来理论界的领袖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的贡献。紧跟批判和宣传之后进行的，是编纂法律的工作。在整体的目标和字句上，编纂工作都完全满足了先前提出的要求（尤其是1963年和1974年的宪法以及1976年的《联合劳动法》[*Gesetz über assoziierte Arbeit*]）。然而现实中的社会关系和结构、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却和规范性的准则有着明显的出入。社会自治的基本原则和为它所制定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即成了一种门面，掩盖了互相角力而分裂的众多权力和集团在社会经济上的特权结构。这些结构在先前提到的法律编纂之前，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不过它们却可以利用法律的规章，继续加强自己的权力和社会经济特权。不过我们不应该因此否认，南斯拉夫基于现实中社会自治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有意义的。它在其政治和社会中的（但不是经济上）成形，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整体上规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化方式，提供了迄今未有过的具体实践。

4. 苏联的国家和社会科学代言人或

许可以在形式上指明，苏联的国家权力已经依据其联邦形式的宪法实现了分散化。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实施在整个社会都有效力的决策、占有政策实施的基本物质条件、支配社会剩余产品这样的特权，却相当集中。（参见 Hough/Fainsod 1979）

655 现实情况中，最晚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逐步分散某些仍由中央机关把控的决策和执行权能，就已经成为党和政府决策并在实践中开始落实的目标。尤其在领导经济工作和组建苏维埃体系这两个领域中，将某些职权转移到更基层的机关、企业和地方的苏维埃，就显得至关重要（党和政府 1965 年通过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 1971 年《关于被委派劳动者城市和城市辖区苏维埃的主要权利和义务》[*Über die Hauptrechte und -pflichten der Stadt- und Stadtbezirkssowjets der Deputierten der Werktätigen*] 的指示）。显然，推动这些决议的意志与其说是为了平衡尖锐的等级分化，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靠中央当局对所有经济和社会细化的程序，在职能上进行有效的计划和调控，是不可能的。然而，相关的尝试几乎没有在实质上扩大这些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基层机关决策和行动的独立性。前者本来就只打算在小范围进行，后者主要受到了中间级别机关的阻挠。由于中央的指示和调控政策日渐失效，以及基本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自发性（Naturwüchsigkeit）随之逐渐加强，这些困难的急迫性积累起来，并最终造成所谓的“停滞阶段”。在这个背景下，分散化措施的必要性重新被强调：它首先是暗含在对经济机制和政治体制进行“完善化”的概念中，而后又包含在“提速”这一概念中。1983 年以后，在这方面的各类决议也得到通过。

全面的分散化也成为由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经济改革的口号。“一切实践性经济工作的重点都要转移到基层，即各个劳动集体（Arbeitskollektive）”，这样同时也会使中央的要素更有效率。（Gorbatschow 1985，AW 2，第 300 页）苏联 1977 年宪法的序言提到了“共产主义自治”（*kommunistische Selbstverwaltung*），并把它作为长远目标，而 1986 年 2 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党代会，却在新的政党纲领中宣布，“社会主义自治”（*sozialistische Selbstverwaltung*）的全面实现是当下的任务。“这在根本上是要解开行动能力两端的束缚：国家中心的一端和经济参与者的一端。”（Haug 1989，第 183 页）人们期待，这样的 65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解开个人和集体积极性的束缚，且能够“分配和使用基于盈利原则（Rentabilitätsprinzip）之上的收益”。（Gorbatschow 1988）分配

（Allokation）和定价（Preisbildung）应当分散进行，中央应当作到专注于框架性的任务。不同种类的所有制形式、经济参与者的“平行关系”，以及它们与国家机关的合约关系，都应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框架下的新型市场秩序的支撑要素。换句话说，就是成为社会主义中区分公民社会（Zivilgesellschaft）和国家（Staat）的支撑要素。（参见 Haug 1989，尤其是 Kap. 7-8 及 12）——经济改革的失败标志着苏联的终结。（参见 Haug 1990；Brie/Böhlke 1992）

参考文献：

B. Bošković u. D. Dašić (Hg.),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 in Yugoslavia 1950-1980. Documents*, Belgrad 1980; M. Brie u. E. Böhlke, *Rußland wieder im Dunkeln. Ein Jahrhundert wird besichtigt*, Berlin 1992; V. R. Daniels, *Das Gewissen der Revolution. Kommunistische Opposition in Sowjetrußland*, Köln-Berlin 1962; M. Gorbatschow, »Die praktische Arbeit zur Verwirklichung der Beschlüsse der 19. Gesamtsowjetischen Parteikonferenz« (Referat beim ZK-Plenum vom 29. Juli), in: Pravda, 30./31.7., 1988, 1-3;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1990); ders., *Versuch, beim täglichen Verlieren des Bodens unter den Füßen neuen Grund zu gewinnen. Perestrojka-Journal*, Hamburg 1990; G. Hillmann, *Selbstkritik des Kommunismus. Texte der Opposition*, Reinbek 1967; J. F. Hough u. M.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London 1979; E. Kardelj, *Die Wege der Demokratie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Köln-Frankfurt/M 1979; F. Kool u. E. Oberländer, *Arbeiter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 Dokumente der Weltrevolution*, Bd. 2, Olten-Freiburg/Br 1967; L. Trotzki, *Naše političesk zadači* (Unsere politischen Aufgaben), Genf 1904.

汉斯格奥尔格·科纳特（Hansgeorg Conert）撰

刘宇辰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erklasse, Autorität,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Bolschewisierug,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Entstalinisierung, Gorbatschowismus, Herrschaft, Illegalität, Konzentration, Macht, Pariser Kommune, Perestrojka, Rätesozialismus, Selbstverwaltung,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taat,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Zentralismus

657 辩证法（Dialektik）

A: djadal, dīyālīktīk. – E: dialectics. F: dialectique. – R: dialektika (диалектика). S: dialéctica.

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为“革命的代数学”（Algebra der Revolution），而人们，尤其是列宁的追随者习惯于将唯物主义辩证法标示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它是布莱希特哲学思想的关键，也是其语言—审美生产方式的关键，他将辩证法称为**伟大的方法**。辩证法的意蕴是有争议的，并且这种关于辩证法的争议，往往也是关于正确道路的争议。

“在其神秘形式上”（这里指的是黑格尔的形式），辩证法“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在马克思所给出的形式中（在《资本论》第二版［1873］跋中，他将这种形式称为“其合理形态”），辩证法“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颠覆性的**，是因为它将运动带**进**统治秩序**当中**，是“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MEW 23，第 27—28 页）。在这一意义上，实践的辩证法也将引起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恼怒和恐怖”。

似乎不以**非辩证的**方式就几乎不可能**谈论**辩证法，这就像辩证法家布莱希特所警告的那样，将“物本身的流变”转变为“一种坚硬的物”（*AJ*，6. 1. 1948）。另一方面，如果辩证法是内容丰富的，那么，只有以“辩证的”方式，也就是使坚硬的物再次流变起来，才有可能“正确地”谈论事物。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典的所有词目中，辩证法的可能内容必须表明，这些词目**在实践中**（*in praxi*）对辩证法做出了什么贡献，就像辩证法呈现在“事物本身”的阐释中那样。

马克思首先将辩证法运用为与“形而上学”思想相对立的**否定的**辩证法，在此之下，他对静态的秩序思想作了理解，这种思想预设了刻板的分离，它是二元论的，它认为物有一种固定的本质，而不是在运动与过渡中，在彼此对立与相互作用中来理解物。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用于反对如下思想，这种思想在面对属人的物时，并没有关注变化与消亡、冲突与矛盾、统治关系及其颠覆。有三 658
个方面需要特别考虑：（1）**哲学史方面**，

需要思考辩证法同传统的断裂与连续关系。（2）**认识论方面**，需要研究辩证法为马克思这位理论家和科学家提供了什么。（3）**效应史方面**，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规律”的论述相联系的、几乎贯彻始终的那种颠倒，需要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的官方主流思想中已然发生的辩证法的损失（Verlust），它与解放生产力的例子形成了对比。总之，关键在于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构建一种关于辩证法观念的辩证法。

1. 马克思是从黑格尔那里开始接触辩证法的，但也直接受益于古代哲学，他从中选取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

1.1 赫拉克利特被认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辩证法家之一，他述说了世界的非受造性（Ungeschaffenheit）、普遍的生成与消逝以及对立面的统一。对于古代语言用法来说，似乎绝不能如此表达，因为他前面这些一反常识的说法就像是晦涩的谜语，它们不理睬“**通过说话**”（*Durchsprechen*）这种方式，而辩证法恰恰意味着这一点：辩证法这个词来源于动词 λέγω（“言说”）和介词 διά（“通过、经由”）：διαλέγομαι 的中间形式很多情况下意味着通过说话，“因而，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也经常练习辩证法，以在言谈中变得灵巧”（Benseler）；由此引申出形容词 διαλεκτικός（“熟练或巧妙地进行争执，这属于辩证法”，同上）。

1.2 苏格拉底，准确来说是以苏格拉底之名进行对话的柏拉图，将辩证技艺（διαλεκτικη τέχνὴ）（*Phaidros*，276e）描述为以问答游戏形式进行对话的能力，这种游戏旨在就**真理**达成共识（ὁμολογεῖν）。这种辩证法观念针对的是作为公众（“民众”）之言说的修辞技艺（ῥητορικὴ τέχνη），后者直接涉及语言的工具，其目的是，在古代的民主（δημοκρατία）制度中达成各色“人群”的一致同意：说服他们（πείθειν τὰ πλήθη）。（*Gorgias*，452e）修辞学旨在**通过说服大众获得权力**。经过专业性地实践与（反对金钱的）教学，它在“蛊惑人心的”（即在公开的群众演讲中争取对民众的领导权）这一字面意义上是争辩话术、论辩术（τέχνη ἐριστικῶν）。投入（Einsatz）是城邦的正当秩序。

柏拉图反对争辩话术，他提出如下要求：凭借辩证法来解决“政治”争辩并由此超越论辩术本身。他将这一计划称为**哲学**。因而，人们可以从辩证法精神出发谈论哲学的诞生。——这里假设的是，“通过语言”这种方式在这件事上绝未失利。尼采将之称为“辩证法的乐观主义”（KSA 7，第 134 页）。由此预设的“可探究性”假设了“事物”及其同思维之间的关系具有一致的性质：“因而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思维与存在的同

-性。”（同上）——然而，可以看到的是，在柏拉图那里，这种双重的一致性（没有绕过劳动和改变社会的实践）如何只能被强行主张，“技艺性的”辩证法（die “technische” Dialektik）如何屈服于技艺辩证法（eine Dialektik der Technik）并向其对立面转化。柏拉图试图借助“是什么”的问题来实现思维的重组，这种重组应当导向无可置疑的理念领域。但是，这就意味着以共识为指向的“通过语言”这种方式，变成了专制的、非辩证的，甚至无法言说的直观。一种应当终结一切争论的方式，变成了一种阵地战机制。因此，尼采将之视为希腊哲学谱系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个）阶段：“辩证法是最确定的东西。没有知识就不算优异。哲学变成了改革性的、迫切性的和进取性的。”（KSA 7，第 388 页）

1.3 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不同于毕达哥拉斯（Pythagoreern），“他在概念领域中探索，把理念引入了发问式的思考”（ἡ τῶν εἰδῶν εἰσαγωγὴ διὰ τὴν ἐν τοῖς λόγοις ἐγένετο σκέψιν，*Met* I. 6，987b 31 及下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插入说：“在他之前没有人接触过辩证法”（οἱ γὰρ πρόετροι διαλεκτικῆς οὐ μετεῖχον，同上）。但是，在第四卷中，他将诡辩论者和辩证法家一同视为哲学的对立面：διαλέγονται δὲ περὶ ἁπάντων（“他们探讨所有的问题”）；他们“与哲学思考的是同-一种问题（περὶ μὲν γὰρ τὸ αὐτὸ γένος），但是哲学与前者在能力的方式上（τῷ τρόπῳ τῆς δυνάμεως）相区别，与后者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τῆς δὲ τοῦ βίου τῇ προαιρέσει）相区别”（*Met* IV. 2，1004b 19 及以下）。本应象征着消除歧义的辩证法，本身就是歧义。与修辞术的对立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在古希腊文化中，辩证法被列为七种人文学科（artes liberales）之一。在中世纪早期，最初存在着如下公式：文法学＋修辞术＋辩证法＝逻辑学（*grammatica* + *rhetorica* + *dialectica* = *logica*）。（HWPh，2，第 166 页）

1.4 现代经验科学及其哲学的诞生必须超出这种表达。因为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辩证法不外是把世界变成人类思想的奴隶，而思想又成为文字的奴隶。”（*Novum organum*，I，第 69 条）“逻辑学本质上是以形式化的、无质料的方式运作的，并且应当完美地而不仅仅是可能地得出正确的推论，基于这一信念，自 17 世纪以来，将逻辑学指称为辩证法的做法已经被放弃了。”（W. Risse，HWPh，第 167 页）

1.5 不过，康德提到了一种“普遍逻辑”意义上的辩证法，它被误用为产生客观断言的工具并因此变成了假象。（*KrV*，B 版第 85 页）他没有理睬苏格拉底关于辩证法和修辞术的区分，而是言

简意赅地将古代的辩证法称为“**幻相的逻辑**”，“这是一种诡辩论者的技艺，要使他的无知，甚至使他的有意的假象具有真理的模样”（B 版第 86 页）。与之相对，康德的批判是要“保护纯粹知性”，或者说是“批判这种辩证的幻相”，这种幻相是在知性的越界使用或“无限制使用”中产生的。（B 版第 88 页）对于他来说，那些（以非历史的方式所设想的）“纯粹理性的理念只是由于误解和不谨慎才成为辩证的”（B 版第 708 页）。例如，“自然的统一性”是理性的一个“调节性原则”；它被当作“构成性原则……这只是理性的迷乱而已”。（B 版第 721 页）但是现在，康德将辩证法这个名称，从一种幻相逻辑的名字运用到一种幻相理论的标题上，因为基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本性，这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B 版第 354 页），因而是“先验的”，这是必须被控制的。康德将先验幻相同经验幻相（如视觉的幻相，A 版第 295 页）、逻辑幻相区分开，逻辑幻相是“对理性形式的单纯模仿”，因而是“谬误的幻相”，一旦人们将它揭示出来，它就消失了（B 版第 353 页）。而先验幻相则不然，它基于“幻觉”，其主观必要性是客观的。（同上）康德将他的认识理论中的这一部分称为“先验辩证法”。

1.6 黑格尔又一次在一种质料逻辑中扬弃了形式逻辑，并将辩证法变成了思维的“活的灵魂”。他在主观的和客观、意识经验和事物本身的发展（对于他来说，二者最终是同一的）的双重意义上表达辩证法。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通过在事物中经验自身来发展：“在各个意图中，它主动地、大步地失利，并通过这种经验来实现飞跃。在这里，辩证法所指的，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主体所拥有的单纯方法，而是对相互矛盾的经验层次的经历，在这种经历中，主体本身得以“形成”。适用于思维的东西，也适用于它的各个事物：辩证法的要求在于，“理念”即“对象的理性”，它是“从概念中发展出来的”，“或者这样说也是一样，必须观察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发展”。（*RPh*，§2）“因此，辩证法构成科学进展的推动的灵魂，只有通过辩证法原则，科学内容才达到**内在联系和必然性**。”（*Enz*，§81）

如果具体的“操作化”不应当仅仅是尼采在柏拉图那里诊断出的“逻辑的形而上学”，那么就有必要考察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一方面，黑格尔看到的是“生命、产生、成长、消亡与涅槃重生的一般辩证法”，如在“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生命领域中”遇到的那样（他的例子取自植物的循环过程：萌芽、花朵、种子等等，此外还有象征着年龄的季节，*Ästh*，Bassenge，第 352—353 页）。直观的内容使得这种自然循环模式被普

遍接受。与之相反，（肤浅的）理智上的接受提供了如下图式：正题、否定性的反题与否定了这种否定并扬弃了对立的综合之间的游戏。

然而，除了以上的循环图景和三阶段之外，黑格尔还处理了思想投射到事物上的阴影，这是因为，思想在其固定性中错失了事物的运动性，在其分离性中错失了事物的联系。因而，黑格尔能够说："但要使固定的思想取得流动性却比将感性存在变成流动的要困难得多。"（*PhG*，Vorrede，W 3，第 37 页）（这是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规定的关键词，即"对每一种……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黑格尔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1812）中将**逻辑学**规定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同上书，Lasson，第 5 页），并且在导论中将之规定为"上帝的展示，展示出永恒本质中的上帝在创造自然和一个有限的精神以前是怎样的"（第 31 页），规定为"阴影的王国，是单纯本质性的世界，摆脱了一切感性具体"（第 41 页），然而，第二版序言（1831）暗示了晚年黑格尔的一种（从内容上来说是未完成的）范式转换：由于**思维形式**是逻辑的材料，**语言**就变成了主题。自发地有一种"自然逻辑"，它"对范畴的使用"是"不自觉的"。（第 13 页）在这一维度上，精神"在思维的本能活动中，被它的范畴所束缚，支离破碎，成为无穷杂多的质料，散落于无数材料当中"（第 16 页）。黑格尔这样表述他的《逻辑学》（1831）计划："这些范畴，当其只是本能地起推动作用时，它们之进入精神的意识，还是零碎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定和混乱不清的……纯化这些范畴，从而在它们中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第 16 页） 662

根据晚年黑格尔的这种变化了的观点，辩证法使思想摆脱其假想的本质的不动性和在语言的范畴网络中的无意识偏好，变成适当的运动性。

1.7 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知识的辩证法，费尔巴哈希望使辩证法回归到通过语言的对话："**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孤独的思想者对自己的独白，而是我和你之间的对话。**"（*Grundsätze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62）普列汉诺夫不怎么令人信服地回应道：（1）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已经"不意味着'孤独的思想者对自己的独白'"，（2）费尔巴哈凭借他的人类学唯物主义"确实正确地规定了**哲学的出发点**，但不是哲学的方法"，这一空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填补的。（*Grundprobleme*，第 36—37 页）但是，**唯物主义**和**方法**这两个关键词并未命中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表达的同时发生的双重领域变化。

2. 马克思以激进批判和重新阐释的

方式继承了黑格尔的遗产。与一切思辨的辩证法相反，对于他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一种“科学的辩证法”（1865，MEGA I. 20，第 62 页）。蒲鲁东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思辨哲学的论证方法提出了批评：“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述方法（Entwicklungsmethode）来代替了。”对于他来说，蒲鲁东把范畴变成了理念，而不是“看作历史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同上）。马克思将辩证法改编为历史，一切预先建构的东西都被抛开了。这种将辩证法合理地此岸化（Verdiesseitigung）的范畴要求，使得马克思同辩证法的发起者黑格尔的关系变得成问题了。

2.1 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还陷在黑格尔的魔法当中：“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因为辩证法是内在的纯朴之光，是爱的慧眼，是不因肉体的物质的分离而告破灭的内在灵魂。”（MEGA IV. 1，第 106 页）——同黑格
663 尔的决裂所起到的效果就像是一场解放，此后否定性的东西显现了出来：“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MEW 2，第 98 页）——但是，是什么取代“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主要谈到的是“辩证的阐述方法”（MEW 31，第 313 页）或者就是“阐述方法”，他经常将这些概念与“辩证法”当作同义词来使用（MEW 32，第 538 页）。但是，与黑格尔的差别是什么呢？

2.2 马克思曾说，他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说明他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观念的差别。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8）时，他写信给恩格斯：“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MEW 29，第 260 页）十年后（1868 年 5 月 9 日），他写信给狄慈根（Dietzgen）：“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MEW 32，第 547 页）非神秘形式的辩证法在哪里呢？

虽然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系列批判黑格尔的文本，但很多依然是含蓄的，而且明确的表达中又包含着隐喻（上下颠倒、头足倒置、合理内核摆脱神秘化的外壳等等），这些隐喻是模糊的、有误导性的，柯尔施（1932，第 174 页）和阿尔都塞（*FM*，第 112—123 页）就曾批判过这些隐喻的不恰当性。因而马克思解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

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MEW 32，第 538 页）；“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MEW 32，第 538 页），马克思借此表达出了黑格尔辩证法同他所称的“合理形态”（MEW 23，第 27 页）的辩证法的区别。由于 F. 朗格（F. Lange，*Über die Arbeiterfrage...*，Winterhur ^{3}1870）以赞扬的口吻提到了马克思，马克思在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信中写道，朗格因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将“全部历史”归结为“‘生存斗争’这一句话”，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朗格赞扬马克思，“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而马克思评论说，他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
664 诠释而已”（MEW 32，第 685 页）。因此，面对新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黑格尔的差异就缩减为他的方法即辩证法的“批判的应用方式”。

如果研究一下关于黑格尔批判的文本或段落，特别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EGA I. 2，第 275 页及以下，第 292 页）、《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EW 1，第 203—333 页）或一笔带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Einl* 59，MEW 13，第 625、第 632—633 页），再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在与黑格尔决裂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一种彻底的领域转变，一种认识论上的翻转，在这种翻转中，一切都是或应当是变动不居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说到了这一点，这里指出，他对辩证法的理解“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MEW 23，第 27 页）。但是，在这一语境中，他是通过如下一点来表达这种“截然相反”的：黑格尔“在观念这一名称下”将思维过程“转化为独立主体”，马克思以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来反对这一做法，因为“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同上）。这虽然明确，但实则更为模糊，因为劳动、行动、实践等一切超越头脑的改造活动，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来马克思所认为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实践领域，一直是晦暗不明的。严格来说，这种表述既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感觉主义或霍布斯的机械唯物主义，甚至也完全不同于康德的批判主义。由于黑格尔将思维变成“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所以“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马克思继续用看似清晰的隐喻“倒过来”来表达他的批判的否定。（同上）

此外还有更多含糊之处。俄国评论家考夫曼（Kaufman）写道："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转引自 MEW 23，第 25 页）马克思以研究（*Forschung*）与叙述（*Darstellung*）之间的差别来回应这一评论，在这里，他承认，后者可能会引起这样的印象，即"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第 27 页）。但是，这没有说明，为什么对一个结构的叙述应当同时是先天的，没有说明，辩证法仅是一个叙述问题还是在研究中也能发挥作用。由于存在这种含糊之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这对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来说是很重要的——导致了相互争辩的学派的形成。与对清晰表达的通俗解说相对，总是会出现如下尝试，即阐明主要
665 包含在《资本论》这一科学专著当中的、**可操作的辩证法**。

3.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辩证法，人们必须研究：（1）它为何是必要的？（2）它实际上做了什么？（3）它的表达形式有哪些？（4）它的界限在哪里以及它的认识论地位是什么样的？

3.1 马克思曾大体上这样描述他的辩证法的成就，"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去理解（见上文），与此相应，它应当回答的问题是：**乍看之下没有联系的事物之间的联系问题，结果上不同的各个现象之间的联系的产生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一般问题是：消解"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MEW 25，第 838 页）。作为认识目标，这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之处，古典经济学也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也"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MEW 26. 3，第 490 页）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与解决联系问题。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分析"把非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独立的形式或名义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而利润又融于剩余价值当中。（第 490—491 页）马克思观察到，这种分析有时会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因为它把"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第 491 页）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起源性的重构取代分析性的还原，将形式历史化**，而不是以"自然主义的"方式不假思索地匆匆一探。主导

性的认识兴趣是“说明起源，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同上）。

3.2 很多段落都表明，当马克思将辩证法描述为“阐述方法”时，他是在**研究结果的叙述**这一意义上使用“阐述”的。在研究时，关键是“通过批判使一
666 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相反，如下这点是被排除掉的：“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MEW 29，第 275 页）之后，辩证法表现在叙述的**结构**中，被处理的范畴序列中，一个范畴与另一范畴的**过渡**中。——马克思提到，他的“辩证的阐述方法”的副作用是，给那些资产阶级批判者“**设下陷阱**，迫使他们过早地暴露出他们的愚蠢”。（MEW31，第 313 页）——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也会陷入这些陷阱当中。

3.3 在马克思这里，辩证法经常表达成如下形式：商品生产形成了一种**内部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冲突的，因而是在“外部的对立”中运动着和再生产着的（MEW 23，第 127 页），这些**矛盾**被理解为发展的动力，因为它们本身创造了一种“运动形式”（参见第 118 页）。特别重要的是“倒转”（Umschlagen）这一说法。如马克思分析到，通过价值增殖过程的重复和在至少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中，“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很明显，……占有规律……通过它本身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倒转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凭借自己的劳动去占有，变成了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第 609—610 页）的占有。——罗莎·卢森堡赞扬这种分析是“历史辩证法的杰作”（GW 5，第 222 页），这需要“一种科学分析的深刻的辩证法”（第 397 页）。——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指出，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手工业者变成资本家部分，“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作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同样有效的规律”（MEW 31，第 306 页）。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 24 章，马克思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应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上，这种**扬弃**是对剥夺者的剥夺。（MEW 23，第 791 页）

3.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警告说，关键在于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MEW 13，第 640 页；MEW 42，第 43 页）。如果从黑格尔的观点来看，这相当于是向康德迈近了一步，对于康德来说，真正的差别——特别是“为我之物”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差别——是不可扬弃的，并且在认识论上是根本性的。（参见 Colletti 1977，第 5 页及以下）应当防止历史唯物主义的辩

证法重新陷入同一性哲学的思辨。

667 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的功能和地位问题，最初是因为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攻击而提上日程的，他质疑马克思“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因而凭借如否定之否定这类“黑格尔蠢话”来建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转引自 MEW 20，第 120—121 页）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解释说：“杜林先生把辩证法看成是单纯证明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第 125 页）马克思“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同上）。——在这里，恩格斯似乎是将辩证法的地位限于**对科学认识的事后解释**。然而他补充道：“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不过它高超得多；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同上）——对于《反杜林论》时期的恩格斯来说，辩证法所要做的是：（1）对科学结果的事后解释；（2）启发性的引导功能，类似于“发现的技艺”，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辩证法的理解那样；（3）开启一种世界观。——恩格斯并未阐明这三种功能之间的关系。科学上最重要的东西似乎是具有启发性的东西，它给研究者提供了确定的探索问题与期待，根据历史的经验科学的一切规则，这些探索问题与期待当然是需要解决的。然而，恩格斯自己已经超出了这些界限，因此无意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念的去辩证化（Entdialektisierung）过程。

4. 恩格斯将马克思所使用的辩证法的“应用”这一表达，扩展为“马克思主义”（这是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的说法）的系统化。他在 1882 年解释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Utopie*，MEW 19，第 187—188 页）在 1878 年《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Skizze des Gesamtplans der Dialektik der Natur*）中，他就已经将辩证法规定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并编列了三个“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DN*，MEW 20，第 307 页） 668

4.1 辩证法不是将事物“孤立起来”（MEW 19，第 203 页），而是在其起源和作用联系中呈现它们。至此，恩格斯一直是尊重马克思所划定的辩证法的界限的。然而，他此后就超出了这些界限：“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第 205

页）在马克思去世后，他解释说（1885年），在他退休后，他一定要去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为的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同时“贯串于”思维的历史中。（MEW 20，第11页）辩证法变成了一般性的存在规律。恩格斯仍然保证，他不是“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是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第12页），可即便如此，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在他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才成型为“著作”），他对标准作了大体说明：“外表上的排序已经不够用了，正如黑格尔所巧妙论证的辩证转化也已经不够用了一样。转化必须自行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第515页）由此，辩证法观念封闭成了一般性的宇宙论。

4.2 此后，对于恩格斯来说，辩证法就是关于“两个系列的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因为人脑自觉地应用它们，“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LF*，MEW 21，第292—293页）。

4.3 这样，作为“两个系列”的命题（第二个系列是对第一个系列的反映）的认识论结果，**反映论**（*Abbildtheorie*）出现了。而且，“辩证法”由此变成了**进化的世界观**，它包含着普遍性的发展和相对性，它从如下“基本思想”出发：“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第293页）恩格斯补充道，自黑格尔以来，这一思想“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同上）。 669

5. 在马克思之后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中，考茨基、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占有重要位置。

5.1 格奥尔格·卢卡奇指责卡尔·考茨基“将革命的辩证法颠倒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进化论”（W 2，第591页）。斯

坦伯格（Steinberg）认为，考茨基“始终是将‘黑格尔主义’排除在他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阐释之外”，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理解“马克思论证的辩证结构”（第 XVII 页）的。考茨基的“非辩证的阐释方式”（同上）是他的著作得以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秘密。卢卡奇更为准确地命中了要害：考茨基陷入的是一种庸俗的黑格尔主义的进化论。

在考茨基对《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Ökonomischen Lehren von Karl Marx*）的总结中，这种“非辩证的”进化论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例如在对货币向资本的过渡的解释中。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过渡是不连续的，其必须越过“深渊”，因为它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MEW 23，第 183 页），在这一过程中，单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得以出现的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第 184 页），考茨基将这简单地说成“随着时间而发展着的”等等（第 52 页）。考茨基略过了对价值形式的分析和从起源上对诸价值形式交替过程的重构，而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辩证叙述的范例。

5.2 考茨基所作的，正是伯恩施坦所表达的：在他看来，“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狡诈之物，是陷阱，它妨碍着对事物的一切合乎逻辑的观察”（*Voraussetzungen*，第 52—53 页）。他质疑晚年恩格斯是用并不周密的论证来使辩证法“以脚立地”的，在遵守“黑格尔所确立的辩证法规律”时，人们“再次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包围之中”。（第 48 页）然而，他针对的是马克思，并且他不过是歪曲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而已。（参见第 52 页）

5.3 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他对于葛兰西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向一种“实践哲学”的领域转换中看到了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决裂的关键，他将这种哲学看作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之路是“从劳动出发，是通过行动来认识”，并形成“作为抽象理论的认识”，它揭开了“马克思如下表述的秘密，即他将黑格尔辩证法倒了过来，这一表述令许多智者大伤脑筋”。（*SPh*，第 318 页）——不过，在另一段落中，拉布里奥拉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改写为“辩证的理解，或者是进化的或起源上的直观，或者人们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第 338 页），他赞扬《资本论》具有“特别的精神机动性和灵活性（*Souplesse*），即辩证法的美学”（第 337 页）。显然，他认为无需澄清这些不同方式的组合。然而，由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意义上的实践具有决定性地位，这就为以一种既非 670

形而上学又反自然主义的方式接受辩证法确定了方向。

5.4 在俄国，格奥尔基·W. 普列汉诺夫（他在列宁哲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关于此，他在黑格尔关于发展过程中飞跃式颠倒的命题中看到，辩证法根本不同于“庸俗的‘进化论’”（*Grundprobleme*，第38页）。在《突变理论》（*Mutationstheorie*，de Vries，2 Bde.，Leipzig 1901-1903）中，因日的论的误判，普列汉诺夫看到了从生物学出发的对“辩证的飞跃”的承认，并赞扬这种新拉马克主义的“物质敏感性”学说是“辩证的”，因为它“正确地将费尔巴哈关于存在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相统一的唯物主义理论”，翻译“成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语言”。（第40—41页）普列汉诺夫解释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是一致的。而在我们这里，**辩证法**是以关于**自然**的学说为基础的。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观念**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对一种**运动的抽象**，这种运动造成了**物质的一切联系和状态**。”（第128页）普列汉诺夫毕竟还是看到，运动（Grundtatsache des Seins，第123页）只是在作为坐标体系框架中的概念时才是一种矛盾（第121—122页），因而辩证法之必要性的初始问题必须要在思维与“存在”的非同一性中寻找。

6. 在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大约是在20世纪初登上历史舞台的，包括卢森堡、潘涅库克、列宁等）和第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因1917年十月革命而被马克思主义吸引的，包括葛兰西、马里亚特吉、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等）中，直到布莱希特和本雅明这一代，都是在一种“左派的”、革命的意义上来接受辩证法的，此后，在阿多诺那里，鉴于20世纪的总体性恐怖和1917年以来革命的屡次失败，这种接受退回到一种否定的“内部抵抗”的黑格尔主义，而一种转回到形而上学的辩证法观念，在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形式。 671

6.1 罗莎·卢森堡严厉批评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而**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情况，然而她并未对马克思的辩证法作出更为准确地规定：在经济史中，她看到的恰恰是那些自以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人，他们“直接从汤碗中以原始的方式推导出最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GW 1/2，第470页）。她赞扬西斯蒙第已经具有了“一种辩证理解的历史视野”，因为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化了，将雇佣劳动与其他非自由的劳动形式相比较，并使如下一点能够得到解

释：感受到前者像后者一样野蛮的时代将会到来。（*Akku*，GW 5，第 172—173 页）对于卢森堡来说，辩证法不能形式化地应用，而是意味着——更准确地说是启发性地指向——矛盾。因此，她反对将村社（Dorfgemeinschaft）浪漫化："俄国农民在为沙皇的专制主义服务时，遭受到他的同伴的严厉惩罚——这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的狭隘界限所作的最为残酷的历史性批判，而且最明显地表达出了如下事实，也就是，即便是这种共同体形式也服从如下辩证的规则：理性变成荒诞，仁慈变成灾难。"（第 687 页）

图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i）等人指责马克思关于积累的分析是矛盾的，对此，卢森堡说道："但是，人们只需看到看似僵化的矛盾，那么将其转换为历史辩证法这一做法，就是符合整个马克思学说和思维方式的精神的，马克思的图式的矛盾就变成了对资本及其幸福与终结的活生生的反映。"（GW 5，第 518 页）这里的关键是如下"辩证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积累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作为其环境才能运动起来"（第 315 页），它渗透进这一环境中，由此它逐渐偏离了自己的基础。马克思积累图式的批评者们（他们在指责这一图式时未能作出正确的预估）认为它违反了如下危机理论洞见，即它"恰恰因其不可消解性而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垮台的精准预言，这种垮台是由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造成的"，然而，它马上附加如下一点并因此避开了一种经济崩溃理论，它"是一种理论虚构，恰恰因为资本的积累不仅仅是经济积累，而且也是政治过程"。（第 519 页）

不过，罗莎·卢森堡不仅是在理论实践中，而且在实践理论中也是一位重要的辩证法家：例如她以**革命的真实政治**（*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概念来中介或双重地扬弃革命主义和真实政治，又如她依据群众的**"自我集中制"**（*Selbstzentralismus*）来中介或双重地扬弃必然的集中制和对集中制的无政府主义拒斥。（参见 GW 1/2，第 429 页）

6.2 1909 年，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也要为革命的左派索回辩证法。然而，他的讨论并不是真正辩证地而是以二分法的方式整理了各种立场："**无产阶级的直观方式是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直观方式是意识形态的。但是，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恰恰是相互从属的，就像意识形态的与非辩证的是相互从属的那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起支配作用的是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外在于个人的力量；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人的精神的头脑力量支配着发展。唯物主义的现实性是辩证的，因为它只能被完全理解为相互对立的概念之间的统一。"（第 60 页）——列宁反对潘涅库克，

但却接受了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

6.3 对于青年列宁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的”东西。（LW 1，第 158 页）后来，他诉诸马克思所运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参见 *SR*，LW 25，第 485 页），而这与第二国际从卡尔·考茨基到奥托·鲍尔的传统说法并无不同。

依据恩格斯关于“两个系列”的观点，列宁从因果角度解释了他的反映范畴：“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PH*，LW 38，第 186 页）辩证思维充其量只能发现事物的运动联系和作用联系，
673 但不能创造这种联系。错误不在于答案，而在于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已经从实践的立场出发突破了关于两个系列的哲学表述，突破了笛卡尔所说的“身心二分”（*commericum mentis et corporis*）。拉布里奥拉正确地指出，忽视这一突破的人，也就忽视了马克思的辩证法观念。

列宁从如下四条规则来理解**可操作的辩证法**：（1）全面性（这差不多是康德的调节性理念：“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2）“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来观察它（要注意的是，这条规则不能应用到一个抓立的对象上去，列宁用如下思想取代了这条规则：“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是能够变化的）；（3）“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4）不应当忘记，“‘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LW 32，第 85 页）——这些规则显然并未指出具体的方法步骤，而是指出了一种一般性的框架方向或一种态度。

作为理论家的列宁（他本人依然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助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念的再黑格尔主义化。这倒不是因为他坚持“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LW 33，第 219 页），而是通过那些接受马克思的提法时形成的表述：“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PH*，LW 38，第 168 页）或者说是通过《谈谈辩证法问题》（*Zur Frage der Dialektik*）这一片断中的解释：“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第 343 页）当列宁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一种进化论模式显现出来了：在他对商品交换（这是资产阶级的“细胞”）的分析中，马克思揭

示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矛盾的萌芽”，进而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第340页）在这里，辩证法已经失去了一切令人惊异的、不连续的东西，而是表示着关于业已预先确定了的未来的“历史—哲学”知识。对黑格尔的《逻辑学》的阅读也使列宁创造出后来影响
674 深远的“‘资本’逻辑”概念：“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第316页）以下注释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后果：“要义：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第170页）在阅读黑格尔的饱满热情中，他感觉他是看到一个新世界的第一人（或者说是马克思之后的第二人）。

不过，这使得作为“哲学研究者”的列宁不同于创造历史的政治家（这与卢森堡的情况类似）。他关于辩证法的讨论（“辩证逻辑要求……，教导说……，绝对要求这样做”，LW 32，第85—86页）比他的行为更有争议。在政治斗争实践及交往实践中，他能够呈现出极为灵活的、面向具体情况的另一面。在这里，他是一位熟练的辩证法家，他认识到各个方面之间的游戏、矛盾、相互依赖与潜在的潜力，认识到力量关系和恰当的干预时刻。当然，对意外转变的认识又是政治中一种唯意志论的、貌似“之”字形进程的另一面。继列宁的政治艺术之后的，是斯大林的暴力政治。

6.4 斯大林将辩证法编为四个“基本特征”或“主导命题”：（1）自然的统一性；（2）变化与消亡意义上的普遍运动；（3）“上升的运动……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导致“质变”，这种质变是“突然地发生的”，但也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量变积累而成的”；（4）自然物的内部矛盾与对立面的斗争是这种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动力。（*DHMat*，第133—134页）

6.5 毛泽东对辩证法观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37年，他在为授课而写的《矛盾论》中，着手研究由斯大林筛选后的列宁，他采取的表达形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因为他“更为有力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与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结合了起来”（Klimaszewsky/Thomas 1972，第1213页），这可能促使布莱希特特别欢迎1954年《矛盾论》德文本的出版，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参见Schickel

1968，第 150 页及以下）。毛泽东将矛盾
675 当作一般性的存在规律，在这里，他将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区别开
（AW 1，第 388 页及以下）：前者规定着
一切“次要矛盾”，“无论什么矛盾，矛
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第
390 页）。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新旧之间
的尖锐矛盾是处处存在的，这一矛盾是
通过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来解决的（“宇
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第
391 页）。这一矛盾的实践意义是毛泽东
所说的新旧之间斗争的无所不在，在这
里，新事物必然取得胜利。（参见第 383
页）关于“矛盾对立方面的同一性与斗
争”，毛泽东举例说：“巩固无产阶级的
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
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
阶段去的条件。”（第 398 页）因而，辩
证法是作为对群众有影响力的修辞术起
作用的，它将目标与道路之间、理论与
实践之间的矛盾合法化了。

如果矛盾是无处不在的，那么社会
主义中的矛盾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正是
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作的。（AW 5，
第 434—476 页）与之前不同，此时他发
现，“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
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
抗性的一面”（第 435 页）。人民和人民
的敌人之间被认为是对抗性的。但是，
人民、敌人以及矛盾的内涵是不断变化
着的，毛泽东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就
经历了这些变化。这些概念并不表示本
质上的差别，而是从具体情况出发得出
策略上的区分和对抗。即便是在社会主
义社会中也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本身
是非对抗性的（因而是可以在制度内解
决的），但是它们有可能被错误地当作
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参见第 442 页）
与此相反，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的矛
盾是对抗性的，在其制度内是无法解决
的。（第 440 页）

1964 年，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
的谈话》中修正了恩格斯的三大规律学
说。基本论点在一开篇就敲定了（关于对
阿尔都塞学派的影响，参见 Balibar 1977）：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
论没有用）。”（1974，第 212 页）“质量
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
的并列，这是二元论，不是一元论。最 676
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
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
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
定，又是否定。”例如奴隶社会否定原始
社会，而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
（第 226 页）辩证法是“不断走向反面”，
因此人们必须在生活中接受死亡，并且
将死亡与消失作为生活的要素来接受。

6.6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苏联的影

响范围内出现了关于矛盾的讨论，这一讨论从承认社会主义中存在矛盾这一点出发，并肯定这些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动力。被斯大林删除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在去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被重新引入。（可参见 Stiehler 1960，第 3 页）然而，这种讨论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因为没有与之相伴的矛盾的政治（Politik des Widerspruchs）。政治领导要求经常研究辩证法，但是这种研究又是与现实脱节的。此外，必胜论的基调支配着官方意识形态：首席意识形态家宣称，“唯物主义辩证法被证明是无可辩驳的”，他歪曲了列宁的表述（参见 LW 22，第 108 页）：“过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暂时的特征，它的消亡因一种新的、完善的社会秩序而变得成熟了。”（Suslow 1974，第 48 页）

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停滞在这种庸俗形而上学辩证法之复生的阴影中。罗伯特·哈弗曼（Robert Havermann）在 1964 年指出，这些阴影“被僵化所环绕，其完全不具有现实内容”（第 168 页）。“那些从苏联的讲台上学会辩证唯物主义的先生们退回到了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们说，在经典作家之前的一切辩证法都只不过是扭捏作态的托词而已。”（第 12 页）——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在 1966 年解释说，“将理论原则置于具体实践之上”（第 176 页）是这种辩证法复生的原因，它变成了一种“先天的、从根本上来说抽象的辩证法图式”（第 174 页），因而变成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针对那种必胜论的言说方式（“苏联对辩证法的支配和应用”，Stiehler 1960，第 5 页）和不可兑现的要求（“分析的全面性原则”，参见 Wahner 1981，第 636 页），他努力根据一种“新的、更高的辩证法”，即“辩证的辩证法”（第 175 页）来表达一种清醒的一解放性的真理：“一种全面的直观是无稽之谈。”（第 179 页） 677

虽然“消极的辩证法”（Haug 1985）被共产主义事业抛诸身后，但在这一事业的边缘和空隙中，辩证思维总会产生各种新东西。在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受到压制的辩证法，首先回归到了文学与艺术当中。

6.7 尽管存在着制度性缺陷，但在民主德国的历史中还是出现了一系列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关于逻辑的讨论，关于实践的讨论，以及最终关于作为方法的辩证法的讨论；相关回顾可参见 Bogomolow 1974）。在一系列讨论的最后，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幻灭感。——最初，人们“依据列宁”，将辩证法“简单地”规定为“关于发展的学说”，它的内容被规定为“持续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等等。（Redlow 等 1971，

第 182 页）相应地，人们也认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方法，它是“不断完善着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愈益锋利的武器”（Rosental 等 1974，第 6 页）。但是，发展是否意味着没有腐烂、衰落、倒退，没有覆灭？在经典作家那里，辩证法难道不是与如下思想紧密相关的：没有什么能够一直存在，一切总是要灭亡的？因此，这种进步乐观主义与辩证法之间难道不是有矛盾的吗？——赫尔曼·莱伊（Hermann Ley）认为，辩证法充当了自然神学的继承者，因为他说道：“辩证的立场认为，产生和灭亡是持续的变化的要素”（1977，第 765 页），而且他还误以为“在太阳系、地球与人类的暂时性特征中”看到了恩格斯的“实现了的辩证法”。他想确证尼采关于辩证法乐观主义的判断，因此他将如下一点解释为辩证法的特殊成就：“从对自然的认识中得不出任何悲观的结论”（第 766 页）等等。——沃尔夫冈·艾希霍恩（Wolfgang Eichhorn [I]）以区域—本体二分的方式解释了列宁对恩格斯的复述，即“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他说：辩证规律是最普遍且最高的东西，其下有两种区域辩证法，它们具有顺应的平行性与预定的一致性，它们的局限性很小，它们“必然是完完全全一致的”。（1973，第 13 页）科辛等人是这样说的：“辩证法主要是以两种基本形式存在：一是作为**客观辩证法**，它是内在于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二是作为**主观辩证法**，它在辩证法理论中反映了客观辩证法及由此得出的辩证方法。”（1982，第 32 页）在这里，整体封闭成了如下意义上的“系统”：“整体形成了一种独立 678
的外观，它渗透在所有部分当中，相对于部分来说，它是作为规定者出现的。”（Redlow 等 1971，第 185—186 页）——在后期，这种辩证法理论在科学和哲学史上的分支，经过领域转换之后，一方面变成了**系统思想**（可参见 Camilla Warnke 等 1977a 及 1977b），另一方面变成了**发展理论**（可参见 Redlow/Stiehler 1977）。

M. 瓦尔纳（M. Wallner）感觉到，从这种同一性哲学出发就消除了必要的努力。他在 1981 年转向了他曾长期与之斗争的、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分析理论”的基本立场：人们必须将（规范性的）方法与理论区分开，否则就是在“建构‘观念性的半人半马怪物’，这些怪物既是知识也是行为指令，并且假设了一个抽象的主体，该主体的行为完全是由客观性知识决定的，并因此无意于在现实中运动”（第 633 页）。直接反映论也被指责为机械论的，因为它消除了利益，因而消除了主体同客体的关系。（第 635 页及以下）方法作为“观念性的行动概念”最终与主体联系了起来。（第 637—

638 页）

在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中（例如可参见 Iljenkow 1969），在关于逻辑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可参见 Gropp 1970，Iljenkow 1974），或者在纳尔斯基（Narski）关于马克思对困境的处理的研究中（可参见 Bogomolow 1974）等等，关键在于“辩证方法”的操作性意义。然而，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现实的清晰性。E. 托马斯（E. Thomas）认为，“辩证法基本规律”的功能在于，通过它们，“研究……以一般形式在理论上得以确定”（1976，第 161 页）；补充如下这点也许是有帮助的：在一个具有启发性功能的、暂时的理论框架中。G. 帕维尔齐克（G. Pawelzig）将功能性地位归于“恩格斯关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当它涉及中介历史理解并因此能够以指向未来的方式来处理时”，它“在方法结构中就具有了领导性的形式，具有引导叙述的形式”。（1981，第 135 页）这似乎是一种辩证的—宣传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格茨·雷德洛夫（Götz Redlow）解释说：“辩证方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它首先在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所有东西和每一种东西……，但不是在一种‘实用的钥匙’（Patentschlüssel）的意义上……，因为辩证法的客观普遍性只存在于其具体的个别性中。”（1979，第 10 页）瓦尔纳反问道：“一种普遍适用但又不是万能钥匙的方法是如何起作用的？”（1981，第 638 页）这指向了如下企图：“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展现为一种工具，在各种特殊的方法之外，它也能解决具体的研究任务。”（第 639 页）赫伯特·霍尔茨（Herbert Hörz）正确地写道：“它不是其他方法之外的方法，而是适用于对这些方法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1976，第 344 页）

679

因而，对于瓦尔纳来说，对辩证法的自觉运用最终限于，“它引导对特殊方法的选择与联结，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方法论，它能够揭示对象领域的客观辩证法”。瓦尔纳将之称为对特殊方法论的“归摄”（Subordination），然而他承认，“即便没有科学地应用”辩证方法，这种“归摄”也是可能的，“因为科学家个人自发地、正确地将特殊方法联系了起来”。（同上）如果事实证明，作为方法的辩证法“不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灵丹妙药’”（第 640 页），那么这就相当于提升了（有能力的）科学家的自发的辩证法的价值，否则这种辩证法就会被称为天赋或直觉。

7.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1917 年这一重要时刻，以辩证法的名义，世界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当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

克化早晚会使他们作出选择，或是提供口头支持，或是沉默以对，抑或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及与之相关的政党之外表达观点。在斯大林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诸种理论文化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误导性的）名称占据了上风；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被视为它的“真正奠基人”。（参见 Anderson 1978，第 51 页；对此的批评，参见 Haug 1985，第 234—259 页）

7.1 卢卡奇在 1919 年将他的批判（这对之后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了多方面的进一步影响）指向了恩格斯，他指责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针对他，卢卡奇严格地将辩证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上”。（*GuK*，第 175 页，注释）——萨特在其《辩证理性批判》（*Kritik der dielektischen Vernunft*）导言中沿着这一论证路向，从背后实现了对恩格斯的辩证法的颠倒。（参见第 15 页及以下，第 27 页及以下，第 33 页及以下）——卢卡奇的第二个主要批判针对的是恩格斯的客观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十月革命使“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一次成为可能，通向认识的道路向理论敞开了“它的本质，即辩证的方法”（*GuK*，第 173 页）。恩格斯没有认识到这一思想：“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同上）“那么就不再能在如下一点中发现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一切‘形而上学的’观察中，客体……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第 174 页）此外，“‘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同上），而且辩证法就好像是“多余的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暴事实的空洞结构”（第 175 页）。——此后，恩斯特·布洛赫也反对“总是变成纯粹装饰或图式的”辩证法（GA 11，第 393 页）。——无疑，对于卢卡奇来说，由于他脱离了“实践”，辩证法变成了总体性思想，这后来引发了阿尔都塞对**表现的总体性**的批判。

7.2 弗朗茨·梅林等人主张，方法不能脱离对内容的分析，针对这一观点，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在 1923 年解释道，之所以说“对辩证法的阐释‘是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等，是因为‘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最进步的部分中，产生了创造一种全面而严格有序的世界观的需要’”。——卡尔·柯尔施引用了这一点，但他在 1924 年指责塔尔海默是实证主义—唯心主义，并重申这“完全颠倒了一种独立的

唯物主义辩证法‘体系’的可能性的观念。只有一种唯心主义辩证法才会企图将所有思维形式（思维规定、范畴）视为一种特殊的自为质料”（第 176 页）。1930 年，柯尔施将他的批判扩展到列宁，他发现，在列宁那里，辩证法被片面地置于客体当中，并通过反映论破坏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法。（第 62 页）列宁不是在辩证法中，而是在“对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攻击的唯物主义立场的辩护”（第 65 页）中看到他的主要任务的。

柯尔施日益迫切地要求澄清辩证法这一术语，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一直指向一切现存事物内部的动荡不安”（1932，第 177 页）。特别是矛盾“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通过一种符号意义上简写的或出于其他理由而误解的表达方式假装出来的”（第 197 页）。由于已经受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影响，柯尔施在 1932 年解释说：“从逻辑上和经验上完美地澄清辩证法中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至今未经考察就使用的概念，是与马克思相关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最重要的未来任务之一。”（同上）他进一步的思路使他越出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学生”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清晰地记着如下两方面：辩证法的意义和它的非思辨运用的意义。

681

7.3 布莱希特。像柯尔施及其他因 1917 年革命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那样，布莱希特也是列宁主义者（Leninianer）：因此，他所要理解的正是，被斯大林制度化了的“列宁主义”呈现了怎样的颠倒。1926—1927 年，布莱希特注意到“一个极具特点的时代：当列宁去世时，人们一起找寻不朽的格言。但这是没有的。人们发现的是纸片，上面写满了实践的指示”；于是他们就去研究，如何能够从这些指示出发去“改变世界意义”。（GA 21，第 179 页）在 1934 年给柯尔施的信中（*Briefe*，第 185 页及以下），布莱希特解释说，“好的旧的辩证法并未因此被战胜和消失”，而且他将其“模糊性”追溯到工人运动的弱点上。相应地，他在后来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依然将“辩证法的萎缩”置于重要位置。（GA 23，第 417 页）

7.31 几乎与柯尔施偏离辩证法同时，布莱希特制定了一个“辩证的戏剧”（GA 21，第 431 页及以下）的计划。这是一种对抗条件下的实践哲学，它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有关，后者出现在此时，并且也是以“辩证的”形式，因为它避免了分离、统一与包罗万象的一般性，并且它不仅仅主张运动性，而且使运动性成为它的表达的标准。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谈论遭到了批判，因为它遮蔽了“相互矛盾的趋势，这些趋势相互斗争并且是具有决定性的”（GA 21，第

523 页）。辩证法之所以是必需的，是因为思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扬弃的差别，是因为必须找到一种在这种条件下采取行动的态度。“过程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出结论。这是观察，它需要并设定了结论。”（同上）布莱希特提出了一种反向的不确定关系（Unschärferelation）：不是干预而是不可干预性使图像变得不
682 确定：“不是通过思维来改变的（独立于我们的）状态与事物是不可想象的。”（第 521 页）——在 1949 年给艾里希·英格尔的信中，布莱希特建议，应当将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研究”，其结果就是：“人们绝不是仅仅从以往的思维方式中推导或批驳辩证法，正如新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被推导出来的那样：这需要的是一种跳跃或实现一种（可能有利的）下落。”“更为明智的是，从其在政治上的适用性来理解辩证法，即从掌控中推导出新的概念。”（Br［第 619 页］，第 591 页）

对于布莱希特来说，“辩证的批判”在于，直观基于其结果而被运用到“危机当中”。（GA 21，第 520 页；GW 20，第 153 页）在这一意义上，他所指的是苏联检查制度的危机，因为这一制度与其结果是相互冲突的：“当这个国家抑制、破坏、取消那些反对国家的文献时，它也就破坏了支持国家的文献。”（GA 22.1，第 132 页）

7.32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曾说，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是“统一化概念，是中心视域”（第 1 页），而这也正是布莱希特所说的。布莱希特在其《墨翟：易经》（*Me-ti: Buch der Wendungen*）的副标题中，接受了列宁在自我批判和改变方向的语境中所用的“变易”（Wendung）这一表达。在这本关于辩证的道德或态度的“小册子”中，辩证法被称为“伟大的方法”。这里的关键是，“在事物中认识并利用过程。它教会设问，而问题使行动得以可能”（GW 12，第 475 页）。同一性是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同一性，黑格尔的这一命题被改写为“远离思维的”（第 493 页）事物的压力，被改写为如下非等同性命题：事物不会坚定不移，概念不会全神贯注（第 548 页）。“事物是事件（Vorkommnisse）。状态是过程。过去是消逝。”（第 517 页）布莱希特是在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的：颠覆任何秩序的意识形态的永恒性。“将辩证法用于摧毁意识形态。”（GW 20，第 157 页）

战败使德国人摆脱了纳粹，布莱希特在其中感觉到了悖论：“这个国家通过同化而再次骗得了一场革命。”（*AJ*，6.1.1948）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就无法理解德国的状况：“因为它的统一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分裂来获得，自由要通过支配来实现，等等。”（同上）——布莱希特注

意到如下危险，即一种歪曲了的、重又变为形而上学的辩证法，顺从于对革命的欺骗：这种伪辩证法“为了平息一切而扰乱了一切，它将事物本身的流动变成了一种僵化的事物，它将物质‘提升’为一种
683 观念，这恰恰是为这样一个糟糕的时代扮演着魔法袋和诡计袋”（同上）。

7.33 布莱希特完全将他在民主德国导演的戏剧指向辩证法：“一切与冲突、碰撞、斗争相关的东西，如果没有唯物主义辩证法，都是不可能处理的。”（GA 23，第 376 页）戏剧“能够使辩证法变得有趣。逻辑上渐进式或飞跃式发展，旧状况的不稳定、矛盾的冲突等等的惊喜，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的乐趣、过程，他们提升了生活的艺术以及生活的乐趣。一切艺术都为那最伟大的艺术即生活艺术做出了贡献”（GW 16，第 702 页）。——接受不仅仅是有利的。谨慎说来：“对于那些在其他领域中认识到辩证法的人来说，将辩证法引入戏剧的做法也［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冲击。”（*AJ*, 25. 12. 1952）

7.4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主要是在批判布哈林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的扭曲”（Schmied-Kowarzik 1981，第 116 页）和与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争论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辩证法的理解。

7.41 葛兰西所指责的布哈林处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这一路向中，他此后又代表着斯大林所推崇的理论结构。因此，这一批判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先声。葛兰西看到了如下假设的基本错误，“实践哲学经常分裂为两个部分：关于历史与政治的学说和哲学，然而，关于这种实践哲学，［布哈林］说道，它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再是旧的哲学唯物主义”。“如果人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么也就不再能够理解辩证法的意蕴与意义。”（*Gef* 6，H. 11，§22，第 1420 页）积极地说：“如果将实践哲学理解为一种整合与起源哲学，那么辩证法的功能和意义只有在其完整的基本性中才能被理解，这种哲学开启了历史与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新阶段，因为它既扬弃了传统的唯心主义，又扬弃了传统的唯物主义（并且是在扬弃其活的因素的过程中进行整合的），这二者都是旧社会的表达形式。”（同上）布哈林的前斯大林主义时期的“理论文法”将一种奠基性的唯物 684
主义哲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和之上，葛兰西在这种“理论文法”中也看到了对常识的屈服：“人们意识到，辩证法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困难的事情，因为辩证思考反对的是普通常识，后者是独断的，其渴望最终的确定性，并且以形式逻辑作为其表达。”（同上）在暗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EW 3，第 5—6

页）中的第三条时，他继续说道："未受教育的、原始的环境支配着教育者，普通常识胜过了科学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环境是教育者，那么他就必须接受教育，但**教科书**并不理解这种革命性的辩证法。"

对于葛兰西来说，辩证法的恢复就意味着对进化论和旧观念的批判，它们假设了一种无缝的、有目的的、可预见的发展，并且不能"从量到质的过渡中认识辩证原则"，"这种过渡干扰着庸俗进化论意义上的每一次进步和每一条等同性规律"。（H. 11，§26，第 1426 页）有人提出异议说，如此一来，任何辩证法的概念都是无法确定下来的，对此，葛兰西回答道："但是，人们可以从事历史和政治，因为尽管事实总是被个体化的，并且在历史运动之流中是可变的，但这些概念是可以被理论化的；否则，人们甚至无法知道运动或辩证法是什么，人们就会陷入一种新形式的唯名论中。"（第 1427 页）

7.42 葛兰西指责克罗齐：（1）他从马克思的**实在辩证法**（*Realdialektik*）退回到了**观念辩证法**（*Idealdialektik*）（"他在变化中看到的是变化本身还是变化的'概念'？"，*Gef* 6，H. 10，§1，第 1254 页）；（2）他"企图打消反题，将之分割为一长串的要素，这意味着将辩证法还原为一个由革命—复辟构成的改良主义的发展过程，在其中，只有第二个术语（即复辟）是有效的，因为这里的关键是持续地（从外部）恰当地修补一个机体，而这个机体又没有自己的修复基础"（§41. XVI，第 1332—1333 页）。克罗齐"在对立辩证法（Dialektik der Gegensätze）之外又引入了"（H. 10. I，§1，第 1254 页）"差异辩证法"（Dialektik der Unterschiedenen），而葛兰西主要是在这一辩证法中看到了这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驯化，这种驯化是在一种改良主义的、"被动革命"（参见 H. 10. I，第 1226 页）意义上的。"这一概念在哲学上的谬误（实践上的起源！）在于，在辩证的过程中'机械地'预设了，正题必须由反题来'保留'，以免破坏这一过程本身，因此，这一过程成了一种机械的、任意前缀的重复，变成了无限的'预期'。……在现实的历史中，反题趋向于破坏正题，综合将是一种扬弃，然而，不能先天地确定正题中的哪些内容将在这种综合中依然保留下来，人们不能如在一种由传统规制着的'环'中那样先天地'度量'节奏。这些最终实际上发生了，这是一贯直接的'政治'问题，因为辩证的过程在现实的历史中崩溃成无数的组成环节。"（H. 10. I，§6，第 1236—1237 页）葛兰西认为克罗齐的"差异辩证法"的好处是，它"可以被当作对 685

一种现实的方法论需求的纯粹口头解决来批判”（H. 10. 11，§41. X，第 1322 页）：“在对立与差异的区分中有一种真实的需求，但是，也有一种概念上的矛盾，因为辩证法只存在于对立当中。”（第 1323 页）这里主要挑战的是结构与超结构（Superstrukture）之间的差异：克罗齐思辨地思考联系，而葛兰西则是真实地思考联系，他用“历史集团”（geschichtlicher Block）概念来掌握这一联系。（参见同上）

7.43 葛兰西从积极的自然行为出发重构了辩证法观念，并恰恰由此避免了将之还原为主客辩证法。他试图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寻找出路。在对一个新托马斯主义文本（在其中，辩证法被视为形式逻辑和修辞术的一部分）的摘录中，葛兰西对客观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作了间接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Grundproblemen*）中，普列汉诺夫无视关于客观性的分类，无视实践的首要地位，将辩证法规定为“形式逻辑的一个分支，规定为运动的逻辑，这种逻辑不同于静止的逻辑”（H. 11. §41，第 1451 页；此外可参见 Bogomolow 1974，第 236 页）。

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只能用于人类历史，而不能用于自然”（H. 11. §34，第 1441 页；参见 *GuK*，第 175 页，注释），对于这一观点，葛兰西指出：“当他的陈述预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时，他是错误的，因为他陷入了宗教、希腊—基督教哲学以及唯心主义当中，而唯心主义只是在口头上将人与自然聚合起来，而实际上并未做到。……然而，如果人类历史也被理解为自然历史（而且是关于科学历史的），那么辩证法如何能够与自然相分离？卢卡奇大概是在回应通俗的教科书的古怪理论时 686
陷入了相反的错误，即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当中。可以肯定的是，在恩格斯那里（《反杜林论》）有很多关键词，它们可以导致对教科书的偏离。人们忘记了，尽管恩格斯曾长期致力于此，但只是留下了关于他曾承诺的著作的零散资料，这一著作应当证明，辩证法是宇宙规律，而且人们夸大了两位实践哲学创始人在思想上的一致性。”（同上）

7.5 1975 年，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在法国共产党的研究所，以继承自毛泽东的辩证法与阶级斗争的双重关系思想召开了一场辩证法会议：“同时，辩证法的主要对象（尽管不是唯一对象）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它本身是一种产物，更准确地说，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形式。（1977，第 21 页）在此，巴利巴尔看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偏差”，然而，它们同永久性的“过渡”与“修正”之间的博弈，对于马克思主

义的过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客观主义**（其主要形式是一种自然与进化的辩证法以及一种普遍的本体论；次生形式则是实证主义、认识理论的形式主义或辩证的方法论等）。（2）（非对抗性的对立）建构一种**实践哲学**或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以及主观主义、关于自由与主体的哲学或理论上的人道主义等较弱的次生形式）（第25页）。实践哲学最重要的形式“不是将实践设想为**主体**的实践……，而是将**实践本身**设想为**匿名的、内在分裂的历史过程‘主体’**”（凭借如下范畴：力量关系、组织形式、居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相对意识形态等）（第35页）。由恩格斯和葛兰西具体化了的客观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对立“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所**固有的**”（第40页），因而人们是摆脱不了这一对立的。对这一对立的解决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本身的生命：对于它来说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内部，的确存在着**为了**这种定义的复杂的理论斗争。（第41页）巴利巴尔用两种互补的修正来干预这些对立面的斗争：“（1）只有一种**客观**辩证法，它就是**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而不是‘反映在思维中的’事物的运动，**更别说**是单纯的思维运动了。（2）只有一种从实践立场（Standpunkt der Praxis），或者毋宁说从一种**实践（性）的立场**（*praktische Standpunkt*）出发的辩证法，这种立场使理论服从于实践的规定。”（第38页）

巴利巴尔认为，“‘对立统一’（*unité des contraires*）命题、矛盾（*contradiction*）普遍性命题与矛盾特殊性（*spécificité*）命题”（第60页）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说是基础性的。相反，如果人们将辩证法理解为关于运动等的学说，那么它依然是以遭到批判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为基础的。它是关于矛盾之产生、发展与消解（不是和解）的理论：“因为任何矛盾都**不是**‘稳固的’、‘永恒的’，虽然**这一**矛盾，即‘物的本质’的矛盾性特征本身是永恒的，或者毋宁说是**绝对的**。”（同上）——布莱希特已经提出了对“特殊性”的要求：“例如，人们使一种质改变为另一种质从而将突变命题简单化了，这一命题就变成了老生常谈，即一个微不足道的、不起作用的真理。也许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设想的、可以预期的事件，在这种事件中，通过一定数量变化，一种新的质产生了，这种新的质是一个完全特殊的样式，然而，就此而言，从它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特殊的，而是未被规定的、**不可处理的**，因而最好不要将之标示为质。”（*Brecht*, 1949, [第619页], 第591页）被讨论的事物在实践和改变的意义上是“可处理的”，这是布莱希特如下命题的意义：“从掌控中推导出新的概

687

念。”（同上）——巴利巴尔将他关于对立（*contraires*）之特殊性的理解作为对恩格斯的“反映命题”（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的解释：它不是指存在着两种其间关系有待研究的辩证法，而是意味着“只有**一种客观辩证法**，它的思维、认识的发展，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方面**（*Aspekt*），因此是一种确定的**效应**（*Effekt*）”。反映意味着“认识是作为一种本身客观的实践过程而发展着的”（第29页）。因此，巴利巴尔可以坚持关于**这一**矛盾之普遍性的命题，尽管它的确只是特殊的对立或矛盾，它们是为了实践并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

在这种明显受到列宁影响的思考方式中，巴利巴尔以如下格言作结：“辩证法对于无产阶级理论的意义，相当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实践的意义，它是其组织或‘集中的形式’。”（第63页）这一命题变成了历史性标志：4年后，在法国，实践—理论的政治文化崩溃了，而这一命题正是从这种文化中言说出来的。

7.6 1981年，沃尔夫迪特里希·施米德-科瓦齐克（Wolfdietrich Schmied-Kowarzik）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我证成”（第210页）理解为实践哲学，他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扬弃出发，通过马克思而重建了实践哲学。他的注意力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支配”（Übergreifenden）上，他在广义的生产中看到了这种“支配”。他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发展出支配概念的，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分配、消费]。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MEW 42，第34页）施米德-科瓦齐克在这里看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思想”（1981，第97页）。对于他来说，生产是人的自我生产，也是人的异化的生产以及通过实践来扬弃这种异化的趋势。（同上书，第116页）依凭恩斯特·布洛赫，他在如下条件下重新理解了自然辩证法思想：“自然不仅仅”被设定“为社会生产的对象”（第206页）。他的结论是：“社会生产的辩证的支配总是而且必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这种支配本身被辩证地引入到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然辩证法当中，这种辩证法就其自身而言又是从社会实践，即从由它所支配的要素中产生的，是能够被辩证地完成与规定的。”（第210页）

8. 后共产主义的境况受到了含混模糊的辩证法的影响，这种辩证法几乎不能在理论上加以思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概念，辩证法似乎已经丧失信誉。这种的曾经想法依然无所顾忌地滥满在苏联的废墟中，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向也有中断之虞。

8.1 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等（1992，第 6 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在深入理解卡尔·波普尔 1940 年对辩证法的毁灭性批判（关于此可参见哈贝马斯 1963 年的《关于波普尔与阿多诺之争的补充》[*Nachtrag zur Kontroverse zwischen Popper und Adorno*]）时，在其讨论中可以发现很多“蒙昧主义”（Obskurantismus）的东西，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特殊性（distinctiveness），特别是在那个“显然不清晰的”和“广泛重复的”断言中，即：它是辩证的。“似乎巧妙地使用辩证的隐喻可以服务于有价值的、启发式的目的。”然而，对一种“暗示性的习语”之类的东西的掌握，不同于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的展开，尤其是“辩证的陈述要么是重复能够以极为浅显的方式最透彻地表达出来的东西，要么是不可理解的”。关于一种可操作的辩证法，没有任何具体的一示范性的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作出如下断言的理由，即辩证方法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他们最多承认，“一种在前理论层次上组织与指导思考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中，有助于发现那些可以在符合科学文化规范的术语中很好地表达出来的见解”。

689

这一判断不仅仅来源于科学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狭隘的方法概念，历史学家爱德华·P. 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也对如下观点作了评判：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存在于辩证理性的领域中的某个地方”，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如果马克思发现了“宇宙之关键”，他就会把它写下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它没有被写下来，因为它是不能被写下来的。”与之相反，汤普森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一种通过练习（Praktizieren）而学会的实践，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辩证法从来不是能够被固定或熟记的”（1980，第 167 页）。——理查德·冈恩（Richard Gunn）要求原则上承认“概念与对象之间、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基本差别……；简言之，目的论与因果论之间的差别”，并希望将之作为辩证法的“首要应用领域”，他是以“泛灵论和人类学”的方式发现这种辩证法的，至多是将之概念化了，因而充其量是能够“依照参与其中的行动者的（正确或错误的）意识”来理解历史辩证法或社会辩证法。（1977，第 48—49 页）“一种辩证的—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第 49 页）

——正如汉斯·海因茨·霍尔兹（Hans Heinz Holz 1986，第 11 页）那样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关于世界结构的表述体系”并将之固化为“本体论理论”——它其次才是充当“思维的元理论”（参见 Narski 1973，第 83 页），那么，辩证法观念就是向着回退的方向扬弃自身。1990 年，霍尔兹计划要“阐述一种由原则、范畴与结构线索构成的本体论基本模式”（第 562 页）。根据斯大林的关于两种秩序——逻辑秩序与其“本体论上的相关物”（第 563 页）——相等的观念，他可以说，“反映理论……依靠自身证立证成了辩证法”（第 564 页）。——彼得·鲁本提出了一种不同类型的辩证法界限，他在自然哲学思想的框架下提出了“**创造自然的自然**”（*natura naturans*），“整个自然被视为它本身的**生产场所**”，并且认为：“恰恰是这制造出了辩证法。”（1978，第 70 页）由于如此一来辩证法的理论问题就表现为“界限的自我运动”，所以鲁本认为，“相互作用”概念是不恰当的。（第 82 页）

690

8.2 **警惕误用**。特奥多尔·W.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反思辩证法时（Nr. 152）写道：“为了撼动独断的断言”，“后来是针对‘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辩证法将一种源自诡辩的讨论程序“发展成经久不衰的批判方法，即所有受压迫者的思想，甚至它们从未想到过的思想的避难所。但是，它作为持有天理的手段，从一开始也是一种统治，是形式化的辩解技巧……。因而，它的真理性或非真理性并不在于方法本身，而是在于它在历史过程中的意图”。出人意料地是，阿多诺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动和参与。而在多年之后的《否定的辩证法》中，重点发生了变化。现在，辩证法被视为“自己对客观的蒙蔽联系（Verblendungszusammenhang）的意识，而不是已经从中逃脱出来。客观上说，它的目标是从它的内部爆破出来的。爆破的力量是从内在联系中生长出来的：用黑格尔的格言来说就是，辩证法再一次吸收了对手的力量，并转而反对它：不仅仅是在辩证的具体环节中，而且是在整体的终结之时”（1966，第 396 页）。

同样是在 1966 年，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布拉格黑格尔大会上对阿尔都塞提出了反对观点：“只要唯物主义辩证法不毁掉进步观念（根据这种观念，未来总是植根于现状当中），那么它就依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理性当中，停留在实证性当中；只要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将向一种新的历史阶段过渡的概念彻底化，这就意味着：将倒转、同过去与现状的决裂、进步方向中质上的差异纳入理论当中。”（1969，第 186 页）马尔库塞注意到

了一种社会辩证法的结构转换："当对抗性的社会团结为一个巨大的、压抑的总体时，所谓否定的社会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否定的力量是从外部生长起来的"，并且这种力量"今天不聚集于任何阶级之中"。（第 190 页）因而，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规定的否定从历史上来说已经过时了。（参见 1954，第 370—371 页）

691 8.3 据此，辩证法与一种将运动与智慧结合起来的态度有关：它不是一种可形式化的方法，但它与一种更基本意义上的方法有关，因为它被理解为启发（发现的技艺）。这两种功能与一种世界观相结合，这种世界观相信可以思考一种矛盾的运动联系。——"或许在布莱希特看来，将智者定义为这种辩证法的完美舞台并不过分。"（Benjamin，转引自 Ruoff 1976，第 39 页）最终，辩证法能力是一种技艺。"成为辩证法家意味着历史之风充满风帆。概念就是风帆。但是，拥有风帆还是不够的。能够扬起风帆的技艺是至关重要的。"（Benjamin，*Passagen*，GS V，第 592 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M 1951;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P. Anderson, *Über den westlichen Marxismus*, Frankfurt/M 1978; R. Bhaskar, *Dialectic, Material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London 1983;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99), Nachdruck aufgrund der 6. Aufl. 1920, hgg. v. G. Hillmann, Reinbek 1969; E. Balibar, »A nouveau sur la contradiction. Dialectique des luttes de classes et lutte de classes dans la dialectique«, in: CERM 1977, 17-63; A. S. Bogomolow, »Probleme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in der Philosophie der DDR«, in: M. Klein u.a. (Hg.),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hilosophie in der DDR*, Berlin/DDR 1974, 229-252; B. Brecht, *Briefe*, Berlin/DDR-Weimar 1983; M. Bung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Dialectics«, in: Ch. Perelman (Hg.), *Dialectic/Dialectique*, Den Haag 1975, 63-77; Centre d' 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CERM),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77; L. Colletti,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Berlin/W 1977 (1974); W. Eichhorn (I), »Zur Bestimmung des Gegenstands der Philosophie«, in: *DZPh*, 21. Jg., 1973, H. 1, 5-19; H. Eisler,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München 1970; C. F. Gethmann, »Formale Logik und Dialektik. Die Logik-Diskussion in der DDR 1951 bis 1958«, in: C. Burrichter (Hg.), *Ein kurzer Frühling der Philosophie. DDR-Philosophie in der »Aufbauphase«*, Paderborn 1984, 75-155; R. O. Gropp, *Grundlagen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DDR 1970; R. Gunn, »Is Nature Dialectical?«, in: *Marxism Today*, Febr. 1977, 45-52; 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V. Havel, »Über dialektische Metaphysik« (1966), in: ders., *Das Gartenfest /Die Benachrichtigungen*, Reinbek 1989; R. Havemann, *Dialektikohne Dogma*, Reinbek 1964; H. H. Holz, »Hinleitung zu den Problemen«, in: J. Bartels u.a., *Dialektik als offenes System*, Köln 1986, 11-28; ders., »Dialektik«, in: EE, 1990; H. Hörz,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Berlin/DDR 1976; E. 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Marx« (Moskau 1960), in: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hgg. v. A. Schmidt, Frankfurt/M 1969, 87-127; ders., »Logisches und Historisches«, in: Rosental u.a., Berlin/DDR 1974 (Kap. 8); J. Israel, *Der Begriff der Dialektik – Erkenntnistheorie, Sprache und dialektisch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K. Kautsky, *Karl Marx' ökonomische Lehren* (1886), hgg. u. eingel. v. H.-J. Steinberg, Berlin/W-Bonn 1980; G. Klimaszewsky u. E. Thom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Dialektik oder maoistische Pseudodialektik?«, in: *DZPh*, 20. Jg., 1972, H. 10, 1208-1226; G. Klimaszewsky (Hg.), *Weltanschauliche und methodologische Probleme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Berlin/DDR 1976; L. Kofler,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Zur Methodenlehre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 Darmstadt und Neuwied ³1973; K. Korsch,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im 'Kapital'« (1932), in: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hgg. v. E. Gerlach, Frankfurt/M 1971; A. Kosing, E. Hahn, M. Hagen, H. Schliwa u. I. Schulze, *Dialektik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81 (⁴1984); N. Levine, *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 London 1984; H. Ley, »Dialektische Methodologie und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m 'Anti-Dühring'«, in: *DZPh*, 25. Jg., 1977, 765-778;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1971*, hgg. v. St. Schram, London 1974; H. Marcuse, »Nachwort« (1954), in: *Vernunft und Revolution. Hegel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esellschaftstheorie*, Schriften 4; ders., »Zum Begriff der Negation in der Dialektik«, in: ders., *Ideen zu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9, 185-190; J. Mepham u. D.-H. Ruben (Hg.), *Dialectics and Method* (= Bd. I: dies., *Issues in Marxist Philosophy*, 3. Bde.), Brighton 1979; M. Merleau-Ponty, *Die Abenteuer der Dialektik* (1955), Frankfurt/M 1968; O. Morf,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 ²1970; I. S. Narski, *Dialektischer Widerspruch und Erkenntnislogik* (1969), Berlin/DDR 1973; A. Pannekoek, *Die Klasse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und ihre Funktion im Klassenkampf*, Hamburg 1909; G. Pawelzig, »Das Gesetz der Negation der Negation in Engels' Darstellung historischer Prozesse«,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Berlin/DDR, H. 9, 1981, 134-138; G. Plechanow,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1908), Berlin/DDR 1958; K. Popper,

692

»Was ist Dialektik?«, in: E. Topitsch (Hg.),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Köln-Berlin/W 1966, 262-290 (»What is dialectic?«, in: *Mind*, 49. Jg., 1940); G. Redlow, H. Frommknecht, M. Klein u.a., *Einführung in den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Berlin/DDR-Frankfurt/M 1971; G. Redlow, »Zu einigen aktuellen theoretischen Frag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in: *DZPh*, 27. Jg., 1979, 5-19; ders. u. G. Stiehler (Hg.),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Berlin/DDR 1977; M. M. Rosental,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i Karl Marx* (1955), Berlin/DDR 1969; ders. u.a.,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 Von der Entstehung des Marxismus bis zur Leninschen Etappe* (1971), Berlin/DDR 1974; P. Ruben, *Dialektik und Arbeit der Philosophie*, Köln 1978; K. Ruoff, »Tui oder Weiser? Zur Gestalt des Philosophen bei Brecht«, in: *Brechts Tui-Kritik*, AS 11, Berlin/W 1976, 17-52; J.-P. Sartre,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1960), Reinbek 1967; J. Schickel, »Me-ti, Bertolt Brecht und die Große Methode«, in: ders., *Große Mauer, Große Methode*, Stuttgart 1968; W. Schmied-Kowarzik, *Die Dialek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Zur Genesis und Kernstruktur der Marxschen Theorie*, Freiburg-München 1981; W. Segeth,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als Methode*, Berlin/DDR und Frankfurt/M 1977; L. Sève, *Über 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76; H.-J. Steinberg, *Einleitung* zu K. Kautsky; G. Stiehler, *Hegel und der Marxismus über den Widerspruch. Zur Frage der kritischen Überwindung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durch die wissenschaftlich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Berlin/DDR 1960; ders., *Der dialektische Widerspruch*, Berlin/DDR 1967; ders., *Dialektik und Praxis. Untersuchungen zur »tätigen Seite« in der vormarxistischen und marx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68; ders., *System und Widerspruch. Zur Dialektik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1; M. A. Suslow,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 die internationale Lehre der Arbeiterklasse*, Berlin/DDR 1974; A. Thalheimer, *Einführung in den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1927), Reprint, hgg. v. d. Gruppe Arbeiterpolitik, Bremen o. J.; E. Thomas, »Die Einheit der Grundgesetze der Dialektik in der ökonomischen Lehre von Karl Marx«, in: Klimaszewsky 1976, 150-161;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Zur Produktion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eingel. v. M. Vester, Frankfurt/M 1980; M. Wallner, »Fragen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als Methode«, in: *DZPh* 6/1981, 629-640; C. Warnke, H. Bergmann, U. Hedtke u. P. Ruben, *Dialektik und Systemdenken. Historische Aspekte*, Berlin/DDR 1977 (a); C. Warnke, B. Heidtmann, G. Richter u. G. Schnauss, *Marxistische Gesellschaftsdialektik oder »System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77 (b); E. O. Wright, A. Levine u. E. Sober, *Reconstructing Marxism. Essays on Expla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y, London- New York 1992.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侯振武 译，张义修 校，俞可平 审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lthusser-Schule, Analyse/Synthese, analytischer Marxismus, Anfang, Antagonismus, Antiideologie, Antiphilosophie, Anwendung, Aufbaupläne, Aufhebung, Begriff, Bewegung, bestimmte Negation, Bewußtsein, Brecht-Linie (II), Camera obscura, Darstellung/Forschung, Della-Volpe-Schule, Denkform,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ialektisches Bild,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ntwicklung,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Grenzen der Dialektik, Hauptwiderspruch, Hegelianismus, Hegelkritik, Kapitallogik, Klassenkämpfe, Krise,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Leitfaden, logisch-historisch, Marxismus, Metaphysik, Methode, Moment, Naturdialektik, Negation der Negation, Ontologie,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ositivismus, Positivismus-Streit,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chranke, Sprache, System, Theorie/Praxis, Übergang, Umschlag, Verdoppelung, Vermittlung, Wechselwirkung, Weltanschauung, westlicher Marxismus, Widerspruch

辩证唯物主义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A: māddīya dīyālīktīkīya.

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R: dialektičeskij materializm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S: materialismo dialéctico.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列宁进一步发展的、关于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科学的哲学”，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其哲学基础”。（Buhr/Kosing，1974，第63页）这是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词典和教科书中标准的用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哲学”、“科学的哲学”、“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等这些表述曾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具有一种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蕴。 694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知道“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表述。能够指称他们观点的“哲学”也是找不到的。1859年，马克思提到同哲学的决裂，这是他与恩

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已经实现/完成的：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Vorw* 59，MEW 13，第10页）。这一批判导致了同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决裂：对“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叙述使那些通过哲学而在经验上（“抽象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上（“唯心主义者”）独立化了的抽象（“独立的哲学”）丧失了其存在基础。（*DI*，MEW 3，第27页；参见*AD*，MEW 20，第24、34页）在捍卫革命的措辞（“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MEW 3，第20页）与一种认识论上的（gnoseologische）客观主义（“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同上书，第42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出了一种理论类型，居于其中心的，是对革命实践的理解和革命的自我改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ThF*，MEW 3，第6—7页）。

这提出了如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如何以及为何先是能够被建构为“社会民主主义哲学”（J. Dietzgen），之后被建构为国家哲学（Diamat，在苏联流行的“辩证唯物主义”一词的缩写词。——译者），因而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建构起来的？一方面，随着辩证唯物主义（Diamat）固化为教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被中断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的构件已被纳入一种思想体系当中，这种思想体系不加批判地将司空见惯的思维形式、“健全的人类知性”以及科学的成果系统化了，目的是使无产阶级能够通过一种“科学的世界观”的中介来实现革命性的变革。 695

相较而言，哲学上的再意识形态化更容易以恩格斯为基础，而不是马克思。特别是对《反杜林论》（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和《自然辩证法》（1873—1883，1925年出版）的接受，促进了作为基础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通过将辩证法标示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AD*，MEW 20，第132页，参见*LF*，MEW 21，第293页），辩证唯物主义似乎足以被证明是哲学。1885年，恩格斯看到他的任务在于证明，“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AD*，MEW 20，第11页）。

在1878年的《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中，恩格斯将他的研究对象（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本体论）概述如下：“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

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AD*，MEW 20，第307页）相应地，恩格斯将辩证法区分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前者“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后者“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第481页）一种宇宙性的扩展本体论在该文中达到巅峰：“我们还是确信：物质……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第327页）

依靠这些永恒的经典引文，理解革命实践的要求已经被一种一般性的本体论所替代。实践沦为对一般性定理的应用或确证。那么，对一个时代的革命主体之类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被设想成是可以从一般性规律中推演出来的：一般性的东西，即辩证唯物主义在研究个体的过程中，包括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发现了它自己的应用或确证。

696 2.“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要回溯到约瑟夫·狄慈根（Josef Dietzgen），他在1887年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Streifzügen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theorie*）中用这个名称来表示“社会民主主义哲学”。这种辩证唯物主义通过一种以自然科学为导向的决定论和自然概念（达尔文主义）而得以丰富。尤其是通过G. 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在社会民主党中扩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指称。

2.1 主要是经由列宁——他在1908年研究了狄慈根的著作——*PH*. LW 38，第449—488页），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狄慈根谈论不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他们是从更高级、更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斥责它[**不好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ME*，LW 14，第5、237页，参见第9—10、130、241、308页，第313页及以下，第333—334、362—363、366页）在这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狄慈根的阅读。《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是这样说的：“因此，唯心主义的荒谬就是这样一个逐渐被克服的东西，现代唯物主义则是哲学发展和普遍科学发展的产物。”进一步的：“因为唯心主义——它最后的著名人物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荒谬完全是德国的，所以从这种荒谬中产生的结果，即辩

证唯物主义，也主要是德国的产物。”（Dietzgen 1887，第 61 页；转引自 LW 38，第 461 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被设想为一种观念史的发展产物，即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产物。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Drei Quellen und drei Bestandteile des Marxismus*，1913）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精神史上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是井然有序的，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阶级斗争学说）被呈现为它们的来源的发展产物：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它通过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得以丰富，特别是通过辩证法。（LW 19，第 3—9 页）

将社会民主主义的辩证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启蒙哲学的要求。狄慈根在与自然科学类比的意义上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科学学派”：“正如自然科学不是从头脑中，而是从对物质现实的感性观察中

697 得出自己的论断一样，当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不是设计，而是对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认识。”（Dietzgen 1873，第 304—305 页；转引自 LW 38，第 389 页）K. 考茨基（1901/1902）——列宁在 1902 年的《怎么办？》中以他的观点为出发点——是这样说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转引自 LW 5，第 395 页）与“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相应的，是对无产阶级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训练的实践，学习过程最终被还原为产生“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

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1918/1919）上，以如下观点来反对上述理解，这种观点的核心指向的，是将环境改变与自我改变的同时发生组织起来：“由于群众运用权力，因此他们必须学会运用权力。”无产阶级群众“由于采取了行动而得到了训练”（GW 4，第 511—512 页）。

卢森堡所批判的那种无产阶级教育实践，在共产主义工人运动中持续了下去，这是从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 年）开始的，这次大会决定共产党要布尔什维克化。在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种对“劳动群众”的教育实践得到了继承。这强化了一个牢固树立起来的永恒真理体系。这一真理体系成为基础教育的对象、职业学校与高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研究对象、青年组织教育方针的对象、工会以及政党的对象。

2.2 通过苏联20年代的哲学争论（机械主义者与德波林主义者[Deborinist]）和最初曾起决定作用的德波林主义者的失败——这是1930年年中通过M. B. 米定（M. B. Mitin）、W. N. 拉尔泽维奇（W. N. Ralzewitsch）和P. F. 尤丁（P. F. Judin）而开始的，并于1931年1月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相应决定而结束——最后是通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1938），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获得了支配地位，它变成了Diamat。（参见Labica 1986）

列宁认为，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LW 19，
698 第5页）。这一命题影响深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新唯物主义”同时被表达为对哲学的规定的否定（“新的”或“现代的”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MEW 19，第207页），而列宁以哲学—历史的方式引入了“推广命题”（Ausdehnungs-these），并因此将“新唯物主义”置于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连续过程当中。此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并赋予这一命题一种体系化的地位：辩证唯物主义被还原为一种自然—本体论。1938年，斯大林以教义问答的方式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DHMat*，第131页）因此，一种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客观真理”）就以一种自然—本体论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出发点不再是马克思的对革命实践的理解，而是一种绝对确定的、关于存在之一般规定的知识。这一方法的结果，也就是显现出为了政治而将自然—本体论扩展与应用到社会上的实践意义，将如下功能赋予这种自然—本体论：通过一种绝对知识（辩证唯物主义）来确保斯大林主义的政治。一般来说，斯大林的论证具有如下特征：（a）“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b）“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c）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为基础，以研究这些规律为基础”。（第143—144页）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辩证法变成了随意的东西，因为出于政治需要，“永恒的”规律可以被其他规律替代。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

证唯物主义，这一观点仍然是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丛》（*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des Marxismus*，St. Petersburg 1908）的回答（*ME*，LW 14，第 9—10 页），而在斯大林这里，这种确定的联系看不到了。列宁从未要求过的东西在 1938 年得到了初步整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Marxismus）。（参见 *DHMat*，第 129—130 页）结果，
699 “唯物主义立场”和“阶级立场”逐渐被相互还原。“立场问题”表达了一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政治的信奉（这种信奉是被要求的），“立场问题”也就被建构为意识形态的统治手段。

2.3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批判也遭遇了变成一个政治议题的内在危险。**国家哲学的功能**（参见 Labica 1986，第 56—57、73 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短路”（这是斯大林造成的）并未被放弃。例如在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开启了同正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任教的恩斯特·布洛赫的争论。1957 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组织了一场“布洛赫哲学问题会议”，会上力图证明的是，布洛赫的“哲学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的原则是不一致的”（*Blochs Revision* 1957，第 7 页），或者是，在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中，“物质这个词之所以具有‘辩证的’这种称号，为的是将最纯粹的唯心主义冒充成唯物主义，冒充成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Gropp 1957，第 26 页）。

对于布洛赫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是一种“与机械的木块完全不同的物质”：在这种物质中，“辩证法、过程、外化的外化、自然的人化绝不只是外在的称号”。（1954，第 239 页）布洛赫对辩证唯物主义（Diamat）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一种去主观化了的物质，它作为既定的事实，变成了一种革命实践的基础。

“木块物质”必须被理解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支柱的批判，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 1953 年将这种支柱称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他的科学学说中，卡尔·马克思是从自然界中的发展规律出发的。他从如下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物质永远存在。……这是永恒真理。”（1959，第 47 页）这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相符合的。对健全人类知性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被解释成“永恒真理”。以这些努力为背景，苏共二十大后，为了克服斯大林主义，这种将斯大林的命题集中汇总起来、作为国家哲学和党的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再被用来“掌握”党员，以假想要“以更根本的、原则性的方式，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争论”（同上书，第 10 页）。对“修正主义者”的毁谤、定罪和司法迫害，侧面反映了这

种由冷战精神所激发的思想控制的企图。

700 在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批判地改变辩证唯物主义的尝试（E. W. 伊利延科夫 [E. W. Iljenkow]、P. W. 柯普宁 [P. W. Kopnin] 等人）。在回溯列宁的哲学遗产，特别是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同一（*PH*，LW 38，第316页）的命题时，人们想争取一种有利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优势转变。在这一方面，对黑格尔的接受也复生了，随之是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M. N. 阿列克谢耶夫 [M. N. Aleksejew]、E. W. 伊利延科夫、S. M. 奥鲁杰夫 [S. M. Oruds-hew]、M. M. 罗森塔尔 [M. M. Rosental] 以及J. 泽勒尼），跟随列宁的命题，将“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都应用于一门科学”（同上）。然而，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教学体系的存在，这些努力对于教育机构依然没有产生影响。

在民主德国，赫尔穆特·赛德尔（Helmut Seidel）在1966年列举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缺陷，这些特征使它具有了一种“沉思的”自然哲学的特征，因为它只在客体形式下理解真理。（1966，第1179—1180页）在一系列文章中，赛德尔的批判遭到了反驳，并被认为是与“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和教权主义的马克思研究”（Gropp 1967，第1103页）的结果相一致的。1969年，彼得·鲁本从赛德尔出发，针对格罗普（Gropp）的观点强调说，“劳动……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并且“是一个特殊的自然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拥有了自然本质。因而，劳动范畴这一出发点，也是自然的出发点”。（1969，第59—60页）

鲁本的观点遭到了《德国哲学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的批判。（H. 7和H. 8/1981，H.2/1982）沃尔夫冈·艾希霍恩针对“小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攻击”，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念和哲学基本立场”（1982，第174页；参见 Rauh 1991）作了辩护。

在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批判的萌芽并未影响到国家控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虽然如此，独立的观点还是能被提出来并传播开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地位突出了这些观点，它们使辩证唯物主义经受了一种含蓄的批判。（可参见：Ruben 1972；Iljenkow 1974；Seidel 1982；Kühne 1985；Zeleny 1986）

在苏联，只有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即从1987年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才受到一种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考验。在谈到和评价这一讨论时，赫尔穆特·弗莱舍（Helmut Fleischer）得出结论说，这种哲学是“一种庞大的逻辑，它的内容是顺从、服从规律以及与对……当局的难以查明的 701

决定的赞同”（1988，第 11 页）。

2.4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批判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时，期待一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性批判。由于在常识中，“‘实在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要素”占大多数，然而这些要素是“‘迷信的’、非批判的”，所以实践哲学不是从对体系哲学的批判出发，而是必须从对常识的批判出发。（*Gef* 6，H. 11，§13，第 1395 页）否则，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的哲学就会屈从于常识，后者“是独断论的，它渴望最终的确定性”（§22，第 1420 页）。葛兰西解释了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等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出于对一种完成了的、可用于教学的体系的需要，在这种体系中，通常“[存在着]抽象的、非历史意义上的部分”，它“与之前的哲学结合着”。（§16，第 1406 页）这里暗指的哲学是“颠倒过来的唯心主义”（§14，第 1400 页）。对于葛兰西来说，这种谬误的根子，是社会学与体系哲学的分工：“一旦脱离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哲学就只能是形而上学，然而，实践哲学所体现的现代思想史中的伟大成就，恰恰是哲学的具体的历史化，是哲学与历史的等同。”（§22，第 1421 页）

50 年代，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历史和基本内容遭到了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Bochenski 1950；Wetter 1952）这些冷战期间出现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处于一个连续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开始，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直到列宁和斯大林。G. 克劳斯（G. Klaus 1957）的“共产主义的回答”（Wetter 1960）也停留在这种关于哲学上的连续过程的断言的框架中。

1957 年，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到了天主教的神学和苏联的政党哲学之间的亲缘性：“它们产生于共同的神学方法，这种方法不是用理智（ex ratione），而是用权威（ex auctoritate）来论证……；在这两种情况中，权威有效地得到了制度化：在教堂和执政党这种机构中。”（1963，第 267 页）哈贝马斯的评判是尖锐的：“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早就禁止对其原则进行讨论，以及在最深层已经没有生命力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句话，苏联共产党的官方哲学，不仅从哲学上看已经微不足道，而且它对政治实践的导向力量缺乏作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同这种哲学进行辩论的重要性，几乎不能低估。”（同上书，第 266 页）A. 施密特（A. Schmidt）关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著作对瓦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做出了贡献：“只有跟随马克思

认识到物质现实已经被社会中介时，才能避免本体论。”（1971，第 28 页）

对于奥斯卡·内格特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真正的断裂发生在”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命题的贯彻对如下洞见的破坏中：“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是孤立，不可能脱离发达的工业社会。”（1992，第 278—279 页）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工具化为支撑国家的哲学，这变成了上述命题的一种后果：“现实越是强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就被以越恐怖和越粗鲁的方式纳入对国家的服务，即改造暴力的**唯心主义**（*Gewaltidealismus*）。”缺点依然是一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某种东西存在，这变成了针对思想和表象力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异议。”马克思主义“被带到了一个具有自然规律的封闭世界观的层面”（第 279 页）。

3. 最近，随着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崩溃，一种具有广泛作用的、声称拥有科学性和普遍可理解性的革命理论事业失败了。它本身作为脱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作为变成国家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个历史运动中的要素，它并不打算转化马克思的如下视角：“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第 482 页）

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所导致的种种困难，关涉到马克思主义中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哲学意义上的‘反哲学’”（Korsch 1930，第 37 页）、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都表达了这一问题。阿尔都塞（1974，第 16 页；参见 *FM*）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间差别的问题，解释了“**哲学提问**（*Fragestellungen*）的术语学中的”种种困难，“然而，要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术语学中，即在作为**问题**（*Problem*）的术语学中来思考这些困难，并且这意味着要在客观的（因而是科学的）知识的术语学中来思考它们”。将辩证唯物主义当作科学理论来发展，这一尝试为卢多维科·杰莫纳特（Ludovico Geymonat 1980）所接受。问题依然是，如果不根据其作为哲学的地位，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是否以及如何还能作为一种范畴学说来发展；作为一种理清“历史资料的顺序”（MEW 3，第 27 页）的指南来发展？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Lenin und die Philosophie*, Reinbek 1974;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1954), GA 5; I. M. Bochenski, *Der sowjetrussische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Diamat)*, Bern-München 1950; M. Buhr, A. Kosing (Hg.), *Kleines 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74; *Dialek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Lehrbuch für d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Grundlagenstudium*, Berlin/DDR 1985; J. Dietzgen, »Der Wissenschaftliche Sozialismus« (1873), in: *Schriften in drei Bänden*, Berlin 1961, Bd. I.; ders., »Streifzüge eines Sozialisten in das Gebiet der Erkenntnistheorie« (1887), in: *Schriften* Bd. III; *Ernst Blochs Revision des Marxismus*, Berlin/DDR 1957; W. Eichhorn (I), »Über Dialektik der Geschichtsauffassung«, in: *DZPh*, 30. Jg., 1982, H. 2, 174-190; H. Fleischer, »Die Perestrojka erreicht die Philosophie«, in: *Argument* 167, 30. Jg., 1988, 9-31; L. Geymonat, *Grundlagen einer realistischen Theorie der Wissenschaft*, Köln 1980; R. O. Gropp, »Ernst Blochs Hoffnungsphilosophie – eine antimarxistische Welterlösungslehre«, in: *Ernst BlochsRevisiondes Marxismus*, a. a. O.; ders., »Über eine unhaltbare Konzeption«, in: *DZPh*, 15. Jg., 1967, H. 9, 1092-1104; J. Habermas, »Zu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um Marx und den Marxismus«,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W 1963; E. 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von Abstraktem und Konkretem«, in: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en Dialektik. Von der Entstehung des Marxismus bis zur Leninschen Etappe*, Berlin/DDR 1974, 211-233; G. Klaus, *Jesuiten – Gott – Materie. Des Jesuitenpaters Wetter Revolte wider Vernunft und Wissenschaft*, Berlin/DDR 1957;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²1930), Frankfurt/M-Köln 1975; L. Kühne, *Haus und Landschaft. Aufsätze*, Dresden 1985;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P. Macherey,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in: KWM 2; O. Negt, »Karl Marx im Jahre 1991. Wie es um sein Bürgerrecht in der wissenschaftlichen Kulturbestellt ist«, in: ders. u. A. Kluge, *Maßverhältnisse des Politischen. 15 Vorschläge zum Unterscheidungsvermögen*, Frankfurt/M 1992; G. PLechanow, »Zu Hegels sechzigstem Todestag«, in: NZ, 1891/1892, Bd. I, Nr. 7-9; ders., »Materialismusmilitans. Antwort an Herrn Bogdanow«, in: *Eine Kritik unserer Kritiker: Schriften aus den Jahren 1898 bis 1911*, Berlin/DDR 1982; H. C. Rauh (Hg.), *Gefesselter Widerspruch: Die Affäre um Peter Ruben*, Berlin 1991; P. Ruben, »Problem und Begriff der Naturdialektik«, in: *Weltanschauung und Methode*, Berlin/DDR 1969; ders., »Die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 und ihre Grundgesetze«, in: *Gesetz-Erkenntnis-Handeln. Beiträge zum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Gesetzesbegriff*, Berlin/DDR 1972;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M 1971; H. Seidel, »Vom praktischen und theoretischen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r Wirklichkeit«, in: *DZPh*, 14. Jg., 1966, H. 10, 1177-1191; ders., »Hegels Kritik der Metaphysik und Kritik der Hegelschen Metaphysik«, in: *DZPh*, 30. Jg. 1982, H. 4, 460-469; A. Tosel, »Diamat«, in: KWM 2, 255ff; W. Ulbricht, *Über die Dialektik unseres sozialistischen Aufbaus*, Berlin/DDR 1959; G. A.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952], Wien 1960; J. Zeleny, *Dialektik der Rationalität. Zur Entwicklung des Rationalitätstypus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Berlin/DDR 1986.

克里斯蒂安·勒泽（Christian Löser）撰
侯振武译，张义修校

参见：

Ableitung, Alltagsverstand, Antiphilosophie, Anwendung,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ufhebung der Philosophie, Aufklärung, bestimmte Negation, Bolschewisierung, Brecht-Linie (II),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Entwicklung, Gesetz,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Ideologie, ideologische Form, Kalter Krieg, Leitfaden, Materie, Materialismus, Naturdialektik,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Materialismus, Negation der Negation, Ontologie, Parteilichkeit, Philosoph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ositivismus, Praxis,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Standpunkt, von außen,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liche Weltanschauung

辩证图像（dialektisches Bild）

A: śūra dīyālīktīkīya. – E: dialectical image. F: image dialectique. R:dialekitičeskij obraz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образ). S: imagen dialéctica.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从1927年直到去世前写作的包含素材、笔记、提纲和文章的《拱廊计划》（*Passagen-Werk*），在他身后于1982年作为整体发表。全书的核心范畴是辩证图像和“静止状态的辩证法”（Dialektik im Stillstand），体现出了“历史学的新辩证方法”（V，第491页）。这两个范畴最早在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美学和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批判研究中浮现出轮廓。

1. 本雅明将超现实主义看作某种“正在起作用的东西……也吸引着我的思考”（1927年6月5日致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的信，*Briefe*，第446页）。他采纳了超现实主义的很多母题并把它们转用到政治空间中；同时他也转换了超现实的程式方法以服务于自己的表现形式。

1.1 超现实主义主要致力于重新恢复“在逻辑的统治下”（André Breton，*Manifest 1924*，第15页）被放逐的意识形式和现实形式。“超现实主义所立足的根基是相信某些直至当时仍被忽视的联想形式具有更高的现实性，相信梦的全能，相信思维的无目的游戏。”（第

26—27 页）超现实主义的“罪过”，按
705 照阿拉贡（Aragon）的看法，在于“无度地……使用图像（*Bild*）这一麻醉剂”（1926，第 78 页），带有无政府主义地破坏资产阶级思维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冲动（参见第 79—80 页）。还有：“每人都被要求，找到一幅消解整个宇宙的图像。”（第 79 页）而这种混乱应当只有通过一种特别组织起来的、超现实的图像才能引发，这种图像要和**比喻**（*Vergleich*）完全区分开来。在比喻（和隐喻 [Metapher]）中指代者和被指代者有着语义的交集，而超现实主义的图像建立在不可比事物的区别和组合上。比喻用一个成分代替另一个，而在图像中各种成分保持等价并列存在。布勒东（Breton）引用的勒韦尔迪（Pierre Reverdy）的表述，实际上也见于本雅明：“图像是精神的一种创造。图像不可能产生于比喻，而是产生于两个或多或少差距很大的事实的相互接近。相互接近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越疏远、越准确，图像就越强——图像就占有越大的情绪感染力和诗学现实性。”（*Manifest 1924*，第 22—23 页）“最强的图像……对我来说，是那种以最高程度的任意性为特征的图像；这种图像需要最长的时间，才能翻译成日常生活的语言。”（第 36 页；例如：“**露水像母猫头似的在桥上摇晃**”，同上）

本雅明的文章《超现实主义》（*Der Sürrealismus*，1929）本身也有这种隐微的特征，此文试图把超现实主义的尝试转用到政治语境中（这首先接续着纳维尔 [Pierre Navilles] 1928 年写的《革命与知识分子》[*La Révolution et les intellectuels*]，此书最清楚不过地完成了从超现实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折）。超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图像概念（两种差距很大的独立的事实相互接近）此处在两种理论语境中起作用：

这首先关系到领导权问题。“政治行动的空间”被表述为“图像空间”，图像空间中“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双重任务，既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知识统治，又要赢得与无产大众的联系。（GS II，第 309 页）前一个任务涉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阶级内部的实践。他们应当用自己最特有的理论和艺术工具为革命赢得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绝不是成为“‘无产阶级艺术’的大师”之类，同时应当在“这种图像空间的重要地点”“发 706
挥作用”（第 309 页），“图像空间”这一表述体现着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在 1934 年的《作为生产者的作者》（*Der Autor als Produzent*）一文中，本雅明将以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Sergej Tretjakow）为例谈到“行动的作家”（II，第 686 页）。

其次这关系到人类学和政治学在革命理论方面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费

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将针对人的本质的问题外移到了社会领域，本雅明含蓄地回应了对这一条的一种简单化理解。对本雅明来说，人类学的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而是首先表现为社会化的问题。社会化的人是政治性的和身体性的人。“图像空间”是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政治唯物主义和身体性的生物相互分有着内在的人、灵魂、个体……”（第309页）。这两方面既不能相互分开，也不能相互融合。还有一点，集体也有一个身体。身体性的集合名词，而不是——像福格特或者布哈林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中——“抽象的物质或宇宙应该作为唯物主义的基础”（II，第1041页）。本雅明后文谈到将“图像空间”误认为“身体空间”所带来的危险（此处亦参见布洛赫《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不同时性和陶醉”[Ungleichzeitigkeit und Berauschung]一章）：“共产主义政党”的理性主义由此拒斥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特有“神秘的、属于身体性的因素”（V，第853页）的观点——并因此听凭这些因素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表达出来。与此相反，超现实主义的方案是“为革命赢得醉的力量”，然而超现实主义，正如本雅明所批评地指出的，仅仅强调这个方面，同时将“革命有条理、有纪律的准备工作”（II，第307页）置之不理。

1.2 本雅明将他的方法称为一种从图像出发的解释。（*Briefwechsel Scholem*，第168页）图像不一定是语言图像，也可能是造型艺术的图像，比如保罗·克莱（Paul Klee）的水彩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本雅明在他的历史论纲的第九节中将它从**历史天使**（GS I，第697—698页）转化成一个“文本事件”（Konersmann 1992，第145页）。“文本事件”不同于艺术科学的图像描述，它相对于它的起点，形象的图像，是独立自主的——正如同超现实主义诗歌中“文字、图像”构成了一个“跳板”，“精神”则跃出了这个跳板。（Breton，*Manifest 1924*，第34页）

布洛赫考察本雅明《单行道》（1928）中的“思维图像”（此处参见Schlaffer 1973），发现了一种“典型的超现实主义思维方式”（*Revueform in der Philosophie*，GA 4，第386页）。“这种语言风格充满了思想上的联结，这构成了从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到科克托（Cocteau）的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彼处和近旁此处的联结、玄思的神话和最确切的日常生活的联结。”（第370页）这种风格的先驱是尼采笔下“自由化了的智识”，它把“概念的条条框框……砸碎，到处乱扔，又嘲讽式地重拼在一起，把最不相关的配对，把紧密相邻的分开”，而且不再受“概念，而是受直觉的引导”。（KSA 1，第888页）

阿多诺后来批评“超现实主义的辩证图像”是“客观不自由状态中的主观自由的辩证法的图像”，这种批评也隐含着对本雅明的批评，因为他使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方法：“这个自由支配自身的、摆脱了对经验世界的任何顾虑的、已变得绝对的主体，在完全的物化面前，暴露出自己其实是没有灵魂的，虚幻得就像死人一样。”（*Rückblickend auf dem Surrealismus*，第104页）超现实的图像、梦幻图像让“现实毫发无损，无论现实的图像有多么破损”（第101—102页）。

2. 辩证图像的概念在本雅明对布莱希特的叙事剧（episches Theater）的批判研究中（1931），本身没有明确出现，但呈现出和超现实主义正好对立的轮廓。本雅明的叙事剧研究的核心是“姿态”（Geste）和“中断”、“发现”、“惊讶”、“兴趣”等概念、内在的辩证法。叙事剧通过建立在“姿态”的基础上，“展现出辩证法的社会意义和适用性”。“姿态对人的状态作出试验。”（GS II，第530页）姿态是叙事剧作为材料在“试验规定”中使用的“真实事物的元素”（第521页）。它们是现成的材料，但必须借助戏剧的手段，才能在辩证地（再）生产的意义上被制造出来。姿态由戏剧生产，就是姿态被发现的方式。“叙事剧不是重新给出某种状态，确切说是发现这种状态。”（同上）但是被发现的状态不是静止的，相反在其中“内在的辩证态度……闪电般地清楚显现出来”（第530页）；“我们社会秩序的矛盾的现场”（第526页）和“静止状态的辩证法”（第530页）。如果被发现的状态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就是属实的。“辩证法，叙事剧的目标，……并不依赖于时间中的场景顺序，相反在作为每个时间顺序的基础的姿态性元素中就已经呈现出自身。这些姿态性元素只能称为不真实的，因为它们比这些时间顺序更简单。”（同上）叙事剧通过“中断进程”而得到姿态（第522页）。 708

本雅明认为，叙事剧的生产方式寄希望于观众的“惊讶”，作为认识实践的模式，这种模式包含着对惊讶的起源的兴趣，因为叙事剧的生产方式针对的是这样的一种“对戏剧感兴趣的人，他们‘没有理由思考就不思考’”（同上），这种人，按布莱希特的话说，“让自己被周围环境改变，同时自己又力图改变周围环境”（转引自第531页）。这和没有利益关系的愉悦或者“教养”都无关（第522页）。哲学的惊讶是“认识的起点”（I，第697页），认识的“终点”是“状态的发现”（II，第522页）。

与此相反，布莱希特认为“辩证戏剧要……将状态消解在过程中”（GA 21，第439页）。因为布莱希特看到了

"固定化因素"的危险在于，"经过这样的'创作'（=物化），现实像河水一样的流动性被忽视了……：然后人们得到了对概念的拜物教，这种反革命的和违背革命的因素"（GA 21，第 761—762 页）。布莱希特陌生化效果的目的恰恰是本雅明式的："观众不再从现在逃避到了历史，现在也将成为历史。"（GA 22，第 736 页）

3. **集体意识中的辩证形象**。在《拱廊计划》1935 年的提纲中，和早期的以及后期的构想不同，本雅明把辩证图像理解为集体无意识中的愿望图像和梦幻图像——也借鉴了马克思论拜物教的章节，把辩证图像理解为"幻影"——是对每个时代首先由技术带来的社会状况的革命化的回应。社会集体发展出一种"受新事物启发的图像想象力"，同时又回溯"最原始的事物"。"在每一个时代在图像里展望下一个时代的梦中，最近的时代融合了史前的因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因素。"无阶级社会的各种图像"在集体无意识当中沉淀"，"在与新事物的相互渗透中产生出乌托邦观念，乌托邦观念在生活的千姿百态上、从摩立的大厦到转瞬即逝的时尚中都留下了痕迹"。（GS V，第 47 页）这正是这个时代的拱廊计划，在一个"千姿百态"的全景图中——比如在闲逛者和赌徒等人物身上，在巴黎的拱廊街和人群的面貌上——把 19 世纪的历史作为现代的"史前史"来写作。（参见 V，第 579 页）

阿多诺反对拱廊计划和辩证图像的构想，他提出，把图像定位在"集体的无意识"之中预设集体意识为先决条件，集体意识"没有和荣格的学说区分开来"。（*Briefe*，第 674 页）"为了把注意力从真实的客体性及其补充物，即异化的主体性转移开，集体意识才被杜撰出来。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意识'按照社会和个人来辩证地对立两极化和相互消融，而不是把它镀成商品属性的图像补充物。在梦幻的集体中没有阶级的区分，这一事实清楚明了、发人深省。"（第 674—675 页）本雅明试图把马克思分析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理解为图像，甚至梦幻图像，而阿多诺坚持："这根本不是意识的事实"（第 672 页），"辩证图像作为模式不是社会的生产品，而是客观的状况，在其中，社会的状态自己显示出自己。因此从来都不能指望辩证图像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或者一般的社会'功能'"（第 678 页）。

4. **历史图像**。依靠"历史学的新辩证方法"（GS V，第 491 页；参见第 1006 页）这种本雅明希望用辩证图像的概念和"静止状态的辩证法"来展示的方法，"过去"不应再"用历史的，而

是用政治的方式，在政治范畴中”来处理（第 495 页）。他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文章就已经赞扬超现实主义“用政治的眼光代替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过去”（II，第 300 页）。这种做法的典范是法国大革命，它将自身理解为回归的罗马。“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古希腊罗马就是一个负载了现在的过去，被他从历史的连续性中炸裂出来。”（I，第 701 页）对于编年史的连续性有“历史时间的不连续性”的概念：历史是不连续性中“构造的对象，构造地点不是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被现在充满的时间”（同上）。本雅明把“过去和现在闪电般地相交汇聚”也称为“图像”。（V，第 576 页）将过去当下化的历史方式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象：“过去如在现在”，与此不同，“真相是：现在是过去的最内在图像”。（第 1035 页）过去发生的事物将成为现实正在发生的事物一种功能，服务于政治的功能，政治作为历史的现实形式，由此才真正有历史 —— 这种思想是有传统的。

历史概念“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方面”，它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包括历史的叙述”，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Geschphil*）的导言中指出：这两方面“有一个内在的、共同的、同时推动这两个方面基础”。历史开始于国家，所有其他的都是“**史前史**”，由国家开始了历史的写作：“一个生存渐见稳定、进展而成为国家的集体”，要求“各种诫命、法律、范围广大而且普遍适用的规定，由此产生对理智的、在本身中确定的、在结果上持久的行为和事件的记录和兴趣。记忆女神摩涅莫辛涅（Mnemosyne）为了国家形象和国家性质的永恒目的，不得不赐给这些行为和事件长久的纪念”。如果不“融入过去的意识”，国家的存在只是“不完全的当下”。（WA 12，第 82 页及以下）如果对黑格尔来说存在着继承性的功能联系，那么他对“在历史中获得当下”的形式保持怀疑（第 19 页）。对过去的当下化同时需要历史距离的意识。过去并不含有当下问题的答案。“在世界运动的奔涌中……对类似状况的回忆起不了作用，因为像苍白的记忆这样的东西不能抗衡当下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看，经常重复出现的对古希腊罗马先例的召唤，就像革命时期法国人频繁干的，空洞得无以复加。古希腊罗马等民族的天性和我们时代的天性，不同到无以复加。”（第 17 页）

马克思尤其知道这一点，而且分析了这类古典化“幻影”的辩证法。它释放出了必需的革命实践的能量和“前所未有的事物”（MEW 8，第 115 页），“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第 116 页），资产阶级的“冷静务实”本身未含有把它的“激情”（参见 Hegel，前

引书，第 38 页）“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MEW 8，第 116 页）。这不合乎时代的表达，从过去“借来的语言”使得革命者能够完成“当代的任务”。没有对“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的“自我欺骗”（第 116 页），很可能他们无法实施这些斗争内容。“新的社会
711 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第 116 页）新情况对应另一种语言，政治经济学的语言，它“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同上）

如果说“使死人复生”在 17 和 18 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那么马克思则认为，“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第 117 页）——然而不会通过“对未来信口吹嘘”，从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第 119 页）。“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 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第 117 页）

类似地，即便是按照另一个反对方向，尼采也用“让死人埋葬活人”这句格言抨击同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历史学”。对于纪念碑式的历史学来说，当下和未来只是英雄的过去的空缺形式而已。（KSA 1，第 264 页）尼采的批评首先针对历史学的科学化，把超然于当下目标设置的过去当作认识的客体。然而，“对过去的认识”“在所有时代都只是为了服务于将来和现在而追求”；否则对过去的认识会导致“现在的弱化”和“充满生命力的未来失去根基”。（第 271 页）因为历史的“根基”不是在过去，而在现在。只有以融入现在行动的方式，才能成功地“从过去发生的事物中重新创造历史”（第 253 页）。只有“通过为了生命而使用过去的力量……人才成为人：然而过度的历史学使人又停止成为人，没有了非历史的外壳，人永远不会开始，也不敢开始成为人”（第 253 页）。于是尼采将“使幸福成为幸福的忘记能力”置于历史记忆能力之上；“遗忘属于所有的行为”。（第 250 页）因此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历史的和“非历史的”能力都是必需的（第 252 页），但鉴于遗忘能力优先，历史记忆就成了“暂时消灭遗忘”（第 269 页）。 712

尼采似乎抓住了马克思的启迪（和表述），为了对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革命方向进行非社会的、生命哲学的修正。尼采的目标不是解放被认为低下的劳动大众，对“受到普遍欢迎的科学的‘大众化’（包括‘女性化’和

'幼稚化')"(第 301 页)的讽刺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旨在接受历史使命的主体是一个新的、男性的精英("正确的"、"健康的"、"伟大的",参见第 252 页),他的目光毫无顾忌地指向前方:"在你们当中形成一种应当与未来相符的图像,忘记迷信和模仿。你们思考那未来的生活,就能充分地发现发明;然而不要在历史中寻求历史向你们展示怎样、如何。"(第 295 页)如果没有什么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借鉴,那么历史应当以"生命"的名义被工具化,甚至真正地被消灭:"一个人内在的本性拥有的根基越强,他就从过去占有或强迫更多东西;如果人们思考最强大的和巨大的本性,那么这种本性可供识别的特征就在于,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上的边界;它把所有的过去,无论自己的还是最陌生的,都拉到自己一边或者纳入自身内部,几乎把它们转化成血液。这种本性懂得忘记那些它所没有征服的:那些都不再存在了,视野是封闭而完整的,没有什么使它回忆起,在这个人以外还存在着激情、学说和目标。"(第 251 页)这里将资本积累冲动的毫无节制,把所有的社会关系纳入自身的趋势,移用到历史占有的领域。

5. 本雅明读起来就像一位敌尼采者,把被拐走的母题取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人们说,辩证的方法就是在每一时刻都适应对象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况。"本雅明在笔记中暗引列宁。"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辩证的方法同样是适应对象的利益的具体历史情况。"(GS V,第 1026 页)历史利益的导向——此处参见克罗齐(1893,第 31 页)的自由主义变体——意味着转向主体和当下。本雅明谈到了一种历史观的哥白尼式转折(第 1057 页;参见第 491—492 页),在 713
这种转折以后,"过去"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被争夺的变量。过去不再是一个当下逐步令认识靠近的"定点"。这种关系应正好颠倒过来,使"过去"通过"记忆"的行为才得以"辩证地固定"。(第 1057 页)而且过去能得到一种"比它存在的时刻更高的现实程度"(第 1026 页)。"过去如何适应自己更高的现实性,由图像决定和完成,过去作为图像又在图像中被理解。"(同上)"图像"的隐喻在这里意味着:在话语上对过去进行当今化。在此"历史图像和过去的真正图像这些说法",并不意味着"把抽象事物形象化或图像化","而是摒弃了直线型的单一维度"。(Greffrath 1981,第 56 页)本雅明认为,呈现给历史记忆的"从来不是一个过程,而只是一个图像"(I,第 1243 页)。如果现在通过摆脱了统治的引力,发现自己在过去中被"指谓"(第 695 页),这种图像形式就

超越时间，产生出一种同时性。这正是反历史主义、反兰克的原则的要义："历史地表述过去不意味着'按它本来所是'地认识过去"，相反是"确定过去的图像，按它在危险的时刻突然呈现在历史主体面前的那样。沦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危险既威胁着传统的存在，也威胁着传统的接受者"。（第 695 页）这样的工具化每一刻都可能发生，如果现在为自己构造它的过去，同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首先是统治者的思想。

本雅明按照一个简单的模型思考着这个问题。"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东西的是所有那些在历史中取得胜利的人的遗产。"（第 1241 页）每一次重新确认这些遗产，就让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书写成为统治者的历史书写。"从前有个"对应的是向"胜利者"的"移情"。"受过马克思训练的历史学家的任务"（第 694 页），正好相反，是占有被压迫阶级的传统，并且首先要"建立"传统（第 1246 页）。这种工作伴随着争夺"原料和物质"的阶级斗争。（第 694 页）

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型来思考历史的客观主义，以及进步意识形态的未来导向，按照本雅明的诊断，使得过去作为当今斗争的力量源泉枯竭了。在"被奴役的祖先的图像"中，工人阶级滋养了他们"最好的力量"——"仇恨和牺牲精神"——"不是在被解放的后代的理想中"，工人阶级应以被奴役的祖先的名义，完成"解放事业"。（第 700 页）因为："只有那历史的书写者才有能力，在过去当中点燃充满预感的希望的火花：如果敌人胜利了，即便死者也不再安全。"（1，第 695 页）——这种经验包含着和伽达默尔（Gadamer）保守的"图像'辩证法'"的关键不同点（1960，第 135 页，注释 2；参见第 128—137 页），后者的范式存在于"宗教图像"中（第 134 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Rückblickend auf den Surrealismus«, in: ders., *Versuch, das Endspiel zu verstehen*, Frankfurt/M 1973; L. Aragon, *Pariser Landleben. Le Paysan de Paris* (1926), München 1969; W. Benjamin, *Briefe*, hgg. v. G. Scholem und Th. W. Adorno, Frankfurt/M 1972; ders. u. G. Scholem, *Briefwechsel 1933-1940*, Frankfurt/M 1985; A. Breton, »Erstes Manifest des Surrealismus« (1924), in: ders, *Die Manifeste des Surrealismus*, Reinbek 1968, 9-43; S. Buck-Morss, *Dialektik des Sehens. Walter Benjamin und das Passagen-Werk*, Frankfurt/M 1993; H.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1960), Tübingen ^{4}1975; K. R. Greffrath, *Metaphorischer Materalismus, Untersuchungen zum Geschichtsbegriff Walter Benjamins*, München 1981; R. Jerzewski, *Zwischen anarchistischer*

Fronde und revolutionärer Disziplin. Zum Engagement-Begriff bei Walter Benjamin und Paul Nizan, Stuttgart 1991; H. D. Kittsteiner, »Benjamins Historismus«, in: N. Bolz, B. Witte (Hg.), *Passagen Walter Benjamins Ur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84, 179-215; R. Konersmann, »Walter Benjamins "Kritische Historie"«, in: *Neue Rundschau*, 1992, H. 3, 140-158; J.-P. Sartre, »Über die Einbildungskraft« (1940), in: ders., *Die Transzendenz des Ego*, Reinbek 1967, 51-149; H. Schlaffer, »Denkbilder. Eine kleine Prosaform zwischen Dichtung und Gesellschaftstheorie«, in: W. Kuthenkeuler (Hg.), *Poesie und Politik*, Stuttgart 1977; J. Starobinski, »Grundlinien für eine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der Einbildungskraft«, in: ders., *Psychoanalyse und Literatur*, Frankfurt/M 1990, 3-23; R. Tiedemann, *Dialektik im Stillstand. Versuche zum spätwerk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M 1983; Th. Weber, »Glücklose Engel. Über ein Motiv bei Heiner Müller und Walter Benjamin«, in: *Argument* 198, 35. Jg., 1993, 241-253.

托马斯·韦伯 撰

张雪亮 译，曹旸 校

参见：

Abbil,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ntizipation, Artikulation, Ästhetik, Bedeutung, Begriff, Bild, bildende Kunst, Brecht-Linie (II), Desrucktivkräfte,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Theater, eingreifendes Denken, episches Theater, Expressionismusdebatte, Faschismus, Fortschritt, Futurismus,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tus, Gleichnis, Haltung,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maginäres, Materialästhetik, Metapher, Montage, Mythos, Objektivismus, Phantasie, Surrealsimus, Symbol, umfunktionieren, Zeichen, Zeit, Zitat, Zukunft

辩证戏剧（dialektisches Theater） 715

A: al-masraḥ al-dīyālīktīkī.

E: dialectical theatre. – F: théâtre dialectique.

R: dialektičeskij teatr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

S: teatro dialéctico.

在布莱希特那里，“辩证戏剧”的概念首次出现在出版于1954至1955年的《戏剧小工具篇补遗》（Nachträge zum kleinen Organon）中。在排演埃尔温·施特里特马特的当代剧作《猫儿沟》（*Katzengraben*）时，但特别是在排演他自己的剧本《高加索灰阑记》时，布莱希特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一直使用的“叙事剧”（episches Theater）概念，在他看来仿佛已不再充分。恰恰是在《高加索灰阑记》这部就形式而言最称得上“叙事剧”的作品中，诗意与机智并非主要通

过叙事性的方式阐释自身，因为叙事元素为了能够“开始运转”，恰恰需要挑战另一种东西：辩证法。不仅是在场景的分析中，更是在其美学的实现中，都需要一种辩证的解答。布莱希特在排演中，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矛盾，特别是人物内部的矛盾之表现，集中在对突然的变革，对“时代之变化”的表现上。但对于这种工作方式而言，“叙事剧”的概念就太不具体了：“假如现在要放弃‘叙事剧’的概念，也不能放弃大步迈向有意识的体验，是叙事剧使这一步得以可能。只不过这个概念对于我所指的戏剧而言太贫乏、太不明确；它需要更精确的定义，也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GW 16，第 701 页；GA 23，第 289 页）并且：“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倒退。恰恰相反，无论是现在的戏还是迄今为止的戏，正是通过在所有的戏中巩固叙事元素，才为将来戏剧的特殊性创造了基础。而将来的戏至少在这一方面是新的：它**有意识地**塑造了之前戏剧的特征，即辩证的特征，并将之变得更轻松愉快。从这一特殊性出发，**叙事剧**的提法就显得太过一般、不确定，几乎只是个形式概念。”（GA 23，第 301 页）另外：“现在人们正在尝试从**叙事**戏剧转向**辩证**戏剧。在我们看来，叙事剧的实践与其整体概念绝不是非辩证的，也不会有一部辩证戏剧可以不带任何叙事成分而存在。然而，我们所设想的依然是一场规模颇大的改造。”（第 299 页）

一般认为，所谓辩证剧就是在剧院上演辩证的情节；但布莱希特的辩证剧概念却要走得更远。戏台上的辩证对于布莱希特而言是剧院绝对的生存法则：“当然，不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人物塑造、戏剧情节塑造、大方向、戏剧之功能及其应当引发的冲动之上，就写不出任何一部政治剧。”（GA 23，第 371 页） 716

布莱希特对辩证法及其剧院中的运用所作的系统性研究，要追溯到 1930 至 1931 年。当时的他正尝试勾勒一种“辩证的戏剧学”（GA 21，第 431 页及以下）。回顾往昔，布莱希特描绘了当时的自然主义戏剧是如何从法国小说中接纳了那种叙事性，之后的新戏剧又是如何纯粹在形式上使用了这种叙事元素；而“在空荡空间中的一系列纯粹建构主义的尝试之后”，新戏剧终于将叙事性运用于现实之上，“便由此发现了现实的辩证性，并意识到其自身的辩证”。（第 435 页）

不仅对于戏剧，同样对于社会而言，布莱希特也将辩证法视为一切认识与行动的关键，将辩证法的缺位看作灾难。他在 1956 年的斯大林批判中写道：“斯大林主义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使辩证法枯败凋零。”（GW 20，第 326 页；GA 23，第 417 页）

《剧院中的辩证法》（Die Dialektik

auf dem Theater，GA 23，第 386 页及以下）是布莱希特于 1956 年撰写并分发给他同事的一组论文集。（同上书，第 603 页）它在柏林剧团（Berliner Ensemble）中又引发了一场关于辩证法作为工作方法的激烈讨论，特别是考虑到之后即将上演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在一场有关该剧第一幕的对话中，人们讨论了如何运用辩证法来标记这一幕中的矛盾和支点。但“辩证戏剧”的概念表达的却是另一种方案。辩证法在这里不再是一种工作方法，而是艺术表现的对象；不再只是认识的来源，而是享受：“科学时代的戏剧能够将辩证法变为一种享受。在逻辑上进步的或跨越式的发展、所有现状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惊讶、种种矛盾的可笑等等，都是在享受人类、物体与过程的生命力。而享受也增强了生命的艺术和生命的欢愉。所有艺术都为这最高的艺术而贡献，也就是生命的艺术。”（GW 16，第 702 页；GA 23，第 290 页）

布莱希特在他的演出和理论著作中，为作为美学范畴的辩证戏剧发展出一系列措施，不仅将观众引向认识，更将其引向充满享受的态度。布莱希特在《猫儿沟》笔记中（GW 16，第 774—840 页；GA 25，第 399—490 页）谈到，仅向观众展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如何挣脱枷锁，是远远不够的；观众必须“也在欢愉中学会如何解救普罗米修斯”（GA 25，第 418 页）。这一切思索的根据与“叙事剧”中一样，一方面是剧院面对现实所特的“批判性态度”，即将现实表现为可改变的，而另一方面则是观众面对舞台剧情的“批判性态度”，即不将剧情接受为既定的，而是视为可改变的。为此，导演与演员就发展出了“不是——而是”的原则。（GW 16，第 688 页；GA 23，第 87 页）试举一例：大胆妈妈学会的**不是**将战争视为她的敌人（这一点在演出中必须作为一种可能性显现），**而是**在她的孩子们死后继续投身战争。因此，对于舞台上所展示的一切，观众应始终发展出自己的想法、问题、相反的方案，并由此得到更大的享受。观众应成为自己的叙述者。在“共同讲述”（Ko-Fabulieren）中（参见 GA 23，第 301 页），观众就进入了社会中最富创造性、最迫不及待、对幸福改变要求得最多的那一部分人的立场。 717

布莱希特为辩证戏剧继续发展了批判性态度。对于舞台上所展示的一切，观众不应只发展出反对的观点，而是应在演出时就通过不断地将舞台情节消解在其过程中，在自己的脑海里将之改变。观众最重要的道德，就是怀疑一切自认为永恒、仅因为长久未变而自认永不可变之物。为此，布莱希特创造了“总是之物”（das Immrige）的概念。（参见 GA

23，第279页）正如布莱希特在1956年最后几次谈话中所言，观众应在对“总是之物”的“辩证化”（dialektisieren）中获得享受和愉悦。而他也毫不掩饰对自己所造词汇的满意。这些谈话所涉及的是他的新剧《公社的日子》（*Die Tage der Commune*）的首演。（关于这些谈话，只有布莱希特的学生韦克维尔特所做的未公开发表的笔记。）布莱希特建议，正因为这部戏的效果源自政治与人性之变化的迅猛，更应将这部剧的情节“辩证化”。公社成员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当其看起来意义明确时，都应消解在其过程之中，即揭示言行如何产生、带有何种矛盾，以便由此发展这部戏的美学。公社成员称自己为“无名者”。他们在公社委员会中所选举的代表，想要在完成工作后尽快回到群众之中，以便作好准备抵御特权的诱惑。即便在统治时，他们仍只想做个“小人物”。而在布莱希特看来，恰恰是这些“微不足道”需要加以辩证化，即被表现为公社中真正的伟大，而具体说来，这种伟大就产生

718 于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府都会要求的那种不可或缺性的放弃。导演必须让“无名者”生长出不会混淆的面孔，并展现出他们的个性，就仿佛他们是莎士比亚剧作中的角色。但却不要将其理想化。正是因为人们允许他们带着所有人性的特点留在其“微不足道”之内，才能发现他们真正的伟大，也就是那种以新的方式施行统治的能力。布莱希特例外地建议，也使用所有心理学手段，对“无名”进行辩证化，即恰恰在此发现出公社成员全新而伟大的个性。

对于布莱希特而言，“辩证化”是“陌生化”（Verfremdung）的一种更为积极的形式，因为它需由观众自己参与完成。布莱希特坚持认为这并非一个复杂、抽象，以至于“正常观众”无法完成的过程。恰恰相反。正是辩证化出现在平民的每一种观察方式中，例如当人们挨了上司的一顿训斥，就总会设想上司一丝不挂只穿一条内裤的样子。就其方法而言，“辩证化”并非布莱希特的新发明。每一出喜剧都依赖于观众不断地以相反的内容来补充舞台上角色的言之凿凿。臆想自己得病的人越是坚持他得了病，观众就越将他当作臆想的健康人。在这种以对辩证的享受为导向的演出方式中，“对不同体裁的严格区分”，例如区分喜剧和悲剧、喜剧场景或悲剧场景，“就不再有任何的理由”。（GA 23，第300页）

辩证戏剧的概念对于当时柏林剧团的工作方式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排演贝歇尔（Becher）的《冬日之战》（*Winterschlacht*）时，布莱希特尝试不去污名化戏中主角，年轻的纳粹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霍尔德，而是赋予他主观上的诚实与同情心。观众应当在过程中消

解这种诚实和同情心，包括当它们在客观上作为法西斯暴行出现之时。这极大地丰富了表演艺术，因为演员可以“批判”他所饰演的角色而不对其公开发难，也就可以展现其悲剧性的伟大。同样，在他于1956年开始排演却未能完成的《伽利略传》一剧中，布莱希特试图让观众亲自发现恩斯特·布什所饰演的伽利略身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又通过伽利略令人信服、事实上却完全错误的断言，让发现矛盾的过程困难重重。例如，伽利略断言没有人能抵抗源自证据的诱惑。但观众应在下一场就发现，僧侣很可以抵抗这种诱惑，因为他直截了当地拒绝通过望远镜观察世界。

布莱希特在1956年8月，即他生命的最后时日里所作的谈话中，已经表现出对“辩证戏剧”这一概念的不满意。他认为这一概念归根结底还是太过理论。辩证法——至少自发地——同样也存在于市民戏剧之中，因为没有辩证法就无法设想真正的现实主义。此外还有一些左派戏剧，虽使用了辩证法却并未采用平民的立场。对于它们而言，辩证法更多地是戏剧建构中的一种精神活动。然而对布莱希特而言，辩证法首先是“人民智慧”的表达。总的来说，布莱希特并未将哲学理解成理论性的思想工作，而是理解成一种“介入性思考”（eingreifendes Denken），它让实践行为成为可能。（参见GW 20，第127页）他的出发点是那种“在下层民众中流转的哲学思考方式”（GW 15，第252页），“采取、巩固并修正其立场”（GW 19，第325页；参见Ruoff 1976，第36页及以下）。在这里，布莱希特与葛兰西和他对“‘每个人’都独有的‘自发哲学’”（*Gef* 6，H. 11，§12，第1375页）之兴趣不谋而合。或许就是这些思考导致布莱希特考虑是否用“哲学的大众戏剧”（philosophisches Volkstheater）取代“辩证戏剧”的概念。吸引他的一定是其中的对立，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大众戏剧总是排斥思想性，而哲学也同样排斥娱乐。哲学与大众戏剧的对立互为辩证化。布莱希特一定预计着观众和戏剧导演对这组矛盾统一体的惊诧。对他而言，惊诧恰是所有享受和认知的出发点。然而，布莱希特没能完成“哲学的大众戏剧”这一构想。只有他的学生们对此所作的尝试。

719

参考文献：

P. Chiarini, »Dal teatro epico al teatro dialettico«, in: *Quaderni del Piccolo Teatro*, Nr. 2, *Nuovi studi su Bertolt Brecht*, Mailand 1961, 7-26; K. Ruoff, »Tui oder Weiser? Zur Gestalt des Philosophen bei Brecht«, in: *Brechts Tui-Kritik*, AS 11, Berlin/W 1976, 17-52; M. Wekwerth (Hg.), *Theater nach Brecht. Baukasten für eine Theorie und Praxis des Berliner Ensembles in den neunziger Jahren*, Son-

derausgabe der Theater Arbeit 1989, Berliner Ensemble.

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 撰
毛明超 译，曹旸 校

参见：

Antiideologie,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Brecht-Linie,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Bild,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pisches Theater, Gestus, Materialästhetik, Montag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sches Volkstheater, Tuismus, Verändern, Verfremdung, Weisheit

720 无产阶级专政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A: dīktātūrīya brūlītārīya.

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 dictature du prolétariat.

R: diktatura proletariata (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S: dictadura del proletariado.

根据沃尔夫冈·莱昂纳德（Wolfgang Leonhard）的说法，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概由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ete Blanqui）在1837年”创造的概念“经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使用才获得了其政治意义”。（1966，第86页）这里还必须补充的是，通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接受，并最终通过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时代的执政党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毋宁说是滥用——它才获得了政治意义。20世纪70年代，在激烈的争论中，欧洲共产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说法断绝了关系。

1.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把“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MEW 7，第89页）1852年，他在给魏德迈（Weydemeyer）的信中说，他拥有这样的权利，即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MEW 28，第508页）

1891年，恩格斯在巴黎公社20周年纪念日里，用这些话结束了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MEW 17，第625页；22，第199页）

马克思本人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没有使用这个概念，只是提到了“**工人阶级的政府**”（MEW 17，第 342 页），但他还是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特征。对此，恩格斯在 1891 年总结如下：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武装人民，合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选举并随时撤换一切管理者、法官、教师，参照工人工资支付一切公职人员的薪资，在代表团中的所有当选代表按照（指令）授权行事。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才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期将实行“**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MEW 19，第 28 页）。恩格斯在他的《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中说，“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MEW 22，第 235 页）。同时，他反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幻想，即“好像在那里［在德国］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同上）。由于恩格斯把国家视为“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第 199 页），他自然而然地把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国家理解为“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祸害”，“它的最坏方面应立即尽量除去，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同上）。这一看法早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Ursprung*）和《反杜林论》中就已经提出来了。他后来提出的国家在无阶级社会将会消亡的思想在这里得到了精炼的概括。

局限于相对较小的地域范围的巴黎公社没过多久就遭到了国际上联合起来的法国与德国资本家和军队的打击，并在血腥的报复中被扼杀了。工人的下一次革命尝试是 1905 年俄国革命；第一次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胜利尝试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当时的条件和巴黎公社时期迥然相异：革命爆发在世界上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该国的产业无产阶级数量很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民主组织经历；各国的反革命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结成了广泛的多国战线；该国的生产力发展也处在很低的水平。总之，这里客观上并没有为革命作好成熟的准备。

1917 年 8—9 月，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分析了当时的问题。在这部著作里，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人民这个大多数享有民主，对人民的剥削者……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这就是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改变了的形态”（LW 25，第 476

721

页）。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就已经提到，为此而准备一套特殊的机器是没有必要的，“简单的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就足够了。（第477页）在这本书的后续章节，列宁的思绪很快大大向前迈进，描述了带有基层民主特征的未来社会，而其对立面则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

罗莎·卢森堡在她关于俄国革命的未完稿（GW 4，第332—365页）中表
722 示，她原则上对列宁的组织原则持保留意见。卢森堡虽然欢迎十月革命，但又担心无产阶级专政的扭曲变形。她呼吁，“不要只是在广受赞誉的国家”，也不要像“为正直老实的人民准备好的圣诞礼物”一样开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开始于阶级统治的废除和社会主义的建立。它开始于社会主义政党取得政权的那一刻。它无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363页）

2. 十月革命的胜利加深和强化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分裂。成为俄国革命反对者的考茨基，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1918）中拒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批判首先针对的是明显的非民主措施（在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意义上），而正是依靠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试图维护并且确实也维护了自己的统治。这场批判最初是为了保护现已被开除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后来却扩大成为一个反对俄国革命的阵线。列宁以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Renegat Kautsky*，LW 28，第225—327页）来对此作出回应。这本小册子写道：“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后来又把这个词译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内……，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高得多和广得多的民主，开始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第293页）

列宁严厉而详细的争辩部分地表明，考茨基以前曾持一种有些激进的立场：1909年，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Weg zur Macht*）中提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不过，他在这部著作里并不认为物理上的暴力（从过去的受压迫者一方看来）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他还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我们可以把未来放心地交给它来决定（第172页）。不久之后，他便开始为现存的议会制度辩护：“我们开展的政治斗争的目标一如既往，仍是通过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并把议会提升为政府的主人来取得国家权力，而不是毁掉国家权力。”（1912，第732页）

安东·潘涅库克坚决反对这一路线，

认为通过议会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是一种
723 幻想。对他来说，权力斗争是必定要决出胜负的群众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无产阶级将意识到自身的意义和力量，并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多数人的组织是凭借这样的办法来显示其优胜地位的，那就是，他们消灭了统治者的少数人组织。"（1912，第548页）

1919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试图作出妥协，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在议会形式中也是可行的。在后来的研究中（1922年），他更加明确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区分了"政治民主"和社会（全面）民主，前者"根本就算不上民主，因此，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消灭政治民主"。利用这个并非总是众所周知的、带有双重含义的民主概念，他解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看似矛盾之处：在阿德勒看来，他们"引以为无产阶级专政之例证"的"巴黎公社事实上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第127页）。不过，他对苏维埃俄国实施的非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持批判态度。奥托·鲍威尔（1920年）采取了类似的批判立场，但他用农民占人口多数、国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的落后解释了苏俄背离民主规范的缘由："专横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文化水平低的产物。"（1920，第64页）

早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的那段时间里，托洛茨基就曾谈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1923年，他辩解说，镇压措施和红色恐怖都是革命针对原来的统治阶级的必要反击，因为他们不但对自己丧失政权感到不满，而且企图并采取行动复辟他们对政权的控制；在他看来，恐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暂时措施："如果恐怖措施被反动派拿来反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阶级，那它就是无力的。但如果恐怖被用来反对一个不愿意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那它可能会非常有效。威慑是一种有力的政策手段，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是如此。战争和革命同样都是以威慑为基础的。一般说来，胜利的战争只是消灭了败北军队的无足轻重的部分，震慑了其余人，击溃了他们的意志。革命也是这样进行的：它杀一儆百。"（1923，第64页）后来，托洛茨基把苏维埃看作民主的机关，认为它相对于工人政党和工会，在代表和动员群众方面要广泛得多和直接得多。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得到巩固后，可以限制、废除和用更多的民
724 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没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补充新思想。1926年，他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劳动群众以推翻资本和达到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为目标，以无产阶级充任领导力量

为条件的阶级联盟。”（*FL*，第 145 页）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在联合其领导团队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之后，利用国家和党的权力工具来整治他在军队、行政机关、经济界、党和中央委员会领导机关中实际的和可能的政治对手，并对这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大部分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措施。理论上的粉饰言辞提供了未经证实的断言，声称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胜利之后变得更加尖锐。斯大林宣布，反对他的党内同志都是资本主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等等的代理人。那时的统治者把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做法等同于无产阶级阶级专政。

3. 基于截然不同的经验和考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辩护。和平发展社会主义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被证实是一条歧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1918 年十一月革命遭到了阻遏，最终堕落为在军事上受挫的资本家阶级的复辟。资产阶级民主虽然被证实是对工人阶级最有利的斗争基础，但绝不是足以抗拒最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不可战胜的堡垒。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得以实现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并未呈现出其理想类型所要求的那种形式：该种形式要求把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其策略基础。在人们行使了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后，统治的社会力量是以如下的形式行事的：“经济管理层”及其在议会前厅的游说集团、军队、政府官僚机构（司法机关、警察机关、情报机关）、新闻媒体，最终是赋予城市工人的投票较低比重的选举法和选区划分。为大多数（劳动者）利益代言的政党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事实证明，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其说认识不到或接受不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不如说他们不愿意进行社会改革。他们宁愿在发生危机时让改革向后退。 725
此外，属于这一经验的，还有左派最初对俄国革命胜利及其自我主张的歌颂。不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如何实现的构想还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和苏联的现实存在差异。

罗莎·卢森堡的带有前瞻性的批判尤其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继续发挥着影响。他们试图找到一些特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些形式可以把俄国革命的普遍有效的教益和德国工人运动长期的民主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某种综合。其中，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D-Opposition）的纲领以如下这些话列举了“直至今天仍具有前瞻性的德意志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特点：……全部劳动人民对苏维埃国家的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积极参与将会是一个长期的学校，从而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自治很快就会实现。

此外，劳动人民将对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实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和最广泛的监督。彻底消除国家官僚制的目标将因此在德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将落实无产阶级民主即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脱离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国家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建立在人民群众及其组织的自主活动的基础上。苏维埃将把执行权、立法权和裁决权合一。它们是一个工作团体。当选的代表随时可以撤换。公职人员将依照工人工资率支付薪资。”（1930，第 30 页）

事实上，在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之前，各国官方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以外）一直把斯大林时代的统治形式和办法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这些持完全赞成的态度。然而，在多次危机中，这却引起了有组织的分化、开除和个人的退出（西班牙内战、莫斯科审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斯大林和他的团队所掌控的共产国际领导层根据苏联对外政策的不同需要调整其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这些需要越来越成为共产国际策略的决定因素。它明确拒绝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和 30 年代的西班牙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红军 1945 年占领的东欧、东南欧和中欧国家，共产国际安置了一些“人民民主政权”，并且用一些拙劣的诡计来掩饰共产党的统治和社会的转型。

4. 直到 1953 年之前，各国共产党都和苏联共产党保持着亲密的盟友关系，甚至对后者无条件地认同。1956 年后，紧密的盟友关系逐渐松弛，最终导致很多国家的党在其目标纲领和策略计划中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距离。但是就连它们的策略也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而更加接近改良主义：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三个西占区，共产党参加了部分受占领国任命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政府；意大利共产党人也试图和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人达成历史性妥协。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他们通过内战和军事胜利掌握了政权——的理论家 E. 卡德尔 1954 年 10 月 8 日在奥斯陆的一次讲话中委婉地指出，“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通过革命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是不适宜的。W. 哈里希（W. Harich）说：“西欧社会主义将以和平的方式取代资本主义。”（转引自 Hillmann 1967，第 191 页）长期负责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工作的卢恰诺·格鲁皮（Luciano Gruppi）拒绝承认列宁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是无懈可击和普遍有效的。P. 陶里亚蒂（P. Togliatti）1967 年明确宣布扣护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份文件，其中提到，“工人阶级和人民面

临着的历史任务是着手建立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方式的新道路”（第374页）。1966年，还在担任奥地利共产党理论杂志主编的弗朗茨·马雷克（Franz Marek）就不想再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了，因为“在揭露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后”，它已经颜面扫地，而且“就连年轻人也把它与恐怖统治和警察专横相提并论”。西欧各国共产党的纲领逐渐抛弃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同，其中尤为坚决的是瑞典共产党。1967年，该党在C. H. 赫尔曼松（C. H. Hermansson）的领导下公布其新纲领时，已经改名为左翼党（*Linkspartei*）。

对于传统学派特别是基于德国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新方针
727 走得太远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重新赢得那份由于几十年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斯大林路线而丧失的信任，那就必须公开承认错误。1989—1990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证实了罗莎·卢森堡的批判，而不是修正主义的批判。

参考文献：

M. Adler, *Demokratie und Rätesystem*, Wien 1919; ders., *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 Wien 1922, Darmstadt 1964; O. Bauer, *Bolschew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Wien 1920 (wieder in: WA 4, 223-357); U. Bermbach und F. Nuscheler (Hg.), *Sozialistischer Pluralismus*, Hamburg 1973; »Eine sozialistische Alternative-Programmentwurf der KP Schwedens«, in: *Ostprobleme* 14, 14. 7. 1967, 396ff; L. Gruppi, »Die Thesen Lenins und Engels' über den Staat«, in: *Ostprobleme*, 1964, 662-666; G. Hillmann, *Selbstkritik des Kommunismus. Texte der Oppositionen*, Reinbek 1967; K. Kautsky, »Die neue Taktik«, in: *NZ*, 1912, XXX, II, 654-664, 688-698, 723-733; ders.,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Wien 1918; ders., *Der Weg zur Macht. Politische Betrachtungen über das Hineinwachsen in die Revolution*, Berlin 1920; ders., *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 und ihr Programm*, Stuttgart [2]1922; W. Leonhard,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in: MiS, *Grundbegriffe*, 1, 1966, 86-103; F. Marek, »Probleme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Westeuropas«, in: *Weg und Ziel*, 11. 11. 1965, Wien; A. Pannekoek, »Massenaktion und Revolution«, in: *NZ*, 1912, XXX, II, 541-550, 585-593, 609-616; P. Togliatti, »Für eine demokratische Regierung der werktätigen Klassen«, in: ders., *Reden und Schriften*, hgg. v. C. Pozzoli, Frankfurt/M 1967, 124-134, zit. n. Bermbach/Nuscheler, 368-377; L. Trotzki, *Die Grundlagen der Revolution*, Hamburg 1923; *Was will die KPD-Opposition?* Berlin [3]1930.

特奥多尔·贝格曼 撰
张志超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rbeiter-/Bauernstaat, Austromarxismus, Bürgerkrieg,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ritter Weg, Erziehungsdiktatur, Gewalt, historischer Kompromiß, Kautskyanismus, Legalität, Novemberrevolution, Pariser Kommune, Parlamentarismus, Rätekommunismus, Revolution in einem Land, russische Revolution, sozialdemokratische Sowjetkritik, Staatsmacht, Staatsterrorismus, Stalinismus, Volksdemokratie, Volksfeind

话语分析（Diskursanalyse）

A: taḥlīl al-baḥth. – E: discourse analysis.

F: analyse de discours.

R: diskursivnyj analiz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анализ).

S: análisis del discurso.

1. 在修辞学的传统中，“话语”（Diskurs）指“途经”（Durchlaufen，拉丁语 *discurrere*）不同的论辩手法（引入 [exordium]、叙述 [narratio]、论证 [argumentatio]、反驳 [refutatio]）。它们旨在确保在公开场合进行的演讲具有约束力和连贯性。在近代哲学中，笛卡尔《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话语”作为一套由命题（它们是由错觉带给人的经验得来的）和规则组成的体系出现，它们旨在允许人们提出能构成真理的论断。尤尔根·哈贝马斯也把这种意义上的“话语”理解为一种生产规定（Produktionsanordnung），它为可以构成真理的命题而设。他试图用语言分析的手段重新制定它们。于是，这种“话语”的概念着眼于获得真理的能力，给“言语”（das Sprechen）蒙上了一层规范性的色彩。

与此相对，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析”方法则建立了一种批判的视角。其中，那些隐含的、非专题的或是被隐瞒了的语言或制度条件，成了研究对象。它们使各个表达构成一种“话语”——也就是说，它们为了某些语言行为的产生构成了一种结构复杂的机制，这种语言行为要求获得真理，抑或是唤起认同并形成共识。它们构成了某些认识客体，一旦承认了认识客体，这个话语的“主体”也就同时被辨识出来了。这项研究的范围从对语言符码（Kodes）的语言学分析，到主体的建立这一精神分析问题，一直延伸到福柯提出的问题：“在西方社会中，那些（至少在某段时间内）被赋予了真理价值的话语的生产，是如何与不同的权力机制和机关相结合的。”（1977，第 8 页）

所有这些研究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反对一种阅读的宗教式神话（religiöser Mythos des Lesens）”，用阿尔都塞学派的说法，“就是反对那种哲学字义上的诠释学”（Pêcheux 1982，第 388 页）。它使我们“在诠释学上依附于”（Haug 1992，第 182 页）一个强加给文本的真理。由于真理显现为一种话语效应，这种《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Gadamer 1962）中规定的依附关系，实际上就这样被颠覆了。

由于话语分析远离“已有现象的立场”（Marx，NEW 24，第 218 页），“与社会的自然化决裂”（Laclau 1982，第 21 页），并使语义学的自然主义（即一种朴素假设，认为词语 [Wörter] 命名了事实，而且意义 [Bedeutungen] 自身是存在的）成了问题，这样，它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否出于自愿，就已经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不过，这种连接的形成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充满困难；那时，话语分析起先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领域，与结构主义一起，开始传向各个人文学科。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已经在诠释学注解的实践中传播开来，而话语分析的批评也正是从这里着手的，话语分析在由阿尔都塞学派铺垫的接受中，其历程既富有成效，又有破坏性。

729

1.1 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说，研究的目的在于，在一个充满对立的领域中理解意义（Sinn）和主体建立的过程。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学转向**造成了一个矛盾的结果：虽然话语分析用特有的逻辑首先为意识形态开辟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在其中进行斗争和干预，但是它和意识形态概念的关联却一直在减少。只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基于“真实”利益和“虚假”意识的对立——被理解成启蒙的范畴，那么它和话语分析就是互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如果意识形态概念被应用到一种纯粹的、有意义的同一性上，正如阿尔都塞学派所作的那样，它作为分析的范畴就没有用处了。按福柯的思路（1973，第 88 页）可以反问，“话语理论是不是已经使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成为多余？”（Bogdal 1990，第 94 页）

1.2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本身就成了问题。在**认识论**上，重点在于要理解，马克思是怎样用他那个时代思想的素材表达自己的，哪些对概念的重新规定建立了他的认识客体，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客体应当达到的科学性——这是“一个由阿尔都塞开启的问题，他这样说道：人们读马克思读得不好，因此必须**读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阿尔都塞有一本著作恰好名为 *Das Kapital Lesen*，即《读（资本论）》。——编者）；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人和文本，以及和开始被人们称为‘话语’的事物之间的关

系”（Pêcheux 1982，第 387 页）。

福柯在他对《读〈资本论〉》的反对意见（1971）中，与马克思提到的“人文的”意识形态在认识论上分道扬镳：他指出了尼采和三类“反科学”——分别是精神分析、民族学和语言学——的出现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一种观点似乎在话语理论学者中被广泛接受，那就是有了以上这些理论革新，才使一种“去中心化”的，即没有被一个超越的主体统一起来的思维方式成为可能。以厄尼斯特·拉克劳为首的学者就强调了“知识型的转变”（Episteme-Wechsel），这种转变分割了“我们理论和政治的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实践”。（1982，第 7 页）如果说，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对批判和科学的理解，的确“局限于反映现实的客观秩序”，并且这种理解也着实“倾向于否定它的特有的话语形式（Diskursivitätsformen）”（第 10 页），那么话语分析就是一种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isch）建立理论的方式。与此对应，80 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就用话语分析的方式表述自己。

阿尔都塞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我们在马克思那里“不仅能从他所说，也能从他所做中，领会到从最初阅读（Lektüre）的理念和实践，到一种新的阅读实践，再到一种历史理论的过渡。这种历史理论能让我们了解一种阅读的理论”（*DKL*，第 18 页）。它首先表明，对于《资本论》的**症候阅读法**（*symptomale Lektüre*）也被马克思自己采用。阿尔都塞不仅将这种方法归功于弗洛伊德，还主要有拉康（他“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以及巴舍拉（Bachelard）、卡瓦耶斯（Cavaillès）、冈吉朗（Canguilhem）和福柯，这四位都是“阅读知识作品的大师”（maîtres à lire les œuvres du savoir，第 15 页）。其次，这种理论还表明，那种新的、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这种非诠释学的阅读方式起到的一个作用。它最后还表明，借助这种新的历史观，一种“新的话语的概念”应当成为可能。（第 18 页）由于这些隐藏的含义几乎没有被逐一深究，我们似乎有必要推敲马克思暗示的那种阅读理论的现实意义。然后我们会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理论革新，与另一场催生了各个话语分析学派（它们受现代语言思考启发）的理论革新，是什么关系？

730 2.1 阿尔都塞根据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青年马克思依然深陷“阅读的宗教性神话”（*DKL*，第 17 页）之中。马克思在书中将工业历史看作“打开了的关于人类本质力量的书”（MEW 40，第 542 页）。在这个哲学史上已经超载的比喻（参考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之书”和笛卡尔《谈谈方法》中

"世界这本大书"的说法）中，一种诠释学的假设得到表达：世界的意义，正如书本中所传递的那种意义一样，让世界成为一种现象，现实成为书本，事物变成了符号，并让"阅读敞开的书本，即伽利略理解的'世界这本大书'的渴望"（*DKL*，第16页），成为占有世界的媒介。对这些联系的钻研，就由此变成对它们在预设中具有的意义，进行辨识和解码，以至于"撰写1944年手稿的青年马克思认为，他在打开的书本中直接读出了人的本质，洞穿了它的异化"（同上）。

正如主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建议的那样，理论的革新在于走出这个由文字意义阐发的世界，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logozentrisches Denken）（Derrida），去研究工业"真实的"历史。为此，人们首先当然还是要真正阅读书本，这样才让我们警惕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过于单纯的读法"（Althusser）：改变世界和阐释并不是对立的。马克思从"理念"到"现实"的道路就是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之路，它仍然停留在"直接阅读现实的假象中"（*DKL*，第17页）。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开始"把握"要点的时候，是它不再让人去理解人类"本质"的另一种设想，而开始研究关于本质/现象的言语（Reden）本身，也就是将它作为一种言语的形式。黑格尔思考的独特性"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的思考方式，或者说是**言语的方式**（*Sprechweise*）"（*KHS*，MEW 1，第206页）。这里的思考不是像哲学诠释学要求的那样，"切入"（einrücken）（Gadamer）思想的传统中，而是"抽离"（ausrücken）阐释的配置（"不是你们拥有书本，而是它们拥有你们。你们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MEW 1，第31页），以此重新获得自身。

事实上，正是要"不理解意义"地走近黑格尔，才能使一种批评成为可能，使它不会再苦于尝试在大师的领域战胜大师。马克思关注的中心则转移到这种"脱离现实"且拔高的思考（＝言语）方式，这种思考用已经脱节了的抽象形式推导出现实。接下来，在批评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KHR*，MEW 1，第379页）时，后来称为"症候式阅读法"的方法首次出现：它"一方面是现实中苦难的**表达**，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中不幸的**抗争**"（第378页），也就是说，应把这种批判读作关于冲突的独立的、固定的表达。重要的不是启蒙地或是理解地接受它，而是帮助这种局限于形式的抗争成为现实（而不是帮助它表达自己）。

731

2.2 阿尔都塞强调了这种与诠释学阅读方式的决裂在认识论上的含义：它"接受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于整体的构想之间的决裂。这种整体是一种精神上

的，准确地说是“一个富于表达的总体”（*DKL*，第 17 页）。这样的决裂因而对应了向历史观领域的转换，这种历史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并不研究具有意义的表达关联。但是，人们如果不愿“重新掉回到将认识当作一个给定客体的显现（Vision）这样的镜面神话中（Spiegel-Mythos）”（同上），是很难马上看清这个由划分和机关的情况决定的领域的（如阿尔都塞兼顾索绪尔和弗洛伊德所准确阐释的那样）。只有不理解意义地研究文本资料，这个领域自身才能被开启。

732 实际上，“如何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MEW 3，第 432 页）这个难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用语言分析方法重新表达成“如何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因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MEW 3，第 432 页）。为了自己不陷于“思想通过词句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同上）这个错觉中，哲学的批判不可以像费尔巴哈那样，仅仅抽象地召唤这个“现实的世界”。它若想逃脱过于拔高的言语的构成的陷阱，就只能分析这种言语的“逻辑把戏”（第 269、274 页）并拆解哲学的“构造”（第 186—187 页）。

与此呼应，《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些“特别”的部分也用详尽和讥讽的方式（“圣布鲁诺知道有一种不同于尘世的尘世存在”，第 89 页），着手将语言表达放置到别有风味的意义范围中，并按照特定规则重新配置它们。这种批判的目标是一种“言语（*Sprechen*）的形式”（第 280 页），它凿空（entleeren）了词句。比如说，如此便使施蒂纳“用其他任何一个字来代替法（Recht）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第 279 页）。不过这种批评也表明，由于有些表达脱离了它们的日常使用语境，互相呼应，并拥有独立生命，这种言语极可能还拥有某种——虽然是已经以特有的方式“错位”了的——意义（“法就是我认为对的东西”[Recht ist, was mir Recht ist]）。“举例来说，桑乔（Sancho，这里的‘桑乔’也指施蒂纳。——译者）就是这样玩弄金钱（Geld）和效用（Geltung）、财产（Vermögen）与有才能（vermögen）等等之间字源上的联系”（第 258 页），这样一来，他就有办法“作出许多新的光辉的经济学的发现，尽管他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而且以后还将提到的他所举的新的经济事实也的确完全可归入这种同义语的领域”（第 213 页）。马克思没有采纳这样的论证，而是详尽展示了让字义变得有意义的“把戏”。（第 186—187 页）

将哲学理解为分裂的社会中特定的“言语形式”，这样做的必然性就以这种方式产生了一些分析方法，它们不寻求理解意义，经过反思的程度也不同。例如，经常被使用的是替代实验（Substitutions-experimente），意在查明某些特定表达在诸如农民之中究竟是什么意义。依据施蒂纳的所有制学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分析了“对立”（Antithesen）和对于正常语言感觉来说“暴力的对等”（gewalt-same Gleichungen），例如“彼此相互依存＝只有依靠他人而生存＝作为工人而生存＝普遍的工人王国”。在这些对等
733 中，哲学的抽象“稍稍接近了经验世界”（第 197 页）。在这样的等价链中，特定的符码或是话语构成（Foucault）就突显出来。不过，此类语言批评的作用，更在于供人消遣，并反复证明，哲学家没有离开“思辨的基地”，“以便解决思辨的矛盾：他仍在这一基地上施展伎俩”。（第 83 页）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没预见到，“社会意义 / 意谓（Sinn/Bedeutung）的生产”（Laclau 1982，第 12 页）这片新大陆随之浮出水面。不过他们毕竟至少发现了意识形态言语的运动网络。佩舍后来也强调了这张网络，它“即是一种义释（*Paraphrase*），只不过是把一种关系改写成另一种关系的存在方式而已”（MEW 3，第 280 页）。“圣桑乔在哲学思辨中找到了这个现成的、在哲学思辨中起一种主要作用的义释法。”（同上）

认清精神的世界就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第 433 页）。这样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则强调，要对一种新的历史观有基本的概念。相应地，《德意志意识形态》把言语的结构（其中，表达的主体以演绎的方式在“脱离成一个独有领域的语言”中运动）理解为思想中社会生活的一类实践，它们是在劳动分工中脱离出来的；阶级的分化，就体现在这种社会生活的二元对立状态，及其虚构的无条件性中。由此，对这些表达进行形式分析地解读，对一种新的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理解着眼的不是观念，而是职业的“空想家们”具有制度特点的言语结构。

更加现代的话语理论学者恰恰是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用比喻（意识形态“迷雾的形成”，第 26 页）的原因，将它作为印证，以此证明对于“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分析是无法统一的。不过鉴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已经把理解意义的阅读配置（Dispositiv）自身作为研究的客体，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不仅已经告别了“意识形态上的”的意识形态问题，这种问题仍将观念诠释为预设中意义的表达（例如“现实”的表达、

特定“利益”的表达等等）：他们还发现了一个领域，它在制度上取得独立，并生产着表达。在这个领域中，一种“更高的”、异化于个体的意义规定着言语。这种阶级分化、国家和劳动分工的结构支配了这种言语的无条件性，并使它自己在由它留出的意义领域中不可言说。

734 这里暗含的话语理论之不足，首先并不是在语言学概念的和方法的层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达到了当时语言学的高度，然而，还没有这样的形式分析工具供人使用，让人不借助主体的明晰性［subjektive Evidenzen］就能理解意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处理他们周围的“空想家”时所使用的那种（尚未获得名号的）话语分析，尽管可以分析纯理论的倒置（spekulative Verkehrung）：他们将这种倒置中的“意识形态，既当作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也当作它们的目的”。但是，他们却无法真正展示，为什么意识形态在现实中“仅仅是它们［社会关系的］的表现和征兆”（MEW 3，第 403 页。此处页码有误，应为第 405 页。——译者）。

这个问题受到另一个倾向的干扰，那就是将一种历史观再次以赋予意义的方式，强加在此处开辟出的话语世界上。这意味着富有表现力的总体这种思考形式（阿尔都塞等不恰当地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归结到了这一点）的回归。这体现在了一种诠释性话语（如“内容空洞”、“现实世界”）中，它要求描绘“现实中的冲突”反对将其解读为“想象的冲突”的做法。但只要这种针对哲学家而要求“关于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关系”（第 83 页）的知识只是在论辩中与“空洞标语”（Phrase）的行家对立，那么它自身也不得不停留在“空洞标语”的水准上。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文本的处理落后于这种理论上的构想：它没有把文本当作“现实生活的语言”进行分析，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哲学的语言与“现实生活”对抗。

2.3 相反，在完成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并不是马克思从外部将一种话语加在经典的文本之上”；而是文本本身泄露了“它所隐瞒的：它的隐瞒就是它自己的言语”。（*DKL*，第 24 页）阿尔都塞在此处发现，有两种阅读的形式发挥着作用：一方面，“马克思透过自己的话语阅读他的先驱们（比如斯密）的话语”（*DKL*，第 16 页）；斯密对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混淆”（Marx）在这里有了“弱视”（Althusser）的意思，因为马克思在眼前看到了这个客体。“这种阅读没有为我们提供判定这些缺陷的依据，因为断定了它们就不再需要它们了。”（同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促进认识且具有批判性、革命性或

科学性的地方在于，它直接——而不是通过（由诠释学开辟的）“预先理解”所搭建的桥梁——介入了另一个文本中，并展示了它主动隐瞒的东西。阿尔
735 都塞将此称作“**症候阅读法**”。《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能“反映现实的客观秩序”（Laclau），而只能为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在给定关系中表达的东西，更加全面地提供一种语言。

3. 一个现实的难题是当时还无法供马克思使用的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和构想，它们凭借对于语言物质性（即对现成语句表达的分节 [Artikulation]，而不是对预先存在意义的客观化）的洞见和对无意识的意义“深层诠释学的”的阐释，开辟了该领域。如果我们采纳阿尔都塞的说法，认为马克思的理论革新，在用到非诠释学的阅读法时才能展现出来，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说，马克思完全不了解那场“认识的革命，它的震中……来源于重新评估语言在分析和解释社会进程时所起作用”（Laclau 1982，第 12 页）。

这两场革命尚未明确的联系在理论史的发展上分为了两个阶段，强行的结合和不可避免的破裂支配了这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尝试利用语言学的话语分析作为辅助学科，为自身还不是很成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服务。该阶段催生了语言学的认识论批判和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意识形态理论的语言分析转向，并首先与米歇尔·佩舍（Michel Pêcheux）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当第二阶段这种**糟糕的结合**（*liason fatale*）在双方互相的责难中被迫终止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也被置于语言分析的反思之中，由此，认识论的立场发生了改变。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在厄尼斯特·拉克劳那里得到最令人信服的表达。

3.1 话语分析的难题和它的概念一样，都打上了语言学的烙印，在建立之时它就是一个拥有大量分支的研究方向。“话语”在语言学家的观念中被当作“付诸行动的语言”（Benveniste 197，第 286 页），它所代表的，是作为具体情境过程的言语，与语言系统相对；后者被设想成抽象并抽离语境的。这样，在句子层面“以外”的表达，也就是那些规则不再由普遍的语言系统支配的文本（Texte）、“言语”（Reden）或对话（Gespräche），就成了话语分析的对象。为了进行描述，语言学创造了数量庞大的方法和跨学科的结合。（参见 v. Dijk 1985 年手册）

佩舍带领的小组所作的尝试，试图 736
将症候阅读法置于语言学的问题规范中，并将其转化成为意识形态理论的研

究计划，这样作的动机是出于两方面的吸引。其一，这个领域有一整套形式上的方法供人使用，可以“使宗教的影响破灭”，并创立“一种对意义效应（Sinn-Effekte）的非主体性分析”。（1982，第391页）另一方面，“现代语言学的”认识承诺，“存在一些话语结构，它们是无意识的，并决定了阅读法，即主体在阅读中的位置”（第388页），这样就回答了对于意识形态物质作用的追问。

一个事实对于这种思想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话语分析在推动自身脱离语言学的问题规范。事实上，对于言语的“语法”所作的探寻本身，就已经暗含了对索绪尔定义的语言学客体的批判。这位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将语言系统（*langue*［语言］）想成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faitsocial*）。根据语言学经典的原理，语言系统对于个体而言，代表了以强制和惯例为形式的社会面；它的现实表达（*parole*［言语］）则“与此相反，是意志和智力的个体行为。需要区分的是：（1）一些组合，通过它们，说话的人（*le sujet parlant*）带着表达个人思想的目的使用**符码**（*code*），（2）一种心理和身体上的机制，它们使人能够表达这些组合”（*CLG*，第30—31页；德文译本第16页）。这样，索绪尔将这个对象转移给了诠释学和心理学。

“有没有可能研究出一种**言语**（*parole*）的语言学，在**语言**（*langue*）和言语之间，是否有一个由居中调解的规则组成的合集（Korpus）”（Eco 1977，第97页），这个问题在这些条件下导向了“规范”（Coseriu）这个现象。它排除了某些“语言”本身允许的表达，规定了某些连接，并疏通引导可以言说的范围。这一事实在语言学的观念中，却一再促使一种互补的观点产生，那就是言语是“一种自由的创造”，“那些人们试用来为它奠基的规则，永远不能完全解释它”。（同上）

佩舍提醒人们注意，语言学对语言的观察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受制于意识形态倾向之间的争论的。这样，人们就能站在语言创造的立场上，从挣脱（Sprengung）、“去规则化”（Entregelung）或是解构等方面，对这种“规范”进行批判性考察，特别是透过文学文本的媒介。这一观点在原样派小组（*Tel Quel-Gruppe*）（Kristeva 1974）和英国电影杂志《银幕》（*Screen*）（Coward/Ellis 1977）中，曾有一段时间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形成联盟，并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那里得到最激进的表述。他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讲座中称，“语言”“根本就是法西斯主义的”（1980，第19页），并将它与对表达机会的剥夺完全等同起来。另一方面，语言实践的规范

化，也可把规范性作为目的进行分析：尤尔根·哈贝马斯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更新了这类制定规范的话语分析的范式，它基于过去的传统，为能够传达真理的命题确立规则。

与此对立的是另一种尝试，它将批判的目光聚焦于这种语言实践的规范化上面。在语言学的框架中，人们会碰到一些专有的符码，它们被理解为整体语言系统的子系统。按照索绪尔构想的作为普遍符号学说的“符号学”，这样的分析也被运用于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上。巴特曾以最有启发的方式，用他对日常生活的“神话”（1964）的研究，展示了这类分析对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意义。他后来看待这些研究，则持有很多保留意见：“被权力加工过的语言，才是这类最初的符号学的客体。”（1980，第49页）他将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的意义作用理解为一种“去—命名化”（Ent-Nennung，*dénomination*——这个法语词意义模糊，第124—125页），它使得“公民社会中的人每时每刻都浸没在虚假的自然中”（第148页）。他借助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附属义语言（Konnotationssprache）理论，将意义效应描述为“神话的”符号系统对日常语言的占据。这些系统将特定的表达从日常的使用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嵌入到看似独立自主的意义范围中；这时符号就“实实在在地呼唤着我”（第106页）。这种机制既可以在广告的话语中研究，也可以在哲学的“深奥的行话”中。（参见Bourdieu 1982）在这里提到的第一个阶段里，这种批评还基于存在一种中立的“客观语言”的假设。对这种虚构的抛弃，标志着向符号学的第二个，也就是“解构的”阶段的转变。

语言学或符号学的话语分析发展了一套复杂的辅助手段，以研究“跨越的话语”（Interdiskursen）、“集体象征的共时性系统”（Link）等问题；而福柯则促使人们将研究的问题从纯粹的语言思考，向外转移到社会实践、机构和历史进程的领域。对言语的规范和彻底的管控，构成了那些被隐瞒的，也就是像是“性”（Sexualität）这样的对象。这些对象是如此规定表达意义的：让在推移（Verschiebungen）和凝集（Verdichtungen）之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东西”，无法被说出。当人们分析这些规范和管控时，会遇到一整套由治理的机构、操作程序、仪式和机关组成的复杂网络：这就是社会情势中的装置或规定，福柯后来为它们改造了配置（*Dispositiv*）这个概念。（1977）

这一视角不仅使话语分析的精神分析前提，也使它的语言学前提成了问题。其一，这里的分析并不探寻某个被压制的“本质”，不使被压抑的事物重 738

见天日，而是着眼于产生这种意义和主体效应的外部状况。其二，一些专有的“符码”、表达模式和两极对立（比如健康—有病、正常—病态、主体—客体）是可以被支配的，它们不能独立于语境，被理解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之间的“中间层”。显然，这些“话语的构成”（Foucault 1973）已经不能从普遍语言的角度来理解了；“历史的话语分析”使得人们必须将阵地转移到对现实历史进程的分析。

如今在这个被称作话语分析的难题中，汇集了语言学家们为超越索绪尔范式的限制（参见 Jäger 1993）所作的努力，以及历史学家（Robin 1973，Schöttler 1988）、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Link 1983；Fohrmann/Müller 1988）研究意义形成的历史进程的兴趣。这种研究领域在传统中，由人文科学的诠释学承担。

佩舍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建立联系的方式，是通过将福柯所言的“话语构成”，解释为阿尔都塞概念中的“意识形态构成”的一部分。佩舍工作的特点，是他对语言学、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深入研究。他理论上的主要著作（1975）致力于对一种语义学的批判，这种语义学将意义理解成接近自然的必然之物，因而也代表了这些学科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他的话语理论后承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拉康和阿尔都塞，首要将表达过程中的语言学机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说话的个体不是给予他的意图一种表达，而是让自己成为“被预先构建”意义的“主体”。由他开发的“自动话语分析”为了分析这样的话语构成，动用了美国结构主义（与欧洲的结构主义不同的是，它分析的不是被划分的整体，而是分配）的描述方法，并借助了计算机语言学。这样，佩舍就使那种尽可能排除“主体”预先理解的非诠释学阅读原则，变得更加激进：话语分析成为一套完全由形式上的方法构成的工具，它能“阻止主体效应造成的错觉”（1982，第 391 页）。 739

佩舍曾自我批评地评论道，这种试图用技术驱逐一切“主观”明确性的客观主义，确立了一种“居高临下”视角，在其中，那个隐蔽起来的意识形态主体又会再次出现。当自动的话语分析探索语义学的领域时，它其实从一开始就知晓其中表现出来的阶级结构。“这当时当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有个教育上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价值，把法国工人阶级的各个组织（尤其是法国共产党），从实行统治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解放出来。”（Pêcheux/Gadet 1981）阶级斗争是如何表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构成中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的第一个阶段，即描述性阶段

中，则没有被考虑：是否有机会有效地干预这些过程，也没有考虑到。

3.2 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改写成一种名叫“话语分析”的研究计划：如果说这种尝试的失败，在此种意义上与工人运动既定政治形式遇到的危机息息相关，那么这个危机同样也在话语分析中被提起和钻研。他们批判的核心在于，这种理论从一种预设的阶级理论出发，去解读意识形态的现象，而该理论曾由于制定规定和贴标签，在政治上产生破坏性作用。“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遭到摒弃，加之新的社会运动兴起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得到广泛接受，这些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都使得人们在原则上表达了对“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批判。

这一出于政治考虑的批评，由于语言分析的范式发生改变而愈发激烈。只要话语分析是在现代语言学的框架中发展的，它就是客观主义的，也就是说聚焦于结构考察、符号系统和符号（就是能指 [Signifikanten] 和固定的所指 [Signifikate] 之间的关联）。但是，语言的代表模型，也就是认为存在由语言表达命名的“客观”确定事实，和现代语言学的基本认识是不相符的。后者认为，意义是通过对声音材料结构的划分被建立起来的。因此索绪尔发现的“区分性分节”，作为一种主动的意义构造过程，被称为“区别”（*différance*）（Derrida）、“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Coward/Ellis）等；它成为批判性阅读的各学派关注的中心。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解构”范式，某种程度上切断了语言 / 文本与被指涉物（Referent）、对象或所指之间的联系，而仅仅研究符号材料中的内部关系，这些关系在效果上生产了意义 / 意谓。

在厄尼斯特·拉克劳那里，“话语分析被理解为对语言可能性作区别的分析”（1982，第 14 页）。这使人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要素’如果孤立地看，则没有必然的阶级意味，这样的意味是这些要素在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得到表达，才造成的结果。”（1981，第 87 页）这一思想的贡献是，它把意识形态作为独立领域加以阐明，它拥有特殊的运动形式和干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阶级斗争围绕的，是对（阿尔都塞理解的）确立共识的“号召”进行“去分节”（Desartikulation）和“再分节”（Re-artikulation）。也就是说，关注点在于，像是**人民**和**国家**这样的表达，其意味究竟是权威的还是“进步的”，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不过正如语言学向人传授的那样，这并不是要追问这类概念“本质”的问题；而是取决于概念借助其他意义要素实现的“区分性分

节”。正如拉克劳对于法西斯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研究（1981）、斯图亚特·霍尔关于撒切尔（Thatcher）时代的“权威式民粹主义”（Autoritärer Populismus）的著作和意识形态理论计划（1980）展示的那样，这一问题对意识形态研究来说，被证明是极有成果的。

拉克劳将话语分析对客观主义在理论上的克服引向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必须从实践中的介入这个角度出发，对这些过程重新进行彻底的思考。为此他采用了由西尔弗曼/托罗德（Silverman/ Torode）拟就的对于“阐释”（Interpretation）和“阻断”（Interruption，Unterbrechung）的区分，也就是对介入的两种基本形式的认识。阿尔都塞已经看出，它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就起着作用（2.3）：“诠释的语言用它自己理解的现实，着手分析另外一篇文本或演讲。它把被
741 诠释的语言当作预设现实的现象处理”；“阻断的语言质疑其中提出的现象与现实的关系”，并支持“日常语言（Alltagssprache，*ordinary language*）中的反权威实践，其中日常语言与诠释进行斗争并压制它。通过批驳对超出日常语言以外唯心主义‘本质’的引证，阻断标志着向着语言实践进行的唯物主义转向”。（Silverman/ Torode 1980，XI—XII）

拉克劳让这一方法的成果，不仅仅限于理解如何有效地介入政治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不能局限于解释现实，它还必须要建立现实”：它要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Geltung，*validité*），取决于它是否有打断其他话语、建立新的对象和新的作用领域的能力。其他的话语，比如民主的话语和性的话语，都不是上层建筑，换句话说，它们不是话语之外事物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是物质上的力量建立了主体，并产生了作用。面对这些力量，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它自己产生的作用，证明自己的有效性，而不是借助某种先验的存在论原则”。（1981b，第67页）就这方面来说，阶级、经济对于斗争的支配作用，还有作为一种特别机关的意识形态，就成为“话语外”假设的事实，而不再获得承认。这样，在这里得出的结果中，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自身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构”（Laclau/Mouffe 1991），同时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依据。

同时，由于话语分析对于意识形态进程必然要采取诠释和观察的态度，那么如果我们的立场把“解构”理解为一种转向主动的政治实践，话语分析就自己废除了自己。拉克劳由此出发，发展了“激进民主”的理念。然而在哲学上发展出解构这一目标的德里达，则看到了一种危险，那就是当解构的思想被与政治等同起来时，会变得集权化。因为

"认为解构的话语能够支配其他实践，不管它们是不是话语性的，是一种疯狂的想法"（1994，第158页），所以德里达认为，对实践中的政治有所保留，并保持解构主义实践存在的边缘化，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和德里达一样认为，"'批判'这个表达……在马克思的语言和计划中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如今也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第150页），
742 马克思主义者就遭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将话语分析必然的客观化维度和话语介入的必要性调和起来。问题的中心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难题：既不能"诠释"地设定（话语）实践的决定要素，以避免暗示存在一种解构主义反对的"话语外的现实"，同时还要研究话语实践的现实决定要素，以及它们介入的领域和逻辑，以避免陷入话语分析就是政治这种错觉。

参考文献：

R. Barthes, *Mythologies*, Paris 1957 (*Mythen des Alltags*, Frankfurt/M 1964); ders., *Leçon/Lektion. Antrittsvorlesung am Collègede France (7.1.1977)*, Frankfurt/M 1980; E. Benveniste, *Probleme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1972), Frankfurt/M 1974; K. M. Bogdal, »Symptomatische Lektüre und historische Funktionsanalyse (Louis Althusser)«, in: ders. (Hg.), *Neue Literaturtheorien. Eine Einführung*, Opladen 1990, 82-106; P. Bourdieu,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Paris 1982; R. Coward, J. Ellis, *Languag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1977; J. Derrida, »Politik und Freundschaft. Ein Gespräch mit Michael Sprinker« (1993), in: H. Böke u.a.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AS 228, Hamburg 1994; T. van Dijk (Hg.),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4 Bde., London 1985; U. Eco, *Zeichen*, Frankfurt/M 1977; J. Fohrmann, H. Müller, *Diskurstheorien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88; M. Foucault, *Die Ordnung der Dinge*, Frankfurt/M 1971; ders., *Die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 1973; ders., *Sexualitätund Wahrheit I: Der Wille zum Wissen*, Frankfurt/M 1977; H. 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1962;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AS 203, Hamburg 1993; L. Hjelmslev, *Prolegomena zu einer Sprachtheorie* (1943), München 1974; S. Jäger, *Kritische Diskursanalyse*, Duisburg 1993; J.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Paris 1974; E. Laclau, *Politik und Ideologie im Marxismus* (1977), Berlin/W 1981; ders., »La politique comme construction de l'impensable«, in: B. Conein u.a., *Matérialités discursives*, Lille 1981 (a), 65-74; ders., »Diskurs, Hegemonie und Politik«, in: W. F. Haug, W. Elfferding (H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ders., C. Mouffe, *Hegemonie und radikale Demokratie. Zur Dekonstruktion des*

Marxismus, Wien 199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1985); J. Link, *Elementare Literatur und generative Diskursanalyse*, München 1983; D. Macdonnell, *Theories of Discourse. An Introduction*, Oxford 1986; M.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Linguistique, sémantique, philosophie*, Paris 1975; ders., *L'inquiétude du discours. Textes de Michel Pêcheux*, hgg. v. D. Maldidier, Paris 1990; ders., u. F. Gadet, *La langue introuvable*, Paris 1981; dies., »Sprachtheorie und Diskursanalyse in Frankreich«, in: *Argument* 133, 24. Jg., 1982, 386-399; dies., »La langue introuvable«, i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 Projekt Ideologie Theorie, Faschismus und Ideologie, 2 Bde., AS 60 u. 62, Berlin/W 1980; R. Robin, *Histoire et linguistique*, Paris 1973;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15), Paris 1972 (*Grundfragen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Berlin 1967); P. Schöttler, »Sozialgeschichtliches Paradigma und historische Diskursanalyse«, in: Fohrmann/Müller 1988, 159-199; D. Silverman, B. Torode, *The Material Word. Some Theories of Language and Its Limit*, London 1980.

托马斯·劳格施廷 撰
刘宇辰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lthusser-Schule, Artikulation, Ausdruck, Bedeutung, Determinismus, Diskurstheorie, Dispositiv, eingreifendes Denken, Epistemologie, Hermeneutik, Ideologie-Theorie, Klassenreduktionismus, Literaturkritik, Materialästhetik, Methode, Ökonomismus, Phrase, Postmarxismus, Rhetorik, Semiotik, Sprache, Subjekteffekt, symptomale Lektüre, Text, Wahrheit, Zeichen

话语理论（Diskurstheorie）

A: naẓarīyat al-baḥth. – E: discourse theory.
F: théorie du discours.
R: teorija diskursivnaja (дискурсивный анализ).
S: teoría del discurso.

“话语理论”概括了一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符合以下描述的思潮：这些思潮讨论了历史中特定陈述构成的物质性和权力效应（包括主体形成带来的权力效应），尤其是“话语分析”的多样性。为避免术语混淆，在这里需要指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不管是精神分析的，还是语言学的）“对话分析”（商谈分析），以及哈贝马斯概念中的“话语”（Diskurs），都另有所指，在这里不作讨论。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基于“无统治的”理想话语类型，它是一种避免被经验扭曲的（例如精神

病理的强迫、“意识形态”视角的局限等等）、论点间的理性交流。哈贝马斯旨在构建一种受规范性引导的模型以衡量历史中的案例。相比之下，下文所涉及的话语概念在法国的以本维尼斯特和托多罗夫（Todorov）等为代表的叙事理论争论中获得了特别的关注。在这场争论中，人们通常所说的“赤裸的”叙事内容（Erzählinhalte），即（历史［histoire，Geschichte］），被拿来与它们具体而且常常具有主观视角的表达（话语［discours］）相比较。与以上理论以及英国的言语行为理论（Sprechakttheorie）呼应，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也将“词”（Wörter）与“物”（Dinge）、“话语”（它被看作独特的陈述构成）及其“对象”双双对立起来。它在此所强调的是话语的塑造性与制度性力量。福柯强调了主体—实用主义，尤其是知识光学模型（“反映”）与认知的彻底决裂：对象并不是先于话语（prädiskursiv）而存在的，它只会在话语（作为“主体的观点”）或多或少的扭曲中被感知；相反，话语必须在严格意义上被理解为物质性的生产工具，它以规则的方式产生（社会）对象（例如“癫疯”、“性”、“规范性”等等），以及与之对应的主体性。

从马克思的角度出发，人们也许首先会对福柯提出如下问题：该怎样理解话语概念和意识形态概念（福柯曾多次批判它）之间的竞争关系？此外，话语理论是否确实断言了话语式的唯心主义的对象产生方式？

话语概念似乎和所有“意识形态”概念（不管它是马克思还是后人提出的）不相容，它以二元论的方式，将“头脑中迷雾的形成”和“实证科学”对立起来。（*DI*，MEW，第26—27页）话语理论以另一种方式构建了整个问题领域：话语（不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还是主要是“科学的”）看来是通过它的特殊性（“知识”的特定领域）和它的边界（有些事物是人们可以且必须说的，有些则不行），以及它们各自独特的可操作性（技术的，形成主体的等）构成的。不管是出于表达强制（Sagbarkeitszwänge），还是话语的具体操作性，话语的社会功能性往往会被人们意识到，但并不是根据逻辑的错觉或科学。更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话语往往会通过排除无法形式化的知识，放大不可言说的内容。（Foucault 1973，第262页及以下）可以肯定的是，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也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指以哲学话语为基础的、实现知识整体化的空想，“法兰西意识形态”则是基于法律—政治的话语，等等）。但是这种方式过度地受到“实证性”和“迷雾”之间两极分化的支配。这样看来，话语概

念似乎和晚期马克思理论（*Vorw* 59）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指特定的知识门类）这一概念更加契合，即强调任何社会中“上层建筑”的功能必要性。（这可能象征性地表现为“一切都很难”，而“意识形态形式”难辞其咎。）

对于可能出现的唯心主义问题：真正的唯心主义是“泛话语主义”（Pan-Diskursismus），比如它会断言，整个社
745 会现实仅仅是话语产物。而福柯区分了“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比如经济学，参见1973，第224、231、234、260、264页）。与主体和客体、反映和实物那样的关系相反，两种社会实践都被看作是物质的且在功能上互相融合。

我们可以尝试将话语理论的基本假设视为对唯物主义社会的理论贡献。话语范畴不遵循阶级分析，而是分工理论。“话语”这一范畴不与阶级分析，而是与**分工**接轨。一个社会中劳动分工的特殊实践与**专门的知识领域**相对应，并（根据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边界）被区分为“话语实践”。长期与存在其对象中的主观话语形式（或“角色”）、概念范畴、主题“策略”（Foucault 1973，第61页及以下）和操作性等方面保持一致的知识专长被称为“话语形成”。一个例子是17和18世纪作为“财富分析”而创建的政治经济学。（参见 Foucault 1971）话语理论重构的目的不在于揭露用科学真理来衡量的“视角扭曲”，而是在于找到各自历史中**知识操作性**，并在话语上构成社会行为的对象。据此，话语理论提供了一种可以描述“知识和灵巧的积累，也就是社会大脑的总生产力的积累”的模型。（*Gr*，第586页；MEW 42，第594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的我们经常能看到“智力”在生产力中所占比例的讨论，显然，与此对应的操作性专业知识并不能还原为“科学”。从斯大林的笔记中可以看出，由于缺乏这种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他将知识置于“基础”和“上层”之间“悬而未决”的地位上（生产性知识、技术，与语言一起“悬而未决”！）。

斯大林认为，语言和技术并不属于特定的阶级。这并不代表它是中性的。话语的定义有很强的选择性，这点将它和语言（Sprache）区分开：话语由一系列受限制的陈述组成，用以描述对象范围，它具有操作性，凭借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如分类、表格、测量值、实验报告等构建社会行为的对象，它被制度
746 化并赋予某个物质设施以话语意义，比如，医学话语中的诊所。它只能被少数的主体合法地表述。通过所有这些特别化内容，话语具有了**权力效应**。通过劳动分工的结构和依附于它的话语结构，一个历史中的特定社会为自己“量身定

做”它的社会对象。这种“量身定做”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社会权力具有的现实功能性。（参见 Foucault 1973，第 264 页）当然，由反霸权和非霸权的阶级和团体进行的占领和功能化“抵抗”还是可能的。这种将话语视为权力斗争之地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观点，以及葛兰西的关于霸权（福柯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的理论，很容易联想在一起。

话语专门化的趋势与重新组合和重新融合的趋势相反。如果没有知识分工（包括仅仅是想象中的重新组合），历史中罗马共和国的军事联盟（Socii）就不能形成，我们的联想（As-Soziation）也就不能展开。这里需要区分三种**话语间**的事实情况：第一，多个话语的构成能够通过它们程序的相似性，形成“话语间的态势”。与此相匹配的话语程序由此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的特殊影响。第二，**跨话语的“配置”**可以生产在整个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重要具象（Gegenständlichkeiten），例如“理性行为”、“规范性”、“性”。第三，所有跨话语要素的集合（例如跨话语的类比模型、隐喻、符号等）构成了话语系统中的一般**话语间框架**。这个框架中，所有具有特定视角的，即一个社会专有的、构成权力的话语元素，被以特定的方式“绑定”在了一起。该框架大体构成了一种实证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用“意识形态”来理解这种想象中的知识总体。由此看来，话语理论能够为意识形态理论减轻“迷雾”和“实证性”之间的二元论（也就是说它不够唯物主义！）负担。

如何将劳动分工理论和阶级理论严谨地结合起来，至今都是唯物主义社会理论未能解决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方向上，通过“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关系，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启发。安东尼奥·葛兰西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有关键进步：“社会历史同盟”（sozial-historischer Block）具有阶级分析和劳动分工的维度，霸权的概念意味着统治阶级通过专门知识的特定操作同盟而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可以假设，话语理论中讨论的权力效应可以被理解为霸权。

革命（或者说**文化革命**）的问题依然存在。福柯的所有论著都围绕近现代话语体系的划时代变化展开，且福柯有意识地**不让**这样的“非连续性”（Diskontinuitäten）呈现为“市民阶级革命的表达”。福柯的话语理论不接受经济性支配（的观点），且有意识地把自己限制在描述**话语事件以及非话语事件**的出现、激增和交错上。其理论不相信可以把革命思考成目的论的过程，或是想成主体有意图的行为或互动。在这一点上，它与阿尔都塞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相符。当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

1800年左右不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占了上风，还有类似于“规范化设定”的东西（这自然不能被理解为资本的表达）。尽管如此，福柯拘囿于事件的偶然性，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这不能令人满意。这样的不足在于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何某些偶然发生的新事件又一次“消散”了，而另一些则不断再生、扩大，有时还成为整个时期社会的主导（例如“规范性”）。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不同的再生产强度、稳定性和抗停滞性具有不同的再生产周期（包括话语的和非话语的），比如，如果规范性不能与资本积累的再生产周期紧密衔接，它在文化上是不是还会形成支配？（当然，这也不允许我们作出相反的预测，认为资本只能靠规范性进行再生产。）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家在这个方向延续了思考，诸如阿尔都塞、巴利巴尔、佩舍、拉克劳、德米洛维奇（Demirović），林克/林克-黑尔（Link/Link-Heer）等。

参考文献：

A. Demirović, W. Prigge (Hg.), *Diskurs Macht Hegemonie* (= *kulturRevolution* Nr. 17-18), Essen 1988; M. Foucault, *Die Ordnung der Dinge*, Frankfurt/M 1971; ders.,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 1973; ders.,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München 1974; ders.,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Frankfurt/M 1976; ders.,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I. Der Wille zum Wissen*, Frankfurt/M 1977; ders., *Dispositive der Macht*, Berlin/W 1978; C. Kammler, *Michel Foucault*, Bonn 1986; E. Laclau, *Politik und Ideologie im Marxismus*, Berlin/W 1981; ders., »Diskurs, Hegemonie und Politik.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in: W. F. Haug, W. Elfferding (Hg.),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6-22; ders.,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New York 1985; J. Link, U. Link-Heer, *Literatursoziologische Propädeutikum*, München 1980; dies., »Diskurs/Interdiskurs und Literaturanalyse«, in: LiLi, 1990, Nr. 77; dies., »für Althusser«, in: *kulturRevolution*, 1983, Nr. 4, 42ff; J. Link, » 'diskurs' und/oder 'ideologie'?«, in: ebd., 46ff; ders., *Elementare Literatur und generative Diskursanalyse*, München 1983; M.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Paris 1975; ders., »zu rebellieren und zu denken wagen! ideologien, widerstände, klassenkampf«, in: *kulturRevolution*, 1984, Nr. 5, 59ff. u. Nr. 6, 63ff.

尤尔根·林克（Jürgen Link）撰
刘宇辰译，李牧今校

参见：

Arbeitsteilung, Artikulation, Bedeutung, Erkenntnis, Diskursanalyse, Dispositiv, Hermeneutik, Ideologie-Theorie, ideologische Formen, Imaginäres, Normalisierung, Phrase, Semiotik, Sinn,

Sprache, Sprachphilosophie, Strukturalismus, Subjekt-Effekt, Überdeterminierung, Unbewußtes

可自己支配的时间 (disponible Zeit)

A: al-waqt taḥta'l-taṣarruf.

E: disposable time. – F: temps disponible.

R: imejuščeesja v rasporjaženie vremja (имеющиеся в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время).

S: tiempo disponible.

一

一方面，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在社会层面上可理解为再生产之外可支配的时间。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可自己支配的时间与受他人支配的时间相反，是可自由使用的。它既是人们进行享受并发展享受能力的条件，也是人们在劳动中进行自主决定和自主计划的条件。产生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和所有权。

1. 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劳动不被视为人的本质特征。它由奴隶或是贫穷的自由民承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人是进行言语活动和“政治的动物”（参见 *Pol*, I. 2, 1253a 1-19），而非从事劳动的动物。劳动（πόνος）是负担、痛苦、贫穷，是西西弗斯（Sisyphus）的岩石。罗马帝国除进行征战外，为日益贫穷的公民群体提供“面包和竞技”。——自由且拥有财富的男性希腊城邦公民除 οἰκοδεσπότης（指地主）参与统治和管理外，还投身于政治、文化、体育、军事和宗教事务。其前提是，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即“高贵的清闲”（σχολή，拉丁文为 schola）；没有“高贵的清闲”便不会有美德教育，也不会存在有美德的生活。然而清闲也是用于获得智识、开展学术辩论、进行学习（这里指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时间。它使得普通的社会精英能够自由而不屈从于外部约束地开展一般社会活动。

在基督教中，人对自身品格的展现——虽然不是唯一，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劳动中。人被塑造成神的形象，是上帝的“合作者”和“搭档”。（参见 1. *Kor* 3，第 9 页；Klüber 1982，第 46—47 页）但天堂彼岸的人们被迫劳动是上帝的惩罚。劳动首先是教育的手段，它抑制肉欲。无所事事便享有财富的生活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9，24）中被视为罪恶。在实际生活中，劳动与非劳动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下层民众为每日的面包而苦苦发愁，而贵族在打猎或比武中度日，或是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互相贬损。这种“英雄的懒惰”与

749

基督教劳动至上主义的道德标准相反。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财富的积累，商业资产阶级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挥霍无度的享乐式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蔓延至其余的阶层之中。（参见 Kofler 1948，第 126 页）

2. 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剩余产品价值研究指出了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决定性因素。亚当·斯密问道，如何能让个体和国家尽可能地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Reichtum*，I，第 5 页）。在他看来，生产不只是包括生产者自身工资在内的弥补生产直接开销的劳动，还有开销之外获得的盈余（*Surplus*），以便能供养“不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政治家、军队、“神职人员、法律工作者、医生、各类学者、演员、小丑、音乐家、歌剧演员、芭蕾舞者等等都得到了其他人每年部分辛勤劳动成果的供养”。（II，第 74 页）

卢梭在他的成长小说《爱弥儿》（*Émile*，1762，1，第 331 页）里揭露了社会中产生的矛盾，即生产和消费、劳动和受益分别由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承担。“懒惰地消耗非自己努力所获成果的人相当于在行窃。”（第 353 页；参见 Ahrbeck 1984，第 83—84 页）卢梭的人格理想是成人并懂得生活。这一点是对西斯蒙第的承袭。只有人们对所处社会中享有的“充分的闲暇或充足的财富感到愉快，从而可以进行更强烈的感知和更周密的思考时”（1819，I，第 21—22 页），他们才可被称为进步启蒙的、文明的人。从批判乌托邦的视角来看，财富的范畴涵盖范围更广，它还包括精神财富这一层面。（参考 Zahn 1984，第 145—146 页）在物质财富之外，人们应当“懂得鉴赏美术，认识到自然现象及其变化的方式”，圣西蒙（Saint-Simon 1822，第 337 页）这样要求。精神财富表现为知识和技能的总和，它从社会公民所拥有的科学知识、精神文化、文学修养和洞察力中得以体现。傅立叶在他的自由劳动理论中阐述了劳动的未来特征和新型集体社会中的“消遣”（Vergnügen）。（1826，第 34 页）

3.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逐步阐述了可自己支配的时间这一概念。“但是当没有为资本支出的利息时，这个国家才是真正富裕的国家。当劳动 6 小时而非 12 小时的时候，‘财富是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别无他物’”，马克思在他的《1850—1853 年伦敦笔记》（*Londoner Heften 1850-1853*）（MEGA IV. 9，第 163 页）中记录道。该内容出自一篇于 1821 年发表的匿名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证实其作

者是英国文学评论家查尔斯·温特沃斯·迪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参见第616页）他承袭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认为社会中的剩余产品是通过剩余劳动创造的。足够高的劳动生产力和制度化的财产关系使得侵占他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可能。迪尔克认为，市民社会是阶级社会。在市民社会中，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中有大部分由不从事劳动的阶层侵吞，而其本人只能获得生活必须的部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性工作的研究阐明了社会关系和意识形式的全貌。当“大工业发展”伴随以计划、设计、规划的形式出现的“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并且劳动力在物质生产过程中需要作为“监督者和调节者”时（MEGA II. 1. 2，第580—590页；MEW 42，第599—560页），为资本剩余价值进行生
751 产的生产性劳动将不再产生物质财富。“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第582、601页），并且使实质上的解放成为可能。在生产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也如“**群众的剩余劳动**”是“**少数人的非劳动**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的物质基础一样，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第581—582页；第601页）社会的真正财富通过“个性的自由发展”和人们自我价值的证实得以实现。社会财富并非在工作时间中，而是在“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得到积累。（第583页及以下；第603页）

阿格内斯·黑勒（Agnes Heller）（1976，第125页）强调了一个人拥有特殊工作技能的必要性，因为这样他还可以参与到“生产过程之外”。马克思在这一方面没有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他也没有特别注意生产性工作和物质需求之间关系的次序。《哥达纲领批判》中假定，不是简单机械的劳动，而是工作之后的“生活需求”（MEW 19，第21页）更适宜合格的监管，因为至少在这样的劳动中脑力和手工劳动的对立较少。

最理想的对获得“**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固有需求的满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表述为“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MEGA II 3. 4，第1388页；MEW 26. 3，第253页），它假设社会中的个体需要获得更充分的闲暇，从而可以利用多种自由行动和行为的机会，也进行“娱乐和休息”（第1387页；第252页）而非持续生产新的消费品。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将自己的需求变为现实的一部分，并且试图有意识地计划现实。通过进一步揭示社会经济条件是实现人的自主性的前提，马克思发展了来源于德国启蒙运动和唯心主义的人的自主性的观点。米夏埃尔·瓦尔策（Michael Walzer）怀疑马克思不认为单纯的“消磨时间”与合理度过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具有同等的价值。（参见第 1992 页，第 276 页）实际上，他将时间理解为人发展的维度。（参见 Negt 1984，第 25 页）马克思将“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星期日的休息时间”算入可自己支配的时间之中。（MEW 23，第 280 页）

在工厂组织形式的雇佣劳动下，时间成为“经济和理性的手段”（Maurer 1992，第 117 页）。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所写，资本比率规定“不得不节省时间”（MEW 23，第 500 页）。这样的时间节省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和工业化时期以前的工作习惯，还力求超出每种文化对于工作时间的束缚：对于资本而言，劳动者的所有可自己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第 280 页）。攫取资本的欲望还侵占了可自己支配的时间之外的时间：“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同上），吃饭、睡觉所需要的时间，“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甚至还有“儿童游戏的时间”（第 416—417 页）。

经济原则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工业资本主义史中的一大特点。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中将“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MEW 16，第 11 页）阐释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两种对于消费、理性标准和生产的文化含义有根本不同理解的经济学的分配斗争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3 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谈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这个王国中“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开始发展”。（MEW 25，第 828 页）在“必然王国”中，社会的基本物质需求在一定条件下产生，而主体无法自主地从自身获取该种需求。（同上）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 1989，第 237—238 页）指出，当今时代，必要性的范围在程度和特征上都与马克思时期不同。为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已完全工业化了，并且形成于“异质”的劳动，即实行社会分工并且高度专

752

业化的职业劳动之中。顾客 / 消费者 / 广告受众都无法对这种劳动及其产品施以影响。于是，自由越来越不意味着摆脱维持生活所需的劳动，而是指我们通过真正愿意并且能够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负责，为我们赢得自主的活动空间。

马克思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的观点，即劳动是诅咒，只有“安逸”才能通往自由和幸福。与斯密相反，他认为个体“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停止安逸和“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的需求。（MEGA II. 1. 2，第 499 页；MEW 42，第 512 页）马克思将通过劳动克服障碍称为“自由的实现”，他同时还指出，“外在目的”失去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而作为“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决定劳动的内容。这一目的的确立是“自我实现”，因此“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他对自由劳动的理解是“具有社会性”和“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同上）。马克思意识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并抛弃了必要性与自由、劳动与消遣之间的对立关系。

753

参考文献：

R. Ahrbeck, *Die allseitig entwickelte Persönlichkei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humanistischen Bildungsideals*, Berlin/DDR 1984; Ch. Fourier, »Die zwei Ziele der Sozietären Theorie. Manuskript (1826)«, in: ders.,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Eine Textauswahl*, hgg. v. L. Zahn, Berlin/DDR 1980; A. Gorz,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Vernunft*, Berlin/W 1989; A. Heller, *Theorie der Bedürfnisse bei Marx*, Berlin/W 1976; F. Klüber, *Der Umbruch des Denkens in der katholischen Soziallehre*, Köln 1982; L. Kofler, *Zur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Halle 1948 (2. Aufl. Neuwied-Berlin 1967; Neubearb. Berlin 1992); A. Maurer, *Alles eine Frage der Zeit? Die Zweckrationalisierung von Arbeitszeit und Lebenszeit*, Berlin 1992; O.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M 1982; J. J. Rousseau, *Emil oder über die Erziehung*, hgg. v. H. Denhardt, 2 Bde., Leipzig 1945; C.-H. De Saint-Simon, »Über die Bourbonen und die Stuarts« (1822), in: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 A. Toepel, Berlin/DDR 1971; M. Walzer, *Sphären der Gerechtigkeit. Ein Plädoyer für Pluralität und Gleichheit*, Frankfurt/M-New York 1992; L. Zahn, *Utopischer Sozialismus und Ökonomiekritik. Eine ökonomie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zu den theoretischen Quellen des Marxismus*, Berlin/DDR 1984.

754

福尔克尔·格兰佐（Volker Gransow）、冈特·维林撰
赵宇婷译，李牧今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Arbeiterklasse,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Ausbeutung, Befriedigung, Beruf, Besitz/Eigentum, Bourgeoisie,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Fabrik, Faulheit, Feudalismus, Fourierismus, Frauenarbeit, Freiheit,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Kopf/Hand,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bensweise, Lumpenproletariat, Mehrarbeit, Mehrprodukt, Menschenbild,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tur, Notwendigkeit, Ökonomie der Zeit,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duktivität, Spiel, Surplus, utopischer Sozialismus, Zeit

二

如果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包括特定的历史道德时期，即不依赖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工人生活的费用”（Engels，MEW 20，第 180 页）的时期，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目标冲突和盲点。通过专注于有偿就业的社会劳动和缩短工作日，以及企业家不断尝试将潜在的可支配时间最大可能地部分转变为剩余劳动，整个社会劳动的非营利部分就从分析中消失了，实际上，家务劳动的问题被转交给了在历史中偶然发展出来的父权制。马克思早先将“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视为历史上“最早的所有制”，其内涵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MEW 3，32）后来的分析研究将社会总财富作为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却没有关注这部分劳动的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的妇女运动中出现了**关于家务的辩论**（*Hausarbeitsdebatte*），它对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进行了批判，并进一步关注了对工薪阶层解放。（比如：Dalla Costa 1973；Dietrich 1984；Haug und Hauser 1984；Mies 1981；Neunüss 1985；Secombe 1974；v. Werlhof 1978）这一没有全面考虑到社会总劳动或妇女家庭劳动的批判有着对于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某种限定，即将整个社会主义解放宏图作为男性建构的延伸：“仅仅是妇女运动的存在本身就表达了妇女对于通过劳动获得解放这一神话的否认，同时妇女运动必须持续以不同的行动来坚持这一立场。”（Dalla Costa，第 57 页）女权主义研究和行动的重点变为了性（Mitchell，1975）、暴力、堕胎、意识和文化（Rowbotham 1979，1993），以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联系的问题（比如：Hartmann 1981；I. Young 1981；K. Young 等 1981）。

在可自己支配的时间这一问题上，人们对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进行了构想，

展望了变革性的力量和未来的前景。20世纪80和90年代，劳动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高的确带来了劳动时间的显著缩短，却实际上导致了结构性失业现象的增加，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奥斯卡·内格特在他关于劳动时间的著作的“作为生活必需的劳动——只有乌托邦还是现实的”（第165页及以下）一章中作出了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劳动时间是探讨劳动理想的核心，工作时间的缩短是人们共同装点生活的根本途径：“生产者是社会机制中的附属品，他们随着这个机制运转并服从这个机制的法则，相互关联，共同协作，从而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将他们主要的社会想象和工作精力集中于政治的集体劳动中。抛弃对于工作岗位的担忧，尤其是抛弃物质层面的对于日常生计的忧虑，使得人们有机会拓展劳动的范围，投身于政治、文化和具有创造性的领域。”（第214页）对自己时间的自由支配使人们能够在政治上不听凭代表的决定，在文化上积极促进公民倡议活动，并开展更多有创见的行动。想象这些人的确很好。不过有个问题被忽视了，奥斯卡·内格特在先前的分析中忘记了，危机现象与生活而生产领域有关——包括生活环境、居住、意识产业（Bewußtseinsindustrie）、自由和道德——它们都是需要组织建构的。孩童的照料以及个体身体和心灵的重建不也同样应予以考虑吗？亨利·列斐弗尔（1945/1977，I，第96页）是最早强调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处于闲暇时间中的生活仍受到制约，休息逆转了异化的劳动时间。——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实际上没有“闲暇时间”，而可自己支配的时间便发展为寻找自我身份的问题。（Haug/Hauser 1988）在将食品生产贬低为“生活生产”的商品这一前提下，每种解放的设想必须被预见为社会生产的重新调整和新的社会契约（同时也是性别契约）。这将可自己支配的时间这一问题如同其他对于财富的构想一样置于权衡之中。对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支配不仅仅是资本和劳动之间交战的领域，它同时也是争取有价值的文明模式的斗争。理论上，这种文明模式可以表述为通过减少生产中的工作份额而“放弃”可自己支配的时间的进一步延长，或是有计划地利用可自己支配的时间参与对社会与环境必要的活动。（参见Haug 1990）

756

参考文献：

M. Dalla Costa, »Die Frauen und der Umsturz der Gesellschaft«, in: dies. u. S. James (Hg.), *Die Macht der Frauen und der Umsturz der Gesellschaft*, Berlin/W 1973, 27-66; G. Dietrich, »Die unvollendete Aufgabe einer marxistischen Fassung der Frauenfrage«, in: Projekt Sozialistischer

Feminismus (Hg.),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und Frauenpolitik*, Berlin/W 1984, 24-41; H.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L.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1981 (dt. Berlin/W 1983); F. Haug, »Ökonomie der Zeit, darin löst sich schließlich alle Ökonomie auf«, in: *Argument* 184, 32. Jg., 1990, 879-894; dies. u. K. Hauser,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Zur internationalen Diskussion um Marxismus-Feminismus«, in: Projekt Sozialistischer Feminismus (Hg.),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und Frauenpolitik*, Berlin/W 1984, 9-23, 42-102; dies, »Probleme mit weiblicher Identität«, in: dies., *Subjekt Frau*, Berlin/W 1988, 14-98;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Bd. 1, Kronberg 1945/1977; M. Mies, *Marxistischer Sozialismus und Frauenemanzipation*, Den Haag, 1981; J.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New York 1975, dt. Frankfurt/M 1976; O. Negt, *Lebendige Arbeit, enteignete Zeit. 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M 1984; C.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oder die Genossin Luxemburg bringt alles durcheinander*, Hamburg-Zürich 1985; S. Rowbotham, *Nach dem Scherbengericht.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Feminismus und Sozialismus*, London 1979, dt. Berlin 1981, Neuaufl., Hamburg 1993; W. Secombe »The Housewife and her Labour under Capit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1974, No. 83, 3-24; C. v. Werlhof, »Frauenarbeit: Der blinde Fleck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1. Jg., 1978, Nr. 1, 18-32; I.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L. Sargent, *Women and Revolution.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London 1981; dies., C. F. Wolkowitz, R. Cullagh (Hg.): *Of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Women's Subord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London 1981.

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撰

赵宇婷 译

参见：

Arbeit, Arbeitsteilung, Arbeitszeit, Armut/Reichtum, Hausarbeit/Familienarbeit, Feminismus, Frauenbewegung, Gesamtarbeit, Hausarbeitsdebatte, Patriarchat

配置（Dispositiv） 757

A: tarkība, taṣarruf, al-iʿdād al-taktīkī.

E: apparatus. – F: dispositif.

R: dispozitivnost' (Диспозиция).

S: dispositivo.

对法语术语 *dispositif* 的复制（*dispositif* 来自拉丁语 *dispono*，部署，乔治斯[Georges]译为："布置在不同地点"[此处释义取自拉丁语词典Georges中的 *dispono* 词目，后面作者引用的 *dispositio* 一词的解释同理。——译者]；*dispositio* 指军队行军、战术部署、设施、支配、安排）。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性史》（*Geschichte der Sexualität*，1977）中用这一概念详尽阐释了对"压抑假说"（Repressionshypothese）的批评。这一假说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性（Sexualität）与治理（Herrschaft）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福柯则将配置描述为机构（Institutionen）、实施程序（Praktiken）和话语（Diskurse）的支配结构（Verfügungsstruktur），在这些支配结构中，"性"在市民社会中被建立起来。根据这个想法，性压抑不是性的对立面，而是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这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的围堤（Staudamm）比喻，其恰恰是通过压抑欲望的能量而使自身提高。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中，性解放的倾向吸收了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性政治"（Sexpol）运动的思想，并盛行起来。福柯的争论与之对立：由于性是统治机制（Herrschaftsmechanismus）的结果，重要的并不是解放性，而是改变性的配置本身。而福柯此处所暗示的复兴古代师徒关系（这里的师徒关系，主要是指古希腊文化中师生分别扮演爱者和被爱者的角色。福柯的著作也详尽地讨论了古希腊的"少年爱"。——译者）的前景，当然还是含糊不清和不切实际的。

不过，性的配置这一原理对于受精神分析影响的思维方式是最有成效的理论挑战。在话语理论、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理论女权主义中，福柯的学说都得到了继承，而且它有时是出于相反的动机。其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联系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这个概念反驳了对于该对象"自然化的"理解，即"'性'是人们赋予一种历史配置的名称"（Foucault 1977，第28页）。另一方面，他将某些反抗的形式置于批判的日光中，它们在结构本身中运动，并且固化了这些结构的"权力"（Macht）。他还将这些形式与针对权力结构本身的反抗形式区分开。在研究的实践中，配置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由外向内"（PIT 1979，第201页）着手，即从某个"表面的"整体出发，研究它体现在"虚构的内向性"（illusorische Innerlichkeit）中的效果，"而不是由某个显现出来的外表，过渡到'内在的本质核心'"（Deleuze 1986，第64页）。沿着反本质主义的意图，福柯将配置的各要

素，想象成一张连接起来的“巨大表层网络（Oberflächennetz）”（1977，第 128 页）。这在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中意味着，“不要在要素中，而要在它们的划分（Gliederung）上”，也就是在分节（Artikulation）中，体会法西斯主义特有的性质。（PIT 1980，1，第 8 页）“因此，理论和实践中的战略维度涉及社会关系和形态整体的划分、它们的安排和法西斯主义的配置。”（Haug 1986，第 171 页）。

1. 福柯在分析中使用这个概念时，在术语上是不固定的，这导致这个法语术语的意义依附于使用时的上下文。配置（*Le dispositif*）在技术上被理解为装置（Anlage）、设备（Apparatur）或者机制（Mechanismus）；在法律上，它作为有效的命令（Anordnung）和规定（Verfügung）本身出现，区别于造成它们的原因和动机；它在军事上还尤其指为了贯彻某种战略进行的（物质上的）预备措施的总体。古代修辞学中，布置（*dispositio*）一词则指划分与主题相关素材的结构。（参见 Coseriu 1981，第 164—165 页）——福柯利用此类表达语义上的多样性，强调性经验化效应的生产（“一张话语、知识、快感和力量的细密网络，它被置于急流之下”，是一片“闪烁的性之光海”；1977，第 92 页）。

这些意义在其他语言中很难关联起来。于是，当这个概念在福柯关于惩戒性政权研究的德语译本（1976）中，被译成“装置”（Anlage）、“设施”（Einrichtung）、“经营”（Betrieb）等词语首次出现时，德语读者是难解其意的。对此，《性与真理》（*Sexualität und Wahrheit*）的译者进行了批评。（Raulf 1977，第 196—197 页；参见 Kammler 1986，第 244 页）由于这个概念在英语中被译成设备（*apparatus*）——这与福柯所使用的另一个术语雷同，且让人误以为要从阿尔都塞的角度去理解它——该概念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中，显然极少被留意。

福柯按照人们的要求，将配置定义为社会分析的范畴（1978，第 119—125 页），这主要是参照了结构主义的解释原则。首先，它指的是“明显的异质整体，它包含话语、机构、建筑设施、治理的决策、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还有哲学、道德或者博爱的教条，简而言之，它包含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配置本身就是那张可以连接在这些要素之间的网络”（1978，第 119—120 页）。

如果要研究的不是各要素，而是这种分节，配置其次还意味着它的要素之间“相互交错的位置交换和功能变化”（第 120 页）。在方法论上，这个思想首先在“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性（Polyvalenz）规律”（1977，第 122 页及

以下）中得到体现。这个规律告诉我们，有条理的社会结构的权力在个体中可以创造“支点”——比如内在的效果，或是对自我隐秘“真理”的渴求——这些支点同样也能起到“反抗点”的作用。这就是说，它们可能成为个体抑或集体反抗的动机。福柯坚信，出于这种动机的反抗，并不能改变造成它的支配性规定，而只是复制了“权力”的结构。

福柯对配置的第三个规定从“生成”（第 120 页）和“功能”（第 119 页）的角度出发，将配置理解为“特定历史时间点”对于“急迫问题”（*urgence*）的回应；举例来说，它可以是“重新吸收那些被解雇的人群。他们对一个本质是重商主义经济类型的社会来说，表现为一种负担”（同上）。一个能够引领研究的要点是在某个“策略性命令式”之下的一种特定的共同作用（第 120 页）：按照这一要点，社会截然不同的结构要素应当被看作一个配置。“策略性命令式”体现的是一种主体效应。因为这种效应，那些由包围着个体的整治性措施、空间上的安排和监管机构提出的或明说或暗示的过分要求，便会被转移到人的内在。因此，人们会想探寻某种配置，以便从它们在历史中的生成和效果出发，研究“个体化”和“规范化”的特定形式。

话语理论往往被人们和福柯的二级理论化（1973）概念一起讨论。研究这一点的文献就像一个概念组成的调车场。（例如 Kammler 1986；Deleuze 1986）首先需要把握的是结构性无意识这一维度：那种在要求之下对性唯命是从的谈论，会使身体的欲望向“内”，即向“意识”发生推移。在这个意义上，性的配置造成了“话语化”的结果。（Foucault 1977，第 31—32 页）这样的后果是，“性”成了一个“纯理论的要素”（第 187 页）：成了一种在构想中隐藏的东西，它在一切可能的、完全不同的现象中展现出来。“性”的话语——我们可以用不同于福柯的方式，把它理解为欲望表达的异化形式——需要这样的理念（Idee），以使其运作。起支配作用的安排，在它“支配”的话语中，结构性地藏匿了自己；在话语中，**抽象的**性（*die* Sexualität）进行着统治（用与福柯对立的方式，可以把它理解为阿尔都塞概念中的巨大的意识形态“主体”）。

据此，“个体化”和“规范化”借助了言语（即话语）的媒介。这种认识同样也构成受拉康启发的“主体效应”理念，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基础。然而，福柯所说的“客体”却和其他人的互不相容，因为与拉康主义相反，它将分析集中在意识形态真实的物质性上，而不是集中在“语言”这个虚构的客体之上。

2. 无论是配置的反本质主义概念策略，还是它在结构与历史形成的视角之间的连接，都让这个概念早早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接受。普兰查斯直接将其纳入了他的国家理论（1978）中。意识形态理论计划致力于在现实中“寻找意识形态化的事物”，“并把它当作社会关系中……外在的规定进行研究”。（PIT 1979，第 180 页）女权主义理论家们（Haug 1983，Hauser 1983）曾将福柯的课题转变为对特定性经验化配置（Sexualisierungsdispositiv）的追问，这种配置把“女性特征”（Weiblichkeit）当作受他人支配的个体形式生产出来。

将福柯的“配置”这一概念的“头和脚倒置过来”（PIT 1979，第 180 页），这个要求在比喻上是矛盾的：该如何将一张“表面网络”倒置过来呢？这体现出一个未经思考的悖论，即唯物主义地批判一个反唯心主义的概念。要是遵循了福柯对概念操作式的使用，这一意图也就没有必要了。在解读者之间的争论中，它是必要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对于配置的反思中，就需要留心意识形态的陷阱。

这里先讨论一个众人皆知的难题，那就是“福柯拒绝提出权力物质性的依据，进而拒绝了为国家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作用提供根据”（Poulantzas 1978，第 60 页）。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认为，“社会的规定，即整体的配置”（1993，第 113 页）体现在劳动分工、阶级统治和国家的结构之中：这种结构是一种瓦解（Zer-Setzung）着的确立（Setzung）（第 156 页），它建立了权能的有无（In/Kompetenzen）和个体化的形式。“这些关系不受支配，它们是支配本身。”（第 160 页）“作为主体的配置，国家出现了，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和政治形态。”（第 128 页）那些拥有各自实践形式的不同社会领域（经济、政治、艺术等）具有的独特性，“取决于整体的结构，即各个社会空间的规定。……正是这种规定以荒谬的方式，把自己展现成命运的安排（Fügung）：某种程度上，这是社会的策略性部分。这便是社会的配置，也是支配着的规定，而社会中的斗争最终也围绕着这种结构。因此，这种结构一直处于运动中。伴随着它，每个单独空间的内在本质也在各自发生变化。因而，这些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部内在的历史”（第 143—144 页）。配置这里指社会化联系具体的、历史的整体。

普兰查斯让人们注意到，福柯“粉碎成分子微观网络的权力概念，恰恰在国家的扩张和影响达到迄今为止没有过的规模时，获得了成功”。与此相反，他则坚持“国家的中心地位”（1978，第 41 页）。他使用福柯这个概念时，参照了阿

尔都塞，以此思考意识形态特有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使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它对于经济条件的相对独立性：这可以发生在“大众持续远离决策中心这样的配置中”（第 53 页），或是通过“将社会的经济单元（Monaden），转化为法律政治的个体—个人—主体”（第 58 页）等等。回过头看可以发现，这里继承了马克思《论犹太问题》中对于“私人性、政治和道德配置的概述”（Haug 1993，第 157 页）。不过马克思并没有继续追问社会机构的构成如何发生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对普兰查斯来说，权力配置中的规范化和个体化，“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劳动分工的物质形态，……也是国家程序和技术的物质效果”（第 59 页）。

3. 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配置的尝试，容易陷入一个风险，那就是让这个概念重新本质化，并且（正如一个女历史学家批判的那样）会把在福柯的讨论中重新出现的“完全非人格化的新的庞大主体”，例如抽象的话语、知识、语言和权力（*der* Diskurs，*das* Wissen, *die* Sprache，*die* Macht）（Honegger 1982，第 508 页），替换为“经济”或者“国家”。因此，对于批判而言，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解构的方法比较合适。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配置”理解成某个结构关系或“图式”（Diagramm）的具象化（Konkretionen）。这样，他将指引性的要点转向了福柯使用过的概念，以此，他将边沁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描述为“被还原为理想形式的权力机制”，也就是“一种政治技术的形态，它能够，且必须要从它专门的应用中抽离出来”。（1976，第 264 页）德勒兹的“图式”是一种抽象的样式（Schema），它在每个特定的领域中被具体化，是一种组织“质料”的“形式”。（1986，第 51 页）普兰查斯曾将“这个据称是颠覆性的发现”，鉴定为“结构主义古老的结构性同族”。（1978，第 60 页）这个“隐藏的神”没有经济基础；德勒兹写道：“整体的经济，比如车间或工厂，已经把这些权力机制作为先决条件。”（第 42 页）德勒兹依据《反俄狄浦斯》（*Anti-Ödipus*，Deleuze/Guattari 1972）一书中对具体机器和抽象机器作出的区分，得出以下结论：“具体的机器就是配置；抽象的机器就是非正式的图式。”（1986，第 59 页）这位福柯的阐释者在作更新一些的释义时认识到，人们也可有“‘抽象’和‘具体’配置的说法”（Kammler 1986，第 163 页），以此类推。德勒兹将表现为“抽象机器”的“图式”（图式又可以理解为“抽象的配置”），规定为“康德图式的类似物”。（1987，第 114 页）他在认识论上，将目光从权力的配置，

重新投向一切看与说的超越性“先天”（Apriori）。（第 119 页）

尽管这样会出现“从表象的外在到‘内在本质核心’”（Deleuze）的倒退，福柯还是将先验哲学的解读和他的讨论互相联系起来。哈贝马斯因而认为，福柯的权力概念“恰恰是取自意识哲学的总目”（1985，第 323 页）。不过这个难题更多地源自哲学充满窘境的基本结构，即哲学的话语“在现实中（de facto）和规则中（de jure），……都不得不脱离支撑它们自身的见解：这些话语自身必须具备自己的规范性”（Derrida 1972，第 86 页）。至于这种情况是在哲学家“为了他人（也就是说为自己）反思”（第 96 页）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还是说福柯仅仅是老练地与他周围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环境达成一致，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至少，豪格对于意识哲学配置的研究（1984）从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评中收获了一个噱头，那就是可以探寻福柯权力哲学的配置。

4. 普兰查斯认为，“福柯的分析出现困难的症结”在于，“那些著名的‘反抗’权力的方式缺乏基础”：福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且不可逃避的现实”，那就是“斗争起初就总是存在的，它们主要是建立在剥削之上”。（第 71 页；参见第 137 页）按照他的观点，本应当在一个充满冲突的区域中来思考权力的配置，它并不是由配置本身建立的。“与福柯严格区分意识形态规训和规范化的观点截然相反（因为对他来说意识形态只存在于理念中）”（第 59 页），普兰查斯在配置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社会化形式独有的物质性。这是意识形态理论计划对此进行接受的初衷（PIT 1979 及 1980；Haug 1993）。

763

哈贝马斯从反面出发，认为福柯的概念试图在“策略性行动”的条条框框中解释权力的构成，进而陷入了困难。福柯“**破碎的权力化**这一概念，对解释现代的晦暗现象无能为力”（1985，第 343 页）。批判理论的后继者们在这一概念中，既找到了自己的先驱，也找到了自己的对手：当马尔库塞把“解放受到监管，变得商业化……并遭到统治这类当代的现象”（第 341 页），解读成“压迫的去升华”（repressive Entsublimierung）（1964，第 76 页及以下）时，他至少还保留了一种“解放的去升华的前景”（Habermas，第 341 页）。而福柯则用他“对‘单一维度社会’的新见解”（Honneth 1986，第 219 页），“对启蒙辩证法展开了系统性的分解”，而且他也没有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融合形式”提供“行之有效的工具”（第 223 页）。接受一种“社会融合的机制”的存在，“如语言，……它就可以把个体化效应解释

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尽管这种机制遭到了“权力理论家福柯”和“制度主义者盖伦（Gehlen）”在意识哲学层面上的排挤。（Habermas，第337页）该机制能提供一种《权力批判》（*Kritik der Macht*，Honneth 1986）的立场，这样的立场能使社会化的获得成功的理想，摆脱权力的配置。

如果对于解放的愿望不仅仅满足于“保留了它的可能性”，那么福柯“有益的地方”（Hauser 1983，第140页）就在于，他没有要求提供一种“理论”，而是想要提供一种“对权力的分析”（Foucault 1977，第102页）。普兰查斯建议，要将“福柯的二级认识论话语（epistemologischer Diskurs zweiten Grades）”（1978，第60页），也就是在诠释他思想的争论中进行的向主体哲学的转移，与他作的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很明显，配置这个概念的实践性价值在于，它反对对于“权力”的抽象认识，而着眼于
764 对统治中起作用的机能进行具体的干预，使其不同时陷于未经思考的反抗辩证法中。不过问题在于，能否对机制进行“功能改造”（Haug 1993，第48页），从而使改变异治的（fremdbestimmter）社会化配置本身成为可能。

一种批评认为，在福柯的“理论预设”中，“人可能实现的自治——作为人未来可能的社会化形式——已经被排除”（Hauser 1983，第142页）。这种批评也代表了意识形态理论计划（PIT，1979）的方法。它有一种风险，那就是会重复哈贝马斯学派批评的手法，诱导人们“从内部”思考自治。将他治（fremdbestimmter）社会化形式的配置，纳入绝对自治（selbstbestimmung），这种理想继承了马克思的愿景，但这种愿景被国家社会主义留下的经验带入了危机。福柯的方法与之相比，在历史的经验中显得更合理。豪格曾在“结构性霸权”（1985）的课题中提出，不从“主体”的角度，而要从社会化配置的角度出发，思考自我的社会化。这种思考对一种配置的现实性（它对福柯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进行实验，它们的权力效应不产生异治的结构，而是产生一种社会权限，也就是说它们不形成“支配性的”规定，而是形成“可支配”的规定。或许马克思主义福柯批评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尤尔根·哈贝马斯倒置过来。

参考文献：

E. Coseriu, *Textlinguistik. Eine Einfiihrung*. Tübingen ²1981; G. Deleuze, *Foucault* (1986), Frankfurt/M 1987; ders. u. F. Guattari, *Anti-Ödipus. Kapitalismus und Schizophrenie I* (1972), Frankfurt/M 1974; J. Derrida, *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 (1967), Frankfurt/M 1976; M. Foucault, *Die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1969), Frankfurt/

M 1973; ders.,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1975), Frankfurt/M 1976; ders.,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Bd. 1: *Der Wille zum Wissen*, Frankfurt/M 1977 (*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I*, Paris 1976); ders., »Ein Spiel um die Psychoanalyse. Gespräch mit Angehörigen des Departement de Psychanalyse der Universität Paris/Vincennes«, (1977), in: *Dispositive der Macht*, Berlin/W 1978; J.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85; W. F. Haug,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ßtseins. Zur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Berlin/W 1984, 9-95; ders., »Strukturelle Hegemonie« (1981),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158-184; ders.,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Die Ideologie der gesunden Normalität und die Ausrottungspolitiken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1986), AS 80, Hamburg ²1987;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K. Hauser, »Sexualität und Macht«, in: F. Haug (Hg.), *Sexualisierung der Körper*, Berlin/W 1983, 125-159; C. Honegger, »Michel Foucault und die serielle Geschichte«, in: *Merkur*, 36. Jg. 1982, H. 5, 500-523; A.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Frankfurt/M 1986; C. Kammler, *Michel Foucault. Eine kritische Analyse seines Werks*, Bonn 1986;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chriften 7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N. Poulantzas, *Staatstheorie* (1977), Hamburg 1978;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W 1979; dass., *Faschismus und Ideologie*, 2 Bde., Berlin/W 1980; U. Raulf, *Das normale Leben. Michel Foucaults Theorie der Normalisierungsmacht*, Diss., Marburg 1977.

托马斯·劳格施廷 撰

刘宇辰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lthusser-Schule, Artikulation/Gliederung, Basis, Determinismus (II), Diskursanalyse, Diskurstheorie, Disziplin, Essentialismus, Ideologie-Theorie,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deologische Subjektion, Kräfteverhältnisse, Macht, Normalisierung, Psychoanalyse und Marxismus, Subjekt-Effekt, Sexpol, Sexualität, Sprache, Subjekt-Effekt, Wahrheit, Wissen

765

持异议者（Dissident[innlen）

A: munshaqqūn, munshaqqāt.

E: dissidents. – F: dissident(e)s.

R: dissidenty, dissidentki (диссиденты, диссидентки).

S: disidentes.

持异议者源于拉丁语 *dissidens*（字面意思：旁坐），意思是与某人意见不一致。持异议者指的是那些所持观点与主流政治观、世界观或宗教基本原则有偏差的人群（持不同意见者、异党分子）。在 18 世纪的英国，“持异议者”尤指那些拥有不同态度并积极倡导资产阶级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异教人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那些公开并明确表达出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统治形式持对立立场的知识分子被统称为持异议者。

1. 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持异议这一现象的历史背景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的政治发展。当时，工会、青年组织、苏联共产党的地方组织以及女性组织均被剥夺了政治独立权，与此同时，应当扮演领袖角色的学界与媒体也被以斯大林为领导的中央委员会强制管束。在苏联的官方叙事中，在 1934 年召开的第十七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背景下，异党派已不复存在，因而在此届党代会上他们宣称了实质上（在国民经济和思想教育领域）的成功。而托洛茨基主义这样的分裂政党也像公然背离的个体知识分子一样，作出了反共产主义的回应（Arthur Koestler，Manès Sperber 等）。一方面，当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和平共处之上并且不再能够摆脱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时，持异议者的历史时刻才得以出现；另一方面，后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人类文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丧失了其霸权力量，尽管这被当权者称为停滞期。持异议者出现在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环境中，在政治上被国家垄断所压制。

持异议者的运动由不同的知识分子引导，早在 1956 年苏联的学生起义就宣告了这一运动的开端，直到 70 年代逐渐形成与当权党派相对的反对党。出版与传播当时的禁书或者被当局严查的书籍以及对政治犯的支持等，都是持异议者运动的主要支撑活动。（参见 Lecourt，1984）持异议者一致要求公民权利，以及言论、集会、宗教和新闻出版自由，这些方面都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比如赫尔辛基协议）。此外，持异议者在对未来苏联社会的设想上也有其独特的见解。

一般来说，持异议者通常被分为两大派别。一类如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j Sacharow）和罗伊·麦德维杰夫（Roy Medwedew）等人，他们强调在苏联社会内部进行民主化的可能性；另一类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schenizyn）等人则控诉苏联社会主义的“无神论”。（参见 Lecourt）有些人还看到了持异议者内部的进一步分歧：一些人像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左派反对党”一样，支持搞一场改变一切的革命，另一些则谴责诸如文化单一性这样的特定

弊端。（参见 *Frauen und Osteuropa*）但是他们所有人都一致遭到当局迫害，在不同国家程度有所不同，有诸如工作禁止、放逐、强制心理治疗，驱逐出境或者非人虐待等形式。（参见 Solschenizyn 1962；Wulff 1978）很多持不同意见者都被迫流放国外。

2. 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作为持异议方出现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对持异议者有着一种特殊的论调。乍一看，持异议和传统正统思想相对立，但是，仔细思考后会发现，只要正统思想为官方
767 意识形态或者“国教”（Lefebvre，1962，第 24—40 页；1978，第 30—47 页）服务，持异议的对立面就是教条主义。在这样的条件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成为持异议者，除非他们赞同将这种暂时的必要状态视作马克思主义的顽固不化。

和西方国家的左派合作对于大部分左派持异议者来说都是自保和/或宣扬其政治观点的唯一方法，比如在西欧国家撰写和传播地下文章。鲁道夫·巴罗因为在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发表名为《批判现存社会主义》（*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一书而于 1977 年在原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捕，但他却在 1979 年由于国际声援被释放回西德。他主要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社会主义经济。（参见 1990，第 312 页）

总的来说，持异议者要在苏联（以及波兰、斯洛伐克或者匈牙利）掀起群体性运动很困难（参见 Pljuschtsch 1978）；对于西方左派来说，要和持异议者实现团结也有一定难度（参见 Singer 1978）。当时的主流思想是，持异议这种现象证明了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的不人道的特征。从 1952 年萨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左派的影响，他毫无保留地为苏联说话（参见 Rossanda 1979），尽管他在其小说里（如当时一部没完成的文学作品《最后的机会》[*Die letzte Chance*]）分析了个体的矛盾，并指出不管是在法国共产党之内还是之外都能人道地行事（参见 Sartre 1986，第 172 页及以下）。此外，许多西欧共产党对苏联的依赖阻碍了他们与反对派运动富有成效的接触。

即使一些其他的社会运动，例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瑞典、法国等国的）一些自主的社会主义女性组织试图与持异议者们团结，同样面临重重困难。他们当时不仅面临联系上的困难（出入境、信件往来），同时持异议运动内部还有特权倾向。在 1979 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之时，一本女权杂志抵挡住所有阻力，首次以地下刊物的形式发表文章，并指出其目标在于为各

方搭建讨论平台。这些刊物由持异议运动中的女性们出版，然而她们在1980年
768 均被驱逐出境。西欧各国的女权主义者翻译了这些期刊，为独立的团结运动提供思路，并向公众宣传苏联的女性境况。（参见词目 *Frauen und Osteuropa*）这些地下的女性组织已经在当时分裂为宗教和社会主义两派。

《宣言报》（*Il Manifesto*）于1977年在威尼斯组织召开了持异议者的代表大会，由罗桑娜·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所撰写的开幕词中所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不止团结问题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来自苏联、斯洛伐克、波兰和古巴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均参加了此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罗桑达谴责西方左派拒绝解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忽视这个团体的内在障碍。她提到，持异议不仅仅是政治权利的要求，还应被理解为西欧没发生革命的原因。由于左派不清楚其他地区的革命历史进程，因而也就丢失了他们自己的历史线索。（参见1979，第27页）罗桑达批评了苏联的经济组织和如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西欧学者的设想，指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仅由单方面的财产所有权的关系而定，这个设想是欠妥的。他们忽视了这一点，从私有制向国有制的过渡不仅仅是接受国家整体，其中的每个矛盾都包含阻力，并且是一个在前进中变僵化的社会。罗桑达指出，工人阶层依旧是完全剩余经济价值的来源。（参见1979，第32页及以下）

夏尔·贝特兰在支持马克思时也持类似观点（MEW 25，第884页及以下，以及 *Gr*，第76页），他认为，“生产过程的形式和分配形式都表明，在苏联的企业里复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此外，他还指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复制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同时，也会通过“对人民的过度剥削”引发一场“永久的危机”。（参见1979，第105—106页）对于罗桑达而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意味着某些特定的、相互牵制的因素的瓦解和重新组合：“生产关系、工作分工和过渡阶段。”（参见1979，第31页）

由于对持异议者成员的镇压和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Gorki），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境内的持异议运动持续低迷。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反对派力量才再次得到提升。经济改革促 769
进了苏联境内（Gorbatschow 1987）和依赖于苏联的其他国家针对不同反对派团体之间矛盾的对话和公开调停。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崩塌，新的问题又随之浮现。东西两德的统一与东德内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派运动有着紧密联系（这些东德反对派最初追求的是民

主形式的社会主义），因而他们被指责未在民主德国政权内部坚定不移地履行他们作为反对派应该有的责任。这实际上都有利于西德文化对东德文化的覆盖，比如围绕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展开的讨论。（参见Rossanda 1994，第222页及以下，Anz 1991）许多问题，如欧洲左派政治主体、有群众参与的民主结构、生态学、生产和性别关系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都在持异议者的背景下被提出，但直到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瓦解时，这些问题依旧在很大程度上未被解决。这可能也导致了在此之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在重新制定内容和组织时变得更加困难。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所有后苏联社会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个突出的事实：尤其是先前的社会主义持异议者在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设计。

参考文献：

T. Anz (Hg.), *»Es geht nicht um Christa Wolf«. Der Literaturstreit im vereinte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1;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Köln 1979, ²1990; N. Baranskaja, *Woche um Woche. Frauen in der Sowjetunion*, Moskau 1969 (Darmstadt-Neuwied 1979); C. Bettelheim, »Über die Natur der sowjetischen Gesellschaft«, in: ders. u.a., *Zurückforderung der Zukunft. Macht und Opposition in den nachrevolutionär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1979, 101-106; »Frauen und Osteuropa«, Einführung, in: *Die Frau und Rußland*, Almanach No. 1, Textauswahl aus Almanach No. 2, *Marija*, Nr. 1, München 1980, 7-25; M. Gorbatschow, *Perestroika. Die zweite russische Revolution, eine neue Politik für Europa und die Welt*, München 1987; C. Hanson u. K. Liden, *Unerlaubte Gespräche mit Moskauer Frauen*, München 1983;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D. Lecourt, »Dissidenz«, in: KWM 2, 1984, 272ff; H. Lefebvre, *Introduction à la modernité*, Paris 1962 (dt. von B. Schwibs, mit unausgewiesenen Auslassungen und Veränderungen: *Einführung in die Modernität*, Frankfurt/M 1978); L. Pljuschtsch, »Wir werden entweder gemeinsam vorankommen oder gemeinsam untergehen«, in: Bettelheim u.a. 1979, 54-62; R. Rossanda, »Macht und Opposition in den nachrevolutionären Ländern«, in: Bettelheim u.a. 1979, 19-36; dies., *Auch für mich. Aufsätze zu Politik und Kultur*, Hamburg 1994; J.-P. Sartre, *Die letzte Chance*, Reinbek 1986; D. Singer, »Schwächen und Chancen des Dissenses in der UdSSR«, in Bettelheim u.a. 1979, 39-53; A. Solschenizyn, *Ein Tag im Leben des Iwan Denissowitsch*, Moskau 1962 (dt. 1963);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engl. 1963), Frankfurt/M 1987; E. Wulff, »Politische Indienstnahme der Psychiatrie in West und Ost«, in: *Argument*, 20. Jg., 1978, Nr. 110, 503-517 (Teil I),

Nr. 111, 672-702 (Teil II).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 撰
王媛媛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lltag, Arbeiterbewegung, Autorität,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ürgerrechte, Bür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Dogmatismus, Frauenbewegung, Öffentlichkeit, Ökosozialismus, Orthodoxie, Perestrojka, Pressefreiheit,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Revolution,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Subjekt, Zivilgesellschaft, Zweifel

分配（Distribution）

A: tauzi^{e}. – E: distribution. - F: distribution.

R: raspredelenie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S: distribución.

所有社会形态都可以根据其对资源和机会以及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品如生产和消费资料、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以及决策权力的分配（Verteilung）来加以描述。分配不仅涉及个人和群体，而且还决定了特定的生产部门与生产单位或者特定的区域等所能得到的份额。在早期社会中，生产资料和生产条件（如土地、牲畜、工具，同时也有武器或者贮存设施）的分配以及生活资料的分配随着分工过程的发展而发展。当时的分配通过原始的公社机关以直接和自然的方式进行。伴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产生了通过市场进行的分配。这一进程与私有制的发展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分配关系围绕着作为金钱与物品、物质设施、有价值的信息、对自然资源的占有需求、劳动能力和消费能力、特权、荣誉头衔和官职等的资本进行。

有各种不同的原则适用于分配：原则上的权利平等，对劳动产出的评估，需求的任意性，占有关系，年龄次序，出身、性别或者宗教的优势，与“教父”的关系等。是应该每个人都获得相同数量的分配，还是“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分配！庸人们一直对其念念不忘。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全部想象都存在于分配之中。”（Kautsky 1892，第156页）不平等的分配会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的社会形态存在于象征世界（Symbolwelten）、群体、冲突、权力和统治之中。（参见Nahr 1977，第11页）

1. 平等和公正是底层社会人民的原始梦想。在《旧约》的社会立法中写道：“既不要给我贫困，也不要给我富足。”

(*Sprüche* 30，8）贫穷与公正的分配从而与上帝的意志相矛盾，而富足则招致上帝的惩戒："可叹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Micha* 2，2；参见 Farmer 1969，第 15—20 页）在《新约》中则将与税收关联的财富分配描述为神圣的。使徒保罗负责筹集国家公职人员的生活费用，并要求罗马人交税，因为"国家权力的代行者是在履行上帝的托付"(*Römer* 13，6)。

除了那种与国家法律一致的普遍性公正以外，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与比例相符的公正。这种公正以"补偿"(交换的）公正以及分配公正的形式存在。**交换公正**（*kommutative Gerechtigkeit*）普遍存在于在法律上具有同等地位者的付出与回报之间，比如存在于买方和卖方、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而分配公正（διανεμητικὸν δίκαιον，*EN*，1131b 27，*iustitia distributiva*）则涉及"荣誉、金钱以及其他能够在城邦（Politeia）共同体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事物"(*EN*，1130b 31f)。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平等，而是合乎比例，是不平等的存在之间的合适性。例如，按照分配公正的理念，国家公职会按照德行和教育进行分配：人们的能力越高，则得到的职位也越高。而在交换公正的情况下，成就与补偿作为大小相当的量，能够直接互相参照，并由此产生某种算术上的平等，而在分配公正理念下，根据"几何的"比例制原则（参见 1131b 13）每个人获得他所应得的。在维护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贫困和富有的过分集中非常危险，因为这可能导致暴动（στάσις)。(参见 Schefold，1989，第 44—45 页；Klenner 1994，第 15 页；R. Müller 1980，第 168 页)。 77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o）认为，在买卖进行中，如果一方可以得到基于平等原则（aequalitas）而应获得之物时，那平等就能够实现。(*Summa*，II. II，80，1）在更多地存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分配公正（*iustitia distributiva*）中，这种平等是难以实现的。这一分配公正存在于分配之中（I，21，1），并且通过上帝、统治者或者某个管理机构按照普遍认可的传统加以保障。私人利益在此被置于全体、团体、社会或是教会等的利益之下。(参见 Gurjewitsch 1983，第 326—329 页；Beutter 1989，第 56 页及以下)

2. 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中的个人主义意味着传统的分配模式消失了。(参见 Vobruba 1991，第 12 页）分配上的斗争成为一种常态。罢工、停工、占地、静坐、抵制和破坏买卖、囤积居奇、操纵证券、货币贬值、征收关税、税收负担、税务欺诈和资本转移等都是其表现形式。这样一来，对于企

业工资、股息、利息、佣金、贸易差额、工资、补贴、地价、出让金、租金、费用、自然资源价格、税费来说，分配尺度是不断更新的。

从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提出相较于其对手荷兰和法国，英国的财富是如何增长的这一问题以来，分配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开始成为一个主题。假如充分利用当地优势并支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参见 第 224 页；Klingen 1992，第 58—62 页），小国在财富积累上完全可以和更大的国家并驾齐驱（参见 1690，第 223 页）；如果所得能够应用“在生产上”的话，那么财富就能够进一步增长。因此配第呼吁实行就业计划和国家的贫困救济措施。相关的支出应该通过再分配提供，如“削减教会支出”和“取消冗余的和过时的官职”。（1662，第 33—34 页）在配第看来，内战的原因也在于整个国家的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分配和再分配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与交换和市场相关。这一经济关系既能够与经济繁荣、秩序和个体自主性共生，同时也能够与贫困、混乱和压迫并存。

773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研究了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净产品的分配是如何进行的。土地所有者无需参与生产，就以土地租金的形式获得净产品。这样一来，他便使“国民收入”的分配依赖于所有制关系了。（参见 Diehl 1922，第 148—149 页）

对国民财富的研究，即哪种要素应当被视为使国民得到充足物品供给的原因，以及财富“在各个阶级的人民之中如何以自然的方式进行分配”所应遵循的“规律”（*Reichtum*，I，第 9 页），是亚当·斯密的核心关切。剩余，即非工人阶级的各阶级分得的产品份额，由两部分组成：地租和利润。企业主和工人在工资上有着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因此就会产生“斗争”。（参见 I，第 89 页）为公共财政支出（国防、法律保护、国民教育、经济基础设施）进行的税收以及所有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养老金）必须由这三种收入来支付。（III，第 216 页）由于对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会损害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因此斯密要求征收一定的收入税，以抵消耗资巨大的国家开支。（参见 Fellmeth 1981，第 54 页及以下）

对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来说，“政治经济学主要的问题”在于制定法律以确认社会总产品份额的分配，这些份额以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形式构成了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阶级收入。（*Grundsätze*，第 3 页）他在一个充满极端的分配斗争的时代创作了他的主要作品。上升的税收负担、货币贬值、针对谷物法的“面包起义”、针对最低

工资法的骚动以及捣毁机器运动，在19世纪初震撼了整个英国社会。（参见Thompson 1963，第628—633页）李嘉图的理论的中心是将社会中的剩余产品（Surplus）定义为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商品的总量与生产这些商品的所有必需支出（原材料、机器折旧、工人必需的消费资料）的总额之间的差额。（参见Dobb 1973，第80—81页；Schrader 1980，第156—157页）

把剩余产品按地租和利润进行的分配可以通过生产条件来加以解释。如果生产率提高了，就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国民财富就会增长。地租就是最肥沃的土地和最贫瘠的土地之间的收成的差额。工资就是维持工人阶级生活所必要的消费资料的价格，而利润就是工厂主为其高风险的资本投资所获得的补偿。只有在分配问题上，李嘉图才坦承有必要用价值量的单位衡量社会剩余和必要消费。尽管工资是“毫无疑问……表现在食物和生活必需消费品上”（*Grundsätze*，第77—78页），但是这些产品的价值却是变化的。例如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依赖于民众的风俗习惯”（第78页）。生活习惯的可能的改善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手工产品的价格会下降（同上），而这些产品是那些领取工资者的必需品，所以工业化的生产条件（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下）会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关系中扮演关键角色。在此，分配的社会经济规定性的初始轮廓得以呈现出来（第91页）。

在李嘉图看来，工资的增长意味着利润的下降以及可能出现的经济的停滞。为了使经济重回增长的轨道，他建议为国家开垦出新的肥沃土地。（参见*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 of Corn on the Profits of Stock*，W IV，第18页）一种基于产品分配的阶级对立由此产生。

3. 西斯蒙第对财富以创造财富为目的被积聚起来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的经济制度的谴责，开启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政治的立法“为每个工人获得一定的社会劳动的份额提供保障”（1819，1，第353页）。接着，圣西门主义者在其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批判中，主张通过“银行的整体体系”（Système général de banques）有组织地分配生产资料。（参见Gide/Rist 1923，第230—245页）在傅立叶的社会乌托邦中，那些通过联合体的合作所获得的产出应该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distribution sociétaire）分配给“劳动、资本和才能”。（1829，第213页）新的所有制关系决定了新的分配形式，即“分配公正”（第214页），这种“分配公正”是物质上的兴趣和劳动的创造性

775 得以展开的基础。对罗伯特·欧文来说，因为英国19世纪初的贫困化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即究竟如何分配那些容易生产的剩余财富以产生对整个社会都有益的效果”（*Ausgewählte Schriften*，第152页）。在他的共产主义的体系中，那些有赖于高劳动生产率而得以大量生产的物品应该不再“是争夺或者是私人欲望的对象”（第22页），而是应该根据需要进行分配。

在19世纪20和30年代，在英格兰有一批激进学者，他们自称为工人作家（*Labour Writers*），并在1900年前后被称为“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他们借鉴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参见Diehl 1922，第190页及以下；Blaug 1958；Jahn 1993，第106页及以下）如果劳动创造全部价值，那么任何对“劳动”价值的扣减，也就是对工资的扣除，都是对工人阶级收入的掠夺。地租和利息来自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对于欧文的追随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来说，“劳动和资本都掌握在相同的人手中”的、“建立在合作社基础上的劳动制度”意味着将全部产品在工人之间进行“合乎自然的分配”，并创造了实现物质解放的机会。（参见1824，第66—67页）对影响了宪章运动的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来说，只要存在利润，即“不公平的交换”，就会存在“占有之间的不平等”和阶级对抗。这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形式”没有关系。（1839，转引自Morris 1954，第122页及以下）

对蒲鲁东来说，不劳动而得到的收入——比如地租、佃租、房租、借贷利息、利润、贴水、银行贴现、分红、挂名薪水、贿赂等——都可以看作盗窃。但是为了“扭转我们的整个经济”，他却不赞同任何生产和分配的革命，而是支持流通上的改良。（1841，第323页）交换银行（Tauschbank）应该成为商品交易所，并提供无息贷款。

就像左翼宪章派一样，拉萨尔也将“十足劳动收入”的要求与建立生产者协会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全部的重点放在了消费资料的分配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收入会基于“无耻的工资法”而“被大量地剥夺，并以维持工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为限度而进行分配”（1863，第241页）。而在生产合作社中，则“完全取消了工资（Arbeitslohn），以劳动收入（Arbeitsertrag）作为劳动报酬（Vergeltung der Arbeit）取而代之”（第246—247页）。拉萨尔关于“十足劳动收入”的分配要 776
求成为统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哥达纲领》的一个要点，并且据梅林说，

它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斗争中的第一次抗争”指明了方向。（GS 2，第 43 页）考茨基在他为《埃尔福特纲领》所写的指导方针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分配的形式和种类”具有“多样的变化”。（1892，第 160—161 页）

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同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时，也联系了这一理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看法。（MEGA II. 1. 1，第 26 页；MEW 13，第 620 页）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各种经济关系当作存在于某种“纯粹反映的联系”（第 25 页；同上）中的、相互隔绝的环节：在生产中，产品为了满足需求被生产出来，而“分配则将产品按照社会法则进行分配”（第 26 页；同上）。这样便产生了“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表面的联系”（同上；第 621 页）。生产和消费的确是“一个总体的各个部分”（第 35 页；第 630 页），在这个总体中，生产应被作为决定性的环节来理解。产品的分配是生产资料的分配的“结果”，“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第 32—33 页；第 628 页）即便生产工具的分配“对于一个阶段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它在之后的生产和再生产阶段中也会成为“历史结果”。（同上）在急剧变革（革命、征服战争）时期，如果旧的所有制关系遭到破坏，产品的分配似乎就成了某种“先于经济的事实”。（同上；第 627 页）但是，通过征服、掠夺和革命建立起来的分配形式只有在与社会生产取得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具有经济意义：每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一定的分配方式”（*Ms 61-63*，MEGA II. 3. 1，第 62 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是“分配形式”。（*Einl 57*，MEGA II. 1. 1，第 31 页；MEW 13，第 626 页）它们把雇佣劳动、资本所有权和某种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设定为“生产要素”，并因此看起来“仅仅是生产要素的反面”。（同上）对李嘉图来说，分配方式从属于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领域：只有分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Grundsätze*，第 39 页）的数量维度上的特征，也就是那些可测量的财富，会发生改变。对马克思来说“真正的主题”（*Einl 57*，MEGA II. 1. 1，第 23 页；MEW 13，第 617 页）是阐述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定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出了相应的特定分配方式，然后是“同样的资本再生产方式”（第 31 页；第 626 页）。马克思不只是将分配简单地历史化，而且还将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进行阐述。这一概念把分配

的量的和质的要素同社会进程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看待，并认为前者和后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参见 Zelený 1968，第 35 页；Gey 1980，第 104 页；Poulantzas 1968，第 66 页）法律如何规定分配的形式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法律对于巩固分配关系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第 34 页；第 630 页）

《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将地租称为"分配的最新形式"（第 31 页；第 626 页），紧接着是关于收入及其来源（*Revenuen [Einkommen] und ihre Quellen*）的一章，其中的一节"（4）分配和生产关系"（MEGA II. 4. 2，第 894 页）在恩格斯作了少量的调整和修改之后，被单列为《资本论》第三卷第 51 章。在"收入"（Revenue [Einkommen]）这一日类下，马克思阐述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的阶级和阶层分化的不同情况。作为分配形式的"收入"汇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关系的各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段性地新创造出来的价值（新价值）"分解为……三部分，并呈现为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同上；MEW 25，第 884 页）：来自报酬相关的收入（工资）、来自资本占有的收入（"公司盈利＋利息"，第 838 页；第 829 页）以及基于对土地的占有而产生的收入（地租）。对这种初步划分的分析限定了"三个阶级，他们组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包括……雇佣工人、职能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第 671 页；第 632 页）。这一"**分配关系**"（第 894 页；第 884 页）在不同的层面上得到了分析（参见 Roth 1974，第 129 页；Bischoff/Otto 等 1993，第 191—196 页）。生产工人的工资在关于工业生产进程的研究框架下加以确定（参见 MEW 23，第 557—588 页），而非生产的商业劳动的报酬则包含在关于商业资本的论述中（参见 *Ms 63-67*，MEGA II. 4. 2，第 366—375 页；MEW 25，第 303—313 页）。"资本利息"、企业家报酬和地租便理所当然地被置于关于"完成形态的……平均利润率"之后了。（第 411 页；第 350 页）

通过重新分配在这三个主要阶级中 778
初始分配的社会财富，产生了二次收入（sekundäre Einkommen）。二次收入通过对"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购买而产生。（*Ms 61-63*，MEGA II. 3. 6，第 2179 页；MEW 26. 1，第 381 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官员、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都归为"非生产劳动者"。（MEGA II. 3. 2，第 460 页；MEW 26. 1，第 145 页）国家所消耗的财富的大部分都通过税收征集。因此，私人家庭的收入总额并且由此那些"由需求原则统辖的"东西都得到了调整。（*Ms 63-67*，MEGA II. 4.

2，第256页；MEW 25，第191页）“对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税收（从而它们的价格上升）”主要影响“雇佣工人的境况”，而那些资本家必须支付的税收“所改变的，只是他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份额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份额”。（MEW 23，第784页，第544页，注释10）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分配的论述中，马克思进一步抽象出了随后的再分配的各个环节。但是1857/19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却为后来打算写作的《论国家》（Vom Staat，MEW 29，第551页）安排了阐述“‘非生产’阶级、税收、国债、公共信贷”的部分（MEGA II. 1. 1，第43、151、187页；MEW 42，第42、154、188页）。特别是在《1850—1853年伦敦笔记》中，马克思研究了这一连串问题，比如税收史。（参见MEGA IV. 7，第150—154、252页；IV. 9，第357—364页）他认同李嘉图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社会经济影响的观点，并摘引了关于英国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他由此确信，国家的实际支付（Realtransfer），特别是以对国债支付利息的形式进行的实际支付，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一直在持续增长。（MEGA IV. 8，第594、733页）恩格斯在《论住房问题》（*Zur Wohnungsfrage*）中提及了“在买卖过程中的分配”及其“主要手段”，即“卖方对买方的欺诈”以及房东对房客过度取利。（MEW 18，第214、216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呈现为特定收入的不同来源。在这一经济的三位一体（Trinität）中，生产和分配的关联被打破。随着资本的社会再生产，收入的源头逐渐演变为价值的源头。作为分配形式的利润、工资和地租也因此呈现为生产形式。因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MEW 24，第437页）；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生产要素，而在工人手中它们则是收入，是工人通过付出劳动所获得的报酬（MEW 23，第557页）。平均利润表现为“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而分配给这些资本量的剩余价值的总体”（*Ms 63-67*，MEGA II. 4. 2，第250页；*K III*，MEW 25，第183页），而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这部分是职能资本家、工业家或商人在他……使用**借贷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资本所有者的”（第441页；第383页）。此外，在社会上也存在着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从总利润中扣除地租”的现象。（第838页；第829页）分配领域看似是由与生产规律、“资本主义积累规律”（MEW 23，第640页）、“剩余价值或者剩余生产”规律（第647页）和“价值规律”（*Ms 63-67*，MEGA II. 4. 2，第897页；MEW 25，第887页）

没有任何关联的独立的规律规定的。但是，“整个经济……**原则**”，即“作为人类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规定的人的行为的**劳动**”的**原则**（*Ms 61-63*，MEGA II. 3. 4，第 1361—1362 页；MEW 26. 3，第 182 页），把生产与分配、再生产与分配以及流通与分配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具有同样结构的关系。通过“按照产品各自的价值（可进一步扩展至其各自的生产价格）将其卖给不同的群体”，“社会总劳动时间”便按照比例分配给了国民经济的各个分支。（MEW 25，第 648—649 页）劳动市场的存在“本身又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劳动者的商品的劳动力同作为非劳动者的财产的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基础上”（MEW 24，第 385 页）。在分配斗争中，各个阶级争夺他们在包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在内的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参见 *Gr*，MEGA II. 1. 2，第 583—591 页；MEW 42，第 603—609 页）

只有在资本关系的掌控下，人们才能创造总体的财富，并由此创造“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础。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会对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领域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以“个人在总体劳动中所承担的生产者的份额为尺度”（*K I*，MEW 23，第 92—93 页）。在这个社会中，“具体的物质财富是为了满足那时的劳动者的发展需求”（第 649 页）。在《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其他作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按劳分配之外，还提出了这个社会的其他特征：社会全体成员在生产资料上的平等，明确的分工，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参见 MEW 19，第 20 页），存在“向完全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期”（MEW 36，第 426 页）作为中间环节的合作社生产。只有到了“更高的阶段”，当实质上的平等取代了使用生产资料的平等时，下面的口号才会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MEW 19，第 21 页）与这种分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是阶级的消亡（参见 MEW 17，第 415—416 页）、城乡对立的消失（参见 MEW 18，第 243 页）和国家职能向简单的管理工作的转变（MEW 18，第 50、308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述的分配是对“庸俗社会主义”的批判的一部分。庸俗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主要围绕着分配这一领域”（MEW 19，第 22 页）。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对“不折不扣的劳动收入”进行“公正分配”的要求，同保留再生产必需的社会总产品的要求是对立的。只有在对补偿、补充和贮存投资并为满足人民集体需求作了必要扣除之后，才能提供个人消费基金。

在经过这样的分配之后，单个生产者取回的，恰好就是他在“个人工作时间”中为社会所创造的东西。（MEW 19，第19—20 页）这样，某种形式的同等量的工作便可以与另一种形式的同等量的工作交换。“联合体的总产品”不具有任何价值形式。（参见 MEW 23，第 93 页）至于在一种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究竟如何实现个人劳动的平等，却并没有得到解释。（参见 Heinrich 1991，第 254—255 页）

5. 19 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引发了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不只是在社会民主党中进行。1872 年“讲坛社会主义者”施莫勒（Schmoller）谴责“财产和收入分配上的巨大不平等”（转引自 Boese 1939，第 10 页），并对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感到担忧。1891 年，列奥十三世（Leo XIII）在《新通谕》（*Rerum novarum*）中询问在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中企业家利润和资本收入的合理性和尺度。庞巴维克（Böhm-Bawerk）关于企业主收益的学说（1884—1889）是 19 世纪末期自由派为反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者而在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上所作的第一次大的尝试。（参见 Hennings 1989，第 180—190 页；Fuchs 1978，第 30 页及以下）庞巴维克认为，现货的价值要高于期货。利息就源于这种贬值。企业主所做的就是用现货来换取期货，这样就会产生“贴水”，而这些贴水则会进入企业家自己的腰包。（参见 1884—1889，II，第 328 页及以下）

庞巴维克曾经将分配看作一种与价格形成紧密相连的过程，而其分配学说因此也符合主观的价值理论。在“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图干-巴拉诺夫斯基（1913）对这种理论的批评中强调了分配的自发性。不同收入的比例对他来说是由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确定的；分配仅仅被看作是各阶级之间的分配斗争。布哈林批判图干-巴拉诺夫斯基“把庞巴维克和马克思混为一谈”（转引自 Fetscher 1989，第 430 页）：既然马克思在价值形成和价值分配中看到了社会总劳动及其产品的分配过程，那就必须研究资本和工作之间的分配斗争“在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下以及在价值的一般范畴下是如何表现的”（第 431 页）。

6. 十月革命之后，面对由农业主导的俄国经济的落后局面，面对战争混乱和无序，列宁一再要求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要联合起来。社会化进程应该首先包括一次“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和监督”（LW 27，第 235 页）以及对工人的权威的管理和纪律训练（参见 LW 33，第 290 页）。同时分配也是“提升产量的方式、工具和手段”（LW 32，

781

第 471 页）。

在战时共产主义中，国家承担了全部的分配职能。在强制征收生活资料之后，对这些物资的分配也无偿地按照固定的标准进行。“不劳动者不得食”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LW 27，第 385 页）接着，在新经济政策（NÖP）实行的初期，曾经存在用“实物税”来代替缴纳余粮的义务。列宁意识到，“我们不能实行直接的共产主义分配”。现在为了争取农民，应该逐渐形成一种“新经济”，这种新经济“我们已经开始在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全新的生产和全新的分配的基础上……建设起来了”，1922 年俄国共产党（RKP）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一份速写记录中这样写道。（转引自 Cakunov 1994，第 87 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阶段，葛兰西注意到“劳动和消费的人力的分配”发生了变化。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发生了变化，表现为“经济上消极的和寄生的国民”借助再分配过程而不断增长。他们的消费消耗了继续投资所需要的资源。但事实证明，高风险的股票市场或者某种其他的“寄生性官能”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说是“内在必需的”。（*Gef* 6，H. 10. II，§ 53）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苏联经济文献中，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问题并没占据核心位置。特别是在 1928—1929 年新经济政策被迫中断之后，由于不顾后果的集体化和国家推进的工业化，分配体系中没有太多可以分配的东西。

波格丹诺夫和斯科沃科夫-斯蒂凡诺夫（Skvorcov-Stephanov）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23）提出了一种对所有的生产方式同等适用的法则。对这一法则的兴趣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分配关系中。从理论渊源上来看，这和图干-巴拉诺夫斯基的学说有所关联，并且也认为分配的实质是各阶级为了获得社会收入中的份额而展开的斗争。分配是一个同经济关系分隔的领域（例如，参见学者索恩采夫 [S. Solnzew] 于 1911 年发表、1925 年重新发表的博士论文，《作为分配问题的工资》[*Der Arbeitslohn als Distributionsproblem*]，转引自 Sonina 1972，第 232 页）。

在分配领域中，苏联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工资。尽管在一系列的教材、期刊文章和专著中，工资被作为经营簿记中的标准量而加以处理（参见 Lapidus/Ostrovitjanov 1928，第 441 页），但其他政治经济学家，如沃兹涅先斯基（Wosnessenski）和斯特鲁米林（Strumilin），却将工资作为对价值创造和积累过程的监督工具、纪律工具和管理工具来加以探究。斯特鲁米林认为，鉴于大企业越来越广泛地承担起社会福利任务这

一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在以工资形式的分配为主的同时，辅之以社会消费基金形式的分配，变得越来越重要。（参见 Sonina 1974，第 238—245 页）

泰罗式的劳动组织、集中式的官僚组织以及计划和大规模生产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支点。生产被视为技术性的东西，同时“技术决定…… 一切”（Stalin，*FL*，第 401 页）。与此相反，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被视为政治性的，从而是可以加以改变的。因此，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是“价值规律……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调节劳动分配的‘份额’”（*Ökp*，AW 2，第 426 页），而是由作为生产机构直接的政治组织者的国家进行调节（参见 Marcuse，*Schriften* 6，第 125 页）。这令人联想起马克思将蒲鲁东的交换银行称作“专断的生产控制者和分配管理者”的描述。（*Gr*，MEGA II. 1. 1，第 89 页；MEW 42，第 89 页）斯大林预测，在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劳动分配的管理……会按照社会对于产品的需求的增长来进行”（AW 2，第 425 页）。但即便那时候，需求也是通过集中化的、行政式的“计划机关”来掌控的。

783

在斯大林反对“‘左倾’平均主义”的口号下，自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出现了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对生活资料的集中统一分配由于市场交易和自发经济的出现而被废止了。社会差异突然之间成了经济技术进步的“推动力”。一个针对苏联知识分子中的高层次人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Stachanowarbeiter）和“党内布尔乔亚”的全面的特权体系产生了。（参见 Medwedew 1973，第 460 页）为了论述这种在所有实行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的国家存在消费特权的合理性，按劳分配思想的辩护者通过援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材料而发挥了作用。（参见 Lopata 1982，第 76 页及以下）左派对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分配的批判（参见 Bettelheim/Dobb/Mandel 等 1969）被当作“帝国主义分化政策的一部分”（Müller 1982，第 98 页）。

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主义分配”包括为个人消费以及为生产性积累所进行的对国民收入主要部分进行的分配，这种分配“取决于相关的经济主体为社会做出的贡献”（Niesler/Pein 1989，第 1707 页）。如同《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Programm der SED*，1987，第 29 页及以下）所写的那样，这种“社会主义国家的以贡献为标准的工资政策”，被视为“对按劳分配规律的较为有效的利用的核心”。（Richter 等 1988，第 642 页）相反地，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存在着一种不考虑所做出的贡献多少而要求工资的思维。在官方（如对原料、物品、 784

能源、财政资源等）的分配之外，还产生了一种非正式的分配。这是自发经济对于可分配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长期短缺、对官僚计划体系、对市场和金钱等调节机制的取消和政治干涉的回应。流通机构及其“关系”网络则是分配的监督者。

斯大林在1952年宣称，在共产主义中，贸易不再是交换关系的形式，而变成了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这一看法以一种荒唐的形式成了现实。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非正式的分配制度化了，形成了巨大的地下经济。（参见Schneider 1992，第269页及以下）在民主德国，那些直到1990年还停留在设想中的住房建设计划被宣称为“社会政策的核心”（1987）。尽管因此在民主德国既没有了无家可归的人也没有了过分高昂的房租，但由于主观能动性被压制以及不受监督的垄断权力，这种以爱国主义形式组织实施的社会政策无法在经济、科学和技术上释放任何的激励。“社会保障和安全”（Richter等1988，第202页）这一被宣称为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势最终导致了一种“供给思维”（Versorgungsmentalität）。

7. 新古典经济理论脱离了社会分配斗争的层面。资源配置的组织原则成了经济秩序的建构性特征。欧肯（Eucken 1939）将“自由的流通经济”与“集中领导的管制经济”对立起来。分配因此是交换价值的结果，而这种交换价值则是在市场上的个体之间的交易中形成的。对生产要素占有状况的终端分配是如何形成的探究是无用的；人们更愿意在不依赖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解决配置的问题。

“新古典”思维也体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中。“社会国”及其“可以实现所有人和国民各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Orientierungsrahmen '85*，转引自Langkau等1994，第132页；参见Bischoff/Detje 1989，第109—118页），应该通过税收和信贷金融上的再分配来建立。在这种模式首先以“瑞典福利国家”的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取得成果之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社会国式的再分配及其后来越来越官僚主义的分配因为初始收入和劳动分配的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而达到了极限。

关于分配的全面讨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出现。借助凯恩斯（Keynes）的理论，人们从利用社会产品的角度来研究收入分配。卡莱斯基（Kalecki）在他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分配理论中（参见Kühne 1987，第52—59页；Winkel 1994，第141—143页）得出了凯恩斯（1930）已经宣称过的结论，即资本家在总体上是根据他们投资的规模以及他们的消费支出这些尺度来自己决定其盈利的多少。

与此相反，企业主们的市场力量在分配斗争中产生出一种趋势，即只要工会力量不进行干涉，那他们就让社会产品中的工资份额，即工资比例，保持不变。（参见 Kalecki 1939，第 13 页及以下）由于原材料和原料成本降低的影响，那些被工资份额削弱的企业力量也得到了补偿。这一进程与来自殖民地的原料的价格下降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思想也在依附理论中得到体现。

乔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即完全就业的问题和应该为谁生产什么这一问题没有联系："这主要涉及产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但是这也和人与人之间的物品分配联系在一起。……简言之，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分配理论。"（1952，第 52 页）对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危机进行的调控必须与对社会有益的生产的设想联系在一起。将生态要求纳入经济增长之中变得显而易见。（参见 Hickel 1993，第 580—581 页）如果由于生产顾及生态而造成工作机会减少，那就可能与工人阶级的分配利益产生冲突。（参见 Hoffmann 1993，第 63—64、73 页）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女性要求平等参与社会政治决策和职业生活，开始出现了"配额问题"。对女权主义的批评来说，配额的要求不仅仅是分配社会上的机会和职位的问题，它还涉及社会的整体联系。这样一来，在关于家务劳动、再生产劳动和儿童抚育任务的公平分配的讨论中，在关于劳动和教育机会的比例分配的讨论中，劳动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便同其父权主义的组织联系起来了。（参见 Kurz-Scherf 1993，第 341 页）

参考文献： 786

Ch. Bettelheim, M. Dobb, E. Mandel u.a., *Zur Kritik der Sowjetökonomie*, hgg. v. P. Strotman, Berlin/W 1969; F. Beutter, »Thomas von Aquin (1224/1225-1274) «, in: Starbatty 1989, I, 56-95; J. Bischoff u. R. Detje, *Massengesellschaft und Individualität. Krise des 'Fordismus' und die Strategie der Linken*, Hamburg 1989; J. Bischoff, A. Otto u.a., *Ausbeutung Selbstverrätselung Regulation. Der 3. Band des 'Kapital'*, Hamburg 1993; M. Blaug, *Ricardian Economics*, NEW Haven 1958; E. v.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1884-1889), 2 Bde., hgg. v. F. v. Wieser, Jena [4]1921; F. Boese, *Geschichte des Vereins für Sozialpolitik 1872-1932*, Berlin 1939; A. Bogdanov u. I. Skvorcov-Stepanov, *Kurs političeskoi ekonomii*, Moskau 1923; S.V. Cakunov, *V labirinte doktriny. Iz opyta razrabotki ekonomičeskogo kursa strany v 1920-e gody*, Moskau 1994; K. Diehl, *Theoretische Nationalökonomie*, Bd. 1, Jena 1922; R. Dlubek u. R. Merkel, *Marx und Engels über die 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81; M. Dobb, *Wert- und Verteilungstheorien seit Adam Smith* (1973), Frankfurt/M 1977; W. Eucken,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1939), Jena ⁴1944; K. Farner, *Theologie des Kommunismus?*, Frankfurt/M 1969; R. Fellmeth, *Staatsaufgaben im Spiegel politischer Ökonomie. Zum Verhältni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stätigkeiten in Werken von Adam Smith und Adolph Wagner*, München 1981; I. Fetscher, *Der Marxismus. Seine Geschichte in Dokumenten*, München-Zürich ⁵1989; Ch. Fourier, »Das sozietäre Verteilungsprinzip« (1829), in: ders.,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Schriften*, hgg. v. L. Zahn, Berlin/DDR 1980, 213-217; A. Fuchs, *Geistige Strömungen in Österreich* 1867-1918, Wien 1978; P. Gey, *Der Begriff des Eigentum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M 1980; Ch. Gide u. Ch. Rist, *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Lehrmeinungen*, Jena ³1923; A. J. Gurjewitsch, *Das Weltbild des mittelalterlichen Menschen*, Dresden 1983; M.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Hamburg 1991; K. H. Hennings, »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 in: Starbatty 1989, II, 175-190; R. Hickel, »Joan Robinson-Mit der Kritik der Marktorthodoxie weit über Keynes hinaus«, in: *Prokla*, 23. Jg., 1993, Nr. 4, 573-583;Th. Hodgskin,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London 1825; J. Hoffmann, »Ökologisch produzieren–ökonomisch verteilen? Gewerkschaften im Modernisierungsdilemma«, in: *Argument* 197, 35. Jg., 1993, 63-74; J. Höppner u. W. Seidel-Höppner (Hg.), *Von Babeuf bis Blanqui. Französisch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vor Marx*, 2 Bde., Leipzig 1975; W. Jahn, »Das Studium der Ricardianischen Sozialisten Ch. W. Dilke, P. Ravenstone und Th. Hodgskin durch Marx 1851-1852«, in: *Z-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4. Jg., 1993, Nr. 16, 106-118; R. Jones,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London 1831; M. Kalecki,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Fluctuations*, London 1939;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1892), Berlin/DDR 1965; H. Klenner, »Gerechtigkeitstheorien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in: *BzG*, 36. Jg., 1994, Nr. 1, 3-21; H. Klingen,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Präklassik. Die Beiträge Pettys, Cantillons und Quesnays zur Entstehung der klassischen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rburg 1992; K. Kühne, »Michael Kalecki–ein präkeynesianischer Postkeynesianer«, in: *Postkeynesianismus. Ökonomische Theorie in der Tradition von Keynes, Kalecki und Sraffa*, Marburg 1987, 37-70; I. Kurz-Scherf, »Fragen an ein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Arbeit«, in: *Argument* 199, 35. Jg., 1993, 339-348; J. Langkau, H. Matthöfer u. M. Schneider, *SPD und Gewerkschaften. Bd. 1. Zur Geschichte eines Bündnisses*, Bonn 1994; I. Lapidus u. K. Ostrovitjanov, *Politicesk-*

aja ekonomija v svjazi s teoriej sovetskogo chozjajstva, Moskau 1928; F. Lassalle,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Zentralkomitee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kongresses zu Leipzig« (1863), in: ders., *Reden und Schriften*, hgg. v. H. J. Friederici, Leipzig 1987, 227-262; H. Lehmann (Hg.), *Grundlinien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 in Deutsch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DDR 1977; P. P. Lopata, »Die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kommunistischen Formation und die Konzeption der entwickelten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in: *Marxistische Studien. Jahrbuch des IMSF. Sonderband I/1982*, Frankfurt/M 1982, 68-85; R. A. Medwedew, *Die Wahrheit ist unsere Stärke*, Frankfurt/M 1973; J.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1; M. Morris (Hg.), *Von Cobbett bis zu den Chartisten 1815-1848. Auszüge aus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Berlin/DDR 1954; K. O. W. Müller,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Linksradikalen*, Berlin/DDR 1982; R. Müller, *Menschenbild und Humanismus der Antike*, Leipzig 1980; H. Nahr, *Mehrwert heute. Leistung und Verteilung in der Industriegesellschaft*,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A. Niesler u. J. Pein, »Das sozialistische Leistungsprinzip als Triebkraft der umfassenden Intensivierung«,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37. Jg., 1989, Nr. 11, 1707-1715; R. Owen, *Das Soziale System.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 L. Jauch u. M.- L. Römer, Leipzig 1988; W. Petty, »Eine Abhandlung über Steuern und Abgaben« (1662) u. »Politische Arithmetik« (1690), in: ders.,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hgg. v. W. Görlich, Berlin/DDR 1986, 9-108 u. 215-286; N. Poulantzas, »Theorie und Geschichte. Kurze Bemerkungen über den Gegenstand des 'Kapitals'«, in: W. Euchner u. A. Schmidt (Hg.),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eute. 100 Jahre 'Kapital'*, Frankfurt/M-Wien 1968, 58-68; P.-J. Proudhon, »Was ist Eigentum? « (1841), in: Höppner/Seidel-Höppner 1975, II, 296-325; F. Quesnay, »Bevölkerung« (1757), in: ders., *Ökonomische Schriften. Band I. 1756-1759. Erster Halbband*, hgg. v. M. Kuczynski, Berlin/DDR 1971, 227-335; H. Richter, J. Becher u. G. Fabiunke (Hg.),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88; J. Robinson,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56), Frankfurt/M 1972; V. M. Roth, »Die Aufteilung des Mehrwerts in Profit und Rente«, in: ders., D.v. Holt u. U. Pasero (Hg.), *Aspekte der Marxschen Theorie 2. Zur Wertformanalyse*, Frankfurt/M 1974, 122-131; B. Schefold, »Platon und Aristoteles«, in: Starbatty 1989, I, 19-55; M. Schneider, *Das Ende eines Jahrhundertmythos. Eine Bilanz des Sozialismus*, Köln 1992; F.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Die Vorarbeiten zum 'Kapital' von Karl Marx in seinen Studienheften 1850-1858*, Hildesheim 1980; J. C. L. S. de Sismondi,

Neu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1819), 2 Bde., hgg. v. A. Toepel, Berlin/DDR 1971/1975; T. A. Sonina, »Probleme der Verteilung«, in: Leningrader Universität, Lehrstuhl Politische Ökonomie (Hg.),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73; J. Starbatty (Hg.), *Klassiker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 2 Bde., München 1989;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1963), Frankfurt/M 1987; W. Thompson,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Verteilung des Reichtums« (1824), in: Morris 1954, 66ff; M. I. Tugan-Baranowski, *Soziale Theorie der Verteilung*, Berlin 1913;A. R. J. Turgo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Bildung und Verteilung der Reichtümer* (1770), hgg. v. M. Kuczynski, Berlin/DDR 1981; G. Vobruba, *Jenseits der sozialen Frage. Modernisierung und Transformation von Gesellschaftssystemen*, Frankfurt/M 1991; H. Winkel,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 der neueren Zeit*, Darmstadt [4]1994; J. Zeleny,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Berlin/DDR 1968.

788

Arb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Arbeitslosigkeit, Armut/Reichtum, Aufbaupläne, Ausbeutung, Bauernkrieg, Beamte, Bedürfnis,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sitz/Eigentum, Börs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Chartismus, Dependenztheorie, disponible Zeit, Eigentum, Etatismus, Fetischcharakter, Feudalismus, Fourierismus, Frauenbewegung, Freizeit,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Gewalt, Grundrente, Handelskapital,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athedersozialisten,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lassenkämpf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ebensweise, Lassalleanismus, Lohn. Lohnform, Mehrarbeit, Mehrprodukt, Mehrwert, Mystifikation, Naturalform, Owenismus, Privateigentum,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onsweise, Reproduktion, Staatstätigkeit, Stadt/Land, Steuerstaat,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Übergangsperiode, Verdinglichung,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Wert, Wertgesetz, Wertgesetz im Sozialismus, Wohlfahrtsstaat, Wohnungsfrage, Zins

冈特·维林 撰

蔡廷建 译，张志超 校

纪律（Disziplin）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kkumulation, Alltagsverstand,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neignung,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pologetik,

A: nizām, adab, ḍabṭ al-sulūk.

E: discipline. – F: discipline.

R: disciplina (дисциплина). – S: disciplina.

该概念来源于拉丁语（*discere*，lernen）——抚养、教育、教授、培养以及学科。1734 年的《泽德勒大辞典》（Zedlers Lexikon，Bd. 7，第 1043 页）认为“纪律”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专业知识的分工，另一方面它“尤其”是指“一种对于认识事物和养成好习惯的训导。所以，比如在天主教会中，教会的纪律就是一种鞭笞……通过这种仪式……那些因为某种罪过而受到处罚的人，或者那些想要赢得虔敬生活的巨大勋绩的人，鞭打自己裸露的脊背，直至流血。军事纪律则是一种让士兵服从长官的训练”。1977 年的
789 《杜登大词典》揭示了军队强制秩序的统治性的一面：在外在规训的意义上，纪律可被视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将个人置于“社团”之下，军队和学校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内在规训的意义上，纪律被解释为一种努力，即个人通过控制与自我训练获得某种能力。（Bd. 2，第 548 页）这里显示纪律的某种意义，用古语来表示即是 ἀρετή，也就是 *virtus*（两个单词字面上都是“男子气概”的意思，通常将它们译作“美德”），也可用 ἄσκησις（希腊语，意思是练习，不应当与略晚的基督教中专用名词“禁欲”搞混。［希腊语 ἄσκησις 对应的德语即 Askese，Askese 在当代德语中是禁欲的意思，因此作者特别强调不要将这两个词搞混。——译者］）表达。这两个古语都表示出纪律的统治性，它们因此可以被理解为统治纪律（Herrschfts-Disziplin）。然而，在不同的环境下，以及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者而言，纪律一词还需要结合相应的立场以及使用方式来理解。

1. 纪律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集体行动能力之间的紧张领域，这种紧张领域一方面存在于他主决定与自主决定之间（Fremd- und Selbstbestimmung），另一方面则存在于自我控制与自然控制之间（Selbst- und Naturbeherrschung）。集体纪律首先是在劳动过程中作为协调机制而发生作用的。它将诸多个人意志置于集体之下（这里的集体既可能是联合的，亦可能处于专制之下；其目的既可能是自主决定，亦可能是他主决定）。个体纪律使得个人有能力从动机各异的集体当中振作自己。自主纪律（Selbst-Disziplin）如同他主纪律（Fremd-Disziplin）一样，都是在不同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培养与自我培养的过程以及相应的训练以达到相应的学习目的。在统治环境之下，纪律必然伴随着臣服行为出现；反过来讲，纪律也是解放过程中必要的态度。因此，纪律本身是对立的，它有着多重意义。纪律有可能是革命性的，这恰恰与纪律本身的意义相

冲突。

作为解放运动必需的态度，纪律需要不断的反思与批判。罗莎·卢森堡将相关问题系统性地展开："每一个基于众多个体相互影响而建立的组织和大型社区，都需要纪律，即它们都需要将个体置于某种秩序之下，否则个体之间的合作将无法实现。没有纪律，将不会有工厂企业，不会有学校教育，亦不会有军队和国家。那么这种纪律是社会民主党派的基础吗？完全不是！……军队式的
790 纪律如同资本主义工厂纪律一样，是建立在外在强制基础之上，而社会民主式的纪律则建立在自愿服从基础之上：前者服务于少数者对普罗大众的暴政，而后者服务于民主，即服务于受启蒙的大众的意志，以针对私人意志。"（*Parteidisziplin*，1914；GW 4，第 15 页）这种对外在强制与内在服从简单的区分，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无论是为了实现理想化自我服从而采取的精致的策略与实践，还是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纪律"而采取的强制手段，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企业、学校、军队以及管理都是统治社会的重要手段，其中，纪律是必须拥有的态度，而且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劳工运动中，政党纪律是中心，而从理论角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劳动纪律亦扮演着重要角色。

2. 马克思首先对纪律在劳动过程中的双重确定性（Doppelbestimmung）和机器生产所导致的变化感兴趣。他将资本主义组织下的劳动过程视为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由某一领导者组织起来的生产者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进行集体自主决定，同时，这也是一个将人们置于异己的意志之下的过程。在雇佣劳动中，管理职能由于"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其本身也是两重的：对于直接生产者而言，"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MEW 23，第 351 页）。

2.1 **劳动纪律**。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资本家的纪律化功能在历史进程中是如何一步一步由不同层次的工人接管，从而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直接矛盾；以及改变工作条件的诸种方式——尤其是工资形式（计件工资和小时工资）以及工作时间（考勤时钟于 1855 年在美国开始使用，参考 Thompson 1967，第 83 页，注释 87）——是如何使得实现必要的纪律更加容易；还有机器的使用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外在强制的纪律化，从而使得统治具体化。马克思还在生产社 791
会化的条件下研究了阶级关系中纪律的发展："工厂规章的引入"有力地证明了

“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然而，这种现象“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MEW 23，第 433 页）

这展示出进一步的发展过程：纪律化可被视为一种秩序安排，一种对习惯、实践、需求以及它们在普通人中的满足形式的整合，工厂纪律则实现了对生活有意义的安排，它作为教化中的强制与暴力，也作为一种必要的自我教育。在谈及所谓的**“原始积累”**时，马克思将纪律化描述为无产阶级化的一部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无产阶级“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第 762 页）在此，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暴力剥夺了土地……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第 765 页）

这种更侧重暴力过程——“血腥纪律”（MEW 23，第 770 页）——的看法并没有阻止马克思同时将纪律中的自我教育视为一种积极因素，它将雇佣工人与奴隶区别开：“然而，他如此却成了自由行动者，他必须忍受这一切；他需要对自己如何消费自己的工资而负责。**他学会如何区别于奴隶而主导自己的行为，**而奴隶则需要一个主人。”（*Ms 63-67*，MEGA II. 4. 1，第 103 页）

2.2 **军队纪律。**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方面来研究纪律的，而恩格斯则在自己的研究重点军事方面来探讨纪律。恩格斯批判性地研究军队中纪律化的实践，并试图将其应用到生产过程的组织中， 792
从而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组织，尤其是革命性的政党。引起恩格斯兴趣的是因素的多样性。在西班牙军队中，恩格斯观察到纪律与权力辩证的相互关系：“纪律教会军队认识自己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反过来又削弱纪律。”（MEW 10，第 379 页）通过比较德国与法国的军队，恩格斯强调了科层等级的指挥结构与纪律贯彻的民主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体现出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管理策略的视角：“德国人的长处在于他们有大量的后备军官；法国人的长处则在于官兵关系好；而在我们这里，士兵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MEW 38，第 404 页）最后，他通过革命时期西班牙的例子，展示出物质基础与士气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革命时期一切从属关系都松弛了，只有使将军们严格服从国民纪律才能恢复军纪。……不服从命令的现象因缺乏粮食、被服和一切军需物资而更加严重了，因为军队的士气，按拿破仑的说法，完全取决于它的物质条件。"（MEW 10，第459 页）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在理论上深入探讨，他却通过多个方面证明了纪律是士气的基础以及纪律一方面与物质优势、另一方面与对上级与国家的信任之间的联系。（参考 MEW 11，第 425 页）反之，恩格斯将纪律的松弛与国家腐败所导致的"去士气化"（Demoralisierung）联系在一起。（MEW 17，第 100 页）对士气与纪律联系的研究亦导致了如下结论，体罚"却是破坏纪律的手段，因为它损害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MEW 11，第427、510 页）。

2.3 **政党纪律**。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原则上是支持政党纪律的，但他们却认为（在这一点上与李卜克内西和伯恩施坦的观点不同）当执行而非抵抗"错误的"命令时，纪律在实际上是被破坏了（这是在讨论向当局缴纳税金时提出的，MEW 19，第 157—158 页）。他们两个人都认为，政党纪律必须与制度性批判的可能性——比如来自独立报刊的批判——同时发展。恩格斯指出："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 793
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过去给予的行动自由不仅足够了，而且由于规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处。"（恩格斯 1892 年 11 月 19 日给倍倍尔的信，MEW 38，第 517—518 页）在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典范一直被谈及，它被视为胜利的原因（比如参见 Engels, MEW 22，第 413 页，第 518 页及以下），另一方面"在一个大党内不能继续存在严格的宗派纪律，这也是件好事"（MEW 38，第 87、95 页）。

在第一共产国际围绕着政党形式进行激烈争论之际，恩格斯反对巴枯宁的"联盟的党派学说"，而主张纪律在"斗争时期"的必要性：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就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MEW 17，第 478 页）纪律的问题导致了（1873 年）西班牙党派的退出："凡是拒绝承认代表大会决议或故意逃避履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

的义务的团体和个人，就是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MEW 18，第 692 页）

恩格斯认为，对那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政党领袖，他们有必要向工人学习纪律：“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的前提不应当是“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而是“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MEW 22，第 70 页）

3. 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对政党纪律的鼓吹首先是针对“高级”政党代表轮换和调整的武器：“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将社会民主式的服从视为奴仆在贵族宫廷的俯首，然而不管人们怎么想，政党纪律将个人无条件地置于组织的集体意志之下，从而成了我们组成政党的基础，也成为任何一个大型政党的生存形式，这些政党体现出一种封闭的权力。因此，纪律所规定的义务没有任何例外，亦不会有任何赦免。纪律要么约束政党中的所有人，要么它对任何人都没有作用。”（GW 2，第 508 页）卢森堡将自我决定的维度置于入党那一刻和随之而来的自愿服从（GW 4，第 16 页）；政党纲领应当是有义务服从的，通过“政党机构”对其破坏再次将顺从的成员解绑（同上）。卢森堡将缴纳战争国债的意愿（1914）评价为“纪律的断裂，它表现为，政党中单个的机构替代了集体意志，它不再服务于政党纲领，而是靠自身力量将集体意志折服”（GW 4，第 17 页）。她归纳了两种纪律，一种是政党代表与机构的纪律，一种是成员的纪律，而后者有义务知晓政党的纲领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理念：“当紧急状况实行的严厉的纪律被取缔，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会重新回归他们的纪律，并要求对曾经的纪律断裂（Disziplin Brüche）进行解释。”（同上）

列宁赞赏劳动对无产阶级有着纪律训练的意义，而卢森堡则持不同意见，她主张纪律有双重确定性（Doppelbestimmung）：“列宁所言的纪律，并非仅仅通过工厂锻造出来，还会通过兵营（*Kaserne*），通过现代的官僚机构，简而言之，通过集中化公民国家中的诸种机制锻造出来。”（GW 1/2，第 430 页）她将纪律作为实际上相互排斥的矛盾概念，并进一步讨论道：“当人们同时将纪律用两个截然相反的概念来表述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关键词被滥用了：这正如缺乏自由意志和思考的多手多足的傀儡听从于根据指挥棒的机械运动与人们自愿配

合社会某阶层政治领袖的行为；也如对统治阶层的盲目服从与为争取自由而挣扎的阶层组织起来的叛乱。无产阶级要开始新的纪律——社会民主中自愿的自主纪律——训练，并非是通过接受资产阶级国家强加于它的纪律，即简单听命于资产阶级在社会民主集中会议中挥舞的指挥棒，而是要将这种充满奴性的纪律精神彻底摧毁、抛弃。”（第430—431页）在对卢森堡的反驳中，列宁将纪律的双重确定性置于工厂所建构的劳动中分析：“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我狠狠地嘲笑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证明他把工厂纪律的两个不同方面混为一谈，可惜罗莎·卢森堡同志竟也这样做了。”（LW 7，第482—483页）

列夫·托洛茨基（Leo Trotzki）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将其解释为本质上是争夺党内的权力（集中主义）。他认为，对政党纪律的鼓吹是一种危机的信号，它企图压制不同意见。纪律对他而言“只有在如下情况才是有意义的，即它允许人们为正确的事情以及人们服从于纪律的原因而奋斗”（1904，第92页）。他认为人们存在着如下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曾经指出，新的生产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诞生于旧的生产关系中，工厂纪律即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发展起来，之后它又成为革命政党的基础。针对知识分子应当向工厂培训出来的工人学习纪律的观点，托洛茨基指出：“在这些客观条件与政治行动的自发纪律之间，存在着一条漫长的斗争道路，亦存在着一个误解，还存在着教育——不是‘工厂学校’，而是政治生活的学校，在此我们的无产阶级仅受（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社会民主的知识分子的指导。”（第95页）他将围绕纪律的斗争视为围绕着知识分子角色的斗争。“根据列宁新的哲学——自从小册子《怎么办？》完成之后鲜少有人对此质疑——无产阶级只需要经过‘工厂学校’，就可以让那些至今仍在政党中扮演着领导角色的知识分子学习到政治纪律！”（同上）

795

1917年之后，自觉纪律（Selbst-Disziplin）成为列宁宣讲与传单内容的中心。（另外参考LW 27，第44、77、90—91页等处）此时列宁将报刊视为“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从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LW 27，第193页）“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这样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同上）

苏维埃俄国的困难处境最终导致了纪律的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都曾强调“对劳动热情的培养”以及通过劳动训练纪律的必要性。这种强调，连同泰罗制在工厂中的引进，以及为转向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生产而展开的竞争，共同使得纪律自律自愿的一面逐渐在纪律的执行过程中边缘化。列宁最终建议，法院应当成为“强制的机关”，负责“教育居民遵守劳动纪律的巨大任务”，以及应当让“最广大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参与到法院实践当中，这样“才能通过与苏维埃政权的原则相适应的民主形式，使遵守纪律和自觉纪律的愿望不致成为空洞的愿望”。（LW 27，第 207 页）然而，现实却与构想完全不一样

对劳动教育意义与纪律意义的强调以及将劳动热情视为人性发展的一个方面的观点，使得劳动成为一个宣教意义上的纪律化工具。同时，作为惩罚措施的劳动教化机构也成为必要。这导致了卢森堡所担忧的劳动中的纪律关系最终成了现实政治的结果。卡尔·李卜克内西早在 1914 年就对监狱中青年罪犯的教育进行过思考，并指出：“最重要的教育方式是以及一直是劳动……，一个合理的、有组织的、与朋友一起进行的劳动以及对自我有效纪律化的鼓舞。……从对生命、自我本质、自我力量以及自我观点健康的、有希望的理解中，亦会自发产生出健康的道德。”（GRS 7，第 169 页）强制与自愿的区别在此逐渐消失。

4. 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秩序政治常被视为革命的障碍，因为它阻止着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危险”，在这方面，埃米尔·涂尔干（1902）解决了纪律在道德领域既是外在的命令又是内在的态度的困境。他写道：“道德行为意味着按照某个规则行动。”（1973，第 77 页）涂尔干通过以下论证思路证明了这种规则反映了真实的人性：（1）“好的行为意味着服从”（第 78 页）。（2）接受习惯和通过规则来满足需求的能力，是道德的前提（第 81 页）。（3）然而，通常还存在着“权威概念”（第 83 页）。（4）于是就有如下作用：“在每一种让我们觉得它比我们自己更具优势的道德威力中，都有某种让我们的意志向它屈服的东西。”（同上）这就是权威。在它面前，只有我行我素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没有“道德威权感受”（第 85 页）的人，才拒不服从。涂尔干通过规则性和道德权威的联系对纪律进行了探讨：纪律“实际上是为了管理服从纪律的人”，以及是“一个合法的权威”；因此“道德的首要因素就是纪律的精神”。（同上）与社会主义理论家追求不受阻碍的发展不同（第 90 页），涂尔干认为纪律对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生活形

796

797

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个人而言，道德律令应当是一面“保护墙，通过它人们克服了自己激情的浪潮”（第 95 页）。在此涂尔干明确地否认，纪律是作为一种“禁忌”以针对人性之恶，正如教会一样。他更多地强调纪律的必要性与人性的一致，只有当人自觉受纪律的约束时，人才能成之为人。这种观点是统治者驯服这个古老话题的变种：“自我统治是任何一种有效力的权力的前提条件。”（第 97 页）在涂尔干看来，它使自身成为一个绝对必要的基本姿态，而这种姿态是“人格中最重要的成分”（第 98 页）。相应地，通过惩罚与奖励系统来训练纪律就成为学校的基本功能。

马克斯·韦伯在其统治社会学（Herrscaftssoziologie）中将纪律视为伦理的对立面。所有类型的统治都需要纪律。卡里斯玛型统治限制了个人行动的范围，并生产出纪律。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纪律形式逐渐让位于普遍的物化；“理性的纪律”（*WuG*，第 866 页）变得更为重要，其所强调的不再是对个人，而是对普遍性事物的服从。韦伯将其描述为“以有计划的教育的、精确的、无条件地拒斥一切针对自己的批评的方式进行的，对所接受到的命令的完成，以及以此为唯一目的的、不间断的内部调整”（第 867 页）。在这个意义上，纪律是“对众多个体的服从的理性统一”；对韦伯而言，纪律的“最理性的形式”即官僚制，反之，非理性以及非物化是纪律的对立面。（同上）纪律会通过调整和训练得以维持下去。如果在此情况下要讨论伦理，那么则需涉及义务与良心。韦伯认为，军队中的纪律是“孕育纪律的子宫”，而“**大型的经济企业**”则是纪律的“第二重要的培养者”。（第 872 页）他研究了各种在他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形式，这些形式生产着纪律——战争共产主义、寺院共产主义，最终韦伯落脚于人们对机器心理上的适应，这些机器的目的是将收益最优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工作中理性的调整与训练的最大成功，广为人知的是美国的‘科学管理’系统，这种管理最终导致了企业中的机械化与纪律化。”（第 873 页）这描述了福特—泰罗制发展的路径。“如此这般，伴随着对政治与经济需求满足的理性化，出现了纪律化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蔓延。这种纪律化不可阻挡地发展着，并越来越强有力地限制了卡里斯玛以及个人分化的行为。”（第 873 页）之前所探讨的自觉纪律，被韦伯一方面称之为“市民的天职伦理”（1920，第 188 页），另一方面则称之为“劳动意愿”（第 46 页及以下）；韦伯并不把这两者看作是纪律，相反，它们是一种“‘将劳动作为义务’的态度”（第 47 页），它们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多数是宗教性的）

教育问题。

米歇尔·福柯的观点与涂尔干（并不明显）相似，他在对权力效应批判分析的框架下，从统治性再生产的积极的意识形态视角出发，对纪律的双重特征进行了考察。在此，福柯基于一个有关匿名的、不断自我生产的权力关系的理论——这种权力关系实践于具体的组织之中——而解决了他主决定与自主决定之间的问题。“纪律增强了组织的力量（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同时减弱了个人自我的力量（为了使其在政治上变得顺从）。总而言之：它分裂了组织的权力；由此它一方面获得了一种‘能力’，一种‘适应性’，从而使其自身不断生长；另一方面，它将一种能量，一种从中产生的巨大的力量置于严格的服从地位。”（1979，第177页）组织的纪律化是一个双重过程，是权力的实践，亦是对组织权力的影响。福柯将这个过程视为其与组织不断增长的机械互动的一部分。福柯的伟大研究适用于那些对纪律性要求极强的组织，如精神病院与监狱。纪律被总结为空间与时间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监控实现的，并通过规则化的概念与实践来维持。之前人们用自我统治、自我教化以及自我决定的纪律等概念所表达的，在福柯这里则属于“权力的决定性”导致的结果。

评释：

对涂尔干和韦伯关于纪律看法的叙述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军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是纪律产生的起源。寺庙以及教堂完全是“男人的领域”（韦伯），纪律存在于其中。之后发生作用的则是工业的生产过程、国家、政党。凡是那些需要将个人意志置于集体意志之下的大型社会团体，都是需要纪律的。纪律因此是一个重要的人类美德。涂尔干曾向学校提出建议，他认为有关女性是否需要一个特殊纪律的话题是没有意义的。在市民社会中对女性进行纪律训练是否是必要的？女性既无法加入军队，一般情况下亦无法进入工厂工作，她们的个人意志并非在集体意志之下，而是在他人的个人意志之下，即“她们的男人”。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那么该如何对女性进行纪律训练？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个问题与以下问题相关，即劳动何时可以成为“绝对的自身目的”或是“天职”，这是将劳动意愿与直接报酬分离的前提条件。韦伯观察到“女性工人，尤其是未婚的女性工人……在能力上和意志上都存在绝对的缺陷”，“她们无法适应新的劳动模式，亦缺乏学习能力。她们无法集中精神思考，甚至无法简单地使用头脑”。（1920，第46—47页）一个例外是有着“特殊宗教教养”的女性。基于福柯，肖

沃尔特（Showalter 1985）强调那些妇女权益运动的反对者是如何在市民传统中被诊断为病态的。也许这也能反映出，“纪律化”的行为是对于男性而言的。

5. 涂尔干所认为的个人自制与“社区”需求，在安东尼奥·葛兰西那里退回到了从臣服关系中的解放的观点。“自由的概念应当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种责任产生了纪律，这种依靠外在强制力的纪律并非直接理解为对自由的强制限制。责任与个人专断相对立：自由是唯一的‘有责任的’，也是‘普遍的’，因为它是集体或是团体的自由在个人视角的反映，是法律的个人表达。”（*Gef* 4，H. 6，§ 11）然而，只要不再从统治者的角度或是从统治再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纪律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

葛兰西在解放教育的框架下对纪律展开探讨。他认为应当建立学前机构，
800 “在这种机构中，6 岁以下的孩子也能养成自觉遵守集体纪律的习惯，以及学习学前知识和行为习惯”。葛兰西试图通过这种学前教育，实现“从目前流行的虚伪以及机械的纪律形式的解放”。同时，如果可能的话，也要实现纪律功能的一个巨大的转变：“从通过外在强制力与监督以维持学习纪律的学校，到（知识分子的）自觉纪律以及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不受限的学校。当冲动的、不可抗拒的青春期激情以失控的方式对抗着道德良知对个人的束缚时，这种转变应当在青春期危机之后立即执行。”（*Gef* 3，H. 4，§ 50，第 526 页）葛兰西设想“将高中阶段作为综合学校中最重要的过渡”，“在此阶段，学校将传授‘人文主义’中基本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的自觉纪律以及道德自主性。而这些对将来的专业学习至关重要，无论是学术模式（大学学习）还是直接的实践生产模式（工厂、交易组织、官僚机构等等）”。（同上）葛兰西不同于涂尔干之处在于，他将有关自觉纪律的构想与社会群体联系起来，而社会本身就被视为集体意志和思想的一个产品。显然，葛兰西所言的理性纪律亦与韦伯的民主式社会化的计划有所不同。

在某些地方，人们可以发现葛兰西对知识纪律（wissenschaftlichen Disziplin），以及劳动、军队、政党中的纪律亦有论述。同布莱希特一样，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纪律问题。他并不认为简单的“对必要性的认识”是一种自由，自由是一个“生命系统的发展……，这个生命系统的目的即是获得现今所‘必须’的‘自由’”。（*Gef* 2，H. 3，§ 11）对于葛兰西而言，只要妇女“没有真正从男性身边解放出来”，那么上述过程对她们而言是不可能的。（参见 *Gef* 1，H.

I, § 62）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于 1976 年发表演讲反对弗里德里希·通贝格（Friedrich Tomberg），该演讲的题目为“社会主义集体需要独立思考的个人以及建立在真知远见之上的服从”。其中，豪格坚持自觉纪律与批判态度，而反对向未经民主合法化的政党机器的服从。在与豪格的辩论中，克劳斯·霍尔茨坎普 1980 年试图同时强调个人批判的立场以及对政党纪律的服从：“个人在组织中以及对于组织所必须拥有的**‘批判立场’绝不会**与集体劳动中的**纪律以及义务相对立**，相反，对我而言，纪律和义务只有在我明确了解其**必要性**时才会被接受和实践。”（1980，第 219 页）霍尔茨坎普认为这种“必要性”并不是需要每个人都理解，而是作为干部强制手段的一个结果。在之后的辩论中，批判随之而来。比如，组织的决定在理论上有可能违背个人主观上的对错观念。而作为对“公共利益中的批判理性”的要求（第 224 页），这种对立却必须被忍受。上述观点并没有怎么考虑现存政党是否理性。不管怎样，布莱希特在其《墨翟》（*Meti*。布莱希特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此书乃是他假借墨子之名完成的一本哲学著作。——译者）一书中所言不假：“当人们可以使用服从来表述时，那么人们不应将其称为纪律。”（WA 12，第 534 页；参考第 421 页）

801

参考文献：

E. Durkheim, *Erziehung, Moral und Gesellschaft. Vorlesungen an der Sorbonne 1902/1903* (frz. 1934), Neuwied 1973; M. Foucault, *Überwachen und Strafen. Die Geburt des Gefängnisses*, Frnkfurt/M 1979; *Großer Duden in 6 Bänden*, Mannheim-Wien-Zürich 1977; W. F. Haug, »Das sozialistische Kollektiv braucht denkende Individuen und durch Einsicht vermittelte Verbindlichkeit«, in: *Argument*, 18. Jg., 1976, Nr. 98, 648-667 (wieder abgedruckt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3); K. Holzkamp, »Individuum und Organisation«, in: FKP 7, 1980. 208-224; K. Liebknecht, »Nicht nur strafen, sondern erziehen«, Rede im preuß. Abgeordnetenhaus zum Etat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1914), in: GRS 7, 166-178; E. Showalter,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980*, London 1985; E. 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Past & Present*, 38, 1967, 56-97; F. Tomberg, »N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zur wissenschaftlichen Weltanschauung (II)«, in: *Argument*, 18. Jg., 1976, Nr. 98, 619-647; L. Trotzki, *Unsere politischen Aufgaben* (1904), in: ders., *Schrifen zur revolutionären Organisation*, Reinbek 1970, 7-134; M.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in: ders., *Ge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920), Tübingen 1934, 1-206; *Zedlers Großes Universallexikon all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welche bißhero durch menschlichen Verstand und Witz erfunden worden*, Bd. 7, Halle-Leipzig 1734 (Reprint Graz 1994).

弗里加·豪格 撰
刘梦岳 译，金建 校

参见：

Anerkennung,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beit, Arbeitserziehung, Autonomie, Autorität, Bürokratie, Charisma,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spotic des Kapitals, Dialektik,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ispositiv, Ethik, Fabrik, Fordismus, Frauenarbeit, Freiheit, Führung, Gewohnheit, Haltung, Handlungsfähigkeit, Herrschaft, ideologische Subjektion, Intellektuelle, Kritik, Leistung, Leitung, Macht, Moral, Ordnung, Parteien, Taylorismus, Triebkraft, Unterwerfung, Wille, Zwang

802 教条主义（Dogmatismus）

A: ʿaqā'idīya, al-djumūd al-ʿaqā'idī.

E: dogmatism. – F: dogmatisme.

R: dogmatizm (догматизм).

S: dogmatismo.

教条（Dogma）是“有约束力的、应予承认并遵循的信条”，教条主义是“死守教条”、“非批判性的、形而上学的、基于臆想中颠扑不破定律的思维方式”；18世纪，德语吸纳了“教条”这一表达。（*Etymol Wb*，1，1989，第295—29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剖析教条主义是他们意识形态批判法的一个方面。在科学理论方面，既与公理—演绎的、以初始的原理和原则（教条）为出发点的知识形式决裂，也摒弃经验主义决裂，经验主义只把现实感知成“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DI*，MEW 3，第27页）。科学抽象被理解成“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Manifest*，MEW 4，第475页）。

1843年9月，在致青年黑格尔派信徒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信中，马克思将其“介入性思考”（eingreifendes Denken）（Brecht）的纲领表述为**“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MEW 1，第344页）。这意味着摧毁任何教条主义：“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同上）这样就把卡贝（Cabet）、德萨米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刻画成教条的抽象：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同上）。批判

自身变得不教条，因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上）。同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与哲学决裂：“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同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为对现状的批判，摒弃了把形而上学论证为科学的计划。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身处康德和黑格尔形而上学批判的传统中。

康德把批判理解成“必要的暂时
803 活动以利于缜密的形而上学成为科学”（*KrV*，Vorr. 2，B 版第 XXXVI 页）。批判却并不“反对理性在作纯粹认识时的**教条方法**成为科学……而是反对**教条主义**”（同上书，B 版第 XXXV 页）。教条主义是“纯粹理性**对自身能力不作先导性批判**的教条方法”（同上）。黑格尔认为此类形而上学同样是教条主义：“知识和哲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上的教条主义不管认为，真即固定结论的定律，抑或直接为人所知的定律。”（*PhG*，Vorrede，W 3，第 41 页）。黑格尔与康德保持距离，强调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并非那种唯心主义，“作为**确信的教条主义**或者**对自己有把握的教条主义**而代替下**断言的**教条主义”（同上书，第 46 页）。因此作为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必然有着不同的特征：“这种形而上学成为**教条主义**，因为它按有限规定的本性必定假设，**两种相反的论断**（那些定律即系此类论断）中，其一必为真，另一则必为假。”（*Enz*，§ 32）

尽管如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马克思仍发觉黑格尔这里一个后果广泛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他首先强调，“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看作一种**矛盾**，这是他较深刻的地方。但错误的是：他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解决这种矛盾，并把这种表面当作事情的本质”（MEW 1，第 279 页）。后面概括道：“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第 295—296 页）“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第 296 页）是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以要求“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来应对（同上）。1886 年，恩格斯就区分了“黑格尔体系的教条内容”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LF*，MEW 21，第 268 页）

依马克思之见，“庸俗的批判”又陷入了相反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例如，它批判立宪制度，它注意各种权力的相互对立等等。它发现到处都有矛盾。这仍然是**攻击**自己的对象的教条主义批判。”（MEW 1，第 296 页）而“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

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同上）。

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一纲领开启了对“现实历史”的把握，这种把握并非从“教条”，而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DI*，MEW 3，第 20 页）这种理论不仅不教条，而且是关于教条的理论，因为它把人们的教条主义理解为“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第 26 页）。在此意义上这样谈到“共产主义体系”：“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为基础的。只是说所有的体系都是教条的和独裁性的，这丝毫没有说明共产主义体系的这种基础和内容。”（同上书，第 449 页）

在分析马克斯·施蒂纳时，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论点作了详述：如果此人“把他的整个思想上的破烂摊暂时抛开……那就会剩下他的现实的我，但是他的这个现实的我处在对这个现实的我来说是存在着的外部世界的现实关系中。这样他就暂时摆脱了一切教条式的前提，然而他摆脱教条式前提之日正是他开始有现实的前提之时。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获得其他现实的前提因而也没有获得其他教条式的前提的时候，或者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么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同上书，第 419 页）。

在《哲学的贫困》（1846/1947）中，面对普鲁东，马克思用黑格尔对教条主义的描述来论辩：“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问题。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教条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MEW 4，第 132 页）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变成“教条集成”肇因于落后的现实：“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K I*，MEW 23，第 19 页）总之，国民经济学教条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

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K III*，MEW 25，第838—839 页）。——相应的命运，随着马列主义确立为体制化的学说大厦，很快也落到马克思思想的头上。

随着 19 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发觉教条主义日盛且伴有宗派主义：“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其独特的发展方式来说，非常突出的是，在这里和美国，凡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正确的理论——**这是就其教条而言**——的人，都只能成为一个宗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像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因此，真正的运动是在这个宗派之外进行的，而且离它越来越远。”（1891 年 5 月 4 日致 L. 拉法格 [L. Lafargue] 的信，MEW 38，第 101 页）在马列主义中也有这句论断成为套语：“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887 年 1 月 27 日致 F.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F. Kelley-Wischnewetzky] 的信，MEW 36，第 597 页）德国人把理论当作“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1886 年 11 月 29 日致佐尔格的信，MEW 36，第 578 页）。

尤其是伯恩施坦转向修正主义在社会民主党中引发了“批评自由”之问。1899 年，罗莎·卢森堡只愿在纲领方面准许“**一项自由**”：“**是否隶属我党的自由。**”（GW 1/1，第 528 页）否则“甚至在我们坚持的事物中都完全不存在坚定不移、不可触犯、限制性的事物”（同上）。相反，她认为科学中的“批评自由”是不可触犯的：在伯恩施坦的理论中有“**两个不同部分，一个理论性**部分……和一个**实践性**部分”（第 529 页）。第一部分不该放到党代会上，而第二部分必须成为议决的对象。（第 530 页）在此意义上，1899 年，卢森堡在汉诺威党代会上声明：“我们并非清谈馆，而是必须具有特定基本观点的一个政治斗争党派。”（第 574 页）另一方面，她看出推行教条的理论与机会主义政策之间有关联：“开战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守庙人考茨基其实只是在理论上做着谢德曼们实际所行的同样的事。”（GW 4，第 338 页） 806

在《怎么办？》（1902）中，列宁给首章加的标题是：“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Dogmatismus und »Freiheit der Kritik«*）。列宁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的‘批评’派无非是**机会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LW 5，第 364 页）“那些捍卫‘批评自由’的骑士们”指责“教条主义、学理主义”

和“党的僵化（由于强制束缚思想而必然受到的惩罚）”（第 378 页），列宁以此论点加以反驳：“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等的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人们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批评自由”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它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第 379 页）即使列宁一再强调“正确的革命理论”“并不是教条”，“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才能最终形成”（*LR*，LW 31，第 9 页），他还是以其在“理论思想”方面的犀利评判来表述斗争概念，这些概念随后会经由斯大林决定体制化的马列主义。“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这种观念就给这一思想趋向教条化铺平了道路，在这方面，批评教条主义的语言成为教条主义的工具。

与“教条主义”、“党的僵化”、“官僚主义”相对立的“批判”，在斯大林这里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教条主义被宣布为“偏离”马列主义。1924 年，斯大林在涉及“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时表述道：“脱离了生动的群众革命斗争并变成陈腐教条的一些自相矛盾的原理和理论片断，代替了完整的革命理论。为了装饰门面，他们当然也记起马克思的理论，但目的是要阉割这个理论中活的革命的灵魂。”（W 6，第 72 页）“检验第二国际的各种理论教条”，“对第二国际的奥吉亚斯的牛厩（Augiasställe）做一番总检查和总清洗这一光荣任务就落到了列宁主义的肩上”。（第 73 页）马列主义作为“革命理论”，作为“运动规律的知识”和“革命规律的知识”，成为党的工具。（第 151 页）由于如此使“革命理论”服从党，那么用党的决议结束“争论”，把决议视为颠扑不破的定律，就很正常了。（第 160 页）清洗“机会主义的肮脏东西”（以后是清洗其他“偏离”）成为持续的任务。（第 163 页） 807

1939 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宣布：“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就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FL*，1947，第 718 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等的“科学”成为“必须具备的……”那种“科学部门”。（第 719 页）这进一步推进了把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为颠扑不破的定律体系。（第 720 页）同时：“但是我们必须要求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局限于背熟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而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使其更加确切和完善。”（第 725 页）——恩格斯关于中世纪之言可以套用于苏共：“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

法律效力。”（*Bauernkrieg*，MEW 7，第343页）

后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并未突破这种“社会主义教会化”（Haug 1976，第657页）。《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Erklärung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1960*）中写道：“若不坚决反对理论和实践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它们就可能在各党的这个或那个发展阶段成为主要威胁。它们使革命的党派无力基于对马列主义作科学分析而发展马列主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创造性地应用马列主义。”（转引自 PhWb I，第286页）1969年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称：“忠于马列主义……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统一行动有效、方向正确的恒久条件。”（*Internationale Beratung*，1969，第45页）类似说法见于各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本党把掌握并传播马列主义视为旨在深化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基本任务之一。”（*Statut der SED*，1976，第5页）

1976年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直言“社会主义教会化”：“我们各党所受的痛苦……、我们在地下墓穴中度过的时光，令我们的队伍在科学社会主义和一种牺牲的、前定的神秘主义之间产生了联系。我们成为拥有自己的殉道者和先知的新教会。我们的梦想开始在莫斯科实现，它多年来是我们的罗马。我们谈论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似乎它是我们的圣诞。”（第120页）凝固为教条的马列主义、学说大厦及其制度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领导”没落以及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崩溃才终结。

1965年罗伯特·哈费曼（Robert Havemann）描写了他为何“曾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我受教育要无条件听从党召唤。我该承认：党永远正确。……我以为斯大林是当时在世的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话不容反驳。我只能努力理解他，如果我做不到，责任不在斯大林，而在我。”哈费曼引证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的话来总结思想境况：“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由当局规定。……只有表示自己愿意在各种情况下都接受当局提供的内容，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90，第125—126页）耶吉（U. Jaeggi）强调了此观点：教条主义“原因并非在于传承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而在于中央委员会的大会和报告每次塑造的（空谈理论的）实践的标准”（1977，第150—151页）。就此而言，官方马列主义并非正统，而是教条。

贯彻当局规定的教条，需要官方机器。强推马列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是

党派和群众组织还有国家机构的任务。“社会主义教会化”就制造出其“神职人员”。“此类状况产生一种思维方式，它恪守信条，走极端，落后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实现之事。一种最大限度去辩证法、反对科学实证和历史经验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哲学’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发展、军事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同努力中，令基层纪律化、上层合法化，尤其在苏联成为职能，以
809 图压制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促进群众积极性的职能。”（Haug 1976，第657—658 页）通过批判那种“铁板一块的”体系的定律（原则）来战胜马列主义的学说大厦的努力，被“神职人员”成功地挫败。哈费曼的《无教条的辩证法》（*Dialektik ohne Dogma*，1963/1964）和巴罗的《选择》（1979）均遭到处分和控告。

1985 年，苏联开始改革，随之尤其试图通过公开化（Glasnost）政策来克服官方马列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社会主义的多元意见表达”、“揭露全部真相”、与共产党“对真理的垄断”决裂，日益成为公众中的决定性话题。这种冒进尤其败于“神职人员”之手，他们无力且不愿与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中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决裂。

参考文献：

R. Bahro, *Die Alternative. Zur Kritik des real existierenden Sozialismus*, Köln 1979;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S. Carrillo, »Rede des Genossen Santiago Carrillo«, in: *Konferenz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Europas*, Berlin/DDR, Juni 1976;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Berlin 1989; W. F. Haug, »Das sozialistische Kollektiv braucht denkende Individuen und durch Einsicht vermittelte Verbindlichkeit«, in: *Argument* 98, 18. Jg. 1976 (überarbeitet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3); R. Havemann, »Ja ich hatte unrecht, Warum ich Stalinist war und Antistalinist wurde«, in: ders., *Die Stimme des Gewissens*, Reinbek 1990; *Internationale Beratung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Berlin/DDR 1969; U. Jaeggi (Hg.),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7; L. Kolakowski, *Der Mensch ohne Alternative – Von der Möglichkeit und Unmöglichkeit, Marxist zu sein*, München 1960; *Statut der SED*, Berlin/DDR 1976.

克里斯蒂安·勒泽（Christian Löser）撰
朱更生 译，蒋旸 校

参见：

Anerkennung, Anwendung, Denkform, Dummheit,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Gesetze, Glasnost, Ideologiekritik, Kommunismus, Kritik, Marxismus-Leninismus, Metaphysik, Opportunismus, Orthodoxie, Perestrojka, Philosophie, Revisionismus, Stalinismus, Theorie, Wahrheit

双重负担（Doppelbelastung）

A: al-taḥmīl al-muzdauwidj.

E: double burden.

F: double journée de travail.

R: dvojnaja nagruzka (двойная нагрузка).

S: carga doble de trabajo.

双重负担指的是“女性同时担当家务和工作或有家庭之外事务。女性对家庭事务的传统职责（性别角色）阻碍了她们对工作和公共事务的投入”（*Schwarzer Lexikon*，第257页）。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问题都被看作是“双重角色”（Doppelrolle）。乌苏拉·雷尔（Ursula Lehr 1969，第39页）和其他人在一项关于女大学生前景的调查（Christensen 和 Swihart，1956）中说道：“女性们大多认为自己扮演家庭主妇和职业女性的双重角色；她们的男同事大多数反对双重角色。”这意味着，他们想要自己的妻子辞去工作。在1971年为女性工作辩护的陈述中，阿尔瓦·缪尔达尔（Alva Myrdal）和维欧拉·克莱恩（Viola Klein）乐观地认为，双重角色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与此同时，出现了双重负担这一术语（Hofmann 和 Dietrich，1958），它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地取代了双重角色的概念。

时间预算（Zeitbudgetberechnungen）是完善这个概念的关键基础。概念的重命名也意味着内涵的转变。这时的人们不再认为生活的这两个领域是对立的，只是要付出超出平均值的精力。这使得双重负担的概念流行起来。它同时也把女性不被正视的和没有报酬的家务负担曝光在大众视角中，并且至少从负荷量上将其与职业相提并论。该术语开启了一个讨论：全球的女性比男性做了更多工作。双重负担也就成为压迫女性的关键概念。克里斯蒂娜·克莱纳（Christina Klenner）1990年整理了东德社会压迫女性的特殊情况。“更深地讨论双重负担的问题，消除人们对它的轻视，揭示女性负担带来的诸多后果，对我来说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第866页）她根据严密计算得出了结论：女性通过减少有偿工作（1小时18分钟）和空闲时间（53分钟）补偿了每天2小时3分钟在再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是整个劳动力得到恢复的领域，包括所有关怀工作，例如照顾老人、病人和儿童；这项工作

810

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完成，经常被政治经济学批评所遗忘。——译者）的工作。（第 867 页）

双重负担这个概念有诸多缺点，作为解读女性压迫的切入点，它将（压迫）简化为不同的时间付出，并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此外，工作——无论何种工作——在“双重负担”术语中仅被描述为负担问题，既不是参与社会的问题，也不是身份发展的机会。在这个概念中，工作和家务之间的关系被推到了同一等级，并掩盖了最不同的境况，在社会层面上这是两个领域且面临不同的工作。双重负担把当事人带入了越发撕裂的矛盾中，而这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负担过度了。

811

沿着这一研究方向，汉诺威的一些女社会科学家们看到了分裂的“双重方向”，并试图用“双重社会化”（doppelte Vergesellschaftung）的概念去理解两种不同的统治关系（父权和资本）中所同时产生的义务，“每天在工作和私人领域之间转换，这种不共时状态的持续再现实化（Reaktualiserung）是女性工作能力的矛盾表现，倘若它使得工作能力一方面在资本意义上被稀释（Verflüssigung）和变得易变（Variabilität），另一方面在家族意义上又要‘依恋’（Befestigung）和‘约束’（Bindung），那么这种再现实化客观上又意味着什么呢？”（Knapp 1987，第 244 页）这个想法引申出了关于性别差异的表述：“鉴于女性从两个层面上参与了社会化再生产，她们的身份便不仅是双重的，也从根本上与男性有着不同的社会化方式。”（Becker-Schmidt 和 Dölling 1994，第 129 页）弗里加·豪格从不同时间逻辑（Zeitlogiken）的层面研究了这些不同领域的差别。她指出，资本主义父权制中哪个领域是上级的，哪个领域是从属的，是这些时间逻辑的结果。（1990）双重负担在政治上被重新阐释为将工作的概念扩大到所有相关领域，将所有社会成员的工作分为雇佣工作、再生产工作、文化工作和政治工作。（1985）

参考文献：

R. Becker-Schmidt u. I. Dölling,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und Frauenpolitik«, in: O. Negt (Hg.), *Die zweite Gesellschaftsreform*, Göttingen 1994, 121-130; F. Haug, »Automationsarbeit und Politik bei Kern/Schumann«, in: *Argument* 154, 27. Jg. 1985, 813-831; dies., » Ökonomie der Zeit, darin löst sich schließlich alle Ökonomie auf. Neue Herausforderungen an einen sozialistischen Feminismus«, in: *Argument* 184, 32. Jg. 1990, 879-893; A. C. Hofmann u. K. Dietrich, *Frauen zwischen Familie und Fabrik. Die Doppelbelastung der Frau durch Haushalt und Beruf*, München 1958; C. Klenner, »Doppelt belastet oder einfach ausgebeu-

tet? Zur Aneignung weiblicher Reproduktionsarbeit in DDR-Familien«, in: *Argument* 184, 32. Jg. 1990, 1865-1874; G.-A. Knapp, »Arbeitsteilung und Sozialisation. Konstellationen von Arbeitsvermögen und Arbeitskraft im Lebenszusammenhang von Frauen«, in: U. Beer (Hg.), *Klasse Geschlecht. Feministische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Wissenschaftskritik*, Bielefeld 1987; U. Lehr, *Die Frau im Beruf. Eine Psychologische Analyse der weiblichen Berufsrolle*, Frankfurt/M 1969; A. Myrdal u. V. Klein, *Die Doppelrolle der Frau in Familie und Beruf*, Köln-Berlin/W 1971; *Schweizer Lexikon*, Bd. 2, Luzern 1992.

弗里加·豪格撰

罗梓丹译，李牧今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kraft, Arbeitszeit, disponsible Zeit,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Familienarbeit/Hausarbeit, Frauenfrage, Hausarbeit, Patriarchat, Widerspruch, Zeit

劳动的二重性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A: al-ṭābiᶜ al-muzdauwidj li'l-ᶜamal.

E: dual character of labour.

F: double caractère du travail.

R: dvojstvennyj charakter truda (двой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труда).

S: dualidad del trabajo.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K I*，MEW 23，第 56 页）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MEW 23，第 56 页），也是《资本论》中他的分析（被其评论者杜林所忽视）的“三个崭新的因素”（1868 年 1 月 8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MEW 32，第 11 页）之一。“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MEW 32，第 11 页）李嘉图或者斯密都没有将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正因如此，他们不可能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刻画出来。（参见 MEW 23，第 94—95 页）前人所不能解释的、通过马克思的揭示而得到认识的现象，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主体方面都存在着矛盾的联系。

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1859) 中，马克思提出的“劳动的二重形式”是基于这样一种劳动概念，它在其产品方面被当作“二重存在”或“二重定在”。(MEW 13，第 53 页) 马克思在这里将商品的双重规定的存在形式区分开来：不同于使用价值的“现实的”存在，交换价值只是一种社会的有效关系的“观念的”或“想象的”存在。这就决定了“私人的特殊劳动为了取得社
813 会效力，必须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即抽象一般劳动”这样一种“必然性”。(MEW 13，第 54 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片断》[*Urtext*] 中也有类似的原文，参见 MEGA II. 2，第 53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劳动二重性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抽象与一般的辩证法：最初的问题是，“特殊的劳动时间不能直接与其他特殊劳动时间相交换，而必然要以它们的一般可交换性为中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MEGA II. 1. 1，第 102 页；MEW 42，第 103—104 页) 从《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开始，马克思才从根本上不再将劳动的两方面作为“特殊”与“抽象—普遍”的对立而在逻辑上加以范畴化。而在此之前的草稿中，交织着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质与量、特定性与无差别性等范畴的对立。

1.1 正如商品得到了二重的规定一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指出：“商品在活动中，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当然也是一个具有两方面的过程……并且这两个过程必须只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的形式。”(MEGA II. 3. 1，第 60 页) 在这里，马克思将“具有赋予形式作用的质或规定性”或者“有用劳动”，同“等同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的抽象劳动”(第 63 页) 区分开来。马克思在此仍然将创造价值的方面理解为“一般劳动”(第 64 页)。

在《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中，正是“把特殊的具体劳动作为**必要的社会平均劳动**的**量化**计算”(MEGA II. 4. 1，第 66 页) 构成了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方面。马克思在这里重新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他说，他“此前已经表明，以往所有经济学家基于‘**劳动**’对商品的分析都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将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应研究**劳动**的二重形式，其中它一方面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在**交换价值**中被当作**社会必要**劳动”(第 67 页)。马克思在注释中补充说，如果想到这种二重性，“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如下的争论，即劳动之外的自然是否对生产有所贡献。因为这种贡献只涉及**具体**劳动方面”(同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

（1867）中解释说，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了简化起见，在这里简称为**有用劳动**”（MEGA II. 5，第 22 页），而创造价值的劳动则是“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第 25 页），或者像他在分析价值形式的章节中说的那样，是“**抽象人类劳动**”（第 30 页）。在马克思于 1871 年 12 月至 1872 年 1 月为该卷的修订而作的**增补与修改**中，对劳动二重性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其中的第二段增补中就说，产品“只是价值……因为在产品中实现的各种具体劳动都被化为了**抽象人类劳动**”。从此，抽象劳动概念得到了澄清，“一般劳动”概念则用于承担另外一种重要的意义。这里的概念运用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第 23 卷中的表述（基于 1890 年出版的《资本论》第四版。——译者）大体相符：“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MEW 23，第 61 页）

814

1.2 劳动的二重性的原理反映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一种作为统一体被把握的现实存在（商品、劳动、生产过程、社会）分解为矛盾着的不同向度，而这种矛盾冲突对于形成这种现实存在的形式具有建构性作用。正如商品被理解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一样，生产过程也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MEW 23，第 201 页）的统一体。

正如商品的二重性不是指两种实体一样，劳动的二重性也不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而是同一个劳动之中的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规定，无论是就作为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言，还是就作为劳动的“对象性表现”的价值而言。马克思所试图总结的是一种对立运动的动态机制，它促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并迫使劳动者屈从于这种结构。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如何规定劳动的目的。这种规定性本身将成为与之相应的社会的控制性原则，并决定着劳动者的行为方式与思维形式。

对劳动的二重性（正如对商品的二重性）而言，出发点是为了市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这使“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MEW 23，第 87 页），一方面，在“社会分工体系”的意义上，它是“社会总劳动”的有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是单个生产者用以换取其必需的使用价值的交换手段（同上）。人们通过“实际交易……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来感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也就

815

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第 88 页）劳动的这两种趋向，即劳动力的耗费和具体有用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劳动的社会发展方面（对所有人的使用价值）似乎与其对立面（劳动力的耗费和交换价值的创造）融合在了一起，而劳动的具体有用性方面（相反）表现为劳动的私人性。在马克思进一步的分析中，劳动二重性概念还具有这样的功能，它被用来揭示运动形式之中的发展动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危机。在**形式分析**以及**危机理论**中，它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明显的体现是，财富的增长也会伴随着价值量的下降：“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MEW 23，第 61 页）以商品二重性的揭示为基础，也形成了对**货币形式**的分析：“为了交易，需要［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第 102 页）对劳动二重性的认识首先被用于分析等价形式，后来被用于分析资本的规定性。劳动一方面在劳动过程中是具体有用的，在这一属性上，它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劳动在另一方面是抽象的（即劳动力的耗费），在这一属性上，它**创造**价值。“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第 214 页）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同时保存价值，这种对劳动的规定后来被马克思用于分析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机器不使用也会产生损耗。（MEW 816
24，第 173 页）马克思还指出，斯密由于没有区分价值保存与价值创造，因而无法发现年产品中固定的那部分价值，即无法发现蕴含在生产资料中的资本的再生产。（参见第 376、383 页）马克思最终破解了**工资形式**的秘密，资本家为劳动力的职能，即有用劳动支付工资，但是，工资背后的劳动力商品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属性，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MEW 23，第 563 页）

1.3 马克思在各种语境中使用二重规定的分裂这样的隐喻，他在这里带领我们认识了一种悖论、一种发展机制，这种机制的基础同时又是对置身其中的

主体的限制。对于解放而言，科学地解释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就此而言，劳动二重性的概念对于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它表明，劳动尽管在形式上是自由的，却是被剥削的、异化的，劳动者的认知与生活乐趣备受劳动的阻碍。劳动以这种形式，而且仅仅以这种形式推动着社会发展，最终会使自由的生命活动与社会需要的满足不再必然相互排斥。从劳动二重性中解放，不是摆脱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创造价值的方面，而是指劳动二重性不再成为社会规则的规定性因素。根据马克思的意思，解放的基础，第一个是公有制，第二个是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发展，第三个则是政治革命，因为这关乎社会秩序与社会主体的全面转变。

2. 矛盾之中的因素构成一个“统一体”，它们彼此推动，这一运动既带来解放的力量，也带来阻碍解放的束缚。虽然这种观念具有政治意义，然而，在工人运动史上，对于“二重性”的分析并没有得到很多注意。罗莎·卢森堡曾提及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的分析，并且特别阐述了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的差异，由此将价值转移过程以及相关的“过去的劳动”的观念描述为“人与自然的文化历史的联结”（*Akku*，GW 5，第41页），描述为“人类社会中相互交织的劳作的持久链条，它的开端已经消隐在社会性的人类形成的朦胧破晓之中，它的终结则只有等到全部人类文明的覆灭”（同上）。她还提到了“古典学派”无法区分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第42页），但是对她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一学派传统的语境之中，特别是在李嘉图和斯密那里，价值创造是“人类劳动的一个自然属性”。她讽刺道：“因为劳动的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商品生产者，正如人类社会天生就以交换为基础，商品经济就是正常的人类的经济形式。”（第43页）她将具体有用劳动与抽象一般人类劳动的区分称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天才的基础思想”（第78页），由此发展出如下成果：货币问题的解决，即对“再生产总过程的两个方面……的分裂与统一”（同上）的破解；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明确区分，它使生产中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关系得到理解。卢森堡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加具有发展与限制相互作用的观念，这种观念通过二重性概念得到表达和研究，并被转化出政治意义。在“革命的现实政治”的发展中，她运用这种认识提出从“正义感”和群众经验出发的战略安排，在这里，人民生活中的矛盾催生出新的解决方案。

3. 不仅是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也有所获益于劳动的二重性的

817

分析。正如马克思的分析中对各种因素的安排一样，对于研究劳动意识和人格发展而言，规定性的因素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对人类劳动的二重存在的理解中，个人与社会最终以某种方式交织在一起，这至少给出了行动与思维的框架条件，以及对意识的规定性的启示。马克思曾反复表明，这种二重性是在“普通意识”（*K I*，MEW 23，第 563 页）领域之外的。他最终这样描述受制于价值形式的人类行动，这种行动丧失了完整的意义：“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同上书，第 88 页）

佐恩-雷特尔（1970）正是在这一点上批评马克思，他指责马克思的（对
818 商品的）分析没有包含“关于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遗传学的（genetisch）解释思路”（第 185 页），这恰是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建立在将交换平等或等价作为前提的基础上，因而建立在价值范畴本身的基础上”（第 187 页）。佐恩-雷特尔发现，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的简单商品交换与本质上是剥削与统治的商品交换之间存在根本断裂。历史在货币经济出现之际展现出这种断裂。他与马克思的不同意见在于，通过一般商品交换而出现的抽象，是伴随着货币经济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而出现的，马克思却错误地、未经证实地将其归结于抽象劳动。他由此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证“基于商品抽象的质性问题（qualitative Problematik）”而存在“一种不合理的范围扩大”。（第 189 页）

对于马克思借由其分析而带来的科学上的飞跃，佐恩-雷特尔试图使它回退一小步，并限缩在特定领域之内，相反，吕西安·塞夫（1972）则试图扩展它。他尝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直接转译到人格理论之中。他的出发点是，劳动二重性“正是一切关于人格的研究真正得以展开的要点”（第 172 页），他还提出了“**能力活动**与能力**生产**的二重性”（第 338 页）的构想。当然，他绕过了矛盾运动的思想，而这是马克思所运用的二重性的概念所独有的思想，他也不再认为能力既是行动的出发点，又是行动的结果。他在人格发展的时间规划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规定。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理论，霍尔茨坎普（1983）开始对马克思的这种二重规定下的统一体的概念构造方式加以理解和发展：在有限的/一般的行动能力的概念中，有限的方面强调的是既有结构的均衡，而一般的方面则试图对行动的条件加以掌控。

在自动化与技能项目（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1980—1987）关于自动化劳动的经验研究中，劳动二重性作为具有理论张力的框架而得到运用。他们的基础性假设是，随着技术的

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价值的劳动与导向使用价值的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将经历一个撕裂性的加剧过程，以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的现代雇佣劳动者而言，必将会发现一种劳动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全新形式。

819 **参考文献：**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Automationsarbeit. Empirische Untersuchungen*, 4 Bde., Berlin/W 1980-1985; dass.,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 1987;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Frankfurt/M 1972;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弗里加·豪格 撰
张义修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bstrakte Arbeit, abstrakte Tätigkeit,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Befreiung, Denkform, Dialektik, Entfremdung, Form, Gebrauchswert, Geld, Gleichgültigkeit, Handlung, Individualitätsformen,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ubjektwissenschaft, Wert, Wertform

两个政权（Doppelherrschaft）

A: sulṭa muzdauwidja. – E: dual power.

F: double pouvoir.

R: dvoevlastie (двое властие).

S: doble poder.

在报纸上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列宁在1917年3月15日写道："今天我们在苏黎世都很激动。"（致伊·费·阿尔曼德 [I. F. Armand] 的信，*Briefe* 4，第397页）一天后，他得知了更详细的情况："工人们血战了一个星期，米留可夫十古契柯夫十克伦斯基却掌握了政权。"（致柯伦泰 [Kollontai] 的信，同上书，第398页）第二天，列宁提到了新政府是"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LW 23，第301页）。于是在3月19日发出的电报中，列宁写道："不给新政府任何支持；把无产阶级武装起来——这是唯一的保证。"（第306页）对此他并没有高估无产阶级的前景。唯一最可能会实现的是沙皇制度的迅速崩溃，"因为在当时那种异常奇特的历史形势下有**完全不同的潮流、完全异样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社会倾向汇合起来了"（第316）。除了新政府的产生，废除沙皇的斗争还导致了一个"非正式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比较弱的工人政府"

的产生（第 318 页）：列宁在工人和士兵代表组成的彼得堡苏维埃中看到了“真正的人民政府”的希望（第 365 页）。

在 4 月 22 日的《真理报》上，列宁第一次用“两个政权”这个概念来形容这种两个政府之间的相互共存、交织和反对的局面（LW 24，第 20 页及以下，见《为论证四月提纲写的要点》[*Entwurf eines Artikels oder einer Rede zur Verteidigung der Aprilthesen*]，写于 4 月 17 日和 25 日，他使用这个概念时用了引号，参见第 14 页）。“同时并存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第 28 页）这个“以前谁也没有想到，而且也不可能想到”的概念证明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公式’”，即无产阶级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之后出现，只是“大体上”正确。（*Über die Doppelherrschaft*，LW 24，第 20 页）

最初列宁和他的观点是少数派。甚至在他自己的队伍中，同样也有人表示了对临时政府的支持。《远方来信》（*Briefen aus der Ferne*）中只有第一封在《真理报》上刊登出来，其中“批评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的妥协政策和揭露临时政府继续君主主义的意图”则被删去了。（*Briefe* 4，编者注 493）

列宁将两个政权作为一个革命战略的概念。事实上，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彼得堡苏维埃所采取的“实际政策”几乎否认了两个政权的主张，相反，他们采取了直接参与临时政府和继续支持战争政策的做法。艾伦斯坦认为，两个政权只存在于“制度”层面上而不是“政治”层面上。（1972，第 100 页）同时列宁也明白，实际上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的霸权导致了临时政府的专制。在此背景下，之所以提到两个政权是旨在提醒人们，革命尚未结束，而且必须“通过民主变革到达公社”（1917 年 3 月 24 日致卢那察尔斯基[Lunatscharski]的信，*Briefe* 4，第 409 页）。两个政权的概念强调了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区别，但实际上活动家们是“交织在一起”的。（LW 24，第 45 页）列宁一次次地提醒道，苏维埃是与临时政府“完全不同的政体”：也就是这样一种政体，它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是……法律”（第 20 页；原着重标记未保留）。布尔什维克派的任务是继续保持这种尖锐的对抗。因此“决不同其他党派接近”（*Briefe* 4，第 409 页）。所以不仅要反对内部的妥协派，也要反对那些想要立刻就推翻临时政府的布朗基派。在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形势下，不存在要“推翻”什么。真正至关重要的是“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LW 24，第 31 页）。要成为领导党派，

820

821

布尔什维克必须以“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说明**”为中心工作。（第5页）

这种“说明”所包含的并不仅是针对落后的阶级意识和从外部对“群众”进行呼吁的政策。列宁将苏维埃视为一所人民的学校，视为社会的动员模式，它“比议会制共和国更快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LW 24，第36页）。其中最关键的是将说明和主动性结合起来：“**培养群众**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手段……不仅用言语，而且通过行动”，即参与到“政治生活”中。（LW 23，第343页）另一方面，“群众”和“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相对立，明显暴露出政治参与的中介形式的缺乏。之后苏维埃迅速转变为一个由政党独自控制的苏维埃国家，在此过程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同时人民代表退化成统治者的鼓掌机关。

马克思主义中一系列具有“两个（双重）”（Doppel-）前缀的词组都很重要：“劳动的二重性”、“双重压迫”、“双重斗争”、“双重权力”等。这些词组使得人们可以理论化地处理这一经验——各种各样的分类还原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做法或许是将现实分为一个主要矛盾和多个次要矛盾）已经原则上证实是无效的。阿尔都塞为了将精神分析领域的“多元决定”的概念引入历史唯物主义，追溯1917年俄国“集两次革命于一身”（1962，第61页）的例子，这不是偶然的。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Widerspruch und Überdeterminierung« (1962), in: ders., *FM*, 52-85; J. Elleinstein, *La conquête du pouvoir 1917-1921*, Paris 1972 (= Histoire de l'urss, Bd. 1); M. Hildermeie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1905-1921*, Frankfurt/M 1989.

彼得·耶勒（Peter Jehle）撰
盛舒洋译，张文红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sterben des Staates, Arbeiter-/Bauernstaat,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riats, permanente Revolution, Rätekommunismus, Rätesozialismus, Revolution in einem Land, Revolutionäres Subjekt, Russische Revolution, Staatsmacht

双重斗争（doppelte Militanz） 822

A: nidāl unthāwī muzdauwidj.

E: double militancy.

F: double militantisme.

R: udvoennaja voinstvennost' (удвоенная воинственность).

S: doble militancia.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许多投身于左翼组织的妇女认识到，社会主义方案没有很好地纳入妇女解放。因为她们没有成功地把反抗妇女压迫的斗争确定为社会主义政策的一个独立层面，最终她们意识到必须要“发动两次斗争：一是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二是对父权制文化及其产物的斗争，这些文化和产物会反过来利用资本并进行恶毒的剥削”（Ravaioli 1977，第 163—164 页）。这种实践被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命名为**双重斗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中的单一不可分割的统治概念。这个概念将阶级对抗作为社会统治的根本关系，是所有其他统治关系的根源。这种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使得男性在女性面前拥有特权地位的最终和最深层的根源”是私有制（Zetkin 1920，第 260—261 页），“妇女问题”是“次要矛盾”。女权主义者反对这种还原论，指出必须认识到父权制压迫关系的特征，必须对多种形式的男性的权力和统治进行独立斗争。这不仅意味着打击各个机构内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性别歧视，也意味着挑战对政治的传统理解。政治中“私人的”和“公共的”的传统划分被抨击为父权制的表现，因为私人领域按照这种划分总是超出政治范畴，而正是在私人领域父权统治表现得尤其强烈。“男性化的”政治形式受到质疑，这种政治形式和职业革命家这个概念一样，建立在排除主体的和私人的领域的基础之上，从而再生产出妇女的从属地位。通过提出“我们每个人既是群众也是先锋队”的要求（Usai/Ravera 1977，第 217 页），女权主义者诉之于新形式的政治实践。

将社会主义项目按照女权主义的做法激进化的尝试，在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中得不到大力支持。这些组织对此的反应是忽视和抵触。妇女的经验报告充分证明，女权主义要求如何一次次被边缘化，她们的报告如何被视为“偏离主题的”，女权主义者如何被指责在搞分裂。（参见 Jelpke 1981）结果很多女权主义者为了能形成**主体性政治**（*Politik der Subjektivität*）和自己的抵抗形式，离开了社会主义组织而只投身于妇女运动：“过去的几个月已经证明了，占据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还是不足以实现女权主义……今天我们不得不说……实现的方式只能有一种：在小组中的意识发展以及妇女之间的实践。”（Usai/Ravera 1977，第 213 页）另一些女权主义者则希望继续将当前机构作为活动领域，并且没有放弃去干预政治制度的尝试，这些女权

主义者在现实中代表了双重斗争的一种政策。如意大利金属工人工会中的女性一样，她们追求的是“一种对妇女进行双重组织的计划，一方面是将普通妇女组织起来以赋予她们主观能动性和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则是在工会的框架下将妇女组织起来，因为她们坚信，妇女斗争是阶级斗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工会谈判中的优先内容”（Piva/Ingrao 1986，第 667 页）。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双重斗争就是“从一个新的女权主义视角出发，推动整个工人阶级的要求和行动”（同上）。

尽管这种女权主义社会主义政策的实践让个别妇女有效地了解了来自不同方面的经验和观点，但这种双重义务也带来了双重负担。而且由于男性主导下的组织十分僵化，因此想要通过将妇女问题添加到各个机构的政策和实践中以此来对总政策进行改变的做法最终无法实现。即使在设立了独立妇女代表的工会和政党中，其作用也仅仅只是推迟了这些问题的暴露。妇女委员会并没有获得对“整个组织的影响力”，除非她们先放弃自己的立场：“因此，在很长时间内，许多妇女从政治活动中退了出来，因为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女权主义的真正内容从来就没被代表过，而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又跟男性政治的内容和形式太像了。”（第 670 页）

跟意大利相似，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出了多种实践，其中将反父权制和反资本主义的战略结合起来。如美国**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的妇女就提出了“双重前线”，并建议妇女应该在美国学生运动“内部‘单独地’”组织起来。（McAffee/Wood 1972）法国女权主义者则主张“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差异化的斗争”，她们推动的这些斗争比在意大利的斗争更加相互融合。（参见 Jelpke 1981） 824

荷兰的妇女们则构想出了自己的“双重战略”，旨在“让自治团体中的妇女到现有的机构中工作，而不是或在自治团体里或在机构中”。（Svenhuisen 等 1978）英国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则将反抗女性压迫的斗争视为“与阶级斗争密不可分”，他们将视线对准了“既在男性主导的权力关系中进行斗争，也与这种权力关系进行斗争”。（Cootc/Campbell 1982，第 33 页）同样在联邦德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也采取了一个政治的**双重概念**：“我们在解放的道路上根本无法绕过这个前缀为双重的单词，在工作中不行，在家中不行，在政治上也不行。因为我们是被双重压迫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发起双重的斗争。”（Doormann 1979，第 69 页）关于父权制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父权制的讨论也将这个问题包含了进来，并指出必须要“意识到如下

特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对妇女的压迫并将自己建立在了此基础之上”（Haug 1990，第 879 页）。

双重斗争的政策强调的是妇女在对还原主义式单一政策的斗争中的独立性，由此这种政策遭受了来自其他方面尤其是种族主义和“异性中心主义”的挑战，他们主要批评的是女权运动内部和对外表现出来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妇女压迫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似乎显示了需要的并不是**双重斗争**，而是**多重斗争**，但由此产生的风险是，每个社会总体项目愈来愈碎片化，容易被忽视。因此这里的问题就是如何去设计旨在废除一切形式剥削和压迫的解放项目。这就需要相应的组织结构，在保证其独立性的同时，还能保证它和其他不同斗争之间保持联系。从民主德国的民主运动产生出来的
825 “圆桌会议”模式，似乎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参见 Kurz-Scherf 1992，第 112 页及以下）

参考文献：

Autonome Frauenredaktion Argument (Hg.), *Projekt sozialistischer Feminismus. Frauenpolitik 2: Weiberräte-Frauenmacht*, Berlin/W-Hamburg 1984; dies. (Hg.), *Frauenbewegungen in der Welt. Bd. I: Westeuropa*, Berlin/W-Hamburg 1988; A. Coote/B. Campbell, *Sweet Freedom: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Liberation*, Oxford 1982; L. Doormann (Hg.), *Keiner schiebt uns weg: Zwischenbilanz der Frauenbeweg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Weinheim-Basel 1979; Z. Eisenste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1979; F. Haug, »Ökonomie der Zeit, darin löst sich schließlich alle Ökonomie auf: Neue Herausforderungen an einen sozialistischen Feminismus«, in: *Argument* 184, 32. Jg., 1990, 879-895; B.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1984; U. Jelpke (Hg.), *Das höchste Glück auf Erden – Frauen in linken Organisationen*, Hamburg 1981; I. Kurz-Scherf, *Nur noch Utopien sind realistisch: Feministische Perspektiven in Deutschland*, Bonn 1992; C. McAffee u. M. Wood, »Was ist das revolutionäre Potential der Frauenbewegung?«, in: Arbeitskollektiv der sozialistischen Frauen (Hg.), *Frauen gemeinsam sind stark.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den USA*, Frankfurt/M, 1972, 41-59; P. Piva u. C. Ingrao, »Subjektivität der Frauenund gewerkschaftliche Macht«, in: *Argument* 159, 28. Jg., 1986, 666-671; C. Ravaioli, *Frauenbefreiung und Arbeiterbewegung: Feminismus und die KPI*, Hamburg-Berlin/W 1977; R. Rossanda, *Einmischung*, Frankfurt/M 1983; S. Svenhuisen u.a., *Socialisties-feministiese teksten 2*, Amsterdam 1978; A. Usaiu. L. Ravera, »Die Zeiten der Frauen sind die Zeiten, die die Frauen sich geben«, in: M. Wunderle (Hg.), *Politik der Subjektivität: Texte der italienischen Frauenbewegung*, Frankfurt/M 1977,

206-221; C. Zetkin, »Richtlinien für die kommunistische Frauenbewegung« (1920), in: dies.,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Bd. I, Berlin/DDR 1957, 260ff.

苏珊娜·莱托（Susanne Lettow）、阿丽亚娜·布伦塞尔（Ariane Brenssell）撰
盛舒洋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Befreiung, Besitz/Eigentum, Doppelbelastung, Feminismus, Frauen, Frauenbewegung, Frauenemanzipation, Hauptwiderspruch, Herrschaft, Marxismus-Feminismus, Patriarchat, privat/gesellschaftlich, Runder Tisch

村落共同体（Dorfgemeinschaft）

A: mashāʿa rīfīya. – E: village community.

F: communauté de village.

R: sel'skaja obščina (сельская община).

S: comunidad campesina.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及政治家对村落共同体的观点持续地受到《共产党宣言》中一句话的影响，即资产阶级使一部分人“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MEW 4，第466页） 826

看来，作为居住于城市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公民，马克思和恩格斯欢迎西方通过不可阻挡的世界市场摧毁那些古老区域与国家的自给自足与封闭孤立状态。他们认为，这个过程的负面影响表现为持续的劳动分工所导致的城市与农村的区隔，这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DI*，MEW 3，第50页）。大城市的局限体现在生存的物质压力以及其对生态过程的破坏，而农村的缺陷则体现在精神与政治上的封闭守旧。恩格斯于1872年期望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缩小城市规模，并解决废料问题——如农业中的肥料——以及将农村人口从“孤立与愚昧”中解放出来，而这种状态“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Zur Wohnungsfrage*，MEW 18，第243、280页）。

从经济上看，“愚昧的乡村生活”源于生产工具的分离，以及农业劳动封闭、分裂的特点（集体劳动的观念在此是缺失的，如在亚洲农业中）。而在政治上农村居民并不具备历史性的首创精神。这就导致了农民成为专制政权的支

持者，如路易·波拿巴以及东方的专制国家。恩格斯在1875年一场有关亚细亚生产模式的讨论中对村落共同体的政治角色进行了反思。“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共同体里面生活和活动”，这对他们而言是整个世界（俄语中的“村落共同体”）。“各个共同体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单个社区之间的隔离。”（*Soziales aus Rußland*，MEW 18，第563页）

这里欠缺了对村落共同体中团结因素所产生的社会功能的评价，它在专制关系中以及变迁的经济条件下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并孕育着反抗的因素。《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农民在城市中作为逃离土地的个体出现，他们面对的是有组织的行会团体。而农村所特有的社会纽带则是一种羁绊，这种纽带将农奴与其封建主捆绑在一起。这可能来自于欧洲封建结构的某些特征。农民们往往被视为一袋子土豆（*18. B*，MEW 8，第198页），这种充满贬义的比喻反映出农田与村庄的孤立和农民的无能，他们缺乏以一个阶级展现历史性首创精神的能力（Draper 1978，第348页），他们也无法真正理解农村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在这些农业社会中，农村作为社会共同体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点却很少被社会主义者重视——在那些“农村社会主义者”（Agrarsozialisten）看来。

关于“愚昧的乡村生活”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隐藏了另一条线索。正如T. 沙宁（T. Shanin）、H. 瓦达（H. Wada）等人所言，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与民粹派（Narodniki）的对话使得马克思于1870年重新评价了俄国的农民公社。在新的认识中，农民与其组成的公社性的社会组织在后革命社会中扮演着更积极的角色。在与摩尔根的对话中，马克思首次回答了维拉·查苏利奇，“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马克思还补充道：“因此，不应该特别害怕‘古旧’一词。”（MEW 19，第386页）他将俄国农村公社视为“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第403页）。他看到，农村公社拥有发展集体劳动以及自我发展的潜力。这个“区域性微环境”的缺陷在于，它与其他社区相隔离，马克思长时间关注不同国家中的农村，他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并在普雷斯科特（Prescott）1851年有关墨西哥和秘鲁的著作中作了摘录。（MEGA IV. 9，第412页及以下，第427页及以下）在此方面，马克思研究的顶峰出现在1879年第82期的《民族志节选刊》（*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n）中，但人们却更多地关注了他对查苏利奇的回复而将此忽视了。

班瑞杰（Banerjee 1985）指出，在此研究中马克思极力避免——如同摩尔根一样——基于单一模式对远古社会形式进行分析。

很不幸的是，马克思的上述见解并没有在俄国革命中得到贯彻。年轻的列宁似乎赞美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以及资本主义的“使命”，如在《共产党宣言》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旧的压
828 迫的环境，在此环境中，俄国农村的居民在其剥削者的控制之下，并如同牲畜般“得过且过”。（LW 3，第 389 页，参见第 317 页及以下，以及第 616 页及以下）列宁发现，农民们的“天真，他们对政治的疏远，他们的神秘主义，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愿望，他们的‘对邪恶不抵抗’”反映在了托尔斯泰那里（LW 16，第 337 页）。尽管如此，受到农民（革命）行动的启迪，列宁对农民革命的潜力的评价相对还是高于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列宁的评价也就仅限于此。他没有研究社会形式和结构中的相互义务与团结。在他的期盼中，这些情况将在现代化的熔炉中首次实现。因此，列宁随后没有将农村中现存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些在斯托雷平改革后仍然存留的形式——作为新建的上层建筑（Neuaufbau），尽管他曾试图将穷困的农民以阶级为基础组织起来，但这并不成功。在此之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针对传统结构发动了一场社会战争，这场战争毁灭性的后果导致了后共产主义的危机。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在对秘鲁印第安农民“社区”（comunidad）的分析中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采取不同的做法，并在某些恶化的条件下依然“不断加强、稳固的合作和团结的习惯”（1928，第 76 页）。

这并不是说，为了将村落共同体浪漫化而忽视社会微结构。剥削关系以及反人性的环境存在于村落共同体中。但是，有必要改变一下对其整体负面的看法。传统农村的“微环境”蕴藏着多种多样的经济与社会的行为、关系和经验。同时，其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有时也比人们想象中的更多样化。最重要的是去追问，农村在经济、生态与社会方面可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做出何种贡献。

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其自传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反思，他指出，社会运动并不能放弃区域社区的社会化功能。他提到了其在威尔士所体验到的农村中邻里关系的团结性，而在临近的工业区也有相同的情况。在威廉姆斯看来，这有助于在国内以及在国际层面上实现一个团结的社会，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829 他问道：产业工人的团结多大程度上来自于先前农村集体中的归属感？这个问题又引出进一步的提问：团结传统在大城市中的破裂在多大程度上与团结在显而易见的关系中缺乏具体经历有关？威廉姆斯建议进行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应当将地区内相互联结的社会纽带考虑进去。将社会中的微结构作为小格局或小市民的因素排除是马克思主义在自身发展中的一次修正。在这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例外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与马克思所批判的“乌托邦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被重新评价。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与向生态社会主义（Saral Sarkar、Vandana Shiva 等）的转向汇聚在一起，以超越中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即去中心化，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而不是简单地改变农村并为重构的农村寻找到一个新的角色。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村落共同体持有负面态度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认为农村市场仅仅服务于世界市场，以及任何参与市场的农民都必然是潜在的资本家或是投机者。这种观点忽视了小农从业者和小手工业者卖东西仅仅是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并且，他们都是以传统的团结结构作为支撑的。C. T. 奎恩（C. T. Kurien）认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农村经济”实践在农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一直延续，并部分存留于城市中，因此，无论在对经济现象的实际分析中还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策略中，它都应当被重视。这就意味着，在一些仍有大部分民众生活与工作在农村的社会中——如印度——应当探索一种社会主义的导向，即并不全盘否定那些仍然存在的“远古”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而是看到一种未来具有生态生命力的新的社会潜力。

参考文献：

D. Banerjee (Hg.), *Marxian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u Delhi-Beverly Hills-London 1985; H.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lasses*, Bd. 2, New York 1978; L. Krader (Hg.) *Karl Marx. 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 Frankfurt/M 1976; C. T. Kurien, *The Economy. An Interpretative Introduction*, Neu Delhi 1992; J. C. Mariátegui, *Sieh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hkeit zu verstehen* (1928), Berlin/W-Freiburg 1986; T. Shanin (Hg.), *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 Harmondsworth 1971; ders.,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83; B. Wielenga, *Marxist Views on Ind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dras 1976; R. Williams,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London 1989.

830

巴斯蒂亚安·维伦加（Bastiaan Wielenga）撰
刘梦岳译，李牧今校

参见：
Agrarfrage, Agrarreform,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Bauern, Bauernbewegung, Bonapartismus, Dezentralisierung, Dummheit, Erinnerung, Eurozentrismus, Fortschritt, Gemeinwesen, Modernisierung, Ökosozialismus, Pariser Kommune, Solidarität, Stadt/Land, Tradition, Universalismus, ursprüngliches Gemeinwesen,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Weltmarkt, Weltsystem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Drei-Welten-Theorie)

A: nazarīyat al-ʿawālim al-thalātha.

E: three worlds theory.

F: théorie des trois mondes.

R: teorija trech mir (теория трех миров).

S: teoría de los tres mundos.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依托于毛泽东在1974年2月22日（在与赞比亚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K. Kaunda]的谈话中）的一个说法："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1977年11月1日，这一表述首次公开发表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但在邓小平于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一表述对中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邓小平援引了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但并没有指明作者。然后，邓小平强调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政治核心："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决裂，这一决裂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随着《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1963/1964）的出版彻底完成。这一决裂的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有关中国革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有反对的声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遵循了一个独立的方针路线，尤其是在关于革命的主要力量的问题（农民而非工人阶级）、与国民党的结盟问题上。出于一种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天下"、"中央之国"），以

及从一场凭借自身力量、部分地违背苏联命令却充满胜利的革命中得来的自我意识，中国不可避免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角色，这一角色不甘服从苏联的领导。苏联在1949年以后的强权政治，尤其是试图将中国融入自己的军事政治计划中（如企图将苏联的海军基地建在中国领土内），加剧了中国逐步与苏联拉开距离的倾向。此外中国最初将自己视为“贫穷的”、不发达的国家，既不能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核武器和航天计划）相比。中国自1955年（万隆会议）起加强了在“不结盟运动”领域的外交政策参与，尤其是在亚非拉三大洲的领域。

与苏联的决裂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使中国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中国的领导人得出结论，中国从苏联方面受到了比美帝国主义方面更多的威胁。同时，中国的领导人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看得很重，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盟友。按重要性序列是：（1）与中国有亲善意向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朝鲜、有所保留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2）“第三世界”；（3）那些试图摆脱超级大国影响的“第二世界”国家；（4）作为“较为不危险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形成，可以看作重新定位外交政策的终点。

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事后通过“经典语录”（在中国马列主义的语境中首先指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得到阐述。《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引用列宁在1916年所作的一个评价来论证，与“第三世界”结盟等战略是正确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只能是指一个时代，其间既有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的、革命的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LW 23，第53页）划分多个“世界”也可以追溯为列宁的传统：“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压迫民族。”（LW 31，第228页）“但遗憾的是，现在地球上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旧世界……一个是正在成长的新世界。”（LW 33，第132页）斯大林说：“世界已经确定不移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W 4，第205页）——这只解释了世界的二分，但斯大林也谈到过与上述分法交叉的第二种划分：“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拥有财政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为数极少的文

明民族的阵营，另一个是造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阵营。”（W 6，第 127 页）

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实践家和理论家，毛泽东在 1940 年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这种（世界）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AW 2，第 404 页）这一表述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日后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依据，“第三世界”国家之内的阶级对立相比“第三世界”国家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泽东在 1957 年 1 月彻底抛弃了列宁和斯大林原来主张的世界二分的理论。“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AW 5，第 408—409 页）本质上这里谈的就是后来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中所说的“三个世界”，只是苏联还必须被添加到超级大国那一栏去。

苏联共产党批评了这一“新理论”：“按照这一理论，我们时代的根本矛盾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成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Die Polemik*，1965，第 225 页）反过来，中国共产党也谴责苏联共产党抛弃了上述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第 221—227 页）但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通过任何公开的书面或口头表述支持过“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相反，他甚至在世时就阻止过发表他 1974 年 2 月 22 日的讲话。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表述是从 1977 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后一年，才开始的。与之相反，毛泽东是在外交政策构想的意义上阐释和提及这一理论的。

夏尔·贝特兰在 1978 年（第 129 页，注释 70）否认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有任何科学根据、反映了任何现实。“这一理论错误地假设了，仿佛‘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中，团结会高过矛盾。这个想法与我们从历史、过去和当下中学

到的所有东西背道而驰。历史揭示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彼此对立，激烈冲突。”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掩盖了其中的阶级矛盾”，尤其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对抗。

实际上在毛泽东去世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仍然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外交政策概念，而没有成为一个建立在具体分析之上的理论。这一理论是从特定但几乎未被论证的理论前提出发的，例如，认为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80年代初以后，这些前提甚至最后对苏共修正主义的指责都放弃以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随之消失了。这一理论不能被视为战略计划，是因为它总体上依赖于当时对苏联的实际战术判断。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另外两个基础要素，即重视“第三世界”及其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仍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意义重大。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政策引领了一场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于是曾经的外交政策也变得过时了。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了工业国家，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与亚非拉三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日益频繁地出现不一致的情况。

参考文献：

C. Bettelheim, »The Great Leap Backward«, in: *Monthly Review*, 30. Jg., H. 3, 1978; »Die Theorie des Vorsitzenden Mao über die Dreiteilung der Welt ist ein bedeutender Beitrag zum Marxismus-Leninismus«, von der Redaktion der *Renmin Ribao*, 1. November 1977, in: *Peking-Rundschau*, Nr. 45/1977, 11-43; *Die Theorie der Drei Welten*, 2 Bde., hgg. v. ZK der Marxisten-Leninisten Deutschlands, Frankfurt/M 1978 (Dokumente I: *Die Theorie der Drei Welten. Die Klassenlinie im Internationalen Kampf des Proletariats. Dokumente der KPCh und der Partei der Arbeit Albaniens*; Dokumente II: *Der Vormarsch der Drei-Welten-Theorie Mao Tsetungs*); Deng Xiaoping, »Rede auf der Sondertagung der Uno-Vollversammlung (10. April 1974)«, in: *Peking-Rundschau*, Nr. 15/1974, 8-13; *Die Polemik über die Generallinie der internationalen kommunistischen Bewegung*, Peking 1965.

英戈·内特维希（Ingo Nentwig）撰

阿斯汗 译，曹旸 校，杨河 审

参见：

Blockfreiheit, chinesische Kulturrevolution,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ritte Welt, Hegemonismus, Maoismus, Mao-Zedong-Ideen, sozialistische Marktwirtschaft, Supermächte, Trikontinent

第三世界（Dritte Welt）

A: al-ʿālam al-thālith. – E: Third world.

F: Tiers-monde.

R: Tretij mir (Третий мир).

S: Tercer mundo.

—

“第三世界”一词有着非常广泛的定义和用途，但也因此被很多人出于意识形态和学术的理由而拒绝（拒绝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和学术上的专有名词。——译者）。有时它的含义十分明确，有时则是人们在找不到更合适的名词时才会用它——或者仅仅是出于习惯和为了方便学界和政界的理解而使用这个单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这个词愈加含糊不清和复杂。它形成了一个包含各种含义的交集，可以用来表示同一个模糊的特殊现象。雅尔塔会议（Konferenz Von Jalta，1945 年）以及“西方的”、“自由的”或“资本主义的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两者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使它在政治上获得了第一个含义。在主要由亚洲国家和一些非洲国家参与的 1955 年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在上述两个集团之外还存在着第三个集团，这是一个为独立自主的发展而奋斗的集团。会上，人们明确地意识到，除了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斗争，即争取独立、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大国干预国家内政或者侵犯领土的斗争。此外还包括争取国家之间的相互平等以及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国的出席、苏联和西方大国的缺席对万隆会议起到了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同样还有拥有极度贫困人口的国家的参与和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缺席。许多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缺席，暴露了（第三世界中的）不同团体之间存在着界限，也间接地揭示了万隆会议所要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界限。

万隆会议提出了“不结盟”的概念。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原则之外，不结盟运动还拥护了“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共存，这与民族和国家的大小、经济力量、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差异无关，与种族、宗教和历史文化传统无关”（Gavrilovic 1970）。除了亚非拉的参与者之外，南斯拉夫是唯一的欧洲代表。南斯拉夫的加入凸显了这个运动的独立性，即独立于大国，独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民主”之间的斗争。

第三世界中的国家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一些国家生活在极度贫困和落后之中，而另一些国家的社会阶层则是以中高收入群体为主；这些国家在城市化的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一些国

835

836 家盛产石油并且高度工业化，而另一些国家则是资源匮乏和工业程度很低；一些国家以农业和矿业为主，而另一些国家则已具备了有效的工业化政策，并形成了本土资产阶级，在面对来自拥有高度发达的技术和生产力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时，这些得到国家支持的资产阶级通过替代进口产品和保护主义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市场。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很大：一些国家依然以朝贡式的生产关系和不同形式的非自由劳动为主，而另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雇佣劳动、城市化，出现了广泛的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积累的政策和剩余（价值或产品）的分配——除了愈来愈多留在国内的部分——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其中主要受益者是第三世界中新出现的大资本家，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并维护国家的稳定，采取了一种能够获得有组织的就业者、城市居民和乡村群体广泛支持的剩余分配政策。这些国家用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阐述自己的政策并使之合法化，这些政策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面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大国时能保持不同程度的中立或遵守联盟义务。

20世纪60年代初，积累模式和民粹—民族主义项目的危机显现出来。从那时起，对不结盟运动的“民族主义”的批评也就转变成对第三世界概念的批评。

在关于第三世界的纲领中，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尝试去把殖民地的人民组织起来，即那些经历过殖民历史并且现在正在遭受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和从属关系的人民。但这一点被一些大国的思想家和学者否定或者很难被他们所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殖民主义只是一种过去的和从属关系的现象，而不是造成这些国家现在落后的原因。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和思想家，尤其是那些在苏联领导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从一开始就认为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是不科学的，在政治上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第三世界”是与“科学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表述。他们指责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的目的是去寻找另外一个能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同样遥远距离的地方。在政治上，他们将第三世界这个概念称为“是对帝国主义和垄断的投降”；这个概念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斗争，即由“全世界人民”参加的、旨在反抗“帝国主义反动的、好战的倾向”的斗争。于是这些作者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Breve Diccionario*，1970）（在民主德国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参考文献中没有出现这个概念，在《社会主义辞典》[*Lexikon des Sozialismus*]和 837

《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中也是如此。）不过他们忽视了，虽然他们所属的两极体系终结了殖民主义，但后殖民主义依然存在，于是这些后殖民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却还是因共同的立场而站到了一起："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世界，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对立解放出来了一个**第三世界**。"（Haug 1979，第 202 页）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同样也受到了新左派思想家的批评，即由于古巴革命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产生的新左派。随着跨国集团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在传统的民粹式执政的基础上产生了民粹主义政权，这种民粹式执政的弊病导致了两种典型现象的出现和相应批评的出现。一个是在第三世界内部出现了统治中心和积累中心，从而使得南非、以色列、伊朗、巴西和印度等国家被列入了"次帝国主义"的范畴（Petras 1981，第 39 页及以下）；另一个则是除了国家资产阶级和跨国家资产阶级不断融合的现象之外，第三世界中还出现了军事一体化进程以及军队与"官僚—威权主义"政府的结合。所有这些联盟和融合使这些国家的独立事业化为泡影。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中，社会积累和私人/个人积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集会也变得越来越教条化和空洞化，里面只有仪式，没有理性、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于是左派的某些作家不仅否认了第三世界的存在，而且还否认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安德烈·贡德·弗兰克（1991）的观点，即认为只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实际上自人类历史开始以来"就是如此。

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最终导致了不愿看到的苏联的终结——不仅抛弃了基于积累、阶级立场和反帝国主义的观点，而且还提倡只存在一个人类斗争的概念，即实现共同的、有尊严的生存的斗争，它凌驾于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之上。为了实现这个全世界的幸福，他提出需要两个阵营之间的对抗性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指停止极端的军备竞赛，并在"裁军促进发展"的口号下将停止军备竞赛所获得的资金投入到有利于第三世界和有利于产业政策的生态转型中去。（Gorbatschow 1988 及 1989；参见 Haug 1989，第 49—102 页）在承认世界革命周期已经结束和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失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1989）提到："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要建立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尊重其这样做的权利。"而苏联的大部分学者则更激进，他们宣称类似"阶级斗争"这样的范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和实践形式，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都已经过时了，于是他们认为接下来要先去改变官方崇拜的对象，即终结上述那些

838

官方形象，并将“市场”作为他们新的崇拜对象。

随着“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结束，似乎就只剩下了那个从16世纪开始形成并控制世界的“第一世界”。在一段时间内，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致力于国家发展并坚持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立场的国家，都遵循了国内积累和全球积累的规则，这种规则和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有区别的。即使那些大国的“社会民主党”也想作出类似的改变，但只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中或者20世纪60年代的新革命运动才能真正重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的再分配，让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从更长远来看也有助于去恢复和保持曾经掌握在那些大国手中的国家领土和财产，
839 有助于去维护世界和平与和平共处。但如事实所示，它们也陷入更加激烈的矛盾中，这些矛盾促使产生了通过腐败来致富、威权主义，以及轻视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现象，导致了国内国外的军事化。它们的最终失败让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变得声名狼藉。

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重新回过头去思考“中心资本主义”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这方面的先驱者是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的劳尔·普雷维什，代表人物是保罗·巴兰。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主要是萨米尔·阿明完善了外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它包括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前殖民地国家，其中就有苏联的成员国以及苏联在中东欧的盟友国家。至于中国、越南和古巴，看起来则是尽力地去抵制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进程中，贫困国家的人口从占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增加到了四分之三。

在“冷战之后的时期”，第三世界这个表述被继续沿用了下来，尽管它在意识形态上几乎没有什么界限，而且这个表述的不确定性也变得更大。同时，有些人则更喜欢用“南方国家”和“南北关系”这种说法，以此来回应——当然是间接地——之前人们对第三世界这个范畴所提出的问题。

参考文献：

S. Amin, *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 Paris 1973; P.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1957; M. Bedjaoui, *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New York-London 1979; D. Boris, »Gibt es noch die DritteWelt?«, in: ders., W. Gerns u. H. Jung (Hg.), *Keiner redet vom Sozialismus. Aber wir*, Köln 1992, 52-67; *Breve Diccionario Político*, Buenos Aires 1970 (auf Grundlage des *Kleinen politischen Wörterbuchs* von I. V. Lionjin

u. M. E. Struve, Moskau 1969); F. Castro, »Discurso en el XXXVI. Aniversario del 26 de Julio«, in: *Granma*, 1989; T. T. Evers, *Bürgerliche Herrschaft in der Dritten Welt*, Köln 1977; A. G. Frank, »World System History Phase«,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 Jg., Nr. 1, 1991; M. Gavrilovic, »The Vitality of Nonalignment«,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1. Jg., Nr. 482, Belgrad 1970; P. González Casanova, *Imperialismo y liberación en ameica Latina. Una introducción a la historia contemporánea*, Mexiko-Madrid 1978; M. Gorbatschow, »Rede vor der UNO-Vollversammlung v. 7. Dezember 1988«, in: *Pravda*, 8. 12. 1988 (Auszüge in: FAZ, 9. 12., 6); ders., »Das intellektuelle Potential der Perestrojka erweitern«, Rede vor Wissenschaftlern und Kulturschaffenden im ZK, 6. Januar 1989, in: *Sowjetunion heute*, Nr. 3/1989, Beilage, I-XII; W. F. Haug, »Marxismus, Dritte Welt und das Problem des Eurozentrismus«,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2 (Teil II: »Marxismus in den 'Drei Welten'«), Berlin/W 1987, 197-227 (engl. in: *Socialism in the World*, 3. Jg., 1979, Nr. 15, Belgrad); ders., *Gorbatschow –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J. F. Petras u.a., *Class, State and Power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81; E. Schoeck-Quinteros u. L. Quinteros-Yáñez, » 'Dritte Welt' « in: EE, 1, 595-628; D. Senghaas,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4; P. Strotmann, »Der Zusammenbruch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smodelle in der Dritten Welt«, in: *Argument* 51, 11. Jg., 1969, 32-49.

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Pablo González Casanova）撰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娜娜·巴登贝格（Nana Badenberg）译为德文

盛舒洋译，张文红审校

参见：

Abkopplung, Armut/Reichtum, Blockfreiheit, Dependenztheorie, Entkolonialisierung, Entwicklungsländer, Exterminismus, Imperialismus, Metropolen, nationale Befreiung, Neokolonialismus, Nord-Süd-Konflikt, Perestrojka,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populamationale Politik, Populismus, Systemkonkurrenz,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Trikontinent, Vierte Welt, Weltmarkt

840

二

20世纪70年代末期，“比勒费尔德理论”（Bielefelder Ansatz）（尤其是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薇罗妮卡·本霍尔德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和克劳迪娅·冯·沃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尝试着在全球理论层面去构建一个第三世界的剥削/

压迫和第一世界中妇女的剥削/压迫之间的平行关系。其出发点就是将他们在第三世界的经验添加到当时关于生产方式的讨论中（Cordova、Amin、Rey、Terray、Mandel、Meillassoux 等），当时将生产方式判定为是异质的、交织的和不同步的。

沃尔霍夫把生产方法的多元决定（Mehrfachbestimmungen）形容为普遍规律，而不是特殊规律。她将资本主义领域和非资本主义领域的同时性作为其论点的核心，这和罗莎·卢森堡的积累理论有一定的联系。卢森堡积累理论内容大致为："因此，非资本主义形态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严格地说，资本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形态的毁灭。虽然资本主义的积累，是无条件地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环境，但它的所谓需要，乃是牺牲非资本主义环境，从它那里吸取养分，以养肥自己。从历史上来考察，资本积累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间所进行的新陈代谢过程。没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资本积累也就无法进行。从这一点上看，积累是由咬破并同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而成长起来的。从而，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不可能进行积累，但同时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Akku*，GW 5，第 363—364 页）不过卢森堡认为上述这些是用来分析帝国主义理论的，相反，沃尔霍夫——梅亚苏（Meillassoux）也持有类似观点——将这个过程描述为"持续的原始积累"（1978，第 21 页）："非常典型的是，我们发现在持续的原始积累的所有领域中，它既没有脱离经济层面（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也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的支配：在家庭中，主要就是对妇女的支配和在再生产领域的支配，同样也存在于第三世界中。"（第 25 页）

当工业化国家的私人家庭被确定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生产方式后，全球趋势和男女关系就挂上了钩："这种机制可以最终被追溯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微观关系，无论是在家庭内还是家庭外。"（同上）从内容上来说，这些非资本主义形态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用来直接消费的无偿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活动；米斯提出了**自给自足**（*Subsistenzproduktion*）的概念，并将家庭妇女和农民视为主体——他们生产和维持了自然生活和基本食物。"因此，'殖民地'就成了外部世界的'家庭主妇'，而这里（即第一世界。——译者）的家庭妇女则成了资本和男性的内部殖民地。"（1983，第 117 页）沃尔霍夫明确地说道："和女性状况最为类似的，就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和第三世界中

城市里只能维持‘生存’的‘边缘’人群。不仅妇女有着如同殖民地一样的地位，而且殖民地也有着如同妇女一样的地位。或者说：‘第一’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就相当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1978，第 30 页）

上述这种理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资本将是在非资本主义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并同时摧毁了这些基础，因此不仅必然会摧毁第三世界的生产方式，而且还必然会摧毁第一世界的私人家庭。而比勒费尔德理论女学者们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资本主义需要维持这种不同步的生产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积累。卢森堡认为过渡到另一个社会要么是以野蛮的方式，要么是以革命的方式，与此不同，沃尔霍夫等人则认为是出于资本的利益，通过全面有意识地保留压迫妇女的方式来实现过渡。但是，在这种方式下就很难同时兼顾到，一方面真的想要将妇女从私人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接受将妇女遣回到私人家庭中去，因为这样能够用较少的社会动荡化解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结构性危机。

另一个问题就是将全球帝国主义的实践和微观关系等同起来。这需要非常具体的观察。而且似乎很难做到让所有人都来认同上述对女性压迫的理解，就像很难相信大部分过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妇女，如德国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和第三世界人民受到了一样的剥削。如此，从整体上思考问题的美德就骤然变成认为每一个元素都已经充分确定了的恶德。因此，尽管这些从全球理论层面赋予妇女压迫新定义和提出父权资本主义理论的尝试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但在拒绝全面理论化的时代，尤其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逐渐不被讨论了。

鉴于跨国银行的资本逐步全球化，尤其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试图将第一世界中妇女的压迫/剥削和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平行处理。与单方面提供帮助的合作不同，为进行政治合作和针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以及实现平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理论分析。这一发展趋势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妇女的尝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世界银行资助的发展政策不仅取代了传统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利于帮助妇女摆脱控制。第三世界和来自第一世界的妇女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真正的被剥削的“自然资源”。这在再生产部门（可以被理解为是不同种类的再生产领域）的重组和国际分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就有了致力于争取“美好生活”权利尤其是妇女生活权利的共同政策。这些政策的成效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同时要质疑

那些到目前为止为人们所接受的财富观念。（例如参见 Dietrich 1994）

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n

843 参考文献：

V. Bennholdt-Thomsen, »Subsistence Production and Extended Reproduction«, in: K. Young (Hg.), *Of Marriage and the Market*, London 1981; dies., M. Mies, C. v. Werlhof, *Frauen, die letzte Kolonie*, Reinbek 1983; G. Dietrich, »Defense of Production of Life vis-à-vis Onslaught of Worldbank Politics on Urban Women's Organizations in the Informal Sector« (unveröff. Beitrag zum 13. Weltkongreß für Soziologie in Bielefeld 1994); M. Mies, »Gesellschaftliche Ursprünge der geschlechtlichen Arbeitsteilung«,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3. Jg., 1980, Nr. 3; dies., »Subsistenzproduktion, Hausfrauisierung, Kolonisierung«, in: ebd., 6. Jg., 1983, Nr. 9/10; C. v. Werlhof, »Der blinde Fleck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ebd., 1. Jg, 1978, Nr. 1.

弗里加·豪格 撰

盛舒洋 译，张文红 审校

参见：

Akkumulation, Frauenbewegung, Hausarbeit/Familienarbeit, Hausarbeitsdebatte, Hausfrauisierung, Impe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Produktionsweise, Reichtum, Reproduktion, Subsistenzproduktion,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vorka-

第三条道路（dritter Weg）

A: al-ṭarīq al-thālith. – E: third way.

F: troisième voie.

R: tretij put' (третий путь). – S: tercera vía.

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者民主道路这一概念是“民主斗争的伟大遗产”和“无产阶级革命”（Otto Bauer）的伟大遗产的结合——“在民主条件下的革命”（P. Togliatti）的一种推进，它是由与以下内容保持批判—辩证的距离来规定的，即：不仅是“第一，改良主义的或者‘典型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是“第二，列宁主义的或者‘典型共产主义的’”道路，以及它们的“同属一个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Albers 1987，第 102 页）与此相反，第三条道路不能被定义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道路，而是比这一“正统集团”偏左的道路。（Vikström 1982，第 148 页）“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一个比喻，用这种手法“同样也可以提出第四条或第五条道路”（Ingrao 1978，第 87 页）。就此而言，第三条道路的形式似乎是“‘后

雅尔塔时期’意义上的一个战略性构想”（Buci-Glucksmann 1982，第 87 页），是在资本主义堡垒内对自身转型战略的思考和指南，但也包括——更确切地说——现实社会主义国家。

1. 这个概念的产生和来源同国际工人运动自 20 世纪初期以来的分裂有关。具体来说，相关的因素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挫折，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胜利，1914 年的大劫难以及以“保卫祖国”为名而背弃一切革命观点的行径，各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在第二国际解体后）的成立，各国党的联合和党内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流派的合作乃至 1921 年“第二半国际”的成立，以及在奥托·鲍威尔和马克斯·阿德勒的大力推动下于 1923 年 5 月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AI）。（参见 KWM 1，第 91 页及以下，第 126 页及以下；KWM 3，第 559 页及以下）

844

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随着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斯大林化，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也就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承认了资本的改良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停滞或倒退之后，又一次兴起了两种互相对立的主要立场：在第一个阶段是以奥托·鲍威尔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在第二个阶段是以意大利共产党及其先行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参见 Albers 1978；1987，第 103、123 页）鲍威尔一方面主张原则上拥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对于西欧另有特色的社会环境”的革命性变迁来说必不可少的“截然不同的手段和道路”。（转引自 Steiner 1967，第 3—4 页）他的著作《取得政权的斗争》（*Der Kampf um die Macht*，1924）和《林茨纲领》（1926 年）——“第三条道路的出生证”（Albers）——记述了这一构想在策略上的基本特点。葛兰西还区分了东方的革命的“运动战”（Bewegungskrieg）和西方的从反资本主义角度设想的“阵地战”（Stellungskrieg）。“尽管鲍威尔和葛兰西的‘前线’的重点——用于阐明其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极为不同，并且同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特定理论一传统不可分割，然而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总的贡献，却共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精神武器沿着非教条主义的方向继续发展，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推动。”（Albers 1983，第 189 页；参见 Abendroth 1982）

1976 年，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提出了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一种新的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寻求一种与“当今时代的民族特色和条件”相一致的“自由的

社会主义”。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
845 相反，也不同于“十月革命后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变革”，而是关乎“发起”适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条件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到欧洲，我们才会提到第三条道路。”（《意大利共产党人》[*Die italienischen Kommunisten*] 国外宣传册，1978 年特别版，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纲要）

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苏共“二十大”）和 1968 年“布拉格之春”的到来，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塔（Sviatoslaw Richta）和奥塔·希克（Ota Šik）等改革者要求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同时要求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企业管理的自主权，工人的参与决策权，独立的工会，党退居为只是有一定权限的协调工具，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法治国家的扩展，等等。有人认为，这种捷克斯洛伐克式的“第三条道路”模式（Fetscher 1988）类似于苏联的经济改革，但在诸如对“阶级”的看法、党和国家的作用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参见 Rossanda 1989）

2. 第三条道路的问题首先在于，在西方工业国家没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历史模式可供参照，这促使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家有时采取了某种防守的论证策略（参见鲍威尔 1923 年对委员会共和国模式的研究）。同样成问题的还有与改良主义观点和传统的马列主义观点相对立的一种自主定义，该定义指出，第三条道路不单单是两种弊端之间的中庸道路。“但是，无论如何，它导致的结果是，‘第三条道路’的各种观点……尽管也同样依据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经验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却同列宁主义勾勒的‘第二条道路’的观点处于互相排斥的关系中。”（Albers 1987，第 113 页；参见 Schöler 1985，第 104 页及以下；Gardoncini 1978，第 99 页及以下；Löw 1980）因此，在以一种“革新了的马克思主义”（Buci-Glucksmann 1982，第 89 页）为基础和缺乏历史先例的情况下，第三条道路首先只能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Lombardo Radice 1979）。

就此而言，对于“西方的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和一种新的经济逻辑。在这里，有两个学习步骤是必要的：同**国家主义**（*Etatismus*）决裂，它自动地以自上而下的命令安排一切，把社会主义计划误读为向一个想象中的左翼政府提出的一份需求清单，或者只是左翼政党的竞选宣言；同**经济主义**（*Ökonomismus*）决裂，它符合从国家的角度出发的经济利益代理人政治。（Haug 1982，第 104 页）这种“集合体”（aggregazione）（Ingrao）的社会主义 846

计划思想要求把转型战略的基准置于日常工作——一种“变革的文化”（cultura del cambiamento）（B. Trentin）——之上，就此而言，在资本主义居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过渡到一种“生产者负责”的新生产方式了。（Trentin 1978；Ingrao 1985）为了明确批判国家主义和代理人政治（Buci-Glucksmann 1982），第三条道路必须达到“去集中化的人民权力的民主（Volksmachtdemokratie），它以多元主义为基础，强调赋予公民社会各种机会，要求自由社会主义的人们独立解决问题”（Vikström 1982，第 50 页）。

汉斯·米特米勒（Hans Mittermüller）、尤尔根·米特米勒（Jürgen Mittermüller）撰

3.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关于转型战略的讨论取得了成功，其标志是“形成了新形势和趋同化。能够体现这一点的，尤其是从第三条道路的视角提出的口号‘在工业化主义和生态学之间’”（Timmermann 1986，第 140 页）。它在苏联——两极世界体系的一个超级霸权中心——尝试的从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造，引发了第三条道路的意义变迁。第三条道路现在似乎在走“第二条道路”的大国中已经具有了具体的可能性。“因为这确实是改革（Perestroika）本身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寻找在让生产者处于从属地位的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第三条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Haug 1989，第 213 页）这个方案的失败又一次改变了第三条道路的题旨。在后共产主义的形势下，费伦斯·费赫尔（Ferenc Fehér）和阿格内斯·黑勒反思了概念的右转（Rechtdrift）：他们注意到，“‘第三条道路’的意识形态”最初许诺避开或者超越现代性，但如今却“被用来反对‘完全’融入现代性”（第 124 页），甚至被法西斯主义占领。然而，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最初的问题消失了。对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追寻仍然是在苦难中降临的人类议程，而无论是否采取了社会和环境方面有效的、“驯服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形式。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Die Bedeutung von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für die Diskussion der Eurolinken«, in: Albers u.a. 1982, 25ff; D. Albers, *Demokratie und Sozialismus in Italien*, Frankfurt/M 1978; ders., J. Hindels, L. Lombardo Radice (Hg.), *Otto Bauer und der »Dritte« Weg. Die Wie-*

derentdeckung des Austromarxismus durch Linkssozialisten und Eurokommunisten, Frankfurt/M 1979; ders., J. Cap, J. P. Chevenement, P. Ingrao (Hg.), *Kapitalistische Krise und Strategien der Eurolinken*, Berlin/W 1982; d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Berlin/W 1983; ders., H. Heimann, R. Saage (Hg.), *Otto Bauer-Theorie und Politik*, Berlin/W 1985; ders., »Gedanken überden 'dritten Weg zum Sozialismus' in Westeuropa«, in: ders., *Sozialismus im Westen. Erste Annäherungen: Marx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Berlin/W, Hamburg 1987; O. Bauer, *Die österreichische Revolution* (1923), WA 2, 489ff; ders., *Der Kampf um die Macht* (1924), WA 2, 935-967; J. Bischoff u. J. Kreimer, *Annäherungen an den Sozialismus. Strategieneines Dritten Wegs zum Sozialismus*, Hamburg 1980; C. Buci-Glucksmann, »Neue soziale Bewegung und sozialistische Transformation«, in: Albers u.a. 1982. 87ff; dies., »Eurokommunismus«, in: KWM 2, 1984, 321 ff; J. P. Chevenement, *Ende der Spaltung?*, Hamburg 1978; F. Feher u. A. Heller, »1989 und die Dekonstruktion des politischen Monismus«, in: *Journal für Sozialforschung*, 34. Jg., 1994, H. 2, 119-143; I. Fetscher, »Vordenker der Perestroika«, in: *Die Zeit*, 21. 10. 1988; G. B. Gardoncini, »Die Sowjetunion im Urteilder Austromarxisten«, in: Albers u.a. 1979, 99ff; W. F. Haug, »Veränderungskultur und Neuzusammensetzung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Albers u.a. 1982, 93ff; ders., »Der Entwurfeiner neuen Einheit in der Unterschiedenheit bei Otto Bauer«, in: Albers u.a. 1985, 146ff; ders.,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²1990); P. Ingrao, *Crisi e terza via*, Rom 1978; ders., »Wohin führt der Dritte Weg?«, in: Albers u.a. 1979, 153ff; ders., »Der Ubergang zu einer neuen Produktionsweise unddie Aufgaben eines 'Dritten Weges'«, in: *Argument* 154, 27. Jg., 1985, 802ff; M. Jänicke, *Der dritte Weg*, 1964; R. Löw, *Otto Bauer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Wien 1980; L. Lombardo Radice, *Unsocialismo da inventare. Riflessioni sulla via democratica alla transformazione della società*, Rom 1979; *Programm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österreichs, beschlossen auf dem Parteitag zu Linz am 3. November 1926*, in: O. Bauer, WA 3, 1017ff; R. Rossanda, »Von den Mauern in Prag zu den Fenstern in Glasnost«, in: *links*, Nr. 255, 1989; U. Schöler, »Otto Bauer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m sowjetischen Modell«, in: Albers u.a. 1985; O. Šik, *Der dritte Weg*, Hamburg 1972; ders., *Prager Frühlingserwachen*, Herford 1988; H. Steiner, »Am Beispiel Otto Bauers –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r Austromarxismus«, in: *Weg und Ziel*, Sondernummer, Wien 1967; G. Storm, F. Walter, *Weimarer Linkssozialismus und Austromarxismus. Historische Vorbilder für einen »Dritten weg« zum Sozialismus?*, Berlin/W 1984; H. Timmermann,

»Dritter Weg«, in: LS, 137-140: B. Trentin, *Arbeiterdemokratie*, Hamburg 1978; L. Vikström, »Der orthodoxe Block und eindritter Weg«, in: Albers u.a. 1982, 147ff.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杨河 审

参见：

Arbeiterbewegung, Austromarxismus,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Etatismus, Eurokommunismus, Gramscismus, Integraler Sozialismus, Internationale, Marktsozialismus, Okonomismus, Perestrojka, Reformkommunismus

二元经济（Dualwirtschaft）

A: iqtiṣād muzdauwidj. – E: dual economy.

F: économie duale, économie à deux vitesses.

R: dvojstvennaja ėkonomika (двойств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S: economía duale.

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语境描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两个不同的运行场域。它最初被运用到殖民经济上，来区分本土居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生产方式与殖民统治者引入的货币经济。（参见 Khalatbari 1984，第260—261 页；Rastjannikov 1989，第 48 页及以下）在这个意义上，伯克（Boeke）提出了“社会二元论”。（参见 1910，第 2 页）

马克思早就提过“最不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的问题。世界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导致工业资本的循环席卷了一切生产方式产出的商品。无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K II*，MEW 24，第 113 页），都是如此。马克思讽刺地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提及了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与日常的太平境况”和“犯罪”的二元对立：犯罪有利于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减轻劳动力市场的负担，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MEGA II. 3. 1，第 280、283 页；MEW 26. 1，第 363—364 页）马克思认为“上层”资本同“下层”资本平行的权力结构之间存在矛盾关系。所有在“阴影”下用暴力从而在资产阶级“良好的社会道德”之外获得的价值

可以积累起来，并随后扩张资本再生产的等级。

罗莎·卢森堡研究了在农民和殖民地的形态中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部门与非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849 她断定，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具有决定性的不仅是那些有酬的雇佣劳动的增殖，还有其“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实质价值联系”（*Akku*，第 356 页）。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发展方案的依据是，“在俄国境内存在的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国营成分、工厂协作成分、合作社、私人农民经济；此外，还应吸引国外资本来投资。（LW 32，343；参见 33，第 453 页及以下）基于这种构想，布哈林提出了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共存的主张。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苏联经济的社会主义部门开展反对私人部门的斗争的主张（1926，第 525 页及以下）相反，布哈林特别强调了国有部门和农民部门的合作对于整个社会的益处：“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工农联盟问题。”（*Bolschewik*，Nr. 6，1925，转引自 Vacic 1989，第 153 页）

20 世纪 60 年代末，二元经济的概念进入了关于依附理论的讨论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这个概念被以越来越多样的方式和各异的视角被运用到国内非正式部门（其他常见的称呼有：灰色经济、地下经济、替代经济、次级经济、非官方经济、自我劳动、白救部门）和带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官方部门色彩的正式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参见 Huber 1983，第 1 页及以下、第 34 页）

随着生产高度合理化，并且主要由于妇女、中学毕业生、老人以及外国人参加劳动，工作岗位减少了；在新保守主义的经济政策框架下，私人和公共消费要求遭到了抑制，与此相关的是非法劳动的增加和以公共部门为代价的避税；服务业部门扩大了；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了；所有这些推动了关于工业国家内带有二元性和补充性的工作形式的讨论，也就是关于那些与正式的拿薪水的工作不同的、不能以市场价格计算从而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之内的工作（参见 Gershuny 1978）的讨论。这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与针对技术革新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出现。（参见 Altmann，Bechtle，Lutz 1978）这场讨论通过重提 850
生命、自然、“有机”生成的社会关系、情感、艺术与无生命的、技术性的和机械的、构建的、出于实用考虑的社会关系之间的二律背反——例如，这体现在滕尼斯（Tönnis）的“共同体”和“社会”的对立（1887，第 3 页）以及韦伯的成对概念“共同体化”和“社会化”上——而获得了一层“哲学的”色彩。

对于韦伯来说，资本和官僚制度的带有工具理性的统治建立起了一层“顺从的外壳”（*WuG*，第1060页）。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关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想法。（参见 Paci 1973）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失业和就业不足也归因于生产结构的分割：大企业里大多有给领导层、经过选拔的专业人员提供的高水平、高薪资的“好工作”。这些工作有晋升的机会，受劳动法的保障，即使在合理化投资的过程中也相对安全。在一些小型或中型的企业里，大多是给技能较低或未受过教育的帮工提供的“坏工作”。这些工作要求的资质低，薪水低，没有晋升机会，也不受劳动法保护，并且当劳动市场出现需求波动的时候很不稳定。这种二元模式将劳动力市场的核心领域，即固定在编人员与多少有点边缘化的群体，区分开来，长期失业者、残障人士、老年人、一些大学生、年轻的中学毕业生、难民和女性，都属于后者。对于这些潜在劳动力来说，国家拨款的促进就业措施应该会建立“次级”劳动力市场，使其成为过渡到劳动力市场核心领域的（多半是不切实际的）手段。

阿玛多、斯托法斯（Amado & Stoffaes 1980）和斯托雷如（Stoleru 1982）区分了运输、交流和销售等直面世界市场竞争的经济部门与位于受保护的“国家后方”的、“业绩不佳”的经济部门，如公共事务、农业、手工业和娱乐休闲业。按照这种二元经济的说法，首要部门凭借其以竞争、效率和压力为导向的劳动力精英生活方式，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都取得了相对于次级部门的优势。安德烈·高兹将这种社会职业的二元分层称为部分人口的“技术专家治国主义的、有组织的排斥主义的一个变种”（1983，第60页）。与此相反，他的二元经济观借鉴了马克思对“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的区分。在“自由王国”里，“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了”（高兹称之为自治部门）；在“必然王国”里（高兹称之为非自治部门），为了满足需求和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劳动“必须与自然搏斗”（*K III*，MEW 25，第828页）。每种现代工业都必然包含非自治。大型机器的运行模式必然是非自治的。高兹认为：“任务在于，在机器复合体的一旁或它的上面夺取更大的自治空间，这样的自治空间摆脱了社会逻辑，与之相违背，并且允许个体的存在获得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展。”（1980，第67页）高兹还认为，自治生产——也就是那些非必需但能满足个人愿望、品味和幻想的商品生产——的领域的扩大是以一种革新的、非自治的工业化生产为前提的。鲁道夫·巴罗对此提出了批判。对于他来说，“只有当‘我们’能

够持续从世界市场获取超额利润的时候，才能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实现高兹的这种二元经济设想”（1984，第8页）。

在医疗、社会和文化领域，替代项目（Alternativprojekte）和自我互助团体都属于“小型自由载体”。（参见 Huber 1983，第 13 页）它们以其共同协作的模式同权威性职业模式形成了对比。这种共同协作模式在团体性工作上效果最好。这些团体的工作既不是“纯粹专业性的”，也不是“纯粹自治性的”。有很大一部分团体都需要国家的支持。由此便形成了它们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中包括专业援助和非专业自我援助、公共援助和私人自我援助，或者公共预防与私人预防。（参见 1987，第 57—58、96—111 页）替代经济的想法在 1975 年前后从环境保护、反核电站公民倡议、替代技术的发展、适应生态的生活方式、消费批判，扩展到了妇女运动、青少年运动、同性恋运动，又进一步扩展到了反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倡议以及公民委员会和生态社会主义者运动。（参见 1986，第 112 页）

权威性的专业模式与合作性的形式的对立使得“老的”和“新的”个体经营者产生了区别。“新”的个体经营者想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不是企业里那种通过掌握金钱、工作职位和工作条件而行使权力和支配的状况（参见 Lange 1989，第 141 页及以下），而是日益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运用环保型 852
技术的生产方式（参见 Wicke 1991，第 584—587 页）。企业应当自我管理。这个自我管理不论是作为理念，还是作为社会行动，都早已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参见 Herbert 1992，第 3 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爆发经济危机之时，东欧国民经济的崩溃和西欧企业濒临关门的困境导致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自我管理的企业和合作型企业。这些企业由于大多资本有限而仅拥有简单的技术装备，只能为当地生产产品。资本的缺乏只能通过剩余劳动和严格控制或者放弃消费支出才能得到平衡，这就给替代性的合作形式提供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是，这些企业在经济状况上确实和“小生意”或者“地方企业”并没有什么区别。这些分散的企业和集中化的大企业之间在经济上会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交换。这些“新型个体经营者”只能通过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络，来避免资本主义的兼并，但是这种网络也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才存在。

有时，二元经济的非正式部门主要指的是家务劳动、邻居互助、公益组织和（被当作非法劳动的）地下经济。（参见 Gershuny 1978；Matzner 1979）非法

劳工们不顾工会协商达成的工资体系而出卖其劳动力，也不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从非法劳动发展到实质上的地下经济和经济犯罪是很容易的。尤其在建筑行业和餐饮行业，对临时工的非法雇佣相当普遍。毒品交易、电脑和信用卡犯罪、对银行里“黑账户”的管理和教派生意都属于参与经济犯罪的地下经济。（参见 Ehrenpfordt/Heller 1989）

在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二元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与被允许多少存在一些的次级非官方经济系统是共存的。这种非官方经济会对由国家管理的短缺经济作出反应，如服务行业里的节假日加班、地方层面的园艺劳动和养殖业。苏联经济改革的目的主要在于实施地下经济的合法化、扩大城市里的个人经营业态和集体农庄土地的家庭私人承包（参见 Gorbatschow 1988，第 117—121 页）等促进“首创性的民主化”（参见 Haug 1989，第 178 页及以下）的措施。在苏联和其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临近崩溃的前夕，这种非正式的关系已经达到了显著突出的程度。当涉及更深层次的领域时，这些关系就带有犯罪色彩了。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领域能在没有地下经济的经济主体拥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存在下去。特别是在当时苏联的较为边远的地方，在权威性社会主义社会崩塌后的社会转型中，老旧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元素、新兴企业和有组织的犯罪之间的类似于黑手党的关系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参见 Dellheim 1993）

853

在通过付款而获得的他人的服务和诸如邻里互助、拥有名誉性职位的活动等无酬的社区义务劳动之间的二元经济之外，还存在着在空闲时间里的“自我劳动”。这种提法是指无酬的个人活动，但并不是指援助行为中相应的个人行为，而是指自己给自己劳动。自我生产通常是商品密集型的。建筑市场、家具建造市场、园艺中心等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非正式的家务劳动和正式的工作之间的二元性也引起了女权主义研究的兴趣。例如，冯·沃尔霍夫、米斯和本霍尔德特-汤姆森（1983）断定，通过节约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而从家庭妇女劳动中获利的不仅有资产所有者，还有已婚男性。他们使用“家庭妇女化”（Hausfrauisierung）这一术语，是为了反对所谓劳动关系的无产阶级化不断加深的看法。与这种看法相反，他们提出，家庭妇女这种不受保护的、非正式的状态有越来越普遍化的趋势。除了家务劳动，分娩护理和养育儿童的劳动也是商品密集型的，而不是自己生产出商品的。因此，在弗里加·豪格看来，这在结构上一方面导致了“那些被迫负责受到较

少保护的再生产工作的人在物质上的贫困化”，另一方面导致了“那些出于职业的缘故除了把照顾孩子的责任推诿给其妻子而别无他法的男性”在人道上的贫困化。（1990，第 879—893 页）

目前，对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案例的层面，并没有系统的概括。在一系列二元经济的概念里，各种劳动形式和生活形式都被归为同一个部门，但是它们在现实里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还远未形成一种一贯的理论。

854

参考文献：

N. Altmann, G. Bechtle, B. Lutz, *Betrieb – Technik – Arbeit. Elemente einer soziologischen Analytik technischorganisatorischer Veränderungen*, Frankfurt/M 1978; J. Amado, Chr. Stoffaes, »Vers une socioéconomieduale?«, in: 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 (Hg.),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et la technologie. Préparation du huitième plan 1981-1985*, Paris 1980, 5-112; R. Bahro, »Fürst Glotz wohlgerüstet im Engpaß«, in: *taz*, 25. 5. 1984, 8; J. H. Boeke,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of Dual Societies* (1910), New York 1953; J. Delheim, »Widerstandals Überlebensfrage«, in: *Ost-West Gegeninformationen. Alternativsozialistisches Osteuropakomitee Graz*, 5. Jg., Nr. 4, 3-6; R. Ehrenpfordt, L. Heller, *Die ganz großen Geschäfte. Geschichten von fliegenden Göttern, Rattenfängern, Tigern und anderen Profitjägern*, Berlin/DDR 1986; J. Gershuny, *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 Service Economy*, London 1978; M. Gorbatschow, *Umgestaltung und neues Denken für unser Land und für die ganze Welt*, Berlin/DDR 1988; A. Gorz, *Abschied vom Proletariat*, Frankfurt/M 1980; ders., *Wege ins Paradies*, Berlin/W 1983; F. Haug, » ‘Ökonomie der Zeit, darin löst sich schließlich alle Ökonomie auf’«, in: *Argument* 184, 32. Jg., 1990, 879-893;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2] 1990; G. Herbert, »Chance für Selbstverwaltung«, in: *Ost-West Gegeninformationen. Alternativsozialistisches Osteuropakomitee Graz*, 4. Jg., 1992, Nr. 3, 3-5; J. Huber, »Konzepte der Dualwirtschafteine begriffliche Anstrengung«, 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Hg.), *Discussion Papers (IIM/LMP 83-28)*, Berlin/W 1983; ders., *Wer soll das alles ändern. Die Alternativen der Alternativbewegung*, Berlin/W 1986; ders., *Die neuen Helfer. Das ‘Berliner Modell’ und die Zukunft der Selbsthilfebewegung*, Berlin/W 1987; P. Khalatbari, *Ökonomische Unterentwicklung. Eine historischpolitökonomische Analyse*, Berlin/DDR 1984; E. Lange, *Marktwirtschaft. Eine soziologische Analyse ihrer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Opladen 1989; E. Matzner, »Zur Entwicklung des autonomen Sektors«, in: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Hg.), *Discussion Papers (IIM/LMP 79-*

89), Berlin/W 1979; M. Paci, *Mercato del lavoro e classi sociali in Italia*, Bologna 1973; E. O. Preobrashenskij, »Das Gesetz der ursprünglichen sozialistischen Akkumulation«, in: U. Wolf (Hg.), *Die linke Opposition in der Sowjetunion 1923-1928. Bd. III. 1925-1926*, Berlin/W 1976, 525-582; V. G. Rastjannikow, »Die Periphe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Weltwirtschaft. Widersprüche der Mehrsektorenwirtschaft und Strategie der sozialökonomischen Entwicklung«, in: *Probleme kapitalistischer Entwicklung in Entwicklungsländern Asiens. Berichte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6. Jg., 1989, Nr. 4, 48-58; L. Stoleru, *La France à deux vitesses*, Paris 1982; F. Tönnies,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1887), Berlin 1928; M. A. Vacic, »Grundfragen sozialistischer Ökonomie. Die Auseinandersetzung zwischen Bucharin und Preobraschenski«, in: T. Bergmann u. G. Schäfer (Hg.), *'Liebling der Partei'. Bucharin – Theoretiker und Praktiker des Sozialismus*, Wuppertal 1988, 147-170; C. v. Werlhof, M. Mies, V. Bennholdt-Thomsen, *Frauendie letzte Kolonie. Zur Hausfrauisierung der Arbeit*, Reinbek 1983; L. Wicke, *Umweltökonomie. Eine praxisorientierte Einführung*, München 1991.

参见：
Akkumulation,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markt,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Beruf, Bürokratie, Entfremdung, Freiheit, Freizeit, Gebrauchswert, Geld, gemischte Wirtschaftsordnung,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lück, Hausarbeit, Hausfrauisierung der Lohnarbeit, Heimarbeit, Herrschaft, Hierarchie, Industrialismus, informelle Wirtschaft,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onkurrenz, Kooperation, Krise, Kulturindustrie, Lebensweise, Leistung, Leitung, Lohnarbeit, Macht, Management, Mangelwirtschaft, Marginalisierung,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Nomenklatura,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Ökonomie der Zeit, Ökosozialismus, Perestrojka, Planwirtschaft, primäre sozialistische Akkumulation,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Schattenwirtschaft, Selbstverwaltung, Verbrechen, Wirtschaftskrise, Wohlfahrtsstaat

杨·奥托·安德森、冈特·维林 撰
张志超、王媛媛 译

愚蠢（Dummheit）

A: al-ghabā'. – E: stupidity.

F: stupidité. – R:glupost' (глупость).

S: estupidez.

1. **概论。**“愚蠢”究竟能被视为一个概念吗？反过来考虑就可以打消这种怀疑：哲学公理体系从一开始就涵盖了**明智**（*Klugheit*）、**理智**（*Verstand*）、**理性**（*Vernunft*）甚至**智慧**（*Weisheit*），以及怎样的**举止**（*Haltungen*）才符合这些品质。那么，缺乏它们的状态为什么不算呢？愚蠢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正如有翼飞翔的话语所唱的：“即使天神与愚蠢作战，也是白费心神。”（Schiller，*Jungfrau von Orleans*）

尼采在《快乐的科学》（*Fröhlichen Wissenschaft*）中说，古典时代的哲人，尤其苏格拉底，否认愚蠢能与良知并存。“思想家们不倦地说教：‘正因为你们的心不在焉和愚蠢、你们的循规蹈矩的生活、你们对邻人见解的屈从，你们才如此少见地幸福。’”（KSA 3，第 555—556 页）实际上，苏格拉底就像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中描绘的那样，将人的品质不好归结为教得不好。这一点也为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所接受，又见于斯宾诺莎，在布莱希特对伦理道德的批判中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布莱希特用“你这头牛”式的命令取代“你这头猪”式的命令（“你这头牛”指向人分析特定道德原则所维护的特定利益，使人理性地决定遵守；“你这头猪”指将公认的道德不加批判地当作规范命令，进行道德谴责。——译者）。苏格拉底的想法还在耶稣那里有了回响，他说，凡听见他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愚人（ἀνδρὶ μωρῷ，*viro stulto*）把房子盖在沙土上（*Mt* 7，26）。聪明的“利己主义”自然会理解这话，但是基督教引入了原罪的概念，并“妖魔化”利己主义：“它使自私自利变得愚蠢、丑陋、长满毒素。”（KSA 3，第 555—556 页）尼采竭力神化他的超人狂想时这样说道。 856

或者说，哲学家追求真理和智慧，偶然谈及愚蠢和笨拙，而人民大众对愚蠢则是抱怨、谩骂或嘲笑？黑格尔对这种笑声深恶痛绝，他认为愚蠢尽管惹人发笑，它本身不包含喜剧性。“人往往也嘲笑最重要最有深刻意义的事物，如果其中露出与人们的习惯和常识相矛盾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方面。”（*Vorlesung zur Ästhetik*，Bassenge，第 1074 页）这令人回想起哲学的起源神话，哲学家只顾抬头仰望，摔进坑里，遭到了女仆的嘲笑。在黑格尔眼里，粗俗的平民没有资格嘲笑什么。“例如在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民族中，如果公民们都自私，爱争吵，轻浮，好虚荣，没有信仰和知识，爱说闲话，说大话，这样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救药的，它只有由于愚蠢而土崩瓦解。”但黑格尔认为这还不是喜剧性的，只是可笑的。最后，他对愚蠢有极其刻薄的看法：如果谁因为觉得每一派哲学都是片面的，就怀疑地游离于每一派哲学之外，他就是

真正片面而且愚蠢的，因为他面对知识却不愿求知。“实际上，这种小家子气的理智只会从荒谬的顶点一落而下坠到愚蠢的谷底。”（*Notizen zur Philosophie* 1，W 11，第 557 页）

在黑格尔眼里，正在成为万物尺度的资产阶级事务是愚蠢的化身，而康德则忠于日常语言习惯，与之相反：“愚蠢主要是指不能被用来做事情的人，因为他不具有判断力。”（*Anthrop* 1，§ 46）两百年后“对愚蠢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仍只在萌芽阶段”（HWPh），或许可以认为，愚蠢的含义无法理论化，它纯粹是不同立场的人相互挖苦的用语。或许问题的关键是，哪里在运用这个词相互攻击？

在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的形成时期，
857 愚蠢这个词颇显威力。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理论家起来反对以教会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权威。伊拉斯谟（Erasmus）把大人物和国家权力逻辑的愚蠢写进作品。（*Lob der Torheit*，1515；此外参见 Krippendorff 1985，第 268 页及以下）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中的愚人（*stultus*）相信神迹，有一种欲望要把神造的万物都视为导向一定的目的，因而探寻超自然的东西，最终总是要乞灵于“无知的避难所”（*ad ignorantiae asylum*），也就是愚人所谓的“神意”。“因此，要是有人……科学地认识自然，而不随愚人那样大惊小怪，便会被……斥为异端邪说。”斯宾诺莎的命运（革除教籍、遭遇暗杀、死后思想才得到关注）就是一个例证。他的远见使他洞烛世情，高蹈于流俗之外，不得不一再孤身抗击权力精英的“非理性”统治：信仰神迹的首先是人民大众（*vulgus*），他们的观念一经教会的意识形态家改造，就会变得非常危险。后者将启蒙主义者宣布为异端，“因为他们知道，无知一经揭穿，蒙昧（*stupor*），他们用来维护尊严的唯一手段，也就随之失效了”（同上）。

斯宾诺莎所抨击的人则有一套相反的话语。他们谈论愚蠢时，很容易就暴露出自己的愚蠢。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才能有效地操纵关于智识的抽象概念，把可测定的“智商”反过来作为定义愚蠢的标尺。因此，把愚蠢理解为“人的智识表现不佳”（H. Geyer，*Über die Dummheit*，[5]1955，该书的副标题正是如此露骨）是“愚蠢”的。相反，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 1937）指出，智识和愚蠢并不是一对相互排斥的矛盾。

愚蠢和迟钝相近，可以指心智不灵活，但是同样可以指轻率地跳过矛盾、不加反思的“敏捷”的灵活。“机灵的”愚蠢也是存在的。无论灵活与否，这两种性情都牢牢陷入了陈旧条件的无限循环，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回旋曲。愚蠢是**某一种观念的习惯法**。它就栖居在语言

中的套话里。“把习惯看成对现实的把握”，这种思维是愚蠢的。“预制好的词组筑成了一个窑穴，墨守成规的人高卧其中。”（Mülder 1968，第 10 页）

858 尽管愚蠢这个概念本质上针对个人的举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它总使我们注意到敌对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个人或集体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成了“蠢人”。“别傻了！”等于说：别受人愚弄！愚人的特点是没有应对敌意的能力、轻信易骗、胸无城府、一副好心肠，或者是不谙世事、无知无识、拙于应付你来我往的游戏规则。不能适应环境的人就是蠢人。这是一切资产阶级交易的法则，由此产生出的新鲜故事，生动地展现在资本主义曙光初现时期的民间故事书《捣蛋鬼提尔》（*Eulenspiegel*）里。而且，愚蠢这个词可以用在所有可能的冲突当中，无论是敌对冲突还是求团结的斗争。这个词的使用特别带有阶级属性。在贵族和市民眼里，农民是“愚蠢”的；站在统治者及其文人，也就是掌握话语有权力下定义的人的立场上，“心智简单”的人也全然是“愚蠢”的。单纯被混同于幼稚。但民间故事总是揭示出另外一层。聪明的爱尔莎（Die kluge Else）和她婚礼的来客，在新婚之夜预感到未来可能发生的灾祸而坐在地窖里痛哭，过度的预见和谨慎反而成了愚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则（不带政治意味地）指出，英雄“通常是最年幼的儿子，他在父亲面前装傻，也就是装得无害”（GW 13，第 153 页），正是作为不受宠的“蠢儿”，他才能够和其他所有不受宠的人结成密谋的同盟，或者像童话《傻大胆学害怕》（*Von einem, der auszog, das Fürchten zu lernen*）里一样，不因恐惧而任人愚弄，才能战胜左右环伺的恐怖力量。哈谢克（Hašek）笔下的帅克（*Schwejk*）在统治者的代理人（军官、教士、心理医生）面前充分表演了自己的“傻气”，这伙人将帅克当作蠢人，正是这一点出卖了他们本身的愚蠢。帅克身上体现了平民的“装傻”所蕴含的瓦解统治的力量，从（以及在）他永不枯竭的奇闻逸事中，确定无疑的东西在笑声里轰然坍塌。这一点在平民的“笑文化”里有着悠久的前史，比如“傻瓜的节日、蠢驴的节日里笑的风俗”（Bachtin 1969，第 34 页）。我们笑小丑的愚蠢，把自己的愚蠢投射到别人身上，摆脱对自己的愚蠢的忧惧。

而且笑也具有阶级属性。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写过一群工人子弟，他们笑着讲起一个知识分子的故事，这个知识分子收到了书，却没办法读，因为他打不开装书的箱子。（1979，第 91 页及以下）同时，工人子弟从一开始就自我贬低，认为他们就是要比那些有朝一日“搞出名堂”的人“更愚蠢”，他 859

们的自我贬低巩固了精英统治的意识形态，使他们自己也深陷其中。于是不仅有下层对上层的粗俗的笑，也有上层对下层的鄙夷的笑。但即使在反动的笑之中，比如种族主义的笑话里，也会暴露出统治关系；笑虽然生产着共识，但至少削弱了被嘲笑者的归属。“因此笑最不可能成为压迫和愚弄人民的工具，官方也从来不能完全驯服它。”（Bachtin 1969，第39页）一旦平日总是被视为愚人的人，开始笑话愚蠢，那将是愚民者可怕的噩梦。众所周知，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2. 马克思没有在理论上探讨过“愚蠢”这个概念，而是多用它来挖苦论敌，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书通常没有收录这个概念。这是不对的，其实马克思使用这个概念（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地方使用这个概念）富含理论上的深意。如果说马克思明确将**辩证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辩证法着眼于现实的矛盾，要求现实认识和行动能力二者相结合，那么这就暗示着**愚蠢是辩证法的反面，是不会运用辩证法。**

2.1“德意志观众坐在安乐椅上，/惬意愚蠢，一声不响。”——他们丝毫不为席卷四方的政治风暴所动。（MEGA I. 1，第643页）19岁的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讽刺诗的第一篇开头这样写道。——4年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追溯伊壁鸠鲁的线索，写道：“愚蠢和迷信也就是泰坦神族（Titanen）。”（MEW 40，第300页；MEGA I. 1，第53页）“因此，如果说亚里士多德责备古代人，说他们认为天还需要阿特拉斯（Atlas）做它的支柱……那么与此相反，伊壁鸠鲁则责备那些认为人需要天的人；并且他认为支撑着天的那个阿特拉斯本身就是人的愚蠢和迷信造成的。”（同上）因此，愚蠢是除**暴力**、**经济**以外的历史力量。愚蠢的作用自然不同于后两者，而且，任何对愚蠢的定义，都很可能栽倒在愚蠢的辩证法上，本身就是愚蠢的。

2.2 威廉·魏特林（Wilhelm Weitling）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1842）认为，愚蠢介于无知和粗鲁之间，起源于不平等。不平等表现为“那种天生的鲁钝和那种粉饰的、矫揉造作的教养之间的刺目的对比，某一些人的文雅的、有教养的世情俗调，另一些人极端的愚蠢和野兽般的粗鲁”（第219页）。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出现了愚蠢这个诊断式、论战式的概念，它具有经济学批判的底色和政治的含义。不仅货币“颠倒黑白的力量”“把愚钝变成理智，把理智变成愚钝”（*Ms 44*，MEGA I. 2，第321页），而且私有制统治下的雇佣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 860

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第237页）。马克思又援引赫斯的观点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也就是“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第268页；MEW 40，第540页）“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第269页）愚蠢的基础就是——私人占有。

马克思由此出发理解愚蠢的政治，他在致卢格的信中写道：“在德国一切都受到了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的时代来到了，极端愚蠢笼罩了一切。”（MEGA I. 2，第486页；参见MEW 1，第343页）这个国家就像一艘“愚人船”。（同上，第477页；第340页）他指的是“主人的无能和奴仆、臣民的冷漠”（第479页；第342页）。“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第479页；参见第343页）马克思敏锐地体认着不堪忍受的环境，把握着历史的信号。“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绝望，即使它只是由于愚蠢而长期地期望着某种东西，然而在很多年后，总有一天它会变得突然聪明起来，实现它的所有的虔诚愿望。”（第475页；第338页）

马克思似乎又感到，宣称什么是愚蠢的，本身也有愚蠢的嫌疑，因为他接着写道：“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蠢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等绝对科学的烤松鸡飞进嘴里就得了。”（第486—487页；参见第344页）这句话后面，是马克思著名的反教条主义宣言，通过分析意识以认清本身的意识。（参见《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文末。——译者）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露过一种批判理论所特有的愚蠢观念，这种批判理论“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本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 861
的一个独断的对立中”（MEGA I. 2，第276页）。

2.3 欧洲1848年革命和反革命的结局，造成了一个时代的失望/迷惑（Ent-Täuschung）。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写道：“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MEW 30，第324页）1848年12月国民议会被解散后，马克思写道：“同时，人民也在赎取他们在3月间以及后来在4月和5月间由于宽大，更确切些说，由于愚蠢所犯下的罪过，赎取他们进行所谓‘消极抵抗’所犯下的罪过。”（MEW 6，第101页）愚蠢就

是逃避已经无处可逃的斗争，陶醉于美妙的想法，尤其是陶醉于自己的想法。随着马克思革命观的发展，他后来将恐怖主义称为革命的愚蠢。当法国警方声称弗路朗斯（Gustave Flourens）谋划刺杀波拿巴时，他写信给恩格斯：如果这个“阴谋”不光是“警察局的捏造”，那“无论如何也是人可能搞出来的最大蠢事”。（1870 年 5 月 7 日，MEW 32，第 497—498 页）为解放的政治斗争奠定坚实历史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参与第一国际的政治经验，也改变了马克思对愚蠢的看法。

2.4 **一般的资产阶级愚蠢。**马克思这样评价杰里米·边沁：“如果我有我的朋友 H. 海涅（H. Heine）的勇气，我就要把杰里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材中的一个天才。”（*K I*，MEW 23，第 637 页，注释 63）这番谩骂其实有理论上的深意，它反对边沁将“现代的市侩”人类学化：“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同上）边沁的效用原则“不过是把爱尔维修和 18 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第 636—637 页）。

马克思已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指出，“资产阶级愚蠢”在理论上的基本模式，就是资产者将他的关系自然化并完全奉为人类的标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引用了这段话：“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MEW 4，第 139 页；MEW 23，第 96 页，注释 33）按照狭隘的资产阶级理智，按照资产阶级时代的立场，过时的增殖方式就是愚蠢的——从现代资本增殖的角度看，单纯的货币贮藏是“十足的愚蠢行为”（MEW 23，第 615 页）。贝内代托·克罗齐刚好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认为“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会混淆目的和手段，去做吝啬鬼、守财奴，却视占统治地位的、以价值本身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增殖方式为完全天然的。（1929，第 203 页） 862

这种思维模式并非理论错误，而纯粹是愚蠢，因此马克思也就用反讽的笔触来对待它，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24 章开头，把资产阶级关于原始资本积累的神话，类比为原罪的故事。马克思这么做可以十分坦荡，因为这种愚蠢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人的，而是**囿于阶级利益的愚蠢**，是基于谬误的利益。马克思的论证不仅揭示了真相，也揭露了伪装成普世主义的本位主义的虚假。

两种互补的利益催生了**资产者囿于利益的愚蠢**：获取利润的利益（或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益）和将这种利益合法化的利益。意识形态家尤擅后者，而“学术官僚日光的异常狭隘”（致库格曼的信，MEW 32，第 589 页）在论战中带来了无穷的笑柄。这两种形式的愚蠢都会精打细算，将它们判为愚蠢绝不是否认它们代表人物的智识，然而，这种**狭隘的智识**里本身就包含着智识和智识狭隘的功用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认为，狭隘地、囿于利益地运用智识的代表，就是“单个资本家”。利润和作为剩余价值源泉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不关心，而且释放烟雾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这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K III*，MEW 25，第 53 页）。工人运动自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学习运用经济学理论的成果，“烟雾”之于资本家的利益，成了真正的科学障碍，政治经济学随之分化为辩护式的庸俗经济学和技术性、实用性的模型建构。

单个资本家的囿于利益的愚蠢和在
863 阶级斗争中为之辩护、将其合法化的愚蠢，会相互转化，马克思论及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时举过这样的例子。（MEW 23，第 237—243 页）从“工厂主日常应用的计算方法”出发，可以将最终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物质资料＋工资支出＋利润）表述成各个时间段的结果（“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其蛮横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好像工人在第一段时间内生产出原料的价值，在第二段时间内生产出劳动资料的价值，在第三段时间内生产出他的工资，直到第四段最后一段时间才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实际上，工人将生产消耗的物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同时也就创造着新价值，新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前面那种想象会导致工厂主迫使工人在一天内生产出多个工作日的价值。“掠夺成性的贪欲相信这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马克思举了纳索·W. 西尼耳的例子（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此人没有真的“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对工厂主言听计从，1836 年把前面那种自发的想象包装成了理论。后来，为了反对缩减工作日，西尼耳的“信号……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在伦敦一家工厂主报纸上重新吹奏起来：工人减掉一小时工作时间会让企业主失去全部利润。“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博士则又证明，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 18 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

整整12个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工厂主未免太悲观了，”马克思嘲笑道，“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

阶级对立使得工人眼中的明智在资本家眼中显得愚蠢，比如马克思谈过围绕科技革新的斗争。工人强烈要求引进可以减轻不堪忍受的劳动但不能省钱的新机器，对此“资本家十分小心谨慎，不做这种对他来说纯属空想的蠢事”
864 （MEW 25，第272页）。反之，工人运动的根本一点，就是要将技术的潜能（减轻劳动和劳动人道化）和资本对技术的运用区别开来。否认这一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MEW 23，第465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逻辑分不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他们来说，谁反对纯粹追求利润地使用新技术，谁就在反对社会进步。“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便是患这种傲慢的呆小病的能手之一。”（同上）

3.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里暗示过他第一次到英国的印象：“大约在本世纪中叶，让每个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都感到惊奇的，是那种他在当时必然认为是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愚蠢的现象。”（MEW 22，第294页）而且“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恩格斯又安慰性地添了一笔：“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第295页）恩格斯这里使用的“愚蠢”概念是启蒙主义的，不是辩证地而是截然对立地看待愚蠢。他所说的愚蠢，大多数还是指那些违背自身利益的做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会遭到批判。例如恩格斯指出“容克老爷们的蠢举”和“完全没有理智”，就在于他们反抗专门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县组织法。（*Rolle der Gewalt*，MEW 21，第460页）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恩格斯是否相信，罗斯柴尔德家族（die Rothschibds）“为了给他们受到……迫害的同道报仇”，促成了一笔俄国公债的失败。恩格斯反对“他们这样愚蠢”的臆说，认为他们“只是从他们作为银行家的利益出发，这种利益就是要得到尽可能多的代售佣金和剥削尽量多的糊涂虫，如此而已”（MEW 22，第536—537页）。

作为糊涂轻信的愚蠢，是资产者一再要犯的特殊毛病，因为资产阶级交易关系的基本形式，就是私有者的竞争以及永远相互赚取便宜。在阶级对抗中，相应的策略屡见不鲜，在政治上，这就

是愚弄敌方的战术。“只有傻瓜才相信言论。”（Lenin，*Über Abenteurertum*，LW 20，第 359 页）这句话各方都会挂在嘴边，而且统治者说得不会比奴隶少。

865

3.1 **愚弄群众**。雇佣工人和相互竞争的资产者、小农和被殖民者，各有不同的糊涂轻信之处。如果把反犹主义称为“蠢汉的社会主义”（参见 GG 1，第 149—150 页），那么这里的愚蠢，就像汉斯·艾斯勒所说的，是落入“虚假的集体”的圈套（*Gespräche*，第 273 页及以下）。1906 年，在罗莎·卢森堡依然确信，“在一个严肃的革命时期”，所有那些将汇聚到工人运动中来的人们，“现在看来处于政治上的愚钝之中，他们对任何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尝试……都是麻木不仁的”。（GW 2，第 145 页）恩斯特·布洛赫把 1914 年的战争狂热写进了《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1917，第 9 页）一书的序言，当作“愚蠢大获全胜，宪兵为它保驾，知识分子为它喝彩，不惜绞尽脑汁献上谀辞”。这段战争狂热的经历，使得卢森堡反对“愚弄人民”和“毒害人民”以及由之造成的，比方说，“群众的沙文主义迷醉和浑噩麻木”（GW 4，第 152 页）的形象的斗争染上了些许绝望的意味。

3.2 **社会主义的愚蠢**。马克思主义者经常一再在文章中骂同志是“蠢驴”或“蠢货”。（参见例如 MEW 33，第 54 页）尤其危险的，是工人运动的机构中的结构性愚蠢。正是针对这一点，罗莎·卢森堡 1912 年 4 月 19 日致信梅林（Briefe 4，第 202 页），谈到党的领导机关中的“痴呆症”（Kretinismus）。与之相对的是激进左派的愚蠢。议会路线和革命路线的分裂成了焦点。卢森堡 1912 年把其中一个极端的危险概括为“议会痴呆症”，议会痴呆症容易导致危险的社会主义愚蠢，但是她又补充道：“究竟如何把握这个症状，我还要仔细考虑。”（1 月 26 日，同上书，第 159 页）

“议会痴呆症”这个说法不仅可能为反议会的右派所利用，也可能助长左派的反议会“痴呆症”。经典作家一再与后者展开过斗争，比如恩格斯 1895 年说过，“愚蠢”就是受已在议会斗争中陷入政治守势的反动派的挑衅而发动起义。（MEW 22，第 522 页）列宁 1920 年也将卢卡奇和贝拉·库恩（Bela Kún）鼓吹的抵制议会斥为“愚蠢”。（LW 31，第 155 页）列宁认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第 153 页），两人的文章都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第 154 页）。这一著名的论断针对的就是抽象空谈的愚蠢。卢卡奇的文章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到必须夺取和学会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工作部门和机关等等”（第 153—154 页）。这

866

里已预见到葛兰西后来的文化霸权议题。列宁继续指出，判断“过渡的”、“妥协的”办法是否必要，就是看它对“这样的工人”（同上）所起的作用。将自己和“先锋队”同“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隔绝开来，孤立地搞革命，“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LR*，LW 31，第80页）

3.3 列宁批评贝拉·库恩的愚蠢在于，“援引马克思的话（批评德国共产党的声明），但是这些话所指的情况跟目前的情况不同”（LW 31，第154页）。列宁指出，死守“当时很有益处”（LW 33，第466页）但现在已经过时的教科书，是愚蠢的。他告诫道：“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种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第467页）这里列宁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类像鼠疫一样摧毁自身发展空间的愚蠢——愚蠢地引用。有的人只引用革命路线；有的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御用文人”，只引用合法路线。二者都没有对情况作具体分析。

罗莎·卢森堡1906年曾预言，未来将出现这样的形势，恰恰“今天尚未组织起来的落后阶层将在斗争中自然地成为最激进、最勇猛的部分，而不是被裹挟进来的部分”（GW 2，第145页）。列宁在俄国革命中直接抓住了群众“最勇猛的部分”，又不断地和它斗争，才能掌握住激进和极端之间的界线，在这一过程中，俗语中耳熟能详的范畴“愚蠢”就有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可以重申马克思的话：在革命时做出的蠢事不会少，有时还会更多［参见 Engels，‘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LW 33，第209页），“在激烈的战争（革命就是最激烈的战争）中干蠢事是要受到失败这种惩罚的”（第92页）。这一语境中的“蠢事”指“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要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同上）。和帝国主义德国缔结和约，后来尝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对辩证法水平的严峻考验。列宁评论说，拒绝向强盗作出任何妥协，将妥协与同谋混为一谈，是同样愚蠢的。（LW 30，第486页）绝望的是：如果我们在合营公司里不能向外国资本家学到什么，“那么我国人民就是毫无希望的傻瓜了”（LW 33，第444页）。在自我批评调整革命进程的方向时承认：“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第414页）鼓舞人心的是：“我们干的蠢事比起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和第二国际一起干的蠢事来，简直算不了什么。”（第416页）

列宁认为，《凡尔赛条约》极佳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愚蠢，他预见

到这个条约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下一场战争。他这样评价这个不是和约的和约：布尔什维克干的蠢事，是说2×2＝5，资产阶级干的蠢事，是说2×2＝蜡烛。（第415页）

4. 斯大林官方化的马列主义的统治，使得批判的反思或转移到文学艺术领域，或转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4.1 葛兰西用**洛里亚主义**刻画资本主义中知识分子特定的一类愚蠢，他认为，“知识”一词背后很可能是愚蠢。“人们所称作知识的东西，经常不外乎是用次要的事实混淆掩盖本质的事实的能力。”他摘录出贝尔纳斯科尼（Ugo Bernasconi）这段话并评论道：“这种知识一般也被称为‘才能’（Talent），常见于某种肤浅的辩论，辩者受虚荣心支配，表现得独立自主，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因而努力用一系列局部的、次要的事实反对本质的事实。”（*Gef* 4，H. 6，§15，第723页）他在另一处又谈到知识的罪行和受害者的愚蠢之间的辩证关系：污蔑受害者“和众所周知的、板上钉钉的流氓打交道，是极为愚蠢的，恰恰相反，人们总要极其频繁地和不确定的流氓打交道，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流氓，遍布于日常生活中的流氓”。因此流氓比高尚的人得势，正因为他们不仅流氓，而且可以“高尚”起来，而高尚的人却不会变得流氓。与之相似的是“‘愚蠢—知识’的关系，知识分子可以装傻，而且让别人相信自己真的愚蠢，但是愚人无法装得智慧而且让别人相信自己真的智慧——除非他能找到比自己更愚蠢的人，这倒不难”（*Q*，第1746页）。尼采的妙语“装得比一般人傻，这在日常生活中和雨伞一样是必要的”（KSA 5，第233页），正适用于托马斯·曼所谓的“受权力保护的内向性”。对于权力的反对者而言，装傻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更比雨伞要紧得多。

4.2 布莱希特尤其深化了对愚蠢的批判，这一批判在他关于姿态（Verhalten）的学说中占有核心地位。“布莱希特经常令人惊讶地恶语相向——针对傻瓜！”（Eisler，*Gespräche*，第61页）《时代倒错的游行》（*Anachronistischer Zug*，改编自雪莱《暴政的假面游行》）中，有“六位人物”加入游行，“六个都是（纳粹）党员”，其中一个便是愚蠢。其他五个是压迫、麻风、欺诈、谋杀和抢劫：“老态龙钟，但还/总是忙忙碌碌/愚蠢也走进了游行队伍/一眼不眨地瞅着欺诈。”（GW 10，第948页）欺诈的表现则是：“晃着一大罐/免费的啤酒。只要把你们的孩儿卖给它/就能痛快喝个够。”布莱希特回溯戏剧史时写道，愚蠢是喜剧在贪婪、虚荣、无知、好斗之外的又一“主要对象”，正如“非人的社

会环境”是严肃戏剧的主要对象一样。（GW 17，第 1166 页）

和葛兰西一样，布莱希特也认为，兜售理智有时其实是愚蠢，这符合愚蠢的辩证法。葛兰西提出的“洛里亚主义”，对应着布莱希特对“图伊”（Tui，布莱希特将“知识分子”[Intellektuelle]拆解为 Tellekt-Uell-In，Tui 是其缩写，指服务于政治、经济上的当权者而滥用自己思维能力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布莱希特笔下的作家费胡旺（Fe-hu-wang，原型为孚希特万格[Feuchtwanger]）断言，许多知识分子反对马克思主义，《墨翟》回应道：“聪明的头脑既可能被当权者，也可能被头脑的所有者本人极其愚蠢地使用。恰恰是为了支撑最愚蠢的或最站不住脚的说法或机制，人们才利用聪明的头脑。最聪明的头脑不是致力于认识真理，而是致力于通过谎言去获取利益。他们追求的不是得到尊敬，而是填饱肚皮。”（GW 12，第 436 页）于是就有了恩格斯所讽刺的“高超的胡说”（MEW 20，第 329 页）等等，而这种胡话在任何时代都免不了受到批判。比如卢克莱修（*Von der Natur der Dinge*，I. 第 42—45 页）说过：高等的傻瓜（愚人）“只惊叹那些，他们以为 / 用生僻的词语所揭示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晦涩的语言”是深刻的标志。

将阶级矛盾消解，尤其是从被压迫者的意识中消解掉，是图伊们一再要解决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评点过，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如何将一切阶级矛盾都颠倒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人，即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与贱人之间的矛盾”（MEGA I. 10，第 271 页）。特权阶级“说话条理分明”，被压迫阶级是“哑巴，说话条理不清”，“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确定”。（同上）

布莱希特认为，轻信易骗是愚蠢的一种基本形式，他尤其关注下层人所表现出的轻信易骗。谁自发地做蠢事，谁的情感就有必要接受批判。“如果我们产生同情心，那么我们会对抽噎着说放跑了受害者的强盗，像对抽噎着说错走了远路的受害者一样感到同情。”（*Me-ti*，GW 12，第 516 页）面对娱乐工业，更有必要进行情感批判。布莱希特参与美国电影工业的制作的体验是：“聪明的变得愚蠢，进步的变得倒退，高贵的变得下流，下流的变得魅力十足。”（*AJ*，22. 10. 1942）好莱坞制造情绪紧张的技术“或许高超，但是这种技术只是为了……激起观众对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物和理念的兴趣”。这其中隐藏着“惊人的无聊……让谎言和愚蠢在每一名观众脑中循环往复”（GW 17，第 469 页）。

4.3 从古希腊到现代科幻作品，一

再把受愚弄展现为一种享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里，女巫喀尔刻（Kirke）代表着虚假的快乐，它会毁灭“享乐的人的自主性”（1947，第88页）。文化工业献上的作为享受的自我背叛，波兹曼（Postman）所说的娱乐至死，在理论上一再受到批判，在现实中则形式愈加露骨。音像店里即可买到的令人神魂颠倒的“消遣”，似乎早已消解溃散了集体行动能力。

维利·勃兰特经历过，愚蠢是权力的来源，他寄希望于艺术和文化的反作用力：“许多产业生产着伪装成娱乐的异
870 化和讥讽，什么才能阻止它们势如破竹地占领市场？……如果人不批判称心如意的事物，不反思周围环绕的事物，结果会怎样？……而文化就是要进行上述工作的领域，在这里，严肃和欢乐发展壮大起来，以遏制统治人的愚蠢和愚弄人的行为。愚蠢是这个世界一边容忍军备竞赛继续升级、一边坐视千百万人饥馑而死所必需的原料，以至于自然资源仿佛都不足以满足愚蠢的需求。我们在德国见得太多，我们还几乎没有哪一个产业因为愚蠢而被及时叫停。”（1985，第30页）

虽然这番严厉批评振聋发聩，也契合布莱希特对戏剧提出的要求，但是它所呼吁的对象，自身却虚弱困窘。而且，这番针对愚蠢的话语并不涉及现实政治，不会对任何人造成触动。何况笛卡尔就曾嘲笑过，健全的人类理智一定是人间分配得最合理的东西，因为从来没有人觉得自己分得不够。（*Discours de la méthode*，I. 1）

4.4 布莱希特严格区分了愚蠢同学习中必然犯的错误，像马克思一样，他也将愚蠢视为不会运用辩证法。对此，“墨翟建议，任何时候都要问一句：怎么学？”（GW 12，第514页）布莱希特排演《安提戈涅》（*Antigone*）的工作笔记（*AJ*，10.4.1942）体现了上述观点的核心内涵，即全然“抵制”将这部戏道德化地排演。这部戏的主题是终归失败的暴力，这是完全特殊的一类暴力，可以理解为“那种因欠缺不足而产生的”。“这就把残忍归结为愚蠢，道德则归为不实用的东西，这样道德就失去了绝对的、固定的、高踞感性之上的王位。”愚蠢因而成为比道德更深刻的概念。对愚蠢概念的扬弃既包含了道德也扬弃了道德，这就是为什么（道德评判的）“你这头猪”式的命令变成了“你这头牛”式的命令，这也将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把“恶”视为愚蠢或不理智的观点，纳入到对社会实践关系的总体考察中来。

4.5 **法西斯主义和愚蠢**。“上层的自私、上层的愚蠢”等恶习使人民求助于

871 其他更恶劣的品质，如残忍、无批判力等等。（GW 12，第 519 页）布莱希特以此解释（*AJ*，19. 2. 1939）当时趾高气扬的纳粹政权何以能用知识分子来装点门面。他悲观地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希望渺茫："他们为了消灭失业，咽下太多苦果。纳粹政权告诉他们，没有战争就等于失业（的确）。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政权是熟谙图伊主义的老手，全然晚期资本主义的环境赋予了它一批知识分子来装点门面。只要它清静无为，就是在推行连贯的政策，令人'安然梦游'。希特勒（最近的演说中）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很棒。这帮傻瓜不改变生产，就想改变消费！于是他们要在一个政治上被剥夺权力的国家建起庞大的理性化工业体系，又推行和平政策！希特勒就连贯得多：商品不能跨越的国界，就用坦克跨越，而坦克（以及操作坦克的劳动力）也是商品。图伊们慌了。"布莱希特在《图伊小说》（*Tui-Roman*）中写道："愚蠢越是无边无际，在人们眼里反而越无影无踪。"（GW 12，第 649 页）尽管他从马克思主义出发，但尼采有句话也适用于此："愚蠢总是挂起漂亮的名号，管自己叫必然。"（KSA 12，12.2）

5. **国家的愚蠢**。E. 克里彭多夫（E. Krippendorff）最近提出了国家、战争和愚蠢之间的关联："国家作为由暴力取得的压迫人的权力，构成了'愚蠢的疆域'，政治上的非理性在这里……被系统地生产出来，并遵循着非理性自己的逻辑——这是最关键的地方之一。"芭芭拉·图赫曼（Babara Tuchmann）称"愚蠢是人性的常量"（Krippendorff，第 15 页），"因为人类……一再被与自身利益相反的政策诱惑"（Tuchmann），而克里彭多夫认为愚蠢"只是受权力愚弄的政治领袖才有的一种特质"——这就提出了针对政治制度的问题。正如存在结构性的暴力，也存在着结构性的愚蠢。对此，交往理论和控制论有所讨论，例如等级制会阻碍信息反馈，如果评价汇报者的工作优劣不是按照汇报的消息是否准确，而是按照消息的好坏。多伊奇（Karl W. Deutsch）将权力定义为能够保证自己不必再学习任何事情的能力，那么任何权力都包含着自我愚弄的风险。让-保罗·萨特认为东西阵营的军备竞赛体现了"如果希望和平，那么准备战争"（*si vis pacem, para bellem*）这种"千年老蠢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基础观点就是，这类军事优先的安全政策导致了最大的不安全，"行政命令制度"排除公共空间使得社会陷入停滞和腐败。（参见 Haug 1989）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东德则是 1989 年秋天以前——戳破官方话语的愚蠢之处的 872

人都会成为“持异议者”。

相较于其他人，作家、画家、电影制作人，受艺术的特权的保护，更能够表现正直的共产主义者的悲剧，讽刺飞黄腾达的阴谋家，抨击经院哲学、长官意志和奴隶性。艾尔达·申格拉亚（Eldar Schengelaia）的电影《蓝山》（*Die blauen Berge*）讽刺官僚主义，也是对国家—社会的愚蠢现象的研究。从福尔克·布劳恩60年代末的创作中就可以看到，愚蠢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者对东德国情的批判研究中，占据了愈来愈重要的位置。比如他抨击1969年东德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愚蠢的升级”，一个演讲者要求，不应该再谈论“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布劳恩称之为“愚蠢的空话”：“这样的空话连篇，大会堂里响起愚蠢的掌声，众人又竞拾牙慧。”（1976，第64页）布劳恩主张这样一种文学生产方式，通过矛盾—寓言（Widerspruch-Fabeln）将人物“从非历史的狭隘中”（同上书，第136页）解脱出来。这与官方宣传中的愚蠢针锋相对：“指望用单纯的‘说服工作’来‘提升’人的意识，也是愚蠢的。”（同上书，第30页）海纳·米勒的尝试也方向相近。“但是我看见，权贵只是向他报以愚蠢和无知。”在某种程度上，深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全部可以视为反愚蠢的文学。

柏林墙和史塔西所代表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基础的压制措施，同经济低效发生综合作用，导致了东德的崩溃，而当时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似乎已并不遥远。“重读马克思可以预见，愚蠢还会表演出可怕的悲剧。这对于牺牲者并非慰藉，但是我们能做的唯有工作，尽管我们的工作收效甚微，对于死者更毫无价值。”（Heiner Müller，转引自Birkmeyer 1990）

6.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而言，愚蠢 873
这个概念不仅体现着竞争的关系，也体现着阶级的关系。对这个概念迥异的使用，蕴含着对在敌对的条件下形成个人的、集体的行动能力的困难和矛盾的反思。因此愚蠢不是智识的问题，而是向智识提出的、询问智识的使用、询问在对立的关系中应取的态度、询问思与行的关系的问题。

下层会狡猾地伪装愚蠢，会由从属的状态转变到反抗的立场，与之相对的是上层的狭隘智识。他们屡试不爽的操纵大众的妙方是“世界愿意受骗”（*mundus vult decipi*），受害者因轻信和不可饶恕的幼稚而上当受骗。各阶层的对立、涣散、消费再生产出的旧关系以及旧关系中结构性的愚蠢，使得在所有阶层都只有通过“难以置信的”辩证法，才能发掘出行动能力和生命力。

曾经召唤出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难题，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得到历史的解决，反而成倍地再生产出来。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MEW 12，第4页）这句话大约写在科技发达的资本主义起步的时期——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遭遇第一次危机时的评论，也可以为即将结束的20世纪带来反思：人们几乎认为，意识形态的迷失混乱反映了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因此许多人受末日将近的情绪和意识影响，完全遁入了一种迟钝的宗教当中。他们的说法甚至还颇为动听，但实际上都是一类宣称从经济出发解释历史的喋喋不休的蠢话"（*SPh*，第324页）。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撰

曹旸译，田洁审

874

参考文献：

M. Bachtin: *Literatur und Karneval. Zur Romantheorie und Lachkultur*, München 1969; O. F. Beer, »Dummheit«, in: HWPh 1, 1971; J. Birkmeyer, »Vom Leben nicht die Rede« [Leserbrief], in: *Marxistische Blätter* 2, 1990, 5; W. Brandt, »Die Kunst des Anstands«, in: *L 80*, H. 36, 1985; V. Braun: *Es genügt nicht die einfache Wahrheit*, Frankfurt/M 1976; B. Croc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Oekonomik und Ethik* (1908), Tübingen 1929; K. W. Deutsch, *Politische Kybernetik*, Freiburg i. B. 1969; H. Eisler,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München 1970;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²1990);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E. Krippendorff, *Staat und Krieg. Die historische Logik politischer Unvernunft*, Frankfurt/M 1985; D. Mülder, Einleitung zu G. Flaubert, *Wörterbuch der Gemeinplätze*, München 1968; R. Musil,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1937; B. Tuchmann, *Die Torheit der Regierenden. Von Troja bis Vietnam*, Frankfurt 1984; W. Weitling,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1842), Berlin/DDR 1955;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Frankfurt/M 1979.

参见：

Angst, Antisemitismus, Apologetik, Aufklärung, Chauvinismus, Dialektik, Dogmatismus, Dummheit in der Musik, Entfremdung, Enttäuschung, Gefühle, Gewalt, Gewohnheit, Glück, Haltung, Hegemonie, Ideologen, Intellektuelle, Intelligenz, Irrationalismus, Irrtum, Krise des Marxismus, Kulturindustrie, Lachen, Lorianismus, Lüge, Macht, Manipulation, Moral, Phrasen, Plebejisches, Staat, Tuismus, Vulgärökonomie, Weisheit, Witz, Zitate

音乐中的愚蠢
(Dummheit in der Musik)

A: al-ghabā' fi'l-mūsīqa.

E: stupidity in music.

F: stupidité dans la musique.

R: glupost' v muzyke (глупость в музыке).

S: estupidez en la música.

“音乐中的愚蠢”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作曲结合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作曲家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 1898—1982）提出的“美学—政治范畴”（Hodek 1981，第5页），他的文章和谈话录证明了他作为独创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地位。“艾斯勒在晚年，大约1956年前后，辑录自己的摘抄和笔记，编为《音乐辩证法资料》（*Materialien zu einer Dialektik der Musik*）。”（M. Grabs，同名书前言）他曾与音乐中的愚蠢“作过不懈的、热情的斗争”，又在该书中展开了对它的反思。（同上）“他没有放弃过这个主题，这个主题以一系列变奏形式一再出现。”（Frei 1975，第283页）最重要的原始文献是艾斯勒的《和汉斯·邦格对话》（*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这部对话“从1958年延续到他1962年9月去世前夕”（Bunge，Vorbemerkung）。书中他说，他自少年时起同音乐中的愚蠢作斗争，音乐中的愚蠢这个概念来自于普遍的、社会的愚蠢。（*Gespräche*，第229页）艾斯勒承认，“到今天他已经输了”（第150页）。

“存在愚蠢的音乐吗？”这个问题，罗伯特·穆齐尔也曾讨论过。“有的人说当然存在，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存在着深刻的，甚至思想深刻的音乐；但有的人 875
说不可能存在，因为用‘愚蠢’评判形式和感觉的做法毫无意义。”（GW 2，第821页）穆齐尔建议，试着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愚蠢可能是音乐的吗？持续地重复、固执地抓住一个主题、絮絮叨叨若干个念头、循环往复、旧内容略加修饰重新登场、激情的剧烈取代精神的领悟：愚蠢可以毫无愧色地宣布，以上种种也是愚蠢偏爱的特质。”（同上）

艾斯勒大概会同意穆齐尔。他在流亡者的队伍中，尤其在与布莱希特的合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布莱希特将观众当作“改变世界的人的集会，他们在会上收取关于世界的报告”（*AJ*，15.3.1942），报告应该公开地给出建议，并用实验的方式表演出来。为此，他尝试反意识形态地调动戏剧美学。这不仅意味着改变戏剧内容，而且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将戏剧嵌入到社会实践的整体中去，为了突出这一点，他笔下《买黄铜》中的哲学家考虑引入“剧戏”（Thaeter。这是一个颠倒“戏剧”[Theater]的字母顺

序构造的新词，同时与“案犯”[Täter]谐音。——译者）这个概念。（GW 16，第 508 页）相应地，布莱希特要求创造一种根本不同的音乐，他称之为“乐音”（Misuk）。“这种音乐让人首先想起劳动妇女周日下午在后院里的歌声。”（Eisler，*Materialien*，第 236 页）它应该无法被“身着燕尾服的先生们仪式化”，也不应该制造“感觉紊乱”或凭借音乐的法外特权传播“屠杀画面”。（同上）艾斯勒说，他对这个“乐音”的设想报以“怀疑、轻视的态度”。（同上）这体现了他相对于布莱希特的独立之处。毕竟他是十二音体系创始人、资产阶级最高超的音乐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大概最重要的弟子。这一背景使他有别于布莱希特，避免了他唯布莱希特是从，因此也使得二人的合作异乎寻常地丰产。艾斯勒彻底批判了带有资产阶级烙印的音乐观，以及这种音乐观中遗留的前资产阶级元素；他的批判尤其针对这种音乐意识形态在工人运动和最终在社会主义权威国家中的持久影响。而他的批判立足于伟大的资产阶级音乐（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成就与它遵循美学“真理”（参见 *Materialien*，第 229 页）的品质，它始终是艾斯勒的榜样。唯其如此艾斯勒才有资格，为属于未来的、具有解放力量的音乐奠定基石，“供应”出在争取团结、理性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有所作为的乐曲。

艾斯勒认为，愚蠢首先是一个“社会现象”（*Gespräche*，第 187 页）。愚蠢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落后于实际情况”（第 229 页）。这种情况在高等人那里表现得最危险。“广大观众并不愚蠢，愚蠢的是专家。”（第 151 页）教皇在通谕里直接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辩护，却谴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结果，即贫富矛盾，这么做是“愚蠢”的；社会民主党人诺艾伦（Noellen）欢迎教皇的通谕，这么做也是“愚蠢”的。（第 164 页）单数的愚蠢表示必须消灭掉的一种态度、一种做法，复数的愚蠢则表示某些无法避免的东西。不从复数的愚蠢中学习，是最愚蠢不过的。这样的教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德早期历史中就有一个：“艺术的过度政治化导致了审美中的野蛮。”如果共产党人“将每一片垃圾都政治化，审查它是否符合我们的世界观”（第 155 页），那完全是“天真”的，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幼稚病”。一个例子便是压制牛仔裤。牛仔裤起源于工人服装，却被当作“美国文化的代表”（第 157 页）遭到打击，这个做法最后彻底失败并导致文化政策 180 度的转向。又一个例子：布莱希特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1952 年在莱比锡上演，其中有一幕，母亲弗拉索娃（Pelagea

Wlassowa）借女房东和贫困的女房客的关系，充分演绎了圣经中对富人的批评。党的机关考虑到教会的反应，命令删去这一幕。（第 163 页）艾斯勒其实还能开列更多的例子，比如领导干部毁灭性的愚蠢，使他放弃了为新德国谱写民族歌剧《浮士德》的计划。

音乐中的愚蠢对应着“乐育”。（*Materialien*，第 253 页）马克思是这样理解后者的：“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Ms 44*，MEGA I. 2，第 270 页）

877

情形概览：广播里可以听到“一种卑微小气的、通常是华尔兹形式的生活小乐子……一种用进行曲节奏表现的伪军事做派……所谓重要交响乐作品中的某种故作深思的浮夸……一种膨胀的‘世界观’”（*Gespräche*，第 233 页），“乐队指挥的调子”，“瓦格纳的翻版”，永远“通宵达旦”的重复（第 185 页），“乏味得可怕的东西”。大众音乐媒体像竞争激烈的社会体制一样，这样的音乐同时从“西边和东边的频道里”（第 216 页）传出。音乐中的愚蠢也是演奏中的问题，即使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奏中，艾斯勒也察觉到了“浮夸、虚假、污秽”。（第 185 页；另参见 Adorno/Eisler 1976 中 »schlechte Gewohnheiten« 一篇）

在概念上探讨音乐、进而探讨音乐中的愚蠢是困难的，这体现在艾斯勒用来表示相反两极评价的、成对出现的范畴上：情感对伤感、力量对虚浮、宏大对浮夸、愉快对滑稽。（*Materialien*，第 215、254 页）积极的范畴还有：“轻快、明亮、近乎幽默的”（*Gespräche*，第 147 页），“所有使音乐表达理性而不是愚蠢的创作风格”（第 215 页）。相应地，可以这样评价艾斯勒的音乐：他的音乐“将情感重新组织起来，使之产生出真正开朗、清醒的品质，而且不仅限于欢乐和乐观主义的情感，悲伤、痛苦、哀叹等情感也做到了这一点”（Hodek 1981，第 7 页）。布莱希特在《歌曲和康塔塔》（Lieder und Kantaten）第一卷的前言中评价艾斯勒的音乐：“整体风貌是真正意义上革命的。他的音乐在听者和演奏者那里引发起强烈的冲动和对一个时代的洞见。在这个时代，各领域的生产力是所有享乐和道德的源泉。生产力创造出了新的柔弱和力量、坚韧和灵巧、急躁

和谨慎、求索无厌和自我牺牲。”

概念浅析：“各个民族，”艾斯勒援引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早年作品《欢乐与时日》（*Frühe Freude*）写道，“在苦难深重和喜气洋洋的时候都有同样的信使和哭灵人，那就是糟糕的乐手。”（*Materialien*，第253页）但是愚蠢的音乐和糟糕的音乐不完全一样，愚蠢并不排斥美。中国哲学家墨翟在《非乐》中有一句话：“绝望者不得安慰。”（此句不见于《墨子·非乐》，或出自布莱希特。《非乐》原文：“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布莱希特有诗：“奏音乐害处有四：/饥者不得饱，/寒者不得暖，/无家者仍无家，/绝望者不得安慰。”——译者）艾斯勒改成：“考虑到音乐中的愚蠢，我认为：绝望者可得安慰。”（第255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为此提供了佐证：“强力的消遣、代偿满足、麻醉剂使我们对苦难变得麻木不仁。”（GW XIV，第432页）在这一点上音乐的作用正如毒品。

“毒品”及其效果“迷醉”（Trance）也是布莱希特思考“艺术的麻醉作用”（GW 15，第490页）时所用到的范畴。例如他这样概括旋转木马型戏剧（和天文馆型戏剧相对，后者将观众纯粹当作观看者）的特点：“我们想象自己骑马、飞行、驾车。通过音乐制造一种非常轻微的昏迷状态。”（GW 16，第542页）一方面人“有一种受到机械的不可抗拒的裹挟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自己指挥的假象。如果我们在一架旋转木马上感觉比在一座天文馆里更主动，那么这感觉并不完全是假象——至少我们自己在运动，而不只是在观察”（同上）。布莱希特强调这种“旋转木马型”在艺术中功效卓著：“布尔什维克1917年在内战中把列宁格勒歌剧院搬到前线，用音乐代替了食品和燃料，而几获得了宝贵的战斗激情。”（第544页）布莱希特指出的悖谬是，如果“为音乐厅写‘进步音乐’”，相反只会看到“一排排听众处于彻底的麻醉状态，完全消极被动，沉湎于内心活动”。而且“对乐队指挥的赞颂体现了我们音乐会听众的积极性已完全消磨殆尽”，指挥身上的生产过程变得“可供消费”，成为预期效果的展演：如果他“表情上呈现出甜蜜的哀伤，又认为演奏这支曲子应该产生出这甜蜜的哀伤”，那么他只是假模假样地借助了演奏者；“实际上他企图把这种伤感直接地，而不是通过音乐传染给观众”，就像电影音乐同样越过电影情节“提前制造银幕上的事件预期达到的效果”一样。（GW 15，第488—489页）戏剧音乐，尤其电影音乐，尽可以“编写出某种人为的逻辑，也就是制造宿命感、无力感

878

879

等等”，频繁地“盖过”剧本审美上、思想上的断裂。（第 491 页）以上种种令布莱希特看到，“带来如此效果的音乐，不可能用于实现政治和哲学的目标”。这话多少令人回想起柏拉图的音乐批判（参见 Adorno 1958，第 11 页），但与之相反，布莱希特归根结底反对的是“音乐完全作为命运”（GW 15，第 480 页）出现。

艾斯勒反对音乐中的愚蠢进行创作的尝试，和所有针对音乐意义的讨论一样，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将困难的根源解释为“音乐中的愚蠢数不胜数”（*Gespräche*，第 185 页），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的分析中有两个范畴最能把握住音乐中的愚蠢：“姿势”（Gestus）和“态度”（Verhalten）。愚蠢就是错误的姿势、错误的态度。有左翼音乐家希求创作进步音乐，以政治鼓动的方式完成这个任务，对此艾斯勒指出，音乐必须“更明智地进入”（第 188—189 页）现实，因为愚蠢首先是“音乐对我们的实际社会情况充耳不闻”（第 215 页）。

反复无常的（*Proteus*）**特性**：对上述“充耳不闻”的分析可以看出音乐基本的特征。音乐倾向于取消意义的具体内涵，比如说，将悲伤呈现为悲伤本身，抽空其原因，表现悲伤的音乐便可以为任何可能的主体效劳。艾斯勒将此称为“音乐反复无常的特性”，在音乐创作中（即使在音乐课堂上）反对“抽空原因”，是与音乐中的愚蠢作斗争的形式之一。音乐被扁平化，“定位为非历史的”，反过来变成“意识形态操纵或艾斯勒所说的‘愚民’的理想工具”。（Hermand 1981，第 170 页）音乐反复无常的特性，使人可以用音乐将自我背叛变成值得享受的事。例如，艾斯勒“在《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这样的通俗作品中，指出了没落的资产阶级愚蠢的程度，他们在歌剧舞台上享受自己的屈辱”（*Materialien*，第 254 页）。但这绝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正是音乐该死的反复无常特性导致了愚蠢。”（*Gespräche*，第 232 页）音乐反复无常的特性和它落后于“我们时代的认知水平”（第 186 页）的根本原因是它超脱的介质：“音乐因为远离现实世界……而具有迟钝、过时的特征，某种程度上是愚蠢的渊薮。”（第 230 页）教会音乐“不是愚蠢，而是迟钝，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练习”（第 231 页）。音乐被用来为自己服务，艾斯勒提到了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第 230 页）“封建主义早期，智识和愚蠢都还无足轻重，直到自由市民壮大起来，音乐中的愚蠢才取代了封建主义早期的迟钝。”（第 231 页）音乐的世俗化暴露出“纯粹享乐的特性”，这才有了愚蠢，即虚假的享受，但同时也开启了音乐的伦理和

880

认识特性——这正是艾斯勒要继承的。（第230页）赫尔曼德（Hermand）认为音乐美学的愚蠢是一种“盲目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的最高标准是直接而无意识的满足感”（1981，第188页）。

艾斯勒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的面纱”是对音乐中的愚蠢进行社会分析的切入点。“同样的面纱也遮盖住音乐……不揭破这层面纱，就会困在愚蠢之中。”（*Gespräche*，第187页）这一点也切中阿多诺对“音乐中的拜物教特性和听觉退化”（1958，第9页及以下）的分析。“音乐拜物教”不断自我重复又不断被辨识出来，在阿多诺看来，它纯粹是价值形式的普遍统治的特殊情况：“消费者还没有了解‘价值’特殊的质，就在消费‘价值’并热情地追求它，这是价值的商品属性晚近的表现形式。”（第18页）相对于艾斯勒（和布莱希特略有分歧）试图调和朴素的音乐和高超的艺术音乐，阿多诺完全依据后者规范性地提出了他的音乐美学。他批评剔除一切“非同流者”（1962，第210页）的音乐文化工业强化了“操纵者”和“被操纵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新制造出“虚假的意识”，而是将既有的意识固定下来。“存在着的东西反正都悄悄地再生产出来，包括既有的意识；现状成为崇拜物。”（同上）而且，听众的意识状态巩固了文化工业的合法性，于是成了“别人灌给他们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意识形态”（第211页）。阿多诺也警惕音乐中另一种对愚蠢的批评，批评者“自负于本身的水平而必须愚弄大众”，比如他们拒斥文化工业对青少年音乐的移用，却美化这些音乐作品本身的品质。“着眼于整体的视角已经变得片面。”（1968，第137—138页）阿多诺提到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的设想，用一本音乐杂志作为“惩治愚蠢音乐的机关”，它“引用乐曲中的段落”就像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火炬》（Fackel）杂志上引用其他报刊一样。（第141页）

文化工业用“高级”音乐帮助极权主义征服个人，用流行音乐娱乐个人，这构成了布莱希特、艾斯勒、阿多诺的典型经验，他们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艾斯勒的音乐路线调和了阿多诺和布莱希特的观点，在政治维度上吸取了葛兰西的学说：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普通人的关系在音乐中也至关重要，不过不是像天主教那样将知识分子绑定在“普通人”的水平上，而是通过一种新个体的审美运动形式而起作用，这种新个体将从前被视为依附者的各色人等转变为主体。（参见 *Gef* 6，H.11，§12，第1375页及以下）音乐具有一种危险、古老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用来为权威政治服务，因为耳朵“不与时俱进”，而是

"保留过时、迟钝的特征"。(*Gespräche*，第 182 页) 音乐作用于人脑中更原始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活跃着的还是人的动物本性。它联系着个人原子化以前的时代，就像动物种群式的原始共同体一样模糊可疑。就此而言，人的动物本性尤其易为"**虚假的集体**"(第 273 页及以下) 所利用。"战争需要音乐"，瓦普涅夫斯基 (Peter Wapnewski) 回忆纳粹时期的校园这样写道。(FAZ，1982 年 6 月 12 日) 艾斯勒认定，"所有战争都滥用人身上某种迷误的社会主义情感"——"摆脱沉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置身于一个大集体里"，于是战争变成了值得享受的体验。印第安人故事中的幻想就如同预演了战争体验。"人必须勇敢，人必须守住他的部落。"鄙视金钱反对商业。年轻读者在这里读到了"某种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战争所滥用的、音乐古老的深刻作用所根植的，正是"人抛弃个体转向普遍的本能"，一种既可贵又危险的冲动。

音乐的模糊可疑中，隐藏着音乐的神话前身的爆炸性潜能，"令石头起舞"的俄耳甫斯 (Orpheus) 的传说就暗示了这一点 (关于俄耳甫斯神话的乌托邦爱欲和颠覆潜能，亦参见 Herbert Marcuse 1957，第 156—167 页)。艾斯勒就此提到过耶利哥 (Jericho) 的号角吹塌了 (国家的) 墙的故事。(君特·迈尔注意到，故事在《旧约·约书亚记》6.1—20 有不同的讲法："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 882
呼喊，城墙就塌陷。"艾斯勒或许会更爱这个讲法。) 艾斯勒畅想东德僵化的环境里出现运动的活力："请您设想，我，一个音乐家，也许能够让斯大林大道瞬间焕然一新！"(*Gespräche*，第 183 页)

后来更名为卡尔·马克思大道的斯大林大道，代表着乌布利希时期建立的社会—绝对主义 (Sozial-Absolutismus)。关于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紧要问题，越来越迫在眉睫地摆在明智、正直的共产主义者面前，直到可能变革的历史时机被彻底错过，这段马克思主义自我探索的历史，在其早期就纳入了音乐中的愚蠢这个主题。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俄耳甫斯走进冥府时，"一些可怕的幽灵接近他，其中就有愚蠢幽灵，它走过来说：我是聋子"(*Gespräche*，第 184 页)。这令音乐家感到自己已经输了。艾斯勒预期，可能两百年后，他的音乐才能得到普遍认识。但是无论时尚如何，他对音乐中的愚蠢的批判，影响已超出了音乐领域。(参见如 Stötzer 1983)

归根结底，音乐中的愚蠢的核心内容是虚假的集体，批判它的意义在于争取团结的新形式：将政治和音乐领域的知识分子团结为一个集体，一个向个人开启空前自由空间的集体。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Dissonanzen –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2. erw. Aufl., Göttingen 1958; ders., *Einleitung in die Musiksoziologie – Zwölf theoretische Vorlesungen*, Frankfurt/M 1962; ders., *Impromptus. Zweite Folge neu gedruckter musikalischer Aufsätze*, Frankfurt/M 1968; ders. u. H. Eisler, *Komposition für den Film*, in: GS 15, 7-155; H. Eisler,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GW, Serie III, Bd. 7, Leipzig 1975; ders., *Materialien zu einer Dialektik der Musik*, hgg. v. M. Grabs, Leipzig 1972; ders., *Musik und Politik*, GW, Serie III, Bde. 1-3, hgg. v. G. Mayer, B. Frei, Rezension von Eislers Gesprächen mit Bunge, in: *Hanns Eisler*, AS 5, Berlin/W 1975, 283-286; S. Freud,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GW XIV; W. F. Haug, K. Völker, M. Zobl, *Der Streit um Hanns Eislers »Faustus«*, Argument-Studienheft 8, Berlin/W 1978; J. Hermand, *Konkretes Hören. Zum Inhalt der Instrumentalmusik*, Berlin/W 1981; J. Hodek, *Musik gegen die Dummheit*, Programmheft zur gleichnamigen LP. Berlin/W 1981; H. Marcuse, *Eros und Kultur*, Stuttgart 1957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4); R. Musil, »Aus einem Rapial« (1937), in: Ges. Werke, hgg. v. A. Frisé, Bd. 2, Reinbek bei Hamburg ^{2}1981; W. Stötzer, »Für Frau Luise Seitz«, in: SuF, 35. Jg., 1983, H. 3, 791f.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曹旸 译，田洁 审

参见：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Antiideologie, Aufklärung, Autonomie der Kunst, Befriedigung, Brecht-Linie, Dummheit, eingreifendes Denken, falsches Bewußtsein, Fetischcharakter, Genuß, Gestus, Gewohnheit, Ideologie, Kitsch, Kulturindustrie, Musik, Verfremdung

附　录

词目及作者

Bank (Michael Krätke)

Banknote (Michael Krätke)

Basis (Thomas Weber)

Basis-Ästhetik (Günter Mayer)

Basisgruppen (Welf Schröter)

Bauern (Rolf Hecker)

Bauernbewegung (Gerhard Hauck)

Bauernkrieg (Theodor Bergmann)

Beamte (Michael Krätke)

Bedeutung (Thomas Weber)

Bedürfnis (Heinrich Taut)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Andrea Catone)

Befehlswirtschaft (Hansgeorg Conert)

Befreiung (Peter Penner)

Befriedigung (Erich Wulff)

Begriff (Veikko Pietilä)

Beruf (Gerhard Zimmer)

Berufsrevolutionär (Werner Mackenbach)

Berufsverbot (Morus Markard, Gabi Minz)

Besitz/Eigentum (Lawrence Krader)

bestimmte Negation (Wolfgang Fritz Haug)

Bestimmung, Determination (Wolfgang Fritz Haug)

Bewegung (Karin Weingartz-Perschel; Renate Wahsner)

Bewußtheit (Heinrich Taut)

Bewußtsein (Wolfgang Fritz Haug)

Bild (Michael Franz)

bildende Kunst (Norbert Schneider)

Bildung (Terri Seddon)

Biologismus (Garland E. Allen)

Black Marxism (Hans Gustav Klaus)

Blöcke (Michael Jäger)

Blockfreiheit (Anouar Abdel-Malek)

Bodenreform (Helmut Arnold)

Bolschewisierung (Theodor Bergmann)

Bonapartismus (Werner Mackenbach)

Börse (Michael Krätke)

Bourgeoisie (Florian Schmaltz; Immanuel Wallerstein)

Brandlerismus (Theodor Bergmann)
Brecht-Linie (Gudrun Klatt; Wolfgang Fritz Haug)
Bucharinismus (Theodor Bergmann)
Bündnispolitik (Klaus-Michael Bogdal)
Bürgerinitiativen (Fred Karl)
Bürgerkrieg (Ulrich Albrecht)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Peter Brandt)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Reinhard Markner)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Peter Brandt)
Bürgerrechte (Hartmut Wagner)
Bürokratie (Michael Krätke)
Camera obscura (Wolfgang Fritz Haug)
Charaktermaske (Wolfgang Fritz Haug)
Charisma, charismatische Führung (Jan Rehmann)
Chartismus (Editha Kross)
Chauvinismus (Theodor Bergmann)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Michael Ramminger)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Helmut Gollwitzer)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Klaus Kreppel)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Kuno Füssel, Bernhard Walpen)
Darwinismus (Volker Schurig)
Defaitismus, revolutionärer (Theodor Bergmann)
Definition (Arnold Schölzel)
Della-Volpe-Schule (Ruedi Graf)
Demokratie (Hartmut Wagner)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Uwe-Jens Heuer)
Demokratische Psychiatrie (Erich Wulff)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Robert Lederer)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Monty Johnstone)
Denken (Rainer Seidel)
Denkform (Wolfgang Fritz Haug)
Dependenztheorie (Jan Otto Andersson)
Despotie des Kapitals (Daniel Barben)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Uli Schöler)
Destruktivkräfte (Kurt Jacobs)
Determinismus (Emilia Giancotti; Thomas Laugstien)
deutsche Misere (Helmut Peitsch)
Dezentralisierung (Hansgeorg Conert)
Dialektik (Wolfgang Fritz Haug)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Christian Löser)
dialektisches Bild (Thomas Weber)
dialektisches Theater (Manfred Wekwerth)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Theodor Bergmann)
Diskursanalyse (Thomas Laugstien)
Diskurstheorie (Jürgen Link)
disponible Zeit (Volker Gransow, Gunter Willing; Frigga Haug)
Dispositiv (Thomas Laugstien)
Dissident(inn)en (Barbara Ketelhut)
Distribution (Gunter Willing)

Disziplin (Frigga Haug)
Dogmatismus (Christian Löser)
Doppelbelastung (Frigga Haug)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Frigga Haug)
Doppelherrschaft (Peter Jehle)
doppelte Militanz (Ariane Brenssell, Susanne Lettow)
Dorfgemeinschaft (Bastiaan Wielenga)
Drei-Welten-Theorie (Ingo Nentwig)
Dritte Welt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Frigga Haug)
dritter Weg (Hans Mittermüller, Jürgen Mittermüller)
Dualwirtschaft (Jan Otto Andersson, Gunter Willing)
Dummheit (Wolfgang Fritz Haug)
Dummheit in der Musik (Wolfgang Fritz Haug)

本卷作者简介

Anouar Abdel-Malek, 1924, Universität Kairo (Blockfreiheit)

阿努阿尔·阿卜杜勒-马莱克，1924，开罗大学（不结盟）*

Ulrich Albrecht, 1941,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ürgerkrieg)

乌尔里希·阿尔布雷希特，1941，柏林自由大学（内战）

Garland E. Allen, 1936,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USA (Biologismus)

加兰·E. 艾伦，1936，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美国（生物主义）

Jan Otto Andersson, 1943, Abo Akademi, Turku, Finnland (Dependenztheorie, Dual-wirtschaft)

扬·奥托·安德森，1943，图尔库大学，芬兰（依赖理论、二元经济）

Helmut Arnold, 1950, Frankfurt/M (Bodenreform)

赫尔穆特·阿诺尔德，1950，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土地改革）

Daniel Barben, 1961,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Despotie des Kapitals)

丹尼尔·巴本，1961，柏林工业大学（资本专制）

Theodor Bergmann, 1916, Universität Hohenheim (Chauvinismus, revolutionärer Defait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Bauernkrieg, Bolschewisierung, Brandlerismus, Bucharinismus)

特奥多尔·贝格曼，1916，霍恩海姆大学（沙文主义、革命的失败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战争、布尔什维克化、布兰德勒主义、布哈林主义）

Klaus-Michael Bogdal, 1948, Pädagogische Hochschule Freiburg/Br (Bündnispolitik)

克劳斯-米夏埃尔·博格达尔，1948，弗莱堡（高等）教育学院（联盟政策）

Peter Brandt, 1948, Fernuniversität Hagen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彼得·勃兰特，1948，哈根函授大学（德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

* 括号内为该作者所撰写词目名称。——中文版编者

Ariane Brenssell, 196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doppelte Militanz)

阿丽亚娜·布伦塞尔，1963，柏林自由大学（双重斗争）

Andrea Catone, 1950, Universität Urbino, Italien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安德里亚·卡托内，1950，乌尔比诺大学，意大利（行政命令制度）

Hansgeorg Conert, 1933, Universität Bremen (Befehlswirtschaft, Dezentralisierung)

汉斯格奥尔格·科纳特，1933，不来梅大学（命令式经济、分散化）

Michael Franz, 1937, Zentrum für Literaturforschung, Berlin/O (Bild)

米夏埃尔·弗朗茨，1937，（东）柏林文学研究中心（形象［图像］）

Kuno Füssel, 1941, vorm. Universität Münster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库诺·非塞尔，1941，前明斯特大学（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

Emilia Giancotti, 1930-1992,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Urbino, Italien (Determinismus I)

埃米莉亚·吉安科蒂，1930—1992，乌尔比诺大学，意大利（决定论 I）

Helmut Gollwitzer, 1908-199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赫尔穆特·戈尔维策尔，1908—1993，柏林自由大学（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1922,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exico (Dritte Welt I)

巴勃罗·冈萨雷斯·卡萨诺瓦，1992，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第三世界 I）

Ruedi Graf, 1952, Gymnasium Oberwil, Basel (Della-Volpe-Schule)

吕迪·格拉夫，1952，上维尔文理中学，巴塞尔（德拉沃尔佩派）

Volker Gransow, 1945, Berlin/W, FSP Zeithistorische Studien, Potsdam (disponible Zeit I)

福尔克尔·格兰佐，1945，西柏林历史研究中心，波茨坦（可自己支配的时间 I）

Gerhard Hauck, 1939, Universitat Mainz (Bauernbewegung)

格哈德·豪克，1939，美因茨大学（农民运动）

Frigga Haug, 1937, Hochschule fu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Hamburg (disponible Zeit II, Disziplin, Doppelbelastung,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Dritte Welt II)

弗里加·豪格，1937，汉堡经济政治学院，（可自己支配的时间 II、纪律、双重负担、劳动的二重性、第三世界 II）

Wolfgang Fritz Haug, 1936,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estimmte Negation,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Bewußtsein, Brecht-Linie II, Camera obscura, Charaktermaske, Denkform, Dialektik,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1936，柏林自由大学（规定的否定、规定 / 决定、意识、

布莱希特派 II、暗箱［照相机］、［性格］面具、思维形式、辩证法、愚蠢、音乐中的愚蠢）

Rolf Hecker, 1953, Berlin/O, MEGA-Redakteur (Bauern)

罗尔夫·黑克尔，1953，东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部（农民）

Uwe-Jens Heuer MdB, 1927, Berlin/O,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乌韦-延斯·霍伊尔，（德国）联邦议院议员，1927，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民主 / 无产阶级专政）

Kurt Jacobs, 1956, Berlin/W (Destruktivkräfte)

库尔特·雅各布斯，1956，西柏林（破坏的力量）

Michael Jäger, 1946, Berlin/W, Wochenzeitung »Freitag« (Blöcke)

米夏埃尔·耶格尔，1946，西柏林，《星期五》周报（集团）

Peter Jehle, 1954, Berlin/W, 5. Gymnasium Pankow (Doppelherrschaft)

彼得·耶勒，1954，西柏林，潘科第五文理中学（两个政权）

Monty Johnstone, London, Mithg. der engl. Marx-Engels-Werkausgabe (demokratischer Zentralismus)

蒙蒂·约翰斯通，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共同出版者、共同编辑者（民主集中制）

Fred Karl, 1947, Universität-Gesamthochschule Kassel (Bürgerinitiativen)

弗雷德·卡尔，1947，卡塞尔大学（公民倡议行动组织）

Barbara Ketelhut, 1956, Fachhochschule Lüneburg (Dissident/inn/en)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1956，吕讷堡应用技术大学（持异议者）

Gundrun Klatt, 1943-1990, Berlin/O (Brecht-Linie 1)

古德伦·克拉特，1943—1990，东柏林（布莱希特派 I）

Hans Gustav Klaus, 1944, Bremen, Universität Rostock (Black Marxism)

汉斯·古斯塔夫·克劳斯，1944，不来梅，罗斯托克大学（黑人马克思主义）

Lawrence Krader, 1919, Washington,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esitz/Eigentum)

劳伦斯·克拉德，1919，华盛顿，柏林自由大学（占有 / 所有权）

Michael Krätke, 1949,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Bank, Banknote, Beamte, Börse, Bürokratie)

米夏埃尔·克莱特克，1949，阿姆斯特丹大学，（银行、纸币、官员、交易所）

Klaus Kreppel, 1944, Studienseminar Detmold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克劳斯·克莱佩尔，1944，（基督教的社会主义）

Editha Kross, 1952,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Chartismus)

伊迪莎·克罗斯，前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宪章运动）

Thomas Laugstien, 195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Determinismus II, Diskursanalyse, Dispositiv)

托马斯·劳格施廷，1953，柏林自由大学（决定论 II、话语分析、配置）

Robert Lederer, 1948,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罗伯特·莱德勒，1948，波鸿大学（民主社会主义）

Susanne Lettow, 1956,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doppelte Militanz)

苏珊娜·莱托，1956，柏林自由大学（双重斗争）

Jürgen Link, 1940,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Diskurstheorie)

尤尔根·林克，1940，波鸿大学（话语理论）

Christian Löser, 1953,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ogmatismus)

克里斯蒂安·勒泽，1953，前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辩证唯物主义、教条主义）

Werner Mackenbach, 1951, Frankfurt/M, Universität Managua (Berufsrevolutionär, Bonapartismus)

维尔纳·马肯巴赫，1951，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中美洲大学-马那瓜（职业革命家、波拿巴主义）

Morus Markard, 1948,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erufsverbot)

莫鲁斯·马尔卡德，1948，柏林自由大学（职业禁令）

Reinhard Markner, 1967,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赖因哈德·马克纳，1967，柏林工业大学（市民［资产阶级］社会）

Günter Mayer, 1930, vorm. Humboldt-Universität Berlin (Basis-Ästhetik)

君特·迈尔，1930，前柏林洪堡大学（基础美学）

Gabi Minz, 1950, Berlin/W (Berufsverbot)

加比·明茨，1950，西柏林（职业禁令）

Hans G. Mittermüller, 1954, Müchen (dritter Weg)

汉斯·G. 米特米勒，1954，慕尼黑（第三条道路）

Jürgen Mittermüller, 1962, München (dritter Weg)

尤尔根·米特米勒，1962，慕尼黑（第三条道路）

Ingo Nentwig, 1960,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 (Drei-Welten-Theorie)

英戈·内特维希，1960，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Helmut Peitsch, 1948, University of Wales, Cardiff (deutsche Misere)

赫尔穆特·派奇，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德国的鄙俗气）

Peter Penner, 1955, Stuttgart (Befreiung)

彼得·彭纳，1955，斯图加特（解放）

Veikko Pietilä, 1941, Universität Tampere, Finnland (Begriff)

维伊科·派特利，1941，坦佩雷大学，芬兰（概念）

Michael Ramminger, 1960, Institut für Theologie und Politik, Münster (Christen für den Sozialismus)

米夏埃尔·拉明格，1960，神学与政治学研究院，明斯特（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督教徒）

Jan Rehmann, 195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Charisma/charismatische Führung)

扬·雷曼，1953，柏林自由大学（卡里斯玛、卡里斯玛的领导）

Florian Schmaltz, 1968,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ourgeoisie I)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1968，柏林自由大学（资产阶级 I）

Norbert Schneider, 1945, Universität Münster (bildende Kunst)

诺伯特·施奈德，1945，明斯特大学（造型艺术）

Uli Schöler, 1953, Bonn (despotischer Sozialismus)

乌利·舍勒，1953，波恩（专制社会主义）

Arnold Schölzel, 1947, vorm. Humboldt-Universität Berlin (Definition)

阿诺德·舍尔策尔，1947，前柏林洪堡大学（定义）

Welf Schröter, 1954, Tübingen (Basisgruppen)

韦尔夫·施罗特，1954，图宾根（基层小组）

Volker Schurig, 1942, Universität Hamburg (Darwinismus)

福尔克尔·舒里希，1942，汉堡大学（达尔文主义）

Terri Seddon, 1952, Monash University, Melbourne (Bildung)

特里·塞东，1952，蒙纳十大学，墨尔本（教养）

Rainer Seidel, 1941,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Denken)

赖纳·塞德尔，1941，柏林自由大学（思维）

Heinrich Taut, 1907, vorm.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 (Bedürfnis, Bewußtheit)

海因里希·陶特，1907，前东德科学与人文学院（需要、觉悟［自觉性］）

Hartmut Wagner, 1952, 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 (Demokratie, Bürgerrechte)

哈特穆特·瓦格纳，1952，萨尔大学（民主［民主主义］、公民权）

Renate Wahsner, 1938, Einstein-Laboratorium Potsdam (Bewegung II)

雷纳特·瓦斯纳，1938，波茨坦爱因斯坦研究室（运动 II）

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inghamton, USA, und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 Paris (Bourgeoisie II)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30，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市，美国和巴黎人文科学之家（资产阶级 II）

Bernhard Walpen, 1959, Luzern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伯恩哈德·瓦尔彭，1959，琉森（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

Thomas Weber, 1954,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asis, Bedeutung, dialektisches Bild)

托马斯·韦伯，1954，柏林自由大学（基础、意义、辩证图像）

Karin Weingartz-Perschel, 1943, Volkshochschule Düsseldorf (Bewegung I)

卡琳·魏因加茨-佩舍尔，1943，杜塞尔多夫业余大学（运动 I）

Manfred Wekwerth, 1929, Berlin/O (dialektisches Theater)

曼弗雷德·韦克维尔特，1929，东柏林（辩证戏剧）

Bastiaan Wielenga, 1936, Tamilnadu Theological Seminary, Madurai, Indien (Dorfgemeinschaft)

巴斯蒂亚安·维伦加，1936，塔米尔纳杜神学院，马杜赖，印度（村落共同体）

Gunter Willing, 1953, Halle, MEGA-Redakteur,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isponible Zeit I, Distribution, Dualwirtschaft)

冈特·维林，1953，哈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部，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可自己支配的时间 I、分配、二元经济）

Erich Wulff, 1926, Medizinische Hochschule Hannover (Befriedigung, Demokratische Psychiatrie)

埃里希·武尔夫，1926，汉诺威医学应用技术大学，西柏林（满足、民主精神病学）

Gerhard Zimmer, 1943, Bundesinstitut für Berufsbildung, Berlin/W (Beruf)

格哈德·齐默，1943，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西柏林（职业）

德文版编写体例

标题。对于双重和多重标题，当它们形成互补的术语对子时，关键词用斜线（例如，*Analyse/Syntbese*）分开。当用逗号表示不同形式的表达时（例如，*Artikulation*，*Gliederung*），首字母 Ä、Ö 和 Ü 按字母顺序 A、O、U 处理。

对应外语。对于标题术语，对应外语将以六种语言给出：阿拉伯语（A——以拉丁字母录入），英语（E），法语（F），俄语（R——以拉丁字母录入），西班牙语（S），中文（C——拼音和汉字）。

缩写。标题关键词中的首字母不带点，在大写名词中（例如，A 代表 *Abbild*），在小写形容词中（例如，a 代表 *abstrakt*）。语法改变仅出现在复数形式中（例如，A. er 代表 Abbilder）。所有其他缩写均按照惯例使用或列在缩写列表中。

荣誉称号。作为词目名称的人名，当首次出现在思想概述中时将以大写出现。作者姓名只有当其被指定为该领域主题时才会使用大写。——所有其他重点均以**斜体**表示。

引号与括号。双引号 »...« 内为引文（希腊文除外），元语言或生疏表达用单引号 '...'。引文中作者的插入语用方括号 [ ] 表示，省略将用方括号加三个点标记 [...]。编辑的插入内容用尖括号 ⟨⟩ 表示。由引用作品的作者所补充的内容放在大括号 {} 中。

引用方式。通常情况下引用的文献和著作都会标识出来。分类整理中也将给出标识。除此之外，“美式的”引用方法同样适用：而在引文后，作者、出版年份和引用作品在括号中标出；如果紧随其后的参考文献涉及同一作者和 / 或同一作品，则不再重复作者的姓名和著作名称（如果适用）。若相同版本著作出现多次，同一著作用逗号分隔；在涉及不同卷的著作时用分号分隔，第一个数字表示卷的序号。更多信息可以在每个词目末尾的参考文献中找到。古典哲学著作将根据章节、段落等最大程度地

被引用，以便引用的段落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中找到。与参考文献不同的是，所有引用的标题（如“Bücher”）在文本部分均用斜体字表示。

参考文献。引用内容或其他标题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文章标题放于引号内，书名和期刊将以斜体字表示。

正字法。引用内容的拼写与标点符号将在所有情况下保留原样。较早作品将根据杜登字典正字法翻译，现代作者的作品，如果按原版或考证版本引用，采用“老式”拼写。若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将采用调整过的拼写法。若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引用的话，保留原文。

缩　　写

1. 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Benseler	《本泽勒希腊文—德文词典》（*G. E. Benselers Griechisch- Deutsches Wörterbuch*），A. 克吉（A. Kaegi）修订，1990 年莱比锡第 19 版
DMT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T. 博托莫尔（T. Bottomore）编，1983 年牛津版
EE	《欧洲哲学与科学百科全书》（*Europäische Enzyklopädie zu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H. -J. 桑德屈勒（H. -J. Sandkühler）编，1990 年汉堡版
Etymol WB	F. 普法伊费尔（W. Pfeiffer），《德语词源字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两卷本），1989 年东柏林版，柏林 1993 年第 2 版（西柏林对应版：F. 克卢格［F. Kluge］《德语语言词源字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西柏林 1989 第 23 版）
Georges	K. E. 乔治斯（K. E. Georges），《拉丁文德文详解小词典》（*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两卷本），1913 年汉诺威—莱比锡第 8 版
GG	《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7 卷本），O. 布伦纳（O. Brunner）、W. 康策（W. Conze）、R. 科泽勒克（R. Kosellek）编，1974—1992 年斯图加特版
HWPh	《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J. 里特尔（J. Ritter）、K. 格林德尔（K. Gründer）编，1971 年起在巴塞

	尔出版
Kl Pauly	《小保利古典学辞典》（*Der Kleine Pauly. Lexikon der Antike*），1964年斯图加特版
KWM	《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8卷本），G. 拉比卡（G. Labica）、G. 邦叙桑（G. Bensussan）编，1982年巴黎第1版，1985年第2版；德文译本（*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W. F. 豪格（W. F. Haug）编，1983—1989年柏林版
Lalande	A. 拉郎德（A. Lalande），《哲学术语与批判辞典》（*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1988年巴黎第16版
LS	《社会主义辞典》（*Lexikon des Sozialismus*），Th. 迈尔（Th. Meyer）等编，1986年科隆版
MiS	《马克思主义系统比较》（*Marxismus im Systemvergleich*），C. D. 克尼希（C. D. Kernig）编，1966年弗赖堡版（多次重印）
PhWb	《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两卷本），M. 布尔（M. Buhr）和G. 克劳斯（G. Klaus）编，1974年莱比锡增订第10版
RGG	《历史与现实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6卷本，附索引卷），1957—1965年图宾根版
WdL	N. I. 孔达科夫（N. I. Kondakow），《逻辑学字典》（*Wörterbuch der Logik*）1978年莱比锡版

2. 期刊

Argument	《观点。哲学与社会科学杂志》（*Das Argumen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1959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Blätter	《德国与国际政治报》（*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56年起在科隆出版
BzG	《工人运动史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1958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DZPh	《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53—1989年在东柏林出版；自1990年起在柏林出版，加了副标题“国际哲学研究月刊”（*Monatszeitschrift der internationalen philosophischen Forschung*）
FKP	《批判心理学论坛》（*Forum Kritische Psychologie*），K. 霍尔茨坎普（K. Holzkamp），1978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Grünberg-Archiv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卡尔·格律恩贝格（Carl Grünberg）编，1911—1930年莱比锡版
IWK	《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der Arbeiterbewegung*），1964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KZfSS	《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48年起在科隆出版
Leviathan	《利维坦—社会科学杂志》（*Leviathan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1973—1974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975年起在奥普拉登出版
NZ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Prokla	《阶级斗争问题。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杂志》（*Probleme des Klassenkampfs. Zeitschrift für politische Ökonomie und sozialistische Politik*），1971年起在柏林出版，1992年起在明斯特出版，副标题改为“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en*）
SoPo	《社会主义政治。批判的社会科学机关刊物》（*Sozialistsiche Politik. Organ kritischer Sozialwissenschaft*），1969—1978年在西柏林出版
spw	《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杂志》（*spw – 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1978—1989年在西柏林出版，1990年起在科隆出版
SuF	《意义与形式。文学论丛》（*Sinn und Form. Beiträge zur Literatur*），1949—1950年在波茨坦出版，1951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WB	《魏玛文丛。文学、美学与文化学杂志》（*Weimarer Beiträg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Ästhetik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1955—1991 年在魏玛—东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维也纳出版
ZfG	《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53—1991 年在东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柏林—海德堡出版
ZfS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2 年在莱比锡出版，1933—1938 年在巴黎出版，1939—1941 年在纽约出版

3. 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B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1852），MEW 8，第 111—207 页，MEGA I. 11，第 96—189 页
AD	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1878），MEW 20，第 5—303 页，MEGA I. 27，第 217—538 页
AMI	《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机器与工业的摘录笔记》（*Karl Marx, Exzerpte über Arbeitsteilung, 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历史考证版，R. 温克尔曼（R. Winkelmann）改写并编辑，198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Bauernkrieg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50），MEW 7，第 327—413 页，MEGA I. 10，第 367—443 页
Bürgerkrieg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1871），MEW 17，第 313—365 页，MEGA I. 22，第 179—226 页
DI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1845—1846 年，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MEGA¹]. Werke, Schriften, Briefe*），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委托 V. V. 阿多拉茨基

（V. V. Adoratskij）主编，第 5 卷，MEW 3，第 9—530 页

DI, Hiromatsu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I 卷第 1 篇新编辑版》（*Die deutsche Ideologie. 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Abschnittes I des Bandes I mit textkritischen Anmerkungen*），广松涉（W. Hiromatsu）编，1974 年东京版

DN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1873—1883，首次发表于 1925 年），MEW 20，第 305—620 页，MEGA I. 26

Einl 5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eitung« zu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7），*Gr*，第 3—31 页，MEW 42，第 15—45 页，以及 MEW 13，第 615—642 页，MEGA II. 1. 1，第 17—45 页

Elend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1847），MEW 4，第 63—182 页

Erfurt　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1891），MEW 22，第 225—240 页

Ethnol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Karl Marx: 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L. 克拉德（L. Krader）编，197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ormen　《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H. -P. 哈尔斯蒂克（H. -P. Harstick）编，197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otha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1875，首次发表于 1890/1891 年），MEW 19，第 11—32 页，MEGA I. 25，第 3—25 页

G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首次发表于 1939/1941 年），1953 年东柏林版，1983 年新版见 MEW 42，第 47—768 页，MEGA II. 1. 1—1. 2，第 49—747 页

HF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1845），MEW 2，第 3—22 页

Inauguraladresse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 3—13 页，MEGA I. 20，第 3—12 页（英文版），第 16—25 页（德文版）
Judenfrage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1844），MEW 1，第 347—377 页，MEGA I. 2，第 141—169 页
K I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 1 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1867 年第 1 版，1872 年第 2 版）
K II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第 2 册《资本的流通过程》，（*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F. 恩格斯编，（1885 年第 1 版，1893 年第 2 版）
K III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3 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ritter Band,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ß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F. 恩格斯编（1894）
KHR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1844），MEW 1，第 378—391 页，MEGA I. 2，第 170—183 页
KHS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1843，首次发表于 1927 年），MEW 1，第 203—333 页，MEGA I. 2，第 3—137 页
Klassenkämpfe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1850），MEW 7，第 9—107 页，MEGA I. 10，第 119—196 页（第 1—3 部分）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ag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1845），MEW 2，第 225—506 页
LF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1886），MEW 21，第 259—307 页

Lohn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Lohn, Preis und Profit*）（1865，首次发表于 1898 年），MEW 16，第 101—152 页，MEGA I. 20，第 141—186 页（英文版），MEGA II. 4. 1，第 383—432 页（德文版）

Lohnarbeit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1849），MEW 6，第 397—423 页

Manifest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1848）MEW 4，第 459—493 页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1975—1989 年东柏林—莫斯科版，1992 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国际马恩基金会编辑，柏林—阿姆斯特丹出版

ME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arx-Engels Werke*），第 1—42 卷，1957—1989 年东柏林版；第 43 卷，1990 年柏林版

Ms 44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首次发表于 1932 年，MEGA 第 I 版 I. 3），MEW 40，第 465—588 页，MEGA I. 2，第 187—438 页

Ms 61-6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e 1861-1863]），MEGA II. 3.，第 1—6 页

Ms 63-67 马克思：《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 - 1867），MEGA II. 4. 1 及 II. 4. 2

NRhZ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上的文章（1848/1849），MEW 5，第 11—457 页，MEW 6，第 5—519 页

Randglossen 马克思：《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79/1880），MEW 19，第 355—383 页

Res 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第 3 稿第 6 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5.

Das Kapital, 3. Entwurf, 6. Kapite: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ctionsprozesses«）（首次发表 1933 年），MEGA II. 4. 1，第 24—135 页

Statuten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Provisorische Statut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 14—16 页，MEGA I. 20，第 13—15 页（英文版），第 54—56 页（德文版）

Tech Exz 《卡尔·马克思技术史笔记》（*K.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历史考证版，H. -P. 穆勒（H. -P. Müller）改写并编辑，198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ThF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1845，首次发表于 1888 年），MEW 3，第 5—7 页

TM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1862/1863，由 K. 考茨基［K. Kautsky］编辑，首次发表于 1905 至 1910 年），MEW 26. 1，26. 2，26. 3，MEGA II. 3

Umrisse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1844），MEW 1，第 499—524 页，MEGA I. 3，第 467—494 页

Ursprung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1884），MEW 21，第25—173 页，MEGA I. 29

Urtext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片断》（Fragment des Urtextes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8），*Gr*，第 869—947 页，MEGA II. 2，第 17—94 页

Utopie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1880），MEW 19，第 177—228 页，MEGA I. 27，第 583—627 页

Vorw 5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ort«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7—11 页，MEGA II. 2，第 99—103 页

Zur Kriti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3—160 页，MEGA II. 2，第 95—245 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

Briefe　《书信》（*Briefe*），10 卷本，1967—1976 年东柏林版

Im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Der 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 des Kapitalismus*）（1917），LW 22，第 189—309 页

ImpHefte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Hefte zum Imperialismus），LW 39，（1915—1916）

KapR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ßland*）（1899），LW 3，第 7—629 页

LR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Der »linke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im Kommunismus*）（1920），LW 31，第 1—9 页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40 卷和两卷补遗，1953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ME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1909），LW 14，第 7—366 页

ökInh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r Volkstümlerrichtung und die Kritiken in dem Buch des Herrn Struve*）（1895），LW 1，第 339—528 页

PH　《哲学笔记》（Philosophische Hefte），LW 38

SR　《国家与革命》（*Staat und Revolution*）（1918），LW 25，第 393—507 页

Taktiken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Zwei Taktik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1905），LW 9，第 1—130 页

VF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as sind die »Volksfreunde« und wie kämpfen sie gegen die Sozialdemokraten?*）（1894），LW 1，第 119—338 页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Akku	《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913），GW 5，第 5—411 页
Briefe	《书信集》（*Gesammelte Briefe*），6 卷本，1982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 6 卷，1993 年柏林版
GW	《全集》（*Gesammelte Werke*），5 卷本，1970—1975 年东柏林版
Krise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1916），GW 4，第 49—164 页
Mass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1906），GW 2，第 70—91 页
SoR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1899），GW 1/1，第 365—466 页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B, Bochmann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笔记》（*Notizen zu Sprache und Kultur*），K. 博赫曼（K. Bochmann）编，1984 年莱比锡—魏玛版
Briefe	《狱中书简》（*Gefängnisbriefe*），4 卷本考证版，U. 阿皮奇（U. Apitzsch）、P. 卡默勒（P. Kammerer）、A. 纳托利（A. Natoli）和 M. P. 奎尔乔利（M. P. Quercioli）编，1994 年起在汉堡出版
CPC	《共产党的建设》（*Costruzione del Partito comunista*）（*1923—1926*），1971 年都灵版
Gef	《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基于 1975 年葛兰西研究所委托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所编版本的考证版全集，在 K. 博赫曼（K. Bochmann）和 W. F. 豪格（W. F. Haug）的学术指导下的德国葛兰西项目（Deutsches Gramsci Projekt）编，1991 年起在汉堡出版
INT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1949 年都灵版
K. Kebir	《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文学》（*Marxismus und Kultur. Ideologie, Alltag, Literatur*），萨比娜·凯比尔（Sabine

	Kebir）编译，1983 年汉堡版
LC	《狱中书简》（*Lettere dal carcere*），1965 年都灵版
LVN	《文学和民族生活》（*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1949 年都灵版
MACH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1949 年都灵版
MS	《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1949 年都灵版
ON	《新秩序》（*Ordine nuovo*）（*1919—1920*），1954 年都灵版
Opere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作集》（*Opere di Antonio Gramsci*），1947 年起在都灵出版
PP	《过去和现在》（*Passato e presente*），1949 年都灵版
Q	《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葛兰西研究所 4 卷本考证版，V. 杰拉塔纳（V. Gerratana）编，1975 年都灵版
Ri, Riechers	《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Chr. 里歇斯（Chr. Riechers）编译，196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F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新秩序》（*Socialismo e Fascismo. L'ordine nuovo*）（*1921—1926*），1971 年都灵版
SG	《青年时期著作集》（*Scritti giovanili*）（*1914—1918*），1958 年都灵版
SM	《防波堤下》（*Sotto la mole*）（*1916—1918*），1960 年都灵版
Südfrage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Alcuni temi della quistione meridionale«，德文译本：»Einige Gesichtspunkte der Frage des Südens«）（写于 1926 年，1930 年首次发表），载《共产党的建设》（CPC），第 137—158 页。E. 萨莱夫斯基（E. Salewski）译，载《安东尼奥·葛兰西——被遗忘的人文主义者？》（*Antonio Gramsci – vergessener Humanist?*），H. 诺伊贝特（H. Neubert）编，1991 年柏林版，第 41—68 页
Z 1980	《关于政治、历史和文化。文选》（*Zu Politik, Geschichte und Kultur. Ausgewählete Schriften*），G. 扎米什（G. Zamiš）编，1980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Z 1987	《对文化的思考》（*Gedanken zur Kultur*），G. 扎米什（G. Zamiš）

编，1987 年莱比锡版

其他出版物和著作标题

阿多诺（Th. W. Adorno）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20 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编，1973—198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阿尔都塞（L. Althusser）	*ISA*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1977 年汉堡版
	LLC, DKL	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8 年巴黎版。德文译本：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1972 年赖因贝克版
	PM, FM	《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 年巴黎版。德文译本：《保卫马克思》（*Für Marx*），196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	*Cat*	《范畴篇》（*Categoriae*）
	Ph	《物理学》（*Physica*）
	Oec	《经济学》（*Oeconomia*）
	EN	《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
	Int	《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
	Metaph	《形而上学》（*Metaphysica*）
	Po	《诗学》（*Poetica*）
	Pol	《政治学》（*Politica*）
	Rh	《修辞学》（*Rhetorica*）
鲍威尔（O. Bauer）	WA	《文集》（*Werkausgabe*），9 卷本，1975—1980 年维也纳版

本雅明（W. Benjamin）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7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和H. 施韦彭霍伊泽（H. Schweppenhäuser）编，1972—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伯恩施坦（E. Bernstein）	*Voraussetzungen*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1899年斯图加特版
布洛赫（E. Blo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20卷本，1969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布劳恩（V. Braun）	Texte	《按时间排序的文章》（*Texte in zeitlicher Folge*），10卷本，1989—1993年萨勒河畔哈雷—莱比锡版
布莱希特（B. Brecht）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20卷本，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A	《文集》（*Werke*），1989年起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出版，大开本
	AJ	《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1938—1955）
迪米特罗夫（G. Dimitroff）	AW	《选集》（*Ausgewählte Werke*），3卷本，M. 亚尔泽瓦（M. Jarzeva）总编，197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艾斯勒（H. Eisler）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民主德国柏林艺术大学委托S. 艾斯勒（S. Eisler）、M. 格拉布斯（M. Grabs）主编，系列三，1972年起在莱比锡出版
	Gespräche	《与汉斯·邦奇的对话。进一步了解布莱希特》（*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GW 7，1975年莱比锡版

费尔巴哈 （L. Feuerbach）	AS	《人类学唯物主义》（*Anthropologischer Materialismus*），《文选》（Ausgewäh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主编，196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19 卷本，W. 舒芬豪尔（W. Schuffenhauer）编，1967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 19 卷，1993 年在柏林出版
	W	《著作六卷本》（*Werke in sechs Bänden*），E. 蒂斯（E. Thies）编，1975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Wesen	《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
弗洛伊德 （S. Freud）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按时间排序，17 卷本，1946—1952 年伦敦版
	SA	《研究读本》（*Studienausgabe*），A. 米切利希（A. Mitscherlich）、A. 理查兹（A. Richards）和 J. 斯特雷奇（J. Strachey）编，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戈尔巴乔夫 （M. Gorbatschow）	AR	《演讲与文章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1988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黑格尔 （G. W. F. Hegel）	*Ästh*	《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1835 年第 1 版，1842 年第 2 版）
	Bassenge	《美学》（*Ästhetik*），两卷本，基于 1842 年 F. 巴森格（F. Bassenge）编辑版本的第 2 版，1955 年东柏林—魏玛版及以后各版
	Enz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17 年第 1 版，1830 年第 3 版）

	GeschPhil	《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19—1828，出版于 1833—1836 年）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Rheinisch-Westfäl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编，1968 年起在汉堡出版
	Logik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
	PhG	《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 年第 1 版，1831 年第 2 版）
	PhilGesch	《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1837 年第 1 版，1840 年第 2 版）
	RPh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1 年第 1 版，1833 年第 2 版）
	SW	《全集》（*Sämtliche Werke*）. G. 拉松（G. Lasson）编，1917 年起在汉堡出版；新考证版《全集》，J. 霍夫迈斯特（J. Hoffmeister）编，1955 年汉堡第 5 版
	W	《著作二十卷本》（*Werke in 20 Bänden*），在 1832—1845 年《文集》（*Werke*）的基础上重新编辑，E. 莫尔登豪尔（E. Moldenhauer）和 K. M. 米歇尔（K. M. Michel）编，197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和 G. 施密德–内尔（G. Schmid-Noerr）编，1985 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康德 （I. Kant）	*Anthrop*	《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 年第 1 版 = A，1800 年第 2 版 = B）
	KpV	《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KrV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 年第 1 版 = A，1787 年第 2 版 = B）
	KU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 年第 1 版 = A，1790 年第 2 版 = B）
	Prolegomena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
	WA	《著作集》（*Werkausgabe*），12 卷本，W. 魏舍德尔（W. Weischedel）编，1968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柯尔施 （K. Kors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受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汉诺威大学政治学研讨班的委托，M. 布克米勒（M. Buckmiller）编，1980 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拉布里奥拉 （A. Labriola）	*GkM*	《纪念〈共产党宣言〉》（*Zum Gedächtnis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1895），载于《唯物史观论丛》（*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C. 波佐利（C. Pozzoli）和 A. 阿斯凯里-奥斯特洛（A. Ascheri-Osterlow）编，1974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73—138 页
	ÜHM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准备工作》（*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 Präliminarien*）（1896），同上书，第 139—266 页

	SPh	《社会主义和哲学》（*Sozialismus und Philosophie*）（1898），同上书，第267—414页
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	GRS	《演讲与论文集》（*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德国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 Marxismus- 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编，1958年东柏林版
卢卡奇（G. Lukács）	W	《文集》（*Werke*），17卷本，1962年起在新维达—柏林出版
	GuK	《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年增订版）
	Zerstörung	《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1954）
毛泽东（Mao Zedong）	AW	《毛泽东选集》（*Ausgewählte Werke*）第1—5卷，1968—1978年北京版
	T	《毛泽东著述文稿与演讲谈话》（*Texte. Schriften, Dokumente, Reden und Gespräche*），H. 马丁（H. Martin）编，1979—1982年慕尼黑—维也纳版（汉—德对照本）
马尔库塞（H. Marcuse）	Schriften	《马尔库塞著作集》（*Schriften*），9卷本，1978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里亚特吉（J. C. Mariátegui）	*Sieben Versuche*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kkeit zu verstehen*）（1928），附K. 福赛尔（K. Füssel）写的“导言”和W. F. 豪格（W. F. Haug）写的“跋”，1986年西柏林—弗莱堡（瑞士）版
梅林（F. Mehring）	GS	《梅林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11卷本，1960年起东柏林出版，1971年东柏林第2版

尼采 （F. Nietzche）	KGA	《尼采著作集》（*Werke*），考证版全集，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972 年起在柏林出版
	KSA	《尼采全集》（*Sämtliche Werke*），考证研究版，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5 卷本，1980 年慕尼黑—西柏林版
柏拉图 （Plato）	*Cra*	《克拉底鲁篇》（*Cratylus*）
	Grg	《高尔吉亚篇》（*Gorgias*）
	Prt	《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
	R	《理想国》（*Respublica [Politeia]*）
	Smp	《会饮篇》（*Symposium*）
	Sph	《智者篇》（*Sophista*）
	Tht	《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Ti	《蒂迈欧篇》（*Timaeus*）
大卫·李嘉图 （D. Ricardo）	W	《大卫·李嘉图著作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rdo*），11 卷本，P. 斯拉法（P. Sraffa）和 M. 多勃（Dobb）编，1951 年起在剑桥出版
	Grundsätze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der Besteuerung*）（1817），P. 塔尔（P. Thal）编，1979 年东柏林版
亚当·斯密 （A. Smith）	*Reichtum*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Wesen und die Ursachen des Reichtums der Nationen*）（1776），3 卷本，P. 塔尔（P. Thal）编，1976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斯大林 （J. Stalin）	W	《斯大林全集》（*Werke*），13 卷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译，1950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1947 年起在莫斯科出版俄文版）

	AW	《斯大林选集》（*Ausgewählte Werke in zweri Bänden*），两卷本，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派编，1979年多特蒙德版
	FL	《列宁主义问题》（*Fragen des Leninismus*）（1938），1947年莫斯科第11版
	ÖkP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1952年柏林版第1版，多次再版
	Sprachw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Der Marxismus und die Frag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1951年柏林第1版，多次再版
	DHMat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Geschichte der KPdSU[B]*），1938年莫斯科版；又载于 *FL*
托洛茨基（L. D. Trotzk）	GW	《托洛茨基文集》（*Gesammelte Werke*），两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riften	《托洛茨基著作集》（*Schriften*），两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88年和1990年汉堡版
马克斯·韦伯（M. Weber）	GA	《马克斯·韦伯全集》（*Gesamtausgabe*），受巴伐利亚科学院社会经济史委员会委托由H. 拜耳（H. Baier）、M. R. 勒普修斯（M. R. Lepsius）、W. J. 蒙森（W. J. Mommsen）、W. 施鲁赫特（W. Schluchter）、J. 温克尔曼（J. Winkelmann）编，1986年起在图宾根出版
	WuG	《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纲要》（*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1921），J. 温克尔曼（J. Winikelmann）编，第5版修订版，1976年图宾根版

4. 常用缩写

AdW	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GW	社会科学院（Akademie d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O	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oin）
AS	《观点》特辑（Argument Sonderband）
Benseler	字典索引
Br	书信集、通信集（Briefe）
BR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西德（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SP	国民生产总值（Bruttosozialprodukt）
CCCS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Birmingham］）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CERM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巴黎）（Center d' 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Paris］）
CGT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NT	全国总工会（Confederación de Los Trabajadores）
DC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
D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GB	德国工会联合会（Deu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iaMat	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KP	德国共产党（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MT	字典索引
EE	字典索引
EKKI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ite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AZ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
FDGB	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Frei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FDP	自由民主党、自民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GA	全集（Gesamtausgabe）
Gef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基于 1975 年葛兰西研究所委托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所编版本的考证版全集，在 K. 博赫曼（K. Bochmann）和 W. F. 豪格（W. F. Haug）的学术指导下的德国葛兰西项目（Deutsches Gramsci Projekt）编，1991 年起在汉堡出版
GG	字典索引
GS	文集、著作集、著述集（Gesammelte Schriften）
GULag	古拉格（苏联劳动改造集中营管理总局）（Glawnoje Uprawleenije Lagerej［Hauptverwaltung des Straflagersystems der UdSSR］）
GW	文集、著作集（Gesammtelte Werke）
Hg.	编者（Herausgeber）
Hgg.	编、编辑、编纂、编写（herausgegeben）
HWPh	字典索引
IAA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iation）
IfS	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GB	工会国际（Internationaler Gewerkschaftsbund）
IISG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Amsterdam］）
IMSF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Frankfurt/M］）
Jh	世纪（Jahrhundert）
KGA	考证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I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l Pauly	字典索引
Kominform	各国共产党情报局（Kommunistisches Informationsbüro）
Komintern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P	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KPCh	中国共产党、中共（KP Chinas）
KPD	德国共产党、德共（KP Deutschlands）
KPD (O), KPO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德共（反对派）（KP Deutschlands［Opposition］）
KPdSU	苏联共产党、苏共（KP der Sowjetunion）
KPF	法国共产党、法共（KP Frankreichs）
KPI	意大利共产党（KP Italiens）
KPR (B)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俄共（布）（KP Rußlands［Bolschewiki］）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 Ökonomie）
KSA	考证研究版（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KSZ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KWM	字典索引
KZ	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Lalande	字典索引
LS	字典索引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40 卷和两卷补遗，1953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1975—1989 年东柏林—莫斯科版，1992 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国际马恩基金会编辑，柏林—阿姆斯特丹出版
MEW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第 1—42 卷，1957—1989 年东柏林版；第 43 卷，1990 年柏林版
MiS	字典索引
ML	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Marxismus-Leninismus）
ND	《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
NÖP	新经济政策（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S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
PDS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hWb	字典索引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RGG	字典索引
RGI	红色工会国际（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SAP (D)	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
SBZ	苏联占领区、苏占区（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SDAPÖ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
SDAPR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Rußlands）
SDS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I	社会党国际（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U	苏联（Sowjetunion）
SW	选集、文选、著作选（Sämtliche Werke）
UN (O)	联合国（组织）（United Nations［Organisation］）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USPD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民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W	著作集、文集、文选、全集（Werke）
WA	著作集、文集（Werkeausgabe）
Z	期刊、杂志（Zeitschrift）
ZK	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5. 译者姓名首字母

BK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Barbara Ketelhut）
DB	丹尼尔·巴邦（Daniel Barben）
GW	冈特·维林（Gunter Willing）
MH	迈克尔·豪普特（Michael Haupt）
NB	娜娜·巴登贝格（Nana Badenberg）
RM	赖因哈德·马克纳（Reinhard Markner）
TL	托马斯·劳格施廷（Thomas Laugstien）
UB	乌尔里希·布卢门巴赫（Ulrich Blumenbach）
WFH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第一卷、第二卷名词索引

Abalkin I: 385 388 / II: 32f

Abbé de Saint Pierre I: 38

Abdel-Malek I: 400 / II: 274

Abel II: 96 114

Abendroth I: 21-9 126 329 337
441 763 / II: 289f 334 545f
550 612 844 847

Abramovich II: 422

Abusch II: 648 650

Ad-Dīn I: 401

Adams I: 211

Adamson II: 250 252

Adelung I: 144

Adenauer II: 170

Adler, A. I: 282

Adler, M. I: 462 479 756ff
760f 763 / II: 389 392 422f
428 540f 545 550 612 844

Adler, V. II: 414

Adler-Karlsson II: 563 567

Adorno I: 15 16 19f 147 149
196 232 279 286-9 291f 297
308f 322 363 374ff 421 645
648 650f 669 676 679ff 707
727 729 746 748 778f 785
799 / II: 123 126 140 159f
185ff 225 227 230 239 243ff
343 352-6 391f 464 648 650
671 690f 707 709 869 874
877 879-92

Afanas'ef, W. G. I: 103

Afanasjew, J. I: 388 648
II: 362

Afashijew I: 651

ʿAflaq I: 398

Aganbegjan II: 133

Agartz I: 24

Aglietta I: 186 462

Aguilar I: 613

Ahlberg I: 462 / II: 420 428

Ahmad I: 400

Ahrbeck H: 750 753

ʿAisa I: 400

Aitmatow I: 388 / II: 75

Ajdukiewicz II: 524 527

Al-Afghānī I: 396

Al-Arzūzī I: 398

Al-Assad I: 398

Al-Barāwī I: 393

Al-Bitār I: 398

Al-Bustānī, B. I: 396

Al-Bustānī, S. I: 395

Al-ʿAzm I: 400

Al-Gābirī I: 400

Al-Inānī I: 396

Al-Madanī I: 397

Al-Mansūrī I: 396 400

Alavi II: 80 82

Albers I: 760 763 807 / II: 188
221 224 567 612 623 843ff
847

Aleksejew II: 700

Alexander II. I: 386

Alexander, R. II: 509

Alexander, R. J. II: 334

Alheit I: 157 161

Alicata II: 524

Altuusser I: 34 42 47 50 55
126 184-90 200 230 232
237 247f 251 254f 257f
261f 267 270 305 312 341
353 377-80 382ff 516f 619

621-4 627 703 707 715 717
748 753 797ff / II: 41 46ff
97 140 142f 159f 192 212
224 248 251 352 356 388
436 448 531 594 634f 639f
663 675 680 702f 728-31
734f 738ff 747 758 760f
821
Altmann II: 849 854
Altvater I: 50 208f 544 613
II: 188
Amado II: 850 854
Ambarzumow I: 647f
Ambrogio II: 523 527
Amendt I: 322 325
Amengual I: 261
Amin I: 30 32 71 75 349 400
II: 274 601f 604 839f
An-Nāsir I: 401
An-Numairī I: 398
Anaxagoras I: 291
Anders I: 49 287ff / II: 48 95
114 347 353 356
Anderson I: 188 191 805 807
II: 380 388 390 393 679 691
Andresen II: 154
Angehrn II: 533
Angst I: 69
Anikin I: 102
Annenkow II: 32
Antal II: 243f
Antūn I: 396
Antunes II: 623
Anz II: 769
Anzinger I: 592
Apel I: 9 / II: 115 142f
Apitz I: 335
Apitzsch I: 779
Ar-Rihānī I: 396
Aragon II: 705 714
Arato II: 380 393
Ardiles II: 140
Arendt I: 590 747f 785 799
II: 252
Arens I:190
Arensberg I: 320
ʿArif I: 398
Aristoteles I: 7f 127 223 291
313 365 402 410 566 574
721 765 / II: 52 150 200 214
439 515 518 589 625 659
667 730 748 771 859
Armand II: 819
Armanski II: 93f
Arnason II: 48
Arndt I: 140f
Arroyo II: 491
Arthur I: 90f
Arwatow I: 651 669 / II: 50 63
242
As-Saʿid I: 399
Assmann II: 140
At-Tahtāwī I: 394
Aubenque I: 51 55
von Auer I: 592
Auerbach I: 164 167
Aufhäuser I: 276
Augustinus II: 52 880
Austin I: 90f
ʿAuwad I: 400
Aveling II: 436f
Avineri I: 786f 790 799
Axelrod I: 434
Baacke II: 62f
Baade I: 81f
von Baader I: 462
Babeuf I: 396 / II: 276
Bach II: 125
Bachelard I: 185f / II: 730
Bachofen I: 316 320
Bachtin II: 112f 858f 873
Bäcker I: 597 600
Backhaus I: 62f 267 270
Bacon I: 227 292 410 / II: 193
348 660
Badaloni II: 524
Bader I: 201
Badiou I: 187

Badoglio I: 332
Badot I: 185
Baethge I: 162 278
Bagehot II: 318 329
Bahr I: 359
Bahrdt I: 276 278
Bahro I: 388 578 581 635f 638
II: 427f 566f 809 851 854
Baierl II: 338
Bailey II: 101
Bakhīt I: 395
Bakke I: 521f 524
Bakunin I: 211-2 215 322 430
681 786ff 796 799 / II: 206
211 457 570 793
Balázs II: 243
Balibar, E. I: 47 50 55 186-91
270 308f 321 325 516 621ff
627 648 798f / II: 47f 436
675 686f 691 747
Balibar, R. I: 185
Bali I: 203f
Balzac I: 777 / II: 646
Balzer II: 500
Bambey I: 261
Banerjee II: 827 829
Bangert II: 374
Bannister II: 509
Barabasch I: 651 672
Baran I: 208f / II: 184 188
601f 605 839
Baranskaja II: 769
Baratta, A. II: 402 405
Baratta, G. I: 195
Barck I: 667 669 / II: 356
Barlach II: 338
Barone II: 133
Barrot II: 443
Bartel II: 378f
Bartels II: 691
Barth, H. I: 20 470 472
Barth, K. I: 342 / II: 496-500
Barth, P. I: 228 763
Barthes I: 605 607 / II: 392f
737 742
Bartoli II: 111
von Barton I: 443 462
Bartra I: 168 176
Basaglia I: 355f / II: 551-4
Bassenge II: 451
Bassin II: 122 126
Basso II: 289 405
Bastiat I: 640 648
Batkin I: 385 388
Batscha II: 393
Battisti I: 606f
Baudis I: 732
von Baudissin I: 40
Baudrillard I: 675
Bauer, A. I: 230 / II: 48
Bauer, B. I: 357f 361 682 708
721 / II: 517 732
Bauer, F. 597 600
Bauer, O. I: 46 50 195 275f
278 330 339 539 541 756
758-61 763 792 794 / II: 91
218 221 224 262 266 298
391 407 420 422ff 427 502
504 513 541 558f 610ff 672
723 727 843ff 847
Baum I: 669
Bauman I: 747f
Baumgarten I: 649
Baur II: 464
Baxandall II: 244
Bayle I: 389
Baynes I: 717
de Beauvoir I: 285
Bebel I: 359 363 395 432 473
481 491 / II: 452 455 492
510f
Bebler I: 41
Becher, J. I: 270 / II: 787
Becher, J. R. I: 296 651
II: 718
Bechtle I: 552 / II: 849 854
Beck II: 161 163 166
Beckenbach I: 276 278
Becker, C. -H. I: 400
Becker, J. II: 281f

Becker-Schmidt I: 580f
II: 811
Beckett II: 185
Beckford I: 91
Beer, M. II: 470
Beer, O. II: 873
Beer, U. I: 580f / II: 811
Behrens, D. I: 63
Behrens, F. I: 69lf
Beiner I: 799
Belinski I: 684
Belting II: 245
Beltschikow I: 672 / II: 65
Benedetti I: 201
Benevolo I: 607
Benhabib I: 259 261
Benjamin, J. I: 259 261
Benjamin, W. I: 277f 371f 603
607 651 669 675f 679ff 706
749 754 756 777f / II: 238f
242 244f 336 340f 353 355f
636 640 671 691 704-9 712ff
Bennholdt-Thomsen I: 103
II: 840 843 853 855
Benningsen II: 274
Benseler II: 452
Bensussan I: 55 375 517 519
Bentham I: 38 / II: 23 320 861
Benton I: 188 191
Benveniste II: 735 738 742f
Benz I: 279 289
Béranger II: 646
Berdjajew I: 684
Berg II: 880
Berger, C. I: 334 337
Berger, U. I: 278
Berghaus II: 339
Bergmann, H. II: 693
Bergmann, J. II: 563 567
Bergmann, Th. I: 81f 88 337
400 / II: 82 278 282 334 474
514 727 854
Bergmann, U. I: 325f
Berkman I: 210
Berlau II: 336
Berle I: 118f / II: 315 329
Berlinguer II: 578f, 844
Bernard II: 626
Bernasconi II: 867
Bernbach II: 547 550 727
Bernecker I: 220
Bernier I: 628
Bernstein, B. II: 251f
Bernstein, E. I: 44 50 113 119
207 274f 363 432 441 462
500 612 644 648 752 757f
761 763 / II: 40 158f 199
201 377 434 534ff 550 637
669 805 809
Bernstein, E. J. II: 114
Berque II: 274
Berthold, J. I: 190f
Berthold, W. II: 650
Bertolazzi II: 356
Besenbruch I: 651 669 / II: 60
63
Besson II: 337f
Bethe II: 436 451
Bethge II: 171
Bettelheim II: 428 486 601
605 768f 783 786 833f
Betto I: 685f / II: 503f
Beutter II: 772 786
Beveridge I: 520 524
von Beyme I: 650 669 / II: 562
567
Bhaskar I: 695 703 707
II: 629 691
Bidet I: 418 420 647f
Bierbaum I: 552
Biermann I: 339
Bimberg I: 652
Bin-Billā I: 398
Binas II: 58 63
Binswanger I: 354
Björlin I: 82
Birkmeyer II: 872f
Bischoff I: 190 419 690 692f
II: 567 777 784 786 847
von Bismarck II: 285ff 376 454

Blackbourn II: 378f 649 651
Blanc I: 396 / II: 456
Blanqui I: 430 735 / II: 720
Blaug II: 775 786
Bleiber II: 378f
Bleicher I: 23
Bloch, E. I: 20 181 277f 285f 289 294f 297 330 333 337 372ff 375f 601 603 607 650f 676 679ff 684 686 731 II: 66f 75 82 121 126 139 186 188 243ff 337 340 352-6 377 379 404 493f 502 504 532f 544 546 550 582 588 648 651 671 680 688 699 703 706f 865
Bloch, J. I: 665f / II: 628
Bloch, J. R. I: 731
Bloch, K. I: 376
Blohm II: 568
Blois I: 189
Blomeyer I: 606f
Blonskij I: 508 510 512
Blos I: 789 / II: 457
Blum, O. I: 762
Blum, R. I: 388
Blumhardt II: 498f 502
Blunt II: 244
Bluntschli II: 374
Bobbio II: 380 390 393 405f 428 523
Bobrowski I: 335
Boccara I: 201 690 692
Bochenski II: 701 703
Bock I: 220
Böckelmann I: 325 651
Boehmer I: 651 669
Boehncke I: 669
Boeke II: 848 854
Boese II: 780 786
Boethius I: 51
Bogdal II: 729 742
Bogdanow II: 242 427f 782 786
Bogomolow II: 129 677f 685 691
Böhlke I: 582 / II: 656
Böhm-Bawerk I: 61 63 II: 780f 786
Bohn II: 239
Böhringer I: 807
Bohte II: 278
Böke I: 190f / II: 640
Bolivar Echeverria I: 55
Bolle I: 544
Bolte I: 682
Bolten I: 779
Bolz, A. I: 512
Bolz, N. I: 667ff / II: 52 63 714
Bolze I: 468
Bonaparte siehe Napoleon
Bongartz II: 171
Booth II: 603 605
Borew I: 651 669
Boris I: 27 29 / II: 839
Borkenau II: 218
Born II: 21
von Bortkiewicz I: 691
von Borzeszkowski II: 194 199f
Bosch, A. I: 599f
Bosch, G. I: 597 600
Bosković I: 50 / II: 654
Botman I: 400
Boudin I: 113 119 756
Bouglé II: 394
Boumedienne I: 398
Bourdieu I: 188 277f 717 II: 251f 737 742
Bourne I: 69
Bowler II: 509
Bowles II: 251f
Bowring II: 616
Bozeman II: 274
Brakemeier I: 27
Brag II: 775
Brakelmann I: 686
Brandler I: 22 26 329 / II: 280 282 331

Brandt, G. I: 552 771 773
Brandt, P. I: 337f / II: 379 400 597 599
Brandt, R. II: 225
Brandt, W. II: 170 367 563 567 869 873
Brasch II: 649
Brater II: 161 163 166
Braudel I: 148f
Braun, E. II: 380 393
Braun, K.H. II: 599
Braun, V. I: 304 309 570 574 578 769 773 / II: 223 225 446 872f
Braunthal, A. II: 19 21
Braunthal, J. I: 441 762 II: 567
Braverman I: 501 541 544 550ff 561-4 771 773
Bréal II: 96 111
Brecht I: 20 48 152 155 254 296 304 333 335 339ff 353 375 385 391 604-7 651 664 669 675f 680f 704 715f 732 749 754f 778 / II: 110 119 137 145 185 187 223 244 290 334-58 443 515 519 521 630f 636 639f 648 657 671 674 681ff 687 691 704 707f 715-9 800ff 855 868ff 875-88 880f
Bredekamp I: 779
Bredel I: 777
von Bredow II: 380 393
Breker I: 728
Brenner, O. I: 23
Brenner, R. I: 202 204
Brentano I: 500f / II: 29
Brentel I: 63f
Brentjes I: 400
Breschnew I: 386 / II: 73 128 578 784
Breton II: 704ff 714
Brie I: 127 141 247f 388 582 643 647f / II: 656
Briefs I: 501
Bright II: 467
Brik II: 242
Brinkmann I: 55 268 270
Brockhaus I: 652
Brockmeier II: 60 63
de Broglie II: 629
Bromley II: 330
Brosdorf I: 337
Brosius I: 577 581
Broszat I: 333 337
Broz-Tito I: 487 / II: 269
Bruckmeier II: 371
Brückner II: 66
Brüggemann II: 356
Brüggen II: 263 266
Brüning I: 329 / II: 558
de Brunhoff I: 186 / II: de 10 21 27
Brunner II: 144
Brus II: 427f
Bruschlinski II: 585 588
Buber I: 210
Bucharin I: 4 80 82 100 102 116 119 214f 293ff 297 349 387 391 509 512 762 / II: 21 42 44f 49 73 92 94 111 299 301 358-63 419 422 427f 519 593 599 638 683 701 781 849
Bücher II: 243
Büchner II: 507
Buci-Glucksmann I: 185f 195 717 780 783f 805 807 / II: 567 843 845ff
Buck-Morss II: 714
Buckmiller II: 341 356
Buckwitz II: 339
Budilowa II: 583 588
Buess II: 502
Buhl II: 503f
Buhle II: 260
Buhr I: 15f 20 233 / II: 694 703
Buk II: 550
Bulgakow I: 684

Bull II: 274
Bunge, H. II: 356
Bunge, M. II: 691 874
Bunzl I: 360 363
Burawoy I: 412 420 542 544 550 552 554 557 559 563f
Burbach I: 90f
Büren I: 400
Buret I: 443 452 462
Bürger, Ch. I: 651
Bürger, P. I: 651 669
Burlackij II: 129 133
Burmeister II: 356
Burns I: 557
Burow I: 651 669
Burrichter, C. II: 691
Burrichter, R. O. II: 691
Busch II: 336 718
Butenko I: 384 386 388 II: 129ff 133 363
Butterwegge I: 764
Buttigieg I: 296f
Byron II: 646

Cabet II: 802
Cabral II: 259f
Cafiero I: 211
Cakunov II: 782 786
Callinicos I: 187 191
Campanella I: 721
Campbell, B. II: 824f
Campbell, G. I: 628
Campe I: 502
Camus I: 287 289
Canard II: 302 309f 329
Canguilhem I: 186 225f 232 II: 730
Cantimori II: 437
Cap II: 847
Carchedi I: 562 564 / II: 92 94
Cardoso II: 601 605
Carducci II: 192
Carey I: 299 640
Carling I: 204
Carlyle II: 315 870
Carmichael II: 260
Carmona I: 613
Carow I: 335
Carrillo I: 806f / II: 807 809
Cartelier I: 201
Carter, A. I: 215
Carter, R. I: 563 565
Cartwright II: 466
Casagrande I: 355
Casalla II: 140
Cäsar II: 283 287
Cassano II: 524f 527
Cassirer II: 200 212 225 228 239 591 594
Castel I: 148f
Castillo, F. II: 491 502-4
Castillo, V. M. I: 176
Castles I: 462
Castoriadis II: 235ff 239
Castro I: 685 / II: 271 289 452 463 503 604f 838f
Catone I: 195
Caudwell I: 651 / II: 244
Cavaillès II: 730
Ceausescu II: 464
Cerroni II: 523 526f
Cerutti-Guldberg II: 140 143
Césaire II: 260
Chaplin I: 155
Charlot I: 604 607
Chavée II: 105
Chen Boda I: 79
Chen Yi II: 478
Chen Yun II: 478
Cherbuliez I: 240
Chesneaux I: 176
Chevènement II: 847
Chiarini II: 719
Childe II: 244
Christensen II: 810
Christian I: 512
Chruschtschow I: 39 100 II: 73 128 270 359 526 575 578f 829

Cicero II: 382 436
Claas II: 356ff
Clarke I: 157 162
Claudin II: 280 282
Claussen I: 323 325 357 363 748/II: 303 309
Clemens Alexandrinus I: 722
Clemens I: 41
Clutton-Brock I: 69
Cobden II: 467
Cochran I: 493
Cockburn I: 556 559 577 581
Cocteau II: 707
Cohen, G. A. I: 202f 204
Cohen, H. I: 758
Cohen, J. II: 380 393 549f
Cohen, M. I: 204
Cohen, S. F. II: 362f
Cohn-Bendit, D. I: 324f 797 799
Cohn-Bendit, G. I: 324f 797 799
Colletti I: 298 305 309 695f 704 707 / II: 523f 527 639f 666 691
Collins I: 90f
Comenius I: 502
Commoner II: 623
Commons I: 500
Comte I: 227 232 / II: 626
Conein II: 742
Conert II: 623 656
Conrad I: 579 581
Conradi II: 278
Considérant I: 402 421 639 648
Constant II: 283 289
Constantine I: 525
Conze II: 451 555 567
Cooper I: 354-6 / II: 551
Coote II: 824f
Coquery-Vidrovitch I: 75
Corallo II: 218 225
Cordova II: 840
Cornelissen I: 211 216
Corpet I: 489
Coseriu II: 736 758 764
Cotten I: 233 248
Coward II: 737 740 742
Cremer, F. I: 335
Cremer, J. I: 651
Croatto II: 140
Croce I: 19f 231f 343 476 619 627 705 707 / II: 44 46 48 112 390 522f 683ff 712 862 873
Cromwell II: 283 373
Croner I: 276 278
Crozier I: 552 558f
Crucé I: 38
Crüger I: 232 / II: 48
Culpeper I: 608
Cunow I: 683 686 762 II: 389 393
Cutler, A. I: 562 565 / II: 300f
Cutler, C. I: 651 669 / II: 62f
Cwienk II: 605

D`Encausse II: 487
D'Amico I: 186
Dadà I: 216
Daheim II: 161 163 166
Dahlhaus I: 666 669
Dähne I: 27 29
Dahrendorf I: 414 418f 421 590 592 / II: 186 188 380 393 447 451 649 651
Dalla Costa I: 579 581 II: 754ff
Damaschke II: 277f
Dammann II: 94
Dan I: 434 / II: 422 513 580
Daniel I: 263 270
Daniels II: 654 656
Danton II: 387
Darlington II: 509
Darwin I: 220 222 311 315 317 703 730 / II: 254f 505 507 509

Dašić II: 654
Däubler I: 598 600
David I: 82
Davids II: 260
Davis, J. H. I: 88f 91
Davis, M. I: 195
Deborin I: 391 762 / II: 49 363
Debray I: 805 807 / II: 80
Dedekind I: 17 20
Dege I: 216
Deichgräber II: 452 464
Deleuze II: 758f 761f 764
Della Volpe I: 201 627 651
695f 703f 707 717 / II: 522
527
Dellheim II: 853f
Demeter I: 765
Demirović I: 191 623 627 781
784 / II: 49 114f 528 533
543 550 747
Demokrit I: 10 290 / II: 230f
625
Deng Xiaoping II: 475 478f
830 834
Denis I: 201
Deppe I: 27 29 441 735
II: 546 548 550
Derrida I: 184 187 189 191
II: 634 640 730 740ff 762
764
Descartes I: 236 767 / II: 112
214 515 580 583 586 588
673 728 730 870
Desmoulins II: 387
Dessau II: 337
Detje II: 784 786
Deutsch, H. I: 275 278
Deutsch, K. W. II: 871 873
Deutscher I: 362f 495 746 748
II: 204 211 289 358 363
Deutschmann I: 597 600
Dézamy II: 117 126 802
Dickens II: 326
Diderot II: 309 439 442 446
646
Diebold I: 768
Diehl I: 81f / II: 277f 775
Diels II: 230
Diemer II: 214 225
Dietrich, B. I: 29 337
Dietrich, G. II: 754 756 842f
Dietrich, H. II: 605
Dietrich, K. II: 810f
Dietzgen II: 381 393 694 696f
703
van Dijk II: 735 742
Diligenski II: 123 126
Dilke II: 750
van Dillen II: 3 21
Dilthey I: 748 / II: 243
Dimitroff I: 331 337f / II: 471
474
Dirks II: 496f 500f
Disraeli I: 468
Djilas I: 426 428
Dlubek II: 786
Dobb I: 62 64 199 201 451
462 / II: 773 783 786
Dobias I: 201
Döbler II: 122 126
Doeringer I: 542 544
Döhl I: 599f
Dollfuß II: 391
Dölling, I. II: 123f 126 811
Dölling, J. II: 522
Doormann II: 824f
Dörner I: 727 729 / II: 554
Dorner I: 88
Dorpalen II: 651
Dörr I: 554 559
Dörrie II: 464
Dorval II: 439
Dos Santos II: 601 605
Dostojewski I: 386
Dowe II: 393 561f 567
Downton II: 463f
Daniels II: 654 656
Draper II: 421 429 827 829
Drechsler I: 27 29 / II: 567
Dreßen I: 325, 353

Dreyfus II: 285
Dreyfuss I: 277f
Droz I: 441 / II: 470 567
Dubček II: 578
Dubiel II: 380 393 549f
Dubislav II: 515 522
DuBois II: 258 260
Dubrovskij I: 634 638
Duby II: 310 329
Duchamps II: 56
Ducpétiaux I: 462
Ducrot I: 185
Dudow II: 335
Dühring I: 12f 356 379 459 576 / II: 507 519 667 812
van Dülmen I: 149
Duncker II: 43
Dunde II: 501
Dunlop I: 501
Dunn I: 400
Dupuy II: 374
Durkheim I: 567 574 581 II: 322 329 736 796 798ff
Dussel I: 685f / II: 140-4
Dutschke I: 322-5 638 732 796f 799 / II: 66 354 450
Duve I: 553

Eagleton II: 433 435
Ebeling I: 376
Eberle I: 63 201
Ebertz II: 462 464
Eckart I: 591f
Eckert II: 499
Eco II: 97 99f 112 114f 742
Edelman I: 187
Edwards, E. I: 604 607
Edwards, R. C. I: 542-4 550 552 562 565
Egbert II: 244
Ehmke II: 170
Ehrenpfordt II: 852 854
Ehrlich I: 211 216
Eibl-Eibesfeldt I: 69
Eichhorn, W. II: 677 691 700 703
Eichhorn, W. P. II: 393
Eichler II: 561 567
Einemann I: 553
Einstein II: 125
Eisenstein, S. I: 651
Eisenstein, Z. II: 825
Eisler I: 333 335 340f 480 651 669 676 681 754 / II: 335f 338 353 356 648 691 865 868 873-92
El Lissitzky I: 602 607 / II: 50 64
El-Sa'id I: 400
Eley II: 378f 649 651
Elfferding I: 342 627 / II: 366 599 742
Eiger I: 562 565
Elias I: 149
Elleinstein II: 612 820f
Ellerbrock II: 97 115
Elliott I: 185 188 190f
Ellis, J. II: 737 740 742
Ellis, W. I: 443 462
Elsner I: 652
Elson I: 62 64
Elster I: 202-5 740 742
Emmanuel I: 349 740 742 II: 602 605
Endemann II: 583 588
Endruweit I: 501 553
Enfantin II: 4 21
Engel II: 337
Engelberg II: 48f
Engels II: 123 126
Engler II: 350 356
Enzensberger I: 651 / II: 62f 623f
Epiktet II: 438 591
Epikur I: 9f 127 290 364 722 II: 230f 859
Erasmus von Rotterdam I: 38 II: 857
Erckenbrecht II: 97 115

Erdös II: 27
Erhard II: 265
Ermanski I: 552
Ernst II: 707
Ernst-Poerksen I: 183
Eschbach II: 114f
Espartero II: 458
Eßbach I: 162
Esser I: 495
Establet I: 185 187
Euchner I: 82 693 / II: 784 786f
Euripides II: 228
Evechild I: 211
Evers II: 605 839
Ewald II: 500f

Fabiunke II: 783 787
Fahmī I: 396
Fahrenbach II: 110 115 340 342 355f
Fainsod II: 654 656
Faletto II: 601 605
Falin II: 210f
Fanon I: 805 807 / II: 80 274 317 329
Farbstein I: 651 669
Farner I: 685f / II: 502 504 771 786
Farr I: 203f
Faye I: 185
Feder I: 90f
Federn I: 282 289
Fedoseev II: 567
Feher II: 846f
Feist I: 652 657
Feldmann II: 302 309
Fellmeth II: 773 786
Fenner II: 567
Ferguson I: 403 / II: 245 383 393
Ferner I: 502
Fetjä II: 567
Fetscher I: 199 201 261 363 II: 363 374 427 429 448 451 567 624 781 786 845 847
Feuchtwanger II: 868
Feuerbach I: 51 233 235f 248 253ff 290ff 297 365 649 677 684 697 708 711 713 / II: 29 39 105 117 120 126 216 219 231 385 393 491 581 584 632 662ff 670 701 731f
Fichte I: 250 252 256 506 693f 721 / II: 234 590 643 696
Fichter I: 325
Fiebach I: 652
Fiedler I: 245 248
Fineman I: 525
Fischer, E. I: 650f / II: 126 244 648
Fischer, R. II: 280
Fischer, W. I: 401
Fischer-Lichte II: 115
Flanders I: 498 501f
Flaubert II: 310 874
Flechtheim I: 375f 427f 441 799 / II: 282 310 435 533 564-7
Fleischer II: 37 48 629 700 703
Flieger I: 588 592
Flierl, B. I: 605 652
Flierl, Th. II: 57 59 63
Floerke II: 464
Flourens II: 861
Flusser II: 226 239
Flynn I: 90f
Fogarasi, A. I: 425f 428
Fogarasi, B. I:136 141 762 764
Fohrmann II: 738 742
Folbre I: 74lf
Fontius I: 669 779
Fornari II: 140
Fornet-Betancourt II: 138 142f
Forster II: 310 323 329
Foucault I: 49 354 356 566 581 626f 729 / II: 251f 551 553f 728ff 733 737f 742-7

757-60 762ff 798 801
Fourier I: 42 110 119 396 402
421 430 547 570 576 602
639 677 / II: 117f 124 161
750 753 774 786
Fowkes II: 436
Fraenkel II: 550
Franco I: 332 / II: 289
Frank I: 32 349 / II: 601 605
837 839
Frankei II: 300f
Franken I: 479 481
Frankenberg II: 549f
Franklin II: 518
Frantsov I: 686
Franz I: 244 651 664 669
II: 60 63
Fraser II: 523f 527
Fredel I: 779
Frei I: 215f 746 748 / II: 349
357 874 882
Freier I: 779
Freiligrath II: 456
Frenkel-Brunswik I: 799
Frese I: 69
Freud I: 149 185 258 282f 373
II: 125f 153 192 212 224
236 238 355 463 730f 757
858 878 882
Freyber I: 126
Friedberg I: 552 558f
Friederici II: 787
Friedman I: 556 559 562 565
Friedmann I: 596 770 773
Friedrich II: 112 115
Friese I: 472
Frisé II: 882
Fritsch II: 21 27
Fröbel I: 506
Fröhlich II: 94 426 429 558
Fromm I: 284f 289 417 421
II: 322 329 648 651
Frommknecht II: 692
Frostin I: 686 / II: 494
Frund I: 88 91
Fryer I: 525
Fuchs, A. I: 764 / II: 780
Fuchs, E. I: 648
Fuchs, W. I: 497 / II: 451
Fuegi II: 357
Führmann I: 651 685f
Fülberth I: 27 29 441 / II: 550
563 567
Fulda I: 693f 705ff / II: 199f
Fullarton II: 7 22
Funke II: 651
Furet II: 398
Fürstenberg I: 496
Furtado II: 601 605
Furth I: 137 141
Füssel II: 491 504
Gäbe II: 588
Gadamer I: 163 167 246 248
377f 380 383f / II: 714 728
731 742
Gadet II: 739 742
Galander I: 692
Galceran Huguet II: 629
Galen II: 231
Galilei I: 54 196 / II: 195 336
350 357 718
Gall II: 329 380 393
Gandhi II: 269 601
Ganßmann I: 63f
Garaudy I: 186 650f 685f
II: 502
Gardavsky I: 685f / II: 493f
Gardoncini II: 845 847
Garfinkel I: 158 162
Garhammer I: 600
Gärtner II: 612
Garvey II: 257 260
Gastev II: 241
Gaudemar I: de 534 544
Gaudig I: 507
Gaugler I: 501
de Gaulle II: 289
Gauthier I: 777

Gavrilovic II: 835 839
Gay II: 117
Gaziet II: 122 125f
Gefeller I: 23
Gegenbauer II: 505
Gehlen I: 728f
Geier I: 628
Geiger I: 276 278 497 / II: 92 94
Geissler I: 592 / II: 166
Gendreau I: 320
Gensior I: 544
Gente I: 322 325
Gentile II: 391 522f
Georges I: 92 102 613 / II: 757
Geras I: 204
Gerhard II: 309
Gerlach I: 219f 297 / II: 692
Genns II: 839
Gernsheim II: 431 435
Gersdorf II: 431
Gershuny II: 849 852 854
Gerstenberger II: 94
Gerster I: 739 743
Gethmann II: 691
Gey I: 82 / II: 777 786
Geyer II: 857
Geymonat II: 703
Ghaddafi (Al-Qaddāfī) I: 398
Ghālī I: 400
Ghazoul I: 400f
Ghisu I: 15 20
Giacometti I: 190f
Giannantoni II: 527
Giap II: 80
Giddens I: 558 / II: 307 309
Gide II: 774 786
Giebe I:335
Giese II: 337
Gilbart II: 10 21f
Gintis II: 251f
Girard I: 177
Girardi I: 686 / II: 491 503
Girnus I: 651 670 / II: 52 63
Girvan II: 601
Gisselbrecht II: 344 357
Glaser I: 764
Gleisberg I: 24
Gleserman II: 122 126
Glotz I: 307 309 / II: 262 266
Gluckstein II: 363
Godelier I:70 75 168 177 201 624 627 / II: 48
Godes I: 634 638
Godwin I: 210 216
Goebbels I: 651
van der Goes I: 275
Goethe II: 145 438f 641 643 646f
Goetze II: 462ff
Goffman I: 162 354 356 II: 551 554
Gogarten II: 144
Göhring II: 94
Goldberg I: 88-91
Goldmann, E. I: 210f 216
Goldmann, L. I: 187 236
Goldschmidt, H. I: 652 670 II: 63
Goldschmidt, W. I: 717
Gollwitzer I: 686 732 / II: 494f
Gontscharow I: 386
Gonzales Casanova II: 839f
Gorbatschow I: 28 306f 384f 388 440 487-9 578 685 772 II: 73 76 128ff 132f 203 211 359 547 550 575 612 655f 838f 853f 872
Gordon I: 525 543f
Gorki I: 684 / II: 336 876
Görlich I:103 / II: 787
Gorny I: 400
Gorsen I: 470 472
Gorski II: 515 522
Gorz I: 48 50 132 141 414 421 461f 549 591f 600 806f II: 316 330 567 752f 850f 854
Gössler I: 15 20f
Gossweiler II: 21

Gottschalch II: 154
Gottsched I: 728
de Gouges II: 309
Gould II: 509
Gournay II: de 407
Grabek II: 350 357
Grabs II: 874 882
Graf I: 479
Gramsci I: 14 19f 47 145 147 152-66 185 192f 195 214f 223 230ff 295f 329 343 351ff 370 373 395 428 475ff 493f 550 552 619ff 625 627 646 650 705ff 715 727 760 763 780 783 793 804ff
II: 37 41 44-7 49 67 91 111f 133 140 169 192 221 224 251f 263f 285f 288 311 343-50 355 357 361 365 380 390f 393 397 400 425 459ff 490 502 525 525f 542 548f 551 577ff 598 624 635-8 670f 679 681-6 701f 719 739 746f 782 799f 844 866ff 881
Grebing I: 441 / II: 378f 555 567
Greffrath II: 713f
von Greiff I: 16 20 600
Greimas II: 97
Grene II: 509
Griepenburg I: 126 / II: 288f 334
Griese II: 200
Grimm, J. u. W. I: 129 144 II: 96f 437
Grimm, R. II: 357f
Grimminger I: 779
Gromyko I: 746
Gropp I: 55 199 201 / II: 392f 678 691 699f 703
Groschoff II: 76
Groschopp I: 477f 481
Groskurth II: 165f
Gross, J. II: 154
Gross, M. II: 349 357
Grossmann I: 99 102 113 116 119 199 201 349 691f
II: 19 21 300f
Grosz II: 335
Grotius I: 721 / II: 374
Grottian II: 371
Grün I: 648 / II: 116 555 567 641
Grunenberg I: 337
Gruppi I: 807 / II: 727
Guattari II: 762 764
Guérin I: 211 216
Guesde I: 78
Guevara I: 87 321 348 795 799 805 807 / II: 66 80
Gugel II: 378
Guggenberger II: 371
Guillot II: 140
Gumbrecht I: 672 / II: 65
Gunn II: 689 691
Gurjewitsch II: 772 786
Gurland I: 329 337
Gurr II: 374
Gutelman I: 86 88
Gutiérrez II: 139 143
Gutman I: 261
Gutschkow II: 819
Guttnow I: 602 607
Gutzkow II: 641
Gysi, B. I: 245 248
Gysi, G. II: 579

Haarmann I: 401
Habermas I: 27 48 50 158 162 246 248f 251 257-61 415 419ff 647f 718 729 / II: 114f 142 188 251f 380 393 531 533 549f 649-51 688 701 703 728 737 743 762ff
Hackl I: 512
Hacks II: 119 126 338 649
Haddād I: 396
Haeckel I: 222 / II: 255 505-8

Hagen II: 692
Hahn, B. I: 191
Hahn, E. I: 20 55 / II: 692
Hahn, L. A. II: 21
Hahn, M. E: 393
Haible II: 62f
Hajek II: v.133
Halberstadt I: 27
Hall I: 157 162 185 618 626f
779 782ff / II: 47f 598f 740
von Haller II: 381 393
Halliday II: 115
Haltern II: 392f
Hanaf I: 399f
Hanisch II: 82
Hanke II: 62f
Hänninen I: 718 / II: 260
Hannington I: 525
Hansen I: 493
Hanson II: 769
Haraszti II: 470
Harder I: 768
Harding I: 581
van Haren II: 599
Harich I: 42 47 50 322 325
335 / II: 524 726
Harney II: 468f
Harrer I: 27 29 441
Harrington II: 555f 567
Harrison II: 487
Harstick I: 168 177 400 638
Hartig, I. A. II: 393
Hartig, V. I: 479 481
von Hartmann, E. I:705 707
Hartmann, H. I: 416 421
II: 755f
Hartmann, N. II: 189 192 591
594
Hartsock I: 556 558f 581
II: 598f
Hartz I: 589 592
Harvey, D. II: 300f
Harvey, Ph. I: 69
Hašek I: 340f 344 / II: 858
Hase I: 652
Hastings I: 211
Haufe II: 371
Haug, F. I: 149 160 162 237
244 248 288f 371ff 376 415
418 421 577 580f 590 592
II: 124 126 181 188 448 451
599 754 756 760 801 811f
819 824f 853f
Haug, W. F. I: 48 50 55 148 150
162 192 195f 201 230 232
248 264 267 270 279 284
289 305f 309 322 325 336ff
340 342 344 353 363 369f
376 384 388 481 488f 491
524f 573 578 581 613 627f
646 648 651 670f 673ff 680f
712 718 728f 772f 804 806f
II: 29 38f 43 48ff 59 62f 65
97f 115 127 133 153ff 160
179f 183 185 188 191f 202
211 225 303 309 340 342
344 350 356ff 371 380 393
435 443 449 451 543 550
599f 633 640 655f 677 679
691 693 728 742 760-4 788
800f 807 809 853f 873f 882
Haupt, G. I: 349 713 718
Haupt, H. -G. II: 330
Hauptmann II: 335
Hausen II: 440 451
Hauser, A. II: 243ff
Hauser, K. I: 288f / II: 754 756
760 763f
Häusler I: 305 309 / II: 266
Havel II: 676 691
Havemann I: 335 339 344 382
II: 676 691 808f
von Haxthausen I: 636
Hay II: 337
Head I: 338 344
Heartfield I: 754
Hecht II: 342 349 357
Hedeler II: 362f
Hedtke II: 693
Heeger I: 793 799

Heer I: 123 126
Hegedüs II: 428f
Hegel I: 11ff 33 36 51 127f 184 196ff 225 228 235f 249-53 255 257 261 263 266 268 280 284 290f 310 402 418f 443 579 601 614f 619 621 646 649 660 676 681f 684 693-8 703ff 708 711 713 721 723 748-53 758 775 II: 29 31 37 46 86ff 97 99 102 104 116 124 144 155-9 172 177f 183f 188f 192ff 197 200 202 215f 234 246f 252 254 303 352 384f 387 390 400 403 409 432 439 442 480 496 515ff 520 523f 528f 581 591f 627 641ff 647 657f 660-64 666 669f 673f 679 682 684 688 690f 696 700f 710 731 802ff 856
Heidegger I: 184 285f 343f 728f / II: 95 104 115 212
Heidtmann II: 693
Heimann II: 567 604 612 847
Heine II: 192 641f 861
Heinrich, K. I:729 / II: 187f 355 357 501
Heinrich, M. I: 63f / II: 593 780 786
Heinrichs I: 270
Heins II: 380 393
Heinsius I: 144
Heinz II: 165f
Heinzen II: 407
Heise, H. I: 580f
Heise, W. I: 651 656f 663 670f 680f 744 / II: 60f 63f 356 357ff
Heisenberg II: 629 636 640
Heisig I: 335
Heister I: 651 670 / II: 62 64f
Heitman II: 363
Hejl I: 69
Helander I: 268 271
Held II: 251f
Heller, A. I: 146 150 155 162 651 / II: 126 751 753 846f
Heller, H. I: 25 / II: 545 550
Heller, L. II: 852 854
Heller, O. I: 361 363
Heller, V. II: 497
Hellpach II: 453
Helms I: 321 325 651
Helvétius I: 290 721 724 II: 117 126 861
Henning I: 495
Hennings II: 780 786
Henry I: 185
Hensche I: 29
Henselmann I: 605ff
Henze I: 651 670 / II: 63
Hephaistos I: 764f
Heppener II: 43 49
Heraklit I: 721 / II: 194 658
Herbert II: 852 854
Herder I: 163 167 / II: 480 590
Herkommer I: 552 598 600
Hermand I: 651 / II: 244 357 879f 882
Hermlin I: 333 335
Herodot II: 230
Herre II: 309
Herzberg II: 568
Herzen I: 684 / II: 657
Herzog II: 280
Hesiod I: 765
Heß I: 417 421 710 / II: 285 289 641 651 860
Hetherington II: 466
Heuer II: 543 550 567
Heuermann II: 260
Heyden II: 473f
Heydorn II: 252
Heydrich I: 746
Heym I: 333
Hickel I: 98 102 183 / II: 785f
Hickethier I: 668 670 / II: 62 64
Hildebrand-Nitshon II: 586 588

Hildebrandt II: 379
Hildermeier II: 821
Hilferding I: 27 61 64 99 102
113-6 119 207 269 271 330
349 441 756f 763 / II: 6 17ff
21 27 296-9 301 422 429
557 593
Hillmann II: 654 691 726f
Himmler I: 343
Hinde I: 69
Hindels I: 763f / II: 612 847
Hindess I: 185 188 / II: 301
Hinkelammert I: 368 376
II: 494
Hinrichs I: 543f 597f 600
Hintze II: 94
Hinz I: 779
Hirdina, H. I: 670 / II: 62 64
Hirdina, K. I: 651 666 670
Hirsch, H. I: 357 363
Hirsch, J. I: 36 305 309 495
624 628 806f / II: 47 49 266
Hirst I: 185 188 626 / II: 301
Hitler I: 331 334 437 745f
II: 280 336 377 454 647 725
Hjelmslev II: 737 742
Ho Chi Minh I: 395
Hobbes I: 38 130 252 290 721
767 / II: 97 254 382ff 394
515 522 625
Hobsbawm I: 400 456 462 718
II: 470
Hobson I: 269 271 349 520
II: 468
Hodek II: 874 877 882
Hodgskin I: 132 239 / II: 786
Hoff II: 93f
Hoffmann, A. C. II: 810f
Hoffmann, J. II: 785f
Hofmann, M. I: 779
Hofmann, P. I: 271
Hofmann, W. I: 22 28 428 441
II: 278
Hohoff II: 492, 495ff, 501
d'Holbach I: 290 721 723f
II: 102 117 120 126
Hölderlin I: 284
Holländer I: 739 741 743
Holt II: 787
Holz I: 325 680f 718 / II: 689
691
Holzkamp I: 18ff 129 140f 243
248 322 325 365 376 416
421 / II: 54 64 110 115 124ff
145 154 233 239 586ff 597
599 800f 818f 837ff 846f
Holzkamp-Osterkamp siehe
Osterkamp
Homer II: 228
Honecker II: 473f
Honegger II: 761 765
Honneth I: 253 260f 421
II: 763 765
de Hooch II: 243
Hook II: 556
Hooks II: 825
Hopkins I: 400
Höpp I: 400
Höppner I: 421 648 / II: 786f
Horkheimer I: 147 149 196
279 285f 288f 291 297 322
330 337 362f 374 376 727
729 746 748 794ff 799
II: 160 185 225 239 252 353
391 393 464 520 651 869 874
Horvat II: 428f
Hörz I: 136 141 / II: 629 639f
679 691
Hösle I: 167
Houck I: 91
Hough II: 654 656
Hountondji II: 260
Hourani I: 400
Houtard I: 686
Howard I: 191
Hromádka I: 687
Huber, J. II: 849 851 854
Huber, W. I: 355
Hübner I: 613
Huffschmid I: 208f 388

Hugo II: 283 289 646
Humbert-Droz II: 281
Humboldt I: 748 / II: 97f 112 252
Hume I: 292 566 582 639 II: 120
Hund I: 421
Hunt II: 400 579
Hurd II: 439
Hurrelmann II: 166
Hurwicz II: 337
Husain I: 399
Huss I: 363
Hussain I: 82 / II: 301
Husserl I: 354 / II: 150 154
Huster I: 126 / II: 558 567
Huxley II: 505
Huyghens II: 200
Huyssen I: 670 / II: 64 185 188
Hyman I: 501f

Ihering II: 530
Ikonnikow I: 605 607
Iljenkow I: 54f 200f / II: 678 691 700 703
Immler II: 278
Inglis II: 252
Ingrao, C. II: 823 825
Ingrao, P. I: 763 807 / II: 843 846f
Inhelder II: 237 239
Iolk I: 634 638
Irrlitz II: 357
Ismae II:400
Israel II: 692
Itoh I: 62 64 113 119
Iveković I: 404 421

Jacoby II: 429
Jaeck II: 49 309
Jaeggi I:190 421 / II: 808f
Jäger, M. I: 48 50 / II: 266f
Jäger, S. II: 738 742
Jahn, E. I: 495
Jahn, W. I: 271 690 692 II: 775 786f
Jahoda I: 52If 525 589 592
James, C. L. R. II: 259f
James, S. I: 581 / II: 756
Jameson I: 621 628 651 670 II: 62 64 97
Jänicke I: 49f / II: 847
Jankowitsch II: 274
Jansen, G.H. II: 274
Jansen, J. II: 278
Janshen I: 591f
Jantzen I: 243 248 / II: 109f 115
Janz II: 440 451
Jarman II: 567
Jauch II: 787
Jaurès II: 455
Jay II: 143
Jean Paul I: 263 / II: 437 443 451
Jefferson I: 157 162
Jelpke II: 823ff
Jena I: 344
Jenssen I: 479 / II: 611f
Jermakova I: 671
Jermann I: 167
Jerzewski II: 714
Jessop I: 783f / II: 47 49
Jesus I: 146 685 / II: 855
Jiang Qing II: 476 478f
Jiranek 651
Jochimsen I: 271
John I: 651 660 670 672
Johnes I: 628
Johnson, P. I: 462
Johnson, T. I: 543f
Johnstone I: 807
Jolly I: 69
Jonas I: 376
Jones, E. II: 469
Jones, M. I: 354 356 / II: 552 554
Jones, R. II: 29 786

Jost II: 357
Jung I: 97 102 / II: 93f 839
Jung-Stilling II: 386
Jungclas I: 24 / II: 289
Jungk I: 375 / II: 371
Jungnickel I: 131 141
Juretzka II: 62 64
Jürgens I: 552
Jürschik I: 651 670
Jurtschitsch II: 267

Kaden I: 126
Kadritzke I: 278
Kaestner II: 334
Kagan I: 244 248 605 607 651
660 670 676 681 / II: 52ff
62 64
Kahl I: 687
Kaiser I: 334
Kaldor II: 624
Kalecki II: 785f
Kalinin II: 241
Kalivoda II: 567
Kallscheuer I: 50 / II: 394 567
Kamann I: 211 216
Kamenew II: 484 574f
Kamenka II: 429
Kamlah II: 200
Kammler II: 747f 758f 762
Kampe I: 363f
Kamper I: 667 670 / II: 52 58
64
Kampfmeyer I: 761
Kan II: 362f
Kang Sheng II: 476 478
Kant I: 38 127 163 196 236
252 280 298 365 639 649
660 695f 711 714f 719 721f
758 762 774 795 / II: 182
192 197f 200 215 432 440
515f 523 582 590 595f 625
643 660 664 666 696 802f
856
Kaplan I: 190f
Kaplow II: 330
Kappes II: 499
Kardelj I: 50 80 82 / II: 654
656 726
Karge II: 338
Karjagin I: 651
Karl. II: 373
Karl II: 371
Karsunke I: 496
Käsler II: 465
Katsoulis II: 541 550
Katz I: 168 176ff
Katznelson I: 457 462
Kaufman II: 664
Kaufmann I: 651 / II: 405
Kaulbach II: 200
Kaunda II: 830
Kautsky I: 44 50 61 64 78 82
89 113 119 194 196 269
271 274 360f 363 395 433f
462 491 495 612 683 687
691f 726 734 757ff 790f 799
801ff / II: 38 49 91 94 159f
167 169 218 377 389f 393f
415 418 422f 427ff 458 464
481 513f 534ff 538ff 550
556f 568 611f 620 624 630
638 640 669 672 692 697
722 727 771 776 806
Keane II: 380 393 549f
Kebir I: 167 / II: 350 357 549f
Kehr II: 86 95
Keiler I: 248/II: 585 588
Keller I: 501f
Kelley-Wischnewetzky II: 805
Kellner II: 494
Kelloy II: 509
Kelm II: 62 64
Kelsen I: 25 760 / II: 389 393
Kemper I: 82
Kepler I: 750 / II: 195
Kerbs II: 154
Kerenski I: 387 / II: 286 819
Kern I: 577 582
Kernig II: 470

Kerr I: 541 544
Kerschensteiner I: 506f
Kershaw I: 747f
Kerzencev II: 241
Kessler I: 400 / II: 282
Keynes I: 521 525 / II: 785
Khalatbari II: 848 854
Kierkegaard I: 285
Kiernan II: 274
Kim Il Sung II: 577
Kimminich I: 722 729
Kimpel I: 606ff
Kirchheimer I: 25
Kirchhoff I: 762 764
Kirillov II: 241
Kiselew II: 129
Kisker I: 355f
Kittsteiner II: 714
Klare I: 191
Klatt II: 339 352 357
Klaus I: 16 20 55 233 / II: 108f 115 238f 524 527 588 596 701 703
Klee II: 706
Kleger I: 49f
Klein, H. I: 762
Klein, M. I: 764 / II: 691f
Klein, V. II: 810f
Kleinknecht II: 487
von Kleist II: 339
Klenner, C. II: 810f
Klenner, H. II: 772 786
Klicker II: 605
Klim I: 678 681 688 692f
Klimaszewky I: 304ff 309 II: 674 692f
Klingen II: 772 786
Klingender I: 651 670 II: 244f
Klix II: 239 588
Klohr II: 503
Klönne I: 441
Klotz I: 779
Klotzbach I: 330f 337 II: 393 561 567
Klüber II: 749 753
Kluge I: 156 162 519 652 II: 355 358 703
Klussmann II: 650f
Knapp II: 811
von Knebel I: 723
Knepler I: 652 670 / II: 59 63f
Knirsch II: 363
Knobel I: 271
Knödler-Bunte I: 470 472
Knoll II: 495 501
Knopf II: 342 346 357
Koch, G. I: 232 / II: 48 394
Koch, H. I: 651 660 670 II: 53 64
Kochan I: 502
Kock I: 69
Kocka I: 278 441 462 / II: 330
Koestler II: 766
Kofler II: 357 392f 426 429 648 651 692 749 753
Kofman II: 435
Kogan I: 692
Köhler, M. I: 468
Köhler, W. I: 69
Köhm II: 211
Koivisto I: 341 344 718
Kojève I: 257 261
Kokin I: 634 636 638
Kolakowski II: 808f
Kolkenbrock-Netz I: 185
Kollontai I: 339 492 / II: 373 819
Kolumbus II: 147
Kondakow I: 17 20 / II: 516
Konersmann II: 392 394 442 450f 706 714
König, E. II: 568
König, H. I: 600
Königsdorf I: 579 582
Könnemann I: 126
Konnertz I: 579 581
Konstantin II: 493
Kool I: 216 495 / II: 574 579 654 656

Kopernikus I: 721
Kopnin I: 55 201 / II: 700
Köppen I: 721
Kornegger I: 211 216
Korsch I: 219f 290 293 297 349-53 383f 696 792 / II: 29 41 49 66 160 220 225 335f 343 356ff 389f 394 568 593 599 663 671 678 680f 692 702f
Kosík I: 53 55 144 147 150 623 628 796 799 / II: 141 143
Kosing I: 16f 19 244f 248 305 309 762 764 / II: 115 521 677 692 694 703
Kossack I: 462
Kößler I: 400 / II: 80 612
Kossman II: 330
Kossok II: 398ff
Kostede I: 36
Köster I: 762
Kotzias II: 599
Kovalevskij I: 168 629 634 638 / II: 70
Kozlik I: 114 119
Kracauer I: 277f
Krader I: 168 177 317 320 628f 635 637f / II: 394 827 829
Krahl I: 62 64 322-5 796f 799 II: 66f
Krais I: 544
Kramer, A. I: 805 807 / II: 49
Kramer, D. I: 472 481
Krämer II: 226 239
Kranz II: 230
Kratz I: 718
Kraus II: 880
Krauss I: 343f 651 671 678 681 719f 729
Krebs I: 102f 167 627 / II: 49
Kreimeier I: 651 / II: 62 64
Kreimer II: 567 847
Kreisky II: 567
Kremendahl I: 495
Krenzlin I: 651 671 / II: 62 64
Kreppel II: 501
Krieg I: 92
Krippendorf II: 857 871 874
Kristeva II: 97 737 742
Krjukowski II: 54 64
Kröber I: 136 141 199 201 365 376 / II: 599 640
Kropotkin I:210 216
Kross II: 470
Krüger, H. II: 166
Krüger, H.-P. II: 110 115 350f 357
Krüger, S. I: 96 103
Krupskaja I: 508 / II: 204 211
Krusch I: 126
Krygier II: 429
Kuckartz II: 334
Kuczynski, J. I: 149f 152 162 304 306 309 441 462 671 772f / II: 76 648 651
Kuczynski, M. I: 103 / II: 787f
Kuda I: 485
Kugelmann, G. I: 788
Kugelmann, L. I: 2 262, 788 II: 663 862
Kuhlen I: 36
Kuhn II: 67
Kühne, K. II: 785f
Kühne, L. I: 237 244f 248 651 671 680f / II: 50f 53f 57ff 62 64 700 703
Kühnl I: 27 29 / II: 378f
Kulemann I: 764
Kulikowa I: 651 671
Kummer I: 69
Kummermuß I: 23
Kumpf I: 269 271
Kun II: 865f
Kunfi I: 764
Kurella II: 337
Kurien II: 829
Kurnitzky II: 67
Kuron II: 568

Kurz-Scherf I: 588f 592 598 600 / II: 785 787
Kusch II: 140
Kuschey I: 325f
Kuthenkeuler II: 714
Kutscha I: 29 / II: 171
Kutter II: 499
Küttler II: 42 48f 309
Kuusinen I: 305 309

La Bruyère II: 438
Laaser I: 613
Labica I: 6 15 20 187 211 216 235ff 249 709 718 / II: 28f 49 340 357 366 432 435 515 697 699 703 765 769
Labriola I: 49 229 233 302 309 338 344 412 619 / II: 218 474 502 669f 673 873
Labrousse II: 312 330 393
Lacan I: 185 251 257f 261 II: 225 236 730 738 760
Laclau I: 624-8 780 782 784 801 805ff / II: 97 603 605 728f 733f 740ff 747f
Lacouture II: 463f
Ladeur I: 185
Lafargue, L. II: 805
Lafargue, P. I: 596 600 789
II: 301 629
Lafontaine I: 307 309
de LaGorce II: 274
Lahme I: 82
Laing I: 354 356 / II: 449 551 554
Laitko I: 136 141 / II: 200
Lalande I: 234 / II: 189
Lambrecht I: 717
Lamm I: 24
Land I: 578 582
Landa II: 588
Landauer I: 210
Landes II: 322 330
Landgrebe II: 154
Landsberger II: 82
Langbacka II: 339
Lange, B. P. II: 260
Lange, E. M. II: 530 851 854
Lange, F. A. II: 431 435
Lange, H. I: 27 29
Lange, O. I: 199 201 266 271 II: 426 429
Lange, P. I: 275f 278
Langer I: 735
Langewiesche I: 478 480f
Langhans I: 326
Langhoff II: 338
Langkau, G. II: 394
Langkau, J. II: 784 787
Lapidus II: 782 787
Laplace II: 626
Lappé I: 90f
Larzarsfeld I: 521 525 589 592
Lasch I: 687
Lassalle I: 163 412 421 430 486 644 648 730 779 801 II: 68 283 285 289 364 452 455f 459 545 775 780 787
Lasson II: 516 661
Lavollée I: 462
Law II: 3 16 21
Lawick-Goodall I: 69
Lazarus I:190f
Le Corbusier I: 603
Le Play I: 462
Lebowitz I: 462
Lecercle II: 470
Lecourt I: 185 187-91 798f II: 766 769
Lederer I: 278 501f
Lee I: 356
von Leeuwen I: 687
Lefebvre, G. II: 393
Lefebvre, H. I: 6 9 20 143 147 150 152 154f 158f 162 489 718 / II: 340 354 357 767 769
Lefebvre, J. -P. II: 436f
Lefèvre I: 325
Leggewie I: 400

Lehmann, G. K. I: 651 671
II: 62 64
Lehmann, H. II: 787
Lehmann, H. G. I: 82
Lehmann, H. -T. II: 355 357
Lehnhardt II: 67
Lehning I: 220 / II: 211
Lehr II: 810f
Leibniz I: 478 / II: 112 200
515 583 586 588 626 642
Leichter I: 762
Leist I: 15 21
Leithäuser I: 155 162
Lemercier-Quelquejay II: 274
Lengyel I: 764
Lenin I: 1 4-7 14 39 45f 53
61 79 89 100f 113 116 121f
145f 187 194 198f 214f 219
229f 251 256 269 282 292-5
302f 305 323f 339 346ff 350
360 371 380 386ff 395 413f
423-8 433ff 459 464ff 470
474ff 483 486 488 491f 508
515 550 552 577f 585 612
621ff 633f 640 642 647 650f
654 667 679 684 696 727
734 754 759f 776 791 794
802f / II: 18f 23 37 41f 49 66
72 77ff 90 107 109f 121 128
131 135 158 163 167ff 183
202-11 222f 230 242 250
264f 279 281 285f 300f 314
335 344 349f 357 361 363
365 372 377 379 388 396ff
403 414 416-20 423 427
429 452 461f 465 473 482f
493 512ff 516 519 525 532
536f 539f 542 556 558 569-
74 586 592f 600 638 645
653 670-4 676f 680f 683
687 694 696-701 712 720ff
726 794ff 806 808 819f 827f
831ff
Lenk, K. I: 28 290 297
Lenk, W. II: 787
Leo XII. II : 780
Leo I: 334 337
Leon I: 362f
Leonhard II: 568 720 727
Leontjew, A. A. II: 109f 115
Leontjew, A. N. I:18 21 140f
235 243f 249 417 421
II: 109f 115 584ff 588
Lepeletier I: 502
Lerke I:762
Leser I: 763f / II: 560
Leske I: 688
Lessing I: 8 / II: 438f
Lethen II: 355 357
Letsch I: 651 / II: 62 64
Leukipp I: 290
Leutner II: 487
Levenstein I:462
Lévinas II: 141 143 152 154
Levine, A. I: 205 / II: 693
Levine, N. II: 682 692
Levins II: 257
Levinson I: 799
Lewin I: 188
Lewis, B. I: 400
Lewis, W. J. II: 82
Lewontin II: 257
Ley II: 677 692
Leys II: 601 605
Li Fuchun II: 478
Li Xiannian II: 478
Libermann I: 100 103
Lichtenberg I: 263
Liden II: 769
Lidtke I: 478 481
Lieber I: 352f / II: 289 580
Liebig II: 619
Liebknecht, K. I: 38 41 792
799 / II: 796 801
Liebknecht,W. I: 78 84 359f
477 682 / II: 278 510f
Liebscher II: 588
Liedman I: 718
Lifschitz I: 651 671 678f 681
II: 60 64

Ligatschow II: 131
Lilge II: 252
Lin Piao II: 476 478 577
Linguet I: 724 729
Linhart I:187f
Link, J. II: 97 737 748
Link, W. I: 27 29
Link-Heer II: 747f
Linke II: 524
Linné I: 221
van der Linden I: 495
Lionjin II: 839
Lipietz I: 102f 186 190f 621
624 628
zur Lippe I: 252 258 261
II: 239
Lippold I: 652
Lipps I: 728f
Lipset II: 262 267
Lissa I: 651
List, Ch. II: 774 786
List, E. I: 162 261 579 582 729
List, F. I: 405 421 568 688
Little II: 603 605
Littler I: 553
Liu Shaoqi II: 362 475 478f
Livius I: 224
Ljubimow II: 339
Lock I: 186
Locke I: 38 234f 239 241 249
402 502 / II: 234 382f 394
515
Loeser II: 587f
Lohmann II: 450f 533
Lombardi I: 651 794
Lombardo-Radice II: 502 612
845 847
Lönnendonker I: 325
Lopata II: 783 787
López-Austin I:176f
Lorenz, K. II: 241 245 256f
Lorenz, W. I: 21
Lorenzen I: 613
Lösche I: 479 481
Löscher II: 566 568
Lotman II: 97
Lough II: 309
Louis-Philippe II: 283 443
Louis II: 389 394
Lovett II: 466
Löw II: 612
Löwe II: 487
Löwenheim I: 330
Löwenthal II: 185 188
Löwy, A. G. II: 358 361 363
Löwy, M. I: 349
Lu Dingyi II: 478
Lübbe, H. I: 687
Lübbe, P. II: 429
Lück I: 651
Luckmann I: 158 162
Lüdke, A. I: 150
Liidke,W. M. 1:671
Ludwig XI. II: 310
Ludwig K. -H. II: 357
Ludz I: 216
Lueger I: 356
Luhmann I: 553 / II: 262 267
Lukács I: 14 34 36 146f 155
187 293ff 372 375 381 384
607 650f 656f 660 664 671
679ff 696 716 748 752ff 762
796 799 801 803f 807
II: 54 64 159 168f 220ff
234 243ff 252 337 339 341
351f 357 361 377 379 383
394 425 429 446f 458 464
493 496 520 543f 550 641
646-51 669 671 679f 685
865f
Lukin I: 651
Lukrez I:10 / II: 342 722f 869
Lunatscharski I: 508f 650 671
678 681 687
Luo Ruiqing II: 478
Lurčnat I: 604 607
Lurija II: 109 115 584 588
Lütgenau I: 683 687
Luther I: 292 365 722
Lutz I: 779 / II: 566 568 849

854
Luxemburg I: 27 39 45 61 99
113 151f 207 209 293 302
348 361f 371 386 391 395
412 433ff 467 473 486 491f
500 515 539 585 608 612
733 759 791 802f / II: 66 77
123 167 202 220 250f 263
285ff 377 397 404 414 422
434 452 459 471 502 504
510ff 532 535f 540 557 560
571 616 653 666 671f 674
697 721f 725 727 789 793-6
805 816f 840f 848 865f
Lynch I: 605 607
Lyon II: 274
Lyons II: 96 101 115
Lyotard I: 681 / II: 339

Maas II: 97
Maase I: 471f / II: 63
MacCulloch II: 864
Macdonnell II: 742
MacFarlane II: 381
Mach I: 757 759
Macherey I: 187 191 / II: 304
309 703
Machiavelli I: 721 / II: 461 464
Machovec I: 685 687 / II: 493
495 502
Machtan II: 378f
MacIntyre II: 449ff
Mackintosh I: 39 41
MacLeod II: 10 21
Macpherson II: 383 394
Mader I: 718
Magdoff I: 40 41
Magyar I: 634 636 638
von Maidell I: 167
Maiers II: 115
Maine I: 318 320
Majakowski I: 651 / II: 241
Makarenko I: 508 510 512 799
Makarow I: 651
Maldidier II: 742
Malevič II: 241
Mallet I: 278 463 770 773
Malthus I: 314 390 533f
II: 254-7
Mamardaschwili II: 224f
Mammach I: 332 337
de Man I: 479 706f
Mänchen-Helfen II: 612
Mandel I: 99 103 107 118f 365
376 489 493 807 / II: 208f
211 289 301 418 420ff 428f
600 605 783 786 840
Mandeville I: 93 103 402 421
608 613 / II: 384
Mann I: 657 / II: 313 330 521
647 858
Mannheim II: 243f
Manninen I: 718
Manzoni I: 165 651
Mao Zedong I: 46 79 72 185
303f 321 348 395 510 622
650 696 733 793 / II: 78f
203 274 420 452 463 474
476-9 486 575 577 580 602
674f 686 830-3
Mar II: 605
Marc II: 243
Marek I: 762
Marcuse I: 147 150 287 289
297 309 324 326 354 375f
416f 421 651 681 702 707
777 779 795 799 805 807
II: 66f 139 143 160 177
184ff 188 245 352f 357 391
394 455 465 551 554 565
568 623 648 651 690 692
763 765 783 881f
Marek II: 726f
Marglin I: 553
Mariátegui I: 88 174 177 650
671 / II: 73f 83 490 502 504
671 828 830
Marinetti II: 241
Marini II: 601 605

Markard II: 115
Marković II: 67 115
Maron I: 579 582
Marothy I: 651
Marramao I: 764
Marschak I: 278 501f
Marshall I: 463 526
Märten I: 651 671
von Martin II: 243
Martow, J. II: 206ff 571f 580
Martow, L. I: 762
Marx I: 788
Marxhausen I: 690ff
März I: 462
Mascitelli I: 764
Masi II: 486
Massarat II: 602 604f
Massing I: 357 363
Mate II: 489ff
Matoré II: 310 330
Matthes I: 421 590 592
II: 166
Matthias I: 330 337
Matthöfer II: 787
Mattick I: 98 103 489 807
Mattmüller II: 502
Matvejević I: 489
Matzner, E. II: 852 854
Matzner, J. II: 447 451
Mauke I: 247 249 276 278
Maurer, A. II: 752f
Maurer, F. II: 451
von Maurer, G. L. I: 318 320
Maus I: 22
Maximow I: 787 799
May I: 651 671
Mayer, Günter I: 651f 672
II: 62 64 351 357 881f
Mayer, Gustav I: 321 326 708
718
Mayer, H. I: 333 719f 729
II: 342f 352 357 649 651
Mayne II: 215 225
Mayr II: 509
Mazrui II: 274
Mazzone II: 523
McAffee II: 824f
McCulloch II: 21
McGinity I: 90f
McLennon I: 320
McRobbie I:157 162
Mead I: 250f 259 261
Means I: 188f / II: 315 329
Medick II: 393
Medvedev, P. II: 112 114f
Medwedew, R. II: 363 766 783
Meek, E. I: 199 201
Meek, R. L. I: 62 64
Meeks II: 453 465
Mehelin II: 438 451
Mehring I: 228 233 293 358f
473f 650 656 721 723 729
757 762 / II: 29 49 81 243
377 680 776
Mehtonen I: 718
Meier, H. G. II: 599
Meillassoux I: 72 75 320
II: 840f
Meissner II: 394
Mellor I: 308f
Melz II: 503
Mendel II: 254
Mendelssohn II: 383 394
Menenius Agrippa I: 224
Menger I: 757
Menne II: 150 154
Menzel I: 32
Mepham I: 55 / II: 692
Merhab II: 223
Mérimeé II: 646
Merkel II: 786
Merker, M. I: 424f 428
Merker, N. II: 523 526f
Merleau-Ponty II: 692
Mertens II: 496f
Merton II: 408 447 451
Meschke II: 302 309
Messner II: 495 501
Metscher I: 21 244 249 468
471f 651 671 681 / II: 58f

62 65
Meisu II: 243
de la Mettrie II: 581 588
Meumann II: 62 65
Meyer, A. I: 223 233
Meyer, E. I: 484
Meyer, G. I: 27 29
Meyer, Th. I: 495 / II: 555 567
564 567f
Meyerhold I: 651
Michalski I: 400 / II: 392 394
Michel II: 496 500f
Michels II: 414 419 425 429
455f 459f 462 465 558 568
Mierau I: 672
Miermeister I: 326
Mies I: 103 / II: 754 756 841
843 853 855
Migdal II: 83
Miliband I: 495 / II: 95 289
318 330
Militz II: 302 309
Miljukow II: 819
Mill, J. I: 35 574 628 687
II: 480 787
Mill, J. S. II: 407 515 522 618
Miller I: 441
Millerand II: 285
Milles II: 378f
Mills I: 278 / II: 316 330
Milton I:135
Mirhūm I: 396
Mirtin II: 697
Mises II: 133
Mitchell, J. II: 755f
Mitchell, W. J. T. II: 229 239
Mitrany I: 77 79 82
Mittenzwei I: 651 672 / II: 335
339 341f 344 349 356f
Möbius I: 606f
Möckel I: 762 764
Modica II: 525 527
Modzelewski II: 568
Mohammed I: 394 398
Mohl II: 371
Mohr II: 650f
Mohrmann I: 744 748
Molcschott II: 507
Molière II: 310 439
Molina I: 189 191
Molyneux I: 807
Mommsen II: 454 465
Monk II: 337
Montaigne II: 393
Montesquieu I: 38 724 / II: 480
Moore, B. II: 83 649
Moore. S. H: 436f
Mooser I: 463
Moraw I: 126
Morawetz II: 603 605
Morawski I: 651
Morazé II: 319 330
Moreau I: 187 191
Morf I: 55 / II: 692
Morgan, H. II: 827
Morgan, L. H. I:167f 177 312
315 318 320 / II: 176
Morgner I: 579 582
Morishima I: 737 739 741 743
Morris, D. I: 69
Morris, M. II: 775 787
Morris, W. II: 829
Morton II: 470
Morus I: 396 726 / II: 276
Moses II: 152
Most II: 69
Mouffe I: 628 801 805ff
II: 741f
Moulier Boutang I: 184 190f
Moysset II: 394
Mozeck I:141
Mrūh I: 401
Mūsa I: 396
Mühlberg I: 472
Mühlhaus I: 598 600
Mühlmann II: 462 465
Mühsam I: 210
Mukařovsky II: 97
Mülder II: 857 874
Müller, H. I: 578 651 / II: 338f

649f 738 872
Müller, J. H: 431
Müller, J. C. I:191
Müller, K. D. II: 341f 357
Müller, K. O. W. II: 783 787
Müller, M. I: 683 779
Müller, N. R. II: 371
Müller, R. II: 772 787
Müller,R.W. II: 596 599
Müller-Hegemann II: 125 127
Müller-Jentsch I: 501f
Müller-Seidel I: 779
Müller-Waldeck II: 358
Muñoz I: 339 344
Münkler II: 568
Münster II: 356
Müntz I: 652 657
Müntzer I: 369 / II: 81 334
Münz-Koenen II: 651
Murra I:176f
Musil II: 857 874
Musolino II: 523 526f
Mussolini I: 327 332
Myrdal II: 810f

Nagel, H. I: 325
Nagel, Th. I: 204
Nagīb I: 397
Nahr II: 771 787
Naphtali II: 557f
Napier, J. R. I: 69
Napier, P. H. I: 69
Napoléon I. I: 107 338 / II: 283 285 287 289 387 646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I: 38 330 / II: 283 285ff 387 395 443 464 826 861
Napoleoni I: 516
Narr II: 267
Narski I: 55 201 389 / II: 678 689 692
Naschold I: 553f 557 559
Nasser I: 397f / II: 268f 274
Natorp I: 758
Naumann I: 651 657 670 672 II: 441 451
Naville I: 495 / II: 705
Nedoshin I: 651
Neef II: 366
Negri I: 55
Negt I: 27 156 162 391 418 421 519 590ff / II: 49 66f 355 358 362f 546 550 565-8 702f 752f 755f 811
Neher II: 337
Nehru II: 268f 274
Nelles II: 371
Nelson II: 561
Nemitz I: 34 36 341
Nenni I: 329 337
Nerlich I: 92 103
Nettlau I: 210
Neubert I: 672
von Neumann II: 629
Neumann, F. I: 283 289 II: 423 426 430
Neumann, F. L. I: 498f
Neumann, H. II: 280 282
Neusüß I: 365 376 415 421 553 564f 579 582 / II: 624 754 756
Newell II: 583 588
Newton I: 196 / II: 195 200 626
Nie Rongzhen II: 478
Niesler II: 783 787
Niethammer I: 333 337
Nietzsche I: 9 190 235 342f 715 / II: 186 212 225 348 355 358 431 436 439f 451 514 659 661 677 707 711f 729 855f 868 871
Nikolai-On (Danielson) I: 78
Nikolaus von Kues II: 195
Niraad I: 721
Nischanow II: 623f
Nizan I: 604 607
Nkrumah II: 269 274

Noever I: 607
Nöhle I: 335
Nohlen II: 374
Nolte II: 649
Nono I: 651 672
Norman II: 22
Noth I: 401
Nowak I: 55
Nowikowa I: 651
Nuscheler II: 547 550 727
Nutzinger I: 743
Nyerere I: 87f / II: 602 605

O'Brien II: 469
O' Connor II: 467ff
Ober II: 142 144
Oberbeck I: 278
Oberländer I: 216 495 / II: 574 579 654 656
Obermann II: 310
Oberndörfer II: 568
Obitschkin II: 211
Oelssner I: 106 119
Oertzen II: 432 435 562f 565 568
Offe I: 278 419 421 543f 590 592
Ogden II: 96 115
Oiserman I: 718
Okishio I: 739 743
Olbrich I: 652
Olender I: 748
Olson I: 401
Ongaro-Basaglia II: 552 554
Oommen II: 83 462 465
Oppenheimer I: 278
Orel II: 495 501
Ortmann I: 554 560
Orudshew I: 55 / II: 700
Osterkamp I: 64 243 249 285 289 / II: 123 126 147 154 256f 587f 597 599
Ostner II: 166
Ostrovitjanov II; 782 787
Otto, A. I: 692 / II: 777 786
Otto, O. I: 690 693
Otto, Th. II: 337
Otto,W. F. I: 164
Ottomeyer II: 448f 451
Ottwalt II: 335
Overesch I: 338
Overstone II: 22
Owen I: 42 301 396 570 576 583 602 640 / II: 4 775 787
Owsjannikow I: 651 660 671

Paci II: 850
Padmore II: 258 260f
Paech I: 27
Paetel I: 338
Paetzold II: 245
Pahl I: 463
Paige I: 88 / II: 83
Paldan I: 718 / II: 260
Palgrave II: 2
Palitzsch II: 337f
Palme II: 567
Panikkar II: 274
Pannekoek I: 757 762 / II: 93 95 671f 692 722 727
Panzieri I: 798
Papajan I: 634 636 638
Papuzzi II: 554
Parekh I: 391
Parisi II: 140
Parsons I: 501
Parthey II: 587 589
Parvus II: 6 21
Pascal, J. II: 515
Pascal, R. II: 246 252
Paschukanis I: 117 119
Pasero II: 787
Passeron II: 251f
Pätzold I: 744
Pauer-Studer I: 162 261 579 582
Paul I: 691 693
Paulus I: 365 722 / II: 452f

461 462 771
Pawelzig II: 678 692
Pawlow, L. II: 584 586 589
Pawlow, T. I: 16 21 651 660
672 / II: 51 65
Pawlowitsch II: 482 487
Pearson I: 320
Peccei I: 375f
Pêcheux I: 48 49f 185 188f
339 628 / II: 97f 114f 728f
733-6 738f 742 747f
Pein II: 783 787
Peirce II: 99f 114f
Pelger I: 713 718
Pelikan II: 578 580
Pelinka II: 568
Pelloutier I: 217
Peng Dehuai II: 477
Peng Zhen II: 478
Penn I: 38
Pennavaja I: 516
Penth II: 93f
Peregrinus I: 468
Péreire I: 298 309
Perelman II: 691
Perels I: 28f 337
Pérez-Esclarín I: 685 687
Perón II: 289
Perroux II: 601 605
Pestalozzi I: 502 505
Peter, A. II: 144
Peter, G. I: 588 593
Peter, L. I: 27 29
Peters, C. I: 686
Peters J. I: 589 593
Petersen II: 257
Petras II: 837 840
Petruschat I: 651
Petry I: 61 64
Petsch II: 166
Petty I: 93 103 227 233 688
II: 264 275 772 787
Pfabigan I: 761 763f
Pfau I: 592
Pfeiffer, H. II: 1 21
Pfeiffer, K. L. I: 672 / II: 65
Phillipson I: 356
Piaget II: 237 239
Pieck I: 338
Pieper II: 381
Piercy I: 141
Pierwoss II: 356
Pietilä I: 341 344
Pietranera I: 113f 116 119
II: 19 21 523
Pindar II: 228
Piore I: 542 544
Pirella I: 355 / II: 554
Pirker I: 337 / II: 363
Piro II: 554
Piscator I: 754 / II: 335
Pius XII. II: 502
Piva II: 823 825
Pjatakow II: 131
Pla I: 168 177
Planck II: 629 639f
Platon I: 7ff 127 223 389 396
566 / II: 98f 228ff 435 658f
661 667 855 879
Plechanow I: 184 214ff 230
233 256 261 293 434 633f
638 650 656 672 684 696
II: 54 65 206f 209 243 245
662 669f 673 683 685 696
703 727
Plessner II: 58 65 648 651
Plinius d.Ä. I: 92
Pljuschtsch II: 767 770
Plon I:185 188
Plutarch I: 722
Pohlmann II: 94
Pokrowski I: 269 271 / II: 70
Pokrytan I: 270f
Pol Pot II: 464
Polanyi I: 208 320 448 451
463 520 525 527 544
Poledniak I: 651
Poliakov I: 748
Pollock I: 768 773
Polyklet II: 227

Ponomarjew II: 133
Popper I: 516 519 / II: 630
635f 640 688 692
Portelli II: 502 504
Postel-Vinay I: 186
Postlethwayt II: 2
Postman II: 858
Postone I: 363
Pott II: 105
Potthoff I: 441
Potts I: 544
Poulantzas I: 6 47f 50 182
185f 495 557 623 628 645
648 780f 783f 797 799
II: 47 49 92f 95 263 267 289
318 330 399f 427 430 565f
568 649 760-3 765 777 787
Pozzoli I:103 533 / II: 727
Pracht I: 651 660 672 681
II: 51 54 61f 65
Prebisch II: 601f 605 839
Preiswerk I: 32
Premack I: 69
Preobraschenski I: 80 82 99
103 509 512 / II: 73 363 419
429 849 854
Prescott II: 827
Prestipino II: 524 527
Prévost II: 339
Priester I: 805 807 / II: 527
Priewe I:183
Prigge II: 747
Pro II: 140
Pröhl I: 55
Prokop I: 651 / II: 62 64f
Prometheus I:765
Proudhon I: 44 206 210 212
216 396 430 459 463 570
615 618 640 648 705 736
751 / II: 4f 21 30 155 283
289 381 394 568 775 783
787 804
Proust, I. II: 309
Proust, M. II: 877
Przeworski I: 202 205 560
Puchta II: 530
Pufendorf II: 383

Quack I: 597 600
Quaisser I: 82
Quesnay I: 93 103 / II: 275
773 787
Quinteros-Yañez II: 840

Rabehl I: 322 325f 807
II: 169
Rabkrin I: 466
Radek I: 328 338 483f 550
Radjavi, K. I: 495
Radjavi, W. I: 6
Raffael II: 240f
Ragaz II: 498 502
Ragon I: 606f
Rahner II: 144 503
Raich I: 400
Ralzewitsch II: 697
Rammler II: 53 65
Ramnstedt II: 447 451
Rancière I: 185 187 191 271
Rank I: 282
Ranke II: 713
Raphael I: 604 607 / II: 244f
Rasch II: 358
Rasputin II: 75
Rastjannikow II: 605 848 854
Ratnam II: 462 465
Rattansi I: 567f 582
Rau II: 267
Rauh II: 700 703
Raulf II: 758 765
Raum I: 652
Ravaioli II: 822 825
Ravera II: 822f 825
Raymond I: 185 187f 190f
Read II 244f
Reagan II: 270
Red II: 554

Redeker I: 651 672 / II: 53 65
Redlow II: 677f 692
Reese I: 441
Reese-Schäfer II: 450f
Reeve I: 743
Regin I: 220
Rehmann I: 342 344 687
II: 465 495 504
Reich, J. II: 650
Reich, M. I: 543 544
Reich, W. I: 289 322 330
II: 463 465 757
Reiche I: 322 326
Reichelt I: 62 64 495 / II: 159f
Reichenbach, H. II: 200
Reichenbach, M. II: 200
Reif I: 376
Reiners I: 340
Reinfeldt I: 191
Reisberg I:271 / II: 211
Renner I: 108 116f 119 461
463 756 759f 763f / II: 19
21 296f 299 301
Resch I: 189-91
Reschke I: 651 / II: 108 115
Resnikow II: 107 115
Rétat II: 310
Reumann II: 450f
Reverdy II: 705
Rey I: 72 75 / II: 840
Ricardo I: 35 53 94 198f
226 264 268 299 365 403
411446 516ff 533 608 688
691 736 / II: 4 16 22 24 27
275 619 812 817
Richards II: 96 115
Richet II: 398
Richta, R. I: 796 799 / II: 596
599
Richta. S. II: 845
Richter, G. II: 693
Richter, H. I: 270f / II: 783f
787
Rickert I: 61 757
Ricoeur I: 223 233 / II: 143
Rida' I: 396
Rideau I: 211
Riechers I: 166
Riedel II: 302 310 358 382 386
394
Riehl II: 394
Rienecker I: 652
Rilling I: 136 141
Rinderspacher I: 599f
Ringer II: 246f 252
Risse II: 660
Ritsert I: 264 271
Ritter, G. A. I: 472
Ritter, J. I: 233
Rivera I: 607
Rizzi II: 421 426 430
Rjasanow I: 233 382 634 638
Robbe I: 401
Robelin I: 428
Robespierre II: 192 387 709
Robin I: 186 / II: 738 742
Robinson, C.J. II: 261
Robinson, J. I: 182f 201
II: 785 787
Robinson, J. G. II: 92 95
Roche, D. II: 323 330
Roche, W. I: 600
von Rochow I: 502
Rocker I: 210 218
Rodbertus II: 101 275
Rödel II: 549f
Rodinson I: 363 748
Rodney II: 260f 601 605
Roemer I: 201 203-5 739 741
743
Roesner I: 651 672 / II: 61 65
Röhr I: 162 233 245f 249
Roig II: 140 144
Rojas I: 263 271 613
Rolfes II: 504
Romanes II: 505
Römer, M. -L. II: 787
Römer, P. I: 27 / II: 550
Ronai I: 762
Roorda II: 312 330

Roosevelt I: 439
Roover II: de 21
Rorty II: 143
Roscher I: 228
Rosdolsky I: 103 361ff 691 693 / II: 159f
Rose, H. II: 257
Rose, R. II: 95
Rose, S. II: 257
Rosenbauer II: 358
Rosenberg I: 441 / II: 282 544 550 556 560 568
Rosental I: 55 200f 294 297 382ff / II: 677 692f 700
Rosenthal I: 396f
Rossanda II: 49 767-70 825 845 847
Rossi, A. I: 606f
Rossi, M. II: 523 527
Rossi, P. II: 393
Rostow II: 600 605
Rotelli I: 355
Roth, G. I: 69 / II: 393
Roth, K.H. I: 553
Roth, R. II: 371 380 394
Roth, V. M. II:777 787
Rottländer II: 591 495 504
Rötzer II: 65
Rousseau I: 38 135 250 721 725 / II: 383 394 525f 646
Rowbotham I:159 162 II: 755f
Roy, J. II: 436
Roy, M. N. II: 483 600 605
Royle II: 470
Ruben, D.-H. I: 55 / II: 692
Ruben, P. I:16 18 21 136-41 246 / II: 200 521f 690 692f 700 703
Rubin I: 61f 64
Rubinstein I: 249 417 / II: 121 127 586 589
Rubzow I: 605 607
Rucht II: 371
Rückriem II: 586 588
Rüddenklau I: 419 421
Rudé II: 470
von Rüden I: 470 472 478 481
Rudnick II: 267
Ruge, A. I: 708 721 / II: 802 860
Ruge, W. II: 208 211
Rühle, H. II: 568
Rühle, O. I: 461 463
Rülcker II: 447 451
Ruoff II: 356 358 691f 719
Rürup I: 748
Ruse II: 509
Rustow II: 462 465
Rweyeman II: 601
Ryschkow II: 133
Šik I: 270f / II: 845 847
Saage II: 612 847
Sabaouk I: 651
Sabiny I: 69
Sable I: 560
Sablowski I: 102f 627 / II: 49
Sa'd I: 400
Sacharow II: 766 769
Sa'Td I: 397 401
Sacks I: 162
Sacristan II: 436
Said, A. M. I:401
Said, E. II: 274
Saint Just II: 387
Saint-Simon I: 227 298 396 545 639f 736 800 / II: 4 29 750 753
Sakowski II: 75
Salazar Bondy II: 139f
Samuelson I: 739 743
Sandberg I: 604 607
Sandford I: 799
Sandkühler I: 19 21 55 257 261 376 672 764 / II: 266 597 599
Sanio II: 27
Santos II: 140
Saragat I: 7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2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俞可平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ISBN 978-7-100-18016-0

Ⅰ. ①马… Ⅱ. ①沃… ②俞… Ⅲ. ①马克思主义—词典 Ⅳ. ①A8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9580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二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寰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8016-0

2021年4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55 1/4

定价：286.00元

上架建议：马克思主义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8016-0

9 787100 180160 >

定价：286.00元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三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层面至极端主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三卷

北京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项目

800余位学者为本辞典的编写做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三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从层面至极端主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Herausgegeben von
Wolfgang Fritz Haug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d. 3: Ebene bis Extremismus

©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2023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InkriT.

Colombe aux quatre profils entrelacés, 1951.
Pablo picasso © Succession Picasso 2018

E-mail-Adresse der redaktion （编辑部邮箱地址）: hkwmred@mail. zedat. fu-berlin. de

第三卷顾问及编委会名单

总顾问：

郝　平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龚旗煌　北京大学校长

顾　问：

陈宝剑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　博　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　编：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殿利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丰子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东茅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教育学院教授

朱良志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仰海峰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

宇文利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　河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沈红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主任

张文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

张异宾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张志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小文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

赵家祥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敦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段忠桥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顾　青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

顾海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德文版第三卷工作人员名单

编辑部：

丹尼尔·巴本　罗尔夫·切斯克莱巴-杜邦　弗里加·豪格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托马斯·劳格施廷　托马斯·马克斯豪森　蒂尔曼·赖茨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

托马斯·韦伯　乌尔里希·魏斯　冈特·维林

学术顾问：

萨米尔·阿明（达喀尔）　特奥多尔·贝格曼（斯图加特）　弗兰克·坎宁安（多伦多）

伊藤成彦（东京）　詹明信（达勒姆／美国）　米夏埃尔·克拉特克（阿姆斯特丹）

乔治·拉比卡（巴黎）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乌尔比诺）　君特·迈尔（柏林）

伊萨贝尔·莫纳尔（哈瓦那）　佩德罗·日瓦斯（马德里）

加夫列尔·巴尔加斯·洛萨诺（墨西哥城）　巴斯蒂亚安·维伦加（马杜赖／印度）

弗里德·奥托·沃尔夫（布鲁塞尔）　殷叙彝（北京）

在辞典研讨会上，还有以下人员参与：

贝蒂娜·埃尔哈特　罗伯托·菲内斯基　宝拉·福拉博斯基　罗尔夫·黑克尔

乌韦·希施费尔德　斯特凡·胡特　郭卢元（No-Wan Kwack，据韩语音译）

权钟林（Jong-Im Kwon，据韩语音译）

统筹协调：

托马斯·韦伯

外语校对：

卡里姆·阿萨迪　阿米尔·哈姆扎维　安德里亚·克雷尔　乌尔里希·梅勒姆（阿拉伯语）

詹明信　丹加·维雷希斯（英语）

杰拉德·邦苏桑（法语）

佩德罗·日瓦斯　蒙特塞拉特·加尔塞兰（西班牙语）

冈特·维林（俄语）

贝蒂娜·格兰佐　殷叙彝（汉语）

翻译：

纳娜·巴登贝格　丹尼尔·巴本　克里斯蒂安娜·艾特尔　克劳斯·弗里克

乔治奥·贾科马齐　卡特里·格吕内普特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斯特凡·胡特

彼得·耶勒　托马斯·劳格施廷　沃尔夫冈·迈尔斯　瓦伦娜·莫姆森

蒂尔曼·赖茨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　卡廷·施密特　约阿希姆·维尔克

修订：

索尼娅·豪斯曼　克里斯多夫·克尼斯特（古希腊语）　霍尔格·莱德希

埃丽卡·绍尔曼

姓名索引：

郭卢元（No-Wan Kwack，据韩语音译）　权钟林（Jong-Im Kwon，据韩语音译）

沈勇玉（Yong-Ok Shim，据韩语音译）　卡米尔·乌鲁达

总　序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之一，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而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兴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图谱。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叶诞生后，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大量的反对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如果要有足够的知识力量，就必须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对于当代的学者来说，研究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础文献，首先是MEGA（*Marx-Engels Gesamtausgabe*），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其次便是HKWM（*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即《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正如蒙蒂·琼斯顿（Monty Johnstone）所说：MEGA和HKWM互为补充[①]。《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概念的深度阐释，不仅凝聚了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心血，也反映了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是迄今最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豪格夫妇（Wolfgang Fritz Haug和Frigga Haug）、P.耶勒（Peter Jehle）和W.考特勒夫（Wolfgang Küttler）等4位德国学者在编译G.拉比卡（Georges Labica）主编的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titique de marxisme*）的基础上，发起编辑了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编纂时间最长，也最具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大辞典》原计划撰写1200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概念，后来逐渐增扩至1500个，卷次也从原计划的12卷扩至15卷，而且

---

① 蒙蒂·琼斯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互为补充》（"HKWM and MEGA Complement Each Other"），《MEGA研究》（*MEGA-Studien*），1995年第2期。

从第 6 卷开始，每卷均分为上下两册。这样，整个《大辞典》的规模实际上将达到 15 卷 25 册。截至 2018 年 5 月，已经出版德文版共 9 卷 13 册。另有 6 卷共 12 册尚未出版。

《大辞典》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除了规模大和时间长的特点外，《大辞典》还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跨学科性。《大辞典》所选录的 1500 多个关键概念，几乎横跨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哲学、文学、史学、美学、法学、神学、伦理学、语言学、修辞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学、军事学，等等。相应地，这些关键概念的作者也分别来自上述哲学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不同观察。第二，国际性。尽管《大辞典》的原文是德文，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际性的研究和出版计划。“迄今，它已经成为一个包括 80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参与的国际性项目。”[①] 不仅有发达国家的作者，也有发展中国家的作者；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为了突出其国际性，编者还在《大辞典》的每个德文词条上分别注上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的译名，甚至还包括中文译名。《大辞典》每出版一卷，就会有一些重要条目在英文版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发表。第三，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其批判性。《大辞典》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这一特征，将批判性作为贯穿于整个辞典的一条主线，并体现于《大辞典》的书名之中[②]。正如欧洲劳工研究所的乔恩·詹森（Jorn Janssen）在书评中所说，“《大辞典》旨在提供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③]。这里的“批判性”，主要是指理性的审视和独立的评判：既不屈服于权力的淫威，也不屈服于世俗的利益，而是秉承客观的和科学的精神，对当代世界和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做出独立的分析与判断。鉴于这种批判精神，丹麦的著名社会学家 G. 索邦（Göran Therborn）赞赏说：《大辞典》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百科全书”，是知

① 参见 P. 托马斯（Peter Thomas）：《〈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介绍》（“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ritical Dictionary of Marxism*”），《历史唯物主义研究》（*Historical Materialism*），第 13 卷第 235 页。

②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德文原文是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其中的 kritisches 译成中文本来就有“批判的”意思，但此处的“批判”不含有中文语境中的政治意义。

③ 乔恩·詹森：《〈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书评》，《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2016 年 2 月 15 日。

识分子“拒绝屈服的唯一榜样”[①]。

以豪格教授为主要负责人的《大辞典》核心编纂团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群体，他们的奉献和敬业精神，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榜样，也是所有严肃学者的榜样。《大辞典》的编纂计划始于1983年，那时“两德”尚未统一，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主要来自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这是一群独立的学者，他们既不是东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东德政府不可能支持他们；他们也不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主流学者，西德政府也不支持他们，连德国的科学基金会（die 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也“拒绝资助这部辞典”[②]。他们把编撰《大辞典》当作自己终生的事业，依靠社会捐助和自我奉献，坚忍不拔地开展工作。在过去35年中，他们锲而不舍，前赴后继，努力推动着一卷又一卷《大辞典》的出版。尽管困难比想象的更大，进度比计划的更慢，但他们丝毫不减严肃认真的学术精神。《大辞典》第一卷的编撰出版，居然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从1983年开始，到1994年才得以面世。其间有些作者已经离开了人世，至少有7位作者“已不能亲历本辞典第一卷的出版”[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所有学者学习。

正是豪格先生这个核心团队的这种高尚的学术精神感动了我，促使我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的协调工作。我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研究重心转向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本来已经没有计划再从事其他领域的研究。2017年10月，经德国友人推荐，豪格先生与我在柏林自由大学初次见面，他表达了出版《大辞典》中文版的热切愿望。回国后我专门向学校进行汇报，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郝平书记、林建华校长担任《大辞典》中文版总顾问，于鸿君常务副书记、王博副校长任顾问，学校委托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了《大辞典》中文版编辑委员会，杨河教授兼任主任。

尽管据说全国有500多家马克思主义学院或研究机构，6万—7万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专业人员，但懂得德语并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高水平专家却凤毛麟角。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公开向全国发出招聘高水平译者的邀请，

① G. 索邦：《从马克思到后马克思主义》（*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维索出版社（Verso）2008年版，第174页。

② 沃尔夫冈·豪格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第一卷，德文版“前言”，第6页；见本书“前言”第7页。

③ 同上书，德文版“前言”第5页；见本书“前言”第6页。

最终有近30名学者加入到《大辞典》中文版的翻译队伍中。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才使这部高深而浩繁的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得以陆续呈献给中文读者。《大辞典》的德文版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作，其中文版也同样如是。幸赖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同仁的全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大辞典》的中文版才能顺利编译出版。作为《大辞典》中文版的主编，我对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专家学者、各界朋友和编辑部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俞可平

2018年3月11日

德文版前言

一

正如布莱希特所言，走过群山的坎坷，又踏上平原的艰辛（布莱希特原文指经过反法西斯的艰苦斗争以后，要在民主德国从头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平原”[Ebene]在德语中还有“层面”的意思，是本卷的第一个词条。——译者）。1983年，当我们讨论这套辞典的第一稿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各种不可触碰的禁忌，就好像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一样，以其绝对主义的哥特式风格耸立在我们面前。几年后，永恒的建筑倒塌了，这场灾难不分彼此，错误的废墟下也埋藏着正确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考证项目在此时突然间获得了拯救性批判（rettende Kritik）的意义。然而直到今天，依然有许多新的障碍挡住了它的道路。在冷战胜利者妄想自己处于历史终结的时代，不仅对马克思以及每一种马克思主义，甚至对介入的思考和理论的批判本身，人们都因失望而选择背离。

前两卷的编纂，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收获了出乎意料的惊喜。从“国家的消亡”到“愚蠢”——仅这一串术语就值得在《明镜》（*Spiegel*）上报道。在后共产主义格局下，没有什么比计划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证辞典显得更荒谬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黑格尔误导人的说法，所谓“密纳发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分起飞”，也无济于事。胜利者拒绝失败者的反思，而失败者自己也集体放弃了希望。

虽然辞典的编辑们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开辟后备力量，迎难而上，但无法掩盖的问题是，本卷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的产物，艰辛的付出犹如撒哈拉沙漠般望不到头。资金支持在这个时候显得尤为重要，技术工作已然超过了理想主义牺牲精神的时间极限。

本卷是在新的机构背景下出版的，这表明我们正在努力通过基本的财政支持使工作得以长期继续。成立于1996年的非营利性的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InkriT: Berliner Institu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e.V.）承担着这样的职能。就像狄德罗（Diderot）的

《百科全书》曾经被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用来反抗专制主义一样，今天我们也努力探寻超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市场专制主义的公民社会的要素。

II

二

第三卷论述114个关键词，其中7个分多篇文章论述（如“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有3篇文章），以纠正无法避免的片面性。有99位作者做出了贡献。遗憾的是，与第二卷相比，女性作者的比例从11人下降到10人。令人欣慰的是，外国作者的比例和东德作者（他们的工作在第一卷中还没有得到充分呈现）的比例各增加了一半左右。

这一卷的体量较之前大约增加了三分之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对前两卷中遗漏的关键词用其他名称（用Exklusion[排除]代替Ausschließung，用Existenz[存在]代替Dasein）或其他组合（用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ines[个别、特殊、一般]代替Allgemeines und Besonderes[一般和特殊]）的方式进行了补充。内容的增加主要来自关键词网的细化。在本前言第一部分所使用的以E开头的概念中，有不少于7个出现在了词条里（层面[Ebene]、历史的终结[Ende der Geschichte]、失望[Enttäuschung]、规划[Entwurf]、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密纳发的猫头鹰[Eule der Minerva]、永恒[Ewigkeit]）。只需查看这些词在书中与其他词的互见，就可以证明上述细化的成果。毕竟，E不仅仅是德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母；作为首字母，它还掌管着政治理论词汇中丰富的尤其具有历史批判意义的概念。

一些关键词来自哲学语言（统一、折中主义、经验主义、外化、发展、认识论、经验、认识、现象、伦理学、明见性、存在主义），另一些则来自20世纪的政治及其灾难性的动荡（拯救、非殖民化、非纳粹化、发展中国家、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欧洲一体化、灭绝主义、极端主义），或者工人运动特有的语言（统一战线、五一节、伦理社会主义）和左派的批评（国家主义、本民族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自我批评（革新）。由于是按照字母顺序来安排词条的，这一卷没有涉及多少女性运动和女权主义的东西，但在第四卷中，同样是字母顺序的原因，我们将到有六分之一的词条都来自这个领域。

诸如“解放”和“异化”等词条尚在大家的意料之中，但其他一些术语在一马克思主义的辞典中出现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特别是对于那些还对马列主义手

册有记忆的人来说，他们也许要刮目相看。一些词条涉及社会存在的基本范畴（利己主义、寂寞、贫困、吃饭），一些词条涉及知识实践的社会政治意义（介入的思考、象牙塔、介入、遗产、记忆工作、伦理—政治的），还有一些词条涉及审美实践（移情、叙事戏剧、表现主义论争）或当代哲学和历史神学范畴（回忆、祛魅、记忆、拯救）。遵循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会看到相关的术语（铁的工资规律，所有制、财产，简单/复杂劳动，简单商品生产，简单流通，剥夺、没收，超额利润）；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的词条还是会让人感到惊喜。

三 III

在某种意义上，以概念编码和以理论透视经验的方式来开启一部包罗万象的书，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诚然，经典文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材料已然经过大量加工。但马克思依旧像探针一样被使用着，在某些时候他可以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相提并论：他一次又一次地作为一个人物出现，一部概念戏剧围绕着他展开。对于马克思而言，这部戏剧同时也是一部尚未完成的历史剧。因为，比概念历史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的历史。

我们所期望于马克思的，不是解决所有问题，或提供一种真理，而是提供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启发和敏锐标准。正因如此，历史批判性的工作带来了不同于各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看似只是对死人传统的回顾，实际上却是将精神贯注于当下的沉着机敏（Geistesgegenwart）。正如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马科斯（Marcos）所指出的那样，年轻一代在开创自己的道路时，需要沉着机敏的能力。[①]

四

我们学术顾问委员会的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南北美洲可能形成了新的合作协调中心。在此，我们感谢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他们在这个项目的第一个十年中给予了有力支持。1995年，死亡带走了海因里希·陶特（Heinrich Taut），这位老当益壮的学者几乎在辞典工作坊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不得不哀悼里奥·科夫

①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Vom Machen der Wege«, *Argument* 217, 38. Jg. 1996, 647–52.

勒（Leo Kofler）、尤尔根·库钦斯基（Jürgen Kuczynski），以及澳大利亚理论家瓦尔·聚希廷（Wal Suchting），他为本卷（经验主义、认识论、实验）和下一卷（证伪主义）贡献了重要文章。我们失去了克劳斯·霍尔兹坎普（Klaus Holzkamp），他的思想出现在许多文章中；我们失去了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ek Mlynař）和马里亚特吉的研究者尤尔根·莫特斯（Jürgen Mothes），甚至未能见到他们的大作完成。

五

本卷相对于已出版的前几卷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有关拼写的变化需要加以解释。在正字法的新规则中，我们采用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合理的规则。尽可能按照单词的发音来编写是合理的安排，因此，只在表示元音发长音的地方，我们保留了字母 ß。形容词的拼写以它的词根名词为依据（存在 [Existenz]、存在的 [existenziell]）。大小写则基于名词（例如“关于”[in Bezug auf]）和形容词（包括从名字衍生出来的形容词：马克思的理论 [marxsche Theorie]）的区别来决定。在新规则要求
IV 分开拼写的地方，我们保留了将名词融入动词的可能（令人恐惧的形状 [furchteinflößende Gestalt]）。源文本（例如 MEGA 版本）继续以原文的拼写方式引用，经现代拼写方式处理的版本（例如 MEW）以调整后的方式引用。

六

感谢所有不顾一切考验、挫折和冲突，为本卷的成功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以及那些定期向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捐款支持本项目的人。为了使第四卷《从费边主义至反权力》的编写得以继续，柏林批判理论研究所呼吁以项目为基础为该卷提供资金支持。每捐赠 100 马克（可减税）就可以确保制作可付印的一页！如果您能响应我们的倡议，第四卷出版时将附有赞助者名单。此外，我们欣然接受关于内容的建议与合作的提议。

柏林，1997 年 8 月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凡 例

一、本辞典为德文版《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的中译本。德文版1983年开始编纂，自1994年出版第一卷以来，已经出版九卷十三册，另有六卷十二册尚未出版。全套十五卷辞典拟收录词目1500条，词目按照德文字母先后次序分卷册顺序排列。德文版辞典自编撰伊始，累计800余位学者（不限于德文作者）参与撰稿和编辑工作，辞典中文版各卷依据德文版，附有该卷撰写者简介和编辑名单。

二、本辞典中文版于2017年立项，由北京大学资助并组织编译，设有中文版编辑部。第一卷于2018年5月出版，第二卷于2021年4月出版。中文版的编译总体沿用德文版的卷册及词目编排，对于词目及个别词目内容的选录和删减，中文版编委会有决定权。

三、本卷（第三卷）条目录自德文版第三卷（总第三册），含德文首字母E之词目，即从“层面”（Ebene）至“极端主义”（Exterminismus），共计一百一十四条。

四、辞典词目使用中文、德文两种文字书写；本卷另沿用德文版成例列出其他五种语言的译名，置于中文德文词目之后。五种语言分别以字母AEFRS代表，其中A代表阿拉伯文，E代表英文，F代表法文，R代表俄文，S代表西班牙文。德文版第三卷中俄文以拉丁字母标识，中文版第三卷增加了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译文，以括号紧附拉丁文后。

五、中文版词目的编辑体例基本沿用德文版的格式。兹说明如下：（1）词目名称以中德两种文字书写，德文置于括号中。（2）德文版正文中以斜体字表示的重点词，在中文版中均改用黑体字表示。（3）正文中括注内的文字（个别词目附有评释），除引用文献的标题或缩写（在“参考文献”和“附录”中可找到文献的详细信息及全称）及篇章序号保留原文外，其余内容均翻译为中文。（4）每个词目末尾德文版均设有“参考文献”和“参见”两项，分别列出词目相关的参考文献，以及

可与该词条相参照的其他词目，中文版皆原文照录，不作翻译。(5) 辞典中文版边栏处用阿拉伯数字标识的边码，为德文版原书的页码。

六、对于辞典德文版的词目中文译名，中文版依据义理和译界长期形成的主流翻译进行了修订。本卷修订词目包括：(1) 词目“平等主义”，原译为“平均主义”；(2) 词目“所有制、财产”，原译为“所有，财产”；(3) 词目“简单 / 复杂”，原译为“简单的 / 复杂的”；(4) 词目“简单 / 复杂劳动”，原译为“简单的 / 复杂的劳动”；(5) 词目“回忆”，原译为“唤起记忆”；(6) 词目“介入式社会研究”，原译为“介入的社会调查”；(7) 词目“折中主义”，原译为“折衷主义”；(8) 词目“经验研究 / 理论”，原译为“经验 / 理论”；(9) 词目“介入”，原译为“投入”；(10) 词目“社会关系的总和”，原译为“社会关系的总体”；(11) 词目“脱嵌”，原译为“脱床”；(12) 词目“异化讨论”，原译为“异化的讨论”；(13) 词目“祛魅”，原译为“解魅”；(14) 词目“土地”，原译为“地球”；(15) 词目“爱欲”，原译为“性爱”；(16) 词目“伦理学”，原译为“伦理”；(17) 词目“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原译为“社会主义中的伦理”；(18) 词目“词源学”，原译为“语源学”；(19) 词目“明见性”，原译为“明证”；(20) 词目“进化经济学”，原译为“进化的经济学”；(21) 词目“表现主义论争”，原译为“表现主义的争论”。

七、辞典中文版标点符号的使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目　录

E

层面（Ebene）.....1
教育主义（Edukationismus）.....11
平等主义（Egalitarismus）.....17
利己主义（Egoismus）.....27
婚姻（Ehe）.....34
铁的（ehern）.....42
铁的工资规律（ehernes Lohngesetz）.....47
荣誉工作（ehrenamtliche Arbeit）.....52
独立工作（Eigenarbeit）.....58
本真性（Eigentlichkeit）.....64
所有制、财产（Eigentum）.....70
简单 / 复杂（einfach/komplex）.....75
简单 / 复杂劳动（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82
简单商品生产（einfache Warenproduktion）.....104
简单流通（einfache Zirkulation）.....111
移情（Einfühlung）.....117
回忆（Eingedenken）.....130
介入的思考（eingreifendes Denken）.....138
介入式社会研究（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143

统一、统一性（Einheit）.....147
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170
收入（Einkommen）.....175
寂寞（Einsamkeit）.....180
个别、特殊、一般（Einzelnes, Besonderes, Allgemeines）.....186
折中主义（Eklektizismus）.....198
电气化（Elektrifizierung）.....209
元素、元素形式（Element, Elementarform）.....215
新社会的要素（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221
贫困（Elend）.....226
象牙塔（Elfenbeinturm）.....230
精英（Elite）.....236
解放（Emanzipation）.....240
移民（Emigration）.....256
经验研究 / 理论（Empirie/Theorie）.....262
经验主义（Empirismus）.....282
历史的终结（Ende der Geschichte）.....291
最后解决（Endlösung）.....304
能量（Energie）.....319
介入（Engagement）.....325
恩格斯主义（Engelsismus）.....337
英国革命（englische Revolution）.....345
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358
外化（Entäußerung）.....377
脱嵌（Entbettung）.....384
剥夺、没收（Enteignung）.....389
异化（Entfremdung）.....403
异化讨论（Entfremdungsdiskussion）.....411
热情（Enthusiasmus）.....421
非殖民化（Entkolonisierung）.....424
非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427

加入主义（Entrismus）.....438
熵（Entropie）.....444
决定（Entscheidung）.....453
失望（Enttäuschung）.....457
发展（Entwicklung）.....471
发展中国家（Entwicklungsländer）.....483
规划（Entwurf）.....495
祛魅（Entzauberung）.....502
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515
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epigonaler Stalinismus）.....528
叙事戏剧（episches Theater）.....532
认识论（Epistemology）.....544
时代（Epoche）.....562
遗产（Erbe）.....581
土地（Erde）.....596
经验（Erfahrung）.....605
记忆（Erinnerung）.....614
记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625
认识（Erkenntnis）.....631
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635
拯救（Erlösung）.....651
革新（Erneuerung）.....664
爱欲（Eros）.....671
社会主义的成就（Errungenschaften des Sozialismus）.....679
现象、表现形式（Erscheinung, Erscheinungsform）.....690
五一节（Erster Mai）.....705
教养 / 教育（Erziehung）.....709
秘传的 / 非秘传的（esoterisch/exoterisch）.....716
吃饭（Essen）.....723
国家主义（Etatismus）.....733
伦理学（Ethik）.....746

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Ethik im Sozialismus）.....765
伦理社会主义（ethischer Sozialismus）.....772
伦理—政治的（ethisch-politisch）.....778
民族、民族性（Ethnie, Ethnizität）.....783
民族学（Ethnologie）.....792
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zentrismus）.....797
某物（etwas）.....799
词源学（Etymologie）.....809
优生学（Eugenik）.....817
密纳发的猫头鹰（Eule der Minerva）.....833
欧洲共产主义（Eurokommunismus）.....841
欧洲（Europa）.....853
欧洲一体化（europäische Integration）.....858
欧洲策略（Europastrategien）.....870
欧洲中心主义（Eurozentrismus）.....880
明见性（Evidenz）.....889
进化（Evolution）.....908
进化主义（Evolutionismus）.....913
进化经济学（evolutorische Ökonomie）.....920
永恒（Ewigkeit）.....930
不有（Exappropriation）.....941
实例学习（exemplarisches Lernen）.....949
存在（Existenz）.....955
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us）.....964
排除（Exklusion）.....978
生产的排泄物（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986
实验（Experiment）.....996
表现主义论争（Expressionismus-Debatte）.....1009
外在性（Exteriorität）.....1025
灭绝主义（Exterminismus）.....1030
超额利润（Extraprofit）.....1034

极端（Extreme）.....1038
极端主义（Extremismus）.....1047

附 录

词目及作者.....1054
本卷作者简介.....1057
德文版编写体例.....1065
缩写.....1067
名词索引.....1092
第二卷勘误表.....1126

中文版第三卷译后记.....1127
引文版权说明.....1130

E

1 层面（Ebene）

A: mustawā.

E: level.

F: niveau.

R: ploskost' (плоскость).

S: nivel.

“层面”是常用的但通常从不专门加以解释的地形学（topisch）隐喻（参见如“上层结构”[Aufbau]、“基础/上层建筑”[Basis/Überbau]、“表面/深层”[Oberfläche/Tiefe]、“内在/外在”[innen/außen]、“上/下”[oben/unten]）之一，思维通过地形学的隐喻，空间性地表述其认识客体的各种结构、方面或维度，从而将自身组织起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他的地形学层级模型中把“功能意义上”的空间性和“解剖分析意义上”的空间性区分开来，并反思“当人们真正空间地、地形学地想象心理过程时所产生的困难”（*Das Ich und das Es*，GW 13，第246—247页）。认识论的任务是澄清这些术语的适用性，澄清思维规定与物质规定的关系，尤其要分析这类隐喻的界限，隐喻一旦越过界限，要么会成为认识的障碍，要么会产生虚假的自明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使用“层面”这个词，但他们在实质上作出了相应的区分：“微观”上有对不同方面和立场的分析；宏观理论上则主要有基础—上层建筑理论。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Hegemonie）理论立足于对上层建筑即上层结构（Superstrukturen）的两个层面的区分。特别是对阿尔都塞（Althusser）学派而言，以及对霍尔茨坎普（Holzkamp）所建立的批判心理学（Kritische Psychologie）而言，“层面”是规定特定难题与认识客体不可或缺的概念。

1.“层面”的作用是表明复杂性。重点首先在于科学研究者的活动：于是便有了各种“研究层面”。因为每个研究层面都是在特定的“视角”下，抽象掉其他视角后展现出来的，所以有各种“抽象层面”。每个特定的见解都会（方法论上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暂时地）忽 2

视其他“方面”，因而是一种抽象的强调。但“观点”必须要使自己符合待认识对象的活动或结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于是便有了各个“功能层面”或“结构层面”。为了对应古代哲学对本质/现象的区分，（人们）通常会在谈到“虚假意识”时使用“现象层面”这个说法。

“层面”的图像让人想到多个水平“剖面”（Schnitte）垂直排成一列，暗示这些层面中存在着等级。要克服这个暗示中所蕴含的危险，就要通过对方法论—行动方面的强调来防止“客观主义”的理解。

诸层面不是“给定”的存在；它们同切面一样，由待认识的具体对象设定。这里的问题总是在于一个“整体”（Ganzes），整体只能作为“被划分者”、在自身中有区分者，用推理加以把握并根据一定方法加以研究。越是强调划分，对“整体”的“环节”（Glieder）、“层级”（Instanzen）或“要素”（Momenten）之间关系的分析就越重要；若要强调“总体性”（Totalität），则这种分析就会让位于整体性的表述。

2. 马克思在他对认识论的思考中，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 57）论方法的一章中明确指出，复杂整体从来不能直接地思考，而只能通过“许多规定的综合”（MEGA II.1，第36页；MEW 42，第35页）来思考，这些规定要通过抽象获得。如果任意地进行抽象，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一句“空话”；如果抽象以客观分析为依据，那么它就是对一个可多方面观察的对象的“单方面的”思维规定。作为一种有效的抽象，它“固定”住了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关系”“规定”或“个别要素”。正如“实在抽象”不同于“形式抽象”，“抽象物”具有经验的一面：它“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第37页；第36页）。这种整体是被结构化或被划分的。那么，“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之类的说法就没有意义了，而应当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第35页；第34页）。生产在此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但“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比如市场决定于生产，但在市场扩大等情况下，生产也决定于市场（同上）。

研究可以立足于这些“要素”——马克思也称之为“范围”（Sphären）——的其中之一，从而展现出一个“方面”（例如有别于“形式规定”的“物质方面”）。马克思通常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作为”（qua）来表达这一点：“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MEW 23，第 211 页）马克思注意到，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会由于这种经济学家的视角转换而“分裂为两重身份”：“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26.1，第 383 页）马克思指出：“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看，实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第 384 页）因而这是建立在事实（但要理解为事情、作为实践的事实）之上，并注入社会意识（“国民经济学”）之中的“表现方式”，问题就在于用方法将这些表现方式表述、综合为一幅整体图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过程多样地分化，分解为各种功能层面和部件，特殊的资本主义立场也同样是多样的。从任何立场出发都存在相应于功能层面的特定的区分，作出这些区分就是经济学的要求。”（Haug 1973，第 165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中，马克思反思了权利用以计量“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的机械同一尺度。马克思质疑这是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 4
“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MEW 19，第 21 页）。

3.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斯大林主义早期逐渐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突破，集中体现为他对“上层建筑”的分解。一方面，他将其分解为相互竞争且共同起作用的并存的上层结构；另一方面，他也将其区分为与此相反的两种层面：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Gef* 7，H. 12，§1，第 1502 页；“层面”[*piani*]，克里斯蒂安·里歇斯[Christian Riechers]译为“层”[Stockwerke]，*Ri*，第 412 页；罗伯特·帕里斯[Robert Paris]的法译本译为类似含义的 étages，第 314 页）。需要彻底区分的是“不同的层面（[gradi]，本义“级”[Stufen]、“度”[Grade]，给抽象的剖面附加了一种“分级”序列的表象；里歇斯交替地翻译为“分级”[Abstufungen]、“级”、“度”和“初级”[Grundstufen]，参见 *Ri*，第 291、319 页；帕里斯译为 degrés，第 373 页），在这些层面上能产生双重的视角，从最基本的到最复杂的层面……理论上都可以化约为两个根本的层面：强迫与共识、权威与领导权、暴力与文

化、个别环节与普遍环节（‘教会’与‘国家’）、煽动与宣传、战术与战略等层面”（*Gef* 7，H. 13，§14，第1553—1554页）。为了避免经验主义的误解，葛兰西强调这个区分具有方法论—抽象的性质：“但实际上这个区分是纯粹方法论上的，不是有机的，并且在具体的历史生活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是完全同一的。”（3，H. 4，§38，第498—499页）他用“整体国家”（integraler Staat）这个概念概括两个层面的统一。市民社会层面的定义是与“领导权形成”相关的社会团体、话语与媒介的总和，但它并不涉及这些事物的经验具体性，而只是就其与领导权相关而言。

葛兰西认为，若要“从根本上说明政治科学与政治艺术”，关键就在于研究“如何分析‘局势’，即如何确定一种力量关系的不同层面”：“经验观察所得到的各种要素，在政治科学论文中通常呈现为杂乱无章……，只要不是抽象的或飘浮在空中的问题，就应当在力量关系的不同层面上确定它们的位置，这
5 番工作从国际力量关系开始……，是为了过渡到客观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政治的与政党的力量关系（国家内部的霸权体系）以及直接的政治（或潜在的军事）局势。”（7，H. 13，§2，第1540—1541页）实践哲学不必像黑格尔那样在“绝对精神的诸环节间”作出区分，“而是要在上层结构的诸层面间作出区分，因此问题就在于把政治活动（以及相应的科学）的辩证位置确定为特定的上层结构层面”（§10，第1547页）。但葛兰西也以“历史集团”（geschichtlicher Block）的概念反思了“上层结构各层面间的循环”（同上）。为了分析力量关系，应当区分下列“环节或层面”：（1）一个“与结构紧密相连的社会力量关系，它是客观的且独立于人的意志”；（2）本身一再“出现在不同层面上”有待分析的狭义的政治力量关系，这里政治上最重要的形式“不在团体的，而在‘普遍’的层面上提出问题，并以此产生出一个主要社会群体相对于一系列从属群体的霸权”；（3）军事力量关系，但在这一关系中也要“区分两个层面：狭义的或军事—技术意义上的军事层面以及可称作军事—政治的层面”（§17，第1560页及以下）。葛兰西谈到不同层面对权力关系而言有决定意义的共同作用时，正如他通常使用的“形势”（konjunkturell）概念（参见§17，第1556页，在“机会决定的、直接、偶然”的意义上）一样，使用了“战略形势”（strategisch Konjunktur）这个军事科学概念（§23，第1548页）。这个概念经过“结构主义”转向，成了阿尔都塞学派的关键概念。

4. 阿尔都塞学派。4.1“层面”（*niveau*）这个概念对阿尔都塞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基本上将它当作“层级”的同义词使用。阿尔都塞暗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 59*）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主张：“马克思把任何社会的结构都设想成是由不同的‘层面’或‘层级’所构成的……：下层结构或经济基础（l'*infrastructure* ou base économique）……和上层建筑（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上层建筑又包括两个‘层面’或‘层级’：一个是法律—政治的（法和国家），另一个是意识形态（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的、道
6 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等等）。”（*ISA*，第113页；1976，第74页）“这种表述除了有理论—教学上的好处……之外，还有这样一种决定性的理论优势：它使我们有可能把我所说的这些基本概念各自的作用力指数纳入这些概念的理论配置中。”（第113页）此处阿尔都塞谈的是不同层面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为了能够区分可能性、主导性与决定作用，并思考主导关系中的偏移，最终才能谈到生产方式“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字面义为“最后层级的决定作用”。——译者）（第114页）。

同时，阿尔都塞质疑这种表述的隐喻性质，这种表述“把一切社会结构都说成是一座大厦，它有一个基础，上面竖立着两‘层’上层建筑”。这种表述意味着“上层如果不是正好建立在它们的基础之上，是不可能独自‘矗立’（在空中）的”（第113页）。他认为这个隐喻的局限在于“始终是描述性的”。他超越这一点的办法是从再生产的角度研究上述层面，这是他意识形态理论的出发点。

20世纪60年代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FM*）和《读〈资本论〉》（*DKL*）里就已经拟定了带有某种“偏移”（参见Lipietz 1992，第12页）的上述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复杂（结构完备、划分好的）整体的认识方式。在《读〈资本论〉》里，对层面的分析使人得以探究“社会整体的不同‘层面’或层级之间的作用力（*efficace*）等级。因为每个层面本身是结构化的，所以，这种等级便是整体中当前（*en présence*）不同的结构化层面之间的作用力的等级、程度和标志”（*LLC* 2，第45—46页；参见*DKL* 1，第129页）。“不同的结构化层面——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等等——的共同存在，即经济基础（下层结构[*infrastructure*]）、法律和政治的上层结构、意识形态和理论形式（哲学、科学）的共同存在，不能再按照黑格尔的当前（*le présent*）的共同存在来思考。黑格尔的在场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在场，它意味着时间的当前性（*la présence*）与本质在其现象中的当前性是一致的。”（*LLC* 2，第 46 页；参见 *DKL* 1，第 130 页，德译文不可用）因此也不再可能“**在同一历史时代中**思考整体
7 的不同层面的发展过程。这些不同‘层面’的历史存在各有其不同的类型。相反，我们必须赋予每一个层面以**特有的时代**，这个时代是相对自主的，因而即使依赖于其他层面的各个‘时代’仍相对独立”（第 46 页；第 130 页）。这种结构上的“不同时性”对于“哲学史时代”（参见 Bloch GA 4，第 104 页及以下）而言，意味着这个时代“不能直接阅读出来”（*LLC*，第 49 页；第 133 页）：“当然，人们**看到**，在编年史中，哲学家**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于是就把这种顺序看作了历史本身。”但是必须努力“**建立哲学史时代的概念**”，为此“有必要确定现存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形态之间的特殊的哲学方面的差别：把哲学总体确定为从属于理论本身层面的东西”（同上）。

为了“有可能在‘相对’自主性中考察不同层面的历史”（第 53 页；第 138 页），阿尔都塞把“一个层面的当前”思考为“另一个层面的缺席，并且一种‘当前性’与众多‘缺席’的共同存在，无非是被划分的分散性（*décentration articulée*）的整体结构的结果”（第 53 页；第 137 页）。这里要避免重新陷入一个匀质时代的观念，好像可以根据这个时代来衡量那些不同的、相对自主的时代彼此的间隔。因而同时性的“本质的切割”（*coupe d'essence*）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像铁路时刻表一样分级排列，即并列于同一个时代的“不等的切割”（*coupe inégale*）。最终的问题在于生产方式的历史，取决于此的有“不平衡发展”、“遗存”（*survivance*）、“落后”（*retard*）（落后的意识）等概念（第 54—55 页；第 138—139 页）。

这对历史理论而言意味着需要一个“结合”（*conjoncture*）的理论。“整体的现实共存形态”包含着理解一个层面的功能特殊性的关键：必须“根据对整体起决定作用的结构来说明过度决定和不足决定”（第 56 页；第 140 页）。正是各结构层面间的这种链接关系与依赖性，由此“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个体系”（第 57 页；第 141 页）。

4.2 希腊的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在 1968 年密切地参与了《读〈资本论〉》的工作，但由于重新阅读葛兰西，他的思想发生了偏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完全致力于利用他们的政治实践”，而现在应当“把政治这个部分领域……单独置于理论**体系**的层面上处理”（第 17 页）。这是要“把政治严格定义为某种

既定生产方式的层面、层级或部分领域（*région*）”（第 15 页）。“历史主义”把政治理解为一种在所有结构层面起作用的推动变化的要素，与此相反，普兰查斯把“政治领域”规定为“**一个特殊的结构层面与一种独特的实践**”；这种规定也反对“臭名昭著的，以‘资产阶级科学 / 无产阶级科学’的二元图式为极端形态的理论层面过度政治化”（第 36 页）。阿尔都塞 1965 年在《保卫马克思》的前言中，援引“斯大林本人”批评这种“漫无边际地挥舞大旗”的做法（*FM*，第 18—19 页）。普兰查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把政治“不只理解为独特层面，还要理解为反映且浓缩了一种社会形态的诸多矛盾的批判层面，希望由此最为精确地阐明其论点——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发动机——的反历史主义性质”（第 38 页）。最后，考察“国家的秩序功能或组织功能可以发现不同的**模式**”：“它们涉及国家功能各自起作用的诸层面：经济层面上的技术—经济功能；政治阶级斗争层面上的直接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各层面特有的功能通过“一种整体的凝聚功能”（第 49 页）统合起来。

4.3 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自我批评地强调“阶级斗争的**不同方面**的辩证法，它们彼此实际上区分开来，又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因而它们并不像‘本质’与本质的‘现象’或‘诸现象’那样只是表面上区分开来）”（1977，第 318 页）。经济方面只是许多方面中的一个。“因此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不同于任何一种经济主义——本身就总是在一个抽象的层面上，标志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出的各种决定作用的复杂**统一体**。”（第 322 页）

5. **接受**。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P. 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以出色的反击回应了阿尔都塞的反历史主义：“他想象的不同‘层面’以不同的速率在历 9
史中来回疾驰，这种想象是学术的虚构。因为所有这些‘层级’和‘层面’在现实中就是人的活动、制度与理念。……我们说的‘特定关系’指的是特殊社会形态中按阶级构成的关系——这是阿尔都塞一般所忽略的、完全不同的另一类‘层面’——而阶级经验就同时表现在所有在这些‘层级’、‘层面’、制度与活动中。”（1980，第 148 页）他将阿尔都塞的理论比作一种“由一只不可见的手推动的星象仪”（第 154 页）。但他对“把整体分解为‘个别’部分（‘层面’‘层级’）的“拆解方法”一律反对（第 175 页），就像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普兰查斯反经济主义地将生产方式定义为“多种结构与实践形式”

各自特殊的结合，这些结构与实践形式“互相结合又表现为本身多样的层级或层面”（1974，第11页）。这是汤普森所无法理解的（第168页）。

在关于18世纪的研究（《辉格党和猎人》[*Whigs and Hunters*]，1977）中，汤普森“发现，法不会客客气气地停留在一个层面上，而是出现在每一个该死的层面上：它反映在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本身（以财产权、农业劳动规定的形式），同时也反映在洛克（Locke）的哲学当中；它粗暴地侵入陌生的范畴，戴上假发，穿上礼服，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再度登场；它和宗教一起跳交际舞并在泰伯恩（Tyburn）的戏院做道德说教；它是政治的手臂，而政治也是它的手臂之一；它是学院的一门学科，服从学科自己严格自律的逻辑；它既参与规定了统治者的自我认识，也参与规定了被统治者的自我认识；它尤其为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竞技场，在这里，它与围绕法的别种想象进行过彻底的斗争”（1980，第147页）。为了能描述法在所有其他层面上的存在，当然就必须区分法的层面和这些层面。事实上，汤普森的总结（如果不考虑夸大之处）更多是巧妙地具体化了而非反驳了阿尔都塞的尝试：将整体思考为被划分的。

阿兰·利皮耶茨（Alain Lipietz）把“调节学派”（Regulationist）称为阿尔都塞的“叛逆的孩子”，他们首先从阿尔都塞那里学会了“把历史思考为矛盾关系的一个织体，这些矛盾关系虽然互相过度决定，但它们在彼此关系中仍是自律的……。无论政治或意识形态都不是对经济力量的反映，实际上，这里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的多种‘配置’（Konfigurationen）”（1992，第9页）。利皮耶茨所接受的第二条思想是“去物化”（entdinglichend）观点，即生产力“本身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化”（第45页，德译文有改动）。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在与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争论时坚持区分“分析层面”，否则“积累制度”“调节方式”与“领导权结构”等概念就“不会从属于不同的抽象层面，而是会向同一个具体复杂的客体提供三个备选视角”。此外，他坚持分清“战略维度与结构维度”的关系（1988，第382—383页）。

调节理论的支持者如克劳斯·图尔克（Klaus Türk）在其经济社会学中对“参照系的分析层面”（第83—87页）作出如下规定：他把“经济的真实物质交换层面”同经济的“社会形态层面”与“经济调控层面”区分开来。考虑到下列事实，即作为系统的经济“只具有有限的自我再生产能力”并且需要“一系列经济之外但仍关乎经济的制度与意识

形态”，他还借鉴利皮耶茨与阿格列塔（Aglietta），引入了“调节层面”的概念。“真实层面、经济调控层面、社会形态层面与调节层面的整体系统构成了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第87页）

以著有《论意识形态》（*On Ideology*，1977）的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主要通过对葛兰西、阿尔都塞（麦克伦南[McLennan]等）与普兰查斯（克拉克[Clarke]等）的批判—建构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观点。类似的项目有受批判心理学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工程”（Projekt Ideologietheorie[PIT 1979]）。两者都批判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考虑个体的活动。对两者来说，对层面的分析以及对层面相对（但被过度决定的）独立性的思考都具有决定意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工程引发的争论，参见《重思意识形态》[*Rethinking Ideology*]）。

6. **批判心理学**。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在他的《心理学基础》（*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开头提出要“阐明哲学、社会理论、范畴和个体理论的参考层面”（第27页及以下）。这说明批判心理学不是心理学的个体理论或学校教育，而是“具有一种科学范式的性质”，这种范式“使个体科学/心理学的对象，在外在特性与内在结构中是明确可理解的，在范畴—方法论规定所组成的一个统一的、按照对象进行划分的系统中是可再现的，如此才能在个体理论—现实经验层面上进行可科学判定的分析……，从而实现……科学进步”（第32页）。为此，应当使“‘层级’‘维度’‘方面’‘层面’‘过程类型’等等，作为对既定心理现象的范畴规定得到强调”（第512页）。在这些规定的“语境”中也将“表明，每次被分析的‘前概念’在何种视角、简化、神秘化等情况当中……同对象发生关系……，由此认识，心理的诸多基本特征各自在多大程度上会在‘人的’层面上被强调、被排除，等等”（第515—516页）。这种根据诸层面分级的细化能力，标志着“范畴系统成为‘分析的工具集合’”（第516页）。

7. 对层面与层级——或许还有“领域”（参见 Demirović 1994，第99—100页）——的分析会始终伴随着经验主义混淆抽象事物与认识客体的问题，伴随着忽视整体联系、忽视经济关系与经济过程——总是通过中介起作用的——决定作用的危险。当然，不存在“给定的”经济本身，经济这个概念也仅表示一个抽象层面。当具体地碰到经济时，它总是早已同政治与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11

按照法律表述并按照道德构形，等等。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Positions (1964-1975)*, Paris 1976; É. Balibar, »Über historische Dialektik.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Lire le Capital*«, in: U. Jaeggi, A. Honneth (Hg.), *The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7; J. Clarke, I. Connell, R. McDonough, »Misrecognizing Ideology: Ideology in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in: *On Ideology*, 106-22; A. Demirović, »Totalität und Immanenz«, in: H. Böke, J. Ch. Müller u. S. Reinfeldt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AS 228, Berlin-Hamburg 1994, 87-102; W. F. Haug, »Die Bedeutung von Standpunkt und sozialistischer Perspektive für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143-87;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Berlin-Hamburg 1993;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B. Jessop, »Postfordismus. Zur Rezeption der Regulationstheorie bei Hirsch«, in: *Argument* 169, 30. Jg., 1988, H. 3, 380-90; A. Lipietz, »Vom Althusserianismus zur ›Theorie der Regulation‹«, in: A. Demirović u. a. (H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ss*, Münster 1992, 9-54; G. McLennan, V. Molina, R. Peters, »Althusser's Theory of Ideology«, in: *On Ideology*, 77-105; *On Ideology*,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Nr. 10, CCCS, Birmingham 1977;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 Paris 1968), dt. v. G. Seib u. E. Hültenschmidt, Frankfurt/M 1974;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W 1979, ^{3}1986;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Zur Produktion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78),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K. Türk,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e der Wirtschaft*, Stuttgart 1987.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Wolfgang Fritz Haug） 撰
曹旸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lthusser-Schule, Analyse/Synthese, Anatomie, Artikulation, Aufbau, Ausdruck, Basis, Bestimmung, Epistemologie, Erscheinung/Erscheinungsform, Evidenz, falsches Bewusstsein, Form, Formalabstraktion/

Realabstraktion, Forschung/Darstellung, funktional-historische Methode, Ganzes, Historizismus,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deologietheorie, integraler Staat, Kategorie, Kritische Psychologie, Metapher, Methode, oben/unten, Oberfläche, Problematik, relative Autonomie, Standpunkt, Struktur, Superstruktur, Totalität, Überbau, Überdeterminierung, Vermittlung, Zeit, Zelle, Zivilgesellschaft

教育主义（Edukationismus）

A: ta'līmawiya.

E: educationalism.

F: pédagogisme.

R: ėdukacionizm, vospitatel'naja diktatura (эдукационизм,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ая диктатура).

S: educacionismo.

教育主义表示这样一种教育方案，它把指导者、领袖和群众的关系视为教育活动而非合作，并相应地行动。这个用作贬义词的术语——比如 W. F. 豪格（W. F. Haug）说教育主义是来自上层的不断启蒙（参见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1979，第 38 页；又见 Haug 1989，第 232、415 页；1990，第 235 页）——开启了探讨政治与教育学之间联系的可能性，鉴于国有社会主义的教育主义历史经验，这种联系具有根本的意义。

1. 在西方哲学中，对政治与教育学之间联系的反思有着漫长而充满变化的历史。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Politeia*）和晚期著作《法律篇》（*Nomoi*），无论在政治理论方面还是在教育学方面，均是西方哲学的关键文本。前者描述理想国的结构和运行方式，主题是以理想国为目标并且在理想国中进行符合教育学的教育和教养过程。柏拉图的学说起着范式作用：从古典时期经过近代早期的空想直至法国大革命，所有社会蓝图既可解读成政治文本，也可解读成教育学文本，因为它们呈现了双重的差异，这种差异指的是政治和教育学的辩证法，在接受中却要为了二者中的某一方而遭受歪曲。这种差异，其一存在于现有社会与未来社会之间，其二存在于个体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之中。如果要主体和社会顺利发展，就必须把对既有事物和可能的未来所作的分析转换成时差结构，即过程化。政治需要教育学作为战略维度，因为正是教育学有助于把空想的理想化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因为它把未来的理想状态托付给成长中的一代，从而使理想状态（至少在某种程 13

度上）可以实现。乌托邦的历史也可以解释成消解教育学与政治之间不对称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此过程的终点是合理地理解两者的辩证法。

近代的乌托邦，例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us）的《乌托邦》（*Utopia*，1516）、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的《太阳城》（*Sonnenstaat*，161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岛》（*Das neue Atlantis*，1624），其最初标志其实是过多的教育学内容。人们无一例外地依赖教育的强大作用，后代——总之所有人——为了新社会都必须接受而且将要接受教育。所有蓝图均包含对塑造公共教育体系的详细说明。摩莱里（Morelly）1755年的《自然法典》（*Gesetzbuch der natürlichen Gesellschaft*）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最早提出，社会的改变旨在成功实现幸福且合乎自然的人类生活，其核心问题就是所有权问题。此外，他使教育受理性约束："人们不会给他们（儿童）规定未被他们理解为理性的事情。"（1959，第196页）摩莱里认为，社会行为的产生基于对社会性的感觉，人类实践由此能够导向关于上帝（理性）是什么和意欲什么的知识，这样他便使主体化更靠近个体的支配范围。

14

政治与教育学的关系问题随着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卢梭[Rousseau]、爱尔维修[Helvétius]、霍尔巴赫[d'Holbach]）而更具分量。爱尔维修（1792）始终不确定是否"教育使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但随即断定，社会处境使特定品质得到发挥，人"毕竟有榜样，需要教师，两者均是人所要服从的严厉师长"（第447—448页）。不久之后，他拟定了详尽的公共教育体系。霍尔巴赫的环境理论使主体发展的社会决定因素得到反思，但因假设这些因素的绝对作用，妨碍了主体日益增强的自我支配这种观念。

卢梭以《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Abhandlung über Ursprung und Grundlagen der Ungleichheit unter den Menschen*，1755）和《社会契约论》（*Gesellschaftsvertrag*，1762）在社会理论方面达到了更高的理性形式，但是关于教育，他坚持把人的教育领域和公民教育领域——更一般地说，把教育领域和社会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对于两者的辩证法，他只看到一些苗头，这就是他在《爱弥儿》（*Emile*，1762）中提出的个人教育方案同在《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的"经济学"词条与在《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Betrachtungen über eine Regierungsform für Polen*，1772）中提出的社会教育方案的对立。

法国大革命的教育规划（米拉波[Mirabeau]、孔多塞[Condorcet]、勒佩勒提[Lepeletier]）把公共教育从国家利

益转变成社会利益：在形成了自我意识的市民社会中，普遍利益不必再由国家利益来为之做准备或促使其形成，教育可以从国家手里交给市民社会来支配，因为市民社会已经完成了自我建构。

通过康德（Kant）、洪堡（Humboldt）、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尤其是费希特（Fichte），一个起初可能的理性国家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文化国家，一个只有如此才能存续的国家。“教育规划和政府规划完全是一码事。”（Fichte，SW 7，第583页）。但是，当一个国家创立了民族教育并因此成为文化国家时，它作为强制国家，即作为一个没有社会合法统治权的国家，就开始了自我废除。费希特认为，这样政治和教育学就成了一回事。他为市民阶级拟定的文化霸权方案和纲领，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志向和能力。

2.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F*）第三条中写道：“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MEW 3，第5—6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是“恩格斯改动最厉害的一条，而且不仅出于教诲的意图”（Labica 1997）：他用“变革的实践”代替“革命的实践”，特别是删去了目标概念“自我改变”。“自我改变……摒弃了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当作简单对比的解释，而是把它们准确解释成同质行为，解释成自我创造。它接近《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n Ideologie*）中的**自主活动**。”（Labica）马克思不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告别哲学家的任何**教师爷般的思想先驱做派**”（Fleischer 1995，第291页），而且他此前就看到，“单纯政治革命”的局限在于，它“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中组织起一个统治阶层”（MEW 1，第408页）。得到同样结论的还有《神圣家族》（*HF*）中对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等人提出的批评：“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MEW 2，第91页）

多年之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Gotha*）中重拾对自以为是的“教育者贵族”（Cornu 1968，第166页）加以教育这一主题，并把这种教育推向极致：并非社会需要国家实行教育，“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MEW 19，第31页）。这种看法在布莱

希特（Brecht）《统一战线之歌》（*Einheitsfrontlied*）的口号中得到正面表述："解放工人！只能靠工人自己。"（GW 9，第653页）因此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第二句话的翻译，是否确实如拉比卡（Labica）所认为的，给马克思强加了太多他实际没有说的内容？科尔纽的翻译如下：
16 "它（教育主义学说）必然试图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构成统治阶级。"（1970，第137页）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针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学说，后者——如霍尔巴赫（1959，第146页及以下）——认为只有环境或（如爱尔维修）现存风俗和法律是人无论实践还是状态的决定因素。这种机械唯物主义虽然抱有革命雄心，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无法为改变社会现实奠定基础。虽然可以设想两种可能性，却均以无计可施告终。一方面，可以由一个立法者在政治上改变风俗、法律和环境，但立法者自身不得不置于社会关系之外。社会契约理论在下列情况暴露了这个问题：它——如霍布斯（Hobbes）——宣布统治者有强迫社会成员接受契约状态的自由裁量权（参见 Macpherson 1973），运用立国神话，或者如卢梭在理论中通过援引古典时期的城邦模式来指出一种理想状态，以便能够论述社会关系的重重问题和亟待改变（参见 Forschner 1977；Fetscher 1975，第254页及以下）。问题始终在于，统治没有通过社会成员本身得到合法化。另一方面，由教育者实行教育的教育学方案可以充当社会变革的基础。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启蒙运动都选择了这条道路，用归在康德名下的话来说就是："孩子们受教育，不应当适合人类当前的状态，而应当适合人类未来可能的更好状态，亦即适合人性的理念及其整个规定。"（《论教育学》[*Über Pädagogik*]，WA 12，第704页）但康德早就意识到，教育者所受的教育同样必须异于当下。康德认为，使用自己的理智是一个选择问题。关于环境具有塑造力量的学说不再尝试用教育学来规定社会变革，也就是不把它规定为教育的后果，代价是把教育当作用教育学伪装起来的统治。

马克思的思考不仅用政治与教育学的统一来反驳上述尝试，而且把这种教育学理解成主体通过革命地改变其生活环境而改变自我的过程。这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它同时也是教育实践。在这一实践中，他人决定统治的问题转变成主体在其鲜活实践中占有自我和建构自我的观念，这种观念基于主体（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政治于是有了教育学维度，正如教育自身嵌入决定主体行动的政治关系的塑造过程中。主体通过其行动改变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6页)，同时社会关系的总和又呈现出具体的历史形态，主体自身在此形态中通过占有其类本质得到自我的规定。

3.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路线中，主要是葛兰西阐发了政治与教育学的联系："任何'霸权'关系必然是教育关系。"(*Gef* 6，H. 10，II，§44，第1335页)"历史是个体或群体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持续斗争，但为达此目的，这些个体或群体必须感觉自己高于社会，是社会的教育者，等等。因此环境不为个人的举止辩护，而只是'解释'它，尤其是解释历史上最被动者的举止。这解释用于偶尔宽容个人，还给教育提供了材料，但如果不是必然产生出保守主义和'落后状态'最虚伪、可憎的形式之一，就从来不可能成为'辩护'。"(*Gef* 5，H. 8，§156) 葛兰西在狱中独自翻译了(恩格斯版本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多次援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他认为政治机关和国家的教育任务是必要的，但力求通过对受教育者的教育引入对教育者实行的教育，从而辩证地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学和政治之间关系的观点。他认为从前景来看，"师生关系是互动的积极关系，因此每名教师也总是学生，每名学生也总是教师"(H. 10.II，§44)。

如果从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中得出结论，认为必须把政治领域和教育领域分离，这会是一个误解。其实问题在于规 18
定并分析两者的联系，从而规定并分析主体自身在怎样的形成条件中确立自我。对教育主义的批评也不想取消马克思仔细分析过的政治与教育学的这种联系。对教育主义的批评质疑教育学在其中相较于政治而显得突出的那些关系。教育主义可以理解成**悖谬的政治**，它把教育学用作政治工具，从而在教育学面前去除了政治本身。因而政治与教育学的统一虽未遭到消解，却仿佛以倒错的面目出现，代价是必须重新提出统治问题。

把一种特定的社会实践判定为**教育主义的**，这是一种双重的攻击：一方面，它批评政治实践伪装成教育学的傲慢是在剥夺其余社会成员的权利。教育主义这个"斗争概念"旨在通过任何一套教育泛化话语来保障统治权，教育泛化话语把政治变革的任务描述为教育学任务，从而重塑了它。真正主体的能动地位转移到精英身上，固化成政治上不再由人支配的精英统治。另一方面，对教育主义的批评同样拒绝政治利用教育学。相较于教育有别于政治行动的特殊性，这类利用是幼稚的——就此而言，对教育主义的批评也在质疑教育家的野心，他们为了政治乌托邦而去除教育自身的品质和实际结构。反思教育主义的问题时，

关键不是公共教育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把教育纳入其中的社会化的具体形式。此外，应该认识到“教育与统治的矛盾”(Heydorn 1995)，亦即在社会所必需的公共教养和教育框架下所达到与促成的理性水平，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洛伊木马”，这种社会形态最终要走向其自我扬弃。就此而言，对教育主义的批评也可以用作批评教育之国或教育专政中社会实践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占领国在再教育计划框架下培育民主的项目，或行政命
19 令式社会主义中爱劳动的教育，如果在这些过程中寻找自我反思的因素，它们就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这些因素的存在或不存在，使人得以在事后或者说为了将来确定因环境而异的发展潜力。非常独特的是，这首先是一种表现为理论的革命实践。

参考文献：

R. Alt (Hg.), *Erziehungsprogramm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erlin/DDR-Leipzig 1949; A. Cornu,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Bd. 3, Berlin/DDR-Weimar 1968; ders.,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Bd. IV, Paris 1970; I. Fetscher, *Rousseau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Zur Geschichte des demokratischen Freiheitsbegriffs*, Frankfurt/M 1975; J. G. Fichte, *Sämmtliche Werke*, Bd. 7, Berlin 1846; H. Fleischer, »Das Verändern interpretieren«, in: *Intern. Z. f. Philosophie*, H. 2, 1995, 280–96; M. Forschner, *Rousseau*, Freiburg/Br-München 1977;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ders., *Versuch, beim täglichen Verlieren des Bodens unter den Füßen neuen Grund zu gewinnen*, Hamburg 1990; C. A. Helvétius, *Vom Menschen, seinen geistigen Fähigkeiten und seiner Erziehung* (1792), Frankfurt/M 1972; H. J. Heydorn, *Über den Widerspruch von Bildung und Herrschaft*, Vaduz 1995; P. T. d'Holbach, *Ausgewählte Texte*, hgg. u. eingel. v. M. Naumann, Berlin/DDR 1959; R. Hosfeld, »Massendemokratie oder Erziehungsdiaktatur? Überlegungen zur politischen Form der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bei Marx«, in: *Eurokommunismus und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AS 44, Berlin/W 1979, 144–56; U. Krautkrämer, *Staat und Erziehung. Begründung öffentlicher Erziehung bei Humboldt, Kant, Fichte, Hegel und Schleiermacher*, München 1979; G. Labica, *Karl Marx. Thesen über Feuerbach*, Berlin-Hamburg 1997; C. B. Macpherson, *Politische Theorie des Besitzindividualismus. Von Hobbes bis Locke*, Frankfurt/M 1973; Morelly, *Gesetzbuch der*

natürlichen Gesellschaft oder der wahre Geist ihrer Gesetze zu jeder Zeit übersehen oder verkannt (1755), Berlin/DDR 1964;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AS 40, Berlin/W 1979, [3]1986; J.-J. Rousseau, *Emile oder Über die Erziehung* (1762), München 1979; ders., »Abhandlung über die politische Ökonomie« (1755), in: ders., *Sozialphilosophische und Polit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81, 227–68; ders.,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Regierung Polens und über deren vorgeschlagene Reform« (1772), in: ebd., 562–655; *Der utopische Staat. Morus: Utopia, Campanella: Sonnenstaat, Bacon: Neu-Atlantis*, Hamburg 1969.

康拉德·比克曼（Konrad Birkmann）、米夏埃尔·温克勒（Michael Winkler） 撰
朱更生 译，曹旸 校

参见：
Alltagsverstand, Aufklärung,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wusstse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mokrat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lite,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rziehung, Feuerbachthesen, Gesellschaft, Gramscismus, Hegemonie, Herrschaft, Intellektuelle, kritische Pädagogik, organische Intellektuelle, Pädagogik, Praxis, Revolution, Schule, Staat, Staatssozialismus, Subjekt, Utopie

平等主义（Egalitarismus） 20

A: musāwāt.
E: egalitarianism.
F: égalitarisme.
R: ėgalitarizm (эгалитаризм).
S: igualitarismo.

—

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 1760—1797）和他的战友菲利普·米歇尔·邦纳罗蒂（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i）、西尔万·马雷夏尔（Sylvain Maréchal）等人在1796年以前倡导的、反映在《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中的纲领，一方面延续着雅各宾左派、忿激派（Enragés）和埃贝尔（Hébert）派的要求，抨击贫富对立，和圣茹斯特（Saint Just）一样主张政治民主必须建立在社会民主之上（Soboul 1974，第293页）；另一方面这一纲领在1794年热月和1795年最后一次人民起义以后继续激进化，1795年起义由物价激增和工资下降所导致的群众加剧的

贫困化所触发。巴贝夫突出强调革命的阶级性质，是“富人和穷人的公开战争”（引自 Garaudy 1954，第 82 页）。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消灭私有制，实现所有人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平等，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MEW 2，第 126 页）。邦纳罗蒂认为，巴贝夫学说中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不平等并恢复公共的福祉”（*Analyse*，第 100 页）。马雷夏尔的《平等派宣言》（*Manifest der Gleichen*，1796）中写道，法国革命“只不过是另一次更为伟大、更为神圣的革命的先驱，而那将是最后一次革命”（引自 Buonarroti 1828，2，第 95 页）。

巴贝夫的平等纲领源自启蒙时期的激进自然权利学说。他在 1795 年的《平民宣言》（*Manifest der Plebejer*）中写道：“**完全的平等**是一项原始权利。社会契约绝不是要中断这项权利，相反，它只是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这项权利永远不受损害。”（第 71 页）私有财产是不平等、不幸和奴役的源头。“财产是社会最大的灾殃，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公罪。”（Buonarroti，*Analyse*，第 98 页）为了实现平等的目的，也就是实现“公共的福祉和社会的目标”，必须“建立**公共管理制度**；废除私有制；让每一个人发挥他所擅长的才干和技能；约束每一个人将他劳动的成果原物交给公共储备仓库；建立简单明了的分配管理制度……登记所有人员和所有物资，以最严格的平等原则分配物资，并配送至每一个同胞户中”（第 79—80 页）。消灭私有制同时意味着废除继承权。

在巴贝夫设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劳动共同体”和“享受共同体”（Buonarroti，*Analyse*，第 96 页）旨在建立面向所有人的实行公有制、计划和公共（职业与公民）教育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是消除当时的普遍贫困、减轻劳动负担、创造更多自由时间从而繁荣艺术文化的先决条件。在筹划“为平等而密谋”派暴动（进而发动人民起义）期间，邦纳罗蒂在 1795—1796 年起草的临时过渡纲领中，提出了下列巩固革命领导者的群众基础、打击人民公敌的社会和政治措施：免费供应公共储备的面包和衣物，用富人的别墅安置穷人，没收逃亡者和人民公敌的全部财产，国家垄断外贸，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推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全民武装，等等（参见 *Entwurf*，第 101—110 页）。

巴贝夫主义作为现实斗争提出的纲领，经历了“革命中平民运动火的淬炼”（Höppner/Seidel-Höppner 1975，1，第 86 页），处在 18 世纪道德化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Saint-Simon）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参见 Soboul 1974）。邦纳罗蒂是参与起草平等派密谋的共产主义纲领的核心人物之一，作为平等派唯

一的幸存者，1828年他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为平等而密谋》（又称《巴贝夫密谋》）。此书对19世纪30年代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代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社会和政治纲领的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qui）。当然，布朗基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法国催生出的工业无产阶级有着更紧密的关系。

参考文献：

G. Babeuf, *Manifest der Plebejer* (1795), in: Höppner/Seidel-Höppner 1975, 2, 70–83; F. M. Buonarroti, *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 (1828), 2 Bde., Paris 1957; ders., »Analyse der Lehre Babeufs«, in: Höppner/Seidel-Höppner 1975, 2, 92–101; ders., »Entwurf eines ökonomischen Dekrets« (1795/96), aaO., 204–14; F. Deppe, *Verschwörung, Aufstand und Revolution. Auguste Blanqui und das Problem der sozialen Revolution im 19. Jahrhundert*, Frankfurt/M 1970; R. Garaudy, *Die französischen Quell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54; J. Höppner u. W. Seidel-Höppner, *Von Babeuf bis Blanqui. Französisch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vor Marx*, 2 Bde., Leipzig 1975; P.-S. Maréchal, »Manifest der Gleichen« (1796), in: *Die frühen Sozialisten*, hgg. v. F. Kool u. W. Krause, Bd. 1, München 1972, 121–26; W. Markov, *Revolution im Zeugenstand. Frankreich 1789–1799*, 2 Bde., Leipzig 1982, Frankfurt/M 1987; K. u. M. Middell, *François Noël Babeuf. Märtyrer der Gleichheit*, Berlin/DDR 1988; A. Soboul, »Die Utopie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in: J. Droz (Hg.),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Bd. 1, *Das utopische Denken bis zu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4, 260–340.

弗兰克·德佩（Frank Deppe）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22

二

1. 在着重论述平等问题的两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的《反杜林论》（*AD*）中，恩格斯严格区分了两个概念。其一是“非常古老的”观念，认为“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其二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提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如恩格斯所补充的，从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

(*AD*, MEW 20, 第 95—96 页; MEGA I.27, 第 302 页)。"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恩格斯继续指出,"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第 96 页; 第 302—303 页) 在原始社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除在平等权利之外。基督教早期的财产共有,随着"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归于消失。日耳曼人侵入西欧,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平等思想,但是在"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内""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为人的平等权利准备了一个基础(第 96—97 页; 第 303 页)。平等权利的主要承担者是资产阶级,因为"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第 97 页; 第 304 页)。"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第 98 页; 第 304 页)

23

资产阶级要求打破上述限制、迅速波及各社会领域的解放运动,最终终结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不局限于单个国家,自由和平等被宣布为普遍的人权(当然仍保留着特有的资产阶级性质,美国宪法中认可的种族特权就体现了这一点)。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第 99 页; 第 305 页) 法国资产阶级局限于仅要求公民的平等,而法国无产阶级把要求扩大到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但"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第 99 页; 第 306 页)。

恩格斯这里所写的历程,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平等原则势不可挡的进军,这一原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第 99 页; 第 306 页)。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第 100 页; 第 306 页),恩格斯认为,"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相反,平等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它现在被普遍认为理所当然,是"由于 18 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第 99 页; 第 306 页)。总之,"非常古老的"道德平等

思想和追求平等身份、平等地位的“现代要求”应予以区分，后者——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资产者和无产者都提出的要求，因此同一个词语有着不同的阐释。

2. 平等原则遭到迥然不同的解释，又得到几乎普遍的承认，这一点在一百年后看上去更明显了。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社会关系伦理中几乎所有得以成立的学说都是对于某一方面平等的愿景，这某一方面分别在不同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价值。不仅‘收入平等主义者’要求收入平等，‘福利平等主义者’要求福利平等，而且古典功利主义者也坚持每个人的利益都有平等的分量，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要求一系列权利和自由基础之上的平等。”（1992，第 ix 页）还可以接着补充：各种等级和特权的形形色色变种的当代拥护者，乃至种族主义者，都在使用平等的话语。就此而言，20 世纪末的所有人都是平等主义者。

如果说“平等主义”有特定的意义，那么它指向一系列基本道德立场以及与之相连的政治、社会、经济策略，以这些立场为基础对平等的意义和内涵的某种特定认识，正是政治上通常所谓“左派”的标志特征。有待探究的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这种平等观念有着怎样的关系。

平等主义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对社会正义的观念，它要求消除非故意造成的不公平，维护公平交换，建立以互利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参见 White 1997）。“社会正义观念”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看来是针对“怎样公正分配社会合作的成果和负担”（1979，第 21 页）的观点。平等主义对社会正义的理解基于道德上平等的古老思想，要求合理地分配负担和利益，给现有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这显然包括但不限于形式上的机会平等、反对歧视，因为即使在竞争和机遇条件公平的条件下，没有自身过错的个人依然有可能遭受不利或阻碍——因为总有所谓“倒霉”的事。

这类不幸不可能全部消灭或得到弥补，因此平等主义者一般致力于借助适当的程序保障生活质量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低但可接受的水平以上。这一策略传统上依靠福利国家机制，将收入和资源进行再分配，但会遇到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限制。许多国家的政府逐渐寻求多种途径，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和其他“现代化”福利国家的方式，提高受救助者的技能和素质。其次，平等主义者反对剥削，即利用他人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占有。对此，传统的和“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调节办法

都能在福利国家的框架下起到补救作用。比较有争议的是（第三）贡献原则，它反对搭便车的行为。按照这一原则，从社会合作中分得利益的人，只要具有相应能力，就必须为该利益的生产作出相应的贡献。贡献原则显得与已经流行开来的“基本收入”倡议相悖，“基本收入”旨在使全体公民，无论其贡献大小，都合法地享有一份并不菲薄的资源；另外，贡献原则也要求征收高额遗产税。

3.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上述定义的“平等主义”？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首先，总的来说，正义和平等权利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得到了消极评价。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中揭露了美国宪法和法国1789年、1793年《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只是从属于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权利。他在1864年11月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他不得不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导言中采纳“真理、正义和道德”等“字眼”，以至于他要将这些字眼妥当安排，“使它们不可能造成危害”（MEW 31，第15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KI*）中嘲笑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将学说建立在“永恒公平”的理想上是彻头彻尾的前科学时代的做法（MEW 23，第99—100页，脚注38）。他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道：“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MEW 19，第21—22页；MEGA I.25，第15页）恩格斯也在《论住宅问题》（*Zur Wohnungsfrage*）中批驳蒲鲁东论述正义的内容，认为这 26
种论述陈腐过时且不科学（MEW 18，第273—274页）。这种对正义和权利的“道德主义”话语的敌意，贯穿在大量的（即使不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文献中（参见Lukes 1985）。

上述言论部分地可以归因于他们对自以为立足于普遍道德价值上的空论的不耐烦，这些空论其实钝化了阶级斗争的利剑。但是他们对道德话语的敌意仍有更深刻的原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准确界定马克思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关系。因为社会正义的理念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以降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拒绝接受的前提条件。社会正义原则的产生，本身就是对迄今存在的所有社会中既存的各种状况的回应；它所给出的分配负担和利益的准则，会被所有当事人认作现有状况下理智且公平的做法而得到肯定和接纳。

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39—1740年的著作中考察正义的起源时，就曾谈到上述状况中的两种，他认为正义起源于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以及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人性论》[*Treatise*] 第3卷第2章第2节）。进一步概而言之，可将这两个因素称为（资源）稀缺和利益（当然也包括自私以外的动机所引发的利益）冲突。

此外还可以补充两个条件——它们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始终存在，可能在当代社会更强烈地凸显出来。其一是“文化多元主义”，表现为不同文化产生的关于人类生活中的善和价值的不同伦理习俗与观念，而且极难将这些不同习俗与观念统一到一个取得普遍共识的世界观中。其二是人的能力有限，难以充分地接收、整理、运用信息，以预测、控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运动，实现一个完全透明、完全得到掌握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我们称这一制约为理性的边界。

27 4.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就是对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过程的理解）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对上述四个条件的考察。它认为这四个条件不是内在于人类命运的固有因素，而是可以在历史中超越的特定状况下的现象，并将在完成了共产主义所解放的环境中去除这些条件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

马克思所设想的完成了的或者说真正的共产主义将宣布这样一个世界的降临：它克服了物资稀缺，而且“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Gotha*，MEW 19，第21页；MEGA I.25，第15页）。在消灭了自私和利益冲突的根源以后，也就是“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第21页；第15页），随着货币统治和它所附属的贪婪、恐惧等动机的终结，简言之，随着阶级对立的根源的消失，共产主义将如它的名字所体现的那样，其特点之一就是和谐的、“共同体”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写道，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Ms* 44，MEGA I.2，第389页；参见MEW 40，第536页，有出入）。显然，共产主义世界也将是一个不同伦理趋同的世界，以“个人的全面发展”（MEW 19，第21页）的普遍目标作为自己的理想。因为所有局限的、地方的、伦理的、民族的或宗教的世界观都将在这个世界得到克服。马克思和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如果不考虑葛兰西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谈到

伦理冲突，例如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道德观之间，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道德观之间，功利主义、义务论和至善论道德之间的冲突，会给社会秩序或人的关系带来怎样的问题。共产主义提出从上述各伦理立场来看都更为优越的、与之不同的社会远景。它设想世界最后将完全透明地受理性的主导，联合起来的生产
28 者将共同调节生产，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和政治制度将按照列宁（Lenin）在《国家与革命》（*SR*）中所预告的那样，得到精简并接受民主监督（参见 LW 25，第 486—499 页）。

简言之，正义的各种条件将成为越来越遥远的历史记忆；关于正义和权利的话语，也就是正义作为道德的一个显要分支的话语，在共产主义中将完全成为断代谬误（anachronistisch）。“直接共产主义”愿景的实现将使世界有超越正义的发展路径；解放也就同时意味着从正义的必然性下解放出来。这也许更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流对待正义特别是社会正义话语相对冷淡，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其他派别对这类话语也相对不满。因为社会正义只是许诺逐步修正所有社会可能料想的状况，而激进的解放愿景激励了马克思无数的读者和追随者，唤醒了摆脱这些状况的希望。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很符合上面所定义的平等主义者，因为毫无疑问，他们经常热切地同情穷人、不幸的人和被剥削者的处境，表达他们对不事生产的剪息票者和靠剩余价值过活、阻碍工人人格发展的寄生的资本家阶级的愤怒。但是他们的同情一般并没有促使他们思考现存社会内部切实可行的平等主义策略，或至少严肃地讨论这类策略。整个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体上都对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或其他主义的）福利国家持怀疑态度。苏联阵营的“国有社会主义”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态度相对暧昧。斯大林（Stalin）曾在 30 年代攻击过早期的平等原则，指出在一个高速工业化的社会中，物质刺激和特权是必要的，宣布反对“平均主义”。苏联政策在他死后的转折并不能阻挡陷入绝境的东欧指令型经济中产生 29
并非主要由市场造成的广泛的不平等，马克思主义没有在这种指令型经济以外提供平等主义的替代方案。

之所以未能提供替代方案，原因显而易见。作为一种社会正义愿景的平等主义提供的是或多或少难称完美的方案，以之在给定的环境内，修正或弥补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运转所产生的不正义的不平等。与之相反，共产主义的蓝图开启了对另一种制度的设想，在那里，平等主义的方案将

不再必要，因为随着物资稀缺、利益冲突、价值多元主义和理性的不完善被克服，不正义以及不正义的不平等的观念也就失去了意义。似乎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意识形态一样，致力于自身对平等价值观的呈现，但没有成功地找到在资本主义现存社会框架内实现这一图景的策略。

5.《哥达纲领批判》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马克思本人是否具有哪怕最细微的平等主义者的特征？因为他在此文中主张不平等（差异）基础上的平等权利。作为《反杜林论》之外另一部着重论述平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此文可以视为对分配平等观念的反驳。在这篇探究未来的分配机制的文章中，马克思谈到了对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构想，在这个阶段，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且有权“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MEW 19，第 20 页；MEGA I.25，第 14 页）。这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 30
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再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第 20—21 页；第 14 页）。

马克思认为上述分配制度的主要错误明显在于，任何权利体系在界定合理需求时，都必然不平等地对待不同的

人，因为任何权利体系本身必然依据某一共同标准对待个人，此外也只从某一特定方面出发衡量个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单一标准运用于不同情况做法本身的普遍拒斥。而且即便用更广泛的方面衡量个人，也许仍不能令马克思满意，因为他的观点几乎是：任何使个人有别于他人的因素，都是有意义的。在这里表达的浪漫主义整体视角的观照下，任何一般规则，仅凭它无视本来有权得到差别对待的个人差异，就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马克思继续写道，“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第21页；第15页）这也许意味着，消灭阶级对立和“国家消亡”以后，在充分相似的情况下使用单一的分
31 配标准——平等思想形式上的核心——的做法将会消失，理由有如下三点：第一，能力和需要将被视为无法通约的个人的、多元的因素，不预先限定或用规则确定下来；第二，能力将不受制约地用于促进公共利益和以互利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第三，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丰裕使需要可以不经冲突而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St. Lukes,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1985; J. Rawls, *Eine Theorie der Gerechtigkeit* (1979), Frankfurt/M ^{6}1996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1972); A. Sen,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Mass. 1992; St. White, »What do egalitarians want?«, in: J. Franklin (Hg.), *Equality*, London 1997, 59–82.

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 撰
卡特琳·格吕内皮特（Katrin Grünepütt） 译为德文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rbeit, Aufklärung, Bedürfnis, Chartismus, Demokratie, Distribution, Eigentum, Elite, Emanzipation,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eiheit, Genuss, Gerechtigkeit, gleicher Lohn für gleiche Arbeit, Gleichheit, Gleichmacherei, Glück, Hierarchie, Jakobinismus, Klassen, Klassengesellschaft,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ommunismus, links/rechts, Menschenrechte, Mindesteinkommen, Moral, neue Weltwirtschaftsordnung, Normen, Pluralismus, Quotierung, Sozialdemokratie, Sozialpolitik, Sozialstaat, Staat, Tausch, Unmittelbarkeitskommunis-

mus, Werte, Wohlfahrtsstaat, Wohnungsfrage

利己主义（Egoismus）

A: anānīya.

E: egotism.

F: égoisme.

R: ėgoizm (эгоизм).

S: egoismo.

在道德化的视角下，利己主义被当作一种（坏的）个人特质而遭到谴责。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使“利己主义”成为个人必要行为模式的社会条件和实践形式受到重视。在经验上得到证实的个人利己主义很早便用来与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争论，（这种观点）通过参考人性来证明其普遍虚幻的特征。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支持了这个判断。

1.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他们对当时哲学的分析脉络中阐释了利己主义。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中试图把个人与社群利益间的矛盾在“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与“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aufopfernder Egoist）的对立中人格化并扬弃之，如此一来，两者就会在自我克制中、在“非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中相遇（参见 *DI*，MEW 3，第 114 页及以下）。这种阐释的历史背景是，个人从其在封建国家生活中所归属的“等级、同业公会、行帮”中获得解放（MEW 1，第 368 页）。利己主义的概念也就这样在 18 世纪中叶出现，并迅速普及，其定义在道德意义上得到了表达。

马克思走上了另一条途径，即他分析了“现代各国”（*KHR*，MEW 1，第 379 页）生存于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他在《论犹太人问题》（1843）中指出了市民社会解放的局限性，并以此找到了批判立足点，利己主义因此不仅被把握为依附于意识与意志的个人道德品质，而且也被把握为社会现象。“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MEW 1，第 369 页）“**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第 374 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利己主义者的方法论处理在这些地方追随了施蒂纳：“你们的意识是一个本身并不是利己主

义者的意识，从而它表明：你们本身不应该是利己主义者；换句话说，你们应该是一种与你们实际的样子不相同的人。……这个贪得者不是一般的贪得者，而是……完全个别地确定出来的‘唯一的’贪得者。”“圣马克斯竟想对这个贪得者进行道德说教，向他证明他‘不是满足自己，而是自己的一个欲望’。”（第233页）根据施蒂纳的说法，“只妥以前的利己主义者改变自己的意识……，就能成为非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第235页）。

与利己主义的意识决定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从理论上看，他们既不是从情
33 感的意识形态形式，也不是从过激的意识形态形式去理解这个对立，而是旨在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会消失。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宣扬道德，施蒂纳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者不对人提出道德要求：彼此相爱，不要利己，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第229页）。

1844年11月19日，恩格斯在阅读了施蒂纳后，给马克思写信道：“而不管怎样，这里正确的地方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事，利己的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想从利己主义成为人。”（MEW 27，第11页）“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只要‘人’的基础不是经验的人，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第12页）恩格斯在此脉络下谈到了“唯心主义的诡辩”（idealistische Flausen）的危险，即当人们在阐释“理论问题时……总是归结为范畴”（同上）。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KrpÖ*）中接受了这个普遍的提醒，就他在私有财产预设之下的劳动分工脉络中分别考虑个人，并且同时揭露个人（以及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在将其自身利益整合进普遍利益方面的自我欺骗机制而言：“他对特殊的劳动的特殊关系不是由社会决定；他的意愿是由他的天赋、爱好，他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然地决定的。”（*Urtext*，MEGA II.2，第55页）“个人及其需要的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作为交换者而实行社会组合的动因。”（第56页）“也就是说，表现为整个交换行为的内容的共同利益，虽

然作为事实存在于双方的意识中，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存在于自身反映的个别利益的背后。主体还尽可以有这样一种庄严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
34 正好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同上）

在《资本论》第1卷中，个人作为自利者在货币流通中的贪婪得到揭示。“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Bentham）！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MEW 23，第190页）

2. 即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对一般道德现象的理解，对人类行为及其动机的理解，也体现在对利己主义的理论处理中。人类行为有时深受个人和集体主体（在意识形态或实践上）的影响，有时则主要通过其复杂的生活条件来实现。财产、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在利己主义的讨论中起着关键作用。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在《妇女与社会主义》（*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一书中拒绝了社会主义需要天使而不需要人类的假定，即社会主义与“人类存有者的本性”处于矛盾之中，并且会迅速地在历史中被校正。到该文本的第五十个版本（1910年）时，内容已做了重大调整，但其坚持认为：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利益冲突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国家存在的必要性都被消除了。“今天对个人利己主义与公共福祉的满足大多是互斥而对立的；在新的社会中这些对立将被扬弃，满足个人利己主义与公共福祉的要求将处于和谐之中、互相涵盖。”（1879，第307—308页）倍倍尔得出了这样一个“利益和谐”（Harmonie der Interessen）的简略图像，因为他不要明确地阐释个人利益与公共福祉的组织—结构性调和（organisatorisch-strukturelle Vermittlung）。这也阻碍了他在先前的反思中必然导致的分析，即将利己主义理解为个人行动动机的发展。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向前，他指出了市民人类学在对人类本性各种乐观或
35 悲观的判断思潮中的共通性：“谴责利己主义，实际上是（谴责）普遍享受。”（1936，第12—13页）他进一步说明了欧洲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及其界限中的共通性，“努力……在绝望的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执行自己对合理行政的要求……同时，巩固对群众的统治”（第25页）中的共通性。霍克海默对利己主

义现象采取了人类学观点，并将其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结合起来，以此来揭示事实。“在个人解放的时期，在基本的经济领域中，人将自己体验为一个孤立的利益主体，并只能通过买卖（行为）与他人产生联结，从这个事实就已经产生了作为人类学范畴的异化。……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每个他者都是‘外在的’（draußen）。”（第70—71页）“利己主义的糟糕之处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历史处境上；如果处境改变了，那么其概念就会过渡到理性社会的概念上。”（第86页）对人类学观点的采纳也使他能够把自阿里斯提波（Aristipp）与伊壁鸠鲁（Epikur）以来的诸思想家纳入其中，他们“对立于主流精神，既不掩饰也不贬低或谴责利己主义，而是表示认同”（同上）是局限的人性悲观或人性乐观概念的克服者。霍克海默注意到，在现代历史中，“享乐主义心理学家们”（hedonistischen Psychologen）（尤其是尼采[Nietzsche]）的思想资源中的解放潜能在于，他们（以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区别于“抽象且悲惨的虚构，那种利己主义出现在某些国民经济学家与杰里米·边沁[Jeremias Bentham]的虚构中”），他们将利己主义认知为“享受”“最大程度的幸福”的利己主义，“甚至小心翼翼地探究那些受人轻蔑的冲动（Triebregungen）并在没有拒绝或贬低的情况下将它们提升到意识中”，由此“这些权力就摆脱了它们恶魔般的力量”（第86—87页）。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塑造行为的诸种条件成了一项实践任务。在这些条件下，被定义为私人的个体应该以这样一种方式维护他们的利益，即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由计划整合的要素之一，共同造就了社会利益，甚至他们自己也成了收获社会性个体的条件。现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根据社会结构安排的利益冲突，以及满足或拒绝这些利益的政治组织工具之间的中介维度和复杂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利己主义属于这种关乎利益问题的领域，列宁在对政治经济学与国家理论的反思以及他对官僚主义的剖析脉络中讨论了这些利益。随着向新经济政策（NÖP）的过渡，关于农民角色和工会角色的争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列宁在1922年对此所撰写的决议中认为“工人群众同国营企业的经理即管理人员或同企业主管部门存在利益上的某种对立”（LW 33，第169—170页），从中可以引申出工会对于官僚机构臃肿的预防功能，而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决断权方面，工会在其中也负有责任。在面对做政治—文化“宣传”（Aufklärung）的干部时，列宁特别谈及了“同个人利益结合的原则”（LW 33，第50页）。“请记住，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为自己

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再说一遍，我们的共和国就会灭亡。”（第52页）然而，与倍倍尔的观点相似，自我在这里也先天地被视为与集体处于和谐状态：“为自己工作，为工农政权工作。”（同上）

与较发达的工业国家相比，个人解放，以及以这种方式体验自身的个人，在革命之前只得到很小程度的发展。这必然地反作用到了首次社会革命在公共福利与社会正义层面调和利益冲突的理论性反思上。因此，利益冲突所讨论的阶级与团体（工人、农民、专家、机构）之间的冲突，不会同时被当作私人个体间的冲突来讨论。

到1920年代末斯大林获得中央权力时，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将内部矛盾作为不同群体利益的客观矛盾（在这一点上，鲁科夫[Rykow]起了关键作用）的认识和分析，就已经被废除了。因为如此一来，任何主观—策略性的正当化权力也来自上层。实践的规划尝试与思想路线被打断。内部政治利益分析不再有任何空间，它们通过中央对必然
37 性的设置而完全地被排挤掉，其满足或不满足被评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行为问题。

对主观主义权力的附加使得私人利益在社会必然性背后得以实现。等级式的政治结构在结果上会产生利己主义式的利益感知形式，这部分地会再次倒退为封建形式，一方面造就特权，另一方面产生社会冷漠。

3. 如果利己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不出现在马克思方法论的层面上，而仅作为政治—道德术语或个人心理学范畴（利己主义是“个人主义性格的一种特征，在与强调的自我性[Ichhaftigkeit]与自我中心[Selbstbezogenheit]的特征结合后，其自私自利面被突出”，*Wörterb Psychol*，1981）出现，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方面，具体的权力结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理论安排的，（对其研究）亦延伸到对经验性关系与个人行为的唯物主义分析上。这导致了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化处理与一种（在马克思看来：教条的）理解，例如利己主义作为迷恋（Gemütsaffektion），而不作为“从个体自然的生存方式中必然产生的关系”（*DI*，MEW 3，第229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中，它对利己主义的解释部分地遵循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理论家的思想范式，利己主义在其中被定义为“道德生命原则以及人类相应的实践行为”。如同“利益”这个关键词在同一辞典中仅被视为个体心理范畴一样，利己主义也被限定为人们行为中的一种道德“遗物”（Relikt），并因“受到资本

主义环境的外在影响”而被强化。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胜利之后，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确立之后，并且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建成之后，利己主义就会失去它的客观社会基础并在显著的程度上被克服”。“与过去那种遗物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教育与教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4，第145—146页）

但在另一方面，社会同质化与差异化的特殊系统结构必然地会引起人们对于人
38 类个体—原始本性，包括生物本性的更大的理论兴趣。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发展与人格心理学的诊断中，人类作为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双重特征解释了他们高度矛盾的行为，包括个人利己主义也不仅仅被视为阶级社会数百年生活方式的产物。

4. 在对现实社会主义变形历史（Deformationsgeschichte）的理论分析中，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坚持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作为克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条件。不同的历史发展水平，不同市民社会的替代方案，以及现在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物质变形的表现形式，在他的分析中都十分重要。在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于1968年进驻捷克斯洛伐克（CSSR）之后，他明确谈到在经济基本进程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任务。“因为经济是，并且永远是社会和其中人民的物质再生产过程，个人最终仍然是其对象……。当然，这丝毫不会削弱生产资料社会化所带来的飞跃性特征：首先，个人或组织能够利用经济的社会功能为他们利己的私人利益服务这种社会现象将得到杜绝；其次，与之紧密相关的是，人们会有意识地使经济发展为高等群体的利益服务成为客观的可能性，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这至多只能是一种无意的副产品。”（1987，第45页）他把（最终变为失败的）变形归因于列宁死后出现的彻底“抛弃马克思对经济在社会整体发展进程中角色的构想，这在当时的整个工人运动中已经广为流传”（第66页）。马克思理论的庸俗化在斯大林对于理论的策略性掌控下成为可能，此时意识形态机器作为一种工具，确保了其支配地位，并使经济学处于一种策略操纵之下。这种机器以一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为前提来进行运作，这种理解不以物质基础来说明意识形态，因此也不试图主要通过规划来影响它，这意味着，经济要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引导，“它能够在人们身上唤起那些品质、那些相互关系，通过这些品质和关系的反作用，他们才能够发挥自己作为真正的人的才能”（第110页）。

乌韦-延斯·霍伊尔（Uwe-Jens Heuer）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研判了斯大林领导下的变形过程的理论推力。“斯大林想象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离

与这种否定内部……矛盾作为发展的动力密切相关”，与他对“一个仿佛脱离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的固有运行”的想象紧紧相连（1989，第241页）。不同于卢卡奇的是，霍伊尔认为“社会化不必然等同于国有化（Verstaatlichung）”，“实际上的社会化也能以其他形式产生”（第415页）。

戈尔巴乔夫（Gorbatschow）在理论上从列宁晚年作品着手为自己的经济改革进行论证，将“人的因素”视为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最重要储备”。它以一种普遍积极的道德作为支撑，推进民主化，并在经济上尤其突出干部的带头作用（参见1988，第127页及以下）。“人的因素”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之外——作为私人利益的发展空间——释放了它的“创造力”，并产生了资产阶级国家。

5. 尽管艺术是以处于相互关系中整体性的人为对象，但是，在艺术这个媒介中看到利己主义之形成的原始呈现并非偶然：在布莱希特的寓意戏剧作品《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1941）中，在原始积累的历史层面上以最为经典的纯粹性为压制善良的替代性强迫力量。这个透过研究中国戏剧而得出的以面具来呈现的戏剧性作品刚好符合马克思的概念“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ökonomische Charaktermasken der Personen）（MEW 23，第100页）。

相反地，福尔克尔·布劳恩（Volker Braun）讽刺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奴小说（DDR-Herr-Knecht-Roman）揭露了设置的“社会利益”的瓦解，它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虚构，是因为没有空间通过类似于霍克海默意义上作为具体的自由、享受的个体利己主义，来使之成为现实。对社会利益的描述上升为社会利益的任务。“我不能理解……您怎么承受得住？一个跟着一个，我们也参与进去！我把它写下来！以社会利益之名！”（第169页）“孔策（Kunze）：堕落的人们……/欣策（Hinze）：对于任何上级立场而言都是过分的要求。他们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可以带来胜利的观念！”（第192页） 40

参考文献：

A.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79), Berlin/DDR 1979; V. Braun, *Hinze-Kunze-Roman*, Berlin/DDR 1985; M. Gorbatschow, *Umgestaltung und neues Denken*, Berlin/DDR 1988; U.-J. Heuer, *Marxismus und Demokratie*, Berlin/DDR 1989; M.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1936), GS 4, 9-88; G. Lukác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sierung*, Frank-

furt/M 1987; *Der Mensch. Neue Wortmeldungen zu einem alten Thema*, hgg. v. D. Bergner, Berlin/DDR 1982; H. D. Schmidt, *Grundriß der Persönlichkeitspsychologie*, 2., durchges. A., Berlin/DDR 1985; 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Leipzig 1844; *Wörterbuch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hgg. v. A. Kosing, Berlin/DDR 1974; *Wörterbuch der Psychologie*, 3., neubearb. A., Leipzig 1981.

加布里埃莱·林德纳
（Gabriele Lindner） 撰
林正昊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Bedürfnis, Befriedigung, Bestimmung/Determination, Bewusstheit, Bürokratie, Charaktermaske, Disziplin, Dummheit, Emanzipation, Engagement, Enthusiasmus, Enttäuschung, Ethik im Sozialismus, falsche Bedürfnisse, Faulheit, Freiheit, Frustration, Gefühle, Geiz, Genuss, Gewohnheit, Haltung, Hedonismus, Individualismus, Individualitätsformen, Individuum, Initiative, Interess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Kleinbürger, kollektives Handeln, Konflikt, Korruption, Menschenbild,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Oktoberrevolution, Personifikation, Plebejisches, privat/gesellschaftlich, Sein/Bewusstsein, Selbsttätigkeit, Selbstverwirklichung, Subjekt, Verantwortung, Wille

婚姻（Ehe）

A: zawāǧ.

E: marriage.

F: mariage.

R: brak, supružestvo (брак, супружество).

S: matrimonio.

除了专偶制婚姻这种首先是在具有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中普遍实行的婚姻形式之外，至今还存在着一些多配偶的婚姻形式，特别是一夫多妻制（例如在一些穆斯林的社会里，但也包括摩门教信徒）或者是少见的一妻多夫制（例如在拉达克 [Ladakh]）。专偶制婚姻首先仅仅以夫妇彼此的承诺为基础，继而变成一种公共契约，从中世纪早期以来最初是通过教会的介入，自 18 世纪以来则是通过国家的干预（参见 Marie O. Métral 1981；Michael Schröter 1985）。与之相应，婚姻、经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持续地变化。

在人类繁衍的框架内，以社会对父母关系的认可为出发点，婚姻形式已扩展到了性关系和同居生活的根本联系上，正如近来同性婚姻关系的趋势所展现的那样。

1. 和黑格尔类似，24岁的马克思已经区分了婚姻的本质和形式，他赞同婚姻的世俗本质，反对其宗教本质，并且借由社会对婚姻协议的某些方面进行调整而进一步扩展了这些看法。在关于1842年普鲁士离婚法草案——它的颁布对《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被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MEW 1，第603页，注释91）——的辩论中，他反对婚姻法首先要保证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看法。他指责草案的批评者们“抱着幸福主义的观点”：“他们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他们忘记了，几乎任何的离婚都是家庭的离散，就是纯粹从法律观点看来，子女及其财产也不能按照随心所欲的意愿和臆想来处理。如果婚姻不是家庭的基础，那么它也就会像友谊一样，不是立法的对象了。”（第149页）

马克思将他认为像“真正的友谊”一样“不可分离的”“真正的婚姻”与“在国家中”“可以分离的”“现实的婚姻”（MEW 1，第149—150页）区别开来。他批评立法纵容了任性，因为通奸者想要将任性变成婚姻法。

1.1 在其后来的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Manifest*]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Ursprung*]）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当时婚姻的形式和内容，以便为异性的共同生活阐明前景。他们（主要）以三个论据对市民的婚姻进行了批判，即法律行为、经济影响和男人的统治地位。根据马克思（关于摩尔根[Morgan]）的人种学摘要，恩格斯将一夫一妻制的历史发展（自野蛮时代以来）分为三个阶段——从群婚（乱 42
淫），到尽管确定了男女结婚却并不排除其他性交的对偶婚，再到专偶婚。对于向对偶婚及最终向专偶婚的过渡，恩格斯认为应归因于对遗传、避免近亲繁殖和女性摆脱“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的“素朴的原始的性质”的需求（MEW 21，第57页）的愿望。在后者中，他明确倾向于巴霍芬（Bachoffen）的观点，并补充了一个理由说明为何男人尽管实行了专偶制，但却不能完成走向对偶婚的第一步：“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同上）在20世纪，人种学家保罗·德雷克塞尔（Paul Drechsel）（1985，第54—55页）得出结论：在对偶婚的阶段，夫妻始终

都会联合，以限制女性未来的性行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父系的遗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民阶层推进了个人的性爱和专偶制婚姻之间的联系，但却批判权宜婚姻的特征从来都没有被放弃。相应地，专偶制婚姻这样调节着个人的性爱，以至于使婚外性爱的机会成为必需。专偶制的反面是卖淫和乱交——作为（在积极的消费需求的意义上）只为男人保留的特权。因此，阶级关系和两性关系成为由国家以某种方式（通过法律）进行调整，即面对个人性爱的动机，权力退居幕后。然而，恩格斯认为个人性爱是短暂的。“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人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MEW 21，第 83 页）在恩格斯看来——和马克思的看法类似——个人的性爱意味着一种成就，其中，恩格斯含蓄地将基于好感的爱情与肉体的爱等同起来。

43 *1.2 在无产者的婚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看到了一个基于夫妇的感情、不依赖于财产考量而带来的前景。无产者理想的婚姻生活被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社会状况所阻碍。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婚姻的两种基础，即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也会消灭”，“两性间的关系将”被变成“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MEW 4，第 377 页）。*

由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并没有具体分析男子在其历史发展中的统治地位，所以，这种统治地位偶尔就会作为容易解决的残留问题出现。于是，他能够在无产者的婚姻中看到一个希望，因为在那里不仅缺乏财产，而且也缺乏“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但他抱怨“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MEW 21，第 73—74 页）。他寄希望于人类的新生代。“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与此相适应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第 83 页）

马克思想象出一种两性间不依赖于形式的被解放的爱（*Ms* 44，MEW 40，第 535、567 页）。恩格斯则认为男人的性欲更强，它会阻碍完全的平等；然而，他在对婚姻作为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劳动契约一样的协议关系加以批判的时候，指出了夫妻之间需要克服的不平等。照此，契约双方虽然被认为是平等的，但“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MEW 21，第 74 页）在结婚时，人们并没有体验到“自愿的

同意是如何产生的。毕竟当时通常还是男人（如果不是父母的话）为了婚姻挑选女子，而不是与此相反。

2. 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以新娘的举止和境况为出发点，分析了自古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婚俗和婚礼歌曲，由此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与人种学研究做了补充。他的结论是，女
44 性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在任何情况下都由于婚姻而受到约束，“为了说服女孩离开她的家庭、追随她的丈夫，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第89页）。在通奸含义的历史发展中——拉法格视之为侵犯财产权——他指出自推行父权制婚姻和家庭以来，就存在于男子统治权中的专横，“只要她的主人有通奸的需求”，妇女的通奸就时而被当作一种“犯罪”，时而又被当作一项“神圣的义务”（第122页）。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类似，拉法格希望这种奴役妇女的社会能够被其他经济关系改变。

当无政府主义的女性社会主义者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n）批评理想婚姻为国家和教会提供了“持久控制男人和女人”（1914，第23页）的机会时，她持有一种超越经济关系批判的鲜明女性立场。在她看来，结婚意味着女性“用其姓名、隐私、自尊和生命为自己”购买了一份经济协定、一份保险合同；因此，爱情和婚姻对于戈德曼来说是处于彼此矛盾中的（第19页）。婚姻既无法为妇女，也无法为儿童提供保护。在一种“能够无视所有法律和习俗的爱情”（第26页）中，戈德曼看到了一种希望。就这一点而言，爱情总是自由的。“爱情不需要任何保护，它足以自我保护。只要生命源于爱情，就没有任何孩子会被抛弃、忍饥挨饿或者因需要爱而患病。”（第27页）由此，戈德曼将希望寄托在个别男人和女人的塑造意愿上。

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也批判现状，虽然他将工人运动对于生育保护的要求看作一种“混乱结局的征兆”，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认为“家庭已经被破坏侵蚀”（1910，第219页）——也包括无产者的家庭。在他看来，夫妻的共同意志比习俗的约束更重要，习俗导致通奸意味着“一般婚姻类型的破裂”（第211页）。他认为重要的是“男人和女人共同居住、共同操持家务并共同照顾自己和孩子”（第213页），其中爱情、家庭和婚姻对于他来说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开的（第210页）。他把个人性爱的所有形式都看作婚姻（而且明确包括穆斯林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他把希望寄托在婚姻固有的共同意志上，在这种意志上能够建立 45
一个面向未来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个人的基础之上；我们的乡镇应

该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我们的集体精神不能从任何其他幻想中获得其亲密、坚定、激情和行动，而只能从性爱的分离与排他的自然幻想中获得。”（第217页）当他由此出发，即每个社会为了生存都需要爱或者宗教，于是就会认为爱成为宗教的生产性替代。

直到19世纪，婚姻的批判者们首先讨论的是婚姻产生的条件，随着由国家管控的婚姻逐渐普遍化，其解体的条件成为核心问题。在接下来的讨论中，经济常常被解释为婚姻中性别控制的基础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列宁看来，除了经济上的依赖之外，缺乏离婚可能性对于女性来说则意味着“一副额外的枷锁”。然而，他却并不希望将自由离婚误解为向所有女性提出的离开其丈夫的要求（LW 23，第67页）。

亚力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也反对婚姻的“不可解除”，反对将婚姻与财产联系在一起，同时从根本上质疑婚姻：“婚姻的不可解除是基于与所有心理学学说相矛盾的思想，即人的心理在人的一生中的不变性。今天的道德主张荒谬的要求是无论代价如何，人都要在婚姻中‘找到他的幸福’。它要求人突然而确凿无疑地从数百万同时代人当中找到那个与他心灵相通的另一个心灵，找到第二个‘我’，唯有它能够保证婚姻的幸福。”（1918，第54页）。和埃玛·戈德曼类似，柯伦泰在婚姻的定位中看到了对女性的束缚；她将榜样和社会前景不仅与个人的性爱联系起来，还与那些“作为性别代表为自己争取权利”的单身女性联系起来（第9—10页），所有的可能性都“自由地”、“不”被男人“防御地”向她们敞开。男女之间的圆满爱情还需要两性去领会。

当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墨翟》（*Me-ti*）中提出“妻子对丈夫不忠是否伤风败俗”时，他将经济、道德和妇女受压迫的混合体中女性无法解决的矛盾婚姻关系作为主题来讨论。当女性最终不得不把自己卖给丈夫以确保她的物质生活时，他得出结论：“在一个像我们国家一样的国家里，一切都是不道德的，无论是通奸还是婚姻。”（GW 12，第474页及以下） 46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婚姻作为在国家控制下并享有特权的经济形式及同居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UNO）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结婚的可能性被确定下来（第16条）。此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以契约形式规范两性同居与两性关系，并将其与对不同需求的规范联系起来。苏联的例子令人看到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即一个国家的社会财富与在两性关系领域自由化的可

能性之间的联系问题。在那里，从1917到1918年，离婚明显变得容易了，但是从1936年开始，当国家不再能够承担某些特定“家庭职能”时，离婚变得“几乎不可能”（Bronska-Pampuch 1969，第128页），这种情况直到1965年才因一项改革而改变。

离婚时把孩子的监护权给妇女，而男人则被要求承担抚养费，这种普遍惯例主要对女性不利，因为要么是女性和孩子靠男人所支付的抚养费无法生活，要么就是靠父亲的支付行为甚至什么也得不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联邦德国，有半数的离异母亲及其未成年子女依靠濒临最低生活水平的收入生活（参见*Achter Jugendbericht* 1990，第41页）。

一方面，婚姻的形式提供了以私密方式（按照伴侣的个人需求）追求恋爱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婚姻来调控一部分行政机构的任务。过去或者如今，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任务曾经是或现在是发放信贷、分配住房（苏联、中国）、人口政策（最有力度的是中国）、两性间的分工和性行为讨论（尤其是异性恋的归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很多这样的规定虽然在法
47 律上是无效的，但在事实上却是有效的。婚姻不再是女性的主要供养场所，因为大多数妇女都有工作或者有此追求，但同时，在联邦德国有大约四分之三的妇女无法单独依靠其月收入维持生活（参见Frigga Haug 1990，第75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妇女工资低，也在于非全日制工作的增加，在于国家转移支付对工资水平的相对引导，还在于以婚姻和家庭为导向的从属负债，它们促成了这样的事实：就男人而言是职业业绩、就女性而言则是其经济状况成为标准，只要它低于国家确定的最低生活水平（Ketelhut 1993）。这种规定导致了一种男性家庭工资思想的存在，这种工资虽然被要求，但却从未实现（Smith 1994）。

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是，在两性之间已发展出一种由国家安排的契约来处理彼此好感的需求，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爱情是对婚姻的附和——在德国，主要是妇女在三月革命之前斗争的结果（Schenk 1987，Möhrmann 1978）。

4. 女权主义者反对将婚姻（和家庭）归化，因为一种历史的视角是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前提条件（Barrett/McIntosh 1982）。一些人建议，把婚姻看作一种劳动合同（Kuhn 1918；Delphy 1977；Schröder 1983），它与其他劳动合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妇女将其劳动力出售给男人，但并未得到任何工资，而男人则获得了对女性的支配权。这个视角隐含着这样的危险，即面对资本主义，父权制

获得了一种分析自主性，它忽视了资本主义与男性统治之间的各种关联（Barrett 1983，第22页）。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75）批判了“传统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通过婚姻与家庭世代相传（第252页）。朱丽叶·米歇尔（Juliet Mitchell）（1966）强调了婚姻的契约性和“爱情的自发特征”之间的矛盾，毕竟经验证明，爱情无法被融入一份契约中——这种发展有助于减少性压迫。

48 婚姻是由国家赋予特权的制度，它将继续为其他同居形式（未婚伴侣、同性伴侣）提供标准。它虽然提供了以私密方式（按照伴侣的个人需求）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摆脱男性主导地位的自由爱情的可能性仍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探索。

尽管女性仅有局部的经济独立，但在像联邦德国这样的国家里，统计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已不再在婚姻内生活，这一数据的年增长率为6%（Beckmann/Trometer 1991）。然而，人类需求的物质保障——对子女、病人、老人和失业者的照料，收养子女的可能性，财产的继承，部分的国籍问题——都会继续通过亲属关系和婚姻来调控。这对女性尤其不利，对于不想结婚或者不被允许结婚的人也是如此。在这种形势下，个人的性爱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调节。女性抱怨其伴侣参与家务劳动太少，投入的理解和情感太少，以及对性生活不满意（Metz-Göckel/Müller 1986；Segal 1994）。

一方面，婚姻提供了抵御公共干预的保护，比如当夫妻不必在法庭上互相指责时；另一方面，对于女性来说，仍然很难保护自己免受丈夫的直接暴力。

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通奸的报道在欧洲国家变得越来越开放，有婚外情的可能性比没有的更大，男性比女性发生的频率更高。离婚率升高，婚外生活的方式日益增多，以至于法律必须适应这些变化，例如，使未婚伴侣关系在法律上等同于婚姻（在分居和社会福利国家方面），以及与此相反，像刑事法律处理婚外强奸那样处理婚内强奸。

参考文献：

Achter Jugendbericht, Bericht über Bestrebungen und Leistungen der Jugendhilfe, Bonn 1990; M. Barrett, *Das unterstellte Geschlecht*, Berlin/W 1983; dies. u. M. McIntosh, *The Anti-social Family*, London 1982; A.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Frankfurt/M 1977; P. Beckmann, R. Trometer, »Neue Dienstleistungen des ALLBUS: Haushalts- und Familientypologien, Klassenschema nach Goldthorpe«, in: *ZUMA-Nachrichten* 28, 1991; W. Bronska-

Pampuch, »Ergebnisse bei den Marxisten«, in: Ch. Rotzoll (Hg.), *Emanzipation und Ehe*, München 1969; C. Delphy, *The Main Enemy. Women'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Center*, London 1977; P. Drechsel, »Eine Rekonstruktion der Evolution der Deszendenzorganisation als Erscheinungsform sich entwickelnder geschlechtsspezifischer Arbeitsteilung«, in: *FKP* 16, 1985, 28–63; S. Firestone, *Frauenbefreiung und sexuelle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75; E. Goldmann, »Ehe und Liebe«, in: *Frauen in der Revolution*, Bd. 2, Berlin/W 1977, 19–28; F. Haug, »Die Hälfte des Himmels«, in: UFV und Argument-Frauenredaktion, *Ohne uns ist kein Staat zu machen*, Hamburg 1990, 75–83; B. Ketelhut, *Vereinen, was ewig sich flieht? Zum Zusammenhang von Familien-, Liebes- und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n*, Münster-Hamburg 1993; A. Kollontai, *Die neue Moral und die Arbeiterklasse*, Münster 1977; A. Kuhn, »Structures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 in the Family«, in: dies. u. A. Wolpe (Hg.),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London 1978, 42–67; P. Lafargu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 F. Keller, Hamburg 1995; G. Landauer, »Von der Ehe«, in: ders., *Zwang und Befreiung*, Köln, 208–21; S. Metz-Göckel, U. Müller 1986, *Der Mann*, Weinheim-Basel 1986; J. Mitchell, *Frauenbewegung—Frauenbefreiung*, Frankfurt/M 1981; R. Möhrmann, *Frauenemanzipation im deutschen Vormärz. Texte und Dekumente*, Stuttgart 1978; H. Schenk, *Freie Liebe—wilde Ehe. Über die allmähliche Auflösung der Ehe durch die Liebe*, München 1987; H. Schröder, »Das ›Recht‹ der Väter«, in: L. F. Pusch (Hg.), *Inspektion der Herrenkultur*, Frankfurt/M 1983, 477–506; M. Schröter, »Wo zwei zusammenkommen in rechter Ehe ...« *Sozio- und psychogenetische Studien über Eheschließungsvorgänge vom 12. bis 15. Jh.*, Frankfurt/M 1985; L. Segal, *Straight Sex.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1994; D. Smith, »Familenlohn und Männergewalt«, in: *FKP* 33, 33–54.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
（Barbara Ketelhut） 撰
马剑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nachismus, Arbeitsteilung, Armut/Reichtum, Bedürfnisse, Ethnologie, Familie, Familienarbeit/Hausarbeit, Feminismus, Frauenbewegung, Frauenunterdrückung, freie Lieb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walt, Hedonismus, Herrschaft, Liebe, Lust,

Moral, Prostitution, Sexualität, Sozialstaat

铁的（ehern）

A: ḥadīdī.

E: iron.

F: d'airain.

R: železnyj (железный).

S: férreo.

出自古高地德语 êrîn，êr 即矿石的形容词；隐喻“坚硬的、牢固的、不可弯曲的（永远持久的、耐久的）：坚强的意志；铁的（不可改变的）法则”（Duden 1976，2，第 612 页）。在古代语言中，占主导地位的首先是非隐喻的使用，其中材料通常在由它制作的工具的名称上显示出来（比如 χαλκεῖον 是一种铁制的容器，或者 χαλκῷ，字面意思是被“用矿石”杀死，参见 *Ilias*，23.176）；除此之外，形容词 χάλκεος 的隐喻义也被使用，指“坚硬的、结实的、强壮的”，作为战神阿瑞斯（Ares）或者男人、心肠的修饰语，也指睡眠（意为死亡的“酣眠”）；类似的有 σιδήρεος，“铁质的”，它在荷马（Homer）（*Ilias*，23.177）那里已经发挥了隐喻作用：πυρὸς μένος ... σιδήρεον，“烈火的无情的力量”（Liddell/Scott）。在古代，这个表达被诺斯替主义（Gnosis）赋予宗教意义，以表达在异化的物质的世界牢狱中“铁墙”后的灵魂禁锢。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设身处地地描述了法西斯主义时期的这种状况：“那时，人们必须带着何种感受仰望布满星斗的天空啊！在他们看来，星光的闪烁该是何其邪恶……其呆板的、一成不变的表面……这密不透风地与彼岸的家乡分离的穹窿看起来又是多么吓人……。一片已经变得坚硬的天空使恐惧、反抗、向往、恳求和鄙视都无情地爆发。人们逐字逐句地谈论着苍穹的‘铁墙’。”（1934，第 162—163 页；参见 Haug 1991，第 73 页）

因为“铁的”与呆板的、一成不变的观念有关，所以在声称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准确认识时，一方面，这个形容词可以用来反驳怀疑和异议；另一方面，它可以表达受制于这种发展或者表达在一种总览状态下对结构性行为障碍的认识。作为短语，它本身往往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障碍。

1. 最晚自从歌德（Goethe）“把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永恒不变的规律’改为‘永恒的铁的规律’”（MEW 35，第 298 页）以来，“铁的”这个表示强调的比喻便属于高雅文风的市民阶层的修辞手法。除此之外，在资本主

义的钢铁时代里，发挥作用的是接近口语的 eisern（比如俾斯麦 [Bismarck] 作为 eiserner Kanzler，即铁血宰相），stählern（即钢的）用得更少。彼得·魏斯（Peter Weiss）在阿道夫·门采尔（Adolf Menzel）的画作《轧铁工厂》（*Eisenwalzwerk*）里看到了作为“铁的奴仆”的工人——“德国劳动者的神话”，他加工着象征“帝国的扩张”的“金属”（1975，第 355—356 页）。但是，即使是在工人运动中，“铁的”作为表达尊严的词汇也很受欢迎，用以修饰坚定、战备和类似的美德。在一封国际工人协会（IAA）祝贺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64 年再度当选总统的信中，马克思称赞他是“工人阶级忠诚的（starksinnig，eisern）儿子”（MEW 16，第 19 页）。用金属来比喻坚韧，表达得很阳刚（参见恩格斯关于马拉 [Marat] 和丹东 [Danton] 这样的“刚毅果敢的人物”和关于“具有坚强毅力的”人的讲话，MEW 2，第 613—614 页）。恩格斯赞扬了在反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之下德国工人的“铁一般的纪律”（MEW 22，第 10 页）。惯用语的亲合力特别存在于“铁的”和“必然性”之间。为此，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Allzumenschliches*）（I，Aph. 514）一书中这样解释：“铁的必然性是一样东西。由这样东西，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认识到，它既不是铁的，也不是必然的。”

51

为了表达“牢不可破”“坚定不移”“不可改变的规定”等等（参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讲话，LW 21，第 64 页），人们用“铁的”来表现工人运动语言中确信的激情，这种表达在其实际核心中常常是非常模糊的。当修辞手段夸夸其谈但却空洞乏味时，就会动用这样的元素。比如，拉萨尔（Lassalle）就让“时代”去宣布“阶级的胜利”：“它用铁的手指催促地敲击！今天还是**民族重生**的问题，不久以后就会自己变成民族生存的问题。”（GRS 3，第 260—261 页）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帝国议会党团在 1914 年 8 月 4 日关于同意战争拨款即为自我背叛的声明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将面对战争的铁的事实。”（引自 Luxemburg，W 4，第 63 页）

此类“充满信心”（阿多诺语）体现出官员语言的特点，它将自己与反思隔离开来。以法律知识呈现的、客观主义的和经济主义的确定性惯用语能够作为“意识形态的黏固剂”（葛兰西语）发挥作用，这样它就组织起团结一致和认同。在深受拉萨尔影响的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批评了这一作用：“‘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MEW 19，第 25 页）这里的

"虔诚的信徒们"是指拉萨尔的支持者。(参见同上:"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但是,这句话被更广泛地理解为对于正统修辞的洞察,从"正确的学说"变成空洞的自我肯定。恩格斯的评论——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是"一种很有弹性的规律"(MEW 34,第127页)——也要引申为一般性结论:坚硬的修辞外壳往往掩盖着一个模糊的内核。

然而,马克思本人偶尔也把"铁的"当作褒义词来使用。在谈到工场手工业时,他就指出了"一定数量的工人"的
52 "比例的铁的规律"(MEW 23,第376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1册(1867)的序言里,他谈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并将它定义为"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MEW 23,第12页)。但是,在持续数年的法语翻译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将他的理论地位限制在"西欧"(de l'Europe occidentale)所有其他国家都将经历的一种发展"提纲"(esquisse)上(II.7,第634页;与此相反,参见MEW 23,第744页)。铁的必然性的修辞被放弃了。"停滞"和"僵化"充当了实践形式的隐喻,这些实践形式使个人相对于自然力量独立出来并且具体化了。这种语言惯用法构成了本应坚定的永恒主张的对立面。因此,说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梦想着规则的"铁的必然性"从而梦想"消除偶然性"(Schwemmer 1995,第268页),是一种具有倾向性错误的概括。

恩格斯经常使用这个短语。在《自然辩证法》(*DN*)的导言中,面对普遍的生成和消逝,他"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MEW 20,第327页)。

2. 伯恩施坦(Bernstein)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39页)中,嘲笑了那种夸大"历史的铁的必然性"的修辞。正如他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钢铁般构造的信念的动摇",将"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第219页)。伯恩施坦的批评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继承了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的观点(参见*AD*,MEW 20,第264页),并补充道:"这种'飞跃'也与历史必然性……相联。"(W 4,第61页)后来,关于强度的隐喻——也可以从诸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Molotow)(锤子的意思)这类

名字中听得出来——逐渐变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激情。布莱希特将这种修辞的“硬”与征服硬的“软”的形象进行对照，作为辩证法（和辩证策略）的形象。

3. 在第二国际的这种修辞影响下（参见 Rehmann 1997），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称物化的理性的外界压力
53 是“钢铁牢笼……，它使经济工作获得了当前的性质和命运”（GA I.15，第 464 页；GPS，第 331—332 页），这种说法直击资产阶级宿命论的核心资本主义经济学。按照韦伯的观点，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它的影响，“命运使得钢铁般的牢笼产生了。禁欲已着手改造世界，并在这世界踏实地发挥作用，结果是，这世间的物资财货，如今已史无前例地赢得了君临人类之巨大且终究无以从其中逃脱的力量。如今，禁欲的精神已溜出了这牢笼——是否永远，只有天晓得？总之，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机械的僵化”（RS，第 203—204 页）。在革命的 1918 年，韦伯发问：是否希望通过废除资本主义，以“打破现代工业劳动的钢铁牢笼”？他对此表示否定，因为这将意味着国家官僚机构的专制。他在著作中断定：“当……理性的官方行政部门……决定其事务的领导方式时，未来的顺从的牢笼就会建立起来，有朝一日，人们将无能为力地屈服于这一牢笼，就像在古埃及国家的农民一样。”（GA I.15，第 464 页；GPS，第 331—332 页）在韦伯的影响下，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在其《政党社会学》（*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中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ehernes Gesetz der Oligarchie）（第 362 页及以下）。

4. 在葛兰西的《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里，eisern 在分析泰勒主义（Taylorismus）和福特主义（Fordismus）的时候，偶尔和韦伯的问题相呼应，主要用作一个批判—描述的概念，经常与“纪律”一起使用（参见 H. 1，§92；H. 6，§28）。葛兰西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铁的独裁”和在其框架内包含的“旨在弥补结构性弱点的意识形态狂热”因素，或者天主教会阻止其知识分子远离“普通人”的“铁杆纪律”，它“甚至都没有给自己提出”将自己的水平向知识分子看齐的“任务”（H. 11，§12，*Gef* 6，第 1383 页）。葛兰西还特别将崩溃理论批判为“铁的经济决定论的一种形式”（H. 7，§10），并且将“原则上对于妥协的反感”理解为“铁的信念，即……对 54
于历史发展来说，存在着和自然法则相同的客观规律，由此增加了对某种宿命

论的信念，在其方式上类似于宗教目的论"（H. 13，§23，*Gef* 7，第 1586 页）。

5.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主义呼唤"经济学的铁律"（Wassner 1984）时，对跨国高科技资本主义的信仰表明，"最初的现代化所建立的束缚性钢铁牢笼破碎了。其结果是：它主要开启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看似非政治的中心和参与者的不自觉的、往往是看不见的并且不受欢迎的新的行动机会。然而，它们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和多重价值的，因此可以为对立的利益和参与者铺平道路"（Beck/Giddens/Lash 1996，第 10 页）。但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致力于在"全球化"的符号下把资本主义的"实际约束"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硬。在后共产主义中，关于铁定信仰已有其替代的讨论业已消散。回应困境的随机应变只会被修辞的铁甲所阻碍。

参考文献：

U. Beck, A. Giddens, S. Lash,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 Frankfurt/M 1996; Duden, *Groß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6 Bde., Wiesbaden 1976;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1966), 3. veränd. A., Hamburg 1991; H. Jonas, *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 Teil I: *Die mythologische Gnosis*, Göttingen 1934; F. Lassalle, *Reden und Schriften*, hgg. v. E. Bernstein, 3 Bde., Berlin 1893; H. G. Liddell u.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1843), Nachdruck der 9., ergänzten A. v. 1940, Oxford-New York 1990; R. Michels,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oligarchischen Tendenzen des Gruppenlebens*, Leipzig 1911, ²Stuttgart 1925 (Neudruck mit Nachwort von W. Conze, Stuttgart 1957); J. Rehmann, *Max Weber: Modernisierung als passive Revolution. Kontextstudien zu Politik, Philosophie und Religion im Übergang zum Fordismus*, Phil. Diss.,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1997; O. Schwemmer, »Philosophie als Weltveränderung?«, in: *Int. Z. f. Phil.*, H. 2, 1995, 260–79; F. Wassner, »Die Banken und ihre Diskretion«, in: FAZ, 1. 2. 1984, 13;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3 Bde., ³Tübingen 1934 (zit. RS);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d. 1, Frankfurt/M 1975.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马剑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rtikulation, Disziplin, Dogmatismus,

Dummheit, ehernes Lohngesetz, ewig, Fordismus, Gesetz, Kompromiss, Metapher, Notwendigkeit, Objektivismus, Ökonomismus, Orthodoxie, Phrasen, Rhetorik, Sprache, Taylorismus, Verdinglichung, Verselbständigung, Zusammenbruchstheorie

55 铁的工资规律 (ehernes Lohngesetz)

A: qānūn aǧr ḥadīdī.

E: iron law of wages.

F: loi d'airain des salaires.

R: železnyj zakon zarabotnoj platy (железный закон заработной платы).

S: ley de bronce de los salarios.

1. "铁的工资规律"这个术语可以在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著作中找到。根据其《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Zentralkomitee*)(1863年3月),他在《工人读本》(*Arbeiterlesebuch*)中写道:"我的公开答复中最重要的一点为,其他一切必须用以作为根据而得到说明的东西是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所提出的平均工资规律。"此后,他又引用了《答复》中的话:"在今天的关系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的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久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的话,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越来越多的工人会结婚和繁殖后代,工人人数就会增加,从而人手的供应就会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贫困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水平。"这个规律"已为全体科学人士一致承认,它的根据是如此简单和明了,以至我认为不可能听到它的反对意见"(GRS 3,第183—184页)。

2. 在拉萨尔的自我评价中有一个矛盾,按照他的评价,是他自己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中提出了这一规律,而另一方面,这已经得到了各方面的普遍承认。对此,马克思在一封写给女儿燕妮(Jenny)的信中强调:"拉萨尔想出来的只是词句(而不

是发现了李嘉图[Ricardo]和杜尔哥[Turgot]等人确定的规律本身)。而实际上他——拉萨尔——是借用了'有文化
56 的'德国人所熟悉的歌德的说法,而歌德则是把索福克勒斯的'永恒不变的规律'改为'永恒的铁的规律'。"(MEW 35,第298页)事实上,后来被拉萨尔作为证据引用的经济学家(斯密[Smith]、李嘉图、萨伊[Say]、穆勒[Mill]、劳[Rau]、罗雪尔[Roscher]和洛贝尔图斯[Rodbertus])都从未认为必须将他们所发现的事实上升到规律的高度。

2.1 拉萨尔的想法——缩减到其理性的内核——实际上早在重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中就可以找到。其创始人魁奈(Quesnay)在1767年的《第二经济问题》(*Second problème économique*)中写道:"工资的价格以及领薪者由此所能获得的享受,已被精准确定,并且由他们之间的激烈竞争被限制在最低程度。"(引自Daire 1846,第134页)鉴于革命前的法国的状况,杜尔哥提供了以下论证:**"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的工资被限制到了其必要的生活费用的水平。"**(1770,第99页)按照重农主义的观点,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他们只得到了一份最低的工资(工资最低额),它只能保障他们(及其家人)继续生存下去。这个论证的语境与拉萨尔的思想完全不同,但其优点在于把握了当时具体的历史状况(见下)。

2.2 在《剩余价值理论》(*TM*)中,马克思开始分析斯密并得出结论:"A. 斯密(A. Smith)和一切值得一谈的经济学家一样,从重农学派那里接受了平均工资的概念,他把平均工资叫作'工资的自然价格'。"(MEW 26.1,第40页)然后他引用了《国富论》(*Reichtum*):"一个人总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他的工资至少要够维持他的生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应略高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就不可能养活一家人,这些工人就不能传宗接代。"(同上;参见Smith,第89页)在这里,最低工资被表述得更精确,即还考虑到工人在再生产方面的需要。但是,斯密不仅接受并精确阐述了重农主义理论,他还在一点上将其继续发展,这对于铁的工资规律在历史上和理论上的正确分类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发挥作用的不仅有竞争,还有它的对立面:"一般的工资在任何地方都取决于协议,协议通常是由 57
利益无论如何都不一致的两方之间订立的。……然而,不难预见的是,双方中的哪一方在正常情况下会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优势,从而迫使另一方遵守它的条款。由于企业家的数量不是非常多,所以他们更容易联合在一起。另外,他们的联合会组织受到法律的准许或者至少不像工人组织那样被禁止。我们没有任

何议会法令针对企图降低劳动力价格的同盟，但却有很多议会法令是针对试图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同盟的。”（第86—87页）

马克思认为，斯密以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问题（MEW 26.1，第121页），他在其著作中给出了不止一个最低工资的规定。因此，我们找到了一个将工资与人口流动之间的联系置于中心地位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被马尔萨斯（Malthus）修改成自己的人口理论，在它的基础之上，李嘉图根据所谓耕地产量递减规律，创立了自己的工资理论。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全部的价值产品表现为工资、利润和退休金，为工资基金理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出发点，就像它尤其是被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创立的那样。在发展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下，作为铁的工资规律的概念的来源，这两个发展方向（参见 Vint 1994）都值得一提。

2.3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找不到斯密关于企业家和工人之间达成协议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参见他们在《神圣家族》中的批判，MEW 2，第30—31页），但是，到1858—1859年，已出现了这种观点，即在私有财产统治的条件下，由于自由工人之间的竞争，他们的工资在一个最低额的上下浮动（参见 *Umrisse*，MEW 1，第512—513页；*HF*，MEW 2，第16页；*Lage*，MEW 2，第306—319页；*Elend*，MEW 4，第82—85页）。早在1858年4月，马克思就在其未来的《资本论》一书“资本一般”这一篇中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MEW 29，第312—315页）。但另一方面，在《哲学的贫困》[*Elend*]和《共产党宣言》中也已经可以找到关于组织工会和罢工的必要性的提示（MEW 4，第175—182、470—471页）。

3. 铁的工资规律的经济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是——在西欧，直到18世纪中叶，实际工资大幅、长期地在同一低水 58
平上波动，从那时起到19世纪中叶，它一直在下降（参见 Kuczynski，*Geschichte*，Bd. 22，第191页；32，第79页；37，第111页；Brown/Hopkins 1956，第311—314页；Scholliers 1989）。数据显示，当时的实际工资大致相当于维持生计的水平，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早在杜尔哥时代就被打下贫困的烙印。与封建晚期—资本主义早期不同，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增长或多或少都被城市完全吸收，所以，那里的劳动力数量增加，相互之间的竞争加剧，于是进一步压低了实际工资。在这方面，法定的结盟禁令发挥着作用——这是尚未完全发展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禁令直到19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才逐步被废除。但是，重农主义者提出的对最低工资的论证的这一面却逐渐过时了：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英国，实际工资还徘徊在此前的低水平附近，有时也会低于这个水平，那么在1856—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结束之后，实际工资终于开始增长；在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820年起才具备可靠数据，它们显示，在1856—1857年之前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然后适度地增长（参见Kuczynski，*Geschichte*，Bd. 37，第111页）。拉萨尔还没有判断出据称如此铁定的趋势改变及其决定性原因。他凭借铁的工资规律论证了用国家帮助来建立合作社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他忽视了工人联盟或者工会的行动（参见Dunning 1860和马克思在《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Ms 63-67*]中的评论，MEGA II.4.1，第11—12页），它们越来越有效地同最低工资的资本主义内在趋势进行斗争（参见Zwiedineck-Südenhorst 1900）。事实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实际工资增长了一半以上（参见Kuczynski，*Geschichte*，Bd. 37，第111、116页）。发展起来的、自发组织的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了使工资不再摇摆于物质上的最低生存水平，而是大大超过了这一水平。

4. 无论是在三卷《资本论》（*K I*，*K II*，*K III*）还是在相关的准备文献中，都没有提到或者批判地看待铁的工资规律。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铁的工资规律只被批判性地提到一次——在关于《资本论》第1卷的评论中，恩格斯指出，拉萨尔“限于不断重复所谓李 59
嘉图的工资律”，相反，马克思“在与整个经济科学的联系中，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MEW 16，第210页）。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气愤的是，在1875年拉萨尔派（Lassalleaner）和爱森纳赫派（Eisenacher）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时提出的党纲（《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中，铁的工资规律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Gotha*，MEW 19，第24—26页；MEW 34，第125—131页，第158—163页）。恩格斯后来的论战（MEW 22，第117页；35，第359—360页；36，第686页；38，第5页）也延续着1875年表述的方向，据此，“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而马克思则首先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资本积累的篇章中证明了：“调节工资的各种

规律……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MEW 35，第127页）（此处有误，应为MEW 34。——译者）

4.1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把铁的工资规律视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这一事实表明，无论是在1865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与韦斯顿（Weston）的论战（参见Lohn，MEW 16，第101—152页）中，还是在1881年恩格斯为《劳动旗帜报》（*Labour Standard*）撰写的关于劳动力工资政策、工会和购买力发展等问题的系列文章（MEW 19，第247—290页）中，它都没有发挥作用。

铁的工资规律本身在实践中被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理论上被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证明是荒谬的。它不仅在思想史的著作中，而且在一些关于普通经济理论的著作中依然被提及（参见例如Blaug 1987；Samuelson/Nordhaus 1992），这是由反对者的历史意义造成的。

4.2 奥古斯特·倍倍尔回忆说，在他年轻时，德国“几乎所有当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是通过拉萨尔了解马克思的”（1910，第131页）。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r）1883年对恩格斯说，他“注意到年轻人中缺乏马克思和你的优秀品质。他们都知道拉萨尔”（引自Andréas 1981，第27页）。在讨论新的党纲时，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遗憾地指出：“我们不得不在《哥达纲领》（1875）中提到的一种铁的工资规律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所谓的‘规律’来自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个表达被拉萨尔所鼓吹，还完美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它便于理解、很直观，唯独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1890，第167页）随着拉萨尔影响的减弱，铁的工资规律逐渐消失，终于成为历史的记忆。尽管直到1914年，它仍然是一个流行的“国民经济学说史”的博士论文主题，但在现实的讨论中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在1910年写作关于工人阶级和物价上涨的内容（WA 1，第641页及以下）时，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在分析“为了获得劳动合同而斗争”（1910，第487页及以下）时，都没有提及铁的工资规律。它总是在马克思的纲领批判的语境中被提及（参见K. Korsch，GA 3，第150—154页；H.-J. Friederici [1985]；Sh. Na'aman [1970]）。

参考文献：

B. Andréas,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Ferdinand Lassalle«,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3. Jg., 1963, 331-423;

ders., *Ferdinand Lassalle—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 Bibliographie ihrer Schriften und der Literatur über sie von 1840 bis 1975*, Bonn 1981; A. Bebel, *Aus meinem Leben*. Bd. 1, Stuttgart 1910; M. Blaug, »Iron law of wages«, in: J. Eatwell, M. Millgate, P. Newman (Hg.),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Bd. 2, London/Basingstoke 1987, 1001f; E. H. Ph. Brown u. Sh. V. Hopkins, »Seven centuries of the prices of consumables compared with builders' wage-rates«, in: *Economica*, Oxford 1956, Nr. 92, 296–314; E. Daire (Hg.), *Physiocrates*. Bd. 1–2, Paris 1846; J. T. Dunning, *Trades Unions, and Strikes, their Philosophy and Intention*, London 1860; H.-J. Friederici, *Ferdinand Lassalle.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Berlin/DDR 1985;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1910), Frankfurt/M 1968; J. Kuczynski, *Die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Bd. 1–40, Berlin 1960–72; W. Liebknecht, [Redebeitrag], in: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es der SPD zu Halle«, Berlin 1890; Sh. Na'aman, *Lassalle*, Hannover 1970; P. A. Samuelson u. W. D. Nordhaus, *Economics*, New York 1992; P. Scholliers (Hg.), *Real Wages in 19th and 20th Century Europe.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New York-Oxford-München 1989; A. J. R. Turgot,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Bildung und Verteilung der Reichtümer* (1770), Berlin/DDR 1981; J. Vint, *Capital and Wages. A Lakatosian History of the Wages Fund Doctrine*, Aldershot 1994; O. v. Zwiedineck-Südenhorst, *Lohnpolitik und Lohntheorie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Minimallohnes*, Leipzig 1900.

托马斯·库钦斯基
（Thomas Kuczynski） 撰
马剑 译，张文红 校

参见：61
Arbeitskraft,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markt, ehern, Etatismus, gerechter Lohn, Gewerkschaften, Genossenschaft, Konkurrenz, Lassalleanismus, Lohn, Lohnform, Malthusianismus, Populationstheorie, Streik, Verelendung

荣誉工作（ehrenamtliche Arbeit）

A: 'amal taṭawwu'ī.

E: volunteer work.

F: activité bénévole.

R: obščestvennyj trud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уд).

S: trabajo voluntario.

荣誉工作预设了这样一种关于工作的理解，即被支付报酬的才被认为是工作，但这样一来，很大一部分对于社会而言必要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工作了（尤其是那些主要由主妇从事的家务）。在此，“荣誉”（即象征性的报酬）的作用就是要对那些雇佣形式和家庭之外的必要劳动力进一步加以利用。因此，荣誉工作者既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开口，同时也是对雇佣工作形式的批判。

荣誉工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福利慈善领域，在这些领域
61 中，市场经济和基于高科技生产力的政府渐渐无法“满足人们最重要的需求”；里夫金（Rifkin）认为，“第三产业”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独立于市场和政府运作的”慈善活动领域（1996，第179页及以下）。1991年，51%的美国人平均每周在这个领域投入4.2小时的劳动。1996年，德国政府的数据表明，有多达1200万德国人从事过“荣誉”工作（FAZ，1996年10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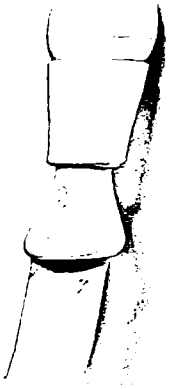
“荣誉”的官方定义是“没有服务合同和实质报酬而在社会服务和体制中从事专门工作”（*Freie Wohlfahrtspflege*，1983，第33页）。另一种定义则是“在社会领域中，不以报酬为目的的志愿活动”；因此，除了“补贴和偿还垫款”，荣誉也意味着无偿劳动（*Ehrenamtliche Arbeit*，1982，第9页）。荣誉工作还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在不少荣誉工作者看来，这些称呼有点不合时宜，需要修改，例如：自由合作、志愿工作、无目的救助、为社会无私工作等等（Notz 1989，第43页；Müller/Rauschenbach 1988，第7页）。

历史地看，荣誉工作首先是与富裕 62
资产阶级的私营慈善组织相关联的。随着慈善团体、福利型政府的发展，以及作为“社会荣誉职位”的那种基于个人关系的、按职业组织起来的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的兴起，“慈善互助会”也被视作荣誉工作的一部分，并成为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联邦德国的叙事中，我们应当区分两类荣誉工作：一类是负责慈善团体的**政治性荣誉职位**，以及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宗教等委员会中的监管会；另一类则是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作为（无偿）劳动或（不受社会保护的）服务性的荣誉工作。一方面，传统上的无偿分享，尤其是教会与慈善团体的社会工作，被视作荣誉工作；另一方面，文化与体育中的自助和倡议活动也被归在荣誉工作的范围内。荣誉工作中的活动有时伴随着政治上的诉求，例

如公民倡议等。这些活动旨在帮助社会边缘群体，并且提醒公众关注这些问题，或者在政治上为其寻求解决方案。有些人倾向于在机构、团体和教会中从事荣誉工作，有些人参加这些团体的目的是在其中施加影响。自助活动与慈善活动之间的界限正变得日益模糊。

社会福利性质的荣誉工作往往首先出现在儿童、老人的社会救助以及医疗健康领域。而后，救助的领域渐渐扩展，包括：外来移民、离异双亲、幼儿和学龄儿童、青少年、失业者、无家可归者、残障人士、艾滋病患者、吸毒者、年老或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囚犯、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等等。如果没有荣誉工作，许多需要救助的人就会更加被社会忽视。荣誉救助者不仅带着善良的意愿工作，而且把他们（先前）赖以谋生的有偿工作以及在家庭和护理工作中获得的各种能力投入到荣誉工作中。



荣誉工作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联邦德国1993年的统计表明，光是慈善义工的数量就高达170万人，他们在7万多家组织和机构中提供荣誉服务。这相当于16万全职劳动者的劳动量（Sengling 1993）。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荣誉工作者是女性。在社会救助领域，女性荣誉工作者的比例更是高达94%（Bock 1994，第13页）。他们的社会工作是无报酬的。虽然他们的花费会得到一定的补助，但那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荣誉工作者是依靠其他收入维持生计的，例如他们自己的其他收入或者他们配偶的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前提是“养家的人”与“家庭主妇”在劳动分工上的性别等级差异。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荣誉工作越来越多地在意识形态上被重新评估，这往往是通过表彰、“荣誉者日”和公众活动来达成的（Nolte 1996）。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日益意识到荣誉工作作为相互关爱的行动，事实上起到了降低成本的效果。

无偿（或应当无偿的）工作与荣誉工作之间，并没有那种“质料上的”、关乎具体效用特征的区分。大多数荣誉工作也可以是有偿工作。荣誉工作的主要特征在于志愿、无偿以及自我负责（主要指参与种类、环境以及活动的目标）。对于有意义工作的兴趣、自身对行动的决定性、对社会团体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以及贡献自己的经验或能力，这些往往是荣誉工作最主要的驱动力。19世纪80年代之后，传统上作为参与荣誉工作主要原因的宗教慈善动机在逐渐减少（参见Notz 1989，第143—144页；Kramer等1993，第69页）。

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德国，由于妇女参与劳动的比例很高，无偿社会救助作为“对第三方有利的工作”，因而需要毫无保留地进行帮助也就是理所当

然的了，这类工作两性都有参与（Müller-Kohlenberg 1993，第81页）。1919年之后，苏联以共产主义义务劳动（Subbotniks）（周末闲暇时间进行的生产劳动）的形式推行集体式的无偿工作。列宁把新社会的开端定义为：一种无偿劳动，它“不是为了劳动者个人或与他亲近的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疏远的人’，也就是作为全体的整个社会的利益”（LW 29，第417页）。在雇佣劳动形式已经消亡的社会中，将志愿社会工作称为荣誉工作似
64 乎是有问题的。尽管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政府有意识地在“工人阶级战斗团”等准军事组织中进行意识形态的整合，并且在1961年修建柏林墙的过程中将其付诸实践；反过来说，这类带有政治动机的团体也会避免从事这样的活动，例如在1989年10月反对莱比锡游行示威中所发生的那样。1989—1990年之后，大多数这类无偿社会工作组织或是被解散，或是被合并到西德相应的荣誉工作组织（例如福利组织、体育运动队、志愿消防队等）中。此外，在剧烈的社会解体过程中，为了捍卫社会利益和文化主张，还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荣誉工作形式（例如失业者团体、租户联合会、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倡议、教育界联盟等）。

社会工作。托马斯·奥尔克（Thomas Olk）（1988）把社会工作视作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非正式的、私人的干预和正式的、国家化的社会干预相互影响。专业社会工作与荣誉社会工作的相互合作并不是毫无冲突的。虽然形式上的培训并不能作为是否可以从事荣誉工作的标准，但荣誉工作者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情形屡见不鲜。汉斯·蒂尔施（Hans Thiersch）（1988）指出了荣誉工作所受到的来自体制化和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压力。他在其中看到这样一种危险，即体制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可能无法觉察到急迫的普遍社会问题和社会所急需的救助。事实上，志愿的社会救助——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志工——已经有所衰退。其中的原因是社会的个人化和个体化（Beck 1986），以及人们的价值观渐渐转向享乐主义（参见Klages 1984）。

价值。大约从1989年开始，人们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社会中不承担义务的现象提出了批判，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价值的争论。人们对保守价值、关系和传统的丧失感到遗憾（Walzer 1993，第160页）。主张解放与理性的观点被视作使社会变得冷酷无情的罪魁祸首。源于美国的社群主义被认为提供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个选项，社群主义试图为“保存完好的共同体”寻求新的价值（Honneth 1993，第10页），它建立在以往的共同体基础上，存在于传

统的共同体中，在那里，人们并未遗忘对于他人命运和社会的兴趣（Taylor 1995，第 10 页）。在新自由主义视角中，社会责任和社会福利的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所代表和承担的（Jung 1994，第 65 110 页）。因此荣誉工作也成为 20 世纪末社会政治论述中的潮流。社会福利被广泛地私有化，并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削减的影响，社会机构的一部分职能被交给了慈善机构，也就是自助和荣誉工作。与专业救助人士冷冰冰的态度相比，小型社会网络更富于人性的温暖，这个优势使得后者在救助中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参见 Schuster 1991，第 13—14 页），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大都市中的失业与贫困也在日益增加。荣誉工作被认为“有助于增进福祉”，因为它能以多种方式承担社会责任，并且能完成那些最初并未指派给它的任务。在专业组织的救助体系之外，荣誉工作在社会领域还有更多的潜力（Kramer 等 1993，第 46 页、第 66 页及以下、第 75 页）。保守派的政策认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或者都愿意在工作中实现自我，我们的满足感还来自家庭以及荣誉工作中的彼此互助。

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对荣誉工作的批判主要源于它们所包含的雇佣劳动形式，这种批判针对的是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及对于工资的依赖性。另一些批判则是针对其中的性别差异。批判的目标在于达成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化的社会总体劳动，以及适用于所有人的有偿劳动的权利。只有这样，那种被解放的荣誉工作维度，也就是那种没有剥削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才能得以实现。人们试图给出这样一种劳动，它能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将一切有偿劳动、家务劳动，以及政治、文化、艺术和社会等领域的劳动统一起来，而为使儿童、青少年、病人和老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所提供的慈善、责任和救助，也都将被整合到这统一的劳动中来。那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Manifest*，MEW 4，第 482 页）的社会。

参考文献：

U. Beck u. E. Beck-Gernsheim (Hg.), *Riskante Freiheiten*, Frankfurt/M 1994; T. Bock, »Ehrenamt—Definition,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Perspektiven«, in: Akademi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usw. (Hg.), *EhrenAmt—Krise oder Formwandel?*, Tutzing 1994, 3-20; 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Der Freien Wohlfahrtspflege (Hg.), *Ehrenamtliche Arbeit in der Freien Wohlfahrtspflege*, Bonn 1982; dies., *Die Freie Wohlfahrtspflege*, Bonn 1983; A. Honneth (Hg.), *Kommunitarismus*, Frankfurt/M-New York 1993; D. Jung, »Gemeinschaft und Geschlechterdemokratie«, in: M. 66

Fechtner (Hg.), *Mut zur Politik und politischen Verantwortung?*, Frankfurt/M 1994, 108–14; H. Klages, *Wertorientierungen im Wandel. Rückblick, Gegenwartsanalyse, Prognosen*, Frankfurt/M 1984; D. Kramer, P. Sauer, S. Wagner, *Untersuchung über Art, Umfang und Motivation ehrenamtlicher Arbeit im Rahmen des Paritätischen Wohlfahrtsverbandes Berlin*, Berlin 1993; H. Müller-Kohlenberg, E. v. Kardorff u. K. Kraimer, *Soziales Engagement in Ost und West. Eine Berliner Studie*, Berlin 1993; S. Müller, T. Rauschenbach (Hg.), *Das soziale Ehrenamt. Nützliche Arbeit zum Nulltarif*, Weinheim-München 1988; C. Nolte, *Rede anlässlich der Veranstaltung des Deutschen Bundesjugendrings ›Demokratie braucht Ehrenamt‹ am 7. 12. 1996*, Bundesministerium für Familien,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Pressemitteilung, Bonn 1996; G. Notz, *Frauen im sozialen Ehrenamt*, Freiburg 1989; dies., »Das Ehrenamt im Sozialbereich«, in: Ministerium für Stadtentwicklung, Kultur und Sport NRW (Hg.), *Das Ehrenamt im Sport und in sozialen Bereichen*, Düsseldorf 1996, 3–13; T. Olk, »Zwischen Hausarbeit und Beruf. Ehrenamtliches Engagement in der aktuellen sozialpolitischen Diskussion«, in: Müller/Rauschenbach 1988, 19–36; T. Rauschenbach, S. Müller, O. Ulrich, »Vom öffentlichen und privaten Nutzen des sozialen Ehrenamtes«, in: Müller/Rauschenbach 1988, 223–42; J. Rifkin, *Das Ende der Arbeit und ihre Zukunft*, Frankfurt/M-New York 1995, ^{2}1996; F. Schuster, *Ehrenamt im sozialen Bereich*, Düsseldorf 1991; D. Sengling, »Zwischen Ehrenamt und sozialem Management«, in: *Frankfurter Rundschau* 12. 8. 1993; Ch. Taylor, *Das Unbehagen a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95; H. Thiersch, »Laienhilfe, Alltagsorientierung und professionelle Arbeit. Zum Verhältnis von beruflicher und ehrenamtlicher Arbeit«, in: Müller/Rauschenbach 1988, 9–18; M. Walzer, »Die kommunitaristische Kritik am Liberalismus«, in: A. Honneth 1993, 157–80.

吉泽拉·诺茨（Gisela Notz）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teilung, Bürgerinitiativen, Eigenarbeit, gesellschaftlich notwendige Arbeit, Hausarbeit/Familienarbeit, Lohnarbeit, Recht auf nützliche Arbeit, Selbstverwaltung, Sozialstaat, Subbotnik

独立工作（Eigenarbeit）

A: 'amal ḏātī.

E: individual work.

F: travail individuel, propre.

R: individual'nyj trud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й труд).

S: trabajo individual.

“活着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是为了活着”，这句话成为20世纪70年代围绕工作与收入再分配问题所展开讨论的焦点。在把有偿工作视作工资奴隶制的批判中，独立工作的概念作为一种可能超越官僚和资本的社会工作形式被提了出来。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
67 与技术条件的变化，一种隐隐约约的改革意义上的独立工作概念也产生了，只是它带有更显著的社会政治维度。独立工作被视作缓解失业、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的方法（参见Madōrin 1996）。在这方面，“第三部门”与各种形式的独立工作位于中心地位。此外，女权主义方面的思考也渐渐出现，这些思考关注的基本论题包括：社会全体劳动、独立工作与谋生（有偿）工作的关系，以及预期生活质量与经济的关系等。这两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差异：

1. 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工作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有偿的。但那些几乎占社会全体劳动三分之二（*Statistisches Jb.*，1994，第1页）的无偿工作，是资本主义父权式剩余价值生产力的第二大重要来源。无偿工作有许多称呼，例如独立工作、志愿工作、黑色工作、护理工作、自助、助邻工作、消费工作、再生产工作、生计工作等等。

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二次妇女运动中，人们围绕**工作**概念展开了讨论，并开始提出关于无偿的家务工作、教育工作和义务工作的政治经济重要性的问题（参见Delphy 1970；Bock/Duden 1977；Kontos/Walser 1978；v. Werlhof 1978；Neusüss 1985）。作为一种**无偿工作的概念**，独立工作首先是由克里斯蒂安·冯·魏茨泽克（Chr. von Weizsäcker）与恩斯特·冯·魏茨泽克（E. von Weizsäcker）在《为了独立工作权：一份宣言手稿》（*Für ein Recht auf Eigenarbeit. Entwurf eines Manifestes*）一书中提出来的（1978，第185页及以下）。由于试图凭借“增长来消除失业的希望”日益渺茫（第186页），他们主张“拥有自身工作的积极体验的权利”（第187页）。它的价值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心理和政治意义上的。它可以发生在房屋、花园、城市街区和村庄中，一起从事独立工作的可以是同事、朋友，也可以

是各种熟人。在这种工作中，原先被排斥的群体，例如儿童、青少年、病患、老人、未受教育者等等，得以重新融入社会。

于是不少学者做出了各种尝试，力图对非谋生工作做出系统化的论述（Illich 1978；Huber 1994；Heinze/Olk 1984；Heinze/Offe 1990；Teichert 1993；等等）。但所有的学者都有这样一个共识：独立工作的概念指的不是那种定期的、直接面向商品经济的独立或非独立的营利活动，因为独立工作中获得的社会价值并不体现在“国民经济总产值”
68 中。独立工作属于非营利部门，亦即属于“第三部门”或“非正式产业”。

在专业文献与日常语言中，对于独立工作，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尤其是独立工作与黑市等非法市场形式的界限，以及与志愿工作、家务工作等形式的无偿工作的界限，乃至与个人业余活动（如健身、语言课程等）的界限，都还是比较模糊的。对于受政府资助的独立工作（如教育资金、配偶离异补助等），也缺乏相关的研究文献。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影子工作”或“黑色工作”不属于独立工作，伯格（Berger 1982）、格雷施曼（Gretschmann 1985，1988）、尼森（Niessen）、奥尔曼（Ollmann 1987）等学者则把各种形式的非法市场视为独立工作（参见 Teichert 1993，第 65 页）。

根据所谓的“第三人标准”，只有那些可以被第三个人免费从事的工作才能算是独立工作。但有些超过该标准的工作是否算独立工作，也仍然没有定论。有些学者的研究遵循的就是第三人标准（参见 Gershuny 等 1986；Gretschmann/Schulz 1988；Teichert 1993）。在这套体系中，决定活动类型的是市场价格，而非活动的价值。因此冯·施韦泽（von Schweitzer 1990，第 12 页）认为：虽然独立工作与私人家庭“创造价值的成果”不同，但前者也应归在家庭生产中，就像“外语知识或者为了健康慢跑”（第 12 页）一样。戈茨（Gorz）则再一次把诸如健身、休闲等“业余活动”排除在独立工作的范围之外。他把这些自愿进行的活动称为“自主”（autonom）工作（1994，第 235—236 页）。

V. 泰赫尔特（V. Teichert）试图对所有不以货币为中介的劳动形式进行普遍的系统化。与“正式经济”和“盈利经济”相对，他提出了“非正式经济”和“需求经济”的概念。需求经济的工作领域又分为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经济和自助经济（1993，第 65 页）。家庭经济包括物质上的家庭工作、消费工作、心理上的家庭工作、教育，以及对儿童、病人和老年人的照顾等。自给自足经济——泰赫尔特也称其为独立工作——
69 包括住房翻新以及自己动手的建筑活动、手工艺活动和田园活动等。自助经济包

括邻居互助、自助联合会中的活动、志愿工作、环境政治与公民倡议中的协作等（第65页）。泰赫尔特细致的概念工作划分仍然是在量的层面上进行的，因为他所强调的“正式经济与非正式经济间的独特的相互关系”（第5页）并不被视作不同利益间的关系，相反，泰赫尔特的目的在于揭示出那些被主流经济所忽视的非正式经济，以便“达成正式与非正式双重经济尽可能平衡的发展”（第281页）。至于这种“平衡性”关系到社会中哪些群体的利益，作者并未明确指出。

2. 在关于独立工作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与目标**。这方面通常思考的出发点是，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府和工作社会的危机。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他们的工资收入并不足以确保维持其生存。正如妇女研究学者指出的那样（参见 von Werlhof 1991），整个工作领域的“家庭主妇化”日益普遍。按照通常对社会的（大多数社会从男性视角出发的）不同理解，作为非正式经济部门一部分的独立工作在解决方案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里夫金看来，独立工作是“第三部门”中的工作，在其中，工作的目的是“救助他人”（1995，第187页）。他所主张的那些慈善活动，例如对病患、老人、酗酒者、药物上瘾者、受虐待者和无家可归者的照顾，以及对协会、联合会、治安小组和艺术工作的建议（第181页），大多都承担着修复伤害的功能，这些伤害正是由正式私有经济（第一部门）和公共部门（第二部门）中的工作条件以及因此固化了的生活条件所造成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紧缩政策认为，第三部门是社会责任的领域。它关系着数百万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是政府和经济部门所忽视的”（第183页）。政府面临的是这样的选择：“要么在警察和监狱上花更多钱，以防止日益扩大的底层犯罪；要么在第三部门投入更多资金，好让这些人有事可干。”（第189页）

里夫金关于如何组织慈善工作的建议，其目的是要政府对这些产业的潜力加以控制和引导，而这与他认识到的政府后退的趋势背道而驰（第191—192页）。自组织和基层民主的发展并没有被加入计划。那些在受认可的非营利机构从事志愿工作的员工应该享受税收优惠。在有偿工作范围之外的工作，则也应获得一定的社会收入，而不应被视作社会救助，所需的资金会划拨给受认可的相关机构。“第三部门的组织应当引入和产业经济中类似的职务、资历与收入的等级制。”（第193页）里夫金也考虑了伴随志愿工作而来的最低收入保障

70

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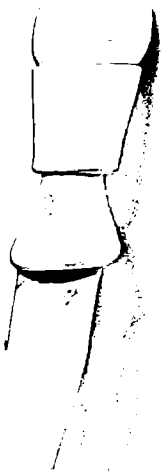
另一些学者（胡贝尔 [Huber]、戈茨、伊里奇 [Illich] 等）则认为对独立工作的再占有是解决“私有领域的创造和分裂问题”的途径（Gorz 1994，第 225 页）。戈茨对有偿工作的部门做了分类，并主张在不减少实质收入的前提下大幅缩短该部门的工作时间（第 334 页），他还主张创造使得个人（为自己工作）和共同体（为我们工作）的独立工作以及各种“自主”活动的扩展成为可能的“非经济部门”的基础结构条件（第 226 页）。在他看来，对独立工作的再占有是对抗资本主义走向“服务社会”趋势（亦即沦为收入不足的国民组成的市场化的家庭经济）不可或缺的条件。试图为正式经济划出边界的尝试，带来了关于平衡性的双重经济概念。戈茨反对最低收入保障的做法，他认为这会加剧社会的分裂（第 335—336 页）。

戈茨假定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能通过缩短工作时间而获得有保障的有偿工作，因此他无须考虑被社会排斥者的保障问题。尤其是在独立工作与自主活动领域，男女间仍然存在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对此，戈茨主张把
71 家庭转变为“家庭共同体”，“在其中，男性和女性自愿和完全地参与到生活和财产共同体之中”（第 234 页）。

当独立工作被作为“为共同体自身规定的目标而花费的力量”以及“集体性自我行动”加以运用的时候（Frigga Haug 1994，第 409—410 页），它就获得了一种与此有着根本差异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这种形式的独立工作是从实践中发展出来的，但还没有被科学地研究过。独立工作的内容往往取决于局部范围的需求，以及关注生态和社会各学科的需求。这些工作按基层民主原则组织。它们大多是无偿的，但也存在一部分有偿劳动。与此前描述的独立工作形式相比，它们的决定性差异取决于这样一些方面：有偿或无偿工作是否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生产，以及这些工作的达成是以父权资本主义为条件还是采取社区性质的自决形式。自给自足的无偿工作的整个领域（例如消费工作、一部分志愿工作、对异化工作的身体或心理上的修复等）并非都属于这类独立工作。我们目前对此仍然没有明确的分类原则。

只有在一种新的、非父权的意义上，这种形式和建制的独立工作才有可能获得吸引力。作为这方面论述的前提，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非父权的劳动分工和劳动组织，这种分工和组织能够让参与者平等地融合到权力和决策领域中。苏珊·艾尔森（Susan Elsen）（1996）把这类经济学家称为“共同体导向经济”。这些主要由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

论述，往往把独立工作视作一种由基层民主组织起来并以当地需求为导向的工作（Biesecker 1994；Busch-Lüty 1994；Jochimsen/Knobloch/Seidl 1994；Elsen 1996；Mies/Shiva 1995；Möller 1991；Mückenberger 1990；Pietilä 1996；Scurrell 1996）。在对当今经济体制的分析中，艾尔森的观点与里夫金类似：按照父权资本主义原则运作的全球化经济无法在提供足以维持生存的有偿工作职位的同时，以不损害环境的方式进行生产，它既不会停止对原材料的掠夺，也无法满足人们关键的生活需求。为了继续生存，我们必须进一步建设共同体导向经
72 济，由此至少能部分地确保继续生存，并减少在物质和规范上对主流经济形式的依赖性。



一方面是维持生存的有偿工作的可能性被阻断，另一方面则是人们自我照顾的时间的增加，而这种工作此前是由父权依赖性条件下的妇女所完成的。

共同体导向经济中的独立工作既不是有偿工作在私营领域中的延长，也不是对有偿工作的补充，相反，它是创造生活质量的尝试，这种尝试此前受到扭曲和压制，如今则受到鼓励。在主流经济体制的束缚下（Althusser，Balibar，*DKL*，第253页），这种另类的经济能否成功，是一个关乎权力关系的问题，它会随着相应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税收支配者，政府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对税收的再分配，建立起对大多数人免费的、适用于这些经济形式的基础设施，并且强化各种形式的公有财产。

参考文献：

J. Berger, »Zur Zukunft der Dualwirtschaft«, in: F. Benseler u. a., *Zukunft der Arbeit. Eigenarbeit, Alternativökonomie?*, Hamburg 1982, 97–117; A. Biesecker, »Wir sind nicht zur Konkurrenz verdammt«, in: *Politische Ökologie*, 1994, Sonderh. 6, 28–31; G. Bock, B. Duden, »Arbeit aus Liebe—Liebe als Arbeit«, in: *Beiträge zur Berliner Sommeruniversität*, Berlin/W 1977, 118–99; Chr. Busch-Lüty, »Ökonomie als Lebenswissenschaft«, in: *Politische Ökologie*, 1994, Sonderh. 6, 12–17; Chr. Delphy, *Close to Home. The Exploitation of Women's Work in the Family*, Paris 1970; S. Elsen, »Zum Verständnis gemeinwesenorientierter Ökonomien«, in: Bildungswerk der Katholischen Arbeitnehmer-Bewegung Trier u. a. (Hg.), *Regionen im Aufbruch*, Annweiler 1996, 57–74; J. Gershuny u. a., »Time Budgets: Preliminary Analyses of a National Survey«, i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Social Affairs*, 1986, H. 1, 13–39; A. Gorz,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Vernunft*, Hamburg 1994; K.

Gretschmann, *Wirtschaft im Schatten von Markt und Staat. Grenzen und Möglichkeiten einer Alternativökonomie*, Frankfurt/M 1985; ders. u. F. Schulz, »Ende des Wirtschaftens oder Wirtschaften ohne Ende?« in: V. Teichert (Hg.), *Alternativen zur Erwerbsarbeit? Entwicklungstendenzen informeller und alternativer Ökonomie*, Opladen 1988, 81–95; F. Haug, »Arbeit«, in: HKWM 1, 1994, 401–22; R. G. Heinze, Th. Olk, »Selbsthilfe, Eigenarbeit, Schattenwirtschaft.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s informellen Sektors«, in: M. Opielka u. a., aaO., 203–16; ders. u. C. Offe(Hg.), *Formen der Eigenarbeit*, Opladen 1990; J. Huber, »Duale Sozialpolitik. Fremdversorgung und Eigenbeteiligung«, in: M. Opielka u. a., aaO., 56–65; I. Illich, *Fortschrittsmythen*, Reinbek 1978; M. Jochimsen u. a., »Vorsorgendes Wirtschaften«, in: *Politische Ökologie*, 1994, Sonderh. 6, 6–11; S. Kontos, K.Walser, » Überlegungen zu einer
73 feministischen Theorie der Hausarbeit«, in: *Alternative*, 21. Jg., 1978, Nr. 120/21, 152–58; M. Madörin, »Der kleine Unterschied— in Milliarden Franken. Überlegungen zur Umverteilung von Arbeit und Einkommen aus feministischer Sicht«, in: *Widerspruch. Beiträge zur sozialistischen Politik*, 16. Jg., 1996, Nr. 31, 127–42; M. Mies, V. Shiva, Ökofeminismus, Zürich 1995; C. Möller, »Rahmenbedingungen für menschenwürdigere Arbeitsverhältnisse—Ansätze einer konkreten Utopie«,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14. Jg., 1991, H. 29, 15–24; dies., »Feministische Ansätze zu einer alternativen Ökonomie«, in: Bundesweites Feministisches Bündnis (Hg.), *Rundbrief*, Nr. 4, Bremen 1996, 1–3; U. Mückenberger, »Allein wer Zugang zum Beruf hat, ist frei, sich für Eigenarbeit zu entscheiden«, in: Heinze, Offe (Hg.), a.a.O., 197–211; Chr. Neusüss, *Die Kopfgeburten der Arbeiterbewegung*, Hamburg-Zürich 1985; H.-J. Niessen, R. Ollmann, *Schattenwirtschaft in der Bundesrepublik*, Opladen 1987; M. Opielka u. a., *Die Zukunft des Sozialstaats*, Stuttgart 1994; H. Pietilä, »The Triangle of the Human Economy: Household—Cultivation—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ür Feminist Economy, *Summer Conferenc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1996; J. Rifkin, *Das Ende der Arbeit und ihre Zukunft*, Frankfurt/M-New York 1995; D. Schäfer, »Konzeption für eine Zeitbudgeterhebung der Bundesstatistik—Erhebungs- und Auswertungsprogramm«, in: R. v. Schweitzer u. a. (Hg), a.a.O., 169–86; B. Scurrell, »Bildungsarbeit in der Regionalentwicklung

›von unten‹. Erfahrungen am Bauhaus Dessau«, in: Stiftung Bauhaus Dessau u. Europäisches Netzwerk für ökonomische Selbsthilfe und lokale Entwicklung (Hg.), *Wirtschaft von unten*, Dessau 1996, 110–18; R. v. Schweitzer, M. Ehling, D. Schäfer u. a. (Hg.), *Zeitbudgeterhebungen. Ziele, Methoden und neue Konzepte*, Wiesbaden 1990; ders., »Einführung in die Themenstellung«, in: ebd., 9–22;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as Ausland*, 2 Bde., Bonn 1994; V. Teichert, *Das informelle Wirtschaftssystem. Analyse und Perspektiven von Erwerbs- und Eigenarbeit*, Opladen 1993; Chr. u. E. v. Weizsäcker, »Für ein Recht auf Eigenarbeit. Entwurf eines Manifestes«, in: *Technologie und Politik*, 1978, H. 10, 185–89; C. v. Werlhof, »Der blinde Fleck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1. Jg., 1978, Nr. 1, 18–32; dies., »Der Proletarier ist tot. Es lebe die Hausfrau?« in: dies. (Hg.), *Was haben die Hühner mit dem Dollar zu tun? Frauen und Ökonomie*, München 1991, 114–33.

卡罗拉·默勒（Carola Möller）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rbeit,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teilung, Arbeitszeit, Bedürfnisse, Demokratie, Dualwirtschaft, ehrenamtliche Arbeit, Familie, Feminismus, Frauenarbeit, Frauenemanzipation, Frauenfrage, Gemeinwesen, Gesamtarbei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sellschaftlich notwendige Arbeit, Hausfrauisierung der Lohnarbeit,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informelle Wirtschaft,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ohnarbeit, Mindesteinkommen, ökologische Wirtschaft, Patriarchat, Schattenwirtschaft, Selbstverwirklichung, Subsistenzproduktion, Überdeterminierung

本真性（Eigentlichkeit） 74

A: ğauharīya.

E: authenticity.

F: authenticité.

R: podlinnost'(подлинность).

S: autenticidad.

本真性最初是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概念，自从阿多诺（Adorno）的著作《本真性的行话》（*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问世之后，这个概念也渐渐成为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语汇：在此，“本真性”是对更高意义的、更真实存在的措辞上的简称。人们通常会强调它是“较高等”的概念（与“质料”相对）。本真性指的是一种出自个体的批判，也就是说，其中哪些部分要加以批判和改变，是由个体所决定的。

布洛赫（Bloch）曾写道：“本真之物既潜在地寓于人中，也寓于世界之中。”（GA 5，第 267 页）布洛赫在此的意思是：人的生命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得以完满，这种社会能够使人类历史进程所累积的乌托邦潜能最终得以实现。尽管这种概念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中体现的对于不容置疑的真理的追求，即把“本真之物”作为某种未来的、尚无法从当前立场把握的东西的用法，并不属于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所反对的那类术语。在术语意义上，本真性被视为当下真实的和可达成的，因此，真实的人与话语的当下的尊严决定着其是否为“真实的”和“本真的”，亦即是否全然成为其自身。在海德格尔（Heidegger）那里，本真性的概念作为术语被固定了下来，这也构成了阿多诺论述的出发点，在此基础上，阿多诺不仅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所有语言和思想模式进行了批判，而且其批判对象还包括这些模式在日常语言中的衍生含义，它们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性和夸张性。

作为名词，“本真性”源于相应副词向形容词的转化：首先，从肯定式“它本来是如此这般”中派生出一种虚假的属性，即“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是真正的”，而后产生了关于人、事件以及人的态度或直观等具有“本真性”的说法（参见 Adorno 1964，第 104—105 页）。这个概念可能的同义词，例如“本质的”“不流于表面的”或者“真正有效的”等都有着同样的形而上学维度，这种维度已经体现在副词形式“本真地”之中。此外，这些可能的同义词还有着与“本真”类似的语用场合。首先，它们旨在确定事物或事实发生了什么，而不管其解释是否有误或不正确。其次，“某物真正的是如此这般”这类的表述带 75
有施为式（performativ）的含义：它往往被认定为一种支配性的、不依赖于经验和立场的普遍真理，由此产生了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区分：一方面是逻辑上被证明为真的本质，另一方面则是那“非本真的、流于表面的东西”，也就是表象（HWPh 2，第 724 页）。存在主义哲学通过运用本真性与“本己的”（eigen）或“固有的”（eigentümlich）等概念的亲缘关系，把这种区分颠倒了过来。不过该区分的作用并未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即与世界结成的那种个体性的、先于理论和超越理论的关系才是本真的和本质的，而一切抽象的中介

物则都是非本真的和流于表面的。

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性是作为与那种随波逐流的举止和自我关系相对立的概念而被引入的："日常生活中的此在自己就是**常人自己**，我们把这个常人自己和**本真的**亦即本己掌握的自己加以区别。"（*Sein und Zeit*，第 129 页）在此，海德格尔将本真性的概念性基础放置在了个人经验与举止（亦即个人的"存在"）之上，这些经验和举止在社会中被构造出来，且概念上只能以超越个人的方式加以固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海德格尔对前述的两难问题做出了回应。在海德格尔看来，摆脱抽象规定性是个人存在方式的应有之义：它必须对自身所是和所做的负责，必须掌握那被本真地把握的可能性，还必须从自身偶然选择的角度来审视其"责任"并从整体上接受自身。因此，本真性就成了那种完全形式化了的自主性的代名词。此外，海德格尔指出，这种阐释工作"同日常此在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文化哲学的'旨趣大相径庭"（第 167 页），这使其与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性批判中以"人"为代表的一类术语形成了对比（对此参见 Bourdieu 1988），从而为本真性概念赢得了内容上的鲜明性：这类术语包括："人"的"堕落状态"、在"公共性"与"世界"条件下的"平均性"，以及"扁平化""单层化""空洞的话语""模棱两可""分散性""漩涡""无居所的状态""无底状态""去根源化"等诸如此类的术语。

在《本真性的行话》中，阿多诺提出了一系列肯定的对立概念。"首先"是在术语中起作用的以下要素（"信号上相契合的词"）："生存上的（existenziell）、'在决定中的'、使命、呼唤、照面、真正的话语、陈述、请求、承诺。"（第 9 页）无论是这些"带贵族色彩的名词"，还是它们术语化了的用法，都不单独具备在海德格尔那里的专门含义："在德国，人们不仅言说，而且更频繁地书写这些本真性的术语，它们标志着一种社会化的选择，这些术语既高贵深奥又亲切舒适，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这些术语从哲学和神学领域……一直到教育学，从青年团和成人高中教育，一直到经济学和行政管理领域的言说与辩论方式。它们一方面充满了伪装出来的深刻，但另一方面又与它们所指责的世界一样被标准化了。"（同上）阿多诺认为这些术语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出现的，它们曾是法西斯主义的官方措辞，而后又延续到了战后的西德。尽管阿多诺的这些研究最初是作为献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否定辩证法的一部分而计划的，但战后德国的日常语言和哲学语言同样也是阿多诺的研究对象。

从意识形态上说，术语具有一种

76

代用品的特征：它是一种失去了的形而上学姿态的替代物，因为术语模仿了宗教—形而上学的语言，并且保留了那种单纯的信仰形式，“将其本来是有问题真实性的当作追求和相信的标准”（第61页）。“没有神圣内容的神圣之物……是术语的关键特征……，它是宗教光芒的堕落产物。”（第12页）在关于死亡的庄严论述中，海德格尔指出：“此在自身面对的是其最本己的能在。”对此，阿多诺评论道：“死亡成了上帝的替代者，对《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的海德格尔而言，上帝这个概念太过现代了。”（第115页）阿多诺对唯心论主体向海德格尔此在的转变做了批判，他从这种转变中看到“一种具体意义上的费希特式的绝对自我”（第98页）；类似地，在雅斯贝尔斯（Jaspers）等哲学家那里以及日常术语中，“人”都被置于中心位置，对此阿多诺认为：通过把人说成是“其自身空虚无力的实体化”，术语也就“剥夺了人的概念本身……，也就是那蕴含在一切启蒙运动以及早期德意志唯心主义的立场，该立场对把灵魂与它的天赋权利分开的做法持批判态度”（第56—57页）。我们把讨论的地方称为“相遇之屋”（Haus der Begegnung），正是源于这种世俗的、以人为中心的解释：那“建造在地面上的可见的房屋，通过对活动的组织就具有了神圣地位，这些活动由于是真实地发生在活着的、存在着的人之间的，因此胜过了各种讨论”（第14—15页）。

这表明了术语真正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在真实的“人的具象化”（Versachlichung）中，使“事实获得了一种虚假的人性化”，并进入了一种“管理境况”结构，“在其中，抽象的权利与客观的过程秩序总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将自身伪装成各种不同的观点”（第71页）。反现代的抗议无法消除这种物化，因为“对人这个概念的任何提升都不是要阻止它事实上被降低到一束功能的层面，而仅仅是改变了那些把人的概念引入其中，并使其不间断自我增殖的条件而已”（第59页）。在此，那被确定为非外化本质的本真性具有了一种自我物化的特征，“被分离和固定下来的自我属性首先变为了一种外部属性，它将主体变成了本己所孕育和包含的对象”（第102页）；另一方面，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抗议被动员起来，这种抗议主张通过暴力手段保卫权力结构的对象化：“首先，其特定的内容”以那种形式上向朴实直接性与关联性的退化为模子来改造思想，“使其与作为目标的屈服相一致……。于是绝对物的权威也就被那被绝对化之物的权威所颠覆了”（第8页）。本真性的术语不仅在法西斯主义中被言说，它本身就与法西斯的语言有着亲缘关系。

77

在后现代语境中，这种批判有所减弱，并且出现了为本真性术语恢复名誉的趋势。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战时日记中对本真性做了讨论，认为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它使那些不断诱惑着我们的有序范畴和确定性变得不稳定”（Charmé 1991，第7页）。在《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中，萨特深化了这方面的观点，对海德格尔的本真性论述提出了反对。在萨特看来，“‘本真的’和‘非本真的’这类表述是可疑而缺乏真诚的（douteuses et peu sincères；1962年的版本用了‘模棱两可而不明晰’这个弱化了的表述），因为它们隐含着某种道德立场”（1943，第614页），而非单纯地表明自我关系的不可避免。（该书1991年德文版的译者把萨特所说的authenticité[本真性]译成Authentizität，但这样一来，读者就看不到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印记了。）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认为，萨特推进了“本真化运动”（mouvement d'authentification）（1963，第156页），但此观点只有部分的准确性。为了“从根本上避免”所谓的“自欺”（mauvaise foi），即“虚假意识”的存在主义变体（对此参见Haug 1991，第163页），萨特说道，“堕落的存在者的自我接管”，“我们将其称为本真状态”（1962，第121页）。不过在谈到这种接管的时候，萨特很少提及authenticité，并且并未将其作为核心概念。在这方面，萨特显得比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更具反思性，在波伏娃看来，“被选择的目标的价值……与选择的本真性（authenticité）……具体地保存在了耐心、勇气和忠诚之中”（1947，第219页）。萨特在“疏离”“自欺”“逃避自我”等概念上的困难，他作为“自我的自由选择”（第697页）的相关解决方案中的欺骗和自欺，以及那些伴随着“我实现了在世界的在场这个事实”（第699页）和我自己的出生而来的“绝对的责任”，这些概念都重现了和海德格尔类似的基本特征，不过与海德格尔不同的是，它们并不是作为能带来有责任的、可靠的良好生活的那种本真性而被正面提出的。萨特的这种怀疑态度接着还扩展到了海德格尔关于死亡是“最本己的可能性”的观点。萨特指出：“这不是我的可能性，它在某种本真的或非本真的存在中被把握，能被某个不是我的人所筹划”（第673页），而死亡则直接终止了这种存在。试图获得这种卸掉了重担的本真性概念的努力，恰恰使这个概念变得如此含混，以至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一种全体本真性的层面上，我认识到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它是一个自由的存在……，同时我也认识到，

我只能意愿他人的自由。”（Sartre 1946，第 84 页）

只要社会的渐进对象化过程不是基于可理解的、理性的标准，问题就会出现（即便在左翼阵营中，特别是在文化批判中，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只需要那种在意识形态上缄默不语的本真性。对此，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给出了一剂可能的解药，安德斯把存在主义哲学刻画为“从这个时代的严肃使命那里逃离到作为使命的严肃中去”（1946，第 50 页）：原真的（das Authentische）非本真性构成了一种反讽；他们认为，只要以严肃的态度如其所是地对待自身处境，就能获得“真正的本质”，但这种想法恰恰是虚假的。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4; G. Anders, »Nihilismus und Existenz«, in: *Neue Rundschau*, H. 1, Okt. 1946, 48ff; S. de Beauvoir, *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ité*, Paris 1947; P. Bourdieu, *Die politische Ontologie Martin Heideggers*, Frankfurt/M 1988; S. Z. Charmé, *Vulgarity and Authenticity. Dimensions of Otherness in the World of Jean-Paul Sartre*, Amherst 1991;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dritte, veründerte Aufl., Hamburg 1991;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27), Tübingen 1993; F. Jeanson, »Les caractères existentialistes, de la conduite humaine selon Jean-Paul Sartre«, in: ders., *Lignes de depart*, Paris 1963; J. P.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1943 (dt. *Das Sein und das Nichts*, übers. v. J. Streller u. A. Wagner, Hamburg 1962; Neuübersetzung v. H. Schöneberg u. T. König, Reinbek 1991); ders.,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1946.

蒂尔曼·赖茨（Tilman Reitz）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nthropologie, Aufklärung, Bewusstsein, Dummheit, Emanzipation, Entscheidung, Entwurf, Erscheinung, Existenz, Existenzialismus, Freiheit, Handlung,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Massengesellschaft, Menschenbild, Menschwerdung, Moderne, Moral, Naturwüchsig, Ontologie, Phrase, Sinn, Subjekt, Tod, Verantwortung, Verdinglichung, Vermittlung

所有制、财产（Eigentum）

A: milkīya.

E: property.

F: propriété.

R: sobstvennost'(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S: propiedad.

一

从古至今，财产关系都被视作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在不同的程度上，个人对一些物品还可以部分地拥有共同的所有制权利（这些产权或是平等的，或是等级化的），这些物品或是可动的（动产），或是不可动的（土地）。因此《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对财产做了这样的界定："财产就是那些被人（集体或个人）声称为'属于他的'，从而首先和主要只能由他自由支配的东西。"（1986）同样的界定也出现在1900年的《民法典》（BGB）第903节中："说某人是某个物的所有者，指的是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第三方权利，此人可任意处置此物，并且排除其他人对此物的任何影响。"从法律上说，所有制被视作"支配权"（Herrschaftsrecht），也就是人与物之间在绝对统治意义上的关系（Baur/Stürner 1996，§ 24 I1）——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无法把权力施加在物品上，我们也无法影响物品的意愿——或者作为将某物"划归"给某人的那种关系（Westermann 1966，§ 28 I2，§ 2），据此，我们可以把所有制作为一种**权利上的**拥有，从而与那些单纯**事实上的**拥有区分开来（例如房子的业 80
主是所有制前一种意义上的所有者，而租户只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所有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对这种观念提出了两方面的反对意见：**首先**，所有制与其说是人与物品间的关系，毋宁说首先是就某个物而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谈论的主要是在经济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物品，也就是生产资料和产品。换言之，所有制问题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哲学或法律问题，它关注的是一个社会如何生产产品，以及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这意味着不同的经济形式总是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历史发展中联结起来，形成各种不同的组织分工的生产方式。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MEW 3，第22页）在他们的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乃至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描述始终都居于显著的位置。但他们也试图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初期。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了四种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相关的出色论述，参见 Eric Hobsbawm 1964，第 9—65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MEW 42，第 383—421 页）：1.**“部落共同体”**及其较高的发展阶段，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两者都与公社所有制相结合；2. **古代生产方式**，它建立在城市的基础上，兼具私有制和公社所有制；3. **日耳曼生产方式**及其较高的发展阶段，即**封建生产方式**，它们以土地为基础，兼具私有制和公社所有制；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只具备私有制。

尽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制形式的这四个阶段是相互排除的（MEW 13，第 9 页），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明确地指出：至少其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是从旧的部落社会中同时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可能形式（参见 Hobsbawm 1964，第 36—37 页）。

81 “部落共同体”是天然产生的社会中的自然的生产方式（*Gr*，MEW 42，第 399—400 页）。在其中，财产意味着**“属于某个部落”**，公社所有制就是建立在这种归属关系的基础上。就如同归属于某个部落那样，个人也归属于土地等决定性的生产资料。因此，就如同部落包含着个人，土地（部落领地）也像“无机体”一样包含着个人。

古代生产方式兼具私有制和公社所有制，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马克思的早期手稿中，奴隶财产的重要性在其中已经得到了强调（*DI*，MEW 3，第 22 页及以下；*Manifest*，4，第 462—463 页），而后它也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42，第 386 页及以下）。在《资本论》第 1 卷的一处注释中，马克思把奴隶制视作一种生产方式，并对其经济上的根本缺陷做了出色的分析（23，第 210—211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做了类似的论述（*AD*，20，第 585—586 页）。此后，他将奴隶制视作“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Ursprung*，21，第 163 页）。

封建制度中的公社所有制成分要小于古代，而土地私人所有制则出现了等级化。与此相结合的人身附庸关系使得贵族有了支配农奴的权力，后者从属于土地财产。在城市中，手工业者自身就是财产所有者，他们支配着学徒的劳动（3，第 24—25 页）。

最后，资本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无节制的私人所有制，它与此前阶段的私人所有制的区别在于：在社会化生产的基础上的财产所有者“不是劳动者”

(23，第789页及以下)，他们通过资本财产，占有着其他人的劳动剩余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概念的讨论体现出两大趋势。首先，那些被马克思视作同时出现的不同生产方式，后来被放到了同一个发展序列之中，人们试图由此寻求一种普遍的发展规律。其次，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再被视作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马克思用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一种历史上停滞不变的特点，这意味着亚洲国家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1930年之后，莫斯科当局不再认同这个观点。不过1962年以来，这个问题又一次成了人们讨论的论题(Hobsbawm 1964，第60页及以下)。

82 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参见Wesel 1982)，这方面的研究表明：我们对所谓部落共同体中的所有制形式有多种不同的理解。狩猎/采集者有多种领地归属方式，土地是被分配给群落的，个人对产品的所有权的本质功能只是为了将自身的劳动成果与他人分享，后来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恰恰颠倒了这种关系。国家出现之前的农民与牧民的土地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落所有制，而是在(母系或父系的)亲属群体所有制下把土地分配给个人使用，牛也没有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也有所论述。此外，产品的私有制最初出现在狩猎活动中。甚至在国家出现和发展之后，这些形式最初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在有些阶级社会中，农民是没有土地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出不同的形式，包括：少数贵族家族所有(塔希提)、国王所有(夏威夷)、神庙所有(苏美尔)或者三者皆有(埃及)。与此相应，各种不同的税收形式也发展起来，如领地经济、宫廷经济、神庙经济或者兼有三者的混合经济体制。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土地私有制变得日益重要，并最终与奴隶制和生产单一作物(主要是酒和油)的种植园经济结合起来。从布匿战争一直到帝国晚期(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初，约5个世纪)，这种奴隶经济在罗马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到古典时代晚期，该制度被其他一些形式所取代，如强制集体工作制和佃农制等。这些形式后来演化为封建制中的农奴制，奴隶在其中依然长期存在。在中世纪的城市中，近现代的那种不受限制的私有制渐渐发展起来。中世纪的支配观念以及古罗马的所有权概念的术语都是dominium，它源于dominus，也就是"主人"，这使其具备了一种作为财产所有者之自由支配权威的意识形态形式。这也体现在法学家巴托卢斯(Bartolus，13. Jh.，zu D.41.2.17，n. 4：ius de re perfecte disponendi[处置物的完备的权

利]）和多内卢思（Donellus，16. Jh.，*Commentarii Iuris Civilis*，Bd. 2，Buch 9，Kap. 8，n. 10：ius de re pro arbitrio statuendi[任意处置物的权利]，在此"任意"[pro arbitrio]首先是在使用与
83 滥用之自由的意义上而言的）最初对财产权所做的著名定义中：经由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8世纪的自然权利财产权概念演变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财产权概念，后者还仍然体现在当前的德国《民法典》第903节中，不过《基本法》第14条以及《国家福利规定》的第20条第1款对其做了限制。

参考文献：

J. Baur, R. Stürner, *Lehrbuch des Sachenrechts*, 16. A., München 1996;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17. A., Wiesbaden 1986; F. de Martino,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alten Rom*, München 1985; P. Gey, *Der Begriff des Eigentums bei Karl Marx. Zur Kritik des klassischen Eigentumsparadigmas in der Theorie von Locke, Smith und Hegel*, Frankfurt/M 1980; E. Hobsbawm, »Introduction«, in: *Karl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New York 1964, 9–65; H. Hülsmann, *Karl Marx—Antagonismus und Eigentum*, Frankfurt/M 1980; A. Künzli, *Mein und Dein-Zur Ideengeschichte der Eigentumsfeindschaft*, Köln 1986; V. Wesel, »*Die Entwicklung des Eigentums in frühen Gesellschaften*«, in: *Z. f.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 81. Jg., 1982, H. 1, 17–38; H. Westermann, *Sachenrecht*, Heidelberg 1966; D. Willoweit, »Dominium und Proprietas. Zur Entwicklung des Eigentumsbegriffs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d neuzeitlichen Rechtswissenschaft«, in: *Hist. Jahrbuch 94*, Freiburg 1974, 131–56.

乌韦·韦泽尔（Uwe Wesel）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二

让-皮埃尔·蒲鲁东（Jean-Pierre Proudhon）那句斩钉截铁的宣言"财产即抢劫！"（1896，第1页）似乎比马克思对不同社会形式中私有制关系之关键意义的分析更有效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其地位被国有制形式所取代，因为在（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践中，尤其是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中，居主导地位的形式不是社会所有制，而是与中央指令式计划相对应的国有制。到了"改革重组"（Perestrojka）时期，人们突然在列宁的著作中（LW 22，第280—281页）发现了这样的洞见：不仅那些基于私有制的垄断"会成为科学技术和经济进步的阻碍"（Abalkin 1988，第49页），社会主

义条件下的垄断也是如此。在这种具体的形式中，“劳动离开财产的异化过程”以及“其次……财产本身与其管理的隔绝”（Butenko 1988，第656页，倾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导致了
84 这样的局面：国家在领导、机构和用人政策上都与政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它的具体权力则被推到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之间，并将两者都置于管理之下。通过削减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一切形式的所有制都被还原成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于是社会化就成了空洞的概念。这使得“公共的和受国家控制的财产不再是财产”，这种“无主的财产意味着生产那些没有需求的使用价值，这种劳动毫无具体作用，有时甚至是有害的”（Haug 1989，第161、163页）。戈尔巴乔夫试图“把社会所有制和绩效方法引入到这种形式中，从而使得个人在生产过程中更真实地感到自己是事实上的财产所有者”（1988，第120页）。

在民主德国的最后阶段，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所有制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认为“它把人作为生产力主体相互联系起来”（Brie 1990，第32页）。这种关系决定了经济和社会总体发展的驱动力，因为“作为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转化过程，财产在所有者的再生产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作用”（第40页）。“因此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的并不是不同主体在利益上的普遍同一性，而‘仅仅’是其具体的、社会主义式的中介关系，亦即每个个体的自由发展与所有人的团结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第43页）虽然戈尔巴乔夫模糊不清的“改革重组”计划最终失败了，但对于在此意义上的那种可行的、具有解放性质的社会所有制形式的追问，对我们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Labalkin, »Lehre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ie Umgestaltung der sowjetischen Wirtschaft«, i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Moskau), 4/1988, 42–53; M. Brie, *Wer ist Eigentümer im Sozialismus? Rechts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en*, Berlin/DDR 1990; A. Butenko, »Über die revolutionäre Umgestaltung des staatlich-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in: J. Afanasjew (Hg.), *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 zu Perestrojka: Glasnost, Demokratie, Sozialismus*, Nördlingen 1988, 640–61; M. Gorbatschow, Perestrojka. *Die zweite Etappe hat begonnen. Eine Debatte über die Zukunft der Reformpolitik*, Köln 1988; W. F. Haug,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²1990; J.-P. Proudhon, *Was ist das Eigentum? Erste Denkschrif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Ur-*

sprung und die Grundlagen des Rechts und der Herrschaft, dt. v. A. Fedor Cohn, Berlin 1896.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85 参见：

Aneignung,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steilung,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Besitz/Eigentum, Enteignung, Erde, Etatismus, Exappropriation, Familie, Feudalismus, Gemeinwesen, Genossenschaft, Gleichgültigkeit, Gleichmacherei, Herrschaft, Klassengesellschaft, Naturrecht, Perestrojka, Planwirtschaft, Privateigentum,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Recht, Sklaverei/Sklavenhaltergesellschaft, Staatskapitalismus,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Vergesellschaftung, Verstaatlichung, Verwandtschaft

简单 / 复杂（einfach/komplex）

A: basīṭ/murakkab.

E: simple/complex.

F: simple/complexe.

R: prostoj/kompleksnyj (простой/комплексный).

S: simple/complejo.

笛卡尔（Descartes）在论述方法时提出的第三条准则是“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初看之下，马克思似乎也遵循了这个准则。简单 / 复杂这对概念构成了马克思方法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只有当我们仔细思考并对不同的使用方式加以区分之后，马克思的辩证法才能从中凸显出来。

简单与复杂的区别具有现实的重要性，因为它在一系列自然科学领域中占据显著的位置。混沌理论指出，“简单的定律其实会导致相当复杂……的结果”；复杂性理论源于混沌理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对后者的补充和完善（参见 Waldrop 1993；Stein 1989），这种理论认为，“复杂原因可导致简单的结果”（Cohen/Stewart 1994，第 2 页）。与线性、平衡、可逆和决定论的牛顿（Newton）力学分析范式相反，复杂性理论所依据的要素是矛盾的，例如：不确定性、不平衡性、非线性和不可逆性等等。为了避免简单性与复杂性僵化的对立印象，有的学者建议使用“简杂性 / 复单性”（*simplexity/complicity*）这对概念（参见 Cohen/Stewart 1994，第 13 章）。

1. 马克思在多种语境中使用了“简单”这个表述，例如：简单商品生产、简单商品流通、简单再生产和简单合作。他还提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从
86 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等方面，“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Einl* 57，MEW 42，第35页）。这些概念的理论地位和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的问题，都是各种诠释所要讨论的对象。这些诠释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单方面的意义上理解“简单”概念的，并且（在未注意到其他区分的情况下）往往把简单/复杂的固定对立关系作为出发点。

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头原则上认可了“简单”这个概念，但他对从“简单”开始的做法进行了具体的批判：“比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氏族，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氏族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第36页）我们可以区分出“简单”概念在此的三个方面或层次上的含义：e1. 作为基础的、历史上在先的或初始的关系（“简单的家庭团体”关系）；e2. 作为某个复杂和发达整体中的基本关系（“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e3. 作为具体（复杂、多层次）发展之前提的关系，例如司法关系（“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等）。

1.1 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把三种不同的概念放到同一个范畴中，这与那种单纯分析性理解方式是相反的。鉴于《资本论》中对“简单”概念的处理，把握此概念不同含义的区别及其在马克思著作脉络中的位置并非易事。显然，这个问题在语义和概念上的困难在于：如何明确地区分因其基础地位而简单的东西与因其“纯粹性”和普遍性而简单的
87 东西。以日常的方式看来，上述含义e1与e2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它们指的是单一的关系。但我们很难把e3合理地描述为“简单”，因为那个含义是以进步发展的概念以及多重规定性为前提的。

我们不妨看看马克思的“简单”概念的三种主要解释，并考察一下证明其

有效性的两个例子，这三种解释分别是历史主义解释（主要参见 Engels，MEW 13，第 468—469 页）、结构主义解释（参见 Fine/Harris 1979），以及理性主义解释（参见 Rubin 1928；Morishima/Catephores 1978）。根据**历史主义**解释，简单被视作历史上“最初”的关系，它假定了历史是由简单形式向复杂形式发展的；**结构主义**解释则把简单视作简单关系，它未必是历史的起点，但在结构上从属于某个复杂的整体；在**理性主义**解释看来，简单概念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关系到用于解释某种复杂现实性的抽象模型。

上述三种观点分别看到了马克思关于“简单”概念的某些方面，但都没能把握其完整含义，因此它们都是抽象的和片面的。所有这些立场最终都导向一种关于简单结构的假定，在其被发现之后，这个假定就被视作科学研究的起点。因此，对当前简单起点之规定的探究，也往往会发展出具体或复杂的结果。第一种情形是运动随着时间的推进，第二种情形是既有结构的各层级间的上升过程，第三种情形则是从简单模型向更复杂（由此也更现实）模型转变的思想运动。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最终结果都是应当与现实性相对应的思想具体物。因而关于最广泛的现实性的知识过程都不可避免地要描述从简单到复杂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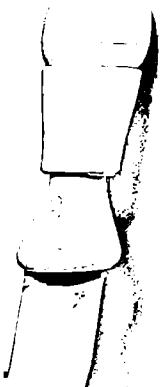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来看看区分简单和复杂的标准问题，显然，前述各种思路都没有给出这种标准。因而我们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复杂性等于现实，简单性等于思维**。这个说法有一种自发的合理性：现实性是复杂的，因为它需要用多重的事件、因素和维度等加以解释；思维从根本上从属于现实的复杂性，并且能在思想上对后者进行“再生产”。因而复杂的思维仅仅是现实复杂性的体现；它 88
不具备任何自主性，换言之，它自身不可能是复杂的。因为思维之所以复杂，仅仅是由于它体现了复杂的现实。思维并不具备自身规律的复杂性。与这种观点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的序言中就观察到：“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价值形式要求复杂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起来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却能够相对简单地研究复杂的形式（MEW 23，第 12 页）。

简单关系的这种现实性，似乎否定了反映着思维的简单性与反映着现实的复杂性两者的对立。但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根据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简单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现实”，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简单关系会随着复杂整体的出现而消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以从属关系的形式继续存在。

1.2 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马克思的论述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其中，

他对不同的商品形式、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做了区分。马克思为何从作为一切商品生产经济学之公分母的商品开始，而不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特征的资本为起点，仍然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参见 Shamsavari 1991，第 2 章）。

根据历史主义观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的分析作为起点，是因为商品是历史上第一种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基础。结构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之所以从商品开始，是因为商品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结构。理性主义解释则认为，马克思把商品当作一切商品生产经济学的一般形式，其目的在于首先不去考虑生产资料中的财产等复杂属性，从而简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过程。对于上面这些理解，我们可以反驳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的开篇探讨的既不是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商品，也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结构的商品，更不是在谈论某种简单的模型——就仿佛黑格尔在《逻辑学》（*Logik*）中所说的那样，这种模型在复杂的积累性的限制因素作用下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达模型。恰恰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开头所说的商品，既不是前资本主义关系中的商品，也不是简单的上层建筑或某种思想上的建构和模型，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之结果的商品。



89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述，是以资本主义的一切特征为前提的。在并未收入《资本论》第 1 卷、题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ktionsprocesses）的章节中，马克思对此做了反思：“我们现在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产品的这个特殊的社会形式——出发。……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大一部分产品不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但是，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点**。我们把商品作为这样的前提对待，因为我们就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简单的元素的商品出发的。但是，另一方面，**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元素的东西，后来表现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出来的**商品**，与我们据以出发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元素和前提的商品是有不同规定的。……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绝不再是……单个的商品，而是一个再现着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商品量**。”（*Ms 63-67*，MEGA II.4.1，第 30—33 页）

1.3 因此，马克思开始论述的“简单”概念，既以最丰富的历史发展为前提（e3），同时其自身也是历史发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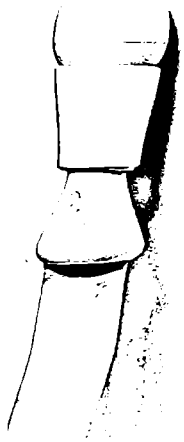
真实前提（e1）。如果只从e3的角度出发，我们可能就难以看出它与理性主义观点的区别，后者也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为出发点的。尽管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imidt）（参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的论述，*K III*，MEW 25，第18页及以下，第903页及以下）以及伊萨克·I. 鲁宾（Issak I. Rubin 1972）等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e3的观点，但“简单”概念最终仍然是被当作某种上层概念加以使用的，例如简单的商品生产，或者作为资本主义关系最初的近似模型的、一种基于简化的价值法则。这种对于“简单”的理解剥离了与发达资本主义关系的任何内在或必然的联系，并且在形式上描述了一切生产商品的社会的公分母。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并没有指出除资本主义之外的、任何以显著发达的商品生产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因此，商品只是资本主义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形式。马克思那里的商品——就如同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概念——不仅以高度的发展为前提，而且在本质上也包含了高度的发展，即便只是在隐含的意义上（参见Shamsavari 1991，第2、4章）。

90

2. 这把我们带到了第二个例子，也就是马克思简单流通概念的错综复杂的特点。“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媒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须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流通过程的这种独立化表明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已经具备。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流通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作为商品来生产的产品的实现，以及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的补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一种形式。”（*K III*，MEW 25，第340页以下）这段话表达了对流通概念的三种界定，在下文中我们分别将其称为Z1、Z2和Z3。

Z1：流通作为历史进程的形式，是一种过程。它位于以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生产领域（即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这些领域首先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生产用于自身消费的产品，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性的消费。这并不

意味着自身需求的有限范围之外就不存在生产——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出现流通了，相反，这意味着交换并没有把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产品吸收进来：只有剩余产品才能进行交换。在这种条件下，
91 流通与生产的关系因而是纯粹外在的。因此产品被生产出来，主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自身的需求，流通并未触及生产结构的核心，那种生产结构并未转变。与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的是，流通在此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既没有增进生产，也没有作为一个要素融合到生产过程之中。对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流通功能的这种否定性刻画，指向的正是资本主义的流通。



Z2：流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单纯阶段，被完全吸收到了生产过程之中。因此Z2的功能与Z1类似，它首先是不同生产单位之间的媒介，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仍然位于生产过程之外。Z2与Z1的区别在于，Z1并不是被资本吸收了的生产领域之间的媒介。以Z2为媒介的那些单位在与资本的关联中发挥其功能，其内在的组织原则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不是。同样的看法也适用于商业资本：这些历史上“直接源于流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似乎“仍然只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

Z3：流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两种方式与生产相关联：（1）“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2）“流通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流通解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组织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单位首先是为了市场和流通而进行生产。因此流通增强了一切生产过程，并以自身为榜样对它们加以重新组织。

3. 总之，我们需要澄清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要对多种不同概念使用“简单”这个表述？它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这些概念都被称为“简单”，所依据的是哪些理由？它们统一性的基础是什么？（2）从e1向e3的过渡，背后究竟有哪些机制在起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在马克思（以及黑格尔）看来，简单性具有两重含义：（1）作为本身抽象和片面的个别关系；
92 其本身可以是空虚的（就像集合论中的空集），也可以是具体整体中的某个抽象环节（e1或e2）；（2）以“最丰富的内容”为基础的简单性（e3）。e1和e2意义上的“简单”很容易理解，但e3意义上的“简单”就有些难以把握了。e1/e2和e3的共同点在于个别性，而e1与e3的共同点则在于自足性。不过e1/e2和e3之间仍然有很大的差异，因为e3是建立在复杂关系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从e1与e3之间观察到从简单/简单向

简单/复杂的过渡。但这种复杂性中的简单性又源自何处呢?

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体现出简单性:(1)作为自足的、个别的整体;(2)作为精巧地组织起来的整体,由于其运作特别完满,以至看起来像是很简单;(3)作为艺术作品中完美性的概念;(4)指与偶然性(无规律性和巧合性)相对的必然性(以及合规律性);(5)作为简化(并且往往转变)复杂任务的方法,亦即将其视作简单的东西来观察或对待(机器与计算机)。上述这些对于简单性的解释大部分都能与马克思(e3)和黑格尔那里的含义相吻合,也就是个别性、整体性、自足性、完满性以及必然性等等。

第(2)点就是关于复杂性理论的论题:"相互交换关系的'简单性'并不是直接显现的。在何种意义上,人类大脑的哪些能力或属性(例如,对象认知能力)可以被视作简单的?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在特定的层面上,也就是在更高等级的组织层面上,大脑的不同运作方式在一种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意义上是能够被描述的。这一点都不令人吃惊:我们都有大脑,因此我们都不难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当往窗外看的时候,我们认知了某一棵树:这整个过程看起来是简单而不假思索的。只有当我们开始探究大脑本身,要弄清楚自己如何能认知一棵树的时候,它的复杂性才显现出来。"(Stewart 1997,第106页)

第(5)点可以借助马克思关于工具与机器的区别的论述加以解释。其中的例子特别合适,因为马克思在那里更多使用的表述是"复杂性"而非"具体性",这种用法源于黑格尔,并且频繁 93
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指出: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K I*, MEW 23,第391—392页)。马克思为这个观点给出了一系列依据。第一,工具是对人类身体能力的本质性的扩展,而机器则并非如此。第二,一切机器都由三个显著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第393页)第三,工作机包含一定数量的工具。这些方面的论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机器不是复杂工具,而是体现着自身的复杂性。马克思在此并没有讨论机器复杂性中的简单性问题。根据上述对于复杂性中的简单性的评论,我们可以理解机器为什么会被视作简单的。机器改变了工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那种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关系。机器虽然是复杂的,但它简化了对劳动者的要求,因为它把大量工具和职能从劳动那里移走,并与工作机放到一起。机械化简化了劳动者经由大量工具组成的复杂组织,并使其常规化了。计算机等现代机器也

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在机器和计算机那里，劳动和计算的复杂性被削减为简单的常规事务。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在概念上把机器削减为简单工具，或者把计算机削减为某种袖珍计算器（甚至算盘），但那样一来它们的功能也就无法运作了。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试图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削减为简单的交换体系（萨伊［Say］定律），或者把语言削减为不用语词的交流方式。就如同语言通过其复杂的结构简化了交流过程一样，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弥合了买卖双方的偶然性问题，因而简化了交换行为。所有这些从简单向复杂的过渡都涉及一种社会化过程，其中，个人的情绪或错误所带来的影响渐渐减少。因而必然性、合规律性、再生产和网络化取代了偶然性、巧合性、封闭性和抽象性。正是出于这个理由，简单性往往寓于复杂性之中。

94 **参考文献：**

J. Cohen, I. Stewart, *The Collapse of Chaos*, London 1994; B. Fine, L. Harris, *Re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9; M. Morishima, G. Catephores, *Value, Exploitation and Growth*, London 1978; I. I. 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1928), Detroit 1972; A. Shamsavari, *Dialectics and Social Theory. The Logic of Capital*, Brauton-Devon 1991; D. L. Stein, *Lectures in the Sciences of Complexity*, New York 1989; I. Stewart, »Science and Future«,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London 1997; M. M. Waldrop, *Complexity*, London 1993.

阿里·沙姆萨瓦里
（Ali Shamsavari）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konkret, Anfang, Aufbau,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einfache Warenproduktion, einfache Zirkulation, Element/Elementarform, Epistemologie, Forschung/Darstellung, Funktion, Hegelkritik, Indeterminismus, logisch-historisch, Maschine, Notwendigkeit, Tausch, Ware, Wertform, Wesen/Erscheinung, Zufall

简单 / 复杂劳动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A: ʿamal-basīṭ/murakkab.

E: simple/complex labour.

F: travail simple/complexe.

R: prostoj/složnyj trud (простой/сложный труд).

S: trabajo simple/complejo.

马克思曾写道："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且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1868 年 1 月 8 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2，第 11 页）对于种类或质不同的劳动，如何确定劳动时间的价值量？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讨论体现出他从古典经济学中继承来的那种不清晰性。为了使价值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马克思在此必须摆脱先前经济学家们的直觉。因为与前人不同的是，马克思不满足于仅仅找到并指称某种价值量，而是要进一步指出：经济的量如何在市场经济中作为价值的量被建立起来，以及那种使特定经济合理性得以可能的经济的量与"量的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劳动时间不仅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相同劳动和相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被用于衡量"社会化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但对马克思而言，这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他需要证明这个结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对范畴便是由此产生的，通过这对概念，多种多样的劳动得以被转化为有价值的、社会化的量的关系。

1. **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商品交 95
换的那些经济学理论家已经直观地认识到：作为商品的不同产品的关系，与它们各自的生产者所需的劳动之间是有关系的。法国和英国的道德哲学家们认为，为了确定公正价格（*iustum pretium*）的高低，我们必须把生产者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与劳动在种类和质上的差异放在一起考量。对现代价值概念的寻求始于这样一种假设：交换关系的规定并不依赖于上述两个因素。资产阶级发展早期的研究者试图推测生产商品的"一切劳动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MEW 23，第 74 页）。在他们看来，各种劳动在质上的差异是问题所在：他们显然认为，不同价值的产品是用不同种类的技艺生产出来的；在交换中，普通的与"更高的"劳动自然应当都被作为纯粹的量来比较大小。但这如何做到？早期的价值理论家（配第 [Petty]、坎蒂隆 [Cantillon]、哈里斯 [Harris]）对此问题都没能给出很好的解答（参见 Liebknecht 1902，第 1—36 页）。

亚当·斯密解开了这个谜题：不同劳动的劳动量的差异并不是由"它们各自所花的时间所决定的"。"一小时的粗重工作的劳动的量，也许大于两小时的轻松工作；需要十年才能学会的行业里，工作一小时所含的劳动的量，也许大于在一学就会的行业里工作一个月"；

诚然，不同劳动之间的比较“不是根据精确的测量，而是在市场上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来决定，……但就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目的来说，这种大致的公平原则却已足够”（*Reichtum*，I，第41—42页）。如果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格外地需要不寻常的熟练技能与精力”，那么这些产品就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往往正是“弥补为了取得（熟练技能）而花掉的时间与劳动”（第62—63页）。

李嘉图对此问题只做了附带的讨论。金匠一天的劳动要比初级雇工一天的劳动更有价值；不同职业中相同时长的劳动，其价值并不是相等的。“市场上”不同的价值以一种“对于所有实际目的都
96 以足够的精确性”呈现在“价值的标尺上”。不同劳动在这个标尺上的位置取决于“工人熟练技能的相对水平”以及“学习某种特定手艺所花费的时间”（*Grundsätze*，第19页及以下）。至少在此后一个世代的时间里，人们把这种价值标尺视作理所当然。虽然李嘉图与斯密都没有在劳动报酬和工人创造的价值之间作出区分，但与斯密不同，李嘉图认为：不同水平的劳动在工资上的差异不可能是商品价值差异和变化的根据（参见第9、19页）。

李嘉图同时代的批评者们，尤其是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利用了这种模糊性，他认为，由于不同劳动存在质的差异，因此不能把劳动的量作为规定价值的唯一依据（*Dissertation*，第209—210、213页）。故而那个普遍规则是不成立的。

2. **马克思**。2.1 马克思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谈到了这个困扰经济学家多年的问题：如果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是否要认为，不同工人——无论他们的劳动在种类和性质上有怎样的差异——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都相等？马克思赞同李嘉图的论证：不同的工人——例如金匠与纺织工——每个劳动日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与古典经济学家类似，马克思在此也认为产品的“价值关系”等同于“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之间的关系。竞争提供了“用于比较的标准”。竞争决定了“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但这种化约的前提是：只把“简单劳动本身”，也就是“只把劳动量当作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如何”；亦即只有在“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的前提下，这种化约才有可能（MEW 4，第84—85页）。现代工业开启了“劳动平均化”的过程：机器的使用和对劳动的组织使得不同劳动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消失了，换言之，这些差异被化约为劳动时间上的差异。至少在大工业的领域，“机器劳动中早已实

现的这种平等”使劳动的差别变得无足轻重（第 85—86 页）。在其对于大工业的最初分析中，马克思已经远离了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对后者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工人的价值”不能作为衡量价值
97 的尺度，因为“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第 86 页）。

马克思对此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一种“工厂理论”：大工业被分成许多部分，工人几乎无需学习时间就能掌握其中某一个部分，“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Lohnarbeit*，MEW 6，第 406 页）。这些无需学习费用的“简单劳动力”的工资，就降低到了“必需生活资料”的水平（同上）。在现代工厂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趋势：“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并且“总是把熟练劳动”转变为“简单劳动”（第 540 页）。这种趋势降低了劳动工资并使其平均化，在工业体系较发达的国家，绝大多数工业劳动已经不再是熟练劳动了（第 536 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马克思把劳动规定为“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它的尺度，即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就是价值的尺度。劳动与工人在质上的差别和相同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并不吻合，但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工人之间质的差别”部分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它们是简单劳动。“质上较高的劳动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对比来找到它的经济尺度。”（MEW 42，第 513 页）因此，劳动在质上的差异如何在经济上被拉平并使得“一切劳动都化为简单的非熟练劳动”，这个问题“在这里自然还不能加以考察”。至少暂时可以确定的是，“各种劳动的产品只要（在交换中）确立为价值，这种简化实际上就实现了”（第 735 页）。“各种劳动的产品作为价值在一定比例上是等价物”；在交换过程中并经由交换过程，“一种较高级劳动的产品实际上化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马克思以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为例：黄金“便是简单劳动的产品……况且任何一种劳动都是用黄金支付的”。可见，对不同质的劳动所做的这些计算，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种计算中的困难“丝毫也不损害原理”（同上）。

在其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坚持了上述论证。他认为，在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加以分析的时候，各种劳动在质上的差异也是可以忽略的：我们至少可以假设，资本占有的是“绝对劳动和简单劳动”，而不是“有特定要求的劳 98
动”，因此为了确定商品的价值，我们还需从中扣除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为

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第243页）。当然，只要“劳动到处都是简单劳动”，因而“必要劳动是相同的”，那么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种比例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就会是相同的（第258页）。同样，马克思后来也坚持了这种抽象过程。只要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关系本身，而非那些以不同的比例占有质上不同的劳动的“各种资本”，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就是合理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了早期基于价值理论的精确解释面临的问题：为了理解“交换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概括了几个“主要观点”。首先，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产生之前，“劳动化为简单的、可以说是无质的劳动”，“它们只有量的差别”。简单劳动因而是一种抽象，它以价值尺度的概念为前提。因为在给定劳动的质的前提下，劳动的量只能通过时间加以衡量。只有在时间与劳动的形式、内容和个性无关的情况下，时间才能成为普遍的价值尺度。这种关于“一般人类劳动”的抽象就和自然科学里通常的抽象一样现实。因为首先，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其次，它作为一个现实的量“存在于平均劳动中，这是一定社会中每个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MEW 13，第17—18页；MEGA II.2，第109—110页）。

这种简单劳动的性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定的社会中却是一定的（同上）。它与“一定社会中”的“平均个人”相关，但这种关系不能做生理学意义上的解释。“任何统计都能证明，简单劳动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劳动总量的绝大部分。”（第18—19页；第110—111页）与此相对，复杂劳动是（单位时间）“比重较大的”、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劳动。马克思在分析中把复杂劳动规定为“复合的简单劳动”或“高次方的简单劳动”。因此复杂劳动是对“抽象劳动”之量的一种规定；这个概念关涉的是建立价值的过程，而不是某种特定种类的、具体有用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或困难程度。至于一切特定种类的劳动是如何被“简化”或消解在简单劳动之中的，马克思在此并未解释，他只说：“这里还不是研究那些支配这种简化的规律的地方。”（同上）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Ms 61-63*）中，马克思明确讨论了贝利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批评。贝利的“最后一个反驳”是这样的：商品价值无法用劳动时间衡量，因为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一些工人创造的价值要高于另一些工人（参见*Dissertation*，第210页）。马克思支持

李嘉图的解答，即“如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比是既定的”，那么商品价值就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MEW 26.3，第 165 页；MEGA II.3.4，第 1347—1348 页）。不过李嘉图“并没有说明，这种比例是怎样发展和决定的”。马克思对此评论说“这属于对工资问题的说明”，可见他曾打算消除这个理论上的漏洞。此外，马克思也暗示了他所期待的能给出解答的思考方向：“这就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的差别，即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差别。”通过加上“归根到底”这样的字眼，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这个主张，而在其他地方，他曾指出：更高水平的工人要比简单工种的工人费用更高，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时间段和“在同样的比例下”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参见 MEW 26.2，第 286 页；MEGA II.3.3，第 1009 页）。

2.2 在《资本论》中，这种简化遇到了更多困难。该问题同样出现在对于简单流通的分析层面。此后它不仅重新出现在对于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中，而且也出现在引入平均利润率概念的时候。不过马克思对此真正的论述，要么用的是“以后”这样的模糊字眼（MEW 23，第 204 页），要么则是说要放在将来“专门研究工资的著作”中（MEW 25，第 152 页；参见 26.3，第 165 页；MEGA II.3.4，第 1347 页；II.4.1，第 111 页；II.4.2，第 215 页）。为了确定和计量价值的量，人们必须认识价值实体的“计量单位”，也就是一般人类劳动。马克思把它的质规定为“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亦即“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劳动能力；这种简单劳动力构成了“简单平均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差异“只在量上”，即在同样的计量单位下，前者在相同时间中创造出较多价值。复杂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MEW 23，第 59 页；MEGA II.5，第 19—20、24—25 页）。正如马克思在一处时常被忽视的脚注中指出的那样，这里指的不是工资的差异，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价值量的差异（同上）。 100

在为其简化过程的假说性质辩护时，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旧的论证：“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不同比例”（第 59 页；第 20、25 页）。“为了简便起见”，马克思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假定为简单劳动力；从而省去了简化的麻烦（第 59 页；第 25 页），可见他这么做并不是基于系统性的依据，即这些复杂过程无法通过对简单流通的分析加以解释。

在对价值的创造和增殖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重新回到了这一假定（参见

第203—204页；第140页）。在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中，“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第211页；第146—147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一切资本家而言，使用简单劳动与使用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两者无论在程度上还是种类上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无论所剥削的劳动力是“较简单的”还是“较高级的”（较为专门的），从剥削中获得的剩余价值率是大致相同的。因而马克思在此基本上是以一种事后补充的方式，为其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的生产和增殖都需要更高的费用。它不仅具有较高的价值，而且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第211—212页；第147页）。前一个表述是熟练劳动力具有更高价值，后一个表述则是复杂劳动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两个表述之间的连词是此处问题的关键（《资本论》前三版中都用了“但是”，第四版则用了“因此”，法文版用的是“以 及”——II.6，第210页；II.7，第162页），而“相对的”这个字眼也同样重要：熟练劳动力的较高价值与复杂劳动创造的较高价值，两者的关系如何？马克思对此未加论述，而是又一次回到那个毫无争议的主张，即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在被剥削的方式上都是相同的。

接着，马克思在讨论工场手工业各发展阶段时，指出了简单劳动和简单劳动力如何实现为真实的范畴——这是其价值理论往往被忽视的一个方面。通过企业中系统性发展的劳动分工，“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第370页）便被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东西。工场手工业在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他们“没有任何发展成为专长”，并造成了“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显著分化（第371页）。在工厂中，这种分化进一步发展，并且与那处于支配地位的“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或均等的趋势”同时存在（第442页）。工厂取消了工人的固定工作，使其岗位更加灵活。但质上的差异还是存在的：机器工人与单纯下手的区别，前者是操作、维护和修理机器的工人，“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第443页）。在数量上并不可观的这一群体中，亦即在他们与真正的机器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最重要的质上的差异。旧的劳动分工体系，连同“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区分，都将被机器化大生产所推翻；但是这种分工还在工厂制度里延续着，一方面是由于

习惯，另一方面则是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而获得了巩固（第 442 页及以下）。由此看来，这也表明马克思至少部分地调整了他关于一切现代工业中的劳动都会简化为简单劳动这个普遍趋势的看法。

在《资本论》第 3 卷中，马克思假定一切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都是相同的。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以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但这些差别绝不会影响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例如，如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么金匠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创造的剩余价值（MEW 25，第 151 页；MEGA II.4.2，第 283 页；同样的说法见于 *Ms 61-63*：MEW26.2，第 386 页；MEGA II.3.3，第 1009 页）。这个论述比《资本论》第 1 卷中更加明
102 确，在那里，马克思认为：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价值生产的关系就如同其中劳动力价值的关系，劳动力的价值随着其所受的培训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因为劳动力能够进行复杂劳动，并且在单位时间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但马克思并未给出这背后的依据，而只是说它与一切生产部门剩余价值率相同这一假定相符合。马克思对此的论述并不是斩钉截铁的，他同样提到了其所面临的各种障碍，它们阻挠着“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工资与工作日的平均化”（参见 MEW 25，第 151—152 页；MEGA II.4.2，第 212、215 页）。“自由竞争”的理想条件有利于促进和加速这种平均化过程，马克思在后文中把这种趋势称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最大限度地化为简单劳动”（第 206 页及以下；第 270 页）以及“对一切职业偏见的抛弃”（第 207 页；第 270 页）。随着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差异的减少，它对形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阻碍也变小了。

2.3 在解释为什么特定工人（群体）在相同时间内能比另一些工人生产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时候，马克思时常把复杂劳动这一概念作为类比来使用。这种类比往往用于说明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

与生产力较高的劳动的类比：“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MEW 13，第 132 页；23，第 336—337 页；MEGA II.3.1，第 293—294 页）这是如何造成的？生产力较高的劳动在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相同的使用价值，但为何能创造出更多价值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相关商品的（市场）价值是由生产力较低的劳动所决定的，换言之，生产力较高的劳动只是在少数工厂中被使用，而大多数工厂还处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

在超过平均水平的技术、组织和/或自然条件下生产的单位商品，其所需的劳动量要低于平均水平，而其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与平均生产力水平生产出的商品相同。它们由此可以按这种单件价值来销售，更多的商品意味着更大的价值总
103 量，也就是说工厂的工人创造的价值提高了。“更高的生产率”也意味着一定生产部门的单个工人有了“更高的熟练程度”：只要其熟练程度没有被一般化，他们都会为雇主带来一定的超额剩余价值。

与强化劳动的类比：马克思往往以一种相等的平均劳动强度为前提（参见例如 MEW 23，第 23、53、583—584 页）。一旦某个人的劳动超过了普通劳动时间，他创造的价值就比其他人更多。同样，当工人在普通劳动时间内以更高的强度劳动时，他也能创造更高的价值。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第 431—432 页）。只要强化的劳动还是例外状况，它就被视作能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的、更高水平的劳动。就价值的创造而言，超过平均强度的劳动和延长时间的劳动一样，都是“复杂劳动，即自乘的简单劳动”（MEW 26.3，第 302 页；MEGA II，3.4，第 1444 页；参见 MEW 23，第 432—433、547—548 页）。对资本家个人来说，这是超额剩余价值的可能来源，而对工人个人来说，这是超额工资的可能来源（参见 MEW 23，第 547—548 页、第 432—433 页）。

与民族经济之间的发展差异的类比：在国际贸易中，“各民族的工人”连同其生产的产品都处于对立状态。马克思将“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一小时劳动做了对比，并指出：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就如同“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关系（MEGA II.3.1，第 310 页）。这在国际竞争中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由于对劳动时间的法律限制，英国的产业要更舒服一些，因为虽然英国工厂的日劳动时间与周劳动时间都比欧洲大陆更短，但它们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补偿。因为在世界市场自由竞争的前提下，英国的产业会拥有更高的平均生产率和/或劳动强度（参见 MEW 23，第 548、584 页；26.3，第 101 页；MEGA II.3.1，第 310 页）。

上述情形都与劳动的质的差异或者工人熟练程度的差异无关。而在相同的劳动中，技巧水平的差异也是要考虑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都有技巧水平上的差异——它们同样也有劳动强度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用同一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普通熟练程度加以计量。马克思在此运用了类比。这种类比虽然揭示
104 了试图呈现的事实，但还无法加以说明。

2.4 1877—1878 年，恩格斯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Einfache und zusam-*

mengesetzte Arbeit）中讨论了杜林对马克思关于简化问题的批评（*AD*，MEW 20，第 183 页及以下）。“简单劳动”的概念源于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但存在着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恩格斯诉诸自己的观察：“一小时复杂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两倍或三倍的商品。”在这种比较中（诚然，与恩格斯所认为的相反，它并不能被观察到），一小时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一小时简单劳动的许多倍。恩格斯（与此前的马克思一样）认为，这种简化“是由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完成的”。马克思对此的抽象是完全正确的：“在阐述价值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不能予以说明。”（第 184 页）恩格斯也承认，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只是需要在合适的地方。在这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只需表明：“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第 186 页）显然是错误的；“一个工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上）。“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负担的，因此“有学识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也会获得更高的工资（MEW 20，第 187 页）。后来在编辑被忽视的马克思《资本论》第 2、3 卷手稿时，恩格斯不认为这个观点是重要的（与平均利润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的问题相比），并认为他可以将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某种价格问题（参见 MEW 24，第 26 页；25，第 16 页及以下）。

2.5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语境中，这种解决方案需有如下这些限制条件：（1）复杂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可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复杂劳动生产的每件商品的价值都比简单劳动生产的 105
产品更高。单件商品的价值与不同种类劳动创造价值过程的差异相关，而与不同商品范畴在价值的量上的差异无关。（2）复杂劳动能创造更高的价值，但这无法用更高的劳动力价值加以解释——“以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去决定商品价值”只是一种“同义反复”（MEW 16，第 125 页），因为它无非是用价值来解释价值。（3）与生产力、技巧或强度特别高的劳动的类比，并不能解释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差异。（4）使用简单劳动的剩余价值率与使用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是相同的；这意味着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相同的比例上”比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更高，就如同较熟练劳动的价值比“较简单”劳动的价值更高。

严格地说，存在三种可能性。用形式化的语言，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w）可表示为：we = ve + me，其中 e 指的

是简单劳动（v=资本变量，m=剩余价值）。在复杂劳动中，每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与能够进行复杂劳动的劳动力的价值都增加了，但两者是彼此独立的。我们不妨用k来表示复杂劳动，并且引入系数x，以便体现每单位时间创造价值的差异，而系数y则表示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在价值上的差异。这样一来，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就可表示为：wk = xve + yme。

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高于简单劳动，即：wk > we。当x = y时，简单劳动所能达到的剩余价值率就与复杂劳动的相等。当x > y时，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就低于简单劳动。当x < y时，复杂劳动的剩余价值率就高于简单劳动。马克思假定熟练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与其创造价值的能力会获得相同比例的提高，但这显然并不是自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通常都认同第二种情形（x > y）；第三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支持者。马克思本人倾向于第一种可能性。他在《资本论》中只做了这样的表述：we：wk = yve：xve，其中x = y（参见MEW 23，第213页；25，第151页；26.2，第386页）。

如果马克思的假定成立，那么就不会遇到难题。在第二种情形中，价值创造过程出现了尽量避免复杂劳动并且用简单劳动取代复杂劳动的趋势。在第三种情形中，价值创造则会出现增加复杂劳动的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问题未加详论，更没有解决它，其中似乎有两方面原因。**首先**，马克思不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与劳动的量相关的是简单劳动而非复杂劳动（42，第513页；13，第18—19页；更常见于23，第212页）。在大工业中“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最大限度地化为简单劳动”（25，第206—207页），劳动在质上的差异也出现被抹平的趋势（参见4，第85—86页；6，第420页；通常参见23，第443—444页）。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差异部分地建立在单纯的错觉和习惯的基础上，它也取决于“工人的职业偏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人灵活性的提高，这种偏见也必定会渐渐消失（参见23，第212页；25，第207页）。在此，马克思犯了错（参见下文）。

其次，熟练劳动力价值的问题与教育制度的特定形式有关。学习费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熟练劳动力价值与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其生产/再生产是如何管控的。这是一个与准商品的劳动力的独特性质相关的政治问题。需要特别熟练程度的生产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国家相关。即便资本的代表能够对专业工人的劳动进行控制和命令，但如果违反后者的意愿，前者就无法正确地使

用劳动力的熟练技巧，并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正如马克思所预计的，从“雇员”直到准独立劳动者等等这些雇佣劳动关系的特殊形式就从中产生了。而马克思时常暗示的（通常参见MEW 13，第19页；23，第59页；25，第207页）那个计划中“专门研究雇佣劳动和工资的著作”（MEGA II.4.1，第111页），必定需要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同时还会涉及相应的工资结构问题（通常参见23，第212页；42，第243页）。

3. **马克思批判和元批判中的简化问题**。后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克思的指责，恰恰是马克思用于指责李嘉图的，即：虽然看到了问题，但事实上未能论述其解决方案（MEW 26.3，第165页）。1851年，马克思在评论李嘉图时说：“李嘉图没有给出进一步论述。”（MEGA IV.8，第327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批评者们所采取的立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不少主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解决这个问题。

107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在其1896年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中提出了三方面的指责，这些指责也被其后的学者多次提出。**首先**，马克思做了循环论证。把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不同种类劳动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但马克思在此诉诸经验，确切地说是诉诸事实上的交换关系，其中，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产品被视为相同，也就是说，他把要加以说明的事实用于进行说明。**其次**，马克思直接主张：在交换中，那些不相等的东西（例如雕刻的劳动与碎石的劳动）可以等量齐观。**最后**，复杂劳动是多重的简单劳动这个原则，之所以是可接受的，是由于我们要把为了获得相应的熟练技能而须付出的一定量成本计算在内；只是我们无法凭借该原则从经验上对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间的特定比例加以说明（参见1974，第116—119页）。

上述批判对不少学者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中既有布赫（v. Buch）、涂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y）等马克思的批评者，也有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密特等马克思的追随者。1904年，鲁道夫·希法亭在其详细的反批判中，提出了能够调和并解决价值理论简化问题的经典论述。后世学者的不少讨论，基本上就是希法亭论述的各种变体（参见例如Deutsch 1904；Bauer 1906；Sweezy 1942），较晚近的一些学者则对其做了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形式化（Morishima 1973，Rowthorn 1974）。这方面的讨论再次扩展到了“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解答”（Rosdolsky 1969，第609页）。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觉得这是个

重要的问题，他们似乎认为问题的解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只需相信马克思的原话（参见例如 Fischer 1907，第 20 页；Boudin 1909，第 122—123 页；März 1976，第 235—236 页）。有不少学者主张：价值理论的任务就在于规定出一个把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的（实际可用的）绝对标准（参见 Rubin 1973，第 135 页）；而一些研究涉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的学者，则试图重新完成这一任务（参见例如 Maier 1967；Ludwig/Maier/Wahse 1972）。

关于简化问题的意义，学界有着广泛的共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
108 克思本人低估了这一问题（参见 Meek 1973，XVI）；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它比所谓的“转化问题”更加重要，因为它在价值量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层面上展开，并且必定要在该层面上解决问题。它显然是最严肃、最困难的问题（Schlesinger 1950，第 129 页），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的最大障碍（Elster 1985，第 131—132 页）。而更困难的地方在于：尽管许多人作出了解决的尝试，该问题仍然是充满争议的（Mandel 1984，第 49 页）。

3.1 伯恩施坦是第一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持保留意见的知名马克思主义者。庞巴维克“揭示了马克思价值学说中真实存在的那种含混性”（1899/1900，第 357—358 页）。根据伯恩施坦的解读，《资本论》第 1 卷的意义在于马克思试图对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在工资上的关系进行简化，而这是价值理论无法给出的（第 359 页）。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替代物，伯恩施坦阐述了布赫（1896）此前不久提出的生理学解释，根据这种解释，复杂劳动能够给出更多“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力”（MEW 23，第 61 页），这也意味着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内比简单劳动耗费更多能量。伯恩施坦认为该解释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Voraussetzung*，第 403 页）。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布赫的“能量价值学”（Energiewertlehre）意义上第一次试图给出该问题的解答：复杂劳动只能理解为在生理学意义上强化了的劳动，我们可以用单位时间内所耗费的能量来计量它（1902，第 100 页及以下）。把马克思的价值量解读为能量的耗费，这为价值理论增添了解释力，但也使其把所有耗费能量的活动（至少所有生理学上消耗能量的行动，甚至是动物的行为）都归为价值创造（类似的批评，参见例如 Maier 1965，第 196 页；Pietsch 1979，第 28 页及以下）。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问题缺乏热情。考茨基（Kautsky）在其对伯恩施坦的批判中坦承：马克思此处的理论是“不完美”的。

可惜的是马克思没有“进一步阐述（关于简化的）法则，他自己显然认识到要这么做，否则他就不会对此有所暗示”（1899，第 39 页）。

3.2 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最早为解决此问题做了尝试，他们这方面的努力也成为后来学者的标杆。1904 年，希法亭提出了与庞巴维克和伯恩施坦针锋相对的观点：熟练劳动力不仅拥有更高的价值，而且创造更高的价值——这
109 两方面并没有相互推导的关系（1974，第 125 页）。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教育过程的分析。为了培训出熟练劳动力，社会整体劳动的一部分就必须被投入到教育中。希法亭首先提出了一个假定，即：培训劳动是“培训者的劳动”，它属于简单劳动。他将其视作一种形式的商品生产劳动。培训劳动具有两重性：它能造就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旦熟练工人开始进行复杂劳动，这种使用价值就凸显了出来。希法亭认为，培训者的劳动具有三方面的作用：首先，它能造就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会持续存在于受教育的工人身上；其次，培训劳动把价值——也就是培训劳动的工资（亦即简单培训者的工资）——转移到熟练劳动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培训劳动中，培训者作为潜在或隐性的商品生产者（也就是雇工），也转变为他们自身劳动力的特定的社会使用价值，他们成了“新价值的来源”。一旦熟练工人开始进行复杂劳动，这种由培训者转移到他们身上的“价值创造力”就开始发挥作用。当一个熟练工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中进行复杂劳动时，他总是在进行多人同时劳动，也就是工人自己与他的培训者一起劳动，后者以前的简单劳动如今作为共同起作用的要素，被计算在价值生产的过程之中。因此，从价值计量上说，复杂劳动总是多人简单劳动的组合（参见 1974，第 127—128 页）。

希法亭指出，一切培训劳动都是简单劳动这个假定也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在培训熟练劳动力的过程中加入了（培训者的）复杂劳动，那么培训过程就会缩短（1974，第 128 页）。希法亭也认识到这种再生产过程中，必定存在某个起点或终点，其中，简单的培训劳动或教育劳动事实上得以完成，不过对此问题他没能做进一步的阐述。

希法亭的解释是以一种明确的等价假定为基础的，即那些使复杂劳动得以可能的培训活动无法令社会整体劳动及其价值创造力获得提高。如果说熟练工人通过其复杂劳动创造出更多价值，他们创造出的价值，也只不过等同于他们的培训者在不成为培训劳动力的情况下，
110 其简单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而已（参见 1974，第 127 页）。希

法亭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区分了两个问题：熟练劳动力如何产生更高的价值？熟练工人如何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两个问题又都与熟练雇工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使用问题相关。熟练工人比非熟练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同时也受到来自简单劳动以及（在较少的情况下）复杂劳动的压力。

汉斯·多伊奇（Hanns Deutsch）想要把复杂劳动的问题系统性地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对他而言，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简单的思考，即培训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过程。他主张一种“劳动力生产理论”，该理论能够对马克思所暗示的熟练劳动力具有更高的价值与复杂劳动创造更高的价值这二者间的关系给出解释（1904，第21—22页）。多伊奇分析了最重要的熟练劳动力生产形式，例如学校、企业培训，以及自学课程等（1904，第23页及以下）。在每种培训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在共同劳动；教师生产课程，学生则必须生产性地消费这些课程。学生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着自身的技能；在学生自己动手的过程中，教师的讲课只起到了扮演由他人生产的劳动资料的作用（第28页及以下、第33—34页）。被多伊奇视作简单劳动的这种学习劳动具有两方面的效应：首先，它带来了新的使用价值，也就是熟练劳动力；学习劳动创造和转移了价值，并且生产了商品，亦即学生的熟练劳动力。它把耗费的单位课程的价值以及培训时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转化为培训好了的熟练劳动力的价值。它还创造了一种同样要进入它自身的新价值。（社会平均必要的）培训时间越长，其所耗费的单位课程与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越大，因此培训出来的熟练劳动力的价值也会更高（第28—29页、第30—31页）。为了把握学习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对其整个的普通生活劳动期加以考察。因此，劳动技能就应被视作一种劳动资料，它是熟练工人在开始进行复杂劳动之前，通过其自身的劳动（并且在他人劳动产品的帮助下）所创造的——因而在多伊奇看来，复杂劳动就等同于将熟练技能作为劳动资料加以使用的那种简单劳动。

因此熟练工人生活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由以下几方面构成：（1）工人获得培训之后的简单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2）熟练技能的价值，即等于在受培训的时间中新创造的和被转移的价值。在完成培训的劳动者作出的劳动中，这两部分价值会转移到产品的价值中，并且它们在其中的比例依据的是相关生活劳动产品的量。熟练劳动力每天所创造出的剩余价值的计量与任何非熟练工人是相同的；但通过使用熟练劳动力，剩余价值率大幅度下降。于是熟练工人受剥

削的程度要显著低于非熟练工人。熟练技能的价值既不会影响新价值的创造，也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因为与生产资料里的价值转移类似，它只会转移到产品上，并且会以不变（流通）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因此，资本家雇佣的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人数上的比值越高，或者熟练工人的熟练程度越高，工厂的个人（以价值计）利润率也就越低（第31页及以下，第71页及以下，第78页）。

与希法亭类似，多伊奇也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复杂劳动解释为一系列简单劳动的组合，这些简单劳动不是同时进行，而是在不同时间段完成的。多伊奇也和希法亭一样区分出了自身培训时间，在此时间内，工人不是为资本家生产商品，而是生产自身的商品劳动力，并且真正重要的是其作为完全受过培训的雇工的劳动时间。和希法亭不同的是，多伊奇在培训者的劳动之外还强调了学生或学员的劳动。而在学生或学员的简单劳动何时、何地以及以怎样的方式有效地成为复杂劳动的问题上，两人的看法截然不同：多伊奇认为，培训劳动直接成为培训中生产的特殊商品之价值的一部分；希法亭则主张，只有当熟练劳动力开始生产商品时，培训劳动的价值才会成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此外，在熟练劳动力的使用是否以及如何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影响的问题上，两人也存在分歧。

奥托·鲍威尔试图从这些理论争端中寻求出路，他的思考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即学生的简单学习劳动如何影响后来熟练工人的价值创造（WA 7，第858—859页）。在培训者劳动的问题上，鲍威尔赞同多伊奇的观点，认为培训者的劳动产品（即课程）进入了熟练劳动力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之中；但他在学生学习劳动的问题上倾向于希法亭的主张，认为学习劳动并不进入学生劳动力的价值，而是成为学生将来作为培训好的雇工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价值就像某种已经作出的额外剩余劳动，因此通过使用熟练劳动力，剩余价值率是不降反升的（参见WA 7，第860—861页）。 112

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延续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工作（参见Maier 1965，第1969页及以下）。珀斯涅科夫（Posnjakow 1925）把希法亭的基本思想转化成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模型：通过培训过程，劳动力得以暂时从价值的再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如果没有培训，这些劳动力本该在生产价值。因此珀斯涅科夫通过一种平衡条件来规定熟练工人更高的价值创造力：熟练工人后来所创造的价值，必定要比社会在其培训时间中耗费的不熟练的劳

动，至少是各种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更高。

试图从社会理解的视角或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寻求理论资源，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并不罕见。罗斯多尔斯基（Rosdolsky）在其对“马克思的可能解答”的简短论述中重新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其中，每个熟练工人的劳动成果都被计算为直接劳动时间与培训时间两者的总和。在资本主义中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个总和要更加复杂（参见1969，第611—612页）。1924年，鲁宾指出了通常对于此问题的误解（即把复杂劳动等同于强度、生产力和技能要求更高的劳动），他认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即熟练工人之所以创造更高的价值，是由于他们在培训时间中就已付出了简单劳动（1973，第126页及以下，第130—131页）。他还补充说：未完成培训的工人所失去的培训劳动，必定要用熟练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价值加以计量，因为这些更高的价值必须补偿社会为其整个培训所花费的成本（1973，第131—132页）。

1942年，斯韦齐（Sweezy）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做了形式化的再表述：培训中的劳动总和只能在熟练工人的生产性的劳动时间中加以计量。假设A是培训中所做的简单劳动，P表示（单位简单劳动中的）生活劳动时间，那么一个熟练工人每小时的复杂劳动就可以表达为每小时简单劳动的倍数：例如当A：P=1：2时，它就相当于1.5小时的简单劳动。每小时复杂劳动等于1+A/P小时的简单劳动（1959，第32—33页；Meek 1973，第172页）。

4. **经典解答的缺失与疏漏**。复杂劳动被视作简单劳动之和，这些简单劳动不仅包括熟练工人自己在不同时间作出的劳动，也包括培训者作出的劳动，这个说法初看起来是个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这符合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作为“简单劳动之和”的复杂劳动——例如MEW 13，第19页；26.3，第165页）。但尚不明确的是，熟练工人后来的简单劳动、他们的培训者以往的简单劳动，以及他们以往作为受培训者的简单劳动，这三者如何能进入同一件商品之中，而这个商品只是复杂劳动的产品，是被某个熟练劳动力生产出来的。为了合理解释这种关系，我们必须给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限制灵活性的假定，即特定的产品只能由特定的熟练劳动力生产出来；任何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过渡都离不开必要的培训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简化过程至少由四部分组成：作为商品的“熟练劳动力”的培训和制造，它们在劳动市场上的销售、在生产中的使用，最后是对其生产出的商品的

销售。

劳动力商品与其他所有的商品都不同，确定其价值的时候首先遇到的困难在于：算在其中的只能是其他商品的价值，即“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MEW 23，第185、542页）；培训费用也只能包括那些为了私人课程的需要而由工人个体购买和支付的商品。就像所有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反映的也只是对其进行再生产的必要社会劳动的量。因此，只有在存在一种标准化的再生产规则的情况下，培训费用才能被算在熟练劳动力的价值之中，根据这种规则，熟练雇工负责把新手培训到相同
114 的熟练程度；在对熟练工人进一步再生产的情况下，这个规则是有局限性的。熟练工人较高的工资也可以不诉诸培训成本加以解释：由于较高的工资，熟练工人能够为其子女支付更昂贵、时间更长的教育和培训。在公共教育体系中，雇工和资本家的生活都体现出一种矛盾性：熟练劳动力被作为商品购买和销售，但并不被作为商品生产。

下一个困难则是熟练雇工创造价值的问题：以前作出的培训劳动如何在其中产生作用？如果说它促成了更高的劳动力价值，那么它也只能对再生产这些更高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产生影响。与价值转移的类比在此出现了错误：即便我们一开始给定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寿命”（MEW 24，第127页），通过培训而获得的熟练技能也不会像一般的生产资料那样，在平均劳动生活中渐渐被使用和磨损；相反，熟练技能水平会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而提高。

要想挽救这个类比，我们就只能把熟练雇工视作一个分裂的人——他既是自身简单劳动力的销售者，同时也是他租给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技能的所有者。因此我们应当把工人个体视作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就价值理论而言，一个更融贯的做法是：在熟练工人接下来的工作期里，所有过往的培训劳动体现在熟练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中，而不体现在商品（课程、培训或技能）中。由于一个培训者一般可以带多个学员，并且工人在正式完成培训后仍然可以独立工作，因此这种等价假设（即自身劳动期中多创造出的价值精确地等同于培训期中所耗费的价值）并非必然。复杂劳动因而也可以被视作潜在的简单劳动。更高的价值创造与熟练雇工在整个工作期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有关，而与熟练工人生产的单件商品的价值量无关；后者在整个工作 115
期内可能会有很大变化。

5. 新的解决尝试与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不愿在价值理论上做细枝末节的争论，而是试图为经典解答（即把复杂劳动视作当前简单劳动与以

往培训劳动之和）给出形式上正确的解释。例如置盐信雄（Okishio）指出：通过一种数学方法为任意熟练技能水平给出简化标准事实上是可能的，我们需要通过必要的“培训费用”来评估熟练工人每小时工作中多出来的价值，并简单地将这种费用定义为一定的简单培训劳动时间（1974，第41—42页）。森岛通夫（Morishima）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只需在形式上把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理解为一般的生产过程。不过这样一来，不同的熟练工人群体就需要很不一样的计量标准，而如果我们倾向于按严格的工资关系把熟练劳动简化为非熟练劳动的话，这种状况在数学上是应当避免的（参见1973，第191页及以下）。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古典经济学家的解决方法是不言自明的（参见Krause 1981；Steedman 1985）；它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也有若干变体（参见例如 Maier 1967；Morris/Lewin 197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森岛通夫的观点是不必要的：剩余价值率的平衡问题对于用利润率来形式化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并非必要（参见Bowles/Gintis 1977）。在对经典解答的形式化方面，罗桑（Rowthorn 1974）做了最详尽的尝试，他对培训费用的各组成部分做了仔细的区分，并考察了其中哪些部分能够进入再生产费用；而且，他根据教育体系的组织和资金支持方式（公共的/私人的/资本的）以及获得资金的方式（售价/学费/税收）等的不同，区分了熟练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继续再生产（第141页及以下）。不过他的大部分论述所基于的假定（即国家教育部门的未支付的剩余劳动转移到熟练雇工创造的价值中）并不比古典经济学者的假定更站得住脚（第142、144、146页）。

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了简化问题，并且带着政治的意图（为了给出与教育政治相关的论述）对其做了研究（参见 Maier 1967；Hinrichsen 1971；Ludwig/Maier/Wahse 1972）。学者们计算了简化系数，以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教育支出计划寻求支持（参见 Maier 1994）。但对于教育部门的分析以及复杂劳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问题而言，这些研究并无多大帮助。这些学者重新发现了经典论述，并对其做了重新表述。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陷入了那个著名的类比：他们认为复杂劳动之所以能创造更高的价值，只能用更高的生产力、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来加以理解；因此那个简化定律只能从额外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寻找（参见例如 Zech 1978，第278页及以下，第282页；Bidet 1985，第25—26、32—36页）。其他学者则试图通过细化熟练技能中的价值转移概念来寻求问题的解答，即对价

116

值的组成成分做进一步的区分，并以培训劳动的组织与融资方式的区别为依据，对其进行外部的分类（参见 Pietsch 1979，第 62 页及以下、第 79 页及以下）。这类解决方案是以对生产性 / 非生产性这对概念的严格规定为前提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具有更高价值创造力的主张提出了尖锐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个主张无法与价值理论相容（Bidet 1985）。与马克思所认为的相反，在资本主义中，相同时间内能产出相等价值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平均性与同质性；熟练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国有部门）正是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问题（Itoh 1988，第 162 页及以下）。

马克思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会变得愈加同质化，这个看法很早就显示出了其矛盾性：去熟练化（Dequalifizierung）与重新熟练化（Requalifizierung，即熟练技能的进一步分化）这两个趋势是同时存在的，产业雇佣劳动并没有发生那种过分简单化的进步，相反，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反向的变化，它们带来了熟练技能上的新差异（参见 Deutsch 1904；Bauer 1906）。虽然那个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不仅在工业领域）进行去熟练化的论点（马克思当时指的是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化工业生产的转变）后来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例如 Braverman 1985），但经验事实与 117
此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不同劳动的异质化问题，因而，复杂劳动也简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连同剩余价值率的平衡问题都已经不甚显著了。的确，雇工（职业与空间上的）灵活性上的传统限制已经减弱了；但新的限制又产生了。我们尚不明确现代资本主义雇工灵活性在形式和程度有怎样的显著发展趋势（参见 Blaug 1982）。我们也不能认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职业和生产部门中的教育体系都是类似的。与此前一样，我们的论述取决于对竞争（无论是雇工之间的竞争，还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作出一种根本上是历史性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S. Bailey,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 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 London 1967 (1825); O. Bauer, »Qualifizierte Arbeit und Kapitalismus«, in: WA, Bd. 7, 844-62 (1906); E. Bernstein, »Zur Theorie des Arbeitswertes«, in: *NZ*, Jg. 1899/1900, Bd. 18, 356-63; 398-404; J. Bidet, *Que faire du »Capital«?*, Paris 1985; M. Blaug, »Another Look at the Labour Reduction Prob-

lem in Marx«, in: Bradley/Howard (Hg.), *Classical and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1982, 188–202; E. v. Böhm-Bawerk, »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in: O. Häring (Hg.),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Festgaben für Karl Knies*, Berlin 1896 (Auszug in: Nutzinger/Wolfstetter 1974, 115–20); L. B. Boudin, *Das theoretische System von Karl Marx* (engl. 1907), Stuttgart 1909; S. Bowles u. H. Gintis, »The Marxian Theory of Value and Heterogeneous Labour: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i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7, H. 2, 173–92; H. Braverman, *Die Arbeit im modernen Produktionsprozess* (1974), Frankfurt/M 1985; L. v. Buch, *Intensität der Arbeit, Wert und Preis der Waren*, Leipzig 1896; H. Deutsch, *Qualifizierte Arbeit und Kapitalismus. Werttheorie und Entwicklungstendenzen*, Wien 1904; J. Elster, *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1985; P. Fischer, *Die Marx'sche Werttheorie. Zur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von Marx* (1894), Berlin 1907; R.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Marx-Kritik«, in: *Marx-Studien*, Bd. I, Wien 1904, 1–61 (Auszug in: Nutzinger/Wolfstetter 1974, 121–28); D. Hinrichsen, »Zum Problem der Reduktion komplizierter auf einfache Arbeit«, in: E. Altvater u. F. Huisken (Hg.), *Materiali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Ausbildungssektors*, Erlangen 1971, 303–43; M. Itoh, »Skilled Labour in Value Theory«, in: *Capital and Class*, Nr. 31, 1987, 39–58; ders., *The Basic Theory of Capitalism. the Forms and Substanc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London 1988; K. 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 Stuttgart 1899; U. Krause, »Heterogenous Labour and the Fundamental Marxian Theorem«,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48, 1981, 173–78; W. Liebknecht, *Zur Geschichte der Werttheorie in England*, Jena 1902; U. Ludwig, H. Maier u. J. Wahse, *Bildung als ökonomische Potenz im Sozialismus*, Berlin 1972; E. März, *Einführung in die Marxsche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Wien 1976; H. Maier, »Historisches zum Reduktionsproblem«,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1965, H. 12, 1956–71; ders., »Die Reduktion der komplizierten auf einfache Arbeit im Lichte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Problem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d. 10, Berlin 1967, 147–207; ders., *Bildungsökonomie*, Stuttgart 1994; E. Mandel, *Karl Marx—Die Aktualität seines Werkes*, Frankfurt/M 1984; R.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2nd ed., London 1973; M.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118

Cambridge 1973; J. Morris u. H. Lewin, »The Skilled Labor Reduction Problem«, in: *Science and Society*, 1973, H. 4, 454–72; H. G. Nutzinger u. E. Wolfstetter (Hg.), *Die Marxsche Theorie und ihre Kritik*, Bd. II, Frankfurt/M 1974; N. Okishio, »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63, H. 2, 287–98 (dt. in: Nutzinger/Wolfstetter 1974, 39–53); A. Pietsch, *Das Reduktionsproblem und die Kategorien produktive und unproduktive Arbeit*, Frankfurt/M 1979; V. N. Posnjakow, *Qualifizierte Arbeit und Marxsche Werttheorie*, Moskau 1925 (russ.); R.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Der Rohentwurf des »Kapital« 1857–1858*, Frankfurt/M 1969; B. Rowthorn, »Komplizierte Arbeit im Marxschen System«, in: Nutzinger/Wolfstetter 1974, 129–63; I. I. Rubin, *Studien zur Marxschen Werttheorie* (1924), Frankfurt/M 1973; H. Schilar, »Zum Problem der Reduktion der komplizierten auf einfache Arbeit«,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1966, H. 2, 553–72; R. Schlesinger, *Marx, His Time and Ours*, London 1950; I. Steedman, »Heterogeneous Labour, Money Wages and Marx's Theory«,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H. 17, 551–74; P. M. Sweezy, *Theorie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1942), Köln 1959; R. Zech, »Die Reduktion komplizierter auf einfache Arbeit«, in: *Gesellschaft*, Bd. 11, Frankfurt/M 1978, 248–310.

米夏埃尔·克拉特克
（Michael Krätke） 撰
王师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rbeitskraft, Arbeitsmarkt, Arbeitsteilung, Ausbeutung, Austromarxismus, Automation, Bildung,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infache Zirkulation, Extraprofit, Fabrik, Fabrikgesetze, Gebrauchswert, gesellschaftlich notwendige Arbeit, Institutionen, Kapital, konstantes und variables Kapital, Konkurrenz, Lohn, Lohnarbeit, Manufaktur, Markt, Mehrwert, Mehrwertrate, Produktion, Produktivität,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fitrate, Qualifikation, Reproduktionstheorie, Schule, sozialistische Warenproduktion, Staat, Tauschwert, Transformationsproblem, Wert, Wertform, Wertgesetz, Wertmaß, Wertsubstanz

119 简单商品生产 (einfache Warenproduktion)

A: intāğ sila'ī basīṭ.

E: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F: production marchande simple.

R: prostoe tovarnoe proizvodstvo (простое товар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S: producción mercantil simple.

1. 简单商品生产这一表述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更确切地说是由恩格斯对它的接受中创造出来的，形式上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创造的概念“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MEW 23，第63页)或“简单商品流通”(第163页)类似。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是按如下意义来使用简单商品生产的：“简单”特指一种历史维度中的商品生产，是对一种“发展阶段”(第184页)的命名。“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同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特征是“庞大的商品堆积”(第49页)。但是市场的喧嚣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品也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或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或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K III*，MEW 25，第337页)。在这些“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第342页)，存在着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但这些关系在一个社会整体中还不发达(参见Jánoska等1994，第156—157页)。

2. 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一件产品不是由其生产者消费，而是“用来出售”的，那它首先是一件“简单商品”(*Ms 61-63*，MEGA II 3.1，第60页)。其前提是“分工发达”(*K I*，MEW 23，第184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商品才能借助商品生产出来，“劳动过程的所有要素都是购买的(就同在工厂生产中的情况一样)”(*Ms 61-63*，MEGA II.3.1，第61页)。考虑到“劳动过程的对象条件，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因而“这些物品、商品种类繁多”(同上)。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会出现“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几乎所有东西都具有商品的形式。

此外，还存在“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K III*，MEW 25，第186页)。此处是指“小规模进行生产”(第322页)，即“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

120

的直接需要以后。——译者）余下的部分”（第337页）在当地销售。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或者“为消费者的私人订货”（第322页）而生产。生产受制于如“手工业行会组织”（第187页）这样的传统规则。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凭这种商品生产的方式并不能解释“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正是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同上）之中，劳动产品获得了确定的商品形式。历史上，从货币转化而来的商品生产首先发展成为由商人资本促成的商品生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商品生产还是商品流通，都存在于前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Res*，MEGA II.4.1，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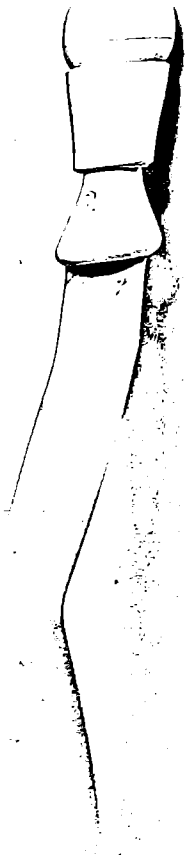
马克思分析商品生产、货币种类和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积累、商业资本、利息、土地所有制、殖民地、世界市场和危机，以便“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MEW 25，第839页）。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基本形式，商品是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同时，商品现在也表现为资本的产品。马克思“在理论上严格地重建了一种生成关系”（Haug 1984，第73页），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一种发展着的、产生着的或消失着的结构”（Zelený 1968，第21页）。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这些概念的系统性发展同样有助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众多必要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历史性的：“我们叙述的这种循环，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Res*，MEGA II.4.1，第24页）其他历史条件，如私有制的产生、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人口增长、社会分工的发展、技术、经营方式、社会劳动的分配和组织的发展、现代信用体系的形成以及农业的资本化，121
也都通过各自在一般资本概念中的地位而获得了系统意义。历史过程并不表现为经济历史的过程，而是可以在经济范畴中追溯到的“历史痕迹”（MEW 23，第183页）。必要条件似乎包括“世界历史”（第184页），然而马克思想写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以糟糕的可信度将一切都导向资本的历史。如果马克思认为历史的诸规定只在诉诸资本时才有意义，那么资本就会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概念”，只有它“才具有**现实性**，并从而使自己现实化”（*RPh*，§1）。

3. 根据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方法论的观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

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MEW 23[应为25——译者]，第20页）。在这里，马克思所分析的简单流通形式W—G—W被理解为简单商品生产。《资本论》第1卷第1章被理解为对资产阶级社会开端的“修正的反映”（MEW 13，第475页），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同上）。

在这一论证中，被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手法安置在“社会早期发展阶段”（*Grundsätze*，第39页）的价值规律，与经济实践中的经验也没有明显矛盾：“总之，只要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MEW 25，第909页）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1885）中，恩格斯提出了贯穿第3卷的“转型争论”，即根据价值规律如何能够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MEW 24，第26页）。从维尔纳·桑巴特（1894）、欧根·冯·庞巴维克（1896）和拉迪斯劳·冯·鲍特凯维兹（Ladislaw von Bortkiewicz）（1906）等人开始，后来的批判和评论均针对这一点。批评者认为这是第1卷与第3卷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论》第3卷 122
常常被解释为对理论失败的承认（参见Behrens 1995）。恩格斯显然不知道他1885年提出问题的后果。《资本论》第3卷前言中对简单商品生产的阐释说明了他在证明两个理论的一致性时遇到的困难。《资本论》第3卷中探讨利润与平均利润、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平衡的段落，也属于编辑技术方面有问题的段落（参见Vollgraf/Jungnickel 1994）。除了调整之外，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前言部分中还做了文风上的改动，使含义发生了改变。马克思说商品交换是“在不同共同体（communities）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MEGA II.4.2，第253页），恩格斯将其中的共同体翻译为“共产主义共同体”（MEW 25，第187页），从而使马克思的表述具有了形态理论的色彩。

恩格斯把简单商品生产解释为中世纪的生产，表明他试图将社会关系历史化。在他看来，简单商品生产似乎是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要素——这种历史观将原始共同体的关系与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排除了不连续的、庞大的历史要素。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声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



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MEW 20，第151页）。他继续写道：“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第253—254页）恩格斯在这里描述了简单商品生产的本质，但并未这样命名。他所理解的简单商品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类型，其基础是有分工的手工业或农业生产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实质上还不是雇佣劳动。对他来说，这是最简单、最不发达的商品生产形式，其历史起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分析起点。尽管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欧根·杜林（Eugen Dühring）的著作，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撰写了边注，并审阅了手稿（参见 Vollgraf 1992），但他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叙述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即马克思是否认为这一叙述是正确的，还是说他是否只是不确定如何用群众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述科学观点。

4.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87年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Oekonomische Lehren*）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反映了人们接受这种阐释的迫切程度。此前，恩格斯在谈到他与卡尔·约翰·洛贝尔图斯（Karl Johann Rodbertus）的《资本论》批判的论战时教导考茨基，“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像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1884年6月26日，MEW 36，第168页），这是需要证明的。考茨基对此得出了以下结论：“对于承认资本为历史范畴，以及证明资本是在历史之手中产生而非从头脑中建构出来，马克思是有所保留的。”（1884a，第350页）在《新时代》（*NZ*）上的另一篇答复中，考茨基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只适用于进行商品生产的社会”，但为了避免误解，马克思讲解了“虚构的鲁滨逊漂流记”（1884b，第503—504页）。

在《资本论》第1卷的普及版中，考茨基听从了恩格斯的建议。他有所限定地总结了生产方式的历史顺序，即所阐明的不是“商品生产的历史，而只是它的特殊性”（1887，第12页）。这使得“简单商品生产”介于“原始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间。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彼此独立工作的个体劳动者，用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制造的产品，自然是他的私有财产”（第252页）。因此，如果说私有财产在简单商品生产下是“劳动的结果和成果”，那么，资本

主义生产则是撕裂了这种联系。考茨基由此得出结论，人们认识到社会今后的发展道路通往“生产资料的占有”：“有计划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取代了混乱无序的商品生产。”（第259页）

5. 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的分歧再次受到了热烈讨论。按照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的观点，恩格斯的“简单商品生产”的概念是以“荒谬的方式”对马克思的“简单流通”这一基本概念的误解，并
124 通过“将第一章解释为前货币的自然经济的价值理论，以及将第三章解释为‘简单商品生产’的货币理论，首先忽视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货币理论意图”（1978，第18页）。类似的还有赫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对《资本论》“逻辑结构”的论证。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1984，第68页及以下）和弗兰克·库内（Frank Kuhne）（1995，第104页）则批评这种解释模式是“黑格尔化的”。汉斯-霍尔格·保罗（Hans-Holger Paul）认为恩格斯是“庸俗化者”，将马克思的辩证法接受为进化论，从而无意间剥夺了马克思理论的革命特征（1978年，第46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的重印本中，弗雷德·E. 施拉德（Fred E. Schrader）认为这个版本体现了马克思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马克思“明确地选择了一种严格的辩证的阐述逻辑，特别是在对商品和货币的分析上”（1980，第11*页）。格哈德·格勒（Gerhard Göhler）同样认为第1版中存在一种概念逻辑上的叙述，后续版本为了便于理解，将其简化了。相反，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则持一种现实历史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开头“既没有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没有分析资本”，因为没有“简单商品生产就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1991，第11—12页）。

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相统一），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了。对此，汉斯·格奥尔格·努辛格（Hans Georg Nutzinger）和艾尔玛·沃夫施岱特（Elmar Wolfstetter）指出，“被解释为价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实质上可以追溯到恩格斯”，恩格斯认为，“价值和价格的等同对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商品的社会（‘简单商品生产’）来说是合理的”（1974，第11页）。探讨重新阐释价值理论的苗头——民主德国的彼得·卢本（Peter Ruben）和汉斯·瓦格纳（Hans Wagner）（1980），以及苏联的什克列多夫（Škredov）（1973）——被扼杀了。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

史考证版（MEGA）编辑工作的学者批评了将《资本论》第1卷第1篇视为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的解释，但未明确提及恩格斯的阐释方式（Jahn 1978，Hecker 1979）。同样，1988年出版的民主德国最后一版《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Ökonomie*）教科书中坦率地申明，《资本论》第1卷第1篇探讨的肯定不是简单商品生产，而是资本主义。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1992）中首次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手稿（1863—1865），这个问题再次被
125 提出。通过与恩格斯编辑的刊印稿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恩格斯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MEW 25，第11页），因为他对文本的处理造成了“历史化”（参见Heinrich 1991和1996，Backhaus/Reichelt 1994，Vollgraf/Jungnickel 1994）。如此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差异远比以前认为的要大。对此，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1995）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二人之间的差异有这么大，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例如在撰写《反杜林论》时不纠正恩格斯呢？

参考文献：

H.-G. Backhaus,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II«,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2*, Frankfurt/M 1978, 16–117; ders. u. H. Reichelt, »Der politisch-ideologische Grundcharakter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Eine Kritik der Editionsrichtlinien der IMES«, in: *MEGA-Studien*, Berlin 1994, H. 2, 101–118; D. Behrens, »Ein Kommentar zum MEGA-Band II.4.2«, in: *MEF* 1995, 5–26; E. V. Böhm-Bawerk, »Zum Abschluß des Marxschen Systems«, in: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Berlin 1896; L. V. Bortkiewicz, »Wertrechnung und Preisrechnung im Marxschen System. Erster Artikel«,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Bd. 23, Tübingen 1906; G. Göhler, *Die Reduktion der Dialektik durch Marx.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dialektischen Entwicklung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Stuttgart 1980;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Köln 1974, 5., überarb. u. erg. A., Berlin/W-Hamburg 1989;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sstseins.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Philosophie-Ökonomie-Wissenschaft*, AS 70, Berlin 1984, 9–95; R. Hecker, »Einige Probleme der Wertformanalyse in der Erstausgabe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in: *Arbeitsblätter zur Marx-Engels-*

Forschung, H. 8, Halle 1979, 76–94; M. Heinrich, *Die Wissenschaft vom Wert. Die Marxsch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zwischen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und klassischer Tradition*, Hamburg 1991; ders., »Engels's 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in: *Science & Society*, 60. Jg., 1996/97, H. 4, 452–466; W. Jahn, »Die Entwicklung der Ausgangskategori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in den Vorarbeiten zu Marx' Kapital«, in: »... *unsrer Partei einen Sieg erringen*«. *Studien zur Entstehungs- und Wirkungsgeschichte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Berlin/DDR 1978, 66–79; J. Jánoska u. a., *Das »Methodenkapitel« von Karl Marx. Ein historischer und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Basel 1994; K. Kautsky, »Das ›Kapital‹ von Rodbertus«, in: *NZ*, 2. Jg., 1884(a), H. 8, 337–350; ders., *Eine Replik*, in: *NZ*, 2. Jg., 1884(b), H. 11, 494–505; ders., *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 Stuttgart 1887; F. Kuhne, *Begriff und Zitat bei Marx*, Lüneburg 1995; E. Mandel, *Kontroversen um »Das Kapital«*, Berlin 1991; H. G. Nutzinger, E. Wolfstetter, *Gesamteinleitung*, in: *Die Marxsche Theorie und ihre Kritik I. Eine Textsammlung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New York 1974, 3–27; B. Ollman, »Some Questions for Critics of Engels's Edition of *Capital*«, in: *MEF* 1995, 58f; H.-H. Paul, *Marx, Engels und die Imperialismustheorie der II. Internationale*, Hamburg 1978;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Kapitalismus und des Sozialismus. Lehrbuch für d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Grundlagenstudium*, Berlin/DDR 1988; H.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M 1970; ders., »Warum hat Marx seine dialektische Methode versteckt?«, in: *MEF* 1996, 73–110; P. Ruben, H. Wagner, *Sozialistische Wertform und dialektischer Widerspruch*, in: *DZPh*, 28. Jg., 1980, H. 10, 1218–1230; F. E. Schrader, »Editorisches Vorwort zum Nachdruck der Erstausgabe des ›Kapitals‹ von Karl Marx (1867)«, in: *Karl Marx, Das Kapital*, Hildesheim 1980; V. P. Škredov, *Metod issledovanija sobstvennosti v »Kapitale« K. Marksa*, Moskau 1973; W. Sombart,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in: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1894, Bd. 7, H. 4, 555–594; C.-E. Vollgraf, »Ein ›Handgemenge‹ im Vorfeld des ›Anti-Dühring‹«, in: *MEF* 1992, 109–123; ders. u. J. Jungnickel, »›Marx in Marx' Worten‹? Zu Engels' Edition des Hauptmanuskripts zum dritten Buch des Kapital«, in: *MEGA-*

126

Studien, Berlin 1994, H. 2, 3–55; H. Wagner, »Die Darstellung der Wertformanalyse und Wertformentwicklung durch Marx und ihre methodologische Bedeutung in der Gegenwart«, in: *DZPh*, 28. Jg., 1980, H. 2, 197–211;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Berlin/DDR u. Frankfurt/M 1968.

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 撰
胡晓琛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e Arbeit, Abstraktion, Anfang, Aufbaupläne, Dialektik, einfach, einfache Zirkulation, Feudalismus, Form/Formbestimmtheit, Forminhalt, Forschung/Darstellung, Genese, Geschichte, Hegel-Kritik, historisch-kritisch, Kapitallogik, logisch-historische Methode, Markt, Rekonstruktion, Subsistenzproduktion, Transformationsproblem, Ware, Warenform, Wert, Wertform

简单流通（einfache Zirkulation）

A: tadāwul basiṭ.

E: simple circulation.

F: circulation simple.

R: prostoe obraščenie (простое обращение).

S: circulación simple.

流通一般代表周转、循环。它显现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特定形式、过程、流通行为中，这些形式、过程和行为彼此有别，却也在部分程度上相互转换：商品流通，作为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流通，信用货币和纸币的流通（参见MEW 42，第118—119页），资本的流通过程，剩余价值的流通过程（参见*K II*，MEW 24，第31页及以下，第321页及以下），“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小流通”（*Gr*，MEW 42，第579页）。为了能够用结构化的要素描述作为复杂整体的流通，马克思运用了抽象法，“将较为复杂（较为具体）的各种形式抽丝剥茧，以便研究对象内在结构的各要素” 127
（Zelený 1962，第168页）。

任一产业的单个资本都在“资本的循环过程”（*K II*，MEW 24，第31页）中相继经历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阶段。“流通”在此表示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分为两个阶段，即购买“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第36页）和销售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第64页），在这里，预付的价值不仅得到保存，而且发生了增殖。在产业总资本

层面，“流通”以各自特定的比例同时并相继囊括这些阶段和职能。在这两种意义上所涉及的，都是以资本**为中介的**流通。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简单流通在不考虑其生产关系的情况下是“**现有的**商品的交换”（*Urtext*，*Gr*，第923页），此时，货币是“买卖的媒介”（第875页）。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也把这种形式最简单的流通称为“商品流通”，比如标题中有《货币或商品流通》（23，第109页），称为“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第162页）或者“简单商品流通”（24，第70页）。

1. 亚里士多德认为简单流通的要素自然而合理，他着眼于需要，着眼于关涉当下的自给自足原则，谴责货币的“牟利性”流通是（高利贷）资本，是积聚的金的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参见*Politik* 1257 a 35，1258 b 35）。知识的次序和时间观念原则上以圈子（»Enzyklopädie«）（Enzyklopädie[百科全书]源于希腊语 enkyklios paideia，原指学习的圆圈，即全面的学习体系、无所不包的知识。——译者）和循环为本，而经济（Ökonomie）的所指本质上正如其名：嵌入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家庭经济和庄园经济。

资产阶级的现代才生发出劳动、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规范关系。货币流通这个概念是以隐喻的方式从医学生理学（medizinische Physiologie）那里借用过来的。1628年，威廉·哈维（Willam Harvey）把血液循环分为小循环（肺循环）和大循环（体循环）并研究了两者的关系。与血液循环类似，重商主义经济学家设想了一种循环，其中货币在整个经济体中易手流通，刺激贸易进而促进物品生产。他们认为，经济政策必须促进这种循环，方法是设法不因购买外 128
国商品而让货币原料即贵金属流出国境。但一个国家“有商品就不会缺乏货币”（Thomas Mun 1664，第44页）。

2. 马克思认为，简单流通是“经济范畴中第一个总体”，在这第一个层面上，可以把资产阶级社会理解成以交换为中介的、劳动分工的行为关联。简单流通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Urtext*，*Gr*，第922页）。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感知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在这种经济中，日日发生无数买卖。

2.1 简单流通的尺度和目的在于“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K I*，MEGA II.5，第106页；参见MEW 23，第167页）。对于简单流通的“**形式上的特点**”（*Urtext*，*Gr*，第919页）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马克思用公式W—G—W（商品—货币—商品）来表

示："W—G的运动，即用商品交换货币或**卖**"和"相反的运动G—W，即用货币交换商品或**买**"（*Zur Kritik*，13，第69—70页），是"简单流通的环节"（*Gr*，52，第531页）。此时，"等价物，即相等的价值量进行交换"（*Urtext*，*Gr*，第919页）。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时，是在商品买卖者之间充当"物质变换"的"中介"，而在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和储备手段，作为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时，W—G这一形式变换"变成了目的本身"（*K I*，MEW 23，第144页），变成了作为货币的货币。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同上），作为"契约上的一般商品"（第154页）越出商品流通领域，或者充当用来平衡国际收支的外汇金属。

货币充分完成作为货币的使命，就转成资本。《资本论》第1卷在阐述资本总公式时，是以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形式开始的。如果货币以G—W—G的形式流通，也就是说，预先支付的货币额变成商品，随后，商品再变成货币，那么，货币"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第162页）。流通的商品只是给货币的运动G—G做中介。只有货币额在流通前后数量不同，即它是"**非等价物的交换**"（*Zur Kritik*，MEW 13，第102页）或"价值增殖"（*K I*，MEW 23，第167页），该过程在经济上才有意义。马克思用公式G—W—G'来表示为了剩余价值而扩大预先支付的货币额这个过程。简单流通既不能提高价值的数额，也不能提高所交换商品的价值。这指向劳动，仅有劳动才是剩余价值、剩余产品、生产剩余的源头。

2.2 简单流通同时作为"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即资本流通的从属关系（*Einl* 57，MEW 42，第37页）。作为"资产阶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简单流通给"现有的商品的交换"做中介，它把现有的商品"当作前提"（*Urtext*，*Gr*，第922—923页）。"仅就这些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而言，这个过程在我们称为'简单流通'——商品流通本身——的地方已经阐述过了。"（*Res*，MEGA II. 4.1，第51页）

但在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中，商品又是"资本的承担者"，而且，起初作为简单流通被研究的东西，随后"在下一册中"被视为"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的"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不仅发生于货币资本的循环中，而且发生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中。货币资本、货币形式的资本就在劳动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上转换成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参见MEW 24，第44、79页）。在那里，"生产资本已通过商品产

129

品的出售转化”（第75页），如果包含在商品资本中的剩余价值在销售商品资本后作为资本家的收入被花掉（第74页），就是“简单商品流通”（第72页），在商品资本中“转化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第100页）。这种流通同时又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包含着商品流通的抽象考察所没有涉及的进一步规定”（*Res*，MEGA II.4.1，第51页）。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是“论述简单流通的杰出的意识形态理论家”（Brentel 1989，第190页）。蒲鲁东认为，一切经济形式均由简单流通的中介运动构成。他看不到，“商品交换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蒲鲁东想坚持最简单、最抽象的交换形式”（*Gr*，MEW 42，第734页）。蒲鲁东的“交换
130 银行”设想中，商品显现为单纯的劳动产品，货币行使简单的交换手段职能。

2.3 在阐述简单流通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性的自我定位展开了广泛批判。在简单流通中，“购买一块面包的工人和百万富翁”都只显现为“简单买者”；在“劳动市场”上，“雇主”和“雇员”都是简单的商品所有者，即“买者和卖者”（*K II*，MEW 24，第36页）。因为在简单流通中，在“这种老实的价值对价值的交换中”（*Reflection*，MEGA IV.8，第231页；MEGA I.10，第507页），交换了等价物，订立了合同，交换者显现为“价值相等的人”（*Gr*，MEW 42，第168—169页）。从霍布斯到康德的自然权利论和契约论（立宪主义）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宪法阐述成自由、自主的主体之间达成一致的行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消费者具有绝对主权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可以从所有人那里得到一切，妓女、科学、保护、勋章、奴仆、吮痈舐痔者，一切如同咖啡、糖和鲱鱼一样皆是交换品”（*Reflection*，MEGA IV.8，第233页）。作为简单流通的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商品所有者、货币所有者、货币贮藏者），资产阶级主体是自由的，并且和他人是平等的（参见 Kostede 1980，第146—147页）。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源于交换关系，因为商品占有者按契约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K I*，MEW 23，第99页）。所以，简单流通显现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第189页），关于其公正观念显现为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在流通领域，资本起初并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K III*，MEW 25，第355页）。因而，简单流通显得如同“一团云雾，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整个世界，资本相互联系的世界”（*Gr*，MEW 42，第539页）。如果连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市场上的雇佣工人之间也发生等价物交换，后者就会陷入“困

境”（*K I*，MEW 23，第 603 页）：工人始终是“依附于人的”受雇者。就此而言，阶级剥削和阶级再生产主要不是借助直接对身体施暴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以简单流通为中介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来实现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看到，简单流通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分配，也为自身利益和自决的表达提供了机会。所以，“工
131 人阶级在必要的生存资料之外节省下来的”，可以“给自己购买书籍和讲座（lectures）、会面（Meetings）。工人阶级比知识分子有更多的手段来掌握社会的一般权力”（*Reflection*，MEGA IV.8，第 233—234 页）。

2.4 在马克思那里，简单流通规定的系统顺序与经济史并不直接对应。简单流通既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抽象片段，也并非作为“逻辑的研究方式……而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Engels，*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ezension]*，MEW 13，第 475 页）。“既不可能把逻辑与历史彻底分离，也不可能反映两者关系。”（Kuhne 1995，第 35 页）把历史的规定性纳入话语的发展，源于话语的发展自身，因为一切“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K I*，MEW 23，第 183 页）。因而，借助简单流通这一抽象、简单的范畴，马克思也把真正资本主义的范畴和关系的一种历史上的胚胎形式视为工业革命的前提之一。早期商人资本“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K III*，MEW 25，第 337 页）。它在简单流通领域充当中介者。如果在“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中（第 190—191 页），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第 340 页）出现，那么，“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由此，“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同上），为建构作为社会价值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创造了前提（参见第 190—191 页）。

2.5 在简单流通中断时，形式上可能有危机，它表明“简单”阶段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不稳定性：“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K I*，MEW 23，第 127 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赋予卖以关键职能。马克思把出卖商品（W—G）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salto mortale）（第 120 页）。如果转换失败，留在卖者手里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第 121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并未详细研究销售停滞的原因，因为它们“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但他点出了企业的产品、

132 市场、销售和成本规划在竞争斗争中的意义："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第121页）

3. 严格根据《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44页），卡尔·考茨基（1887）区分了"商品流通"与"直接的产品交换或者简单的物物交换"。罗莎·卢森堡在其《国民经济学导论》（*Einführung in die Nationalökonomie*）中未对简单流通做形式上的陈述，而是对"商品经济"做了经济史上的描述，认为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只不过是商品对商品、劳动产品对劳动产品"（GW 5，第729页）。欧内斯特·曼德尔把简单流通刻画成"商品所有者在基于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中所做的交易"（1972，1，第91页）。他还从经济史上探究了古典时期的希腊、传统中国、日本古村中的流通过程。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ksy）率先详细接受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里关于商品中、简单流通中和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发展的论述（1968，2，第374页及以下）。

20世纪70年代，西欧左翼内部讨论了资产阶级国家对阶级斗争的发展有何意义，并寻求了可能的改良策略。例如，约阿希姆·希尔施主张，"必须从分析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中生发出一种关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理论"（1974，第23页），国家理论是"阶级运动及其经济、政治使命的理论"（1976，第100—101页），而其他人则在抽象和范畴的层面从简单流通中推论出了"国家的特殊化"。据此，国家为简单流通产生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则提供了保障。海德·格斯滕贝格尔（Heide Gerstenberger）等人批评这种方法是单一归因，略而不提历史现实（1975，第8页及以下）。

参考文献：

H. Brentel, *Soziale Form und ökonomisches Objekt. Studien zum Gegenstands- und Methodenverständnis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Opladen 1989; H. Gerstenberger, »Klassenantagonismus, Konkurrenz und Staatsfunktionen«, in: H.-G. Backhaus (Hg.),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3, Frankurt/M 1975, 7-26; J. Hirsch, *Staatsapparat und Reproduktion des Kapitals. Projekt Wissenschaftsplanung*, 2, Frankfurt/M 1974; ders., »Bemerkungen zum theoretischen Ansatz einer Analyse des bürgerlichen Staates«, in: H.-G. Backhaus u. a.,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8/9, Frankfurt/M

133

1976, 99–149; K. Kautsky, *Karl Marx's Oekonomische Lehren. Gemeinverständlich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Stuttgart 1887; N. Kostede, *Staat und Demokratie.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Marxismus*, Darmstadt, Neuwied 1980; F. Kuhne, *Begriff und Zitat bei Marx. Die idealistische Struktur des Kapitals und ihre nicht-idealistische Darstellung*, Lüneburg 1995; E. Mandel, *Marxistische Wirtschaftstheorie*, 2 Bde., Frankfurt/M 1972; T.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eign Trade (1664) «, in: K. Diehl, P. Mombert (Hg.), *Ausgewählte Lesestücke zum Studiu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9. Bd., *Freihandel und Schutzzoll*, Karlsruhe 1914, 33–47; R. Rosdolsky,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M 1968;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1962), Berlin/DDR u. Frankfurt/M 1968.

冈特·维林（Gunter Willing） 撰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bleitung, Akkumulation, Alltag, Alltagsverstand, Apologetik, Arbeitsmarkt, Ausbeut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rechte, Charaktermaske, Demokratie, Denken, Denkform, Distribution, Eigentum, Empirie/Theorie, Erscheinung/Erscheinungsform, Freiheit, Gebrauchswert, Gesellschaftsvertrag, Gleichheit, Handel, Handelskapital, Herrschaft, Kapital, Kapitalistenklasse, Klassenherrschaft, Konsument, Kontraktualismus, Kreislauf, Kris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risentheorien, Lohnarbeit, Markt, Mehrwert, Personifikatio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Reproduktion, Staatsableitungsdebatte, Tausch, Vermittlung, Wertgesetz, Zirkulation

移情（Einfühlung）

A: ta'āṭuf.

E: empathy.

F: empathie, identification.

R: sposobnost' ponjat' kogo-n., včuvstvovat'sja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понять кого-н., вчувствоваться).

S: empatía.

与“移情”这一术语相关的设问，涵盖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方面，移情是人社会属性和归属需求的基本心理需求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移情是人

作为个体归化于统摄该个体的社会秩序的表现形式。通过将移情规定为一种经验的形式，艾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不情愿地点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移情就是一种'此我'从'他我'那里所获得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不仅关涉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也关涉意识形态方面的纵向联系："人通过移情来感受周围人的精神世界，也是通过移情，作为信徒来感受他的上帝的爱恋、憎怒、诫命。"（1917，第10—11页）

纵观接续马克思的思想传统，布莱希特对移情的诠释最切中要旨：对他来说，移情是"占统治地位的美学的基石"（GA 22，第551页）。但是，布莱希特的"移情批判"所针对的并非移情本身对情感的背离，而是源自占统治地位的
134 再生产关系的情感泄导。情感理应成为一种解放性的生产力，为极具凝聚力的社会而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将"移情"这一概念夺回，化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葛兰西将"移情"阐发为作为一种"批判"的必要因素的群众激情，这种"批判"指的是能够孕育"自下而上"的反霸权（Gegenhegemonie）力量的批判。

布莱希特认为，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正因德国学界的主流哲学话术由此概念生发而来，该术语才变得至关重要；与之等量齐观的是"交往"（Kommunikation）这一术语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地位。该词语年纪还轻，1862年刊发的《格林词典》第3卷中都还未见其踪影，其进入哲学话术的路径，始于弗里德里希·费舍尔（Friedrich Th. Vischer）的《美学》（*Ästhetik*，1843）一书的接受。

1. 这个概念的意义谱系，首先关涉的是"同情"（Mitgefühl）或"怜悯"（Mitleid）。至迟从启蒙时代开始，基督教伦理统摄下的这个概念，增添了神诫要求普遍人性之爱的内涵（参见Fuhrmann 1982，第162页）。堪称范式的是休谟和卢梭的诠释，尽管这两种范式不尽相同。

1.1 在休谟看来，在"同情"（*sympathy*）的原则下，人具有一种天赋的能力，对他人的感受表现出热烈的兴趣。人与人之间真实可感的类同，让一个人在看到别人感情流露时，情不自禁地发挥想象力（*imagination*）去想象其情动的原因，与自身境况进行比较，即"进入"对方的情感世界（"to enter into the sentiments of others"，*Treatise*，1739/40，I.2，11），假想自己身临其境。这种原则不仅是道德观念的基石，也是审美能力的根基（参见von der Lühe 1996，第234—235页）。从同情（*sympathy*）到移情（*empathy*）的路途，即始于

此处。

而在卢梭那里，若不考虑其与休谟观点的相异之处，同情（*pitié*）同样是具有建设作用、中和“自爱”情绪、体现人社会性的自然本性。同情是一种“感情”，通过它，“我们得以超出自身之外”，“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但由此一来，这种“自然性质的感情”就变成了“社会性质的情感”，这种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Identifikation）
135 须有“想象力”（*imagination*）激活过的同情心，这种“设身处地”（*transport*）须有“既得认知”作为前提。“从不思考的人，不会是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人”，“不会想象（*n'image rien*）的人，只会考虑他自己”（*Diskurs*，1. Tl.；147；*Essay*，Kap. IX）。

1.2 另一方面，从这一概念的影响史来看——就布莱希特的论点而言——如下事实更能说明问题：戏剧充当了争取资产阶级霸权的重要工具。所以说，亚里士多德《诗学》（*Poetik*）中“净化说”的被接受，孕育出的是绝对主义的反对者和拥趸都吁求的权威机制。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因对人的理解迥然不同于现代，“同情”（拉丁语作 *compassio*，希腊语作 συμπάθεια）和“移情”都没有直接的对应词。但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却可以从一系列核心概念中追溯一二：摹仿（μίμησις）、类同（ὅμοιον）、体认（ἀναγνώρισις）、怜悯（ἔλεος）、恐惧（Φόβος）、净化（κάθαρσις）。亚里士多德将悲剧定义为“借助摹仿的手段，将优美、完整圆融的情节施加于观众身上，在这样的触发机制下唤起的恐惧与怜悯，其最终目的是起净化作用的整体关联”（*Poetik*，第 6 章）。这种整体关联包括“体认”（ἀναγνώρισις）和“类同”（ὅμοιον），因为要观众能从戏剧表演中深化认知，就要以实现以下情况为前提：舞台上所呈现的人物虽则“比我们更好”，但也要与我们“相似”（15，1454b，11）。为实现悲剧的这一功能，亚里士多德设定了诸多准则，其根本的伦理和政治诉求，是为了调节人（更确切地说，男人）出于政治共同体的立场而生发的激情。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并非“去除激情”（ἀπάθεια），而是“中和激情”（μετριοπάθεια）（参见 Fuhrmann 1982，第 161 页）。

1.3 莱辛（Lessing）所译的《诗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以适应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伦理和政治诉求。莱辛索回“媒介”（μεταξύ）这个概念，即观众与作为“一般人”的主角之间的关系（*Poetik* 13，1453a 10），要求对普遍事物和普遍人性发生共情，以对抗等级限制（Ständeklausel）。此外，莱辛将“ἔλεος”译为“同情”

(Mitleid)，这乃是莱辛的“净化说诠释”的核心概念：将“Φόβος”译为“恐
136 惧”(Furcht)，在这两个概念之间建起逻辑—心理层面的联结，让剧场对观众激情的调节得以变成观众的自我调节。悲剧“应能拓展我们感到同情的能力”，因为在莱辛看来，“极富于同情心的人”是“最好的人”(an Nicolai，28. Nov. 1856，引自 Berghahn 1981，第 686 页)。但这种目标，只有在悲剧将同情心以“恐惧”(Furcht)的外壳装扮起来的时候，才能实现。因此，“我们所同情的对象”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我们可能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我们之中的某人而感到恐惧。若是没有恐惧，就不会有同情”；“恐惧就是从这种相似性中产生的，我们唯恐自己的命运与之相似，觉得好像自己就是当事人一样”(*Hamb. Dramaturgie*，75. Stück；1981，第 384—385 页)。

1.4 若说“移情”这一德语概念在莱辛那里已初具雏形，那么，数百年后随着市民阶层霸权的确立，这一概念才获得了系统的发展，主要体现于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心理学。现在，净化的目的，不再是同情能力的构建，而是“自我享受”(1903，第 159 页)。总的来说，利普斯所阐释的移情，是一种发生于人所有感性知觉内的转化过程，一种对象能被“内在”地涵纳、能被内在心理活动感知的过程。这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统觉的移情”(以几何学的形式)，也适用于“氛围移情”(Stimmungs-Einfühlung)(颜色和声响作于我都是氛围：“这种氛围是我的情绪，但它附着于颜色”)以及“对生命存在的感性表象的移情”(1907，第 355—359 页；关于心理学内部的批评，参见 Holzkamp 1965)。

利普斯论述的主体是“审美的移情”，主要特征如下：它提升了感知者的“自我价值感”，让因艺术品而被激发的内心情感能体验到“我行为的力度、丰富度、宽广度以及内心的自由”的乐趣(1903，第 97 页)，同时，这也是对审美形式和审美活动移情的情感(第 132 页)。这种审美范畴的移情，促成了一个“从现实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我”，一个“纯粹的‘人’”，“我对审美客体满心肯定”，“在这种肯定中感到幸福快乐”(1907，第 364 页)。

1.5 与利普斯主要将“移情”局限于审美领域不同，狄尔泰(Dilthey)将 137
移情模式用于他称为精神科学(作为自然科学的补充)的整个领域。“理解”这一基本概念，可以定义为“一种自我代入，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确切说来，对于被理解的对象，自己的体验需要“在场”(gegenwärtig)(1910，第 263 页)：“理解是在‘你’中再次寻

得我。”（第235页）狄尔泰也将之表述为，“自我化为一种生命表达的既定存在的转化”。随即，这种“转化”为“摹仿或者仿效”中的真正理解提供了“逆向操作”（inverse Operation）的基础（第264页）。

哈贝马斯对狄尔泰的这种“隐秘的实证主义”（heimliche Positivismus）持批评态度，因为狄尔泰以“沉思的真理概念”（kontemplative Wahrheitsbegriff）为导向的再体验概念（Begriff des Nacherlebens）正是自然科学中“颓靡的观察”（desengagierte Beobachtung）的精神科学领域的对应物，会令他自己误解“体验、表达和理解”原则上的“不对称性”。其原因在于，主体“能通过普遍的象征相互协调，正如在同等程度上彼此不相协、互相抗衡”。因而，从主体间性来看，“体验”并“不能持续不断地”客体化：“这个和另一个”“由于同一性丧失”，实现其“直接性”（Unmittelbarkeit）的“非直接传达”是“必要”的（1968，第225页）。理解最首要的是“交往的经验”（kommunikative Erfahrung）（第224—227页）。尽管哈贝马斯的批评是如此切中肯綮，但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误解了狄尔泰“移情”概念的社会实证方面的潜文本，主要是误解了交换关系中潜藏的欺骗的危险。“贸易和交往、社会生活、职业、家庭，一切要求我们去了解周围人的内心世界，为的是确认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仗他们。”（1910，第259页）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也从交换的范式中，以及“对个人而言”必不可少的“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中得出了他的移情概念。

2. 纵使只是局限在戏剧美学领域，布莱希特与移情的传统范式的决裂仍是彻底的。在布莱希特看来，整个西方戏剧都建立在亚里士多德净化模式的基础之上，因为它“催生移情的产生”（GA 22，第171页），即便有些许不同。“我们的戏剧形式所依赖的基础是，观众能被调动起来，充分理解，感同身受，同其歌哭。”（GA 21，第279页）与亚氏 138
戏剧相对，布莱希特称他的新型戏剧为“非亚里士多德的（即，不以移情为基础的）”（GA 22，第212页）。

在布莱希特看来，移情、理解、摹仿、体认，都是同一层面的近义词（参见GA 22，第168页），是一种被动产生的心理活动形式，因为在此过程中观众既要主动参与，同时也要受人摆布。其特有的消极内涵——“幻想”“暗示”“习惯”“命运”等等（参见GA 24，第110、115页）——在建构批判能力和否定能力时有其否定性的标准，这与移情及其目的——净化——是截然对立的，“观

众完全自由的、批判性的、为挣脱尘世艰辛而采取的立场”——这就是布莱希特戏剧的出发点——“并不是净化的基础”（GA 22，第 172 页）。

布莱希特很清楚，“移情这种奇特的心理行为”在古典时代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方式完全不同”（GA 24，第 171 页），但究其实质而言，布莱希特视其为纯然“宗教性的”（参见 GA 22.1，第 172 页）。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个体性的经济解放”在艺术中的体现，“移情”极富成效（借助美学再现，通过“体认”来构建身份；第 175 页）。“移情美学”，一方面赋予资产阶级以权力，另一方面又平衡了屈服于其权力的工人阶级的虚弱，这一点尤其在大众传媒（比如电影）中有所体现。“当工作与闲暇之间的鸿沟愈益变深，当工作效率的缓和与提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人对代替性体验的渴求会达到顶峰。人所不能忍受的是生活的原子化，所渴求的是整体的行为；他人的行为会对我们的无力状态施加影响，而我们与之对抗的方式，正是让我们自己对之移情。”（第 173 页）在涉及大众解放时，移情技术并不具有生产性的功能，因为就“个体性的解放”而言，“我们时代的重大进程无人再能理解，它们也不会再受制于种种个体的影响。这样看来，移情技术的优势即体现于此”（第 175 页）。

在布莱希特看来，这并非一种为集体而放弃个体的行为，相反，这关涉的恰恰是“个体在集体中的作用”。所以，他同样反对那些“将移情技术进行改 139
造”的尝试，那些试图“融入集体（阶级）中获得自我认同（Identifikation）”的尝试。此类尝试一如既往地披着形而上学—宗教的形式留存下来，并且“导致个人和集体同时出现非现实的模糊化和抽象化”（同上）。所以，他要求彻底地“放弃移情”，而不是只是“暂时地”，为的是利用其促进身份创立的功能，以鼓动阶级斗争（第 172 页）。从社会个体的角度来看——布莱希特理论的立足点正在于此——“认同”的提法是极有问题的，因为它消解了“移情”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张力。就“认同”的自我性来看，个体丧失了其社会性；就构建戏剧的集体形式（“观众”）来说，个体丧失了其个性。所以，“移情”确实是原子化资产阶级主体恰如其分的心理表现，它突出了个体性，在同种体验中弥补了耗损的社会性。

因此，布莱希特将建立在“内心性”基础之上的“摹仿模式”的要素，替换为社会性的要素：以“好奇”取代“恐惧”，以“团结”取代“同情”（参见 AJ，15.11.40）。布莱希特由此发展

了一种“去认同化”（Entidentifizierung）（Michel Pêcheux）的技术和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得以拉开距离观看剧情，激励观众采取立场。认识上的缺陷、谬误甚至误解，都比移情、认同和理解更具有认识论的价值。为了激发观众的自我主动性，戏剧艺术必须“放弃其教育功能”，“放弃其对观众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能批判的引导的垄断，努力展现人社会性的共同生活，让观众能够对所呈现的社会现实以及表演持一种批判的，也许是否定的立场，也就是参与进去”（GA 22，第 176 页）。在布莱希特的构想中，并不存在“好的移情”，形式方面的消极作用并不能通过“正确”（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的内容，也并不能在“美德”中得到补偿。运用移情技巧的“引导”已然是一种“诱导”。由此，布莱希特认为，对旧风格戏剧原则的超越十分必要，因为旧的原则并不包容“错误（主角所犯的错误）”的表演（AJ，4.3.41）。

布莱希特将戏剧的“戏剧”形式和“叙事”形式相对举的初步纲领（《对〈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评论》[*Anmerkungen zur Oper »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1930，GA 24，第 74—84 页），1932 年发表于报纸《左转》（*Die Linkskurve*）上，遭到了安多·嘉博（Andor Gábor）和卢卡奇的猛烈攻击。

140

布莱希特所理解的“重心转移”（24，第 87 页，脚注 5）——比如重心从“感情”到“理性”的转移（第 79 页）——被判定为“僵硬的对立”（Gábor，引自 GA 24，第 478 页）。为了消除这种误解，布莱希特修改了方案。在 1938 年（GA 24，第 85 页）的版本中，他虽然取消了“感情”和“理性”的对立，但是转而强调带有意图的内容。反对意见并非不切实际，体现在：一些概念在这个模型的双方均会出现，在其谓词中实施一种“重心的转移”，例如，戏剧性的形式“存储感情”，而叙事性的形式“推动理性认识”（第 78、85 页）。前者“催生观众情感的产生”，后者“促其作出理性决断”。由于这种对立并非绝对的（因为感情和决断并没有共同的非兼容域），正确的表达可以这么说：“通过促使观众作出理性决断的方式，激发其感情。”布莱希特对以前模型作出的关键性变更，却是他初衷最激烈的表现（暗含一种自我批判）。在这里，布莱希特克服了他 1930 年的文学纲领中仍显得形而上学的残余：不再是“体验”（Erlebnis）和“世界图景”（Weltbild）的对立（第 78 页），而是“体验”（Erlebnisse）和“认知”（Kenntnisse）的抗衡（第 85 页）。布莱希特所追求的功能转换（Umfunktionierung），并非将“感情从艺术中彻底剔除”，而是通过将感情与批评（对统

治阶层的批评）联系起来，以改变“感情在当下有利于统治阶层的社会角色”。“一种彻底摒弃移情的表现方式，一定得站在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立场之上，站到一种感性的感情层面与理性的批判层面相协调的立场之上。”批判的立场本身即是“极度情绪化的”（*AJ*，4.3.41）。在布莱希特这里，实现了一种理性和感情关系的范式转换，并且，这种转换体现在立场而非内容上。维尔纳·密滕茨威（Werner Mittenzwei）认为，布莱希特要遏制的只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感情”，而并非“所有感情”。这种观点其实会错了布莱希特的用意。纵使不是辩证性地以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观众也并非像密滕茨威所认为的那样，“能对故事积极的进程完全移情”。

布莱希特“移情批判”如此激烈
141 的缘故，人们只有在理解了希特勒主义（Hitlerismus）根植于移情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教化之后才能领会。与本雅明“政治的审美化”（GS I.2，第508页）相对应，布莱希特的分析指出，希特勒粉墨登场，企图调动起物质手段将自身建构成“戏剧中的英雄”，试图令“民众所言，皆其所言。更确切地说，民众所感，皆其所感”（GA 22.1，第566页）。亚里士多德“情境”“摹仿”的功能说在此处大展身手，因为希特勒是“作为普通人且面向普通民众”进行演讲，其言说姿势给人这样一种“印象”（Eindruck），就好似他所投身的正是一种“个人的奋斗”：“观众在感情上完全被他感化，被他胜利的激情所征服；观众认同其观点。”（同上）他让每一个对他移情的人，“在表演者的鼓动下采取立场，忘记其自身利益，只知为鼓动者效劳”。但是，这种令个人忘却自我的唆使，从其形式来看，消解于鼓动者的表演里，在移情的基础之上，实现了令观众信服的效果。“他以一种说服者的姿态动员群众”，目的是“诱使对他移情的观众向鼓动者靠拢……，也就是说，向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摇唇鼓舌者靠拢”（第567页）。

3. 布莱希特所持的“移情批判”，不但和资产阶级美学势同水火，而且与社会主义美学的主要纲领也尖锐对立。社会主义美学不再专注于“‘永恒’的艺术素材”（GA 21，第278页），却与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有相通之处。纵使是社会主义美学，探讨的也还是“个体灵魂体现的过程”，而这往往被理解为“历史进程的投射”（Fadeev，*Die Herrstraße der proletarischen Literatur*，引自 Gallas 1971，第99页）。这种美学立场的源头，主要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普列汉诺夫（Plechanow）创立的学术观念，即“一切意识形态”——艺术形式

也隶属于其中——“都在相关历史阶段的心理学中拥有其共同的根柢”（1908，第 82 页）。与普列汉诺夫的五位一体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相对应，据这种模式分析，（1）生产力的状况是（2）经济情况的前提，经济状况又决定（3）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经济和政治社会状况二者又决定了（4）社会人的心理具有决定性，其特质最终会（5）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得到反映（第 81 页）。

142 在此处，艺术中的表达和移情中的摹仿范式也是艺术的根基。“艺术活动根植于如下情境”，普列汉诺夫在援引托尔斯泰时这样论述道：“人，在以耳或眼感知别人情感表达的前提下，有能力感受别人所表达的同种感受。恰恰是人这种能被他人情感所感染的能力，是艺术创作立足的根基。艺术萌蘖于这样的时刻：人想要和别人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情感，在自己内心复又激活这种感情，再以某些外在的符号表达出来。”（1904，第 361 页）

这种观点在卢卡奇的美学里被尊为经典。尽管卢卡奇同样否定来自利普斯移情理论中的主观性（参见 Mittenzwei 1968，第 36 页），但是与布莱希特相反，卢卡奇攻讦摹仿—净化模式的激烈程度有增无减，他为此竭力弱化该模式与移情的联系。“我们能够对某些我们全然不知也漠不关心其客观属性的事物‘移情’，但与外露的真实或其正确的表征截然相反，我们只能经历一种‘再体验’（Nacherleben），‘再体验’中会涵纳如下认识：这关乎的并不是我们的主观世界，而是一种依附其存在的‘世界’。”（*Ästhetik*，II，第 187 页）在卢卡奇看来，这种摹仿的净化效果——和移情截然相反——表现为一种诫命：“你的生命必须改变！”（I，第 818 页）借用里尔克这句化用达尔菲神庙诫命的表达，卢卡奇试图搭起通向布莱希特的桥梁，让他背弃他的初衷，皈依净化说。不过，卢卡奇局限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范式之内的移情批评，以及他的净化说阐释，都落后于马克思：“净化针对的是人的本质”（*Ästhetik*，II，第 868 页），该论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就不再这么表达了。

与上述立场不同，利维·S. 维谷斯基（Lew S. Wygotski）（1925）试图将利普斯的移情理论从其形而上学的前提下解放出来，以有益于艺术的“客观心理学”（objektive Psychologie）的发展。他也延续了普列汉诺夫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说（参见第 13 页），持如下观点：“艺术社会学”必须得到“艺术心理学”的补充，“艺术心理学”须以“人的审美行为”的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第 11 页）。从而，移情成为这样的要素：通过这种要素，“意志情感（Willensge-

143 fühle）好似渗入对象之中，作为想象中的‘内在’的心理活动，甚至将观看着的主体从心理活动的发生过程中解脱出来”（第73页）。这是维谷斯基与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著述中的观点。但是，艺术的“真正效用”——维谷斯基在此用的是净化说的话术——存在于一种“复杂的感情转化”（第249页）之中，这种转化的基础在于，“每件艺术品……都蕴含感情上的矛盾，会触发截然对立的情感，彼此间相互作用，导致情感的短路和消陨”（第248页）。这么一来，“就能摆脱负面感情……而向正面感情转化”（第249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维谷斯基将艺术定义为“**社会性的情感技巧**”（第7页）。

4. 葛兰西从赋予卑贱者以历史权力的视角，促进理解和解释之间僵化对立的和解，这一点对于精神科学的构建至关重要。他将这种对立转化为一个过程，从非亚里士多德（nicht-aristotelisch）的意义上将其目的阐明为“净化”：感受，理解，解释，批判性地连贯解释（*Gef* 6, H.11，§67和§12，第1490和1376页）。和索雷尔（Sorel）观点一致，葛兰西赞赏——尽管有其他种种批评——蒲鲁东理论中的“心理学导向”，要“与大众的感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情感）感同身受”，要“切身体会”大众感情，力求理解，并以法律上理性的形式表达出来（§66，第1486页）。与德·曼（de Man）“科学主义的”（szientistisch）立场不同——德·曼将民众的感情当作待分类和图解的研究对象——葛兰西强调的是，要“与民众的感情真切地产生共鸣，获得法律和教育上的准则”（同上）。每种负有“革新”文化而非“守成”（第1487页）任务的“历史性的动议”都对知识分子提出了要求，要知识分子与民众打成一片。若无“知识分子和民众—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就“无从创造政治历史”（Politik-Geschichte）（§67，第1490页），也就是说，若要创造政治历史，知识分子不可以“对民众不可抗拒的强烈激情毫无察觉，相反，知识分子要能理解民众的激情，能于特定历史情境中对之作出解释和辩护，并辩证地将其与历史的法则相结合，与更高层面的、学理层面透彻升华过的世界观相结合，与‘知识’相结合”（同上）。

5. 本雅明和葛兰西一样，都对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大众”之间“联系”的解放性意义具有洞见（GS II，第309页），但是正是他们从知识分子中赋予 144
“被压迫者”以历史权力的目的，要求“向移情宣战”。本雅明从两方面展开批判：一方面，将对移情的批判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自我异化”

的心理方式（I，第681页）；另一方面，将对移情的批判作为主流历史书写的手段，历史主义为此构建了范式。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移情与本雅明因受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GuK*）和柯尔施（Korsch）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启发而得的"**幻象**"这一概念紧密相连。这一概念脱胎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拜物教特质**（*K I*，MEW 23，第85页及以下）的章节，而在本雅明这里，"幻象"超越其社会经济的问题预设，指的是就其引发的主体效果（Subjekt-Effekte）而言的商品社会的物质安排（materielles Dispositiv）。在表现形式（Präsentationsformen）和表现空间（Präsentationsräume）方面，商品自身已经呈现为一种"幻象"，其来源痕迹消失在其美学表象（ästhetischer Schein）之中（I，第1168页）：无论是生产商品所需劳动的技术条件，还是社会条件（"以一种剥削的形态"；第1167页），现在在商品的（表现）形式中都不复存在。这种效应，本雅明理解为**美化的抽象**（*verklärende Abstraktion*）（参见V，第1256页），因为商品消费者在"体验"消费时，由于与劳动生产过程（Arbeitsprozess）关系断绝，这种断绝的关系自身就渐趋消亡。因此，**移情**和**消遣**构成互补的两个作用因素。商品表现空间（Warenpräsentationsraum）开启"一种消费者为图消遣而进入其中的幻象"（第50—51页），从心理学上看，这种"**进入**"（*Eintritt*）是"沉浸于商品中的移情"，即"沉浸于交换价值之中的移情"（I，第561页；V，第267、963页）。然而，移情的主体一直以来都是移情的对象。"如果马克思诙谐提及的商品的灵魂确实存在，那么，它将是灵魂疆域内所能遇到的最具移情作用的灵魂，因为它将不得不视每一个人为购买者，并且还想在买主手中安身立命。"（I，第558页）商品成了一种体验的客体，这一体验甚至将主体化作了"受激情驱动"的客体——从范式上说，是商品之"爱"："商品对买主移情/对买主的移情即是对金钱的移情……买主对商品移情/对商品的移情即是对交换价值的移情/实则为：对价格的移情。"（第1159页）本雅明的考察终究归结为以下沉思："对交换价值的移情"，是否就是"首先使人'全面感受'，进而暗示'战争'的那种移情"（V，第962—963页）。套用 145
纳粹的一个话术，即"移情即是内心感受的强制一致（Gleichschaltung）"（第967页）。

本雅明批判的第二个方面则是"传统历史书写"（V，第594页）中的"移情机制"（I，第696页），典型的代表是历史主义。早在《论德意志悲剧的起源》（*Trauerspielbuch*）中，他将"移情"批

判为掌控审美形态和史料的形式，“凭借移情，历史学家试图用悄然‘替代’创作者的位置，就仿佛创作者恰恰因创造了作品，而成了自己作品的最终阐释者”，其目的仅仅是“把移情纳入不能自拔的幻想中”（I，第234页）。一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Geschichtsthesen*，1940）中的扼要总结，移情之法，每每催生的是“对胜利者的移情”，往往“对现统治者裨益良多”（I，第696页）。若说历史学（Historie）的功能与移情不同，旨在赋予被统治者支配历史现状的力量，那么，就需要同时实现建构和解构：历史经验的现实化只有在与历史传统决裂时才能实现。“移情中的历史事实的重构是单层的。‘建构’是‘解构’的前提。”（V，第587页）因为特别是“文化商品”所呈现的是凝结的统治者历史，这种统治者的历史以文化史进行再生产。一如通过商品形式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会越来越从人的标志世界（Merkwelt）进而从经验世界（Erfahrungswelt）中剥离，在文化史中，历史现象也正是因对其移情而变得“不可亲近”（unnahbar），因为文化史已经弃以下情况于不顾：文化商品“不仅归功于其诞生，还归功于其对长期的社会劳动的传承，而且，这些商品自身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了加工，即，得到了改变”（V，第1255页；参见I，第698页）。

支持本雅明的“移情”具有结构/解构双重含义的对立概念的是他的解构特性的构想和“唤起记忆”（Eingedenken）概念。“解构性因素”能够摆脱文化史在“人类的脊背”上积累起来的“宝藏的重负”，“将其牢牢擒入手中”（II，第478页），并且——若用严厉的措辞——“清算干净”（IV，第398页），即，以“其致力于斗争或者工作的动员至少是以致力于对现实的改造，而非对现实的描述”来使之液化（verflüssigen）（IV，第398页），一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中（以一种疑难的对立方式）所暗示的那样。如果说，“摧毁性的目光”为前景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条件（参见IV，第397页），那么，对解 146
放斗争历史中惨痛“失败”的“记忆唤起”（Eingedenken）就会成为有望取得胜利的反历史（Gegengeschichte）的构建性资源。“实际上，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它”——在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持的这一相反观点的抗衡中，本雅明式论战的重要性（en jeu），方才真正显示出来（1960，第261页）。如果说，伽达默尔对移情行为之中与人心理密切相关的主观性方面的批评（第236页），将人的移情行为转化成了人“在传统中的浸淫”，比如对国家、家庭、法律、风俗、道德等具有代表性的

重大意识形态力量的臣服（第274—275页），那么，本雅明对移情的批判，恰恰让人从意识形态的魅惑力量中“解脱出来”。

参考文献：

W. Dilthey, *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10), Einl. v. M. Riedel, Frankfurt/M 1981; O. Ewert, »Einfühlung«, HWPh 2, 1972, 396f; H. Flashar, »Aristoteles und Brecht«, in: *Poetica. Z. f. Sprach- u.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 6, Jg. 1974, 17–37; M. Fontius, »Einfühlungstheorie« in: PhWb, 10. A., Berlin/DDR 1974, 295ff; M. Fuhrmann, »Nachwort« zu Aristoteles, *Poetik*, Stuttgart 1982, 144–78; H.-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1960), Tübingen ⁴1975; H. Gallas, *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Kontroversen im 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Neuwied-Berlin/W 1971; G. Gebauer, Ch. Wulf, *Mimesis. Kultur-Kunst-Gesellschaft*, Reinbek 1992; M. Geiger, »Wesen und Bedeutung der Einfühlung«, Bericht über den IV. Kongress für experimentelle Psychologie in Innsbruck vom 19. bis 22. April 1910, Leipzig 1911;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 1968; K. Holzkamp, »Zur Geschichte und Systematik der Ausdruckstheorien«, in: *Hb. d. Psychologie*, Bd. 5: *Ausdruckspsychologie*, Göttingen 1965, 39–113; K.-P. Lange, »Zum Begriff der Einfühlung (Theodor Lipps und Johannes Volkelt) «, in: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Künste im 18. Jahrhundert*, Bd. 1, hgg. v. H. Koopmann u. a., Frankfurt/M 1971, 113–28; G. E. Lessing,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1767/68), hgg. u. kommentiert v. K. L. Berghahn, Stuttgart 1981; Th. Lipps, *Ästhetik*, Teil 1, Hamburg-Leipzig 1903; ders., »Ästhetik«, in: *Kultur der Gegenwart*, hgg. v. P. Hinneberg, Teil 1, Abt. VI, Berlin-Leipzig 1907, 349–88; A. v. d. Lühe, *David Humes ästhetische Kritik*, Hamburg 1996; G. Lukács, *Ästhetik*, 2 Bde., Neuwied 1963; G. H. Mead, *Geist, Identität und Gesellschaft aus der Sicht des Sozialbehaviorismus* (1934), m. e. Einl. hgg. v. Ch. W. Morris, Frankfurt/M ²1975;W. Mittenzwei,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Argument* 46, 10. Jg, 1968, 12–43; G. Plechanow, »Über die Kunst« (1904), in: ders., *Kunst und Literatur*, Berlin/DDR 1955; ders., *Die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1908), hgg. u. eingel. v. D. Rjazanow, Wien-Berlin 1929 (Nachdruck Berlin/W 1973); J.-J. Rousseau, *Diskurs über die Ungleicheit* (1755), hgg. v. H. Meier, Paderborn u. a. 1984; ders., »Essay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n (1753/1781) «, in: ders., *Musik und Sprache.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 P. Gülke, Leipzig 1989, 99–168; E. Stein, *Zum Problem der Einfühlung*, Halle 1917 (Reprint München 1980); D. Suvin, »On ›Haltung‹, Agency, and Emotions in Brecht: Prolegomena«, in: *Communicati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Brecht Society*, Bd. 24, 1995, Nr. 1, 1995, 65–77; L. S. Wygotski, *Psychologie der Kunst* (1925, zuerst veröff. 1965), Dresden 1976; F. Th. Vischer. »Plan zu einer Neugliederug der Aesthetik« (1843), in: ders., *Kritische Gesänge*, hgg. v. R. Vischer, Bd. 4, 2. A., München 1922, 160f; Th. Ziegler »Zur Genesis eines ästhetischen Begriffs«, in: *Z. f.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 7. Jg., 1894, 115–45.

147

托马斯·韦伯（Thomas Weber） 撰
江唯 译，金建 校

参见：

Brecht-Linie, dialektisches Bild,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in der Musik, Egoismus, Eingedenken, eingreifendes Denken, Emanzipation, Engagement, Entscheidung, episches Theater, Fehler, Film, Führung, Gefühl, Geschichtstheorie, Gestus, Haltung, Hermeneutik, Katharsis, Kontemplation, Metaphysik, Mimesis, Parteilichkeit, Theater, Verfremdug, Verstehen, Warenästhetik

回忆（Eingedenken）

A: taḏkira.

E: reminiscence.

F: remémoration.

R: pamjatuja očem-n (памятуя о чем).

S: recordatorio.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将这个概念引入马克思主义，表达的诉求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传统”（GS I，第69页）的立场上，用革命理论革新历史书写和历史观。“历史认识的主体是斗争着的被压迫阶级本身。”（第700页）问题在于被压迫阶级如何在几乎完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获得权力。“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曾把希望寄托在一些政治家身上，但这些政治家却卑躬屈膝，随波逐流，以背叛自己的事业承认了失败。”（第698页）本雅明在流亡法国、自己逐渐陷入绝境时这样写道，很可能在影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躲避纳粹途中，本雅明1940年自杀于西班牙边境的波涉（Port Bou）。

回忆希望实现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这

样一种联结，让历史记忆鼓舞直接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者、间接属于所有被压迫者的当下的勇气。目标是在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建立一种集体记忆，借助历史回忆这一媒介建立被压迫者的国际联合。“哀叹”和“危险”两个概念是在这里起激活作用的原则。

1.本雅明用回忆这个概念继承了以色列—犹太记忆文化中的解放母题（《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GS I，第701、702、704页；参
148 见第1252页），这些母题记载在《妥拉》（Thora）的最后一卷《申命记》（*Deuteronomium*）中。

1.1“回忆”（Zachor）是希伯来语的命令式，要求以色列民族回想并思考自己的历史，特别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的历史（参见 Yerushalmi 1982）。这个对历史记忆的要求形式全部是“回想”或“思考”，主要而且一再表述为：“回想，你曾在埃及为奴。”（同上书，第22页）这个要求是记忆文化的一部分，记忆文化主要具有“政治—民族起源的功能”，用来促成并巩固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即“联盟”，这种新形式“外在于、独立于任何一种行使统治的国家组织”（Assmann 1995，第114页）。但词源学指出这种共同体具有父权制的狭隘性：“只有男人（zachar）才能保持鲜活的记忆（zecher）。”（Funkenstein 1995，第15页；相反意见参见 Veerkamp 1993，第72页）

如果说《申命记》总体上是一部以“自治和平等”为基础的“宪法”（Veerkamp 1993），那么其中的记忆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其阶级国家的形式迥然不同。它不再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种“国王的功业记”（Assmann 1995，第114页），也不再是仿效希罗多德（Herodot）的名人故事，而是对（摆脱）奴役的回忆。“记住！”这一命令作为回想和思考，同时也是在要求行动。希腊神话中也有对应的关系，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Mnemosyne）的女儿们在神谱中以谟涅墨（Mneme）和墨勒忒（Melete）的形象代表“沉思某物”或“面向行动、面向未来的专注存在状态”（Herzog 1993，第3页）等记忆能力的联系。这种联系后来被掩盖：拉丁语的“记忆”（memoria）让“回想”脱离了“直接先于着手行动的‘打算’层面”（第4页）。

1.2本雅明将犹太人的这一实践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转译了它。“在行动的时刻意识到自己在打破历史的连续性，这是革命阶级的特征。伟大的革命引进了一个新的年历。这个年历的头一天像一部历史的缩时摄影机。同样是这一天，以节日的形式不住地循环，而

节日是回忆的日子。”（GS I，第 701—702 页）

“打破时间连续性”应当让理论关注
149 这一事实：在当下的象征秩序中，未来和过去作为图像总是当下在场的、斗争得到的。“过去的事业”本身也是“未完结的”（II，第 477 页）。霍克海默批评这种说法：“如果未完结性没有在自身中容纳完结性，那么未完结性的断言就是观念论的。过往的不公正已经发生并且已经完结，被杀害的人就是已经被杀害了。”（引自 V，第 588—589 页）针对这种批评，本雅明坚持：“历史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更是回忆的一种形式。回忆能够修改科学所‘确定’的东西。回忆可以将未完结的东西（幸福）变成已完结的东西，也可以将已完结的东西（痛苦）变成未完结的东西。”（第 589 页）本雅明承认：“我们在回忆中有这样一种经验，我们无法以本质上非神学的方式把握历史，也同样无法尝试直接用神学概念书写历史。”（同上）为此他——紧密联系布莱希特的母题——提出下列解构性干涉策略：

通过一种当下的弥赛亚概念**对未来祛魅**（I，第 704 页），这个概念取代了乌托邦，让人关注当下。此前马克思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观念被提升为“理想”，从而给未来施加了魔法（第 1231 页）。这一批评针对的是社会民主党，他们按新康德主义将无阶级社会定义为“无限的任务”。但正如本雅明所言，马克思与此相反，通过无阶级社会这个目标“将弥赛亚时间的观念世俗化”。本雅明这里说的首先是一种动员原理：“现实中没有一个时刻不携带着**这个时刻的**革命契机——这个契机只愿意被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契机，即面对一个全新任务的全新解决方案的契机。”（同上）如果摆在面前的契机不被发现因而不被利用，那么被提升为“理想”的目标就会被神化为乌托邦。因此，当下这个概念被理解为“‘此时此刻’，弥赛亚时间的碎片就散布其中”（第 704 页）。由此本雅明继承了列宁对考茨基的论战（LW 25，第 493 页）。柯尔施在批评“改良主义”的和“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接受了列宁的论战：两派有一点是共同的，“革命问题”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不再“作为尘世此岸的问题而存在”（*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GA 3，第 336 页）。

对作为一连串灾难的历史展开回忆 150
从而**解构进步意识形态**，重构历史的**概念**：“进步的概念应建立在灾难的观念上。事情‘就这样’，**这正是灾难**。灾难不是每次将到来的东西，而是每次**既**定的现实。”（GS I，第 683 页；V，第 592 页）“灾难——失去了机会；危机时刻——现状恐怕要保存下去；进步——

第一个革命措施。”（V，第 593 页）

解构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背景，建构一种“被压迫者的传统”。呼应布莱希特《一个工人读书时的疑问》（*Fragen eines lesenden Arbeiters*，1935；GA 12，第 29 页）中对历史书的提问（“每一页一个胜利……谁付出那些代价？”），本雅明也为历史唯物主义者设定了一个工作前提：“没有一座文明的丰碑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暴力的实录。”（GS II，第 477 页；I，第 696 页）占统治地位的历史书写是一场场胜利的记录，其方法是“向胜利者移情”（第 696 页），它通过这种方法成为统治者的历史书写。因为“每一个统治者都是曾经的胜利者的继承人。因而向胜利者移情总是对统治者有利的”（同上）。这里本雅明也与布莱希特一致：“总是 / 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的历史。/ 凶手歪曲 / 被害者的面目。世界上 / 消失了弱者，留下了 / 谎言。”（GA 24，第 279 页；GW 4，第 1480 页）批评本雅明过分简单化的人（参见如 Smith 1996，第 26 页）没有认识到他的启发意义、生存—政治意义。革命的启发经由“对危险的阐释”实现（John，1996），阐释既有生平经历的底色（“犹太人的身份是危险发生的具体位置”；同上），也有政治的底色：“危险既威胁着传统的存续，也威胁着传统的承载者。两者而临同一个危险：卖身为统治阶级的工具。”（GS I，第 695 页）

恢复哀叹。历史编纂学已经屈服，它“换来自己的‘科学性质’，代价是彻底删除所有它最初作为回忆的规定。……清除历史中‘哀叹’的任何余音”（GS I，第 1231 页）。本雅明再一次结合布莱希特，后者的诗《地狱里的罪人》（*Von den Sündern in der Hölle*）使用了一种中世纪的文学形式：“可以说，它借用古老的挽歌（哀叹），为的是哀叹当下的情况——现在甚至连哀叹也 151
不存在了。”（II，第 550 页）这也针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颂歌式历史书写，本雅明援引布莱希特的诗《致后代》（*An die Nachgeborenen*）进行批评：“我们请求后代不要感谢我们的胜利，而要回忆我们的失败。”（I，第 1240 页）本雅明恢复的“哀叹”概念与“悔恨”概念相对立，后者由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在 1921 年再次引入，目的是帮助“各族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重生”。对舍勒而言，过去也是未完结的：“历史‘事实’是未完成的，似乎是可以拯救的。”（第 99 页）但是这套神学通过悔恨相对于哀叹“向后作用的力量”完成了彻底的立场转换：从牺牲者到凶手。霍克海默在这里的批评切中要害。

2.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本雅明的思想拓展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同

于本雅明，他们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中提取出这种关系。他们将《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1944）的主旨概括为“主体对自然的回忆”（*DA*，第47页）这一概念。这针对的是思维自我遗忘的状态，思维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他者，它与自然相对立，却不反思这一分离。启蒙从自然力量的统治中解放，同时翻转为另一种统治：“对自然的全面统治”（第32页）使自然成为剥削的纯粹对象，反作用于变成“第二自然”的社会（第46页），并且最终毁灭了“思维着的主体自身”（第32页）。虽然不放弃思维本身就无法消灭思维与自然的分离，但是思维应当在“主体对自然的回忆”中将自身反思为“自我遗忘了的自然”（第46页）：“虽然相分离，但不是彻底分离”，正如阿多诺之后在《美学理论》（*Ästhetische Theorie*，GS 7，第86页）中的说法。在这种自我反思中，“启蒙不仅是启蒙，（它也是）在其异化之中得到呈现的自然”（*DA*，第46页）。

“所有物化都是一种遗忘。”（阿多诺1940年2月29日致本雅明；*Briefwechsel*，第417页）而概念的基本法则就是物化。因此对被遗忘事物的回忆只存在于不可概念化的媒介中，更确切地说，广义的理性概念的媒介中，它包含了神学的维度和艺术的模仿因素，作为对过于规整的理性的修正。因此哈贝马斯（Habermas）的批评并不准确，他认为回忆这个概念“背离理论认识”，以迎合无声 152
的、模仿性艺术的“精神练习”（1981，第516页；参见 Söllner 1979，第199页及以下）。实际上，本雅明认为，概念应当为唯物主义的历史书写配备额外的“理论附件”（GS I，第702页）。虽然晚年阿多诺越来越多地将概念内涵从革命理论移入美学领域，但他的《美学理论》恰恰要求艺术“参与到理性中”（GS 7，第86页）。只有艺术反对“作为一个被统治世界的理性世界中的邪恶的非理性”（同上），与那些“为文化承担责任”（第78页）的人结盟，为自己保留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由于排斥“哀叹”所不具备的否定的力量，只有这样，艺术才是理性的。“即使在一个传说般美好的未来中，艺术也无法否认对过往所积聚的恐惧的记忆，否则艺术的形式就毫无意义。”（第479页）“没有历史回忆就没有美”（第102页）：艺术必须“将被斥为丑陋的事物作为自己的主题”，才能“在丑陋中揭露世界”，凸显出丑陋事物的“社会面向”（第78—79页）。“渴望着天翻地覆的被压迫者，按照丑陋社会中美好生活的规范看来是多么粗鄙，他们心怀恨意、扭曲变形，他们承受着不自由的、以体力为主的劳动重担下屈辱的所有印记。”“把这些印记作为献给记

忆女神的画像”，这是被压迫者的“人权”之一（同上）。

然而这些被压迫者不再可能是反抗的主体或呼吁对象。艺术乃至沦落为“促销商品”（第101页）的风景，仍在回忆痛苦时索取未被偿付的历史债务。正是艺术的社会超越性赋予了艺术这样的功能，控诉恶劣的现实对社会边界的超越。“艺术作品的现实性证明了可能之物的可能性。”（第200页）想象事物现实存在的非现实性代表了“不存在之物的现实性”，而这不存在之物就是“对艺术作品的渴望”所指向的。由此可见，阿多诺从柏拉图的模式中获得了某种抵抗性东西，即正是关于原初本质的理念论要承担起一个更好的未来。“自从柏拉图的回忆（Anamnesis）学说开始，人就在回忆中梦想着尚未存在的东西，它只是使乌托邦具体化了，而没有把乌托邦出卖给此在。”（同上）对阿多诺来说，可能性仅仅仍存在于一种否定性观念的模式里：可能因素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在场的不在场。

153 但对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而言，“尚未”恰恰是柏拉图的回忆学说无法设想的，原因是该学说“远离未来”（*Prinzip Hoffnung*，GA 5，第21页）。回忆（Eingedenken）是“乌托邦回忆”，它作为“记忆模式的希望”区别于“作为警示的记忆”（*Tübinger Einleitung*，GA 13，第282页）。记忆与回忆分别代表“传统与革命”，就像是历史中两张彼此交流的“雅努斯的面孔”（第280页）。“对希望的回忆”（第282页）占据“高于记忆的地位”（第283页）。

纳粹的浩劫也许使布洛赫的期待显得幼稚，但解释了为什么阿多诺会采取退让的路线。为了巩固联邦德国的战后资本主义（同时是这一状况导致的结果），不祥的奥斯维辛被解释成一个污点，被解释成“不愿意过去的过往”。占主导地位的除了对历史的“了结”（Schlussstrich）策略之外，还有作为回忆的否定形式的“共情”（大多是与罪犯共情）和意味深长的沉默。“在关于‘那十二年’后续影响的解释话语花样百出的这个时代，对支撑纳粹统治的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讳莫如深。”（Haug 1987，第323页）但分析这些利益，是得以与大屠杀牺牲者达成布鲁姆里克（Brumlik）所说的“病史团结”的条件之一。“‘千年帝国’延续了十二年，但这十二年必须铭记一千年。”（Haug 1987，第337页）这里的铭记要使用一种语言，它排除任何产生“意义或和解的可能性”（Anders 1965，第53页；关于纪念场所形式的公共“记忆政治”，参见 Reichel 1995）。

3. 回忆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中

重新获得了社会革命的意义。殖民主义不仅从各土著民族那里夺走了“土地和自由”，而且“就连他们对自己斗争的记忆也想夺走。他们就这样被剥夺了力量的源泉，不再有塑造历史和反叛的意志”（Gutiérrez 1984，第 26 页）。因此“白人的手”（Boff 1976）书写的历史，按古铁雷斯（Gutiérrez）援引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的说法，应当“从穷人、‘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才能“自下而上地重新创造历史”（第 27 页）。这里种族问题作为覆盖象征秩序的社会经济的统治关系，转变成了阶级问题。**女性主义**
154 **神学**又扩展了围绕性别关系的问题（参见 Moltmann-Wendel 1978 等；关于黑人神学参见 Gutiérrez 1984，第 175 页，脚注 75）。这些神学的目的是反对“三重压迫”，在颠覆中开启“新的信仰体验”（第 27 页）。

针对 20 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破坏性后果，一些抵抗运动也强调历史记忆和在回忆中取得对历史的权力。萨帕塔（Zapatistas）民族解放军的发言人指出，遗忘是“最恶劣的死亡”（Marcos 1996，第 111 页），是“我们的道路丧失历史的原因”（第 105 页），是“我们一直以来生活在其中的巨大谎言”的原因。马科斯（Marcos）认为这“谎言”是各种意识形态同义语诸如“沉默就等于贫穷，一无所有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声音”（第 66—67 页）组成的锁链。现实的规范化权力宣布下层被迫接受的地位是合法的，因为当权者表明：“他们能做任何事情，绝对任何事情，没有人对此发表意见，没有人会高喊‘够了！’（Ya Basta!）重新开始。”马科斯自称为“有声音的人”——受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被迫蒙面，只剩下声音，却是“最渺小、……最被遗忘、最被边缘化、最被蔑视的人”的声音。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u. W. Benjamin, *Briefwechsel 1928–1940*, hgg. v. H. Lonitz, Frankfurt/M 1995; G. Anders, *Philosophische Stenogramme*, München 1965; J. Assmann, »Die Katastrophe des Vergessens. Das Deuteronomium als Paradigma kultureller Mnemotechnik«, in: *Mnemosyne, a.a.O.*, 337ff; ders.,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1992; ders., »Kulturelles Gedächtnis als normative Erinnerung. Das Prinzip ›Kanon‹ in der Erinnerungskultur Ägyptens und Israels«, in: O. G. Oexle (Hg.), *Memoria als Kultur*, Göttingen 1995, 95–114; D. Boer, »Solidarischer Widerstand. Denken über die Zeit: Barth—Miskotte—Benjamin«, in: *Argu-*

ment 213, 38. Jg., 1996, 83–93; L. Boff, *Teologia do Cativeiro e da Libertaçao*, Lissabon 1976; D. Diner, *Kreisläufe.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Gedächtnis*, Berlin 1995; A. Funkenstein, *Jüdische Geschichte und ihre Deutungen*, Frankfurt/M 1995; G. Gutiérrez, *Die historische Macht der Armen*, München-Mainz 1984; J.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1, Frankfurt/M 1981; W. F. Haug, *Vom hilflosen Antifaschismus zur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1987), 2., erw. A., Berlin-Hamburg 1993; R. Herzog, »Zur Genealogie der Memoria«, in: A. Haverkamp u. R. Lachmann (Hg.), *Memoria. Vergessen und Erinnern*, München 1993, 3–8;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4), Frankfurt/M [8]1995; O. John, *»Und dieser Feind hat zu siegen nicht aufgehört«. Die Bedeutung Walter Benjamins für eine Theologie nach Auschwitz*, Münster 1996; *Memoria als Kultur*, hgg. v. O. G. Oexle, Göttingen 1995; Subcomandante Insurgente Marcos, *Botschaften aus dem Lakandonischen Urwald. Über den Zapatistischen Aufstand in Mexiko*, Hamburg 1996; G. Mensching, »Zur metaphysischen Konstellation von Zeit und Fortschritt in Benjamins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n Thesen«, in: P. Bulthaupt (Hg.), *Materialien zu Benjamins Thesen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M 1975, 170–92; *Mnemosyne. Formen und Funktionen kultureller Erinnerung*, hgg. v. A. Assmann u. D. Harth, Frankfurt/M 1991; E. Moltmann-Wendel (Hg.), *Frauenbefreiung*, München-Mainz 1978; St. Moses, *Der Engel der Geschichte. Franz Rosenzweig, Walter Benjamin,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M 1994; P. Reichel, *Politik mit der Erinnerung. Gedächtnisorte im Streit um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ergangenheit*, München-Wien 1995; M. Scheler, »Reue und Wiedergeburt« (1921), in: N. Petrilowitsch, *Das Gewissen als Problem*, Darmstadt 1966, 92–139; J.-C. Schmitt, »Die Geschichte der Außenseiter«, in: J. Le Goff, R. Chartier, J. Revel (Hg.), *Die Rückkehr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Frankfurt/M 1990, 201–43; G. Smith, »Arbeit am Vergessen«, in: ders., u. H. M. Emrich (Hg.), *Vom Nutzen des Vergessens*, Berlin 1996, 15–26; A. Söllner, *Geschichte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79; P. Szondi, »Hoffnung im Vergangenen. Über Walter Benjamin«, in: ders., *Schriften II*, Frankfurt/M 275ff; Y. H. Yerushalmi, *Zachor: Erinnere Dich! Jüdische Geschichte und jüdisches Gedächtnis*, Berlin/W 1982; T. Veerkamp, *Autonomie und Egalität. Ökonomie, Politik*

155

und Ideologie in der Schrift, Berlin 1993; J. Zimmer, *Die Kritik der Erinnerung. Metaphysik, Ontologie und geschichtliche Erkenntnis in der Philosophie Ernst Blochs*, Köln 1993.

托马斯·韦伯 撰
阿思汗 译，曹旸 校

参见：

Angst, Antizipation, Auschwitz, Befreiung, Black Marxism, dialektisches Bild, Einfühlung, Entstalinisierung, Erbe, Erinnerung, Erinnerungsarbeit, Existenzialismus, Fanonismus,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Fortschritt, Frankfurter Schule, Geschichte, Geschichtsschreibung, Globalisierung, Hiroshima, Hoffnung, Juden, Kanon, Leid, Neoliberalismus, Niederlage, Opfer, Subalternität,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Triumphalismus, Unterdrückung, Utopie, Vergessen, Verstehen, Zapatismus

介入的思考
(eingreifendes Denken)

A: fikr tadaḫḫulī.

E: intervening thought.

F: pensée intervenante.

R: rešajuščee myschlenie (решающее мышление).

S: pensamiento de intervención.

按照维茨斯拉（Wizisla 1992，第283页）的说法，介入的思考这一概念来自“本雅明和布莱希特的对话，无法判定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个概念”。1929年，布莱希特在构想一份杂志《批评报》（*Kritische Blätter*）时首次记录下这个概念：“这份报纸必须提供真实运作的工厂的图景。……它捍卫并澄清以下的基本命题：通常对艺术作品产生的喜爱与厌恶等情感，往往落脚于品味——‘对于品味根本没什么好争论的’——根本没有价值；一个判断如果不被表述、不做要求，那么它就没有价值。这份报纸教导一种‘介入的思考’。”（GA 21，第331页）也许受到特列季亚科夫（Tretjakow）的影响，他在这里区分了行动的作者与传达信息的作者。本雅明将这一区分尖锐化：行动的作者的任务“不是扮演观众，而是主动地介入”（*Der Autor als Produzent*，GS II. 2，第686页）。

布莱希特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思考理解为介入的思考（参见GA 22.2，第716—717页；GW 16，第531页），而不是一种世界观。卡梅（Ka-meh）大师是《墨翟》中的马克思形象，布莱希特将他

改写为“介入思考者”（GW 12，第 653 页）——与曼海姆“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相对立。对布莱希特而言，介入的思考意味着着眼于“脑力劳动”所处的阶级关系对抗场域，以克服这种阶级关系为愿景，对社会斗争进行干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 11 条中表达过这一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MEW 3，第 7 页）这一思想的一个行动主义庸俗化版本是，为了让位给某种直接的“实践”，应当放弃思考（包括解释性的思考）。但这既错解了马克思的观点，也错解了布莱希特的介入的思考。“介入的思考不只是介入到经济的思考，而首先是根据经济介入到思考中的思考。”（GA 21，第 415 页；GW 20，第 158 页；参见 Ruoff 1976，第 43、51 页；Fahrenbach 1986，第 42 页）

对布莱希特而言，介入的思考是唯一合适的马克思主义思考方式。可见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在于，将思考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视作问题，而不是还原或消解这对关系。正如布莱希特在《买黄铜》（*Messingkauf*）中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了进行观察的特定方法、标准，由此才能为实践提供对现象的某些特定评价、预言和提示。它在现实接受社会介入的范围内，面对现实教导介入的思考。这种学说批判着人们的实践，也让自己承受实践的批判”（GA 22.2，第 716—717 页；GW 16，第 531 页）。布莱希特对介入的思考的讨论，与其说是指向一种创造性的躁动不安，不如说是指向对思维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的证明，这一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往往误导人形成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机械观念。

介入的思考描绘的不是思想或一门理论的**建筑**，而是对待思维与社会现实 157
之间可能关系的**看法或态度**（参见 GA 21，第 331 页）。它的重点是作为行为的思考（GA 21，第 421 页及以下；参见 GW 20，第 166 页及以下）——不是作为认知上的操作，而是作为公共话语领域概念思考的行为。没有系统的著作呈现过一套介入思考的理论；相关的文献都是由笔记和片段组成的——最初收录在《哲学笔记》（*Notizen zur Philosophie*，GW 20，第 158—178 页；参见 Subik，第 240 页）以及关于戏剧的文章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买黄铜》。《全集》（GA）将它们分散地收录在“论文”（*Schriften*）部分（第 21—25 卷）。

这些内容通常是尝试性的、实验性的、片段式的。“介入的思考。可行的定义：就是使人得以处理被定义范围的定义。在决定因素中总是会出现决定者的行为。”（GA 21，第 422 页；GW 20，第

168 页）在这种表述中，布莱希特（像葛兰西一样）“受到现代物理学的非决定论原理的启迪，并且将测不准原理，即那种‘被研究者随着研究本身发生了改变’（GA 22.2，第 730 页；GW 16，第 576—577 页）的观点，移用到行动的领域”（Haug 1996，第 53 页）。即使在人际间认识和自我关系的领域这种观点对布莱希特而言也是适用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介入他人时，我们才能把握他人。同样地，只有当我们能够介入我们自己时，我们才能把握自身”（GA 24，第 182 页）。缺乏对介入的思考的系统呈现，这符合介入思考本身的概念，这个概念考虑到了社会的自反性，也考虑到了可能的社会介入具有变动的条件。

布莱希特的介入的思考这一概念，以及不断作出的新表述，源于他对部分马克思传统中歪曲事实的客观主义的拒斥，客观主义使思考和行动都陷入瘫痪，也是葛兰西所批判的（参见 Fahrenbach 1986，第 51 页及以下；Haug 1996，第 47 页及以下）。这一宗旨对以艺术作为实践领域的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于布莱希特而言，这个领域就是舞台。虽然他的批评并不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剧院里收获果实，就必须克服其抽象性。“这个学说处理的首先是大规模群众的行为。这门科学所提出的规律适用于人组成的大型单位的运动。即使对于个体在这些大型单位之中的位置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但通常也只涉及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但在我们的演示中，更多要处理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为方式。”（GA 22.2，第 715 页；GW 15，第 530 页） 158

“演示”的意思是：这门科学如何“在各个方面寻求实验的或生动地呈现问题的可能性”。因此布莱希特希望利用戏剧，“为了这种演示而运用戏剧对人的模仿”（GA 22.2，第 715 页；GW 16，第 529 页）。

布莱希特用戏剧材料模仿的不是大规模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群体运动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人不是作为群体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个体在体验世界。正因如此，布莱希特对介入的思考的讨论以及他的艺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丰富了辩证法和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布莱希特的戏剧——他有所保留地指出——提供了一种“视角”（GA 22.2，第 715 页；GW 16，第 530 页），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他的兴趣在这里聚焦于两组关系之中的关系：思维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群体之中的个体间关系。目的在于把握它们的自反性，把握特殊的历史（也即当下的）辩证法中的灵活变量。戏剧工

作呈现的是“人物彼此之间采取的态度”（GA 23，第 89 页；GW 16，第 689 页），戏剧工作的姿态因素加上布莱希特的格言，比理论命题更有效。这些态度不仅是行动关系，而且首先是思维关系，也就是对别人看法的看法。布莱希特将语言描述为“行动的工具”，并且强调：“当一个人对自己说话时，他也在对他人说话。”（GW 12，第 459 页）布莱希特也相应地描述了列宁的姿态：“他在别人的头脑中进行思考，别人也在他的头脑中进行思考，这就是正确的思考。”（GA 21，第 420 页；GW 20，第 166 页）布莱希特认为，按照介入思考的精神表演的演员的方法和态度，应当通过关系对行动的重要程度向观众揭示出关系：“演员要从这样的角度呈现人的被动反应，使
159 被动反应可以被认识到是主动行动。而他们将命运本身呈现为人的活动。因此事件背后的事件、决定命运的事件——也就是说，介入这些事件就能介入人的命运——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因此呈现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GA 22.1，第 520 页；GW 15，第 257 页）

1933 年的夏天，布莱希特致信奥托·诺伊拉特（Otto Neurath），他批注过此人 1931 年出版的《经验社会学》（*Empirische Soziologie*）。信中布莱希特建议开创一种小型社会，这个社会“应当通过紧密合作建立一个介入性命题的目录。‘介入’的意思自然是‘介入对社会生活的塑造’”。他初步设想的纲领是：“那些对应着一种社会行为的……任意命题都应当得到分析，使得它们的生成和有效性以及它们对其他命题的依赖性清晰浮现。如果可能的话，除了给出特定预测以外，每次都应当给出使这些命题起效或不起效的行为。这份目录应当以这种方式与各类形而上学作斗争，并且同时具有组织性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列举出一大堆毫无疑义的命题。而是将那些伪真理、谎言、下流话、形而上学的玄谈集中在这个目录中，置于解剖刀之下，从而教导进行毫无疑义的思考。”（*Briefe*，第 164 页及以下）

布莱希特描写了五种思维方式：（1）“反思的思维。”（2）“自我评估。自身区分的思维：竞争思维。”（3）“自我表达。”（4）“世界观。”（5）“介入的思考。”（GA 21，第 424 页；GW 20，第 170 页）介入的思考不仅反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过的直观的思维方式，也反对起合法化作用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出卖”自己的思维能力给权力和财富的占有者——的思维方式，即图伊（Tui）的思维方式（Tui 是智识 [in-tellekt-uell] 这个词首字母后置重排以后的缩写），“他们出租自己的

思维能力和措辞艺术，他们也将自己的理智能力用于和其他知识分子的竞争，以提升自己的市场价值，贬损他人的市场价值"（*Brechts Tui-Kritik*，第 5 页）。正如布莱希特的介入的思考能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结合起来，"介入思考者"可以广义地、不限于党派地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结合起来。鉴于知识分子对社会财富拥有者的依赖性，布莱希特提出的并不是一个小要求。他们的思
160 维方式通常是反过来的，"非介入的思考"也叫"无结果的思考"和美化现状的思考（参见 Šubik 1986，第 192 页）。"单看那种在精神上为自己构建世界的人（脑力劳动者）——他们构造出的世界本身是不协调的（它恰恰是凭着自己的不协调才存在的）——就会发现，实际上他们或多或少已经认识到了这种不协调，但还是照常行动，仿佛世界是协调的。世界极少介入这类人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不介入世界之中，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但这意味着，他们根本不追求用思考去介入。这样就产生了自为存在的、或多或少地受'外部'环境阻碍的'纯粹精神'……头脑何需知道揣在口袋里的手在做什么！这些人是反政治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支持他们参与形成的政治。"（GA 24，第 133 页；GW 20，第 175—176 页）

悖谬的是，介入的思考也可能转化为非介入的思考。例如这种情况：现状无法或者还无法通过人的介入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现实接受社会介入的范围内，而对现实教导介入的思考。"（GA 22.2，第 716—717 页；GW 16，第 531 页）

行政命令式社会主义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感到自己面临来自党 / 国家权力全面的职责要求。"总是下达命令而不是进行说服。"（GA 24，第 409 页）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吃谁的面包，就唱谁的歌"。福尔克尔·布劳恩在这样的条件下总结"介入思考的困难：必须既向事实屈服同时又改变它"（1976，第 58 页）。但"介入国家的生命运动，必要时甚至介入国家的痉挛"，必须现实地（而不仅是在完全非现实领域）发生（第 59 页）。

为完善介入的思考，布莱希特整合了资产阶级的反形而上学的思想派别、维也纳学派的启发以及行为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的思想，用辩证法对它们进行了功能转换。介入的思考与他的辩证法观密切相关："介入的思考。辩证法作为对世界的划分、排序和观察方式，通过说明世界的变革性的矛盾使得介入的思考成为可能。"（GA 21，第 424 页；GW 20，第 170—171 页）正因为布莱希特如此理解辩证法，他反对使用这一概念时存在的还原论倾向，这一概念始终只有在"未完成状态"中才具有生产能力。

161 参考文献：

V. Braun, *Es genügt nicht die einfache Wahrheit. Notate*, Frankfurt/M 1976 (Leipzig 1975); B. Brecht, *Briefe*, Berlin/DDR-Weimar 1983; *Brechts Tui-Kritik*, hgg. v. H. Claas u. W. F. Haug (AS 11), Berlin/W 1976; H. Fahrenbach, *Brecht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1986; W. F. Haug, »Zur Aktualität von Brechts Tui-Kritik«, in: *Brechts Tui-Kritik*, AS 11, Karlsruhe 1976, 7–16; ders.,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K. Ruoff, »Tui oder Weiser? Zur Gestalt des Philosophen bei Brecht«, in: *Brechts Tui-Kritik*, 17–52; dies., »Das Denkbare und die Denkware«, in: *Aktualisierung Brechts*, hgg. v. W. F. Haug, K. Pienvoss u. K. Ruoff (AS 50), Berlin/W 1980; Ch. Šubik, *Philosophieren als Theater. Neue Versuche über die Philosophie Bertolt Brechts*, Habilitationsschrift, Klagenfurt 1986 (Ms.); E. Wizisla, »›Krise und Kritik‹ (1930/31). Walter Benjamin und das Zeitschriftenprojekt«, in: *Aber ein Sturm weht vom Paradiese her. Texte zu Walter Benjamin*, Leipzig 1992, 270–302.

卡伦·劳夫·克拉默
（Karen Ruoff Kramer） 撰
阿思汗 译，曹旸 校

参见：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Brecht-Linie, Charaktermaske,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Engagement, episches Theater, experimentelles Theater, Feuerbach-Thesen, Gestus, Ideologen, Objektivismus, organischer Intellektueller,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raxis, Tui-Kritik

介入式社会研究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A: baḥṯ iǧtimāʿī tadaḫḫulī.

E: interventive social research.

F: recherche sociale intervenante.

R: rešajuščee social'noe issledovanie (решающее соци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S: investigación social de intervención.

对社会研究的设计通常是，研究者不应因为其介入其间而改变有待研究的内容。至于在研究空间中仅因“第三者”在场而仍可能出现的错误，我们称之为“偏误”（bias），约翰·洛克（John Locke）早就用它来表示因兴趣而导致的错误认识（»men, being biased by their interes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Ch. IX, § 124)。批判性的要求是，至少要反思场域的改变。与此相反，有许多研究致力于社会运动，明确宣称实证研究的宗旨在于自行改变研究场域，并把研究对象作为正在学习的和正在安排自己生活的主体纳入研究。可以仿照布莱希特的**介入的思考**（*eingreifendes Denken*），把这种社会研究称为介入式社会研究。

事实上，马克思以其《工人调查表》（*Arbeiterumfrage*）率先从事介入式社会
162 研究。因为法国不同于英国，没有工厂视察员，因而也没有关于工厂劳动条件的报告，他便试图在自己的调查中查明这些条件。马克思在三个关键方面改变了已有的实证方法：应该详细了解劳动条件，包括如何组织工人的问题和抵抗的问题；工人应该负责文献记录，从而不让“专家”制作数据资料，而让工人自己通过陈述其经历和研究其条件（比如工作岗位上的光线和空气）使自己具备专家的资质；最后，要这样安排调查，以便工人能够在全面的、研究式的自行文献记录中形成对自身处境的意识，从而使问卷调查的行动本身具备启蒙功能。在20世纪下半叶，这里实际运用的调查形式扩展成了社会批判型的、经验的社会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讨论了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问题、对专家角色的怀疑，最后还有对客观性和价值中立这些指导原则的批判。

安东尼奥·葛兰西本人并未从事介入式研究，但从其《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中可以提炼出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经验的指导原则。“批判性完善的第一步是形成关于什么是现实的意识，亦即‘认识你自己’是迄今在你身上留下无尽痕迹的历史进程的产物，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的遗产目录。甫一开始就应制订这份目录。”（*Gef* 6, H.11, §12, 第1376页）为此需要一个旨在变革生活条件的联合计划，若无此计划，个人会体验到自己无能为力，被抛入琢磨不透的结构中。“有机知识分子”为人人皆可成为知识分子开辟道路，其任务是“更新现有活动并使之变得‘有批判性’”（第1382页）。葛兰西不仅以此引导研究与解放计划挂钩；同时，普通人自己也于此作为主体进入研究过程，而学者的地位则转向推动性的、支持性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其分析工具供人使用。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理解成这样的指南，即它引导人研究日常生活，揭示沉陷在日常生活 163
中的颠倒的力量，并把批判作为革命的力量来使用。“批判日常生活之所以导致批判政治生活，因为日常生活已经包

括并且生成这种批判：日常生活就是这种批判。”（1946，第100页）从人的实践来看，可以把传统的理论体系解读成意识形态、思辨。列斐伏尔致力于这样一种科学，即它可以为社会化的人所用，促成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并以此为基础。他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媒体分析，钻研电影和戏剧，探究家庭和业余行为中改变了的技术条件，等等。他的分析却并未促使他把平常人本身纳入研究框架。在著名的马林塔尔（Marienthal）研究中，同样未发生这种情况（Jahoda等1933），即使此项研究是按解放理论设计的，事关工人中可能有的革命意识。C. 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9）同样如此，他试图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以阶级斗争为方向进行经验的社会研究。他也未拟定研究安排来使研究对象成为参与者。

与此相反，**行动研究**（*Aktionsforschung*）采纳了介入式社会研究的一些维度。行动研究这一概念源自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1946年，他提议把行动研究（Tat-Forschung）作为这样一种形式，即利用这种形式，研究者参与到所探究的领域中，并改变社会行为。“它是一种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对不同形式的社会行为的条件和结果做比较研究，是导向社会行为的研究。”（1953，第280页）这种动议在密歇根团体动力研究中心（Michigan Research Center for Group Dynamics）（参见Cartwright/Zander 1960）和伦敦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Institut）得以延续（参见Rapoport 1972），两者均把研究与社会劝导相结合。这些研究还纠缠于利益充斥的领域中的价值中立性问题，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已经以《红宝书》（*Quaderni Rossi*）杂志为中心在工人运动内部组织了参与型研究，即合作研究（conricerca）。其理论家试图在运动中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从事经验研究和分析，以使工人阶级基于企业中劳资纠纷的具体经验而更有行动能力。这和奥斯卡·内格特（Oskar Negt）的“示范性学习”（exemplarisches Lernen）构想有隐性的交集。

20世纪70年代，把研究对象纳入 164
研究过程，并把受压迫者、社会弱势群体的认识与变化联系起来，成为行动研究的焦点。经验与解放理论之间难以明确的联系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之下来探讨的，即把社会研究政治化在学术上是否正当。行动研究尤其在教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和应用。

20世纪70年代末在瑞典兴起的**就地挖掘运动**（*Grabe-wo-Du-Stehst-Bewegung*）是介入式社会研究的一种形式，因为它鼓励劳动者与学者协作研究自己的历史，以体验自己是社会的中心并赢

得“经济民主”(Lindqvist 1989，第282页及以下)。与之同名的书包含了在劳动者生活的30个领域中做详细研究的建议和令人惊讶的问题。这本书引起了一场运动。在它出版后的约10年里，这场运动有50000人积极参与，推动建立了600家地方性的劳动博物馆，撰写了约500本记载研究成果的书籍(第293页)。**历史工作坊**(Geschichtswerkstätten)以另一种形式继续从事此类工作。

回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Haug 1990)同样自我定位成介入式社会研究。据此，个人作为其历史的专家，共同弄懂他们在社会化时走过的道路，追踪这些道路所扼杀的可能性，并尝试以某种方式协调一致地工作，促使改变生活条件和改变自我成为交互的过程。

无论如何，介入式社会研究总归是一种解放计划：它与受压迫者和处于依附地位的人相结合，试图让科学助益集体赋能。

参考文献：

R. Alquati, *Klassenanalyse als Klassenkampf. Arbeiteruntersuchungen bei Fiat und Olivetti*, hgg. u. eingel. v. W. Rieland, Frankfurt/M 1974; D. Cartwright u. A. Zander (Hg.), *Group Dynamics.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1960; F. Haug,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M. Jahoda u. a.,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1933), m. e. Vorw. v. P. Lazarsfeld, Frankfurt/M 1975; H. Lefebvre,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1946, 1962), 3 Bde., Kronberg 1977; K. Lewin, *Die Lösung sozialer Konflikte* (1946), Bad Nauheim 1953; S. Lindqvist, *Grabe wo du stehst. Handbuch zur Erforschung der eigenen Geschichte*, Bonn 1989; C. W. Mills, *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 Neuwied 1963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1959); O. Negt,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 Zur Theorie der Arbeiterbildung*, Frankfurt/M 1976; R. N. Rapoport, »Drei Probleme der Aktionsforschung.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rfahrungen am Tavistock-Institut«, in: *Gruppendynamik*, 3. Jg., 1972, H. 1, 45ff.

弗里加·豪格(Frigga Haug) 撰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lltagsforschung, Arbeiterumfrage, Befreiung,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Erfahrung, Erinnerung, Erinnerungsarbeit, Erkenntnis, exemplarisches Lernen, Ideologiekritik, Kritik, Methode, organische Intellektuelle, Standpunkt und

Perspektive, Parteilichkeit, Philosophie der Praxis, Verallgemeinerung

统一、统一性（Einheit）

A: waḥda.

E: unity.

F: unité.

R: edinstvo (единство).

S: unidad.

“统一”这个词在日常用语、各门科学、政治一意识形态以及哲学领域中有多种意涵。“统一”不同的、有些游移不定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含义不能被压缩成一个固定的概念。似乎只有在数学术语中（作为数量单位），这个词才有一个公认的含义。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和“统一”类似的表述，并且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问题。“统一”只有加上特定标志才能被理解为一个概念（比如数量单位、本体论的统一、认识理论的统一、物理学的统一、功能的统一），因此，不加限定地理解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尽管如此，统一本身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综合、联系、总体、整全性、普遍、同一等等，即想到“理性”的特征。因此，黑格尔合理地将统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出现总结为理性在哲学史中的轨迹，以至于将哲学史本身归结为统一的问题，与统一的问题史相一致，“哲学……和**统一**有关，但它并不是和抽象的统一……，而是与**具体**的统一（概念）有关，并且在它的全部进程中完全只与具体的统一有关，——它的进展的每一阶段都是这个具体统一的**特有的规定**，而统一的诸规定的最深刻的和最终的规定就是绝对精神的规定”（*Enz*，^{3}1830，§573“说明”）。强调理性统一是**具体**的，当然也意味着，统一只能通过思想规定的内在联系，即通过特 166
定的概念完成，而在这些概念中出现了“其（统一的）规定性的变化多端的种种方式”（同上）。因此，统一正是理性的统一，具有（概念）规定性的特殊化或**具体化**特征，它指向对特定关系的把握与呈现，而不是对众多模糊整体的非概念直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接受黑格尔对具体统一的观点，但是用他们自己的哲学框架，对特殊学科和社会实践有着根本不同的规定。具体来说，哲学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被理性建构，相反，以理性为特征的认识形式，是由历史建构的。这样，探讨具体统一时就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理论难题，特别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实践主要运用于对特定科学的批判、历史分析和社会政治干预，而在哲学层面

只有初步的反思。

1. 统一在哲学传统中的用法。统一多种多样的用法与各自所讨论的相关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不能说，这些用法可以综合为一个关于统一的概念，可以在历史上追溯这个概念的发展和谱系；相反，应当考察特定的条件和语境。截至目前的研究总体上仍没有为此提供充分的条件。这些研究或是概念史导向的（参见 Hadot、Flasch 和 Heintel 1972），或是在研究个别学者和学派研究以外（Pätzold 1981；Beierwaltes 1985）讨论一些面对基本现实问题的典型立场（例如 Zahn 1973；Henrich 1982；Gloz 和 Rudolph 1985）。

社会历史的语境中一般也难以定位。马克思主义主导写作的哲学史基本没有突破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一”解释为“对交换价值实体的反映或投射”（Thomson 1968，第 254 页；另参见 Sohn-Rethel 1970）这样的说法。而这种缺陷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规定一
167 个关于具体统一的构想时——只要规定涉及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和精神过程的中介——缺陷的一部分。从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类中介实际上有多么丰富的层面（参见如 Lefèvre 1981 论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与他们对“一”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将“统一”政治—社会的、各门科学的和哲学的用法混为一谈，会破坏统一的各种中介的复杂性，因而“统一”首先在各门科学和哲学两个领域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地方则没有什么作用。

尽管如此，社会的秩序观念即便在没有得到明确反思的情况下，也会注入关于统一的各种构想中。比如古希腊哲学的历史很难与城邦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长期面临危机这一背景脱离关系，而且经常以政治密党（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或秘传学派的形式作为组织基础。古代晚期和中世纪哲学（参见 Wolff 1978；Flasch 1986；Mensching 1992）不仅讨论“基督教世界”永远受到威胁的统一、政治权力和世界权力的统一等问题，而且——由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个体作为人的统一也成为问题。近代哲学同样如此，它将主体的统一视为社会与政治统一的前提。

一与统一的各种构想在科学史上以特别的方式与尺度的概念相联系。这不仅涉及数学和物理学单位作为量和质的大小的确立，也涉及各种经济的价值规定。沃尔夫（Wolff 1978）指出，物理学与经济学问题在冲动（Impetus）理论从古代晚期到洛克的历史中相重叠。这种理论认为，一种保持同一的力量的统一产生了创造者和被造物的统一。与之

相关的是法律和道德对人的统一的理解（行为能力、为行动负责的能力）。更广义的统一问题涉及一般的主体状态，即在心理和社会的中介条件中形成与持存的人格的统一。

168 理论论述连贯性意义上的统一是科学的一个标准。这既要求论述的形式关联（统一性作为无矛盾性或一致性），也要求内容上证实的、体系的统一性。

此外，对价值标准的探讨也与统一相关。一或统一的问题与起源或本原的问题，也与本体论的、社会的等级问题相结合，因为统一体的差异体现出统一体符合本质的程度，从而体现出自律的程度。对行动的评价同样如此。从古代到康德实践理性自律的观念以至哈贝马斯（“交往”或“互动”取代“劳动”），那些可以称为实践（πρᾶξις，行动）、区别于ποίησις（facere，制作行为、劳动）的行动统一体，即行动目标在自身之中、在实现时只与自身相交会、不依赖外在环境的行动统一体，都占有特权地位。道德行动作为规范规定的行动，一般要按照这类自我指涉的行动统一体的模式来理解。

启蒙运动中的哲学术语词典第一次介绍了统一这个概念哲学用法的差异。根据瓦尔赫（Walch）的说法，统一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个事物这样的特点：它被看作单一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可以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无论是根据它的本质还是数量”（1775，1，第954页）。他细致地区分了排他的统一（唯一性）、计数单位、偶然的统一和普遍的统一（类）。本质的、简单的和不可分的统一体（例如上帝）与复合而成的统一体（例如身体）在形而上学中相互对立（2，第1370—1372页）。这部相对浅显的词典分类整理了哲学传统中形成的、以不同方式彼此相联系的规定。

1.1 **古代哲学**。早在古代哲学中就有许多与统一问题相关的术语，它们根据不同的视角有各自的侧重和界定。最重要的是对什么是“一”（εἷς，μία，ἕν；古希腊语“一”的阳阴中性形式。——译者）的理解。不过这个问题不仅指数的单位，而且涵盖“一”的全部用法， 169
即个体与整体、特殊与普遍等等。强调整体或普遍意义的“一”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柏拉图理论的特点，而亚里士多德则思考特殊状态的一。两种方案的对立似乎才让人区分开了统一的不同形式。柏拉图为描述统一，提出了μονάς（出自μόνος，唯一的、单个的）或ἑνας（出自ἕν，一）的概念，以表示理念的一（*Philebos* 15 a—b；*Phaidon* 101 c 6，105 c 6）；此外还有μόνωσις表示“世界”的统一（*Ti* 31 b 1）。相反，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作为数的本原的一（μονάς）（*Metaph* 1053 a 27）和在自身之中包含了多、应依据这种多来定义的统一（ἑνότης）（*Metaph* 1018 a 7，1023 b 36，1054 b 3；*Ph* 222 a 19）。

1.1.1 一的问题与存在者的起源或本原（ἀρχή）问题密切相关，它由伊奥尼亚哲学家最早明确提出。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将它视作无边界、无规定和无限的物质实体“无定”（Ἄπειρον，ἄπειρον）。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则认为，作为万物基础的只能为一（μία）的本原（τὴν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φύσιν）虽然是无边界的，却是有规定的（Theophrast，据 Simplikios *Phys* 24，26）。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据 Aristoteles *Metaph* 986 b 1）将一等同于神，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个一如何与世界的多样性联系起来。赫拉克利特（Heraklit）以“一切是一”（ἓν πάντα εἶναι；Frg. 10）为前提——尽管没有在概念上，但就实质而言——开始思考对立面的统一，并总结为一句话：“从一切产生出一，从一产生出一切。”（ἐκ πάντων ἓν καὶ ἐξ ἑνὸς πάντα，Frg. 10）这个说法由讨论“大全一体”（All-Einheit）的近代哲学重新接受。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以及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这个数既是尺度，同时又是生成性的本原。

巴门尼德（Fragment 8）将不生、不灭、不动、无止境的存在者规定为“完整的、唯一的”（οὖλον μουνογενές），规定为“整体的、连续的一”（πᾶν，ἕν，συνεχές）。“一”在这里被视作不可分割的真正存在者的谓词。但巴门尼德没有将一当作主体，直到麦里梭（Melissos）（Fr. 8）——也许他是延续芝诺（Zenon）（Fr. 3）的说法——才把一当作主体。对于后两者而言，一作为存在者谓词的问题变成了一本身存在的问题，一与显现 170
的现实相关的本体论状态的问题。这个转变——后来由柏拉图批判地接受——显然同存在者作为一如何与显现的现实的对立性共存这个问题相关。爱利亚学派的回答是，后者只是假象。与此相对，有人试图在一本身当中思考对立，或者说，从一当中产生出对立，比如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和阿那克萨戈拉（参见 Aristoteles *Ph* 187 a 20 及以下），而原子论者留基波（Leukipp）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相反，在显现的现实中思考巴门尼德的存在。

1.1.2 柏拉图在对话《巴门尼德篇》（*Parmenides*）中批判了爱利亚学派关于一的说法，以指出他们把存在者与一等同这一前提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考察一存在这个论断，条件是一当中没有部分和整体的关系（137 c—142 a）。但在这个条件下关于一的说法会自己扬弃自己，

必然修改成：一既包含各个部分，又是一个整体，于是一与多相互包含（142 b—155 e）。二者的对立在对话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对立的原因在于，存在者也是多，不能与一完全等同起来。因此“一存在”意味着一“有”存在，从而不同于存在（142 b—c）。《斐勒布篇》（*Philebos*）结合理念学说讨论从一过渡到多的问题（14 c—18 d）。应当总是去寻找“万物的形式”（μίαν ἰδέαν περὶ παντός；16 d），并确定它位于一和无限（无边界的多）之间的数目。因此，可思维的东西表现为根据可能划分的数形成的特定的量，也就是说，数规定了众多有限物和无限理念的一之间的关系。（理念的）一在这里表现为类本原，而非理念本身，更不是理念的总和。

1.1.3 亚里士多德通过扬弃本质与个别事物的分裂（*Metaph* 1079b），从根本上批判柏拉图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的上述构想。他首先用算术问题说明了这种分裂的后果（1080a）：作为数，每一个单位（μονάς）都必须能和其他单位合并，这样才能被计数，而如果这个单位被当作理念，计数就完全不可能了，因
171 为后一种情况证明数之间有本质的差异，使得计数变得不可能或至少不可理解。基于数学的反驳与对不加辨析地使用“一”（τὸ ἕν）的批评紧密相关。与那种用法相对，亚里士多德列举了一“本身”（καθ' αὑτά）的四种主要类型（1052a）：（1）联系的或连续的东西；（2）出乎自然而完整的东西，尤其是“在自身之中包含着联系的原因”（ἔχει τι ἐν αὑτῷ τὸ αἴτιον αὑτῷ τοῦ συνεχὲς εἶναι）的整体。这里的联系被设想为动态的，即联系的特点是运动的连续性或内在的运动原则。此外还有就概念而言可以称为一的，它们要么是（3）个体，要么是（4）普遍者。判断某物是否为一的标准，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不可分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不可分而成为一，不过有一些是在运动中，有一些是在思想中或概念中。”（πάντα δὲ ταῦτα ἓν τῷ ἀδιαίρετον εἶναι τῶν μὲν τὴν κίνησιν，τῶν δὲ τὴν νόησιν ἢ τὸν λόγον；1052 a—b）亚里士多德批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和柏拉图的观点时指出，一不是自为成立的普遍，而是作为一个个别物的特殊存在（1053 b—1054 a）。“一和存在者”（τὸ ἓν καὶ τὸ ὄν）意义在某些方面相同，作为一而存在就是作为个别而存在（τὸ ἑνὶ εἶναι τὸ ἑκάστῳ εἶναι；1054 a）。“作为一而存在就是不可分地存在，作为这个特定的个别物，在地点上、形式上或思想上分离，或者整体不可分地存在，特别是作为每一个类的第一尺度。”（1052 b）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这个思想阐释如下：一应当理解为存在者内在的尺度，即作为存在者的类概念、作为各自的谓词，比如马的

概念之于马，生物的概念之于人、马和神（1088 a）。与之相应，一在数学中也不是数，而是各个数的尺度和本原。

将“作为一而存在”与“作为存在者而存在”当作谓词运用，意味着它们不能被设定为实体，因为实体就是个别物本身，而它们只不过是对个别物的称谓。因此被认为是实体（οὐσία）的东西大多数只是潜能，是集合物，经过转化
172 才会变成一（1040 b）。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Summa theologica* 3，q 66）代表的后世看法不同，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作为一的存在确定为唯一的实体形式所规定的存在，因而他把劳动产物也当作实体（*Metaph* 1029 a 5）。因此合一或“成为一”（ἕνωσις）也指“混合”（τό μικτόν），这种混合是组成部分（作为潜能）的性质变化所产生的（参见 *De Generatione* 328 b）。

如果说一或作为一而存在指的是个别事物的存在方式，那么统一性这个术语则是在形容同一性（ταυτότης）与多的关系。同一性是存在的一种统一性（ἑνότης），它要么指一种（偶然的）特性（συμβεβηκός），比如“人”和“文雅的”，因而不能用来述说普遍，要么指本质上作为一而存在（*Metaph* 1018 a）。后一个统一性反之可以作为类概念（生物同人、马、神……的关系）用来述说普遍，或者形容一个由内在各部分统一所变成的整体（1023 b—1024 a）。后一种含义接近有机统一体的观念。这个统一体生成的问题，是斯多亚派物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1.1.4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作为一而存在可以算作一种非偶然统一的情况，但在普罗提诺（Plotin）那里，关系则反了过来：他将太一绝对化，理解为一种先天的、完全直接的东西，太一是存在者本身的前提和基础（参见 *Enn.* VI，17）。这个绝对的一与作为一的存在相对立，后者由实体部分的多所规定，因而是不完满的。太一同时是万物的可能性，从自在自为、静止不动的太一的“充盈”（参见 *Enn.* V，2，1，8）中产生出多（流溢）。这种产生的方式，和太一一样，是不可认识的。统一性被设想为严格意义上客观的、先天的，因而也是思想的前提和基础。思想不能思维绝对的、不在任何关系中的统一，而总是在作为一而存在的多之中运动。因此人与绝对太一的关系，即通过消融于大全一体与太一合一，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具有神秘主义的特点。

1.2 中世纪哲学。在经院哲学中，
173 太一的先验性成为形而上学思辨超世俗事物的性质及其等级结构的出发点。这个太一倾向于同基督教—神论的上帝观念等量齐观，它和此世之中存在者的多，

特别是和人的存在与思想的多之间的关系，成为核心的问题。否定神学给出了一个极端的答案，它强调上帝的不可言说性与绝对先天性。但总体而言，经院哲学的特点是尝试调和一与统一，这导致个别情况下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的某种摇摆。

1.2.1 约翰内斯·爱留根纳（Johannes Eriugena）在《论自然的区分》（*De divisione naturae*）中继承了奥古斯丁、波爱修斯（Boethius）和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os Areopagita）等不同思想家，将作为整体（*universitas*）的一（*unum*）理解为先于思维与存在者的、超越一切对立的不可规定者。虽然这个大全一体既包括神也包括被造物，但这里的被造物并非个别存在物，作为一个有限者与大全一体只是分有的关系。因此，这个观点不能解释为泛神论（参见 Flasch 1986，第 173 页）。因为太一超越对立，没有任何东西与之对立，所以在太一当中，统一和众多、同一和对立等关系概念相重合。因此，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律，太一必须也被理解为对立面的统一。当我们思考太一，也就是在用思维规定不可规定者时，对立面从太一当中显现。将自然现实与历史现实解释为上帝显现（Theophanie）也就意味着，人作为上帝同样的形象不断实现一个“世界”的统一，并由此消灭显现的现实的对立性。中世纪晚期，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重新接受上述思想，他将经院哲学思维没有恰当地理解大全一体，归咎于运用统一与众多等对立面、不能思考对立面重合的知性。

1.2.2 爱留根纳肯定新柏拉图主义中太一地位高于作为一的存在，而晚期经院哲学受到重新讨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etaphysik*）的阿维森纳（Avicenna）与阿威罗伊（Averroes）的影响，以存在者与一的相互转化为出发点（*ens et unum convertuntur*；参见 Thomas von Aquin，*Summa theologica* 1，q. 11，a 1）。阿威罗伊认为，一与存在者是同一的；然而托马斯认为，一作为本质与形式，与作为潜能的实际存在者（*esse*）相互对立。因此存在者与一的相互转化意味着，潜能与现实每次在不可分割的实体性存在中合而为一。托马斯在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所作的注释（1，13）中指出，实际的存在者从来不可能由多个实体构成。因此，此世存在物的统一就是本质性形式的每一次实际实现，因此人的劳动产物不能算作实体性的统一体，相反，它们的形式只有偶然的性质。总之，托马斯认为统一性的程度是一个本体论等级秩序的标准。 174

1.3 **近代哲学。**乔尔丹诺·布鲁诺

(Giordano Bruno) 在形而上学主要著作《论原因、本原与太一》(*De la causa, principio et uno*, 1584) 中，将宇宙规定为充溢着神性的世界灵魂、有生命的、运动的统一体。在宇宙的每一个状态中，世界灵魂都实现了存在者包含在物质中的可能形式，这些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宇宙的有限变动，而宇宙本身则永恒处在它与上帝的统一中。这种绝对者的运动统一体思想，经康德以后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被接受，成为关于一种包罗万象的有机统一体的观念，比如谢林对布鲁诺的明确援引。

1.3.1 近代哲学主要从主体出发来思考统一。在这一语境下，自笛卡尔 (Descartes) 以来自我意识问题就具有特殊意义 (参见 Jaeschke 1995)，自我意识是思维自身统一的基础。思维作为自我意识 (Selbstbewusst*sein*) 同时包含了自身存在 (Sein) 的确定性，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院哲学传统中的“存在者与一相互转化”原则仍然成立，例如，沃尔夫根据传统的本体论观念强调了这一点：“对存在者进行规定的不可分割性称作存在者的统一性。”(»Inseperabilitas [...], per quæ ens determinatur, *unitas entis* appellatur«; *Ontologia*, Leipzig ^{2}1736, §328) 然而重点转移到主观性上，意味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成了问题，笛卡尔提出的两个实体——思维 (*res cogitans*) 和广延 (*res extensa*) ——的相互关系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问题。费尔巴哈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书写从培根到斯宾诺莎 (Spinoza) 的哲学史 (参见 Feuerbach GW 2) 的。斯宾诺莎将二者综合为上帝这个概念所表示的一个绝对的、实体性的统一体的属性，但这个概念剥离了全部主观规定。与此相反，莱布尼茨 (Leibniz) 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 中将各种实体形式理解为无法扬弃的特殊性状态中的诸统一体；每一个单子作为隐德来希 (Entelechie) 是在自身之中完满的，并用各自特有的方式表象着整个宇宙。单子被设想为进行统觉，即通过 (内在) 反思进行认识，因而它不仅是一个本体论的统一体，而且同时也是以“自我”为原型的主观统一体。

1.3.2 经验主义不像唯理主义形而上学那样将统一问题置于本体论层面，而是置于经验层面。洛克探讨了外在的和内在的经验，即感觉 (*sensation*) 与反思 (*reflection*)，如何在经验的过程中自身构成一个统一体。因此，统一属于同样存在于两种经验方式之中的简单观念 (《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VII.1)。休谟认为存在和统一是等价的，但统一只能属于完全不可分、不能还原到更小统一体的个别对象。因而关于起支配作用

的统一体甚至大全一体的思想是无意义的（《人性论》[*A Treatise on Human Nature*]，1.2.2）。

经验主义与笛卡尔、莱布尼茨的唯理主义方案无论有多少分歧，都有以主体统一作为出发点这个共同前提。这在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中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这时必须从非社会的个人出发思考社会化，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的契约理论模型。但这些模型也——例如休谟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社会统一理解为公民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的结果，将作为私有者的独立主体当作前提条件。

随着经验地位上升，历史的统一呈现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成为18世纪中叶才形成的历史哲学的问题。从莱辛到康德再到黑格尔，都试图从理性的统一出发将历史的统一解读为**理性的历史**。与
176 此相对的是主要来自历史语文学的尝试，将历史的统一归结为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其中赫尔德（Herder）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等人将历史的中介理解为诗（*Poiesis*[本义为制作。——译者]）或劳动。黑格尔也认为这种中介形式属于历史，因为他将世界精神的活动规定为劳动。马克思批评这种做法将劳动化约为精神劳动，主张对历史进行“自然史”的考察，从而继承了赫尔德和浪漫派的历史理论。

1.3.3 康德强化了统一与主体性的联系，因为他让统一与按客观主义理解的存在分离，将统一视为思维的形式规定，这个形式规定与永远受到认识处理的、显现着的客观性相关，而无关物自体。先验的“统一原则”是“统觉的综合统一”（*KrV* B 134）。这个统一是原始的，因为它首先确保了显象的全部杂多的任意一种综合，但这个统一也是客观的，因为只有通过它才能产生客体的概念。因此康德认为：“统觉的综合统一就是人们必须把一切知性应用，甚至把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的点，这种能力也就是知性本身。”（B 134，注释）先验的统一性原则不能与统一性范畴混淆，后者标志着一种判断中的逻辑功能，并且以那个原始的统一性为前提（B 131）。康德区分了知性统一和理性统一，前者以统觉的综合统一为基础，后者作为理论统一，指对于无条件者的知性知识完备、系统的统一（B 673），作为实践统一，指出于自由设定的全部目的和谐一致的道德统一。

康德将统觉的统一归纳为一个纯粹的（非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我思”，即自我意识“借我”表达自身。但“我思”总是已经预设了这个思想的主体及其存在，于是“我们在一个不断的循环中围绕着这个主体打转，因为我

们要想对它作出某种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已经使用了它的表象"（*KrV* B 404）。"我思"要求存在，而自身作为思维却不能被把握这种存在。

这个循环及其他内容引发了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的批评，影响了后来的
177 哲学发展。他批评先验哲学是内在没有根据的："我即一切，在我之外，实际的知性就是空无。自我，我的一切，最终只是某物的空洞幻相，是一个形式的形式，和我称为物的其他现象一样正是一个幻影。"（*David Hume*，W 2，第217页）雅各比以此为依据，批评先验哲学只是斯宾诺莎主义的一个主观颠倒（《论先验唯心论》[*Über den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W2）。雅各比提出了与之相对的、直接的、非反思性的实在意识，即信仰，以期在主观的或客观的大全一体学说之外确保主客观的统一。

费希特试图回应雅各比的批评：他在1794—1795年《全部知识学的基础》（*Wissenschaftslehre*）的最高原理中指出，自我意识作为自我的直接统一产生于一个原初的行动，从而明确让自我意识遵循非反思性认识的模型。"自我原初就直截了当地设定了它自身的存在。"（*Werke*，hgg. v. I. H. Fichte，1，第98页）这个直接的、无条件的作为一的存在超越了自我与非我的对立，自我与非我不断发展的统一以绝对自我的统一为前提和基础，规定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理论和实践过程。

1.3.4 自我意识中的直接统一这一前提——不同于古代晚期将太一的超验性理解为客观的——重新在认识的逻辑—范畴的前提层面上区分了绝对统一和相对统一。在荷尔德林（Hölderlin）、辛克莱尔（Sinclair）、谢林、黑格尔等人组成的法兰克福—洪堡（Frankfurt-Homburg）圈（参见 Henrich 1991）的所谓"一体化哲学"（Vereinigungsphilosophie）和诺瓦利斯（Novalis）、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等代表的早期浪漫主义（参见 Arndt 1994）中，直接统一只能直接地（通过直观和感觉）把握，它是各种对立与所有相对统一或者说有条件的同一性的前提，被规定为所有同一化过程的根据。然而，这个原初统一被规定为超越意识的，主要原因是受雅各比对先验哲学批评的影响。这就重新结合了斯宾诺莎主义的实体统一的思想，可以看到很多把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斯宾诺莎联系起来的尝试。因而与经验论和康德不同，统一体重新获得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维度。

然而这种回归发生在问题域已经改 178
变的背景下。谢林主要遵循同时代各门科学中的有机统一观念，从这些观念出

发，他相信能在自然哲学中为哲学找到一个确定的、同时可用经验证明的基础。其次，后康德哲学日益面对着历史问题的挑战，历史问题要求以迄今未知的方式将理性知识扩展到历史经验之中。因为哲学和所有科学、技术一样，变得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所以历史统一的问题也就成了所有知识与行动形成一个统一体系的条件的问题。黑格尔将关于作为大全一体（不同于斯宾诺莎，这个大全一体也是主观的、活动的）的绝对者的认识与历史的展开结合起来，这并非偶然。但这个历史起源于理性的统一，即理念，理念自身外化，目的是在它自身的他者之中理解自身并由此复归自身。

1.3.5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后的问题域的特点，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理性批判明确不再追求统一的普遍性。一个例外是用一个统一的原理解释整个“世界”的一元论，19 世纪下半叶一元论在德国的代表是 E. 海克尔（E. Haeckel）和 W. 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在英国的代表是 P. 卡卢斯（P. Carus）。这种一元论的基础是相信各门科学从自身出发的统一，最终在德国“一元论联盟”（Monistenbund）中形成了教派式世界观的特征（参见 Hillermann 和 Hügli 1984）。恰恰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统一”的整体论思维一再复兴，这说明统一问题也必然是社会个体的一个生存问题。

哲学面临的问题域是，仅仅以哲学为基础无法重建分工独立的各门科学的统一。狄尔泰将哲学定位为区别于精确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是对于科学统一性丧失的一种反应，但又愈加损害了哲学本身的统一性。在生命哲学（狄尔泰、西美尔 [Simmel]）中，起支配作 179
用的各种理性统一体的丧失带来了浪漫主义个体性思维的活跃：在绝对统一体下的不同层次中，个体性是可理解的最高的统一性。相反，尼采将关于持存的、最终的统一体（如灵魂、自我或主体）的思想视作幻觉：“**一切统一唯有作为组织和相互作用才是统一，无非犹如人类共同体是一个统一体，也就是原子论上的无序状态的对立面；因此是一个统治的构成物，它意味着一，但其实并不是一。**”（KSA 12，第 104 页）

在回到个体统一和放弃个体统一这两个极端之间，“后形而上学”思维左右摇摆。它依靠对统一的纯粹形式规定，例如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在他的《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1884）中将统一简化为数量单位。他区分了两种统一：一种是对象的数量或复多，对象得到规定而彼此区隔开；另一种是一个概念的特征，永远不会出现复数。

然而从上述立场出发，并不能充分把握作为理性普遍性问题的统一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关涉到社会生活本身，因此，哲学反思不应满足于放弃理性统一的各种构想，它的任务始终是寻找有效的替代方案。

2.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里“统一”展现出不同又彼此关联的层面：哲学、各门科学和政治实践。因为马克思本人在他的哲学实践中更多关注后两个层面，并且理论上只是初步地阐发了他的哲学实践，因此首先要澄清统一问题有哪些维度，而且要注意出于合法性动机而宣称统一的主张，这样的主张在规定统一时暴露了理论的欠缺。其次要探究，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否能重构出一个一贯的统一概念。最后应当更仔细地界定从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问题中产生的哲学任务。

2.1 问题的诸维度。2.1.1 在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Einl* 57，MEW 42，第 35 页；这个说法可能也在指涉康德提出的统觉的先验统一。）这里强调一个方法原则，要求考虑具体事物时集中关注每种状况的特殊性，因此体现了实践导向的、切合情况的“辩证”分析的核心（按照列宁著名的说法，“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LW 31，第 154 页）。

与此不同，恩格斯似乎意图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者的统一性，并希望由此挑战思辨建构的统一性：“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两三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AD*，MEW 20，第 41 页）考虑到论战的语境，不应当认为这里出现了实体形而上学。恩格斯的对手是杜林，后者认为，包罗万象的存在可以作为统一体表述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恩格斯则认为，存在的统一性是无规定的，忽略实在的区别则是把所有事物还原到存在的空洞规定上：“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同上）这里统一性与单纯、无规定的存在解除关系，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目的是指向具体的、在自身之中进行区分的统一性，在这个统一体中，物质作为一种多样形态的、具有特定区分的存在替代了抽象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证明世界这种统一性的任务，没有按实证主义科学的方式单独交给某些特殊学科，而是也要求运用哲

学，这样，统一性在这里就具备了基本哲学问题的地位。这个事实说明，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不管对传统哲学，尤其对黑格尔有怎样的批评，都自觉地置身于德国古典哲学时代的理性概念传统中。因此，这个传统构成了解读他们统一性观念的最切近背景。

2.1.2 统一在工人运动中也是政治组织性的斗争概念，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
181 合起来！"马克思认为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也主要是"保证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团结和联合的力量"（MEW 18，第52页）。统一在这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作为争取政治权力的、有行动能力的准主体的构成条件。马克思的理论希望在客观上证明，工人阶级是世界历史原则的承担者；他们担负着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之以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任务，当然后者的轮廓只能通过否定从反面来描绘。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K I*，MEW 23，第92页）。在这个视角下，阶级主体的统一是无阶级社会中的社会个体统一的条件。后一种统一重新被塑造为黑格尔意义上的具体统一。这个统一体的自觉形成，以客观的、个人无法支配的各种条件为基础，又对应着资本主义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希望将客观基础的统一和自我意识的主观统一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为此他吸收了黑格尔自由概念的认识论维度（自由作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就像他在论述"自由王国"时简要表述的："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K III*，MEW 25，第828页）

上面没有说明，相对于社会个体的行动和自我意识，在政治上被询唤为阶级主体的统一体如何建构自身；如果它不同于黑格尔的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不是自觉的主体，那么它有怎样的理论地位。相对于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然形成政治的自我组织（参见MEW 16，第14页；30，第490页；32，第332页；33，第32页），马克思指出：工联组织一般在政治上软弱无力（MEW 17，第649页），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MEW 16，第194页；33，第333页）并推进革命进程（第386—387页），需要一个政治性的"战斗组织"（MEW 33，第436页）。工人的自我组织和工人通过政党组织起来，二者未决 182
出结果的紧张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特征（参见列宁与卢森堡关于自发性与组织的争论），而且也

伴随着整个工人运动史。它反映了各种现代市民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随着19至20世纪现代市民社会的发展而更尖锐地凸显：一方面，个人越来越隶属于各种客观过程；另一方面，个人不论有怎样的依赖关系，都处于实际的社会化中，强制分工基础上产生了个体化和原子化的趋势。社会的统一，虽然只能作为具体的统一而重建，却是与个人生命实践相对立的抽象统一。与此对应，遵循客观条件的政治统一也无法毫无困难地与社会个体的自我意识相协调。

2.1.3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RPhil*，1821）中只有将“需要的体系”即社会化经济的领域在二元分裂的立场上当作抽象统一体的一个方面（§186），设定为家庭统一体和国家统一体之间（不可扬弃的）“差异环节”（§182），并由此划清外在的界限，才能维持政治和社会普遍性意义上的具体统一。然而这个否定性领域存在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不受限制，因而黑格尔关于团体和等级纽带的观念必然表现为幻觉，于是国家中的伦理统一体反而相对于市民社会各种对立必然表现为抽象的。这些对立在黑格尔那里只能被否定地处理，而现在成了市民社会否定之否定的中介，成了“第四等级”即工人阶级解放的中介。但马克思1843年彻底地批判黑格尔对具体统一的理解是幻想（*KHS*，MEW 1，第203—204页），并不意味着具体统一毫无作用，而是将它变成了一种应当存在。“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Gr*，MEW 42，第93页）被视为社会联系的一种异化形态，其中“比较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第95页）。这种联系作为“历史的产物”与下面的状态相反：“全面发展的个人”塑造他们的社会关系，使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因为这种状态被视作“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带来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所以这种状态不接受浪漫主义的判决，后者鼓吹客观社会关系未充分发展的阶段“个人的丰富”（第95—96页）。

183

值得追问的是，马克思描述的个人全面发展的状态——对这样的个人而言，他们的关系应当是“极明白”的（参见MEW 23，第94页）——是否也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即向前逃避时掩盖了个人不可消灭的、客观的依赖性，正如浪漫主义在向过去逃避时回避了个体的依赖关系。与此相关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单一主体”的看法（Brie 1988，第33页）。如果考虑到马克思逐

渐放弃了这类预先推定，而且如上文所述，继承黑格尔自由概念的认识论维度后变得审慎这一点（参见 Arndt 1985，第 116—120、222—226 页），理论在这里也始终是有问题的，因为正如奥伊蒂宁（Oittinen，第 190、646 页）所正确指出的，无论马克思本人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发展出“对统一 / 多样问题的一套连贯观点”，用来解释按照自己的概念什么才是理性的、社会的统一。即使从后黑格尔哲学到当代的光谱中，马克思作出了可能最超前的尝试，通过批判地吸收黑格尔，发展出一种对象性中介的理论对统一的辩证理解（参见 Arndt 1994，第 231 页及以下），但他的尝试很大程度上始终是非直接表达的，而且只能从马克思本人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字中推导出来。

2.1.4 理论的问题在于，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时候采纳了他的具体统一概念，但拒绝了黑格尔关于纯粹自我指涉的理性的思想，从而使严格意义上的具体统一概念失去立足之地，变成了一个**乌托邦**概念。然而另一方面，在青年黑格尔派“实现哲学”的纲领下，正是这个在黑格尔那里——按照批判——只
184 能在绝对理性的概念内虚幻地出现的理性统一，应当获得人类社会现实中的位置，证明自己是人类社会现实中应实现的统一。因为理性统一的实现需要一个承载者，哪怕这个承载者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性质，所以马克思和费尔巴哈、青年黑格尔派同样都寻求精神统一的替代物，而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统一已在绝对精神中作为哲学完成。早期马克思讨论类主体时的费尔巴哈主义，正如晚期马克思讨论全面的个人、讨论工人阶级自身组织为政治主体时的浪漫主义一样，都反映了既反对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又希望坚持并论证黑格尔的构想这一尴尬困境。马克思可能最迟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开始，就既反对费尔巴哈的类主体思想，也反对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对于理性统一的替代方案，包括马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1845）提及无政府主义地从理性统一退回到孤立个体的唯一性。但始终不清楚的是，为了能够论证通过无产阶级否定现存关系——这个否定应当同时是对社会个体的人格的解放（MEW 3，第 77 页）——应当用什么取代理性统一。将历史塑造为统一科学的计划，“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第 18 页），尽管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删掉相关段落而马上受到质疑，但承载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景。它本身没有给出另一种可能，因为它只是拖延问题，而没有回答：历史的统一和科学的统一，如果不在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之中，还能是什么？

2.1.5 这个缺陷的后果可以在关于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看到。马克思有时将具体统一表述为一种应当存在，具体统一在他这里的棘手状况近乎对（马克思默认的）黑格尔道德批判的釜底抽薪，为一再有人提出的要求——用伦理规范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奠定基础——提供依据。而且对黑格尔统一概念的接受基础没有作出充分的阐明，导致马克思的理论联系被解读为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联系的转译：从认为历史唯
185 物主义就是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例如 Barth 1890），到广为流传的《资本论》的“逻辑”与《逻辑学》的平行关系（参见 Ruben 1977），再到用各种虚构的统一体来替代黑格尔的精神统一体的各种形态，比如卢卡奇（*GuK*，1923）的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统一体。这种转译策略在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的官方马列主义中显得最为可疑（参见 Labica 1986），它尽管坚持自己的哲学和黑格尔的区别，但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力求与之展开竞争，即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在哲学中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性的统一体。根据斯大林的说法，“哲学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在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因而世界也就不需要有一个世界精神（Stalin 1938，第 654—655 页）。物质在这里替代精神，直接起统一原则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在去斯大林化以后也被保留下来（参见 Bock 和 Clairmont 1978），直到 1980 年仍是民主德国中斥各种哲学构想时的依据（参见 Rauh 1990）。

结果，容纳一切的哲学统一性原则被硬解释成一个排他的政治统一性原则，后者再也不标志着内在的具体统一。这不仅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政治，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使这类服务得以可能的一个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出于实践目的所关注的具体统一是无法定位的。为了合法性目的而要求这种统一性，充分利用了这一事实：哲学并不支配任何关于统一的明确的理性概念，以传达——黑格尔意义上——统一各自的规定性。这促使各种部分的形态——无论是理论还是团体——在排他的、部分的统一中直接自称为更高统一的代表，自命为更高统一的代言人。对统一的仪式性召唤——政党、阶级、人民、国家等等以及这些环节彼此叠加的统一体——号称以合规律进程的统一为基础，将对立设定为统一体之外的外在对立。这不仅显然符合统治机器的合法性需求，其中也反映出马克思已发觉的（*Gr*，MEW 42，第 96 页）、现代市民社会深处的浪漫主义，即用直接透明的统一反对社会中介的不透明性（参见 Furth 1991），这样的统一经过实践的改变就 186

成了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

2.1.6 这样将统一和差异或对立彼此割裂，抛弃了具体统一这个概念，尽管这么做同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而且列宁的准确概括得到列宁主义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致接受——“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PH*，LW 38，第214页）相矛盾，但是，没有任何公认的、阐述完备的矛盾概念与列宁这个说法相匹配，能在概念上说明统一相对于不同对立面的各自侧重，以及反过来不同对立面相对于统一的各自侧重（参见Arndt 1994，第216页及以下）。列宁认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PH*，LW 38，第339页）这种表述允许政治上建立暂时的联盟（统一行动），同样也允许强调排除自身对立面的统一（即政党、阶级等等）；然而，后者如何作为自身内在对立的或具体的统一进行“辩证”中介，始终没有在理论上充分阐明。在极端情况下，各种形式的对统一的召唤，直接与指向政治斗争过程的辩证法并存。

规定统一与对立的关系时的缺陷，在列宁主义中经常通过宣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来弥补，根据这种说法，实践向理论预先给定问题，证明理论的真理性，因此，理论的缺陷只能通过重新转向实践来消除。这里出现的具有多重含义的“实践”一词——某种程度上是有意识地与下面的尝试区分开来：用对物质的“辩证”理解在理论上为旨在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辩证法奠定基础——作为统一性原则，相对于在“世界”的物质性中实体主义地证明统一性，这样做的优点是，指向特定过程诸环节在完成过程中的具体统一性，然而，这种统一性的特征有不确定的方面：它多大程度上只是作为实践与理论相对立， 187
无法被理解为包含理智或理论因素的统一。

2.1.7 “统一”一词在讨论系统的、理论的联系时，有一种更传统的、归根结底遵循黑格尔用法的含义，比如一定程度上继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探讨各门科学的统一性问题时（参见Kedrow 1975/76），不仅注意到形式的结构，也注意到内容的联系。对于辩证法、逻辑、认识论的统一的讨论（参见Kopnin 1970）源于列宁的一个命题：列宁认为黑格尔对观念的阐述指明了“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PH*，LW 38，第182页），并由此推论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第316页），这是一个直接继承黑格尔的思辨逻辑计划的结论。

2.2 **重构马克思对“统一”的科学运用。**实际上，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候，只提出了一个（始终是片段的）社会统一体理论，并在它的框架中，将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每一个社会统一体的独立于社会形态的普遍条件规定为劳动。

2.2.1 这个问题首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现，那里讨论的主题是一般生产作为总体，作为“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MEW 42，第24页）。这些环节作为一个社会总体的各个部分形成统一，并不阻碍它们自身相对彼此的独立（参见第25页）。它们不是同一的，而是“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第34页）。这个统一体不是作为主体（“把社会当作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做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第29页），而是作为实际不同领域形成的统一体塑造出来的，生产是对它们“起支配作用”的原则（同上）。其中各个领域不仅是起支配作用的统一体隐藏着的诸环节，也是独立的环节，它们相对于联系彼此独立化。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各个环节的区别表现为对立的形式，统一体只能强行——危机就是统一体的各种矛盾最充分发展的形式——发挥作用（参见 Arndt 1985，第246—250页）。这种可能性在生产商品的社会中就已经存在，因为买和卖作为“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程”，通过金钱的中介（W—G，G—W）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于是“如果说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么，这个过程同样本质上也是这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之间的独立化”（*TM*，MEW 26.2，第501页）。然而“自在的”统一（第505页）或者说“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种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第501页），不仅受资本的实现条件或增殖条件的制约，而且自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即物质交换过程和增殖过程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在商品中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并在全社会的再生产中必然引发冲突（参见 Arndt 1985，第205—210页）。 188

2.2.2 回溯到社会个体通过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这一普遍的、涵盖各社会形态的层面——这个层面意味着基本的“内在统一”——在“劳动概念”的框架下，尝试从物质中介的劳动过程的统一出发，思考具体统一（参见 Ruben 1978；Furth［主编］1980；Damerow 等 1983）：“这个统一在劳动中发生，而不是劳动本身先于统一并产生了它。”（Damerow 等 1980，第235页）劳动与“实践”不同，它“只有作为自身主客观条件的统一，才是现实的劳动”（同上）。劳动与用“世界”的物质性解

释统一不同，它指向这样一种基础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关系中“世界”对社会个体而言才被开启，变得可及。“劳动”因此标志着一个基础的、在自身之中具体的反思关系，也意味着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关系同自己发生关系。在这里，劳动过程的统一不是通过设定目标的主观因素所建构的，而是通过对工具的使用所建构的，正是通过工具，主体才同劳动对象发生关系。工具“在物质上代表现实劳动过程的基本因素的统一……因为它将单纯能力（劳动能力和可以加工的自然对象）的统一体作为特定的中介可能性包含在自身之中”（Arndt/Lefèvre 1983，第30页）。劳动的立场也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理性立场，这一哲学实践的出发点是“作为物质生产和观念评价的统一、作为客观条件与主观活动的统一的劳动”（Furth 1983，第
189 13页）。实践在这里“不是处在现实化与异化的抽象对立之间的东西，而应当被理解为它们彼此制约的作用”（同上）。这样才有马克思对浪漫主义原则的批评：“异化”被看作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批评现存关系的尺度，只来自避免盲目依赖的客观可能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团体的可能性——而非对一个透明的社会统一体的设想。因此，通过劳动的中介得到的总体性范畴里“交叠”着“分析性与规范性的努力”（第14页），这样才能超越单纯道德性的应然立场。

2.2.3 通过劳动过程的具体统一，重新获得一个关于统一的理性方案，这个尝试首先继承了对工具和目的的关系的反思（参见 Rohbeck 1993），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作为劳动的精神活动的模式（参见 Furth 等 1980；Arndt 1994b）。这个理性方案的批判性成就在于，将作用于各种直接统一体的整体观念分解为具体的、经过中介的各种统一体。与之相应的是科学哲学中对一种统一思维的自然主义预设——如名言“自然的统一”（v. Weizsäcker 1971）——的批判。这种自然主义没有认识到：“（1）物理学一经验研究的对象以一整套概念和技术为前提；（2）物理学理论的术语和逻辑是文化的成果；（3）技术的目标才……使人可能区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实验（由此才可能有个别经验命题的有效性）。”（Janich 1980，第529页）对劳动过程具体统一的回溯的建设性成就，本质上依赖于是否能成功地发展出一个关于统一的理性方案，避免相对主义的批评。这里有必要澄清精神劳动及其特有工具的性质，超越对劳动的隐喻用法并把握劳动特有的统一，但也有必要澄清最广义的“劳动”的身体维度，包括人类的再生产（繁衍与儿童抚养）以及体力和心

理的再生产，还必须注意到社会个体作为人格的统一体。

190 2.3 **统一和理性。**要回应对马克思理论粗暴的、政治的占用——无论占用是出于辩护的目的还是批判的目的——就只能将这门理论整合进一个理性构想的统一体中。这也要求批判吸收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达成统一的各门特殊科学的方法与结论。

2.3.1 与这个传统相近的还有奥托·诺伊拉特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创立的“统一科学”（Einheitswissenschaft）计划，“统一科学”要以物理学语言或者说“物语言”（Dingsprache）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建立自己的基础，即建立在日常语言中涉及物的可见特性与物之间关系的部分上（参见McGuiness/Schulte 1992；Saltzer 1990）。但与此相对，马克思坚持关于统一非纯粹形式的理解。计划的困难在于，它无法仅用哲学的工具实施，更无法由一个人单独实施。尽管如此，基于对落空的启蒙的理性批判，要求知识的体系统一，仍主要是无法缺少这种统一的各门科学的要求。

2.3.2 霍克海默批评这些科学是“工具理性”的代表——对自然的统治在工具理性中倒转成统治为了统治本身在主体上的内在化——质疑援引当然属于实证主义的特定科学。这个批评对应一种不仅在批判理论中，也在整个20世纪的技术批判和文明批判中广泛存在的对各种普遍性结构的不信任，这些结构变成了千篇一律、归顺，简言之，统治的同义词。赫伯特·马尔库塞（Marcuse 1967）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批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统一是“单向度”的。不同于波普尔（Popper）等人视哲学上坚持总体性为政治上极权主义的根源，批判理论则希望总体性的观念“证明与自身并存的非同一性，非同一性根据自身概念否定总体性”（Adorno 1966，第150页；参见Wahsner 1996）。这种非同一性本质上在于，普遍与个别在客体与主体关系中彼此分裂，在阿多诺看来，二者的同一今天只能是一个“谎言”（1969，第152页）。这样，同一性表现为对一个并不能和统一性看作一致的、远古神话般的“无区分”（第153页）的 191
延长。因此，非同一性指向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别，即具体的、从不同的环节出发来思考的统一性。相应地，霍克海默提出了精神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论预设这两个实体两极对立，还是把其中一个还原成另一个，都是不可取的”，这些做法反映了“所有哲学思考都面对的棘手状况”（《工具理性批判》[*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GS 6，第172页）。因而一方面，“两极中的

任何一极都必须借助抽象从另一极剥离；另一方面，它们的统一不能被理解和确定为一个给定的事实”（第 174 页）。不过，这也没有让后来的批判理论在主体与客体、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中重新系统地规定统一的定位，因为对于具体（以及具体统一）的哲学思考已经被视为同一化思维。相反，要做的是“拆解诸系统和系统本身……。此前系统想要加给个别部分的东西，现在只能在个别部分之内去寻找。……不要对具体进行哲学思考，而是从具体出发进行哲学思考”（Adorno 1966，第 43 页）。

2.3.3 批判理论的这个结果等于放弃概念（概念对黑格尔来说正是具体的统一），导致同样结果的还有强调不可扬弃的差异的解构方法对各种统一体的批判分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对米歇尔·福柯（Michael Foucault）来说，对各种所谓统一体的批判也没有消除统一的问题：“如果存在统一，那么它并不在已形成的要素的可见和横向的连贯性中；它完全在使要素可能形成并控制其形成的系统之内。”（1981，第 105 页）这里理解的统一是话语的“建构系统”。同样，批判理论不关心设定自为的统一体，甚或将统一实体化，但这里也不试图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具体统一，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有要让统一体独立的嫌疑。因此，德勒兹默认辩证法与它的柏拉图主义形式相同，在此基础上拒斥任何统一设想：“多样性不能指多与一的组合，而应当指一种专属于多本身的、绝不需要借助统一性来形成一个系统的组织。一与多是知性概念，它们形成了通过对立来运作的变质 192
的辩证法那过于宽大的网眼。”（1992，第 233 页）统一性在这里似乎是对存在的“单义性”的颠倒表述。

2.3.4 关于理性统一构想的讨论处在紧张关系的交错中：主观可实现的统一式微，同时对各种占支配地位的统一体的依赖性不断增长。面对差异坚持各种形式统一和反过来面对统一体坚持差异一样，都妨碍观察差异化与一体化的联系。具体统一性或者说具体普遍性应当如何理解的问题，处在一个历史的视域中，在这个视域中，具体统一不能被理解为在感觉里纯粹理性的统一，好像它产生于一个独立自主的理性。因此，统一问题首先是历史统一的问题，正是在历史统一中，理性得以建构并奠定了它推进统一的功能。此外，统一保存着一种实践的、政治—社会的维度，这个维度不能只通过回溯统一的理性构想来解决。不仅实施政治权力所必然的个人联合产生了内在的认同压力以及排他现象，而且全社会层面的民主决策——无论是

以怎样的形式——也不免出现上述情况，因为众多个人的协调只能"反事实"地假装为"无强迫"完成的（Habermas 1988，第103页）。自我规定，即众多个人的统一，与政治—社会的统一，二者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只能通过制度遏制，而无法消解。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5]1988; ders., *S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 Frankfurt/M 1969; A. Arndt, *Karl Marx.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bang seiner Theorie*, Bochum 1985; ders., *Dialektik und Reflexion. Zur Rekonstruktion des Vernunftbegriffs*, Hamburg 1994; ders., »Romantik der Arbeit. Perspektiven des frühromantischen Arbeitsbegriffs«, in: *Das Argument*, 36. Jg., 1994, Nr. 207, 883–96; ders. u. W. Lefèvre, »Poiesis, Praxis, Arbeit. Zur Diskussion handlungstheoretischer Grundbegriffe«, in: P. Damerow u. a. (Hg.) 1983, 21–34; P. Barth,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 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 Leipzig 1890; W. Beierwaltes, *Denken des Einen. Studien zur neuplatonischen Philosophie und ihrer Wirkungsgeschichte*, Frankfurt/M 1985; K. Bock u. H. Clairmont, »Grundlagen materialistischer Dialektik in der UdSSR und DDR«, in: H. Kimmerle (Hg.), *Modelle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Beiträge der Bochumer Dialektik-Arbeitsgemeinschaft*, Den Haag 1978, 242–72; M. Brie, »Die Erarbeitung der Konzeption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in: A. Brie u. a., *Philosophische Grundlagen der Erarbeitung einer Konzeption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88, 33–56; P. Damerow, P. Furth, B. Heidtmann u. W. Lefèvre, »Probleme der 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 in: Furth (Hg.) 1980, 234–80; P. Damerow, P. Furth u. W. Lefèvre (Hg.), *Arbeit und Philosophie. Symposium über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s Arbeitsbegriffs*, Bochum 1983; G. Deleuze, *Differenz und Wiederholung*, München 1992; K. Flasch, *Das philosophische Denken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86; M. Foucault,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 1981; P. Furth (Hg.), *Arbeit und Reflexion. Zur materialistischen Theorie der Dialektik. Perspektiven der Hegelschen Logik*, Köln 1980; ders., »Praxis der Philosophie-Arbeit und der Vernunftbegriff der Philosophie«, in: P. Damerow u. a. (Hg.) 1983, 3–19; ders., *Phänomenologie der Enttäuschungen. Ideologiekritik nachtotalitär*, Frankfurt/M 1991; K. Gloy u. E. Rudolph (Hg.), *Einheit als Grundfrage der Philoso-*

phie, Darmstadt 1985; J. Habermas, *Moralbewuss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M 1988; P. Hadot, K. Flasch u. E. Heintel, »Eine (das), Einheit«, in: HWPh 2, 1972, 361–84; D. Henrich (Hg.), *All-Einheit. Wege eines Gedankens in Ost und West*, Stuttgart 1982; ders., *Konstellationen. Probleme und Debatten am Ursprung der idealistischen Philosophie* (1789–1795), Stuttgart 1991; H. Hillermann u. A. Hügli, »Monismus«, in: HWPh 6, 1984, 132–36; W. Jaeschke, »Selbstbewusstsein. II. Neuzeit«, in: HWPh 9, 1995, 352–71; P. Janich, »Einheit der Natur«, in: J. Mittelstrass (Hg.),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Bd. 1*, Mannheim, Wien u. Zürich 1980, 529f; B. M. Kedrow, *Klassifizi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2 Bde.*, Köln 1975/76; P. V. Kopnin, *Dialektik-Logik-Erkenntnistheorie. Lenins philosophisches Denken—Erbe und Aktualität*, Berlin/DDR 1970;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 1986; W. Lefèvre, »Rechensteine und Sprache. Zur Begründung der wissenschaftlichen Mathematik durch die Pythagoreer«, in: P. Damerow u. W. Lefèvre (Hg.), *Rechenstein, Experiment, Sprache. Historische Fallstudien zur Entstehung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 Stuttgart 1981, 115–69;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Neuwied u. Berlin 1967; B. McGuiness u. J. Schulte (Hg.), *Einheits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92; G. Mensching, *Das Allgemeine und das Besondere. Der Ursprung des modernen Denkens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92; V. Oittinen, »Einheit/Vielheit«, EE 1, 643–47; D. Pätzold, *Einheit und Andersheit*, Köln 1981; H.-C. Rauh (Hg.), *Gefesselter Widerspruch. Die Affäre um Peter Ruben*, Berlin 1991; J. Rohbeck, *Technologische Urteilskraft. Zu einer Ethik technischen Handelns*, Frankfurt/M 1993; P. Ruben, »Über Methodologie und Weltanschauung der Kapitallogik«, in: *Sozialistische Politik*, 9. Jg., 1977, Nr. 42, 40–63; ders., *Dialektik und Arbeit der Philosophie*, Köln 1978; W. Saltzer (Hg.), *Zur Einheit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Darmstadt 1990;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J. W. Stali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38), in: ders., *Fragen des Leninismus*, Berlin 1970; G. Thomson, *Die ersten Philosophen*, Berlin/DDR 1968; R.Wahsner, »Totalität und Totalitarismus. Verschiedene Begriffe des Allgemeinen«, in: *Hegel-Jahrbuch 1995*, Berlin 1996, 236–42; J. G. Walch,

Philosophisches Lexicon, Leipzig 1775; C. F. v. Weizsäcker, *Die Einheit der Natur*, München 1971; M. Wolff, *Geschichte der Impetustheorie. Untersuchungen zum Ursprung der klassischen Mechanik*, Frankfurt/M 1978; M. Zahn, »Einheit«, in: *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 Bd. 2, München 1973, 320–37.

194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
（Andreas Arndt） 撰
阿思汗 译，曹旸 校

参见：

Aktionseinheit,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Aufklärung, Bewusstse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Zivilgesellschaft, Dialektik, Einheitsfront, Empirismus, Entäußerung, Erfahrung, Erscheinung, Extrem, Ganzes, Geist, Geistesgeschichte,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chichtsschreibung, Gesellschaft, Gesellschaftsformation, Gesellschaftsvertrag,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ch, Identität, innerer Zusammenhang, Kohärenz, Kommunikation, Leninismus, Luxemburgismus, Metaphysik, Monismus, Naturgeschichte, Ontologie,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Philosophie, Pluraler Marxismus, Praxis, Rechtssubjekt, Relativismus, Selbstveränderung, Selbstzweck, Spinozismus, Subjekt, Subjektwissenschaft, System, Totalität, Universalismus, Vermittlung, Vernunft, Volksgeist, Widerspruch, Wissenschaft, Zusammenhang

统一战线（Einheitsfront）

A: ǧabhat waḥda.

E: united front.

F: front uni.

R: edinyj front (единый фронт).

S: frente unido.

1920年前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在德国落空，列宁、保罗·列维（Paul Levi）、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egori Sinowjew）等德国和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同拟定了统一战线策略（参见 Reisberg 1971；Watlin 1993；Firsow 1987）。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统一战线策略被确立为必须遵循的线路方针，并被作出如下定义："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为了捍卫工人阶级最基本的切身利益，倡议共产党人与那些从属于其他政党或组织的工人以及所有无党派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资产阶级。"

(*Thesen*, 1922, 第 14 页)

统一战线以下述认知为依据：(1) 1914 年以来，德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分裂为改革派和革命派，这既是事实，也是历史必然；两派对社会主义终极目标的设想以及达成此目标要走的道路互不相容。(2) 但是，有一些共同的阶级利益和需求与所有劳动者相关，而且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达成目标。例如，工资和工作条件、反对福利的下滑以及资本的进攻、反抗军国主义和战争危机、抵御民主权利的削减和法西斯的危险。(3) 大多数劳动者在意
195 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受改良派的领导并且信任改良派。

根据统一战线的概念可得出如下结论：携手斗争以联合的组织和机构为前提，例如工会、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反法西斯的卡特尔防御组织、无产阶级反法西斯防卫组织。与政治党派不同，这些组织和机构必须将所有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包括进去。共产党人作为政治上更积极的一方，应当向社会民主人士提出共同行动的建议，并建议组织之间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他们承认改良派（仍然）领导着大多数工人。两派保留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之相关的辩论要以友好的、同志式的方式进行。共产党人不可放弃自己的夙愿，要说服大多数工人坚信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想法具有正确性和优越性。按照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民主—资本主义的国家中，赢取多数人的信任是发动革命的先决条件，而这建立在并肩作战的经历之上，在这些共同战斗中，改良派的工人们会感受到改良主义斗争的局限性，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共产主义的战友。

1922 年，列宁在《真理报》(*Pravda*) 上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了如下说明："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代表需要统一战线，因为他们希望从我们方面得到过分的让步，从而削弱我们；他们想不花任何代价就进入我们共产党的会场，他们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统一战线，因为我们希望使工人持相反的看法。……为了帮助这些群众同资本斗争……我们采取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且要把这种策略贯彻到底。"(LW 33, 第 320 页)

列宁明确地把统一战线策略限定在苏维埃势力范围之外使用，而这表明了统一战线策略纯战术的性质。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1922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2 日），他为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起草了一项补充性的、一致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就苏俄的特殊情况而言，统一战线

策略应当被拒绝："当大多数工人已经建立本阶级的即苏维埃的代表机关，而不
196 是'全民族的'即同资产阶级共同的代表机关，并且已经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时候，统一战线的策略当然就不能要求向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社会革命党'）之类的政党发出呼吁，因为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LW EB 1，第431—432页）

然而，从战略层面上看，统一战线也可以被归为辩证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改良主义的发展，现代工人运动之初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统一性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方向。在日常战斗中，统一战线会消弭这种对立。在统一战线的尽头，统一性会再度出现，而这种统一性基于更高层次的斗争经验以及大多数人对共产主义正确性的理解。

斗争意愿较弱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可能会反对。这种阻力可通过动员的方式来克服，共产党人以对方理解的方式提出建议，对他们施以影响、施加压力。统一战线策略与大众（下层）保持紧密联系，也与领导人（上层）保持紧密合作。

在魏玛共和国，统一战线的行动案例有：（1）1920年，德国共产党几经犹豫才参与其中的反对卡普政变的大罢工；（2）巴伐利亚中央党议员埃茨贝格尔（Erzberger）被谋杀后的示威游行活动（参见 Lukács 1921）；（3）1925年反对对贵族进行补偿（Fürstenabfindung）；（4）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PD[O]）一再敦促并邀请那些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大型组织参与抵御法西斯威胁的活动（例如，1932年6月1日和1933年1月30日）。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从1928年起）拒绝参与抵抗法西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AGDB）的领导人也同样拒绝抵抗法西斯。其他"中间地带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列宁同盟[Leninbund]、左翼反对派[Linke Opposition]、国际社会主义斗争联盟[ISK]）却支持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在战略和战术方面，德国共产党（KPD）和共产国际（Komintern）争论的要点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策略。1921年，随着"进攻论"（Offensivtheorie）的出现，极左的歧途出现了。在此之后，德国共产党党中央决定起草并持续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然而，在1924年初到1925年的第一次极左转向中，统一战线策略被抛弃了，德国共产党着手建立自己的工会。在1925年下半年，德国共产党再度迎来了一次不太坚定的转折，转向了以统一战线和工会团结（Gewerkschaftseinheit）为代表的"右"的政策。最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德 197

国共产党1928年11月举办的第二次党代会上，这一政策被彻底放弃。统一战线这一名称得以保留，但现在仅仅要求一种“与下层群众联合的统一战线”：改良派的工人应抛弃改良派的领导，和共产党人一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作战。要携手作战，他们就必须先和他们改良派的领袖断绝关系。这是在事实上否定了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这种否定与对世界形势的错误判断（紧迫的革命形势）有关，也与后来在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中被称为“头号敌人”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demokratie）有关。

1933年后，人们批判德国共产党放弃了统一战线策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ff）批评得尤其多。但是，风向转向了另外一边：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人民阵线策略（Volksfronttaktik），这一策略从右的角度否定了统一战线策略，就像“与下层群众联合的统一战线”是在左的意义上的否定一样。围绕着工人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诉求，统一战线策略把他们组织了起来，它展现出来的力量就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社会上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Mittelschichten）。与之相反，人民阵线的方案则面向小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以期与之结盟。在这一方案中，出于对盟友（利益）的考虑，阶级诉求则被搁置一旁。

与各国官方共产党长期持有的观点相悖，下述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以及法国工人阶级同时陷入瘫痪，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咎于人民阵线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是因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1935年前后，在与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势力的联盟之后，苏联领导人就把目光转移到了共产国际在西方各国的分部。然而，共产国际各分部事实上的善意倡议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直到1940年，英国（的领导人）和（法国的）戴高乐才意识到，轴心国正在威胁两国各自的生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统一战线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仍然争取与民族小资产阶级（即不愿意与日军媾和的那部分资本主义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然而，这些努力获得的成果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正如农民军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之间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统一战线是很受欢迎的。正如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回忆的那样，只要工人运动的斗争行动是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被呼吁的，那么参与其中的人数就会急剧上涨。尽 198
管布莱希特和艾斯勒（Eisler）创作的统一战线之歌（“只因为他也是人/他不

喜欢被皮靴欺凌"）针对的是"与下层群众联合的统一战线"，但也能让人感受到统一战线具有的基本的政治一伦理魅力。

1945年，德国资产阶级战败。在德国仅存的部分地区，劳动人民强烈希望归纳1933年不战而败的教训，团结社会主义者（布痕瓦尔德宣言、诸多城市中的反法西斯行动委员会、施瓦岑贝格共和国），消除共产主义的极左变形以及改良主义。占领德国东部和西部的大国禁止了这些自发的成立行为，并且给那些愿意服从他们的旧的、大的工人党派颁发了许可证（参见 *Arbeiterinitiavive* 1976）。

在资本主义的占领的三个西部区域，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重拾反共路线；在苏维埃占领的区域里，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仓促地强制合并在一起，而这就使得统一战线的方针失去了价值。对于改革主义而言，一旦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方案在左的方面争夺霸权，统一战线就会再次成为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Ein Leben in der Arbeiterbewegung*, Frankfurt/M; *Arbeitereinheit rettet die Republik*, Frankfurt/M 1970; *Arbeiterinitiative 1945. Antifaschistische Ausschüsse und Reorganisation der Arbeiterbewegung in Deutschland*, hgg. v. L. Niethammer, U. Brosdorf, P. Brandt, Wuppertal 1976; H. Bendarek, *Die Gewerkschaftspolitik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fester Bestandteil ihres Kampfes um die antifaschistische Einheits- und Volksfront zum Sturze der Hitlerdiktatur und zur Verhinderung des Krieges (1935 bis August 1939)*, Berlin/DDR 1969; G. Dimitroff, »Die Einheitsfront und der Vorstoß des Kapitals« (1923), in: *Gegen Faschismus und Krieg.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Leipzig 1982, 5–9; ders., »Die Einheitsfront und die bürgerliche Reaktion« (1923a), in: Dimitroff 1982, 10–13; ders., »Einheitsfront oder Zusammenbruch der Klassen«, in: Dimitroff 1982, 14–29; ders., »zur Vorbereitung des VII. Welt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1934), in: Dimitroff 1982, 35–37; J. A. Elfond, *Kommunistischesjieje partii w borbe sa jedinstwo dejstwij robotschego klassa*, Moskau 1963; F. I. Firsow, »K woprossu o taktike jedinogo fronta w 1921–1924« in: *Wroprossi istorii KPSS*, Nr. 10, 1987, 113–27; J. v. Freyberg, *Aktionseinheit—SPD-Linke vor der Alternative*, Köln 1972; KUO, Heng-yü,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n Kuomintang 1924–1927, Paderborn 1979; ders., *Maos Weg zur Macht und die Komintern. Am Beispiel der Bildung der »Antijapanischen Einheitsfront« 1931–1938*, Paderborn 1975; G. Lukács, »Die Einheitsfront des deutschen Proletariats« (1921), in: ders., *Organisation und Illusion. Politsche Aufsätze III*, 1921–1924, Darmstadt-Neuwied 1977, 56–61; J. L. Moltschanow, *Kominern u istokw politiki jedinogo proletarskogo fronta*, Moskau 1969; W. Pieck, *Im Kampf um die Arbeitereinheit und die deutsche Volksfront*, Berlin/DDR 1955; A. Reisberg, *An den Quellen der Einheitsfrontpolitik*, 2 Bde., Berlin/DDR 1971; J. Schleifstein, *Die ›Sozialfaschismus‹-Theorie*, Frankfurt/M 1980; A. Thalheimer; »Zur Dialektik der Einheitsfronttaktik«, in: *Gegen den Strom*, 3. Jg., 1930, Nr. 52, 745–56; ders., *Wie schafft die Arbeiterklasse die Einheitsfront gegen der Faschismus?*, Berlin, 1932; ders., *Was will die KPD-Opposition? (Plattform)*, Berlin 1930; E. Thälmann, *Wie schaffen wir die rote Einheitsfront? Thälmanns Antwort auf 21 Fragen vor SPD-Arbeitern*, Berlin 1932; *Thesen und Revolutionen des IV. Weltkongresse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n. Moskau 5. November-5. Dezember 1922*, Hamburg 1923; A. Watlin, »Die Geburt der Einheitsfronttaktik. Die russische Dimension«, in: ders., *Die Komintern 1919–1929. Historische Studien*, Mainz 1993, 45–72.

199

特奥多尔·贝格曼
（Theodor Bergmann） 撰
李之 译，李靖新弘 校

参见：
Aktionseinheit, Antifaschismus, Brandlerismus, Bündnispolitik, chinesische Revolution, Einheit,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Linksradikalismus, Linksunion, Reformismus, Sozialfaschismus, Spaltung, Taktik, Volkseinheit, Volksfront

收入（Einkommen）

A: dahl.

E: income.

F: revenu.

R: dochod (доход).

S: ingresos.

—

收入与生活方式，对文化的参与以及对商品和享乐的兴趣紧密相连。收入

分配关系体现了社会的福利分配，这导致了不同类型收入者之间不断的斗争。关于收入的理论也特别地向权力和利益领域推进。“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也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中如此嘲讽道（MEW 23，第16页）。

1. 重商主义思想发现了现代的收入：资本收益，即所谓的“资本租金”“地租”等；利息，即借出的钱或工资产生的额外增值（North 1691，第51页）。资本收益作为贸易利润被发现，并被解释为溢价的结果。重商主义者尚未对收入问题作为社会分配问题感兴趣，而对其作为资本形成以及促进资本形成的问题感兴趣。在此背景下，利率政策的问
200 题被讨论起来。高利率被视为缺乏资金的迹象。只有像在荷兰那样的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才有可能被预期。为了促进出口业，从而促进“人民的富裕”，商业领域的工资成本应保持尽可能低的水平（参见Hofmann 1971，第21页；Blaich 1973，第85页；Gömmel/Klump 1994，第131页）。在英国，那些为工资而工作的人被称为“劳动穷人”——他们的工资很难保证基本生活。对穷人的援助被拒绝了，否则他们就不会再去工作。因此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704年在他的讽刺小册子中给出了“施舍并非仁慈，雇佣穷人是国家的弊病”（*Almosen sind keine Wohltat, und die Beschäftigung der Armen ist ein Übelstand der Nation*）的标题（引自Polanyi 1944，第143页）。

1662年，威廉·配第（Willam Petty）率先将工作作为价值的产生，与收入理论联系起来。他将“自然和真正的地租”——对他来说，是财产收入的实际形式，也就是“每年的使用权（*usus fructus per annum*）价值”（第52页，第54页）——理解为最初的自然劳动剩余形式。重农主义者的学说基于国民经济附加值；这样就可以将所有收入汇总为较大的社会总量。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在《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8）中指出，租户阶层是唯一产生净收入的阶层。土地所有者（贵族、教士、皇室）是这笔仅有的可支配收入的受益者，这也是在不妨碍扩大再生产机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库中提取的唯一收益。这样就可以增加公共收入，这是当时法国经济政策探讨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收入理论占有重要地位。工资不仅表现为生产成本的要素，而且还首次被视为分配变量，并对地租和利润之间复杂的相互

依存关系进行研究。同时它们标志着社会冲突，所有工资问题都置于这些冲突之下。斯密认为，工人必须“将整个劳动产品……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享”（*Reichtum I*，第 65 页）。工人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赚取，企业主们希望尽可能少地给予”（第 86 页）。除了将工资视为剩余收入外，斯密还认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供求关系。此外他还用工资基金理论论证，“工资额只能与打算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第 90 页）。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der Besteuerung*）里假设，人口增长将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进而导致更高的基本养老金和工资上涨。因此，随着投资的增加，社会产品中的利润份额变得越来越小，并且利润率趋于下降。同时缺乏投资动机，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他“通过整个著作致力于表明”，无论如何“通过减少花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来长期降低工资……”必须实现（第 113 页）。

在斯密和李嘉图看来，资本和资本利润被视为统一的类别，不取决于它们在商业和农业生产之间，贸易、运输和货方之间的分配如何（参见 Hofmann 1971，第 73 页）。直至后来者，如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1825）、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836）以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8），才开始将资本利润分解为单独的要素——尤其是利息、风险溢价和企业主收入——并分别进行解释。

2. 对于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是利润和地租共同的“物质实体”（*K III*，MEW 25，第 830 页）。他按照经典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将收入分为三种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阶级：工人阶级 / 工资，资产阶级 / 资本利润和利息，地主 / 地租。与之相反，马克思认为现在雇佣劳动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中心，因为所有的社会经济类别都可以从中派生出来，所有其他阶级也都与此有关（参见 Mauke 1970，第 57 页）。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作为社会的价值盈余，它以利润和以贸易利润、利息、租金利润、租赁、税收等形式从中获得的收入流向私人和公共收入接收者。剩余价值是“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后者除利润和地租外还包括工资（MEW 25，第 848 页）。各种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的总和，即新价值（v + m），是产品总价值（c + v + m）的一部分，该总价值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转移的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这种双重结果，即新价值的产生和已经存在的价值

202 的转移，是商品生产工作的双重特征的结果：作为抽象劳动，它创造了新价值；而作为具体劳动，它转移了已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参见23，第214—216页）。一年中创造的国民经济新价值，即国民收入，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单个产品中包含的新价值的总和（参见 Müller 1987，第162页及以下）。“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K III*，MEW 25，第848页）

对于马克思来说，利润是与个人资本价值相关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K III*）中分析了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的利润分配。通过将“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让“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第383页）。当工业的利润率趋于相互平衡时，农业享有的“剩余利润”转化为地租。马克思根据历史上从中产阶级的地租收入到劳动收入、生产收入和租金的各个阶段，推演出资本主义地租。

除了这三个阶级的年收入，即其原始“收益”（第830页）之外，还存在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衍生的收入这一结构。它们不是直接由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关系产生的。它们产生于比如收益重新分配中的“国家干预”（MEW 23，第587页）。这样税收改变的“只是比例”，资本家必须自己获得剩余价值或与他人分享（第544页）。

埃娃·米勒（Eva Müller）、
冈特·维林 撰
宋珊 译，唐娇 校

二

对于马克思来说，衍生收入是指所有通过剩余价值分化而产生的收入。继斯密之后，在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的背景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特别讨论了关于“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的收入的争论，其通过“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是资产阶级所必需的（MEW 26.1，第259页）。马克思观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是如何按寄生方式攻击它的，而统治阶级将“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第145页）。马克思认为，塑造资产阶级社会并使其稳定的直接推动 203
力从形式上“像罗西这样的‘精神的’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从物质生产中取得的那个巨大的份额辩护”（第267页）。特别是，从执政的立场来看，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被合理化为“国家的安全、安定和保卫”（第238页）的报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814）“给各种非生产劳动”“发明”了“一个

新名称”——“生产非物质产品”(productifs des produits immatériels)。萨伊的见解是:“音乐家、教士、官吏。”(第238页)(此处萨伊的见解是指:“一个国家有许多音乐家、教士、官吏,可能有很好的娱乐,精通宗教教义,并且治理得非非有条;但不过如此而已。国家的资本不会由于这些人的劳动而有任何直接的增加,因为他们的产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了。”——译者)马克思用这个海涅(Heine)式的笑话指的是这些立场的代表维护其相对较高收入的辩护话语。正如昂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1823年所说:医生生产健康,道德家生产道德,等等。马克思反驳道:“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第258—259页)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斯密的划分:1. 是将工作交换为(a)个人收入还是(b)工资,是否通过将(b)及其酬劳用于他人的服务而转换为资本,或者(a)是否仅限于个人使用;2. 是否固定在商品中。“无论‘纯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妓妇身上,还是花在油炸馅饼上,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第183—184页)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确定收入和支出的类型,它们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表现出“物质”或内在的本质,以及确定由此产生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工作之间的区别。

综上所述,可以说马克思虽然将收入关系作为所有权关系来分析,但并不是作为客观既定关系的机械表述,而是不断争论的结果。把意识形态阶层的收入和“混蛋官吏的收入(是)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第206页)列入其中,表明收入分配不仅要从生产的角度出发,还必须全面地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社会关系整体再生产的角度出发。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宋珊 译,唐楠 校

参考文献:

F. Blaich, *Die Epoche des Merkantilismus*, Wiesbaden 1973; R. Gömmel, R. Klump, *Merkantilisten und Physiokraten in Frankreich*, Darmstadt 1994; W. Hofmann, *Einkommenstheorie. Vom Merkantilismus bis zur Gegenwart, Sozialökonomische Studientexte 2*, Berlin/W 1971; M. Mauke, *Die Klassen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 Frankfurt/M 1970; J. R. McCullo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1825; J. St.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1848; E. Müller, *Der Nationalreichtum*, Berlin/DDR 1987; D. North, »Abhandlung über den

Handel« (1691), in: K. Diehl, P. Mombert (Hg.), *Ausgewählte Lesestücke zum Studiu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Neunter Band. Freihandel und Schutzzoll*, Karlsruhe 1914, 48-67; W. Petty, »Eine Abhandlung über Steuern und Abgaben (1662)«, in: W. Görlich (Hg.), *William Petty. Schrift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Statistik*, Berlin/DDR 1986, 9-108;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Ursprünge von Gesellschaften und Wirtschaftssystemen* (1944), Wien 1977; F. Quesnay, »Tableau Économique (1758)«, in: ders., *Ökonomische Schriften. Band I, 1756-1759*. Erster Halbband, hgg. v. M. Kuczynski, Berlin/DDR 1971, 337-448; J. B.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2. Bde., Paris ^{2}1814; N. W. Senior, *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36; H. Storc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Paris 1823.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rbeit, Arbeiterklasse, Arbeitslosigkeit, Armut/Reichtum, Bauern, Bourgeoisie, Distribution, Geld, Genuss, gerechter Lohn, Gewinn, Grundrente, Kapital, Kapitalistenklasse,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Lohn, Lohnarbeit, Mehrprodukt, Mehrwert, Pächter,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Profit, Staat, Zins

寂寞（Einsamkeit）

A: wiḥda.

E: solitude, loneliness.

F: solitude.

R: odinočestvo, uedinenie (одиночество, уединение).

S: soledad.

寂寞作为个人和社会问题是一种现代现象。尽管孤寂的感觉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但它的现代含义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才出现的。从1300年左右开始，由于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迅速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关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孤立化形成了普遍的孤独经历的环境。常见的反映方式既有对过去共同性的浪漫化，也有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存在形式的“寂寞与自由”（洪堡）的理想化（参见 Schelsky 1963，第68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必须从对其社会起源的分析开始，既需要克服寂寞作为行动能力条件的团结的必要性，也要列出存在的

规范的解除以实现寂寞。

205 1. 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结构都具有一种不可置疑和不可支配的万物秩序的特征，这被年轻的卢卡奇理想化为“自发的整体”（1920，第 21 页）。它形成了一个等级化的“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每个人都知道他或她的位置。为此，马克思用了一个术语“自然产生的统治”，即现代社会学中的“分层分化”（参见 Luhmann 1987，第 264 页）：上层，无论是唯一的统治者、贵族阶层还是宗教统治阶层，对于下层阶级而言都是决定性的，而整个共同体生活都具有等级特征。在这种结构中，唯一一个可能寂寞的人就是最顶层的人。由于疾病或惩罚而被排斥在共同体生活之外的人们不能在该词的现代意义上被描述为寂寞的人。将这些人与他们的共同体联系起来的生活纽带被切断了，他们在社会上是不存在的，并且从根本上而言已经死亡。然而，在宗教领域，自由选择的（并被社会所接受的）从“世界”中撤出，也就是说社会绝对有可能在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义中宣称“隔离”，其中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纯粹……质朴与……永恒”（引自 Emmel/Dierse 1972）。在现代的寂寞中，这个共同体在孤寂中消失了。

在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职能分化）中，自治、教育，以及人们为改善自身社会地位而展开的竞争，代替了牢固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消失可以被体验为有传统保证的安全和自然产生的团结的消失，因此也可以被体验为个人从社会整体的异化。但是，这种消极的含义伴随着积极的含义。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对寂寞（*solitudo*）的积极方面进行反思。彼特拉克（Petrarca）是第一个对于与统治世界和——变得越发具有支配性的——商业的分离持积极观点的人。个体有权退出等级制结构，不仅为了服侍上帝，而且为了独处，“孑然一身”，以便从远处获得对世界客观的看法。

在 17 世纪的英国，努力克服封建关系的亚伯拉罕·考莱（Abraham Cowley）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就撰写了 206
有关寂寞的文章。政治方面的诱因是以传统秩序的代表即皇室和教会为一方，议会和清教徒为另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事物的神圣秩序在众多人的意识中瓦解，一方面导致了直接经历分离，另一方面造成人们往往逃向寂寞或隐居。然而，后者激起了负罪感，因为这种逃遁否认了社会责任。考莱就是这种观点的一个代表。在对斯多亚派道德价值的寻求中，他并未找到真正的不动心，他以具有清教特征的意志对那些价值做了调整，即用社会性的个体主义取代了封建的家长

作风。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寂寞理解为教育和学习的一个短暂时间，贵格会的领袖威廉·佩恩在《反思与格言中的孤独的果实》（*Fruits of Solitude in Reflexions und Maxims*）中就这样认为。

在18世纪，约翰·格奥尔格·齐默尔曼（Johan Georg Zimmermann）在德国撰写了四卷关于寂寞的著作，代表了类似一种适应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寂寞感。他认为，这是文明人的特权，他们可以占用一些时间为自己的社会职责做准备。在18世纪的德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总体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这一思考至关重要。

在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成功建立受到了威廉·冯·洪堡（Wilhelm v. Humboldt）的影响："大学的任务就是让人通过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能发现的东西即对纯粹学术的认识。最原始的理解对这个自我认识来说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从这两者之中产生出大学整个外在的组织机构。"（《立陶宛的教育计划》[*Litauischer Schulplan*]，1809）1963年，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在"寂寞与自由"的口号下提出了与"大众大学"相反的构想，并将洪堡的大学观点称为联邦德国的榜样："它的社会宗旨即坚信，在社会性的寂寞并且具有资产阶级以及精神自由的生活方式中，在对自身和世界的哲学沉思里提升自己的人的生活必将取得规范性的基本一致。"（第68页）

作为对唯心主义的回应，寂寞的概念转移到了感觉和主观性领域。叔本华（Schopenhauer）的意志哲学就是这种范例，它与理想主义的理性希望保持着距离，却坚持了无世界的主体。基本的悲观情绪与远离社会并进："能够自得其乐，感觉到万物皆备于我，无疑是构成幸福的最有益的特征。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SW IV，第500页） 207

索伦·克尔凯郭尔（Sören Kierkegaard）将寂寞解释为一个既无法与同胞沟通，也无法接受信仰的人的绝望。但是"对寂寞的渴望是精神在一个人体内的标志"（*Krankheit*，第62页）。从中表达出克尔凯郭尔试图从"世界痛苦"和他那个阶级的"市侩的"（第39页）舒适感中逃脱。在与归因于（德国）体系哲学和日益肤浅的基督教的大众化进行斗争的同时，克尔凯郭尔激化了现实经验的个体化。他的寂寞就是徘徊在信仰门前的寂寞。要通过美学和伦理获得信仰，必须有一个"飞跃"；这种飞跃需要积极的、创造性的寂寞来调动讽刺和幽默感（参见 *Furcht*，Problem III）。

对于尼采来说，寂寞似乎是对"伟大诅咒"的理想选择："具有较高哲学

性的人自认为孤独，不是因为他想一个人，而是因为他无法找到与之匹敌的人：今天，那些危险和新的痛苦对他来说已经消失，在那里人们已经知晓荒废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因此不尊重和不理解寂寞！”（*Wille zur Macht*，MA 19，第 329—330 页）后期信件的主题是“缺乏……爱，荒谬的孤独，随之而来的是几乎所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残余都只会成为创伤的一个原因”（an Overbeck，3. Febr. 1888）。

在 20 世纪的对话哲学和神学中，例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反对绝对地依赖这种寂寞的实体化和理想化。“布伯指出，哲学史上寂寞难度的增加，这通过奥古斯丁（Augustinus）、帕斯卡尔（Pascal）和克尔凯郭尔，后来到尼采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不能再因寂寞违背神圣的形象与之背道而驰’，而海德格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从‘现实生活’中，即你与他
208 人的关系中脱离出来。”（Emmel/Dierse 1972，第 412 页）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尤其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在他的人类学对神学的批评中，他对宗教瓦解的可能影响提出了质疑，宗教瓦解使个人完全回到了自己身上。由于这个原因，他将“他人”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哲学重点，预见了布伯和列维纳斯（Levinas）的思想。

2. 尽管马克思讨论了疏离和具体化等相关术语，但他从未直接将寂寞作为主题。但他在理论和实践中遵循“**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KHR*，MEW 1，第 385 页）。马克思对待资产阶级个人的态度类似于费尔巴哈，他们需要靠自己而必须在没有上帝和宗教的情况下生活。与这种情况和本世纪的寂寞哲学不同，马克思在个人与自己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并不假定形而上学或非历史人类学的恒定性。他允许在社会关系中建立人类的本性（*ThF* 6）。这是他的爆炸性提法之一，因为这些关系与所有权（“十分之九”的居民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写道，MEW 4，第 477 页）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尽管大多数现代哲学家在寂寞观念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绑定在一起，但马克思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工人阶级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eil II，第 474 页及以下）中以讽刺的方式描述资产阶级的生活，以及他的无聊（“Trägheit”，第 477 页）和与通过竞争产生的孤立，这不仅停留在市场的范围内，而且渗透到私人生活中。无论（资产阶级）个人还是无产阶级个人，都首先是社会关系体系的“产物”。这样，它们的生产，即社会的孤立就占据了寂

寞的理论位置。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其起源不是（或多或少的）自由竞争，而是可以被称为整个阶级的“奴隶化”（参见MEW 4，第473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谈及无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它被生产组织所割裂。

209 假设无论是阶级还是个人，人类的认同在工作中被发现，“寂寞”就是工作关系中明显的异化结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摘录了马克思关于分工的主题。在前现代社会中，工作是集体生活的一部分。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与土地和其他“家庭经济”情况的联系发生了急速变化。新的生产过程需要公共的工作岗位，工人们虽然在一起工作，但却是孤立劳动的：通过分工进行合作（参见MEW 23，第371—379页）。

因此，不同的角度汇聚在一起，产生了寂寞感：人们被迫通过部分行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的生活领域与工作场所被分开，工作被划分。工人与生产、产品、同事以及他本人都疏远了（参见MEW 40，第512—520页）。他的“寂寞”与资本主义工作剥削直接相关，并且受制于生产剩余价值的制度的硬性要求。这就要求相对立的阶级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中相互合作。同时，这些约束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被诸如“自由”和“自由的选择”之类的概念掩盖，它们将资产阶级的寂寞话语归纳为生存哲学。

与之相反，马克思指向了一个阶级，在其中，他独自看到了解除寂寞的异化产物的可能性。《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已经说明了这点。目标是使工人从孤立和寂寞的位置中解放出来。就其本身而言，这已经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因为“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们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Manifest*，MEW 4，第473—474页）。无产阶级个体不再接受他和他的同伴被迫进入的位置，包括他们的依赖。这是革命道路上的第一步。对保守的、浪漫的集体生活的渴望对于现实情况来说不是 210
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生产关系的变化与人际关系的变化结合起来。因此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团结在一起。”（MEW 23，第320页）

3. 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基石，但不足以解释现代个人的寂寞感。还必须从传统关联中释放的角度来看待

它。这是一个在不同阶级中以不同方式发生的过程，但是最终没有人能够从中逃脱。

鉴于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人类的命运》（*Condition humaine*），瓦尔特·本雅明将寂寞描述为中国内战中资产阶级的但又是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一种模式："这种智慧已经脱离他们的阶级，使无产阶级事业成为他们自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已经接受了他们。它并没有。……他们为无产阶级而生活。但他们并不作为无产者行事。至少他们出于阶级意识的行为要比出于寂寞意识的行为少得多。这就是这些人没有摆脱的痛苦。这也构成了他们的尊严。'没有基于痛苦的尊严。'痛苦是孤独的，并靠近它所产生的寂寞。"（GS II.2，第 800 页）在这里，尼采颠覆性地重新诠释了寂寞的英雄主义：他的苦难不是指过去的统治，而是驱使他为未来的自由而努力。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假设，建立这种自由的可能性在原则上或至少很长时间以来都变得不可能，这使得针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或美国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工人的反对派智慧关系变得棘手："就连社会主义最令人尊崇的行为——团结也患病了。"人们"已经相信，政党有千余只眼睛，仿照早就晋升了的工人队伍而成为穿制服的管理者，要比实际上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更为强大"（1951，第 58—59 页）。因此，"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坚不可摧的寂寞感是他仍然能够证明团结的唯一形式"（第 22 页）。这并不是最后的言语，孤独也可以理解为激活，即指在每次团结中都应捍卫的主张，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如此明确指出。他谈到"寂寞的 211
权利"（这也可能成为诅咒）。没有沉默就没有自由的社会，没有自由得以展开的内在和外在的寂寞领域（1968，第 56 页）。

君特·安德斯在消费和媒体社会中谈到了没有自我的个体——"大众隐士"。其他人将在全面"布线"条件下的大量孤立化现象描述为"非交流"系统。具有文化批判性的"晚期马克思主义"（Jameson 1992）对于指出克服寂寞只是退化的立场做出了贡献：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量孤立个人，"主体的消失"的后现代言论仅表示对抗可能性的消失，寂寞问题就自行解决了。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M 1951; M. Buber, *Das Problem des Menschen*, Zürich 1947; A. Cowley, »Of Solitude«, in: A. B. Gough (Hg.), *Abraham*

Cowley. The Essays and Other Prose Writings, Oxford 1915, 129–37 u. 308–25; H. Emmel/U. Dierse, »Einsamkeit«, HWPh 2, 1972, 407–13; F. Jameson, *Spätmarxismus. Adorno oder Die Beharrlichkeit der Dialektik*, Berlin-Hamburg 1992; S. Kierkegaard, *Furcht und Zittern* (1843), übers. v. L. Richter, Frankfurt/M 1984; ders., *Krankheit zum Tode* (1849), übers. v. L. Richter, Frankfurt/M 1984; 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M 1987; G. Lukács, *Theorie des Romans. Ein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r Versuch über die Formen der großen Epik*, Berlin 1920; H. Marcuse, *Revolte, Anarchismus und Einsamkeit*, Gespräch mit L'Express (1968), Zürich 1969; F.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Drittes und Viertes Buch*, in: Musarion-Ausgabe, Bd. 19, München 1926; W. Penn, »Some Fruits of Solitude in Reflections and Maxims«, in: C. Eliot (Hg.), *The Harvard Classics*, New York 1903, 385–416; F. Petrarca, *De Vita Solitaria* (1346); D. Riesman, *Die einsame Masse*, Reinbek 1958; H. Schelsky, *Einsamkeit und Freiheit. Idee und Gestalt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und ihrer Reformen*, Reinbek 1963; A. Schopenhauer, *Aphorismen*, SW IV, Frankfurt/M 1963; J. G. Zimmermann, *Über die Einsamkeit*, 4 Bde, Leipzig 1784–1785.

汉斯·D. 范·霍格斯特拉滕
（Hans D. van Hoogstraaten） 撰
宋珊 译，唐婧 校

参见：

Angst, Arbeiterklasse, Arbeitsteilung, Aufklärung, Ausbeutung, Bild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Egoismus, Eigentlichkeit, Eigentum,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ntfremdung, Enttäuschung, Erfahrung, Existenz, Existenzialismus, Flaneur, Freiheit, Gemeinschaft, Handlungsfähigkeit, Herrschaft, Idealisierung, Ideologie, Individualismus, Klassenkampf, Kooperation, Kulturkritik, Leid, Lohnarbeit, Menschenbild, Moderne, Postmoderne, Proletariat,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Romantik, Solidarität, Verdinglichung, Verzweiflung, Wille

个别、特殊、一般（Einzelnes, Besonderes, Allgemeines） 212

A: fardī, ḫāṣ, ʿām.

E: single, particular, general.

F: singulier, particulier, général.

R: otdel'nost', osobennost', vseobščnost' (отдельность,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всеобщность).

S: singular, particular, general.

自古希腊时代以来，个别、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就成为哲学的疑难问题的标准。它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系统地阐述——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和20世纪哲学讨论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1868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找到马克思对此理解的关键段落："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即'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私人财产（Sondereigen），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MEW 32，第52页；参见Höll 1988，第7页及以下）这与洛克特别提出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洛克认为，通过特殊和个别的抽象来强调和记述而获得的作为思想抽象的一般不具备客观存在。在这方面，个别、特殊和一般的辩证法被简化为概念抽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从而将现实理解为个别与个体对象的直接存在的整体。当要检查发展整体的发展过程时，就会发现这种理解的局限性。

1. 在经典的德国唯心主义中，与洛克对于一般的观点传统以及使之毁灭的本体论结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距离，特别是以康德设计的"整体逻辑"作为一种思考方式，有利于对一切形式的存在和思想的过程性见解。这里要解释的是，在概念和直接经验的二分法（由康德自己设定）的前提下，经验的特殊可以与概念的一般性相匹配（特殊对于理解是偶然的，不能从中得出）。假设自然适宜人类的认知能力的目的性，作为反思性判断的超验论原则，"**自然规范法**（*Gesetz der Specification der Natur*）考虑到其经验法则"意味着特殊的"偶然合法性"（*KU*，B，第186页）。一般和特殊被促成，形成一个具体的同一性，一般的认识问题就变成了多样性中的统一认识的问题。 213

在康德对自然目的的思考中，这个新问题变得更加清晰：这样的整体观点被认为是思考可能性的"直觉判断"的特征；这种"综合性的一般"并不像"分析性的一般"那样，在不考虑所有差异的情况下，并没有表达特殊的认同状态，而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概念包括了特殊（多样性）的丰富性。康德关于有机体是"自我组织"的本质的观点也包含了由其决定的"部分"，一般成为特殊的本质（*KU*，B，第405页及以下）。

黑格尔在康德之后继续推进了一贯

追求的关于一般与特殊（个别）具体同一性的观点。对他而言，所有事物都是“判断”，“即它们是具有**一般性**或内在性的**个别**”（*Enz*，§ 167）。在判断类型的顺序中，一般被首先确定为抽象的、感性的普遍性，然后被确定为一般性（共同性或反思一般性），再后来被确定为种类和方式，最后被确定为已发展的概念一般性。黑格尔在此不仅区分了一般的不同形式，而且还互相推导了它们。这些形式中的每一个都有相对的合理性，并在更具体的形式中作为辩证地扬消的要素出现。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联系起初是突然的、偶然的；随着一般的确定，它变得更加可交流和必要，抽象的一般变成了具体的一般。

根据黑格尔的说法，这一概念的具体一般性通过基于事实的相互内在的必要性体现，表明它的要素，即一般、特殊和个别。它们是一个或同一个整体和概念的各个方面。一般是同一性的、与自己平等的一方面（要素）；特殊是差异的要素，并且在同一性中表达了内在的差异；个别是这两方面的统一，是一致与差异的同一性。因此，一般、特殊和个别与对同一性、差异和基础的反思决定相同，但与本质的逻辑相反，它们具有相互的内在性。在伯恩哈德·莱克布林克（Bernhard Lakebrink）的表述中，“绕成一团的”这一概念的要素（1985，第 77 页）在生命或有机体的概念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内容。

根据经验主义，个别、特殊和一般仅在其范围上有所不同，但对于黑格尔而言，与经验主义思想相反，在《精神现象学》（*PhG*）中，个别是一般和特殊极端之间的调解。由此也可以得出，每个与特殊和个别相对的一般或多或少都是抽象的和单方面的。因此，除了它的理解性概念（思想）之外，连同其简单性（“开端”）的开始——自在，该概念在其一般性上只是抽象的，尽管相对于“空”概念而言是具体的。“简单的概念”，“仍然以其**简单性**掩盖的整体或一般原因”（*PhG*，W 3，第 19 页），是抽象的；只有随着发展，它的差异的分化和确定才成为具体的东西，只有在具体的整体上，一般归根结底才有其“真实”和“现实”：“但是普遍性本质上是具体的——这就是**整体性**——只有真理才是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W 11，第 452 页）

2. 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一般的观点的批评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HS*）。他指责其把概念变成对待的主体。通过“二元论”，一般“没有被视为真正有限的真实本质，即现存的、确定的或真实的本质没有被当作无限的**真实主体**”去理解（MEW 1，第 224—225

页；MEGA I.1，第25页）。像黑格尔一样，“理解”并不包括“重新认识逻辑概念的确定”，而是“掌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第296页；第101页）。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以苹果、梨等为例，与黑格尔一样，解释了从现实的果实中如何形成“‘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而这反过来又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也就是被解释为它们的“实体”。由于这种抽象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因此以“思辨的、神秘的方法”将其抛弃，据此，“果实”应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能动的本质”，作为苹果等存在：“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
215 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把单个的果实都消溶于自身中，又从自身生出各种果实。”（MEW 2，第60—61页）

金德里奇·泽列尼（Jindřich Zelený）认为这是“简化通用措辞”，是出于“修辞新闻”的争论（1968，第212页）。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那么实际上只不过是说，一个自我发展的整体的概念不能应用于“抽象一般的观念”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较少针对黑格尔的有机主义概念，而是针对其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联系的概念（MEW 1，第261页及以下）。

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s 44*）中提出了通过个人的活动构建一般（社会的）想法，尽管这是在费尔巴哈的类概念的范围之内：“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MEW 40，第537页；MEGA I.2，第264页）人们应该“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第538页；第267页）。个体的生命表现，其内容和存在方式上是社会性的，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正如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在科学活动的基础上解释的那样（同上）。事实证明，“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而且人总是特殊的个体（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作为“类意识”，特殊的个体以理想的方式成为社会的总体：普遍和特殊作为思维和存在对立，虽有“区别，

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第539页；第268页）。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劳动构成了人类本质普遍性的基础。意志、意识、语言是“类特性”的衍生形式，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在劳动中，人类的个体客体化了他的“本质力量”，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第517页；第241页），个体使自己翻倍并审视着自己，以至于“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第542页；第271页）。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一般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化解于“人的本质”，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MEW 3，第6页）。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人是社会存在物，但是他的社会性的真正基础——社会实践——并没有被揭示，甚至没有被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这种被费尔巴哈假定的人类个体是孤立的、抽象的。因此，他没有在社会关系中寻求作为一般的人的本质，而是接受以“自然”联系的一般的形式将其纳入单独的个体：理性、思维、语言、爱等等被理解为人类的“类功能”。

马克思的批评导致将人类的“真实”——所有个体的普遍性——确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6页）。它是个体“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并不创造自己本身”（第37页）。个体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不是他们的相互关系”，它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第423页）。人类的“类本质”的一般性是历史性的，只能通过实践作为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必要性的活动来实现：它是“每天都在被人们改造着的历史产物”（第468页）。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相距甚远的是，现在“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其真实原因在于，“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第38页）。在这里，“人的本质”一词最终失去了其目的论和思想学特征，它原则上具有历史特征，不再是必须作为现实基础的理想。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键基本思想是，在阶级社会中，一般独立于个人。但两方面是“同一种个人发展的表现”（第228页），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

216

217

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第229页）。这种共同的利益“不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第33页）。

期待着共产主义革命，“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有意识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对他们说来却一直是异己的、统治着他们的力量”（第37页）。个体的活动现在成为一种自由的“普遍的操作方式”（第424—425页）。他们的直接普遍性体现在可能不断变化的活动中，这对于个体的普遍发展是必要的转变。一般，根据其适用的理由（由社会个体组成）、其适用范围（其与“类普遍性”在人类的“经验论的普遍个体”中达到顶点）以及其有效期（与历史进程有关），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要素（Cöster 1983）。

《政治经济学批判》贯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经济范畴的基本思想。商品、金钱和资本被分析为“异化”阶段。商品价值形式的变质对应于活动及其产品“异化”的不同形式。在“一般价值形式”中，所有商品的价值都以一种单独的商品类型表示，该商品以一般等价形式出现：“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MEW 23，第81页；MEGA II.6，第98页）私人工作的相互依赖性（其社会性、普遍性）以本体论上独立的、“异化”的形式表达，通过特殊商品是所有其他商品的等价物的“类形式”。“除了狮子、虎、兔子和所有其他真正的动物，它们按照动物的不同性别、种类、亚种、家族等等进行分组，并构成了整个动物王国，而同时动物也存在，是整个动物王国的个别化身。这样的个别，本身包括同一事物的所有真正存在的类型，就是一般，例如动物、上帝等。”（MEGA II.5，第37页） 218

表现在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会变成社会劳动”（MEW 13，第21页；MEGA II.2，第113页）。这种“分散的个人”概括的一般，只能（相对）拥有无关紧要的外部形式。交换价值促成了个人的社会关系，并始终具有对立的、以货币形式出现的个性化存在，是一种“一般的东西，其中一切个性、一切特征都已被否定和消灭”（MEW 42，第90—91页；MEGA II.1.1，第90页）。

一般的这种外化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内化，其社会性降低为“类活动”，即大脑、肌肉、神经等的生产消耗减少。在这方面，雇佣劳动是“针对其特殊的**确定性**绝对无关紧要，但能够具有任何确定性”（第218页；第217页）。“分散的个人”的工作的抽象性质和社会工作总量的发展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抽象又一般的劳动的发展表明社会财富的发展、更普遍的需要和个人的能力。

作为价值实质的抽象由一般劳动的推导遵循每天商品交换时发生的“现实的抽象”（参见MEW 13，第18页）。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它不再表现为互不相关的主体的劳动，而是不同劳动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同上）。在价值关系中，“抽象的一般不具有具体的、感性的和真实的特征，相反，感性和具体只不过是抽象一般性的单纯表现或某种特定的实现形式”（MEGA II.5，第634页）。

将个人的活动作为各种形式的协作模式中的直接的社会活动，并不意味着废除了它们异化的形式。因此，以简单协作开始的工场手工业，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分离导致工人被肢解为
219 局部工人：这在工业中得以实现（参见MEW 23，第380页及以下）。根据合作的类型，马克思将其区分为共同劳动和一般劳动。如果假定直接协作，那么科学工作作为“一般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MEW 25，第114页）。如果将其用于资本服务，则固定资本的发展作为“对象化的知识力量”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MEW 42，第602页）。

通过为“自动化过程”发展的劳动方式，“**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第605页；第585页）。但是，如果活跃的劳动直接变得普遍，工作的客观时刻就会失去其异化的形式，那么它们就被设置“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第723页；第698页）。作为个别，它们直接包含一般。

马克思在从抽象一般性的角度分析更具体形式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现了将抽象一般性的观点视为与个体和特殊相对的抽象一般性基础。因此，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MEW 23，第95页）。然而，它只在资本主义中占据了社会的地位，并发挥了“自己的全部

潜力”（第 613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版中写道，“细胞形式或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金钱的内在要素**”（MEGA II.5，第 28 页）是简单的价值形式。

作为货币形式“萌芽”的商品形式与其相比是抽象的，它尽可能只包含这种更发达、更具体的形式。就其简单性和抽象性而言，它也是一个（抽象的）一般；它虽然是经过修改的形式，但作为下一层的要素以更具体的形式被复制，因此代表了对立于差异的统一的要素。因此，在他们的分析中获得的作为出发点的用途——“物种”以“类”的功能出现——可以在由此产生的所有发展形式（“物种”）中找到，因此，它们仅在
220 最发达的形式中才完全有效。因此，“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在这种抽象中，“实际上真实的”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MEW 42，第 39 页）。

具体的整体的发展作为对抽象一般基础“本身”中所包含可能性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在黑格尔的风格中，“观点”构成了发展的绝对基础。从劳动产品到商品形式的转换，本来是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它才变得必要和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从抽象到具体一般的发展作为一个真实的过程，是将一个个别的偶然现象转变成一个普遍的和必要的现象，而抽象和一般关系只有在最丰富和具体的发展中才能充分发展，只有通过具体的整体，一般才成为特殊和个别的本质。

与黑格尔相反，对于马克思来说，从“萌芽或细胞形式”发展出的具体的整体与本质的发展有关。黑格尔的纲要并没有做到它所声称的——在其发展中掌握一个对象。在概念的运动中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新含义。它仿佛是一面“镜子”，它的镜像是一个封闭的、起点和终点相重合的循环。

形成有机系统的历史条件和前提条件与系统功能的条件绝不相同：系统的“自我存在”，仍然是先前系统的要素，与已成为有机系统的“自我存在”具有不同的目的。一方面，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另一方面，它是资本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其原则上是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机系统最重要的特性是“每条规定同时是前提条件”（MEW 42，第 203 页），即系统自身创造了“维持和增长的前提条件”（第 372 页）。历史的前提条件在已经形成的系统中消失了，新系统运行的自我复制运行的前提条件仅通过其形式（外观）指出了历史所带来的教育。

“萌芽或细胞形式”不是具体的一 221
般，必须首先从自身中产生。其中一般

的基础决定了特殊和个别的现象："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它）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MEW 42，第40页）

马克思最初计划独立于资本的"实际运动"而提出"一般资本"。一方面，"一般资本""仅作为一种抽象"出现，表示资本的特定差异；另一方面，"与特殊的实际资本不同，它本身是真实的存在"（第362页），并以此种形式在比如银行中积累，通过他们分配。"因此，尽管一般一方面只被想象成是特定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一种特别真实的形式，与特殊和个别的形式并存。"（第363页）与其相似的是，协作作为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MEW 23，第355页）。

但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之前"（MEW 26.3，第482页），资本的发展是否也不会导致对本质的不同认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业资本是资本关系的基本形式，它服从于诸如有息资本的历史条件，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衍生或特殊功能"（第460页）。在术语"一般资本"中固定的"萌芽或细胞形式"和"资本的概念"，即已经形成的资本比率的思想性的再生产，是不相同的。因此，对资本比率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这种抽象的一般，而应包括对特殊和个别的分析（参见MEW 42，第201页）。资本的本质，即（具体的）一般性以更发达的形式进行表达。因此马克思不得不放弃他原来的划分。

通过考察对象在客观发展过程中一般与特殊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推断出一般是事物的已发展形式（Höll 1988，第168页）。在一般抽象的基础上，发展变成了"自身"现存的可能性的实现。 222
随着具体从抽象中发展，从"类"到"种类"，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在更发达的形式中，在具体的整体中，只有一般成为特殊和个别的本质，并且包括特殊和个别的多样化。这种一般是同一性与差异、直接与间接、无限与确定性的统一；这表现为一种矛盾、一个过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一系列表象、过程等的一般性不是它们都具有的共同点，而是那种特殊的表象，其中的本质和一般性以发达的（"经典的""成熟的"）形式出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谈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而德国读者则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

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是未来的景象”（MEW 23，第 12 页）。因此，对于一般的理解并不在于对所有可能的个案进行“概括”或“抽象”，而在于对这种特殊现象的分析。

3. 在列宁死后、1929—1930 年发表的《哲学笔记》中，关于个别、特殊和一般的言论——通过他对《资本论》辩证法的研究——引起了极大的学术讨。对他来说，个别的存在“与通向一般的相互关系无异”。这反过来“仅存在于个别之中，通过个体。每个个体都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的）一般。每个一般都是个别的（一小部分、一方面或本质）。每个一般只包括几乎所有的个别的事物。每一种个体都不完全地进入一般，等等。通过成千上万的转换，每个个体都与不同类型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等相关联”（LW 38，第 340 页）。亚里士多德陷入了“一般和个别之间、概念和知觉等等之间，本质和现象等等之间的辩证”的矛盾中（第 349—350 页）。在他看来，“一般（概念、想法）……似乎是**个别的本质**。这看起来很野蛮，非常愚蠢（更正确的是：幼稚）。但是，现代理想主义者——康德、黑格尔——关于上帝的观念不是同一种观点（**完全**是一样的类型）吗？”（第 352 页）列宁认为黑格尔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发展”“非常抽象和‘深刻’”（第 166 页）。但是，正如“简单的价值形式”（在《资本论》第 1 卷）已经“包含资本主义自身的所有主要矛盾以未发展的形式”一样，“意味着最简单的**概括、概念**（判断、结论等）的最 223
初及最简单的形成，是通过人类对**客观**世界深层联系进一步的了解”。在这里，人们不得不“寻找黑格尔逻辑的真正含义和作用”（第 168—169 页）。他以这样的断言强调：“如果没有仔细研究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就无法理解《资本论》。”（第 170 页）

1950 年代，人们还试图克服斯大林在其正式的著作中提出的哲学思想（参见《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HMat*]），作为对原始思想的回归，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内容和意图的认识，是对总体哲学传统的重新思考。根据列宁的评论，“一个出色的表述：‘不仅是抽象的一般，而且包含了特殊、个体、个别’（特殊和个别的所有内涵）的丰富性的一般！！特雷斯·比恩！（Très bien！）”（LW 38，第 91 页）是由许多苏联哲学家提出的，是一种具体的一般概念，但未能在官方教科书和出版物中盛行。

但是，这种“具体一般”的想法部分地基于一种误解：与设想相反，这个**概念**是指有些具体的普遍（反映了整体

性），而不是“萌芽或细胞形式”。根据伊瓦尔德·W.伊尔延科夫（Evald W. Iljenkow）的说法，具体的一般具有双重意义的“特殊和个别的丰富性”：一方面，一般“自身分化为特殊的要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给定的现实形式，这肯定是一个其他特殊形式系列和相同的具体整体中的某些‘特殊’事物，正是由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代表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一般基础”（1971，第453页）。抽象一般被归结为基于感官的现象的抽象本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读者“如果真想跟着”他走，必须“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MEW 13，第7页）。伊尔延科夫评论说，这种表示方法导致“对特殊细节的理解，从抽象到越来越具体、更发达和更普遍的观点，从经济现实到一般，这是特殊要素相互渗透的结果”（1969，第95页）。

4. 直到1980年代，东德关于个别、特殊和一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权威观点仍体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典和教
224 科书中。冈特·克勒伯（Günter Kröber）将个别定义为“受时空限制的具体、定量和定性的单独情况（事物、过程、特点、关系等）”（1969，第267页）。从概念上讲，它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是只能通过单一名称来表达，其可以直接或间接描述它所表示、面对的东西”。根据列宁的《哲学笔记》，确定个别与特殊和一般之间处于辩证关系。“独立于普遍的相互关系之外是不存在个别的。但是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之中并通过个别而存在。在发展中，个别可以转变成一般。……在奴隶主和封建制度中，商品经济是个别的；在社会向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个别变得一般。”（同上）

个别、特殊和一般是相关的限定：一方面，特殊是一般的，“但前提是它具有比一般更广泛的个别”；另一方面，如果特殊对于其他个别而言是一般的，那么它也可以是个别。由此，它是“一般和个别之间的调解”（第186页）。由于在日常语言使用中，个别和特殊之间通常没有明显的区别，克勒伯强调：“但是，只有在存在至少一种具有个别的关系，并且至少存在一种具有一般的其他关系时，特殊才存在。”（第186—187页）

一般是“客观现实或其写照的一类个别的事物、属性、关系、过程等的客观存在的共性”（第53页）。它被区分为“两种类型的一般”：“一种一般，只能通过比较许多个别的共同属性而获得，它本身仅仅是一种抽象或数目上的一般，还不需要表现个别的本质。”（第57页）例如，所有无产者都有语言和意识，而这些共同特征不是无产者的本质。“只

有在不仅考虑个人的共同方面（属性），而且将其置于与其他个别的关系系统中时，当揭示了与其他个别的关系的共同性时，我们才能得出**具体的或特定的**一般。具体的一般掌握了某一类所有个别之间的共同的、不变的关系，因此在个别中是对本质的依法表达。"（同上）

一本教科书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个别、特殊和一般都存在于客观现实本身中**；它们绝不只是思想的
225 决定或直觉的形式。"（《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第82页）但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个别作为事物和过程相对独立地存在。尽管这些总是与其他事物等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可以要么以感性的方式直接感知它们，要么至少通过特殊的辅助工具、器具和其他手段间接地感知它们。"不同于一般。……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颜色、躯体形状或类似的外部特征——一般可以被直接观察到。"（同上）以下个别、特殊和一般问题的例证基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异同（第82页及以下）。

参考文献：

Cöster, *Hegel und Marx. Struktur und Modalität ihrer Begriffe politisch-sozialer Vernunft in terms einer ›Wirklichkeit‹ der ›Einheit‹ von ›allgemeinem‹ und ›besonderem‹ Interesse*, Bonn 1983; *Dialektischer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Lehrbuch für d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Grundlagenstudium*, Berlin/DDR [15]1988; Düsing, »Die Teleologie in Kants Weltbegriff«, in: *Kantstudien, Ergänzungsheft 1996*, Bonn 1968; Höll, *Das Allgemeine. Studien zur dialektisch-materialistischen Auffassung des Begriffs des Allgemeinen*, Diss.,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1988; V.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Marx«, in: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hgg. v. A.Schmidt, Frankfurt/M 1969, 87–127; ders., »Vseobscee«, *Bol'saja sovetskaja enciklopedija*, 5, Moskava 1971, 453; ders., *Dialekticeskaja logika*, Moskva 1984; Kröber, »Allgemeines«, PhWb 1, [6]1969, 53–8; ders., »Besonderes«, PhWb 1, [6]1969, 186–87; ders., »Einzelnes«, PhWb 1, [6]1969, 267; Lukács, *Über die Besonderheit als Kategorie der Ästhetik*, Berlin/DDR-Weimar 1985; B. Lakebring, »Der Begriff des Einzelnen und die Hegelsche Metaphysik«, in: *Studium Generale*, 21. Jg., 1968, 512–37; ders., *Kommentar zu Hegels ›Logik‹ in seiner ›Enzyklopädie‹ von 1830*, 2 Bde., München 1979, 1985; M. Müller, *›Das Kapital im Allgemeinen‹ als zentraler Begriff im*

Marxschen ökonomischen Schaffen von 1857-1863, Diss., Halle/S 1975;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Berlin/DDR 1968.

卢茨·霍尔（Lutz Höll） 撰
宋珊 译，唐轶 校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llgemeine Arbeit, Aufbauplāne, Aufhebung, Bedeutung, Begriff, Bild, Definition, Denkform, Dialektik, Ebene, einfach/komplex, Element, Entwicklung, Empirie/Theorie, Erkenntnis, Etwas, Form, Formalabstraktion/Realabstraktion, Ganzes, Gesetz, Gleichgültigkeit, Individuum,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apital im Allgemeinen, Logik, sichtbar/unsichtbar, Theorie/Praxis, Wesen/Erscheinung, Zelle

226 折中主义（Eklektizismus）

A: taufīqīya.

E: eclecticism.

F: éclectisme.

R: éklekticizm (эклектицизм).

S: eclecticismo.

这个术语源自古希腊语“选择”（ἐκλεκτικός；拉丁文为 *electicus*），刻画了一种处理材料的方式，这一方式对彼此矛盾的宗教或理论学说、观念和教义，或者中立地说，对彼此矛盾的各种立场的选择等价接受并进行加工。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折中主义由一种有益的方法转变为对这一方法的一种批判，由最初代表了一种独立思考和选择转变为对材料不加批判地混合和逻辑荒谬的象征。折中主义偶尔也曾被等同为**调和主义**（*Synkretismus*）。然而，调和主义与折中主义有着不同的前提，调和主义的前提是所有思想体系的精神性收益是可以联合的；调和主义时常会在经验和形式逻辑方面失效，因为事物的不同体系无法被公约。与之相反，根据经典的理解，折中主义则尝试通过对最好的（或正确的、真的）事物的选择去构建一个无矛盾的整体。

一个思想家是不是折中主义者，不是由他处理材料的纯事实，而是由他对材料处理方式的原因所决定的。这一理论实践的前提也是它自身的理论状况，这种状况在与所选择或所经历的问题之解决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上加强自身或者从中产生。每一种哲学学说对它之前的知识的态度都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这一矛盾既包含了与那些作为其材料的学说之间的争论，同时又包含

了一种与前辈们的选择性关系，这种关系是与其自身学说的社会和哲学方向相适应的。

就马克思来说，当他尚属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他的观念就深刻地植根于其同时代的冲突和斗争之中。借助于否定之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不仅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还可以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启蒙运动以及理性主义本身。马克思对折中主义的理解也受到了在德国观念论（Idealismus）中流行的（对折中主义）贬抑观点的影响。

19世纪及20世纪法国与美国的医学流派在独立性、开放性及选择的意义上代表了折中主义，折中主义这一术语的原初用法在某种约定习俗内继续存在，对这种用法来说，折中主义这一术语的
227 消极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种由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代表的观点，即“所有哲学家总在某处或好或坏是一个折中主义者”（Schneiders 1985，第150页），混杂了歌德的格言“不存在一种折中主义哲学；但可能存在折中主义哲学家”（《来自马卡里恩的档案》[*Aus Makariens Archiv*]，出自《箴言和沉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与后现代主义的“一切皆可”（Feyerabend）。后现代主义在哲学、科学和艺术中致力于一种调和性的折中主义，以在已熟知的“新的不可概括性”（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中不完全丧失概貌。

1. 从古代经由教父学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折中主义被理解为一种正当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区分好的（正确的）和坏的（错误的）并吸纳前者、摒弃后者，而从口传的非真理、半真理、谬误以及歪曲向真理，即真的信念、正确的知识过渡。文艺复兴以来，这一方法被视作反对宗教或哲学教条和宗派之约束的自我主张之表达。由此，折中主义与博学者之间就有了一种正向的关系，而与宗派主义（Sektierertum）和逻辑至上主义（Logizismus）则保持着批判性的距离。

1.1 **古代**。折中主义首先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os）对亚历山大的颇塔孟（Potamon von Alexandria）的引证中被介绍（《名哲言行录》[*De vitis, dogmatis et apophtegmatis clarorum philosophorum*]，I，21）。西塞罗（Cicero）定义了折中主义的内容（《图斯库鲁姆论辩集》[*Tusc.*]，V，82）并积极地与之工作，贺拉斯（Horaz）就此解释道：“我已不再有义务忠诚于大师之言。”（《书信集》[*Ep.*]，I，1，14））大约与第欧根尼同时，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s von Alexandria）（《床单集》[*Stromata*]，I，37，6）、奥利金（Origenes）和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肯

定了折中主义。对他们来说，折中主义表明了神学相对哲学的优势。这种态度也在保罗（Paulus）那里得到反映："请你们检查所有的东西；请你们保留好的东西！"（《帖撒罗尼迦前书》[*1 Thess*]，5.21）哲罗姆（Hieronymus）在同样的意义上把折中主义理解为一种对宗教文本中所蕴含的真实之物的学术化选择，这些宗教文本并不仅仅包含真实之物。直至近代早期，这种理解还是对折中主义理解的本质方面。

1.2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之人文主义者在折中主义的意义上总结文化，正如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他们把对折中主义的理解追溯到西塞罗，以维护哲学思考及教育学生的自由。那些由经院哲学所破坏或哲学意欲破坏的
228 东西，现在都聚集于折中主义的名下，而对所选择事物的逻辑严格性的自由选择也被确立下来。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Francesco Pico Della Mirandola）引证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5.21）以正当化哲学性选择，并引用第欧根尼·拉尔修所使用过的寓言：蜜蜂选择所有它们喜欢的东西，但是，它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来酿造蜂蜜。尤斯图斯·利普希斯（Justus Lipsius）影响了"选择"（*electiva*）这一概念的翻译，并将折中主义和对斯多亚学派，尤其是对塞涅卡（Seneca）和爱比克泰德（Epiktet）的更新联系起来。丹尼尔·森纳特（Daniel Sennert）首次在一门单一科学，也即医学中践行了折中主义，他由此奠定了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人的权威可以巨大到比真理更优先。

这一时期的很多哲学家都是折中主义者，虽然他们不这样称呼自己。这样一种受折中主义影响的精神文化可以伴随着一种强大的自我意识蓬勃发展，这种自我意识赞赏"基于博学、精神和人格的巨人们"（MEGA I.26，第 295 页）。或者，被与之剥离并不间断地被物化（versachlicht），被极端的市场压力所逼迫。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况正是前者；而后者则创造了受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us）所影响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

1.3 **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在 17 世纪，新柏拉图主义（Neuplatonismus）和教父学（Patristik）被理解为折中主义的典范。对它们来说，与神学一致是真哲学的标准，同时上帝的话语被视为哲学之源。一般来说，在这一时期对折中主义的信奉成长着；折中主义者们的诉求则日益带有进攻性。对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而言，折中主义哲学就是"最卓越的事物"（*Opera omnia*，1，Sp. 76）。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在 1647 年创作了一本名为《选择神学》

（*Theologia electica*）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他要求并实践了宽容（Toleranz）。

1650年到1675年间，折中主义开始在哲学讨论中出现。对亨里库斯·博尼乌斯（Henricus Bornius）来说，折中主义是实现自我应用的唯一正确的思考方式，因为未来属于它。哲学进步尤其被基于盲从观点的学派争吵所阻碍。在过去，亚里士多德是最高的学术权威；而现在，笛卡尔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两个方向的绝对化在知识上是无法长久的；而关于哲学研究之自由的观念也会随之丧失。

雅各布·托马修斯（Jakob Thomasius）代表了作为开路先锋的折中主义，因为在所有地方追求真理都是正确的，但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找到真理的各方面，所以必须进行选择。同时他反对莱布尼茨所代表的调和主义。

229 在17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折中主义兴盛起来并与实验性的自然科学结为同盟。约翰·克里斯托夫·施图尔姆（Johann Christoph Sturm）通过他的文集《折中哲学》（*Philosophia eclectiva*，1686）和他的专著《选择或假设物理学》（*Physica Electivasive Hypothetica*，1697），使折中主义从一种方法态度变成一种经验—实践科学。这种科学用同一标尺来衡量新旧事物，既不完全否定，也不完全肯定，而是通过简单地抛弃错误的东西来选择最好的东西。在它的自我理解中，折中主义哲学从来不会完成，而只会越来越完善。一种假说被视为更好，只要它所能解释的现象更多；它的最高训练是一种进行预测的能力。

年轻的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同样拥护折中主义作为自我思考和独立性的代号。他认为："折中哲学（Philosophia Eclectica）优于任何其他东西。"（1701，第76页）与关于自然的机械论解释、原子论和微粒论（布洛赫：《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Bloch，*Thomasius*]）的辩论构成了这种折中主义立场的背景。对小约翰·法布里丘斯（Johann Fabricius D. J.）（《折中神学》[*Theologia eclectica*]）来说，每一个神学家都是折中主义者，只要他选择了最真和最好的原理与解释。在约翰·弗朗茨·布德（Johann Franz Budde）的著作《折中哲学》（*Philosophia eclectiva*）中，有一种关于折中主义的独特的哲学理解。根据这种理解，折中主义并不选择。对布德而言，折中主义是确立明证的原则并从这些原则中进行合乎逻辑的单一学说的推导。

这种发展为折中主义在知识史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位。折中主义包含着某些矛盾的东西。一方面，它把自己理解为一种"摆脱所有教派联系而进行工作"的态度，它的"选择方法"刻画

了如下特点，即“最不同的答案提议要根据它们的真理性或最大可能性，通过实验而受到检验”（Albrecht 1994，第264—265页）。如此看来，折中主义不仅成功反击了经院哲学，还促进了唯物主义思想的突破。就斗争—组织性功能而言，对折中主义的使用是一种口号，通过它，敌人——非折中主义者，即宗派主义者——被揭露出来。另一方面，只要人们自己是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反笛卡尔主义者，折中主义抵抗那些由亚里士多德或笛卡尔所发展起来的重要的精神原则。为自我宣称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得主观主义的选择本身成为教条。反对教条主义之狭隘的斗争的确不局限在反经院哲学的攻击方向上。路德的宗教改革不需要太长时间便能建立一座思想僵硬的、毫无宽容之心的路德
230 派教堂：虔信派（Pietismus）以一种并不比它的敌人更宽容的方式展开事业。这种自相矛盾的折中主义与各处阵线纠缠在一起，并作为最小公分母实践着一种由防御所表达的自我宣称，它把所有不分享它的方法立场者要么评价为宗教的，要么评价为哲学的宗派主义者。通过这种方式，不管是教皇和宗教改革者，还是机械论者和空想者，都被扔到了同一个锅里。由此，一种辩证法被写进了这一时期所实践的折中主义，这种辩证法与折中主义的无批判性选择和平行的材料组合离奇共存，同时又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

1.4 十八世纪。在18世纪，折中主义式微，且被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对材料的）抓取（Zusammenraffen）。这一术语沦为一种没有精确意义和功能的陈词滥调。它出现在形形色色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和逻辑学著作的标题中，不再意味着选择、客观性或自我思考。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用那构建他的开放系统的数学方法来替代折中主义；当他附上与他的系统相适应的事物时，他在折中主义处停留。大约在1725年至1800年之间，折中主义还出现在很多哲学史著作中。折中主义者一再被理解为近代思想的代表者，如通过雅各布·威廉·福伊尔莱茵（Jakob Wilhelm Feuerlein）、雅各布·布鲁克（Jakob Brucker）、约翰·安德烈亚斯·法布里丘斯（Johann Andreas Fabricius）等其他思想家。

特别是德国哲学家，他们偏爱折中主义并对其他欧洲人如艾萨克·沃茨（Isaac Watts）、安托尼奥·格诺威色（Antonio Genovesi）和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产生影响。根据狄德罗，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哲学家，他把偏见、习俗、传统、普遍的赞同、权威，简言之，所有那些奴役大部分心灵的东西，全部踩在脚下，由此，他勇于自我思考，勇于向最清晰的普遍原则进

发，并勇于检验和讨论这些原则，勇于让那些没有经过他的经验和理性所证明过的东西失效，勇于自己从所有他客观和公正地研究过的哲学中建立一种独特的、他自己的哲学……因为与其说折中主义者的雄心是成为人性之师，不如说是成为人性之学生；与其说是去改善他人，不如说是改善自身；与其说是认识真理，不如说是教授真理。折中主义者不是种植者和播种者，而是收集者和筛选者”（《百科全书》[*Encyclopädie*] III，第 36 页）。对狄德罗来说，折中主义是“自创世以来的那些卓越的心灵之哲学”（第 39 页）。

这种为狄德罗所肯定的折中主义是一种对统治关系的蒙昧主义（Dunkelmännertum）、耶稣会主义（Jesuitismus）和护
231 教学（Apologetik）的挑战，因为它通过可用性检验一切，并且绝不根据给定之物的实存去承认该物。在此，产生了一种重心的变化：狄德罗在某种程度上把折中主义嵌入了系统思想中，但没有把两者等量齐观。这种由狄德罗所想到的“系统”是由理性所支撑的，任何在理性面前站不住脚的东西都需被摒弃。这种选择不愿收集不确定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收集被理性所接受的东西。这种启蒙运动的公理化理性概念规训了主观主义的选择。由此，一种材料的处理（方式）被准备好了，它不去翻寻异质的材料，而是去整理它们。一种被如此理解的折中主义与之前对它的理解极少相同，因为根据这种方法论的自我理解，这个术语可以说或让位或被批判性地重估了。

对温克尔曼（Winckelmann）来说，艺术中的折中主义是一种源自依赖性（Unselbständigkeit）的混合之尝试。随着沃尔夫学派（Wolff-Schule）影响力的衰退，折中主义经历了某种分裂。只要它推动自我思考，它就是正确的；但是，一种非批判的折中主义学说妨碍自我思考并会导致依赖性（约翰·格奥尔格·亨里希·费德尔[Johann Georg Heinrich Feder]、克里斯托夫·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

1.5 对德国古典哲学家来说，折中主义最多是在历史方面令人感兴趣的。也许是看到了弗里德里希·尼柯莱（Friedrich Nicolai），费希特拒绝选择—折中主义和流行哲学。黑格尔尖锐地批评“折中主义哲学”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前后矛盾的”，并且认为折中主义这个术语是“非历史的”（SW 19，第 33—34 页）。在这背后是极端化的对标准之追问：为了去认识“好”（“真”“正确”等），必须有一个现存的标尺，这个标尺则以关于好的知识为前提，但关于好的知识又需要另一个标尺，依此类推。这就是折中主义的症结，它反历史地忽视了所挑选和所接受的材料

的时间限制性和时间相关性。

19世纪以来，这种以及其他相似的评价日益决定了关于折中主义的主导性理解。这种对折中主义一词的贬义用法被那种通过近代理性批判所训练的理性形态之接纳性（Akzeptanz）所支撑，这种理性形态则在封闭的体系中表达自身。尽管宗教或政治狂热者一如既往地产生影响，甚或被统治者们所偏爱，但是他们被视为向自身到临的自我意识或世界精神业已被超越了的前形式（Vorformen）。

232 歌德的定义："一个折中主义者是每一个从他周围的和从他周围发生的事物中学会符合其本性的事物的人；而这也适用于所有理论或实践上获得的教育和进步。"（《来自马卡里恩的档案》）这一定义区分了折中主义和折中主义者，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看，这一区分一直流传至今（参见 Albrecht 1994；Dreitzel 1991；Schneiders 1985）。

2. 自从18世纪末以来，对折中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其对异质的立场、陈述和材料的依赖性混合，以及由此产生的调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处于他们传统之下的20世纪左派）同样进行此类批判，但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套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折中主义的经常性批判发生在他们逐渐形成的哲学和经济学知识与理论以及政治目的的语境中。他们的批判是在与19世纪下半叶李嘉图学派在第一哲学和德国学院哲学中的解体（Auflösung）的论战中进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折中主义论述的价值或无价值的衡量绝不仅仅基于自身的知识状况，而且也基于古典哲学、经济学以及早期社会主义的成果。那些被他们所批判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绝不把自己理解为折中主义者或它的代言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那个如此理解自己的人，如维克托·库辛（Victor Cousin），完全是无足轻重的。那些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尝试以一种"简便的方式"去克服传统所遗留下的各种矛盾。因为这些在对抗的社会结构中所固化的矛盾不是内在的，它们仅可以通过社会批判的立场被解决，所以，在修复中情况得以保留：参差不齐的理论误差通过语言被黏合起来。这就挑起了对折中主义的诘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保罗的）名言采纳了（折中主义的）原初的概念内容：一个折中主义者就是那个"从所有不同的体系和理论中挑选出最好的东西的人：请你们检查所有的东西；请你们保留最好的东西！"（MEW 18，第536页）

与后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家的折中主义进行论争的关键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当1830年之后英国和法国的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公开发生
233 之时，这种斗争就鸣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MEGA II.6，第702—703页），因为谁想把资本的要求和无产阶级的要求相协调，谁就提供了“折中主义的、调和论的纲要，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II.1.1，第3页）。在穆勒的著作中，生产的法则，即市民资产阶级的生产和财产关系，被理解为不变的自然法则，只有鉴于分配原则，出于实现诸如更多公平的目的的（对生产法则）的人为干涉才被同意（IV.7，第39页）。

另一折中主义之变体存在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中，即想“通过改变事物的真正名称”（by changing vera rerum vocabula）来消除价值规律与“剩余”（Surplus）的产生之间的矛盾（MEW 26.3，第83—84页）。为反对这样一种托辞——认为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利润与平均利润之间的争论仅仅是由于相同词汇的不同用法而产生的——马克思评论道：“这样一种怀疑论总是一种理论消亡的宣告者，一种无思想、无良知的朝向私人需要的折中主义之先驱者。”（第106页）

第三种特殊的德国折中主义形态出现在这样一种“**带学究气的形式**中，这种形式‘历史地’针对著作并以一种智慧的节制到处搜寻‘最好的东西’，而这种最好的东西不是于矛盾处，而是于完整性中到达。它是所有体系的去精神化，对这些体系而言，它们的关键点总是被打断，且它们和平地在读书笔记中共存。……由于一俟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圆圈达到其终点，这一类工作就同时出现，所以，这一终点同时也是这种科学的**墓地**”（MEW 26.3，第492页）。

纯理论性的社会主义（Kathedersozialismus）是折中主义的又一变种，“一种柔软的、可延展的、凝胶状的胶质，这种胶质可被压成任意形状，因此也适宜于充当一种极好的喂养追名逐利之徒的养料”（36，第199页）。

在马克思与后古典经济学进行辩论的同时，恩格斯同样反对“折中主义的施舍汤……，这些施舍汤在大学中以哲学的名义被分发”（21，第263—264页）。人们丢弃黑格尔以及辩证法。“由此，人们重又无助地遭受旧的形而上学制约。从那时起，一方面，那种为庸人所量身定制的浅薄的叔本华的以及晚一点甚至是哈特曼（Hartmann）的反思在大众中蔓延；另一方面，是一种福格特（Vogt）与毕希纳（Büchner）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唯物主义（Reiseprediger-Materialismus）。在大学里，不同种类的折中主义彼此竞争。它们仅仅在一点上 234
是一致的，即它们是从旧哲学的纯粹

垃圾中被修剪到一起的，且同样都是形而上学的。”（MEGA I.26，第168—169页）为反对这种衰退，恩格斯自豪地宣称：“并且，如果德国资产阶级的老师们对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和他们所承载的辩证法的记忆在空虚的折中主义的泥沼中沉溺得如此之甚，以至于我们已被迫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作为辩证法在现实中的可靠性之见证者——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不仅起源于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与欧文（Owen），还起源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MEW 19，第188页）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哲学的境况类似，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评判社会主义的境况：从不同的社会主义派别和学派的竞争与损耗中，“只能产生出一种折中主义的平均社会主义（Durchschnitts-Sozialismus），正如它事实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第200—201页）。

3. 列宁对折中主义的语言用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他的中心问题是折中主义反对辩证法的斗争，列宁动员用辩证法去反对那种被机械地理解的形而上学、哲学和政治思想。折中主义对列宁来说仅是无原则且无轮廓的、有适应能力的“观点之大杂烩”，它“适应每一种新的‘思潮’”，没有能力“去区分日常需求与运动整体上的根本任务和持久需要”（LW 5，第5页）。

这通过政治性的根本论争得到了例证。列宁批判道：机会主义（Opportunismus）把国家消亡说与革命学说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革命应该等待，直到国家消亡之时刻。“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折中主义，即一种毫无理念的、诡辩的选择的帮助下联合这两者。这种选择武断地（或者为了迎合当权者）一会确定这一种观点，一会确定另外一种观点。然而，在一百种情况中就有九十九种情况——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话——这种‘消亡’恰恰被推到了前台。辩证法被折中主义取代。……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中，那种折中主义中对辩证法的歪曲习惯以最轻微的方式欺骗大众，给予一种表面上的满足，考虑过程的所有方面、所有发展趋势、所有矛盾的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然而，事实上这种歪曲并不提供任何统一的、革命性的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见解。”（LW 25，第412页）

根据列宁的理解，考茨基与王德威尔得（Vandervelde）向工人们隐瞒了：国家的逐渐消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非前提。“理论和哲学地看，折中主义和诡辩术对辩证法的替代也正在于此。……为了资产阶级，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的折中主义与诡辩术通过过渡

阶段这一普遍概念，封住了阶级斗争中所有具体和精确的东西。”（LW 28，第325页）

列宁批判布哈林（Bucharin）在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中的角色的争论中用折中主义取代了政治与经济之间辩证的相互关系：“‘既这一个，又另外一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是布哈林的理论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LW 32，第81—82页）布哈林的论点显示了“无生气且无内容的折中主义”，因为他没有尝试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工会问题（第86页）。

列宁想通过他的黑格尔研究来澄清这种政治上可理解的要求，他展示了辩证法是一种运动着的、关于某种身体性对象的‘知识’的总体力量。“形式的或经院哲学的逻辑”采用两个或若干个定义，“并且完全偶然地联合它们（既玻璃圆筒，又酒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获得了一个折中主义的定义，它除了指示对象的不同方面以外，什么都不是”（第84—85页）。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种论点中所遭遇的庸俗化，阐明了列宁对折中主义的理解。

4.《哲学辞典》（PhWb）把折中主义定义为“不同思想元素的机械联合”。“如果没有尝试进行创造性的综合，没有在排除逻辑矛盾的情况下，就将各种理论与观点，特别是不同哲学体系和流派的单一元素与命题整合为所谓‘新的’体系——正如在古代、在教父学、在18世纪的德国启蒙哲学的代表者和在库辛那里——哲学的折中主义就存在。”（PhWb 1，第267—268页）康达科夫（Kondakow）只知道折中主义是“一种形而上思想的变种。当两种不同的、有时完全相反的观点被混淆，或为证明它 236
们之间根本没有区别或为强塞错误的观点，这种变种就是一种对现实有意识的歪曲的结果。一个折中主义者正是如此处置哲学的，当他比如提议联合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与实用主义（Pragmatismus），以将辩证唯物主义归于经验主义（Empirismus）之下。当某人不能在一个现象和它与其他现象的众联系的诸多不同方面找出本质的联系和原因时，例如区别必然的东西和偶然的东西以及区别现实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折中主义也可能出于关于研究现象（Erscheinung）的知识不充分”（WdL，第147页）。同时，马克思或列宁对折中主义的运用都被排除在外，正如折中主义与那种（在诸权威中看到其永恒真理）的教条主义的历史紧张关系。总的来说，一种传统由此被操纵。这种传统延续得越长，就越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自身的变化。

5. 一般来说，在折中主义的原初含义（选择）没有被抛弃的地方，折中主义是合法的和有效的。在那儿，折中主义出于接近和赢得真理的目的，关乎独立且在论据方面可信的，而非那种源自他人的、未经自身检视的、盲从权威的选择。在那里，人们也肯定受到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这区别于教父学的折中主义，在那儿，人们相信自己在选择之前已经占有了真理。当然，这需要一个基础和一种指导思想。除此之外，真理追求者的和平共处，而非宗派或体系之争，是折中主义的工作氛围。没有折中主义的话，人们将停留在一种无益的教条主义前止步不前。

参考文献：

M. Albrecht, *Eklektik. Eine Begriffsgeschichte mit Hinweisen auf die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94; P. Bayle, *Historisches und Critisches Wörterbuch*, übersetzt von J. Chr. Gottsched, Bd. 4, Leipzig 1744 (Nachdr. Hildesheim-New York 1978); E. Bloch, *Christian Thomasius, ein deutscher Gelehrter ohne Misere*, GA 6; H. Bornius, *Oratio inauguralis de Vera Philosophandi Libertate* ..., Leiden 1654; J. F. Budde (Buddeus), *Elementa philosophiae instrumentalis seu Institutionum philosophiae eclecticae tomus primus*, Halle ^{2}1706 (^{1}1703); ders.: *Elementa philosophiae theoreticae seu Institutionum philosophiae eclecticae tomus secundus*, Halle ^{2}1707 (^{1}1703); Clemens Alexandrinus, Stromata Buch I–VI, Bd. 2: hgg. v. O. Stählin, neu hgg. v. L. Früchtel, Berlin ^{4}1985; D. Diderot, »Eclectisme«, i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 5, Paris 1755, 270–93; Diogenes Laërtios, *De vitis, dogmatis et apophtegmatis clarorum philosophorum libri decem*, hgg. v. H. G. Hübner, 2 Bde., Leipzig 1828–1831 (Nachdr. Hildesheim-New York 1981); H. Dreitzel, »Zur Entwicklung und Eigenart der ›eklektischen Philosophie‹«, in: *Zeitschrift für historische Forschung* 18, 1991, 281–43; Th. Gale, *The Court of the Gentiles* ..., Teil 2, Oxford 1671; *Großes vollständiges Universal-Lexicon Aller Wissenschafften und Künste*, Verlegts J. H. Zedler, Band 17, Halle und Leipzig;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W 19, Jubiläumsausgabe, hgg. v. H. Glockner, Stuttgart 1928 (Neuaufl. Stuttgart 1959); H. Holzhey, »Philosophie als Eklektik«, in: *Studia Leibnitiana* 15, 1983, 19–29; W. Nieke, Eklektizismus, in: HWPh 2, Basel-Stuttgart 1972, 432f; J. Selden, *Opera omnia*, hgg. v. D. Wilkins, Bd. 1, London 1726; W.

237

Schmidt-Biggemann, *Topica universalis. Eine Modellgeschichte humanistischer und barocker Wissenschaft*, Hamburg 1983, 249–92; ders., »In nullius verba iurare magistri«, in: ders., *Theodizee und Tatsachen. Das philosophische Profil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Frankfurt/M 1988, 33ff, 203ff; W. Schneiders, »Vernünftiger Zweifel und wahre Eklektik. Zur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Kritikbegriffs«, in: *Studia Leibnitiana* 17, 1985, 143–61; J. Chr. Sturm, *Philosophia Eclectica. h. e. Exercitationes Academicae ...*, Altdorf 1686; ders., *Physica Electiva sive Hypothetica. Tomus Primus Partem Physicae Generalem Complexus*, Nürnberg 1697; Chr. Thomasius, *Allerhand bisher publicirte Kleine Teutsche Schriften*, Halle 1701; W. Chr. Zimmerli, »›Schwere Rüstung‹ des Dogmatismus und ›anwendbare Eklektik‹. J. G. H. Feder und die Göttinger Philosophie im ausgehenden 18. Jahrhundert«, in: *Studia Leibnitiana* 15, 1983, 58–71.

西格弗里德·沃尔加斯特
（Siegfried Wollgast） 撰
周兵 译，张觅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utorität, Definition,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mpirismus, Erfahrung, Freiheit, Idealismus, Junghegelianer, Kathedersozialismus,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Leitfaden, mechanischer Materialismus, Metaphysik, Negation der Negation, Neoliberalismus, Opportunismus, Postmoderne, Pragmatismus, Reformation, Renaissance, Revolution, Scholastik, Sektierertum, Standpunkt, System, Übergang, Vernunft, Wahrheit

电气化（Elektrifizierung）

A: kahraba.

E: electrification.

F: électrification.

R: ėlektrifikacija (электрификация).

S: electrificación.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列宁 1920 年 12 月 22 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LW 31，第 513 页）曾被广泛视为苏联推进工业化的宣言。一首由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谱曲的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Becher）的诗歌这样刻画列宁：“他那闪电的话语 / 撼动沉睡的世界，/ 沿着铁轨和河流 / 驶向每个地

238 方……变作驱动/锤头的电力，/在人人心头写下/永不磨灭的字。”列宁话语的力量，无疑在于它提出了能够动员和振奋群众的口号。这句口号产生的背景环境提醒我们注意，苏联社会主义具有强制推进的后发工业化的性质。

1. 恩格斯曾写到过电气化所蕴含的可能性和革命后果。他最重要的相关评论是，电气化使工业摆脱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即使“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MEW 35，第445页）。

列宁的口号有着相近的思想语境和政治语境。他在报告中提出这个口号之前正在谈黑市问题，黑市“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LW 31，第512页）。它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地主和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同上）。列宁期望电气化将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第513页），从而创造埋葬小农思维的条件。电气化带来的人造光源——农民和列宁谈话时将它称为“非自然的光”——形象地体现着对农民的政治“启蒙”（第514页）。他从更广阔的视角指出，电气化与他所期待的其他方面的一系列发展相互关联，其中首要的就是他所预期的在苏维埃内“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将讲话的机会更多地让给“工程师和农艺师”（第510页）。在内战胜利以后，他指出政治问题让位于经济事务，是既可行也必要的。鉴于贫困的经济现状，列宁偏重于用技术概念提出他的提议。他的表述令人回想起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LW 25，第439—440页），又令人回想起恩格斯的设想，“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 239
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MEW 19，第224页）。类似的言论还有，列宁表示内行的资产阶级工程师比不懂技术的共产党干部更宝贵（LW 32，第138页及以下）。

列宁认为，政治领域以外的每一点进步，其实都依赖于以非常政治的手段制度化地保障计划的推行，而且认为“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GOELRO）公布的电气化计划为此奠定了技术基础。列宁1921年2月重申了对电气化计划的支持，同时批评不学无术的官僚主义者只知抱怨计划制定者的阶级出身，而不积极地推动计划的实施（LW 32，第136页及以下）。他要求尊重以实际经验为基础的电气化计划，因为“除了已经由‘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制定的计划以外，再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统一的经济计划”（第139页）。

2. 电气化对苏联工业化的战略意义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同时成立（Bailes 1978，第 416 页），电气化被赋予了奠定全部其他计划基础的地位（Carr 1952，第 369—370 页）。列宁的口号预先给予了电气化一般而言归于工业化名下的意义。这一联结也体现在当时的宣传画等艺术中，特别是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Gustav Klutsis）的作品中（Gassner 1992，第 316 页）。

无论列宁的口号专指电气化还是泛指经济发展，它都体现了技术主义的还原论。共产主义被当作苏维埃政权和电气化的简单加和，却略过了必然内在于这个过程中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因素和动力。

马克思最初构想中的核心诉求在于，必须消灭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以及将生产过程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活动。但这一议题在 20 世纪初的社会民主党内已不再具有关键的地位。在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工会的工作重点从监督生产过程变成了“为劳动占产品的份额而讨价还价”（Braverman 1974，第 10 页）。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虽然
240 掌握着政治权力——相对于工会，也不具有更优越的条件以撼动既有的企业管理模式。它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使革命克服相对落后的环境、内战、外国武装干涉，得以幸存下去。因此，列宁处理工业化问题的办法立足于业已得到证明的方式。这解释了他对德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的赞同（LW 27，第 332—333 页）。在工业大生产中，他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LW 27，第 259 页）。

工作岗位上的革命热情所不能胜任的部分，需要在其他地方加以弥补。一般的工业化和专门的电气化，都更需要革命动力在结果中而不是在过程中发挥作用。列宁已在 1914 年确切地表述过对“科学管理”劳动即泰罗制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劳动组织形式利用流水线技术压缩工人肢体活动的空间和自由；同时得出结论，最终工人自己的政府将能够利用已有的成果缩短工作时间以保证工人福利（LW 20，第 145 页及以下）。而在 1918 年，这类扩大闲暇时间的议题就不在议事日程之列了；列宁考虑的是工人在工作时间以外还能够承担的任务，但保证“劳动时的铁的纪律”（LW 27，第 262 页）则更重要。劳动规章制度在企业中的优先地位和并未缩减的工作日长度，共同意味着取消了工人参与制定生产计划、参与领导生产过程的构想（Sirianni 1982，第 140 页）。

3. 传统的即资本主义权威的劳动关

系模式得到加强，同时共产主义活动者越来越趋向于将社会主义建设等同于实现改造物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的伟大工程。在电气化口号和其他计划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依靠苏维埃的力量，才使人创造前无古人的成就得以可能（Kopp 1975，Rosenberg 1984）。这是同
241 时期艺术常见的主题，清楚地体现在计划建造的塔特林塔（Tatlin-Turm）的设计方案中（Lodder 1993，第 18 页）。托洛茨基笔下出现了尤为豪迈的幻景，他畅想且预言“勃朗峰顶和大西洋底竖立着人民宫殿”，“普通人将比肩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在山脊上将耸立起新的巅峰”（1925，第 254 页及以下）。

马克思主义长期有偏爱畅想宏伟科技的传统，罗莎·卢森堡也是其中之一。她比布尔什维克更鲜明地主张工人直接行使权力。她在谈到当时的运河修建工程时曾强调：“我们社会的怀抱里沉睡着多么强大的生产力，一旦它挣脱了资本主义利益的枷锁，文化和进步事业将有多么壮丽的腾飞。”（GW 1.1，第 283 页）

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dgdanow）在科幻小说《红星》（*Der Rote Stern*，1908）中想象的新社会特别具有高科技的特征：火星上的工厂“既没有尘雾，也没有煤烟，还没有废气和烟尘……杠杆……匀速、平稳地运动……火与蒸汽的淫威消失不见，精巧又强大得多的电力是这部庞大机器的灵魂”（第 II 部，第 2 章，第 70 页）。

电力不同于之前所使用的动力，可以和动力来源分离并进行远距离传输。发电在经济和生态上所需的条件和带来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更促进了电力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无论是在生产、运输或通信领域，还是在社会成员个人的日常活动中。

接受上述创新，却不思考作为它们基础的生产关系，这种在苏联普遍存在的倾向集中表现为——讽刺的是，恰好美国最初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将美国视为未来的象征而加以崇拜。根据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的观察，“俄国比美国更崇拜机器，因为机器在俄国仍是崭新的事物，而且笼罩着一层浪漫的魔法”（1928，第 165 页）。

斯大林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说法，恰好体现了这种态度。他形容列宁主义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 242
实精神”（*FL*，第 99 页）的结合。斯大林认为后者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而且不承认有什么阻碍，它以自己的求实的坚忍精神排除所有一切障碍，它一定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进行到底……没有这种力量，就不可能有认真的建设工作”（第 100 页）。

斯大林所谈的结合（Kombination）——

他没有称之为“综合”（Synthese）——的逻辑与列宁的电气化口号相似。“美国人的求实精神”被视为革命现成可用的一种工具，而让使用这一工具的人修改调整它，则并无必要。

4. 斯大林对电气化口号的阐释在列宁死后得以确立。列宁在世时，社会各层面都能看见得到列宁基本首肯的欣欣向荣的其他的可能方向。在与无限制的工业化相反的方向中，最值得注意的有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即划定长期免受任何经济开发影响的区域。自然保护区的倡议者——集中在苏维埃俄国的教育人民委员部（RSFSR）——和倾向于无限制开采自然资源的农业与外贸人民委员部之间的斗争，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歧理解之间的斗争。“发展派”指控“保护派”“为了科学而科学”，敌视社会主义建设；拥护自然保护的人则指责批评者忽视了保护未开垦的自然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Weiner 1988，第 2—3 页）。

列宁坚持不懈地支持建立“受保护地区”的措施。1920 年 5 月他通过签署法令而在伏尔加河三角洲建立的“保护区，是第一个仅基于研究自然的目的而由政府设立的保护区”（第 28—29 页）。另一部针对自然遗迹、园林和公园保护的法令（1921 年 9 月）授权教育人民委员部筹划和确定未来的保护区（同上）。

推进电气化和作为例外办法的设立特定自然保护区，二者并不存在理论上的抵牾，因此两种政策反映的是关于优 243
先顺序的对立主张。二者之所以在苏联初期能够共存，是因为二者共同的立场，即把社会主义建设视为一项以科学为基础的工程。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强调科技的无限可能性；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使全社会的理性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一些深有远见的领导人——或许和普通群众一样——坚持两个方向同时并举。但是官僚主义的强制命令尤其在起中介作用、决定着实际执行的各行政层级导致了僵硬的唯技术论、唯经济论立场。

斯大林上台意味着“技术巨人症”的胜利，原有的基本“科学”共识随之发生急剧转变。全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包括一直到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将自然科学视为理解社会的方法论准绳，但是斯大林时期出现了奇特的转折，自然科学研究似乎要开始接受意识形态的统治（Loewy 1984，第 169 页）。这一转折使得李森科（Lyssenko）等人的伪科学理论得以登场，而且掐灭了任何遏制自然环境破坏的可能。对“为了科学而科学”的攻讦，制造出成倍增长的无知。自然保护恰恰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问题，而是为了使自然本身得以延续，必须首先将自然保护起来——必要时也要免于

研究者的破坏”（Schurig 1995）。苏联忽视了这个问题，付出了严重破坏环境的代价，如贝加尔湖的污染和咸海的干涸以及其他种种不计其数的损失，其中最为惨重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它使得苏联工业化进程开端时曾得到热情欢呼的作为生产力的电气化，最终展现出它作为庞大的破坏力量的另一面。

5.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目标和它的其他目标并存，如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征服自然、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是
244 列宁1920年的口号中所召唤的“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多地放弃了它的某些特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它原本能成为领导电气化（或工业化）进程的力量。

苏维埃政权在实际的实践中为大多数人口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和教育成就，同时它试图通过——既针对工人，也针对领导干部——加强个人物质刺激这种典型的资本主义方式，弥补任何它所缺乏的政治支持（Nove 1961，第116—117、160—161页）。

在苏联统治的数十年中，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一定程度地回避市场的力量，虽然发展和生产效率从一开始就是占支配地位的概念。与此相伴的现象中，一些具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意义，另一些则固执地局限于《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本主义时所呈现的生产的不断变革（MEW 4，第465页）。强调后者的苏联式计划，随着因畏惧持续政治高压、表现为普遍政治冷感的去政治化个人心理而日益增强，使得人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易于接受西方的口号，例如把持续不断的翻新作为发展进步的表现。因此当苏联统治动摇的时候，社会主义也缺乏基础的力量，以动员抵抗资本主义的摩洛赫神（Moloch）。

参考文献：

K. E. Bailes, *Technology and Society under Lenin and Stalin. Origins of the Soviet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1917–1941*, Princeton 1978; A. Bogdanow, *Der rote Stern. Ein utopischer Roman* (1908), übers. v. H. zur Mühlen, Berlin 1923; H.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4;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Bd. 2, London 1952; H. Gassner, »The Constructivists. Modernism on the Way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Great Utopia. The Russian and Soviet Avant-Garde 1915–1932*, New York-Frankfurt/M 1992; A. Kopp, *Changer la vie, changer la ville*, Paris 1975; C. Lodder, »Lenin's Plan for Monumental Propaganda«, in: M. C. Brown/B. Taylor (Hg.), *Art of the Soviets. Painting, Sculpture and Ar-*

chitecture in a One-Party State 1917–1992, Manchester 1993; M. Loewy, »Stalinist Ideology and Science«, in: T. Ali (Hg.), *The Stalinist Legacy. Its Impact on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Politics*, London 1984; A. Nove, *The Soviet Econom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1961; W. G. Rosenberg (Hg.), *Bolshevik Visions. First Pha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Ann Arbor/Mass. 1984; V. Schurig, »Ignorabimus. Nichtwissen als höchste Wissensform in den Biowissenschaften am Beispiel des
245 Naturschutzes«, in: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Streitforum für Erwägungskultur*, 6. Jg., 1995, H. 4, 515–28; C. Sirianni,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London 1982; D. Thompson, *The New Russia*, New York 1928; L. Trotzki,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25; *Trudy GOELRO. Dokumenty i materiali*, Moskau 1960; D. R. Weiner,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Ind. 1988.

维克托·沃利斯（Victor Wallis） 撰
克劳斯·弗里克（Klaus Fricke）
译为德文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rbeitsprozess-Debatte, Assoziation,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Destruktivkräfte, Energie, Enthusiamus, Fortschritt, Generallinie, Hebel (materielle/ideell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novation, Lyssenkismus, Naturbeherrschung, Naturschutz, Ökologie, Oktoberrevolution, Planwirtschaft, primäre sozialistische Akkumulation, 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Ressourcen,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owjetische Gesellschaft,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Taylorismus, Tschernobyl, Tonnenideologie

元素、元素形式
(Element, Elementarform)

A: ʿunṣur/ṣūra awwalīya.

E: element, elemantary form.

F: élément, forme élémentaire.

R: èlement, èlementarnaja forma (элемент, элементарная форма).

S: elemento, forma elemental.

拉丁语 *elementum*（“字符 [Schrift-

zeichen]，字母 [Buchstabe]"；复数 elementa 也作"基本知识" [Grundkenntnisse]）是依据希腊语 ἐλέφας（"elephant [大象]，Elfenbein[象牙]"）形成的，原因是象牙制成的小写罗马字母被用于阅读和写作课中。这个概念通过翻译"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希腊术语 στοιχεῖον 而进入哲学术语（通常为复数 στοιχεία："字母 [Buchstaben]，基础 [Grundlagen]，定理 [Lehrsätze]，自然力 [Elementarkräfte]，精神的 [-geister]，物质的 [-stoffe]"；它通常在军事上被用作"按顺序走" [in Ordnung einherschreiten] 等，Frisk，2，第 757—758 页）。亚里士多德将 στείχω 定义为"其中某些东西被分解成它所包含的素材，例如音节中的 a 和 b"（εἰς ὃ διαιρεῖται ἐνυπάρχον ὡς ὕλην，οἷον τῆς συλλαβῆς τὸ ᾱ καὶ τὸ β̄，*Met*，1041 b，第 31 页及以下）。

1. 在青年马克思当记者时所写的文章中，当他谈到捡拾森林中的木材是旧法律的现代刑事定罪时，我们也能听到（这个概念的）古典意涵，他谈到来自大自然的"自然力"（elementarische Mächten），并将乡村中的贫民称为"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elementarische Klasse），在那里能感到"一种友好的、比人类力量还要人道的力量"（*Holzdiebstahl*，MEW 1，第 119 页；MEGA II，第 209 页）。

246

1.1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元素"（以及从中派生出的理论术语"元素形式"）是具有认识论高度的隐喻。在希腊哲学中，元素的诸形式描述了不可还原物质（基本材料或原始材料）（因此马克思认为，工具机是"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 [Element]"，参见 *K I*，MEW 23，第 398 页），"元素形式"的概念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有价值形式的共有根基，即总的来说属于商品生产的商品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第 49 页）"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26.1，第 143 页）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Element）（26.3，第 178 页）。

元素形式同时也能清楚回答关于形式批评的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问题。元素形式的商品作为分析的最后一个部分出现，从中可以重构出资本主义的复合词。金钱的、资本的、工资的、利息的、基本养老金等形式的价值形式的复合词相应地以商品的不可还原的元素价值形式为前提。马克思希望从形式—元素的商品出发揭示复杂的资本主义形态。反过来，工资、收益、基本养老金等"决不

因此就得出结论说……是这样的构成要素”，从中可以确定价值或价格（25，第870页）。

1.2 然而马克思意识到，“元素”只是一个在有限范围内有意义的图像。与化学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元素不仅是它的“建筑砖块”，也在其中反过来“被建造”。《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商品批判开始，正如在马克思反思最多的方法论评论中所说的，商品是“最小的具体物”（*Randglossen*，19，第369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结果。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终编辑版本中，被拿掉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MEGA II.4.1）一章的草稿中，
247 马克思称由此得出的理论结构为“我们陈述的循环往复”，它符合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仅是“零星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资本的历史发展”，也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即“商品的形式作为一般的、必要的社会产品形式，其自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第24页）。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顺序的起源性意义是没有争议的：只有作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的商品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是其边缘的“元素性”前提。

2.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元素形式商品的认识论地位是一场复杂的且在政治上意味深长的辩论。辩论尤其聚焦于将元素形式首先理解为是**经济的**，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元素形式，还是理解为**社会的**元素形式，即作为资本主义总体的元素形式。第一种观点认为，商品是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的**财富**的元素形式；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素形式，是所有基本规定和矛盾的“核心形式”。如果元素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构成很关键的话，那么社会变革的前景也将堪危，因为旨在进行系统改造的政策必须清楚要扬弃的底层结构是什么，以及它相对于“整体”而言有多深远。从经济上全面扬弃商品生产的尝试到近来通过对市场进行广泛政策调节而实现社会化的理念，各种立场的辐射范围很广。

马克思对元素形式的理解属于前者，对它的接受历史以围绕商品作为社会元素形式的论辩为特征。

2.1 如果劳动产品是物质财富的元素，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永恒的自然必然性”（*K I*，MEW 23，第57页）。那么它们就不是构成特定元素的商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货币表现价格形式的商品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新陈代谢的自然形式，所以《资本论》的初始目标是

重构“货币形式的起源”（第62页）。为
248 此，马克思首先分析的是简单的、个别的或随机的价值形式，然后分析总的或展开的价值形式。当说起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第85页）时，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自动地产生与人类实践和历史特定条件无关的货币形式。但马克思的著作在这一点上，在概念衍生和人类行为学论证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张力：在《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1版中，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的不同发展阶段以更为黑格尔化的概念逻辑呈现，在德语版第2版中和法语版中，它们被结合历史，更清晰地从实践—起源观点进行了重构。

确定按这一方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修订，不仅仅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因为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或对货币形式起源的重构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范式。马克思对自己批判方法的描述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K I*，MEW 23，第11—12页，第89页及以下）。对于社会历史分析而言，完成的形式——如商品的货币形式——是问题所在，因此，必须理解其元素形式，以便可以抵消其归化（Naturalisierung），并同时将其作为历史上特定的实践形式——因而可改变的形式——加以处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第95页，脚注32）如果可以从分析上将不同的价值形式作为共同形式追溯到元素形式的商品中去，那么马克思的起源性重构表明，某种过渡，尤其是向资本形式的过渡，指明了辩证法的局限性（参见Ripalda 1978）。因为通过区分占有生产资料和单纯占有劳动力，资本形式包含了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不是已经从形式发展中产生的，而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暴力历史中才能产生。

2.2 在将商品解释为社会的元素形式的路径中，在列宁死后的1929—1930年代发表的他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 249
评论摘录中，有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条目，商品交换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在这里，元素形式的概念与细胞形式的概念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

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LW 38，第 340 页）

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商品结构被认为“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第 94 页），因此商品“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范畴”（第 97 页），它将“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的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第 94 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资本逻辑的延续中，赫尔穆特·莱希尔特将商品作为很多社会“倍增”的基本结构（1970，第 140 页；第 152 页及以下）。瓦尔特·奥伊希纳（Walter Euchner）认为这一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吻合，即从这种“倍增过程”中能够产生“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1983，第 102—103 页）。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评论说：“这个小说的简化目录是：商品在商品和货币中翻倍，货币在货币和国家中翻倍。”（1984，第 70 页）

2.3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埃蒂安·巴利巴尔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在解构分析和自己的理论构建、辩论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对他们而言，当将社会整体理解为一种底层结构的、元素形式的商品的“表现的总体性”时，黑格尔主义、阶级还原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弊端就会出现并达到极致（*DKL*，第 17 页）。与此相反，他们将生产方式规定为“形式系统的要素”（第 279 页及以下）的不同表达，据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是复杂的，不能从元素形式中推导出来。

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绝对化和本体化”（参见第 325 页，脚注 10），金德里希·泽勒尼（Jindrich Zelený）在其 1962 年著名的关于《资本论》的认识论研究中试图表明“马克思 250
主义的出现，在逻辑基础研究的新哲学方法中，克服了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传统对比，内容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本体论的”（第 12 页）。针对概念逻辑的意涵，豪格强调了《资本论》中基本的起源性重构过程，由此，马克思作为实践形式—思想形式的社会起源性重构的价值形式分析变得清晰可见。相应地，他分析了元素形式的商品，将其视为“逻辑上基本的和起源上初始的”（1976，第 42 页）。不过，他未经批判地使用了如上所引的、在第二部分中有问题的列宁描述（第 79—80 页）。

3. 在语言心理学中，莱姆·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Lem Semjonowitsch Wygotski）于 1934 年反对将分析理解为分解成元素，相反试图将“语言思维

的整体分析为多个单元，这些单元与元素不同，它们展现的是原始时刻，这些时刻不会影响到要检查的整个现象，但确实与特定的单个方面和属性有关"（1969，第292—293页）。

4. 元素形式的经济学观点，即商品建构并决定了社会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的社会性联系，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充足的。基于复杂性和差异性的元素形式观点也遇到了理论和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受到阻碍和修正，也在其元素价值形式性（elementaren Wertförmigkeit）中被压制。这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在苏联集团解体后，一个理智健全的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必须以乌托邦形式提出的一个问题，尽管与此同时，在"后市场经济时代"至关重要的生存之际（通常参见 Rifkin 1995，第191页），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地球和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受到暴力、排斥、不平等、饥饿以及经济压迫的影响"（Derrida 1996，第139页）。

参考文献：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dt. v. S. Lüdemann, 2., überarb. A., Frankfurt/M 1996; W. Euchner, *Karl Marx*, München 1983;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Köln ²1976;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sstsein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Philosophie—Ökonomie—Wissenschaft. Drei Bereichsstudien*, AS 70, Berlin/W 1984; E. W. Iljenkow, *Die Dialektik des Abstrakten und Konkreten im ›Kapital‹ von Karl Marx*, Moskau 1979; H.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ankfurt/M 1970; J. Rifkin, *Das Ende der Arbeit und ihre Zukunft*, Frankfurt/M-New York 1995; J. M. Ripalda, »Notiz über die Grenzen der Dialektik«, in: *Argument*, 20. Jg, 1978, Nr. 110, 529–34; L. S. Wygotski, *Denken und Sprechen* (1934), eingel. v. Th. Luckmann, Frankfurt/M 1969; J. Zelený, *Die Wissenschaftslogik bei Marx und »Das Kapital«* (1962), Berlin/DDR u. Frankfurt/M 1968.

丹尼尔·巴本（Daniel Barben） 撰
李牧今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bleitung, Anatomie, Anfang, Artikulation/Gliederung, Ausdruck, einfach/komplex, einfache Warenproduktion, Epistemologie, Exklusion, Form und Substanz, Formbestimmtheit, Forminhalt, Forschung/Darstellung, Ganzes, Genese, Gewalt, Gren-

zen der Dialektik, Kapitallogik, logisch-historisch, Metapher, Rekonstruktion, Totalität,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Wertform, Zelle/Zellenform

新社会的要素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A: ʿanāṣir al-muǧtamaʿ al-ǧadīd.

E: elements of the new society.

F: éléments de la nouvelle société.

R: élementy novogo obščestva (элементы нового общества).

S: elementos de la nueva sociedad.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新社会的要素”理解为可以从中发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构要素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组成成分。这一观点使他们截然不同于唯意志论者，后者要“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之作”(MEW 7，第273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空想主义者“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MEW 20，第247页)。

以“新社会的要素”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构想才具有科学性质，才具有“**可能的客观经济前提**，这些前提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要素”(Lukács，*GuK*，第287页)。“新社会的要素”构成了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铰链(A. Schmidt 1971)，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对它们予以肯定，使他的资本主义批判成为一种规定的否定(W. F. Haug 1973)。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力和交往手段”(机器和货币)变成了“破坏的力量”，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MEW 3，第69—70页)。此处仍然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受亚当·斯密关于生产三要素的学说影响，将“劳动”等同为雇佣劳动。 252

马克思分析社会斗争和资本强大支配力量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广泛的形态变化，从而提出了过渡(Übergang)理论，既摒除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又摒除经济上的浪漫主义：“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

尝试都是堂吉诃德的荒唐行为。”（*Gr*，MEGA II.1.2，第92页；MEW 42，第93页）工人运动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束缚在旧结构中的新要素。

在分析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马克思基于对劳动形式上和实质上隶属于资本的区分，提出了从家庭劳动出发，经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分工协作，到现代工厂制度等历史概念的发展序列。他呈现了在劳动隶属于资本的过程中，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要素怎样缠绕在一起，资本主义要素的扩张怎样强烈地动摇着封建主义的统治，为自己的统治铺平道路（参见MEGA I.4.1，第91—108页；II.3.1，第229—237页）。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资本的内在矛盾开始发挥作用（危机、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积聚等等），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核心范畴也体现出相应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写的发展进程开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MEGA II.4.2，第503页；MEW 25，第454页）这种扬弃分为消极的扬弃（股份公司）和积极的扬弃（合作社和国企）。前一种扬弃之所以是消极的，原因在于它尽管看似瓦解了之前所有权和支配权的统一，但资本的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分离还没有被扬弃，因为私人所有权（股票持有者）和生产者的分离依然保留着。后一种扬弃之所以是积极的，是因为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取得了第一种（最初的）结合形式，尽管是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结构所扭曲的形式（见MEGA II.4.2，第504页；MEW 25，第456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分析了过渡的要素，强调指出随着现代工厂的扩张，剥削和社会化两个方面的因素都在矛盾地增长。现代工厂的扩张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危机，机器与人竞争，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同时也消灭了不断变成“过剩人口”的男女工人的“最后避难所”（MEGA II.5，第408页；MEW 23，第526页）。马克思认为“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同上）。

推而广之，资本的范畴及其矛盾的发展决定着这些范畴变化和可能变化的形式。资本积聚实际上导致了垄断资本和大型股份公司的出现，它们因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例严重失调，而彻底改变了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的趋势。“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

253

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MEGA II.4.2，第 502 页；MEW 25，第 452 页）

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是发展和社会化生产力，它的前提是资本能够在它化身为机器这一环节中无偿地利用社会的知识、“普遍的知性”或“一般智力”
254 （general intellect）（*Gr*，MEGA II.1.2，第 582 页；MEW 42，第 602 页）。如果要大幅扩大资本的不变部分，并随着自动化的进程将工人转变为生产过程的看守和调节者，那么资本的这一性质就是必不可少的。这带来的结果是，直接劳动失去了它核心的作用、价值规律的地位下降，由此才会出现全新意义上的“财富”。“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MEGA II.1.2，第 581 页；MEW 42，第 601 页）

2.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中，还有可能发现新社会最初的要素，也就是发现社会主义的预示迹象，那么判断在社会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内哪些是共产主义的要素，则要困难得多。如果以阶级利益的消失作为“对物的管理”（MEGA I.27，第 445 页；MEW 20，第 262 页）取代对人的统治的绝对必要前提，那么这绝不是指已然完全内化在资本主义本质中的韦伯所谓的“理性化”，而是指社会的理性化，后者已经在自然保护（如自然保护区）、文化（如古迹保护）、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如国家邮政、铁道）等一些领域显露出萌芽。这些领域中无可争议地属于全社会的财产的最初形态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随着经济基础当中出现社会主义的要素，上层建筑中也必然有这样一个阶段，最初只是在形式上，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开始隶属于社会，这只能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民主自身内部扬弃资产阶级民主：比如中央集权式治理的各种分化，如果只是将原用于中央领域的形式民主简单移用到边缘领域，就应该视为消极意义上的扬弃。与之相对的是，一些通常作为临时设施的政治、社会、行业和文化自治机构（大学生政治团体、自然保护联合会、通信传媒、失业者联合会、文化中心、疗养中心等等）涌现出来，它们积极地体现着共产主义准备 255
阶段的上层建筑要素。

3. 对列宁而言，“过渡这个词……

在经济上是说，在这个社会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LW 32，第 342 页）。列宁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理论观点的不确定，对应着革命时期俄国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实际上列宁最初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工人和农民的监督，之后又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1921 年他在俄共（布）十大上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俄国还不存在（LW 32，第 173 页）。之前（1917 年）他曾认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有化是同义的，或者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LW 25，第 370 页）。1923 年他完善了观点并确信：“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LW 33，第 457 页）但毕竟：“从物质、经济、生产技术的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论粮食税》[*Über die Naturalsteuer*]，LW 32，第 349 页）“前阶”不过是“新社会的要素”的另一种说法。显然，列宁认为夺取政权以后已经在上层建筑实现了社会主义，而他面对经济基础则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摇摆：其一，小资产阶级的前权在俄国阻碍社会主义；其二，无产阶级专政将把所有非社会主义的事物改造为社会主义。

斯大林——这里不对他的行为和思想展开评价——有时更接近于马克思而非列宁，例如他写道：“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力以及同它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不是离开旧制度而单独发生的，不是在旧制度消灭以后，而是在旧制度内部发生的；不是人们有意地、自觉地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 256
的。”（*DHMat*，*FL*，第 675 页）显然，按照他的理解，在夺取政权很久以前，历史矛盾就必然导致旧社会中生长出未来社会的要素。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不顾历史条件的缺乏，尝试在苏联创造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以至于必然产生出一个位居生产机制之上的严格的党政官僚体系。

4. 关于新社会的要素的争论深刻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从 19 世纪末在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和改良、征服资产阶级政权中采取支持还是反对态度等问题上各党的分裂和理论家的分歧，到关于伯恩施坦、“叛徒”考茨基（列宁语）的争论，再到第三国际时期提出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葛兰西和毛泽东没有提出专门的过渡理论，而是赋

予政权和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范畴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文化凭借它和权力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经济。

5. 在各个共产主义党派、工会和新左派之间及其内部出现的新的讨论显示，社会主义文化以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方式受到马克思的启迪。许多批评家拒绝接受“新社会的要素”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是整个结构同时进行的，不存在某些个别领域提前发生决定性的转变（参见 Balibar 1965，Lagrassa/Turchetto 1979）。

另一方面，持渐进主义观点的人对于具体说明哪些是新要素则有着争议。争议涵盖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种新型民主的构想——建立在下层政治经济权力的扩大之上（自我治理、参与、共同决策等不同形式，参见如 Bettelheim 1969，Galgano 1978）——和由国家或政党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集中权力的策略（参见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理论家在意大利针对大型企业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和民主国有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讨论——*Il capitalismo italiano* 1970）。这一讨论曾发生在很多国家，它关系着
257 劳动领域的两个主要发展方向：企业的集体组织和私人企业中劳动者参与领导层决策（参见 Kolm 1977 对不同国家这类讨论的概述）。

直接民主和基层民主之间，自治、领导和自我领导之间，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中央计划和地方自治之间，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针对上述概念关系的新型关系已有广泛的争论。关于大型企业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和民主国有化二者的区别，也有详细的讨论（参见 1966 年舒瓦西勒鲁瓦国际会议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Choisy-le-Roi] 的报告和法国共产党的手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Traité marxiste*, 1972]）。

参考文献：

E. Balibar, »Éléments pour une théorie du passage«, in: L. Althusser, E. Balibar, *LLC*, 1965;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e Choisy-le-Roi«, Berichte in: *Économie et Politique*, 1966; G. Lagrassa u. M. Turchetto, *Dal Capitalismo alla societá di Marx*, Rom 1979; C. Bettelheim,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socialiste*, Paris 1969; F. Galgano, *Le istituzioni dell'economia di transizione*, Rom 1978; *Il capitalismo italiano e l'economia internazionale*, Editori Riuniti, Rom 1970; W. F. Haug,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S. K. Kolm, *La transition socialiste*, Paris 1977; A. Schmidt,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München 1971; *Traité marxiste d'economie*

politique,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 Paris 1972.

恩里科·格拉西
（Enrico Grassi）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rbeit, Arbeiterkontrolle, Aufhebung, Automation, Basis, bestimmte Negation, Destruktivkräfte, Fabrik, Form/Formbestimmtheit,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friedlicher Weg zum Sozialismus, Genossenschaft, Heimarbeit, Konzentration, Kooperation, Kriegskommunismus, Krise, Mitbestimmung, Monopolkapital, Naturschutz,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Produktionsfaktoren, 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Reichtum, Sozialfaschismus, Staatskapitalismus, tendenzieller Fal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Übergang

贫困（Elend）

A: ta'āsa.

E: misery, poverty.

F: misère.

R: niščeta (нищета).

S: miseria.

正如欧洲各语言中许多关于贫穷（Armut）和强迫劳动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语一样，贫困这一术语与其所属的形容词 elend 也在两种意思之间摇摆：一方面，它指的是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引发了同情（*misericordia*）并要求承诺改变；另一方面，它是指人或事物的品质 258
低劣。战争受害者、第三世界的饥饿人口等贫困者都在控诉着世界统治秩序。另外，卑鄙的（elend）家伙惹人厌恶，虚弱的（elend）老翁引人同情，浅陋的（elend）愚人受人蔑视，乏味的（elend）戏剧表演让人疲倦。贫困可以是一种经济状态或精神状态，也可以是道德状态。

当马克思在 1847 年用一部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经常在标题中模仿）回应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时（参见 MEW 4，第 63—182 页），他把这个词的意思从第一种推移到了第二种。类似的还有在区分“宗教的苦难”和“现实的苦难”（Elend）时出现的双重含义。因此，马克思在 1844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KHR*）中评论道：“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

议。”（MEW 1，第 378 页）当他在《剩余价值理论》（*TM*）中写道“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misérable）”（MEW 26.2，第 111 页）时，词义又发生了转化。但对马尔萨斯的评论延续着这种两面性，因为他在反对“被压迫阶级”，“反对无权者（misérables）”时是残酷无情的（第 113 页）。在这场短暂的论战中，这个词的用法从表达道德上的卑鄙，变成了表达对统治阶级道德的鄙视。

与此类似，在《共产党宣言》中也出现了这个词的互相对立的用法：“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elend）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MEW 4，第 476 页）不过，在接下来的 9 页里，这个词是这样使用的——并不是在可鄙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这种社会主义……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Elend）、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第 484 页）这种混杂在一起的做法的典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前 39 卷的名目索引，在那里，对于该词的这两种用法没有任何提示。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用这 259
个词的名词和形容词形式来描述工人阶级或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的农民的状况。就此而言，贫困这个词具有两重意义：一种是从纯经济的和较为通用的意义上描述的，一种是从社会立场的意义上描述的。

马克思很早就在两重意义上用过贫困这个词。1844 年，他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 »Der König von Preußen und die Sozialreform«*）中写道：“英国议会把赤贫是**工人自己造成的贫穷**那种看法和这个博爱的理论结合在一起。”（MEW 1，第 398 页）早在一年前，恩格斯在一篇发表于 1843 年 11 月 4 日《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上的文章中评论道，在英国，人们趋向“共产主义学说”是“由于贫穷、道德败坏和赤贫现象迅速加剧”（MEW 1，第 480 页）。对于贫困和赤贫（Pauperismus）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或者是否应该以贫困来解释道德败坏和赤贫即一个精神要素和一个经济要素，这里还没有说得十分清楚。几页之后，恩格斯将“不道德和贫困”并列在一起

(第488页)，从而表明贫困是一个经济要素。

二十年后，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不论是机器的改进、化学上的发现、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MEW 16，第9页)在这里，贫困显然不是被视为经济要素，而是被看作一般社会范畴。

有这样一种关于贫困的表述，尽管它同前述句子中的陈述是矛盾的，但它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贫困一词时的极端模糊性。这里所说的句子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中："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
260 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Hephästos)的筷子把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MEW 23，第675页)在最后一句中，贫困毫无疑义是指经济上的穷苦，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附加的苦难。与此相反，在前一句中，贫困或许整个代表了后面一句中提到的所有附加的苦难。

在《资本论》第1卷中，还有一处使用贫困这个词的地方和最后一句一样含义丰富。这也是体现这个表达(从名目索引来看)的另外一种用法的唯一一处。那里写道："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Cobett)、道布尔迪(Doubleday)等一大批著作家错误地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第784页)

贫困这个词在今天是怎么使用的呢？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一样，贫困仍然拥有同样的两重意义(参见Ebeling等1980；Alexa Mohl 1981；Edward P. Thompson 1980)。但是，正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一样，就其多种多样的意思，特别是就其直接物质的意思以及就其在各个社会内部和它们之间的分布而言，贫困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参见Altvater等1987)。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共产党宣言》时，德国工人往往每天仍必须工作14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却常常依旧食不果腹，或者至少家庭成员不得不忍饥挨饿。就连妇女

和儿童也必须在工厂做工。家庭生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是贫乏的。然而，在1847年的英国，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出台，资本主义制度也出现了转变，至少在其发达的中心是这样的。

当恩格斯逝世时，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物质上的贫困已成为过去，特别是由工会方面和政治方面组织起来的那些工人还摆脱了精神上的贫困。到了20世纪末，即使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贫困也卷土重来了。由于同过去的两个世纪相反，生产率的提高快于产品和服务的增长，所以1991年后，正如经济景气时期一样，每一年的
261 失业率都创下了新纪录。然而，失业常常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贫困，也意味着社会上的（精神上的）疏离，因为在20世纪末（同1929—1932年相反），不论工会还是政党，都不管不顾失业者了。此外，德国在1997年有大约100万人流离失所。接着，又出现了数十万毒品依赖者。在第三世界，约有1亿儿童处于饥饿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人类面临着这样一个抉择："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在20世纪末，资本主义似乎正一步步消亡在野蛮中。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K. Hübner, J. Lorentzen, R. Rojas (Hg.), *Die Armut der Nationen. Handbuch zur Schuldenkrise von Argentinien bis Zaire*, Berlin/W 1987; H. Ebeling u. L. Lütkehaus (Hg.), *Schopenhauer und Marx. Philosophie des Elends—Elend der Philosophie?* Königstein/Ts. 1980; A. Mohl, *Verelendung und Revolution oder Das Elend des Objektivismus*,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E. P. Thompson, *Das Elend der Theorie. Zur Produktion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尤尔根·库钦斯基
（Jürgen Kuczynski） 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rbeiterklasse, Arbeitslosigkeit, Armut/Reichtum, Ausbeutung, Bauern, Dritte Welt, Grundsicherung, Hoffnungslosigkeit, Hunger,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inderarbeit, Marginalisierung, Pauper, Proletariat, Proletarisierung, Qual, Resignation, Unglück, Unterdrückung, Verelendung, Verzweiflung

象牙塔（Elfenbeinturm）

A: burǧ ʿāǧī.

E: ivory tower.

F: tour d'ivoire.

R: bašnja iz slonovoj kosti (башня из слоновой кости).

S: torre de marfil.

这一贬义的譬喻风行于20世纪的语言运用，主要出现在“艺术家或科学家身处或退居象牙塔内”的断言中；因此才会要求他们走出象牙塔，进入生活。与之功能相同的还有诸如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或玻璃球游戏（*Glasperlenspiel*）等表达，意指秘传式的独处、无效用与无益处；其反义词包括：以实践为导向、参与性的思考、有用性等。这一术语是关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之话语的组成部分，同时考虑到了霸权关系。在左派那里，这关乎社会参与，即与非霸权的力量结盟，打破国家—政治的、社会—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的统治。这一术语的运用包括了与实践的关系和与人民的联系、拥护与拒绝等问题。

262

1. 在《圣经》中，象牙塔是诸多身体比喻之一：所罗门的雅歌（das Hohelied Salomos）畅想着一段“如象牙塔一般”的脖颈（7.5）。自12世纪以来，象牙塔主要出现在圣母文学和圣母圣像中（Marienliteratur und -ikonographie）：珍贵的象牙被视为纯洁、童贞和美的象征；塔则是逃避世界的避难所以及坚毅的象征（Schweikle 1990，第119页）。这一术语的世俗化由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与作家圣勃夫（Saint-Beuve）完成，他将之——但并非贬义地——用于德·威尼（de Vigny）的作品上（Brockhaus，6，第308页）。这一语言图像的启发或许来自天主教会中象牙制的圣体容器（Meyer，4，第235—236页）。

语意的转变仍旧遵循词源学来源：一座象牙塔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人们只能揣测在由如此贵重的材料砌成的墙后究竟发生着些什么。“塔”一词让视线转向高处，发现似乎出自天外之人的手笔。这一概念让人联想到几乎不可逾越的距离：隐蔽与幽居，脱离尘世，进入天空与云端，因此与“云中鸟居”（Wolkenkuckucksheim）（Aristophanes，*Die Vögel*）（典出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意为“不切实际的幻境”。——译者）这一概念接近。

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则继承了这一概念（*The Ivory Tower*，1917）；通过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等人，这一概念经历了一种批判性的变化。伍

尔芙认为，19世纪的作家高踞于大众之上，端坐在“一座由石灰（这是他们的中产阶级出身）和黄金（这是他们昂贵的教育）所打造的塔上”（1940，第279页）。针对保守主义者任凭“远离现实的幻想”自生自灭的苛求，出现了致力于讽刺的抵抗。例如《我是个象牙塔中的居民》（*Ich bin ein Bewohner des Elfenbeinturms*）（Peter Handke，1975）或《象牙塔与路障》（*Elfenbeinturm und Barrikade*）（Siegfried Lenz，1983）等标题嘲弄对其不谙生活或不擅生活的非难。君特·安德斯阐述了这种即便是在进步阵营也不受重视的态度的深层意义：“与那些如此虚荣又如此愚笨、像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一样游荡的伪激进作家不同……，我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用我们最好的表达者的话说：**美就是真实的伪装**（*die Schönheit ist das Tarnkleid der Wahrheit*）。没有哪座塔像象牙塔一样如此罕见地受到攻击。我们把长枪的枪管塞进塔中砖瓦的缝隙。而
263 当我们开火时，没人相信，即便在我们自己人中也没有人，即便我们承认，也没有人相信，居然是**我们**开的火。”（1991，第251页）

马克思的一句名言阐明了，以实践中起效为义务实际上多么有限：他“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MEW 31，第542页）。“实践”在这里意味着与统治者达成约定。

2. 彼得·魏斯的问题“写作者就其整体本质而言，/与他的世界处于何种关联”（*Notizbücher*，I，第41页），却清晰地展现出，仅仅拒绝稳固统治的实践并不足够。在葛兰西从历史视角出发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与群众之关系的研究中，他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例，阐发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因此也就是其主观的态度与行动空间中的——矛盾：马基雅维利和路德走人人群；而面对反抗的大众，人文主义者则选择抽身而去，回到对古典的研究中去。“这一立场为他们不完全‘投身’于真正的历史行动提供了辩护，且无疑是舒适的：这是伊拉斯谟（Erasmus）面对宗教改革的立场。”（*Gef* 6，H. 10，§6，第1237—1238页）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用象牙塔来形容众多被隔绝于真正的权力施行外，被隔绝于生产生活必需品等创造性工作外的知识分子们所身处的社会位置（1993，第108页及以下）。社会主义方案的实践证明了，即便是左派科学家，也被困于一个在社会中形成的行动场域，即便是与计件工人和手工业者联盟的决心，也无法消除这种依附性（第91页）。

根据这种理解，知识分子的存在就其本质而言只能在象牙塔中展开，但不必在其中安居。存在如自尊、同情、求知欲、团结等动因，使人希望离开象牙塔，但这并不容易，也无法一步完成。布莱希特的诗“我离开我的阶级/并与更底层的人为伍”（*Verjagt aus gutem Grund*，GA 12，第84页）视意图与永恒的过程为同一。

资产阶级思想烙印通过将这一概念说成“道德纯洁”或“一个只在他自己世界（只在他的作品中）生活、不关心社会和日常问题的艺术家或科学家自我选择的孤立”（Brockhaus，第308页）之象征，来致力于政治中立化这一概念。
264 而与之相反，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象牙塔则被理解为表达“高傲的与世隔绝”，因此也就是能表达一种“资产阶级艺术家，包括学者的可能姿态，他们……避免卷入政治斗争”（Meyer，第235—236页）。相对立的定义反映了这一术语所承载的张力；这样看来，象牙塔就如同一座灯塔，用侧光照亮了阶级斗争。

3. 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形成的关于艺术之自律特征的概念，标志着艺术家对遭到市场与权力之利用的反抗态度。左派反对先锋派时经常提起的指责——逃往“人的内心世界”而蜷缩于象牙塔中——忽视了，譬如说，艺术对于表现主义者而言——尽管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陌生与艺术敌视”恰恰将他们囚禁于艺术中（Schmidt 1965，第22页）——并非一项隐秘的事项，而是与唯美主义的斗争。卢比纳（Rubiner）要求：“不要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而要为人类而人类（L'homme pour l'homme）。”（Mittenzwei 1968，第9页）

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作为反叛诞生，却成了资产投资品；彼得·魏斯从他与超现实主义的接触中推论出：“我的书是我的交易商品。一旦作品承认这一游戏规则，它就剥夺了自身最后一点力量，变得中性，适应了舞台的机械装置。”（1979，第59页）他随后立刻选择了一种发展以克服这一立场，这种发展精确地区分了作为自我目的的市场营销与社会主义艺术的生存必要性，即通过高销量触及其受众。

应如何避免魏斯所隐射的妥协？应对象牙塔中的生活之批判做区分，将对从事“图伊”式的“头脑短工”（布莱希特语）（Kopflanger，是布莱希特用“头脑”[Kopf]与“短工”[Handlanger]新造出的词。——译者）式服务的拒绝与那种过于轻易便能转变为自我辩护与自我认同的精英意识区别开来。

4.1 1933年前后的反法西斯斗争

赋予了知识分子之困境以先前从未有过的紧迫性。法西斯分子视“知性主义”（Intellektualismus）为“死敌”（Johst 1933，第 150 页）；这种“知性主义”化身为“患痨病的美学家”（Hitler 1939，第 190 页）以及“面色惨白的书虫”（Schemm 1933，第 347 页），在“为艺术而艺术的真空立场上”隔绝于“时代的推动力”（Goebbels 1934，第 88 页），且/或逃入“幻想人人皆成兄弟的空中楼阁”（Horn 1940，第 172 页）。

265 许多反资本主义及反法西斯式的自主艺术形式，在排斥艺术工业与统治政策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发展出了一种语言，（据说）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权力滥用的侵害。例如，“几乎无人‘理解’”的十二音音乐（Zwölftonmusik）绝不可能在纳粹的每周新闻中播放。但“借无用性之形式的反抗有其代价。无用性不再区分上层与下层等等”。一个工人会认为十二音音乐或克利（Klee）的画作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胡诌”。这样一来，反抗的美学还是会被滥用，正如“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展览所证实的：被压迫的劳动者“大军”对先锋艺术充满嘲讽，在这里习惯于将意识形态的偏离、陌生性与（精神）病态联想到一起，并将对其的克服视为大众卫生的必要之举。显然，此种“反抗形式”中被写入了另一种形式，其作用是使“整个秩序得以保留”（Haug 1993，第 110—111 页）。

这就解释了为何反对者的表述，例如“艺术即武器”（弗里德里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语），或是要求用“艺术政治化”反抗法西斯的“政治美学化”（本雅明语），都如此棱角分明。以象牙塔为故乡的艺术无法实现这种效果；它会被敌人当作工具利用。若以历史视角为前提，那么卢卡奇将德国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之化身抬高为社会主义艺术的范式，甚至表示赞誉地写道，“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男性精神不愿毫无抵抗地就在自我消解的必然性面前投降，但他同样也不愿让他对所有人类兄弟般平等的生动感知在冰冷而僵硬的为艺术而艺术之贵族主义、在象牙塔道德面前低头”（1950，第 51 页），虽然令人难以接受，但毕竟可以理解。

4.2“六八”运动使得对（批判）理论与政治实践的表态不可避免。阿多诺在 1969 年被迫终止了他的讲授课，因为课堂沦落为喧嚣骚乱的场景。他在去世前不久曾表示（*Spiegel-Gespräch* 1969）：“我的思想……或许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了实践影响，即部分主题进入了人的意识，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直接以政治行动为目标的话。”当被问及“那么这就是象牙塔中的科学吧？”时，他解释说：“这一表达曾见过更美好的时日， 266

即当波德莱尔（Baudelaire）使用它的时候。但既然您已经说起了象牙塔：我想，一种理论更能够通过其自身的客观性在实践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臣服于实践。今天，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幸之处恰恰在于，理论要服从于实践的预先审查。”在他与霍克海姆的论著中，“所谓个体行动的价值因为对社会整体的强调而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整体如何在没有个体行动的情况下发生改变，这个问题问住了他。“对于‘人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的确通常只能回答：‘我不知道。’”（GS 20.1，第 403 页）

即便布莱希特将这一素材归入“**图伊”综合征**（Tui-Komplex）——阿多诺点明了 18 世纪启蒙主义者就已经必须面对的困境：批判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其影响大吃一惊。看着自己的教条走上大街，让他们诧异；看着从理论中解放的实践和他们对政治文化之理解格格不入，更让他们惊恐。当他们在街垒路障之间时，他们对于其学生而言就已在象牙塔中消失不见。

5. 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需要所有知识分子认同的参与。若按照其所宣扬的人文主义、主权在民、保证自由与取消剥削等价值来衡量，这样的要求或许并不算太多。那些抽身回到“象牙塔中的‘纯粹’科学”的学究，将年轻学者培养成了“不问政治的态度”（Hager 1966，第 74 页）——这也因此遭到了批判。

政治实践让价值经典变得可疑。乌布利希（Ulbricht）要求“我们的科学家们”从他们的“科研房间”中走出来（1952，第 194 页），或是断言“假如我们那么多的科学家们不是如此孤立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今天会另作他想”（1958，第 18 页），不过是“新统治阶级”的众多陈词滥调之一（Djilas 1957）。他们“用粉色的玻璃装饰办公室”，“从里往外看的公务员看见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而从外往里看的世界则看见了奇妙的公务员”（Brecht，GW 16，第 926 页）。埃里希·勒斯特（Erich Loest）也带着同样的想法调转枪头，批评统一社会党（SED）欺瞒性的信息政策才是象牙塔的产物。党媒的编辑们“展示了一幅既可笑又极令人痛心的图景：他们坐在象牙塔中，挥舞着红旗”（1996，第 218—219 页）。“通过‘六一七’，我们媒体的象牙塔开始出现晃动。现在就需要媒体人自己和所有那些重视有影响力的媒体的人，用最快速度拆掉那些摇晃的墙，一直拆到其底座！”（第 221 页）这并未实现，而批评者也人狱多年。

以下的发展进程是多轨的、间歇的以及自相矛盾的：知识分子对没有接受

过预先教育的合作社农民或泥瓦工生产队欣赏歌剧演出而表达的愤怒，应当与让缺乏能力的党内干部做有关专业知识的原则性决定一样看待。在50年代末于民主德国开始的那种努力，即通过广泛的业余时间艺术创作发掘工人大众的文化潜力——比特费尔德路线（Bitterfelder Weg）——使得众多艺术家与工业生产长久地联结在了一起。看起来，艺术已经离开了象牙塔。1976年，沃尔夫·别尔曼（Wolf Biermann）被剥夺国籍，这激起了整个艺术知识界与权力机构的公开决裂，之后许多艺术家都转向了能够通过类比批判体制的历史主题。这是——读者与审查者都心知肚明——持久的政治化的表达。不能再说这是"象牙塔"了。

东德党与国家领导层越来越多地忽视所有社会领域中骇人听闻的弊病，不由得引发了下述问题，即领导层在1989年秋天是否自己正端坐在勒斯特1953年认为媒体所置身的象牙塔中，而许多知识分子则终于短暂地离开了他们——自60年代中期就被统一社会党所攻击的——"怀疑的地堡"（Höpcke 1965）。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Keine Angst vor dem Elfenbeinturm« (1969). GS 20.1, 402–9; G. Anders, *Ketzereien* (1982), München 1991; *Brockhaus Enzyklopädie*, Bd. 6, Mannheim [19]1988; M. Djilas, *Die neue Klasse: eine Analyse des kommunistischen Systems* (1957), Wien-München 1976; J. Goebbels,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München [4]1934; K. Hager, »Partei und Wissenschaft«, in: *Einheit*, 21. Jg., 1966, H. 4, 439–50;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Hamburg 1993; A. Hitler, »Eröffnungsansprache der Deutschen Kunstausstellung 1939«, zit. n. J. Wulf, *Die bildenden Künste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M-Berlin 1989, 190; K. Höpcke, »...der nichts so fürchtet wie Verantwortung«, in: *ND*, 5. 12. 1965; W. Horn, »Rufe in das Reich— Zum fünfzigsten Geburtstag von Hanns Johst«, in: *Völkischer Beobachter*, 7. 7. 1940, zit. n. J. Wulf, *Literatur und Dichtung im Dritten Reich,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M-Berlin/W 1989, 172; H. Johst, *Standpunkt und Fortschritt*, Oldenburg 1933, zit. n. ebd.; E. Loest, »Elfenbeinturm und rote Fahne«, in: *Börsenblatt für den Deutschen Buchhandel* vom 5.7.1953, zit. n. ders., *Durch die Erde ein Riss. Ein Lebenslauf* (1981), München 1996; G. Lukács,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Berlin/DDR 1950; *Meyers Neues Lexikon*, Bd. 4, Leipzig [2]1972;

268

W. Mittenzwei, »Der Expressionismus, Aufbruch und Zusammenbruch einer Illusion«, in: *Menschheitsdämmerung. Ein Dokument des Expressionismus*, hgg. v. K. Pinthus, Leipzig 1968; H. Schelsky, *Die Arbeit tun die anderen*, Opladen ²1975; H. Schemm, »Gleitwort« *zu: Das Jugendbuch im Dritten Reich*, Berlin 1933, zit. n. J. Wulf, *Literatur...*, a.a.O.; D. Schmidt, Vorwort zu: *Manifeste 1905-1933*, Dresden 1965; J. Schweikle, »Elfenbeinturm«, in: *Metzler Literatur Lexikon, Begriffe und Definitionen*, hgg. v. I. u. D. Schweikle, Stuttgart ²1990; W. Ulbricht, *Über Fragen der sozialistischen Bewusstseinsbildung*, Berlin/DDR 1958; ders., *Die gegenwärtige Lage und die neuen Aufgaben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chlusswort auf der II. Parteikonferenz der SED 1952*, Berlin/DDR, 1952; P. Weiss, »Aus dem Pariser Journal (1960-62)«, in: ders., *Aufsätze Journale Arbeitspunkte*, Berlin/DDR, 1979; ders., *Notizbücher 1971-1980*, 1. Bd., Frankfurt/M 1981; V. Woolf, »Der schiefe Turm« (1940), in: dies., *Die schmale Brücke der Kunst*, Leipzig 1986.

托马斯·马克斯豪森
（Thomas Marxhausen） 撰
毛明超 译，李之 校

参见：
Ästhetik, Autonomie der Kunst, eingreifendes Denken, Elite, Engagement, Enttäuschung, Expressionismus-Debatte, falsches Bewusstsein, Faschismus, Frankfurter Schule, Gebildete,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Ich, ideologische Stände, Individualismus, Intellektuelle, Intelligenz, Kritische Theorie, Kultur, Kulturindustrie, Kulturkritik, Kunst, Massenkultur, organische Intellektuelle, Parteilichkeit, politische Ästhetik, Proletkult, Selbstverwirklichung, Spiel, Spontaneität, Theorie/Praxis, Tuismus,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精英（Elite）

A: nuḫba.
E: elite.
F: élite.
R: ėlita (элита).
S: elite.

对精英的追问就是对权力之复制以及对执掌并传承权力之行动者的追问。因此，关于统治、能力、教育与成就、分工的问题在精英问题中相互交织。同时，精英也可以意味着解放运动中最优

秀的那一部分人，而他们即便身处这样的地位，依旧与民主和平等对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精英的概念并未出现，但就其内涵而言，却已在不同的维度上有所指向。例如，恩格斯——与独立于彼此的布克哈特（Burck-
269 hardt）和米什莱（Michelet）类似——曾谈及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城市新贵［Patriziat］），将之视为一个因为不受任何劳动分工的约束而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的阶层，而个性的全面发展正是此阶层的主要特征。马克思随后发声，将精英阶层置于确定的社会条件之中："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DI*，MEW 19，第 46 页［经查，应为 MEW 3。——译者］）

马克思在这里借由统治理论所表达的内容，被葛兰西用霸权理论重构为夺取并保留权力的问题。不过，葛兰西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与通过财富和统治权力形成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物完全不同：在后者眼中，这一问题表现为其"臣属"的解放。在《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的札记》（*Anmerkungen zur Politik Machiavellis*）中，葛兰西主要阐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同时也在"现代君主"（moderner Fürst）这一概念下反思了其中所确立的"精英问题"：现代君主"不可能真有其人，也不可能具体指哪个个人；他只能是集体意志已在社会上被承认，或多或少以行动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并开始采取具体形式时所出现的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历史已经提供了这种有机体，它就是政党。这是一种基本细胞，其中包含着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种种胚芽"（*Gef* 7，H. 13，第 1537 页）。旧社会对于这种集体行动力的形成并未袖手旁观。它"从肉体上消灭敌对阶级的精英人物，并对其广大的后备力量采取恐怖手段，以保全自己并获得一段喘息的时间"（§ 17，第 1564 页）。葛兰西反思了军队中"志愿兵"与精英的关系（§ 29），以及精英在代议制民主中的相关性。在代议制民主中，民意调查实际上评价的正是"少数人，活跃的少数人，精英、先锋等少数人物的意见的可取性、扩张性和说服力"，"也就是这些意见的合理性、历史性或实用价值……。这批假定的杰出人物尽管拥有无限的物质力量，要是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那评价必然是说他们名不符实。如此说来，问题不是'有头脑的'人感到他们被贬低到文盲的最低水平，而是其中有人认为，他们有 270
头脑的人应该把'普通人'手中仅有的一丁点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生活进程的决

定权夺走”（§ 30，第 1598 页）。

在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人们会援引马克思，用精英理论将共产党的作用理解为整个无产阶级的代表。如此一来，“精英”的因素就在于：党因其对社会本质有更出众的理论认识，而与剩下的无产阶级大众区分开来（参见 *Manifest*，MEW 4，第 474 页，但在此处共产主义者尚不打算建立一个特殊的政党）。对于这个概念，列宁的表达更加犀利，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DAPR）1903 年伦敦党代会及 1911 年布拉格党代会上提出了“先锋队”的概念：他指的不是所有党员，只是党内最训练有素、实践中最灵活的精英（LW 6，第 501 页）。其他党员依旧是接受先锋队领导的对象以及补充先锋队的预备队。

属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工作的，是分析资产阶级中的统治阶层；没有这种分析，就无法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自我复制。这一阶层便是资本主义精英。这不是一个资产阶级已固化的阶层，而是一个以财富和休闲为特征的无定形群体，与表面上唯一的政治领导层处于宽泛且若即若离的关系中。据估计，这一阶层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者有意识地成为“绝对的致富欲”的最佳代表，因此花钱绝不大方，更不会浪费（*K I*，MEW 23，第 167 页及以下）：但与马克思不同，为资本而运转的精英之秘密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联结”，甚至是“狄奥尼索斯一情色的生活形式”：让经理人同“大资产阶级精英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的，乃是“社交、音乐会、剧院、旅行、情爱、与身份相称的住所、与身份相称的汽车、服从、文化及其他种种……。与大众之禁欲相对立，恰恰是管理阶层的自由情欲将之与统治阶级联结在了一起”（Kofler 1967，第 217—218 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精英研究形 271
成了独立的分支。不同学派互相争论，将精英作为社会领导群体——从其地位上讲，是“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顶峰”（Ballerstedt 1977，第 341 页）；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与工会、教会与文化界的高层干部也可算入上述群体。与之相应，领导团体人员流动的数据会定期发布。借助马克斯·韦伯及其对统治的定义，精英在这种理解下便被解读为“功能精英”（Funktions-Eliten）。另一种理解则与帕累托（Pareto）一脉相承，就是“价值精英”（Wert-Eliten），包括所有顶尖成就的承载者与最富有者中的上层。出身于这一阶层的科隆社会学家列奥波德·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完全正确地指出，精英是那些确实位于社会顶端的人，他们掌握大量权力工具，

对世界政治、经济、商业与金融、文化与道德等宏大理念很感兴趣，尝试用各种方法通过个人关系，对建立基金会、影响立法草案等事项施加影响，以发挥和增加他们的影响力。正如冯·维泽所强调的，精英最主要的姿态是在幕后匿名地施加影响。对这类精英更进一步的理解，包括对颓废的意识形态定义：在"颓废"中，精英的艺术享受与虚无主义相互结合，而秘传的自我意识则与被反思为值得鄙夷的外部世界相互割裂。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为关于社会权力通过精英实现自我复制的讨论赋予了另一种转向。为了描述统治阶级的特征，他扩展了资本的概念。可通过金钱实现权力继承的经济资本之外，他还补充了文化或曰教育资本，最后还有社会资本。在这一概念框架中，他可以分析把握领导团体的更迭、在这些团体中的历史变迁——例如教育与头衔的意义不断增长——以及通过裙带与人际关系实现的权力交接问题。"那些属于占有资本之阶级或阶级党团的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借助再生产策略，试图通过确保或增殖其资本，巩固或改善其在阶级关系的结构中的地位；这些策略构成了一个整体，在他的行为与变化中展现去系统的特质。"（1975，第23
272 页）这是面向未来的姿态。如此，布尔迪厄便将对资本主义体系中统治的分析与对个人交接做社会学分析的可能性，乃至与对资本功能转移至作为新精英的能者这一过程的阐释结合了起来。

参考文献：

E. Ballerstedt, W. Glatzer, *Soziologischer Almanach. Handbuch gesellschaftspolitischer Daten und Indikatoren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P. Bourdieu, L. Boltanski, M. de Saint Martin, P. Maldidier, *Titel und Stelle. Über die Reproduktion sozialer Macht*, Frankfurt/M ²1975; C. Edwards, *Controls of Cartels and Monopolies*, New York 1967; U. Jaeggi, *Die gesellschaftliche Elite*, Bern ²1968; H. Kleining, A. Moore, »Das Selbstbild der sozialen Schichten«, in: *KZfSS*, 12. Jg., 1960, H. 1, 86–119; L. Kofler, *Der asketische Eros*, Wien 1967; ders., *Die Vergeistigung der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86; Th. Veblen, *Theorie der feinen Leute*, Frankfurt/M 1958; L. v. Wiese, »Die leitenden Eliten«, in: *Universitas*, 10. Jg., 1955, H. 3, S. 261–71.

里奥·科夫勒（Leo Kofler） 撰
毛明超 译，李之 校

参见：

Arbeiteraristokratie, Avantgarde, Bildung,

Diktatur, Entwicklung, Eros, Führung, Geld, Genuss, Gleichheit, Hegemonie, Herrschaft, Luxus, Macht, Muße, Nihilismus, Nomenklatura

解放（Emanzipation）

A: taḥarrur.

E: emancipation.

F: émancipation.

R: émancipacija (эмансипация).

S: emancipación.

解放意味着人们（消极或积极地）从对自然的奴性依赖以及社会统治中解脱出来。（我们）要探讨的是，解放过程的主体、有效解放的前提条件和形式、解放的标准：要研究的是，局部解放与普遍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普遍的解放运动与无统治的或统治最小化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目标之间的矛盾联系。

“解放”一词源自拉丁语 *emancipare*，它由 *ex manu capere* 转化而来（*ex*——向外，*manus*——手，*capere*——取），其含义为“免于从属，使之自由”，适用于父系氏族的奴隶社会（Georges，1，第2396页）。类似的用语还有：*mancipator*（奴隶贩子）；*mancipatio*（要式买卖）——在五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据为己有，它是“罗马的一种取得方式”；*mancipium*（正式购入）——转喻“通过戴上手铐而获得的奴隶”；等等（第2卷，第790—791页）。解放，“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是儿子从父亲的控制中正式解脱出来（通过三次“要式买卖”[*mancipatio*]以及“从手中释放”[*manumissio*]实现），是一种纯粹的释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放）是指，正式地让渡一个事物（1，第2396页）。 273

1. 在迈向资本主义新时代的过程中，“解放”这一罗马法的专业术语（terminus technicus）也经历了意义的转变和拓展。它不再优先地表示赋予（法的意义上的）自由这一消极的法律行为，而是越来越多地指积极的自我解放。（德语中的）反身动词“**解放**”（*sich emanzipieren*）的用法体现了这一点。在18世纪，解放一词有了政治内涵，并最终成为一个革命概念。1792年，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就预见了黑格尔关于主奴关系的思考，他认为：享受阶级依靠那些“为他们欲望服务的人，从而日益解放自己”。这一过程以及下述事实——“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公共见解几乎盛极一时”，而这一见解为“思想自由和

意志自由”以及“政府、宪制和共和主义的思想”铺平了道路——为法国大革命做好了准备（*Umrisse*，第739—740页）。正如福斯特期望的平等主义那样，就财产的含义而言，即“**对无生命事物的依赖**而言”，法国大革命是致命一击，并且还导致了“道德解放”（第745页）。尽管“自利（Eigennutz）与权力之间的联系”需要并且产生无知，但革命运动却使得“（人们）从盲从中解放了出来，使得所有强制手段和所有命令都变得多余”（*Zunftzwang*，第369—370页）。

康德没有把“解放”一词作为术语本身来使用，在《学科之争》（*Streit der Fakultäten*）中，他还把人们挣脱占统治地位的依赖性视作革命和启蒙的作用。尽管他“不是通过事物**自下而上**的进程，而是通过事物**自上而下**的进程”期待着更善之物，但他宣称（法国）“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就是“向着更善的方向的进步”的明证（WA 11，第357—358页）。其条件和内容就在于，人变得成熟。正如康德在《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lärung?*）中所言，关键在于，自由、公开地运用理性（第53页）。

黑格尔认为，解放首先是人对自然的依赖的一种矛盾克服，即变得比“普遍的权力和整个客观本质”更强大（*PhG*，W 3，第155页），并且废除行为人本身与之相关的支配关系。通过（精神的）劳动，人们获得了“对个别自然事物”的控制权（W 16，第278—279页）。然而，（在一开始）拥有普遍的权力的人，并不是“那些在生活中只做一般的事，而把特殊事情摆在面前”的人，他们把力气耗费在钓鱼和打猎上。只有当受过教育的人“从这种普遍的定在、活动、劳动中抽身而退……进入一种**更高级的状态**”，他才能在这一状态中把握“事物，在其质的确定性之中……，在彼此形形色色的联系之中”，才能对自然界本身以及那些投身其中的人“行使真正的权力”（同上）。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认为，主奴关系不可避免地成为“自我解放的开端”（W 4，第80页），从被奴役的一方来说，首先要从被主人逼迫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内化的自我克服（Selbstüberwindung）开始，最终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因此，奴役就成了“在完成之后，完全与自己相反的东西”（W 3，第152—153页）。人类“不是从奴役中解放出来的……，而是**通过被奴役才获得解放**”（W 12，第487页）。在讨论文艺复兴时，黑格尔明确提到了解放：随着“科学的恢复、艺术的绽放、美洲的发现以及通向东印度群岛的道路”，解放宣告了“普遍日”（Tag der Allgemeinheit）的降临，而这一“普遍日”“彰显了最崇高的东西，把解放了的人的精神（Menschengeist）描述 274

为永恒且真实的内容”（*PhilGesch*，W 12，第491页）。

作为政治—哲学的参照点，“解放”在三月革命前夕成为运动以及目标的核心概念（参见Grass/Koselleck 1975，第153页）。它指的是社会运动的事业，即与封建的、民族的、殖民的、父权的依赖做斗争。在这方面，对宗教和其他精神依赖的克制（通过知识传授和教育，以及个人、阶级、种族和民族在法的方面日趋平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828年问道：“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是什么？”“就是解放。不仅仅是爱尔兰人、希腊人、法兰克福犹太人、西印度黑人和类似被压迫的人，而且是整个世界的解放，尤其是欧洲的解放，已经成熟，正在从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铁箍中挣脱出来。”（*Reisebilder*，第259页）——在夏
275 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看来，“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普遍基石”（1841，第190页），而这一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普遍解放的标尺（MEW 2，第208页；MEW 19，第196—197页）。

2. 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尤其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术语，马克思一直用到了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且在后来60年代的著作中又一次启用了这一术语。这个术语可以和很多用法联系起来，比如马克思的“犹太人的解放”“现实的解放”“实际的解放”“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人类解放的矛盾方式”（《论犹太人问题》，MEW 1，第353、356、372—373页），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理论的”“政治的”“局部的”“全面的”“普遍的”解放，“人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等（第385页，第389页及以下）。1839年，青年恩格斯将“妇女解放”称为“当代的问题”（MEGA，I.3，第71页）。在“妇女宗教思想自由”那里，“新事物的胜利才会到来”（第133页）。1840—1841年间，马克思强调了（由塞涅卡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的辩证名言，即哲学（作为奴隶）为自由服务，凡是这样做的人，都“将立刻……获得解放”（MEW 40，第273页）。

2.1 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解放这一概念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布鲁诺·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把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这是“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MEW 1，第351页）。作为政治解放的一部分，宗教上的政教分离只意味着宗教自由，而不是宗教解放。“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

身”（第371页），但在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它们的分裂依然存在，所以政治解放不能消除宗教性。在“现实的、实际的解放”（第356页）的意义上，它只能与市民社会本身一起被扬弃掉——通过人的解放（来扬弃）。纯粹的政治解放是“一大进步，……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同上）。它“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但它仍然是局部的，因为“人即使已经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这时他总还是受到宗教的束缚，这正是因为他仅仅以间接的方法，……通过中介承认自己”（第353页）。相反，国家的“唯灵论”（Spiritualismus）符合“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第369页），即释放利己主义的
276 私人利益（第353页）。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探讨废除国家和宗教作为诸个体之间中介的社会经济条件。区分政治解放的社会和人的解放的社会的决定性标准在于，“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它是“我们时代的自我解放，是一种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的社会组织”（第372页）。“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成为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的时候”，又或者，就像马克思在间接谈到卢梭时（参见MEGA IV.2，第91页及以下）所说的，“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MEW 1，第370页），人的解放才算完成。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里，马克思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的不同与其实际载体联系起来。在政治革命中，“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但这个阶级没有能力，“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只有“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本身”（MEW 1，第388页及以下）。这种“人的解放的实践因素”就是无产阶级（MEW 27，第426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行了解释，“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需求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

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MEW 40，第540页)。自然科学和工业，在私有财产中"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同时也为"人的解放"做了准备(第542—543页)。废除私有财产是"人的解放的必然环节"，但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得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形态"才是社会主义(第546页)。

277 2.2 二十年后，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使这种观点成为发人深省也极具历史影响力的现实。在此之前，英国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已经局部战胜了资产阶级——马克思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MEW 16，第11页)的胜利——(这种工会性和政治性的阶级胜利)在资本主义时代内推动了解放的进程。

自1864年以来，在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几乎所有政治纲领性文件中，口号一直都是："解放劳动"(Emancipation of labour)(MEGA I.20，第13页)、征服政治权力(MEW 16，第12页)。解放运动的焦点与政治斗争相关，旨在解放工人阶级，即"一切政治运动都应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MEW 17，第421页)，而这束缚了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解放概念。之前的理解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废除私有财产的运动是通向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也是通向"最终目标——废除阶级(*Abschaffung der Klassen*)"的道路，不过它并不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本身(第422页)。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日常斗争中，这种认知找不到政治对象。

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矛盾就能找到它的理论表达；在派系斗争中(1872年巴枯宁[Bakunin]派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则找到了它的现实的一政治的表达。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通过占有国家权力、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其他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组织等形式来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都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最终目标，即"充分实现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抵制"专制的一中央集权的"共产主义，认为它是"对人权的永久否定"(*Brief*，第188页)。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无产阶级有组织地使用国家权力工具(Machtinstrumente)看作是通往普遍解放的必经之路(参见MEW 4，第481—482页)。恩格斯认为，如果像巴枯宁派要求的那样，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国际工人协会及其章程作为"未来社会的确切的原型"(MEW 17，第477页)，这就成了神秘主义。

在具体问题出现的地方，例如，英

国工人运动的目标与爱尔兰民族解放的目标相互冲突，马克思坚决力挺后者。
278 一个参与压迫另一个民族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解放自身的。

因此，有必要“唤醒英国工人阶级，让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人道主义情感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社会解放的首要问题**”（MEW 32，第 669 页）。因此，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框架内，处于英国政治统治下的爱尔兰人应该能够组建自己的分会。当然，这并不代表笼统地支持民族独立甚至“种族”（ethnisch）独立。1882 年 2 月 22 日，恩格斯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写道：“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不管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等等多么令人感兴趣，只要他们的解放愿望同无产阶级的利益相抵触，那我就同他们毫不相干。亚尔萨斯人也受压迫，将来我们再次丢开他们的时候，我会感到高兴。”如果他们对民族解放的追求破坏“我们的整个革命形势……，为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毫不留情地牺牲他们”（MEW 35，第 280 页及以下）。倘若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因，那么这些严厉的话语就有了预言的分量：恩格斯防止这样一种危险，即“这些人的起义会引起世界大战”（第 281 页）。

1892 年，恩格斯终于收回了自己以前的“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其最终目标是解放整个社会，也包括资本家在内”；他现在宣布，他从 1844 年起的解放思想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一种胚胎形式，仍然依附于德国哲学，虽然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在阶级斗争的现实面前，只有新手或“工人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才会鼓吹“解放全人类”的立场。（MEW 23，第 269—270 页［经查应为 MEW 2，第 641—642 页。——译者］）

2.3 劳动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两个方面思考了**经济解放的条件问题**。一方面是通过“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使劳动从中世纪狭窄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的联系形式中解放出来。第二种意义上的劳动解放，是指扬弃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 279
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MEGA II.1.2，第 412 页）。因此，经济前提就是：工作设备进化蜕变为机械自动化系统。这样，“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第 587 页）。这一点之所以可以实现，是因

为在生产者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生产者的地位有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个人不再直接与自然对象打交道，“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Gr*，MEW 42，第 601 页）。这样一来，决定社会财富的不再是生产者的直接工作时间，而是“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MEGA II.1.2，第 581 页）。马克思的早期假设，即普遍的人的解放是可以争取的，在这里获得了政治经济的基础。

因此，人们在思考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解放劳动的同时，也考虑废除社会的统治；劳动变得普遍：“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法兰西内战》，MEW 17，第 342 页）马克思展望了这样一个共同体（Gemeinwesen），它克服了劳动颠倒（《哥达纲领批判》，MEW 19，第 19 页及以下）。他认为，劳动已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这既是解放的出发点，也是解放的结果（第 21 页）。如果人们成功地将自己从物质需求和控制中解放出来，那么物质生活的生产就是创造力享受和能力发挥的自我实现。一旦他们把自己作为人解放出来，他们将能够过上这种需要的生活。这包括废除劳动分工（它产生人类劳动的对立从属关系，是社会形态的基础）；将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男人的劳动和女人的劳动、劳动和非劳动。

福尔克尔·布劳恩提出了把人的 280
解放与劳动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发展相结合的思想。他在《伟大的和平》（*Großer Frieden*）中谈到农民时提道：“但在和平中，他孤独地来了 / 被他的工作与世界隔离 / 在他的木头后面，他把木头压在地上 / 在这个小小的王国，从清晨到下一个清晨 / 他也不知道还有谁。这只恐龙 / 不把额头从沟里抬起来 / 他有他的办公室 / 农民不能代表自己。”农民必须被统治。（*Texte*，5，第 224 页）

3. **第二和第三国际**。3.1 由于争取解放的斗争显然还有广阔的前景，以及考虑到无产阶级本身很难通过被征服的国家政权来领导国民经济、促进文明的发展，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900 年作出了下述评价：为了真正的进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无产阶级运动，现在比为实现最终目标而展开的革命斗争更重要（*Voraussetzungen*，60，第 250 页及以下）。他明确反对“警察意义上的革命”（Revolution im

Polizeisinn)。在他看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关系中，只有社会层面的逐步改良是有成功希望的，因此，必须把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引向“宪制之渠”(1895，第455页)——这些看法最后把整个社会民主主义包含在内(参见 Meyer 1977，第135页及以下)。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争夺国家权力的斗争定义为：**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决定性手段**，而这意味着，在整个过渡时期(即直到新社会在它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之前)，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解放运动与普遍人性的利益和解放运动之间存在**非同一性**(*Nichtidentität*)。在20世纪，这种非同一性演变为明显的矛盾，最终在斯大林主义中发展为一种致命的对立。列宁认为，“阐明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的作用”是“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LW 18，第576页)。1899年，在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时候，列宁仍宣称，“就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立场而言……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举起**一般民主主义**的旗帜”。(LW 4，第23—24页[经查，应为该书第231页。——校对者])。

3.2 对罗莎·卢森堡而言，解放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解放(这个术语后来被彼得·魏斯采用：“如果我们不解放自己，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这一思想决定了她的政治著作，也明确了她宣传鼓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她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说，民主党人(即革命的小资产者)‘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18.B*，MEW 8，第145页]。现代无产阶级在经过历史的考验后却是另外一种样子。无产阶级的错误也像它的使命一样重大。没有现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者，可以给无产阶级指明它应该走哪条路。历史经验是它的唯一导师，它的自我解放的崎岖道路不仅是用无限的苦难，而且也是用无数的错误铺成的。无产阶级旅程的目标及它的解放取决于它是否懂得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自我批判，无情的、严厉的、彻底的自我批判，是无产阶级运动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GW 4，第53页)对个人和政党而言，对学习的称赞是其存在的要求。卢森堡在文章中也特意提到了马克思：“今天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即社会民主主义党如果不善于学习，那么，他们就将退出舞台，‘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Klassenkämpfe*，MEW 7，第79

281

页)。”(第63页)因此,她将她革命性的现实政治设计为一种框架形式,(人们)可以通过这个框架学习经验。她抨击了下述观点,即“领袖”要为错误负全责,并且认为布尔什维克对党和革命的理解都与建设和塑造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她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恰恰是集权的领导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无产阶级,他们作为政治自由、公共领域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为解放而斗争的阶级”(I/2,第429—430页)。卢森堡还把解放视为人类能力的实现,即“把自觉的观念、有计划的思想并从而把自由意志”灌输到人的社会行动中去;在这段话里,她把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称为“人类从动物界向自由王国的一
282 次飞跃”(4,第61页;但恩格斯指的是“必然王国”,参见《反杜林论》,MEW 20,第264页)。

3.3 这里还要提到葛兰西。在他看来,自我解放与参与社会事业联系在一起。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个体的不协调也与社会相关,即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落在了社会后面。葛兰西称其为“给自己的行为一个意识的方向”(*Gef* 6, H. 11, § 12,第1379页)。一旦人们这样做,他们就成了“哲学家”。对葛兰西而言,这意味着形成一个他们能够认同的连贯的世界观。要想达到这一点,唯一的方法就在于,开展以塑造生活条件为旨归的公共事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在背后突然袭击他们的四分五裂的问题域(Problematik)亦是一种结果,而这也是由于个体没有参与社会事业,或者仅以从属的形式(作为“庶民”)参与其中。这种情况又使得这一事业需要“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每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铺平了道路。它的任务不是“将科学引入‘所有人’的个人生活中,而是要对一种已经存在的活动进行更新,使之成为‘批判性’的”(第1382页)。

葛兰西关注的是在工人运动和整个国家社会主义中都尚未解决的任务,即如何领导废除资本主义结构的现实斗争,而不至于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的那样,“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MEW3,第6—7页),以至于错过普遍的人的解放。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最初是带着“吸收整个社会”的诉求登场的;但由于这一诉求难以实现,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暴力解决方案被提上了日程;真正的普遍解放运动,必须能够在争取霸权的斗争中“同化社会”;因此,这意味着“国家和法律的终结……,因为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被市民社会所吸收而变得多余”(*Gef* 5, H. 8, § 2,第943页)。按照葛兰西的说法,霸权起源于工厂(1, H.1, § 61;参见

H.7，§ 11）。他考察了当时新兴的福特制生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斗争之间的关联，以便于寻找新的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解放条件这一问题的答案，
283 特别是生产的合理化所产生的约束是否能转化为个人的“自律，也就是……自由的问题”（H. 7，§ 12）。

4. **批判理论和反权威的运动。**4.1 借助社会民主的解放概念，瓦尔特·本雅明批判了作为其基础的劳动概念和进步概念。这种社会民主赋予工人阶级以“后代救世主”（Erlöserin *künftiger* Generationen）的角色，他们等待他们必然到来的时刻（GS I.2，第 700 页）。在另一方面，本雅明还在他的笔记中，就像在放大镜之中一样，收集情感碎片：“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必须深入思考三个因素：历史时间的不连续性；工人阶级的破坏力；被压迫者的传统。”（I.3，第 1246 页）解放不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是从灾难性的发展中突围而出的东西：“任何一个瞬间都可以带来革命性的机会”（第 1231 页）。

4.2 着眼于美国的形势，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56 年引燃了围绕解放的讨论，把解放看作是个体与大众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在劳动中和从劳动中获取自由，这里指的是马克思的矛盾（Horkheimer，GS 6，第 42—43 页）。与马克思类似，霍克海默至少使用了两种解放概念，首先是针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解放概念（7，第 98 页）。然而，个体在“大众社会的自由”（第 94 页）方面做不了什么，因为“依靠个体的……太少了”（第 98 页）。鉴于上述事实，霍克海默关心的是，“把社会从原子化（Atomisierung）中救赎出来”（6，第 142 页）。这就是个体的解放，而这只有“在个体所属的整体关联之中”才能实现（7，第 61 页）。霍克海默反对把劳动的神化（Vergötzung）与文明等同起来，但马克思却如是宣称。

在阿多诺看来，“社会的解放”就是“事物凭借其自身的动力，从社会习俗和控制中自我解放（Sich-Befreien）出来”（GS 7，第 343 页）。只有在“个体的解放”那里，“理性的发展才有其生存的权利”。“倘若它把握了所有个体赖以生存的普遍性，它就能成功。”先决条件在于“公共领域中的合理秩序”（第 452 页）。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说得更加具体：“当被问及已经解放了的社会的目标时，人们会得到，诸如实现人的可能性、实现生活的丰富性这样的答案。这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此不合法，而回答中令人作呕、夸夸其谈的内 284
容却也同样难以避免。……唯独最简单粗暴的东西是温柔的：不能让人饿死。”

(*Sur l'eau*，第206页及以下)。

4.3 批判理论的原理，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提供的原理，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西欧和美国绝大多数独立于阶级的、新的、社会的解放运动中就产生了影响。马尔库塞对社会的诊断（工人阶级全面融入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愿景（通过激进团体的大拒绝，全面的统治能够对个人乃至制度产生改变）(1967a，第11—12、53、159页；1967b，第49页及以下)，与反专制的学生运动的愿望不谋而合。

这场运动想要推动个人的彻底解放，让人们直接生活在一种新的文化之中，克服政治的以及个人精神的、心理的和性方面的禁锢，并且同时也要克服整体，即部分地运用马克思理论来分析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在这场运动中，解放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口号。因此，越南的解放斗争被当作国际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来讨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断言，革命变革缺乏社会先决条件。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批判哈贝马斯用他“无概念的客体主义……扼杀了解放的主体”(Dutschke 1967，第76页)。

哈贝马斯坚称：“‘善’……必须被如此精确地幻想，以至于它满足并且阐明一种潜在的兴趣：正是对解放的范围有兴趣，解放在历史上……才是客观可能的。”(1968，第350页）这种反思是哲学的任务。“科学所促成的启蒙过程是批判性的，但批判地瓦解教条却并不是解放，它变得无动于衷：它不是解放性的，而是虚无主义的”(第355页)，因为理论—技术取代了理论—实践。

4.4 1967年，约翰内斯·阿格诺里（Johannes Agnoli）认为，在与反独裁运动的结合中，解放违反了规则。与“五万名‘强大的’示威者和平……游行，还自己出警维持秩序”相比，解放更适合在“骚乱”中体现自己（1994，第68页)。这是针对工人运动的。面对1968年的运动，工人运动大多持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这是学生运动未能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原因之一，但学生运动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和部分民主化。在部分地放弃了解放全社会的雄心壮志之后，学生运动成为新的社会运动的开端，与之对立的方向被扩大，但没有形成固定的结构（参见 Hirsch/Roth 1986，第213页，第220页及以下)。然而，特别是在反种族主义和女权运动中，(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解放的概念（Emanzipationsbegriff)，转而采用解脱的概念（Befreiungsbegriff)。

285

5. 同时，过多的顽固结构把控着东德：以权力为中介的解放诉求日渐凋敝，

与这种凋敝相关的思想内容内嵌在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的官方精神生活之中。对国家社会主义而言，在局部的进步之后，一种普遍的人的解放的视角不再存在。在这里，广义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概念几乎完全被放弃了，或者被斥为不成熟的。苏联的《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是这样评价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的："人的解放这一概念，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印记。"（1959，第3卷，第36页）这无可非议，而且确实化解了当时主流解读对马克思的挑衅（即马克思早期著作出版后，西方学界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人道主义的解读。——译注）。在《哲学词典》中，沃尔夫冈·P. 艾希霍恩（Wolfgang P. Eichhorn）用四个句子论述了解放的问题（1964，第273页）。马克思的术语"解放"（工人阶级的解放除外）和"异化"都被看作是前科学的早期形式。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这些内容，但还没有以更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替换它们。在"人的解放"方面，费尔巴哈的"共同的出发点"（gemeinsamen Ausgangspunkt）被提及（Klein/Lange/Richter 1969，第225页）。在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为它们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打破了术语的边界（第228—229页）。因此，它们就不再被认为与"系统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关（第239页）。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它们更像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Marxologen）的侵入口（第234页）。安娜丽丝·拉施扎（Annelies Laschitza）和君特·拉德昆（Günter Radczun）反对奥希普·弗勒希特海姆（Ossip Flechtheim）"不可接受的"主张，即罗莎·卢森堡是世界公民，代表着"解放了的人的未来"（引自 Laschitza 1971，第91页）。赫尔穆特·塞德尔（Helmut Seidel）则略有不同。尽管他在1966年表示，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还不是"理论上的批判对象"，但与此同时，塞德尔也竭尽全力地挖掘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丰富的思想。恰恰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生活过程的总体性"居于分析的中心，而这种分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书，第1191页）。当时，莱比锡的哲学家们计 286
划把作为科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自己从行政限制中解放出来，并在此意义上重新设计学生的哲学教学，但（他们的这一计划）在行政上受到了阻碍。

6. 1917年和1945年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福特制生产方式的危机以及方兴未艾、危机四伏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之中出现了，后者可以被灵活可调自动

化（flexible Automatisation）、丰田主义（Toyotismus）以及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等关键词描述（参见PAQ 1987；Womack/Jones/Roos 1991；*Schlanker Betrieb?* 1993），而这正是马克思提出的潜在的劳动解放的经济条件（参见 Weiss 1995）。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就已经把对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的新可能性的希望与初显端倪的灵活可调自动化联系在一起。人们探讨这些可能性时用到了下述这些关键词：美国的“工作生活品质”（quality of working-life）、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技术的设计理念”（sozio-technisches Gestaltungskonzept）、西德的“工作生活的人道化”（Humanisierung des Arbeitslebens）（Kern/Schumann 1984，第19页、第100页及以下）。在东德，人们期待“在科学—技术的革命方面……新的条件能充分地发展人类劳动的独特特征”（*Politische Ökonomie*，1969，第288页）。然而，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些承诺并没有得到履行。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领域中出现了新的解放的可能性，而对文明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例如，大规模失业在事实上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排斥），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如果人们像安德烈·戈茨（André Gorz）那样，把个体的解放仅仅看作“从工作中解放出来”（1989，第133页及以下），或者不假思索地宣称以劳动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解放是一种幻觉，并断言，利润性原则（Prinzip der Rentabilität）衡量的恰恰是“‘消极解放’（negative Emanzipation）和社会—生态破坏最终的双重路径”（Kurz 1991，第46、74、238页），那么就很难接受在工作过程本身中形成的人的解放的新条件。人们期望，通过“彻底地废除现代商品及其世界体系”获得拯救（第270页）。对生产过程本身中所产生出来的解放潜力进行阻挠，似乎是对下述事实迟钝的反应：直到20世纪后期，倘若想要在世界经济中立足，东西方的所有解放运动就都必 287
须参照福特制的工业生产模式。那些遵循马克思思想的人，即认识到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MEGA I.2，第245页）的人，至少能够认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反解放这一特点的经济基础，即福特制制造的障碍无法克服这些奴役关系。

由此可见，解放运动不稳定的强制性也变得值得怀疑，它们在“旧社会”的政治形式下，在其部分成功的范围内活动，并且不得不启用被视作过渡内容的、反解放的“解放手段”，而这些手段“在解放后就会消失”；正如国家社

会主义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它们不仅“尚未”实现其作为解放了的社会的“最终构成”，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言（MEW 18，第 636 页），完全就没有实现。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兴的解放运动愈发拒绝把自己与之前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部分成功的政治斗争的结构捆绑在一起，拒绝把自己与工人政党或其他党派联系在一起。这种拒斥不一定要被当作某种缺点，而是可以被视作对必不可少的探索的一种表达，即寻求解放斗争新条件和进一步目标的必要探索。

20 世纪末，人类文明的新威胁喷涌而出，一种新的可能性也浮出水面，即马克思主义可以作为“人的解放的一般理论”（Huget 1990，第 659—660 页）。在争取全面社会自治形式的斗争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解放了的劳动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但政治的解放运动要如何采用它的这种可能性。鉴于新自由主义的野蛮行进，在我们普遍寻求文明兼容方案的过程中，解放运动的新形态浮出水面。例如，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en）的“包容的、反前卫的和集体的构想”。斗争的目的不是权力，不是以权力为中介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是民主、自由和正义的领域，是一个“让革命成为可能的革命”（Marcos 1996，第 227—228 页）。下述问题正在成为现实—历史批判的问题：在后福特制的基础上，形形色色的解放运动采用类似的原则，能否打破历史统治的连续性，为全人类的解放开辟道路？

288

参考文献：

J. Agnoli, W. Gehrcke u. B. Rabehl, »Die 68er Studentenbewegung—eine vergessene Revolte? Ein Streitgespräch«, in: *UTOPIE kreativ*, 1994, H. 49, 54-68; M. Bakunin, »Ein Brief Bakunins an die Internationalisten der Romagna«, GW 3, hgg. v. M. Nettlau, Berlin 1924, 176-203; E. Bernstein, »Nachwort«, in: B. u. S. W. Webb,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Stuttgart 1895, 445-55; R. Dutschke, »Prof. Habermas, Ihr begriffsloser Objektivismus erschlägt das zu emanzipierende Subjekt!« (1967), in: ders., *Geschichte ist machbar*, hgg. v. J. Miermeister, Berlin 1992, 76-81; ders., »Die geschichtlichen Bedingungen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Emanzipationskampf« (1968), in: ebd., 105-21; W. P. Eichhorn, »Emanzipation«, in: PhWb, ^{6}1969; G. Forster, »Über den gelehrten Zunftzwang«, in: ders., *Werke in 4 Bdn.*, hgg. v. G. Steiner, Leipzig o. J. (etwa 1971), Bd. 3, 367-74; ders., »Parisische Umrisse«, in: ebd., 727-76; Ch. Fourier, »Theorie der vier Bewegungen

und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1841), hgg. v. Th. W. Adorno, Frankfurt/M 1966; F. Frosini, »Krise, Gewalt und Konsens. Gramsci—Machiavelli—Mussolini«, in: *Utopie* 1990, 59–74;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5 Bde., hgg. v. d. AdW der UdSSR, Moskau 1959 (russ.), Berlin/DDR 1961; A. Gorz,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Vernunft. Sinnfragen am Ende der Arbeitsgesellschaft*, Berlin/W 1989; K. M. Grass u. R. Koselleck, »Emanzipation«, GG 2, 153–97;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se, Frankfurt/M 1968; H. Heine, »Reisebilder. Reise von München nach Genua«, in: *Werke in 10 Bdn.*, Berlin/DDR-Weimar 1980, Bd. 3, 193–272; J. Hirsch u. R. Roth, *Das neue Gesicht des Kapitalismus. Vom Fordismus zum Post-Fordismus*, Hamburg 1986; M. G. Huget, »Emanzipation«, in: EE 1, 1990, 658–60; S. Kebir, »Zwischen Emanzipation und Puritanismus. Gramsci zur Geschlechterfrage«, in: *Utopie* 1990, 148–56; H. Kern u. M. Schumann, *Das Ende der Arbeitsteilung? Rationalisi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Bestandsaufnahme, Trendbestimmung*, München 1984; M. Klein, E. Lange u. F. Richter, *Zur Geschichte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69; M. Kossok u. W. Küttler, »Di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Grundpositionen einer historisch-vergleichenden Analyse«, in: *Vergleichende Revolutionsgeschichte. Probleme der Theorie und Methode*, hgg. v. M. Kossok, Berlin/DDR 1988, 1–114; H.-J. Krahl,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Zur historischen Dialektik von bürgerlicher Emanzipation und proletarischer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71; R. Kurz, *Der Kollaps der Modernisierung. Vom Zusammenbruch des Kasernensozialismus zur Krise der Weltökonomie*, Frankfurt/M 1991; A. Laschitza u. G. Radczun, *Rosa Luxemburg. Ihr Wirken i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DDR 1971; Subcomandante Marcos, *Botschaften aus dem Lakandonischen Urwald*, Hamburg 1996, 206–33; H. Marcuse, »Emanzipation in der repressiven Gesellschaft. Ein Gespräch mit H. Marcuse«, in: *Argument* 23, 4. Jg., 1962, 2–11; ders.,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Studien zur Ideologie der fortgeschrittenen Industriegesellschaft*, Neuwied-Berlin/W 1967a; ders., *Das Ende der Utopie*, Berlin/W 1967b; Th. Meyer, *Der Zwiespalt in der Marxschen Emanzipationstheorie*, Kronberg/Ts 1973; ders., *Bernsteins konstruktiver Sozialismus, Eduard Bernsteins Beitrag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W-Bonn-Bad Godesberg 1977; *Politische Ökonomie*

289

des Sozialismus und ihre Anwendung in der DDR, Berlin/DDR 1969; PAQ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Berlin/W-Hamburg 1987; *Schlanker Betrieb? Schlanke Menschen? Schlanke Gesellschaft?*, hgg. v. d. Gossner Mission, Mainz 1993; G. Schweppenhäuser, *Emanzipationstheorie und Ideologiekritik.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n Theorie*, Cuxhaven-Dartford 1990; H. Seidel, »Vom praktischen und theoretischen Verhältnis der Menschen zur Wirklichkeit«, in: *DZPh*, 14. Jg., 1966, H. 10, 1177–91; *Was tun? Über die Bedingungen und Möglichkeiten linker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skritik*, hgg.v. A. Schneider u. B. Gröndahl, Hamburg 1994; *Utopie und Zivilgesellschaft. Rekonstruktionen, Thesen und Informationen zu Antonio Gramsci*, hgg. v. U. Hirschfeld u. W. Rügemer, Berlin 1990; U. Weiss, »Die menschliche Emanzipation—von der Utopie zur Wirklichkeit«, in: *UTOPIE kreativ*, 1995, H. 61, 65–75; J. Womack, D. Jones, D. Roos, *Die zweite Revolution in der Autoindustrie*, Frankfurt/M-New York 1991.

参见：

Anarchismus, Aneignung, Arb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steilung, Aufklärung, Befreiung, Bildung, Bürgerinitiativen,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dukationismus, Egalitarismus, Errungenschaften des Sozialismus, Exklusion, Feuerbachthesen, Fordismus, Fortschritt,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auenemanzipation, Freiheit, Frühschriften, Führung, Gegenkultur, Gesellschaft, große Weigerung, Herrschaft, Humanisierung der Arbeit, Interesse, junger Marx, Kasernensozialismus, Klassenkampf, Kommunismus, Kritik, Lernen, Lohnarbeit, Menschenbild, Menschenrechte, Minderheiten, nationale Befreiung, Neoliberalismus,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Postfordismus, Produktionsweise, Proletariat, Radikalität, Religionskritik, Revolution,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revolutionäres Subjekt, Selbstverwirklichung, sexuelle Befreiung, Staatssozialismus, Stalinismus, Subalternität,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Wesen des Menschen, Zapatismus, Zivilisation, Zwang

乌尔里希·魏斯（Ulrich Weiss） 撰

李之 译，李靖新弘 校

移民（Emigration）

A: hiğra.

E: emigration.

F: émigration.

R: émigracija (эмиграция).

S: emigración.

移入（Einwanderung）或者移出（Auswanderung）是一个自愿或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过程，为了要么暂时要么长期地在另外一个国家定居下来。尽管人们多次尝试解释这一对概念，这一术
290 语在关于族裔关系的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中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概念最开始是在法国大革命背景下被使用的，主要用来描述来自旧制度（Ancien Régime）阵营的法国大革命反对者，他们尝试在他国寻求避难。因此它的使用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巩固有着紧密联系的。

移民这一概念首先是在政治学领域兴起的。在政治学中，移民者（émigrant/émigré）与诸如“难民”（Flüchtling）、“流亡者”（Exilierter）和“被放逐者”（Verbannter）等概念进行比较，它们被越来越多地描述为那些因政治方面的原因移居他国者。这样的移民者多指那些在祖国因为自己的观点或者政治行为，甚至因为他们自愿或被迫属于某个宗教派别或民族而受到迫害。这一概念在政治学中仍然被使用的同时，也在社会经济学中站稳了脚跟。这一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迫使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寻找生存手段（这个过程被称为Landflucht，即农村人口外流）：“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MEW 2，第250页）由于这些剩余劳动力在工业化进入第一次危机的国家无法被吸收，因此，只要他们享有相应的行动自由，就会向那些诸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南美国家等更发达的国家转移。那里不仅有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有移民政策保障其生存、定居下来。从19世纪末开始，这些移民者主要是在工业领域中找到了工作机会。从移民接受国的角度看，他们就是迁入者（immigrants/immigrés）。这些人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虽然是通过扩大工业后备军的方式达到的。

一方面是流亡者或难民，另一方面是迁入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难适用于移出者。因为前者很明显是不得已离开自己国家，而后者似乎是自愿离开的，像学徒期满的熟练工的游历一样。现在，“进口”合同工（Vertragsarbeiter）的存在，取代了奴隶贸易，大大削弱了谈论

291 “离开祖国”——这是这个语义领域的另一个术语——的自由决定的可能性：对于以罢工破坏者或者廉价劳动力的身份被引进的人来说，他们的迁移很难被认为是自愿的，因为是贫穷迫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此外，难民和流亡者一旦到达目的地——或许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他们必须保障自己的生存。在这些因参与革命性工人运动而流亡的人中，不乏一些企业主，比如恩格斯，或者成立了一家克非尔酸奶工厂的帕维尔·阿克雪里罗得（Pavel Akselrod），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接管了其广告业务。除了作为在他们组织中的一员而要承担的日常工作以外，有一些人还有着其他的工作，比如记者（马克思），或者私人教师，少部分人还是被公开聘任的教师，他们在工业领域找到了工作。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像所有的移民那样，从事所有可能的零工——除非夫妻双方在任务分配时把确保收入来源的任务托付给女方（比如格奥尔格·V. 普列汉诺夫 [Georg V. Plechanow] 的妻子就是一名医生）。纳粹上台后逃往美国的德国女性，比起她们的丈夫，大都做好了适应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准备，比如，忍受因移民而造成的工作能力的贬值。

还有一些因素使迁入者（Einwanderer）和流亡者（Exilierte）更加接近：每一次移民，尽管过程是痛苦的，但是它在自身之中都包含了解放的一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尤其适用于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对于那些单身的女性亦是如此，尽管她们在移民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障碍。关于这一点，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在《论欢迎外国妇女的重要性》（*Nécessité de faire bon accueil aux femmes étrangères*，1835）中首次指出过。一般来讲，移民可以作为阶级意识形成的催化剂。

最后，迁入者和流亡者可以分享归国的希望——虽然这经常让人失望。在国外停留的时间越长，与当地社会的必然融合就会增加与原籍国的间隙，并破坏对原籍国的政治施加影响和重新适应一个因经济发展而改变的社会的希望。

移民（Emigration）这个概念在语义学上的不确定性在于，不同概念都被用于两种可相互比较的——因为同样具有政治动机——移民过程：对于原来是沙皇俄国的公民来说，他们要么是俄国 292
内战的战败者，要么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人们将这些人统称为“俄国移民”（russische Emigration）；而谈起那些因纳粹和因政治或种族原因受到迫害的德国人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苏联，都将他们称为“流亡者”（Exil）。在这里，是不是要接受在左翼和右翼之间、在白

方和红方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分裂状态的事实呢?

对于逃往法国的那些人而言，他们的共同流亡之路在法国被（纳粹）占领后仍要继续：在《过境》（*Transit*）一书中，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就描述了那些想要从马赛出发移民到美国的人的绝望境地。在移民接受国——在这个事例中是美国——流亡者和迁入者身份的区别会再一次失效。从欧洲角度看，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对于庇护权的限制，其目的在于将难民的身份变为迁入者。此外，他们在庇护申请被拒绝的那一刻就被宣布为“非法移民”，从而加强了他们的污名化。

只要劳动市场——可能是按种族划分和等级划分的——处于饱和状态，那么总是有更多的措施来减缓甚至阻止进一步的移民。这样对于移民的控制尤其是通过国家间的协议来实现的，或者如美国那样通过配额系统来管理。对于移民和流亡者的定义一次又一次变得更加严格，他们被困在一些“非场所”（Un-Ort），诸如集中营、船上（对于那些借助船只移民的人来说）或者是在机场的治外法权区。

移民作为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政治转移的来源。移民者复制了他们祖国的组织形式，有时候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所以人们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诸如来自沙皇俄国的犹太社会主义之间的所有细微差别都能在“新兴世界”（Neue Welt）中站稳脚跟。同时，确定在新兴工人运动中对于来自旧大陆的已经众所周知的模式的复制和调解到底占了多少比例又是很困难的。比如（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它们对于美洲工人运动的贡献是恩格斯所强调的（MEW 2，第634页），又如（法国和意大利）具有革命性的工会运动或（俄国）共产主义的模式。这种反作用于自己国家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其重要性一点也不小。正如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1917）就基于他在美洲的经历，曾尝试为爱尔兰的民族 293
主义和工人运动指明新方向。马克思就曾对这一点做出过确认（MEW 16，第445页），是向美洲的移民才让爱尔兰人建立了“芬尼亚”（Fenian）（一个1858年成立的爱尔兰秘密同盟，其支持者寻求运用武力来使爱尔兰从英国获得独立）。

因此，移民是一个国际主义大熔炉，这种国际主义可被称为生存主义的，并导致了制度性的国际主义。因为那些移民者（其中包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连同其他流亡者（Verbannte）建立了第一国际。在不同部门活跃着数以千计的移民。第二国际的建立就符合了恩格斯曾明确表达出的观点，它仅仅联合牢牢扎

根于国家联盟中的党派。当1889年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时，正值攻陷巴士底狱一百周年，这个时候它们未来的“领导党”（Führungspartei）——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受到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的影响，一些领导人被迫流亡海外。这些领导人一部分在英国处于创始人的阴影之中，而主要的是在瑞士遇到了另外一个流亡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人是俄国劳动解放社（Befreiung der Arbeit）的社会民主人士，长久以来他们只是一些光杆司令。大约在19世纪末，这个团体合并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政党的领导班子也同样是由一些流亡者组成的。在国外支持这个党的团体的主要活动之一是用一个超党派的基金会（emigrantskaja kassa）为那些移民筹措经费，以及通过这种方式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社会革命党党员（Sozialrevolutionäre）团结起来，两者都是第二国际的一部分。

在十月革命以后，第二国际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它把流亡在海外的党派都包括了进来。首先是孟什维克和俄国社会革命党人（Sozialrevolutionäre），这两个政党在思想上的主张正符合右派和左派的对立，日后它们也就各自分裂成第二国际（日内瓦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维也纳国际）。1923年，那些移民国外的社会主义者和那些已经执政的社会主义者共同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SAI，Sozialistische Arbeiter-Internationale），前者主要来自那些逐渐建立起威权制政权的国家（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而后者主要是些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莫斯科和共产国际也逐渐开始接纳那些被禁止的共产党成员，比如来自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和波兰等国的党员。他们成为党内大清洗的牺牲品，更遑论那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活动积极分子的人了。但是仍然是扎根于祖 294
国的需求引导着团体之间的融合。所以孟什维克人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影响力，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仅仅主观上臆测的，都要得益于其长时间在苏联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他们没有被允许加入在“二战”后重新成立的社会党国际（SI，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在苏联再也得不到支持了。社会革命党的国际影响力更小，同样也可以追溯到这个原因。

当人们把移民视为工人阶级形成的根源和国际主义的最初经验的时候，人们就把这一现象置入了工人运动历史的核心之上。国际工人协会的最初成果之一就是阻止了破坏罢工的人人境，这一成果在这一协会创立人眼里证明了该协会成立的必要性（MEW 16，第164、534页；17，第641页；31，第216、516

页）。随后，移民成为两个国际性争论的焦点。一个争论发生在第二国际中，另外一个发生在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er Gewerkschaftsverband）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同举办的政治代表大会上。前者开始于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在1907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又被重新提起，之后在纳粹时期也有着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论表明了国际主义对于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的逐步民族化的模棱两可性。对于那些支持保护国内工作机会的人来说，苦力（Kuli）和撒拉森（Sarazene）就是他们明确批评的对象，因为他们拒绝承认那些由不具有斗争精神的反对者制定的妥协协议，并受到自由贸易倡导者的反对。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他们只想借助政治和工会行动，仅仅在合约工人境时和涉及被海运公司强制招募的劳动力时做出一定的限制。事实上，自19世纪人们对于迁入者就有着负面的看法，比如爱尔兰人在英国，或者亚洲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固有偏见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迁入者在物质和文化上的匮乏，在当地人眼里，这些又与犯罪相连。关于爱尔兰人，恩格斯这么写道："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谈不到的状况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受惯了各种各样的匮乏，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们迁移到英格兰来，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习惯带给英格兰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来就不大感到兴趣的那个阶层。"（MEW 2，第320页）在1884年，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的信中，对"黄祸"（gelbe Gefahr）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突然间，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企业主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MEW 39，第298—299页） 295

在"一战"后，国际劳工组织（ILO，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主要负责移民问题，该问题也碰巧与难民问题相关。在1926年的伦敦大会上，俄国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他们在流亡共同体的定位（对于革命党人来说，俄国在国外的共同体就是他们最根本的关切点，而对于孟什维克来说，则是在第二国际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宣布自己是俄国移民的发言人。但是，与1907年一样，各国成员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了在移民输出国和移民接受国之间有着一条分界线：美国没有派出代表，相反，法国和比利时，甚至奥地利，都只属于第二类移民接受国。所以在是否接受移民的问题上，反对者和支持者又出现了

分歧。支持者同意在工会的参与下合法地管理移民——即使在威权制和独裁的政权里，这一点也很难被实行，而自由贸易交往的原则不应该被改变；而移民反对者认为，这会损害原本就已经岌岌可危的国内工人运动成果。那些共产主义人士在第一次的解决方案中见识到一个与阶级敌人勾结在一起的典型案例后，对于两派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支持。但是亚洲与会代表则又一次指责国际组织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点在问题的性质中已经有所展现了。因此，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之间并没有取得一个长久的一致。

那些奥地利工人遇到过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工人运动找到一个相适合的组织形式，在伦敦的移民国家再次出现。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偏爱同化模式，这个模式一般被称为雅克宾模式（jakobinisch）。也就是说，在国内的工会组织中以牺牲移民者的自我组织为代价，根据语言进行分组，因为在自我组织中会有分裂运动的危险。在法国，先是成立了国外劳动力组织（MOE，main-d'œuvre étrangère），之后演变为移民工会组织（MOI，main-d'œuvre immigrée），而在"二战"时他们因以法国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身份（FTP，Francs Tireurs et Partisans）富有战斗精神地投入到抵抗运动中而出名。这个组织的出现也被视为对于前一种原则的颠覆。

在"二战"后，欧洲民族劳工卫士把攻击目标从亚洲人转向非洲人、马格里布人（Maghreb）和东欧人，美国民族劳工卫士则把攻击目标转向拉丁美洲人。工人运动的民族化成为工人阶级融合的一大障碍，因此也使国际主义的设想成了纸上谈兵。

296

参考文献：

O. Bauer, »Proletarische Wanderungen«, in: *NZ*, 25. Jg., 1907, Nr. 41, 476–94; J. W. Brown, *World Migration and Labour. Supplemented by Report of World Migration Congress, conve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s and the Labour and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at London 1926*, Amsterdam 1926, 333–92; J. Connolly, *Labour in Ireland. Labour in Irish History. The Reconquest of Ireland* (1917), London 1922; St. Courtois, D. Peschanski, A. Rayski, *L'Affiche Rouge. Immigranten und Jud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Résistance* (1989), Berlin 1994; K. Dohse, *Ausländische Arbeiter und bürgerlicher Staat. Genese und Funktion von staatlicher Ausländerpolitik und Ausländerrecht. Vom Kaiserreich bis zu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Königsein/Ts 1981; L. Elsner u. J. Lehmann, *DDR-Literatur über Arbeiterwanderungen und*

Fremdarbeiterpolitik im Imperialismus. Forschungsstand und Bibliographie, Rostock 1979; dies., *Ausländische Arbeiter unter dem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1900 bis 1985*, Berlin/DDR 1988; *Heute hier—morgen fort. Migration, Rassismus und die (Un)Ordnung des Weltmarktes*, hgg. v. d. Arbeitsgruppe 501, Freiburg/Br 1993; *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en Kongress zu Stuttgart, 16. bis 24. August 1907*, Berlin 1907; *Marx, Engels und Lenin über grenzüberschreitende Migration im Kapitalismus, deren Ursachen und Wirkungen*, hgg. v. d. Abt. Wissenschaftspublizistik der Wilhelm Pieck Universität, Rostock 1983 (= Fremdarbeiterpolitik des Imperialismus 14); *NZ*, 25. Jg., 1907, Nr. 40–45; A. Seghers, *Transit* (engl. 1944, dt. 1948), in: *Gesammelte Werke in Einzelausgaben*, Bd. 5, Berlin/DDR 1988; F. Tristan, *Nécessité de faire bon accueil aux femmes étrangères* (1835), Paris 1988; *Vocabul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des relations inter-ethniques*, Paris 1993–96; C. Weill, »Le débat sur les migrations ouvrières dans la IIe Internationale«, in: dies., *L'Internationale et l'Autre. Les relations inter-ethniques dans la IIe Internationale*, Paris 1987, 97–121.

克劳迪·魏尔（Claudie Weill） 撰

克里斯蒂安娜·艾特尔（Christiane Eitel）、卡特琳·格吕内皮特 译为德文

虞皓然 译，朱思聪 校

参见：

Antisemitismus,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lasse, Dritte Welt, Europa, Eurozentrismus,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eihandel, fremd/Fremder, Hunger, Imperialismus,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Internationalismus, irische Frage, Klassenbewusstsein, Komintern, Kosmopolitismus, Marginalisierung, Menschenrechte, Migration, Migrationspolitik, multinationale Arbeiterklasse, Nation, Nationalismus, Nationalstaat, Nord-Süd-Konflikt, Pauper, Proletariat, Randgruppenstrategie, Rassismus, Sklaverei/Sklavenhaltergesellschaft

297

经验研究 / 理论（Empirie/Theorie）

A: taṭbīq/naẓarīya.

E: empirical research/theory.

F: recherche empirique/théorie.

R: émpirija/teorija (эмпирия/теория).

S: investigación empírica/teoría.

在社会研究中，社会现实如何在理论上确定以及如何在经验上把握的问题，成了理论与方法的关系问题。理论变造了所选择的现实片段，还是说它们是对于任何有意义的实证工作而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反过来看，经验上所获得的东西能否质疑、拒绝或改变理论？由于必须为经验研究确定某个片段和人口，如何选择（Wie des Auswählens）的问题——因此如何追问本质——就变成了认识问题，并将“兴趣还是价值中立的科学”这一问题带入讨论当中。这些问题尖锐化为社会科学批判。

1. 在 17 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研究呈现出经验式倾向，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关系也随之成为实践问题。正在萌芽的工业化、社会结构的剧变、原始积累以及农民被驱离土地的现象，产生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关于社会进程的可靠知识的需求。霍斯特·科恩（Horst Kern，1982）区分了如下战略性的阶段：

1.1 在英国，威廉·配第和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于 1660 年左右完成了《政治算术》（*Politische Arithmetik*）。他们为国家的政府事务收集信息，并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程序，证明这些信息是精确的数据。被马克思视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MEW 23，第 909 页）的配第针对思辨哲学写道：“我已经采取了一种方式……用**数字、重量或者尺寸**来表达我自己；只用感性的论证，只考虑那些在自然中有可见基础的原因；而把那些依赖多变的心灵、意见、嗜好和个别人的激情的东西，交给其他人去考虑。”（1691，第 244 页）这是将数据进行组合，以便从散乱、崩坏、不确定的过程中获得合乎规则的东西。它所选择的程序力求在数量上把握不同质的事物，这些程序能够依靠这样一种发展，在这种发展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实际上等同于不同的事物——这是一个关于马克思所展现的现实发展和认识可能性之间关系的例子。 298

1.2 在德国，为国家事务管理提供土地和人口情况的官房学派的大学统计学（1750—1800 年），掌握了社会经济数据以及有关“人民性格”的问题。即使在这一早期阶段，也是存在争议的，在这些争议中，能够描述“奇特性”的量化的经验研究被用来反对纯粹的“表格奴隶”。被公认为统计学之父的戈特弗里德·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写道：“第一眼……看起来像个迷宫花园……人们必须把一切分成两类：一个由土地组成的王国和一个由人口组成的王国。一切都可归结到这两个概念之下。”（1749，10.7，引自 Kern 1982，第 20 页）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泽（August Ludwig Schlözer）是阿亨瓦尔的

学生，他撰写的统计学理论（1804）将统计学称为“静止的历史”（stillstehende Geschichte）。他将统计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同人体知识与医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如果每一个国家都是比机器更崇高的东西，如果它塑造了一个有自己原则、行为方式，并作为个体存在的道德人，那么每个人必然与众不同：因此，作为关于一个国家之知识的，是比统计者的习惯性理解更多和更高的东西。”（引自 Kern，第 26 页）在反对纯粹量化程序的论战中，对如下任务的知悉也清晰地表达了出来，即阐明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1.3 在德国，自 1850 年开始，在“道德统计学”（Quetelet 1835）的概念下，发展出了这样一种方法：从社会维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方式。个别的方法依然有现实性，比如对平均人格和类型的寻求、将偶然性和个人抽离、概率论、
299 大数字法则。此外，通过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关联，它要求用科学取代经验和实践。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关系中的争议由于对方法的关注而暂时平息。

1.4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830—1842）认为：统计上的合乎规则性还没有把握到关键的社会结构。在他的社会物理学中，理论家的地位相当重要，通过这种社会物理学，他把社会学作为社会自然科学来论证，并谴责克托莱（Quetelet）的经验主义。“对于任何一种现象，即使是最简单的现象，真实的观察也只有在它首先被某种理论指导并最终阐明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如果从真正科学的立脚点出发的话，如下一点很清楚，即任何孤立的、完全经验的观察基本上是无用的，甚至根本不可靠。”（第 304—305 页）当然，孔德超前的、关于人类会持续发展和完善的理论预期（他是基于文化、政治、社会等相互依存的层面来思考这种理论的），被证明是一种基于系统性的阶级斗争、统治和压迫的方法，而作为基础的经济确实是被忽视了。

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用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来反对孔德的定律。经验的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的对象成了“社会事实”，他将其视为超个体力量，然后“客观地”“像（对待）物”一样地进行研究。“如今不可再否认的是，我们的大部分思想和努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成果，而是从外部流向我们的。它们只是通过将自己强加于我们来渗透我们。”（1895，第 107 页）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现代”对社会理论的排斥命中了涂尔干和马克思的要害。

1.5 在 19 世纪的欧洲，社会统计的扩展催生出不同的方法。它能够自己生成必要的数据，同时在生产中找到“本质”。莱珀雷（Le Play）（1855）提出了

专题研究方法，这也是一种今天仍然很常见的研究方法，它主要通过直接观察和描述的方式进行高度还原细节的案例研究（以家庭预算为核心）。莱珀雷对“欧洲工人”进行了研究，并在家庭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社会理论，它根据各种家庭类型同生活资料的关系来区分不同的社会。

300 1.6 在英国，工厂制度和雇佣劳动在 19 世纪初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以至于需要国家监管来解决“社会问题”。卡伦（Cullen）（1975）通过“社会调查运动”（1830—1850 年）确定了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基础。在英国资产阶级改革派的支持下，两个机构主要致力于减轻工业革命的副作用：创立统计协会的私人，以及在议会委员会和国王委员会帮助下的国家机构——下议院。私人协会明确反对正在出现的工人反抗和自发形成的工人运动，并排除了对工厂制度本身的批评，他们的改良建议只涉及教育和在农村建立工厂，而不涉及劳动保护。在方法上，他们最先制定大型初级调查，为此雇用“代理人”（后来的采访者）并执行测试程序。根据 1833 年的工厂法，下议院还任命了工厂视察员。他们准备每半年进行一次报告，并制定了一系列有条不紊的程序，例如，他们用盘问的方式直面矛盾，连接对立的利益和意见。在场的观察是核心。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大量的调查成果，并提出了经他们整理过的方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资本论》）。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被马克思详细地引用：“为了监督这项法律的执行，任命了专门的官员，即工厂视察员……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MEW 23，第 254 页）。这有助于检验理论思考与现实的联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MEW 3，第 20 页）在呼吁经验研究的同时，反对单纯的数字和思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 301
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第 27 页）实践和发展的关系成了认识对象。

经验研究在此并不是泛指的经验，而是通过某种批判贯穿的经验。这种批判反对，“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

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49页）。经验研究需要意识形态批判。

经验研究的任务是无所不包的：“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第25页）这种要求把经验主义者置于复杂的理论关系中。前提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同上）。生产关系是决定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内容的命题，是“主导线索”（第27页），经验主义者应该把他们的数据和事实按照这个线索进行归类，这个线索也必须根据研究结果进行相应改变（第25页）。否则的话就走向了思辨，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个人“作为另一种现实的表象、现象”被分配进了社会和国家领域，“通常的经验研究没有把自己的精神，而是把一个异己的精神作为法则；另一方面，现实的理念没有使一种从它自身发展出来的现实成为定在，而是使通常的经验研究成为定在”（*KHS*，MEW 1，第206页）。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在与巴师夏（Bastiat）争论时，反对一种只确证经验研究的抽象过程，它之所以做这种确证，是为了把经验归结成同等的基本关系（MEW 42，第174—175页）。即便它能作为一种经验陈述而存在，但仍然需要理论渗透其中。由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视为一个项目，它以“批判的”、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安排经验陈述。在另 302
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也表达了“矛盾的结果”，即工人会“或多或少地根据经验”将自己的创造力作为外来力量与自己对抗（*Gr*，第214页；MEW 42，第228页）。

比如对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很重要的平均概念，马克思研究了很多过程的重复问题，直至它们成为平均化过程（比如商人资本的平均周转次数问题；MEW 25，第320页）。那些一开始作为偶然现象出现的（例如在竞争中），当“对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时，则作为趋势被加以认识，因而“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才能看到”（第836页）。

认识对象也包括经验的“背面”，在成本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语境中，这一点的相关性得到体现。成本价格的立场的经验是：“在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盘算从实际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

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形成要素。”（MEW 25，第 882 页）“不以工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对这种变动的隐蔽的调节作用，却是‘经验’说明不了的。”（第 875 页）反过来，商品价值复杂地、间接地通过市场价格而被调节，某些情况下市场价格下降，而商品价值上升。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一种联系的要素被各自经验到，而对于一种特殊情境中的经验来说，这种联系本身则是难以接近的，甚或表现得正好相反（错误的证据）。

实践与实践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分析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关系时的难题。经验是知识本身的基础，但如果不将生活收益及其关系的全面过程作为参考，就无法理解它。

3. 对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来说，“经验事实”足以“导致错误的经验社会主义的胡乱作为”（GW 1/2，第 138 页）。在同他们的争论中，罗莎·卢森堡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干预的可疑定位，将经验研究和理论的生产性的相互交织，即二者的交互作用分离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她反对一项宣布剥削为财富分配问题的政策：“对剥削事实、‘剩余产品’的纯经验观察已经足以作为基础，以使人们意识到，分配的‘不公正性’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合法性。”（第 137—138 页）伯恩施坦指责马克思说：“他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演绎，先天地预见了社会主义胜利和斗争的必然性，而不是简单地参考‘剩余产品’这一经验事实及其‘不公正性’。”对此，卢森堡回答说：“正相反，只有当演绎被阐明时，所有‘经验事实’才会在他面前豁然开朗；只有当他拥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阿里阿德涅（Ariadne）线团时，他才能穿越当今社会的日常事实的迷宫，发现通往其发展和消亡之科学规律的门路。”（第 140—141 页）

卢森堡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被宣称为方法的胆怯的经验摸索”（第 295 页）。这种表达归功于政治争论，并拥有一种历史性的正当性，但对它们的表述至少助推了对理论的拜物教式理解和对其与经验科学联系的独断式拒绝。

在此，卢森堡通过改变语境，即陈述的意义，用经验数据来构成政治。这更多是以话语分析的方式完成的。例如，根据详细的贸易活动报表，“对于大众来说，土地的获得和保有是要花费大量金钱的，然而对于德国商业和工业来说，为此而获得的土地几乎是没有意义的”（GW 1/1，第 284 页）。“不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光是在货物和流血方面的巨大牺牲……就能把德国大众带入世界冒险的政治。”（第 285 页）她运用经济统

303

计来支持为争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而与统治阶级进行的斗争。她反对那种所谓为了人民和他们的福祉而必须进行贸易战争的宣传，不过，她既不是在道义上，也不是在呼吁团结被征服的大众的层面上反对之。可以说，她认为，只要多数人相信统治者实际上关心的是人民福祉，那么为国家福祉做论证的战争宣传就会获得支持。她表明，在这里恰恰相反，人民的金钱和鲜血被牺牲掉了。因而经验数据不是不说自明的，它们是被统治阶级以霸权方式所占据的战场的因素。

304 罗莎·卢森堡欢迎这种数据收集，虽然它明显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由国家收集的，但大众也因此获得了更多信息。但同时她也表明："关于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冲突的信息收集，反过来也能完全用作**国家同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材料。"（1/1，第289页）当然，如果社会数据对当权者有用，那它也必然地说出了一些关于社会的正确信息。比如人口统计数据，"人们也肯定能从这些单方面开展的统计中推导出一些有益的学说，特别是指出了工人组织在与资本的经济斗争中的不可或缺性的学说"（第291页）。

从马克思那里可以得知，对"经验事实"的感知本身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实践有关，而且它是一种独立的分析实践。作为现实性表现出来的，已经是"完成的现象"（MEW 24，第218页），它的形成过程是可以被破译的。因此，对社会统计、数据、文件等的处理具有历史重建性，它根据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利益来定位所涉及的行为者。乍看之下，这些数据可能与其中处理的内容相反，例如，如果人们将钱存（在银行）足够长的时间，它就会变成更多的钱。经验证据要归功于实际的处理方法。然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利息的产生条件在它的识别性上就被进行了伪装。

卢森堡将这些关于马克思的思考——包括从人们的实践出发，进行历史性的重建，并从中提取出立场和观点等——进行了语言上的神秘化，并最终形成一个成型的理论（站在这种理论对立面的，是看到了经验中不公正性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只能是不忠诚的思想平庸者）。鉴于此，有必要去核验，她在自己的作品中是如何论证对马克思的批评的，以及她是否和如何使用"经验数据"的。卢森堡独一无二的伟大著作《资本的积累》（*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913），是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的一种批评，其主要论据是，该图式缺乏对积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批评是如何展开的呢？首先，她对模型假设进行分析测试，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的预设，并触及了一种"矛盾"（GW 5，

305 第 285 页）。可以看出，先前宣称的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组块根本不存在，相反，马克思在理论上是会犯错的，人们需要批判性地接受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是一个如何进行研究的项目建议，人们也可照此进行检验，看他自己是否遵循了这个建议。

卢森堡首先用分析的方法查验了马克思模型假设中的前后不一致和漏洞。一个模型抽象掉了一系列在实际中（即经验上的）相互矛盾的特殊之处，换言之，为了对它们的相互关联中的主要作用力进行把握，可以在模型中去掉它们。“不断进步的劳动生产率”（同上）就属于被马克思去掉的因素，但它不能缺少，因为它对于扩大再生产和发展过程是非常基础的。卢森堡“经验地”进行了论证：假设不得与现实相矛盾，必须去掌握“事物的真实过程”（第 286 页）。她坚持认为，一系列其他的假定也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这个前提——资本的不同部分，作为消费资料或者生产资料，会在相应的可再生产的事实内容中产生，由之形成结论：“实际的资本实践”，“如果不打破马克思图式中的基本关系，在积累过程中……对生产方式的技术性推动就无法开展”；就连“寻求投资的资本”的实际存在也“被排除”了，同样，生产与销售的跳跃性扩大和具体部门的单方面发展被排除了（第 290—291 页）。马克思的思考推导出了一系列结论仓促的、关于积累和危机加速的理论，她的结论是：“该图式以总资本的运动为前提，但该运动并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过程。”（第 292 页）

在对模型进行分析性检验后，卢森堡专注于对历史现实性的检验。她的化用词——真实的过程、和现实性不矛盾、实际的实践、实际的过程、第一印象等等——与“经验事实”直接相关。因此，在对棉花工业（消费资料）历史和铁路建设（生产资料）的数据、报表进行勾画之后，她的理解得出如下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都不是以自然形式产生的。”（第 302 页）

在所有的社会中，只有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也即只有资本家和工人是主要 306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这种抽象被证明是马克思的主要错误。从逻辑上讲，这种图式缺乏驱动性的矛盾，去逼迫资本家在非资本主义的世界寻求销售市场。因为“为了积累而去实现剩余价值，在一个只有工人和资本家组成的社会中是无法解决的任务”（第 299 页）。但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矛盾产生了，就像她引用马克思的话：“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

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MEW 23，第 631 页）。

卢森堡介绍了一系列的理论家：西斯蒙第（Sismondi）、马尔修斯（Malthus）、萨依（Say）、李嘉图、麦克库洛赫（MacCulloch）、洛贝尔图斯（Rodbertus）、基尔希曼（Kirchmann）、施特鲁韦（Struve）、比尔加克夫（Bilgakow）、图干-巴拉诺夫斯基（Tugan-Baranowski）等。他们都“正确地感觉到”，马克思的图式中缺乏“第三人称”，但他们屈服于对缺乏驱动性矛盾的图式仅做补充的诱惑。他们自己的论证必然地把他们带向了帝国主义理论。其整体批评绝不仅仅适用于已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是反经验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暗示，应该把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建议来理解，它自己的研究工作始终并且在每一步都要与真实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并根据涉及其中的利益和现实的人的实践，进行经验性的，当然也是历史性—重建性的工作。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KapR*）一书中，列宁批评了统计所证明的俄罗斯工业发展下降的说法，并呼吁，在每一次数据收集之前要进行概念和理论工作。“只有当形式的本质……被清楚地确定下来，通过正确处理的统计数据描述的发展……才有意义。”（LW 3，第 465 页）经验研究在列宁那里，和在卢森堡那里一样，是批判性地出现的。在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争辩中，他强调要将日常观察作为认识过程的因素。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和感觉主义的立场（“一切知识来源于感受”）之间，他提出建议，要这样来确定经验：“客观的现实”是被感知到的，只有把经验、感受和感知作为认识 307
的来源来谈论才有意义（LW 14，第 122 页）。1914 年，列宁反对经验主义的普遍化方式，这种方式把“所有资产阶级的、不令人喜欢的普遍化”都从科学中排斥出来——比如像商品经济、交换关系、价值等概念——“然而可以说，人们必须非正式地重新承认这些概念”（LW 20，第 197—198 页）。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98 年要求，“重新接近经验主义，但放弃它把一切事物的普遍计划都掌握在手中的自负”（*SPh*，第 339 页）。修正一元论的主要根据在于实践和如下一点，即“我们通过实验接近事物的活动性，并确信，事物本身就是一种活动，换句话说：一种创造”（第 340 页）。这种转向把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对立推进到了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核心是实践和实验。后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遵循了这种指引（比如参见 *Gef*，H. 11，§34；W. F. 豪格研究了相应

的“实践认识论”，参见 Haug 1996，第 47—63 页）

4. 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是创造社会关系的人类实践（而社会关系又反过来规定了这些实践）问题，这可以被理解为批判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作为一次艰苦的否认尝试，它最初与德国社会学的发展相伴。根据 1922 年至 1930 年间社会学大会上的表述，经验研究和理论之间没有联系这一点，变成了如下建议，即分解为抽象的、“纯粹的”社会学和具体的、经验的社会研究（比如，Tönnies 1927；参见 Kerne 1982）。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之相反的是，马克思的路线在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所中得以继续。在就职演讲（1931 年）中，马克斯·霍克海默呼吁，“通过哲学理论和具体科学实践持续的辩证渗透和发展的思想”（第 29 页）来克服经验和理论之间的分歧。他把经验和理论的关系，设想成“理论意图”和由经验研究提供信息的哲学的批判性改变之间的交替过程；具体学科之间像在实验室中那样进行合作。作为研究所所长，他认为他自己的任务在于“建构关于哲学结构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并存的有计划研究的最终决定权”（第 31 页）。在这一点上，合作工作要探索经济、心理生活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初步调查对象是符合条件的德国（后来是欧洲的）工人和雇员。他们的方法是：对统计、协会报告、公共机构提供的与分析整体经济形势相关的材料进行评估；详细研究新闻和文学作品（“因为那些文献的分类结构往往会影响群体成员”；第 33 页）；作为调查方法的问卷调查（可以借鉴美国的社会调查），其结果有助于获得推动和验证；此外还有事实沟通、实验访谈、档案研究和文献学习。各种不同研究方法的混合，产生了一种连贯的、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自我改善的理论，以便“统一的意向既要避免教条主义的僵化，又要避免陷入纯粹经验的技术中去”（第 34 页）。研究所通过问卷调查，展开了《权威与家庭》（*Autorität und Familie*）（1936 年在流亡期间发表）的研究工作。由于其展现德国工人态度的方式颇具争议，研究所不得不迁到了国外。

芝加哥学派。威廉·以撒·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对波兰农民的研究中假设，只有当社会被纳入“客观复杂性的整体”（1919/21，VII）时，具体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否则就会盲目接受规范，并对实践进行简化理解，放弃分析社会现象的锚定性和整体性。在方法上，他们有条不紊地将许多定性研究带入了经验调查中：自传和对信件的评估。

1920—1930 年代，一些经验性的大型研究项目进入芝加哥学派：**霍桑**研究（*Hawthorne*-Studien），**中部城市**研究（*Middletown*-Studien）和**洋基城市系列**（*Yankee-City-Series*）研究，其理念是将定性研究和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陈述用于定量测量。这是态度评估和扩大民意调查的开始。

保罗·F. 拉扎斯费尔德（Paul F. Lazarsfeld，1927—1938 年奥地利经济政治研究所的奠基人，1939 年后进入纽约应用社会研究所）希望在维也纳学派的影响下，以经验研究来支持政治实
309 践。为了研究大众情绪，即当时正在兴起的法西斯主义，作为数学家的他转向了社会心理研究。“我们不会满足于简单地去‘计算’行为的一致性，我们的雄心在于，经验地去把握复杂的经历方式。那个经常被宣称的、在‘统计’和现象学的丰富多彩性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我们工作的一开始就被‘扬弃’了。”（1975，第 14 页）

“马里恩塔尔研究”（»Marienthal-studie«）（Jahoda 1933）作为介入性社会研究的早期方式而闻名于世。为了从内部、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来收集材料，研究者们亲历生活现场。一方面，他们是研究者；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社区中承担了基于分工的帮手工作。这些方法以多种方式组合，包括协会统计、选举数据，以及关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时间管理、健康统计、步行速度测量、个人访谈和个别案例描述等——的报告。这些多样化的数据收集，从研究团队的社会学热情中获得了它的内在连贯性，“对这群人来说，问题比方法更重要”（第 121 页）。此外，拉扎斯费尔德回忆说，这项研究是他方法发展的开始，这使他在美国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同上）。

5. 经验研究 / 理论的发展，是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热情紧密相关的，因此，在德国，这种发展因法西斯主义而被迫中断，直到“二战”以后才重新被接纳。

批判理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美国流亡期间写下了《启蒙辩证法》，不过同时也在继续开展经验研究。1950 年，《权威主义人格》（*Autoritäre Persönlichkeit*）出版。同年，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开张。“只有到了美国我才真正了解被称为经验研究的东西的重要性。”阿多诺回忆道。然而，他批判性地反对“在科学实践中实施的经验主义”，因为在这里，“因经验主义的游戏规则，经验的未被规制的丰富维度比在经验概念本身当中还要狭隘”。对阿多诺来说，关键在于“修复经验主义对经验的损害”（1969，第 738 页）。经验和理论的问题还包含另一个尖锐问题：这不再是一方

宣称相对另一方的重要性或者独立性的问题，而是要相互启发的问题；阿多诺
310 的不信任，针对的是经验程序对现实性 / 经验的处理，同时，他也反对潜在地为这些程序奠基的理论。

实证主义之争。这场论辩是战后早期最富成果的讨论之一，它作为“实证主义争论”而被载入社会科学史当中。批判理论的两代代表性人物——阿多诺和尤尔根·哈贝马斯，否定了实证主义的两大代表性人物卡尔·R. 波普尔（Karl R. Popper）和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的方法能够认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事实预先“已经被各种不可靠的概念附加物冲洗过了”（Adorno 等 1969，第 48 页），而且重要的东西也被忽略掉了。阿多诺认为，统计方法再造了统治，因为它们只能衡量主体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方面，诸如大小。无论这些方法在哪里被使用，它们都必须首先被简化为诸如数量、频率等僵死的东西。他将这种物化设想为一种由生产关系的暴力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此而言，实证主义本身就是“否定性社会在社会科学中的非概念的显象”（第 77 页）。

反过来，波普尔和阿尔伯特指责法兰克福学派完全无法根据他们的要求和理论来达到现实性。阿多诺在这场争论中代表的立场是：被收集的事实，不仅是不可见本质的显象，同时也是具有误导性的，而且它们都像铁屑一样排列在晚期资本主义关系的扭曲力场中。如果人们以这种处理方式来收集数据，那么如此获得的数据就再次固化了那些制造它们的关系。波普尔最终呼吁一种带有“纯粹客观”方法的、谦虚的经验研究，这种方法与行动主体的“情境逻辑”相关，并强调，理论只能不断地改善，而不能被当作正确的东西来依赖（参见 1979，第 120 页及以下）。

大约在同时代的美国，在许茨（Schütz）和加芬克尔（Garfinkel）的圈子中展开的方法辩论，达成了西库里尔（Cicourel）提出的简洁结论：对于社会的复杂性来说，形式化的方法是不合适的，它是官僚化的结果，而且再次固化了官僚主义的结构（1964，第 11 页及以下，第 59 页，第 312 页及以下）。

阿多诺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经验的经过特殊处理的显象，让人不可能只在 311
方法视角下来谈论经验研究；由此，波普尔对历史唯物主义处理方式之方法的质疑，通过指出这种质疑同社会整体的相互交叉，而被驳回了。通过极力将实证主义方法作为问题提出（第 236 页），哈贝马斯回应了被阿尔伯特嘲讽为“法兰克福总体性”（1969，第 198 页及以下）的指责。他不是要更新或者谴责实证主义的方法；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在判断社会现象时，要承认前科学的、积累

起来的经验的其他要素（第 246 页）。

作为这场争论在社会学中的回响效应，马克思主义者给人们留下了节制经验研究的印象，同时对经验的社会研究中日益精细化的方法保持着非批判性态度。在德国，这种方法的发展壮大与从流亡中归来的勒内·柯尼希（René Kōnig）密切相关，他也出版了相应的手册（1952，1962）。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置于意识形态的怀疑下，因此他把经验的社会研究作为检查装置，来解码社会理论和进行实验控制。“科隆学派”（Kölner Schule）并不拒绝任何经验研究和理论的联系，而是坚持经验的东西相对于理论工作的优先性，由此也放弃了对社会的批判。

对于经验的社会研究在战后德国的重建，赫尔穆特·舍尔斯基是至关重要的，他在概念的层面上积极地反对着当时的所谓纳粹国家。他对经验研究和理论的明确理解使他在方法上具有批判性。然而，他认为现代社会不能再为了政治而塑造，因此同经验研究相联系的理论并非必须是批判性的。他的出发点是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科学、技术应用和工业评估之间的关联早就形成为一个自治的、伦理上中立的上层建筑。”（1957，第 54 页）

6.20 世纪 60 年代，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作为一种对领导社会有用的科学，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获得了尊重。社会学家专门从事对劳动和工业、家庭和青少年、教育和个性发展的研究（从 1967 年起，出版了一些自己的社会学书系）。它口头上与资产阶级社会学划清了界线，但部分地继承了从后者那里发展出来的方法，并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信奉从组织上导致了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在诸如访谈这样的方法上，它将“社会访谈中的教育作用”（Roede 1968，第 19—20 页）列入调查规划。事实上，访谈在马克思的工人问卷中就已经隐性地开始了。 312

多年以后，经验研究和理论分道扬镳了：一个是形式上对马列主义的信奉，另一个则是对西方国家中发展起来的方法的完全接受，这些方法依然被质疑是意识形态的和统治性的（Friedrich/Hennig 1975，第 764 页及以下）。W. 弗里德里希（W. Friedrich）和 W. 亨尼希（W. Hennig）所编的这部书指责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错误地判断了被观察的显象的本质，而且这种研究建议，出于“方法论”的原因，把被测量的现象断言为人的本质（第 761 页，脚注）；通过把“非本质”分离出去而获得“本质”（第 762 页）；借助概率分布来确定哪些是非本质的。另一本手册则建议人们，通过数据归类来获得要寻求的普遍性。实证主

义者被指责说，他们的理论“撕裂了具体的显象”（Berger/Jetzschmann 1933，第 22—23 页）；人们很少了解，按照对立面的逻辑，这种关联必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如果说经验和理论的这种关系打开了一个质上的裂缝，那么这种裂缝也可以通过解释来克服（第 19 页）。对方法的批判在原则上可以归结为，承认解释中立数据的正确理论。

7. 对于经验和理论而言，依然还有诸多重要问题：批判理论强加的方法所进行的调整和还原经验的问题；经验和理论之间到底是何种联系的问题（这被卷入了价值中立和偏见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被推进到了关于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典型调查还是案例调查、专业分析还是融入日常生活，以及基础研究还是实践导向等问题的讨论中。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勾画的关于科学家的实验性实践的想法（这种实践实际上与知
313 识对象相关联），作为主客体问题，在经验研究中得以延续，并且具有了观察主体带入被观察过程中的那种模糊性。

由美国社会学所规定的经验的社会研究和一般社会学的划分使得相关方法和测量程序不断完善：“陈述的准确性（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在成为日趋专业化的研究事业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指标。”（Kernel 1982，第 247 页）然而经验和理论的问题同样贯穿在研究者的背后，例如，作为个人行为的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来自工业社会学领域的 70 项经验研究的检查表明（PAQ 1978，第 155—179 页），在明确承认常用的统计方法（数理统计程序、代表性、显著性、方差等，大量待检对象、概率计算、分布、围绕平均值的分散幅度）时，这些研究毫不在意地收回了这些方法施加到调查上的约束。很少有研究考虑代表性规则——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就十分没有说服力：在一些调查中，抽样选择并没有满足可验证的标准，但它们却宣称自己具有代表性；大部分研究回避了这种约束，理由诸如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和新颖性、要节省研究时间和费用，或是简单地声明他们倾向于对研究对象做“量化分析”。统计测试程序和数学统计计算则使用得更少。通常，正是宣称支持数理统计程序的那些人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忽略了这些程序。

对于这种程序来说，社会过程在一定情况下是过于复杂或者过于分化的。关于这一点的提示，把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了这些方法的成功应用上：保罗·诺伊拉特（Paul Neurath）在阐明这些方法时，是以不同种族群体之间体型变化的程度为例，证明这些方法的成效差强人意（1974，第 52—53 页）。这同样适用于数学程序，凭借这些程序，人

们可以准确地计算到小数点后几位，比如在42岁人群中随机抽样时平均差的大小。不满主要集中在精确性和说服力之间的反差。例如，它在美国引起了关于
314 主观的时间感觉和大小、数字等的主观意义的争论，并最终形成了这种设想：为了从干巴巴的数字王国中走出，基本上只有社会学的心理学化才是有意义的（详见 Schütz/Luckmann 1975）。在这种不满的背后，暗含着西库里尔的明确见解：统计程序与对象的可量化属性有关，比如米、年或者小时，这些属性最初是为了测量而被分配给对象的。它们对于事物而言是外在的，是一个可比较的、忽视了个体特殊质性的第三者，这就像货币忽视了事物的使用价值一样。

同时，随着量化方法的日益精细化，经验研究的定性形式也扩大了：行为研究、自传方法和日常生活研究。它们都以研究中的主客体相互交叉为主题，而且大多是干预性的社会研究。

自动化与技能项目（*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改变性干预的导向激发了关于价值中立与偏见性的讨论，并通过对解放的无条件热情掩盖了关于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关系的必要讨论。自动化与技能项目（1975—1987年）在劳动社会学和企业社会学的调查语境中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中得到明确讨论，其结论是：方法一方面依赖于实践目的，另一方面依赖于对象自身的实践形式（PAQ 1980，第19—63页；F. Haug 1978）。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矛盾性的社会联系的理论设想决定了方法的选择。矛盾必须触及每种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在其不再是什么（Nicht-mehr）和还不是什么（Noch-nicht）的状态中来理解。除了最初提出的建议，即将重点放在与其框架条件相关的某些维度，还有发展概念的附加性范围。会被经验研究者所接受的，并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而是那些被研究人员自己赋予一定意义的维度，即发展维度。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发展意味着在成长的行动能力方面获得社会性的生活条件。经验研究者是这样一种研究者：从自我发展着的人 315
的立场出发，观察他们在特定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活动。

在这一点上，运动方向是由驱动力针对约束它的环境而开展的斗争所决定的。在此，现象的发展并不明显，它可能是危机、暴力甚至倒退。趋势预计或者趋势规律因此拥有预测的价值，尽管这在特定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上或者到底是否发生上，是不可靠的。例如，基于改变了的劳动要求而做出的关于个人发展的陈述，是关于发展可能性及其条件的陈述。然而，人们是否开始有意识地行动，这是一个回避了是一否逻辑

的问题。不过，这也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

每种方法的采纳，都有对有待研究的现实片段的潜在理论理解，从这个假定出发，就会做出一个对经验程序的独有建议。鉴于社会的矛盾性、企业中的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力的对抗性发展，只有当以平均值为导向的、量化收集的统计方法被大规模运用时，这些统计方法才能认识运动，并因对劳动中出现的变化的认识而受到批评。“新型劳动工具的要求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运行于其中的实践行动和斗争，引发了对自动化所引起的变化的兴趣。通过哪些实践行动……矛盾会变得尖锐？通过哪些实践行动，以进步的形象或冲突和战略的暂时取消的形象出现的解决形式会被把握住（这些解决形式通过被唤起的反向压力的运动压力而产生，这样表面看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没有运动）？”（PAQ 1980，第 28—29 页）

自动化与技能项目建议，为了便于经验处理，那种排斥统计程序的、在表述问题时又不能被排除的矛盾，应该被提出来。这是因为，在理论上取消的方面，虽然是暂时的，但本身也是在社会
316 中的取消，唯有这样，人们才能感知变化本身。逻辑上没有矛盾的经验问题完全允许将传统的统计方法（它的验证核心是概率、分布、偏离、分散宽度、概率错误）只应用到被取消了的旧的方面上。

新的现象作为或多或少被排除的极值出现在类似的程序中，或者充其量会提高整体平均值（就好像统计图表中企业收入的提高也提高了工人的平均收入一样）。可以简单直接地假定，在特定关系中，每一个相反现象、每一个例外都是值得研究并需要解释的现象。至于它是不是新的现象，要由检验它的范畴的历史性来决定。

这种方法可以找出具体现象的一般发展情况，进而认识某些先兆，而且这些先兆也不再会被视为怪诞的。例如，测量员是否在头盔上贴了贴画，他是否绘制了不同驾驶风格的弯道，或者为了在业余时间研究建筑规划而偷偷窃取施工方案（参见 F. Haug 1978，第 653 页）。

经验研究者的任务并不是竭尽全力在不同的显现形式（起义、抗议、对抗力量）中找到新的现象。重要的是要去研究使发展现象得以产生及得以可能的条件。然而它的普遍化是实践的行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中，发展仍然表现为某种具有特定程度和形式的否定。在显象的多样性中，人们会发现某些频繁出现的东西，它们在力量最大或者反抗力最小的时候出现。在此，对相关案例的数量的提及具有一种独特的效果，即这会引起人们的失

望。其原因是，虽然分析社会过程的统计方法并未贯穿始终，但数理统计预期决定性地影响了对结果的评估和评价。

人们仍然能在 1977 年的一份关于自动化劳动的研究中看到，维护性的劳动变得越来越重要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建设性的战略知识成为必备技能之一。
317 在一家被调查的冶炼厂里，维护性的劳动的份额在所有岗位工作中只占 18%—25%（SOFI 1977，第 508 页）。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工人阶级是主要的历史力量，但在当时，工业中的从业人员（包括资本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占人口的大约 8%（计算依据 *K I*，MEW 23，第 469—470 页），只比佣人的份额稍多一些。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一年后，工人的比例在普鲁士只占 2%—3%（Becker 1960，第 212—213 页）。自动化与技能项目的建议指出，在关于变化的经验研究中，在社会进程中，收集预料之外的、令人惊讶的和新颖的现象，并在总体发展的历史重建中来决定它们的重要性。发展在这里被理解为私人关系中劳动的日益社会化和劳动者及其行动能力的矛盾性的应答。自动化与技能项目把解放理论同经济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

8. 女性研究作为一种解放科学一出现，它所提出的方法建议就明确地遵循着关于经验研究和理论的内在联系的设想，遵循着将认识视为自身实践的设想。当前的讨论和一种明确的态度相关：之所以要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是为了不遗漏真正的共同点：研究主体和对象之所以具有同一性，是因为对自身状况的认识是自我解放的前提；将经验研究与解放计划、实际变化联系起来，也是意义深远的研究；要从经验出发，从主观出发，从日常生活出发。

由于女性经验在男性主导的科学中遭到忽视（Maria Mies 1978，Regina Becker-Schmidt 1987，Frigga Haug 1990，Dorothy Smith 1997），所以，我们应当将传统科学的语言和概念作为一种片面的抽象来进行追问。研究方法集中在叙述、自传、叙事性的访谈、回忆或者回忆活动上，由于明确规定通过纳入研究对象来改变研究，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称为干预性的研究。女性在社 318
会中的特殊定位（这是经过历史性—重构性的研究的），使得女性在其中再次遭受压迫的社会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经验研究领域，从而超越了既定的学科界限。例如，史密斯（Smith 1997）最初主张从（作为女性的）主观经验出发，进而得出结论：经验研究过程是以各种关系和关联为导向的，而在她的案例文本中，后者将这些经验规定为一些关节，它们将个人的实践重新与体制联系在了一起。

由于女性研究在历史上的不稳定地位，也就是说研究只能回溯到几十年前，经验研究问题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从所搜集的经验中进行理论概括，也即经验研究和理论的交互过程。“性别关系作为生产关系”成为核心的框架概念，这种局部的知识成为核心的立场问题（Haraway 1991，Harding 1990）。

9. 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将经验研究 / 理论问题更多地集中在对矛盾关系中的人类实践的研究上。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社会的日常再生产问题在文化研究中得到集中讨论，比如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例如，Hall/Jefferson 1976; McRobbie 1978。此外，Clarke 1979; Willis 1979）。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最初尝试是以青少年文化中的背离现象为例进行研究，其研究标志着与传统文化概念的断裂和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接受。在方法上，调查几乎没有超出由多人参与的社会研究范围。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的（被视为批判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新规则中，也接受了这种想法。他指出，社会学不关心给定的对象领域，而是关心主体的行为。社会结构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不应让概念化简单地对人类能动性施加限制，而应该用概念化进行赋能”（1976，第 161 页）。主体的心态、能力、知识结构和符号世界成为关注焦点。

哈特穆特·爱瑟（Hartmut Esser）认为，不能仅仅将吉登斯的方案简单地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争论中的又一块基石，而应该将其视为真实的社会变化的必然结果，他力求通过（在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出现的）如“功能分化了的 319
社会”的“个人化”和“主观化”等口号与标语来证明这些变化（1991，第 744—745 页）。同时，他也批评了和这些概念伴随发生的、为了简单直接的描述而干脆放弃理论的情况。在经验研究 / 理论之争中，他提出了社会学的存在问题，这种社会学为经验研究预设了一些理论概念，而它自身却从来不能对这些概念进行真正的理论解释。因此，社会存在条件的变化逼得社会学要为自身存在辩解。最后，爱瑟不仅因为方法问题而告别涂尔干，也因为社会理论的过时而告别马克思。出于理论需求，他设立了人的“行动理论”，这个理论是他在“客观环境”中进行“主观感受”和“评价”，并最终按照“日常理性”“选择”而得出的（第 759 页）。这一建议从拒绝经济学和劳动（即人们谋生的方式）以及历史当中获得日常的可信性，因此同时或多或少也拒绝了经常发生的围绕着“控制还是解放”展开的争执，这个争执引起了围绕经验研究 / 理论长达 300 多

年的争辩。这表明，社会学作为科学的存在，依赖于劳动之于社会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否定回答。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Zur gegenwärtigen Stell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1952) 1972, GS 8, 478–93; ders., u. a.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armstadt (1969) ⁶1978; ders., »Wissenschaftliche Erfahrung in Amerika« (1969, GS 10.2, 702–38); H. Albert, »Der Mythos der totalen Vernunft«, in: Adorno u. a.,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armstadt (1969) ⁶1978, 193–234; W. Becker, »Die Bedeutung der nichtagrarischen Wanderungen für die Herausbildung des industriellen Proletariats in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Preußen 1850–1870«, in: H. Motteck u. a. (H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DDR 1960; R. Becker-Schmidt, »Frauen und Deklassierung. Geschlecht und Klasse«, in: U. Beer (Hg.), *Klasse und Geschlecht*, Bielefeld 1987, 187–235; H. Berger u. H. Jetzschmann, *Der soziologische Forschungsprozess. Methodologische und methodische Aspekte*, Berlin/DDR 1973; P. Bollhagen, *Gesetzmäßigkeit und Gesellschaft*, Berlin/DDR 1967; A. V. Cicourel, *Methode und Messung in der Soziologie* (1964), Frankfurt/M ³1974; J. Clarke u. a., *Jugendkultur als Widerstand*, Frankfurt/M 1979; G. Cohn, »Über Untersuchung von Thatsachen auf socialem Gebiete«, in: *Schriften des Vereins für Socialpolitik*, Bd. 13, Leipzig 1877; A. Comte, *Soziologie*, 2 Bde., Stuttgart 1974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6 Bde., Paris 1830–1842); M. J. Cullen, *The Statistical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The Foundations of Empirical Sociological Research*, London 1975; E. Durkheim, *Regeln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1895), Neuwied 1961; H. Esser, »Verfällt die soziologische Methode?«, in: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Frankfurt/M-New York 1991; W. Friedrich u. W. Hennig (Hg.), *D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sprozess*, Berlin/DDR 1975; A. Gehlen, *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Hamburg 1957; A.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London 1976; J. Graunt, *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 (1676), in: Hull (Hg.) 1899, 315–435; J. Habermas, »Gegen einen

320

positivistisch halbierten Rationalismus«, in Aodorno u. a. 1969, 235–66; E. Hahn,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und marxistische Soziologie*, Berlin/DDR 1968; S. Hall u. T. Jefferson (Hg.),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London 1976; D.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London 1991; S. Harding, *Feminis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1986), Berlin-Hamburg 1990; F. Haug, »Dialektische Theorie und empirische Methodik«, in: *Argument* 111, 20. Jg. 1978, 644–56; dies.,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W. F. Haug,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M.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es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1), GS 3, 20–35; Ch. H. Hull (Hg.),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1899), Reprint New York 1963; M. Jahoda u. a.,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1933), Frankfurt/M 1975; H. Kern, *Empirsiche Sozialforschung. Ursprünge, Ansätze, Entwicklungslinien*, München 1982; J. Klofác u. V. Tlusty, *Empirische Soziologie*, Berlin/DDR 1964; R. König (Hg.), *Praktische Sozialforschung* I, Köln 1952; ders., *Handbuch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2 Bde., Stuttgart 1962; P. F. Lazarsfeld, »Vorwort«, in: Jahoda 1975, 11–23; E. Leiser, *Einführung in die statistischen Methoden der Erkenntnisgewinnung*, Köln 1978; F. Le Play, *Les Ouvriers européens. études sur les travaux, la vie doméstique et la condition morale des populations ouvrières de l'Europe*, Paris 1855; A. McRobble, »Working-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e of Femininity«, in: CCCS Women Studies Group, *Women Take Issue*, London 1978; M. Mies, »Methodische Postulate zur Frauenforschung«,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1: Erste Orientierungen*, München 1978, 41–64; O. Neurath, »Grundlegende Methoden und Techniken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König (Hg.) (1962) 1974; W. Petty,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1672), in: Hull (Hg.) 1899, 121–231; ders., »Political Arithmetick« (1676), in: Hull 1899, 233–313; K.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Adorno u. a. 1969, 103–24;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Untersuchungen zur Automationsarbeit in 7 Bdn., Berlin/W 1975–1987; A. Quetelet, *Soziale Physik-Abhandlung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Fähigkeiten des Menschen* (1835), Bd. 1, Jena 1914, Bd. 2, 1921; H. Rode, *Befrager und Befragte. Probleme der Durchführung des soziologischen Interviews*, Berlin/DDR

1968; A. F. Schlözer, *Theorie der Statistik, nebst Ideen über das Studium der Politik überhaupt*, Göttingen 1804; A. Schütz u. T. Luckmann,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Neuwied-Darmstadt 1975; D. Smith, *Eine Soziologie für Frauen*, Berlin-Hamburg 1997; Soziologi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321 Göttingen (SOFI), *Produktion und Qualifikation.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r Entwicklung von Qualifikationsanforderungen in der industriellen Produktion und deren Ursachen*, 2 Bde., Göttingen 1977; V. Stoljarow (Hg.), *Zur Technik und Methodologie soziologischer Forschung*, Berlin/DDR 1966; W. I. Thomas u. F. Znaniecki,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19/21), New York 1958; F. Tönnies, »Die Statistik als Wissenschaft«, in: ders., *Soziologische Studien und Kritiken*, 3. Sammlung, Jena 1929; ders., »Moralstatistik«,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Bd. 6, Jena ⁴1925, 637; P. Willis,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弗里加·豪格 撰
李牧今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bleitung, Abstraktion, Alltagsforschung, Analyse, Aneignung,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umfrage, Aufbau,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Empirismus, Entfremdung, Erfahrung, Erinnerung, Erinnerungsarbeit, Erkenntnis, Erscheinung, Experiment, expressive Totalität, Fabrik, Fabrikgesetze, falsches Bewusstsein, Feuerbachthesen, Forschung/Darstellung, Frankfurter Schule, Genese, Gesetz, Handlungsfähigkeit, Ideologie, Imperialismus, Kostpreis,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Leitfaden, Marktpreis, Materialanalyse, Methode, Nationalsozialismus, Oberfläche, Parteilichkeit, Philosophie der Praxis, revolutionäre Realpolitik, Standpunkt und Perspektive, Verallgemeinerung,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Verdinglichung, Wesen

经验主义（Empirismus）

A: imbrīqīya.
E: empiricism.
F: empirisme.
R: èmpirizism (эмпиризм).
S: empirismo.

这个概念一方面涵盖了各种不同的哲学教条，另一方面也指最初由路

易·阿尔都塞这样命名并反对的认知概念。

1.这个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语“经验”（ἐμπειρία）一词，它一般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使用（比如亚里士多德，*EN* 1143 b 11），不过也常常贬义地指一种不是作为能力或者技能的实践，原因在于，这种实践缺乏理论（比如柏拉图，*Grg* 463b），从医学的角度看尤其如此（例如 *Gesetze* 875c）。然而一些医生仍然使用这个概念，称自己为有经验的（*empirici*）（Celsus，*De Med.*，Praef），并把他们的理论也称为经验（*empirice*）（Plinius，*HN*，29，5）。

在17和18世纪的英语惯用法中，“经验主义”在使用时通常具有贬义。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他伟大的《英语语言词典》（*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中这样定义：“依赖于经验，而没有知识或技能；庸医。”尽管莱布尼茨较早使用这个概念，但似乎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KrV*）中把“经验主义”引入到哲学用语中的
322 （在别的地方他也使用同义词 Empirism，比如，*KpV*，WA 7，第118页）

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494页，然而在B版第882页才得到解释，康德在“考虑纯粹理性知识的起源”时区分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纯粹理性知识“来自经验”，而另一种认为纯粹理性知识“独立于经验，源自理性”。第一种倾向的支持者被称为“经验主义者”，而亚里士多德是这个学派的“首领”，洛克被称为这个学派“在近代”的代表。这里涉及的区分附和的是B版前言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知识从经验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我们所有的知识随着经验启动，但知识并不是完全从经验起源。”（*KrV*，B版，第1页）

经验主义对于康德来说是一种教条，按照这种教条，所有的知识不仅从经验“开始”或者“启动”，而且“从”经验中“起源”或者“被推导”出来。或者可以否定性地表达为：“综合”命题（它的真值不是从它所用术语的含义直接推导出来的；参见A版，第6—7页）对真理的知识有唯一的“来源”，它仅仅来源于经验。

2.经验主义的历史同时显示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这两种趋向的历史的和系统的区别在哲学史中通常是模糊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MEW 2，第131页及以下）中对唯物主义史的评论，是理解这个状况的重要资料；我们也可以参考黑格尔富有洞察力的陈述（*GeschPhil* III.1.2，W 20，第61页及以下）。

经验主义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倾向，至少开始于近代。尤其是在弗朗西斯·培根（*Novum Organum*，1623）、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Syntagma Philosophicum*，1658）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De homine*，1658）的学说中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随之产生的古希腊原子论的复兴密切相关。这种倾向与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认知主张的根本性批判相关。当黑格尔把经验主义作为三种“思想对客观性的态度”当中的第二种来对待时，他描述了这种倾向的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对**具体**内容的需
323 要，针对的是知性的抽象理论，知性本身不能从它的普遍性走向特殊性和规定；另一方面是对**稳固支点**的需要，针对的是在有限规定领域和按照有限规定方法**能够证明一切**的可能性，这些需要首先导向了**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不是在思想本身中寻求真理，而是从经验中，从外在的和内在的当下中获取真理。”（*Enz*，§ 37）

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著作（尤其是他1690年发表的论文《人类理解论》）在这个倾向的继续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康德注意到，“洛克在从经验中推导出所有概念和原理之后，在运用经验的范围内宣称，人们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尽管这两个对象完全位于可能经验的边界之外）……”（*KrV*，B版，第882—883页，参见B版，第127页）洛克的确想提供一种适合新自然科学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既包含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广泛批评（比如“天赋观念”），同时也与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保持一致。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洛克认识论的基本概念“观念”中所存在的问题，洛克认为这一概念代表了知识的基石。这些“观念”一方面**代表**等同于物质的“实体”，在因果关系上为“实体”所决定；但与此同时，它们也被呈现为一个本质上**主观的**实体。

前者在洛克那里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受到了唯心主义者的猛烈批评（洛克在世的时候尤其受到莱布尼茨1704—1705年发表的《人类理解新论》[*Nouv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的批评）。这种倾向进入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尤以狄德罗为代表（《对自然的解释》[*D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1753），并由此进入现代唯物主义。后者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在主教贝克莱（Berkeley）那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人类知识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1710）。如果“观念”纯粹是个人的主观状态，那么它们就无法识别“实体”，甚至无法以有意义的方式提及它。贝克莱谈论这些，实际上是为了消除“实体”，捍卫有神论。大

卫·休谟（《人性论》，1739—1740）完善了这一阐释，他表明“实体”已经通过贝克莱自己对洛克的批评而被排除了。这种倾向随后越来越被等同为“经验主义”。

3.“严格”的经验主义在休谟那里获得了其经典的、“范式性的”形式。它
324 的各种不同形式构成了（常常混有相互不一致的因素）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哲学的重要分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43，1865）、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905）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12）为代表，并在奥古斯特·孔德（1849）的“实证主义”中得到强化（对他的作品的细致研究，参见 Macherey 1989）。经验主义在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或者“逻辑经验主义”中经历了第二春，后者使用现代逻辑学方法，重新表述了严格经验主义的经典版本。“建构经验主义”（van Fraassen 1980）是严格经验主义的一个新分支。

精确区分两类可能的综合命题的范畴是严格经验主义的基础。第一类基本范畴包括仅仅和感性事实相关的范畴，以及仅仅通过对感性事实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得以证实的范畴因素。第二类范畴可以包含具有假定指涉对象（例如“基本粒子”）或具有不确定的普遍性（例如“自然法则”）的表达，但必须在语义上追溯到第一类或从对其的归纳中得出。

黑格尔的下列观点明显和这种经验主义相关：“经验主义把属于感知、感觉和直观的内容提升到了**普遍的表象、命题和规律**等等的**形式**。然而这只发生在这种意义上：这些普遍的规定（如力）自身，除了从感知中获得的意义和有效性之外，本身不应有进一步的意义和有效性，而且作为在现象中需要加以证明的关联不应具有权由。”（*Enz*，§ 38）

严格的经验主义很早就受到了激烈的批评，比如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自1764年起），接下来主要是康德（他同时也承认经验主义对他的决定性影响，参见 *Prolegomena*，WA 5，第118页）和黑格尔。康德式的批评尤其被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继续推进。其中，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历史上（1907年）以及体系上（1910年）的影响最大。与黑格尔的批评接近的是英国“绝对唯心主义”的批评（Green 1874，Bradley 1883）。其他的攻击则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Pierce 1868，Dewey 等 1903）和现象学（Husserl 1900）。本质上源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或者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展开了新一轮不同角度的
325 批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1935），本质上是内在经验主义的观点（Russell

1948），有着与批评方式迥异的语言分析哲学（例如，Wittgenstein 1953，Austin 1962），杜威的实用主义（1938），奎因（Quine）（受实用主义的影响）、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1967，1970），塞拉斯（Sellars）（1963）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乔姆斯基（Chomsky）（例如 1966）还通过语言习得理论对严格经验主义的行为主义分支进行了激烈批评。这些批评（尽管不够详尽）以如下要点为特征：

首先，很早就出现了——比如黑格尔（*PhG*，W3，第 82 页及以下）——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严格经验主义假定的那种纯粹感性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此外也有很多人提出，并没有任何独立于理论元素的纯粹感性认识，或者用后来的术语表达：没有任何"不含理论"的事实观察语句，它总是"含有理论的"（实际上，歌德已经说过，"一切事实都是理论"：W12，第 488 页）。

其次，有人认为，即便有可能获得纯粹感性领域的认识，也不可能以此来证明其他类型的可能知识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严格经验主义暗含了一种普遍认识论的怀疑主义，比如关于外部世界或自然规律的存在。实际上，休谟自己毫不掩饰这种秘密。（此外，他在《人性论》的附录中举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表现智性真诚的例子，承认他不能用这些术语去谈论据称感知这些事实的自我，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在后期的作品中继续假定自我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康德（例如 *KpV*，WA 7，第 166 页及以下）和黑格尔都强调了这一点，例如黑格尔写道："在称为经验的东西内……，可以发现两种因素：一个是本身个别化的、无限杂多的质料；另一个是**形式**，即**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种种规定。然而由于感知应当保持为那种要当作真理性的事物的基础，所以普遍性和必然性似乎就是某种**没有合理性的东西**，一种主观的偶然性，……它的内容能够这样或者那样被创造。"（*Enz*，§ 39）

"广义"的经验主义，以大卫·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oyd）或者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ed Sellars）为代表（这 326
里只列举一些人），本质上对这类问题进行了回答。和严格的经验主义相比，它们至少在如下方面有所不同：**首先**，没有必要假定有一组完全不含理论的事实观察语句，感性观察只是判断（综合性的）知识主张的最后一个诉求；**其次**，对于在这种条件下明显不可观察的断言，不必在语义上直接回溯到可观察的事物上，但可以意指它们明显指代的东西（比如基本粒子）；**最后**，直接观察可以或多或少把不可接近的东西从可接近的东西中演绎或归纳地**推导出来**，这一思

想可以被以下思想所取代——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出关于不可接近的东西的假设，它们最终只需要根据可接近的东西和初始条件（“假设—演绎”方法）进行检查。

此外，库恩（Kuhn）（1962）、普特南（Putnam）（1990）和罗蒂（Rorty）（1979）也表述了对“广义”经验主义的批评（也可参见在魏纳特［Weinert］1995年所编著作中的文章）。

“有限的”经验主义指称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严格的经验主义以及广义的经验主义有共同之处，不过在重要的方面还是有偏差的。比如保尔·迪昂（Paul Duhem）（1906）虽然在自然科学认识论上是经验主义者，但其中也混合宗教教义。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至少在一切明显可以言说的方面，是事实上的经验主义者，然而他却宣称在这种方式中存在“不可言说的事物。它显示自身，它是神秘的”（*TLP*，6.522；参见6.44—6.45）。

4. 在马克思的阵营中，首先是严格的经验主义得到了批判性的接受，这与对广义经验主义的接受非常相似。“我们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恩格斯在1844年11月19日致马克思的信中（*MEW* 27，第12页）写道。并且他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同时代的《神圣家族》（MEW 2，第135页）认为培根是“经验科学”观念的始创者。《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在“想象”基础上的事实和“经验的观察……不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所揭示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事实进行了区分（MEW 3，第25—26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东西的区分中，也出现了（至少在语句上）对这一认识的附和（MEW 13，第9页）。这就遗忘了对于《政治 327
经济学批判》的辩证认识具有核心地位的**“中介”**（*Vermittlung*）概念。

恩格斯从三个方面批判了（“严格的”）经验主义：**首先**，就外部世界（比如*LF*，MEW 21，第270页）和因果性（比如*DN*，MEW 20，第458页）而言，他强调了与休谟的观点必然关联的怀疑主义；**其次**，他对归纳推论的批判（比如第496—497页）也与此相关，目的是支持一个更接近于“假设—演绎”方法的概念；**最后**，他批判了观察可以“不含理论”的想法。“那顶多也不过允许自己用数学计算的形式来思维的地道的经验论，却自以为自己所运用的纯粹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运用的主要都是些因袭的观念……诸如此类的经验论对同时代的思想成果是如此地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想成果又是如此

地盲目信任。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第415—416页；参见第503页）

列宁对经验主义的一个分支，即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建立在恩格斯的认识作为“反映”或者“镜像”的概念基础上。这在基本特征上最终决定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对待经验主义的态度。

D. 维勒（D. Willer）和J. 维勒（J. Willer）（1973）、海因兹（Hindess）（1977）、多亚尔（Doyal）和哈里斯（Harris）（1986）以及表述杰出的米勒（Miller）（1987）代表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经验主义进行了较新的批判。尽管如此，一些特定思潮，特别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例如 Preti 1957），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接近逻辑实证主义 / 经验主义。

5. 阿尔都塞的概念将马克思的基本概念（就他的科学理论观点而言，其复杂性现在才成为一个问题：参见 Han 1995）与在特殊意义上对经验主义的批判（然而，其中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经验主义）和一个根本不同的认识观的立场联系了起来。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似乎是正确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MEW 13，第631页）。在这种情况下的出发点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同上）。相反，科学与“把直观和表象 328
加工成概念”有关，从而构建了一种不同于具体实际但使对其的认识成为可能的“思想具体”（第632页）。

这种暗示批判了认识建立在“抽象”而不是“加工”基础上的想法，被阿尔都塞当作出发点。“经验的认识概念开启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给定的客体和给定的主体之间运转。……总体的经验认识过程，实际上在这个被称为抽象的操作中展开。认识意味着：从实际客体中抽出本质（抽象）；通过主体对本质的占有称为认识。不管这个抽象概念的特殊变体是什么样的：这个概念总是指一种不变的结构，即经验主义的特定标准。”（*DKL*，第44页）

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中得到了范例性的表达，即把在经验领域（ἐμπειρία）几乎被埋葬的本质（按照中世纪的术语即“现实中的”普遍性）通过精神能力（νοῦς）“带出来”（希腊语为 ἐπαγωγή）。因此，他不仅刻画了在哲学史传统中所谓的“经验主义者”。此外，在阿尔都塞那里，“经验主义”变成了一种谴责用语，这既是

因为他声称这一概念引发了认识论问题，也是因为经验主义用这种方式，将意识形态的元素悄悄混进了号称是纯粹事实的知识中。

阿尔都塞模仿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K I*，第5章），用认识作为“生产”的概念，取代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经验主义”基础的主体和客体的排列顺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用主体“抽象”出已存在于客体中的东西的概念。

6. 作为一种哲学意识形态，经验主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目标。如前所述，经验主义，尤其是它在英国的传播中（培根、霍布斯），起初被视为启蒙的唯物主义武器，这个功能在18世纪的法国也得以保留。贝克莱利用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形式来攻击唯物主义及其追随者，尤其是“无神论和迷信”（就像他的《人类知识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同样属于经验主义传统的休谟，正是利用他的怀疑论结论
329 来质疑宗教信仰本身，尤其是在他死后发表的《自然宗教对话录》（1779年）中，经验主义在意识形态攻击方向上的这种模糊不清一直在持续。例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恩斯特·马赫和保尔·迪昂代表了经验主义的不同分支，但前者在启蒙运动的传统上使用经验主义，而后者则是围绕宗教建立了一个认识论防御圈。

参考文献：

J. Austin, *Sense and Sensibilia*, Oxford 1962; F. H. Bradley, *Principles of Logic*, Oxford 1883; E.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eren Zeit*, Bd. II, Berlin 1907, 4. u. 6. Buch; ders.,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Berlin 1910; 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New York 1996; A. Comte, *Discours sur l'esprit positif*, Paris 1849; J. Dewey, *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New York 1938; ders., u. a. *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 Chicago 1903; L. Doyal, R. Harris, *Empiriscism, Explanation and Rationality*, London 1986; P. Duhem, *La théorie phyisque, son objet et sa structure*, Paris 1906; P. Feyerabend, »Bemerkungen zur Geschichte und Systematik des Empirismus«, in: P. Weingartner (Hg.), *Grundfragen der Wissenschaften und ihre Wurzeln in der Metaphysik*, Salzburg 1967, 136-80; ders., »Classical Empiricism« (1970),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Cambridge 1981, Bd. 2, 34-51; B.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Cambridge 1980; J. W. v. Goethe,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in: *Werke*, hgg. v. E. Trunz, Hamburg 1948ff,

Bd. 12; T. H. Green, [Einleitungen], in: ders., T. M. Grose(Hg.),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avid Hume*, London 1874-75; S. Han, *Marx in epistemischen Kontexten*, Frankfurt/M 1995; B. Hindess,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socks 1977; E.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Bd. I, Halle 1900; W. James, *Essays in Radical Empiricism*, London 1912; T. S. Kuhn, *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 (1962), Frankfurt/M 1967; E. Mach, *Erkenntnis und Irrtum*, Leipzig 1905; P. Macherey, *Comte. La Philosophie et les sciences*, Paris 1989; J. S. Mill, *A System of Logic*, London 1843; ders., *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liton's Philosophy*, London 1865; R. W. Miller, *Fact and Method*, Princeton 1987; C. S. Peirce, »Fragen hinsichtlich gewisser Vermögen, die man für Menschen in Anspruch nimmt«(1868), in: ders., *Schriften zum Pragmatismus und Pragmatizismus*, hgg. v. K. O. Apel, Frankfurt/M 1976, 13-39; ders., »Einige Konsequenzen aus vier Unvermögen« (1868), ebd., 40-87; K. R. 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Wien 1935; G. Preti, *Praxis ed empirismo*, Turin 1957; H. Putnam, *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 Cambridge/Mass, 1990; Th. Reid, *Works*, Edinburgh 1846; R. Rorty, *Der Spiegel der Natur* (1979), Frankfurt/M 1981; B. Russel, *Human Knowledge*, London 1948; W. Sellars,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London 1963; F. Weinert (Hg.), *Laws of Nature*, Berlin-New York 1995; D. u. J. Willer, *Systematic Empiricism*, Englewood Cliffs/NJ 1973; L.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1922; ders.,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Oxford 1953.

瓦尔·A. 聚希廷
（Wal A. Suchting） 撰
托马斯·劳格施廷
（Thomas Laugstien） 译为德文
李牧今 译，胡晓琛 校

参见：330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mpirie/Theorie, Epistemologie, Erfahrung,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 Evidenz, Experiment, Falsifikationismus, Idealismus, Materialismus, Objektivismus, Subjekt-Objekt, Tatsache, Vermittlung, Wesen/Erscheinung, Widerspiegelung

历史的终结（Ende der Geschichte）

A: nihāyat at-tārīḫ.

E: end of history.

F: fin de l'histoire.

R: konec istorii (конец истории).

S: fin de la historia.

“终结”和“历史”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终结”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希腊语“τέλος”和拉丁语“*finis*”，这两个词都有着从亚里士多德经由黑格尔再到当今哲学家的漫长传统，都有“完成、实现”以及“极限”“边界”或者“目的”的含义。“终结”是一个过程的结果和完结，但同时也是它的边界和天际线。“终结”还有“目的、打算、意图”的意思。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原因论中将动力因和目的因区分开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komachische Ethik*）中将“τέλος”当作意愿或者意图。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这一概念获得了众多的含义，例如，自然史、人类史、科学或文化史、哲学和政治史。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PhilGesch*）中区分了有关经验确定的事件的实际历史和发现统治这些事件的理性的哲学的历史或者叫历史哲学。“理性看待世界的人，世界也会理性地看待他，二者处于一个交互的关系当中。”（*PhilGesch*，W 12，第 23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了人们客观制造（不管是否具有意识）的真实历史同历史的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别。在此，“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具有专门的含义，正如曼努埃尔·萨克里斯坦（Manuel Sacristan）所说明的，这个概念批判地超越了 19 世纪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科学”（science）概念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观和黑格尔的科学观。基于历史的哲学阐释，“历史的终结”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由果及因解释的历史具有的一种意义（正如黑格尔 331
的解释）；对未来的预测（正如传统的历史哲学和犹太—基督教传统末世论）；一段历史进程或时期的结束或流逝。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论纲《论历史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表达了另一种历史哲学的含义。他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新天使》（*Angelus Novus*）解释为历史的天使，他脸朝后，震惊地注视着历史上不断堆积的瓦砾堆，从远处的天堂则刮来风暴。“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GS I.2，第 702 页）这里的重点是，通过重新获取一种从当前出发、从对被压迫者公正的愿景出发的历史记

忆，获得新的历史概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终结”这一术语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Bell 1960），描述一个新的技术时代的开始，人们设想，在这个时代当中，意识形态将要消亡——而事实上却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技术专家治国主义的”或“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Horkheimer/Adorno 1947）；此外，还有“历史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哲学的终结”，最后还有“人的终结”以及“最后之人”的说法。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这些末世论的主题，“在50年代”是“我们每天的面包”（1995，第33页），而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则是其经典作家。

伴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从极端主义体系中出现的“世界的终结”的幽灵赋予“终结”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意义，即人类自我毁灭于核战争的“现实可能性”，例如让-保罗·萨特、B.罗素（B. Russell）、H.M.恩岑斯贝格尔（H.M. Enzensberger）以及特别是E.P.汤普森等人都曾焦虑地指出过这一点。20世纪70和80年代“终结”的问题指的是“现代的终结”；当代则被描述为“后现代”。按照现代终结的理论，一种文明形态宣告终结，这种文明形态产生于16世纪，在启蒙时代获得新的力量，在20世纪垂死挣扎，其展示出了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的危机。在90年代，人们谈论“乌托邦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这种阐释是一个事实即以苏联模式（1917—1989年）体现的历史经验的终结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关于现代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思考与讨论，对以“后历史”概念为特征的当代历史撰述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些相关讨论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将其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和对话伙伴，尽管它早就被以各种方式放弃。但是，很多已被宣告的死亡（不管是现代、历史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基于对形形色色的危机的片面的或根本错误的阐释，以一种批判的、开放的和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其进行研究，这能够促进新的理论—实践视野的生成，从而更好地理解21世纪。

1.黑格尔的“历史的终结”和马克思的“史前时期的终结”。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历史概念是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412—426）以来，G.维科（G. Vico）（《新科学》[*Scienza nuova*]，1744）、伏尔泰（Voltaire）（《风俗论》[*Essai sur l'histoire générale et sur les mu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1756）、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

遍历史观念》[*Idee zur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1784）和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等人关于历史的意义的多种思考的巅峰。

1.1 黑格尔第一个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将历史描述为一个理性的过程（Lukács 1930）。特别是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他将历史理解为精神通过自我认识战胜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黑格尔说："我们必须在历史中寻求普遍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不是某种特殊的主观精神或情感，我们必须通过理性来获得，理性的兴趣所在并非某种特殊的最终目的，而只是绝对的最终目的。"（*PhilGesch*，Lasson，29）因此，这里关涉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个体的理性，而是神的绝对的理性。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黑格尔阐释了变化、年轻化、理性、思
333 想（与自由概念相关）、民族精神、国家、习俗等等范畴。精神的最终目的是意识的自在和自为。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但是目的在于，它（精神）带来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与它自身相适应，完善、实现它的真理，宗教、国家都从中创造出来，它与自己的概念相适应，它在真理当中，或者观念是它本身……因此，精神和历史的普遍目的就得以实现了。"（第 61 页）这一过程是逐级实现的，哲学揭示了其逻辑。精神的实现在理性国家达到高峰，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而且同时体现在民族精神方面。

正如有关这一主题的卷帙浩繁的文献所显示的，这种历史观颇具意义，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功绩在于：将历史描述为一个过程，在其中使用的辩证方法——精神和世界的交换关系——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包括由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构成三分结构，从而质疑了自然权利的二分结构。但是，自马克思以来，批判指向了唯心主义概念，指向精神的理性和现实的同一性（Mészáros 1995，第 9 页）。这导致黑格尔所生活的历史时刻的合法性；还有对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最后还有他的未决断性，这让他一方面说出"欧洲是世界历史的绝对目的"（*PhilGesch*，第 134 页），另一方面又说"美洲（即美国。——引者）是未来的国土"（第 114 页）。

1.2 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历史的终结"的目的论观念，而坚持另外一种阐释。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并没有什么事先确定的目的。它并不承载超验的或内在的主体，其理性并非建立在目的性基础上。但是，我们仍然能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多种"历史"含义。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阐述了人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本身

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MEGA I.2，1，第396页；MEW 40，第544页）

334 在此，历史表现为通过劳动产生的人的本质的实现。“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第398页；第546页）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被有些作者进行了目的论的阐释，尽管它事实上包含着对异化存在的批判，哪怕只是以思辨的形式。不过，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已经在此区分了异化和物化（Sánchez Vázquez 1966），而且思辨的特征在第二年即已消失，在这一年，马克思就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ThF* 6；MEW 3，第6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开放的、从实践出发决定的历史概念。不过实践是由更早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历史观念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DI*，MEW 3，38）因此，历史并没有遵循什么事先确定的方向，而是人必须自己逐步确定这个方向。

这种开放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后来的全部著作当中。自著名的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来，错误的诠释就一直存在，经过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机械、教条的表述，更加变本加厉，其中包括将马克思的观点描述为线性历史观和经济化约论。

至于第一种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是这样反驳的：在1857年《〈大纲〉导言》和《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MEW 42，第383页及以下），马克思将历史理解为一个复杂的、不一致的和综合的过程。 335
1877年底，马克思在以法文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强调反对先天确定的普遍历史。马克思在信中指责他的批判者，将自己“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

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在这种（错误地归于马克思的）观点中，作为终点（τέλος，Endpunkt，dernier lieu），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MEW 19，第 108—109 页；参见 MEGA I.25，1，第 116 页）。马克思嘲笑这种关于历史哲学的“万能钥匙”的理论，“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第 112 页）。

至于第二个误解，恩格斯在 1890 年 9 月 21—22 日给 J. 布洛赫（J. Bloch）的信中予以澄清：“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另外，他还阐述了社会体系的所有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和现实性。20 世纪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作者（葛兰西、布洛赫、卢卡奇、马里亚特吉 [Mariátegui] 等等）的大部分努力都是有关这些因素的分析。

但是，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宣称，“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MEGA II.2，第 101 页）。这种表述让人想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关于历史的开端的观点。事实上，对于黑格尔来说，在国家的形成问题上，历史哲学的研究唯一有价值的因素，就是“要当合理性在世界的存在中开始表现它自己的时候”，“不是当它仅仅是一种在本身的可能性的时候，而是当它在一种现有的事物的状态里，实现它自己为意识、意志和行动的时候”（W 12，第 81 页）。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说：“各民族在达到它们这个使命之前，也许已经没有国家而经过一个长时期的生命，在这个时期 336
内，它们也许已经在若干方面获有某些方面的文化。这个史前时期……是在我们的研究的目的之外；不论在这个时期以后是否跟着就有一种真正的历史，或者这些民族始终没有取得一致国家的组织。”（第 82 页）反之，马克思使用“史前时期”这个术语指所有在人类行动者形成之前发生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的史前时期在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终结于剥削关系的完结，在第二阶段——共产主义——则终结于国家的消亡（参见 *Gotha*，MEW 19，第 11—32 页）。

1.3 在 20 世纪末期，异化消失、国家消亡从而人类的史前时期得以超越的自决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ThF* 10，MEW 3，第 7 页），有违于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观点，变成了乌托邦。但是，鉴于这一事实——带来史前时期终结思想的社会矛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甚至更加尖锐，再者，乌托邦不能被理解为天国的来临，而是一种反事实的批判，一种先于自身的存在（Sich-vorweg-sein），布洛赫意义上的预先推定（Antizipation），从一种新的历史观出发的过程——那么，持有以下观点的理由就足够了（既同乌托邦批判者马克思相悖，又同马克思相符）：乌托邦继续有效，尽管它的实现没有被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发展一种从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新的理论。无论如何，马克思所指涉的不是对史前时期的强制的、突然的超越，而更是一种必然性，它为人类的自我实现，开启了一条更为公平和理性的道路。不过，不管在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Suslov）中还是在“福特社会主义”（Haug 1996）或“官僚集体主义”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都是以目的论方式被阐释，这为其主要的批判者提供了攻击点。例如，卡尔·波普尔通过他的《历史主义贫困论》（*Elend des Historizismus*），竟然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波普尔对马克思著作的诠释有失严谨，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历史”在马克思及其开放的历史观那里有多种含义。波普尔的批判成了无的之矢，因为它所针对的似乎更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手册，而非波尔普本人所声称的作者的著作。

2. 现代的终结。“现代的终结”和后现代开始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这种理论是用来解释受到生产和交流的新技术（电脑、机器人、传真、调制解调器、光纤等等）影响所产生的社会变化，这种影响开始有代表性地体现在艺术和文化当中（博物馆消失的趋势；拼贴画；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的无差别；先锋派的斗争；新建筑；虚拟现实；等等）。

两种最重要的解释方法来自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和基阿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利奥塔是“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的成员，他是在这一前提下考察变化的：知识的地位在社会“进入所谓后现代工业世纪”时发生了变化（1994，第19页）。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的特征通过“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表现出来，比如，精神辩证法、不断推进的解放，以及主体或劳动者的解放。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变化，国家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对于交流透明的意识形态来说，似乎变成越来越难以看透的干扰因素；合法性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阶级消失了，个人成为“交流循环中的控制中心”。“小

叙事”变得比“宏大叙事”更加适宜。“大/高级政治”变成“小/低级政治”。夺取权力被小的公民动议所取代。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认为，一些变化发生了，“浮士德式的（也许是俄狄浦斯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让位于网络的‘蛋白质’时代，属于交流宇宙的联系、交往、邻里/接触、反馈和普遍化的控制中心的纳喀索斯和普洛透斯时代”（1989，第188页）。

瓦蒂莫（明确地）持这种看法：我们处于“历史的终结”。他的基础是尼采的永恒回归思想以及海德格尔的形而
338 上学批判。二者从不同的视角质疑了这一观点：思想是从基础或起源开始一直持续不断进步的获得过程。不再有“扬弃”，仅剩“事件”。后现代不仅是相对于现代来说的某种新事物，而且“还以新范畴的消解为特征，是历史的终结的经验，更是历史本身的另类阶段——不管它是进步的还是后退的——的构想”（1990，第9页）。历史的终结的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在理论上，历史性的概念越来越成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历史撰述四分五裂，在方法论的自我认识上，历史作为统一过程的思想破灭了。在具体的存在上，极具影响力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威胁颇大的核灾难，还有并且尤其有技术和信息系统——它们赋予了历史一种真正的非历史的不变性。”（第10页）因此，作为不断进步的救赎和统一的整体的历史不复存在，在瓦蒂莫看来，剩下的是脱胎换骨的解放，是差异和地方理性多样性的解放。

批判。对新现象的阐释，在社会理论上极其贫乏。第一，如果不联系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和政治转变，阐释这些变化，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的，如果我们要将后现代当作一种替代概念来使用，我们必须“将文化中新形式的出现同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出现相结合，同通常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后现代或消费社会、媒体或体验社会，或者多样化的资本主义等等联系起来”（1983，第124页）。在哲学概念中，后现代的真正特点仍然晦暗不明，事实上，后现代是各个阶段特色鲜明的资本主义的当前发展阶段的文化逻辑，即在想象中的和在永恒存在的时间的崩溃中的现实转变的文化逻辑，它是以消费资本主义为取向的。第二，现代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本应有更为精确的分析。如果我们像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Bolivar Echeverría）那样将现代视为开端于文 339
艺复兴的“人类生活的历史统一形式”，将其同资本主义的特殊关系视为“人本质的经济再生产”（1995，第138页），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建立现代和资本主

义之间的多种不同关系，还可以确定现代所体现的多种模式和形式。第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误认为，马克思正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的第一人，因为他发现，这一制度不仅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异化、物化、不平衡和社会不公，而且埋葬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第四，反对“宏大叙事”的概念，从而试图靠攻击来解决掉历史哲学——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表明，历史哲学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存在——并贬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知识含量。以起源于19世纪的马克思观点来看，向后福特制度或高科技生产方式的过渡，同所有这种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一样，都可能导致根本的变化，这涉及所有鲜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五，一个名为“后现代”（应与之前的“现代”毫无关系）的新时代的确定，不能仅仅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新时代单方面地以牺牲旧时代进行了升级。新时代与旧时代共存，并与之相关，如果如宣称的那般，现代终结了，那么就要追问，资本主义结构是否就不再能够满足在社会之中产生的需求了。上述后现代理论家们对此都缄默不言。或者说，如阿道夫·桑切斯·巴斯克斯（Adolfo Sánchez Vázquez）所言，虽然他们谈论现代的终结，“但是他们提防着，不要同带来现代形式并宣告其终结的社会深层结构的‘终结’的必要性联系到一起”（1996，第125页及以下）。

尤尔根·哈贝马斯正确地指出，对当前现象的多种阐释体现了新保守主义的特征。“新保守主义者寻找危机根源，不是在经济和国家机构的运作方式中，而是在文化确定的合法性问题中，特别是在民主和文化被破坏的关系中。”（1985a，第33页）因此，他们将社会认同的错误归咎于享乐主义，将追随意 340
愿的缺乏归咎于自恋情结，将退出社会和竞争统治的成功归咎于“文化”。但是，事实上，文化在所有哲学问题的产生上只起到非常间接的作用。因此，哈贝马斯说，现代是启蒙哲人为了客观知识、普遍道德和普遍有效的法律、自主的艺术和文化的留存而设计的，使得日常生活的丰富和理性组织成为可能。从而，他认为，现代的理想仍然有效，只是在当今社会仍然无法实现（参见1985b）。

尽管哈贝马斯对此有了阐释，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还是将反抗的后现代主义同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一种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这里的“我们”指的只是三分之一的人类，因为另外三分之二生活在贫困甚或赤贫当中）处于一种被称为“后现代”的新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同现代的关系并没有突然中断，也并没有超越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另外一种后现代主

义，因为将后现代视为自主的最后的形式，所以试图合法化这种制度转变，从而同时清除系统的解放替代方法的可能性，正如利奥塔所做的那样。

最后说到瓦蒂莫的解放理论。该理论片面地强调差异和碎片化而忽视了辩证法，在以实际打算实施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消费资本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均质化为一方，以涉及多数人的碎片化和排斥为另一方之间进退维谷。差异、理性的不同形式，还有无根化，都能够和必须加以思考，但是不能脱离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来思考。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因为将现代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令人期望地在某些方面进行批判，因为没有充分考虑到现代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盲目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将实践的和交往的理性提上日程，所以滑入了相
341 对主义，在威胁到大多数人的社会不平等方面，可能无法提供一种替代方案。

3.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1989 年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后来他又将其扩展为一本书（1992）。福山对上述复杂现象，尤其是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崩溃的后果进行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阐释（路易·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是以重新认识 / 错认的概念加以改写的歪曲意义上的“意识形态”；*ISA*，第 149 页）。在福山看来，自由主义民主能够被描述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最后的人类统治形式”，从而是“历史的终结”（第 11 页）。至于历史的终结，根据全部的人类经验都无法认为，没有能够改变、扬弃或者代替自由主义民主的新的理论方法或者新的现实。关于“最后的人类统治形式”的论断，福山补充说：“在之前的统治形式中，表现出极大的匮乏和非理性特征，最后导致其崩溃，自由主义民主明显摆脱了这种根本的内部矛盾。”（第 11 页）而且，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矛盾正是在排除经济和文化领域之外的政党政治领域的缩减。同时代的民主理论家，比如 C. B. 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N. 博比奥（N. Bobbio）、C. 奥菲（C. Offe）、D. 赫尔德（D. Held）和 F. 加里·坎宁汉姆（F. Gary Cunningham）等人以不同的方法从多种视角指明了自由主义民主在形成及变形中的巨大困难，与福山的看法相悖，他们认为这些矛盾造成了对平等和公正的损害。福山承认，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例如美国、法国和瑞士也会发生种种问题和不公正，但是他认为，这“应当归因于现代民主的两大基本原则——自由和平等贯彻得不充分，而不是因为这些原则本身”（第 11 页）。

正如雅克·德里达所指出的，福山将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统一起
342 来的“信条”建立在非常严重的逻辑矛盾的基础上。尤其是，福山不惧将以民主的名义犯下的暴行、压迫和种族谋杀等罪行解释为与理想不相违背的纯粹的经验现象。“这种态度以一种理想的终极形式为进步的顶点。所有看上去与其相违背的事物，都被归结为历史的经验，不管它们如何强烈、具有灾难性、多样化和遍布世界。”（Derrida 1995，第98页）

针对想象中的误解，福山解释说，他并不是宣称事件的终结，而更是他理解为“一个独特的、连贯的、演化的过程，包括所有时代的人类经验”的历史的终结（第12页），以及一种按照他的理解归因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终结。这种观点的失败在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E. 霍布斯鲍姆（E. Hobsbawn）也表明（1964），马克思的观点极为复杂。福山强调他的思想是一种以自由主义民主收尾的历史的终结。这种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为一国创建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的”自然科学以及“经济生产可能性的统一视域”（第15页）。这就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均质化。但是，这还不够。福山说，此外，我们必须联系由黑格尔宣称的为认同而斗争，认同塑造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政治之间已经消失的纽带（第17页）。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福山所拥护的，不仅是为认同而斗争的黑格尔，而且是描绘基督教世界图景的黑格尔。以经济和认同为基础的普遍的、均质的国家，是历史的终结的标志，代表着上帝降临于世。为了确保这一“福音”，必须宣告，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民主国家的实现。“因为福山没有重新研究，能够如何思考这一事件，所以他混乱地在两个无法调和的讨论之间来回摇摆。”（Derrida 1995，第107页）经济战、保护主义、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贫困、外债——福山似乎对所有这些都不感兴趣。他仅仅宣告了理想及其实现——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终结的思想还要继续存在一 343
段时间，直到它——因为一直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受到分裂趋势威胁的制度的社会团结——被一种新的思想所取代。因为“这些人们欢呼其过时的模式（指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世界的所有旧模式）的前景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晦暗不明，如此令人害怕，又如此濒临危险”（Derrida 1995，第89页）。

4. 历史的终结和后历史。如前所见，现代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概念在历史理论上也不了了之。这表现了历史学家的思考，历史理论的危机在他们身上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危机产生于托马斯·S. 库恩（Th. S. Kuhn）针对逻辑经验主义传统和历史唯物主义赖以依靠的各种认识论基础的批评指责。在 1993 年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召开的总结学科的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米格尔·安吉尔·卡布雷拉·阿科斯塔（Miguel Angel Cabrera Acosta）在自己提交的论文中就这一主题总结如下："在涉及社会理论（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对主体的再评估，对以整体性为代价的碎片化和非连续性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在结构性规定上对偶然性联系的推崇。至于认识论，作为科学性标准的真理概念和现实相关发生了修正。语言和叙事理论接管了认识论的主要作用。同时，与描述性理解相比，分析性叙事丧失了领土。简要地总结之，在我看来，这就是后现代历史理解的本质。"（1993，第 209 页）

这场关于后现代的讨论的主要功绩在于，摈弃了线性的、连贯的、均质的和乐观主义的历史图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作者已经阐发了这种摒弃——并且向一种社会复杂性过渡。问题在于，他们建议引入的替代概念又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即碎片化和主观性占据了优先地位，客观性和结构化则被忽视了。由此，经验事实化约为注疏的话语，化约为语言的无法解释性。因此，所有在历史理论上的发展都消失了。后现代概念的主要弱点是，它将一个层面——历史哲学——的钥匙，交给了另一个层面——历史理论，从而让"宏大叙事"被另一种叙事所代替。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放弃历史理论。哲学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要看两个学科新的构建形式，而不是相互之间以邻为壑。对以非批判的进步信念为基础的黑格尔式历史哲学的批判，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在历史理论的此岸和彼岸，仍然有历史哲学的任务。总而言之，保持以下几个方面似乎是必要的：（1）产生于历史（科学）的成果（参见 I. Wallerstein），使哲学反思成为可能的全球式的社会科学思考；（2）历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分析；（3）哲学反思，比如本雅明在驳斥兰克（Ranke）的历史主义时所阐释的，"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时将其把握住"（*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Thesen*，6. Th.，GS I/2，第 695 页）。

5. 真正的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这个说法可能有多种意义。对此的争论出现在一个阶段或过程的确定特征减弱的时刻。很多阐释都试图解释新事物，了结旧事物。因此，谈论"终结"，

一种新思想就产生了。将历史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来冻结，这是一场徒劳的妄为。但是“历史的终结”也有一种迄今为止几乎还未被提及的意义：作为所有物种自我毁灭的真正的历史的终结。这是所有历史的终结目的的终结，它的可能性是历史中的某种新颖事物。在E. P. 汤普森看来，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不再同比如他在（从前）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中所发现的纯粹的犯罪意图或预防措施相关，而是有关在经济、统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表现出的一种社会类
345 型。“结果将是毁灭”，这个结果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由毁灭手段的积聚和完善，由于社会在终结层面的结构化所导致的”（1981，第341页）。虽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要对手苏联消失了，但是核战争的潜在威胁和灭亡的逻辑本身并没有消失。因此，汤普森的判断仍然有效，正如德里达所要求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以便赋予历史的新天使一种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P. Anderson, *Zum Ende der Geschichte*, Berlin 1993; J. Baudriliard, »El éxtasis de la comunicación«, in: H. Foster (Hg.), *La posmodernidad*, Barcelona 1985; ders., *Die Illusion des Endes*, Berlin 1994; D.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New York 1960;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GA 5; N. Bobbio, *Liberalismo e democrazia*, Turin 1985; ders., *Die Zukunft der Demokratie*, Berlin/W 1988; M. A. Cabrera Acosta, »La historia y las teorias del fin de la historia«, in: C. Barros (Hg.), *La historia a debate. T. I: Pasado y futuro. Actas de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Santiago de Compostela 1993, 209-21; F. Cunningham, *Democratic Theory and Socialism*, Cambridge 1987;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Der Staat der Schuld, die Trauerarbeit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M 1995; B. Echeverría, »Modernidad y capitalismo«, in: ders., *Las ilusiones de la modernidad*, Mexico 1995, 133-97; H. M. Enzensberger, »Zwei Randbemerkungen zum Weltuntergang«, in: *Kursbuch* 52, 1978, 1ff; J. Ferraro, *Freedom and Determination in History According to Marx and Engels*, New York 1992; J. Ferraro Mora, *Diccinario de filosofia*, 4 Bde., Madrid 1979, erw. Ausg. Barcelona 1994; J. Fontana, *La historia después del fin de la historia*, Barcelona 1992; 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3-18; ders.,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Wo stehen wir?*, München 1992; J. Habermas, *Die Neue Unübersichtlichkeit*, Frankfurt/M 1985 (a); der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85(b); H.-P. Harstick (Hg.):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 Frankfurt/M 1977; W. F. Haug, »Was kommt nach dem fordistischen Marxismus«, in: *Argument* 214, 38. Jg., 1996, 183–99; 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Cal. 1987; A. Heller,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Fragments*, Oxford-Cambridge/Mass 1993; E. Hobsbawm (Hg.):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1964;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 Foster (Hg.),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Post Townsend-Wash 1983, 111–25; ders., »Postmoderne. Zur Logik der Kultur im Spätkapitalismus«, in: A. Huyssen, K. Scherpe (Hg.), *Postmoderne. Zeichen eines kulturellen Wandels*, Reinbek 1986, 45–102; 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en von Dialektik und Ökonomie*, Zürich/Wien 1930, 1948; J.-F. Lyotard, *Das postmoderne Wissen: ein Bericht*, Wien-Graz 1986, 1994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Paris 1979); C. B. MacPherson,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1977 (*Nachruf auf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Frankfurt/M 1983); ders.,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1962(dt. Frankfurt/M 1967); I. Meszaros, *Beyond Capital*, London 1995; J. Niethammer, *Posthistoire. Ist die Geschichte zu Ende?* Reinbek 1989; J. Pico (Hg.), *Modernidad y postmodernidad*, Madrid 1988; M. Sacristan, »El trabajo cientifico de Marx y su noción de ciencia«, in: *Mientras tanto 2*, Barcelona 1980; A. Sánchez Vázquez, *Filosofía de la praxis*, México 1966, 1972; ders., *Filosofía y ceonomía en el joven Marx*, México 1982; ders., »Hacia la nueva modernidad«, in: *Dialéctica 29*, Revista de la Benemérita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Puebla, México 1996, *Primavera*, 125–30; H. W. Simons/M.Billig (Hg.),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ng Ideology Critique*, London 1994; E. P. Thompson, »Der Exterminismus als letztes Stadium der Zivilisation«, in: *Argument* 127, 23. Jg. 1981, 326–51 (engl. in: *NLR* 121, 1980); G. Vargas Lozano, *Más allá del derrumbe*, México 1994; G. Vattino, »Ursprung und Bedeutung des utopischen Marxismus«, in: M. Brodersen (Hg.), *Benjamin auf Italienisch*, Hamburg 1982, 47ff; ders., »Das Ende der Geschichte«, in: H. Kunnemann, H. de Vries(Hg.), *Die Aktualität d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 1989, 168ff; ders., *Das Ende der Moderne*, Stuttgart 1990; ders., *Die transparente Gesellschaft*, Wien 1992; A. Wellmer, *Zur Dialektik von*

346

Moderne und Postmoderne. Vernunftkritik nach Adorno, Frankfurt/M 1985.

加布里埃尔·瓦尔加斯·洛扎诺
（Gabriel Vargas Lozano） 撰
卡特林·格林纳普特（KG）
译为德文
金建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erkennung, Aufhebung, Ausbeutung, dialektisches Bild, Eingedenken,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Entfremdung, Epistemologie, Erinnerung, Ewigkeit, Exterminismus, Fortschritt,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deologi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Metaphysik, Neuliberalismus, Notwendigkeit, Postfordismus, Postindustrialismus, Postmoderne, Selbstverwirklichung, Teleologie, Übergang, Utopie, Vorgeschichte

最后解决（Endlösung）

A: ḥall nihā'ī.

E: final solution.

F: solution finale.

R: konečnoe rešenie, okončatel'noe rešenie evrejskogo voprosa (конечное решение,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еврей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S: solución final.

1941 年，当德国统治者在其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开始系统性地屠杀犹太人时，“最后解决”概念便具有了明确的含义。在计划阶段刚开始时，即当帝国安全总局（RSHA）在 1941 年 5 月 20 日的命令中提到“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时，该概念就已经被用于掩盖罪行了（Nürnb. Dok. 3104，引自 Kogon 1986，第 20—21 页）。同时，犯罪者在内部和公开场合也使用其他术语代替“最后解决”：“解决”（Lösung）、“总体解决”（Geamtlösung）、“迁移”（Umsiedlung）、“外迁”（Aussiedlung）、“疏散”（Evakuierung）、“消除”（Abschaffung）、“特殊处置”（Sonderbehandlung）。1943 年 7 月 11 日，当越来越多有关杀害犹太人的消息传到帝国领土并在公众中被讨论时，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全国领袖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颁布法令，要求“公开探讨犹太人问题时，……任何关于总体解决的讨论”必须被禁止（Rundschreiben 33/43，引自 Fleming 1982，第 35 页）。德国法院曾对例如声称使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帝

国公民”和被驱逐出境的外国人判处了徒刑。

最后解决概念的杀人意义被传媒和社会科学的语言所接受。当这个概念出现在书的标题中（例如，Reitlinger 1953；Gilbert 1982；Aly 1995）时，常常会加上解释的副标题。最后解决与“大屠杀”（*Holocaust*）、“种族灭绝”（*Genozid*）、“浩劫”（*Shoah*）等概念相互竞争。然而，语言上最贴近事实的理解似乎是“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是，这种理解没有考虑到的是，凶手甚至杀害了生活在北非的犹太人，而且德国统治者同时策划了“对吉普赛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并在与谋杀犹太人相同的地点谋杀了辛提人和罗姆人。

1. 1941 年 7 月 31 日，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签署了对帝国保安总局负责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的授权文件，要他“制订实施力争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总体方案”（参见 Pätzold 1983，第 298 页）。这个概念的前史——主要体现在“最终解决”（endgültige Lösung）这一表述中——以及国家官僚机构和纳粹党宣传中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全部技术性和掩饰性语言的形成，可以追溯到 1933 年末至 1934 年初。最初，政权中的法学家、意识形态家和宣传家使用的是“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这一概念，其在反犹主义者中的贬义使用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40 年代。1933 年，戈培尔（Goebbels）先是将“犹太人问题”称为“德国的问题”，随后又称为“世界的问题”（同上书，第 67 页）。前者表达的意思是，这个问题与其他国家无关，完全是德国的内政事务；后者的意思是，德国的处理方式是其他国家有朝一日会遵循的开创性行为。反犹种族宣传的策略原则之一是公布其他国家的所有反犹言论和行动，并将其作为证据，证明对犹太人作 348
用的“启蒙”（Aufklärung）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同时，基督教反犹主义的大量言论被用来论证迫害的合理性。起初，对“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含义的界定是不一致的。1933 年流行的说法声称，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目的仅仅是抑制犹太人在社会生活（金融、贸易、新闻、科学、艺术、法学、医学）中的所谓过度影响。这种说法标志着反犹措施的早期阶段，同时也起了误导作用。希特勒（Hitler）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已经提出了将犹太人当作“寄生虫”（Parasiten）、“细菌”（Bazillus）、“蚂蟥”（Blutegel）和“瘟疫”（Pest）一律逐出德国的要求（1942，第 334、339 页），但它似乎

没有成为国家政策。特别是按照1914—1918年世界大战前线战士的标准，在算作犹太人的人群中间存在差别。关于犹太人政策目标的各种观点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传播也引起了迷惑。犹太人被有意给予了较低的法律地位（“少数民族”[nationale Minderheit]或“帝国属民”[Reichsangehörige]，而不是“帝国公民”[Reichsbürger]），颁布外国人法的目的也在于此，犹太人应当与“居住在这里的任何一个黑人共和国的……黑人”（引自Pätzold 1983，第63页）一样服从该法。然而，在这个早期阶段，纳粹党的宣传也远远超出了这种“适度的”（gemäßigt）计划。他们的主张是，德国犹太人由于不可更改的、由血统决定的低劣特性而成为“雅利安人种族发展”的破坏因素。他们阻碍了“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形成，因此是“不受欢迎的”。这是和“清洗”（Reinigungsaktion）或“清除”（Säuberungsaktion）一样的不祥用语（参见上书，第71页）。很快，根据市政管理法规而将犹太人排除在公共设施（浴场、澡堂等）之外的行动开始了。

帝国内政部长的一项法令（1934年1月17日）使用了“特殊处置”概念，这意味着更为严苛地对待犹太人，这超出了1933年生效的反犹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参见同上）。考虑到犹太人自己的不满及其追随者中的激进分子（他们对1933年通过的反犹法律或条款感到失望），统治者强调了其措施的暂时性。比起他们在1934年初无限期停止敌视犹太人的立法，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更有必要。这是为了避免外贸中的不利因素和购汇受挫，以免有损重整军备。从这时起，这些概念直到后来才出现，统治者区分了“近期计划”和“远期计划”（Schumann 1989，第154—155页）。政府1933年以来的实际上的但又很隐秘的政策就是要将犹太人赶出帝国领土。第一批受害者是居住在德国，既没有德国国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籍的犹太人。自193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失去了生计。然而，当希特勒于1935年9月15日制定被他称为“一次性的世俗解决方案”的“纽伦堡法”（Nürnberger Gesetze）时，他向犹太裔德国公民保证：他们如果在政治上表现良好，并且遵守纳粹的种族法律，则可以继续在德国生活（*Völk. Beob.*，16.9.35）。

349

这与肆无忌惮的反犹煽动和将占少数的犹太人从大多数德国人中孤立出来的逐步措施形成鲜明对比。犹太人进入了没有围墙的犹太人区（Ghetto）。对他们来说，整个城镇、城区、公共场所均被宣布为禁区。有人喇讽地要求“希伯来人”搬到巴勒斯坦去。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Julius Streicher）主编的《冲

锋队员报》(*Stürmer*)希望他们去一个必须与"猎头者和食人族"(Kopfjäger und Kannibalen)打交道的地区，或者去"俄国北极的新地岛"(Insel Nowaja Semlja)(《犹太人去往何处？》[Wohin mit den Juden?]，Nr. 20，1934；参见Pätzold 1983，第89—90页)。法律法规剥夺了犹太人越来越多的工作、赚钱和培训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村庄和小城镇，他们越来越多地受到纳粹积极分子和反犹暴民的骚扰与敌视。受迫害的人开始向大城市内迁，在那里寻求加入强大的犹太社区和某种匿名保护。在反犹主义者中，如何加快逃离帝国的速度是一个争论的焦点。纳粹党的领袖和《冲锋队员报》的编辑试图通过抵制生意以及制造针对个人的心理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来驱逐犹太人，同时也对"白种犹太人"(weiße Juden，指不遵守反犹
350 命令的德国人)予以公开谴责(Pätzold 1975，第232页)。最初负责的内政部和司法部的反犹官僚，以及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党卫队保安处(Sicherheitsdienst der SS)和盖世太保(Gestapo)的犹太政策制定者，拒绝了"吵吵闹闹的反犹主义"(Radauantisemitismus)，而是依靠加强法律镇压和警察镇压。犹太人被完全控制，他们的组织被监控，并在宣传和组织"移民"的意义上被引导。1938年颁行了新一轮的反犹法律法规，也在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为其他的法律法规做了准备。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目标一致。1938年11月9—10日的恶性骚乱使对犹太人的迫害进入了强制驱逐的阶段，两种方式也在此时合二为一。大约25000名犹太男性被驱逐到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集中营，以迫使他们及其家庭成员逃离帝国。在骚乱期间，有数目不详的犹太人死于集中营和监禁。从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永久的威胁。1939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讲话，要求"解决犹太人问题"(参见Pätzold 1983，第217页)。根据解释，这意味着将犹太人从当时已扩大的帝国中驱逐出去。这一政策是由作为四年计划专员和军备经济总负责人的戈林领导的。这项任务符合他的明确意图，即"筹措并适当使用国内外资金"，而这些资金是从被驱逐前的犹太人那里抢来的(参见Vogel 1977，第291页)。这种"雅利安化"(Arisierung)政策从1938年起在国家强制下公开实施，其受益者是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工厂的业主，中产阶级成员以及纳粹干部(他们低价收购了大公司或商店，或从这些公司或商店的关闭中获利)。驱逐犹太人也缓解了由军备扩张导致的住房日益短缺的问题。1939年初，戈林将所有措施

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移交给安全警察和保安处的负责人海德里希。他的上级是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德国警察头子。当一支别动队（Spezialkommando）以官僚方式在维也纳对驱逐进行了完美测试之后，德国成立了一个被编入警察机构的
351 “帝国犹太移民中心”（Reichszentrale für die jüdische Auswanderung）（“移民”即驱逐）。它的负责人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一位党卫队军官和盖世太保总部的部门负责人。在战前阶段，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已经受到统治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使。这些利益交织在一起，也使统治者愈加有兴趣用彻底的社会变革欺骗“雅利安”追随者，并从“雅利安化的成果”（Arisierungsgewinne）中为他们提供实在的好处。同样，种族主义宣传及实践也为统治者提供了机会，满足自己和他人的复仇欲望，增强和享受他们自己的优越感和权力，并以“雅利安种族”（arische Rasse）独特优越性的学说来取悦他们的追随者。反犹主义实践同时也是对民众的惩戒，是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准备，也是对所谓种族敌人实施野蛮犯罪行为的实际演练。对犹太人的迫害产生了大批的告密者。

2. 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后，逃离帝国的犹太人大潮变成了涓涓细流。驱逐政策陷入危机。同时，随着1939—1940年的占领，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数量开始增加。纳粹政权高层谋划了针对整个欧洲被占领地区的最后解决新方案。这些方案与波兰的德意志化计划联系在一起。1939—1940年冬，新帝国大区（但泽-西普鲁士[Danzig-Westpreußen]、瓦尔特兰[Wartheland]）以及并入西里西亚（Schlesien）和东普鲁士（Ostpreußen）的各个地区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这和对波兰人的驱逐一起，为来自苏联西部地区的所谓德意志侨民（Volksdeutsche）的落户腾出了空间。服务于建立帝国主义欧洲新秩序的种族清洗开始了。犹太人也将被从帝国转移到“波兰总督府”最东边的“保留地”（Reservat）（尼斯科计划[Nisko-Plan]），这个计划绝对谈不上清晰。但与之相对的是自1940年夏天起开始实施的对苏战争准备工作，这一工作将使这一地区成为集结区。正是在这个阶段，海德里希于1940年6月24日向帝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解释了“区域最后解决”的必要性（Vogel 1977，第312—313页）。即便是法
352 国投降后出现的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kar）岛巨型集中营的方案，也始终是外交部和帝国保安总

局的案头工作。英国没有屈服。但无论是保留地计划还是马达加斯加计划，都见证了思想和计划的逐步极端化。现在不仅是德国，就连欧洲也应当成为“无犹太人”（judenfrei）的地区。规划者们怀着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处理整个领土的“日耳曼化”（Germanisierung）和“去犹太化”（Entjudung）问题，并在运送大批人口方面积累了经验。然而在被占领的波兰总督府，犹太人的贫民窟化（Ghettoisierung）却主要是在大中城市铁路沿线进行的。1940 年，对犹太人的侮辱、虐待、剥削、折磨和屠杀是波兰被占领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里第一次使用黄色的“犹太星”（Judenstern）来识别受迫害者。与此同时，另一项措施也在帝国领土上开始广泛实施：根据希特勒 1939 年 10 月（日期为战争开始之日）发布的指令，在选定的“疗养院”（Heilsanstalten）中处死真正的或据称无药可救的患病雅利安人和犹太人（Klee 1985，第 85 页）。受害者是在密室中被毒气杀害的。在尚未决定进行大屠杀前，驱逐、贫民窟化、灭绝计划和谋杀病人便在思想和实践上推动了最后解决的实施。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的统治者在越来越多帮手的支持下（这些人主要利用了人们对军事事件的关注），采取了一些措施，开始塑造他们想要建立的欧洲。这些措施包括驱逐某些族群（犹太人、波兰人）和为了日耳曼化而杀害被认为无用或危险的群体（疗养院里的囚犯、波兰知识分子）。在战争期间，现有的相当一部分政治—官僚潜力甚至军事—组织潜力被用来塑造战后秩序，而战争本身也被用来证明犯罪的合理性。

3. 走向系统性大屠杀（目的是消灭生活在德国占领区的所有犹太人，而且要在最终胜利后使欧洲中立国的犹太人也成为受害者）的决定性的、不可改变的一步是在入侵苏联后进行的。这方面 353
的证据主要是艾希曼为在万湖与国务秘书磋商（1942 年 1 月 20 日）而准备的统计资料，海德里希在自己的报告中也使用了这份资料，并将其添加进了备忘录中。这份资料还提及了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欧洲部分）、瑞士和瑞典的犹太人（Pätzold 1983，第 338—339 页）。

在这一步之前的决策和指示没有留下文献记录，也无法进行可靠的间接推断。因此，历史学上产生了对“决策过程”（Entschlussbildung）的争论。存有争议的是，希特勒到底是走向最后解决的始作俑者，然后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按照他的命令执行，还是他们向他提出了杀死所有犹太人的建议，他对之予以批准和认可。无法解释的是，到底是唯一一项触发事件的决议旨在立即谋杀所

有犹太人，还是连续的几份决议扩大了杀戮范围。

1941年6月22日之前，由海德里希担任总指挥的屠杀团——秘密警察（Sicherheitspolizei）和保安处的四支别动队（Einsatzgruppen）——已经组建完毕。在战争开始前，他们的权限、行动领域和行动方式也已与陆军总司令商定完毕。这些团体的成员被编为小分队，在入侵苏联领土后立即开始就地击毙包括老人和青春期少年在内的男性犹太人。同时，他们还试图煽动当地的非犹太人进行屠杀，然而根据实施报告的判断，结果不尽如人意。1941年8月，妇女和儿童也成为屠杀行动的对象。为了增援别动队，治安警察（Ordnungspolizei）的警察营也加入了杀人行动。德国国防军部队以及通敌者（Kollaborateur）特地组建的队伍也参与了覆盖整个被占领国家的暴行。1941年秋，最后解决——可能从未存在一个总结所有做法的文件——的计划和实践形成了清晰的轮廓。相关的证据是：11月底至12月初，贝尔泽克（Belzec）灭绝营开始施工——这是波兰东部"莱因哈特行动"（Aktion Reinhard）三个灭绝营中的第一个（随后是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位于瓦尔特兰大区最东部的库尔姆霍夫（Kulmhof，波兰语为海乌姆诺[Chelmno]）灭绝营投入使用——自12月9日起，犹太人就在该地所谓的毒气车厢中被杀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KZ Auschwitz，后来的奥斯维辛一号营）使用齐克隆B（Zyklon B）进行"毒气试验"（Probevergasung）——1941年9月，这一试验的受害者主要是苏联战俘。 354

起初，凶手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谋杀计划将如何、在何时付诸行动。他们遵循的方法是试验—得到部分结果或不满意的结果—新试验。政权高层的指挥官和幕后策划者前往犯罪现场——例如希姆莱就于1941年8月14日至15日抵达明斯克（Ogorreck 1996，第181页），听取代表的汇报（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处——盖世太保处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就听取过下属艾希曼的汇报），或收到别动队带有"成功率"数据的书面报告。1942年1月20日，一群党卫队高级军官和帝国最高当局的国务秘书们举行会议，协调继续采取屠杀犹太人的措施，并讨论处理"混血犹太人"（Judenmischlinge）的建议（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1942年间，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使用柴油发动机废气的杀戮设施和奥斯维辛使用齐克隆B的新建二号营（比克瑙[Birkenau]）已准备就绪，并且运转如此顺畅，以至于从被占领的欧洲各地通过铁路运来的受害者，大多数在抵达后几小时内便被杀死

了。少数人在奥斯维辛主营区及其分营中受到折磨，直到丧失劳动力（“劳动灭绝”[Vernichtung durch Arbeit]），然后被杀害。艾希曼的部门与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Deutsche Reichsbahn）共同保障用铁路运来犹太人，并与德国办事机构（帝国交通部）、当地的党卫队和秘密警察高级指挥官、国防军办事机构（运输部门）、治安警察指挥官和帝国在盟国与卫星国的外交机构中设立的“犹太人事务专员”（Judenbeauftragte），以及通敌者合作。

随着犯罪的升级，直接或间接参与犯罪的德国人及其帮手人数（目前只能估计）不断增加。其中最主要的是治安警察的别动队，党卫队的其他队伍，警察营，国防军部队，灭绝营、集中营及
355 其他营地的人员，以及驱逐专列和行军的护送队。例如，在帝国的大城市里，有相当多的德国人参与了将犹太人驱赶到杀人犯身边的准备工作或之后的善后工作，他们或是“兼职”（nebenamtlich）执行特别任务，或是从事本职工作：警察，冲锋队人员，纳粹党人民福利组织的干部，帝国铁路人员，国家机关（特别是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银行、储蓄机构和保险公司雇员，房东，拍卖商，等等。

在“莱因哈特行动”的集中营被关闭，集中营所在的地方被伪装，甚至在奥斯维辛二号营的杀人设施被炸毁之后，最后解决还一直持续到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在劳动营和驱逐过程（死亡行军 [Todesmärsche]）中，犹太人丧命或被卫兵（其成员都是从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的军事和准军事组织中迅速而随意挑选的）射杀。即使在解放后的几天和几周内，被剥夺权利的人们仍然大批死亡。根据 1993 年的详细研究，受害者总数至少为 529 万人，但可能超过 600 万人（Benz 1991，第 17 页）。因此，这与 1945—1946 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时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所依据的估计数字接近（570 万；参见 *Der Prozess*，1947，2，第 47 页）。

4. 战争结束后，最后解决首先成为许多欧洲国家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查明、逮捕和判决凶手为目的的工作的对象。因此，自 1945—1946 年第一次纽伦堡审判（针对戈林等人）以来，相关文献得到了保护和公布，事实和背景已为法庭所知。对凶手的搜捕工作已基本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司法档案广泛分布在当地。对审判和调查的概述并不存在。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主要来自美国、以色列、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参与研究了最后解决的历史。历史研究者拥有大量刊印和未刊印的大屠杀幸存者回忆录。

其他任何受迫害的群体（辛提人和罗姆人、强迫劳动者、集中营和劳动营的囚
356 犯、战俘）都没有留下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生见证。最后解决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政治和统治中研究与叙述最密集的部分。

在经济史方面，尤其是在大企业的“雅利安化”方面，存在着研究上的不足。大部分研究的不足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东欧国家对大屠杀研究的忽视（有时甚至到了完全无视的地步）。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变革在阻力之下缓慢地进行着。现有的档案资料既没有经过整体筛选，也没有被整理好及不受限制地利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立国（瑞典、瑞士、西班牙和葡萄牙）银行的作用才开始得到澄清，这些银行从驱逐犹太人中获利，但从未报告从因犹太人被屠杀而无法提取的账户中获取的收益（Roth 1997）。直到20世纪90年代，阐明国家、政府和精英对德国迫害犹太人升级的明确态度（对抵制德国政权的阻挠态度、对寻求避难者关闭或迟迟不开放边界）依然要面对重重阻碍。对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的灭绝设施和运输路线没有进行轰炸的做法始终存在争议。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和言论，多次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法西斯反犹主义历史、关于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著作。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对最后解决做出根本性的叙述，也从未成立过研究会。在人力和物资配备最好的研究所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苏联，方法论条件和政治条件却最差，大屠杀研究无法开展。由于没有消除自己的责任，大国的精神领袖作用对所在阵营其他国家的研究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最后解决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的历史仍然付之阙如。

国际上对最后解决的研究在过去和现在都伴随着许多争议。一部分争议的产生源于文献留存上的空白。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不同的方法论程序，此外还有政治利益。学术争论的中心始终是最后 357
解决的起源、驱动力和过程，而重构从驱逐到屠杀犹太人的步骤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特别挑战。于是，最高层的决策和指挥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所有的提问方向及其答案中，关于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不可估量的比例的不同观点始终相互对立。遵循德国历史主义方法论或其他以历史唯心主义解释历史的流派的研究者，把最后解决的历史归结为希特勒的思想和命令，以及他和一些同僚领导人对犹太人的非理性仇恨。据此，希特勒在进入政坛时就已经做出了屠杀犹太人的决定，只是在寻找机会，以便能将其实施。这个机会应当是在1941年

策划入侵苏联的时候发现的。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并没有区分“灭绝幻想”（Vernichtungsphantasien）（它在德国的反犹主义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德意志帝国早期），与其逐步成为理念、方案、计划，以及最后的决定和命令的过程（参见 Benz 1994，第 109 页）。

其他历史学家并不否认希特勒对犹太人狂热的、病态的或癫狂的仇恨是他思想世界与感情世界中的常态，但明确区分了模糊的屠杀意图与其在历史过程中的表现。他们标明了从反犹政策直到最后解决的各个阶段，探讨了思想—计划—行动—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了犹太人政策的变化和飞跃。这样，诸如反犹主义在民众、纳粹领导团体及其追随者中的传播，犹太人政策对其在党和国家官僚机构中的操作者的思想和道德影响，迫害的社会结果（战前德国犹太人的赤贫、波兰被征服后犹太人在贫民区的贫困化、疫区的产生等）等社会进程就成为焦点。有人极度夸张地断言，这一实践逐渐产生了实质约束（Sachzwang），制造了“累积性的极端化”（kumulative Radikalisierung），其结果是最后解决理念在文武官僚机构中的诞生。在这一观念中，希特
358 勒的角色被简化为一个发动呼吁的人物（Appellationsfigur）（Mommsen 1983；批评见 Friedländer 1985，第 20 页，第 31 页及以下）。

由于一系列问题仍未阐明，争议一直没有解决，但两种观点逐渐趋于一致。一般认为，最后解决的命令并没有以书面形式存在，其直接的思想前身也没有在统治者最核心的圈子里留下明确的文献记录。宣称希特勒是唯一凶手或认为他的角色虽不可或缺但却处于边缘的假设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已经证实的是，当最后解决进程陷入僵局时，他推动了这一进程。1944 年，希特勒在与匈牙利国家元首米克洛什·霍尔蒂（Miklos Horthy）的协商中施加了勒索性的压力，为的是驱逐最后一大群生活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

有观点固执地认为，希特勒在认为不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之后（1941 年 12 月，其他资料来源认为是在 1942 年期间）就下令屠杀犹太人。从此，针对反希特勒联盟势力的战争退到了“反犹太人战争”（Krieg gegen die Juden）的后面，所以它对犹太人变得不利（Dawidowicz 1975）。这种说法的依据是物力（机车车辆、铁路）和人力（警卫队以及灭绝地点和营地的“操作和安保”人员）的大量消耗。这个论点在两方面站不住脚。首先，指挥战争——目标有所减少——直到 1945 年春天仍然是希特勒及其政权付出一切努力的首要任务。其次，空前的罪行是以相对较小的人力

犯下的。统治者衡量收益后，认为在战争经济和军事上有必要将犹太劳动力驱逐到已被宣布为“无犹太人”的帝国内地，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利用匈牙利犹太人在帝国边境修筑所谓的东南壁垒（Südostwall）。

在这方面，有人讨论过如下问题：如果没有得到犹太人组织和“犹太委员会”（Judenräte）的帮助，那么投入的少量猎杀和灭绝人员是否能使犹太人遭到实际规模的屠杀？这场辩论在艾希曼审判（1961年）之后，由于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观点而达到了高潮。阿伦特认为，面对没有组织、没有
359 领袖的犹太人，大屠杀的凶手能够取得可怕的成功，但不能取得现已实现的成功（1964，第162页）。另一方面，在政治—教育利益的推动下，以色列对犹太人在贫民区和灭绝场所的抵抗行动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从被驱逐开始，绝大多数犹太人就没有机会反抗了。在此之前，取决于普遍的和具体的生活状况，以及非犹太人提供的帮助，只有少数人能够非法地隐匿起来，从而摆脱犹太猎手，加入游击队——特别是在苏联被占领土上——或组建自己的游击组织。英雄主义的最后起义和突围行动（例如在华沙，参加者大多为年轻的犹太人，男人和女人都有），此前参加1936—1938年西班牙战争，而后参加苏联和波兰游击队、参加被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地下组织，以及在反希特勒联盟军队中充当士兵的犹太人，都不适合抵消手无寸铁的上百万人。后者的结局导出了一个问题，即在有办法或能想出办法的条件下，依然无法及时感知和应对危险的原因为何。

5. 在与最后解决有关的问题中，争议最大的是历史地位、驱动力以及起着造成和推动作用的利益。与其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问题在研究中基本被边缘化了，往往连问都不问。不可知的论题阻挡了这些问题，正如最后解决在犹太人千年苦难史中全然狭隘的定位一样（它被解释为救赎事件和不幸事件）。面对最后解决这场“元史学事件”或“极端事件”（»metahistorisches« oder »Grenzereignis«），历史学中所有触及认知目标的方法都将失败（Friedländer 1985，第438—439页）。有时，有人在拒绝面对最后解决向科学提出的挑战的同时，还提出这样的论点：理性的解释尝试会造成“无害化”（Verharmlosung）或“亵渎”（Entweihung），而二者都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事件的先天误解。它只能被描述，却无法被解释。另外，理性也被认为形成了哀悼的障碍（Schneider 1991）。在大多数情况下，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犹太政策史自转入最后解决阶段后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政权的历史
360

政治坐标。最后解决被宣布为希特勒及一些同僚领导人的唯一战争目标（Haffner 1978，第 153 页及以下）。德国社会在驱逐犹太人阶段的利益仍需得到分析，但这个社会却被忽视了。最后解决表现为目的本身，表现为一种固定理念即反犹种族学说的单纯实现。只有少数研究者确定了屠杀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德国的目标观念及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精英建立“万字统治下的欧洲”的计划中的地位。这个欧洲并不是一个因战争事态变化而出现的临时产物，而是按照法西斯主义原则设计的一个永恒政权。精英们得出的结论是，根据统治者的标准和需要，给予甚或完全剥夺生活在“大日耳曼世界帝国”（großgermanisches Weltreich）这一统治区的人民——德意志人和非德意志人——的生存权利。为了对人民和空间进行统治和剥削，统治者已经开始对战争中落入征服者手中的群体在种族上进行评估、归类和分级。不懂人类概念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只知道区分优等与劣等、享有特权与“不配生存的种族”（lebensunwerte Rassen），结合实际考虑如何方便地组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早在灭绝开始之前很久，犹太人就被放置在这个评价尺度的底端，处在绝对的负面范围内。他们被认为对剥削目的毫无用处，而且是所有“异族”（Rassenfremde）和“种族敌人”（Rassenfeinde）中最危险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家和政治家们把犹太人视为统治世界最重大的竞争对手，害怕犹太知识分子，把犹太人妖魔化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jüdische Bolschewismus）和“犹太财阀主义”（jüdische Plutokratismus）的始作俑者与受益者。通过后一手段，他们为自己及其追随者创造了一个普遍的敌人形象，这个形象适用于为对西方（法国、英国和美国）和东方（苏联）的战争进行辩护。即使是在不可更改地步入最后解决阶段的时候，利益和意识形态都交织在犹太人政策中。在任何阶段，罪行都没有挣脱政权及其计划。它从来就不意味着背离已考虑好的政策。大屠杀被定为 361
对最终目标的呈现。对犹太人的屠杀与先于它及与之同时进行的对病人和穷人、辛提人和罗姆人的大屠杀一样，都是帝国统治计划的一部分。实现的最后胜利将继续造就新的最后解决计划和实践，其受害者将主要是斯拉夫人。这一点可以从戈林的绿色文件夹和被称为“东方总计划”（Generalplan Ost）的计划中得到证明（Eichholz 1992，第 291 页）。对苏联战俘（其中有 300 多万人死于饥饿、疾病、瘟疫和无家可归）的处理是这些计划已经实施的步骤。这种灭绝政策的获利者和受益者是未来德国“统治种族”（Herrenrasse）的阶级分化社会。在其设

计者的思想中，凶残的最后解决同时代表了一种达到“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的路径，它被理解为“雅利安”劳动人民绝对的社会静止，以及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完全腐坏。

最后解决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决定彻底地消灭一群人，指挥、组织、控制、执行这种暴行，从而表现为史无前例的暴行、反人类的罪行、具有多样性的整体；它还体现为帝国主义征服、灭绝和摧毁政策的过分膨胀。它有其前身，但体现了连续性和断裂性。在充满妄想的种族教条的驱使下，它追求不合时宜的目标，直至其拥有了历史地位，在庆祝演讲（Habermas 1997，庆祝戈德哈根获奖的演讲 [Festrede zur Auszeichnung von Goldhagen]，*ND*，13.3.1997）中被称为“文明的断裂”（Zivilisationsbruch）。这种在历史研究中很难被采纳的特征描述是模棱两可的。如果它充当一种思想工具，将最后解决视为对现存社会的突破，而不是从社会矛盾中予以理解，那将引起错乱。但是，它也可以抵消对最后解决的过度孤立的定义，即认为它是德国和犹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此外，欧洲范围内的通敌、外国（交战国和中立国）自得知屠杀犹太人以来的态度，以及
362 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恰当结论的争论表明，最后解决的罪行应该不可能再重演了。

参考文献：

U. D. Adam, *Judenpolitik im Dritten Reich*, Königstein/T. 1972; G. Aly, *»Endlösung«. Völkerverschiebung und der Mord an den europäischen Juden*, Frankfurt/M 1995; G. Aly u. S. Heim, *Vordenker der Vernichtung. Auschwitz und die Pläne für eine neue europäische Ordnung*, Hamburg 1991; 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München 1964; B. Bailer-Galanda u. a. (Hg.), *Wahrheit und »Auschwitzlüge«. Zur Bekämpfung »revisionistischer« Propaganda*, Wien 1995; D. Banki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Public Opinion under Nazism*, Oxford 1992; Y. Bauer, *A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1982; W. Benz (Hg.), *Dimension des Völkermords. Die Zahl der jüdischen Opfer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München 1991; ders., »Endlösung. 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in: *Tribüne. ZS zum Verständnis des Judentums*, 33. Jg., 1994, H. 132, 96–109; Ch. Browning, *Fateful Months. Essays on the Emergence of the Final Solution*, New York 1985; ders., *Ganz normale Männer. Das Reserve-Polizeibataillon 101 und die »Endlösung« in Polen*, Reinbek 1993; H. Buchheim (Hg.)

u. a., *Anatomie des SS-Staates*, München 1979; Ph. Burrin, *Hitler und die Juden. Die Entscheidung für den Völkermord*, Frankfurt/M 1993; D. Cesarani (Hg.), *The Final Solution. Origins and Implementation*, London 1994; L. S. Daw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 New York 1975; K. Drobisch u. a., *Juden unterm Hakenkreuz. Verfolgung und Ausrottung der deutschen Juden 1933–1945*, Berlin/DDR 1973; D. Eichholz, »Der Generalplan Ost und seine Opfer«, in: W. Röhr u. a. (Hg.), *Faschismus und Rassismus. Kontroversen um Ideologie und Opfer*, Berlin 1992; H. Eschwege (Hg.), *Kennzeichen J. Bilder, Dokumente, Berichte zur Geschichte der Verbrechen des Hitlerfaschismus an den deutschen Juden*, Berlin/DDR 1966; *Europa unterm Hakenkreuz, Die faschistische Okkupationspolitik in Polen (1939–1945)*, hgg. v. W. Schumann, Berlin/DDR 1989; G. Fleming, *Hitler und die Endlösung. »Es ist des Führers Wunsch...«*, Wiesbaden 1982; S. Friedländer, »Vom Antisemitismus zur Judenvernichtung«, in: Jäckel/Rohwer 1985, 18–60; M. Gilbert, *Endlösung. Die Vertreibung und Vernichtung der Juden. Ein Atlas*, Reinbek 1982; H. Grabitz u. a. (Hg.), *Die Normalität des Verbrechens. Bilanz und Perspektiven der Forschung zu 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 Berlin 1994; V. Grossmann, I. Ehrenburg u. A. Lustiger (Hg.), *Das Schwarzbuch. Der Genozid an den sowjetischen Juden*, Reinbek 1994; I. Gutman (Hg.), *Enzyklopädie des Holocaust. Die Verfolgung und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3 Bde., Berlin 1990; S. Haffner, *Anmerkungen zu Hitler*, München 1978; R. Hilberg, *Die Vernicht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Die Gesamtgeschichte des Holocaust* (1961), 3 Bde., Frankfurt/M ^{6}1994; ders. (Hg.), *Documents of Destruction. Germany and Jewry 1933–1945*, London 1972;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Yad Vashem 1986ff, NF 1993ff; E. Jäckel u. J. Rohwer (Hg.), *Der Mord an den Juden im Zweiten Weltkrieg. Entschlussbildung und Verwirklichung*, Stuttgart 1985; E. Klee (Hg.), *Dokumente zur »Euthanasie«*, Frankfurt/M 1985; E. Kogon u. a. (Hg.),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assentötungen durch Giftgas. Eine Dokumentation*, Frankfurt/M 1986; V. Král (Hg.), *Die Vergangenheit warnt.* 363 *Dokumente über die Germanisierungs- und Austilgungspolitik der Naziokkupanten in der Tschechoslowakei*, Prag 1960; H. Krausnick, »Judenverfolgung«, in: K. Kwiet u. H. Eschwege (Hg.), *Selbstbehauptung und Widerstand. Deutsche Juden im Kampf*

um Existenz und Menschenwürde 1933–1945, Hamburg 1984;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London 1955ff; P. Longerich (Hg.), *Die Ermordung der europäischen Juden. Eine umfassende Dokumentation des Holocaust 1941–1945*, München 1989; C. Madajczyk (Hg.), *Vom Generalplan Ost zum Generalsiedlungsplan. Dokumente*, München 1994; M. R. Marrus, *The Nazi-Holocaust. Historical Articles on 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 9 Bde., Westport-London 1989; A. J. Mayer, *Der Krieg als Kreuzzug. Das Deutsche Reich, Hitlers Wehrmacht und die »Endlösung«*, Reinbek 1989; H. Mommsen, »Die Realisierung des Utopischen. Die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 im ›Dritten Reich‹«,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9. Jg., 1983, 381–420; R. Ogorreck, *Die Einsatzgruppen und die »Genesis der Endlösung«*, Berlin 1996; K. Pätzold, *Faschismus—Rassenwahn—Judenverfolgung*, Berlin/DDR 1975; ders.(Hg.), *Verfolgung—Vertreibung—Vernichtung. Dokumente des faschistischen Antisemitismus 1933–1942*, Leipzig 1983; D. Poh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Judenverfolgung in Ostgalizien 1941–1944. Organisation und Durchführung eines staatlichen Massenverbrechens*, München 1996; L. Poliakov, J. Wulf, *Das Dritte Reich und seine Diener. Dokumente*, Berlin/W 1956; *Der Prozeß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c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ärgerichtshof Nürnberg 1947*, Bd. 2, Nürnberg 1947; G. Reitlinger, *Hitlers Versuch der Ausrottung der Juden Europas 1939–1945*, Berlin [7]1992 (engl. 1953); C. Roth (Hg.), *Encyclopaedia Judaica*, 16 Bde., Jerusalem 1972; K.-H. Roth, »Der Splitter im Auge des anderen«, in: *Junge Welt*, 8./9. 2. 1997; H. Safrian, *Die Eichmann-Männer*, Wien 1993; W. Schneider (Hg.), *Vernichtungspolitik. Eine Debatte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Sozialpolitik und Genocid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 Hamburg 1991; G. R. Ueberschär, »Der Mord an den Juden und der Ostkrieg. Zum Forschungsstand über den Holocaust«, in: H. Lichtenstein, O. R. Romberg (Hg.), *Täter—Opfer—Folgen. Der Holocaust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Bonn 1997; R. Vogel, *Ein Stempel hat gefehlt. Dokumente zur Emigration deutscher Juden*, München 1977; H.-H. Wilhelm, *Rassenpolitik und Kriegsführung. Sicherheitspolizei und Wehrmacht in Polen und der Sowjetunion*, Passau 1991; ders., *Die Einsatzgruppe A der Sicherheitspolizei und des SD 1941/42*, Frankfurt/M 1996; *Yad Vashem Studies*, Jerusalem 1957ff; M. Zimmermann, *Rassenutopie und Genozid.*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Lösung der Zigeunerfrage«, Hamburg 1996.

库尔特·佩措尔德（Kurt Pätzold） 撰
胡晓琛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ntisemitismus, Auschwitz, Emigration, Entnazifizierung, Faschismus, Gewalt, Gewaltstaat, Herrschaft, Imperialismus, Juden, Judenverfolgung, Nationalismus, Nationalsozialismus, Pogrom, Polizeistaat, Rassismus, Shoa, Sozialdarwinismus, Staatssklaverei, Staatsterrorismus, Völkermord, Widerstand, Zionismus

364 能量（Energie）

A: ṭāqa.

E: energy.

F: énergie.

R: ėnergija (энергия).

S: energía.

来源于希腊语 ἐνέργεια，意为“功效、活动、运动、力”。能量最初意味着一种由“力”的主观输出和客观效用构成的连续体。与此相区别的既有19世纪发展出的物理学的能量概念，也有通俗的能量概念。前者不仅应用于技术领域，也应用于生态领域，后者产生出了一种特定的能量拜物教，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65年批评这种拜物教：“与电这一主题一起流行的是种种极难克服的错误见解。简单来说，电之于当代就如同永动机之于并不遥远的过去。人们惊叹于电精妙的效力，以至于觉得只要电带来越多超自然的效用，就证明人对电的特性有更深入的理解。但这些人像曾经的永动机捍卫者们那样走得太远了——他们不是把电当作一种分配力的高效方式，而是当作自动产生的力的一种源泉。”（1965，第160—161页）只有科学地考察能量概念，才能产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仅在电气化问题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作家在理解能量学说时始终停滞不前，这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

1824年尼古拉-莱昂纳尔·萨迪·卡诺（Nicolas-Léonard Sadi Carnot）写下《论火的动力》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孩童。他们二人是1840—1850年间提出热力学两大定律的尤利乌斯·罗伯特·迈尔（Julius Robert Mayer，1814—1878）、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1819—1889）、鲁道夫·埃马努埃尔·克劳修斯（Rudolf

Emanuel Clausius，1822—1888）、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en [Kelvin]，1824—1907）、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 Helmholz，1821—1894）等科学家的同时代人。热力学解释了（在蒸汽机中）从热能到功的能量转化。热力学是科学的能量学说得到承认的名称，热力学的“能量”是一个新造的词，描述各种显然属于不同类别的事实（运动、热量、营养），所有这些事实都能通过热力学第一定律
365 （能量守恒）和第二定律（能量的分散，也叫熵增定律）得到解释。

生态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英国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1922年大度地写道：“假如马克思生活在现代能量学说奠立之后而不是之前，那么他深刻而博学的思想无疑会轻松地把握住能量学说对各门社会科学的意义。”（第13页）但是索迪弄反了，《资本论》第1卷出版于1867年，正值文化界对能量学说的接受与日俱增，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没有将能源利用的研究纳入对社会史、经济史的分析之中。他们始终固守“生产力”概念，这一概念中的“力”（作为“强度”在物理学中实际被视为能量的一种形式）在物理学上的意义是模糊的，没有考虑任何能量单位（如卡路里或马力——这些是当时常用的标记）。

他们当然没有忽视能源利用之变化的社会意义。太阳能转化而成的水力或风力，是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煤炭（制造污染且存量有限）和蒸汽机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标志。煤炭使用量的指数增长在英国是公共争论的主题。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到过杰文斯1865年论煤炭问题的著作。他们从未摘录能源利用方面的统计数据，并且忽视了人类生态学能源学说的意义，谢尔盖·A.波多林斯基（Sergej A. Podolinsky，1850—1891）在19世纪80年代曾向他们提示过这门学说。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博学的。他在1858年7月14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提及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焦耳对提出这条定律的贡献（MEW 29，第337页及以下）。恩格斯和焦耳都生活在曼彻斯特。三十年后，恩格斯在致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i Daniellson）的信（MEW 37，第111页及以下）中强调，19世纪会作为达尔文（Darwin）、迈尔、焦耳和克劳修斯的世纪载入史册，19世纪不仅是进化论的世纪，而且是能量转化理论的世纪。恩格斯在1875年的一些私人札记中提及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些札记在恩格斯身后成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著名段落（在由札记所组成的这部著作的诸多版本中得到重点强调，它们在恩格斯去世多年后全文发表——所幸在《马 366

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中这些段落的位置并不突出）。恩格斯认为克劳修斯的熵增定律与能量守恒定律之间存在（更多是逻辑的而非辩证的）矛盾关系，他希望“发现辐射出去的热可以重新利用”（MEW 20，第 545 页）。也许是恩格斯原本就对与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关的文化悲观主义感到恼怒，又或是恩格斯偏爱关于“回收”外太空能量的思辨，这是亥姆霍兹和威廉·兰金（William Rankine）等物理学家当时正在考虑的。恩格斯大概无法忍受汤姆森本人为宗教运用热力学第二定律，后者劝诫民众放弃他们罪恶的道路，因为世界的（更确切地说，太阳的）终结已经不远了。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人类才理解核聚变，汤姆森当时对太阳的能量来源仍一无所知。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正确地指出，马克思的“物质变换”（Stoffwechsel，作为生物学术语意为代谢。——译者）概念作为人和地球之间的物质转化关系并不是比喻（参见 Schmidt 1962，第 63—78 页）。马克思专门援引尤斯图斯·李比希（Justus Liebig）、让·巴蒂斯特·布森戈（Jean Baptiste Boussingault）以及其他化学家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研究的植物营养物质的循环。马克思承认李比希的这一功绩，但不承认雅各布·莫莱斯霍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他与路德维希·毕希纳（Ludwig Büchner，1824—1899）、卡尔·福格特（Karl Vogt，1817—1895）并称为“庸俗唯物主义者”，他们都属于 1848 一代——是引入物质变换概念（物质转化）的人。有趣的是，工业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即研究生产的物质强度和能量强度、“非物质化生产”的可能性、原料的耗费与毒性）在 20 世纪末的名称就是“工业物质变换”（Ayres/Simonis 1994，Aures 1996）。但无论如何，马克思对农业中物质转化的兴趣没有延伸到工业（换言之，他对工业的研究没有考虑物质转化），也没有延伸到对生产和消费中的能量流的研究。

恩格斯错过了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与能源利用研究结合起来的机会，他虽然有这方面的能力，却对 1880—1883 年波多林斯基（用俄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在多家杂志上发表的想法反 367
应消极。波多林斯基 1880 年 3 月 30 日（从他流亡时居住的蒙彼利埃）给马克思寄去他的论文。他是乌克兰民粹派、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大学医学博士。1883 年《新时代》（*Neue Zeit*）杂志上刊登了他论文的一个版本，实际上他的著作几年以前就已经广为流传。恩格斯在 1882 年 12 月 19 日、22 日致马克思的两封信中，援引 1881 年的一个意大

利语版本（MEW 35，第 133—137 页）。这两封信自 1919 年起被译为多门语言出版，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似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才展开对波多林斯基作品的研究（Martinez-Alier/Naredo 1982；Martinez-Alier/Schlüpmann 1987）。

波多林斯基试图将剩余劳动的概念与将农业作为能量转化系统、作为营养能量源泉的研究结合起来。正如他在 1880 年 4 月 8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所说（原件存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他力图“使剩余劳动与主流的物理学理论相协调”。他的思路是：农业生产来自光合作用和人类劳动；通过营养能量转化为劳动，再通过人类劳动（借助家畜和其他辅助能量来源）转化为农业生产，人们可以建立起能量的平衡；生存的最低限度要求人类劳动的能量生产效率超出营养能量转化为劳动的效率；显然一个社会越分化，这种剩余产品的量就必然越大；于是对能量剩余产品的研究最终可以与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结合起来；现在由于对化石能源的利用，人类社会中的能量流动发生了变化；而煤炭是会被耗尽的（波多林斯基著作的俄文版中还提到，有些理论将气候变化与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联系起来）。

可能是由于马克思敦促回应波多林斯基的论文，恩格斯忠实地复述了论文内容，但斥责它将经济学与物理学乏味地混为一谈。虽然农业产品的能量消耗是可以计算的，但是恩格斯认为，计算工业产品的能量值会受阻于无法克服的困难：“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 368
针里所包含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我看，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MEW 35，第 134 页）在已出版的通信中，没有出现当时已经病重的马克思对恩格斯这番评论的回应。

多年以后，生态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茨基（Vladimir Vernadsky）指出（1924，第 334—335 页），波多林斯基探究生命的能量学（即允许能量流入并变得更结构化、更复杂的系统的能量学），并将由此获得的认识运用到经济现象的研究中。虽然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Alexander Bogdanow）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charin）（1922，第 116 页及以下）等马克思主义者赋予了能源利用在他们历史观中的核心地位，但是 1925 年出版的恩格斯私人札记（指《自然辩证法》。——译者）中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误解、他致马克思的信（出版于 1919 年）中对波多林斯基的负面态度，都阻止（至少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与普通系统论相接近，以及马克思主义与尼古拉·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1906—1994）等人代

表的20世纪后期的生态经济学（参见1971）相接近。

20世纪后半叶加剧的生态问题，使60年代国有社会主义的能源和经济计划已经认识到的任务变得更加具有紧迫性，即努力实现物质过程和（价格）信息过程之间更好的协调一致（参见Altvater 1969）。应对这一要求，民主德国科学院在70年代尝试发展生态学反思下的原料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根据再生产的定价对自然资源进行长期评估（Roos 1976）。汉斯·鲁斯（Hans Roos）在他领头的《论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经济问题》的文集中，要求民主德国的经济学家预备进行“大规模技术革新，以推广比过去更适应自然环境的技术”（Roos/Streibel等1979，第258页）。这部延迟面世的著作不仅遭到了内容上的审查，而且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显示出自我审查的痕迹。虽然它分析了民主德国的
369 营养链条上从作物生产的能量损耗到最终消费者的烹制损耗，但是没有分析在燃煤发电方面，从褐煤开采到随后各提炼阶段的能量链条。它没有实际论证，而只是解释称：“在能量学研究者看来，可用能量无法用测量技术测定。”（第174页）美国物理学会相关的报告也始终无人注意，该报告的基本观点是：“可支配的功（available work）应当是估算所有层面上能量使用效率的基础。”（Ford等1975；引自Illum 1981，第139页）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计算能量转换效率，相对于按照第一定律计算的显然结论，为节能措施开辟了更多可能，因为后者不考虑要以绝对零度为基准测量的能量转换的温度水平（参见Illum 1981以及Bossel 1980）。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 1977）从这一差别出发，诊断分析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联系。作为批判经济的生态学家，他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建立了一套对能量利用情况的分析，涵盖从美国的能量来源到能量的最终使用，提醒读者注意“利润率下降……与资本代替人类劳动”（第217页）的经典联系。他认为，这与资本所推动的、新自由主义中出现的“‘消费’紧缩”一道，都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属于资本主义的症候”。康芒纳由此成功地将能源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判初步综合起来。后来大多数对能源转型话语的讨论（参见Bossel等1980，Hennicke等1985，Hauff 1987，《布伦特兰报告》第7章）与此完全相反，立场更加片面。鉴于社会分析被庸俗化地错误使用，向21世纪过渡的马克思主义有任务将能量学说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起来，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运用（Bimboes/Tjaden 1992）。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Gesellschaftliche Produktion und ökonomische Rationalität. Externe Effekte und zentrale Planung im Wirtschaftssystem des Sozialismus*, Frankfurt/M-Wien 1969; R. U. Ayres, U. E. Simonis (Hg.), *Industrial Metabolism. Restructuring for Substainable Development*, Tokyo-New York-Paris 1994; R. U. Ayres, L. W. Ayres, *Industrial Ecology. Towards Closing the Material Cycle*, Cheltenham/Gloucester 1996; D. Bimboes, K. H. Tjaden, »Stoff- und Energieflüss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Dialektik, 1992*, H. 2, 55–66; H. Bossel u. a., *Energie-Wende. Wachstum und Wohlstand ohne Erdöl und Uran*, Frankfurt/M 1980;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der marxistischen Soziologie*, Hamburg 1922; *N. L. S. Carnot, Ré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 Paris 1824; B. Commoner, *Energieeinsatz und Wirtschaftskrise*, Hamburg 1977 (engl. *The Poverty of Power*, New York 1976); P. Hennicke u. a., *Die Energiewende ist möglich. Für eine neue Energielogik der Kommunen*, Frankfurt/M 1985; K. W. Ford u. a. (Hg.), *Efficient Use of Energy*, New York 1975; N.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Boston 1971; V. Hauff (Hg.), *Unsere gemeinsame Zukunft. Der Brundtland-Bericht der Weltkommission für Umwelt und Entwicklung*, Greven 1987; K. Illum, »Kraft-Wärme-Systeme. Kritik des physikalischen Energiebegriffs in praktischer Absicht«, in: *Alternative Umweltpolitik*, AS 56, Berlin/W-Hamburg 1981, 138–55; W. S. Jevons, *The Goal Ques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1865), Reprint, New York 1965; J. Martinez-Alier, J. M. Naredo, »A Marxist Precursor of Energy Economics: Podolinsky«, i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82, H. 1, 9ff; J. Martinez-Alier, K. Schlüpmann,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Oxford 1987; S. Podolinsky, »Trud cheloveka i ego otnoshenie k raspredeleniiu energii«, in: *Slovo*, 1880, H. 4–5, 135–211 (span. in: J. Martinez-Alier [Hg.], *Los Principos de la Economía Ecológica: textos de Geddes, Podolinsky y Soddy*, Madrid 1995); ders., »Le socialisme et l'unité des forces physiques«, in: *La Revue Socialiste*, 1880, H. 8, 353–65; ders., »Il socialismo e l'unità delle forze fisiche«, in: *La Plebe*, 4. Jg., 1881, H. 3, 13–16, u. H. 4, 5–15; ders., »Menschliche Arbeit und Einheit der Kraft«, in: *NZ*, 1. Jg., 1883, H. 9, 413–24, u. H. 10, 449–57;

H. Roos, »Natürliche Umweltbedingungen und nationalökonomischer Reproduktionsprozess«, in: *Geographische Berichte*, 80. Jg., 1976, H. 3, 179–89; H. Roos, G. Streibel u. a., *Umweltgestaltung und Ökonomie der Naturressourcen*, Berlin/DDR 1979;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1, hgg. v. Th. W. Adorno u. W. Dirks, Frankfurt/M 1962; F. Soddy, *Cartesian Economics. The Bearing of Physical Science upon State Stewardship*, London 1922; V. I. Vernadsky, *La Géochimie, Alcan*, Paris 1924.

胡安·马丁内斯-阿利尔
（Juan Martinez-Alier） 撰
罗尔夫·切斯克莱巴-杜邦（RCD）
译为德文
阿思汗 译，曹旸 校

参见：

Arbeit, Destruktivkräfte, Elektrifizierung, Entbettung, Entropie, Erde,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Grüner New Deal,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Landwirtschaft, Material, materiell-technische Basi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Naturbeherrschung, Naturdialektik, Neoliberalismus, Ökobilanzen, Ökologie,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Ökosozialismus, Produktion, Produktivkräfte, Recycling, Reproduktion, Ressourcen, Stoffwechsel, Umwelt, Vergeudung, zweiter Widerspruch

介入（Engagement） 371

A: iltizām.

E: involvement, commitment.

F: engagement.

R: objazatel'stvo, aktivnost'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о, активность).

S: compromiso.

介入（与形容词形式 engagé 一道“在近年来的哲学中变得非常常见”，Lalande 1968，第 283 页）作为自主选择地、自愿地献身于超越个体的目的，其概念首先来自萨特（1948）；与此相对，该词语之前的法语用法，无论是穆尼埃（Mounier）、马塞尔（Marcek）人格主义的哲学用法，还是尼赞（Nizan）、马尔罗（Malraux）的文学用法，都退居次要位置。介入概念在文学探讨中获得了固定的术语意涵，在 20 世纪 60 年代渗透进日常的政治语言。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泛化过程中，这个概念与知识分子、阶级斗争中的立场、脑力劳动对改变社

会的贡献等问题的联系变得不再重要。

1. 萨特晚期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反而不利于用马克思主义辨析这个概念。反驳萨特有权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尝试，使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卢卡奇（Lukács 1951）和沙夫（Schaff 1966）以及雅罗谢夫斯基（Jaroszewski 1975）、霍尔茨（Holz 1976）、弗罗布列夫斯基（Wroblewsky 1977），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为批判的焦点，于是顺理成章地也将“介入”这一术语作为一个从个人出发建构的社会实践概念予以拒斥。

一方面，萨特晚期的作品越来越少地就作家的历史社会环境，而更多地就文学的本质定位介入。另一方面，他越来越少地将文学书写与行动相提并论，而是将它理解为对于不行动提供无罪证明。萨特阐发介入理论时两个矛盾的方向可以追溯到《什么是文学？》（*Was ist Literatur?*）（1948）中这个概念的多层含义。

在这部纲领著作中，可以区分概念运用的四个层面：在**描述**的层面上，全部文学总是已然介入的，正如人的一切此世存在是介入的一样。在**规范**的层面上，文学应当用有意识的立场选择取代依赖性（第 141 页）并承担责任（第 60 页）。在**体裁**的层面上，散文写作表现为一种行动——和读者约定（第 35 页）通过揭露来改变世界（第 17 页）。这类 372
散文的一个历史实例是反法西斯主义抵抗运动所产生的、极端处境下的文学。它与牛顿时空观的叙事者的小说技法，与沉思式现实主义的风格决裂，通过它与无产阶级的结合保卫文学的自主性，以免变成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处境小说不是给出一个精心构想好的世界，而是在“处境之中”（第 124 页）给出呼吁：超越特殊性。处境小说的普遍主体性（第 88 页）——将历史整合进绝对，将社会整合进形而上学——使小说一方面拥护民主制度（第 91 页），另一方面又变成不断革命的画像（第 98 页）。

不过《什么是文学？》也用社会学的方式界定了作家在历史中的位置。这是**第四个层面**，写作对阅读（表现为受引导的创造）的依赖构成了文学概念与读者关系分析之间的桥梁。资产阶级上升阶段与无产阶级的类比在这里有重要意义。启蒙的传统构成了一方面针对 1848 年至 1940—1945 年之间数代作家，另一方面针对共产党的批评标准。如果说唯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因为给它们“良心不安”（第 51 页）的资产阶级读者只提供了“无罪证明”（第 106 页），而同等地遭到批评，那么对共产党的指责，则是他们为了让无产阶级读者坚定信仰，将后者挡在批

372 判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启蒙之外。文学显得与共产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不相容，它的本质显得是旁门左道（第 150 页）。

萨特这一概念的多层含义允许多种可能的解读。在战后的最初三十年，传统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新现实主义与新先锋派的文学语境中都讨论过介入概念。

2. 卢卡奇简短而又值得重视地提到过萨特与加缪（Camus）的争论，他在《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中赞同地引述冷战中做出决定的强迫性："我们今天的自由无非就是为了自由而选择斗争。"（第 662 页）除此之外，在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1960 年之前只有两个"二战"期间流亡西方的作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施泰凡·赫
373 尔姆林（Stephan Hermlin）评论艾吕雅（Éluard）作品的第一个德译本时，将介入这个法语概念置于历史—政治的和文学的语境中："西班牙内战作为世界大战的直接前奏，对于艾吕雅来说，有着和对于法国先锋派其他代表人物相似的意义，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先锋派也同样如此。西班牙内战意味着选择立场，用萨特经常重复的概念来说就是'介入'。选择立场是因为这样的现实：诗人不再能够回避诗是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Hermlin/Mayer 1948*，第 197 页）如果说赫尔姆林将诗的自主性与以人道主义为标志的政治联系起来，那么汉斯·迈耶（Hans Mayer）关注的则是"两种观点的对立，一种认为知识分子由自身功能、自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里可能的和现实的角色所规定，另一种认为精神成就不依赖于个人实体所决定的效果，具有自身价值"（1948，第 979 页）。

后来迈耶（1962，第 154 页）在反对萨特概念的论战中倾向于掩盖他们的一致，这种一致在于对知识分子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兴趣。掩盖的策略也出现在民主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部详尽的研究中，即维尔纳·克劳斯（Werner Krauss）1968 年由罗沃尔特（Rowohlt）出版的书中的"什么是文学？"一章，此书按照丛书主编的构想是"两个世界的对话"（Krauss 1984，第 613 页）。克劳斯 1968 年不仅承认萨特的功绩（第 152 页），还尽量系统地阐释"介入"概念的接受史。他将作为"任何文学练习的标志"的"广义"的介入概念解读为"阶级性质"，将"有义务选择立场"的狭义介入概念解读为"党性"（第 164 页及以下）。海因茨·普拉维乌斯（Heinz Plavius）认同克劳斯的这一看法，反对官方将介入概念当成"语言的遮羞布"（*ND*，1966 年 5 月 29 日）草草打发，认为它是一种"党性的萌芽形式"。

通过描述介入概念从肯定到批判

的历史变迁，克劳斯——他的学生巴克（Barck）、瑙曼（Naumann）和施罗德（Schröder）用介入这个说法称赞他“自觉履行历史使命”（1970，第603页）——本人遵循了“阿多诺的弟子”（Heißenbüttel 1972，第3页）恩岑斯贝格尔的观点，后者的文章《诗与政治》（*Poesie und Politik*，1962）表述了50年代在联邦德国达成的共识。如果说正是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对此共识有过贡献，
374 那么在对萨特的再接受之中“迟到”地补办欧洲关于介入的论争时（Michel 1968，第78页），主要由《时刻表》（*Kursbuch*）杂志举行的辩论，使得批判理论的权威从阿多诺转变成了赫伯特·马尔库塞。

3. 意大利人对《时刻表》的批评——对此恩岑斯贝格尔后来坦白地回应道，“德国的‘左翼知识分子’直到最近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左翼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引自 Schickel 1970，第190页）——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投身’于某一确定的东西”是德国的“地方习俗”（Paséro，同上书，第183页）。引人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出现意大利的弗朗哥·福尔蒂尼（Franco Fortini）等人此前翻译介入这个术语时使用的概念。这位意大利评论家选取了**义务和历史的自我认识**两个词，它们对于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文学的不顺从主义（Nonkonformismus）来说是十分遥远的。福尔蒂尼关于文学的“授权”或“全权”的理论与西德的共识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强烈反对，文学对于在他看来从法西斯主义延伸到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保持着连续的徒有其表的独立性（1968，第31页）。他认为这种政治对应着文学创作不介入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

与萨特不同，福尔蒂尼认为，只有以政党为制度条件才能超越文学创造的直接性（第54页及以下、第98页）。尽管这里运用的“投身”形象局限于意大利抵抗运动，并且渲染献出生命的英雄壮举（第11页），但他的理论关注的焦点却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反法西斯主义问题：“‘谈论财产关系’恰恰意味着‘介入’的反面。”（第117页）福尔蒂尼认为，针对共产党文学政策的理论分歧暴露了反法西斯主义所掩盖的冲突（第98页），这种冲突存在于个人的创造与以政党形式制度化的中介之间。他认为先锋派与启蒙人道主义传统的决裂（布莱希特）、人道主义的连续性（卢卡奇）、文学成为宣传的转变（共产党的干部），同样都是对文学与资产阶级的“民族协议”破裂的事实做出的不充分回应，破裂表现为历史上的先锋派文学与工人运动。福尔蒂尼的现实主义纲领将克罗齐（Croce）、萨特和卢卡奇结合起来，他

们的共性是——具有道德与宗教义务的
375 （第 207 页）——对“控诉”的文学“呈现”（第 159 页），不仅作为对资本主义结构的拒斥，也作为对“个人”（第 161 页）的肯定。

在法国，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966 年重申了他在 1946 年表述过的评价：“介入文学”是一个不必要的新造词（Adereth 1985，第 477—748 页）。如果说在 1946 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他拒斥的根据，那么 1966 年的根据则是此时法国共产党主要受加洛蒂（Garaudy）影响而拓展了的现实主义概念。正如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6 年 3 月关于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联盟所指出的，文学与艺术“实验的必然性不应当被否认或限制”（Craig 1975，第 528 页）。这个联盟中一旦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指出“萨特的‘介入文学’理论与《原样》（*Tel Quel*）杂志成员表述的‘文本生产性’理论”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相似性”，便难以为继：“前一种情况下作家的介入（他们的良知），后一种情况下‘先锋派文本的颠覆性力量’，变成革命变革的发动机”，就会取代工人阶级，尤其是取代共产党（Barck/Burmeister 1977，第 56 页）。

西班牙的流亡作家胡安·戈蒂索洛（Juan Goytisolo）和豪尔赫·森普伦（Jorge Semprún）1963—1964 年批评了主要由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但在意大利还有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所代表的将艺术介入区别于政治介入的观点：“形式之中的介入和为了形式的介入”（罗伯-格里耶，引自 Burmeister 1983，第 73 页）或“形式作为介入”（Eco 1973，第 237 页）。森普伦主要强调萨特对介入作为客观的绑定存在，与作为对这一处境主观的、有意识的态度的区分，强调将这个概念限制为“一个‘只涉及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问题”（Burmeister 1983，第 73 页）。

4. 在联邦德国，恩岑斯贝格尔援引阿多诺关于艾兴多夫（Eichendorff）的演讲，反驳萨特的概念，认为可以用三个概念把握现代社会之中自主文学的社会功能：拒绝、无政府主义颠覆性的批判、以否定的模式进行预期（1964，第 135—136 页）。所有这些成果只归功于那些“除了语言不在其他地方”揭示出“客观的……社会的……内容”（第 130 页）的作品。他在从浪漫主义到现代派的“文学的革命性进程”（第 135 页）中排除了一系列不合法的问题：对阶级、意识形态、报酬、读者以及人们为之“投身”（第 127 页）的“种种观点”的问题。文学完成的批判尽管自身 376
就会“炸裂”和“颠覆”（第 118 页）权

力，但是或许同“信念与动机”（第124页）无关。

同时，阿多诺强调他自主审美的立场，他在一场新的辩论中表现得仿佛辩论的问题是一个“快要被遗忘的分歧”（1962，第409页）。因为“艺术只有独立于现实……才能保持自己战斗的先验性”，所以阿多诺致力于严厉揭示介入概念的非批判性。阿多诺认为，他用“宣传”、缩减为“概念的……本质”、与保守主义的“责任鼓吹者”相似、属于“具有依附威权性质”的“社会心理”的“传统主义”、“奉命选择的抽象权威”、“落后于审美形式进化”以及“文化产业所接受的”（第410—415页）等关键词将萨特的理论与行动理解为“精神退化”（第423页），不过他出于安全起见，也批评布莱希特是“共识的鼓吹者”（第421页）。阿多诺不仅引用了恩岑斯贝格尔的“介入滑入作者的信念”，而且首先引用了这段话：“萨特的问题‘为什么写作’和将问题归结为一个‘更深刻的选择’，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对于写下的东西，对于文学产品来说，作者的动机是无关紧要的。”（第413—414页）他尤为激烈地反对极端处境的文学（第424页），认为这类文学违反了对奥斯维辛所判处的表达禁令。

阿多诺排除了文学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任何具体联系，与此相关的是怀疑介入概念带有权威主义。《本真性的行话》与文章《介入》同时问世。即使阿多诺对存在主义哲学话语的语言批判仅在一处——没有点名萨特——提及法国（1964，第107页），语言批判也不仅是理解介入概念在联邦德国的接受史的一把钥匙，而且是理解阿多诺强烈拒斥态度的钥匙。语言批判针对权威对牺牲的英雄化，阿多诺发现这种英雄化出现在《什么是文学？》的译者用来对应介入概念的所有德语词——**责任、义务、投身、表现**（第9、19、22、30、94页）——之中：“责任是严苛管教的常用词。”（第60页）译者汉斯·格奥尔格·布伦纳（Hans Georg Brenner）和此后的讨论都没有将这些术语中的任何一个固定为概念，不过在萨特的接受史中可以发现许多证据，证明阿多诺的质疑有相对的道理（参见Rahner 1993，第162—163页、第291页及以下）。其中最有问题的证据之一来自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他1947年认为在纳粹国防军的“青年德国”同“萨特与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年轻战士们”之间有“一条细微而突出的线索”相连：“他们都在最后几年同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整个人都奉献了出去。”（第21页）

377

阿多诺非常清楚地拒斥法西斯主义男性气概，在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1966）针对汉

斯·海因茨·霍尔茨（Hans Heinz Holz）的论战中也产生了共鸣。豪格引用霍尔茨的博士论文中绝非随意选取的“一个斗争群体的例子”，作为“压抑—道德式地接受”（第119页）萨特的证据是：“无条件地投身于斗争的关键场合，这个处境不再允许有任何半心半意的出路。在这样的极端处境下……显示出了‘介入’更深刻的含义。”（Holz 1951，第59页）然而在豪格看来，介入并不是因为它的道德压抑，而是因为它的否定与方案缺乏社会历史的规定，才变成了没有“任何可能的具体意义”的“煽动词”（第98页）。豪格甚至倾向于指责萨特与阿多诺是同样的荒诞主义（第36页）：理论只是对于政治实践的无能为力。

马尔库塞版本的批判理论在50年代就已经转入这条“不顺从主义”——这个术语在战后阿多诺于德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以正面形象出现（1950，第474页）——的、逃向艺术的出路，他论述的基础是对30年代经典文学既肯定又批判的功能的分析。尽管阿多诺认为形式保证了作品——尤其是经典的现代派作品——的批判、否定和预见的功能不变为肯定，但马尔库塞强调的正是在经典的现代派被“吸纳”（1967，第90页）的情况下，体制化为艺术铲除了矛盾（第83—84页）。只有废除艺术形式，才能拯救批判的冲动，从而在一种作为美学实践而具有政治性的实践中，拯救艺术形式“不受惩罚地”否定的“特权”（同上）。在60年代反权威实践的美学面向中，马尔库塞看到“人道的内容”——这些内容在艺术的形式中一直充满歧义，始终既是控诉，也是对控诉的扬弃（1969，第69—70页）——变成实践的（第46页）。他最后也使用了“介入”（第62页）概念来描述这个情况。

米夏埃尔·沙朗（Michael Scharang） 378
深受本雅明对自主美学的批评和他将技术与潮流结合起来思考的尝试的影响，宣布“为艺术而艺术”和“唯心主义地介入的文学”的对立是“假象”（1973，第294页），因为两者都尊奉文学为虚假自由的保护区，因而把批评倒转成了辩护（第293—294页）。他同时依据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用作品的语言技巧衡量反抗，作为他对社会的抗议反思的尺度（第293页）。他尽管激烈批评“信念介入”，最终仍然要求一种“具有一些约束力的介入”（第293页），这种介入要把语言组织起来，从而凸显出被掩盖的诸多矛盾。他充分利用颠覆行动的文学性以反对介入，介入——就像学生运动的范围里经常发生的一样——推动了一种文学与政治未经中介的同一。

5. 恩岑斯贝格尔1960年看到占主流

的保守主义文学批评主张一种“责任文学”（第235页），这就扭曲了他们主要通过批评介入概念所形成的对文学自主性的立场。他们主张将艺术同道德和政治分离，代表是阿诺德·盖伦和赫尔穆特·舍尔斯基，二人1945年以前都是纳粹核心分子，将介入阐释为补偿思想差距产生的失望：“我们定义‘介入’……**为出于信念背叛事实**”，在文学的情况下，就是背叛文学的自主性（Schelsky 1975，第330页）。基于当下是**后历史**（*posthistoire*）时代的评判——也就是说“伟大的启蒙理想不再有前途”（Gehlen 1964，第412页）——他要求艺术“封闭在幻想的独立王国里，激进化可以限制在这个王国中”（第413页）。《水星》（*Merkur*）杂志置于一场介入论争暨知识分子论争开篇的盖伦的文章就意在这样一种分工，为此他援引马克斯·韦伯对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分（第401页）。这两个概念使人有权利将介入的作家——作为不行动的、仅仅获得二手信息并且对行动不负责任的——不仅从政治中排除，也从作为艺术的文学中排除，只要“介入的作家往自己的自由写作中添加社会批判的倾向，从而摆脱纯粹艺术的评价”（第403页）。

保守主义批评可以用不顺从主义和
379 自主性的观念反对这些作家：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就越来越以介入知名，但因为认同上述观念本身而对介入理论态度矛盾。如果说保守主义批评家要求不顺从主义的社会批判者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是他们的批判的积极条件，应当用他们的文学作品肯定民族传统——就像西堡（Sieburg）所表述的，通过做说不的人而成为说是的人，或直截了当地承认“当权者的辩护人”（1969，第18页）和“资本主义的寄生虫”（第17页）的角色——那么介入的文学家在回顾时认为，将不顺从主义的拒绝局限在自主的作品内是在适应整体，正是这种做法在60年代早期对他们而言变成了问题。这导致对介入的补充接受产生了两种变体：其一是作家作为公民的介入，其二是为了行动放弃文学。在两种变体中，真正文学——萨特称之为诗——的自主性始终未受触及。不过，它们放弃了50年代介入的作者也主张的作家“独立性”的说法。

6. 介入的概念直到70年代末在文学批评的话语中都保持着自明的含义，这也要归功于它的整合能力，即斡旋于60年代所阐述的文学政治化与1973年以来所断言、所宣传的“新主体性”（参见Ruoff Kramer 1993）等潮流之间。当然后者可以也愿意被理解为“**对介入文学的强烈拒绝**”（Ruoff Kramer 1983，第802页）。

以后现代讨论为标志的转变，表现为文学批评使用“信念美学”（Gesinnungsästhetik）这个概念。1978年，“那个介入写作时期”的终点——“介入写作受这样一种信念或幻觉驱动：文学负有社会责任而且有政治效应”（Baumgart 1990，第299页）——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在卡尔·海因茨·博雷尔（Karl Heinz Bohrer）主编的《水星》杂志上提出了“信念美学”概念。博雷尔把它用作一篇书评的标题，在这篇评论中，勒佩尼斯赞美了博雷尔出版的恩斯特·容格尔（Ernst Jünger）著作——容格尔在当时的文学批评领域内，面对人们感到占据主导地位的、介入的“责任美学”，仍需要辩护。因此，勒佩尼
380 斯正面地使用“信念美学”概念，希望捍卫容格尔以及博雷尔，反驳攻击他们不负责任的伦理—政治谴责。乌里希·格赖纳（Ulrich Greiner）和弗兰克·席尔马赫（Frank Schirrmacher）遵循博雷尔“美学走向成年”的方案，把1989年又一次巨变以后围绕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争论树立为“告别联邦德国文学”即告别“德国的信念美学”（1990）。

上述相反的评价明显可以互换，这表明现在号称的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只是假象。杂志上没有明言对“信念美学”的诅咒所隐含的要求，文学要作为民族主义政治的技艺“担负责任”。“介入的唯美主义”“假装为艺术‘本身’而介入，结果它对艺术的规定却是同义反复：‘审美就是审美……。’但介入的审美主义主要的旨趣在于，在文学与社会中消解作为主题的特定冲突，这就不再是出于审美的理由了”（Schmidt 1992，第94页）。

不过，早在1989年以前，左派之中就已经有批评者越来越坚决地分割开文学与政治，比如杂志《具体》（*konkret*）的主编对君特·瓦尔拉夫（Günther Wallraff）的抨击：在他的报道中，文件资料和主观经验报道构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整体。赫尔曼·L.格雷姆利扎（Hermann L. Gremliza）抨击“艺术必须”——考虑到对工人读者的“效果”——“为人服务的要求”，强调“单纯道德义愤没有价值”：“因为不能写，所以至少必须说些政治的话；因为无话可说，所以至少必须承担危险；因为没有危险，所以至少灵魂必须受苦；因为灵魂没有受苦，所以这事必须喊出来。”（1987，第47页）

7. 对战后文学的批评能够以70年代以来获得过影响力的不同的文学理论和知识分子理论为依据，比如皮埃尔·布尔迪厄对文学之外义务的去合法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文学知

识分子的在地化与划分。

布尔迪厄不仅提出“文学场域概念的方法论自主化”(Jurt 1995，第 85 页)使文学史变成“两个统治原则之间的永恒斗争，一个是他律原则，政治与经济
381 上主导场域的人遵循这个原则，另一个是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它的定义是相对于经济的独立性”(第 90 页)，而且，布尔迪厄认为，“内部”的文学立场与“外部”的政治立场的选择，最终由自主文学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他对萨特的刻画最多将介入概念当作萨特的策略的后果，这策略指在竞争中使他作为“完全的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主导地位合法化：“既然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最卓越的体现，萨特就注定要面对政治。”(1980，第 11 页)

福柯为了强调特殊知识分子而对普遍知识分子的拒斥，直接针对萨特的介入概念：“迄今为止，最卓越的知识分子都是作家：他们作为普遍的意识，作为自由的主体，和那些无非是服务于国家或资本的工具相对立。”(1978，第 45 页)“普遍的话语”(第 46 页)受限于一个“意义和价值的承载者，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承载者上重新认出自己”(第 47—48 页)，这种话语同基于有待揭示的现实、指向受话者等做法一样失效了：“知识分子说出真理，向尚未看到真理的人，以不能说出真理的人的名义。”(1974，第 130 页)然而，福柯对特殊的、在地化的知识分子的描述，表明重新归结到介入的激情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科学家以‘地方的’科学真理的名义干预所处时代的政治”(1978，第 48 页)，还是知识分子要在“他们既是权力的对象又是权力的工具”的地方“与权力作斗争”，“‘理论’就是这种斗争的地方体系”(1974，第 130—131 页)。尽管这个矛盾不仅把公民，而且把理论家呈现为批判的介入者，但在福柯造成的影响中，关键的始终是对文学介入的贬斥：“但是现今的知识分子不再适合身居所有人之首或站在所有人一边，希望讲出所有人的沉默的真相。”(第 130 页)他告别了作为“天鹅之歌”的 60 年代的讨论：“作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政治特权而抗争”，因为“作家的行动不再是活跃的中心了”(1978，第 46 页)。

“如果萨特的自我理解，‘普遍知识分子’(福柯语)，或多或少在我们当中流行，我们就可以感到满意。”1988 年在 382
同《解放报》(*Libération*)的访谈中，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90，第 36 页)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赞扬作家作为公民的批判性“持续介入”，在 1989 年以后的联邦德国与卢曼(Luhmann)相对立，后者称介入为“抗议的习惯”，对此抱以系统理论的怀疑(1992a，第 98

页)。按照卢曼的看法，抗议的新闻媒体提出了“对于政治介入的特定要求，但对于智识却几乎没有任何要求”(1992b，第71页)；“艺术作为社会自主性的系统，而不是承担任务的功能系统”(第69页)始终有“任务”，发现“艺术上令人信服的形式”，这样“才能用不同的方式展现不充分性”(第70页)。

另外，哈贝马斯——针对韦伯—盖伦—舍尔斯基这个脉络提出的批评，即“介入的作者”将“艺术与科学的自主性”和“政治运行所特有的理性”“两者同时拿来冒险”(1986，第462页)——突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政治公共空间：作家“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介入……好比是副业，并不因此放弃他对顽固结构化的语境的专业处理，但另一方面也不被吸纳到政治运转的组织中去。从知识分子的视角来看，科学与艺术一定是始终自主的，但不是绝对秘传的”(第463页)。

参考文献：

M. Adereth, »What is ›Littérature engagée‹?«, in: Craig 1975, 445-85; Th. W. Adorno, »Auferstehung der Kultur in Deutschland?«, in: *Frankfurter Hefte* 5, 1950, 469-77; ders.,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Frankfurt/M 1964; ders., »Engagement« (1962), GS 11, 408-30; A. Andersch, »Das junge Europa formt sein Gesicht« (1947), in: H. A. Neunzig (Hg.), *Der Ruf*, München 1976, 19-24; K. Barck u. a., »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Zur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n Position von Werner Krauss«, in: W. Mittenzwei (Hg.): *Positionen.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in der DDR*, Leipzig 1970, 555-605; ders., B. Burmeister (Hg.), *Ideologie—Literatur—Kritik. Französische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DDR 1977; R. Baumgart, »Boulevard—was sonst?«, in: V. Hage (Hg.): *Deutsche Literatur 1989*, Stuttgart 1990; K. H. Bohrer, »Die Ästhetik am Ausgang ihrer Unmündigkeit«, in: *Merkur* 44, 1990, 851-65; P. Bourdieu, »Sartre«,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11.-4.12.1980 (»Die Erfindung des totalen Intellekturellen«, in: *Romanist. Zeitschr. f. Literaturgeschichte*, 1981, Nr. 4, 385-91); B. Burmeister, *Streit um den Nouveau Roman*, Berlin/DDR 1983; D. Craig (Hg.), *Marxists on Literature*, Harmondsworth 1975; U. Eco, »Form als Engagement«, in: *Das offene Kunstwerk*, Frankfurt/M 1973, 237-92; H. M. Enzensberger, *Einzelheiten II. Poesie und Politik*, Frankfurt/M 1964; ders., »Plädoyer für eine literarische Regierung« (1960), in: Pinkerneil 1973, 235-40; F. Fortini,

Die Vollmacht. Literatur von heute und ihr sozialer Auftrag,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8; M. Foucault, *Dispositive der Macht*, Berlin/W 1978; ders., »Die Intellektuellen und die Macht«, in: *Von der Subversion des Wissens*, München 1974, 128–40; A. Gehlen, »Das Engagement der Intellektuellen gegenüber dem Staat«, in: *Merkur* 18, 1964, 401–13; U. Greiner, »Die deutsche Gesinnungsästhetik«, in: *Die Zeit*, 2.11.1990; H. L. Gremliza, »Karl Kraus-Preis 1987. Preisrede«, in: *konkret*, 1987, H. 11, 41–8; J. Habermas, »Heinrich Heine und die Rolle des Intellektuellen in Deutschland«, in: *Merkur* 40, 1986, 453–68; ders., *Die nachholende Revolution.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VII*, Frankfurt/M 1990; W. F. Haug, *Jean 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1966), 3., veränd. Aufl. Berlin-Hamburg 1991; H. Heißenbüttel, »Neue Linke und die bundesdeutsche Literatur nach 1945«, in: H. L. Arnold (H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aus Methoden. Westdeutsche Literatur von 1945–71*, Bd. 3. Frankfurt/M 1972, 1–7; S. Hermlin, H. Mayer, *Ansichten über einige Bücher und Schriftsteller*, Berlin 1948; H. H. Holz, *Jean Paul Sartre*, Meisenheim 1951; ders., »Jean Paul Sartre—der Umschlag von Philosophie in Politik«, in: *Die abenteuerliche Rebellion. Bürgerliche Protestbewegungen in der Philosophie*, Darmstadt-Neuwied 1976; T. M. Jaroszewski, *Der ›verlassene‹ Mensch Jean Paul Sartres*, Berlin/DDR 1975; J. Jurt, *Das literarische Feld. Das Konzept Pierre Bourdieus in Theorie und Praxis*, Darmstadt 1995; W. Krauss, *Grundproblem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Reinbek 1968; ders., *Literaturtheorie,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hgg. v. M. Naumann, Berlin/DDR-Weimar 1984; N. Luhmann, »Immer noch Bundesrepublik?—Das Erbe und die Zukunft«, in: O. Rammstedt, G. Schmidt (Hg.): *BRD ade! Vierzig Jahre in Rückansichten von Sozial- und Kulturwissenschaftlern*, Frankfurt/M 1992a, 95–100; ders., »Gibt es ein ›System‹ der Intelligenz?«, in: M. Meyer (Hg.), *Intellektuellendämmerung? Beiträge zur neuesten Geschichte des Geistes*, München-Wien 19926, 57–73; G. Lukács, *Existentialismus oder Marxismus?* Berlin/DDR 1951; der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1954), 3. Aufl., Berlin/DDR-Weimar 1984;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Neuwied-Berlin 1967; ders., *Versuch über die Befreiung*, Frankfurt/M 1969; H. Mayer, »Der Breslauer Weltkongress«, in: *Frankfurter Hefte* 3, 1948, 975–80; ders., »Anmerkungen zu Sartre«, in: *Ansichten. Zur*

Literatur der Zeit, Reinbek 1962, 139–54; K. M. Michel, *Die sprachlose Intelligenz*, Frankfurt/M 1968; B. Pinkerneil u. a. (Hg.), *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3; H. Plavius, *Zwischen Protest und Anpassung*, Halle 1970; M. Rahner, »*Tout est neuf ici, tout est a recommencer ...*« *Die Rezeption des französischen Existentialismus im kulturellen Feld Westdeutschlands (1945–1949)*, Würzburg 1993; K. Ruoff Kramer, »Rückblick auf die Wende zur ›Neuen Subjektivität‹«, in: *Argument* 142, 25. Jg., 1983, 802–20; dies.,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Third Thoughts on »New Subjectivity«*, Bern Berlin/W-New York 1993; J. P. Sartre, *Was ist Literatur?* (1948), Reinbek 1958; A. Schaff, *Marx oder Sartre? Versuch einer Philosophie des Menschen*, Frankfurt/M 1966; M. Scharang, »Vergesellschaftung der Literatur«, in: Pinkerneil 1973, 292–97; H. Schelsky, *Die Arbeit tun die anderen. Klassenkampf und Priesterherrschaft der Intellektuellen*, 2. erw. Aufl., Opladen 1975;
384 J. Schickel (Hg.), *Über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Frankfurt/M 1970; F. Schirrmacher, »Abschied von der Literatur der Bundesrepublik«, in: FAZ, 2. 10. 1990; U. Schmidt, »Engagierter Ästhetizismus. Über neudeutsche Literaturkritik«, in: *Text + Kritik*, 1992, Nr. 113, 86–96; F. Sieburg, *Verloren ist kein Wort. Disputationen mit fortgeschrittenen Lesern*, München 1969; V. v. Wroblewsky, *Jean-Paul Sartre. Theorie und Praxis eines Engagements*, Berlin/DDR 1977.

赫尔穆特·派奇（Helmut Peitsch） 撰
阿思汗 译，曹旸 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ufklärung, Autonomie der Kunst, Avantgarde, Eigentlichkeit, Entscheidung, esoterisch/exoterisch, Existenzialismus, Expressionismus-Debatte, Extreme, Formalismus, Freiheit, große Weigerung,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Humanismus, Intellektuelle, Kritik, Kritische Theorie, Kunst, Moderne, Parteilichkeit, permanente Revolution, Realismus, Situation,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Surrealismus, Tendenz, Theorie und Praxis

恩格斯主义（Engelsismus）

A: fikr ingilz.

E: engelsianism.

F: engelsianisme.

R: ėngel'sizm (энгельсизм).

S: engelsianismo.

从某种意义上说，1890年以来一般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多的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而不是由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创造的。于是，阿诺德·昆泽里（Arnold Künzli）说，“恩格斯主义”这一表述实际上更为贴切（Hirsch 1968，第95页）。在被社会主义者普遍研究的著作中，对《反杜林论》及其节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的研究要远远多于《资本论》。发展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在第二国际的早期，对于工人领袖和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恩格斯是没有争议的权威，是可以在所有理论和政治战略问题上寻求建议的先知。因此，有必要认清马克思主义中的恩格斯主义。正如海因茨·毛斯（Heinz Maus）所说：“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阐述才向更广泛的大众阐明了理论，但这种阐述是否无意间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主流的实证主义，并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苏联规则下的实证主义）开辟了道路，即或是伦理地或是科学地修饰了的对现存事物的适应。”（1981，第367页）

正统的马列主义神话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思想上的双胞胎，二人出于实际原因承担着不同的工作任务。因此，当马克思忙于写作《资本论》中的基本理论时，恩格斯则成了一般理论的伟大普及者。对此，人们常常提到恩格斯的表述，他宣称：“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MEW 21，第328页） 385

进行这样的任务划分是有原因的。马克思比恩格斯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对于恩格斯来说，是马克思而不是他取得了《资本论》中的基本发现，这并非偶然。马克思能够多年深入地研究某个问题或某个经验材料，而恩格斯则能够更快地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首先批判地研究了新国民经济学的是恩格斯：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于1844年出版，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出发点。凭借影响深远且在诸多方面都十分出色的研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

den Klassen in England，1845），恩格斯也跻身实证社会学的先驱行列。他在书中将敏锐的观察和详细的阶级分析以及宏大的（通常过于宏大的）推论结合起来。这部青年时期的作品证明了他的思考和科学能力。

恩格斯还早于马克思认识到现代自然科学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他都是一位既敏锐又优秀的评判者。马克思在1864年7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MEW 30，第418页）但是，马克思的缓慢作风也意味着更高的可靠性和科学的独创性。当他最终完成研究工作时，结果总是非凡的。相反，恩格斯则常常在天才的思想中混入陈词滥调。马克思的缓慢作风也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批评者。

马克思以一种有意义的、真正辩证的方式来创作他的作品，尤其是《资本论》。相反，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总是
386 使用简单的结构，在其中，主题也都是以能够为大众所理解的方式排列的。他一直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和普及者，但是他不能或不愿常年研究同一个问题。他擅长做简化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著作（与马克思不同）是那些"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列主义）手册"的蓝本，这些手册在工人运动中及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起着十分消极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远非思想上的双胞胎，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思想家和创作者。

必须要立刻补充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也有着深刻的见解。在研究文献中，思想上的双胞胎神话与另一个神话相对立，即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观点犯有严重错误（"可悲的欺骗"[tragic deception]——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按照这个说法，恩格斯彻彻底底地误解了马克思的所有基本概念，但事实并非如此。二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十分相似；他们也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纲要。恩格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曾谈及这种史观的局限性，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一无所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写的内容相符。经济基础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1890年9月21日至22日致布洛赫的信，MEW 37，第462页），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复杂关系的表述——生产在其中具有同样的作用——完全一致。

而在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理解中，二人则存在某些典型的差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重要脚注中说："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

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MEW 23，第393页）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只以自“下”而“上”的方向为前提。相反，恩格斯采取的则是“自上”而下的分析，例如在探讨不同的法权关系时。他曾在1893年7月14日给梅林（Mehring）的信中纲领性地写道，他和马克思“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
387 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MEW 39，第96页）。这是两种不尽相同的策略。在这里，不能无条件地认为马克思是“更深刻的”，而恩格斯是“更肤浅的”。恩格斯所坚持的，与唯物主义理解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相反，马克思似乎并没有进行原始的文本分析。

恩格斯能够出色地完成《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难度更大），这便已经证明他对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对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的总结总是清晰明了的，当然也比马克思的总结更为“完整”，从而在思想的丰富程度上不如马克思。

在另一种广泛传播的观点看来，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比马克思更有自然主义的特征。例如，马克思常常谈到未来国家机器被摧毁，而恩格斯则倾向于以类比自然进程的方式来描述这一过程。恩格斯的革命概念更多地受19世纪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另外，恩格斯很清楚社会进程的积极方面。对评价恩格斯更为重要的是，他努力阐明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一般辩证法。一方面，他试图确定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其他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他打算阐明唯物主义本体论——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枢纽的世界观。

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19世纪其他划时代的新思想引起了恩格斯的兴趣。最晚自19世纪50年代末起，在杰出的化学家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成为恩格斯的朋友和顾问之后，他就一直密切关注着如在流行的期刊（《自然》[*Nature*]）和书籍中都可以追踪的自然科学的进展。直到1873年，他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阐明一般辩证法。这些努力最重要的结果是《自然辩证法》（1878年）及其节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第1版，1880年），尤其是《自然辩证法》——一本收录了恩格斯1873—1882年间所做的笔记、摘录、完整的书章和箴言的合集（除了后来的一些笔记外），这些作品到1925年才以更适当的标题《自然辩证法》出版。

对于恩格斯来说，阐述一般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友好地予以鼓励，但并没有真正投身其中。对于恩格斯来说，这是发展整体构想的问题；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实现它的可能性甚微。这份努力的未完结的成果远未具有统一性；其中存在不同的倾向，主要是孔德与斯宾塞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庸俗黑格尔主义和非还原论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的实证主义主要体现在他为所有现实领域提出普适规律的努力，以及科学本身的绝对化上。黑格尔的影响体现在例如他关于思维规律适应现实发展的观念中。相反，第三种倾向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思路，并且更加有趣。如果想要积极地评价恩格斯，那么可以说第三种倾向符合他的实际意图。他非常清楚地说过，生命体与无生命体、人与猴子、思维与头脑进程、上层建筑与基础、晚近的历史时期与过往的历史时期之间并不具有还原关系。这便勾勒了一个不是很明确但仍富有成果的观念的出发点。

还必须补充的是：首先，恩格斯著作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其次，苏联以及之后整个“现实社会主义”世界对《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的应用大多走了另一条路径。这种应用首先是为了阐释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教义问答，这种教义问答的主要任务是提供适用于所有人类和科学领域的成熟样式。当然，恩格斯本人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但他的著作迎合了这种应用。

在这种应用中，所谓的辩证法三大规律扮演了主要角色，而它们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具有戏剧性的地位。这种构想完全是非辩证的。它的起源令人惊讶：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及从手 389
工业到工场的过渡时写道：“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MEW 23，第323页）由于黑格尔在这方面没有提到“规律”，因此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这句话与马克思提到“否定的否定”（Negation der Negation）的一个段落（MEW 23，第791页）都受到了欧根·杜林的猛烈攻击。当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询问时，恩格斯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为马克思反驳这种攻击。直到那时，辩证法规律的概念才出现在他的笔记和记录中。他没有认真对待不同的可能性。在《反杜林论》（MEW 20）中，他实际上只提到了两种规律（杜林攻击的两种规律：从量变到质变，第111页及以下；否定的否定，第120页及以下）。在收入《自然辩证法》的另一篇草稿中，他谈到了三种这样的规律（MEW 20，第348页）。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论述被视为权威，因此斯大林主义的手册中也

使用了这三种规律，它们被认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相反，对于恩格斯来说，它们是如此不重要，以至于当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F*）中总结他的学说时，完全没有提到辩证法的规律。这个概念在恩格斯那里再次消失了。

不管其主要意图为何，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工作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尽管如此，恩格斯著作仍然保留了正面和有趣的特点，含有治疗各种唯心主义和迷信的良方。

恩格斯对19世纪90年代新兴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意义更为显著，但也更为短暂。当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向他征求意见时，他坚定地警告他们不要进行暴动主义冒险，但也要警惕激进主义的减少或增长。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功使他充满了乐观情绪，他一再表示，工人政党将仅凭借工人的多数就能夺取议会的多数席位，随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百年后，指责恩格斯缺乏对社会辩证法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指责所做的正是它们指控恩格
390 斯所做的事情：它们从当下的发展进程出发进行简单的外推。

相反，恩格斯的观点似乎更值得注意："这支以前在德国特别充满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到1900年"，由于多数人是工人，"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MEW 22，第240页［页码有误，应为第251页。——译者］）。恩格斯是军事力量和战争方面的杰出专家，至今仍然受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军事理论家的高度评价。在社会主义者圈子中，他被称为"将军"。他高度关注当下的战争进程，而他得出的结论几乎总是准确的。另一方面，他也像马克思一样陷入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名言的"战争逻辑"中，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对于他以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革命与阶级斗争根本就是一种战争事务。公开的、血腥的斗争是实现最终目标即和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手段，否则，社会主义者就必须从内部征服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主义，也必须掌握战争机器。相反，从那以后，一个最主要的经验是，军事手段总是试图掌控整个社会主义计划；面对着拥有军事纪律的指令式国家（Kommandostaat），无阶级的社会就像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一样消失了。

区分恩格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为了给恩格斯主义这个概念赋予一般意义，必须从假定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将之分离出来，并且只分离出无疑不属于马克思而属于恩格斯的东西。文献中与此相关的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不是恩格斯（也不是黑格尔），而是马克思首先提出了"辩

证法规律”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分迷信科学、自然主义和19世纪中叶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的特点；诚然，这些影响在恩格斯那里要更强大得多。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我们在恩格斯那里，而不是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构建包罗万象的理论、哲学体系或世界观的努力。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致命的趋势，这种趋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
391 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回答了或应该回答所有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问题。这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要求，不只遍布于马克思主义的手册中。在手册中，这些要求无疑具有核心地位：原则上，一本马列主义的手册中有对所有问题的答案；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并且这本百科全书曾长期将相对论或现代遗传学等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暂时排除在苏联及其影响范围之外。后来，我们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体验过作为应答机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左翼浪潮中，一再出现谈及“前后一致的马克思主义”（konsequenter Marxismus）的流派和个人，而这意味着遍及生活和知识各领域的一致性。因此，必然有且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或法律理论等等。这种思维方式也出现在政治领域中：一个政党当然必须对许多问题提出观点，但是这里的关键在于，对所有能想到的日常问题和世界政治问题给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此类马克思主义并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样的努力往往只是荒谬的；在“国家垄断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样的努力对于个人自由和操守，对于健康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发展来说，是具有威胁性且常常是具有毁灭性的。

必须承认，恩格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还是有两个积极的特点：一方面是迫切地竭力奠定马克思主义核心构想的理论和本体论基础，另一方面是努力普及这些构想，也就是使其为大众所理解。但是，在不提出绝对主义的要求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完成这些重要任务的。在后共产主义的形势下，恩格斯主义所谓的全知并不是危险。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理解的人都要注意，不要再次陷入最糟糕的恩格斯主义。相反，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恩格斯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给予完全批判性的关注。

参考文献：

Th. Bergmann, M. Kessler, J. Kircz, G. Schäfer (Hg.), *Zwischen Utopie und Kritik. Friedrich Engels—ein »Klassiker« nach 100 Jahren*, Hamburg 1996; H. Bollnow, »Untersuchung über Engels' Auffassung von Revolution und Entwicklung«, in:

Marxismusstudien, Bd. I, Tübingen 1954; T. Carver,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
392 *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 1983; ders.. *Friedrich Engels.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1989; L. Colletti, *Bernstein und der Marxismus der Zweiten Internationale* (1968), Frankfurt/M 1971; A. Cornu,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Leben und Werk*, 3 Bde., Berlin/DDR 1954, 1962, 1968; *Engels' Druckfassung versus Marx' Manuskripte zum III. Buch des ›Kapital‹*, *MEF*, Hamburg 1995; F. Haug, »Entweder Geschlecht oder Arbeit—eine rätselhafte Disjunktion bei Engels«, in: *Argument* 214, 38. Jg., 1996, 239–245;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2 Bde., London 1976; H. Hirsch, *Engels in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 Reinbek 1968; D. C. Hodges, »Engels' Contribution to Marxism«,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5; L. A. Leontjev, *Engels und die ökonomische Lehre des Marxismus*, Berlin/DDR 1970; 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Santa Barbara 1975; S.-E. Liedman, *Das Spiel der Gegensätze. Friedrich Engels' Philosoph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 1986; H. Maus, *Die Traumhölle des Justemilieu. Erinnerung an die Aufgabe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gg. v. M. Th. Greven u. G. van de Moetter, Frankfurt/M 1981; G. Mayer, *Friedrich Engels*, 2 Bde., Haag 1934; T. I. Oiserman, *Die Enstehung der marxistis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65; A. Peralta, *...med andra medel. Fran Clausewitz till Guevara—krig, revolution och politik i en marxistik idétradition*, Göteborg 1990; R. Rosdolski, *Zur nationalen Frage. Friedrich Engels und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slosen Völker«*, Berlin/W 1979; M. Rubel, »The ›Marx Legend‹, or Engels, Founder of Marxism«, in: J. O'Malley, K. Algosin (Hg.), *Rubel on Karl Marx*, New York 1981;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M ²1971; G.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 E. Hobsbawm (Hg.), *The History of Marxism*, Bd. 1, Brighton 1982; H. Ulrich, *Der junge Engels*, 2 Bde., Berlin/DDR 1961 u. 1966.

斯文-埃里克·里德曼
（Sven-Eric Liedman）撰
胡晓琛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wendung, Basis,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stimmte Negation, Darwinismus, Dialektik, Enzyklopädie, Evolutionismus,

Freiheit, Gesetz, Ideologie, Lehrbuch-Marxismus, Klassenreduktionismus, Krieg, Marxismus-Leninismus, Militär, Naturdialektik, Naturwissenschaft, Negation der Negation, Ontologie, Postkommunismus, Realer Sozialismus, Revisionismus, Revolution, Semiotik,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Wechselwirkung, Weltanschauung, westlicher Marxismus

英国革命（englische Revolution）

A: at-taura al-inglīzīya.

E: English Revolution.

F: Révolution Anglaise.

R: anglijskaja revoljucija (англ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S: revolución inglesa.

1. **史学史**。虽然卡尔·马克思没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专门解释，但是在每一种对17世纪英国革命连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没有他是不可
393 想象的。对历史中的分裂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如果不是要完全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么就要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在与英国革命的关联中，只要提到英国共和主义的理论家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就够了。他的处理方式在本质上局限于变化着的地产关系（他称之为“财产均衡”）（Harrington 1973b）与这些变化必然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宪法影响之间的关联。有理由把哈林顿看作是农业决定论者，因为他的著作相对忽略了贸易、工业以及整个城市区的经济。

尽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引入了许多的引证和文本分析，但要从马克思自己的文集中推导出一个具体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却绝非易事。马克思对前工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最透彻的分析出现在《资本论》（第1卷）的“**所谓原始积累**”章。为证明英国内战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夺取国家政权的论题（Hill 1940，1948，1949），还参照了马克思其他一些文集中的简短的附加注释。全面修正这一进路却是在马克思死后。与此相应的讨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间的讨论，必须被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看。在此语境中，要把连续的生产方式设定为人类历史基本的发展阶段或时代。其中，从一个生产方式到下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具有特殊意义。1950年美国学者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在所表明的过度乐观主义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事实赋予这项研究从一个社会体系

向另一个社会体系更早的过渡特别的兴趣。”（Hilton 1976，第 33 页）

很难确定政治斗争和变革在这些过渡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它们只是被看作由变化的生产力和自身能引起新的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影响，还是也可以充当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催化剂并在这些过渡中达到顶
394 峰？如果不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做出的思考，那么 20 世纪的历史讨论则受到了 1917 年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夺取政权的强烈影响并有时被其主导着。在不陷入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 20 世纪早期的、列宁主义理论中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讨论的情况之下，也能详细地探讨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一个更早的过渡的问题以及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无论如何，要首先返回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前。

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他们后来被共产国际抨击为修正主义者）是第二代富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 1895 年提交了多卷本的《社会主义的历史》（*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由伯恩施坦独自撰写的第 1 卷第 5 节研究的是“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趋势”（sozialistische und kommunistische Tendenzen in der Großen englischen Revolution）。尽管这一节的一个扩大版于 1908 年在德国单独出版成书并以一个“简化的”（Bernstein 1908，前言）标题为题，即《英国大革命中的社会主义和民主》（*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in der großen englischen Revolution*），但整部著作直到 1930 年才在英国（以《克伦威尔与共产主义》[*Cromwell and Communism*] 这个有些渲染性的标题为题）出版。在此期间，其他一些相对不依赖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开始把英国 17 世纪中叶发生的事件看作是革命，而革命这个术语之前专门用于奥兰治国家政变和 1688 年废黜詹姆斯二世（“光荣革命”）。这个概念的最早证据已于 1826 年出现在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那里——他的英文版《英国革命史》（*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却在二十年之后才出版（1846 年）；他在 1850 年对英国 17 世纪 40 年代的革命和法国 1789 年革命两种革命做了最全面的比较。“古典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学者塞缪尔·罗森·加德纳（Samuel Rawson Gardiner）一本题为《1625—1660 年的清教徒革命宪法文件》（*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1889，1899，1906）的文集的导言中。尽管构想一场革命对于 19 世纪的一些历史学家来说仍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但是这个构想当时已经存在了。

毫无疑问，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395 的高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亚瑟·莱斯利·莫顿（Arthur Leslie Morton）的《英格兰人民历史》（*Volksgeschichte Englands*，1938）包含一章“英国革命的起源”（Ursprung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另一章直接以“英国革命”（Die englische Revolution）为题。接下来的一章包含“1660年妥协”以及“1688年妥协”。最清楚明确和最关键的表述却是在1940年与克里斯托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作品《英国1640年革命》（*Die englische Revolution 1640*）一起公开出版的。在第74页上，希尔对之前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提出挑战，希尔的阐述后来导致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建立。1949年出版的（概述性的）论文集也吸收了希尔的一篇题为《英国革命与国家》（Die engl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Staat）的文章（《现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 1949）。

当时在剑桥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莫里斯·赫伯特·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于1946年就已做出了下述总结：“尽管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少地促进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进步，但这场革命也达到了这一结果，工业资本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飞速增长，并超过了其他没有经历过相应政治变革的国家的发展。因而，这场革命为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平台。”（1972，第180页）1976年，在一个题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过渡》（*Übergang vom Feudalismus zum Kapitalismus*）的文集中，才再版了出自美国杂志《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中希尔的一个注释。在这个注释中，希尔维护多布著作正统的处理方式，坚决反对斯威齐的批评。

随着希尔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脱离（以及由此产生的免于正统党派的要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在1956—1957年惨遭重创。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希尔仍被继续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却高度打上了个体化的烙印，正如在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著作中体现的那样（Hill 1961，1965，1972，1993，1996）。布莱恩·曼宁（Brian Manning）曾经是希尔的学生。作为从事研究英国17世纪中叶事件的历史学家，曼宁仍继续处于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中。

早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解体之
396 前，马克思主义把英国革命解释为政治和理智的主要力量的做法，就严肃地受到质问。如果还没有完全抵制或全然忽略希尔的全部原初理论，那么希尔曾经的一些学生（Pennigton 1954，Roots 1966，Underdown 1971，Thomas 1971）

与其他部分历史学家（Hexter 1961；Stone 1965a，1965b，1972；Everitt 1966a，1966b）则会共同出击。在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另一边，休斯顿·雷德沃德·特雷弗-罗珀（Hugh Redwald Trevor-Roper）和美国学者佩雷斯·扎戈林（Perez Zagorin）首先把革命解释为农业与国家之间的分裂，而不是解释为阶级斗争。在此期间，已经出现了更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挑战。康拉德·罗素（Conrad Russel）是这些自称"修正主义者"当中最年老、最杰出的代表。在1974年，他已提出了修辞学问题："在我们转向研究英国革命的原因之前，我们应当要重新去问，是否究竟发生过这场革命。"（Richardson 1977，第146页）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罗素和（不是完全作为修正主义者出现的）其他人不仅在革命的原因和起源方面，而且也在革命的特点、影响和意义方面，质疑这一革命事件（Fletcher 1981；Morrill 1976，1933；Sharpe 1992）。就变革的影响和事件来说，重点再次落到了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下的君主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强烈主张之上。这又与复兴人们对1688—1689年的兴趣有关——不是作为辉格党的"光荣革命"，而是作为王位继承的更替，这一更替最终产生了根本性的（尽管是预料之外的）中期和长期后果。不仅关于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通过封建力量有限提升的思想受到质疑，而且把议会或清教主义设想为挑战旧秩序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思想也受到质疑。修正主义者也至少考虑到了，要抨击所谓的"辉格党"（立宪派）对17世纪的解释以及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解释。一个超修正主义的托利党人乔纳森·C. D. 克拉克（Jonathan C. D. Clark）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宣称，英国在天主教解放和《1829—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29-32）之前，是一个古老政体（*ancien regime*）类型的宗教国家（1985，1986）；这不过是一种极端和孤立的立场。

当涉及要解释个人在20世纪40年代对于国王或者国会的义务以及解释17世纪晚期甚至是18世纪的分裂时，所有 397
的修正主义者都承认宗教的重要地位，有时是关键地位。但从消极的，即防御的或是反作用的方面来看，这主要涉及民众在反对什么以及民众最担忧哪些发展。就资本主义而言，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宁愿把英国的变化普遍刻画为间接性的和长期的。极端的立场甚至否认这段时期的英国存在农民（正如农民存在于欧洲大陆那样），因为土地在英国是在自由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且除此之外，自远古时期就有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MacFarlane 1978，1987）。农业历史学家琼·瑟斯克（Joan Thirsk）在其关于近代早期英国的著作中，代表一种温和的立场（Thirsk 1990）。她自身是理查德·亨利·陶尼（Richard Henry Tawney）的学生，而陶尼的影响在1930年和1950年之间不仅延伸至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延伸至其他立场的代表们（Tawney 1941）。

在后共产主义的情境中，布尔什维主义革命、斯大林主义以及冷战的不幸遗产还是一再地妨碍到了许多历史学家。这是一种使得表达关于17世纪某些问题的见解变得困难的状况，而不是在关于20世纪（更确切地说是在1917年和1991年之间）各种论题方面，陷入要夺取政党的猜疑之中。但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们似乎已经战胜了这一阻碍（参见Hughes 1991以及其他文献）。

2. **历史**。确定英国革命的特点或是回答在那段时间是否究竟发生过革命这个问题，要以详细定义对象为前提。这说的是查理一世在十一年无议会统治以及在1640—1641年改革之后政体的垮台，还是涉及1642—1646年和1648年的内战？当我们把危机理解为“不列颠的”危机（就像近来一些历史学家所设定的那样），并把苏格兰和爱尔兰包含在内，那么时间范围将不再仅仅包括1638—1652年了吗？或者换言之，应该要强调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的崛起及其最后胜利，以及1645—1647年控告、处死国王并建立1649年英国共和国的激进的新教主义者吗？或者实际 398
上涉及的是一整个系列事件以及一些于1640—1649年间在教会、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变化？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再次决定了这一判断：多少变化是由共和国的毁灭以及自1660年以来君主制开启的复辟阶段再次被宣布无效引起的；第二次革命、废黜詹姆斯二世和1689年及其之后出现的“平衡”在何种程度上再次与这些变化重新具有关联或者甚至进一步推动了这些变化？

阶级问题在17世纪40年代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尽管20世纪末的一些历史学家对此有争议）。伦敦群众、市民和学徒，同样还有从事简单工作的工人，在（特别是1641—1642年的）长期议会时期的关键阶段，帮助打败国王及其支持者。在1642年内战爆发之时，双方首先都有贵族首领。同时在社会构成方面存在一个显著的、可见的区别：大多数上层贵族（*Peers*）和中上层贵族（*Gentry*）支持国王，比较而言，国王军始终拥有一个比步兵队更强大的骑兵队，并时常处于太多军官与太少士兵的关系的窘迫处境之

中。议会军招募比较多的士兵（后来也有军官）。他们来自伦敦社会中层、海港、手工业城市、手工业乡村以及主要在东部郡县（但其他地方也有部分强大支持）的新教主义的农村中心。国王在全国的大部分支持来自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威尔士、康沃尔郡、部分北部地区以及主要是天主教徒居住区的西部和北部米德兰。自 1645 年以来，上议院（*House of Lords*）成员就被排除在议会野战军之外。尽管在议会两院中有小部分盟友和最激进的伦敦群众的支持，但议会军自 1647 年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和宗教力量。当议会和军队在 1646—1648 年与国王协商无果之时，整个国家出现了反应：人民对财政负担和其他负担的日渐不满、持续驻军的规模和支出
399 产生的问题，使得查理一世得到了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强大的支持。1648 年第二次内战是由国王及其追随者通过与苏格兰的结盟而推动的（在国家暂时不受英国议会之前盟友的控制之后）。1648—1649 年冬，议会军的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通往更加革命的方向上，更快、更明确地前进了一步。在与英国一小部分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结盟中，干预军队最终导致了控告、处死国王。因为没有合法的、能够出任继承查理一世的“王位觊觎者”，所以君主制就被宣布废除。在少数剩余军队盟友反对（保留上议院）这一做法之后，上议院也被废除了（但世袭贵族 [*hereditary peers*] 仍然继续备受承认）。作为积极的声明，共和主义只得到了非常有限的支持。英联邦（*Commonwealth*）的砥柱力量是军队和激进的新教派。1653 年出现了军队与所谓的“残缺议会”之间的对立，这导致了军事政体的产生。但克伦威尔（Cromwell）致力于达成一个宪法的统一，这个统一准许议会的某些作用，但却不是重复被称为 1640—1653 年的“长期议会”。克伦威尔在此方向上的第一个尝试就是“提名的”议会或者小议会（*Barebones*-Parlament），而这一议会事实上是一个宪法的或者是新教教会的政党集会。一个由被提名者（这一称呼源自一个名叫巴朋 [Barbon] 的议员）组成的激进小组要求教会改革和法律改革。在克伦威尔及其社会上更加保守的追随者看来，这些改革意味着对私有财产权的威胁。八个月之内，最高指挥官的权力第二次落到克伦威尔手中。第二次达成一个民间协议——这次是以一个与军事首领查理一世 1647 年提出的条件几乎没有区别的成文宪法的形式。现在就是要试图平衡护国主、议员和议会之间的权力。摄政政体却非常依赖克伦威尔无与伦比的作用以及他作为军事领袖和宗教领袖的威望。摄政政体最终只使克伦威尔免受危难几个月。奥利弗·克伦威 400

尔（Oliver Cromwell）的继承者——他庸碌无能的儿子理查德（Richard）已于1659年春被推翻。英联邦再次被恢复，目的仅仅是当其市民支持者和军事支持者陷入冲突的时候，它能再重新被解散，这次（不同于1649—1653年）却仅维持几个月——一场作为闹剧重演的悲剧的真实例证。1660年的复辟标志着共和政体、新教政权和军事统治政权的结束。在克伦威尔曾经的指挥官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将军的领导之下，君主制、上议院和主教通过与旧统治阶级的结盟，在一场不流血的反革命之后，再次占据了其之前的位置。他们没有受到来自剩余民众的严重抵抗。

由于1660年共和政体屈辱的垮台，这一问题被提出：共和制的统治权在其不同的阶段是由哪些社会派别或哪些社会阶级来承担的？1649年英联邦获得了一些民众阶层的支持，特别是在伦敦。他们自1640年以来就长期一贯地支持议会。但这只是一些民众阶层，因为这些派别当中的另一些派别已公开反对议会，因为他们援引平等派（*Levellers*）（约翰·李尔本[John Lilburne]及其追随者），在士兵和“鼓动者”代表团同盟的帮助下，没有成功地获得军队的控制权。平等派轻易地被打败了；平等派作为有组织的运动解散了，不久就几乎消失了。随之，革命进一步向民主的——尽管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也消失了。挖掘派（*Diggers*）是一个更小的、农业共产主义的运动，由一个完全独立（尽管神秘）的思想家，即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领导。镇压挖掘派花费的力气更小。包括浮嚣派（*Ranters*）和早期贵格派（Quāker）在内的其他激进派别被当作异端和亵渎神明者而受到迫害。第五王国派（*Fifth Monarchists*）的千年王国——教派—激进分子、无民主主义者——在小议会和建立护国公事件之后加入了反对派。这一切也许意味着，只有一个不断缩小的基础在支持政权，而这个政权的支持者总的来说在全国从未超过少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自 401
1650年以来有些许提高（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不一定要归因于连续政府有意识的政策的情况。美国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提交了一项关于伦敦商人人群的宏大研究。他认为，主要是航海船长、船主、自由商贩（垄断集团之外的商人）等人进一步推动了英国与美国的贸易，并在17世纪40年代和英联邦时期最长久地支持了激进主义议员。包税人（*tax farmers*）以及其他具有特权的特许经营者，包括一些农村最富有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曾经一开始是保皇主义者；但其他一些大商

人，尤其是具有特权的公司（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回避了激进主义议员，或者最迟在处死国王或更早的时候改变了他们的阵营。他们支持大部分以长老派信徒著称的保守主义议员，尽管这在严格教会的意义上，不适用所有长老派信徒（参见 Brenner 1993）。这一判断并不为所有历史学家所认同，并且布伦纳决定把 1653 年而不是 1660 年确定为这一发展的终点是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这项考察是少数富有成果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一，它以大量对历史材料的分析为基础。仍要追问的是，长期议会以及最后英联邦时期的（当然也包括护国公时期）的政策是否在总体上比君主制之前和之后的政策更符合工业和贸易利益。问题的部分答案在于，17 世纪英国的商业利益，没有形成整体的同盟。不管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同样也都没有形成整体的同盟。在伦敦和海港之间，在贸易协会成员和自由“入侵者”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在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和城市与农村中的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一些贸易和手工业部门出现了工匠与帮工之间的斗争，相反在其他一些
402 领域却出现了工会或者协会的整个组织结构的垮台。城市与农村的变化导致了雇主与雇工之间（马克思会认为，这是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但这是一个渐进的、逐步的过程。因而，公共政策不能完全统一地发挥作用。例如一些人群从 17 世纪 50 年代的西班牙革命和尼德兰革命中受益，而另一些人群（估计大部分人群）则站在失败者这边。在恢复的君主制统治下的外国领土中所进行的战争也同样是这种情况。17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之间的一些公共措施，无疑是有利于地主的利益、商业世界和贸易世界的部分利益或者上述双方的利益的：这些政策包括取消王权控制（王室监护[*royal wardship*]）和其他旧的封建租赁法，降低法定利率、实施著名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并在爱尔兰和美国继续实行殖民地统治（通常被称为“种植园”[*plantation*]）。

1660 年的复辟，完全没有颠覆所有的这些变化。长期议会的大部分宪法形式仍然生效并减少了王室的法律权力和税收权力。其他措施也重新达到了法律级别甚至是被扩大了。尽管查理二世个人倾向罗马—天主教信仰和绝对的统治权，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足够聪明，没有重复他父亲的错误。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后几年间，反对派辉格党企图更改王位继承人并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削减王室的全部权力，这一企图失败了。在与大多数上层贵族和中上层贵族以及与复原的英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坚

定不移的合作中，君主制在17世纪80年代初，处于一个比之前自都铎王朝统治以来任何时候都稳固的处境之中。不信任促使查理二世的反对者策划起义甚至谋杀君主（正如之前近三十年企图谋杀克伦威尔一样）。如果有一个更加实际的继任者，那么这一政体还能存在多久，对此只能推测。贸易繁荣，公共收入不断涌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对辉格党和不信奉国教的新教主义者（但不再反对共和主义者）的反应并未随着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反应一同出现。尽
403 管查理二世并无特别迷人的个性，但根据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他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国王。其胞兄詹姆斯二世相反，虽然更正直，但却采取了更强硬、更严格的措施。他不久就远离了地主阶级、上层贵族和中上层贵族，却没有同时赢得其他人群足够的补偿性支持。这也主要是因为（即便不是唯一的原因）他公开支持天主教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自1660年以来就由国家最大的军队来保障。不可能把对“罗马教皇权位”的恐惧与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分开——这两者都是效仿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即詹姆斯的远亲。这使得詹姆斯二世自1688年以来，比其父更加孤立。这一情况实际上也可以解释那场不流血的革命。此后，国王的外甥（和女婿）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登陆英国。与英国不同，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产生的影响绝不是和平的。以《革命稳固法》（Revolution Settlement）著称的时期，从1689年延伸至1702年威廉三世统治的结束。按照宪法进一步限制王权。税收改革和政治改革（其中一些改革涉及的时间更长），虽有利于地主的利益，但普遍更有利于加强金融、商业和军事—帝国的利益，尽管地主从来都是政治上和社会上占优势的阶级。这一发展为后来英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享有海上帝国的霸权地位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当然还有不断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历史不是实验科学。不可能让历史发展的序列重新来过，这一次没有詹姆斯二世的倒台，没有1688年，也没有17世纪40年代的各种事件。

即便人们接受一切（不是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这样做），也并不总意味着，在17世纪40年代发生过一次资本主义秩序替代封建主义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也进一步远离这些事件的“经典”解释。有太多人反对这样一种简化的解释：双方既有经济上“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地主，也有倒退的、贫穷化的地主；城市精英，尤其是最富有的银行家以及进出口商人，
404 通过他们各自的结盟分为两大阵营——这同样适用于城市与农村的中间阶层。国王和议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利益群组的两方面支持，而很多人更愿意

保持中立或更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虽然支持在各个不同的群组和阶级之间分配不均，就像在两大阵营的分配不均一样，但是像（最重要的）宗教、地理以及年龄因素和阶级利益一样重要（更不用说个体心理的维度）。即便在国王失败以及随之发生的短暂地废除君主制之后，地主在地方的优势地位仍然继续存在。但在乡村的许多地方，在中上层贵族内部有一个显著的（即便只是短暂的）权力向下转移：由这个阶级中层向下层的转移。但原因并不在于：与大地主相比，下层乡村贵族在经济上更加进步，在其方法和思想上“更加资本主义”。大部分大地主在政治上处于阴影之中，因而他们在17世纪40年代末到1660年这段时间，没有积极地加入反对派。在一些（不是所有）城市和乡镇，这些年间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权力转移。它不是转向另一个阶级，而是转向同一个阶级的下一阶层。在17世纪中叶，政府在支持贸易和工业的各个方面不统一且有局限。尽管有国王垄断（这一垄断的程度和意义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中必定被夸大了），但是在都铎—君主制和复辟之间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垄断。即便就是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之下的早期斯图亚特—君主制，也不是完全以敌视贸易或敌视经济变革的普遍过程为特征的，但也有一些产生抑制作用的政治进步。在17世纪50年代晚期，护国公克伦威尔却也艰难地依赖单个包税人和其他特许经营者的信贷，这与查理一世或查理二世统治下的情况一样。自17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府的长期债务和国家银行而言，才有一个可持久的平衡。

20世纪后期的一些历史学家、修 405
正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一点上将走得更远。如果不考虑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也在上述概略的有限且暂时的意义上，最强烈地否认这场革命的事实，那么他们将提出，17世纪的英国尽管出现了一切政治和宗教变更，但还是能看到一个基本的持续性。他们也完全有理由指出，贵族制和占有土地的中上层贵族也许至少直至19世纪还持有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一解释得到如下事实的支持：许多中间阶层的成员直至《1829—1832年改革法案》时还未获得选举权。在经济变革方面，仍可以看出的是，成功的地产家庭通过经营其货物，以雇农、工人，当然还有消费者为代价，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他们则同时为了下一代试图保留、保障他们的地产。这与下述事实不相矛盾：单个的个人，有时是整个家庭显示了富有、严肃的父权主义的迹象——正如一些（新兴工业资本家阶级也被称为）工场手工业主（*manufacturers*）所做的那样。在此期间，与几

乎一切其他前工业社会相比，17世纪的英国完全和尼德兰一样，有一个相对大量、富有的资产阶级（中间阶级［*middle class*］）。这意味着对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强、不断增长，即这一需求远超过仅有的生存最低限度。不是所有导致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经济加速增长的因素都已在这段时间发挥作用。许多因素在1700年就发挥作用了，一些因素甚至已在100年前就发挥作用了。克里斯托弗·克莱（Christopher Clay）（1984）和保罗·朗福德（Paul Langford）（1991）对这一发展过程中变化与持续性之间的平衡的研究堪称典范。

正如马克思自身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由贸易和农业向工业的扩张是一个渐进的、非均衡的过程。在此，进行的是这样一种尝试：通过援引一些最重要的历史学家的争论去展示1640—1660年间各种戏剧性的变革（参见 Aylmer 1986；zur Geschichtsschreibung Richardson 1977）。

参考文献：

A. Ashton, *The Englisch Civil War. Conservatism and Revolution 1603-1649*, London 1978; T. H. Ashton (Hg.),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1965; G. E. Aylmer, *Rebellion or Revolution? England 1640-1660*, Oxford 1986; E. Bernstein, »Kommunistische und demokratisch-sozialistische Strömungen während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des 17. Jahrhunderts«, in: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in Einzeldarstellungen*, hgg. v. E. Bernstein u. a. Bd. 1, Stuttgart 1895; der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in der großen englischen Revolution des 17. Jh.*, Stuttgart ²1908 (engl. *Cromwell and Commun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Great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30); R. Brenner,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Princeton-Cambridge 1993; D. Brunton, D. H. Pennigton, *Members of the Long Parliament*, London 1954; J. C. D. Clark, *English Society 1688-1832. Ide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ractice During the Ancien Regime*, Cambridge 1986; ders.,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Cambridge 1986; C. G.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 Cambridge 1984; M. H.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1946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Vom Spätfeudalismus bis zur Gegenwart*, Köln-Berlin/W ²1972); A. Everitt, *The Community of Kent and the Great Rebellion*, Leices-

406

ter 1966; ders.,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he Great Rebelli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amphlet*, London 1969; A. Fletcher, *The Outbreak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 1981; S. R. Gardiner, *Th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Puritan Revolution 1625–1660*, Oxford 1889; F. P. G. Guizo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 depuis l'avénement de Charles Ier jusqu'à sa mort*, Paris 1826 (London 1846); ders., *On the Causes of the Succes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1640–1688. A Discourse*, London 1850; J. Harrington, *The Political Works*, hgg. v. J. G. A. Pocock, Cambridge 1973a (*Politische Schriften*, hgg. u. eingel. v. J. Gebhardt, München 1973b); J. H. Hexter, *Reappraisals in History*, London 1961; C.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London 1940; ders.,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terpreted by Marx and Engels«, in: *Science & Society*, 12. Jg., H. 1, 1948, 130–56; der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and the State«, in: *The Modern Quarterly*, new series, 4. Jg., H. 2, 1949, 110–28; ders.,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603–1714*, Edinburgh 1961; ders.,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1965; ders., *Reformation to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530–1780*, London 1967 (*Von der Reformation zu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Englands 1530–1730*,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ders.,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2; ders., *The English Bibl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Revolution*, London 1993; ders., *Liberty against the Law. Some Seventeenth-Century Controversies*, London 1996; R. Hilton (Hg.),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n 1976; A. Hughe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Basingstoke-London 1991; P. Langford, *Public Life and the Propertied Englishman 1689–1789*, Oxford 1991; A. MacFarlane, *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 1978; ders.,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Oxford 1987; B. Manning, *The English People and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6; ders., *The Crisi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Chicago-Melbourne 1992; J. S. Morrill, *The Revolt of the Provinces. Conservatives and Radical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s 1630–1650*, London 1976; ders., *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Essays*, Harlow/Essex 1993; A. L. Morton, *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38 (*Volksgeschichte Englands*, m. e. Nachwort v. G. Schilfert, Berlin/DDR

407

1956); R. C. Richardson,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77; I. Roots, *The Great Rebellion 1642–1660*, London 1966; C. Russell (Hg.),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London-Basingstoke 1973; der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Oxford 1990; ders.,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Monarchies 1637–1642*, London 1991; ders., *Unrevolutionary England, 1603–1642*, London 1990; K. M. Sharpe, *The 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 London-New Haven 1992; L.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1965; ders., *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1540–1640*, London 1965; der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1972 (*Ursachen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 1529–1642,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83*); R. H. Tawney, »Harrington's Interpretation of his A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7. Jg., 1941; ders., »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st series, 11. Jg., 1941, H. 1, 1–38; ders., *History and Society. Essays*, hgg. v. J. M. Winter, London 1978; J. Thirsk, *Agricultural Change. Policy and Practice 1550–1750*, Cambridge 1990; K.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H. R. Trevor-Roper, »The Gentry 1540–1640«,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uppl. 1, 1953; der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Past and Present*, 16. Jg., H. 1, 1959, 31–64; D. Underdown, *Pride's Purge. Politics in the Puritan Revolution*, Oxford 1971; ders., *Revel, Riot and Rebell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England 1603–1660*, Oxford 1986; B. Worden, *The Rump Parliament 1648–1653*, Cambridge 1975; P. Zagorin, *The Court and the Country. The Beginning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1969.

杰拉尔德·艾尔默
（Gerald Aylmer） 撰
朱渝阳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grarfrage, Ausbeutung, Bauernbewegung, Besitz, Bodenreform,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Eigentum, Epoche, Feudalismus,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ühsozialismus, Geschichte, Geschichtsschreibung, Grundeigentum, Hegemonie,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nteresse, irische Frage, Jakobinismus, Klassen, Klassen und soziale Schichten, Klassengesellschaft, Klassenkämpfe, Kleinbauern, Landwirtschaft, nationale Revolution, nie-

derländische Revolution, Pächter, Produktionsweise, Revisionismus, Revolution, Revolutionstheor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adt/Land, Übergangsperiode,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408 社会关系的总和（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A: maǧmuʿ al-auḍāʾ al-muǧtamaʿīya.

E: ensemble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F: ensemble des rapports sociaux.

R: sovokupnost' obščestvennych otnošenij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

S: conjunto de las relaciones sociales.

—

1. "社会关系的总和"表述的出现及含义。在一条1845年——"可能是5月到6月"，而非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所认为的3月或4月（Labica 1997，"导言"）——布鲁塞尔时期的一个笔记本上草草写下的评注中，马克思写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6条，MEW 3，第6页）这则评注就是后来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因此，这涉及的是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并且最重要的一次提及"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表述。直到1888年，恩格斯才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中发表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修订版）（参见MEW 3，第547页，注释1）。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中，它被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后者编辑于1845—1846年，但直到1932年完整发表之前，仍然鲜为人知。

马克思用"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表述来反对费尔巴哈在其1841年的《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中提出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人的本质是一种由无时间的或永恒的、所有人都固有的特性所构成的总合（Gesamtheit）。这样一来，费尔巴哈就可以将涉及上帝与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一神学范畴，追溯到人的特性上。马克思虽然接受了这种对宗教观念的翻转，但他认为费尔巴哈做得还远远不够。在他看来，并不存在着一种无时间的，超越了不同社会、时代和国家的，自身同一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总是具体的，并且体现在人的类型（Menschentypen）中，人的类型的地位与存在方式是通过一定的、准确界定的功能和社会角色确定的。可以追溯那些著名的例子：古希腊

的“自由民和奴隶”，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中世纪的“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现代的“资产者和无产者”（*Manifest*，MEW 4，第462页）；或者，用不同的类型来命名同一个时代：无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
409 是英国的资本家”，他们的劳动所生产的都是同一种产品，即小麦（*Zur Kritik*，MEW 13，第16页）。这些是个体—“类型”，他们共有同一个“本质”，共有同一个符合本质的特性的总合。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假如社会个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就只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上，个人的这些个别类型是通过一定的、规则性的和主导性的关系来定义的，这些关系在普遍的社会分工中决定了这些类型。彼此之间的交流、他们所维持的社会关系，既在内涵上（涉及既定的个人），也在范围上（众多个人所组成的范畴或阶级），形成了一种“总和”“总合”。

“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与唯物史观同时出现，并且与它的提出紧密相关。正如“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Gr*，MEW 42，第96页）——“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DI*，MEW 3，第30页）——在这种历史地和社会地规定了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之外，也不存在任何人的本质。这些社会关系是基于物质条件而非基于一种理想的本质而成为具有如此特征的总和的：“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同上）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斯·施蒂纳否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具体的本质和这些社会类型；对于他来说，只有“唯一的”个人。施蒂纳“希望：个人彼此之间应进行纯粹私人交往，他们的交往不应通过某种第三者，某种东西。……第三者……是现代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个人彼此之间的地位。譬如说，施蒂纳并不希望两个个人以资产者和无产者的身份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他反对资产者比无产者‘先有’的那种‘特殊的东西’”（第422页）。但是，“就个人自身来考察个人，个人就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归根到底是：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表现为他们彼此如何对 410
待。……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由于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

是……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同上书，第422—423页）。

2. 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一种具体的本质（它是指一种社会类型）的思想，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本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KHR*，MEW 1，第378页）布鲁诺·鲍威尔也考察了人们在社会之中保持着的纽带的本性，并断定，“普遍国家制度（Staatswesen）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HF*，MEW 2，第127页）。这一经典命题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贯彻到卢梭和黑格尔，而马克思则对之予以拒斥：“原子的**典型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特性，因此也没有任何受它自己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同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同上）“但是，因为一个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为此，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才是**原子**”；认为他们最初是由国家联系起来的想法，是“**政治上的迷信**”（同上书，第127—128页）。

因此，“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一方面与原子论对立，根据这一理论，社 411
会的产生要以自律的和独立的个人为前提；另一方面与本质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对立，这类理论将社会纽带建基于一种普遍的、观念的“人的本质”之上，并认为这种“人的本质”是一切时期所有人都固有的。马克思拒绝这种将一种唯一的理想本质永恒化的做法，也拒绝那种鲁滨逊故事（Robinsonade），这类故事想象了社会起源之时相互孤立的个人，这些个人如真正的原子那样，是自我封闭的、自满自足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获得了其最为重要的含义，自此以后，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后来著作中都是在场的，并且以相当不同的方式表述出来。马克思使用“总合”、“总体”（Totalität）、“体

系”（System，或译为“制度”。——译者）、“有机体”（Organismus）等表述，以及大量其他的惯用语，当他谈及“联系”（Zusammenhang）时尤为如此，这种“联系”将处于相互作用中的个人、社会群体、阶级、职业以及社会要素、生产要素等结合起来。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在人的物质活动当中的，是在人的“需要”当中的，这些关系与活动和需要一样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是指“存在方式”，即人际间的行为方式、处事方式和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DI*，MEW 3，第 71 页）并且，“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的 *commerce* 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 Verkehr 一词那样”（1846 年 12 月 28 日致安年柯夫 [Annenkow] 的信，MEW 27，第 453 页；原文为法文，参见 MEGA III.2，第 70—80 页，此处为第 72 页）。“在现实世界中，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原文中为 ensemble）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权，封建所有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MEW 27，第 456 页；MEGA III.2，第 74 页）“**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合。**”（*Lohnarbeit*，1849，MEW 6，第 408 页） 412

通常，这种关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并不是明确出现的，而只是被唤起、被暗示或是潜在地预设了。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MEW 3，第 25 页）在下面这段话中，这一思想表达得更为清晰：“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同上书，第 36 页）因而，如果“物质活动方式”是“狭隘的”，那么“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也是狭隘的（同上书，第 26 页，注释）。只要“宗法关系”占据主宰，师傅就“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同上书，第 51—52 页）。相反，工业时代中生产力的释放表明，当前的阶级社会将会被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所克服，

在后一种社会中，个人本身将变成全面的，并能够凭借多样的和不受限制的社会关系来发展自己的潜能，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同上书，第35页）。因而，如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Manifest*，MEW 4，第464页）那样，共产主义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DI*，MEW 3，第70页）。

3. 但是，这种对“总和”或“总合”的谈论是否依然会引起误解？定义了一种社会类型的社会关系依然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有机总体，还是相反，它仅仅涉及一系列因素的总和，这些因素以单纯外在的和机械的方式被结合成纯粹偶然的和任意的关系？也许，这些总和并不仅仅是基于偶然情况而形成的组合体（Aggregate）或混杂物？（让-保罗·萨特在其1960年的《辩证理性批判》[*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中
413 就是在这一方向上展开的，在这部著作中，他用“总是未完成的总体化”观念和“不完整的整体”的观念取代了总体的观念。）众所周知，马克思喜欢用很强的隐喻，特别是有机体隐喻（参见Schlanger 1971）来谈论社会的总和、阶级的总和、社会生活各部分（基础、法律结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总和、经济生活各方面（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交换关系）的总和或生产部门（工业、农业等）的总和，在这里，每一个“领域”都构成了一个相对自律的“整体”。他解释说，“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Elend*，MEW 4，第130页；参见Lukács，*GuK*，W 2，第65页），并谈道，“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同上书，第131页）。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关于一种有机整体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包含着如下观念：这些“总合”或“总体”中的每一个，就如一个个人那样，具有统一性和生命，其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相互需要、相互紧密依赖的，并且具有一个唯一的共同意志。但是，马克思同样也经常使用机械隐喻。机器（Maschine）或装配起来的机械（Mechanismus）同样是由相互依赖的器官（Organe）组成的，并且如一个“有机整体”那样发挥功能。

“总和”或“总合”概念的含义也是需要探讨的。马克思可以将它理解为各种不同因素的一种或多或少偶然的、“历史的”结合，也可以在严格有机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也就是人们通常优先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被认为是

有机的，是因为古希腊城邦的自由民和奴隶、封建主义的贵族和农奴、现代的资产者和无产者彼此结合在一起，并且如果没有对方的话，自身就不会存在。但是，一个国家、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从多样的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从有时相当不同的活动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它们相互之间并不具有真正极其重要的联系。当它们的统一体崩溃时，这一点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例如中世纪末期封建国家的瓦解（参见《哲学的贫困》与《资本论》各处）。马克思也没有忘记提醒如下一点，即总是存在着落后的生产部门、遗物等等。那么，
414 “总和”或“总合”的概念就具有了一种偶然总体的机械的和经验的意义，这种总体只具有松散的结合，这些结合是能够消解的，因为它们并未构成现实的统一体。

因而，这一概念是有歧义的，确而言之，它具有两重相互对立的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指互为条件的各部分的相互结合，因为它们是相互产生的，就像一种生物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当涉及具有独立生命的有机类型的具体总体的内部分化时，这种结合就会被经常提及，如一定时期内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领域的分工与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这一图景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流通之间一般关系的抽象分析（MEW 42，第24—34页）。据此，一个总体的这些因素或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个完美的演绎推理（Syllogismus）。根据马克思（在其普遍的哲学一元论的背景下），这似乎必须适用于任一总体。然而，这种关于一个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所组成的总体的观念，完全是理论上的。它的前提是局限于狭隘范围内的一定时期、一个地理单元或一个国家，简言之，它要求理想条件，如果要使这些条件是纯粹既定的，那么人们就必须设想封闭的贸易国家、执行大陆封锁的国家、完美的保护主义与完全永久的闭关自守，但这些架构恰恰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总和”或“总合”的概念有时在第二种也是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其用于如下这些情况，即仅涉及求和，也就是各种原因或要素的纯粹相加性的累积，它们之间除了时间上接近和共存外，没有其他的内在关系：在这里可以举如下这个例子：一个曾经有机的体系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彼此互异的因素，而后因子与组成部分的一个新的组合产生了，在其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有机的统一体。

例如，当马克思说，法的关系以及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合，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 415
为‘市民社会’”或者“生产关系的总合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Vorw 59*，MEW 13，第 8 页）之时，人们应当如何理解“总合”？除了各自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的生活关系”和“生产关系”之外，是否也总是存在着由过往和传统带给我们的东西。但是，之所以难以规定“总合”的基本含义，其原因可能在于如下一点，即将一种总合的本性及其统一评估为本质的和必然的，还是评估为非本质的和偶然的，这通常取决于我们各自的知识水平。

4.“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方法问题与认识问题。认识与实在的关系。马克思对此的反思，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Einl 57*，MEW 42，第 34—42 页）。马克思关于 17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如下说法可以应用于所有可观察到的和可以想到的总和与总体上：实际上，人们起初只是形成了“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同上书，第 35 页）。相反，有一种趋势是高估有机关系的必然性，认为这些关系整合了一个社会或一个生产体系的所有活动部门与活动领域，并因此整合了一个总合的所有要素与因素，例如当人们谈到“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时（*Vorw 59*，MEW 13，第 7 页）。因为根据马克思对这一方法论与认识论问题的深刻观察，我们处理的是一个“作为思想总体的具体总体”，它“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因此“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Einl 57*，MEW 42，第 36 页），其所具有的全都是包含着抽象的东西。“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一般”（参见 Althusser，*FM*，第 124 页及以下），它本身有其界限。

这种循环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们从字面意义上接受了有机总体的隐喻，并将每个社会、每个社会领域乃至于任一总体等同于一个实在的有机体，那么人们就会遭遇如下危险，即“思辨地”高估这些总体的有机统一——现代市民社会、古典城邦、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等，并将某一活动部门——工业、农业等——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有机 416
体”，即自主的且具有独立生命的有机体。一方面，不言而喻的是，这涉及了总体：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活动领域的不同要素、领域、阶级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Einl 57*，MEW 42，第 23 页）。但是，另一方面，如马克思同时指出的那样，人们在实在中总是面对着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Einl 57*，MEW 42，第 35 页）。这种多样性

表明，需要坚持区分如下二者：一方面是关于一个紧密结合着的整体的精神表象或理论概念，人们只是从这个整体中挑选并记录下突出的或本质性的要素；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和实在中存在着的经验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方面的丰富性。因而，马克思在谈到19世纪中叶的德意志国家时提醒人们，“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K I*，“前言”，MEW 23，第14—15页）。哪里可以看出这个分裂的和落后的德国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有机性质？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的分析中，不是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上的简单化出发的，《共产党宣言》只是记录了现代社会的两极分裂趋势，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MEW 4，第463页）；相反，这里的重点是法国社会的复杂多样性。此外，马克思还评论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K I*，“前言”，MEW 23，第16页）最好不要说，这种“有机体”正在经历着向另一种有机体的蜕变。但是，这——为了彻底搞明白有机体隐喻——是在另一种社会的竞争的影响下发生的，还是基于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后者不再适应前者）发生的？在这里，我们达到了这种生物学隐喻的极限。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尚未完结的“故事”。

5. 这导致了关于这种“社会关系 417
的总和”的范围的问题。**第一**，生产关系与实际的社会关系处于何种联系之中（关于归根结底的决定的问题）？**第二**，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处于何种联系之中？如果人们拓展了联系的领域，那么就会出现需要考虑的第三种联系，即社会与时空中的社会制度的联系。

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相似的或同源的。实际上，人们必须以一种一元论的观念，将社会关系的总和扩展到整个人类以及整个历史上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有代表性的下述段落也是与此相应的（但这里主要还是关于物质条件的）：“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DI*，MEW 3，第423页；参见第

45页，以及致安年柯夫的信，MEW 27，第452页）

因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范围似乎没有被先天地设置界限。实际上，马克思对分工（它随着世界市场而国际化了）也没有做任何限制。恰恰相反，他强调，“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K I*，MEW 23，第57页），因而可能实现财富的无限增长（这基于现代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DI*，MEW 3，第34—35页；参见“自由王国”，*K III*，MEW 25，第828页，以及作为“个人的普遍发展”的完整的或总体的人的观念，MEW 42，第91页）

418 那么，生产关系与其他的实际的社会关系的联系是怎样的？马克思预先记下了“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Einl 57*，MEW 42，第43页）

为此，他首先在纯粹经济层面上进行了说明：“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同上书，第34页）在这里，我们拥有的是有机总体。同时，这个总体的要素之一，即“物质”要素具有辩证的优先地位：“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作为生产性消费。——作者注），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同上）据此，所有其他要素也不过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决定着其他要素的特征：如果生产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分配、交换和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这种必然性所渗透，尽管这些关系也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最终目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同上）然而，就在同一页，马克思也提到了重要的另一面：“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同上）恩格斯也认为，经济基础对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不能被过高估计（1890—1894年致施密特、布洛赫、梅林、博尔吉乌斯[Borgius]的信）。即便生产可能是经济整体中最严格意义上的决定性的领域（或“要素”）（参见*Einl 57*），然而，社会生产关系

的总和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更大的总和，即实际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部分，这些关系也包括全部法的关系、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宗教、艺术等）关系："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
419 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恩格斯 1894 年 1 月 25 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MEW 39，第 205 页）同时，意识形态关系及形式也要被考虑在内，在这些关系和形式中，人们思考所有前面提到的关系，并意识到这些关系（*Vorw 59*，MEW 13，第 9 页）。"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的信，MEW 39，第 206 页）因此，社会关系的扩展是没有界限的：只有"外部的"自然限制了这种扩展。更有甚者，在所有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关系都与最广泛意义上的周边环境保持着"普遍的自然关系"，其中包括"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DI*，MEW 3，第 21 页），简言之，土地与耕地、下层土、海洋等环境的一切特征、特性和资源，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完全切断与它们之间的"脐带"。

基于世界市场的发展，自 16 世纪以来，没有哪个现代社会能够与其他社会分离开："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一目了然"了（*Vorw 59*，MEW 13，第 7 页）。发达的个性实际上只有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会出现。然而，尽管个人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独立，但现代社会却是完全相互依存的，因为它们相互之间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着贸易。

6. 有机隐喻和机械隐喻之间的联系。人们可以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完全是一种有机论和活力论的隐喻手法。然而，有机隐喻虽然无处不在，但仍不能排除马克思对机械隐喻的使用，尽管笛卡尔的钟表隐喻对马克思的理论武器库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道具。机器的隐喻，尤其是自动机的隐喻，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同样普遍和简洁，并且和有机隐喻一样都属于"社会关系的总和"概念的含义。

一切类型的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一个体系，该体系被叙述为一个总体。这些总和也都可以很好地被理解为机械。因 420
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国家必须被理解为统治阶级手中的一种设备或机器（参见 *DI*，*Manifest*，*18.B*，*Bürgerkrieg* 各处）。社会经济形态的总体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那样在发挥功能，其中无论在

整体层面还是在个别组件层面，都笼罩着一种盲目的、不幸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机械的”和“自然的”外部规律。按照这种观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由齿轮组和啮合器、带有中央发动机的传动带、不可抗拒的推动力组成的：资本，一种现实的（*in actu*）的利维坦，其最终目的或内在必然性是生产剩余价值（《资本论》各处）。作为个人的工人和资产者是一台极为庞大的机器的一部分，他们是这台机器的仆人，他们被还原为功能和部分活动的简单载体，就像承载着工具的工作台那样的载体。因此，工厂工人成了一个支配着他的机械总合的附属物，这个总合就是机械化工厂。

马克思抓住一切机会来谴责操作技巧、任务和生产功能的机械化趋势，自18和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趋势就在不断发展。所有的社会功能也都不断地在机械化；生活发生了普遍的机械化。机械化推动社会前进，并使其器官相对于目标而言日益异化和外在化。因此，个人失去了生命和活动的目的，首先是部门工人，但也包括每个作为个人的资本家。个人也日益远离具体的社会和他们所构成的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所有仆人都被异化成机械的和盲目的目的的个人，这一目的就是生产剩余价值。整个体系都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就像在机器中那样，这里的目的也变得日益外在于其器官，外在于其物理的和物质的存在。

如果说，在使用“总和/总合”、“总体”、“体系”、“联系”、“相互作用”等概念时到处都涉及有机隐喻，那是因为工业机器体系（Maschinenwesen）的发展，同器官对其功能的从属关系、功能对其目的的从属关系（这些从属关系是活力论的）并不矛盾。正是一台机器的各元素，即零件及其链结（结构）构成 421
了总和，它们为了一定的目标而发挥功能。现代工厂体系就是一个由活动、生活、目的组成的场所。器官、功能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与生物中的情况没有根本区别，只不过机器所具有的目的是外在于它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分工（无论是社会还是技术的）中，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时，目的也在个人之外，而且也在每个个别阶级之外。因此，从整体上来讲，以有机的还是机械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总和或总合概念，这并不重要。根据马克思，重要的是，活动与其合目的性（Zweckgerichtetheit）的分离表现在技能的外表化中，这些技能变得独立，并且控制、异化和征服了个人。这种分离无法克服它所造成的矛盾，因此，人们必须回到内在于社会整体当中的个人的目的的内在性上。通过社会个人本身来重新分配其活动目的，这是本质性的，是最终目标。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批判，是随着对其压倒性的合目的性的批判而来的：创造剩余价值就是它唯一的目标，它与个人通过自身并为了自身而实现的全面发展是相互龃龉的，尽管它使这种发展在物质上得以可能。

参考文献：

G. Labica, *Die Feuerbach-Thesen*, Berlin-Hamburg 1997; K. Popper, »Marxens Methode«, in: ders.,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1944), Bd. 2: *Falsche Propheten. Hegel, Marx und die Folgen*, Bern 1958, 102–66; J. -P. Sartre,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1960), Reinbek 1967; J. Schlanger, *Les métaphores de l'organisme*, Paris 1971;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u. Frankfurt/M 1972.

米夏埃尔·瓦迪（Michel Vadée） 撰
卡特琳·格吕内皮特 译为德文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二

维果茨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6条中，马克思提出了如下观念，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MEW 3，第6页）。这一观念构成了列夫·维果茨基（Lew Wygotskis，1896—1934）工作的出发点。这位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直接开始了工作。他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重建心理科学。尽管不幸 422
早逝，维果茨基还是在对一门他并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学科的重建中占有一席之地。当时的历史状况使得他的工作尤为紧迫：他努力重建心理学并将其成果应用于正常儿童和残疾儿童的教育，他认为自己的这一努力是社会重建的革命任务的一部分。因此，他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具有深远的实践意涵。

维果茨基的工作偏离了当时在苏维埃中确立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他的著作在他去世的几十年中长期被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允许再次阅读，其中有一些是首次出版。维果茨基不在乎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的工作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强烈影响。尽管他对革命的积极赞同和对社会改造的热情投入从未被质疑过，但后来的一些评论者（如米哈伊尔·巴赫金 [Michail Bachtin] 和他的圈子的著作）怀疑维果茨基的心理学究竟是否将某些内容归功于马克思的著作，以及他对马克思的表述的（很少的）诉诸是否仅仅出于对当局的让步。可是，有充分的理由将他视为一位“忠实并坚定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Wertsch 1985，第10—11页），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家”（Newman/Holzman 1993，第2页）。在一则身后出版的笔记中，他写道：“我不打算通过一系列引文的拼凑来发现精神的本质。我想了解必须如何建立科学，我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来进行意识研究。……为了以普遍接受的科学方式创建这样一种能够胜任的理论方法，必须发现既定范围内的现象的本质、其变化的规律、其质上和量上的性质、其原因。必须制定与之特别相关的范畴和概念，换言之，必须书写它自己的《资本论》。”（引自 Cole/Scribner 1978，第8页；参见 Wygotski 1974，第102页）由于他只是很少地引用马克思，所以人们必须在其创作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前提中寻找他的“马克思主义”。

423 维果茨基的核心前提是如下论点：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人类意识是由“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的。同生物主义的或行为主义的解释的还原论相反，他强调精神的历史本性和文化本性，并将意识视为人们所进入的特殊社会关系的产物。我们只能在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语境中来研究和理解个人。这需要以下三方面：**第一**，一种发展方法；**第二**，对更高级的心理功能的历史起源与个人起源的重构；**第三**，对工具和符号（Zeichen）的心理学功能的分析。

1. 维果茨基对发展思想的理解不应与它在经验的发展心理学中的使用相混淆。他写道：“历史地奠基的心理学概念被大多数研究儿童发展的研究者误解了。……**历史地研究某物，这意味着在变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研究**；这是辩证方法的基本要求。”（*Mind*，第64—65页；参见1934，第102—103页）维果茨基的发展方法或发育方法的目的是研究心理结构的历史。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形成那样，维果茨基打算对心理结构和个人结构进行这种研究。为了理解成年的文明的个人的行为（Verhalten），他认为有必要研究行为起源的三条发展线：**种系发育**线（从亚人类灵长类到人类）、**文化—历史**线（从原始人到文明人）、**个体发育**线（从儿童到成年人）。在此，维果茨基没有遵循重演说（Rekapitulationstheorie），该理论认为，个体发育（Ontogenese）重演了种系发育（Phylogenese），因而个人在从儿童到成年人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与从动物到人类或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相同的阶段。维果茨基对这三条线之间的类似性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想发现这些过程的不同之处，而不是共同之处。”（Wygotski/Luria 1993，第38页）他

在更高级的心理功能中发现了人的思维
424 特征和人的行为的独特之处，这些功能是在工具和符号的文化—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人的特殊之处不在于一种灵魂或先验自我，而在于人们在历史上和社会中所产生的实践活动和思想活动形式："更高级的心理功能构成了正在形成的人格的主要核心，这些功能的发展和建设的第一规律可以被描述为如下一点的规律，即**在正在形成的心理功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向中介了的、人为的功能过渡。**"这一过程并不在于"获得新的自然的心理、生理功能……，而是在于基本功能的复杂组合，在于思维形式和思维程序的完善，在于形成新的思维程序，这些思维程序主要是支持语言或任一其他符号体系"（AS 2，1987，第625页）。

2. 据此，更高级的心理功能，就其起源和特征而言，是社会性的。它们是在社会互动与生产活动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此外，它们还以交往的方式由每一新的世代继续中介。"在社会中锚定着与在历史中发展着的活动的内在化，是人类心理的显著特征，是从动物心理向人类心理的质的飞跃的基础。"（*Mind*，第57页）

维果茨基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6条做了改写，"人的心理本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合，这些关系"被翻译为"人格的内部之物"。这种"内部的社会关系"就构成了"人的人格的社交结构的基础"（AS 2，1987，第629—630页）。"我们不想断言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含义，但是我们在这个立场上看到了对文化发展史引领我们走向的那个地方的完整表达。"（引自 Wertsch 1985，第58页）

维果茨基关于更高级的心理功能的社会起源的理解，使他描绘了一幅儿童发展的图景，它与让·皮亚杰（Jean Piaget）具有重要影响的发展心理学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虽然对于这二者来说，幼儿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并且他们的社交言说能力和互动能 425
力发展得非常缓慢，但对于维果茨基来说，儿童的发展是一个逐步个体化与外部操作之"内在重构"的社会过程。在皮亚杰看来，个人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是首要的；而根据维果茨基，个人是第二级的，他是发展过程的结果。反过来，这一发展过程不是根据已确定和可预测的阶段对预已编制好的结构的自然展开，而是传达（Übermittlung）和内在化的过程，这种过程是社交性的和主体间的："儿童文化发展中的每一项功能，在两个层面上都出现过两次，首先是在社交层面上，之后是在心理学层面上；在第一个层面上是作为人际合作的形式，作

为集体的、心理之间的范畴，在第二个层面上是作为个人行为的手段，作为心理之内的范畴。这是建立所有更高级的心理功能的一般规律。因此，所有更高级的心理功能都是集体的、社交的和人际间的关系的铸件。”（AS 2，1987，第629页）发展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种“劳动”形式，是一种活动，其产生并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以及内在于儿童当中的社会空间。据此，维果茨基主张，教与学的统一（儿童同其他儿童和成年人的互动）先于发展，并且这种统一实际上必须起到指导作用。儿童最初在成年人或同伴的帮助下可以做的事情，后来就变成了发展成就和他自己的心理结构的要素。

3. 维果茨基关于工具之于人的发展的功能的看法，是以恩格斯最先提出的纲领（*DN*，MEW 20，第322页及以下）为指导的，并对之进行了深化。更高级的心理功能是以工具和符号为中介的，维果茨基将它们理解为心理工具（例如语言、计算及其他符号体系）。他对灵长类动物学家（Primatologe）和人类学家（关于猴子的行为和原始思维）的工作的重新诠释，以及他设计用来研究儿童思维发展和言说发展的创新实验，表明了在历史层面和个人层面上，工具和符号的社会使用如何产生了人的意识（参见1974，第97—98页）。人们使用工具和符号，为的是计划和规约行为，为的是使行为处于意识的控制之下。人造器官和发明提供了与心理发展要求相应的附加手段。维果茨基表明了，工具和符号的制造如何使人们能够控制自然和自己的行为。按照这种方式，他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心理维度，根据这一原则，人们在使用工具时改变了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例如，“记忆和注意功能最初是作为外部操作产生的，在这里插入了外部符号。……它们起初是……集体行为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联系的一种形式。……因此，符号最初总是影响他人的手段，而后它又变成了影响自己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每一外部功能都内在化了，其变成了内部功能”（AS 2，1987，第630页）。 426

维果茨基去世后，他的工作由一群坚定的追随者继续进行，其中包括亚历山大·R.鲁利亚（Alexander R. Luria）和亚历山大·N.列昂季耶夫（Alexander N. Leontjew）。沃茨尔（Wertsch）指出，他们的“活动心理学”（Tätigkeitspsychologie）是以如下信念为指导的：心理学必须基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1条（而非第6条），即关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批判活动的观念（1985，第199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维果茨基的著作和观念在批评皮

亚杰的西方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然而，为了公正地对待维果茨基的心理学的精细性（Elaborierheit）和复杂性，必须在其历史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即马克思主义的和革命的）语境中来解释它，简单地从中摘引出个别的概念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M. Cole, S. Scribner, »Einleitung« zu Wygotski, *Mind in Society*, 1978, 1-14; P. Keiler, *Feuerbach, Wygotski & Co.*, Berlin-Hamburg 1997; A. N. Leontjew, *Tätigkeit—Bewußtsein—Persönlichkeit*, Köln 1982; A. R. Lurija, *Sprache und Bewußtsein*, Köln 1982; F. Newman, L. Holzman, *Lev Vygotzky: Revolutionary Scientist*, London u. New York 1993; *Thought and Language*, hgg. u. übers. v. A. Kozulin, Cambridge 1986; J. Wertsch,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Cambridge 1985; L. S. Wygotski, *Denken und Sprechen* (1934), hgg. v. J. Helm, 5. korr. A., Frankfurt/M 1974; ders.,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hgg. v. M. Cole, Cambridge 1978;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Bde., Berlin/DDR u. Köln 1985, 1987; ders., A. R. Luria,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Behavior: Ape, Primitive and Child*, hgg. v. V. Golod, J. Knox, Hillsdale 1993.

阿德里安娜·西尔维娅·邦扎康
（Adriana Silvia Benzaquen）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三

批判心理学（*Kritische Psychologie*）。对环境理论（Milieutheorie）的批判可以依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种批判希望基于主体活动来摆脱决定论的一被动化的假设。克劳斯·霍尔茨坎普特别将第6条当作分析人的生活成就（Lebensgewinnung）的客观规定性和主观规定之间关系的起点。他区分了人的社会本性和人的存在的“整个社会的中介性”（gesamtgesellschaftliche Vermitteltheit）（1983，第192页）。

文化史学派（特别是列昂季耶夫）接下了重构自然史、社会史与个人史之统一的计划，该计划旨在以分析的方式区分心理的生物的、社会的与传记的等方面，对于直接的直观而言，这些方面是密不可分地“混合”着的（参见Holzkamp 1984，第14页）。批判心理学所要处理的窘境是，要从人与世界的联系的自然史基础出发，但又不能将社会关系生物化（biologisieren）。结果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具体的一历史的创造，只有基于一种自

然史框架中产生的自然的社会化潜能，基于人的一种“社会本性”（gesellschaftliche Natur）（1983，第178页及以下），才是可能的。如此，人的本性（自然）与人的社会性就不是对立的（跟精神分析的本能理论的框架完全不一样）。因此，社会关系的人化也必然不会因为人的本性而失败。

人的存在的“整个社会的中介性”的贯彻，恰恰是通过创造一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实现的，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同合作的生活必需品与个人的生活必需品之间的统一的断裂有关，而这种统一在自然史占据主导时还是存在着的。个人的再生产和社会的再生产不再直接相合，这使得有机体与环境的联系不同于人与世界的联系。通过环境条件直接决定有机体的活动，这一点成了世界**含义**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同上书，第233页及以下）。因此，一方面，霍尔茨坎普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为“**含义结构**”，这些含义结构“在其整个社
428 会的指涉联系中是所有行为的总称”，如果要解释社会（再）生产，必须对之详加说明：“另一方面，‘含义’表示每个人与整个社会的行为联系的关系，……因为只有行为实现了在整个社会中同时交织着的含义之后，才能维持或发展每个人的存在”（同上书，第234页）。

作为心理学上“刺激”概念的对立范畴，含义应当使决定与自由之间的专属于人的关系以及客观生活条件与主观行为之间的传统上被心理学撕裂的联系，在心理学上可以被理解为**行为可能性**。个人既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活动，又要与之相对待；这使得他的行为既模棱两可，又具有科学可分析性。由于主体性被理解为物质的社会生活关系的一个方面，因此它不再与社会过程的客观特征相冲突。“我的”主观立场“虽然是我的世界经验和自我经验的出发点，但并不因此具有不可逆转的或‘自在’自足的最终性”（同上书，第538页）。“我的主观经验不会像一堵墙一样立在我与客观实在之间，相反，我可以成功地将我的主观性本身理解为物质的生活成就过程的一个方面，上述情况表明，我对我的经验所‘知道’的东西，能够比从对它的直接描述中得出的东西更多。”（同上书，第539页）

如下一点成了心理学的基本任务，即将社会再生产与个人再生产之间已变得“成问题的”了、具体历史的中介关系，理解成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行为与自我对待：存在的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之间的中介范畴是**行为能力**，它使得如下一点得以可能，即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将社会关系的总和理解为一种通过权力关系和阶级关系建构的、由行为可能性和行为可能性之**丧失**组成的总和，

其可以在适应和集体抵抗之间做出选择。

与传统的心理学不同，系统地将个人行为与作为相互矛盾的行为可能性之总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允许“毫不质疑地就将单个人”规定“为‘具体的’”，而是与之相
429 反，这种做法将诸如“社会”之类的概念视为一般化抽象的结果，“因此，这不是着手处理‘具体的’单个人的行为方式，以至于‘社会’似乎只是一种思维产物”（1972，第 100 页）。“单个人的概念”——如马克思所说的，是“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MEW 3，第 6 页）——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具体的’呈现物（Vorfindlichkeit）”，而是“极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对人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处境进行抽象的结果”（Holzkamp 1972，第 100 页）。一门没有系统考虑个人的具体的—历史的世界联系（Weltbezug）的心理学，也就是以孤立的视角观察个人，撇开了锚定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行为可能性和行为可能性之丧失。这种心理学依然是抽象的，它对个人的研究是“对直接性的固定”（1983，第 410 页）或“伪具体的”（Kosík 1967，第 9 页）。

只有与社会关系的总和联系起来，才有可能区分社交性（Sozialität）和社会性（Gesellschaftlichkeit），或是区分经验的直观方面和非直观方面。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直接直观的经验组成部分**，而是经由各种（亦即制度的）子系统的中介而建构了个人的经验；这种建构化只能以**重建的方式**（参见 Holzkamp 1984，第 14 页）来理解。这些整个社会的结构与直接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区别在分析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里需要重建的**东西**，恰恰是它们的中介联系。

心理学必须包括社会的结构分析，因为世界组成部分的**非直观性绝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经验的**。另一方面，直观上貌似直接的、与语境相关的**社交**联系，并非完全在其直观性中产生的：关于在男女之间、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师生之间、恋人之间的联系中获得的经验，如果人们没有考虑到这些经验是由思想形式和制度建构的，那么这些经验就依然是没有被理解的。同样地，在成问题的情况下，由于锚定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多种指涉，存在于直接既定的含义组合中的可能性并非一下子就可看清的，而只有经由社会结构和直接语境之间的中介联系才可得到澄清。

有些心理学的（或社会科学的）方法错失了这种中介联系，它们（如社会 430
建构主义或符号互动主义）以生活世界语境的绝对化来反对规律（nomothetische）心理学的非历史的普遍主义，或者将社会关系的总和消解为诸多语境的

一种“非结构化的”大杂烩，并且在这种抽象否定中错过了人的社会存在中的具体普遍之物（das Konkret-Allgemeine）。由于“根据‘直接性’模式”来构想“如此被‘中介’的整个社会的联系”，并且“一种思想上重构物质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独立方法论方法被忽略了”，因此，它们也错过了“个人生活世界与整个社会过程之间的矛盾性，因为根据它们的模型，整个社会过程……不能以概念的方式来设想”（Holzkamp 1984，第52页）。

在一则尚未展开的构想中，霍尔茨坎普认为，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于自己的传记，它是个人的主动成就（尽管一切皆有常规），即协调个人的存在的不同领域，而这种存在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可能性。在这种预设下，一种核心的认识兴趣在于，通过阐明“容易理解的”结构联系和尚待揭示的结构联系之间的差异，个人关于成问题的事态的“自我理解”得以可能（1996）。

参考文献：

K. Holzkamp, »Wissenschaftstheoretische Voraussetzungen kritisch-emanzipatorischer Psychologie«, in: ders., *Krit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tende Arbeiten*, Frankfurt/M 1972, 75–146; ders.,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ders., »Kritische Psych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 Psychologie. Der Weg der Kritischen Psychologie zur Subjektwissenschaft«, in: *FKP* 14, AS 114, Berlin/W 1984, 5–55; ders., »Psychologie: Selbstverständigung über Handlungsbegründungen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in: *FKP* 36, *Klaus Holzkamp—Texte aus dem Nachlaß*, Hamburg 1996, 7–112; K. Kosík, *Die Dialektik des Konkreten*, Frankfurt/M 1967.

莫鲁斯·马卡德
（Morus Markard）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natomie,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rbeitsteilung, Artikulation, Basis, Bedeut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nkform, Dialektik, Ebenen, Einheit, Epoche, Erfahrung, Feuerbachscher Materialismus, Feuerbachthesen, Freiheit, funktional-historische Methode, Ganzes, Gefühl, Gemeinwesen, geschichtlicher Block, Gesellschaft,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andlungsfähigkeit, Hierarchie, Ideologie-Theorie,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ndividualitätsformen, Individuum, Integration, Klassengesellschaft, Lebensführung,

letzte Instanz, Maschine, Mechanismus,
431 Metapher, Methode, Milieu, Natur, Regulationismus, Staat, Struktur, strukturelle Kausalität, Subjektwissenschaft, Superstrukturen, Totalität, Überbau, Verhältnisse, Vermittlung, Wesen/Erscheinung, Wesen des Menschen

外化（Entäußerung）

A: tanāzul.

E: exteriorisation, devistiture.

F: extériorisation.

R: otkaz (отказ).

S: exteriorización.

拉丁语中的 *alienatio* 概念既可以用于表示外化，也可以用于表示异化和转让（Veräußerung），其最初表示的是财产的让渡或出售。在自然法的契约论中，例如在卢梭那里，这一概念还意味着个人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这种让渡也许是可以修改的（“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让渡给整个共同体”[l'aliénation totale de chaque associé avec tous ses droits à toute la communauté]，*Contrat Social*，I.6，1964，第360页）。除了这种“关于权利的外化及其在革命中的重新占有的思维模式”（Röttgers 1972，第504页）之外，对于外化的唯心主义版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德语单词与其罗曼语对应词相反，它所说的是从内到外的过渡。由于它与“表现”（Äußerung）相近，所以它（类似于意大利语中的 *esprimere*）既能代表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也能代表一种创作行为。这使得它能够与“设置出来”（Heraussetzen）（作为“自我对象化”）、“排空”（Entleerung）、“耗费”（Verausgabung）或“外表化”（Veräußerlichung）等概念联系起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外化可以为此给出价值中立的中间概念（参见 Garaudy 1962，第75页；Lange 1980，第19页），而与剥夺的联系正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例如新教的语言用法说明的那种联系：在路德对“腓立比书”（Philipper）2.5—2.7的翻译中，耶稣曾经具有“上帝的形态”，他“抛弃自身并采取了奴仆的形式”。在古希腊原文中，ἑαυτὸν ἐκένωσεν（抛弃自身）来自 κενόω（排空、倒空）。拉丁文圣经（Vulgata）将之译为 *semetipsum exinanivit*，其来自 *exinanire*（“倒空”“抢光”）。在这里，放弃行为（Entsagungsakt）被提升为人格理想：“每个人都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怀有抛弃之心。”（entäußern、Entäußerung 的字面意义是抛弃或放弃，而在国内学界，该词通常被译为“外

化”，因此，这里在涉及德国古典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均译为“外化”。——译者）

1. 在德国唯心主义中，这种复杂的含义结构得到了运用，部分用于统治制度，部分用于将对象性全然理解为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在费希特以及特别是
432 黑格尔那里，就已经有了如下见解，即资产阶级的社会化暗含了人与其基本能力的分离。对于他们二人来说，外化也始终意味着自己的活动服从于一种异己的规律性。

费希特将“外化”一词引入了德国哲学。为了使康德的先验主体从单纯形式的东西变成一切现实的整体，他将与之相对的客观性，即“非我”，构想为自律的自我的外化；一旦自我知道它是自己的外化，那么对于自我来说，它就被扬弃了（*Wissenschaftslehre*，W 1，第165页）。这同样适用于认识论和实践哲学：一个自我如果沉湎于感性直观，那么他就是将他的认识力量外化了（*Die Thatsachen des Bewußtseyns*，W 5，第55页）；类似地，一个人如果将道德律当作上帝给的来接受，那么他就是将他的自由外化了（*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W 2，第653—654页）。因此，“外化”概念在内在之物和外在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前者被设想为意识、自律或本质，后者被设想为经验世界、他律或显象。

最初，黑格尔经由对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接受来采用费希特的这个概念（参见 Lukács 1948，第402—403页，第416页）。在《耶拿实在哲学》（*Jenaer Realphilosophie*）中，他将劳动理解为“意识使自身成为物的行为”，这种意识在“一般性的因素”中，在这里就是私人分工产品的可比较性中（这种可比较性对于交换来说是必需的），变成了“一件抽象的劳动产品”（*Realphil*，第214页）。因此，交换中产品的外化就可以被等同于意识在劳动过程中的作为“同一种外化”的“对象化”：活动主体在他的产品中将自身直观为“直接的自我”，而在交换中，他发现了自己“是被承认的”（Anerkanntsein），这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来中介的（同上书，第216—217页）。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使外化成为一个核心概念，用以表示实体与主体之间或客观性与（自我）意识之间努力要达成的同一。因此，对于康德和费希特来说，依然在意识之外的经验（Empirie），应当被纳入“精神”的哲学当中。认识与行为主体的活动首先以其同对象性的关系的各种形式，确立了对象性在概念上的可规定性。在这种发展的结果中，这种活动被视为主体的外

化。在这里，这个概念不再以劳动理论的方式来理解（它在“主人与奴隶”一节中可能有所缺失），而是与异化一起考虑的：在“理性”这一标题下，自我
433 意识最初是现实地变成了单纯的物，而在“精神”一章中，自我意识通过伦理、教化和道德等范畴，第一次被系统地描述为社会的要素。

如果自身（Selbst）是“直接地，也就是没有异化而自在自为地”起作用，那么，它的社会命运要么表现为其实质特性的结果（黑格尔在古希腊悲剧的例子中展示了这一点），要么是从它的目标与他者的目标之间的冲突中产生的（如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它变成释放了的个体性的“激荡因素”的“玩物”（《精神现象学》，第360页）。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它必须外化这种现实，由此，这种现实以社会制度与机制的形态、以异己的和规定的方式面对着它。现在，“它的实体就是这种外化本身，而外化就是实体，或者说就是将自身组织为一个世界并由此维持自身的精神力量”（同上）。现在，自我只有永久地实现这种力量，它才是有效的：“本性和性格的特殊性……纯然是臆想的东西，它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落脚之处，而只有在这个世界中，自我外化着的东西……才能获得现实性。”（同上书，第364页）

对于黑格尔来说，在社会中，只有以恐怖为代价才能取消这种外化。导致这种恐怖的，是以摧毁中介的方式重新占有被外化之物，这就是革命（这里指的是法国大革命）。

因此，一旦关于“天启宗教”的那一章开始撤回外化，它就不再被设想为对异化了的社会性（它是统治秩序）的接受或再生产，而是被设想为对一般对象性的创造。虽然自我意识已经可以由此将这种对象性理解为“它自己的外化”；但是，为了使自我意识不是自在的，这种对象性必须独立于自我意识所把握的东西，即依然保持为一种外部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必须“同样”外化“其自身”，并“成为自我意识”（同上书，第550页）。现在，由于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上帝本身变成了人并因此变成了被牺牲的自我意识的实质客观性，这种外化就以宗教天启的形态发生了。

为了使“精神”最终能够“在其外化中”作为“关于自身的知识”（同上书，第552页）出现，在“绝对知识”中，天启就转变成了对自身的认识。一方面，黑格尔通过跟随费希特提出如下论证而实现了这一点：“还应当理解为，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了物性（Dingheit），并且，这种外化不仅具有否定含义，而且也具有肯定含义，它不

434 仅是为我们或自在地具有肯定含义，而且也是为其自身而具有肯定含义。”（同上书，第575页）但是，另一方面，他可以以他现在已经展开的现象学的如下基本观念为依据：各形态的总合——显现着的精神在“意识的运动”（同上）中经历了这种总合——应当既被视为对象世界，又被视为精神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纯粹自身关系。精神的“存在作为空间”被等同于自然，“它的纯粹自身作为时间”被等同于历史（同上书，第590页）。然而，这两方面一旦被认识为外化，它们就在“绝对知识”的“内化”（Er-Innerung）（在这里，黑格尔并未使用Erinnerung的写法，意在说明，该词不仅具有通常的回忆的含义，而且还意味着一个内化的行动和结果，并且后一含义是更为重要的。——译者）（同上书，第591页）中被扬弃了。

在黑格尔后期著作中，特别是在《美学讲演录》（*Ästhetik*）中，外化偶尔还会被使用，但是，由于他现在相信自己已经克服了意识哲学的方法，因此，这个概念既没有添加新的含义成分，也没有将曾在《精神现象学》中共同起作用的全部概念联合起来。然而，“理念在……其分裂中的定在”（*RPh*，§184）依然是黑格尔整个哲学的基本图式，这种定在只有通过外化及其假定的撤回才是可以设想的，黑格尔在以形而上学方式所委婉表达的现代性诊断中，使这种定在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

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详细地反思了外化，在这里，他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因为他将外化（在这里，它与异化是同义的）理解为对如下这一点不可避免的、否定的表达：在私有制的统治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实际状况”（MEW 40，第512页）中，人在劳动过程中或在社会与历史中将自身对象化了。如果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他的理论就如“神学”那样，即“将人一分为二并外化了，为的是之后将被外化的本质再度与人同一起来”（1842，AS，第84页；参见Mehring，GS 13，第104页）；那么，马克思则是将这种诸如神学意义上的外化理解为社会实在——这强化了黑格尔做法的丑闻：妨害这种丑闻的，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MEW 40，第572页）。因为黑格尔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异化或外化只能是一种受到社会限制的异化或外化，所以他是在异化了的范畴中思考自身的；他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是外化的……思维”

（同上书，第571—572页）。精神也在其外化中，例如在宗教和国家中认清自
435 身，哲学家的抽象知识不顾及一切异己规定性（Fremdbestimmtheit），而认为外化已经被扬弃了。黑格尔所说的被外化之物的“回忆”（Er-Innerung），只能是异化了的社会秩序的内在化（Verinnerlichung）（参见上书，第581页）。

在进行这种批判时，马克思无疑是用一种就其各方面而言与黑格尔的概念并无不同的概念在工作的：当他假定“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同上书，第575页）时，不仅如下观念是有问题的，即一个被认为是异化了的社会（Soziales）可以完全被重新占有。毋宁说，隐藏在“人的对象化”（同上书，第573页）或“人的自我产生”（同上书，第574页）背后的，几乎只有唯心主义的外化，这种外化是从异化思想中纯化出来的，并用人类学化的术语做了重新表述。马克思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在这里，他直接用新的概念来描述外化：“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同上书，第512页）在这里，占有所形成的与外化的关联，不再是乌托邦式的，而是现实中可共同思考的，因此，一种在劳动理论中细化了的概念用法就进入了可能之物的领域当中——“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也就是一种受到异己规定的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同上书，第520页），这种劳动不断重新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工人被剥夺了对其活动与产品的支配权。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经由对劳动力这一商品的分析，马克思获得了一个相应的新的外化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具有劳动形式的活动都依赖于一种流通，“在这种运动中，一般外化表现为一般占有，一般占有表现为一般外化”（MEW 42，第127页）。同时，它们的动机在于，摆脱了占有（Besitz）和义务（Bindung）的劳动力看到，自己被迫地创造其“创造性的力量”、价值和使用价值，被迫地换取已经“对象化了的劳动”即现有财富。劳动力的自身外化直接就是异己积累（Fremdakkumulation）：工人“为了取得对象化在他身上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动时间”，由此，这种劳动时间就被并入客观化了的劳动时间当中。“这样，交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私有制的规律……即对自己 436
劳动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动外化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系。”（同上书，第575

页）因此，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关键不在于一种无论如何都是具体的“物化（Vergegenständlichtsein），而在于异化（Entfremdetsein）、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同上书，第722页）。由此，黑格尔的外化的本质性要素同时发生了转变：工人在一般的价值媒介中将自己的活劳动力外在化了；资本尽管是一种自身对象化了的、抽象的或被外化了的活劳动，但它依然占有自身，并因此作为异己力量与活劳动相对立，这种力量已经屈服于社会生产率的总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再使用外化概念，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唯心主义的基因。然而，在分析商品的拜物教特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在涉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运动形式）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保持的那种精确意义依然是在场的。

3. 如果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就已经知道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那么他的物化命题可能就必须明确涉及外化了。实际上，他的这一黑格尔化的马克思解读所围绕的，恰恰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在外化概念之下所理解的那些现象：一方面，他主张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对象性形式的不断翻转的历史，这些对象性形式塑造了人的定在”（*Guk*，第321页）；另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变成了“商品的自我意识”（同上书，第295页）并由此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特有的“物化”，所以无产阶级就变成了“历史的同一的主客体”（同上书，第339页）。在1967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补充的“前言”中，卢卡奇接受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的“外化”用法的批判，他承认，当时通过将“异化与对象化”等同，试图和黑格尔一样，实现一种类似的“对象的现实的终结”（同上书，第25页）。然而，他在这里对马克思早期的对象化模型的简单接受，也使他放弃 437
了1922年时提出的一些重要洞见。例如，当他断言“对象化事实上”是“人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消除的表现方式”（同上书，第26页）时，他就又回到了黑格尔式的“使自身变成物”的意识。

马尔库塞就是在这一方向上展开的，他尝试从1932年新发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读出马克思的“基本范畴的原初意义”（1932年，第136页），在此，这种意义将不仅可以被理

解为“国民经济学概念”，而且也可以被理解为表示“人的本质的历史中的决定性事件的概念”（同上书，第141页）。他的主要观点是，“对象化变成物化，表现变成外化”这种历史可能性，奠基在“人的本质的二分中，也就是使自身成为对象的”（同上书，第149页）。因此，他也给马克思装配了一种哲学人类学，而这正是马克思在其成熟著作中有理由拒绝的。

阿多诺以一种更具怀疑论色彩的方式处理这一概念，他以一种几乎没有受到马克思影响的黑格尔批判明确地表明，在他的“外化”用法中，为何那种强烈的黑格尔化的“外化”用法几乎没有出现：“‘外化’这个词要求私人的任意（Willkür）摆脱对私人意志（Wille）的遵从，恰恰由于它明确地坚持认为外部之物是制度上与主体对立的东西，因而它才无视一切关于和解的保证，坚持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一直是不可和解的，这本身构成了辩证批判的主题。”（Adorno 1951，第332页）

对于阿多诺来说，存在于实现主客和解这一要求（它被表达为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当中的那种唯心主义，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那里是以一种更加自信的方式出现的。例如，布洛赫在其《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的著名的结束段落中，追求的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总体性思想（虽然它是以乌托邦的方式应用的，但终究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他主张，“历史的根基”是“劳动的、创造的、改造并超越对象性的人”，并由这一主张出发，将外化的完全消灭当作历史的目标插入进来：“如果人掌握了自己，并将没有外化与异化的存在奠基于真正的民主当中，那么，在世界中就会产生一个地方，它对于所有人的孩童时代来说都曾闪现但又没人去过，这就是家乡。”（GA 5/2，第1628页）

因此，可以推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一种普遍外化的黑格尔式概念总是在如下这些情况中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要么是像这样要形成一种思想上的 438
原则（作为一切社会现实的起点），例如商品结构、劳动的人、辩证的启蒙；要么与此互补，即要努力实现对异化了的社会结构的完全重新占有。与之相反，这一概念起作用的方式不仅指明了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在哪些地方依旧必然是局部性的，而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即普遍的整合也总意味着全面的排除。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M 1951;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GA 5; L.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2), AS

I, 82–99; J. G. Fichte, *Werke*, hgg. v. I. H. Fichte, Leipzig 1924; R. Garaudy, *Dieu est mort*, Paris 1962; G. W. F. Hegel, *Jenaer Realphilosophie*, hg. von J. Hoffmeister, Hamburg 1969; G. Irrlitz, »Entäußerung«, PhWb, 287–89; E. M. Lange, *Das Prinzip Arbeit*, Frankfurt/M-Berlin, Wien 1980; 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Zürich 1948; H.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in: *Die Gesellschaft*, 9. Jg., 1932, Bd. 2, 136–74; K. Röttgers, »Entäußerung«, HWPh 2, 1972, 105f; J. - J. Rousseau, *Oeuvres complètes* 3, Paris 1964.

蒂尔曼·赖茨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bstrakte Arbeit, allgemeine Arbeit, Aneignung, Anerkennung, Arbeit, Aufhebung, Ausdruck, Bewusstsein, Dialektik, Eigentum/Besitz, Entfremdung, Erinnerung, Erscheinung, Existenz, Freiheit, Geist, Gesellschaftsvertrag, Hegelianismus, Hegel-Kritik, Ich, innen/außen, Kontraktualismus, lebendige Arbeit, Materialismus, Mehrwert, Privateigentum, Revolution, Subjekt, Subjekt-Objekt, Totalität, Verdinglichung, Vergegenständlichung, Vermittlung, Wesen/Erscheinung

脱嵌（Entbettung）

A: iḫrāǧ šay' min iṭārihi.

E: disembedding.

F: désencastrement.

R: dizėmbedding, lišenie ballastnogo sloja (лишение балластного слоя).

S: desarraigar.

随着“嵌在战后经济秩序当中的自由主义”（Ruggie 1982）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被消除，“脱嵌”成了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语。围绕“去管制”（Deregulierung）展开的争辩使人们注意到，“纯粹的”（无管制的）市场是一种非历史的模型假设，但是，脱嵌的特殊推动力（其在某种程度上使真实的市场近似于这种模型）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历史。

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然而，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经济化”（Vermarktwirtschaftlichung），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货币和资本向二阶商品的转化，都是近世之事，并且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才真正成为决定性的、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

439

主义原则。从这一时期开始，“市场经济”（Marktwirtschaft）才有可能被说成是一种社会总体；在此之前，至多是有“集市经济”（Märktewirtschaft）（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语）。实际上，作为劳动的普遍化的和全球化的社会耗费形式，“自由的雇佣劳动”早就不存在了。在早期资本主义中，家庭（参见 Hobsbawm 1995，第 429—430 页）负责创造“对劳动的自然偏好”，也就是负责忠诚和培养后来所谓的“次级美德”。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历史所表明的那样，雇佣工人是被暴力强迫着走向“自由”的。

布罗代尔认为，这种“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前就已经发生了（1968a，第 44 页及以下），而波兰尼（Polanyi）则认为，这是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才出现的，至少就英国的情况而言是这样的（1978）。经济脱嵌于社会，同时给社会强加了经济的规则。总体的市场经济是自工业革命时代起才存在的，它将自然和劳动力转变为商品，并在资本主义积累制度下对之施以强制。波兰尼将导致这一点的过程（“大转型”）描述为“脱嵌”（disembedding）过程，即市场经济脱嵌于管制经济并指导控制人的行为的社会座架（Bett）。市场经济化不仅挤入尚未被掌握的地理空间，而且也向内挤入社会生活的避难所中。它在新自由主义中找到了其理论表达，新自由主义认为，人在一切社会领域中的行为合理性都是通过经济的目的—手段逻辑（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工具合理性）来奠基的。经济原则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与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里，经济是受到社会纽带束缚的，是嵌在文化和历史当中的。哈贝马斯将这一过程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Kolonisierung der Lebenswelt）（1982，特别是第 2 章，第 489 页及以下）。他呼吁将对社群主义的批判纳入议事日程，这不仅是因为意义丧失和对团结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些是不可避免地随着社会关系的合理经济化而来的，而且还因为社会在脱嵌过程中摆脱了其 440
共同性（Gemeinschaftlichkeit）资源，这些社会经历了相当大的效率损失。波兰尼的批判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主张对市场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管制，为的是避免它如“撒旦的磨坊”（Satansmühle）那样运作。管制学派的代表也追溯至波兰尼，他们将经济解释为一种社会活动，在其中，管制机构被历史地创建起来，它们各自构成了“管制方式”。

脱嵌论题的如下方面特别引人注意：（1）可以记录脱嵌或“脱嵌机制”（吉登斯语）的历史过程的各阶段，波兰尼并没有意识到所有这些阶段；（2）脱嵌

过程的强度因如下一点而增强了，即市场的货币具有了相对于“脱嵌了的市场”（*disembedded market*）的独立性；（3）经济被全球化了；（4）一种全球性的时空制度逐渐形成了，它是与本地的和区域的、植根于文化的时空经验相对的，具体的社会空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毫无意义了；（5）但是，这种动态只有因为如下一点才是可能的，即脱嵌机制将配备有一种强大的推进力——化石能源和核能，它们取代了人和动物的有限的生物能。

1. 脱嵌的第一个阶段是波兰尼所描述的经济与社会的脱离。当然，这只是一个更广泛的脱嵌进程的一部分。安东尼·吉登斯是在指出如下一点时强调这一方面的：“技术效率或专业知识的……专家体系”建立起来了，“这些专家体系塑造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广泛的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1995，第40—41页）。吉登斯给出的专家群体的例子（律师、建筑师、医生等）是指“风险社会”中的分工体系内的职能承担者，他们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其职能的发挥对于所有人的社会行为的正常性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专家体系之所以作为脱嵌机制起作用，是因为它们如象征符号那样，可以使社会关系脱离其语境中直接给定的东西”（第42页）。

2. 一个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市场是极其不合理的。然而，货币不只是一种完全遵守商品交换规律的交往或流通媒介。 441
可以说，它作为“货币”给予它一种与社会性的联系、纽带、语境相对的自主的生命（Eigenleben）；它为谈及脱嵌的“第二阶段”做了辩护。在这里，它涉及的是亚里士多德已经质疑的抽象的谋生追求，它避开了社会中“好的生活”的标准。与化石能源结合着的货币将“大转型”推向了全球层面。

3. 只有到现在，全球化才是有可能的，它不再仅仅是零星的发现之旅或历史上独特的掠夺战争。由此就形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货币领域，它是与真实经济过程脱节的。马克思在其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正确地表明了，作为一切价值（不能与“质料性的”使用价值相混淆）之塑造者的劳动，最终如何以特殊的形式通过货币运动而被社会化了。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它用货币来破译自己的运动规律。因而，人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疏离化得以可能，经济脱嵌于社会，货币与经济脱节，但随后又将其逻辑强加给经济，这种逻辑迫使社会将之当作“外在强制”（Sachzwang）来服从。由此，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在信贷和债务的意义上定义的”（Giddens 1995，第

39 页，第 36 页）。只有当货币解除了它与商品世界之间的纽带时，它才能“作为货币”起作用，吉登斯在西美尔之后有些无奈地描述了这一点：“因现代货币经济而可能的脱嵌，比在已有货币的前现代文明时期具有更大的规模。”（同上书，第 37 页）

4. 只有当时空与受日常世界之限的陈词滥调（Banalität）的直接性的脱离在物质上和能量上变得可能之后，货币之作为货币的自身运动才会有效。只有到了现在，货币才成了结合遥远的时空和重新组织时空坐标的绝佳工具。尽管商品所有者仍然必须在时空的意义上出现在市场上来交换他们的商品，但是这
442 在货币关系中已经变得多余了。因而，脱嵌机制对一切社会时间节奏都有影响。它们服从的是脱嵌了的经济逻辑，而非社会和文化的“原时”（Eigenzeiten）。信贷的期限规定了全球时间模式的节奏。债务的到期支付——它不再像在农业社会中那样是收获周期或像在“大型工业”中那样是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界定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中的行动视域和循环的周期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世界文化将会融合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混合文化**（*Hybridkultur*），这与具有“原教旨主义的”特征的抵抗是相对的。在那种如脱嵌论题所阐述的消除了社会纽带的市场中，当下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历史时期**（*Zeitraum*）汇聚到一个**时间点**（*Zeitpunkt*）上，它的坐标不再是在自然的理性空间中，而是在经济的理性空间中。当下掌控着过去和未来。未来出现时，至多是作为折现（abdiskontiert）价值的当下，作为“呈现出来的未来”（Anders 1972，第 123 页），或作为一种简单的外推，作为一种“去未来化了的”未来（同上书，第 125 页），因此在之后的时间中，未来就转变成一种脱离了历史的当下。最好的未来是与当下类似的，是一种“当下＋”（Gegenwart plus），而过去则是一种作为倒影的“当下－”（Gegenwart minus）。因此，时间轴不是历史上不可逆的、有指向的时间箭头，而是像围绕着一个中心旋转的辐条那样，并且明显是以当下为特征的，它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5. 在扩展波兰尼的论证并超越吉登斯时，必须指出，自 18 世纪以来，化石能源的广泛使用表明了人类能力的扩展，同时也表明人类摆脱了其时空限制。只有到现在，在现代时间制度所塑造的时间中的加速才是可能的。现在，也可以用新的交通手段和交往手段来开辟空间，并且完全可以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升为资本积累的原则（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也用“劳

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MEW 23，第 531 页及以下）概念来表示工业中提高生产率的方法。由此所说的只是如下
443 这点，即劳动（也可以附加上自然条件）对资本统治的服从，不过是表现为对传统社会形式的脱嵌。由于与传统纽带相对的技术—社会进步，脱嵌过程也被视为视域的扩展。

脱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结果反过来作为外在强制影响了社会，社会必须去适应这些外在强制。如何实现这种适应，这成为一个合理决策的问题，这种决策是由专家体系（Giddens 1995）做好准备并以科学的方式伴随着的。脱嵌导致的是，商品和货币看似无害的“拜物教特征”——马克思根据商品形式分析了这种“拜物教特征”（MEW 23，第 85 页及以下）——在当代世界市场上，转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物神**，它具有超出其创造者的全球性力量（参见 Altvater/Mahnkopf 1996，第 112 页及以下）。货币拜物教变成了外在强制。脱嵌机制具有致命后果，即它们创造了具有一系列标准的实在，这些标准对社会来说是具有约束力的，即使社会应当抵制这些标准的有效性。一旦听任市场机制的摆布、服从全球性的时空制度并依赖于货币价格（利率和汇率），那么，社会就必须适应已脱嵌的经济机制，因而必须持续贯彻“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以保持竞争力，或是屈服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所实施的“结构调整计划”。因此，不仅存在着脱嵌机制，而且也存在着“外在强制机制”。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B. Mahnkopf, *Grenzen der Globalisierung—Ökonomie, Ökologie und Politik in der Weltgesellschaft*, Münster 1996; G. Anders, *Endzeit und Zeitenende. Gedanken über die atomare Situation*, München 1972; F. Braudel,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Der Handel*, München 1986a; ders.,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Aufbruch zur Weltwirtschaft*, München 1986b; A. Giddens, *Konsequenzen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95; J.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ände, Frankfurt/M 1981; E. Hobsbawm, *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Wien-München 1995; K.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Frankfurt/M 1978; ders., *Ökonomie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9; J.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 *Int. Organization*, 36,

Jg., 1982, Nr. 2, 379-416.

444 埃尔玛·阿尔特瓦特
（Elmar Altvater）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kkumulation, Energie, Fetischcharakter, Finanzkapital, Form,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Freiheit, Fundamentalismus, Geld, Gewalt, Globalisierung, Kommunitarismus, Kredit, Kultur, Marktwirtschaft, Neoliberalismus, Rationalität, Raum, Regulationismus, Sinn, Solidarität, Tradition, Verselbständigung, Weltmarkt, Wertformanalyse, Zeit, Zukunft

剥夺、没收（Enteignung）

A: naza'u milikīya.

E: expropriation.

F: expropriation.

R: ėkspropriacija (экспроприация).

S: expropiación.

一

1.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剥夺——作为单方面行为，是指取消对一件财物的现存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其著作中，他们在四种不同联系中讨论了“剥夺”或“没收”（Enteignung，Expropriation）概念。

1.1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所谓的原始积累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原始剥夺**”，其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MEW 16，第131页），导致“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条件”（MEW 25，第886页）。这种“原始”剥夺的基础是“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MEW 23，第744页；MEW 25，第627—628页）。这里涉及的是从“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的所有权或……小农所有权”转变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形式（MEW 25，第630页）。封建剥削向资本主义剥削的转变对于欧洲历史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种转变在于奴役形式的改变：直接生产者（农奴或帮工）摆脱了臣属关系和行会强制并由此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MEW 23，第743页）。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由暴力活动书写的，“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同上）。随着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MEW 40，第

506页)。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土地所有者是“完全多余的”，是“无用的赘疣”(*a useless superfetation*)(MEW 26.2，第38—39页)。

445 1.2 **资本家对资本家的剥夺**。一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自立，那么就开始了资本家对资本家的剥夺，这与对直接生产者的不断剥夺是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MEW 25，第229、251页)。“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MEW 23，第790页)。“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MEW 25，第256页)，这导致“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大规模“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属于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同上)。在这里，信贷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MEW 25，第456页[原文误写为“同上”。——译者])

1.3 **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剥夺**。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不断社会化，使得国家干预变得至关重要。一旦“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股份公司的形式不敷其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MEW 20，第259页)。当这样一种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时，它就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进步”和一个“为社会本身占有……作准备的阶段”(第259页)。然而，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因为“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MEW 20，第260页)。因此，如下观点被认为是“冒牌的社会主义”，即“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是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写道：“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 446
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

施了。”（第259页）

1.4 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的剥夺。《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说过，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将利用其政治权力，“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在此，“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是至关重要的（MEW 4，第481页）。在“最先进的国家”中直接必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同上）。三十年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重复了这一思想：“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MEW 20，第262页）。随着这种占有，民主社会将会出现，它能够“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MEW 17，第343页；MEW 19，第104页）。同时，“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也要消失了”（MEW 21，第77页）。恩格斯构想了一种“垄断的国家银行”以作为可能的过渡形式。他考虑了蒲鲁东的一个想法。蒲鲁东在1851年7月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一书中建议，通过银行改革和货币改革来实现社会改造。他计划通过降低利率来逐步剥夺所有银行家和食利者。恩格斯认为，如果这一计划由一种“垄断的国家银行”来实现，那么它在“某个时候也许可能是需要的”，以“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的最后措施”（MEW 27，第310页）。

在《资本论》中，直接生产者剥夺资本家的条件是由“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的过程提供的，这一过程为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创造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确而言之，是通过“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MEW 23，第790—791页）。由于积聚和集中的不断发展，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资本家越来越不重要了。“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MEW 25，第256页）

447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对资本的剥夺则是相对迅速地执行的。“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MEW 23，第 791 页）对资本家的剥夺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过程，它将长期持续，“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MEW 7，第 248 页）。这种全球性的变革将从英国开始（MEW 8，第 545 页）。英国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MEW 10，第 126 页）。

革命性的剥夺仅针对资本家和大地产占有者。恩格斯在 1894 年写道：“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
448 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MEW 22，第 499 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否在有补偿的情况下进行剥夺，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非基本问题。马克思赞赏巴黎公社的审慎周到，因为它将“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MEW 17，第 347 页；参见 MEW 18，第 285 页）。1894 年，恩格斯记下了对大土地占有者的剥夺，“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MEW 22，第 504 页）。剥夺不仅涉及生产资料，也涉及耐用消费品，尤其是住宅。根据恩格斯，住房短缺的社会革命，将通过“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MEW 18，第 226—227 页）而结束。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衰过程形成了一种剥夺辩证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MEW 23，第 791 页）马克思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

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MEW 20，第 124 页）

2. 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剥夺的前三种形式很少或从未引起争议，而剥夺的第四种形式却引起了许多争议，这些争议经常但不限于在革命（革命前）或急迫的反革命条件下爆发。第一次重要的争辩发生在 1906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
449 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其最重要的发言人是列宁）主张土地国有化，为的是消除封建主义并使工人运动能够和农民结盟。布尔什维克的出发点是世界历史五阶段的线性发展模式（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与之相反，孟什维克的格奥尔基·W. 普列汉诺夫（Georgi W. Plechanow）、尤利乌斯·O. 马尔托夫（Julius O. Martow）、亚历山大·S. 马尔丁诺夫（Alexander S. Martynow）、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更倾向于从俄国的特殊历史遗产，而非普遍主义的社会范畴的角度来看待俄国”（Sawer 1981，第 15 页）；他们的观点是，俄国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富营养化的国家（hypertrophierten Staat），据此，他们认为，应该削弱而非加强中央国家，因此绝不能将土地国有化，而是必须地方化。最终，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更为一致地遵循了孟什维克的分析，而且做出决议要求“没收私人地产（小地产除外）并将之移交给民主选举出的地方自治机构”（*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第 43 页）。

在《金融资本》（*Das Finanzkapital*，1910）中，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如下思想，即资本通过其积聚和集中为克服自身创造了条件。他预告说，资本主义卡特尔化的最后阶段是总卡特尔（Generalkartell）。“它是被有意识地调节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处于对抗形式中的。但是，这种对抗是关于分配的对抗。这种对抗本身是被有意识地调节的，因此，货币的必要性消失了。金融资本在完成过程中脱离了其由以产生的温床。”（1910，第 295 页）由此，向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过渡实际上只是一个民主化过程，它将使总卡特尔处于工人阶级的统治之下。

列宁曾长期经常或多或少在字面上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而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或补充（例如 LW 2，第 100 页），之后才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理论重点。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中，紧接着希法亭的分析，他写道：“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组织原料的供应，其数量达几千万居

民所必需……；既然运送这些原料……
450 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原料的依次加工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所有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进行的……那就看得很清楚，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LW 22，第 308 页）与这种论证相平行，除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外，列宁开始将剥夺银行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性方面（LW 23，第 14 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提出但不限于如下思想，即无产阶级革命所执行的剥夺，要求重组国家机构，因为“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LW 2，第 447 页）。同时，列宁认为，对资本家的剥夺将“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第 482 页）。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中，他终于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即只有当能够有效地管理剥夺而来的企业、商品和财富时，剥夺行为才是有意义的。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Sowjetmacht*）中，他写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LW 27，第 236 页）

尼古拉·布哈林在一种更高的抽象层次上主张如下观点，即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作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高发展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少数寡头剥削群众的最完美形式。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则使任何剥削都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它把集体资本主义的财产及其私人资本主义形式转变成集体无产阶级的‘财产’。因此，从本质上讲，尽管二者形式上相似，但还是截然对立的。”（1922，第 131 页）因此，需要严格区分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如果人们没有如资产阶级科学的代表所做 451
的那样，将国家机构视为一种具有中立神秘的本性的组织，那么人们还必须看到，国家的所有职能都具有一种阶级特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的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形态。正如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定，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对立面那样，无产阶级的国有化也是否定，是与资产阶级国有化完全对立的。”（同上书，第 136 页）

在俄国之外，自“一战”结束后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也促发了进一步的讨论。罗莎·卢森堡在 1918 年德国共产党成立时的讲话中提出，要警惕一种官僚主义的剥夺政策。在引用了前文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剥夺的要求之后，

她说道："如您所见，我们今天虽然直接面临着同样的任务，但还是有些差别的。"（GW 4，第 488 页）然而同时，她指出，剥夺不能是一项纯粹的行政措施，工人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社会主义不是也不能通过政令建立起来，即使是相当优秀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做不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群众、通过每一位无产者建立起来。他们在资本链条的哪处被锻造，该链条就必须在哪处被打破。"（同上书，第 502 页）

不久之后，卡尔·考茨基从社会民主方面出发指出，要警惕仓促的剥夺。在革命后，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过渡时期，因为不同生产部门能够进行国有化的成熟程度是不同的。"股份公司比单一资本家的企业更易国有化；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易国有化；卡特尔化的企业比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企业更易国有化；主要服务国内市场的企业比主要参与世界市场的企业更易国有化。此外，销路更有保障的企业比必须寻找销路的企业更易国有化；只生产较少的、类型单一的企业比生产量大、款式多样的企业更易国有化；等等。"（1919，第 30 页）但是，那些暂时必须继续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只有在抄没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被国有化。"出于经济的原因，为了不受干扰地进行生产，迫切值得做的是，为一切其占有者绝不应受到惩罚的企业制定清偿原则。"（同上书，第 31 页）

1919 年，奥托·鲍威尔接受了这一分析并做了深化。"今天的问题不再是剥夺是否应当执行，而是应当如何执行。这不能也不应以一种粗暴抄没资本主义财产和封建领主财产的形式进行，因为以这种形式进行剥夺的话，只能以生产资料的巨大破坏为代价，因这种破坏，人民群众自己将会陷入贫困，国民收入的来源将会被埋葬。"（1976，第 124 页）如果剥夺是"以有序的、调节的方式执行的"，那么税收就是最重要的手段。因此，鲍威尔建议，"平均征收有产阶级的总财富的六分之一的（逐步拟定的）财产税"来支付补偿。这样一种操作的结果就是，"有产阶级自己必须通过放弃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来筹措补偿金，以此为代价，社会将把重工业和大地产划归自己所有"（同上书，第 126 页）。

3. 对国有化的批判。直到"一战"结束，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都默认，剥夺总是由中央或地方的国家机关执行的。格尔方德·I. 帕尔乌斯（Helphand I. Parvus）等人指出了由此在国家富营养化过程中潜伏着的危险。在将银行团、工业卡特尔和辛迪加国有化时，国家不仅将极大增强其政治权力，而且还将获得"巨大的经济权力"（1919，第 50 页），只有当人民群众有足够的民主控

制手段来支配这个利维坦时，这种经济权力才是可接受的。因此，一种以国有化方式进行的剥夺，必须补充以全面的议会民主、人民组织、出版自由、强大的工会、消费合作社等等（第51页）。在《什么是社会化》（*Was ist Sozialisierung?*，1919）中，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打破了潜在的共识（即剥夺等于国有化），由此迈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他采用了辛迪加主义理论的因素，以此来辩护如下两个主要论点。**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对资本的剥夺能够以两
453 种形式出现，分别是："生产资料从私人权力领域转移到整体（Gesamtheit）的公共机构的权力领域（国有化、地方化等）"："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者的占有过渡到全体生产参与者的共同占有（以生产合作社形式进行的辛迪加式社会化）"（GA 2，第116页）。这两条道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不违背社会主义理念"（同上书，第114页）。**其次**，柯尔施认为，剥夺的这些变体本身是不够的。需要对所有权概念进行一种内部转换，这种转换将新的生产负责人的权限以公法的形式限制在"整体的利益之中"（同上书，第117页）。

对剥夺与国有化之等同的批判，在议会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达到了顶点。在这里相当重要的是其集体作品《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的基本原则》（*Grundprinzipien kommunistischer Produktion und Verteilung*，1930）。在该书中，希法亭等社会民主党人和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都因主张剥夺政策而遭到了指责，因为这一政策包含了对工人阶级权力的取消。国有化必然导致对工人群体的"强烈压制"。"从政治或经济角度来看，所有想与中央管理不同的对立元素都遭到了暴力机构的压制。这样，马克思曾宣告的**生产者的自由平等的联合**，就变成了我们对之还不甚了解的监狱国家。"（1930，第13—14页）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的剥夺是自发地、"由下而上"发生的，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来完成。而后，单个的企业和工业能够"水平地和垂直地结合成一个有计划的整体，而所有部分都以机器、基本材料和辅助材料以及劳动力的损耗的形式来记录所耗费劳动时间"（同上书，第23页）。

20世纪30年代初，在剥夺问题上呈现出的就是以上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重要的新元素加入到了争辩当中。特别有影响的是亚力克·诺夫（Alec Nove）关于《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1983）的研究，它在谈到英国和苏联的经验时，对相当广泛的国有化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并且，与柯尔施的思路大致相同的是，它主张将国有大型企业、自治

454 公司和私人小企业结合起来。诺夫的贡献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参见 Mandel 1986；Blackburn 1991），也促使戴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提出了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剥夺政策的建议。她不仅强调要克服消费和生产之间的撕裂，而且说明了相关信息的民主化比先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变体所主张的都重要得多。公开获取信息是“有意识地控制经济的关键”。“在解释有意识的控制时，从马克思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就倾向于从如下角度来解释，即收集一个决策点上的所有相关信息，并在充分了解所有相互联系和后果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和不值得追求的目标。”与此相反，重要的是使每个决策者都能获得与所有同类人都相同的信息（1988，第 43 页）。

参考文献：

O. Bauer,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1919), WA 2, Wien 1976, 89–131; R. Blackburn (Hg.),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1991; N. Bucharin, *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Hamburg 1922; H. Cunow, »Verstaatlichung«, in: *NZ*, 37. Jg., 1919, I, H. 10, 217–23; D. Elson,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in: *NLR* 172, 1988, 3–44; W. Greiling, *Marxismus und Sozialisierungstheorie*, Berlin 1923; *Grundprinzipien kommunistischer Verteilung und Produktion*, Kollektivarbeit der Gruppe Internationaler Kommunisten (Holland), Berlin 1930; R.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Eine Studie über die jüngst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Wien 1910; K. Kautsky, »Ablösung oder Konfiskation«, Anh. II, in: ders., *Was ist Sozialisierung?*, Berlin ^{2}1919, 28–32; R. Luxemburg, »Unser Programm und die politische Situation« (Rede auf dem Gründungsparteitag der KPD [Spartakusbund] 1918), GW 4, 486–511; E. Mandel,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in: *NLR* 159, 1986, 5–37; A. Nove,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1983; H. Parvus, *Die Verstaatlichung der Banken*, Berlin 1919; M. Sawer, »The Politics of Historiography, Russian Soci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1906–1931«, in: *Critique*, 1978/79, Nr. 10/11, 15–35; *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in einem unterentwickelten Land. Texte der Menschewiki zur russischen Revolution und zum Sowjetstaat 1903–1937*, Hamburg 1981.

马塞尔·范·德尔·林登
（Marcel van der Linden）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二

德国资产阶级宪法中关于剥夺的表述。在争取加强民主宪法思想和反对拆解福利国家结构（例如对承租人的保护）的过程中，以宪法形式规定的对公众利益的剥夺可能性扮演着重要的角
455 色。《魏玛宪法》第一次规定了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Sozialbindung des Eigentums*）（参见第153条第1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为《基本法》。——译者）第15条中包含了将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可能性，第14条第1款规定，立法机关有权根据这一任务的简单法律来相应地重新定义财产概念，以及有权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组织经济。根据第79条第3款，在第20条的“社会与民主的国家”这一表述中，这种经济体制改造的前景被确保在宪法上不会发生任何可能的变化。这种宪法上的妥协是“《基本法》得以完成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Abendroth 1981，第336页）。在当时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党团与基督教民主党党团一样强大。基督教民主联盟中的左派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也希望能够阻止垄断资本主义占有关系的完全恢复。

在20世纪50到60年代，立法在规定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时表现得相当克制。作为“社会市场经济”这一决定的结果，所有者的权利系统地扩展到了经济权利和地产权利的一切领域当中。与此相反，从20世纪70年代初起，立法机关出于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加强了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例如在消费者权利、环境权利、建筑权利和租赁权利等方面（参见Brünneck 1989，第127—128页）。

联邦最高法院在规定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的宪法界限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它提出如下学说，即超出《基本法》所允许的无偿剥夺范围而做出的对财产权的限制，是应当给予补偿的。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特别牺牲学说”（Sonderopferlehre）的标准，规定了无偿的社会公益义务和有偿的剥夺之间的界限。“特别牺牲学说”是从如下一点出发的，即无偿的剥夺的合法性不取决于任何能够为这种剥夺辩护的公共福利利益的意义，而仅取决于，相关的所有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者而言，是否做出了“特别牺牲”。

财产的社会公益义务本身并不是一项基本权利。因而，几乎不可能设想有某种程序允许因此受益之人就此向联邦
456 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参见Eckertz 1989，第138页）。社会国家的规定依然分散在《基本法》的条款中，而没有遵循一种自成一体的概念。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依然如此；《基本法》为国家统一而拟定的制定新宪法的工作被阻止了。

参考文献：

W. Abendroth, »11 Thesen zur politischen Funktion und zur Perspektive des Kampfes für die Erhaltung des demokratischen Verfassungsrecht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D. Deiseroth, F. Hase u. K.-H. Ladeur (Hg.), *Ordnungsmacht?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Legalität, Konsens und Herrschaft*, Frankfurt/M 1981, 335–54; A. v. Brünneck, »Sozialbindung des Eigentums? Einführung«, in: M. Pfeiffer (Hg.), *Auftrag Grundgesetz. Wirklichkeit und Perspektiven*, Stuttgart 1989, 126–35; R. Eckertz, »Sozialbindung des Eigentums? Ergebnisbericht«, in: ebd., 135–41.

尤尔根·贝歇尔（Jürgen Becher）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三

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中的剥夺。1.“社会主义”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剥夺。根据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中在“社会主义”国家手中，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这一点是从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中得出的：“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条件丧失了资本性质。”（MEW 26.3，第291页）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这种有利于国家所有制的排除，以及通过一种有效的国家经济管理，就可以实现“生产者和所有者的同一”，“不会再有某个阶级在不付出等价物的情况下占有其他阶级的劳动成果”。没有任何一位劳动者“会被排斥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之外。劳动力不再是商品；生产资料已经从资本变成了社会基金”（*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1969，第219页）。据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在苏联是1936年（Stalin，*FL*，第616页），在民主德国是1962年（*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1969，第176页）。1989—1991年的社会动荡，取消了如下观点，即已执行了的剥夺具有不言自明的社会主义特征。产业工人并未表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求或容忍“社会主义”国家的剥夺，最终却有利于外国资本家或党政要员（Nomenklatura）和黑手党组织。

在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民主德国的国家干部弗里茨·贝伦斯（Fritz Behrens）开始质疑国家社会主义剥夺能够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贝伦斯在谈到马克思对国家 457
的理解——国家是“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MEW 17，第541页）——时指出：国家“绝不可能成为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生产者依然是雇佣工人，“因而他们的奴役关系也被共同决定和共同负责深深地遮

掩起来了”（1992，第148页）。通过贝伦斯，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自1989年起，东欧各国的雇佣工人只是决定选择新的雇主，而如下的短期希望消失了，即之前对资本家的剥夺现在能够变成生产者的真正占有。结果就是：**剥夺国家的生产资料，这有利于资本家**或资本家的联合体，并且是通过消除竞争的大规模财产销毁的方式进行的。

2. 剥夺大土地占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战犯（1945—1946年），以及将土地转让给农民、工人和雇员，这些做法在东欧各国产生了第二类剥夺或占有。直到1960年，这些民主德国境内的小所有者一直都集中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这些合作社被编列进一个国家框架计划中，其对再生产过程及地方生活本身的影响确实远大于工业生产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与国家所有制相对，这是一种较低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1969，第224页），所以要通过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合作社所有制，来实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根据马克思，这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定性标准（*Bürgerkrieg*，MEW 17，第342—343页）。列宁也希望通过一种“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LW 33，第457页）来开辟出一条社会主义道路。

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就已经拒绝了这种剥夺的尝试。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农业应转变为高度分工了的泰勒制—福特制大生产，动物生产和植物生产应分离，工农业综合体应创建（参见Honecker 1976，第62—63页；Hausleitner 1994）。这有摧毁集体自治的危险，即将农民降级为雇佣工人，也就是剥夺他们。这种策略在经济上适得其反，在生态和人的方面也是糟糕的，因此遭到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的抵制，并且至少在民主德国已经停止了（参见Chemintzer 1981，第152页及以下）。在转折时期，东德农民也在捍卫自己的集体所有制，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贪欲和新的国家剥夺的尝试。 458

这些有利于合作社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的剥夺的相关经验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如下二者的区分是具有紧迫性的，即作为专政干预的剥夺和剥夺超出自身而发展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变革本身（参见MEW 4，第481页）。“排除资本家”是否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剥夺？决定这一点的，是与剥夺相关的占有过程的形式、方法和承担者。“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能够大批地“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与共产主义者完全无关（第476—477页）。

是否因丧失其阶级性质而“改变财产的社会性质”，资本是否转化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是否可能，“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是否因劳动不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同上）而被消除，这些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的经验表明，对资本家的剥夺只是作为生产者自己对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的要素，这导致了资本关系的永久废除。雇佣劳动的保留（它从作为可以垄断的力量的资本中脱离出来），尤其是导致了垄断力量，导致了国家所有制的剥夺，推动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推动资本关系达到了顶峰。“社会主义的”总资本家（Gesamtkapitalist）使几乎整个社会都服从于其价值增殖的需要，即便是远离生产的领域亦如此。这一总资本家体现在对国民收入稳定增长的要求中。“一切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成了无所不在的口号。

3.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改革，工业中也尝试了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剥夺资本家到生产者自己对生产资料的现实占有，并消除生产者事实上没有所有权的情况。在保留国家对生产资料
459 的支配的同时，经济单位和直接生产者自己应保有对生产资料的更广泛的支配权（参见 Liberman 1970；Šik 1966）。为此，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几个出发点：首先，“在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中发展创造性的参与”（*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1969，第713页），这是自动化和电子数据处理所要求的，因为劳动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作为看守者和调控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Gr*，MEW 42，第601页）。其次，以此为基础，在国内开展思想运动，以发展所有者意识，同时进行精神上的整合。最后，全面开展商品生产。价值（其从现在开始被认为是一项可认识且可计划的标准）有助于确定，“从一种有效的和合理的生产的立场出发”，什么“是好的和有利的”。个人的物质利益通过“物质杠杆”与价值增殖结合在一起（*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1969，第266—267页）。行政管理应当在很大程度上让步于由经济的无声强制而实现的监管，因而作为总企业的国家应当全面资本化。这些在民主德国新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应当使如下二者之间的矛盾具有生产性：一方面是不断作为被剥夺者的、进行着再生产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不断占有生产资料和商品的剥夺者。但这一点没有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导致了资本关系（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它已经被剥夺克服了）的发展，而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一

问题的理论表达，存在于趋同论中（参见*Der Imperialismus der BRD*，第515页；*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第455页及以下），也存在于民主德国关于社会主义的如下新规定中，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些人将东欧各国的剥夺和国家所有制理解为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特定的且暂时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将东西方冲突理解为本质上同样异化了的社会变体之间的竞争（参见 Weiss 1995）。

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剥夺经验和剥夺理论的批判有助于阐明，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变革，解放运动如何能够在后福特
460 制生产的新基础上找到一种新的剥夺形式，它不再是重建统治关系，而是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真正地占有物质的生存条件。

参考文献：

F. Behrens, *Abschied von der sozialen Utopie*, Berlin 1992; J. Chemnitzer, »Versorgung aus der eigenen Agrarproduktion sichern«, in: *3. Tagung des ZK der SED*, Berlin/DDR 1981, 148-56; M. Hausleitner, »Stalinismus und Neostalinismus in Rumänien«, in: Inst. f. Geschichtswiss., Humboldt-Universität Berlin (Hg.), *Berliner Jb. f. osteurop. Gesch.*, 1994/2, 87-102; E. Honecker, *Bericht des ZK der SED an den IX. Parteitag der SED*, Berlin/DDR 1976; *Der Imperialismus in der BRD*, hgg. v. Inst. f. Gesellschaftswiss. b. ZK der SED, Berlin/DDR 1971; *Kleines Politisches Wörterbuch*, Berlin/DDR 1973; E. Liberman, *Methoden der Wirtschaftslenkung im Sozialismus. Ein Versuch über die Stimulier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 (russ. 1970), Frankfurt/M 1974; *Politische Ökonomie des Sozialismus und ihre Anwendung in der DDR*, Berlin/DDR 1969; O. Šik, *Ökonomie—Interessen—Politik*, Berlin/DDR 1966; *Politische Ökonomie. Lehrbuch*, Moskau 1962, Berlin/DDR 1964; W. Ulbricht, *Die Bedeutung des Werke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für die Schaffung des entwickelten gesellschaftlichen Systems des Sozialismus in der DDR und den Kampf gegen das staatsmonopolistische Herrschaftssystem in Westdeutschland*, Berlin/DDR 1967; ders., *Die weitere Gestalt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ystems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68; U. Weiss, »Die geborgte Kraft des Systemkonflikts«, in: *Utopie kreativ*, 1995, H. 59, 41-48.

乌尔里希·魏斯 撰
侯振武 译，胡晓琛 校

参见：

Anarchosyndikalismus, Aneignung, Assoziation, Eigentum, Etatismus, Feudalismus, Genossenschaft, Konkurrenz, Kapitalkonzentration, Marxismus-Feminismus, Negation der Negation, Privateigentum, Privatisierung, Produktionsweise, Realer Sozialismus, Revolution, Sozialisierung, Staat, Staatskapitalismus, Übergang,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Vergesellschaftung, Verstaatlichung, Zentralisation/Konzentration

异化（Entfremdung）

A: iġtirāb.

E: alienation.

F: aliénation.

R: otčuždenie (отчуждение).

S: alienación.

异化这个概念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ἀλλαγή，交换）、塞涅卡、西塞罗和奥古斯丁（alienatio），他们用“异化”或描述转移和让渡财产的经济—法律过程，或描述迷狂和混乱的精神状态以及精神疾病。自启蒙运动以来（卢梭：异化是在社会契约中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异化这个概念无论在哲学中（黑格尔：异化是精神的必然自身外化），还是在经济学中（斯密：异化是财产交换的结果），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要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Hess]）的研究、对英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批判和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的分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Lenin，LW 19，第3页），形成了他的异化观念。 461

1. 马克思的异化观念的发展，与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相互联系：异化概念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细化的，特别是社会经济角度的具体化的论述。即使马克思的晚年著作多处使用物化（Verdinglichung）、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独立化（Verselbständigung）等类似概念取代了异化，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反对带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概念（如“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MEW 3，第34页），但绝不能得出结论认为，异化观念体现了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或“成熟”马克思发展历程中的断裂，或认为异化观念逐渐失去其意义（相反的观点参见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异化观念随着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且，马克思在他主要的经济学著作里也谈到了异化，如《资本论》(MEW 23，第420、455、596页；MEW 25，第95—96、274、832、837—838页)、《剩余价值理论》(MEW 26.1，第21、53、321页；26.2，第418页；26.3，第255页、第288页及以下、第483—486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EW 42，第74、84、94页及以下，第367页等处)和《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三稿第6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MEGA II.4.1，第65、125页等处)。异化不仅就其内容而言，而且这个词本身在马克思一生的全部著作中也直接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1.1 **早期著作**。马克思分析异化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经济形式。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人作为"人"(homme)和"市民社会的成员"(bourgeois)追求他具体个人的利益，而在国家中，人作为"公民"(citoyen)服务于一个抽象普遍的整体利益，二者的差异就是**政治异化**(MEW 1，第354—355、第362页及以下)。借助黑格尔在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利益中扬弃社会市民的个人利己主义的构想的阐释，马克思发展了用于描述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特点的"统一性内部的异化"思想(*KHS*，MEW 1，第204页)。他认为君主制是"这种异化的完备表现"，共和国则是"在它自己领域内对这种异化本身的否定"(第233页)。马克思批评说，黑格尔法哲学至多只能思辨地解决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实际存在的对立(参见*KHS*，第204、233、283页；*Judenfrage*，第367页)。 462

马克思和1845年写作《论货币的本质》(*Über das Geldwesen*)的赫斯、1844年写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MEW 1，第499—524页)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超越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中神性本质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的观点，要求展开"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他认为问题在于"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MEW 1，第379页)。不同于(以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赫斯为主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马克思不仅将**宗教异化**理解为将人的潜质投射在一个全能的上帝之上，并对神身上这些本属于人的性质加以崇拜，而且指出，这样的关系使人实际上无法实现这些潜质。由此，他将宗教现象解释为"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第378页)，也就是异化地抗议异化。

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施蒂纳、蒲鲁东、穆勒等人时，将异化意识的各种意识形态形式，和宗教现象一道，全部

归结为**社会经济的异化**。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EW 1，第303页及以下、第311页）对继承权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商品拜物教的雏形，《论犹太人问题》更指出商品拜物教产生了“**货币拜物教**”：“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MEW 1，第375页）社会经济异化导致财产成为被批判的中心（参见MEW 3，第277、333页；2，第55页）。在马克思1844年阅读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23）所做的摘要里，除了对货币拜物教的思考——货币作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MEW 40，第455页），即作为“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第451页）——以外，还有第一次将“直接谋生的劳动”视为“异化劳动”（第454页）关系的构想。

1.2 **异化理论的展开**。根据维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的观点，马克思主要著作里的异化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般异化**”，作为商品拜物教和物化，以其不同的形式深刻影响了全社会的关系；“**特殊异化**”，作为**异化劳动**，标志着生产者与其活动的关系的特点。此外还可以区分“**根本异化**”和“**特定异化**”，前者在所有商品生产社会都占统治地位，后者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特有（Oppolzer 1974，第79页以下）。

463

1.2.1 **一般异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生产者只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产生联系，这就“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EW 23，第86页）；“私有者”在这里处于一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第102页）。“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第85页）使得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第87页）。

人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MEW 42，第91页），即表现为物化（MEW 40，第564页及以下），这一现象就是**货币拜物教**或“货币的魔术”（MEW 23，第107—108页）。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MEW 42，第94页），而且货币这一“**普遍商品**”（MEGA II.2，第30页；*Gr*，第883页）以物化的形式，赋予了货币所有者“一般社会权力和一般社会关系”（MEGA II.2，第20页；*Gr*，第874页）。货币拜物教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货币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现实

的共同体”（MEW 42，第 152 页）。

随着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劳动市场上的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作为单纯的“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MEW 23，第 16 页）而相互对立：一边是“资本家的经济角色”（第 591 页），他们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第 618 页）行使职能；另一边工人是“活机器”（第 601 页），“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第 217 页）或“资本增殖的手段”（第 532 页）。但是人单纯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基本经济职能的代表相互发生联系，就会使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人格与工人相对立……因为资本家作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只是劳动条件的人格化，与作为单纯的劳动能力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MEGA IV.1，第 18 页）。最终工人只表现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MEW 23，第 621 页）。

464

在**资本拜物教**中，转化为资本的“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以“异化的形式”（MEW 26.3，第 290 页）作为物化的统治手段和剥削手段（*Gr*，第 585 页及以下；MEW 42，第 594 页及以下）。这里，“人们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MEGA IV.1，第 79 页）。

生产过程的全部要素转化为资本，导致了“内在于资本关系中的神秘性”（MEGA IV.1，第 92 页），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第 95 页）表现为物化的“资本的生产力”（同上）。这里，资本所购买的雇佣劳动的“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表现为“资本的力量”（第 63 页）。资本拜物教的特点是，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的存在方式”（第 120 页），正如雇佣劳动表现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MEW 23，第 352—353 页），协作和分工表现得“只是资本的结果”（第 351 页），连“自然力和科学”最终也表现为“属于资本的力量”（MEGA IV.1，第 122 页）。

如果说资本在流通中还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它最终在“生息资本”这一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MEW 25，第 837 页）。

1.2.2 **特殊异化：异化劳动**。“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本身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MEW 23，第 87 页）。一般异化在特殊的生产领域具体化为**异化劳动**，是适用于所有商品生产社会的原则，因为与商品拜物教相关的“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MEW 13，第 35 页）。因为在任何以实现交换价值为目标的商品生产中，

465

"工人的产品同工人的需要、同他的劳动使命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而是不论就哪方面来说，都决定于同工人本身格格不入的社会组合体"，所以"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直接谋生的劳动以交换为目的，因此内在地导致劳动异化于"社会需要"（MEW 40，第 454 页）。

资本主义所特定的异化劳动的形式，在两个层面上以"劳动的外化"为特点：劳动力本身必须让渡给他人，劳动力在属于他人的产品里外化出来，因为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里，发生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MEW 42，第 421—422 页）。随着"劳动从它同它的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来"（第 422 页）——这关系着"劳动和资本的分裂"——最终产生了"劳动本身的分裂"（MEW 1，第 511 页），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MEW 42，第 375—376 页）雇佣劳动者全面异化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部因素——"他人（异己）的材料""他人的工具""他人的劳动能力"和"他人的劳动"，"他人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即资本——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四个不同维度展开论述（MEW 40，第 454 页及以下和第 510 页及以下）。

工人同他活动的产品相异化。对于工人而言，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已经包含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作他失去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MEW 2，第 54 页），"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MEW 42，第 382 页），因为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MEW 23，第 593 页）。这就是"占有表现为异化"（MEW 40，第 512 页）。

工人同他的活动相异化。"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MEW 40，第 515 页）以及与此相关的对劳动内容的"无 466
所谓"（MEGA II.4.1，第 88 页）态度，都根源于"他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MEW 40，第 514 页）。

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因为劳动作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本质上属

于“人的类特性”，所以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工人同“**人的类本质**”或他自己的“人的本质”相异化，而且同“他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MEW 40，第 516 页及以下）

自我异化。所有使得“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第 536 页）不可能实现，使工人不能相应地生产出自己“人的本质”（第 518 页）的条件，青年马克思最后都总结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第 536 页）的统治。

1.3 **异化与阶级对立**。异化劳动的关系体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虽然两个阶级都受到异化关系的支配，但是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因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资本那方面则实现为“在非工人那里**外化的、异化的状态**”（第 522 页）。“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MEW 2，第 37 页）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劳动的异化表现为“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MEW 23，第 675 页）。

1.4 **异化的产生、发展和扬弃**。从历史的视角看，马克思认为异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MEGA II.4.1，第 65 页）。因为交换价值生产和私有财产不仅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而且同时“也 467
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MEW 42，第 95 页）。“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第 95—96 页）问题在于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实现“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为“**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MEW 40，第 537 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第 533 页）。只有当**社会**生产过程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MEW 23，第 94 页）的时候，即只有“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MEW 42，第 722—

723 页）。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就在于，在将自己从私有制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同时克服异化，因为“从一开始工人就作为劳动的异化过程的牺牲品，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而“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MEGA II.4.1，第 65 页）。随着对立社会形态的矛盾的深化，资本主义中的异化关系最终将趋向激化，如果无产阶级革命使社会生产“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MEW 3，第 72 页），生产资料变成集体财产即“联合的工人的财产”（MEW 42，第 723 页），那么异化关系就将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中化解。

2. 接受。几乎没有其他哪个概念像“异化”一样，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受到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界极其迥异的各种立场的接受和改写。围绕这一范畴不仅展开了学术的争论，还有政治的争论。早期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马尔库塞的文
468 章（1932）提醒人们注意异化思想在马克思著作中的意义。50 至 60 年代关于如何评价“哲学的”早期著作和“经济学的”主要著作的关系，如何评价后者对马克思理论的意义，展开了一场备受关注的争论。其中一方的代表有让-伊夫·卡尔韦（Jean-Yves Calvez 1956）、依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 1957）、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 1939）、海因里希·波皮茨（Heinrich Popitz 1953）和埃里希·蒂尔（Erich Thier 1957），另一方的代表有阿尔弗雷德·库莱拉（Alfred Kurella 1958）、尤里·达维多夫（Juri Dawydow 1962）、T. I. 奥兹曼（T. I. Oiserman 1956）和沃尔夫冈·海泽（Wolfgang Heise 1965）。60 年代同样引发争议的问题还有，异化在国有社会主义中将得以扬弃还是继续存在。参与讨论的有布罗尼斯洛·巴奇科（Bronislaw Baczko 1965）、亚当·沙夫（Adam Schaff 1965）、米哈伊哈·马尔科维奇（Mihailo Marković）、加约·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ć 1967）、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Predrag Vranicki 1966）、安德拉斯·葛多（Andras Gedö 1971）和里奥·科夫勒（Leo Kofler 1964）等等。不仅立场各不相同的西德社会学家，如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 1952/53）和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63），而且美国社会学家，如梅尔文·西曼（Melvin Seeman 1959）、迪恩（Dwight Dean 1961）、内特勒（Gwynn Nettler 1957）和罗伯特·布劳纳（Robert Blauner 1964）等人，都曾移用异化理

论，以说明无力、无意义、失范、孤立和自我异化（Seeman 1959）等现象的特点。古罗马医学家奥鲁斯·科尼利厄斯·凯尔苏斯（Aulus Cornelius Celsus）认为心理疾病的特点就是异化（alienatio），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1955）、约瑟夫·加贝尔（Joseph Gabel 1962，1964）、罗纳德·D.莱恩（Ronald D. Laing 1967）和吕西安·塞夫（Lucien Sève 1972）等心理学家也论述过异化和心理障碍的关联。瓦尔特·福尔佩特（Walter Volpert 1975）分析认为"局部化"（partialisiert）动作是异化劳动的形式。

参考文献：

B. Baczko, *Weltanschauung, Metaphysik, Entfremdung*, Frankfurt/M 1965; R. Blauner, *Alienation and Freedom*, Chicago 1964; J.-Y. Calvez, *Karl Marx*, Freiburg 1956; L. A. Coser, »Entfremdung und Entfremdungstheorie«, in: *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hgg. v. W. Bernsdorf, Stuttgart 1969, 228–323; J. Dawydow, *Freiheit und Entfremdung*, Frankfurt/M 1962; D. D. Dean, »Alienation: Its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Jg., 1961, 753–58; I. Fetscher, *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 München 1957; E. Fromm, *Der moderne Mensch und seine Zukunft* (1955), Frankfurt/M 1964; J. Gabel, *Ideologie und Schizophrenie*, Frankfurt/M 1962; ders., *Formen der Entfremdung*, Frankfurt/M 1964; A. Gedö, *Der entfremdete Marx*, Frankfurt/M 1971; A. Gehlen, »Über die Geburt der Freiheit aus der Entfremdung«, in: *Arch. Rechts- u. Sozialphil.*, 40. Jg., 1952/53;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1963; W. Heise, »Über die Entfremdung und ihre Überwindung«, in: *DZPh*, 13. Jg., 1965, H. 6, 684–710; W. Hofmann, *Ideen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Berlin/W 1970; J. Israel,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Reinbek 1972; L. Kofler, *Der proletarische Bürger*, Wien 1964; A. Kurella, *Der Mensch als Schöpfer seiner selbst*, Berlin/DDR 1958; G. Labica, »Entfremdung«, in: KWM 2, 1984, 295–301; R. D. Laing, *Phänomenologie der Erfahrung*, Frankfurt/M 1967; G. Lichtheim, »Alienation«, in: *Int. Encycl. Social Sciences*, hgg. v. D. L. Sills, New York 1969, 264–8; N. Lobkowicz, »Entfremdung«, in: *Sowjetsystem und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II, Freiburg-Basel 1968, 149–59; K.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Marx und Kierkegaard* (1939), Stuttgart ⁴1958; E. Mandel, *Entste-*

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Lehre von Karl Marx, Frankfurt/M 1968; H. Marcusc,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32), Schriften 1, 509–55; I. Mészáros, *Der Entfremdungsbegriff bei Marx*, München 1973; G. Nettler, »A Measure of Alienation«, in: *Am. Sociol. Rev.*, 27. Jg., 1957, 670–77; T. I. Oiserman, *Die Entfremdung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 Berlin/DDR 1965; A. Oppolzer, *Entfremdung und Industriearbeit*, Köln 1974; G. Petrovic, *Wider den autoritären Marxismus*, Frankfurt/M 1967; H. Popitz, *Der entfremdete Mensch*, Basel 1953: E. Ritz, Art. »Entfremdung«, in: HWPh 2, 1972, 509–26; A. Schaff,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1965), Reinbek 1970; M. Seeman, »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 in: *Am. Sociol. Review*, 24. Jg., 1959, 783–91;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u. Frankfurt/M 1972; E. Thier, *Das Menschenbild des jungen Marx*, Göttingen 1957; F. Tomberg, »Der Begriff der Entfremdung in den ›Grundrissen‹ von Karl Marx«, in: *Argument*, 11. Jg., 1969, Nr. 52, 187–223; W. Volpert, »Die Lohnarbeitswissenschaft und die Psychologie der Arbeitstätigkeit«, in: P. Groskurth u. W. Volpert, *Lohnarbeits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75, 11–196; P. Vranicki, *Mensch und Geschichte*, Frankfurt/M 1966.

阿尔弗雷德·奥波尔策
（Alfred Oppolzer）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neignung, Arbeit, Assoziation, Aufklärung, Charaktermaske, Emanzipation, Entäußerung, epistemologischer Bruch, Erscheinung, Fetischismus, Gattung, Gesellschaftsvertrag, Gleichgültigkeit, Lohnarbeit, Mensch, Mystifikation, Personifikation, Philosophie, Religion, Spaltung, Tausch, Trennung, Verdinglichung, Wesen, Vergegenständlichung, Verselbständigung, Warenfetischismus, Zins

异化讨论（Entfremdungsdiskussion）

A: naqāš ḥaula al-iġtirāb.

E: alienation debate.

F: débat sur l'aliénation.

R: diskussija o otčuždenii (дискуссия об отчуждении).

S: debate sobre la alienación.

“异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同时又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争议涉及如下五个方面。1. 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它只局限于生产关系领域，还是涵盖了
470 社会关系的整体？它对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有意义，还是毫无意义？2. 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享有怎样的语文学**地位**？由此又产生了这个问题：它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核心地位是否一直保持不变，如果改变，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改变，甚或遭到了坚决的摒弃？3. 认识论**价值**，即它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面向社会现实的整体还是局限于社会现实的某些表现）。4. **历史**争论：国有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存在”异化？构成异化基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是有利于克服异化，还是正相反，强化和扩大了异化？5. 是否有可能最终**克服异化**，或者异化毋宁是一种内在于人的存在和人的生产活动的因素？

对上述论题的每一个个别论题的态度，都暗示着对其他所有论题的态度。诸多有必要破除的神话之一是：仅仅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哪怕使用得非常广泛——就意味着对掌权的或在野的共产党的官方政策的批判态度，或反过来，拒斥这个概念就意味着支持那些政策。

1. 异化讨论特别和针对 1932 年首次出版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马克思著作整体的意义问题的讨论重合。直白地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标志着异化讨论的开始，没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就根本不会有异化讨论，即使有，也必然要少得多。如果说《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领域首次唤起人们明确地使用“异化”概念，那么它在 3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现象学、存在主义（在法国，还有人格主义）的潮流交汇所产生的理论中，为“异化”概念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和保证。而正是这场交汇，为马克思的青年著作赢得了空前的反响。但无论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还是在列宁或卢森堡、葛兰西那里，都没有这个概念的只言片语。即使卢卡奇在他的奠基之作《历史 471
与阶级意识》（1923）里也没有提到这个概念，而是重点强调一定程度上与之相近的术语“物化”（Verdinglichung）。此书的关注重点，同它的人道主义问题关怀一道，成为异化讨论的一个“先例”，因为它使得好几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地将异化概念接受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

突出强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意义的第一人当推赫尔伯特·马尔库塞（1932），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写的书评发表于社会民主党的杂志《社会》(*Die Gesellschaft*)，根据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方式得出结论认为，异化概念对“革命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本身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奥古斯特·科尔纽 1934 年论青年马克思的一些论文以外，阿尔弗雷德·库莱拉 1936 至 1937 年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杂志上发表的多篇文章——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正致力于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反法西斯联盟——也认为“费尔巴哈已经按唯物主义理解的‘异化’概念的具体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内核”的来源之一（1981，第 83、97 页）。

2.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无论在共产党内还是党外，异化概念的使用频率激增，而且不再局限于解读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使用这个概念首先在法国，其次在意大利，成为一时的风尚。福柯当时还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提问方式的影响下，也在他的《精神疾病与人格》(*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 使用这个概念，并且玩弄法语里“异化”(aliénation) 这个词的两重含义——出离自身 (außer sich sein) 即“精神失常”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人不是因为有病才出离自身，人是因为异化才有病。”(Foucault 1954，第 101 页)

这个概念在亨利·列斐伏尔的著作中具有核心地位。他在 30 年代和诺伯特·古特曼 (Norbert Guterman) 一道翻译过《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战后时期法国共产党对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攻击中起过关键作用。在他因为批评镇压匈牙利事件、因为对党内民主的批评 472
意见于 1958 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他成为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阐释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这一阐释派别的阵地是《观点》(*Arguments*) 杂志。此外他尤其反对阿尔都塞，批评他是“新教条主义”(1971，第 335 页)。他在 1939 年的《辩证唯物主义》(*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德译本，1966 年) 里已清楚地表述过异化和完整的人 (*homme total*) 等主题，此后一直没有抛开这些主题，而是借助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加以深化：“完整的人是生成的主体和客体。他是活生生的主体，自己与客体相对，又超越这一对立。”(第 132 页) 就此而言，“完整的人”就是“非异化的人”(第 133 页)。因此对于列斐伏尔而言，异化概念等同于总体性 (Totalität) 的互补概念，是理解人的存在所不可或缺的一个范畴：“异化理论和‘完整的人’始终是日常生活批判的主导原则。它们使人得以呈现社会发展的全体，给出社会发展的方向。”(1977，第 84 页) 列斐伏尔当

然看到，马克思曾摒弃或至少改造了异化等哲学概念，但是他认为，这不意味着这些哲学概念“没有意义，或者说哲学已经完成了它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第88页）。马克思其实是将这些概念纳入了一门特殊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这也是列斐伏尔现在想为社会学做的工作。

另一位（部分由于他在法国共产党内的重要职务）引导潮流的异化理论家是在开除列斐伏尔党籍一事上起到关键作用的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1949年，时任法共中央委员的加洛蒂就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人性的人》（*Le marxisme et la personne humaine*）里以异化为核心论题，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人对本身的复归”（引自 Geerlandt 1978，第30页）。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环境，是一种异化的环境。“资本是人类的异化力量，作为一种异己和非人的力量与人相对立。异化在这里就是非人化。”（Garaudy 1969，第65页）人性的人的兽性前史，将随着资本主义政权一道灭亡：“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道德的第一准则，就是全力以赴地投入无产阶
473 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阶级目标同完整的人的解放相互一致。”（第68页）

加洛蒂试图在理论上论证同天主教群众的沟通谅解政策，他是阿尔都塞的理论反人道主义和异化概念批判的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们的辩论，是法国60年代初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更广泛的人道主义论争的一部分（参见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批评》[*Nouvelle Critique*] 的第164—171号）。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1965）和《读〈资本论〉》（1965、1968）像是向法国官方马克思主义的死水里扔进了一块石头（结果让法国和其他国家共产党党外的不少“批判性”马克思主义者也愤怒不已）。异化范畴和与之相关的人的观念第一次遭到彻底的否定。为什么由此产生的震动，会让法共中央委员会——自1937年以来首次——为了讨论理论问题，1966年3月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召开会议？

3. 原因或许是，共产党为党内理论家所划定的边界，突然遭遇了人为的变动。对马克思主义的每种新的解读，都要不由自主地作为官方的因而也是唯一正确的解读的备选方案，接受主管机关的审查。对解读方式的评价，取决于它论证和巩固当前政治策略的能力。每一个理论主张，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外界归给它的政治意义。

3.1 阿尔都塞的出现，无论在官方马克思主义还是在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的领域，都是一次轰动性事件。因为他彻底地动摇了构成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

基础的东西。阿尔都塞没有对异化范畴本身给予特别的关注，关键其实在于这个范畴所暗含的前提：依旧以二元的视角看待人的主体同社会的关系；将主体理解为行动的起源、不可化约的推动因素、原始需求的载体等等。针对这个难题，有不同的回答：要么用历史法则的铁一般的决定论（许多批评者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理解阿尔都塞的）来回应；要么强调主体和主体实践的本源地位，认
474 为主体是人类解放的保障（而人类的解放在一个单向度的社会里必然要失败）。

关于主体异化的说法宣称，主体成了或将要变成不同于其本质的东西。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主体总是已经是不同的东西，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在斗争中并列存在的大量不同物的表述。主体置身于力量关系当中，这些力量关系再生产和改变社会，贯穿和建构（而非决定）着主体。因此才有阿尔都塞的观点——主体是关系的载体（*le support d'un rapport*），以及他的断言——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写道，马克思只有“对他青年时代（1840—1845年）的理论基础——人的哲学——作了彻底的批判后，才达到了科学的历史理论”（1968，第171页）。“他把主体、经验主义、观念本质等哲学范畴从它们统治的所有领域里驱逐出去。这些领域不仅有政治经济学（破除了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神话，也就是说，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主体而具有特定功能和特定需要的个人）、历史学（破除了历史原子说和政治伦理的唯心主义）、伦理学……而且还有哲学本身，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排除主体的经验主义（以及它的反面：先验的主体）和概念的唯心主义（以及它的反面：概念的经验主义）。”（第178页）

“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第176页）社会分析概念的总和取代了人的哲学。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此同时强调了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因此，重新使用“异化”这样的概念是在“逃向意识形态”，可以视为“逃向理论的替代品”。

3.2 法共的阿让特伊会议决议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队伍内存在不同的——实质上相互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但同时提出了调和折中的方案：既不赞成党内影响减弱的加洛蒂，也不赞成阿尔都塞。这一立场早先的代表是 475
吕西安·塞夫。他在同时反对“人道主义者”和阿尔都塞的双重斗争中，认为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不是异化理论的完成，而是它的变形（transmutation）”（1973，第66页）。因此青年时期的著

作和成熟著作之间不存在的认识论“断裂”(coupure)；除了“连续性的断裂”以外，应当看到“过程的统一”(第72页)，因为马克思既没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没有在接下来的著作里完全地摒弃异化概念，而是剥离了这个概念的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性质，塞夫说：“异化这个哲学表述在1844年混合了极为异质的现象，其后分解在了精确细微的论述过程中。”(第68页，注释)“异化的哲学理论让位于**关于矛盾和人的历史发展条件的科学理论**”(第88页)，走向了“非思辨的人类学”(同上，德译本“人类学”作“人的概念”)。由此塞夫将异化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1980，第217页)。

3.3 奥古斯特·科尔纽虽然承认异化概念包含唯心主义残余，但坚持这个概念尽管如此仍具有科学价值，尤其是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1962，第174页)方面——这一观点也见于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和约阿希姆·伊斯雷尔(Joachim Israel)，他们认为异化概念已经为更特定的概念“物化”所取代。托洛茨基派第四国际的思想家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意义在于“实际上提出了工人的贫困的问题”(1968，第156页)，因此异化概念丝毫没有减损它的意义，“不仅……不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相反构成了成熟马克思的理论工具的一部分”(第176页)，因为异化概念揭示了，不仅工人同他的“劳动工具”相异化，而且劳动工具作为一种“异己的、奴役和窒息工人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摧毁了工人最基本的发展可能”(第180页)。

这场争论70年代初在意大利发生了新的转折：安伯托·艾柯和朱利欧·普雷蒂(Giulio Preti)宣称，即使在从社会异化下解放出来的现实当中，异化依旧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在艺术领域生产者和产品的关系)，而吉安尼·托蒂(Gianni Toti)和阿尔伯特·阿索尔-罗萨(Alberto Asor-Rosa)则主张异化的影响只局限于阶级社会。

3.4 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 476
用异化概念形容被殖民民族同殖民者的文化从属关系：“被压迫者在谴责、诅咒、抛弃自己的文化形式、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饮食、自己的性行为(德语翻译为‘举止’[Betragen])、自己坐、休息、笑、娱乐的方式以后，以溺水者的力量和顽强，**扑向**强加给他们的文化。”(1986，第143页)

4.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异化讨论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特殊的意义。异化这个范畴在50年代中期(从这时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

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才在苏联公开发行）以前都不见于官方理论，也从未遭到批判。直到在去斯大林化的长期过程中，它才获得了特定的意义。一些人将它的适用范围限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Mende 1964，Buhr 1966，Oiserman 1965；另参见和西特尼科夫［Sitnikow］和费切尔的辩论，载 Schrey 1975）或宣称异化的克服“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正在全速推进”（Kurella 1981，第 199 页），而且“消灭异化的过程……只有到共产主义建立的时候才会结束”（Cangli 1969，引自 Schrey 1975，第 489 页；另参见 Popov 1968）。因此只有持异议者才使用异化这个范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甚至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确定异化的某些特定形式，能够服务于使掌权的共产党的高压性政策正当化。相反，强调异化的暂时必然性，就要求当权者服从理性批判的标准。比如沃夫冈·海泽就说，消灭异化“不会在建立社会所有制以后自发、自动地完成，而只能是一个自觉创造其主客观条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自然也同时依赖于外界的世界政治局势”（1965，第 702 页）。恰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集中制的领导、计划、高度的集中……要求或期待生产中的直接民主，抛弃权威的集中计划和决定，并以此作为消灭异化的条件，或把削减社会的组织程度当作个人自由的条件，都是荒唐的”（第 706 页；关于科技发展是消灭异化的条件的论述，参见 Dawydow 1964）。 477

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 Klaus）更准确地区分了社会异化和技术异化。前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消灭”，同时构成“消灭技术异化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而技术异化要在社会主义中才能逐步地克服”（1963，第 456 页）。沃尔夫冈·艾希霍恩（1959）否认社会主义中存在任何形式的技术异化，克劳斯反驳认为：“除了生产革新运动，除了以新方式生产生活的社会主义生产队，必然还存在着——让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技术异化的劳动者。在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除了自己的收入什么都不关心的人，完完全全适用技术异化这个概念。否认我们仍然存在这样的现象是毫无意义的。”（第 472 页）

亚当·沙夫从另一个方向展开思考，他在 1954—1968 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主管意识形态等问题。基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阐释——“马克思的出发点，无论在青年还是晚年，都是现实的个人”（1977，第 70 页）——他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时代人的理想类型，是从异化的力量下解放出来的人、完整的人。尽管这个人的类型就像数列的极限一样无法实现，但是人能够且应当朝着

它努力。”（第 181 页）他认为弊端不在于“社会主义中存在异化，而是只有当人停止自觉地同异化斗争时才产生弊端”（第 182 页）。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Eduard Goldstücker）也用异化概念表达过这种赫鲁晓夫（Chruschtschow）所激发的希望（而非今人回顾时爱说的幻想）。戈尔德施蒂克 1963 年在（当时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利比采（Libice）国际卡夫卡（Kafka）研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世界）异化被克服了吗？每一次简单化都会导致教条主义。甚至在这个过渡时期——难道我们生活的经验还没有足够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吗？人们在某些阶段比在资本主义还要更加强烈得多地感到异化。我们不能用对我们想要的某种现实的想象，取代实际所是的现实。”（1967，第 282 页）戈尔德施蒂克的演讲和他作为布拉格之春活动家之一的政治参与，体现了诸多改革的尝试如何——始于 1956 年的匈牙利，经过 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直到苏联的经济改革——借异化这个范畴表达诉求。同样，异化范畴也见于战后波兰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56 年建立的波兰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过引入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形式的草案）成员奥斯卡·朗格（Oskar Lange）：“在企业的框架下缺少有效的工人自决，会带来生产者重新同他的产品相异化的危险。”（1964，第 28 页）异化范畴还见于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思想先驱之一奥塔·锡克（Ota Šik）（1972）和戈尔巴乔夫（1988），戈尔巴乔夫曾用这个概念概括公民和行政命令的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

异化概念和与之相关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为共产党的改革派提供了对他们政治行动的辩护，还给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整体人类社会的全面解释：从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到布达佩斯学派，从卡尔·科西克（Karel Kosík）到南斯拉夫实践学派。特别是对实践学派而言，异化概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全部人类历史就是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Petrović 1971，第 121 页）艾格尼丝·赫勒（Ágnes Heller）和布达佩斯学派运用这个概念构建一种普遍的日常生活理论：“自从社会分工产生以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化现象：‘生在’（Hineingeborensein）一个具体的环境，日常生活中的优先任务是占有这一环境。”（1978，第 33 页；另参见 Heller/Fehér/Markus 1983）

478

5. 异化理论无疑对各种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潜在的批评，但是必须追问的是，它是否由此扩展了对这些制度的认识。留给人们的印象可以说是，异化理论没有使持异议者准确地界定体制的边界，反过来，让官方理论家也陷入无法

思考体制边界的境地。

虽然异化范畴在80到90年代的使用频率降低了，但理论上的人道主义并未受此影响。阿尔都塞将异化范畴还原为意识形态，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认
479 为——根据他对意识形态的定义（参见Ghisu 1995）——这个范畴是不可避免的。也许当时代条件让人的形态和人各种异化的形态具有特定连贯性时，异化概念就会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福柯宣布异化的消失，是否操之过急？无论如何，异化理论很有可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Für Marx*, Frankfurt/M 1968; E. Balibar, »Les ideologies pseudo-marxistes de l'aliénation«, in: *Clarté* 1/1965; M. Buhr, »Entfremdung—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Marx' Kritik«,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7/1966; A.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1934), Paris 1962, Teil 3, 135–77; J. Dawydow, *Freiheit und Entfremdung*, Berlin/DDR 1964; W. Eichhorn, »Widersprüche in der Entwick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5/6, 1959; F. Fanon, *Das kolonisierte Ding wird Mensch. Ausgewählte Schriften*, Leipzig 1986; M. Foucault, *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é*, Paris 1954; ders.,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1969 (dt.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 1981); J. Gabel, *Formen der Entfremdung*, Frankfurt/M 1964; R. Garaudy, *Die Aktualität des Marxschen Denkens*, Frankfurt/M 1969; A. Gedö, *Der entfremdete Marx*, Frankfurt/M 1971; R.Geerlandt, *Garaudy et Althusser. Le débat sur l'humanisme dans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et son enjeu*, Paris 1978; S. Ghisu, *Ewigkeit des Unbewussten—Ewigkeit der Ideologie. Psychoanalyse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bei Althusser*, Berlin-Hamburg 1995; E. Goldstücker, *Franz Kafka*, Berlin/DDR 1967; M. S. Gorbatschow, »Die Verwirklichung der Beschlüsse des 27. Parteitages der KPdSU und die Intensivierung der Perestroika, 28. Juni 1988, Eröffnungsrede zur 19. Parteikonferenz«, in: *Pravda*, dt. Ausgabe, 29.6.1988; W. Heise, »Über die Entfremdung und ihre Überwindung«,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6, 1965; A. Heller, *Das Alltagsleben. Versuch einer Erklärung der individuellen Reproduktion*, Frankfurt/M 1978; A. Heller, F. Fehér, G. Markus, *Der sowjetische Weg. Bedürfnisdiktatur und entfremdeter Alltag*, Hamburg 1983; J. Israel, *Alienation from Marx to Modern Sociology*, Boston 1971;

W. Jahn, »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s Begriffs der Entfremdung der Arbeit«, i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6/1957; G. Klaus, *Kybernetik in philosophischer Sicht*, Berlin/DDR 1963; L. Kofler, *Der proletarische Bürger*, Wien 1964; A. Kurella, *Das Eigene und das Fremde. Beiträge zum sozialistischen Humanismus*, Berlin/DDR 1981; O. Lange, *Entwicklungstendenze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Wien 1964; H. Lefebvre,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66; ders., *Audelà du structuralisme*, Paris 1971; ders., *Kritik des Alltagslebens*, Kronberg 1977; E. Mandel,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ökonomischen Lehre von Karl Marx*, Frankfurt/M 1968; H.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32), Schriften 1, 509–55; G. Mende, »Der Marxsche Entfremdungsbegriff«, in: *Wiss. Ztschr. d. Fr. Schiller-Univ. Jena*, Gesellsch. u. sprachwiss. Reihe, 13, 1964; I. Mészáros, *Der Entfremdungsbegriff bei Marx*, München 1973; T. I. Oiserman, *Die Entfremdung als historische Kategorie*, Berlin/DDR 1965; G. Petrović, »Gibt es noch Entfremdung in sozialistischen Systemen?«, in: Schrey 1965; H. Popitz, *Der entfremdete Mensch*, Basel 1953; S. Popov, *Sotsializm't otchuzhdenieto i svobodata* (Sozialismus, Entfremdung und Freiheit), Sofia 1968; A. Schaff, *Entfremdung als soziales Phänomen*, Wien 1977; ders., *Marxismus und das menschliche Individuum*, Wien-Frankfurt-Zürich 1975; H. Schrey (Hg.), *Entfremdung*, Darmstadt 1965; O. Šik, *Der dritte Weg*, Hamburg 1972; L. Sè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Frankfurt/M 1973; ders., *Une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Paris 1980; F. Tomberg, »Der Begriff Entfremdung in den ›Grundrissen‹ von Karl Marx«, in: *Argument* 52, 11. Jg., 1969, H. 3, 187–223.

塞巴斯蒂亚诺·吉苏
（Sebastiano Ghisu） 撰
彼得·耶勒 译为德文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lltag, Alltäglichkeit, Alltagsforschung, Althusser-Schule,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Determinismus, Dissidenz, Ebene, Emanzipation, Empirismus, Entfremdung, Entstalinisierung, Epistemologie, ethisch-politisch, Existenzialismus, Feuerbachscher Materialismus,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umanismus, Ideologie, Kafka-Diskussion, Klassenkampf, Kolonialismus, Kräftever-

480

hältnisse, kritischer Marxismus, Kritische Theorie, letzte Instanz, Lukacsianismus, Marxismus, Perestrojka, Prager Frühling, Praxis-Philosophi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vkräfte, Reformkommunismus, Subalternität, Subjekt, Subjekt-Effekt, Theorie, Überbau,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Verdinglichung

热情（Enthusiasmus）

A: ḥamāsa.

E: enthusiasm.

F: enthousiasme.

R: ėntuziazm (энтузиазм).

S: entusiasmo.

在20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将热情作为对淡漠的一种补偿加以使用。党的领导人发动群众为“社会主义理想”，特别是经济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马克思就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所发表的言论，在十月革命之后又重新被提及：“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MEW 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116页）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中的“英雄主义”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永恒主题这件事，最迟出现在列宁的《伟大的创举》（*Die große Initiative*，1919；LW 29）中。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Subbotniks）的倡议源于1919年的直接困难，但随之就脱离了具体情况，并且继续成为自上而下组织的群众的热情。这种热情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党内领导人成功地——即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种成功越来越不充分——“赞美新的斗争”和“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同时，热情也被武断任意地用于“揭露和消灭群众的敌人”：任何不熟练掌握与热情相关的语汇体系的人，或是没有准备好“做出牺牲”的人，就冒着与群众为敌的风险。自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以来，这一机制变得越发无效。另外，它带来了与日俱增的漠不关心与无动于衷。 481

一本1951年的苏联心理学教科书中列举和解释了苏联人的性格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准备克服困难的意愿，斯大林的一句话解释了这一点：“你们见过暴风雨前在像叶尼塞河这样的大河上的渔夫吗？我经常见到他们。有一类渔夫在即将袭来的暴风雨面前，会调动起所有

的力量，鼓励他们的同胞，带领着船只勇敢地走向暴风雨。……但还有另外一类渔夫。当他们感到暴风雨的临近，就失去了勇气，开始呻吟，遣散他们自己的队伍。”（*FL*，引自 Teplow 1953，第 242—243 页）热情的另一面也暗含在苏联人的下一个特点——勇气——之中。斯大林的话再次被引用，他说：“伟大的列宁——我们的建国者——曾说，苏联人民的主要特点必须是勇敢、大胆和无畏地斗争，愿意同人民共同打击祖国的敌人。”后面他又说：“懦夫并不是感到恐惧的人，而是出于恐惧能背叛其事业的人。”（第 243 页）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劳动英雄”和党作为群众行动的组织者的观念并没有中断，这一事实在党代会领导人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schnew）在 1976 年宣布：“如果我们将我们生活的时代称作大有作为的时代，我们就会感谢那些使之如此的人们。我们向劳动者致敬。”（第 48 页）谈论到党时，他说：“党的领导、动员作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就是生活本身，是我们全部的日常实践。但是党作为群众组织者和激励者的角色在艰难关头尤为显著。”（第 84 页）

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热情被以宣传运动的方式组织起来，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其经济构成就是国家的生产方式。政治领导层取消个人的民主权力的目的之一，是运用政治手段压制经济规律，从而保证重工业和其他关键领域的直接生产过程的顺利运行。只有民主公民权利的缺失，才使得以准封建的方式来支配活劳动成为可能。其结果是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相反，从经济学角度看，基于再生产理论的方法需要民主的个人权利，否则，比如劳动力循环就无法正常进行。

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大量的“组织”试图弥补民主的缺乏和随之而来的淡漠的增加。组织取代了实际的民主。列宁在这一点上的特别思考——斯大林对此“做了清晰的……总结”，但却偏离了列宁的原意（Althusser，*FM*，第 61 页）——变得非常关键。严密组织起来的职业革命家可以积极地在“最薄弱的环节”（Stalin，*FL*，第 30—31 页；列宁原话并无此表述，虽然《列宁全集》索引确有这一说法）上领导和塑造变革的开端。然而，很明显，尽管强调有计划的发展，但职业革命家（党务工作者）的联盟——这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持续增长的机构——必须依赖特定条件才能存在。它需要持续的运动（Kampagnen，以前这被称作“推力工作”，是从俄语直译过来的）作为其存在的原因。这个机构的全部力量都要集

中在每一个当前的运动上，而运动反过来又需要激励人民。运动的内容包含从反对核武器的行动到根茎类作物的无损采摘。其中很少有民主的个人或公民权利。因此，虽然国家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尽管执政党人数众多，但社会发展的机制仍然是外在的：基本路线仍然是将东西“带入”人民；自主学习仍然是口头承诺。

就像历史上的每一种特殊利益一样，这一机构试图将自己变成统括一切的普遍性，即将其自身的内在原则变为社会的原则。但其特殊性只能通过自我废除而实现。因此这种机构的内在冲突很明
483 显：将自己区分为特殊的，但同时其为了其存在而将自己消解为一般的。一些特殊人群为了替公众行事而要求自己拥有特殊的权力，而他们与公众缺乏正常的联系，这与民主的个人权利是不相容的。如果特殊人群和公众之间没有正常的联系，社会共存将会瓦解。

在行政命令式的政治经济体制统治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占主导地位。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吨位思想”（Tonnen-Ideologie）的含义。在这种框架条件下，个人的价值和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例如，即使在个人创造力方面，国家也在各种运动中以近乎命令的方式进行规定。

根据这一主张，社会财产应该是民主发展的有利来源；应该在直接生产者层面制定有利的微观经济法规。在民主德国，“同工作，同计划，同治理”（Arbeite mit，plane mit，regiere mit）的口号至少是短暂地被提升到了国家学说的地位。最终，由于整个体制的不民主，这种方法也失败了。剩下的就只有合作，因为国家机构垄断了计划和治理的能力。造成这种情况的经济原因是，这些不同机构仅管理国有财产和非个人财产。它们所妄称的代理地位意味着，它们必须以家长式的方式，分配工人阶级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如果不得已，还要限制工人阶级的自由。为了摆脱只能从人民的未来中获取东西的恶性循环，“必须尽一切努力使群众充满热情”（Havemann 1964，第 154 页）。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表明，以“社会主义理想”为由对民主个人权利的限制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些目标本身被消耗殆尽，无人能够，也更无人愿意对其再抱有热情。

参考文献：

L. I. Breschnew, *Rechenschaftsbericht des ZK der KPdSU und die nächsten Aufgaben der Partei in der Innen- und Außenpolitik*, Berlin 1976; R. Havemann, *Dialektik ohne Dogma? Naturwissenschaft und Weltanschauung*, Reinbek 1964; B. M. Teplow,

Psychologie, Berlin 1953.

克里斯蒂安·勒泽
（Christian Löser） 撰
朱思聪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vantgarde,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befehlsadministratives Regime, Berufsrevolutionär, Bewusstheit, Bürgerrechte, feudaler Sozialismus, Gleichgültigkeit, Kampagne, Kettenglied, Kompetenz/Inkompetenz, Organisation, Reproduktion, staatliche Produktionsweise, Stellvertreterpolitik, subjektiver Faktor, Tonnen-Ideologie

484 非殖民化（Entkolonisierung）

A: taḥarrur min al-isti'mār.

E: decolonization.

F: décolonisation.

R: dekolonizacija (деколонизация).

S: descolonización.

在“一战”结束的时候，绝大部分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地区在形式上还服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作为英国殖民政策的开端和中心，印度于1948年在甘地（Gandhi）和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压力之下，获得独立；缅甸和锡兰也是如此。荷兰人在“二战”中被日军驱逐之后，曾短暂地返回印度尼西亚。1950年，他们必须要从印度尼西亚撤出。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军事失败和《日内瓦协议》之后，不得不放弃他们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占。1957年，加纳作为第一个黑人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直至1964年，随之而来的是非洲大陆所有其他英国殖民区、法国殖民区和比利时殖民区的解放。津巴布韦除外，其白人统治在1979年才被动摇。1974年，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从葡萄牙的暴力统治中解放。在形式上，欧洲的殖民统治实际已消失。武力的解放战争是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葡属东非以及津巴布韦这些地区摆脱殖民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而在大多数原殖民地，相对和平的群众行动就已足够。

这个非殖民化过程的原因一方面是1945年之后，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在原殖民地内部出现了反殖民的抵抗。

先来解释后者：反殖民的抵抗在原则上不是新的现象，不是1945年之后或者1919年之后才第一次出现的。它自欧洲殖民统治之始，以星星之火之势遍

及世界各地（阿卜杜·卡迪尔[Abd-el-Kader]领导的阿尔及利亚1832—1847年战争、1857年印度士兵兵变和1904年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起义，也许就是最著名的例子）。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反抗运动中掌握了领导权，
485 这是之前没有过的。两者对非殖民化有直接的兴趣。知识分子获得了各种能力。根据白人宣称的价值体系，这些能力本可以为他们进入司法领域、行政领域、卫生和教育等部门的顶尖位置打开通道，但这些位置仍是为白人预留的。本国的资产阶级基本都是（尽管程度不同）在宗主国公司的背风面发展的。这些宗主国大公司在完全没有本地中介人的情况下，很少能应付过来，而这些本地中介人不完全服从于这些大公司的控制。因而，例如在印度独立之时，就存在一个雇佣三百万成员并在几年间就实现了极大增长率的工业资产阶级（参见Bettelheim 1968，第49页及以下）。想要从国家资产阶级与宗主国（垄断）资本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来解释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参加抵抗，这有些夸张——双方对彼此的依赖都太多，这体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资本和国家政府在独立之后很快汇聚一起，在与宗主国企业集团的合作中相互获利。对于国家资产阶级而言，问题不在于排除欧洲资本，而在于被封锁的国家机器的影响，而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却占据着国家机器——例如，这能使英国资本家通过如下方式反对印度资本家的要求：向在英国出售的印度货物征取额外的税收并维持这一税收政策至1925年（第52页）。

就世界政治局势而言，美国崛起成为西方的经济和政治霸权国家，这是非殖民化的关键因素。首先在经济上，美国在外国投资的急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1951年至1961年间产生的长期资本输出总量的70%源于美国；1964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国外资本占所有外国投资的半数以上（参见Jalée 1971，第66—67页）。虽然这些资本输出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殖民体系对美国的资本出口和货物出口限制的可能性要比预期的大，因为殖民体 486
系试图把殖民地作为保护区，专门为各个宗主国的资本活动保留下来。此外，美国自身没有形式上的殖民占有区。并且自威尔逊（Wilson）以来，把意识形态确立为“民族自决权”，这是一种原则，罗斯福（Roosevelt）（不同于威尔逊）也清楚明确地把这种原则与殖民地民族联系起来。意识形态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要求美国支持非殖民化过程。美国也是这样做的，尽管是以由于冷战和出于外交考虑而产生的各种断断续续的方式。在新资本投资领域和影响可能性方面达到的成功还未出现。

与美国崛起、成为霸权国家相对的是，老牌殖民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衰败。由于“二战”，这些老牌殖民国家不仅国际威望受损，而且财力也受损。为了重振经济，它们依赖美国的资本输出并且为其在殖民地的新经济活动只留有少许余地。尽管如此，它们也不是不加抵抗地就放弃殖民地——至少是在大批欧洲开拓者已经驻扎的地方，如阿尔及利亚、津巴布韦、肯尼亚、安哥拉、莫桑比克等等，这些地方也出现了常年的军事冲突。

使非殖民化过程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同盟得到巩固。存在着苏联超级大国和体系竞争，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不结盟运动，这在不利于殖民国家的方面，意味着国际力量平衡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而产生的外交支持，反殖民运动始终是可以肯定的；在一些情况之下（印度支那、葡属殖民地），社会主义国家也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

参考文献：

C. Ak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frica*, London 1981; R. V. Albertini, *Dekolonisation*, Köln 1966; S. Amin, *Die ungleiche Entwicklung*, Hamburg 1975; C. Bettelheim, *India Independent*, London 1968; H. Bley u. R. Tetzlaff, *Afrika und Bonn. Versäumnisse und Zwänge deutscher Afrikapolitik*, Reinbek 1978; G. Grohs u. B. Tibi, *Zur Soziologie der Dekolonisation in Afrika*, Frankfurt/M 1973; P. Gutind u. I. Wallerste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Africa*, Los Angeles 1976; P. Jalée, *Das neuste Stadium des Imp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0; P. Khalatbari, *Ökonomische Unterentwicklung*, Berlin/DDR 1984; D. D. Kosamb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Bombay 1956; J. Lacoutre, *Le Vietnam entre deux paix*, Paris 1965; H. Magdoff,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0; E. Mandel, *Der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2; B. Moore, *Soziale Ursprünge von Demokratie und Diktatur*, Frankfurt/M 1969; W. Mühlmann, *Mahatma Gandhi*, Tübingen 1950; W. Wertheim,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den Haag 1969; E. Wolf, *Peasant Wars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1971.

格哈德·豪克（Gerhard Hauck） 撰
朱渝阳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Blockfreiheit,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ependenztheorie, Dritte Welt, Entwick-

lungsländer, Fanonismus, Gandhismus, Guerilla, Guevarismus, Imperialismus, Indiofrage, innerer Kolonialismus, Kalter Krieg, Kolonialismus,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Nationalbourgeoisie, nationale Befreiung, Neokolonialismus, Nkrumahismus, Nord-Südkonflikt, Ökokolonialismus, postkolonialer Sozialismus, Sandinismus, Self-Reliance, Systemkonkurrenz, Trikontinent, Ujamaa, ungleicher Tausch, Unterentwicklung, Verwestlichung, Vietnamkrieg, Zapatismus

491 非纳粹化（Entnazifizierung）

A: al-qaḍā' 'alā an-nāzīya.

E: denazification.

F: dénazification.

R: denacifikcija (денацификация).

S: desnazificación.

1. 纲领。1.1 同盟国。非纳粹化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同盟国的非军事战争目标。不仅是纳粹德国占领的领土，而且德国本身也要在盟军胜利后从纳粹体系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纲领，在战争期间，它代表了各种差异巨大的利益之间的共同出发点。在盟国和被占领的欧洲的大多数民众眼中，它在道义上使战争合法化，增强了他们战斗、坚持和抵抗的意愿，传播了对胜利的普遍信心。因此，不管盟国政府和军方的利益如何不同，他们都领导了这场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并公开要求惩治纳粹战犯和人权罪犯，清理纳粹罪人的公职并撤换其在私营企业中的领导岗位，对德国经济的去中心化和德国的非军事化。

雅尔塔会议（1945 年 2 月 3—11 日）决定将非纳粹化作为盟国政策的一部分。由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签署的文件 492
主要规定了："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NS]，……解除所有德国部队的武装并将其解散，永远粉碎……德军总参谋部，……将所有战犯绳之以法并使他们迅速受到惩罚，废除民族社会主义的政党、法律和组织机构，在德国人民的公共服务机构和文化经济生活中消除一切民族社会主义的影响和军事影响，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志。"（*Potsdamer Abkommen*，1954，第 11—12 页）在 1943 年 1 月 12 日至 23 日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议上，盟国决定摧毁纳粹的统治机器，这就已经超越了以往战争中胜利者的意图，即只限于惩罚所谓的常规战争罪行。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盟国在波茨坦会议上做出

了关于和平秩序的决定，并对以前的决定做了扩充。决定主要内容为："对于战犯和所有参与策划和执行纳粹措施、导致或造成暴行或者战争罪的人员，应予逮捕并移交给法院。纳粹党领导人、有影响力的纳粹支持者、纳粹部门和组织的负责人以及所有其他对占领及其目标有威胁的人都将被逮捕和拘留。所有超出名义限度参与活动的纳粹党员……应被免去公职或半公职以及重要私营企业的领导职务。"（第23—24页）教育系统、司法机构和行政部门也要清除纳粹党和军国主义人员。德国的经济生活要尽快地去中心化，"目的是要摧毁现有的通过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其他垄断协会……过度集中的经济权力。应尽快将主要战犯绳之以法"（第25—30页）。

实现这些对德国国内状况的结构性和人事性的影响，被认为是德国人民能够"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生活"的先决条件（第21页）。

493 1.2 **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地下和流亡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希望德国人民推翻希特勒并使德国民主化。1934年，流亡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曾期望"革命群众打败纳粹敌人"，并号召工人阶级统一成"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Arb* 5，第458—461页）。按照社民党流亡领导层的说法，在消灭法西斯主义之后，应建立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中，私营企业的雇员将拥有共决权（Mitbestimmungsrecht），重要的公共福利机构和纳粹企业将被国有化。在政治上只允许反法西斯的党派和团体存在（Söllner 1982，第280—281页）。

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1945年4月13日发布的《布痕瓦尔德宣言》（*Buchenwalder Manifest*）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这场所有战争中最令人发指的战争的最终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以及两者所产生的对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政治的忽视"。此宣言还要求没收大地产（第279页）。

与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Frankfurt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有联系的社会民主党法学家弗朗茨·纽曼（Franz Neumann）在《巨兽》（*Behemoth*，1942）中宣称："为了消除侵略，除了解除党、国防军和高级官僚机构的权力外，还必须一劳永逸地打破垄断经济的权力……"当时他仍旧认为，推翻纳粹政权"只能通过被压迫群众的自觉政治行动来实现"（1977，第549—550页）。纽曼与战争期间在美军侦察机构研究部门工作的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奥托·基尔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一起制订了非纳粹化计划，该

计划依据的是他对纳粹德国经济结构的分析："一小撮强大的工业、金融和农业垄断者正日益与一批党内高级干部合并成一个既掌握生产资料又掌握暴力手段的阵营。"（第661页）这些流亡者希望"通过清除纳粹精英来触及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Söllner 1982，第148页）。

在1935年的**布鲁塞尔会议**（*Brüsseler Konferenz*）上，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了统一战线，作为推翻希
494 特勒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核心。它的目标是"恢复民主自由和权利，恢复组织、集会和新闻的充分自由，恢复信仰和良知自由，恢复所有公民不分宗教与种族的平等"（*Arb* 5，第123—124页）。在1939年的**伯尔尼会议**（*Berner Konferenz*）上，德国共产党宣布，纳粹垮台后，必须从由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民阵线队伍中组建一个自由的人民政府。新的民主共和国必须通过"没收法西斯主义的信托资本"来剥夺"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将关键产业特别是军备工业收归公有，并进行有利于少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民主土地改革。国家机构必须民主化，必须将所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从国家机器中清除出去（第220—221页）。

1943年9月，**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ationalkomitees Freies Deutschland*）在莫斯科发布的成立宣言旨在推翻希特勒，这要由国防军官兵和国内所有德国人来完成。1944年春季，德国共产党的行动领导层将委员会的成立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永久革命的第一阶段，包括与希特勒的所有反对者结盟。在"德国人民反法西斯革命胜利"之后，要"动员工人阶级实行社会主义行动纲领"，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工人阶级……将取得政权"，并将"与农民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结盟"，以"清算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建设"过渡（*Arb* 5，第595页）。

1944年10月，当流亡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制订了一个得到苏联政府批准的反法西斯主义计划时，就不再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了（Laschitza 1969，第193—194页）。

关于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无偿没收重工业和大地产、社会化和接管银行的要求，都一致包含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共产党流亡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左翼政论家的出版物中。这些要求本来可以在法西斯主义失败之后形成建立联合行动联盟的共识基础。

纳粹帝国垮台后，整个德国立即成 495
立了大多源自抵抗组织的反法西斯理事会和委员会，即**安提法**（*Antifa*）（数量在137—500个之间波动，参见Kless-

mann 1986，第 122 页）。他们的纲领和要求与左翼政党关于非纳粹化的公开声明并无不同。在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左翼政党宣传了其流亡领袖撰写的对德国非纳粹化基本一致的要求。

1947 年 2 月 3 日，**基民盟阿伦经济纲领**（*Ahlener Wirtschaftsprogramm der CDU*）也反映了当时德国人民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的情绪。纲领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罪恶的强权政治造成可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崩溃之后，只能进行根本的重组……。技术、社会或经济上非绝对必要的公司和类似经济实体必须解散，并转变为独立的个体公司。"（Hohlfeld，第 204—207 页）然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在 1945 年 10 月已经要求"从政治和经济上使德国的非俄国占领区平静下来，并使其恢复健康"。他的意思是必须防止具有威胁性的"东方政治取向"（östliche politische Orientierung）占上风（参见 Klessmann 1986，第 425 页）。这与 1947 年 1 月西德钢铁联营集团给在明登（Minden）的经济管理办公室主任维克多·阿加茨（Viktor Agartz）的信是一致的，信中坚持认为"既要考虑有机形成的联系，又要考虑建立新的、独立的、清晰可见的、经济上最优的经营单位"。"将这些新工厂转为混合经济所有制，同时，这种转变也是在工会的合乎资本的参与下进行的"，这将"使公共利益与私营部门对利润的追求相一致"。当时，他们甚至提议"使雇员也参与钢铁行业大型盈利团体的计划、管理和监督机构"（第 394—395 页），其中只有工会领导人加入监事会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2. **实现**。2.1 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所有占领国（除个别情况 496
外）在 1945 年夏天都已经停止了自决政治活动的开端。自发成立的反法西斯行动委员会被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污蔑为纳粹伪装组织并遭到了解散（Leonhard 1990，第 469—479 页）。莱比锡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NKFD）是根据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发出的指令由战时的地下团体组建的，共有 38 个地方委员会和 4500 名成员，于 1945 年 4 月被美国人取缔。当苏军进军莱比锡时，它再度获得批准，但德国共产党领导层通过重新安排来改组它，向各个领导成员分配其他任务，从而使这个集体被撕裂。因此，由于柏林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大规模干预，它终于也在当地消失了。1945 年 5 月，23 名前工人组织的代表组建了不来梅**反法西斯战斗联盟**（*Kampfgemeinschaft gegen den Faschismus*），选举产生了由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共产

党反对派（KPO）和国际社会主义战斗协会（ISK，*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ischer Kampfbund*）组成的主席团。到5月中旬，它已经有6495名成员。尽管取得了各种成功，但由于美国占领军当局的阻挠，以及新成立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的领导层给他们的成员和干部分配了新的任务，反法西斯战斗联盟也消失了。因此，在反法西斯共识基础上统一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尝试在各地都失败了（Klessmann 1986，第124—125页）。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东部占领区和柏林就非纳粹化措施进行的平等合作也只持续了短暂的时间。1945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达成了一项协议，其中指出，联合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在执行共同商定的紧急行动任务方面密切合作，以清除纳粹主义残余，在更为稳固的基础上重建国家。作为前提条件，考虑建立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避免过去的错误和弱点，确保有创造力的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Arb* 6，第352—353页）1945年7月14日在柏林苏占区成立的**反法西斯民主政党集团**（*Block der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n Parteien*）也力争"在清除德国的希特勒主义残余和在反法西斯民主基础上建设国家的斗争中进行合作。与纳粹意识形态的毒害以及所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路线做斗争，……在民主法治国家的基础上享有充分的法律保障，……精神和良知自由，尊重每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世界观，……制止煽动民族仇恨"（第358—359页）。

在1945年7月的呼吁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要求将大工业、大金融国有化，并分割大地产。因为"垄断资本……帮助希特勒上台，并以他的名义……准备和领导了对欧洲的大规模战争，只要在德国有可能使大量财富积聚在不负责任的私人手中，……民主就得不到保障"。但舒马赫在这里就已经拒绝了社会民主党对德国共产党的和解尝试做出"哪怕是含蓄的回应"（Scholz/Oschilewski 1953，第31—39页）。

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在苏占区实行的压制所有批评——不仅是对占领国政策的批评，其中包括批评对苏联经济无益的且常常是毫无意义的拆除行动，还包括对每一位苏联军人所犯罪行的批评，以及占领国偏爱德国共产党的批评（这使该党的机构得以将喜欢的人安置在权力中心）——的政策引发了社会民主党人的不信任，正如社会民主党领导层毫不妥协的反共主义造成了共产党人的敌对一样。因此，尽管在几乎所有涉及根除法西斯主义的基本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联盟只是在基层暂时形成。他们

497

立即到处遭到了相关政党领导层及占领军当局的联合诽谤与粉碎。因此，在全国各地，自发形成的统一行动意愿都被打破了。刚刚开始的东西方冲突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随着自发成立的反法西斯机构的结束，非纳粹化主要成为由占领国建立的军事法庭与占领国指定的德国当局合作进行的事务。西德当局破坏了改变社会的非纳粹化措施，而东德当局则独断专行地，常常是任意地实行了这些措施，这也使它们没有成为民众关切的事情。

498 2.2 1946年1月12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第24号指令下令“将所有积极的和不仅仅是名义上属于纳粹党的成员以及所有敌视盟军行动的人员从公职和半公职以及重要私营企业的负责岗位上开除。这些人将由根据政治和道德态度被认为能够促进德国真正民主制度发展的人所取代”（Klessmann 1986，第383页）。但从一开始，由于“社会政治观念和对纳粹政权起源的想法不同，利益和优先事项不同”，四个占领区对波茨坦的“四个D”命令的实施就存在差距（第78页）。

纽伦堡的主要战争罪行审判是“由盟国的共性最为有力地决定的”（Klessmann 1986，第79页）。法院由战胜国的代表组成。被告是纳粹领导精英的成员，也是以下组织的集合：纳粹党、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党卫队、冲锋队、帝国政府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罪名是参与阴谋策划危害和平罪，即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罪，即违反国际战争公约；反人类罪，尤其是种族灭绝。在22名被告中，有12人被判处死刑，另有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3人被判处10年至20年监禁，2人被宣告无罪。此外，所有占领区的军事法庭都进行了后续的战争罪审判。在3个西部占领区，有5133人受到审判，668人被判处死刑（同上）。美占区所谓后续审判的地点还是纽伦堡。在一次审判中，被告是23名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他们曾参与纳粹的安乐死措施，或被指控进行不人道和残忍的医学实验；在对法律工作者的审判中，要惩处的行为是“参与消灭犹太人和波兰人，恐吓被占领土的居民，并通过参与制定恐怖主义法律和死刑判决来消灭国内的政治抵抗力量”（Ratz 1979，第41页）。被起诉的16名法律工作者的活动被视为犯罪。党 499
卫队经济和行政总局（Wirtschafts- und Verwaltungshauptamt der SS）的18名成员被控建立集中营和在其中实施谋杀。工业家中的领袖人物——弗里德里希·弗里克（Friedrich Flick）和5名同事，IG法本工业集团（IG-Farben-Industrie AG）的23名高级人员，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及他的11名高级雇

员，因对战俘和被驱逐者施加奴隶劳动、盗窃外国财产和参与侵略战争而受到指控。12 名高级官员被控枪杀人质、杀害游击队员和平民。对别动队的审判涉及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罪行，对米尔希（Milch）将军的审判涉及他对战争军备计划的参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 14 名高级军官被控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针对党卫队种族和移民安置总局（Rasse- und Siedlungshauptamt der SS）的审判是针对总局的 14 名高级官员、**巩固德意志民族特性帝国专员**（*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Festigung des deutschen Volkstums*）办事处和**生命之源协会**（*Verein Lebensborn e. V.*），因为他们参与了消灭外国人和从被占领土绑架儿童的活动。**威廉街审判**（*Wilhelmstraßen-Prozess*）调查了参与情况。在这些**后续审判**中，共做出了 24 项死刑判决，其中一半得到执行。19 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人则被判处 18 个月至 20 年的监禁。在英国军事法庭以及意大利和荷兰，共有 1085 名集中营工作人员被认定负有罪责，其中 240 人被判处死刑。后来，因受到宽大处理，监禁减少了。在德国、法国和法属北非的法国军事法庭判处约 5000 人入狱，104 人死刑。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没有可靠的资料。1994 年 5 月 31 日的**统一社会党调查报告**（*SED-Enquête*）指出，至少有 140000 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或国家安全部的“执行机关”送到特别营（其中有些是以前的集中营），或直接驱赶到苏联，“大规模逮捕……的对象是‘法西斯分子’、其他‘危险人物’、‘资产阶级’成员，但也包括那些以任何理由被举报的人”。留在德国的囚犯中，1948 年和 1950 年约有 43000 人获释，约有 14000 人被移交民主德国判决或继续服刑；至少有 53650 名囚犯在集中营中死亡或被处决（第 89 页）。 500
弗里德里希·沃尔夫（1994，第 175 页）认为，苏占区及民主德国在 1945 年至 1967 年的审判中，对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做出了 12807 项判决。

2.3 只有在苏占区和后来的民主德国，当局才在进行非纳粹化时，不仅惩治纳粹党罪犯和战争罪犯，没收其财产，将其坚决清理出公职人员队伍，而且还彻底干预财产关系，并由此改变了其领土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这最为坚定地实现了所有左翼党派和团体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立即要求采取的摧毁纳粹政权基础的措施。与解放主张相矛盾的是，由于采用了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在苏占区以及后来在民主德国进行的改革（土地改革、工业和银行改革、教育、司法、文化和医疗改革）成果出现了退化。这并没有改变它们最初反法西斯的坚定性。土地改革是为了消除“容克对德国命运

的腐朽影响”。1989年前，民主德国境内通过无偿征用2189999公顷土地，并将其分配给559089名小农、农场工人和难民，实现了这一点（Klessmann 1986，第81页）。康采恩和所有垄断组织被清算，企业家的利益代表被解散。市镇、省和国家的自治机构接管了满足公共需求的企业（运输公司，自来水、天然气、电力公司等）。新的公司章程被制定出来，其中规定了集体劳动合同、工会的集体谈判权以及工会和劳动委员会的充分共决权（*Arb* 6，第394—399页）。其他改革最初在体制上和个人上都是一致进行的。但是，后来的苏联化使它们越来越流于形式，并脱离了其激进民主的本质。在1945年至1948年之间，共有520000名纳粹分子被清除出公共管理和工业界。在39348名教师中（有71.6%曾是纳粹党员），大约有20000人被解雇。在2500名法官中，约有80%是纳粹党员。在大约16000名司法人员中，有4/5被解雇，而且再未复职。在999
501 名被认可的律师中，有224名（22%）在1949年底仍是前纳粹党员。在其他领域，肃清行动不那么严格。

2.4 对美国占领军当局及其政策“后来的执行者”来说，他们“只关心消除按照西方路线建立议会民主制……的意识形态及人事障碍。非纳粹化的效果……只是精英的更换，而财产结构和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变化”（Söllner 1982，第148页）。这也或多或少地适用于另外两个西方占领国。至于西部占领区公务员的人事非纳粹化，到1945年底前，在美占区有117512人，英占区有68500人，法占区有18963人，以及苏占区有67179人被逮捕和关押，到1947年初，其中共有93000人又被释放（Klessmann 1986，第87页）。早在1946年3月，根据《消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n NS und Militarismus*），西部占领区的非纳粹化工作就已经交由德国当局负责。在所有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如果年满18岁的人因为填写了登记表而被认为有罪，就必须到法庭接受审判。仅在美占区，就有1300万人填写问卷，其中350万名被起诉者必须在共有22000名成员的545个裁决庭的诉讼程序中进行答辩。这种带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大规模行动，导致众多纳粹分子被“被清洗掉……褐色的粉饰，并换上新马甲，被重新送回社会”（Niethammer 1972，第653—654页）。西部占领区的分类非常不统一。在非纳粹化的审判中，“不是有罪的当事人被判有罪”，而是被告人“必须自行‘开脱’”（Ratz 1979，第58页），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出示“洗白证书”（Persilscheine）来证明他们的非法西斯主义思想。这一切常常使这一审

判名誉扫地。在1945—1948年的民意调查中，高达55%的人宣称，他们认为纳粹政权是个好东西，只是执行得不好（Klessmann 1986，第91页）。甚至连黑森州教会首脑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也呼吁消极抵制非纳粹化法案（第90页）。由于这种非纳粹化实践，“1948—1949年，在某些公共服务部门中，纳粹党员甚至比第三帝国时期还要多”（Friedrich 1985，第203页）。对司法机构而言，尤其适用的是可被称
502 为“以刑事诉讼为幌子的大赦”（第172页）行为。“1947—1948年，西部占领区司法部门中，1945年以前曾任职的法官和检察官有90%都已复职。”（第175页）没有一名“身穿法官袍的凶手”被绳之以法（Klessmann 1986，第297页）。犯下纳粹罪行的大学教授和医生也仍然未受影响。

不仅是非纳粹化，西方占领国的再教育建议也常常遭受挫折（第94—95页），这也是这一时期没有实现民主教育改革的原因。西部占领区未进行坚决的经济结构非纳粹化。在美占区，大地产应将100多公顷土地中的10%—90%让给新的定居者，但这一做法非常缓慢，而且程度很小。占领国法国和英国的方式与此类似，尽管英国最初还严肃地努力过。即使是最初被没收的大企业，特别是矿冶和化学工业，既没有被解散，也没有被收归国有。所有制关系保持不变，通常没有进行有效的去卡特尔化。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商业银行）暂时被解散，但很快又重新结合起来（第84—85页）。

西方占领国及后来受其委托的德国当局在执行波茨坦决定的非纳粹化政策时并不坚决，且往往适得其反。这进一步影响了后续发展。“那些以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犯罪行为负责的人……被逐步解除了责任，并被赋予了新的任务，他们本着已遭挽救的传统的精神完成了这些任务。”（Ratz 1979，第59页）尽管联邦议会在1950年12月15日非纳粹化结束时的指导方针中指出，非纳粹化的终止“丝毫不影响对个人犯罪的刑事诉讼”，并且“应该有效地追究已经成为刑事罪犯的民族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责任”，然而阻止对纳粹罪犯定罪和服刑仍然司空见惯。联邦德国的司法部门在审理纳粹罪犯案件时，一般不考虑谋杀罪所需的阴险、残忍、谋杀欲或其他卑劣动机的条件，这对案头凶手（Schreibtischtäter）特别有利，但也对下 503
面这样的谋杀犯有利，如拿骚（Nassau）的安乐死机构“谷仓”（Scheuern）的负责人，或化学家彼得斯（Peters）博士，来自德格奇（Degesch）公司的“齐克隆B之王”（Zyklon B-Kōnig），他向奥斯维辛集中营运送了3790千克的杀

灭剂（Friedrich 1985，第208—209页）。“‘仅仅’大规模杀死受害者对法院而言尚不构成残酷行为”（Ratz 1979，第83页），因此只是符合杀人罪的犯罪要件，其时效为15年，自1969年起为20年（*9. Strafrechtsänderungsgesetz* vom 4. August 1969）。1969年，联邦议院采纳了弗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和前总检察长马克斯·居德（Max Güde）的提议，区分纳粹罪行和战争罪的罪犯与犯罪辅助者。从犯应不受惩罚。1969年5月20日，联邦法院第五刑事合议庭决定不再追究1960年5月8日前未被列入犯罪嫌疑人的谋杀辅助者的责任。另外，区分了犯罪和参与，即假设参与仅仅是协助杀人，这导致与一般刑事案件完全不同的情况：“在纳粹谋杀案中——即使是被自己亲手谋杀——也不会对犯罪者进行惩罚，除非凶手存在‘过激行为’或‘任意行为’。”（Ratz 1979，第84页）寻找排除和减轻罪责的理由也使许多纳粹犯罪者避免受到惩罚。与1969年11月26日《联合国公约》、欧洲委员会1974年1月25日通过的《欧洲反人类罪和战争罪时效公约》，以及民主德国1964年9月1日通过的类似时效规定相应的是，一项关于无限期追究纳粹罪行的法律在联邦议院宣告失败。

1945年的转折点“并没有破坏西部占领区和联邦德国基本社会经济结构的连续性，也没有取消有产上层阶级的特权社会地位”，因此“政治制度设计的极大缺口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决定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的”（Elm 1991，第38页）。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于1967年指出，联邦共和国在1948—1949年间已经出现了复辟性的转折。

2.5 在奥地利，也没有对纳粹历史进行政治评价，虽然纳粹党及其他民族社会主义组织被禁止，其成员必须登记。在1945年11月的第一次全国选举中，他们没有投票权。“直到1957年废除《战争罪法》时，根据该法，有130000多人因《战争罪法》规定的罪行 504
而受到审判。有23000多起诉讼以判决方式结案，其中13000多起被定罪。在死刑有效期内，有43项死刑判决被取消，30项判决被执行；2名被判处死刑的人以自杀告终。”（Marschall 1973，第1页）“公务员队伍中的有罪人员被清除。‘雅利安化’被扭转。德国公司被国有化或在苏维埃政权下运营（直到1955年）……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未能实现。处于重要地位的是一种行政—官僚主义的方法，想通过规章制度从上而应对纳粹的过去。”（*Rechtsextremismus*，1981，第139—140页）为纳粹罪犯逃脱罪责提供帮助的组织网络导

致其中许多人未受到起诉或被认定罪行不重。

3. **总结**。非纳粹化作为一揽子措施，在实现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时，旨在将纳粹从所有重要岗位上消灭掉，在德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进行结构性变革，并永远防止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重新壮大，但它在整个德国都失败了。无条件投降后不久，反希特勒联盟开始分裂为两个阵营，其非纳粹化观念变得越来越不相容。分歧的大国利益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随着战争同盟的破裂和冷战的开始，占领国的主要利益是确保他们在德国的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卫星国手中，并确保他们在那里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受威胁。在东部，虽然旧的所有制关系消失了，但它们却让位于新的等级制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一再以暴力阻止了民主的关系。东西德的工人政党，即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和东德的德国共产党及后来的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都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尽管遭到占领，他们却并没有用尽自己的政治余地。相反，事实证明，他们同样无法从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中吸取教训，放弃了彼此间及与其他反法西斯团体间的真诚合作，并摧毁了所有自发产生的、自下而上的非纳粹化运动，并宁愿每一次都毫无保留地认同其占领国的政策。因此，在法西斯主义被摧毁后，已经错失了建立一个彻底非纳粹化的、民主的德国的机会。

505

参考文献：

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Ein Bericht von der Banalität des Bösen*, München 1964; *Bericht der Enquête-Kommission Zur Aufarbeitung von Geschichte und Folgen der SED-Diktatur in Deutschland*,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 12/7820 vom 31.05.94 (zit. *SED-Enquête*); L. Elm, *Nach Hitler. Nach Honecker. Zum Streit der Deutschen um die eigene Vergangenheit*, Berlin 1991; J. Friedrich, *Die kalte Amnestie. NS-Tä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M 1985;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de. 5 u. 6, Berlin/DDR 1966 (zit. *Arb*); R. Giordano, *Die zweite Schuld oder von der Last ein Deutscher zu sein*, München 1990; W. F. Haug, *Vom hilflosen Antifaschismus zur Gnade der späten Geburt*, Hamburg ^{2}1993; J. Hohlfeld (Hg.),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Berlin u. München, o. J.; K. Jaspers, *Antwort. Zur Kritik meiner Schrift »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München 1967; Ch. Klessmann, *Die doppelte Staatsgründung. Deutsche Geschichte 1945-1955*, Bonn 1986; H.

Laschitza, *Kämpferische Demokratie. Die programmatische Vorbereitung auf die antifaschistisch-demokratische Umwälzung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Parteiführung der KPD*, Berlin/DDR 1969; W. Leonhard, *Die Revolution entlässt ihre Kinder*, Köln 1990; K. Marschall, *Volksgerichtsbarkeit und Verfolgung vo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Gewaltverbrechen in Österreich 1945-1972*, Wien 1973; A. u. M.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1967), Leipzig 1990; F. Neumann, *Behemoth* (1942), Frankfurt/M 1977; L. Niethammer, *Entnazifizierung in Bayern*, Frankfurt/M 1972; *Das Potsdamer Abkommen u. a. Dokumente*, Berlin 1954; M. Ratz, *Die Justiz und die Nazis. Zur Strafverfolgung von Nazismus und Neonazismus seit 1945*, Frankfurt/M 1979; *Rechtsextremismus in Österreich nach 1945*, hgg. v.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Wien 1981; A. Scholz u. W. G. Oschilewski (Hg.), *Turmwächter der Demokratie. Ein Lebensbild von Kurt Schumacher*, Band II, Berlin 1953; A. Söllner, *Zur Archäologie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Analysen politischer Emigranten im amerikanischen Geheimdienst*, Bd. 1, 1943-1945, Frankfurt/M 1982; ders., *Analysen von politischen Emigranten im amerikanischen Außenministerium 1946-1949*, Bd. 2, Frankfurt/M 1986; F. Wolff, *Politische Strafprozesse*, in: J. Czerny u. a., *Ans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DDR*, Bd. 3, Eggersdorf 1994.

汉娜·贝伦德（Hanna Behrend） 撰
胡晓琛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ktionseinheit, Antifaschismus, Arbeiterbewegung, Auschwitz, Bodenreform, Bündnispolitik, Demokrat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inheitsfront, Emigration, Enteignung, Faschismus, Finanzkapital, Gewerkschaften, Großgrundbesitz, Illegalität, Imperialismus, Kalter Krieg, Kapitalismus, Militarismus, Monopole, Nationalsozialismus, Ost-West-Gegensatz, Rassismus, Sozialisierung, Stalinismus, Totalitarismus, Vergesellschaftung, Verstaatlichung, Volksfront, Widerstand, Zweiter Weltkrieg

加入主义（Entrismus）

506

A: duḫūlīya.

E: entryism.

F: entrisme.

R: èntrizm (энтризм).

S: entrismo.

加入主义这一概念（源于英文 entry，法文 entrer，德文 eintreten）意指在政党构建过程中作为策略而产生的、少数共产党群体或干部加入/进入已存在的、居主导地位的（改良派）工人党的现象，其目的是获得该政党中决定性的份额以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甚至达到分裂该政党的目标。该概念的历史渊源包括如下方面：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反沙皇运动时期关于工人运动之起源（布朗基主义[Blanquismus]）的阴谋论圈子和秘密结社理论与实践、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际工人协会（MEW 18，第 2—51 页）的态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者在民主运动或政党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述（MEW 4，第 474—475 页），以及普列汉诺夫（Plechanow）将其团体“劳动解放社”（Befreiung der Arbeit）与俄国民意党（Narodnaya Volya）关联起来的尝试（Trotzki，Wr 7，第 36 页）。

然而加入主义这一概念的历史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运动的决定性分裂，并与托洛茨基运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尤其是）之后，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的霸权地位之下的发展紧密相关。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维里肯（Georges Vereecken）于 20 世纪 30 年代首次使用了这一说法，他在一篇文章中表明了其反对所谓的政治策略的立场（参见 Trotzki，Wr 8，第 154 页）。

1. 早在共产国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一波革命性浪潮回潮的条件下所进行的讨论中，以及列宁与“左翼激进主义”（Linker Radikalismus）的争论中，关于加入性策略的问题就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内容。在并没有明确使用该概念的情况下，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0 年 6 月 8 日决定，建议英国共产党员加入属于第二国际的工人党（Labour Party）。列宁将其归因于英国共产党极度的弱势与封闭，以及工人党的独特性：“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党，确切一点说，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党。它是由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组成的，现在 507
将近有 400 万党员，所有加入它的政党都享有相当的自由……这就是说，加入工党的党不仅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而且可以公开地指名道姓地骂这些老领袖是社会主义叛徒。”（LW 31，第 249 页）因此总体的启示是，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员有义务加入工人党，以便为自己赢得“革命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第 252 页），其中要明确记入一项例外。这些策略性的启示除在当时英国独特的条件以

外并没有得以运用，因而仅是一次性的。

2.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加入主义的讨论短时期内在国际左翼反对运动（internationale Linksopposition）即第四国际的运动内部具有核心意义。托洛茨基——与自身行列内部抵抗相反——1934年以来支持在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瑞士、英国和美国发生的加入社会民主党（SP）的做法。在法国，这一讨论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为在法国，正如左翼反对派和他们的法国支部自其成立之日起所要求的那样，两大工人政党法国共产党（PCF）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于1934年7月结成了统一战线联盟。鉴于只有不到200名成员的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存在被继续孤立的危险，托洛茨基要求其被纳入统一战线之中。“它实力太弱，不足以提出获得独立地位的要求。这意味着，它必须立即通过订立协议在两个政党其中之一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我们来说，两个政党之间不存在或者几乎不存在原则性区别。但同时只有加入社会民主党实际上才是可能的。”（Schriften 3，第103页）对这一以“法国式转变”（因为其意义在法国得到了最大的体现）所描述的取向必须在变化的条件和新的任务的语境下观察，正如左翼反对派对它的描述：通过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无抵抗的投降而导致的斯大林主义的“八月四日”，对共产国际改革路线的放弃，直接准备建立新的（第四）国际的必要性，共产党中实现分组工作的不可能性，左翼反对派在数量上的弱势及其消逝的、少量的工人阶级基础，以及最后威胁性的世界大战与某些国家（首先是法国和 508
美国）中群众斗争的爆发和在纳粹胜利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对向左倾向的开放。“正是现在，改革被迫自我否定并转型或被转变为中间主义（Zentrismus）。”（Schriften 3，第99页）在这种条件下，加入主义的策略应该与对那些从两大工人政党的危机中产生的“中间派”组织（如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英国的独立工人党［ILP］、荷兰的独立社会主义党［OSP］和革命社会主义党［RSP］）重新组合的策略，即“重新整编”（Wr 8，第26页）一起，帮助克服“我们自己行列中的宗派倾向”（Trotzki，Wr 8，第152页），并通过取得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的支持以及获得对受到社会民主思想影响的工人的影响而使创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成为可能。加入的策略是一种短期的方针，是以能够毫无退让地代表自身议程的可能性为基础的；它明确包含着（大多数情况下被迫地）重新脱离改革政党的内容，正如托洛茨基1935年在评价法国经验时所阐述的那样：“第一，加入这种改革的一集中

式的政党并不包含任何长期的考量。这只是一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被限定在某一时期内的阶段。第二，危机和战争风险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是为加入主义总体上成为可能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迫使统治机构在许多剧烈波动之后，采取完全排除革命性因素的手段。”（Br v. 30.12.1935）针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托洛茨基自 1936 年之后就已经将任务界定为确保一个——即便小型的和继续被隔绝的——国际性组织并抵抗民族沙文主义的浪潮，以便为了革命的考量赢得那些在战争的持续进程中自我激进化并对其所在的传统组织感到失望的大众。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1938 年宣布成立的第四国际几乎完全解体之后，那些在战争结束前很长时间就已经采纳这一传统的团体构建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这一考量并没有最终实现。虽然在一
509 系列国家中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产生了，然而托洛茨基式的团体构建在总体上比之前更加隔绝，而斯大林主义则将其统治区域扩展了，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政党经历了重生。加入主义的策略在超过十五年的时间里赢得了某种类似于**策略性的**意义。在这一讨论中这一概念第一次成为中心：30 年代的讨论几乎仅仅只是关于“加入”的具体策略，仅仅在 1939 年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偶然地提到了“反加入者政策”（Wr 11，第 313 页）。

最初（直到 1950 年代末）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由当时第四国际书记米切尔·拉普迪斯 [Michael Raptis]——其化名为米切尔·巴勃罗 [Michel Pablo]——所提出的）预测，即人们直接面临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而这次世界大战将以国际范围的内战形式，以一种“战争革命”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革命性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时间去建立独立的政党。因此 1951 年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针对社会主义 / 社会民主政党的加入主义式的方针（最初出现于英国——在那里，这一方针自 1947 年开始就得以实践——以及奥地利）。1952 年起，这一“深入加入主义”的方针扩展到了共产党，据此认为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危机以及大众激进化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左倾转向，并由此赢得革命性的立场。这一“独特的加入主义”颠倒了托洛茨基运动的方针和早期加入主义讨论中的假定：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主义被解释为可以改革的，斯大林主义被看作在几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是必要的，而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长期看来则被置于共产党中的消极角色（绝非偶然，这一结果首先于 1953 年导致了托洛茨基运动第一次大的分裂）。

自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开始，这一直接面临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观点不再被人们确信。“后资本主义”（Mandel 1968，第 558—559 页）的论点越来越多地出现，即关于资本主义进入新的稳定极端，进入“其衰落时期”的假设（第 564 页）。大城市中的工人阶级被渗透了，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殖民地地区。与 1920 年代初和 1930 年代中期的讨论相反的是，加入主义被理解
510 为创造更晚期的左翼进程初始点的尝试，而这种左翼进程只有在大的传统型的工人政党中才可能出现。这里涉及的不再是这些政党的分裂，而是在这些政党内部长期的努力并推动政党向左转向。这里可以看到关于“通过体制进行的长征”的讨论与该讨论如何在 60 年代被引入联邦德国之间的交叉点。相应地，这一（被其批评者称为）融合加入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短期的策略并由此要求放弃为了自身政治议程的加入行动，即放弃自我认可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并由此提出原则性的问题。

直至 60 年代，加入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一直是托洛茨基团体政治上的主要方针（例如在联邦德国，其导致了围绕《社会主义政治》[*Sozialistische Politik*]和《国际快讯》[*Express international*]两本杂志的浪潮）。只有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在附属国家出现革命浪潮，尤其是随着世界范围内青年人激进化浪潮的出现，这一方针才逐渐被放弃。1969 年第四国际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加入主义在官方意义上的终结。

然而直到 1980 和 1990 年代，托洛茨基团体仍在不同国家（首先是英国）推行着加入主义的策略。艾萨克·多伊彻（Isaak Deutscher）就已经批评了托洛茨基的“法国式转折”并对他的评估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评估对左翼反对派团体的增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并没有成功取得社会民主派中大多数成员的信任，因为这一概念“与（大多数成员的）思考习惯以及深植于他们思想中的改革传统有很强烈的”冲突。对于共产党的拥护者来说，托洛茨基的这一理论甚至促成了“反感转变为强烈的敌意”（1972，第 259 页）。1930 年代加入主义策略的政治—组织平衡非常薄弱：在 1934、1935 和 1936 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加入法国、比利时、波兰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后的很短时间内，又纷纷脱离了这些政党。只有在法国，其分支到 1936 年时将成员数量增加了 3 倍以上；在美国，到 1937 年末 1938 年初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大约 1000 名成员）发展成为最大的分支。不管怎样，多伊彻的批评的相关性可以在 1945 年之后得到验证：在被大的工人党中的大多数成员当作外来者，被共产

511 党贬低为“背叛者”，以及持续性地处于适应政党机构各个部分的压力之下的情况下，加入主义造成的后果是使得托洛茨基团体接下来被广泛地与新兴的、始于传统组织之外的激进化运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团体不得不长期与外来渗透和工人运动序列中的特洛伊木马这类的指责抗争，以及这一政策与政治的（以及部分也是心理的）破坏性的、个体的后果（“掩饰”，双重人格，谎言，假装的官僚主义，获取政党机构中的小职位，等等）具有相关性。

在实质上由新的社会运动共同导致的、变化了的条件下的单一的政治方针使人联想起加入主义（诸如马克思主义团体进入绿党等），这种政治方针超越了加入主义争论的范畴，但是其实质上仍旧是沿着新的社会冲突基线（如生态）尝试将不同来源的政治流派融入某个新的政治性政党。

参考文献：

R. J. Alexander, *International Trotskyism 1929-1985*, Durham-London 1991; P. Brandt u. R. Steinke, »Die Gruppe Internationale Marxisten«, in: *Parteien-Handbuch. Die Partei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1980*, hgg. v. R. Stuss, Bd. 2, Opladen 1984, 1599-1647; I. Deutscher, *Trotzki*, Bd. 3: *Der verstoßene Prophet 1929-1940*, Stuttgart 1972; *Die Taktik des Entrismus. Dokumentation*, hgg. von der Gruppe Internationaler Marxisten, Köln o. J. (etw 1972/73); *Ergebnisse und Perspektiven. Probleme der Praxis und Theorie des Marxismus*, hgg. von der Gruppe Proletarischer Internationalismus, Berlin/W o. J.; »Leitsätze über die Grundaufgaben der KI, angenommen auf dem II. Kongress der KI am 6.8.1920«, in: *Der I. und II. Kongress der KI*, Berlin/DDR 1959; *Les congres de la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Bd. 4, Paris 1989; E. Mandel, *Einführung in die marxistische Wirt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 1968; J.-J. Marie, *Le trotskysme*, Paris 1977; ders., *Trotsky, le trotskysme et la IV. Internationale*, Paris, 1980; *Queleques enseignements de notre histoire*, hgg. vom O. C. I., Paris 1970; M. Pablo (d. i. M. Raptis), »Ou allons-nous?«, in: *Quatrième Internationale*, 1951, Nr. 2, 27-47; ders., »Bericht an das 10. Plenum des EK der IV. Internationale (Januar 1952)«, in: *Intern. Information Bulletin*, Juni 1952, 333-61; J. Seifert,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als ›schmaler Weg‹. Kooperation in der Redaktion der Zeitschrift ›Sozialistische Politik‹ (1955-1961)«, in: *Soziale oder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gg. v. J. Seifert, H. Thörmer u. K. Wettig, Marburg 1989, 21-

31;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hgg. von der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New York 1973f.

维尔纳·马肯巴赫
（Werner Mackenbach） 撰
蔡廷建 译，王师 校

512 参见：

Aktionseinheit, Antifaschismus, Arbeiterbewegungen, Brandlerismus, Bündnispolitik, Einheitsfront, Kaderpartei, Linksunion, Opportunismus, Parteien, Reformismus, Sozialdemokratie, Spaltung, Strategie/Taktik, Trotzkismus, Volkseinheit, Volksfront, Volkspartei, Zentrismus

熵（Entropie）

A: miqyās iḥtimālīya.

E: entropy.

F: entropie.

R: ėntropija (энтропия).

S: entropía.

技术占有的自然中的子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中的子系统，无论按日常用语的理解还是一般在系统理论中，都被描述为这样的机制，其合理的结构保证了无限重复的可用性。这里所使用的循环观念，在注意其界限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必要且有用的。如果超过这些界限，把技术或者经济的子系统原则上理解为“永动机”，而不是重构这些子系统，就会适得其反。熵的概念源自热学领域，这个领域的一整套物理理论提供了反对永动机可能性的基本论据。如果把热量理解为废料再循环进入环境的特殊能量形式（Roos 等 1979，第 193 页），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热动力学中的熵概念能够成为将能源、材料和资源经济领域的结构转变结合起来的关键概念（Illum 1981，Czeskleba-Dupont 1981）。只有通过这样一种结合，才能够可持续地解决环境、能源和经济的危机，布伦特兰（Brundtland）报告已经让人关注到这些危机的统一性（Weltkommission 1987）。

然而只有当熵的讨论路径集中在地球的生命系统，尤其是自然环境（人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环境的物质和能量流动保持联系）的系统性质上时，这一路径才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行性。因此恩格斯对克劳修斯的批驳（见下文）毋宁说阻碍了必要的思想进步，不如更准确地认识熵这一概念有充分的必要。

513 **1. 熵增定律**：“熵指这样一个基本量，作为自然过程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

标准和量度，用以认识对全部自然现象都有效的不可逆性问题。”（v. Weizsäcker 1974，第 10 页）如果说热力学第一定律表达了获得能量的基本法则，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则描述了能量形式转化的过程。一个封闭的系统自动地趋向于熵的增加，直至达到能量平衡，也就是说，达到温度的平衡。这一进程只要不受系统外所引发的能量影响，就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时间中有特定的方向。总的熵变化取决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熵的交换以及系统的熵的增加。在内部的熵自动增加的同时，外部的熵的流入也可能是负值。这被描述为负熵（Negentrophie）的流入：“熵的产生是系统内部发生的不可逆变化的一种表达。”（Prigogine/Stengers 1990，第 127 页）因此也很明显，确定系统的边界对于判断熵的进程具有关键意义。

克劳修斯在 1865 年对两个定律进行了宇宙论的阐述：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宇宙的熵趋向于极大。冯·魏茨泽克（von Weizsäcker）之所以称熵为一个基本量，是由于其适用于自然中的所有过程，且不同于诸如牛顿力学系统的公理，其在时间上是不可逆的。因此熵是一个描述自然中特定时间方向的实际过程的自然科学概念。“熵作为一个系统中混乱状态的量度，既适用于生态系统，也适用于其他非生命体，用以理解秩序状态，更准确地说是理解秩序的缺失。熵天然地不断增加（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对生命领域也同样适用；与此同时，势能也相应地减少。有生命的系统如果要保持其生命，就必须弥补这一等同于损耗的势能流失：系统中熵的增加必须通过‘负熵的流入’，或者更恰当地说，通过熵的向外输出加以平衡。”（Kreeb 1979，第 91—92 页）

热力学的两大定律是欧洲和北美工业革命突破的年代自然科学的基础发现。通过这两大定律可以理解化石能源向机械功的转换。虽然热力学第一定律仍完全满足牛顿力学系统的可逆性标准，但第二定律的表述则超越了这一范 514
围。因为不可逆性在牛顿和笛卡尔世界体系的概念中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在 19 世纪中期可以看到对于克劳修斯的两种不同反应：其一是“热寂运动”（Wärmetodbewegung），宣扬一种文化和文明上的悲观主义，其二是许多人尝试强行将第二定律的认知塞入牛顿式世界体系的秩序框架之中。维也纳物理学家玻尔兹曼（Boltzmann）在 19 世纪 70 年代尝试将概率引入物理学中作为解释原则，来解决这一基本矛盾。根据他的理论，复杂体系只能表现为不可逆的，因为原子和分子的许多可逆碰撞太过复杂，以至于它们的作用无法在统计学上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不可逆性产生于处理

时间可逆的定律时必然要使用的近似迭代法（Näherungsverfahren）。由此，波兹曼虽然对过程的物理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也把熵的含义缩减为动力学，这并没有解决不可逆性的问题（参见 Prigogine/Stengers 1990，第 131 页及以下、第 208 页）。

直至今天，应用科学一直基于热力学第一定律，尝试运用技术手段减少热力学过程的应用中不可逆的部分，也就是提高能量转化效率。其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方面被忽略：不可逆性涉及的并非宇宙，而是人类所居住和利用的地球及其环境。其中熵的额度仅仅与太阳能有关。太阳能作为媒介，为地球这个系统提供必要的负熵以阻止温度平衡，进而防止无法进行能量转化的情况。存储和新增加的太阳能的额度是有限的。

太阳能利用上的变化带来了人类的两次“普罗米修斯革命”（Georgescu-Roegen 1971）。5000—10000 年之前的新石器革命使得人类能够相比之前更加有效地使用太阳能，因为人类不再仅仅作为猎人和采集者利用偶然找到的太阳能产物，而是通过农业和饲养家畜优化了太阳的负熵流。工业革命推动了第二次热力学变革，即通过使用开采地球上的化石能源从而大规模利用贮存的太阳
515 能。但是化石能源相较于（排除过度开采的情况）不断生长的原料如木材、谷物或者牲畜等有一个缺点：它是有限的。化石能源通过热力学过程转化为机械功，使大规模利用贮存的太阳能变得可能，从而大范围使用机械来取代人类劳动才成为可能。因为这一技术的可能性与披着工业外衣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进行，所以人类劳动与劳动的物质产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自然变成对人有用的使用物品，这一过程伴随着私人商品生产中的抽象价值量的形成及其在市场上作为交换价值的增殖。

通过消耗化石能源，人逐渐消灭了生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因为生产越来越少地依赖季节、天气、共栖集群（Syntropieinseln）——后者指太阳能的贮存，它在地球上分布不均匀。这不仅涉及化石能源的载体，也涉及气候情况。然而这只是趋势，因为这种“脱嵌”越来越多地依赖对化石能源的利用，比如，用于交通运输。由此熵的产生也成倍地增加。

这里熵增定律中的人化特征变得很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能源利用以及相应的熵的产生都有看似天然的限制（疫病、过度开采等）。从蒸汽机以及后来的能量转化系统如汽油和柴油发动机或者发电机发展出来以后，这些限制似乎已经被消灭。对于宇宙的延续来说，地球上的熵的产生率如何发展并不重要。人类则不能不关心，是否能有效

率地接触到可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因此能量和物质过程的不可逆性不仅是物理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熵的增加的自然过程与形成熵增加率的社会过程紧密交织。违反物理法则而动员社会的反抗，虽不至于毫无结果，但是熵增定律有一个社会的维度，这一维度是可支配的。”（Altvater 1991，第 269 页）。

516 2. **熵与经济**。随着人类生存变得明显依赖于保护人类所处的生命及非生命环境，人类生产相对于这些环境的性质问题越来越引发关注：“只有当系统在低熵的情况下存在，其自由能可以完全利用时，能量才能供人使用。这一观察对于经济学理论有直接的意义。经济系统由复杂的结构组成，这些结构通过消耗较低的熵得以自我存续（Schrödinger 1944）……经济活动不仅仅可以理解为在维持物质集群的能量投入的条件下物质受控制的变化，它更产生了持续的熵流。经济活动将低熵的状况转化为高熵的状况，由此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只有通过不断地充分利用低熵的势能才能够得以维持。”（Stephan 1991，第 333 页）

自亚当·斯密开始的将经济固定在量的维度上的做法，能够在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社会意义层面找到支撑，因为它阐述了自然过程的无穷性和可逆性。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说，被利用的自然没有设定任何限制。当自然真的展现出枯竭的可能时，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科学就给出了替代性范式（Solow 1979，第 314—315、328 页）。这种范式称，劳动和资本投入可以替代自然的损失。劳动这一核心范畴在这里遭到马克思的批评：“劳动首先是……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MEW 23，第 192 页）这一自然的改造之所以是质的改造，是因为这里涉及生产对人有用的使用价值。这种改造与价值形成过程纯粹量的性质相互关联。与两种过程相对应的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它们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并没有充分重视的范畴。

上述劳动生产的过程作为人和自然 517
之间的过程，“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MEW 23，第 532 页），它对自然的改造既是量的又是质的。与自然物质相应的人的需求的改变，需要一定量的自然，同时，自然发生质的改变。但是“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

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Gr*，MEW 42，第 397 页）。

这种以劳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的物质变换本身是一种能量和物质转化的物理过程，这一过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劳动组织中实现。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自然的物理转化完全隐藏在了价格和货币的范畴中，因为通过资本占有劳动力，抽象价值量的形成和增殖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就变成了首要价值。自然表现为附加物，尤其由于自 19 世纪初以来利用自然的机会的急剧增加，自然表现为无限的。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消耗的影响（参见 *K I*，第 13 章，第 10 节“大工业和农业”；另见 MEW 25，第 782 页及以下）。此外，《资本论》第 3 卷指出：“这个领域（生产力的扩大——引者）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MEW 25，第 828 页）

问题在于，对自然的使用既不是合理性的，也不是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组织的，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根据资本的增殖原则进行的。马克思主义 / 社会主义传统的问题在于这个观点：无需批判现代的自然观，就能实现将人类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E*] 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马克思自己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采取了明确和纲领性的立场：“**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MEW 19，第 15 页）国际工人运动过去和现在最大的疏漏之一，就是没有在理论和实践中严肃对待这一提示。 518

如果没有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化

石燃料资本主义”（fossiler Kapitalismus）以及在其基础上短暂繁荣的福特制资本主义是无法想象的。每种经济循环理论都符合热力学的可逆性范式。没有对它的突破，就不可能有面向可持续性的自然观。另一方面，如果不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价值增殖原则，似乎也很难想象实现在使用自然方面的必要改变。

3. 一个物理学范畴例如熵能否被纳入社会科学的讨论中呢？能，而且不仅仅是因为许多其他自然科学范畴和法则理所当然地（只是通常并未言明）规定了经济和政治的话语。热力学第一定律对于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有决定意义，但是它告诉我们的只是一小部分。熵增定律至少指出，对自然中物质和能量的任何利用都意味着不可逆的消耗。但因而它也指出，对自然的任何使用都意味着毁灭，熵这个范畴给了我们工具来量化这种毁灭，同时不忽视其性质，即对自然的利用方向。熵的产生对人类来说总意味着一个质的层面，从来不仅仅是
519 能量守恒定律所体现的一个量的层面。人在其一生中能得到他所想要数量的能量——但是人终将死亡，而且是因为人无法等效地转化这些能量——这不外乎就是第二定律的内涵。

自从工业化开始科技为运用能量在改善能量转化效率方面的各种进步，相对于自然的绝对消耗是微不足道的（20世纪末的高科技发动机比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生产的豪华轿车提高了15%的能量转化效率，但带来了光化学烟雾由于不断凝聚而产生这一质的问题，参见 Commoner 1972）。对物理学来说，将熵的概念纳入其体系的问题在于无法恰当认识该概念质的方面。它不符合物理学对科学的认知，因为质是一种无法测量的参照物。然而熵作为衡量秩序或者说无序的标准，有一种伦理的维度。如果支配熵的力量完全听命于非物理学的机制，那么用熵这种“新”的标准来描述现实有什么用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而且也只有不完全的回答。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制体制崩溃尤其重要的原因，是它把人自然的生存条件变成了地狱，并把对自然的掠取当作原则。与之相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资本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导致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而进行干预（19世纪的莱茵河以及化工厂、酿酒厂、城市污水处理厂和渔民等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例证，参见 Radkau，Sieferle，Brüggemeier）。

然而世界范围内减少自然消耗的努力——它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Wetkommission 1987）并展现在诸如1992年《里约宣言》中——不仅仅有待具体落实，还有待理论的论证。无论是将自然的消耗纳入新古典增长理论（Ham-

picke），还是通过结算物质和能量流动（Hofmeister）阐明自然的消耗，这些尝试都在用货币为自然的消耗估价上遇到了瓶颈。这种与利息率的变动密切相关的货币化只能在量的范围内变动，因为金钱没有质的特征。但是自然的消耗总有一个质的维度。对这个维度的估价就
520 是理论问题所在。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至少在对民主德国的能源链的分析上，罗斯等人（Roos 等 1979）将关系到计划制订的价值理论同生态学整合起来，在其他情况下理论成果丰硕的尝试却失败了。能量学学者拒绝将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价值理论和生态学，他们认为："实际利用的能量……无法用测量技术确定。"（第 174 页）美国物理学会数年前关于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效能概念的最新讨论（Ford 等 1975；Commoner 1977）没有被接受。

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认同价值（Martinez-Alier 1991，第 45 页），所以这里只有重新回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可取的做法是纳入对自然的利用所产生的社会化形式，从而扩展价值理论，而不是延续恩格斯的观点，仅仅坚持分工的商品生产所中介的社会化形式，而后一种社会化形式正是马克思版本的价值理论的根基。因此恩格斯斥责任何将价值理论的问题和熵理论的问题放到一起讨论的尝试。他在 1882 年 12 月 19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一个锤子、一个螺丝钉和一根针里所包含的能量，其大小是无法用生产费用来表示的。我看，用体力量度来表示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可能的。"（MEW 35，第 134 页）但正如马丁内兹-艾利尔（Martinez-Alier）就此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既是结算能量，也同样是物物交换尝试的基础。

恩格斯对于热力学持有双重怀疑的立场，因为一方面他坚信能量"循环"即完全可逆性的期望（MEW 20，第 545 页），另一方面坚持批判克劳修斯的宇宙论。这里有必要回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指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因此从实质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范畴，让我们有可能不仅把劳动理解为（必须实现为货币的）价值的生产，而且理解为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Altvater 1992，第 43 页；参见 O'Connor 1988）。

因此，使用价值的范畴应当被理解为劳动所改造的自然被利用和消耗的尺度、贮存的能量和物质的尺度。这一尺
521 度的单位是熵产生率。熵这个物理量之所以能够被选为自然的消耗的社会量度，是因为它使人社会地评价改造自然的物理过程——不是以货币的形式，而是以社会的规范变化的形式。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和能量过程的质，能用熵的范畴来评判，因为熵增定律受人支配的性质说

明了这些过程的社会效用。因此包含在使用价值范畴内的主观的效用概念，受到社会层面的限制。加速熵增的过程，其社会效用不如流入负熵抑制熵增的过程。熵增缓慢、能量流量和物质流量小的过程，则比那些能量流动加速熵增的过程更有益。

熵增定律有物理的和社会的维度。它同时在质和量上描述自然过程，因为通过它能够定义对人类来说不再可利用的能量和物质的增长。因此“效用”这一概念在其主观主义的意义之外又有了社会的意义。如果用熵作为使用价值的尺度，就有了一种物理标准以新的方式与社会的评价标准相契合。熵产生率高的使用价值，其价值不如熵产生率低的使用价值。于是使用价值作为社会价值的载体将接受社会的监督，能够用来限制占统治地位的交换价值原则。关于将熵增定律纳入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理论辩论，能够对一门新的、批判重构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能量和资源政策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Alternative Umweltpolitik. Natur- und arbeitsorientierte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AS 56, Berlin/W 1981; E. Altvater, *Die Zukunft des Marktes*, Münster 1991; ders., »Geld, Natur und die Reflexivität der Gesellschaft«, in: *Dialektik* 1992, 3, 35–50; F. Beckenbach (Hg.), *Die ökologisch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ökonomische Theorie*, Marburg 1991; ders., u. H. Dieffenbacher (Hg.), *Zwischen Entropie und Selbstorganisation, Perspektiven einer ökologischen Ökonomie*, Marburg 1994; J. Briggs, D. Peat, *Die Entdeckung des Chaos. Eine Reise durch die Chaos-Theorie*, Frankfurt/M 1990; F. J. Brüggemeier, T. Rommelspacher (Hg.), *Besiegte Natur. Geschichte der Umwelt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87; B. Commoner, *Wachstumswahn und Umweltkrise*, München 1972; ders., *Energieeinsatz und Wirtschaftskrise*, Hamburg 1977; R. Czeskleba-Dupont, »Stoff-, Energie- und Ressourcenwirtschaft: Grundlagen für eine alternative Bewirtschaftungsweise der natürlichen Umwelt«, in: *Alternative Umweltpolitik* 1981, 128–37; K. W. Ford u. a., (Hg.), *Efficient Use of Energ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New York 1975; N.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Boston 1971; U. Hampicke, *Ökologische Ökonomie. Individuum und Natur in der Neoklassik*, Opladen 1992; S. Hofmeister, *Stoff- und Energiebilanzen. Zur Eignung des physischen Bilanz-Prinzips als Konzeption der Um-*

522

weltplanung, Berlin 1989; K. Illum, »Kraft-Wärme-Systeme: Kritik des physikalischen Energiebegriffs in praktischer Absicht«, in: *Alternative Umweltpolitik* 1981, 138–55; H. Immler, *Natur in der ökonomischen Theorie*, Opladen 1985; K. H. Kreeb, *Ökologie und menschliche Umwelt*, Stuttgart 1979; J. Martinez-Alier,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Oxford 1987; ders., »Ökologische Ökonomie und Verteilungskonflikte«, in: Beckenbach (Hg.) 1991, 45–62; J.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 in: *CNS*, 1. Jg. 1988, H. 1, 11–45; I. Prigogine, I. Stengers, *Dialog mit der Natur. Neue Wege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Denkens*, München ^{6}1990; J. Radkau, »Eine Energiekrise im 18. Jahrhundert? Revisionistische Betrachtungen zur vorindustriellen Holzmangelproblematik«, in: *Energie in der Geschichte*, Düsseldorf 1984; J. Rifkin, *Entropie. Ein neues Weltbild*, Hamburg 1982; H. Roos, G. Streibel u. a., *Umweltgestaltung und Ökonomie der Naturressourcen*, Berlin/DDR 1979;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M ^{2}1991; W. Schmied-Kowarzik, *Das dialektische Verhältnis des Menschen zur Natur. Philosophiegeschichtliche Studien zur Naturproblematik bei Karl Marx*, Freiburg-München 1984; E. Schrödinger, *What's life?*, Oxford 1944; P. Schyga, *Kapitalismus und Dritte Welt. Zur Aktualität der Akkumulationstheorie von Rosa Luxemburg*, Frankfurt/M 1993; ders., *Besiegte Natur—Ökologische Deformation beim Prozess nachholender Entwicklung. Ägypten im 19. Jahrhundert*, Diss., Hannover 1994; R. R. Sieferle, *Der unterirdische Wald. Energiekrise und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München 1982; R. M. Solow, »The Economics of Resources and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 in: *Am. Economic Review*, 64, Jg., 1979; G. Stephan, »Ökologisch orientierte Wirtschaftsforschung heute: Was kann ein entropie-theoretischer Ansatz leisten?«, in: Beckenbach (Hg.) 1991, 323–40; E. v. Weizsäcker (Hg.), *Offene Systeme I. Beiträge zur Zeitstruktur von Information, Entropie und Evolution*, Stuttgart 1974; Weltkommision für Umwelt und Entwicklung, *Unsere gemeinsame Zukunft*, Greven 1987.

彼得·许加（Peter Schyga） 撰
蔡廷建 译，曹旸 校

参见：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rbeit, Armut/Reichtum, Denken, Destruktivkräfte,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Dritte Welt, einfach/komplex, Elektrifizierung, Elend, Energie, Entbettung, Enteignung, Erde, Evolutionstheorie,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faux frais, Fetisch, Fordismus, Fortschritt, Freihandel, Frieden, Gebrauchswert, Geld, gesund/krank, Grenzen des Wachstums,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apital, Katastrophentheorie, Konsum-
523 tion,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ybernetik, Material, Materie, materiell-technische Basi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Naturbeherrschung, Naturdialektik, Naturwissenschaft,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eues Denken, Ökobilanzen, Ökologie,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linienanalyse, Raubbau, soziale Kosten, Stoffwechsel,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Transport, Umwelt, Vergeudung, Wirtschaftswachstum, wissenschaftliche Weltanschauung

决定（Entscheidung）

A: qarār.

E: decision.

F: décision.

R: rešenie (решения).

S: decisión.

就自由的哲学理解而言，决定这一概念指向其非确定性（indeterministisch）方面。因此这一概念在主观主义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许多现代生活哲学中。这一概念也同时被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概念之中，但总体上并没有成为单独的论题（但是参见PhWb）。

从词语的历史上看，“决定”一词源自 Scheiden，古高地德语 skeidan，意思是分开、分离、使脱离。古希腊语中对应的是 σχίζειν，意思是切开、分裂、撕裂、分离。决定这一概念在法律领域中主要表示判决、决定、决议，意思是在对立的双方产生意见冲突（参见古高地德语 skeidunga）时（通过法官）确定对的一方（Pfeifer 1989，第 1504 页）。这是一种促使对立双方做出决定的情况，或者说这种决定本身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为 κρίσις。亚里士多德将法律的决定称为 κρίσις του δικαίου（*Pol*. 1253a，第 39 页）。类似的使用情况也可以在宗教语言中看到。

1. 据黑格尔的观点，在古典时代的苏格拉底那里，“决定从自身产生的起点”开始出现（W 18，第 489—490 页）。

在“决定回溯到意识”（第443页）的过程中，黑格尔看到了欧洲哲学史上巨大的断裂，“精神在其自身的主要转折点”（第441页）。黑格尔写道，直到苏格拉底时期，希腊人还没能用主体意志进行决定，还仍在外在中寻找决定，诸如通过神谕（第493页）。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毫无反思地遵循当时存在的生存秩序和道德观念，在其中，他们将普遍的、好的和真实的都当作绝对的（第469、492
524 页）。但是道德观念却随着不断衰败的内部的雅典生活方式以及国家在对外事务上的软弱而出现动摇（第516页），其自身所坚持的神圣性也逐渐消失。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一点（第476页）。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民众已经能够将个体的意识看作独立的而与“整体的精神”区分开来（第514页）。是苏格拉底将真实之物置于内在的决定中（第497页）。现在，两个方面被区分开来，一方面是普遍物本身作为一种外在客体，正如它同时也作为一种主观的客体，作为一种实体，是从属于意识的；另一方面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即“作为主体性的决定者的行动的个体”（第489页）。然而，个体本身是“性格的偶然性”（第490页）中的个体。他可以选择善，也可以不选择，对什么是善的决定是一种任性（Willkür）（第473页）。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的全部努力都致力于从意识本身和来自内心的普遍性作为个体存在以及其思想和意愿的实质。但是苏格拉底还没有达到“主观反思”（第514页）的程度，而更多的只是将所有的决定都归于那个对他来说无意识地驱动的、内在的精灵（Daemon）。相反，黑格尔认为，我们在现代愿意自己承担我们所做之事，“愿意依据智慧这一原因来做出决定并将其看作是最后的”（第493页）。

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描述现代国家的原则，认为它有“巨大的力量和深度，能使得主体性的原则转向个体特殊性的自主的过渡得以实现，而且同时将其回溯到实质的统一中并由此在其自身之中获得这种实质的统一”（W 7，第407页）。如果主体的实体性表达为“政治观念”，表达为“爱国主义”，那么客体的实体性就是“国家的有机体”（第412—413页），但与古典时期不同，其现在“作为通过培育的形式得以发展、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愿的精神”（第415页），是依照那些不仅针对自身同时也针对意识的法律行事，作为在其普遍性上有意识和有意愿的目的。这种现代国家将在古典时期出现在个体方面的东西重新纳入进来，它在国家方面将与意识关联的个体的任性与实质的普遍性统一起来，因此它自身成为——通过一种具体的个体展现出来——某个个体的人格，即君权（参见第444页）。一方面，

525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它与立法权和政府权并驾齐驱的必要要素之一，即作为“最终决定所在”的王权（同上），“在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决定”（同上）；另一方面，作为存在于自信的主体性和毫无根据的自决中的主权，在如何将个体权力结合为一个整体的问题上，现代国家将自身变成了“有自我意识的道德与理性”（第 428 页）。

2.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国家理念进行了考察。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颠倒了现实性，因为他将当时欧洲的立宪君主制抬高到意志绝对的自我决定的程度。黑格尔没有说“君主的意志就是最终的决定，而是说最终的决定是君主的意志”（MEW 1，第 226 页）。第一句话是经验性的，第二句话则将经验性事实转换成为形而上学的公理。由此一个个体的任性获得了无条件的权威，这种权威也会通过个体传达到国家。

在黑格尔那里，个体总是出现在国家中。因此他认为，（在尚且没有宪法的普鲁士）如何能够制定宪法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这更多的是“完全自在自为的存在，这些存在被看作是神的和持续存在的，并且是超越那些被造物的范畴的”（*RPh*，W 7，第 439 页）。如果个体不在国家意义上被理解的话，那么个体就“仅仅是原子的集合”（同上）。马克思反驳了这一点，认为个体的实质并不是在其抽象的自然（Physis），而是在于其“社会属性”（MEW 1，第 222 页）。因此——正如他稍后将解释的——他们不需要通过国家宪法来摆脱他们的个体存在，他们早已是社会集体劳动者中的一份子，但同时又具有个体化的倾向（参见 *Einl 57*，MEW 42，第 20 页）。

这种个体化在现代市民社会中通过将个体看作私人的物质生产者而事实上得以产生。这种个体化并非需要纠正的历史偏离，它是产生新的社会构造的基础，即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存在于普罗大众的劳动现实性中，作为在资本的统治下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生产的共同体（参见 MEW 25，第 454 页及以下，以及其他文献）。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共产主义将会把所有个体都联结成对其自身事务的整体的 526
管理，但这将会是“自由的‘生产者’的联合”（MEW 18，第 62 页）。在对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和由此产生的利益共同性的基础上，自我意识将能够呈现出与客观道德的一致性，就像黑格尔为现在国家所假设的那样。但是不同于黑格尔所期望的，它不会局限于一个君主，而是在摆脱了阶级统治的情况下，无一例外地包容一切。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共产主义

不是一种要追求的理想，而是正在发生的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关于经济的必要性的思想经常会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历史看上去是立足于一种线性的进程，这种进程会在自然法原则下推动革命性政党的形成并为了实践其政策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任何看到这种必要性的人都别无选择，只能遵循它，他也因此获得了自由。正如我们可以在恩格斯的作品中不断读到和一再引用的那样，自由并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DN*，MEW 20，第106页）。由此，在恩格斯看来，意志的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同上）。

但是，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决定的出现可能是为了善（Gutes），也可能不是为了善。这与经济上的决定论并不相符。因此，恩格斯并不认为无产者只要融入他们的政党并毫无疑问地遵循它，就可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所有一切都要取决于对事实的认知。根据恩格斯的阐释，这些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推导出来，现在这个理论表明，行动的任意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多的情况下，人类虽然自己塑造自身的历史，但是同时“环境也同样塑造人类，正如同人类塑造环境那样”（*DI*，MEW 3，第38页）。

3. 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种环境和条件在其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阐释上变得越来越受到质疑。这里实际上也会产生出某种必然性，但是这是一种 527
世界的必然性，这个世界推动个体日益进入一种对于自身来说不可消解的异化经历。个体只有通过以下方式才能摆脱这种异化，即通过他们作为自身的决定者反对在现实中压迫性的决定因素。在源自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中，人类决定着自由决定的存在，从而也决定了对他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内容。在这一意义上，让-保罗·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1958，第17页）。

克里斯蒂安·冯·克罗科夫（Christian von Krockow）（1958）在恩斯特·容格尔、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尤其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等人的论述中发现，决定论（源自拉丁语 decisio，决定）与此密切相关。对卡尔·施密特来说，决定首先意味着法律决定，其在内涵上是无法论证或者推导出来的。施密特写道：“从规范性的角度看，决定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的。”（1922，第37—38页）然而，根据施密特的说法，任何政治宪法都是基于这样的决定，与黑格尔相反，它并不总

是来自客观伦理，而只能通过得到承认的任性行为（Willkürakt）来设定。这符合施密特所引用的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立法的是权威而非真理（*Leviathan*，第26章；引自第39页）。

参考文献：

Ch. v. Krockow, *Die Entscheidung*, Stuttgart 1958; K. Löwith, *Heidegger—Denker in dürftiger Zeit*, Stuttgart 1984; W. Pfeifer,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Q-Z, Berlin/DDR 1989; J.-P.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1958; C.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 (1922), 7. A., Berlin 1996.

弗里德里希·通贝格
（Friedrich Tomberg） 撰
蔡廷建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ssoziation, Autorität, Befreiung, Bewusstsein, Determinismus, Einheit, Einsamkeit, Einzelnes/Allgemeines/Besonderes, Entfremdung, Enttäuschung, Existenz, Existenzialismus, Extreme, Freiheit, Geist, Geschichte, Gesetz, Gewalt, Glück, Haltung, Handlungsfähigkeit, Hegel-Kritik, historische Notwendigkeit, Indeterminismus, Individualismus, Individuum, Initiative, Kulturhistorische Schule, Legitimation, Macht, Notwendigkeit, Planung, Reflexion, Resignation, Staat, Voluntarismus

失望（Enttäuschung）

A: iḫbāṭ.

E: disillusionment.

F: déception.

R: razočarovanie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S: decepción.

该词的构造包含着双重含义：期望没有满足，导致期望产生的错误想象随之消散。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Joachim Heinrich Campe）1800年前后提出用 entteuschen 这个动词取代借自法语的外来词 *desabusiren*（使醒悟）和 *detrompiren*（指出错误）。新造的词固定了下来，意思是结束错误——格林兄弟编纂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1862）解释为使离开错误（*ex errore rapere*）——直到19世纪末，由前缀 ent- 所构成的词汇一概都具有的消极内涵仍保留在这个词上（详见 *Deutsches Wörterbuch*，1995）。这个动词及其名词 Enttäuschung 在日常用语中

指：期望令人沮丧地无法满足，从中除了坏情绪外什么也产生不了。双重否定可以归结为简单的生活经验，即事情通常会变得更糟，而且人总是对未来的状态抱有终成泡影的愉快幻想。(所以它的反面——预期的坏事结果不那么严重，就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来描述。如果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喜事，或者发现担心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人们会说这是“惊喜”[angenehme Überraschung]。这时候说“失望”则等于在反讽。)语言作为社会的官能，反映出社会的可能空间。德语里 Enttäuschung 的不同含义彼此隔绝，失去了发人深思的力度。其他许多语言中有不同
537 的词表示失望/幻灭，暗示幻想终结而且主观参与了之前幻想的形成（即幻想具有自欺因素）：英语除 *disappointment*（失望）外，还有 *disillusion*（幻灭）和 *disenchantment*（祛魅）。西班牙语可以将 *ilusión*（幻想）和 *esperanza*（希望）完全同义地使用，也就没有对期望和幻想做出分辨（此处参见 Hirschman 1984，第 151—152 页）。早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打上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意味着把幻想信以为真之前，“失望”一词凭借它的语义史就值得马克思主义的考察。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这个词揭示出过去的感觉、思维和行动受到误导，要求未来为错误的经验保留发言的权利。

在后共产主义的环境下，失望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化的蓝图在 20 世纪末失去了脚下的根基和未来的前景，因而变得无立足之地又希望渺茫。这次失败连同 19 和 20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其他进步事业的停滞一道产生出的失望，既是摆脱幻觉的解放，又是绝望，至少造成了中断并产生出明确自我定位的需求。轻视失望的意义、认为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最初会认为，直接愿望满足的落空、日常的不足所导致的不满，并不损害希望的本质，于是就这样接受着日常中的不满。失望直到成为当代“体验社会”中负面的基本模式，才升级为备受瞩目的范畴。

1. 在古典时代，人间的事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失望。每个人的命运是命运女神摩伊拉（Moiren）所分配的，不可违抗。有贫困和痛苦，有辉煌和幸福，但是没有失望，因为“只有在有所期待的地方才会有失望”(Löwith 1953，第 13 页)。秩序井然的宇宙整体和循环往复的生灭运动令人产生应有的敬畏和谦逊，而不会产生努力改变自己的历史的念头。

基督教对世界末日来临时恩典的期望，从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和升天等末世事件开始就是注定的，同样不会因为经验而失望——即使在世界末日到来之

前充满了人的罪孽、激烈的悔恨和蒙受
538 上帝喜悦的转变，而且促使人们从各个方面思考什么能在末日审判时起作用。

虽然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清扫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但是神话为人所带来的对人最终得到救赎的希望，在既有的时间发展模型内部，作为世俗世界中自我完善的事业延续了下来。“熬过了信仰的希望固定在人身上。”（Plessner，GS VI，第 119 页）只有当期待视域由神圣转为世俗，当人的理性开始关注从事一项可以被实际控制的历史工程时，对未来的幸福承诺才可能带来失望。

自从宗教启示的权威遭到动摇并开始逐渐消失，集体的希望热忱便集中在了此世以内的事物上。黑格尔卸掉神学的枷锁，才让哲学注意到历史的工作。他通过努力达成合题以构建的体系，要将破裂的各部分重新汇聚起来，因为他怀疑，启蒙的单纯进展会在它的每一步成功时制造出意识新的自我欺骗（参见 Furth 1991）。他认为，即使世界历史的进程最终在自由的意识里迈向进步，但是已然意识到自己的时代性质的“哀怨”意识“否定地”在“分裂”中反对“分裂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只在一方面本身就是虚无飘缈的，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被奉若神明的世界”（Hegel，W 3，第 170—171 页）。他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本身无足轻重的”世俗需求体系固定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态；他在历史哲学中则认定“被奉若神明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世界精神的理念在运行中所必需的质料。但历史的直接现象隐藏了特定的目的，即“精神复归它自身的意识并将世界塑造得符合它自身”（*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第 51 页）。对于“世界精神的动力”而言，个人的想象和愿望无关紧要，“在生命旅程中撞上坚硬现实的礁石，就被砸破而沉没了”（第 52—53 页）。经验上的特殊事物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世界是一个疯狂愚蠢的过程”，黑格尔哲学覆盖了这些事物，宣称它们合乎上帝的计划，一切艰难险阻在上帝的计划中都将幻灭为泡影：“一般所
539 谓的现实，在哲学看来是正在腐化的东西，也许还维持着良好的外观，但并不是自在自为的现实。这个认识可以说包含着安慰，缓解人们对绝对哀怨和已发生事情疯狂性质的想象。但安慰只是替代了本不应该发生的恶，而且存在于有限之中。”（第 55 页）给受难者提供非哲学的安慰，向明智者显露理性。由此黑格尔切入此世的失望这个问题：“把历史看作各民族幸福、各国家智慧和各个人品德横遭宰割的屠场。”（第 58 页）只要人的意识和绝对精神不相重合，每一种新的确定性就都会让人产生幻觉并旋即陷入分裂，又在发现分裂的同时重新找到克服的途径，这就是“无法得到满足

的”启蒙。而且黑格尔可引以为傲的是，在他延续的神圣的拯救计划中为政治革命保留了一席之地——代价是政治革命的未来限定在神圣的拯救计划中。“但是在1830年或在那前后，黑格尔认为历史停止了，不再对将要来临的事物感到好奇，甚至于不让它来到世界。时代精神复归自身的道路，‘在自由的意识里迈向进步’的道路，就在黑格尔时代的柏林。历史变化就这样结束了，至少在记载它的书里结束了。”（Bloch 1962，GA 8，第226页）布洛赫为此感到痛惜，在这里失去了希望哲学的一位先驱。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认为已经复归自身的精神的宿命是：“生命只剩下一件事：回忆。”（1935，GS VI，第123页）

2. 马克思在展开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时探讨过失望问题，既承认意识远离社会存在是必然的，又认为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实践扬弃，并据此提出了政治上的革命策略。他用政治实践摆脱幻想的解放方案替代黑格尔理性狡计的构想，根据这一方案，一方面确定恶的产生条件，另一方面在这些条件中明确指出消除恶的实际可能，就必然能将人遭遇的恶也转变为善。他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第一次使用失望这个复杂概念，形容大卫·F.斯特劳斯（David F. Strauss）的《耶稣传》（*Das Leben Jesu*，1835）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所包含的对宗教彻底批判的意图：“对宗教的批判使人 540
不抱幻想（enttäuscht），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KHR*，MEW 1，第379页）历史上不存在独立于人起作用的精神。宗教批判带来的失望是新的批判方案的前提和开端，批判的目的是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同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为了“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而在写作进程中搁置“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MEW 40，第467页），从国民经济学迈向“工人对生产的关系”（第514页）的问题。他同时指出，工人对自身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对异己对象的关系，工人对自身活动的关系是对异己活动的关系，并明确地将这些异化和之前发现的宗教异化关联起来：“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第537页）

人的自我异化的广义范畴中包括幻觉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根据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判，认为不能期望科学分析的成就和人自发产生的理智可以直接通过失望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结构，

《资本论》第1卷论商品拜物教的一章既呼应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批判方案（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MEW 40，第467页），又有经济层面的具体论述，指出“后来科学发现”也绝不能“消除”社会关系之上的“物的外观”（MEW 23，第88页）。自然宗教的拜物教仪式使人赋予人自己的产物以凌驾于创造者之上的独立力量，类似地，历史上的生产关系能够形成“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第90页），能够不断建起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MEW 25，第835页）。于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屈服于同样的自我异化。自我异化的扬
541 弃，只能作为奋起的无产阶级发动的普遍解放而实现。“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HF*，MEW 2，第38页）因此失望这个母题早在马克思最初的理论构建中就已成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意味着用武装起义和重新占有终结压迫和掠夺。行动的激情要用持久的怒火点燃，比如晚年恩格斯在1891年所表达的愤怒（指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译者）：“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的和平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大的幻想。”（MEW 22，第235页）

3. 主观转向。其他所有社会理论对失望问题的研究，都要回应历史目的论的进步期望所遭遇的失败，失败使进步期望丧失了貌似理所当然的纲领效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不更加致力于重建历史主体。同时也出现了自19和20世纪之交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和马克斯·韦伯（明显继承尼采）的相反立场。他们提出反驳，在历史进程中最多可以证实个人和团体的权力追求，而非臻于完善的进步。“当人类命运进程已经清空了宗教意义，又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要求赋予人类命运进程以此世的却客观的‘意义’时，才出现了必要的‘进步’思想。”（Weber 1922，第33页）为赋予意义的评价所做的辩护，不能再归结为神秘力量的操纵，而是服从着祛魅世界的规则，祛魅后的视野着眼于理性的目标实现和实用性。马克思同样认为，历史发展不会任由完全外在的强制规律力量摆布，相反在他的革命的社会理论中，理论需要人的实践行动才能为人的自我解放发挥作用。行动在持续不断的现实政治斗争中修正自己的理论想象，使人对斗争前景的期望落入失望。韦伯的祛魅概念不是为了提出一个与马克思相对

542 的唯心主义对立面。但他批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普遍化运用到人类历史是鲁莽的总体性思辨，认为它早已结出的恶果就是社会民主党的消极等待。

相对于韦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西美尔的“纯粹”社会学更敏锐地预示了一种以每个个人的视角为认识前提的相对化的多样性，在这一前提之下，已经得到认识的事实都不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义。“‘绝对真实’的观念同样只是历史的产物，人一旦抛弃了这个观念，就会产生一个悖谬的观念：在连续不断的认识过程中，刚刚抛弃的错误的尺度正好与刚刚接受的真理的尺度持平，就像一列永不抵达终点站的火车，多少‘真实的’认识从车厢前面上车，就有多少‘错觉’在车厢后面被甩了下去。”（Simmel 1918，第 103 页）“人的整个灵魂和实践状态导致，人——大体上和就根本来说——只会从环境中感知到符合他的信念的东西，对迥然不同的则径直视而不见，事后则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的做法。”（第 102—103 页）资产阶级社会对所处时代的认同，随着进步期望一同受到动摇。正因为德国先验哲学传统下的社会科学学者以绝对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绝对价值对他们而言处在可能经验之外，只依赖于选择行为，所以科学中不再存在有约束力的价值判断，至多还存在对个人价值选择的条件和后果的解释。这里强调的科学和价值的分离，只要专业学科彻底失去做出独立和普遍有效的价值判断的能力，就不再成立了，专业学科即使不能明确地——像国民经济学已经把私人经济的目标转用在国民经济的整体上那样——也会实际上将主观偏好变成整个学科的根本组成成分。

西美尔没有接受这种妥协。资本主义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同时增长出来的个人对无数其他人的依赖，制造出了潜在的失望，这成为他追问的对象。他对愿望满足的思考描绘了货币占有者紧张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对于 543
货币占有者而言，在货币上面“支配货币的能力发出极度尖锐的特殊声音：这实际是关于未来的纯粹能力，我们掌握的当下只有在未来才能获得意义”。但是愿望满足从来不对应先前的缺乏。“老百姓的智慧说得不错，占有期待的东西通常会让我们失望。”另一方面，也无法停留在货币“无规定的某物”的状态，因为“如果愿望不在货币以外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那就必然产生出致命的失望”（《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第 315—316 页）。拥有期待的东西让人失望，因为它消灭了期望带来的紧张感觉，而在需求中停滞同样会杀死这种感觉。以体验为商品的市场既消灭失望又维系失望，日常生活中的失望就这样显露出来。

4. **失败和后撤**。马克思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在结构形式上颇为接近它想要通过彻底完成而扬弃掉的黑格尔世界哲学。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强调世界革命的必然的一面，以至于为第二国际的消极等待和被误解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埋下了伏笔。德国社民党虽然意图继承资本主义，但又不想促成自己预言的资本主义的终结。对“加快日出的党”的嘲笑正反映了逐渐裂开的令人失望的主体空隙，这一空隙随着己方阵营1914年完全倒向世界大战的卫国激情而彻底暴露出来。列宁“变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LW 21，第20页）的主张只有在沙皇俄国才能成功实现。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革命希望在1923年前后消耗殆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随之瘫痪。其间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不仅从已经变为改良主义的运动中分离出来，而且针对作为解放运动自决承担者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体并未出现这个问题，也在理论交锋中分化形成了多种派别。卢卡奇承认，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关于革命的持续时间和速度所怀抱的过分乐观的希望”（*GuK*，W 2，第163页）同样是为了巩固仍在持续的希望。他将正确的意识归结为理论——一个彻底的黑格尔结构——以应付持续的落后状态。接下来的失望又会把人从更高处抛下。

544

列宁式的党组织取代了人民自决的革命机关（苏维埃、革命职工代表、工会代表），逐渐确立为意识落后群众的先锋队。俄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中的成功使它上升为包括西欧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榜样，以至于后者紧跟前者的指令，虽然自身有着截然不同的条件，但还是压制对政治策略展开独立自主的讨论。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西欧各党完全依赖于革命胜利的国家的神话。非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此时斯大林及其政党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实际政策之间的分歧，可以反映出接下来的失望程度。具有后见之明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可以清楚地指出产生这一情形的原因链条（西欧革命的失败、在落后的俄国保卫胜利成果、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却不适于解释为了维系这一情形而推行的智力和道德的无穷自我牺牲（对此的批评见 Wiethold 1986）。

弗洛伊德的文化批判著作对宗教观念的幻想性质的研究可以用在这里。宗教观念的力量不来自证明，而来自满足愿望的预言：“它的力量的秘密就是这些愿望的力量。”（1927，GW XIV，第352页）这使得宗教观念成为一种幻想，却不必然是一个错误。“如果信仰最突出的动机是满足愿望，那么我们就将信仰称为幻想，而且不考虑它和现实的关系，正如幻想本身不要求证明自己。”

（第354页）对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革命的失败触发了愿望思维和自欺（Selbst-Täuschung）的机制，取代了幻灭（Ent-Täuschung），于是幻灭自然暂缓到来。“这里幻想和现实的关联更加松弛，从人们明知是幻想的幻想中获得满足，而幻想和现实的出入并不会干扰享受。”（第439页）与之类似，正如在压力之下的个人心理中，避免痛苦会取代追求快乐，
545 成为首要的任务。弗洛伊德认为：“多数人都共同努力地通过在幻想中改造现实，保证自己的幸福，保护自己免受痛苦……本身还在参与幻想的人当然永远不会识破幻想。”（1930，GW XIV，第440页）弗洛伊德指出个人过程和文明过程的区别在于它们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是幸福，要把适应人类社会当作无可避免的条件来承受；另一方面是众多个人的统一，只短暂地允许把谋求个人自己的幸福当作目标。“几乎要人不再关心个人的幸福，才能最成功地创造一个大人类共同体。”（第500页）社会主义也不能克服这一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毫无疑问，人的关系发生的现实改变能对财产起效”，但是“这一社会主义者的认识被唯心主义对人性的误解污染了，失去了实施的价值”（第504页）。一切“对集体神经官能症的诊断”（第505页）此时都是多余的，因为还看不到任何权威的治疗方法。最终弗洛伊德屈服于他周围的人对他强加的指责：“我不懂得给他们带来安慰，因为他们所有人本质上都需要别人带去安慰，最狂野的革命家和最循规蹈矩的虔诚信徒都一样热切地需要。”（第506页）

批判理论的圈子从30年代初开始尝试，将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作为一门“辅助科学”（Horkheimer 1932，GS 3，第57页）纳入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列奥·勒文塔尔（Leo Löwenthal）后来回忆：“苏维埃共和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从20年代中期开始给我们带来失望，在理论上和情感上从这些失望中完全恢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1982，GS 4，第132页）失望增强了“在心理学上揭示各种强制决定着人的理性力量”（Horkheimer，GS 3，第59页）的需求，同时随之增强了捍卫个人自我意识的需求。“我相信，最本质性的，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也令我们惊骇不已的东西，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人可以为其他人确定计划。”（Löwenthal，GS 4，第133—134页）批判理论拒绝代替历史主体，又英勇地放弃在思维本身以外的实践中兑现追求真理的诉求。面对耀武扬威的实践自行颁布思维禁令，批判理论的坚守不应被 546
理解为听天由命，自愿地放弃改变的意志。“思维不是精神再生产出那些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只要思维不停止，它都紧紧抓住可能性……思维越不对象化为

乌托邦从而破坏乌托邦的实现，思维中的乌托邦因素就越强。”（Adorno 1969，GS 10.2，第 798 页）阿多诺警惕任何对思维的物化。“但是这让理论这个概念蒙上阴影。没有哪一种理论不因为它的构造，即因为固定的结构联系，自身便具有物化的因素，也就是形成偏执狂的特征。恰恰是偏执狂特征给理论带来了效力。”（1951，GS 4，第 294 页）这样反思自身的思维最后会问“是否只存在某物才会更好”（1966，GS 6，第 373 页），并在这个问题中发现希望的避难所，“对某物的否定”是另一种可能。否定的踪迹产生于“过去的事物……必定衰败和被遗弃的东西；这样的解释也许非常适合本雅明评歌德的《亲合力》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只是看在这些无希望者的份上，我们才获得了希望’”（第 370—371 页）。阿多诺的结论是坚守，最终只有“主体所组织完成的艺术品”能够担负“无主体地组织起来的社会所不允许的事情”（1970，GS 7，第 57 页），因为这种艺术品的出现“就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它们成了可能一样”（同上书，第 253 页）。

5. 介入的思考。目睹敌人和朋友同时带来的失败，而且身受意大利法西斯的迫害，葛兰西基于他的“实践哲学”继续用政治行动反抗失望。他深刻地指出了共产国际版本的马列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工具化的历史根源和宗教崇拜性质，是“宗教和（作为一种毒品的）兴奋剂的一种形式，在历史上变成必要的，由于特定社会阶层的‘属下’性质而具有合理之处。如果人在斗争中没有主动性，斗争本身也因此最终等于一连串失败，那么机械决定论就会变成坚守道德、同心协力、百折不挠的惊人力量”（*Gef* 6，H. 12，§12，第 1386 页）。如果反抗意志的承担者上升为负有责任的活动家，反抗意志也就披上宗教伪装，不再一目了然。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机械决定论“变成知识分子一方的反思、连贯的哲学，变成消极被动、愚蠢地安于现状的原因”（第 1387 页）。葛兰西以意大利为例，特别对比了天主教的历史，阐述了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争取文化霸权的努力。实践哲学没有用权力技术把常识中各异的因素固定下来，而是在连贯的“高级”哲学中批判地扬弃这些因素，但是“高级”哲学依靠它与“普通人”的文化联系才得以存在，这样才能“建立一个道德一智识的集团，这个集团在政治上使群众的智识进步而非一小群知识分子的进步得以可能”（第 1384 页）。党作为“历史的‘实验员’”（第 1385 页）完善并推广这一观念。毫无疑问，这样的任务以党外部的合法地位和内部的讨论自由为 547

前提，而这正是葛兰西的环境所缺乏的条件。于是实践哲学集合了“理智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Gef* 1，H.1，§63，第 136 页）。

布洛赫在法西斯主义最初崛起的时期同样起草过这样一个方案，即左派怎样衔接混乱的、“非同时性的”日常意识，用自己的革命内容填充对当下不满、失望的态度——当下的抗议立足于过去的、遥远的、梦与醉的传统和状态——才能和纳粹争夺不满、失望的态度。意识的“同时性”是努力得来的结果，“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下……足够地具体和全面，才能解决反应之中真正非同时性的矛盾”（1935，GA 4，第 123 页）。

幻觉的产生是科学认识现实时永远要面临的问题，却是艺术生产从一开始就确凿无疑的根本事实。艺术的存在方式就是假象。布莱希特“科学时代的戏剧”的理论正是强调这一点，以此为基础介入失望的政治。他所鄙弃的制造幻觉的戏剧希望用艺术技巧消灭假象和现实的区别，而布莱希特的艺术理论则在试验处理人共同生活的各种形式时，将假象和现实的区别彻底变成丰产的艺术
548 练习的起点。在开头看穿的幻觉，在结尾，当人意识到自己离幻觉结果的实现相距多远时，变成一条建议。戏剧观众“不再应该从他们自己的世界被诱拐到艺术的世界，相反应该引导他们意识清醒地走进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1939，GW 15，第 301 页）。社会情况要接受审查，这非常类似于法庭对事件和行为的讨论，但即使是对事情经过的简单报道，也已经包含着改变和塑造的基本成分（参见《街景》[*Die Straßenszene*]，GW 16，第 546—558 页）。布莱希特在美学上开辟视野，是为了“在软弱的时代”（GW 20，第 97 页）给“介入的思考”夺回主动权：“艺术中存在失败的事和一定程度上成功的事。我们的形而上学家必须理解这一点。事情可能非常轻易就失败了，因为它们只有经历一个很困难的过程才能成功！……但是不能从必将确定的失败中得出结论说，不会再有斗争了。”（约 1938 年，GW 19，第 305 页）从美学生产中得来的认识适用于整个社会感知体系。布莱希特在法西斯得势以后对环境的分析中具体展开了这些认识。觉察不到失败的人不会失望：“没有优秀的革命者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出现而背弃自己的事业，但是也没有谁仍不审视他自己的观念。最不受触动的大概是这些人，他们自视为共产主义的设计师，视共产主义为不可避免的‘下一个’社会形态，视无产阶级为将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看见了法西斯主义，于是就说，法西斯主义还不是下一个社会形态，下一个社会形态一定还会出现。他们就从明天的预言家直接变成了后天的预言家。”

（GW 20，第 93 页）但是觉察到失败而且不将失败的事实视为斗争的终结的人，他们清楚现状并承认，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蓝图还是实现它的手段，都已经受到了损害。布莱希特《追问失败》（*Fragen nach einer Niederlage*）中就有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这是一个失败？我们丧失了哪些物资和阵地以及其他东西？无产阶级内还存在幻想吗？失败情绪太强烈了吗？"但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阶层将
549 会失望？……哪些社会主义措施会由法西斯执行？"最后："法西斯能在一场战争中取胜吗？"（GW 20，第 97—98 页）值得钦佩的是，这些问题对己方阵营的失败直言不讳，同时没有陷入绝望，而是试图通过自我追问，理解法西斯主义因为得势而已经变化的前景——法西斯主义不会永存。于是失望不是需要忍受的东西，而是"紧随困难又走在行动前面"（GW 12，第 443 页）的活动和思想。

在早期民主德国这样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治理但是和联邦德国一样居住着被击败的纳粹分子的国家，1953 年的示威游行和起义终结了党和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假象。制度的破产促使布莱希特展开他的介入思考，对于这种思维而言，矛盾就是希望。"'六一七'使整个存在变得陌生。工人阶级的游行示威尽管完全茫无头绪、悲惨无助，但依然表明这就是正在崛起的阶级。行动的不是小资产者，而是工人。他们的口号混乱而无力，是阶级敌人偷运进来的。没有表现出组织的力量，没有产生委员会，没有形成任何计划。但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个阶级，处在他们最堕落的状态，但就是这个阶级。一切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充分地评估这第一次遭遇。这是接触，不是以拥抱的形式，而是以斗殴的形式，但这的确是接触。党应该感到震惊，但不必绝望。历经全部历史发展以后，反正党也不能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自发认同。存在这样一些任务，党在有的情况下，在既有的情况下，必须不经工人同意，甚至顶着工人的反对执行到底。但是现在，这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事件，成了争取工人的非常时机。因此我感到，可怕的'六一七'不是单纯消极的。在我看见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能令我在此狡猾地、安抚人心地取样说明——再度听任阶级敌人摆布，也就是听任法西斯时代再度增强的资本主义的摆布时，我也就看见了唯一能够清算法西斯时代的力量。"（*AJ*，1953 年 8 月 20 日，第 1009 页）这里存在的陌生化消灭了存在的虚假熟悉性质，以启蒙的精神使人脱离幻觉（ent-täuscht）。在剧院中发展起来的实验戏剧技术，在现实中被工人阶级的自发防御行动触发。工人阶级背水 550

一战，却并没有武器，借以从战斗中争取到自主决定的自为存在。被委托领导工人阶级事业的党震惊地认出了它的委托人，体验到了它的委托人即工人阶级的能量——体验了它的斗殴。辩证法从不合时宜的事件中看出机遇，从攻击中看出联系的建立，从反领导的暴动中看出工人阶级到底向往着某些东西，它的"社会性"没有衰落。（引文最后半句表明，布莱希特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清算的最紧迫的对象是法西斯，其次才是资本主义。）

瓦尔特·本雅明提出的具有"破坏性格"的行动类型，为布莱希特的介入性思想者增添了一个贴近现实的激进的盟友，它气质年轻活泼，不知疲倦地毁灭工作，不受自己的怀疑和别人的误解的干扰，把自己的痕迹遍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文物上。围绕创造的迷雾已经消散，破坏性格从中腾出明朗清爽的空间，将一切都极度地简化。悖谬的是，这个在自己出身的阶级获得了自我意识却背叛本阶级的叛徒的使命，是跻身于"传统主义者的前列"（GS IV.1，第398页）。本雅明指出的错位意味着，要控诉在过去淤积起来的预言能量，释放它们的传统以反击灾难的常态。在破坏性格的阵列后方，积极意义的"野蛮人"正摩拳擦掌，要打扫干净、推倒重来，他们是哲学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以重新开始的能量与茫然无绪、束手无策的人文主义残余相对峙。"在他们的建筑、图画和故事中，人类准备好——如果必要的话——熬过文化而幸存。"（II.1，第219页）布莱希特同意本雅明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威胁时，只给予文化以相对的意义："让我们不要只为文化说话！我们要同情文化，但是首先我们要同情人！如果人得救了，文化也就得救了。"（1935，GW 18，第245页）"政治具有先于历史的优先权。"（Benjamin，V.2，第1057—1058页）这在弥赛亚的拯救中由历史的中断宣告，在政治上由暴动宣告。

本雅明就如何对待失望提出了两套相反的方案，而且两套方案显得对他完全同等重要。除了破坏方案，即无情地 551
扫除历史的废墟以便为新事物腾出空间，还有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案，即要在每一个当下实现过去未兑现的预言。其中组织回忆和遗忘的能量核心，他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就是"战斗的被压迫阶级"（I.3，第1243页）本身，这个阶级不由自主地回忆起种种图景，而非随心所欲地建构过程。"不由自主"意味着，这里本雅明超越了人本质上是理性的、受意识引导的这样一种观念，这一观念产生于启蒙运动，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无产阶级的统治诉求提供了合法依据。正如集体无意识和面

向客体的有意识行动共同存在，过去有意识的工作的沉淀没有受到失望的损害，也没有在社会化过程中遗失。本雅明以此反驳西美尔的生命哲学对具有历史力量的主体的理解。

6. **去历史化和时间限定**。失望的机会或者说风险对应着人在历史上的期望范围和活动范围。古典时代的和谐宇宙观能够确保人免于失望，基督教的救赎也不受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是随着启蒙和科技给人带来自我完善的观念，人自身背负起了失望的风险，一旦笼罩着人自己事业的光芒消散，失望就击中了人。在价值理论转向价格理论、解剖经济社会的问题转向市场上单个价格形成的问题的一百年以后，文化社会学也效仿着收窄了问题视野。文化社会学不再致力于将社会中的个人纳入社会化的方案，那些方案要求拥有超越个人自身生活的意义。相反，文化社会学观察到，体验作为目标、人愿意不知疲倦地追求和积累愉快经历等等，成为决定人行动的结构现象。这一过程（新的阶层参与到体验中来，个人扩大用于体验的时间预算，不仅在自由时间而且在工作时间也同样充满了体验性质）带来的不同社会后果，在格哈德·舒尔策（Gerhard Schulze）看来，也包括下面的心理后果："对体验的诉求从边缘因素变成了个人价值的核心，它完全变成了生命有无价值的标准，并且定义着生命的意义。"（1992，第59页）不幸的是，体验的世界里作为目标的情境和主体，即西美尔所描述的灵魂的幻影运动，极易发生故障。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依赖于五花八门的体验原料的供应者，另一方面是因为原料只有借助心理的力量才能变成体验。"在以体验为目标的行动之前便有了不确定的问题，接着便有了失望的问题。"（第60页）在不同的以体验为目标的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并且害怕决定失误，就产生了不确定性。失望通常被归因为条件的不充分，但"只要没有理解这忽略了主体对于失望产生的意义"（第65页），失望就会一直存在。舒尔策"向内定义问题"的做法效仿企业管理学的模式，虽然他没有忽视"经济……必须参与生产出消灭自身产品的需求"（第67页）。营造成功假象的机会就是以体验为商品的市场上的顾客准备决定购买时的心理动机（参见 Haug 1971）。体验的承诺总是下面这种威胁的帮凶：如果不购买，将产生怎样的失望。人所热衷的体验配有保质日期一样的失望。同时，体验—失望这组对子具有了更高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地位。阿尔伯特·O. 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从群体和个人令人失望的消费经验变化不定的强度中推导出转入政治参与的契机，政治参与本身又会

再度产生出令人清醒的体验，使积极的行动者落回私人活动的领域。生活方式转换的结果让公民在失望和社会介入中来回摇摆。失望这个概念这里解释了“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转换”的“机制”（1984，第148页），活动者的“错误选择”触发了这种转换。但是正确选择的机会遥不可及。“失望”一词局限为消极的含义，似乎是因为，让失望发挥解放作用的愿望已然声名扫地，这就保护了现有的社会情况维持原状。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Resignation« (1969), GS 10.2, 794–99; ders., *Minima Moralia* (1951), GS 4;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GS 6; ders., *Ästhetische Theorie* (1970), GS 7; W. Benjamin, »Der destructive Charakter« (1931), GS IV.1, 396–98; 553 ders., »Erfahrung und Armut« (1933), GS II.1, 213–9; E. Bloch,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1962), GA 8; ders., *Erbschaft dieser Zeit* (1935), GA 4; B. Brecht, »Über experimentelles Theater« (1939), GW 15, 285–305; ders., »Über den formalistischen Charakter der Realismustheorie« (etwa 1938), GW 19, 298–307; ders., *Arbeitsjournal*, Frankfurt/M 1973; ders., »Rede auf dem I. Internationalen Schriftstellerkongress zur Verteidigung der Kultur« (1935), GW 18, 241–46; »Enttäuschung«, in: *Deutsches Wörterbuch*, Neubearbeitung, 8. Bd., Doppellieferung 1/2, Stuttgart 1995; S. Freud, *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 (1930), GW XIV; ders., *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 (1927), GW XIV, 323–80; P. Furth, *Phänomenologie der Enttäuschungen. Ideologiekritik nachtotalitär*, Frankfurt/M. 1991;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G. W. F. Hegel, *Die Vernunft in der Geschichte.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 hgg. v. G. Lasson, Leipzig 1917; A. O. Hirschman, *Engagement und Enttäuschung*, Frankfurt/M 1984; M.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1932), GS 3, 48–69; W. I. Lenin, »Der Krieg und die russische Sozialdemokratie« (1914), LW 21; L. Löwenthal, »Zum Andenken Walter Benjamins« (1982), *Schriften* 4, Frankfurt/M 1984, 121–35; K. Löwith, *Weltgeschichte und Heilsgeschehen. Die th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53, ^{4}1961 (*Meaning in history*, Chicago 1949); H. Plessner, *Die verspätete Nation. Über die politische Verführbarkeit bürgerlichen Geistes* (1935/1959), GS VI, Frankfurt/.M 1982; G. Schulze,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M-New York 1992; G. Simmel, *Lebensanschauung. Vier metaphysische Kapitel* (1918), München-Leipzig ²1922; ders., *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 GA 6, Frankfurt/M 1989; M.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1922), Tübingen ⁷1988; F. Wiethold, »Alles im Griff«, in: *Düsseldorfer Debatte*, H. 8–9, 1986, 7–19.

赫伯特·克拉斯（Herbert Claas）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ntizipation, Arbeiterbewegung, Aufklärung, Befreiung, Brecht-Linie (II), Denken, Dummheit, Eingedenken, eingreifendes Denken, Ende der Geschichte, Engagement, Entscheidung, Entwurf, episches Theater, Epoche, Erfahrung, Erinnerung, Eschatologie, falsches Bewusstsein, Faschismus, Fetischcharakter, Fortschritt, Frankfurter Schule, Frustration, Gefängnishefte,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ianismus, Hegemonie, Ideologie, Ideologietheorie, Illusion, Irrtum, Katharsis, Krise des Marxismus, Kritische Theorie, Optimismus-Pessimismus,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rojekt, Prophetie, Revolution, Sein-Bewusstsein, Selbstkritik, Sinn, Unglück, Utopie, Zweifel, Zynismus

发展（Entwicklung）

A: tanmīya.

E: development.

F: développement.

R: razvitie (развитие).

S: desarrollo.

发展在日常语言中是多义词：这个术语可以指涉运动、变化、在资格意义上“从低水平到高水平的跃升”即“更高的发展”、成熟、增长或改善；发展也可以被理解为阐述或起草。和它相对 554
的概念是不发展或者“同样事物的永恒反复”。发展与不发展的循环这两种观念都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多层次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这种差别关乎实际的发展或想象的发展的不同驱动力，关乎其具有客观决定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属性还是超自然的属性，关乎其具有主观上或个体方面易受影响的属性还是“坚强不屈的”属性，关乎其尺度、意识和目标。发展是指新事物的形成，而新事物多半源于“旧事物”的某种趋势。

马克思主义被考茨基鼓吹为和达尔

文主义相提并论的“经济发展学说”。恩格斯对于这种倾向的形成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就对历史唯物主义面临的“自然主义的”和“客观主义的”侵扰保持警惕。1895年，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抨击这一派别的拥护者是“假冒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么把我们的唯物史观拉回到一般发展理论，而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理论只不过是某种新形而上学的新隐喻；要么在这种学说中寻找达尔文主义的歧路。”（*GkM*，第83页）

1.“世界就是变化”（ὁ κόσμος ἀλλοίωσις，《德谟克利特》[Demokrates]第85节，参见*DK*，第115节），这句简明扼要的话可以归之于德谟克利特（Demokrit）。但是，与此相对应的并不是发展思想。为何古希腊的集体想象将发展思想排除在外呢？造成这种观念的是赫西俄德（Hesiod）关于各时代将以堕落的顺序排列的“故事”（λόγος）（参见《工作与时日》[*Werke und Tage*]，第106—200页）。根据这种神秘的观念，各个时代都会发生突然的恶化，并按照这样的顺序行进到最终崩溃的边缘。在古希腊语中，最早和发展的意义范围交叠的概念有γένεσις（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时采用了这个概念，希望通过这种分析重构“货币形式”的“起源”，参见MEW 23，第62页）、αὔξησις（增长）和φθορά（毁灭），等等。发展是拉丁语词语*explicatio*的“一个相对晚近的”（Weyand 1972，第550页）译法。这个术语（类似于*evolutio*）最初指的是展开、松开或打开（如纱线、一张网或一卷书）；随后，它在比喻的意义上被用来指涉言辞合乎逻辑的陈述（见若尔日[Georges]）。展开（Explikation）一个文本意味着讲清楚它蕴含的意思。如果 555
把全世界都看作类似于文本的东西，并参照“对自然之书的阅读”来获得知识（正如莱布尼茨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iristian Wolff]的著作中提到的那种哲学），那么*explicatio*或发展也可以指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阐述，以便接下来最终形成合乎因果的解释。

因此，莱布尼茨（他最多说过*involutio*[纠缠]和与之相对的*evolutio*[展开]，以及*enveloppement*[封包]和与之相对的*développement*[打开]）还没有把发展理解为某种全新事物的产生，而是将其理解为解开以“纠缠的”形式早已存在的事物。在这里，发展也是指意识到还未被意识到的现象（“微妙的知觉”——“所有困惑都必须解开”；参见《人类理智新论》[*Nouv. Ess.*]第IX章，《莱布尼茨全集》科学院版[Ak.-Ausg.]，第6卷，第69页及以下，其德语版是《新论》[*Neue Abhandlungen*]）。

在莱辛和赫尔德那里，发展的词义猛然增多了。莱辛的《论人类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77/1780）“前言”把宗教看作“过程”，“据此，每个地方的人的理智都可以独自发展，而且也应该进一步发展”。在这里，发展这个概念处于教育的统摄之下，依照教育的范型，一切文明史都是可以想见的。在以宗教为教育者的教育过程中，人类将走出童年，臻于成熟，最终扔有被启发的理性，而不再需要这个教育者。还没有进入这个过程的东西被莱辛称为“预习……、暗示和指点”（§ 43）。后者被他定义为“从已经包含着某种萌芽的东西中发展出还隐约未现的真理”（§ 46）。除了“隐含”“表述风格”和“寓言”等等之外，这些形式是对儿童有益的，而一旦在它们上面逗留太久，它们就变得“有害了”。理智在经过很多阶段后就会“达到完全的启蒙”（§ 80）。在这里，发展似乎讲的是“人类达到其完善状态”而经过的以及每一个个体必须“首先走完的轨道”（§ 93）。

在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85）中，发展占据着一般性的地位。从实质（而非术语）来看，和莱辛的著作类似，这本书也几乎把发展等同于养成（Bildung）。“养成”这个词或许是赫尔德发明的，但至少是和别人共同造出来的。养成包含着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发展，而人类在这里被理解为“自然最后的宠儿”，“为了它的养成和实现，必须预先有很多的发展和变革”。根据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 556
世界史的进程同上帝的创世蓝图是一致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第1—3册）。

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的书评中，康德反对“从与大自然的类比中进行推理的思路，即便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自然造物连续的等级序列以及逐渐向人靠近的法则”（W 10，第790页）。赫尔德把由气候决定的人种的变化归因于某种“基因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康德对他表示赞同，他看到赫尔德努力认为“一方面是进化体系，但另一方面也包括外在因素的纯机械的作用”有利于某种“修正着的生存原则”。但是，康德指出，“我们大概也可以把这种生成中的自然的自然规定性称为胚胎或者初始的设计，而不必因此将最开始的那些看作本来就是移植的、只是偶尔展开的机制或蓓蕾（正如进化体系中那样）”（第802页）。在《论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1800）中，费希特在自然界中看到了“一个表象的闭合的链条，因为每一环都由它前面的一环决定，并决定它后面的一环”；他还把内在驱动力和外在条件（“环境”）结合起

来，以解释“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这个链条才会发展”（第1册，III，第270页及以下）。由于反对唯物主义观点，费希特认为理性是“源自本身的发展的永恒过程”的主体，“它本身是没有穷尽的，它在发展中并通过发展达到穷尽”（第3册，III，第399页）。

黑格尔在精神的主体—实体中扬弃了这种理性。在他那里，发展是由概念内在的矛盾向前推动的，并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是辩证的。这个过程是无休止的、不可逆转的。“概念的行进不再是转化为或者显现为别的东西，而是发展，其方式是不同直接同时被设定为彼此的同一和整体的同一，而规定则被设定为整个概念的自由运作。”（*Enz*，§ 161）因此，对黑格尔来说，精神的历史独占着字面意义上的发展（这正是因为它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历史，而是一直包含在精神的永恒自然中的序列）；他把自然理解为“**等级体系**”，“但这并不是指一个从另一个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相反，它处于内在的、由自然的基础构成的观念中”（§ 249）。等级序列的图景也影响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观。

557 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形而上学的话语不再被考虑，即便在他们浩繁的著作中几乎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话语的余音。和德谟克利特一样，他们认为不存在不变化的事物；但和古典思想不同的是，对他们而言，世界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联系。在这种联系中，连续和断裂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一切都是发展的结果和“中转站”。不发展意义上的停滞是一种空洞的幻觉。两人在其提出的政治纲领、理论和发表的报刊文章中，都自动地把发展理解为从低到高的转变。不过，他们也认识到了进步中的倒退，甚至斗争的各阶级的同归于尽。他们自己的发展过程表现在不同的尺度上，他们把这些尺度一个挨着一个排列起来，以便能够判断或预测从“低”到“高”，或者更确切地说，从基础、简单的事物到复杂事物的转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以一种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理解的实践——它是他们后来的发展思想的支柱和核心——取代了起初主张的唯心主义发展观。但是，实践和发展的关系仍然是一对还未完全澄清的矛盾。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类发展史的过程和动力的理论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看法上，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对于他们的理论作为发展理论的价值的思考上，却表现出他们两人的理解各有侧重。

作为进步的发展。遵循启蒙的传统，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发展首先等同于进步。马克思在研究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写道：“没有党派就没有发展，没

有区分便没有进步。”（MEW 1，第 104 页；MEGA I.1，第 190 页）他在为《莱茵报》遭查禁而发表的意见中，谈到了报刊和国家的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就是公民和封建专制的关系。其中写道：“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MEGA I.1，第 352 页）

558 因此，报刊的任务要理解为服务于公法制度和私法制度进步的反对派。只有对现状进行批判性的和理性的辩论，国家和法律才有可能发展。在发展是过程和结果统一的意义上，进步是建立在矛盾、反抗和批评基础上的。如果理论上和报刊上的批评遭到禁止，那么公共生活连同私人生活都会停滞下来。在公共批评的形态中，以其名义颠覆了迄今为止的发展思想的实例已经在这里出现了，那就是在社会路线斗争中变化着的实践。

马克思是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概念发展时，开始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的。黑格尔将家庭和市民社会当作国家的产物，而马克思则相反地把它们作为国家的能动基础（MEW 1，第 205—206 页；MEGA I.2，第 7—8 页）。

1844—1845 年，马克思告别了对发展的历史哲学理解。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还为了“提高到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之上”而问道：“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MEGA I.2，第 208 页；MEW 40，第 477 页）他确信，原因就在于私有制。在一组对抗关系中，一面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私有制，而另一面却是异化劳动。由于“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最终的关键就在于废除这种关系。在旧神学和哲学意义上探寻历史中的理性时，马克思又一次问道：“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第 246 页；第 521 页）此后不久，马克思就放弃了这个历史神学的意义问题，相反，他把问题转向了获得解放的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即使是劳动的人们也可以被视为目的本身——的客观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的发展是衡量历史进程的尺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MEW 3，第 22—23 页）随着分工的发展，出现了城 559

乡的分离。“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MEW 3，第 22 页）接着，“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第 26 页）。在《共产党宣言》以及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表达了原则上相同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MEW 13，第 8 页；MEGA II.2，第 100 页）或者：“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MEW 13，第 616 页；MEGA II.1.1，第 22 页）

我们还不清楚能否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找到同一种尺度。但是有一些明确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一种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多少更先进些。我们也可以断言，就此看来，最宽泛意义上的科学的发展即便面临着意识形态化的危险，无疑也是进步的。

一个在理解接受上有争议的问题是历史决定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MEW 13，第 9 页；MEGA II.2，第 101 页）就此而言，理解过去的历史不存在什么困难，马克思通过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广泛历史研究推导出来的结论就能在大体上为人所理解。但是，他和恩格斯是如何勉强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共产主义的过渡论证的呢？在这个理论问题中，隐藏着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

如果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生产力上，那就可以尝试着进一步思考马克思的这样一种思想了，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Elend*，MEW 4，第 130 页）。在社会主义社会或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突出的是哪一种生产力的发展，仍是悬而未决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最终 560
就失败在重新发展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被引入的各种生产力类型。

如果把形态理论的论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最终结论，并对其旨在影响政治的目的视而不见，那就过于片面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是对当时各种基于世界史目的的发展观念的彻底否定。然而，对辩证法的简化导致一些人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壮大足以

"跨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创造了解决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物质条件"（MEW 13，第9页；MEGA II.2，第101页）。这并不是说，单单物质条件就能够以新社会取代旧社会。"客观"起见，一种可能性必定不会不经任何行动就自动变成现实。我们不能怪罪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撇开了或忽视了在世界史发展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相反，他们的辩证研究方法指出，在获得解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由此产生的这个社会的"掘墓人"之间存在着联系（MEW 4，第468—469页）。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类会在愈益严重的生产利润的迷途中破坏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生存基础，并因此最终毁灭自身。他们假定了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关于这种本能，本雅明说道："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实际情况也许同马克思的话截然不同。也许，革命是在这趟列车上旅行的人类在急刹车后拉下的手柄。"（GS I，第1232页）

同进化论的关系。对于生物学上的进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起初是谨慎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令恩格斯振奋，他感到，达尔文"驳倒了"从有自然科学以来的目的论。"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1859年12月11日或12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29，第524页）当再一次阅读达尔文的著作时，马克思阐明了其认识论上的自我误解，并因此而"感到好笑"。在马克思看来，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 561
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Phänomenologie‹），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1862年6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0，第249页）。

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比马克思更像他那个时代的人。对杜林的反驳也把恩格斯带到了这样一个境地，在那里，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评论的，杜林警告"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Entwicklung）这些字眼"，其理由是"发育（Entwicklung）概念只有在发育（Entwicklung）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MEW 20，第70页）。恩格斯没有理会方法论上的疑虑，而是把全部精力都用于证明马克思和他真的可以阐明这样的发育（Entwicklung）规律了。接着，在《自然辩证法》中，他区分了"生存斗争"与植物和动物的发展：

前者是由“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引起的，而后者则没有这样的压力就发生了(MEGA I.26，第124页；MEW 20，第563—564页)。因此，他拒绝把达尔文对马尔萨斯主义一股脑的吸收作为进化的基础，并在此背景下消解了发展和进步的同一。在这里，他认为“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化同时又是退化，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面的发展的可能性”(第125、564页；参见第108、504页)。

发展概念和理论地位。达尔文的理论和其他自然科学上的发现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考虑他们的理论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当马克思专注于进一步推进其经济学批判工作的时候，恩格斯却出于部分政治的、部分理论的动机，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研究了一般辩证法的问题(参见*DN*、*AD*以及部分*LF*)。他计划把“辩证法作为普遍联系的科学”来把握，这一计划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总的说来，“发展是由矛盾或者否定的否定”引起的，并且发展表现出“螺旋的形式”(MEGA I.26，第173页；MEW 20，第307页)。因此，恩格斯确信，“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MEW 21，第293页)。

562 把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纳入发展原则之下，产生了互相矛盾的效应。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大多偶然出现的、关于非有自然主义印记的总体的两条、三条或四条一般的辩证法则(参见MEW 20，第111页及以下，第131、307、348页)被证实是极其有害的；与其说这些法则形成了严谨的理论，不如说它造成了教条主义。这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还不能明确断定。一方面，他也许无意间——在《资本论》第1卷的注释中，他提到，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既适用于历史，也适用于化学——向恩格斯传递了辩证法则的观念。马克思的态度与其说是热心的，不如说是欣然的(不过，他的含蓄也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恩格斯关于一般发展辩证法的很多笔记)。他本人的志向并不是擘画一幅新的世界图景。

3. 在恩格斯那里引人注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考茨基那里更加突出。考茨基自认，他“早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前……曾倾向于达尔文主义”，并“以如火的热情”研究过它，当时，他“对马克思还不感兴趣，甚至是拒斥”，并“深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的影响”(1910，第V页)。根据恩格斯发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MEW 19，第335页)，他把马克思同达尔文几近相提并论。通过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考茨基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主要由他共同构建

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家。对他来说，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正如他同自然科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的立场所表明的那样——他指责庸俗唯物主义“搞错了社会有机体的特征”（第 VIII 页）。在他看来，社会“只不过是遵循着特殊规律的自然的一个特殊部分。我们如果愿意，也可以把这些规律叫作自然规律，因为就其本质而言，这些规律同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区别”（第 11 页）。这种思想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广为流传。于是，狄慈根（Dietzgen）宣布，“未来是从当前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Zukunft*，第 136 页）。由此，在语言中出现了把自然和历史等而视之的用法。就连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也提出了“普及达尔文理论的任务”（1887）。他给自己著作的第一部分起的标题是“发展理论”（Entwicklungstheorie），并在开头把达尔文的理论归为“全面的”“进化（发展）理论”的一部
563 分：发展 / 进化对他来说是“现象的统一和不间断的联系”，而“真正的进化论者”（Evolutionär）——注意，这是对“革命者”（Revolutionär）的简化——“认识到，在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并无鸿沟”等等（第 7 页）。在其出现时还无辜的社会进化论（Sozialevolutionismus）在自由主义发展信念和进步信念统治下的第二国际内部流传，并在 1918 年十一月革命后直接服务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反革命煽惑，即用“社会主义在进军”的空话安抚起义群众。罗莎·卢森堡号召抵制这种“自动论”（Selbstlauf）的意识形态；她不断地要求促进劳动群众的实践的—政治行动。

通过列宁，人的行动再一次成为发展观的中心问题。由此，“人的发展”这一表达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但这一点在他晚年的思想中和在法语版中被去掉了，甚至部分被完全撤回了，参见 MEW 19，第 111—112、242 页），但列宁的早期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KapR*，LW 3）却证明，发展也可以意味着一项未来的工程：由于资本主义（正如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所表明的）有历史“使命”要完成，因此对它应予以促进；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社会主义才能自己开辟道路，它才真正彻底地具有了一个工程的特征——它将被“建立起来”。

然而，在列宁那里，能动主义（Aktivismus）和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决定主义（Determinismus）又走到了一起。他的几乎所有或多或少产生了直接政治影响的著作研究的都是现实问题。于是，从要分析的力量对比和介入可能性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发展主要被理解为“现实

的发展”；《国家与革命》（*SR*）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等提出原则要求的著作所研究的也主要是当下和不远的将来。与此不同的是，用于研究和自己理解的《哲学笔记》（*Philosophische Hefte*）却把发展和统一列为两个基本原则。“此外，必须使发展的一般原则与世界、自然、运动和物质等的统一的一般原则相一致、相联系和相结合。”（LW 38，第 242 页）列宁批判修正主义者，说他们“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LW 15，第 21 页）。

564 在早期的苏联，“辩证法论者”或“黑格尔派”和“机械主义者”之间围绕历史发展的节奏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问题是：历史发展是跳跃的还是连续的？是文化变革后自动发生政治经济革命，还是说革命者应当有目的地变革文化生活？在这场讨论中，阿布拉姆·德波林（Abram Deborin）和布哈林等人极有趣的思想是那个活泼的哲学思考盛行的短暂时期所存留的证据——这种思考由于斯大林（参见 *FL*）和所谓总路线的胜利而被粗暴禁止了。现在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不可动摇的正统说法：存在三条辩证法则，它们共同引起了一切发展。

由于完全遵从斯大林批准的路线，马列主义把“唯物辩证法”设想为“全面的发展理论”，其“含义是，在客观现实世界，由于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的各种矛盾的作用，发生了这样的运动和变化，即它们在性质上从低级转变到高级，并由此使得沿着上升路线的发展形成了总过程”（Bartsch/Klimaszewsky 1975，第 40—41 页）。但是，这种“全面的发展理论”止步于宇宙之前。“不存在世界总体的发展，而只有世界总体里的发展。”（Kirchhoff/Klaus/Kröber 1975，第 338 页）世界总体被认为是“‘上升’路线和‘下降’路线的”同步的“统一”（同上）。

这种发展理论（就其直观上同马克思的矛盾而言）被理解为建立在“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这种唯物主义“被辩证地扩展到了社会之上”（Redlow 1977，第 8 页）。这种观点的对手是“所谓的实践哲学”，其先驱者是柯尔施和卢卡奇（第 10—11 页）。与实践哲学相反，唯物辩证法被视为构成了“统一的整体；它建立了对世界的合乎规律的秩序的科学理解，而这套秩序是运动和发展的秩序”（Stiehler 1977，第 20 页）。发展被定义为超出纯粹的运动而产生的“许多单个的运动过程的”积累，“在这些过程中，质的矛盾通过内外矛盾的作用转变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质”（第 23 页）。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观的深入研究，彼得·卢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即“综合的进化论为把握自然界的基本辩证规律奠定了经验基础”：“生物学上的进化总的来说建立在物种再生产之上，而在统计上，物种再生产相对于
565 突变表现为同一的重复，这种进化由此表明，矛盾是一切运动的本质。其中，突变是对某种预先规定的物种准则的简单否定。通过选优，否定的否定作为取决于环境条件的物种统一性的再生产而得到实现。”（1977，第 127 页）在这里，发展思想的辩证革命化导致了唯物辩证法的进化论化（Evolutionierung）。

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的晚期，科技革命使人的行动融入了自然的发展本身。“相对于自然过程的人的行动不再需要物质的、能量的中介，而是作为信息直接在交流中自我实现。这样一来，人便根据自己的目标掌控生物学过程的进化，从而由这些过程的模仿者变成了其建构者……人对自然的统治作为对自然过程的有意识的掌控，便不是外部的关系了。相反，人的创造性变成了自然发展的一般的、内在的发展要素。”（Jünger 1985，第 97 页）

4.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GuK*，1923）中，视角之广泛也如同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这里涉及的是包含了一切的社会总体的发展；大体说来，客观的社会发展和进步阶级的主观意识之间存在着某种（往往是历时的）联系，这些被卢卡奇总称为“过程”。革命的阶级意识以某种发展意识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使无产阶级所处于的独特精神状态就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看起来似乎成了历史发展的一部分。”（W 2，第 438 页）这使得国家从其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走向外面”，来到了意识的前面。它“只不过仍是一种现实的给定，其实际权力必须被考虑在内，但这种权力无法对我们行为的目的提出任何内在的要求”（同上）。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卢卡奇的对手是阿尔都塞，后者希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他认为的黑格尔历史神秘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中写道，究竟能否说存在统一的历史发展是有疑问的，因此，他提出了“矛盾不平衡发展规律”，并带着赞赏的口吻重述了毛泽东的观点：“世界上不存在发展得绝对平衡的事物。”（FM，第 146 页；PM，第 206 页）由此 566
也可以看出：“历史是开放的。”（Sève 1980，第 207 页）

一般发展理论因此也蒙受了同样的嫌疑，马克思在谈到“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时就无比肯定地说道，这种嫌疑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MEW 19，第 112 页）。于是，所谓后共产主义觉醒的标志，所指的已不再是作为上升的发展，更谈不上

有保证的上升了。如今，发展简单地表现为“不可抗拒的过程的变迁”（Schurig 1990，第706页）。由于对概念的填充是糟糕的，于是干脆否定了填充本身。失去保证得到的回应是失去内容。这将几乎不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了。

参考文献：

E. B. Aveling, *Die Darwin'sche Theorie*, Stuttgart 1887; G. Bartsch u. G. Klimaszewsky, *Materialistische Dialektik—ihre Grundgesetze und Kategorien*, 2. überarb. A., Berlin/DDR 1975; Ch.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of Life* [1859]; A. Deborin/N. Bucha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zist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69; J. Dietzgen, »Die Zukunft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g. von E. Dietzgen, Bd. 3, Stuttgart 1922; J. Jünger, *Die Vergesellschaftung der Produktion im entwickelten Sozialismus als einheitlicher Prozeß von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r Revolution und sozial-ökonomischer Reife und die qualitativ neuen Anforderungen an die Forschungs- und Entwicklungsarbeit der Kombinate*, Diss. A,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1985; K. Kautsky, *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1910), Stuttgart-Berlin ^{3}1921; R. Kirchhoff, G. Klaus, G. Kröber, »Entwicklung«, in: PhWb, 1, Leipzig ^{11}1975;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S. E. Liedman, *Das Spiel der Gegensätze. Friedrich Engels' Philosoph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New York 1986; G. Redlow, »Zur Einheit von Materialismus und Dialektik«, in: ders./Stiehler 1977, 7–18; G. Redlow u. G. Stiehler (Hg.),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Berlin/DDR 1977; P. Ruben, »Das Entwicklungskonzept in der Naturerkenntnis«, in: Redlow/Stiehler 1977, 97–128; V. Schurig, »Entwicklung«, EE, 1, 1990, 706–24; L. Sève, *Une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Suivie d'un vocabulaire philosophique*, Paris 1980; K. Weyand, »Entwicklung«, in: HWPh 2, 1972, 550–57.

斯文-埃里克·里德曼、
托马斯·马克斯森、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审校

参见：

Ableitung, Aufhebung, Bewegung, Bildung, Darwinismus, Dependenztheorie,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hern, Engelsismus, Entwicklungsländer, Epoche, Evolution, Evolutionismus, evolutorische Ökonomik, Fortschritt, Geist, Geistesgeschichte, Genese, Geschichte, historische Notwendigkeit, Indeterminismus, Materialismus,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nachholende Modernisierung, Naturdialektik, Negation der Negatio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raxisphilosophie, Reife, Selbstorganisation, Selbstveränderung, Selektion, Sozialdarwinismus,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Umwälzung, ungleiche Entwicklung, Ungleichzeitigkeit, Unterentwicklung, Verändern, vorwärts, Zerstreuung

567 发展中国家（Entwicklungsländer）

A: buldān nāmīya.

E: developing countries.

F: pays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R: razvivajuščiesja strany (развивающейся страны).

S: países en vías de desarrollo.

“不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ies）这一概念的出现一般可追溯至1949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Program）。它是指称所有殖民地国家或者——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以广泛存在的贫困和经济技术的落后为标志的“新国家”。在50年的时间里，这个概念得到了联合国、各个国家和国际发展机构以及研究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学者的接受，并被转化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这一更加友好、外交色彩更加浓厚的名称。就这个概念不只是（相较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欠缺的）一种特征性描述而言，其理论渊源和宗旨基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成为分析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导范式，即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前现代的（即传统的）社会，它们将以发达社会为榜样，并由于内在的动因，走上现代化（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态）的道路，或者说其目的就是要这样做。尽管对于如此理解的（并且通常冒用“发展”的）概念存在一些理论批评，尽管对于可以被归为发展中国家的内容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个概念在政治上、在国际组织中并且最终也在学术上得以保留，只不过被赋予了各种精确属性（新兴工业化国家、产油国、最不发达国家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偏爱“不发达”“不发达社会”“外围资本

568 主义”或“第三世界”这些概念，尽管这些术语并不总是精确的，也并不能把握这一类国家的所有结构特征。

1. 虽然原则上遵循共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待（“二战”以来的）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现象时还是捉襟见肘，因为所涉及的国家在发展水平、资本主义化程度、历史和政治一制度设置以及发展潜力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别。此外，不确定它们是封建社会形态、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还是已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形态；它们的发展方向是由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预先确定的，还是也可以想见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统治下取得经济和社会解放的其他方式（也就是说部分地“跨越”或者“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讨论具有巨大影响的P. A. 巴兰（P. A. Baran）就把这一类国家定义为：在这些国家里，经济剩余（1）部分被统治阶级占有并用于非生产的目的，并且/或者（2）被外国资本利益攫取并绝大多数输送至中心国家（1962，第177、184页）。另外一些定义则更侧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和政治方面：“发展中国家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因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解体而获得其政治主权，但仍一直在与帝国主义争取自己的经济独立的所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Khalatbari 1981，第807页）还有一些定义强调——相对于历史和可能的未来方面存在的相似之处——当前的差异，这里当然也含蓄地指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典型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今天的第三世界，存在着由前资本主义的关系、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或者由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决定的社会结构。在一些国家发展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尽管各国利益千差万别， 569
但独立的国民经济发展都以克服经济的落后和依附为目标。”（Faulwetter/Stier 1984，第48—49页）对于埃及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来说，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又“导致了外围发展过程的方向出现了三种扭曲”（有利于出口部门的扭曲、第三部类的过度膨胀、有利于轻工业的扭曲）；受资本主义中心统治的“外围资本主义”由于其结构和政治条件，可能无法实现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唯一的发展趋势目标、无法实现经济一社会的一体化和均质化并发展出相应的独立的动力（1975，第160页及以下）。追随马克思（和巴兰）的委内瑞拉社会科学家A. 科多瓦（A. Córdova）和H. 席尔瓦·米切莱纳（H.

Silva Michelena）提供了两个可被视为互相补充的定义尝试。科多瓦将“欠发达”定义为“一个国家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没有广泛占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用来供养其处于某种与历史时期的相应技术状态和现存自然资源相符的生产水平上的经济活动人口”（1969，第38页）。席尔瓦·米切莱纳补充道：“不发达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本身主要是以一种社会形态为标志的，这种形态——同畸形的、依附的生产工具紧密相关——以这样的方式起作用，即它把国家在富裕社会和穷困社会之间的国际分工中的特定地位永久化了。”（1969，第43页）

2. 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当然不能推断出今天所理解的关于不发达的理论，但在不同的著作里（如在论印度、中国、俄国、爱尔兰的著作里以及在《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或其他著作中）还是可以发现他们解释不发达或全球层面的不平等发展的一些零星的想法（Melotti 1977；Banerjee 1985）。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些简短而零散的评论就至关重要。尽管这
570 里不可能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社会形态序列中的地位的争论或社会内部差异问题发表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缘故，这些评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不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从发展中国家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论的认识原则来看，可以得出不发达通常是由在历史上和在当下以一定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造成的结论；而且，这样一个发现，即在这种社会类型中，尽管在政治表面发生了所有运动，但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这种相互的、紧密的啮合使得两方面的动态变化几乎不可能，也被证实在方法论上是有益的。一方面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各种类型的公有制（在农村层面）和相对集权与专制的（担负基本的基础设施任务的）国家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分工在宏观社会和微观社会方面业已确定的形式和发展高度，这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像欧洲的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后来的工业资产阶级那样的革命阶级，从而也不可能推行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的有活力的新生产方式。缺乏牢固的私有制以及与此相关的不可能将直接生产者同其生产资料分离；这样一来，社会分工和企业务工便又极难转化为新的生产率提升和专业化等，最终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一些论述涉及复杂的不发展问题，它们是一些相互矛盾的段落，导致了不同的解释。例如，关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政策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商业

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残酷被直截了当地揭示出来（如在《资本论》第1卷关于原始积累的著名章节中）。但在个别论述中，马克思认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客观后果是引起了相应国家和各种关系的第一次（或者说唯一一次）真正的、必要的社会革命化。不过，关于这些社会变革的论断，马克思本人也有
571 不同的评价。尽管在1853年论述英国统治印度的未来结局的文章中提到，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Samindari- und Raiatwari-System）虽十分可恶，却包含着“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MEW 9，第221页）两种形式的私有制；但例如在1881年给维拉·查苏利奇（Vera Sassulitsch）的那些著名信件草稿中，马克思关于私有制的进步性的评论却发生了重要变化，核心是同较早的论述相对立。“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利·梅因爵士（Sir H. Maine）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MEW 19，第402页）

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的《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中，主要的观点是向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使世界同质化，并以或多或少相同的方式把野蛮的、“无历史的民族”推进资本主义文明。因而，例如在今天看来令人诧异和难以置信的是，最初恩格斯在1847—1848年把美国合并墨西哥大部分地区视为进步的发展而表示欢迎，而后，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观点得到更正（MEW 4，第501页；MEW 15，第334、338页）。相应地，《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的名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MEW 23，第12页）也是不成问题的（诚然，只是针对德国读者来说不成问题，他们不应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与他们无关）。（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发展理论家来说，这些以及另外一些相似的片段构成了把马克思归入纯粹的现代化理论家之列的基础，例如参见Menzel 1991，第88页，以及Nohlen/Nuscheler 1992，第62页。）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到，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完全相反的物质后果可能源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征服。的确，已有一些论述提到了一种自动出现的国际分工。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的一个地方写道，世界必然会被分成工业国、原材料生产国和农业国（MEW 23，第475页），把便宜的工业品输入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将破坏当地工商业的萌芽；再如，572
在批判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定理时，马克思也强调了对于参加贸易的各国来说，优势的大小各不相同。然而，对于

在全球层面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拓展，对于发展与不发达、活力与停滞的分化这样一些想法，马克思却没有系统地论述。

资本主义被理解为必要的过渡阶段，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没有被探讨。社会主义被看作一个只有在走完资本主义阶段后才可以想见的、相对遥远的时期，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而言，这个时期无论如何只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才具有现实性。这些大致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主要观点。自50年代末以来，他们在某些点上开始有所变化。特别是在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和俄国农业发展的论述中，出现了新的转折和侧重点。基于对历史学和民族学问题的深入研究，马克思在其晚年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一些著作中清楚地限定了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范围。他明确指出，这一理论只涉及西欧。与此相关的是，在方法论上也要求对涉及其他社会事实的特定范畴进行重新检视、修正和扩展。“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MEW 19，第112页）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说明中（例如MEW 32，第667页及以下），马克思第一次详细探讨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统治，认识到不平等专业化（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对立）的问题，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的积累过程得益于对爱尔兰剩余价值的攫取，相反，爱尔兰的积累过程却以各种方式 573
（关税保护的缺乏、爱尔兰产品的低价、英国地主的侵占等）遭受阻碍和扭曲。马克思认识到，完全从属于英国的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后果，并因此走上了与英国本身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又导致了爱尔兰的佃农或无产者同英国工人的不同利益状况和政治态度。在马克思看来，爱尔兰工人和英国工人之间的这种分裂和深深的敌意是在爱尔兰——甚至在英国——的英国大地主和资本家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撑。他从中得出如下结论：（1）英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民族革命，即爱尔兰获得民族独立；（2）爱尔兰的革命既是一场民族革命，同时也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土地占有者，即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分，是英国人）；（3）革命纲领必须以爱尔兰独立于英国、没收土地和关税保护为基础；（4）这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

纲领将芬尼亚社（fenians，爱尔兰的一个革命组织）转变为一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族运动；（5）这场运动的社会基础是跨阶级的，并且必须有农民、知识分子、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手工业者等（Franco 1982，第 70 页及以下）。

此后，列宁、共产国际时期以及所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解放运动的理论发展，都或多或少地明确以附属国、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进程的民族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辩证联系为起点。

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战”期间和之后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又恰逢特别是在亚洲（中国、印度）兴起了民族解放斗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家愈益致力于不发达问题和反殖民主义革命的条件、形式与结果等问题。例如，最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
574 会（1920 年）之后，即将到来的殖民革命的主力问题、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工人阶级和大部分民众、农民之间）问题和阶段问题，连同中心（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外围的革命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成了激烈争论的主题。然而，在这些讨论中，立场的各不相同不仅源于分析（或者说经验）的分歧，而往往更多的是由政治家或政党的实际政治需求——有时是合法性的需求——共同决定的（对此，可参见 Schlesinger 1970）。

3. 发展中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纲要。发展中国家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些特征是由其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形式和当前形式以及相应的内部经济—政治统治形式带来的，或者被打上了后者的烙印。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研究不满足于仅仅列举原则上同等重要的特征，如人均收入低，储蓄率和投资率低，生产率低，劳动力的一般水平、技术水平和资质水平低，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出口品目录以第一产业的少量产品为主，基础设施缺乏，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相对于工业国）较高，等等。相反，这种研究致力于把这些特征和其他特征置于一个结构性解释背景中，一方面包含历史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维度研究题目的内在联系。这样，不发达就被同时看作状态和过程。在这种状态和过程中——不管时间如何推移，也不管各国多种多样的特殊性——一方面结构上的高度内在异质性和另一方面较强的对外依赖性经常决定着发展参数。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个基本的结构要素重新在某种程度上互为条件，它们是在历史上（部分早在 500 年前）逐渐形成的，并被不对称的世界市场关系和内部

阶级关系固化了。

575 “对外依赖性”（Außenabhängigkeit）或“全球经济关系中的不对称分布”（asymmetrische Einordn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lichen Beziehungen）这一概念包含着不同方面。第一，这个概念是指，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主要部分不能由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活动所覆盖，因此，只有与外部即世界市场发生联系，这些部分才能为再生产过程所利用。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这种变形，即它们根本无法独立生产资本商品、它们难以填补的科技短板，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单方面经济从属的基础。这种“对外依赖性”不能同比利时或瑞士等国家的“主动的对外依赖性”（与高出口配额有关）相混淆；就此而言，它也不是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不要忘了，还有美国）等主要出口原材料的国家，因为这一类国家的民族经济本身就进行着重要资本货物的生产，具备对生产设备和出口设备进行可能的改造的科技能力。它们尽管拥有某种专业化结构，但仍表现出一种在性质上不同于不发达经济体和依附经济体的、跨部门和跨行业的交叉程度。第二，“对外依赖性”意味着，同外国和世界市场的交换过程（不得不）在不利条件下进行，这导致资源通过价格、交易成本、保险费、专利支付和特许支付等方式转入中心国家。第三，“对外依赖性”意味着，引用外国资本（作为自身积累源泉的替代品）的趋势，这些资本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的扭曲过程和资源外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发展中国家向中心的价值流出总额（包括利息分红、国内资本外逃、债务危机背景下的利息支付等）估计每年高达4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这同时约为过去几年亚非拉国家生产性部门投资总额的两倍”（Faulwetter 1988，第18页；Goldberg 1992，第1057页及以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必须将“对外依赖性”的这些非常 576
具体的含义作为其焦点之一。不对称的“对外依赖性”是：（1）由外部引进和输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和表现；（2）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非普遍化的结果和表现，因为迄今为止，主要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同质化的（在经济交叉程度的意义上，而非社会平等主义倾向的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倒不如说是个例外。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即“结构异质性”，可以直接由此推导出来。

“结构异质性”的概念在拉丁美洲关于依附性（Dependenz）的讨论中出现（如Córdova 1973，第24页及以下），并被引入马克思主义文献（在那里有时也被称为“多部门经济”）。除了起决

定作用的经济维度，它还包含了不同的社会方面：如在社会结构上，在政治制度、文化、消费、人口统计和许多其他方面。在经济领域，结构异质性首先是指各经济部门、各经济分部、各行业相对长期的共存，这些部门、分部和行业相互之间的特征是与显著的不同生产力水平相应的生产率差异、不同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等。例如，可以这样进行区分：有自然经济—家长制部门，有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部门，有简单商品生产部门，有国内资本主义部门，有外国资本主义和作为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的国有部门；其中一些部门内部，也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在国内资本主义内部，就有垄断资本主义领域和相对竞争资本主义领域）(Handbuch，1988，第 228 页)。在西欧的发展中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相应共存的事物并不鲜见。这绝不是要否定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与欧洲和北美早期的社会之间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的相似性，甚至淡化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
577 矛盾（参见 Hurtienne 1981，第 105 页及以下）。

这种理念既同资产阶级二元论和现代化论相对立，但也同基于从前按照主要形态顺序而演进的发展过程的强制性的社会形态决定论相对立。它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应用于经验—操作层面和分析—解释层面。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尝试，对各部门和各行业在其相互关系中的等级的确定（除了别的因素外，其标志是与世界市场的远近），与对这些不同的经济部分和社会部分之间互相的横向联系的分析一样，尤其有助于说明不发达的各种机制和运行空间，特别是有助于解释非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的和/或不稳定的、边缘的劳动关系与生活关系的继续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权力和财富上突出的巨大差异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外向性，小型的、有活力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一极与外围即简单商品生产、其他过时的残余经济形式这另一极之间的对立得以维持。结构异质性的范围和强度可以直接被视作不发达水平的决定性标准。

4.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极为抽象的结构特征并不表示对它们的前景可以做出全面概括的判断，相反，这些特征意味着资本主义的长期积累面临着特定的、特殊的障碍，而“追赶型发展”可能就是这种积累的后果。正如 20 世纪初期日本的例子和 20 世纪 70 年代初以来韩国和中国台湾所证实的那样，追赶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发达的路线和结构性因素被消除了——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在特定的内外部条件下，这些过程几乎不能被一般化，而更多地被视为“规律的例外”。

无疑，20世纪末最重要的趋势是，
578 就人均收入，当然也从所谓的社会指数（如，平均寿命、识字率等）来看，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多年平均增长率方面日益分化。这种发展反映在国际组织和学者对国家类型进行的划分上："门槛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最不发达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石油出口国或石油进口国、无人海口国家、岛屿国家或大陆国家、人口稀少国家或人口密集国家、高债发展中国家和低债发展中国家等。除了以所谓的"中等收入"（1993年的标准是人均收入在670美元以上）和低收入（相应地，低于670美元）来进行极为频繁的分类之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和社会类型也是可以设想的和有趣的，但这些划分的意义和用处却取决于各自的认知目标（关于可能的类型划分，参见Nuscheler 1996，第68页及以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批判两极分化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被一种新的分类掩盖了："如今在国际统计的最底层出现了许多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被降低到了那里），它们根本不可能被国际上的好听话称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贫困，而且还越来越落后。因此便礼貌性地为最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子类别，以便可以对1989年人均收入（其已经获得的收入）处于330美元的那30亿人归类。"（1995，第454—455页）

在不结盟运动（1955年以来）中，在一度拥有120多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所谓"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以来）中，以及在各种联合国组织或联合国会议（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发展中国家试图向帝国主义国家表达它们的共同利益。随着战后繁荣的终结和石油价格的上涨（1973—1974年），以及第三世界的相对团结，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都达到顶峰。但早在1970年代末，"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严肃对话就已经成为历史。在"冷战"的第二阶段，美国对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预的意愿日益提升，苏联和古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军事存在增加，这也使得第三世界的政治两极分化。自那时以来，
579 不结盟国家的运动尤其受到严重动摇。1980年代初以来席卷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此后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计划，以及最终在1989年后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失败，又更加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尽管偶尔会爆发南北冲突的因素（例如，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或者在1996年新加坡的世贸组织会议上），但第三世界的利益一致已走入困局，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它们的冲突能力和冲突意愿——与70年代相比——几乎在所有

层面都下降了。目前，第三世界几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分量的声音。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尽管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尽管一些门槛国家（特别是在东亚）的资本主义活力有时仍在持续，但是全球的南北差距从各方面来看都变大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没有出现与国内生产总值的高增长率相应的人均收入统计提高，那么第三世界的经济总体平衡在数量上将是更衰退的。即使把这些强烈的校正因素（指上文所提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译者）考虑在内，仍然可以确信，到20世纪末，约占人类1/4（16亿人）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所达到的经济水准和部分社会水准比15年前还要低。“在这些国家中，有70个国家现今的平均收入低于1980年，有43个国家甚至低于1970年。”（UNDP 1996，第1页）。另外，不容忽视的是与此同时，至少在社会方面还能够取得明显的进步，如在儿童死亡率的降低、人均寿命的提高等关键社会指标上。“从1960年到1993年，人均寿命的南北差距下降了一半多，从23年减少到了11年。”（UNDP 1996，第5页）在诸如入学率、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等其他指标上也都获得了改善，尽管这些社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各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个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配是相对不平等的。总体上看来，发展成就的差异在经济层面似乎比在社会层面更显著。

这种不同的发展结果促使许多研究者放弃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概念、“第三世界”论和对“南北冲突”的分析。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从不同的趋势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有问题的，即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只有个别案例描述、类型构建或者充其量是“中观理论”的理论（Theorien mittlerer Reichweite）才是可能的。此外，这些学者的反应相当模棱两可：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在某种后现代理论疲倦中鼓吹要拒绝“宏大的普遍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常常是这同一批理论家倾心于一种并不缺少普遍主义色彩的现代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需要加强理论努力。“发展理论失败之后，并不预示着要告别‘宏大理论’，而是要批判性地解决这一问题。”（Altvater 1992，第77—78页）从原则上讲，要针对理论上可疑的观点提出科学理论的问题，即理论或者普遍的解释方法是否只能适用于同样的过程和同质的学科范围。显然，正是理论才尝试经过诸如类型构建等中间步骤把不同的单个因素、部分过程和部分结构，纳入一个相关的、更广泛的发展环境之中。世界市场及其作用机制不足以作为发展中

580

国家问题的最终解释变量，始终还须分析各自的内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现实情况，这些情况与世界市场的条件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从这些条件中推导出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从内外部条件的不同样态中得出各种不同的发展。因此，关于发展和不发达的理论不仅要能够解释不发达及其固化格局的形成，还要能够从一个一般但又有区别的理论中推演出追赶和倒退的过程。这种区分
581 发展和不发达的理论也一定以某种方式超前于时代；因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唯物辩证理念还必须包含可能的发展路径以及未来替代的发展前景。就此而言，要摆脱不发达、落后和贫穷，不能停留在迄今为止追赶型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构想上，而必须把对于发展过程越来越重要的生态维度和全球维度纳入考量。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Die globalen Kosten des Fordismus. Zur ökologischen Interdependenz von Metropolen und Peripherie«, in: D. Dirmoser u. a. (Hg.), *Conquista, Kapital und Chaos. Lateinamerika. Analysen und Berichte*, Nr. 15, Jahrbuch 1992, Münster-Hamburg, 77–102; S. Amin, *Die ungleiche Entwicklung. Essay über di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des peripheren Kapitalismus*, Hamburg 1975; D. Banerjee (Hg.), *Marxian Theory and the Third World*, New Delhi u. a. 1985; P.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1962; D. Boris, »Marx, marxistische Revolutionstheorie und die Dritte Welt«, in: *Marxistische Blätter*, 1983, H. 2, 47–53; ders., »Die Dritte Welt im Zeitalter der Extreme«, in: *Sozialismus*, 23. Jg., Nov. 1996, 49–56; R. H. Chilcote, *Dependency and Marxism. Toward a Resolution of the Debate*, Boulder 1982; A. Córdova, H. Silva Michelena, *Die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 Lateinamerikas. Drei Studien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Unter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69; A. Córdova, *Strukturelle Heterogenität und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Frankfurt/M 1973; M. Dobb, *Economic Growth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1963; K. Ernst; H. Schilling (Hg.), *Entwicklungsländer: Sozialökonomische Prozesse und Klassen*, Berlin/DDR 1981; H. Faulwetter, »Die Ausbeutung der Entwicklungsländer durch das internationale Monopolkapital«, in: Stier 1988, 14–8; ders. u. P. Stier, *Entwicklungsländer am Scheideweg*, Frankfurt/M 1984; C. Franco, »Entwicklung, Nation und Sozialismus«, in: W. F. Haug u. W. Elfferding (Hg.), *Internationale Sozialismusdiskussion* 2, AS 78, Berlin/W 1982,

6–22; J. Goldberg, »›Springquell des Reichtums‹ oder Sozialfall? Der Süden in der Weltwirtschaft«, in: *Blätter*, 37. Jg., 1992, H. 9, 1069–77; E. Hobsbawm, *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Wien 1995; Th. Hurtienne,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und autozentrierte Entwicklung«, in: *Prokla*, 11. Jg., 1981, H. 44, 105–36; P. Khalatbari, *Ökonomische Unterentwicklung. Mechanismus—Probleme—Ausweg*, Berlin/DDR 1971; ders., »Entwicklungsländer«, in: *Handbuch Wirtschaftsgeschichte*, Bd. 2, Berlin/DDR 1981, 807–12; V. Kiernan, »Marx and India«, i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7*, London 1967, 159–89; U.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77; U. Menzel, *Geschichte der Entwicklungstheorie. Einführung und systematische Bibliographie*, Hamburg 1991; D. Nohlen u. F. Nuscheler (Hg.), *Handbuch der Dritten Welt*, Bd. 1, Hamburg 1982 (3., veränd. A. Bonn 1992); dies., »Über das Konzept der strukturellen Heterogenität«, in: Nohlen/Nuscheler 1982, 92–116; dies., »Was heißt Entwicklung«, in: dies. ^{3}1992, 55–75; F. Nuscheler, *Lern- und Arbeitsbuch Entwicklungspolitik*, Bonn ^{4}1996; *Peripherie*, 4. Jg., Nr. 14, Herbst 1983 (*Die Dritte Welt und Marx*); R. Schlesinger, *Die Kolonialfrage in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M 1970; P. Stier (Hg.), *Handbuch Entwicklungsländer. Sozialökonomische Prozesse, Fakten und Strategien*, Köln 1988;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Bericht über die menschliche Entwicklung 1996*, Bonn 1996.

迪特尔·鲍里斯（Dieter Boris） 撰
张志超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bkopplung, Antikolonialismus, Armut/Reichtum,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Ausbeutung, Blockfreiheit, Dritte Welt, Entkolonisierung, Entwicklung, Epoche, geschichtslose Völker, Gesellschaftsformation, Globalisierung, Impe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Kalter Krieg, koloniale Produktionsweise, Kolonialismus, Marginalisierung, Metropolen, Modernisierung, nachholende Modernisierung, nationale Befreiung, Nationalstaat, Neokolonialismus, neue Weltwirtschaftsordnung, Nord-Südkonflikt, Ökologie, Reproduktionsbedingungen, Schuldenkrise, Tausch, transnationale Konzerne, ungleicher Tausch, Unterentwicklung, Weltmarkt, Weltsystem, Weltwirtschaft, Wertgesetz, Zentrum/Peripherie

规划（Entwurf）

A: mašru'.

E: project.

F: projet.

R: proekt (проект).

S: proyecto.

规划在日常用语中与（拉丁语族的对应词）计划（Plan）、方案（Konzept）或项目（Projekt）用法类似，然而不同之处在于，它与草图（Skizze）一样，更让人联想到原始的和未经完善的发明——规划存在于详细的执行计划、已完成的方案或已组织起来的项目之前。Entwerfen（起草）最初在德语中是提花织造的行业术语（它描述了梭子来回摆动形成图案的过程，参见 *Herkunfts-Duden*，第158页），通过混合法语词*projeter*而扩展出“掷到前面”（Vorwerfen）或者说计划（Planen）的意思，进而有了今天的含义。这种用法的“规划”首先用于视觉艺术和技术领域（与今天的Design[设计]相当），而一旦有意识地与现存事物划清界限，并进行基础革新与框架设定，规划（这一概念）就拓展到了科学、哲学、政治和自我（Selbst）等领域。同一个词在科学中也可以称为“纲要”（Grundrisse），意思是一套有待完善的、全面的基本思想，或者一个新的“范式”（Paradigma），会在成功的情况下带来“范式转换”；在政治上，布洛赫“更美好世界的纲要”（GA 5，第523页）在社论和专栏的行话中变成了所谓有欠缺的“愿景”；最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人的生活规划或生活计划往往被视为“自我实现”。 583

规划已成为存在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中心概念，它被视为包含了人类此在的基本结构：我们“被抛入”（geworfen）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我们必须面向这个世界和生活最初独立于我们的规定性行事，我们向着未来规划自己，这样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因此，规划概念是去历史化的，并且局限于每个个人。为了使规划概念能为马克思主义所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团结社会的规划能富有成果，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这种方法的历史条件和理论后果。

1. 在古典哲学中虽然没有“规划”的直接对应词，但可以看到邻近的概念，例如柏拉图的“原型”，亚里士多德的“目的”（τέλος）和“选择”（προαίρεσις）。亚里士多德将“选择”作为人类特有的行为，区别于动物的欲望和意愿，并与具体的可能性相关联（*EN* 1111 b 4及以下），是“经过考虑之后的、对力所能及的事物的期望”（βουλευτικὴ ὄρεξις τῶν

ἐφ' ἡμῖν; 1113 a 15)。个人和集体行动的规划，要在“德行”(ἀρετή)和德行所适应的“完美城邦”的概念中理解。在古典哲学的后继者那里，规划失去了其“政治”性质，变成了世界主义的人格理想。

在犹太—基督教的线索中，上述观念融合了人格化的造物主的模式，神根据他的“形象”创造了人，并且如保罗所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συμμόρφους τῆς εἰκόνος τοῦ υἱοῦ αὐτοῦ，《罗马书》8.29)。“新人”相应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塑造自我(κατ' εἰκόνα τοῦ κτίσαντος αὐτόν，《歌罗西书》3.10)。

德国观念论的理性概念将这一点同其他许多神学理论一样进行了“合理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的前言中，康德假设“理性只洞察它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B XIV)。它为我们铺陈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只有通过主观构建的形式才能进入客观事物，同时它也指出了进行规划对理解世界的必要性。对于康德来说理所当然的是，一旦发现了思维所必要的直观和知性(或实践和判断)形式，各种规划就会化约为一种有效的规划。阿多诺注意到，这种结构中延续到了存在哲学中，也就是在著作中妄想：“理性的规划可以预先规定所有存在着的结构。”(GS 6，第69—70页)

584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规划”(Projekte)应理解为“来自未来的断片”(《雅典娜神殿断片集》[Athenäumsfrg.] 22)，较早地表达了对康德先于经验和超历史的理性假说的抗议。就像时间的碎片炸裂又修补了曾经完整实体的组成部分一样，规划是“生成中的客体的主观萌芽”，事后才会证明自己是一个总体的碎片。这导致人们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扬弃主观理性和客观经验二者的先验哲学分离：“鉴于现在恰恰是那些与理想同现实的结合或分离有关的东西是超验的，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断片和规划的意识，乃是历史精神的超验成分。”(同上)理性历史地展开，历史地毁灭，只有在这种框架下，它才能被历史中的人把握。但是，这就使得理性规划的可行性及其合理性本身变成问题，因为正如与康德同时期的弗格森(Ferguson)所指出的，历史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执行”(*Civil Society*，Part II，Sect. 2)。

黑格尔针对此问题的解答是众所周知的“**理性的狡计**”(W 12，第49页)，它虽然只通过面向目标的行为来实现，但不考虑个别的目的。于是历史地看，现实的是合理的，合理的是现实的，而参与者无需在每个时刻意识到这一点。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将这个构想转化为历史的一种规划建构：“辩证理解只能针对历史现实，即通过以

一个规划为基础的劳动所创造的现实。”（1958，第 132 页）尽管这种表述归功于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评价，但其内容已经见于黑格尔。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通过将行动概念与内在事物的“越出”（Heraussetzen）或“外化”（Entäußerung）固定在一起，重新界定了这个概念。由此就产生了历史现实以什么“内在事物”为基础的迫切问题——科耶夫将
585 它理解为规划。然而他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黑格尔而言，单个人的（*einzelmenschlicher*）的规划和历史—社会的实在是彼此分裂的，对后者的哲学理解除外。

存在哲学在此展开了批评——而且从谢林就已经开始。卡尔·洛维特指出，谢林 1841 年在柏林的讲演中（听众包括克尔凯郭尔、巴枯宁和恩格斯等），已经以不同的概念提出了海德格尔的对子“被抛状态—规划”：“进行哲学思维的人甚至上帝的真正道路是：从盲目被发现的存在、从‘忘我的存在’解放自己回到自身，‘挣脱’自己达到对盲目实存者的独立性，盲目实存者对自己的实存‘无能为力’，是‘偶然必然的东西’。”（Löwith 1950，第 153 页）谢林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考，即个人的生活环境最初向个人呈现为非理性的。但他没有将理性的现实化留给合理的历史过程，而是置于个人的责任中。

克尔凯郭尔断言了这种个体理性的失败：只有“将自我从它与设定了它的力量的所有关系中挣脱出来，或者将它从‘这样一种力量存在’的观念中挣脱出来”（*Krankheit*，第 66 页），才能实现具体的自主。因为单个的人既没有自主地选择他能做出抉择这一事实，也没有自主地选择他应该从哪个具体的生活环境出发做出抉择，而且只有一个包含个人全部规定性的抉择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从这种决定关系中挣脱出来达到合乎理性的独立，是虚幻的想法，每一个存在的选择都是“不可通约的”（*Furcht*，Problem II）。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意识必须在‘无限断念’的运动中挣脱一切表面的存在，并在选择和决定的自由中从自身当中外化出所有内容，才能最终在自身无所不能的假象下放弃所有内容，并在毁灭的同时洗刷自己之前因为相信自己自主存在而担负的罪责”（Adorno，GS 2，第 152 页）。

为了防止对于实存无动于衷的理性规划以及非理性个体规划间的彼此分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 6 条中提供了理论工具：每个个人都生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必须占有社会关系——这样才能成为一个人，然后通过他所接受的东西以及他与什么东西产生差异来定义自己。不仅文化所要求的每一种对欲望的克制都包含了抵

6 抗或偏离的可能性，每一种交往都包含了做出这样或那样反应的可能性（参见 Luhmann 1987，第 153—162 页），而且，规定应当占有什么的关系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是需要接受塑造且可改变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MEW 3，第26 页）马克思对公民—市民（Citoyen-Bourgeois）二分法的分析（*Judenfrage*，MEW 1，第 355 页）表明，甚至个人生活规划的不可通约性也仍然是由社会结构所规定的。如果没有只存在于个体的偏差中的规划，社会本身是不可想象的。

2. 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隐含地）从马克思的另一个问题开始：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努力提出一套同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构想明确类似又隐晦地反对它的概念，这套概念将人的关系以及个人同自我、同客体的关系本质上描述为“存在方式”（Seinsmodi）或“生存结构”（Existenzialien），而不是对象化的“现成之物”。卢卡奇的社会批判变成了海德格尔对“庸俗的”日常本体论和“遗忘存在”的西方哲学批判：并非像西方哲学假定的那样，一个超越此世的认识主体与各种各样的现成客体相对立，而是（人的）“此在”处于其在世的存在中与之对立。在这里，规划成了焦点，因为“此在不是一种附加有能够做这事那事的能力的现成之物。此在原是可能之在”（*SuZ*，第 143 页）；所有的领会都是“把此在的存在向着此在的‘为何之故’加以规划”；“规划是使实际上的能在得以具有活动空间的生存论上的存在建构”（第 145 页）。作为存在建构的规划不是物一样“给定的”。主体不站在规划的对立面，而是在规划中领会自己。“领会的规划性质又是说：领会本身并不把它向之规划的东西，即可能性，作为专题来把握”，而是“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抛到自己面前，让可能性作为可能性来存在”（第 145 页）。

尽管海德格尔回避了主体的概念，但他所把握的正是（个人）主体的投射。因为他思考这种投射时没有考虑“历史材料”，所以这种投射实际上总是事先以一种空洞但更强有力的方式得到了规定：“最本己的能在的规划托付给了被抛 587
进此的实际状态。”（第 148 页）其中的“此”（Da）既指对自身处境的洞察，也指这个处境本身。

海德格尔对公共领域是“非本真”领域——由“常人”（Man）而不是个人来决定——的反对，使得个人规划与历史集体规划之间的调和变得不再可能，

唯一将完全孤立的个人连接起来的东西是死亡。“先行着向生存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规划自己，亦即向死规划自己，这只能担保决心的完整性与本真性。”（第383页）这样一种终极的可能性，某个时刻将再也没有任何可能，从终点出发赋予了任意的个体规划以神圣的效力。于是产生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构想：个人通过“自由地面对死，而且借一种继承下来的，然而又是选择出来的可能性把自己承传给自己”（第384页）——简言之，不抱希望地重新将自己承传给继承下来的事物——通过实践“重演”，实现个人的“历史性”。因而历史变成了天命：“此在在它的‘同代人’中并与它的‘同代人’一道有其具有命运性质的天命”——海德格尔引用了狄尔泰“同代人”的概念，但并未阐明“同代人”的不自主与“常人”的不自主有什么区分——“这一天命构成了此在的完整的本真演历”（第384—385页）。

晚年的海德格尔完全放弃了规划概念中所包含的自由：“规划中的抛掷者不是人，而是存在本身，它将人推向了生存的此在，作为人的本质。”（1954，第84页）克尔凯郭尔的上帝，即设定自我的力量，这里变成神化的概念（参见Adorno，GS 6，第94—95页）。

3. 对让-保罗·萨特而言，规划（projet——Habermas 1963，第299页错误地翻译为Plan）是“人在没有任何支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每时每刻都被判处要把人发明出来”（1946，第38页）。这重现了海德格尔在个人与集体的可能性之间的游移：“因为‘人’这个主体中包含了一切，包括个人、类、社会等，所以这样的言说者可以弥合人的所有现象。”（Haug 1966，第146页）类似的批评也适用于《存在与虚无》中的词汇：“‘自为’这个表述既涵盖我们也涵盖我，既是集体意识也是个人意识……‘自为’创造了民族、阶级、阶级差异等，使它们成为自己自由‘规划’ 588
的一部分，因此对它们‘负有责任’。”（Marcuse 1950，第66页）

在萨特转向马克思主义时，他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他用存在主义重组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以便在术语上排除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劳动作为人对人的生活的再生产，只有在其基本结构处于规划（pro-jeter）之中时，才有意义。”（1960，第138页）与此相关的是下面的见解：分配给规划的“可能领域……高度依赖于社会和历史现实”（第77页）。规划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依赖关系变成了一种具体的可能性。描述这种可能性时，“特定社会的未来结构”（第79页）是核心，社会现实被规定为“不同规划碰撞（affrontement des

projets）的结果”（第 81 页）。考虑到这一点，规划应当从社会环境和创作者各自的角度出发，以“渐进—回归”的方式展开。但是，个人和社会的因素几乎无法调和。一方面，萨特相信“每一个意识形态的规划……都会通过意识到（prise de conscience）起始状况与深远目标（but profond）的矛盾而改变起始状况”（第 91 页），因而这种分析针对的是有社会效果的规划；另一方面，“存在主义的对象——由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失败——是社会领域中的个人（l'homme singulier）”（第 107 页），他们的生活规划只能通过社会心理学传记开启——萨特以福楼拜（Flaubert）和热内（Genet）为例做了说明。因此，如果萨特的规划概念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可以理解的知识”（第 143 页），那么它不可能是对历史的知识。

马尔库塞摆脱了这些困境，虽然他早年就接受过海德格尔，但规划在《单向度的人》（*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1964）一书中才成为中心，他明确表述了调和个人和集体规划的问题：“个体规划”是“由思想、价值观和目标所组成的预先给定的超个人系统”的一部分，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这个社会本身使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个人规划和超个人规划结合起来”（*Schriften* 7，第 211 页）。马尔库塞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将最普遍的超个人的规划置于关注的焦点：“‘规划’这个术语”旨在“强调历史实践的特殊性质。历史实践源于一次特定 589
的选择，从一系列理解、组织和改变现实的方式中选择了一种。最初的选择规定了这条道路上展开的种种可能性的范围，并排除了与这条道路不相容的其他可能性”（第 231 页）。这让马尔库塞得以在概述历史时将古典时代“本质上人的规划”（第 141 页）或者现代“技术”和“科学的规划”论述为基本配置——这么做的危险在于，因面向（哲学）历史的宏伟结构而忽视实际的个人对立。诚然，当他另外试图制定“判断不同历史规划的真正价值的标准”（第 231 页）时，具体的现实就随着政治导向的话语回到了规划之中。对于马尔库塞而言，如果“实在的可能性”内部相对于现存事物“超越的规划”“对文明的生产成就提供保存和改进的前景”，“在现有社会的结构、基本趋势和关系中对社会做出规定”，以及“在为人的需求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机会的制度框架之内，为实现安定的生存提供更大的机会”（第 232 页），那么它就是合理的。这个构想的概念缺陷与它启蒙的正当性和潜力一样明显：虽然马尔库塞这里能意味深长地确定，只有在有霸权能力的政治纲领或政治工程中，才能真正调和个人的诉求、他们的社会建构活动、社会现实和

普遍的理性诉求；但是，政治规划应该怎样无缝地融合到历史的基本配置（如技术对自然的掌握）中，它是否真的代表协商（甚至代表“最初的选择”），以及在“社会的基本结构”的规定中如何准确地揭示真实的历史可能性，这些仍是不清楚的。

规划是面向未来的永久张力，是比任何东西都更基础的和更相关的反事实（Kontrafaktizität），它类似于哈贝马斯不可还原的反事实。“因为没有可能性就如同一个人无法呼吸。”（Kierkegaard, *Krankheit*, 第 37 页）马尔库塞也再次指出了贯穿这个概念的基本问题：它所担
590 保的个人自主只能在社会中确立，而可能的事物只有在单个人的种种规划中才是真实的。

参考文献：

Duden,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Mannheim-Wien-Zürich 1989; A. Ferguson,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W 1963;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1966), 3., veränd. A., Berlin-Hamburg 1991;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1927), Tübingen 1993; ders., *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 Bern 1954; S. Kierkegaard, *Die Krankheit zum Tode* (1849), übers. v. L. Richter, Frankfurt/M 1984; ders., *Furcht und Zittern*, Kopenhagen 1843; A. Kojève, *Hegel. Kommentar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Stuttgart 1958; K.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Zürich-Wien 1950; N. Luhmann,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M 1987; H. Marcuse, »Existentialismus. Bemerkungen zu Jean-Paul Sar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in: *SuF*, 2. Jg., 1950, H. 1, 50–82; J.-P.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1943; ders.,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 Paris 1946; ders., *Marxismus und Existentialismus. Versuch einer Methodik* (1960), Reinbek 1964; F. Schlegel, »Fragmente« (1798), in: *Werke in zwei Bänden*, Berlin-Weimar 1988, 189–259.

蒂尔曼·赖茨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参见：

abstrakt/konkret, Anthropologie, Antizipation, Arbeit, Bewusstsein, Eigentlichkeit, Emanzipation, Enttäuschung, Existenz, Existenzialismus, Freiheit, Geschichte, Handlung, Hoffnung, Humanismus, Interesse, Klassenbewusstsein, Massengesellschaft,

Menschenbild, Menschwerdung, Möglichkeit, Naturwüchsig, Ontologie, Phantasie, Politik, Praxis, Projekt, Selbstverwirklichung, Sinn, Subjekt, Tod, Verdinglichung, Vernunft

祛魅（Entzauberung）

A: naza' al-qadāsa.

E: disenchantment.

F: désenchantement.

R: vyvedenie iz sostojanija očarovanija (выведение из состояния очарования).

S: desencantamiento.

“资本主义时代”是通往祛魅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927年在《大众装饰》（*Das Ornament der Masse*，1977，第56页）中这样写道。这里他使用了马克斯·韦伯数年之前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所提出的概念“祛魅”。韦伯在相关研究中探究的问题是，哪些文化内部的条件导致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产生，而西方理性主义在他看来是资本主义关系得以发展的基础。理性化进程的结果——完全的祛魅，即在科学的观念中变得完全可计量、可支配的世界——被韦伯称作“钢铁般坚硬的外壳”（*RS I*，第203页）。格奥尔格·卢卡奇、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继承了这一论断，他们的表述是，不断发展的物化或被管理的 591
世界。但是他们不接受韦伯的结论，不接受他最终对科学作为“专业从事的天职”（*WL*，第609页）的肯定态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态度是实证主义的自满向现存事物让步。他们认为，科学的核心问题是改变的可能，以及自我祛魅的科学在改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尔根·哈贝马斯试图让批判理论在科研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努力可以被视为将完全位于马克思的脉络中的去神话化（Entmythologisierung）加以普遍化，而不是去限制去神话化。至于他为了适应按照马克思本意要改变的生产关系而付出了多少代价，则是另一个问题。围绕祛魅的讨论意味着，要在相互对立的科学哲学纲领中做出选择，认识“对历史和社会领域所做的研究的可能性和界限”（Weiss 1993，第33页）。

1. 韦伯1919年的《科学作为天职》（*Wissenschaft als Beruf*）中写道：“日益加强的理智化和理性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所处的生活状况的普遍认识也随着增加。这一过程倒……意味着这样一种认识或者信念：人，**只要想要了解，就能随时了解到**。这就等于说，在原则

上，所有发挥作用的力量都不是神秘莫测的，相反，人们原则上可以通过计算支配所有事物。这就意味着世界的祛魅。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相信这种魔力的野蛮人那样求助于巫术的手段，支配或祈求神灵。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手段和计算。这就是理智化本身首要的意义。”（*WL*，第 594 页）韦伯形容这是“千百年来一直持续推进的”（同上）发展的结果，认为它肇始于古代犹太教，终点则在“西方形成的诸多禁欲主义的新教教会和教派”，在这些教会和教派中“完全实现”了两方面的转变：“世界经历祛魅，通往拯救之路从沉思的‘遁世’转为积极禁欲的‘开垦世界’。”（*RS I*，第 263 页）他分析了文化实践活动和价值领域的分化。统一的神话世界图景毁灭带来的结果是意义丧失（Sinnverlust），只剩下世俗的价值多元主义。科学和宗教相分裂，对于前者而言：“吃下知识之树的果实的
592 文化时代的命运，就是必须知道，我们无法从彻底探究世界历史事件所得到的十分圆满的结果中解读出事件的意义，而必须能够自己创造这个意义：各种‘世界观’从来不可能是向前迈进的科学带来的产物；最强烈地撼动着我们的最高理想，任何时候都只会在摈斥其他理想的斗争中起作用，而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就像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是一样神圣的。”（*WL*，第 154 页）

在围绕韦伯的讨论中，广泛达成一致的观点是，他是“社会学经典作家中唯一一位”与“历史哲学思维的前提”（Habermas 1981，1，第 207 页）决裂的人。有争议的地方则在于，韦伯是否因为他所提出的祛魅的普遍历史进程，而“突然在宗教问题上站到了当时的进化论阵营一边”（Tenbruck 1975，第 682 页；批评意见参见 Winckelmann 1980，Riesebrodt 1980）。这里解读出的或设想的“进化论的最低纲领”（Seyfarth 1973，第 361 页）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哈贝马斯的着眼点（参见 Bogner 1989，第 89 页）。其他研究者如莱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君特·罗特（Günther Roth）、约翰纳斯·温克尔曼（Johannes Winckelmann）则认为，简化了的一般发展观念仍太过具有普遍规律的色彩（参见 Schluchter 1979，第 2 页及以下）。但是“韦伯认为，‘发展趋势’这样的表述并不指历史中的某种形而上学本质或推动‘力量’，而是说：我们能够……识别出……使特定的发展进程变得可以预期的……条件和因素”（Bogner 1989，第 97 页）。

2. 马克思是揭示和分析祛魅进程的重要先驱之一。他也“认为去神话化作为一种文明进程，不能（如启蒙运动代

表人物直到孔德学派那样）简单化约为科学认识所内在固有的进步，相反它需要广泛的物质基础”（Schmidt 1986，第203—204页）。“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Gr*，MEW 42，第602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第44页）恩格斯认为，宗教和哲学有“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密特的信，MEW 37，第492页）。而马克思认为神话也是巩固统治、起整合作用的积极力量。他以早期公社的成员为例指出：“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更高的共同体，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MEW 42，第385页）为了保持联合体的稳定，“想象的和现实的共同利益”（第388页）相互融合。彼得·魏斯在《抵抗的美学》（*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中这样描写统治者如何借助神话保障自己的统治：“他们知道，有权得到财富的不是鬼神，而是通过使用暴力和营造恐惧把财富抢到手里的人，他们也知道精神王国的魔法，于是他们把可以理解的和不可思议的东西糅合在一起。”（1987，第324页）简言之：“资本主义来自神庙，歆享着咒语和香火。”（同上）

5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有在神话祛魅之后复苏神话的企图都报以尖刻的嘲笑，如他们对格奥尔格·F.道默（Georg F. Daumer）《新时代的宗教》（*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的评论。“用现代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的企图，在他们看来是“对自然界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MEW 7，第202页）。过时且已沦为空谈的空想社会主义，也难逃类似的批评，例如“一帮半大不小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以崇拜“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取代严肃的政治。马克思反对这种做法，指出社会基础要求人们必须“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致左尔格［Sorge］的信，MEW 34，第303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社会分析，揭穿任何将社会因素自然化的企图，因此可以被视为对政治经济学的神话和神秘性的祛魅。而且马克思本人的行文也多引用
594 神话用语，借反讽颠倒原意：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KI*，MEW 23，第 85 页）、“货币的魔法”（第 107 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第 562 页）等等。莫瑞斯·郭德列（Maurice Godelier）在此注意到，《资本论》中“拜物教”和“魔法”等术语“在理论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步骤都会重新出现”（1972，第 293 页）。因此，分析“粗制滥造物凌驾于制造者之上的权力”（Haug 1974，第 167 页）的论拜物教性质的一章具有典范的作用。卢卡奇甚至还说过，这一章中“隐藏着……整个历史唯物主义”（*GuK*，第 186 页）。魔法的原因在于这一“影响深远的事实：社会调节的功能落到了纯粹的物的头上，生产者将他们的社会性转让给了商品”（Haug 1974，第 168 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的根源是“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MEW 25，第 838 页）。悖谬的是，韦伯眼中祛魅的世界在马克思那里呈现为赋魅的世界。这一颠倒，在本雅明的一则札记《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Kapitalismus als Religion*，1921）中表述为：“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没有促进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是自己变成了资本主义。”（GS VI，第 100 页）赫尔曼·施韦彭霍伊泽（Hermann Schweppenhäuser）补充道：“如果说古代的神庙是神圣的银行，那么现代的银行就是世俗的神庙——世俗世界的教堂。”（1992，第 149 页）

因此马克思对去神话化的观点既不容许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制造，比如“《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恩格斯《英文版序言》，1886 年，MEGA II.9，第 13 页；MEW 23，第 39 页）这一说法之中所浮现的意味；也不容许将物的世界和社会混同起来这种本质上同样是神话的、伪科学的做法：“石头从斜面上滚落——于是认识了落体定律。王冠从人头顶滚落——于是认识了……革命的定律。”（Ladislaus Rudas 1929，转引自 Ritsert 1980，第 80 页）这类说法错认了真实的活动者（参见 Haug 1984，第 43 页）。与之相对，葛兰西最关切的问题就在于塑造真实的行动能力。为此必须要让马克思的祛魅纲领从小学起就锚定在人民当中。“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之间存在平衡的观念以人的劳动和实践活动为基础，产生出 595
摆脱了任何魔法和巫术的基本世界观，并且提供了进一步发展出历史理解的契

机。”（*Gef* 3，H. 4，§55，第 539 页）

3. 韦伯的学生卢卡奇在《小说理论》（*Theorie des Romans*）中简明扼要地呈现了祛魅进程的各阶段。此处的语境是，他设想古典世界意义充盈而现代世界意义被抽空。如果说前者还能够被视为“自身完整的生活总体”（1920，第 49 页），那么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先验的无家可归”（第 23—24 页）。韦伯也认为古希腊人曾体现了统一和意义，但是他同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从阐释的角度加以论述的（参见 *WL*，第 596 页）。而在卢卡奇那里，“总体作为为每一个个别现象赋形的先在者”（1920，第 16 页）成了客观给定的事实（参见 Beiersdörfer 1986，第 229 页，脚注 97）。于是现代的个体也就面对着这样惨淡的事实：“自发的存在总体”（第 21 页）只剩下“经验的总体”（第 24 页）。在这一情况下，卢卡奇指望小说“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秘的生活总体……历史情况自身所承载的一切破裂和险境，都得包括进塑造中去”（第 49—50 页）。他认为祛魅进程原则上是可逆的，这一点是他和韦伯的关键分歧所在。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以他提出的概念“物化”（Verdinglichung）肯定了韦伯的祛魅。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理性的局部操作”（第 99 页），也就发生了与“经验的、非理性的、依据传统的”行为模式的断裂，这种行为模式在卢卡奇看来等于“主观上为行动的人、客观上为具体的材料制定的”（第 108 页）。物化是将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降格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可加工的物料。在资本主义条件所构成的框架内，人的活动降格为“理性计算”，“理性计算”的“本质”在于，“认识到和计算出一定事情的——不依赖于个人‘任性’的——必然合规律的过程，人的行为仅限于对这种过程成功的可能性做出正确的计算”（第 108 页）。摆脱这一情况的出路，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找到：正如被加工的材料是计算的对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是“商品的自我意识”（第 185 页）连同对这一意识的克服，无产阶级革命将摧毁物化、异化和四分五裂的状态。这一构想内包含的问题，暴露为卢卡奇《理性的毁灭》（1954）一书中的自我庸俗化：在此书中，“不信神、被神遗弃的祛魅生活”是世界历史的“帝国主义阶段”的标志特征（W 9，第 536—537 页）。

596

4. 克拉考尔也深受韦伯的祛魅论的影响。他在《等待者们》（*Die Wartenden*）中概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流行的不同的拯救道路——鲁道夫·施泰纳

（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学、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圈子、恩斯特·布洛赫的弥赛亚共产主义——但强调相对于他们，只有韦伯“目光敏锐地把握住异常严峻的情况，同时自身又坚信，他和他的同道无法逃脱这一局面”（1977，第113页），并批评韦伯是“原则上的怀疑主义者”（第197页）。对于等待者们而言，“科学的危机”（第197页）表现为“世界缺乏崇高意义所造成的形而上学痛苦”（第106页）。科学由于将自己“局限于获取价值中立的认识……所以要么陷于内容空洞的概念形式主义，要么陷入漫无际涯而无休止的事实确证，最后纠缠于各种评判”（第197页）。

克拉考尔第一次提出了日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核心思想：理性和神话辩证地相互存在于对方之中。本雅明的《单行道》（*Einbahnstraße*，1928）也表述过这一思想：“魔法的经验变成了知识。孩子作为父母亲阴暗住宅的工程师将它祛魅，并寻找复活节的彩蛋。”（《捉迷藏的孩子》[*Verstecktes Kind*]，GS IV.1，第116页）克拉考尔则写道：“**资本主义时代**是通往祛魅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今天经济制度所特有的思维使得支配和利用自身完整的自然界成为可能，这种支配和利用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曾未发生过的。……过去15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要归功于理性，即使不唯独归功于它。这理性一定程度上源自童话的理性（Märchenvernunft）。资产阶级革命清算了根基深厚的教会、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自然般的力量，这些和其他神话纽带的不断瓦解为理智带来了机遇……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性不是理性本身，而是一种变浑浊了的理性……**它不把人包含在内。**”（1977，第57页）

5. 霍克海默也从韦伯的论断出发展开自己的学说。他认为，韦伯“强调了资产者精神中的理性主义特征，而非理性主义特征从一开始就与资产者精神的历史有着同样紧密的关联”（1936，第59页）。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科学，科学无力反思自身的应用，或者有意识地放弃了反思任务。“在社会斗争中向历史进程施加影响的人和指明前者位置的社会学诊断者之间，产生了分工。”（1937，第196页）在这一条件下，现代科学的自我认识发生了赋魅。“将人从奴役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第219页）的运动脱离了自身的概念和诉求，从而理性无法掌握的历史就具有了正当性。 597

5.1《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阿多诺在他最初的几篇文章中以批判任何“对历史的赋魅”这样的表述，概括批判理论的指向。每当“要把历史现象美化成某种有意义的

事物”（1932，第361页）时，就出现了对历史的赋魅。而“不给世界强加任何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Horkheimer，GS 12，第246页）便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此书的主旨可以在马克思1856年所说的下面几句话中找到萌芽：“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MEW 12，第3—4页）韦伯的“祛魅”成了《启蒙辩证法》的关键词：“启蒙的纲领是为世界祛魅。它力图祛除神话，用知识推翻幻想。”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中”，“知识，本身作为力量，无论是奴役万物还是听命于世界统治者，都不接受任何限制”（1947，第25—26页）。此处的辩证法其实韦伯早已涉及，但不同在于，韦伯的“理性概念不仅用于描述人在用工具维持生活的领域能力的增长，而且在这一领域中找到了价值的锚定点”，而对此《启蒙辩证法》则“指明，进步以对自然的支配为媒介，映照出了人在和他人、和自己的关系中的发病机理”（Hommerich 1986，第113页）。

598 “所有去神话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不停地体验到牺牲是徒劳和多余的”（*DdA*，第77页）。为了批判总体启蒙，《启蒙辩证法》坚持将启蒙理想理解为偶像禁令这样一种否定的形式。在犹太教中，“禁止称呼上帝之名这一禁律确认了名称与存在之间的纽带”具有魔力。同样的道理，“在上帝的观念中否定魔法”达成了与魔法的和解。“犹太教只将希望系于这些禁律上：禁止把虚妄称为上帝、把有限称为无限、把谎言称为真理。拯救的保证在于拒绝一切强加给拯救的信仰；对拯救的认识在于揭露幻想。”（第46页）

在《启蒙辩证法》的接受史上（参见Görtzen 1987），一个经常成为焦点的问题是，启蒙辩证法本身在多大程度上不是再赋魅的产物。围绕这个问题，哈贝马斯（1981，第4章；1985，第5章）的判断与正统马列主义者（参见如Beyer 1971）相近：除了指责《启蒙辩证法》“放弃实践”外，还批评它没有正确处理“文化现代性的理性内容”（Habermas 1985，第137页）或者说社会主义的成就。批判理论的新一代代表人物对此展开了各种回应：原先的批判理论“不愿告别……理论思考的解放诉求，哪怕已经经历了奥斯维辛带来的绝对无力的体验”（Claussen 1994，第41页）；《启蒙辩证法》中上升为理性批判的科学批判是在回应“历史进程没有确证对社会理论中的进步的信心”（Moritz

1992，第96—97页）这一状况：只要对启蒙和统治的相互缠绕的分析能够激发对历史进程的批判，那么“《启蒙辩证法》的窘境就是……有成效的”（G. Schweppenhäuser 1996，第45页）；尽管如此，“博物馆式的全盘接收和辩护式的正统建构”（Schnädelbach 1989，第15页）十分不适宜于一门着眼于改变社会的理论。踏上“从历史哲学回返社会理论的路”（第27页）的主张，要求追回马克思学说中去神话化的潜能。安科·蒂恩（Anke Thyen，1989）由此将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此书的核心是“概念的祛魅”（1966，第23页）——阐释为与《启蒙辩证法》相对的新尝试（诚然，此书将阿多诺的非同一从社会问题变成了哲学方法论问题，参见 Ritsert 1997）。

599 5.2 阿多诺以《最低限度的道德》中的《反神秘主义的提纲》（*Thesen gegen den Okkultismus*）为基础，对共和党右派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占星术版面展开研究。阿多诺所着眼的现象，是一个“祛魅世界”中巫术活动的延续乃至复活。一神论解体为次级神话。次级神话“比最初的神话更不真实”，因为它“在一个无所不包的交换关系令天然的东西凭空消失、神秘主义者却声称掌握这些东西的社会中”，弃置不顾“曾经已取得的知识”（1951，第271页）。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明怎样的社会心理学特质易受神秘主义感染。这个问题是阿多诺的占星术研究与他探讨法西斯主义的《权威人格研究》（*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相关联的地方。两份研究都破解出一种性格结构，其特征是“放弃独立思考和判断，自愿盲目地顺从集体，倾向于使用暴力而非通过说理取得共识以解决规范问题引发的冲突”（G. Schweppenhäuser 1995，第210页）。研究的背景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各地都有人加入群众运动，却在运动中做出与理性地自我保存利益相悖的举动？（参见 Adorno 1957，第14页）“晚期资本主义向巫术思维退化”（Adorno 1951，第272页）令人注意到文化工业的组织形式和经验受到的阻碍。神秘主义者将物化信以为真。环境在他们眼里不再是实践的对象，社会环境的威力给他们内心留下无力的体验。他们不再“思考无限而忍受有限”，而是“不加分别地混同二者”（第271页）。他们由此加剧了“随波逐流”的从众效应：“现存事物最乐意接受的，就是将现存本身当作意义。”（第275页）

统治以退化的形式进行内化，由此也可以理解后现代的文化活动，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就将这些文化活动解读为针对“世界祛魅”的“再赋魅”（1995，第10页）。“在后

现代生活空间里，慢跑、节食、减肥等‘自己动手做’（Do-It-Yourself）活动大部分取代和排挤了现代工厂、学校或兵营的全景监狱式操练。这些活动和
600 它们的原型不同，不再感到是外界强加的……相反，成了主体自由的宣言。”（第230页）

6. 哈贝马斯希望将“宗教世界图景的发展……作为一种学习历程”（1981，1，第104页）加以理解。在《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中，他通过对韦伯的批判研究，初步地区分了工具行为和以沟通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由此他重新阐述了自己原先对劳动和互动的区分（1968，第9—47页）。“神话不允许在物和人之间，在可以被操纵的对象和具有语言、行为能力的主体、活动者之间，用清晰的基本概念做出辨别……因此合乎逻辑的是，巫术活动不会区分目的行为和交往行为。”（1981，1，第79页）

哈贝马斯认为，韦伯以理性概念作为研究祛魅进程的基础，而这个理性概念并没有像韦伯分析社会理性化时所认为的那样，降格为工具理性。哈贝马斯在此补充，交往理性的“不可摧毁的因素”同时建立在超验和实用的根据上（每一次谈话都包含的有效基础），希望以此重新统一韦伯所判为四分五裂的价值领域：“真理问题、正义问题和品味问题”应该“能够细致地区别开来，并就其本身理性地处理”（1，第340页）。哈贝马斯虽然基本把现代视为理性增长的进程，并以此肯定现代历史的意义，但也认为要“解释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的社会病理学”（2，第449页）。他的理论“总是拾起功能主义所剔除的‘危机和批判’的主题，并有所修改”，在这一点上保持了“马克思主义”（Berger 1986，第256页）。相对于将人仅仅作为“起作用的周围环境”（参见Breuer 1992，第98页）的系统论，哈贝马斯试图将社会病理理解为沟通的失败或体制的命令对生活世界的侵入，这一尝试的目的，可以说是避免将现存事物作为崇拜物确定下来，并将他的社会理论导向实践哲学。但有待商榷的是，他观察到了哪些病理（参见Berger 1986，第274页），又遮蔽了哪些。特别是考虑到哈贝马斯将“经济和国家机器”（1990，第36页）纯粹视为“作为不再 601
能够从内部进行民主改造的、体系严整的行动领域”，批评他的社会理论具有辩护性质也无不可（参见Moritz 1992，第225页）。“看一眼每日新闻”，也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无法消灭干净”，这使人疑问，生活世界（Lebenswelt）这个正面的核心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并非浪漫主义的圈套（参见Weiss 1993，第

116 页）。面对脱口秀文化，交往理论仅以“其中很可能包含着批判的信息”（Habermas 1981，2，第 574 页），带来微弱的慰藉。针对哈贝马斯的著作重新为理性寻找基础，格哈德·施韦彭霍伊泽（Gerhard Schweppenhäuser）批评这放弃了“对原则本身的批判”：“启蒙思想对本身阴暗面的反思止步不前，这会妨碍启蒙思想的普遍实现。”（1993，第 241 页）

7. **生产力的祛魅**。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中曾发问，怎样才能让支配科技的力量重新成为从事行动和协商的市民的共识。他的回答是：“围绕针对行为的原则和规范，着眼于工具理性行为的不断发展的子系统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反作用，展开公共的、不受限制的、不受支配的讨论。”（1968，第 98 页）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其道路”，“法律或禁令都不能阻碍它”，“更不用说投石或火刑这些古老的手段”（1992，第 157 页），斯特凡·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激烈地将技术和科学形容为“显圣”（Hierophanie）。布罗伊尔试图用这个再赋魅产生“神圣”的术语，概括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等所代表的技术独立化进程。这些事件受到“超越人的支配能力”的结构和力量的推动，但“最初也要通过人的主动活动体现出来”（第 157 页）。布罗伊尔认为，与祛魅过程中发生的现代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相反，存在着一条“削弱这一对立”（第 162 页）的谱系：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力图在形而上学批判之外，为一门“承载范围更广的新形而上学”奠定基础，新形而上学“将起到一切经验得以可能的条件的作用”（第 165 页）。作为合题产生的是“高危文明”（第 171 页），这种文明彻底丧失或者说放弃了以人为中心和自然中心的 602
方面。“神圣”侵入技术和科学，并“通过将它的对立面，单纯的自然、以感性感知为基础的经验、人自然的生活世界，消耗掉或边缘化”（第 166 页），彻底渗透进技术和科学。启蒙被打回神话。阿多诺看到了这一点：“奥古斯特·孔德所提出的前提条件，实证主义要成为一种宗教，反讽地实现了——科学已经实体化为最终的、绝对的真理。”（1957，第 111 页）

奥托·乌尔里希（Otto Ullrich）1977 年曾就迄今不断跨越创造边界的突破所立足的各种立场写道：“在这条前线上可以感觉到‘上帝的气息’，人能够分享‘造物主’的全能和智慧。如果人存在这种‘浮士德式的欲望’一类的东西，那么今天这样的欲望也在自然科学逻辑的维度中片面又完美地得到了疏导。”（第

340 页）如果将富有表现力的、象征的特征视为宗教仪式相对于科学方法特有的性质以区别二者（参见 Beattie 1987，第 174 页），那么这一差异已然消失不见。布罗伊尔称之为仪式化的科学。这一称谓及其各种变体和变形要接受已然衰微的神学原本所遭遇的怀疑。阿多诺评论斯宾格勒说："他的技术神话在崇拜物的拜物教性质已经公开以后，依然向物朝拜，从而妨碍对技术的虚假功能的批判。"（1932a，第 198 页）而布罗伊尔形容为"显圣"的现象，体现了瓦解着自身的交往和政治限制的现代科技的偶像化。现代科技的祛魅变得遥不可及，此外要指出："事业越宏伟，那些要忠实履行伟大事业要求的人就必然越渺小，越委顿，越不自由。"（Anders 1970，第 36—37 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Die Idee der Naturgeschichte« (1932), GS 1, 345–65; ders., »Oswald Spengler, Der Mensch und die Technik« (1932a), GS 20.1, 197–9; ders., *Minima Moralia* (1951), GS 4; ders.,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trology Column. A Study in Secondary Superstition* (1957), GS 9.2, 9–120;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1966), GS 6; G. Anders, *Der Blick vom Mond. Reflexionen über Weltraumflüge*, München 1970; Z. Bauman, *Ansichten der Postmoderne*, Hamburg-Berlin 1995; J. H. M. Beattie, »Über das Verstehen von Ritualen«, in: *Magie.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Kontroverse über das Verstehen fremden Denkens*, hgg. v. H. G.Kippenberg u. B. Luchesi, Frankfurt/M 1987, 174–212; K. Beiersdörfer, *Max Weber und Georg Lukács. Über die Beziehung von verstehender Soziologie und westlichem Marxismus*, Frankfurt/M-New York 1986; W. Benjamin, »Kapitalismus als Religion« (1921), GS VI, 100–3; ders., *Einbahnstraße* (1928), GS IV, 83–148; J. Berger, »Die Versprachlichung des Sakralen und die Entsprachlichung der Ökonomie«, in: *Kommunikatives Handeln*, hgg. v. A. Honneth u. H. Joas, Frankfurt/M 1986, 255–77; W. R. Beyer, *Die Sünde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Berlin/DDR 1971; A. Bogner, *Zivilisation und Rationalisierung. Die Zivilisationstheorien Max Webers, Norbert Elias' und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m Vergleich*, Opladen 1989; S. Breuer, *Die Gesellschaft des Verschwindens. Von der Selbstzerstörung der technischen Zivilisation*, Hamburg 1992; F. Cerutti, »Hegel, Lukács, Korsch. Zum dialek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 in: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

603

phie Hegels, hgg. v. O. Negt, Frankfurt/M 1970, 195–210; D. Claussen, *Grenzen der Aufklärung. Die gesellschaftliche Genese des modernen Antisemitismus*, Frankfurt/M 1994; M. Godelier, »Warenwirtschaft, Fetischismus, Magie und Wissenschaft im Marxschen Kapital«, in: J. B. Pontalis (Hg.), *Objekte des Fetischismus*, Frankfurt/M 1972, 293–314; R. Görtzen,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Eine Literaturübersicht«, in: *Vierzig Jahre Flaschenpost: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bis 1987*, hgg. v. W. van Reijen, G. Schmid Noerr, Frankfurt/M 1987, 242–52;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der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Frankfurt/M 1981; der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M 1985; ders., »Vorwort zur Neuauflage«, in: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M 1990, 11–50;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W-Hamburg ^{5}1989;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sstseins.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Berlin/W 1984, 9–96; B. Hommerich, *Der Wille zur Herrschaft und der Hunger nach Glück*, Opladen 1986; M.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ur Anthropologie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1936), GS 4, 9–88; ders.,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GS 4, 162–225, ders.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GS 5; S. Kracauer, *Das Ornament der Masse. Essays*, Frankfurt/M 1977; G. Lukács, *Die Theorie des Romans*, Berlin 1920; P. Moritz, *Kritik des Paradigmenwechsels. Mit Horkheimer gegen Habermas*, Lüneburg 1992; M. Riesebrodt, »Ideen, Interessen, Rationalisierung: Kritische Anmerkungen zu F. H. Tenbrucks Interpretation des Werkes Max Webers«, in: *KZfSS*, 32. Jg., 1980, 109–29; J. Ritsert, *Der Kampf um das Surplusprodukt*, Frankfurt/M-New York 1980; ders., »Das Nichtidentische bei Adorno—Substanz oder Problembegriff?«, in: *Z. f. kritische Theorie*, 3. Jg., 1997, Nr. 4, 29–51; W. Schluchter, *Die Entwicklung des okzidentalen Rationalismus: Ein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79; A. Schmidt, »Aufklärung und Mythos im Werk Max Horkheimers«, in: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hgg. v. A. Schmidt u. N. Altwicker, Frankfurt/M 1986, 180–243; H. Schnädelbach, »Die Aktualität d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in: H. Kunnemann u.

H. de Vries (Hg.), *Die Aktualität d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Frankfurt/M-New York 1989, 15–35; G. Schweppenhäuser, *Ethik nach Auschwitz. 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 Hamburg 1993; ders., »Die Selbstzerstörung des Kultur-Überichs. Überlegungen zu den Grundlagen von
604 Kultur- und Moralkritik bei Adorno«, in: *Impuls und Negativität. Ethik und Ästhetik bei Adorno*, hgg. v. G. Schweppenhäuser u. M. Wischke, Hamburg-Berlin 1995, 198–214; ders., *Theodor W. Adorno*, Hamburg 1996; H. Schweppenhäuser, *Ein Physiognom der Dinge. Aspekte des Benjaminschen Denkens*, Lüneburg 1992; C. Seyfarth, »Protestantismus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Zur Reformulierung eines Problems«, in: ders. u. W. M. Sprondel (Hg.), *Seminar: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Frankfurt/M 1973; F. H. Tenbruck, »Das Werk Max Webers«, in: *KZfSS*, 27. Jg., 1975, 663–702; A. Thyen, *Negative Dialektik und Erfahrung. Zur Rationalität des Nichtidentischen bei Adorno*, Frankfurt/M 1989; O. Ullrich, *Technik und Herrschaft* (1977), Frankfurt/M ^{3}1988; J. Weiss, *Das Werk Max Webers in der marxistischen Rezeption und Kritik*, Opladen 1981; ders., *Vernunft und Vernichtung. Zur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der Moderne*, Opladen 1993;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d. 1, Berlin/DDR 1987; J. Winckelmann, »Die Herkunft von Max Webers ›Entzauberungs‹-Konzeption«, in: *KZfSS*, 32. Jg., 1980, 12–53.

霍尔格·莱迪希（Holger Leidig）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ufklärung, Dialektik, ehern, Emanzipation, Epoche, Fetisch, Fetischcharakter, Fortschritt,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penst, Industriegesellschaft, Innovation, Klassenbewusstsein, Kritische Theorie, Kulturindustrie, Moderne, Modernisierung, Mystifikation, Mythos, Naturbeherrschung, Ökologie, Okzidentalismus, Produktivkräfte, Rationalisierung, Rationalität,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Säkularisierung, Sinn, Taylorismus,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Verblendungszusammenhang, Verdinglichung, Vernunft, Vernunftkritik, weberianischer Marxismus,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skritik

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

A: mausūʿa, īnsīklūbīdīya.

E: encyclopedia.

F: encyclopédie.

R: énciklopedija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S: enciclopedia.

百科全书不是马恩著作中的中心概念。在18世纪的《百科全书》中，它几乎没有被讨论。德达朗贝尔（d'Alembert）仅因其科学著作而被提及（《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71页及以下，第380页；《资本论》第2卷第2册，第24、83页）；狄德罗则因其文学作品而被影射（《资本论》第1卷第1册，第23、148页）。除了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第20卷，第514页）中有一处对科学的分类外，百科全书这一概念本身几乎没有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出现。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以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两个方面讨论了百科全书思想：在他们对18世纪法国哲学的评判中，以及在他们关于黑格尔的哲学科学之百科全书的事业的论争中。

1. 百科全书概念导向一种所有知识的汇总方案。狄德罗在《百科全书》里的一篇同名文章中写道："事实上，百科全书致力于去搜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知识，向那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解释这些知识之普遍体系，并把这个体系传给以后的人们，由此过去所做的工作对将来就不至于是无用的。"（1972，第396—397页）百科全书以一种对所有知识领域和知识形式的详尽描绘为目的。然而，这种企图自文艺复兴以来就已经被证明为不可详细地被实行。详尽描绘之海市蜃楼因此让步于对原则的有序描绘，根据这些原则，知识领域之地图被描画出来，而单一的知识原本就产生于这些原则。由此又产生了其他问题：完整性的程度之问题、与经验知识的关系之问题，以及这种总体的统一性之问题。事实上，一种对知识各领域的描绘只有在它形成一个**总体**（*Totalität*）时才是百科全书式的。**圆圈思想**（*Kreis-Gedanke*）为这一总体命名，在表达它的词源学中就能看到这种圆圈思想。"这个词（圆圈思想）表示'知识之联结'；它由古希腊语介词'在……里'（ἐν）和名词'圆圈'（κύκλος）以及'学说'、'学科'、'知识'（παιδεία）共同组成。"（同上书，第396页）为了成就**完整性**，事实上自古希腊以来，**教育**（*Bildung*）在一种被理性安排的学习过程中必须遍历知识的**圆圈**。知识领域的总体性也必须根据一种详尽的秩序和列举原则被统

一起来。因此，相比分裂的景观而言，百科全书思想今日更受知识的量之规模所伤害，每一种寻找知识统一形式的可能性都受到质疑。

16世纪初，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的拉丁文著作《论希腊化到基督教的过渡》（*De transitu Hellenismi ad Christianismum*，1508）中出现了百科全书这一表达："圆圈训练，希腊人把它称为百科全书。"（*disciplina orbicularis quam encyclopaedia graeci vocant*）数年之后，这个词被拉伯雷（Rabelais）引入法语（《庞大固埃》[*Pantagruel*]，1532）。然而，百科全书思想有一段很长的前史。如果将一种全方位的教育理念回溯到古代（这一表达被归于智术师伊索克拉底[Isokrates]），那么第一批百科全书著作就出现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作为普林尼（Plinius）的《自然史》[*Naturgeschichte*]的延续（1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idor von Sevilla）的《词源》（*Etymologien*）（4世
606 纪）为很多关于"物之本性""物之属性"或"宇宙"的著作提供了榜样。这些知识汇纂时而纯描述性地，时而在把被创造物与它们的创造者联结在一起的象征主义（Symbolismus）的视角之下被理解，它们包含了大量的、通常相互无关的观察。这种趋势在12世纪同样出现在让·德博韦（Jean de Beauvais）的《自然之镜》（*Miroir de la nature*）中。在13世纪，一个在法国生活的意大利人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用北方古法语写下著作《珍宝录》（*Livre des Trésors*）。同时，"科学分类"开始对知识的结构进行更彻底的反思。多米尼库斯·冈底林斯（Dominicus Gondissalinus）（12世纪）是这方面的例子，他重以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Al-Farabi）（9—10世纪）为依据。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von St. Viktor）（12世纪）的《阅读与注释研究指南》（*Didascalicon de studio legendi*）推荐了一种知识分类，它的原创性在于对数学更强的关注和对"机械"技能新的安置。在古希腊—阿拉伯逍遥学派被重新发现以后，学科的等级划分与对理性建构的努力取代百科全书的形式，占据了统治地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一种作为对中世纪的逻辑和哲学知识之反抗的百科全书式精神才重新出现，这种精神在追求新知识的同时怀有一种教育理念。

但是，古代及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的有限性能为知识的总体化提供辩护基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并且人类的知识能够无限进步。对原则的理性描绘消解了中世纪的总汇精神，这些原则允许对知识进行归类。因此，弗朗西斯·培根设计了一种广博的、无人能单独实现的

百科全书计划，并在《新方法》（*Novum organum*，1620）中对这种百科全书的方法进行了阐释。研究知识之树图景的笛卡尔也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阐释哲学的诸原则（*Prinzipien*，第 XLII 页）。尽管总体是无限的，但考虑到这些提供事物之简单本质的知识原则，它仍是可以掌握的。

2. 18 世纪百科全书精神的最大成果是 1751—1772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或艺术及职业全备辞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métiers*）。
607 这个出版物包括 17 册文字集和 11 册插图集，收录了超过 6 万个词条，它的编撰先是由狄德罗和德达朗贝尔一起，然后由狄德罗独自领导，共有 160 名作者参与其中。它由“一个学者和艺术家协会”出版，“这些学者和艺术家在各自的领域独立工作，仅仅通过人类的共同福祉和彼此互惠的情感聚集到一起”（Diderot，*E*，1972，第 405 页 [*E* 指《百科全书》。——译者]）。这一著作完全是一项资本工程，在其 4300 名订阅者的贡献下发展壮大。书商勒布雷东（Le Breton）在 1745 年得到一项“特权”，即独享对 1728 年开始的埃弗拉伊姆·尚伯（Ephraim Chambers）的著作《技术与科学之百科全书或万能日记》（*Cyclopaidia or Universal Diary of Arts and Sciences*）之翻译的出版许可，这部著作在当时已是艺术与科学之总揽辞典。为此，勒布雷东通过订阅为自己创造了资本和员工。当狄德罗和德达朗贝尔加入这项工程时，他们改变了它的意义。1748 年一项新的百科全书出版特权被授予，它不仅针对翻译，而且还针对原著。为此，他们在当时最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中征募工作者。《传单》（*Einleitung*）作为预告出版于 1750 年，包含德达朗贝尔前言的第 1 卷出版于 1751 年。很快《百科全书》就招致抨击，尤其是来自耶稣会会士的抨击。他们指责《百科全书》剽窃了《特雷武字典》（*Dictionnaire de Trévoux*，1704，^{5}1743）中的专著，但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百科全书》会损害道德及社会秩序的基础。1752 年《百科全书》被判决，但因受克雷蒂安-纪尧姆·德马勒泽布（Chrétien-Guillaume de Malesherbes）的保荐得以再次出版。这种情况持续到 1757 年，之后情况则更为严峻。爱尔维修因为他的著作《论精神》（*De l'esprit*）被批判，连带《百科全书》也根据国王的公告被禁止了。从那时开始，争议越来越大。德达朗贝尔中止了其共同出版者身份，而狄德罗则坚定不移地坚持着。《百科全书》继续以秘密的方式被撰写和印刷。1766 年以前以字母排序的最后十册出版，十一册插图版则于 1762—1772

年间出版。这一出版计划也由此结束。《百科全书》的极大成功可通过随后数十年的复本和影本的数量窥见一斑。

《百科全书》呈现为一种人类在不同的科学和技术领域所积累的知识的总结。“人们必须检验所有东西，无一例外地、毫不留情地质疑所有东西。”（Diderot 608 1972，第482页）因此，《百科全书》只能产生于共同协作：“我不相信，某个个体被恩赐去认识所有可以被人认识的事物。”（同上书，第398页）观点和文章价值的差异由此产生。德达朗贝尔负责数学和物理领域；狄德罗则负责自然和生命科学。布丰（Buffon）提供自然科学类文章；德奥尔巴克（d'Holbach）奉献化学和矿物学文稿；爱尔维修与孔狄（Condill）呈递心理学论文。新的关注涉及社会（参考文章《农民、临时工与大众》[*Landmann, Tagelöhner, Volk*]）、语言和美学研究（狄德罗撰写了文章《美的事物》[*Schönes*]与《美》[*Schönheit*]；马蒙泰尔[Marmontel]和伏尔泰也致力于此）、经济运行（在魁奈和杜尔哥的共同影响下；卢梭撰写了文章《经济学》[*Ökonomie*]）、政治理论和社会改革。最后，《百科全书》还有很多技术类文章。编辑们关注手工工场新的现状和手工业者的技能。手工业者被请求分享自己的经验，以促进特定文稿的撰写。

如此的知识汇总不可能仅是知识的堆积，它必须被整理。事实上，《百科全书》与多种秩序相交，它不仅是百科全书，而且还是“辞典”。在这方面，《百科全书》有一个不总是被承认的前辈，即培尔（Bayle）的《历史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Rotterdam 1697）。相对于事物的自然秩序而言，辞典的字母表排序看起来完全是外在的。它引进了一个任意的语言学秩序。然而，这条通道是必要的，因为语言是这样一种工具，没有它，知识既不能产生也不能被传达（参见Diderot, Prospekt, 1972，第62页）。语言是“理性使用严格且忠实的映像”。字母表秩序之武断被参阅（Verweisen）之可能性所补偿。这些参阅不仅允许时而欺骗审查，而且说得更深入些，允许建立独特的、令人激动的关系。狄德罗提供了关于参阅的使用说明。他强调了参阅之多样性和重要性并随后探讨了反讽性参阅：“在我们的一篇文章中所能找到的提示属于这种类型的参阅，在这篇文章中人们根据浮夸的赞扬来阅读：‘请看蒙头斗篷。’这个滑稽的单词‘蒙头斗篷’和人们在这篇文章中读到的东西，可以导致这样的猜想：浮夸的赞扬不过是一种嘲讽，而人们必须细心阅读这篇文章。” 609
（Art. *E*, 1972，第469页）这些参阅展示了思想道路的多样性，因此也展示了阐释知识的多种可能性。“宇宙——观

实抑或概念的宇宙——有数不清的众多观点，在这些观点中，宇宙可被描绘出来；而人类知识的可能体系之数量也一如这些观点数量之巨。”（同上书，第450页）从《百科全书》开始，之后的绝大多数百科全书计划——尤其是在20世纪——都被作为字母排序的辞典而制定，这使得秩序多样性之选择成为可能。这代替了一种理性的演绎，这种演绎描摹事物之秩序或直接奠基在存在和认识原则的形而上阐释之上。这些知识依然构成一个“普遍体系”。然而体系也是组织原则：“作为《百科全书》，这一著作应该尽可能地展现人类知识的结构与互相联系。”（d'Alembert 1751，1989，第12页）这种联结是直接自明的，因为“不难认识到：科学与技术互相帮助；因此某种共同的东西（链条[*une Chaîne*]）必然连接二者”（同上；参见Diderot，*Prospekt*，1972，第27、28页）。然而，困难的是为无限多样的知识分支寻找唯一统一的连接原则。

培根作为对百科全书主义者来说伟大的哲学权威之一，提供了这一组织原则。德达朗贝尔在《前言》（*Einleitung*）中赞扬他；狄德罗在1750年的《传单》中就已经解释道：我们的知识谱系学提供了主导思想，根据它，学科被区分，百科全书的诸文章被归类。我们的诸能力被回溯到记忆、理性和幻想。记忆与历史相对应，理性与哲学相对应，幻想与诗歌相对应（参见1972，第29页）。这些概念在广泛的意义上被理解。如同在培根那里，除了第一哲学以外，哲学还包括自然和人类的各种科学。诗歌之同伴是建筑学、音乐、绘画、雕刻术、雕铜术及诸如此类，也就是说，不仅是全部的美之艺术，而且还有技术。人类精神为知识之统一奠定基础并允许去仿制一种人类知识之谱系学秩序。这样的划分显然受到培根启发，以一种对精神的经验性理解为基础：每一种知识开始于感觉（Empfindung）。然而，这种谱系学秩序并不与百科全书秩序相重合，610
不如说后者如同“一份世界地图”那样显露出来（同上书，第61页），而根据前者知识之全体——正如在笛卡尔那里——形成了一棵知识之树。在这份世界地图上，尽管只有大的地区能被发现（因为人们在“普遍原则”和“最本质的细节”处停留），但是百科全书主义者将如同一个精神的探险旅行者那样在世界地图中活动。因此，百科全书必须把历史和精神地理学联合起来。它预告人类精神进步之历史图景，这一图景将由孔多塞在世纪末勾画出来。《传单》和《前言》都坚持文艺复兴以来引人注目的知识进步。然而，百科全书做了一种批判性的总结，并出于教育的目的呈递了知识的状况。百科全书这一表达包含了

这一教育学目的，即“向后来的人们传承”它（Diderot，*E*，1972，第397页；参见*Prospekt*，第37页）。

由于众多作者的差异性，人们很难在《百科全书》中找到一种共同的哲学。尽管如此，这整个计划仍然受同一种精神启发，而这种精神是由它最重要的参加者和出版者注入的。如果说理性和与权威相对的批判精神的价值提升——就像18世纪常见的那样，以笛卡尔的思想为基础的话——那么在此之前对知识和人类精神的理解，即在洛克的后继者那里，则强调对感性经验的依靠。孔狄亚克（Condillac）被视为哲学介绍者。百科全书主义者信赖人类精神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能力，他们避开怀疑论（如在休谟那里）或唯我论的歧途（在文章《身体》[*Körper*]中德达朗贝尔反对贝克莱）。这种感觉主义（Sensualismus）导致了过去一个世纪那种宏大的理性建构被当作“形而上学的”而被抛弃，而经验的意义，则获得了提升（参考德达朗贝尔的文章《假设》[*Hypothese*]以及《笛卡尔主义》[*Cartesianismus*]），尤其在科学知识中。同时实践的角色也得到了价值提升。德达朗贝尔强调机械技能对社会生活的更大功用。如果某些手工劳动对娴熟技巧（的要求）已经导致它们被保留给“那些通过偏见被流放入最底层阶级的人”，那些能力仍然对社会有一种“更大功用”：当这个社会在“对伟大心灵行进行正当的尊崇之时，因为这些伟大心灵使社会拥有了清晰的知识，它也不能轻视进行服务的双手的力量”（d'Alembert 1751，1989，第41页）。

这种知识理论和对社会实践的重视有时汇入到一种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之中。正如在狄德罗的思想中，他因其生物进化论观点达到了一种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在没有公开持有这种唯物主义的情况下，狄德罗的某些文章倾向于唯物主义（参考例如狄德罗的《斯宾诺莎主义者》[*Spinozist*]）。但是当时这种倾向没有被普遍分享。毋宁说，在哲学和宗教领域最主要的对手是教条主义。斗争主要在于反对不宽容（Intoleranz）、宗教狂热（Fanatismus）和迷信（Aberglauben）（参考狄德罗的文章《哲学家》[*Philosoph*]或《基督教》[*Christentum*]）。紧接着贝尔（Bayle），《圣经》遭受了历史批判（参见《诺亚方舟》[*Noah*]或《确信》[*Gewißheit*]——一篇马上被耶稣会士评价为异端的来自阿贝·德普拉德[Abbés de Prades]的文章，以及《神圣年代》[*Heilige Chronologie*]、《批判》[*Kritik*]等等）。狄德罗在文章《斯堪特羊羔》（*Agnus Scythicus*）中彻底谴责了轻信（1972，第72—73页）。宗教不被认可为道德之基础，因为狄德罗在文章《无神》[*Gottlos*]

（第689页）中解释道：没有宗教，道德（Sittlichkeit）照样能存在。一种自然的伦理学是可能的，不管是人们现在让它从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法则中产生，或者是把它理解为基于人类自身本性。宗教也不可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人类是天生的群居生物。紧接着旅行见闻报告和对自然状态的哲学训练，人们对社会的起源感兴趣并时而练习人类学。更根本地看，更占优势的政治学说以一种受到洛克启发的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参见若古［Jaucourt］的文章《自然法则、自然平等》［*Naturrecht, natürliche Gleichheit*］；1972，第309—310、385—386页）。若古所写的文章大多是关于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思想的通俗版本（例如《论主权》［*Souveränität*］）。君主制没有被质疑，但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权力最终基于意见一致（狄德罗的文章《权力、权威》［*Macht, Autorität*］）。

因此，狄德罗和德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不仅是那个世纪最宏大的理智计划（从那之后很少再有同等规模），也被深深地卷入了那个时代的各种争论中。它是一种对基于经验的人类理性与人性进步的宣言。通过描画知识图景，它遵循了一种尚未有过的在自身的不同
612 部分——包括技术部分——传播知识的要求，并同时强调了时代的哲学要求。但是，最重要的是它清楚地为自身设置了目标，即推进知识和有用的技能，由此促进生产能力并对共同性之中的美德和幸福做出贡献（参考 Diderot 1972，第397页）。具体来看，百科全书主义者一般驻足于改革要求，改革的方向是公民自由（参见《人身保护令、信仰自由或信仰迫害之阿尤斯·罗库提乌斯》［*Habeas corpus, Aiuslocutius zur Glaubensfreiheit oder Presse*］）、商业与行业自由和废除特权。例如文章《税赋》（*Steuer*）（若古）就力主改革，并包含一整套改革计划。《百科全书》基于启蒙哲学的主要原则，以全新的方式描绘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它在政治层面反映了18世纪中期启蒙资产阶级的意愿。它期待释放经济主动权的改革，提出人民主权观念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并捍卫公民自由。为此，它抗争绝对君主制最反动的方面并逐渐破坏权力之宗教基础。尽管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它表达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愿望，这些愿望预言了1789年革命并为它做了准备。《百科全书》自发行起就获得了极大成功。它一直是启蒙运动的哲学精神之声明。这将为它带来最矛盾的评价，评价的矛盾性来自支持或反对科学、技术和人性进步，支持或反对法国革命的根本决断。

3. 半个世纪后，另一个哲学家黑格

尔，为百科全书概念在另一方面赋予了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他在《哲学史讲演录》（*GeschPhil*）中将法国启蒙运动的这部著作看作对抗权威之自由的根本宣言和反对形而上学之具体普遍性阶段，但是他没有研究《百科全书》，也不接受它的主要方向。然而他却决定性地丰富了百科全书的概念，因为他探讨了一些根本问题，即诸知识形式总体化（Totalisierung）之可能性和一体化原则与经验多样性的关系。如同狄德罗提醒自己的那样，百科全书是一个体系。现在，
613 紧接着康德以来的整个德国哲学，黑格尔哲学是一个思想体系。“真理实存于其中的真形态，独自就可以是真理之科学体系。”（*PhG*，W 3，第 3 卷，第 14 页）只有体系可以克服那和每个主观观念论相对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思维之矛盾，并把那不断生产的、向自身回撤的各种差异总体化。这一黑格尔自 1800 年的《体系片段》（*Systemfragment*）（W 1，第 419—420 页）以来就遵从的要求在 1807 年导致了这样一个计划，即撰写一本名为《科学体系》（*System der Wissenschaft*）的著作（W 3，第 14—15 页）。《精神现象学》应该是该著作的第一部分。《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z*）随后成为这一体系的最完善表达。

为了定义《哲学科学全书纲要》，黑格尔回到它的词源学和圆圈思想。但是这里呈现出黑格尔思想的基本开放性：圆圈的那种可让人联想到封闭状态和单纯的自我同一性之僵硬图像必须被辩证化为不断向其他存在开放的众圆圈之圆圈。“哲学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哲学整体，一个在自身之中完成的圆圈。”（*Enz*，§ 15）《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每一个部分已具备一种体系形态。每一种特殊的科学就自身而言显示了一种确定的秩序，该秩序与经验所给定之物或理性知识之演绎的形态相符合。但是，只要特殊科学在哲学上的内容以特别的形式存在于哲学事物之中，那么这些圆圈中的每一个圆圈都已被决定，在理念（Idee）的运动中并通过这一运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扬弃自身。“因为单个圆圈在自身中是一个总体，它突破了自身要素的限制并为一个进一步的领域奠定基础。”那个众圆圈之圆圈也是由此建构自身的：“因此整体作为一个众圆圈之圆圈呈现出来，每一个圆圈都是一个必然的要素，如此以至于它们特有的元素之体系构成了整个理念，该理念也在每个个体中显现。”（同上）因此，人们不关心部分的量的积累。每一个部分自身就是一个整体；整体之理念同时是整体的扬弃原则，它在整体中以一种确定的形式得以表达。《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作为众圆圈之圆圈打破了简单的（圆圈的）循环性，并进入一种开

放的总体化原则。该原则以另一种方式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末尾的绝对精神（absoluter Geist）的三个结论中表现出来。这处文本确证了线性阅读的不恰当，这种阅读在绝对精神中仅仅看到一种单向运动的到达点，在那里理念以一种最终和解的方式静止下来。第一个结
614 论将逻辑作为基础，自然作为中心，精神作为结果，停留在“过渡”（Übergehen）完全外在的形式之中。这个结论自身在第二个结论中被扬弃，后者以精神的角度，也即以自由而不再以必然性为出发点，这种必然性以自然为前提并把自然与逻辑辩证地联结起来，因为逻辑反映自然。第三个结论解释绝对普遍事物（Absolut-Allgemeines），也就是那种解除一切现实性的逻辑事物，自身如何“在精神与自然中一分为二”。这三个结论有同样的有效性，因此，百科全书之圆圈自身无法包含总体性。在第三个结论中，逻辑事物同时显现为自然和精神（也即历史），并不断地对它们进行中介，因此只有第三个结论允许无尽的生产（Hervorbringen），由此“事物之本性、概念……向前运动并发展”（*Enz*，§ 577，同时参见 § 575—§ 576）。百科全书的体系是绝对事物之自我展现。因此，百科全书的圆圈回到自身，并且没有开端，如果开端不是铁事式的、外在于事物自身运动的，“哲学以这种方式把自身展示为一个向自身回归的圆圈，这个圆圈没有其他科学意义上的开端，开端由此只有一种和主体的关系，该主体意愿去决定进行哲学活动，但是开端和那种科学没有关系”（§ 17）。

接续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性乐观主义，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首先表明了这样的信念：精神能够把握绝对之物，这与康德的被解释为导致怀疑主义（Skeptizismus）的批判主义（Kritizismus）相反。物自身（Ding an sich）、本体论或神学的不可言说之物（Unsagbares）不能为知识设置界限。作为体系的哲学和作为体系之完整表达的百科全书建构知识，知识通过人自身在人那里获得绝对的东西。其次，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反对每一种直接性，坚持中介和反思的重要地位。每一个部分自身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仅仅是就自身而言的。为了被理解，部分必须被展开。因此，一种哲学式的百科全书至少不可以是实证知识的纯粹累积。“哲学式的百科全书通过这种方式区别于其他通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即后者大概仅是一种以偶然和经验的方式被接受的科学之集合（*Aggregat*）。”（*Enz*，§ 16）在这里，决定性的是去阐释必然的互相联系中的科学的诸原则。“作为百科全书的科学不在其详细的特殊化发展中得到阐释，而是被局限于特殊科学的开端和 615

基本概念。”（同上）然而，在这里人们不可以在原则和特殊事物的一种形式化的对立中不再理会上述观点。重要的是去展示是什么将差异设置和统一为差异，也即一个具体的统一体之诸要素。与一种后来广泛流传的形象相反，黑格尔对他同时代的科学材料实际上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他进行物理实验，掌握数学知识，对化学感兴趣，等等。《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的第1版和1827的版本中所出现的众多修改对此做出了证明。这也意味着，百科全书——正如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对持续的修改是开放的**。这最终意味着，经验事物在这里有一种不可约简（irreduziblen）的地位。面对约简式的理智（reduzierenden Verstand）和“反思哲学”，黑格尔总是捍卫经验。他谴责哲学经验主义（Empirismus），仅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经验主义是抽象的，且相对于具体的总体性，它孤立了直接被选出的元素。但是，正如黑格尔在1802—1803年间关于自然法的文章中已经强调的那样，自然法完全是处于一种直接形式中的整体和绝对事物，重要的是对这种形式进行反思和中介，以使它重新在概念的有意义的要素中得到发展。

黑格尔为文艺复兴以来对百科全书的疑问给出了一个原创性答案，这种百科全书不满足于反思一个在有限的产品中自我封闭的世界，而是能思考一种无限。黑格尔是在一种辩证法最外在，同时一直鲜活的张力中思考无限的，而这种辩证法发展和统一了差异。人们不可荒谬地将这种辩证法简化为一种公式主义（Schematismus）和诸如此类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黑格尔自己总是谴责这类东西，尤其是费希特和谢林哲学。黑格尔对哲学百科全书的理解与后来的各种萎缩形式（Schrumpfformen）完全对立，在那些萎缩形式中，辩证法被降低至预先规定的形式法则的一小部分上。

4. 在一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化和被评价为“抽象推理的”趋势的反向运动中，马克思踏入了对特殊事物（历史、《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的研究领域，但他并没有系统化地扩展出一种自己的哲学。在一种根本的哲学批判中，所有以前的哲学对马克思而言都是需要被扬弃的意识形态形式（参见Labica 1976）。尽管他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的精神和他博学多才的学识使他首先及在通俗意义 616
上拥有百科全书式的头脑，但是更适合他的是去探究这个或那个内容，而不是去撰写一本百科全书式著作。当然，在马克思和之前的两种百科全书思想的主要形态之间存在着联系和亲缘关系。如果说18世纪的《百科全书》本质上总结

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倾向，那么马克思并没有错过对这一阶段发表意见，尤其是在《神圣家族》中他把法国唯物主义放到了一个比他的时代的德国哲学更高的位置。由此，启蒙运动的哲学被等同于（其中也包含了简化）唯物主义，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以笛卡尔的物理学（这儿与他的形而上学相反）为出发点，另一个组成部分则以洛克为出发点并接受了形而上学的批判形式本身。马克思主要强调这种唯物主义在批判形而上学、宗教、神学以及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社会组织方面的效能。他甚至认为法国唯物主义“直接汇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MEW 2，第 138 页）。

对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另一项分析在恩格斯 1844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看到了革命变化在英格兰、法国和德国的不同形式，德国人是“基督教唯灵论民族”，与之相反，法国人则是“古代唯物主义的、因此政治性的民族”（1，第 552 页）。尽管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的批判效能，但他更多地停留在科学发展方面并且列举了不同学科最重要的学者。同时他参考了当时杰出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思想在 18 世纪是典型的：它基于这样的意识，即所有科学都互相联系。”换言之，这种科学互相联系的意识在 18 世纪日益凸显。但某种形式的不成熟仍然妨碍了去真正思考这种相互联系，以至于材料仍然仅仅被排列在一起而没有形成整体（第 551 页）。在恩格斯那里，当时已经有了关于诸知识与学科的必然联系之思想的萌芽，这一元素稍后也见于《自然辩证法》。然而《百科全书》却很少被讨论。德达朗贝尔仅因为他关于动力学（Dynamik）的论文而在《自然辩证法》中出现（20，第 371 页及以下），而 18 世纪的哲学在《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中仅被泛泛提及，这些泛泛之词没有超出 1845 年的发展。与此相 617
反，恩格斯强调那种兴起的对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法（Synthese）的需求：“前一个世纪末，根据法国唯物主义者——其中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出现了一种这样的需求，即对整个旧的牛顿—林奈学派（Newton-Linnéschen Schule）的自然科学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总结，两个最天才的人物圣西门（非完全地）和黑格尔致力于此。而现在，在新的自然观在其根本方面业已完备的地方，同一需求触手可及。”（*DN*，第 514—515 页）借由物质现实整体相互联系的观念——正如在各种科学中的这种观念（因此也在整体计划的草案中被标出）——恩格斯继续深化那种他归于百科全书主义者的直觉，并且首先采纳了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的，尤其是他的自然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恩格斯谈到了《自

然哲学》的粗略划分，甚至它的某些发展，如关于机械主义［Mechanismus］和目的论［Telcologie］），也即各知识领域的互相联结以及那种内在于科学运动及其对象的辩证法的复归。然而，恩格斯评价道：在黑格尔那里可以找到“巧妙设计好的辩证法过渡”。而且他强调道：“正如一个运动形式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运动形式的镜像，不同的科学，也必然一者从另一者中产生。”（第515页）

5.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带着“重新书写整个哲学百科全书”（*SPh*，第340页）的尝试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危险要么与经验主义相关，也即向“非哲学”倒退，要么向一种“超哲学”（Hyperphilosophie）跳跃，“也即成为了僭越，人们可以事实上想象这个宇宙”（第341页）。以恩格斯的某些（来自草稿的）文本出处为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稍后的变化当然要求最大的谨慎。辩证法的虚假法只可能导致科学成果的恶性重复或不可接受的僭越，即想从外部评判这些成果的有效性，李森科事件（Lyssenko-Affaire）则为此提供了令人悲哀的、犯罪似的例证。尽管有一些误导性的表达，但恩格斯的努力不在于先天地建构一种辩证方法，而在于去找出在自然历史进程中产生作用的辩证法，正如它同样在科学成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尽管那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方式。百科全书式的、总体化的目的取向仍然存在，这种取向既被打上了黑格尔遗产的标签，也被打上了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Positivismus）的标签。同样在这个层面，向一种封闭的科学图景的滑落不是不可避免的；毋宁说，人们可以从一种（暂时的）知识状况出发提出知识的相互联系问题。在这种意义上，恩格斯绝对更新了自然历史科学的百科全书规划，这种百科全书符合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况并越来越强烈地关注现实运动。

20世纪末，百科全书可以以不同于18或19世纪的那些形式出现。在量方面，由于知识自身的快速增长，知识领域的总和几乎不可能通过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完成，这种努力也仅是“走向那一知识总体的步骤，在这个总体中，历史来源与现实的多样性和对人类未来的预测都得以被思考”（Sandkühler，EE I，1990，第9页）。然而，网络系统中信息存储与流通的新的可能性则可能抵消上述观点。人类遗产中主要作品的保存和供用以及现代研究成果的快速交换展示了新的可能性，但其前提是它与一种批判性的教育相伴而生，以使数据量保持为可管理的。知识的范围与多样性看起来甚至在公众那里唤起了对辞典或好

618

的百科全书（特定的领域或带着普遍性要求）的补偿性愿望，正如20世纪末此类努力的增多所表明的那样。但是，这第一个纯粹量方面的难题导向一个基本问题，即联合不同的理性形式究竟是否可能。如果说古典时代认为可以把多样性向统一的原则回溯的话，不同的客观性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客观性水平在黑格尔那里已经被考虑了）之发现则汇入到不可互相追溯的地域理性主义之观念中。一种统一科学（并且首先是一种统一哲学）的观念似乎是无效的。那种主导了黑格尔方案的科学之交互产生的观念看起来与20世纪末的科学分工
619 几乎不相适应。因此，百科全书必须放弃统一方案并再次根据字母表顺序应用完全外在的材料分类原则，正如在18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狄德罗坚持交叉引用（Querverweisen），这种交叉引用在体系的某些要点之间建立了新式的、富有成效的联系并由此在为作者提供了行动空间的同时也为使用者创造了自由空间。人们可以追问：是否相比对总体化的要求，现在的百科全书式需求更能表达对联系、有效转译和过渡的要求，而它们激发出新的概念理解？百科全书由此从圆圈形式转换为那种迷宫式的、无限过渡的形式，这种过渡建立关系和相互联系，但不是以一种直接普遍的方式，而总是以在个体中的，但在趋势上可融合到一个普遍网络中的方式。但是这种情况仍然存在，即知识领域与知识形式的碎片化（这是专业化的结果，但也是进行严谨研究的前提）对共同体公民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因为科学、艺术和工艺之总和归根结底会在社会和人类计划中获取一席之地。而百科全书思想保卫着它的现实性——既在它的直接显现中（它名下著作的增多），也在它将知识的多样性联结进一个整体计划的精神中，这种精神不是对世界进行统治的精神，而是一种教育的精神，这种教育允许弄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介入世界。

参考文献：

J. D'Alembert, *Discours Préliminaire de l'Encyclopédie*, Paris 1751, *Einleitung zur ›Enzyklopädie‹*, hgg. v. G. Mensching, Frankfurt/M 1989; J. D'Alembert u. D. Diderot (Hg.),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arts et métiers*, Paris 1751–1772;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métiers*, Paris 1751–1780; *Artikel aus der von Diderotund d'Alembert herausgegebenen Enzyklopädie*, hgg. v. Manfred Naumann, Leipzig 1972 (^{2}1984); F. Bacon, *Novum organum scientiarum*, London, 1620; P. Bayle, *Historisches und kritisches Wörter-*

buch (1697), Leipzig 1741–4; E. Chambers (Hg.), *Cyclopai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d Sciences*, London 1728; R. Darnton, *Glänzende Geschäfte. Die Verbreitung von Diderots Encyclopédie*, Berlin 1993; R. Descartes, »Prinzipien der Philosophie«, in: ders., *Philosophische Werke*, Bd. 2, Leipzig 1908; H. Dieckmann,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in the ›Encyclopédie‹«, in: ders. *Studien zur europäischen Aufklärung*, München 1974, 234–57; C.-A. Helvetius, *Vom Geist*, Berlin und Weimar 1973; G. Labica, *Le statut marxiste de la philosophie*, Brüssel 1976; J. Proust, *Diderot et l'Encyclopédie*, Paris 1962.

若埃尔·比亚尔（Joël Biard） 撰
约阿希姆·维尔克（JW） 译为德文
周兵 译，张觅 校

参见：

Aufhebung, Aufklärung, Bewegung,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ogmatismus, Einheit, Eklektizismus, Empirie/Theorie, Empirismus,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eiheit, Ganzes, Geist, Geistesgeschichte, Geschichte, Idealismus, Leitfaden, Logik, Materialismus, Metaphysik, Notwendigkeit, Philosophie, Philosophiekritik, Reflexion, Religion, Sowjetenzyklopädie, Spekulation, Subjekt-Objekt, System, Totalität, Vermittlung, Vernunft, Wissen, Wissenschaft

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epigonaler Stalinismus）

A: stālīnīya muqallida.

E: epigonic stalinism.

F: stalinisme des épigones.

R: ėpigonskij stalinizm (эпигонский сталинизм).

S: estalinismo epigonal.

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试图阐述在斯大林主义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扩张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种意识形态是在苏联直接统治范围之外发展起来的。该术语由沃尔夫冈·鲁格（Wolfgang Ruge）在1990—1991年创造。“甚至在斯大林主义达到其经典形式之前，它便开始感染西方的共产党。自1920年代中期以来，类似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形成，它既植根于本地的发展（不宽容等），同时也需要适应被赞誉为世界革命先驱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需要。它加强了

教条主义倾向，导致批判知识分子离开德国共产党，并且（这一举动）得到大多数党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条件下精简组织是必不可少的。”（1991，第 134 页）

苏联统治范围之外的苏俄辩护士（sowjetrussische Apologetik）被描述为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它在理论家、党员、共产国际各部门的拥护者以及依附苏联共产党的各个共产党中建立起来，他们为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在起步阶段的非批判性意识形态辩护，甚至在苏维埃政权出现了明显变形之后仍在继续。彼得·魏斯（1975，1978，1981）以小说的形式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

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的代表人物跟随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并最终违背了它们。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已沦为空洞公式的情况下，为了苏联官僚体制的外交和内政目的而进行的共产党的工具化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除此之外，它的代表还试图
621 在西半球的反帝国主义和工人运动中为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与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的代表的社会生存条件不同于在苏联霸权地区工作的那些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他们不像上述斯大林主义者那样被绑定在经济依赖、腐败特权、行政组织上，甚至，在回绝的情况下还面临生存危险。不同于苏联权力范围内的人，他们以某种方式面临着帝国主义制度统治的现实，这同样使得马克思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变得困难，因为一种理论基础的替代方案几十年来都受到阻碍。除此之外，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方式和运行方式也有不同的看法。长期以来，这种制度在工业化成功和促进文明成果的文化革命的背后，在支持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等等的背后，隐藏着各种畸形现象和违法行为。苏联秩序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造就了一大批“面包学者”（Schiller 1789），其体制内的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西方人文科学相隔绝的教育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俄罗斯—亚洲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相比之下，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的代表们发现，因为自己的主观信念和虚幻的外部图景，他们在学科上陷入了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的牢狱。在他们那里，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不可少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被扰乱了。关于苏维埃制度真实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被放弃了。相反，面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暴力和非经济暴力，他们同样自我麻痹，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胜利阶段，共产主义运动接受暴力的内在准备成为斯大林主义辩护士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惨烈革命尝试后的休克经 622

历以及随后贫民窟的出现让人坚信，只有最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以及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才能对抗资本主义的霸权，而与社民党立场对立的少数派立场则成为自愿接受斯大林主义的必要前提。此外，鉴于以马克思主义形式呈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来自斯大林灌输的著作，因此他能够使他作为新时代的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和辩护的形象变得可信。在此，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概念和范畴在表面上得到了坚持。

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和法西斯对欧洲的进攻，以及最终对苏联的入侵，对这个十月革命国家的任何批评似乎都被禁止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斗争从本质上看是斯大林主义政治和理论的胜利，是由斯大林主义塑造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制度的成功。随后，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左翼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在与其他社会科学流派的不断对抗中，发展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家从根本上坚持捍卫现实社会主义，但在官方科学界（*scientific community*）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下，他们被迫发展出超越苏联辩护士的、部分是批判性的意识形态。

与官方苏联马克思主义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比，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在思想和理论上具有许多实质的特殊性。经济领域的赤字、生活水平的倒退以及其他短缺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原因看似合理地被解释，例如，参考历史起点和外部影响（被迫军备竞赛）。另外，由于上层建筑的明显扭曲，民主和政治统治的核心问题变得尤其举步维艰。自1956年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备忘录（1968，第34—61页和第235—247页；1977，第765—779页）以来，苏联之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知名领导人也对这些扭曲进行了持续批判。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通过在 623
权力与统治之间建立起一种分离而引入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工具。这使它不必完全否定政治官僚机构的独裁权力，但同时又能够维持工人阶级在苏联的统治。由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至少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说是可以维持的，而社会主义民主在国家和社会上取得突破似乎也只是一个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长期以来，对斯大林主义体制在作用、成就和表现方面的矛盾心理让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得以存活。一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斯大林主义者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分裂往往持续了数十年，在此期间，因面对外界对符合党派的作用和立场的认知，以及内部的怀疑和矛盾，他们的内心承受着意识形态精神分裂症的折磨。恩斯

特·菲舍尔（Ernst Fischer）（1964）和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Elleinstein 1977）等理论家，或者像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一样的党的领袖等，都在传记里像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一样揭示了类似的东西。

在欧洲所有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瓦解后，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几乎完全消失了。那些对所谓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批判，对斯大林主义之下的苏联在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斗争中所取得成就的辩护，不过是建立起继承斯大林意识形态的边缘意识形态的避难所，通过回溯斯大林的优先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的发展，得出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希特勒联盟中做出主要贡献的错误结论（Wagenknecht 1992，第12—26页）。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被追问，即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这一切是否可能。随后，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瓦解被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肤浅政策，而不接受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只是揭示了斯大林体制在结构上的不可救药这一主张。由于对世界危机进程的预期加剧，不排除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源的斯大林辩护士会重生，因为占绝对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无法证明，可以用文明
624 的方式应对它的胜利。尤其是前苏联霸权地区的灾难性社会发展为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的局部复兴提供了温床，当然，这也不过是历史性的跟风模仿而已。

参考文献：

W. Benjamin, *Tagebuchnotizen 1938*, GS 6, 532ff; ders., *Versuche über Brecht*, Frankfurt/M 1966, 131ff; E. Berlinguer, *Für eine demokratische Wende.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1969–1974*, Berlin/W 1975; S. Carrillo, »*Eurokommunismus« und Staat*, Hamburg-Berlin/W 1977; »Erklärung über das Treffen von KPI, KPF und KPSp in Madrid 1977«, *ND*, 4.3. 1977; J. Elleinstein, *Geschichte des »Stalinismus«*, Hamburg 1977; L. Feuchtwanger, *Ja—Das Ganze nochmal. Eine Biographie in Selbstzeugnissen Feuchtwangers*, hgg. von J.Hoffmann, München 1984; E. Fischer, *Was Marx wirklich sagte*, Wien 1964; *Konferenz kommunistischer und Arbeiterparteien Europas. Berlin, 29. u. 30.6.1976. Dokumente und Reden*, Berlin/DDR 1976; W. Ruge, *Stalinismus. Eine Sackgasse im Labyrinth der Geschichte*, Berlin 1991; P. Togliatti, »Intervista a ›Nuovi argo- menti‹«, in: *I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e i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1956–1968*, Rom 1968, 34–61; ders., »Memorandum zu Fra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und ihrer Einheit«, in: ders., *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DDR 1977,

765–79; S. Wagenknecht, »Marxismus und Opportunismus«, in: *Weißenseer Blätter*, 4/1992, 12–26;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es*, Roman, 3 Bde., Frankfurt/M 1975, 1978, 1981.

海因茨·尼曼（Heinz Niemann） 撰
李牧今 译，张文红 校

参见：

Apolog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ntstalinisierung, Eurokommunismus, Gorbatschowismus, kritischer Marxismus, Leninismus, Marxismus-Leninismus, Perestrojka, Stalinismus, westlicher Marxismus

叙事戏剧（episches Theater）

A: masraḥ malḥamī.

E: epic theatre.

F: théâtre épique.

R: ėpičeskij teatr (эпический театр).

S: teatro épico.

本概念——和**辩证戏剧**、**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nicht-aristoteliesches Theater*）及**科学时代的戏剧**（*Theater im wissenschaftlichen Zeitalter*）一样——是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实践中的纲领性表达，表示的是布莱希特戏剧与欧洲传统戏剧和舞台美学的有意识决裂。此外，叙事戏剧也指戏剧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传统——尤其是在自19世纪晚期以降的现代戏剧——中的多种非对话的形式或技巧。由此，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重构布莱希特与传统以及与**现代戏剧之危机**（*Krise des modernen Dramas*）之间关系，并借此重构其戏剧之史前史的可能性。

1. 在《现代戏剧理论》（*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1956）一书中，彼得·斯丛狄（Peter Szondi）将戏剧及舞台艺术的叙事化——与种种将“封闭的”和“开放的”形式简单对立的非历史性的类型学（Klotz 1960; Grimm 1963）相反——定义为一种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侵蚀了建立在对话与“人际关系”之上的“经典”戏剧的根基，并揭露出“社会主题与戏剧形式之间的矛盾”（Szondi 1978，第105页）。斯丛狄认为，**戏剧的危机**（*Krise des Dramas*）与一场社会变革有关。他运用青年马克思、青年卢卡奇与阿多诺的概念范畴，将这一变革理解为“人的自我异化，人的社会存在成了其自身的客体”（第110页）。塞萨尔·凯斯（Cesare Case）与托马斯·梅彻尔（Thomas Metscher）的

625

批评就从这里入手，二人或多或少地都以黑格尔与卢卡奇晚期的美学构想为指引。帕特里斯·帕维斯（Patrice Pavis）（1981）和他们相反，他在与斯丛狄的论证中提出，戏剧的危机应该和作为独立艺术的舞台表演模式同步化表现，并在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将形式与内容的辩证转化为**所指**（*Signifikat*）与**能指**（*Signifikant*）这一对概念。

斯丛狄从黑格尔处主要继承了后者将**对话**（*Dialog*）视为“最完善的戏剧形式”（W 15，第 493 页）之定义。但对于黑格尔，对话之所以是最完善的形式——斯丛狄正是在此处开始概括总结——恰是因为“行动的个体”以这一形式“**互相反对**，陷入冲突，以推动情节在真正的运动中向前发展”（同上）。亦即，黑格尔认为戏剧的“关键点”（第 488 页）乃是在矛盾、在利益的“冲突”（同上）中；此外，他大体上是从古希腊城邦悲剧中推论得出这一规则的。在他对绝对精神从艺术过渡到宗教的历史哲学建构的基础上，黑格尔能够接受在这一严格意义上的戏剧之终结。

历史哲学构建与经典形式定义之间的两难，在马克思理论及基于该理论的讨论中延续。一方面，人们认为，黑格尔将戏剧定义为**冲突**（*Kollision*），这也可以恰好运用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戏剧上去——尤其要在**阶级斗争**（*Klassenkampfes*）的视角下。在 1859 年关于费迪南德·拉萨尔那部《济金根》（*Sickingen*）戏剧的辩论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阐释并批判了拉萨尔对人物的塑造：人物的阶级特征凸显得还太不 626
明确，因此才会让人怀念人物所缺乏的“个性”。这里所涉及的虽然是出自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的一桩历史素材，但马克思却将这种“冲突”（MEW 29，第 590 页）明确地归入当前时代，并且认为，这里所关涉的是“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MEW 29，第 591 页）。但相对地，这一美学评价却与比马克思更早期或更晚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公私区分、对于匿名且抽象地而非个人且具体地转达的权力关系、对于在发达的物质社会中人际关系已形成的拜物特征等一切与戏剧冲突之可能性背道而驰的条件之认识相矛盾。这种矛盾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提出的**性格面具**（*Charaktermaske*）这一概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性格面具将马克思要求戏剧所具有的“性格中的特点”（MEW 29，第 592 页）降格为物化了的关系的纯粹人格化，并恰恰在形式上要求马克思批判过的拉萨尔悲剧的那种“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同上）。

这一矛盾直到青年卢卡奇的戏剧美

学中才被意识到。资产阶级戏剧在这里首先被呈现为市民与贵族之间阶级冲突的戏剧——甚至被视为第一部“从有意识的阶级对立中生长出的戏剧；第一部以表达一个为了自由与权力而斗争的阶级之情感方式与思维方式、表达它与其他阶级之关系作为目标的戏剧。从中可以得出，在多数戏剧中须有两个阶级相互冲突，既要有斗争的阶级，也要有斗争所针对的阶级”（W 15，第 74 页）。然后，卢卡奇接下来却清楚地表明，现代市民生活作为素材不再是戏剧性的了，因为“一个人的整体个性正是在生命感的基础上被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所充盈，这种生命感……已消失或至少正在衰减”（第 103 页）——而正因如此，戏剧与剧院必然变得“更加叙事化，或更准确地说，更像小说”（第 100 页）。在一个正在变得愈发抽象化的社会面前，无力感和孤独感需要叙事化的元素来表现——卢卡奇在梅特林克（Maeterlinck）与德国自然主义的戏剧中发现了这些元素。

627 随着人民阵线（Volksfront）理念的发展，这一历史化获得了一种规范性转向：卢卡奇认定冲突的消解与戏剧的叙事化是颓废的一种表现，必须以文学批评和政治的方式与之斗争——并援引一种社会主义的、具体的或革命性的民主，其在人民阵线与人民民主的框架内成功地抗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化。因此，卢卡奇在他流亡莫斯科时写作的《历史小说》（*Der Historische Roman*）以及之后的《审美的特殊性》（*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中，均保留了原先的历史化论述，但通过对不断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想象，这种历史化却转变为一种规范美学，其非现实的现实主义在真实的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崇拜（stalinistischer Staatskult）中显示出一种谜一般的乌托邦——同时又拒斥乌托邦！

由此，斯丛狄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形成的理论乃是一种将叙事戏剧的概念从规范性的建构中再度解放出来、“回归”卢卡奇早期美学的尝试；布达佩斯学派代表费伦茨·费赫尔（Ferenc Fehér）、阿格尼斯·赫勒（Agnes Heller）和乔治·马尔库斯（György Markus）（1977）的论点与斯丛狄非常类似，但又独立于他的论点，同时与卢卡奇的观点直接对立。

在现代戏剧与叙事戏剧的整个理论史中，引人注意的不单是某种强制性的重复，还包括一个盲点：黑格尔哲学与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目的论——在这里几乎从未被讨论过。尤其是考虑到戏剧——或许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音乐除外）都更多地——抛出目的论行为的问题以供讨，对它的忽视就更让

人惊讶了。只要“好的”或悲剧的结局抵消了冲突，从而取消了对话的必然性，就能够被当作目的，即合题所在之处：“到此为止”以便让幕布落下的形式强制，通常与内容上的强制——给游戏画上句号，或用古典主义的语言表达，即在和解中取消冲突——合而为一。“更符合我们情感的是，悲剧有使人和解的结尾。”（Hegel W 17，第 135 页）无论是在最后驱逐“恶”的统治者的“好”统治者，还是通过婚礼在家庭的和谐中化解男性与女性的冲突，这种目的论始终让戏剧变得积极（参见 Scheit 1995）。若是人们想要在这里标明现代性的戏剧
628 特征，那么这种特征就在于，唯目标论渐渐地或突然地成了问题。

当阿尔都塞在他的《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Bemerkungen über materialisches Theater*）中将“布莱希特之前”的冲突和戏剧与“艺术的虚假辩证法”，将戏剧本身与其主人公的意识画上等号时，就触及了上述问题。在阿尔都塞看来，与这种辩证法的决裂是在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中实现的：“在他笔下，没有一个角色可以通过反思将戏剧的全部条件纳入自身。”（1977，第 201 页）然而，在黑格尔的美学当中就已经存在裂痕：互相表露其利益并相应地陷入冲突的个体们——这些个体完全不必将戏剧之条件的整体通过反思纳入自身——与被归入其冲突结束的和解意义之间的张力。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在生产者的层面上再度抛出了戏剧的问题，尖锐化了这些问题——并将其变为文本、表演艺术、舞台布景、舞台与观众之间的关系等等主题。

2. 布莱希特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了他的“叙事戏剧”概念——从 1927 年开始，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 30 年代，布莱希特又加入了**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概念，但并没有详细展开：它宣扬与整个西方传统的抽象决裂，同时又紧盯着舞台与观众之关系或曰效果美学问题不放（幻觉的产生；净化—共感），却并未详细研究分析亚里士多德诗学及古典时代、中世纪与启蒙时代对其的反驳阐释（参见 GA 22，第 168—172 页）。这就导致错误地将**净化**（*Katharsis*）与**共情**（*Einfühlung*）混为一谈。直到在 1948 年的《戏剧小工具篇》（*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中，布莱希特才对亚里士多德有更细化的评价（参见 GA 23，第 67 页）。与之相对，运用“辩证戏剧”的改变，布莱希特从一开始就将继承与断裂推入了更清晰的光线下：他不单让人们注意到这种悄无声息地塑造了迄今戏剧与剧院史的趋势，更将之编写为纲领——而舞台

与观众之关系以及效果美学问题也始终被包括在内。有了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戏剧在历史上首次以整体的形式有了自我反思的属性。

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从一开始就有别于其他**实验戏剧**（*experimentelles Theater*）的著名导演于同时期的尝试；
629 这种区别主要在于，叙事戏剧坚持“戏剧性”（亦即书面性）与戏剧创作的一体性：亚历山大·泰洛夫（Alexander Tairow）在《解除束缚的戏剧》（*Das entfesselte Theater*，1923）中致力于完全摒弃书面剧本的场景形式；而弗谢沃洛德·迈耶霍尔德（Wsewolod Meyerhold）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在流传下来的“经典”戏剧与譬如说马雅可夫斯基（Majakowski）的剧本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对立，“好的旧东西”与“好的新东西”对他的剧院同等有用；埃尔温·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则用戏剧家滞后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为他的执导艺术辩护：“我的技术手段已得到发展，可以弥补戏剧生产中的不足。”（1985，第125页）布莱希特则从戏剧生产者这一边支持了这一追求——在他加工这些伟大导演的实验时，他的戏剧便转变成了叙事戏剧。

当布莱希特在30年代谈论亚里士多德时，他实质上指的是19世纪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wski）。忽视自黑格尔以来关于戏剧危机所做的一切哲思，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他作为戏剧理论家“自我戏剧化”的一部分：“其相是：所有古老的戏剧形式已经破旧。去研究它们究竟为何破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毕竟没有人乐意再去运用这些形式。”（GA 21，第235页）但他如果想要回顾并理清他从《巴尔》（*Baal*）到《三毛钱歌剧》（*Dreigroschenoper*）的发展，他恰恰必须进行这样的调查——而他到处都遇见趋向于消解对话与冲突的“拜物角色”：“我们能用抑扬格的形式谈论金钱吗？……石油抗拒着五幕剧，今天的灾难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有着危机循环的形式，所谓‘英雄’在每一阶段都会换人，是可替代的……，命运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清晰的力量，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看到向相反方向辐射的不同强力领域。权力团体本身也不单展现出外在冲突，更有内部冲突的运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是为了把一则简单的报纸短文戏剧化，就算有黑贝尔（Hebbel）和易卜生（Ibsen）的戏剧技巧也远远不够。”（GA 21，第303页）这一段作于1929年的笔记（是对《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关于“将来的戏剧”所做的民意调查的回答）标志着布莱希特与库尔特·维尔（Kurt Weill）合作时期所采取的立场：他已与自己的早期作品有了距离，在清空经典

630 戏剧学的视角下对其做了描述："我们就这样（暂时地）帮了自己一把，完全不去探究动机……，以便至少不给出错误的动机。"（同上）有趣的是，布莱希特依旧将阿诺尔特·布伦宁（Arnolt Bronnen）的剧作和自己的并列，视其为叙事戏剧的开拓者——尽管布伦宁自己在其剧作《卡塔隆战役》（*Katalaunische Schlacht*）中已为他的叙事戏剧找到了全新的民族主义动机，并最终采用了左翼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与传统的决裂——布伦宁与布莱希特共同认为托马斯·曼代表了这种传统——显然比纳粹阵营左派的政治分歧更有分量。

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在这一阶段已直接以商品崇拜发挥作用的方式为导引。可以说，这种叙事戏剧是在尝试将《资本论》的第 1 章戏剧化：个体像是资本的"性格面具"；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几乎不扮演任何角色。在这些年里，有这样一句话："当我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时，我理解了我的剧本。……这个马克思是我迄今所见我的剧本的唯一观众。……对他而言，这都是直观的材料。"（GA 21，第 256—257 页；GW 15，第 129 页）无法用对话展现的进程，在小说中可能由一个叙事主体来汇报，但在布莱希特笔下，却可通过切入股市走势、统计数据或（当代）历史档案，通过插入解间标题与评论，通过不同形式的倒叙、预告与各种概括，把这些时间带到舞台上。叙事异化首先能使在传统的戏剧形式中必须保持不可见的一切变得可见。它照亮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盲目崇拜，但是否能够将之消除，只有对各作品、场景与演出的分析才能展示。在这一视角下，必须特别对赋予女性形象（妓女、母亲）的戏剧功能加以批判性考察（参见 Lennox 1978）。

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与皮斯卡托实验性的戏剧实践紧密相连乃至相互合作，也顾及了如投影、电影与舞台装置等新技术手段；它以不同形式接受了身体语言重要程度的上升——哑剧、风格化、杂技、舞蹈——正如这一过程在迈耶霍尔德和泰洛夫反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然主义表演风格的舞台中所实现的那样；但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在这里主要关注 631
的是文本，并由此出发挑战表演艺术、音乐、舞台与观众，以期实现叙事化效果，即所谓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e*，V-Effekte）。而对文本的把握又必须对间离效果的实现与影响做出反应：叙事戏剧是"进行中的工作"。（作品在公共领域被归给作者；而在叙事戏剧的具体实现中，父权结构的特征贯穿于作者与其不同的协作者之间的关系中。）

在歌剧《马哈哥尼城的兴衰》（*Aufstieg und Fall der Stadt Mahagonny*）的注

释中，布莱希特首次系统性地阐述了叙事戏剧。其中表达尤多的是破除艺术作品同质性并引入一种“各元素的极端割裂”的兴趣（GA 24，第 79 页）：音乐与文本、演员与角色、舞台与观众不应相互融合，而应相互对立起来，以保持批判的距离：演员对角色、观众对形象的共鸣——对主体的重新认识——应被中断。瓦尔特·本雅明在他作于 1931 年的研究《何谓叙事戏剧？》（*Was ist das epische Theater?*）中发掘出了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与中世纪神秘剧以及巴洛克戏剧之间的共同点，并将各元素的割裂主要归结到时间结构上：“叙事戏剧不复述现状，而是发现现状。对现状的发现是通过打断进程实现的。”（GS II，第 522 页）但这也意味着，叙事戏剧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抛出目的论问题。在布莱希特为《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的注释所做的提要中，他写道，戏剧的戏剧形式表现了一个过程，而叙事形式则讲述了这一过程：在戏剧形式中，“紧张在于结尾”，而在叙事形式中，则“在于过程”（GA 24，第 79 页）。事实上，布莱希特在《三毛钱歌剧》中戏仿了传统歌剧**好的结尾**（*lieto fine*）；在《马哈哥尼城的兴衰》中则戏仿了悲剧性的结尾——整部歌剧以描绘彻底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收尾，任何政治行动在这一无政府中都失去了意义：“没有人能帮助我们、你们或任何人。”（GA 2，第 389 页）

与之相对，教育剧阶段看起来是在走回头路：对资本主义无政府的模仿转变成了目的论的教条。这一转折与布莱希特同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接近同时发生。现在不再是揭下性格面具的面具，而是要唤醒一个**新的主体**（*neues Subjekt*）。这个新的主体不是作为个体——这会导致戏剧形式的重生——而是作为集 632
体。如果说叙事戏剧在早期致力于揭示个体在物品交换的功能中的“自动”消解，那么教育剧中的叙事主体——范式性地由合唱队所代表——则展示了个体有目的地通过集体消解于集体之中（不过在单独的歌曲［*Songs*］中，先前的经济去面具化依然持续——强行进入了集体叙事主体全新的政治“叙述”）。这种戏剧理论的抽象性在《措施》（*Die Maßnahme*）一剧中被赋予了政治立场：“年轻同志”作为个体出于个人动机而行动，但正是因此被党消解；在对这个为谋杀而辩护的具体情境之构建的事无巨细性中，暴露出了预先设定的抽象目的：消解个体。（布莱希特之后拒绝上演这部戏剧，理由是“只有饰演年轻同志的演员可从中学习”；GA 23，第 418 页。）在某种意义上，布莱希特借此预知了斯大林主义进程的运作机理——因为对于教育剧戏剧学而言，个体对其消解的同意（*Einverständnis*）乃是一个核心的赋

予意义的契机。

此处，布莱希特叙事剧的极端性引人注目，它以游戏的方式将政治可能性推入极端，并借此——超然于策略性的构思与政治宣传——写清楚了特定姿态的后果。在此过程中，教育剧中所固有的观众在表演者中的消解显然是发挥了作用的。布莱希特日后仅仅把“对于表演者（*Darstellende*）富有教益”（GA 23，第 418 页）而不需要观众的戏剧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剧。但这些戏剧也同样能够对作家有教育意义，例如，柏林新科伦区（Berlin-Neukölln）一所文理中学（后来的卡尔·马克思学校）的学生们在排练《说“是”的人》（*Der Jasager*）时的抗议便导致了对剧本的修改，并由此产生了两部新剧：《说“是”的人》和《说“不”的人》（*Der Neinsager*）。学生们就是不能明白，为何剧中的男孩没有任何具体理由——仅仅是因为“伟大的戏剧”（GA 3，第 53 页）这样要求——就被其他人推下深渊，而自己还要再说“是”（参见第 426—427 页）。

看上去布莱希特似乎没有再停止过对这一抗议——与同意的决裂——之思考。从纳粹政权上台到莫斯科审判，这
633 中间有着足够多的反思契机。《圆脑袋与尖脑袋》（*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köpfe*）展现了，如果以老式的“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的方式来理解反犹主义对纳粹运动的意义有多困难。布莱希特这个“从头开始的专家”（Benjamin，GS II，第 515 页），仿佛是后退一步并且——在《卡拉尔大娘的枪》（*Die Gewehre der Frau Carrar*）之后——在《第三帝国的恐惧与苦难》（*Furcht und Elend des Dritten Reichs*）的场景中重新启用了戏剧形式，即便是缩小版（*en miniature*），且运用了蒙太奇手法。从这里开始，批评家们基于自身不同的立场，把布莱希特的发展视为对人民阵线概念有益，或是应受到批判的一种接近——也就是接近共产国际以抵抗纳粹为目标的结盟策略；这种策略拔高了对资产阶级遗产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评价，并赋予了个体及经典戏剧形式以新的意义。（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和尤里乌斯·海伊[Julius Hay]的剧本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范。）事实上，布莱希特却是在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例如，《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四川好人》或《高加索灰阑记》（*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戏剧张力：个体既没有彻底消解于性格面具中，性格面具也无法被个体简单地抹去。个体行为与抽象功能更多的是可以作为叙事戏剧的两极加以阐述，而单个人物就在此两极之间摇荡：在其中一极的近旁，共情（*Einfühlung*）在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它却始终被另

一极的力量场域所打断；这种中断的媒介是表演艺术或舞台呈现。即便在这一张力关系中存在单个的戏剧高潮（例如在《大胆妈妈》中哑巴卡特琳的那一场擂鼓戏中），只要**戏剧**（*dramatisch*）行为无法改变以**叙事的方式**（*episch*）表现的社会状况，这就依然是一部叙事戏剧。一个能在个体反抗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建立关联的党派，在这些戏剧中并不存在。（《大胆妈妈》之后遭到斯大林主义文学与戏剧批评界的拒斥——但卢卡奇例外。）第一眼看来，叙事戏剧仿佛回到了《马哈哥尼城的兴衰》结尾处的转折：但与其说是宣告由一种彻头彻尾的目的论简单地转向绝对的无目的性，不如说是将对可能目的的寻找转交给了观众，并至少声称自己已展现出这样的目的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找到。

634 对类似阿多诺的那种以卡夫卡与贝克特（Beckett）为导向的美学理论而言，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自然“走得还不够远”：因为主体“化作客体的程度要远多于”布莱希特所呈现的；因此“贝克特笔下角色的碎片都要比一种对现实的摹像更加真实，这种描摹已经被其模仿性柔化了”（GS 11，第 594 页；参见 Haug 1996，第 20—21 页和第 157 页）。然而，阿多诺将艺术理解为**无窗的单子**（*fensterloser Monade*）的构想所无法感知的是，与贝克特的《终局》（*Endspiel*）戏剧学不同，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将模仿性及其前提条件本身变成主题——因此当然与美学理论产生纷争。

在《工作日志》（*AJ*）的若干条笔记中，布莱希特阐明了流亡时期所写剧本的哲学。被资本主义所腐化的人在他看来是“全新的图像”，但依旧“个体地、单次地、‘非系统地’”回应与行动（GA 26，第 476 页；也参见 2，第 71—72 页）。而在他完整的戏剧理论中，这些思考更多地处于边缘位置；例如《小工具篇》这样表述对戏剧的要求：“他在哪里，那鲜活的、不可替换的人，即那与他的同类不完全一致的人？显然，摹像必须使他可为人所见；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在摹像中塑造这一矛盾即可。”（GA 23，第 80 页；GW 16，第 679 页）“社会运动的法则无法在‘理想情况’上得到展现，因为‘不纯洁’（矛盾性）恰恰属于运动与被推动者。”（第 85 页；第 686 页）性格面具与个体性之间的张力关系通常被有意识地通过与物理学新认识的类比加以描写，由此在某种意义上被本体化了（GA 22.1，第 395 页）。如果说主要作于流亡时期的著作《买黄铜》（*Der Messingkauf*）以及日后的《小工具篇》中缺乏魏玛共和国时期作品的挑衅式尖锐，这可能是因为布莱希特更多地倚重自然科学，并从中发展出了一种更高层面的进步乐观主义。他在《小工具

篇》中用**科学时代的戏剧**（*Theater im wissenschaftlichen Zeitalter*）取代了叙事戏剧的概念，这绝非偶然（GA 23，第65页；也参见第289页；也参见**辩证戏剧**的概念，第299—302页）。确信自己处在一个不再两极对立、其进步只不过是“掌控自然”问题的社会门槛上，促使这位戏剧理论家在不同角度上平整了
635 审美问题上固执己见的矛盾——在这些矛盾中，所谓掌控自然的破坏性一面常常得以清晰呈现。同时，布莱希特发现自己的戏剧构想在苏占区及民主德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例如来自弗里茨·埃尔彭贝克[Fritz Erpenbeck]）；作为回应，他的论证再度获得了具象性：“在那种更显大胆的表演方式中可以看见效果的衰微，这种衰微被同资产阶级的衰落关联起来。无产阶级需要强有力的食粮，即‘血腥的’、直接切入现实的戏剧，其中矛盾对立激烈地相互碰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我年轻时，盐腌鲱鱼对在我长大的那个城郊小镇上的穷人而言当然是有劲道的口粮。”（GA 23，第295页）

当布莱希特在柏林剧院（Berliner Ensemble）持续工作时，他呈现了作于流亡时期之剧本的典范化演出，但他显然希望在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创作的新剧本中从头再来。在资本与拜物已被驱逐出苏占区或民主德国的前提下，他认为教育剧以《措施》为模板重新回归，是有未来的。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海纳·米勒（Heiner Müller）的戏剧以教育剧的手段对教育剧提出了批评；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毛瑟》（*Mauser*，1970）就像是布莱希特的《措施》迟到四十年的自我批评。

3. 布莱希特叙事戏剧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指出了一条脱离自然主义戏剧狭隘视野的出路，同时又排除了“崇拜”形式的回归，即欧洲各地把戏剧再度神圣化，作为对历史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反应。“在整体上，这是对古老的狂热崇拜机制的世俗化。”（GA 22.2，第702页；GW 16，第657页）但这一点只有在集体及政党自身未成为崇拜对象、暴力未被当作牺牲仪式来庆祝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恰恰是叙事戏剧与尼采对**狄奥尼索斯式**（*Dionysisch*）的建构，以及与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残忍戏剧**（*Theater der Grausamkeit*）之接近，标志着与布莱希特有联系的作者们在60年代的发展——除了那些将叙事戏剧主要作为“道德机关”加以重构的尝试（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无论是彼得·魏斯（在他1964年的《马拉/萨德》[*Marat/Sade*]一剧中）还是海纳·米勒，都以不同的方式，636

致力于将叙事戏剧与一种以崇拜仪式想象为导向的戏剧概念相结合（伴随着如杨·科特 [Jan Kott] 或约阿希姆·费巴赫 [Joachim Fiebach] 的学术研究）——魏斯在马拉与德·萨德（de Sade）的冲突中把美学对立作为主题。叙事戏剧与类仪式元素的交织或“补充”或许在同等程度上得以实现，正如取自自然科学的进步概念——作为共产主义的指路标——出了问题。与之相反，福尔克尔·布劳恩则尝试在布莱希特的世俗化意义下继续发展叙事戏剧。如果米勒展现的是某种消极的牺牲仪式，这种牺牲仪式消解个人与集体之对立而不神化国家，只释放——作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Marx，MEW 29，第 592 页）的——世界观的譬喻之间的冲突，那么布劳恩则力图实现一种哲学上充分平衡的戏剧学——一种在“整体人性”与“不完全的集体”之间的辩证平衡，当然，这种平衡最后依旧被扬起于（技术）进步的理念之中。所以布劳恩才会为他的“主人公”保罗·包赫（Paul Bauch）（在他自 1962 年便开始创作又多次修改的《翻斗车工人》[*Die Kipper*] 中）在最后指出了一个体现在自动控制论中的乌托邦——但带着一种再度将主体相对化的讽刺的背景音：“存在自己操控自己的自动化机械……。人必须将初始推动力打造入技术之中，否则就得每天发动它，这就太冒险了。”（1978，第 224 页）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Offener Brief an Rolf Hochhuth« (1967), in: GS 11, 591–8; L. Althusser, »Das ›Piccolo‹, Bertolazzi und Brecht. Anmerkungen über materialistische Theater« (1965), in: K. Barck u. B. Burmeister (Hg.), *Ideologie—Literatur—Kritik. Französische Beiträger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DDR 1977, 187–208; A. Artaud, *Das Theater und sein Double* (1938), Frankfurt/M 1983; V. Braun, *Gedichte, Prosa, Stücke, Aufsätze*, Halle-Leipzig 1978; C. Cases, »Peter Szondi ›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 (1963), in: ders., *Stichwor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Wien-Frankfurt/M 1969, 367–97; J. Fiebach, *Von Craig bis Brecht. Studien zu Künstlertheorien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DDR 1975; R. Grimm (Hg.), *Episches Theater*, Köln-Berlin/W 1966; ders., »Pyramide und Karusell. Zum Strukturwandel im Drama« (1963), in: ders., *Nach dem Naturalismus. Essays zur modernen Dramatik*, Kronberg/Ts. 1978, 3f.; W. H. Haug, *Bestimmte Negation. »Das unwerfende Einverständnis des braven Soldaten Schwejk« und andere*

Aufsätze, Frankfurt/M 1973; ders.,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A. Helle u. a., *Die Seele und das Leben. Studien zum frühen Lukács*,
637 Frankfurt/M 1977; M. Kersting, *Das epische Theater*, Stuttgart 1959; V. Klotz, *Geschlossene und offene Form im Drama* (1960), München 1972; ders., *Dramaturgie des Publikums. Wie Bühne und Publikum aufeinander eingehen, insbesondere bei Raimund, Büchner, Wedekind, Horváth, Gatti und im politischen Agitationstheater*, München 1976; J. Kott, *Shakespeare heute* (1965), München 1970; S. Lennox, »Women in Brecht's Works«, in: *new german critique*, 1978, Nr. 14, 83–96; T. Mettscher, *»Kritik des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n Idealismus am Beispiel Peter Szondis«*, in: *Argument*, 10. Jg. 1968, Nr. 49, 466–92; W. Meyerhold, *Schriften*, Berlin/DDR-Weimar ²1965; ders., *Gestaltung und Gestalten im modernen Drama. Zur Technik des Figurenaufbaus in der sozialistischen und spätbürgerlichen Dramatik*, Berlin/DDR-Weimar ²1969; ders., *Das Leben des Bertolt Brecht oder Der Umgang mit den Welträtseln*, Berlin/DDR-Weimar, 1986; H. Müller, *Texte I–II*, Berlin/W 1974ff; P. Pavis, »Szondis Erbe für die Semiologie des Theaters«, in: *Vermittler*, hgg. v. J. Siess, Frankfurt/M 1981, 143–60; E. Piscator, *Zeittheater, ›Das politische Theater‹ und weitere Schriften voon 1915 bis 1966*, Reinbek 1986; G. Scheit, *Am Beispiel von Brechtund Bronnen; Krise und Kritik des modernen Dramas*, Wien-Köln 1988; ders., *Dramaturgie der Geschlechter. Über die gemeinsame Geschichte von Drama und Opfer*, Frankfurt/M 1995; P. Stefanek, *Vom Ritual zum Theater. Gesammelte Aufsätze und Rezensionen*, Wien 1992; P. Szondi, *Theorie des modernen Dramas* (1956), in: ders., *Schriften I*, Frankfurt/M 1978; A. Tairow, *Das entfesselte Theater* (1923), Leipzig-Weimar ²1980; P. Weiss, *Stücke I u. II*, Frankfurt/M 1976ff.

格哈德·沙伊特(Gerhard Scheit) 撰
毛明超 译，李之 校

参见：

Antiideologie, Antisemitismus,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Brecht-Lin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Charaktermaske,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Bild,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Einfühlung, eingreifendes Denken, Erbe, experimentelles Theater, Expressionismusdebatte, Faschismus, Fetischcharakter, Form, Fortschrit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estus, Katharsis, Klassenkampf, Lehrstück, Lukácsianismus, Materialästhetik, Moderne, Montage, Nationalsozialismus, Personifikatio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hilosophisches Volkstheater, Realismus, Reflexion, Sickingen-Debatte, Strukturalismus, Teleologie, theater, Tuismus, Umfunktionieren, Utopie, Verändern, Verfremdung, Volksfront

认识论（Epistemology）

A: ibīstīmūlūğīya.

E: epistemology.

F: épistémologie.

R: èpistemologija (эпистемология).

S: epistemología.

1. 这个单词可以追溯到英语中的新造词认识论（*epistemology*），它依据希腊语 ἐπιστήμη（知识）形成，而这个词本身又是对德语概念科学学（*Wissenschaftslehre*）的再翻译，“在胡塞尔再次使用这个术语之前，费希特和波尔察诺（Bolzano）曾在许多地方使用过它”（Fichant 1975，第 118 页），J. F. 费里尔（J. F. Ferrier）根据“本体论”的模式为这一哲学分支创造了认识论一词，作为这一哲学分支的“真正的开端”，它旨在回答一个普遍的问题：“什么是知识？”（1856，第 48—49 页）

638

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认识论一词在德语中的地位并不稳定：里特尔（Ritter）的《哲学历史辞典》（HWPh）和米尔特施特拉斯（Mittelstrass）的《哲学与知识理论百科全书》（*Enz. Philos. u. Wissenschaftstheorie*）都未曾涉及它；而布尔（Buhr）和克劳斯（Klaus）编撰的《哲学词典》（PhWb）则进一步注意到了 Wissenschaftstheorie/lehre 和 Erkenntnistheorie/lehre。后者对应于英语中的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ge*）；这个概念通常与认识论（epistemology）同义，不过它在法语中的含义更为狭窄。埃米尔·迈耶尔松（Émile Meyerson）在介绍其 1908 年的作品《同一性与现实》（*Identité et Réalité*）时指出，将这一表述等同于“科学哲学”（»Wissenschaftsphilosophie«[*philosophy des sciences*]）的情况“正在逐渐流行”。这个意义上的 *épistémologie* 也可能是当今认识论概念的最重要来源，这种认识论主要通过新兴的法国知识哲学而传入不同语言。

与 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相比，认识论领域的特殊性尚不清晰，因此，对其阐述的尝试也必须是一种澄清尝试。为了避免任意性，我们从属于认识

论的现有话语出发。认识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深层结构”或“问题架构”（Problematik），它们决定了该领域中什么被视为一个问题，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被找到的问题架构只能根据 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中的相应问题架构来确定，（因为）它作为特殊情况被包括在后者当中。

拉朗德（Lalande）把 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问题规定为“研究主体和客体在认知行为中所具有的关系”，以及“确定科学和观念有哪些作用”（第 1129 页）。这个问题架构的基本要素由两个术语即（1）“主体”和（2）“客体”，以及（3）“知识行为”组成，在后者中，前两个术语之间的关系通过（1）关于（2）的“表象”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是（4）规范性的：对（3）中包含的“表象”及其中介（1）进行评估的根据是对（2）的忠诚度，并以知识主张的辩护标准为参考。在它的现代形式
639 中，这种“知识问题”（5）补充以规律类型问题，这些规律源自（3），并主要通过（4）得以实现。

这个基本图式有无穷的变体。（1）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超个人的（überindividuell）（笛卡尔的“主体”或黑格尔的“精神”）；（2）可以是物质的或观念的（霍布斯的“身体运动”或柏拉图的 εἶδος）；（3）中的表象可以是抽象的或具象的（莱布尼茨的“观念”或洛克的“观念”）；对于（4）可以给出怀疑论的或非怀疑论的答案（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Sextus Empiricus] 或笛卡尔）；（5）中的“规律”——（3）据此产生——可以被设想为自然主义的或理性主义的（休谟的联想模型或康德的先验综合）。

认识论的问题架构也适用同一基础图式。因此，（1）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罗素或库恩 [Kuhn]）；（2）可以是主观的或自然的 / 客观的（卡尔纳普 [Carnap] 早期的“现象”基础或其后期的“物理学”基础）；（3）可以是可察觉或不可察觉的（马赫 [Mach] 或弗雷格 [Frege]）。建构性的问题（4）的类型是相同的，无论是在过程（例如归纳）还是内容（例如理论实体的存在）方面。（5）有许多变体（例如笛卡尔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培根的“白板”[*Tafeln*]、牛顿的“哲学思考的规则”[*Regulae philosophandi*] 或穆勒的“四种实验研究方法”[*Vier Methoden der experimentellen Untersuchung*]）。

2. 由于马克思自己的知识哲学资料零散且不完整，而且往往只是间接的，因此，首先要从认识论问题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2.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不难想到，可以根据上述图式来探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份“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Engels，*LF*，MEW 21，第 264 页）。清楚的是，这里至少可以识别出相应的特征（1）—（4）：传统唯物主义的特征是通过如下四点来刻画的，即（1）它的认识主体（“单个人”，*ThF* 9），（2）它的“对象”（*ThF* 1），（3）将前者成功地把握为后者的知识的方式（“直观”/“思想客体”，*ThF* 1），以及（4）应付一般性规范性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ThF* 2）。唯心主义相应的一般特征也得以确定。此外，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拒绝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
640 主义，这从他提出了一种替代观点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作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或**“感性的人的”**（*sinnlich menschliche*）活动、实践”被引入（*ThF* 1）。

但是，为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对象直观”是错的？因为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个问题只考虑到了那个被提出的问题，那个实际上作为答案出现的问题，即如下评论：（4）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否则就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ThF* 2）。这个主题没有再被进一步谈论。

马克思只是对老问题（4）给出了**替代性的**答案（因此，老问题本质上依然存在于决定性地构成它的问题架构中），还是说他从根本上拒绝了（4）并以这样的方式贡献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架构**（为的是处理与知识有关的疑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在阅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是根据更早的著作还是后来的著作；也取决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征是无缝连续的还是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断裂”。第一个立场导致了一种“预成论的”（präformationistischen）的观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更早的著作中已“预先形成”了），第二个立场导致了目的论式的解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后来著作的“胚芽”）。如果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视为过渡工作，则可以避免以上选择，这也将有助于确定这一文本中难以消解的不清晰之处的地位。

马克思没有详细或系统地处理过这些问题。然而，对于这些问题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的著作中，许多段落具有直接的、无可争议的意义。在概览了可能最重要的段落之后，（传统）认识论有何缺陷这一问题就可以被重新提出并尝试给予解答。

2.2《德意志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生产”的概念出现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

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MEW 3，第 26 页）因此，应该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隐含的认知术语放在“生产”的语境中，而不再是在“实践”的语境中，后者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在马克思后来的作品中只重新出现在边缘位置），即使在这一转变中，“物质活动”仍然保留着它的痕迹。

随后的段落中说到，这些“观念”
641 等是在生产及其社会和政治框架中自发形成的，它们通常是不真实的。其中一个方面是，“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倒立”地呈现着“存在”/“生活”和“意识”之间的真实关系，这一关系最终是由脑力劳动和手工劳动的分工来解释的（同上）。这就是要进行“经验的观察”，即“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地“揭示”、“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事实，为的是表明，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活动着的”（第 25—26 页）。但是，这里既没有说也没有暗示，这种理解本身也包括思想的“生产过程”。

2.3《〈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此，时间顺序被打乱，以显示上文立场与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立场之间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社会革命”时代，“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正在改变，他还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MEW 13，第 9 页）

这取决于两种对待“变革”的途径。一方面，存在产生“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事实的东西，简言之：科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与此相应的显然是对“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内容的指涉。另一方面，存在“意识形态的形式”。与科学的形式不同，它们的特征是本质上的**实践意义**（这里首次包括了艺术），因此，它们不应被视为缺乏对科学的指涉，而应属于不同**范畴**。

2.4《〈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方法》（*Die Method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的一节里有马克思关于该主题的最广泛讨论。最重要的段落（MEW 13，第 631 页及以下）由以下几对对立构成。（1）全面的对立存在于如下二者之间：（1.1）“现实的前提”“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的“实在主体”，“只要这个头脑……仅仅理论的 642

（活动着）”；（1.2）关于（1.1）的知识。（2）在（1.2）中存在这组对立：（2.1）“直观”和“表象”；（2.2）“思维”和“概念”。（3）是横跨（1）和（2），在（3.1）“具体的”和（3.2）“抽象的”之间有一个一般性的对立。（3.1）是一种涉及“整体”即一个复杂总体的方式；（3.2）在两种对立的语境中使用。其中之一是在（1.1）和（1.2）之间，并引出了（3.2.1）：“抽象”涉及关于实在的知识，而后者同样作为知识。另一种对立与（3.1）相反，并导致（3.2.2）：“抽象”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它实际所属的相关总体。（上述术语源自黑格尔，参见例如 *Enz*，III，§ 445 及以下，W 10，以及 *Logic*，W 5，第 75 页；W 6，第 511、556、669 页。）

传统上，人们将（1.1）称为（1.2）的**本体论的**起点，它不受（1.2）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它被恰当地称为（3.1）。**认识论的**出发点是包含在（2.1）中的东西：在（3.2.2）的意义上，“直观”和“表象”都是“抽象的”。它们忽略了（1.1）和（1.2）之间的区别：它们既是（1.1）的（本体论上次要的）部分，也是（1.2）的手段。但是，如果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它们被规定为（3.2.2）。

如果它们是知识的起点，那么认识论的目标或所需的“结果”就是关于（1.1）的知识，即处于一种表象形式中的（1.2），这种表象形式包含着被规定为（3.1）的（2.2）。马克思将其同义地描述为“精神上的具体”“思想总体”或“思想具体”，这呈现的是对（1.1）的“再生产”或“占有”。它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认知结果是一个“过程”的“产品”，这一过程是在（2.2）的帮助下借助（2.1）的“处理”而发生的，在此，“思维”或“把握”产生了“概念”，这些概念可以用来建造“精神上的具体”。

人们注意到，上面引用的内容部分地暗示了对（1.1）另一类“占有”，它们被归为“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这些“仅仅是……理论的”行为的特征是，使“实在主体……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而另一种“占有”方式并非如此，它们在处理某物时会有 643
所改变，也就是说，它们是**实践的**占有方式。因此，理论的和实践的这两种基本占有形式之间的区别，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之间的区别有关。但是，带有真理要求的哲学属于“意识形态”，因此，这种联系不是强制性的（参见 PIT 1989，第 187 页及以下）。

2.5 在《资本论》中，讨论被固定在以下三个段落中。根据《资本论》，

（A）“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MEW 23，第 27 页）。（B）“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第 95 页；参见 *TM*，MEW 26.3，第 445、490 页）。（C）“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MEW 25，第 344、825 页）

2.5.1 首先，（在 A 中）我们在（5.1.1）“物质的”和（5.1.2）“观念的”之间进行了区分。这基本上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2.1）之中涉及的（1.1）和（1.2）之间的区别。

2.5.2 但是，（A）没有阐明“质料”与（5.1.1）之间的关系。毕竟，前者属于“研究”，而在其他地方，后者显然始于（5.2.1）生产者的“表象”或“意识”（例如，MEW 23，第 95 页）。相应地，“研究”所针对的知识需要（5.2.2）一个“对应概念”（MEW 23，第 219 页），而它“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MEW 23，第 564 页；参见上文 C 和 B）。（5.2.1）和（5.2.2）之间的区别对应于第 2.1 节中的（2.1）和（2.2）之间的区别。凭借属于（5.1.2）的适当概念，研究（如果它是成功的）允许一种“反映”（5.1.1）的叙述：这是“移入人 644
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可以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精神上的具体”。

2.5.3 此外，（5.1.1）里，（5.3.1）“生活”、“内部纽带”（A）、“内在联系”（B）、“真正的内在运动”（B 和 C）、“事物的本质”（C）和（5.3.2）“表象联系”（B）、“可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表现形式”（C）之间存在不同。传统的概念（如本质 / 表现和内部 / 外部）所表达的区别可以被视为与所讨论作品中的其他地方基本相同。“拓扑学的”模式在《资本论》第 3 卷中再次出现了，它区别了如下二者：（5.3.1a）“被遮盖核心结构”“隐藏背景”和（5.3.2a）“完成形态”“表面”“实在主体”（MEW 23，第 219 页）。（5.3.1）和（5.3.2）之间的这种对立是从哪里产生的？

首先，否定地说，这种对立的产生与有意识的主体没有任何关系。例如，

马克思写道："表现……作为思维形式……再现出来。"（MEW 23，第564页）但我们如何才能肯定地理解这种对立呢？这里给出的答案是，这种对立不是实在（*Realität*）本身的各种"秩序"之间的对立（若是这种对立，一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比另一种更加"不现实"），而是关系到解说项（*Explanans*）和待解说项（*Explanandum*）之间的不对称性。前者实际上可以与后者在空间上被分开，例如，因果链条的起点在涉及链条的末端时被赋予解释性功能的情况。就《资本论》第1卷中的天文学示例来说（MEW 23，第335页），确定的行星运动在涉及"表面的"行星运动时是"现实的"，因为前者解释了后者，但反之则不然。然而，后者在一般意义上是完全真实的：它是将光线从一个光学平面投射到另一光学平面的方式，这可以被客观地陈述，例如在电影里。但是，这两个元素不必在空间上被分开，例如，当通常所称的气体的运动被解释为一定量的分子在运动中的宏观行为时；这个解释的成功借助的是以下假设：两个描述性的表达具有共同的目标所指。例如
645 转换问题，也就是把"生产价格"处理成"价值的转化形式"（MEW 25，第173页）

2.5.4 上文已经阐明了（5.3.2）中"假象"和"表现"之间的区别。在这一情况中，马克思的术语源自黑格尔（例如，*Logik*，W 6，第17页及以下，第124页及以下）。在马克思那里，两者都与（5.3）中"现实的"相反，但彼此之间存在以下差异。

从对其现实解说项的抽象的角度来看，"假象"是待解说项。因此马克思写道，收入及其源泉的观念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是"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MEW 26.3，第445页；关于这种方式，参见Spinoza，*cognitio primi generis*[*"第一类知识"*]*mutilate [...] et sine ordine*[没有相互联系……且曲解了]世界[*Ethik*，II，Prop. 40，Schol. 2]）。

"表现"是指一种待解说项，它被理解为（a）中立的，或（b）与其解说项重叠（干扰）的。例如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比例……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这是（a）意义上的表现。但是，如果人们把这作为全部真理，就会陷入"假象"的语境："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MEW 23，第50—51页）但是，马克思后来又说："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第53页）这是（b）意义上的表现。

2.5.5 就（5.2.1）里的术语而言，马

克思不是指内在于主体当中的东西，而是指有关行为者直接实践的一般形式，它就像自然语言的句法规则一样，不是在个体主体意识中建构的，即使使用这种语言会包含那些自觉行动的人的心理过程。因而，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解释说，商品所有者早在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大致的了解之前，就已经按照某些商品交换原则行事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第88页），并且货币的形式是因商品交换的要求而不是通过有意识的发明产生的——“起初是行动”（第101页）。

646 后来他解释了资本家和工人如何通过买卖劳动力的实践产生与工资形式有关的“假象”（第17章）。马克思再次指出，关于利润形成的错误“理论观点”表达了“一个实践事实”和某些形式的“计算”（MEW 25，第179、219页）。科学是必要的，因为假象是“直接地、自发地”，对应的思维形式是“流行的”（MEW 23，第564页）。

2.5.6 至于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的”叙述，是为了建构“纯粹的情况”而使用的基本术语（参见MEW 23，第173页），即实在模型仅考虑了在现实中始终有效的一些因素，在这里，模型随着叙述的进展而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概述位于《资本论》第3卷开头：MEW 25，第33页）。这里发现的规律仅具有“趋势性的”作用，因为它们所表达的关系是“被多种情况所修正的”（第674页），这里涉及的是与利润率情况有关的最著名的例子（*K III*，第3章）。在这里，马克思处在分析—综合（“可分解的—复合的”）的方法传统中。（关于马克思的唯心化问题，参见Nowak 1980。）

3. 接受。曾经有许多不同的尝试想从马克思的零散陈述中重建一个连续无缝的学说。而这似乎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认识论。

3.1 差异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关于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观点是否统一，有不同的意见。若不是统一的，那么哪些段落和著作应被视为“正统的”（kanonisch）。例如，（a）德拉·沃尔佩（Della Volpe）学派（1973）专注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关键文本；（b）科拉科夫斯基（Kolalowski）（1967）和普雷蒂（1957）专注于《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见Márkus 1969）；（c）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巴利巴尔/马舍雷（Macherey）（1968）或雷蒙德（Raymond）（1973）主要依靠《〈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

其他差异涉及选择和解释的不同角度。例如，援引（a）康德（如早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而其他立场则受到

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例如 Banfi 1965）；（b）以实用主义（尤其是杜威）为导向；（c）以斯宾诺莎和法国认识论，特别是巴什拉（Bachelard）、卡瓦耶（Cavaillès）（1938、1960、1962）、冈圭朗（Canguilhem）（1955、1966、1968）和孔德的一部分内容（参见 Macherey 1986）和柯瓦雷（Koyré）（参见 Jorland 1981）为导向；（d）卢卡奇特别依赖黑格尔。

647

一些学者还曾尝试靠近恩格斯（Liedman 1986，尤其是第 8 章），特别是反映论。这实际上是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相关的潮流开始的，这些潮流一方面沿着“辩证唯物主义”方向发展（参见 Sandkühler 1973），另一方面也有个人的贡献（例如 Geymonat 1977；Ruben 1977）。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1934，在死后的 1974 年发表）的作品考据丰富，但获得的关注太少。葛兰西的相关工作也是如此，尽管它们根植于对贝奈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批判性分析（因此间接地源自德国的古典唯心主义）。虽然它们不像拉斐尔的著作那样系统化，但却包含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其中一些见解预见了科学哲学的新成果（参见 Rossi 1976）。

3.2 若把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观念汇聚在一起，则至少应该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生产过程的结果。基本观念是，以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生产的分析为榜样，系统地建立起科学认识，并首先将其视为劳动过程。

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称“概念”是对“直观和表象”进行“加工”的“过程”的结果（MEW 13，第 631 页及以下），并在《资本论》中将研究称为“劳动”（MEW 23，第 27 页）。这至少在言语上与他在使用价值生产中所说的“对象……加工”有关（MEW 23，第 195 页；参见 Haug 1984，第 36—39 页）。他甚至把科学说成是“一般劳动”（MEW 25，第 114 页），尽管这个概念似乎很难被阐述（参见 Haug 1994）。马克思还屡次谈到“脑力劳动”（MEW 26.1，第 257 页），甚至曾提到“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第 329 页）。这似乎也是合理的，因为他将物质生产从开始（《德意志意识形态》）到结束（《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都放在了他对知识思考的中心位置。

这种解释的缘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路易·阿尔都塞（参见 FM，第 124—137 页）。然而，早在 1934 年，“加工”对马克斯·拉斐尔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布莱希特谈到一种“真理的生产方式”（GW 20，第 189 页）和“实验性思维”（参见 Haug 1996，尤其是第 3

648

章“实践认识论”）。继阿尔都塞之后，其他人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念（Suchting 1986，Baltas 1993，Stachel 1974）。

4. **理论劳动过程**。首先，必须根据经济劳动过程模型来构建“理论劳动过程”概念。通常，理论劳动过程的目标是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可以被称为“理论使用价值”）。问题可能出在如何获得特定的结果上，但这通常会预设如下问题，即如何知道某物是如此这般的，而这正是理论劳动过程的作用。此外，关于某物是如此这般的知识，会涉及“这般”是怎么样的以及一种正确的**描述**（*Beschreibung*），或者，它会涉及“这般”**为什么**是如此以及一种**解释**（*Erklärung*）（仅是出于理解或预测和/或者控制的目的）。

作为“劳动”被实现出来的“劳动力”存在于科学活动的知识和技能中（例如计算方面的或材料手工技术方面的）。

“劳动对象”首先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所涉及。它是（4.1）一个**实在的**客体（最终是自然），也是（4.2）一个“抽象的”客体，如果它包括（4.2a）“推理的”客体（例如语言表达或数学表达）和（4.2b）在这些客体的概念中专门化了的模型（例如平滑的钟摆）。物质手段（4.1）最终通过其因果特性被包含在理论劳动过程中（例如通过它们对照片板的作用），但它仅通过相关的推理形式（4.2）被包括在理论劳动过程中（例如通过将拍摄路径描述为“中子的路径”）。劳动对象可以是被“自然地”给予的或是“原始材料”。至于（4.1），它可以是自然界中发现的化学元素，也可以是专门制备的高纯度的样品。（4.2）可以包括前科学的/理论的“前概念”，例如（4.2a）根据“常识”的生物分类、（4.2b）亚里士多德型的环形球仪或已经获得的科学概念和模型。

“劳动资料”（4.4）通常包括（4.1）已经可用的或必须专门开发的“抽象”工具（例如概念、理论、逻辑数学推导 649
技巧），以及（4.2）物质工具（例如静电计）。后者具有类似于（4.1）中提到的内容，它具备双重特征。也就是说，涉及的对象最初只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当它们服从于某些描述时，它们将成为“工具”。（这也适用于“纯”逻辑和数学，在它们包含一种来自数学之内或数学之外的“解释”之前，它们只是玻璃珠游戏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工具可以被描述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K I*，第85页）。葛兰西正确地说道：“科学进步的主要‘工具’是脑力的（也是政治的）、方法论的。”（*Gef 6*，H. 11，§21）

就像在经济劳动过程的模型中一样，(4.3) 和 (4.4) 共同构成了理论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这些特征也是有效的，但不是永久的，因而，在一个理论劳动过程中找到的问题解决方案在另一理论劳动过程中则可能属于劳动资料，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我们可以找到例子。马克思的问题 (a) 是剩余价值的起源，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 (*K I*, Kap. 4.2)；(b) 劳动对象是 (ba) 现有资本主义经济和 (bb) 由其代理人自发形成的思想，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c) 它的劳动资料包括后者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较早的阶级斗争观点 (参见 *Br* an Weydemeyer v. 5.3.1852, MEW 28, 第 507—508 页)，以及使马克思在某些条件下形成了“生产方式”概念的社会主义著作。这使得商品之间交换关系的定量特征问题和形式问题得以建立 (MEW 28, 第 95 页, 注释 32)，并可以区分“劳动”和“劳动力”(*K I*, Kap. 4.3)。恩格斯 (MEW 24, 第 21 页及以下) 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拉瓦锡对燃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了比较 (参见 Althusser *DKL*, 第 20 页及以下)。

5. 理论生产方式。与经济劳动过程一样，理论劳动过程也预设了其元素间的组合，这不仅取决于它们固有的特征 (例如，实验必须以一定顺序进行)，还 650
取决于界定了对理论劳动过程元素之控制的生产关系，它们使其构成了生产力。(例如，一个实验室通常有一个主管，该主管最终控制理论劳动过程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物质和人力资源。) 根据上述模型，这就是**理论生产过程**。

理论劳动过程可以以这种方式在理论生产过程中更具体地被规定。理论劳动过程是一个过程的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其元素会被分配、交换、流通 (例如通过复制和再制造) 和消费 (例如一个特殊生产过程的结果可以是另一生产过程的原料)。这一总体可以被称为“理论生产方式”(a)。

在消费的最后阶段，理论生产方式不仅包括生产，还包括理论生产力的再生产。不过，理论生产的生产关系也必须被再生产。这种情况的发生方式可以是“政治的”，例如专业协会对“科学生活”的规制，其通常包括制裁 (例如反对科学诈骗)；也可以是“意识形态的”(例如制定出于自身意愿的争取真理的准则；参见 Althusser 1985)。根据生产和再生产的这种分化了的统一，可以谈论理论生产方式 (b)。

6. 经济生产方式和理论生产方式的联结。理论生产方式始终嵌入在经济生

产方式中；从因果角度来说，前者的实例始终以后者的实例为前提（尽管反之并非如此）。这意味着，经济生产方式会在每个层面上（同样在所有层面上）都过度决定理论生产方式。因此，它只是“相对自治”的。下面将展示这种复杂情况的几个方面。

经济生产方式影响：（a）对问题的选择，而这一选择确定了理论劳动过程的目标（例如通过一些需求的影响：近代初期日益增长的贸易对天文学革命的需求，军事上对现代基础物理学的需求，意识形态上有抱负的资产阶级在近代之初对构建非等级主义的宇宙学的意识形态需求，参见 Lefèvre，1978）；（b）提供受过适当训练和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
651 劳动力；（c）提供理论劳动过程的大部分对象，无论是物质性的（例如用于基础物理学实验的可裂变材料）还是推理性的（例如商业风险的计算技术和机会博弈是概率理论的材料；参见 Raymond 1975）；（d）提供大部分物质工具设备，从物质设备（例如近代初期的机械或今天的电子数据处理装置）直至理解科学对象时所用模型的图样（例如时钟）。

生产方式影响着理论生产方式（a）。（1）前者的生产关系也规定了理论生产关系（例如，类似于伽利略 [Galilei] 或牛顿甚至赫兹 [Hertz] 那样的、本质上是属于个人的研究安排，也都有大型合作公司，如现代大型公司中的研发部门所呈现的那样）。（2）生产方式（a）影响着刻画了理论生产过程之特征的交换模型 / 分配模型 / 流通模型和消费模型（例如可参见，在现代科学之初，相对个人的与简单的、相对自由的传播形式，具有大量印刷的和电子的传输手段，包括企业研究和军事研究中的“保密级别”）。

生产方式（b）影响理论生产方式（b）。（1）无论是直接地（例如，瓦维洛夫 [Wawilow] 和其他苏联基因工程师的情况）还是间接地（例如，作为违反合同的结果）实施暴力，对生产方式（b）的制裁都会影响理论生产方式（b）。例如，政治压力会影响研究资料的分配（如关于和平的还是军事的应用原子能的工作）。（2）生产方式（b）的意识形态特征会影响所研究过程的种类（例如，高度可预测的线性系统还是高度不可预测的非线性系统）、理论模型的选择（例如，生命科学中的目的论模型还是因果模型）、动机（例如，寻找神圣行动的痕迹还是为了自己而寻找真理）。

当然，理论生产方式（b）也可以影响生产方式（b）。例如，知识的生产水平或多或少地影响着物质生产的水平（如近代开端与现代），而科学的进步通常通过偏爱某些群体而使其他群体处于

不利地位，从而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倾向（参见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的影响）。

7. 关于一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 这里概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什么意义上取代了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架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对世界的每种认知倾向都发生在人们与这个世界的实践关系中（特别参见 *DI*，*Randglossen*）。最终，所有这些关系都根植于或指向了使用价值的生产，并且，一旦劳动“摆脱了……最初的本能形式”（*K I*，第 193 页），它们就是被各种类型的工具（手段）所中介的。即使是最基本的生产形式，也是以一些在先前交互中获得的知识（例如，有关生产资料的某些属性的知识）为前提的。这些知识不必被明确地阐释，它可以“像知识”，而不一定“就是知识”，并且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有目的的，是通过反复试验而不是有针对性的研究获得的。总而言之，这种生产首先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作为这些行为的副产品而产生的任何新知识，相对于它们来说都是偶然的，或者，若是有意识地寻求，其目的和范围也将会受到限制。

652

出于各种原因（根据这些原因，使用价值生产的认知需求并非最不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一种生产形式，它之所以与不同于使用价值的生产，是因为它首先指向的是知识的产生。这需要具有概念—理论性工具以及物质工具的、更高水平的装备。这种类型的生产参与进前者及其预设的所有条件（包括感知力、能力、对象及其属性的基本分类等）当中。这种明显“解决问题的”生产并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尽管自然科学是从事这种生产的范例。实际上，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构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装置，该装置是专门为此目的构想的，并且通常由内部理论关系和物质—工具操作的组合构成。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领域应该被规定为第二种生产形式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涉及知识本身。它独立于任何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并且没有嵌入其中。因为这种（认识论）完全被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心理科学所取代，这种科学主要致力于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关的那种生产类型中的行动者的心理生活的起源和特性，这种生活自然是基于社会关系的，并且，就其最一般的特征而言，它是以社会关系和生产作为中介的（Holzkamp 1983）。

653

8.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传统认识论。 如此构想的认识论程序与传统认识论程序的逐点比较可以促进对两者的阐明。

8.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不是

主体—客体对子（传统图式中的第1点和第2点），这一对子的两个术语在涉及如下情境时就已被预先建构了：前者（“主体”）努力实现对后者的认识关系：应当说，这一基础是一种实践关系，其中可以区分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但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些要素是由与它们有关的关系的特征构成的。马克思关于经济生产的说法也适用于知识的生产：“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Einl 57*，MEW 13，第624页）恩格斯也同样说过：“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DN*，MEW 20，第498页）

当然，与通常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一样，实在客体**本身**也不是由认知生产过程建构的。以这种方式建构的，是作为**认知占有对象**的实在客体。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主体”是被建构者，而不是建构者。它的功能只是理论劳动资料的代理人，尽管通过它的这种功能方式预设了（并在此过程中发展了）自然的主观个体能力。

8.2 主观表象（传统图式中的第3点），无论是以心理的方式还是以物化—对象化的方式去领会，都会被用于执行理论内部和理论外部程序的（难以全面专门化的）主体间规则所取代（例如，关于形成与重塑符号及行为方式的规则，这些规则应保证与现实相关）。这些规则不具有个体心理学的性质，尽管它们在使用时也参与了这类过程（在这方面，它们可与自然语言的规则相提并论）。这里的区别对应于马克思在商品的物质“使用对象性”与其“社会的……价值对象性”之间所做的区别（MEW 23，第87页）。 654

8.3 对于完全一般的、**先天地**可专门化的、涉及主体表象之于客体的适当性的评价标准（传统图式中的第4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没有提及，这只是因为这些原则的前提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标准，它**内在地**出现在历史—理论地规定了的对世界的实践—认知的占有过程中。因此，评价取决于环境，它既是“历时的”（取决于相关科学），也是“共时的”（取决于知识水平）。

8.4 恰恰因此不能谈及那些先天可规定的“规律”，一个主体根据这些“规律”恰当地给出客体的表象（传统图式中的第5点）。就像没有“生产一般”一样——尽管有界定了“特殊生产

形式”的“生产的一般规定”（*Einl 57*，MEW 13，第 617 页）——这里概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寻求的，是界定对世界的认知性占有过程中最一般的元素和关系，不过特定知识元素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也是特定的。

8.5 由此可见，这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处理的不是单一类别的“科学”，而只是由各个历史阶段所规定的“科学”。按照这种观点，也不能有统一的科学方法。葛兰西明确表示：“每种研究都有它特定的方法并建立了其特定的科
655 学，方法是随着这个特定的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与完善而发展与完善的，并与它们形成一个整体。若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应用一种已选好的方法来推进一项特定的研究，只因为这种方法在另一项使用它创建的研究中产生了良好的结果，这就是与科学无关的奇怪幻觉。”（*Gef* 6，H. 11，§15，第 1401 页）

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史并不是实例合集（这些实例用于阐明一种独立于它而建构起来的认识论），而是认识论反思的主要对象。不过，通过研究历史地规定了的科学话语形式而获得的、从历史角度来考虑的认识论原则，常常作为不断重写科学史的启示。

最终，这种观点至少在原则上解决了科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内部主义”和“外部主义”方法之争。这是因为理论劳动过程确保了与客观性的关系，然而，它连续嵌入理论生产方式和经济的生产方式这一点表明，这种理论劳动过程的推理结果的非理论决定因素是有其一席之地的。

9.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一个非常不发达的领域。部分地来说，根本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缺乏普遍被接受的规划可能反而会带来创新，而非停滞不前。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至少都要遵循以下主要方向。

9.1 发展更清晰的基本概念和论点是根本。马克思主义科学史将是第一个从中受益的。这里已经可用的工作包括巴拉卡 / 罗西（Baracca/Rossi 1976）、齐科蒂等（Ciccotti 等 1976）、菲尚 / 佩舍（Fichant/Pêcheux 1977）、吉莫纳特（Geymonat 1985）、耶格尔（Jäger 1985）、雷蒙德（Raymond 1975a）。

9.2 对于诸如澄清概念（等问题）来说，某些重要的知识分支的认识论需要包含历史研究。在这方面，逻辑和数学领域（例如，Badiou 1970；Damerow/Lefèvre 1981；Houzel 等 1976；Leiser 1978；Raymond 1973，1977；Renou 1978；Schimid 1978）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在非“形式”科学领域同样如此（例如，Baracca 等 1979；Bernal 1954；Freudenthal 1982，1988；Guenancia 1976；Geymonat 656

1970—1977；Lefèvre 1984；Wolff 1978；Zilsel 1976）。

9.3 第三条路径批判地占有了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计划中的工作，这些研究计划在许多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融合在一起。在法国认识论的某些思潮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巴什拉、冈圭朗和卡瓦耶（参见 Fichant 1975），还有巴里巴尔（1994）、勒古（Lecourt）（1969，1972，1974）、马舍雷（1964，1986）、巴里巴尔与他人合作的不同著述（1993）。

同样，这里有大量的工作从行动、实践或生产的中心角度来看待认识论的问题。从较早的文献来看，这包括实用主义的部分内容（尤其是皮尔斯[Peirce]和杜威）、丁格勒（Dingler）及受其影响的一些工作（例如，V. Greiff 1976；Holzkamp 1968）、沃森（Watson 1938）、维特根斯坦（参见 Rubinstein 1981）等。在其之后还有图尔明（Toulmin 1953）。最近，在数学领域有德桑蒂（Desanti 1968，1975）和基切尔（Kitcher 1984）的工作，在自然科学领域有莱文兹（Ravetz 1971）的工作，以及最近的实验认识论的发展（参见 Hacking 1983 和 Gooding 1990）。

9.4 有一些同隐含的或明确的认识论取向进行论战的争辩，它们部分地与其他方面有重合之处，且这些争辩仅具有消极意义。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方向的历史性工作，例如康里（Conry）（1983）。今天意识形态斗争的典范是批判心理学对主流心理学方法的批评工作（例如，Holzkamp 1983）、社会科学的多亚尔/哈里斯（Doyal/Harris）（1986）和海因兹（Hindess）（1977）以及语言学里佩舍（Pêcheux）（1975）的工作。

一般来说，这里值得记住的是布莱希特的格言："与唯心主义相反，唯物主义必须总是告诉你它产生了什么，但是唯心主义则必须探寻它来自什么。"（GW 20，第 144 页）

参考文献：

E. Agazzi, F. Minazzi, L. Geymonat, *Filosofia, scienza e verità*, Mailand 1989; L. Althusser,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1967), Berlin/W 1985; G. Bachelard, *Epistemologie. Ausgewählte Texte*, hgg. v. D. Lecourt,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4; A. Badiou, *Le concept de modèle*, Paris 1970; E. Balibar, *Lieux et noms de la vérité*, Paris 1994; ders. u. P. Macherey, »Epistémologie«,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1968, Bd. 6, 370–73; ders. u. a. (Hg.), *Georges Canguilhem. Philosophe, historien des sciences*, Paris 1993; A. Baltas, »Physics as a mode of Production«, in: *Science in Context*, 6.

Jg., 1993, 569–616; F. Banfi, *L'uomo copernicano*, Mailand 1965; A. Baracca, A. Rossi, *Marxismo e scienze naturali*, Bari 1976; ers., S. Ruffo, A. Russo, *Scienza e industria 1848–1915*, Bari 1979; J. D.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4 Bde., London 1954 (*Sozial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Reinbek ²1978); G. Canguilhem, *La formation du concept de réflex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 Paris 1955; *Das Normale und das Pathologische* (1966), München 1974; ders., *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aris 1968; J. Cavaillès, *Méthode axiomatique et formalisme*, Paris 1938; ders., *Sur la logique et la théorie de la science*, Paris 1960; ders., *Philosophie mathématique*, Paris 1962; G. Ciccott u. a., *L'Ape e l'architetto. Paradigmi scientifici e materialismo storico*, Mailand 1976; Y. Conry (Hg.), *De Darwin au darwinisme: science et idéologie*, Paris 1983; P. Damerow, W. Lefèvre (Hg.), *Rechenstein, Experiment, Sprache*, Stuttgart 1981; G. Della Volpe, *Für eine materialistische Methodologie*, Berlin/W 1973; J. T. Desanti, *Les idéalités mathématiques*, Paris 1968; ders., *La philosophie silencieuse ou critique des philosophies de la science*, Paris 1975; L. Doyal, R. Harris, *Empiricism, Explanation und Rationality*, London 1986; J. F. Ferrier, *Institute of Metaphysic*, Edinburgh 1856; M. Fichant, »Die Epistemologie in Frankreich«, in: F. Châtelet (Hg.),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d. 8,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5; ders., M. Pêcheux, *Überlegungen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969), Frankfurt/M 1977; G. Freudenthal, *Atom und Individuum im Zeitalter Newtons*, Frankfurt/M 1982; ders., »Towards a Social History of Newtonian Mechanics. Boris Hessen and H. Grossman revisited«, in: I. Hronszky u. a. (Hg.),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ized*, Dordrecht 1988, 193–211; L. Geymonat, *Storia delpensiero filosofico e scientifico*, 7 Bde., Mailand 1970–76; ders., *Scienza e realismo*, Mailand 1977; ders., *Scienza e storia*, Verona 1985; D. Gooding, *Experiment u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Dordrecht 1990; B. v. Greiff, *Gesellschaftsform und Erkenntnisform*, Frankfurt/M-New York 1976; P. Guenancia, *Du vide à Dieu. Essai sur la physique de Pascal*, Paris 1976; I. Hacking, *The Emergence of Probability*, Cambridge 1975; *Representing u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1983; W. F. Haug,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sstsein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Hg.),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Berlin/W 1984, 9–95; ders., »allgemeine Arbeit«, HKWM 1, 1994, 126–42; ders., *Philosophieren*

57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B. Hindess, *Philosophy und method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assocks 1977; K. Holzkamp, *Wissenschaft als Handlung*, Berlin/W-New York 1968; ders.,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C. Houzel u. a., *Philosophie et calcul de l'infini*, Paris 1976; M. Jäger, *Die Method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Revolution*, Berlin/W 1985; G. Jorland, *La 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Paris 1981; P. Kitcher, *The Nature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New York 1984; L. Kolakowskil, »Karl Marx und die klassische Definition der Wahrheit«, in: ders., *Traktat über die Sterblichkeit der Vernunft*, München 1967; M. H. Krieger, *Doing Physics*, Bloomington 1992; D. Lecourt, *L'épistémologie historique de Gaston Bachelard*, Paris 1969; ders., *Und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ders., *Bachelard ou le jour et la nuit*, Paris 1974; ders., *Kritik der Wissenschaftstheorie. Marxismus und Epistémologie*, Berlin/W 1975 (*Pour une critique de l'épistémologie*, Paris 1972); W. Lefèvre, *Naturtheorie und Produktionsweise*, Darmstadt-Neuwied 1978; ders., *Die Entstehung der biologischen Evolutionstheorie*,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84; E. Leiser, *Widerspiegelungscharakter von Logik und Mathematik*, Frankfurt/M 1978; S.-E. Liedman, *Das Spiel der Gegensätze. Friedrich Engels' Philosophie und die Wissenschaften des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New York 1986; P. Macherey, »La philosophie de la science de Georges Canguilhem«, in: *La Pensée*, 113, 1964, 50–74; ders., *Comte*, Paris 1986; G. Márkus, »Über 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Ansichten des jungen Marx«, in: A. Schmidt (H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18–72; É. Meyerson, *Identité et Réalité*, Paris 1908; L. Nowak, *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 Dordrecht 1980; M. Pêcheux, *Les vérités de La Palice*, Paris 1975; PIT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1989), Berlin/W-Hamburg ^{3}1989; G. Preti, *Praxis ed empirismo*, Torino 1957; M. Raphael, *Theorie des geistigen Schaffens auf marxistischer Grundlage* (1934), Frankfurt/M 1974; J. R. Ravetz, *Scientific Knowledge und its Social Problems*, Oxford 1971; P. Raymond, *Le passage au matérialisme*, Paris 1973; ders., *De la combinatoire aux probabilités*, Paris 1975; ders., *L'Histoire et les sciences*, Paris 1975 (a); ders., *Matérialisme dialectique et la logique*, Paris 1977; X. Renou, *L'Infini aux limites du calcul (Anaximandre—Platon—Galilée)*, Paris 1978; P. Rossi,

658

»Antonio Gramsci sulla scienza moderna«, in: *Critica marxistica*, 14. Jg., 1976, 41–57; D.-H. Ruben, *Marxism und Materialism*, Sussex 1977; D. Rubenstein, *Marx and Wittgenstein*, London 1981; H. J. Sandkühler (Hg.), *Marx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Bad Cannstatt 1973; A.-F. Schmid, *Une philosophie du savant. Henri Poincaré et la logique mathématique*, Paris 1978; J. Stachel, »A note on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R. S. Cohen u. a. (Hg.),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5, 1974, 417–33; W. Suchting, *Marx and Philosophy*, London 1986; S. E. Toulm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ndon 1953; W. Watson, *Understanding Physics*, Cambridge 1938; M. Wolff, *Geschichte der Impetustheorie*, Frankfurt/M 1978; E. Zilsel, *Die sozialen Ursprünge der neuzeitlichen 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78.

瓦尔·A. 聚希廷 撰
克劳斯·弗里克（KF）、托马斯·劳格施廷 译为德文
李牧今 译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llgemeine Arbeit, Althusser-Schule, Analyse/Synthese, Aneignung,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Bewusstsein, Camera obscura, Darstellung, Definition, Della-Volpe-Schule, Denkformen, Diskursanalyse, Ebene, Element/Elementarform, Empirie/Theorie,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 Falsifikationismus, Forschung/Darstellung, innen/außen, innerer Zusammenhang, Kernstruktur, Kritische Psychologie, Leitfaden, Methode, Oberfläche, Problematik, Produktionsweise, Realabstraktion/Formalabstraktion, Rekonstruktion, Repräsentation, Schein, Subjekt/Objekt, Theorie, Transformationsproblem, Überdeterminierung, Wahrheit, Wesen/Erscheinung, Widerspiegelung,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stheorie

时代（Epoche） 659

A: ḥiqba.
E: epoch.
F: époque.
R: epocha (эпоча).
S: época.

时代，或者说古希腊语的ἐποχή（来自 ἐπ-ἔχω），首先意味着终止、停顿、中断（按波利比乌斯 [Polybius] 的用法，指战争的中断）、抑制（按盖伦 [Galen]

的用法，指抑制精液射出）或停止支付（或按普鲁塔克［Plutarch］的用法，指日食或月食期间光照的停止）；这个词在托勒密（Ptolemäus）的天文学中意味着（用经纬度）定位，最后按普鲁塔克的用法，意味着星象图上群星彼此的位置关系（ἐποχὴ ἀστέρων）构成的“局面”（Kon-stellation）；这个词在迈特罗多鲁斯（Metrodoros）和克律西波斯（Chrysipp）的哲学中，意味着在方法上抑制或悬置判断（Liddell-Scott，第 677 页）。（胡塞尔［Husserl］后来借用这个术语悬置判断的意义，用来指对特定意识内容是否符合客观实在性这个问题的悬置或对这个问题加括号。）Epoche 长期以来被视作怀疑论者的“生造词”（Benseler; Gemoll; Hossenfelder in HWPh 2，第 594 页），但“ἐπέχειν 在古代语言中有‘拒绝草率地表达意见’和‘自我抑制’的含义”，见于希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等人的用法（Görler 1994，第 818 页）。抑制意为中断，比如阿尔克西拉乌斯（Arkesilaos）将这个词与“拳击手的防守策略”以及“驭手勒停竞赛马车”相提并论（第 855 页）。18 世纪的启蒙与革命将这个术语移用到历史上，并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历史的分化与发展随着时间进程不断前进又受到时间进程的决定，在历史的分化与发展中，事物或事件的状况一个接着一个出现。”（Riedel 1972，第 597 页）

当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开始使用对历史分期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方法时，仍通行着诸多不同的“时代”概念——循环的时代、“人类时代”、基督教的救赎时代、资产阶级的进步时代。他没有专门在理论上阐明这个概念，但在他看来可以理所当然地有效使用这个概念。他将时代变更回溯到生产方式中的结构性变化，在《资本论》第 1 卷中，他有时将主导因素归结为生产关系，有时归结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MEW 23，第 76 页）生产力：“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第 194—195 页）时代概念不能还原为“历史哲学”，但是两个主题紧密地，也许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在时代概念本身内部就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紧张关系：时刻或瞬间的观念与时期或连续体的观念相对立（参见 Riedel 1972，第 596 页）。

660

结构主义在 1965 年之后的影响，使人通过**共时性**（*Synchronie*）（一个主宰整个时期的体系）与**历时性**（*Diachronie*）（在时间进程中不同体系的变更）两个范畴重新建构了上述对立。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阿尔都塞学派对这一新问题

的处理本身就不无问题。一般来说，古代的“时代”概念自身已包含的张力隐秘地残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理论问题里。通常更为人所接受的时代观念是一个内部同质的时期，这个观念本身又受到微妙的质疑，因为时代也可以标志一种断裂。因而在时间上展开的一个时代可以理解成纯粹的过渡阶段。

另一组张力——（已经包含在基础—上层建筑的划分之中的）阶级、意识形态的语言与经济生产的语言相互转换——导致马克思理论内部历史分期的含混。因而一般而言的资产阶级时代这一观念——通过繁荣或者衰落的市民阶级的阶级文化来定义（更不用说还有“中产阶级”）——和各种资本主义时代的概念，无论是民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还是“晚期资本主义”都不完全一致。因此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建议，将这类描述性的语言细分成三个层面，即设定第三个层面（区别于前两个以阶级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单纯的**事件**或**事件性**（*eventfulness*）的层面：政治形势的每日变更，特别是革命的历史书写，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此的呈现。很明显，这三个层面分别有自己的时间性，有自己的节奏、频率和速度。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不同（或长或短）**时段**（*Dauer*，*durées*）的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特殊意义。

最后要注意黑格尔的现实性概念：他设定当下之中有一种“时代性”（Epochalität），其中的主体突然以新的方式受到这样一种感觉的推动：与变革的、实践的历史进程结成一种新的、更主动的关系。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有助于用戏剧呈现这种经验——人类创造性的感觉与历史的普遍开放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变体。这种现实感在马克思主义中曾一般表述为：生活在一个革命年代的意识（20世纪20年代早期，“二战”之后最初的几年，20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

1. 马克思主义时代划分的哲学原创性在于，将时代概念与生产方式概念联系起来（由马克思从苏格兰启蒙，尤其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学说中发展而来）。但这绝不是时代问题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唯一领域。因此，更恰当的做法似乎是在那些问题交叉的地方考察一系列的参数——在这些地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着时代问题的不同方面或特征——而不是试图推导出某个唯一的、连贯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作为最终概念比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其他时代概念或前马克思主义的相应概念都更完美。

1.1 马克思关于时代的许多设想保留了所有过去范式的标志，因而“人类时代”的生物学观念危险地用生机论强

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以发展为导向的形式。甚至马克思本人，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著名的、未经铺垫的结尾也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MEW 42，第 45 页）实际上，马克思这里开始触及艺术时代与社会经济时代的关系这一更复杂的问题。（见下文）

将各个时代和生产方式解读为或高或低的发展水平（结合对或高或低"生物学"成熟程度的想象），是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做法，近年来又得到与此很不一样的"现代化"发展范式的强化。然而"人类时代"范式同时呈现的，是一
662 种关于退化和衰败的阴暗想象：高龄、衰朽和死亡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有时会认可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更健康的、现实主义的。于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口号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解体的强烈预警，而马克思早已频繁提出的告诫，即革命斗争的结局可能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Manifest*，MEW 4，第 462 页），至少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到来的看法绝不总是包含"必然"的观念（参见 Lenin，LW 21，第 64 页）。法西斯主义的经验明显加深了这种现实主义，而反乌托邦文学连同更古老的乌托邦文学的巨大成功，证明了当时人的幻想中鲜活的末日图景。但这些经验也可能导向对于重建的轻率希望，这种希望把"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视为从法西斯主义或反乌托邦的毁灭中复活，换言之，一种失败之失败，类似于否定之否定，或者甚至说，从衰老和死亡中重焕青春——这又把"人类时代"范式变成了循环范式。

如果将循环理解为螺旋上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就同样被纳入了这个范畴：部落社会或原始共产主义中出现异化社会，此后一个生产方式先进的社会克服了这种异化，这个社会最终"在更高阶段""重现"非异化的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这可以被视作一个非常松散的三段式模式。也可以认为循环过程会停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死胡同里，更高生产力的缺席导致这类社会形态倒退回起点，必须从原始状态重新出发。

毫无疑问，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基督教发明了（现代的）历史性；也有理由认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范式深受基督教的影响——除非这种观点攻击马克思主义，指责它有所谓宗教的、观念论的或先验的背景或起源。因为按同 663
样的道理可以指出，特定的宗教的和观念论的传统已经预见到真正唯物主义传统的出现。这种情况下无可争辩的是，马克思主义同样希望提出一幅拯救图景，

尽管是此世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拯救图景。严格意义的拯救时代是否还能算作时代，当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伟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1）有一个典型的副标题：安息的时代（*An Epoch of Rest*）。

马克思主义同样明确地扬弃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这些概念主要在启蒙运动中由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Esquisse d'un tableau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1793—1794），特别是由杜尔哥阐发。因此马克思主义针对线性进步或者说连续展开的进步等资产阶级观念，在着重强调（仅仅“进步”话语及其符码化意涵就已经是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和同样强烈的怀疑之间摇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时代的顺序、方向和运动——的任何观点都必然是次生的或者说反思的观点，因为它在能够提出独立的、新的或者说原创的构想之前，总是必须回应已然存在的资产阶级的进步构想。这里或许也包含着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时代是否能在任何方面视为相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进步”？比如，社会主义时代是否会简化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必要的复杂问题？对此，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非常少见地持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将比资本主义不是更简单，而是更复杂（比如分配机制，而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代表制也要耗费更多精力）。在这些对立看法的背后，无疑是更古老的乌托邦想象的分裂：乡村的还是城市的；回归简单而基本的生活，还是前进到难以想象的新的（未来还有控制论的）复杂程度。

1.2 对这类时代理论的考古学不应当忽视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对阶段论历史模型的（否定的）论述，他阐发这些论述的地方不仅有对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1960）及其辩证法不留情面的批评（在《野性的思维》[*Das wilde Denken*，1962] 中），而且有他关于部落组织模式二元论与三分法对立的文章（参见《结构人类学》[*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1958]）。 664

因此，时代理论除两阶段论和三阶段论以外，还提出了四阶段模式，自然有其意义。于是“人类时代”通常分为四个阶段（童年、青少年、成熟期、老年），和金属（黄金、白银、青铜、黑铁）时代别无二致。马克思主义总结的生产方式列表删去了有问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尚未到来的社会主义，似乎同样落入了四阶段模式（原始共产主义、古代生产方式与城邦、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但四阶段论体系不具有按照内在必

然性充分区分四阶段名称的坚实的、内在的语义结构，经常容易陷于简化的扁平二元论体系：在西方关于时代的思想中，这种二元论一般并不倾向于相互交替或循环的类型的不平衡对立（比如阴和阳），而是倾向于一种与各式现代方案相对立的、彻底不对称的类型。

选择任何一种新的分析方法都会发现（例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其他“后现代”立场的“现代”批判者），每一个“现代”概念都必然产生另一个更弱的或限制性的术语作为现代概念的先决条件——这也符合德里达提出的补充（*Supplement*）结构——描述前现代的术语，提供了传统（或无论什么名称）作为必要的“他者”。这个体系与马克思谈到的各种各样生产关系共存，因为资本主义及其不断变化的生产彻底不同于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这种马克思对现代的看法中，社会主义清楚地属于资本主义一边，与所有前资本主义的或者传统的形式相对立——除了在个别时候，例如马克思给维拉·查苏利奇的论俄国村社的著名复信（MEW 19，第 384—406 页），时代处境或特殊偏爱促使理论奠基人坚持社会主义与原始共产主义之间存在更强的亲缘性。

665 现代与其“他者”的这种二元论，很有可能带来比之前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更严重的意识形态困境：毫无疑问，多数“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更爱强调所谓马克思主义感染了现代或者现代化的构想，而较少提到马克思主义与“进步思维”或与基督教历史主义的沉重的亲缘关系。

但仍需要考察在许多方面都成果最丰硕的三阶段论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回溯到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1135—1202），他关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阶段（律法与畏惧、尊严与信仰、灵与爱）的学说是千年以来时代理论的经典范式。维科（Vico）《新科学》（*Die neue Wissenschaft*）中的范式本质上仍围绕诸神、英雄与人三个时代来排列，尽管他的范式包括了第四个特征，即循环回归（ricorso）。奥古斯特·孔德受黑格尔影响的历史观与此相反，更多地在认识论上设定有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三个环节。这样的范式将启蒙对宗教和迷信的批判（无疑既是神学的又是形而上学的）与后来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联系起来，后一种批判怀疑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单纯可能性（尤其是海德格尔），却召唤某一种更早的、前形而上学的时代（例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或其他——中国或日本——文化对存在的理解）。两种“形而上学批判”都与唯物主义对一般“观念论”的不同批判有关，尽管唯物主义

的批判很少对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与唯物主义时代的到来抱有同样的怀疑（这是他们与孔德共同的信念）。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三阶段论的范式没有经常陷入二元论体系——现代（我们自己当下的世俗化、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时代）与宗教、形而上学、观念论的前现代？进一步还可以问：为什么三阶段论模式不顾前现代的内容特征，将它分成两部分？为什么孔德分出神学和形而上学时代？为什么维科如此坚决地假定有一个半神和英雄的
666 时代与纯粹诸神的时代并列？这一范式的命运要求我们探查更深的原因，为此最好首先考察黑格尔对这个问题的详细阐发。

黑格尔主要在《美学》（*Ästhetik*）中用文化和符号区分历史时代，将它们划分为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这些做法如同预演了马克思对希腊人的惊叹，有力地影响或者说变动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结构。众所周知，青年黑格尔不仅与他的同窗好友谢林、荷尔德林，而且与整个欧洲的同时代人，都共同振奋于古希腊的艺术、社会和生活；同样深刻影响了黑格尔发展的，是这样一个开始萌芽的信念：古希腊的黄金时代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了。无论是他对基督教（作为“苦恼意识”与异化的历史必然形式）的学习还是他对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等）的研究，都强化了这种信念。失落的黄金时代的范式与关于现代的新范式骤然相交，这一碰撞迫使黑格尔区分一好一坏两种前现代形式：一个正面的前现代（古希腊人的黄金时代，所谓古典时代），一个负面的前现代（非欧洲的文化与历史的象征型时代，这些文化与历史的特点是各式各样的形象中没有一个达到古希腊的抽象思维或哲学，黑格尔用“崇高”[Erhabenes]一词来概括它们，他对这个词的用法是独特且非康德意义的）。因为黑格尔关于现代（浪漫型）的理论又设定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将这个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加以扬弃，亚历山大·科耶夫（1947）将它阐释为拿破仑的“历史的终结”，然而黑格尔自己将它描述为“艺术的终结”，描述为通往一个新的、真正哲学的时代的道路，所以同样有可能将黑格尔的体系统当作一个倾向于发展出四阶段的三阶段论体系。

如果强调马克思的范式与黑格尔的相似之处（无论存在怎样充满张力的不一致），那么他的时代体系同样可以理解为三阶段论。尽管他醉心于古希腊，但他对于前现代更多考虑的是原始共产 667
主义，这个判断还得到了他的敏锐感觉的支持：奴隶制与古代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相对地，他对资本主义或现代本身的活力的突出赞扬（如在《共产党宣言》

中）迫使他认定这一社会形式及其时代与所有过去的时代之间发生了彻底的断裂，所有过去的时代都归入某个否定的前现代术语，这个术语把阶级社会、国家的存在和前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这些结合方式覆盖马克思看似线性的生产方式序列，并根据不同语境发生变化，以至于似乎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确定的、静态的时代划分。有时，这些结合方式简化为每一个个别时代的状况，在这个时代中再生产出自身的张力。相应地，资本主义三阶段论（首先是国内层面生产的古典阶段，其次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阶段，最后是跨国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人得以在更广的资本主义一般框架内以新的方式解读时代，新方式包括肯定与否定重点的转移——然而确定重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家与政治的、社会的、美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2.1 结构与个别事件、社会学与历史之间的基本张力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尤其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在多个方面都宣称自己具有上述两种维度、两种分析方式的最彻底的烙印。这一点又可以在新的（理论化程度相对不足的）时代概念和得到非常精确阐发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主义最原创也最核心的标志之一）的关系上观察到。但这两个相互对应的领域，每一个都重新出现了上述的张力。因此我们尽管可以提出一个特定的时代，但总是同时提到一种生产方式。反之，对于后者的公开讨论也总是必然暗含一个时间框架，即使只有个别时候才能详细确定这个时间框架。

生产方式学说的奠基文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小段话，它概述了当时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且 668
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四个经典形式（“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同时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此处未提名字的社会形式（MEW 13，第 9 页）。193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的出版第一次在内容上充实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说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在这唯一一次较长的讨论中详细地描述了这个对象（参见近 40 页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MEW 42，第 383—421 页）。这一社会形态从恩格斯晚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EW 21，第 25—152 页）里重新整理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消失，最后从斯大林主义和苏联的民族学中消失，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阐释带来了重大影响。首先是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无法真正地普遍化，也不能被当作分类的或类型学的范畴，因为人们注意到它两个紧密关联的特点——奴隶制，以及以这个概

念为特征的独特的古希腊文化。因此，压制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意味着只存在一种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实际上涵盖了所有前资本主义或前现代的、已形成国家权力的社会，即封建主义。这么做的结果是破坏了“生产方式”概念本身的名声，因为许多不同的社会形式都必须被理解成这个概念；尤其是历史上所有不同的“封建主义”之间极端的文化差异，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问题乏善可陈（最多把文化当作上层建筑，最坏时把它当作“附带现象”来考虑）这种偏见。封建主义问题本身的能量已经在革命运动内激发了一系列现实论争与政治论争，因为对策略的思考总是取决于要面对的权力结构的本质（参见中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学论争 [Dirlik 1978]，以及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论争）。

同时有人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什么消失这个尴尬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原成员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957 年发表了《东方专制主义》（*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669 在这本书中，他指控斯大林和列宁压制这个概念，他们很可能知道这个概念对他们自己的体系做出了多么准确的描述；同时他还假定，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已经对此有了某种特定的无意识的预感，这预感促使他们开始采取隐匿这个概念的策略。魏特夫此书至少产生了这样的作用：其他作者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君主神”和贡赋制度，是否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这个概念的重新发现至少触发了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最初是苏联的人类学，之后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莫瑞斯·郭德列支持用这个新概念代替普遍使用的封建主义。郭德列也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印加社会。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感到概念的丰富使自己摆脱了马克思最初模式的狭隘，并且开始狂野任意地发明新形态：女性主义的家庭生产方式、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游牧生产方式、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的商品生产方式等等。由于生产方式的加倍，数量问题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唯名论的做法是为每一个历史上可区分的社会形态创造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对此的唯一解答似乎又是把这些多样的形态还原为少数基本类型（按照基督教解释学的智慧，不多于四个）。这里生产方式的理论自然只遵循资产阶级的时代类型学的发展逻辑：孔多塞将三个时代的逻辑扩展到人类进步的十个不同时代，而他伟大的空想后继者傅立叶则由此开始以真正的分类狂热发明不同的时代。

2.2 可用范畴的数量限制不仅让人感觉文化在变化多样性上远超经济生产，

而且让人感觉马克思主义始终局限于一种技术决定论。

毫无疑问，马克思最欣赏的民族学作品是摩尔根（1877）的著作。摩尔根
670 信奉技术决定论，因为在他看来，新的科技发现使社会生活得以产生并发展新的时代形式。因此在他的三阶段论模式中，对金属的运用克服了“蒙昧”阶段，而紧随其后的“野蛮”阶段通过发明文字进入“文明”阶段。在不同的技术中对文字的注重，能够佐证后来的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摩尔根是亲属关系概念的发明者，因而是民族学或者说人类学的奠基人。）也有人会论证，技术决定论在较简单的或者说前现代的社会中作用更强，而且它的存在也更为明显（这种思想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决定论”本身会在现代、在资本主义中消失）。然而可以反过来这样看，技术在部落社会中也是文化，因此不像现代的技术决定论具有“还原论”作用。

马克思明确地肯定了摩尔根对科技创新和社会结构相互关系的复杂分析中亲属关系的辩证法。但在马克思（注意，他的思想比摩尔根的代表作早了约二十年）看来，技术、所谓生产力的作用和社会关系、所谓生产关系的作用，是相互平衡的；这两者又会合起来与第三个环节，即所谓上层结构相对立，它们对于上层结构而言是“现实的基础”，或者说下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论无疑使人能够把过度强调前者的马克思归入技术决定论的派别。但对后者的过度强调同样是可能的，这么做可能会使理论模型在处理劳动过程、财产关系和社会等级等问题时更有指导意义。于是海因兹和赫斯特（Hirst）在他们仍处于马克思主义阶段的著作《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Pre-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中提出了另一种思考的可能。他们坚持认为，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表述，结构（基础）只能理解为生产方式，在生产方式中，一套特定的生产力可以与一套特定的生产关系全面融合，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能作为有自身规律的、独立自为的对象加以研究，
671 然而它们结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这就是抛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不科学”范畴的原因。）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生产关系这个概念必须保卫马克思的方法免受技术决定论的指责。

有趣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经常从一类技术决定论中汲取它的唯物主义能量，“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如此。本雅明影响深远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文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布莱希特的现代主义、对发明与新机制的热情——似乎提前探讨了麦克卢汉（McLuhan）的思想，本雅明在文章中实践了某种“机械”决定论（不过这个决定论既能解读为寓言式的，也能解读为因果性的）。类似的是本雅明关于19世纪文化的著作也讨论了一系列技术“决定因子”——摄影、城市化、电气灯等等——这引导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将不同的科技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符号学结构进行探讨，如德勒兹、基特勒（Kittler）等人。

2.3 阿尔都塞主义的“革命”为生产方式的理论带来了新的可能，又似乎与后者保持着相对正统的联系。阿尔都塞主义这场运动的严格的“理论主义”以及它反对经验主义所有形式的斗争，似乎特别倾向于将生产方式的概念变为这样一种抽象模型，以至于它无法容纳任何社会学或者文化的材料。这当然意味着，必须引入普兰查斯的新模型“社会形态”（1974，第68页及以下），才能描述通过抽象的“生产方式”仅仅被过滤排除和粗糙分类的具体社会的经验实在。

同时必须更明确地处理混合的或重合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在这里，社会形态的范畴使人得以描述重叠，进一步讲，它实际上就要求人描述重叠。因为如果说“生产方式”在严格意义上应当是纯粹的、概念上自身同一的，以至于事实上它不能再与“实在”的、历史的环境保持一致，那么必须同样清楚地看到，它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在现实中出现。672 因此阿尔都塞对于偶然性的强调使人想到历史中混乱并存的一系列生产方式，这些生产方式在余波或初现等不同阶段交叠存在（沿用雷蒙德·威廉斯对于这类情况天才的重新阐释）。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类“结构主义”构想切中前人更辩证的设想，特别是恩斯特·布洛赫的“非同时性”概念，布洛赫首次用这个概念讨论纳粹时代，本雅明称，这个概念移用自他关于巴黎拱廊街的论文。

共存、不平衡发展（托洛茨基语，对此参见勒维［Löwy］的论文）和非同时性等普遍原则最终导向了更严谨的表述。在人类学中，皮埃尔-菲利普·雷（Pierre-Philippe Rey）描述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特定阶段内，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如何保存之前的生产方式，就像有一块生产方式本质不同、通过贡赋加以剥削的飞地。过渡到另一个时代的标志，就是旧的飞地式生产方式解体，通过绿色革命与农工联合企业同化为资本主义本身。

所有这些模型内在的运动，最终带来了埃蒂安·巴利巴尔的主要贡献，即过渡形式的概念。这个概念致力于化圆为方，从社会学转向历史，从结构转向

事件，换言之，一种将时间性和过渡等维度重新引入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否则生产方式就只有在顺序上是符合历史的。这种提法的危险在于，以某种方式把所有生产方式都当作过渡现象，这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完全抛弃生产方式的概念。

同时由此产生了关于马克思的“过渡”观念本身的问题，因为“过渡”对于考察特定的、受偏爱的时代具有核心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绝对重心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如多布、斯威齐和布伦纳），对此的强调导致欧洲 18 世纪这个由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实现上述过渡的时代，被赋
673 予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另一后果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的发明。佩里·安德森称它并非马克思创造的新词，而是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想象为原型，往回投射到历史上得到的东西。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的思想没有得到同样全面的理论研究，部分原因是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只有少量描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宣言”《法兰西内战》，MEW 17，第 313—365 页；列宁《国家与革命》，LW 25，第 392—507 页），而且基本针对社会与政治而非经济。然而“社会主义”一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般限定在共产主义统治的历史时期（右翼的卫道士 1989 年后没在理论上花多大功夫，就开始嘲讽地谈论“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

同时，对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进行历史分期，产生了另一个说法，即所谓“前革命时期”。这个概念实际上联系着一个革命时期，至少联系着一个觉醒的、力求变革的、至少可能汇聚成革命的新发展的时期（最后一点更应理解为节点而非相对长期的过程）。这里重新出现了时代一词最初的双重意涵：一方面“革命”联系着节点或断裂，断裂之后是一个根本不同类型的时代，另一方面可以划分出（“社会主义”意义的）前革命、后革命时期，以及同质的日常生活不断延续、没有特殊的变革在地平线上显现的时期（谈到后者时，马克思一概援引亚细亚生产方式来描述实际感受不到历史变化的王朝更迭）。这里也区分进步的时代和反动的时代，然而一般这种区分着眼于不同时代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系。

然而问题是：这样即使不基于时代的革命潜力，也是基于它的“进步性”来界定时代，是否给出了一种“历史哲学”，给出了一种和生产方式的顺序同一类型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尤为可疑的是，生产方式顺序是否本身 674
就是一种“叙事”？它在发展理论统治的时代（这里很有理由说，发展作为霸权概念不能追溯到达尔文），无疑曾变

成一种叙事。了解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自然史“辩证法”的热情，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整合到进化论中去。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常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进化论，这一指责与所谓它是神学和历史“必然性”的指责一道，已经长期影响了它在历史领域的名声。

3. 时代与生产方式的关联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在这一领域的原创性，但这一关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服从怎样的二元论，最终只是强化了这样的观点：两方面彼此处在一种无法消灭的紧张关系中，而强势的一项一般同化弱势的或从属的一项，因此最终总是重新出现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一元论。这里，纯粹经济结构（“基础”）的观念往往导致文化的、符合经验的、政治的或认识论的要素被消解掉，尽管它声称自己与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果是，除了一连串经济体系与模型的干枯骨架之外，过去的时代观念就不剩下什么内容了。阿尔都塞主义向生产方式的“回归”启发了许多关于这个题目的研究，它无论如何都明确排除经验事物（至少部分原因是经验事物与萨特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以及生活世界、异化等相近学说的联系）。阿尔都塞对文化肯定讲得不够，并且以非历史的方式处理政治和认识论的问题，把它们当作形式，取消每个情况下过往事物的有效性（例如将先前的科学颠倒成意识形态）。实际上阿尔都塞学派明确斥为意识形态与人道主义的，正是晚近资产阶级时代分期方案的基本原则，即经验的观念。历史主义的命运与时代、时代分期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主义本身就是阿尔都塞学派论战的核心。

然而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采 675
用了一种现成的时代理论，并借助政治经济学使之去人道主义化，那就错了。没有人证实更早的时代理论明确地以经验为基础（此外也不清楚，在历史主义中具有核心意义的“经验”本身这个观念当时是否已经出现）。兰克的名言，“所有时代都直通上帝”（1845，第141—142 页），具有评价研究活动的经典地位——每一个时代都值得研究。这个命题应该是在很久以后才由里格尔（Riegl）在他（反对当时关于繁荣时代与衰落时代的观念）为晚期罗马艺术正名的时候第一次详加阐述的。实际上，如果不立足于图像或审美的重新体验，就无法理解各个时代如何能够彼此比较，在这样的学说（它的强烈影响是“历史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出现之前，各个时代只能根据道德标准来评价（最宽泛地说，根据后来所谓的道德伦理“现代化”）——古老的时代比现在的更原始、更野蛮，或者说更有活力，没那么虚弱；或者用发展的概念来评价，比如

最著名的是黑格尔，他认为现代与古希腊人或非欧洲文化的关系是变革或必然抛弃的关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通过罗马法、精神的基督教异化，占有了最终建构黑格尔的“日耳曼”现代世界（或者这样说更好：他看到将要到来并当作已经建立而热烈欢呼的乌托邦社会。参见《法哲学原理》，§358）所必需的要素。

之后，在传统的时代观念与19世纪后期出现的历史主义之间，有影响的除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这门学说在第二国际兴起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外，还有新出现的不同学科。尤其当各现代文学系从古典语文学和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分析和介绍不久以前的文本就产生了紧迫的分期问题。19世纪末，艺术史也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使
676 得它的对象（原本一直是文艺复兴“思想”等传统得多的历史分期形式的核心直观材料）开始从原先生动交织的历史织体（社会史、思想、政治等等）里脱离出来；对象现在重新形成“半独立”的发展顺序，要求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分期，而且提出同样的顺序也要平移到其他“层面”上去。哲学与文化中新出现的各独立领域现在全力要求某种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比如当时狄尔泰等人所阐发的），因为艺术和哲学讨论要求人努力地移情和进行狄尔泰式的新创造，然而这些做法在政治结构的历史乃至学术史本身中的作用并不明了。

最终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念及其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能够以一定的活力重新介入讨论，因为它撼动了主流的观念论，以种种形式迫使它们认识到，在文化或哲学的形式与各种对象和物质的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意味着，马克思对这些领域“重新奠基”，依靠的是将这些领域作为学科在早期发展阶段变成半独立的。这类重新奠基的不同做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科学的相互竞争的方法。相反，哲学的作用很少成为这类批判的对象。古代哲学在希腊伊奥尼亚的出现是一个特例（参见康福德 [Cornford]、汤姆孙 [Thomson]、韦尔南 [Vernant] 的研究），因为这里更必要的是解释事件而非解释一个特定文本。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MEW 23，第73—74页）中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暗示性评论没有得到非常充分的关注；卢卡奇的作品《青年黑格尔》（*Der junge Hegel*）和《理性的毁灭》没有真正的继承者；哲学本身的社会学是一个完全未开发的领域，其中通常渗透着稍加改头换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参见 Labica 1976；Haug 1993，第175—191页）。

尽管如此，意识形态同风格、文体等概念共同提供了一个工具，使人得

以更全面地分期描述一个时代：前文
677 提到的马克思偶尔插入的批评经常受到自身框架的限制，它的框架是对个别的文本或对象、对个别的“杰作”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或去神秘化。但这样的思想——一个主导的（或者实际上“霸权的”）意识形态标志着一整个时代的特征，意识形态也包含着风格或文体作为整体的或象征性的组成部分——使人又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刻画一个特定的时代，让马克思主义呈现的图景能与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主义图景（始于布克哈特）一较高下。只有更全面的意识形态（今天包括了阿尔都塞称为不同“实践”的东西）观念，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思想跨越结构上但更是经济上的“生产方式”与不同主体性之间的鸿沟，不同的历史主义学派为了评判和享受审美活动，就要产生出这些主体性。

在普列汉诺夫等人19世纪做出一些有趣的尝试以后，萨特与卢卡奇立足具有核心意义的1848年变革，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分期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建议。在卢卡奇看来，这一年至少既代表《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也代表革命。他在相关作品（《历史小说》、《德意志文学二百年》[*Deutsche Literatur in zwei Jahrhunderten*]、《近代德国文学论稿》[*Skizze eine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deutschen Literatur*]、《理性的毁灭》）中评价文学内的形式变革与思想变革是独立、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危机的结果，这场危机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开启。萨特的作品（尤其是他研究福楼拜的巨著《家庭的白痴》[*L'idiot de la famille*]的第3卷）集中讨论了人们称为意识形态矛盾的东西。然而在他看来，矛盾根本上在于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在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产业工人阶级）出现以后所处的困境——一种根本不同于之前的贵族等级制（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首先作为反对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形成）的威胁。

这样的文学史模型似乎要求对意识形态困境与各种形式可能性做出特定的归类。在欧洲的语言空间之外，民族文 678
学史的建构（新兴资产阶级国家合法性的关键构成部分）经常与对外来（大多数是欧洲的）形式及其运用于特定后殖民环境的高度评价相重合，这时，上述文学史模型大多是更成功的。巴西人罗伯托·施瓦茨（Roberto Schwarz）论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著作，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模型来研究这些看似异常的环境下的“形式意识形态”。

不过，最新的文学史书写开始研究可变的叙事焦点、叙事焦点游移的时间尺度等问题。旧的文学史大体满足于一代又一代地记录和解读形式与思想的

那些似乎能用来解释风格、派别等概念的变化。但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形式和意识形态总是对具体的（而且矛盾的）环境的回应，环境的时间度量或时间范围本身现在也会被看作可变的——测量单位从一代人变成了周围环境的起落。文学史的对立面不再产生于个别作品，而是产生于对作品语境的更严密的定义——比如马克·昂热诺（Marc Angenot）论法语在1889年这一年之中发展的杰作。这个转变或许同时意味着，直接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取代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潮流。

重要的是，坚持“基础结构”（从“经济下层建筑”出发的）解释路径的多元性，这些可能的解释面向任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保持开放，它们无疑都始于按“生产关系”进行归类，但能够毫无障碍地应对一个时代的经济周期（从危机到繁荣以及反过来），也能应对意识形态的模式和策略的冲击。（这可能导致就连在基础或下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内，也始终存在着选择狭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是意识形态和商业周期的可能性。）

679 4. 历史书写的方法每发生一次变化，都会重新出现分期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结构主义运动对共时性的强调，它似乎产生了对新形式的需要，要求新形式能够以更适当的方式把握历时性。然而，随着上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解放战争）、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胜利，以及西欧告别马克思主义和苏联20世纪末的解体，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理论上阐明一个新的资本主义时代。

资产阶级社会学早已进行过尝试：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所有其他描述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谓“晚期资本主义”（1972）——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阶级斗争、矛盾、利润率下降等等）丧失有效性的一个时代——的提法，这里都可以作为例子。而曼德尔因《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kapitalismus*）成为第一个提出详细论证、主张资本主义出现第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模仿列宁宣告一个新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开启的姿态。曼德尔坚持强调市场扩大（以及经济在规模和结构方面的辩证变化）与技术运用之间的联系，从而能用新的方法在理论上把握资本主义的断裂和重组，并同时确定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认为原子能和通信技术是这第三发展阶段的新科技，这样一个规定使人能比之前的时代更精确地说明文化变迁，因为现时代的大众文化的影响和意义尤其依赖于新的通信技术

（当然也依赖于经济贸易）。

曼德尔的思考为将后现代作为资本主义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提供了基础。这里的关键是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从很多视角看，新的发展阶段在形式上和质上都是独创的，
680 然而却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结构的最初分析（曼德尔更进一步，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模型的一种更纯粹的变体，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与之前各时期相反，很少混杂遗留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犹豫是否接受曼德尔的第三发展阶段论——可能是因为列宁帝国主义是"最高阶段"的说法，也许还因为人们觉得党的传统政策和现代帝国主义时代具有根本的联系，而先在理论上断定了后者的消亡。类似地，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拒绝后现代这个概念，因为它承认一种新的文化活力和各种新的社会力量（所谓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而这些社会力量与阶级政治和基于产业工人运动的策略似乎不能统一。但新立场也能以列宁为依据，因为列宁坚持强调任何政治的（包括文化政治的）策略都要基于分析具体情况的绝对必要性。进入当下时代的意思，不外乎是弄懂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P. Anderson, *Die Entstehung des absolutistischen Staates*, Frankfurt/M 1979; ders., *Von der Antike zum Feudalismus. Spuren der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1978; M. Angenot, *Le cru et le faisandé. Sexe, discours social et littérature à la Belle Epoque*, Brüssel 1986; D. Bell, *Die nachindustrielle Gesellschaft*, Frankfurt/M-New York 1975; F. Braudel,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Bd. 1: *Der Alltag*, München 1985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e*, Paris 1979); J.-A.-N. de Cariat Marquis de 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s de l'esprit humain* (1793–94), Paris 1795 (dt.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Darstellung der Fortschritte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 hgg. v. W. Alff u. H. Schweppenhäuser, Frankfurt/M 1963); J.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1972 (dt. *Randgänge der Philosophie*, hgg. v. P. Engelrnann, Wien 1988); A.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1978; E. Engelberg, W. Küttler, *Formationstheorie und 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Untersuchung von Gesellschaftsformationen im Werk von Marx, Engels und Lenin*, Vaduz 1978; E. Engelberg, »Zu methodologischen Problemen der Periodisierung«, in: *Theorie, Empirie und Methode*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Gesammelte Aufsätze, hgg. v. W. Küttler u. G. Seeber, Berlin/DDR 1980; A. Ferguson, *Versuch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hgg. v. Z. Batscha u. H. Medick, Frankfurt/M 1986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 M. Godelier, *Horizon, trajets marxistes en anthropologie*, Paris 1973; ders., *Natur, Arbeit, Geschichte. Zu einer universalgeschichtlichen Theorie der Wirtschaftsformen*, Hamburg 1990; W. Görler, »Älterer Pyrrhonismus. Jüngere Akademie. Antiochos aus Askalon«, in: *Die hellenistische Philosophie*, hgg. v. H. Flashar, 2 Halbbände, Basel 1994, 717–990 (=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Die Philosophie der Antike, 4); W. F. Haug,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Berlin-Hamburg 1993; F. Jameson, *Das politische Unbewußte. Literatur als Symbol sozialen Handelns*, Reinbek 1988; A. Kojève, *Hegel. Eine Vergegenwärtigung seines Denkens. Kommentar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947), Frankfurt/M 1975; G. Labica, *Le statut marxiste de la philosophie*, Brüssel 1976; B. Latour, *Wir sind nie modern gewesen. Versuch einer symmetrischen Anthropologie*, Berlin 1995; C. Lévi-Strauss, *Das wilde Denken*, Frankfurt/M 1968 (*La Pensée sauvage*, Paris 1962); *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 (1958), Frankfurt/M 1967; M. Löwy, *Revolution ohne Grenzen. Die Theorie der permanenten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87 (engl. *The Politics of Combind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1981); G. Lukács, *Der junge Hegel. Über die Beziehungen von Dialektik und Ökonomie* (1948), W 8; der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1954), W 9; E. Mandel, *Der Spätkapitalismus. Versuch einer marxistischen Erklärung*, Frankfurt/M 1972; L. H . Morgan, *Die Urgesellschaft* (1877), Wien 1987; W. Morris, *Kunde von Nirgendwo: Eine Utopie der vollendeten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1892/93), hgg. v. G. Selle, Einl. v. W. Liebknecht, Köln 1974 (*News from Nowhere, or an Epoch of Rest, Being Some Chapters from a Utopian Romance*, London 1891; N. Poulantza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Frankfurt/M 1974; Th. v. Ranke, »Über die Epoche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1854), in: *Geschichte und Politik*, hgg. v. A. Hofmann, Berlin 1941; P.-Ph. Rey, *Colonialisme, néo-colonialisme et transition au capitalisme. L'exemple de la ›Comilog‹ au Congo-Brazzaville*, Paris 1971; ders., *Les alliances de classes. ›Sur l'articulation de mode de production‹ suivi de ›Matérialisme historique et*

681

luttes de classes‹, Paris 1976; M. Riedel, Art. »Epoche, Epochenbewusstsein«, in: HWPh, Bd. 2, 1972, 596–99; A. Riegl, *Spätrömische Kunstindustrie*, Wien 1901; J. P. Sartre,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Bd. 1: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Reinbek 1967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ome 1: *Théorie des ensembles pratiques*, Paris 1960); R. Schwarz, *Um maestre na periferia do capitalismo: Machado de Assis*, Sao Paulo 1991; G. Thomson, *The First Philosophers*, London 1955; G. Vico, *Prinzipien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Über die gemeinschaftliche Natur der Völker*, n. d. Ausgabe v. 1744 übers. v. V. Hösle und Ch. Jermann, 2 Bde., Hamburg 1990; R. Williams, *Gesellschaftstheorie als Begriffs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Kultur‹*, München 1972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1958); ders.,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New York 1961; K. A. Wittfogel,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totaler Macht* (engl. 1957), Frankfurt/M Berlin/W-Wien 1977.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撰
斯特凡·胡特（SH）、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译为德文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grobusiness, altame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lthusser-Schule, Artikulation,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Basis, Dependenztheorie, Diskursanalyse, Diskurstheorie, Dorfgemeinschaft, Einfühlung, Empirismu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682
Entzauberung, Evolution, Evolutionismus, Existenzialismus, Feudalismus, Fortschritt, Fortschritt/Rückschritt, Frankfurter Schule,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Geschichtsschreibung,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äusliche Produktionsweise, Hermeneutik, Historismus, historische Notwendigkeit, Ideologie, Klassenkämpfe, Leninismus, Literaturkritik, Literaturtheorie, Negation der Negation,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orientalische Despotie, Paradigma, Pariser Kommune, Periodisierung der Geschichte, Postindustrialismus, Postkommunismus, Postmoderne,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onsweise (antike), Phänomenologie, Reife, Revolution, Rückschritt, Semiotik, Situation, Spätkapitalismus, Strukturalismus, Text, transnationaler Kapitalismus, tributäre Produktionsweise, Tyrannei, Überbau, Übergang, Übergangsgesellschaften, Ungleichzeitigkeit, Urkommunismus, vor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Wechselwirkung

遗产（Erbe）

A: irt.

E: heritage.

F: héritage.

R: nasledstvo, nasledie (наследство, наследие).

S: herencia.

682

1. 晚年恩格斯曾提到这个概念，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将德国的工人运动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Erbin）”（MEW 21，第 307 页）。第二国际的德国理论家将这一论点加以普遍化，表面上直接援引恩格斯，然而时常深受拉萨尔的潜在影响。对于其中包含的两个问题，除了恩格斯，马克思也在谈到传统时表达过看法：批判的问题和社会接受的问题。两个问题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显现。《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一方面消除了一切“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另一方面把“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的财产”（MEW 4，第 465—466 页）。由此出现了第三个问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作为“上升阶级”的相似性。共产主义表现为“同传统的观念……最彻底的决裂”，同时又可以如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强调的那样，表现为启蒙运动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发展”（MEW 20，第 16 页）。这一矛盾性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加以解决。传统首先消极地表现为“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8，第 115 页）：一方面以“现有思想材料”（37，第 493 页）的形式，作为“巨大的保守力量”（21，第 305 页）或“巨大的阻力”（22，第 310 页）阻碍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上召唤亡灵的行动”（8，第 115 页）中表现为政治行动自我欺骗的因素。关键就在于：“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18，第 221 页）

683

2. 遗产在其后的发展中被认同为一个正面的概念。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和卢森堡肯定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的功绩之一在于，他证明了德国工人阶级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也是本国古典艺术的继承者”（Zetkin 1979，第 195 页）；他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将德国无产阶级“同古典文学……同莱辛、席勒和歌德用牢不可破的纽带联结在一起”（Luxemburg，*Briefe* 5，第 104 页）。梅林在这个方面追随他所钦佩的

拉萨尔，根据后者的历史观，无产阶级负有“天职……继承资产阶级业已丧失的精神巨人的遗产”（Korn 1907/08，第414页）。威廉·李卜克内西有一句更为影响深远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而且自“道德破产的”资产阶级“停止履行责任”以来，工人阶级就表现为文化的“承担者”——保卫者和拯救者。

遗产作为评判、筛选的范畴具有相对确定的内涵：偏爱古典，将作家或作品中的人物作为理想和战斗热情（男性气概）的代表与工人运动建立关联，视当代文学为颓废文学而加以拒斥。这些做法的理论依据是，夺取政治权力以前不可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文学。“如果正在没落的资产阶级不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艺术，那么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也就还不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Mehring，GS 11，第225页）工人阶级“只是被视作资产阶级文化的看守”（Luxemburg，引自 Wegner 1971，第44页）。伟大的艺术和以此为基础的理论，特别是康德美学，被当作古典遗产的同义语。蔡特金认为，在革命后有望来临的“文艺复兴”要“同过去和现存事物”相联系，利用“资产阶级的古典艺术”的“路标”作用：“代表文化之光的上升阶级的艺术不能接续历史上正在堕落的阶级的艺术。”（1979，第195页）

德国社民党1906—1907年党代会及其主席团所做出的决议强调，“重塑”或“重估”在“科学和艺术的最高理想的连续发展”中“没有被无产阶级简单移用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艺术价值”（引自 Wegner 1971，第34—35页）。这一要求的意义一直备受争议，例如卢森堡曾委婉地批评梅林——不仅在他写莱辛时证明有效——的做法，保护对象免遭歪曲的接受史写作，是“为无产阶级争取资产阶级所否认的使徒”的“程式”（Luxemburg，GW 1/2，第534页）；卡尔·科恩（Karl Korn）指出拉萨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歧，并质疑“遗产”这个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根据无产阶级对过去的所有权凭证，比如遗产，而是根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推论出他们的社会地位。”（Korn 1907/8，第414页）而蔡特金肯定梅林“模范地保管并增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遗产”，同时又有“批判地检验”（Zetkin 1979，第109页）的方法。 684

3.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政治传统——他所列出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是吸收“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LW 31，第308页）的“典范”（LW 31，第275页）。这一观点针对的

是无产阶级文化派。既然“无产阶级文化”是传统“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那么文化革命中的断裂就必须服从于其中的连续性。列宁的主张从革命的建设任务出发。为了在夺取政权以后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为“文明创造前提”，即“改变通常的历史顺序”（LW 33，第 466 页）。这一点尤其可与法国大革命相类比。

遗产是应该“提高”的“普遍教养和文化水平”（列宁语，引自 Zetkin 1979，第 336 页）的一部分。不同于后来奉为经典的说法（参见 Gorbunow 1974），列宁和托洛茨基、无产阶级文化派在遗产这个抽象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不管是“第一次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
685 大会的决议”还是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Literatur und Revolution*）都肯定遗产。鉴于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与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力量，托洛茨基否认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无产阶级——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无产阶级文化派则特别否认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无产阶级性质。

3.1 托洛茨基相对于列宁更为突出地批判“小资产阶级波希米亚作风的虚无主义”（1924，第 63 页），批判未来主义从“决裂”而不是从“同化”（第 74 页）开始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闭的等级美学的反抗”（第 75 页），强调文化和艺术发展的“连续性”（第 112 页）。他的论点是：“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会存在。”（第 115 页）直到世界革命以后无产阶级不再作为阶级存在，才会有“新文化”（第 114 页）：“一个个体在其发展中……要重复它所属的种的历史，部分地要重复整个动物王国的历史；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其多数刚刚步出史前生活的新阶级，也不可能不在自己身上重复艺术文化的全部历史。”（第 111 页）托洛茨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口号是“具体的学文化运动”：“让落后的群众批判地掌握已有文化的那些最必需的成分。”（第 124 页）托洛茨基用“从来都生活在（1789 年、1848 年、1871 年、1905 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传统中”（第 63 页）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对“与过去的决裂归根结底只是知识分子的茶杯里的一场风暴”的“形式上的革命创新者”（第 63 页），这就把问题归结成了不同的心理学类型。托洛茨基用无产阶级的线性进步反对知识分子和过去决裂的循环运动。“工人阶级不需要也不可能与文学传统决裂，因为它根本不曾受到过这一传统的支配。工人阶级不了解旧文学，它需要的只是熟悉旧文学，它需要的只是再去掌握普希金（Puschkin）的作品，将其吸收进来，从而超越他。”（第 63 页）

3.2 如果说托洛茨基将遗产定义为“资产阶级文化中那些永远汇入人类财产目录的因素”（第 121 页），那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定义则是“以往文化……带有普遍人性印记的一切成就”（*Kulturrevolution*，第 22 页）。托洛茨基并非像列宁那样因为这一点而反对无产阶级文
686 化派，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派为文艺生产提出了一个**具体纲领**。对于什么是与无产阶级艺术新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家如波格丹诺夫归根结底也认同对颓废派的批判。波格丹诺夫称“以最晚近、最现代的东西为榜样”是一个“错误”：“当一个社会阶级完成了它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使命，颓废就会无可避免地成为它的艺术的内容；形式与内容相适应，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学会在统治阶级勃兴和繁荣时期作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出现的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技巧”（第 42—43 页）。

4. 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艺术和文学》（*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1933 年俄文版，1937 年德文版）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过程中早期手稿的发现、各国学者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努力，30 年代初第一次提出了遗产理论。米凯莱·利夫希茨（Michail Lifschitz）“有感于古典遗产和革命的内在统一”（1967，第 15 页），从经典作家的表述中整理出“美学观点的体系”作为“他们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第 26 页）。利夫希茨、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和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并将相对而言并非列宁所特有的文艺政策格言移用为美学或诗学的规范，从而明确提出了第二国际自发形成的理论中已隐含的内容：普遍根据人道主义的观点解释对古典的偏爱；用现实主义理论论证对现代派的拒斥，现实主义理论不仅遵循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认识理论转变，而且特别反对所谓的庸俗社会学。前文所引的恩格斯和列宁的表述，被用来反对追问遗产的阶级利益，质疑这样的问题是以虚无主义对待遗产，下面的“客观”标准被定为衡量遗产的唯一标准：“过去的哲学、经济学、国家理论等等多大程度上至少相对正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它们所在时代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现实。”（Günther 1981，第 343 页）过去文学中“向绝对真理的接近、意识形态的进步性质及其由此作为遗产的用处”（同上）都被归于现实主义的征兆而被看作一回事。1934 年以后，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j Schdanow）所提出的资产 687
阶级经典作家作为“大师”所具有的连续性，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科书定义，成为艺术界的主导方法，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必须向“大师”学习：“正

如在其他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一样，无产阶级是世界文学的最优秀部分的继承人。资产阶级任由文学遗产瓦解破裂；我们对它则有义务小心谨慎地收藏、学习、批判继承并发扬光大。”（*Realismus-konzeption*，第49页）认识理论的主导方向（反映论）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在30年代就饱受诟病的文学中心主义，人道主义的模糊性使得必须不断地根据各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重新划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界线，从而导致了周期性的争论。

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归结为“保卫”（W 10，第213页）人在文学中的总体性，于是在作者的阶级立场或世界观方面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从资产阶级经典作家那里继承而来的方法，应当独立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从而保证客观性，使得反映可能具有总体性；沿自颓废派的形式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无论如何都是主观的，是反动世界观的表现。

5. 随着各国共产党从排斥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立场转向统一战线政策，遗产也获得了文化文学政策以外更广的意义。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援引恩格斯关于“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MEW 37，第463页）的论述，解释法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向，第一次提出要“充分利用”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传统这一“辅助武器”（*VII. Welt-kongress*，第215页）。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的报告也将雅各宾派称为“勇气和活力”（第216页）的“范例”（第199页）和“榜样”。多列士还提到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纲领”这一“知识传统”（第216页）也可供统一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联盟政策充分利用。大会决议要求“将当前斗争同本民族以往的革命传统结合起来”（第286页），这一要求基于德 688
国法西斯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法西斯对萨尔和苏台德地区的“民族情感”（第127页）的成功利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认为，要同对民族情感“嗤之以鼻”的“民族虚无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都划清界限，共产主义者就要认真对待“我们自己民族的过往……的每一个重要问题”：“法西斯主义者搜遍各民族的全部历史，以图把自己打扮成各民族过往所有崇高和英雄事迹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竭力以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德国历史，使得仿佛根据某种‘历史规律’，过去的两千年贯穿着一条红线一样的发展脉络，将民族的‘拯救者’召唤到历史的台前。”（第126页）

5.1 英国和法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向极大地促进了历史传记的写作，其成果

如克里斯托夫·希尔、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革命史作品，甚至在冷战时期依然保持着文化领导权的地位；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

对比可见，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和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著作，尽管与卢卡奇接近，带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但极少用遗产这个概念，而是更倾向于使用“传统”这个否定、批判的概念，比如福克斯用这个词反对 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伟大作品具有不受时间限制的普遍性的观点（1975，第 170—171 页），考德威尔将传统比喻为不变资本，有待作家个人经验的否定（1966，第 104、205 页）。他们和德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主流、30 年代德国共产党的纲领文献相反，坚持当下相对于过往的意义具有优先性。

5.2 德国共产党 1935 年仍要求拯救并发扬民族“文化和精神瑰宝”，以“复兴……1848 年革命的伟大自由传统”（*Brüsseler Konferenz*，第 595 页），而 1939 年在伯尔尼做出的决议则只强调文学遗产。决议谴责法西斯主义“伪造德国文化遗产”（*Berner Konferenz*，第 123 页）呼吁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父母“充分利用德国以往伟大的精神巨著，用进步、自由、公正、人道的理想精神培养他们的子女”（第 133 页）同时表示流亡作家是“真正德国文化的守护者”（第 149 页）。

而何谓“真正”，对此进一步的定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流亡作家的争论，特别是表现主义论争，证明了这一点。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捆绑，对于具有民族性质的遗产而言，更多地起到了破坏而非整合的作用。

5.3 恩斯特·布洛赫 1934 年完成的《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是为建设人民阵线做出的一项贡献，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文学领域。他对具有民族属性的事物（GA 4，第 154 页）持极为保留的态度，但是非常重视联盟政策，主张提出一种不同于规范美学、规范诗学的筛选遗产、处理遗产的方法。他的评论者汉斯·君特（Hans Günther）只赞同“将共产主义作为人道主义宣传”（1981，第 275 页）这一个——然而是核心的——方面。而布洛赫对所谓上升和衰落阶段的叙述程式的质疑，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重新阐释，则因为与客观主义相矛盾，遭到了断然否定。布洛赫的质疑动摇了经典的核心地位，而他对意识形态批判的重新阐释旨在从过去遗留的和当下的作品中提取出作为“无意识形态”内容的乌托邦因素：“所谓每个阶级只有在最初的革命阶段才富有创造力，这一说法使人无论如何都错误认识了绝大部分真实的文化史，而

听命于一种绝非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当意识形态领域充满了‘过剩’而非掩饰时，情况就尤其复杂，尤其包含着丰富的复节奏和插曲。”（GA 10，第 38 页）

布洛赫与汉斯·艾斯勒合写的文章《先锋派艺术和人民阵线》（*Avantgarde-Kunst und Volksfront*）及《继承艺术》（*Die Kunst zu erben*）针对遗产理论所带来的“艺术灾难也是政治灾难”（Eisler 1973，第 159 页），更明确地指出了两点：其一是“不加批判、不加选择”的做法近乎纳粹的“守护传统”（第 158 页），其二是对颓废主义的批判表面上起到了附和法西斯主义迫害现代派艺术的作用（第 151、161 页）。

5.4 布洛赫就遗产问题所写的文章提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目的在于不论人道主义是以小资产阶级（GA 4，第 257 页）、浪漫主义（第 61 页）还是美学立场的反对派（第 224 页）的形式表达反资本主义的内容，都要拯救人道主义内容免遭法西斯主义的利用，也就是要改变“继承方法”（Eisler 1973，第 157 页）。而艾斯勒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以现代艺术为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何以结成联盟。法西斯对二者的迫害，废除文化教育垄断的目标，谋求以形式主义以外的方式回应异化的知识分子，以上因素都令艾斯勒感到二者之间的裂缝并非不可弥合。他认为，审美材料的发展取决于社会表现形式，也同样取决于生产力，经历着损耗更新——历史地理解审美材料，使得有可能解决现代艺术的接受问题，反抗强制尊崇古典的决定。

本雅明在同一时期的理论兴趣也着眼于技术、生活形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他（以迪特列夫·霍尔茨 [Detlev Holz] 为笔名）在纳粹德国出版的文集《德意志人》（*Deutsche Menschen*，1936）可以当作布洛赫、艾斯勒所描述的流亡者的任务的一个例证：为反法西斯斗争“挑选和准备合适的材料”（Eisler 1973，第 158 页）。卢卡奇在《问题在于现实主义》（*Es geht um den Realismus*）中评价这一要求说：“人们在对待德国人民的光荣文学遗产的态度上，没有再比这更冷淡、更高傲和更排斥的了。”（W 4，第 339 页）本雅明的“拯救性”历史批判的构想和他借“回忆”（Eingedenken）和“辩证意象”（dialektisches Bild）等概念所形成的文化遗产问题意识，可被视为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观。在他看来，历史遗留的艺术品同时是社会暴力关系的证据（“没有一份文化的档案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实录。”GS I.2，第 696 页），这本身就必须加以辩证的，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在文化遗产方面拒斥‘合乎规律的更高更远的发展’

690

的说法，对待建设性地摧毁传统连续性的历史对象，则放弃沉思的态度，从而不利于意识到现时和过去作品之间所构成的批判关系，这些做法对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实践及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Brüggemann 1973，第200页）本雅明的构想和布莱希特有着紧密的联系：“接手‘遗产’不是不
691 需要斗争的过程。这并不是在立遗嘱人因为年老体弱、体力自然衰退而死亡以后简单地继承这样一种形式。”（GW 19，第317页）

5.5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论文化的肯定性质》（*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1937）一文采取笼统的反对立场，力图证明文化不适宜被用作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口号”（1965，第71页）。他看到德国古典被简单地绝对化为“庆典”和“高峰”，于是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绝对要求得到肯定、永远更好、更有价值的世界的宣言，这个世界和每日进行生存斗争的现实世界本质不同，每个个人不用改变现实，就能够‘从内心’为自己实现这个世界”（第63页）。他认为从法西斯主义“针对博物馆行业”的攻讦中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保存文化本身。”（第98页）本雅明在一篇评论中将这篇文章置于“倾向自由的文艺界”讨论“德国‘文化遗产’”的语境内加以论述，与马尔库塞相反，他坚持要求“尝试”“从民主社会的崩溃过程中……分离出这些因素，它们和自己的原始时期、自己的梦想紧密相连，不否认它们与将要来临的人类、与人类本身的团结”（GS III，第525—526页）。

6.“二战”以后，“遗产”概念在德国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中最初具有反法西斯主义再教育和文化革新的双重含义：它既用以批判一切作为法西斯主义前身的传统，又用以重思人文主义的理想和价值为基础绘制一个真正德国的蓝图。“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认识它的历史，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以扫清像梦魇一样压抑得每一代人无法自由奋起的以往的一切黑暗。”（Abusch 1947，第217页）在德国历史中划分出两条路线，这一做法也见于卢卡奇在战后影响广泛的著作。这些著作一方面发扬德国文学从莱辛到海涅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遗产，另一方面如《理性的毁灭》一书标题所示，批判哲学和社会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传统：“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一直是非理性主义的‘古典’国度……这一事实属于德国历史最耻辱的一页，正因如此必须得到深入的研
692 究，以便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翻过这一页，并且坚决防止它的残留或回潮。丢

勒（Dürer）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歌德和马克思的民族……没有理由……因畏惧而不敢无情地清算危险的过往和它有害、有威胁的遗产。”（W 9，第 35 页）

6.1 西部占领区和西德避免使用“遗产”概念。这个术语经过纳粹的使用，附着上了生物学、种族主义的所谓“德意志民族本质”的色彩，从沃尔夫冈·门策尔（Wolfgang Menzel）起，最初在民族主义的文学史写作，其后在德语文学的学科建制中固定下来（Rosenberg 1989，Gress 1971，Reiss 1973，Frank 1976），通常作为“神圣的、值得守护的宝藏”，和宗教、园艺、财产等隐喻结合在一起。取而代之的是“传统”（*Tradition*）这个说法，传统的主体则是整个西方。与此相反，民主德国自 50 年代以来通过援引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Bauernkrieg*）中“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MEW 7，第 329 页）这句话，使人无法批判地、否定地对待遗产这个概念——对“德国的鄙俗气”（deutsche Misere）这一观点的拒斥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自民主德国建国以来，反法西斯主义再教育除人道主义题材以外，又纳入了民族色彩的内容，其中如反拿破仑统治争取独立的“解放战争”，原先甚至是反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对象。1951 年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会的决议称，“民族文化遗产”是反对颓废的世界主义最重要的根据，后者是美帝国主义分裂德国的工具。于是，艺术家和作家所运用的表现方式，就和道德、政治建立起了关联。偏离“古典”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经典形式，可能被指为“客观上起到代理人的作用”，“以创造‘全新’的东西为借口，或真抱着这样的错误意图，与古典文化遗产完全决裂”（*Kritik* 1970，第 251 页）。在统一社会党对艾斯勒的歌剧脚本《浮士德》（*Johann Faustus*）展开批判时，歌德原著作为民族遗产的价值最终对判决起到了关键的典范作用：“将德国古典文学中永不消逝的精神巨人形象呈现为‘德国鄙俗气’的核心人物，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事情。”（Abusch 1967，第 145 页）

根据统一社会党建设社会主义的决议——尽管历经 1953 年六一七事件、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冲击——除 693
了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以外，社会主义传统也应得到相应的重视，但二者得到了各不相同的待遇：历史学科偏爱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遗产，而在德语文学学科则依旧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遗产。即使 1956 年后针对卢卡奇的猛烈批判，最初也没有改变衡量遗产的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标准。于是在 1959 年和 1964 年的作家大会上提出具有文化革命意义的“比特费尔德道路”（Bitterfelder

Weg）的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库莱拉的权威主张，与列宁所提出的“发现民族文化内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以作为批判选择资产阶级文化遗产的标准”（1961年，第632页；参见LW 20，第8—9页）正截然相反。因为在库莱拉看来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格奥尔格·福斯特的文学创作对无产阶级比歌德和席勒的作品还要‘富有教益’得多。”（第630页）

6.2 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直到1965年才放弃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模型，停止将特定的塑造方式与现实主义挂钩，但是仍不无保留：虽然一方面明确“不存在本身堕落的塑造方式”（*Geschichte* 1967，第614页），但另一方面又指责所谓“批判原则”，认为它“必然只会触发片面而且悲观、压抑、非建设性、腐蚀道德的情绪和联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则与之相反，旨在触发振奋人心、积极的‘社会主义冲动’（布莱希特语）”（Dokumente 1972，第65—66页）。

6.3 遗产理论的狭隘虽然在文化政策上带来消极后果，但是也提供了空间。清算主张批判现实主义的卢卡奇使得人们发现，布莱希特是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对立面。布莱希特就表现主义论争所写的文章于1967年首次被收入文集而问世，很快就获得了经典的地位。维尔纳·密滕茨威1967年发表、次年由西德的新马克思主义杂志《观点》翻印的影响广泛的论文《布莱希特—卢卡奇论争》（*Die Brecht-Lukács-Debatte*）以卢卡奇的修正主义解释他的美学——始终囿于“经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榜样”（*Kritik* 1970，第790页）——充分考虑了对民主的禁忌。这一禁忌在文学领域，自1963年卡夫卡会议标志着“从现实主义论争到民主论争的过渡”（Mittenzwei 1991，第85页）以后，就更为严格。恩斯特·菲舍尔和罗杰·加洛蒂将卡夫卡作为现实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们遵 694
循卢卡奇的观点），从而指出社会主义中的异化这一问题。加洛蒂在布拉格提议，“拓宽现实主义的定义”（*Marxismus* 1969，3，第197页），以求将卡夫卡的作品作为“异化的反面”（第202页）“纳入过去的遗产”（第197页）。

密滕茨威的布莱希特研究揭开了遗产理论多元化的序幕，遗产理论多元化是文学学科对作家和传统的——正如出自1955年首印的布莱希特告别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1971年后出现在统一社会党文件中的一个说法——“广泛而多样”（Brecht，GW 19，第340页）关系的反应。承认这一复杂关系体现为对所谓遗嘱执行人理论的批判：“不容曲解的事实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只是过去伟大的人道理想和乌托邦的

实现。”（Hager 1972，第 57 页）文化政策强调社会主义具有新的本质而非人道主义传统的延续，不仅同当时对民族问题的重新阐述一样，旨在与联邦德国划清界限，而且更是为了回击以传统为名，特别是以自我实现为诉求的对当下的批判，这类诉求的代表有文学中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对克里斯塔·T 的思考》（*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和德语文学学科中彼得·米勒（Peter Müller）1969 年的《歌德〈维特〉中的时代批判和乌托邦》（*Zeitkritik und Utopie in Goethes ›Werther‹*）。拒绝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实践上的乌托邦主义等遗产中的“干扰因素”（Werner 1971，第 180 页）或“退回到自我欣赏的‘内向性’”（Mittenzwei 1970，第 182 页），都限制着为了当下而实现过去的人道主义内容的可能性，因为当下的实现坚持历史化的原则：“批判继承首先意味着，将之前的社会时期的伟大艺术成就置于它们的社会条件下，基于它们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加以理解。”（Hager 1972，第 57 页）这就打破了人道主义的特定传统在原则上的优先性。遗产不再是规范诗学的标准之后，也减少了历史哲学标准的约束力。罗伯特·魏曼（Robert Weimann）将遗产理论相对化为一种解释学，它解释对文化政策负有责任的、科学的历史化和听凭作者主体意识的审美现实化二者预设“一致”（1971，第 43 页）之下的妥协，因而“当下和过去 695
在文学史中的关系就变得愈加丰富和自觉”（第 45 页）。“客观联系”（Werner 1971，第 171 页）中所固有的一致性存在不同的形式，人或享受“他斗争的历史”，或安于阅读以人的本质力量为主体的书籍（Mittenzwei 1970，第 30 页）。

6.4 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Christian Daniel Rauch）所刻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雕像 1980 年在原址重立，释放了开启遗产的最鲜明的信号。随着从联邦德国传入的口号，直面“整个历史”（*Protokoll* 1983，第 92 页），被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在整个德国历史中的根脉更强烈的意识”（Haase 1986，第 509 页），统一社会党放弃在传统中做出批判的区分：相反，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特别留意的是为社会进步做出客观贡献的剥削阶级成员，“不论他们处在怎样的社会和阶级关系之中”（Haase 1986，第 494 页）。

7. 联邦德国自与民主德国关系缓和以后，对民主德国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可能而且必要。这里主要批评遗产理论是以历史哲学代替缺席的民主合法化。此外，70 年代学生运动所提出的“道德左翼激进主义”（Baier 1978，第 60 页）批判，以布莱希特为依据，效仿他将卢

卡奇提出的“形式主义”指控简单地翻转过来指责“遗产管理员”(GW 19，第308页)卢卡奇本人，以求最后能达到阿多诺所谓的“唯一一贯的立场”(Lindner 1978，第110页)。汉斯·迈耶阐述他对遗产这个概念的“反感”时，也援引布莱希特《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中的一处讽刺内容(参见 Mittenzwei 1968，第12页)，以阿多诺所给出的规定作结，除教养市民的隐喻之外，现实意义和遗产概念只有以“否定”的形式才能连接起来：“和传统的关系转变为被禁止物的典范。”(Adorno 1967，第33页)

8. 针对这一指向合法化功能的批评，首先可以提出的反驳是，这一批评指向某个社会和过去之间的关系的明显政治性质，却决然漠不关心哪些条件决定了自己所在社会的传统关系。甚至一再因
696 为这些条件是多元的，就假定它们是非政治的或自由的，这通常就排除了对谁占支配地位的追问。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矛盾：遗产概念(以及特别是它理论建构中的合法辩护作用)在70年代输入了联邦德国，用文化民族这个方案来论证重新统一的主张，使得直到当时都是禁忌的术语“民族”又通行起来。

相对地要问，遗产，尤其是遗产民族化以后的最终形式，在民主德国是否实际起到了去合法化的作用。当它失去反法西斯批判、规范诗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以后，只剩下了以过去为基础的和联邦德国的文化共性。“‘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这个口号怎样变成了‘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将成为今后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现在我可以透露一个原因，”乌弗·蒂姆(Uwe Timm)在1990年3月9日的《人民报》(*Volkszeitung*)上写道，“这也是麻木迟钝、不问政治的遗产口吃病的结果。”(1990)

遗产理论的终结先于民主德国的终结，本身在民主德国表现为自夸相对于历史拥有“至高地位”(Kaufmann 1980，第31页)。所谓的至高地位，其实是对本身的历史哲学假说的幻灭，不仅可以被视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应物(Oesterle 1985)，也是后人在拙劣地模仿本雅明《历史的概念》中绝望的希望：“对于被救赎的人类，过去的每一个瞬间都变得可以援引。”(GS I.2，第694页)本雅明反对“顽固信仰进步”，认为它和“对‘群众基础’的信心”“奴颜婢膝地顺应无法控制的机器”是“同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第698页)，主张“一次虎跃扎入过去”(第701页)，从而有意识地激活了马克思批判传统时所使用的典范的唤醒和召唤亡灵的方法。讽刺的是，70—80年代

民主德国的理论家们正是用这幅“回忆世界历史”（Träger 1981，第 143 页）的图像，修正民主德国早期反法西斯主义的遗产政策（Kaufmann 1980，第 28—29 页）。他们误以为人类已经复归自我，因此才会引用本雅明（Weimann 1971，第 45 页）。

参考文献：

A. Abusch, *Der Irrweg einer Nation. Ein Beitrag zum Verständnis deutscher Geschichte*, Berlin/DDR 1947; A. Abusch, *Kulturelle Probleme des sozialistischen*
697 *Humanismus. Beiträge zur deutschen Kulturpolitik 1946–1963*, Berlin/DDR-Weimar 1967; Th. W. Adorno: »Thesen über Tradition«, in: ders., *Ohne Leitbild. Parva Aesthetica*, Frankfurt/M 1967, 29–41; L. Baier, »Vom Erhabenen der proletarischen Revolution«, in: H.-J. Schmitt (Hg.), *Der Streit mit Georg Lukács*, Frankfurt/M 1978, 55–76; E. Bloch, *Erbschaft dieser Zeit*, erw. Ausg., GA 4, Frankfurt/M 1962; ders., »Bemerkungen zur ›Erbschaft dieser Zeit‹«, GA 10, 31–53; H. Brüggemann, *Literarische Technik und soziale Revolution. Versuch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Kunstproduktion, Marxismus und literarischer Tradition in den theoretischen Schriften Bertolt Brechts*, Reinbek 1973; Chr. Caudwell, *Illusion und Wirklichkeit. Eine Studie über die Ursprünge der Poesie*, Dresden 1966; *Dokumente zur Kunst-, Literatur- und Kulturpolitik der SED*, hgg. v. E. Schubbe, Stuttgart 1972; H. Eisler, *Materialien zu einer Dialektik der Musik*, Leipzig 1973;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hgg. v. H.-J. Schmitt, Frankfurt/M 1973; R. Fox, *Der Roman und das Volk*, hgg. v. G. Seehase, Berlin/DDR 1975; H. J. Frank, *Dichtung, Sprache, Menschenbildung; Geschichte des Deutschunterrichts von den Anfängen bis 1945*, Bd. 1.2, München 1976; G. Fülberth, *Proletarische Partei und bürgerliche Literatur. Auseinandersetzungen i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der II. Internationale über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einer sozialistischen Literaturpolitik*, Neuwied-Berlin/W 1972; H. Gallas, *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Kontroversen im 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Neuwied-Berlin/W 1971;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eitrags zur Theorie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im Bereich der Literatur*, in: *WB*, 13. Jg., 1967, 576–620; W. Gorbunow, *Lenin und die sozialistische Kultur*, Berlin/DDR 1974; F. Gress, *Germanistik und Politik.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einer nationalen Wissen-*

schaft, Stuttgart 1971; H. Günther, *Der Herren eigner Geist.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erlin/DDR-Weimar 1981; H. Haase u. a., *Die SED und das kulturelle Erbe. Orientierungen, Errungenschaften, Probleme*, Berlin/DDR 1986; K. Hager, *Zu Fragen der Kulturpolitik der SED. 6. Tagung des ZK der SED, 6./7. Juli 1972*, Berlin/DDR 1972; P. U. Hohendahl, »Theorie und Praxis des Erbens: Untersuchungen zum Problem der literarischen Tradition in der DDR«, in: ders. u. P. Herminghouse (Hg.), *Literatur der DDR in den siebziger Jahren*, Frankfurt/M 1983, 13–52; H. Kaufmann, *Versuch über das Erbe*, Leipzig 1980; *Die Berner Konferenz der KPD (30.Januar–1.Februar 1939)*, hgg. v. K. Mammach, Frankfurt/M 1974; *Die Brüsseler Konferenz der KPD (3.–15.Oktober 1935)*, hgg. v. K. Mammach, Frankfurt/M 1975; K. Korn, »Proletariat und Klassik«, in: *NZ* 26, 1907/08, Bd. 2, 414; *Kritik in der Zeit. Der Sozialismus—seine Literatur—ihre Entwicklung*, hgg. v. K. Jarmatz, Halle 1970;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in Sowjetrussland (1917–1921). Dokumente des »Proletkult«*, hgg. v. R. Lorenz, München 1969; A. Kurella, *Der Sozialismus und die bürgerliche Kultur. Gedanken zu einer Aussprache*, in: *Einheit* 16 (1961) 77–91, 619–36; M. Lifschitz, *Karl Marx und die Ästhetik*, Dresden ²1967; B. Lindner, »Der Begriff der Verdinglichung und der Spielraum der Realismus-Kontroverse«, in: H.-J. Schmitt (Hg.), *Der Streit mit Georg Lukács*, Frankfurt/M 1978, 91–123; G.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Der Weg des deutschen Irrationalismus von Schelling zu Hitler* (1954), W 9, Neuwied-Berlin 1962; ders., »Einführung in die ästhetischen Schriften 698
von Marx und Engels«, in: *Probleme der Ästhetik*, W 10, Neuwied-Berlin 1969, 205–31; K. R. Mandelkow, »Die literarische und kulturpolitische Bedeutung des Erbes«, in: H.-J. Schmitt (Hg.), *Die Literatur der DDR*, München 1983, 78–119; H. Marcuse,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1*, Frankfurt/M 1965; *Marxismus und Literatur. Eine Dokumentation in drei Bänden*, hgg. v. F. J. Raddatz, Reinbek 1969; H. Mayer, »Kultur ist immer ein Werk der Neinsager. Über die Schwierigkeit, Bildung als Besitz und Erbe zu begreifen«, in: *Die Zeit*, 4.1.1980; W. Mittenzwei, »Marxismus und Realismus.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Argument*, 10. Jg., 1968, H. 1/2, 12–43; ders., »Aufgaben und Auftrag des Zentralinstituts für Literaturgeschichte«, in: *WB*, 16. Jg., 1970, H. 5, 10–30; ders., »Zur Kafka-Konferenz 1963«, in: G. Agde (Hg.): *Kahlschlag. Das*

11.Plenum des ZK der SED 1965. Studien und Dokumente, Berlin/DDR 1991, 84–92; G. Oesterle, »Zur Historisierung des Erbebegriffs«, in: B. Thum (Hg.): *Gegenwart als kulturelles Erbe. Ein Beitrag der Germanistik zur Kulturwissenschaft deutschsprachiger Länder*, München 1985, 411–51; *Protokoll der Anhörung zum Forum für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hgg. v. Senator für kulturelle Angelegenheiten, Berlin/W 1983; *Sozialistische Realismuskonzeptionen. Dokumente zum 1.Allunionskongress der Sowjetschriftsteller*, hgg. v. H.-J. Schmitt und G. Schramm, Frankfurt/M 1974; G. Reiss, *Materialien zur Ideologie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de. 1 u. 2, Tübingen 1973; R. Rosenberg,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Germanistik. Zur Geschichte ihrer Probleme und Begriffe*, Berlin/W 1989; U. Timm, »Von der Schönheit subventionierter Schnittblumen«, in: *Volkszeitung*, 9.3.1990; F. Trommler, »Die Kulturpolitik der DDR und die kulturelle Tradition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in: P. U. Hohendahl u. P. Herminghouse (Hg.): *Literatur und Literaturtheorie in der DDR*, Frankfurt/M 1976, 13–72; C. Träger, *Studien zur Erbetheorie und Erbeaneignung*, Leipzig 1981; L. Trotzki,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Wien 1924; M. Wegner,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und russische Klassik 1900–1918. Theoretische und praktische Probleme der sozialistischen Erbe-Rezeption*, Berlin/DDR 1971; R. Weimann, *Literaturgeschichte und Mythologie. Methodologische und literaturhistorische Studien*, Berlin/DDR-Weimar 1971; H.-G. Werner, »Umfrage: Zum Erbe in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in: *WB*, 17. Jg., 1971, H. 2, 170–82; *VII. Welt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Referate Aus der Diskussion Schlusswort Resolutionen*, Frankfurt/M 1971; C. Zetkin, *Kunst und Proletariat*, hgg. v. H. Koch, Berlin/DDR 1979.

赫尔穆特·派奇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bbild, Antifaschismus, Ästhetik, Aufklärung, Autorität, Avantgarde, deutsche Misere, dialektisches Bild, Dummheit in der Musik, Eingedenken, Einheitsfront, Engagement, Entfremdung, Entnazifizierung, Enzyklopä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Faustusdebatte, Formalismus,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umanismus, Ideologiekritik, Jakobinismus, Kafka-Debatte, klassisch/Klassik, klassische deutsche Phi-

losophie, Kritik, Kultur, kulturelle Identität, Kulturrevolution, Kunstpolitik, Literatur, Literaturverhältnisse, Moderne, Objektivismus, Proletkult, Realismus, rettende Kritik,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Sickingendebatte, Sozialfaschismus, Subjektivismus, Totenbeschwörung, Tradition, Utopie, Volksfront, Widerspiegelung

699 土地（Erde）

A: arḍ.

E: earth.

F: terre.

R: zemlja, Zemlja (земля).

S: tierra.

1.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把土地或土壤（Boden）“看作自然力……，地主将其使用权转让给佃农”。在斯密看来，地租“多少根据这些力量预计的大小而定，换言之，依据预计的自然或人力提升的土地肥力而定”（*Reichtum*，2，第114页）。大卫·李嘉图把地租或土地利息定义为“因使用原初未经破坏的地力而支付给地主的部分土地产出”（*Grundsätze*，第48页）。土地的肥力归功于土壤或耕地的自然力，而在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土地是这样被赞颂的，即它是“自然”对生产的唯一“帮助”（aid），影响到价格的构成。这是因为其稀缺性，也是因为私人占有的可能性。与之相反，空气和水虽然对于商品生产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在李嘉图看来，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它们“没有价格……，只是因为土地的数量不是取之不尽的，在质量上也不是相同的；由于随着人口的增长，质量较差的或位置偏远的土地也要被耕种，所以对它的使用本身就要支付租金”（第51页）。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地租并不是对农产品之类的支付，而是因为使用土地即“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土壤生产力”而给予的酬金。李嘉图学派的地租理论声称，地租是一种酬金，这是由于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渐开始耕种条件较差的土地，使得土地变得更加稀缺了。被耕种的条件较差的土地越多，就要为那些之前被视为最差的土地——它一直还未收地租——支付越多的地租。对于所有肥沃的土地来说，地租同样要依据其肥力大小而提高（此处完全忽略不计也影响地租水平的土地位置问题）。这一理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地租受假定中的“收益递减规律”调节。据此，随着人口的增长，更多质量低劣的 700

土地即肥力低的土地得到使用。这样一来，在田地上使用的劳动就其生产率而言就下降了，同时，对投入到肥沃土地上用于土壤改良的资本的使用，也因为边际生产率下降而受到了损害。这导致谷物价格上涨，引起满足产业工人生存需要的工业企业所需的原料价格上涨。与这种一般分析紧密相关的是（并以多种方式引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标志性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参见 Lebowitz 1982）。这也接近于马尔萨斯关于地球人口过剩的思想。由于这个缘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把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1899，第 44 页）。

尽管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但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并不否认土地生产率可能会提高。李嘉图写道，“农业的改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另一类是通过改善我们的机器，以更少的劳动取得产品”。前一类包括适当的“轮作或挑选更好的肥料”（*Grundsätze*，第 62 页）。关键是如下这种看法，即这些改善措施对于肥力只起到有限的作用。穆勒在其关于农业领域的收益递减规律的文章中明确地指出，这一规律适用于“每一个农艺学阶段”（1965，第 173—174 页）。

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深受农业收益递减这一简单模型的影响，而这个模型能发挥作用是以如下假设为前提的：（1）土地是稀缺的“生产要素”；（2）土地生产率相当有限；（3）人口及其食物需求不断增加；（4）农业的发展方向是逐渐耕作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5）通过农业知识的进步来提高生产率的机会有限。

2.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土地生产率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要复杂得多，因为它并不是立足于对“原初未经破坏的地力”的抽象想象，而是明确基于人类通过其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来提高或降低 701
土地肥力的能力。在 1843 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青年恩格斯论证道：“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MEW 1，第 510—511 页）“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这样来理解的地租问题的自然方面决定了供给，而人的方面则决定了需求（第 510 页）。

马尔萨斯主义把土地肥力递减提高到自然规律的地位。马尔萨斯在其最后版本的模型中强调，在土地完全被占据后，农业生产率“更近似于递减的几何序列，而不是递增的几何序列”（1826，第 123、138 页）。恩格斯与此针锋相对。

人利用科学的潜能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趋势必须直接被考虑在内（参见 Foster 1994，第 60—65 页）。“科学，”恩格斯评论道，“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MEW 1，第 521 页）恩格斯在尝试拟定这份具有指导性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时，两次提到了德国伟大的土壤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名字，并把他作为对于提高土地生产率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的一个活生生的化身，这使得恩格斯的这样一个主张具有了说服力，即要十分细致地考虑人的作用、社会组织和农艺学的效应。

一些批评家把恩格斯关于科学进步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立场引以为据，来说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然观，也就是说，他们强调技术在支配自然方面发挥着无限制的作用，并完全否认人的生产存在着“自然界限”（Giddens 1981，第 59—60 页）。这样的阐释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方法的辩证属性。他们无法接受“简单的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即在社会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物质占有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之间选择一方作为分析的出发点”（Burkett 1996，第 62 页）。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更倾向于考察人的生存本质（即作为生产的社会本质）和自然之间的、马克思称之为“物质变换”的东西（MEW 23，第 198 页）。因此，正如他们关于城乡分工的结果的研究一样，他们关于农业发展的分析也撇开了自然界限如何被历史特定的社会关系中介的方式和途径。这种进路远非忽视自然界限或生态危机趋势。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论断，即在人对土地的占有中隐藏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的根源并非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外部因素，即超脱于历史之外的自然法则，而是历史特定的发展形式。这些形式撕扯着人的生存本质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从而损害着生产的条件。

正如马尔萨斯的学说一样，过于简单地鼓吹某种超历史的自然困境，只不过是以此为工具来维护社会现状罢了。基于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立场，则不仅要从经验上评估在既定生产方式中占有自然要素的方式和方法，而且要从经验上评估这样的占有所面临的、由自然设定的界限。“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MEW 25，第 664 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发现，“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

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MEW 4，第172页）。这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的辩证观是马克思全部著作的特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坚持认为，人依靠自然而生存这一事实“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
703 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MEW 40，第516页）。

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这种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进展而出现的辩证法已经采取了一种思辨色彩较少的形式。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MEW 23，第198页）。

对马克思来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包括水在内的土地首先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Gr*，MEW 42，第384页）。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称土地是“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和“劳动对象”（“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它当然是“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也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第193—194页）、“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Gr*，MEW 42，第393页）。因此，“从各个方面利用土地”（MEGA II.1.2，第322页）是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即便在发生工业革命后，“自然界”对于生产的直接贡献仍然是相当可观的：“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MEW 23，第198页）

对马克思来说，根本上是要懂得资本主义的价值关系系统地掩饰了土地对于生产使用价值的贡献，这种价值关系认为自然界的贡献就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但……这种无偿的自然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MEW 25，第754页；23，第407—408页）。与此相反，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MEW 23，第58页；
704 参见 *Gotha*，MEW 19，第15—16页）。

在一些人看来，自然对于财富毫无贡献。和他们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每一份财富终究都是自然的产物："卢克莱修（Lucretius）说，'无中不能生有'，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MEW 23，第 229 页）

因此，马克思的观点是，"土地所有权——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MEW 18，第 59 页）。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的这种所有权是异化的。资本主义"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MEW 23，第 536 页）。这一点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的产生本身不是"自然必要性"；它并不是首先出现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相反，在那里，自然是"过于富饶的"。"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同上）

到了 19 世纪 60 年代初，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农业进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它都要超过工业了。事实上，通过指出**"土地的肥力一般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提高"**（MEW 27，第 161 页），他倾向于强调土地质量的持续改善。然而，他从对李比希等农艺学家（如被马克思称为"英国李比希"的英国化学家 J. W. 约翰斯顿 [J. W. Johnston]）著作的研究中得出的却是另一套东西（MEW 27，第 359 页；25，第 627 页及以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阐述资本主义地租问题时总结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扣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MEW 25，第 821 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中的这个裂缝也是随着在很大程度上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经营的农业的前进而出现的，它是"连续投资的土地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MEW 25，第 753 页）。马克思对李嘉图从耕种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那里推导出来的地租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证明了从耕种不同肥力的土地出发才是合适的（MEW 27，第 158 页及以下；参见 LW 5，第 113—114 页）。 705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使得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MEW 25，第 630 页）。但与此同时，严格资本主义

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一定量的土地作为专门领域”任由私人利益处置（第628页）——削弱了资本主义农业本身。特别是，土地产品从乡村中心到城市中心的长途运输，以及资本主义企业在重新培育土地肥力方面实行的极其不充分的措施，引起了土地生产率的长期下降。“历史的教训……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第131页）

马克思是从李比希那里借用“合理的农业”这一概念的。这个概念拿出售土地各组成部分的商人的“经验上的农业耕作法”同“合理的耕作”相对照，后者重新培育而不是夺走土地的肥力（Liebig 1859，第162、68页）。在后来的著作中，李比希指出，出现了“掠夺性农业”（Raubwirthschaft），土地中储存的“（作物）再生产（的）各种条件”遭到了破坏——年复一年、一茬接一茬地流失到了产品中。他写道：“一块被拿走产品的田地，其肥力不能持续性地不变或者增加。”实际上，“每一种以掠夺为基础的经济都会导致贫困……。与掠夺性经济相反，合理的耕作建立在补偿的基础上：通过恢复各种条件，农民使田地获得了肥力”（第166—167页）。对李比希来说，“被称为‘密集型农业’的欧洲的耕作法……不像美国农民那样进行粗暴的掠夺，……相反，它实行的是精巧的掠夺，以致人们乍一看并不能发现它是掠夺”（第172页）。李比希指出，在美国，小麦种植中心和其市场之间常常相隔成百上千英里。这样一来，土地的构成元素所在地离这些元素的原产地非常远，因而土地肥力的重新培育变得越发困难了（第40页）。 706

对马克思来说，李比希的这一分析是农业问题的关键。1866年，他写信给恩格斯，提及他为分析资本主义地租问题所做的准备：“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Schönbein），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MEW 31，第178页）实际上，“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MEW 23，第529页）。基于李比希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以这样一个解释为他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两种主要的论述做了结语，即大工业和以大规模的方式经营的农业互相作用的方式在于，使土地和劳动者流尽鲜血。“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

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MEW 25，第 821 页）“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因此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MEW 23，第 528 页及以下）。

这些发展路线关系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矛盾的一个主要源泉，即城市和农村的极端对立。诸如此类的巨大裂痕展现了人和土地的物质变换关系中的断
707 裂。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写道：“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碍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MEW 18，第 279—280 页）

在思考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时，马克思为自己关于资本主义农业的界限的观察注入了具体的含义。他希望，通过引入现代农艺学的方法，古老的公社转变为采取“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发达农业体系。在相应的国际条件下，它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而无须成为各种矛盾的牺牲品——这些矛盾同私有制造成的土地分割和小块化以及资本主义农业原则上难免短视的目标有关（参见 MEW 19，第 392 页；法文版见 MEGA I.25，第 227—228 页）。

3. 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来说，马克思关于土地肥力的一般研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考茨基认为，化肥“使得预防土地肥力下降成为可能，但扩大其使用范围的必要性只不过意味着在农业的许多负担之上再加上一项而已，这些负担不是自然必然性，而是来自现存的社会关系”（1899，第 211 页）。在列宁看来，所有这些体现了“城乡对立消亡”的必然性（LW 5，第 148—152 页）。

708 日本生态经济学家、现代生态经济学的奠基人真弓浩三（Kozo Mayumi），是尼可拉斯·杰奥尔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的学生。他使世人注意到，李比希和马克思都勾画了土地恶化的“未来景象”，这些景象为一种将经济学和热力学相结合的分析提供了参考，使这种分析后来成为生态经济学的特征（Mayumi 1991，第35—36页；Georgescu-Roegen 1971）。这种分析蕴含着的观点是，引入化肥等化学物质在任何情况下都使得“土壤的暂时解放”成为可能。它要求不断增加物质投入，以便补偿土壤的恶化。这是现代农业的一个特征，对此，巴里·康芒纳以戏剧性的方式记录到：从1949年到1968年，美国的农业生产增长了45%，而每年消耗的氮肥增长了648%（1972，第149页）。

4. 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关于土地（或土壤）危机的分析，以及他关于自由联合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中农业的必要基础的思考，总体上促使他提出了一种较为宽泛的可持续性概念（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一概念预示着现代生态学思想的优越性（Foster 1995）。马克思认为，显而易见，“生产的自我持续的危机、农业和手工业的统一”（*Gr*，MEW 42，第394页）体现了再生产的一般条件。这个关键的看法同马克思的这样一种倾向相一致，即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农业中的土壤危机是关系到环境条件的生态可持续性危机，而未来的世世代代可能会把这些条件视为今天行为的结果。马克思在著作中写道：“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MEW 25，第631页）

马克思明确指出，消除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矛盾对于共产主义社会具有绝对的必要性。对他来说，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显得非常尖锐：他认为，要反对资本主义“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就 709
得联系社会形式。他在阐述资本主义地租问题的结语部分写道，“对土地这个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是“摆脱锁链的人类世世代代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MEW 25，第820页）。这种思考方式促使马克思产生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

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第784页）

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和滥用土地肥力的批判使他做出了关于在20世纪80年代后被称为“可持续发展”（nachhaltige Entwicklung）问题来讨论的事物的经典论述。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Kommission）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组概念，这些概念和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意思上有些模糊：可持续发展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妨碍后代子孙满足自身需求”（*Weltkommission*，1987）。早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由于破坏了土地再生产的条件，给后代子孙造成了危险，正因如此，它必将为另一个社会即使用合理方式耕种土地的社会所取代。21世纪将为危及生存的一系列危机而苦恼，这些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警告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P. Burkett, »On Some Common Misconceptions about Nature and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NS*, 7. Jg., 1996, H. 3, 57–80; T. Carlyle, *Latter-Day Pamphlets, No. I: The present time*, in: *The Works of Thomas Carlyle*, Bd. 20, London 1899 (dt. Leipzig 1903); B. Commoner, *Wachstumswahn und Umweltkrise*, München 1972; J. B.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1994; ders., »Marx and the Environment«, in: *MR*, 47. Jg., 1995, H. 3, 108–23; N.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Mass. 1971; A.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1981;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Tendenzen der modernen Landwirtschaft und die Agrar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Stuttgart 1899 (Nachdruck Hannover 1966); M. Lebowitz,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in Marx's Theory of Crisis«,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1982, H. 7, 5–25; J. v. Liebig, *Naturwissenschaftliche Briefe über die moderne Landwirthschaft*, Leipzig-Heidelberg 1859; T. R. Malthus, »A Summary View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1826), zit. n. D. V. Glass (Hg.), *Introduction to Malthus*, New York 1953; J. S. Mill, *Collected Works*, Bde. 2 u. 3, Toronto 1965; K. Mayumi, »Temporary Emancipation from the Land«, in: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1, H. 4, 35–56; D. Ricardo, *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710

der Besteuerung, Bd. 1, Berlin/DDR 1979; *Weltkommission für Umwelt und Entwicklung, Unsere gemeinsame Zukunft*, hgg. v. V. Hauff, Greven 198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撰
张志超 译，孙易晨 校

参见：

Agrobusiness, Arbeit, Arbeitskraft, Armut/Reichtum, Destruktivkräfte, Elektrifizierung, Energie, Entbettung, Enteignung, Entropie,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Gebrauchswert, Grenzen des Wachstums, Grüne Revolution, Grüner New Deal,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ndustrielle Patholog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apitalismus, klassische bürgerliche Ökonomie, Landwirtschaft, Malthusianismu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Naturbeherrschung, Ökobilanzen, Ökologie,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Ökosozialismus, Produktivität, Raubbau, Rente, soziale Kosten, Stadt/Land, Stoffwechsel, Transport, Umwelt, Vergeudung.

经验（Erfahrung）

A: ḫibra.

E: experience.

F: expérience.

R: opyt (опыт).

S: experiencia.

1. 自古典时期以来，与经验这个词相当的词语（希腊语 ἐμπειρία，拉丁语 *experientia*）就一直属于哲学思想和社会理论思想的术语。不过，在经过这么多个时代以后，这个词的意思也变得相当多样化了。它的内涵也随着使用它的思想体系以及用它来表达的理论需求和实践—社会诉求而变化着。甚至用经验来指涉的思想过程及其结果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别。除了那些只是把感官材料称为经验的思想家之外，在现代还有一些人把这一名称扩展到了一些理论中。就此而言，最晚从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Das neue Organon*，1620）开始，一方面在“偶遇的”从而自发出现的日常经验与同“着意寻求的”（“所谓实验的”）经验相区别的“漫无定向的经验”（*experientia vaga*）之间，另一方面在“不稳定的”实验性经验与“真正的经验秩序”（*verus experientiae ordo*）——它从由经验支撑的公理（*axiomata*）规定

711 的实验中推导出来，并对实验结果再次予以一般化，以此类推——之间，出现了分别（I，第82条）。约翰·洛克在其《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中，仅用一语就回答了“理性材料和知识材料”（materials of reason and knowledge）的来源问题：“来自经验。”（II，第1.2章）于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头写道：“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这一点完全毋庸置疑。”（B版，第1页）但这种开端只是“根据时间而言”，经验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因此，需要研究的是“把感性印象的原始素材加工成对象知识”的“知性活动”（同上）。正是为了确信这种本身就合理的经验知识，才必须先行分析先于一切经验而存在的“理性”的领域。黑格尔把经验概念溯源至思想。例如，《精神现象学》指出，“感性确定性的辩证法无非是其运动或其经验的简单历史”（第1章，W 3，第90页），而与此相应的是复杂的意识形态，这些形态从一个到下一个的转变是由这种经验的反馈来中介的。

总体看来，认知过程或（与）其结果就被称为经验，这些过程和结果是单个主体或集体主体在同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互动时自行地（尽管只是多少自主地）进行并实现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关于经验的理论上的，特别是哲学上的思考不仅涉及每种经验的特点（其主观性和客观性、认知价值、社会规定性和历史规定性、实践意义等），也特别涉及日常经验或科学经验的特点。

在撰写《资本论》时，马克思主要是在上述问题的范围内进行研究的。在书中，他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经验置于经验研究的中心。不过，在这方面，马克思可以以他早些时候（结合他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提出的一些观点作为基础，这些观点不仅涉及经验的具体形态特点，而且也由此涉及一切经验的客观规定性，涉及其主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特点。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同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是一切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这一思路循着逻辑的一贯性，必然得出的结论是，人依靠自然而“生存”，“自然界”是“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 712
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Ms 44*，MEW 40，第516页）。故而，对于“一切科学”来说，其认知的“基础”也只能是“感性”（第537页）：“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即人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是“社会本质”的一个器官（第538—539页）。这又导出了这样

的结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第542页）

此后，马克思只是偶尔才会明确论述各种经验的若干侧面。恩格斯则越来越关注相应的一些问题。对他来说，"全部思维内容起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也是毫无疑义的（*DN*，MEW 20，第529页）。他连续不断的批判所针对的是与此相反的一种"竭力要自己禁绝思维"的"经验"（第395页）。在他看来，"纯粹的经验"（第416页）是相当可疑的，因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经验论者深深地陷入了体会经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东西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在感性认识的领域内。"（第502页）

恩格斯对于经验崇拜——如自然哲学时代之后在他那时的学者中广为流行的经验崇拜——深恶痛绝，而这也是受黑格尔影响的结果。黑格尔批评了未经理论思考的经验，说它对个别的把握只能是孤立的、同总体相对立的，从而犯了将事物现象等同于事物本质的错误（例如参见SW 1，第55页及以下，第185、456页）。

由于缺乏这种深刻的哲学背景，恩格斯的同代人约瑟夫·狄慈根（Josef Dietzgen）极其由衷地赞扬了经验的认知意义。于是，"经验的多样性是第一位的，思考是第二位的"（*Schriften* 1，第28页）。感性经验"为我们的大脑活动"充当了"材料，以便通过抽象得到整理和修改"（第57页）。在提出各种流行的唯物主义观点之外，狄慈根还写作了《科学与手工业》（*Die Wissenschaft und das Handwerk*），在那里，他把科学和手工业的关系与经验和理论的关系联系起来予以说明。其内容如下："科学的认识是处理对象的前提，反之亦然，正确处理对象是科学认识它的前提，因而，科学和手工就如同两种产生化学反应的物质一样互相吸引和彼此相连。"（第94页）这种思想促使他得出了一个一般性规则："如果不事先用你的肉体感官对事物进行加工，不对它进行实验，不去体验它，你就不会认识和理解。"（第93页）这种忽视社会分工的简单化此后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常常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务实取向。 713

与恩格斯和狄慈根不同，马克思终生都专注于对"日常经验"（MEW 16，第129页）的研究，这些经验也被他称为"日常偏见"（25，第839页）、"流行见解"（第795页）、"习惯看法"（第884页）等等。它源于"日常生活"（Alltagsleben）（23，第559页；25，第839页）和"实际日常生活"（praktisches Werkeltagsleben）（23，第94页），并作为这种生活的观念要素，使人们不禁自发产生观念。正如早些时候的思想

家一样，马克思也认为，日常经验首先是同科学认识相反的。“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16，第129页）在马克思看来，谁在认知上不能超脱于日常经验之外，那他就是在“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25，第838页）。如果“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第324页）。

因此，和较早时候的思想家不同，马克思试图对日常经验做历史的、具体的规定，这对他的时代来说，就是把日常经验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它们和“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是“大不相同的”，甚至是“相反的”（MEW 25，第214页），这是马克思从日常经验自然生发的商品拜物教中得出的看法，而商品拜物教则认为，人的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不是表现为某种只从属于特定生产方式的东西，而是表现为一种近乎天然的、“纯粹物的”（第833页）并因而只是每一种可能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实相。“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 714
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23，第95—96页）

在马克思看来，摆脱这种“神秘化”（MEW 25，第828页）的前提是，“社会生活过程”成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并“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23，第94页）。在此之前，由于既存的社会关系而造成的偏见，即将这些关系作为似乎天然的关系而接受下来，会被那些和它们在实践上、情感上和理论上相对立并因而把它们理解为可以改变的从而历史的关系的东西击退。

2. 接续马克思关于日常经验的论述的，尤其是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即他们在变化的历史形势下把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来加以研究。这体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和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在这方面，所有这些理论家同时阐明了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中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同那些早期唯物主义观点的区别（与例如在恩格斯的著作中相比）更彻底得多。在较

早的时候，列宁就在《怎么办？》（*Was tun?*，1902）中试图阐明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活动的战略步骤。如果工人阶级在自发条件下只能形成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那就必须向这个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马列主义中，这主要被解释为要求党的“成熟的”宣传家帮助“不成熟的”劳动人民取得“觉悟”。

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也赞同那种自古典时代以来在哲学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关于日常经验的片面观点。这种传统合理地强调了日常经验和理论思考之间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异；但与此同时，它也多少忽视了两种认识方法之间仍存在的认知联系。例如，对于培根来说，只要经验是偶然获得的，并且随意地对它进行不同的、惯常的取舍，那就相当于在黑暗中“徒劳的兜圈”（*Novum Organum*，I，第62、82条）。黑格尔发
715 现，哲学“和知性——更确切地说，借以来理解人作为类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的、健全的人类知性——恰恰是对立的”（SW 1，第185页）。在19世纪的工人运动中，甚至在雅各布·奥多夫（Jakob Audorf）的所谓《工人马赛曲》（Arbeiter-Marseillaise）中就存在着一种片面贬低日常经验的看法（1864）：“我们最痛恨的敌人，就是不理解群众。”

只是到了国家社会主义末期，在马列主义中才出现了这样一些观点，即它们强调的不再是日常经验的局限性，而是日常经验对于每一个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认知价值（例如，Wittich 1987）。这不仅涉及马列主义以外的新近出版物（例如，Reichelt 1969，Hoffmann 1979），而且也涉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经验之人［οἱ ἐμπειροι］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些人（技艺之人，τέχνη）则兼知其所以然。”（981a，第28—30行）然而，“我们要看到，经验中的人仍比那些有概念却无经验的人要来得正确”（第14—15行）。亚里士多德为其观点提供的理由是：“经验是对个别事物的认识，技艺（τέχνη）是对整体的认识，而业务与生产都是有关个别事物的；因为医师并不为‘人’治病，他只为‘加里亚’（Kallias）或‘苏格拉底’（Sokrates）或其他各有姓名的治病……。倘有概念（λόγον）而无经验（ἄνευ τῆς ἐμπειρίας），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涵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因为他所要诊治的正好是些‘个别的人’。”（*Met*，981a，第12—30页）

在对科学知识进行实践性或理论性运用的所有地方，都必然会在这种知识的一般性与其运用领域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之间产生一种学问的区别。为了弥合这个裂缝，只能在认知上利用日常经验。

就此而言，日常经验也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的一种学问形式。例如，“照章劳动”（Arbeit nach Vorschrift）是工会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努力拒绝日常经验，大概是知道，没有这些本身就极其现代的生产设施，就不能在最优条件下运行，甚至常常根本就无法顺利运行。

撇开上述的列宁的结论不谈，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马列主义中，马克思对日常经验的理解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相当
716 不受重视。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对此甚至一丁点都没有提到（*FL*，第 647 页及以下）。例如，在民主德国，只有沃尔夫冈·海泽再次较为深入地参考了马克思关于日常经验的研究（1964，第 41 页及以下）。然而，正如《哲学辞典》所表明的，前文提到的马克思的论述，此后只是在边缘问题上才得到注意。也有一些例外，如维蒂希、格斯勒和瓦格纳的著作（Wittich/Gössler/Wagner 1978）以及格斯勒的著作（Gössler 1983）。马克思的论述在马列主义中受到相对较少的重视并非偶然。这些论述旨在主要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现实中自动发现某种大多基于日常经验的政治意识存在的基础。但这很难适合独裁的领导风格。因此，缺乏事实上的或想象中的政治群众意识的原因，大多要去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特别是当前的反共产主义宣传中去寻找。正如在 18 世纪一样，资产阶级的“教士幻觉”（Priestertrug）观念解释了“错误意识”的存在。例如，直到政权垮台，在民主德国的党的机构和国家机器中，这种对政治群众意识的意识形态误读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卢卡奇关于“哲学上对日常……的研究太少”（1981，第 27、32 页）的遗憾就可以理解了。

马列主义关于经验的论述在哲学上更多的是由列宁的思想而非马克思的思想主导的。这些论述涉及关于经验的传统哲学问题，并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交汇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起因于对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以及哲学家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的研究。马赫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科学思想应当具备“非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这个基础不能逾越人的经验的界限。他要求取消“一切形而上学问题”，“不管它们被视为当前无法解决的，还是被视为根本上或者永远都无意义的”（1903，第 287 页）。所谓“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就是指认为人的经验具有某种源泉的看法。“不但身体产生了感觉，而且要素复合体（即感觉复合体）构成了身体……。对我们来说，颜色、声调、空间、时间……暂时是最终元素……，其既定的联系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第 23—24 页）“材料对

717 我们来说并不是最先被给定的东西。相反，这是元素（众所周知，这被称为感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称为材料的东西是各元素的某种互相作用。”（第188页）所以对马赫来说，“无疑，世界是我们的感觉”（1896，第226页）。

马赫不仅阐述其“反形而上学”立场的严格性，而且利用“反形而上学”传播的原创性的科学理论、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思想的丰富性都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如奥地利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勒（Friedrich Adler）或俄国流亡人士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tscharski）。这些思想看起来是“反形而上学的”生产率的令人信服的特征，特别是它们常常近似于或甚至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工作的理解。这样一来，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内，通过马赫的反形而上学的努力可以不断揭示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的幻想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相反的立场上，首先登场的是L. I. 阿克雪里罗得（L. I. Axelrod）和格奥尔基·W. 普列汉诺夫。在《战斗的唯物主义》（*Materialismus militans*，1908/1910）这本文集中，普列汉诺夫坚决否认同贝克莱相近的认识论可以同某种唯物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取得一致。

列宁紧随着普列汉诺夫，有时也同他保持着批判的距离。基于这样的立场，列宁在1909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LW 14）。列宁完全忽略了马赫及其社会民主党内的追随者的“反形而上学”主张以及表面上同这种主张有必然联系的那些关于科学理论的看法。与之相反，列宁试图证明（正如普列汉诺夫一样），马克思主义只能被看作这样一种认识论，即它总体上把人的经验和认识行为理解为“事物”的“复制”“反映”“图像”和“镜像”（LW 14，第231页）。列宁把恩格斯奉为据说毫无疑义的马克思主义最高权威的努力，以及他常常相当单纯的现实主义表达方式，甚至不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对手。1910年，波格丹诺夫就以他的答复《信仰与科学》（*Vera i nauka*）反对列宁，而卢那察尔斯基（1924）直到逝世始终在认识论上是党内的马赫追随者。后一种情况也非常适用于弗里德 718
里希·阿德勒，他在写给马赫的信中取笑列宁不懂马赫真正的理论主张（参见Ardelt 1984，第189页及以下）。

然而，无可争议的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正确地强调了马赫的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一致。1931年，甚至“恩斯特·马赫”协会的发起人奥托·诺伊拉特也说道：“列宁在他反对经验批判主义的书中——经验批判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没有得到他的正确评价——

以政治怀疑论的视角发现了很多具有经验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者的论述，这些论述广泛记录了这些研究者持有某种通常被人忽视的、粗糙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的证据。”（1981，第524页）

1930年前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列宁自己在俄语第2版（1920）中只是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辅助材料”的书（LW 14，第7页）应斯大林的要求，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研究的权威证明。于是，由于异常狭隘的认识论问题视角，出现了对一些往往在逻辑上和语义学上站不住脚的命题的教条化。此后，在马列主义中，人类全部感觉和思考先是被完全地，后来仍大多被置于其“相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性”的观点之下进行考察（例如，参见Chasschatschich 1949）。然而，在这方面，经验这个概念之所以没有得到特别的注意，或许是因为列宁指出，这个概念不能被明确断言为唯物主义的：“在哲学中，‘经验’不仅包括唯物主义路线，也包括唯心主义路线，并允许把它们混同起来。”（LW 14，第143页）不过，长达几十年的对列宁的书的解读——参与解读的除了德波林、卢波尔（Luppol）、卢卡奇、君特、克劳斯，还有阿尔都塞和勒古——主要涉及的也是认识论上对通常被称为经验的对象的反映。

3.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外，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于经验和理论的关系以及感官经验的具体形态的规定性进行了一些影响广泛的研究。特别地，前者主要是在所谓的实证主义论战中变得清晰的（参见Adorno等1968）。这场论战表明，经验是“阿多诺哲学的关键概念”，这一哲 719
学把“起源和有效性之间的辩证法”置于中心位置（Negt 1995，第169页）。克劳斯·霍尔茨坎普创立的“批判心理学”（Kritische Psychologie）把经验理解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受到承担商品属性的对象（其“对象意义”）以基本方式影响的某种东西（1973）。也有一些人尝试将人的经验整体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下（参见Brinkmann等1973）。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u. a.,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 1968; R. Ardelt, F. Adler, *Probleme einer Persönlichkeitsentwicklung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Wien 1984; H. Brinkmann u. a., *Sinnlichkeit und Abstraktion. Prolegomena zu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Empirie*, Gießen 1973; F. I. Chasschatschich, *Über die Erkennbarkeit der Welt*, Berlin/DDR 1949;

J. Dietzgen, »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1869), in: ders., *Schriften in drei Bänden*, Bd. 1, Berlin/DDR 1961, 1–87; ders., »Die Wissenschaft und das Handwerk« (ca. 1865),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 15. Jg., 1973, H. 1, 93–95; J. Freudiger u. A. Glaser, *Der Begriff der Erfahrung in der Philosophi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 1996; K. Gössler, »Karl Marx und Probleme des Alltagserkennens«, in: DZPh, 31. Jg., 1983, H. 11, 1260–72;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 1973; W. Heise, *Aufbruch in die Illusion. Zur Kritik der bürgerlichen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Berlin/DDR 1964; W. Hoffmann, »Die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Produktion und das Wissen der Arbeiter«, in: G. Böhme, M. v. Engelhardt (Hg.), *Entfremdete 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79, 229–56; K. Holzkamp, *Sinnliche Erkenntnis. Historischer Urspr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Funktion der Wahrnehmung*, Frankfurt/M 1973;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Leipzig 1923; G. Lukács, *Die Eigenart des Ästhetischen*, Bd. 1, Berlin/DDR-Weimar 1981; A. V. Lunatscharski, *Idealizm i materializm*, Moskau-Leningrad 1924; E. Mach, *Populärwissenschaftliche Vorlesungen*, Leipzig 1896; ders., *Die Analyse der Empfindungen und das Verhältnis des Physischen zum Psychischen* (1885), Jena 41903; O. Negt, »Adornos Begriff der Erfahrung«, in: G. Schweppenhäuser U. M. Wischke (Hg.), *Impuls und Negativität. Ethik und Ästhetik* bei Adorno, Berlin-Hamburg (AS 229) 1995, 169–80; ders. u. A. Kluge, *Öffentlichkeit und Erfahrung. Zur organisationsanalyse von bürgerlicher und proletarischer Öffentlichkeit*, Frankfurt/M 1972; O. Neurath, »Empirische Soziologie. Der wissenschaftliche Gehalt de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rs. *Gesammelte philosophische und methodologische Schriften*, hgg. von R. Haller und H. Ruttke, Bd. 1, Wien 1981, 423–527; K. D. Oetzel, *Wertabstraktion und Erfahrung. Über das Problem der historisch-materialistischen Erkenntniskritik*, Frankfurt/M-New York 1978; G. W. Plechanow, »Materialismus militans. Antwort an Herrn Bogdanow« (1908/10), in: ders., *Eine Kritik unserer Kritiker*, Berlin/DDR 1982, 249–351; H. Reichelt, »Zur Marxschen Werttheorie und deren Interpretation bei Werner Hofmann«, in: *Sozialistische Politik*, 1. Jg., 1969, H. 2; M. Vajda, »Die Kritik der Tatsachenwissenschaft bei Lukács und Husserl«, in: B. Waldenfels u. a. (Hg.), *Phänomenologie und Marxismus*, Bd. 4, *Erkenntnis- und*

720

Wissenschaftstheorie, Frankfurt/M 1979, 46–74; D. Wittich, »Die Bedeutung sozialer Erfahrungen angesichts der Verwissenschaftlichung menschlicher Tätigkeit«, in: DZPh, 35. Jg., 1987, H. 8, 721–5; ders., K. Gössler, K. Wagn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DDR 1978.

迪特尔·维蒂希
（Dieter Wittich） 撰
张志超 译，孙易晨 校

参见：
Abbild, Alltag, Alltagsforschung, Alltagsverstand, Bewusstheit, Dialektik, Empirie/Theorie, Empirismus, Entfremdung, Epistemologie, Erinnerung,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rscheinung, Experiment, falsches Bewusstsein, Fetischismus, 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 Marxismus-Leninismus, Mystifikation, Positivismusstreit, Staatssozialismus, Subjekt-Objekt, Theorie, Wissenschaft

记忆（Erinnerung）

A: ḏikra.

E: remembrance.

F: souvenir.

R: pamjat' (память).

S: recuerdo.

记忆对于任何一种解放理论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记忆既是集体的历史意识，又是个人的能力。立足过去对可能、改变、抵抗展开想象，由此绘制未来的蓝图——记忆就以这种方式在解放理论、批判理论和文学中起作用。记忆是意识形态入侵的关口，同时也是意识形态批判和介入性行动的前提条件，是希望和绝望的承担者。历史批判的工程要接受记忆的检验。

记忆虽然不断得到历史哲学、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探讨，但它不是严格定义的概念，相反，它经常被用作“记性”（Gedächtnis）的同义语。特别是它的动词形式 erinnern，在日常用语中就表示让任意事物在当下浮现。

1. 在哲学传统中，记忆（希腊语 ἀνάμνησις）作为对遗忘的克服，是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核心。这同时意味着，记忆只涉及已知的东西，学习是对已观看的事物的回忆。这个母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贯穿了整个哲学史，后来也出现在心理学中。比如笛卡尔说：“我学到的新东西不及我回忆起的已知的东西。”（*Medit.*，第 3 章）莱布尼茨称：“我们能

够学到的，不外乎已经存在于观念内的东西。”（*Phil. Schriften* 5，第41—42页）

721 亚里士多德最初将“记性”意义上的记忆规定为动物的基本能力：“动物生来具有感觉（αἴσθησις），它们中有一些从感觉中得到了记忆（μνήμη），有些则没有。由于这个缘故，那些有记忆的动物就比不能记忆的动物更聪明，更善于学习。”对人而言，记忆是经验的前提，“同一事物的众多记忆导致单一的经验（ἐμπειρία），经验大致类似科学和技术”（*Metaph*，980 a29—b22）。

康德将记忆规定为“有知性的记性”：他在探讨认识能力时强调，记性是一个任意存储的仓库，一个“抓入”“沉思”和“保持”（*Anthrop*，§34）的容器，从中形成的记忆才是有意识的行为。“有意地使过去成为现在的能力是**回忆的能力**，而想象某种本属未来的东西则是**预见的能力**。”“健忘”，尤其“不忠于记忆”（同上）的幻想，是记忆的敌人。因此康德顺带攻击了读小说的妇女：“在艺术中消磨时间，使自己对世界毫无用处，但事后却抱怨生命短暂，且不说这种习惯所带来的耽于幻想的心境，它是对记忆力最有敌意的侵袭之一。”（同上）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7章C）中将记忆活动解释为“内在化”（Erinnerung）。这个进程在他看来总是关乎普遍、关乎共同体、关乎语言所记忆的“民族精神的伦理”（第7章B.c）的。例如史诗的歌唱者就是这类记忆的承担者：“他的情怀并不是一种令人眩晕的自然力，而是一种记忆（Mnemosyne），一种静思和一种后来形成的内在性，一种对于以往的直接本质的追忆。”（同上）从“绝对知识”的角度看，记忆完全变成知识，它的图像存在形式消失了。记忆以这一方式扬弃了异化。这使精神得以不断重新从更高的阶段开始。“**目标本身**，亦即绝对知识，或者说那个自知其为精神的精神，把早先关于精神的回忆当作它的道路，回忆起那些精神本身是怎样的情形，以及它们是如何完成它们王国的组织机构。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自由的、显现在偶然性形式下的实存保存下来，也就是历史；另一方面，把那些精神当作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组织机构保存下来，也就是**以显现出来的知识为对象的科学**。两者合在一起，作为一种已经得到概念式把握的历史，构成了绝对精神的回忆，以及 722
骷髅般地构成了绝对精神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和确定性。假若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将会是一种无生命的孤寂的东西。”这是《精神现象学》结尾对历史意识连同记忆在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史中的定位。

黑格尔有力地将记忆置于能动的

语境里，把这个词改造成了一个历史哲学的概念。他不大关心记性、保存和遗忘等后世的记忆研究与心理学所探究的问题，相反，单纯外在性或外化的对立面——“内在化”——成为伦理教育的中介。康德和后人使用“记性”的地方，他使用的是“理智”（Intelligenz）。后者是“黑夜的矿井，在它里面保存了一个无限多意象和表象的世界”（*Enz*，§453），这些意象和表象不在意识里，只是虚幻的记忆。“但是，理智作为理智是在其发展中自己向自己内在化着的**自在存在**的自由实存。所以另一方面，理智必须理解为这种**无意识的**矿井，即**实存着的**普遍的东西。”（同上）“能动的内在化”（§448）即“严格的所谓记忆是意象与一个直观相联系，更确切地说是把直接的个别的直观**包摄**于就形式而言的普遍东西，即包摄于是同一个内容的**表象**”（§454）。

2. 青年马克思将黑格尔关于历史意识的观念严格地转用于此岸世界，但是他最初仍停留在启蒙主义的意识话语里：“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MEW 1，第 346 页）这种进步主义记忆的对立面是倒退的记忆，马克思认为后者的代表是国民经济学里“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Ms 44*，MEGA I.2，第 292 页）。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历史的重构，原因正在于他们关注人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问题（*Utopie*，MEW 19，第 226 页；*AD*，MEW 20，第 264 页）。但是他们没有把记忆当作一个特别的问题来处理。

3. 列宁强调历史记忆的必要性：“谁要是像健忘的伊万那样来对待工人自己的运动的历史，他就不可能是有觉悟的工人。”（LW 20，第 278 页）

马克思主义对记忆真正的讨论和研究始于布洛赫、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恩斯特·布洛赫扩展了马克思对于 723
人类拥有的梦想的思考。他对“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和“过去中的未来”的追寻，构成了他《希望原理》（*Prinzip Hoffnung*）的主题。他在阐发希望时展开了对认识只是单纯重新发现的柏拉图主义记忆模型的批判。他常用的术语有“向前的黎明”（第 128 页）、“尚未”、“使将出现事物得以解释的前意识”和“另一方面的无意识的、向前的黎明的心理学”（第 130 页）。“主体嗅到早晨的新鲜空气。”（第 131 页）黑格尔的意象再度浮现，人被理解为“盛满未来的容器”（第 133 页）。然而记忆不会开启希望，记忆不会把经验集合起来供知识使用。相反，记忆是希望的对手：“希望不仅是**害怕**的对立面，而且——尽管它

有冲动的性质——也是记忆的对立面。”（第 126 页）记忆用“逻辑—静态的斗争反对可能”（第 261 页及以下）。“障碍是阶级关系所限定的沿海航行，即围绕既定的东西乃至过去的东西游弋，是静态思维对活跃的开放世界和深海的厌恶。”（第 263 页）

布洛赫认为记忆是狭隘、虚弱的，是对可能的厌恶。于我们而言重要的东西，有时根本不会进入记忆。我们自己也可能不会出现在记忆的任何有用的区域。（《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GA 3，第 241 页）因为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所以“改造工作”必须依靠希望，依靠完成了一半、停顿在历史中的观念，这观念是“依旧有效、未被抵消的指示”（GA 10，第 166—167 页）。“在记忆里有时只显现出人仿佛更崇高的愿望，有时则是梦的阴影披上看似预感到秘密的外衣，免受光的侵扰；当然在记忆里有时也显现出对过往事物的深思熟虑的美化，以此彰显并拯救出散落在过去中的广泛的、乌托邦的、本质的因素。”（GA 3，第 238 页）因此记忆在他看来“不是适宜我们的力量”（同上）。相反，应当利用梦想。他重视“觉醒”（aufwachen）这个词，要让梦想站立在大地上，实现梦想。因此对他而言最终不是记忆，而是愿望，是“梦幻图像”，才蕴含着让“社会免于异化、自然免于发展和熵减的单纯循环”（第 169 页）的能量。

布洛赫在另一个地方的表述没有这么严厉，他将记忆视为预期的补充，并划入了乌托邦的范畴：“记忆和预期表 724
现为既相互从属又方向相反的两种行动。前者是保存的行动，反抗吃人的时代……后者是潜在的行动，与新生的时代同行。”（*Prinzip Hoffnung*，第 329—330 页）“记忆表现为敦促，希望表现为怀念。二者因良知与知识对被中断、未实现、将要实现的事物的追求，完成了乌托邦的统一。”（《“尚未存在”本体论》[*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第 76 页）

瓦尔特·本雅明坚持梦以及与此相关的觉醒观念的意义，但他认为自觉的记忆是对解放事业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在梦中无意识出现的，是史前的因素，它不仅是愿望意象，而且是对一个无阶级社会的隐秘的记忆（GS V，第 47 页）。作为自觉进行透视的工具，“辩证思维是历史觉醒的器官。每个时代不仅梦想下一个时代，而且在梦中奔向觉醒。每个时代自身当中就蕴含着自身的终结，而且用狡计展开终结的过程……对过去形势的辩证透视和再现，检验着当下行动的真实性”（V，第 1027 页）。于是，记忆的功能变成对现实行动的解释。本雅明在其他地方还赋予记忆以一种意义结构的地位：“生命的真正尺度是记忆。

记忆闪电般地回望，穿透了人的一生。”（*Versuche*，第 124 页）他抓住过去不大有价值的记忆问题，将之视为自己的任务。“历史认识的主体是斗争着的被压迫阶级本身。”（I，第 700 页）“过往的一去不复返的意象”在“认为自己不蕴含在这些意象中的每一个当下，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他记录下这些意象，从而将记忆同解放和认识，将对记忆对象的处理同历史书写者关联起来（I，第 694—695 页）。“对于生命已经变形成文字的人，比如老人而言，他们只想从后往前翻阅这篇文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遇见自己本人，也只有这样——通过逃离当下——他们才能理解自己的一生。”（*Versuche*，第 125 页）这一思想的雏形已见于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是希腊人谈到‘记忆’时的一个关键概念……重复和记忆是同样的运动，只是方向相反。记忆的对象是已经存在的，是向后重复；相反，真正的重复是向前记忆。”（1843，W II，第 7 页）

725 本雅明在另一个地方认为，从梦中觉醒是“辩证法完全特有的经验”（V，第 491 页）。本雅明思考记忆的语境，是方兴未艾的商品社会以及生产、消费、商业和建筑的工业化，这是一个集体意识陷入沉睡、个人意识日益得到反思的时代。媒体试图“把时事闭锁在可能触及读者经验的领域以外”（V，第 610 页），从而制造越来越多的娱乐。一连串代替的过程加剧了经验的枯萎：讲故事被通知取代，通知被新闻取代，新闻最终被轰动事件取代。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病态地试图再度占有童年世界的众多个人。

在本雅明看来，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既典型地代表了记忆的私人性质，又阐发和揭示了这一状态。普鲁斯特区分了任意的记忆同不由自主的记性，前者服从于理智，还会受到理智的审查，而后者则是创造性幻想的源泉，不接受意志的塑造：“往事也是如此。有意去回想，只能是徒劳，智力的一切努力都是没用的。往事隐匿在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一记忆，这一往昔的瞬间，由某个一模一样的瞬间吸引远道而来，从我脑海深处唤醒，真能浮升到我意识的表面？”（《追忆似水年华》[*Auf der Suche*]，第 1 卷，第 63 页及以下）

本雅明将这个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化问题，将不由自主的记性称为各种各样孤立的个体的财产清单（V，第 612 页），称为行动的生活同沉思的生活相分离的产物，而沉思的生活就产生于记性，合成出综合的经验（V，第 609 页）。解放理论的任务，就是分析哪些条件使得积极经验——它能够被当作自己的历史来回忆——再也无法产

生出来。这些条件包括大众文化制造的娱乐，雇佣劳动把非熟练工人排除出劳动学习经验，以及赌博的重复和空洞。过去的失落和无法复原的徒劳，导致存在的状态如同失去记性的机器（V，第
726 633—634 页）。重新夺回包含人的所有感觉的记忆（I，第 1034 页），既是解放的必要条件，也是解放的目标。“当然，只有被救赎的人类才能完整保有他们的过去”，而且这过去“在它的每一瞬间都变得可以援引”（I，第 694 页）。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思考中指出，记忆问题同历史主义“‘按它本来的样子’认识”过去的宏图相对立，这里指的是：“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这种危险既威胁着传统的内容，也威胁着传统的接受者。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那就是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在每个时代都必须努力重新从意图制服传统的随波逐流习性中夺取传统。”（I，第 695 页）

阿多诺关注的是“自我遗忘”、自我无意识这个方面。这是对一个被交换行为扭曲到再也无法产生真实经验的社会的彻底批判（《否定辩证法》[*Neg. Dial.*]，GS 6，第 178 页）。“‘所有物化都是遗忘’，批判其实就意味着记忆，即调动各种现象里使这些现象得以存在的因素，从而发现这些现象原本能够变成，进而成为其他事物的可能性。”（1968，第 250 页）就此而言，记忆和记忆工作意义相同。阿多诺认为，完好无损的经验作为记忆的基石，只有在艺术中才是可能的，他将艺术的经验称为“客观性在主观意识里的突破”（《美学理论》[*Ästh. Th.*]，GS 7，第 363 页）。“只有当批判与记忆交汇，才能通过传统自身的毁灭保存传统，避免把现代理性反抗传统的起义出卖给统治者。”（Zamora 1995，第 442 页）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无形中呼应了布洛赫：“目的不是保存过去，而是兑现过去的希望。”（《启蒙辩证法》[*Dial. d. Aufkl.*]，GS 3，第 15 页）

马尔库塞主张“恢复记忆的权利以作为解放的途径”（1968，第 228—229 页）。他强调记忆“特殊中的普遍性”：“在个人记忆里重新出现的私人事件贯穿着人类的害怕和渴望……正是历史保存着记忆。”（1967，第 117—118 页）因此他借用普鲁斯特的说法称：“‘追寻逝去的时光’将成为未来解放的桥梁。”（1968，第 24—25 页）“假如没有遗忘的能力，人将无法承受文化中的生活……遗忘的能力也是灵魂的能力，使人能够 727
屈服和放弃。”（1968，第 228—229 页）为了应对这一状况，不仅要动用记忆作为解放的力量，而且首先要解放记忆本身，使它免受意识形态的损害。首先应当“明确指出我们文化里的记性训练的片面性”：记性“主要受到这样的安排，

让人记住义务而不是欢乐。记忆同愧疚、负罪感和罪恶扯上联系。绑定在记性里的是困苦、不幸和惩罚的恫吓，而不是幸福，不是自由的承诺”（同上）。

奥斯卡·内格特和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将“记忆和遗忘的自我调节”视为“活生生的人同自我的斗争”。记忆与遗忘“集体和个人层面的历史原因都已经退入无意识当中……这里的自我调节意味着一种秩序，它既不按自然的法则也不按意识的法则，而只按潜意识的法则运行。这是一种无意识的秩序，**因为它是合作的**”（1981，第60页）。

4. 彼得·魏斯在《抵抗的美学》（*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中探讨了记忆与遗忘同统治与臣服相交织的关系。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终结以后，一个民族顺从地欢迎自上而下颁布的缄默，欢迎遗忘，这使得在文学中对记忆展开激烈讨论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魏斯、乌维·约翰逊（Uwe Johnson）、克里斯塔·沃尔夫在围绕记忆的斗争中创作了伟大的小说。这不是要用意识形态权力收服记忆，而是关乎不忘记过去又不因过去而绝望的能力。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这样一段历史，关于它的相反记忆使遗忘变成了迫切的诱惑。问题是，我们如何记忆摧毁了社会主义事业信心的斯大林主义暴行历史，如何记忆吕贝（Lübbe）所说的“慎勿多言”的战后霸权文化里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魏斯认为，关键在于为叙述和拒绝遗忘的任务找到这样一种语言——一个民族在说这门语言，同样在用它掩盖和欺瞒他们参与其中的责任。写作成为对抗沉默的拯救尝试，即便有人感到沉默本身也是对恐怖的必要反应（参见 728
《抵抗的美学》里的母亲，*Notizbücher* 2，第782页）。魏斯不想回忆胜利者的历史，而是要通过叙述赢取对压迫和反抗的记忆。

魏斯在《抵抗的美学》的开头一章描绘了建造帕加马（Pergamon）祭坛的战败者、亡国者、被剥削者的形象。这呼应着卢森堡的观点，“整个人类文化”是“许多人和……群众社会协作的成果”。官方历史把“各民族的幸福和苦难”写成“个别统治者或伟人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各族人民，是无名的群众自己，创造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幸福和他们的痛苦”。比如金字塔是奴隶“为自身所受奴役树立的石质证明”（Luxemburg，GW 4，第206页）。布莱希特也在《一个工人读书时的疑问》一诗中表达了这一思想：“谁建筑了七座城门的忒拜城？……那些岩石，是国王们拉来的吗？”（Brecht，GW 9，第656—657页）

约翰逊在《周年纪念日》（*Jahrestage*）中区分了记性的记忆功能和作为存

储器的功能："记性的关键功能在于记忆，而不是做一个存储器，不是重现，不是返回过去，重复从前的事：再一次置身现场，再一次进入那里。这是做不到的。"（1970，第1卷，第63页）克劳斯·布里格勒布（Klaus Briegleb）分析约翰逊和魏斯的作品时采用黑格尔的概念"能动的内在化"指出：约翰逊试图阐明抵抗立场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具有怎样的辩证法，结果失败了（1992，第205页）。约翰逊最终陷入创作枯竭。

占有记忆不仅是艰苦的行动，而且揭示出牵连、参与和罪责。除了追问被压迫阶级和他们所记忆的历史以外，我们还要追问个人：对法西斯主义的质询恰恰也包含着作为个人问题的记忆。沃尔夫写《童年规范》（*Kindheitsmuster*），探寻童年时代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她和约翰逊的主人公格辛·克雷斯帕尔（Gesine Cresspahl）一样，首先触及的难题是人本身是否愿意记忆，而非服从遗忘的霸权模式，这种模式让"我们势必变成自己的陌生人"："记性的工作……如同蟹行，如同费力向后的运动，如同落入时代的矿井，井底的石头上坐着个全然无辜的孩子……而你必须'给出修改到面目全非的原版记忆'。"（第10—11页）不仅记忆拣选、拼接的方式是有问题的，而且它依赖的可疑权威是"你不可靠的记性，记性以孤岛的原则运行，它的任务就叫作：遗忘！伪造！"（第13页）记性就像一个用于保存的容器。有意识的记忆则相反，是个人事后启动的自觉过程："对乡愁、悲伤和遗憾的记忆。用斧子砍断它们。那时感觉刚形成，感觉还完全是感觉本身，没有同言语相混，但日后统治它们的并不是直接性，而是——毫不讳言地说——算计。"（第321页）

5. 本雅明和马尔库塞都立足于弗洛伊德的工作。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记忆本身都是无意识的，即使铭刻最深的记忆也不例外。"（GS，II/III，第545页）整理记忆意味着使被压抑的事物免于故意的遗忘。"早年经历的记忆痕迹始终保留在个人心中，只不过是保留在特殊的心理状态里。可以说，个人一直是明白这一点的，也知道被压抑的事物。"（GW XVI，第201页）记忆对精神治疗至关重要，治疗师的工作就在于将记忆转化为意识。

弗洛伊德参与了始于19世纪末的关于记性和记忆的讨论。当时记忆已不再是记住并再现某些东西的技艺，而是与心灵研究密切相关。哈金（Hacking）（1996）认为，各种新的记忆科学（神经科学、研究特定记忆内容的实验、记忆的心理动力学）"全都是作为心灵的替代科学而产生……它们要提供一种新的知

729

识，帮助治疗、培育和监督人的心灵”。哈金把这种对心灵的干预视为围绕知识的权力斗争下“记性的政治化”（第272页）。他阐述了记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怎样首先在美国成为“社会运动”话语的强力核心，并于80年代达到高峰，这一运动又向美国文化霸权控制的国家如加拿大、德国，以及向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传播。精神病机构、媒体同这场运动相互作用，将记忆作为分析和诊断身份识别障碍（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最初被称为“多重人格”）的工具，将这种障碍解释为童年遭受性侵的后果。这样的做法粗糙地简化了精神分析对记忆的复杂处理，以为记忆的根本是分裂的“双重人格”下隐藏的暴行的真正历史，而呈现暴行会有治疗的功效。这种几乎像瘟疫一样扩散的话语表现了一种对本真记忆的“柏拉图式”信仰，要求重新赢得本真记忆。这种看法忽略了记忆意味着在矛盾的世界里努力让自己保持一贯。

总的来说，记忆研究在20世纪以某种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仿佛记忆机制是独立于历史、社会、统治制度而起作用的。它的重点问题是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记忆能力以及记忆作为学习理论中的规则和系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心理机制的语言趋近于计算机语言。存储器、操作系统和检索信息使人得以进行实验室实验，测量记住无意义音节所需的时间等等（参见 Schmidt 等 1991）。

6. 文化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谢耶夫·N. 列昂季耶夫（Alexejew N. Leontjew）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学习与意识的语境下研究记住无意义音节的能力，力图证明对意义的追寻是作为“高级形式”的人类记忆力的基础（1973，第313页）。记忆在这里出现在确定方向和加工处理的语境中，又表现为人格发展的一个维度，却不是对特定历史社会化过程的回应。

克劳斯·霍尔茨坎普没有探讨记忆问题，而是在行为能力（1983，第381页及以下）和学习（1993，第120页及以下、第134页及以下）的语境中探讨记性问题，他反对把记住和遗忘当作纯粹机械过程的倾向（第122页）。霍尔茨坎普同列昂季耶夫一样，都以意义与记忆加工为出发点。他在处理弗洛伊德的观点时，将记性置于行为能力的语境：“这就要分析行为能力——包括记性，作为个体生命的连续性与矛盾性的真正‘承载者’——的个人作用基础的所有变化，分析哪些过程让掩盖现实的各种特定形式变成活动着的世界经验和自我经验（相对）持久的模式，即近乎确立为人格‘动态无意识的’部

分。”（1983，第381页）他在《学习》（*Lernen*，1993）中总结批评记性研究，提议用“解释话语里的储存/记忆”替代“记性”概念（第139页及以下、第269—270页、第295页及以下、第319页及以下）。这个新的说法指出了学习过程同主观规定的关系，然而很少进一步反思历史社会环境里记忆的特殊性以及记忆同解放的关系。

7. 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口述史（*Oral history*）中，记忆成了一个核心范畴。其宗旨是：“一个民主的未来需要一个不只听得见上层声音的过去。”（Niethammer 1980，第7页）访谈变成了材料来源，同时是工人和第三世界受压迫者的传记等的研究方法。多数情况下，这种形式的历史书写同时自我定位为介入的社会调查，目的在于搭建“从历史理论的主体性到历史主体的解放”（第15页）的桥梁。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为“第三世界”阐发了关于过去的意识对反抗殖民主义毁灭各民族的意义：印第安人“没有同他们的过去断裂。印第安人的历史进程遭到阻碍和迟滞，但他们正因此没有丧失自己的个性。他们拥有一种社会存在，保存着他们的习俗、他们的生命感受、他们对待宇宙的态度”（*Sieben Versuche*，第300页）。副司令马科斯以类似的方式在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中召唤记忆作为反抗的资源：“我们，这片地区最早的居民，印第安人，被判处在隐秘的角落遭人遗忘，而其他人却变大变强。我们要保卫自己，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的历史，我们不想死亡，就只有牢牢抓紧我们的历史。”（1995，第71页）对历史的召唤几乎出现在他的所有讲话里。

另一个流派——文化研究也赋予记忆对历史书写的意义。扬·阿斯曼（Jan Assmann）强调记忆文化的意义，认为科学是一种集体记忆，希望避免传统的断裂（1992，第299—300页）。“集体记忆”（kollektives Gedächtnis）这个概念在口述史的框架下经历了复兴，它最初由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用来形容个人记忆形成时地点、语 732
言、建筑、规范、伦理和习俗的集合。“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取自当下的事实重构过去，而且已经经过先前历次不同的重构铺垫，从先前的重构当中产生出了已大为改变的过去的图像。”（1925，第55—56页）他认为这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社会环境”（soziales Milieu），在社会环境里不仅生产和传承着集体记忆，而且搭建出通往个人记忆的桥梁。此外，“社会环境”未经批判地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文化、国家机器都在干涉它的建构。

口述史吸收了葛兰西的术语“文化霸权”，并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记忆为了把记忆的承载者建构为所在时代和当时价值观里的协调人格，试图在个人的历史里顺应各自的霸权文化。对记忆的研究变成了对霸权文化如何占领记忆的研究。詹贾科莫·奥图（Giangiacomo Ortu）在这一语境下提醒注意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注意葛兰西如何批判“非哲学”地思考民俗，以及为了书写整体的历史必须研究属下阶级的世界观与生活观（1980，第124页）。

8. 记忆在感觉、梦、变革、幻想、想象、观念等概念的视域中，在知识、能力、意识、思维的再现中所展示的多元的面向（例如，参见Rusch 1991，第732页）向历史批判的工程证明：记忆对于历史认识，对于阶级意识问题，对于反抗都具有根本意义。记忆作为人有意识的存在的一个维度，也是一个战场：既是意识形态入侵的关口，屈服于霸权文化，也是变革的基础。同时，记忆受到性别特征的决定，在研究中要注意相应的区别。对于被压迫者的反抗和个人的行动能力，记忆工作都是必需的。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1968], Editionen des Th. W. Adorno-Archivs, Vorlesungen, hgg. v. Ch. Gödde, Frankfurt/M 1993; J. Assmann,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Schrift, 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t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München 1992; W. Benjamin, *Versuche über Brecht*, Frankfurt/M 1966; D. Bertaux u. I. Bertaux-Wiame, »Autobiographische Erinnerung und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in: Niethammer 1980, 108–22;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Bd. 1, Berlin/DDR 1960 (1953); ders.,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Phil. Grundfragen* I, Frankfurt/M 1961; K. Briegleb, »Widerstand als tätige Erinnerung«, in: *Das Argument*, 33. Jg., 1992, H. 2, 205–18; H. Eidam, *Discrimen der Zeit: Zur Historiographie der Moderne bei Walter Benjamin*, Würzburg 1992; I. Hacking, *Multiple Persönlichkeit. Zur Geschichte der Seele in der Moderne*, München-Wien 1996; M. Halbwachs, Das *Gedächtnis und seine sozialen Bedingungen* (1925), Berlin-Neuwied 1966; ders.,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Frankfurt/M 1991 (1967); K. Holzkamp,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 1983; ders., *Lernen. Eine Grundlegung*, Frankfurt/M 1993; U. Johnson, *Jahrestage. Aus dem Leben von Gesine Cresspahl*, 4 Bde., Frankfurt/M 1970ff; S. Kierkegaard,

733

»Die Wiederholung« (1843), in: Werke II, Reinbek 1961; A. N. Leontjew, *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s Psychischen*, Frankfurt/M 1973; Marcos, »Die Zapatisten bringen Blumen und Freiheit«, in: *Die Aktion*, 137/144, 15. Jg., 1995; H. Marcuse, *Der eindimensionale Mensch*, Frankfurt/M 1967; ders.,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8; O. Negt u. A. Kluge, *Geschichte und Eigensinn*, Frankfurt/M 1981; L. Niethammer (Hg.), *Lebenserfahrung und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Die Praxis der ›Oral History‹*, Frankfurt/M 1980; G. Ortu, »Historische Subjektivität und revolutionäres Subjekt. Arbeit mit mündlichen Quellen in Italien«, in: Niethammer 1980; M. Proust,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lorenen Zeit*, Frankfurt/M 1964; G. Rusch, »Erinnerungen aus der Gegenwart«, in: Schmidt (Hg.) 1991, 267–92; S. Schmidt (Hg.), *Gedächtnis. Probleme und Perspektiven der interdisziplinären Gedächtnisforschung*, Frankfurt/M 1991; P. Weiss, 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3 Bde., Frankfurt/M 1976–81; ders., *Notizbücher 1971–1980*, Frankfurt/M 1981; Ch. Wolf, *Kindheitsmuster*, Darmstadt-Neuwied 1977; J. A. Zamora, *Krise—Kritik—Erinnerung. Ein politisch-theologischer Versuch über das Denken Adornos im Horizont der Krise der Moderne*, Münster-Hamburg 1995; J. Zimmer, *Die Kritik der Erinnerung. Metaphysik, Ontologie und geschichtliche Erkenntnis in der Philosophie Ernst Blochs*, Köln 1993.

弗里加·豪格 撰
曹旸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lltagsforschung, Antizipation, Bedeutung, Befreiung, Bewusstsein,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Bild, Denken, Einfühlung, Eingedenken,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Entäußerung, Enttäuschung, Erfahrung, Erinnerungsarbeit, Erkenntnis, Erlösung, Geschichtsschreibung, Hoffnung, Ideologie, kulturhistorische Schule, Lernen, Massenkultur, Persönlichkeitstheorie, Sinn, Subalternität, Utopie, Vergessen, Zerstreuung

记忆工作（Erinnerungsarbeit） 734

A: ʿamal taḏakkurī.

E: work/effort of remembering.

F: travail de mémoire, travail mnésique.

R: trud pamjati (труд памяти).

S: trabajo de rememoración.

记忆工作的方法是为了了解女性的经历而发展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于经验的理解，就没有“依据去质疑父权制的规范”（Grosz 1990，第 94 页）。但记忆工作对于经验并没有这样的假设，即认为它们是明显的，或者是既定且没有问题的。就像自传一样，记忆工作将“一个制造并理解经验的主体放置在知识生活与研究的中心位置”（Stanley 1996，第 47 页）。在记忆工作中产生的记忆提供了产生于话语矛盾中的（以及来自这种矛盾中的）主观性的“快照”。经验不再被视为“可以证明已知事物的——因为被看到或被感觉到——具有决定性的证据，而是被当作解释的对象，从而产生相关知识”（Scott 1993，第 410 页）。人们寻找的是一种“隐藏”在叙事形式背后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个人经验能够被理解。这些形式可能形成“一个叙事铠甲，主体在其中寻求稳定（感）”（Bay 1995，第 17 页）。

弗里加·豪格将记忆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发展，在这种方法中，女性写下她们记得的经历，然后再通过小组访谈去破译这些经历的结构。主观感受上举足轻重的事件总是会被铭记，其可理解性也由此得到反映。这种方法基于这样的假设：“所有被记住的东西都是与身份相关的痕迹。”（同上书，第 23 页）记住的东西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它是有问题的或陌生的。某件事情之所以令人费解、复杂或矛盾，是因为它并不理所当然。事实上，“他者”才是（塑造）核心自我的可能性条件（Butler 1990）。

记忆（这个活动）关注叙事形式的产生（Wertsch 1985）。肖特（Shotter 1993）赞同比利希（Billig 1987）的观点，强调差异和争论在文化参与中的作用。“活的传统”产生于不同立场的主体们所带来的困境（参见 Stephenson 等 1997）。记忆工作对日常生活困境中个人“如何”和“为什么”（如此）定位自己感兴趣。它试图以一种改变经验性 735
质并使其更具社会响应性的方式缩小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差距（Schratz-Hadwich，1995）。

记忆工作是在集体中进行的。在“想要从经验中获得个人如何将自己融入环境的知识诉求上……，基本上人们都是在寻求一种方法。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看作是一连串的反映，不把社会条件看作塑造我们的、压倒一切的结构，而是从我们的经验中找出我们可能的活动在哪里，那么在通常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个体对象……是不合适的”（Haug 1983，第 11 页）。小组才应该是研究的对象，记忆构成材料；一个集体过程取代了“测试领导者”和“测试对象”的层次结构。

记忆场景被当作叙事而被阅读。与

维果茨基类似，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1992）将叙事视为“正常思维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基本过程。学会说话就意味着学会讲故事”（第39页）。我们和他人交谈的方式，与我们自己将生活中以及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和经历（在记忆中。——译者）的反映方式是一样的，即我们如何反映自我的方式（人们会将自己的行为和经历反映到大脑，形成很主观的记忆。而当我们向别人讲述时，提到的其实是这种主观性的自我反映，未必是客观角度的行为和经历。——译者）。

以第三人称写作的方式，用异化技术抵消了那种意识形态神话般的书写自传传奇的冲动。（自己的）传记促成了一种与自己的虚假一致，从而掩盖了社会的自我：已经过去的事情被诠释为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先导（传记中的自我过于主观，社会性的自我才是客观的。即在社会中保持过去和未来的连贯性，才是真正的自我。——译者）。这种意识上的连贯性主要是会防止小组中的个人政治化（倾向），也有助于避免某种心理化（倾向）。

以书面的形式，“我们走出去，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公之于众。……我们不是有意识地放弃日常生活，而是再次将它们掏出来，并从中找到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的点”（Haug 1983，第12页）。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哪些点没有达成目标。对记忆场景的分析试图揭示所描述的动作和细节中的社会意义，并重新打开人们获得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解构（或对建构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女性创造意义的方式、抵制霸权和统治性话语实践的方式都能被展示出来并加以讨论。每一段记忆都经过了陈词滥调、 736
惯用语、隐喻和文化束缚的审视。

隐喻指向隐藏的意义，因为“不在场的”东西意味着问题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陈词滥调是对坚持走应该走的路的自我谴责。无论如何，它们都是理解的障碍。”（Haug 1983，第33页）克劳福德（Crawford）等人（1992）发现从“显而易见的（问题）”进入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被排练好”的记忆：“它们圆润流畅，没有一丝矛盾；它们的含义浮于表面”（第45—46页），避免了差异和矛盾。对于文本的处理使研究人员能够进行不下定论的干预。

说到底，记忆工作还是取决于支配该领域的学术理论。记忆材料在其理论框架中试验性地被测试和被理论化，同时也使这些理论的边界变得可知。主导性学说和小组成员的理解相互对抗，理论知识与维科的“第三类知识”（参见Shotter 1993）被放置在一起——例如，关于成为女人、母亲或妻子的知识。克

劳福德等人（1992）根据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情绪的部分，以及对日常情绪的理解，重新讨论了记忆。记忆工作带来了理论的发展，包括对理论的批判性阅读。这些解构有助于使常见理论中不成文的假设变得明确；而个人在这些理论中了解自己的方式也是如此。“隐藏的”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记忆工作变得可见。

当记忆工作能够带来改变时，它是令人愉快的。但它也会带来动摇和不安，进而导致失衡。已达成的“共同”理解并没有被真正地统一起来；意义本身必然是多重的。比如在克劳福德的小组里做“假期”回忆时，小组内对“责任”的理解就有争议。年轻女孩以被赋予责任为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成年女性认为，为确保每个人都享受假期而“担责任”是很烦人的（1992，第143—144页）（克劳福德的原文中提到，在女孩和成年女性的记忆中，提到假期都会想到做家务。但作为女孩，会因帮忙做家务而感到骄傲；成年女性却认为享受假期的前提不应是承担这些责任，妇女应该和男人、孩子一样都有享受假期的权
737 利。——译者）。同样，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1989）也提到，快乐与痛苦、自主与分离总是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差异并非总能解决，但差异和冲突构成了记忆工作的核心。

集体记忆作品“具有将来自意识形态、语言、日常生活、理论、社会和文化的批评结合起来的优点；它的缺点是，作为组织者的女性社会学学者，需要在架构、组织、理论和意识形态等尽可能多的领域具备知识，同时，作为女性学者，她们还必须在经验层面上表现出平等（态度）”（Haug 1994，第655页）。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矛盾。在同一小组中的地位差异会扼杀与意义相关的争论和斗争。然而，经验丰富的女性学者的在场是必要的。在记忆工作的小组中，基于性别考虑（Crawford等1992）的情绪建构被加以研究，因此小组里有更多的女性心理学家。研究小组（就像研究女性“沉默”的史蒂芬森[Stephenson]一样）也成立了一个男性记忆工作小组，以便进行比较工作。

口述历史、传记研究或叙事心理学等方法同样关注文本，因为自我构建的隐藏过程可以在文本中得以阐明。但它们不依赖集体记忆和集体分析方法。它们不仅使得对（文本）意义的商讨空间越来越小，而且还让收集案例的治疗师和案例研究的发起者继续控制着（对文本的）解释，或许“叙事心理学”能避免这种情况。关于“现存的传统”的争论应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主体间性和话语定位则受到治疗师—患者关系和受访者之间关系的限制。

许多记忆工作的主题已经在自我经验小组（即意识提升小组）中讨论过，在这些小组中，女性分享了她们从属和受压迫的经历。自我意识小组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女性能够更容易地表达自己的经历，并且女性也能在其他女性的故事中再次认识她们的经历，从而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力量。记忆工作的“介入式分析”（Haug 1994，第650页）也提供了一种新的、集体的
738 理解方式。它使女性能够重塑自己的生活并激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记忆工作将理解置于社会运动变革的文化中。作为个体，女性可能无法抵抗压迫她们的力量；作为集体，当谈到改变她们的处境时，她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强得多。

记忆工作致力于通过改变实际行动而再现女性的被压迫问题，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文化。通过填补记忆场景中的空白和断裂，小组成员开始打破记忆的建构，进而重新思考她们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并加以改变。

许多女性研究人员掌握并改进了“连接”的方法。在克劳福德小组的圈子里，她们对衰老、亲密、羞耻和内疚、儿子、母亲、月经、异性恋和同性恋进行了研究。尤纳·高尔特（Una Gault）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织了一系列关于更年期和“令人厌恶”的情绪（如嫉妒和羡慕）的研讨会。许多参与者继续使用记忆工作（方法）作为研讨会和课程的基础，另一部分人则探讨了它在治疗中的应用可能性。在美国，施拉茨-哈德维奇（Schratz-Hadwich）（1995）在跨文化学习与和平研究的课程中使用了记忆工作。在几乎所有北欧国家的女性研究机构里都有记忆工作组。在德国，记忆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变成了一场运动，来自不同城市的大约40个小组相互合作，并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了年会。当然，在此类课程和研讨会中，不可避免地会丢失部分必要的语言和理论工作，但这种对记忆工作的扩展性理解也证明了它对相关女性是十分有用的。

参考文献：

H. Bay, »Erzählpanzer. Überlegungen zu Ideologie und Erfahrung«, in: ders. u. Ch. Hamann (Hg.), *Ideologie nach ihrem »Ende«. Gesellschaftskritik zwischen Marxismus und Postmoderne*, Opladen 1995, 17–41; J. Benjamin, »Herrschaft-Knechtschaft: Die Phantasie von der erotischen Unterwerfung«, in: E. List u. H. 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rankfurt/M 1989, 511–38; M. Billig, *Arguing and Thinking. A Rhetorical Approach to Social Psychology*, Cambridge 1987; J.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1990; J. Crawford, S.

Kippax, J. Onyx, U. Gault, P. Benton, *Emotion and Gender: Constructing Meaning from Memory*, London 1992; B. Davies u. R. Harre, »Positioning. The 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Selves«, in: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20. Jg. 1990,
739 Nr. 1, 43–63; E.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Sydney 1990; R. Harre, *Personal Being. A Theor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Oxford 1983; d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lves«, in: K. Yardley u. T. Honess (Hg.), *Self and Identity*, Chichester 1986, 41f; F. Haug (Hg.), *Sexualisierung der Körper* (AS 90), Berlin-Hamburg 1983, 3. Aufl. 1991; dies.,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dies. (Hg.), *Erziehung zur Weiblichkeit. Alltagsgeschichten und Entwurf einer Theorie weiblicher Sozialisation* (AS 45), Berlin-Hamburg 1980, ^{3}1991; dies., »Alltagsforschung als zivilgesellschaftliches Projekt«, in: *Argument*, 36. Jg. 1994, Nr. 206, 639–57; dies. u. K. Hauser (Hg.), *Subjekt Frau* (AS 117), Berlin-Hamburg 1988; dies. u. K. Hauser (Hg.), *Der Widerspenstigen Lähmung* (AS 130), Berlin-Hamburg 1986; dies. u. K. Hauser (Hg.), *Die andere Angst* (AS 184), Berlin-Hamburg 1991; dies. u. E. Wollmann (Hg.), *Hat die Leistung ein Geschlecht?* (AS 219), Berlin-Hamburg 1993; dies. u. Hipel, Sündiger Genuß? (AS 236), Berlin-Hamburg 1995; J. Henriques u. a., *Changing the Subject. Psychology, Social Regulation and Subjectivity*, London-New York 1984; J. Hodge, »Subject, Body and Exclusion of Women from Philosophy«, in: M. Griffiths u. M. Whitford (Hg.), *Feminist Perspectives in Philosophy*, Bloomington 1988, 152–68; S. Kippax u. a., »Women Negotiating Heterosex. Implications for AIDS Prevention«, i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13. Jg. 1990, Nr. 6, 533–42; U. Leguin,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London 1992; G. H. Mead, »Social Psychology as a Counterpart in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i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 Jg. 1909, 401–8; C. R. Rogers, *On Becoming a Person*, Boston, 1961;B. Schratz-Hadwich, »Collective Memory-Work. The Self as a Re/Source for Re/Search«, in: M. Schratz u. R. Walker (Hg.), *Research as Social Change*, London-New York 1995; J. Scott,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 in: M. A. Barale u. D. M. Halperin (Hg.),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y Reader*, New York 1993; J. Shotter, *Social Accountability and Selfhood*, Oxford 1984; ders., »A Sense of Place: Vico and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Social Identities«,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Jg. 1986, 199–211; ders., *Cultural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Social Constructionism, Rhetoric, and Knowing of the Third Kind*, Buckingham 1993; L. Stanley,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Necessity, 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6. Jg. 1996, Nr. 1, 45–51; N. Stephenson, S. Kippax, J. Crawford, »You and Me and She. Memory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in: S. Wilkinson (Hg.), *Feminist Social Psychologies*, Milton Keynes 1997; J. Wertsch, *Vygotsky and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Mind*, London 1985.

苏珊·基帕克斯（Susan Kippax） 撰
瓦伦娜·莫姆森（VM） 译为德文
李牧今 译，盛舒洋 校

参见：

Alltagsforschung, Aneignung, Bedeutung, Diskursanalyse,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Empirie/Theorie, Erfahrung, Erinnerung, Frauenformen, Frauenunterwerfung, Ideologie, Kohärenz, Kritik, Materialanalyse, Metapher, Methode, Phrasen, Sinn, situiertes Wissen, Sprache, Subjekt-Effekt, Subjekt-Objekt, symptomale Lektüre, Text, Wissen

认识（Erkenntnis） 740

A: ma'rifa.

E: knowledge.

F: connaissance.

R: poznanie (познание).

S: conocimiento.

1.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反对纯直观的唯物主义，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问题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MEW 3，第 5 页）。如果说在直至今日的唯物主义中，思考现实性的概念而不分别考虑相应的人与自然的社会具体冲突，那么在唯心论中，活动也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同上）。与此相反，被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对象性的**活动”（同上）这个概念，则克服了直至今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这个片面化的前提。

对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马克思的思想来说，资产阶级社会是作为既定的、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总体来理解的。在这里，思维只有被理解为这种作为它的前提的、作为“思想具体”（*Einl* 57，MEW 13，第 632 页）的总体的“再生产”时，才能获得客观真理性。这样一来，对马克思来说，范畴不是像

在黑格尔那里首先是思想规定性，而是“这个一定社会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第637页）。就像关于资本关系的分析一样，思维也是作为这个社会总体的现实性的、思想性的再生产，也即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解剖”（第636页）来理解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最简单的范畴在此是一般的从而也构成意识形态的理论的范畴，是一种相较于早期社会形式得到广泛发展的总体的意识形式。于是，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性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第635页）。就此而言，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法则可以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重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第636页），它带有早期关系的形式。

《资本论》试图对刻画资产阶级社会特征的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性重建的总体分析（资本的生产、流通和总过程）；这种分析的“一般前提”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MEW 23，第374页）。
741 如果说这一生产方式的标志是价值规律和以私人占有物质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对活劳动的支配，那么与此相应，个人就在物化的意识形式中活动，据此，对个人来说，“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即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第87页）。如果说对于马克思来说，涉及无产阶级角色的解放等同于这种生产组织的解散，那么这种可能性形成于这种生产组织的矛盾性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不同于黑格尔那里被理解成的“逻辑的事物”，而是这种特定的“事物的逻辑”的特定表达（*KHS*，MEW 1，第216页）。

2. 和马克思不同，当恩格斯说到“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宣称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LF*，MEW 21，第275页）时，他把认识的问题最终等同于宇宙从哪里开始的问题。思维被等同于精神，存在被等同于自然，这样一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便被区分开来。如果自然、物质相对于精神被当作本原的，那么我们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客观导向的，也就是“能认识现实的世界的”或者“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同上）。于是，对于恩格斯来说，“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第277—278页）。这里终究必须在物质自身里面假定能产生精神的潜在性，由此，唯物主义成了一种万物有灵论。

与此相应，列宁参照黑克尔（Haeckel）强调，我们可以“认为，在‘物质大厦的基石’中……存在一种和感觉相似的能力”（*ME*，LW 14，第37页）。这样一来，以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为标志的

反映论，便现实地以作为认识源泉的外部世界在意识面前的优先地位为起点，最终在本体论上得到支撑。就此而言，实践只是“认识的客观性的验证、标准”（*PH*，LW 38，第 202 页），尽管另一方面，在关于黑格尔观点的摘录中，列宁认为“实践……高于（理论）认识”
742 （第 204 页），从而“**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第 207 页）是必要的。这样一来，某种具体的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开端便由于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而被放弃。

3. 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新批判论的解释中（Staudinger，Vorländer），康德的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在伦理学中被建立起来，而另一方面，坚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的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的理论用社会先验的概念进行了以康德为导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奠基，这和对认识论问题本身的相对实证化相对应（参见 Kerber 1981a）。卡尔·考茨基也主张这种实证化，对于他来说，马克思主义成了一种“伪自然科学的发展形而上学”，而且“试图……建立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发展共同遵守的规律”（Matthias 1957，第 159 页；参见 Kautsky 1929，Bd.2，第 630—631 页）。这种普遍的发展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导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一种非辩证法的发展信仰”，这种信仰让“社会主义的实现听凭”各种关系的“支配”（Matthias，第 165 页）。和这种自然主义不同，伯恩斯坦（Bernstein）的修正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在原则上无法完成的伦理任务，即康德意义上的规范性观念，而对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可以归结为它的某个特定的部分。回到康德和对马克思理论的实证化相互呼应。

4. 与此相对，同时也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官方列宁主义相对，由柯尔施、卢卡奇和——在更广泛的方向上——葛兰西开展的重新表达，更明显地与马克思的总体分析从而和这种分析的批判的、革命的内容相关。对于柯尔施来说，作为资产阶级哲学特征的“理论与现实的严重脱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得到了克服，“在黑格尔通过他提出的‘辩证法’已经为这种克服做了准备之后”（*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第 151 页）。卢卡奇表明，认识论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像康德接过这个问题一样，是物化的表达。在卢卡奇看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德国唯心主义的运动方向遭遇了由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普遍化设定的 743
某种思维和存在的社会限制，而这种限制只能——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理论的认识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达到顶点——借助于（被理解为历史本体论前提的）作

为社会进程的同一主体—客体的无产阶级通过社会的自我转变才能被扬弃。在此，辩证法指示“走出资产阶级社会”（*GuK*，第 164 页）并成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中介。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认识问题是在与自我保存的概念的关联中，作为资产阶级意识的贯穿历史的形式登场的。在这里，社会原则上缩减成一种物化的关联、一种错误的总体。然而，在这方面，认识批判家也处于困步于这种关联的危险中。在坚持认识论批判传统的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那里，与马克思的总体分析相对，认识批判的问题被局限于交换抽象（Tauschabstraktion），从而在原则上是有悖于马克思的，是去历史化的。

与较老的批判理论相反，交往商谈理论认为——这里援引在哈贝马斯看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关于个人的生活世界的、互动沟通的方面和物化的、工具体系的方面脱嵌的命题——由体系化的控制工具（权力和金钱）对现代生活世界的侵犯引起的物化日益增加，但它还不足以描述整个社会的特征。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理论研究的焦点也相应地“从认识的工具理性转移到了商谈理性”（1981，Bd.1，第 525 页）。但反过来，在脱嵌命题中隐含的对这里所谓的“生活世界”和“体系”的肯定，本身也要经受以马克思的总体分析为导向的社会理论的批判。

如果说在交往商谈理论中，主体概念就像它被呈现的那样，是通过提到某种在超验—经验的意义上理解的主体间性概念而得到探讨的，那么它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导向的马克思阐释那里，就被完全消除了。马克思主义几乎被定义成实证的科学；对来自某些特定 744
的社会关系的科学的、哲学的对话的演绎——这些关系还决定着对话的特征——也不复进行了。尽管在马克思所阐发的活动概念的意义上，生产在它的物化形式中还一直包含着特定的主体结构，但这个维度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阐释中却被隐去了。

参考文献：

M. Adler, *Das Rätsel der Gesellschaft. Zur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Grundlegung der Sozialwissenschaft*, Wien 1936; Th.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 1956; ders.,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M 1968; der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Frankfurt/M 1981;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

auffassung, 2 Bde., Ber; in 1929; H. Kerber, *Transzendentalismus und kritische Gesellschaftstheorie. Zur 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Begründung der Marxschen Theorie durch Max Adler*, Osnabrück 1981a; ders., »Gesellschaftstheorie als Erkenntniskritik? Zur Kritik der Marx-Rezeption durch Habermas«, in: W. Kunstmann, E. Sander (Hg.), »*Kritische Theorie*« *zwischen Theologie und Evolutionstheorie*, München 1981b;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1923/1930), hgg. v. E. Gerlach, Frankfurt/M-Köln 1966; E. Matthias, »Kautsky und der Kautskyanismus«, in: *Marxismusstudien der evangelischen Studiengemeinschaft*, Bd. 2, Tübingen 1957; A. Schmidt (H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A. Sohn-Rethel, *Warenform und Denkform*, Frankfurt/M-Wien 1971.

哈拉尔德·克贝尔
（Harald Kerber） 撰
张志超 译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lthusser-Schule, Anatomie,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ustromarxismus, Bestimmung, Bewusstsei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lla-Volpe-Schule, Denkform, Dialektik, Emanzipation, Empirie/Theorie, Empirismus,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theorie,Ethik, Feuerbach-Thesen, Form, Formalabstraktion, Frankfurter Schule, Geist,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Genese, Gesellschaftsformation, Gesetz, Idealismus, Ideologie, Innenwelt/Außenwelt,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ategorie, Kritik,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ritischer Rationalismus, Materialismus, Materie, Methode, Natur, Naturalismus, Praxis, Realabstraktion, Revisionismus, Subjekt/Objekt, Theorie, Totalität, Verdinglichung, Wahrheit, Widerspiegelung,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stheorie

认识论（Erkenntnistheorie）

A: nazarīyat al-ma'rifa.
E: theory of knowledge.
F: théorie de la connaissance.
R: teorija poznanija (теория познания).
S: teoría del conocimiento.

19世纪在“认识论”这个名称下，关于有效认识的条件、标准和边界的理解被作为一种专门的哲学能力建立起

来。这个概念在19世纪初之前没有出现
745 (Vaihinger 1876, Köhnke 1981, Gössler 1993)，通过爱德华·泽勒(Eduard Zeller)，这个概念"被提升到了现在的学术地位"(Mauthner 1910，第447页)。与研究知识的现实生产方式(Epistemologie)不同，在康德的后继者当中，"关于本质的科学和认识的原则"(Eisler 1927，第389页)要求在所有的实践研究之前进行判断：是否和在哪些边界内，事实性的知识要求是必需的。"所谓内省的"事物，显现为近代哲学的认识对象(Habermas 1968，第11页)。有争议的是，这个事物本身到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它的问题在于由此给出的批判意识的要求，即作为超越性主题做出判断。康德所提出的代表"理性法庭"的要求，深刻影响了现代将哲学作为职业的理解(Köhnke 1986，Rortz 1981)。康德的认识批判代表了对于社会解放的更为广泛的利益，这种利益对批判理论及其"作为社会理论的认识观念"(Habermas 1968)再次提出了诉求。

1. 笛卡尔通过取消实践—感性的经验以及这种经验把一切确定性建构在思维的自我感知上的绝对地位，论述了随后的认识论的前提。对这个由此产生的问题的讨论，"发生在哲学的基本原则当中，当时被称为'第一哲学'甚至'形而上学'，后来称为认识论"(Diemer 1967，第37页)。

洛克提出了塑造一个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学科的任务("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定性和范围，连同信仰、观念和断言的基础和程度"；Essay I.1，§2)；由洛克开始"出现了普遍理解基础上的真正的认识论"(Diemer 1967，第35页)。洛克把感知的材料作为基本的确定性，并尝试通过研究理解的工作方式来推论：关于外部世界的可靠信息如何产生。康德把"哲学和大众理性的丑闻，即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存在……必须只是作为信仰来假定"(*KrV*，B XXXIX，脚注)视为人类认识不可逾越的限定条件。他通过把感官观察颠倒过来，向"形而上学……承诺了某种科学的可靠路径"(XIX)：保证客观性的"法则"，并不"在我们之外"，而是在认识活动 746
本身。正是由于认识活动构造了认识对象，认识对象对于认识活动来说才是可以认知的。康德为认识论构造了独特的认识对象，他把笛卡尔的反思——对这种反思来说，"重要的不是行动而是认识"(non rebus agendis，sed cognoscendis tantum incumbo；*Med.* I，第11页)——引到"伟大的消除混合的工作"中，这一工作"从理性中去掉感性，从感性中去掉理性，把道德限制在一个专门的领域"(Haug 1987，第105页)。对这种领

域的安排给出了认识论问题的意义：这里要提出的问题要摆脱实践价值，符合感觉的判断以及政治之类的约束。

黑格尔的辩证法摒弃了这种内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二元论，把这种程式，即“在人们认识之前先去了解认识能力……比作人们在下水之前先去想游泳”（*GescgPhil*，III. 3. B；W 20，第334页）。康德“把出于对事物的兴趣而来的认识……归结于自我自身，归结于形式”。然而“对认识的考察只能以认识的方式发生”（*Enz*，§ 10），黑格尔称之为“字面上的认识的‘流动性’”（Schmidt 1969，第8页），他稀释了理论活动和理论对象之间的区别，然而正如同新康德主义的回答，由此导致了“他淹没在众多概念的自我运动中”（Mauthner 1910，第296页）。

2. 黑格尔的要求对马克思很有影响力，即便他认为，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只带来了现实认知的表象”（*KHS*，MEW 1，第211页），马克思从认知过程中实践—活动的方面出发，强调“主观”途径，然而同时也批评了认识论的二元对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反对近代哲学和之后的认识论的构成原则：反对由笛卡尔发起的对于被当作有欺骗性来感知的通感（Sinnlichkeit）的排斥，这种通感应该开启一条通往“绝对”确定性的可靠道路（方法）。马克思把思维重新引向了外部，朝向“通感的人类活动，实践”（*THF* 1）。

因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没有论证任何认识论，而是表明了与认识论前提的断裂。对以前提出的确定性的“标准”或者保证的问题，现在被认为是搞错了。尽管这样，这种情况也并非偶然，即在马克思作品的标题中，没有任何概念出现得像康德所凸显的批判概念一样频繁。

但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摧毁 747
了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识理论家。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从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即便只是相对的）中脱离出来的、去研究认知的源泉、产生和有效性的学科分支。”（Schmidt 1969，第7页）然而实际情况也不是那么清楚，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一唯物的并因此科学的方法”论证所表明的（MEW 23，第391页）：从物质的生活过程出发，并由此发展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由此形式中社会—历史的生活得以展开。**这种从根源上进行重组的方法**禁止从想象出来的原则推理现实。这种哲学批判不仅在其通过从理想和原则的立场来判断现实的规范层面上的推进这一方面受到批判，同时也在其——正如费尔巴哈所述——通过把“神圣化”

的原则简单归结成“物质”现实来进行还原（reduktiv）论证的方面受到批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出现的方法论反思，当它包括这种哲学批判维度时——哲学的论证本身在其（统治形式的）前提上被质疑并通过这一角度被理解——就不再是传统的认识论。用这种方式，哲学的论证就获得了不再是形式的、与现实对立的批判维度，而是物质的、内在于社会并且在各种存在的关系中自我运转的批判维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不需要为自己‘奠基的’认识论立场，它的‘立场’就是其自我实现。”（Schmidt 1969，第 7 页）在批判中所采用的立场以及社会主义的解放角度本身（参见 Haug 1973）被马克思从它的社会的实践领域中发展出来，并随后把它的联结置于各种相互关系中。一个外在的、在这样分析和重建之前就采用的“基础”立场，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意义。虽然马克思严格区分“本质”和“现象”，在他那里这些区分并不是建立在对欺骗性感知的之前方法论上的排斥，而是产生于认识对象的结构。

欧根·杜林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和对马克思的攻击，创造
748 了一种恩格斯“必须服从他在认识论整个领域”的敌对意见的局面（MEW 20，第 81 页）。他引领了以辩证法的名义、作为形而上学批判的论争，这种辩证法“在事物及其概念映像的相互关系、联结、运动、出现和消失中加以理解”（第 22 页）。然而他由此把辩证法带到了这样一个处境，在该处境中，辩证法作为普遍的本体论在其自身之中摒弃了形而上学：“自然是对辩证法的检验。”（同上）这种对辩证法概念的过度拉伸对于主流方向来说是不必要的：反对作为某种“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存在和自然的对立面的”、非历史的、“自然主义的”“意识”或者“思维”概念（第 33 页）；反对采用在历史现实之外或者之前的逻辑基本形态的柏拉图式逻辑主义，无论这种逻辑主义所采用的基本形态是认识论的还是辩证法的产物。根据恩格斯对这些观点的判断，杜林认同“这种迷信，这种‘基本形态’或逻辑范畴在其所被‘应用’的世界之外或之前引领了一种神秘的存在”（第 133 页）。

因为恩格斯（马克思也同样）把哲学等同于形而上学，他也就中断了一种特定的、从总体上拒绝哲学的哲学理论形态，这种拒绝被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认为是不成熟和错误的。恩格斯似乎干脆把思辨哲学的环节简单地重新命名为“科学”；因为他把辩证法作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运动法则的科学”而放到了哲学的位置上（第 132 页）。然而这无非是一种并没有被如此命名的超级哲学并且由此也排除了批判

性反思。

在19世纪末期，恩格斯对突然得到重视的认识论领域给予了与第一次无法简单比拟的、第二次成功的推动。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几乎是操作主义的转向。当《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次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的附录中发表时，恩格斯就对该文如何被理解和接受施加影响：他将“实践”作为真理的证据标准置于认识论之中，而不是去从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上再造的实践关系角度来解释那种有问题的认识论状态（*LF*，MEW 21，第276页）。他反对康德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行动的成功，为我们的感知与感知对象的物的本性之间的一致性提供了证据”（MEW 22，第297页），并通过“对于布丁的论证就在于食用”的大众格言来对其进行进一步论证（第296页）。

749

3. 为了确保工人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可以参照的理论“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中的认识论显得很必要。在狄慈根和恩格斯看来，认识理论的论述要满足以唯物主义为根基的“世界观”需求。第二国际中这种认知开始分化，因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及其“社会国家”的早期形式中出现的理论与现实的不一致，以及在革命激情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成功实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多地映入眼帘。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stein）要求通过借助康德的理论来进行认识批判上的修正，以便“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致”（Voraussetzung，^{2}1921，第50页）：何处存在其必须被“认可”的科学前提？什么能够保证其对已经转变的现实的“应用性”？哪些形而上学小辫子必须被剪掉？“用别的话说，马克思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培育必须从它的批判开始。”（同上）

由此，伯恩斯坦反对那些反对他的图新的改良主义而顽固坚持“正统”立场的要求。但这些要求也同样必须在认识批判的角度上进行合理说明，而不再只是“存在于一直重复大师的原话”（同上）。

因此奥托·鲍威尔尝试“恰恰用康德的认识批判工具，针对所有的（理论）注水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并把它和社会主义的伦理论证严格区分开来”（W9，第755页）。即便批评康德主义取向的乔治·卢卡奇，也为了“反对毫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论”（*GuK*，W2，第13页）而回溯到“那些理论”，“怀疑这些理论就不可能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61页）。但是现在“方法论”又回到了旧的形而上学的立场上来：“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正

统论……仅仅和方法相关。”（第 13 页）修正主义也同样宣传对其抱有正确的理解。如果说伯恩斯坦在对因果机制的观察中（这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是唯一科学的）看到了这种基础，那么对卢卡奇来说，这种基础则存在于被伯恩斯坦判断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游戏的“辩证的方法”中。

750 对于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来说，“认识论”突然之间成为方向论争的基础，并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成性环节。这带来了一种形式上的约束力，因为相互对立的争论双方都同样需要马克思的“方法”。这个从来没有被清楚地、毫无争议地阐释过的方法，由此成为总是能够引发讨论的相互对立解释的神圣的联系枢纽。

4. 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哲学方面的”晚期作品中（《自然辩证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开创的“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的一致性（*PH*，LW38，第 316 页），在列宁那里联结到了受狄慈根影响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名下。“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答复”蕴含了几乎宗教般的地位。其他由晚期恩格斯给出的方向处理所必需的灵活性的问题，这些方向被列宁作为“认识论中的实践标准”所确定，并要求把“生活和实践的角度”作为“首要的、基本的认识论角度”（*ME*，LW 14，第 132—138 页）。客观主义和实践主义的矛盾仍未被顾及。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那里，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他通过导向主客观的辩证法解决了这个矛盾。对他来说，“无产阶级思想”看起来“作为实践思想是非常实用的”。与此相对，他从中看到了“历史进程的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意义符号：如果对于布丁的证明在于吃，那么布丁就是“把无产大众变成阶级的构建：这种朝着真实性的实践就成了无产大众的阶级意识”（W2，第 217 页）。

斯大林按照同样的针对对立方的原则来解决这个矛盾：在“大转变的年代”，他在农学家面前证实了“理论相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成功的滞后”，他禁止理论争辩，让“理论和实践、哲学和政治之间的裂缝”（Miten 1931，第 330 页）通过构建一种国家哲学而消失（参见 Labica 1986，第 40 页及以下）。这种实践标准“明确”展现出思维应服从于某种异质的存在。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格拉夫·巴勒施特雷姆 [Graf Ballestrem] 语）认为上述观点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间的差异在于：“理论不再通过实践被扬弃，实践仅仅只是理论的真理标准。”（第 90 页）阿尔弗 751

雷德·科辛（Alfred Kosing）用以下论证反驳道："所有别的标准都停留在意识领域。"（1970，第17页）马列主义认识论也同样在意识哲学的框架范围内进行论证，通过寻求思维和现实的"一致性"保证，由此保留了消解行动的反思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哲学得以以传统形式得到表达；然而通过意识放弃自身的独立性并通过信仰的行动与"外部的"事实一致起来的方式，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回归到了一种"临界的"立场。

5. 与第一哲学的传统断裂开来的马克思式的认识论理解只存在于被拉比卡称为"地下马克思主义"的连续不断的暗流中（1986，第113页及以下）。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豪格在**实践认识论作为客观主义的批判**（1996，第47页及以后）的标题下所描述的布莱希特和葛兰西的论述。

5.1 葛兰西使作为唯物主义思考的认识论的核心信条成为批判的对象。他明确反对用布哈林式的教科书在"外部世界现实性"的假定基础上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明确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在大众中很普及（因此列宁要求把这种观点作为他霸权集团的黏合剂），但其中呈现出一种面对世界"如其所是"的被动接受态度，这实际上有一种"宗教来源"，且其中预先确定了统治性关系（*Gef* 6，H.11，§17，第1408页）。就像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建立在这种日常理解的经验的基础上，以便通过其'可笑'来破除主观主义的理解"（同上），相应的天主教牧师的实践也是用这种方式使信徒团结并且服从。

这并不违背列宁对干预认识论的基本关切，即鉴于自然科学的大变革，党的知识分子应注意不能割裂同日常经验的联系。然而葛兰西也指明了恩格斯在认识论中引入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人们客观地克服主观主义的过分张扬时，日常理解就会被从这种努力中排除，而这种努力则倾向于不把"事实"作为不可改变的来接受。葛兰西因此将其反驳的论题建立在被马克思归结为唯心 752
主义的、认识过程中的"活动方面"上（*THF*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在于，这个方面不是处于精神的媒介中，而是在日常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普遍化（并由此消解掉某种特殊"精神"的存在基础）。实践的哲学在此获得了元批判的维度：其暗示了一种对传统认识论前提的批判，这种认识论试图把它的问题从其统治上狭隘的立场中解放出来。

这样葛兰西把存在"一种外在于历史、外在于人类的客观性"的观念带进了历史，并建立了它和物质生活过程的关联。"客观总是意味着'人的客观'，能够准确对应'历史的主观'，客观因

此意味着‘普遍的主观’。”（第 1411 页）这一辩证法应该唤醒一种意识，即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认识”不应该只在思维中确立，而是具体的、实践的或者在日常生活中确立。思维和现实的一致是当前的任务，同时又显现为遥远的结果：这种一致意味着一场“围绕客观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围绕着“人类种群自身的文化一致性”，表明了“分裂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的消失”（第 1411—1412 页）。

只要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的事业重新用认识论的概念阐释出来，他就能够确定，“即使是霸权的理论和实践原则，也有认识理论上（gnoseologico）的适用范围”；因此“在这个领域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伊里奇（Iljitsch）对实践哲学的论述”（H. 10. II，§ 12，第 1264 页；Q，第 1249 页）。应当认为：列宁的认识论意义不在于他对认识论的详尽说明，也就是说，不在于他所说的，而在于他**所做的**：“一个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影响了“意识和认识方法的改革”（同上）。阿尔都塞在他的列宁研究中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1974，第 44 页）。

5.2 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所假定的辩证法中认识论的扬弃，要直面认识论如何摆脱“绝对认知”的情况的问题，通过这些绝对认知，黑格尔主义相信能够“克服这样的认识论批评”（Habermas 1968，第 18 页）。恩斯特·布洛赫在他 20 世纪 50 年代的莱比锡笛卡尔讲座中打磨了“认识论之刺”，“从物本身转到 753
对物的认识、方法或者理解工具上”（第 34 页）；他通过“主观因素”重新强化了认识的工具论理论。

相对于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称为一场“认识论革命”（1997，第 47 页），在布洛赫《希望原则》（*Prinzip Hoffnung*）中对命题的重新归类（第 19 章）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按照 5—1—3 的顺序被看作“认识理论部分”，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被看作“理论—实践—部分”。不管怎样，因为哲学的讨论此前还没有在认识论这个标签下成为专业的讨论，马克思在此之前（*avant la lettre*）所推动的认识论前提的革命化就已经提出下述问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它可以获得“认识理论”的身份，而不是对认识论的决定性内容的批评？

5.3 布莱希特提出的“认识必须首先是语言批判”（GW 20，第 140 页）的要求大约在 20 世纪时得到越来越多的接受，同时对立的哲学传统也提出了同样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来说，进行语言批判分析对黑格尔、斯特纳（Sterner）或者鲍威尔的关键的或者“逻辑上”构成性的阐述是必要的；哲学

理论应该被当成活动来理解，并从“真实的生活”出发来分析（而不是相反）。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中，马克思重新运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方法，突出了语言批判。

和葛兰西一样，布莱希特把映像现实主义（Abbildrealismus）从认识论的基础上转换到行动的基础上。根本问题不是意识是否是被映象出来的，而是人造的或者哲学的作品是否维持了一种与现实的“幻象”关系——努力“赋予假象一种最高程度的真实”（GW 16，第 523 页）——或者它是否提供了“可行的映像”。正是由于后者，“那些支配生活过程的整个进程的法则才变得可见”（第 520 页），它在用现实的素材进行的（思想或者情景的）实验中能够被认识。“人们通过改变事物来认识事物。”（第 20 页，第 172 页）

“那些对于认识理论问题的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维和行动、‘思想产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等等巨大的分离，被布莱希特当作了认识理论问题的研究对象，但这一基础并不会陷入认识理论的意识之中。”（Haug 1985，第 84—85 页）“认识过程”（第 20 页，第 140 页）是物质的生活必
754 要性，不能在直观的隐喻里（作为“理论”）来论证，而且绝不是人类特有的并体现思维的特权。“树对人类的认识至少像对二氧化碳的认识一样。”（第 139 页）在关于笛卡尔和康德的笔记中，在与立场相关的效用和隐含的前提的角度上对“与行动完全分离的认识”进行了询问，以便使得认识可以被检验和判断（第 132 页）。联想到那些使得充满兴趣的立场变得可能的干预性的思想，作为语言批判的认识自身也成为某种充满兴趣的建议。非幻觉认识的产生地点不是在头脑中，而是在（把单个的头脑在自身组织起来的）集体的建议之中。哲学作为关于行为的学说“必须得有某种姿态”，这种姿态体现于“充满兴趣的矛盾之中”。“同样的姿态也被用来处理旧的认识论问题。”（第 127 页）

6. **批判理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通过阿多诺的论述提出了反对：哲学上的认识论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权力起作用的，也即承担着异化的社会化功能。阿多诺感受到了认识论占统治地位的、起源哲学性的观点，并将认识论的观念重新进行了否定性的表述：“当认识论将自己想法的不可能性纳入考虑之中以及在它的每一步骤中让事物的不足本身来加以推动，认识论是真的。然而当认识论自负地声称它是成功的，并且它的构成及各种疑难概念总会和日常现实对应时，它就不是真实的。”（1956，第 33 页）这样的话，认识论就会成为某种把关于推

导的强迫性的思维从原则中解放出来的实体，某种与第一哲学的概念是在原则上相互矛盾的哲学。

阿多诺在这里的思考对象是胡塞尔的现象学。阿多诺反驳了胡塞尔现象学中不再把现象学当作认识论的要求；然而对真理的干预是以其海德格尔式的转向为目标的，这种转向使得近代哲学中的起源哲学的成分转为反对其中的自主思维的被认可的可能性，而这种自主思维不再被要求坚持某种实体化的公共精神。阿多诺按照严格范畴的角度对近代思维传统进行了评价（“起源哲学的科学形象是认识论”；第30页）。他通过与他所处时代的哲学事业中令人压抑的趋势否定性地保持距离，而试图获得这种可能性。

阿多诺还把认识—“过程”的法律形式的表达固定在后期的诸如现象学等
755 的修正上。“胡塞尔的表达方式例如完成——合同的完成、证据——证据的组成部分、判断——对过程的判断，类比于某种普遍的法律关系而意外地构造了认识论。”（第33页）阿多诺从中看到了一种对应于某种“信用体系”的债务联系的拟古思维：“在一个从来没有完成的，因而从本身来说无止境的、毫无出路地不断重复的合同构造中，对第一存在的神话最为启蒙了的认识论也参与其中。”（第34页）认识论的元批评“向认识论呈现了这种转变，并促使其自身接受从社会中获得的观点，即等价不是真理、合法交易并非公正。社会的真正生活过程是……逻辑心态的核心”（同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本应该最先对逻辑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公式的“物质”形态以其挤压式的社会内容进行解密。

当把同等价值物的归类过程回溯到商品交换时，阿多诺的判断受到了索恩-雷特尔的影响。认识论的元批评通过把这种过程同时反映在古代的债务联系中，其自身就进行了起源哲学式的论证。它必须忽略以下情况，即通过在第一哲学中的解放性时刻的突破，认识论得以产生。因此这个模棱两可的事实，即思维“使得自己独立”——“转向主体”——迫使导向了某种特定的否定（参见布洛赫的祷言“认识论绝不是唯心主义”；*Leipz.Vorl*，第34页）。

作为与阿多诺相反的一极，哈贝马斯尝试在近代认识论自身传统的内部，重新获得社会批判的维度。这暗示了近代对康德的重新回归。康德明确地将他的认识论批判的政治维度表述了出来，而政治维度这一点让后来的认识论很难猜测得到，即它用于确保一个自我形成的“市民”社会中的沟通原则。

对哈贝马斯来说，这是关于重新赢回得以维持其自身的、对资本主义

权的认识论批判活动所具有的意义。然而这误解了阿多诺所坚持的、对于这种意义的主导性观点的批判。康德也同样谈到了这个维度。当时他向统治阶层建议，他们可以“在批判的可靠立场上”平静地旁观争论：“在这种辩证法中没有任何你们可能会忧虑其产生原因的胜利”，然而“理性已经从自身出发通过理性……被限制和保持在界限内”（B，第 775 页）。

756 阿多诺在**认识论的元批判**中重新强化了这个维度。然而哈贝马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想法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很好地得到扬弃。他“只是把绝对唯心主义已经充分实现的东西再一次”确认：“为了从对它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普遍科学而对认识论的扬弃。”（1968，第 86 页）马克思“认为对于社会理论的认识批判性的合理化说明……是不必要的”（第 62 页），他陷入了自身的、针对黑格尔所建立的非批判性的“实证主义”的裁决（*Ms* 44，MEW 40，第 581 页）。这种学派奠基性的判断，意味着与社会批判的经济批判论述形式的中断和对康德近来的重新回归，康德在形式上建立的认识论批判通过语言分析被重述。关于马克思随着转向“现实的、实证的科学”而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想法（*DI*，MEW 3，第 27 页），在马列主义没落之后，在其映像理论式构建起来的认识论（这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出现）的失望的追随者中找到了论证（Sandkühler 1990）。

7. 路易·阿尔都塞把“构成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基石的‘认识论观念’”，归类为“异于马克思主义的”（1975，第 143 页）。它的位置属于某种“理论化实践的理论”（*DKL*）。它应该研究“理论性的生产方式”本身，其关键性、决定性或者合乎真理性正式立基于这种生产方式之上。由于对于阿尔都塞来说，这种决定性又是由马克思设定进程的概念体系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不管所有互相对立的断言，这里也贯穿了一种对马列思想的潜意识的黑格尔主义的附属性。

然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决定性的意义上和康德联系在一起：他在“实际对象”和“认识对象”之间进行了区分，并使得理论性的实践对其对象的构造被广泛接受。他由此能够援引《〈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那里马克思赋予了理论在构造要调查的“实体”时的积极角色。然而，马克思主义对“客体形式”（*ThF* 2）自身的批判并不在关注之内。在这种批判看来，理论性的实践产生自理论的迷雾中，并对立于其实体而出现。这就重新提出了思维如何确保其实际性的问题。阿尔都塞的回答是：“在特定的科学实践框架内作为

认识的科学断言的有效性，通过对一些
757 特殊形式的操控得到保证，而这些特殊形式在认识的产生过程中确保了因素的存在的科学性。”（第 90 页）这个回答引发了关于保证的问题，这一问题之前还被作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加以判断，却出乎意料地重新取得效力，并由此存留在认识论的残垣断壁中。

在阿尔都塞看来，认识论的“意识形态问题”阐释的是（1）可视的隐喻性，其与（2）经验主义关联在一起，即关于“特定在的”客体的想象；这与（3）**本质主义**相关，本质主义服从于事物的核心，它要求作为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并使得以“认识”为名的效应得以产生。正如阿尔都塞所展示的，这是“资产阶级”认识论从来没有摆脱的宗教想象。同样（4）由于思维和现实的脱离，出现了关于保证的问题：认识论应保证它们的一致。

总体来说，阿尔都塞认为认识论的意识形态内容之所以被确定，是通过以下方式，即这种形式的思维“通过其他的实体而不是认识自身的实体”（*DKL*，第 72 页）来让它的问题来预先确定，也就是使其服从于社会的权力。阿尔都塞运用拉康（Lacan）的心理分析，把在外部权力中有代表性的实体中对主体的认可（承认［Anerkennen］/误认［Verkennen］/重新认识［Wiedererkennen］）的过程理论化了。“意识形态的认识效应，由于它在映像关系中的重新认识和误认机制，而和科学的认识效应不同。”（第 89 页）

被阿尔都塞描述为“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代表了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映像现实主义（Abbildrealismus）。恩格斯在“前批判的”—经验主义基础上建立了这一传统，而这一传统还无法确认阿尔都塞这个反对者。阿尔都塞为马克思的认识批判的新读物而使之变得富有成果性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哲学路线，以及对于巴什拉的心理分析所激发的科学哲学的回归，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毫无疑问是非常富有成果的（MEW 19，第 371 页）。认识论的标签与作为“资产阶级”而受到抵抗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而完全在认识论理论前提下开展的或者附属的“马克思的哲学”，却并没有在这个标签下被提到。批评对于“外部世界真实性”的客观想象（参见葛兰西的相关笔记）并对“主观的”构成过程进行分析的康德主义传统则继续被屏蔽。

最终阿尔都塞把构成理论的视角和 758
唯物主义的信条（承认客观真实性、外部世界、物质）联系起来，以便确保“理论性的实践”继续坚持“唯物主义”（以及确保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哲学”的解读与党一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由此保留了在康德传统内的资产阶级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即对各种可能意见在不同领域中的合法化标准的遵守做出判定。然而，如果可能的话，只有抛弃映像现实主义而保留对其认可的基本前提，“认识论的批判功能作为意识形态警惕性的一种形式”（*KWM* 2，第 311 页）才得以确保。因此在阿尔都塞学派内甚至会考虑，参照列宁来思考“没有镜子的反映”（Lecourt 1975）。

8.“回到康德”的口号允许学院哲学，鉴于 19 世纪开始的在“经验领域”出现的规模化生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重新将着眼于产生概念的认识纳入自己的范畴。随着被称为“认识论”的专业学科的新建立，方法论的讨论避开了实践研究。新康德哲学家的专业能力局限于去反思各种可能的学术研究对象的构成前提。认识论以这种形式把握了客观观察（对应该源自“规律”和“解释”的自然科学来说是规定性的）和通理的共通感（这对“人文学科”是必需的）之间的区别。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影响下，专业性推动的认识论致力于促使“**客体或认知**的形式”（*THF* 1）在研究中得以保存。作为替代，则只允许建立在“主观”想象基础上的认识产生方式。任何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联系都违反了**价值中立**的设定，这一原则被深受德国西南部新康德主义影响的马克斯·韦伯写进了学术的资产阶级法典之中。

认识论因此得以保存了很多形式，在这些形式中，理论性的实践被归类到社会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中。这些形式在康德的意义上作为“边界警察”起作用。如果人们认同罗蒂（Rorty）（1981）的哲学批判，那么康德主义的范式就继续保持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态，即便认识论的标签不再如同在 19—20 世纪的转折时期那样作为哲学官方的 759
第二名称成为时尚，同时认识论的意识哲学前提在语言哲学上得到更新。

比罗蒂在此处意识到的更甚，像语言哲学一样对于传统认识论的重新表述从内部瓦解了认识论的根基性要求。学科哲学（Fachphilosophie）提供了某种毁灭性的图景。不再存在作为与知识的分支相呼应的根源性科学的认识论。“在现代意义上，认识论本质上由逻辑学、语言哲学、广义的科学理论和阐释学等分支领域组成。”（Mittelstrass 1980，第 577 页）第一哲学的位置继续是空的。如果认识论的权威因此被分割了，但其权威也同样以此方式得以保存，那么其权威就受到专业学科的质疑。心理学理论的成功如皮亚杰（Piaget）（1973）的“基因认识论”或者由生物学中概念化产生的“进化认识论”（Vollmer 1975），被

评价为“某种发展的症状”，“其中，哲学认识论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专业能力变得越来越不自信”（EE，第776页）。

根据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1976），单一学科门类的产出应当摆脱所有它们本就从未遵守的义务的约束。当理性的法庭允许此法则（“一切都行得通”）通过时，却对它所赋予正当性的东西视而不见。因为事实上研究想要摆脱的那些强迫并不是由认识论本身施加的。根据经验来说，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评估强迫、成功强迫以及其他类型的强迫的市场上都行得通。与此相反，“认识论的批判需求”（EE，第777页）却使得对它的适用成为必然。

在后现代的符号中，对作为规范性论证学科的认识论的分割得以完全实现。一个作为竞争性认知要求的规则实体而出现的学科的必要性，在一个去规则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更为持续性地拥有适用性。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批判汇集了语言哲学、阐释学和实用主义的倾向。他援引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为了有效地创造一种后康德文化的可能性，**他们告别了认识论**，在这种后康德文化中，不再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学科为其他学科提供合法化和论证基础。”（1981，第16页）其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花也得以展现。“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引导我们走向了‘革命’哲学的时代……，他们在其中设计了（人类活动的全景）领域的新地图，在这一新地图上以前起支配作用的符号干脆不再被标注。”（第17页）罗蒂和维特根斯坦“在治疗哲学家认为认识理论是存在问题的观点”（1981，第245页）的过程中，看到了哲学实践的“后康德”式理解。如果“‘认识论’是对某种可以通过治疗手段加以解决的确定性的偏执兴趣的堆积”（第253页），那么解决的途径就在于，“为了寻求问题的答案，病人必须重新经历他的过去”（第45页）。 760

罗蒂通过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映像式代表的俘虏。自古代时期以来，通过对视觉比喻的选择，哲学已经被预先判定，“意识的图像作为一面巨大的包含有各种表达内容的镜子，……并能够通过纯粹的、非经验的方法被研究”（第22页）。为什么这个比喻得以建立，为什么它如此牢固，就像费尔巴哈一样，罗蒂或者海德格尔很少回答宗教性事物的社会产生问题。

“后康德文化”的前景总体上保持着并不明确的状态，因为罗蒂在这个统一的称呼下引入了互相对立的思潮。人们是否应该在杜威（也许也包括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把领域转换理解成把批判能力重新置于日常实践之中？或者是

否应该将其在把意识哲学的基础故意破坏的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使这种独立思维的实体丧失力量？或者在与这些观点的关联中，思维最终是否应当有义务遵守一种起源哲学上阐释的常识，而这种常识呼唤批判精神成为某种秩序？

在罗蒂看来，在认识理论上“建立”的对于真理的要求应当被嵌入以沟通方式加以协调的日常理性之中。这和哈贝马斯的设想正好相反。哈贝马斯的规范性对话理论尝试通过把认识批判的理念引入到按照普遍理性标准相互沟通的公共空间中的方式，重新获得认识批判的理念。如果这种想法符合罗蒂的构想，那么康德主义的文化在其中将会是非常有活力的。哲学思考作为一个规范调节性的、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中促成共识的实体，其地位则得以毫无争议地保持；哲学思考的地位也被完好无缺地保
761 持下来，至少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即对于意识哲学及其语言分析性的更新而言有建构意义的领域（Sphäre）与置于其下的“劳动”领域的分离，而批判的、“建构性”的思维在这种领域之中活动（“互动”“沟通行为”）。

与此对应，马克思式批判概念的现实性可能在于，哲学意识首先要解释自身的社会结构上的条件性，这种条件性必然地区分思维和行动，使理论性的实践独立，并制造想象的反映（Reflexe），而认识论的反思自身首先以这种反映为导向。只有这样，关于思维的理论和对思维的批判才能同时成为关于行动的理论和对行动的批判。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tinomien*[1934–37, veröff, 1956], Frankfurt/M 1970; L. Althusser, *Lenien und die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74; ders., »Versuch über Lenins philosophische Position«, in: Lecourt 1975, 142f; P. L. Assoun, »Erkenntnistheorie«, KWM 2, 307–11; K. Graf Ballestrem, *Die sowjetische Erkenntnismetaphysik und ihr Verhältnis zu Hegel*, Dordrecht 1968; E. Bloch, *Neuzeitliche Philosophie* I: *Von Descartes bis Rousseau. Leipziger Vorles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1950–56, Bd.3, Frankfurt/M 1985; A. Diemer, »Erkenntnistheorie«, in: Das Fischer-Lexikon Philosophie, hgg.v. A. Diemer u. I. Frenzel, Neuausgabe Frankfurt/M 1967, 32–43; ders., »Erkenntnistheorie, Erkenntnislehre, Erkenntniskritik«, in: HWPh 2, 1972, 683; R. Eisler,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I, 4. A., Berlin 1927; P. K. Feyerabend, *Wider den Methoden-*

zwang. Skizze einer anarch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83(*Against Method*, Princeton 1976); C. F. Gethmann, »Erkenntnistheorie, Erkenntnislehre, Erkenntniskritik«, in: HWPh 2, 1972, 683–90; K. Gössler, » Zur Genesis des Namens 'Erkenntnistheorie' im deutschen philosophischen Sprachraum«, in: *Jahrb. f. systemat. Philosophie* '93, Münster 1993, 116–38; J.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1968), Frankfurt/M 1973; W. F. Haug, »Was soll material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in: *Argument* 81, 15. Jg. 1973, 559–73; ders., »Die Bedeutung von Standpunkt und sozialistischer Perspektive für d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 in: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143–87; ders.,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Köln 1974, Berlin/W ^{3}1985; ders., »Die Camera obscura des Bewusstseins, Kritik der Subjekt-Objekt-Artikulation im Marxismus«,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70, Berlin/W 1984, 9–95; ders., »Brechts Beitrag zum Marxismus« (1983), in: ders., »Die Einräumung des Ästhetischen im Gefüge von Arbeitsteilung, Klassenherrschaft und Statt«,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2, Berlin/W 1987, 101–15; ders., *Philosop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S. Hall, »Ideologie und Ökonomie—Marxismus ohne Gewähr«,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Berlin/W 1984, 97–121; O. Kallscheuer, *Marxismus und Erkenntnistheorie in Westeuropa*, Frankfurt/M 1986; K. Ch. Köhnke, »Über den Ursprung des Wortes Erkenntnistheorie und dessen vermeintliche Synonyme«, *Archiv f. Begriffsgeschichte*, Bd. XXV, 1981, H. 2; ders.,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Die deutsche Universitätsphilosophie zwischen Idealismus und Positivismus*, Frankfurt/M 1986; A. Kosing, »Die Entwicklung de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durch W. I. Lenin« (1970), in: Sandkühler (Hg.) 1973, 5–30; G. Labica, *Le statut marxiste de la philosophie*, Brüssel 1976; ders., *Der Marxismus-Leninismus. Ele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Paris 1984); ders., Karl Marx: *Die Thesen über Feuerbach*, Berlin-Hamburg 1997; D. Lecourt, *Lenins Philosophische Strategie. Von der Widerspiegelung (ohne Spiegel) zum Prozess (ohne Subjekt)*,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5 (*Une crise et son enjeu*, Paris 1973); F. Mauthner, »Erkenntnistheorie«, in: der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Neue Beiträge zu einer Kritik der Sprache*, Bd. 1, München-Leipzig

762

1910; J. Mittelstrass, » Erkenntnistheorie«, in: ders., (Hg.), *Enzyklopädie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stheorie*, Bd. 1, 1980, 576–78; M. Mitin, »Über die Ergebnisse der philosophischen Diskussion« (Vortrag in der Kommunistischen Akademie vom 1. 1. 1931), in: N. Bucharin, A. Deborin, *Kontroverse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mechanistischen Materialismus*, hgg. v. O. Negt, Frankfurt/M 1969, 330–91; J. Piaget, *Einführung in die gene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Darmstadt 1980; R. Rorty, *Der Spiegel der Natur. Eine Kritik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81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1979); H.-J. Sandkühler (Hg.), *Maxistische Erkenntnistheorie. Texte zu ihrem Forschungsstand in den sozialistischen Ländern*, Stuttgart-Bad Cannstadt 1973; ders., »Erkenntnis/Erkenntnistheorie«, in: EE, Bd. 1., 772–903; A. Schimidt »Einleitung«, in: ders. (Hg.),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M 1969, 7–17; A. Sohn-R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 Frankfurt/M 1970; H. Vaihinger, »Über den Ursprung des Wortes ›Erkenntnistheorie‹«, *philosophische Monatshefte*, Bd. II, 1876, 84–90; G. Vollmer, *Evolutionäre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 1975; E. Zeller, *Über Aufgabe und Bedeutung der Erkenntnistheorie*, Leipzig 1862.

托马斯·劳格施廷 撰
蔡廷建 译

参见：
Abbild, Abstrakt/Konkret, Althusser-Schule, Analyse/Synthese, Anerkennung, Anwendung, Bewusstsein, Camera obscura, Della-Volpe-Schule, Dialektik, 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Empirie/Theorie,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 Forschung/Darstellung,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Genese, Gesetz, Grundfrage der Philosophie,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apitallogik, Kritik,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Kritischer Rationalismus, Leitfaden, Metaphysik, Methode, Theorie, Theorie/Praxis, Wahrheit, Widerspiegelung, Wissenschaftstheorie, Zweifel

拯救（Erlösung） 763

A: ḫalāṣ.

E: redemption.

F: Rédemption (избавление).

R: izbavlenie.

S: redención.

拯救最初是一个宗教意味浓厚的术语，但并非所有宗教都对此有所谈及，例如儒教中就不曾出现这一概念（参见 Weber，*WuG*，第 290、306、319 页）。然而，在佛教、印度教或耆那教等宗教中却都提及了拯救的观点（第 305、307、319 页）。同样，历史证据也表明，一些已消失的宗教也包含了拯救思想（Eddy 1977，第 344 页）。这里，我们只讨论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拯救。

拯救这一术语的出现最晚可追溯到《新约》中的新造词。它被收录于包含有“解放、救恩、帮助、拯救”意思的“同义词系列”中（Bammel 1958，第 576 页），表达了对结束危急、痛苦等的渴望或希冀。通常，与之对应的是对救世的积极期望或对救世的肯定（参见 Andresen 1966，第 55 页）。和拯救类似的**解放**（*Befreiung*）一词更适用于涉及主观能动和政治的叙述，而拯救则具有更多的宗教内涵。拯救主和弥赛亚两者相互联系（参见 Bammel/Vielhauer 1958，第 579—580 页）：弥赛亚主义“本质上是对拯救主到来的宗教信仰，它在普遍或特定的层面上终止了当前秩序，并颁布了一项有关正义和幸福的新法令”（H. Kohn，引自 Desroche 1960，第 895 页）。耶路撒冷在一些关于拯救的讨论中充当了永恒不变的基点的角色。这座城市被认为是“世界中心”和“与上帝直接联系的地方”（Wilkinson 1987，第 617 页）。由于公元 70 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基督也未再降临，耶路撒冷被越来越多地用弥赛亚启示的方式重新定义：“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2）和“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书》4，26）。

因此，将这一术语利用人类学观点解读为“无处不在的对拯救的关注”在意识形态上与“所有宗教”都“普遍”对“拯救有同等关心”的概括一样（Bammel 1958，第 599 页；相反观点见 Weber，第 285—348 页）。

1. 与通常的含义不同，在希伯来语《圣经》中，这一术语极少出现在有关“崇拜”或“超凡脱俗”的语境中。在《旧约》中，主要有两个动词后来被译为拯救：pdh，经济法律中的自由购买（耶和华在以色列自由购买奴隶），以及 g'l，亲属法律层面的赎回（为组织买回失去自由的亲戚）。制度和法律结构使人们能够从奴隶制、贫困、孤独等之中被拯救出来。拯救在**叙事**（*Erzählung*）中以世俗的、当下的和具体的方式得到阐释（通常与解放一起，参见《圣经》中《出埃及记》的传统）。特别是自公元前 598—前 87 年犹大王国灭亡以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即在不放弃内在世界 764

的前提下，将拯救置于未来。几乎没有人在死亡之外寻求拯救。《旧约》中，解放和拯救常常是互补和重叠的，很难说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单词比另一个单词更优先被选择（Kraus 1958，第586页及以下；Schenker 1985，第609—616页；Schott 1972，第717页）。

尽管《新约》与《旧约》达成了全部一致性，但它仍对某些内容进行了加工。其中拯救（ἀπολύτρωσις，口语中也可用 ἐξαγοράζω，在武加大译本中主要用 *redemptio* 或 *redimere* 翻译）与罪和牺牲有关，特别是在《保罗书信》（*Paulus*）中，它还与死亡相联系。解放一词也受此影响，部分地从社会话语转向宗教话语：从罪恶中解放。《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中对拯救进行了重要的重新解释，将所描述的耶稣事迹明确地表述为独特的历史拯救行为，并着重强调了“灵魂的救赎（σωτηρία）”（《彼得前书》1，9）（Andresen 1966，第103页及以下，第107页；Vielhauer 1958，第582页）。结合这些类似的片段，神学发展出一种钝化的拯救概念。其中，信众希冀着苦痛能奇迹般地解除，而这应是源自上天、发生在来世的奇迹（参见 Hödl 1995）。马克思把宗教的这种功能视为“人民的鸦片”（MEW 1，第378页）。

《新约》产生之时，犹太哲学家菲伦·冯·亚历山德里亚（Philon von Alexandria）在希腊文化的影响下致力于拯救这一概念在宗教个人主义中的研究。拯救成了一种“去世俗化”和“人类去历史化进程中的恩赐”（Andresen 1966，第75页）。

最晚随着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拯救在基督教中被重新定义为排斥概念。一个综合了基督教和异教的拯救和解脱概念随之出现，与之对应的是一种“公开驱逐异教思想”（第163页）的措施。在这一社会历史过程中，出现了“帝国健康本源学”（imperiale Salutologie）（第168页）。

2. 从真实的历史角度来看，拯救这个概念在各种群众运动中都具有意义。在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67—前67年），765
神父玛塔提亚斯（Mattatias）和他的五个儿子领导着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宗教和政治的动机交织在一起。在与哈西德派（Chassidim）结盟中，宗教自由本是首要目标，但在夺回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之后，它却变成了争取政治自由。公元前140年，叙利亚占领下的政治独立得到实现。争取自由的斗争经验“无疑使后来的犹太教中谈到的有关拯救的集体概念更加牢固，但同时又促成这样一个事实，即鉴于对拯救的先知神权主义期望及其拯救历史神学的民族化，宗教批评界草拟了一种实践于虔

诚者圈子内的末日启示式的拯救观念”（Andresen 1966，第62—63页）。拯救锡安人的传说（引自第63页）被刻在硬币上。对于安德烈森（Andresen）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拯救是“世俗化迹象”的表达（第76页），而这点也正是法利赛人和昆兰人所批评的。

同样，在发生于公元66—70年的深受启示期待影响的犹太起义中，人们再次从硬币中发现了“用宗教神权政治的拯救概念来识别政治自由”（第64页）的现象。

在早期的教堂内部的斗争中，拯救再次获得了政治意义：胡斯运动以末日元素为核心，对起义农民来说也有部分意义（Opocensky 1985，第130页及以下；Weber，第333页）。早在这场运动以及在1530—1535年的再洗礼派中（例如来自荷兰的斯特拉斯堡人梅尔基奥尔·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n]和扬·马蒂斯[Jan Matthys]，参见Karasek 1977，第37—40页）就已经能找到有关拯救的内容。

在所有这些群众运动中，拯救成为使解放、使重新振作和获得支持的时刻。但是托马斯·闵采尔的命运表明，当将彩虹解释为上帝的象征，而他本人支持农民一方，盲目地参加决定性的战斗时，这一力量也会导致厄运。

这种辩证法的更复杂的例子在拯救运动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围绕在约瑟夫·魏森贝格（Joseph Weissenberg）展开的运动就提供了一个例子。在魏玛共和国，这一运动启动了合作项目，说明了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圈子里被宗教政治化的人们最初是如何先批评反对“教皇和皇帝”的统治（Linse 1996，第114页），然后反对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最后庆祝“希特勒的胜利”（第156页）并转而归 766
入纳粹。1934年，该运动在与纳粹分子在各自领域的竞争中走向了它最后的阶段。他们被指责为“滥用（纳粹党的）褐衫制服”（引自第165页）。作为“拯救者”和“新救世主”（第126页），魏森贝格让他的追随者佩戴纳粹万字符领带从他身旁列队接受检阅。这是与希特勒的直接竞争。希特勒不仅把自己看作“元首”（Führer），还把自己看作“拯救者”和“解放者”（参见宗教语言资料：Theweleit 1978，特别是第136—151页）。此后，魏森贝格和他的追随者便遭到了纳粹的迫害，部分人甚至被杀害。这个例子表明了一个群众运动所存在的问题，即这类运动深受宗教动机（拯救、启示录、新耶路撒冷）的影响，并指向一种带有垂直式的、等级森严制度的“个人崇拜”。

3. 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

使用拯救这一概念，而且对这个术语的使用也不尽相同。

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关拯救的基本观点已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KHR*）中阐明："**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MEW 1，第385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点（*ThF* 3）对这一命令进行了明确说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MEW 3，第6页；参见Labica 1987，第55—65页）这种思维必须在这里找到它自己的"此岸性"（*ThF* 2）。紧接着，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出现了对自我统一和组织的呼吁。这里马克思谈论的完全是与解放有关的理论和实践，与拯救无关。如果马克思接受拯救的概念，那么这一切就变得极具批判性了。他绝不会"把耶稣描述为上帝之子或拯救主，而是描述为人"（Frostin 1978，第192页）。在他1835年撰写的论宗教问题的高中毕业论文（MEW 40，第601页）中，这种说法被论证为是正确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欧仁·苏（Eugène Sue）的小说《玛丽花》（*Fleur de Marie*），展现了玛丽是如何转变为一位"**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的（MEW 2，第185页）。她只有通过无条件地献身于上帝，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第186页）。"解脱于非人的境遇"只能是"神的奇迹"（同上）。马克思指责克利盖（Kriege）提出的"向宗教谄媚"的观点。他认为，克利盖的出发点并不是"现实的贫困"，而是"充满幸福的幻想"，而解放也会迷失于"关于'永恒救世'的胡说"之中（MEW 4，第12—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767
中批评了蒲鲁东、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体系中潜意识里的拯救思想。蒲鲁东敦促无产阶级实现其"救世体系"（恩格斯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27，第65页）并"走进新的耶路撒冷"（MEW 4，第488页）。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接受"对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但并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因此发展成为"幻想的方案"，简言之，"创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第490页及以下）。

马克思在关于魏特林（Weitling）的讨论中提出了拯救的另一个内容。根据安年科夫的通信记录，马克思在"他的讽刺回答"中对魏特林进行了谴责："煽动人民，却又不为此给出准确的、具体的和深思熟虑的理由，这种行为与欺诈是一回事。""这么做只会导致确定性的

灾难，而不会使受难者获得拯救。”（引自 Frostin 1978，第 187 页）除了极具挑衅的使用之外，深思熟虑后产生的拯救是有可能成为受难者的实际目标的。拯救的这个概念后来在《国际歌》（*Die Internationale*）中被接受：“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Producteurs, sauvons-nous nous-mêmes!”）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深刻地描述了可能引发社会关系革命的剥削、压迫和艰辛的具体情况（参见 MEW 23，第 23 章）。同时，他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对于未来的构想，虽然有些相关的想法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他的这种克制与他对乌托邦式的构想的尖锐评论是相吻合的（参见第 25 页）。

4. 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其与现代工人运动的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起初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放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MEW 22，第 449 页）。两者的区别在于拯救这一参考点。在基督教中，拯救是去往来世的方式，而社会主义则把拯救看作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解放。恩格斯为社会主义退回到庸俗的宗教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即社会主义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同上）。

5. **早期的社会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以“社会经济情况”为出发点，专注于拯救（*ÜHM*，第 243 页）等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他将基督教的发展归因于“那些无产阶级，那些奴隶，那些不幸的人，那些迫切需要拯救、天启和神之国的预言人的努力”；另一方面，如果“社会相互牵制机制”得以科学地实现，那么“奇迹”就会消失，“唯物主义和批判主义”也不必再“向众神宣战”（第 242 页）。一方面，拯救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幻想”，它把“真正的道德看作是受条件限制的东西”（第 234 页）并试图克服；另一方面，“从这个邪恶世界的苦难中得到拯救”的感情完全可以动员“反叛的群众”，正如在“基督教群众起义的伟大系列事件”中所见（*SPh*，第 392 页）。这里，拉布里奥拉提到叛乱者弗拉·多尔奇诺（Fra Dolcinoi）和再洗礼主义者的例子。

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结合，约瑟夫·狄慈根认为拯救与工人“自我思考锻炼”有关，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

"救赎"(Heil):"对于这些想要进行本阶级自我拯救的工人来说,首要需求不在于了解所有事情,而在于对自己的了解。"(3,第70—71页)在这里,拯救再次成为一个需要被创造的东西。狄慈根坚信,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宗教终将完成它的任务,取而代之的是"反宗教的社会民主"(1,第119页;参见第194页)。而社会民主包含了"一种新宗教的东西"(第95页)。它和宗教在"意图去拯救"(第111页)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宗教的目标是"精神上"的拯救,社会民主则是"肉体上"的拯救。狄慈根特别指出,"劳动"(第97—99页,第110页;参见第163—165页)是"人类的救世主和拯救者"(第104页)。本雅明从中看到了"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概念的阐释"(GS I,第699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不落俗套地批判过(参见 *Gotha*,MEW 19,第15—17页;第23页,第26页)。

卡尔·考茨基对恩格斯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Geschichte des Urchristentums*)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将拯救定位于由"在天堂"来到"在这个世界
769 上"在这儿并不适用,因为在早期基督教中,"拯救被认为是源自苦难,是物质的,存在于地球上,而不是天堂"(1908,第124页)。根据考茨基的观点,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期望着拯救,而后者则使拯救得以实现。

1905年,卢森堡在《圣经》和早期的基督教会中认识到解放的传统,并探究其缘由:"工人阶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在教会的仆人中没有朋友,只有敌人。"(*Kirche und Sozialismus*,第21页)她将教会传统上占领的地区归为社会主义者所有,因为他们"将兄弟情谊和平等的福音带给了人民"(第44页)。她关于基督教传统的著作强调了世俗的一面,因此批评了教会与各自统治者的盟约。特别是在沙皇俄国,神职人员被捏造为"金牛犊的侍者"(同上)。卢森堡概括了社会民主人士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他们"无处不在地将复活带给人民,给绝望的人加油鼓劲,给予弱者力量,拨开人们眼前的混沌,展示了解放之道,呼唤人民在世界上建立平等、自由和仁爱的王国。与此同时,教会的奴仆却呼吁各地的人们谦卑、绝望和精神上的死亡"(第43页)。

在关于"属下"(Subaltern)的论述框架下,安东尼奥·葛兰西等在《狱中札记》第25卷中对达维德·拉扎雷蒂(Davide Lazzaretti)进行了研究(§1,Q,第2279—2283页;参见 *Gef* 5,H. 9,§81,第1132页)。达维德是"拉扎雷蒂宗派运动"和"达维德基督徒运动"的奠基人。即使在他被处决后,该团体也没有完全解散。尽管"了解其教

义的要点”（第2283页；第1132页）并不简单，但根据葛兰西的说法，它创造了“一种混合物，其中融合了过去的宗教教义、适量的社会主义准则和对人类道德拯救的暗示。这一道德拯救，只有通过对天主教教会的宗旨和等级制度进行彻底更新才能实现”（同上）。葛兰西描述了在失败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达成宗教妥协，但同时又至少保留对抗教会的抵抗潜力（参见Rehmann 1991，第180页）。

结合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导致钝化、敷衍甚至苦痛和贫困、剥削的拯救概念，
770 从对受难者本身的立场出发，针对宗教和教会进行的、主要关于政治行动能力的精确分析的批判被全面呈现。正如在拉布里奥拉和葛兰西的观点中，拯救仍被视为解放的动机。它不是鸦片，而是反抗者的鼓舞力量。狄慈根开启了通过社会民主填补拯救主题的过程，在社会民主中也可以看出宗教特质。彼得·魏斯以从自由主义者转成社会民主党人的帕尔姆斯提纳（Palmstierna）为例，展示了这位工人领袖如何扮演“拯救者”的角色（1978，第266页）。

6. 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列宁的去世，出现了带有宗教特性的官方无神论辩证法。列宁去世三天后，即1924年1月24日，政治局决定不接纳列宁妻子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ja）及其兄弟姐妹的意愿，执意将他尸体木乃伊化。斯大林也认识到这副“布尔什维克遗骨”的价值（Wolkogonow 1994，第500页）。列宁得到了一个“神圣光环”（第13页），直到苏联解体。1924年，《列夫》（*Lef*）杂志上出现了一则“**不要买卖列宁！**”的呼吁（引自Mierau 1987，第114页）：“我们不要圣像”，“不需要铜制的列宁”，“不要将他抽离于当下的生活和不要带走他的面孔”（第115页）。这个评论没有取得成功。恩斯特·布洛赫也看到了这一点。但在纳粹主义的背景下，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被低估了：“在俄国，农民迎接丰收的节日和列宁的墓碑，教堂被集体的和年轻的象征所替代；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将所有这些政治合作转让给了反动派。”（GA 4，第68页）

斯大林在1924年1月26日关于列宁之死的沉痛演讲中，两次在中心位置提到了拯救。首先，他阐明了“神秘的天空，在那儿工人们希望找到拯救”（W 6，第42页）。而列宁则不以为然，他“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以此向全世界被压迫的群众展示对拯救的希望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不会持久；劳动人民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地上，而不是在天堂上创造劳动的王国”（第42—43页）。在斯大林的演讲中，拯救的讨论

获得了新的意义。因为它不再被称作要创造的东西，而是已经在苏维埃共和国
771 得到实现的东西。这一切再次源于一个人的实践：列宁。在他的灵柩旁，人们找到关于他的遗产的权威解释者。正如斯大林在致辞中赞扬的那样，为了保护这个苏维埃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需的："**列宁同志离开我们时，他留下了保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我们向列宁同志发誓，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诫命**（总共六分点）！"（第43页）在官方赞美中，非常有必要对列宁和斯大林在各宗教中所起到的拯救者功能与地位进行详细的研究。

7.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哲学论纲》（*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本雅明在弥赛亚主义的语境下对拯救及救世主进行研究。论纲第6条阐述了二者的区别："救世主不仅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他还是反对基督的人的征服者。"（GS I，第695页；参见Bloch，GA 14，第156—157页）反基督者的地位会被"统治阶级"取代："要是敌人获胜，即便死者也会失去安全。而这个敌人是不会停止追逐胜利的。"直截了当地讲，这就是"解除拯救思想中存在的毁灭性力量"（第1246页）。本雅明对拯救术语的批判是基于时间作为过程（*chrónos*）和时间作为时间点（*kairos*）的区别之上的。前者是"进步的概念""同质而空洞的时间""历史的连续性""过去的'永恒'形象""名为'从前有一天'的妓女"和"历史主义"相关联（第697—702页）。对于**时间点**，本雅明则用"面临危险时的灵光一现"（第695页）、"危急状态"（第697页）、"当下"、"虎跃"（第701页）和"停顿"（第702页）来解读。这种差异对应了"拯救的概念，即它将是存在，不是成为。这样的拯救并不是进步历史的实现和完成，而是它的终止"（Ebach 1982，第72页）。

本雅明对虚假拯救的第二个批判与他未来愿景中的无偶像论（参见Ebach 1982，第82、87页，注释2）和对"解放此时此地"的强调有关（Konersmann 1991，第42页）。社民党"喜欢将后代拯救者的角色交给工人阶级。它也因此割断了最具力量的肌腱"（GS I，第700页；参见第1246页）。面向"解放了的后代孙子的理想"，而不是"被奴役的前人的形象"（同上）。这种行为不仅将必要的斗争抛在脑后，更是忘记了"过 772
去携带着的那份指向救赎的秘密清单"（第693页）。

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他的《最低限度的道德》结尾处，借鉴本雅明当时未出版的手稿论述了拯救这一概念。他写道："哲学，正

如它是唯一能在绝望面前仍然有理由的东西，总是试图从拯救的角度来观察所有的事物。知识没有那样源于拯救、照亮世界的光芒：其他一切都在重建中耗尽一生，终究只是个机械块。我们必须创造一些视角。在这些视角下，世界进行类似的转变、陌生化，展露出它的缝隙和裂痕。因为有一天它将躺在那儿，在弥赛亚的光芒下，潦倒且残缺。”（GS 4，第281页；参见Boer 1996，第22页）然而这样一种思想“显然不可能，因为它预设了一个脱离存在影响范围的观点，而每个可能的认知都承受着那些它本想逃避的、同样的潦倒和残破的打击”（同上）。与本雅明不同，阿多诺更明显地从拯救的角度考虑思想界限。二者的共同处在于，他们都与乐观的拯救确信决裂，转向一种源自犹太传统、与基督教的表述不太相同的拯救概念。最突出的一点是表明了强调仇恨的（参见 Benjamin，GS I，第700页）姿态。

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早期著作《黄昏》（*Dämmerung*）中，他将“拯救的梦想”（GS 2，第452页）构想为实现跨历史的正义和真理的一种方式。它将以某种方式降临到一个“身处谷底”、饱受“永恒折磨”的人身上，并纠正“错误的形象”（同上；参见第336页）。

在恩斯特·布洛赫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的拯救主题最全面的分析。除了批判“内在”的拯救（GA 4，第129页）和“在罗马广为接受的拯救宗教”（GA 14，第49页）外，对他来说，复辟在法国大革命后本身也成为拯救。他还参与有关《圣经》翻译和释读的争论。一方面，他以约伯（19，第25—27页）为例，批评希伯来语 go'el 这个词的翻译是“拯救者（redemptor）。也就是说，自此，这个词便带有温和的基督教意义”（第156页）。另一方面，go'el 更适合被译为“血亲复仇者”或“辩护人”（第157页）。通过反对将 go'el “低估地理解为‘拯救者’，特别是 773
反对基督教式的文本解读，布洛赫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其颠覆性”（Ebach 1982，第76页）。为了揭露概念推动解放实践的情况，布洛赫揭示了该术语的矛盾内容（参见 GA 14，第206、228、292页）。

迄今为止，解放的希望已被真实的统治和灭绝历史所粉碎。正如布洛赫所强调的那样，“否定他的否定不可能带来不可计数的干扰和破坏”：“整个世界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在这里，不会诞生营救和拯救。”（GA 14，第322页）由此，布洛赫还看到了“隧道的尽头”：“经济和社会的革命一口气将犹太问题从餐桌上抹去了。有列宁的地方，就有耶路撒冷。”（GA 5，第711页）与他的方式相反，自动主义派上了用场（参见第713页）。真实历史情况在苏联朝着不同

的方向发展。隧道的尽头尚未可预见，且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本该是犹太人的家园——用希伯来语《圣经》中的话来说——埃及的奴隶之家。

路易·阿尔都塞以基督教宗教意识形态为例，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主体和隶属的理论。为了“完成拯救（la rédemption）最终准备的工作：基督的复活”，伟大的**主体**（SUBJEKT）神必须使自己成为耶稣/人这类小的主体，以便人们能够看到和感觉到“他们既是主体，并且又臣服于（伟大的）**主体**”（1976，第131页；ISA，第147页）。同时，宗教的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重言式的身份（“你就是你，彼得”[第129页；ISA，第145页]），并为主体安排他们“在世间的位置”。如果他们遵从所给的诫命，他们就会得救（sauvé）。阿尔都塞也在《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中表达了他对拯救和宗教的意识形态与影响的兴趣。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每个科学家**”背后藏匿的“沉睡中或打盹中的哲学家”都会醒来（Althusser 1974，第71页；1985，第74页）。然后，一种终极的精神主义哲学变得活跃起来。它投身于科学，就像某些“为了灵魂救赎（祝词）”，支援临终者的神父一样；这种“救赎宣言就像一个完整的哲学传统”，“除了在意识形态上对人的苦难、病痛和尸体进行剥削外，什么也不是”（同上）。另外，阿尔都塞敦促科学家们“不要信任任何致力于科学的救赎（祝词）的哲学”（第71页；第75页）。

8. **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 774
（新）自由主义一方经常指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宣言”“预言”和“信仰”（参见Popper 1992，第18—21章），并将它描述为一种内在宗教形式。这类批评，无论是含蓄的还是直接的，都关乎宗教领域。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在亵渎神灵，“它让我们尝试在人间实现天堂愿景”，实际上却诱导我们将“我们的美好世界变成地狱”（ders. 1987，VIII；参见1992，第409页）。这种批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潮流，这些潮流将它本身表述为“预言”（Korsch 1932，第28页；波普尔始终只使用柯尔施负责整理的那一版《资本论》），并以这种方式一劳永逸地贬低为争取解放和主观能动而做出的努力。抱着“从天上到地面”的动机，波普尔在纳粹逃离前接受了一个反犹太主义的概念（参见Theweleit 1978，第14、21页）。A.罗森堡（A. Rosenberg）将这一概念比作“真正的犹太梅毒”（引自第14页），H.泽伯莱因（H. Zöberlein）将它与创造“地狱”（引自第21页）联系在一起。

结合波普尔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以《资本论》的“似乎是科学的形式”实践了“拯救的科学”（Yovel 1996，第356页）。马克思仅限于经济学领域，为它的分析提供了“拯救的途径”（第377页；第355页）。无产阶级被称为“革命和拯救的先锋”（第357页）。约维尔（Yovel）没有用任何文字来证实他的主张。他并没有看到马克思是如何对未来计划，尤其对拯救概念持越来越怀疑的态度（第377页）。

更甚于波普尔的要数马克斯·韦伯。他从反犹太层面上对拯救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参见 *WuG*，第300—302页）。在犹太教的“拯救希望”中，他发现了公开的（或苦心孤诣的）复仇渴望。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中，都没有像耶和华这种对复仇有着空前渴望的万有神”。简言之，犹太教是“复仇宗教”的典范。因此，人们移情于统治者和压迫者。当复仇渴望升华时（这是针对他们的），便承认了文明的进步。

9. **解放的神学。**解放的神学出现于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菲律宾和南非。从这一实践出
775 发，这种神学成为一种分析盛行的剥削和压迫关系的工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最初被接受的是具有批判性的趋向，还有葛兰西和马里亚特吉（参见 Gutiérrez 1973，第6—37页；Dussel 1995，第108—114页；Füssel 1985，第200页及以下）。在1984年梵蒂冈宗教裁判所的抨击中，主要目标是对解放概念的割裂：解放首先是“从罪的极端奴役中解放出来”（**指示**，前言）。据称，“宗教经典”经常用与解放非常接近的概念“拯救”来替换它（IV. 3）。解放神学对从具体社会条件和《圣经》著作中同样具体的描述进行抽象化的做法表达了明确的反对立场（参见 Venetz 1985，第80—83页）。因为它把“传统的问题（关于罪恶、拯救、教会、基督学、圣礼等）置于具体和现实的层面上”（Dussel 1995，第129页）。

那些与拯救主题相关的丰富历史表明，低估宗教领域会带来什么后果。对于拯救的合理保留不得妨碍我们针对行为能力和对统治的批判进行大胆分析。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 (1967)*, Paris 1974 (dt.: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Berlin/W 1985); ders., »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in: ders., *Positions*, Paris 1976, 79-137 (dt.: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W 1977); C. Andresen, »Erlösung«, in: *Reallexikon*

f. Antike u. Christentum, Bd. 6, 1966, 54–219; P. Annenkow, »Marx' Diskussion mit Weitling«, in: Frostin 1978, 186ff; F. Bammel, »Erlösungsreligionen«, in: RGG 2, 1958, 599f; ders. u. a., »Erlösung«, in: RGG 2, 584–99; ders. u. P. Vielhauer, »Erlöser«, in: RGG 2, 576–84; D. Boer, »Im Niemandsland«, in: F. Haug, M. Krätke (Hg.), *Materialien zum Historisch-Kritischen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 Berlin-Hamburg 1996, 19–26; H. Desroche, »Messianismus«, in: RGG 4, 1960, 895–900; J. Dietzgen, *Sämtliche Schriften*, Wiesbaden 1911; E. Dussel,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und Marxismus«, in: I. Ellacuría, J. Sobrino (Hg.), *Mysterium Liberationis. Grundbegriffe der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Bd. 1, Luzern 1995, 99–130; J. Ebach, »Der Blick des Engels. Für eine ›Benjaminsche‹ Lektüre der hebräischen Bibel«, in: N. W. Bolz, R. Faber (Hg.), *Walter Benjamin. Profane Erleuchtung und Rettende Kritik*, Würzburg 1982, 57–107; S. K. Eddy, »Gründe für den Widerstand gegen den Hellenismus in Asien«, in: H. G. Kippenberg (Hg.), *Die Entstehung der antiken Klassen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7, 328–50; P. Frostin, *Materialismus, Ideologie, Religion. Die materialistische Religionskritik bei Marx*, München 1978; K. Füssel,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in: P. Eicher (Hg.), *Neues Handbuch theologischer Grundbegriffe*, Bd. 4, München 1985, 200–11; G. Gutiérrez,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Mainz 1973; L. Hödl, »Soteriologie«, in: *Lexikon des Mittelalters*, Bd. 7, 1995, 2060–63; *Instruktion der Kongregation für die Glaubenslehre über einige Aspekte der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Bonn 1984; H. Karasek, *Die Kommune der Wiedertäufer*, Berlin/W 1977; K. Kautsky,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 1908 (Reprint, Berlin/W-Bonn 1968); R. Konersmann, *Erstarrte Unruhe. Walter Benjamins Begriff der Geschichte*, Frankfurt/M 1991; K. Korsch, »Geleitwort zur neuen Ausgabe«, in: K.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32, 5–33; H.-J. Kraus, »Erlösung. II. Im AT«, in: Bammel u. a. 1958, 586ff; 1972, 717ff; G. Labica, *Karl Marx. Thesen über Feuerbach* (1987), Berlin-Hamburg 1997; G. Lanczkowski u. a., »Heil und Erlösung«, in: *Theologische Realenzyklika*, Bd. 14, 1985, 605–37; U. Linse, *Geisterseher und Wunderwirker. Heilssuche im Industriezeitalter*, Frankfurt/M 1996; R. Luxemburg, *Kirche und Sozialismus* (poln.: Krakau 1905), mit Einf. v. D. Soelle u. K. Schmidt, Frankfurt/M o. J.; S. Mercier-Josa, G. Labica, »Utopie«, in:

776

KWM 8, 1989, 1359–64; F. Mierau (Hg.), *Die Erweckung des Wortes. Essays der russischen Formalen Schule*, Leipzig 1987; M. Opocensky, »Die Hussiten eine sozialrevolutionäre Bewegung in Böhmen«, in: D. Schirmer (Hg.), *Kirchenkritische Bewegungen*, Bd. 1: *Antike und Mittelalter*, Stuttgart 1985, 129–58; K. R. Popper, *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 Tübingen 1987; ders.,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Bd. 2: *Falsche Propheten. Hegel, Marx und die Folgen* (1. dt. A.: Bern 1958), Tübingen 1992; J. Rehmann, »Gramsci und die Religionsfrage. Ein Beitrag zum christlich-marxistische Dialog«, in: *Widerspruch*, 11. Jg., 1991, 179–83; A. Sschenker, »Heil und Erlösung. II. Altes Testament«, in: Lanczkowski u. a. 1985, 609–16; K. Theweleit, *Männerphantasien*, Bd. 2, Basel-Frankfurt/M 1978; E. P. Thompson, *Die Entstehung der englischen Arbeiterklasse*, 2 Bde., Frankfurt/M 1987; H.-J. Venetz, »Der lehramtliche Umgang mit der Bibel. Eine Analyse«, in: ders., H. Vorgrimler (Hg.), *Das Lehramt der Kirche und der Schrei der Armen*, Freiburg (Schweiz)-Münster 1985, 77–104; P. Weiss,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 Bd. 2, Frankfurt/M 1978; J. Wilkinson, »Jerusalem IV. Alte Kirche«, in: *Theologische Realenzyklika*, Bd. 16, 1987, 617–24; D. Wolkogonow, *Lenin. Utopie und Terror*, Düsseldorf 1994; Y. Yovel, *Spinoza. Das Abenteuer der Immanenz*, Göttingen 1996.

伯恩哈特·瓦尔彭
（Bernhard Walpen） 撰
肖瑶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ntisemitismus, Antizipation, Arbeit, Artikulation, Aufhebung, Auschwitz, Bedeutung, Befreiung, Charisma, Christentum und Marxismus, christlicher Sozialismus,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Denkbilder, Dialektik, Eingedenken, Elend, Emanzipation, Endlösung, Erinnerung, feministische Theologie, Glauben, Ideologie, Jenseits, Juden, Kritik, Leid, Messianismus, Negation der Negation, Personenkult, Philosophie, Religion, Religionskritik, religiöser Sozialismus, Resurrektion, Rettung, Revolution, Theologie der Befreiung, Tod, Utopie, Verhimmelung, Widerspruch

革新（Erneuerung）

777

A: taǧdīd.

E: renewal.

F: rénovation.

R: obnovlenie, perestrojka (обновление, перестройка).

S: renovación.

直到1989年，“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反复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论题出现。在国家垄断社会主义崩溃，以及与之相关的除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政党垮台之后，革新成了关键词。革新的意义和“重建”一样备受争议。

1. 革新表明一种重制（Neu-Machen），也可以仅表示重建或重复。从语源学角度来看，革新在创新性更新和纯粹的修复性更新之间没有区别。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的语境中，革新已经并且正在以各种含义被使用。因此，“社会存在条件的基本要素革新”也被视为“社会革命”的同义词。在这种语境下，革新将对于现状的质疑与“根本”或“彻底”的改变主张联系起来。这种改变没有借鉴过去的标准，即使在形式上有所改变，也不会引发既定权力和规则关系的重建。

革新对自身确定性的否定和颠覆，不仅仅意味着对现有秩序的宣战。它也可以在约翰内斯·阿格诺里所谓的**从众性反叛**中表现出来（1996，第14—15页）。这种在秩序框架下进行反叛的原型是纳粹。它彻底拒绝了魏玛关系，将自己粉饰为一场革命性的鼎新运动。根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它更像是一种抛光了的、完全恢复活力的旧政权，而不是一种从根本上完全不同的新政权”（1995，第167页）。

另外，从历史意义上讲，革新是具有创造力的。“19世纪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MEW 8，第11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革新承载了必要的洞察力，并且是以新事物的理论构想为指导的社会存在形态的根本变革。它无关“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 778
过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MEW 14，第439页）。

2. 革新或革新能力有时被用来将资本主义的特征刻画为一个现代社会，其特点是它对“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MEW 23，第789页）毫不知情，因而具有持久不断的自我更新能力。所以，革新代表着向创新迈进。“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不使

生产关系和所有社会关系持续不断地变革，资产阶级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不变是所有早期工业阶级存在的首要条件。生产中的不断变革，各种社会关系的不断震荡，永恒的不安定和变动，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MEW 4，第465页）

革新在这里意味着“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不断改变其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能力”（Brie等1997，第27页）。这种现代社会的革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相关，特别是在马列主义传统中，它与商品货币关系，尤其与资本比率联系紧密。区分社会分化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性的出现，但其作为发展潜力的意义却被大大忽略了。“保证这种发展能力的组织内在价值与逻辑（银行系统、法治、自由选举、分权制度等），以及现代社会中社会团体所依赖的价值观（自由、平等、财产等）都被低估了。”（第28页）

特别是在马列主义理论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学观点占上风，这在资本统治的理论绝对化中得到了体现。其后果是，在现代社会中被创造出的政治和文化形式（公民社会）被否定，现实中
779 取而代之的是被国家垄断的社会主义政党。它取缔了在社会领域里出现的任何独立性，以便对其进行一一把控，并以此将社会主体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控制。苏维埃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其自身所建立的党和国家官僚结构，削弱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潜力，而不是发展其可塑造性，并以此解放人道发展（参见Land 1996，第188页及以下）。

3. 在苏维埃和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之始与存在危机的阶段，革新成为敷衍了事和以失败告终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尝试的指导思想。它们通过长期社会变革以克服结盟的国家和政党官僚主义对社会发展潜力的阻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苏联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通过民主化将“改革”（Perestroika，Umbau）作为社会的革新；通过提升议会的权重和政治制度的多元化来打破单一政党国家形式；努力发展更有效的商业组织形式以促进现代经济竞争结构的形成；建立民主的公开性和精神生活的自由（“开放政策”）；通过对斯大林时代的持续批判来摆脱传统理论和实践的束缚（参见Haug 1989）。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反对戈尔巴乔夫路线。在执政党的政治行动可能性因为公开爆发的社会冲突被减弱之后，真正的革新努力才预示到来。统一社会党于1989年11月采取的行动计划（参见Behrend和Meier 1991，第190

页及以下）目标是实现党和国家的拆分、经济改革、民主选举权、人民代表自主权的保障、社会主义法治、宪法改革和宪法裁判权的引入、艺术自由、科学和媒体以及党内民主化。因此，1989年的革命危机应该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革新意义上被克服，对继承而来的“真
780 正的社会主义”所有权和统治权的保留应得到保障。虽然在此期间，人们将革新预示与之前被取缔的民主社会主义声明以及一个现代社会主义概念的必要性声明联系在一起（参见 Krenz，同上书，第206—207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也不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

4. 在“后共产主义”（参见 Haug 1993）中，革新对于（欧洲）左派来说是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纲领和政治这一尚未完成的过程的概括性表达。这些左派拥护民主社会主义。他们一方面独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之外，另一方面也远离一体化社会民主主义。本质上，这是为了应对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政治、生态和文化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而遇到的挑战。通过对纲领和组织政治基础的重新规划，革新就应能保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的社会执行能力的扩大或恢复。

在这个意义上，革新的必要性已通过欧洲左派总的意义丧失，特别是目睹发生在东欧和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崩溃得到充分证明。革新以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发展为基础，正如它在历史妥协政策、欧洲共产主义以及东欧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的改革共产主义的努力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尽管革新自视为带有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传统，并且有意否定了反共的时代思潮，却意味着它与传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纲领、政党和政治理解发生了彻底决裂。这些政党在十月革命后的几十年里，在斯大林领导的苏共统治下发展起来，并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和政党纲领。

革新中所表达的纲领性的重新定位 781
不可能存在非现代社会主义。因此，革新与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特别是西欧的传统息息相关。在这种传统中，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发展形式被视为社会主义得以贯彻的必要条件。这首先就要涉及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民主成就的批判性要求，例如大选、对俄国革命者的新闻和集会自由（参见 GW 4，第358页及以下），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所强调的在公民社会层面把西方资本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变革基础（参见 *Gef* 4，H. 7，§ 16，第874页）。

但是，从对变革的这种理解的角度来看，人们对现代发展潜力的利用并不

是社会主义真正的本质内容。这种发展潜力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现今却深陷于“现代化的冲突”之中（参见 Beck 1991，第 40 页及以下）：“这与权力结构和财产结构的运行相关。这类关系消除了资本和资本利用的主导地位，并迫使在历史可能的状态下落实人权。换言之，现代性的观点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必要的，但绝不是充分的条件。真正的社会主义特殊性是以全面落实人权为目标，解决现代性社会问题的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旨在取代资本主义并形成社会主义现代性。衡量标准在于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这涉及权力和所有权关系的问题。”（Brie 等 1997，第 86 页）在关于革新的争论中，主要分歧不在于“革新者”“想留在当前社会中”；他们也“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变革出发，即必须打破利润至上作为衡量经济和社会基本决策的标准这一现状”。对革新而言，其与马列主义传统的主要分歧在于，“必须为此维护和充分发展当前社会的重要发展潜力，保证这份潜力绝对不被破坏。但这必须确定在当前特定社会中的行动”（第 110 页）。

782 与革新相关的、与传统的政党和国家共产主义的决裂特别体现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上。也就是说，在肯定和进一步发展历史必然性特征的过程中，人民通过斗争所获得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多元化和分权政治制度，在拒绝国家垄断的公有化设想、社会国有化和对国际主义的重新定义中必须有所体现。在这种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革新的特点是试图“寻找一条不同于 1917 年 10 月的社会主义新道路”（Buci-Glucksmann 1976，第 184 页）。

5. 革新涵盖了左派纲领和战略工作的所有方面，其本质为新的纲领的特征是从当前和未来利益的辩证法角度来看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重大问题的辩证关系：和平、（新的）社会问题、欠发达、生态平衡、妇女权利。它们不会被归类为主要矛盾和衍生的次要矛盾，而是被视为相互关联的普遍人权问题。其解决方案也被视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区域和国家互相交织在一起解决问题。决定性的是要遏制利润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监管者的作用。

因此，革新的纲领为典型的反资本主义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这并没有削弱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而是在其不同领域（实践）认识到所存在矛盾的“替代”形式和因此产生的挑战利润主导地位的潜力。从组织政策的角度来看，这导致了对潜在解放性的主体的多元化认识和前卫设想的离场。从革新的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将这些主体联系在

一起的计划，传统的同盟政策观念必须加以修正，并重新定义历史版块形成的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左派的霸权概念不能再被理解为一个主体（阶级）
783 的霸权，而是一种“结构霸权”（参见 Haug 1985，第 158 页及以下）。这种霸权的实现主要是一项文化和公民社会的任务。

后共产主义革新的核心要素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建，以及在这种联系下重新建立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党派对于政治实践“科学化”的要求不可被撤换掉：每一场带有解放特征的运动都依赖于对不存在的与已经存在中的被视作必要和可能的进行理论思考。例如，左派的理论弱点导致他们“忽略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Bischoff 1996，第 208 页），而这已成为其失败和失去意义的决定性原因。

正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读里所描述的那样，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革新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是以对理论与实践统一范式的讨论为前提的。首先，它是关于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的政治分析和科学话语的传统性融合。这里所涉及的科学话语是基于哈贝马斯正当批评的假设，即理论知识已经隐含在政治决定里或已代表其合法性。“该理论不仅使澄清工作合法化，而且通过失败的沟通来自我驳斥，最终得到修正。但它不能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具体情境里使得具有高风险决策的战略行动合法化。政治斗争的决定不能事先缺少理论合理的支持，然后在组织上得以执行。在这个层面上说，唯一可能的正当性是在相关人员之间的实践对话中达成共识，他们自己清楚地知道基本情况、彼此的共同利益，以及可预见的后果和次要后果，也清楚自己在哪些可能性下承担哪些风险。尚无理论可以在执行世界历史使命之前为潜在的牺牲者提供保障。”（Habermas 1993，第 38—39 页）

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中，理论话语与启蒙、政治进程的融合为理论从 784
属于权力政治特权和对理论发展的政治领导的最终意识形态统治开辟了可能性。由此，理论被贬低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批判性发酵因素。“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马列主义概念恰恰证明了权力政治处于主导地位时所产生的理论话语与意识形态争霸和政治战略决策的过程相融合的现象。这既是理论进步的障碍，又是政治上的革新。

政治实践与理论知识之间的产生关系必须是多元的，并尊重科学的独立性。只有通过处理和协调不同的理论观点，才能把理论现实的高度客观性作为前提，并将其作为政治纲领和战略工作的一部分。这些是对理论认识及其政治意义启

发和理解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理论论述。努力按照科学知识推进的政策必须考虑到，只有当这些知识在政治行为者的意识中被认可，被政策相关人员认定为理论正确的规范时，它才能获得政治效力。基于理论知识的标准，协调理论与政治变革同样是被公众所“批准”的行为（参见 Habermas 1971）。毕竟，政治决策和行动具有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这不是理论知识的直接输出，而是对行为后果的一种表达，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基于“责任道德”的决定（1919，第 70 页及以下）。因此，政治的纲领要求和策略不仅要做到与理论观点相对应，而且还必须确定其在具体历史形势中政治实践的可认责标准。

参考文献：

J. Agnoli, *Subversive Theorie*, Freiburg 1996; U. Beck, »Der Konflikt der zwei Modernen«, in: *Die Modernisierung moderner Gesellschaften. Verhandlungen des 25.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in Frankfurt am Main 1990*, hgg. v. W. Zapf, Frankfurt/M-New York 1991; M. Behrend u. H. Meier (Hg.), *Der schwere Weg der Erneuerung.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91; J. Bischoff, »Am Ende des Fordismus. Soziale Konflikte und die Schwäche der Linken«, in: P. Ingrao u. R. Rossanda, *Verabredungen zum Jahrhundertende*, hgg. v. H. Heine, Hamburg 1996, 207–17; A. Brie, M. Brie, J. Dellheim u. a., *Zur Programmatik der 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Ein Kommentar*, hgg. v.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politische Bildung e. V., Berlin 1997; C. Buci-Glucksmann, »Über Stalinismus-Kritik von links«, in: *Freiheit der Kritik oder Standpunktlogik*, Berlin 1976, 168–85;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71;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1963), Frankfurt/M 1993; 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d. 1, Berlin/W 1985; ders., *Gorbatschow. Versuch über den Zusammenhang seiner Gedanken*, Hamburg 1989; ders., *Determinanten der postkommunistischen Situation*, Berlin-Hamburg 1993; E. Hobsbawm, *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Welt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München-Wien 1995; R. Land, »Staatssozialismus und Stalinismus«, in: L. Bisky, J. Czerny, H. Mayer u. M. Schumann, *Die PDS—Herkunft und Selbstverständnis*, Berlin 1996, 186–99; M. Weber, *Politik als Beruf* (1919), Stuttgart 1992.

米夏埃尔·舒曼
（Michael Schumann） 撰
肖瑶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Demokratie,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ritter Weg, Emanzipation, Eurokommunismus, Freiheit, Gegenmacht, Gewaltenteilung, Glasnost, Hauptwiderspruch, historischer Kompromiss, Innovation,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ismus, Marxismus-Leninismus, Menschenrechte, Moderne, Perestrojka, pluraler Marxismus, Postkommunismus, postkommunistische Parteien, Profit, Projekt, Rechtsstaat, Reformkommunismus, Revolution, Sozialismus, Spätkapitalismus,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Theorie/Praxis, Verantwortung

爱欲（Eros）

A: šahwa ğinsīya.

E: eros.

F: eros.

R: ėros, Ėrot (эрос, Эрот).

S: eros.

从爱欲的神话形态中可以衡量出资产阶级启蒙的边界。资产阶级启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还原论和唯心主义唯理论之间摇摆，而且一再地从后者召唤出操纵伪古风冒牌货的反启蒙作为自身的反动。货币，资本主义的平均主义者，倾覆了包括爱欲在内的力量。新社会基础上各种力量的解放，构成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宣布的"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和"自然界的复活"（MEGA I.2，第264页）的蓝图的必要组成部分。

1. 在古希腊人以神话为基础的思维中，爱欲（和其他很多对这一生命力量的称呼一样）时而是"创造和维系宇宙的原则本身"（Kl. Pauly，2，第361页）且包括人性中的性和爱欲冲动，时而是 786
代表这一冲动的神祇。在赫西俄德看来，爱欲之神厄洛斯（Eros）和混沌之神卡俄斯（Chaos）、大地女神盖亚（Gaja）、地下世界的化身塔耳塔罗斯（Tartaros）一样属于没有祖先的原始神。厄洛斯因为"在不朽的诸神中最美"而尤为突出。赫西俄德这样描绘他的力量："他能使所有的神和所有的人销魂荡魄，丧失理智（νόον）和谨慎的思维（ἐπίφρονα βουλήν）。"（《神谱》[*Theogonie*] 122）在巴门尼德的《说教诗》（*Lehrgedicht*）中，"掌管一切的精灵"（残篇第12）"所创造的所有神当中，厄洛斯是第一个"（残篇第13）。在古罗马的诗歌和神话传统中，爱（Amor）或人格化的欲望制造者爱神丘比特（Cupido）依然是高居所有

力量之上的强大力量，因为它能让所有的心乃至所有（其他的）神都燃起欲火，陷入爱情的疯狂。奥维德（Ovid）向爱/爱神致意："连朱庇特也被你征服。"（*Tu superas ipsumque Iovem*，《变形记》[*Metamorphosen*] 第V章，第369行）维吉尔（Vergil）写道："爱战胜一切，让我们臣服于爱。"（*Amor vincit omnia et nos cedamus amori*，《牧歌》[*Bucolica*] 第10章，第69行）

爱欲如此游移不定，而且正因其吸引力具有随时可能征服理性和道德的危险，所以必须受到节制。德谟克利特将对美的欲望或对美以及美的人和事物的追求（ἐφίεσθαι τῶν καλῶν——残篇第73）理解为合法的、正义的爱欲（δίκαιος ἔρως）。柏拉图书中的厄洛斯首先代表对少年之爱的力量，这里处理的问题是，在厄洛斯和它所唤起的被爱欲者回应的爱欲安忒洛斯（Anteros）之间的关系上，"凭羞耻和理性"（《斐德若》[*Phaedros*] 256a）节制对少年的爱。从此，爱人者（ἐρῶν 或 ἐραστής）和被爱者（ἐρώμενος）男性的、严格脸谱化的形象就成了各个时代的政治哲学都出现的母题。《会饮篇》（*Symposion* 211b）的主题也是"爱少年的正确方式"（ὀρθῶς παιδεραστεῖν）。柏拉图在此书中赋予了对厄洛斯的神话阐释——尤其是与令男人对女人欲火中烧的"卑劣爱欲"（πάνδημος）相反的、天国的或者说诞自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os）的、表现为对少年之爱的厄洛斯——无限魅力，以实现从对（少年的）美好身体的爱到对美的理念的爱的升华，借此突出哲学的意义。他书中的苏格拉底将厄洛斯规定为既非人也非神的"精灵"，它是"居于两者之间"（μεταξύ，202e）不息活动的人格化。

基督徒延续了这套关于爱欲的分裂话语，区分开爱欲和圣爱（*Agape*），区 787
分开肉体的、尘世的爱和一种更加属灵的、包含了对上帝和对邻人的爱。圣爱是上帝为人牺牲自己的儿子以赎人类的罪从而向人显现的爱，同样也是耶稣本身的行动所体现出的爱。对于信徒而言，圣爱将个人从自我中心解放出来，转而以他人为中心，使个人不再是尘世渴望和自我利益的奴隶，转而获得一种精神的本质，能够以谦卑和自我牺牲无限地爱他人和上帝。

现代哲学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以神为中心的依附于神学的哲学，转向一种更以人为中心的、立足于自身利益和自我保存的世俗哲学。虽然爱欲这个概念不是任何一位重要的近代哲学家的主要概念或基本概念，但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开始，爱和求爱就是自然的和物质的生活条件的组成部分，是个人追求性欲满足时的目标。而柏拉图、苏格拉

底的爱欲升华经历种种变形之后依然保存着。斯宾诺莎《伦理学》(*Ethik*)的顶点是"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intellectualis Dei*),青年黑格尔也以爱的哲学开启他的思考。

2. 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中写道:"死和爱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神话。"(MEGA IV.1,第106页)爱欲虽然不是他精密阐释的概念,但始终起着作用。在他几乎倾注毕生心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爱欲首先体现为否定的辩证因素,它屈从于现代世界的最高权力——货币。围绕这个题目,马克思搜集了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名言,将黄金比喻为把"丑变成美"的皮条客(如参见MEW 23,第146页)。马克思将爱欲屈从于新的强势力量比喻为"商品爱货币"(MEW 23,第122页)。而资本家充当可能的买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提供"殷勤服务"(MEW 40,第546页及以下)。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概述了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完全唯物主义的、社会的理解,按他的理解,欲望和激情在人的存在中占有根本的地位。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同意费尔巴哈将人首先视为感性本质,因此(历史活动所形成的,故而人所特有的有组织的)感官构成了人走向世界的通道。马克思希望将黑格尔设定的精神本质的人 788
置换为活生生的、有气息的个人,个人拥有全部的感觉,与他周围的人及自然环境发展出各种关系:"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他的主体性就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MEW 40,第577页)。因此,人"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第578页)。马克思将"激情、热情"定义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第579页),这本质力量可以视为爱欲的变体。但是热情具有历史的性质,感觉的历史决定了人的本质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对象关系的方式:"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私有财产的意义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第563页)历史不仅留下了认识异化的钥匙,也蕴藏着培养每一个人感性存在的全部丰富性的潜能:"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

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第541—542页）

虽然马克思早期谈过“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展开丰富的人的天性，实现人的多样的存在（第540—541页），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傅立叶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拉法格才更为详细地探讨了激情和性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傅立叶描绘了激情的吸引力，设想将有一
789 种社会制度，使不受限制地考察人的感觉、性和爱欲成为可能。他所提出的乌托邦集体法伦斯泰尔的目的就在于最大限度地生产出爱欲关系和满足，尝试用从工作到游戏、从劳动到休闲等一系列活动满足人全方位的需求。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样的愿景是否即马克思所批判的“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后者不仅否定私有财产，也“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它“昭然若揭的秘密”就是“公妻制这种思想”。公妻制是对婚姻这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的抽象否定（*Ms 44*，第534页）。一旦爱欲成为社会管理技术排列组合的对象，它就降格为“自然的类关系”（第535页），降格为性。与之相反，拉法格“通常从女性的立场”（F. Haug 1995，第21页）论述爱欲在历史上的不同形态。

3. 马克思、恩格斯对“志愿部队”和“兵营社会主义”的爱欲柏拉图主义的嘲讽，已然敏锐地预见了右派军国主义者及其元首人物的特征，正如由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与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范围内蔓延的现象所证明的那样：“对女人的魅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偶尔让一个裁缝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兵营生活不能缺少观念的神通；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庸俗的平民活动的鄙视获得了更大的意义。”（MEW 8，第321—322页）类似地，德国青年运动在不断加强对爱欲的理想化的同时，又用自己设想的典范的共同体和元首反对毫无灵魂的商业世界，反对威廉二世时期的繁缛作风。德国青年运动营造了一种无性爱欲的想象。“艺名‘忠诚’（Fidus）的胡戈·赫普纳（Hugo Hoeppner）的画作《向光祈祷》（*Lichtgebet*）从背面塑造了少年裸露的身体的秀美，将色欲的表露和自命为‘纯洁’的‘宗教虔诚’姿态糅合在

一起，无怪乎自1913年上迈斯纳山（Hoher Meißner）青年集会起就成为‘青年运动崇拜的图像’（Janz 1985，第310页），成为挂在无数中学生、大学生房间墙上的美男子画像。感性欲望和双重
790 服从（既放弃行动又听命于统治制度的系统要求）之间的对抗矛盾，此处变成了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于是彼此缓和从而消解。”（W. F. Haug 1986，第135页）斯特凡·格奥尔格和汉斯·布吕尔（Hans Blüher）等人运用的母题一部分就来自这场运动，和其他浪漫主义反动派的男性联盟想象一道涌入了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主义最后的潜伏期，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用改造过的爱欲神话反对“毁灭的犬儒主义代言人……袒露肉欲的广告逻辑”和“性欲的使徒强词夺理的著书立说”（第8—9页）。他的根本前提是这样的信念：“图像的真实”是“最真实的或唯一存在的真实”（第178页）。由此爱欲被称颂为“群星孕育的、永恒重生的精灵”和“男性之爱的爱欲”：“它必然是某种极其严肃的东西，甚至是对神的畏惧，神使得底比斯‘圣队’忠诚地团结起来，为保卫故土英勇赴死，使得克里特人将正是最美年华的少年排在阵列的最前线，献祭给爱欲之神。”（第37—38页）这里的爱欲和欲望、情欲无关，以尼采的酒神为标志作为推动世界运行的“洋溢热情”（第52页及以下）与性欲截然对立，并且与战争紧密相连。

4. 左派的马尔库塞、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和列奥·科夫勒在学生运动前夕，提出与上述爱欲截然相对的解放了的爱欲。他们学说的基本前提是弗洛伊德用神话人物表述的本能（Trieb）理论的概念。弗洛伊德摧毁了爱欲和性欲互不关联的观念，所以他对本能的分析引起了右派的仇恨和迫害。他在《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文明及其不满》（*Unbehagen in der Kultur*）和其他晚期著作中用“爱欲”这个术语形容性本能，用“死欲”（Thanatos，希腊语的“死亡”）形容破坏的本能，或他所设想的“死亡本能”。而且弗洛伊德认为，满足本能的欲望和文明的要求处在永恒的斗争中，文明在他看来就建立在对本能冲动的抑制、延迟和升华之上。

马克思主义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广泛吸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论文集《权威与家庭》（*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中，霍克海默和埃里希·弗洛姆等作者分析 791
了资本主义经济、父权制家庭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对于统治的核心意义。相关分析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里集中

表述为一个论题：丧失基本本能满足的人性不仅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后果，而且是它的前提条件。这种人性的主体是原子化的，缩减到只关心自我保存，但是自我保存只有通过永远地延迟本能满足才能实现，延迟使得对自然和对周围的人的统治都内化了。文明的进步隐含着感觉的退化："社会……机器越是复杂和精致，……体验便越是贫乏。"（*DdA*，第 50 页）爱欲必须被打断。"在商品交换的世界里，付出过多的人是错误的；而爱人者总是爱过了头的人。"（第 91 页）爱欲本能如果受到工具的统治，就会只剩下经过算计的冲动满足，"把快乐变得机械，把渴求歪曲成花招"（第 131 页）。工业生产的文化"只挑动起未经升华的前戏快感"，又"惯于拒绝"。文明的不满在本真的艺术作品里还能表达出来，而在大众文化产品里就变成了对未完成的满足。"艺术作品既禁欲主义又恬不知耻，文化工业既淫秽色情又羞羞答答。"（第 167 页）为了概括这一辩证关系，马尔库塞提出了"**压抑性反升华**"（*repressive Entsublimierung*）的概念。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sation*）中和弗洛伊德一样用"爱欲"形容生存本能，用"死欲"形容死亡本能。他延续弗洛伊德的观点，"爱欲应定义为强大的统一力量，蕴藏于所有生命之中"（Schriften 5，第 31 页；参见 Freud，GW XIII，第 289 页）。爱欲不断构成"生命更高级的统一"，是迈向交往、文明和共同体的本能，用力比多的关系将人连接起来。虽然弗洛伊德认为爱欲首先是性欲，通常起破坏作用而且与死亡本能交汇，但是马尔库塞提出"性欲转变为爱欲"（第 170 页及以下），从而使关系、劳动和经验以"非压抑升华"（第 179 页）的形式得到爱欲化。爱欲在这里成为非压抑社会的伦理。

马尔库塞重视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经济学"，根据这一说法，疏导多余的本能力量，使本能满足得以可能。弗洛伊德曾提到过的生死合一的"涅槃原则"（第 200 页）启示马尔库塞，既然对本能、对平静和满足的追求体现了人 792
的根本活动原则，那么保证更多本能满足的社会条件必将客观上提供减少和清除本能压抑的机会。马尔库塞大胆地预测 20 世纪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和伦理将是"非压抑文化"，非压抑文化自由释放爱欲和感觉，通过培养感觉、游戏、爱欲之爱和审美创造力，创造自由和幸福的人。这类解放希望的推动力，在马尔库塞看来，不仅有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发现的潜意识趋向本能满足以达到自由和幸福的冲动，还有现代哲学和艺术的隐蔽运动。

不受抑制的爱欲具有自身特有的道

德（第194—196页），敦促个人将享受最大化，将破坏性的行为后果最小化。“力比多道德”的目标是本能解放，在这一点上它彻底区别于在马尔库塞看来意味着压抑生命本能的传统道德。因此他将“唯心主义”或“人文主义”的伦理一概批评为压抑的、屈从潮流的。马尔库塞坚信，生命本能的释放和高涨能够驯服死欲的毁灭本能（第200—202页）。马尔库塞虽然接受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但是依然认为，在一个非压抑社会中，生存本能将成功控制住侵略的本能，并将它用来昂扬生命。他进一步认为，虽然“所有快乐都想永存”这个愿望遭到时间和死亡的否定，但是人能够通过重现过去的满足、预期将来的满足，扩大生命中的欢乐：“从俄耳甫斯的神话到普鲁斯特的小说，幸福和自由一直与重现的时光（le temps retrouvé）这一观念紧密相关。记忆恢复了逝去的时间，即满足和实现的时间。深入意识之中的爱欲被记忆所推动，凭着记忆反抗克制的秩序，利用记忆努力在一个受时间统治的世界上战胜时间。”（第198—199页）

爱欲需求既会为直接压抑所压制，也同样会被“压抑性反升华”掉转方向，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一方面，起升华作用的艺术要求“高度的自主和洞见”（Schriften 7，第95页），但因为“并入厨房、办公室、商店以及为生意和娱乐发挥商业作用”而“失去了效力”（第91页），“结果便是精神器官萎缩，无力把握矛盾和其他可能”（第98页）。另一方面，“技术现实”除了限制艺术，还通过“压低爱欲能量而激化性欲能量”“限制着升华的范围”（第93页）。“社会准许且值得期望的满足范围显著地扩大”，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它削减了所有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维度。“经过调整以后的快乐制造出顺从。”（第95页）

布朗援引尼采，希望分裂的因素（“男性和女性、自我和他人、生命和死亡”——1964，第221页）通过“酒神”得以重新统一。与之相似，科夫勒也延续尼采对日神（形式分明、个体的）和酒神（心醉神迷、普遍的）的区分。他认为这一分离是纪律和享受的分离，预示着文明的门槛，既包含着灾难也包含着进步（1967，第39页）。由此他认为，乌托邦是上述被分裂因素或曰“绝对自由”的“和谐”，在和谐状态下“（爱欲的）本能”和“历史趋势”联合起来（第52页）。虽然科夫勒对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提出了反驳，但他们的批判分析有着共同之处：“现代发达资产阶级的压抑形式隐藏在重重面纱之下，面纱就是貌似得到准许的政治自由、爱欲自由，尤其是后者。但是得到准许的爱欲，是以

793

个人以外的生活领域的屈服和弃权为代价换来的。正因如此，它在个人生活领域也不能实现意识形态所谎称具有的作用。禁欲是爱欲的副产物，又一再完全地取代爱欲”——这就是科夫勒所说的“禁欲主义爱欲”（第 15 页）。科夫勒将弗洛伊德的人的“逃避劳动的”快乐追求同马克思的人的充满乐趣的活动追求结合起来（第 23 页及以下），作为一门辩证人类学，即“以人的可变作为不变前提的科学”（第 28 页）。在这门科学里，他强调那些“在真正的层面上揭示人的本质在质上的特殊性”的前提条件；
794 在他看来，这质的特殊性就在于“理性活动和非理性爱欲的辩证统一。我们得到的最终结果就是‘游戏的人’”（第 29 页）。爱欲在此起着总括的作用，因为根据科夫勒最后的定义，“‘真正的’人是和爱欲同一的人”（第 327 页）。

即使爱欲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议题，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多维度的人性理论依然为完善关于需求、渴望和爱欲满足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实现将解救人的存在的深切渴求，爱欲是这个乌托邦的必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H. Blüher, *Die Rolle der Erotik in der männlichen Gesellschaft. Eine Theorie der männlichen Staatsbildung nach Wesen und Wert*, Bd. 1: *Der Typus inversus*, Jena 1919, Bd. 2: *Familie und Männerbund*, Jena 1920; N. O. Brown, *Zukunft im Zeichen des Eros*, Pfullingen 1964; F. Haug, »Einleitung« zu Lafargue 1995, 9–21; W. F. Haug,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Berlin-Hamburg 1986;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R.-P. Janz, »Die Faszination der Jugend durch Rituale und sakrale Symbole. Mit Anmerkungen zu Fidus, Hesse, Hofmannsthal und George«, in: T. Koebner u. a., *»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Der Mythos Jugend*, Frankfurt/M 1985, 310–35; L. Klages, *Vom kosmogonischen Eros* (1921), Stuttgart ^{5}1951; L. Kofler, *Der asketische Eros. Industriekultur und Ideologie*,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7; P. Lafargue,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Ausgewählte Schriften*, krit. A., hgg. v. F. Keller, Berlin-Hamburg 1995; K.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zsche*, Zürich-Wien 1950; F. Manuel, *The Prophets of Paris*, Cambridge/Mass. 1962; H.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1954 (New York ^{2}1962) – dt.: *Eros und Kultur. Ein philosophischer Beitrag zu Sigmund Freud*, Stuttgart 1957 (Neuausgabe unter dem Titel *Triebstruk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3); R. M. Schott, *Cognition and Eros. A Critique of the Kantian Paradigm*, Boston 1988.

道格拉斯·克尔纳（Douglas Kellner）、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蒂尔曼·赖茨 译为德文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nthropologie, Antizipation, Arbeit, Bedürfnis, Befreiung, Befriedigung, Eigentlichkeit, Erfahrung, Erinnerung, Erlösung, Ethik, Ewigkeit, Frankfurter Schule, Freudomarxismus, Frustration, Gegenkultur, Gemeinschaft, Geschichte, Geschlecht,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Glück, Kultur, Leib/Körper, Liebe, Lust,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ormen, Pariser Manuskripte, Psychoanalyse und Marxismus, Resurrektion, Sexualität, sexuelle Befreiung, Sinnlichkeit, Tod, Utopie, Zivilisation

795

社会主义的成就
（Errungenschaften des Sozialismus）

A: munǧazāt al-ištirākīya.

E: achievements of socialism.

F: conquêtes du socialisme.

R: dostiženija socializma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S: logros del socialismo.

在1989至1991年欧洲的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终结之后，产生了这个社会还留下什么的问题。当代人的判断在两者之间摇摆：或将这个社会视为“歧路，没有值得保留的东西”，或不加批判地粉饰这个社会的福利成就，但不追问它的代价以及这些代价和它的失败之间可能的联系。在苏联式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成就”在宣传中代表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Moskauer Erklärung*，第13—14页）。它不仅断言新社会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还使人得以合法地拒绝其他任何社会主义思想和行动的尝试（参见Kosing等1981；Hümmler等1987）。因此，社会主义的成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它的标准。

1. 要评估社会主义的成就，首先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目标。应当注意的是，他们拒绝规范性的社会主义概念。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因而不该有

规定性的预判。

1.1 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写道："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MEW 1，第 370 页）《共产党宣言》认为，要通过工人运动来争取政治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赢得的权力应该被用于集中和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由此，阶级和阶级统治将被这样一个联合体扬弃，"在
796 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第 481—482 页）。

马克思拒绝在这些一般的目标设想以外，为"未来的食堂"制定详细的"调味单"。这种做法与他的政治观点以及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矛盾。他和恩格斯期望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发明"从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社会。马克思说："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Bürgerkrieg*，MEW 17，第 347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视为新社会的两个阶段，他将低级阶段理解为这样一个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他指出仍存在要消灭的"旧社会的痕迹"、与劳动量相匹配的工资、继续起作用的"资产阶级法权"、商品交换，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的平等交换不能消灭个人的不平等。马克思认为高级阶段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局限，在高级阶段，"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只有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打破劳动和消费之间的联系并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MEW 19，第 20—21 页）

1.2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预言："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MEW 20，第 261 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可能性："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

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第
797 263—264 页）这体现了革命的制度政策和主要针对社会保障的新政治体系的特征，即承诺采取全面的社会和经济措施。尽管目的是跃入“自由王国”（第264 页），民主目标依然服从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或等同于它。个人自由始终被忽视。列宁后来明确指出了它们的权重关系。

1.3 卡尔·考茨基称，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优于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因为它不仅“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富裕，还提供了生存的保障”（1891，第 167 页）。考茨基与社会主义的反对者进行论战，后者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给予“成员富裕与保障”的能力，但声称这个社会必然要以“完全丧失自由”为代价（第 168 页）。考茨基认为“劳动自由”的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提出与之相对的口号“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将“为人类带来生命的自由”“艺术和科学活动的自由、最崇高享受的自由”等等（第 176 页）。

2. 在围绕 1918 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是否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社民党领导层利用革命成就的说辞，阻止了革命的转变，尤其是阻止了群众行动。人民代表委员会（Rat der Volksbeauftragten）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说，“工人和士兵不必担心社会革命的成功。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启动了社会化”（1926，第 115 页）。因此，社民党党委决定反对革命左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为了捍卫革命的成就，要将所有反革命行动抵制到底……要反对所有不承认德国人民自决权的人，即使他们借口能通过违背德国人民自身意志的专政来造福德国人民”（*Beschluss*，第 79 页）。为了宣告革命结束，在“向着社会化前进”的口号下，社会变革已经实现的状态——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八小时工作制、谨慎的社会化措施——就是革命的结果、革命的成就。这个形 798
势第一次否认了社会主义的成就。

3. 正如历史的反讽，昔日的激进左派日后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及其东欧盟友，以社会主义的成就为名压制革命的进步。当 1968 年布拉格之春试图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时，军事干预的理由是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成就”的共同责任：镇压“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监督大众传媒和相应的共产党的团结一致（*Gemeinsamer Brief*，第 85 页）。“社会主义的”或“反社会主义的”定义完全基于是否承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被视为反社会主义。《布拉迪斯拉发宣言》（*Erklärung von*

Bratislava，第 110 页）确认："捍卫这些成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国际义务。"因此，"只有严格和坚决服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普遍规律指导，尤其是巩固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才能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让人不解的是，领导者和人民用以评估社会主义成就的标准是什么。

俄国十月革命相对于落后的起步水平所产生的制度，与东欧、东亚（最初名为人民民主的，后名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战胜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之后的社会变革一样，对于大部分民众而言是值得向往的：反对战争，惩治战争责任人，重建更好的未来。共产党人证明自己是重建的积极分子。他们成功地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了食物、住房、工作和新的理想。

列宁的描述指向了一种生产方式，它应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Materialien zur Ausarbeitung des Programms der SDAPR*]，
799 LW 6，第 40 页）。其结果按官方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者摆脱剥削和压迫"；"自觉互动、同志间合作……和互助的生产关系"；"每个人都有广泛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创造力"，"积极利用民主权利和自由"，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越来越好地满足生活需求"；"全面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发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定维护和平"（Große 等 1988，第 277—278 页）。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民主、公平、废除特权的理想越来越沦为确保官僚权力的空洞口号。实际影响人们的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它们在某些国家尤为成功。在克服战争创伤以后，国民经济效率的增长使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与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相对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相比，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从先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飞跃更为显著。它们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提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统一"与"主要任务路线"（Kurs der Hauptaufgabe）的口号，这一路线指"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发展、效率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Programm*，第 20 页），显现了成效。

这一路线的标准始终是党的领导人的观点，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定义什么是

社会主义的成就，且通常带有自身经验的烙印。面对危机、失业和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应当有合乎人尊严的另一种选择。不仅昂纳克（Honecker）把“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社会保障”视为社会
800 主义的成就（1987，第250页），社会保障得到广泛的理解：“我们认为，人现实中受教育、在工作和休闲中创造性地自我实现的权利，还包括免费医疗、对老年人的充分照顾，尤其还有符合人尊严的居住条件。”（同上）

越来越理所应当的社会保障意味着或多或少突出的物质条件。这是积极因素，但它们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动员人们为自己的体制工作。它是“来自上面的礼物”，人们清楚通常要为它而努力工作。从家用电器到小轿车，经常都达到可与西方家庭相比的规模。度假别墅允许人独立支配休闲时间。尽管旅行机会丰富多样，但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东德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禁忌。多年以来，对于越来越多的公民来说，相对于西方而言较为落后的物质生活水平，使得社会保障在有限的个人自由和民主赤字面前变得不那么重要。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希望通过社会成就——每次党代会都根据它来评判，人民最终也只能通过它来评判——给效率带来新的动力。“我做多少——我自己得多少！”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行之有效的按劳分配原则。然而，这种宣传口号其实是满意的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无行为能力的公民退缩到安乐窝里的反映。只要大多数人仍感觉领导者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在1953年6月17日和1961年8月13日的灾难以后，主要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情况），就没有问题。

因此，同时代的民众对社会主义成就的评价是矛盾的。一方面，必须当时就区分落后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中的效果和成就——在历史回顾中更是如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思考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MEW 27，第452页）

另一方面，必须同时区分，社会主义的成就与本国社会之前不成熟的资本 801
主义结构甚或封建结构的文明水平相比，与周边国家及其发展水平（例如中美洲的古巴）相比，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标准相比，分别代表什么。

4. 保守派今天指责国家社会主义“远远落后于有时条件较差的自由社会”，原因是：“富足和物质丰富的王国首先应当产生出更公平的生存状态和真正的人，无论如何，这个王国始终遥不

可及……社会主义驱使人民穿过沙漠。应许之地却从来没有到来。”（Fest 1991，第83—84页）另一部分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成就，但也指出了局限：“这个国家以自由、诚实因而还有尊严为代价来给予社会保障。那是可耻的社会契约：举止得体换来生活幸福，后者作为国家的善举，附带的义务是不断的感激和一贯的欢呼。”（Schröder 1991，第18页）

尽管国家社会主义具有教育专政的性质，由一个政治官僚等级进行统治，但仍然有社会主义的成就，在国家组织的社会主义毁灭以后，作为对一个更好社会的愿景和替代性诉求而继续存在。这指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与利益导向的经济和社会相对的社会保障的要素。这些要素首先符合福利国家调节的目标和结果，成功的福利国家调节是19世纪末以来的工人运动所赢得的，得到俾斯麦以来统治阶级的承认。但这些要素又远不止于此，它们同时作为劳资谈判无形的第三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据，反作用于西方社会。

上述社会主义的成就集中在这样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与以前的经验相比，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和利润经济的直接影响最为强烈：打破对少年儿童全面教育和公众文化权利的社会限制；基本免费的医疗保健；为那些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群体（退休者、大学生、需要护理的人）提供适度但足够的最低保障；确保全体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得到工作并 802
实现社会独立；妇女的物质平等、法律平等以及她们对未出生生命的自决权；无论物质消费品还是人际关系普遍没有用完即扔的心态。最后，还有在劳动过程中或在集体住房、集体劳动的框架内调解冲突所进行的民主协作的要素，以及作为合作社财产所有者的经验。

这些都是在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被摧毁的领域，因此被大多数公民所怀念。它们勾起了怀旧之情，许多人从这些生活过的经历中找到了认同。因此，强加另一种经济和社会机制被视为“殖民化过程”（Dümcke 1995，第24页）。对很多人而言，正确地指出这种主要是社会性质的保障有哪些弱点，回想起来反而显得是次要的。因而一种更偏重社会的心态也被算作社会主义的成就：“制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但是态度可能留下了很多。从表面上看，社会国家的精神遗产仅是一种诉求的姿态，但其背后却隐藏着特有的思维方式……。简单概括：东德人考虑社会，西德人考虑经济。”（Bender 1993，第116页）

1989至1990年的转折决定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命运，在这个存在幻觉的时刻，严厉的批评者正确指出社会措施几乎无法负担的成本、不足的经济效率、局部的不公平和特权、有限且经

常缺位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损失（参见 Winkler 1990）。当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事后才怀念的社会主义成就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参见 Hofmann 1994）。因此，捍卫社会权利不是议题，它们被视为新社会的天经地义的伴手礼，好像新社会将结合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最佳特征（参见 Häder 1991）。后者代表热带水果、高速小轿车、旅行自由和坚挺的外汇。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同时在不同阶层民众中起作用的团结的情感和行为是有矛盾的：“民主德国不知不觉地保护并创造了一些统一的德国所必需的东西——但东德的简朴、
803 诚实和正直有什么生存机会？”（Bender 1993，第 140 页）削弱这些继续起作用的心态要素的，不仅有破坏团结的资本主义竞争机制和消费杠杆，还有一种生产方式结构性失败所产生的重负，那些心态要素代表了这种生产方式积极的方面。

与此相反的消极的“社会主义成就”首先包括无力“保证复杂社会的进步和自我调节”的“系统性的无能”（Meyer 1990，第 10 页）。支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调节的不是效率标准。政治领导人最终一再阻挠真正基于经济的甚至更加民主的机制。正反面的因素共存于一个系统：“行政命令式”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导致“与西方相比，即使假定经济水平相同，东方也存在短缺，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利用资源来满足基本需求，以及健康、社会和教育的需求。……因为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基本供给，所以短缺一直存在。这里政治原因优先于效用考量”（Braun 1995，第 100—101 页）。由此产生的短缺经济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个社会非常明显的缺陷：它是历史遗留问题，在体制斗争中固化，这种社会形态的内在力量迟迟难以克服它。

这种形态的内在矛盾的标志是，民众对它最强烈的拥护——在东德，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上半叶——是通过“主要任务路线”来换取的，它不仅承诺而且兑现了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这一“路线”破坏了经济的物质基础，始终是一张在未来不可兑现的支票。确保所有人的工作岗位而没有同样一致的效率要求，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预先计划好、与效率无关的职业进步机会，紧张的住房建设计划与城市中心同一时间的衰落，都表明社会主义成就的矛盾性。这一“路线”坚持的时间越长，出于对动乱（如 1953 年 6 月 17 日）的恐惧，越是拒绝削减不合理的补贴或拒绝较严格的效率导向，这种体系便越快 804
陷入崩溃。它只能通过不惜一切代价的自我毁灭式出口来维持，有时是通过“出售”其本国子女（指民主德国收取联邦德国钱款后允许本国被捕的反对派

自由出境。——译者），通过向“阶级敌人”越发不受限制地借债。同时，社会保障和不断的灌输促使人们产生了丧失行为能力的心态，使国家成为“监护国”（Henrich 1990）。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了其历史生命，如安德烈·戈茨（1991，第93页）所见：“因为它……拒绝个人解放和生命自我形成的诉求。”

民主的缺乏阻碍了路线的及时调整，进而在新的基础上保持社会主义的成就。这加速了崩溃，但特殊之处在于，在关键的危机中，这个社会及其精英的人道主义基本取向，使许多国家在1989至1991年的转折中和平地自我消灭了威权国家的社会主义。而在这种社会主义与多民族社会的民族—帝国统治关系相结合的地方，这种解体直接导致了内战，例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情况。通常，以往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在它们的民主转型中迎来的并不是“社会市场”，而是野蛮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剧烈的社会不平等和普遍的贫困（参见 Klein 1993，第12—13页）。

5. 东方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就，结合这些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中许多人感受到的痛苦的损失，是很好理解的，但也要注意社会主义成就的西方脉络。后者是工人运动（工会和左翼政党）斗争以及社会民主党改良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在西方中心地区。“旧西方的欧洲是由一部基本宪法所塑造的，它可以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宪法。”（Dahrendorf 1992，第245页）如果说直到1989年社会保障似乎都和民主机制一样扎根于这些社会，那么随着制度竞争的消失，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福特主义的危机和向高科技生产方式的过渡，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势力发动的社会反动攻势也迫使西方中心地区释放和松绑资本主义。与现实 805
存在的社会主义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导致削弱了工会、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别。新技术，少数人高精尖劳动的突飞猛进，无保障、低报酬工作的扩大以及越来越多的被排斥人群，这些都可能使西方福利国家的成就也化为乌有。国家的“精简”意味着“拆除”社会保障体系、民主地施加影响的可能性遭到侵蚀，它们伴随着企业经济效率思想的释放，这种思想意味着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力量的自由竞赛”。

6. 作为一项后起的福特主义现代化工程的社会主义——不论是与斯大林、乌布利希、昂纳克还是齐奥塞斯库（Ceausescus）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崩溃了，如同早期工业化时代的巨兽一样不复存在，就像被磨光的“艺术”文物。它们是一种国有化而非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的见证

（参见 Schaff 1988，第 397 页及以下）。然而，社会主义成就的魅力始终取决于具体的内部和外部的局势：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仅仅是之前被压制的革命阶级在夺取政权上的可能性，就对他们的追随者和许多知识分子而言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反应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 1929 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苏联以其最初的五年计划，成为稳定和关心劳动者的孤岛。而强制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损失以及正在兴起的大规模迫害却被忽视了。苏联对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和胜利再次提高了这个新社会的声誉，并使许多人忽视了这个社会反民主的一面。这个自我彰显为替代方案的社会丧失了其魅力——这不仅是受到 1937 至 1938 年莫斯科大审判的短暂影响，更随着苏共二十大揭露“个人崇拜”以及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而加剧——而 1957 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的“斯普特尼克危机”和 1961 年的第一次载人航天似乎又证明了这个体制的合理性优势；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西方中心地区，古巴和越南的民族解放版本的国家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学生运动中重新获得了声誉，这些国家实行的是相当独立的各式社会主义，而其他东欧集团国家的声誉则逐渐下降，并且随着暴力镇压布拉格之春而消失。随着向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和生产力发展程度差距的扩大，这种魅力的丧失从 70 年代——这一时期苏联日益严重的特征是停滞和腐败——开始在内部和外部都可以感觉到，苏联及其盟友在非洲和亚洲对所谓的社会主义试验的支援也于事无补。苏联社会后期的短暂民主化改革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希望。激进的改革性、公开性（开放政策）和社会的自我批评——民主德国后来的圆桌会议政策和自由公共电视政策——似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西方根本不愿伸手支持的社会主义成就。这一时期的戛然而止将这些社会主义成就片刻的领导权宣判为短暂的热情。

806

运转良好的福利国家的成就仍然植根于西方，在东欧，人们对本国社会主义成就的回忆依旧存在，这些成就曾给了他们现在在利润制度的压力下已经丧失的社会保障。这些作用持久的社会主义成就属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即国家给予公民社会保障，有时也包括部分的民主参与。这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替代方案，它通常远远超越了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政策的结果。（应该注意，在阶级斗争取得成功和经济增长的年代，瑞典以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奥地利、瑞士和西德，这些福利国家的物质选择比东欧要大得多。同样，它们与葡萄牙等西欧国家或希腊的显著差别，甚至在单个国家例如意大利内部的差别，特别是与非欧洲国家的差

别，也都不能忽视。）随着国家及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毁灭，这些社会主义的成就自然而然地处于被支配状态。显然，在这种“社会主义”中，个人解放的载体是一个匿名的、压倒性的“巨
807 型机器”，即国家，而不是实际上必要的“自主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性形式的扩展”（Gorz 1991，第96页）。因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通过真正的经济社会化和全面的民主化将这些形式固定下来。谁“将来想处理社会主义观念的传统，就必须考察，哪些东西可以在人类的可怕经历之后继续存在，什么被证明是不合适的，或者在实现过程中暴露出了其固有的非人道性”（Strasser 1990，第21页）。对失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批判性经验和研究，要算作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成就。社会保障、确保个人自我实现的社会条件、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实现了的民主——它们只有在扎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前提下才能是社会主义的成就，这个社会真正进行社会化，不仅是为了社会成员，而且首先是由社会成员进行统治。它们尽管是不完善和走样的，但仍将长期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社会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P. Bender, *Unsere Erbschaft. Was war die DDR—was bleibt von ihr?*, Hamburg ²1993; *Beschluss des Parteiausschusses der SPD zur Einberufung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vom 28. November 1918*, in: W. Ruge/W. Schumann,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17–1919*, Berlin/DDR 1975; A. Braun, »Emanzipation im Kontext patriachalischer und Kapitalverhältnisse«, in: H. Behrend/A. Braun/H. Wagner, *Emanzipation = menschliche Selbstveränderung?*, Berlin 1995; R. Dahrendorf, *Der moderne soziale Konflikt. Essay zur Politik der Freiheit*, Stuttgart 1992; W. Dümcke, »Gab und gibt es eine Kolonialisierung der DDR?«, in: *spw*, 18. Jg., 1995, H. 81, 24–27; ders./F. Vilmar, »›Sozialistische Errungenschaften‹ in der DDR. Ein Gespräch«, in: *Utopie kreativ*, 4. Jg., 1993, H. 37/38, 40–68; F. Ebert, *Schriften. Aufzeichnungen. Reden* 2, Dresden 1926; *Erklärung der Beratung von Vertretern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der sozialistischen Länder* (Moskau, 14. bis 16. Nov. 1957), Berlin/DDR 1957; »Erklärung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sozialistischer Länder« (Bratislava, 3. Aug. 1968), in: *Dokumen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d. XII, Berlin/DDR 1971; J. Fest, *Der zerstörte Traum. Vom Ende des utopischen Zeital-*

ters, Berlin 1991; G. Fülberth, *Eröffnungsbilanz des gesamtdeutschen Kapitalismus. Vom Spätsozialismus zur nationalen Restauration*, Hamburg 1993; »Gemeinsamer Brief der ZKs der kommunistischen und Arbeiterparteien Bulgariens, Ungarns, der DDR, Polens und der SU an das ZK der KP der Tschechoslowakei« (Warschau, 15. Juli 1968), in: *Dokumen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Bd. XII, Berlin/DDR 1971; A. Gorz, *Und jetzt wohin? Zur Zukunft der Linken*, Berlin 1991; G. Grosser u. a. (Hg.), *Wissenschaftlicher Kommunismus. Lehrbuch für das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Grundlagenstudium*, Berlin/DDR 1988; M. Häder (Hg.), *Denken und Handeln in der Krise. Die DDR nach der »Wende«. Ergebnisse einer empirisch-soziologischen Studie*, Berlin 1991; R. Henrich, *Der vormundschaftliche Staat*, Leipzig-Weimar 1990; J. Hofmann, »Zwischen Hoffnung und Ernüchterung. Über ostdeutsche Erfahrungen mit der deutschen Einheit und der Gesellschaft der Bundesrepublik«, in: *Utopie kreativ*, 5. Jg., 1994, H. 43/44, 48–63; E. Honecker, *Aus meinem Leben*, Berlin/DDR 1980; H. Hümmler u. a., *Sozialismus in der DDR. Gesellschaftsstrategie mit dem Blick auf das Jahr 2000*, Berlin/DDR 1987;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1891), Berlin/DDR 1965; D. Keller u. a. (Hg.), *Ans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DDR*, Bd. 4, Berlin 1994; D. Klein, »Ost-West-Einflüsse im Gefolge östlicher Transformation«, in: *Utopie kreativ*, 4. Jg., 1993, H. 29/30, 7–18; A. Kosing u. a., *Dialektik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81; Th. Meyer, *Was bleibt vom Sozialismus?*, Reinbek 1990; H. Nick, *Warum die DDR wirtschaftlich gescheitert ist*, Hefte zur DDR-Geschichte 21, Berlin 1994; *Programm der SED*, Berlin/DDR 1976; A. Schaff, *Perspektiven des modernen Sozialismus*, Wien 1988; M. Schneider, *Das Ende eines Jahrhundertmythos. Eine Bilanz des Sozialismus*, Köln 1992; R. Schröder, »Was war verkehrt an diesem Sozialismus?«, in: *Die Zeit*, 46. Jg., 1991, Nr. 20, 18f; J. Strasser, *Leben ohne Utopie?*, Frankfurt/M 1990; G. Winkler (Hg.), *Sozialreport '90. Daten und Fakten zur sozialen Lage in der DDR*, Berlin/DDR 1990.

808

斯特凡·博林格
（Stefan Bollinger）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参见：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manzipation, feudaler Sozialismus, Fordismus, Fortschritt, Gesellschaftsformation,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jugoslawischer Sozialismus, Kommunismus, Mangelwirtschaft, Modernisierung, nationaler Weg zum Sozialismus, Neoliberalismus, Perestrojka, Personenkult, Planwirtschaft, Prager Frühling,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mus, Sozialstaat, staatsmonopolistischer Sozialismus, Systemkonkurrenz, Vergesellschaftung, Verstaatlichung, Volkseigentum, Weltwirtschaftskrise, wilder Kapitalismus

现象、表现形式 (Erscheinung, Erscheinungsform)

A: ẓuhūr, šakl ẓuhūr.

E: appearance, form of appearance.

F: apparence, forme phénoménale.

R: javlenie, forma projavlenija (явление, форма проявления).

S: apariencia, forma de manifestación.

多义的术语“现象”(Erscheinung)连同其复合词(自然现象、天象、显灵等),尤其近乎 Schein(光、外表、外观、假象)(连同外表、印象、假象、显露、反光、反射、日光、阳光、日曜等),由同样多义的动词 erscheinen 派生构成,该动词“在各义项上”均包含“光照可见”(Grimm 33, 第 955 页),而 scheinen 起初意为发光、照耀、照射本身,因为它是一切看见和可见成为可能而必须经过的程序。该术语的义项从“出现”“形成”“公开”到“显现”,直到“造成错觉,给人假象”,加入关于光和外表的隐喻行列之中。这些隐喻常见于对认识的反思中,如启蒙、洞见、澄清、明晰、lumen naturale(自然之光,理性)、海德格尔的“澄明”等,与之相对的是盲目、黑暗等,还有马克思在隐喻中信手拈来的障眼物霾、雾、云等。哲学术语“现象”在范畴上不同于 Schein,18 世纪起译自希腊文 φαινόμενον,是动词 φαίνω 的被动分词(参见 τὸ φάος,阿提卡方言 τὸ φῶς:光,公众[视线],生命之光;幸福,拯救;灯;眼[力])。φαίνω 的主动态用法意思从“发光、发亮、闪耀”到指示性的“曝光”,直至“给某人照亮、掌灯”;被动态用法从“经人指出、真相大白”到“形成、生成,骤起”,直到弱化的副词意义上的“显然、确实”或者“似乎”(Gemoll)。它有“大量复合词和派

809

81

生词”（参见 Frisk 2，第 982—983 页）；在许多复合词和派生词（如 φαιδρός，即“明朗、辉煌、闪烁”）中，重叠的意义有“明晰和壮丽”，也就是“真理和威力”“盛誉和统治地位”。

术语“现象”有异于 Schein，属于难以译成其他语言的术语之列，这点在拉朗德那里可以看出来：他把 *apparence*（现象、假象、外观）译成 Schein，但以“外观平庸的建筑”（un édifice de médiocre apparence）为例做出首个界定“事物的一个方面”（aspect d'une chose）。如果用“现象”来复述，这个义项“显然不属于哲学语言”（n'appartient pas à la langue philosophique）。作为形而上学术语，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词描述了这样一个事物，它异于自己相应的自在之物。”这番考证的结论是，为避免与 Schein 有双关歧义，最好说 Phänomen（现象）。作为现象是“在构成诸科学的材料的一切事实这种最广义上而言”（第 765 页；参见 Descartes，*Principia*，III，第 4 页）。

古希腊人的地中海世界如此重视 αἴσθησις（明朗、辉煌、闪烁），也高度发展了假象惑人的技巧，致使假象惑人的技巧载入创世神话、普罗米修斯的传说之中。这个地中海世界把现象这个术
810 语拉入形而上学二元论中，将其与逻辑上的本质真理对立起来。此后，现象依此传统表示“非本真的事物、表面的事物”（HWPh 2，第 724 页）。

在康德处，Erscheinung 和 Phänomen 成为认识论概念，适用于经验对象的存在样态，不同于无法认识却在逻辑上必须有的自在之物。费希特把“现象论”（Erscheinungslehre）理解成“一种特殊的义务论，当然，这种义务论只是生活特殊领域的现象论”（Grimm 3，第 958 页；参见 Fichte，Hinterl. Werke 3，第 102 页）。黑格尔把现象学（*Phänomenologie*）扩展为意识的现象论，要求用自成一体的话语辩证地推导完整系列的意识诸形态。

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在历史哲学上因允许诸历史形态相互生成而有其新颖性，但他仍然停留在传统哲学领域；马克思则离开了这一领域及其相互竞争的诸种解决之道。后者所说的现象问题根植于事物自身的认识论上的障碍。现象（在不加深究即被认为是事物自身这种意义上）和显现之物的“现实”或者“本质”的分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问题。特别是因为受制于形式，现象是“表现形式”。于是，认识论的问题就在于误判形式规定。在这里，现象或者表现形式往往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支点之意。

不过，马克思使用的术语却并非一清二楚，偶尔还令人迷惑。现象可能意为“直接的实在形式”（Sève 1980，第

697页），但在使用时也可能类似于“对象、事物、过程等”（Kröber 1975）。他常把 erscheinen（出现）用作 auftreten（出现）或者 vorkommen（遇到）或者 gelten（有效）（参见 MEGA II.5，第631页，在此语境中，表现形式被视为“实现形式”，第642页），而且还常颠覆性地采用传统的哲学术语。这助推马克思主义一再受累于前马克思主义的甚至前康德的形而上学。

1. 马克思之前的传统。航海民族希腊人一再使用水的折射来比喻假象惑人：浸入水中的桨看起来像弯折了一样。此类水的折射也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举出的例子之一，用以把感性认识贬低成纯属迷惑人的“剪影”之源。
811 阻止“显现之物在我们中间一统天下”（μὴ ἄρχειν ἐν ἡμῖν τὸ φαινόμενον）的，是“衡量、计算和掂量”（τὸ μετρεῖν καὶ ἀριθμεῖν καὶ ἱστάναι），也就是“灵魂中有逻辑的部分的工作”（τοῦ λογιστικοῦ ἂν εἴη τοῦ ἐν ψυχῇ ἔργον——*R* X，第602页 d—e）。

亚里士多德也把存在之物与显现之物对立起来，比如在其关于可爱和舒适的论文中：“因为，每个人都不喜爱对他来说是善好的存在之物，却喜爱（对他如此）显现之物。”（οὐ τὸ ὂν αὐτῷ ἀγαθὸν ἀλλὰ τὸ φαινόμενν，*EN* 1155 b，第25—26页）不过，不同于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少在如下这一处因不可行而又不做区分：归根结底，在这方面并无区别，只不过可爱之物就是如此显现之物罢了（διοίσει δ'οὐδέν ἔσται γὰρ τὸ φιλητὸν φαινόμενον——第26—27页）。他在《形而上学》中解释道，“并非一切显现之物皆为真”（οὐ πᾶν τὸ φαινόμενον ἀληθές），并且断言现象与感官的知觉（φαντασία——博尼茨/赛德尔［Bonitz/Seidel］译成 Vorstellung［想象］）并非同一（οὐ ταὐτὸν τῇ αἰσθήσει，1010 b 1）。

伊壁鸠鲁以“映像”（εἴδωλον）为名，赋予现象以物质的、可做物理描写的实在性，使其可以“在无法想象的时间内”（ἐν ἀπειρινοήτῳ χρόνῳ）也就是以“光速”离开显现的事物（*Brief an Herodot*，第46页）。流溢的映像（εἴδωλον）长期保留原子的姿态和秩序（θέσις καὶ τάξις）（第48页）。因而，这些物质性图景侵入的感官并不会让人产生错觉。错觉（ψεῦδος）和迷误（διημαρτημένον）总是产生于所穿凿附会之事（ἐν τῷ προσδοξαζομένῳ——第50页）。

斯多亚派以希腊概念 φαντασία 表示感官印象（τύπωσις）的结果，西塞罗用与肉眼可得的印象（evidentia）相配的术语 *visus*（现象）——本义为“视”或者“观察/瞥”（*Acad. libri*，第18页）翻译此希腊概念。“拉丁术语 *visum*（现

象，景象）（来自 *videri*［显现］）充分吸收了 φαινόμενον（显现之事物）的意义。”（Bächli/Graseser in Cierro，第 202 页，注 34）与伊壁鸠鲁相反，西塞罗也拒绝的观点是，“显现的一切本就如其所示”（*quiquid videtur, tale dicam esse, quale videtur*，第 19 页）。但这种思考并不清晰。因为即使在他那里，也必须通过思考来领悟现象，他把 ἔννοια（观念、表象、概念）领会成 πρόληψις（预期）的同义词（参见第 30 页）并译成 *notitia*（知识、认识、理解）（参见第 22 页）。

现象的认识论问题受制于现实的对象形式，这种对象形式是被自发地给
812 予直观的。对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这个框架予以内在合乎逻辑的充实，是康德的目标。由于“对象”必定“指向我们的认识”（*KrV*, B 16），它们便成为具有超验—主观结构的现象（Erscheinungen 或 *Phänomenen*）。在现象的构成关联之外，对主体的彼岸即“外界”无可言说。因而，哲学依内容成为现象学；依思维方式成为结构分析。康德把“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使形形色色的现象井然有序”的原因称为“现象的形式”；它必须“在头脑中先天（a priori）准备就绪”（B 34）。即使现象因此“无非是表象”（A 250/B 306），仍应严格分清现象与假象：真之问与不真之问即关于被认为是现象的假象的问题，均以现象世界为媒介提出（参见 A 293）。

黑格尔把“非本质”现象与本质现象区分开来。与“非本质现象”互补的是他在平衡柏拉图的理念说和法国大革命的唯理论（Rationalismus）时归于概念之事：“一切事物，举凡不是这种由概念自身设定的现实，皆系转瞬即逝的此在、外部偶然性、意见、无本质的现象、不真、错觉等等。”（*RPhil*, §1）“关键就是在一时和转瞬即逝的假象中认识内在的实体和临在的永恒。”（*Vorrede*, W 7，第 25 页）受形而上学保守主义的改造，此处按捺不住的仍是回想“初始的宏伟奇观……，即意欲从头、从观念开始，通过颠覆一切既存事物和已有事物，来制定一个伟大、现实的”——并非如柏拉图只是想到的——“国家的宪法，并且只愿给予这种宪法以臆想的理性作为基础”（§ 258，W 7，第 400—401 页）。思维和理性在此代表的是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那就是通过公众舆论和投票表决来检验被压制的言论是否具有达成共识的能力。在本质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中出现的这种区分，即在“内外此在的辽阔王国中只存在的转瞬即逝、毫无意义的现象和自身真正当之无愧的现实”（*Enz*, Einl, § 6）之间所作的这种区分，把革命的冲动关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中。不过，

在黑格尔阐发其辩证法之处，即在“本质论”之中，却出现了一个与形而上学二元论针锋相对的“现象”概念：“本质
813 必定显现。”（*Enz*，§ 131：马尔库塞改述成“自我显露、自我显示、表现”——1932，第91页）黑格尔继续说道：“显现是限定，由此，本质并非存在，而就是本质，展开的显现就是现象。因而，本质并非在现象的**背后**或**彼岸**，而是由于本质是存在物，实存就是现象。”（*Enz*，2，§ 131）他接着说道：“现象并不表明不在本质中之事物，而本质中无物不表现出来。”（§ 139）与此相反，布洛赫主张“现象与实际的本质（Wesen）的尚不同一，最终实存和其内在的本质（Essenz）的尚不同一”是“世界自身的实在问题”（《希望原则》[*Prinzip Hoffnung*]，I，第267页）。与亚里士多德关于被动的质料（ὕλη）和唯一能动的形式（εἶδος）的二元论（*Metaph*，984 a，第24—25页）相反，黑格尔考虑的是“**持存**”（质料）和（使持存者有别于他者的）“**形式**、反思成他者、**自我扬弃的持存**”的统一（*Enz* II，§ 131）。“所以，形式就是**内容**，而根据形式展开了的规定性，它就是现象的**规律**。”（§133）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形式时，就受到了“形式内涵或形式内容”这个概念的启发（参见Niji 1995）。

尼采同样“明了”，“一切现象均有质料”，还有逆反定律：“因为是质料就意味着是现象。”（KGA III.3，Aph.6.4）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目标完全合理”；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也追逐**假象**，（因而于臆想或者幻想而）以为假象是实在（同上）。

2. **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主义，指责现实知识违反纯粹现象学：把个人分配到社会领域和国家领域的方式是“这种**现实的关系**被思辨的思维归结为**现象**。这种情势，这种任性，这种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即这种**现实的中介**似乎只是由现实的理念私自制造出来并在幕后行动的那种**中介的现象**”（MEW 1，第206页）。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还批判黑格尔，说他在“精神”或者“观念”的名称下把“思维过程”理解为“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认为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MEW 23，第27页）。

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自己在表述科学的认识任务时，似乎把现实与现象或者表现形式对立起来。他后来又把表现形式领会成有待探究的状况自身的作用方式。最后，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功能 814
（如劳动）的历史特定的形式规定。

2.1 作为认识的障碍的颠倒的现象。

在许多表述中，马克思均把认识的障碍这一问题表达为颠倒的现象："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MEW 23，第559页）而"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MEW 25，第825页）。

（不科学的）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恰好对于……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同上）。出发点是"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不符，"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科学才能揭示出来"（MEW 23，第564页）。主要例子表明一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此类形式自发再现于"普通意识"中（MEW 23，第562页）。与此相反，科学的关键必须是把表面的运动归结为现实的运动（参见MEW 25，第324页）。于是"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马克思1867年6月27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1，第313页）。现象在此代表直接性，若不探究现实的中介，这种直接性就会导致错误的表面印象。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Lohn, Preis, Profit*）中，马克思针对此类错误的表面印象，以哥白尼式转向来暗喻。他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们说：要想在理论上说明利润，"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曾经也是奇谈怪论"（MEW 16，第129—130页）。

如果说可以把这种辩证修辞法理解为让健全理智脱离其思维定式的尝试，而且，如果从现实的运动出发来解释现象是现实的任务，那么，马克思的结论 815
就过当了，以偏概全，在双重意义上成问题："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同上）对此，可以提出异议：**首先**，存在这样的科学真理，它们使日常经验没有任何悖论而连贯自洽，而借助自己的日常经验，人们绝非"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其次**，日常经验也包括经常感知诱人的外观，但人们却不会被这种外观欺骗——在技术上与社会交往上都是如此。

《资本论》的草稿中有许多注释，其中对“delusive appearances of things”即“事物的假象”（MEGA II.4.1，第411页）这个认识论问题所做的论述，比《资本论》第1卷中常出现的本质和现象的二元论说法更不谨慎。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顺带地把“现实的历史”理解成只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支配性的资本过程的现象）（MEW 42，第180页）。又如，《资本论》第3卷手稿提出这样的要求，即“透过假象”揭示关系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25，第178页），还要着手科学的认识任务，“把仅仅是现象的（phänomenale）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MEGA IV.2，第245页；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卷中改成“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erscheinende］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MEW 25，第324页）。于是，为了调和剩余价值和利润，马克思又遁入关于本质性不可见之事物和非本质性可见事物或者现象的二元论：“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MEW 25，第53页；MEGA IV.2，第52页）不过，这是解释性的话语——它还借助惯用语的隐喻“表面”（Oberfläche）来制造纯粹修辞上的印象——而非操作性的理论。应该专门在认识论上探究马克思的实际科学—理论工作。

2.2 作为被中介的事物的错误的直接性的“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片断》（*Urtext*）中，马克思把货币看成“流通的产物，它仿佛是违反（交换者的）约定而从流通中生长起来的”，“无须依赖社会的协助和意志”，“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种固定的、压 816
倒一切的、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这一点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中，而且是表现在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义、最难捉摸的形式，即扬弃了一切媒介的形式中”（MEGA II.2，第73—74页；*Gr*，第928页）。这种“表现”既然是以“原子般的各个私人”为前提，它“也就更加严酷”。“它们的权力表现为一种天命”，集推动“人们的意识”和阻碍认识于一身（同上）。对中介本身做思考，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张力中，即把中介者当作起支配作用的目的。

中介的现实和现实的中介在商品生产中构成不可或缺的整体。因而，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中，马克思在关于价值形式分析的附录中把表现形式领会成“实现形式”：在价值表现中，“非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被当作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被当作只是抽象的

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实现形式”。一方面，“这种私人劳动的**社会联系**，是**在物质上存在的**”，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联系却“只有通过他们的产品的**交换才间接地**得到实现”，这些产品在实现为价值之前只是**按照规定性**是社会的使用价值，而非已是实际的社会使用价值。因而，表现形式又是“本质”的实现形式（MEGA II.5，第634—635页，参见第642页）。

2.3 作为表现形式或者表达形式的价值形式。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中，马克思一再提醒，有许多商品时才谈得上交换价值（MEW 19，第375页），在涉及交换价值时，他把表现形式改述成“独立的表达方式”（MEW 19，第369页）。这关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关涉把交换价值规定成“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MEW 23，第53页）。“表现方式”常常是在“表达的总体性”（阿尔都塞语）这一意义上被理解成一种对自我表达的本质的表达。马克思对价值所做的实际分析（MEW 23，第62页及以下）揭示了另一种意义。据此，一件商品要能够被交换，就必须使它的价值在同另外的至少一件商品的比较关系中、在复杂的条件下通过货币表现出来。马克思所说的单个商品作为价值物的不可捉摸性也只是为下述看法所做的准备。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马克思认为一件商品的价值并非不可捉摸的或者不可见的（Althusser 1969，第11页；1973，第83页）：只是在**单个的商品自身**上，价值才是不可捉摸的和不可见的；体现在另一件商品上，价值就是可捉摸的和可见的。把价值表 817
现的实践形式领会成骗人的幻象或者假象，是毫无意义的。在私人劳动分工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实践形式必然是生产关系自身的实现形式。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说，由于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形式也表达成价值的表现形式，他把不熟悉他的辩证法、无论如何就是对“本质”感兴趣的人送入了歧途。于是，对于倾心于臆想的本质之物的笨人来说，价值**实体**是要事，价值**形式**是次要之事。

2.4 作为一般社会职能的历史特定烙印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意识认为价值形式（商品、资本、雇佣劳动等）“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MEW 23，第94页及以下）。为了批判这种将历史的形式规定说成天然的做法，马克思区分了一般性（指一切社会或者阶级社会共同的）职能与其为每个社会形态留下的特定烙印。为了表达“跨社会的相对化”（Haug 1973，第151页）时的这种特定性，马克思又使用了“表现形式”这一术语。

例如，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份基金以维持并再生产劳动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1867年），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23，第594页），所以，马克思说他们“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虽则如此，把“所表现的东西”作为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仍会误导人。资产阶级的眼光所透视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此处指资本主义的）特性本身。

3. **马克思主义。**列宁用恩格斯的话批判休谟和康德，“他们**都把**‘现象’和显现者”“**根本分开**”，尤其是康德把显现者领会成“属于另一个根本不同的领域，即属于知识不能达到而信仰却能发现的‘彼岸’”（LW 14，第95页）。列宁在此虽然仅仅认可对“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所做的区分（第96页），但后来在关于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语境中，他又写道，我们“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LW 36，第347页）。

与此相反，早在1907年，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显得迟钝、刻板。例如，
818 他把“物质方面、外部条件、存在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区分为**内容**，把“观念方面、意识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区分为**形式**，宣称一项“著名的唯物主义原理”是“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W 1，第276页）。此外，他又认为“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这是一般称为自然或社会的同一现象的两种不同形式”（第277页）。

站在此类庸俗斯宾诺莎主义简单化的对立面，格奥尔格·卢卡奇使现象和表现形式靠近意识形态，宣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因为由此“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现象的魔圈中的个人（当然，他们往往以物为中介）觉得人际关系是物”（1951，第9页）。卢卡奇把“这种社会现实的实际的、本质的进程与掩盖它的、直接可见的表面之间的”对立描绘成“资产阶级思想持久的问题”（第8—9页）。

当然，借助旧的哲学术语来表达特定实践形式内自发的观念与对这些实践形式自身所做的社会理论上的分析之间的歧异，至少会引人误解。比如，若按劳动时间给雇佣劳动付酬，就显得纯属“假象”。如此来理解，即把**矛盾的**关系简化成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变得问题重重。于是，又显得纯属“假象”的是，与奴隶或者农奴不同，雇佣工人是自由的，在某方面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成员地位相同。“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显现**为自由的、相同的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合法关系。”（Herkommer

1985，第36页）但“显现”在此大致意为“在其他方面构成”。因而，沉迷于马克思偶尔的言论而把雇佣工人的自由——这种“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MEW 23，第183页）——宣布为“纯粹的假象”，就成问题了（Herkommer，36，参见MEW 23，第609页及以下）。“背后的东西”因而“被掩藏的东西”这种惯用语的印象使人脱离了对实在的中介的分析，而这些中介根本不了解“背
819 后”（参见同上：“背后的内容，即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占有，被交换过程的形式掩盖了”）。尤尔根·哈贝马斯宣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形式是“客观的外观”，理由是“它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双方识别不出他们争执的对象，并限制了他们的沟通。劳动的商品形式是意识形态，因为它既隐瞒又表达了对一种不受拘束的对话关系所做的抑制”（1963，第81—82页）。此类表述的问题是以总体性之名用解释学来压缩矛盾。对雇佣工人而言，在另一种意义上，至少在劳动之外，在公民社会的条件下，自由和平等的关系的现实性不亚于工资关系中的剥削。这些关系是争来的。应该强调的是这样一种矛盾，即它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自身内部对资产阶级习性所做的这种否定中。

无疑，在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思潮复归了某种无意识的形而上学，这些复归是基于马克思多义的论述而产生的失误。就马列主义而言，例如，科辛等人把现象界定为“对一事物的本质性（一般性和必然性）和非本质性（个别性、外在性、偶然性）规定的总和”（1967，第313页）。他们把“外在的”、感知可以理解的现象与本质对立起来，把本质设定为无法直接认识的“内在规定”；现象和本质虽然构成对立面，却是辩证的对立面，因而是不可分离的：“本质显现，而现象是本质性的。”（同上）。

在精读马克思和黑格尔著作的基础上，霍斯特·弗里德里希（Horst Friedrich）勾画了一套关于本质和现象的精妙辩证法。他强调“把现象归因于本质的要求”有反实证主义的意义，并在本质和现象之分——在马克思那里，本质和现象之分的“基本原则”是再现能力这一问题——中看到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的条件，“对物质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社会关系的区分，以及用那些对这些进行的解释”（1981，第100、104、99页）。弗里德里希认为，现象并非自己设定其前提，跟它在其中起作用的体系相反，它并不给自己做中介（参见第105页及以下）。在现象的对立面，存在着“作为关系的本质，也就是由自身构成，具有直接的存在”（第11页）。

在这方面，他援引了马克思的话，后者
820 在《资本论》第3卷中把“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过程的领域”称为“没有中介的领域”（MEW 25，第835页），却忘记了以价值形式为中介，正如弗里德里希在以为生产设定了自己的前提时，忘记了自然（参见第104页）。现象是非独立的、单纯的衍生物。远离“内在本质”，做中介时适当有度：这是现象特性的尺度。弗里德里希把现象特性的增强理解成**外化**：外化的出现是由于“后来的表现形式并非直接源于本质性的形式，而是关涉它们分别直接接续的表现形式……。表现形式的外化通过不同的中介而越来越强烈地与本质相分离，最终独立化”（第126页）。但是，表现形式的独立化**“构成假象”**（第127页）。在辩证的总体性观框架内，对这个现象概念的可能的运用（借用马克思反驳蒲鲁东的论据）就是，工人运动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加以攻击，以连同本质一起也消灭其全部现象”（第98页）。但在认识论上有用的，看来主要是在探寻实在的中介关联时有意义；附带地，还可以了解“内在和外在”之类的说话方式的意义。

在奥托·莫尔夫（Otto Morf）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时，其主导思想是把“本质”（essentia）解释成“本体论结构”，把“现象”（existentia）解释成“存在的结构”，把它们的合并“本质和现象”解释成“在统一中既同一又对立的二元性”（1970，第109、111页）。莫尔夫的这种黑格尔化的理论原则并非没有问题；不过，它毕竟还是避免了把现象或者表现形式斥责为纯属假象。“因此，表现形式就不仅是自身本真的本质历史地表现出来的征象，而且是由该形式来决定并且实现的本质。”（第112页）

恩里科·兰巴尔迪（Enrico Rambaldi）（1990）在古典形而上学框架内着手解决本质和现象离散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此视野中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了该问题。他没有看到，马克思在激进的论域转换中，不仅离开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把这种基础及其哲学原则自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对象，以意识形态上的“暗箱效应”（Camera-obscura-Effekt）来把握在 821
国家政权中再现的阶级社会。兰巴尔迪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是范例，适用于“不把现实中充满矛盾和对立的现象看成纯粹假象，而是归因于统一的基础性本质”（第824页）。

与此相反，恩格斯洞察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经济形式归结为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MEW 13，第476页）；“关系”中就有其“本质”。所以，

正是私人的而仍进行劳动分工的生产把产品“标记”成商品（参见 Haug 1976，第 165—166 页）。言说商品的（甚至“内在的”）本质，就只是迎合被马克思批判为形而上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因为它无意识地把社会关系加倍物化了。马克思认为，统治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再现形式归根结底并无应从它们自身来领会的历史，而有应从这些关系来领会的历史，商品、货币、资本和其他价值形式归根结底并无内在本质。言说“外在本质”较为合理：货币形式反映商品的价值表现，货币性质由本身并非货币之事所导致，也就是由私人—劳动分工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所导致。因而，要从单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来重构货币形式的起源。

马克思确实是如此思考和行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细节上也是这么说的。他著作的读者分裂成两方，一方更多接续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操作方面，另一方更多接续了马克思的文本中较为传统的表达素材。如让-保尔·萨特依托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自然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合法性，意欲把辩证法限制在历史上。在此语境中，他解释道，一旦发现“一方面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是辩证的，另一方面”发现“对这种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也是辩证的”，那么“被机械打散的（éparpillement mécaniste）所谓历史——借助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的鼻子理论：它若短一些，世界就不一样了——就会成为简单的现象（apparence）”（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理论这个说法来自法国近代思想家布莱兹·帕斯卡尔 [Blaise Pascal]，意思是如果克利奥帕特拉七世 [即埃及艳后] 的鼻子短一些，可能凯撒和安东尼就不会被她吸引，历史也会因此被改写。——译者）。此类“我们可以把握（saisir）的，而且彼此还互有条件关系的直接现 822
象实际上纯属表面的现实”，这些表面现实常把“身为总体性的根据本身”转换成其对立面（1962，第 2 页）。

被归结到马克思名下的、颠倒的可见性或者现象与不可见的本质之间在认识论上的戏剧性冲突，可能是以马克思的哲学辩才为基础的，从而也就是以他可用的阐述方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特定社会关系的集合，这些社会关系通过这个集合得以统一化和条理化：这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发现的实质。因此，对于这一实质的阐述，他只能采用要么偏向思辨的方式，要么偏向经济主义的方式。后一种版本面临的危险是，把对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压缩成‘经济学’。”（Böke 1992，第 89 页）这却不再符合 20 世纪达至的反思水平。因而，斯图尔特·霍尔要求取

消马克思的语言中“关于表面和现象的误导性内涵”，因为否则的话，《资本论》的术语会令人“极其迷惘”（1984，第112页）。

默默依循葛兰西的某种观念（参见H. 11，§17，*Gef* 6，第1408页），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LLC*）前言中强调了经验主义认识观与“本质在生存透明时的宗教问题”之间的关系（第45页）。这种自发的认识上的意识形态向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穿过可见的外表（外壳、现象、可见表面[*surface visible*]）而深入不可见的内部（核心、本质、不可见核心[*noyau invisible*]），仿佛逼近了“实在的两个根本部分”：要获得本质，就必须采取萃取法，即解蔽（Ent-Deckung）（*LLC* I，第44—45页）。但这样就把属于（在有待解决的任务这个意义上的）认识的某种区分，投射到了这种区分的对象上。

尽管雄辩的、辩证的或者说解释自己方法的马克思还常说旧语言，尤其是恩格斯和列宁在对手领域的论战中使用这种语言，但学者马克思不仅事实上有不同的做法，而且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方法论部分开始勾勒一种认识论，内在/外在和本质/现象在其中无足轻重。据此，阿尔都塞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任务是，重新发现专属马克思的领域（*LLC* I，第46页及以下）。玻利瓦尔·埃切维里亚断定，《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现象及这个世界自发 823
产生的理想化的、精神上的征象出发”，描述了其“现实主义的图景”，这决定了《资本论》中的阐述方式（1994，第6页）。不过，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如果把批判的这种禀赋理解成“好似我们不得不看穿现象：我们的探究却并非针对现象，而是可谓针对现象的‘可能性’，那就是误解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就现象做了何种表述。”（*Ph*，*Unt.*，§90，W 1，第292页）当然，关于语用习惯的探究一旦未被嵌入对社会关系和受制于社会关系并促成社会关系的实践形式和生活方式所做的分析中，就会失去意义（参见Haug 1996，第4章）。而它们的关联并非可直接观察的既存状态。对关于本质和现象的表达所做的批评并不防止隐匿在其中的问题，而是相反，要让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以得到处理。就此而言，阿多诺对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反驳就适用：“哲学怀疑现象的迷惑，力争解释之，社会呈现的外表越平整，理论也更加彻底地怀疑它。理论想要命名暗中把驱动装置组装为一体的事物。”（1967/1972，第81页）

4. 对马克思的批判。甚至各种手册也大多比波普尔的歪曲描写更好。卡尔·波普尔以为，可以因马克思的《政

治经济学批判》使用了现象和表现形式这两个概念而将其置于死地："价格背后有名堂，即客观的、实际的或者真正的价值，价格与之相比如同'表现形式'。这整个理念（它并不来自马克思）足够清晰地表现出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连同其区分隐蔽的本质性的或者真正的实在与偶然的或者迷惑人的现象有何影响。"（1958，第216—217页）这就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认为价值形式既非偶然亦不迷惑人。波普尔懵懂地认为马克思会有此荒唐的论断："工人所领工资的价值就不同于其工时数量。"（第210页）波普尔汲汲于摆脱价值概念，浑然不觉他由此复制了这种差异：即使赞同波普尔的意见，把工资视为劳动的价格，此价格仍旧"不同于工时的数量"。

波普尔不仅误解马克思用表现形式这一概念所表达的问题，还把此问题与
824 商品交换是缠讼不休的体系这一观念纠缠在一起，而这一体系总是事后才处理，通过其结果来居间调停。波普尔以为自己在解读马克思："但这些价格背后总是存在或者至少显出较为固定的东西，即某种平均价格，实际价格围绕着它振荡，它被称为'交换价值'或者简称'价值'。"（第209—210页）他没有看出，振荡是用以达到"平均值"的形式。于是，他就让结果支持得出结果的过程。简言之，他根据显现的世界对岸的"背后世界"（尼采语）的形而上学模式，误解了原初无序、后来才得到规整的一个过程的反形而上学模式。他归咎于马克思的是，"使用这种普遍的理念"把商品的价值界定成"生产商品……所需工时的平均数"（同上）。他不明白，马克思把自己发现的将价值归结为劳动的十足资产阶级的做法转换成这个问题：是如何以及在哪些条件下导致所耗费的人类劳动被视为物的属性、被视为"价值"的？（参见MEW 23，第94—95页）

5. 现象技术和虚拟现实。另一组问题涉及在艺术中——但尤其是在社会对抗的框架下的迷惑性技术中——作为美学抽象的现象。强大的现象工业部门致力于运用技术复制并最终运用高技术建构模拟现实的现象。在基于商品一货币关系的特性的商品美学中就是如此，以至并非使用价值，而是使用价值的"现象一材料"作为"美学使用价值的保证"，才惹人购买（Haug 1980，第45页）。从此，一场风潮开始席卷跨国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面对"现象（我们把该词理解成'幻影'）即拟像的新速度、合成图像或者人为假象、虚拟事件、虚拟空间和架构、如今无以复加的占有和投机"，此问题在高技术资本主义中尖锐化了（Derrida 1996，第92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in: der. u. a.,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armstadt-Neuwied 1969/1972 (^{6}1978), 81–101; L. Althusser, »Avertissement aux lecteurs du Capital«, Vorwort zur Taschenbuchausgabe (Flammarion) von K. Marx, *Le Capital I*, Paris 1969, 7–26 (dt. »Vorwort für die Leser des I. Bandes des ›Kapital‹«, in: L. Althusser, *Marxismus und Ideologie*, Berlin/W-Hamburg 1973, 75–110; 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Bd. 1, Berlin/DDR 1953 (^{2}1960); H. Böke, »Polemik und Paradigmenwechsel im Werk von Marx«, in: IMSF (Hg.), *Defizite im Marxschen Werk*, Frankfurt/M 1992, 80–90; Cicero, *Akademische Abhandlungen. Lucullus/Academici libri, Lucullus*. Text u. Übers. v. C. Schäublin, Anm. v. A. Bächli u. A. Graeser, Hamburg 1995;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a.d. Frz. v. S. Lüdemann, 2., überarb. A., Frankfurt/M 1996; B. Echeverría, *Circulacion capitalista y reproducción de la riqueza social. Apunto crítico sobre los »esquemas« de K. Marx*, Mexico (UNAM) 1994; H. Friedrich, Die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Berlin/DDR 1981; H. Frisk, *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Bd. 2, Heidelberg 1970; W. Gemoll, *Griechisch-deutsches Schul- und Handwörterbuch*, Wien-München-Zürich 1991 (Nachdr. d. 9. A.);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W 1963; S. Hall, »Ideologie und Ökonomie-Marxismus ohne Gewähr«,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Die Camera obscura der Ideologie*, AS 70, Berlin/W 1984, 97–122; W. F. Haug, »Zur Bedeutung von Standpunkt und sozialistischer Perspektive i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ders., *Bestimmte Negation*, Frankfurt/M 1973, 143–86; ders.,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1974), Berlin/W-Hamburg ^{5}1989; ders., *»Werbung« und »Konsum«.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in die Warenästhetik*, Berlin/W 1980; ders.,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S. Herkommer, *Ideologie. Eine Einführung*, Hamburg 1985; A. Kosing u. a.,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Lehrbuch*, Berlin/DDR 1967; G. Kröber, »Erscheinung«, PhWb I, 1975, 366f; G. Lukács, *Existentialismus oder Marxismus?* Berlin/DDR 1951; H.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keit*, Frankfut/M 1932; O. Morf, *Geschicht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 ^{2}1970 (Bern 1951); Y. Niji,

»Der Formgehalt oder Forminhalt des Wertausdrukes in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on Karl Marx—die hegelsche Logik als Quelle des marxschen Wertbegriffs«, in: *The Hannan Ronshu, Social Science*, Vol. 31, Nr. 2, Sept. 1995, 1–4; K. Popper,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1944), Band II: *Falsche Propheten—Hegel, Marx und die Folgen*, Bern 1958; E. I. Rambaldi, »Wesen/Erscheinung/Schein«, in: EE 4, 1990, 818–25; J. P. Sartre, R. Garaudy, J. Hyppolite, J. P. Vigier, J. Orcel, *Marxi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lectique*, Paris 1962; L. Séve,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Paris 1980; L. Wittgenstein, *Werkausgabe*, 8 Bde., ²1995.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Ausdruck, ästhetische Abstraktion, Bestimmung, Camera obscura, Darstellung, Denkform, Dialektik, Empirismus, Epistemologie,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videnz, Existenz, Fetischcharakter, falsches Bewusstsein, Form, Formgehalt, Innenwelt/Außenwelt, Kritik, Metaphysik, Phänomenologie, phänomenologischer Marxismus, Oberfläche, Schein, Totalität, vulgärökonomie, Warenästhetik, Wertform, Wesen/Erscheinung, Wissenschaft

五一节（Erster Mai） 826

A: awwal māyū.

E: May Day.

F: premier Mai.

R: Pervoe maja (первое мая).

S: primero de mayo.

自19世纪30年代起，各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即使英国工人运动和此后很可能从大不列颠移民国外的工人起过决定性作用，实际上也不可能把不同的情境、运动和诱因确切联系起来。在美国，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首次促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自1867年起，这场运动与五一节结合起来。到了1886年的芝加哥事件时，其全球影响达到顶点。在为抗议警察的暴行而在干草市场（Haymarket）举行和平抗议示威时，一枚炸弹爆炸——历史研究证明，此系“制造事端者所为”（Debouzy 1976，第35页）——导致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任意逮捕和刑罚。干草市场事件点燃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斗争的烽火。

"应在一定时刻组织一次**大型国际示威**，而且同时于某一天在各国、各城市，工人们向**公权力（行政当局）提出要求**，即要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其余决议付诸实施。"（*Protokoll*，1890，第123页，引自Fricke 1980，第21页）1889年，"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国际工人大会确定举行五一示威活动，所作决议把八小时工作日升格成应在全球统一谋求的目标。

1890年，恩格斯支持这些努力，他积极参与了伦敦五一节的准备工作（MEW 22，第60页及以下）。三年后，他看出"五一节不会像过去三年那样，在国际无产阶级生活中起压倒一切的作用"（MEW 22，第404页）。除了在奥地利"工人确实没有其他的斗争手段了"，他似乎觉得"同普选比较起来"，五一节"可能是退居次要地位了"，他将此解释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势力增强
827 的标志（同上）。1893年，恩格斯致函奥地利、德国、西班牙和捷克的同志们，祝贺五一节（MEW 22，第400页及以下）。行将成为第二国际的主导力量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采取政治行动，迫使国家接受一项法律，从而不管所在阶层和职业分别而实现本阶级的统一。

1900年，列宁认为"哈尔科夫的五一示威活动彻底"驳倒了这样的"鬼话"，即"说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程度"，没有成熟到"反对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的程度（LW 4，第357页）。随后几年里，列宁多次以传单（7，第192页及以下；8，第343—346页）、口号（18，第100—105页）和分析俄国危机的演进参加五一节活动，以便在政治上引导与群众性罢工相结合的五一示威运动（19，第208—217页）。

无政府主义者和对他们亦步亦趋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把政治行动与直接行动原则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五一节尤其是展示集聚的工人威力（总罢工景象）的时机。八小时工作日的目标发挥了普遍化和划一的功能，因为它甫一开始就不仅诉诸工人的兴趣，而且诉诸工人的情感、道德感、想象力和象征价值观，尤其是平衡工作时间和生命时光的需要。这种需要以3乘8的公式来表达——8小时给自己，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获得新的生命时光便于人放眼新的差异化需要，后者涉及社会共处、教化和与自然的别样关系。因而，五一节这天就有意义，度过这一日就有特别的心绪：示威活动和节日、劳动的世界和艺术创作、文学、戏剧、声乐交集；与自然的关系有意义，还需要把自然景象借用到社会解放的过程上（自然的苏醒象征着社会的苏醒；五一节的阳光彰显了阶级斗争的权利；喷薄的破晓景象；等等），

但八小时工作日并非在1890年示威取得压倒性成功后唯一与五一节相关的主导理念。此外还有：平等理念，它是
828 在政治斗争的层面要求公民权和普选权时被拿来作为依据的；国际团结理念以及（日益增强的）争取和平的理念；希望全面解放的理念，它统摄多项具体的单个目标，不仅牵涉经济领域，而且涵括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以及文化事务。这种动机的多样性是不可以加以化约的：于是，五一节可以被视为研究工人运动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辩证法的指南。

在此意义上，1907年，罗莎·卢森堡在简短回顾历史时阐发了五一节的政治前景。她发现，五一节的历史上有三个“大阶段”（GW 2，第201页）。第一阶段始于（当局的）血腥镇压，“五一节诞生之年……在德国挫败了反社会党人法”（第202页）。在接下来的第二阶段，随着议会主义日渐重要，19世纪90年代的五一节“逐渐”演变“成市民社会心平气和观看的和平的民间节日”（同上）。不过，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加剧，“五一节的新阶段也开始了”。它变成了“群众的示威活动”，在活动中，“他们的阶级解放利益”得到捍卫，“工人事业的国际性……”这一因素“凭借新生力量而凸显”（第203页）。所以，五一节“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为八小时工作日、为世界和平而举行的无产阶级示威”，直到它“逐渐”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举行的示威”（第204页）。

1907年，当社会民主党内部放弃五一节示威的呼声渐高时，卢森堡声明坚决反对“埋葬五一节”（2，第269页），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对实践活动的修正，而且是对直接发动最广大群众的少数方法之一的修正”（同上）。这样看来，五一节休假有助于落实游行示威权，抵制那些关于在选举权运动中形成公共舆论的禁令（*Die Maifeier im Zeichen des Wahlkampfrechtes*，GW 2，第334—338页）。就其政治意义而言，五一节证明“停工的思想是无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挺进的一种新斗争手段”（第336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月里，卢森堡又一次做了历史性回顾，反思了 829
五一节25年的历史，并如此展望未来：“它依然是各民族无产阶级亲如一家的环球彩虹，受剥削和受压迫者大军将通过无产阶级的光辉门径迈向更好的社会制度。”（3，第438页）

1914年之后，五一节不复如故，战时，这在多数庆祝者面前就一览无遗。俄国社会主义孟什维克派首领尤利·马尔托夫（Juli Martow）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报纸《我们的言论报》（*Naše slovo*）——此报坚决反战、反对多数社

会主义政党支持的“社会和平”（“国内和平”）政策——5月1日专刊上写道：“旧五一节死了。”马尔托夫还补充道：“国际主义的节庆的时代过去了，国际主义的工作日开始了。”

随后几年里，这种决裂的意识更加突出。20世纪20年代，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战后的革命活动导致工人运动内部决裂，五一节随之成为分裂的证明和象征，这种分裂在1929年柏林的**血腥五月**里得到最鲜明的表现，当时，社会民主党籍的警察局长下令向支持共产党的工人射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五一节经历了形形色色的制度化过程：它成为工人运动融入议会政体的标志；它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就在苏联流行的新意识形态；最后，五一节偷梁换柱地变成了纳粹政权的国家仪式（参见Behrens 1980），但即使在萨拉查（Salazar）统治下的葡萄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维希（Vichy）政权时亦如此，或者是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把4月21日作为“劳动节”的制度。工人运动几乎不可能在这些沉浮中重新发现这一天的意义。不过，这一天一再发挥作用：在争取联合对付法西斯主义政权时，在动员人们防止战争危险时，在不能合法庆祝的情况下坚持五一节的传统时，在为西班牙的共和事业采取行动时，或者在支援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时。

1945年5月1日的游行示威在欧洲各国表明“二战”结束和反法西斯阵线获胜，之后，五一节的历史日益分化：年复一年的五一节不足以保证多样化的运动具有统一的意义。“劳动节”的许多方面在转向后福特主义时，至少在高度工业化国家陷入危机，或者（在大众传媒的压力之下）因文化同质化过程而耗竭。但五一节的历史又证明，它完全能够集中新的需要并助力表达相应的意志形成过程。 830

参考文献：

U. Achten,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s 1. Mai*, Oberhausen 1979; ders., M. Reichelt u. R. Schultz (Hg.), *Mein Vaterland ist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e 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s 1 Mai 1886 bis heute*, Oberhausen 1986; M. Antonioli, *Vieni o maggio. Aspetti del Primo Maggio in Italia tra otto e novecento*, Mailand 1988; P.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rinceton 1984; M. Behrens, »Ideologische Anordnung und Präsentation der Volksgemeinschaft am 1. Mai 1933« in: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Faschismus und Ideologie*, 1, AS 60, Berlin/W 1980, 81–106; *Sentenario del Primero de Mayo*, in: *Estudios de Historia Social*, Nr. 38 u. 39, 1986; M. Debouzy,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n Ver-

cinigten Staaten bis 1918«, in: J. Droz (Hg.),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Bd. 8,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6, 7–68; M. Dommanget, *Histoire du Premier Mai* (1953), Paris 1986; Ph. S. Foner (Hg.), *Autobiograph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e*, New York 1969; ders., *May Da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Holiday 1886–1986*, New York 1986; D. Fricke, *Kleine Geschichte des Ersten Mai. Die Maifeier in der deut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Berlin/DDR 1979 u. Frankfurt/M 1980; F. Giovagnoli, *Die Maifeierbewegung. Ihre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ogischen Ursprünge und Wirkungen*, Karlsruhe 1925; *Le 1er mai*, hgg. v. M. Rodriguez, Paris 1990; I. Marssolek (Hg.), *100 Jahre Zukunft. Zur Geschichte des 1. Mai*, Frankfurt/M-Wien 1990; L. Martov, »Revanć«, in: *Naše Slovo*, Nr. 79, 1.5.1915; A. Panaccione (Hg.), *May Day Celebration*, Venedig 1988; ders. (Hg.), *The Memory of May Day*, Venedig 1989; ders., *Un giorno perché. Cent'anni di storia internazionale del 1° maggio*, Rom 1990; *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Paris. Abgehalten vom 14. bis 20. Juli 1989*, Nürnberg 1890; D. Roediger, F. Rosemont (Hg.), *Haymarket Scrapbook*, Chicago 1986; S. Sen, *May Day and Eight Hour's Struggle in India*, Kalkutta-Neu Delhi 1988.

安德烈亚·帕纳乔内
（Andrea Panaccione） 撰
彼得·耶勒（Peter Jehle） 译为德文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narchismus, Anarchosyndikalismus, Arbeiterbewegung, Arbeiterkultur, Arbeiterkulturbewegung, Arbeitszeit, Arbeitszeitverkürzung, Bedürfnisse, Befreiung, disponible Zeit, Emanzipation, Freizeit, Friedensbewegung, Gegenkultur, Gegenmacht, Gewerkschaft, gewerkschaftliche Kampfformen, Illegalität, Internationale, Internationalismus, Kampf, Klassenbewusstsein, Klassenkämpfe, Legalität, Massenbewegung, Massenstreik, Solidarität, Sozialdemokratie, Parlamentarismus, Revisionismus, Revolution, revolutionärer Syndikalismus, Streik, Wahlen, Zeithaushalt

教养 / 教育（Erziehung） 831

A: tarbīya.

E: education.

F: éducation.

R: vospitanie (воспитание).

S: educación.

1.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中，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和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教育主义（Edukationismus）最终决裂是同步发生的。致力于人的自由发展和创造相应的条件，对他们早期的理论性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决定性的（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伦敦来信》[*Briefe aus London, 1843, Lage*]）。马克思和恩格斯此时还作为被剥夺者的维护者而写作，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蓝图感兴趣。与关于社会变革的教育主义观念决裂的关键文本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它是公认的转向“成熟”之作的文献，尽管就此问题转变的彻底性众说纷纭——如阿尔都塞（Althusser 1968，第 168 页及以下，还有 *DKL*）和塞夫（Sève 1972，第 64 页及以下）就对此有不同看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人的“对象性的活动”对人的发展有何意义出发，向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策略提出了两个异议：创造教育环境时，不可避免地做循环论证（“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尤其是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TF*，MEW 3，第 5—6 页）。结论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同上）这种一致，而不再是教育，才是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一途径（第 10 个命题）。马克思看出，“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在于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第 6 页）；这样一种洞见剥夺了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鉴于社会的两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构意识形态的形成就意味深长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导致意识“摆脱”“世界”；历史的前景就在于把独立化的领域再与物质劳动联系起来（参见 MEW 3，第 31—32 页）。这样一来，国家、宗教、科学等制度的独立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异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而被扬弃。 832

反对意识形态力量（恩格斯语）、国家和教会的斗争以及反对旧的劳动分工的斗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教育问题的主导动机。他们在纲领性文本中提出了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要求（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847 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1866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矢志不渝的目标，可以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表示，那就是“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共产主义原理》），亦即在拓展儿童和青少年保护时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这方

而，决定性的信念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分工已经在资本主义中遭到“破坏”，以至即使在工人方面，有计划、有安排的活动也是必要的，当然，这在资本统治下只有在制造新矛盾的情况下才可行（MEW 4，第 376 页；MEW 23，第 508 页及以下；参见 PAQ 1987）。马克思尤其着迷于综合技术教育规划。在此方面，他把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教育计划视为“未来教育的萌芽”（MEW 23，第 508 页）。因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断定要求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反动的”，因为这种要求排斥“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依马克思之见，这种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MEW 19，第 32 页）。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只有触动工业上的劳动分工，才可能成功（*AD*，MEW 20，第 300 页）。教育中反对意识形态力量的斗争首先针对教会，其次针对国家，确切地说，针对摆脱了人民监督、组织上官僚机构化的国家。因而，马克思为巴黎公社“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Bürgerkrieg*，MEW 17，第 596 页）而感到振奋。虽然只有借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通过一般立法，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要求及教育政策要求（参见《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Instruktionen an die Delegierten des provisorischen Zentralrats*]，1866，MEW 16，第 190 页及以下），但可以委托给资产阶级国家的只是对公共教育的筹资和法律监督，而绝非内容安排。因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断然摒弃“由国 833
家实行国民教育”（MEW 19，第 30 页）。

至于家庭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区分了资产阶级家庭即一种绝对意识形态的关系（MEW 3，第 163—164 页）与无产阶级家庭，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家庭真正而理想的解体“往往”产生一种新的关系形式的因素（同上，MEW 21，第 73—74 页）。依马克思和恩格斯之见，大工业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入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MEW 23，第 514 页；参见 *Ursprung*，MEW 21）。在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中，应该为了自由的、纯粹由情谊决定的关系而废除“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应该规定尽早共同教育孩子（Grundsätze，MEW 4，第 377 页）。

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教育只有与生产劳动和“批判性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才是解放性的——只要共产主义不在这种结合中扬弃这种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即从远景来看，年长者和年轻者通过合作而共同发展将接替传统意义上的教育

关系。他们认为，教育任务与资产阶级国家不相宜，但以前的公共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公共监督的途径仍未得到解释。

2.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修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教育的国家地位和与生产相结合方面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教育政策上采纳了在德国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世俗、统一、免费的教学）。该党在“劳动教学”问题上更接近改良教育学的意见（参见 Clara Zetkin 1904，1906），认为“劳动”应该“在社会主义的未来”成为教育的基础。依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从“经济的统一”到“道德的统一”这一历史趋势，Zetkin 1896），社民党的纲领对家庭教育的评价时有不同。1889 年，蔡特金在关于妇女问题的一篇早期文章中
834 主张儿童教育社会化。与此相反，她与人合著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民主主义曼海姆指导原则》（*Mannheimer Leitsätzen*，1906）却承认家庭教育价值不小。蔡特金和早前的奥古斯特·倍倍尔（1878）都把深化家庭关系视为历史前景。相较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教育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体上又具有了较大的战略意义。虽然认识犹存，“‘通过教育获得自由’，这是错误的口号，是假朋友的口号”（Wilhelm Liebknecht，1872），但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垄断的斗争，证实了德国社民党对资产阶级教育其实持肯定态度。

3. 对于世纪之交的工人运动来说，各方面条件的变化为讨论工人意识的形成、领袖与基层的关系和知识分子在运动内部的职能提供了契机。马克思主义中的教育主题就此获得新的维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罗莎·卢森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一再坚持把群众与领袖的关系作为问题来表述。她认为，领袖的“唯一作用是对群众宣传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增加影响力的程度只等于“他们自己放弃领导地位”的程度（1903，GW 1/2，第 396 页）。与资产阶级党派的政治伦理相应的是一种群众观，认为“必须像对孩子一样教育他们”（GW 1/2，第 397 页；另参见 Gramsci，*Gef*，H. 10. I，§6，第 1237 页）。

在革命前的俄国，运动组织方面的特殊困难，其中特别是自发主义倾向，对列宁构成了挑战。为此，他重点探讨了政治斗争中的领导和指导问题。尤其在《怎么办？》（1902）中，该问题处于中心地位（LW 5，第 355—551 页）。列宁关于领导和指导的想法在他编辑的《火星报》（*Iskra*）上关于党的报刊的功能的论述中尤为清晰。他认为，党的报刊主要服务于阐明观点并概括局部的矛

盾冲突。在革命后的阶段，革命成果受到意识形态的威胁（“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使列宁等人认为“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LR*，LW 31，第 1—91 页）
835 是有必要的。列宁不仅（像在他之前恩格斯早就做过的那样）旗帜鲜明地强调纪律和权威的意义，而且宣扬教育专政。在剧变的社会状况下，葛兰西重拾并重新界定了列宁所表述的问题。与陈腐的对比相反，首先应该强调两人之间的一致（知识分子的精英作用和传播者作用）。但列宁更突出领袖角色中的行政因素，而按葛兰西的想法，知识分子在争取“霸权”的斗争中更适宜承担创造性的文化使命，亦即完善一种世界观，在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葛兰西明确接续“教育学说和实践的现代行事方式”，“照此学说，师生关系是互动关系中的积极关系，因此，每名教师也始终是学生，每名学生始终是教师”（*Gef*，H. 10. II，§44）。知识分子自身必须仍是学习者。依葛兰西之见，必须把人理解成“一系列积极关系（一个过程）”（同上书，§54）。他认为教育专政不在考虑之列。

4. 苏联尚年轻时，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教育方案出自 A. S. 马卡连柯（A. S. Makarenko），在此方案中，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个人对教育权威的依赖由协作性的具体活动接替。此种构想由接触一组青少年违法者的实际经验而生发。“工读生”的个性发展基于集体组织的劳动，从中逐步发展出个人和社会的前景，激励人“自觉守纪”。文化因素对集体的发展也很重要（传统教育、礼仪、戏剧等等）。教育工作者集体应着意于集体的发展，而非个人的发展。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观念在马卡连柯式的教育中得以实现：通过实践改变自我和把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重新统一起来。此构想自身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似乎并未广受关注，估计是因为它与制度化教育的通常形式很难协调一致。在如今社会天翻地覆之处即所谓第三世界国家，
836 这种设想有望创造性地付诸实践，而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做法确实可以追溯到马卡连柯。

5. 对拉丁美洲还有非洲的解放运动而言，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方案意义重大。弗莱雷在巴西起初依托存在主义观念，从扫盲实践中生发出此方案，而且是在尚未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性过渡的情境中。在进一步的政治探讨中，他逐步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的欧洲还认为，因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化，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世界。身处拉丁美洲的弗莱雷与马克思和

恩格斯不同，他发现尤其农村的人民群众身上具有殖民主义烙印的意识状态，他将其描绘成“沉沦”。因而，意识的觉醒是首要任务。教育工作者必须使人能够“批判性地介入”。但也只有通过参加社会过程才能为参与而学习。尽管弗莱雷起初可能倾向于教育主义，他评判教育的标准仍是，它是否助力学习者关心政治。但即使在早期著作中，他也明确指出，“脱离实践”不可能改变意识（1974，第 117 页）。后来更加清楚的是，意识形成不可能先于争取解放的斗争，而只能与它同时发生。在知识结构和教育形式方面，弗莱雷的方案包含新的洞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认为教育形式在劳动与教育分离方面成问题，尽管他们的终生成就有一大部分是学术批判，他们却还是把教育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简化成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后来在马克思主义中，部分程度上还对这种简化推波助澜（如意识形态教育等于宗教教育）。与此相反，弗莱雷由于经历过帝国主义及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形式，而发现了知识结构和传授结构的问题。他要求并践行对话式教育。这还因为从学习者的“生存情境”出发而得以实现。“生成性话题”由教育工作者在学习者的帮助下提出，由教育工作者团队在学习者的帮助下加以处理，从而使得两者相互学习。尼加拉瓜或者佛得角群岛上的经验表明，在具有共同革命经验的社会中，就连“国家现实的各方面”（弗莱雷语）也会成为生成性话题，于是，弗莱雷的纲领没有考虑地方的局限性。教育不可能代替政治行动，弗莱雷给这种认识补充的洞见是，“任何教育都是政治行为”。

837

6. 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言，如今重要的是心理学的活动理论，它主要由 A. N. 列昂季耶夫接续维果茨基而建立。用它也可以在理论上重新解释从教育实践中生发的马卡连柯的方案，弗莱雷的方案与此类似。活动作为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中介过程，在列昂季耶夫处成为心理学的基本范畴。成为焦点的是个体借以参与社会过程的活动。个体以此习得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对象化的社会意义，释放自己的具体需要。依此拟设，应把教育界定成在习得过程中协作支持、帮助形成对个性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动机层次（1982，第 208—209 页）。因为，自觉组织生活条件被视为个人的发展任务。这表明了马卡连柯所说的前景的价值。列昂季耶夫所做的“个人的意义”（Sinn）与客观的、社会的“意思”（Bedeutung）之间的区分对确定教育的任务格外重要（第 144 页及以下）。个人的意义源于个体的生活实际，反映其经验，并且依列昂季耶夫之见，导致人的意识的热心投入。

与此相对，意思则作为我们用以吸收历史—社会的经验的形式，“传递世界的意识”（第 259 页）。不依赖个人生活关联的社会意思深入我们的感知并且“冲破”它。在列昂季耶夫看来，个人的意义并非个人把超个人的意思具体化，恰恰相反，意义在意思中具体化。由这种辩证的视角来看，个人的意义无法直接
838 通过教育来传递。尝试用教育来传递意义不仅不恰当，而且注定失败。教育只能通过学习者为意义的具体化提供文化上的意思。不过，它在这时必须搞清楚个人的意义——弗莱雷所谓的“生成性话题”。教育能够安排实践场域并且引导人进行活动。

霍尔茨坎普的批判心理学自我定位成列昂季耶夫的文化历史学派的继续发展（1983，1994）。该心理学关注功能—历史的分析所强调的、在参与全面掌控生活条件这种意义上的行为能力需要。这种掌控只能是社会性的，换言之，只能通过个体对社会发展过程施加影响来予以保障。批判心理学要求，在学术上使人领会资产阶级社会化所导致的行为能力受限。此时，应把教育界定成对于健全行为能力的形成的助力。虽则霍尔茨坎普于 1993 年详尽钻研了教育学上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两种心理学理论迄今仍未“转换”成教育学课题。霍尔茨坎普努力以其“主观—学术奠基”使学习“在概念上重新成为普遍的人类可能性”（1993，第 197 页）。扩展对生活条件的支配权确立了尺度。学习行为被界定为有利于这种扩展或者为了防止面临的限制而从其他实践中划分出去的行为。在此意义上，“扩张性的学习行为”意欲加强“探知世界”和提高“生活质量”。学校的现实经受不起这种批判性的学习概念的检验。霍尔茨坎普对学校做了激进的批评，因为他发现扩张性学习的主观前提在学校里面临着结构性障碍。对他来说，学校成为“世人堕落、学习文化式微之地”（1993，第 485、555 页）。他虽然不附和非学校化（Entschulung）的要求，也明确同“反教育学”（Antipädagogik）的各种立场保持距离，但可能的教师任务在霍尔茨坎普处却仍不确定（参见 1993，第 561 页）。他也避免使用教育这一概念。或许他陷入了“死胡同”（1993，第 553 页）或在马克思处就可以注意到的两难困境，即这里所宣传的是在异化的实践中的未异化的学习。

参考文献： 839

L. Althusser, *Für Marx*, Frankfurt/M 1968; L. Althusser/E. Balibar, *Das Kapital lesen*, Bd. 1, Reinbek 1972; A.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1878), 55. Aufl., Berlin 1946; R. Bendit/A. Heimbucher,

Von Paolo Freire lernen, München 1979; P. Freier, *Pädagogik der Unterdrückten*, Stuttgart 1971; ders., *Erziehung als Praxis der Freiheit*, Stuttgart 1974; A. Gramsci, *On education.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1971; K. Holzkamp, *Lernen. Subjektwissenschaftliche Grundlegung*, Frankfurt-New York 1993; Lê Thành Khôi, *Marx, Engels et l'éducation*, Paris; A. N. Leontjew, *Tätigkeit, Bewusstsein, Persönlichkeit*, Köln 1982; W. Liebknecht, *Wissen ist Macht!—Macht ist Wissen!*, Berlin 1919; F. Lombardi, *La pédagogie marxiste d'Antonio Gramsci*, Toulouse 1971; A. S. Makarenko, *Ein pädagosiches Poem*, Werke 1, Berlin/DDR 1976; ders., *Werke* 5, Berlin/DDR 1978; Projekt Automation und Qualifikation (PAQ), *Widersprüche der Automationsarbeit. Ein Handbuch*, Berlin/W 1987; L. Sê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Frankfurt/M 1972; C. Zetkin,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1, Berlin/DDR 1957; dies., K. Dunker, J. Borchardt, *Die Erziehung der Kinder in der proletarischen Familie*, hgg. v. G. Hohendorf, Berlin/DDR 1960.

格奥尔格·奥尔恩海默（Georg Auernheimer） 撰
朱更生 译，张志超 校

参见：
Aneigung, Arbeit, Arbeiterbewegung, Arbeitserziehung, Aufklärung, Autorität, Bedeutung, Bedürfnis, berufliche Bildung, Bewusstsein, Bildung, Disziplin, Dritte Welt, Edukationismus, Ehe, Entwicklung, Erfahrung, Existenzialismus, Familie, Feuerbach-Thesen, Führung, funktional-historische Methode, Handlungsfähigkeit, ideologische Mächte, Individuum, Kinderarbeit, Kopf und Hand, Kritische Psychologie, Kulturhistorische Schule, Lernen, materielle und geistige Arbeit, Pariser Commune, polytechnische Erziehung, Praxis, Religion, Schule, Sinn, Staat, Subjektwissenschaft, Tätigkeit, utopischer Sozialismus, Vergegenständlichung, Vergesellschaftung, Verselbständigung

秘传的／非秘传的 (esoterisch/exoterisch)

A: bāṭin/ẓāhir.
E: esoteric/exoteric.
F: esotérique/exotérique.
R: ezoteričeskij/ekzoteričeskij (эзотерический/экзотерический).
S: esotérico/exotérico.

秘传和非秘传这一组概念中，前者表示非公开或仅面向某个特定圈子的事物，相反，后者表示公开或具有公共性质的事物。秘传事物不开放的原因可能有多种：要么需要有意识地隐藏和保密，要么它作为专业知识虽然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但是需要相应的资质才能对它有所理解。

1. 在古典的哲学思想中，秘传和非秘传的概念区分尤为重要，人们认为，柏拉图除了一套非秘传、面向广大民众的哲学以外，还有一套只接纳少数会员的秘传学说。直至近现代，这一推测中的秘传学说（以及重建它的尝试）始终是柏拉图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例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这样重新解读柏拉图哲学的秘传内容："秘传事物是通过书写和印刷所揭露出的事物，但对于没有兴趣努力去了解的人来说是隐秘的。秘传事物并非秘密，却是隐秘的。"（1. T.，3. Kap.，A；W 19，第76—77 页）因此，柏拉图并没有创造两种不同的文本，而是从读者的角度，对同一文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840

但是，黑格尔对以下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质疑，即秘传意味着有意隐藏某物且哲学家"支配自身思想，就像支配外在事物"。他认为：哲学家们必须"遵从自己的理念（Ideen）；他们不能将其存于口袋"。这种理念"始终是秘传的；并非只有哲学家的非秘传的思想"（第 21—22 页）。这样的话，如果"理念"完全无法被隐藏，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可以推断，创作者的言语（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不是人支配理念，而是后者凌驾于人）能够超越其认知，也就是说，他的一部分论述对于本人也是"秘传的"，其中蕴意只有经过日后剖析才会展示出来。

2. 黑格尔认为秘传内容还需借助非秘传事物方可生效，马克思在他 1840—1841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引用这一想法来反驳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对黑格尔的单一道德批判，这些批评者将黑格尔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仅仅看作某种顺应。但"缺乏一贯性"（Inkonsequenz）和"适应"（Akkomodation）的根源不在于哲学家的个人品性，而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他的学生们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解释那些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非秘传的意识形式**的东西"（MEW 40，第 326 页）。由于其展示了秘传内容的不充分，非秘传事物由此成为一种重要的认知媒介。

2.1 马克思还将秘传和非秘传的区分写入《剩余价值理论》。文中，它被用来概括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说的特

841 征。马克思多次强调，斯密在自己并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承担了两项不同的任务："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机制；另一方面，他试图部分地仅仅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MEW 26.2，第 162 页）马克思将亚当·斯密这两项相互渗透又矛盾的研究称为其作品中的"秘传"和"非秘传部分"（第 163 页）。直到李嘉图，至少是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前两章中，"秘传和非秘传视角下亚当·斯密理论的连续的矛盾性"才被打破（第 166 页）。马克思将秘传和非秘传的区分应用于对亚当·斯密的分析，体现了他并非立足于作者的自我理解，而是立足于自己独立分析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正如在表面上显示出的，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因而也是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对于这种关系的设想中，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形态、其不看见的根本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Ms 63-67*，MEGA II.4.2，第 279 页；MEW 25，第 219 页）故而资本主义关系的概念重建必须区分秘传（隐藏）和非秘传（外部可见）的层面。亚当·斯密的著作之所以秘传，并非因为他要有所隐瞒，而是因为他的分析径直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某一秘传层面；之所以非秘传，并非基于某种"适应"，而是需依附研究对象的外在展示。

资本主义关系的非秘传显象（Erscheinungen）构成了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verzauberte und verkehrte Welt）（MEW 25，第 835 页），因为在这里，特定的社会规则以它们物质载体的自然特征显现。这一颠倒（Verkehrung）在《资本论》第 1 卷中作为商品和货币狂热已经分析过，它结束于"三位一体的公式"（第 822 页）："在资本—利润（或者，更好的形式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与其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已经完成。"（MEW 25，第 838 页）对于日常意识（Alltagsbewusstsein）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此类神秘化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反对"庸俗经济学"（Vulgärökonomie）只涉及此 842
类神秘化关系，与此不同，他一方面认可古典政治经济学揭开"虚伪的假象"（falschen Schein）这一贡献，即通过将利息归纳为利润的一部分，将租金归纳为平均利润的盈余，这样两者都能被视为剩余价值。但他另一方面认为，即使是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还"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MEW 25，第 838—839 页）。换言之，"庸俗经济学"完全困于非秘传

层面，而在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不仅是亚当·斯密）这里，秘传和非秘传两个层面的研究相互交错。据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理论著作存在“错误的结构”（fehlerhafte Architektonik）（MEW 26.2，第 164 页）。

通过将秘传和非秘传的区分直接应用于亚当·斯密，以及间接应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马克思能够对这些理论做出评判，这一评判不仅仅依据真实或虚伪、已知或未知的两分法（Dichotomie）。例如，亚当·斯密在其著作的非秘传部分里将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商品价值整合起来，这一观点不应被简单判定为错误，而是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秘传显象。错误仅仅是基于上述观点在亚当·斯密理论框架内部的定位：在其中，它不是作为需借助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被解读的现象，而是和深入到秘传层面的劳动价值理论一样被安排在相同的理论空间。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话来说，马克思区分亚当·斯密著作中秘传和非秘传层面的做法好比一部“症候展示的教材”（symptomatische Lektüre）（*DKL*，32）。这部教材正是立足于古典经济学（klassische Ökonomie）之可见，同时展示其不可见：尽管古典经济学将非秘传和秘传元素尽收眼底，但正是在考察这些元素时，即在同质性的理论空间内，忽视了它们所属的不同层面以及由此导致的协调这些元素的必要性。

2.2 至于为何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秘传与非秘传的观察会相互交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的手稿中借助经济学家们浅尝辄止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此进行了论证（参见 MEW 25，第 838 页）。《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版的后记提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知方式的局限性在于，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MEW 23，第 19—20 页）。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主义（Ahistorismus）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马克思所断定的非秘传和秘传观察之间的摇摆。《剩余价值理论》给出了另一个提示。在书中，马克思也同样赞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它尝试“通过分析，把各种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MEW 26.3，第 490 页），接着他又谈道：“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盾：它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第 843

491 页）尤其最后一句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决定性的思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各种形式的起源性说明不感兴趣，“因为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主义，更主要在于它的经验主义（Empirismus），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所评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纲要“在其对于材料的冷酷重视中忽视了一切形式区别”（MEW 23，第 565 页）。

这一经验主义认为经验上的既有存在已经包含全部的现实（Wirklichkeit）。这种现实虽然需要解释（例如，财富的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基于同一源泉），但无须从起源来说明。若从起源展开分析，则要以一种不仅限于经验的既有存在的现实概念为前提。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它的经验主义，无法从根本上区分非秘传和秘传的观察方式。关于如何调解展示了市民社会内在生理学的分类和描述其外部显象形式的门类，这样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需要调解的不同层面并不能被确定下来。

844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反，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完全以深入秘传层面为目标。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到 3 卷中没有使用秘传和非秘传这组概念，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致力于揭示“秘密”：他想要解开“货币的谜”（MEW 23，第 62 页），解释自我增殖的价值的“奇能”（okkulte Qualität）（第 169 页），揭露“赚钱的秘密”（Geheimnis der Plusmacherei）（第 189 页）。然而马克思除了想要揭示秘密内容，让相关的秘传事物重新展现，还意图解释为何这一秘密内容完全不可见并且仅以“颠倒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非秘传的显象不应仅仅被还原为它的秘传内容，还要作为秘传内容的必要形态得到展示。

2.3 如果对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剩余价值理论》中运用秘传和非秘传概念进行批判的方式方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博士论文只强调非秘传内容是不真实的，同时非秘传内容体现了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秘传内容的不充分认识。秘传内容虽与遭到批评的作者的原本的意识不符，但可以在由他所界定的理论范围内予以重建。因此，这种情况下涉及的是一种内在批判的细微模式。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非秘传并非单纯地表示对立于真实的秘传内容的非真实事物，其主要是对秘传和非秘传相互关系的不充分的且受到批评的认识。这一不充分认识却恰好根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应用的理论空间的经验主义特征，因此它无法在该理论范围内被弥补。《剩余价值理论》中涉及的不再是一种同样接受被批判事物的总体前提条件的内在批判，而是对这些前提条件本身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针对同一对象的对立的理论派别。后者的核心更多的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其研究对象的理解方式的批判。

3. 秘传和非秘传的区分在马克思理论的相关文献中反响不一。根据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解析，阿兰·利皮耶茨（1983）用这一组概念来形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同层面，并试图更详细地介绍
845 “着了魔的世界”的非秘传关系。

秘传和非秘传的区分也被应用于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事实上，在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这一评论早已为人所熟知：“如果没有认真钻研黑格尔的完整的逻辑学并理解它，便难以参透《资本论》第1卷，尤其是第1章。所以半个世纪后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能领会马克思的思想！！”（LW 38，第170页）。这样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形同秘传的事物，正如黑格尔在柏拉图研究中如此描述秘传之物：并非被隐藏起来的，而是因资质有限未被理解的东西。

然而也有学者借鉴马克思运用秘传和非秘传概念解读亚当·斯密著作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理论。马克思理论中秘传和非秘传两个不同的方面被区分开来。例如，沃尔夫冈·雅恩（Wolfgang Jahn）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权的结构性和起源性描述中……有马克思理论的秘传部分”（1991，第143页），其中，尤其是追随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形态尚未确定。相反，那些有以下特征的文章是非秘传的：“心急的革命家马克思在左倾上超越了学者马克思”（同上），并且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以及高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能。在此之前，熊彼特（Schumpeter）（1942）就已经尝试过类似的区分，他对比了马克思作为“预言家”（Propheten）和（社会学与民族经济学）学者的不同身份。

海涅（Heine）与赫尔（Herr）（1992）从货币凯恩斯主义（monetärkeynesianischen）的立场来区分马克思秘传和非秘传的货币理论。秘传的是其理论中所推导的“市场调节型经济中货币的结构决定性意义”（1992，第195页），这一意义本应暗含（直到凯恩斯[Keynes]及货币凯恩斯主义学派才被提出的）“生产（Produktion）的货币理论”的一些元素。然而由于马克思理论在现实层面的固化，这些观点又丢失了。非秘传则在于最后重新提出的货币中立（Neutralität）理论，以及利息理论。

巴克豪斯（Backhaus）从根本上批判了将秘传和非秘传概念应用于马克思的做法。20世纪70年代重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尝试，其中也包括

巴克豪斯自己早期的论文，都不约而同以这一假设为出发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致由截然不同的两个层面
846 叠加组合而成：一个非秘传的表层以及一个秘传的深层。此类'重建'大抵只是撇去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尤其是《资本论》的非秘传层面，使秘传的深层昭然可见。"（1978，第19页）对于一种所谓的整全的秘传理论的观点，巴克豪斯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正是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存在一系列有待解决的实际问题以及方法论的模糊之处，基于这些，此类简单的重建并不可行。

参考文献：

H.-G. Backhaus, »Materialien zur Rekonstruktion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3«, in: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r Marxschen Theorie* 11, hgg. v. H.-G. Backhaus u. a., Frankfurt/M 1978, 16–117; M. Heine/H. Herr, »Der esoterische und der exoterische Charakter der Marxschen Geldtheorie—Eine Kritik«, in: A. Schikora u. a. (Hg.), *Politische Ökonomie im Wandel. Festschrift für Klaus Kisker*, Marburg 1992, 195–209; W. Jahn, »Ware, Wert, Geld und Sozialismus. Die Problemantinomie in der Entwicklung von Ware, Wert und Geld zwischen dem esoterischen und dem exoterischen Werk von Marx und die Folgen«, in: *Z. Zeitschrift für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2. Jg., 1991, H. 3, 141–8; A. Lipietz, *Le monde enchanté*, Paris 1983; J. A. Schumpeter,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Demokratie* (1942), München 1980.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
（Michael Heinrich） 撰
焦燕屏 译，李牧今、蔡廷建 校

参见：

Analyse/Synthese, Ebene, Einheit, Empirie/Theorie, Empirismus, Erscheinung, Fetischcharakter, Form, Geheimnis, Geld, Genese, historisch-kritisch, Idealismus, immanente Kritik, innerer Zusammenhang, Interpretation, Kernstruktur, Keynesianismus, klassische bürgerliche Ökonomi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ethode, Mystifikation, Oberfläche/Tiefe, Schein, sichtbar/unsichtbar, Standpunkt, Struktur, symptomale Lektüre, Totalität, transitorische Notwendigkeit, trinitarische Formel, Unbewusstes, Verkehrung, Vermittlung, Vulgärökonomie, Wertformanalyse, Zins, Zusammenhang

吃饭（Essen）

A: akl.

E: food.

F: manger.

R: eda (еда).

S: comer.

繁衍人类生命的斗争与努力这类基本活动，在吃饭中得以典型地凝结。“面包就是自由，自由就是面包”，出现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工会会歌（全德工人联合会会歌。——译者）之中，而“面包与玫瑰”则是妇女运动的口号之一。因为吃饭不仅仅意味着获取营养。吃饭不仅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前提，而且是人
847 们将自己视为目的本身的一种实践方式。我们说的是饮食文化（Esskultur），而不是营养文化（Ernährungskultur）（参见 Pudel 1996，第 118 页）。一顿饭可能贫乏或丰盛，日常或隆重，凡俗或神圣。无论如何，它永远不止于营养摄取。吃饭包含对于个体、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的多重意义。吃饭将必要与愉悦结合在一起。而在所有文化中，一起吃饭都标志着和解与共享。一起吃饭意味着彼此信任。

1. 饥饿、干渴、贫穷和疾病，千年以来一直是人民日常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不劳者不得食”（保罗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的宣言（至少也）表达出劳动者的正义感：他们要求拥有一份收入，以保证他们合乎尊严地满足吃饭这一基本需求和其他的生存需求。另外，豪奢宴饮中则展现着权力和统治。自农民战争以来，世俗统治者与宗教统治者就在传单上被讽刺地描摹为“大肚子”或者“大胖子”的形象。宗教改革家、革命者、起义者抨击掌权者的暴饮暴食，表达了忍饥挨饿之人的渴望与梦想。

对神职人员的批判态度主导了 14—15 世纪欧洲相关文献的立场、基调。在谚语、滑稽剧和诗歌中，一身肥膘、贪吃无度的神职人员形象标志着教皇与教廷的贪婪、纵欲和伪善。路德抨击天主教的斋戒制度是宗教谎言：当他们在罗马嘲笑着斋戒时，却让我们大嚼滚烫的肥肉，之后再向我们兜售自由、黄油和其他各种食物，就像神圣的使徒所说的，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在从福音中获得自由之前就已经拥有”（Luther 1520，第 70 页）。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抗议书、书信和纲领草案描述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他们反抗的目标。《致普通农民的联合》（*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Bauernschaft*）的匿名作者咒骂税收与劳役是当权者“非基督教的、异教的行为”，因为真正生产食物的人往往“连同他们

的妻子和无力抚养的小孩都既没有面包和盐，也没有奶酪”（1525，引自 Lenk 1980，第 176 页）。米夏埃尔·盖斯迈尔（Michael Gaismair）评论 1526 年的《蒂罗尔乡村秩序》（*Tiroler Landesordnung*）
848 时认为，它只有通过公共社会设施让老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穷人“不仅饮食，而且穿衣以及所有基本需求都有保障”（引自上书，第 240 页），才能代表一种“乡村中的良好秩序”。

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公布之后，米拉波（Mirabeau）问制宪会议的代表——事实证明，他们无力组织巴黎的食物供应，也明显无法感受到被饥饿而非被食欲折磨是什么滋味——“你们知道吗，这么多吃不上饭的人允许你们安宁地享受每一餐，而你们却既不愿减少菜的道数，也不愿吃得朴素一些”（1798，第 229 页）。那些常常并未直接地处在事件进程中的大众，用自己肠胃的状态衡量新秩序。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希望用人民教育与共和主义宗教进一步发展大众公民意识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一个亲历者说：“在巴黎饮食变成了时尚，在饮食上民众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有钱人带来勃艮第的烤肉和葡萄酒，穷人带来奶酪和汤。”（引自 N. Petersen 1988，第 132 页）大约与此同时，无套裤党希望通过推广互相称“你”来促进全体男女公民（citoynes et citoyennes）的平等。

废除君主制之后，尤其是在英国出现了很多关于不知餍足、口欲强烈、食人的革命者的说法，据说在他们用餐时，头戴弗里吉亚无边便帽的邪恶厨师呈上被处死的国王或其他显要的尸块（参见 Meller 1992，第 121—122 页）。因此，这些革命者被当作“异族”和“野人”，排除于基督教—西方文明之外。

在傅立叶计划的工业化与社团化的世界中，劳动与生活享受之间的二元对立将不复存在。在傅立叶的未来之城（*cité future*）之中，劳动“就像是今天准备……丰盛的宴席一样，是一种消遣”，而享乐则应当与劳动一样是一件严肃的事。这种劳动文化和生活文化构成了社会财富的基础。食物在这个社会中应当是丰裕的。“在欧洲……优质的水果和奶制品……会变成日常食品”，最贫困的孩子们也会得到“精美的果酱、加糖的牛奶糊和不同种类的糖渍水果”（1828，第 229 页）。傅立叶详细描述了“在新社会秩序中的宴饮乐趣”（第 220 页）。这样的饮食文化不仅“由美味佳 849
肴构成”，不仅是饱餐一顿，也是一种共同体的体验，它意味着通过“巧妙地挑选客人”（第 221 页）实现共融（*communio*）。这种饮食文化是针对 19 世纪 30 年代法国无产者家庭饲料一般的口粮提出的理想。傅立叶认为爱会随着吃饭出

现："从我对宴饮之乐的论述可以看到，爱的欢乐不会逊色于它。"（第235页）傅立叶对积极享受美食与性的推崇同敌视娱乐的道德相对立，后者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圣哲罗姆（Hieronymus）的话："肚子和生殖器彼此靠近，它们的邻近清楚表明它们的恶习也是彼此相连的。"（引自 Heimgartner 1996，第162页）

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一种感性的、肉体的存在，这种本质的产生与持存都归功于自然。在他的反思辨哲学中，实践和日常的强制要求——以独立于意识的对象为前提条件——是需要被严肃对待的理论问题。"吃喝是日常的，因此不被崇拜，进而是不被敬重的自然的化身。"人的感觉虽然是主观的，但是指向客观事物。比如盐是"我们血液的必要成分"，人就用盐给菜调味，因为"菜没有盐既不好吃，也对身体无益"。这种"科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AS I，第218页）颠覆了自我与世界、意识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对立。在感觉的层面上，同样也在概念认识的层面上，人都与对象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19世纪实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种营养理论，这种理论用新的方法揭示了饮食对人体造成的影响。食物的养分和人的能量分配被直接地联系起来。J. 摩莱肖特（J. Moleschott）在他的《食物学说》（*Lehre der Nahrungsmittel*，1850，第23页）中这样问道："心脏的火热、肌肉的力量、骨骼的坚实、头脑的灵敏，难道不是一定由食材决定的吗？"费尔巴哈对于这本书的评论结尾是一句挑衅的断言："人是他所吃的东西。"（GW 10，第367页）有人因此骂他是庸俗"唯物主义者"——那些人"在主桌上全心全意地效忠最低俗意义的唯物主义"（AS I，第218页）。费尔巴哈要求以符合人尊严的生活作为人教化的基础。在人不能吃饱的地方，就存在无知、愤怒与憎恨。

2.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吃喝住穿"是"一切人类生存的前提"（*DI*，MEW 3，第28页）。生命的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第29页）。生产食物的活动作为物质的活动总针对个别的对象，这些对象在消费时即刻消失。这种活动是一个普遍生产关系的环节。在创造食物的过程中，这种活动同时服务于社会过程的特定组织形式的再生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吃饭定义为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MEW 42，第26页）。生产、供给、烹调和装盘食物，即"消费的对象"，以及"消费的方式"，有它们的历史，而

这个历史是生产关系、劳动关系与生存关系的历史的一部分。“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也因此同样创造了有不同餐桌礼仪、有标准和规则的食客，他们脱离了“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第26页），同待食用的食品之间产生了距离。

要获得食物并不简单。只有在伊甸园中才有现成的牛奶、蜂蜜、面包和葡萄酒，根本不需要劳作。“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MEW 32，第552页）在所有社会和任何时期，都存在一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K III*，MEW 25，第828页），这里必须进行劳动以“维持肉体生存”，以满足诸如“吃、喝、生殖”（*Ms* 44，MEGA I.2，第239页）的需求。相反，当人处在“自由王国”（MEW 25，第828页）中不再受直接的肉体需求的强迫，而是根据审美的视角行动时，他们作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Einl 57*，MEW 42，第27页）就能够培养“有能力享受人类乐趣的感官，
851 从而享受食物的人性化形式”（*Ms 44*，MEGA I.2，第394页）。

除了“资本家、大地主或纯领薪水的闲职人员者”之外，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要部分的民众都被迫“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K I*，MEW 23，第264页）并且为了买得起食物，必须用劳动换取报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生存条件的再生产的分析中，马克思根据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的功能，将生产划分成两个国民经济部类。第I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而第II部类一方面包括“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同”，另一方面包括“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K II*，MEW 24，第402页）。交换发生在两个部类之间和部类之内。

中世纪手工业者和农业劳动者延长的用餐时间，被资本主义“时间经济”的新运作模式（*Gr*，MEW 42，第105页）有力地终结了。马克思引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中关于“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K I*，MEW 23，第257页）的信息。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讽刺地以一个工厂工人的形象展现了这个去人性化的进程——工人在无休止的劳动中被机器“投食”（参见 Tavernier-Courbin 1991，第126—127页）。

“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K I*，

MEW 24，第 254 页）也意味着“把工资强行压低”（第 626 页）以便于进行新的投资。劳动收入的降低被解释为国际竞争中的必然现象，甚至被辩护为“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第 627 页）。马克思指出，18 世纪的《论手工业和商业》（*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就泄露了英国资本一如既往的“灵魂深处的秘密”（同上），即希望将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法国或者荷兰无产者那样，因为后者“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引自上书，第 627 页）。尤其
852 是为了让无产阶级的食品便宜一些，拉姆福德（Rumford）伯爵写了“一本菜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第 628 页）。他的“大全汤”，在历史上被称作“拉姆福德汤”（参见 Steiner 1978，第 15 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主要是用谷物、盐、醋和一点青鱼做成的。

在一些社会，因为食物短缺，吃饭成为了特权，就像卡弗尔人那样“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的器官”（*K I*，MEW 23，第 110 页）。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吃掉现成的东西，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设法为他提供各种消费品”（*Ms 44*，MEGA I.2，第 360 页）。之后，在社会规范逐渐内化的过程中，粗野、庸俗的形象同突出的身体肥胖联系在了一起，身体被塞入了习惯的束身衣中。暴食的资产阶级和贵族尝试用医疗手段“消除过剩的脂肪”（*K I*，MEW 23，第 111 页），而大部分无产阶级则营养不良。

食材通过厨师的劳动变成可以吃的食物。这种加工作为家务或者家庭劳动的一部分，要求人们小心谨慎，预先计划，熟知传统。恩格斯在 19 世纪末看到，大工业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入公共的事业中”（*Ursprung*，MEW 21，第 158 页）。这个过程被他简单化地评价为妇女解放历史上的第一个可能，而这一点导致他没有深入研究家庭劳动对于社会再生产的意义。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探讨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指出“物质”上同类的活动，可能承担着不同的经济形式规定：“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性的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但如果“一个纯粹的贪吃鬼自己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那厨师就是非生产的（MEW 26.1，第 129、269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顺带讨论了不是雇佣劳动而是作为家庭劳动一部分的烹调，以说明应对大规模失业的悖谬形式：这时纺织女工才第一次“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兴奋剂（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官方报道吹嘘，女工“有时间学习烹调

853 了”，而马克思却指出，“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MEW 23，第 416—417 页，脚注 120）。

3. 倍倍尔的“共产主义厨房”是一种“电气化”的公共厨房，它应当代替不经济的私人厨房（Bebel 1918，第 469 页）。列宁提出要在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将“孤立的小家庭”社会化（LW 32，第 160 页），创办“示范性的设施如食堂和托儿所”（LW 30，第 27 页）。公共食堂应当是充满闲暇、享受与交流的生活的一部分。受内战所迫，布尔什维克党没有推行这种文化革命，而是被迫采取了“粮食专政”。粮食人民委员部被委任组织全部的居民食品供给。内战时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忍饥挨饿。在国家重建时期，马雅可夫斯基（Majakowskij）在俄罗斯通讯社（Rosta）海报上宣传建设工作：“你想要战胜寒冷吗？你想要战胜饥饿吗？你想吃吗？你想喝吗？快加入模范生产突击队吧！”（参见 Bucharin/Preobraschenskij 1920，第 557 页插图）。

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发展，苏俄人民的营养状况也得到改善。然而沙皇时期就存在的奢侈餐馆的重新开业以及新经济时期商人的奢侈行为，在很多共产主义者看来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现在“肚子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地位，而且还受到推崇”（Ehrenburg 1982，第 68 页）。

斯大林在 1933 年和 1934 年提到，“最主要的工业部门的工人”由“工厂供给饮食”（W 13，第 179 页）。这类“广泛设立的廉价食堂”保障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基本粮食需求。与此相反，在集体化过程中则有上百万的农民饿死。在 1935 年，农产品配给制被废除，代之以市场交易。拥有自己分配系统的领导人和人民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越来越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平等主义生活方式仅存的因素的消逝。于是 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了一系列描绘丰盛食品、美味水果和丰富肉类的油 854
画，从中可以感受到荷兰静物画的旨趣（参见 Gassner/Gillen 1994，第 33 页及以下）。在 1939 至 1952 年之间多次再版的《美味与健康饮食之书》（*Buch über die schmackhafte und gesunde Ernährung*）将斯大林的评论当作导言，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仅给人民自由，还有物质财富，能过上幸福的、有文化的生活”（引自 Molcanova 等 1952，第 1 页）。许多声称存在、实际上从来买不到的食品罐头的图片营造出了这种高水平的日常饮食文化。

4. 女性主义者曾认为，对于马克思

来说，要保障雇佣工人的生存，“只需他每天吃够一定量的食物，而且好像他消费的食物是同买来时一样的未经烹调的形式”；而做饭作为“妇女的生计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没有被纳入考量（v. Werlhof/Mies/Bennholdt-Thomsen 1983，第 85 页）。还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分析菜谱和家政书如何塑造了烹调活动的女性专属和性别分工的性质（Langreiter 1996，第 21—22 页）。男人发明美味佳肴，而日常照顾家庭是女性的职责。但家务在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却不被定义为工作，而是被归结为拴住胃的“爱”，进而被索取。妇女的责任在于提升饭菜的味道，降低它的花费，在于保障家人的健康。为了维护殷实市民的形象，食物应当“又好又便宜”。在战争和危机时期，厨房成了“家里的前线”，妇女们被要求用极大的劳动量和创造力填补短缺（参见 Bergschicker 1985，第 204 页）。

5. 埃里希·武尔夫（Erich Wulff）在他的《跨文化精神病学》（*Transkulturelle Psychiatrie*）一书中历史唯物主义地指出了社会化和个体化、居住和穿衣、谈吐和品味等形式之间的结构关联，他特别举了皮肤（标志界限的器官）和“内脏”的例子。他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文化中令人作呕的东西，可以是东方文化的珍馐。他的论述始于这样的观察：“比如说，剥下来烧软的鸡皮在越南是特别的美味，同各种内脏一样直接—— 855
既不改变它自然的样子，也没有被做成‘肉’——端上桌来。同样，血液、头、眼睛、生殖器也都是越南菜的特色。”他的观点是：“对‘内脏’的反感，与无意识之中形成的非常排他的（将自己的肉体当作‘不可让渡’的个人私密领域、将其与环境和其他人隔绝开的）自我结构相关联。”他认为这一现象的前提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1969，第 246 页）。

类比语言的“音素”，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把一个社会的烹饪方法分解为“烹饪要素”（Gusteme），他把“烹饪要素”归纳为既相互对立又彼此对应的结构中。他发现，在英国的烹饪方式中——与法国的不同——“**内生 / 外生**（即国产原料或进口原料）”以及“**重口 / 不重口**（即鲜美可口或味道寡淡）”的差别意义重大。主菜由英国本地原料制成，而且口味相对清淡，而佐以一些本属外来的、调味较重的配菜（1967，第 100 页及以下）。列维-斯特劳斯并不想把这个“结构”限制在饮食上，而是同样在神话、艺术和政治中，在“相关社会的无意识行为中”寻找这类结构。

结构主义导向的视角倾向于从研究

对象的整齐划一性和同质性出发，不同于此，年鉴学派和“新史学”（nouvele histoire）的代表人物则探讨饮食习惯的变化以及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们将马克思视为“一种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的社会概念的思想先驱，具有对历史进程的总体观念”（J. Le Goff 1990，第 47 页），他们继承马克思的思路，展示了饮食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如何反映出社会层级结构内部的变化、扩张的企业、市场与贸易结构和科学化进程。社会隔离和冲突表现在饮食习惯中，布罗代尔（1990，第 189 页及以下）通过不同种类的面包和肉食的消费情况以及咖啡、香烟和白兰地的进口证明了这点。“总体来看，”布洛赫为《法兰西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française*）这样写道，“饮食就像一种记录装置，它记录所有经济的变化，而心理的抵抗使记录迟于事
856 件。”（引自 Le Goff 1990，第 76 页）皮埃尔·布尔迪厄（1982）认为，口味是已经成为本性的、融入身体的文化，是体现社会区分度的媒介之一。

N. 埃利亚斯（N. Elias）在历史社会学中根据刀叉的使用、上菜顺序和肉的食用等现象，描述了 16 世纪起出现的“对就餐礼仪的强制塑造”，这种塑造形成了“交往形式、饮食规定和饮食禁令的新标准”（1976，第 142 页）。圣门内尔（St. Mennell）（1988，第 56 页及以下）延续埃利亚斯的思路，认为饮食行为中日益增长的自我控制是文明进程的倾向。异常的饮食行为诸如厌食症或肥胖症在行为主义的视野下被视为这个文明进程遇到的阻碍。克莱斯本（Th. Kleinspehn）则对此持批判态度，他借助西美尔的文化社会学以及精神分析理论，将“饮食紊乱”视为文明进程的产物：一方面，面对“效率社会”的适应压力，吃饭是对抗消沉的手段；另一方面，吃饭是对吃饭自身的否定，目的在于实现身份认同（1995，第 15、23—24 页）。

特别在妇女身上，追求符合角色期待的过程带来更多冲突。女性身体要通过持续的能量计算、不同的节食方式、训练计划和减肥药达到一种“男孩子般”的样子。这种广告中压抑性的瘦身理想导致了羞耻心、自卑心、贪食症、厌食症或暴食症，身体在主观意识中变成了有罪的客体（Deuser/Gläser/Köppe 1995）。

6. **快餐**是泰罗制（Taylorismus，或称科学管理模式。——译者）、劳动分工和劳动合理化在餐饮业的应用（参见 Fischler 1996，第 252 页；Grefe 等 1985）。快餐业用流水线的方式制作菜品，食品的材料在餐馆之外就已经通过工业预制完成。饭菜可以在大街上或者汽车里食用，或者订餐送上门。在

快餐店的用餐时间变得很短，食客始终是机动的，而且可以在用餐的同时做其他事情。这展示了一种“文明模式，其中人的发展服从于一种极端理性化的对工作时间的压榨，服从于相应的产品和需求”（F. Haug 1994，第916页）。在广告中，快餐店看起来像是健康与平
857 等主义的福地（参见Grisshammer/Burg 1989，第118—123页）。与此相反，布莱希特在《流亡者对话》（*Flüchtlingsgespräche*）里说：“我经常感到惊奇，为什么左派作家在宣传鼓动时，不去绘声绘色地描写人们可能拥有的享受。”“对于不同种类奶酪的简单描述……或一个给人以艺术感受的真的蛋饼的图片一定会产生教育意义。”（GW 2，第205页）

全球化和放松管制的进程加剧了食品领域中最终作用于个人身上的产品链的彻底资本主义化：南方国家的人民只能按照世界市场上的价格购买食物，因此，“饥饿是大多数穷人唯一确知的东西，他们在经济改革之前都没吃过一次饱饭”（Mies 1996，第3页）。在北方国家的超市中，未经标明的转基因食品广泛传播，而肉食工业等部门则受到化学丑闻、激素丑闻和病毒丑闻的冲击。因此，妇女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生态运动要求在地方与区域经济的框架内恢复食品生产的能力和食品责任。

参考文献：

A. Bebel, *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Berlin 1918; H. Bergschicker, *Deutsche Chronik 1933–1945. Ein Zeitbild de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 Berlin/DDR 1985; P. Bourdieu,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Ein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Frankfurt/M 1982; F. Braudel, *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 Der Alltag*, München 1990; N. I. Bucharin u. J. A. Preobraschenskij, *Das ABC des Kommunismus. Populäre Erläuterung des Programm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Russlands (Bolschewiki)* (1920), mit Illustrationen von W. W. Majakowskij, Zürich 1985; K. Deuser, E. Gläser u. D. Köppe, *90–60–90. Zwischen Schönheit und Wahn*, Berlin 1995; I. Ehrenburg, *Menschen Jahre Leben. Memoiren*, Bd. 2, Berlin/DDR 1982; N. Elias, *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Wandlungen des Verhaltens in den weltlichen Oberschichten des Abendlandes*, Frankfurt/M 1976; C. Fischler, »Über den Prozess der McDonaldisierung«, in: A. Hürliinann u. A. Reininghaus für MAK—Österreichisches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 (Hg.), *mäßig und gefräßig*, Wien 1996, 250–61; F. Fourier, *Theorie der vier Bewegungen*

und der allgemeinen Bestimmungen (1829), hgg. v. Th. W. Adorno, Frankfurt/M 1966; H. Gassner u. E. Gillen, »Vom utopischen Ordnungsentwurf zur Versöhnungsideologie«, in: H. Gaßner u. a., *Agitation zum Glück. Sowjetische Kunst der Stalinzeit. DocumentaHalle, Kassel*, Bremen 1994, 27–59; Ch. Grefe u. a., *›Das Brot des Siegers‹. Das Hackfleischimperium*, Bornheim 1985; R. Griesshammer u. C. Burg, *Wen macht die Banane krumm. Kolonialwarengeschichten*, Reinbek 1989; F. Haug, »Familienarbeit/Hausarbeit«, in: *Argument* 207, 36. Jg., 1994, 911–16; S. Heimgartner, »Die Gula und die Temperantia. Zur Ehrenrettung einer Sünde«, in: A. Hürlimann u. A. Reininghaus für MAK—Österreichisches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858 Wien (Hg.), *mäßig und gefräßig*, Wien 1996, 161–69; Th. Kleinspehn, »›Er fühlte sich nicht satt, nur voll‹. Zur historischen Soziologie des Essens«, in: J. Kleber (Hg.), *Die Äpfel der Erkenntnis. Zur historischen Soziologie des Essens*, Pfaffenweiler 1995, 14–27; N. Langreiter, »In der Küche—die lachende Hausfrau. Über das allgemein brauchbare, einfache, wirklich praktische und unentbehrliche Kochbuch«, in: *Gegenwart. Kulturzeitschrift für Österreich und Umgebung*, 7. Jg., 1996, Nr. 29, 21f; J. Le Goff, »Neu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rs., R. Chartier u. J. Revel (Hg.), *Die Rückeroberung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Grundlagen der Neu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Frankfurt/M 1990, 11–61; M. Lenk (Hg.), *Dokumente aus dem Deutschen Bauernkrieg. Beschwerden. Programme, Theoretische Schriften*, Leipzig 1980; C. Lévi-Strauss, *Strukturale Anthropologie*, Frankfurt/M 1967; M. Luther,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1520), in: *Hutten. Müntzer. Luther, Werke in zwei Bänden*, hgg. v. den Nationalen Forschungs- und Gedenkstätten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Literatur in Weimar, Bd. 2, Berlin/DDR-Weinar 1989, 15–101; H. Meller,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Revolutionäre und konterrevolutionäre Dreifaltigkeiten«, in: D. Harth u. J. Assmann (Hg.), *Revolution und Mythos*, Frankfurt/M 1992, 104–27; St. Mennell, *Die Kultivierung des Appetits. Die Geschichte des Essens vom Mittelalter bis heute*, Frankfurt/M 1988; M. Mies, »Gegen Globalisierung. Nahrungssicherheit durch Selbstversorgung«, in: *Frauensolidarität*, Jg. 15, 1996, Nr. 4, 2–4; V. R. de Mirabeau, »Die Finanzen (1789)«, in: *Mirabeau ›Der Redner der Revolution‹. Reden. Briefe. Schriften*, hgg.

v. H. Günther, Frankfurt/M 1989, 225–30; O. P. Molcanova u. a., *Buch über die schmackhafte und gesunde Ernährung*, Moskau 1952 (russ.); J. Moleschott, *Lehre der Nahrungsmittel. Für das Volk*, Erlangen 1850; S. Petersen, *Die Große Revolution und die kleinen Leute*, Berlin/DDR 1988; V. Pudel, »Zur Psycho-Physiologie des Essverhaltens«, in: A. Hürlimann u. A. Reininghaus für MAK—Österreichisches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 (Hg.), *mäßig und gefräßig*, Wien 1996, 118–26; S. Steiner, *Karl Marx in Wien. Die Arbeiterbewegung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stauration 1848*, Wien-München-Zürich 1978; J. Tavernier-Courbi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umor in Charles Chaplin's movies«, in: A. Nysenholc (Hg.), *Charly Chaplin. His Reflection in Modern Times*, Berlin-New York 1991, 125–30; C. v. Werlhof, M. Mies u. V. Bennholdt-Thomsen, *Frauen, die letzte Kolonie. Zur Hausfrauisierung der Arbeit*, Frankfurt/M 1983; E. Wulff, *Transkulturelle Psychiatrie*, Berlin/W (= SH 23: Argument-Studienhefte) 1979 (davor in: *Argument* 50, 1969, 226–60).

冈特·维林 撰
陈扬 译，曹旸 校

参见：
Agrarfrage, Agrobusiness, Alltag, Arbeiterbewegung, Armut/Reichtum, Bedürfnis, Disziplin,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Familienarbeit/Hausarbeit, Feminismus, Feuerbachseher Materialismus, Fourierismus, Gentechnologie, Genuss, Globalisierung, Hausarbeit, Hausarbeitsdebatte, Hedonismus, Hung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onsument/Verbraucher, Konsumtion, Krankheit, Lebensmittel, Lebensunterhalt, Lebensweise, 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ÖP), Ökonomie der Zeit, Produktion des Lebens, produktive/unproduktive Arbeit, Schlaraffenland, Taylorismus, Verelendung

国家主义（Etatismus） 859

A: daulānīya.
E: statism.
F: étatisme.
R: ėtatizm (этатизм).
S: estatismo.

若要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对国家主义进行有意义的探讨，就必须在词语和概念之间做出区分。即便国家主义甚少作为词语出现，但它所指涉的

现象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为人所了解和讨论。作为词语，国家主义这一表达最早于1880年前后在法国出现，它旨在描述这样一些学说，即它们主张把国家的角色和职责扩展到经济和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在19世纪90年代的瑞士，在针对拟议中的、以牺牲各州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为代价来扩大联邦权限的反抗斗争中，也使用了这一表达。国家主义这个词的一个用法便因而得以传播，用来指涉国家相对于社会、社会各个领域和个人的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传统大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家主义的，只不过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据此，国家的支配地位是同资本主义动力、国民经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或各阶级力量的变动中的均衡相联系的。

1.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没有使用这个表达，但作为概念，它被包含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论述的国家体现的异化。后来，在论述19世纪的法国，特别是波拿巴主义时，马克思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扩展；在生命最后阶段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中，马克思关于国家主义的阐述更为清晰。在确定马克思关于国家主义的看法时，可以区分出两个表面看来互相对立的观点：有时，他认为国家主义现象是例外和不稳定的假象，这种假象只出现在特定的阶级力量对比形势下，或者只出现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但他又在其中看到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的一个普遍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这一特性蕴含在政治的异化形式中。马克思在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著作中也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在其他类型的社会形态中，国家也可以取得自主性。

1.1 应该说，做出这些必要限定的 860
前提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就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而言，国家主义出现了三种主要形式。在理论上，第一，国家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特殊形式的一个主要特性；第二，它被视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内在固有的特点，这一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愈益重要。这两种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能找到，在他们关于法兰西国家的论述中最为突出。

第三，国家主义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一种策略上的意义。在这里，它指的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要强化国家以便推动“自上而下的革命”。起初，这一策略通过与波拿巴主义或普鲁士国家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推动资产阶级发展的作用进行历史类比而获得合法性。后来，随着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以意外保险、烟草专卖、铁路国有等形式）登场，这一策略得以强化。在一些时期，

如最近在凯恩斯式的、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时期或在东亚的发展中国家里那样，随着国家（无论是否遵从民主形式）看起来具备了消除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危机趋势的能力，国家主义这个策略得以进一步巩固。

1.2 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历史上，这些支持国家主义的观点或政治行为是建立在国家同社会形态其余部分的制度性张力之上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说，这种张力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必然特征。我们可以想见，资本积累取决于许多经济之外的条件，这些条件无法由市场交换和经济竞争予以保证，以至它们必须或者可能由国家提供保障。除了社会必要的最低条件外，国家干预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得有利于连续积累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中以及在不同的特定形势下是各不相同的。

国家主义意味着，为了保证资本增殖的条件，可以牺牲交换关系和/或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及政治代表的（总
861 是间接的）民主的形式，以便国家机器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无论何时，这种制度性张力都允许国家机器的激进自主化，这种自主化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凌驾于社会结构之上的统治，即国家利益和国家管理人的利益凌驾于各经济阶级和市民社会成员利益之上的统治。国家主义的这样一种极端形式尤其意味着，国家不仅对被统治阶级，而且对统治阶级，也决定性地扩大了其权力和自主性。同时，国家同社会结构其余部分的这种制度性张力也为国家主义“自上而下的革命”策略准备了物质和意识形态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各阶级在其正式组织中的根本性缺席（这是指，国家主权的法律—政治的建构，表面上的阶级中立假象，对民族—大众的利益而非阶级利益的提倡）。由此，这种假象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利用国家权力来改造经济和市民社会。基于这一点，一些人相信可以在国家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其基础是集中计划和对经济的行政管理。持有这种信念的，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也有斯大林主义的、由“全体人民的”自主国家强制实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1.3 这一问题的史前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及其对国家理由（Staatsräson）的兴趣。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现象的描述主要来自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充分发展的理性国家以理想的方式充当着“整体利益”的代表（参见 *RPh*，§ 270 和 §273）。与此相反，马克思含蓄地指出，现实中的国家是政治的一种异化形式。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可能认为，国家主义在这样一个限度内是存在的，即国

家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异化形式。这种解释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具有的那种侧重阶级理论的国家理论。其出发点是对作为形式的国家的抽象分析，而不是对统治阶级或管理阶级的社会来源与关系和/或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一般所服
862 务的阶级利益的具体强调。事实上，要恰当地描述国家主义，就不能奉行简单的、基于阶级理论的国家论，后者把国家视为各阶级力量的政治机器或工具。因为国家主义趋向主要根植于各种资本主义形态的政治组织的必然形式中，而非阶级统治的偶然性或特殊形势下的特定政治格局中。

2. **国家的正常形式和例外形式。**国家主义是国家的一般特征这一观点，一开始隐含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在那里，他阐发了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提出了异化政治的思想，并论证了只有废除国家才能彻底实现政治解放。除了哲学上的批判，这些解释在其关于法兰西国家和巴黎公社的革命意义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于“东方专制主义”的评论，尽管探讨的是一种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但似乎给出了这样一个推测，即国家可能会变得极端自主。在对法国的研究中，马克思首先指明了拿破仑的作用：他为了建立一个联合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摧毁了（地方的、市镇的和省的）独立权力，从而使得法兰西国家臻于完善。政治权力集中于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的权力又通过牺牲中间各机关而扩大。马克思还论证道，此后的所有政治革命都服务于完善国家机器，而不是推翻它。在路易·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兰西国家的精致化和自主化中，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2.1 不仅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在外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种“规范性”（Normalität）观点的新例子层出不穷。与此相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提出的，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和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的登场而出现的强硬的官僚国家趋势——无论是威权形式的，还是极权形式的，都是一样的（参见《经济、权利与国家》[*Wirtschaft, Recht und Staat*]，1984）。这种国家形式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相适应，后者越来越依赖大众媒体来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对工会 863
运动则是要么为了取得政治支持而将其兼并，要么为了巩固极权统治而予以打击。马克斯·霍克海默把国家主义归类为威权国家的变种：“摆脱了对私人资本的一切依赖的、最彻底的威权国家类型是整体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GS 5，第300页）对他来说，苏联就是这样的：“在整体国家主义下，社会化是法律

规定的。私人资本家被废除了。息票是唯一仍从国家债券上剪下的。由于体制的革命的过去，主管机关和职能部门之间的龃龉不像法西斯主义下那样因为社会出身和官僚班子内部的社会关系——这在那里引起了非常多的摩擦——的多样而变得复杂。整体国家主义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意味着力量的增强，它可以在没有种族仇恨的情况下存在。”（第301页）在战后时代的理论家中，广为引用的是约阿希姆·希尔施（1980）在战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提出的“安全国家”（Sicherheitsstaat）在增加的观点，以及诸如“强国家”、“卫戍国家”（Garnisons-Staat）、“友好的法西斯主义”一类的理论。这些观点普遍关注的是欧洲和北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外围资本主义则呈现出更极端形式的国家主义——与发展中国家融为一体的国家主义——问题，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土耳其、李光耀（Lee Kwan-Yiu）的新加坡。除了这些看起来“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主义形式之外，还存在“发展中”国家的例外形式（如韩国的发展中国家政权及其国家安全机构）。

2.2 这些观点的一个新近的代表性例子出现在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中。在其广为阅读的著作《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1968）中，普兰查斯基于马克思对于波拿巴主义的多维分析以及恩格斯关于作为“资产阶级的真正宗教”的波拿巴主义的专门理论（恩格斯1866年4月13日致马克思的信，MEW 31，第208页），提出将国家主义与相对自治的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这种国家不仅反对单个资本的利益，也反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与此相反，在后来的著作里，普兰查斯区分了国家的民主形式和例外形式，并提出后者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他对它们的进一步分析基于如下角度，即国家机器的哪一部分占据支配地位：在代议制下是立法机 864
关还是行政机关，在例外体制下是官僚、政治警察、军队还是一个政党（参见1972，第332页）。然而，在其最后的著作中，普兰查斯却开始认为威权主义是国家的一般特征。他特别指出，一种新形式的国家已经出现，并将其称为“威权国家主义”（1978，第185页）。这种新的国家形式的基本发展趋势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的越来越多的干涉，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民主制度土崩瓦解，所谓的‘形式自由’也遭到各种各样的限制”（1978，第185—186页）。更确切地说，威权国家主义包含着行政机关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政党的功能强化（它充当着从国家到人民而非从人民到国家的“传送带”）以及新的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在普兰查斯看来，

这进一步损害了群众已受限的对政治决策的参与权，严重削弱了政党制度的组织功能（即使多党制仍安然无恙地继续存在），并打击了政治对话的民主形式的生命力。与此相应，威权国家主义形式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与日俱增的渗透却几乎不受阻碍。实际上，普兰查斯的结论是："**当今的每一个政权都充当了威权国家主义。**"（1978，第221页）

2.3 根据"例外论"的解释，如果由于被统治阶级的压力和/或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威权的和专制的政府形式，国家主义一般就形成了。国家主义为例外情形这一看法提供了依据，它是关于绝对主义、波拿巴主义等体制下的国家相对独立性的一些更为流行的观点。马克思多次指出法兰西国家的整体强大及其以牺牲农村群众为代价的中央集权趋势；除此之外，他还专门描述了一定条件下的路易·波拿巴统治的非同寻常的自主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858年（暂时地，而非多次地）指出，作为御用军人体制的波拿巴主义拥有绝对自主性。在这一评论中，马克思确信，"帝国的统治所依
865 靠的不是人民的意志，而是60万军队"（MEW 12，第399页）。

这些分析构成了经常被提出的这样一种主张的基础，即马克思阐发了两种即便不是完全矛盾的但也是互相对立的国家理论：一种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必要政治机器；另一种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在一定条件下自主的、掠夺性的和寄生的机器，这个机器服务于其功能承担者的利益。这里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尽管马克思在研究国家的天然国家主义趋势时，引以为据的是国家的内在本质，而不是阶级分析的形式，但马克思对国家自主性非同寻常的特点的考虑却取决于阶级分析的偶然条件。例如，关于波拿巴主义，马克思写道："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MEW 8，第151页；MEGA I.11，第133页）他还写道："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MEW 8，第154页；MEGA I.11，第136页）

2.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自主化的本质、扩大和持续取决于特定体制下阶级力量的互相平衡。因此，在绝对君主制下，在两个波拿巴建立的专政体制下，在俾斯麦执政时期，以及在其他的例外体制下，这种向自主化、相对独立性或者国家主义演变的趋势形成

了。然而，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形下，这些体制都对应着各不相同的阶级均势类型，其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涉及这样一些时期，即在这些时期，彼此对立的各阶级几乎达成了均势，以至国家机器或者国家管理人可以作为所谓的协调人，获得一定的独立性。在所有情形下，一定的典型局势都能使国家管理人（在某个领域的某些阶级力量对比态势下）达到某种反常的或例外的自主状态。事实上，在马克思很早期的论述中，国家常常被描述为对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没
866 有任何效用的寄生虫。尽管这些论述最多也不过是前马克思主义的，但马克思后来时不时地还会指出，“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的国家是寄生虫。不论这种看法是否切合历史唯物主义，后来的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马克思对于东方专制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御用军人权力的分析，以便为这样一个观点辩护，即国家可以变得完全自主。

2.5 这种分析的例子在后来关于绝对主义国家、波拿巴主义和俾斯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比皆是。它们都涉及可以使国家管理人获得某种独立性的例外状态的特定形势。

在论述法兰西国家自主化趋势的著作中，罗莎·卢森堡参考了马克思关于波拿巴主义的论述（GW 1/1，第265—266页；1/2，第19页）；但她也提到了一个新矛盾，这个矛盾源自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各帝国主义列强的对立。列宁在谈到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克伦斯基（Kerenski）政府时，也阐发了类似的观点（LW 25，第221页及以下）。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扩展了这些论述，并借此区分了（相对均衡下的）妥协均势和即将使彼此对立的、斗争着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的灾难均势（*Gef* 7，H. 13，§ 27，第1592页）。后者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凯撒主义（Cāsarismus），即由一个“英雄般的”伟大人物依靠国家机器的支持进行统治的联合体。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到来以前，军事强权在凯撒主义体制下发挥着关键作用：1848年后，“现代政治技术……完全改变了”，官僚组织（包括工会和政党）现在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见第1594页）。凯撒主义可以是进步的（如凯撒、拿破仑），也可以是反动的（如路易·波拿巴或俾斯麦）（参见 *Gef* 5，H. 9，§133，第1179页；§136，第1181页）。葛兰西补充说，凯撒主义甚至可以在没有“英雄般的”、具有代表性的伟人时存在。就此而言，警察在稳定政治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凯撒主义是警察当政，而非军人当政。”（第1182页）这一点使得他的分析更为接近国家主义的普遍现象。

2.6 在一些例子中，国家主义可以 867

由各阶级力量的普遍弱势来解释，而无论这些力量是否处于均势。在托洛茨基关于1905年和1917年革命之前的沙皇俄国的论述中（1922和1930），以及蒂莫西·梅森（Timothy Mason）（1966）关于纳粹德国的政治优先的分析中，可以找到两个不同的例子，它们都凸显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弱势。托洛茨基对俄国1905年以前的历史处境描述如下："在沙皇统治为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而努力时，与其说它被迫避开了特权等级的要求，不如说它致力于反对野蛮、贫困的斗争和一个国家普遍的分散现象——这个国家的分崩离析的各部分在经济上完全是独立的。正是经济上占据优势的阶级的弱势，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的均势，才使得俄国的官僚专制形成了一个独立化的组织。"（1973b，第26页）就此而言，他认为沙皇的"独自统治"是"介于欧洲绝对主义和亚洲专制主义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其在很多方面更接近后者（1973a，第388页）。梅森论证道，与此相反，纳粹国家是相对独立的，因为资本和劳动以及其他阶级的政治机关在统治最开始的三年里已被消灭和摧毁。因此，在托洛茨基和梅森描述的那些形势下，国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在于阶级斗争并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定义的"正常情况"相反，国家不再执行直接的阶级职能，而是实际上加速了"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Manifest*，MEW 4，第462页）。

2.7 调和对国家主义的这两种对立解释的一条出路在于，在围绕长期的向上趋势而周期性摇摆的框架下理解国家的自主化。据此，在向着威权统治的连续趋势中还存在着某种使民主时期和威权时期交替"扣合"的"倒钩"。在威权统治时期之后，绝非完全倒退到民主的原点，这就使得下一次转变的起点比之前的威权色彩更浓。这一点也是既可以用资本逻辑（这一逻辑要求加强国家干预）来解释，（或者）也可以用阶级斗争的逻辑（这一逻辑要求强化国家的镇压措施和立法措施）来解释的。外围资本主义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尖锐了，因为国家主义在这里是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体制结合在一起的（如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 868

2.8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Verratene Revolution*，1936）中，试图在概念上同"国家资本主义"（Staatskapitalismus）划清界限。在他看来，国家资本主义"指的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将交通工具或工业企业置于自身管理之下的所有情形"。托洛茨基认为，自从"战争特别是自从法西斯主义的经济试验以来"，相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来说，国家主义在指涉"国家干预体系"方面是

一个“适宜得多的名称”（1979，第239页）。“无疑，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些交点，但作为体系来说，它们之间是对立的，而非同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以国家所有制取代私有制，这种取代也因而仍然是局部的。国家主义意味着国家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为了挽救私有制而进行国家干预——无论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罗斯福的美国，还是在雷昂·布鲁姆（Léon Blum）的法国，这一点都是一样的。”（第239—240页）然而，国家主义拯救“小的所有者，使其免于毁灭，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于维护大占有者是必要的”。其“计划措施”不是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性”，而是归因于“维护私有制的考虑”。“国家主义意味着暂停技术的继续发展，维持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使寄生的社会阶层长期存在；总之，它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第240页）对托洛茨基来说，没收生产资料是区分的标准，因此，他不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国家主义。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观点证明，“将资本主义的国家主义同苏维埃制度相提并论是多么地荒谬。国家主义是反动的，苏维埃是进步的”（第241页）。

3. 作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国家主义。从策略的角度看，国家主义可以被定义为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开端，它预先扩大了国家权力，以便自上而下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提出了关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一些问题以及革命策略等同样重要的问题。巴枯宁论证道，这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一种在他看来可以归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李卜克内西和拉萨尔名下的政治策略。在《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 869
态》（*Staatlichkeit und Anarchie*，1873）中，巴枯宁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生产的每一种中央集权的协调形式都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形式，从而不可避免地引起有文化和特权的少数人对工人的政治统治。这个少数由于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比人民群众更了解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一判断被运用于斯大林主义专政的产生，后者加剧了国家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

3.1 有一些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接受了某种较为温和的国家主义策略。这一点在关于英国工厂立法的讨论中尤为明显。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资本论》第1卷中分析了工厂立法和工厂视察员在保护妇女和儿童上的作用。工厂视察员甚至可以被视为黑格尔的官僚“普遍阶级”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不仅仅依赖于立

法、定期报告和公共舆论，而且也依赖于同工人、资产阶级、贵族分子以及一些开明工厂主的同盟关系（参见 MEW 23，第 309 页、第 518 页及以下）。这也暗示着，在议会民主制下，基于选举的策略可以起到改变工人物质处境的作用（参见 MacGregor 1996）。此外，在讲述当时的国家时，马克思常常面对的是欧洲大陆以及英国和美国。他似乎承认，后两者不像欧洲大陆国家一样也发展出了威权统治趋向。尽管马克思由此将法兰西国家的“巨人症”归咎于其民主元素和威权元素，但他认为，美利坚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其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Gr*，MEW 42，第 4 页；MEGA II.1.1，第 4 页）。同样，恩格斯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也就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制道路的可能性做出了一系列的评论，其中不仅涉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也涉及欧洲大陆（参见 MEW 19，第 277 页及以下；22，第 515—516 页）。后来，列宁试图取消
870 这种观点，他指出，帝国主义已经使得英国和美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转变成了军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的威权国家（参见 *SR*，LW 25，第 402—403 页）。他还把这样的观点溯源至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评论所奠定的基础（第 426 页及以下）。

3.2 结合马克思对工厂立法的评论，我们可以以如下方式来理解这个观点，即它们支持某种改良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巴枯宁的批判不仅参考了拉萨尔，也参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然而，就这种批判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后者是拒斥的（参见 MEW 18，第 597—642 页）。他们基于类似的倾向对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传统进行了严厉批判。拉萨尔主义是国家主义在 19 世纪晚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体现。拉萨尔认为，正如工人阶级可以逃脱将工资压制在生理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以下的所谓“经济铁律”（*Arbeiterfrage*，1863，GRS 3，第 58 页）一样，唯一的出路在于组织生产者的合作社，而在他看来这只有在国家补贴的信用机构的支持下才能实现。这种观点是以黑格尔对普鲁士国家的洞见为基础的。据此，拉萨尔把国家视为人类组织的最高形式，认为它是民族有机联合的体现，其功能是“以自由为目标来教育和发展人类”（*Arbeiterprogramm*，1862，GRS 2，第 198 页）。与赞颂国家相关联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工人运动可以和俾斯麦的保守派携起手来，组成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哥达纲领》（Gothaer Programm，1875）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念。马克思从中看到了言语中透露出来的“拉萨尔宗对国家的忠

顺信仰”，他斥责这是“对民主奇迹的信仰”（MEW 19，第 31 页）。鉴于德意志帝国的特定形式，即一个“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第 29 页），马克思犀利地反驳道，这种同民主共和国相对立的体制完全不适合用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要求。但是，当马克思补充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居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第 27 页）时，他也转向了自己早些时候关于异化政治的更为一般的观点以及自己最近关于公
871 社的革命政治形式的发现。这表明，不但在国家相对自外于民主影响的境况下，而且在社会主义运动以保留“国家”这一“形式”（参见 PIT 1989，第 10—14 页）为出发点的一切境况下，马克思都拒绝各种国家主义的策略。

3.3 总之，拉萨尔主义被视为国家主义的一个体现了所有社会主义变革策略共同特点的例子。这些策略在（未经改良的）国家机器中看到了一种关键的职能，即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提供保障。在为过渡提供保障方面，可以同国家主义对照的有强调民主激进主义的雅各宾主义和侧重工会活动的作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国家主义的目标不是打碎国家机器，而是争取它的支持，使其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充当阶级冲突的调解人。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其中包括蒲鲁东的“社会凯撒主义”（它主张策略性地支持路易·波拿巴，以便利用他发动的政变来支持进步力量而非反动力量）（参见 Proudhon 1852），“新政”时期的社会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二战”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或在为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现代化提供保障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中的扩张。

3.4 尽管在 19 世纪 50—60 年代，马克思明显地倾向于通过相对无暴力的、议会制的国家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但巴黎公社的经历把他带回到一种偏向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法兰西内战》（1871）中，马克思宣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MEW 17，第 592 页）。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建立新的国家形式（即公社）。这种看法在列宁的著作中（*SR*，1917）得到了着重强调和片面发展。恩格斯后来的评论偏离了马克思的这一立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策略，就其利用国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总是在证实一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导向。

3.5 这种策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872
尤为突出，并在《爱尔福特纲领》（*Er-*

furter Programm，1891）中得到了确认。这个纲领预言，民主斗争和社会主义斗争会愈益走向一致，民主化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将发挥关键作用。卡尔·考茨基的文章及其后来关于这个纲领的评论强调了较大国家的议会作为组建政府的工具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的必要性。与此相应，他还指出了议会道路连同扩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自由以及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行政机器的重要意义，并因此自然遭到了列宁和卢森堡的严厉批判。考茨基驳斥了直接民主和直接立法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代替现代大工业中的中央计划和行政管理等看法，主张改变议会制和官僚制国家的政治导向。但他也批判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的“国家社会主义”改良家是天然的盟友。因为在反对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的前提下，他坚持认为，国有化对于工人运动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取决于国家的阶级属性：尽管一个保守的国家将会用国有化来分裂运动，但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利用它来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加强工人阶级。后来，他批判伯恩施坦支持民主改良主义，这种主义是基于这样一个看法，即民主和资本主义是互相协调的。考茨基之所以对于改良主义路线持保留意见，是因为他认为，在军国主义化的、即将爆发危机的欧洲大陆，这条路线是不可靠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考茨基拒绝接受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

4. 由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家主义并不是一个广为流传的术语，因此，它的重要性是在不同的争议和争论中得到判定的。就此而言，可以把握的有三个主要参照点：异化政治的本质，这一本质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性张力，在这种张力的基础上，国家或多或少获得了独立性，而这同时也限制了利用国家工具来弥合这种张力的可能性；各阶级力量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国家机器或国家精英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以便去追逐其自身利益和/或自上而下强行发动一场革命；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争论，与之相反的是阶级统治或阶级专政的各种直接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三个参照点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变化。但是，它们中的每一个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都相当重要，足以揭示通常以不同的形态和在不同的组合中登场的国家主义问题。 873

参考文献：

M. Bakunin, *Staatlichkeit und Anarchie und andere Schriften*, hgg v. H. Stuke, Frankfurt/M-Wien 1972; E. Bernstein, *Der Sozialismus einst und jetzt* (1923), Berlin/

W-Bonn-Bad Godesberg ³1975; J. Hirsch, *Der Sicherheitsstaat*, Frankfurt/M 1980; M.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 in: GS 5, 293–319; B. Jessop, »Postfordismus«, in: *Argument* 169, 30. Jg., 1988, 380–90;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d. II, Berlin 1927; F. Lassalle, »Arbeiter-Programm. Über den besonderen Zusammenhang der gegenwärtigen Geschichtsepoche mit der Idee des Arbeiterstandes« (1862), *GRS* 2, 139–202; ders., »Offen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Zentralkomitee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Kongresses zu Leipzig« (1863), *GRS* 3, 39–107; D. Macgregor, Hegel, Marx, and the English State, Toronto 1996; H. Marcuse, »Der Kampf geg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in: *ZfS*, 1934, unv. Nachdruck, München 1980, 161–95; T. Mason, »Das Primat der Politik. Politik und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n: *Argument* 41, 8. Jg., 1966, 473–94; F. Neumann, *Demokratie und autoritärer Staat*, Frankfurt/M 1967; PIT (Prrojekt Ideologie-Theorie),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Hamburg 1989 (³1986); N. Poulantzas, *Faschismus und Diktatur* (1970), München 1972; ders. *Politische Macht und gesellschaftliche Klassen* (1968), Frankfurt/M ²1975; der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P.-J. Proudhon,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s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e décembre 1851*, Paris 1852; J. Robelin, »Etatismus« in: *KWM* 2, Hamburg 1984, 313–20; L. Trotzki,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Teil I: *Februarrevolution* (1922), Frankfurt/M 1973a; ders., 1905 (1922), London 1973b; ders., *Verratene Revolution. Was ist die Sowjetunion und wohin treibt sie?* (1936), Dortmund ³1979; *Wirtschaft, Recht und Staa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Analysen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9–1942 von Max Horkheimer u. a.*, hgg. v. H. Dubiel u. A. Söllner, Frankfurt/M 1984.

罗伯特·杰索普（Robert Jessop） 撰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弗洛里安·施马尔茨（FS） 译为德文
张志超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kkumulation, Apathie im befehlsadministrativen Sozialismus, autoritärer Populismus, Basis, Beamte,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Bonapartismus, Bourgeoisie,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bürgerliche Ge-

874 schaft, Bür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ehern, ehernes Lohngesetz, Elite, Emanzipation, Entfremdung, Entwicklungsländer, Eurokommunismus, Fabrikgesetze, Faschismus, Funktionäre, Herrschaft, herrschende Klasse, Klassengleichgewicht, Korruption, Kräfteverhältnisse, Lassalleanismus, Legitimität, Macht, Nomenklatura, orientalische Despotie, Pariser Kommune, Planwirtschaft, Reformismus, relative Autonomie, Revolution, Sozialdemokratie, Staat, Staatskapitalismus, Staatsklasse, Staatstätigkeit, Stalinismus, Überbau, Verwaltung, Vergesellschaftung, Zentralismus

伦理学（Ethik）

A: ʿilm al-aḫlāq.

E: ethics.

F: éthique.

R: ėtika (этика).

S: ética.

我们很难在伦理学和道德（*Moral*）这两个概念之间进行精确界定，两者总是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联系同样体现在它们的词源史上。在很多情况下，它们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例如在马克思那里。就术语方面来说，伦理学在他的理论中也不是关键性的。习俗（*Sitte*）、风俗（*Brauch*）、习惯（*Gewohnheit*）和习性（*Charakter*）都有源自古希腊词“习俗、习性”（ἦθος）和拉丁词“风俗、习惯”（*mos*）的共同含义。伦理学与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差别与联系在卢曼的措辞中被很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把“伦理学作为道德之理论反思”来理解（1989，第358页），道德被理解为各个社会的道义标准体系，而伦理学则是为这些标准奠定基础的理论。今天，伦理学这个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时常也作为道德哲学的同义词来被使用，以此去界定伦理学同实践，即道德、品德和习俗间的界限。如果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哲学”完全能普遍性地表示这样一种对道德的思索，“伦理学”作为“道德行动的理论和体系”（HWPh 2，第801页）在大多数情况下就被视为表述一种规范的、奠基于理由充分的原则之上的、有约束力的学术探索。个体们应该且有能力根据这些学说指导他们的行动。

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另一种区别在更新近的讨论中体现在：当前的“伦理学家”大部分处于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传统中，他们追问善的人生（*gutes Leben*）的原则并代表这样一种理解：善的人生只有在特殊的但具有实质伦理

（Sittlichkeit）的共同体之中才是可能的，共同体成员在其价值观及背景中定位自己。**义务**（*Bindung*）和**美德**（*Tugenden*）的表象（Vorstellung）在这里起主导作用。与之相反，“道德哲学”则更处于康德的传统中；在**自由**（*Freiheit*）与义务（*Pflicht*）的视野中，道德哲学努力
875 确定**正确的行动**（*richtiges Handeln*）原则，只有那些理性可信、无关上下文且因此能提出一种普遍有效要求的原则才可以被考虑。

在对伦理学与道德哲学这两个术语的分析中，我们不可以忘记：“善的人生”和“正确的行动”这两个概念处于实质性的联系之中，且互相关涉。这种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的**二分法**（*Dichotomie*）看起来完全像“**描述性**（*Deskriptivität*）与**规范性**（*Präskriptivität*）的二分法”一样虚幻（W. F. Haug 1993，第 151 页）。这种以建立一种合乎人类尊严的社会为目的的实践批判纲领，即（1）普遍的宪法将首先使不同个体在道德上正确行动成为可能；（2）这种社会作为整体，将根据它的成员的需求和力量使一种善的人生得以贯彻实施。这关涉到一种双重性：它既关涉到古典的、启蒙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被实现的道德性应是理智人道的、普遍利益与不同个人利益的中介（参考 Marx/Engels，MEW 2，第 138 页；Horkheimer，GS 3，第 126 页；Marcuse，Schriften 3，第 257、266 页）；又关涉到辩证—启蒙的见识，根据这种见识，那些专注于个体的、被假设存在的伦理原则学说退居到了个体意图的后面，因为那些原则理论自身仍然包括这样一种要求，即应使私人德行与公共德行相一致（参见 Adorno 1996，第 28 页）。

与固化为威权主义统治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Dogmatik）相比，马克思理论中并没有伦理学。相反，马克思认为他的批判的、启蒙的任务大部分正好在于把伦理学作为一种错误意识的形象揭露出来，这种形象与社会必然性（Notwendigkeit）同时产生。这种任务还展示：那种无人性的社会关系，那种仅仅“爱说教的批判”（MEW 4，第 331 页）有一种顺从的、美化的功能，因为它是维持这种关系的工具。如果没有规范的前提，马克思的关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及其解放性的转变的批判理论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前提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直有所建树。正如今天反复声称的那样，这不是矛盾（例如在伦奇 [Rentsch] 那里，Rentsch 1994，第 119 页及以下），而是那种要消除伦理学内在矛盾的哲学探索，它们是前后一致的。这种内在矛盾首先被黑格尔讨论过，根据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观点，此矛盾随后在批判理论中继续向前推动。由此，另一些努力也被衬托

876 了出来，即在或多或少与马克思的紧密关联下，去建立新的、与自身变化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实定的伦理学。

1. **概念与问题发展史**。黑格尔关于道德意识的内在矛盾的理论要证明，“道德世界观”（die moralische Weltanschauung）必须不断要求扬弃（Aufhebung）自身的应然（Sollensforderung），并要求这种应然处于一种被追求的、道德上正确的存在状态中；同时，道德世界观通过如下的方式尝试保护自身，以拒绝这种扬弃：它使这种应然（Sollen）长久地持续下去，并因此将道德转化为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这种永无止境的任务从来不允许被履行，也因此从不允许被完成（W 3，第 442 页及以下）。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马克思与道德哲学传统中影响力强大的理论展开了辩论。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伦理学中，他承认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善（das Gute）的抽象规定”（MEW 40，第 87 页），其世俗性（Welthaltigkeit）本质仍然是理想化的。这种情况在康德的伦理学中继续得以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康德批判部分扩展了黑格尔对资产阶级道德哲学的内在矛盾的内在批判，因为它是物质的，是从经济政治的条件中导出的。“当法国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通过庞大的为历史所熟知的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占领欧洲大陆时，当政治已经解放了的英国小资产阶级彻底变革工业及印度在政治上和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地方在商业上臣服于它时，无能的德国市民们则仅仅把这些放进‘美好的愿望’中。康德使自己在这种纯粹的‘美好愿望’面前平静下来，即使这种愿望一直没有任何结果。他把这种美好愿望的实现、这种愿望与个体的需求及欲求的和谐放置到了**彼岸世界**（*Jenseits*）。康德的这种美好愿望完全与德国市民的无能、沮丧和困境相对应。他们狭隘的需要（Interessen）从不可能发展为一个阶层共同的、国家层面的需要。”（MEW 3，第 176—177 页）

马克思追随黑格尔的思想，坚持认为，具有自我决定的道德个体的内在自由不应停留在自己身上，而必须转向外在自由的社会现实。在黑格尔看来，现实伦理只能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即只有当市民社会中的对立在其自己的土地上无法调和时，才出现了国家（W 7，第三部分）。然而，黑格尔理想主义的 877
“国家偶像崇拜”（Adorno，GS 5，第 274 页）使应该被克服的东西永恒化。“共同的对抗是动力，这种动力维持国家的运行并持续地向道德之物的样子转变”，然而事实上“社会的非道德的经济运行法则”（Bolte 1991，第 108 页）

阻碍那种所宣称的和解，即“伦理宇宙”（sittliche Universum）（Hegel，W 7，第26页）。

与此呼应的是，马克思赞赏唯物主义对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因为这些思想站在个体的生活需要的一边。他赞同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其原则——快乐被消极地规定为从悲痛、忧虑和人类需求的不满足中获得自由。“在伊壁鸠鲁那里，没有任何对人来说好的东西是在人外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唯一好的东西是这样一种消极的运动，即从这个世界中获得自由。”（MEW 42，第101页）然而，爱尔维修之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道德哲学，被理解为将特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确定为他们自己的社会理论的预期（Antizipation）。“感官属性与自爱、享乐与应该被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所有道德的基础。”（MEW 2，第13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介绍爱尔维修的体系：“唯物主义关于原初的善（Güte），人类同等的智力天赋，经验、习惯与教育的万能，外部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工业的重要意义，享乐的合法权益等等的学说”指向“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联系……如果这种应该被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所有道德的原则，那么它取决于个人的私人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的重合”（MEW 2，第138页；参见 Mensching 1971，第178页及以下）。因此，一种特有的、以解放的实践为目的的理论目标规定：在资产阶级伦理学与社会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意图的**扬弃**，这种扬弃是通过这些意图在一种社会方面具体的公共利益与特殊利益的中介中的实现来进行的。这种由此预先被设定的人性观念在所有以前的伦理学中保持为纯抽象的、乌托邦式的。而这种人性观念应该作为“自由人类协会”（MEW 23，第92页）得到它的实质的兑现。

2. 马克思对伦理学的扬弃。马克思在他的早期人类学阶段那里将人的本质定义为非异化的人，然而，它只属于非 878
异化的社会。这种本质规定具有在哲学与社会批判中的规范性基础功能（参见 Heinrich 1992，第88—89页）。在黑格尔看来，资产阶级哲学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没有实现这种哲学时，不能去扬弃它；在没有扬弃它时，不能去实现它（MEW 1，第384页）。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甘愿同时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MEW 1，第385页），也就是说，通过一贯的理论的自我反思和对所有社会存在的毫无顾忌的批判（MEW 1，第344页）来为革命性的变化提供前提。马克思的理论标准化地被“绝对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所指导“去颠覆所有的那些关系，因为在

它们中，人是一种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被蔑视的生物”（MEW 1，第385页）。

正如马克思的康德批判已经展示的那样，对晚期马克思来说，对既有道德意识形态的批判处于中心地位。首先，其指向关于人类本质的所有纲领的社会制约性和在此本质基础上所建立的关于道德、宗教、形而上学（MEW 3，第26页）以及法规表象的社会制约性。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道德与所编撰的法规属于“理想表达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被迄今为止的生产发展所决定），它们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有意识的理论性地自主化了……并被作为人生准则，一部分作为统治意识的美化，一部分作为统治的道德工具，提供给被统治阶级的个体”（MEW 3，第405页）。因此，马克思也批评那种无结果的善意假设，这些善意的事物想要被统治者团结一致，然而却不能正确认识伦理规范的意识形态。听从“绝对命令，完全听从‘自由’的绝对要求”，这样的情况并未出现。如果民主的理想——公正、人性、自由、平等、友爱与独立——只是“或多或少”作为“道德范畴”被表达出来，就像这种情况在泛斯拉夫主义的运动中所发生过的一样，那么这些理想将作为“一种‘空的幻想’”保持不变（MEW 6，第272—273页）。马克思的行动不是为了进行道德解说式的抗议，而是关注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它自己所宣称的自我认识而言是不公正的，因为正如哈贝马斯所介绍的那样：“私人所有者之间的自由流动必然排除所有个体享有个人自治（Autonomie）的平等机会”，由此，“资产阶级私有法律制 879
度的形式必然在经济上拒绝伪装的正义。然后，资产阶级的利益便不再等同于所有公民的利益”，因为在形式法律的普遍要求后面隐藏着“一个阶级的独自的利益”（1982，第115页）。

因此，在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尽管规范性论证被**明确地隐**去了（参见 Heinrich 1992，第89页），但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内在运行的意识形态批判”（Wellmer 1986，第233页）仍然是**隐含的**规范性前提。这一点表明，“马克思理论的分析性概念”绝不是“一文不值的”（Schiller 1993，第202页）。然而，自由、平等、公正与人性没有被抽象地作为理想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对立起来，即这种现实停留在理想后面。因为“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核心规范概念的社会有效性（Gültigkeit）”，并且他宣称这不是在一种超验的最终奠基意义上的有效性。他认识到“那些概念的现实性是思想的物质性前提”与“存在的自由、平等和人性的形式……是矛盾的

和自我消解的”（Schiller 1993，第202页）。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社会的商品交换领域嘲讽地描绘为“一种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伊甸园。在这里仅仅充满了自由、平等、财产与边沁（Bentham）”（MEW 23，第189页）（边沁为功利主义哲学创立者。——译者）。因此，他破解了“作为人权社会内容的流通中的商品所有者的社会关系”（参见 Heinrich 1992，第98页）。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展现了：人权的政治性创立，由于其获得者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它既是真实的，也是假象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市民的解放，但不是人类的解放，这里的人类指的是在法律面前被承认为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实体，他们同时受制于自由交换社会的自然条件”（Habermas 1982，第116页；参见 MEW 1，第369页）。人权之所以表现为自然权利，是因为它们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劳动公民视作人为前提。在《资本论》第1卷的边沁批判中，形式自由的权利主体的契约（行为）被证明是唯一存在的人的现实自由，这些权利主体买卖商品——劳动力，而商品所有者的等价交换则被证明为现实平等；同时，功利主义（Utilitarismus）的肯定学说被刻画为通过商品形式所建立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的朦胧反思，根据这种学说，私人所有者的无节制的利己主义（Egoismus），就像通过一支看不见的魔爪，产生出最大的幸福（参见 MEW 23，第189—190页）。因此，如果人们像米夏埃尔·海因里希一样断言“按照马克思的意图，对资本主义条件的批判不需要任何规范基础”（1992，第97页），这就是一种误导。当然，马克思没有终极正当性意义上的基础，但有规范性的先决条件（参见 Lutz-Bachmann 1988，第170页及以下）。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批判的道德动力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例如，当他痛斥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作为“人的浪费者、生命活动的浪费者……不仅是血与肉的浪费者，还是神经与大脑的浪费者”（MEW 25，第99页）时，他的批判以一种唯一的方式把创造性的力量和毁灭性的力量同时展现出来。

“道德批判没有妨碍马克思去进行道德评价。这种悖论从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特性中得到解释”，这种唯物主义不是决定论的，也“没有简单地忽略道德领域的被给予的现实，就好像这种现实通过理论批判而消失了一样”（Schiller 1993，第201页）。这一点也表现在马克思其他对道德哲学反思意义重大的题材中：（1）在对商品的原始偶像崇拜特征（*Fetischcharakter*）的批判中（MEW 23，第85页及以下）。（2）在异化理论（*Entfremdungstheorie*）中。该理论批判

88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这种批判是在“一种真正的人的状态的表象”之背景下进行的（Schiller 1993，第 201 页）。（3）在批判商品生产社会中“阻止社会普遍性”、阻碍个人自治和“手段和目的颠倒”时（Angehrn 1986，第 124 页），马克思从预见的角度将哲学的苦难与道德上合理的手段和目的关系进行对比：“在一种未来的社会中，那儿没有阶级对立、根本没有阶级，（产品与生产者）的使用将不再受最小的生产时间的制约，而是这样一种人们在不同的物品身上所贡献的生产时间将通过这些物品的社会功用被决定。”（MEW 4，第 93 页）（4）在基于**必然性领域**的关于**自由范围**的学说中。（5）最后，关于革命困境的理论（参见 Kramer 1989）也是马克思理论中规范内容的组成部分。

881

3. 扬弃动机向新伦理学的转变。来自马堡学派的左派新康德主义者的伦理社会主义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尝试通过马克思和康德去构建伦理学的基础。这种理论方法及其随后对理论的威权功能化的压制，影响了后来基于马克思主义伦理辩护的许多努力。

麦克斯·阿德勒，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内以康德定位的伦理学里最重要的代表，在一种决定论的马克思理论解释中拒绝了以下假设：马克思把无阶级的社会仅仅理解为“道德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相反，他试图证明存在“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因果必然性”（Adler 1974，第 178 页）。然而如此一来，康德伦理学对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还存在于哪里呢？阿德勒在绝对命令对普遍主义的规范性（Normativität）要求中看到了这种重要性，并把一种社会内容判给了这种规范性：道德法则的普遍主义表达了对人们社会化形式的洞察力，人类可以根据一种普遍适用的法则来校准他们的行动。然而，他们在阶级社会中总是经历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由此，在否定的意义上，他们对此矛盾的抗争受到压制。那种不符合康德道德普遍原则的人类普遍有效性概念的条件，可以被表述为对“人类社会背景的统一”的伦理要求（Adler 1974，第 179 页）。阿德勒对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学分析恰如其分地否定了那些将其贬低为无能为力的道德说教（的批评），并将注意力吸引到对自身隐藏的社会内容上，但却是以有争议地低估康德普遍主义的规范性为代价的：阿德勒宣称，“道德（Sittlichkeit）在康德那里没有……规范的特征，而是……本来作为纯意愿（reines Wollen）的自然法则性（Naturgesetzlichkeit）被理解，这种自然法则性与一种应该本身（Sollen an sich）完全没

有关系”（Adler 1974，第 180 页）。因此，德行可以被当作一种决定论理论的
882 组成部分，这种理论把伦理学作为历史上必需的进步之“工具”（Adler 1974，第 182 页）来看待。

这种进步的假设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一道被划为马列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这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被愤怒地作为修正主义而遭到反对。在对所有革命疑难最终被克服的毫无争议的信仰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伦理学”把自身理解为一种对抽象规范性的纯道德化的成功扬弃。这种伦理学在由政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看到了特殊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公共利益的符合。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增进展开过那种“使道德向它的经济基础溯源的活动”（PhWb，第 380 页）。还原论者与反射理论的方法论、决定论以及伦理学的政治功能化在与马列主义者的伦理学相关的教科书中被当作马克思理论自身独有的组成部分而发布出来；虽然以马列主义者所使用的形式来看，它们充其量只是作为微量元素存在，但实际上它们与列宁有关组织和教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道：“所有到目前为止的道德应是……当时的经济方面的社会地位的成果。并且，就像社会迄今曾在阶级对立（Klassengegensätze）中运动，道德因此一直曾是阶级道德（Klassenmoral）；要么它曾为统治和统治阶级的利益辩护过，要么它反而曾代表对这种统治的反抗和被压迫者的未来利益，只要被压迫阶级的力量曾足够大。”（MEW 20，第 88 页）恩格斯这时确定了阶级道德与另外一种人性的道德概念的界限，只由一种人性组建的社会将必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这种人性的道德概念。“一种超越阶级对立并超越这种对立之记忆而存在的、真正人性的道德将首先在一种不但战胜了阶级对立而且就生活实践而言已经遗忘了的社会阶段才是可能的。”（MEW 20，第 88 页）恩格斯曾经与一个天真的作者进行过辩论，这位作者认为，人们已经能在阶级社会中构建一种真正人性的道德；但这个想法在辩论中绝不是穷尽的。它并不接受将共产主义道德沦为一种“工人阶级世界观”的工具的政党逻辑（PhWb，第 378 页），列宁在 1920 年就已规定好了这种世界观。

“整个……今天的青年教育必须 883
是一种以共产主义道德为目的的教育”（LW 31，第 280 页），列宁要求并定义了共产主义道德与德行作为“完全隶属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利益的”东西（第 281 页）：“为了无产阶级服务于……所有劳动者之团结的就是合乎道德的，无产阶级建造一个新的社会，即共产主义

社会。”（第283页）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关于一种“真正人性的道德”理念的话题不再超越阶级斗争的工具性道德范围。相反，这种工具性道德被冒充为真正人性的道德，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真正人性的普遍利益的实现。在马列主义所提出的价值与美德目录中（例如加里宁 [Kalinin]，引自 PhWb，第383页），它对劳动道德、爱国主义、军事责任感、性方面的管束、诚实等诸如此类的赞美，仅仅在表面上，以标签的方式区别于作为补充的“资产阶级”对立面。这在通俗化了的文本中读起来是这样的，例如：“共产主义道德法典要求：为了社会繁荣而认真工作；不工作者无食。”“你应该总是为提高你的效率而奋斗，厉行节约并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Fragen der ml Ethik*，1962，第40、61页）规范性源于个人对统治的兴趣所带来的任意性，它隐藏在“马列主义伦理学的前后一致的科学特征”的断言之后，在列宁看来，这种特征产生于“马列主义者使伦理学的立场在理论方面隶属于决定论，而在实践方面隶属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由此，能够“发现道德的客观前提与发展原则，并能作为实践社会主义的世界改造工具……对社会主义者的培养产生影响”（PhWb，第379页）。科学拜物教（Wissenschaftsfetischismus）把所有伦理学问题还原为臆想的“客观社会事实”，当它与恐吓结合时，组织狂热（Organisationswahn）便一道出现了：“联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道路，确立人的行动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符的道路，在人类有计划的社会活动组织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在马列政党的领导下有意识地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 884
效能活动被实现了”（PhWb，第384—385页）。由此，在威权国家主义中，扬弃伦理的观念在改造过的现实中失败了，这种潜能是以服从（Einschwörung）一种他律的社会共同体为目的的潜能，这种服从则是通过惯常性（Konventionalität）和顺应潮流（Konformismus）来达到的。

罗莎·卢森堡早就已经认识到了马列主义者在伦理学领域所陷入的决定论的陷阱。在一个未被承认的悖论中，革命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决策行为来执行的，但在理论上却表现为历史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卢森堡预言般地对列宁式革命的专横暴力的批判隐含着一种伦理学的潜台词，她当然对这种批判进行了实践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她的批判的潜台词表明：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导向社会的无创造性和道德倒退。社会主义作为被强迫者使政治道德的进一步发展停顿下来，社会主义“通过排除民主断绝了所有精神财产与进步的鲜活源泉”。“刚好恐怖统

治（Schreckensherrschaft）道德颓败。”（GW 4，第 362 页）它的自由与“革命的唯心论（Idealismus）的展开”被视为反对道德沦丧的唯一方法（GW 4，第 361 页）。

格奥尔格·卢卡奇带着矛盾的心情讨论了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伦理学疑难问题。在《策略与伦理学》（*Taktik und Ethik*）中，他间接地批判了以政治强制取代道德自由的做法，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道德自由”将取代“所有行动规则中的特权之强迫特征”（W 2，第 90 页）。尽管这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强迫特征，但是卢卡奇对道德自由的强调同样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迫特征相对立。与此相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赞扬“政党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伦理学之载体”（W 2，第 215 页）。在他的晚年作品中，尽管关于一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有计划的写作没有出现，但是在他的美学框架中，卢卡奇再次强调了辩证伦理的非决定论概念，这种辩证伦理学拒绝每一种“伦理学目的论假设”（第 583 页），且总是被理解为“假定的和近似的”（W 12，第 581 页），它不想屈从于主观的信念伦理学。

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的《实践哲学》中赞成一种尚未出现的“道德革命”（*Gef* 7，H. 13，§ 20，第 1574 页），这种革命将通过“所有生命和所有道德条件”（*Gef* 7，H. 13，§ 1，第 1540 页）来为“进一步发展人民的民族集体意志（Kollektivwillen）”奠定基础，以便能达到“现代文明”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同上）。青年葛兰西 1917 年（在一个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Nora*] 的戏剧评论中）在一个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圈子里看到了“另一套戏服”（LVN，第 280 页；Z 1980，第 313 页：“另外一种品德逐渐养成”）。然而，这种品德并不是全新的，而是一种人性的品德，它如同恩格斯的“真正人性的道德”一样，第一次为自己的概念提供了辩护，因为它“更好地与普遍道德相对应”。因为正如前马克思主义青年葛兰西一样，他以理想主义和热情方式继续着：“它更多的是由灵性而非动物性构成的，更多的是灵魂而不是经济或神经和肌肉。”（同上）

恩斯特·布洛赫所强调的道德哲学自由概念中对解放内容的拯救站到了马列主义者的伦理学教条主义的对面。这种拯救在某些方面对新康德主义来说是必需的，但是并不停留在它的框架的局限中。布洛赫在康德那里看到的东西，大大地超越了那种使人联想起路德的、对自由的概念进行可理解的、（宗教式）超越的简单还原，即充满经验和现实的道德行为的自发性（Spontaneität）概念。

885

在布洛赫看来，只有“在一种仍然开放的、还没有抵达被决定的世界之尽头的视域中”，这种“在自由中不断革命的强调”才会展现自身。与马克思一样，他也反对自由的伦理学形式化。布洛赫同时也反对其决定性的破坏，因为它实际上是实现“自由的内容：无异化的人性”作为“客观真实的可能性”的对象（Bloch，WA 6，第 186 页）。当然，对于布洛赫来说，去反对系统性的、独立的哲学伦理中的黑格尔—马克思观点是不可能的。

让-保罗·萨特持不同观点。他尝试把存在伦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及历史的理解结合起来，伦理决定的无条件自由的观点则处于他的这种尝试的中心。在萨特看来，自主主体性的可能性是规范性的内容。他反对（新）实证主义的、决定论的可能性概念，也反对结构主义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封闭的系统，
886 他坚持主体自我创造的存在主义基本思想。在这里，道德命令的矛盾双重特征得到了恰当的强调。在这些命令中，规范性与事实性（Faktizität）同时对作为调节行动的、指导性的戒律与规范产生影响。萨特认为，这就是“**伦理悖论**”（das *ethische Paradox*）（1970，第 30 页）。主体性的自主性使开放的未来成为可能。萨特把克服了阶级社会的未来理解为筹划（Entwurf）。这种筹划与费希特、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的联系体现在这样的措辞中：“社会主义的个体是其自身的产物。”（第 34 页）

罗杰·加洛蒂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于萨特的哲学决定论。他认为，依照马列主义的教义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应把共产主义视为一种理想，而应该将其作为历史中的“运动”来理解。为了反对教义主义，他支持一种作为批判哲学的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加洛蒂同样反对“伦理社会主义”，反对存在主义自由观念中激进的自我筹划方案，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社会冷漠。他力求建立一种批判性的、非理想主义的超越观念，借助这种观念，道德可被奠基。依靠费希特的自我设定自身（Theorem der Selbstkonstitution des Ichs）学说，他把三个主题——异化、主体性和实践——结合到一种道德理论中。这种理论愿意考虑道德的含糊不定的、矛盾的特征（社会强迫与个人责任），道德价值的历史特征和革命行动中的集体的自我解放。选择自由和融入社会交往关系由此被根本性地预设了。“人不在被给予的东西中，而在可能的目标（筹划）中进行选择。自由与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同时产生，这种可能性是筹划若干种可能行动的可能性。”（Garaudy 1969，第 83 页）“主体性于交往中产生。”（第 81 页）以这种方式，加洛蒂尝试“不仅在理论

上，而且在实践中同时去建立一种社会与个人道德，这种道德的最终目的是为真正地去成为一个人，也就是一个创造者，而创造条件”（第 89 页）。在当时（1966 年），加洛蒂与被批判的左派存在主义的区别显然已经大大小于所宣称的那样。如果马克思主义被肯定地称作为
887 “一种行动哲学”（第 72 页），它拥有对“历史必然性”的唯一充分认识，并着手“设计和要求彻底消除异化，去实现全面的人之筹划”，那么这种解释与萨特和波伏娃“不受时代限制的、在历史之外的……形而上学的和空想的”（第 75 页）相差无几。加洛蒂坚持在历史斗争中不断发展价值观，然而他超历史地认为：“劳动作为对被给予的东西代表了第一伦理。”（第 88 页）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理论最终只不过是一种受政治约束的、存在主义者的“道德形式主义”（第 75 页）变体。

话语伦理学。阿诺德·昆泽里在以下阐述中总结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困境的看法：“从马克思那里去建立一种伦理学是……不可能的。”（1970，第 54 页）社会主义依然是一种假设。“与马克思相反，然而除此之外，首先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必需的。”（第 58 页）这种伦理学必须在彻底的民主化观点的政治框架内，而不是通过革命言论被定义。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 Otto Apel）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的理论虽不是社会主义伦理学，但也是一种激进民主的新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在早期仍然以释放个人的交往潜力来实现个人的社会解放，它把成功的交往理解为一种成功生活形式的乌托邦式先行。话语伦理学与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关于青少年道德判断发展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又基于约翰·杜威的教育哲学和让·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认知主义方法。科尔伯格发现了道德意识的一种阶段性发展，即从一种前道德状态（阶段 1）经过一种非自治的、传统的状态，到达一种自治的、以普遍原则为准的判断阶段（阶段 6；参见 1987）。话语伦理旨在为科尔伯格的实证研究结果提供系统的论证。同时，它在方法上关注审查规范的正式程序。由此，话语伦理学与康德联系到了一起。它与康德的区别在于：绝对命令的独白式模型被降低为一种主体间对话式的“话语决策过程”（Habermas 1981，第 144 页）。话语伦理学宣称：普遍有效的规范可以从语言行为的默认前提中 888
得出。因为存在“语言使用的普遍性”（Habermas 1992，第 21 页），一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奠基于这些普遍性之中。谁要是否定一种标准内容已存在于每一次交往的普遍适用的前提中，谁就会陷入

一种自我矛盾中，因为只有根据那些前提，人们才能参加到交往行为的相互联系中。在那种早期的假设——成功的相互理解预示着成功的生活——由于内在逻辑关联问题而被放弃之后，话语伦理学局限在提出普遍化的正式原则并以此来检验争议标准的有效性（Geltungsanspruch）。对普遍承认的要求——因此对社会有效性的要求——只有如此的规范能够提出："所有被关涉者愿意承担此类标准所带来的后果，他们是在一个情况下主动应用规范，还是在某些情况下被这种应用规范被动地涉及，这些都是完全无所谓的。"（Horster 1995，第53页）

在话语伦理学中，那种对争议规范有效性所达成的共识成为规范正确性的标准。事实上，话语伦理学所预设的远多于它在形式主义程序道路上所能履行的，为此，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要求道：话语伦理学应该阐明其规范性的实质内涵，也就是社会公正的建构。只有当其所包含的"采取道德立场的平等主义自由思想"得到明确发展时，"以话语伦理为动力的社会理论才能在扩展的反思层面上延续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的批判意图"（1986，第189、193页）。出于类似的目的，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警告不要改变仍然牢固地植根于资产阶级普遍主义的话语伦理概念，这种乌托邦式的内容存在于哈贝马斯对科尔伯格阶段图式的阐释中，这种阐释与一种"可普遍化的需求解释"之维度相关。本哈比把这种意义上的去除了限制的"交往伦理学"视作一种批判道德理论的合法继承者，这种道德理论应克服二分法与矛盾。"交往伦理学看起来以这些二分法和矛盾为基础"：（1）"正当性与美好生活"；（2）"道德实践对话与美学表达对话"；（3）在"作为根据正确规范的自我决定与作为从具体他人的观点出发的能力"之间的自治（1992，第218页及以下）。在致力于交往伦理学的奠基之环境中，关于仁慈与救济的问题一如既往地引起争论，这些问题被科尔伯格的学生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评价为尤其女性化的道德行为与判断动力，其导致的结果是：特定性别的社会化之沉淀物维持着伦理存在论的神圣地位。慈善和关怀问题是道德行为和判断的特定女性动机，但在努力建立交际伦理的背景下仍然存在争议，结果是特定性别社会化的沉积物使伦理本体神圣化（参见 Frigga Haug 1990，第125页及以下）。

889

解放伦理学。在拉丁美洲解放伦理概念框架内，对话语伦理的批评比本哈比和霍耐特更为激进，这种对话语伦理学的批判在拉丁美洲的解放伦理学概念的框架内被陈述出来（参见 Penner

1995）。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的伦理学方案是一种在全球政治经济统治体系的意识形态批判背景下，对基督教伦理学与同情伦理学（Mitleidsethik）的核心直觉的重构（参见 Schelkshorn 1992）。被剥削者，即穷人与牺牲者，是道德主体，他们的利益在解放伦理学中占中心地位。“以批判的、伦理的方式行动着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道德规范、行为、制度或系统等的受害者被剥夺了生活的机会（在他们的整个或生命的某些时刻）”；由此产生了双重义务——作为社会前提的“伦理真理与伦理谬误，伦理有效性与伦理无效性”。这些牺牲者要求：（1）进行批判；（2）“创造性地、团结一致地去改变”这些前提（1996，第 36 页）。杜塞尔将霍克海默早期的唯物主义论题，阿佩尔、哈贝马斯与韦尔默（Wellmer）的有效性理论反思以及列维纳斯关于他者自由的存在主义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由此，一方面，杜塞尔想建立一种要求无条件有效性的权力批判伦理学，打破“欧洲理性的极权普遍主义”（参见 Schelkshorn 1992，第 188 页），并同时挣脱自由主义话语伦理学那种纯程序化形式主义的普遍主义；另一方面，它也没有陷入后现代伦理的文化特殊主义（kulturalistischen Partikularismus），这对批判仍然存在的现代统治和压迫性制度毫无帮助。

实践哲学。沃尔夫迪特里希·施米德-科沃齐克（Wolfdietrich Schmied-Kowarzik）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道德，与金茨里（Künzli）正好相反，这种道德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构想出来的。鉴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全球生产方式 890
造成了我们生命的自然基础被破坏以及物种灭绝的双重危险，在社会进步的自然规律必然性信念终结之后，人们应当使自我意识的对抗性行动成为可能。这种行动能突破“物化逻辑”（Logik der Verdinglichung）并且延续“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的生存方案”，也就是作为“乌托邦目的观的历史中的人的团结一致的主体形成”（Schmied-Kowarzik 1993，第 351、347 页）。

4. 扬弃动机的继续。扬弃既有伦理学的表象——以及其本身——的想法在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中被典型地提出。他的道德批判揭示了道德与统治之间的联系。通过将道德定性为一种权威，从其社会功能中推导出道德，这种权威以内疚和良知谴责（schlechtem Gewissen）的内摄性表象（die Introjektion der Vorstellungen）为中介（KSA 5，第 291 页及以下），它们对于文明和自我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这表明它们与自然统治的内在联系，作为非理性的残余物仍

然存在于理性主义的道德体系中；因此，尼采带着恰当的悖论谈到了“道德自然史”（Naturgeschichte）（KSA 5，第 105 页及以下）。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德是合法性的基础，也是暴力社会关系合理化的基础，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压制和自由密不可分。“每一种道德的本质和无价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长期的压迫行为。”（KSA 5，第 108 页）在尼采看来，在犹太—基督教道德接替远古时代穷兵黩武的地主“主人道德”（Herrenmoral）和在一个长时期的反对神甫与思想者的充满怨恨的“奴隶道德”（Sklavenmoral）的价值的“重估”（Umwertung）过程中，犹太—基督教道德已经承担了其世界历史的角色。就尼采对伦理学的反思性重构批判而言，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也就是他“重新评估所有价值”的筹划，即颓废虚无主义的义务和自主道德，朝向他的超人般的自由审美存在的乌托邦方向发展，它们塑造了（Vitalismus）与新艺术运动（Jugendstil）有关的主题。自治和人性的规范有效性要求在这种乌托邦中被扬弃了，然而在哪种意义上被扬弃，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或者更多的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还是一如既往地说法不一。

891 和尼采一样，道德的强迫性要素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来说也在其文化理论中处于中心地位。弗洛伊德审视了伦理学的内在矛盾性，他认为伦理学既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又加剧了文化的颓败。伦理学是一种“文化超我”（Kultur-Über-Ich）的制度（Institution）和“治疗尝试”，这种尝试“通过超我的信条去达到迄今通过其他文化工作没有达到的目的”（GW 14，第 500—501 页；SA 9，第 267 页）。近代严格的责任道德不考虑个体的心理构造；它不理会个体的伦理能力极限。伦理学所假设的“个体的需求与本能”之间的“和谐”对弗洛伊德来说就像对马克思一样是虚幻的（尽管它们是出于人类本能与文化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不同的是，马克思看到了父权制的阶级社会）。因此，成果丰硕的道德文化工作使人不快乐并导致反抗。通过将道德升华为自治原则，它对人们内在本性的支配发挥着稳固统治的作用，同时，它也通过在主体中产生的文化敌对性和破坏性潜力，对自身造成破坏。

弗洛伊德没有看到道德自治不仅是内化的他律，而且还具有使理性变得实用的预期，即道德行为个体的自主决定的自由；尼采那种在哲学与生活中“超越伦理学”的方案误判了伦理学的真理内涵。道德哲学原则的规范有效性本身就包含着批判性，而尼采对这种辩证法的终止，使得他的道德批判变成了抽象的否定（参见 Schweppenhäuser 1988）。

与此相反，道德批判理论尝试去阐发发生辩证法和发生原理——尤其是自治原理——中解放人类有效性的主张。因此，这种理论把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关系理解为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

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看来，社会批判理论没有在方法上得到详细论证并坐实的规范性基础。这种理论唯一的道德批判实例是以“人性未来”为名的“对社会不公平的扬弃”（GS 4，第216页）。
892 “霍克海默把……资产阶级道德与道德哲学的普遍主义以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式毁灭了，同时他却在政治方面尝试拯救这种普遍主义中所普遍意指的东西：自由、平等与公正的众理想。”（Schnädelbach 1986，第70页）按照霍克海默的思路，这种反对尼采判决的叔本华式的同情冲动（Mitleids-Impulse）的批判性拯救、休谟道德情感在一种抵抗性政治中的转变，以及这种抵抗性政治所认真对待的资产阶级社会化的完整实现，这三者都是道德哲学的中间形态，它们适用处于最先进阶段的阶级社会（参见GS 3，第111页及以下）。

对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来说，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利益和对幸福的要求与……对物种具有约束力的客观规范相一致”，因此，人们总是处于一个“紧张”与“矛盾”的地带（Adorno 1996，第27页；参见Marcuse，*Schriften* 3，第250页及以下）。

在马尔库塞那里，关于伦理与革命关系的思考可以追溯到他晚年的作品。对他而言，如何在“革命暴力”的手段与“扩展自由和幸福”的目标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关系是“革命的伦理问题”（*Schriften* 8，第113页）。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只能在事后，在知道革命目标的历史成败的情况下，才能被做出——通过关于革命目标设置的历史成功或失败的知识被做出。因为伦理的标尺也同样一直是历史性的，当然，这也不应该导致一种对目的一方式反思的、相对化的理性。

阿多诺不再处理成功革命行动的合法性问题，他和霍克海默一样，在20世纪下半叶将注意力转向对晚期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批判，这些制度以越来越有成效的方式反对着对它们的暴力颠覆。阿多诺的否定性道德哲学的主题是“道德冲动”（moralischer Impuls）理论、一种“奥斯维辛事件之后新绝对命令”的表达和一种“代理生活”概念。道德冲动是个体中受折磨或受迫害的人自发团结的一种前反思的一身体的机制。阿多诺以叔本华式的方式使这种机制成为批判理论最重要的规范性内涵（参见Schmid Noerr 1995）。如果一个道德原则能够在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暴力历史的情况下被制定出来，那么它就不可能 893
是肯定的、正式的，也不可能是被最后

奠基的。因此，阿多诺表述了这样的绝对命令，它“如此设置”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以至于奥斯维辛事件不再重复，与此相似的事件不再发生”（GS 6，第358页）。他批判传统的道德哲学，因为它没能阻止奥斯维辛事件。但是这种批判，正如在葛兰西那里一样，是一种内在批判。它根据自己的主张来衡量道德哲学。对于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对正确的生活乌托邦的某种不再稳定的预期。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地抵抗并同时“以一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想象的方式来对待彼此，被解放的、和平的、团结一致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Adorno 1959，引自 Schweppenhäuser 1993，第180页）。不是伊壁鸠鲁派的“秘密”生活，而是一种等待姿态（Wartestellung），在这种姿态中，解放的实践力量慢慢积攒。

参考文献：

M. Adler, *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in: Sandkühler/de la Vega 1974, 157–92; Th. W. Adorno, »Probleme der Moralphilosophie« (1963), in: ders., *Nachgelassene Schriften*, Abt. IV, Bd. 10, Frankfurt/M 1996; E. Angehrn u. G. Lohmann (Hg.), *Ethik und Marx. Moralkritik und normative Grundlagen der Marxschen Theorie*, Königstein/Ts 1986; E. Angehrn, *Sein und Haben. Zum normativen Fundament der Entfremdungskritik*, in: Angehrn/Lohmann 1986, 125–48; S. Benhabib, *Kritik, Norm und Utopie. Die normativen Grundlage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M 1992; G. Bolte, *Staatsidee und Naturgeschichte. Zu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im Hegelschen Staatsbegriff*, Lüneburg 1991; E. Dussel, *Philosophie der Befreiung*, Berlin-Hamburg 1989; ders., *Materiale, Formale und kritische Ethik*, Ms, Mexiko, Juni 1996 [erscheint 1998 in: *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Theorie*]; I. Fetscher, »Zum Problem der Ethik im Lichte der Marxschen Geschichtstheorie«, in: *Probleme der Ethik—zur Diskussion gestellt*, hgg. v. G. G. Grau, Freiburg/München 1972, 15–43; *Fragen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Ethik*, hgg. v. Fernstudium der Lehrer—Unterstufe, Berlin/DDR 1962; R. Garaudy, *Marxismus im 20. Jahrhundert* (*Marxisme du XXième siècle*, Paris-Genf 1966), Reinbek 1969; J. Habermas, »Naturrecht und Revolution«, in: ders.,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M 1982, 89–127; der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M 1981; ders., »Treffen Hegels Einwände gegen Kant auch auf die Diskursethik zu?« in: ders., *Erläuterungen zur Diskursethik*, Frankfurt/M 1992, 9–30; F. Haug, »Die Moral ist zwei-

geschlechtlich wie der Mensch«, in: dies., *Erinnerungsarbeit*, Berlin-Hamburg 1990, 90–130; W. F. Haug, »Marx, Ethik und ideologische Formbestimmtheit von Moral«, in: ders., *Elemente einer Theorie des Ideologischen*, Berlin-Hamburg 1993, 151–74; M. Heinrich, »Kritik und Moral. Zur Diskussion um die normativen Grundlag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ue*
894 *Folge*, 2, 1992, 87–99; A. Honneth, »Diskursethik und materiales Gerechtigkeitskonzept. Eine Diskussionsbemerkung«, in: *Moralität und Sittlichkeit. Das Problem Hegels und die Diskursethik*, hgg. v. W. Kuhlmann, Frankfurt/M 1986, 183–93; D. Horster, *»Der Apfel fällt nicht weit vom Stamm«. Moral und Recht in der postchristlichen Moderne*, Frankfurt/M 1995; L. Kohlberg, »Moralische Entwicklung und demokratische Erziehung«, in: *Moralische Urteilsfähigkei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Lawrence Kohlberg*, Weinheim-Basel 1987, 25–43; K. Kosik u. a., *Moral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68; A. Künzli, »Wider den Parzival-Sozialismus«, in: E. Bloch, H. Marcuse u. a., *Marx und die Revolution*, Frankfurt/M 1970, 51–68; S. Kramer, »Aporien der Revolution«, in: *Krise und Kritik. Zur Aktualität der Marxschen Theorie II*, hgg. v. G. Schweppenhäuser, R. Johannes u. D. zu Klampen, Lüneburg 1989, 74–108; N. Luhmann, »Ethik als Reflexionstheorie der Moral«, in: ders.,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Bd. 3, Frankfurt/M 1989, S. 358–447; M. Lutz-Bachmann, *Geschichte und Subjekt. Zum Begriff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bei Immanuel Kant und Karl Marx*, Freiburg-München 1988; R. Luxemburg,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in: dies., *Schriften zur Theorie der Spontaneität*, Reinbek 1977, 163–93; G. Mensching, *Totalität und Autonomie. Untersuch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des französ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1; P. Penner, *Die Außenperspektive des Anderen. Eine formalpragmatische Interpretation zu Enrique Dussels Befreiungsethik*, Berlin-Hamburg 1995; T. Rentsch, »Aufhebung der Ethik«, in: *Ethik. Ein Grundkurs*, hgg. v. H. Hastedt u. E. Martens, Reinbek 1994, 114–43; H. J. Sandkühler u. R. de la Vega (Hg.), *Marxismus und Ethik. Texte zum neukantianischen Sozialismus*, Frankfurt/M 1974; J. P. Sartre, »Determination und Freiheit«, in: K. Kosik u. a. 1968, 22–35; H. Schelkshorn, »Diskurs und Befreiung. Versuch einer kritischen Zuordnung von ›Diskursethik‹ und ›Ethik der Befreiung‹«,

in: *Diskursethik oder Befreiungsethik*, hgg. v. R. Fornet-Betancourt, Aachen 1992, 181–201; H. E. Schiller, »Brüderlichkeit und Moralprinzip. Zur politischen Ethik der Moderne«, in: ders., *An unsichtbarer Kette*, Lüneburg 1993, 182–218; G. Schmid Noerr, »Adornos Verhältnis zur Mitleidsethik Schopenhauers«, in: *Impuls und Negativität. Ethik und Ästhetik bei Adorno*, hgg. v. G. Schweppenhäuser u. M. Wischke, Hamburg 1995, 13–28; W. Schmied-Kowarzik, »Unsere gesellschaftliche Wirklichkeit und die Utopie des sittlichen Überlebens der Menschheit«, in: *Neue Realitäten—Herausforderungen der Philosophie. XVI. Kongreß für Philosophie*, hgg. v. H. Lenk u. H. Poser, Berlin 1993, 339–53; H. Schnädelbach, »Max Horkheimer und die Moral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Max Horkheimer heute: Werk und Wirkung*, hgg. v. A. Schmidt u. N. Altwicker, Frankfurt/M 1986, 52–78; G. Schweppenhäuser, *Nietzsches Überwindung der Moral*, Würzburg 1988; ders., *Ethik nach Auschwitz. 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 Berlin-Hamburg 1993; A. Wellmer, *Naturrecht und praktische Vernunft: Zur aporetischen Entfaltung eines Problems bei Kant, Hegel und Marx*, in: Angehrn/Lohmann 1986, 197–238.

格哈德·施韦彭霍伊泽 撰
李牧今 译，周兵 校

参见：

Anerkennung, Antagonismus, Aufhebung, Auschwitz, Austromarxismus, Befreiung,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struktivkräft, Egoismus, Emanzipation, Entfremdung, 895
Entwurf, Etatismus, Ethik im Sozialismus, Existenzialismus, falsches Bewusstsein, Fetischcharakter, Fortschritt,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Freiheit, Genuss, Gerechtigkeit, Gesellschaft, Geschichte, Gewalt, Gewissen, Gewohnheit, Glück, Hedonismus, Herrschaft,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mmanente Kritik, Individuum, Interesse, Kritische Theorie, Leid/Schmerz, Marxismus-Leninismus, Materialismus, Menschenrechte, Metaphysik, Moral, moralische Ökonomie, Naturrecht, Normen, Notwendigkeit, Politik, Psychoanalyse und Marxismus, Recht, Revolution, Schein, Theorie/Praxis, Übermensch, Universalismus, Utopie, Vernunft, Widerspiegelung, Widerspruch, Zivilgesellschaft

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
(Ethik im Sozialismus)

A: ʿilm al-aḫlāq fī al-ištirākīya.

E: ethics in socialism.

F: éthique dans le socialisme.

R: ėtika pri socializme (этика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S: ética en el socialismo.

1.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伦理学为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合法辩护，相关论述很早已由考茨基（1906，第137页）和梅林（GS 13，第402页）等人引述。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MEW 4，第481页）。这似乎是一个和伦理学完全决裂的合法契机，而且列宁还肯定过桑巴特的断言：“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LW 1，第436页）

于是1917年后苏联取消了伦理学的教席。讲授伦理学史的书籍不提20世纪的伦理学家，提到的是列宁、卢那察尔斯基、加里宁、克鲁普斯卡娅和马卡连柯（Tschagin 1969），后来还会提到阿克雪里罗得和柯伦泰（Zelikowa 1985），以及对克鲁泡特金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批判内容。所传授的道德以“忠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积极参与志愿无偿劳动”等原则为核心。30年代对知识阶层的大量清洗，压制了所有讨论。同资产阶级道德“彻底决裂”和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成为当时的要求。马克思的两个基本论点开始遭到灾难性的颠倒，其一是共产主义者不做道德说教，其二是应为这样一个“联合体”而奋斗，“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MEW 4，第482页）。

在抗击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时期和其 896
后的数年中，苏联官方将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事迹置于一切道德问题的核心地位。直到50年代中期，实际上仍不存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伦理学的理论探讨。道德问题，如果能够作为理论对象的话，只被视为教育学的任务。与苏联在战争中作为占领者和被侵略者的身份相应，责任和罪责问题成为核心的问题。胜利者与被战胜者和解的思想，很难有展开的空间。随着1946年冷战的开启，精神层面也展开了“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斗争。

2. 大约从1956年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伦理学开始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建立，它的研究内容是道德的产生、道德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特别是在将要新建成的社会中的规范准则和价值

观。在苏联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当推亚历山大·希什金（Alexander Schischkin）（1964），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著作为这个专业领域赢得了声誉。

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在初始阶段就发生了一次尖锐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伦理学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组成部分，还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民主德国学者马特豪斯·克莱因（Matthäus Klein）、弗兰茨·勒泽尔（Franz Loeser）和莱因霍尔德·米勒（Reinhold Miller）开始在《德国哲学杂志》（*DZPh*）上就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展开激辩。问题的核心在于，道德是怎样纳入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中去的。埃米尔·福克斯（Emil Fuchs）1956年出版的著作阐发了他对基督教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观点，以及基督徒在社会主义正在到来的时代中的责任。

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更多的是一种就下面这个问题所展开的思想交流：从新的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中产生出哪些道德规范和理想，或者说根据新的关系，哪些应该被灌输到人的意识当中。恩格斯曾写道，“任何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都具有“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斯巴达式的平等原则”这样的“必经阶段”，但是“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将随着下述……情况的出现而失掉其革命性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加，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MEW 7，第360页）。关于利 897
己主义，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谈道：“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被意识到的本质……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作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MEW 27，第11页）这清楚地表明，如果承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路，那时将有可能产生怎样不同的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思想。

核心问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新的权力关系的形成，是否将创造出新人？不同欧洲国家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观点，反映在1956年的“科学社会主义视角下的自由问题”（Das Problem der Freiheit im Lichte des Wissenschaflichen Sozialismus）会议上，会上发言者有鲁道夫·朔特兰德（Rudolf Schottlaender）、沃尔夫冈·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罗杰·加洛蒂、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人。恩斯特·布洛赫在闭幕词中表示在会议中看到了“克服问题的勇气。欢迎其他思维方式参 898
与讨论，在几年之前还不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第344页）。

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哈里希被

抽，加上诸多杂志编辑部门重组，压缩了理论探索的空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1957年春召开了主张激化“阶级论争”的“新生·新人”（Neues Leben，Neue Menschen）会议，意图以会议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准绳。最初的一份报告（Reinhardt/Schmollack 1960）评价这次会议是“充满希望的序章”，然而也承认，伦理学领域的研究收获贫乏而且“局限在非常狭隘的问题范围内”（第1105页）。

3. 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直到60年代才在民主德国被确立为一门科学学科。沃尔夫冈·艾希霍恩1965年仍在书中悲叹：“在伦理学理论中，不是科学方法论，而是思辨、直觉、未经检验的智慧和先入的立场占据着上风。”（第15页）当时也形成了一些与党的路线不完全重合的思想中心和学派，它们有过短期流行，在一些问题上得到认同。相比于1953—1958年《德国哲学杂志》只刊出5篇伦理学论文，1959—1971年则达到了56篇。有西方的评论者将这一发展归因为“现代化进程加速所提出的要求”（Mansilla 1984，第309页；参见Ehlen 1972）。

898 当时开始讨论的有经济刺激、自动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等问题，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要从规范行为的立场出发加以阐释。勒泽尔（Loeser 1966，第9页）认为“道义论”（Deontik）等学说可以“通过合理运用现代逻辑、数学和控制论的工具，进行规划、规范和调节”（1966，第9页）。经验研究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冷漠、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相互独立、财富占有欲、追求虚荣、利己主义和粉饰美化等正在蔓延的现象，亟待伦理学来解释。按劳分配原则所产生的相互矛盾的影响得到讨论（参见Erdmann 1975；Bradter 1976）。关于人格发展问题，也有大量研究面世（Hörz 1968，1975；Anissimow/Miller 1975；Chartschew/Miller 1976；Wilke 1977；Archangelski 1977；Stiehler 1978）。种种讨论在当时会得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道德可以区分为现实存在的矛盾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谓“社会主义中的道德”，以及理想规范——所谓“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评判与当时正在讨论的另一种观点有关，该观点认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具有相对独立性。

70年代中期以后，美学作品中对道德的批判探讨比重上升（Erpenbeck 1979）。文学创作者认为自己，特别是在政治和受政治统治的哲学沉默的时刻，承担着社会的良心，其中代表如艾特玛托夫（Aitmatow）、施特里马特（Strittmatter）、克里斯塔·沃尔夫。反映人际

关系冷淡、环境破坏的绘画和摄影，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谋生艰难的戏剧和电影，反映生活脆弱易碎的诗歌和小说，无论在莫斯科、柏林还是布达佩斯，都比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的出版物更强烈地震撼着人们。

其中遭遇特殊对待的文学家是布莱希特。虽然人们上演、阅读、讨论他的戏剧、诗歌和警句，虽然道德和伦理学著作频繁地从文学中寻找例证，但是布莱希特1975年在民主德国同样得以出版而且明确涉及伦理道德话题的《墨翟·易经》（*Me-ti. Buch der Wendungen*）却不为伦理学著作所引用。布莱希特认为“从事道德研究”有损道德的观点
899 （GW 12，第504页）和他“谴责伦理学家”（第476、498页）的态度，大概尤其冒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一些警句——“不需要特殊的伦理”（第455页），“并不必需特殊美德的国家”——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MEW 3，第229页）的思想。另一些警句——“但是树从来不说：人必须是绿色的……”（第504页），“如果你的女朋友写信，说她想来/你不要相信她。这话/不会自然而然地起效”（第580页）——在沃夫冈·弗里茨·豪格看来，继承了海涅的讽刺风格，“恩格斯以同样的风格指出费尔巴哈‘人要符合人的概念’的道德呼吁是‘生效的无力’（impuissance mise en action）”（1996，第118页）。还有一些警句完全是狭义上的伦理性质的，因为它们“可以用来谈论普遍道理。不过这样的句子实际上意味着‘你应该生产’”（第499页）。1983年2月的布莱希特诞辰85周年研讨会虽然探讨了布莱希特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但是根据会议记录，布莱希特的伦理学思考既没有在大量的会议报告也没有在讨论中作为主题出现。

4. 最富成果的思考可以说来自跨学科的对话。1973年第十五届世界哲学大会在保加利亚举办，这是大会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办，会议主题是科学伦理学。会议证明了以安格洛夫（Angelov）为代表的保加利亚学派的声望。该学派认为，伦理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美学一样，已经作为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跨学科对话中探讨科学技术进步（Hörz 1976；Kellner/Mocek 1969）、包括同性恋（Werner 1987；Günther/Bach 1989；Aresin 1990）在内的性和伴侣关系（Grassel/Bach 1978）以及生态（Hörz 1986）等新问题的论著在今天仍有价值。在民主德国学者的积极参与下，1981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科学伦理学问题也是以科学研究和生物科学中的哲学、伦理学问题为

主题的屈隆斯博恩研讨会（Kühlungsborner Kolloquium）所关注的重点（Geissler 1976；1978；1988）。这个研究小组的成果被记入世界哲学大会的会议记录。

900 80年代开始，有哲学家和医生致力于就健康和医疗、堕胎和临终关怀等问题进行合作（Baust 1988；Blumenthal-Barby 1982；Hahn/Thom 1983；Körner 1981，1986；Lõther 1967，1981；Luther 1983，1986）。马克思主义者、神学家和基督徒医生之间的对话被证明有益于医生的培养和深造，由此看来，民主德国在医学专业建立的伦理学的教席和科研中心，在联邦德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实现，并不是偶然的。

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阐述往往体现出典型的纯真的进步信念。对此的反思很少有发表的机会，因此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会在教会内部的文献中表达观点。他们在一些关于信仰和健康、痛苦和死亡、马列主义塑造的“人”的形象的研究中，尖锐地批评了大学官方所传授的对终止妊娠的态度、对痛苦和死亡将得到压抑和延缓的信念、对个体生活方式的轻视（Fassler 1985）。值得一提的是维滕贝格的教会研究所（Kirchliches Forschungsheim），其“科学伦理学”工作小组的出版成果丰硕，并于1988年由弗里德里希·勒尔勒默（Friedrich Schorlemmer）领衔发布了一封“致科学家的呼吁书”，它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引发了很大反响，然而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5. 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具有矛盾的历史。民主德国第一部关于“社会主义中的生活方式和道德”（Hoppe等1972）的概论，由政治局批准通过，力图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并非按照一本科学教材的标准来编纂，而第一部由伦理学家领导编写的概论（Miller 1986）也同样如此。针对第一本高校教材（H. E. Hõrz/Wilke 1986），西柏林神学家在一篇书评（Lohmann 1988）中批评它将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两极对立起来，而且使个人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还批评它的科学主义信仰，但也认为书中包含着令教会产生兴趣的启迪。这些启迪主要在80年代后期影响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完全是政治性质的，同时也回应着全球性的关于生存和幸存的社会问题。

如果有人认为伦理学“在民主德国的语言规定中服务于集体行为规范的压制体系”（Schweppenhäuser 1993，第8 901
页），那么他就忽略了戈特弗里德·施蒂勒（Gottfried Stiehler）的《论社会主义中个体性的价值》（*Über den Wert der Individualität im Sozialismus*，1978；另参见 Leske/Redlow/Stiehler 1982）等著作，同类作品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量存

在。当然，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要服从党的决定，在很多方面为政治发挥辩护和合法化的作用。在民主德国也确实不曾存在这样的机会，即像波兰那样发行一份刊物：在一年之中（*Etyka*，18. Jg. 1980），它的14名作者有11人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已经成为历史。而对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价值观更细致的分析仍在质问：一种不受教条束缚而向未来敞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应该激发出对所在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哪些伦理学思考？

参考文献：

S. F. Anissimow, R. Miller (Hg.), *Ethik und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5; L. Aresin u. a., *Lexikon der Humansexuologie*, Berlin/DDR 1990; L. M. Archangelski, *Die Persönlichkeit. Ethische Aspekte ihrer Entwicklung*, Berlin/DDR 1977; G. Baust, *Sterben und Tod*, Berlin/DDR 1988; E. Bloch, Schlusswort zur Konferenz »Das Problem der Freiheit im Lichte des Wissenschaftlichen Sozialismus«, Protokoll, hgg. v. d. Dt. AdW, Berlin/DDR 1956; K. Blumenthal-Barby (Hg.), *Betreuung Sterbender*, Berlin/DDR 1982; W. Bradter, *Moral—Motiv—Verhalten*, Berlin/DDR 1976; A. Chartschew, R. Miller, *Ethik. Philosophisch-ethische Forschungen in der Sowjetunion*, Berlin/DDR 1976; P. Ehlen, *Die philosophische Ethik in der Sowjetunion*, München 1972; W. Eichhorn, *Wie ist Ethik als Wissenschaft möglich?* Berlin/DDR 1965; H. Erdmann u. a., *Ökonomie und Moral im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75; J. Erpenbeck, *Was kann Kunst?*, Halle-Leipzig 1979; M. Fassler, »Themen und Tendenzen. Selbstdarstellungen in der DDR-Philosophie der achtziger Jahre«, in: *Kirche im Sozialismus*, 1985, H. 6, 252–57; E. Fuchs, *Christliche und marxistische Ethik*, Leipzig 1956; E. Geissler, W. Scheler (Hg.), *Philosophische und ethische Probleme der Biowissenschaften*, Berlin/DDR 1976; ders., W. Scheler, G. Tembrock (Hg.), *Philosophische und ethische Probleme der modernen Verhaltensforschung*, Berlin/DDR 1978; ders. u. H. Hörz (Hg.), *Vom Gen zum Verhalten*, Berlin/DDR 1988; H. Grassel, K. Bach, *Kinder- und Jugendsexualität*, Berlin/DDR 1978; E. Günther, K. Bach, *Psychosoziale Aspekte der Homosexualität*, Jena 1989; S. Hahn, A.Thom, *Sinnvolle Lebensbewahrung—humanes Sterben*, Berlin/DDR 1983; W. F. Haug,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G. Hoppe

(Ltg.), *Lebensweise und Moral im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72; H. E. Hörz, *Die Frau als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68; dies., *Blickpunkt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5; dies., U. Wilke (Hg.), *Ethik*, Berlin/DDR 1986; H. Hörz, *Naturerkenntnis und Ethik*, Sonderheft *DZPh*, Berlin/DDR 1973; ders., *Mensch contra Materie?*, Berlin/DDR 1976; ders., *Philosophie und*
902 *Ökologie*, Berlin/DDR 1986;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Stuttgart 1906; E. Kellner, R. Mocek, »Naturwissenschaft und Ethik«, in: *DZPh*, 17. Jg. 1969, H. 10, 1157–79; M. Klein, *Gedanken zu einigen theoretischen Problemen der marxistischen Ethik*, DZPh, 5. Jg. 1957, H. 2, 216–24; U. Körner u. a., *Grenzsituationen ärztlichen Handelns*, Jena 1981; ders., *Vom Sinn und Wert menschlichen Lebens*, Berlin/DDR 1986; M. Leske, G. Redlow, G. Stiehler, *Warum es sich lohnt, um Begriffe zu streiten*, Berlin/DDR 1982; J. Lohmann,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Ethik. Gedanken zum Lehrbuch ›Ethik‹«, in: *Kirche im Sozialismus*, 1988, H. 3, 91–5; F. Loeser, »Zu einigen Grundproblemen der marxistischen Ethik«, in: *DZPh*, 6. Jg. 1958, H. 6, 938–79; ders., *Deontik. Planung und Leitung der moralischen Entwicklung*, Berlin/DDR 1966; R. Löther, *Medizin in der Entscheidung. Eine Einführung in philosophische Probleme der medizinischen Wissenschaft*, Berlin/DDR 1967; ders. u. a., *Sozialistischer Humanismus und Betreuung Geschädigter*, Jena 1981; E. Luther (Ltg.), *Beiträge zur Ethik in der Medizin*, Jena 1983; ders. (Hg.), *Ethik in der Medizin*, Berlin/DDR 1986; H. C. F. Mansilla, »Moraltheorien und Verhaltenssteuerung im sozialistischen System. Zur Kritik der Ethik des offiziellen Marxismus«, in: *Osteuropa*, 1984, H. 5, 309–17; F. Mehring, »Sozialistische Ethik«, in: GS 13, 402–17; R. Miller (Ltg.), *Sozialismus und Ethik*, Berlin/DDR 1984; H. Reinhardt, J. Schmollack, »Zur Entwicklung der marxistisch-leninistischen Ethik in der DDR«, in: *DZPh*, 8. Jg. 1960, H. 9, 1105–19; A. Schischkin, *Grundlagen der marxistischen Ethik*, Berlin/DDR 1964; G. Schweppenhäuser, *Ethik nach Auschwitz. Adornos negative Moralphilosophie*, Berlin-Hamburg 1993; G. Stiehler, *Über den Wert der Individualität im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78; B. Tschagin, *Otscherk Istorii Etiki*, Moskau 1969; R. Werner, *Homosexualität. Herausforderung an Wissen und Toleranz*, Berlin/DDR 1987; U. Wilke, *Risiko und sozialistische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 1977; O. Zelikova, *Otscherki Etitscheskoj*

Mysli w Rossii Konza XIX—Natschala XX Weka, Moskau 1985.

恩斯特·路德（Ernst Luther）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Brecht-Linie, christlich-marxistischer Dialog, Egoismus, Eigentum, Ethik, ethischer Sozialismus, Fortschritt, Frieden, Gerechtigkeit, Gewohnheit, Gleichheit, Hedonismus, Humanismus, Individuum, Menschenbild, Moral, Naturrecht, neuer Mensch, Normen, Persönlichkeit, Solidarität, Verantwortung

伦理社会主义
(ethischer Sozialismus)

A: ištirākīya aḫlāqīya.

E: ethical socialism.

F: socialisme éthique.

R: étičeskij socializm (э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S: socialismo ético.

总的来说，伦理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任何一种基于伦理理论而发生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辩护。它首先是一场处于1870年代至1920年代之间的理论运动，并主要基于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为社会主义的伦理根据辩护。伦 903
理社会主义在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被反映在欧洲工人运动的理论辩论中，这种情况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尤为突出。伦理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矛盾的背景下发挥作用，这种矛盾在向帝国主义结构过渡时变得有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在此后的社会动荡中积淀已久的历史冲突带来了伦理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

1. 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的新康德主义在伦理社会主义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着密切联系的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倡导这样一种哲学伦理观，“理想的立场”应该有助于摆脱世俗和贫穷的束缚，有助于把利己主义扫除干净，有助于将“人类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新的目标”（1902，第538、526页）。朗格与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一致，用马克思的见解进行论证，也针对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论战。

马堡学派的真正创始人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和保尔·那托普（Paul Natorp）试图从根本上贯彻与康德

先验主义关联的唯心主义。对于柯亨而言，历史和社会实践是一种奠基在纯然的思想规定之上的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定言命令包括“新时代和世界历史的一切未来的伦理纲领”；通过将每个人都定义为最终目的，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观念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观念（1907，第320—321页）。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实际的鼻祖”（1902，第524页）。柯亨希望“以更和平的方式进行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但他同时也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中，他始终“宁愿与老一派，也不愿与那些有细微差别的修正主义者”共事（引自 Holzhey，第342页）。

保尔·那托普发展了一种基于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他将社会主义确定为一种对于世界的彻底革新的具体化，这种对世界的彻底革新是从唯心主义出发的，并被理解为一场革命（1920，第4页）。那托普本着一贯的个人立场，捍卫着其理论对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政策的影响，并因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遭到敌视。在
904 十一月革命期间，他支持议会民主的议会原则和经济、国家与教育间的“合作结构”（genossenschaftlichen Aufbau），他宣称自己反对卡普政变，并在根本上反对普遍使用暴力。

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也将他的观点定义为“社会唯心主义”。对于人类历史规律性的某些洞见被赋予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尽管如此，施塔姆勒认为它是错误的。历史的规律性应被理解为目的论式的，社会主义也仅仅应被理解为具备自由意志的人的共同体的规范性观念。如果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客观必要的，那么它必然像日食一样发生，哪怕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党派的干预（1896，第430—431页）。

这些新康德主义者对社会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投入是不可否认的可褒奖之处，朗格和那托普尤其如此。当然，这里还必须考虑到，欧洲当时有许多社会主义观念的运动，有些是进步的和反对的，还有一些是保守的，这些思想也大多出于伦理动机（宗教社会主义、纯理论性的社会主义、杜林社会主义、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 [der Mir-Sozialismus der russischen Narodniki]、英国的费边社 [die Fabier]、法国的可能主义者等）。新康德主义者通常强调其社会唯心主义与马克思历史学理论间的对比，然而，他们对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并没有确切的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历史哲学的努力做出了随附性的但清晰的回应，它们被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不肖子孙”（Engels，MEW 21，第282页），而与之关联的社会主义则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Marx，

MEW 34，第303页）。

2. 弗朗兹·施陶丁格（Franz Staudinger）和卡尔·福伦德（Karl Vorländer）致力于改变并建立与马克思的积极关系。施陶丁格强烈反对施塔姆勒对马克思的批评，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探索了人类活动的客观因果关系；社会主义虽然包含道德判断，但道德判断的“适用价值”（Geltungswert）并不来自发展规律，而是从有意识的意志中得出的。康德的定言命令推导出了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团体必须取代资本统治，在那里，每个自由的人都将根据一个共同的规则为他者服务，并同时受到他者的支持（1904）。

905 福伦德强调道德法则的形式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历史条件，没有一种对社会进行更新的认识，道德法则是无能为力的。政治独立的真实前提是经济独立；如果不作为群众运动活生生的推动力出现，那么哪怕最美丽的原则也无法拯救世界（1926，第279、369页）。

社会主义政党运动的理论家也曾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康德的道德先验主义结合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理论家包括：来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领域的麦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威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 Woltmann）和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俄罗斯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jajew）和彼得·施特鲁威（Peter Struve）——后来都远离了社会主义，还有乌克兰的米夏埃尔·涂干-巴拉诺夫斯基（Michael Tugan-Baranowsky）。

3. 在世纪之交，对于“正统”（orthodoxen）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多样而且具有不同分量的论调的基础主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语中的：“旧瓶装新酒。”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反对施塔姆勒的日食寓言等：它就像维科的论断，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1908，第101页及以下）。恩格斯也曾在他的“晚年书信”（Altersbriefen）中反复使用了贯穿于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基本思想，以反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歪曲。梅林、考茨基和列宁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如果假设社会法则有自动运行机制，不依赖于人，假设伦理观念源于纯然道德法则的超历史性的世界，那么这个假设似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历史的规律性是在人类活动中产生和实现自身的，人类也在其中发展出道德和法律观念。这种相互关系使得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特征成为焦点。

考茨基主张（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观能够发挥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放弃道德观念，因为根

据考茨基的说法，它是“一种用于阶级斗争特殊情况的特殊武器”（1906，第141页），对拉布里奥拉、考茨基、梅林、普列汉诺夫以及列宁来说，这一观念基本上也是毋庸置疑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在（道德）观念之中是否能反映出——正如新康德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一种纯粹的、超历史的、永恒有效的道德法则？梅林问道：伦理是否“超越了历史的发展？”（GS 13，第195页及以下）或者说，（道德）观念是否最终源于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态势和冲突（其中包括道德在矛盾和范式转变中的历史发展）？ 906

4. 伦理社会主义与在欧洲劳工运动之中发生的对方向性的争议是错综复杂和相互矛盾的。眼下偶尔会出现这样的观点，即“在康德的意义上将社会主义解释为一种规范性的观念，而这就必然会导致类似于伯恩斯坦的改良社会主义”，但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对于被宣称为新康德主义者并且如柯亨一样将康德的定言（命令）视为“人类的定向任务”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 Eisner）来说，伦理社会主义与革命的观点和实践完全兼容。艾斯纳呼吁采取反军国主义的政党政策，他在十一月革命期间拥护议会民主原则，并担任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总理（1919年被谋杀）。麦克斯·阿德勒和奥托·鲍尔有相似的看法，格奥尔格·卢卡奇也是如此。

爱德华·伯恩斯坦在他的党内辩论中犯了错（关于道路和最终目标的众所周知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中，对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机械决定论的思想已经相当普遍，这（早已受到恩格斯，并随后受到罗莎·卢森堡的批评）与某种政治上的僵化相关。但是伯恩斯坦的反概念（Gegenkonzept）掩盖了危险的（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灾难）冲突，它首先预设了（这甚至得到了伯恩斯坦的支持）德意志帝国大规模参加对非欧洲人民的殖民掠夺和社会全面军事化的帝国斗争。伯恩斯坦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从伦理学角度对经济进行调控的可能性充满了幻想。

5. 伦理社会主义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具有特定的特征。麦克斯·阿德勒在思考中也走向了柯亨的定理，即道德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意指的理论联系却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社会运动”，即一种由事实知识（Tatsachenwissen）把握的“社会本质”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排除——因为人们自己终会实现社会主义——它“也是一种价值”，并且它也必然是未来的产物。从进化角度来看， 907

所有历史过程都必须证明自身是“内在的伦理发展”（Adler 1913，第 142 页及以下），伦理现象的因果解释抓住了其历史决定论的表现方式，但康德伦理学阐明了伦理学本身的存在。

甚至奥托·鲍尔也不怀疑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研究指南的正确性，以及它将带来的工人阶级革命胜利的必然性。问题在于：是否实然（sein wird）就该是应然（sein soll）？康德伦理学回答了这个问题，用普遍立法在形式上发现了道德准则（1906）。

但是，阿德勒和鲍尔对康德道德准则的推介并不十分令人信服。鲍尔在与考茨基的争论中提出的论点显然不占上风（1906）。从麦克斯·阿德勒的论点中得出的结论是，康德的命令式给出了道德的定义（1913，第 113 页），这很聪明，但是几乎不能说明康德命令式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中起到奠基性的作用。

6. 通过康德的道德先验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必然走向窘境，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像在考茨基那里一样被理解为决定论式的进化论之时。历史决定论和超时间的道德观念的**二元论**（*Dualismus*）是伦理社会主义的特征，它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相吻合。而康德的定言命令也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抽象哲学表达。就像在 1791 年对保税仆人（*serviteurs à gages*）颁布的人权宣言马上就被扬弃了一样，梅林指出，康德通过区分中世纪的（有产）市民和（经济上有依附性的）同胞，也扬弃了道德法的普遍性（参见 Kant，*Metaphysik der Sitten, Rechtslehre*，§46，W 7，第 432 页及以下）。梅林还指出，从康德的伦理学中不仅能推导出社会主义，而且也同样能得出反社会主义的保守主义的论调（卢格 [Ruge]、特赖奇克 [Treitschke]、施莫勒 [Schmoller]）。由柯亨所倡导的将康德定言命令与社会主义建立的结合，等于退回到了 18 世纪自欺欺人的状态，康德“没有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建立贡献一颗沙粒”，但确实为反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Mehring，GS 13，第 189 页）。 908

回溯道德理论的发展历程，（仅仅）退回到康德的伦理学也是有问题的。康德道德先验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供了通向道德基础的途径，而道德基础是从此岸的、理性的人类思考中获得的。这种关切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中得以延续，黑格尔指出了所谓纯粹应然的矛盾性，并把对历史的思考也带入其中，随后马克思在新赢得的历史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打开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后退的道路必然失败。 9

7. 伦理社会主义在国家和法律理论

领域一直有深远影响（莱奥纳德·内尔松［Leonard Nelson］、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赫尔曼·海勒［Hermann Heller］）。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综合在宗教社会主义中得到了支持（西奥多·斯坦布施［Theodor Steinbüchel］）。工人运动受到关于伦理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所倡导的理论的影响，包括正反两方面，既包括右翼社会主义，也包括左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影响理路与20世纪特有的动荡局面交织在了一起。因此，从伦理社会主义的传统路线直接过渡到建构眼下党派运动和政治观念（的做法）应该受到质疑；它绕开了事物的矛盾，其结果是全面的、起了反作用的意识形态工具化。

自世纪之交以来，深刻的冲突、动荡和崩溃改变了世界，讨论社会主义和伦理学的历史条件和框架也发生了变化。
909 道德法则的主张似乎没有达到目的，它的有效性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的不平衡权利分配中化为泡影。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在总体上是错误的。社会主义要求在伦理上准备好旨在解放的价值论原则，并在其中批判性地处理历史经验。特别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实践哲学中发现了伦理—政治对于获得霸权的关键意义。不过这也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在这里，任何机械决定论观点都必须被抛弃。发展理论的预期必须拓宽视野，以适应当下的多元观点以及未来形态的开放性。价值哲学（Axiologie）就像理论一样，必须通过提供意志和行动的方向性决定来证明自己在历史任务中的地位，它们在维持和平上，在社会公正、民主、生态上可以成为理性的选择，并战胜当今的文明危机，塑造历史。这需要现实主义、清醒的头脑、对话意愿，并不断审查真实的历史要求。

参考文献：

M. Adler, *Marxistische Probleme*, Stuttgart 1913; O. Bauter, »Marxismus und Ethik« (1906), WA 7, 870–90; H. Cohen, *Ethik des reinen Willens*, Berlin 1907; ders., »Einleitung mit kritischem Nachtrag«, in: Lange 1902; H. Holzhey, *Der Marburger Neukantianismus in Quellen*, 2 Bde., Basel-Stuttgart 1986; K. Kautsky, *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chichtsauffassung*, Berlin-Bonn 1880; ders., »Leben, Wissenschaft und Ethik«, in: *NZ*, 16. Jg., 1906, 2. Hbb., 516–29; F. A. Lange,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Zweites Buch*, Leipzig 1902; F. Mehring, »Die Neukantianer« (1900), GS 13, 189–94; P. Natorp, *Sozialidealismus. Neue Richtlinien sozialer Erziehung*, Berlin 1920; G. W. Plechanow,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1908). Berlin/DDR 1958; R. Stammler, *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ffassung*, Leipzig 1896; F. Staudinger, »Kant und der Sozialismus«, in: *Soc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0. Jg., 1904, H. 8, 485–99; K. Vorländer, *Kant und Marx. Ein Beitrag zur Philosophie des Sozialismus*, Tübingen 1926.

沃尔夫冈·艾希霍恩 撰
李牧今 译，巩天成 校

参见：

Austromarxismu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Determinismus, Entwicklung, Ethik, Ethik im Sozialismus, ethisch-politisch, Evolutionismus, Fabianismus, Frieden, gerechter Lohn, Gerechtigkeit, Hegemonie, Kantianismus/Neukantianismus, Kathedersozialisten, Kautskyanismus, Moral, moralische Ökonomie, Normen, Philosophie der Praxis, religiöser Sozialismu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me, Werte

910 伦理—政治的（ethisch-politisch）

A: aḫlāqī-siyāsī.

E: ethico-political.

F: éthico-politique.

R: étičesko-političeskij (этичес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S: ético-político.

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作为一种市民社会的工程这一事功中，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伦理—政治的历史这一概念中强调了两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方面是与强制力有关的霸权因素，另一方面是历史的整体性。它可以放在克服经济主义和经济历史观（参见考茨基）的背景下去看，也可以置于避免抽象政治主义的背景下去看——在这种抽象的政治主义中，国家层级使其活动绝对化。伦理与政治的关联体现了政治的伦理维度，对于葛兰西而言，没有它就无法获得历史的行动能力。

这个术语以各种组合出现在《狱中札记》里：伦理—政治的原则（H. 8, § 233，第 1079 页）、伦理—政治的行为（H. 10. I, § 5，第 1234 页）、伦理—政治的系统（H. 10. I, § 9，第 1242 页）、伦理—政治的氛围（H. 10. II, § 9，第 1260 页）、伦理—政治的统一（H. 10. II, § 14，第 1266 页）、伦理—政治的政治观点（H. 10. II, § 41. X，第 1322 页）。但其中最多的还是和历史一起使用。

在意大利语 *etico-politico* 的翻译中出现了两个要素的顺序问题：由于罗曼

911

语族中的形容词通常在名词之后，因此在德语中（和英语一样）就必须更改两个连用形容词（Adjektiv*paaren*）的顺序：就像将“economico-politico”译为“政治—经济的”、将“nazionale-popolare”译为“大众—国家的”一样。为了不与在德国建立起来的葛兰西和克罗齐的接受传统背道而驰，在“伦理—政治的”的德语翻译中，就没有改变词序（现在的编辑认为这是错误的，参见Haug 1996，第124页，脚注167），尽管“伦理—政治的”总是可以甚至必须被理解为“政治—伦理的”。至少可以说，当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继承了对政治伦理（politischen Ethik）的热忱时，这“使他能够发展出一种伦理的政治，这种伦理的政治作为‘伦理的’而成为历史的，而这就意味着它是真正政治的，因为它将成为霸权的”，也就是以伦理的方式成为政治的（Haug，*Einleitung* zu *Gef* 6，第1220页），更重要的是，伦理学由此而再次在政治学中找到了一席之地，就像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样。

1. 葛兰西在贝奈戴托·克罗齐那里发现了伦理—政治的历史这一概念，后者发展了这一概念，其方式是既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也反对将历史简化为纯粹的权力国家历史（Machtstaatsgeschichte）。克罗齐将文明的要素以及文化的和道德的发展的要素都包括在历史编纂学之内，也就是说，包括那些在国家领域之外所有“外于国家而产生的事物，无论它是有益于国家还是试图改变、推翻或者再造它：广义上所有道德机构的形成，包括宗教和革命教派制度，所有习俗、空想和神话等精神的和实践的内容都属于这些事物”（1930，第367页）。由此，克罗齐的新唯心主义与黑格尔联系了起来。在黑格尔那里，狭义的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伦理理念的现实”（*RPh*，§257），但（克罗齐）同时又扩展了这一理解。

1.1 葛兰西很早就在发展其国家理论概念时纳入了伦理的维度。他的考虑最初围绕“伦理国家”概念，作为大家长的国家，道德活动（moralische Aktivitäten）（在某些情况下明确提及黑格尔：参见 *Gef* 3，H. 5，§69）在此就等于伦理国家和市民社会。对克罗齐伦理—政治的历史这一概念明确的批判性接受发生在1930年底，其目的是反对乔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的国家历史：“克罗齐希望保持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保持霸权与专政之间的差异。”差不多同一时间，葛兰西在其他地方指出：“伦理学和政治学这两个术语的汇合恰恰是克罗齐在历史编纂学中所主张的确切表达：伦理的历史是与‘市民社会’‘霸权’之间存在相互关联

911

的历史的一个侧面，而政治的历史是与国家、政府的主动权相符合的历史的另一个侧面。”（*Gef* 4，H. 7，§9，第 866 页）修订版（约在 1932 年中期）则更加强调：“伦理指的是市民社会的活动，也指霸权；而政治指的是政府—国家层面的主动性和强制性。”（*Gef* 6，H. 10，§41. III，第 1310 页）在此期间，葛兰西一再放弃将伦理—政治的历史纳入实践哲学之中（参见 *Gef* 6，H. 10. I，Inh.，第 1226 页），并强调在马克思那里“伦理—政治的视角或霸权和共识的理论是包含在萌芽（in nuce）中的”（*Gef* 6，H. 10. II，§41. X，第 1322 页）。

1.2 伴随着对这一概念的积极接受，
912 对克罗齐所尝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清算”的尖锐批评也随之出现（*Gef* 6，H. 10. I，§3，第 1231 页），这一尝试在例如《欧洲历史》（*Geschichte Europas*）中就能发现。克罗齐从消极革命的角度撰写历史，并系统地隐去了革命的历史的因素，在其中，“一个伦理—政治的制度熔化时，另一个又处在锻造之中了”（§9，第 1242 页）。葛兰西由此认识到“‘霸权’的要素的任意且机械的抽象实体化（Hypostasierung）”（Inh.，1226）。它不是真正的伦理—政治的历史，而是思辨的历史，它为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写，而后者的庸俗化恰恰暴露出自身的弱点（*Gef* 5，H. 8，§240，第 1082 页）。整体上，葛兰西将克罗齐的著作理解为对“经济主义和宿命论的机械论的回应……，尽管它似乎是对实践哲学的破坏性扬弃”（*Gef* 6，H. 10. I，§12，第 1249 页）。

在进一步的阐述中，葛兰西以不同 9
的口吻解读了克罗齐的伦理—政治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伦理—政治的概念作为批评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化和机械化倾向的工具。对克罗齐来说，“重拾”的价值在于“对当今实践哲学的新的吸收”，他还权衡了黑格尔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性（参见 §11，第 1247—1248 页）。克罗齐的“思辨方法”被认为是具有优势的，因为它在文化发展中产生“工具性”的思想价值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12，第 1249 页）。“克罗齐‘健康’和进步的思想无非是用思辨语言表达的实践哲学。”（H. 10. II，§29，第 1280 页）

1.3 在一段时期里，葛兰西对克罗齐的讨论，还与他对布哈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Gemeinverständlichem Lehrbuch*）的批评以及他对历史集团理论的阐述相关，后者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就已然有涉及，并且在《狱中札记》里有了决定性的拓展。关键是要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视为辩证法的本质领域。在一个历史集团的形成中，（历史特定

的）“自然与精神之间的统一”（*Gef* 7，H. 13，§10，第 1547 页）可以形成两个阶段：在经济合作的阶段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是其特殊利益的表现（参见 *Gef* 5，H. 8，§185，第
913 1047 页）。只有通过从“经济因素到政治—伦理因素的‘净化’”（10. I，§ 6），一个阶级或群体才能将自己确定为普遍的，即潜在的霸权阶级，并在必要时依靠市民社会参与其规定的国家活动。

在伦理—政治的净化中，（经济）结构从“一个压迫人民，同化人民，使人民处于被动的外力，转变为一种自由的手段，成为创造新的伦理—政治形式的工具，成为新倡议的源头”（*Gef* 6，H. 10. II，§6，第 1259 页；也请参见 *Gef* 7，H. 13，§17，第 1560—1561 页中对权力关系分析的解释）。知识分子的活动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这促使葛兰西反复指出研究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译者）历史的必要性。

2. 在葛兰西的文献中，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在其他概念（国家、霸权、历史等）的背景下处理伦理—政治的问题（参见例如，Riechers 1970，第 231 页及以下，在解释“Linkscrocianer”时，葛兰西接受了这个概念，没有做修改）。只是“伦理—政治”概念的方法论意义的参考很少被发现（参见 Albers 1984，第 114—115 页）。贝内德托·方塔纳（Benedetto Fontana）认为马基雅维利是葛兰西和克罗齐在其不同政治理论概念发展中的共同参考点。对克罗齐而言，历史的伦理—政治视角是对“纯粹政治”理论的摒弃（参见 Fontana 1993，第 58—59 页）。葛兰西则将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Fürst*）解读为一种伦理—政治统一的典范（参见第 47—48 页）。否则伦理—政治的将被主要用于解释历史集团，并用来区分各个阶段（参见例如，Priester 1981）。只有安德烈·托塞尔（André Tosel）（1990）试图通过质疑伦理—政治的要素来提高人们对当前实践哲学的认识（其首先被总结为“momento etico-cosmopolitico”，1990，第 73 页）：“对于葛兰西来说，这种伦理—政治的要素最终在任何当前制度（阶级、民族、政党、国家）中都没有，它的内在视野是类属的、物种的视野：世界观是一个世界社会的世界观（cosmopolis）。”（1990，第 85 页）在豪格的《与布莱希特和葛兰西探讨哲学》（*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1996，主要参见第 123—129 页）中，伦理反思的中心问题是伦理—政治的，在伦理学中，伦理—政治的净化被理解为“历史行为能力的构成要素”：“它最初 914
指对政治和伦理能力的培养。”（第 126 页）豪格认为葛兰西对伦理与政治之间

关系的看法和布莱希特对艺术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平行的。在葛兰西看来，历史上的“政治—伦理因素”等于布莱希特在艺术中的“‘形式’的要素”：它是历史的“抒情”、历史的“净化”（10. I，§ 7）。

雅克·德里达在没有提及葛兰西的情况下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处理了他的概念，他用“伦理和政治的命令”直面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世界，以继承马克思的遗产（1996，第57页）。德里达将那些被此在存在的、背叛了它所带来的“弱弥赛亚力量”的、被无视的死者和未出生者称为“幽灵们”（Gespenster），人们不得不谈论起他们并对他们说：“在看似没有伦理、没有政治，不知是否有革命性，更多是可能的、可想的以及公正的（gerecht）地方，其原则上并不承认对他者的尊重，这些人不再存在或尚不在此。”（第11页）

参考文献：

D. Alb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Marxismus*, Berlin/W 1983; B. Croce,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 und Betrachtungen zur Philosophie der Politik*, n.d.3., verm. A. bearb. u. übers. v. H. Feist u. R. Peters, Tübingen 1930; J. Derrida, *Marx' Gespenster*, dt. v. S. Lüdemann, 2., überarb. A., Frankfurt/M 1996; B. Fontana, *Hegemony and Power.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 Minneapolis 1993; W. F. Haug, *Einleitung*, in: Gramsci, *Gef* 6, 1995, 1195-1221; ders.,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K. Priester, *Studien zur Staatstheorie des italienischen Marxismus. Gramsci und della Volpe*, Frankfurt/M 1981; Ch. Riechers, *Antonio Gramsci. Marxismus in Italien*, Frankfurt/M 1970; J. Texier, »Etica e politica in Gramsci«, in: R. Giacomini, D. Losurdo, M. Martelli (Hg.), *Gramsci e l'Italia*, Neapel 1994, 299-333; A. Tosel, »Per una rivalutazione del momento etico-politico e della filosofia della prassi«, in: *Gramsci e il marxismo contemporaneo*, hgg. v. Muscatello, Rom 1990.

乌韦·希施费尔德
（Uwe Hirschfeld） 撰
李牧今 译，巩天成 校

参见：

Basis, Dialektik, Einheit, Ethik, geschichtlicher Block, Gewalt, Gramscismus, Hegemonie, Hegemonieapparate, Historismus, Intellektuelle, Katharsis, Korporatismus, Machiavellismus, Ökonomismus, passive

Revolution, Politik, Staat, Südfrage, Superstruktur, Totalität, Überbau, Vulgärmarxismus

915 民族、民族性（Ethnie, Ethnizität）

A: ʿirq, ʿirqīya.

E: ethnic group, ethnicity.

F: ethnie, ethnicité.

R: ėtnija, ėtničeskoe edinstvo (этния, этническое единство).

S: etnia, etnicidad.

性别、民族和阶级是分离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根本因素。马克思和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以上三大因素在一定时间内会发展融合为一种决定性的阶级对抗力量。直到纳粹主义种族灭绝者的出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萌芽，马克思主义中的民族性概念才开始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所主导的“民族”分离方式重塑资本主义统治。在文化特性层面上亟待讨论的则是，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在不放弃普遍主义观念的前提下，抵制既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平等又同时造成两极化的市场机制。

民族和民族性源于古希腊语中的民族（ἔθνος），意思是“属于自己的群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之后被引申为阶级、（陌生的）民族（Frisk I，第448页）。对于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而言，该概念的具体用法则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变得多样化。在耶稣使徒和传教士保罗的故事中，民族（τὰ ἔθνη）指的是非犹太民族；随后的一些译本将其翻译为“异教徒”（Heiden）（使用较多的是拉丁语中的氏族［*gentes*］一词，其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由于这个词语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于指代非基督教徒的整体，因此并不符合《保罗书信》（Paulusbriefen）中描述的基督教化民族（ἔθνη）。然而这个词语在盎格鲁—萨克逊语区却得到了普及：在这里，形容词民族的（*ethnic*）与14世纪中叶拉丁语中出现的外邦人（*ethnicus*）一样，都表示异教徒（*heathen*，*pagan*）（即不信教的人、非基督教信徒）或非犹太人（*gentile*）（参见Williams 1983）；同样，在法语中，民族的（*ethnique*）一词包含的其中一种含义（渐旧）也是“异教的”。除此之外，以上提及两个的语言中的词语与德语中“民族的”（ethnisch）类似，常被引申为“特定民族的”。因此，在19世纪，民族的（*ethnic*）常常会被等同于种族的（*racial*）一词（类似地，在德语中，人们也会把“种族的”［rassisch］和“民族

的”[völkisch]相提并论）；最后，该词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也成为“对犹太民族、意大利民族和其他低等民族的礼貌性称呼”（同上）。

19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民族学和民族志的出现，一个新的观念也慢慢形成，即把原始民族也归于民族（τὰ ἔθνη），而不是单纯地将其视为少数民族或宗教和政治的敌人。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中所表达的观点：“一直以来，西方人总是计划着要征服和统治远离西方的国家和民族。”（1994，第13页）这一反殖民主义的言论，将民族学的关注点重新锁定到西方文化上。总的来说，“民族的”这一概念既涵盖文化上的内容，如饮食、音乐和服装（这些“民俗文化”随后被过度商业化），同时也属于某个与其他民族区别明显的、可以进行政治动员的安排。

考虑到20世纪后期发生的种族问题和冲突，学术界开始猜测，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种族化和文化种族主义的产生，还是它们自身发展出了独立动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今后面对由再民族化导致的社会冲突，以及因愤怒而引起的种族屠杀时，不会在理论和实践上束手无策。

1. 为了能够详尽地阐述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的新范式，把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作为中心话题，马克思很自然地将他关于跨民族和跨阶级的差异的兴趣放到了二线进行讨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差异就消失了，因为它们始终作为一个已知的概念存在。

马克思在他的《民族学笔记》（*Ethnologische Notizbücher*）中，重点讨论了生产关系和统治关系的产生。以亨利·摩根（Henry Morgan）所撰的书籍为参考，马克思分析探讨了家庭关系如何通过发展变为一夫一妻制的父权制家庭模式（马克思认为，这种理想式的家庭关系早已被写入罗马法典中），以及原本无阶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即财产共有和地位平等的时期，如何在最初转变为统治形式。以部落为单位的组织关系会因核心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以私有为基础的剥削和国家的形成而瓦解。这一点在恩格斯之后基于马克思的摘抄录所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有被提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普遍化有所期望。他们认为，通过持续的无产阶级化，所有社会上存在的种族和民族差异都将消失，最终形成一个与全世界资产阶级不同的稳定的工人阶级。然而，这一进程带来的结果却与他们的设想截

然相反：随着民族差异和国家认同的变化，阶级形成的革命潜力也变得支离破碎。这种分离资本主义的潜在因素将会消失，因此对其的期望导致了对抗议潜力的瓦解以及对种族差异冲突和压迫关系的警惕。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书中，马克思将民族差异（如宗教信仰）置于资产阶级社会，即分散的私人利益的战场中。与之相对，国家保障的权力和国家所代表的公民（*Citoyens*）集体利益则位于一个抽象的集体之中，它与市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是唯灵论的”（MEW 1，第 355 页）。在这个建立在解放文化差异的集体中，文化差异始终无法融合（第 353 页）。为了能实现人类解放（或者说“各类属性的解放”），就必须将这种抽象的公民身份与个人利益和具体的个人身份相结合。只有在满足了以上要求，且实现文化和民族的差异不是“由于世俗束缚而产生的自由公民的宗教束缚”的产物时（第 352 页），这种文化和其他特殊差异中固有的社会可能性才能浮出水面并能为之所用。

在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表达了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反对以消除爱尔兰的语言和传统为目标的英国的殖民政策。马克思在英国工人运动的动议簿中写道，这种对爱尔兰的声援是“在姑且不谈国际上的公道的前提下，**解放英国工人阶级的先决条件**”（MEW 16，第 417 页）。总的来说：“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第 387 页）（这里的引用与原文的引用有很大出入，马克思原文为 *Das Volk, das ein anderes Volk unterjocht, schmiedet seine eigenen Ketten*，且原文页数为第 389 页，并非第 387 页。此处引用的中文翻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74 页。——译者）这一点特别旨在通过普通英国工人自发产生的“种族主义”来持续对英国工人阶级进行压迫。他们让英国工人自发“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降低工资和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fe*）的竞争者”（第 416 页）。马克思将这类的“种族主义现象”（Rassistisch）（这一表 918
达在原文中不曾出现）称为“对宗教和国家反感”，他还写道，这些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几乎就像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poor whites*）看待黑奴那样看待他们”；此外，马克思认为，之所以“资产阶级在英国本土的无产者之间人为地煽起和培植这种对立”，是因为“资产阶级知道，无产者的这种分裂状态是**保存它的势力的真正秘诀**”（第 416—417 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474 页。——译者）。

这种外来和自我压迫的辩证关系后

来促使列宁要求（之后被斯大林所否定）原则上赋予苏维埃政权范围内规模较小的民族自主决定权。这一权利包括，像其他“民族”形式的实践一样有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而在本世纪末，这个促进文明化的项目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失败却释放出了暴力种族隔离的愤怒。

2. 在20世纪，针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大量涌现，使用民族或民族性来表达可以避免抽象普遍主义的陷阱。马克思所分析的政治上追求的理想平等状态和现实所展现出的不平等之间的对立矛盾集中爆发，对于追求民族上不平等的统治者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有益的（参见 Horkheimer/Adorno 1947，第203页）。另外，“民族”代表的是他者，应从多元普遍主义的角度来看待。第一步是分析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分裂资本主义决定性的条件。

种族与民族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学界，民族性取代了19世纪后期盛行的基于生物上的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发展理论的种族范式。“民族群体”取代“种族”，成为用来描述基于血统和文化（宗教、语言、风俗习惯、国籍和政治认同）的群体类别。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著的《美国的困境》（*American Dilemma*）分析了非裔美国人无法被同化和受到经济政治压迫的问题，这为民族性问题的研究赋予了重要的价值。

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观点是非裔美国社会学家奥利弗·C. 考克斯（Oliver C. Cox）提出的。他将民族 919
定义为“在一个国家、政体或经济体中，与一个或多个其他民族处于竞争性占有或从属关系的民族”（1948，第317页）。考克斯根据以下标准划分民族系统或民族体：（1）文化发展水平（简单或复杂）；（2）种类（东方、西方等）；（3）语言或者宗教的不同；（4）外表的不同。如果这些民族属于同一个“种族”，那么他们的关系可能隐含着民族或少数民族的冲突；如果将身体特征看作区分民族的根本，那么种族关系和种族冲突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

根据考克斯的观点，文化或国家民族是一种权力集团，其实际或潜在的敌对状态与其关系的历史密不可分，例如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西班牙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之间、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种姓和社 9
会地位决定了社会上较高和较低阶级的制度，但这种政治阶级和民族关系并未形成“有秩序的社会制度，而是对立的政权体系”（第318页）。虽然民族群体或适应或抵制占据主导的地位制度，但是在政治阶级行动中，不仅是地位群体，民族群体也会被分裂，“这一过程中，民

族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因为其地位阶级，而代表某一党派”。因此，民族间的对立关系使政治阶级的冲突复杂化，并将其伪装成一场“种族战争”（同上）。

米夏埃尔·奥米（Michael Omi）和霍华德·温南特（Howard Winant）对民族新保守主义进行了另一次抨击。他们对将这一概念与“在美国发生的种族现象的具体社会政治动态”（1986，第22页）的分离进行了批判。只要美国的民族学理论始终保持对欧洲移民模式的单向依赖，那么它将既无法了解种族冲突带给有色人种（黑人、亚裔美国人、拉丁美洲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的困境，也无法理解遍布于美国国家以及公民社会中深刻的对抗性种族化（racialisation）形成过程。奥米和温南特提出“种族形成”这一替代概念，主要是基于对福柯和后结构主义的思考，试图将民族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因素纳入复杂的意识形态之中（参见 San Juan 1992）。

920 **阶级和市场的民族细分。**美国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P. 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基于《哈佛美国民族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中的一项民族范式，提出了自己关于不同的群体是否可以被同化以及如何完成同化的假设，这与他们在“共享情况”的美国社会的情况中存在的“不同规范”息息相关。因此，民族性即是特定群体的信仰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米夏埃尔·莱奇（Michael Reich）、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和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 Edwards）等则对此模式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细分方法强调劳动力市场上的阶级差异；民族上的不平等是结构性的，是由劳动力分配体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分而治之政策所决定的。此外，埃德纳·博纳契奇（Edna Bonacich）提出了另一个与之平行的理论，即放眼于已发生分裂的劳动力市场，探讨民族性和阶级属性对薪资的影响。民族性在这里仅充当变量，没有太多决定性的影响。

在民族国家，劳动力的民族化和工作的等级制关系十分密切。沃勒斯坦（Wallerstein）将民族性或文化差异的作用归到在特定国家领土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资本敌对主义（Arbeit-Kapital-Antagonismus）之中。由于无产阶级化的家庭结构必须使某些观念社会化，使劳动力市场复杂的等级制度合法化，与此同时又不损害国家形式上的平等。因此，人们利用“民族化或民族意识（peoplehood；德语为‘民族的概念’）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即通过利用工人阶级的特殊心理，缓和理论上的平等和现实中不平等之间的矛

盾，使其得到统一”（1990，第104—105页）。民族性在这里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共同体内形成的基本组织发挥自己的作用。

殖民的范式。在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约翰·雷克斯（John Rex）和马克斯·韦伯试图将“地位”（Status）这一概念与民族性和阶级联系起来，以获得关于冲突、剥削和统治的理论方法。雷克斯反对将民族性的人类学建构视为一种“原始定式”（ursprünglichen Verhaftung），并将与其情况相关的说明视为边界问题的讨论。取而代之，他提出了运
921 用民族性的类别（在由亲属关系、共同住所和习俗所决定的准群体的意义上），结合种族、国籍和阶级，分析群体关系中的压迫和剥削问题。雷克斯区分了友好与敌对民族性，前者来自（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erick Barth]的）人类学的民族边界概念，后者则归因于剥削和压迫，因为它发生在殖民和后殖民社会。他观察到，在工业化社会中“出现了围绕国家、民族和种族意识形态形成的争取独立（independence class struggle）的阶级斗争”。他关注的是比其他人研究更细小的方面：“被剥削政策划分出的不同形式的群组同样也是构成资本主义整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客观存在的事实，民族群体之所以团结在一起并共同行动，是因为它们受到独立和不同的剥削类型的影响。”（1983，第407页）

雷克斯的分析与非洲民族议会（ANC）和南非共产党（die Südamerikanische KP）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在南非联邦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在种族结构的层面上将白人和黑人的阶层派别置于敌对的状态。内维尔·亚历山大（Neville Alexander）（1986）抨击了这种“特定类型的殖民主义模式”概念，他认为这类种族压迫的民族主义带有一种“肤色种姓”的色彩。受“同一个阿扎尼亚，同一个国家”（第59页）这一口号的影响，亚历山大认为，民族成立和普及平权思想的中心任务即是废除种族和民族群体：“国家必须由黑人工人阶级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构建……，以改变整体系统。非种族资本主义在南非是不可能的。对抗种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将会是唯一由黑人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反抗运动。最终，种族、肤色和民族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步趋同。”（第57页）

民族性和劳动力迁移。随着前殖民地臣民涌入英国和其他欧洲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在1945年后变得更加混杂，且这一行为还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层。阶级为了自身的理想状态，不再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自觉的范式概念相吻合，因为它是由非经济因素所促 922
成的，且在这一过程中，剥削仍在以各种非正统的形式发生着。

为了应对这种新形势，罗伯特·迈尔斯（Robert Miles）将民族性视为移民劳工政治经济的一个方面，同时还探讨了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中心作用。和“种族”一样，民族性没有解释或分析价值。真正重要的是，民族性在“种族构建”（*racial categorization*）过程中的作用，即将具体的社会关系转变为意识形态的范畴（参见1991，第99—103页）。对于迈尔斯而言，阶级是“利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进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的产物，是通过“种族”的社会建构形成的一种民族性（Solomos 1986，第100页）。因此，他更倾向于将生产的社会关系视为理解民族性和对抗性种族形成的必要框架（参见1991，第159—167页）。

3. **新趋势**。通过考虑到因种族、性别、地区和其他突发事件而复杂化的阶级斗争的多变性，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更灵活、更真实辩证地表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方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构成社会形态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民族性是“具有统治力的结构”的社会整体中阶级结构的一部分。

受到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影响，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及其追随者通过承认民族和“种族”在历史上特定的“经济情况”中对阶级意识和阶级对立有相对自主的影响，从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问题。重要的是，他们对种族、民族和阶级的具体表达进行了精确的分析。霍尔从英国以专制主义和通俗种族主义为主的情况为依据，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政权依据民族、性别和民族特征的差异来构建劳动力（参见1989，第84页及以下）。由于身份由社会和话语构建，因此霍尔提出他的看法，即通过“交际政治”（Politik der Reprāsentation）得出关于民族性的新思考（1994，第17页）。民族性以往的主题化是为了打击种族主义带来的压迫。但实际上，这一概念应当由有色人种从“多元文化”的自由主义话语中提取，并在社会政治差异的确定领域将其重新改编：民族性这 923
一概念“承认历史、语言和文化对于建构主体性和身份的重要性，就如同每段话语都被定位和置于情境中，任何解读都应基于上下文一样”（第21—22页）。霍尔预计“民族性的归来”（第213页），因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政权分散挑战了霸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同的民族特征中产生混合的、同步的身份。民族性在这里被概念化地重新定义为一个在涉及阶级、性别、种族、国籍等历史特定形式的斗争总体过程中相对自主的时刻。

有色的女权主义。20世纪70—80

年代，在英国和美国兴起了由非洲裔美国人、拉丁美洲移民、原住民和亚洲女性发起的反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妇女运动和他们在60年代提出的欧洲中心论的活动（参见Barrett/MacIntosh，1987）。有色人种的女权主义者没有在对身体自主权（“生育权”）或家务组织问题上的抗议，而是选择了通过群众行动表达她们对民族性和种族的看法，其中包括政治犯、工作岗位和“贫民窟”街区的强奸和性侵害、失业和其他突破了性别与阶级限制的问题。民族排挤和种族压迫交织在一起，决定了阶级剥削和性别统治，以至于种族主义塑造了日常生活的情绪、细微差别和形式。其中，一些民族女权主义者也拒绝将“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作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掩护，并与她们的男性同胞们站在同一阵线，将整个群体或国家从民族的次要地位中解放出来（参见Ogundipe-Leslie，1997）。

民族性和“全球化”。最近后现代的时空压缩（Raum-Zeit-Kompression）（参见Harvey 1898）趋势已经让一些观察家谈及了一种渐进的全球同质化，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民族性和变化性的各个方面成为国际市场消费的对象。因为西方（包括日本）和“其他国家”间权力分配的不均，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被视为西方对商品、优先权和价值观的输出。这一不平衡发展的最大贡献是重新阐明了“全球”，即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和“地方”——现在受到压制的地区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民族和种族标记成为浮动的指示符，其含义取决于谁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生产和接收条件下阐述了这种符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周边到大城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移民，在许多西方民族国家也因此形成了少数民族飞地。例如，法国和比利时的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德国的土耳其人，英国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来自前英联邦国家的公民，等等。在美国，2000年时加利福尼亚以及纽约、芝加哥和迈阿密等城市将主要由有色人种居住——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

民族性作为多元文化主义与“黑人群体”。“文化多元主义”这一概念给予了自由派实现多种不同文化在一种没有冲突的模式下共存的可能性；但是，出于分析的目的，对他们各自的政治取向进行评价确实更有价值。因此，克劳德·梅亚拉索（Claude Meillassoux）提出了社会军团（*social corps*）这一概念，目的是在“为社会阶级服务的机构”的研究中纳入非阶级特定因素（1993，第3页）。在全球化和移民潮背景下，先前封闭的统一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主要有两个影响：其一是在民族主义和以地方

为中心的运动中，民族专制主义和同质化的传统观念被多数人重新提起（参见 Solomos/Back，1996）；其二则是在少数民族社区中战略性地撤退回具有防御性的民族认同。然而，还存在其他创造性的替代方案，如在“黑人群体”中，英国的非洲裔加勒比人和亚洲人在其他文化和社会差异的交汇处构建了基于联盟的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性成了同质和差异的地位表达，是对需要协商的翻译和自我解释问题的回应，特别是在面临跨国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
925 多样性和其他转变压力的情况时。

参考文献：

N. Alexander, »Nation und Ethnie in Südafrika«, in: *Wer Wind sät, wird Sturm ernten. Kultur und Politik der unterdrückten Mehrheit Südafrikas*, Hamburg 1986, 47–59; M. Barrett, M. Macintosh, »Eurozentrismus im sozialistischen Feminismus«, in: *Argument* 163 (*Geschlecht und Rassismus*), 29. Jg., H. 3, 347–63; E. Bonacich, »A Theory of Ethnic Antagonism: The Split Labor Market«,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Jg., 1972, H. 5, 547–59; J. V. Bromley, *Ethnos und Ethnographie* (1973), Berlin 1977; E. Cashmore, »Ethnicity«, in: ders. (Hg.) *Dictionary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London 1988, 97–102; O. C. Cox, *Caste, Class and Race*, New York 1948; R. Edwards, M. Reich u. T. Weisskop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 Radic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2; N. Glazer u. D. P. Moynihan,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gde 1975; S. Hall, »Gramscis Erneuerung des Marxismus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Erforschung von ›Rasse‹ und Ethnizität«, in: der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erlin/W-Hamburg 1989, 56–91; ders., *Rassismus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 Ausgewählte Schriften 2, Berlin-Hamburg 1994; 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1989; M. Horkheimer,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1947; C. Meillassoux, »Toward a Theory of the ›Social Corps‹«, in: H. de Soto u. D. Anderson (Hg.), *The Curtain Rises. Rethinking Culture, Ideology and the State in Eastern Europe*, New Yersey 1993, 2–42; A. Lenz, *Ethnizität und Macht. Ethnische Differenzierung als Struktur und Prozess sozialer Schließung im Kapitalismus*, Köln 1995; R. Miles, *Rassismus.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und Theorie eines Begriffs*, Hamburg 1991; R. Ng, »Geschlecht, Ethnizität oder Klasse?«, in: *Argument* 175, 31. Jg., 1989, H. 3, 395–407; M. Ogundipe-

Leslie, »Afrikanischer Feminismus«, in: *Argument* 218, 39. Jg., 1997, H. 1 (*Pluraler Universalismus*), 27–42; M. Omi u. H. Winant,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86; J. Rex, »Race«, in: DMT, Cambridge 1983, 405ff; ders., *Race and Ethnicity*, Milton Keyes 1986; E. W. Said, *Kultur und Imperialismus. Einbildungskraft und 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Macht*, Frankfurt/M 1994; E. San Juan, *Racial Formations, Critical Transformations*, Atlantic Highlands 1992; J. Solomos, »Varieties of Marxist Conceptions of ›Race‹, Class and the State«, in: J. Rex u. D. Mason (Hg.), *Theories of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Cambrigde 1986, 84–109; ders. u. L. Back, *Racism and Society*, New York 1996; I. Wallerstein, »Die Konstruktion von Völkern: Rassismus, Nationalismus, Ethnizität«, in: ders. u. E. Balibar, *Rasse, Klasse, Nation. Ambivalente Identitäten*, Berlin-Hamburg 1990, 87–106; R. Willams, »Ethnicity«, in: ders. (Hg.), *Keywords*, New York 1983, 119f.

小圣胡安（E. San Juan Jr.） 撰
肖瑶 译，孙易晨 校

参见：

Anthropologie, Arbeiterklasse, Arbeitsmarkt, Arbeiterkultur, Bündnispolitik,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iskursanalyse, Dritte Welt, Einheit, Entbettung, Entkolonialisierung, Entwicklungsländer, Ethnologie, Ethnozentrismus, Eurozentrismus, Familie, Feminismus, fremd/Fremder, Fundamentalismus, Geschlecht, Globalisierung, Identität, Ideologie, Imperialismus,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nternationalismus, Kampf, Klasse an und für sich, Klassen, Klassenbewusstsein, Klassenkämpfe, Kolonialismus, Kultur, Kulturalismus, Menschenbild, Menschenrechte, Metropolen, Multikulturalismus, Naturvölker, neue Weltwirtschaftsordnung, Nord-Süd-Konflikt, Orientalismus, Postmoderne, Randgruppenstrategie, Rasse und Klasse, Rassismus, Segmentierung der Arbeiterklasse, Spätkapitalismus, Subjekt-Effekt, transnationaler Kapitalismus, Universalismus, Vierte Welt, Volk, Völkermord

民族学（Ethnologie） 926

A: 'ilm al-ğama'āt al-insānīya al-mu'āṣira.

E: ethnology.

F: ethnologie.

R: ėtnologija (этнология).

S: etnología.

一

要想捋清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学之间的关系，应该先了解民族学的基本特征。民族学可以被描述为“非西方”（nicht-abendländisch）民族的科学，由于动态复杂性，它试图从历史方面来看待这些民族。从理论角度来看，民族学涉及的关键问题是“此者”（Eigener）——“西方”世界（abendländische Welt），以及“他者”（Anderer）——“非西方”世界（nicht-abendländische Welt）的关系。而随着两个主体的政治历史背景发生变化，这种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与一个不限于“西方”人类文化标准的形成同时出现。在此意义上，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一书也被视为参考。在书中，泰勒完美且系统地阐释了以英国进化论（Evolutionismus）为基础的民族学理论发展过程。

另一个与民族学概念息息相关的关键点是将自然和文化的差异作为一种新的人类学的定义参数。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有意义。进化论学派的理论不仅涵盖达尔文《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中的自然生物学的观点，同时还涉及种族人类学的内容，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形成带来的影响常常被强调。毫无疑问，上述联系是有迹可循的。例如，恩格斯追随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en）的脚步，受《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1877）的 927
影响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另一层面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顺序论（Theorie der Abfolge der Produktionsweisen）也可以与进化论联系起来。在这个理论背景下，马克思论述了“亚洲”生产方式之前的历史时期及这种生产方式的开始阶段。他的目的是要确认“原始”社会的具体特征，具体来说即是土地公有制、公社（Dorfgemeinschaft）劳动的集体性、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无区分性，以及国家和社会阶层在利益上的无冲突性（参见 *Gr*，MEW 42，第383页及以下）。

19世纪的一项重点分析早期公社和亲缘关系（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s）以及“古代”社会的研究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他们批判地将研究结果纳入自己的历史理论之中（参见 Wayand 1990，第1—8页；Clastres 1976，第9页）。“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参见 MEW 3，第29页）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编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普遍视为生产和再生产的一般前提条件。关于日耳曼人的家庭关系，马克思早在他 1843 年起草的《政治历史笔记》（*Kreuznacher Hefte*）中就有所涉及（MEGA IV.2，第 119、223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国家和阶级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其二是在生产共有任务的框架下，将组织的职能转让给政府官员（参见 MEW 20，第 166—169 页）。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批判》中以印度跨村庄、跨地域的灌溉系统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这种安排大大提高了乡村农业生产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也使农民的生产工作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灌溉系统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且这种依附关系很容易转变成一种剥削关系（MEW 42，第 386 页；参见 Hauck 1997，第 23—30 页）。此外，马克思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一级信的草稿；MEW 35，第 166—167 页；19，第 242—243 页，第 384—406 页）、他摘录的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Maxim Maximowitsch Kowalewskis）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作品（参见《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Formen*]，第 2—20 页）、他撰写的《民族学》（*Ethnol*，1880—1882），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都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关系的研究。

如果将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过程的理论框架追溯到进化论的概念，那么其人类学理论的核心显然与进化论框架有出入。例如，如果我们谈论“原始”社群这一在进化论中十分有代表性的概念，这个概念使我们有可能首次正面承认“非西方”文化这一相关联的概念，但我们同时也会想到欧洲中心论。“原始”社群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一类没有被充分认识的族群，他们因为（可能存在的）智力尚未开发完善，或是一种长期脱离历史社会发展的（可能存在的）定居生活方式，所以一直无法被广泛接受。由这种意识形态方法，即西方殖民主义和强权主义的合法化，产生了将“原始”社群简单等同于“无历史”民族的，或从其本质而言，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然而，这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抑或是思想上都不曾出现。因为马克思主义以提升社会劳动的价值为基础，并视其为未来人类解放的基本要素。从这一历史常态出发，所有出于对某个群体的不认可而进行的区分人类的行为都显得毫无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高或低水平发展的生产力和助长人类社会中“歧视”产生的因素，都被认为是具有“外部”特征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映社会劳动组织的历史情况。最后，马克思还指出，“过时的”（archaisch）集体

和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形式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归宿。这种生活模式呈现了自然与文化批判关系中的一个很重要方面：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民族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

参考文献：

P. Clasters, *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 Recherches d'anthropologie politique*, Paris 1976; M. Godelier, *Ökonomische Anthropologie. Untersuchung zum Begriff der sozialen Struktur primitiver Gesellschaften*, Reinbek 1973; G. Hauck, »Der ›Sonderweg des Westens‹ und die ›orientalische Despotie‹— zur historischen Kritik eines unausrottbaren
929 Vorurteils«, in: *Peripherie. Z. f. Politik und Ökonomie in der Dritten Welt*, 17. Jg., 1997, Nr. 65/66, 721–48; L. Krader, »Evoluzione, rivoluzione e Stato: Marx e il pensiero etnologico«, in: E. J. Hobsbawm u. a., *Storia del marxismo. I: Il marxismo ai tempi di marx*, Turin 1978; E. De Martino, »Promesse e minacce dell'etnologia«, in: *Furore Simbolo Valore*, Mailand 1962, 65–10; G. Wayand, *Marx und Engels zu archaischen Gesellschaften*, Koblenz 1990.

马塞洛·马森齐奥
（Marcello Massenzio）撰
肖瑶 译，孙易晨 校

二

在德国，“民俗学”（Volkskunde）领域内追求的是“自己社会的民族学”。由于受到赫尔德“民族精神”（Volksseele）和格林兄弟（Gebrüder Grimm）关于日耳曼古代文化研究的影响，民族学的研究主要是从语文学的角度出发（语言、叙述、民谣研究）。在之后的发展中，这一学科越来越多地转向物质文化和生产资料的研究，但其研究对象也只局限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民族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部分大学中创立。当时一些主要的民俗学家根据民族学中的原始主义概念（Tylor; Lévy-Bruhl）将其定义为对“文化民族下层阶级”的研究，称其为历史和个人发展的“表层土壤”（参见 Dieterich 1902）。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在保守的社会教化和颂扬日耳曼人与农民阶层风气的提倡下，民俗学研究才在理论概念上发展为聚焦日常文化的多元民族学，尤其关注中下层社会群体。随着这项学科改革运动的不断深入，许多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进行了创新（如“实证文化研究学”“欧洲民族学”等）。与此同时，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工人阶级文化研究。在这一点上，新马克思主义（Edward P. Thompson; Ray-

mond Williams; Paul Willis）的影响力是极为重要的。到90年代，该学科还着眼于跨文化关系的民族学研究，使其更接近以欧洲为出发点的民族学。除了部分共同的研究领域外，民俗学或欧洲民族学还结合传统的民族学，试图借助定性的调查方法（如公开访谈、对参与者进行观察和固定领域研究等）来重构社会行为中的“行动者视角”（Perspektive der Handelnden）和“深度描述”（dicke Beschreibung）（Geertz 1973，1987）。另外，“民族学的范式”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如“民族心理分析”和“跨文化心理疾病研究”）也具有巨大的借鉴作用。

民俗学或实证文化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也存在着联系。一方面，它们都重视社会实践，将其视为对既定条件和资源的一种改造性占有。且民俗学或欧洲民族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在物质基础和文化概观方面并无差别，其区别主要存在于有关社会行为的“有意义”或“象征意义”观点上。另一方面，这两种研究都十分关注非霸权阶级和群体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反对社会上存在的精英阶层无视或轻视大众文化价值这一现象。民族学研究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是明确的，因此它不仅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同时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城市大众教育计划持怀疑态度，正如它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被批判为“教育主义”一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尤其是葛兰西，他在其《狱中札记》里密切关注着研究通俗文化和“后代”历史的项目。

参考文献：

H. Bausinger, *Volskunde*, Berlin u. a. 1970; A. Dieterich, »Über Wesen und Ziele der Volkskunde«, in: *Hessische Blätter für Volkskunde*, 1. Jg., 1902, 169–94;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1973; ders., *Dichte Beschreibung. Beiträge zum Verstehen kultureller Systeme*, Frankfurt/M 1987; D. Kramer, *Theoriezur historischen Arbeiterkultur*, Marburg 1987; L. Lévy-Bruhl, *La mentalié primitive*, Paris 1922; W. H. Riehl, »Die Volkskunde als Wissenschaft«, in: ders., *Culturstudien aus drei Jahrhunderten*, Stuttgart 1859, 205–29; E. P. Thompson, *Plebejische Kultur und moralische Ökonomie. Aufsätze zur englischen Sozialgeschichte des 18. und 19. Jahrhunderts*, Frankfurt/M u. a. 1980;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London 1871; R. Williams,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Begriffsgeschichte. Studien zur historischen Semantik von »Kultur«*, München 1972; P. Wills,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London 1977

(dt. *Spaß am Widerstand. Gegenkultur in der Arbeiterschule*, Frankfurt/M 1979); E. Wulff, *Transkulturelle Psychiatrie*, Argument-Studienhefte, SH 23, Berlin/W 1979.

贝恩德·尤尔根·瓦内肯
（Bernd Jürgen Warneken） 撰
肖瑶 译，孙易晨 校

参见：

Aneignung, Anthropologie, Bedeutung, Biologismus, Edukationismus, Entwicklung, Erziehung, Ethnie, Ethnozentrismus, Eurozentrismus, Evolution, Evolutionismus, Familie, Fortschritt, germanische Gemeinde, Geschichte, geschichtslose Völker, Kolonialismus, Kommunismus, Kultur, Menschenbild, Nation, Popularliteratur, Produktionsweise, Produktivkräfte, Rassismus, Sprache, Subalternität, Symbol, Verwandtschaft, Volk, Zivilisation

931 本民族中心主义（Ethnozentrismus）

A: markazīya 'irqīya al-markaziyat-ul-'unṣīrīya, al-markaziyat-ul-ītnīya.

E: ethnocentrism.

F: ethnocentrisme.

R: ėtnocentrizm (этноцентризм).

S: etnocentrismo.

本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拿适用于自身文化的观念和价值来了解和评估他种文化。它通常带来的结果是：将其他文化视为劣等文化，即一种文化种族主义。若通过结构性暴力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他文化，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参见 Said 1994）。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个问题相对较晚时才获得中心地位（关于该主题，参见 Fanon 1961），而与它相邻近的其他问题却总是被提起。首先，它包括意识形态概念和相关的观念，即在霸权思想进入合法化的语境中，为统治关系及其权力系统辩护。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了德国哲学家的“社会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们由于社会地位而产生了扭曲的思想。而本民族中心主义一词是指那些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和结果的扭曲观念。就像意识形态一样，本民族中心主义也起源于事实结构，只不过它的对立面被扭曲（偏狭）的视角所曲解。

本质上，对本民族中心主义的认识与受旅行促进的文化相对主义一样古老。启蒙文学系统地启用外来观点为其自身社会树立了批判的镜子（例如，斯威夫特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Reisen*] 或伏尔泰的《天真汉》[*L'ingénu*])。就目前所知，本民族中心主义一词在 W. G. 萨姆纳（W. G. Sumner）的重要著作《民俗论》（*Folkway*，1906）中首次出现在科学背景中。在这里，这个概念与原始社会密切相关，他们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特征在于：“我群”（ingroup）美化自身和自身的文化模式，而“他群”（outgroup）则被鄙视和被敌视。在这种形式下，西方世界的本民族中心主义一词进入了一个观念框
932 架，这种观念断言了非西方文化的低人一等。因此可以说，它是本民族中心主义一词的本民族中心式应用。

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背景下，本民族中心主义首次在阿多诺等人（1950）那里被明确提出。这里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是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义上描述的一种意识形态，它被应用于西方思想。据此，本民族中心主义不再仅仅是只存在于外来或原始文化中的一种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人员在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解释中使用了这个概念。

本民族中心主义一词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塑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新国际信息秩序的辩论中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下，第三世界国家批评了当时围绕西方本民族中心的信息秩序，尤其是新闻的选择和传播（机制）。这种批评是美国退出该组织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将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立场与观点的植入视为错误的普遍主义，并对此进行了攻击的话，那么本种族中心主义概念就攻击了特定文化及其统治性身份模式的立场与观点的植入。因此，即使没有强调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批判，它也能够被辩护。在多元普遍化的过程 9
中，对绝对化的和排他的身份意识形态的批评在日益增长，在与本民族中心主义相关的概念中，首当其冲的有“男性中心主义”（Androzentrismus）（父权制男子气概的错误普遍性，例如参见 Harding 1990，第 4 章；List 等），它遭到被视为积极的“女本位主义”（Gynozentrismus）（“神学女性经验中价值观的优先性”的主张）（Young 1990，第 38 页）、“以女性为中心的思想”（Lerner 1991，第 282—283 页；参见 Pusch 1992，第 247 页及以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统治的错误普遍性）的明确反对。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E. Frenke-Brunswik, D. J. Levison, R. N. Sanford,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Th. W. Adorno, *Studien zum autoritären Charakter*, Frankfurt/M 1973; J.-F. Bürki, *Der Eth-*

nozentrismus und das Schwarzafrikabild, Bern 1977;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1961), Vorwort von J. P. Sartre, Frankfurt/M 1966; S. Harding, *Feminis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Zum Verhältnis von Wissen und sozialem Geschlecht*, Hamburg 1990; G. Lerner, *Die Entstehung des Patriarchats*, Frankfurt/M-New York 1991; K. Mannheim, *Wissenssoziologie*, hgg. v.
933 K. H. Wolff, Neuwied 1964; R. Preiswerk, D. Perrot, *Ethnocentr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1978; L. F. Pusch, »Ladies first. Über das frauenzentrierte Denken«, in: B. Brück u. a. (Hg.), *Feministische Soziologie. Eine Einführung*, Frankfurt/M 1992, 245–52; E. P. Said, Kultur und Imperialismus. Einbildungskraft und 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Macht, Frankfurt/M 1994; W. G. Sumner,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New York 1906; I. M. Young, »Humanismus, Gynozentrismus und feministische Politik«, in: E. List u. H. Studer (Hg.), *Denkverhältnisse. Feminismus und Kritik*, Frankfurt/M 1989, 37–65.

施蒂格·阿尔内·诺尔施泰特
（Stig Arne Nohrstedt） 撰
李牧今 译，巩天成 校

参见：
Dritte Welt, Ethnie/Ethnizität, Eurozentrismus, frauenzentriertes Denken, Herrschaft,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Kulturimperialismus, neue internationale Informationsordnung, Rassismus

某物（etwas）

A: šay'.

E: something.

F: quelque chose.

R: nečto, čto-libo, nemnogo (нечто, чтолибо, немного).

S: algo.

一、不确定的某物

自中世纪以来（“我知道这个事儿，还知道其他宫廷里不知道的事儿[etzwas]”——Grimm 1862，3，第1180页），“某物”意为在质、量、大小和空间方面没有明确规定的东西。它模糊的对象性，使它更多用在口语、文学或谚语中，而不是理论或科学中：“有某物总比没有好”，“总有某物挥之不去”，“人想要某物”（Wander 1964，第1卷，第900—901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

(*Die Brüder Karamasow*) 中，父亲卡拉马佐夫问他的两个儿子伊凡和阿辽沙，上帝是否存在。伊凡说不存在，阿辽沙说存在。父亲进一步问："伊凡，那么有没有灵魂不死，哪怕是很小的，哪怕是一点点？""也没有灵魂不死！""一点也没有么？""一点也没有！"然后父亲说："你是说绝对的无，还是稍稍有一点某物？也许稍稍有一点吧？总不是一点也没有呀！"(第3卷，第8章，第232页) 哲学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例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回答：不管本体论还是宇宙学和自然神学，都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就连一个范畴也不能被运用于这样一种某物：例如实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关于作为主词但却绝不能纯然作为谓词实存的某物的概念，对于它，如果不是经验性的直观给予我运用的事例，我就根本不知道是否有某个与
934 这种思想规定相应的事物存在。"(§23，B 149；WA 3，第147页) 柏拉图是这样使用理念这一术语的："使人清楚地看出，他把它理解为某种不仅绝非借自感官，而且远远超越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知性概念的东西，因为在经验中永远找不到某种与它相应的东西。"(B 370；第321—322页) 这里的"某物"几乎等同于"自在之物"，后者"并不能凭借思辨理性（更不能凭借经验性的观察）"(B XXVIII：第32页) 来认识。"某物"就像"上帝"，如果说康德的"纯粹理性"认为证明上帝存在是不可能的，那么他的"实践理性"就提出了相反的假设："自然的至上原因，只要它必须为了至善而被设定，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者，它通过知性和意志成为自然的原因（从而是自然的创造者），亦即上帝。因此，派生的至善（极善世界）可能性的公设同时就是一个源始的至善的现实性公设，也就是上帝实存的公设。"(*KpV*，A，第225—226页；WA 7，第256页)

如果说康德的"某物"可以被视为"自在之物"，那么黑格尔的某物就是他的"绝对精神"。"在最后一个精神形态里面，精神赋予它的完整而真实的内容以自主体的形式，从而实现了它的概念，与此同时，它在这个实现过程中仍然保持在它的概念之内。这个最后的精神形态就是……一个在'精神'的形态下认知着它自己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概念把握式的知识。"(*PhG*，第8章"绝对知识"，GW 9，第427页) 通往这条道路的途径是意识的经验，它可以与释迦牟尼通往涅槃的道路相提并论。两条道路之间的差异通常可见于这样一个事实：一条道路是辩证地前进，而另一条则处在循环里。但是，它们也有相似之处。释迦牟尼说："由于所有事物都具有虚空的性质，因此它们既没有开始也没

有结束。它们既不无限也非不无限，既不完整也非不完整。在虚空中，没有形式，没有感觉，没有知觉，没有形态，没有意识。……只要一个人寻求最高的、完美的知识，他就仍然会停留在意识领域。如果他要实现涅槃，就必须超越意识。在最高的三摩地中，他超越了意识，超越了洞察力和知识，超越了改变或恐惧的范围。他已经在享受涅槃了。"（*Meditations-Sutras*，1973，第12—13页）

935 一切总是在变化，人应该将一切都视为变化着的某物。黑格尔强调花蕾、花朵和果实的循环："这些形式不但彼此不同，而且作为不共戴天的东西相互排斥。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它们的流动本性使得它们同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不同环节，在这个统一体里面，各个环节不仅彼此不矛盾，而且每一个都是同样必然的，正是这个相同的必然性构成了整体的生命。"（*PhG*，"序言"，第10页）他就像佛陀一样认为："真相是一个整体。但整体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着的本质。"（第19页）

黑格尔将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理解为"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延绵至今的世界决裂，不再坚持它迄今的实存和表象活动，而是打算把这些东西掩埋在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第14页）。全新的某物到来了，黑格尔将这种某物称为"新的精神"，它的"开端是一个产物，经历了众多教化形式的深远变革"（第15页），其结果"自在自为"就是"科学体系"，因为"真相只有作为一个体系才是现实的"（第22页）。这里并没有"某物"的空间，因为通往绝对知识的道路太清晰和体系化了。但是黑格尔真的已经用"绝对知识"表达出他之前预感为"某物"的所有东西了吗？

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他指出了黑格尔的双重错误：1."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的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Ms 44*，MEW 40，第572页）2."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第573页）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将他伟大地预感到的"某物"囿于他抽象的哲学思维和思维着的精神中，只在这当中展开"某物"。同时他这样评价《精神现象学》：它"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

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但它
936 “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同上）。

马克思认为《精神现象学》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并且“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第574页），由此他破译并翻译了黑格尔的“某物”。这就是劳动，劳动也造成了人的异化。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他虽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是“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同上）。

马克思将黑格尔通过意识的经验抵达绝对知识的道路改造为克服异化的道路。马克思的“某物”是共产主义，是在欧洲游荡的“幽灵”（MEW 4，第461页）。“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MEW 40，第583页）

马克思将黑格尔“天国的”绝对精神作为“共产主义”带到人间，以克服劳动中人的异化。但这并不会缩小黑格尔的世界。“绝对精神”虽然是抽象的，但延伸到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虽然“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因为它不仅包括普通意义上的劳动，还包括人的精神活动；但是，它缺乏黑格尔的世界实际包含的生命意义问题。因此可以说，马克思虽然把黑格尔的思想从天国拉到了人间，但同时又缩小了黑格尔的世界并使之扁平化了。如果说黑格尔的世界由于过于清晰和体系化，已经很难给“某物”留下空间，那么在马克思祛魅的世界中，为这个含义不确定的词找到空间就以另一种方式变得更加困难了。

苏联式国有社会主义的崩溃使人想起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演讲《歌德与托尔斯泰》（*Goethe und Tolstoi*）的结尾，他1921年发表演讲时仍然受到俄国和德国革命的影响：“尤其我们的社 937
会主义，其精神生活在一种低等的经济的唯物主义消耗得太久，它最需要的是，发现与那个一直‘以心灵寻找着希腊人的国度’的、更高的德意志民族性的连接点。它今天在政治方面是我们真正的民族政党；但是，让我们把问题推向极端，在马克思没有阅读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以前（顺

便说一句，这场相遇似乎即将发生），它还不能真正胜任它的民族使命。”（第140—141页）曼不知道，由于亨利·摩尔根的同名著作《古代社会》，老年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在1881年3月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中写道：“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MEW 19，第386页）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发现了他的“某物”。

参考文献：

F. M. Dostojewski, *Die Brüder Karamasow*, in: *Sämtliche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Bd. 14, Frankfurt/M 1986; J. u. W.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Leipzig 1862; *Meditations-Sutras des Mahâyâna-Buddhismus*, Zürich 1973; Th. Mann, *Leiden und Größe der Meister*, Frankfurt/M 1982; K. F. W. Wander, *Deutsches Sprichwörter-Lexikon. Ein Hausschatz für das Deutsche Volk*, Darmstadt 1964.

伊藤成彦（Narihiko Ito）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二、特定的某物

“您是对特定的某物还是对所有事物感兴趣？”出自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笔下的一个角色，这个问题包含一个论点（“在特定方面，某物比一切更多”）。特奥多尔·莱辛（Theodor Lessing）（1914，第305页）有句格言：“这个大脑永远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它没有概览过的某物。”（“概览”[übersehen]此处有可怕的双关义。）（übersehen兼有忽略和概览的含义。——译者）这句格言严厉地针对格奥尔格·西美尔，后者重新将货币规定为“无规定的某物”（GA 6，第315—316页）。在普遍化的哲学中被概览/忽略的东西，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则相反——比如恩斯特·布洛赫坚持这么认为（见下文）——最感兴趣的东西，就是特定的某物。西耶斯（Sieyès）神父的宣言《第三等级是什么？》革命地宣告：“本文的计划甚为简单，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1）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2）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没有。（3）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字面意 938
思是‘成为某物’。——译者）。”（1789年，第3页；引自MEGA I.2，第677页）这个从一切或什么也没有当中爆发的“成为某物”（A devenir quelque chose），显示了革命的限定对某物的影响。相

反，《国际歌》要求“成为一切”（“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工人的确也“成为某物”了，但付出的代价是自身的分裂，可以整合的部分转变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等级”，而市民社会的动力又反复地将这个等级化为乌有。

1. 值得注意的是，《拉朗德哲学辞典》（*Lalande*）讨论的是“任意物”（quelconque），而不是“某物”（quelquechose）。普雷希特尔（Prechtl 1996）认为，某物始终是未规定的，“表示‘现实本身’，也就是说，它表示一个本体论的原始范畴”，换言之，谈论任意物，要以“作为观念的‘某物’范畴为基础”。这种将“占据实体性的空白的某物”“某物这一形式”本身（Adorno 1966，第 108 页，脚注）美化为“原始范畴”的做法，总是一再忽略差异，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分析的，尤其是忽略了关于某物的适当的“哲学语法”差异。例如，他将感觉（疼痛）作为言语的对象与其他对象（房屋、善与恶）区分开来。尽管不能（像指向房子一样）指向疼痛，尽管“疼痛行为”也可能在没有疼痛时表示疼痛，但人会无意识地对象化地言说疼痛，维特根斯坦抵制这种情况下强加于人的“语法”。他得出的结论是，感觉“不是某物，但也并非无”，因此“如果关于某物我们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么某物所起的作用就相当于无”（*Phil.Unt.*，§304）。

贝克特之问指出，“某物”作为与任意物（“万物皆是任意物”）不同的特定物，既否定了**万物**（*Alles*），也（以不同的方式）否定了**无**（*Nichts*）。德谟克利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普鲁塔克所记载的他的名言中可以看到，它“措辞很奇怪：‘非无（Ichts）不比无更多。’或者换个说法：‘某物不比非某物更多’”（Buchheim 1994，第 189 页）——μὴ μᾶλλον τὸ δὲν ἢ τὸ μηδέν（Frg. 156）。迪尔斯（Diels）和克兰茨（Kranz）的德译文作：“无和非无一样存在。”（II，^{6}1952，第 174 页）希腊语 δέν 是一个人造词，它去掉了 μηδέν（无）的否定前缀 μή-。这个去除可以理解为否定之否定。“但是这样一来，某物本身只是去掉了意味着取消它的东西”，因此，“根据这种理解方式，所有东西都是某物和非某物两者，既可以算作去除或取消，也可以算作正在发生的事件”（Buchheim，第 189 页）。这似乎开启了原子论者走出巴门尼德和伊利亚学派困境的出路。亚里士多德把上述思想记在留基波（Leukipp）和德谟克利特名下：οὐδὲν μᾶλλον τὸ ὂν τοῦ μὴ ὄντος εἶναί φασιν——“他们主张存在者并不比非存在者更实在”（*Met*，985 b 8）。但这样他就消除了

939

语言上的特质性，原文的文字游戏本可以动摇恩斯特·布洛赫的论点："德谟克利特没有辩证法。"（*Leipziger Vorlesungen*，I，第93页）这里暗指"某物"的辩证法，因为它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才得到解决，但《逻辑学》没有提到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分析了"某物的某物"（τὶ κατὰ τινός）意味着什么，其结果就如图根哈特（Tugendhat）所指出的，"在场（*Anwesen*）的意义"——海德格尔用"在场"这个概念来理解存在（οὐσία）——"发生变化，不再像巴门尼德认为的那样是一，也不再像柏拉图认为的那样是每一个一（某物），而是每次都是一个'某物的某物'"（1958，第5—6页）。

2. 在踏入近代的门槛上，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on Kues）首先展开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先验学说里仅有所暗示的思想，即每一种某物（aliquid）都是与其他物不同的某物（aliud quid）"（Flasch 1972，第815页）。黑格尔提出了这种辩证法的范式，其《逻辑学》中包含一个题为"某物"的小节。在第一章论"无"的段落（B），他为了从无重新回到存在，就让"某物"直接出现——在一系列带有"是"（ist）的肯定之后是带有"被当作"（gilt）的一句话："那么，到底某物还是无可供直观或思考，那是被当作有区别的。"注释一的开头是："无通常和某物相对立；但某物已经是一个已规定的存在者，有别于另一个某物。"这种规定性现在也影响了无，这里的无是"与某物相对立的无，一种已规定的无"（Meiner，第67—68页），或者"已规定的、有内容的无，人们也可以说是：规定的否定"（第89页）。"只有在已规定的光明里面……某物才能够被区分开来"（第79页）；因为这一某物"仅被当作某种肯定的东西"，所以"掩盖了"它"包含规定性，即也包含否定"（第97页）。简而言之：是"否定本身使存在成为某物"（第109页）。某物经过与他物、与自身的多次中介， 940
但是它作为单纯的否定之否定，一再"融入单纯的统一体，即存在"（第103页），因而重新陷入"实定性的假象"，"某物的'真相'拒绝这种假象：它本身就是作为过渡的变"（Theunissen 1978，第235、238页）。这里联系着黑格尔"前所未闻"的思想：不再用神学思考的、没有彼岸的有限性，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普遍历史性"（Marcuse 1932，第63页）。

阿多诺指出，非同一事物所经的中介是"拙劣的"。他认为"黑格尔拒绝不以存在而以某物为起点"，就已经假定了"逻辑学本应当证明的"绝对观念论（1966，第124页）。恩斯特·图根哈

特（Ernst Tugendhat）（1970b，第 146—172 页）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某物”，认为黑格尔一开始在“存在”和“无”中既暗示又排斥某物。米夏埃尔·托伊尼森（Michael Theunissen）给出了他的理由：“健全的、未经哲学教坏的语感或者将‘存在’和‘不存在’，或者将‘某物’与‘无’（=非某物）视为对立面，而很少与此相反，将一组对立中的一个实体化部分——存在，与另一组对立中的另一个实体化部分——无，彼此联系起来。”（1978，第 96 页）

3. 莱布尼茨之问：“为什么有的是某物而不是无？”（pourquoi a-t-il plutôt quelque chose que rien?）（*Principes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âce*，1718 n.7）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er）视其为“所有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Was ist Metaphysik?*，[8]1960，第 21、42 页）。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以陌生的语言转述了德谟克利特的话一样，海德格尔也损害了莱布尼茨之问的原意，他用“存在”（ist）代替了“有”（a-t-il），用“存在者”（Seiendes）代替了“某物”（quelque chose）：“为什么存在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无？”（Warum ist ü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同上）与此相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许是同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竞争——分析“某物”的出现：与笛卡尔的广延物（*res extensa*）或广延（*extensum quid*）不同，对象化的活动或实践所中介的对象性（参见第 66 页及以下）向在世活动的人、不单纯在“凝视的人”展开，不是向“观看某些属性”，而是向“使用交往的寻视”（第 73 页）展开，因而不是直接作为“物”，而是至多作为πρᾶγμα，作为“操劳打交道”（πρᾶξις）（第 68 页）的东西展开。海德格尔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7 卷）所分析的无利害的观察视为次级的，是“将某物称作某物，把它作为某物来谈论”（第 61—62 页；参见 Tugendhat 1970a）。在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隐秘 941
的联系中——后者暗中动摇了对象化活动的本质的自我理解（因为对象化活动的本质作为“主体的”实践，属于“现实”）——海德格尔思考反作用于主体的、解释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理解某物和理解自己是动态相关的。学习理解某物的人会改变自身（以及已经理解的东西）。但是，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海德格尔即使“达到了对同一性中的非同一性的辩证认识的极限”，仍然“没有解决存在概念中的矛盾，他压制了它”（1966，第 108 页）。

继海德格尔之后，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75）也指出，这种情况如何作为能指与意义（或含义

[*meaning*]）关系中的辩证紧张而起作用：（1）意义有许多不充分对应的意义载体；（2）解释意味着以一种意义载体代替另一个意义载体；（3）因此，表达“某物”总是意味着将其表达为“另一个某物”。

早期的萨特徒劳地试图解决尼采认识到的虚无主义问题：“找到进入‘某物’的出路和洞孔。”（1887年5月23日致罗德[Rohde]的信）萨特的中篇小说《恶心》（*La Nausée*）的主人公感到自己“总是超然于某物”（第216页）。无意义制造出行动主义者的忙碌，因为“人就必须做些事情”（第67页）。“恶心”意味着这一令人瘫痪的悖论，即人总是必须做些事情，但又感到结果是毫无意义甚至是荒谬的：“做某事意味着创造此在——可已经有足够的此在。”（第216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活动“与实现生活的物质实践无关，而是从虚无中延伸出来，将‘某物’或者说‘意义’带入此在，以便在每一次停止和每一次重新开始时又把意义扫回它任意一种冥府般的虚无”（Haug 1966/1991，第123页）。因此，“赋予无意义以意义的工作一开始运行，就在空转中结束了。……在每一个特定的某物中，只能发现它本身空洞的自我规定，总是只有它自己。它的全能是无限制地符号设定的全能。它的无能在于，符号除了表示它的符号设定外，什么内涵都没有”（第97页）。

4. 阿多诺将莱布尼茨之问用于面对纳粹的经验所产生的具体的虚无主义思想实验：“是不是根本无物存在比存在某物更好”这一问题无法泛泛地回答。对于一个集中营里的人来说，“如果他从未 942
出生会更好”（1966，第371页）。“中世纪否定的无（nihil privativum）认为，无的概念是对某物的否定……它像涅槃的形象、作为某物的无的形象一样，比努力克服（虚无主义）更优越。”（同上）阿多诺认为贝克特呈现了“作为某物的无的图像世界”（同上），它“暗含了对无认同的反面”（第372页）。无论如何必须保卫这种虚无主义，抵御关于现存事物实定性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恩斯特·布洛赫——“马克思主义的谢林”（Habermas 1960），最早用“尚未存在的本体论”（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夺回了海德格尔所占领的马克思主义领域。汉斯·迈耶（1975，第244页）指出：“他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的对立，与不外乎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全然对立，大到无以复加。”布洛赫明确要求：“首先必须尽可能远地分开尚未（Nicht）和无（*Nichts*）；规定的全部冒险就在二者之间。”（1961，第16页）无“对某物、对显现者是陌生的，对一个不断发展的

有（Haben）的不同形态是敌对的”（第47—48页）。在布洛赫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转折中，某物成为关键点，但并没有被固定在这里和现在。“对现在的陈述是空洞的，作为一个发酵中的尚未，首先只是无规定的。一切都由这个尚未开端和开始，每一个某物都围绕这个尚未构建。”（第16页）“尚未本身并不持久，而是与某物有推动的关系。”（同上）它推动新事物出现，新事物中“历史的维度被打开并保持开放，它首先是活动着的希望的领域。希望的世界充满某物的天资、某物的趋势、某物的潜质，即充满逐渐消解这个世界根基的可能。一切隐秘的东西都会显露（Quidquid latet apparebit）”（第27—28页；引自《震怒之日》[*Dies irae*]）。布洛赫这样解释“尚未本身并不持久”：“尚未与有相关，对它的原始觉察会被表述出来”（第42页）；排他性的判断“针对特定某物的出现”表述它的尚未（第44页）；“需要改变的事物和能够改变的事物表明，当事物每次不充分地变成某物时，它仍然充满了尚未，每一个外化的存在都被尚未包围。与此同时……尽管某物恰好作为许多事物中的某物，完全不是某种集合，但正是在某物当中，运动似乎结束了，并且不断通过‘他者’，可以说不断通过其他的某物，综合出某物。以这种方式展开的某物就是现象；在这种现象—存在中，尚未继续与此相对被称为尚未的现象（*Nicht-Erscheinung*）”（第46页）。

943

“某物令人不舒服，事情开始于此。”（GA 9，第242页）这是布洛赫《侦探小说的哲学观点》（*Philosophische Ansicht des Detektivromans*）的第一句话。布莱希特将知识分子对侦探小说的兴趣归结为他们的“基本处境”，即“他们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体”，这种情况“塑造了他们在侦 探小说中充满享受地运用的思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诸多未知因素。‘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某些事变得紧张起来’，‘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这是他们的感受，精神处在戒备状态”。在《母亲》（*Mutter*）中，布莱希特塑造了毫无实践的无力状态的对立面，它是改变社会的实践这一框架中的规定的否定。儿子在阶级斗争中被枪杀后，房东问母亲：“您还相信人凭理性能做所有事吗？”回答揭示了潜伏在这个错误问题中的机会主义。人凭理性做不了所有事，但唯有凭理性才能做某事，布莱希特在《墨翟》中这样教导道。相应地，布洛赫也批评“错误的意义问题，它想要一切都是给定的，而不是要实现某物”（Haug 1966，第31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

furt/M 1966; E. Bloch, *Philosophische Grundfragen I. 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 Ein Vortrag und zwei Abhandlungen*, Frankfurt/M 1961; Th. Buchheim, *Die Vorsokratiker. Ein philosophisches Portrait*, München 1994; K. Flasch, »Etwas«, HWPh 2, 1972, 815f; J. Habermas, »Ein marxistischer Schelling« (1960), in: ders., *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M 1981, 141–59;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Frankfurt/M 1966, 3., veränd. A., Hamburg 1991; M.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uZ)* (1927), Tübingen ^{8}1957; ders., *Was ist Metaphysik?* (*Vorlesung:* 1929; *Nachwort z. 4. A.:* 1943; *Einleitung z. 5. A.:* 1949), Frankfurt/M ^{8}1960; Th. Lessing, *Philosophie als Tat*, II, Göttingen 1914; H.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M 1932; H. Mayer, »Ernst Bloch, Utopie, Literatur«, in: *Ernst Blochs Wirkung. Ein Arbeitsbuch zum 90. Geburtstag*, Frankfurt/M 1975, 237–50; P. Prechtel, »Etwas«, *Metzler Philosophie Lexikon*, Stuttgart-Weimar 1996, 152; J.-P. Sartre, *La nausée* (1938), Paris 1966; E.-J.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2. A., Paris 1798; 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1900), GA 6, Frankfurt/M 1989; Ch. Taylor, »Interpretation und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ders., *Erklärung und Interpretation in den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Frankfurt/M 1975, 154–219; E. Tugendhat, *TIKATA TINOΣ Eine Untersuchung zu Struktur und Ursprung aristotelischer Grundbegriffe*, Freiburg-München 1970 (a); ders., »»Das Sein und das Nichts««, 944
in: *Durchblicke. Martin Heidegger zum 80. Geburtstag*, Frankfurt/M 1970 (b), 132–61.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参见：

Angst, Antizipation, Arbeit, Artikulation, Aufhebung, bestimmte Negation, Bestimmung, Bewusstsein, Dialektik, Entzauberung, Existenzialismus, Hoffnung, Jenseits, Metaphysik, Nichts, Ontologie, Unendlichkeit, Veränderung, Vernunft

词源学（Etymologie）

A: 'ilm-al-dalālāt al-luġāwiya.

E: etymology.

F: étymologie.

R: ėtimologija (этимология).

S: etimología.

斯多亚学派用希腊语 ἔτυμος（真实的、正确的）和 λόγος（学说）两个词构造了“词源学”这个概念，它最初指一种哲学和诗学的思考方法，即“通过词和在词中寻求真相”，或在两个发音彼此相似的词之间建立意义联系。现代意义的词源学是根据词的语音和意义的历史，来确定其起源以及原始形式、原始意义的语言学方法。词源学产生于说话者这样的需求，即按照形式和语义上相近或亲缘的系统关系（词族、构词模式、语义场和概念场、反义词等）对语言中看似无序的各种词进行分类，以确保它们的含义和正确的使用。这样与已知内容建立的联系，在吸纳新词汇时减轻了记忆的负担，因而是一种经济的语言方法或思想方法。其中错误的归类时有发生，但如果含义的偏移或形式的改变已成为约定俗成的用法，则称之为民间词源（Volksetymologie）。例如 irritieren 一词可追溯到法语的 *irriter*（使愤怒、使兴奋），但由于在德语中错误地归入 irren 的语义场，就有了“使人不安、令人困惑”的口语含意。作为词和概念的历史展开的词源学可以视为**启发式的**或**适用于认知的方法**，有助于阐明文化史与意识形态史的联系和迁移。它论述的价值取决于多大程度上考虑到如下几点：**首先**，词是相对任意的符号，其选择取决于各种极为不同且随机的决定因素。**其次**，词不直接指称所指事物，而是通过表象（含义）的中介指称事物，因此词和概念的历史充其量只是意识形态史和文化史的旁证，从来不能为真实历史的联系提供唯一的证据。**再次**，在进入新环境的过程中，词的含义不断变化，因此不能从“真正的”含义出发，而总是只能从历史主体在相应的语境中所调整的具体历史含义出发。在这种背景下，词源学作为**语言批判的方法**还有一个用途，即它可以通过证明词如何被创造或重新解释，以歪曲、掩盖或美化事实，从而质疑社会群体在意识形态、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定义权力。最后，词源学还可以用作**诗学方法**，重新激活已经作古的形式变体和含义，通过它们与相关词的当前内涵的联系，来创造一种具有丰富联想的语言。

945

94

1. 词源学的思想一般追溯到柏拉图，然而在《克拉底鲁篇》（*Kratylos*）中，他主要关注名称的“正确性”，或者说，命名要符合所指事物的本质。对事物的正确命名既是日常实践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为词汇创造者提供了构造新词的标准。

在教父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中，

词源学成为唯实论认知理论的工具。依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只有普遍概念才被视为真实存在，而个别现象则不是。人由于无法对普遍概念有直接经验，就尝试通过词义来理解它们。词源学基于形式的、语义的和逻辑的关系（原因，例如 rex[国王]来自 regere[统治]；起源，例如 homo[人]来自 humus[土地]；对立，例如 lucus[树林]来自 non lucendo[没有光照]），公元 7 世纪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编撰的百科全书《词源》（*Etymologiae*，又名 *Origines*）阐述了词源学研究的原则。依据这个典范，10—12 世纪拜占庭编写了词典《大词源》（*Etymologicum Magnum*）、《真正的词源》（*Etymologicum genuinum*）、《古德词源》（*Etymologicum Gudianum*）和《小词源》（*Etymologicum parvum*）。

在欧洲民族语言从拉丁语中解放出
946 来的过程中，词源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大众语言人文主义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含义。除证明神圣语言即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一的所谓血统之外，各民族自己的语言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声誉。在 19 和 20 世纪许多民族语言的语文学里，仍然有人尝试用当时作为科学的词源学来证明符合意识形态需求的起源，反驳不受欢迎的外部影响。

词源学直到 18 世纪都只是哲学、修辞学和诗学的领域，且主要依靠偶然的外在联系。即使引入了例如时间顺序的标准，将词源学变成词的历史，但是历史证据大多都充满裂缝，依然对想象敞开大门。吉尔斯·梅纳日（Gilles Ménage）是 17 世纪最重要的法语词源学家，他将含义设置为常量，将形式设置为变量，形式可以通过无因果关系的某些操作（更改、转换、删除和添加“字母”）随意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对他来说不难设想，法语的“豆”（*haricot*）来源于拉丁语 *faba*，法语的“奴仆”（*laquais*）来源于拉丁语的 *verna*。与之相反，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在《新科学》（1730/1744）中将词源与各民族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结合起来。他认为，所有语言中最初的词都是单音节拟声词，它们表达最基本的生活要素，并通过扩展和隐喻从最基本的生活领域转移到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上。莱布尼茨接受了这个想法，并认为不仅可以用词源学“认识我们的心灵以及它作用的奇妙的千变万化”，甚至可以在“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的坚实可靠的词源学”（《人类理智新论》[*Nouveaux Essais*]，III，IX，9）基础上认识各民族的起源。然而，词源学直到杜尔哥在《百科全书》中撰写《词源学》一文时，才获得科学的基础。它将形式、含义和指称对象视为要同时考虑的要素，并为词和含义之间的关联可能性制定了标准。

随着词源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如弗兰兹·博普（Franz Bopp）和A. F. 波特（A. F. Pott）研究印欧语系的《词源研究》（*Etymologische Forschung*，1833）、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1852—1960）以及弗里德里希·狄茨（Friedrich Diez）
947 的《罗曼语族词源词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1843），词源学在19世纪独立为一门科学学科。威廉·冯·洪堡不再认同莱布尼茨对重建各民族起源和重建一门原始语言的乐观态度，但仍认为“语言研究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证明“语言在观念的形成中所占的份额”（《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en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GS VI，第119页）。然而不久之后，集中体现为“音变定律”（Lautgesetz）的语音史视角过度受到重视，以至于词源学家的工作止步于找到各个词源的原始形式，而不求证概念史和文化史的背景。词源学这样收缩为孤立词汇成分的纯粹形式历史，给它带来了恩格斯所说的乏味的、远离现实的学究气的名声（参见MEW 6，第438页）。

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词源学首先既是批判的对象，也是批判的工具。有时，它被视为社会历史进程的指标。恩格斯尤其熟悉当时的词源学研究，甚至谈过他的“老爱好——比较语文学”（MEW 29，第583页）和他“语文学的良心”（MEW 34，第140页）。这方面知识表现为他对“近60年来这样有力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的欣赏以及对博普、格林和狄茨的明确引用（参见MEW 6，第439页；13，第130页；20，第299页）。他认为维科那里包含着“比较语言学基础”（MEW 30，第623页[此处有误，引文出自马克思1862年4月28日致拉萨尔的信，而非恩格斯。——译者]），然而他也说，“旧词源学家，譬如说维科，都是一些蹩脚的空谈家”，词源学必须“也和生理学以及别的任何‘学’一样，需要加以研究，但决不能发明它”（MEW 36，第299页）。

2.1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注意到作为哲学论证工具的词源学，批判它是当代哲学（“在词源学中寻找避难所的谬论”）中以笃信概念为特征的经院哲学的变体。施蒂纳这样论证“私有财产的不可消灭，他把私有财产变为财产的概念，利用Eigentum（财产）和eigen（自有的）这两个词的词源学上的联系，把‘自有的’这个词说成是永恒真理，因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发生他‘自有’胃痛这样

的事”（MEW 3，第 211 页）。马克思后则在《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
948 济学教科书〉》中也反对瓦格纳的“咬文嚼字”和“玩弄概念”（MEW 19，第 367—368 页），瓦格纳试图用“德语惯用法”和印欧语系中表示价值的词的词源来反驳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如果说相应的词确实最初要按使用价值的意义来解释——马克思从奥诺雷·约瑟夫·夏韦（Honoré Joseph Chavée）1844 年的《试论哲学词源学》（*Essai d'etymologie philosophique*）和恩格斯那里都确认了这一点（1864 年 6 月 16 日的信，MEW 30，第 414 页），那么后来含义转变为“交换价值”则与此无关，正如之前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指出的，这些词“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按事物的性质来说，‘value，valeur，Wert’这些词在词源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 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MEW 26.3，第 291 页）。

《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批评“德国教授们把概念归并在一起的方法”，批评“空谈‘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些概念和词”（MEW 19，第 371 页）。“这个德国人的全部蠢话唯一的明显根据是，**价值**（*Wert*）或**值**（*Würde*）这两个词最初被用于有用物本身，这种有用物在它们成为**商品**以前早就存在，甚至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但是这同商品‘价值’的科学定义毫无共同之点，就像**盐**这个词，古代的人最初用来指食盐，后来，从普林尼以来，**糖**和其他物也列入**盐类**（indeed[事实上]是一切能溶解于水，并具有特殊味道的无色的固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盐’的化学范畴包括糖等等。”（第 372 页）

他纠正了词源学的论证，不仅因为他要求考虑词义的进一步发展：最初表示“使用价值”的词“后来被原封不动地直接转用于**价格**，即价值的发达形式，亦即交换价值”（第 373 页）。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分析一定的经济结构得出的”（第 371 页）：他“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他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 949
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第 368—369 页）。

他没有像语言学的词源学当时最优秀的代表那样，只单纯用文化史确立词源学研究。除威廉·冯·洪堡以外，之前没有人这样清楚地说明词源学在启发上或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虽然不否认它

有助于重构古老的观念世界和思想史历程，但它并不适合作为证据证明超过上述范围的定理。在这一点上体现了马克思与哲学（因而也是语言哲学）唯心主义的对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MEW 3，第 432 页）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后来说："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LF*，MEW 21，第 2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讨论"买卖"对语言的烙印，不仅说明词源学的理论证明是一个循环论证，还在价值讨论的具体案例下揭示了语言支配和概念定义方面的权力关系。"资产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等同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例如，propriété、Eigentum（财产）和 Eigenschaft（特性），property、Eigentum（财产）和 Eigentümlichkeit（独特性）；重商主义意义上的和个人的意义上的 eigen（自有），valeur、value、Wert（价值）；commerce（商业）、Verkehr（交往）；échange、exchange、Austausch（交换）；等等。所有这些字眼既意味着商业关系，也意味着作为个人自身的特性和相互关系。在其他的现代语言中，情况也完全一样。"（MEW 3，第 212—213 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词源学最终成了霸权关系的指标，它表明哪些社会力量以何种方式、为了哪些目标塑造或占据了特定概念。 950

2.2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词源学在它适用的地方来表明社会历史观念的变化。在恩格斯看来，古希腊语 βασιλεύς 和古日耳曼语 *kuning* 的词源支持了历史学论证的假设，即它们最初是一个选举产生的职位，是军事民主制的表现："用 König 来翻译 Basileus 一词，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 König（Kuning）是由 Kuni、Künne 而来的，即氏族酋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 Basileus 跟现代意义的 König 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MEW 21，第 105 页；参见第 85—86 页和注释 123）在关于价值概念的讨论中，马克思的词源学论述追溯到了金和银、矿石和铁、资本等词的词根（参见 MEW 13，第 130 页；19，第 357 页）。马克思偶尔会向他有语文学教养的朋友咨询词源学问题，例如英语的

higid、*hid*、*hiwisce* 以及 *wiffa* 等词（参见 MEW 32，第 47—48、54—55 页）。

最后，大量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词源学的目的，是保证确切而符合现实地使用词的历史含义（例如，关于 *deutsch/teutsch*［德意志的］等形式，参见 MEW 34，第 140 页，市民社会的概念、英语的 *labour* 和 *work* 等），他们在不断批判地考察他人的语言使用时，推动了作为词和概念历史的现代版本的词源学。

3.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最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继承了马克思对词源学以批判为主的观点，他警告不要把词源学和概念史当作社会史的工具，并把主要基于词源学和概念史的方法称为“拘泥字句”（*ÜHM*，1896，第 139 页）。相反，词源学在葛兰西那里重新获得了与在恩格斯那里相当的地位，葛兰西本身就接受过语文学（罗曼语言文学）教育，且熟悉词源学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核心意义。他的《狱中札记》对语言学的词源学进行了方法论上的批评，不仅针对集中研究语音史的传统派，而且还针对 20 世纪初以克罗齐（Croce）、福斯勒（Vossler）和贝尔托尼（Bertoni）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语言学。他的老师马特奥·巴尔托利（Matteo Bartoli）用文化史扩展词源学，“将狭隘地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语言学转变为一门历史科学，‘在 951
时间和空间中’寻找其根源”（*Gef* 2，H.3，§74，第 391 页），在此基础上，葛兰西在词源学和概念史中首先寻找马克思所略述过的对世界观和霸权的反映。正如他的整个作品既旨在分析现存的文化政治关系，又针对争取霸权的实践，他关于词源学的论述也包含实用的方面。在他关于市民社会的整体构想中，霸权的实现要以霸权者的语言教育为前提：“无论在数量上（获得新的表达方式）还是在质量上（获得含义的细微差别以及更复杂的句法和文体规则）完善表达技术，都意味着扩展和加深对世界和世界历史的理解。”（*Gef* 3，H.5，§131，第 686—687 页）对他而言，语言的变化是“一个连续的隐喻化过程”，因此他提出了隐喻词源学的必要性（他本人在题为“百科全书概念”的许多笔记中就实践过这种词源学）：这种词源学“通过将概念回溯到它出现的历史特定的文化世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概念本身”，以及“更精确地把握隐喻本身的界限，即防止隐喻的物质化和机械化”（*Gef* 6，H.11，§50，第 1462 页）。由此，他创造了一种语言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并不断将其用于对克罗齐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科学骗术或者说洛里亚主义、庸俗文学的分析。

4. 虽然词源学在其口语理解中作为一种诗学的修辞手段，在现代语言艺术中有无可争议的地位，让一个受关注的词与一个或多个尽可能古老的词建立派生关系，受到这些词的“辐射”（特里尔 [Trier] 语），从而赋予语言表达以深度和多重性，但是，在哲学上对词源学的使用总是激起受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的反对。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词源学起着参与决定他思维风格的作用。西奥多·W. 阿多诺在《本真性的行话》中反对海德格尔及其模仿者，他认为行话的语言是“词飞升超出事实的、有条件的和可争论的范围”（GS 6，第 420 页）。跨越语言可能性的人“迈向了赤裸的唯名论语言理论，对这种理论而言词是可
952 交换的筹码，不受历史触动。然而，历史进入了每一个词，让每一个词都无法再恢复行话追逐的所谓原始感”（第 418 页）。“相反，生命力顽强的古风只有在语言批判地苛待它的情况下才会在语言中结出硕果，而在语言自己确认并加强它的情况下变成致命的幻想。行话与实证主义分享了对语言古风的粗略观念；两者都不关心辩证因素，即语言作为他者脱离了其神奇的起源，交织进了持续不断的去神话化进程。”（第 441 页）以词源学为基础的行话及其“对时代错乱的语言的社会利用”（同上）本身就是“显著的意识形态、社会必要的幻想”和“权力的手段”（第 525 页）。

5. 词源学在 20 世纪初达到巅峰，代表人物有罗曼语研究的迈尔-吕布克（Meyer-Lübke）、日耳曼语研究的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和西奥多·弗林斯（Theodor Frings）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语言学中失去了中心位置。随着结构主义及其片面的共时性观点的兴起，它甚至沦为语言学的边缘。另外，语言学在 1970 年代的“语用学转向”使得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功能、语言当前的社会文化可变性受到重视。然而词源学也更新了自己的方法：随着语义学发展成为一门语言学学科，产生了将词源学作为词和概念历史的现代观念，而词和概念的历史又被视为一门语言的历史的一部分。语音的、历时的（也包括共时的）比较和词义的历史在这里被理解为一个整体，并与现实历史和概念历史联系起来。因此，现代词源学词典，尤其是那些追求完整的词典（类语词典），也具有很强的百科全书特征。概念史在非语言学的科学，特别是在史学中越发重要的地位，部分地弥补了词源学的边缘化。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 Zur deutschen Ideologie*, GS 6, Frankfurt/

M ⁴1990, 413–523; E. Albrecht, *Sprache und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75; T. A. Amirova, B. A. Ol'chovikov, J. V. Rozdestvenskij, *Abriß der Geschichte der Linguistik*, Leipzig 1980; K. Baldinger, »L'étymologie hier et aujourd'hui«, in: *Cahiers de l'Association Intern. des Études Françaises*, 11. Jg., 1959, 233–64; A. Fasso, »L'Etimologia come filologia e come storia«, in: *Riv. ital. di dialettologia*, 4. Jg., 1980, 181–208; Th. Frings, *Germania Romana*, Bd. 1, Halle ²1966, Bd. 2, *Germania Romanica*, Halle 1968; P. Guiraud, *L'étymologie*, Paris 1964; Y. Malkiel, »The Place of Etymology in Linguistic Research«, in: *Bulletin of Hispanic Studies* 31, 1954, 78–90; ders., »Etymology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in: *Word* 18, 1962, 198–219; K. Marx u. F. Engels, *Über Sprache, Stil und Übersetzung*, Berlin/DDR 1974; W. Meyer-Lübke, *Ro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Heidelberg ³1935; H. Paul,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Leipzig ⁵1920; J. Paulhan, *Alain ou la preuve par l'étymologie*, Paris 1953; V. Pisani, *L'Etimologia. Storia, questioni, metodi*, Mailand 1947; R. Schmidt (Hg.), *Etymologie*, Darmstadt 1977; J. Trier, »Etymologie«, in: HWPh 2, 816; W. V. Wartburg, »Grundfragen der etymologischen Forschung«, in: *Neue Jb. f. Wissenschaft u. Jugendbildung*, 7. Jg., 1932, 222–35; P. Zumthor, »Etymologie«, in: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Paris 1990, Bd. 9, 5–8.

克劳斯·博赫曼
（Klaus Bochmann）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参见：
Artikulation, Bedeutung, Enzyklopädie, Geistesgeschichte, Hegemonie, Ideologiekritik, Interpretation, Kommunikation, Linguistik, Lorianismus, Metapher, Populärliteratur, Semiotik, Sprache, Strukturalismus, Text, Verhimmelung

953

优生学（Eugenik）

A: ʿilm al-wirāṯa al-taḥsīnīya.

E: eugenics.

F: eugénisme.

R: evgenika (евгеника).

S: eugenesia.

优生学（eugenics）这个概念在19世纪末由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它源自古希

腊语 εὐγένεια（出身高贵），指“改良遗传的科学”（1883，第24—25页）。在此以前，对人的再生产，即生殖的调节已有漫长的历史。不仅禁止乱伦和强制族外婚对文明发展有着根本的意义，有史书记载以来，人就一直梦想着通过“拣选”变得更美、更健康、更强，避免出现畸形、疾病、智力低下等现象。由此既产生了幸福的渴望，也产生了统治的策略，使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充满矛盾。实践中调节人的生殖行为的办法，包括禁止特定病患繁殖、婚姻限制、堕胎和杀婴。

1. 众所周知，自古典时代起就有在“质”上干预人的繁殖的主张和行动（Weingart 1984，第173—188页；Weß 1989），其目的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身体再生产找到最佳方案，筛除病人和残疾人，避
954 免他们进行繁殖。尚武城邦斯巴达盛行抛弃或杀死“发育畸形”的新生儿（Feen 1983）。柏拉图的《理想国》（V，458d—460c）可以被视为最早的优生学乌托邦国家之一。为了培育出精英，“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V，459d）。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要求：“凡属畸形与残废的婴儿禁止哺养。”（VII，1335b 19）这些用政策干预人口质量的观念，根据的是观察到的表现型和移用到人身上的饲养动物的经验。

这类思想在近代早期的国家和社会乌托邦构想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如莫尔的《乌托邦》（1516）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2/1623），直到启蒙运动中各种令人在生物学上臻于完美的工程（Hilts 1986）。

尼采预料到了消极优生学方案的毁灭潜能，兴奋地称之为“让面相学成为其他一切问题的女王”，“将人类培育为完全的、更高的存在”并“以无情的严酷对抗生命的退化和寄生虫化”的“伟大政策”（KSA 13，第638页）。福柯认为，在这个地方，资产阶级从贵族接过“标志和维护自身等级区别的工作”，将“血的形式，即祖先的年代和姻亲的价值的形式”转变为“子孙”和“子孙有机体的健康”的形式（Foucault 1977，第149—150页）。“第一代优生学家”处在“从‘血统’向‘性’过渡”的门槛前，他们“完善种类的梦想”让“血统的问题变成对性的强制管理问题”，管理目标是“规定优质婚姻”“实现预期生育能力”和“促进新生儿的健康和寿命”（第177页）。福柯认为围绕上述功能成型的**生命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第168页）。赫胥黎（Huxley）的《美丽新世界》（*Schöne*

neue Welt，1932）描述了一个“运行可靠的优生学系统，目的就是按规范生产出人力资源”（Huxley 1949，第14页），大概是同一主题中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特别在纳粹实施“灭绝不值得生存的生命”以后，优生学的观念彻底地声名狼藉了，优生学已完全成为一个恶劣的“乌托邦”。阿多诺指出：“从技术的发展程度来看，实现它曾指日可待，而它
955 今天粉碎了这样一种天真信念：技术文明所谓的肿瘤将在永不止息的进步中自然痊愈。”（GS 10. I，第99页）

2.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的暮年时代，优生学才开始被确立为一门科学。但是二人都在广义上回应过优生学的要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类概念“纯粹用肉体的产生过程来解释……存在的生理缺陷和智力缺陷”，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存在于现存社会关系中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MEW 3，第410页）恩格斯晚年曾以讽刺讥嘲的笔调反驳杜林提出的婚姻监管和“安乐死”的要求。杜林的依据是“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素质要“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Dühring 1875，第246页）。“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同上），比数量重要得多。这里出现了从量到“质”的人口政策转变。杜林从“未降生的世界”（第396页）的立场出发为消极优生学辩护：“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第246页）

恩格斯指出，这些“神秘的陈述”对于怎样“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没有给出“任何指导”，他认为“预防的”和“选择的”办法是“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MEW 20，第301—302页）。

3. 社会达尔文主义、人口统计学和“退化”（Degeneration）共同交织的话语在19世纪末成为科学优生学的范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Schmuhl 1987，第49—58页）预测“生存斗争”中“天赋条件”处于劣势的人群将因为“演化压力”而灭绝，这一预测在资本主义中长期存在的贫困现象面前逐渐失去可信度。随着工人运动争取到国家干预 956
的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反向选择学说：医学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成就提高了病人和残疾人的生存机会，将威胁到人的进化。精神病医生本尼迪克特·奥古斯特·莫雷尔（Bénedict August Morel）的退化理论“根据对身受残酷剥削的无产

阶级的观察”（Castel 1979，第 296 页）将健康的毁灭解释成遗传素质的问题。

“退化”的幻觉和更早前马尔萨斯所提出的人口和生活资料增长比率不同的学说，结合成了这样一种观点：社会和遗传意义上“高价值”群体的增长率日趋下降，相反，“低价值”群体的人口增长呈指数上升。优生学宣布，出路在于运用**人工选择**进行理性化繁殖，这将带来“与经济生产过程理性化相似的效率提升”（Kühl 1997，第 21 页）。

20 世纪初出现并成为主导科学的遗传学，在“社会问题医学化”（Dörner 1989，第 27 页）的潮流中产生的优生学，都遵循这一观念：心理和身体素质呈现出遗传信息携带者个人的或群体遗传信息库的可遗传的“质”。这一构想催生了按照“退化理论和新人培育乌托邦的二元划分”（Schmuhl 1987，第 53 页）**干预质量的人口政策**。由此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策略：**消极优生学**旨在用限制和阻止繁殖消灭“劣质遗传物质”。“‘安乐死’作为消极优生学的极端形式，体现了种族优生的**终极手段**（*ultima ratio*）。”（第 40 页）消极优生学所包含的灭绝倾向，在德国法西斯系统实施的强制绝育、对数十万归类为“反社会分子”的病人、残疾人的屠杀中变成了现实（参见 Haug 1981 和 1986；Bock 1986；Czarnowski 1991；Baader 1993）。**积极优生学**希望通过培育的、生殖医学的措施增加“期待的”素质（例如“高身体机能”者的精子银行），通过科技手段和社会福利政策促进“高价值”群体的生育率。

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1895 年提出的概念**种族优生**（*Rassenhygiene*）在德国流行一时。许多优生学家都指出这个可疑的概念为种族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重新把科学的处理 957
方法、思维模式当作结合优生学和种族优生的根本因素”，最终却导致“基本上混同地”使用两个概念，“科学和社会政治的携手合作压倒了特定的矛盾”（Kroll 1983，第 19 页）。优生学家比大部分“种族优生学家”更尖锐地批评给不同“种族”划分等级、“增加雅利安北方人种比率”的民族目标和反犹主义宣传等等做法。尽管如此，德国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左派的优生学家还是陷入了区分“高价值”和“低价值分子”的话语中，这一话语后来在纳粹的“选择”和灭绝政策中达到顶点。

历史研究曾集中探讨过下列问题：各种反动的潮流怎样汇集为纳粹的优生学和“种族优生”，此时囿于优生学范式的左派对“种族优生”的批判为何在魏玛共和国基本未曝露出自己的弱点。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德国出现了优生学历史的批判研究（Grossmann 1986；

Zimmermann 1988；Herlitzius 1995；Schwartz 1989，1995）。对优生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联的分析，直到90年代中叶仍局限于传记个案（Roth 1985，Wolff 1993）和苏联优生学的初步概览（Wess 1989，Adams 1990）。

4.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思维促使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工人运动将优生学理解为一种医学预防的方案。一种“被理解成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Steinberg 1972，第53页）有利于第二国际接受优生学。除了部分肯定地接受和重申退化恐惧，科学主义的进步信仰和彻底征服自然的目标都促使将优生学的方案转换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在世界大战和战后危机期间，社会民主党开始转向实用主义的‘优生学改良主义’”（Schwartz 1995，第332页），苏联早期也接受了这一转向。

4.1 考茨基1892年评论“种族优生”的创建者威廉·沙尔迈尔（Wilhelm Schallmayer）的书评开启了社会民主党的论争。他反对用医学和卫生手段“阻
958 止无用的个体结婚和繁殖”，因为在他看来“退化是**群众现象**”，优生学控制生育无异于“判处全部城区、全部工业区甚至可能全部省份的绝大多数人口独身不婚”（Kautsky 1892，第645页）。针对普勒茨宣称的退化危险，梅林表示了谨慎的怀疑：“我们是否已陷入退化，还远未可定论。”（Mehring 1894/95，第825页）他认为“人道事业威胁我们种族品质的担忧”，可能“被夸大了”（第826页）。

德国社民党拒绝遗传决定论、强调卫生和社会政策作用的观点，最后归结为“遗传和环境改良的合题”（Schwartz 1995，第40页）。与此不同的是，费迪南德·弗赖（Ferdinand Frey）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疾病根源”（1902/03，第409页）。他评价教会和国家有权干涉生育这一个人决定领域的主张是“危害公众而极端反动的建议”。这种干涉权会导致形成一个“压迫所有个人自由的监狱国家”（第411页）。奥地利女马克思主义者澳达·奥尔贝格（Oda Olberg）也反对沙尔迈尔的观点，她认为只需要解释一点便已足够：“广大群众出现退化的环境并非产生于有产者的无知，而是经济关系这一财产基础的伴随现象。”（1906，第726页）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种族优生才会变成一门具有突出意义的实践科学，为新社会的伦理提供新的指南”（第727页）。

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消灭贫困的经济根源，但是“首先会加强其他退化的因素，这恰恰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减轻人们的生活负担，降低向人们施加的要求，让老年人和残疾人都能得

到最精心的照顾”（1910，第263页）。考茨基赞成“用人工选择取代生存斗争所导致的自然选择，人工选择的办法是让所有可能生育出生病儿童的体弱多病的个体都放弃繁殖”。但不是“当局用警察禁令和罚单进行干预”，而是仅“公共舆论和本人良心的声音就能起调节作用”（第264页）。

959 4.2 卡尔·柯尔施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曾受费边社的影响，细致地研究过英美优生学运动的著作（Freeden 1979；Searle 1976；Paul 1984）。柯尔施“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并且肯定“种族优生话语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欣赏哈维洛克·霭理士（Havelok Ellis）（1912）书中“从社会改良向种族优生的发展”（Haug 1986，第68页）。柯尔施迷恋于这样一种尝试：“用生物学代替迄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从而赋予社会改良的根本要求以新的、更迫切的重点。”（GA 1，第367页）在他评论爱德加·舒斯特（Edgar Schuster）的《优生学》（*Eugenics*，1913）的一篇书评中，“纳粹用种族优生置换社会政策的话语几乎已露出端倪”，“尽管柯尔施不曾考虑强制、暴力乃至灭绝”（Haug 1986，第69页）。虽然柯尔施没有留下对他曾经痴迷的费边主义优生学的自我反思，但他“一战”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深刻地改变了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思想，这清楚地表现为他对考茨基“庸俗的‘生存斗争’哲学”的尖锐批判（1929，第40页）。

4.3 魏玛共和国社会政策上的让步，使得地区卫生保障设施在1929年经济危机以前得到扩建的机会，扩建过程体现了从救济到预防的思路转变。工人福利组织的卫生政策部门和社民党开始讨论避孕、安全人工流产、婚姻指导、绝育和收容等问题（Schwartz 1995，第99—153页；Reyer 1991）。虽然优生学问题在1919年以后“集中在党的医学和社会政策专家身上”（Schwartz 1995，第555页），但专家们通过议会辩论、研讨会和宣传出版进行了广泛的普及工作。20年代初的主导议题是通过健康证明进行的消极优生学婚姻限制，20年代中叶以后，右翼种族优生学家主张的所谓“遗传低价值分子”绝育计划则成为讨论的核心。

社会民主党人、医生阿尔弗雷德·格罗特雅恩（Alfred Grotjahn）鼓吹用限制性的消极优生学应对“退化携带者的无穷增长”，主张“尽可能收容全部遗传缺陷患者”，并“及时分发避孕药品”（1921，第146—147页），对“表现出某种身体或精神缺陷”的“全体 960
人口的整三分之一”（第144—145页）实施分级强制治疗。他的这些主张一部分甚至超过了右翼种族优生学家（Roth

1984，Weindling 1984）。他相信一种“以科学优生学为依据的社会主义人口政策”将“用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全面地充实德国社会主义，这种民族责任感在‘一战’初期、战败，特别是战后岁月中引领着大多数社会主义领导人，使他们得以维系这个国家”（1926，第291页）。

格罗特雅恩指导的博士马克斯·霍丹（Max Hodann）希望通过“推广优生学知识”树立“优生学责任感”（第10页）。他很早就反驳过“民族幻想家”“从文化兴趣出发”鼓吹的“种族纯洁性”主张（第12页）。

5. 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深刻分裂，使得优生学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倾向于各自加入对立的阵营，但不久以后，同样的矛盾也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再次产生。

5.1 莫斯科的杂志《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发展成了共产党批判改良主义优生学的平台。奥古斯特·塔尔海默（August Thalheimer）抨击奥尔贝格基于文化社会主义的种族优生学，奥尔贝格（1924）在“一战”以后不再将社会主义视为优生学的前提，而是鼓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控制生育（政策）。塔尔海默指责道，“一个时时刻刻准备着用最先进的毒气科技屠戮成百上千万最优秀的劳动力的社会里的种族优生”无异于“麻木不仁、令人作呕、地道小资产阶级的伪善”，如果“不谈种族优生唯心主义而指出资本增殖的需要和帝国主义军事的需要”，那么“小资产阶级的麻木不仁所伪饰和美化的现实”就一清二楚了（1925，第527页）。

瓦尔特·本雅明的胞弟、1942年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格奥尔格·本雅明（Georg Benjamin），曾参与起草德国共产党的卫生政策纲领文件。他1928年的小册子《让弱者去死？》（*Tod den Schwachen?*）反驳当时开始宣传的强制绝育。他认为，强制绝育属于“种族优生近年出现的倾向”，种族优生“服务 961
于加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强制绝育又属于“那种全部思维方式都为资产阶级国家服务的医学的典型表现”（第5页）。他指出，种族优生的理由会促使削减社会福利：“‘种族’，准确地说富有的资产阶级的种族得到保护，因为他们的钱包得到保护，不用管其中无利可图的无产阶级救济机构的需要。”（第12页）

共产国际的生物学家马克斯·莱温（Max Levien）1928年回应右翼种族优生学家，援引研究成果认为“不存在可遗传的退化”，至多社会导致的“衰弱”也是“群众的个人肉体存在的现象，但不是群众的遗传素质，也即不是内在固

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因而能够通过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消灭”（第 192 页）。莱温担心，“‘培育雅利安北方人种’的主张”使得种族主义成为“人民优生学值得科学严肃对待的所有努力的头号危险”，这些努力是“地球上各族人民有目共睹的”（第 155 页）。只有“人的种族上升为人的类的概念”，种族优生才具有“社会主义的优生学”的“存在合理性”（第 162 页）。

莱温认为，社会主义是人“变成主体，变成人自己的类的创造者”的前提条件，因为社会主义中“科学将发挥出难以预料的力量，理性地实用地充分利用遗传规律以创造人的更高类型”，“有意识创造的这种类型……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的生存条件”（1928，第 163 页）。他仍没有讨论积极优生学使人的生命服从功利主义价值等级的问题，功利主义的价值等级和无阶级社会的平等理想相悖。

雅斯贝尔斯 1944 年的学生，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遇害的保罗·路德维希·兰茨贝格（Paul Ludwig Landsberg）1933 年在流亡巴黎的《社会研究杂志》（*ZfS*）上发表的文章中仍认为：“种族优生”如果有意“提高人的质量以推动人的上升”，那么还是“大体正确的思想”；但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没有哪个群体能“得到生物学的改进”，因为“人的自然选择的基本因素原则上在于个人爱情选择中尽可能有益的决定方向”，那么种族优生只有在性关系发生变革的框架下才有意义：性关系变革的关键一步是“将爱情从经济的锁链下解放出来”，这样就把“人类生物学改进的思想纳入了总体变革的思想中”（第 394—395 页）。兰茨贝格所代表的少数批评家认识到，“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医学家”的种族优生学都具有准宗教的性质。他认为这是“乐于自认为有着科学根据的普遍进步信念的一种极其强烈的特殊形式”（第 405 页）的结果。

5.2 托洛茨基曾着迷于遗传学的进步，描绘人变得“更加高贵”的乌托邦。他声称，“人类，这倜化的智人”，应当“重新彻底改造——在自己手上变成人工筛选和生理训练等极为复杂工序的对象”（1923，第 371 页）。在经济变革以后必须进行一场“传统家庭生活的根本改造”，这场改造要在“无意识的、基础的和地下的最深最暗的角落”占领最后一座堡垒——“人的天性本身”。托洛茨基将社会解放的纲领同征服自然的蓝图结合起来：“人类停止向上帝、皇帝和资本匍匐跪拜，不是为了又向阴暗的遗传规律和盲目的自然选择规律谦卑地投降！”相反，人应当“把自己立为目标”，以“创造出一种社会的、生物的更高类型，创造出超人”（第 372 页）。

962

托洛茨基认为，当代的人是一种“生物学上的早产儿”，他们“一旦解决了自己所在社会的无政府力量”，就要“自己对自己展开工作”。在“化学家的曲颈瓶”中，人类被视为“原材料，至多是物理和心理上的半成品。充满矛盾的、不和谐的当代人将为一个更加幸福的新种族开辟道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将意味着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1932，第422—423页）。

5.3 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形成“布尔什维克优生学”的同时，科研组织也随着工业化的起步而发生变革。自由主义的医学家、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尼古拉·K.科利佐夫（Nikolaij K. Kolcov）、尤里·A.菲利普琴科（Juri A. Filipcenko）和维克多·V.布纳克（Viktor V. Bunak）等人在十月革命后创办了优生学学会和杂志（Frolow/Pastusny 1984; Weß 1989; Adams 1990），但是逐渐被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骨干取代。

963

苏联的首席遗传学家之一亚历山大·S.谢列布罗夫斯基（Alexander S. Serebrovskij）反对致力于“构建和实现某种脱离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而存在的‘理想超人’”的“乌托邦优生学”（1929，第125页）。他认为“有组织地筛选人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人工受精”，人工受精“只有在社会主义”，而且要“在最终摧毁家庭、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爱情和生育分离以后”才可能进行。“爱情变成纯粹的私人事务”，而“生育……应当变成社会的事务”（第126页）。

按计划管理人的生产的梦想集中体现在“伟大转变”之年（1929年）的强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的维持和发展需要”许多“健康、有天赋和活泼的儿童”，因此谢列布罗夫斯基要求“人的生产这个领域也有权提出产品质量的问题”（第127页）。他相信一项“规模宏大的人类优生学紧急方案”将“在短期内大幅提高苏联人口的生产效率，使得五年计划能在一半时间内完成”（Weß 1989，第117页）。

“生育小孩不可以直接使用‘爱人’的精子，相反为了完成筛选计划，精子必须从特定的适当的捐赠者提取”，“传播这一观念”首先有赖于教育（第128页）。谢列布罗夫斯基拒绝“绝育、婚姻禁令”等“西方优生学的强制措施”，因为这些强制措施只能“用亚述、巴比伦或埃及式的专制制度实现”（第126页）。他认为优生学应当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戒律，反复强调“破坏这一许多代人的复杂计划是反社会的犯罪”（第128页）。

对马克思主义的育种幻想的批判整理并不顺利，它受到强制推行李森科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的苏联留下

964

的禁忌的阻碍。李森科主义（Lecourt 1976）将已经用证据证明染色体控制遗传的古典遗传学污蔑为“资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优生学”也随着苏联遗传学家遭受的政治迫害而消失（Weß 1989，第54—68页；Adams 1990，第197—201页）。

一种论题认为，“**社会主义和优生学意识形态亲缘性**显著”，二者都具有“结构整齐划一、集体主义、旨在改变全社会的科学主义社会技术”（Schwartz 1995，第328页）的特征。这个说法不成立的地方在于它忽视了，优生学所阐发的社会主义蓝图以特定的统治形式为前提条件，在这些统治形式之下，解放的目标则扭曲为社会技术。

6. 纳粹集中营和灭绝营的人体实验罪行与“种族优生学”大屠杀在1945年后首先导致优生学失去合法性。但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凭借基因就掌握了解释和调节社会问题的钥匙，依然蛰伏在社会生物学和人类学的种族主义派别里。群体遗传学50年代在美国兴起，优生学策略重新在科学和政治上夺取了地盘（Kühl 1997）。

随着60年代初以来分子遗传学和人类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控制也开辟出了经过修正的新形式。“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标志着“优生学思维的一次转折”，“从社会技术的筛选转变为分子遗传学的‘技术解决’（或称基因解决）”，也就是转变为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试验（Weingart/Bayertz/Kroll 1988，第649页）。生殖医学技术的应用使人得以对遗传缺陷进行常规分析，即基因扫描（Gen-Screening）。因此治疗和预防的目的与优生学的控制和选择就产生了重合。产前检测和超声检测自60年代中叶以来发展成了常规项目。建设成网络的人类遗传学咨询点形成了国家的基础设施，使国家能够进行大批量的基因扫描。

6.1 民主德国遗传学家、医学界和哲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讨论这一发展的后果。在第二届屈隆斯博恩研讨会上，汉斯·阿尔布雷希特·弗赖（Hans Albrecht Frey）斥责优生学的企图是“彻底荒唐的，和人的原则与尊严不能相容”（1972，第53页），但又接受经过更新的退化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有害基因的数量”将“在群体中上升”（第55页）。他根据这一判断所主张的“突变预防”是面向全民主德国的消极优生学方案，以“应对威胁未来数十年的质量乃至数量上的不利影响”（第56—57页）。弗赖提出的“积极遗传卫生保健工作”包括，“既为遗传病患者，也为健康人及其家属提供人类遗传学的家庭咨询”，自愿绝育作为“谨慎的卫生防护措施”，“完整统计全部畸形

965

患者，确定全部畸形患者必须遵守的登记义务”以“建立遗传卫生信息表”（第58—59页）。

汉斯·马丁·迪特尔（Hans Martin Dietl）、海因兹·加泽（Heinz Gahse）、汉斯-格奥尔格·克兰霍尔德（Hans-Georg Kranhold）也希望“实现全部人口基因库的改善——或者说防止其恶化”（1977，第13页）。他们对积极优生学的计划表示怀疑，批评“根据预先设立的理想来确定改善的目标”是“纯粹的主观主义”，而且“最后会变为用遗传学延续帝国主义的阶级统治”。“不能从遗传学的立场得出优劣的标准。”（第37页）他们认为，“鼓捣摆弄人的遗传结构以改变人的遗传稳定性、可变性和多样性的做法”由于“这类干涉不可逆的性质”，是“至为危险和不负责任的试验”（同上）。

6.2 面对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和生殖医学的生产/破坏力量的飞速发展，80年代中叶以来主要在妇女运动、生态运动以及残疾人团体中出现了批判分析和政治抗议的尝试。抗议在国际上的代表有女权主义反对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国际联络组织（Jansen 1986）。他们的批评针对用产前检测满足消极优生学目标、
966 用生殖医学（“精英”的精子银行、体外人工受精）满足积极优生学目标的人口政策。

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 1985）、杰内·科列亚（Gene Corea 1986）、维丽娜·施托尔克（Verena Stolcke 1987）和安娜·贝格曼（Anna Bergmann 1992）以生殖技术和父权制统治策略的关联为研究主题。她们希望展现，在生殖医学中男性如何通过技术控制，掌握了支配繁殖过程（妊娠、分娩、避孕和绝育）的权力。

应该考虑到，“迄今为止总是由于对遗传基础的无知而失败”的优生学方案，随着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正在“系统地拆除”“障碍”。在缺乏政治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只有价值体系和法律规定还能保护人的基因组不受操纵干涉”（Schurig 1991，第32页）。此外，“研究到底必须在哪里止步”的伦理政治问题依然尖锐，“因为这种研究危害着，甚或趋向于毁灭人自我决定的主体性，即人的尊严和生存权”（Roth 1985，第148页）。

7. 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原理》（*Prinzip Hoffnung*，1953）中批判但绝非全盘反对地反思了培育新人的乌托邦和臻于完善的幻想。一方面，他认为“如果社会变好的希望不为人知、不受重视，那么任何生物变好的希望都是缥缈不定的”（GA 5，第541页）。“培育人的社会必须首先自身受培育，才能不让食人者的要求决定新人的营养。”（第

533 页）因此，“最好的优生学大概就在于良好的饮食和住所，在于无忧的童年”（第 532 页）。另一方面，恩斯特又坚持“控制个人生物性状、作为‘命运’的性状”的“目标”（第 533 页）。他认为“超越和重组是人极为本质的力量，它在人体内停息”是“不可能的”（第 541 页）——“只有在不以利润为目标的经济中，干涉和重组有机体的梦想才能解除毒性”。这不仅要“马克思主义地、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且要“有意识地介入人产生和人在历史上出现以前便肉体生活于其中的先决条件，就是人在子宫里的存在，进而人由此被赋予的身体状态。不再甘于自己正好已经之所是，
967 对于绝不忍受命运的人来说，是明显的想法。他很容易有勇气要在出生以前设置身体的资质”（第 545—546 页）。布洛赫认可这种做法，理由是：“人在社会中不再是奴隶以后，就也不再是人自己的奴隶。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按照他们在社会所获得和将获得的自由尺度良好地发育。”（第 546 页）

正是这种“人类工程学”（Human engineering）的理由遭到君特·安德斯（Günter Anders）（1956）的质疑，他针对运用分子技术的优生学指出：“人以前从来不敢完全地拒绝他之所是，像这些技术已经实现的那样如此激进地‘抗拒命运’（*rejectio fati*）……和‘人类工程学’的企图相比，建造巴别塔都显得是羔羊般虔诚的事”，因为“应当借助怎样的标准来找到或遵守可以容许的上限，过去都是不确定的。而现在人一旦可以自由决定物的制造，就彻底不再拥有这样的标准，除非人**自己把自己**当作标准，也就是人规定：人‘比自身更小’，‘不再跟得上’自己，即不再能够应付他自己的产品的时刻，就达到了临界点。这个时刻就是今天。至少确定的是，如果人连这一界限也藐视并且改变自己的身体，那么人就开启了根本全新、闻所未闻的一章”（第 45 页）。安德斯认为关键在于早已出现的技术统治，技术统治导致“我们为了有利于我们的工具而改变自己，因为我们把工具本身当作我们改变的模板，也就是放弃把我们自己当作标准，从而限制或放弃我们的自由”（第 46—47 页）。

美国女性主义者如女作家玛吉·皮尔西（Marge Piercy）、女技术哲学家唐娜·J. 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希望寻找一条新的进路。皮尔西将子宫外生殖的设想和生态社会主义、激进民主的社会构想结合起来，在她的社会构想中，生物学性别在社会统治的框架中失去了原有的作用，父母的身份变成纯粹社会文化的现象（1976）。哈拉维对长期以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工技术成为人体一部分的“补充物”展

开激进的思考（1995，1996），受她影响，皮尔西在乌托邦小说《他、她和它》（*He, She and It*）中塑造了赛博格的形象，并把它和布拉格犹太区的戈仑魔像
968 （Golem）传说相映照。两位女作家都将这个危险的场域“辩证”地呈现为矛盾中的斗争，而不是将它“形而上学”地视为统治的场域，从而将它拱手让给统治者。

参考文献：

M. B. Adams (Hg.),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Oxford-New York-Toronto 1990; G.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1, München 1956; G. Baader, »Rassenhygiene und Eugenik«, in: *Medizin im ›Dritten Reich‹*, hgg. v. J. Bleker u. N. Jachertz, Köln 1993, 36–42; G. Benjamin, *Tod den Schwachen? Neue Tendenzen der Klassenmedizin*, Berlin 1928; A. Bergmann, *Die verhütete Sexualität. Die Anfänge der modernen Geburtenkontrolle*, Hamburg 1992; G. Bock, *Zwangssterilisation im NS*, Opladen 1986; R. Castel, *Die psychiatrische Ordnung*, Frankfurt/M 1979; G. Corea, *MutterMaschine. Reproduktionstechnologien von der künstlichen Befruchtung zur künstlichen Gebärmutter*, Berlin/W 1986; G. Czarnowski, *Das kontrollierte Paar. Ehe- und Sexualpolitik im NS*, Weinheim 1991; Th. Degner , S. Kõbsell, *›Hauptsache es ist gesund‹? Weibliche Selbstbestimmung unter humangenetischer Kontrolle*, Hamburg 1992; H. M. Dietl, H. Gahse, H.-G. Kranhold (Hg.), *Humangenetik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Jena 1977; K. Dõrner, »Was unterscheidet die heutigen Überlegungen zur Sterilisation von Menschen mit geistiger Behinderung von der Zwangssterilisation der NS-Zeit?«, in: *Schwangerschaftsverhütung bei Menschen mit geistiger Behinderung—notwendig, mõglich, erlaubt?*, hgg. v. T. Neuer-Miebach, H. Krebs, Marburg 1987, 39–54; ders., *Tödliches Mitleid. Zur Frage der Unerträglichkeit des Lebens, oder die Soziale Frage: Entstehung, Medizinalisierung, NS-Endlõsung, heute, morgen* (1988), Gütersloh 1989; E. Dühring, *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 R. H. Feen, »Abortion and Exposure in Ancient Greece«, in: *Abortion and the Status of the Fetus*, hgg. v. W. Bondeson u. a., Dordrecht 1983, 31–53; M. Foucault, *Der Wille zum Wissen.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1*, Frankfurt/M 1977; M. Freeden, »Eugenics and Progressive Thought«, in: *Historical Journal*, 22. Jg, 1979, 645–71; F. Frey, »Entar-

tung«, in: *NZ*, 21. Jg., T. 2, 1902/03, 407–11; H. A. Freye, »Notwendigkeit und Möglichkeit einer neuen Eugenik im Lichte moderner Humangenetik«, in: *II. Kühlungsborner Kolloquium. Philosophische und ethische Probleme der modernen Genetik*, hgg. v. E. Geissler u. H. Ley, Berlin/DDR 1972, 53–62; I. T. Frolow, S. A. Pastusny, »Die Evolution der russischen Eugenik. Kritik der Neo-Eugenik«, in: *Eugenik. Entstehung und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Bedingtheit*, hgg. v. H.-M. Dietl, Jena 1984, 59–78; F. Galton, *Inquiries into Human Faculty and Its Development*, London 1883; ders., »Eugenics. Its Definition, Scope and Aims«, in: *Sociological Papers*, 1. Jg., 1905, 45–50; A. Grossmann, »Berliner Ärztinnen und Volksgesundhei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Zwischen Sexualreform und Eugenik«, in: *Unter allen Umständen. Frauengeschichte(n) in Berlin*, hgg. v. Ch. Eifert u. a., Berlin/W 1986, 183–217; A. Grotjahn, *Geburten-Rückgang und Geburten-Regelung im Lichte der individuellen und der sozialen Hygiene* (1914), Berlin 1921; ders., *Die Hygiene der menschlichen Fortpflanzung. Versuch einer praktischen Eugenik*, Berlin-Wien 1926; ders., *Erlebtes und Erstrebtes. Erinnerungen eines sozialistischen Arztes*, Berlin 1932; D. Haraway, *Monströse Versprechen. Coyote-Geschichten zu Feminismus und Technowissenschaft*, Berlin-Hamburg 1995; dies.,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ium.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London 1996; W. F. Haug, »Medizin und Psychiatrie als ideologische Mächte im Faschismus und ihre Mitwirkung bei den Ausrottungspolitiken« (1981), in: *Sozialpsychiatrische Informationen*, Nr. 77/78, 1983, 8–25; ders., *Die Faschisierung des bürgerlichen Subjekts. Die Ideologie der gesunden Normalität und die Ausrottungspolitiken im deutschen Faschismus*, AS 80, Berlin/W 1986; A. Herlitzius, *Frauenbefreiung und Rassenideologie. Rassenhygiene und Eugenik im politischen Programm der ›Radikalen Frauenbewegung‹ (1900–1933)*, Wiesbaden 1995; V. Hilts, »Enlightenment views on the genetic perfectibility of man«, in: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in the Sciences*, Cambridge 1984, 255–71; M. Hodann, *Eltern- und Kleinkinder-Hygiene (Eugenik). Anregungen für Erzieher*, Leipzig 1924; A. Huxley, »Vorwort« (1949), in: *Schöne neue Welt. Ein Roman der Zukunft* (1932), Frankfurt/M 1978, 7–15; S. Jansen, »Bericht über die Konferenz des FINNRET/FINRRAGE. 3.-8-Juli 1985 in Schweden«, in: *Frauen gegen Gen-*

969

technik und Reproduktionsmedizin, hgg. v. Die Grünen im Bundestag u.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 und Praxis für Frauen e. V. Köln, Köln 1986, 193–95; K. Kautsky, »Medizinisches«, in: *NZ*, 10. Jg., 1892, T. 1, 644–51; ders, *Vermehrung und Entwicklung in Natur und 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10; A. Klevenow, »Geburtenregelung und ›Menschenökonomie‹: Die Kongresse für Sexualreform 1921 bis 1930«, in: *Der Griff nach der Bevölkerung*, hgg. v. H. Kaupen-Haas, Hamburg 1986, 64–89; K. Korsch,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Karl Kautsky*, Leipzig 1929; J. Kroll, *Zur Entstehung und Institutionalisierung ein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Bewegung. Die Entwicklung der Eugenik/Rassenhygiene bis zum Jahre 1933*, Diss. phil., Tübingen 1983; St. Kühl, *Die Internationale der Rassisten.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internationalen Bewegung fü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m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M-New York 1997; P. L. Landsberg, »Rassenideologie und Rassenwissenschaft«, in: *ZfS*, 2. Jg., 1933 (Paris 1934), 388–406; D. Lecourt, *Proletarische Wissenschaft? Der ›Fall Lyssenko‹ und der Lyssenkismus*, Berlin/W 1976; M. Levien, »Stimmen aus dem teutschen Urwalde«,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2. Jg., 1928, 150–196; E. Meyer, »Zur Frage des Geburtenrückganges«, in *NZ*, 31. Jg., 1912/13, T. 2, 382–89; F. Mehring, »Literarische Rundschau« [Rez. zu Ploetz 1895], in: *NZ*, 13. Jg., 1894/95, T. 2, 825–26; M. Mies, »Sexismus und Rassismus. Grundlagen der neuen Fortpflanzungstechnologien«, in: *Menschenversuche: Wahnsinn und Wirklichkeit*, hgg. v. R. Osnowski, Köln 1988; O. Olberg, »Bemerkungen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Sozialismus«, in: *NZ*, 24. Jg., 1906, T. 2, 725–33, dies., »Rassenhygiene und Sozialismus« in: *NZ*, 25. Jg., 1907, T. 1, 882–87; dies., »Die Stellung der sozialistischen Partei zur Geburtenbeschränkung«, in: *Der lebendige Marxismus. Festgabe zum 70. Geburtstag von Karl Kautsky*, hgg. v. O. Jenssen, Jena 1924, 347–65; D. B. Paul, »Eugenics and the Left«,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5. Jg., 1984, 567–90; M. Piercy, *Frau am Abgrund der Zeit* (1976), Berlin-Hamburg 1996; dies., *Er, Sie und Es* (1991), Berlin-Hamburg 1993; A. Ploetz, *Die Tüchtigkeit unserer Rasse und der Schutz der Schwachen. Ein Versuch über Rassenhygiene und ihr Verhältnis zu den humanen Idealen, besonders dem Socialismus*, Berlin 1895; J. Reyer, *Alte Eugenik und Wohlfahrtspflege.*

970

Entwertung und Funktionalisierung der Fürsorge vo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bis zur Gegenwart, Freiburg/Br. 1991; K.-H. Roth, »Scheinalternativen im Gesundheitswesen: Alfred Grotjahn (1869–1931). Integrationsfigur etablierter Sozialmedizin 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assehygiene‹«, in: *Erfassung zur Vernichtung*, hgg. v. K. H. Roth, Berlin 1984, 31–56; ders., »Sozialer Fortschritt durch Menschenzüchtung«, in: *Gen-Technologie. Die neue soziale Waffe*, hgg. v. F. Hansen, R. Kollek, Hamburg 1985, 120–151; ders., »Schöner neuer Mensch. Der Paradigmenwechsel der klassischen Genetik und seine Auswirkungen auf die Bevölkerungsbiologie des ›Dritten Reichs‹«, in: *Der Griff nach der Bevölkerung*, hgg. v. H. Kaupen-Haas, Hamburg 1986, 11–63; W. Schallmayer, »Rassenhygiene und Sozialismus«, in: *NZ*, 25. Jg., 1907, T. 1, 731–40; H.-W. Schmuhl, *Rassenhygiene, Nationalsozialismus, Euthanasie. Von der Verhütung zu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 1890–1945*, Göttingen 1987; V. Schurig, »Aspekte der Biologie als neuer Leitwissenschaft: Entstehung und Folgen der Molekulargenetik«, in: *Gen-Ideologie. Biologie und Biologismus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hgg. v. J. Heilmeier u. a., AS 175, Berlin-Hamburg 1991, 15–40; M. Schwartz, »Sozialismus und Eugenik. Zur fälligen Revision eines Geschichtsbildes«, in: *IWK*, 25. Jg., 1989, 465–87; ders., »›Proletarier‹ und ›Lumpen‹. Sozialistische Ursprünge eugenischen Denkens«, in: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994, 42. Jg., H. 4, 537–70; ders., *Sozialistische Eugenik. Eugenische Sozialtechnologien in Debatten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Bonn 1995; G. R. Searle, *Eugenics and Politics in Britain 1900–1914*, Leyden 1976; A. Serebovskij, »Anthropogenetik und Eugenik in der 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1929), in: Weß 1989, 120–29; Ch. von Soden, *Sexualberatungsstell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33*, Berlin/W 1988; H. J. Steinberg, *Soziali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I. Weltkrieg*, Bonn 1972; V. Stolcke, »Das Erbe sichern. Die ›Natural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gleichheit«, in: Argument 163, 29. Jg., 1987, 329–46; dies., »Alte Werte—neue Fortpflanzungstechnologien«, in: *Argument* 166, 29. Jg., 1987, 805–22; A. Thalheimer, »Die Auflösung des Austromarxismus«, in: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1. Jg., 1925, 474–557; L. Trotzki, »Literatur und Revolution« (1923), in: *Denkzettel. Politische*

Erfahrungen im Zeitalter der permanenten Revolution, hgg. v. I. Deutscher u. a., Frankfurt/M 1981, 360–73; ders., »Verteidigung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Verteidigung einer Zukunft]« (1932), in: ebd., 420–24; P. Weindling, »Soziale Hygiene, Eugenik und medizinische Praxis. Der Fall Alfred Grotjahn«, in: *Jahrbuch für kritische Medizin* 10, AS 119, Berlin/W 1984, 6–20;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 Cambridge-New York 1989; P. Weingart, »Eugenic Utopias. Blueprints of the Rationalization of Human Evolution«, in: E. Mendelsohn, H. Nowotny (Hg.), *Nineteen Eighty-Four: Science between Utopia and Dystopia*, Dordrecht 1984, 173–87; ders., K. Bayertz, J. Kroll, *Rasse, Blut und Gene.* 971 *Geschichte der Eugenik und Rassenhygiene in Deutschland*, Frankfurt/M 1988; L. Wess, *Die Träume der Genetik. Gentechnische Utopien und sozialer Fortschritt*, Nördlingen 1989; W. Wolff, *Max Hodann (1894–1946). Sozialist und Sexualreformer*, Hamburg 1993; S. Zimmermann, »Weibliche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auf ›Qualität‹ abzielender Bevölkerungspolitik. Ein unverarbeiteter Zusammenhang in den Konzepten der frühen Sexualreform«, in: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21/22, 1988, 53–71.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
(Florian Schmaltz)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nthropologie, Biologismus,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Ethik im Sozialismus, Evolutionismus, Evolutionstheorie, Fabianismus, Familie, Fortschritt, Gattung/Gattungswesen, Geburtenkontrolle, Kampf ums Dasein, Lamarckismus, Lysenkoismus, Malthusianismu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tur, Rasse und Klasse, Rassismus, Reduktionismus, reproduktive Rechte, Sexismus, Sozialdarwinismus, Taylorismus, Technologie, Überbevölkerung, Übermensch, Utilitarismus, Utopie, Zelle

密纳发的猫头鹰 (Eule der Minerva)

A: būmat al-mūnirfā.

E: Owl of Minerva.

F: Oiseau de Minerve.

R: sova Minervy (сова Минервы).

S: lechuza de Minerva.

1. 黑格尔在他《法哲学原理》的“序言”结尾呈现了两幅相互关联、至今影响不衰的图像：“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一种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使之得以认识。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W 7，第 28 页）

“这个比喻是如此辉煌，堪与文学中的伟大比喻，与莎士比亚的手笔媲美。”（Bloch，*Subjekt-Objekt*，第 231 页）

这个比喻应该意指什么，黑格尔已经在上下文中明白交代：他这本书应该“**是把国家作为一种自身有理性的东西来把握和阐述的尝试。作为哲学著作，它必须绝对避免依照国家应该如何存在来构建一个国家的做法。本书所能传授的，不可能达到教导国家它应该如何存在，相反只旨在教导，国家，这个伦理世界，应该如何被认识**”（W 7，第 26 页）。黑格尔声明，他的理论并不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而只批判对象的批判者，或批判历史法学派为这一对象所做的不称职的辩护。如果哲学想要教导世界应该如何存在，那么“反正它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第 28 页）。历史也呈示出，“要等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一个理智世界的形态”（同上）。“哲学家从画家变成猛禽”（Demandt 1978，第 159 页）的双重图像，在这里结合起来。

2. 图像素材具有丰富的含义。“黄昏”和“朝霞”、“正午”和“午夜”是常见的修辞用语。蒙森的《罗马史》第 3 卷第 630 页就写道：“夜晚彻底降临以后，朝霞才会重返。”（引自 Demnandt 1978，第 158 页）马克思在 1847 年也感觉置身于革命的“前夜”（引自同上）。“用一天当中的时段解释当下的处境，这么做的前提只能要么是哈贝马斯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要么是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第 160 页）

猫头鹰是代表死亡、魔法、女巫和魔鬼的鸟，自然会带来降生或幸运的消息，受到各种各样的魔法和反制魔法的魔法驱遣（参见 Bächtold-Stäubli 1929/30，第 1073—1079 页）。它也嵌入了捣蛋鬼提尔·欧伦施皮格尔（Dil Ulenspiegel）的形象，提尔在 1515 年版的《故事集》（*Ein kurtzweilig Lesen*）中就一手拿着镜子，一手拿着猫头鹰。（“欧伦施皮格尔”一名即由“猫头鹰”和“镜子”二词合成。——译者）因此黑格尔写道：“老一代德国人其实是一个风趣的民族……他们把严肃度过一生的

可做的尤利西斯变成了一个愚蠢的欧伦施皮格尔。”（W 2，第 541 页）但是这个诡计多端的平民角色并不愚蠢，相反孺子可教：如果有人敢愚弄他，必然是自讨苦头。“欧伦施皮格尔是破产市民在私人交往中随机应变品质的人格化。”（Haug 1976，第 23 页）

在雅典，猫头鹰与该城的守护神雅典娜联系在一起——因此猫头鹰在法语中也被称为“密纳发之鸟”（l'Oiseau de Minerve）——被“尊为智慧之鸟”（Kl Pauly，第 442 页）：这或许因为它混合了雅典娜的神话形象，神话里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脑中诞生，是人格化的思想产物。黑格尔曾这样谈到密纳发的父亲：“他是政治之神，创造了一项伦理工程——国家。”（*PhilGesch*，W 12，第 101 页）但是阿里斯托芬召唤出的女神雅典娜“带着一只猫头鹰”（《鸟》第
973 516 行），就不会只让雅典人联想起智慧，因为猫头鹰是阿提卡地区的银币上所纹饰的动物，这种硬币也以此得名“猫头鹰”（γλαῦκες），或叫作帕拉德斯（Pallades），因为硬币正面又雕刻有帕拉斯·雅典娜（Pallas Athene）的头像（Kl Pauly，3，第 1449 页）。公元前 5 世纪，雅典试图强迫它的同盟接受“猫头鹰”货币（参见 Austin/Vidal-Naquet 1984，第 91 页），也赋予了“带猫头鹰去雅典”（意为“多此一举”。——译者）这句谚语双重含义。

3. 这个概念获得的普遍接受兑现了原始语境所赋予它的含义。马尔库塞指出：“黑格尔知道，‘一种生活形态’已经变老了……哲学永远不能使它变得年轻”；他的“序言”结尾的段落“奏出了整个法哲学的高音，标志着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所展现的智慧已走向终点、无力使世界恢复生机之后的断念”（*Schriften*，4，第 165—166 页）。阿尔都塞认为，这幅双重图像的含义不是预感到灭亡，而是断言现存事物将永存：黑格尔的总体将时间囊括进当下的体系，当下构成了“全部知识的视域”。“哲学无论走出多么远，都不能超出这种绝对视域的界限：即使哲学等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但它仍然属于白天，而且属于今天白天。它不过是当下的自我反思、概念自身存在的反思：哲学从本质上说排除了明天。”（*LLC*，1，第 124—125 页）恩斯特·布洛赫在《“尚未存在”本体论》（*Zur Ontologie des Noch-nicht-Seins*）中将这幅图像纳入柏拉图以降“用哲学重返起点的”认识构想，它假设对本质的追问“早已得到了解决”，因为本质显得“从史前时代起就静止不变”。“本质就是已存在的。这一魔咒的影响一直延伸到黑格尔，或者说在黑格尔这里达到顶点，至少体现为他的黄昏

的密纳发，体现为他把知识仅仅归类为已生成的内容，体现为他拒斥仍处在开放之中的‘尚未’。”（1961，第23页）与之相近的还有尤尔根·米特尔斯特拉斯（Jürgen Mittelstrass）对黑格尔的这幅图像的理解，虽然他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雅典娜的智慧带来光明——和死亡。如果遵从黑格尔的阐释，哲学、教化就是将世界转变为对世界的思想和记忆。”（1989，第44页）

布洛赫在莱比锡大学的黑格尔课程上又有完全不同的说法：这个比喻后面藏着“古董收藏家黑格尔，正在搜寻着
974 密纳发身上失败主义的一面。在密纳发身后起飞的猫头鹰和生气蓬勃、手执埃癸斯之盾、在清醒的日间显现的女神并不相类。黑格尔自己的哲学的诞生反驳了晚起的猫头鹰的说法，更不用说其中对发展过程充满热情的内容。他的哲学肇端于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精神现象学》完稿于耶拿战役的炮声中，他的学说本身也参与了将年轻的资产阶级推上前台的热月，极其敏锐地把握到自己和‘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拿破仑处在同一历史时刻。假如哲学真的要等到黄昏，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根本不可能在他的时代，而是要到大概1850年后才可能产生”（*Subjekt-Objekt*，第231页）。

与之相反，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则身处一般的理解方向，对它进行意识形态意义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总是事后才作为世界精神出现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这样他实际上就是说，绝对精神似乎只是在想象中创造历史。而之前黑格尔曾经十分坚决地反对认为哲学家本人就是绝对精神的错误理解。”（GS 3，第105页）“但是这种理解，”布洛赫则反驳道，“‘本质上’并不是黑格尔的，也很难算作马克思的，因为虽然马克思认为观念只要和利益发生冲突，就会让自己出丑，但是他也认为，观念只要放弃对抗转而作为意识形态与利益联合在一起，就也能起到参与历史创造的作用。”（*Subjekt-Objekt*，第232页）不过接下来的评价与上文并不连贯：“黑格尔的话是反动的，至少符合他晚年对静止的强烈渴求。”

《法哲学原理》中存在一些纯粹起意识形态合法化作用的段落，比如第286节“王位世袭制的哲学演绎”，属于“就这一论题所写过的最幼稚的东西（而且就此已经写过一些了！）”（Klenner 1982，第129页）。如果抛开这些段落不论，那么明显可以看到，此书的前言和展开的论述相互矛盾。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阐释也认同这一判断。“黑格尔的法哲学教导的东西，除了置身于普鲁士这个被肯定的祖传遗产中的反应以外，还包括司法公开、宣誓法庭、犹太人解放、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地区的

行政自治、人民代表会议。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所发展出来的得到肯定的趋势，符合热月的精神且深化了热月的精
975 神，而不是浪漫派所鼓吹的反动的等级国家式的精神错乱。黑格尔所呈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形式，并不是普鲁士的绝对主义，而是以英国为原型的立宪君主制。君主主义者黑格尔所定义的国王，甚至远比同时期的英国皇家法学家所定义的，还要远为无关紧要得多。”（Bloch，*Subjekt-Objekt*，第233—234页）这话当然不全然成立。一方面，君主以“无根据的直接性”（*RPh*，第281节）行事，行使宗教赦免权（第282节）并凭“无限制的任性”（第283节）任免政府官员。另一方面，君主只是这样一个人，他——但是这一点只出现在马克思的老师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根据黑格尔的口头传授所记录的附释中——“说一句‘是’并在字母I上御笔一点”（第280页，附释）。

无论如何，问题在于：黑格尔为什么在他的猫头鹰比喻中，正如布洛赫所指出的，将“哲学家在政治世界的作用降为一种后见之明（Post festum）”，“这毋宁是一种自吹自擂的谦逊”（*Subjekt-Objekt*，第231页）？又或黑格尔这幅双重图像有着双重含义？

4.“哲学思考中不存在想象的东西。”这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所写的格言。“到处都是人们引以为依据的图像。”他举的例子是“白板”（tabula rasa），这是亚里士多德“偶然应急所使用”的图像，“以它作为灵魂的概念就没有把握住本质”（W 2，第562页）。如果说想象在哲学思考中一无所获，那么哲学在想象中则收获颇丰。哲学借助想象成为普遍的力量，正如黑格尔在另一句格言中所写的：“哲学支配想象，想象支配世界。精神通过意识干预世界的统治……不是刺刀、货币或个别的阴谋诡计在统治……谱写这一切的毋宁是精神。”（第561页）

当然，“精神”既是个体意识的一部分，同时又超越了它。梅林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不能将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这句话解读为，主体为自己创建透明、独立自主的表述方式。而且这句话也许还契合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对比喻的一般反思：“比喻是阐释学的典型范例，但与阐释学方向相反：不是解释使文本更丰富，超越作者已知的注入文本的内容，而是外部输入对文本的生产效率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1979，第79—80页）最终，黑格尔的猫头鹰或是“理论探究的冲动所经 976
历的远古阶段的指准化石之一。这个阶段，并不因为它曾经包含的丰富的刺激推动、真理前景已然无法复归，就必然

是不合时宜的”（第77页）。

5.“哲学，”米特尔斯特拉斯认为，“早已不再是它所在时代的鹰眼。鹰眼象征着力量和洞察力，洞察人的关系、运动、光明和阴影所构成的地形图。取代了鹰的是……黑格尔的猫头鹰。猫头鹰比鹰更靠近事物，但是它在世界活动时沉睡，在世界沉睡时清醒……这正是通常对哲学的理解，而且与之相连的是一种更近于文学和历史而非科学的文化理想。”他希望能够转换“密纳发的智慧的象征和捣蛋鬼、启蒙者提尔·欧伦施皮格尔”的功能，克服哲学和科学的分裂，将“猫头鹰的飞行”变为“二者重新统一的象征”（1989，第9—10页）。但是科学哲学的新猫头鹰似乎有一目失明，因为它看不见**社会的**“运动、光明和阴影”。它看见一种“改变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科学”（同上）光彩夺目，却将**用**科学所创造的，误认为**被**科学所创造的。它缺少马克思“洞察人类关系地形学”的能力，缺少洞察支配科学现实运用的统治力量——资本的鹰眼。失去这种洞察力，科学家就会像政治人（*homo politicus*）一样摆出“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MEW 1，第355页）的派头。米特尔斯特拉斯认为，在“历史主义所理解的科学发展中”——这里暗合波普尔对马克思的批评——“科学理性主要作为**对表现的研究**（第二级的研究），而不像可谬论所理解的科学发展中，作为对研究的表现（第二级的表现）”（1989，第251页）。上述观点其实全然出自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奥斯卡·内格特曾责备《资本论》的接受“相对于马克思的研究逻辑，过分突出表现逻辑”（1976，第38页），认为这是政治上靠不住且迷失方向的体现。但是米特尔斯特拉斯将同样的观点用来对历史进行理性主义批判：“决定真理和谬误的不是历史，而是理性——即使通常正是历史张开理性的眼睛。”（1989，第252页）他没有考虑相反的一面：“历史”作为“被感知的”历史对于“理性”来说，具有和“科学哲学”同样的意义。“理性”本身并不处在这种感知之外。而且，理性作为真理的裁判官，不过是认识论能力对以劳动为形式的获取认识的过程的反思。假如脱离“实践”——熙熙攘攘的人群所交织在一起的、将自己整个地再生产出来的各种实践活动——“理性”就感知不到任何东西。由此出发，米特尔斯特拉斯下面的话才有了意义：“猫头鹰的飞行创造了世界。”（第59页）猫头鹰在这里代表教化在“历史”中形成。“谁想按照世界的‘自在’所是认识世界，就必须把已形成的教化抛开。那么他会找不到……任何还可以算作世界的东西。他几乎返回了单细胞生物的

977

王国——没有概念，没有经验，没有理论。”（第59页）葛兰西有相似的论述（参见 *Gef* 6，H. 11，§20，第1414—1415页），只不过他认为不是猫头鹰的飞行，而是人的实践的总和，尤其是劳动的人的脑和手创造了“人的世界”（马克思语）。

6. 黑格尔笔下密纳发的猫头鹰这个图像，一半是在揭示，一半是在掩盖。也许它最终是在“乔装打扮地隐喻觉醒，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活动着却无知的普通人将活动场域让给有知识却不活动的哲学家……黑格尔有留下悖谬的勇气”（Demandt 1978，第159页）。他没有勇气（这种勇气在他看来或许是不明智的）公开说出反对统治者的意见。就在完成《法哲学原理》的“序言”的二十个月之前，他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仍在欢呼“真诚的精神的黎明”，“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SW XI，第8页）。在此期间发生了刺杀科策布（Kotzebue）事件，由此触发了对所谓“煽动者”的镇压。卡尔-海因兹·伊尔廷（Karl-Heinz Ilting）认为用语的差异证明了黑格尔“对他所在的时代历史境遇和对政治哲学的任务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973，第43页）。变化可能部分出于自我审查，部分是对过往思想的摒弃。卡尔·路德维希·米歇勒（Carl Ludwig Michelet）在1827年和黑格尔的对话中，举出了另一幅和夜晚才会起飞的猫头鹰相对的图像——可惜他话中的“但是……也”模糊了矛盾——“但是哲学也是黎明破晓 978
的雄鸡高鸣，预示着世界重现年轻的形态”。据他记载，黑格尔对此表示同意（*Hegel in Berichten seiner Zeitgenossen*，Berlin/DDR 1971，第331页；引自Klenner 1982，第134页）。

写作博士论文时的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Hefte zur epikureischen Philosophie*）中反对用“心理上的琐屑小事”来写作哲学史，认为要找出“贯穿整个体系的真正的精华”，将它们同“哲学家对它们的论证区别开来，因为哲学家是了解他们自己的。哲学史应该把那种像田鼠一样不声不响地前进的真正的哲学认识同那种滔滔不绝的、显白的、具有多种形式的现象学的主体意识区别开来。这种主体意识是那些哲学论述的容器和动力”（MEGA IV.1，第137页）。这仍然非常符合黑格尔的意思，因为后者的“纹章毋宁是一只田鼠”（Klenner 1982，第127页）。两年以后，马克思（生前未出版的）黑格尔批判的（生前出版的）“导言”以这样一句

话结尾，这句话将生命之鸟、现代的政治民族，作为智慧和死亡之鸟、“诗人和哲人”的民族的对立面：“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MEW 1，第391页）当然，黑格尔也说过“人的自我意识内在的太阳”（W 12，第134页）在西方升起。

参考文献：

M. Austin u. P. Vidal-Naquet, *Gesellschaft und Wirtschaft im alten Griechenland*, München 1984; H. Bächtold-Stäubli, *Hand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 Aberglaubens*, Bd. 3, Berlin-Leipzig 1929/30; E. Bloch, *Subjekt-Objekt. Erläuterungen zu Hegel*, Berlin/DDR 1952; H. Blumenberg, *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 Frankfurt/M 1979; A. Demandt, *Metaphern für Geschichte. Sprachbilder und Gleichnisse im historisch-politischen Denken*, München 1978; *Ein kurtzweilig Lesen von Dil Ulenspiegel*, n. d. Druck v. 1515 hgg. v. W. Lindow, Stuttgart 1968; W. F. Haug, »Die Einübung bürgerlicher Verkehrsformen bei Eulenspiegel«, in: *Vom Faustus bis Karl Valentin. Der Bürger in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AS 3, Karlsruhe 1976, 4–27;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Ed. u. Kommentar in 6 Bdn. v. K.-H. Ilting, Bd. 1, Stuttgart-Bad-Cannstatt 1973; K.-H. Ilting, »Die ›Rechtsphilosophie‹ von 1820 und Hegels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Hegel 1973, 23–126; H. Klenner, »Preußische Eule oder gallischer Hahn?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zwischen Revolution und Reform«, in: *Preußische Reformen—Wirkungen und Grenzen. Sitzungsberichte der AdW der DDR*, Nr. 1/G, Berlin/DDR 1982, 125–37; F. Mehring, *Karl Marx.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GS 3; J. Mittelstrass, *Der Flug der Eule. Von der Vernunft der Wissenschaft und der Aufgabe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89; O. Negt, »Überlegungen zu einer kritischen Lektüre der Schriften von Marx und Engels«, in: *Reihe Theorie und Organisation*, hgg. v. Soz. Büro, H. 1, 1976, 5–40; G. Shapiro, »The Owl of Minerva and the Colors of the Night«, i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Bd. 1, Dearborn/Min. 1977.

979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Bild, Darstellung/Forschung, Dialektik, dialektisches Bild, Elfenbeinturm, Epistemologie, Falsifikationismus, Geist, Hegelkritik,

Imaginäres, Maulwurf, Metapher

欧洲共产主义（Eurokommunismus）

A: šuyū'īya ūrūbīya.

E: Eurocommunism.

F: eurocommunisme.

R: evrokommunizm (еврокоммунизм).

S: eurocomunismo.

在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欧洲共产主义”被用以指称资本主义国家一系列共产主义政党对某些理论、战略和政治观念的概括（Verallgemeinerung），这些观念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kB）中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念形成差异。它们涉及对与改变了的境况相适应的有效战略的探求，涉及关于社会主义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系统性理解，这些理解主要因其民主主义而区别于苏维埃模式：它们由此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realen Sozialismus）的社会体系保持了一种批判性、有距离的差异关系；它们涉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及其实践范围的相对化；涉及一种“**新国际主义**”（*neuer Internationalismus*）方案，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基于各共产主义政党平等关系的多元统一（pluralistische Einheit）；将自身的利益表达为国际问题，比如东西方冲突，战争、和平与军备问题。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是一种长久以来逐渐形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整体的深刻危机的表达形式，是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必然的复兴追求，也即这些政党对于摆脱这一危机和获得成功政策途径的追求。然而就结果而言，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自我改革上的无能，欧洲共产主义最终加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的衰弱和它最终的解体。

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从一开始便模棱两可，具有误导性，因此是成问题和有争议的。这首先是因为它并不适用于欧洲的所有共产主义政党，同时延伸到了欧洲的范围之外。一方面，它遭 980
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特别是那些执政的东欧共产党的决定性拒斥；另一方面，它也并未成功地将那些自命为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各种“异端”（häretisch）联合到一个共同立场之上。而且人们已经无法确切知晓欧洲共产主义这一术语的起源。某些意大利记者被认为首先使用了这一术语，但也有人猜测是兹比格涅夫·卡齐米日·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发明了它（Cesarini 1977，第19页）。它的广泛传播始于1975年秋非共产主义媒体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当时正是1976年6月于柏

林/民主德国召开的欧洲共产主义与工人政党大会的筹备时期。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并非产生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相关政党也仅仅是迟疑并有所保留地接受了它。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那些相关政党而言，20世纪70年代的境况是充满矛盾的。各种积压的问题和困难与新的发展机遇结合在一起。如果忽视这种矛盾性，就无法理解欧洲共产主义内在差异的起源，因为在其中，70年代矛盾的两个方面臻至顶点。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在70年代前半期获得了某种影响力。而为了能将这种影响力用于实现当前的政治和纲领性目标，必须要有新的战略，为广泛的政治联盟建立的全新基础以及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和目标的民主性质可信的宣告和承认。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认识到，他们必须关注其影响得以发挥的条件的显著改变，为此，必须批判性地审视并重新定义部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理论、战略和政治武器（其首要面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并非示范性的解决模式。恰恰相反，现实社会主义的实例影响越来越负面。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至关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自身的新条件。这些新条件包括：**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效应和社会结构转变，1967—1969年抗议运动的后续影响，在传统工人运动之外开展的**新社会和民主运动**，1973年以新的方式发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缓和**，等等。此外，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不属于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家，都试图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现实处境给出符合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答案并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总的来说，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累积的某些问题完全无法得到解决或无法得出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这使得人们难以察觉党业已变化的现实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政策。从20世纪初以来，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西欧工人运动理论家之间对于民主、权力和政党因为理解不同而爆发的冲突，以及十月革命之后对东西方革命的差异问题的冲突，一直以来未获解决，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损害共产主义者的民主可信度。彼时，苏联式的观点作为普遍有效且有约束力的斯大林正统化的列宁主义形式，被强加给其他共产主义政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先在葛兰西那里，继而在东欧人民民主形式中，出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充满希望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以国家为主体，并不遵循苏维埃模式，然而它们很快就被1947年开始的冷战以及斯大林霸权主义（Sta-

981

linscher Hegemonismus）的发展摧毁了。但帕尔米罗·陶里亚蒂领导下的意大利共产党一直坚持一条通过结构性改革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充满矛盾和灾难性的是1948年爆发的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之间的冲突。后者坚持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其他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则被拉拢过来。尽管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一方面表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自我理解的深刻断裂，并表述了某些全新的观点（对立体制和平共存的必要性；战争的可避免性；对于共产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思考：和平方式和对议会的利用），但另一方面它对错误和过时立场的修正以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的探究仍然浅尝辄止。1956年夏秋之际的波匈事件则造成了（苏共二十大之后趋
982 势的）反弹。苏共二十大倡导的**去斯大林化**（*Entstalinisierung*）所带来的自由化以及这一期间的阻碍都引发了落空的希望、不满和群众运动，在双方的这些不满和运动中，各种缺陷、错误以及社会主义的要求和民主的缺乏之间的鸿沟都被突破了。苏联军队军事镇压了旨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匈牙利起义，由此，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得以确立。因此，造成的道德和政治伤害则是无法估量的。

陶里亚蒂对苏维埃模式的系统性批判和他1956—1964年间提出的**多元中心主义**（*Polyzentrismus*），即**多样性统一**（*Einheit in der Vielfalt*）的构想（Togliatti 1968，1977），也因被判定为修正主义而遭到拒绝。20世纪50年代末在**苏共**与**中共**之间发生了意识形态与霸权主义的冲突，这一冲突甚至导致了60年代末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边境武装冲突。在60年代，大多数共产主义政党卷入了这场冲突，其中不少政党因此发生了分裂。由于苏共领导层的权力和路线斗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推翻，由他开启的反斯大林改革路线也被中断。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反对，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对社会主义制度适应新的发展需求的改革计划也在60年代末宣告失败。1968年8月21日华约条约组织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即对所谓“布拉格之春”的暴力镇压，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尤为巨大的道德政治损害。这一暴力镇压同时宣告了苏联内部向保守和停滞的转变以及改革的无力。

西欧共产主义政党坚决拒斥了入侵行为，因为它们曾希望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s）的改革政策中实现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而且将军事干预视为对社会主义原则本身的伤害。执政和非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深刻的公开分

裂，这一分裂再也无法弥合并直接导致了欧洲共产主义的不合。西欧共产主义
983 政党1969年在莫斯科的国际共运会议所要求的对问题批判和建设性的审视，被苏共、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所阻止，因此这些问题日益成为侵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在的争议因素。在“布拉格之春”和之后的欧洲共产主义之间既存在共性又存在差异。两者都追求克服苏维埃模式并将社会主义和民主相结合，两者都是得到当时由政党领导人支持的知识分子运动。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旨在修正和改革既存的、具有内部经济和权力政治限制以及集团内部依赖性的“现实社会主义”秩序，且仅限于一国之内；欧洲共产主义则基于尚需克服的、带有各种限制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对未来战略性方案的国际层面理论探讨。后者还同时涉及对一种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寻求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多数（neue Mehrheit）的探求。就此而言，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政党尤其在新社会运动的发展中看到了对自身的挑战。对意大利共产党（KPI）而言，1970—1973年智利以社会主义导向的人民团结政府（Unidad-Popular-Regierung）的经验和失败为新形式的战略结论提供了示范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证明了他为意大利共产党建立起一种历史性妥协的方向是正确的（1975，第36页及以下）。

令许多共产主义政党沮丧的是，尽管苏共口头承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政党提供平等的权利，但却以固执和粗暴的方式干涉其内部事务。同样令人郁闷的——尤其对于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是如下事实：由苏共钦定（*ex cathedra*）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符合科学社会分析和政策构想的要求。因此，在60年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出现了对于更新（Aggiornamento），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符合时代化更新的争取。其中的主要理论家有格奥尔格·卢卡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USAP]）、罗歇·加洛蒂（法国共产党[KPF]）、卢西奥·洛姆巴多-哈迪斯（Lucio Lombardo-Radice）（意大利共产党）、爱德华·戈尔德施蒂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KPC]）、恩斯特·菲舍尔和弗朗茨·马雷克（Franz Marek）（奥地利共产党[KPÖ]）、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n）（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以及亚当·沙夫（波兰统一工人党[PVAP]）。1963年5月2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利比尼策（Liblice）召开的关于弗朗茨·卡夫卡的会议带来了挑战性的示范效应。与会者们集中关 984
注了人在社会中的异化这一主题，并且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存在着自因

性的异化现象。苏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则将这些努力斥为修正主义。

尽管有许多郁积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矛盾，那些由共产主义政党或其友党执政的国家在70年代还是取得了极大的世界政治影响力，这是其自身在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政治发展，就疆域而言从太平洋延及古巴直至非洲。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统治集团仍然惧怕“现实社会主义”的挑战和影响，这不仅仅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军事上的强大和所谓的军事威胁，也因为它们正在扩散的影响力尚未丧失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一事实，被解释为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正确性的证明。通过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社会主义国家成功使得由其发挥决定性作用共同塑造的欧洲战后秩序获得了国际法上的确认。通过相互承认和降低对峙，缓和进程为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合作开辟了新视界。在军事战略上，苏联创造出一种对美国而言的相对均势，由此，美苏之间的战争变得难以开启。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却展现出固化，无力进行必要的改革，面对各种全新挑战时无法构建有效方案。由于已知的制度欠缺，尤其是对民主、人权和个人自由的要求方面，“现实社会主义”对西方共产主义政党而言已经不仅不再是典范模式，而且还产生了反作用，逐渐令社会主义目标在资本主义西方丧失信誉。

虽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影响力停滞不前，甚或失去其影响力和追随者，但仍然有一些政党强化和扩展了其影响力，比如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达成了一项联合执政方案。意大利共产党则在70年代中期达到其实力和影响力的高峰。它在1975 985
年的地方选举和1976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大约1/3的选票，由此，“共产主义问题”便在于，没有意大利共产党的参与，就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达成重要决定：借由历史性妥协这一概念，意大利共产党敲开了政府的大门，然后在70年代末短暂地在议会中支持了政府。在北约国家葡萄牙，自1974年开始，由共产党决定性地参与的“四月康乃馨革命”（April-Revolution der Nelken）实现了一种革命性的政权颠覆，这似乎是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可能从西方制度中突围。然而权力政治影响范围的两极性没有放任这一革命。葡萄牙正如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一样，为西方共产主义政党提供了抗议由苏联认可和实践的集团逻辑（Blocklogik）的一种契机，因为这一逻辑限制了它们的活动范围。共产主义政党同时也和所有其他属于传统工人

运动的政党与组织一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面对着社会变革、结构变化、价值观与利益的变迁以及社会，特别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去集体化（Entsolidarisierung）也即个体化趋势，这一趋势必然会带来关于“工人阶级的消失”的讨论。尽管如此，这里的一系列客观现象给关于工人运动的传统理解带来危机，动摇了共产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并迫使人们寻求代表政治和社会利益的新方式。

西方共产主义政党的理论家们因此质疑马列主义的两项基本信念：将社会主义政权普遍视作专政，尤其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斗争的主题给出了新的思考。一方面，他们还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真正的主体还是工人阶级。这将需要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合作，尽管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仍然被视作前资本主义而被拒斥。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又主张广泛的社会同盟，这一社会同盟应远远地超越工人阶级的范围。
986 尚待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应由所有参与建立它的力量共同决定。

欧洲共产主义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1）1975年开始的意大利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双边会晤，以及柏林共产主义与工人政党会议材料形成会议讲话阶段相应的立场确立；（2）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英国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共产党（Linkspartei/Kommunisten Schwedens）在柏林会议上的登场；（3）1977年三月马德里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的会晤；（4）70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由欣欣向荣走向衰落。

在柏林会议上出现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理论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国际主义。贝林格将之称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他并未论及马列主义——“没有跟上当今世界现实巨大改变的脚步”（Konferenz 1976，第230页）。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际上以一种过程性的方式进行（第226页）。他既与社会民主主义保持距离，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被证明不适合“真正地克服资本主义”，同时也如此对待东欧国家所遵循的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不符合“西方国家的特殊情况及其广大工人和人民群众的取向”（第228页）。圣地亚哥·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基督教和教会的关系进行类比。迫害的时代给共产主义者“带来了一种科学社会主义与某种牺牲和宿命神秘主义间的联系。我们与我们的殉道者和先知一起成为一种新的交汇。多年来，莫斯科就是我们

的罗马。我们说起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就好像它是我们的圣诞节”（第120页）。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越来越丧失其作为教会的性质。“我们理论的科学内涵通过反对信仰和命定的神话而实现自身。”（同上）他将社会主义称为一种成熟的必要性，但这种必要性却不会仅被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所感知。“劳动与文化的诸力量”站立于最前端，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其统治地位（Hegemonie）不应通过专政手
987 段实现（第125页）。

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重复了之前召开的法共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基本论点。该党宣称自己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同时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法国的政治权力的现实不符”，党代表大会决定放弃它（第249—250页）。这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基本理论和政治原理的修正，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政治实践的一种批判。戈登·麦克伦南（Gordon McLennan）强调，在英国，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大多数英国人民的自由决定”实现。这就要求“不仅要垄断企业、银行以及土地的社会化……，而且需要一种广泛的民主建设”（第150页）。在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的要求下，柏林会议的决议文件包含了一个偏离传统共产主义用语的关于理论和国际主义理解的段落：这些政党将“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伟大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其国际主义、同志式和自愿的合作和团结，严格保护各政党的平等权利和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党）在争取社会进步改造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不同道路的自由选择”。文件避免使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两个词（第25页）。

意大利共产党对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解包含了关于新国际主义的构想，这一新国际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立。它涵盖以下内容：出于自愿的团结；多元主义，也即多样性的统一；相对其他政党，尤其是相对苏共的自主权；拒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中心或领导党；不干涉其他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但保留批评的权利；对苏维埃模式统御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保持距离；所有共产主义政党权利平等；尊重和认识各共产主义政党和国家的民族特性；广泛的运动开放性以及将国际主义扩展到全世界非共产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进步和解放的力量，但 988
不要求共产主义的先锋作用。被强烈要求的自主性多大程度地以克服苏共的霸权干预和独立的行动为目标，新的国际主义解释就多大程度地在实际上意味着否定国际工人运动客观上被给定的相互依赖性。在这一意义上，欧洲共产主义

也催化了国际共产运动凝聚力的解体。

1977年3月1日贝林格、卡里略和马歇在马德里的会晤意在克服意见分歧——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之间——并就“共同的欧洲共产主义立场”达成一致。这次会晤没能实现或者说只是初步达成了这一目标。它仅仅只是确认了之前已经表达过的内容：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需要“更加重视发展民主并采取步骤逐步迈向社会主义”。通往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形成的前提、原则和要求则是“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多元性，……尊重、保障和……所有个人和集体自由的发展：思想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与结社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境内外人员流动自由、工会自由、工会自治与罢工权、隐私不可侵犯、尊重普选权与民主多数的交替、宗教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不同方向和流派的哲学、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自由”，等等（*Erklärung*，1977）。

在联邦德国，欧洲共产主义首先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范围从德国共产党（DKP）中的改革派到社会民主党中的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派。德国共产党领导层则与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达成一致，从原则上拒绝了欧洲共产主义。尽管如此，在联邦德国还是展开了一场引人瞩目的就欧洲共产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的理论探讨。比如西欧工人运动事务委员会（AWA）1977年11月组织了一场关于欧洲共产主义的会议（参见Franz 197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葛兰西和奥托·鲍威尔的想法的强烈倾向。这种与欧洲共产主义的联结也通过鲍威尔以及“第三条道路”在国际会议的层面发挥影响（Albers等1981；Albers 1983）。位于西柏林的市民大学致力于创造性地接纳马克思主义。 989

对欧洲共产主义最明显的反对来自莫斯科和华盛顿。人们抱有猜疑，在西方国家独立行动的政党所进行的共产主义运动更新，更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因此会损害政治影响并促进对原有内部权力结构的侵蚀。苏联共产党及依附于它的政党拒绝参与这场对话，完全不准备进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变形的批判性分析。毕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首次出现深刻异见，而苏联共产党不再有能力将之排除在外，因为它的提出者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共产主义政党。不容忽视的还在于，欧洲共产主义的观点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传播并鼓舞了对于改革的追求。在美国和北约国家，两条路线清晰可见：一方面，人们期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和西方政党脱离苏联，并在欧洲共产主义中看到一种契机；另一方面，人们仍然怀疑并担忧欧洲共产主义会促进社会的另一种民主社会主义化的

可能。早在1974年欧洲共产主义还未成型之前，基辛格（Kissinger）就宣称："不论他们现在是否依赖莫斯科，共产主义者都代表了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就其本质和自我证明而言处于西方宪法史的'资产阶级'范畴之外；它是一种诉诸另一传统的运动，并使用着一种几乎完全误导人的语汇。"（引自 Hutter 1978，第165页）在欧洲共产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中，流行着这样的看法，即它并非真诚的主张，只是莫斯科为了间接取得政权而操纵的一种欺骗性伎俩。

对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仍旧被苏联共产党多数人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部分证明了自身缺乏改革能力，部分却出于对丧失身份和莫斯科的仁慈的恐惧，将欧洲共产主义拒斥为破坏性和修正主义的。那些可以被归属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尽管有影响力，但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它们追求克服美国、联邦德国和北约等针对共产主义者参与执政的反共保留（Vorbehalte），但这并未实现。唯一成功参与过国会联合执政的意大利共产党，也在1979年由于失望和内部分裂被迫放弃了这一角色，由与基督教民主党的"历史性妥协"转向反基督教民主党的"左翼联盟政策"。1978年，基督教民主党的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遭到谋杀，因为他倾向于让意大利共产党参与联合政府。1983年，实际上已经成功地与社会党一起加入政府的法国共产党因其改革方案的失败而离开了执政联盟。总的来说，欧洲共产主义几乎没有成功地促成各种不同的左翼力量的联合。因此，尽管实现了相互接近，但它首先没有成功弥合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鸿沟。对后者而言，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和与莫斯科之间的疏远也不足以克服保留（Vorbehalte）和猜疑（Heimann，载 Hohenstein 1979，第40页及第48页）。类似的批评也来自马克思主义观点（Claudin 1978）。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来看，欧洲共产主义也被拒斥为相关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衰败的表现"，是一个"逐渐社会民主主义化的过程"，是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目标的背离（Mandel 1978，第27、43页；同样，载 Hohenstein 1979，第15—16页）。70年代末，意大利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在大选中遭受了严重的选票流失，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因此降低。共产主义政党在70年代极大地受到这些社会变革进程的政治影响，表现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利益多样化和个体主义化，并侵蚀了左翼政党，亦即工人运动整体上的传统基础。

990

欧洲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原则停留在宣言阶段。它没有成功地在理论上全面地将这些理念和原则建立为马克思主义

创造性的继续发展；它没有成功地阐释一个平台，通过其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完整解答。同样也没有关注环境、“第三世界”以及父权制社会结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尚无答案。在那些被认为或
991 自称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之间，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之间，一些领域中严重的意见分歧也没有被解决，例如在超越国家特性、在理论和政治上普遍需要修正的共性中，有关工人阶级以及与社会民主、欧洲一体化和北约的关系。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谓的导弹裁军问题和苏联对此的共同责任也显示出意大利共产党与法国共产党之间的立场差异。1981年4月28和29日，法国共产党联合波兰统一工人党（PVAP）在巴黎召开了欧洲共产党关于和平与裁军的会议。而意大利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则态度鲜明地与之保持距离，因为它们并未准备好对苏联的行为方式做出让步。不快、分歧乃至分裂现象甚至也发生在某些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内部，这些政党内在的团结和统一形象由此受到损害。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诸如意大利共产党中的历史性妥协问题和法国共产党的参与执政问题。总体而言，也缺乏以政治上有效的方式将欧洲共产主义付诸实践的能力。

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新的军备升级（新的中程导弹装备），国际局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紧张。这再次加剧了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反共两极化。波兰1981年12月对军事特殊状态的宣告和对团结工会运动的禁令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欧洲共产主义政党对此的反应远比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更尖锐且更为原则性，尽管前者是后者的逻辑延伸。意大利共产党宣布与苏联共产党决裂，并声明自己不再属于与苏联共产党相关的运动。在1981年12月30日的一份决议中这样写道：“近期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使我们更强烈地确信，必须找到和走上全新的道路，以便为全世界的民主和社会主的斗争提供新的动力。我们之所以必须面对这一要求，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欧左翼力量必须赖以生效的条件不同。事实上，在东欧国家，我们现在面临着倒退的进程和反复出现的戏剧性危机，这使人们对权力的单一 992
概念产生了怀疑，同时缺少与社会意志真正相符的机构……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出现了团结在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运动的阶段一样，现在这一以十月革命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也已经丧失其势能……人类正面临巨大的、从未出现过的，甚而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资本主义不再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人民已经拥有新的需求和追求，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

家，而且也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以各种方式被表达。”（*Risoluzione*）这一宣言实际上是欧洲共产主义的顶点，但它几乎没有被提及。凯尔曼（Kellmann）1984年还在设想的持久性（第342页），并未在欧洲共产主义身上实现。

在这一已经走向衰败——这主要归咎于它自己——的伟大历史运动中，欧洲共产主义是延迟和特殊的改革追求的一个片段式的、未实现的机遇。然而，欧洲共产主义的构想本身并未失败，而只是那些与之相关的令人陶醉的期待。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统一、权力分立与制衡、政治多元主义**等——在“现实社会主义”的衰败后，才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和民主共产主义的方案与政治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D. Albers, J. Cap, P. Ingrao u. a. (Hg.), *Perspektiven der Eurolinken*, Frankfurt/M-New York 1981; D. Albers, *Versuch über Otto Bauer und Antonio Gramsci. Zur politischen Theorie des Marxismus*, Berlin/W 1983; E. Berlinguer, »Gedanken zu Italien nach den Ereignissen in Chile«, in: ders., *Für eine demokratische Wende. Ausgewählte Reden und Schriften 1969–1974*, Berlin/W 1975, 360–86 (ital.: »Riflessioni dopo i fatti del Cile«, in: E. Berlinguer, P. Bufalini u. a., *I comunisti italiani e il Chile*, Rom 1973, 3–44); J. Bischoff, J. Kreimer, *Annäherungen an den Sozialismus. Strategien eines dritten Wegs zum Sozialismus*, Hamburg 1980; M. Bosi, H. Portelli, *Les P. C. espagnol, français, italien face au pouvoir*, Paris 1976; S. Carrillo, *»Eurocomunismo« y Estado*, Madrid 1977 (deutsch: *»Eurokommunismus« und Staat*, Hamburg-Berlin/W 1977; M. Cesarini Sforza, E. Nassi, *L'eurocomunismo*, Mailand 1977; F. Claudin, *Die Zukunft des Eurokommunismus*, Berlin 1978; F. Deppe, G. Fulberth, R. Kuhnl u. a. (Hg.), *Abendroth-Forum. Marburger Gespräche aus Anlaß des 70. Geburtstages von W. Abendroth*, Marburger 1977; »Erklärung über das Treffen von IKP, FKP und KPSp in Madrid 1977«, in: *L'Unità*, 4. März 1977, *L'Humanité*, 5. März 1977, *Neues Deutschland*, 4. März 1977; H.-W. Franz (Hg.), *Eurokommunismus und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Berlin/W 1979 (AS 44);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KP Spaniens und IKP (Juli 1975), in: *15 Congresso nazionale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Documenti politici dal 14° al 15° Congresso*, Bd. 1, Rom, o. J., 146;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IKP und KP Japans* (Sept. 1975), in: ebd., 152;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FKP und IKP*

(Nov. 1975), in: ebd., 162;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IKP und KP Großbritanniens* (April 1976), in: ebd., 422; *Gemeinsame Erklärung von KP Japans und KP Großbritanniens* (Jan. 1977), in: *Morning Star*, London, 28. Jan. 1977; G. Hohenstein, *Der Umweg zur Macht*, München 1979; C. M. Hutter, *Eurokommunisten—Lenins treue Jünger*, Krefeld 1978; M. Jäger, »Das Potential Gramscis. Über das Verhältnis der eurokommunistischen Parteien zu ihrem revolutionären Theoretiker«, in: *Reader zum AWA-Kongress*, Berlin/W; K. Kellmann, *Pluralistischer Kommunismus? Wandlungstendenzen eurokommunistischer Parteien in Westeuropa und ihre Reaktion auf die Erneuerung in Polen*, Stuttgart 1984; *Konferenz kommunistischer und Arbeiterparteien ropas. Berlin, 29. und 30. Juni 1976. Dokumente und Reden*, Berlin/DDR 1976; W. Leonhard, *Eurokommunistische Herausforderung für Ost und West*, München 1978; G. López Raimundo, A. Gutiérrez Díaz, *El PSUC y el eurocomunismo. Entrevistas y selección de textos*, Barcelona 1981; E. Mandel, *Zukunft des Eurokommunismus*, Berlin/W 1978; E. Mandel, »Eurokommunismus—Was ist er und wohin treibt er?«, in: G. Hohenstein, *Der Umweg zur Macht*, München 1979; F. Marek, *Philosophie der Weltrevolution. Beitrag zu einer Anthologie der Revolutionstheorien*, Wien-Frankfurt/M-Zürich 1966; O. A. Narkiewicz, *Eurocommunism 1968–1986. A Select Bibliography*, London-New York 1987; K. Priester, *Hat der Eurokommunismus eine Zukunft?* München 1982; H. Richter, G. Trautwein (Hg.), *Eurokommunismus—ein »dritter Weg« für Europa?*, Hamburg 1979; »Risoluzione della Direzione del PCI: La riflessione sui fatti di Polonia: aprire una nuova fase della lotta per il socialismo«, in: *L'Unità*, 30. 12. 1981; S. Segre, *A chi fa paura l'eurocomunismo?*, Rimini-Firenze 1977 (deutsch: ders., Wer hat Angst vor dem Eurokommunismus, in: M. Spieker (Hg.), *Der Eurokommunismus—Demokratie oder Diktatur*, Stuttgart 1979); ders., Eurokommunismus—eine strategische Escheidung, in: *Europäische Rundschau*, Wien, Jg. 5, 1977, Nr. 3; M. Steinkuhler, »Eurokommunismus im Widerspruch. Analyse und Dokumentation«, Köln 1977; ders., Zerfallender Eurokommunismus, in: *Deutschland-Archiv*, Köln, Jg. 12, 1980; H. Timmermann, »Moskau und die Linke in Westeuropa. Aspekte und Perspektiven des Verhältnisses zu den Eurokommunisten und zu den demokratischen Sozialisten«, in: *Osteuropa*, Jg. 30, 1980, Nr. 5/6; ders.,

Neue Tendenzen im europäischen Kommunismus, Köln 1980; ders., *Eurokommunismus*, Frankfurt/M 1982; P. Togliatti, »Intervista a ›Nuovi argomenti‹«, in: *I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e i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1956–1968*, Rom 1968, 34–61; ders., »Promemoria sulle questioni del movimento operaio internazionale e della sua unità«, ebd., 235–47, (deutsch: »Memorandum zu Fra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bewegung und ihrer Einheit«, in:
994 ders., *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DDR 1977, 765–79); G. Trautwein, »Eurokommunismus—ein ›dritter Weg‹ europäischer Arbeiterparteien«, in: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Bonn, 26. Jg., 1986; B. Valli, *Gli eurocomunisti. Interventi di Jean Elleinstein, Paolo Spriano, Santiago Carrillo*, Milano 1976.

哈拉尔德·诺伊贝特
（Harald Neubert） 撰
张宽 译，孙易晨 校

参见：

Blöcke, Demokrat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Einheit, Entfremdung, Entstalinisierung, friedliche Koexistenz, friedlicher Weg zum Sozialismus, Hegemonismus, historischer Kompromiss, Internationalismus, kalter Krieg, Kommunismus, Marximus, Marxismus-Leninismus,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Pluralismus, Prager Frühling, Realer Sozialismus, Revisionismus, Revisionismusstreit, Sozialismus, Stalinismus, Volksdemokratie, Volkseinheit

欧洲（Europa）

A: ūrūbā.

E: Europe.

F: Europe.

R: Evropa (Европа).

S: Europa.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包含一个历史性的地点信息。它将《共产党宣言》的讯息情境化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宣言的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它的普遍诉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MEW 4，第461、493页）这两句话的关系是，欧洲是个向每一个被剥削和被剥夺权利的国家发出呼吁的地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具创造性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一理论不能通过理性的"欧洲起源"（»europäischen Ursprungs« der Vernunft）的黑

格尔哲学得到满意的答案。

1.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欧洲”这个概念并不成其为问题；相反，欧洲（尤其是西欧）生产关系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的一种自发意识，首先是在关于“亚洲”（Asien）（例如，英国在印度的统治，MEW 9，第 127—133 页）或者“东方”（Orient）（例如，MEW 28，第 254 页）的表述中出现的。《资本论》中这样说道，“西欧”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故乡”（dem Heimatsland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MEW 23，第 792 页），是有理论根据作为支撑的。在“这个已由资本造就的世界”（dieser fertigen Welt des Kapitals）（同上）和“各被殖民国家”之间，将产生一种相同的赶超的资本主义发展关系，就如英国和其余欧洲国家之间一样，“工业化更发达的国家向工业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这里指德国）展示的仅仅是其自身的未来图景”（第 12 页）。

995 尽管如此，深入的研究会给人们带来西欧具体情境下的历史细节：在法语版的前言中，《资本论》的适用范围被明确限制在了“西欧”（Westeuropa）（MEGA II/7，第 12—13 页）。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已经提醒过，他所描绘的“关于资本主义在西欧产生的历史图景可以转化为一个一般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这个进程预定了所有民族的命运”（MEW 19，第 111 页）。

这种观点所立足的理论背景在世界市场的概念下（der Begriff des Weltmarkts）被明确表达出来：“建立世界市场的趋势直接体现在资本本身的概念中。每一个界限似乎都是要克服的障碍。”（*Gr*，MEW 42，第 311 页）起源于西欧的资本关系的“历史使命”概念引发了这一过程的主要“文明趋势”（zivilisierende Tendenz）的概念，即产生于西欧的资本关系（Kapitalverhältnisses）具有“历史使命”（historischen Mission）（第 317 页）。但是这并没有说明任何马克思对欧洲的真实历史发展的看法，他可能会在其中将俄罗斯的强大反动力量赋予一个决定性的负面角色——这在以俄国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是被压制的（参见 Rjazanov 1909；Drischler 1996）。

与此相区别的是欧洲联邦的政治理念（europäischen Staatenbundes），它在 19 世纪工人运动中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旧欧洲的强权”（Mächte des alten Europas）的备用方案（MEW 4，第 461 页）受到宣传。与这一理念相对，在对拉萨尔主义者狭隘的民族政治批判的语境中（参见 *Gotha*，MEW 19，第 23—24 页），恩格斯坚持更广泛的、更具实际约束力的“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Prinzip der Internationalität der Arbeiterbewegung）（1875 年 3 月 18—28

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MEW 19，第4页）。就此而言，欧洲之外的国家在他眼中仅仅是次要问题："欧洲是首先被再组织（reorganisiert）的，然后是北美，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力量和榜样，使半文明化的国家（halbzivilisierten Länder）自己来到牵引绳面前；仅经济需求（ökonomischen Bedürfnisse）就解决了这个问题。"（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MEW35，第358页）

2. 对罗莎·卢森堡来说，还"只有来自欧洲，来自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发出解放人类的社会革命信号。只有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的工人一起才能领导世界五大洲被剥削和被奴役者的大军"（Krise，GW 4，第162页）。

996 只有列宁考虑到，这不再单纯是"欧洲帝国主义"（europäischen Imperialismus）问题（在引用的卢森堡的文本旁，列宁批注道："那么美国呢？？那么日本呢？？"LW 39，第310页），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这是落后国家的革命问题，由此，一个被加以阐释的欧洲概念才被视为问题。在那里，两条对立的论证线索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欧洲"，尤其是西欧，尽管仍然处于它矛盾的资本主义形式中，但仍然是一个进步的榜样和典范；但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的国家体系越来越被定位为全球反革命的中心和共产主义世界运动的对立面。因此，民族解放运动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领域）受到关注，而不仅仅是欧洲纠纷的一个附属物（"殖民问题"）。

"欧洲的历史"在列宁看来"十分有力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引起全体居民……需要水平的增长"（1，第98页）。或者也可以说："马克思根据西欧情况探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彻底剥夺了工人。"（第206页）此外，美国已经成为一个较少受到欧洲特殊性影响的资本主义样例。正如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我们说甚至在西欧，这是因为在美国这种进步"——这里的进步指资本主义经营的农业——"更为明显"（4，第150页；参见7，第236页）。对此，列宁没有设定机械式的理解。"年轻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有古老国家的先例与帮助而大大加快了。"（3，第503页）

因此对列宁来说，欧洲绝对不能整个地当作一个模型。相反，欧洲是需要进行区分的对象，比如他谈到"阿克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借口欧洲方式（Europäertum）而灌输给孟什维克的那种机会主义。在瑞士小市民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和习惯中没有一点欧洲方式的痕迹。小市民的瑞士是现时欧洲，即

富有革命传统和充满广大群众尖锐阶级斗争的欧洲的奴仆”（LW 11，第358页，注释）。此外，对列宁来说，欧洲
997 也同样对俄国有依赖性。因而他谈到这一“事实：正是由于俄国专制制度（Selbstherrschaft）卑鄙成性，欧洲在政治方面已经几十年停滞不前以至倒退了”（LW 9，第238页）。他提出了这样的前景：“俄国工人阶级一定能……争得自由，推动欧洲前进。”（LW 12，第376页）

托洛茨基（参见 Trotzki 1921）通过将“欧洲”既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合作之地，又视为革命的希望之地，详尽阐释了这一思想。第一个方面（欧洲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合作之地）因美国在欧洲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而改变（道威斯计划 [Dawes-Plan]）。托洛茨基看到，现在欧洲是改革主义者（Reformismus）（1926，第19页）当权，此外，欧洲作为世界历史的力量正在被美国取代：“任何试图弄清欧洲或世界无产阶级命运的人，如果不考虑美国的重要性，他的思考就没有意义。”（第20页）美国之所以成为新的主要敌人，是因为它支持欧洲的社会民主改革主义（sozialdemokratischen Reformismus），从而试图阻止欧洲革命（30，第47—48页）。托洛茨基构想的是“一个与我们一起融合成苏维埃联盟的工农欧洲”的计划（第47页）。这个“欧洲与亚洲人民的强大联盟”将会赢得与美国的斗争。因此，即使在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欧洲革命的希望依然存在。

当“革命在西方”未能实现时，对欧洲的包容也就停止了。在列宁对战略撤退的考量中，或者在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里产生的战略性问题的表述不再涉及“欧洲”。

3. 奥托·鲍威尔试图帮助“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en Sozialismus）重新获得“在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世界中的定位”（1931，前言），虽然这一尝试总是从对美国的情况的分析出发，却在哪里都没有明确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的这种新的示范关系。被鲍威尔诊断为“理性化危机”（Rationalisierungskrise）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他直接转向“苏维埃国家”（Sowjetstaat），只有它能通过计划经济加上最现代的生产方式的模式（第203页及以下）使“福特主义”（Fordismus）的希望成真（第202页），但苏维埃国家历史上却被俄罗斯农业的“错误理性化”和“恐怖主义专政”的必要形式所拖累（第218—219页）。因此，鲍威尔 998
得出了一个战略性结论，即便在被认为可能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中，“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

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第223页）。

相对地，安东尼奥·葛兰西在他对“美国主义”的分析中非常明确，正是因为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明确阐述了由鲍威尔引入的欧洲意义的相对性——“欧洲失去了意义”（*Gef* 2，H.2，§ 24）——他深入探讨了欧洲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对他来说美国主义本身就是“欧洲文明的延续和强化”（H. 3，§ 11）；另一方面，他强调了“旧的、懒惰的欧洲”（Marx，MEW 19，第107页）的一面，欧洲是以大量特权阶级的存在为特点的，这些阶级在生产的世界中毫无作用，也就是说，是完全的寄生阶级（H.1，§ 61）。与之相反，“美国主义”则展现了一种文明的进步。

对于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来说，“民族观念的实现同时就是对源自欧洲的普遍观念的实现”（Mármora 1983，第165页）。因此，他强调：“国家的现实性对欧洲的依赖与不可分割性比我们民族主义者所猜测的要多得多。”（Peruanicemos，第25页）

4.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主张西欧主要政党摆脱苏联模式而进行自治，并将其与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运动整个传统的批判性论点相结合，但它并没有涉及欧洲的特殊政治或理论概念，它也可以在日本或美国得到表达。同样地，它也适用于在其开辟的政治空间中发展起来的新的理论和哲学方法，其中一些得到深入发展，比如阿尔都塞主义。不过，一场有关欧洲一体化的激烈辩论将其取而代之。

这与早期已经兴起的、在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中寻找新的欧洲革命战略模式的尝试不同。对此，萨特如此写道：“作为欧洲人，我从敌人那里盗取了他的书，并以此作为治愈欧洲的手段。”（Vorwort zu Fanon 1961，第12页）法农（“这个欧洲确实是第三世界的作品”）请求“欧洲的帮助”：“欧洲群众必须清楚，他们在殖民问题上经常地——过于经常地——与我们共同的奴隶主结盟。今天，他们必须做出决定，必须醒来，并永远放弃自己不负责任的沉睡。”（第83页） 999

其中隐含的关于“不平等交换”（阿吉里[Arghiri]语）和“沉睡的意识”（马尔库塞语）的论点确定了西欧新左派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基本辩论路线（Debattenstränge）。随后，在80年代末，萨米尔·阿明试图在根本上阐述历史情境化与欧洲发展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并非注定要成为一种纯粹的欧洲特征。但在欧洲率先发明它之后，放慢其他大陆的正常发展成了它的任务。”（1988，第102页）

一些反独裁的学生运动理论家试图通过将“亚洲概念”与“西欧意义上的资本主义”(Dutschke 1980，第147、145页）更清晰地分开以重塑列宁的尝试则是粗略的（1974，参见 Rabehl 1986）。

弗里德·O. 沃尔夫
（Frieder O. Wolf） 撰
李祥伶 译，张觅、李牧今 校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ie: S. Amin, *L'eurocentrisme. Critique d'une idéologie*, Paris 1988; S. Carrillo, *Eurokommunismus und Staat*, Hamburg 1977; O. Bauer,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nach dem Weltkrieg*, 1. Bd., Wien 1931; W. F. Drischler, »Marxist State Theory Without *Russenhass*?«,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F*, 1996, 180–208; R. Dutschke, *Versuch, Lenin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Berlin/W 1974: ders., *Mein langer Marsch*, hgg. v. G. Dutschke-Klotz u. a., Reinbek 1980; F. Fanon, *Die Verdammten dieser Erde* (1961), Frankfurt/M 1969; J.-C. Mariátegui, *Peruanicemos al Perù*, Lima 1970; L. Mármora, *Nation und Internationalismus*, Bremen 1983; B. Rabehl, *Marxismus heute*, Frankfurt/M 1986; D. B. Rjazanov, »Karl Marx über den Ursprung der Vorherrschaft Russlands in Europa« (1909), in: U. Wolter (Hg.), *Die Geschichte der Geheimdiplomatie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W 1977; J.-P. Sartre, Vorwort zu Fanon 1969 (1961), 7–25; L. D. Trotzki, *Das hungernde Russland und das »satte« Europa*, Berlin 1921; ders., *Europa und Amerika*, Berlin 1926.

参见：

Althusser-Schule, Amerikan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Dritte Welt, Eurokommunismus,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Europastrategien, Eurozentrismus, Fordismus,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ternationalismus, Kolonialismus, nationale Befreiungsbewegung, neue Linke, Okzidentalismus, Studentenbewegung, ungleicher Tausch, Weltmarkt

欧洲一体化 1000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A: indimāǧ ūrūbī.

E: European integration.

F: 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R: evropejskaja integracija (европе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S: integración europea.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欧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展现出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挑战和理论挑战。之所以是政治挑战，是因为它提出了欧洲层面对于工人运动争夺领导权的意义问题。之所以是理论挑战，是因为欧洲一体化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和帝国主义的新问题。相应地，辩论也是多方面的，而且这种争论（如其他一体化理论一样）也是对欧洲一体化的不连续运动做出的反应。

1. 欧洲一体化的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消极的一体化”（negative Integration），也就是以创建共同市场的措施为主，以及在组织西方国家进入美国霸权阵营的过程中取得超越决定权（Überdeterminierung）。二者导致激进左派，尤其是西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除外）对欧共体及其扩张计划持反对态度（参见Deppe 1976，Axt 1982）。将欧共体改造成综合性的西欧监管机构的社会民主主义方案，即“联合干预框架”（framework for joint intervention）（Holland 1980，第10页；参见Kiersch/Seidelmann 1979），很快就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没有什么后续进展。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了民族框架下阶级斗争的优先性和社会主义的前景：欧洲一体化层面在其中处于从属地位。在法国关于“美国挑战”和欧共体作用的辩论的强烈影响下，围绕“帝国主义链条在各中心之间关系中的变化”的讨论得以展开（Poulantzas 1973，第14页）。欧内斯特·曼德尔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美竞争》（*Die EWG und die Konkurrenz Europa-Amerika*，1968）一书是新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一体化分析的真正开端，并被广泛接纳。他预测西欧与美国之间竞争加剧的基础是如下分析，即欧洲层面的国际资本联系（Kapitalverflechtung）明显超过了西欧和北美之间的国际资本联系（参见Busch 1978）。尽管他看到越来越有活力的欧洲康采恩正在通过欧洲的合作和资本联系来抵制美 1001
国的康采恩，但对于曼德尔（1972）来说，“民族”大资本阶段尚未被超越。共同市场的创建是“西欧资本在此之前集中的结果”；同时，欧洲经济共同体通过加剧“更大的生产单位、更集中的资本聚集、对生产地点和运输工具的更合理的选择”方面的竞争，成为“自身产生的新集中进程的发动机”（1968，第38页）。随着欧共体内部国际资本联系的进一步提升，“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有利于一个新国家，它能够有效地捍卫这种新的私有制”。因为“‘欧洲的’资本所有制要求一个‘欧洲的’资

产阶级国家，以作为适当的资助、担保和防御工具”（第46页）。这种“支持在西欧建立一个超民族的、帝国主义的国家的突出压力”，源于晚期资本主义中国家的直接经济功能。因为“民族国家的经济规划与多民族的资本联系在较长时间内是无法调和的：要么是前者压制住后者，特别是在危机和衰退时期；要么是后者将会创造出与自身相一致的国际经济规划”（1972，第304—305页）。在曼德尔看来，“抵制北美竞争这种日益强烈的愿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日益巩固以及超民族国家机构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的权重不断增加……只是同一个基本趋势的不同表现：欧共体内部日益增长的国际资本联系”（1968，第47页）。

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观点相反，除了各中心（Metropolen）与依附阵营之间分界线的加强和加深外，他还判断出“各中心阵营之间出现了新的分界线”，也就是“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中心，特别是欧洲之间的分界线”。“然而，这始终是分界线的不对称的二重化。这种新的依附性不能等同于中心—外围关系，这恰恰不是因为这些中心会继续构建自己的资本积累中心并自己掌控外围阵营。”（1973，第14—15页）普兰查斯
1002 认为，资本的国际化是在“美国资本决定性的统治”（第25页）下进行的。这符合欧洲资本与美国资本合并的趋势，却不符合这些资本相互合并的趋向。欧共体又加强了这种趋向。就此而言，普兰查斯引入“内部资产阶级”（inneren Bourgeoisie）概念，与“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en Bourgeoisie）相对（第36页）。基于美国资本在西欧社会内部的再生产，西欧社会的内部资产阶级通过一系列依附关系，被卷入到国际分工和资本集中的过程以及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之中。因此，它们在美国资本和政府面前几乎不再是自主的，尽管它们的经济基础和积累基础（与外围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相反）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超越其民族壁垒的资本是非常依赖民族国家的，**不仅依赖自己的来源国**，也依赖其他国家。这就导致国家在美国资本主导下的国际资本再生产中作用的复杂分化。”其间，“这些职能的行使……被转移和下放。根据经济景气情况，由中心的某个民族国家负责对整个系统的……再生产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干预”（第48页）。通过承担这些职能，“这些国家机器的决定性的制度转变”朝着“强大国家”（威权国家 [autoritärer Staat]、警察国家 [Polizeistaat]）的方向行进（1973，第50页；参见1978）。经济国际化越来越多地将这些国家整合到一个“互联体系”（Verbundsystem）中，但是该体系并不倾向于组建超国家的机

构（第38页；参见1983）。西欧国家就其“硬核”而言仍然是民族国家，它们必须确保社会形态的整体性（系统职能；参见Jessop 1995，第32页）。但是，由于国际化，这一职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普兰查斯预言了“资本主义民族统一的瓦解”（1973，第45页）。

斯图亚特·霍兰德（Stuart Holland 1980）承接了普兰查斯的阶级理论分化（参见van der Pijl 1984）。他揭示了国家职能在不同国家层面和领域之间的复杂分工，特别是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民族竞争性国家”（nationalen Wettbewerbsstaats）（Hirsch 1995）发展过程
1003 中国家职能的分化和（有选择地）超国家化联系在一起后，这一点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西欧与美国之间的竞争问题以及美国领导权的衰退问题，始终与关于全球化和大三角（指美国、欧洲国家及以日本为首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译者）竞争（Triadenkonkurrenz）的辩论联系在一起。曼德尔关于积累空间和调节空间的必然一致性定理，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非常重要。弗兰克·德佩批评曼德尔“将两种趋势——作为超国家地位基础的国际资本联系与作为民族国家地位基础的民族资本集中——单纯并置”。这样就无法提供基本的“关于西欧一体化运动规律和运动形式的信息；毕竟，这两种趋势不只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两种中央集权形式之间的关系、国家中央集权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也完全模糊不清”（1976，第59页）。

在就国家引导和世界市场资本流动展开辩论的当口，20世纪70年代的联邦德国开展了一个项目，即从经济国际化与世界市场的民族国家结构之间的矛盾入手分析欧洲一体化。根据这种理论，日益增加的资本国际化损害了民族国家职能的发挥；同时，民族国家被迫进行越来越多的干预，以支持国家的和国际的资本运动。然而，由此产生的建立超国家的国家组织的趋势，被参与其中的经济体不平衡的发展水平打破了（Busch 1978；Goralczyk 1975）。因此，根据当时的预测，欧洲一体化在结构上有着无法超越关税同盟的限制。鉴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危机，这一观点可以建立在眼前的合理性之上。

在（重新发现的）葛兰西经济主义批判的影响下，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了重要的扩展。阿尔伯特·施塔茨（Albert Statz）批评了老调重弹的观点，即“资本的普遍危机趋势、不平衡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内部的竞争，一再阻碍了区域合并的计划”（1979年，第217页）。在经过“葛兰西式地”扩展后的方法中，经济规律性、利益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被定 1004

义为一个多层次的调解问题。除了确立国际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之外，关键在于纳入区域一体化过程背后的利益和战略以及建立“共同体利益”（Gemeinschaftsinteresses）。因为区域一体化是“解决国际化与民族国家之间世俗矛盾的相对形式，即几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战略介入世界市场本身的结构，以重组资本主义生产和增殖的条件，并使资本主义积累在国际范围内重新开始或继续进行”。这样一来，“世界市场的国家结构在区域框架下被修改”，“国家范围在地域上被扩大”（第224页）。

“共同体利益”被表述为一个持续的利益平衡过程，并且以“一揽子解决方案”（Paketlösungen）的形式超越了个体妥协的总和（第67页及以下，第245页及以下）。区域一体化并不是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为这种竞争的强化创造了新的共同条件。内部的局部统一和开放与划定外部界限的争论息息相关。所达到的一体化水平成为资本和民族国家战略行动先决条件的一部分；然而，正如1965—1966年的一体化危机一样，这也会再次受到质疑。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超国家性成为民族国家的工具，一体化仍然是矛盾和不稳定的。根据德佩的说法，即使是在成功的时期，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也是一个“持续克服危机的过程”：“一体化的进展只能是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之间妥协的结果，也是各自在争夺政治领导权地位时力量平衡的结果。”（1976，第73页）

2. 1979年，欧洲议会进行了首次直接选举（Axt/Deppe 1979），并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EWS），以改变的迹象宣告了**推动一体化**（*Integrationsschub*）的新举措。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当所有国家同时奉行发展内部市场的政策并采取类似的监管方式时，欧共体作为自由贸易区，意味着一种保护而非限制国家发展方式的要素（参见Lipietz 1989）。与此相反，欧洲货币体系的特殊组建方式意味着紧缩政策的国际化（Altvater 1979，参见Altvater/Hübner/Stanger 1983）。欧洲货币体系确立了德国马克的主导地位，该体系成为执行西德经济和货币政策领导权的决定性杠杆（Huffschmid 1994，1，第90页及以下）。参与国除了“竞争中的紧缩”（Austerität im Wettbewerb）途径（Lipietz 1989，第56页）外，没有其他方法来平衡贸易收支。这意味着稳定货币的政策是以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为代价的。

1005

1992年的内部市场项目进一步减少了反竞争机制，从而增加了国家管制方式之间的竞争。“以一体化扩大市场”与“通过放松管制来加强市场”的结合，

导致了“一个扩大的、更大的（西）欧市场，其管制程度比国家市场以前的水平更低”（Altvater/Mahnkopf 1993，第75页）。1983年，在“国家凯恩斯主义”（nationalen Keynesianismus）计划失败后，法国社会主义者对欧洲政策的重新定位，为推动新的一体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大多数其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中，欧共体直到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才成为希望的承载者。在寻求“后社会主义”（postsozialistischen）认同（Deppe 1989，第273页）的过程中，“欧洲”（Europa）适合于成为左派的“替代性乌托邦”（Ersatzutopie），“因为左派不是从制度层面，而是从抽象、文化、理想的层面理解它的”（Dahrendorf 1993，第94页）。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EFTA-Ländern）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使这些国家成为欧共体成员，而左翼社会主义派别和绿党则主要组织为反对者。

一体化研究（*Integrationsforschung*）对新的发展反应较晚。最初，研究主要关注对一体化新动力带来的放松管制负担的批评，以及对生态、社会和性别影响的评估（包括 *Memorandum 1989*，Grahl/Teague 1989，Camiller *1989*，Deppe/Huffschmid/Weiner 1989，*Steinkühler 1989*，Schunter-Klemann 1990，1992，Hörburger 1990，Antunes 等 1990，Busch 1991，Deppe/Weiner 1991，Heine/Kisker/Schikora 1991）。此外，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欧共体体系中，一种新形成的战略性统治结构正在以行政依存和官僚—技术专家治国的政治结构的形式出现，远远脱离了议会程序和法团主义政治模式”（Schlupp 1988，第17页）。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欧洲一体化在1991年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狭义一体化概念也被确立为20世纪90年代的概念”（Huffschmid 1994，1，第58页；参见 Hugenroth 1993 和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Maastricht* 1994）。货币联盟推行的“货币稳定共同体”（monetären Stabilitätsgemeinschaft）计划在实现之前就已经成为“国家和区域分化的工具，同时也是约束社会群体及其利益的工具”（Altvater/Mahnkopf 1993，第88页；参见 Drüger 1996）。 1006

3. 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将一体化研究与监管理论（*Regulationstheorie*）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则加强了对全球或国际视野的关注。

3.1 监管理论的分析重点主要是国家发展方式及其与世界市场的衔接。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这种分析优先性的强调一直是争论的对象（参见 Hirsch 1993，Röttger 1995）。另外，由

于监管理论缺少发达的“政治理论”，因此很难与一体化研究建立联系（Statz/Weiner 1995，第68页）。如果仅仅作为一个临时研究项目的话，类似于对葛兰西政治理论的接受（并且与其结合起来），与监管理论概念的批判性联系应当重组一体化理论的研究领域。监管理论不仅关注“国家和欧洲权限范围的相互关系和互补性”，还“通过考察转型动力……关注潜在的东西（分裂和两极分化趋势），这会质疑社会凝聚力并凝结为政治—思想冲突”（Bieling/Deppe 1996，第62页及以下）。

到目前为止，国际监管的理论计划几乎没有考虑过欧洲一体化，进行推动的主要是希尔施（1993，1994）。按照希尔施的观点，欧洲既没有“区域中
1007 明显占主导地位的霸权国家，也没有完善、全面的政治监管体系”（1993，第215页）。越来越多的西欧国家中的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管制模式的转变（放松管制、废除国家干预手段和公共部门、终止或侵蚀新法团主义安排）与欧洲一体化（参见Hirsch 1988，Ziltener 1995）之间的联系几乎没有得到探讨。人们普遍认为，欧洲一体化对“欧洲的国家地位”（Staatlichkeit in Europa）的转变意义重大。英格伯格·托梅尔（Ingeborg Tömmel）强调，欧共体/欧盟“对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模式的形成和国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监管的后凯恩斯主义形式发挥着积极的、塑造性的作用”（1995年，第50页）。随着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可以确认出现了一种“新的一体化类型”，它不能被理解为建立超国家的权力中心和决策中心的过程。相反，在国际水平上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对民族国家来说是并置的而不是超脱的，是为完成新的国家任务服务的。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复杂的多元决策机制，并且通过国际、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对市场机制的刺激”（1989，第30页）。

鲍勃·杰索普（1992，1995）将欧洲一体化与“熊彼特式的绩效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即在日益开放的经济体中重组国家活动，以促进创新和竞争力。随着民族国家保护其（国内和国际）势力和促进积累的能力减弱，超国家协调的必要性增加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衰退行业中采取了一系列协调危机管理的相对不成功的方法后，欧共体/欧盟通过更加侧重于提高结构竞争力的供给侧要素，为这一变化做出了贡献（1992，第256页）。而对于杰索普（1995，第32页）而言，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大三角、超国家、国家、区域和地方势力之间最重要的战场”。只要超国家政权没有自己的合法基础，或者没有“调节具有阶级划分的

1008 区域集团或世界体系中的社会凝聚力问题”的能力（第 42 页），这一切将不会改变。

对埃蒂安·巴利巴尔而言，“‘欧洲国家’是一个幻影：尽管没有官方主权，但它正在不断发展其干预范围和与经济决策中心的议价能力。它是国家实践的总和，其合法性、权威性和公共性的确切中心即使对那些——至少在理论上——占据它的人来说，也仍然是模糊不清的”（1994，第 631—632 页）。

3.2 到目前为止，**世界体系理论**（*Weltsystemtheorie*）几乎没有将欧洲一体化理论化（参见 Wallerstein 1991，第 49 页及以下；George 1991）。**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en Politischen Ökonomie*）方法的代表人物的工作很重要。罗伯特·W.考克斯（Robert W. Cox）遵循了（大三角）竞争论题，因为他将欧洲一体化理解为对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抗衡，理解为扩大在世界经济中的自主权的尝试。今天，欧洲面临着两种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之间的选择。尽管超自由主义（*hyper-liberalism*）假定国家与经济分离，但它的替代方案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则是要通过（重新）复兴资本主义发展来使二者融合（1993，第 267 页）。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通过产业政策创造和促进经济竞争力，以及通过法团主义政策形式，以共识为导向分配适应成本和增长成果。对于考克斯而言，超自由主义（其早期形式是撒切尔—里根模式）是最具极端形式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这两种形式之间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欧洲，其结果应作为模式或至少在世界其他地区作为替代方案（第 272 页）。欧洲的 1992 年计划中资本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向超自由主义的发展，但是，欧洲大陆上的社会—法团主义传统的强大力量也可能导致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治“补偿”。很多事情都取决于欧洲政治体制与外界政治压力之间的距离：“这些过程始终由市场和设在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机构结合而成，二者又体现了（特别是德国的）大型资本和‘核心国家’的主导地位。欧洲内部的倡议正是来自于这些力量，它们得到了全球经 1009
济自由主义主角——美国的外部支持。”（第 284 页）根据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1992）的观点，推动一体化的经济计划、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缺少的一致性，以及民众中的合法性问题，都将为统一的欧洲争夺领导权设置狭窄的界限。

4. 关于国家社会形态，国际和超国家层面与世界体系之间关系的辩论，对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分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欧洲”是否是“通过捆绑（相互冲突的）资本跨国战略实现领

导权积累的场所”？是否是“出现了新的社会妥协和政治监管方式的政治领域”（Röttger 1995，第 78 页）？“超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战略同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现代化方案”形成的矛盾组合是否会发展成“新的、趋向于‘历史’的妥协，不过这一次是在西欧层面上”（Schlupp 1988，第 16 页）？发展同时跨越和破坏国家政治结构的“跨国政治社会”（transnationalen politischen Gesellschaft）的机会是超国家和政府间机构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吗？

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欧洲政治结构的发展；与欧盟的深化 / 扩大的关系的塑造为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确定了方向。更大的新德国在欧盟乃至整个欧洲的角色仍然是一个“未解决的挑战”（Bonder 等 1992；参见 Bischoff/Menard 1992；Huffschmid 1994）。然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战后社会模式“大危机”的叠加，生态维度的问题即“文明危机”至今没有在一体化的理论和政治讨论中受到必要的重视。

参考文献：

E. Altvater,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Austerity-Politik durch das Europäische Währungssystem (EWS)«, in: *Tagebuch*, 1979, Nr. 1, 11–6; ders., K. Hübner u. M. Stanger,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jenseits des Keynesianismus. Wirtschaftspolitische Optionen der Gewerkschaften in Westeuropa*, Opladen 1983; ders., B. Mahnkopf, *Gewerkschaften vor der europäischen Herausforderung. Tarifpolitik nach Mauer und Maastricht*, Münster 1993; C. Antunes u. a., *Für eine grüne Alternative in Europa. Perspektiven der ökologischen und feministischen Linken*, Berlin-Hamburg 1990; Arbeitskreis Westeuropäische Arbeiterbewegung (Hg.), *Eurokommunismus und marxistische Theorie der Politik*, AS 44, Berlin/W-Hamburg 1979; H.-J. Axt, *Gegen ein Europa der Konzerne und der Konfrontation. Analyse und Dokumente von Gewerkschaften, Sozialdemokraten/Sozialisten und Kommunisten*, Köln 1982; ders. u. F. Deppe, *Europaparlament und EG-Erweiterung. Krise oder Forschritt der Integration?*, Köln 1979; E. Balibar, »Kann es ein europäisches Staatsbürgertum geben?«, in: *Argument* 206, 36. Jg., 1994, 621–38; *Beiträge zur feministischen Theorie und Praxis: »Europa—einig Vaterland?«*, 16. Jg., 1993, Nr. 34; H.-J. Bieling u. F. Deppe, »Der Beitrag der ›Regulationstheorie‹ zur Integrationsforschung«, in: dies., B. Röttger, *Weltmarkt, Hegemonie und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Kritische Beiträge zur Theori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Papier Nr. 15 der*

Forschungsgruppe EG, Universität Marburg, Marburg 1996, 45–71; E. Biester u. a. (Hg.), *Das unsichtbare Geschlecht der Europa. Der europäische Einigungsprozess aus feministischer Sicht*, Frankfurt/M-New York 1994; J. Bischoff u. M. Menard, *Weltmacht Deutschland?*, Hamburg 1992; M. Bonder, B. Röttger u. G. Ziebura, *Deutschland in einer neuen Weltära. Die unbewältigte Herausforderung*, Opladen 1992; K. Busch, *Die Krise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Frankfurt/M 1978; ders., *Umbruch in Europa. Die ökonomischen, ökologischen und sozialen Perspektiven des einheitlichen Binnenmarktes*, Köln 1991; P. Camiller, »Beyond 1992. The Left and Europe«, in: *New Left Review* 1989, Nr. 175, 5–17; P. Cocks, »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4. Jg., 1980, H. 1, 1–40; R. W. Cox, »Structural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 in: St. R. Gill (Hg.),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1993, 259–89; R. Dahrendorf, »Wege in die Irrelevanz. Schwierigkeiten mit der Bürgergesellschaft«, in: *What's Left? Prognosen zur Linken*, Berlin 1993, 91–7; F. Deppe (Hg.),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gemeinschaft (EWG). Zur politischen Ökonomie der west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Reinbek 1975; ders. (Hg.), *Arbeiterbewegung und west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Köln 1976; ders., »Alter und neuer Internationalismus. Einige Überlegungen zum Zusammenhang von Integrationsdynamik und linker Politik in Europa«, in: Deppe/Huffschmid/Weiner 1989, 249–88; ders., J. Huffschmid u. K.-P. Weiner (Hg.), *1992-Projekt Europa. Politik und Ökonomie i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Köln 1989; ders. u. K.-P. Weiner (Hg.), *Binnenmarkt '92. Zur Entwickl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n Europa*, Hamburg 1991; *Die west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und die Weltwirtschaft*, hgg. v. Inst. f. intern. Politik u. Wirtschaft, Berlin/DDR 1979; A. Dost u. B. Hölzer, *Der politische Mechanismus der EG*, Berlin/DDR 1986; K. Dräger, »Spaltet die Europäische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die EU? Alternativen zum ›Maastricht‹-Monetarismus und seiner Austeritätspolitik«, in: *Widerspruch* 31, 16. Jg., 1996, 33–46; W. Elsner, *Die EWG. Herausforderung und Antwort der Gewerkschaften*, Köln 1974; *Die Europäische Union nach Maastricht. Bedingungen und Möglichkeiten linker Wirtschaftspolitik*, Arbeitspapier Nr. 25, hgg. v. Inst. f. intern. Politik, Berlin 1994; FEG (Forschungsgruppe Europäische

1011 Gemeinschaften),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und politische Regulierung. Aspekte, Dimensionen, Perspektiven*, Studie Nr. 5, Marburg 1995; S. George,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a World Systems Perspective«, in: M. Holland (Hg.), *The Future of European Political Cooperation. Essay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Basingstoke 1991, 52–69; S. Gill,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and European Chang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uropean Union«, in: R. Milliband u. L. Panitch (Hg.), *New World Order.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1992, 157–96; D. Goralczyk, *Weltmarkt, Weltwährungssystem und west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Studien zur Integration und Desintegration kapitalistischer Weltwirtschaft*, Giessen 1975; J. Grahl u. P. Teague, »The Cost of Neo-Liberal Europe«, in: *NLR* 174, 1989, 33–50; M. Heine, K.-P. Kisker u. A. Schikora (Hg.), *Schwarzbuch EG-Binnenmarkt. Die vergessenen Kosten der Integration*, Berlin 1991; J. Hirsch, »Binnenmarkt' 92: Ein neues kapitalistisches Paradigma?«, in: *Links*, 19. Jg., 1988, H. 11, 19–21; ders., »Internationale Regulation. Bedingungen von Dominanz, Abhängigkeit und Entwicklung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in: *Argument* 198, 35. Jg., 1993, 195–222; ders., »Vom fordistischen Sicherheitsstaat zum nationalen Wettbewerbsstaat. Internationale Regulation, Demokratie und ›radikaler Reformismus‹«, in: *Argument* 203, 36. Jg., 1994, 7–21; ders., *Der nationale Wettbewerbsstaat. Staat, Demokratie und Politik im globalen Kapitalismus*, Berlin 1995; H. Hörburger, *Europas Frauen fordern mehr. Die soziale Dimension des EG-Binnenmarktes am Beispiel der spezifischen Auswirkungen auf Frauen*, Marburg 1990; S. Holland, *Uncommon Market. Capital, Clas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ondon 1980; ders., *The European Impe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 in the 1990s*, Nottingham 1993; J. Huffschmid, »Überwindung oder Vertiefung der Spaltung Europas? Plädoyer für eine andere Integrationspolitik der EG«, in: *Blätter*, 37. Jg., 1992, Nr. 3, 316–28; ders., *Wem gehört Europa? Wirtschaftspolitik und Kapitalstrategien*, Bd. 1: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EG*, Bd. 2: *Kapitalstrategien in Europa*, Heilbronn 1994; R. Hugenroth (Hg.), *Kein leichter Weg nach Europa. Maastricht—So nicht*, Bonn 1993; *L'integration européenne et le mouvement ouvrier*, Beiträge v. A. Gorz, E. Mandel, L. Basso u. a., *Cahiers du Centre d'Etudes Socialistes*, Nr. 45–51, Paris 1964; B. Jessop, »Regulation und Politik: Integrale Ökonomie und integraler Staat«, in: A.

Demirović, H.-P. Krebs u. T. Sablowski (Hg.), *Hegemonie und Staat. Kapitalistische Regulation als Projekt und Prozess*, Münster 1992, 232–62; ders., »Die Zukunft des Nationalstaats: Erosion oder Reorganisation? Grundsätzliche Überlegungen zu Westeuropa«, in: FEG 1995, 9–47; G. Kiersch u. R. Seidelmann, (Hg.), *Eurosozialismus. Die demokratische Alternative*, Frankfurt/M 1979; A. Lipietz, »Europa als letztes Aufgebot für einen weltweiten Wirtschaftsaufschwung?«, in: *Argument* 173, 31. Jg., 1989, 49–58; E. Mandel, *Die EWG und die Konkurrenz Europa-Amerika*, Frankfurt/M 1968; ders., »Die Zukunft der EG«, in: V. Brandes (Hg.), *Handbuch 1. Perspektiven des Kapitalismus*, Frankfurt/M 1974, 96–104; ders., »Funktion und Grenzen des Gemeinsamen Marktes«, in: *InPreKorr*, 1984, Nr. 163, 17–22; *Memorandum 1989. Gegen Unternehmermacht und Patriarchat: Gleichstellung der Frauen-demokratische Wirtschaftspolitik in der EG*, hgg. v. Arbeitsgruppe Alternative Wirtschaftspolitik, Köln 1989; W. Nicolai (Hg.), *Der Markt Europa. Ökonomische Zusammenarbeit im gemeinsamen europäischen Haus*, Berlin/DDR 1990; K. van Der Pijl,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1984; N. Poulantzas,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und der Nationalstaat*, Berlin/W 1973, wieder in: O. Kreye (Hg.), *Multinationale Konzerne. Entwicklungstendenzen im kapitalistischen System*, München 1974, 81–129; ders., *Staatstheorie. Politischer Überbau, Ideologie, Sozialistische Demokratie*, Hamburg 1978; ders., »Forschungsnotiz üb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n: *Widerspruch*, 3. Jg., 1983, H. 5, 98–105; B. Röttger, »EG-metropolitane Integration und die Krise linker Wirtschaftspolitik«, in: *Prokla*, 23. Jg., 1993, Nr. 92, 473–90; ders., »Über die ›Krise der Politik‹ und die Malaisen einer Regulationstheorie des transnationalen Kapitalismus«, in: FEG 1995, 65–99; F. Schlupp, »1992: Euro-kapitalistisches Herrschaftsprojekt?«, in: *Links*, 19. Jg., 1988, H. 12, 15–7; S. Schunter-Kleemann (Hg.), *EG-Binnenmarkt—EuroPatriarchat oder Aufbruch der Frauen?* (Schriftenreihe der Wissenschaftlichen Einheit Frauenstudien und Frauenforschung an der Hochschule Bremen), Bremen 1990; dies. (Hg.), *Herrenhaus Europa. Geschlechterverhältnisse im Wohlfahrtsstaat*, Berlin 1992; J. Schuster u. K.-P. Weiner (Hg.), *Maastricht neu verhandeln. Reformperspektiven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Köln 1996; A. Statz, *Grundelemente einer*

1012

politökonomischen Theorie der west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Das Verhältnis von Ökonomie und Politik im internationalen Kapitalismus und der widersprüchliche Charakter der EG, Frankfurt/M 1979; ders. u. K.-P. Weiner, *Grundprobleme der west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Arbeitspapier des Inst. f. Intern. Politik, Nr. 28, Berlin 1995; F. Steinkühler (Hg.), *Europa '92. Industriestandort oder sozialer Lebensraum*, Hamburg 1989; I. Tömmel, »Europäischer Binnenmarkt und mediterrane Peripherie«, in: *Prokla*, 19. Jg., 1989, Nr. 75, 29–46; dies.,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ökonomische Regulierung und Politikgestaltung zwischen Markt und Staat«, in: FEG 1995, 49–63; I.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Cambridge 1991; *Westeuropa.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Integration*, Inst. f. intern. Beziehungen, Ak. f. Staats- und Rechtswiss. Potsdam (Hg.), Berlin/DDR 1985; P. Ziltener, »EU-Entwicklungsperspektiven und-blockaden«, in: *Widerspruch*, 15. Jg., 1995, H. 29, 80–94.

帕特里克·齐尔特纳
（Patrick Ziltener） 撰
胡晓琛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Bürokratie, Dritte Welt, Etatismus, Eurokommunismus, Europa, Europastrategien, Gemeinschaft, Geographie, Geopolitik, Gewerkschaften, Hegemonieapparate, Herrschaft,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nternationale politische Ökonomie, Konvertibilität, Konzentration, Liberalismus, Monopolkapital, nationale Bourgeoisie, nationales Interesse, Nationalstaat, Neoliberalismus, Regulationismus, Sozialstaat, Staat, Staatsform/Regierungsform, Staatsschuld, Verwaltung, Weltmarkt, Weltsystem, Weltwirtschaft, Wohlfahrtsstaat, Zentralisation/Konzentration

欧洲策略（Europastrategien） 1013

A: istratīğīyāt ūrūbā.

E: Europe strategies.

F: stratégies européennes.

R: strategii dlja Evropy (стратегии для Европы).

S: euroestrategias.

在商品出口特别是联邦德国资本出口首度大幅上升以及德国资本将20世纪

重要的外交地位和桥头堡地位第三次收入囊中的十年间，出现了“欧洲策略”这一专业术语作为德国垄断资本的扩张理念。这一术语因为莱因哈特·奥皮茨（Reinhard Opitz，1934—1986）出版的文献集《德国资本的欧洲策略（1900—1945）》（*Europastrategien des deutschen Kapitals 1900-1945*，1977）而被引入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中。十年之后，德国资本的最高代表之一（赫尔豪森[Herrhausen]）重拾这一术语，并将它指向最新出现的“欧洲策略”（Roth 1988，第7页）。这使欧洲策略的一系列问题被细化了，这是马克思1844年早已确认的事：“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KHR，MEW 1，第382页）

《德国资本的欧洲策略》强调了：（1）被集中的资本不仅是扩张政策的一般基础，也是它“至关重要的目标”以及“它总体生存智慧的直接反映”的扩张（Opitz 1977，第22页）；（2）尽管这一趋势特别指向欧洲，但是绝不仅限于此——奥皮茨准备了另一本文献集（1977，第26页，第1070页）《德国资本的殖民策略（1900—1945）》（*Kolonialstrategien des deutschen Kapitals 1900-1945*），重点在1933—1945年间，但它从未出版。

1. 对于奥皮茨而言，欧洲策略这一概念从属于一项调查，他在《德国资本的欧洲策略》（第21—43页）一书的前言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并且在关于**社会自由主义**（*Sozialliberalismus*）（1973）和**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Faschismus und Neofaschismus*）（1984/1996）的两部专题著作中，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论述（参见他身后出版的关于“**罗姆事件**”[*Röhm-Affäre*]以及其中展现的德国大资本的走向之争的调查）。对他而言，“扩张目标”意味着“财政或垄断资本的特殊社会团体在某一特定时期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利益’”的“直接组成部分”（1977，第22页）；尽管这些目标出现在他所有的文章中，但更多是作为出发点而非直接的调查研究之物。

对他而言，更多的是“从历史角度 1014
看‘经济’在政治中的具体实现形式”，以求探索发现，“哪些资本团体在哪些历史时期是哪些扩张理念的代表，并且这些扩张理念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它们在变化万千的军事和政治因素局势中经历了何种变革；‘经济’到‘政治’是如何流动的；前者创造后者的实现形式是什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在多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有反馈的具有影响力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一种倡议的优先权会交由纯粹的时间过程去定夺；

一个策略的意识形态化的最初连接点在何处，这一过程的最初阶段在它最直接而密切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行动者圈内是为人熟知的，还是不由他们个人意志所控，又在这一圈子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程序而推进着；哪些意识形态理念最终是由哪些扩张策略生产而来”（第25—26页）。

这不仅仅是人员的联系——它们由不同机构或协会在形式上进行着组织，或者具备非正式的性质，它们由经济依赖性来保障，由资助或经济之外的方式来巩固——不仅是任何一种从“经济”到“政治”的流向，也不仅是在此之上可以重构传递程序和挖掘其形式的社会关联；这一直是一种扩张目标意识形态化以及与此相关的策略，即分批次、分步骤地实现合法化的建构。它们试图允许建立远不止一些相应策略的狭小的主要行动者圈，而是更大的追随者圈。最后的理想是完美地将“所有人民”都**融入**（*Integration*）扩张策略中，因为这也会影响成败。因此，**一体化策略**（*Integrationsstrategien*）是扩张策略的有力支持，并对其策略本身有反作用（参见 *Nachlass*，I）。

2. **这些策略的发展**（*Entwicklung solcher Strategien*）早已在19世纪中期找到出口，这一时期德国领土上工业化和资本化过程并不发达。自1840年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宣传大范围的扩张计划：首先是围绕德法核心联盟建立“大陆联盟”，在这一联盟中“德意志可以与归属于它的海滨属地，与荷兰、比利时和瑞士一起”获得“它自然应得的地位”（引自 Opitz 1977，第53页），而后——如果出现联盟的急剧变化——则是德英联盟的计划。李斯特预先做好了德国资本未来欧洲策略的替代方案。他的计划与殖民地目标紧密相连，对于德国而言首先将目标指向东南欧，然后进攻土耳其，最后是更大范围的视角，借由与英国结为联盟使“亚洲和非洲……臣服于自己”（第74页）。这就是“‘中欧大国’论”，1859年恩格斯提到了这一理论的自负以及对于欧洲的危险后果（MEW 13，第228—229页）。

李斯特利用充满希望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做宣传：在联盟转变之前，广大的基督教—欧洲世界轻视“亚洲的腐朽文化”以及它的“人民混乱”，在此之中无法找到“值得或能够保护和重生”的“单一的民族”（引自 Opitz 1977，第54页）。在转变之后致力于实现一些特殊的建构，特别是对民族传统的建构：因此费希特（1845，第363—364页）将对法关系的批判认定为**机械化**（*mechanistisch*）的（“无非如一台机器”——引自第69页），他对德意志民族特性的

理解亦是如此，并扩展了德国狂热症（Germanomanie）这一视角，这是他的学生雅恩（Jahn）等人由此发展而来的：李斯特认为，德国与英国的共同性是基于“种族”（Rasse）的。俄罗斯是“斯拉夫种族”的主要力量，是“一群野蛮人的纯粹混杂物”，法国能有如今的经济成果，主要归功于“德意志的”各省，“日耳曼种族……被上天授意于担负重大的任务……，即领导国际事务，使野蛮的国家文明化，使荒无人烟的国家有人居住”（第70页）。早在1844年，马克思批判了李斯特不够深远的经济设想（保护关税等）以及他的爱国主义缘由：“条顿主义从人变成了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不知在哪个黄道吉日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他对于这一面临着“过渡到最无耻的实践”（MEW 1，第382页）的“狡猾的理论”的戏谑主要映射了意识形态的建构，由它发展而来的一体化策略最终有力推动了扩张举动的实践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独裁灾难的发生。

1016

3. 若李斯特的建议“已经对今后所有的大资本主义欧洲策略的两大主要前进方向在萌芽阶段提前做好了建构”，那么他已在“富裕的社会”中，即他与奥格斯堡《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以及《科隆报》（*Kölnische Zeitung*）的工业圈之间有紧密的关系（Opitz 1977，第28—29页）。这需要德国工业在19世纪60年代的崛起、1871年帝国的成立以及对19世纪70年代大萧条的克服，直到这些扩张理念继续发展为战略项目。在20世纪初前后形成了成为未来德国资本扩张特征的两大主要方向，并且不仅体现在多种外部前进方向的实现形式上，也体现在内部融合策略的相应多样性上，与这些策略相联系的则是不同的宣传策略：主要由重工业支撑的路线（旧工业）和“主要由新工业资本以及与德意志银行联系紧密的化学和电子企业集团支撑的路线”（第30页）。尤尔根·库钦斯基做出了这一区分（参见Opitz，*Nachlass* III，附件1；Grossweiler 1975，第15—43页；1983，第181—242页；1988，第199—229页，第626—649页）。

重工业扩张的宣传中心主要是泛日耳曼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它于1891年成立，之后迅速扩展为官宦组织，求助于社会、教育机构和政界中的传播者。从一开始这里就对广泛的征服进行宣传，并且向东直至俄罗斯，向西直至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主要是那里的重工业区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北海沿岸。很快在一些出版物中就出现了与此相关的“将绝大部分非德意志人驱逐出去”的要求（引自Opitz 1977，

第102页）。

新工业路线，传统上是**中欧**（*Mitteleuropa*），更向着东南欧方向发展：奥地利的威严统治使得这些区域的领土可开放，因为它们（对于化学工业而言）矿产丰富而具有吸引力，又因为它们与土耳其以及近东领土相连以及作为对付俄罗斯的侧翼阵地而变得有趣。在此并无过多的吞并政策，更多的（在必要情况下从军事上推进）是宣传将德国
1017 作为领导力量的经济联系，其依据是天主教实用神学原则“一众信徒，一位守护者”（Friedrich Naumann，引自 Opitz 1977，第337页）。这一路线的组织核心为自由党派（特别是那些由瑙曼参与其成立及纲领制定的党派）和1904年后的**中欧经济协会**（der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sverein*）。

目标为暴力吞并的路线在国家内部主要体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宣传，与打压和（在必要情况下的）政变措施相结合，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反军事主义者。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被投入使用时，就会发生“由‘种族’替代‘资本’”（Opitz 1996，第18页），与此同时，所有法律和社会范畴中的平等原则和视角都会付之一炬。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以这种形式组成的人民会广泛支持所要求的血腥措施。这样的宣传在宣传册《如果我是皇帝》（*Wenn ich der Kaiser wär'*，1912，参见 Opitz 1977，第180—196页）中达到了顶峰。在这本宣传册中，**泛日耳曼联盟** 1908—1939年的主席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整合了一份需求目录，它已经体现了纳粹罪行，直到东部全面计划，再到对犹太人的屠杀。

新工业路线更致力于**一体化**（*Integration*），致力于为“国家的一切”“大众的爱国意识”而赢得人民；瑙曼将它的内涵定义为“推动德国人民，将他们的影响力在全球扩张”（引自第125页）。于他而言，核心是争夺国际化的地位以及对一种适应“现实”的“真实的商业国际主义”（第171页）的宣传（这最主要是为了渗入社会民主之中），更进一步的是将扩张塑造为历史所不可避免的以及与人民的**利益**（*Interessen*）相一致的。只有通过加强“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势力”才能解决**社会问题**（*die soziale Frage*），因此这些为“大战”和“未来的大量准备”（Naumann 1967，第5页，第201—202页）都是符合德国工人的自身利益的。从**自由主义**（*Liberalismus*）角度理解而言，大企业的、在国内创造依赖性的结构贯穿于国际关系之中。“历史已经决定哪些是领导性的国家，哪些是被领导的国家，实现自由是困难的，因为历史本身如此。”（第355页）瑙

曼首先将这一路线称为“基督教—社会的”，而后称为“国家—自由的”或
1018 “国家—社会的”（他从未称其为“国家社会主义”）。奥皮茨则称之为**社会自由的**（*sozialliberal*），对这一路线的研究是他除了对法西斯主义研究之外的另一个决定性的工作重点。他细致入微地捋清了相关的资本主义策略，并运用以及进一步发展了两条路线中的**民族**（*völkischer*）结构。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准确分析自由主义，才能明确区分作为策略中的一部分的**社会自由主义**（*Sozialliberalismus*）和（在德国薄弱的）指向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潮流——这一区分是奥皮茨反霸权主义策略视角的基础。

在“一战”以前，两条扩张路线在组织上已经成型，即在一部分具有**起指挥作用的**（*dirigierenden*）修会结构，一部分具有大众组织结构的协会中。它们形成了一个指挥部与协会的网络，这两条扩张路线部分是相连的。起到核心宣传作用的是**海外德侨联合会**（der *Verein für das Deutschtum im Ausland*，VDA）——直到1945年，自1955年在德意志联邦德国重新活跃起来（Fricke 1983，第4页，第277—279页；Goldendach/Minow 1994）——以及**泛日耳曼联盟**（der *Alldeutsche Verband*）（Fricke 1983，第1页，第13—47页；Peters 1992）。在这些协会倡议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

4.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促使它完善意识形态及策略。这通过渗入社民党的政治设想而获得了促进，而这些政治设想在此次战争开始前及进程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自1916年初开始，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s，SPD）就参与了**中欧工作委员会**（*Arbeitsausschuss für Mitteleuropa*）的工作，这是一个高层的圈子，瑙曼、马克斯·韦伯、沙赫特（Schacht）、巴兰（Ballin）以及施廷内斯（Stinnes）均属于这一圈子。工会领导人莱吉恩（Legien）、莱佩特（Leipart）以及施特格瓦尔德（Stegerwald）加入了1917年底为了实现社会自由目标而成立的**自由与祖国人民联盟**（*Volksbund für Freiheit und Vaterland*）（Opitz 1977，第275页）。这些合作直接融入魏玛联盟在今后几十年中的内政和外交社会自由政策中，这是一项两害相权取其轻（社会自由的“害”）的政策，而社会自由的“害”自然会给更大的“害”铺平道路。奥皮茨在他文献集的前言中写道，读者在此“能够看到首份以维护扩张策略的持续性为内容的变革制度的例子。他会见证对‘种族霸权主义’的运用”（第33页），正如它在1918年3月马克斯·冯·巴登（Max von Baden）的备忘录中得到了推

进（参见第420—440页）。这位读者将会经历“从总体风格而言……激情澎
1019 湃的由扩张目标转变为人权要求的变革剧目，参与从他所熟知的扩张策略的精神中发展出‘保护人权’‘自治权’‘权利平等’和‘公正’的崭新伟大口号。在记录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的政策以及1931年关税同盟圈套的文献中，他看到的是整架马车从单纯的伦理道德驶向政治运作”（第33页）。正是因为这种关联性，就可以理解《凡尔赛和约》与国际联盟的谎言之网，也可以理解那些恐怖与暗杀袭击除了针对共产主义者外，还使成百上千的和平主义者成为牺牲者，可以理解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反对日内瓦国际联盟记要的政策以及他在洛迦诺（*Locarno*）通过的将边界问题相对化的政策，这一相对化影响深远（Bennhold 1996，第78—82页）；可以理解的是由新工业（*neuindustriell*）主导的魏玛联盟所实施的致力于扩张的武器体系（坦克巡洋舰）系列决定，最后是进一步加强的种族化政策（“尚未收复的欧洲”[Europa irredenta]作为确保统治地位的模式）以及少数民族政策，主要是贪婪地将海外德侨（*Auslandsdeutschen*）集中在远近不同的国家，与海外德侨联合会合作并且由一张严丝合缝的种族意识形态建构之网所支撑。这些策略越成功，两条扩张路线合二为一的尝试就越频繁，这样的尝试在1933年1月4日科隆施罗德银行大楼中正式获得成功（Opitz 1996，第155—156页，参见特别是 *Nachlass* III，第3章，第5页；Grossweiler 1988，第326页）。现在就进入了下一步，之后在不到四周的时间内，希特勒政府就成立了。1934年在所谓的“罗姆事件”框架中，其他的异见者都被血腥清洗。从此开始，就不存在与扩张规模及方法相关的阻碍实际举措的异见了。在战争的后半阶段又出现了一些目标上的分歧，但是表现出来的是不同势力的新对峙，在他们的目标上还无法体现这一点，更不用说不同的利益路线了。随着前线的失利以及在占领国的压力日益增大，这些分歧显现在更为温和的扩张政策上：一方面体现在中欧策略的代表参与到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行动中（参见Asendorf 1978，第387—419页），另一方面体现在战争最后两年的计划以及备忘录中，比如至1944年秋的理查德·里德尔（Richard Riedl）政策（Opitz 1977，第990—1007页，参见 1020
第948—954页）以及从1943—1944年开始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政策（Roth 1995，第53—93页）。在这十二年间，一体化以及组织策略都是与国家和国家外机构的组合暴力一起实施的，而这些策略在魏玛共和国就已经初见端倪了；一种极端激进的宣传，与身

体和致命的恐怖相结合，当然还有参与掠夺和抢劫行动或者仅仅从中获利，包括对犹太人的抵制和驱逐的结果，直至德国公民的优先体制，这一体制与始于1943年的强制劳动严密网络相关联。

奥皮茨对纳粹的看法是，在欧洲策略的延续性与压迫和灭绝措施之间建立了关联性，包括对犹太人的迫害直到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奥皮茨发现，在创立“无敌的统治区”（卡拉斯[Claß]语）过程中有一种扩张的现实性，在这种现实性中日益显现高于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利益，因此在面临战争失败时加紧灭绝措施就解释得通了（参见1996，第4章）。

5. 奥皮茨的研究体现了欧洲策略的流动性，即随着时机的变化“德国资本的欧洲扩张目标目录如手风琴弹奏般渐强、渐弱”。他认识到主要因素在德国民众的一些内在的潜在矛盾中，它们又会跟与此相关联的一体化策略相遇，同时伴随着因局势而变化的“方法与意识形态的转变”。这就体现了这一策略**“在其流动性上的持续性”**（1977，第28页），这一策略的制定与精细化离不开**基金会**、研究与咨询委员会等智囊团。

奥皮茨的作品与主流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的作品满是对当时历史书写方式的领袖代表、对这种书写方式以及他们的前人在一体化策略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批判。他的工作成果在当时从根本上而言是被忽视的。一个例外是奥皮茨与历史学家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学派的关系：前者可以与后者的作品及其长期追求的阐述相联系（1977，第22—23页）。从形式上而言，经济学家约尔格·胡夫施密特（Jörg Huffschmid）对**资本策略**（*Kapitalstrategien*）进行了研究（诚然没有意识形态形成的维度），此后那些不否认20世纪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对此进行了研究，比如曼弗雷德·阿森多夫（Manfred Asendorf）、迪特里希·艾希霍尔茨（Dietrich Eichholtz）、卡尔-海因茨·罗特（Karl-Heinz Roth）或者维尔纳·勒尔（Werner Röhr）以及文集《欧洲新秩序》（*Neuordnung Europas*，1996）的作者们。 1021

6. 随着民主德国“加入”式地与联邦德国完全合并（1990年），德国资本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资本的集中也获得更多推动力。在20世纪末期，欧洲策略是以如下形式出现的：（a）对于西方，是对欧盟的推进；对此优缺点的一个公开讨论，也有关于民主削减以及其社会后果的讨论，对此的探讨是如此被边缘化，以至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b）对于东方，是

对那些德国资本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扎稳脚跟或者显现出极大机会的国家（捷克、波兰、匈牙利）推出欧盟一体化政策；此外对更外圈的国家推行中欧策略，这是对一个有历史包袱的理念的延续，该理念在1983年之后在国际上再次获得了认可（Bennhold 1992，第977—989页）；当然，这一策略的实施是相对内敛的，因为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被考虑为更为全面的资本策略的有利目标。同时，针对东方的欧洲策略与少数民族政策的民族因素相结合，这是对外国德国侨民的一种新的利用，他们被用于干涉外国国内事务（此处又是在传统的海外德侨联合会的参与之下，参见Goldendach/Minow 1994，第287—477页）。(c) 在此基础上的更为深远的策略，体现在军事及军备政策的转向上；由于人员组成的不断减少，技术升级的装备被制造出来，基于德国资本的全球利益，它们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使用。

东欧政治、社会制度的崩溃（1989—1990年）以及与此相关的极化的消失，并没有给国际关系带来一丝宁静；与此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社会内部以及国际社会风起云涌。在冷战背景下，对确保物质条件的一体化的需求凸显，并以福利国家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如今这种需求减弱了；从确保社会基本需求视角而言，不用再担心制度竞争了，并且这些保障的取消都会以一种形式的一体化意识形态加以合法化，而根据这一意识形态，“德国的区位”应该是全民社会关切的资本所在地。 1022

参考文献：

M. Asendorf, »Ulrich von Hassels Europakonzeption un der Mitteleuropäische Wirtschaftstag«, in: *Jahrbuch des Instituts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Bd. 7, 1978, 387–419; ders.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Kapitalstrategie«, in: *Staatliche Kunsthalle Berlin.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1933. Wege zur Diktatur*, Bd. 1, Berlin/W 1983, 126–85; M. Bennhold, »Europa: Expansionsstrategien und -ideologien des deutschen Kapitals«, in: *Marxistischer Bl*ätter, 1992, H. 6, 58–65, u. 1993, H. 1, 64–70; ders., »Locarno und die völkischen Traditionen in der deutschen Außenpolitik«, in: F. Deppe, G. Fülberth, R. Rilling (Hg.), *Antifaschismus*, Heilbronn 1996, 70–82; D. Eichhol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riegswirtschaft 1939–1945*, 3 Bde., Berlin/DDR 1971–1985, Berlin 1996; J. G. 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 in: *Sämtliche Werke*, hgg. v. I. H. Fichte, Bd. 7, Berlin 1845 (Reprint Berlin/W 1971), 257–516; F. Fischer, *Bündnis der Eliten. Zur Kontinuität der Machtstrukturen in Deutschland*

1871–1945 (1979), Düsseldorf 1985; ders.,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s 1914–1918* (1961), Düsseldorf 1994; D. Fricke u. a. (Hg.), *Lexikon zur Parteiengeschichte (1789–1945)*, Bd. 1–4, Köln 1983–1986 und Leipzig 1983–1986; G. Fülberth, »Kapitel ohne Raum. Einnerungen an den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ler Reinhard Opitz«, in: *konkret*, 1995, H. 3, 38–39; W. v. Goldendach, H.-R. Minow, *›Deutschtum erwache!‹ Aus dem Innenleben des staatlichen Pangermanismus*, Berlin 1994; K. Gossweiler, *Aufsätze zum Faschismus*, 2 Bde., Köln 1988; ders., *Großbanken. Industriemonopole. Staat*, Berlin/DDR 1975; ders., *Die Röhm-Affäre* (1963), Köln 1983; M. Grunewald (Hg.), *Le discours européen dans les revues allemandes (1871–1914)/Der Europadiskurs in den deutschen Zeitschriften (1871–1914)*, Bern-Berlin 1996; J. Huffschmid, *Wem gehört Europa? Kapitalstrategien. Bd. 2*, Heilbronn 1994; F. List, *Schriften. Reden. Briefe*, Bde. 1–10, Berlin 1927–1935 (Reprint Aalen 1971); F. Naumann, *Werke*, Bd. 1–6, Köln-Opladen 1964–1967; R. Opitz, »Über vermeidbare Irrtümer«, in: *Argument 121*, 1980, 357–75; ders. »Deutsche Frage und Mitteleuropa-Diskussion. Ihre Bedeutung seit den 20er Jahren im Deutschen Reich und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Marxistischer Blätter* 1986, Nr. 5, 21–30 (posthum u. stark gekürzt publiziert); ders., *Der deutsche Sozialliberalismus 1917–1933*, Köln 1973; ders., (Hg.), *Europastrategien des deutschen Kapitals 1900–1945* (1977) Bonn ²1994; ders., *Faschismus und Neofaschismus*, Bonn 1996 (1. A. vom Verlag gekürzt, Frankfurt/M 1984 u. Berlin/DDR 1984; ²1988 ungekürzt); ders., *Liberalismus. Faschismus. Integration*, Bd. I: *Liberalismus und kapitalistische Integration*, Bd. II: *Faschismus*, Bd. III: *›Die Röhm-Affäre‹* (Nachlass-Edition, erscheint vorauss. 1998); M. Peters, *Der Alldeutsche Verband am Vorabend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908–1914)*, Frankfurt/M 1992; W. Röhr, B. Berlekamp (Hg.), *›Neuordnung Europas‹. Vorträge vor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Faschismus- und Weltkriegsforschung 1992–1996*, Berlin 1997; K.-H. Roth, »Das Ende eines Mythos. Ludwig Erhard und der Überga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der Annexions- zur Nachkriegsplanung (1939–1945). I. Teil: 1939–1943«, in: *1999–Z f Sozialgesch. d. 20. und 21. Jh.*, 1995, H. 4, 53–93 (II. Teil vorgesehen für 1998); H. Wehberg, »Ideen und Projekte betr.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 in den letzten 100

1023

Jahren«, in: *Die Friedens-Warte*, 1941, Nr. 2–3, 49–122; wieder als separater Nachdruck Bremen 1984.

马丁·本霍尔德
（Martin Bennhold） 撰
唐婧 译，宋珊 校

参见：

Antifaschismus, Antisemitismus, Auschwitz, Biologismus, bürgerlich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Charaktermaske, Chauvinismus, deutsche Misere, Endlösung, Europa,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Faschismus, Faschismustheorien, Finanzkapital, Geopolitik,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Imperialismus, innerer Kolonialismus,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ng,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ntegration, Kalter Krieg, Klassenherrschaft, Kolonialismus, Konterrevolution, Krieg und Frieden, Liberalismus, Manipulation, Mitteleuropa, Monopolkapital, multinationale Konzerne, Nationalismus, Nationalsozialismus, Neokolonialismus, Polizeistaat, Preußischer Weg, Rassismus, Raum, Rüstungsindustrialisierung, Sozialdarwinismus, Sozialimperialismus, Sozialliberalismus, Sozialpolitik, Staat, Staatsmacht, Staatsterrorismus, Systemkonkurrenz, Unterdrückung, Unternehmerstrategie, Verbrechen, Völkermord, Weltkrieg, Zentralisation/Konzentration

欧洲中心主义（Eurozentrismus）

A: markazīya ūrubīya.

E: eurocentrism.

F: eurocentrisme.

R: evrocentrizm (евросентризм).

S: eurocentrismo.

欧洲中心主义是指一种错误的普遍主义，它将打上西欧资本主义烙印的文明模式和历史模式不加批判地作为衡量一切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标准。欧洲中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在欧洲征服世界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或多或少自发地产生影响的“文化帝国主义”（Said 1994）。在此，“欧洲”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体系”（Wallerstein）的崛起和扩张；这种生产方式的理性与独特形式，它的积累机制，它的生产力以及科技产品，甚至它的国家主义都使它在全球的胜利扩张成为可能。20世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为争夺全球统治地位而引发的世界大战使得中心越来越向美国转移，这产生的结果是“西方这一术语可以与欧洲（*Europe*）这一术语

相互交替使用”（Gran 1996，第3页），这忽视了日本和其他亚洲大国获得霸权地位的事实。正如证实黑格尔密纳发的猫头鹰这一比喻一般，这一术语出现在欧洲中心地位的“黄昏”。这一概念
1024 “几乎从未出现在百科全书和辞典中”这一事实（Malandrino 1990，第950页；事实上它在《哲学辞典》和《哲学历史辞典》中几乎是缺位的，GG，KWM以及LS）预示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余毒是持久的。世界历史被“欧洲中心地”书写，即“从精英，主要是西方精英视角来看”（Gran 1996，第1页）。当欧洲中心主义被表达出来的时候，它的自发的力量就被打破了。

欧洲中心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殖民主义历史表达的统治所谓第三世界的要求。从文化中是否突出欧洲中心的思维角度而言，只有希腊拉丁欧洲突出这一点。欧洲中心主义对家庭、科学和经济方式的评价使它阻碍了人性的发展（参见Krumpel 1992，第33页）。对批判西方受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爱德华·W.萨义德而言，在“西方”对“并不知晓的世界”以“‘他们’……并不如‘我们’那么人道”（1981，第126页）来表达他们统治世界的要求之前，不存在“不人道思想的明确例子”。因此，欧洲以外的国家或以与“欧洲”（即“西方”）完全不同的“异国”形象而出现，或以正向或者已经向欧洲社会典范看齐的国家形象而出现（参见Gran 1996，第3页；Mall 1995，第1—3页）。

1. 伴随着哥伦布的“新发现”以及此后的征服，形成了“近似于欧洲中心的评价标准”（Melber 1991，第12页）。尽管启蒙运动对西方以基督教为中心的优越性要求、教会的传教热情以及殖民统治者的残暴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参见Dietsche 1984，第105页），但这就等同于将资本主义的理性模式普遍化了，普遍认为，“野蛮的”社会会在它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向欧洲的理性水平“看齐”。启蒙理性主义和18世纪以及19世纪初期的经典哲学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又是“以集团为中心的、种族中心主义的”（Jouhy 1985，第45页；Melber/Hauck 1989，第10—11页）。在这一对矛盾中，资产阶级的利益格局就显现出来了，即他们将特定的解放目标鼓吹为普遍的解放目标，滥用虚伪的普遍主义导向使他们的扩张合法化，隐瞒他们觊觎殖民地经济以外的权力。

在伏尔泰看来，尽管存在着“普遍 1025
的理性原则”，但是他认为非洲人的智慧是“十分低等的”（引自Melber/Hauck 1989，第9页）。孔多塞的启蒙普遍主义一方面批判欧洲殖民大国和奴隶主“对

不同肤色人群的残忍蔑视”（1795，第349页），但另一方面他也对欧洲文明相对于“非洲部族的未开化以及野蛮地区的无知”（第193页）有更高的评价。因此，“有必要将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作为或多或少受历史因素影响的个体看待”（Henn 1988，第110—111页）。

出于对欧洲社会发展的考量，康德将不参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人排除于人类历史之外：“相对温和的地球一隅的居民，特别是地球中间区域的居民，他们在形体上更优雅、更勤劳、更风趣，具备更为适度的热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群体更为理性。因此，这里的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教导着其他人，并用武器驯服他们。”（*Physische Geographie*，§4）黑格尔认为，“欧洲绝对是中心，是旧世界的尽头，也绝对就是西方”，但在亚洲存在着“精神的光芒，以此成为世界历史的萌芽之地”（*Phil-Gesch*，W12，第130页）。西亚“突出的是，这一区域不只保留给自己，还输送至欧洲。那里是一切宗教原则和国家原则的起源之地，而欧洲是这些原则的发展之地”（第132页）。简要地说：“世界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因为欧洲根本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第134页）黑格尔使欧洲残暴的扩张合法化。“建立国家的**英雄权利**（*Heroenrecht*）”属于“文明的国家”，它允许这些国家将其他地方不具备欧洲建制和国家机器的人民的独立“作为某种形式”来看待和对待（*RPh*，第350—351节）。在他看来，非洲“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没有运动和发展”（W12，第129页）。这种“自负的欧洲中心主义”（Davidson 1995，第24页）的立场是，将其他文化视为“原始的”以及“未开化的”，并据此来对待它们。普遍主义的组成部分被民族国家的地方分治主义所取代：“民族国家成了被殖民国家。”（Kristeva 1990，第138页）

2. 关于马克思从多大程度上阐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这一问题，是充满争议的。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 1978）和比尔·华伦（Bill Warren 1980）认为，马克思将欧洲特有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普遍有效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 59*，MEW 13，第9页）中对于经济社会模式各阶段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每一个国家模式的必然发展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 57*）中显示的是一种非线性的社会发展模式（参见MEW 42，第36页及以下），之后它的轮廓更为明显。尽管《资本论》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1版序言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3，第12页）被读者解读为他对历史 1026

普遍“既已确定的发展方向”的信念的证据（Laclau 1982，第 10 页），但是这句话是对 1867 年的德国读者说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英美国家的东西（参见 Haug 1985，第 41 页及以下）。《资本论》第 1 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中认为这种发展最根本的因素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它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被赋予了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顺序。”（MEGA II. 5，第 576 页）在马克思编辑的《资本论》第 1 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法文版的最后一个版本中（1875），马克思在相应的地方明确指出反对所谓欧洲中心主义的阅读方式，也就是错误的普遍化：他确认关于“所谓原始积累”章节的地位现在为一种**梗概**（*esquisse*）的地位。以极端的方式剥夺农民土地的自主权首先出现在英国。“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Mais tous les autres pays de l'Europe occidentale parcourent le même mouvement），尽管它们出现的形式不同或者“过程的顺序不同”（ordre de succession différent）（II.6，第 634 页）。因此，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西欧，欧洲中心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具有破坏性的。此后他（不公正地）期待，全世界所有他的读者都知晓法文版的变化（恩格斯并未将此纳入德文版第 3 版中）。1877 年马克思在给一个俄罗斯杂志的信中提到了《资本论》第 1 卷第 1 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法文版，他反对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MEW 19，第 111 页）仅通过推测就等同于东欧、俄罗斯和亚洲的历史。1881 年他在写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Länder Westeuropas*）。”（19，第 242 页）在马克思主义此后 100 年的发展历程中，只有个别知识分子信服这种说法。

宋荣培（Young-Bae Song）认为，马克思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1027
之间的对立视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两极化（1983，第 88—94 页）。但对于马克思而言，由欧洲自发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绝非文明的最高标准。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那么“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MEW 9，第 226 页）。

如果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传播起源地英国作为例子来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3，第 15 页），那么这就被定义为“真实过程的‘欧洲中心主义’”，它与是否认可它的结构、实现方式和结果无关（Kössler 1983，第 9 页）。

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无产阶级中心的”，因为它宣告“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MEW 23，第512页）。资本主义的活力于它而言是极端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预言，资产阶级“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MEW 4，第466页）。但是，尽管生产、贸易、信息和沟通之间的网络越来越紧密，并且这一网络“将世界经济的各个单独的领域联系为一个全球的体系”（Hobsbawm 1995，第118页），但是世界各地还是存在数以百万的经营着自给自足经济的农民，以及城市中心的长期失业者，这两者均未被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非“工业后备军”的一部分，也非一种二元经济。因此，“无产阶级立场”的普遍性要求只是一种世界资本主义发达中心中自发形成的立场。但是，我们要问的是，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区域是否可以期待业已成型的另一种文明。

马克思认为，对殖民地的洗劫以及大都市的不断富裕是由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特殊特点决定的，而这“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K I*，MEW 23，第675页）。这种社会对抗不仅涉及大都市中资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同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马克思描述的在资本主义积累中的社会基本对抗体现了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在“符合市场情况的”价格的表象下，剩余产品由“南方”流向“北方”。边缘国家的资本削减与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相匹配。“中心与边缘”的结构并非基本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世界市场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并没有欧洲中心的意识形态，尽管在此资本主义的欧洲发展阶段具有核心的地位（参见Haug 1987，第204、215页；Khalatbari 1984，第96—97页）。 1028

3. 爱德华·伯恩斯坦认为殖民者有“更高一等的文化”，也享有“更高一等的权力”（*Voraussetzungen*，1899，第181页），以此为殖民剥削辩解。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持类似的观点（见葛兰西的批判，*Gef* 6，H. 11，第1章）。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将西欧的发展模式普遍化了。原始的物物交换经历了简单的商品交换，之后强制“使原始社会瓦解。随着氏族的萌芽，产生了新的利益，最后会形成新的政治组织；阶级斗争伴随着一切它无法避免的结果出现在人类政治、道德以及智力演变的领域”（1896，第166页）。

在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列宁看来，欧洲中心的历史发展模式的因素与

其理论以及实践的批判相矛盾。在《论国家》（*Über den Staat*）的演讲中，他要求，将“所有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宗教等问题”与“社会从奴隶制的原始形态到农奴制，再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联系起来研究（LW 29，第467—468页）。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ökInh*）中，他阐释了在农奴制废除之后，俄罗斯的经济特点是普遍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情况，并过分强调了在他看来“农业经济经营中资本的全面渗入”（1，第483页；参见Kan 1994，第29页）。但是，列宁反对照抄照搬（西）欧洲的历史。尽管他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比较了布尔什维克和雅各宾派，但是起草了未来俄罗斯革命的“新行动方略”（9，第47页）。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
1029 战后的贫困是“习惯于为世界疗伤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欧洲”腐烂的表现（33，第335—336页）。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演讲和文章中，他更强调亚洲和非洲的意义。庞大的人口数、落后状态以及革命的潜力都使俄罗斯与东方“被殖民的、弱势的人民”团结起来（31，第138页），他称这些人为“新的阶级”（第219页）并将阶级斗争转移到了全球关系的层面。

托洛茨基早已认识到1905年俄国革命对于东方（波斯、中国、土耳其）的意义，他1919年预测，革命之路将会从莫斯科，经过阿富汗、旁遮普和孟加拉等地的城市，通向巴黎和伦敦（Mandel 1992，第28页）。

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达成了共识，即苏联俄罗斯的“欧洲化”——实现更高的文化水平（参见LW 36，第538页）——是在俄罗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斯大林将这种关系倒置了。至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也是“全世界广大受剥削人民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胜利（W 10，第208页）。莫斯科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以20世纪30年代的雄伟艺术为象征。苏维埃构造者们在会议上宣告：“我们是古罗马唯一的直接继承者。”（引自Bown 1991，第86页）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将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纳入西欧发展模式，而将亚洲的生产方式排除在外，并认为西欧发展模式是一种理想类型：“历史上有五种生产关系基本类型：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第156页）

4. 恩里克·杜塞尔称资产阶级的文明的“现代化”的“另一张脸”为“边

缘的被殖民世界、被牺牲的印第安人、被奴役的黑人、被压抑的妇女、被异化的儿童以及被异化的平民文化”。“当开明的理性之下欧洲中心主义日渐被暴露”，当追求霸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意识形态的错误结论”被发现，“现代化”解放的理性才会摆脱边界：现代文
1030 明认为自身发展得更为高级，并因此促使自己“去发展未开化的、不文明的、野蛮的人们”（1993，第193页及以下）。

在第三世界，这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可以作为减轻负罪感的意识形态来使用。“如果……当地的情况影响不大，那么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们就不再为他们国家出现的问题负责。”（Gran 1996，第6页）对于缺乏的包容以及民主监督、缺位的媒体自由、童工、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妇女的压迫的批判都会被这些国家的精英们以欧洲中心主义以及西方的“文化入侵”驳斥回来。对于经济与社会情况的关联的问题、对于政治动机的问题以及对于西方在多大程度上引起这种备受指责的情况的问题，提醒者总是会渐渐将它们移出大众视线（参见Auernheimer 1992，第668页），并且对于人权的一种抽象的普遍主义常常会被工具化为这是以实现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地位为目的的。

当国家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没落之后，“历史的终结”被宣告时，其中体现的是“西方”幻想的傲慢，即用西方的文明模式实现没有争议的世界霸权。这种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地出现在媒体、科学界、政界和日常生活中（Boris 1992，第170页）。同时，生态危机、战争和内战的爆发、移民风潮以及民众失业的扩散使人们对这种以普遍认同和统治地位为目标的模式的继续存在产生怀疑。萨米尔·阿明号召用世界标准来衡量的进步力量“构筑一个多中心的世界”（1992，第86—87页），这是一个在各地区建立一种松散的联系并允许特殊政策实施的世界。

不理性的一种诡计大约是，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中推导出一种最后的、矛盾的欧洲使命感。海因兹·许尔斯曼（Heinz Hülsmann）提醒欧洲人，“欧洲历史的帝国回声不允许有幸福的过错（*felix culpa*），一方面将它作为欧洲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将它推崇为普遍主义的事物（参见Robert Spaemann）。我们更多是出于技术表达的前提和在这些前提下接受自我的。技术已将欧洲抛弃了，尽管技术也已经将欧洲改变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不再生活在欧洲。我们生活在一种同时性中，一种地域的不固定性中，我们自己也会首先在不同洲际间经历并理解这种地域的不固定性。我们的名字也并非直截了当地

1031 就说出来，不是直接从我们自己的嘴里出来再进入自己的耳朵，更多的是，我们根据自己能够听到的不同大洲的回声中的发音音节去学习我们自己的名字怎么念”（1990，第213页）。

参考文献：

S. Amin, *Das Reich des Chaos. Der neue Vormarsch der Ersten Welt*, Hamburg 1992; G. Auernheimer, »Universelle Rechtsansprüche und die Anerkennung kultureller Differenz—ein Antagonismus«, in: *Argument* 195, 34. Jg., 1992, H. 5, 665–74; D. Boris, *Ursprünge der europäischen Welteroberung*, Heilbronn 1992; M. C. Bown, *Kunst unter Stalin 1924–1956*, München 1991; M. J. A. N. Condorcet,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en Darstellung der Fortschritte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 (1795), hgg. v. W. Alff, Frankfurt/M 1963; B. Davidson, »Die Suche nach der Vergangenheit«, in: *Silsia. Z gegen Rassismus u. Imperialismus*, Nr. 5, 1995, 27; P. Dietsche, *Das Erstaunen über das Fremde. 4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 zum Problem des Verstehens und der Darstellung fremder Kulturen*, Frankfurt/M u. a. 1984; E. Dussel, *Von der Erfindung Amerikas zur Entdeckung des Anderen. Ein Projekt der Transmoderne*, Düsseldorf 1993; M. Godelie, »The Concept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nd Marxist Models of Social Evolution«, in: D. Seddon (H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London 1978, 209–58; P. Gran,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1996; W. F. Haug, »Krise oder Dialektik des Marxismus«,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eiträge zur politischen Kultur*, Bd. 1, Berlin/W 1985, 22–51; ders., »Marxismus, Dritte Welt und das Problem des Eurozentrismus« (1979), in: ders.: *Pluraler Marxismus*, Bd. 2, Berlin/W 1987, 197–215; A. Henn, *Reisen in vergangene Gegenwart*, Berlin/W 1988; E. Hobsbawm, *Das Zeitalter der Extreme*, München 1995; H. Hülsmann, *Nietzsche und Odysseus. Eurozentrismus und anthropozentrische Differenz*, München 1990; E. Jouhy, *Bleiche Herrschaft—Dunkle Kulturen*, Frankfurt/M 1985; A. Kan, »Lenin als revolutionärer ›Westler‹«, in: Th. Bergmann u. a. (Hg.), Lenin. *Theorie und Praxis in historischer Perspektive*, Mainz 1994, 23–32; P. Khalatbari, *Ökonomische Unterentwicklung. Eine historisch-politökonomische Analyse*, Berlin/DDR 1984; S.-Y. Kim, *Karl Marx und die nichteuropäischen Gesellschaften. Zur Kritik der eurozentrischen Interpretation der Marxschen Auffassung über die nichteuropäischen*

Gesellschaften, Frankfurt/M u. a. 1993: R. Kössler, »Asiatische Volksbewegung, russische Populisten und ›Das Kapital‹—Über Marxsche Zugänge zu nichtkapitalistischen Gellschaften«, in: *Peripherie. Z f. Politik u. Ökonomie in der Dritten Welt*, 14. Jg., 1983, Nr. 14, 4–23; J. Kristeva, *Fremde sind wir uns selbst*, Frankfurt/M, 1990; H. Krumpel, *Philosophie in Lateinamerika. Grundzüge ihrer Entwicklung*, Berlin 1992; E. Laclau, »Diskurs, Hegemonie und Politik.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se des Marxismus«, in: *Neue soziale Bewegungen und Marxismus*, AS 78, Berlin/W 1982, 6–22; C. Malandrono, »Eurozentrismus«, EE 1, 950f; R. A. Mall, *Philosophie im Vergleich der Kulturen. Interkulturelle Philosophie—eine neue Orientierung*, Darmstadt 1995; E. Mandel, *Trotzki als Alternative*, Berlin 1992; H. Melber, »Die Bürde des weißen Mannes—Von der Last mit uns selbst«, in: *Peripherie*, 11. Jg., 1991, Nr. 43/44, 8–20; H. Melber, G. Hauck, »Kolonialer Blick und Rationalität der Aufklärung«, in: *Peripherie*, 9. Jg., 1989, Nr. 37, 6–20;
1032 G. W. Plechano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Holbach Helvetius Marx* (1896), Berlin 1946; E. W. Said, *Orientalismus*, Frankfurt/M-Berlin/W 1981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ders., *Kultur und Imperialismus. Einbildungskraft und Politik im Zeitalter der Macht*, Frankfurt/M 1994; Y.-B. Song, *Konfuzianismus. Konfuzianische Gesellschaft und die Sinisierung des Marxismus*, Frankfurt/M 1983; R. Spaemann, »Universalismus oder Eurozentrismus«, in: *Merkur* 474, 42. Jg., 1988, 706–12; I.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World-System*, Paris-Cambridge 1991; 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1980.

冈特·维林 撰
唐婧 译，宋珊 校

参见：

Afrikanische Produktionsweise, Anthropologie, Arbeiterklasse, asiatische Produktionsweise, Chauvinismus, Dualwirtschaft, Ende der Geschichte, Entwicklungsländer, Ethnie, Ethnologie, Ethnozentrismus, Eule der Minerva, Europa, fremd/Fremder, geschichtslose Völker, Gewalt, Globalisierung, Imperialismus, Industrialismus,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olonialismus, Kulturimperialismus, Mitteleuropa, Multikulturalismus, Orientalismus, peripherer Kapitalismus, Polyzentrismus, Proletariat, Rassismus, ursprüngliche Akkumulation, Weltmarkt, Weltsystem

明见性（Evidenz）

A: wudūḥ.

E: evidence.

F: évidence.

R: dokazatel'stvo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S: evidencia.

1. 哲学上的诸种认知与真理理论根源于这一洞见：认知主体并不在自身之中具备为真性保证（Wahrheitsgarantie），而毋宁是可错的。认知的根本目标就在于达至确定性（如关于某一事态、一个人、一次行动的道德理由等等）。在形如“‘p……’为真”这样的命题中，确定性得到表达。我们可以确定地知道些什么吗？什么给予我们以确定性？是否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免于怀疑地被保障的知识，这种知识关联于某一可以无可争议地被视为真的东西，这一发问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便是一个经典的问题。如若该问题获得肯定的答复，如此这般的知识是“直观上确定的”，或者说，“显明于实事本身”（aus der Sache einleuchtet），在此意义上它便被视为是本体论与/或认识论上明见的。明见性的比喻义指向光的隐喻（“自然的理性之光”[*lumen naturale*]）。明见判断（E-Urteile）是不经其他判断中介便“可洞见”（einsichtig）的。从而，明见性表示一种哲学/理论中自明的（axiomatisch）、绝然为真的（apodiktisch wahr）诸基础命题的一个为真性标准（Wahrheitskriterium）。

基于对本体论或认识论侧重的不同，明见性或是被归结为“对于某人而言明见的事态”，或是“关于某物对某人而言明见的事态”（Kutschera 1981，第37页）；另一个区分是事态明见（*Sachverhalts*-Evidenz）与直观明见（*Intuitions*-Evidenz）的区分。在时下的诸种认知理论中，如若它们宣称一种明见性理论为可能的，那么对于明见性最为一般的规定便是：明见性标示了这样一种知识，其根据（Gründe）比单纯的真意见可以主张的那些根据要更强（Chisholm 1979）。更强是指，其根据在本体论上被如此保证且可以在本体论上被如此表达：这些根据具备独立于主体性的有效性（Geltung）。“对其为真性起担保作用者在其之外”（Kulenkampf 1973，第426页），这对于一切命题的明见性都成立。在这样的认知理论中，明见性是拒斥怀疑论批评的基础，是宣称一种既无需也无法经过方法性（methodisch）中介（比如通过实验证实或通过证明）的知识的前提。由此，一方面，明见性成了对在认识论上受辩护的主张进行合法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也奠定了基于此所派生的道 1033

德决断（moralische Entscheidungen）、伦理规范证成（ethische Normenbegründung）（首要地在直觉主义中）以及以“明见诉求”（*E-Anrufung*）形式呈现的权利诉求（rechtliche Forderungen）；譬如，首要地，一系列基于不可转让的诸权利的人权与基础权利，正如《美利坚独立宣言》（1776）所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1.1 明见性概念的历史始终伴随着一项争论：判断是如此地“直接显明”，以至于不得不将之视为真或有效的——这是什么意思？以及，“明见性究竟是存在于一种主观的‘当之为真’（Fürwahrhalten），一种判断的强迫性，还是一种客观的事实性（objektive Tatsächlichkeit）之中”？（Elsiler 1922，第 208 页）当明见性概念在德语世界仍争执未定时，英语世界自 17 世纪以来便将明见性严格处理为“自明”（*self-evidence*）（认知内容之为真性的自身明证 [*Selbst*bezeugung der Wahrheit eines Gehalts von Erkenntnis]）。20 世纪，**明见性**（*evidence*）在远远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标示直观的直接确定性与经验的间接确定性（经由方法或辩护的证实而得以建立）。关于明见性之定位的争论中的各种答案不仅仅对理解科学命题的为真性与科学哲学有所影响。尤其在现象学语境中，明见性概念被如此界定：明见性标示了一种通过生活世界（Lebenswelt）前理论（vortheoretisch）地得以中介的、立于科学性认识的明见的诸前提之先的东西。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存在这样一项争议，它首要地关于明见性究竟是一种“信念的内在状态”（internal state of beliefs）还是“被相信的命题本身”（the believed propositions themselves）（Feldman 1993，第 120 页）。在认知辩护理论（Theorie epistemischer Rechtfertigung）的框架下，齐索姆（Chisholm）和费尔德曼（Feldman）主张一种“**明见主义**”（*Evidentialism*），其核心论题为，“一个信念对于某人而言是在认知上受辩护的，当且仅当此人的明见支持这一信念”（第 119 页）。 1034

将明见性看作为真性标准的明见主义主张或明证主义（certistisch）主张如果是一贯的，便很少会认为“直观明见无非是单纯的主观确定性”（Piget 1974，第 32 页）。批判理性主义（der kritische Rationalismus）及与之相亲近的诸立场表达了对于每一明见性主张最为尖锐的批评：如若被明见者仅仅是直观的对象，而无法得到证明，那么明见性便是主观的；它恰恰不能被“看见”或者“显明”，并且因此无法在科学中起到奠基性的功能。

1.2 在上诉至马克思的传统中，明见性概念几乎没有什么位置。马克思主义的语汇保留了这一概念，是因为明见

性概念在语词翻译（比如《哲学辞典》第1卷，第386页）中为其所一般地接受。或者，明见性原则也会——在这一词汇本身未被接受的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批评被归结为唯心论的针对“感官经验表面上的不可靠性”的怀疑论的语境中，一方面得到运用，另一方面作为笛卡尔理性主义（每一真理都必然追溯到一个理性的、明见的命题）的理念而被加以谴责：“科学为了研究本质性的东西所必须揭示的普遍的东西，将在思想与词语中得到反映，思想和词语不是第一，而是第二信号系统的功能。”（Kondakow 1978，第161页）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见性批评，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唯心论的批判性的论题：“并非明见性奠定了诸真判断，而是诸真判断的客观为真性决定了其明见性。”（Bönisch 1983，第260页）这一本体论前提远远比它所知的或被承认的更接近于非唯物论的，也诚然是形而上学—实在论（明见主义的）的认知理论。而相应于“**真理的实践标准**”（*Praxis-Kriterium der Wahrheit*）（恩格斯：“对于布丁的证明就是食用”），这一前提得到了扩展：“这一转变是本质性的，因为当一个判断的为真性充分、频繁地通过人类实践得到证实，以至于它并不直接需要再度检验时，它才被看作是明见的。”（同上）

2. 每一个确切的明见性宣称的前提，无论是否得到阐明，都是一种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也就是说，它假定：（1）存在一种现实性（Wirklichkeit），其实存（Existenz）与属性（Beschaffenheit）独立于人类经验、思维形式与观点的实存与属性；（2）这种现实性作为其自身是可通达于认知的——至少在关键的部分上。对于这种实在论而言，人类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关于一个客观的对象性世界的经验，这是一个明见的原则。与“现实世界”（wirkliche Welt）相适配的认知可以以具备“客观真值”（einen objektiven Wahrheitswert）的命题说出，“独立于我们知道它的方式：它们的为真或为假关联于一个独立于我们而实存的实在”（Dummett 1978，第146页）。“对于实在论者而言，他所相信的物质的或者物理的世界必然不仅仅客观地，而且非精神性地实存。”（Devitt 1984，第13页）而这一现实性相对于意识的独立性必须作为明见信念（“他相信”）而得到宣称，便构成了这种实在论的困境。它的其中一个变式是“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1035

2.1 在（逻辑）经验主义传统以及几乎所有分析哲学的变式中，明见性概念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悖谬。毫不犹疑地谴责明见性批评者将因此必然需要证实（*Bestätigung*）的程序，并遭遇另外的问

题。积极的证实需要（Bestätigungsforderung）是无法兑现的，关于这一命题的一个激进例子是波普尔的消极验证主义（negative Bewährungstheorie）（1935），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可证伪（falsifiziert）的假定是可能有效用的："证实的明见性是不能算数的，除非明见性是一个理论的真正的测验的结果。"（1963，第36—37页）

施泰格米勒（Stegmüller）主张一种激进的明见性怀疑。在其看来，明见性无法区分于单纯的主观确定性。如果不存在区分的标准，那么诉诸明见性便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是否明见性并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明见性（伴随着错误的主观确定性）"；如果假定一个标准，"那么这似乎将导致无穷回溯：在一种被先行给定的确定的情况中存在作为一个标准所需的诸标志（Merkmale），这本身必须不仅仅凭借主观的确定性，而且要凭借明见性得到确定"。因此"所有反明见性的论证都指出了一种自相矛盾"（1969，第168—169页），并且做出这一保留："我们只有相信，我们达成了这一洞见，即我们
1036 对该信仰无法有证明上的明见性（Beweisevidenz）。"（第186页）

2.2 在知识论转向（wissenstheoretische Wendung）中，明见性概念出现于布劳恩（Braun）的《哲学史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1990）中。明见性确立起来（sich verfestigen），又消失了（sich verflüchtigen），它是"充盈的缺失（Verlust an Fülle），明见性始终脱离于它自身，这一状态是那事实上被我们称作过去（Vergangenheit）之物"（第3页）。甚至，深入诸种明见性的内部，每一个时期也都有"一个为明见性之效力所能及的过去"。明见性"从一开始就标示了一个时代独特的观察与思维方式"，恰恰是在我们将这种过去之物作为回忆、收集与重构的对象之时，我们便不再分享这一明见性了："我们尚且所能谈论的只有那嵌入知识之中的过去，那些过去的诸种明见性，只能在历史性的讨论对不同立场的比较中得以召回（beschwören）。"（第357—358页）在多元主义（Pluralismus）——历史化的与诠释学的多元主义——的前提下，这一明见性理论从属于写作该文章的时代的明见性。

3. 我们无法写就一部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明见性概念的语词与概念史（Halbfassoe/Held 1972）。但对于明见性这一哲学概念（不考虑其在法学与宗教语言中的用途）的发展的阐明（仅限于本质性内容）仍然是富有意义的。对比表明，马克思和上诉至马克思的诸立场在明见性的问题

史中是有其分量的：由恩格斯/考茨基/列宁/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建立起来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区分于布莱希特的逻辑—经验学派式（logisch-empirisch geschult）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实践哲学”（praxis-philosophisch）学派式的“结构”马克思主义（›Konstitutions‹-Marxismus），可以被刻画为一种“实体”马克思主义（›Substanz‹-Marxismus）——尽管使用不同的术语与理论语言，并且通常对明见性概念采取拒斥的立场，但这种马克思主义正属于那些在最强程度上从未假以问题化（problematisiert）的或者几乎未假以问题化的诸种明见性中获取其根本的认识论态度、信念、希望与预知，其可理解性与可信力的理论之一。

3.1 第一个可以本然地被解释为明见性的哲学命题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Zweite Analytik*）与《论题篇》（*Topik*）中就已出现。彼处谈到借助证明（Beweise）的知识：证明是由诸原理（Prinzipien）推导出的，而诸原理则是公理，其可洞见性（Einsichtigkeit）是由自身给出的。明见性的希腊语同义词（ἐνάργεια）首要地在伊壁鸠鲁式的认知理论中标明一种感官知觉上的“显然之物”（das in der sinnlichen Wahrnehmung ›Offenkundige‹）。西塞罗将 *ecidentia* 与 *perspicuitas*（透明性）作为术语上的同义词使用。塞克斯都·恩披里克（Sextus Empiricus）在运动的举例上提到了这一观点的代表者，即感官的明见之物必须看作无可争议的事实：“这尤其可以通过感官明见性来证明。因此，当有人对一位犬儒学派中的人提出反运动的论证时，他什么也没有回答，而是站起来并且大步行走，由此通过行动与明见性来表明，运动存在。”（*Grundriss*，III，第66页）自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接受以来，*speculatio* 成为明见性的视域，明见性被理解为——在论证上受到保证的——对神性对象的直观（Intuition der göttlichen Gegenstände）。“这是真正的知识的配得（Lohn），显然，你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一切，既曾在其思辨的观视（spekulative Schau）中呈现为神性的，也曾通过你的论证被证明为无可击败的。”（Boethius，Decons.，IV，第1页）在经院哲学中，邓斯·司各脱（Duns Scotus）认为 *ens* 这一表达是普遍的与最为明见的（*simpliciter simplex*）。这是一个无需定义的概念，因此这一概念是 *primus conceptus distincte cinceptibilis*。与此相对地，感官知觉与经验（“直观”被广泛地理解为 *contemplatio*）在中世纪尚且很少被推崇至明见性之源泉的地位。

1037

3.2 近代以来，被方法性地施行的实验（Experiment）成为经形而上学思辨所获知识的基础，此时，便必须借助尽可能等价的其他明见性原则，替代通过分有神性事物保证明见性的理念。笛卡尔在《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1628）中要求道："只把我们能够以明见的方式认知为真的事物当作是真的，即仔细地避免仓促的判断与前见，仅仅把清楚分明（klar und deutlich）地开显于精神，以至于哪怕最后一个趋向怀疑的理由都被排除的事物当作评判的基础。"（1980，第 20 页）笛卡尔同意伽利略的观点，即自然科学的认知如果要是正确的，就必须数学化。并非实验，而是直观承担了一种典范性的功能。公理只有当其可以被视为"明见为真"（evident wahr）时，才可被接受。"所谓清楚（*klar*，*clara*）的认知，"《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如是说，"就是明显地呈现于能注意它的那个心灵的认知……至于所谓分明（*deutlich*，*distincta*）的认知，则是界限分明，与其他一切对象厘然各别（*sejuncta et praecisa*），而且其中只包括清楚的内容的一个对象。"（第 15 页）

1038

这些规定首要地应归于数学化的精神，因为"虽然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但是与此相反，"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由于它们所对待的都不过是一些非常简单、非常一般的东西，不大考虑这些东西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因而却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Med.*，第 14 页）。《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n*）中的第一个沉思激进化了这种方法性的怀疑，使之越过上帝实存与客观世界的确定性的边界，乃至做出了对"邪恶的欺骗性上帝"（böser täuschender Geist）（第 16 页）的假定，以达至"我在，我存在"（*Ich* bin，*ich* existiere）（第 18 页）。《哲学原理》将这一洞见转化至一个普遍必然的判断形式："因此，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的这种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这是由源自作为"自然之光"（natürliche Einsicht）的直观而来的自身明见（Selbst-E）的知性原则所保障的。*res cogitans* 是通过清楚分明的自身被给予性（*Selbst*gegebenheit）的明见性标明的，而为了保障关于"物体性实体"（körperliche Substanz）的认知（关于空间中的物质的认知），二元实体学说需要"一个行创造的思维着的实体"，这一实体就其自身而言不能仅仅是单纯的理智构造。笛卡尔因此所引入的内容，成为诸多哲学争论的对象：观

念（Ideen）中“有些我认为是与我俱生的，有些是外来的，有些是由我自己做成的和捏造的”（第30页）。与此相应，非经验的数学知识是“由确定的、与我俱生的概念而构成的”（第32页）。奠基的回溯结束于一个第一观念，“其原因同时是一个原型”——因为其确定地是可思的因而实存的上帝：“首先，因为我知道凡是我清楚、分明地领会的东西，都能就像我所领会的那样是上帝产生的，所以只要我能清楚、分明地领会一个东西而不牵涉到别的东西，就足以确定这一个东西是跟那一个东西有分别或不同的，因为它们可以分开放置，至少由上帝的全能把它们分开放置。”（第67页）但究竟明见性是否能够提供一个为真性的标准，早在这一时代便是有争议的了。
1039 帕斯卡尔认为，恰恰是理性使此显现为明见的，即诸明见的命题也是不可以相信的。

再度先天地（apriorisch）、实体本体论地（substanzontologisch）建立明见性的，是斯宾诺莎。在与培根、笛卡尔的争论中，他以一种理性的、服膺于纯粹认知之数学化理想的求知的方法论为目标。基于感官性（Sinnlichkeit）的诸种观念是不充分的（inadäquat）。斯宾诺莎在方法论上的要求是，“在恰如其分的秩序中寻找真理本身，或事物的客观存在，或事物之观念（因为这些都表示一个且同一个东西）”（*Werke* II，第36页）。如若命题“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是同一的”（第35页）成立，那么无论诸种未经保障的认知方式（知觉、意见和表象），还是理性推断，都只能通过*intellectio*加以克服，（也就是）通过一种对本质的直观性的观视（eine intuitive Schau des Wesens），其自发性发动时等同于一种精神性的自主运动（*automaton spirituale*）。这种直观的为真性是通过属人事物对神性理智的分有而获得保障的。

3.3 明见性问题也与之相反地在直接以启蒙（Aufklärung）与成熟（Mündigkeit）为目标的——无论是出于政治抑或科学原因的——思想运动中获得了主题化。自由思考主义者（Freidenker）似乎是值得一提的，比如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1676—1729）与这一诉求：“自由思考”应当仅仅由“实事的明见性”而非由权威导引。

明见性的语言运用（Sprachgebrauch）对于现代尤其影响深远。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758）中引入了这一语言运用。此处所表露的内容在黑格尔之后的批评中得到清晰的揭示：休谟将“经验”（Erfahrung）这一本原（Prinzip）激进化为怀疑主义并且捐弃了客观性（Objektivität）这一“诸思维规定性的自在自为的存在”（*Geschphil*），

休谟认为，这在事实上不再是可以设想的，即“去研究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我们感官的当下证据或我们记忆的记录以外，保证使我们确信任何真实的存在和事实的明见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Sect. IV，Part I）他首要关注的不是基于“关系的观念”（Relations of Ideas）获得的直观的或者证明的数学的明见性（数学命题是通过“单纯的思维活动”而发现的，无论宇宙中是否有什么存在），而是没有明见性与之关联的“事实”（Tatsachen；*Matters of Fact*），是个别的感官材料与合法则性及作为“理性权衡”的因果性这些观念之间成问题的关联。

1040 休谟论断道，关于因果关联（Kausalbeziehung）的知识是“通过先天的思维活动获得的”，并且他坚持：“原因和结果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经验得以发现的。”这一论断将对源于经验的诸经验命题之效用的主张限制为一种“或然性”（Wahrscheinlichkeit）。由休谟所挑选的例子已经被看作认知和知识理论上归纳批评的一类典型，诸如在恩格斯（MEW 20，第497—498页）那里：“‘太阳明天将不出来’这个命题和‘明天太阳将要出来’这个断言是同样易于理解、同样没有矛盾的。”（Hume，第41页）

3.4 休谟的经验批评最大的影响展显于康德的批评之中。“思维方式的改变了的方法”（veränderte Methode der Denkungsart）假定：“我们关于事物只是先天地认识我们置于它们里面的东西。”（*KrV*，B XIVff）这是一种较之经验的优先性，固然“经验自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开启这一“哥白尼转向”的光不来自于形而上学，而是——康德特别突出了伽利略——“所有的自然研究者”，“他们理解到，理性只洞察他自己根据自己的规划产生的东西，它必须以自己按照不变的规律进行判断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必须不让自己仿佛是被自然独立用襻带牵着走”（*KrV*，B VIIIf）。从而，不出意料地，康德在其“先验方法论”（Transzendentale Methodenlehre）（B 741ff）中将明见性概念（“直观的确定性”）归结于“直观性的”公理和数学的证明，而从“推论性”（diskursiv）认知中的先天概念中，明见性则无法产生。

比康德的批判哲学更为激进的是，费希特将“自我”（das Ich）唯独看作自身明见性所诉诸者。这意味着，“除了自我在自身之中所设定的，没有什么被归属于自我”（*Werke* I，第333页）。这一无条件者（das Unbedingte）并非经验对象，而是在绝对自我对其自身确定性的理智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即“自我”中直接呈现于绝对自我的。

而首要地引发了青年谢林的关注的，则是在历史与神话理论框架下的问题意识："在历史性的神话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换言之，哪种明见性可以归于那些从历史叙述的前理论形式中所获得的学说（*Werke* I，第59页及以下）。在即将展开对费希特自我概念和对自我＝自我作为"最高命题的绝对明见性之条件"的循环的问题化时，谢
1041 林列举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并指出，"所有这些（符合这一头衔的）哲学家都谈及各自的科学的一个最高原理（Grundsatz），这一命题必须是明见的，并且这些哲学家都将此理解为一个其内容与形式交互地通过彼此得到奠定的原理"（第101页）。谢林在对开端（Anfang）的追问中发现了其哲学的核心问题。"我们的知识的体系"（das System unseres Wissens）不可能"基于我们的知识得到解释"，"知识毋宁预设了一个高于认知行动的本原（Prinzip）"，这便是"我们内部之先验自由或者意欲的权能"，它必然是"我们一切知识与行动的界限"，也是"唯一无可把握、无可消解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最无根据，最无法证明，也正因此在我们的知识中最为直接与明见"（I，第400页）。谢林与康德一样，认为数学是明见性的典范，数学"给哲学以原初直观（ursprüngliche Anschauung）的范例"，而"每一种诉诸明见性的科学都必须从原初直观出发"。但哲学与内感官（innerer Sinn）的对象相关，与数学不同，哲学无法"为一种建构（Construktion）提供一个与之相应的外直观（äußere Anschauung）"。"如果哲学应当成为明见的"，那么哲学就必须从内感官的原初建构（ursprüngliche Construktion für den innern Sinn）出发（第445页）。"什么是内感官的原初建构"，谢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见于其《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那种实在性东西（das Reale）与观念性东西（das Ideale）之间的无差别（Indifferenz），在数学科学中，它被从属性地纳入，当除去无差别中的一切感官关联（sinnliche Beziehung），从而使之自在地有效（ansich geltend）之后，哲学便使之处于最高和最普遍的意义上。诸种最高的科学所固有的那种明见性，便诉诸这种无差别。"（II，第60页）

在其自然哲学中，谢林追问"将整个自然关联在一起的本原"（die ganze Natur zusammenhaltende Princip），他通过一个实在论转向（realistische Wende）回应康德，康德错认了"一切明见性的根据（Grund）"，因为他"否认哲学之中的构造的可能性"："因此并非我们认知自然，毋宁说，自然是先天的，这意味着，自然之中的所有个别之物都先行

地通过整体得到规定，或者说，通过一般的自然理念得到规定。但是如若说自然是先天的，那么自然便必须可能被当作先天的东西被认知，而这便是我们的主张事实上的意涵。一种这样的科学正如其他科学一般，无法忍受假设性或者单纯或然性的东西，而是指向明见者与
1042 确定者。”尤其在其晚期试图在存在者中规定上帝之存在并由此规定明见性的《肯定哲学》（*positive Philosophie*）中，谢林反对了那种主张明见性可以“通过纯粹思维”获得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tisch）的“独断科学”（selbstherrliche Wissenschaft）（1848，第 26 页）。

3.5 这一假定算是哲学与科学史中的一个神话（Legenden）：诸种实证科学（positiven Wisschschaften）仿佛已经通过其对思辨哲学的批评，使得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以来，因康德而日益变得重要的**经验批判**（*Kritik der Erfahrung*）变得过时（ad acta legen）。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短暂地在经验科学中获胜的“常识的本体论”（Ontologie des *common sense*）相信其明见性可以由“可靠的事实”（sichere Tatsache）获得。它很快将看到自己要面临这一任务：拯救事实在科学内部变得可疑的地位。人们理解到：没有无理论的经验。**归纳科学的逻辑**（*Logik der induktiven Wissenschaft*）成为经验主义将迅猛开展的自身批评的最重要的形式。

胡威立（Whewell）在其《归纳科学的历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1837）中将“归纳”（Induktion）理解为“从对于个别事实的检验中收集一般真理的过程”。但关注的重点却被挪到了关于“事实与观念”的疑难。即便归纳主义（Induktivismus）也必须承认：“意义与理性这两种元素中的任一者都不能就其自身而言建构实体性的一般知识（substantial general knowledege）”；“事实”始终是“去被推理的事实”（facts to reason upon）（第 5—6 页）。这里呈现了一种归纳主义中的诠释学转向：“自然是书本，人类是解释者。”结论是：“经验不能建立任何普遍的或必然的真理。”

穆勒的实验研究的方法论（《一个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1843）几近无异地呈现了关于明见性的诸原则与科学研究之方法的问题处境。“经验的普遍化（Verallgemeinerung）何以可能？”穆勒本人也知道：“人们所通常认为是观察之结果的东西，往往是一种混杂（Gmenge），其中包含了 1/10 的观察和 9/10 的推论。”“抽象观念”的问题必须得到关注，因为归纳不可能“在没有一般表象的情况下发生”；“所有对真理的证明和发现”对于经验主义者而言都来自归纳，也同时“来自对于归纳的解

释（Auslegung）。”

此处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明见性问题发展过程中对于诸种科学而言有意义的阶段，更是一个马克思所了解的认
1043 识论语境，尽管他并未受此影响。这对于马克思自博士论文以来便认识的特伦德伦堡（Trendelenburg）也是相同的。其《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1840）作为“科学的理论”（Theorie der Wissenschaft）导致了“与事实的斗争”（Kampf mit Thatsachen）。这一作品完全符合时代的精神，当其坚持观察的个别之物“是某种就自身而言独特的东西（etwas Eignethümliches für sich），并因此要被独特地研究”。但是这也促使诸种科学“超越自身……科学必须再度开启那些边界，通过发现其在自身之中具备着未澄清的预设（*blinde Voraussetzung*）、未经考虑的基础概念（*unbesehene Grundbegriffe*）、被接受下来的原则（*aufgenommene Principien*）、未经讨论的源泉（*unerörterte Ursprünge*）”（第4页），也就是未澄清的明见性。“在此意义上，每一种科学都汇入形而上学，只要其推进到这一步，即其特殊的根据要过渡到普遍者，或者毋宁说，普遍者将自身发展为特殊者……从而，每一种科学都有其自己的形而上学问题。”（第7—8页）

4. 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黑格尔主义辩证法（Hegelsche Dialektik）与诸科学的实证性（Positivität）（Han 1995）之间，在科学与哲学的交互（Interation）、竞争与争执的语境中，获得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与已是反哲学的（antiphilosophisch）、物理主义（physikalistisch）引导下的“批判—空想社会主义”（kritisch-utopistischer Sozialismus），黑格尔主义辩证法，费尔巴哈主义的“非哲学”（Nicht-Philosophie），方法的物理主义（methodologischer Physikalismus）（或是生物学的，或是政治生态学的）处于亲缘关系——其时代的明见性。马克思追随了费尔巴哈尚且是探索性的、起初尚是感官主义（sensualistisch）的认识论概念，现实性的法则同样是思维的法则。费尔巴哈在经验性自然科学的语境中提及一种“狭隘的、可悲的、无法提升为哲学性东西的经验……但一种哲学如果不下行到经验，那么也便是受限的。但是哲学如何达至经验？通过只接收经验的结果吗？不，哲学只有通过将经验性活动（empirische Tätigkeit）承认为哲学性活动（philosophische Tätigkeit）才能达至经验”（GW 9，第85、145页）。

德罗伊森（Droysen）的《历史学》（*Historik*）与马克思之间形成了理论竞争，在其看来，“现代唯物论与虚无主义”（moderne Materialismus und Nihilismus）及“社会学”（Soziologie）是应

该批判的对象。这也代表了其时代的“声音”(Ton)，当《大纲》(*Grundriß*, 1858)中指出，“历史的科学”是“经验性的知觉、经历与研究(istoria)的结果”，所有的经验都诉诸意义神经(Sinnesnerven)的“特殊能量(spezifische
1044 Energie)，通过其刺激(Erregung)，精神将”——一个(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结论——并非接收到导致此刺激外物的“反映”(Abbilder)，而是接收到外物的“符号”(Zeichen)。他由此建立起诸种符号的系统(Systeme von Zeichen)，在这些系统中，外物相应地呈现于他——一个诸表象的世界(eine Welt von Vorstellung)。“诸时代、人民、国家、宗教等等的全体，都不过如同我们所预知到的与信仰的绝对总体性(absolute Totalität)的一个表达(Ausdruck)，这一总体性来自我思，来自我们之自我存在(Ichsein)的确定性，对我们而言最确定的事实。”

马克思自发的、未经显明并因此有待重构的关于明见性的观点(就此处而言，也是恩格斯的观点)，可以通过与费尔巴哈简单得多的“诸经验性事实”(empirische Tatsache)概念的比较得到阐明，这也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特征。新的“唯物主义”从“地上升到天上”，因为“思想(Ideen)、观念(Vorstellung)、意识(Bewusstsein)的生产……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的”。它如今是“现实生活的语言”(Sprache des wirklichen Lebens)，明见性承诺：“现实生活”，“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die wirklichen, wirkenden Menschen)，“实际生活过程”(der wirkliche Lebensprozess)，理论的“现实的前提”，“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wirkliche, empirisch anschauliche Entwirklungsprozess)……其中所涉及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确定”(empirisch konstatierbar)的事实，“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 positive Wissenschaft)正是由此开展(MEW 3，第26页及以下)。

在认知理论上与此相适配的是当时自然主义支持下的反映理论(Abbild-Theorie)：“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MEW 32，第553页)诸种自然科学成为这一明见性之思的视域并非意外。马克思摘录查尔斯·莱尔(Ch. Lyell)的《关于人类古代遗物的地理证明》(*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便是一个证据。

另外，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反对了认为他的表达方法是“德国辩证法式的”(deutsch-dialektisch)的看法。在其看来，他的表达方

式不如说是“实在论的”。他知道他的关切在一份批评中非常典型，并且引用道：“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简明地回应了这一份显然并非导向黑格尔，而是自然主义的材料：“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MEW 23，第 25
1045 页及以下）科学性的认知尤其且首要地与关于所予的经验（Empirie des Gegebenen）相关，这算是马克思思想所处时代的明见性。马克思所未接受的，是（其时代）诸种科学的自身批判，诸科学领悟到，“经验”的特质并非对“现实性的话语”（Sprache der Wirklichkeit）的复述。马克思与赫兹和玻尔兹曼相竞争。而——正如赫尔姆霍兹（Helmholtz）在《关于新自然科学的发展史》（*Über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neuren Naturwissenschaften*）中基于新生理学所总结的——“我们的感受（Empfindungen）就其质而言仅仅是外在对象的符号，并且根本不是什么反映（Abbilder）或类似的东西”，（这一观点）则是他所不熟悉的。

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还有追随其唯物论文本的“实体”马克思主义学派处，可以发现一处对明见性的重要使用。他们追求**通名性的明见性**（*appellative E*），因为他们关注对理论假定以及政治诉求的可信化（Plausibilisierung）：“工人们知道，他们必须扬弃（aufheben）资本（Kapital）”（MEW 2，第 55 页）——“当人们瞥去第一眼”（MEW 3，第 395 页）——“整个世界都知道”（MEW 4，第 90、161 页）——“每个人都知道，即便他此外什么也不知道”（MEW 23，第 62 页）——“这是意义清晰的，人类……”（第 85 页）——“马上以此种形式映入眼帘”——“每个儿童都知道”（MEW 32，第 552 页）。

在马克思意图为“新科学”——以关于对“事实”的经验因果指称的理论理想为导向地——确定明见性之处，在其作品中同样可见的——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为受关注“能动层面”（tätige Seite），并因此基于实践（praktisch）与实用（pragmatisch）层面的根据来理解认知与科学的倾向终究未成为主导。马克思在实体—本体论上承诺了一个关于“现实的语言”的实在论的概念。恩格斯——但首要地是反考茨基特质的“马克思主义”——加强了这一倾向，因为这种现实的语言有“在其之外的对其为真性的担保”（die Bürgschaft ihrer Wahrheit außer sich）。在认知理论上与此相适配的是受当时自然主义支持的反映理论（Abbild-Theorie）

(尽管并非在晚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所揭示的那种意义上)："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马克思 1868 年致库格曼的信：MEW 32，第 553 页)

此处这一类自发的明见性诉求(在其中，命题态度，即"我相信……"，往往与命题的分析性内容相矛盾)被葛兰西——固然并非对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明确批评——刻画为一种"对于诸假定的预先宣称"(vorbeugende Behauptung von Hypothesen)。当尚且不存在提供支
1046 持具体的要素(这是指，那种显得与日常理解的明见性相一致之物，而非通过深奥的"科学性"分析呈现之物)时，人们可以向其寻求帮助(*Gef* 7，H. 13，§ 18，第 1572 页)。

一种在论证结构上相近的明见性批评，即对寻求"总体性形式"的、一般化的实体—思维的批评已经在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Pragmatismus)的视角下出现。在他看来，"多元主义的直观"(pluralistische Anschauung)恰如其分地认为："最终完全不需要有一个将经验的总体(Gesamtheit)统一于自身之中的全体形式(All-Form)存在……并且一种多元分配的现实性的形式(eine mehr distribute Form der Wirklichkeit)——单一形式(Einzel-Form)——与人们通常安于其中，仿佛它是最为显明与明见之物的那种全体形式在逻辑上是同等可接受的，在经验上是同等可能的。"

5. 康德之后(也包含康德)辩护主体中心化(subjektzentriert)，并同时拒斥"先验自我"(das transzendentale Ich)的决然明见性的哲学，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心理学含义(psychologische Konnationen)的明见性取代对明见性的本体论奠基——无论是在肯定(这种含义)的一方，如心理主义逻辑(psychologistische Logiken)中，还是在批判"心理主义"(Psychologismus)的一方，比如现象学(Phänomenologie)中。一方面，心理主义在逻辑法则中发现思维的实在法则(reale Gesetze des Denkens)，这些思维的实在法则是通过对心理之物的经验分析获得的。真理是与思维法则相对应之物。另一方面，受内在心理因果性所规定的、展现出"诸洞见"的(实在的)客观性的明见性感觉(E-Gefühl)这一概念也表达了一种心理化。

反对心理主义转向者首要地有布伦塔诺(Brentano)和胡塞尔。布伦塔诺在《真理与明见性》(*Wahrheit und Evidenz*)中主张，存在以关联于内觉知(innere Wahrnehmung)("我思")的事实判断(Tatsachenurteil)为形式的，以及以"理性真理"(Vernunftwahrheiten)

或“明察”（Einsicht）（矛盾律）为形式的直接明见判断。明见性在这里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为真性的标准，而且是定义何者为真。布伦塔诺将其明见性理论构想为对真理的符合论（Korrespondenztheorie）的替代。明见性同样是关于“正确之物”与“不正确之物”的道德判断的基础。

早在《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第1901—1902页）中，胡塞尔便已经在辩护一种作为先天（apriorisch）命题之体系的非经验的“纯粹”逻辑（reine Logik），这种纯粹逻辑的精确性与决然明见性是在经验上无法达至的，其判断的为真性表现出观念上去时间化的有效性（eine ideale zeitlose Gültigkeit）。数学对象是不可还原为心理法则的。思维行动（意向活动[*Noesis*]）与“意向性的”把握（intentionales
1047 Erfassen）是与思维的诸对象（意向相关项[*Noemata*]）相区分的。通过对“存在意指”（Seinsvermeinung）（相对于意识的独立性）“加括号”（einklammern），被思维的诸对象的观念性（Idealität）才能得到保证。“任何明见性都是对某个存在者或者应然存在者的自身把握（Selbsterfassung）。就是说，在这种存在中‘自己本身’（es selbst）完全确定的把握”，这种确定性尽管“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却可能在之后的“感觉经验”（sinnliche Erfahrung）中被修正。在胡塞尔看来，明见性不是通过演绎性的证明间接达成的，而是作为“意向意指”（intentional Vermeinten）的“自身被给予性”在直观的直觉中呈现的。在明见性体验中，逻辑的合法则性可以被直接把握。明见性“不是偶然地或按照自然规律地伴生于确定的判断的附加性的感觉，它根本不是一种简单附属在任一特定类型的判断的心理学特质。它毋宁仅仅是真理的体验”（1990，第95页）。现象学试图分析明见性体验，这种体验往往是日常经验与科学认知非主题性（unthematisch）的蕴含。晚期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Krisis-Schrift*）一文中——通过指明始终被预设的世界经验（Welterfahrung），即前谓述（vorprädikativ）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明见性”，消解了与对“先验自我”的必然假定相纠缠的唯我论（Solipsimus）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以及由之所产生的分析哲学潮流广泛地将明见性的理念通过经验证实（empirische Bestätigung）的方案加以替代。逻辑合法则性独立于主体体验而生效。即便明见性体验从属于日常经验，它也不能奠定理论，因为在其主体间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上不可能存在一致。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米塞斯（Mises）强调道：“对其而言显现为

明见之物，都取决于其教育过程、无意识地积累的经验等范围。”

在其晚期笔记《论确定性》（*Über Gewissheit*）中，维特根斯坦在谈论他的一个观点——那些基础的语言游戏（Sprachspiele）在生活领会（Lebensvollzug）中不是被制造出的或者被挑选的建构，它们毋宁是如此地与诸种生活形式及其无可替代的被给予性相互联结，以至于必须在此处谈及一种“认之为真”（Fürwahrhalten）的自然法则——时写道：“概念‘知道’（wissen）与概念‘是确定的’（sicher sein）之间的差异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除非‘我知道’意味着‘我不会错’……‘我知道’似乎刻画了一种保障所知为事实的事实情况，
1048 人们总是恰恰忘记这一表达：我相信我知道。”（W 8，第120—121页）“一个词语的意谓（Bedeutung）是它的一种使用方式。”（第132页）与此相关地被考虑的此时不再是本体论上受保障的明见性：“特定经验命题的真理从属于我们的关联体系。”（第136页）

这种明见性怀疑是由赫尔姆霍兹所做出准备、由相对论的科学革命所贯彻的“新科学精神”的一个本质环节。联结起科学与哲学中不同的明见性怀疑的论证的，是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翻转，以及——“研究立场”（Épistémologie）的建立者巴什拉指出——对于“物的哲学”（philosophe chosiste）（相信物的哲学）的拒斥。物体主义（Reismus；*chosisme*）不仅不再“适于描述现代自然科学的现象”，因为我们“跟随着时下的物理学”，“离开了自然，以便进入‘现象的工厂’（Fabrik der Erscheinungen）”（1951，第17页）。自发的感官主义日常理解的明见性本体论如同一切简陋的经验主义一样，使我们陷入“我们第一直觉的奴役”（Sklaverei unserer ersten Intuiition）；这些“阻碍—概念”（*notions-obstacles*）导致了提问与科学性的好奇心的死亡。

这些可以算是追随康德的明见性批评在20世纪末非常盛行。无论对于出于研究上实用性的理由最低程度地需要本体论上的实在论的实验科学，还是倾向于将诸种有悖于经验的关系关联于革命性变化的必然性之明见性的政治哲学家与知识分子，这些批评都导致了不便。“精神哲学”与科学哲学中的一种强自然主义，以及一种实体一本体论的，黑格尔、恩格斯、列宁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便因此要求明见性概念。

奎因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例子。他将认知理论——转化为一种自然化的认识论——看作是经验自然科学内部的一章。因为奎因并不按传统的理解将感官材料假定为认知的中介，而是将之看作因果作用性的刺激，他便有了感觉明见

性（sensorische Evidenz）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感觉接收器的刺激”（Stimulation sensorischer Rezeptoren）同义：“一切明见性的实在论理论都不能与运用于语句的刺激与回应的心理学分开。”（1960，第17页）明见性概念从而本体
1049 论地（自然主义地）被奠定，而这“保障”了观察句（Beboachtungssätze）之为可能。

自然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构想之间结构上的同质性（Gleichartigkeit）迄今尚甚少得到关注。这一同质性在该论题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认知理论上对于“基于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世界态度’”提出的“‘基础问题’的回答”，只有当其模型由本体论上建立起来的、关于存在者之关联的体系推导而来时，才能成为“认知理论无可动摇的根据”（Holz 1990a，第836页）。相应地，霍尔茨试图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解为“并非马克思哲学内部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域的清算”（1990b，第403页）。如果“反映理论（Widerspiegelungstheorie）要确证其效用性诉求”，那么这一理论就必须“通过对于诸杂多之物的统一体（Einheit）的方法性建构，导向一个必定将自身证明为对反映理论定理（Widerspiegelungstheorem）的一般化把握的行联结的本原。并且这一建构必须是明见的，这意味着呈现为无法进一步追溯的（unhintergehbar）、深入每一能动的、行认知的经验的先天之物”。对于那些认为“外在对象在其内心中的交互作用与反映”如“自身被给予性”般明见的人而言，“我在”的明见性“随其需要而产生”。但是“即便是这种自我的主观层面的优先性，也将被证明为假象，外在世界、自然在现实中对我的自我、我的主体性的生产奠定了这种假象——因为我仅仅作为‘对象性的本质’（gegenständliches Wesen）或者‘自然本质’（Naturwesen）是我所是”。在实践中，“虚幻的主体性东西经验了——我的目的——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以及我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反映理论定理”表达了“自然辩证法的结构”并且由此呈现了明见性的可能位置。

6. 一种如此这般的明见性形而上学并不必然是上诉至马克思的理论中的最终定言。布莱希特便是一个决定性的反面例子（Haug 1996）。阿尔都塞在很大程度上亦然。阿尔都塞受教于巴什拉，是少数几个在新马克思主义内部推进关于“虚假的明见性”之批判的讨论的人之一。他在对严格科学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分析（也是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结构联结的分析，这一结构联结错认了跨学科的意识形态）中，揭示了科学意识形 1050
态（wissenschaftliche Ideologie）与科学

实践（wissenschafteliche Praxis）之间的关联：如果说，巴什拉在自发的对科学中诸实体（Entitäten）的经验主义理解中看到了“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sche Hindernisse），并且断言了一道“在经验与科学之间的鸿沟”，那么阿尔都塞就是在意识形态概念的语境中，从科学内部对虚假的明见性加以研究，其研究基于这一视角：“这种错误的观念在科学活动的特定位置中盛行，这并非意外。其所处理的并非科学的思想与观念，而是意识形态的。它塑造了我们标明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科学家的意识形态的东西。”（1985，第39—40页）从此处开始，一种“科学意识形态”，即实体马克思主义（一种关于“反映理论”之明见性的自发的经验主义）的自我批判成为可能，正如阿尔都塞与巴里巴尔在其对于“对所谓认知理论的意识形态发问”的根本性批评中已经先行展现了这一批判，这种发问扼杀了回答本身：“其明见性使我们盲目”，因为它将认知固化为“再认知的现象”（反映），“‘认知问题’的空间是一个闭锁空间，一个循环论证（这正是对反映关联的意识形态再认知的空间）”（*DKL* 1，第68—69页）。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Philosophie und spontane Philosophie der Wissenschaftler* (1967). Aus d. Franz. übers. u. m. Nachw. v. F. O. Wolf, Berlin/W 1985; G. Bachelard, *L'activité rationaliste de la physique contemporaine*, Paris 1951; S. Bönisch, »Evidenz«, in: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hgg. v. H. Hörz u. a., Berlin/DDR 1983, 259f; L. Braun,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Darmstadt 1990; F. Brentano, *Wahrheit und Evidenz*, hgg. v. O. Kraus, Leipzig 1930; R. M. Chisholm, *Erkenntnistheorie*, München 1979; R. Descartes, *Meditatione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Philosophie mit sämtlichen Einwänden und Erwiderungen* (1641), Berlin 1965; ders., *Die Prinzipien der Philosophie*, Berlin 1965; ders., *Regeln zur Leitung des Geistes* (1628), Leipzig 1980; M. Devitt, *Realism and Truth*, Oxford 1984; J. G. Droysen, *Historik*. Rekonstruktion d. 1. vollst. Fassung d. Vorlesungen (1857). Grundriß d. Historik in d. 1. handschr. (1857/1858) u. in d. letzten gedr. Fassung (1882). Textausg. v. P. Leyh, Stuttgart-Bad Cannstadt 1977; M. Dummett,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Cambridge/Mass. 1978; R. Eisler, *Hand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2. A., neu hgg. v. R. Müller-Freienfels, Berlin 1922; R. Feldman, »Evidence«, in: *A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 hgg. v. J.

Dancy u. E. Sosa, Oxford 1993, 119–22; J. G. Fichte, *Sämtliche Werke*, hgg. v. I. H. Fichte, Berlin 1834ff; W. Halbfass, K. Held, »Evidenz«, in: HWPh, Basel 1972, 829–34; S. Han, *Marx in epistemischen Kontexten*, Frankfurt/M-Berlin-Bern 1995; H. H. Holz, »Widerspiegelung«, in: EE 4, Hamburg 1990a, 825–44; ders., »Metaphysische Denkweise«, in: EE 4, Hamburg 1990b, 402f; W. F. Haug,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D. Hume,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hgg. v. H. Herring, Stuttgart 1982; E. Husserl, *Di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hgg. v. K. Held, Stuttgart 1990; W. James, *Das pluralistische Universum*, Leipzig 1914; N. Kondakow, Wörterbuch der Logik, Leipzig 1978; A. Kulenkampff, »Evidenz«, in: *Handbuch philosophischer Grundbegriffe*, hgg. v. H. Krings, H. M. Baumgartner u. C. Wild, Bd. 2, München 1973, 425–36; F. V. Kutschera, *Grundfragen der Erkenntnistheorie*, Berlin/W-New York 1981; J. S. Mill, *System der deduktiven und induktiven Logik* (1843), GW 2–4, Neudruck, Aalen 1968; R. V. Mises, *Kleines Lehrbuch des Positivismus* (1939), Frankfurt/M 1990; J. Piaget, *Weisheit und Illusionen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M 1974; K. R.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1963; ders., *Logik der Forschung* (1935), 4. verb. A., Tübingen 1971; W. O. Quine,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Mass. 1960; H. J. Sandkühler, *Die Wirklichkeit des Wissens. Geschichtliche Einführung in die Epistem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 Frankfurt/M 1991; ders., »Zwischen Philosophien und Wissenschaften. Eine epistemologische Kritik der Marxschen Bezugnahme auf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in: *Karl Marx—zwischen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hgg. v. A. Griese u. H. J. Sandkühler, Frankfurt/M 1997, 45–89; F. W. J. Schelling, *Sämmtliche Werke*, hgg. v.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Augsburg 1856–61; ders., *Das Tagebuch 1848. Rationale Philosophie und demokratische Revolution*, hgg. v. H. J. Sandkühler, Hamburg 1990; Sextus Empiricus, *Grundriss der pyrrhonischen Skepsis*, eingel. u. übers. v. M. Hossenfelder, Frankfurt/M 1968; B. Spinoza, *Werke*, Leipzig 1907; W. Stegmüller, *Metaphysik, Skepsis, Wissenschaft*, Berlin/W 1969; ders., *Hauptströmungen d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Bd. 1, Stuttgart ^{7}1989; W. Whewell, *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 (1837), Teil 1, in: *Th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Works of William Whewell*, hgg. v. G. Buchdahl u. L. L. Laudan, Bd. II, London 1967; L. Wittgenstein, *Über Gewiss-*

heit, WA 8, Frankfurt/M 1989, 113–257.

汉斯·约尔格·桑德屈勒
（Hans Jörg Sandkühler） 撰
周驰博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bild, Alltagsverstand, Analyse/Synthese, Anerkennung, Anfang, Bewusstsein, Brecht-Linie (II), Denkform, Dialekt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mpirie/Theorie, Empirismus, Epistemologie, Erfahrung, Erkenntnis, Erkenntnistheorie, Experiment, Falsifikationismus, Feuerbach-Thesen, Gesetz, Ich, Idealisierung, Irrtum, Konstitution, Kritischer Rationalismus, Logik, Mathematik, Metaphysik, Ontologie, Phänomenologie,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ragmatismus, Praxisphilosophie, Subjekt, Subjekt-Effekt, Tatsache, Totalität, Vernunft, Wahrheit, Wissenschaft, Wissenschaftstheorie

1052 进化（Evolution）

A: taṭawwur.

E: evolution.

F: évolution.

R: ėvoljucija (эволюция).

S: evolución.

进化在生物学理论形成过程中，具有三种历史上和理论上不同的含义。（1）在17世纪，这个概念用于嵌套理论或者说预成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胚胎的发展不外乎是已经形成的（预成的）结构的展开，因此每一个后代都包含在前一代的胚胎中。（2）卡斯帕·弗里德里希·沃尔夫（Caspar Friedrich Wolff）在1759年提出后成论反对预成论的进化观，根据后成论，每个后果都是某种本质上新于起因的事物。恩格斯（*DN*，MEW 20，第319页）将沃尔夫的后成论理解为对物种恒定性的批判，也即在没有新生物的情况下，物种起源问题是不可想象的。在现代生物学中，后成论（这一语境中一般译为“表观遗传学”。——译者）特指个体胚胎发育过程中细胞和器官的形成，新生物作为这些形成过程的产物从受精卵中产生。（3）预成论和后成论始终都是局限于个体历程的发展理论，还没有提出生命产生和生物起源的问题。在这两门理论之后，19世纪中叶出现了被称作物种起源理论或共同祖先理论的进化论，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Marx，MEW 23，第361页，脚注31）《物种起源》（1859）中提出了这一观点。进化这一概

念在达尔文那里包含两层全新的意义：在决定论层面，基于概率的自然选择取代了线性因果原则；在时间维度上，种群历史发展和物种起源的问题拓展了个体历史的发展时段（*DN*，MEW 20，第468页）。

由于这个概念复杂的历史，进化理论的名称也极不统一。因此恩格斯指出，如果他“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并且“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MEW 20，第11页）。今天通用的术语“进化论”，他只在这句话中使用过一次：“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
1053 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消失了。”（MEW 20，第13页）恩格斯最常用“发展学说”这个概念来表述进化论，这个自然哲学的上义概念涵盖了极多的生物学理论。同样常用的同义词有“起源学说”“达尔文学说”“达尔文主义”等，毫无疑问的是，“发展理论”的意思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即使在当代科学理论中也没有确定的名称，因为进化论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它的众多部分已经引进了各种独立的德语和拉丁语名称，这些名称也被用作进化论的同义词：“生物种系发生学”“系统发生学”“起源学说”“共同起源”和“自然选择理论”。

生物进化论指出，现存的大约200万已知物种的多样形态是通过以往地球史中的进化从少数共同的祖先形态中产生的，因此所有生物群体彼此之间都存在一种分等级的亲缘关系（共同祖先学说）。生物进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大约30亿年前从无机物中产生了最初的原始生命形式，通过进一步多次分化，最终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生物（单细胞生物、真菌、植物、动物）。因此，“进化”这个概念还包含着生物基于不同物种之间的自然选择向高等形态进步发展的思想。由于在种系发生史上出现的数亿生物物种中，只有大约1%存活了下来，因此进化这个概念也意味着选择最适应的形式（自然选择理论）。个别种、属等等的历史亲缘关系作为“生物的自然系统”，转换成一种将起源等级体系化的逻辑分类系统。达尔文是公认的生物进化理论奠基人，因为他通过将自然选择描述为“物竞天择”或拟人化的“适者生存”，首次揭示了一种在因果关系上解释多样形态的起源的进化机制。因此，进化理论也常常被简化地称为自然选择理论，但这仅适用于经典的达尔文主义。

马克思对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的高 1054
度评价，基于他将进化论视为他自己历史观的自然科学根据。马克思1861年致拉萨尔的信中写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

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MEW 30，第 578 页）随着进化论科学地解释了生物的历史性，其也为科学地理解人的历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为进化论是一门具有普遍性的本质相通的历史理论。正如对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了商品社会的历史社会条件，物种起源学说终结了生物学中创世神话的形而上学阶段，并将不同动植物物种的产生归结于自然原因。自然选择原则的发现所表述的自然规律引发了自然科学和生物学思想的革命，类似于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作为资产阶级商品社会规律所引发的革命。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之间的差异，以及它们作为一般发展中一部分的一致性，这个问题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提出，马克思从各种视角出发多次进行论述，并以动物为例加以说明。尽管真正的历史是从人类才开始的，但真正的历史以动物和人类的种系发生发展作为自己的史前史。马克思尤其感兴趣的是使用工具和产生劳动的自然历史前提：“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K I*，MEW 23，第 392—393 页）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比较了杜林构建的“伪马克思”和针对“伪达尔文”的异议，由此论述了达尔文进化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意义。关于物种起源学说的零碎思考以及由此产 1055
生的方法论与内容结论在《自然辩证法》中有非常多的层面。它们不仅包括生命的物质基础（其中蛋白质作为新陈代谢的物质被赋予了基本功能）、作为生命基本组成部分的细胞，还包括多细胞生物的出现、生物的个体化以及动物群体、昆虫王国与社会组织的出现。胚胎学和形态学的比较方法也特别受关注，因为同源结构同时也是共同的种群历史起源的证据。在动物分类学中他强调古生物学的发现（例如原始鸟类始祖鸟）和特殊的生命形态（例如澳大利亚肺鱼），因为它们是不同动物群体之间的过渡形态，证明了相互之间的发展关系。虽然达尔文最初对人类起源问题非常谨慎，但恩格斯本人在这一点上建设性地继承了发展思想，并对人类的形成提出了基本要点至今无法超越的分析。就方法论而言，恩格斯认为达尔文理论的结果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MEW 20，第 563 页）。这里恩格斯谈到的问题后来在进化论中一再引起争议。一方面，与变异性思想相结合的关于新事物如何产生的问题，动摇了机械决定论对自然的解释；另一方面，恩格斯反对将适应的必

然性还原为纯粹偶然事物的产生，还原为自然的游戏。变异性（突变）和选择是偶然与环境必然的选择之间关系的特定生物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关系中将看到是新物种产生还是现有物种灭绝。

正确地解决偶然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不仅决定着对生物的合目的性的解释（这种性质在达尔文之前是目的论的避难所），还决定着生物进化过程的更高级发展和方向性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恩格斯写道，“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
1056 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MEW 29，第 524 页）

针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思想，即物种通过自然选择产生，恩格斯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立场。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了自然选择思想：“达尔文的缺点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者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应这些环境者，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步）。”（MEW 20，第 564 页）

但正是这里批评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论证主线。为了不灭绝，就要生产出更多后代，因为后代的数量提高了有利变异存在的可能性。进化过程中保存物种的代价是后代过剩，由此开始了自然选择。恩格斯提出的反驳“最强者在某些关系中也可能是最弱的”，在活生生的自然界中并不正确，因为在进化中没有“强者”和“弱者”，只有以不同方式理想地适应了环境的生命形态存活下来，即便适应性差、存在遗传缺陷的物种，如果生物整体素质足够好，也能存活下来。恩格斯还在另一个地方直接反对自然选择的概念，因为他认为海克尔（Haeckel）所采用的“适应和遗传”公式足以处理整个发展过程。对自然选择概念（作为达尔文的真正发现）进行限制，符合 19 世纪下半叶作为对立理论出现的（新）拉马克主义的立场，它以作为适应机制的获得性遗传的原则取代了自然选择思想。恩格斯的论断“寄生总是退步”，也是错误的。多洛（Dollo）法则作为生物进化的基本法则指出，每一步发展都是不可逆的。“退步”（反向突变）仅存在于个别特征，而不存在于寄生之类的复杂生命形式，这类生命形式是通过简化和还原完成的专 1057
门化，因而是“进步”。

相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持明显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立场："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日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MEW 20，第 63 页）

《自然辩证法》中的新拉马克主义立场与《反杜林论》中的达尔文主义立场之间存在矛盾，是由于这两个手稿完成于不同的时间。《自然辩证法》最早的部分写于 1873—1876 年，而《反杜林论》完成于 1876—1878 年。处理杜林对达尔文的批评也迫使恩格尔斯更加透彻地思考自然选择思想，为了针对杜林的异议捍卫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他靠近了这一立场。

20 世纪末的进化论结合了不同的理论分支，它们之间的联系将物种起源、种系亲缘关系、更高的发展和个体历史等领域的生物发展的规律系统化。早期达尔文主义的弱点是生命起源问题（达尔文认为无法解决）、物种变异性的无法解释的突变起源以及自然选择原则的适用范围。魏斯曼（Weismann）结合实验遗传学和突变理论假设存在"遗传物质"，将自然选择原则贯彻到底，在 1900 年前后创立了新达尔文主义，将经典进化论扩展为突变—选择理论。突变导致种群内部的变异，其中每次最适 1058
应环境的变种得到繁殖。1937 年，特奥多修斯·多布然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和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用四个进化因子之间的因果关系制定了如今普遍接受的"现代进化综论"：突变和重组作为变异的遗传基础、自然选择作为环境的调控和筛选机制、偶然因素（例如由种群波动引起的等位基因的增加或减少即"遗传漂变"）以及各种形式的隔离。进化论依靠来自古生物学、种群遗传学、胚胎学、免疫生物学和动物地理学的证据在经验上得到了有力的保证，但在理论上并不完整。由于种群是进化过程的首要材料，因此种群遗传学、种系发生学和物种理论作为理论分支具有关键地位。一般法则是种系发生学与个体发生学之间的关系和不可逆法则。最有争议的问题是自然选择原则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个别基因和物种内个

体的竞争，以及生物进化史上是否存在宏观进化的“大飞跃”。

参考文献：

Th. Boveri, *Das Problem der Befruchtung*, Jena 1902; Ch. 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of Life*, London 1859—dt.: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 durch natürliche Zuchtwahl*, Leipzig 1949; Th. Dobshansky, *Dynamik der menschlichen Evolution*, Frankfurt/M 1965; J. Huxley, *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 London 1942; L. Kämpfe, *Evolution und Stammesgeschichte der Organismen*, Stuttgart 1980; W. Lefèvre, *Die Entstehung der biologischen Evolutionstheorie*,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84; E. Mayr, *Systematics and the Origin of Species*, New York 1949; ders., »Wie weit sind die Grundprobleme der Evolution gelöst?«, in: *Evolution, Nova Acta Leopoldina*, 1975, Bd. 42, Nr. 218; H. Weismann, *Das Keimplasma. Eine Theorie der Vererbung*, Jena 1892; ders., *Die Allmacht der Naturzüchtung*, Jena 1893; R. Willmann, *Die Art in Zeit und Raum*, Berlin/W-Hamburg 1985; C. F. Wolff, *Theoria generationis* (1759), Halle/Saale 1959; F. M. Wuketits, *Evolutionstheorie*, Darmstadt 1988.

福尔克尔·舒里希
（Volker Schurig） 撰
李牧今 译，曹旸 校

参见：

Affe, Anatomie, Anthropologie,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Entwicklung, Entwicklungstheorie, Evolutionismus, Eugenik, Fortschritt, Gesetz, Kampf ums Dasein, Lamarckismus, Lysenkismus, Malthusianismus, Natur, Naturgeschichte, Notwendigkeit, Rückschritt, Sozialdarwinismus, Teleologie, Übervölkerung, Zelle, Zufall

进化主义（Evolutionismus） 1059

A: taṭawwurīya.

E: evolutionism.

F: évolutionnisme.

R: èvoljucionizm (эволюционизм).

S: evolucionismo.

这个经常在批判意义上使用的术语——进化主义，不能简单地作为生物学进化论的同义词被使用（就这一情况而言，在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中可能

一样），它指的是那些建立在生物学进化概念之上的世界观或者理论进路（参见 Lalande，第 315 页），它们把进化概念运用到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和历史领域。旨在全面呈现这些领域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总是被理解为或者被处理为进化主义的一种形式；同时，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一种对进化主义倾向持续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经济的合规律性被决定性地理解为社会推动原则的时候，在实践和历史偶然性被清除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概念就是陷入了与进化主义的密切关联之中；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被理解为实践哲学，才能从各种反进化主义的视角打开马克思主义思想。

进化主义的诸概念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中：维多利亚时代的各个作者（J. 拉巴克 [J. Lubbock]、J. F. 麦克伦南 [J. F. McLennan]、E. B. 泰勒 [E. B. Tylor]、L. H. 摩根 [L. H. Morgan]）提出人类学进化主义的方向、社会学的新进化主义（T. 帕森斯 [T. Parsons]、N. 卢曼 [N. Luhmann]）以及进化知识论（K. 洛伦兹 [K. Lorenz]、R. 里德尔 [R. Riedl]、F. M. 伍凯蒂斯 [F. M. Wuketits]）、进化认识论（D. T. 坎贝尔 [D. T. Campbell]、K. R. 波普尔 [K. R. Popper]）或者（由社会生物学家们通过还原的方式建立在行为研究和遗传学基础之上的）进化伦理学。

1. H. 斯宾塞通常被看作是进化主义的奠基者，从一定程度上由先天的某个“普遍进化法则”出发，他在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中不仅（依据现代宇宙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发展了他的自然观，还（通过心理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发展了他的人的理论，而那个“普遍进化法则”被他定义为“从一个不确定的、不关联的同类性向一个确定的、相关联的异类性”（1875，第 401 页）的过渡。（达尔文在第 1 版的《物种起源》中还没有使 1060
用由斯宾塞提出的“进化”这一术语，而是局限于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物种改变。）

2. 就马克思主义与进化主义的关系而言，首先要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是否把进化论范畴作为一个也可以运用在人类领域的、普遍的范式使用。马克思曾建议达尔文从事对已出版的《资本论》的研究——这也许暗含他们理论中的连续性理念——这一传说早已被戳穿（参见 1983 年 G. H. 穆勒 [G. H. Müller] 书目的细节）。此外，马克思的两种表述在如下语境中经常被引用（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被解释得非常离奇），“达尔文《自然选择》一书为我们

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MEW 30，第131页），也就是说，这本书“包含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1861年1月16日致拉萨尔的信，同上书，第578页）。为了解释这两种表述，我们必须要援引《剩余价值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尔萨斯理论的伪自然史（亦即处于像当初所谓的自然科学一样的自然史之中）的基础被批判。马尔萨斯的理论否认了生活富足普遍化的可能性，因为有所谓的自然法则，即人口的增长总是远远快于食品的生产。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规律第一次同时有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博物学的）论据”（MEW 26.2，第108页）。马克思为他更加乐观的信念寻找另一种替代的基础，并相信在达尔文那里找到了这一基础：在此“也有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驳”（同上书，第114页）。某些植物和动物种类或者动物物种在达尔文那里会被其他更加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取代。马克思在其中看到了一个为改善大众生活条件的历史阶级斗争的普遍基础——但这绝不是说，阶级斗争本身及其结果直接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

在其他地方，马克思似乎明显地仿照达尔文，用进化主义的观点来阐释技术史。《资本论》引用了《物种起源》中一处关于自然选择的论述，在这里，达尔文对工具形式的增多和改善进 1061
行比较。达尔文对“自然工艺学”的理解，也就是说对“在动植物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的形成”的理解，类似地说明了在工厂手工业时期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MEW 23，第361页，脚注31；同上书，第392页，脚注89）。通过“劳动分工”而实现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以及“劳动工具专门适用于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技术和物质前提条件之一，而机器的发展是变革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要素之一（*Ms 61-63*，MEGA II.3.6，第1914页）。但这也并不必然地意味着，马克思把他的历史观建立在自然主义的进化模式——并因而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主体和实践作用的理解相反——之上。此外，《资本论》第1卷与达尔文的类比也通过与维科的类比而达到平衡，维科把历史的可认识性与历史是人类意识和人类意向行动的产物相关联（MEW 23，第393页，脚注89）。

人们还可以追问，深入研究自然科学论题的恩格斯是否比马克思更倾向于一种上文提到的普遍的进化主义。恩格斯无疑在试图制定一种普遍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与目的论相对，强调物质本身拥有的动力，并在这种意义上强调自身的“历史性”。对于恩格斯，康德“通过解构牛顿稳定的太阳系及其永恒存在，并把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理论与之相对立，而发现了自然事件的历史进程”（*AD*，MEW 20，第22页）尤为重要。后来，恩格斯通过能量的不同转化形式而把宇宙的变化与能量守恒定律相关联。如果把这个抽象的、基本的“机械热力论普遍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系统从产生到灭亡一个跟一个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因而会变成在每个阶段上由其他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其他现象形式）来支配的历史”（*DN*，MEW 20，第505—506
1062 页）。最终仍是生物学的进化论给了目的论的世界观致命的一击。与目的论世界观相对的是“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1859年12月11或1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MEW 29，第524页）。

为了在理论上为这种“历史的”自然观奠基，恩格斯使用在他看来与进化论思想不相矛盾的辩证法。进化主义的观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却常常——在关于改良主义的讨论中——被理解为渐变论的同义词，被置于质变以及包括革命失败在内的辩证观的对立面。恩格斯坚信，辩证法能使我们既不太死板又不通过还原的方式来思考不同层面的现实性。

显而易见，这种“历史的”、辩证的思考方式不仅适用于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而且也适用于“有一点和自然界根本不相同”的“社会的发展史”：在社会发展史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尽管没有人能完全实现他的目的，因为每个个体都处于与其他人的普遍关联之中；“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和理念的动机“所产生的结果”在后一种分析中发生作用（MEW 21，第296页及以下）。

就像马克思多次认为恩格斯把达尔文“生存斗争”的比喻直接运用到人类社会中是不可能的一样，如果人们想要把这一表达运用到人类社会这一领域，那么人们就必须进一步确定，斗争在这里采取阶级斗争的形式，阶级斗争需要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自主的理论，就像这一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显现的那样。正是社会主义革命使得任何一种生存斗争的形式都被超越（*DN*，MEW 20，第565—566页；参见*AD*，同上书，第61—70页；Vidoni 1985）。

3. 社会民主的理论家和政治领袖考

茨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就接受了达尔文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也试图对伦理学（这是他从动物的社会冲动中推论出来的）和历史做出进化论主义的解释，进化论在这种情形下通过革命的、辩证的跳跃而发生。

一种在生物学领域和历史领域中
1063 出现的进化主义的类比也出现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把发展论……运用到现代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中。……马克思这样提出了共产主义的问题，如果一个自然研究者不清楚共产主义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并且在不同的方向发生变化，那么他是怎样在与生物学变种的关联之中提出这个问题的。"（LW 25，第 471 页）正如其他人（K. 费舍尔、J. 狄慈根）所提议的那样，列宁经常提到一种（辩证的）发展论，并在《哲学手册》中把这一发展论在思想过程方面与黑格尔相结合，或者在物种起源方面与达尔文相结合。但是，列宁反对这样一种发展论，其把自身还原到作为持续的、非辩证的、无间断过程的"庸俗"进化论。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按照生物学模板形成的社会历史观的危险。卡尔·柯尔施猛烈抨击"天真的伪达尔文主义的发展形而上学，……诸如卡尔·考茨基这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地、完全地信奉这种伪发展形而上学"；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发展是从一个先天有效的公理转化为一个经验可证实的研究原则（Korsch 1981，第 27 页）。为了保持积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持续的进步为原则，这一原则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在第一个上升阶段天真地、公允地称为进步法则"；达尔文引入的进化论对于柯尔施来说是对这一原则的扩大化运用；此外，就像人们尤其能在斯宾塞那里看到的一样，"持续的、进步的进化论概念……被提升为一个社会主义科学的基本概念"（第 172 页）。

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1922）在"社会学"的书名之下把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为生产力决定论。葛兰西在这本书中看到，社会学怎样在总体上"试图创造一个依赖已制定的哲学体系，依赖进化实证主义的政治—历史学方法"并"试图按照根据自然科学模板构成的标准对社会事实和政治事实公式化地进行表述和分类"，"社会学不 1064
是努力实现其哲学的预先决定，而是通过'实验'的方式获得人类社会的进化法则"，以便带着具有自然科学般的确信来"预见"未来。"庸俗进化主义是一种无法认识从量向质过渡的辩证法原则的社会学基础。"（*Gef* 11，§26，第 1426 页）

卢卡奇和本雅明也对批评与进化主义经常联结在一起的进步意识形态做出了贡献。对于青年卢卡奇（1923）来说，历史按照抽象的、对人类行为普遍化而形成的普遍法则发展是不可想象的：阐述不同的历史阶段既不能通过同样的范畴也不能不依赖于它们整体的关联（参见 W 2，第 332—339 页）。如果把自然科学的知识理念运用到社会发展中，那么它就显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间断增长的表达，这一意识形态也被纳入许多（特别是社会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计划之中。本雅明同样也驳斥——在他的《论历史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的论题中——把持续不间断的进步设想为“一种历史的规范”以及顺应历史潮流的确信，劳动大众“漂浮在技术进步”及其所引起的“劳动改善”的“风暴中”。这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实证的”和潜在的技术至上的概念“只想承认自然统治的进步，而不承认历史的倒退”（GS I.2，第 697—699 页）。

从另外一个立场出发，路易·阿尔都塞批判了把历史作为固定的、线性的生产方式序列的进化主义的同时，它还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是由一种黑格尔式的（通过单一矛盾的产生和扬弃而发生在自然界和历史中的）辩证法所决定的。这一辩证法被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主义的进化主义”进一步完善（Althusser 1973，第 96 页，脚注 1）。因而，拒绝“黑格尔主义或者进化主义中的组成部分庸俗形式的**经济主义**”至关重要（第 100—101 页）。对于巴利巴尔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是“极端反进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真正阐述的是作为不同经济结构的生产方式自身非进展的变化。因此，“**生物年代学** 1065
与内在发展形式法则之间的同一性被摧毁了”，这一同一性阐明了“进化主义以及任何一种先验历史主义形式的根源”（Althusser/Balibar，*DKL*，第 301 页）。

相反地，尤尔根·哈贝马斯则提议，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中也要融合社会学中的新进化主义的论题（参见 1976，第 200—260 页）。这一依照生物学进化论模式的运用对哈贝马斯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注意力在此被放到了能够转述社会更新的学习过程中，而不是仅仅集中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上（参见第 9—48 页）。尽管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由生物学激发的模式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对他而言，不存在既适用于自然界发展也适用于文化发展的普遍的进化论。

为了不带有错误还原过程地设想不同领域的进化形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

制定了一种普遍的**发展论**：一种从唯物主义—辩证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宇宙学、生物学和社会诸过程的哲学视角，这些过程既能是量的，也能是质的，既能是有差别的，也能是变革的（参见 Hörz 1974，第 5 章；Schurig 1990）。

其他人认为，整个论题最好能放在系统理论进路的框架中来处理（关于这个“普遍系统论”问题：Laszlo 1987 和 1991）。这个非常普遍的进化过程概念，根据不同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社会学）体系或者现象—阶段而具有不同的含义。每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但不能通过低一级阶段的标准和原则而解释的阶段的前提条件。每一阶段都是自主的（因而，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中的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未经反思地把生物学的进化论运用到人类领域的情况得以避免），尽管如此，却没有发生不同阶段之间的理论分离。对这些没有倒退至费尔巴哈提纲的进路而进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加工或者以这些进路为导向的、对资产阶级的进化主义的一般批判尚未形成。

费迪南多·维多尼
（Ferdinando Vidoni） 撰
朱清阳 译，李牧今 校

1066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Anmerkung zur ›Kritik des Personenkults‹«, in: H. Arenz u. a. (Hg.), *Was ist revolutionärer Marxismus? Kontroverse über Grundfragen marxistischer Theorie zwischen Louis Althusser und John Lewis*, Berlin/W 1973, 95–109; N. Bucharin,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Gemeinverständliches Lehrbuch*, Hamburg 1922; J. Habermas,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76; H. Hörz, *Marxistische Philosophie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Berlin 1974; K. Korsch, *Karl Marx* (1938), Hamburg 1981; A. Lalande,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⁷1956; E. Laszlo, *Evolution—die neue Synthese: Wege in die Zukunft*, Wien 1987; ders., *The Systems View of the World*, Recco 1991; G. H. Müller, »Darwin, Marx, Aveling—Briefe und Spekulationen«, in: *Dialektik*, 6, 4. Jg., 1983, 149–59; V. Schurig, »Entwicklung«, EE 1, 706–24; H. Spencer, *Grundlagen d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875; F. Vidoni, *Natura e storia. Marx ed Engels interpreti del darwinismo*, Bari 1985.

参见：

Anthropologie, Biologismus, Darwinismus,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Entwicklungstheorie, Evolutionstheorie, Feuerbach-

Thesen, Geschichte,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determinismus, Kampf ums Dasein, Natur, Naturdialektik, Naturwissenschaft, naturwissenschaftlicher Materialismus, Ökonomismus, Philosophie der Praxis, Praxis,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Rhetorik, Sozialdarwinismus, Teleologi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Vulgärmarxismus, Zweck

进化经济学
(evolutorische Ökonomie)

A: iqtiṣād mutaṭawwir.

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 économie évolutive.

R: èvoljucionnaja èkonomija (эволю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я).

S: economía evolutiva.

根据熊彼特的证明，马克思是“第一个一流的经济学家，他看到并系统地阐明，经济理论怎样才能被转化为历史分析，以及历史叙述怎样才能被转化为思考的历史”(1980，第78—79页；参见1964，第17页)。相反，经济过程的历史性则被自门格尔(Menger)、拉尔瓦斯(Walras)和帕累托以来的新古典主流视为是对公理理论构建来说非必要的。在此，关键性的问题是均衡条件和静态系统。进化经济学正在寻求路径，以克服引入主导的新古典理论后，以及批判地与此理论划清界限后所产生的缺陷。此外，进化经济学在主要方面——不管是明确地还是隐晦地——都认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被取代的)马克思的知识。

进化经济学在宽泛的意义上是研究经济的质变以及经济作为全部自然界进化、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部分的诸多思想进路或诸多理论的总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在自然科学自我组织理论的影响下(Prigogine/Stengers 1981，Ebeling 1986，Jantsch 1992，Ayres 1994)逐步得到完善。并且在1991年以后，通过《进化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获得国际性认可。它把自身理解为“不仅能从静态和动态方面，而且还能……从进化的方面，描述和解释经济过程的更好的数学理论”(Schwarz 1997，第85页)。进化经济学不仅与熊彼特传统中的经济创新理论的起源，同时也与由范伯伦(Veblen)创立的制度主义密切相关。进化经济学的研究方向除了对单个企业和技术的进化进行数学建模之外(Arthur 1984)，还要对创新的起源和扩大进行经验研究，并使用更加全面的进路来分析技术的或者

1067

技术—经济的范式变化（Dosi/Orsenigo 1988）。进化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自生系统论、灾难理论和混沌理论、生物进化论、协同论和非线性过程论的推动。作为经济思想的异端，进化经济学没有统一的理论结构并且质疑这样一个理论结构是否值得推崇（Witt 1991，第83页）。

1. 历史唯物主义在其基本的概念中已经按照进化的方式进行组织了。马克思排除了把经济理论的对象限制在形式—公理的建构性做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经济形式的发展（*Elend*，MEW 4，第130页）。但是阐明这种决定方式不能按照单一的因果关系：技术、组织、知识、社会关系（也有劳动者的反抗、阶级斗争）、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的进化关系在马克思那里通过它们的多维度性而得到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诸如需求、资本积累、摆脱行会限制、世界贸易、殖民统治、保护关税、吸收被解雇的劳动力、组织工场手工业、贸易自由、理论力学的成果、货币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称为机器纺织发展的因素（3，第55—56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确定为第一种生产方式，它的结构连同一切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关系会持续地进行变革（参见4，第465页）。

马克思理论与进化经济学的连接点可以分为三组：最重要的一组包含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思考，另外一组包含经济制度的框架条件，最后一组试图拟定经济发展和再生产形式化或可形式化的模型。

1.1 **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比巴尔贝斯、拉斯贝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2，第3页）。马克思用以确定生产力内在动力的一个主要术语是普遍的影响要素——变革生产方式的“普遍运用”（23，第398页）。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变革生产方式的是蒸汽机和工具机的工具，在福特革命中是电动机和流水线，在信息技术时代是微处理器。这些影响要素被纳入历史上特定的经营机构的形式（23，第474页，第496页及以下）以及“劳动的……社会经营方式”中（3，第22页）。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带有中心动力驱动的工厂系统和生产制造的车间原则、以连续生产特定的对象化的标准产品为基础的福特系统和以灵活的自动化为基础的后福特系统，在今天看来是历史上主导的经营方式的例证。

经济上科技进化的手段首先是单个的创新。变革（change）、不同寻常的生产力和特殊的生产方式，它们是马克思针对这一事实使用的术语（23，第337

页；25，第657页）。在马克思自己编辑并且部分翻译的法语版《资本论》（第1卷）中，他提到“生产方式的一系列变革”（MEGA II. 7，第54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涉及诸如钟表、磨坊、自动纺机、蒸汽机、铁路和铸铁炉这些如此不同的工具和机器，并表明，技术发明的使用依赖于社会关系、既定的机构以及机构的变化。因而，在一种新的工厂制度和一种新的纪律法典实行之后，阿克莱（Arkwright）的新型自动纺机才开始盈利（MEW 23，第447
1069 页）。在荷兰快速传播的风车源于德国，“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解放（MEW 23，第395页）。一般来说，被马克思称为革新元素的有协作、机器改良、新的操作和生产方法、新的规则（比如工厂立法）、新的合同形式、新的社会分工形式、新的生产部门、新的劳动市场和销售市场、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和新的需求、新的质、人的力量和观念以及新的交往形式特别是交流形式（尤其参见第341—530页）。因而，马克思比后来从资本主义企业视角由熊彼特提出的创新体系走得远得多。

在与达尔文学说的直接类比中，马克思把科技史中的变化因素，也就是当时在伯明翰生产的500种锤子看作分化和专门化的结果，或者把机器系统在此部门的传播，以及暂时地设置界限的钟表多样性看作奢侈产品（一百多年之后，进化经济学认识到，一个系统的经济效益从长期来看必须包括自身的多样性能力）。马克思此外还指出，以前的社会有以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的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23，第359—360页）这种“社会颁布的世袭性”是技术革命的保守因素。

这一出现在马克思语境中的思想——再一次直接表明与达尔文著作的类比——把一部批判的工艺史编写为“社会人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3，第392—393页，脚注89）马克思把以现有技术原则为基础的合理化意义上的“既定基础之上的扩大”与使用新技术选择而导致的生产极端变革相区别（第404页，第473页）。以钢铁冶金学为例，马克思说明了创新的阶段：发明、使用、快速增长和传播、由生产力的极限而产生的饱和以及过渡到新技术原则（MEGA II.7，第543页）。
1070

这一通过黑格尔“尺度比例关系的节点线”（*Logik* I，GW 11，第215页）的过滤器而加剧了的本质认知，在技术进步的经济理论中长久以来仍没有反响。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独有的进化动力具有局限性，它们体现在生产力向破坏性力的转变中，体现在僵死的劳动对活生生的劳动的摧毁性作用中，以及体现在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所产生的破坏中（MEW 23，第528页）。当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第791页），历史乐观主义却抵制了这一批判的分析。卢森堡紧接着认为，“技术进步本身和地球的生产力都没有界限”（GW 5，第777页）。具有另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波普尔认为，马克思的预测有损于历史方法。他宣称，无界限的资本主义已消失并且几乎完全根除了困境（1980，第229页）。

1.2 制度。马克思把制度理解为匹配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状况，并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而必然改变的社会机构（各种特权、工会和规则）（参见MEW 27，第453页）。“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23，第99页）。马克思指出，在现存的权力关系框架中，法权制度是逐渐从日常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定、正式的承认及公布通常都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第299页）。因而，英国的工厂立法是在企业家渴望剩余劳动与国家需要可用的士兵和警察之间的妥协。制度能阻止（行会法则）也能促进（1833—1864年的工厂立法）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忘记的既不是所谓的“逃票者问题”，就像所谓的制度主义（企业家和工人自私自利地不顾工厂法则），也不是发生在妥协之前、使妥协成为可能并摧毁妥协的力量。 1071

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个自我显示、普遍理性的结果。“人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人发展的历史，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7，第453页）问题在于为个体性（可支配时间）创造发展空间。手段就是人的社会性发展在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1.3 再生产和趋势。对于重复（复制）、保存旧的东西和更新之间的进化联结，马克思使用对他而言包含整个经济过程（再生产、流通、消费）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劳动概念。“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是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42，第402页）个人及其生存方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对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和破坏”（第

401 页）。在分析资本的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马克思论述了企业、生产部门以及国民总资本的级别。他假设系统各种级别的相互作用并获得进化的各种进路，这些进路在启发性方面比那些只关注资本主义企业竞争中的自然选择过程的进路要有成效得多。马克思的进路包括他价值革命的概念和对个人资本运动产生不利影响的社会价格结构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变化（24，第 109 页）。

马克思曾试图始终在质变的视角之下把握经济动力学中量的因素，但结果不尽相同。马克思的许多从社会学综合中获得的进路，后来成为分析、测量、形式化和操作化的出发点（参见 Roemer 1981）。同时，利润率的运动和资本组成的运动也占据了一个主要地位。因而，马克思在普遍利润率的长期浮动中，看到了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1925
1072 年根据价格运动而描述的经济发展的长波（MEW 25，第 176 页）。

在自然科学自我组织的理论中，熵被作为能量分布的相对尺度以及从有序状态到极有可能的无序过渡的相对尺度来研究，它在这一研究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参见 Jantsch 1992，第 56 页）。一切进化过程都使得熵降低，因为这些进化过程通过摄入能量而产生更高秩序的状态。资本的技术组成或有机组成的、使用的生产资料（物质、能量、设备、房屋）与自然表达或价值表达中的活劳动产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都可以被看作熵的指示器。就价值而言，它们的上升或下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或上升。随着技术的进步，导致利润率下降的技术的和有机的（价值）构成也在增长。另一方面，来自创新的额外新价值抵消了这一点。资本连续的和非连续的贬值是这种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流通和积累的内在手段（MEW 25，第 259 页及以下）。生产方式合乎使用价值的方面与不断增长的社会和经济损失相关。这一损失迫切的现实性进一步确保了具有争议的马克思形式化的重要性。

2. 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其多样性方面，是它们精神相关联的一个诸如多样性和多元性的进化因素。就像替代的结构和多元的结构一样，替代的思想和多元的思想在官僚的社会主义中是不受欢迎的。马克思强烈反对进化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包括拒绝生产的自发性和高估经济行为的意识性，因为通过这些因素，经济改革的进路会被扼杀。所有所谓的自下而上的重大举措实际上都是在总部事先决定的。尼古拉·布哈林在 1922 年就强制推行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元论”，通过中央化、规范化、监管和国家强制而达到平

衡并且为斯大林提供了有序政治的纲领（1970，第147页及以下）。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按照这个纲领而组织
1073 的生产关系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对象化为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潜力，而这个结构连同政党、国家和意识形态是作为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现实障碍发生作用的。苏联的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探明了国民经济学中的进化和波形过程，并于1938年在斯大林的安排下被枪杀（参见Hedkte 1990，第66—67页）。

这一实践的知识理论的伴随现象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几乎无法进一步解释的，如黑格尔所要求的必然性与偶然的同一性以及生物进化理论（即突变）核心现象的不扩散。这也是“二战”之后苏联对遗传学政治压迫的一个直接后果。科学家像谢布拉克（Shebrak）和内姆奇诺夫（Nemtschinow）于1948年在苏联维护染色体理论（参见Lyssenko 1948，第324页及以下，第387页及以下），内姆奇诺夫因此失去了他的农业科学院院长职位。

相反，在应用经济学和历史学中，自30年代以来就集中转向了技术发展的问题。产生长期持续影响的事件包括布哈林和越飞（Joffe）的文章，尤其是黑森（Hessen）于1931年在伦敦科技史国际会议上的报告《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Science*, 1971）。在此，科学—技术进步的进化概念在其与经济和社会的交互影响中第一次被提出。

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战略方向和动态生产推动力的确定，政治经济思想出现了暂时的历史化。因而，在民主德国时期（DDR），瓦尔特·乌布利希把社会主义确定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构成”，这一社会构成以新的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为基础，在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必须先以自身为基础发展并证明它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1967，第38页及以下）。在这一视角之下，“新经济体制”（1968，第141页及以下）得以发展，关于中长期社会预测的公开讨论被引入（第233页及以下）并在“无追赶超越”的口号 1074
之下，发展了经济动态学，而不是遵循（迄今已补上的）西方道路。自70年代以来，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数学均衡模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期——一个值得注意的诸多系统的融合。“在大模式中，诸系统已从功能上表明自身是最难设想的新模式。因为这些新模式现在大多数是从旧模式中造出来的，……看起来是错的，但它们现在不是错的，过去是错的。”（Brecht, *Gleichermaßen gefährlich*, GA 14，第285页）

3. 理查德·N. 内尔松（Richard R. Nelson）和西德尼·G. 温特（Sidney G. Winter）在1982年着重抨击了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这一作品的出版并非偶然。只要经济沿着1945年之后的40年不间断的增长路径前进，人们就不会注意到在均衡一致假设下的经济建模的不现实性。断裂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从那时起，就出现了——例如在劳动力市场——超出系统之外的、大秩序中的、全球范围内的非一致过程。内尔松和温特证实，马克思的很多理论是进化的。他们同意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系统（第44页）。他们还认为，在A. 马歇尔（A. Marshall）的《原理》（*Principles*）中最经常使用的“趋势”概念表明了马歇尔认为经济条件的均衡分析在很多方面是错误的。在涉及发展线的时候，马克思早在马歇尔之前就已经使用同样的术语（参见MEW 23，第377页；25，第233页；42，第326页）。

对于内尔松和温特来说，关键的仍然是经济主体的地位。他们试图从进化的方面使用阿门·A. 阿尔齐安（Armen A. Alchian）组织惯例的概念来规定经济主体。传统的非进化经济理论把经济主体假设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s*），经济人以全面的信息为基础做出理性决定，并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这正是阿尔齐安1950年在他的《不确定性、发展与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中所提出的观点。他认为，经济过程不需要有活力的实业家，即便在一个笨蛋的世界中仍会有利润。因为做决定的主体遵循习惯性的程序，以便获得其利益。内尔松和温特进一步 1075
发展了经济主体惯例的概念，也就是说，把这个概念本身再一次置入进化范畴之下，就像从原则来看在马克思那里发生的那样。例如，马克思强调生产纪律对于工艺变革（参见MEW 4，第155页；23，第389—390页）、经验因素对于技术改进以及“商业习惯”（23，第503页）的重要性。归根结底，惯例改变的问题涉及整个历史语境。

马克思不执着于一个持续的发展观，他对跳跃式变化和质的过渡方面特别感兴趣，并为此提供了很多例证。就像在阿尔齐安、内尔松和温特那里一样，仅从企业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对此会在逻辑上导致一种渐变主义的理论。持续的新产品、工艺和企业源于竞争压力。因为渐变主义不能解释整个经济场景的突变。长久以来，在进化经济学中存在关于“间断进化”（非持续发展）的讨论。同样被证实的是，经济学中除了通过竞争引发的选择之外，还有通过质变而产生的更高系统层次的选择，“宏观冲击”（Makroschocks）或者使用

其他工业部门的成果（Gowdy 1992，第2页）。

进化经济学中的生产力。进化经济学的一个主要方向是技术—经济的范式转换。主要观点如下："技术进步是经济的一个根本动力。存在与传统理论的分配机制极端不同的、各种动态适应的作用机制。这些作用机制与技术进步、制度转换，特别是与缺乏的制度变化相关联。社会经济的框架条件能促进也能阻碍技术进步。"（Dosi/Freeman 1988，第2页）相反地，马克思的进路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方式，他也不研究线性的因果解释或者只是论证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同构性。就技术被进化地纳入到经济和社会中，技术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变化
1076 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技术领域的运动而言，马克思更多的是分析技术。

进化经济学中的制度。社会经济的进化不是企业选择的、直接的偶然过程。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之间的序列和相互影响以及集中化的后果都发挥作用。与生物学进化的合成论概念相类似，这一思想方向在此期间被称作共同演化。这一思想方向也出现在偏离正统理论的、由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1849年创建的制度主义概念中（参见1993，第184页）。弗里曼（Freeman）和佩雷斯（Perez）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在技术—经济的范式转化中，以及彻底改变整个经济的成本结构的（Dosi/Freeman 1988，第48页）关键因素的概念中。对范伯伦进化经济中的制度主义的接受再一次导向了马克思。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在《制度变迁理论》（*Theorie des institutionellen Wandels*）中这样说道："在现有理论一百年的变迁之中，马克思的思想支柱最令人信服，之所以恰好是这样，是因为它包含了一切忽略新古典模式的要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产权对于一个有效经济秩序的关键意义，也强调在一个既定的产权状况和一个新工艺生产潜力之间形成的张力，这是至关重要的。"（1992，第63页）同时，马克思被制造出来要强烈反对诺斯认为的、把技术看作经济变化的出发点，而在现实中却相反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新产权系统的发展才能使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成为可能（第152页）。

再生产和破坏。对于经济进化过程来说，没有算法或数学形式可以让新事物的定性的、与内容相关的特征被表明。进化经济学的形式化包括某些基本特征或者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有点像在内尔松和温特那里的经济的尺寸标准、可自动化、资本成本和节省劳力；如马克思一样，试图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总体把握的尝试，在他们那里迄今还未出现。

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使得社会的未

来建构成为可能的进化经济学的必然性
1077 恰好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所忽略的进化因素变得清晰：国家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因自相矛盾的贬值—革新螺旋的明显错误而备受关注，而这个错误只能通过后补的、模仿的、鲜有经济成效的现代化来弥补。后发优势（高份额的铁路运输、重复使用和回收、无一次性消费观念）由于环境破坏和在非创新方向上对资源的错误分配而被完全抵消了。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实行的各种熵出口形式（为标准化大宗货物、成问题生态产品和能量集中过程以及清除少量发达国家的工业垃圾而调动生产能力）不适用于该系统。

正像霍布斯《利维坦》中的国家信仰忽略了自由货币经济中的内在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一样，好几代的马克思的科学乐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低估并排挤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破坏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威海灾难已成为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遵循电气化路径的灾难性的标志。

进化不是预先固定的进步阶梯，而是一个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同样也包括诸如停滞、灾难、萎缩和退化的可能性。三个相互缠绕的过程创造了人类无所不能的危险幻象：无限的货币增值、全球扩张和按照电脑产生的虚拟现实确立的所谓的技术完全统治的世界。与社会现实相关的意识形态面纱、对社会进化背景的知识缺陷以及对先前知识的否认，会阻碍一个有效的反对力量的形成，一个反对人类自我毁灭的社会力量的形成。

参考文献：

A.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0, Bd. 58, 211–21; B. Arthur,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d Economic Prediction*, II ASA Options, Laxenburg/Österreich 1984; R. U. Ayres, *Information, Entropy and Progress. A New Evolutionary Paradigm*, New York 1994; N. Bucharin, *Ö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1920), Hamburg 1970; G. Dosi, C. Freeman u. a. (Hg.), *Technical Change and* 1078
Economic Theory, London 1988; ders. u. L. Orsenigo, »Coord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Dosi/Freeman, 13–37; W. Ebeling, *Physik der Selbstorganisation und Evolution*, Berlin/DDR 1986; J. M. Gowdy, »Higher selection processe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change«,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 Jg., 1992, H. 2, 1–10; V. Hedtke, *Stalin oder Kondratieff. Endspiel oder Innovation?* Berlin 1990; E. Jantsch, *Die Selbstorganisation des Universums,*

München-Wien 1992; T. D. Lyssenko, *Die Situation in der biologischen Wissenschaft. Vortrag und Diskussion*, Moskau (1948 russ.), hgg. v. J. Kuczynski u. W. Steinitz, Berlin 1948;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1890; R. R. Nelson u. S.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Mass 1982; D. C. North, *Theorie des institutionellen Wandels. Eine neue Sicht der Wirtschaftsgeschichte*, Tübingen 1992; K. Popper,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e Feinde*, Bd. 2, Tübingen 1980; I. Prigogine u. I. Stengers, *Dialog mit der Natur*, München 1981; J. E.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1981; J. A. Schumpeter, *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W 1964; ders., *Kapitalismus, 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 München 1980; R. Schwarz, »Was ist neu an der evolutorischen Ökonomie?«, in: *Berliner Debatte INITIAL. Z. f. sozialwiss.* Diskurs, 8. Jg., 1997, H. 1/2, 85–91; *Science at the Cross Road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ld in London 1931*, Print London 1971; J. W. Stalin, *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Berlin/DDR 1952; W. Ulbricht, *Die Bedeutung des Werke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für der Schaffung des entwickelten gesellschaftlichen Systems des Sozialismus in der DDR und den Kampf gegen das staatsmonopolitische Herrschaftssystems in Westdeutschland*, Berlin/DDR 1967; ders., *Zum ökonomischen System des Sozialismus in der DDR*, 2 Bde., Berlin/DDR 1968; T. Veblen, *Theorie der feinen Leute. Eine ökonomische Untersuchung der Institutionen* (1899), Frankfurt/M 1993; U. Witt,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eory«, in: G. M. Hodgson u. E. Screpanti, *Rethinking Economics*, Aldershot 1991, 83–105.

海因茨-迪特尔·豪施泰因
(Heinz-Dieter Haustein) 撰
朱渝阳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nalytischer Marxismus, Anatomie, befehlsadministratives System, Befehlswirtschaft, Bewusstheit, Darwinismus, Destruktivkräfte, Determinismus, Dialektik, disponible Zeit, Elektrifizierung, Ende der Geschichte, Energie, Entropie, Entwicklung, Evolution, Evolutionismus, Fordismus, Fortschritt, Genetik, Geschichte, Gleichgewichtstheorie,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Krise, lange Wellen der

Konjunktur, Naturgeschichte, naturwüchsig, Neoklassik, Notwendigkeit, organische Zusammensetzung, Planwirtschaft, Produktivkräfte/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Staatssozialismus, Stalinismus, Stoffwechsel, Tendenz/Tendenzgesetz,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Tonnenideologie, Tschernobyl, Übergang, Ungleichgewicht, Utilitarismus, Zufall

1079 永恒 (Ewigkeit)

A: ḫulūd.

E: eternity.

F: éternité.

R: večnost' (вечность).

S: eternidad.

"永恒"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这些基本概念要归功于"意识形态的观念化"(MEW 3，第331页)，尤其是要归功于宗教的观念化。"外部世界"是"事实权力"(暴力、金钱)的世界，而"在精神的世界中……"，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却充满着一个(有点像正义)永恒的、神的秩序"(《恐惧与战栗》[*Furcht und Zittern*]，第23页)。君特·安德斯指出，永恒概念是"超决定性的"，这从它的作用范围可以看出：星辰、柏拉图的理念、上帝、生物物种、灵魂、地狱惩罚、自然法则、自然法、统治以及古典美的准则(1982，第306页)。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的构成看作是对永恒之物的直观，哲学成了"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以及一个在意识形态的永恒形式中成为自身内容的哲学神话。在海因茨·毛斯看来，这个哲学神话是如此地意识形态化，就像"一切号称永恒真理的图像一样。这些图像声称要保护永恒真理并以永恒真理的时效为借口，其目的在于神化这些虽然是'现实的'，但却不是'理性的'状态"(1981，第56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分析的意识形态的永恒观念与弗洛伊德观察到的潜意识永恒相结合。

这句"没有比这个词更不永恒的了"(Anders 1982，第131页)已经说明了词源：永恒的(*ewig*)与拉丁语词 *aevum* 和希腊语词 αἰών 具有相同词源；这些表述首先表达的是"一生""一辈子"(希腊语—英语词典[Liddell-Scott])，也就是纯粹内在时间的持续。永恒在现代的、被神学和哲学推向彼岸的意义上，很难与古希腊实践生命的现实性倾向相一致。《保罗书信》的翻译遮蔽了这种非一致性，因为它把相同的表述 αἰών 有时

候翻译为“永恒”，有时候翻译为“世界”（这对神学来说是一种对立）（参见 1 K 1.20：τοῦ αἰῶνος τούτου – »dieser Welt«［这个世界］vs. R 16.25：χρόνοις αἰωνίοις »seit ewigen Zeiten«［自永恒的时间以来］）。

永恒不是在“无限持续”（durée indéfinie）的原始意义上，而是在哲学中，通常是在外部时间中（Lalande，第304页），被理解为“一个排除了一切时间规定性的、包含思想要求的理想的边界概念”，也就是被看作“无时间性或者超时间性”（Eisler，第209—210页）。拉朗德指出：永恒作为（同步的）无时
1080 间性或者“超时间性”是从时间流逝的理念中推导出来的；永恒是“一种被清除了一切持续的特殊标志的持续观念”（第30页）。针对《共产党宣言》所抨击的“永恒真理”（MEW 4，第487页），毛特纳（Mauthner）写下：不仅“在我们小学作文的语言中”这样称呼席勒的句子，“而且拟人化的真理自身有时也获得了永恒、无时间性的修饰语”。上帝始终作为最高真理（*summa veritas*）介入其中，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即使世界消逝，真理也将存在。”（*erit veritas, etiamsi mundus intereat.*）尽管“在我们的时代”，真理的相对性被实用主义，同样也被尼采识别出，但“关于永恒真理的谈论却没有停止”，主要是因为逻辑学家把关于真理的判断看作是超时间的。如果有人认识到，信仰是“在历史中形成并发生变化”，那么“也就不应当有人谈论永恒真理”。这也适用于诸如能量守恒一样的定律：至少定律“不会以这种形式永恒存在；我说的不是定律表述的形式，而是定律概念的形式”（Mauthner，同上）。

只要有使意识形态永恒化的需求，那么关于永恒的“谈论”就不会停止。只要还靠着物质永恒的魔王来驱赶创世信仰的魔鬼，那么关于永恒的谈论在马克思主义中也将继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国家机器直至其消失，它的作用在于充当“永恒真理的总部”（Havemann 1971）。戈尔巴乔夫回忆起哈夫曼，内心激动：“我们的政党，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一个更高之物，就能永远保持其领导地位。”（1983，第153页）青年瓦尔特·本雅明“猛烈抨击”尼采的“一切快乐都渴望永恒”（Taubes，第100页）。他反对一切对于永恒化和不朽的错误渴望，而把流逝的永恒看作是一切存在者的弥赛亚式的幸福节奏。

1. 柏拉图在《斐多篇》（*Phaidon*）中提到“始终存在者”（ἀεὶ ὄν，79d），目的在于证明灵魂不朽。“始终存在的”是理念。理念不属于感性的—可感知（变化和消逝领域）的序列，而属于存在

(εἶναι) 和本质 (οὐσία) 的序列。经验之物是组合而成的，并因此是可拆分的；而本质和存在序列是由这些不可拆分、不消逝、不变化并且只有纯粹理性才可达到的非混合之物 (ἀξύνθετα, 78c) 组
1081 成的 (78d—79a)。这导致了柏拉图的二元论："逻辑上"获得的本质显现为非物质的，同时也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在《理想国》(*Politeia*) 中，εἶδη 相应的存在方式——一个可能的翻译是概念，另一个可能的翻译是理念——一个"始终存在 (ἀεὶ οὔσης) 的本质 (οὐσίας) 的"理念 (*R* 485b；参见 479e，484b)。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ἀεὶ ὄντα 是始终存在者，是"初始和原因" (τὰ πρῶτα καὶ τὰ αἴτια *Met* I.2，982b 2)，是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的直观对象。

波爱修斯 (*De Consolatione*，5) 区分了运动的永恒持续 (*sempiternitas*：*currens in tempore*) 和绝对现在完全在场的静止状态 (*aeternitas*：*nunc enim stans et permanens*)。从物质主义的立场出发，霍布斯批判了相应的经验哲学的学说："永恒是现在时的停滞，是现在的停驻 (*nunc-stans*) (经院学派用语)。这一名词他们自己不懂，别人也不懂，正像他们用此处的停驻 (*hic-stans*) 来表示空间的无限大一样。"(《利维坦》，第 46 章，§22) 霍布斯认为，这些在物质世界之外、号称现存的思想之物，为灵魂不朽的荒谬学说提供了支撑。在他看来，必要时可以把永恒理解为"无穷的时间延续" (同上)。他也坚信，"从正确推理中所得到的一切却不是别的，而只是普遍、永恒和不变的真理" (同上书，§2)。"作为现代思辨哲学的实际创始人"，斯宾诺莎追寻一条相反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传统却骇人听闻的道路，因为他把"世俗"神学"出于畏惧和无知而推移到彼岸的上帝本质移置此岸" (Feuerbach 1842，第 82 页)。对于斯宾诺莎而言，实体的永恒性源于它的本质必然包含其存在 (*Eth* I，Def VIII)。"人的心灵 (mens) 不能完全随身体消灭而消灭，但是它的某种永恒的 (aeternum) 东西仍然留存着。" (V，Prop. 23) 这种观念"是思想的某种样式，而这个样式属于心灵的本质并且必然地是永恒的"。这一观念当然排除了在未有身体以前的存在的回忆。永恒也"不可用时间去界说，或者说永恒与时间没有任何关系"，即便我们通过纯粹知性 (intelligendo) 经验到我们是"永恒的"，但斯宾诺莎却通过比喻来表达的这一纯粹知性的自明性："推论就是心灵的眼睛，凭借这 1082
种眼睛，心灵就可以看见事物和观察事物。" (同上，附释) 相应地，最高的知识形态"在永恒的形式下" (sub specie aeternitatis) 来看待事物，这在原则上与"把握了身体的现在的实际存在 (actua-

lem existentiam）”，而不是仅仅“在永恒的形式下把握身体的本质”的知识形态相区别（Prop. XXIX，Schol.）。黑格尔辩证的《逻辑学》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思辨的本质主义。

洛克把思辨拉回到经验的地面之上并这样解释永恒观念的起源：我们能随意呼唤和叠加时间长度的观念，“而在加数时却从来到不了终点”；所以我们能得到永恒一观念“就如我们灵魂将来的无限绵延，或亘古存在的无限的造物者的绵延”（*Understanding*，II，Ch. XIV，§31）。

通过援引灵魂（不朽），康德把永恒观念归结为纯粹理性的一种谬误推理（谬论）（*KrV*，B版，第399页及以下）。他的计划是要保护理性以免成为自身的先验幻象，也就是防止理性把其形式的结构元素看作是某种外在于自身的存在。在批判一切“不是关于人，而是关于纯粹理性自身的诡辩论”（A版，第339页）的范围内，康德指出论证上帝存在各种证明的幻象特点。“一个存在者，我们也把它表象为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中间的最高存在者，仿佛在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从永恒到永恒的，在我之外，除了仅仅由于我的意志而是某物的东西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但我是从何处来的呢？人们不能抑制这种思想，但也不能容忍这种思想。在这里，一切都沉沦到我们下面，最大的完善也好，最小的完善也好，都在思辨的理性面前萍飘无定，对它一钱不值；这一个也好，那一个也好，它都让它们毫无障碍地消失。”（B版，第641页）

黑格尔把其《逻辑学》纳入永恒观念之中。在《逻辑学》前言中，黑格尔要求效仿隐士“对永恒之物进行沉思”（第4页）。在导论中，他把《逻辑学》的认识对象确定为“展现在未创造自然和有限精神之前的、处于其永恒本质之中的上帝”（第31页）。黑格尔认为，合理性的理念是“精神”这样的“自在自为的、绝对永恒和必然的存在”，而合理性是“普遍性与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RPhil*，§258，W 7，第399页）。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哲学解释为：“既不与过去的也不与将来的东西有关，而是与存在的并且是永恒存在的东西有关——与理性有关。”（W 12，第114页）尼采的前辈哈勒（Haller）宣 1083
称这就是“上帝永恒不变的定则”：“有更大权力的人进行统治，必须统治，而且永远统治。”即把永恒设置在统治者的时间之中。黑格尔进行干预反驳：“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里所称的权力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了：它不是指正义的和伦理的东西的权力，而是指偶然的自然暴力。”（第403页，脚注）

2. 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与永恒观念不相协调。对于马克思而言，永恒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而恩格斯——即使他嘲笑从哲学唯物主义向自然科学过渡的“永恒的原初决定的观念”（*DN*，MEW 20，第489页）——保留了永恒，仅限于永恒在“物质”上的运用。

2.1 黑格尔通过对“意识形态观念化”（MEW 3，第331页）而使意识形态的范畴永恒化。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建构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Elend*，MEW 4，第129—130页）以及理性自身在时间中被强调为“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并造成这些思想的理性”（第126页）。蒲鲁东在他的经济学阐述中遵循这些理论，因为他认为，这些理论**“在理性中有其逻辑次序和划分结构”**（Proudhon，I，第145—146页；引自MEW 4，第126页）。正如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蒲鲁东从事的“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的历史，而是神的历史观念的历史”——（MEW 27，第454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方面发现了意识形态的永恒：“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是宣布他们的收入来源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MEW 25，第839页）在统治阶级的观念中，他们把在其统治之下的生产条件被确立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这一事实永恒化：“生产条件获得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是它们自然的、可以说是永恒的……天生就有的物质性质了。”（第833页）马克思提到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并认为，他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MEW 23，第352页，脚注22a）。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 1084
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第551页）在包含一个制度的永恒之光当中，能够看清意识形态。

在完全历史必然性的意义上——不是在哲学永恒的意义上——相反，对于马克思而言，劳动过程在其抽象一普遍的要素中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MEW 23，第198页）。

2.2 与“青年黑格尔”和谢林要求“从存在者自身出发来证明神性是永恒运动的”相反，青年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Schelling und die Offenbarung*，1842）中追问：“但是谁向我们证明，永恒的某些部分是存在的？只要从逻辑上推理，

那么自身存在者的运动只能归结为物质的永恒。”（MEGA I.3，第 297 页）这一思想再次出现在恩格斯死后出版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笔记中：物理学和天文学“达到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指出运动着的物质的永远循环是最终结论”（MEW 20，第 318 页）。在恩格斯看来，“新的自然观”表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第 320 页）。恩格斯把当时流行的熵死亡版本和冻死版本去线性化，并且通过自然界一种永恒的循环理论而扬弃了这些版本：“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行程并且遭遇到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怎样呢？是不是太阳的残骸将永远作为残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第 324 页）

通过摧毁一切存在物，恩格斯确保了“运动不灭”并反对“物质会死亡”的理念（第 325—326 页）。“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只有在我们的地球年代不足以作为量度单位的时间内才能完成它的轨道”，并且“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方式……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第 327 页）。物质与规律的永恒有助于掌握知识，“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发展出来，在一个短时间内找到适于生活的条件，然后又残酷地被消灭”。与这种引发不安的洞见相反，恩格斯“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 1085
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第 327 页）。

2.3 在苏联哲学中，永恒动机被带到了“唯物主义”意识形态中，目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瓦解之后从一切庸俗形而上学的无知中再次逃脱出来。

在恩格斯和达尔文之间，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发展了较高物种的永恒生命的思想。一方面他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碰撞结构：“经济奴役主要发展了屈服本能，并且有时纯粹自动地强迫把现存的社会形式看作是‘永恒的’和‘神圣的’。”（第 29 页）另一方面他把单个人的个体性概念推向普遍：“个体化事实上是确定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有机的意义上显现为普遍的生命，人的生命；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个体化将成为心理活动所生产出来的客观化元素。可以看出，个体化是天生的并且不会死亡。它是永恒的。”（第 45 页）早期苏联革命过程的英雄主义已经制定了带有道德的主体效应的意识形

态的永恒："积极—伦理的个性具有永恒的斗争渴望；它渴望斗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第55页）

因为"只是宣称普遍人的上层地位和精神特征，而不是在阶级社会中推行普遍人与共同体解体之间的辩证关系"（Haug 1989，第83页），所以在**苏联政治改革**（*Perestrojka*）阶段，随着"人的价值的优先性"和古老形而上学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动机的出现，以转向"普遍人"为标志的永恒再次成为话题。这一话题是前批判的，它不仅回到马克思之时，而且也回到康德之时。I. T. 弗罗洛夫（I. T. Frolow）从事医学上引发的"人类不死"的研究，并把道德哲学的各种问题解释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外在于具体的时间：它们是'永恒'的问题"（1986，第11—12页）。

3. 差不多同时，恩格斯呼吁物质的"永恒循环"，而尼采则把"永恒轮回"与"永恒生命"的观念相对立。蒙塔纳里（Montinari）也说到了"永恒轮回"：
1086 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决定论的、固有的世界观"，一个"哲学理论，而不是神话"（1981，第95页）。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Zarathustra*）宣称，"一切事物永远回归，我们已存在过无数次了，一切事物也和我们一起存在过"；"有一种不断形成的伟大之年，一种伟大之年的巨怪，它必须像沙漏计时器一样永远重新翻转过来，以便重新漏下和漏完"（KSA 4，第276页）——但是沙漏自身却不反转。"一切走开了，一切又回来"——"存在的轮子""永恒转动"（KSA 13，第272页）的思想是反对宗教和哲学的静止的永恒观念。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宗教是安慰苦难者和被压迫者的鸦片，那么尼采则嘲讽，应该让人们用"永恒生命"引诱那些"多余的人"和"过剩的人"远离生命（KSA 4，第55页）。这既不与尼采自身要"热切地经验到永恒"相矛盾，也不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结尾句的轮唱曲相矛盾："一切快乐都渴望永恒。"（第403页）"快乐渴望自身，渴望永恒，渴望轮回，渴望一切永恒地与自身等同。"（第402页）

尼采的"永恒轮回"被君特·安德斯看作是"一种对于过程概念的过度反应"以及一个以克隆现实的形态出现在基因操控中的"固定的观念"（1982，第102页）。尼采宣称的"*上帝之死*"包含"永恒的死亡"。"海德格尔不仅严肃对待尼采的妄想，还称颂它为划时代的洞见、现代形而上学的重大事件"，这完全是不可理解的（Anders 1982，第100—101页）。

4.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向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介绍一种观念，承认他要称作“永恒”知觉的一种感觉来自宗教的起源，并承认这种感觉好像是某种不受限制的、无边界的、仿佛就是“海洋般的东西”（GW XIV，第422页）。弗洛伊德则用“保留一切过去的猜想”（第428页），也就是采用早期孩童时期的还未区分的经验来解释这种感觉：“本我原初包含一切，后来从本我之中分离出一个外部世界”；对这种原初统一性的遥远记忆可以采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感觉”的形式（第425页）。在弗洛伊德看来，尼采的快乐原则寓居在潜意识之中。“**潜意识—各种进程**”不“顾及现实”。“它们遵循快乐原则”；此外，它们还“无时间性，即它们不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1087 改变，与时间不发生任何关系”（GW X，第286页）。矛盾在潜意识之中得以协调（GW XIV，第11—15页）。同样起作用的是尼采的“是，没有不被玷污的”；矛盾律在这一点上是没有意义的。“潜意识的核心是由本能表征构成，它们追求释放其惯性，也就是说潜意识是由欲望冲动组成的。这些本能冲动之间……互不影响，也不发生冲突。即便在两种看起来目的各不相同的欲望冲动同时被激活时，它们也不相互冲突或势不两立，而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居间或妥协的目的。在这一系统中不存在否定，不存在怀疑”，只有移植和凝缩（GW X，第286页）。总之，弗洛伊德通过“**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贯注的活动性）、无时间性和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同上）来说明潜意识的特性。对一种重要东西的“脆弱”和“短暂”所深切感到的失望会导致“厌世感”或者“反抗”以及对永恒持续的安慰图像：“然而，这种永恒一要求是我们所希望生活的一个成果，这一点是如此显著，以至于这种要求不可能得到现实的价值。”（GW X，第358页）

5. 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永恒概念在实践操作上会被尖锐化。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观点：意识形态没有内生的历史，“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MEW 3，第27页）。与此相应，霍克海默批判带有马堡烙印的新康德主义：“学者的理论活动的过程已变成了更加通用的范畴，如同世界精神和永恒‘逻各斯’的要素……。在现实中，从事科学的职业是劳动和人的历史活动的一个非独立要素，而这个职业却代替了劳动或人的历史活动。……关于人类的自我知识目前来说还不是以永恒逻各斯的形式出现的数学自然科学，而是现存社会中

的、出于兴趣对理性状态进行主导批判的理论。”（1937，第147页）

紧跟《德意志意识形态》，卢卡奇也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使用永恒概念：“每一种非辩证的，并因而在历史的意义
1088 上也非现实的、具有灵魂的哲学，使得现实的本质普遍化，因为这种哲学使得当下膨胀为‘永恒的规律’和‘永恒的存在’。在信仰永恒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自身倾向于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眼中，整个历史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生命形式之中。”（1951，第27页）

直到阿尔都塞才把永恒——超越了意识形态批判——变成一个意识理论概念。他把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元素与由卢卡奇所激发的语言学的弗洛伊德阐释结合在一起（参见 Ghisu 1995）。但阿尔都塞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就他把意识形态理论一般地建立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之上，并这样解释它而言：“人天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l'homme est par nature un animal idéologique.）（1976a，第110页；肖特勒 [Schöttler] 翻译为“意识形态的本质”，1977，第140页）“**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就如同无意识是永恒的一样。”（引自 PIT 1979，第117页）阿尔都塞以此来为这一对比辩护：“无意识的永恒与普遍的意识形态的永恒不是没有关系。”（1977，第133页）“因为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清除在其中从功能的角度来展现意识形态的时间形式并指出：意识形态向来（toujours-déjà）都是呼吁作为主体的个人……。因而，我们达到了一个最后的论点：**个人向来都是主体**。”（1977，第140页）这一观点由于“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而遭到了批判（PIT 1979，第117页）。对于阿尔都塞来说，个人与社会两者之间的距离，最后只能通过服从与适应，即以一种“原则上无意识的基本结构”的形式来消除（同上）。

如果人们把意识形态论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细化为这个问题：怎样把服从统治理解为归入国家再生产出的阶级社会结构的效应，也就相应地把无意识问题和语言问题一般地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解除出去，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倒退至自身是透明的，并且是自身存在基础的主体的理性主义的幻象中。从这一观点中首先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系统规范的意识形态形式没有在理论上被清除。虽然政治系统假定的永恒特性不是别的，而只是表象，但是这种表象以一种社会统治系统的事实形式存在。”（Haug，第177—178页）

6. 布莱希特批判通常由好莱坞电影 1089
推动的“永恒地重复谎言和恩怨”（GA 23，第38页；XV，第469页）。他引入

"平常化"的概念，为的是表达日常"规范性"的永恒效应。即便是轰炸之夜，在"二战"中也成为"常态，它们不再需要解释"（GA 23，第928页）。一种出乎意料之物降临的这种效应将是可见、可经历的。它可能是幸运，也可能是不幸："长久的东西，看起来平常，却快速地、短暂地结束了"——这打断了"安静的、具有正常事物特性的假象"（第297页）。

对于按照葛兰西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绝对历史主义"来说，拉布里奥拉（Labriola）的学生贝内德托·克罗齐以唯心主义的方式示范性地把永恒观念和不朽观念翻译成历史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克罗齐一再地返回到历史（参见*Gef* 6，H. 10. I，§11和A版，第565—566页，脚注3）。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理解马克思"理智革命"的哲学意义。"因而就像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尤其是实践哲学最终要通过把握社会人和历史人及其整体来扬弃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的各种形式中，经验存在之物被看作是任何一种作为前提的思想的反映、再生产、模仿、例证和结果（或者除此之外还能说出的其他），这种思想也恰好意味着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在其不久前还具有的传统意义上的终结……。对于不思考的人来说，（自然）还是一个从未处于形成中（*in fieri*）的事实，一个从未形成的事件，一个永恒的、从未改变的存在者"（*ÜHM*，第318页）。

葛兰西跟随拉布里奥拉进入了极端的历史主义。这一眼看去与他于1927年3月12日在狱中写给塔吉娅娜·舒赫特（Tanja Schucht）的信相矛盾："我因下述思想而备受煎熬（我认为，这是对囚犯而言独有的现象）：根据歌德的一个复杂观点，有必要做一些'永恒'的事情。"（*LC*，第58页）接下来他制定了《狱中札记》的计划。在意大利语的文本中，德语词"永恒的"出现了两次。在第二处，是通过"disinteressato"（有点像"非专用的"）来解释"永恒的"这一表述——考虑到当时的监察官，这不是在政治方面做出的解释（处于危险之中的是写作许可）。众所周知，结果实际上就是永恒的、在古老意义上的无法预见的时间间隔，在这个时间间隔中，《狱中札记》这部著作继续产生影响。六年之后，1933年7月24日，身患重病的葛兰西再次写信给塔吉娅娜。他"整晚都在一个现实和历史的意义上谈论灵魂不朽，即谈论我们有用的和必要的行为及其体现在我们的意志之外、在一个广博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地继续存在"（*LC*，第805页）。 1090

青年本雅明在其所谓的《神学—政

治学残篇》(*Theologischpolitischen Fragment*)(大约1920—1922年，GS II.1，第203—204页)中，辩证地研究确定关于永恒讨论结构的永恒与短暂之间的对立："因为在幸福中，一切世间之物都追求其毁灭。"雅克布·陶布斯(Jacob Taubes)指出，必须要把这个小句子看作保罗《罗马人书》(第18页及以下)的参照文本来读(1993，第97页及以下)。但他忽略了本雅明革命理论中预示的有组织的思想。保罗进行论证(1 K 15，第32页)："如果不能使死者复活"，即如果不是流逝消失了，那会是什么消失了呢？"让我们今天吃喝，明天死亡"(φάγωμεν καὶ πίωμεν, αὔριον γὰρ ἀποθνήσκομεν)的座右铭将适合这种情况。"吃喝"是世间"幸福物品和满足物品"的全部，并且从中也能完全看出"世间"的幸福追求。它的逻辑如下：如果我们明天追求，那么我们现在的生命更有价值。保罗反对上述观点并确立了相反的逻辑：如果我们明天才正确地生活，那么会使此时—此地的生活失去价值。在这一点上，本雅明通过从范畴方面拒绝一切神权政治而打断了上述逻辑。世俗秩序必须要提升尘世生活，并且一切政治要从幸福的观念中(包括吃喝[φάγωμεν καὶ πίωμεν])得到宽慰。如果你们追求的是其中一种尽可能少地阻碍、尽可能多地促进尘世幸福的政治秩序，那么你们将会得到"彼岸"自身。正如保罗所说，流逝不再消失，而是流逝的永恒要被看作是一切存在者的弥撒亚式的幸福节奏。本雅明的基本思想如下："拯救的要求，作为要求，自身是需要拯救的。"尼采所指出的"一切快乐都渴望永恒"，就是这种要求不可被拯救的一个证明。本雅明在尼采的这种渴望中接受了流逝的看法。健全的人类知性应该会同意本雅明，因为快乐的永恒无法与地狱的永恒相区别。即便和解不断消失，实现的时刻还是与流逝和解了。幸福被理解为"这个在其(空间的与时间 1091
的)整体性之中永恒流逝的世界之物的节奏"。"从其永恒和完全的逝去中而产生的自然是"——弥撒亚式的——不仅是在因不幸而产生的拯救的要求中，而且也是在幸福的要求之中。智慧不追求永恒。世界是变化，生活就是接受变化(ὁ κόσμος ἀλλοίωσις ὁ βίος ὑπόληψις)(Frg. Demokrates 85，参见*DK*，Frg. 115)——这句话被认为是德谟克利特写的。

参考文献：

L. Althusser, *Positions (1964-1975)*, Paris 1976; ders.,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West-Berlin 1977; G. Anders, *Ketzereien*, München 1982; L. Feuerbach,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 der Philosophie« (1842), in: ders., *Anthro-*

pologischer Materi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hgg. v. A. Schmidt, I, 82–99; I. T. Frolov, *Mensch, Wissenschaft, Humanismus. Zur Kritik des Anthropologismus, Szientismus und sozialbiologismus*, Berlin/DDR 1986; S. Gisu, *Ewigkeit des Unbewussten—Ewigkeit der Ideologie. Psychoanalyse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bei Althusser*, Berlin-Hamburg 1995; M. Gorbatschow, *Perestrojka. Die zweite Etappe hat begonnen. Eine Debatte über die Zukunft der Reformpolitik*, Köln 1988; 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d. 2, Berlin-Hamburg 1987; ders., *Gorbatschow*, Hamburg 1989; R. Havemann, *Rückantworten an die Hauptverwaltung* »Ewige Wahrheiten«, München 1971; T. Hobbes, *Leviathan oder Stoff, Form und Gestalt eines bürgerlichen und kirchlichen Staates*, hgg. u. eingel. v. I. Fetscher, dt. v. W. Euchner, Neuwied-Berlin/W 1966; M.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in: *Kritische Theorie* II, Frankfurt/M 1968, 137–91; G. Lukács, *Existentialismus oder Marxismus?* Berlin/DDR 1951; H. Maus, *Die Traumhölle des Justemilieu. Erinnerung an die Aufgabe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gg. v. M. Th. Greven u. G. van de Moetter, Frankfurt/M 1981; F. Mauthner,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2 Bde. 1910/11; M. Montinari, *Su Nietzsche*, Rom 1981; *Projekt Ideologie-Theorie* (PIT), *Theorien über Ideologie*, Berlin-Hamburg 1979 (^{3}1986); W. Stepin, »Das Maß aller Dinge‹...—Betrachtungen nach dem Philosophenkongress «(Interview), in: *Pravda* (dt. Ausg.) 3.11.1988, 33; J. Taubes, *Die politische Theologie des Paulus*, hgg. v. A. u. J. Assmann, München 1993.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朱渝阳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Denkformen, Dialektik, Dummheit, Dummheit in der Musik, Erscheinung, Existenz, Glück, Hegelkritik, Herrschaft,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Idealisierung, Ideologie, Ideologiekritik, Ideologie-Theorie, Jenseits, Metaphysik, Perestrojka, Philosophie der Praxis, Schein, Spekulation, sterblich, Subjekt-Effekt, unendlich, Verhimmelung, Vernunft, Wahrheit, Wesen, Weisheit, Zeit

不有 (Exappropriation) 1092

A: naza' milkīya.

E: exappropriation.

F: exappropriation.

R: ėksappropriacija (эксаппроприация).

S: desapropiación.

由雅克·德里达引入的新词“不有”或“剥夺、没收”(Ent-aneignung)(1993，第7页)类属于他的将批判作为“解构”(Dekonstruktion)，并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Radikalisierung des Marxismus)(1995，第149页)的研究项目。德里达指出，只要马克思主义通过某种方式与将可占有物(das Anzueignende)视为实质性的存在的“占有”(Aneignung)关联起来，那么马克思主义本身依然受缚于形而上学。相反，“不有”“与一切‘资本’、一切财产或占有，以及所有依赖于和发起于自由的主观性(freie Subjektivität)的概念——某种趋向这些概念的解放——形成强烈的对照”(同上)。

1.解构是一种颠覆(Subversion)——“相比政治意味的‘颠覆’，它更是‘观念与价值观的剧变’(bouleversement des idées et des valeurs reçues)”(Petit Robert，引自Zima 1994，第1页)，这一颠覆不仅使文本的分解和建构融于一体，并且将“多角度”的思考付诸实践。对于形而上学看似牢固的宏大，解构照其建构方式将它从主体到灵魂再到逻各斯(Logos)进行分解，后重新建立，同时展示出其中的一些问题、矛盾和悖论。解构是反对将“万物”归于逻各斯之下、固定于现时意义(Sinnpräsenz)并将所有不被纳入体系之物都当作无关紧要或次要的而加以排除的形而上学传统。相应地，德里达提到“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zentrismus)的概念，用以描述“将现实缩减为语言等的做法所造成的语言的物化(Hypostasieren)”(1994，第129—130页)。

德里达反对“本体的统一”(*ontologische* Einheit)、“基本”(das Fundamentale)及“源头”(das Ursprüngliche)(原因、准则、本原)(1995，第150页)，并引入了延异(*différance* [Differänz])的概念。用这一巧妙办法应能够将动词“différer”(区分、推延；1995，第37页)的多重含义也应用于名词“différence”，而新词“différance”与它同音(参见1988，第33—35页)。由于二者的差异无法从读音上分辨，展示“话语的统治”(Zima 1994，37)遂成为可能，并且同时也可从中摆脱出来。德里达的论述是一次“将批判的思考从制度化了的哲学中解放出来、对概念及系统的概念性的统治提出强烈质疑”的尝试。(1)因此，不有和在德里达的诸多文章中出现的类似术语(参见1976，

第 410 页；1988a，第 96 页；1992a，第 307、422 页；1993，第 32 页；1994，第 129 页；1994b，第 368 页）从未被明确定义，而主要记录了“通过德里达对不同形象集群的研究工作而出现的动向”（Jameson 1995，第 79 页）。

1.1 不有一词由“占有”（Appropriation/Aneignung）和“征收”（Expropriation/Enteignung）组成，占有和征收又与财产和自有物相关联。德里达反对自有物的概念范围内包含的所有概念，认为它们始终束缚于意味着不再继续传递的东西和固定的基底的本体论和同质性。不有对立于这一“形而上学的支撑”（1994，第 129 页）而被创造出来，德里达称它是“自相矛盾的”（paradox），因为它既不代表“某种消极性，也不代表某种可辩证化的矛盾抑或是某个消极事物的辩证性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占有和征收能够被“消除”（第 130 页）。

正如**解构**一词可追溯至《存在与时间》（§ 6）中的“本体论历史的分解”，并且海德格尔的著作是德里达整个研究的焦点之一（参见 1974，第 269—270 页；1986，第 154—156 页；1988，第 319 页；1993，第 166 页），“‘自有’（Eigenen，Propriation）（**自己的** [*eigen*]，**拥有** [*eignen*]，**发生** [*ereignen*]，**尤其是事件** [*Ereignis*]）的问题”（1986，第 156 页；参见 Lévinas 1988，第 69—70 页）、确实性和非确实性（Eigentlichkeit und Uneigentlichkeit）的问题亦是如此。因为海德格尔将“存在与事件紧密联系起来”（1993，第 32 页）加以思考，借此“挣脱了本体论”，所以，围绕财产的概念的含义也发生改变：例如“财产或自有物恰恰被描述为没什么可拥有，从而也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也因如此，“自有被证明为占有（Appropriation/Apropriation）”（1986，第 157 页）。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化”，这一论述只有当从形而上学批判转移到社会和经济批判的领域时才可被理解。在此，根据解构的逻辑，“通过每个确实的或最终的实体与其自身的各类关系的剥离”（1949，第 129 页）去思考经济之事。

1.2 **礼物**（*Die Gabe*）。德里达对经济学的论述继承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s）的“普遍经济学”（économie généralisée）概念，后者反对“有限的”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解释视财富的支出（Verausgabung）或消耗（Verzehrung）优先于生产的**普遍经济学**（*allgemeinen Ökonomie*）的原则”（1985，第 35 页；1973，第 136—137 页；dazu Derrida 1976，第 380—421 页，以及 1994，第 129—130 页；参见 Balibar 1994，第 341 页；Salemohamed 1995，第 480 页）。同时，“礼物的问题”（1993a，第 7 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094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1974，第351页）对“印欧语系的多数语言”中存在的动词*do*进行语言学分析时，证明了它的矛盾性，即“在不同的语言建构下”表示**给予**（*geben*）或**获取**（*nehmen*）。在解构性的文本中——尤其是莫斯（Mauss）关于礼物的论文，但也有本维尼斯特（1974，第350—363页）、列维-斯特劳斯（1978）、巴塔耶（1985，第93—110页）的文章，德里达指出了以下“矛盾或悖论”（1993，第40页）：礼物（Gabe）是经济的（ökonomisch），同时也是非经济的（anökonomisch）。一方面，它参与德里达所说的“经济叙述的奥德赛式结构”。在这一叙述中，“某个循环的角色**处于中心地位**”。正如奥德赛的出发只为再次归乡，**家政管理学**（*oikonomia*，古希腊词汇，“经济学”一词的源头）也遵循这一路径。这种循环的动机适用于整个经济领域：“循环式交换、货物循环、产品或货品、货币流通、债务清偿和摊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可替代性。”（1993，第16页；参见1991，第52页）在这一意义上，莫斯将礼物和“不外乎是礼物交换体系”的赠礼宴（Potlatsch）等同起来（1978，第62页；Derrida 1993，第54页）。由此，礼物被用于说明某种交换关系，而不再是礼物本身了。因为根据德里达的观点，**作为礼物的礼物会“中止经济的交换”，从而令经济学体系“中断”。“如果循环的角色对于经济至关重要，那么礼物必须始终是非经济的。”**（1993，第41页；参见1995，第46页；1994，第130页）它或许收不到回馈——甚至只作为某种形式的肯定也不会有，因为由此“某个象征性的等价物”会回赠给“事物本身”（1993，第24页）。所以，礼物可以不作为礼物出现，这正是悖论所在。

认为礼物不具悖论性，而“至多具有多重功能性的特点”（1994，第77页）的观点，齐马（Zima）并不认同。格林兄弟所编纂的《德语词典》中就有诸多例子表明，礼物在某个特定的情境中和在不同的背景下，各有特别的含义。皮埃尔·布尔迪厄分析了关于礼物的“**以机构形式被组织的……和被固定下来的……误解**”，认为礼物“不愿认识过去和未来，因而也不愿进行任何计算”（1979，第335页）。被德里达称作悖论的礼物，布尔迪厄通过分析它的社会功能指出，在“远古时期的经济模式”里，还有一种功能在于“限定和隐藏（狭义上的）经济利益和计算的游戏”（第337页）。

1095

1.3 **海角**（*Das Kap*）。借不有的概念所提出的针对一切资本的抗议，德里达在《另一个海角》（*Das andere Kap*，1992）中介绍得最为详尽。文中提到

诸如“一种新型文化的必要性，它能创造另外的方式来解读和研究《资本论》（*das Kapital*）（马克思的作品和普遍意义的资本）”（第 43 页）。除了资本（le capital）的批判，这里也有关于首府（la capitale）的批判。即便“欧洲文化的官方首府”不在计划之列，但“以文化霸权（kulturelle Hegemonie）为目标的斗争……已经开启”（第 30 页）。资本和首府所面对的矛盾是无法分割的，它是文化、经济、政治形势的一部分：“传统上占优势的习语和某些文化产业的固有的势力便是这一竞赛斗争的舞台。”（同上）

德里达认为“cap”（来自拉丁文 *caput*，意为头部）一词同性别关系有关（第 16—17 页，第 49—50 页），他主要在象征性秩序（symbolische Ordnung）的层面上对性别关系进行了解构。“cap”指示“头、首、外部肢体的终端……它意为目标……意味着总体上的**终末**（*eschaton*）；在航海界，它为航行者指向极点、终点、目标……。一般来说——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它是一位决定目标、决定头领的男性，他自己也即是头领、舰首，是掌舵的船长或机长。终末和目的——这便是男性”（第 15 页）。

2.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德里达的定论在不少方面体现了其任意性。例如，在船只航行过程中，海角（das Kap）不是目的地，而是需要绕行的地方。终末论和目的论以“行事果断的男性”形象出现，这一拟人手法使某个正需在其矛盾冲突中进行具体分析的社会问题清晰化了。

理论的分歧形成了对辩证法的理解。德里达同德勒兹、福柯等人一样位于“‘反辩证法的’队列”。他认为辩证法是与“‘生产’和‘实质’”（1994，第 130 页）的意义相关联的。“若辩证法这一概念始终如一地受限于现时的视界（Horizont der Präsenz）”（1974a，第 422 页），则一切辩证法都会被批判，甚至被拒绝。在此项关于辩证法的定论中，1096
辩证法被描述为封闭之物，令“不受限的异在”（1994，第 139 页）不可实现，因为它已将所有事物涵括于自身，或将会这样。马列主义被用来佐证这一批判：它使辩证法变成一种“僵硬的东西”（Brecht，*AJ*，6.1.48，GA 27，第 262 页）。与此相反，辩证法在马克思那儿表示“在运动中把握既成形式的”一类实践活动（MEW 23，第 28 页）。拉布里奥拉、卢森堡、布莱希特、布洛赫、本雅明等人也提出了“解构主义的”思维工具。

这主要适用于“葛兰西主义工作间”（Francioni）及葛兰西在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思考与写作的各类明显不同的场所：在工厂、报社或监狱。形而上学的确定

性被质疑，继而被搁置。葛兰西将视线从关乎道德、政治和责任的——这些尚且被称作“自然的”——“悖论的”存在的“经验”（Derrida 1992，第 33 页）转移到问题的解决上：“悖论（*Aporie*）。怀疑（Zweifel）指的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思维关系，它充满等候某种解答的矛盾。但悖论——正如所有的怀疑——可有正面或负面的解决方案。”（*Gef* 7，H.15，§ 16，第 1733 页）葛兰西通过发问新词对日常理解和日常语言的影响，为新词的形成界定了范围。若依照布尔迪厄的提示，即德里达“归属于哲学生产领域”（1982，第 776 页）及与此相关的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重点研究，德里达所活动的界限范围便会明了。葛兰西站在处理能力的角度来“解构”社会的对抗现象：批判活动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能力之上，即善于发现所有浅层的表象的整齐划一和相似性当中的区别和差异，以及表面的对立和差异之下的本质的统一”（H.23，§ 5，Q3，第 2192 页）。这一批判活动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涉足所有社会领域。

如马舍雷（1994，第 164 页）所评，德里达对马克思的研究是在他所创造的新词“不有”所批判的范围内行动的“自由的再占有”（freie Wiederaneignung）。克里奇利（Critchley）则看到一种“阿尔都塞式的‘抽搐’”（Althusserian ›tic‹），并指出，在**马克思的幽灵们**（*Marx' Gespenstern*）当中，“阿尔都塞显然是其中一位”（1995，第 26 页）。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论点的认识仅位于“边缘地带”，德里达的文章从而有某种“再次发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齿轮”的倾向，因为他并未尝试“对马克思的作品进行优化和修正，并将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畸变中解救出来，就像卢卡奇和葛兰西，或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做的那样”（同上）。 1097

3.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尤其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引起颇多富有成效的共鸣（参见 Fraser 1993），在后殖民批判中也是如此，但不有的概念在那里没有被特别提及。不有可与女性主义的经济批判的论点相关联，前提是这一批判拒绝将既有的“特征”视为“依照自然”而来的女性或男性特征，并且指出象征性秩序的问题以及它的与经济相关的批判（参见 Madörin 1992）。

德里达对一切资本的批判的要求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未被他明确表达的——“象征性的资本”（参见 Bourdieu 1982，第 773—783 页），这一象征性的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了某种政治理论的相关性，因为德里达批判了“对幽灵和幽灵性的终极除魅，以及具有永久现时意义的市场全景的开

始”（Jameson 1995，第 108 页）。与属于新“神圣同盟”的“‘福山’式的修辞”（Derrida 1995，第 162 页）的联系由此产生，因为这种修辞致力于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应转变为一种“普遍被认同的模式”（1992，第 28 页）。这种代表全球范围的剥削、压迫、破坏和种族隔离的模式成为唯一的选择，且不存在乌托邦（参见 Hinkelammert 1994）。与此相反，德里达指出“保持不可能的事物的存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ameson 1995，第 103—104 页）。不有、延异、礼物、他者、痕迹等的动机可被理解为“乌托邦——以及被德里达自己肯定地称为‘救世主式’的东西”（第 104 页；参见 Derrida 1991 和 1995，第 94—95 页）。同时，对相异性（Alterität）的探讨是德里达伦理学构思的基础，其中，他吸收了列维纳斯（Lévinas）（1995，第 257—264 页）的观点，对列维纳斯来说，伦理学在面向他者的过程中得以展开。

参考文献：

A. Ahmad, »Reconciling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 and Deconstructive Politics«, in: *NLR 208, 1994, 88–106*; E. Balibar, »Gewalt und Politik. Einige Fragen«, in: V. Caysa u. K.-D. Eichler (Hg.), *Praxis, Vernunft, Gemeinschaf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anderen Vernunft*, Weinheim 1994, 330–50; G. Bataille,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Paris 1973; ders., *Die Aufhebung der Ökonomie*, München 1985; É. Benveniste, *Probleme der allgemeinen Sprachwissenschaft*, München 1974; P. Bourdieu, *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Praxis auf der ethnologischen Grundlage der kabylisch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79; ders.,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 Frankfurt/M 1982; L. Cartelier, »Enteignung«, in: KWM 2, 1984, 239–95; J. P. Cotten, »Aneignung«, in KWM 1, 1983, 61–65; S. Critchley, »On Derrida's Spectres of Marx«, i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1. Jg., 1995, H.3, 1–30; J. Derrida, *Positions*, Paris 1972; ders., *Glas*, Paris 1974; ders., *Grammatologie*, Frankreich 1974a; ders., *Die Schrift und die Differenz*, Frankfurt/M 1976; ders., »Sporen. Die Stile Nietzsches«, in: W. Hamacher (Hg.), *Nietzsche aus Frankreich*, Frankfurt/M-Berlin 1986, 129–168; ders., *Randgänge der Philosophie*, Wien 1988; ders., *Vom Geist. Heidegger und die Frage*, Frankfurt/M 1988a; ders., *Gesetzeskraft. Der »mystische Grund der Autorität«*, Frankfurt/M 1991; ders., *Das andere Kap. Die vertage Demokratie. Zwei Essays zu Europa*, Frankfurt/M 1992; ders., *Die Wahrheit in der Malerei*,

1098

Wien 1992a; ders., *Falschgeld. Zeit geben I*, München 1993a; ders., »Wenn es Gabe gibt—oder: ›Das falsche Geldstück‹«, in: M.Wetzel u. J.-M. Rabaté (Hg.), 1993b, 93–136; ders., »Politik und Freundschaft. Ein Gespräch mit Michael Sprinker«, in: H. Böke u. a. (Hg.), *Denk-Prozesse nach Althusser*, Hamburg 1994, 103–162; ders., *Meine Chance. Rendez-vous mit einigen epikureischen Stereophonien*, Berlin 1994a; ders., »Den Tod geben«, in: A. Haverkamp (Hg.), *Gewalt und Gerechtigkeit. Derrida—Benjamin*, Frankfurt/M 1994b, 331–445; ders., *Marx' Gespenster. Der Staat der Schuld, die Trauerarbeit und die neue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M 1995 (frz. 1993); ders., »Entretien avec Robert Maggiori«, in: Le cahier livres de Libération, 24. 11. 1994c, 1–3; ders., *Apories*, Paris 1996; T. Eagleton, *Ideologie. Eine Einführung*, Stuttgart-Weimar 1993; ders., »Marxism without Marxism«, in: *Radical Philosophy*, 73. Jg., 1995, 35–37; N. Fraser, »Pragmatismus, Feminismus und die linguistische Wende«, in: S. Benhabib u. a., *Der Streit um Differenz. Feminismus und Postmoderne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M 1993; J. K. Gibson-Graham, »Haunting Capitalism...in the Spirit of Marx und Derrida«, in: *Re-Marxism*, 8. Jg., Nr. 4, 1995, 25–39; J. Grimm u. a., »Gabe«, in: ders. u. W.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4, 1. Abt., 1. Hälfte, Leipzig 1878, 1111–16; F. J. Hinkelammert, *Kritik der utopischen Vernunft. Ein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n Hauptströmunge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stheorie*, Luzern-Mainz 1994; F. Jameson, »Marx's Purloined Letter«, in: *NLR* 209, 1995, 75–109; G. Labica, *Der Marxismus-Leninsmus. Elmente einer Kritik*, Berlin/W 1986; C. Lévi-Strauss, »Einleitung in das Werk von Marcel Mauss«, in: M. Mauss, *Sozi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Bd. I, Frankfurt/M-Berlin/W-Wien 1978; E. Lévinas, »Ganz anders—Jacques Derrida«, in: ders., *Eigennamen. Meditationen über Sprache und Literatur*, München-Wien 1988, 67–76; ders., *Zwischen uns. Versuch über das Denken an den Anderen*, München-Wien 1995; P. Macherey, »Marx dématérialisé ou l'ésprit de Derrida«, in: *Europa*, 72. Jg., Nr. 780, 1994, 164–72 (engl. in: *ReMarxism*, 8. Jg., Nr. 4, 1995, 18–25); M. Madörin, »Mytho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in: Arbeitsgruppe Strukturanpassung und Frauen (Hg.), *Von der Vernicht(s)ung der Frauen. Zur Wirtschaftspolitik und -theorie von IWF und Weltbank*, Bern 1992, 10–21; M. Mauss, *Soziologie und Anthropologie*, Bd. II, Frankfurt/M-Berlin-Wien 1978; B. Men-

1099

ke, »Dekonstruktion—Lektüre: Derrida literaturtheoretisch«, in: K.-M. Bogdal (Hg.), *Neue Literaturtheorien. Eine Einführung*, Opladen 1990, 235–64; dies., »Benjamin vor dem Gesetz: Die *Kritik der Gewalt* in der Lektüre Derridas«, in: A. Haverkamp (Hg.), *Gewalt und Gerechtigkeit. Derrida—Benjamin*, Frankfurt/M 1994, 217–275; G. Salemohamed, »Derrida and the Marxian Promise«, in: Economy and Society, 24. Jg., 471–82; P. Séverac, »Aneignung«, in: KWM 6, 1987, 1043ff; J. Trabant, Neue Wissenschaft von alten Zeichen: Vicos Sematologie, Frankfurt/M 1994; M. Wetzel u. J.-M. Rabaté (Hg.), *Ethik der Gabe. Denken nach Jacques Derrida*, Berlin 1993, P. V. Zima, *Die Dekonstruktion. Einführung und Kritik*, Tübingen-Basel 1994.

伯恩哈特·瓦尔彭 撰
焦燕屏 译，蔡廷建 校

参见：

Althusserianismus, Aneignung, Artikulation, Bedeutung, Begriff, Definition, Dialektik, Diskursanalyse, Eigentlichkeit, Eigentum, einfache Zirkulation, Ende der Geschichte, Enteignung, Entfremdung, Erscheinung, Existenzialismus, fremd/Fremder, Ganzes, Gespenst, Hermeneutik, Kapital, Marxismus-Leninismus, Materialismus, Messianismus, Methode, Neoliberalismus, Nihilismus, Ontologie, symbolisches Kapital, symptomale Lektüre, Zirkulation

实例学习（exemplarisches Lernen）

A: ta'allum namūdağī.

E: exemplary learning.

F: apprentissage exemplaire.

R: primernaja učëba (примерная учёба).

S: aprendizaje a través del ejemplo.

从20年代后半阶段出现关于工人教育的争议开始，奥斯卡·内格特所提出的实例学习概念（参见 Heidenreich 1995，第252—254页）直到今天都对德语区的工人教育理论具有最重要、最卓越的贡献（参见例如 Conert 1978，第124—125页）。在60年代西德“新左翼”及其民主解放主义的推动、马克思理论复兴的背景之下，内格特主张尤其是工会（Gewerkschaften）所组织的工人教育应“重置方向”（1968，第23页）。

19世纪60年代至“一战”前十年，社会民主的工人运动将面向工人的补偿性的基础教育同阶级斗争教育联系起来，经过这一初步阶段，随着规范雇佣

劳动和资本的阶级关系的经过斗争所取得的劳资协定和劳动法的出现，工人教育发生了变化。在魏玛共和国——尤其因为1920年《企业管委会法》（Betriebsrätegesetz）创设了关于领导层的新范畴——工会把教育主要作为面向组织政治需要的“专业的干部培养”（第9页）来落实。教育成了目的性的工具，以实现协会一体化（Verbandsintegration），其中包含着对于左倾（共产主义者）与右倾（无组织者和相互竞争的各类工会）的各种排除和区分。在党派和工会的功能分配基础上，对于工会的功能性的目的教育的设想偶尔会呈现为攻击性和论战性的，例如这样的信条：工会无需向企业管委会“阐明资本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式会计方式的区别”（*SGZ* 1927）。

在内格特看来，作为20世纪5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冷战及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的结果，工人运动与作为其政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假设的）关联的瓦解标志着工人教育第二发展阶段的结束。正如工会不再坚持工人运动理论，工会的教育工作也开始倾向于“将意识培养缩减为组织实践性信息的获得”（1968，第14页）。研讨课程建立在经济学、劳动法和政治学的功能主义模式的基础之上（第60页；关于法学和政治学，参见第91页）。工会与资产阶级的科学和谐共存。知识的传授由工会利益代表的现有实践形式所决定，在功能性上受限于劳资协定和劳动法规范的解读或劳动价值评估方法的应用（第9、25、28页）。教育目标是培养作为“所获权利的维护者”（第87页）的精明强干、躬行实践的工会干部。

内格特的干预体现了工会的教育工作对资产阶级学术的理论和机构的日渐增长的依赖性（参见例如Brock 1980，第85页）；他想要“为了工人、为了解释他们的处境以及为了社会的理解……再次”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实践化”（1988，第41页）。工会的教育工作应能够赋能具体的社会批判。

在此视角下，只有一种启蒙式、以解放的形式自主发展的工人教育才是有效的。1978年，内格特在面对批评声时（Achten 1976，Werner 1975）坚持认为，在现实的、旨在解放的学习过程中，形式与内容是相关联的。当“所有内容以自治、自我思考、政治意识及工会相关的积极行为为目标，那么授课形式也必须不同于学校里的权威的讲授”（1988，第48页）。内格特指责西德工会中“培训和教育不受重视”（1969，第11页）——用常用语来说便是“一天的罢工教给工会成员的，比一周的课程还要多”——先前已有类似的观点（内格特未提及）：1911年，罗莎·卢森堡要求工会的教育工作中要有“学生同老师

的自由的发言”和开放的“思想交流”，因为一所工人运动的教育机构“不可将所有正面知识的机械式填鸭作为它的主要任务，而应是以系统的和独立的思考为目标的教育”（GW 2，第 550—551 页）。

对于为政治的工人教育来说，内格特的实例学习概念和“社会学的幻想”概念形成了一个整体。他的实例学习概念来源于当代关于校内学习材料过于繁重问题的教育教学的争论（参见 Wagenschein 1956；Rohlfes 1963）。如果“以实例为导向的课堂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由各门单独学科堆积起来的学习材料”，那么对内格特来说，单个的社会事实便是历史维度中的社会全貌的反映或焦点的实例（1968，第 15 页）。这样的工人教育需要一种“社会学的思考方式”，它承担社会的和历史的关联中对于单个经验的连接和阐释。“社会学思考方式的教育”（第 17 页）意味着，在社会的相互关系中，根据社会理论学习如何思考。如此一来，实例学习可与乌托邦和学术衔接起来。

从根本上说，内格特对实例原则的重塑所遵循的是不模式化处理某个建构的案例，而是把工人经验变为社会批判的乌托邦式的学习过程的材料。同时教育工作应能信任其主体的“社会学幻想”，因为“工人的实践的经验世界的语言化了的内容，不可简单地以科学上不合适为理由被消除和压制”（第 61 页）。这一观念与葛兰西对人类哲学思考及批判日常理解的能力的强调之间所具有的共通性（*Gef* 6，H. 11，§ 12，第 1375、1382 页），并未被说明。

实例的、指向争议的工人教育也体现在教师是否能够立足于学生的自我积极性，在研讨过程中将科学知识转化为“不同层级的直观的、科学以外的语言形式和思维形式”，“通过这些形式，社会关系的本质的政治和社会学的内容能够鼓励社会行为”（1968，第 19 页）。学习小组成员的资格问题成为整体方案的关键（1988，第 52 页；亦参见 Conert 1988，第 101—102 页）。 1102

由此可见，内格特的概念构思的特别之处来自它反对为理性主义所限的、机械论式的教育理解（事实信息＝被期望的行为改变）以及将心理学引入到必须遵循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工人教育理论。雇佣工人的主观观点、他们的“普遍的思维形式”（Marx，*K I*，MEW 23，第 564 页）作为这一特殊社会制度的“加工产品”，需要被认真对待（Negt 1968，第 35 页；亦参见 Haug 1985，第 171—177 页）。商品、货币和工资的拜物性建构了它们的意识，正是因为借助于此，社会整体的真实关系和因此必然存在的错误的意识能够被识别（参见 Marx，

MEW 23，第 563 页）。

“当工人教育想要依托于个体之间真实的冲突，以便让工人教育能够获得自主意识，并且能够用社会学来解读”，那么根据内格特的观点，工人教育必须“顾及它在保持个体认知的和心理动态的平衡中的功能”（1986，第 34 页）。围绕冲突的工人教育的首要任务便是：在雇佣工人的真实依赖性的意识框架内，使得日常冲突变得可见和可被意识到。最后“对工人群体来说，除了通过自我疏远（Selbstentfremdung）的意识以外，没有其余的消除异化（Entfremdung）的途径”（第 44 页）。对于马克思来说基础性的异化概念（参见 MEW 23，第 89、102、563、596 页）在内格特的论述中被赋予了一种对于工人教育实践来说核心的意义。

内格特构思层面上的工会的工人教育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以及正在遇到）抗议和界限。1966 年，（普法尔茨州的）兰布雷希特住宿制业余大学（Heimvolkshochschule Lambrecht）的一次会议上，当内格特首次提出他的概念进行讨论时，便首先与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
1103 的计划产生了共鸣，他们正尝试以“贴近生产的教育工作”的概念为核心，重建并在数量上拓展其教育实践（Brock 1980，第 82、93—94 页）。会后，金属工业工会和化工、纸张及陶瓷工业工会（IG Chemie-Papier-Keramik）负责教育的部门在劳动与生活（*Arbeit und Leben*）（德国工业联合会［DGB］和业余大学联合会的共有机构）的协作下，决定在下萨克森州为教育工作供应新的资料。1968—1969 年，奥斯卡·内格特参与其中的工作组以“企业主题范围”丛书为框架，编辑了五册，其中印刷了四册（《工业劳动与统治》［*Industriearbeit und Herrschaft*］、《围绕工资与绩效的冲突》［*Der Konflikt um Lohn und Leistung*］、《企业的利益代表》［*Die Interessenvertretung im Betrieb*］、《劳动者的尊严》［*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n der Arbeitswelt*］）。目的是以一种超越单个科学界限的“社会学思考方式”展现个人的处境同社会关系的关联，从而“达到对于社会整体的理解”（引自 Brock 1980，第 100 页）。这些资料的修订版直到内格特退出作者集体后才问世。

金属工业工会内，1972 年以前负责教育工作的部门领导汉斯·马特赫费尔（Hans Matthöfer）多次引用内格特的观点。就实例学习的概念在决定诸如培训企业的教育领导等方面的课程实践而言，它在政治上和教学上有着激烈争议。“关于金属工业工会的教育工作的议题”（刊登于《1971—1973 年金属工业工会工作报告》［*Geschäftsbericht 1971/73 der IG Metall*，第 309—310 页］）表明了“贴

近生产的教育工作”的中断：教育应重新强化置于董事会的核心控制之下，“并带着无可置疑的态度避免针对令人质疑的代理人政策的表现形式的批判冲动”（Conert 1988，第 97 页；主要参见 These 6）。

在公共服务、运输及交通工会（Gewerkschaft Öffentliche Dienste, Transport und Verkehr/ÖTV），青年干部和以内格特方案为导向的学生团队成员同部分专职工作人员一道，于 1974 年实行了一项新的**教育计划**（*Handbuch für Vertrauensleute 1978*，第 180—182 页）。该计划在公共服务、运输及交通工会的核心研讨课程中通行数年，因此，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与国家的教育内容能够得到某种工会的官方认证，在企业工会干部研讨课（Vertrauensleute-Seminare）和“关于公共服务中的理性化”研讨课等课程中获得一席之地。这一计划被公共服务、运输及交通工会的许多干部认为“过于苛责”（引自 Beerhorst 1991，第 196 页），继而迫于来自主要董事会、地区领导及一些教育文员
1104 的压力，被另外一种不推行激进的体系批判的方案所取代。还有一些为实现工人教育中的实例学习的尝试在胡施泰特寄宿制业余大学（Heimvolkshochschule Hustedt）、不来梅大学的**劳动与政治研究所**（*Akademie für Arbeit und Politik* an der Universität Bremen），部分地在金属工业工会柏林教育机构，以及经过调整后在奥伯乌尔泽尔（Oberursel）的德国工业联合会青少年教育机构实行。在德国以外，内格特的方案主要在荷兰和瑞士为人知晓和接受（Coenen 1991）。

70 年代，由于左翼内的党派斗争，工会内的实例学习的观点受到了限制。这一概念成为工会左派多年的“方向争论”（Richtungsstreit）的对象，其间被支持者和反对者当作了权力政治的工具。双方在回答什么是“正确的”工人教育时，未免相互地排斥。德国共产党（DKP）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MSF）抵制实例学习计划并评价认为，它包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虚无”（Werner 1975，第 43 页）。在追随这一概念的教育实践者的角度，部分实例学习的表述成为某种空洞的套话，其中，内格特的工会工人教育的标准淡化了。

参考文献：

U. Achten, *Gemeinsam lernen, solidarisch handeln*. Köln-Frankfurt/M 1976; *Arbeiterbildung.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 in Theorie, Kritik und Praxis—Lernen für Selbstbestimmung*, hgg. v. A. Brock, H. D. Müller u. O. Negt, Reinbek 1978; J. Beerhorst, *Modernismus oder Emanzipation. Krisendeutungen in der*

gewerkschaftlichen Bildungsarbeit, Frankfurt/M 1991; A. Brock, *Arbeiterbildung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s Kapitalismus*, Bremen ²1980; H. Coenen, »Gewerkschaftliche Bildungsarbeit und die Konzeption ›Exemplarisches Lernen und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in den Niederlanden«, in: *Bildung—Wissen—Praxis. Beiträge zur Arbeiterbildung als politische Bildung*, Köln 1991, 142–52; H. Conert, »Probleme und Grenzen der Verwirklichung der Negtschen Konzeption von Arbeiterbildung im gewerkschaftlichen Bereich«, in: *Lernen und Verändern*, 81–104; *Geschäftsbericht 1971 bis 1973 des Vorstands der IG Metall*, Frankfurt/M o. J. (1974); *Handbuch für Vertrauensleute*, hgg. v. Hauptvorstand der Gewerkschaft ÖTV, Stuttgart 1978; W. F.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Berlin/W ³1985; F. Heidenreich, *Arbeiterkulturbewegung und Sozialdemokratie in Sachsen vor 1933*, Weimar-Köln-Wien 1995; *Lernen und Verändern. Zur soziologischen Phan tasie und exemplarischem Lernen in der Arbeiterbildung*, hgg. v. A. Brock, W. Hindrichs, H. D. Müller u. O. Negt, Marburg ²1988; O. Negt, *Soziologische Phantasie und exemplarisches Lernen. Zur Theorie der Arbeiterbildung*, Frankfurt/M 1968; ders., *Keine Demokratie ohne Sozialismus. Über den Zusammenhang von Politik, Geschichte und Moral*, Frankfurt/M 1976; ders., »Marxismus und Arbeiterbildung. Kritsche Anmerkungen zu meinen Kritikern«, in: *Lernen und verändern*, 36–80; J. Rohlfes, »Zur Frage des exemplarischen Lernens im Geschichtsunterricht«, in: *Das Exemplarische Prinzip*, hgg. v. B. Gerner, Darmstadt 1963, 231–47; *Sächsische Gewerkschaftszeitung (SGZ)*, 3. Jg., 1927, Nr. 26; M. Wagenschein, »Zum Begriff des exemplarischen Lernens«, in: *Z f Pädagogik*, Nr. 3, 1956; H. Werner, »Das Prinzip des exemplarischen Lernens bei Oskar Negt oder die Folgen einer Theorie«, in: *Demokratische Erziehung*, Nr. 7, 1975, 41–50.

弗兰克·海登赖希
（Frank Heidenreich） 撰
焦燕屏 译，蔡廷建 校

参见：
Alltagsverstand,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Arbeiterkulturbewegung, Bewusstsein, Bewusstheit, Bildung, Emanzipation, Entfernung, Erfahrung, Erziehung, falsches Bewusstsein, Faschismus, Fordismus, Gewerkschaften, Kalter Krieg, Lernen, Neue Linke, Pädagogik, Persönlichkeits-

1105

theorie, Phantasie, proletarisch-sozialistische Arbeiterbildung, Psychologie, Schulung, subjektiver Faktor, Wissen

存在（Existenz）

A: wuğūd.

E: existence.

F: existence.

R: suščestvovanie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S: existencia.

来自拉丁语的动词“存在”（existere），“在哲学语言中经常被‘esse’所替代，特别是在其分词形式中”，它是公元4世纪时，人们对希腊语ὕπαρξις（ὑπάρχειν，德语的“是”[sein]、“被给予的存在”[gegebensein]、“定在”或“此在”[dasein]）这一概念的翻译（Hadot 1972，第854页）。“存在”这个表达在哲学和日常语言中都很常见，与之相关的动词“existieren”表示的“实际上只是定在（此在）（Dasein）”（Richter 1961，第139页），“由于它强调的是明显的和可感知的存在，因此是实际的存在”（Williams 1976，第106页）。即便如此，它也被赋予着不同的含义：从事物、状态、关系或人的此在（Dasein）到“人们一般意义上说的存在，比如，他有一份工作来养活他，简单说就是，他可以生存”（Brecht，GA 21，第409页；GW 20，第134页）。例如，卢卡奇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对国际力量平衡的影响”时，他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动词的（1963，第697页）；第二种意义则指，个人或家庭（私人）生活进行再生产的经济基础（参见这些用法，例如：“建立存在”[sich eine Existenz aufbauen]、“存在的基础”[Existenz-Grundlage]、“存在基础”[Existenz-Gründung]等）。恩格斯这样期待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运用”，以至于可以这么说：“生存斗争停 1106
止了。”（*AD*，MEW，第263—264页）虽然法国大革命已经宣告了“生存权”，但社会主义的“未来国家”还应该确保“生存安全”（Kautsky 1892，第165页）。与布洛赫所推崇的“事实更糟”（desto schlimmer für die Tatsachen）的表述不同，人们对现实存在的诉求可以用来反对那些没有发挥作用的、单纯的可能性：因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句套话暗示符合马克思标准的社会主义不存在（Nicht-Existenz），从而将这种社会主义的观念贬为空想。

从艾斯勒的哲学词典里可以发现，存在概念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未深入到专业哲学的语言和问题之中：存在没有自己的词条，只有对“是（Sein）、本质（Wesen）”的解释。诸如存在哲学之类的复合词还未出现。

1. 在唯心主义的哲学语言中，存在被视为“观念”（Idee）、“本质”（Wesen）或“概念”（Begriff）的互补概念，与普遍实在论和唯名论中争论的个体与一般的关系具有可比性。对于所有从神学层面思考定在（Dasein）的学派，即要么把存在视为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要么试图在神学结构中理性地解释存在的思想，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给定的“个体事物”如何与它们的普遍存在观念相关联？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来说，出现了关于事实定在（faktische Dasein）是否从属于普遍本质的规定的诘问。

1.1 如果存在是构成事物“完满”（perfectio）的一个要素，那么它也就属于（事物的）本质。这个经院哲学的论据（参见Anselm von Canterbury, Proslogion, 第2.5节）仍然被笛卡尔作为上帝存在的证据：因为存在是一种完满（existentiam esse perfectem），并且因为上帝是绝对完满的存在，所以上帝不可能不存在（*Meditation*, V；参见Prinzipien, I）。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实体的永恒源于它的本质必然包含存在这一事实（*Eth* I, Def. VIII）。

1.2 康德的批判性转向终结了经院哲学的存在问题，其论据是人们不可能从“概念”中“找出”它的“存在”，例如，不可能从100塔勒（18世纪还通用的德国银币。——译者）的概念中“找出”它的“存在”（参见Löwith 1958，第131页）。同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II，Das öffentliche Recht）中，从获得物质存在的角度观察阶级差异，存在的概念由此获得了哲学尊严。康德的公民或市民概念（Staatsbürger- oder Cives-Begriff）设定了以下准入标准：（1）自由；（2）平等；（3）独立。最后一项是指：“一个人的生存和维持不是基于人民中另一个人的任意，而是基于他们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力量。”雇佣工人被限于仅仅享有同胞的地位，因此被排除在投票权之外。但不只是他们，“所有不是按照自己的事业而是根据别人的支配（国家的支配除外）而被需要的个人，他们的存在（饮食和安全）都要维持”。对于每个基于财产关系和统治关系而依赖于他人的个体来说，“他的存在就像是内在固有的”（好比某人内在的器官组织）。康德举出的例子有：“商人或者工匠的学徒；服务人员（不是为国家服务），未成年人（自 1107

然法或市民法意义上的)；所有女人。"(§ 46)

1.3 黑格尔想用口语的多义性消除康德思想中概念与存在的分离。与他之后的谢林不同，海德格尔则追随他的脚步(参见 Löwith 1958，第 133 页)——他从 ek-sistere(存在)的字面意义上着手，把前缀 ex- 翻译成"从……出来"(heraus)或者"来到面前"(hervor)，即潜在的事物，概念上的必然物势必要显现出来，"事物本身，但被抛入存在的外部性"，"事物存在的过程"(*Logik*，II，第 97 页)。"事物在它存在之前"(1)作为本质，(2)"作为定在或者被规定"，"当一个事物的所有条件现成具备时，它就进入实存"(第 99 页)。当事物的"根据"和它的"条件"统一时，它就获得了"外在的直接性和存在的要素"："这种通过根据和条件中介出来，并通过扬弃中介性、自我一致的直接性就是实存。"(第 100 页)实存就像"现象"一样被规定成可能性和现实性、必要性和事实性的结合。"本质必须显现。"(*Enz*，§131)显现在此表示"自我显现，自我公开化，展示"(Marcuse 1932，第 91 页；参见 das *Kapitel Sein als Existenz*，第 90 页及以下)。

然而，黑格尔对"本质是存在的理由"(*Enz*，II.A)的解释并没有多少神学色彩：实存的事物由此而存在——"在自身含有它同其他存在事物的相对性以及多重关系"，并"在自身作为根据被反映出来"(§ 124)。"本质因此不是在现象的背后或彼岸，而是：本质就是要 1108
存在的，实存就是显象。"(§131)

对于黑格尔来说，自我意识也具有某种争取的结构，这种结构通过中介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他谈道："我们的意识通过它获得存在的'中介'。"(Habermas 1968，第 23 页)

1.4 费尔巴哈和克尔凯郭尔在存在问题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反对黑格尔的普遍性理论。费尔巴哈强调"现实性的存在"而不是"纸面上的存在"(*Wesen*，第 17 页)。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AS I，第 89 页)中解释道："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费尔巴哈注解道："自然是和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和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同上书，第 96 页)马克思基于这一论断对他的第六篇论文进行了反驳。费尔巴哈看到了被抽象思辨所否定的具体存在："在把虚无当作实有，谎言当作真理的地方，当然一定要将实有当作虚无，真理当作谎言。"(同上)

克尔凯郭尔同样批评"抽象思维"，不过他并不反对感性直觉，他认为，"具体的思维……，其中有一个思考者和被思考的某物：存在赋予了在其中存在的

思考者以思想、时间和空间”（Samlede Vaerkerm VII，第287页），其中，只有当人认识到“自我”不是自己“设定”的，自我不是只能在“设定它的权力”中建立时，人才成为他自己（Krankheit，第13页）。因为这种力量，（上帝）“使人一方面成为一种关系”（一种行为本质，包括面对自己时），另一方面也“允许这种关系从他的手中溜走”（第16页），“自我决定了存在的个体性——无论赞成或反对基督”（Löwith 1958，第126页）——克尔凯郭尔想要从这一支点撬动黑格尔的普遍性，这是从“孤立的私人存在”立场反对“在历史世界的普遍性中把个人存在虚无化”（第128页）。虽然克尔凯郭尔“名义上”将存在用来对抗本质，就像“神学对抗形而上学的武器”一样，但他“根据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教条，已经将个体视为了有意义的、直接的存在”（Adorno 1966，第128—129页）。

2. 对于马克思来说，普遍性只“存在”于个体及其关联中，这些关系将自己铭刻在历史发展的结构或“关系”中，并从中获得它们的规定形式。

1109

2.1 在论文附录的注释中，马克思将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分析为一个真实想象（Real-Imaginär）的例子：如果我真实地想象某事，它就会影响到我，“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神**，包括异教徒和基督徒，都有一个真实的存在”（MEGA I.1，第90页）。这种意义上的“存在”包含了集体想象。“康德的批评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马克思解释道，康德虽然区分了100个真实存在的塔勒和100个想象中的塔勒（MEGA I.1，第90页），但想象中的真实存在使得二者不再有区别。“（商业）信用展示了‘虚拟’货币的真实性。比如信用是在想象中欠的债务，这种债务**就像全部人性是欠上帝的债务一样**。”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谈到了后来被称为“虚拟资本”的东西。“一个真正的塔勒是否真的存在于人们想象之外的某个地方，还是它其实只存在于人类的一般或相当普遍的想象中？”我们只需将纸币带到一个不知道它的国家，就会明白这一点。这就像给希腊人带来了异教神（Wendengott）一样，“因为这个神对希腊人来说并不存在。**来自陌生地方的神，对于一个对神完全理性的国家，在此就停止了神的存在**”（同上）。“定在”（Dasein）和“是”（Sein）在语境中与实存（Existenz）起到同义词的作用，在费希特主义（Fichteanisch）的意义上，“何种存在是通过想象而直接存在的？自我意识”（第91页）。

2.2 在1843年的黑格尔批判中，马克思仿佛发动了一场反对黑格尔国家哲

学实质的存在概念的起义："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就是说，它们才是这种理念的有限性领域。它们的存在据说并不依赖它们自己的精神，而是依赖另外的精神……它们存在的目的并不是这种存在的本身"等等（*KHS*，MEW 1，第207页）。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是"神秘的"或者是"虚幻的抽象"，即"认为国家意识包含在
1110 和它不相适合的官僚政治形式中，即知识等级制的形式中，并且不加批判地把这种不合适的存在当作真正的、十全十美的存在"（第264页）。"这种虚幻的抽象"把实际存在的民主政治机制、"公众意识"或者"国家精神的现实存在"降级为"'多数人的观点和思想'的简单混合"（同上）。马克思这样译读和批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话：等级要素的作用就是要使普遍事务不仅自在地而且自为地，他通过它来获得存在。马克思说："普遍事务的'形式的'存在或'经验的'存在是和它的实体性的存在脱离的。"（MEW 1，第264页）相应地，马克思考虑革命主体的身份和角色：他们是存在者反抗制度结构压制和异化的轮流承担者。"解放者的角色在充满戏剧性的运动中顺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第390页）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哲学的文法中主张权利的存在一样，他反对将存在贬低为纯粹物质的普遍性——国家被哲学化地理解为物质，而不管它实际存在的事实——在性别关系方面也是如此，男人和女人不是对立的。"真正的、现实的极端是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在前一种场合，差别是存在上的差别，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各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两种本质的差别。"（第293页）

2.3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作为"存在和本质、物化和自我证明、个体和种群之间争论的真正解决方案"（MEW 1，第536页）。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批评这种说法是"抽象和浪漫化的人类学"（1971，第130页）；克里斯托夫·图尔克（Christoph Türcke）则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严格反思的结果：……可以被实现的理性"（1979，第33页）。

2.4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继续了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有所铺垫的观点，即将活

动、实践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费尔巴哈将人作为其宗教批判的焦点，社会条件的总体被视为人的历史领域。

2.5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同的、“社会活动……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MEW 3，第 29 页），属于这种历史存在的，除了“物质生活自身的生产”，还有（和这同等原始的）语言作为现实性的媒介，没有语言意识就是“不现实”：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MEW3，第 30 页）。语言是区分人类现实性的条件：和动物那里不同，我和他人的关系是为**我而存在**（*für mich als Verhältnis*）的（同上）。就像存在的互动含义是通过物质性的存在而中介出来的，这在具体环境中会更加复杂，如果人们认为，在资本关系的前提下，“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第 66 页）。

2.6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最终把社会经济的实践形式和通过它设定的自我分析的思维形式作为“存在形式，存在的规定性经常只是特定社会的个别方面”（*Einl*，57，MEW 13，第 637 页）。

社会辩证法取代民主存在主义的起义对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进行了反驳，但同时它也受到黑格尔的批判性启发。事实上，是社会环境决定了那些存在于其中的人。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联系，除了创造出人们通常所说的商品以外，还铸造了另一种存在，那就是货币（在历史上首先是黄金）。这种双重存在促使马克思这样思考：“两种不同的存在必然继续产生差异，差异进而产生对立和矛盾。”（MEGA II.1.1，第 81 页）年轻的马克思曾经抨击黑格尔的法哲学将具体存在受制于物质的普遍性，而当他研究资本主义时，他发现“劳动的普遍性形……如何通过它作为劳动整体性环节的现实性，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而证明自身（MEGA II.2，第 53 页；Gr，第 908 页）。

2.7 在 1857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方法论反思中，一方面马克思试图通过明确区分思想（抽象）规定和现实存在规定来抵消柏拉图主义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他又将二者联系起来。诸如交换价值之类的抽象概念（作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永远不会存在，除非（抽象［片面的］）已经给定的、具体的、活生生的整体的关系”（MEGA II.1，第 36 页）。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简单的范畴在具体者之前是否也没有独立的历史或自然的存在”（第 37 页）。例如，货币“在历史上早于资本存在”（第

38 页）。另外，当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将占有作为起点时，马克思反对道："在非常具体的家庭关系、统治关系和奴隶制关系之前，不存在任何所有权。"（第 37 页）

2.8 在马克思最后的方法论反思《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他再次强化了他对黑格尔逻辑主义的批判，而且还将这种批判建立在语言分析基础上。这种批判特别针对的是对他的代表作的阐释。"没有矛盾的双重性，交换价值就不会存在"，他在同黑格尔主义辩证法关于交换价值的理解冲突中，看到了矛盾的双重统一（MEW 19，第 358 页；参见第 375 页）。复数的"商品"（"商品的普遍共同性，是体现在交易关系或者商品的交换价值中的，也就是它们的价值。" MEGA II.6，第 72 页），这个由于印刷错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2 版中消失的词（在 MEW 23，第 53 页中也是如此，参见 Haug 1994，第 223 页），强调了反对思辨概念的存在环节。

3. 在 20 世纪，对于存在先于本质的先验预设表示不满的主要是存在主义。格奥尔格·卢卡奇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反对这一趋势，他认为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认识论把戏"（W9，第 432 页），作为一种思潮，"其共同目标就是颠覆理性"（1951，第 47 页）。他用萨特的观点证明了这一点："存在是没有意义的、没有原因的、没有必要的；根据这个定义，存在是'最初的偶然'。"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如何反对存在的原初偶然性呢？除了否定的回答，卢卡奇就没有对这个从神学继承而来的存在问题进行批判的必要吗？尤其是当海德格尔询问存在的意义时。卢卡奇对存在主义的批评，给被他谴责为非理性主义的哲学，留下了一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域。它们表现为，存在的本体论优先于人类的现实劳动和历史本质。这种无意识的放弃，是基于一种黑格尔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1113
普遍有效的理性。即便如此，卢卡奇的批判也为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重新表述的存在主义做出了贡献。

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贝尔托·布莱希特发展出了和卢卡奇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历史进程的动荡中，他研究了和群体处于紧张关系的个体，群体仿佛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存在，而与个体是不同的（GA22.1，第 396 页）。"在所有存在的问题中，除了最原始的问题之外，我们必须满足概率计算。"（第 509 页；参见相关 Haug 1996，第 54 页及以下）布莱希特以"在灾难之后写成"的历史为例，反思了"知识分子所处的基本境况，他们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历史的主

体”。他谈到，这个状况让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他们在犯罪小说中能够充满享受地行动：存在依赖于未知因素。‘肯定发生了某事’，‘某事正在酝酿’，‘某种情况出现了’，他们感受到了这些，精神进入了巡逻”（第510页）。

大约在同一时间，马克斯·霍克海默批评了流行的（传统的）理论见解，因为它没有表明“理论在人类存在中意味着什么，而只是表明，在一个被分离出来的领域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意味着什么”（1937，第146页）。这描述了学术工作在分工和受支配的社会结构中的图景。“在现实中，学术工作是劳动和历史活动中一个不可分割的要素，被放在了它的位置上。”（第147页）学术正是在这种伪自治中服从于他律的目标和应用。个人在社会中的定位揭示了某种相关的隐蔽他律：虽然对象、状态和环境是“由人类活动形成的”，但“个人……在知觉中了解到自己是被接受的和被动的”；反过来，社会却是“一个无意识的、在某种程度上不真实的，但却活跃的主体”（第149页）。我们必须考虑这种“人与社会存在的差异”；它源于社会的分裂，“要么基于直接的压迫，要么是对立力量的盲目合力”（第149页）。这也反过来解释了所谓普遍有效的理性的“存在方式”，就好像比如在康德那里所展现出来的那样，因为这等同于“社会中人们的共同作用”（第153页）。正如这种作用不断变化一样，批判理论的结构也应该变化，然而它的转变必然和以前孤立的概念和判断形成矛盾。这也是必然的状况，因为它“构建了整体的展开图景，其中也包含了在历史中的存在判断”（第187页），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单一展开的存在判断”（第175页）。和存在主义的专业哲学不同，它捍卫“和本质的相互关系”（第194页）。下一代的阿多诺触及了对存在主义专业哲学批评的关键点：“存在主义是一个环节，而不是总体，为了反对总体，人们构想出了存在主义哲学，它从总体中裂变出来，并把总体自身无法兑现的自负扯下，只要这种自负在哲学上还自我吹嘘。”（1966，第128页）

4. **存在条件**。1963年，路易·阿尔都塞将复杂结构整体（“具有支配性的结构”）中的要素、实例和矛盾之间的联系视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一观点与黑格尔的整体性观念（尤其是卢卡奇的观念）相悖（首先是卢卡奇，参见*PM*，第206—211页；*FM*，第146—155页，带有翻译错误）。马克思对各种条件相互关系的分析，构成了他的出发点，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作为“总体的部分和在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区别”（*Einl* 57，MEW 13，

1114

第630页）。在这种情况下，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的生产（活动），但它同样受到其他“环节”的制约，这些“环节”既是要素的生存条件，也是环节的生存条件。这种思考的关键概念是“存在条件”（condition d'existence）。对功能语境的要素间“相互的存在条件”（conditionnement d'existence）的洞察，使阿尔都塞打破了将上层建筑视为“结构的纯粹现象”的想法，并构建了过度决定（Überdeterminierung）的概念。他利用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将它们视为彼此存在的条件。虽然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是偶然性，并不能决定整体的精神本质，但阿尔都塞希望以非经验的方式考虑存在条件的现实性。“比如和自然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
1115 来说，是存在条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首先是主要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个术语；这和它的存在条件一样，在总体的次要矛盾和关系中被反映出来；存在条件也是事实上的绝对、复杂总体（das komplexe Ganze），是已经给定的，并反映在自己的结构中——这对黑格尔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然而如果条件就是复杂总体的现实存在，那么条件也是总体自己的矛盾本身，每人在自身从矛盾中反映这种有机关系，他在复杂总体支配的结构下，同他人一起维持这种关系。”

5. 随着虚拟世界和模拟主义（Simulationismus）的侵入（当媒介能指代自身时，就出现了模拟主义），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在各种表征（Repräsentationen）之外被重新提出。克尔凯郭尔的话“模拟是绝望”（*Krankheit*，第23页），在这种背景下可能有了新的含义。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R. Descartes,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R. Eisler, *Hand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erlin ²1922; J. Habermas, »Arbeit und Interaktion. Bemerkungen zu Hegels Jenenser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in:der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M 1968, 9–47; P. Hadot, »Existenz,existentia«, HWPh 2, 192, 854ff.; W. F. Haug,, »Der verlorene Buchstabe. Eine Forschungsnotiz zum ›Kapital‹ und seiner Rezeption«, 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 1994, 222–26; ders., *Philosophieren mit Brecht und Gramsci*, Berlin-Hamburg 1996; M.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1937), und »Nachtrag« (1937), in: *ZfS*, 6.Jg., H.2, 245ff, u. H.3, 625ff, z. n. ders., Kritische Theorie, hgg. v.

A. Schmidt, Bd. II, Frankfurt/M 1968, 137–91 u. 192–200; K. 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n seinem grundsätzlichen Theil*, Stuttgart [3]1899 (1892); S. Kierkegaard, *Die Krankheit zum Tode* (1849), hgg. v. L. Richter, Frankfurt/M 1984; K. Löwith, *Von Hegel zu Niet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19. Jahrhunderts. Marx und Kierkegaard* (1939), Stuttgart [4]1959; G. Lukács, » Zur Debatte zwischen China und der Sowjetunion. Theoretisch-politische Bemerkungen« (1963), in: *Schriften zur Ideolog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M 1932; L. Richter, *Glossar zu S. Kierkegaard*, Werke II, Reinbek 1961, 135–45;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bei Karl Marx* (1962), Frankfurt/M [2]1971; A. Schmidt, *X*, 1971; C. Türcke, *Zum ideologiekritischen Potential der Theologie. Konsequenzen einer materialistischen Paulus-Interpretation*, Lünberg [3]1990 (Köln 1979);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ontana 1976.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李牧今 译，胡晓琛 校

1116 参见：
Bestimmung, Dialektik, Emanzipation, Erscheinung, Etwas, Ewigkeit, Existenzialismus, Feuerbach-Thesen, fiktives Kapital, Form, Ganzes, Geist, Gott, Idealismus, Innenwelt/Außenwelt, Oberfläche/Tiefe, Schein, Sprache, Tod, Überdeterminierung, Wesen

存在主义（Existenzialismus）

A: wuǧūdīya.
E: existentialism.
F: existentialisme.
R: ėkzistencializm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изм).
S: existencialismo.

存在主义起源于马丁·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基础本体论”转向，这个转向是在他20世纪20年代同他的老师艾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产生思想分歧时提出的，并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破土而出。在这些先驱者中，还应该特别提到克尔凯郭尔（1813—1855），“他的多种形式的作品都指向一个问题：对于一个人而言，单一的个体存在意味着什么？”（Clair 1997，第5页）受到海德格尔式基础本体论影响的存在主义，又“因为政治承诺而（产生）分裂”（Adorno 1966，第55页）。存在主义这个术语首先受到了新康德主

义的影响，并用来描述（比如尼采支持的）“逻辑对存在事物的依赖性”（Moog 1919，引言根据 Hartmann 1972），卡尔·雅思贝尔斯在 1935 年把这个术语“作为‘主义’，嘲讽地将其打上了和**存在哲学**（*Existenzphilosophie*）相区分的、某种派生的标签”（Hartmann 1972，第 850 页）。在邻近语言的翻译中，真的东西和其派生物之间的区别消失了。雷蒙德·威廉斯说：“**存在哲学**，我们将其翻译成**存在主义**（*Existenialism*）。”（1976，第 106—107 页）这一译法并没有被翻译回德语，而是被作为新造词“存在主义”引入德语中，在这里，有许多完全不同的因素在共同起作用：术语上脱离向纳粹妥协的**存在哲学**的需要；摆脱“左派”法国存在主义相反立场的需要；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分道扬镳；不专业的翻译。

当海德格尔把他的存在哲学理解成纳粹的思想（参见 Leaman 1993，Losurdo 1995）时，法国的存在主义作为抵抗运动（Résistance）的哲学逐渐成形，按照君特·安德斯的说法，“一向孤立的哲学在这时变成了一种大众时尚的悖论局面，就变得可以理解了”（1946，第 49 页）。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关系在
1117 法国不仅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而且还具有争论的特征；而在苏维埃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域内，它的特征更多地被判定为“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存在主义者”（Denisowa 1956，第 362 页），这当然是以对知识分子有很大吸引力为背景的。

1. 然而，“明确和连贯的思想运动”（Archard 1980，第 IX 页）并未被掩盖在存在主义这一“不精确的和并非本意的名称”（Schoch 1980，第 53 页）背后——正如萨特在 1945 年时着重指出的——所有能被称为存在主义（或者存在哲学）的路向，其基本思想是，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 1958，第 17 页）。对于萨特而言，这意味着“必须从主体性出发”（同上）。

1.1 这似乎与所有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相悖。尽管如此，此时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事实上还是很接近的。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客观主义相反，马克思要求把现实“……**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ThF* 1）。这是针对费尔巴哈而说的，不过后者已为此做了准备。费尔巴哈的“身体性的存在主义”（Schmidt 1973b，第 121 页）体现在这句信条中：“在存在中思考，在世界中作为它的一员。”（Grundsätze，§52[B：§51]，GW 9，第 334 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不是反对这种“在世之在”，

而是反对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设想成“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按照动物“种群”的方式)；相反地，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媒介(*ThF* 6)。这“与存在主义的主要观点接上了：人的存在没有本质，而是被主动揭示的”(Sève 1980，第 152 页)：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DI*，MEW 3，第 39 页)。吕西安·塞夫因此认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从一开始就揭露了存在主义的幻觉。如果人们局限于否定人的本质……，这就意味着，赋予自在的个体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和想象不到的自由”(1980，第 152 页)，由于在这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具体的历史物质性被屏蔽了，所以塞夫在先前的本质否定性的命题中只看到“对真实历史规定的无意识的哲学伪装”(同上)。这就使他错过了那个命题的真理要素：人类儿童虽然出生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但人的本质并不是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他们首先要生存下来，然后再通过实践掌握文化，进而成人。

这里触及了共同性的边界。萨特说人“在世界中出现并据此定义自身”(surgit dans le monde，et qu'il se définit après)(第 21 页)，这句话顶多是针对个人有意义的，而且也有其局限性：每个新生儿不仅处于他所诞生的具体关系中，而且他也被“定义”所期待。萨特源于现象学的世界概念，只有在作为社会人类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世界的笼统概念时才有意义。否则的话，人类特有的“本质”和“种群”的区分也不再可能。如果不被抚养和带入文化中，新生儿就难以生存下来。尽管如此，“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如下意义上也有适合于人之共同性的要素，即历史素材具有“开放的边缘”(布洛赫语)，也就是说，以实践为中介的人类现实性永远不会封闭。

1.2 左翼的海德格尔学派，例如君特·安德斯和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属于行动主义的存在主义先驱。后者在 1928 年称赞海德格尔揭示了“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具体的人”是“每一种哲学思考的开端”(第 60 页)。这就要求“在整个历史具体性中回溯到‘当下’的决定性事实”(同上)，在这种回溯中，需要“提出和回答的最后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具体的存在？具体的本真存在是什么样的，又是何以可能的？这些针对‘一般此在’(Dasein überhaupt)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空洞的，也就是不做承诺、不负责任的，这些特征是它们作为存在

主义问题必然会具有的”（第61页）。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这“只能作为带来具体改变的行为而发生”，而且“只能通过彻底颠覆事实上现有的存在来开辟道路”（同上）。在海德格尔那里，年轻的马尔库塞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历史性的物质构成”问题的线索（第62页）。
1119 马尔库塞把此在理解成“历史的在世之在”（geschichtliches In-der-Welt-Sein），这个提法同时包括了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存在（Sein）”（第78页）。

在《对后验的一个解释》（*Une interpretation de l'a posteriori*，1934—1935）中，安德斯从现象学角度论证了，每个个体都是在事后才进入世界并成为个体的人。当一个人出生时，他最初是被世界排除在外的：“他必须赶上已经在他面前的世界。”（第65页）特别是安德斯的《自由病理学》（*Pathologie de la Liberte*，1936—1937）“启发了萨特的存在主义”（Brumlik 1988，第115页）。安德斯后来也从“单个存在的本体论事实”（*Antiquiertheit* 2，第219页）出发。但对他来说，这与如下“唯物主义的”事实是同义的：“去冒险、去需要和被需要、去猎取和被猎取、去吃和被吃，这属于鲜活生命的此在。”（第342页）米查·布鲁姆利克（Micha Brumilk）因此（误导性地）把安德斯的哲学称为“自然主义化了的存在本体论”（1988，第113页）。这样一种本体论因如下契机变成了存在主义：“一个再也没有任何道德基础支撑的主体试图为他们的生活寻找意义。”（第144页）

2. 法国存在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是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二战”结束后，后者立即推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计划。这种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相连接，并且是针对斯大林主义和迅速开始的冷战引起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变形而恢复起来的。当梅洛-庞蒂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而失望地放弃这项计划时，萨特继续引领这项计划（参见Schoch 1980；Archard 1980）。

2.1 萨特的思想发展，在“存在主义”这个不变的标签下，有一个极端的转折。他自己谈到了在他生活中“一个明显的断裂”，“这导致了，两个几乎完全分开的阶段，以至于我现在……不再能重新很好地认识前一个阶段的自己”（1976，第33页）。布鲁诺·肖赫（Bruno Schoch）把这个断裂和法国政治状况的大转折关联起来，这个大转折使得“曾在第三共和国中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激进政党，1945年之后不可能“在政治上复活了”（1980，第82页）。

萨特1943年在《存在与虚无》中刻画的“现象学本体论”，深受自在存

在（An-sich-Sein）和自为存在（Für-sich-Sein）的极端二元论的影响，这种二元论
1120 认为一切人类努力注定是会失败的，为此，沟通和协调的媒介开启了一种没有出路的、“徒劳的机制”（Haug 1991，第107—130页）。就像赫伯特·马尔库塞看到的，在向本体论原则的还原中，萨特将“构成人们存在的现实具体性的特殊差别，降级为整个人类本质的共同表现，这其实违背了他自己的命题：‘存在创造本质。’举出的整个例子表明，在具体情况无法弥合本体论和存在之间的鸿沟”（1950，第68页），这个鸿沟“由于‘是’（ist）的模棱两可的使用而被遮蔽了”，它“不加选择地且无中介地作为定义人类本质的系词”起作用，“就如它在关于人们的实际情况的说法中”所起的作用那样（第68—69页）。阿多诺在他的《认识论元批判：胡塞尔与现象学的二律背反研究》（*Studien über Husserl*）中使用了同样的论点：“概念的模棱两可的使用取代了概念的内在运动”，一会儿具有抽象的、最普遍的、中介的意义，一会儿又“如往常一样，给存在者强加上直观要素，并对其进行范畴化。整个存在哲学都依赖这种混合”（1956，第217页）。

在弗朗西斯·让森（Francis Jeanson）看来，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让人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不幸的尝试，一个在其基本目标中总是失望的顽固之物，一种徒劳的激情”（»une passion inutile«；1947，第178页）。鉴于这种世界观以否定的形式附着在旧的形而上学和神学中，萨特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可被理解为**荒谬的构建**（Haug 1966）。尼采所称的虚无主义似乎在这里得到了实现：无休止地陷入自己偶然性的死胡同中（Anders，*Pathologie*，第40页）。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反对将“不幸”做类似的哲学化（处理），这“根本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没有理性的社会组织的作品”（1937，第92页）。与之相反，对于汉斯·海茵茨·霍尔茨（Hans Heinz Holz）来说，1951年对于失败的认可（»échec«），揭示了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悲剧的世界图景……，没有充满英雄主义的激昂，这种激昂常常掩盖和伪造着这种悲剧严肃的、真实的特质”。这要求的是“对形而上学的和伦理学的二律背反的冷静肯定，对无法解决的困境保持克制”（第81页）。后来霍尔茨把法国存在主义解释为“小资产阶级知 1121
识分子”的“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1972，第31—32页）。

在第二阶段，当看到战胜纳粹的反法西斯同盟成为历史，曾经的反抗运动盟友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爆发时，萨特在同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的争论中，将自己的思想世界转向了行动哲学的方向，其依然包括对自由实体化，作为自由之

诡计的畏惧，以及决定（“选择”）。

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转折的一个证据是他和让森针对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争论（*Temps modernes*，8.Jg. 1952/53，Nr.82）。萨特批评加缪的历史图景是一瞬间定格的悲剧（»tragédie instantanée«；第346页），其中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发展。“一个孩子死了，您控诉世界的荒谬和对此装聋作哑、视而不见的上帝，您创造上帝就是为了朝他脸上吐口水；然而孩子的父亲，当他失业或者有（机动的）工作时，人们控诉道：他非常明白，我们在帕西（Passy）的荒谬状况与在比扬古（Billancourt）的不同。”（第349页）萨特批评加缪，在实际的斗争中，看到的仅仅是“两个同等堕落的怪物之间的对决”（»le duel imbécile de deux monstres également abjectes«；第345页）。这个“荒谬的人”将会在历史的染缸中保持纯粹。“我不怀疑，对于那些从地狱中观看他的人来说，他具有一张荒谬而可怕的面孔：因为他们不再与他们所创造的这个人有任何共同之处。”（第351页）不经意间，荒诞主义者为那些处于“意识形态防御”状态的社会力量提供了“阻碍其他社会力量的论据”（第352页）。

晚期的萨特因此要求，在从时代角度来说（和笛卡尔/洛克、康德/黑格尔的伟大构造一样），在不可超越的（»indépassable«）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暂时继续保持存在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Crd*，1960，第17—18页，第107页）。如剥削、异化、拜物教、物化等概念“正是那些最直接涉及存在主义结构的概念”（第107页）。马克思主义“几乎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无法被超越，因为产生它的环境尚未被超越”（第29页）。

2.2 由于《存在与虚无》是二元对立的，莫里斯·梅洛-庞蒂很早就小心 1122
地与之保持着距离（对立命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和别人对我自己的看法”和对立命题“自为和自在”常常可相互替代，而不是被描述为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之间活的、可以相互交流的连接”：1945，第345页）。两年后，他把失败的实体化描述为“劣质的存在主义”，“它仅仅描述了理性和经验的矛盾之间的冲突”，“然而，这只是一种对古典怀疑论的重新采纳和一个不完整的描述（une description incomplète）”（1947，第205页）。相反地，梅洛-庞蒂将他者的经验称为另一个自我。“人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或者未完成的系统，同样是这种使它面临不和谐之危险的偶然性将它从无序的厄运中夺走，并禁止对这种厄运感到绝望。”（II，第99页）

“人不是无缘无故的‘存在主义者’，在莫斯科审判的完整速记报告中

与在海德格尔全集中一样，隐藏着同样多的存在主义（悖论、分裂、畏惧和决断的意义上的）。”（II，第98页）“再清楚不过的是，无神论存在主义本质上把自己视为政治哲学，这在专业哲学层面上是没有出路的。”（Schoch 1980，第53页）

由于1946年萨特开始转向、梅洛-庞蒂起草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案，他们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未能达到目的，受到战后情绪的吸引，这种批判是他们向马克思主义递交的“投名状”：“马克思因经历了异化而进入了历史的本质维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优于所有其他历史学。但据我所知，胡塞尔和萨特都没有认识到历史存在的本质，所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没有进入这个维度，而只有在这个维度之内，它们才能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1948，第87页）

3.马克思主义的答复。在《这个时代的遗产》中，恩斯特·布洛赫批评了海德格尔自相矛盾的“转瞬即逝的基础本体论”（GA4，第308页）：“在这种‘主体的本体论’中，远未也从未触及如下趋势，即在绝望中建立愤怒，在愤怒中到达希望……。它缺少那种‘在存在中的自我理解’，这种理解本可以对抗盲目的生命观念、对抗人类无中介的自然状态（这恰恰来自‘内在性’[Innerlichkeit]）。”（第310页）1123
1956年，在去斯大林化的短暂时刻，布洛赫重新开始了这种批评：“雅思贝尔斯……、海德格尔……和其他所有大西洋的自由存在主义者，都如此深刻地和冷僻地在此在的中心处看到了‘此在的陌生性’（Befremdlichkeit des Daseins），以至于，首先，这种陌生性是没有什么助益的；其次，真理只能永恒处于寻找之中，因而只能是模糊的光线。”（第5页）这个批评是激进的，也因此引起关注，因为它与斯大林主义的裁决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布洛赫，甚至卢卡奇很快就因此而受到迫害。

3.1第一个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内对法国存在主义进行严厉批评的是乔治·卢卡奇，他在1946—1947年冬天说道，在概念上，存在主义哲学是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参见1951，第34、131页等），“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当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导思想潮流”（第33页）。他写了一系列反对存在主义的文章，1951年，这些文章在东德以《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us oder Marxismus*）为题出版成书。在导言中，卢卡奇宣称，目前存在主义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反革命意识形态之一”（第5页）。卢卡奇谴责“波伏娃女士和梅洛-

庞蒂先生”，断言他们“早就选择了反革命”；卢卡奇谈道，“萨特的抽象自由——最初是作为抵抗的神话而创造的——”“现在已成为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元素”（第6页）。在萨特那里，就像在尼采和斯宾格勒那里一样，存在着一个抽象的、“在僵化机械的宿命论对面的、在其绝对性上变得无意义的自由概念”（第31页）。在法西斯主义结束后，相较于各种围绕相关善后事宜的政治上具体的形态问题，对法西斯主义的否定占据优先地位，卢卡奇由此推导出了萨特自由概念的抽象性（第50页）。

在法国存在主义中，搅动当时东西方“两个阵营”意识形态秩序的，是其支持者不可否认的具有左翼性质的参与。1946年，萨特出版了他发表于1945年的演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这确立了他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声望”（Schoch 1980，第83页）。在这篇演说中，萨特开始摆脱他早期著作的荒谬主义立场，并把他的哲学转变为参与的和负有责任的哲学。卢卡奇在萨特的这一转变中看到了他对“存在主义正统”的
1124 违背，并认为这“只是一种折中的、误导的、蛊惑人心的对启蒙运动和康德哲学的道德原则的认同……，因为这种对自由概念的客观化与其所有本体论陈述完全矛盾”（第53页）。然而，卢卡奇承认，在萨特那里有“一种相对的要素真理的形式逻辑上的张力”，这就是对“个人决定与个人决心的强调，而资产阶级决定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都倾向于低估这种个人决心”（第55页）。卢卡奇批评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坦率承认的主观主义，它把主观性伪装成客观性，“在这里，纯粹的思维现象学变成了对现实的调查，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变成了本体论（存在主义）”（第31页）。“即使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也不是存在的客观方式，而是人类存在（人的意识）的显现形式。”（第39页）胡塞尔拒绝将“‘外部世界’的存在和性质问题”视为“形而上学问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他从一开始”就拒绝“将认识论作为理论、作为科学”（第133页），因此卢卡奇（对他来说，这一问题是最重要的）给出了如下奇怪的说法：“尽管胡塞尔还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我们完全可以把现象学的方法视为存在主义的成就。”（第33页）停留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的认识论态度，在处理谋划或者方案这样的“存在主义魔法词汇”（第75页）的概念时，被证明是尤其没用的。卢卡奇没注意到的是，当他指责萨特时，他把自己也限制在了康德的认识论领域。在拒绝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教条”时（第71页），他混淆了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

哲学物质概念——“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和与列宁有着原则性差别的“物质具体本性的具体认识”（第72页）。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实践哲学中对意识哲学的扬弃，看起来已经被遗忘了。最终，卢卡奇谴责萨特，因为萨特否认了“自然的历史性”。在这一点上，他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即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之作 [pièce de resistance]）的那条著名的脚注中”（Schoch 1980，第49页），攻击了黑格尔和恩格斯的历史和辩证法的自然化（参见 Lukács 1923，第17页）。在法国，亚历山大·柯耶夫先于萨特做了类似的论证，他在其颇具影
1125 响力的黑格尔讲座（1933—1939年）中将“辩证的理解”限制“在历史的现实性中，即限制在通过劳动在谋划基础上创造的现实性”（1975，第132页）。

3.2 在去斯大林化的时代中，亚当·沙夫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Marxismus und Existenzialismus*，1961）中记录了“存在主义影响的‘突然’爆发”和在波兰“暴风般的成功”：1951年时还未见踪影，到了1956—1957年，存在主义已“成为一股真实的力量，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氛围中”（1964，第11页）。不是遵循卢卡奇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仍然重申的口号，而是“针对这些世界观开展最尖锐的斗争，即使它们暂时还没有出现公开的反动趋势”，沙夫这么做是想要表明，“马克思主义必须拒绝人类问题的存在主义解决方案，而不是拒绝问题本身”（1964，第7页）。这种批评的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和革新。存在主义的成功被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过错”的买单，尤其是对那种长时间的主导性趋势：“与大众的运动和斗争紧密联系的问题”是否将个体推到幕后（第15页）。如此一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中历史性地出现了一个漏洞”，萨特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第16页）。此外，鉴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普遍的无力感和失望感。萨特在许多作品中都有所表达的“个人在对抗超级权力和非理性力量时那种徒劳无功，以及抑郁、顺从和绝望的情绪”，在沙夫看来，是“许多人都感受到的意识形态镜像”（第17页）。

作为“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发现”，沙夫高度评价“道德情境的模糊性，这个发现给绝对道德观念和与此相关的浅薄道德思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包括对政治和道德的关系领域”（第7页）。这暗示的是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模糊性的道德》（*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ité*，1947）。沙夫明确指出了这一评价中的历史—政治问题：斯大林去世后的剧变以及去斯大林化的放缓提出

了如下这些问题：个体为其行为负责任；良心与纪律之间的冲突；个体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和角色；“当不同的行为规范发生冲突时”（第 18 页），每个独立个体必须做出的决定。

1126 萨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和它的传布者的进步的社会趋势相关——在这个多重含义的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的吸引力正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场”（第 19 页）。然而，沙夫认为“所有存在主义方向的核心问题”都在于从“自治的个体”出发，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随意选择的，并且人们用这种方式创造了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反过来从社会出发，是社会创造了个体并决定了个体的行为方式”（第 21—22 页）。

3.3 在 1961 年举行的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家（R. 加洛蒂、J. P. 皮埃尔 [J. P. Pigier]）和存在主义的代表（萨特、J. 依波利特 [J. Hyppolite]）之间的公开讨论中，萨特和沙夫的立场几乎没有区别。二者都回溯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的马克思中，因为他们都在寻求在个体主观条件和客观社会条件之间的结合点。萨特的文章已经从现象学本体论转向了实践哲学。“存在主义”在此首先意味着一种革新的、（自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并未使用存在主义这个术语，只是在同 J. 依波利特的讨论文章中明确提及了。依波利特反对“某种自然历史化和历史自然化的方式”（详见 Sartre 等 1962，第 46 页）。相比之下，他认为存在主义可以追溯到“处于历史当中的确定性的源头，以便从它们开始理解思辨问题”。他这么解释萨特：自马克思以来，也许自黑格尔以来，我们有了实践形式的新起点（第 46 页）。

在回归“实际存在”（existence vécue）的过程中，依波利特总结了他与苏联哲学家互动的经历：在这里，“僵化的辩证模式和鲜活的自身经验之间的反差”让他震惊（第 49 页），这是一条“我们存在主义者想填补的鸿沟（décalage）”（第 50 页；德语版，第 61 页）。在莫斯科科学院，依波利特被允许谈论存在主义，随之而来的是反映理论（Widerspiegelungstheorie）与“存在主义”谋划之间的争论，这也显现了某种松动的迹象。在长时间争论的最后，“我的谋划思想变得有一点‘反映’，‘反映理论’变得有一点谋划”（法语是“projetant”，第 50 页；德语翻译成“Projektierend”，第 62 页）。但依波利特不能随心所欲 1127
地和学生谈论存在主义，而是必须谈论“机器”。尽管如此，听众似乎“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非常感兴趣”，因为在讨论中他们只询问了被禁止的话题（第 50 页）。

3.4 批判理论。尤尔根·哈贝马斯

(模仿阿多诺1956年的《认识论元批判》)批评了萨特"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存在主义尝试"(1963，第299页)，因为这种尝试(哈贝马斯没有看出，葛兰西也有类似尝试)"在工人参加革命政党的谋划中"(哈贝马斯译作"计划")看到了一种哲学行动，一种从变化的角度揭示世界的世界观(参见萨特：《唯物主义和革命》[*Materialismus und Revolution*]，第59—60页)。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哲学不应被理解为革命实践的序言，而就是实践本身"(1963，第299页)。这种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萨特公开表示关注的是"揭示革命态度的关键主题并将其明确化"(1965，第60页)。对革命行动中隐含内容的解释，并未成为哈贝马斯所宣称"哲学的自我奠基"的事实(1963，第299页)。哈贝马斯的如下论点似乎更有分量，即在萨特这里，关键的"不是事关某种社会的特定革命"，"而是事关在每一种特定革命中总是会重复的东西，也就是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的超验性……。革命本身，连同革命的条件，刻画出了本真存在的形式结构"(第300页)。存在本体论的形式化导致了空洞化和无果。与此相反，哈贝马斯认为，莫里斯·梅洛-庞蒂"和其他所有的(对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释者不同，在其批判思潮中，由马克思主义具体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严肃对待"，并且是"在实践导向下将马克思主义重建为一种历史哲学"(第301—302页)。但哈贝马斯也看到，梅洛-庞蒂以一种超验—本体论的自我奠基方式，"把历史的意义理解成有待形成的真理(vèritè à faire)"(第304页)。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批评了承诺的任意性和决定性，甚至批评了"政治存在主义的蠢行"，因为它吸收了与其"形式特征"(Characteristica formalis)相对应的一切(1966，第55—56页)。"存在主义将人类的不可避免的、纯粹的此在推向一种信念，个人应 1128
该选择这种信念，而又没有明确的选择理由，同时他也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第56页)阿多诺把战后的存在主义视为"无力的、虚幻的"、与时代不符的，因为在克尔凯郭尔的抗议之后，又不断有新的事情出现(第127页)。存在先于本质，这种说法"没有说出什么是人，这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人类学，而是对所有人的否定"(第128页)。这显然是以基于隐秘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统把人类学固定在了某种哲学传统上，并且没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可能性(参见例如Terray 1969；Godelier 1973；Jantzen 1991)。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在看到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时判断道："在理论上，存在主义无法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要素之一来为后者提供什么东西，它充其量只能起到纠正当今苏联正统观念的作用，也就是重申，在一种以客观主义方式删减了的辩证法概念中被压制的主观性。”（1966，第105页）他运用哈贝马斯的论证（1963，第109页），批评了“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变种，它们“经常提到社会实践”，但实践只是服从一种“最终仅仅从一般‘意识’”中推导出来的“意义”（1968，第49页）。针对萨特认为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批评，施密特反对道：“唯物主义的决定性优势正在于此。”（第29页）施密特主要研究了马尔库塞20世纪20到30年代从海德格尔那里获得的追求“辩证方法和现象学方法相综合”的尝试，这种综合预示了“‘二战’后梅洛-庞蒂和萨特在马克思主义中所做的尝试”（第41页）。施密特以与马尔库塞类似的论证指明了这种尝试的失败（哈贝马斯已经证明了这种失败）。马尔库塞在1968年的所作所为使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这并非偶然，正如以下这点也非偶然一样：造就了他巨大的个人魅力的，是其存在主义出身，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趋势，即将革命实践去对象化、将走向本真此在的革命先验化。他从学生运动中看到：“在1960年代后期，在学术上还活着但又的确被宣布死去的存在主义，被证明是一种能够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爆炸力。”（Schmidt 1973a，第9页）1968年，鲁迪·杜契克 1129
解释道：“今天，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不是抽象的历史理论，而是面对一个社会时的生存厌恶，这个社会空泛地谈论自由，却用微妙而残酷的方式压迫着个体以及为社会—经济解放而斗争的人民的直接利益与需求。”（第91页）杜契克从一种“作为‘革命意志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就如这种马克思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那样”（第48页）。它洞察到：进行干预的思想或者思想上预先设计的干预也是“客观”现实自身的元素。革命实践因此“缩小了”“消极的经济存在和积极的革命行动之间的差异……。经济规律的自然发生的且盲目的强制特征……被实践—批判的阶级意识的自觉活动所打破”（第40页）。“被杜契克理解为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哲学’，打破了区分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僵化范式，因为这种范式被证明是有历史局限性的。”（Schmidt 1973a，第24页）

参考文献：

Th. W.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Ästhetischen* (1933), erw. Ausg., Frankfurt/M 1962; ders.,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dien über Husserl und die phänomenologischen Antinomien*,

Stuttgart 1956; ders., *Negatives Dialektik*, Frankfurt/M 1966; G. Anders(=G. Stern), »Une interpretation de l'a posteriori«, i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4. Jg., 1934/35, 65ff; ders., »Pathologie de la liberté«, i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Essay sur la non-identification*, 6. Jg., 1936/37, 22ff; ders., »Nihilismus und Existenz«, in: Neue Rundschau, Nr. 1, Ototober 1946, 48ff, ders., *Die Antiquertheit des Menschen*, Band II: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ünchen 1980; D. Arcahard,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artre and Merleau-Ponty*, 1980 (reprint: Aldershot 1992); S. de. Beauvoir, *Pour une morale de l'ambiguité*, Paris 1947; E. Bloch, »Vorwort« zu: Bloch u. a. 1956, 5–7; ders., u. a., *Gegen die Philosophie des Verfalls. Beiträge zur Kritik der gegenwärtigen bürgerlichen Philosophie*, Berlin/DDR 1956; M. Brumlik, »Günther Anders. Zur Existenzialontologie der Emigration«, in: D. Diner (Hg.), *Zivilisationsbruch. Denken nach Auschwitz*, Frankfurt/M 1988, 111–49; A. Clair, *Kierkegaard. Existence etéthique*, Paris 1997; L. F. Denisowa, »Gegen die Verleumdung der Massen durch die Existentialisten«, in: Bloch u. a. 1956, 362–76 (übers. aus *Aoprossy philosophii* 4/1954); K. Dougals,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Existentialism (Paris School)*, Yale French Studies Special Monograph No. 1, New Haven/Conn., 1950; R. Dutschke, »Die Widersprüche des Spätkapitalismus, die antiautoritären Studenten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Dritten Welt«, in: U. Bergmann u. a., *Rebellion der Studenten oder Die neue Opposition*, Reinbek 1968, 33–57; ders., »Die geschichtlichen Bedingungen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Emanzipationskampf«, ebd., 85–93; L. Feuerbach, »Grundsätze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GW 9, 264–341; M. Godelier, *Ökonomische Anthropologie. Untersuchungen zum Begriff der sozialen Struktur primitiver Gesellschaften*, Reinbek 1973;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Neuwied-Berlin/M 1963; K. Hartmann, »Existenzialsimus«, HWPh 2, 1972, 850ff; W. F. Haug, *Jean-Paul Sartre und die Konstruktion des Absurden*, Frankfurt/M 1966, 3. veränderte A. Hamburg 1991; M. Heidegger, *Platons Lehre von der Wahrheit, Mit einem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Bern 1948; H. H. Holz, J.-P. Sartre, *Darstellung und Kritik seiner Philosophie*, Meisenheim-Glan 1951; ders., *Strömungen und Tendenzen im Neomarxismus*, München 1972; W. Jantzen, *Psychologische Materialismus—Tätigkeits—*

1130

theorie—Marxistische Anthropologie, Berlin-Hamburg 1991; F. Jeanson, *Le probléme morale et la pensée de Sartre*, Paris 1947; A. Kojéve, *Introduction à la lecture de Hegel*, Paris 1947; ders., *Hegel. Kommentar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Frankfurt/M 1975 (zuerst Stuttgart 1958); H. J. Krahl, »Revolutionäre Theorie und existenzielle Radikalität«, in: ders., *Konstitution und Klassenkampf*, Frankfurt/M 1971 ,98–114; G. Leaman, *Heidegger im Kontext. Gesamtüberblick zum NS-Engagement der Universitätsphilosophen*, AS 205, Berlin-Hamburg 1993; D. Losurdo, *Die Gemeinschaft, der Tod, das Abendland. Heidegger und die Kriegsideologie*, Stuttgart 1995; G. *Lukács Existentialismus oder Marxismus*, Berlin/DDR 1951; ders., »Wozu braucht die Bourgeoisie die Verzweiflung?« in: ders., *Schicksalswende Beiträge zu einer neuen deutschen Ideologie*, Berlin/DDR 1956, 151–55; H. Marcuse, »Beiträge zu eine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1928), in: Marcuse/Schmidt 1973, 41–84; ders.,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in: *ZfS*, 6. Jg., 1937, z. n. der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 Frankfurt/M 1965; ders., »Existentialismus. Bemerkungen zu Jean-Paul Sar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in: *SuF*, 2. Jg., 1950, H. 1, 50–82 (wiederveröffentlicht in der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II, Frankfurt/M 1965, 49–84); ders. u. A. Schmidt, *Existenzialistische Marx-Interpretation*, Frankfurt/M 1973; M. Merleau-Ponty, »La querelle de l'existentialisme«, in: *Temps modernes*, 1945, Nr. 2; ders., *Humanisme et terreur*, Paris 1947, dt.: *Humanismus und Terror*, 2 Bde., Frankfurt/M 1966; ders., *Sens et non-sens*, Paris 1948; R. W. Meyer, »Merleau-Ponty und das Schicksal des Französischen Existenzialismus«, in: *Phil. Rundschau*, 3. Jg., H. 3/4, 1955; J. P. Sartre, *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amanisme*, Paris 1958; ders., »Materialismus und Revolution«, in: Situationen, Reinbek 1965; ders.,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Théorie des ensembles pratiques (précédé de Questions de méthode)*, Paris 1960, dt...: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ohne Fragen der Methode)*, Reinbek 1967; ders., *Freundschaft und Ereignis. Begegnung mit Merleau-Ponty*, übertragen v. H. H. Holz, Frankfurt/M 1962; ders., »So bin ich. Ein autobiographisches Interview mit Michel Contat«, 2. Teil, in: *Neues Forum*, Nr. 267, März 1976; ders., R. Garaudy, J. Hyppolite, J. P. Vigier, J. Orcel, *Marxisme et existentialisme. Controverse sur la dia-*

lectique, Paris 1962 (dt.: *Existentialismus und Marxismus. Eine Kontroverse zwischen Sartre, Garaudy, Hyppolite, Vigier und Orcel*, a. d. Frz. v. E. Schneider, m. e. Beitrag v. A. Schmidt, Frankfurt/M 1966); A. Schaff, *Marx oder Sartre?*, Wien 1964; A. Schmidt, »Zum Verhältnis von Geschichte und Natur im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in: *Existenzialismus und Marxismus* (dt. Fassung von Sartre, Garaudy u. a. 1962), Frankfurt/M 1968, 17–49; ders., »Existential-Ontologie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bei Herbert Marcuse«, in: J. Habermas (Hg.),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Frankfurt/M 1968, 17–49; ders., »*Statt eines Vorworts: Geschichte als verändernde Praxis*«, in: Marcuse/Schmidt 1973(a); ders., *Emanzipatorische Sinnlichkeit*, München 1973(b); B. Schoch, *Marxismus in Frankreich seit 1945*, Frankfurt/M 1980; L. Séve, *Marxismus und Theorie der Persönlichkeit*, Berlin/DDR-Frankfurt/M 1972; ders., *Une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marxiste*, Paris 1980; E. Terray, *Le Marxisme devant les sociétés »primitives«. Deux études*, Paris 1969; R.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Fontana 1976.

1131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撰
李牧今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ngst/Furcht, Anthropologie, Atheismus, Aufklärung, Bedeutung, Eigentlichkeit, Engagement,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Entfremdungsdiskussion, Entscheidung, Entstalinisierung, Entwurf, Erscheinung, Existenz, Feuerbach-Thesen, Fortschritt, Hoffnung, Humanismus, kritischer Marxismus, Metaphysik, Niederlage, Nihilismus, Optimismus/Pessimismus, Philosophie der Praxis, Studentenbewegung, Teleologie, Tod, Verzweiflung

排除（Exklusion）

A: ṭard.
E: exclusion.
F: exclusion.
R: isključenie (исключение).
S: exclusión.

1. 阶级理论和阶层理论。 处在马克斯·韦伯传统中的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接续韦伯的社会封闭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排他性封闭”（exclusionary closure）的概念，用来表示一种特殊的封闭形式：某一群人垄断了社会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权。这种封闭

形式使这群人获得了对“外来者”的支配地位，从而与他们建立了一种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对进入社会分工的关键岗位的限制（这是通过对准入资格的正规化实现的），是构成统治阶级的主要方式。这两种排斥形式都需要国家的保障。帕金区分了“排他性封闭”与作为反应和反向运动的“侵占性封闭”（usurpationary closure），后者是一种以资源的重新分配为目的的被排斥者的联合。当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或阶级为了加强其“侵占性
1132 封闭”的能力而将其他非特权阶级或群体排除在外时，就会出现两种封闭战略的结合，即“双重封闭”（dual closure）。社会分工的主线贯穿于两种社会群体，即那些主要用排除来获得和保障其社会地位的群体，以及那些主要依靠侵占策略的群体（1979，第 44—116 页）。

帕金在对新韦伯主义分层理论的批判性研究（1973）中提出了他的概念的雏形。在他之后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的书（1979）中，他针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以结构主义为导向的方法进行了批评。他指责这些方法没有首先将阶级和社会群体理解为参与者，对剥削概念的定义过于狭隘，因此无法解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内部的分化（例如，根据种族或性别特征）（第 3—43 页）。矛盾的是，帕金特别反对行动理论和结构理论的方法。因此继马克思之后，安东尼·吉登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具有特殊的、结构性的性质，它——作为资本和劳动间的关系——融入了生产过程本身，这是以前任何其他的社会类型所没有的。虽然帕金合理地指出，韦伯的分类较马克思的而言更适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斗争和分化，但他没有认识到生产中阶级冲突的基础。生产关系和劳动力市场这两者之间的决定性连接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合同（Giddens 1983，第 193 页）。帕金的“排他性封闭”概念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细分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下被采纳并进一步发展的（参见 Kreckel 1992，第 190 页及以下）。

2. 社会结构性的贫穷和失业研究。此处的排除一词有三种互相关联的内涵。**第一**，它表示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分割线。这一分割线处于两种人群之间，一种是被纳入职业系统及与该系统相关的地位的人，另一种是被推到职业系统边缘或被迫脱离职业系统的人，因而他们无法满足物质参与和社会参与的、在社会中有效的标准。**第二**，排除概念是指有关个人和群体所面临的排斥过程。排斥的过程是时间性、传记性的，并累积蔓延 1133
到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第三**，排除是指产生排斥的社会机制：有偿就业的不断动荡、公司和企业的重组策略、福利

国家的制度效应及其政治转型。

2.1 概念史。这里所说的排除概念是新近的。这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1/4世纪的相对充分就业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种现象的不断持续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排除概念不仅在欧洲的社会科学内传播，而且，特别是在法国，还成为塑造公众意识的一个政治范畴（参见 Silver 1994；法国20世纪90年代对排除的研究概况，参见 Paugam 1996a）。虽然这一概念先前已经存在于对贫困的研究中，但是它很少在其他含义上来使用。塞尔日·波冈（Serge Paugam）指出，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使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不参与普遍经济繁荣的“边缘群体”的状况（1996b，第9页）。不同于90年代关于排斥的讨论，贫困在此并不被视为一种社会危机的征兆，而是被视为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社会余量。勒内·勒诺瓦（René Lenoir）在1974年对这个概念的含义进行了更改。这里的“被排除者”是指各类社会“不适”者，其中包括吸毒者、精神病患者、犯罪者及经济上被边缘化的人。勒诺瓦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因为对他来说，“被社会排斥者”（exclus）并不是代表边缘群体，而是由现代社会的运作所造成的群体，其存在于所有社会环境中（Paugam 1996b，第10页）。

然而，贫困问题在与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失业联系起来后，才从“边缘”走向“中心”。贫困不再仅仅指向“外来者”的个人命运，而是再次——迅速或是潜在地——影响到社会的“核心”，即工薪族。同在德国一样，“新”贫困概念，即由失业造成的贫困概念在法国引发了90年代关于排斥的讨论。在 1134
德国“新贫困”的背景下，排斥首先主要从技术层面上，即从保险法的角度，指被排斥在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资格之外，因而其成为一种衡量贫困的指标。随后进行的关于排除的讨论在两个方面超越了这一点：“排斥”的范畴甚至比“新贫困”的概念更强调社会剥夺的多面性。与该概念不同的是，它提请人们注意的不是一种状态（即可以用一定的收入状况来描述），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包容—排斥）。在制度上，（1989年）欧洲委员会决定将与“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做斗争作为其消除失业和贫困的方案的口号（参见 Commission 1993），从而促进了排除概念的传播。同样于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关于在美国大城市贫困区出现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的热烈讨论，对于在欧洲发生的讨论产生了内容上的重要推进作用。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社会底层”概念被用来说明那些在其他

国家被认为是排除的情况（参见 Silver 1996；Kronauer 1997）。最后，排除概念与 20 世纪 60 年代，特别是在拉丁美洲被讨论的“边缘化”概念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参见有关此讨论的作品，Mollenkopf/Castells 1992，第 409—410 页；参见 Wacquant 1995）。

马克思曾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K I*，MEW 23，第 657—677 页）标题下论述过的一系列问题在关于排除的讨论中被提出。然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分析的角度也随之改变。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带来失业或就业不足的“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变革，即它的资本化；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生产逻辑，即积累过程中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劳动力的矛盾倾向。如果说企业可以根据需要抽调的剩余劳动力库（“产业后备军”）因此是资本主义的必要的伴随物和生产条件之一，
1135 那么，这种过剩人口的存在又会产生一种被马克思称为“过剩者”（第 671 页）的失业人员。这里涉及的是，这些“中年劳动者”在与年轻劳动者的竞争中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自认“已经多少衰老了”，属于“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第 671 页，第 673 页）。这些过剩劳动力与“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以及“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起，组成了贫民主义的队伍（第 673 页）。

关于排除的讨论中引人注目的历史性变化主要涉及两点。**第一**，在 20 世纪末，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过剩者不再是快速工业化的产物，而是去工业化和工业就业全面下降的产物。这对劳动力市场的分裂过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见下文）。**第二**，关于排除的争论是在以福利国家实力增加和相对充分就业为特征的社会繁荣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而这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马克思与关于排除的讨论的侧重点的不同：在马克思那里，“过剩者”问题完全从属于阶级对立的视角，而在关于排除的讨论中，这个问题被独立地表述为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的问题。

2.2 排斥是一种社会分裂。持续的失业将人们排除在物质和社会的参与的可能性之外，从而使社会分裂，这一观点有很多含义。它的前提是，有公认的——或至少是一个大部分人认同的——社会归属标准，就连工人阶级也是按照这些标准被纳入到社会当中的。这种纳入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和利益冲突已经消失，而是代表“以冲突为媒介的一体化”（Dubet/Lapeyronnie 1994，第 17 页）的社会规则的出现，它们可以解决这些利益冲突。为此就需要历史性

的斗争和意义深远的制度创新，这一点在托马斯·H. 马歇尔（Thomas H. Marshall）的“社会公民身份”（social citizenship）概念中最为清楚地表达了出来（1992，第40页及以下）。即使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也是首先通过政治权利补充
1136 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保护权利，最后通过法律赋予的最低限度的物质保障，由福利国家进行保障，这样才为战后几十年的——或多或少充满冲突的——阶级妥协奠定了基础，至少在西欧塑造了一个大体上“一体化”的社会形象。几十年来集体的经济上升的经验巩固了这一形象。正如希拉里·西尔弗（Hilary Silver 1995）所指出的那样，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它因意识形态传统和制度安排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模型：法国的“共和”模型（着重强调公民平等和团结）、英国的社会民主—自由主义混合模型（以“社会公民身份”为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协同主义—社会民主模型（“社会伙伴关系”）（也可参见 Kronauer 1997）。

从社会意义上讲，排除意味着，就业危机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时期出现的一体化模式（包含规范性的观念及其在制度上的固定的双重含义）提出了持续的质疑。在这一过程中，扩大参与权的制度结构所依赖的基础——有偿就业——正在腐烂。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在阶级妥协框架内、在企业和跨企业层面上议定的规则已不再适用。此外，如果那些被排除在有偿就业之外的人因为这些规则而难以甚至被禁止重返工作岗位，那么这些规则就成了他们的障碍。因此，社会的不平等和职业系统内部的分裂，是由“内部”和“外部”的分裂叠加和补充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会成为社会排斥，就如有偿就业是进行日常生活其他领域的社会参与的条件（见下文）。排除概念因而在失业和贫困的关联中一直有政治含义。它的对立面不是功能主义意义上的一体化，而是对具有物质和社会基础的民主的更广泛理解的包容。虽然对少数群体进行的社会排斥绝不需要质疑一个社会的运行，但它无疑会对民主产生深远的影响。 1137
从政治层面上看，发达福利国家中的排斥，造成了历史上新的问题局面和潜在的冲突。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日益严重的排斥现象，增加了为福利国家提供资金的人和必须长期得到福利国家支持的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的风险。

3. 排斥是一种累积的社会经验。“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不同维度，包括经济参与、文化参与、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各个维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同时它们又相互参照。因此，反过来说，正如卢曼所指出的那样，排除也遵循一

种消极的“强化效应”的逻辑：社会生活一个维度中的排斥导致进一步的排斥，这是一个“边缘化直至完全排斥”的过程（1995，第 148 页）。就社会排斥的主观经验而言，它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归属感的经验必须先于它发生，或某种程度上作为公然的矛盾站在一边。后者是指“包容”与“排除”并存于日常生活的不同经验领域。作为一种社会性、累积性的经验，排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维度中：

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这出现在重返或开始正规有偿就业遭到持续阻止时。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必须是指，有关人员不仅客观上机会减少，而且会用自身退出劳动力市场作为对这种机会缺失的反应。于是，他们甚至不再属于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后备军”，而是被视作劳动社会的“消耗者”（Lenski 1977，第 509 页）。这种情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社会排斥，取决于劳动力被迫退出的结果：是采取有偿就业之外的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成为家庭主妇、提前退休），还是在未来几年进入灰色经济和/或选择失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伴随着其他维度的排斥时，持续的就业不足或
1138 其他形式的边缘化也会导致社会排斥（关于具体维度的详细文献讨论，参见 Kronauer 1997）。

经济排斥。这表现在失去在正规就业系统内养活自己或家庭的能力。同时伴随着经济上对福利国家成就的依赖，或对社会价值较低的收入形式的依赖。从物质层面上看，经济排斥一般意味着不得不生活在严格的限制之中，即变得“贫穷”。在这一维度上，如下一点变得特别清楚：“边界”总是被社会定义所决定的。因此，排斥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比例：收入贫困的衡量标准是一种平均可实现的、由文化定义的生活标准；对福利国家的依赖意味着制度上的“包容”，但处于社会消极地规定的地位（“失业者”）。

文化排斥。这意味着被切断了依照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生活目标和价值生活的可能性。但这也意味着因为无法满足预期的文化要求或有时只能借助非法或不合法的手段来满足而受到社会制裁。如果公认的目标和价值因无法实现而被放弃或被其他目标和价值取代，制裁同样是有效的。在这个维度中，排斥关系的悖论变得十分尖锐：“包容”在商品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的普遍规范中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今的程度，而不能适应这些规范的人活得越来越痛苦。

社会隔绝。这个维度既指社会关系的范围，也指其质量，因而本质上是指社会身份。社会隔绝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其结果各不相同：一种是大大减少

社会接触（孤立化），另一种是将接触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同龄人圈子里（群体或环境的形成）。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会促进疏离感（Dissoziation）和认同阻断；在第二种情况下，它能促进联合（Assoziation）和亚文化认同。丧失物质上的参与机会，如遭到诋毁或预料到会被诋毁，也会导致孤立。

1139 **空间上的排斥。**在关于排除的讨论中，它与因社会隔离而受到的排斥密切相关。法国的“被社会排斥者”（以及在美国或英国被认为是“社会底层”的穷人）通常不仅住在（大）城市，而且集中在城市中的某些区域。与社会接触范围小相对应的，是日常生活的活动空间狭窄。这两者一同促成并迫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共同点。对被救济者住房的行政分配，或者劳动力市场危机和住房市场危机之间逐渐增加的纠缠，都会产生集中效应。大多数相关人员都体会到的空间上的排斥是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加强了来自“外部”的诋毁，而如今住宅区也与这种污名联系在一起，同时强化了与自身生活空间自我疏远以及向内分离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避免与较富裕的人接触，从而保护自己不会在社会上出丑。

制度上的排斥。失业者和贫困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日常生活的不同领域都可能面临这种排斥。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种制度尤为重要：一是学校和培训机构，它们承担了判定“内部”与“外部”之间界线的职责。因为学历及职业资格证书对社会地位越来越重要，职业失败越来越不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命运，而更多地被看作一种个人失败。二是失业者和贫困者要面对管理他们状况的机构，例如德国的劳动局和社会福利局。这些机构越来越多地同时承担着包容和排斥他们的服务对象的双重矛盾角色。他们越是无法帮助失业者和贫困者摆脱困境，他们的关怀就越会沦为现状的再生产。第三，制度上的排斥表现为公共和私人服务性部门停止对被排斥者的照顾。

排斥和阶级形成。排斥可以增强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对于这一点来说，最重要的标志是，排斥地位通过相关人员本身而实现的强加的再生产。当他们 1140
看到已经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并采取相应的表现时，分裂就成了定局。此外，如果社会使排斥过程永久化和持续化（要么越过越来越多的人的社会降级，要么越过代代相传），那么这种分裂就会在社会结构中根深蒂固。每一次给新的社会形态命名的尝试都以一个悖论告终：无法找到一个积极的规定。与其他所有的阶层和阶级不同，“过剩者”形态的本质特征是消极性。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资本不会提供积

极的认同。从外部来看，认同被视作一种烙印，但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其积极特征却不断受到威胁。同时，“消耗者”是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一部分，对他们的排斥是以他们的志向、价值和物质上的可能性来衡量的。在这种分裂中，他们代表着一种危机，即发达劳动社会沿着其周边解体了。

参考文献：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ocial Europe. Towards a Europe of Solidarity: Combating Social Exclusion. Supplement 4*, Brüssel, Luxemburg 1993; R. Castel, »Nicht Exklusion, sondern Desaffiliation. Ein Gespräch mit François Ewald«, in: *Argument* 217, 38. Jg., 1996, 775–80; F. Dubet, D. Lapeyronnie, *Im Aus der Vorstädte. Der Zerfall der demokratischen 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94; A. Giddens, *Profiles and Critique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Los Angeles 1983; R. Kreckel, *Politische Soziologie der sozialen Ungleichheit*, Frankfurt/M 1992; M. Kronauer, »›Soziale Ausgrenzung‹ und ›Underclass‹: Über neue Form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paltung«, in: *Leviathan*, 25. Jg., 1997, H. 1, 28–49; R. Lenoir, *Les exclus, un Français sur dix*, Paris 1974; G. Lenski, *Macht und Privileg. Eine Theorie der sozialen Schichtung*, Frankfurt/M 1977; N. Luhmann, *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Frankfurt/M 1995; T. H. Marshall, *Bürgerrechte und Soziale Klassen. Zur Soziologie des Wohlfahrtsstaats*, Frankfurt/M 1992; J. H. Mollenkopf, M. Castells (Hg.),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New York 1992; F. Parkin, *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1979; S. Paugam (Hg.), *L'exclusion,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1996a; ders., »La constitution d'un paradigme«, in: *L'exclusion,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1996b, 7–19; H.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 Inst. f. Labour Studies), Genf 1994; *dies.*, »Culture, Politics, and National Discourse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E. Mingione (Hg.),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A Reader*, Oxford-Cambridge/Mass., 105–38; L. Wacquant, »The Rise of Advanced Marginality. Notes on its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in: R. v. Kempen, P. Marcuse (Hg.), *The New Spatial Order of the Cities*, New York 1995.

马丁·克罗瑙尔
（Martin Kronauer） 撰
孙易晨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Akkumulation, Antagonismus, Arbeitslosigkeit, Arbeitsteilung, Armut/Reichtum, Ausbeutung, Eigentum/Besitz, Elite, Entbettung, Handlungstheorie, Herrschaft, Identität,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Klassen, Krise, Marginalisierung, Pauper, Privateigentum, Schichten, Sozialstaat, Übervölkerung, Wohlfahrtstaat

生产的排泄物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A: faḍalāt al-intāǧ.

E: excrements of production.

F: excréments de la production.

R: ėkskrementy proizvodstva (экскремент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S: excrementos de la producción.

源自拉丁语动词 *excernere*（“剔除、排泄”），完成时分词为 *excrementum*（“排泄物、粪便”）。作为对生产废料的隐喻，生产的排泄物一词引发了自然主义的误解，即某物是否会变为废料，潜藏在事物的本质之中。然而，在与生产行为相结合时，产生哪些废料或外部影响，例如余热，是支配生产资料的一个方面，并因此决定了如何对它们进行社会性管控。

在以私人分工为基础的生产中，正在劳作的劳动者不仅与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异化（Roos 1976），也与生产单位的社会环境相异化。这也同样适用于决定，是否以及如何使原料和素材在生产中被对象化，抑或使之作为生产的排泄物而被剔除。市民社会的工商业管理法规范了邻人的义务，即忍耐生产的排泄物的生产。这就引出了技术性环保（借助稀释），即更高的烟囱以及地下和水中更长或更深的导管。由于偶然的生产的排泄物，技术装置和移动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污染物以及有害物被“排放”到了整条河流中，侵入到空气、水和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并且因此有可能损害到人、物以及非人类生物。

只有当环境倡议以及环境研究者反复说明生产经营与环境之间的重要关联时，我们才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并且应以国家的环境政策来回应（Bachmann 1981；Bechmann/Czeskleba-Dupont 1981）。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技术性环保日益扩充，但仍然基于终端监管，这不能解决矛盾，因而既昂贵又 1142
无效（参见 Commoner 1992），它区别于有计划的、材料方面的替换，即将对环境有害的程序替换为（更加）无害的程序，这种替换的前提是对生产资料的

私人支配权进行公共干预。

历史比较表明，废料问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大大恶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大工业中的废料问题具有技术—经济的意义，它们的变化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化综合生产已经实现了的规模。在剥削劳动力的背景下，由生产的排泄物造成的特殊有害影响，被视作劳动环境问题（劳动过程的排泄物），或者被视作居住环境问题（居民点的稠密化）。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产的排泄物所引发的问题（仍然）没有超出基础结构（Infrastruktur）的层次，而与生态学上的“基础结构的基础结构”（Daly）相关，基于提高了的技术生产力与破坏力，这些问题现在达到了后一种基础结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撕裂了城乡之间的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之视为典型并从中看出，农业生产消费中的排泄物是如何被保留下来并演变为环境问题的。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技术圈（Technosphäre）错误地调控了社会经济系统的因子和生态系统的因子(Commoner 1977，第11页及以下)，而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资源问题和废料问题。即使在事后，掌握与之相关的必要知识仍是一种挑战。

1. 恩格斯在1844年指出，作为曼彻斯特—自由主义（Manchester-Liberalismus）的后果，固态、液态和气态的废料破坏了英格兰工业中心的水和空气等生态循环介质。因此，恩格斯这样描写河流中的污染物：“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料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Lage*，MEW 2，第282页）“烟雾”缭绕的伦敦出现了极端的空气污染，它在百年后的冬季逆温天气中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恩格斯将其理解为煤炭燃烧以及稠密聚居的结果（同上书，第325—326页），并且指出特 1143
别是在工人区“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同上书，第327页）。

此外，恩格斯还留意到了利用生产的排泄物制造廉价商品的情况：“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年能够买一件毛织品的上衣预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买，他在那里买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谓‘devil's dust’（该词的字面含义是‘魔鬼的灰尘’，下文依据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译为‘飞花’。——译者），这种料子制造出来‘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给人穿的’，十四天过后就裂了缝或是磨穿了。”（*Lage*，MEW 2，第298页）二十年后，工厂视察员夸奖了约克郡的棉纺业，称其废品回收利用的行为具有模仿

引领意义，因为它们通过制造“劣质品”（Shoddy）来满足“公认的需要”，“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引自《资本论》第3卷注释，MEW 25，第111页）。马克思批判这种夸大其词的废物回收仅是一种降级再造（Downcycling）：“‘消费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六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薄。”（同上）

“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K I*，MEW 23，第219—220页）倘若“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同上）。资本家获得的是新价值，而劳工获得的却是肺的损伤。有损健康的东西在棉纺业仍是飞花，在毛纺织业却被进一步地加工为劣质布料，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类原料的相对价格来解释。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MEW 25，第111页）。

“节约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真正狂热追求的对象（MEW 25，第93页）。这种节约还包括对废料的再利用以及使之最小化。“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在这方面，废料降低了“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同上书，第90页）。

马克思指出，个别资本在追求超额 1144
利润时，可以选择成本最小化的方法，从而使得生产的排泄物最小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参见Hassenpflug 1974）被推广之后，某一行业的资本互助共同体又会重新规定一种生产方法的标准废料率。

马克思不仅讨论了大量的生产的排泄物以及必要的“机器改良”和“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MEW 25，第111页），而且还考虑到了再次利用这些排泄物的必要条件。化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它致力于研究和阐明物质转换问题。自从发现了火的可能用途之后，化学就一直为物质的提取、构型、组装等工作提供支持（Roos/Streibel等1979，第78页及以下）。马克思视化学工业为“最显著的例子”，因为它“不仅找到了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

（MEW 25，第 112 页）。

2.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在某些工业中，废料再利用有利可图，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更大的伤害——例如，对γ-六氯环已烷产品的剩余物再度加工后，就会形成氯化二噁英——对于这些工业，就可能有必要以政治手段去叫停生产。对此的替代方案就是重新替换材料，这些材料的无害性应当被记录在案，而且在生产技术方面要尽可能与之前的相当，例如印刷厂用植物油代替有机溶剂（Filskov 等 1992）。

倘若对生产的排泄物的这种再利用没有被限定在所谓“正常废料”的特定行业范围内，那么我们将难以想象化学生产在 20 世纪的病态发展。那些最初无法被识别的污染源往往来自曾经在行业中被普遍使用过的那些生产的排泄物（参见 Friege/Claus 1988）。资本有充分的理由不对此承担责任。比如，如果美国的石油化工业必须要销毁那些有毒的生产排泄物，不是像 80 年代末期流行的那样使之达到某一个值，而是要彻底消除，那么美国的石油化工业将不得不损失比其税后利润还要高出许多倍的费用（Commoner 1990，第 51 页）。

1145 行业利己主义（Branchenegoismus）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污染是如何呈现出指数级增长的，这是因为整个市场实现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性排挤（J. Hirsch 1974），特别是通过石油化工业，其基础是消耗能源的矿盐（氯化钠，NaCl）电解，也从而可能引起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Henseling 1990，第 2 页）。而这只能通过一个化学化或去化学化的新阶段来解决。在新阶段中，“不是氯产品的生产量，而是其下降程度……成为进步的尺度”（同上书，第 3 页）。在资本积累的中心区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例如在德国，化学工业中 60% 以上的销售额与氯的使用密切相关（Enquete-Kommission 1994，第 329 页）。但是，这种下降可以从历史—批判的角度开始：“鉴于氯化学有众多的分支，替代可行性问题就变得极其复杂，而且需要区别对待。在这里，回顾历史或许大有裨益，即氯化学的产品是在何种情况下被投放到了市场之中，并进而取代了传统的材料。”（Henseling 1990，第 4 页）康芒纳甚至还建议：“人们必须……记住，几乎所有的石油化工产品都是替代品，替代了之前使用过的某种源自自然资源（例如木头、棉花或纸）的产品，或是替代了自然原料（例如金属或玻璃）。”（Commoner 1992，第 13 页）调查委员会（Enquete-Kommission）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建议采用替代 PVC 的策略。与他们不同，康芒纳得出的结论是：“因此，当下的许多石油化工产品

都可以非常容易地被一种更加原始的、对生态更加友好的材料所代替。”（同上）

3. 1873年，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他的小说《九三年》（*1793 oder Die Verschwörung in der Provinz Vendee*）中，借主人公之口提出了一种社会进步的愿景：“你们有必要先消除各种寄生生活（Parasitentum）：教士的寄生生活、法官的寄生生活、士兵的寄生生活；你们还必须合理地利用一切财富；将肥料洒向田间而不是阴沟。”（第381页）与这种将城乡之间的对立戏剧化的做法类似，马克思认为，“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到了最革命的作用”（MEW 23，第528页）。
1146 “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创造了“农业和工业联合的物质前提”（同上）。极端增长的城市化也使这种新的综合成为一种必要，因为它彻底地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上）。基于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等重要化学家的洞见，马克思形成了他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化学愿景，进而要求“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同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已经将生态政治革命提上了议程。

在伦敦，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使人们拥挤在了一起，而且“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MEW 25，第110页）。就此而言，“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解决环境问题之余，循环利用这些排泄物也避免了“巨大的浪费”，使得土地改良能可持续地进行（同上）。马克思唯一担心的是，这将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了”，例如在意大利、中国以及日本的部分地区，人们经营着“小规模园艺式农业”（同上书，第111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生产方式并非“与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MEW 23，第528页）。

4. 自引进排水系统以来，人们就常在德国城市的周边地带建造灌溉地，而这一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时普遍倡议的（P. Hirsch 1929，第215页）。与此同时，社区经济的集约化（kommunalwirtschaftliche Ökonomiesierung）也显露出了前景：“在社区团体自己的管理之下，通过适当地开发灌溉农场（Rieselgüter），那些重要的食品都能被我们生产出来。”（同上）然而，在

为走出大危机而斗争的过程中，那种将污水管理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物质经济形式（Stoffwirtschaftsarten）的组合被否决了，这是为了支持物质经济形式的其他战略性组合，即农业经济和战争经济同化学的氮合成（Stickstoffsynthese）的组合。1934 年，全国农业生产者协会（Reichsnährstand）把一笔不断增长的、关涉矿质肥料的费用强加到了在意识形态上受到法西斯主义荼毒的农民头上，
1147 这是为了确保“在一个部门中利用化学工业的生产能力”，使之“在战争状态中被用来制造弹药”（Kuczynski 1948，第 153 页）。受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经济，氮合成得以发展。氮合成生产能力的“可持续”扩展不仅使农民们手中的动物肥料贬值了，也使城市社区中的“灌溉产品”（Rieselprodukte）贬值了，而这就导致了灌溉地的衰败。尽管 1989 年之前在柏林周边还存在灌溉地，但近年来已彻底消失。环境污染在这里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5. 大约在 1973 年石油价格革命时期，世界总劳动每年都会从环境中汲取大量的物质，它们转换为干燥物质（Trockensubstanz）后，重达 90 亿吨左右。但只有不到 10% 会被提炼为日用品。超过 90% 的物质以生产的排泄物的形式被释放到环境之中（Ehrensvörd，引自 Roos/Streibel 等 1979，第 190—191 页）。其中，不到 2% 能被分解为液体和可溶物质，大约 25% 是固体，60% 会与空气结合或者成为气态废物，后者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烧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形成的。罗斯（Roos）和施特莱贝尔（Streibel）等人指出，这种“非使用价值的生态循环”在性质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物质经济的问题，而且由于对非生物来源的自然物质的改造不断加强，非自然的化合物就越来越多了，但这些化合物难以通过自然的降解能力被分解为它们的基本形式。因此，除了在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实现了物质变换的生物实体与非生物实体之外，还有第三种成分，诺维克（Nowik）称之为反生物的（antibiogen）实体。此外，当前由于放射性残留物和有毒污染物的积累，呈现出新的再循环问题，即物质实体变成自然的物质循环”（同上书，第 188 页）。作为这一见解的结果，他们建议，在对环境有害的企业进行场地分配时，人们应当不再依赖（马克思仍强调的那种）生产的规模收益（Skalenerträge der Produktion），也不再依赖于较大的社会规模。因为“自然环境已经达到了污染的程度，要消除国民经济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废料量，就意味着，在越来越多、越来远广的地区和领域中，自然潜力的生产能力会不堪重负” 1148

(同上)。就农业范围而言，这在大规模集中化的畜牧养殖中特别适用，在这里，动物的粪便问题很难被解决（这在其他国家也得到了证明）。

6. 总体而言，罗斯和施特莱贝尔等人呼吁“一种大规模的技术性替代，即引入比之前更适应自然环境的技术”(Roos/Streibel 等 1979，第 258 页)，而这仍是最紧迫的社会政治任务，它旨在解决生产的排泄物造成的损害。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Bericht）中，“可持续发展”一词中明确地包含了投资管理这一任务(Hauff 1987，第 2 章)，而环境生物学家康芒纳的各项工作也可以证实这一点。他的基本观点是，大危机以来被广泛使用的生产技术类型及其线性的物质消耗和能量消耗，加剧了环境问题。因此，人们应当基于地球生命的演化中研究如下问题：如何才能像光合作用的物质结构中的二氧化碳再循环那样，成体系地重新利用生产的排泄物，并由此“形成闭环”(Commoner 1972 和 1992)。就像后来的《布伦特兰报告》一样，康芒纳早在 1976 年就指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是合而为一的，在全球危机中彼此交织在一起。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技术因素以及环境体系因素之间的联系必须被颠倒过来。

在民主德国，罗斯和施特莱贝尔等人（1979）相关的看法既没有得到专业上的认可，也没有得到政治上的许可，尽管他们基于价值理论之类的东西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和现在都应当扩大民主德国的基建，例如成立次级原料经济的机构（1989 年之后，这种机构并没有从议程表上消失）：“首先，劳动资料和工业消费品的良好性能和形态会被磨损，而它们的物质实体却得以保留，因为后者的折旧过程通常会比较缓慢。因此，它们可以作为次级原材料被重复利用。这样一来，物质链条在经济过程中就被延长了。变形程度越高（在这种变形中，它们实现了有成效的再循环），节省的社会劳动就越多。”(同上书，第 187 页)
此外，在建造垃圾焚烧厂所需的大量材 1149
料耗费和能源耗费（Braungart 等 1989）上，对这种情况的考量将会消除对其效果的幻想，甚至如果家庭垃圾本身也都含有上述过程中的关键性成分，那就特别危险了（参见 Czeskleba-Dupont 1988 和 1989）。

为了评估重复利用生产的排泄物的可能性，罗斯和施特莱贝尔等人提出了“非生产性结合的劳动”(nichtproduktiv gebundener Arbeit）这一价值理论范畴，这使人联想到受熵限制的劳动不可用性(Nicht-Verfügbarkeit von Arbeit)。应用到社会的自然材料经济上，就意味着：

"物质和能量的非生产结合（nichtproduktiven Bindung）的规模通过其中被对象化了的劳动量来体现，即要花费多少等价的劳动才能变废为宝，这意味着转换为副产品，但又不会因废物利用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因此，非生产性结合的规模和发展就划定了技术运用的经济限度，要求改善材料和能源的利用率，以及利用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废料，即使得它们的生产再循环变得显而易见。"（1979，第148—149页）以食物链和源自褐煤的电力生产为例，罗斯和施特莱贝尔等人说明了，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充分评估的前提下，应当估算出这一限度。与资本主义核算的结果相比，这里限制的范围会更大，而这与马克思的如下见解类似：如果不仅依据更换劳动力所需的（较低的）价值来衡量限度，而且还依据所完成的总劳动来衡量这一限度，那么在劳动过程中引入新机器的经济限度就会进一步扩展（MEW 23，第414页）。根据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促使我们有可能以再生产价格的形式，考虑被束缚在生产的排泄物之中的非生产性劳动，将其视为长期集约化再生产的相关变量（Roos/Streibel等1979，第220页）。

7. 1989年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教条阻碍了再生产的标准被直接纳入定

价。因此，马克思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MEW 1150
23，第612页）。纯粹的市场关系仍旧悬而未决，买卖双方各自的商业合同到期之后，哪一个买家将会继续与卖家进行交易呢？会交易点什么呢？或者，作为私人生产的外部性，又会将什么东西传递给第三方呢？正如在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中一样，在固定资本集约化的问题之中，流通过程也掩盖了"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MEW 25，第96页）。

在资本的大流通之外，尤其是在"小流通"中，以后者为中介的个体消费表现为一种独立因素。它与公共的、生产性的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物质再生产联系难以得到保证：马克思说，"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重新加入生产过程，例如，用坏了的破烂麻布可以用来造纸"。但是，他也补充道："无论谁生产麻布，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破布充当造纸的原料。它只有在麻布织造业的产品本身已经加入消费之后，才取得这种形式。它只有作为这个消费的废料，作为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才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其他生产领域。"（*TM*，MEW 26.1，第207页）现在需要解决的是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即避免或减少家庭垃圾："当最后一勺果酱吃完后，空玻璃罐不是垃圾，而是有用的东西……只有当玻璃罐不再被使用或者二次利用，而是被粗暴地扔到垃圾桶里时，它（才）会变成垃圾。"（Commoner 1991，第 233 页）

尽管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由于产品设计的原因而被允许重复利用，但问题仍然存在，即个体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在这方面，为了遏制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市场经济进程中的鼠目寸光相一致），公民社会就应当将团结的处事规范，不仅推广到全球意义上的共同生活世界，也要推广到非人类的世界（Bund/Misereor 1996）。通过"布伦特兰进程"（Brundtland-Prozess），这一方向上的突破已经在跨国系统中初显成效，特别是通过 1992 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以及为实现《21 世纪议程》（Agenda 21）
1151 而开展的后续活动（Czeskleba-Dupont 1993）。然而，由于民族国家应对跨国资本的政策局部失效，迄今仍只能在物质政治（stoffpolitisch）的领域中实行防御性的措施。1988 年的国际《巴塞尔公约》（Basel-Konvention）限定了垃圾出口，特别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这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而且，如果全球范围内主要的物质和能源流动能够在小规模的区域中与具有生态化倾向的产品捆绑在一起，那么定将愈发有益（Tjaden 1991a 和 b；Bimboes/Tjaden 1992）。最终，这一点的前提是，在已经开始了的效率革命（Effizienzrevolution）进程（在上述文献中被描述为可能的和必要的）之余，人们还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尤其是在个人消费方面。为此，必须遏制寡头资本积累和垄断资本积累的趋势，这种积累主要是通过"计划好了的损耗"，但也要借助于"审美过时"（参见 Haug 1971，第 48 页及以下；1980，第 186—191 页）；下述方式也奏效，即通过强化消费主体对优质耐用的、更低生产强度的产品的偏好，来克服消费主体适应上述积累的消费心态（"充足性革命"[Suffizienzrevolution]，参见 Bund/Misereor 1996）。这两者都要求一个受政府保障的物质政策，这一政策能将物质的手段和财政的手段（价格矫正、生态改革税）有效地结合起来，比方说，基于绿色新政（Grünen New Deal）这样的经济政策（Bömer 1996）。

参考文献：

G. Bachmann (Hg.), *Umweltfragen-kommentierte Bibliographie 1*, Berlin/W 1981 (= SH 50: Argument-Studienhefte); A. Bechmann, R. Czeskleba-Dupont (Hg.), *Alternative Umweltpolitik. Natur- und arbeitsorientierte Politik, Wissenschaft und Technologie,*

AS 56, Berlin/W 1981; D. Bimboes, K. H. Tjaden, »Stoff und Energieflüss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in: *Dialektik*, NF, 2. Jg., 1992, H. 2, 55–66; H. Bömer, »Öko-sozialer New Deal als Konzept alternativer Wirtschaftspolitik«, in: *Z. Zeitschrift für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7, Jg., 1996, Nr. 28, 94–108; M. Braungart, N. Fuchsloch, *EPEA-Studie zu Abfall- und Energiebilanzen einer Müllverbrennungsanlage am Beispiel der MVA Weißenhorn*, Hamburg 1989; Bund u. Misereor (Hg.), *Zukunftsfähiges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 einer global nachhaltigen Entwicklung*, Basel-Boston-Berlin 1996; B. Commoner, *Science and Survival*, New York 1967; ders., *Wachstumswahn und Umweltkrise*, München 1972 (engl.: *The Closing Circle. Nature, Man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1971); ders., *Energieeinsatz und Wirtschaftskrise. Die Grundlagen für den radikalen Wandel*, Hamburg 1977 (engl.: *The Poverty of Power*, New York 1976); ders.,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 New York 1990; ders., »Solving the Trash Crisis«,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Yearbook of Science and the Future, 1991*, 225–40; ders., »Ein vermeidbarer Fehlschlag. Der Kommentar«, in: *Dialektik*, NF 2. Jg., 1992, H. 2, 9–16; R. Czeskleba-Dupont, »Dioxinforschung aktuell: Das kombinierte Risiko von Abfallverbrennung und Chlorchemie ist weiterhin unakzeptabel«, in: *Grünbuch Ökologie*, Nr. 6, 1988, 110–32; ders., *Technische Unsicherheiten bei der Verbrennung Von Müll als Abfall- die kritische Anomalie der Dioxinbildung*, Publ. d. Insd. f. Geographie, Gesellschaftsanalyse und Informatik, Forschungsbericht Nr. 70, Roskilde Universität 1989; ders., »Die Erde, die große Industrie und die Gesamtarbeit«, in: *Dialektik*, NF, 2. Jg., 1992, H. 2, 35–40; ders., »Die Stellung der USA im Spannungsfeld von öko- und Geopolitik—geographische Grundlagen«, in: *Dialektik*, NF 3, Jg., 1993, H. 2, 71–8; Enquete-Kommission Schutz des Menschen und der Umwelt des Deutschen Bundestags (Hg.), *Die Industriegesellschaft gestalten—Perspektiven für einen nachhaltigen Umgang mit Stoff- und Materialströmen*, Bonn 1994; P. Filskov u. a., *Gefahrstoffe ersetzen. Methoden und Beispiele aus der Praxis—Erfahrungen des dänischen Betriebsgesundheitsdienstes*, Frankfurt/M. 1992; H. Friege, F. Claus (Hg.), *Chemie für wen? Chemiepolitik statt Chemieskandale*, Reinbek 1988; D. Hassenpflug, *Umweltzerstörung und Sozialkosten. Die Umweltkrise des Kapitalismus*, Hamburg 1974; V.

1152

Hauff (Hg.), *Unsere gemeinsame Zukunft. Der Brundtland-Bericht der Weltkommission für Umwelt und Entwicklung*, Greven 1987; W. F. Haug, *Kritik der Warenästhetik*, Frankfurt/M 1971; ders., *Warenästhetik und kapitalistische Massenkultur I: »Werbung« und »Konsum«. Systematische Einführung*, Berlin/W 1980; K. O. Henseling, *Chlorchemie. Struktur und historische Entwicklung*, Berlin 1990; J. Hirsch, *Staatsapparat und Reproduktion des Kapitals*, Frankfurt/M 1974; P. Hirsch, *Kommentar zu den Kommunalpolitischen Richtlinie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Berlin 1929; V. Hugo, *1793. Die Verschwörung in der Provinz Vendee* (1873), Bergisch-Gladbach 1995; J. Kuczynski, *Die Beweg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1800 bis 1946. 16 Vorlesungen*, Meisenheim/G ^{2}1948; H. Roos, »Natürliche Umweltbedingungen und volkswirtschaftlicher Reproduktionsprozeß«, in: *Geographische Berichte*, 80. Jg., 1976, H, 3, 179–89; H. Roos, G. Streibel u. a., *Umweltgestaltung und Ökonomie der Naturressourcen*, Berlin/DDR 1979; K. H. Tjaden, »Wir brauchen eine Politische Ökonomie der Stoff- und Energieströme«, in: *spw*, 14. Jg., 1991 (a), H, 1, 41–7; ders., »Marx, der Müll und der Fortschritt«, in: Z, 2. Jg., 1991 (b), Nr. 5, 73–86.

罗尔夫·切斯克莱巴-杜邦
（Rolf Czeskleba-Dupont） 撰
李靖新弘、孙易晨 译，
侯振武 校

参见：

Anarchie der Produktion, Arbeit, Bauern, Destruktivkräfte, Doppelcharakter der Arbeit, Elektrifizierung, Elend, Energie, Entbettung, Entropie, Erde, Essen, Evolutionstheorie, Extraprofit, faux frais, Fortschritt, Gebrauchswert, Grenzen des Wachstums, Grüner New Deal,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Krise, Material, materielltechnische Basis, Mensch-Natur-Verhältnis,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Naturbeherrschung, Ökobilanzen, Ökologie, Ökologisierung der Produktion, Ökosozialismus, Produktion,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linienanalyse, Profitrate, Raubbau, soziale Kosten, Stoffwechsel,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Transport, Umwelt, Vergeudung, Wirtschaftswachstum

实验（Experiment）

1153

A: tağruba.

E: experiment.

F: expérience, test.

R: èksperiment (эксперимент).

S: experimento.

"实验方法的实施无疑将历史中的两个世界、两个时代划分开来，并开启了以实践哲学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的发展进程。"葛兰西如是说（*Gef* 6，H.11，§ 34，1441）。

这句评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背景下很是独特。马克思很少针对实验问题直接发表看法，原因可能在于，他虽然对自然科学抱有浓厚兴趣，但仍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主业，并且"无论是显微镜还是化学试剂都无法分析经济形式"（*K I*，MEW 23，第12页；Brock-meier/Rohbeck 1981）。恩格斯则对自然科学及诸如认识论和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实验的问题到处存在，但这与葛兰西的论断不存在直接明显的联系。此外，在日后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重量级作者中，只有卢卡奇详细论述了恩格斯关于实验的思考，并批判性地指出这些思考并没有真正理解何为真正的"实践"（*GuK*，W2，第310页）。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里都缺少相应的关键字，这就表明该问题一如既往地被忽视了。

如果更广义地去观察研究对象，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实验从15世纪起在科学领域确实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参见 Crombie 1994，第3章），并受到了弗朗西斯·培根和少数同时代人的称赞，但它在哲学界的主流中几乎不被认可，直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7）的序言中写道，伽利略和其他人的实验，使所有的自然科学家们迎来了曙光（B XIII）。然而，这一宣示在19世纪远没有产生影响，当时的兴趣（克劳德·伯纳德 [Claude Bernard 1865] 是个明显的例外）主要集中于（例如 J. S. 穆勒）实验在归纳推理逻辑中的作用（参见 Lalande，1929）。在20世纪初，实验偶尔受到关注（例如 Mach 1917，Duhem 1914），但只有杜威（1929）赋予了它重要的意义，丁格勒（1928）也为此做出了少许贡献。自那之后，这个话题实际上消失了五十 1154
余年（Lewin 1927，Fleck 1935，Holzkamp 1963、1968 等则是例外）。因此伊恩·哈金（Ian Hacking）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对实验几乎没说过什么。"（1983，第149页）。不过在与实验相关的优秀文献中，方才引用的这本书被证明是不断扩大的"主流"文献的开山鼻祖（例如参见 Batens/Bendegam 1988；Crease 1993；Franklin 1986，1990；Fraunberger/Teich-

mann 1984；Galison 1987；Gooding 等 1989，1990；Krieger 1992；Legrand 1990；Radder 1988；Rheinberger 1992；Tetens 1987）。

以下将试图通过揭示开篇引用的葛兰西的论点，来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一问题所形成的思考的基本特征。这里的重点是“经典物理实验”，其他类型的实验则被略去（例如思想实验和研究实验本身的人工产物等），但仍有待于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探索，这同样适用于一组类型迥异的实验，它们本质上与现代计算机有关，意味着数学理论和处理仿真化的复杂系统。

1. **经典物理实验**（*Das klassische physikalische Experiment*）。“物理学家对自然过程的观察，要么以最简洁的形式且至少处于干扰因素的不利影响下进行，要么就在能确保进程纯粹性的条件下做实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这样写道（MEW 23，第12页）。这些描述可借助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称赞这位“伟大的研究者”有“天赋”；MEW 23，第73—74页）发明的术语来分析，即通过他对四类原因（*causae*）（它的拉丁语译法变得如此普遍）的图解来分析，一切均源于以下几点。（1）“物质原因”（*causa materialialis*）：由什么构成；（2）“形式原因”（*causa formalis*）：其性质；（3）“运动原因”（*causa efficiens*）：借助什么而发生；（4）“目的原因”（*causa finalis*）：其产生的目标或目的（参见 Metaph V，第2页）。

1.1“物质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是“自然进程”。这就可以将这里描述的实验类型与纯粹的“思想实验”相区分，并使在自然科学以外其他类型实验的存在成为可能（参见4.2）。

1.2“形式原因”主要通过观察“以 1155
最简洁的形式且至少处于干扰因素的不利影响下出现”的自然进程，即“进程的纯粹走向”而得以确定。这种类型的条件是必要的，因为正如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写的那样，“具体之物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它是诸多决定因素的概括，即是多样性的统一”（*Einl 57*，MEW 13，第632页），因此对具体之物的认识必须要从对“纯粹的”——孤立的——决定因素的认识开始，具体之物是这些决定因素的统一。恩格斯也有类似表述：“当我们观察运动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来自各躯体的各个运动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的**条件限制**（*Bedingtsein*）。”（DN，MEW 20，第497页）但这意味着对某个特定对象的研究通常会被与该研究无关的现象所覆盖（例如，萨迪·卡诺 [Sadi Carnot]“研究了蒸汽机并在分析中发现，关键性的进程并没

有显得纯粹，而是被各种次要进程所覆盖”；第 496—497 页）。

如果这种（相对）孤立、“封闭”的系统不是天然存在，则必须人为地创造为这些系统提供“保障”的条件，以便有可能观察它们，也就是说必须以某种方式改变已有的自然状况。在开篇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似乎将实验等同于对此类系统的产出。

然而，这一描述还需要补充一个重要方面。如此封闭——在其边界条件下尽可能恒定——的系统一旦形成，后续（通常）就可以被改动，从而使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元素的变化如何影响另一个元素。因此，系统**内部**（*innerhalb*）的初始条件被有意识地改变了。

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经典的”物理实验，这里所谓的实验与尤其在基础物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那些实验不同。在那些实验中，被研究的物体本身在给定的边界条件下被实验生产了出来，而不是从已有给定条件中分离出来的（参见例如 Bachelard 1949）。

一般而言：如果实验主要在**分析**（*Analyse*）进程中起作用，则只要该分析得出了（暂时性的）结论，就可以认真考察这一解释性**综合**（*Synthese*）的进程，这一进程通常是针对已被分析过的可能组合进行实验，这也就容易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实验”是“分析”与“综合”的“联合”（*DN*，MEW 20，第 491 页）。

1.3 由上可知，“运动原因”本质上包括物质工具，因为自然进程只能被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改变。这一工具也包括使用它的主体。

1.4 一方面，实验的“目的原因”是与（1.2）一起被给定的，即特定类型自然系统的产生。另一方面，目的原因（*causa finalis*）可被理解为产生这些系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一般来说，这就是对研究目的的贡献，即寻找疑问的答案，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但这个问题能否得到更精确的回答呢？

至少到近期，业界几乎一致认为实验的核心功能是**检验理论**（*Theorien zu überprüfen*）。根据科学研究的“假设演绎”观，实验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在根本上被看作是借助其他手段而实现的理论延续。

如今实验当然起到了这一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甚至也绝不是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如果它们用于**描述**（*Beschreibung*）而不是用于解释，那么实验就具有“研究”功能，也就是回答存在的、真实的和与事实相关的问题。这类问题尤其可以针对以下方面：（1）有哪些对象；（2）有什么（常量或变量）特征（*Eigenschaften*）；（3）（1）和（2）与（2）中的元素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Beziehungen*），特别是从这些特征的形式和变

1156

化（Ko-Variation）的边界方面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并非不存在理论假设，但当它的功能不再是验证已形成的理论时，它便可能是独立于理论的。当然，实验结果可能意味着需要更改现有理论或创建新理论。实验确实有助于形成（*generieren*）这种发展。（理论与实验之间相互作用的例子参见 Beller 1988，Arabatzis 1992。）

简单地说，实验的功能（至少主要）
1157 是为了形成足够孤立的系统，以验证已有理论。这里的前提（*voraussetzen*）是，研究人员要知道被研究对象的“纯粹”形式，以及哪些是“干扰条件”。然而对于以实验作为重要因素的研究而言，其中的一项主要任务正是明确这种差异在何处。一旦明确这种差异，那么实验至少在这方面与其说是实际研究的手段，不如说是演示已知事实的手段。

2. 实验方法的划时代意义（*Die epochale Bedeutung der experimentellen Methode*）。葛兰西在开篇被引段落的第一条论点指出，实验式的方法将两个时代区分开来。

2.1 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近现代早期以前没有进行过任何实验。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有了物理实验（主要在机械领域）和医学实验（参见诸如 Lloyd 1991；von Staden 1975；Wilkie 1984；Zoubov 1959），在中世纪更多的是光学实验（Crombie 1994，I.313 及以下）。但在近现代，实验的疑难属性已经反映在了语言使用上。在古拉丁语中，*experientia* 和 *experimentum*（来自动词 *experiri*）都意为“经验”（取自通常的观察意义，即希腊语的 εμπειρία），也包括“尝试”“试验”“检验”，也可能包括世界产生的有计划的影响（参见法语的 *expérience*），这种影响同时处于科学和法律语境之下。如此“有经验”的人是有能力通过神秘的步骤来开展实验（*experimenta*）的专家（*experti*）。*probare/probatio* 的含义从“检查”到“调查”“判断”再到“批准”，并与 *probus*（“好的”“可敬的”“正派的”）相搭配。在中世纪文学中，经验（*experientia*）和实验（*experimentum*）（因此有了实验 [*experimentalis*]、实验 [*experimentatio*]、实验者 [*experimentator*]）也与世界的自然魔力相关。

相反，前现代时期的实验处于积极的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主要揭示了两种类型的哲学影响。（1）从本体论上讲，亚里士多德（例如 Metaph 1025 b，第20—26页）声称物理科学（ή φνσική επιστήμη）是与它运动和静止的原理（ή αρχή）相关的，而且由于每项脑力活动（διάνοια）要么是实践性的或生产性的（诗意的——ποιητική），要么

是投机性的（**理论的**——θεωρητική），那么物理科学活动一定是后者，因为前两者与上述所说的原理无关（有关艺术[τέχνη]在古典思想中的位置，参见 Isnardi Parente 1966）。因此，科学与干预研究对象无关。（2）从认识论方面来看，
1158 自然研究的对象“十分接近感官”（τὸ φαινόμενον ἀεὶ κύριως κατὰ τὴν αἴσθησιν）（De Caelo 306a，第 15 页及以下，参见 *APr* 46a，第 17—22 页），即在正常条件下不受我们影响的世界所呈现的样子。

2.2 这一时期相比于现代的划时代意义，从研究人员对上述两种原理的摒弃就可以看出。就前者而言，内部（自然）和外部（人工）运动来源之间的区别不存在了；就后者而言，直接的感官数据被认为可能有误导性；伽利略称赞那些出于理性而强力控制自己感觉的人（获得力量[*fatto forza*]）——尤其是在实验的帮助下——从而获得真理（*Op.*，Ed.Naz.，VII，第 355 页）。因此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如果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充其量是无关紧要的，且最坏的情况是对科学知识的获取构成了阻碍，那么这种影响对现代人而言则始终是被允许且往往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2.3 这种新方法尤其表现在以“制造者—知识”为特征的理念中（Pérez-Ramos 1988）：即设想我们以能制造出它的程度去理解它。这主要得益于“假设建模”技术。尽管在古典时期就已有技术先导（参见例如通过浑天仪和天球仪来模拟天体运动），但该技术在 13 世纪中叶成了一种核心方法。这种方法利用一种机制的已知（因为是由机械师设计的）特性来模拟自然现象的未知特性，并以此方式来研究和解释。

起初被采用的主要是以下两种模型：第一种是**比例**（*maßstäblich*）模型，如狄奥多里克·冯·弗赖堡（Theoderich von Freiburg）通过球形晶体或者呈现大雨滴的水壶对彩虹中的颜色构成进行了实验分析，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通过球形磁铁石（*terrella*）来研究地磁性；第二种是**模拟**（*analog*）模型，例如开普勒（Kepler）使用“暗箱”（Camera obscura）来研究眼功能，以及哈维（Harvey）使用泵系统来研究血液循环。

这两种类型的模型都是真实的模型，
1159 但由此也会形成对**抽象**（*abstrakt*）模型的设想（参见 Galilei，Op.VIII，第 197 页及以下），这里的出发点是某些理论（尤其是数学）原理。当研究对象由相关的原理定义或构成，它就会被阐释为抽象对象，构成了抽象模型（例如，简单线性振荡器的方程有许多这样的模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可以是一个在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环境中移动的摆锤）。此后实验方法的采用，会在现实中尽可能地

形成理论中构建的理想情况，从而将概念与理论、实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抽象模型与真实系统“相一致”，那它就能通过定义它的方程式被理解（关于实验验证的理想化，参见 Laymon 1985 等）。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纯粹”或“理想情况”的劳动是马克思式方法的核心特征（参见 Nowak 1980）。当“抽象力”必须用以代替显微镜和试剂的时候，模型与实际对象“相符”的程度，就要看模型得出的结论与实际研究对象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当然，这些信息必须用能详细说明模型的语言来表述，但它也是独立于模型的。

通过卡诺的热力学研究，恩格斯阐明了抽象模型在物理学中的功能。卡诺排除了“对基本进程无关紧要的次要环境，并构造了理想的蒸汽机（或燃气机），这种蒸汽机虽然就像几何线或曲面那样很难被生产出来，但也能像这些数学抽象模型一样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同样的作用：将过程纯粹、独立且不伪造地呈现出来”（*DN*，MEW 20，第 496—497 页）。

2.4 刚刚描述的这一源自工匠和实用数学家传统的流派，与源自柏拉图自然思想的传统有着明显不同。在柏拉图看来，自然是以某些非物质、永恒的理念为原型的神圣作品，而不是依据既有存在的计划进行生产的工匠模型（例如 *R* X，596 b，*Ti*，29a—b）。在基督教的文献中（例如 Augustinus，*De Trin.* XV，第 13、22 页；Thomas v. Aquin，*Summa Theologica* I，14.8.3），只有上帝才能完 1160
全认识自然世界，因为他独自构建和创造了这个世界。

维科的原则“它是真的，可被反驳的或可以转化的”（*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 ... [1710]，I.1.1）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它经常与霍布斯的教义相混淆，霍布斯这样说道：“科学是对原因的认识，无论其中的主体是否源于理性推理。”（*De Homine* [1658]，X，第 4 页；参见 *De Corpore* [1655]，I 和 X）然而，维科不接受在药物和炼金术领域外使用实验（参见他的自传），如果霍布斯未完全接受实验方法的话（Shapin/Schaffer 1985），那么斯宾诺莎也是如此（Daudin 1949，Yakira 1988）。由此，对于科学（*scientia*）的理解就处在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体系中。

3. 马克思主义的实验方法和起源

（*Die experimentelle Methode und die Ursprünge des Marxismus*）。葛兰西在开篇立论中所说的第二点是，实验方法的兴起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高峰的思想发展的开端。

即使这种关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清楚，但实验方法与“观察式”唯物

主义所涵盖的知识的“观察者”一视角相割裂，这种割裂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基于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之间仍有着基本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在恩格斯后期著作里的几处体现得更为明显。

3.1 恩格斯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创建特定状态的这一有据可查的能力，是因果关系设想的**起源**（*Ursprung*）。“我们不仅发现在某种运动过后会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还可以通过创造在自然中运动的条件来形成某种运动，是的，我们可以形成在自然界中不会发生的运动，至少是不会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可以给这些运动预先设定方向和范围。**通过人类的活动**，因果关系的设想获得了解释，即一种运动是另一种运动的**原因**（*Ursache*）。”（*DN*，MEW 20，第 497—498 页）

3.2 此外，人类这种影响大自然运行的能力是因果关系存在的**标准**（*Kriterium*）。“尽管特定自然现象的依次发生就可以形成因果关系的观念，但这里缺少证据；就此而言，休谟的怀疑主义是有道理的，即事先之例永远不能证明常规的事后之例是正确的。但是，人类活动则做到了对因果关系的**试验**（*macht die Probe*）。”（第 498 页）如果“我可以在实验中，在劳动中……做事后（*post hoc*）的部分，那么它就会与事先（*propter hoc*）的部分相一致”（第 497 页）。

此后就针对（3.2）提出的异议，恩格斯这样答复：“怀疑论者就此甚至不能说，无法根据以往的经验而断定下一次仍会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有时确实不（*nicht*）会出现相同的情况，但这恰恰是对因果关系的**证明**（*beweist*）而不是推翻。因为我们在适当的研究中就可以找到这些与规律相悖的原因所在。”（第 498 页）

这与现代实验科学的传统十分符合。伽利略先是寻找一个根本原因（最好以定量关系表示），通过抽象化或为此设计的实验来消除小的随机变化，然后再研究随机情况本身（参见诸如 *Op.* VIII，第 128—130 页、第 136—141 页、第 205—208 页、第 276 页及以下、第 293—309 页）。“任何不因新案件而扩大法律适用范围，或不因某些例外情况而限制法律的实验（*ne la restreinte pas par quelque exception*），都没有任何意义。”狄德罗写道（*De l'interprétation de la nature*，§XLIV，Hervorh. W. S.）。

3.3 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更普遍的立场，即人类有意识地介入事物发展过程的能力，解释了那些哲学家关键性的否定，即像休谟和康德那样“否定了认知或全面认知世界的可能性。……对这种及所有其他哲学奇想的最有力反驳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也就是说，“如

1161

果能通过自己制造一个自然事件、由其条件生成它并使其服务于我们目的的方式来证明我们对该事件观点的正确性，那么康德所说的无法被理解的‘事物本身’就走到了尽头”（*LF*，MEW 21，第276页）。“实验和工业”也同样得以检验假设的知识是否**合适**（*adäquat*）、是否**全面无遗**（*erschöpfend*）。

卢卡奇（*GuK*，第310页）反对道，恩格斯在这一点上已经完全误解了康德的认识论，因为这里的实验发生在现象领域，因此与“事物本身”这一**超越**（*jenseits*）其原理之外的问题无关紧要。然而，卢卡奇在此误解了恩格斯的哲学策略。对恩格斯而言，成为唯物主
1162 义者只意味着“理解现实世界，就像世界本身为每一个对世界没有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奇想而接近现实世界的人所赋予的那样”，并“毅然决然地舍弃同其自身无关联，但与任何奇妙设想中的事实相调和的每一个唯心主义奇想”（MEW 21，第292页）。因此，恩格斯论证的要点恰恰是对卢卡奇异议的**扭转**（*umkehrt*）：如果实验在“事物本身”的这一设想中不起作用，那么该设想对实验也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只能被看作是“唯心主义奇想”。恩格斯并没有基于康德的研究领域进行论证，而只是打了个擦边球。

4. 马克思主义对实验研究的贡献（*Marxistische Beiträge zum Studium des Experiments*）。如果马克思主义得益于实验方法的兴起，那么它也有助于历史地、系统地加深对实验方法的理解。

4.1 首先是“理论生产方式”（阿尔都塞语）的概念。实验一开始处于“理论的劳动进程”中，然后在分析的后续阶段中呈现出越来越具体的“过度化”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许多各有价值但又零散的研究得以在这个框架中被收集起来（参见关于实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资料，诸如 James 1989；Galison 1987；第5—6章；Gooding 等 1989，T.IV；以及康托 [Cantor] 对实验“修辞学”的研究，同上）。

运用这种解释框架的示例，可以在经典文本已经存在的元素中被部分地重构起来。

上文（2.1）将古典时期实验的落后性与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我规制（自由）优于外部强制调节的思想联系了起来。这在本质上是对奴隶主社会特有的统领关系与奴役关系的宇宙学概括。这些生产关系又与生产性体力劳动相比于脑力活动的从属性意识形态有关。毕竟，这种生产方式几乎没有推动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也因此缺少观察材料。

同样，这个框架也可以解释为何实
1163 验方法得以切实发展，因为一切都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科学突然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崭露头角并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那么我们将这种奇迹归功于……生产。首先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工业发展迅猛，并揭开了许多新的……机械的……化学的……和物理事实的奥秘，这些事实不仅提供了大量的观察资料，而且也通过自身提供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neu*）手段的建构成为可能；可以说，系统性的实验科学时至今日才成为了可能。”（*DN*，MEW 20，第 456—457 页；参见 van Helden 1984，Warner 1990，Weigl 1980）除了科学劳动的“生产资料”——“原材料”（事实）和工具——的（广泛和急剧）增长外，手工劳动也被予以重新评估。此外，作为宇宙学模型的自由主体的首要地位被机器（特别是时钟）取代了，与前者相关的对自然秩序的目的论理想也被机械力量导致的秩序观念所取代。

4.2 由于拒绝认识论的“封闭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至关重要，那么屡次试图给实验性质下定义的尝试是应被批判的，这种做法忽视了有必要限定的历史理论背景；同样不可取的做法是，不考虑实验方法与特定对象相关联的特性，就将实验方法进行去语境化的操作。第一点请参见伽里森（Galison 1989，第 24—27 页）对麦克斯韦尔（Maxwells）观点的评论，以及冈圭朗（1970）对克劳德·伯纳德观点的评论。第二点参见勒温（1927）以及霍尔茨坎普（1983，第 9 章）对实验统计变量方案的批评，以及葛兰西的相关评论（*Gef* 6，H. 11，§15，第 1401 页）。

4.3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将对实验的形而上学“转变”（巴什拉语）予以回应，德国唯心主义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这里的关键在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 1 章，据此，认知性把握自然的“积极（*tātig*）面”从“与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中抽象而来，当然唯心主义并不会对真实、感性的活动有如此的认识”（MEW 3，第 5 页）。

4.3.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写道，自然研究者通过实验方法“认识到，理性只能看清由它设计而 1164
得出的结果；理性一定会根据恒定定律遵循其判断的原理，并使自然不得不解释理性的问题，但似乎不必像处于指导方针的束缚那样，仅受理性的束缚……理性必须一手借助原理……一手借助实验……而走向自然”（B XIIIf）。乍一看，这种观点如此绝妙地表征出了对物理学而言“思维方式的有利变革”，由此“自然科学首先被带到了科学的安全进程中”（B XIV）。但这同时（*zugleich*）

也是这一科学性突破向唯心主义的“转移”，是对实验方法的一种哲学式的榨取（*Ausbeutung*）。康德认为，这场革命的教义即在于“根据理性为自然所提供的，在自然中寻找（而不是归因于）它必须向自然学习的东西，以及它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东西”（同上）。这里的论证从一个完全令人信服的立场滑向了**唯心主义**（*idealistisch*）的立场。从前一立场出发，实验包含了基于“理性”计划而对实物的一些部分或方面进行的改变；从后一立场出发，作为知识经验对象的**实物本身**（*das Wirkliche selbst*）是由理性（部分地）建构而成的。

4.3.2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W3，第194页）和《逻辑学》（W6，第521—522页）中将实验表征为客观情况的实际变化，以便将实验的某些特点尽可能地剥离出来。但黑格尔最终也还是在哲学上“转移”了实验，因为对他而言，“知识向真理的驱动，**认知本身**（*Erkennen als solches*）——包括实验在内的理念的**理论**（*theoretisch*）活动”（*Enz* §225，W8，第378页），总是意味着纯粹事实的残余，这种残余阻碍了完整知识的发展：理论上的进程和结果仅在与他者相关时才是合理的。只有“完成同一件事的善意动力、**意志**、理念的**实践**（*praktisch*）活动”（同上），才会根据主体设定的目标改变客观情况，从而使主体在客体中反映自身，与客体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能获得对它的全面了解。

在已被提及的“制造者—知识”（2.3）的背景下，这可能是对以下想法的一种形而上的描述：我们能真正认识到的，只是那些我们能根据预先已有计划建构出来的，因此这些就像我们理解自行安排的计划一样易于理解。由此，黑格尔将康德已有的形而上—认识论观点转化为了伦理话语。 1165

4.4 黑格尔“唯心主义”地看待客观主义观点，对这种立场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中仍然激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实验方法视为由启蒙转向统治的现代范式。“人们向自然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自然，从而充分主宰自然和人类。”（1947，第8页）从经验研究的角度出发，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将实验式的试验规则也运用到社会中。霍尔茨坎普在对实验心理学的批评中否认了这一点。“它没有在实际生活中所处的不同和不一致的条件下去研究人们，而是在实验中人为地创造统一的条件，并将人作为其中的‘试验对象’。”（1972，第50页）为了研究作为实际行为体的他们，实验者在调查中也必须纳入对自身行为的考量。

4.5 葛兰西就此带来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他通过实验活动本身看到了一种

可能性的条件，这种条件可以避免客观导向的观察及其“唯心主义”的补充要素。这一转变将思想行为置于一个新的境地，使其位置抛除了虚幻一封闭式的绝对，并使作为“普遍性劳动”（马克思语）的科学成为可能。“科学家一实验者（也是）一个劳动者，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断受到实践的控制，反之亦然，直到理论与实践达到完美的统一。”（*Gef* 6，H. 11，§34，第1440—1441页）因此，葛兰西可以将实验本身视为“人与自然之间辩证性调解的首个模型”：对他而言，“科学经验”是“新型生产方法的第一个细胞单元，是人与自然之间积极统一的新形式的第一个细胞单元”（同上）。

参考文献：

T. Arabatzis, »The discovery of the Zeeman effect: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ory and experiment«, in: *Studies in History u. Philosophy of Science*, 23. Jg., 1992, 365–88; G. Bache-Lard, *Le rationalisme appliqué*, Paris 1949; D. Batens u. J. P. van Bendegam (Hg.), *Theory and experiment*, Dordrecht 1988; M. Beller, »Experimental accuracy, operationalism, and the limits of knowledge—1925 to 1935«, in: *Science in Context*, 2. Jg., 1988, 147–62; C. Bernard, *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médicine expérimentale*, Paris 1865; J. Brockmeier u. J. Rohbeck, »Beobachten, Kalkulieren, Eingreifen«, in: P. Damerow u. W. Lefèvre, *Rechenstein, Experiment, Sprache*, Stuttgart 1981, 171–221; G. Canguilhem, *Études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 des sciences*, Paris ^{2}1970 (127–71); R. P. Crease, *The play of nature. Experimentation as performance*,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1993; A. C. Crombie, *Styles of scientific thought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3 Bde., London 1994; J.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New York 1929; H. Daudin, »Spinoza et 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 sa discussion de l'expérience de Boyle«, in: *Ré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2, 1949, 179–90; H. Dingler, *Das Experiment. Sein Wesen und seine Geschichte*, München 1928; ders., *Über die Geschichte und das Wesen des Experimentes*, München 1952; P. Duhem, *La théorie physique: son objet, sa structure*, Paris ^{2}1914 (Kap. IV, VI); L. Fleck,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Tatsache* [1935], Frankfurt/M 1980 (Kap. 4.2); A. Franklin, *The neglect of experiment*, Cambridge 1986; ders., *Experiment, right or wrong*, Cambridge 1990; F. Fraunberger u. J. Teichmann (Hg.), *Das Experiment in der Physik*, Braunschweig-Wiesbaden 1984; P. Galison, *How experiments*

1166

end, Chicago 1987; D. Gooding, *Experiment and the making of meaning*,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0; ders., T. Pinch u. S. Schaffer (Hg.), *The uses of experiment*, Cambridge 1989; G. Galilei, *Le opere*, Ed. Nazionale, 20 Bde., Florenz 1890–1909 (Nd. 1964–66); I.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1983; K. Holykamp, *Theorie und Experiment in der Psychologie*, Berlin/E 1963, ^{2}1981; ders., *Wissenschaft als Handlung*, Berlin/W 1968; ders., *Kritische Psychologie. Vorbereitende Arbeiten*, Frankfurt/M 1972; *Grundlegung der Psychologie*, Frankfurt/M-New York 1983; M. Horkheimer u. Th.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947], Frankfurt/M 1971; F. James (H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atory: Essays on the place of experiment i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London 1989; M. H. Krieger, *Doing physics*, Bloomington-Indianapolis 1992; A. Lalande, *Les théories de l'induction et de l'expérimentation*, Paris 1929; R. Laymon, »Idealization and the testing of theories by experimentation«, in: P. Achinstein u. O. Hannaway (Hg.), *Observation, experiment, and hypothesis in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Cambridge/Mass. 1985, 147–73; H. E. Legrand (Hg.), *Experimental inquiries*, Dordrecht 1990; K. Lewin, *Gesetz und Experiment in der Psychologie*, Berlin 1927; G. E. R. Lloyd,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Greek science*, Cambridge 1991 (Kap. 4); E. Mach, *Erkenntnis und Irrtum,* Leipzig ^{3}1917 (201–19); L. Nowak, *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 Dordrecht 1980; M. Isnardi Parente, *Techne: Momenti del pensiero greco da Platone a Epicuro*, Florenz 1966; A. Pérez-Ramos, *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 and the maker's knowledge tradition*, Oxford 1988; H. Radder, *The material realization of science*, Assen 1988; H.-J. Rheinberger, *Experiment, Differenz, Schrift,* Marburg 1992; S. Shapin u. S.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Princeton 1985; H. von Staden, »Experiment and experience in hellenistic medicine«,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Bulletin*, 22.Jg., 1975, 178–99; H. Tetens, *Experimentelle Erfahrung*, Hamburg 1987; A. van Helden,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scientific instrument, 1550–1700«, in: J. G. Burke (Hg.), *The uses of science in the age of Newton*, Berkeley-Los Angeles 1984, 49–84; D. J. Warner, »What is a scientific instrument, when did it become one, and why?« *Brit. J. Hist. Sci.*, 23. Jg., 1990, 83–93; E. Weigl, *Instrumente der Neuzeit*, Stuttgart 1990; J. S. Wilkie, »Galen's experiments and the origin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in: D. J. Furley u. J. S. Wilkie *Galen on respiration and the arteries*, Princeton 1984, 47–57; E. Yakira, »Boyle et Spinoza«, in: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51. Jg., 1988, 107–24; V. P. Zoubov, »Beobachtung und Experiment in der antiken Wissenschaft«, in: *Das Altertum*, 5. Jg., 1959, 223–32; H. Zuckerman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N. J. Smelser (Hg.),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Cal. 1988, 511–74.

瓦尔·A. 聚希廷 撰
托马斯·劳格施廷 译为德文
陈扬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llgemeine Arbeit, Analyse/Synthese, Anatomie, Anschauender Materialismus, Brecht-Linie, Camera obscura, Determinismus, eingreifendes Denken,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Empirie/Theorie, Epistemologie, Erfahrung, Erkenntnistheorie, Ewigkeit, Falsifikationismus, Feuerbach-Thesen, Gesetz, Idealismus, Indeterminismus, Kausalität, Mensch-Natur-Verhältnis, Metaphysik, Naturbeherrschung, Objektivität, Praxis, Philosophie der Praxis, Spekulation,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Wissenschaftstheorie, Zellenform

表现主义论争
(Expressionismus-Debatte)

A: naqāš ḥaula al-tac'bīrīya.

E: expressionism debate.

F: débat sur l'expressionisme.

R: debaty o ėkspressionizme (дебаты о экспрессионизме).

S: debate sobre el expresionismo.

1937—1938年，莫斯科流亡文学杂志《言论》(*Das Wort*) 上展开的一场辩论，对艺术尤其是文学领域的理论建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场表现主义论争的出发点，是在苏联反法西斯斗争和推行斯大林路线的背景下，表现主义受到充满矛盾的美学评价和政治意识形态评价。许多流亡苏联的表现主义论争的参与者认为，表现主义包含的反理性主义、抽象的和平主义、"精神"和"权力"的唯心主义对立以及儿辈对父辈的反抗的无助姿态，最终导向了法西斯主义。反对者则指出，很多流亡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就曾是表现主义者。卢卡奇、恩斯特·布洛赫、汉斯·艾斯勒、安娜·西格斯和布莱希特等政治上处在同一阵营的作家的分歧的实质，与其说是对表现主义的评价，不如说是如何把握现实主义、形式主义、遗产和人民性 (*Volkstüm-*

lichkeit）等理论概念的问题，这些概念是评价表现主义的基础。它们共同组成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所要求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工具集合。这些概念日益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制约，狭隘化为标
1168 准的形式规则，阻碍了不同的现实主义概念，最终汇合成一种为多数人所认同的理论。但是对这些概念的深入探索开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库。产生于表现主义论争的评价模型，无论在民主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争论，如**形式主义论争**（*Formalismus-Debatte*）、**浮士德论争**（*Faustus-Debatte*）或围绕**比特菲尔德之路**（*Bitterfelder Weg*）的讨论，还是在联邦德国1968年运动引发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争论中，都具有核心意义。

1. **背景**。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文化机构的持续斯大林化导致了多家先锋派艺术与文学协会的解散。1932年，最后一个大型团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RAPP]）也宣告解散。同年，苏联的文件中首次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1934年8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的决议，即**苏联作家协会**。它的章程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其中部分地采用了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j Shdanows）的表述（Schmitt 1974，第47、389—390页）。

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会上，季米特洛夫呼吁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而早在1935年6月**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于巴黎召开时，要求建立人民阵线的情绪已经在法国蔓延。大会按乔纳斯·R.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的提议，决定创办一本以统一战线为宗旨的反法西斯文学月刊。布莱希特、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威利·布雷德尔（Willi Bredel）三位编者代表了这本杂志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跨度。《言论》杂志自1936年7月起在莫斯科发行；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刊登出了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一小部分也在其他流亡者期刊上发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加强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力度。以继承艺术遗产和不断增强人民性为导向，拉开了反对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运动帷幕（Günther 1984，第48页）。“遗产”和“人民性”等规范，依照斯大林主义主导并扭曲了发展方向，1936年，流亡莫斯科的恩斯特·奥特瓦尔特（Ernst Ottwalt）和卢卡奇在文章中宣称，这些
1169 规范对所有自我定位为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学，从而也对德语的流亡文学具有约束力（Ottwalt 1936）。卢卡奇在点名那些须与之斗争的文艺派别时，特别强调了表现主义（W 4，第235页）。在此，

他引用了自己1933年以俄语、1934年以德语发表的文章《表现主义的伟大与衰落》(Größe und Verfall des Expressionismus)。其中，表现主义被归结为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立场(第138、146页)，它"富有创造力的方法"(第137页)被批评为"抽空现实"(第142页)以及无关紧要的"表面特征"(第145页)的堆砌。表现主义展示的不是**总体性**(*Totalität*)，而只是伪装成总体性的替代品。在政治上，表现主义被归为魏玛共和国早期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一派(第125—126页)，并且是"日后走向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潮"之一(第121页；参见第146—147页)。凭借此次论辩，卢卡奇成为表现主义论争的核心人物。

2. 过程。《言论》的表现主义论争始于1938年9月克劳斯·曼(Klaus Mann)和阿尔弗雷德·库莱拉(笔名为伯恩哈德·齐格勒[Bernhard Ziegler])针对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的政治道路所发表的文章。克劳斯·曼先前仰慕贝恩，但他自30年代初起多次与他划清界限。他在《言论》上以贝恩1934年的随笔集《艺术与权力》(*Kunst und Macht*)为例再次总结了他的观点，其中，他要求将贝恩的个人发展和表现主义——在他看来捉摸不定的意识形态——二者区别对待(第39—40页)。流亡莫斯科的文艺干部库莱拉则持反对意见："贝恩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他本人，而**在于表现主义**。"(第53页)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表现主义被理解为通往"古典遗产的瓦解"(第57页)的发展道路的终点：贝恩的作品是这一瓦解过程的最后阶段，是"瓦解的瓦解"(第60页)。反法西斯阵营中依然存在的表现主义的残余被称为"杂质"(同上)。库莱拉要求复归德国古典主义的理念，例如"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同时响应斯大林主义方针，反对形式主义，要求"贴近人民和人民性"(同上)。文章开头便直言：表现主义的精神最终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第50页)。

如此一来，卢卡奇提出的论点变得更尖锐了。对未完全脱离自己过去表现主义经历的艺术家的排斥姿态，似乎与人民阵线的概念相矛盾。这一问题在后续讨论中受到了多次指责。赫尔瓦斯·瓦尔登(Herwarth Walden)对表现主义必然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观点反对得"最为强烈"(GA 4，第264页)。表现主义论争的大部分参与者以他们自身的履历驳斥了上述论点，流亡莫斯科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中，瓦尔登、弗兰茨·莱施尼策尔(Franz Leschnitzer)、古斯塔夫·冯·旺根海 1170

姆（Gustav von Wangenheim）、海因里希·福格勒（Heinrich Vogeler）乃至库莱拉自己都曾一度靠近表现主义。另外，布洛赫讽刺地回顾“多舛的命运”：就在库莱拉的论文发表前数周，**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纳粹官方用以攻击现代艺术的概念。——译者）展览会于慕尼黑开幕（布洛赫的文章参见 Schmitt 1973，第 180 页），其中，表现主义画作被当作主要物证展览。

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库莱拉对古典传统不加批判的接受和对表现主义瓦解古典遗产的指责，使他比起争论的参与者，更像是一位“坚定的古典主义者”（冯·旺根海姆语，参见 Schmidt 1973，第 119 页）。库莱拉从苏联的争论中采用的人民性概念同样具有争议。自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旺根海姆批评了对“贴近人民”的执着，认为“贴近人民”容易造成“水准低下”。他还反对将表现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单纯的对立面”，同时反对给表现主义与形式主义不加区分地画等号（第 106 页）。然而《言论》的编辑坚持把表现主义确定为形式主义的“局部现象”（第 131 页）。

3. 布洛赫与艾斯勒 vs. 卢卡奇。 3.1 布洛赫自“一战”结束后开始紧密参与表现主义和文艺先锋派的运动，他先前就回应过卢卡奇 1934 年论表现主义的文章。1935 年巴黎的作家大会上，布洛赫的演讲以纲领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us und Dichtung*）为题。为了冲破“古典主义的、照处方被去势的现实主义”（1935a，第 320 页）的固化模式，他提出一套表现主义和先锋派运动的美学理论，这一理论可以看作卢卡奇的对立面。例如，他明确把“童年”“童话”和“梦幻”（第 323 页）等非理性元素纳入文学素材，而争论对手卢卡奇在 1934 年的文章中曾表示，这些元素包含表现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倾向（W 4，第 147—149 页），然而除了巴黎演讲以外，布洛赫 1935 年还在《这个时代的遗产》（*Erbschaft dieser Zeit*）的前言中，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这一倾向（GA 4，第 16—17 页）。为了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阵线，不仅先锋派的素材，而且先锋派的艺术家也应获得拯救。1937 年底，布洛赫和艾斯勒在流亡者期刊《新世界舞台》（*Die neue Weltbühne*）上发表了一篇共同撰写的对话，从它的标题《先锋派艺术与人民阵线》（*Avantgarde-Kunst und Volksfront*）便能看出这是一篇介入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布洛赫和艾斯勒区分了政治上的先锋派和艺术上的先锋派：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进步意识”的人属于前者，而后者体现为“文艺创作中的前卫 1171

意识”（1972，第321页）。表现这种文艺意识的有勋伯格（Schönberg）、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康定斯基（Kandinsky）、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毕加索和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第322页），还有布莱希特以及艾斯勒自己（1938，第329页）。布洛赫和艾斯勒认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两类先锋有共同之处，甚至近乎一致”（1937，第325页）是毋庸置疑的。这一观点后又出现在彼得·魏斯（Peter Weiss）的《流亡中的托洛茨基》（*Trotzki im Exil*）和《抵抗的美学》（*Die Ästhetik des Widerstands*）中。

另外，布洛赫在巴黎演讲中分析了各种把现实当作封闭事物的观念。“马克思主义观察到的现实”是相互联系但并非连续的：是“**被中介的中断**”（*vermittelte Unterbrechung*）（1935a，第323页）。布洛赫认为现实是“开放的”且“客观碎片式的”；一种试图确切地还原此类现实的现实主义，没有“风格冲撞”（Stilbruch）和“蒙太奇”是做不到的（第324页）。这里提出了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核心定理，它们是布洛赫现实主义概念的组成部分，并且标志着他与卢卡奇的分歧。但归根结底，布洛赫与卢卡奇的对立来源于他们对现实有着不同的历史哲学认识。布洛赫认为，卢卡奇把一个“封闭的内在关联的现实”、一个“不间断的‘总体’”当作前提，他所营造了一个“客观主义封闭式的现实概念”；相应地，他“抵制任何分割世界图景的艺术尝试”，认为在充分利用“表层关联的瓦解”的艺术之中，只有“主观主义的瓦解”；在这样的视角下，“表现主义的分解和……蒙太奇尝试”必然就像是“空洞的游戏”（GA 4，第270页）。

对于艺术遗产的问题也存在分歧。布洛赫认为，不是表现主义，而是资产阶级在对待遗产时的“草率”（Schlendrian），使遗产瓦解（第268页）。他在《这个时代的遗产》中还强调，资产阶级虽然正在没落，但他们的遗产也应当继承，这是“恶意使用”（1935b，第15页）的问题。如何理解这种使用，布洛赫和艾斯勒在他们的第二篇对话《艺术的继承》（*Die Kunst zu erben*）（1938年初）中展开了讨论。艾斯勒以席勒著作为例，认为古典文学作品需要“去粗取精并加以整理”（Bloch 1972，第327页），以证明它们可用于反法西斯斗争。

3.2 卢卡奇在总结他对于表现主义论争的立场时，主要探讨了布洛赫的观点，并承认布洛赫为主要的争论对手（参见 Schmidt 1973，第195页）。他反驳布洛赫和艾斯勒建构的现代与古典的对立关系，认为他们将现代片面地等同于先锋派某种特定的“发展脉络”，即

从“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经过表现主义再到超现实主义”(第193页)。相反他们不提“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卢卡奇认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人物”有高尔基(Gorki)、托马斯·曼(Thomas 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等(第194页)。哪些作家和文学流派代表“当今文学的**进步**”(同上)，借这一问题，卢卡奇将表现主义的讨论引向他理论思考的一个焦点，即他这篇文章的标题“**问题在于现实主义**”(*Es geht um den Realismus*)提纲挈领所指出的(所以表现主义论争也称**现实主义论争**)。卢卡奇举出的现实主义大家有塞万提斯(Cervantes)、莎士比亚和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但主要模板是从巴尔扎克(Balzac)、托尔斯泰、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第227页)到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第216页)和福伊希特万格(第229页)的资产阶级长篇小说。这些作家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先锋”**，他们的著作中有“对现实的多样而丰富的理解”，卢卡奇认为这种理解在先锋派代表人物如乔伊斯(Joyce)、多斯·帕索斯、特列季亚科夫或爱伦堡(Ehrenburg)那儿是没有的(第216页)。

卢卡奇的现实主义观从一个阐释细致、带有谨慎的斯大林主义批判的人民性概念出发。其核心是保护性地对待艺术遗产(第223页)；与之相反，布洛赫认为遗产是“一堆死物”，人们可以将它“随意组合”(第224页)。尤其令卢卡奇不满的是艾斯勒关于如何对待席勒作品的建议。卢卡奇认为这只表现出傲慢随意地对待**遗产**的态度(第224页及以下)。最后，卢卡奇探讨了表现主义的争论对人民阵线的影响。他远没有弱化自身立场的排斥姿态，而是以人民阵线的名义坚持“与帝国主义时期的反现实主义的传统作斗争”(第230页)。卢卡奇还提到，布莱希特近来以一部“小型独幕剧”——《第三帝国的恐惧和苦难》(*Furcht und Elend des Dritten Reiches*)里的《密探》(*Der Spitzel*)一幕——也踏入现实主义者的行列(第229页)，这番表示可以被视为和解的姿态。 1173

4. **西格斯 vs. 卢卡奇**。西格斯以与卢卡奇通信的方式回应了来自莫斯科的参辩邀请。1939年夏天，即表现主义的争论结束后一年，信件刊登于莫斯科的德语文学杂志《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e Literatur*)。尽管在政治的基本问题上有诸多共识，但西格斯和卢卡奇对于现实主义概念的地位产生了分歧。西格斯区分了对这个概念的历史的和元历史的使用，二者分别对应“**今天的**

现实主义”和“一般的现实主义”（参见 Schmitt 1973，第 269 页）。西格斯认为卢卡奇力图用超历史的概念来衡量所有的、包括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实主义（第 284 页），与此不同，她支持历史地特定地使用概念，这种做法承认那些受卢卡奇抵制的现代流派，如印象主义也具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方面（第 271 页）。

西格斯坚持认为艺术的方法是多样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化的“现实意识”（第 271 页），在不同时期，是以不同的方法实现的。她描绘了托尔斯泰提出的一种艺术创作过程的二阶段模式。在第一阶段，艺术家“看似无意识和直接地”接受现实；在第二阶段，无意识的东西又变成有意识的（第 266 页）。西格斯批评表现主义论争，这场讨论主要围绕第二阶段，从而是一场“关于方法的讨论”（同上）。但是在某些时期的作品中，导致现实主义缺乏的不是艺术方法的选择，而是“停滞”在上述模式的第一阶段（第 268 页）。

西格斯认为，这种停滞的原因不在于艺术创作者的主观性，而在于现实本身：特定时期里，它对艺术家们施加了“一种震惊影响”（第 268 页）。她引用克莱斯特（Kleist）作为例证（同上）：克莱斯特和伦茨（Lenz）、荷尔德林（Hölderlin）、比格尔（Bürger）、京特罗德（Günderode）（第 265 页）同属于西格斯的理论文章和随笔中屡次征引的人物，他们形成了卢卡奇奉为典范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叙事文学作家的对立面。西格斯在对照歌德和她列出的作家时，指出了他们作品结构的不同。歌德能够完成他的作品，并赋予它“深度和广度”及“总体性”（同上），西格斯提 1174
到的几位作家的创作却早早中断了。克莱斯特等作家无法让艺术作品走向某个“合题”（第 266 页），这与“危机时代”（第 268 页）和“过渡时期”（第 289 页）的到来有关，这样的时代经常会导致出现“突然的风格冲撞”“实验”和“奇特的混合形式”（第 268 页），而西格斯在她的时代看到了与之相似的情况。

卢卡奇与反驳布洛赫和艾斯勒时一样，举出另一条传承脉络以反驳西格斯：拜伦、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卡莱尔（Carlyle）、曼佐尼（Manzoni）、雨果、梅里美（Mérimée）、巴尔扎克、司汤达——他们是曾令晚年歌德产生“热烈的兴趣”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第 281 页）。未完成的、不协调的事物再次被排除在卢卡奇的名单之外。使争论的双方更加难以达成共识的是，卢卡奇把他予以否定的事物与颓废派的“中心问题”（同上）关联起来，对此，他曾在 1938 年的著作《马克思和意识形态的衰落问题》（*Marx und das Problem des ideologischen Verfalls*）中进行过详

细的阐述。诸如“意识形态的颓废”（W 4，第 252、253 页）或“颓废时代的意识形态”（第 274 页）等论述和措辞表明，这里所思考的更多是政治、历史的范畴，而非美学范畴。德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在文学上带来了一种“对表达事物原貌望而却步”（第 254 页）的反现实主义。就连主观上诚实的作家也屈从于这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此卢卡奇列举了“韦德金德（Wedekind）、凯泽（Kaiser）、哈森克勒费尔（Hasenclever）”等“颓废派剧作家”（第 296 页）以及布莱希特（1938，第 133 页；W 4，第 285 页，此处没有提到布莱希特）。在与西格斯的通信中，卢卡奇依旧坚持“绝对必要的反对颓废派的斗争”（参见 Schmitt 1973，第 284 页），他认为“行会式的‘先锋主义’”（第 283 页）也是颓废派，这令人想到布洛赫、艾斯勒和布莱希特等人。西格斯则不赞成将颓废概念运用到自己人身上；在她看来，这一术语只适用于拥护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诗人、血与土地的鼓吹者”，例如马里内蒂（Marinetti）、邓南遮（d'Annunzio）和他们的“德意志同僚”（第 289 页）。

5. **布莱希特**。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斟酌，在事先向库莱拉表明立场之后（Brecht 1981，第 372 页及以下），布莱希特当时未将他关于表现主义论争的大量札记公之于众。因此，理论的舞台被拱手让与他的对手们。他们与布莱希特派（Brecht-Linie）在战后的民主德国重新爆发了争论：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形式主义论争之中（Mittenzwei 1978）。这次，布莱希特也没有参与。这符合他在 1938 年夏天表现主义论争的高潮时就已经决定的策略，正如他当时的谈话伙伴瓦尔特·本雅明所说（GS VI，第 535 页）：不要在“理论的区域”迎战卢卡奇。即便在战后，布莱希特生平也只有一篇关于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发表（1954），还有一篇发表于他离世后不久（1958）。直到 1966 至 1967 年《文学与艺术论文集》（*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的问世，才使人们得以窥探贯穿在布莱希特札记中的理论建构。1989 年开始出版、按照时间顺序整理作品的《布莱希特全集》，显示布莱希特在 1938 年夏秋时期，曾持续研究表现主义论争所提出的问题。

1175

在通信和《工作日志》（*AJ*）中，布莱希特对表现主义论争的时间点和卢卡奇的规范要求反应激烈：“现实主义论争如若这般继续，会阻碍创作。”（*AJ*，1938 年 8 月 18 日；GA 26，第 321 页）争论对手被斥为“马虎厮主义者”（Murxisten，将“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en］改动一个字母新创的词，或取德语 Murks［草率马虎、粗制滥造］之意。——译者）

（1938年9月12日，第324页）。当卢卡奇将他与颓废派相提并论时，他在一封写给贝歇尔的信件中要求解除他同《国际文学》杂志的合作关系（Brecht 1995）。从本质上说，对策略的思考决定了布莱希特的行为。他始终强调联合，例如，反法西斯主义文学同现实主义“荣辱与共”（GA 22.1，第422页），或者，必须同某些“纯粹形式主义的倾向”做斗争，以获得一种“介入社会的文学”（第423页）。布莱希特还称，《言论》应作为“广泛的反希特勒阵线的刊物”，而不是变成使矛盾“过分尖锐化”（第434页）的争论场地，这样的话令人想起人民阵线政策。平息式的套语多次出现：“必定存在一些误解。”（第421页）布莱希特尝试在方法论上缓和这场争论：他不赞成抽象化的、将整个流派和艺术家团体混为一谈的批判，而推荐对具体个例的研究（第422、444页）。

与卢卡奇一样，人民性的概念也处于布莱希特思考现实主义的中心位置。不同的是，卢卡奇试图将概念普遍化，布莱希特则通过历史化的批判来获取它。布莱希特认为这一概念绝不是“无历史的、无可挑剔的、不含歧义的”（第407页），“尽可能简化的要求”是这个概念所固有的弦外之音，使人民表现为“落后者”（第415页）。布莱希特的人民性艺术概念被纳入阶级斗争，这种艺术是一种“为了被少数人压迫的、必定成为政治主体的多数人”的艺术（第407页）。人民性和现实主义应满足提供“忠于现实的映像”（第406页）的要求，而且是为了“正在斗争的人民”（第408页）。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的对立不在于（一部分可比较的）他们各自如何展开概念，而在于布莱希特的人民性概念系统地放弃了美学标准。

布莱希特认为，现实主义概念也要首先“清除”许多淤积在它上面的意义：有效的不是“永恒的美学法则”，运用现实主义文学要取决于“怎样、何时以及为了哪个阶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黑格尔式扬弃，无法简单地从“特定的现有的作品”中——布莱希特提到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提取出来（第408页）。关于某一种“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文学中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例子”（同上）。与卢卡奇开列各项美学准则的做法相反，布莱希特1938年所作、1954年首次发表的札记的标题就提纲挈领地表明了让现实主义概念保持开放的观点：《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广阔性与多样性》（*Weite und Vielfalt der realistischen Schreibweise*）（GA 22.1，第423—424页）。

在布莱希特的现实主义概念中，美学是从社会现实来考量的。例如，《工作日志》里写道，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

的缺乏“不仅是作者的过失，更主要是资本主义的‘过失’”（GA 26，第321页）——这一思路也可在西格斯那儿找到。布莱希特最重要的定义尝试以这样的表述开头：现实主义就是“揭示社会的因果关系集合体（Kausalkomplex）”（GA 22.1，第409页）。因果关系集合体或“因果联系”（Kausalnexus）（第456、461页）是一个在布莱希特的政治美学中时常出现的概念。它标明了辩证的运动法则，没有这些法则就无法获得社会关系的“实用性”映像（GA 21，第422页；22.1，第169页）。卢卡奇在纪德（Gide）、乔伊斯和德布林（Döblin）等作品缺乏因果联系的当代作家那儿只看出一种“衰退”和“长篇小说技艺的瓦解”（GA 22.1，第456页），而布莱希特则谨慎地摆脱这一观点。他概括那些
1177 作家的特点是：在描述时避开置身因果联系之中的“个体的人”，从“严格的”因果关系转向“统计学的”因果关系，吸收科学中的“不确定因素”，最后只展示“主观的看法”（同上）。从上述概括中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对这条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的批判兴趣。

被批判的还有形式主义概念。布莱希特反对这个概念对新艺术形式隐含的和明确的拒斥：“新问题……需要新方法。”（第410页）哪里有实用性的映像，哪里就有某种现实主义，与形式无关。现实主义不是形式之物（第419、423页），布莱希特将这一反复强调的主导思想精炼地表述为：“关于文学形式的问题，必须向现实询问，而不是向美学询问。”（第433页）但布莱希特所谈的形式的问题是从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去研究并在技术（Technik）的概念中去理解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整个“移情技术”“变得可疑”（第462页），情绪不是只通过移情来达到（第500页）。对宣传鼓动和无产者文化运动感兴趣的布莱希特致力于调解先锋主义的技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拒绝对蒙太奇和内心独白做出如同教会绝罚的处理（第421页）；他为乔伊斯（第441页）、多斯·帕索斯（第484页），偶尔包括卡夫卡（GA 22.2，第630页）的写作方法进行批判式的辩护，指出自己在《三毛钱小说》（*Dreigroschenroman*）中也使用了蒙太奇的技术（GA 22.1，第484页），还将他提出的陌生化手法（Verfremdung）归为上述新技术（第465页）。面对时事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所带来的困难，布莱希特得出辩证的、激励艺术生产者的结论：“不要承接好的旧事物，而要承接坏的新事物。”（第457页）

6. **接受**。6.1 表现主义论争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接受史实则是卢卡奇和布莱希特的接受史。在苏联占领区或

民主德国，卢卡奇自战后开始不间断地发表了大量作品，其中就有他在表现主义论争时期所写的最重要的文章。对于民主德国大学里建立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方向，他有“不容低估的影响”（Mittenzwei 1978，第79页）。1955
1178 年，汉斯·迈耶还赞赏卢卡奇在批判先锋派时提出的“叙述与描写”的范畴（1967，第242页）。而1956年卢卡奇参与匈牙利纳吉（Nagy）政府之后，1958年洪堡大学召开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会鲜明地展现了外界的态度转变，当时除了有针对卢卡奇的集体抨击，还出现了数篇标志着“转向布莱希特”（Mittenzwei 1978，第80页）的论文。

民主德国初期，布莱希特的影响主要源于他自己的剧本的上演。他在民主德国的文学研究中被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局外人”（第80—81页），在形式主义论争中，一位先前的对手再次将他归为“远离人民的颓废派”一类（第38页）。然而自卢卡奇受冷遇以后，布莱希特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思考，开始日益吸引人们的兴趣，促成了由沃纳·赫希特（Werner Hecht）所编的《文学与艺术论文集》（*Schriften zur Literatur und Kunst*）（1966年于民主德国，1967年于联邦德国）的出版。此书的主体是关于表现主义论争的札记和文章。1966年，联邦德国的克劳斯·弗尔克尔（Klaus Völker）援引《文学与艺术论文集》强调指出，布莱希特和卢卡奇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对伟大的敌手（Völker 1966）。文章反映了由以下两方面所决定的影响范围，一方面是阿多诺对卢卡奇作为一名犯了“牺牲知性”（sacrifizio dell' intelletto，指应权威的要求而搁置自己的思想。——译者）罪的学者（GS 11，第252页）的抨击以及阿多诺对布莱希特几乎同样强烈的批判（第415—416页），另一方面是正在组建的新左翼学生团体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对布莱希特这部论文集的阅读热情在1968年运动自我定位为激进左派的团体中，引发了与弗尔克尔类似的针对卢卡奇的论断：“他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共同之处。”（1966，第98页）

弗尔克尔只是附带地谈及表现主义论争，而民主德国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维尔纳·密滕茨威1967年的文章则清晰地论述了争论的概要、背景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但标题《布莱希特与卢卡奇的争论》（*Die Brecht-Lukács-Debatte*）界定范围的方式是成问题的，原因首先是，这样边缘化了艾斯勒、布洛赫或西格斯等人对于表现主义论争的发言，其次是暗示将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两名对手解读为对立的两极。文章详细汇报了布莱希特的理论立场并按

照他理论的内在理路呈现出来，但密滕茨威同时努力消除对卢卡奇作为“修正
1179 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抵触情绪（1967，第239页）。密滕茨威评价二人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的顶峰”（第236页），这篇论文1968年又发表于西柏林的《观点》杂志，启发了众多后续的研究。

在联邦德国，海尔加·加拉斯（Helga Gallas）1971年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BPRS）内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争议的分析，重建了表现主义论争的前史。加拉斯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标题如此——延续了由弗尔克尔开启的亲布莱希特、反卢卡奇的态度，视卢卡奇为苏联官方文学理论的斯大林主义代言人（Gallas 1971，第13、69页）。加拉斯作为编辑，在杂志《选择》（*Alternative*）上推进了围绕表现主义论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而她对卢卡奇的立场的评价依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1972，第123页）。1972年就已经有参与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探讨首先暴露了联邦德国内的讨论当前的裂痕（Baier 1978，第37页）。表现主义论争在联邦德国的接受阶段的高潮，是汉斯-尤尔根·施密特（Hans-Jürgen Schmitt）所编文集的问世，这部文集收录了表现主义论争的所有重要文章，尤其是布洛赫和艾斯勒的文章、西格斯与卢卡奇的通信以及布莱希特的文章（Schmitt 1973）。次年，施密特和戈德哈德·施拉姆（Godehard Schramm）还出版了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会议论文集（1974）；由此，关于表现主义论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讨论有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基础。

不同于在联邦德国，密滕茨威的文章在民主德国影响甚微（Mittenzwei 1978，第117页）。1975年，密滕茨威大幅修改文章以后，再次在民主德国发表。他坚持认为布莱希特和卢卡奇之间存在直到最后都“无法调和的美学立场的对立”，但他鉴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对卢卡奇的批判强调指出，两者的立场都应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内部（Mittenzwei 1975，第162、441页）。文集的另一篇文章讨论艾斯勒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浮士德论争中同样受到猛烈批判的理论观点。君特·迈耶（Günter Mayer）和格奥尔格·克内普勒（Georg Knepler）承认艾斯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的“理论成就”方面甚至部分地超越了卢卡奇（1975，第394页）。库尔特·巴特（Kurt Batt）特别分析了西格斯和卢
卡奇的通信中对遗产的看法。他将二人 1180
各自的传承脉络之间的对立解释为世代差异的表现，这一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现实经验（1975，第216页）。卢卡奇的

美学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不是没有受到“个人崇拜”的影响，当时，他将西格斯所提出的主观问题贬低为“主观主义”（第128页）。

密滕茨威1975年论文里的物质美学（Materialästhetik）范畴，主要取自布莱希特和艾斯勒关于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再度注入重要动力。这一概念将布莱希特周围的艺术生产者——除艾斯勒以外还有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欧文·皮斯卡托（Erwin Piscator）和本雅明——与处在另一美学传统中的苏联先锋派代表如特列季亚科夫、马雅可夫斯基、阿尔瓦托夫（Arwatow）和爱森斯坦（Eisenstein）联合起来（1976，第178—179页）。于是，没有被卢卡奇预留位置的共产主义艺术先锋派获得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理论地位，既使它能够成为20世纪奉为经典的现代派的组成部分，又能够对立于现代派以及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切萨雷·卡塞斯（Cesare Cases）在他为1974年联邦德国出版的文集《卢卡奇的教育剧》（*Lehrstück Lukács*）（Matzner 1974）所写的导言中认为，只有当“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基础改变，并且改变程度使扬弃得以可能”（第41页），才能解决争论。施密特1978年编辑的文集《与卢卡奇的争论》（*Der Streit mit Georg Lukács*）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似乎得而复失。该书不再涉及“社会主义”作家的立场（第10页）这处提示，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毕竟那些与卢卡奇的争论几乎只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洛萨·拜尔（Lothar Baier）认为布莱希特的理论不具任何连贯性（第71页），相反卢卡奇则具有（第74页）；布克哈特·林德纳（Burkhardt Lindner）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悬置现实主义概念（第119页）。

20世纪80年代，针对表现主义论争及所谓布莱希特与卢卡奇之争的论述失去了紧贴现实的倾向：六七十年代的接受也被历史化了（Kliche 1981，第495页）。在民主德国的《卢卡奇的著作及影响》（*Zum Werk und Wirken von Georg Lukács*）（Buhr/Lukács 1987）中，至多还有古德伦·克拉特（Gundrun Klatt）关注表现主义论争的前史，弗里茨·通贝格（Fritz Tomberg）关注表现主义论争对卢卡奇后期著作的影响。联邦德国的克诺普夫（Knopf）回顾布莱希特关于表现主义论争文章的出版时，评价它是“小的轰动，却有巨大影响”，因为通过它，“学生造反者表达并形成了在理论上对现实主义的理解”（1986，第491页）。在《社会主义文学辞典》（*Lexikon sozialistischer Literatur*）中，表现主义论争再次得到了恰当的总结（Schiller 1994）。

1181

6.2 1956年5月，卢卡奇在意大利的巡回演讲上宣读了《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Wider den missverstandenen Realismus*）。表现主义论争中所提出的颓废派与现实主义的对立关系——这里举的例子是卡夫卡和托马斯·曼——得到更进一步强化（W 4，第550页），对此，即使倾向于卢卡奇的意大利批评家们也感到不解（Franco Fortini 1968，第160页；Galvano Della Volpe 1978，第236页）。1969年，卡塞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例，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在国际范围完成的模式转换："从卢卡奇转向布莱希特。"（1969，第12页）在法国，卢卡奇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Die Gegenwartsbedeutung des kritischen Realismus*）和颓废概念也引发了异议。安德烈·吉塞尔布莱希特（André Gisselbrecht）为先锋派运动辩护，并建议以流亡期间布莱希特反驳卢卡奇时所代表的"开放的现实主义构想"（1965，第32页）为指向，扩展现实主义概念。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吉塞尔布莱希特批评卢卡奇的理论，称它主要建立在"内容的美学"之上（1977，第106页），从而呈现出一种"理论的空位"（第107页）。在《欧洲》（*Europe*）杂志卢卡奇专题特刊的前言中，克劳德·普雷沃斯特（Claude Prévost）提醒人们不要让对布莱希特—艾斯勒—布洛赫这条脉络的认同感汇合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他认为更有成效的做法是将布莱希特和卢卡奇的两极对立视为不可消除的张力（1979，第10页）。

在英语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卢卡奇复兴运动（Bahr 1973）。受此影响，布莱希特关于表现主义论争的理论著作的英译本也随之面世，最初于1974年刊登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后来1977年见于《美学与政治》（*Aesthetics and Politics*）。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论争"这个概念总结表现主义论争，并将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阐发为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后结构主义否认艺术代表外在于艺术存在的现实（1977，第199页）。反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强制风格（第209页）；现代主义最后一次可能的革新也许正是现实主义（第211—212页）。

参考文献：

T. W. Adorno, »Erpresste Versöhnung. Zu Georg Lukács: ›Wider den missverstandenen Realismus‹« (1958), in: GS 11, 251–80; ders., »Engagement« (1962), in: GS 11, 409–30;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Ernst Bloch, Georg Lukács, Bertolt Brecht, Walter Benjamin, Theodor Adorno*, hgg. v. F. Jameson, London 1977; E. Bahr, »Die

angelsächsische Lukács-Renaissance«, in: H.-L. Arnold (Hg.), *Text und Kritik, Sonderband Georg Lukács*, 1973, 70–5; L. Baier, »Streit um den Schwarzen Kasten. Zur sogenannten Brecht-Lukács-Debatte« (1972), in: H.-L. Arnold (Hg.), *Text und Kritik, Sonderband Bertolt Brecht I*, ²1978, 37–44; K. Barck u. B. Burmeister (Hg.), *Ideologie—Literatur—Kritik. Französische Beiträge zur marx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Berlin/DDR 1977; K. Batt, »Der Dialog zwischen Anna Seghers und Georg Lukács«, in: Mittenzwei 1975, 204–48; E. Bloch, »Marxismus und Dichtung« (1935a), in: ders. 1974, 317–25; ders., »Vorwort zur Ausgabe 1935« (1935b), GA 4, 15–20; ders., »Der Expressionismus, jetzt erblickt« (1937), GA 4, 255–63; ders., »Diskussionen über Expressionismus« (1938), GA 4, 264–75; ders., »Das Problem des Expressionismus nochmals« (1940), GA 4, 275–79; ders., *Erbschaft dieser Zeit*, erw. Ausg., GA 4, Frankfurt/M 1962; ders., *Die Kunst, Schiller zu sprechen. Und andere literarische Aufsätze*, Frankfurt/M 1969; ders., *Vom Hasard zur Katastrophe. Politis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34–1939*, Nachw. v. O.Negt, Frankfurt/M 1972; ders., *Ästhetik des Vorscheins*, hgg. v. G. Ueding, Bd. 1, Frankfurt/M 1974; ders. u. H. Eisler, »Avantgarde-Kunst und Volksfront« (1937), in: Bloch 1972, 318–25; dies., »Die Kunst zu erben« (1938), in: Bloch 1972, 325–31; B. Brecht, »Weite und Vielfalt der realistischen Schreibweise«, GA 22.1, 423–34 (davor teilw. in: *Versuche*, H. 13, Frankfurt/M 1954, 99–107); ders., »Volkstümlichkeit und Realismus«, GA 22.1, 405–13; ders., *Briefe*, hgg. v. G. Gläser, Frankfurt/M 1981; ders., Brief an Johannes R. Becher vom 8. Sept. 1938, in: *SuF*, 47. Jg., 1995, H. 5, 669–70; M. Buhr u. J. Lukács (Hg.), *Geschichtlichkeit und Aktualität. Beiträge zum Werk und Wirken von Georg Lukács*, Berlin/DDR 1987; C. Cases, *Stichwort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Kritische Notizen* (1963), Wien 1969, 399–412; ders., »Einleitung«, in: Matzner 1974, 9–43; *Das Wort* (1936–1939), Reprint, 10 Bde. u. Registerband, Berlin/DDR 1968; G. Della Volpe, *Kritik des Geschmacks. Entwurf einer historisch-materialistischen Literaturtheorie und Ästhetik* (1960), Darmstadt-Neuwied 1978; H. Eisler, »Antwort an Lukács« (1938), in: ders. ²1985, 433–35; ders., *Musik und Politik*, GW, Serie III, Bd. 1, hgg. v. G. Mayer, Leipzig ²1985; F. Fortini, »Lukács und Adorno« (1959), in: ders., *Die Vollmacht. Literatur von heute und ihr sozialer Auftrag*, übers.

F. Kollmann, Wien 1968, 151–61; H. Gallas, *Marx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Kontroversen im Bund proletarisch-revolutionärer Schriftsteller*, Neuwied-Berlin/W 1971; dies., »Zur Brecht-Lukács-Kontroverse. Bemerkungen zum Beitrag Anders/Klobusicky und zu Lukács' Wangenheim-Kritik«, in: *Alternative*, 1972, H. 84/85, 121ff; A. Gisselbrecht, »Propositions pour une critique marciste«, übers. v. H. von Baby u. W. Krege, in: *Alternative*, 1965, H. 40, 27–33; ders., »Marxismus und Literaturtheorie« (1971), übers. v. U. Harz, in: K. Barck u. B. Burmeister 1977, 103–14; H. Günther, *Verstaatlichung der Literatur. Entstehung und Funktionsweise des sozialistisch-realistischen Kanons in der sowjetischen Literatur der 30er Jahre*, Stuttgart 1984; F. Jameson, »Reflections in Conclusion«, i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196–213; D. Kliche, »Objektivität der Form und ›naturwüchsiger Realismus‹. Realistische Abbildung bei
1183 Lukács, Becher, Brecht«, in: D. Schlenstedt u. a., *Literarische Widerspiegelung*, Berlin/DDR 1981, 459–507; J. Knopf, »Expressionismus-Debatte. Realismus«, in: ders., *Brecht Handbuch Lyrik, Prosa, Schriften*, Stuttgart: 1968, 491–94; A. Kurella (unter d. Pseud. B. Ziegler), »›Nun ist dies Erbe zuende...‹« (1937), in: Schmitt 1973, 50–60; G. Lukács, »Marx und das Problem des ideologischen Zerfalls«, in: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 8. Jg., 1938, H. 7, 103–43; ders., *Die Gegenwartsbedeutung des kritischen Realismus*, W 4, Neuwied-Berlin 1971; K. Mann, »Gottfried Benn. Die Geschichte einer Verirrung« (1937), in: Schmitt 1973, 39–49; J. Matzner (Hg.), *Lehrstück Lukács*, Frankfurt/M 1974; G. Mayer u. G. Knepler, »Hätten sich Georg Lukács und Hanns Eisler in der Mitte des Tunnels getroffen? Zur Polemik zwischen grundsätzlich Gleichgesinnten«, in: Mittenzwei 1975, 358–95; H. Mayer, »Zwei Ansichten über Georg Lukács« (1955 u. 1965), in: ders.,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der Zeit*, Reinbek b. Hamburg 1967, 236–49; W. Mittenzwei,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SuF*, 19. Jg., 1967, H. 1, 235–69 (wieder u. d. T. »Marxismus und Realismus. Die Brecht-Lukács-Debatte«, in: *Argument*, 10. Jg., 1968, Nr. 46, 12–43; wieder in: Matzner 1974, 125–64); ders. (Hg.), *Dialog und Kontroverse mit Georg Lukács. Der Methodenstreit deutscher sozialistischer Schriftsteller*, Leizig 1975; ders., »Brecht und die Schicksale der Materialästhetik«, in: H. Claas und W. F. Haug (Hg.), *Brechts Tui-Kritik. Aufsätze, Rezensionen, Geschichten*, AS 11, Berlin/W-Karlsruhe 1976, 175–

212 (zuerst in: *Dialog 75. Positionen und Tendenzen*, Berlin/DDR 1975, 9–44); ders., *Der Realismus-Streit um Brecht*, Berlin/DDR-Weimar, 1978; E. Ottwalt, »In diesen Tagen« (1936), in: ders., *Schriften*, hgg. v. A. W. Mytze, Berlin/W 1976, 207–19; C. Prévost, »Lukács actuel?«, in: *Europe*, 57. Jg., 1979, H. 600, 3–10; D. Schiller, »Expressionismus-Debatte 1937–1939«, in: S. Barck u. a. (Hg.), *Lexikon sozialistischer Literatur. Ihre Geschichte in Deutschland bis 1945*, Stuttgart 1994, 141ff; H.-J. Schmitt (Hg.), *Die Expressionismusdebatte. Materialien zu einer marxistischen Realismuskonzeption*, Frankfurt/M 1973; ders. (Hg.), *Der Streit mit Georg Lukács*, Frankfurt/M 1978; ders. u. G. Schramm (Hg.), *Realismuskonzeptionen. Dokumente zum 1. Allunionskongress der Sowjetschriftsteller*, Frankfurt/M 1974; K. Völker, »Brecht und Lukács. Analyse einer Meinungsverschiedenheit«, in: *Kursbuch*, 1966, H. 7, 80–101 (wieder in: *Alternative*, 1969, H. 67/68, 134–47).

罗伯特·科恩（Robert Cohen） 撰
焦燕屏 译，曹旸 校

参见：

Ästhetik, ästhetische Theorie, Antifaschismus, Autonomie der Kunst, Avantgarde, Brecht-Linie, dialektisches Theater, Dummheit in der Musik, eingreifendes Denken, Engagement, Epoche, Erbe, Faustusdebatte, Formalismus, Fotomontage, Futurismus, ideologische Formen, Kunst, Kultur, kulturelle Identität, Kunstpolitik, Literatur, Literaturverhältnisse, Materialästhetik, Moderne, Parteilichkeit, politische Ästhetik, Proletkult, Realismus, Sickingendebatte,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Stalinismus, Tradition, Verfremdung, Volksfront, Volkstümlichkeit, Widerstandsästhetik

外在性（Exterioritāt） 1184

A: ḫārigīya.

E: exteriority.

F: extériorité.

R: vnešnee (внешнее).

S: exterioridad.

对卢卡奇、布洛赫和柯尔施而言，总体性（Totalität）是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范畴和视域。事实上，如果人们把存在视域（Seinshorizont）理解为将存在者在其环境中确立为可被理解者，那这就

是总体性。“资本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Ms 61-63*，MEGA II.3.6，第2163页）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K I*，MEW 23，第329页)，资本的存在在本体论上为货币、商品等提供了根据。特别是对任一本体论、世界筹划或体系而言，总体性就是范畴。然而，总体性却以另一个先在的范畴为前提，没有它就没有总体性，它就是外在性或外部性（Äußerlichkeit)。后者是未言明的前提，即“从何处出发”去思考总体性。对总体性的批判总是会假定一种外在于它的立场。在现实意义上，外在性是资本之他者的位置，是尚未归入资本的、活生生的劳动者的位置（事前的)，或者是其之后（由于失业）被逐出资本时停止工作的位置（事后的)。外在性是“解放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参见 E. Dussel，*Philosophie der Befreiung*，Berlin-Hamburg 1989，第54—64页)。

1. **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外在性。**虽然也可以援引更早的、间接的引文，但这里仅指出最重要的文本。在1843年底或者也可能1844年初，但无论如何是在巴黎，并且是在一个动荡的时期，马克思写道：“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MEGA I.2，第181—182页；MEW 1，第390页）在这一文本中，外在性的问题就已经浮现了。无产阶级借此“**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MEGA I.2，第182页；MEW 1，第391页)。在这里，无产阶级是作为绝对的被统治者出现的，但同时也作为总体性（资本主义秩序）的绝对反抗者出现。这涉及的是一种**实证性**的矛盾，它超越了统治秩序的视域；从这种实证性出发，眼下的状况（“**人为造成**的贫民”）就被否定了，成为“关涉已经生成了的世界”的原则（MEGA I.2，第182页；MEW 1，第390—391页)。这一原则不以**总体性**或有效的秩序为基础，而是在其外部。 1185

2. **作为超然于存在的无。**同样在1844年，确切地说，是自恩格斯从英国寄给马克思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以来，马克思开始对经济学进行哲学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二笔记中，他写道：“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

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MEGA I.2，第248页；MEW 40，第523—524页）这些幽灵处于总体性（“王国”）的外在性之中。马克思又立刻补充道：“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MEGA I.2，第249页；MEW 40，第524—525页）对马克思而言，作为非工资依赖者（在被纳入资本之前或之后），人的本质就是对于资本而言**不存在**的“幽灵”。它根本就是**无**。它是超本体论的东西、超然于存在的东西、外在的东西、“充实的无”、外在性的本质。一旦被纳入资本之中，它就化作“绝对的无”，因为为了转变为一个（异化了的：被纳入总和的）资本的规定，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自主的主体了（在资本的外在性之中，缺乏生命能力）。然而，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领域（非资本在这一领域中是现实的），那么在一个人**被纳入资本之前**，就不可能将他与资本分离开来。外在性就是这一领域、这一“位置”。

3. 非资本（*Nicht-Kapital*）作为肯定的和否定的外在性。

十三年后（1857年在伦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第三笔记中写道：“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 1186
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劳动……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MEW 42，第217页；MEGA II.1.1，第216页）当劳动没有“被合并”、被纳入总和之前，劳动就仍然位于资本的外在性之中，并且是它的前提（“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MEW 42，第218页；MEGA II.1.1，第216页）。从外在性出发，活劳动通过劳动契约被纳入剩余价值生产的真实过程之中。

在资本“之前”或“之外”，活劳动就已经是现实的了，虽然它不是在资本的外在性中的资本，但它仍然是价值源泉（源泉，而不是基础，因为资本的**基础**是“价值的增殖”）。从资本的外在性出发，活劳动是潜在的价值创造者（基础的创造者）：未来价值的**肯定的源泉**。在外在性中，活劳动从否定的方面来说被确定为贫穷，从肯定的方面来

说则被视作创造价值的源泉。活劳动是真正的现实性、人格、肉体性（Leiblichkeit）。此外，外在性即活劳动也是对总体性，即对资本进行批判时可供使用的一个角度。

4. 作为创造性源泉的活劳动："赤贫者"。1861 年 8 月，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再度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MEGA II.3.1，第 30 页）资本是给定的、既往的**总体性**，是累积下来的劳动。活劳动是从无中（*ex nihilo*）**创造**出来的资本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位于外在性之中，是**先于**资本的，并且是对其自身的**否定**："一方面，劳动能力表现为**绝对的贫穷**。"（同上书，第 34 页）并且，劳动者"本身，按其概念是**赤贫者**，是这种自为存在的、与自己的对象性相脱离的能力的化身和承担者。另一方面，……劳动能力既是物质财富的一般可能性，也是作为交换价值具有一定社会形式的财富的**唯一源泉**"（同上书，第 35 页）。劳动者是"源泉"，他创造了资本。回顾一下谢林关于"存在的主宰"（Herrn des Seyns）和"创造之源泉"（Quelle der Schöpfung）的说法，很显然，马克思将这一区别用于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资本（**总体性**）的基础或存在；活劳动超脱于这一基础，是其"创造性的源泉"。但是，对它而言，仍有必要使其自身处于这种基础的外在性之中。

5. 当肉体性被鞣作皮革。在《资本论》第 1 卷德文版第 2 版（1872）中，更确切地说，是在体系性方面针对资本进行批判的类似位置上，我们与我们的话题再次相遇了。"在市场上"，目前仍是外在的或前在的，也就是说，仍在资本的外在性之中，所以马克思以讽刺性的口吻评论道，资本家热衷于"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德文版第 1 版写作"交换价值的源泉"；MEGA II.5，第 120 页）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MEGA II.6，第 183 页；MEW 23，第 181 页）。在这里，马克思再次阐明了这样一个环节，在该环节，劳动者从外在性出发被归摄到总体性之中，但劳动者当然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如下能力，即从资本的"无"出发，在他的肉体性以及"活的人体"中，作为"价值的创造性

1187

源泉”而存在（同上）。一旦资本家雇用了劳动者，就能势如破竹，与但丁的《地狱篇》相似，从资本外在性的“外部”步入工厂的“内部”：“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第191页；第191页）“原来的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都内嵌于资本的外在性之中。现在，他们阔步向前——一个走在前，另一个则像狗一样尾随其后——走向了另一个视域：总体性。马克思将这种从外在性中“退场”与“进入”总体性描述为舞台剧中的两个剧中人：“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同上）

所有这些都可以用“归摄”（Subsumption）这一最终概念来表达。然而，如果没有“外部的东西”和“次一级的东西”，那这一概念就变得令人费解了，因为针对“内—外”运动的扬弃肇始于
1188 此。从活的、尚未被归摄的劳动的外在性出发，“包涵”（Einschließung）的过程、纳入总体性（纳入总和）的过程才能够被理解，“异化”是由上述过程构成的，它是一个从“充实的无”（外在性）走向“绝对的无”（在总体性中）的过程。

如果人们仅仅使用总体性这一范畴，那么被压迫者作为被压迫的人（雇佣劳动者）就仅仅只是被剥削的阶级。然而，从外在性的范畴出发，在未来、在某个时间之前或者在范畴之外，被压迫者拥有着独立自主的尊严，可以被视作活的肉体性、人格，是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从否定的方面来看，他是贫穷者；从肯定的角度来理解，他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他是活劳动，他作为外在性“被资本当作前提”，但“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Gr*，第203页；MEW 42，第218页），由于赤贫者需要工资，因而就必然地被包含归摄到总体性之中。

恩里克·D. 杜塞尔·安布罗西尼（Enrique D. Dussel Ambrosini） 撰
纳娜·巴登贝格（NB）、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译为德文
李靖新弘、孙易晨 译，
侯振武 校

参见：
Aufhebung, Befreiung, Exappropriation, Existenz, Exklusion, formelle/reelle Subsumtion, Kapital, Kritik, Leib/Körper, Lohnarbeit, oben/unten, Ontologie, Totalität, Verwertungsprozess, Würde

灭绝主义（Exterminismus）

A: ibāda.

E: exterminism.

F: exterminisme.

R: ėkcterminizm, iskorenie (искоренис).

S: exterminismo.

灭绝主义的概念首先由英国历史学家、（特别是后来的）和平运动活动家爱德华·P.汤普森（1924—1993）在1980年春天提出。在那之前，汤普森以一个活跃的社会史学家（1961）、他和阿尔都塞的论战（1979）以及他科学评论家的身份（1980）被人所熟知。汤普森在他的著作中追寻一种新和平运动中的理论讨论与非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英国卫报》（*Guardian*）在1982年对他公开发表的作品做出了如下的评论：汤普森是全国“最好的政治散文家”。

究其实质而非概念来说，灭绝主义构想首次出现在汤普森于1980年2月写成的《抗议与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这本小册子里（这是对英国官方为原子民防出版的《保护与生存》[*Protect and Survive*]标题的讽刺）。受牛津军事史学家米夏埃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1980年1月30日给《泰晤士报》（*Times*）的一封信的挑衅，汤普森在一场之后变得广为人知的论战中回答说，部署巡航导弹并不是为了改善民防。这个问题更加全面。基于对语言使用的观察，汤普森认为：“技术‘炼金术士’的活动充满了神秘。‘威慑’（Abschreckung，亦有淬火之意。——译者）从现在起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相互毁灭（灭绝[extermination]）的词汇。”（1980，第3页）

1189

受到更精确地描述其含义的压力，尤其是在汤普森于1980年4月与他人共同发起的END运动（欧洲核裁军[*European Nuclear Disarmament*]，其缩写同时代表着对继续军备竞赛的做法说不）的讨论中，他对他的论点做了实质性的推进。这些内容发表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s*）1980年5/6月号上，纲领性标题为《关于灭绝主义的说明——文明的最后阶段》（*Notes on Exterminism—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这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的一种映射。如果与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所做的处理进行比较的话，这种映射就不只是在标题上，列宁说，“当着国家，当着军事机构由于帝国主义竞赛而强化的国家已经变成军事怪物，……屠杀千百万人”（LW25，第506页）。汤普森的构想（这解释了它的迅速影响）所涉及的远不只是和平运动的要求的理论根据。他的文章以这样的程式化

句子开头（在德文译文中大多被删去）："同志们，我们需要对当代战争危机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且是阶级分析。"（1982a，第 1 页）得到证明的是，在汤普森的方法逐渐形成时，他受到C.赖特·米尔斯的著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的强烈影响，特别是以下论点："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是其爆发的直接原因。"（引自 Thompson 1980，第 341 页）灭绝主义代表了将米尔斯所说的"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漂移和追求"（同上）具体化的企图。同时，汤普森觉得自己对马克思有义务："如果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语），那么，今天这些正在运转的、生产灭绝人类手段的撒旦机器又产生了什么呢？"（1981，第 328 页）汤普森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回应大规模毁灭的阶段（这是在串行的杀戮技术阶段即资本主义之后的），这就是灭绝主义，其定义如下：

1190 "'灭绝主义'概念表示一个社会的那些特征——它们可以不同程度地出现在该社会的国民经济、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中——它们作为一种推力，必然向着人类大毁灭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将是毁灭，但这不是偶然发生的（即使最后的导火索可能是随机的），而是从以前的政治行动、从破坏手段的积累和完善、从整个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构建中产生的。"（1981，第 340—341 页）

汤普森没有看到"'灭绝主义的'生产方式"（第 340 页），但是他看到，在"核经济"（小标题）和当代政治的发展中潜藏着通向灾难的路（"现在的军事技术抹去了'政治'的每一个要素"；第 331 页）："终于有这种小比例（百分之八）。"汤普森提到的是自"二战"以来军备在全球生产总值的占比，"是对从流通、服务和消费中转移出来的剩余产品的使用，我们经常把这种剩余产品视为优先权的标志，这种优先权标记的世俗权威或精神志向的肉身性标志，标记的是文明。这种剩余产品凝结在纪念碑中，提供了男人和女人崇拜并使他们陷入束缚的东西的线索：巨大的手推车、巨石阵、庙宇、金字塔、中世纪大教堂、发射井中的巨型导弹、和平卫士导弹系统"（第 335 页）。

汤普森小心翼翼地揭示了，究竟是什么推动他提出灭绝主义概念：精神错乱的迹象。在他的文本中，他并没有独立展开这种精神错乱的内部逻辑（经济、意识形态），而是依靠志同道合者的著作（在经济部分以爱玛·罗特席尔德［Emma Rothschild］为主。除了呼应罗莎·卢森堡对军国主义的批评外，还提到了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的《巴洛克军火库》［*The baroque arsenal*，1980］一书；

汤普森与卡尔多在欧洲核裁军中密切合作）和君特·安德斯。上述次要证据以及汤普森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这通过他参与“跨集团和平运动”就可以看出来）构成了批判的主要出发点。

对灭绝主义概念理论性要求的探讨最为简单。汤普森谈到《说明》（»notes«）并断言，有些“碎片……”呈现出“问题的形式”。“它们面向的是
1191 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不变性。”（1981，第326页）凭借同构论（Isomorphie），即美苏军备综合体之间的“形式和运作方式的同一性”（第326页）的论点，以及美苏的军备政策都是对手的结论，汤普森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最初，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信将疑地接纳了汤普森。沃尔夫冈·哈里希评价道：“该理论是从对武器技术发展状况的准确陈述出发的，它似乎并不想完全抛弃列宁的经典帝国主义分析，而只是想用现代的方式对其进行补充。”（1982b，第68页）如果想要用一种唯一的密码实现这种补充，那么它就会“相当迎合抽象的和平主义的思维习惯”（第68页）。此外，在灭绝主义这一关键词中，“科学的矫饰与普遍的死亡神秘主义”相结合（第68页），在其背后，别人甚至“追踪到了弗洛伊德提出的死亡本能”（第69页）。从经验上看，军工综合体的绝对优势这一前提无法维持。汤普森评价苏联的军备政策——如哈里希总结的（第70页）——是“反应性的和模仿性的”（参见Thompson 1980，第326—327页），因此同构论命题是脆弱的。汤普森质疑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意愿的诚意，并主张“内部颠覆，为此，和平运动应该建立从西方到东方的非正式的即非法的沟通渠道”（Harich 1982，第73页）。

雷蒙德·威廉斯最系统地批判了灭绝主义概念，认为它是技术决定论：“技术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很少能进行简单的因果分析。如果技术决定论……被认真对待，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面对社会过程的复杂性时进行知识分割的形式。”（1981，第352—353页）威廉斯指责汤普森由此“系统性地歪曲历史”，同时认为他所要求的是“面对巨大的、非个人的不可控力量时的无助感”（第353页）。

汤普森的方法的功绩仍然是其建立并证明了民主化的假设，以及强化了东西方政治的可改造性问题。和平运动按照汤普森的这些反策略演化成灭绝主义，
1192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汤普森的概念在1981年被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宣布为“政治指导思想”，“它将不得不替换帝国主义的概念”（1981，第314页），但基于其单线的规划，它几乎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理论发展。此外，因环境破坏而来的生态灾难的危险也日益凸显：

作为消费主义工业主义的灭绝主义。

参考文献：

R. Bahro, »Notizen für eine Vorlesung über ›Dimensionen des Exterminismus und die Idee der allgemeinen Emanzipation‹«, in: ders., *Pfeiler am anderen Ufer*, Berlin/W 1984, 185–99; G. Bensussan, Art. »Exterminismus«, in: KMW, Bd. 2, 328f; W. Harich, »Zur Problematik der ›Exterminismus‹-Theorie«, in: *Argument* 131, 1982, 68–74; M. Kaldor, »Krieg und Kapitalismus«, in: *Argument* 141, 1983, 707–24; dies., *Rüstungsbarock. Das Arsenal der Zerstörung und das Ende der militärischen Techno-Logik*, Berlin/W 1981; C. W. Mills,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New-York 1958, (dt.) *Die Konsequenz*, München 1959; E. Rothschild, »Boom and Bust«,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4.1980; R. Rowthorn,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1980; R. Steinke (Hg.), *Exterminismus. Das Ende der Zivilisation*, Berlin/W 1983;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1); ders., *The poverty of theory*, 1979 (dt.: *Das Elend der Theorie. Zur Produktion geschichtlicher Erfahrung*, Einleitung von M. Vester, Frankfurt/M-New York); ders., *Writing by candlelight*, 1980; ders., »Protest and Survive«, in: ders./D. Smith (Hg.), *Protest and Survive*, Harmondsworth-Middlesex 1980; ders., *Exterminisms and Cold War*, London 1982 (a); ders., »Notes on Exterminism—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 in: ders.: *Zero Option*, London 1982 (b), 41–79; (dt.) »Der Exterminismus als letztes Stadium der Zivilisation«, in: *Argument* 127, 1981, 326–51; ders., »Friedensbewegung und Menschenrechtsbewegung«, in: U. Albrecht, J. Graalfs, D. Lehnert, R. Steinke (Hg.), *Deutsche Fragen. Europäische Antworten*, Berlin/W 1983; ders., *Double Exposure*, London 1985; ders. (Hg.), *Star Wars*, London 1985; R. Williams, »Die Politik der atomaren Abrüstung«, in: *Argument* 127, 1981, 352–66.

乌尔里希·阿尔布雷希特
（Ulrich Albrecht） 撰
孙易晨 译，侯振武 校

参见：

Destruktivkräfte, Determinismus, Ende der Geschichte, hochtechnologische Produktionsweise, Imperialismus, Industrialismus, Katastrophentheorie, Krieg und Frieden, Militär, militärisch-industrieller Komplex, Militarismus, Militärkeynesianismus, Rüstung, Rüstungsindustrialisierung, Tech-

nikdeterminismus, Weltkrieg, Zerstörung, Zivilisation

1193 超额利润（Extraprofit）

A: ribḥ iḍāfī.

E: extra profit.

F: profit extra.

R: dopolnitel'naja pribyl'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прибыль).

S: superganancia.

马克思是在“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的“竞争的强制规律”（*K I*，MEW 23，第335页）这一语境下研究超额利润问题的。单个资本对最大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虽只涉及单个企业主的活动，但在经济整体上，它们可能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变革具有影响。对超额利润的追逐是直接作为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发挥作用的。因此，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Manifest*，MEW 4，第465页）。

1. 马克思对于古典价值论的接受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它把古典价值论嵌入了某种生产方式的总体理论之中（并对此做了彻底的改造），从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K I*，MEW 23，第117页）。尽管马克思指出，他起先并不考虑竞争，但以“平均概念”的形式出现的竞争结果却早就以市场上的“竞争者”（第121页）为前提了。这一点既适用于“社会平均劳动力”（第53页），也适用于规定商品价值的、为生产商品而耗费的社会（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参见同上）。在“平均”这个概念背后隐藏着的全部过程大致是这样进行的：“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第122页）。这样一来，就导致某种商品全部都发生了相对贬值。类似的还有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价值革命。不过，谁因此拥有领先优势，谁就获得了超额利润，而落后者却面临着利润份额的减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超额利润都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

对面临一组给定的成本、利润和市场价格的资本家来说，对超额利润的追逐是自然而然的。超额利润可以是“由

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的”，也可以是被更为精明的生意运作造成的“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的结果（*K III*，MEW 25，第 654 页）。但首要的问题是：如果资本家“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例外生产率”，能够更便宜地进行生产，那么对他来说就形成了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第 207 页）。

在阐发市场价值这一范畴时，马克思预先假定特定生产部门中的生产单元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组别：生产性最突出的企业、生产性平均的企业和生产性最不突出的企业。不计例外情形的话，如果现在一个部门中的大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由以平均生产率生产的商品予以满足，从而它的个别价值规定了统一的市场价值，那么“其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得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第 188 页）。得到超额利润的资本家将使得“他的商品只是通过压低价格”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23，第 336 页），或者由于在更低的价格下对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而扩大其在销售市场上的市场份额。

超额利润的基础是超额剩余价值，为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又必须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而相对剩余价值的起点则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通过采用技术发明、新的生产流程或劳动组织等，一个企业能够在同样长的工作日内取得更大的产品量。早在《1850—1853 年伦敦笔记》（*Londoner Hefte 1850-53*）中，马克思就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机器生产的发展和工艺史（参见《工艺—历史摘录笔记》[*Tech Exz*]，但其编者并未注意结合超额利润的问题）。通过对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性生产条件的垄断，一个资本家可以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个别商品的价值（*K I*，MEW 23，第 335—336 页），因为生产出的新价值被分配在了更大的产品量上。由于商品是在其个别的价值和处于更高水平的平均价值或“社会价值”之间的一个价值上出售的，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超额剩余价值”（第 336 页）。然而，对技术革新及 1195
其在企业中的推行的垄断只能暂时得以维持。“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第 337 页），超额剩余价值就会消失。

在《资本论》第 1 卷的抽象层面，“个别”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作为与较为复杂的形式相分离的、无内容的规定性发挥作用。只是在《资本论》第 3 卷关于市场价值形成的论述中，超额剩余价值才出现在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剩余利润”中。既然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已被给予一些必要限定的市场价值的论

证也适用于生产价格，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如下的公式：剩余利润等于市场生产价格（即一个部门平均成本价格和一般利润率的总和）与使用超出平均水平的生产力，即以低于平均水平的成本劳动的资本家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就超额利润而言，马克思提出存在社会经济利益各不相同的集团：单个资本家每一个都坚持取得他的剩余利润；一个部门中的所有资本家对他们部门以部门内部或部门之间的资本家的商业竞争为形式而取得的剩余利润感兴趣。资本家阶级之间的、经过协调的统一是通过利润率均衡化为平均利润率而形成的。现在，单个资本家，就与其阶级的联系而言，充当了社会总剩余价值中的一个份额的获得者，充当了平均利润的保管人。对马克思来说，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K III*，MEW 25，第208页）。

然而，生产力提高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在于，其单个资本主义的目标被整个资本主义的结果挫败了。每一个资本家追求的都是获得高于平均水平或至少不要低于平均水平的收益。“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同一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K I*，MEW 23，第337—338页）

既然革新并没有使得生产设备相应 1196
地变得便宜，那么资本的有机构成就会提高，也就是说，利润率就要下降，这又要通过超额利润来补偿，而超额利润只有在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的价格上才能取得。只要源自价值增殖强制性的超额利润是生产方式的前因，这一悖论就无法解决。只要“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不占上风，抗拒整体利润率下降的努力就会为对超额利润的追逐所削弱（参见*K III*，第14章）。

当资本向某一个生产部门的流动受到了自然的或人为的限制，或完全被阻断时，就会出现长期的剩余利润，而这种特定的形式就可以被称为垄断剩余利润。这也适用于如下这种情况，即垄断保护不允许普遍采用新的生产性生产方法。自然垄断最常见的例子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矿产的所有权。土地的肥力差异是级差地租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是由较好地块的所有者据为己有的超额利润的转化形式（参见MEW 25，第654页及以下）。

2. 对罗莎·卢森堡来说，竞争使得总利润在单个资本之间“作为‘一国

范围内的'平均利润或作为超额利润"（GW 5，第 442 页）被分配掉了。列宁提到，"垄断超额利润"（LW 29，第 494 页；22，第 289 页）是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结果。超额利润充当了对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上层"的贿赂，接着，"工人阶级上层"便作为"机会主义者"登场，并因而对资产阶级表示感激（同上）。对列宁来说，这些简单化的看法解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对国际团结的背叛。

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指出，超额利润的决定必不可少地包含着时间决定。如果新技术迅速传播开来，那么创新的企业获得的"只是很小的优势，因为由成本优势带来的剩余收益会很快被效仿者消除"（1958，第 86 页）。因此，研发费用高的企业主就面临着一个
1197 困境。只有确信从新技术中可以赚到"足够分摊投资并至少再加上一定利润率的准租金"时，他才会引入新技术。

置盐信雄（Nobuo Okisho）试图证明，新技术并非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它们大概会降低生产成本"（1961，第 175 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本标准"限制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

欧内斯特·曼德尔回顾了帝国主义体系下的超额利润发展史。他把 19 世纪 9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时期称为"对剩余利润的追逐开启的资本输出运动"（1972，第 77 页）。他把殖民地的投资称为由中心和殖民地之间持续的发展差距决定的"剩余利润的长期来源"（第 78 页）。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剩余利润概念被进一步用于阐发一种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对外贸易理论。如果世界市场被理解为普遍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真正现实化场域，那么拥有超出平均水平生产率的民族资本，相对于别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民族资本，便获得了一种剩余利润（参见 Busch 1974；Neusüss 1972；Schoeller 1976）。这样一来，作为生产的目标和终点的剩余利润便不再理会民族的和文化的限制，而将剥削予以全球化了（对此已参见 Marx，*K III*，MEW 25，第 248 页）。

参考文献：

K. Busch, *Die multinationalen Konzerne. Zur Analyse der Weltmarktbewegung des Kapitals*, Frankfurt/M 1974; E. Mandel, *Der Spätkapitalismus. Versuch einer marxistischen Erklärung* (1972), Frankfurt/M 1974; C. Neusüss, *Imperialismus und Weltmarktbewegung des Kapitals*, Erlangen 1972; N. Okishio, »Technische Veränderungen und Profitrate« (1961), in: H. Nutzinger u. E. Wolfstetter (Hg.), *Die Marxsche Theorie und ihre Kritik II. Eine*

Textsammlung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Frankfurt/M-New York 1974, 173–91; J. Robinson,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1958), Frankfurt/M usw. 1972; W. Schoeller, *Weltmarkt und Reproduktion des Kapitals*, Köln 1976.

纳伊尔·萨特勒甘（Nail Satligan）、
托马斯·马克斯豪森 撰
张志超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utomation,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Gewinn, Grundrente, Kapital, Konkurrenz, Krise,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rkt, Marktpreis, Marktwert, Maschinerie, Mehrwert, Mehrwertrate, Neoricardianismus, organische Zusammensetzung, Produktionspreis, Produktivität, Produktivkräfte, Produktivkraftentwicklung, Profit, Profitrate, Surplus, Technik, Technikentwicklung,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1198 tendenzieller Fall der Profitrate, Tendenz/Tendenzgesetz, Transformationsproblem, Triebkraft, ungleicher Tausch, Weltmarkt, Wert, Wertgesetz,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 Revolution

极端（Extreme）

A: ittiǧāhāt mutaṭarrifa.

E: extremes.

F: extrêmes.

R: krajnosti (крайность).

S: extremos.

“极端”一词，17世纪从法语的*extrême*移用而来，而它源于拉丁语*externus*（在外面）的最高级*extremus*。因此，拉朗德将法语词*extrême*译作Äußerstes（最外在者）。他在这个词中区分出了“临界”的含义，比喻义指“最大程度”；在逻辑学中，极端与中项相对，是三段论的“端项”。

中间（μέσον，中道；μεταξύ，居间）和极端（ἄκρα，尖峰，顶点；ἔσχατα，最终者，最外在者）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阐释成了哲学语法的基本概念。亚里士多德援引了一种当时就已成为老生常谈的、社会伦理的思维形式：“中道是再好不过的，我希望在城邦（πόλις）中当一个居中者。”米利都的福基利德斯（Phokylides von Milet）如是说（约公元前600年，引自*Pol* 1295b 35—36）。这种中间的哲学拒斥无尺度和无界限，可以理解成“对无度敛财以及伴随着它出现的（城邦的）所有‘败坏’现象的拒

斥”（Müller 1977，第 122 页）。因而这种哲学是为了缓和阶级对立，特别是大地主和负债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采取的哲学形式，这也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约公元前 590 年）改革的目标。

1. 中间和极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首先也是政治—伦理的标准概念。《尼各马可伦理学》（它的主题是“最好的生活形式”）确立的正当秩序指向“城邦”（πόλις）最佳的政体（πόλιτεία），反过来，城邦政体也根植于正当秩序（参见 *Pol* 1295a 30—31、35—36）。德行被认为是“两种恶的中间”（μεσότης），而两种恶又被理解为德行的极端，是德行的“过度”与“不及”（ὑπερβολή/ἔλλειψις）（*EN* 1107a 2—3）。比如在怒气（ὀργή）即行动热情的激烈程度方面，“过度的人可以被称为愠怒的……不足的人可以被称为麻木的”（1108a 7）。在所有实践活动中，“中间适度的品质都会受到称赞，而那些极端则既不正确，又不值得称赞”（1108a 15—16）。就连在真理问
1199 题上也要避免极端，“对于真的东西（τὸ ἀληθές）来说，具有中间适度品质的人可以称作真诚的（ἀληθής），中间适度的品质就是真理（ἀλήθεια），反之，夸大是吹牛，而不及是贬损”（1108a 19—22）。这些“伦理的”规定同样是“城邦或政体的善恶标准”，因为政体“可以说是城邦的生活”（*Pol* 1295a 40）。“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中间阶层。”（1295b 1）富人的统治是“寡头政体”，穷人的统治则是“民主政体”。只有当中间阶层“强大，胜过两个极端”的时候，城邦才有“优良的政体”（1295b 36）。其他两种政体都会带来“党派和内讧”（στάσεις καὶ διαστάσεις，1296a 9）。因为穷人“不能统治，而只能像奴隶一样（δουλικὴν）服从”，而富人则“全然不肯受治于人，一旦统治就会独断专行”（1295b 20）。

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概念逻辑的联系。中间和极端总是彼此相关。它们构成了对立，而对立不同于矛盾。“对立（ἐναντίωσις）……永远具有某种居间者（μεταξύ）”（*Met* 1056a 12—15），而相反，“矛盾”（ἀντίφασις）没有“居间者”（1055b 2）。比如真与假、存在与不存在等（因而称为矛盾的）对子不构成极端，称为对立的对子如黑与白或善与恶等则不然。因为极端是一个连续体的“最外在者”。极端构成一个“种”（γένος）的东西之间“最大的区别”（1055a 4）和“最大的距离”（9）。因此，极端是可比较的，而“在种上相区别”的东西“彼此不能比较，相互之间没有相通之点”（1055a 6—7）。对于居间者而言，它必然“由对立面构成”（ἐκ τῶν ἐναντίων εἶναι），而且与对立面属于

同一个“种”（1057a 18ff）。三段论的术语“中项”（拉丁语 *terminus medius*）和“端项”（*termini extremi*）也有这个含义。（《前分析篇》[*Erste Analytik*]，25b）

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三段论产生于辩证法（正如辩证法又产生于修辞学）——三段论以无矛盾律的形式内在于辩证法中（参见 Kapp 1942）。三段论抽象为一门独立的规则，从而变得去辩证化。黑格尔在两方面做出改变，他通
1200 过修正柏拉图的辩证法，使得三段论同时也再辩证化。柏拉图哲学尝试在实践中避免矛盾，而亚里士多德将避免矛盾确立为规则，但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必须首先经历矛盾，才能获得关于更高的、无限的统一的思辨知识。因为矛盾的经典形式对于黑格尔来说仅是“所谓矛盾概念的对立的空洞性”（*Enz* §119），他将矛盾理解为对立物的统一，将对立物本身理解为“在自身中包含着**一物与其他物、自身与其对立物**的东西”（*Enz* §120）。因此，“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黑格尔认为这正是“所有自身运动的原则”（*Logik*，I.2，*Der Widerspruch*，注释 3，GW 11，第 286—287 页）。因而黑格尔扬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矛盾（比如某物 / 非某物）和对立的相对关系。黑格尔的对立（比如善 / 恶、精神 / 自然）因为它们的结构依据是逻辑学上核心的正负对立，所以它们既没有极端之间的连续体，也没有此 / 非此的不对称性。同时三段论（从亚里士多德起作为论证的基础只是理性所运用的单纯工具）也就本体论化了。“因此不仅推理是理性的，而且**任何理性的东西也都是一个推理**。”（*Logik*，II.1，第 3 章，GW 12，第 90 页）这里再次表明了逻辑术语里的社会—历史现实性。

黑格尔和此前的传统一样，将推理中彼此相关的诸规定称作“极端、端项”，将联结这两者的规定称作它们的“中项”。“两个端项彼此的关系如同个别性与普遍性，中项则是特殊性。”（W 4，第 137 页；参见 *Enz* §182）普遍者包含特殊者，特殊者包含个别者，这样普遍者也就通过特殊者的中介包含个别者；反过来，个别者包含特殊者的规定，特殊者包含普遍者的规定性（同上）。黑格尔希望根据这种推理逻辑，给君王与人民的关系去掉两个极端之间关系的性质。首先，君王在自身和人民“之间”设立政府。其次，各等级是处在两者之间的“**中介机关**”。这种安排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王权不至于孤立化为极端，因而不至于表现为赤裸裸的统治者的权力和任性；……特殊利益也不至于 1201
孤立起来，或者单个人也不至于……变成一种反对有机国家的赤裸裸的群众性力量。”黑格尔在这里提出“最重要的逻辑洞见之一，即一个特定的环节，作为

对立面而处于极端的地位，因为它同时又是**中项**，也就不再是对立面”（*RPh*，§302）。

2. 面对未达成和解的现实，马克思与黑格尔相反，希望保留极端的思维形式的不可和解的因素。“立法权，其中项是由两个极端，即由王权原则和市民社会，由经验单一性和经验普遍性，由主体和谓语组成的一种混合物（mixtum compositum）。”（*KHR*，MEW 1，第288页）将“中项”理解为极端的“一种混合物”，在马克思看来，表现了黑格尔体系的“全部超验性和神秘的二元论”。因为这样就已经预设，两个极端的对立，即下层与上层之间统治关系的丑恶（无论是在财产关系还是社会决策中），是“合乎理性的关系”。“中项是木质的铁，是普遍性与单一性的被掩盖了的对立。”（同上）

马克思反对“合乎理性的关系”逻辑—本体论的先验性，承认极端本身的正当。“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但是，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具有互相对立的本质。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之点，它们既不相互需要，也不相互补充。一个极端并不怀有对另一个极端的渴望、需要或预期。”（第292页）马克思由此批评两种思维模式缓和了极端概念中直接的、不可调和的因素：（1）“两极相通”（*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仅仅使用于极性对立，“女性和男性也相互吸引，而且也只有男女这两极差异相结合，才会产生人”，但他们的对立不是“本质”（亚里士多德的“类”）的对立，而是“实存”的对立。“**真正的、现实的极端是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第293页）（2）**所谓两个极端的同一性**（“任何极端都是它自己的另一极端”）仅仅适用于抽象对立，在抽象对立中这样理解一个概念：“它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而具有意义，而是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仅仅是作为这样一种**抽象**才具有意义。”例如精神是从物质中得出的抽象。“这样就很明显，…… 1202
抽象对立面，是对象，它就是从这种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存在于这种对象的抽象中……是这一对象的实在本质。”（同上）例如：“**抽象唯灵论是抽象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也正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同上）

但是在极端构成的对立中，每一个元素都不是（像“**转化为独立本质的抽象**”那样）与它的抽象对立面单纯、消极的同一，也不是互补—对立的实存，后者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参照系里才有意义，只要与另一极分开，就会失去意义。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是关于极端的思维里的革命态度。因为“现实对立面的

鲜明性以及这些对立面之形成为极端”意味着“这些对立面的自我认识，以及它们对决战的渴望”，因此，不应当把它们“看作必须尽可能加以阻止的事情或有害的事情”——这种可能性是因为有人“企图用中介来调和它们”。“因为两个极端尽管都现实地存在着并且的确就是极端，可是成为极端这一特性，却仍然只包含在其中一个极端的本质中，对于另一个极端则不具有真正现实的意义。”（第 293 页）因而马克思不仅反对黑格尔的和解哲学，而且同时反对极端哲学，后者的代表是出自叔本华的、反黑格尔的哲学传统。

3. 从叔本华开始的反黑格尔哲学传统在 1848 年革命失败后吸引了有教养的市民阶级（参见 Fellmann 1996，第 273 页）。互补原则替代了在理性中预设的、国家所代表的极端之统一性。对他人劳动力的“清醒”剥削的实践要添加一种“视而不见的”（第 264 页）、审美“沉醉”的补充物。叔本华为此区分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前者以因果律为基础，属于“实践生活”和“科学”（第 265 页）；后者属于天才美学式的艺术。“一般人，作为自然的制成品”（第 268 页），只看到个别的事物，而“天才的思维方式”——这里与迷狂的思维方式相通——将个别事物的内容“提升到理念”：“他们到处看到极端，正因如此他们的行动也陷入极端：他们不知道正确的尺度，没有清醒……”（第 277 页）

叔本华为美学保留的这种极端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由尼采引入道德和政治。尼采的“极端的魔法”作为宣传策略（“诱惑”）适合欧洲的权力精英（“王公”）。他们清楚，“真理”比“谎言”更具诱惑性——但为了“获得权力，走向胜利”，并“不需要”真理。“为我们而战的魔法，会使我们的对手晕头转向的维纳斯的媚眼，这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诱惑：我们非道德论者是极端的人……”（1887 年遗稿，KSA 12，第 510 页；KGA VIII.2，第 176 页）

尼采的（元）法西斯主义追随者将极端主义视作核心教义。权力不再以中道，而是以极端为同义词。在这个意义上，卡尔·施密特将“主权”定义为一个“极端情况的概念”，定义为“临界概念”（1922，第 13 页）。对于之前的国家哲学与法哲学而言，“正常情况是可以认识的，其余都是‘动乱’”，而施密特将理论规定同“极端情况”联系起来。“主权者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同上）他拥有“终止整个现有秩序”的“原则上无限的权能”。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作为中介机关则“隐退”了（第 18 页）。

1943 年，在法西斯主义方案的失败已成定局，新的欧洲权力秩序即将来临之际，海德格尔回溯尼采的思想。在尼采那里，“各种极端显露出来”，“极端之为极端拥有优势”，海德格尔认为这正是尼采虚无主义的特点，他的虚无主义导致“非此即彼的选择的绝对尖锐化状态”。尼采不单和叔本华产生的悲观主义一样，旨在“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而且表达了它的“反动”，即“对于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但是新的价值设定并非简单地用新的价值替代旧的价值，而是改变价值序列本身。“重估”变成“对价值评价的特性与方式的颠倒”。因为以往“上帝”、超感性世界所占据的位置，作为一个空位，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1950，第 206 页及以下；1994，第 224 页及以下）。

尼采对不完全的价值重估的批评针对社会主义提出了批驳（参见 Heidegger 1950，第 208 页）——事后看来有其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继承黑格尔，用“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的公式替代了上帝的位置，历史进程可以毫无保留地扬弃为这个公式。恩格斯已经阐述过这种理解的根据（参见 MEW 20，第 357、485 页）；列宁也用相似的结构来思考，他和黑格尔一样认为“思维的理性（知性）”的任务是“使有差别的东西的已经钝化的差别尖锐化，使表象的简单的多样性尖锐化，以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LW 38，第 133 页；*Logik* II，GW 12，第 78 页），这样才能把理性纳入包揽一切的“对立面的统一”中去（第 213 页等处；直接承继这一思想的有：毛泽东 1937，第 67 页及以下）。两极对立的特殊情况由此就变成了后来马列主义教科书中的（与逻辑矛盾不同的）“现实矛盾”的一般情况。

4. 在共产党的边缘也存在着一类左翼尼采主义。他们也用“极端的魔法”抵消无力的现状，并且在关于左翼知识分子的个体形式的论战中多有洞见。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变成了权力和市场的败坏作用的同义词。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的名言“唯一一条不通罗马的道路，就是中间道路”，无论是针对真理问题还是知识分子的热情，都可以当作这个派别的格言。

青年本雅明就用柏拉图式的语言表述了至关重要的认识论命题：尽管他把“普遍”之物规定为“理念”，但他将理念理解为“对这样一些关联的构造，在这样的关联中仅此一次的极端情况物以类聚”。这样，“理念”就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关于极端的经验主义”。因为在本雅明看来，“经验之物……越是深入地对它透析，就能越清楚地看到它是一种极端。概念则来自极端”（GS I.1，第

215 页）。这个规定看似借鉴了施密特的“临界概念”，但其意图——在本雅明转向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之后才能这么说——则与施密特的再相反不过。它探讨的是知识生产中的革命热情。它的原型，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以后的本雅明看来，是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发展历程：一旦“纪德尝试接触环境”（GS II.2，第 797 页）从而跨过市民阶级私人形式的“门槛”（第 794 页），他最初“上升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就必然“倒转为共产主义”。“小市民”“越是无畏和坚决地”严肃对待他“自由散漫的
1205 和色情的”诉求，“他就越肯定地——通过一条既是最宽阔的又是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道路——介入了政治。正是在此时此刻，他不再是小市民了”（第 802 页）。这里本雅明未明说的证据是纪德在《背德者》（*Der Immoralist*，1902）中所刻画的自己的同性恋“出柜”。

然而，塑造方式的极端主义也可以是一种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形式。于是在本雅明看来，正是“所有先锋派艺术中最突出、最大胆的产品”（第 799—800 页）满足了大资产阶级的需求，因为这些产品缺乏“教育性质”，没有教育性质就不存在“真正革命的文献”（第 801 页）。不过这里彻底改变了“教育”的意涵：知识分子的作品，只有当毫不妥协的自我反思和经过反思的毫不妥协同时起作用，当理论的或美学的激进性使得对自身社会“站位”（第 802 页）的“长期监督”进入作品内的时候，才具有“教育意义”（第 796 页）。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和自我表现，在他们用各自的塑造媒介成功地将自己——正如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中的“智者”——变成“我们社会秩序的种种矛盾上演的现场”（第 526 页）时，就成了政治事件。在这种意义上，纪德如他在访谈中对本雅明所表示的，致力于让“所有内在于我的矛盾”发生公共影响，即“在他的生命中——在众目睽睽之下——为这些矛盾让出空间”（第 795 页）。他毫不顾虑“自身矛盾”，一旦选择了方向，就走到“直至极端”，以便“之后同样坚决地转向对立的方向”。“这对任何‘黄金中道’的否定、这对极端的表白就是辩证法，这不是某一思维的方法，而是生命气息和激情。……将他驱赶至这种极端的东西，并不是好奇心或辩护的动力，而是辩证的热情。”（第 795 页）

霍克海默以相似的热情抨击“黄金中道”（GS 12，第 297 页）的方法。辩证法的三步走里“备受赞誉的对立面的扬弃”实际上意味着，在需要使极端“尖锐化”的地方“磨平极端”。相反，“极端的……辩证方法”拒绝“与定在的和谐”。“引导辩证论者进行取消或否定的是……这样的状况：他无法接受绝

1206 望和恐惧的存在。由此产生了否定的范围和方向”（第 297 页）——霍克海默的极端方法针对人们遗忘（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奥斯维辛和广岛代表的时代转折，徒劳地用理论防止人们回归由哀叹“中道的丧失”（Sedlmayr 1948）所产生的战后正常状态。

晚期阿多诺在他道德批判的语境中重新采纳本雅明（灾难“不是每次将到来的东西，而是每次既定的现实”；GS I.2，第 683 页）和霍克海默的母题（《否定辩证法》[*Negative Dialektik*]，GS 6，第 281—282 页）。在阿多诺看来，“压抑”和“道德”是互补的，而且本身同样都是不自由的标志。自由视角中的“道德”只作为“冲动”存在，它由人所经验的“恶”自发地在意识中触发。这种冲动的不可调和的反抗性质既不能转变成伦理，也不能借助对“恐惧”的理论解释加以理性化从而打发掉。对和解的要求保存在不可调和的东西之中。“不可分割的东西仅仅生存在极端中，生存在自发的冲动中（这种冲动不耐心进行论证，不容忍恐惧继续下去），生存在不被命令所吓倒的理论意识中，这种意识洞察了为什么恐惧无休止地继续下去。”不过在阿多诺看来，反抗性质终归永远是只为艺术的极端主义保留的权利。因而他的《美学理论》反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居中调节的中道的学说，认为至少对“现代”艺术而言，只有“走进某一极端”才是唯一“有成果”的东西（这里指不在模仿与建构这两极之间“中介”的艺术）；“同时追求两者、追求合题的人，得到的回报是可疑的共识”（GS 7，第 72 页）。

与批判理论这些用极端的哲学来革新辩证法的革命内容的尝试相反，米歇尔·福柯彻底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概念本身。“矛盾的经验”应当由“越界”的经验所取代。福柯从巴塔耶那里继承了越界（*transgression*）的概念，将它理解为“空洞的”、跨越“伦理世界”抵达实存的“姿态，这种姿态将生存和价值推到极限，而且是推到做出决断的那个临界状态。越界摆脱了“骇人听闻或颠覆的性质”，既不再像矛盾一样由“否定的力量承载”，也不是对肯定事物 1207
的确认。因为在一个上帝遗弃的世界中，再也不存在依靠或内容，只存在姿态。这样越界就有了悖谬的形式：在一个“判定神圣物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的世界里“渎神”的形式。正因如此，越界通过在“临界经验”中发现一个“在跨越边界的过度中既建构又消解自身”的世界，变成了一种将神圣物“作为空洞形式（不在场的神圣物正因如此变得耀眼）重新拼凑起来”的方式（1964，第 30—76 页）。

在福柯看来，“越界”作为（将性

与死亡统一的）过度，成为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替代物。而在君特·安德斯看来，“夸大”（Übertreibung）在对社会和历史现实的分析中具有“方法论意义”（1956，第15页）。只有通过“放大与聚焦”，才能用理论追赶上由“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的人的境况（conditio humana）的变形。因为大众媒体、文化产业和原子弹使社会关系本身具有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形象”，安德斯对此提出了“普罗米修斯差异”的概念，这种差异由“人与人的产品世界之间的非同时性与日俱增”这一事实（第16页）所决定。灵魂与精神的能力落在“生产”背后，而正是生产的产品带来了一场人类学突变，连同康德视为永恒的“直观形式”（1980，第425—426页）也发生了变化。因而夸大的方法在安德斯看来成了反向的预期：尝试让思想直面当下。

参考文献：

G. Anders,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Bd. 1: *Über die Seele im Zeitalter der zwei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1956), München [7]1987, Bd. 2: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1980), München [4]1995; ders., *Ketzereien*, München 1982; G. Bataille,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Paris 1943; F. Fellmann, »Lebensphilosophie«, in: ders. (Hg.),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im 19. Jahrhundert*, Reinbek 1996, 269–349; M. Foucault, »Zum Begriff der Übertretung« (1963), in: ders., *Schriften zur Literatur*, Frankfurt/M 1988, 69–89; A. Gide, *Croydon. Vier sokratische Dialoge* (1920), Stuttgart 1932; M. Heidegger, »Nietzsches Wort ›Gott ist tot‹« (1943), in: ders., *Holzwege*, Frankfurt/M 1950, 193–247, [7]1994, 209–67; E. Kapp, *Greek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Logic*, New York 1942; Mao Tse-tung, »Über den Widerspruch« (1937), in: ders., *Vier philosophische Monographien*, Peking 1968, 28–88; R. W. Müller, *Geld und Geist.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Identitätsbewußtsein und Rationalität seit der Antike*, Frankfurt/M-New York 1977; H. Röttges, »Mitte«, HWPh 5, 1985, 1421–24; C. Schmitt, *Politische Theologie. 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 (1922), Berlin [7]1996; A. Schopenhauer,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8), Bd. 1, Frankfurt/M 1986; H. Sedlmayr, *Verlust der Mitte*, Salzburg 1948.

托马斯·韦伯 撰
曹旸 译，阿思汗 校

参见：

Aufhebung, Dialektik, Einheit, Empirie/

Theorie, 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ines, Engagement, Entscheidung, Ethik, Existenzialismus, Extremismus, Faschismus, Gegensatz, Haltung, Hegel-Kritik, Hegelianismus, Imperialismus, Kritische Theorie, Logik, Mitte, Moral, radikal/Radikalität, Surrealismus, umschlagen, Vermittlung, vernünftig/wirklich, Versöhnung, Wahnsinn, Wertform, Widerspruch, Widerstand

极端主义（Extremismus）

A: taṭarruf.

E: extremism.

F: extrémisme.

R: ėkstremizm (экстремизм).

S: extremismo.

极端主义是对政治态度的一种消极评价，这种态度由积极的“民主立宪国家”转变而来（Backes 1989，第87页及以下）。极端主义概念因此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规范性认识。其实，民主立宪国家的定义，正如它的对立面极端主义一样，在历史中经历了同样的变化。

人们最早对于立宪国家——尽管不一定是民主国家——的设想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其加以规定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Vom Geist der Gesetze*，1748）中讲到“立法者必须具有节制的精神，必须在政治的善和道德的善这两个界限之间找到平衡”（II，第350页）。“适中”的统治形式：他将贵族政制、君主制和民主制从无政府，尤其是从暴政那里区分开来。在其著名的第11卷第6章中，他阐释了自己这样的见解：应当将这三种“适中”政体的元素在同一个国家中关联起来。关于这种关联，孟德斯鸠列举了英国的例子。这种整合的结果就是权力制衡。这种国家体制的变化可以在很宽的范围内保持“适中”的秩序。否则，则是无政府和暴政两种状态。在第8卷中，孟德斯鸠探讨了“三种统治形式的宪法的败坏”。在这里，他做出了以下论断：“民主的原则不仅仅在失去平等精神后败坏，当人们过分要求平 1209
等，每个人都想平等地具有政府的权力的时候，它也会败坏。”（第156页）

在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陈述中，也会发现被暗示的一对概念：“适中的—极端的。”大不列颠从1215年《大宪章》（*Magna Charta*）到1689年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的立国历程被伯克理解为一种立宪规范。这个历程以各个阶级和统治者之间的合约为前提，经历了许多世纪，这个合约引入新的要素完善

自身，但一直尊重王位的可继承性、私有财产和个人自我定义的权利。对比之下，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和平等绝对化了，而且也放弃了国家中有机联系的各个要素，因此也就走向了极端。“但是，建立一个自由的宪法意味着，将自由与限制的彼此冲突的要素在一个坚固而持久的整体中熔炼为一，这种事业要求深思熟虑，要求敏锐、包容和井井有条的精神。我怀念那些在国民议会中发声的人身上的这种特质。”（1790，第416页）

这样，伯克就树立了一个规范，通过这个规范，我们可以辨识出它想否定的东西。在19世纪保守派的国家理论中，这种反思深度并没有被保留下来。反之，在反对革命努力（尤其是1848和1871年的巴黎工会）的论证中，一种反对暴民统治的合法国家秩序流行开来，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思考的典型可以追溯到对于1789革命的回应，尤其是对1793年恐怖统治的回应。德语文学经典中对这一统治的广泛拒斥也属于这一范畴，尽管它并没有以哲学阐述的方式追随伯克。

2.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昭示着极端主义的复兴。对此也存在着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批评。

2.1 保守主义对极端主义的批评可以追溯到伯克，但这种批评摆脱了他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环节，将“有机”国家组织当成了唯一的标准。19世纪相关的理论家有路易斯·加布里埃尔·安博·伯纳德（Louis Gabriel Ambroise Bonald）、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约瑟夫·玛丽·德·麦斯特（Joseph Marie de Maistre）、亚当·穆勒（Adam Müller）以及弗里德里希·朱利乌斯·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使用明确的极端主义概念。左翼布尔什维克也属于极端主义范畴，因为他们摧毁了由家庭和私有财产构成的传统体制。在右翼中则有对于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批评，因为他们代表了革命性的，也就是摧毁传统的姿态。 1210

2.2 共和主义的极端主义批评并非产生于西方的经典民主制中，而是产生于自1919年成立的年轻的魏玛共和国中。这个共和国反对对于民主立宪国家的否定，无论是立足于反左翼还是反右翼观点。

2.2.1 **反左翼**。人民代表委员会、柏林市指挥官和普鲁士内政部在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使用重组的前帝国军部队对抗革命者的行动，这个重组整体是对于某种隐含的极端主义倾向的反应。这种反应可以被归入某种保守主义的变形：支持平静与秩序，反对暴动。但同时还有另一种新的价值应当得到辩

护——议会制和未来的宪法，而这两者的一个制度性前提是在1919年1月本应当被选举产生出的国民议会。这种定义着极端主义的共和变形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对比中形塑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海因里希·施特勒贝尔（Heinrich Ströbel）和亚历山大·施泰因（Alexander Stein）抛弃了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因为它否定了他们赞成的民主价值（Lösche 1967，第144页）。列宁和考茨基在1918年展开的论战最初被界定为一场关于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对立的辩论："我们当然已经基于民主要求最自由的讨论。专政不会要求来自不同意见的反驳，而只要求对自己想法的进行暴力表达。这样，在对话开始之前，民主和专政的路径就已经彼此抵牾了。一方要求的东西，恰是另一方所禁止的。"（1918，第29页）"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只能明白一件事，即他们在民主基础上的统治。"（第57页）权利保障和代表系统是
1211 民主秩序的最小部分，不过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会内容予以完善。在这种形式性基础之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与另外两个魏玛政党结成同盟（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在1919年国家宪法中，这些法条与保守党达成一致，并没有被当作极端主义想象，比如说，关于行政机构借助德国总统的强硬地位对于全民的，同样也是议会机构的支配地位。

2.2.2 **反右翼**。在外长拉特瑙（Rathenau）于1922年被志愿军行动者谋杀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保卫共和的法案，当时，这项法律被国会议员约瑟夫·沃斯（Joseph Wirth）视作对如下认识的表达："敌人站在那里，毫无疑问，敌人就是右翼。"（1922，第347页）这项法律源自民主立宪国家的标准框架，如前所述，这种框架也有另一种解读方法，可以用来反对这种秩序的左派敌人。

2.2.3 **对两种极端主义的总结**。这种视角实现于魏玛共和国的最后时刻。共产主义者和国家社会主义者同样是民主的敌人。一眼看上去，这种情况只能被理解成共和主义极端概念的完全形态。在司法机构和警察的实践中，也出现了前共和主义的，即一种保守派的极端主义理解，这种理解仅仅是一种转向左翼的"好制度"的变形（Kirchheimer 1981，第314—320页）。

3. 移居国外的讲德语的社会科学家——部分是为了进行为美国特工服务的研究——分析了纳粹的统治体系，并认为国家机构的结构和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当弗兰茨·L. 纽曼将国家机构奠基于一种"彻底地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时候，魏玛共和国终结前的共和—保守主义的左—右派框架就不再重要

了。早在1930年，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已经给出了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描述，就像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概念一样，这个描述也指向国家机构。在这里也对资本主义统治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右翼转向进行了探讨。

大约自1936年起，斯大林在苏联排除所有可能反对者的恐怖行动——尽管
1212 最初并不被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反思——促进了对左—右框架的重新采纳。“大清洗”的政—法执行者是国家机构，正如在法西斯主义那里发生的一样。或许经济条件是不同的，但国家机构的行为确实相似。这种平行状况并没有在德国移民或者在西方国家的科学研究中被详细探讨，因为苏联最初（直到1941年）是潜在地，后来才成为对抗国家社会主义战斗中的真正盟友。

最迟到1947年冷战爆发时，对于无限权力和法西斯政府机构的批评与关于苏联及其成员国中的国家与政党机构行动的相同表达都在极权主义的概念中取得了一致。这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标志：“唯一意识形态，唯一政党，唯一的恐怖主义秘密警察，唯一的新闻垄断，唯一的武装垄断和中央计划经济。”（Friderich 1957，第19页）在这个线索中，两个体系因为它们的“极权”标志被相提并论，由此，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抵制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在民主立宪国家中的“极权主义”信徒在1947年之后占主导地位的对敌人的界定中，展示了最重要的极端主义典型。他们在国内的斗争观念是“真正的民主”，这种观念具有很多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避开被官方当局认定的人群（“职业禁忌”）。这种实践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

极权主义理论激发了社会现实主义的信徒的斗争，它也在社会现实主义终结的时候失去了它的实践意义。借助一种更老旧的，并非针对某种特定的统治形式，而是针对作为对于民主立宪国家的批评的极端主义，转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反对立场。所谓的左右对立仍然被保留下来。在这里，移民国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极端主义概念的实例，即表面上或者事实上的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因为它们试图摆脱对于民主立宪国家的忠诚要求。

4. 最迟从冷战（尽管这种界定早在 1213
对十月革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反应中已初具雏形）开始，激进主义就在对极端主义的随意界定中成为它的同义词。左翼极端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这一组概念对应着左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激进主义。区别在于，“极端主义”是一种外来描述，“激进”这个形容词至少在左

翼那里还是一种积极的（经常也是不可摆脱的）自我描述。相关的名词是“激进性”。而只有“激进主义”是一个否定性的外来描述。

对激进性的积极界定源于法国大革命和最极端左派的要求，他们要求彻底推进革命，无视特定派系仍然持守的界限，比如说，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或者说作为精神性财富的基督教信仰，对于自然不平等一定程度上的接受，等等。对于这种政治的批判也成了保守的激进主义批评的出发点。后来——在20世纪发生的——与激进右翼的融合中，它变得与“极端主义”的负面形象趋同。

5. 批评。一般来说，极端主义概念的出发点是民主立宪国家的规范。这些规范在道德或理性上的正当性得到辩护，而由此出发的偏离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历史发展中的极端主义教义所选择的信条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德语的语言空间中，对于一种应当与民主立宪国家一致的“中间阶级”的支持是毫无疑问的主流。一方面，包含弗里德里希极端主义概念中的对极权主义的界定，首先影响了美国的术语（通过他的学生布热津斯基）。在那里，这种界定的对手是这样一种信条，这种信条从北美和法国革命之中的自由平等预设出发，而不是从所谓的“中间”概念出发，并且，把极端主义首先视作一种向右翼的转向（Lipset/Raab 1970）。另一方面，自1945年后，欧洲（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右翼独裁政权毫不犹豫地谴责自由派或社会主义反对派为“极端主义”。极端的东西，由此就与之前所说的积极规范分离开了。而这本身只是一个政治选择的结果而已。

外在规范性思考的弱点在于，它无 1214
视了作为历史与经济前提的民主立宪国家和它的反对派。所有的历史共识都指出，民主立宪国家的去合法化并不能通过极端主义运动达成，而是相反，极端主义运动必须建立在民主立宪国家的去合法化成果之上。

在规范性的层面上，所有至今为止提出的极端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弱点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废除民主立宪国家的方式一致。法西斯主义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否定民主的原则。而共产主义运动则在它的开端就将民主国家视作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而这种统治形式必须被消灭。它们诚然理解了出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要求一种具体的宪法形态。长期以来，这种模糊导致了一种对于民主立宪国家的中立态度。左翼重提这些问题的根据似乎是因为，通过对于财产关系的改变来扫除统治阶级，仅仅在一个民主立宪国家（人民主权、权力

制衡、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之中才是可能且可欲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法西斯运动不得不为自己排除的历史学习过程，因为法西斯运动的本质正在于否定这些民主立宪国家的原则。对于法西斯主义运动来说，人权和政治上的分权都被元首原则涵盖了，而且，正像在法西斯专政中已经萌芽的那样，这些权利仅仅属于一个民族或者“种族”的成员。

只要在左翼中的共产主义路线和无政府主义路线——如历史所揭示的那样——仍然将民主立宪国家与“国家消亡”关联起来，它们就处在极端主义的有限观察领域之外，因此也就不能就此展开批评。

6. 共产主义的极端主义批判？ 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党派斗争里，
1215 经常出现这样两种对立的理解，一方面，有人将变革的可能性建立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上，而另一方面，有人则将其原因视作与主观的革命决心相关联。这个争论发生在马克思与巴枯宁关于第一国际的论战中，也出现在多党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0—1891 年间的青年团的斗争中。对于革命的唯意志论的批评，列宁在 1920 年关于激进主义的文章中有经典的表述（LR，LW 31）。这种批评同一种对西欧与中欧的革命发展的错误时期划分混合在一起——这种划分的根据是当地方兴未艾的诸多共产党（或者说它们的部分）以及相伴的错误策略，这种策略在尚缺乏物质前提的情况下就希望马上发动革命。“左翼激进主义”意味着对统治的幻想。当斯大林宣布“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宣言之后，他将苏联的安全提升为共产国际的中心目标，并且将其他共产党归于自己的独立运动之下。同样地，每一个策略，只要它看上去或者实际上没有从苏维埃的最高稳定出发就要求革命的可能，那么它就被称为“左的激进主义”。这种抵抗贯穿于接下来几十年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和与之结盟的政党，例如在 1968 年针对部分国际学生运动的辩论中。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激进主义”有时和极端主义是同义词（参见 Linksradikalismus 1989，第 17—18 页）——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联系，它将仅仅适用于西方对于民主立宪国家语境中的术语和被列宁讨论的团结批判之中的术语（“左派激进主义”）相提并论了。

参考文献：

U. Backes, *Politischer Extremismus in demokratischen Verfassungsstaaten. Elemente einer normativen Rahmentheorie*, Opladen 1989; K. D. Bracher, *Die deutsche Diktatur*, Köln 1969; E. Burk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1790), hgg. v. U. Frank-Planitz, Zürich 1986; C. J. Friedrich, *Totalitäre Diktatur*, Stuttgart 1957; K. Kautsky, »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1918), in: P. Lübbe (Hg.), *Kautsky gegen Lenin*, Berlin/W-Bonn 1981, 29–77; O. Kirchheimer, *Politische Justiz. Verwendung juristischer Verfahrensmöglichkeiten zu politischen Zwecken*, Frankfurt/M 1981; *Linksradikalismus. Linksradikale Kräfte in den gesellschaf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AGW beim ZK der SED (Hg.), Berlin/DDR 1989; S. M. Lipset, E. 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Right-Wing Extremism in America 1790–1970*, New York-Evanston-London 1970; P. Lösche, *Der Bolschewismus im Urteil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1903–1920*, Berlin/W 1967; P. Lübbe, (Hg.), *Kautsky gegen Lenin*, Berlin/W-Bonn 1980; Ch. de Montesqieu, *Vom Geist der Gesetze* (1748), hgg. v. E. Forsthoff, 2 Bde., Tübingen ²1992; F. L. Neumann, *Behemoth. Struktur und Praxis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3–1944*, hgg. v. G. Schäfer, Frankfurt/M 1977; A. Thalheimer, » Über den Faschismus« (1930), in: O. Bauer, H. Marcuse, A. Rosenberg u. a., *Faschismus und Kapitalismus. Theorien über die sozialen Ursprünge und die Funktion des Faschismus*, hgg. v. W. Abendroth. Frankfurt/M-Wien ⁴1970, 19–38; J. Wrrth, »Der Feind steht rechts! Rede vor dem Reichstag, 25. Juni 1922. (Auszug)«, in: *Sturm Läutet das Gewissen. Nichtproletarische Demokraten auf der Seite des Fortschritts*, hgg. v. W. Fritsch u. a. (Ltg. D. Fricke), Berlin/DDR 1980, 345–47.

1216

格奥尔格·菲尔贝特
（Georg Fülberth） 撰
阿思汗 译，李牧今 校

参见：

Abbau des Staates, Absterben des Staates, Anarchismus, antiautoritäre Bewegung, Berufsverbot, Bolschewisierung, Bonapartismus,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Demokratie, Demokratie/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 Demokratischer Sozialismus, Extreme, Faschismus, Franzōsische Revolution, Gesellschaftsvertrag, Gesetz, Kalter Krieg, Konservatismus, links/rechts, Linkskommunismus, Linksradikalismus, Mehrheit/Minderheit, Mitte, Nationalsozialismus, Neue Linke, Neue Rechte, radikal, Spanienkrieg, Stalinislus, Terrorismus, Totalitarismus, Unterdrückung, Verfassung

附 录

词目及作者

Ebene (Wolfgang Fritz Haug)

Edukationismus (Konrad Birkmann, Michael Winkler)

Egalitarismus (Frank Deppe; Steven Lukes)

Egoismus (Gabriele Lindner)

Ehe (Barbara Ketelhut)

ehern (Wolfgang Fritz Haug)

ehernes Lohngesetz (Thomas Kuczynski)

ehrenamtliche Arbeit (Gisela Notz)

Eigenarbeit (Carola Möller)

Eigentlichkeit (Tilman Reitz)

Eigentum (Uwe Wesel; Wolfgang Fritz Haug)

einfach/komplex (Ali Shamsavari)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Michael Krätke)

einfache Warenproduktion (Rolf Hecker)

einfache Zirkulation (Gunter Willing)

Einfühlung (Thomas Weber)

Eingedenken (Thomas Weber)

eingreifendes Denken (Karen Ruoff Kramer)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Frigga Haug)

Einheit (Andreas Arndt)

Einheitsfront (Theodor Bergmann)

Einkommen (Eva Müller, Gunter Willing; Wolfgang Fritz Haug)

Einsamkeit (Hans D. van Hoogstraaten)

Einzelnes, Besonderes, Allgemeines (Lutz Höll)

Eklektizismus (Siegfried Wollgast)

Elektrifizierung (Victor Wallis)

Element, Elementarform (Daniel Barben)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Enrico Grassi)

Elend (Jürgen Kuczynski)

Elfenbeinturm (Thomas Marxhausen)

Elite (Leo Kofler)

Emanzipation (Ulrich Weiss)

Emigration (Claudie Weill)

Empirie/Theorie (Frigga Haug)

Empirismus (Wal A. Suchting)

Ende der Geschichte (Gabriel Vargas Lozano)
Endlösung (Kurt Pätzold)
Energie (Joan Martinez-Alier)
Engagement (Helmut Peitsch)
Engelsismus (Sven-Eric Liedman)
englische Revolution (Gerald Aylmer)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Michel Vadée; Adriana Silvia Benzaquen; Morus Markard)
Entäußerung (Tilman Reitz)
Entbettung (Elmar Altvater)
Enteignung (Marcel van der Linden; Jürgen Becher; Ulrich Weiss)
Entfremdung (Alfred Oppolzer)
Entfremdungsdiskussion (Sebastiano Ghisu)
Enthusiasmus (Christian Lõser)
Entkolonisierung (Gerhard Hauck)
Entnazifizierung (Hanna Behrend)
Entrismus (Werner Mackenbach)
Entropie (Peter Schyga)
Entscheidung (Friedrich Tomberg)
Enttäuschung (Herbert Claas)
Entwicklung (Sven-Eric Liedman, Thomas Marxhausen, Wolfgang Fritz Haug)
Entwicklungsländer (Dieter Boris)
Entwurf (Tilman Reitz)
Entzauberung (Holger Leidig)
Enzyklopädie (Joël Biard)
epigonaler Stalinismus (Heinz Niemann)
episches Theater (Gerhard Scheit)
Epistemologie (Wal A. Suchting)
Epoche (Fredric Jameson)
Erbe (Helmut Peitsch)
Erde (John Bellamy Foster)
Erfahrung (Dieter Wittich)
Erinnerung (Frigga Haug)
Erinnerungsarbeit (Susan Kippax)
Erkenntnis (Harald Kerber)
Erkenntnistheorie (Thomas Laugstien)
Erlösung (Bernhard Walpen)
Erneuerung (Michael Schumann)
Eros (Douglas Kellner, Wolfgang Fritz Haug)
Errungenschaften des Sozialismus (Stefan Bollinger)
Erscheinung, Erscheinungsform (Wolfgang Fritz Haug)
Erster Mai (Andrea Panaccione)
Erziehung (Georg Auernheimer)
esoterisch/exoterisch (Michael Heinrich)
Essen (Gunter Willing)
Etatismus (Robert Jessop)
Ethik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Ethik im Sozialismus (Ernst Luther)
ethischer Sozialismus (Wolfgang Eichhorn)
ethisch-politisch (Uwe Hirschfeld)
Ethnie, Ethnizität (E. San Juan Jr.)
Ethnologie (Marcello Massenzio; Bernd Jürgen Warneken)
Ethnozentrismus (Stig-Arne Nohrstedt)
etwas (Narihiko Ito; Wolfgang Fritz Haug)

Etymologie (Klaus Bochmann)
Eugenik (Florian Schmaltz)
Eule der Minerva (Wolfgang Fritz Haug)
Eurokommunismus (Harald Neubert)
Europa (Frieder O. Wolf)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Patrick Ziltener)
Europastrategien (Martin Bennhold)
Eurozentrismus (Gunter Willing)
Evidenz (Hans Jörg Sandkühler)
Evolution (Volker Schurig)
Evolutionismus (Ferdinando Vidoni)
evolutorische Ökonomie (Heinz-Dieter Haustein)
Ewigkeit (Wolfgang Fritz Haug)
Exappropriation (Bernhard Walpen)
exemplarisches Lernen (Frank Heidenreich)
Existenz (Wolfgang Fritz Haug)
Existenzialismus (Wolfgang Fritz Haug)
Exklusion (Martin Kronauer)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Rolf Czeskleba-Dupont)
Experiment (Wal A. Suchting)
Expressionismusdebatte (Robert Cohen)
Exteriorität (Enrique D. Dussel Ambrosini)
Exterminismus (Ulrich Albrecht)
Extraprofit (Nail Satligan, Thomas Marxhausen)
Extreme (Thomas Weber)
Extremismus (Georg Fülberth)

本卷作者简介

Ulrich Albrecht, 1941,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xterminismus)

乌尔里希·阿尔布雷希特，1941，柏林自由大学（灭绝主义）

Elmar Altvater, 1938,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ntbettung)

埃尔玛·阿尔特瓦特，1938，柏林自由大学（脱嵌）

Andreas Arndt, 1949,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inheit)

安德烈亚斯·阿恩特，1949，柏林自由大学（统一、统一性）

Georg Auernheimer, 1939, Universität Köln (Erziehung)

格奥尔格·奥尔恩海默，1939，科隆大学（教养/教育）

Gerald Aylmer, 1926, St. Peter's College, Oxford (englische Revolution)

杰拉尔德·艾尔默，1926，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英国革命）

Daniel Barben, 1961, Wissenschaftszentrum Berlin (Element, Elementarform)

丹尼尔·巴本，1961，柏林科学中心（元素、元素形式）

Jürgen Becher, 1937,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Enteignung II)

尤尔根·贝歇尔，1937，前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剥夺、没收［二］）

Hanna Behrend, 1922, Berlin/O (Entnazifizierung)

汉娜·贝伦德，1922，东柏林（非纳粹化）

Martin Bennhold, 1934,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Europastrategien)

马丁·本霍尔德，1934，奥斯纳布吕克大学（欧洲策略）

Adriana Silvia Benzaquen, 1964, York Universität, Toronto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II)

阿德里安娜·西尔维娅·邦扎康，1964，约克大学，多伦多（社会关系的总和［二］）

Theodor Bergmann, 1916, ehem. Universität Hohenheim (Einheitsfront)

特奥多尔·贝格曼，1916，原就职霍恩海姆大学（统一战线）

Joël Biard, 1952, CNRS, Paris (Enzyklopädie)

若埃尔·比亚尔，1952，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百科全书）

Konrad Birkmann, 1960, 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Edukationismus)

康拉德·比克曼，1960，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育主义）

Klaus Bochmann, 1939, Universität Leipzig (Etymologie)

克劳斯·博赫曼，1939，莱比锡大学（词源学）

Stefan Bollinger, 1954, Berlin/O (Errungenschaften des Sozialismus)

斯特凡·博林格，1954，东柏林（社会主义的成就）

Hans-Dieter Boris, 1943,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Entwicklungsländer)

汉斯-迪特尔·鲍里斯，1943，马堡大学（发展中国家）

Herbert Claas, 1941,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Enttäuschung)

赫伯特·克拉斯，1941，马堡大学（失望）

Robert Cohen, 1941, Universität New York (Expressionismus-debatte)

罗伯特·科恩，1941，纽约大学（表现主义论争）

Rolf Czeskleba-Dupont, 1944, Universität Roskilde (Exkremente der Produktion)

罗尔夫·切斯克莱巴-杜邦，1944，罗斯基勒大学（生产的排泄物）

Frank Deppe,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Egalitarismus I)

弗兰克·德佩，马堡大学（平等主义［一］）

Enrique D. Dussel Ambrosini, 1934, Universität Autonoma Metropolitana, Mexiko-Stadt (Exteriorität)

恩里克·D. 杜塞尔·安布罗西尼，1934，大都会自治大学，墨西哥城（外在性）

Wolfgang Eichhorn, 1930, vorm. AdW der DDR (ethischer Sozialismus)

沃尔夫冈·艾希霍恩，1930，前东德科学院（伦理社会主义）

John Bellamy Foster, 1953, Universität von Oregon, Eugene (Erde)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1953，俄勒冈大学，尤金（土地）

Georg Fülberth, 1939, Philipps-Universität Marburg (Extremismus)

格奥尔格·菲尔贝特，1939，马堡大学（极端主义）

Sebastiano Ghisu, 1961, Universität Cagliari (Entfremdungsdiskussion)

塞巴斯蒂亚诺·吉苏，1961，卡利亚里大学（异化讨论）

Enrico Grassi, 1935, Liceo »Plinio Seniore«, Rom (Elemente der neuen Gesellschaft)

恩里科·格拉西，1935，老普林尼高级中学，罗马（新社会的要素）

Gerhard Hauck, 1939,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Entkolonisierung)

格哈德·豪克，1939，海德堡大学（非殖民化）

Frigga Haug, 1937, 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Hamburg (eingreifende Sozialforschung, Empirie/Theorie, Erinnerung)

弗里加·豪格，1937，汉堡政治和经济大学（介入式社会研究，经验研究/理论，记忆）

Wolfgang Fritz Haug, 1936,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bene, ehern, Eigentum II, Einkommen II, Entwicklung, Eros, Erscheinung/Erscheinungsform, etwas II, Eule der Minerva, Ewigkeit, Existenz, Existenzialismus)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1936，柏林自由大学（层面，铁的，所有制、财产［二］，收入［二］，发展，爱欲，现象、表现形式，某物［二］，密纳发的猫头鹰，永恒，存在，存在主义）

Heinz-Dieter Haustein, 1932, vorm. Hochschule für Ökonomie »Bruno Leuschner«, Berlin/O (evolutorische Ökonomie)

海因茨-迪特尔·豪施泰因，1932，前布鲁诺·洛伊施纳经济大学，东柏林（进化经济学）

Rolf Hecker, 1953, vorm. MEGA-Redakteur, Berlin/O (einfache Warenproduktion)

罗尔夫·黑克尔，1953，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部，东柏林（简单商品生产）

Frank Heidenreich, 1956, IG Metall-Bildungsstätte Berlin (exemplarisches Lernen)

弗兰克·海登赖希，1956，柏林冶金工业工会教育中心（实例学习）

Michael Heinrich, 1957, Berlin/W (esoterisch/exoterisch)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1957，西柏林（秘传的/非秘传的）

Uwe Hirschfeld, 1956, ev. Fachhochschule für Sozialarbeit, Dresden (ethisch-politisch)

乌韦·希施费尔德，1956，新教社会工作应用技术大学，德累斯顿（伦理—政治的）

Lutz Höll, 1954,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Einzelnes, Besonderes, Allgemeines)

卢茨·霍尔，1954，前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个别、特殊、一般）

Hans D. van Hoogstraaten, 1937, Universität Nijmegen (Einsamkeit)

汉斯 D. 范·霍格斯特拉滕，1937，奈梅亨大学（寂寞）

Narihiko Ito, 1931, Chuo-Universität, Tokio (etwas I)

伊藤成彦，1931，中央大学，东京（某物［一］）

Fredric Jameson, 1934, Duke Universität, Durham (Epoche)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34，杜克大学，达勒姆（时代）

Robert Jessop, 1946, Lancaster Universität (Etatismus)

罗伯特·杰索普，1946，兰卡斯特大学（国家主义）

Douglas Kellner, 1943, Universität von Texas, Austin (Eros)

道格拉斯·克尔纳，1943，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爱欲）

Harald Kerber, 1932, Universität Osnabrück (Erkenntnis)

哈拉尔德·克贝尔，1932，奥斯纳布吕克大学（认识）

Barbara Ketelhut, 1956, Hamburg (Ehe)

芭芭拉·克特尔胡特，1956，汉堡（婚姻）

Susan Kippax, 1941, Macquarie Universität, Sydney (Erinnerungsarbeit)

苏珊·基帕克斯，1941，麦考瑞大学，悉尼（记忆工作）

Leo Kofler, 1907–1995, ehem. Universität Bochum (Elite)

里奥·科夫勒，1907—1995，原就职波鸿大学（精英）

Michael Krätke, 1949, Universität Amsterdam (einfache/komplizierte Arbeit)

米夏埃尔·克拉特克，1949，阿姆斯特丹大学（简单 / 复杂劳动）

Martin Kronauer, 1949, soziologisches Forschungsinstitut (SOFI), Göttingen (Exklusion)

马丁·克罗瑙尔，1949，社会学研究所（SOFI），哥廷根（排除）

Jürgen Kuczynski, 1904–1997, vorm. AdW der DDR (Elend)

尤尔根·库钦斯基，1904—1997，前东德科学院（贫困）

Thomas Kuczynski, 1944, vorm. AdW der DDR (ehernes Lohngesetz)

托马斯·库钦斯基，1944，前东德科学院（铁的工资规律）

Thomas Laugstien, 1953, Berlin/W (Erkenntnistheorie)

托马斯·劳格施廷，1953，西柏林（认识论）

Holger Leidig, 1969, Berlin/W (Entzauberung)

霍尔格·莱迪希，1969，西柏林（祛魅）

Sven-Eric Liedman, 1939, Universität Göteborg (Engelsismus, Entwicklung)

斯文-埃里克·里德曼，1939，哥德堡大学（恩格斯主义，发展）

Marcel van der Linden, 1953, Internationales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 Amsterdam (Enteignung I)

马塞尔·范·德尔·林登，1953，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剥夺、没收［一］）

Gabriele Lindner, 1942, vorm. AGW beim ZK der SED, Berlin/O (Egoismus)

加布里埃莱·林德纳，1942，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东柏林（利己主义）

Christian Löser, 1953,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Enthusiasmus)

克里斯蒂安·勒泽，1953，前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热情）

Steven Lukes, 1941, Universität Siena (Egalitarismus II)

史蒂文·卢克斯，1941，锡耶纳大学（平等主义［二］）

Ernst Luther, 1932, vorm.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Ethik im Sozialismus)

恩斯特·路德，1932，前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社会主义中的伦理学）

Werner Mackenbach, 1951, Universität Managua (Entrismus)

维尔纳·马肯巴赫，1951，马那瓜大学（加入主义）

Morus Markard, 1948,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III)

莫鲁斯·马卡德，1948，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关系的总和［三］）

Joan Martinez-Alier, 1939, Universität Autonoma Barcelona (Energie)

胡安·马丁内斯-阿利尔，1939，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能量）

Thomas Marxhausen, 1947, vorm.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Entwicklung, Elfenbeinturm, Extraprofit)

托马斯·马克斯豪森，1947，前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发展，象牙塔，超额利润）

Marcello Massenzio, 1942, Universität »Tor Vergata«, Rom (Ethnologie I)

马塞洛·马森齐奥，1942，罗马第二大学（民族学［一］）

Carola Möller, 1929, Köln (Eigenarbeit)

卡罗拉·默勒，1929，科隆（独立工作）

Eva Müller, 1928,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Einkommen I)

埃娃·米勒，1928，前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收入［一］）

Harald Neubert, 1932, vorm. AGW Beim ZK der SED, Berlin/O (Eurokommunismus)

哈拉尔德·诺伊贝特，1932，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社会科学院，东柏林（欧洲共产主义）

Heinz Niemann, 1936, vorm.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epigonaler Stalinismus)

海因茨·尼曼，1936，前柏林洪堡大学（模仿［者的］斯大林主义）

Stig Arne Nohrstedt, 1946, Universität Örebro (Ethnozentrismus)

施蒂格·阿尔内·诺尔施泰特，1946，厄勒布鲁大学（本民族中心主义）

Gisela Notz, 1942, Friedrich-Ebert-Stiftung, Bonn (ehrenamtliche Arbeit)

吉泽拉·诺茨，1942，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波恩（荣誉工作）

Alfred Oppolzer, 1946, 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und Politik, Hamburg (Entfremdung)

阿尔弗雷德·奥波尔策，1946，汉堡政治和经济大学（异化）

Andrea Panaccione, 1941, Fondazione Giacomo Brodolini, Mailand (Erster Mai)

安德烈亚·帕纳乔内，1941，贾科莫·布罗多里尼基金会，米兰（五一节）

Kurt Pätzold, 1930, vorm.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Endlösung)

库尔特·佩措尔德，1930，前柏林洪堡大学（最后解决）

Helmut Peitsch, 1948, Universität von Wales, Cardiff (Engagement, Erbe)

赫尔穆特·派奇，1948，威尔士大学，卡迪夫（介入，遗产）

Tilman Reitz, 1974, Berlin/W (Eigentlichkeit, Entäußerung, Entwurf)

蒂尔曼·赖茨，1974，西柏林（本真性，外化，规划）

Karen Ruoff Kramer, 1945, Stanford Universität, Berlin Study Center (eingreifendes Denken)

卡伦·劳夫·克拉默，1945，斯坦福大学，柏林研究中心（介入的思考）

E. San Juan Jr., 1938, Bowling Green Staatsuniversität, Ohio (Ethnie, Ethnizität)

小圣胡安，1938，博林格林州立大学，俄亥俄（民族、民族性）

Hans Jörg Sandkühler, 1940, Universität Bremen (Evidenz)

汉斯·约尔格·桑德屈勒，1940，不莱梅大学（明见性）

Nail Satligan, 1950, Universität Istanbul (Extraprofit)

纳伊尔·萨特勒甘，1950，伊斯坦布尔大学（超额利润）

Gerhard Scheit, 1959, Wien (episches Theater)

格哈德·沙伊特，1959，维也纳（叙事戏剧）

Florian Schmaltz, 1968, Berlin/W (Eugenik)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1968，西柏林（优生学）

Michael Schumann, 1946, MdL Brandenburg (Erneuerung)

米夏埃尔·舒曼，1946，勃兰登堡州议院议员（革新）

Volker Schurig, 1942, Universität Hamburg (Evolution)

福尔克尔·舒里希，1942，汉堡大学（进化）

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1960, Hochschule für Architektur und Bauwesen, Weimar (Ethik)

格哈德·施韦彭霍伊泽，1960，建筑与土木工程应用技术大学，魏玛（伦理学）

Peter Schyga, 1955, Universität Hannover (Entropie)

彼得·许加，1955，汉诺威大学（熵）

Ali Shamsavari, 1944, Kingston Universität (Einfach/Komplex)

阿里·沙姆萨瓦里，1944，金斯顿大学（简单/复杂）

Wal A. Suchting, 1931–1997, Sydney-Universität (Empirismus, Epistemologie, Experiment)

瓦尔·A. 聚希廷，1931—1997，悉尼大学（经验主义，认识论，实验）

Friedrich Tomberg, 1932, vorm. Universität Jena u. AdW der DDR (Entscheidung)

弗里德里希·通贝格，1932，前耶拿大学和前东德科学院（决定）

Michel Vadée, 1934, Universität Poitiers (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I)

米夏埃尔·瓦迪，1934，普瓦捷大学（社会关系的总和［一］）

Gabriel Vargas Lozano, 1947, Universität Autonoma Metropolitana, Mexiko-Stadt (Ende der Geschichte)

加布里埃尔·瓦尔加斯·洛扎诺，1947，大都会自治大学，墨西哥城（历史的终结）

Ferdinando Vidoni, 1940, Liceo classico »Omero«, Mailand (Evolutionismus)

费迪南多·维多尼，1940，荷马高级中学，米兰（进化主义）

Victor Wallis, 1938,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Boston (Elektrifizierung)

维克托·沃利斯，1938，伯克利音乐学院，波士顿（电气化）

Bernhard Walpen, 1959, Luzern (Erlösung, Exappropriation)

伯恩哈特·瓦尔彭，1959，琉森（拯救，不有）

Bernd Jürgen Warneken, 1942, Universität Tübingen (Ethnologie II)

贝恩德·尤尔根·瓦内肯，图宾根大学（民族学［二］）

Thomas Weber, 1954, Berlin/W (Einfühlung, Eingedenken, Extreme)

托马斯·韦伯，1954，西柏林（移情，回忆，极端）

Claudie Weill, 1942, 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EHESS), Paris (Emigration)

克劳迪·魏尔，1942，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巴黎（移民）

Ulrich Weiss, 1948, Berlin/O (Emanzipation, Enteignung III)

乌尔里希·魏斯，1948，东柏林（解放，剥夺、没收［三］）

Uwe Wesel, 193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Eigentum I)

乌韦·韦泽尔，1933，柏林自由大学（所有制、财产［一］）

Gunter Willing, 1953, MEGA-Redakteur, Halle/Saale (einfache Zirkulation, Einkommen I, Essen, Eurozentrismus)

冈特·维林，19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部，萨勒河畔哈勒（简单流通，收入［一］，吃饭，欧洲中心主义）

Michael Winkler, 1953, 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 (Edukationismus)

米夏埃尔·温克勒，1953，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教育主义）

Dieter Wittich, 1930, vorm.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Erfahrung)

迪特尔·维蒂希，1930，前卡尔·马克思大学，莱比锡（经验）

Frieder O. Wolf, 1943,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MdEP (Europa)

弗里德·O. 沃尔夫，1943，柏林自由大学，欧洲议会议员（欧洲）

Siegfried Wollgast, 1933, vorm.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Eklektizismus)

西格弗里德·沃尔加斯特，1933，前德累斯顿理工大学（折中主义）

Patrick Ziltener, 1967, Universität Zürich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帕特里克·齐尔特纳，1967，苏黎世大学（欧洲一体化）

德文版编写体例

标题。对于双重和多重标题，当它们形成互补的术语对子时，关键词用斜线（例如，*Analyse/Syntbhse*）分开。当用逗号表示不同形式的表达时（例如，*Artikulation*，*Gliederung*），首字母 Ä、Ö 和 Ü 按字母顺序 A、O、U 处理。

对应外语。标题的概念以六种语言给出翻译：阿拉伯语（A——字母转录），英语（E），法语（F），俄语（R——字母转录），西班牙语（S），中文（C——拼音转录和表意文字）。

缩写。标题关键词在行文中用不带点的首字母表示，名词首字母大写（例如，A 代表 *Abbild*），形容词首字母小写（例如，a 代表 *abstrakt*）。语法规定的词形变化仅出现在复数形式中（例如，A.er 代表 *Abbilder*）。所有其他缩写均按照惯例使用或列在缩写列表中。

突出强调。作为词条研究对象的人物，人名首次出现在相关论述中时用小型大写字母表示。针对该对象的研究文献的作者姓名，只有当作者本人在研究对象所属领域具有相应地位时，才会使用小型大写字母表示。所有其他强调均以**斜体**表示。

引号与括号。引文（希腊文除外）用双引号 »...«，元语言或有所保留的表述用单引号 ›...‹。引文中作者的插入语用方括号 [ ] 表示，省略用方括号加三个点标记 [...]。编辑注明的引用版本用尖括号 < > 表示。引文原作者所补充的内容放在大括号 {} 中。

引用方式。频繁引用的文献和版本，用缩写标识，见缩写列表的分类整理。除此之外，通用“美式”引用方法：在引用后，作者、出版年份和页码在括号中标出；如果紧随其后的参考文献涉及同一作者和 / 或同一作品，则不再重复作者的姓名和著作名称（如果适用）。若相同版本著作出现多次，同一卷的引用信息用逗号分隔；涉及不同卷的引用信息用分号分隔，第一个数字表示卷数。更多信息可以在每个词条文章末尾的参

考文献中找到。

古典哲学著作尽可能根据章节、段落等引用，以便引用的段落可以在不同的版本中找到。不同于参考文献部分，所有引用的标题（无论文章还是书）在正文部分均用斜体字表示。

参考文献。引用的或补充的进一步讨论的文献按作者字母顺序排列。文章标题放于引号内，书名和期刊以**斜体**字表示。

正字法。引用内容的拼写与标点符号通常保留原样。古代作品将根据《杜登词典》正字法翻译；现代作者的作品，如果按原版或考证版本引用，则相反采用“老式”拼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若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引用，采用调整过的拼写法；若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引用，保留原文原貌。对正字法新规则的取舍，见本卷前言第五节。

缩　写

1. 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Benseler	《本泽勒希腊文—德文词典》(*G. E. Benselers Griechisch-Deutsches Wörterbuch*)，A. 克吉（A. Kaegi）修订，1990 年莱比锡第 19 版
DK	《前苏格拉底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H. 迪尔斯（H. Diels）译，W. 克兰茨（W. Kranz）编，第 18 版，苏黎世—希尔德斯海姆 1989/1992（据 1951 年第 6 版原样重印）
DMT	《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T. 博托莫尔（T. Bottomore）编，1983 年牛津版
EE	《欧洲哲学与科学百科全书》(*Europäische Enzyklopädie zu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en*)，H. J. 桑德屈勒（H. J. Sandkühler）编，1990 年汉堡版
Etymol WB	W. 普法伊费尔（W. Pfeiffer）《德语词源字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s Deutschen*)（2 卷本），1989 年东柏林版，1993 年柏林第 2 版
Frisk	H. 弗里斯克（H. Frisk），《希腊语词源字典》(*Griech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3 卷本），1960 年、1970 年、1972 年海德堡版
Gemoll	W. 格莫尔（W. Gemoll），《希腊语—德语字典》(*Griech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第 9 版，K. 弗雷茨卡（K. Vretska）审阅并扩充，H. 克罗纳瑟（H. Kronasser）加入语言史导论，1991 年维也纳版
Georges	K. E. 格奥尔格斯（K. E. Georges），《拉丁文—德文详解小词典》(*Ausführliches Lateinisch-Deutsches Handwörterbuch*)（2 卷本），1913

	年汉诺威—莱比锡第 8 版
GG	《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8 卷本），O. 布伦纳（O. Brunner）、W. 康策（W. Conze）、R. 科泽勒克（R. Koselleck）编，1974—1997 年斯图加特版
Grimm	格林兄弟（J. u. W. Grimm），《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16 卷本），柏林德国科学院编；1854—1960 年在莱比锡出版，自第 4.1.4 卷起由 H. 文德利希（H. Wunderlich）等续编；民主德国科学院与哥廷根科学院新编版，1965 年起在莱比锡出版
HKWM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W. F. 豪格（W. F. Haug）编，1994 年起在柏林出版
HWPh	《哲学历史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J. 里特尔（J. Ritter）、K. 格林德尔（K. Gründer）编，1971 年起在巴塞尔出版
Kl Pauly	《小保利古典学辞典》（*Der Kleine Pauly. Lexikon der Antike*），1964 年斯图加特版
F. Kluge	《德语词源字典》（*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1989 年西柏林第 23 版
KWM	《马克思主义考证辞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8 卷本），G. 拉比卡（G. Labica）、G. 邦叙桑（G. Bensussan）编，1982 年巴黎第 1 版，1985 年第 2 版；德文译本（*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W. F. 豪格（W. F. Haug）编，1983—1989 年西柏林—汉堡版
Lalande	A. 拉朗德（A. Lalande），《哲学术语与批判辞典》（*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1988 年巴黎第 16 版
Liddell/Scott	《希腊语—英语词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H.G.利德尔（H. G. Liddell）、R. 斯科特（R. Scott）编，H. S. 琼斯（H. S. Jones）爵士、R. 麦肯齐（R. McKenzie）增订，1990 年牛津版（重印自

	1940 年第 9 版，附 1968 年补遗）
LS	《社会主义辞典》（*Lexikon des Sozialismus*），Th. 迈尔（Th. Meyer）等编，1986 年科隆版
MiS	《马克思主义系统比较》（*Marxismus im Systemvergleich*），C. D. 克尼希（C. D. Kernig）编，1966 年弗赖堡版（多次重印）
PhWb	《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2 卷本），M. 布尔（M. Buhr）、G. 克劳斯（G. Klaus）编，1974 年莱比锡增订第 10 版
RGG	《历史与现实中的宗教》（*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6 卷本，附索引卷），1957—1965 年图宾根第 3 版
WdL	N. I. 孔达科夫（N. I. Kondakow），《逻辑学词典》（*Wörterbuch der Logik*）1978 年莱比锡版

2. 期刊

Actuel Marx	《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1987 年起在巴黎出版
Argument	《观点。哲学与社会科学杂志》（*Das Argument.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1959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Blätter	《德国与国际政治报》（*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56 年起在科隆出版
BzG	《工人运动史文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rbeiterbewegung*），1958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DZPh	《德国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1953—1989 年在东柏林出版；1990 年起在柏林出版，加了副标题“国际哲学研究月刊”（*Monatszeitschrift der internationalen philosophischen Forschung*）
FAZ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	《法兰克福评论报》（*Frankfurter Rundschau*）
FKP	《批判心理学论坛》（*Forum Kritische Psychologie*），K. 霍尔茨坎普（K. Holzkamp）编，1978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Gesellschaft	《社会。社会主义与政治国际周刊》(*Die Gesellschaft. Internationale Revue für Sozialismus und Politik*)，1924—1933 年在柏林出版
Grünberg-Archiv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卡尔·格律恩贝格（Carl Grünberg）编，1911—1930 年在莱比锡出版
IWK	《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liche Korrespondenz der Arbeiterbewegung*)，1964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
KZfSS	《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1948 年起在科隆出版
Leviathan	《利维坦——社会科学杂志》(*Leviathan—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1973—1974 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1975 年起在奥普拉登出版
MEF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论丛新编》(*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 Nene Folge*)，1991 年起在柏林和汉堡出版
MR	《每月评论。独立社会主义杂志》(*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L. 休伯曼（L. Huberman）等编，1949 年起在纽约出版
ND	《新德国》(*Neues Deutschland*)
NLR	《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1960 年起在伦敦出版
NZ	《新时代》(*Die Neue Zeit*)，1883—192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Prokla	《阶级斗争问题。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杂志》(*Probleme des Klassenkampfes. Zeitschrift für politische Ökonomie und sozialistische Politik*)，1971 年起在西柏林出版，1992 年起在明斯特出版，副标题改为“批判的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en*)
ReMarxism	《反思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与社会季刊》(*Rethinking Marxism. A journal of economics, culture and society*)，1988 年起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出版
SoPo	《社会主义政治。批判的社会科学机关刊物》(*Sozialistsiche Politik. Organ kritischer Sozialwissenschaft*)，1969—1978 年在西柏林出版

spw 《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杂志》(*spw—Zeitschrift für sozialistische Politik und Wirtschaft*)，1978—1989年在西柏林出版，1990年起在科隆出版

SuF 《意义与形式。文学论丛》(*Sinn und Form. Beiträge zur Literatur*)，1949—1950年在波茨坦出版，1951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WB 《魏玛文丛。文学、美学与文化学杂志》(*Weimarer Beiträge. Zeit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Ästhetik und Kulturwissenschaften*)，1955—1991年在魏玛—东柏林出版，1992年起在维也纳出版

Z 《马克思主义革新杂志》(*Z. Zeitschrift für marxistische Erneuerung*)，1990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ZfG 《历史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53—1991年在东柏林出版，1992年起在柏林—海德堡出版

ZfS 《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1932年在莱比锡出版，1933—1938年在巴黎出版，1939—1941年在纽约出版

3. 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B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1852)，MEW 8，第111—207页，MEGA I. 11，第96—189页

AD 恩格斯：《反杜林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1878)，MEW 20，第5—303页，MEGA I. 27，第217—538页

AMI 《卡尔·马克思关于分工、机器与工业的摘录笔记》(*Karl Marx. Exzerpte über Arbeitsteilung, Maschinerie und Industrie*)，历史考证版，R. 温克尔曼(R. Winkelmann)转写并编辑，1982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Bauernkrieg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Der deutsche Bauernkrieg«)(1850)，

MEW 7，第 327—413 页，MEGA I. 10，第 367—443 页

Bürgerkrieg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1871），MEW 17，第 313—365 页，MEGA I. 22，第 179—226 页

DI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1845—1846，首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MEGA¹）. Werke, Schriften, Briefe*］），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委托 V. V. 阿多拉茨基（V. V. Adoratskij）主编，第 5 卷，MEW 3，第 9—530 页

DI, Hiromatsu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 1 卷第 1 篇新编辑版》（*Diedeutsche Ideologie. Neuveröffentlichung des Abschnittes 1 des Bandes 1 mit textkritischen Anmerkungen*），广松涉（W. Hiromatsu）编，1974 年东京版

DN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1873—1883，首次发表于 1925 年），MEW 20，第 305—620 页，MEGA I. 26

Einl 5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Einleitung« zu den *Grundrissen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7），*Gr*，第 3—31 页，MEW 42，第 15—45 页，以及 MEW 13，第 615—642 页，MEGA II. 1. 1，第 17—45 页

Elend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1847），MEW 4，第 63—182 页

Erfurt 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entwurfs 1891«）（1891），MEW 22，第 225—240 页

Ethnol 《卡尔·马克思民族学笔记》（*Karl Marx: Die ethnologischen Exzerpthefte*），L. 克拉德（L. Krader）编，1976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Formen 《卡尔·马克思论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形式》（*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H.-P. 哈尔斯蒂克（H.-P. Harstick）编，197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otha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1875，

首次发表1890—1891年），MEW 19，第11—32页，MEGA I. 25，第3—25页

Gr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Rohentwurf]*）（1857—1858，首次发表于1939—1941年），1953年东柏林版，1983年新版见MEW 42，第47—768页，MEGA II. 1. 1—1. 2，第49—747页

HF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Die Heilige Familie*）（1845），MEW 2，第3—223页

Inauguraladresse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Inauguraladresse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3—13页，MEGA I. 20，第3—12页（英文版），第16—25页（德文版）

Judenfrage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e«）（1844），MEW 1，第347—377页，MEGA I. 2，第141—169页

K I 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Erster Band, Buch I: Der Produk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1867，1872年第2版）

K II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Das Kapital. Zweiter Band, Buch II: Der Zirkulationsprozeß des Kapitals*），F. 恩格斯编（1885，1893年第2版）

K III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Das Kapital. Dritter Band, Buch III: Der Gesamtprozeß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F. 恩格斯编（1894）

KHR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1844），MEW 1，第378—391页，MEGA I. 2，第170—183页

KHS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Kritik des Hegelschen Staatsrechts*）（1843，首次发表于1927年），MEW 1，第203—333页，MEGA I. 2，第3—137页

Klassenkämpfe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Die Klassen-

	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1850），MEW 7，第 9—107 页，MEGA I. 10，第 119—196 页（第 1—3 部分）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Lage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1845），MEW 2，第 225—506 页
LF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1886），MEW 21，第 259—307 页
Lohn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Lohn, Preis und Profit*）（1865，首次发表于 1898 年），MEW 16，第 101—152 页，MEGA I. 20，第 141—186 页（英文版），MEGA II. 4. 1，第 383—432 页（德文版）
Lohnarbeit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1849），MEW 6，第 397—423 页
Manifest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1848），MEW 4，第 459—493 页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1975—1989 年东柏林—莫斯科版，1992 年起由阿姆斯特丹国际马克斯恩格斯基金会编辑，在柏林—阿姆斯特丹出版
ME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arx-Engels Werke*），第 1—42 卷，1957—1989 年东柏林版；第 43 卷，1990 年柏林版
Ms 44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首次发表于 1932 年，MEGA 第 1 版 I. 3），MEW 40，第 465—588 页，MEGA I. 2，第 187—438 页
Ms 61-6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Manuskripte 1861-1863]），MEGA II. 3，第 1—6 页
Ms 63-67	马克思：《1863—1867 年经济学手稿》（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7），MEGA II. 4. 1 及 II. 4. 2
NRhZ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文章（1848—1849），MEW 5，第 11—457 页，MEW 6，第 5—519 页
Randglossen	马克思：《评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Randglossen zu Adolph Wagners *Lehrbuch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79—1880），MEW 19，第 355—383 页
Res	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第 3 稿第 6 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Ökonomische Manuskripte 1863–1865. Das Kapital，3. Entwurf，6. Kapite: »Resultate des unmittelbaren Productionsprozesses«）（首次发表于 1933 年），MEGA II. 4. 1，第 24—135 页
Statuten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Provisorische Statut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1864），MEW 16，第 14—16 页，MEGA I. 20，第 13—15 页（英文版），第 54—56 页（德文版）
Tech Exz	《卡尔·马克思技术史笔记》（*K. Marx, Die technologisch-historische Exzerpte*）历史考证版，H. -P. 穆勒（H. -P. Müller）转写并编辑，1982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西柏林—维也纳版
ThF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n über Feuerbach）（1845，首次发表于 1888 年），MEW 3，第 5—7 页
TM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1862—1863，由 K. 考茨基［K. Kautsky］编辑，首次发表于 1905 至 1910 年），MEW 26. 1，26. 2，26. 3，MEGA II. 3
Umrisse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1844），MEW 1，第 499—524 页，MEGA I. 3，第 467—494 页
Ursprung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es*）（1884），MEW 21，第 25—173 页，MEGA I. 29

Urtext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片断》（Fragment des Urtextes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8），*Gr*，第 869—947 页，MEGA II. 2，第 17—94 页
Utopie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1880），MEW 19，第 177—228 页，MEGA I. 27，第 583—627 页
Vorw 5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Vorwort« vo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7—11 页，MEGA II.2，第 99—103 页
Zur Kritik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859），MEW 13，第 3—160 页，MEGAII. 2，第 95—245 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Wladimir Iljitsch Lenin）

Briefe	《书信》（*Briefe*），10 卷本，1967—1976 年东柏林版
Im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Der Imperialismus als höchstes Stadium des Kapitalismus*）（1917），LW 22，第 189—309 页
ImpHefte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Hefte zum Imperialismus*），LW 39（1915—1916）
KapR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ßland*）（1899），LW 3，第 7—629 页
LR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Der »linke Radikalismus«, die Kinderkrankheit im Kommunismus*）（1920），LW 31，第 1—91 页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40 卷和 2 卷补遗，1953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ME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1909），LW 14，第 7—366 页
ökInh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Der ökonomische Inhalt der Volkstümlerrichtung und die Kritiken in dem Buch des Herrn Struve*）（1895），LW 1，第 339—528 页

PH	《哲学笔记》（Philosophische Hefte），LW 38
SR	《国家与革命》（*Staat und Revolution*）（1918），LW 25，第 393—507 页
Taktiken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Zwei Taktik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1905），LW 9，第 1—130 页
VF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Was sind die »Volksfreunde« und wie kämpfen sie gegen die Sozialdemokraten?*）（1894），LW 1，第 119—338 页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Akku	《资本积累论》（*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1913），GW 5，第 5—411 页
Briefe	《书信集》（*Gesammelte Briefe*），6 卷本，1982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 6 卷，1993 年柏林版
GW	《全集》（*Gesammelte Werke*），5 卷本，1970—1975 年东柏林版
Krise	《社会民主党的危机》（*Die Krise der Sozialdemokratie*）（1916），GW 4，第 49—164 页
Mass	《群众罢工、党和工会》（*Massenstreik, Partei und Gewerkschaften*）（1906），GW 2，第 91—170 页
SoR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1899），GW 1/1，第 365—466 页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B. Bochmann	《关于语言和文化的笔记》（*Notizen zu Sprache und Kultur*），K. 博赫曼（K. Bochmann）编，1984 年莱比锡—魏玛版
Briefe	《狱中书简》（*Gefängnisbriefe*），4 卷本考证版，U. 阿皮奇（U. Apitzsch）、P. 卡默勒（P. Kammerer）、A. 纳托利（A. Natoli）和 M. P. 奎尔乔利（M. P. Quercioli）编，1994 年起在汉堡出版
CPC	《共产党的建设》（*Costruzione del Partito comunista*）（1923—

	1926），1971 年都灵版
Gef	《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基于 1975 年葛兰西研究所委托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所编版本的考证版全集，在 K. 博赫曼（K. Bochmann）和 W. F. 豪格的学术指导下的德国葛兰西项目（Deutsches Gramsci-Projekt）编，1991 年起在汉堡出版
INT	《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Gli intellet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1949 年都灵版
K, Kebir	《马克思主义和文化。意识形态、日常生活、文学》（*Marxismus und Kultur. Ideologie, Alltag, Literatur*），萨比娜·凯比尔（Sabine Kebir）编译，1983 年汉堡版
LC	《狱中书简》（*Lettere dal carcere*），1965 年都灵版
LVN	《文学和民族生活》（*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1949 年都灵版
Mach	《关于马基雅维利、政治与现代国家的笔记》（*Note sul Machiavelli, 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1949 年都灵版
MS	《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1949 年都灵版
ON	《新秩序》（*Ordine nuovo*）（1919—1920），1954 年都灵版
Opere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作集》（*Opere di Antonio Gramsci*），1947 年起在都灵出版
PP	《过去和现在》（*Passato e presente*），1949 年都灵版
Q	《狱中札记》（*Quaderni del carcere*），葛兰西研究所 4 卷本考证版，V. 杰拉塔纳（V.Gerratana）编，1975 年都灵版
Ri, Riechers	《实践哲学》（*Philosophie der Praxis*），Chr. 里歇斯（Chr. Riechers）编译，1967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F	《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新秩序》（*Socialismo e Fascismo. L'ordine nuovo*）（1921—1926），1971 年都灵版
SG	《青年时期著作集》（*Scritti giovanili*）（1914—1918），1958 年都灵版
SM	《防波堤下》（*Sotto la mole*）（1916—1918），1916 年都灵版

Südfrage	《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Alcuni temi della quistione meridionale«, 德文译本：»Einige Gesichtspunkte der Frage des Süddens«)(写于1926年，1930年首次发表)，载《共产党的建设》(*CPC*)，第137—158页。E. 萨莱夫斯基(E. Salewski)译，载《安东尼奥·葛兰西——被遗忘的人文主义者？》(*Antonio Gramsci—vergessener Humanist?*)，H. 诺伊贝特(H. Neubert)编，1991年柏林版，第41—68页
Z 1980	《关于政治、历史和文化。文选》(*Zu Politik, Geschichte und Kultur. Ausgewählete Schriften*)，G. 扎米什(G. Zamiš)编，198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Z 1987	《对文化的思考》(*Gedanken zur Kultur*)，G. 扎米什(G. Zamiš)编，1987年莱比锡版

其他出版物和著作标题

阿多诺(Th. W. Adorno)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20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编，1973—198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阿尔都塞(L. Althusser)	*ISA*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1977年汉堡版
	LLC, DKL	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Lire le Capital*)，1968年巴黎版。德文译本：L. 阿尔都塞(L. Althusser)、E. 巴里巴尔(E. Balibar)等：《读〈资本论〉》(*Das Kapital Lesen*)，1972年赖因贝克版
	PM, FM	《保卫马克思》(*Pour Marx*)，1965年巴黎版。德文译本：《保卫马克思》(*Für Marx*)，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Cat*	《范畴篇》(*Categoriae*)
	Ph	《物理学》(*Physica*)
	Oec	《经济学》(*Oeconomia*)
	EN	《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

	Int	《解释篇》（*de Interpretatione*）
	Metaph	《形而上学》（*Metaphysica*）
	Po	《诗学》（*Poetica*）
	Pol	《政治学》（*Politica*）
	Rh	《修辞学》（*Rhetorica*）
鲍威尔（O. Bauer）	WA	《文集》（*Werkausgabe*），9卷本，1975—1980年维也纳版
本雅明（W. Benjamin）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7卷本，R. 蒂德曼（R. Tiedemann）和H. 施韦彭霍伊泽（H. Schweppenhäuser）编，1972—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伯恩施坦（E. Bernstein）	*Voraussetzungen*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n der Sozialdemokratie*），1899年斯图加特版
布洛赫（E. Blo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20卷本，1969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布劳恩（V. Braun）	Texte	《按时间排序的文章》（*Texte in zeitlicher Folge*），10卷本，1989—1993年萨勒河畔哈雷—莱比锡版
布莱希特（B. Brecht）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20卷本，197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GA	《全集》（*Werke*），柏林和法兰克福评注版，1989年起出版
	AJ	《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1938—1955）
季米特洛夫（G. Dimitroff）	AW	《选集》（*Ausgewählte Werke*），3卷本，M. 亚尔泽瓦（M. Jarzeva）总编，197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艾斯勒（H. Eisler）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民主德国艺术学院委托S. 艾斯勒（S. Eisler）、M. 格拉布斯（M. Grabs）主编，系列三，1972年起在莱比锡出版

	Gespräche	《与汉斯·邦奇的对话。进一步了解布莱希特》(*Gespräche mit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GW 7，1975年莱比锡版
费尔巴哈 (L. Feuerbach)	AS	《人类学唯物主义》(*Anthropologischer Materialismus*)，《文选》(Ausgewäh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主编并作导言，196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维也纳版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19卷本，W. 舒芬豪尔(W. Schuffenhauer)编，1967年起在东柏林出版：第19卷，1993年柏林版
	W	《著作六卷本》(*Werke in sechs Bänden*)，E. 蒂斯(E. Thies)编，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Wesen	《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1841)
弗洛伊德 (S. Freud)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按时间排序，17卷本，1946—1952年伦敦版
	SA	《学术研究版全集》(*Studienausgabe*)，A. 米切利希(A. Mitscherlich)、A. 理查兹(A. Richards)和J. 斯特雷奇(J. Strachey)编，1969—197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戈尔巴乔夫 (M. Gorbatschow)	AR	《演讲与文章选集》(*Ausgewählte Reden und Aufsätze*)，1988年起在东柏林出版
黑格尔 (G. W. F. Hegel)	*Ästh*	《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Ästhetik*)(1835年第1版，1842年第2版)
	Bassenge	《美学》(*Ästhetik*)，2卷本，基于1842年F. 巴森格(F. Bassenge)编辑版本的第2版，1955年东柏林—魏玛版及以后各版
	Enz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1817年第1版，1830年第3版)

	GeschPhil	《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1819—1828，出版于1833—1836年)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莱茵—威斯特法伦科学院(Rheinisch-Westfäl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编，1968年起在汉堡出版
	Logik	《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1812—1816)
	PhG	《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年第1版，1831年第2版)
	PhilGesch	《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1837年第1版，1840年第2版)
	RPh	《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1年第1版，1833年第2版)
	SW	《全集》(*Sämtliche Werke*)，G. 拉松(G. Lasson)编，1917年起在汉堡出版；新考证版《全集》，J. 霍夫迈斯特(J. Hoffmeister)编，1955年汉堡版
	W	《著作二十卷本》(*Werke in zwanzig Bänden*)，在1832—1845年《文集》(*Werke*)的基础上重新编辑，E. 莫尔登豪尔(E. Moldenhauer)和K. M. 米歇尔(K. M. Michel)编，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霍克海默(M. Horkheimer)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A. 施密特(A. Schmidt)和G. 施密德·内尔(G. Schmid Noerr)编，1985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康德(I. Kant)	*Anthrop*	《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ie in pragmatischer Hinsicht*)(1798年第1版=A，1800年第2版=B)
	KpV	《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1788)

	KrV	《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1781年第1版=A，1787年第2版=B)
	KU	《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1790年第1版=A，1790年第2版=B)
	Prolegomena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1783)
	WA	《著作集》(*Werkausgabe*)，12卷本，W. 魏舍德尔(W. Weischedel)编，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柯尔施(K. Korsch)	GA	《全集》(*Gesamtausgabe*)，受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汉诺威大学政治学研讨班的委托，M. 布克米勒(M. Buckmiller)编，1980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拉布里奥拉(A. Labriola)	*GkM*	《纪念〈共产党宣言〉》(*Zum Gedächtnis des kommunistischen Manifests*)(1895)，载《唯物史观论丛》(*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C. 波佐利(C. Pozzoli)和A. 阿斯凯里-奥斯特洛(A. Ascheri-Osterlow)编，197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73—138页
	ÜHM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Präliminarien*)(1896)，同上书，第139—266页
	SPh	《社会主义和哲学》(*Sozialismus und Philosophie*)(1898)，同上书，第267—414页
拉萨尔(F. Lassalle)	GRS	《演讲与论文集》(*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伯恩施坦(E. Bernstein)编，12卷本，1919—1920年柏林版

李卜克内西（K. Liebknecht）	GRS	《演讲与论文集》（*Gesammelte Reden und Schriften*），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院（Institut f. Marxismus-Leninismus beim ZK der SED）编，1958年东柏林版
卢卡奇（G. Lukács）	W	《文集》（*Werke*），17卷本，1962年起在新维德—西柏林出版
	GuK	《历史与阶级意识》（*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1923年增订版）
	Zerstörung	《理性的毁灭》（*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1954）
毛泽东（Mao Zedong）	AW	《选集》（*Ausgewählte Werke*）第1—5卷，1968—1978年北京版
	T	《著述文稿与演讲谈话》（*Texte. Schriften, Dokumente, Reden und Gespräche*），马汉茂（H. Martin）编，1979—1982年慕尼黑—维也纳版（汉—德对照本）
马尔库塞（H. Marcuse）	Schriften	《著作集》（*Schriften*），9卷本，1978年起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马里亚特吉（J. C. Mariátegui）	*Sieben Versuche*	《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Sieben Versuche, die peruanische Wirklickkeit zu verstehen*）（1928），附K. 福赛尔（K. Füssel）写的“导言”和W. F. 豪格写的“跋”，1986年西柏林—弗莱堡（瑞士）版
梅林（F. Mehring）	GS	《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11卷本，1960年起在东柏林出版，1971年东柏林第2版
尼采（F. Nietzsche）	KGA	《考证版全集》（*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972年起在柏林出版
	KSA	《考证研究版全集》（*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G. 克里（G. Colli）、M. 蒙提纳里（M. Montinari）编，15 卷本，1980 年慕尼黑—西柏林版
柏拉图	*Cra*	《克拉底鲁篇》（*Cratylus*）
（Plato）	*Grg*	《高尔吉亚篇》（*Gorgias*）
	Prt	《普罗塔哥拉篇》（*Protagoras*）
	R	《理想国》（*Respublica [Politeia]*）
	Smp	《会饮篇》（*Symposium*）
	Sph	《智者篇》（*Sophista*）
	Tht	《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
	Ti	《蒂迈欧篇》（*Timaeus*）
大卫·李嘉图	W	《著作通信集》（*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rdo*），11 卷本，P. 斯拉法（P. Sraffa）和 M. 多勃（M. Dobb）编，1951 年起在剑桥出版
（D. Ricardo）	*Grundsätze*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Über die Grundsätze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und der Besteuerung*）（1817），P. 塔尔（P. Thal）编，1979 年东柏林版
亚当·斯密	*Reichtum*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Wesen und die Ursachen des Reichtums der Nationen*）（1776），3 卷本，P. 塔尔（P. Thal）编，1963 年、1975 年、1984 年东柏林版
（A. Smith）		
斯大林	W	《全集》（*Werke*），13 卷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译，1950 年起在东柏林出版（1947 年起在莫斯科出版俄文版）
（J. Stalin）	AW	《选集》（*Ausgewählte Werke in zwei Bänden*），德国共产党马列主义派（KPD-ML）编，1979 年多特蒙德版
	FL	《列宁主义问题》（*Fragen des Leninismus*）（1938），

		1947年莫斯科第11版
	ÖkP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Ökonomische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in der UdSSR*)，1952年柏林版第1版，多次再版
	Sprachw	《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Der Marxismus und die Fragen der Sprachwissenschaft*)，1951年柏林第1版，多次再版
	DHMat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Geschichte der KPdSU[B]*)，1938年莫斯科版；又载于*FL*
托洛茨基(L. D. Trotzki)	GW	《文集》(*Gesammelte Werke*)，2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7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Schriften	《著作集》(*Schriften*)，2卷本，H. 达默尔(H. Dahmer)编，1988年起在汉堡出版
	Wr	《作品集》(*Writings of Leon Trotzky*)，12卷本和2卷补充本，1975—1979年纽约版
马克斯·韦伯(M. Weber)	GA	《全集》(*Gesamtausgabe*)，受巴伐利亚科学院社会和经济史委员会委托由H. 拜耳(H. Baier)、M. R. 勒普修斯(M. R. Lepsius)、W. J. 蒙森(W. J. Mommsen)、W. 施鲁赫特(W. Schluchter)、J. 温克尔曼(J. Winkelmann)编，1986年起在图宾根出版
	RS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1920—1921)，3卷本，玛丽安妮·韦伯(Marianne Weber)编，图宾根1988年第7、8、9版
	WL	《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1922)，J. 温克尔曼编，1985年

		校订第6版
	WuG	《经济与社会：理解社会学纲要》（*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1921），J. 温克尔曼编，第5版修订版，1976年图宾根版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PhU*	《哲学研究》（*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1945）
	TLP	《逻辑哲学论》（*Tractate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
	WA	《文集》（Werkausgabe），8卷本，第2版，198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4. 常用缩写

A.	版本
AdW	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GW	社会科学院（Akademie der Gesellschaftwissenschaften）
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O	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oin）
AS	《观点》特辑（Argument Sonderbnd）
Benseler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BKJ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Bund der Kommunisten Jugoslawiens）
Br	书信集、通信集（Briefe）
BRD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西德（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SP	国民生产总值（Bruttosozialprodukt）
CCCS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 [Birmingham]）
CDU	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CERM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巴黎）（Center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tes [Paris])
CGT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hKP	中国共产党（Chinesische KP）
CNT	墨西哥全国总工会（Confederación de Los Trabjadores）
DC	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
DD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东德（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
DGB	德国工会联合会（Deuscher Gewerkschaftsbund）
DiaMat	辩证唯物主义（Dialektischer Materialismus）
DK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DKP	德国共产党（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MT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EE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EKKI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Exekutiv-Komitee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FDGB	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Freier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FDP	自由民主党、自民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KP	法国共产党（Französische KP）
GA	全集（Gesamtausgabe）
Gef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Gefängnishefte*），见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GG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GS	文集、著作集、著述集（Gesammelte Schriften）
GULag	古拉格（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Glawnoje Uprawleenije Lagerej）
GW	文集、著作集（Gesammelte Werke）
Hg.	编者（Herausgeber）
hgg.	编、编辑、编纂、编写（herausgegeben）
HKWM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HWPh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IAA	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IfS	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IGB	工会国际（Internationaler Gewerkschaftsbund）
IISG	国际社会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Amsterdam］）
IKP	意大利共产党（Italienische KP）
IMSF	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Institut für marxistische Studien und Forschungen［Frankfurt/M］）
Jh.	世纪（Jahrhundert）
KGA	考证版全集（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I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I Pauly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Kominform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Kommunistisches Informationsbüro）
Komintern	共产国际、第三国际（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KP	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KPD	德国共产党、德共（KP Deutschlands）
KPD（O），KPO	德国共产党（反对派）、德共（反对派）（KP Deutschlands［Opposition］）
KPdSU	苏联共产党、苏共（KP der Sowjetunion）
KrpÖ	《政治经济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sche Ökonomie）
KSA	考证研究版（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KSZ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onferenz übe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KWM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KZ	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Lalande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LS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LW	《列宁全集》（Lenin Werke），见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见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MEW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Werke），见出版物与著作标题的缩写
MiS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ML	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Marxismus-Leninismus）
NÖP	新经济政策（Neue Ökonomische Politik）
NS	国家社会主义、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
PDS	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PhWb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POUM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
RGG	见百科辞典及词典的缩写
RGI	红色工会国际（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RKP（B）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KP Russlands［Bolschewiki］）
SAP（D）	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
SBZ	苏联占领区、苏占区（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
SDAPÖ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
SDAPR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Rußlands）
SDS	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合会（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SED	德国统一社会党（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SI	社会党国际（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SU	苏联（Sowjetunion）
SW	全集（Sämtliche Werke）
UN（O）	联合国（组织）（United Nations［Organisation］）
UNCTA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f Trade and Development）

USPD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民党（Unabhängige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W	著作集、文集、文选、全集（Werke）
WA	著作集、文集（Werkausgabe）
Z	期刊、杂志（Zeitschrift）
ZK	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5. 译者姓名首字母

CE	克里斯蒂安娜·艾特尔（Christiane Eitel）
DB	丹尼尔·巴本（Daniel Barben）
FS	弗洛里安·施马尔茨（Florian Schmaltz）
GG	乔治奥·贾科马齐（Giorgio Giacomazzi）
KF	克劳斯·弗里克（Klaus Fricke）
KG	卡特林·格林纳普特（Katrin Grünepütt）
PJ	彼得·耶勒（Peter Jehle）
JW	约阿希姆·维尔克（Joachim Wilke）
NB	纳娜·巴登贝格（Nana Badenberg）
RCD	罗尔夫·切斯克莱巴-杜邦（Rolf Czeskleba-Dupont）
SH	斯特凡·胡特（Stefan Huth）
TL	托马斯·劳格施廷（Thomas Laugstien）
TR	蒂尔曼·赖茨（Tilman Reitz）
VM	瓦伦娜·莫姆森（Valena Momsen）
WFH	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Wolfgang Fritz Haug）
WM	沃尔夫冈·迈尔斯（Wolfgang Maiers）

名词索引

Abalkin 83f
Abd-el-Kader 484
Abendroth 198, 455f
Abusch 691f, 696
Achenwall 298
Achten 830, 1100, 1104
Adam 362
Adams 957, 963f, 968
Adenauer 495
Adereth 375, 382
Adler, F. 717ff
Adler, M. 742, 744, 881, 893, 905ff, 909
Adorno 51, 74ff, 78, 151–54, 190ff, 210f, 265ff, 283, 309f, 319, 331, 373–78, 382, 437f, 546, 552, 584f, 587, 590, 596–99, 602f, 625, 634, 636, 695, 697, 718f, 726, 732, 744, 754ff, 761, 772, 791, 793f, 823f, 875, 877, 892f, 918, 925, 932, 938, 940–43, 951f, 954, 1097, 1108, 1116, 1120, 1127ff, 1165f, 1178, 1181, 1206
Agartz 495
Agazzi 656
Aglietta 10
Agnoli 284, 288, 777, 784
Ahmad 1097
Aischylos 659
Aitmatow 898
Ake 486
al-Farabi 606
Albers 913f, 989, 992
Albert 310f, 319
Albertini 486
Albrecht, E. 952
Albrecht, M. 229, 232, 236
Alchian 1074f, 1077
d'Alembert 604, 607–11, 616, 619
Alexander, N. 921, 925
Alexander, R. J. 511
Alquati 164
Althusser 1, 5–9, 11, 72, 249, 321, 327f, 341, 413, 415, 461, 472ff, 478f, 482, 565, 628, 636, 646–50, 656, 660, 671f, 674, 677, 718, 743, 752, 756ff, 761, 773, 775, 816, 822, 824, 831, 839, 842, 922, 973, 1049f, 1064ff, 1079, 1088, 1091, 1096, 1114, 1162, 1188
Altvater 260f, 368f, 443, 515, 520f, 580f, 1005f, 1009
Aly 347, 362
Amin 486, 569, 581, 999, 1030f
Amirova 952
Anaxagoras 170
Anaximander 169
Anaximenes 169
Anders 78, 153f, 211, 262, 267, 442f, 602, 967f, 1079, 1086, 1091, 1116, 1129, 1182, 1190, 1207
Andersch 377, 382

Anderson 345, 669, 673, 680
Andréas 60
Andresen 763ff, 775
Angehrn 880, 893
Angelov 899
Angenot 678, 680
Anissimow 898, 901
Annenkow 411, 417, 767, 775, 1083
Anselm von Canterbury 1106
Antonioli 830
Antonow-Owssejenko 535
Antunes 1005, 1010
Apel 329, 887, 889
Arabatzis 1156, 1165
Aragon 375
Archangelski 898, 901
Archard 1117, 1119, 1129
Ardelt 718f
Arendt 358, 362, 505
Aresin 899, 901
Arghiri 999
Aristipp 35
Aristophanes 262, 972
Aristoteles 95, 127, 135f, 167, 169–74, 222, 228f, 241, 245, 321f, 328, 330, 393, 410, 441, 523, 583, 624, 628f, 676, 715, 721, 811, 813, 910, 934, 939f, 954, 1036f, 1079, 1081, 1154, 1157f, 1198–1201
Arkesilaos 659
Armstrong 325
Arndt 177, 183, 186–89, 192
Arnold 1182
Artaud 635f
Arthur 1067, 1077
Arwatow 1180
Asendorf 1019, 1021f
Ashton, R. 405
Ashton, T. H. 406
Asor-Rosa 475
Assmann 148, 154, 731f
Assoun 761
Atatürk 863, 868
Audorf 715
Auernheimer 1030f
Augustinus 173, 207, 332, 1080, 1159
Austin 325, 329, 973, 978
Aveling 562, 566
Avenarius 716
Averroes 173f
Avicenna 173
Avrich 830
Axelrod, L. I. 717
Axelrod, P. B. 291, 895, 996
Axt 1000, 1004, 1010
Aylmer 405f
Ayres, L. W. 366, 369
Ayres, R. U. 366, 369, 1067, 1077

Baader 956, 968
Babeuf 20f
Bach 899, 901
Bachelard 646, 656, 757, 1048ff, 1155, 1163, 1165
Bächli 811, 825
Bachmann 1141, 1151
Bachofen 42
Bachtin 422
Bächtold-Stäubli 972, 978
Back 924f
Backes 1208, 1215
Backhaus 123, 125, 132f, 845f
Bacon 13, 175, 322, 326, 328, 606, 609, 619, 639, 710, 714, 1039, 1153
Baczko 468
Badiou 655f
Bahr 1181f
Bahro 1192
Baier 695, 697, 1179, 1182

Bailer-Galanda 362
Bailes 239, 244
Bailey 96, 99, 117
Bakunin 277, 288, 585, 868ff, 873, 973, 1215
Baldinger 952
Balibar 8, 11, 72, 249, 256f, 479, 646, 656, 672, 839, 1008, 1010, 1050, 1064f, 1094, 1097
Ballerstedt 272
Graf Ballestrem 750, 761
Ballin 1018
Baltas 648, 656
Balzac 1172, 1174, 1176
Bammel 763, 775
Banerjee 569, 581
Banfi 646, 656
Bankier 362
Baracca 655f
Baran 568f, 581
Barck 373, 375, 382, 1182
Barrett 47f, 923, 925
Barth, F. 921
Barth, P. 185, 192
Bartolus 82
Bartsch 564
Bastiat 301
Bataille 1093f, 1097, 1206f
Batens 1154, 1165
Batt 1179, 1182
Baudelaire 266
Baudrillard 337, 345
Bauer, B. 275, 410, 462, 753
Bauer, O. 60, 107, 111f, 116f, 452, 454, 749, 905ff, 909, 988f, 997ff
Bauer, Y. 362
Bauman 599, 602
Baumgart 379, 382
Baur 79, 83
Bausinger 930
Baust 900f
Bay 734, 738
Bayertz 964, 970
Bayle 236, 608, 611, 619
Beattie 602
de Beauvoir 78, 887, 1123, 1125, 1129
Bebel 34, 36, 40, 48, 59f, 834, 839, 853, 857
Becher 237
Bechmann 1141, 1151
Beck 54, 64f, 781, 784
Beck-Gernsheim 65
Beckenbach 521
Becker 317, 319
Becker-Schmidt 317, 319
Beckett 634, 937f, 942
Beckmann 48
Bednarek 198
Beerhorst 1103f
Behrend 779, 784
Behrens, D. 122, 125
Behrens, F. 456f, 460
Behrens, M. 829f
Beiersdörfer 595, 602
Beierwaltes 166, 192
Bell 331, 345, 679f
Beller 1156, 1165
van Bendegam 1154, 1165
Bender 802f, 807
Bendit 839
Bendix 592
Benhabib 888f, 893
Benjamin, G. 960, 968
Benjamin, J. 736, 738
Benjamin, W. 141, 143–52, 155f, 210, 265, 283, 331, 344, 378, 546, 550ff, 560, 594, 596, 602, 624, 631, 633, 671f, 690f, 696, 722, 724ff, 729, 733, 768, 771f, 960, 1064, 1080, 1090, 1096, 1175, 1180, 1204f
Benn 1169, 1183
Bennhold 1019, 1021f
Bennholdt-Thomsen 854,

858
Benseler 659
Bensussan 1192
Bentham 35, 879
Benton 738
Benveniste 1094, 1097
Benz 355, 357, 362
Berdjajew 905
Berger, H. 312, 319
Berger, J. 68, 72, 600, 603
Bergmann, A. 966, 968
Bergmann, Th. 391, 490, 532, 535
Bergschicker 854, 857
Berija 529
Berkeley 323, 328, 610, 717
Berlekamp 1022
Berlinguer 624, 983, 986, 988, 992
Bernal 655, 657
Bernard 1153, 1163, 1165
Bernstein 52, 107f, 117, 256, 278, 280, 288, 291, 302f, 384, 394, 406, 742, 749, 872f, 906, 1028, 1210
Bettelheim 256f, 485f, 490
Beyer 598, 603
Bidet 116f
Bieling 1006, 1010
Biermann 267
Biesecker 71f
Biester 1010
Bilgakow 306
Billig 346, 734, 738
Bimboes 369, 1151
Bischoff 490, 783, 785, 992, 1009f
Bismarck 445, 801, 860, 865f
Blackburn 454
Blaich 200, 203
Blanqui 21
Blaug 59f, 117
Blauner 468
Bley 486
Bloch, E. 7, 74, 153, 155, 229, 236, 335f, 345, 437f, 539, 547, 553, 582, 596, 672, 689f, 697, 722f, 726, 733, 752f, 755, 761, 770–73, 813, 825, 885, 901, 937, 939, 942f, 966f, 971, 973ff, 978, 1096, 1106, 1118, 1122f, 1129, 1167, 1170ff, 1174, 1178f, 1181f, 1184
Bloch, J. 335, 386, 418, 687
Bloch, M. 855
Blüher 790, 794
Blum 868
Blumenberg 975, 978
Bobbio 341, 345
Bock, G. 67, 72, 956, 968
Bock, K. 185, 192
Bock, T. 63, 65
Boer 154, 772, 775
Boethius 173, 1037, 1081
Boff 153f
Bogdanow 241, 244, 368, 686, 717
Bogner 592, 603
von Böhm-Bawerk 107f, 117, 121, 125
Bohrer 379f, 382
Böke 822, 825
Bollhagen 319
Bollnow 391
Boltanski 272
Bolte 877, 893
Boltzmann 514, 1045
Bolzano 637
Börner 1149, 1151
Bonacich 920, 925
Bonald 1209
Bonder 1009f
Bönisch 1034, 1050
Bopp 946f

Borchardt 839
Borgius 418f
Boris 581, 1030f
Bormann 347
Bornius 228, 236
von Bortkiewicz 121, 125
Bosi 992
Bossel 369f
Boudin 107, 117
Bourdieu 75, 79, 271f, 380, 382, 856f, 1094, 1096ff
Boussingault 366
Boveri 1058
Bowles 115, 117
Bown 1029, 1031
Boyd 325
Bracher 1215
Bradley 324, 329
Bradter 898, 901
Brandler 529
Brandt 511
Braudel 439, 443, 660, 680, 855, 857
Braun, A. 803, 807
Braun, L. 1036, 1050
von Braun 39f, 160f, 280, 636
Braungart 1151
Braverman 116f, 239, 244
Brecht 39, 45, 52, 133ff, 137-42, 149ff, 155-61, 198, 263f, 266, 374, 376, 547-50, 553, 624, 628-36, 647, 656, 661, 690, 693ff, 728, 751, 753, 857, 898, 914, 943, 1036, 1049, 1074, 1089, 1096, 1105, 1113, 1167f, 1171, 1174-81, 1205
Bredel 1168
Brenner, H. G. 376
Brenner, R. 400, 406, 672
Brentano 1045, 1050
Brentel 129, 132
Breschnew 481, 483, 534
Breuer 600-3
Brie, A. 781, 785
Brie, M. 84, 183, 192, 781, 785
Briegleb 728, 733
Briggs 521
Bringolf 529
Brinkmann 719
Brock 1100, 1103f
Brockmeier 1153, 1165
Bromley 925
Bronnen 630
Bronska-Pampuch 46, 48
Brown, E. H. Ph. 58, 60
Brown, N. O. 790, 793f
Browning 362
Brucker 230
Brüggemann 690, 697
Brüggemeier 519, 521
Brumlik 153, 1119, 1129
von Brünneck 455f
Bruno 15, 174
Brunton 406
Brzezinski 980, 1213
Buanek 963
Buber 207f, 211
Buch 107, 117
Bucharin 235, 368, 450, 454, 528, 530, 532, 535, 564, 566, 751, 853, 857, 912, 1063, 1066, 1072f, 1077
Buchheim 362, 938, 943
Büchner 233, 366
Buci-Glucksmann 782, 785
Budde 229, 236
Buddha 934f
Budé 605
Bufalini 992
Buffon 608
Buhr 476, 479, 638, 1180, 1182
Bulganin 529
Buonarroti 20f
Burckhardt 268

Burg 856f
Burger 1173
Burgmeister 1182
Burke 1209, 1215
Burkett 702, 709
Bürki 932
Burmeister 375, 382, 1182
Burrin 362
Busch 1000, 1003, 1005, 1010, 1197
Busch-Lüty 71f
Butenko 83f
Butler 734, 738
Byron 1174

Cabrera Acosta 343, 345
Caesar 866
Calvez 468
Camiller 1005, 1010f
Campanella 13, 954
Campbell 1059
Campe 536
Camus 372, 1121
Cangli 476
Canguilhem 647, 656f, 1163, 1165
Cantillon 95
Cantor 1162
Cap 992
Carlyle 700, 709, 1174
Carnap 190, 639
Carnot 364, 370, 1155, 1159
Carr 239, 244
Carrillo 624, 986, 988, 992, 999
Cartelier 1098
Cartwright 163f
Carus 178
Carver 391
Cases 625, 636, 1180ff
Cashmore 925
Cassirer 324, 329
Castel 956, 968, 1140
Castells 1134, 1140
Catephores 87, 94
Caudwell 688, 697
Cavaillès 646, 656f
Ceausescu 805
Celsus 321, 468
Cerutti 603
Cervantes 1172
Cesarani 362
Cesarini 980, 992
Chambers 607, 619
Chaplin 851
Charles I. 397, 399, 404
Charles II. 396, 402, 404
Charmé 77, 79
Chartschew 898, 901
Chasschatschich 718f
Chavée 948
Chemnitzer 458, 460
Chilcote 581
Chisholm 1033f, 1050
Chomsky 325, 329
Chruschtschow 477, 529ff, 534, 982
Churchill 492
Ciccotti 655, 657
Cicero 227, 811, 825, 1037
Cicourel 310, 314, 319
Clair 1116, 1129
Clairmont 185, 192
Clark 396, 406
Clarke 10f, 318f
Claß 1017, 1020
Clastres 927
Claudin 990, 992
Claus 1144, 1152
Clausewitz 390, 1156
Clausius 364ff, 512ff, 520
Claussen 598, 603
Clay 405f
Clemens Alexandrinus 227, 236
Cobett 260
Cocks 1010
Coenen 1104

Cohen 85, 94, 903, 906–9
Cohn 319
Cole 422, 426
Colletti 392
Collins 1039
Commoner 369f, 519ff, 708f, 1142, 1144f, 1148, 1151
Comte 299, 319, 324, 329, 388, 592, 602, 618, 647, 665, 1083
Condillac 608, 610
Condorcet 14, 610, 663, 669, 680, 1025, 1031
Conert 1099, 1102ff
Connell 11
Connolly 292, 296
Conry 656f
Córdova 569, 576, 581
Corea 966, 968
Cornford 676
Cornu 15, 19, 392, 471, 475, 479
Coser 468
Coster 217, 225
Cotten 1098
Courtois 296
Cousin 232, 235
Cowley 206, 211
Cox, O. C. 918f, 925
Cox, R. W. 1008, 1010
Craig 375, 382
Crawford 736–39
Crease 1154, 1166
Crichley 1096, 1098
Croce 374, 647, 910–14, 950, 1089
Crombie 1153, 1157, 1166
Cromwell, O. 399f, 402, 404, 789
Cromwell, R. 400
Cullen 300, 319
Cunningham 341, 345
Cunow 454
Czarnowski 956, 968
Czeskleba-Dupont 512, 522, 1141, 1149, 1151f

Dahrendorf 804, 807, 1005, 1010
Daire 56, 60
Daly 1142
Damerow 188, 193, 655, 657
Danielson 365
Danton 50
Darnton 619
Darwin 365, 387, 557, 560ff, 566, 651, 674, 926, 953, 1052–63, 1069, 1085
Daudin 1160, 1166
Daumer 593
Davidson 1025, 1031
Davies 738
Dawes 997
Dawidowicz 358, 362
Dawydow 468, 477, 479
De Man 143
De Martino 929
Dean 468
Deborin 564, 566, 718
Debouzy 826, 830
Defoe 200
Degner 968
Deleuze 191, 193, 671, 1095
Della Volpe 646, 657, 1181f
Dellheim 785
Delphy 47, 49, 67, 72
Demandt 972, 977f
Demirovi'c 11
Demokrit 170, 554, 557, 786, 938ff, 1091
Deng Xiaoping 489f
Denisowa 1117, 1129
Deppe 22, 992, 1000, 1003–6, 1010
Derrida 191, 250, 331,

341ff, 345, 664f, 680, 825, 914, 1092–98
Desanti 656f
Descartes 85, 174f, 228f, 606, 610, 616, 619, 639, 720, 745f, 752, 754, 809, 940, 1037ff, 1041, 1050, 1106, 1121
Desroche 763, 775
Deuser 856f
Deutsch 107, 110ff, 116f
Deutscher 489f, 510f, 531ff, 535
Devitt 1035, 1050
Dewey 324f, 329, 646, 656, 759f, 887, 1153, 1166
Diderot 230f, 236, 323, 604, 607–12, 619, 1161
Dieckmann 619
Dieffenbacher 521
Diels 938
Diemer 745, 761
Dierse 205, 208, 211
Dieterich 929f
Dietl 965, 968
Dietsche 1024, 1031
Dietzgen 562, 566, 712f, 719, 749, 768, 770, 775, 1063
Diez 946f
Dilthey 137, 146, 178, 587, 676
Dimitroff 197f, 688, 1168
Diner 154
Dingier 656, 1153, 1166
Diogenes Laertius 227f, 237
Dionysios Pseudo-Areopagita 173
Dirlik 668, 680
Djilas 266f, 533, 535
Dobb 395, 406, 581, 672
Dobhansky 1058
Döblin 1176
Dohse 296
Fra Dolcino 768
Dollo 1056
Dominicus Gondissalinus 606
Dommanget 830
Donellus 82
Dörner 361, 956, 968
Dos Passos 1171f, 1177
Dosi 1067, 1075ff
Dost 1010
Dostojewski 933, 937
Doubleday 260
Douglas 1129
Doyal 329, 656f
Dräger 1006, 1010
Drechsel 42, 49
Dreitzel 232, 237
Drischler 995, 999
Drobisch 362
Droysen 1043, 1050
Dubček 982
Dubet 1135, 1140
Dubiel 873
Duden 67, 72
Duhem 326, 329, 1153, 1166
Dühring 104, 122, 180, 389, 561, 747f, 882, 904, 955, 968, 1057
Dümcke 802, 807
Dummett 1035, 1050
Dunker 839
Dunning 58, 60
Duns Scotus 1037
Dürer 692
Durkheim 299, 318ff
Dürrenmatt 635
Düsing 225
Dussel 775, 889, 893, 1029, 1031, 1184
Dutschke 284, 288, 999, 1128f

Eagleton 1098
Eastman 531, 535

Ebach 771ff, 775
Ebeling, H. 260f
Ebeling, W. 1067, 1078
Ebert 797, 807
Echeverría 338, 345, 822, 825
Eckertz 456
Eckhart 205
Eco 375, 382, 475
Eddy 763, 775
Edwards 272, 920, 925
Ehlen 897, 901
Ehling 73
Ehrenburg 362, 853, 857, 1172
Ehrensvörd 1147
Eichholz 361f, 1021f
Eichhorn 285, 288, 477, 479, 897, 901
Eichmann 351, 353f, 358
Eisenstein 1180
Eisler, H. 198, 237, 689f, 692, 697, 1079, 1167, 1170ff, 1174, 1178–82
Eisler, R. 761, 1033, 1050, 1106, 1115
Eisner 906
Elfond 198
Elias 856f
Eliot 688
Elleinstein 623f
Ellis 959
Elm 503, 505
Eisen 71f
Elsner, L. 296
Elsner, W. 1010
Elson 454
Elster 108, 117
Éluard 373
Emmel 205, 208, 211
Empedokles 170
Engelberg 680
Enzensberger 331, 345, 373–76, 378, 382
Epiktet 228
Epikur 35, 275, 811, 877, 893
Erasmus 263
Erdmann 898, 901
Erhard 1020
Ernst 581
Erpenbeck 635, 898, 901
Erzberger 196
Eschwege 362
Esser 318ff
Euchner 249f
Everitt 396, 406
Ewert 146
Fabricius 229f
Fadeev 141
Fahrenbach 156f, 161
Fanon 153, 476, 479, 931f, 998f
Fassler 900f
Fasso 952
Faulwetter 569, 575, 581
Feder 231
Feen 954, 968
Féher 478f, 627
Feldman 1034, 1051
Fellman 1202, 1207
Feoktistow 490
Ferguson 584, 590, 661, 680
Ferraro 345
Ferrater Mora 345
Ferrier 638, 657
Fest 801, 807
Fetscher 16, 19, 468, 476, 893
Feuchtwanger 623f, 1168, 1172
Feuerbach 175, 184, 208, 215f, 285, 408f, 434, 438, 461f, 471, 539, 639, 747, 760, 787, 849f, 899, 1043f, 1081, 1091, 1108, 1110, 1117, 1129f

Feuerlein 230
Feyerabend 227, 325, 329, 759, 761
Fichant 638, 655ff
Fichte, I. H. 177
Fichte, J. G. 14, 76, 177, 234, 431ff, 438, 556, 615, 637, 810, 1015, 1022, 1040, 1051, 1109
Fiebach 636
Filipcenko 963
Filskov 1144, 1152
Fine 87, 94
Fiore 665
Firestone 47, 49
Firsow 194, 198
Fischer, E. 623f, 693, 983
Fischer, F. 1020, 1022
Fischer, K. 1063
Fischer, P. 107, 117
Fischler 856f
Flasch 166f, 173, 193, 943
Flashar 146
Flaubert 588, 677
Flechtheim 285
Fleck 1153, 1166
Fleischer 15, 19
Fleming 347, 362
Fletcher 396, 406
Flick 499
Foner 830
Fontana 345, 913f
Fontius 146
Ford 369f, 520, 522
Forschner 16, 19
Forster 273, 288
Forsthoff 1216
Fortini 374, 383, 1181f
Foster, H. 340, 345
Foster, J. B. 701, 708f
Foucault 191, 193, 380f, 383, 471, 479, 919, 954, 968, 1095, 1206f
Fourier 234, 274, 288, 669, 767, 788, 848f, 857
Fox 688, 697
van Fraassen 324, 329
Francioni 1096
Franco 573, 581
Frank 692, 697
Franklin 1154, 1166
Franz 987, 993
Fraser 1097f
Fraunberger 1154, 1166
Freeden 968
Freeman 1075ff
Frege 179, 639
Freiberg 1158
Freire 836–39
Frenke-Brunswik 932
Freud 1, 544f, 553, 651, 729, 790–93, 891, 1086ff
Freudenthal 655, 657
Freudiger 719
Frey 958, 968
Freyberg 198
Freye 965, 968
Fricke 830, 1018, 1022
Friederici 60
Friedlander 358f, 362
Friedrich, C. J. 1212f, 1215
Friedrich, H. 819f, 825
Friedrich, J. 501, 503, 505
Friedrich, W. 312, 320
Friedrich II 695
Friege 1144, 1152
Frings 952f
Frisch 635
Frisk 809, 825, 915
Frolow 963, 968, 1085, 1091
Fromm 468, 791
Frosini 288
Frostin 766f, 775
Fuchs 896, 901
Fuchsloch 1151
Fuhrmann 134f, 146
Fukuyama 341f, 345, 1097
Fülberth 697, 807, 992, 1022

Funkenstein 148, 154
Furth 186, 188f, 193, 538, 553
Füssel 775

Gabel 468, 479
Gábor 140
Gadamer 146
Gahse 965, 968
Gaismair 847
Gale 237
Galen 659
Galgano 256f
Galilei 651, 1040, 1153, 1158f, 1161, 1166
Galison 1154, 1162f, 1166
Gallas 141, 146, 695, 697, 1179, 1182
Galton 953, 968
Gandhi 484
Gans 975
Garaudy 20, 22, 375, 431, 438, 472ff, 479, 623, 693f, 825, 886f, 893, 897, 983, 1126, 1130f
Gardiner 394, 406
Garfinkel 310
Gassendi 322
Gaßner 239, 244, 854, 857
de Gaulle 197
Gault 738
Gebauer 146
Gedö 468, 479
Geerlandt 472, 479
Geertz 929f
Gehlen 311, 320, 378, 382f, 468
Gehrcke 288
Geiger 146
Geissler 899, 901
Gemoil 659, 809, 825
Genet 588
Genovesi 230
Gentile 911
Gentz 1209
George 596, 790, 1008, 1011
Georgescu-Roegen 368, 370, 514, 522, 708f
Gershuny 68, 72
Gerstenberger 132
Gethmann 761
Gey 83
Geymonat 647, 655ff
Ghisu 479, 1091
Gibson-Graham 1098
Giddens 54, 318, 320, 440-43, 702, 709, 1132, 1140
Gide 1176, 1204f, 1207
Gilbert, M. 347, 362
Gilbert, W. 1158
Gill 1009, 1011
Gillen 854, 857
Gilligan 899
Ginsburg 535
Gintis 115, 117
Giordano 505
Giovagnoli 830
Gisselbrecht 1181f
Glaser 719
Gläser 856f
Glatzer 272
Glazer 920, 925
Gloy 166, 193
Godelier 594, 603, 669, 680, 928, 1025, 1031, 1128, 1130
Goebbels 264, 267, 347
Goethe 50f, 56, 227, 232, 241, 325, 329, 692, 936, 1089, 1173f
Göhler 124f
Goldberg 575, 581
Goldendach 1018, 1021f
Goldhagen 361
Goldmann, E. 44f, 49
Goldmann, L. 475
Goldstücker 477, 983
Gömmel 200, 203

Gomulka 530
Gooding 656f, 1154, 1162, 1166
Goralczyk 1003, 1011
Gorbatschow 39f, 84, 478f, 623, 779f, 1080, 1091
Gorbunow 684, 697
Gordon 920
Göring 347, 350, 355, 361
Gorki 1172
Görler 659, 681
Gortzen 598, 603
Gorz 68, 70, 72, 286, 288, 804, 807
Gössler 716, 719f, 745, 761
Gossweiler 1016, 1019, 1022
Gowdy 1075, 1078
Goytisolo 375
Grabitz 362
Graeser 811, 825
Grahl 1005, 1011
Gramsci 1, 4f, 7, 10, 17, 27, 51, 53, 134, 143, 157, 159, 162, 256, 263, 269, 282, 307, 312, 318, 335, 413, 470, 546f, 594, 647, 649, 654, 714, 732, 742, 751ff, 757, 769f, 775, 781, 822, 834f, 839, 866, 884f, 893, 909–12, 922, 930, 950, 977, 981, 988, 998, 1003, 1006, 1028, 1046, 1063, 1089, 1096f, 1101, 1127, 1153f, 1157, 1160, 1163, 1165
Gran 1023f, 1030f
Grass 274, 288
Grassel 899, 901
Graunt 297, 320
Green 324, 329
Grefe 856f
Greiff 656f
Greiling 454
Greiner 380, 383
Gremliza 380, 383
Gress 692, 697
Gretschmann 68, 72
Grieshammer 856f
Grimm, J. 536, 809f, 933, 937, 946f, 1094, 1098
Grimm, R. 536, 625, 636, 809f, 933, 937, 946f
Grimm, W. 1094, 1098
Grimmelshausen 1172
Grohs 486
Großer 799, 807
Grossmann, A. 957, 968
Grossmann, V. 362
Grosz 734, 739
Grotjahn 959, 968
Grunewald 1022
Güde 503
Guenancia 655, 657
Guiraud 953
Guizot 394, 406
Günderode 1173
Günther, E. 899, 901
Günther, H. 686, 689, 697, 718, 1168, 1182
Guterman 471
Gutiérrez 153f, 775f
Gutiérrez Díaz 993
Gutind 486
Gutman 362

Haase 695, 697
Habermas 137, 146, 151, 154, 168, 192f, 284, 288, 310f, 320, 339f, 345, 361, 382f, 443, 468, 587, 589–92, 598, 600f, 603, 719, 743ff, 752, 755f, 760f, 783ff, 819, 825, 878f, 887ff, 893, 942f, 972, 1065f, 1108, 1127f, 1130
Hacking 656f, 729, 733, 1153, 1166

Häder 802, 808
Hadot 166, 193, 1105, 1115
Haeckel 178, 741, 1056
Haffner 360, 362
Hager 266f, 694, 697
Hahn, E. 320
Hahn, M. 900f
Halbfass 1036, 1051
Halbwachs 731, 733
Hall 10, 318, 320, 761, 822, 825, 922f, 925
von Haller 1083
Hampicke 519, 522
Han 327, 329, 1043, 1051
Handke 262
Haraway 318, 320, 967, 969
Harding 318, 320, 932
Harich 897, 1190ff
Harre 738f
Harrington 393, 406
Harris, L. 87, 94
Harris, R. 329, 656f
Harstick 345
Hartmann, K. 1116, 1130
von Hartmann 233
Harvey 127, 923, 925, 1158
Hasenclever 1174
Hassenpflug 1144, 1152
Hauck 927f, 1024f, 1031
Hauff 369f, 1148, 1152
Haug, F. 47, 49, 71f, 164, 314, 316f, 320, 392, 734–37, 739, 789, 794, 856f, 889, 893
Haug, W. F. 3, 11f, 50, 77, 84, 120, 124f, 153f, 157, 249ff, 263, 265, 307, 336, 377, 505, 552f, 587, 590, 594, 634, 647f, 676, 746f, 751, 753, 779f, 783, 790, 817, 821, 823ff, 875, 969, 972, 1026, 1028, 1049, 1088, 1104, 1152
Hauser 739
Hausleitner 457, 460
Havemann 483, 532, 535, 983, 1080, 1091
Hay 633
Heartfield 1180
Hecht 1178
Hecker 124f
Hedtke 1073, 1078
Hegel 5f, 41, 86, 88, 90ff, 165f, 175ff, 178, 180–85, 187, 189, 191, 212–15, 219f, 222f, 226, 231, 233ff, 237, 249, 273f, 285, 301, 322, 324f, 330–35, 342, 388ff, 410, 414, 431–36, 438, 461, 523–27, 538f, 543, 553, 556, 558, 561, 565, 584f, 604, 612ff, 615, 617f, 625, 627ff, 639, 642, 645, 647, 660, 666, 675, 686, 711, 714, 721ff, 728, 741f, 746, 753, 756, 787, 810, 812f, 819, 840, 845, 861f, 875ff, 885, 908, 911f, 934ff, 939f, 971–78, 1023, 1025, 1039, 1043f, 1048, 1055, 1063, 1070, 1073, 1082ff, 1107–12, 1115, 1121, 1124, 1126, 1164f, 1200–3, 1206
Heidegger 74–79, 207, 331, 337, 527, 585–88, 590, 665, 754, 759f, 809, 939–45, 951, 1086, 1093, 1107, 1112, 1116, 1118, 1122f, 1128, 1130, 1203, 1207
Heidenreich 1099, 1104
Heidtmann 193
Heim 362
Heimann 990
Heimbucher 839

Heimgartner 857
Heine, H. 203, 274, 288, 899
Heine, M. 845f, 1005, 1011
Heinrich 125, 878ff, 893
Heintel 166, 193
Heinze 67, 72f
Heise 468, 476, 479, 716, 719
Heißenbüttel 373, 383
Held, D. 341, 345
Held, K. 1036, 1051
van Helden 1163, 1166
Heller 345, 478f, 627, 636, 908
Helmholtz 364, 366, 1045, 1048
Helvétius 13, 16, 19, 607f, 619, 877
Henderson 392
Henn 1025, 1031
Hennicke 369f
Hennig 312, 320
Henrich, D. 166, 177, 193
Henrich, R. 804, 808
Henriques 739
Henseling 1145, 1152
Heraklit 169
Herder 176, 332, 555f, 929
Herkommer 818, 825
Herlitz 957, 969
Hermlin 372f, 383
Herodot 148, 659, 811
Herr 845f
Hertz 651, 1045
Herzog 148, 154
Hesiod 554, 786
Hess 461f
Hessen 1073
Heuer 39f
Hexter 396, 406
Heydorn 18f
Heydrich 347, 350f, 353
Hieronymus 227, 849
Hilberg 362
Hilferding 60, 107–12, 117, 449, 453f
Hill 393, 395f, 406, 688
Hillermann 178, 193
Hilton 393, 395, 406
Hilts 954, 969
Himmler 350, 353f
Hindess 327, 329, 656f, 670
Hindrichs 1104
Hinkelammert 1097f
Hinrichsen 116f
Hipfl 739
Hirsch, H. 384, 392
Hirsch, J. 10, 132, 285, 288, 863, 873, 1003, 1006f, 1011, 1145, 1152
Hirsch, P. 1152
Hirschman 537, 552f
Hirst 670
Hitler 141, 147, 264, 267, 348ff, 352f, 357–60, 493f, 504, 623, 765f, 868, 1019, 1175
Hobbes 16, 130, 175, 322, 328, 527, 561, 639, 1077, 1081, 1091, 1160
Hobsbawm 80f, 83, 342, 439, 443, 578, 581, 777, 785, 929, 1027, 1031
Hodann 960, 969
Hodge 739
Hodges 392
Hödl 764, 776
Hoeppner 789
Hoffmann 765
Hofmann, J. 802, 808
Hofmann, W. 200f, 203, 462, 468, 715, 719
Hofmeister 519, 522
Hohendahl 697
Hohenstein 990, 993
Hohlfeld 495, 505
d'Holbach 13, 16, 19, 608
Hölderlin 177, 666, 937,

1173
Höll 212, 221, 225
Holland 1000, 1002, 1011
Holz 371, 377, 383, 1049, 1051, 1120, 1130f
Hölzer 1010
Holzhey 237, 909
Holzkamp 1, 10f, 136, 146, 427, 429f, 653, 656f, 719, 730, 733, 838f, 1153, 1163, 1166
Holzman 422, 426
Homer 50
Hommerich 597, 603
Honecker 457, 460, 695, 799, 805, 808
Honneth 64f, 888f, 894
Höpcke 267
Hopkins 58, 60
Hoppe 900f
Höppner 21f
Horaz 227
Hörburger 1005, 1011
Horkheimer 34f, 40, 149, 151, 154, 190f, 266, 283, 307, 309, 320, 331, 545, 553, 590, 596f, 603, 726, 744, 772, 791, 794, 863, 873, 875, 891f, 918, 925, 942, 1087, 1091, 1097, 1113, 1165f, 1205f
Horn 264, 267
Horster 888f, 894
Horthy 358
Hörz 898ff, 901, 1065f
Hosfeld 19
Hossenfelder 659
Houzel 655, 657
Howard 1188
Huber 67, 70, 72
Hübner 261, 1005, 1009
Huffschmid 1005f, 1009ff, 1020, 1022
Hugenroth 1006, 1011
Huget 287f
Hughes 397, 406
Hügli 178, 193
Hugo 1145, 1152, 1174
Hugo von St. Viktor 606
Hülsmann 83, 1030f
von Humboldt 14, 204, 206, 947, 949
Hume 26, 134, 175, 177, 323, 325, 327f, 610, 639, 817, 1039f, 1051, 1161
Hümmler 795, 808
Hurtienne 577, 581
Hus 765
Husserl 324, 329, 471, 637, 659, 754f, 1046f, 1051, 1116, 1120, 1122, 1124
Hutter 989, 993
Huxley, A. 954, 969
Huxley, J. 1058
Hyppolite 825, 1126, 1130

Ibsen 885
Iljenkow 223, 225, 251
Illich 67, 70, 72
Ilium 369f, 512, 522
Ilting 977f
Immler 522
Ingrao 992
Irrlitz 438
Isidor v. Sevilla 605, 945
Isnardi Parente 1158, 1166
Isokrates 605
Israel 469, 475, 479
Itoh 116f

Jäckel 362
Jaeggi 272
Jaeschke 174, 193
Jäger 655, 657
Jahn 124f, 479, 845f
Jahoda 163f, 309, 320
Jakobi 176f
Jalée 485f

James, F. 1162, 1166
James, H. 262
James, W. 324, 329, 1046, 1051
James I. 404
James II. 396, 398, 403
Jameson 211, 338, 345, 660, 681, 1093, 1097f, 1181f
Janich 189, 193
Jánoska 119, 125
Jansen 965, 969
Jantsch 1067, 1072, 1078
Jantzen 1128, 1130
Janz 789, 794
Jaroszewski 371, 383
Jaspers 76f, 503, 505, 961, 1116, 1123
Jaucourt 611f
Jean de Beauvai 606
Jeanson 77, 79, 1120f, 1130
Jefferson 318, 320
Jessop 10, 12, 873, 1002, 1007, 1011
Jesus 766, 773
Jetzschmann 312, 319
Jevons 364f
Jochimsen 71f
Joffe 1073
Johannes Eriugena 173
John 150, 154
Johnson, S. 321
Johnson, U. 727f, 733
Johnston 704
Johst 264, 268
Jonas 50, 54
Jones 286, 289
Jorland 647, 657
Jouhy 1024, 1031
Joule 364f
Joyce 1172, 1176f
Juda 764
Jung 64f
Jünger, E. 379f, 527
Jünger, J. 565f
Jungnickel 122, 126
Jurt 380, 383

Kafka 634, 693f, 983, 1177, 1181
Kaiser 1174
Kaldor 1192
Kalinin 883, 895
Kallscheuer 761
Kämpfe 1058
Kan 1031
Kandinsky 1171
Kant 14, 16, 130, 168, 175ff, 212f, 222, 234, 273, 321ff, 324f, 332, 432, 556, 583f, 601, 613f, 639, 646, 683, 686, 711, 721f, 742, 745ff, 748f, 754ff, 757f, 810, 812, 817, 876, 878, 881, 885, 887, 903ff, 906ff, 909, 933f, 1025, 1040ff, 1046, 1048, 1061, 1082, 1085, 1106f, 1109, 1121, 1124, 1153, 1161ff, 1164f, 1207
Kapp 904, 1199, 1207
Karasek 765, 776
Kardelj 532, 535
Kardorff 66
Kaufmann 696f
Kautsky 108, 117, 123, 125, 132f, 149, 235, 256, 291, 302, 356, 394, 451, 454, 554, 562, 566, 707, 709, 742, 744, 768f, 776, 797, 808, 872f, 895, 902, 905, 907, 909f, 957ff, 969, 995, 1036, 1045, 1062f, 1106, 1210, 1215
Kebir 288
Kedrow 187, 193
Keiler 426
Keller, D. 808

Keller, G. 1172
Kellmann 992f
Kellner 899, 902
von Kempen 1140
Kepler 1158
Kerber 742, 744
Kerenski 866
Kern 286, 288, 297f, 313, 320
Kessler 391, 532, 535
Kesting 637
Ketelhut 47, 49
Keynes 845
Khalatbari 486, 568, 581, 1028, 1031
Kierkegaard 207, 211, 527, 585, 587, 589f, 724, 733, 886, 1079, 1108, 1128
Kiernan 581
Kiersch 1000, 1011
Kilborn 529
Kim S.-Y. 1031
Kippax 738f
Kirchheimer 493, 1215
Kirchhoff 564, 566
Kirchmann 306
Kircz 391
Kisker 1006, 1011
Kissinger 989
Kitcher 656f
Kittler 671
Klages, H. 64, 66
Klages, L. 790, 794
Klamper 894
Klatt 1180
Klaus 477, 479, 564, 566, 638
Klee, E. 352, 362
Klee, P. 331
Klein, D. 804, 808
Klein, M. 285, 288, 896, 902
Kleining 272
Kleinspehn 856, 858
Kleist 1173f
Klenner 974, 978
Kleopatra 821
Klessmann 495f, 498, 500ff, 505
Klevenow 969
Kliche 1182
Klimaszewsky 564
Klofác 320
Klotz 625, 637
Kluge 719, 727, 733
Klump 200, 203
Klutsis 239
Knepler 1179, 1183
Knobloch 71f
Knopf 1180, 1183
Köbsell 968
Kofler 270, 272, 468f, 479, 790, 793f
Kogon 346, 362
Kohlberg 887ff, 894
Kohn 763
Köhnke 745, 762
Kojève 584, 590, 666, 681, 1124, 1130
Kolakowski 478, 646, 657, 897
Kolcov 963
Kolm 257
Kolontai 45, 49, 895
Kolumbus 1024
Kondakow 235, 1034, 1051
Kondratieff 1071, 1073
Konersmann 771, 776
König 311, 320
Konstantin 764
Kontos 67, 72
Kopernikus 651
Kopnin 187, 193
Kopp 240, 244
Köppe 856f
Korn 683f, 697
Körner 900, 902
Korsch 60, 144, 149, 452f, 564, 714, 719, 742, 744, 774, 776, 959, 969, 1063,

1066
Kosambi 487
Koselleck 274, 288
Kosík 429f, 478, 894, 1184
Kosing 751, 762, 795, 808, 819, 825
Kössler 1027, 1031
Kossok 288
Kostede 130, 133
Kostov 530
Kostrzewa 529
Kott 636f
Kotzebue 977f
Kovalevski 927
Koyré 647
Kracauer 590, 596, 603
Krader 928
Krahl 288, 1130
Kraimer 66
Král 363
Kramer, D. 63, 65f, 930
Kramer, S. 881, 894
Kranz 938
Kraus, H.-J. 764, 776
Kraus, K. 1171
Krause 115, 117
Krausnick 363
Krauss 373, 383, 718
Krautkrämer 19
Kreckel 1132, 1140
Kreeb 513, 522
Kreimer 992
Krenz 780
Kriege 766
Krieger 657, 1154, 1166
Kristeva 1025, 1031
Kröber 224f, 564, 566, 810, 825
von Krockow 527
Kroll 957, 964, 969, 971
Kronauer 1134, 1136, 1138, 1140
Kropotkin 895
Krumpel 1024, 1031
Krupp 499
Krupskaja 770, 895
Kuczynski 58, 60, 1016, 1147, 1152
Kugelmann 1045
Kühl 956, 964, 969
Kuhn, A. 47, 49
Kuhn, T. S. 326, 329, 343, 639
Kuhne 124f, 131, 133
Kühnl 992
Kulenkampff 1033, 1051
Künzli 83, 384, 887, 889, 894
Kuo Heng-yü 198
Kurella 468f, 471, 476, 479, 693, 697, 1169f, 1174, 1183
Kurz 286, 288
Kutschera 1033, 1051
Küttler 288, 680

Labica 15, 19, 185, 193, 408, 421, 469, 615, 619, 676, 681, 750f, 753, 762, 766, 776, 1096, 1098
Labriola 307, 312, 554, 617, 748, 768, 770, 905, 950, 1028, 1089
Lacan 757, 1088
Laclau 1026, 1031
Lacoutre 487
Lactantius 227
Lafargue, L. 294
Lafargue, P. 43f, 49, 788f, 794
Lagrassa 256f
Laing 468f
Lakebrink 213, 225
Lalande 371, 638, 809, 938, 1059, 1066, 1079, 1153, 1166, 1198
Lanczkowski 776
Land 779, 785
Landauer 44, 49

Landsberg 961, 969
Lange, A. 903f, 909
Lange, E. 285, 288
Lange, E. M. 431, 438
Lange, K.-P. 146
Lange, O. 478f
Langford 405f
Langreiter 854, 858
Lapeyronne 1135, 1140
Laschitza, A. 285, 288
Laschitza, H. 494, 505
Lash 54
Lassalle 51, 54ff, 58ff, 625f, 682, 684, 869f, 873, 1060
Laszlo 1065f
Latini 606
Latour 664, 681
Laymon 1159, 1166
Lazarsfeld 308, 320
Lazzaretti 769
Le Breton 607
Le Goff 855f, 858
Le Play 299, 320
Lê Thàn Khoi 839
Leaman 1116, 1130
Lebowitz 700, 710
Lechner 442
Lecourt 656f, 718, 758, 762, 964, 969
Lee Kwan-Yiu 863
Lefebvre 162ff, 471f, 479
Lefèvre 167, 188, 192f, 650, 655ff, 1058
Legien 1018
Legrand 1154, 1166
LeGuin 735, 739
Lehmann 296
Leibniz 175, 228, 321, 323, 555, 639, 720, 940, 946f, 1041
Leipart 1018
Leiser 320, 655, 658
Lenin 28, 36, 38f, 45, 51, 63, 83, 149, 158, 180, 182, 186f, 194f, 197, 222ff, 235–40, 242f, 248, 250, 255f, 270, 280, 306f, 327, 413, 449f, 453, 457, 461, 470, 480ff, 506, 517, 531, 533, 543f, 553, 563, 573, 647, 662, 667f, 673, 679f, 684ff, 707, 714, 716ff, 722, 741, 750ff, 758, 770f, 773, 797f, 817, 822, 827, 834f, 845f, 853, 866, 869, 871f, 882ff, 895, 905, 918, 987, 996f, 999, 1028, 1036, 1048, 1063, 1124, 1189, 1196, 1204, 1210, 1215
Lenk 847, 858
Lennox 630, 637
Lenoir 1133, 1140
Lenski 1137, 1140
Lenz, A. 925
Lenz, J. M. R. 1173
Lenz, S. 262
Leonhard 496, 505, 993
Leontjev, L. A. 392
Leontjew, A. N. 426f, 566, 730, 733, 837ff
Lepenies 379
Lepeletier 14
Lerner 932
Leschnitzer 1170
Leske 901f
Lessing 135f, 146, 175, 555, 937, 943
Lessner 59
Leukipp 170, 939
Levi 194
Levi-Brühl 929f
Lévi-Strauss 343, 663, 670, 681, 855, 858, 1094, 1098
Levien 961, 969
Lévinas 208, 889, 1093, 1097f

Levison 932
Lewin, H. 115, 118
Lewin, K. 163f, 1153, 1163, 1166
Liberman 459f
Lichtheim 469
Liddell/Scott 50, 54, 659, 1079
Liebig 366, 701, 704ff, 707f, 710, 1145
Liebknecht 60, 108, 117, 389, 683, 834, 839, 869
Liedman 392, 647, 658
Lifschitz 686, 697
Lilburne 400
Lincoln 50
Lindner, B. 695, 697, 1180
Lindner, W. 534f
Lindow 978
Lindqvist 164
Linné 611
Linse 765, 776
Lipietz 6, 9f, 12, 844, 846, 1005, 1011
Lipps 136, 142, 146
Lipset 1213, 1215
Lipsius 228
List, E. 932f
List, F. 1014ff, 1022
Liu Shaoqi 488, 491, 535
Lloyd 1157, 1166
Lobkowicz 469
Locke 9, 161, 167, 175, 212, 322f, 610f, 616, 639, 711, 745, 1082, 1121
Lodder 241, 244
Loeser 896, 898, 902
Loest 266, 268
Loether 900, 902
Loewy 243f
Lohmann 893, 902
Lombardi 839
Lombardo-Radice 983
London 535
López Raimundo 993
Lorentzen 261
Lorenz 1059
Lösche 1210, 1216
Losurdo 1116, 1130
Löwenthal 545, 553
Löwith 468f, 527, 537, 553, 585, 590, 794, 1106, 1108, 1115
Löwy 672, 681
Lübbe 727, 972, 1216
Lubbock 1059
Luckmann 314, 320
Lucretius 704
Ludwig 107, 116, 118
Ludwig XIV. 403
von der Liihe 134, 146
Luhmann 205, 211, 382f, 586, 590, 874, 894, 1059, 1137, 1140
Lukács 38ff, 140, 142, 144, 146, 185, 196, 199, 205, 211, 225, 249, 251, 265, 268, 332, 335, 345, 371f, 374, 383, 413, 432, 436, 438, 467, 470, 543, 564f, 586, 590, 594ff, 603, 625ff, 633, 647, 676f, 681, 686ff, 690f, 693ff, 697, 714, 716, 718f, 742f, 749f, 818, 825, 884, 906, 940, 983, 1064, 1087, 1091, 1097, 1105, 1123ff, 1130, 1153, 1161, 1167–84
Lukes 26, 31
Lunatscharski 717, 719, 895, 1085
Luppol 718
Luria 423, 426
Lustiger 362
Luther 229, 263, 431, 847, 858, 885, 900, 902
Lutz-Bachmann 880, 894
Luxemburg 51f, 132, 182,

195, 241, 280f, 285, 302–6, 451, 454, 470, 529, 531f, 535, 563, 683f, 728, 769, 776, 781, 828, 834, 866, 872, 884, 894, 906, 995f, 1070, 1096, 1101, 1190, 1196
Lyell 1044f
Lyotard 191, 337, 340, 345
Lyssenko 243, 617, 963f, 1073, 1078

MacCulloch 306
MacFarlane 397, 406
MacGregor 869, 873
Mach 324, 329, 639, 716–19, 1153, 1166
Macherey 324, 329, 646f, 656, 658, 1096, 1098
Machiavelli 263, 269, 393, 861, 913
MacPherson 16, 19, 341, 345
Madajczyk 363
Madörin 67, 73, 1097f
Maeterlinck 626
Magdöff 487
Mahnkopf 443, 1005f, 1009
Maier 107f, 112, 115f, 118
Maine 571
de Maistre 1210
Majakowski 629, 853, 857, 1180
Makarenko 835, 837, 839, 895
Malandrino 1024, 1031
Maldidier 272
Malesherbes 607
Malkiel 953
Mall 1024, 1031
Malraux 210, 371
Malthus 57, 59, 306, 561, 701f, 710, 1060, 1083
Mandel 108, 118, 124f, 132f, 454, 469, 475, 479, 487, 509, 511, 679ff, 990, 993, 1000f, 1003, 1011, 1029, 1031, 1197
Mandelkow 698
Mann, H. 1172
Mann, K. 1169, 1183
Mann, Th. 265, 630, 936f, 1172, 1181
Mannheim 156, 932
Manning 395, 406
Mansilla 897, 902
Manuel 794
Manzoni 1174
Mao Ze-dong 186, 256, 487f, 490, 531, 565, 1114, 1204
Marat 50
Marc 1171
Marcel 371
Marchais 987f
Marcos 154f, 288, 731, 733
Marcus 478f, 627
Marcuse 190, 193, 211, 284, 288, 374, 377f, 383, 437f, 467, 469, 471, 479, 493, 588ff, 691, 722, 726, 729, 733, 790–94, 813, 825, 873, 875, 892, 940, 943, 973, 999, 1107, 1118, 1120, 1128, 1130
Maréchai 20, 22
Marek 983, 993
Mariátegui 335, 731, 775, 998f
Marie 511
Markov 22
Marković 468
Markus 646, 658
Marmontel 608
Marmora 998f
Marrus 363
Marschall 504f
Marshall, A. 1074, 1078

Marshall, T. H. 1135, 1140
Marssolek 830
Martin 487, 491
Martinez-Alier 367, 370, 520, 522
de Martino 83
Martow 449, 829f
Martynow 449
Marx, J. 55
März 107, 118
Maslow 449
Mason 867, 873
Mattatias 765
Matthias 742, 744
Matthöfer 1103
Matthys 765
Matzner 1180, 1183
Mauke 201, 203
Maus 384, 392, 1079, 1091
Mauss 1094, 1098
Mauthner 745f, 762, 1080, 1091
Maxwell 1163
Mayer, A. J. 363
Mayer, G. 392, 1182f
Mayer, H. 373, 383, 695, 698, 942f, 1178, 1183
Mayer, J. R. 364f
Mayr 1058
Mayumi 708, 710
McCulloch 201, 204
McDonough 11
McGuiness 190, 193
McIntosh 47f, 923, 925
McLennan, Gordon 10, 12
McLennan, Gregor 987
McLennan, J. F. 1059
McLuhan 671
McRobbie 318, 320
Mead 137, 146, 739
Medwedew 535
Meek 108, 113, 118
Mehring 386, 418, 434, 683f, 895, 902, 905–9, 958, 969, 974f, 978
Meier 779, 784
Meillassoux 924f
Meiners 231
Meisner 490f
Melber 1024f, 1031
Melissos 169
Meller 848, 858
Melotti 569, 581
Menage 946
Menard 1009f
Mende 476, 479
Menger 1066
Menke 1099
Mennell 856, 858
Mensching 155, 167, 193, 877, 894
Menzel, A. 50
Menzel, U. 490f, 571, 581
Menzel, W. 692
Menzel-Fischer 490
Mercier-Josa 776
Merimee 1174
Merleau-Ponty 1119, 1121ff, 1127f, 1130
Mészáros 333, 345, 469, 479
Métral 41
Metrodoros 659
Metscher 625, 637
Metternich 445
Metz-Göckel 48f
Meyer, E. 969
Meyer, R. W. 1130
Meyer, Th. 289, 803, 808
Meyer-Lübke 952f
Meyerhold 629f, 637
Meyerson 638, 658
Michel 383
Michelet 268, 977
Michels 53f
Middell, K. 22
Middell, M. 22
Mierau 770, 776
Mies 71, 73, 317, 320, 854, 857f, 966, 969

Mikojan 529
Milch 499
Miles 922, 925
Mill, J. 461f
Mill, J. St. 56f, 201, 204, 233, 324, 329, 639, 699f, 710, 1042, 1051, 1153
Miller, R. W. 327, 329
Miller, S. 61, 66, 896, 898, 900ff
Mills 163f, 1189, 1192
Minazzi 656
Minow 1018, 1021f
Mirabeau 14, 848, 858
von Mises 1047, 1051
Mitchell 47, 49
Mitin 750, 762
Mitscherlich, A. 505
Mitscherlich, M. 505
Mittelstrass 638, 762, 973, 976ff
Mittenzwei 140, 142, 146, 264, 268, 637, 693ff, 698, 1175, 1177, 1179f, 1183
Mlynař 532
Mocek 899, 902
Mohl 260f
Möhrmann 47, 49
Molcanova 854, 858
Moleschott 366, 849, 858
Molina 12
Mollenkopf 1134, 1140
Möller 71, 73
Molotow 52
Moltmann-Wendel 154f
Moltschanow 199
Mommsen 358, 363, 972
Monck 400
Montesquieu 1208, 1216
Montinari 1085, 1091
Moore, A. 272
Moore, B. 487
Moos 1116
Morel 956
Morelly 13, 19
Morf 820, 825
Morgan 669f, 681, 916, 927, 937, 1059
Morishima 87, 94, 107, 115, 118
Moritz 598, 601, 603
Moro 990
Morrill 396, 407
Morris, J. 115, 118
Morris, W. 663, 681
Morton 395, 407
Morus 13, 954
Moses 155
Mounier 371
Moynihan 920, 925
Mückenberger 71, 73
Mühlmann 487
Müller, A. 1210
Müller, E. 202, 204
Müller, G. H. 1060, 1066
Müller, H. 354, 635ff
Müller, H. D. 1104
Müller, M. 225
Müller, P. 694
Müller, R. W. 1198, 1207
Müller, U. 48f
Müller-Kohlenberg 63, 66
Mun 128, 133
Müntzer 692, 765
Mussolini 868
Myrdal 918

Na'aman 60
Nagy 1178
Napoleon I 445, 862, 865f
Napoleon III (Louis Bonaparte) 862, 864ff, 871
Naredo 367, 370
Narkiewicz 993
Nassi 992
Natorp 903f, 909
Naumann 373, 1017f, 1022
Negt 163f, 719, 727, 733, 976, 978, 1099ff, 1102ff

Nelson, L. 908
Nelson, R. R. 1074ff, 1078
Nemtschinow 1073
Nettler 468f
Neumann 493, 505, 873, 1211, 1216
Neurath 159, 190, 313, 320, 718f
Neusüß 67, 73, 1197
Newman 422, 426
Newton 85, 617, 639, 651, 1061
Ng 925
Nick 808
Nicolai, F. 231
Nicolai, W. 1011
Nieke 237
Niemöller 501
Niessen 68, 73
Niethammer 346, 501, 505, 731, 733
Nietzsche 35, 51, 179, 207, 210f, 331, 337, 541, 635, 790, 793, 813, 824, 890ff, 894, 941, 954, 1080, 1083, 1085–88, 1116, 1120, 1123, 1203f
Niji 825
Nikolaus von Kues (Cusanus) 173
Nizan 371
Nohlen 571, 581
Nolte 63, 66
Nordhaus 59f
North, D. 199, 204
North, D. C. 1076, 1078
Noske 1018
Notz 61, 63, 66
Novalis 177
Nove 244, 453f
Nowak 646, 658, 1159, 1166
Nuscheler 571, 578, 581
Nutzinger 118, 124f

O'Connor 520, 522
Oesterle 696, 698
Oetzel 719
Offe 67, 72, 341
Ogorreck 354, 363
Ogundipe-Leslie 925
Oiserman 392, 468f, 475, 479
Oittinen 183, 193
Okishio 115, 118, 1197
Ol'chovikov 952
Olberg 958, 960, 969
Oik 64, 66, 67, 72
Oilman 125
Ollmann 68, 73
Omi 919, 925
Onyx 738
Opitz 1013, 1015–20, 1022
Opocensky 765
Oppolzer 463, 469
Orcel 825, 1130
Origenes 227
Orsenigo 1067, 1078
Ortu 732f
Oschilewski 497, 505
Ostwald 178
Ottwalt 1168f, 1183
Overbeck 207
Ovid 786
Owen 234, 767, 832

Panaccione 830
Pareto 271, 1066
Paris 4
Parkin 1131f, 1140
Parmenides 169f, 786, 939
Parsons 592, 1059
Parvus 452, 454
Pascal 207, 1038
Pasēro 374
Pastusny 963, 968
Pätzold, D. 166, 193
Pätzold, K. 347–50, 353,

363
Paugam 1133, 1140
Paul, D. B. 969
Paul, H. 952f
Paul, H.-H. 124, 126
Paulhan 953
Paulus 227f, 232, 583, 764, 847, 915, 1079, 1090
Pauly 972f
Pavis 625, 637
Peat 521
Pêcheux 139, 655–58
Peirce 324, 329, 656
Penn 206, 211
Penner 894
Pennington 406
Peralta 392
Perez 1076
Perez-Ramoz 1158, 1166
Perrot 933
Peschanski 296
Peters, M. 1018, 1022
Peters, R. 12
Petersen 848, 858
Petrarca 205, 211
Petrović 468f, 478f
Petrus 764, 773
Petty 95, 200, 204, 297, 320, 639, 703
Pfeifer 523, 527
Philon von Alexandria 764
Phokylides von Milet 1198
Piaget 424ff, 759, 762, 887, 1034, 1051
Picasso 1171
Picó 346
Pico della Mirandola 228
Pieck 199
Piercy 967, 970
Pietilä 71, 73
Pietsch 108, 116, 118
van der Pijl 1002, 1012
Pinch 1166
Pinkerneil 383
Pisani 953
Piscator 629f, 637, 1180
Platon 12f, 135, 169ff, 191, 321, 393, 583, 639, 720, 723, 786f, 810ff, 839f, 845, 934, 945, 954, 1079f, 1111, 1130, 1159, 1200
Plavius 373, 383
Plechanow 141f, 146, 291, 449, 506, 647, 677, 717ff, 905, 909, 996, 1028, 1031
Plessner 538f, 553
Plinius 321, 605
Ploetz 956, 958, 970
Plotin 172
Plutarch 659, 938
Podolinsky 365–68, 370
Pohl 363
Polanyi 200, 204, 439f, 442ff
Poliakov 363
Polybios 659
Popitz 468f, 479
Popov 476, 480
Popper 190, 310f, 320, 324, 329, 336, 421, 774, 776, 823, 825, 976, 1035, 1051, 1059, 1070, 1078
Portelli 992
Posnjakow 112, 118
Potamon von Alexandria 227
Pott 946
Poulantzas 7–10, 12, 671, 681, 863f, 873, 1000ff, 1012
de Prades 611
Prauss 762
Prechtl 938, 943
Preiswerk 933
Preobraschenskij 853, 857
Preti 327, 329, 475, 646, 658
Prevost 1181ff

Priester 913f, 993
Prigogine 513f, 522, 1067, 1078
Proudhon 25, 83f, 129, 143, 258, 411, 446, 461f, 767, 820, 871, 873, 1083
Proust, J. 619
Proust, M. 725f, 733, 792
Ptolemäus 659
Pudel 847, 858
Pufendorf 611
Pusch 932f
Putnam 326, 329
Pythagoras 169

Quesnay 56, 200, 204, 608
Quetelet 298f, 320
Quine 325, 1048, 1051

Raab 1213, 1215
Rabaté 1099
Rabehl 288, 999
Rabelais 605
Radbruch 908
Radczun 285, 288
Radder 1154, 1166
Radek 194
Radkau 519, 522
Rahner 377, 383
Rajk 530
Rakowski 532
Rambaldi 820f, 825
Ranke 344, 675, 681
Rankine 366
Raphael 647, 658
Rapoport 163f
Raptis (alias Pablo) 509, 511
Rathenau 1211
Ratz 498, 501ff, 505
Rau 56
Rauh 185, 193
Rauschenbach 64, 66
Ravetz 656, 658
Rawls 24, 31
Raymond 646, 651, 655, 658
Rayski 296
Reagan 1008
Redlow 564, 566, 901f
Rehmann 53f, 769, 776
Reich 920, 925
Reichel 153, 155
Reichelt, H. 124ff, 249, 251, 715, 719
Reichelt, M. 830
Reid 324, 329
Reinhardt 897, 902
Reisberg 194, 199
Reiss 692, 698
Reitlinger 347, 363
Renou 655, 658
Rentsch 875, 894
Rex 920f, 925
Rey 672, 681
Reyer 959, 970
Rheinberger 1154, 1166
Ribbentrop 351
Ricardo 55ff, 59, 94ff, 99, 106, 121, 200f, 232, 306, 572, 699f, 710, 841f
Richardson 396, 405, 407
Richter, E. 285, 288
Richter, H. 993
Richter, L. 1105, 1115
Riechers 4, 913f
Riedel 659f, 681
Riedl 1019, 1059
Riegl 675, 681
Riehl 930
Rieland 164
Riesebrodt 592, 603
Riesman 211
Rifkin 61, 66, 69ff, 73, 250f, 522
Rilke 142
Ripalda 248, 251
Ritsert 594, 598, 603

Ritter 638
Ritz 469
Rjazanow 995, 999
Rjutin 532, 535
Robbe-Grillet 375
Robelin 873
Robert 1092
Robespierre 848
Robinson 1196f
Rodbertus 56, 123, 306, 872
Roede 312, 320
Roediger 830
Roemer 1071, 1078
Rogers 739
Rohbeck 189, 193, 1153, 1165
Rohde 941
Rohlfes 1101, 1104
Röhr 1021f
Rohwer 362
Rojas 261
Rolland 1086, 1172
Rommelspacher 521
Roos 368, 370, 512, 520, 522, 1141, 1144, 1147ff, 1152
Roosevelt 486, 492, 868
Roots 396, 407
Rorty 326, 329, 745, 758ff, 762
Roscher 56
Rosdolsky 107, 112, 118, 132f, 392
Rosemont 830
Rosenberg, A. 532, 535, 774
Rosenberg, R. 692, 698
Rosenberg, W. G. 240, 244
Ross 286
Rossi, P. 647, 655f, 658
Rossi, P. L. E. 203
Roth, C. 363
Roth, G. 592
Roth, K.-H. 356, 363, 957, 960, 966, 970, 1013, 1020ff
Roth, R. 285, 288
Rothschild 1190, 1192
Röttger 1006, 1009f, 1012
Röttgers 431, 438
Röttges 1207
Rousseau 13, 16, 19, 134, 146, 175, 276, 410, 431, 438, 608
Rowthorn, B. 107, 115, 118
Rowthorn, R. 1192
Rozdestvenskij 952
Rubel 392
Ruben, D.-H. 658
Ruben, P. 124, 126, 185, 188, 564, 566
Rubin 87, 89, 94, 107, 112, 118
Rubiner 264
Rubinstein 656, 658
Rudas 594
Rudolph 166, 193
Ruffo 657
Ruge 620, 624, 908
Ruggie 438, 443
Rumford 852
Ruoff Kramer 156, 161, 379, 383
Rusch 732f
Russel 396, 407
Russell 325, 329, 331, 639
Russo 657
Rykow 36

Sacristán 330, 346
Safrian 363
Said 916, 925, 931, 933, 1023f, 1032
Saint Just 20
Saint Martin 272
Saint-Simon 21, 234, 617, 767
Sainte-Beuve 262

Salazar 829
Salemohamed 1094, 1099
Samuelson 59f
San Juan 919, 925
Sánchez Vazquez 334, 339, 346
Sandkühler 618, 647, 658, 756, 762, 894, 1044f, 1051
Sanford 932
Sartre 77ff, 331, 371–77, 379, 381, 383, 412, 421, 471, 527, 587f, 590, 663, 674, 677, 681, 821, 825, 885ff, 894, 941, 943, 998f, 1112, 1116–28, 1130f
Sassulitsch 571, 664, 927, 937, 1026
Sauer 66
Sawer 449, 454
Say 56, 93, 203f, 306, 699
Schacht 1018
Schäfer, D. 68, 73
Schäfer, G. 391, 535
Schaff 371, 383, 468f, 477, 480, 805, 808, 983, 1125f, 1130
Schaffer 1160, 1166
Schallmayer 957f, 970
Scharang 378, 383
Schdanow 687, 1168
Scheit 627, 637
Scheier 151, 155, 901
Schelkshorn 889, 894
Schelling 174, 177f, 585, 615, 666, 1040ff, 1051, 1084, 1107, 1187
Schelsky 204, 206, 211, 262, 268, 311, 378, 382f
Schemm 264, 268
Schenk 47, 49
Schenker 764
Schickel 374, 383
Schikora 1006, 1011
Schilar 118
Schiller, F. 621
Schiller, H. E. 879f, 894
Schilling 581
Schirrmacher 380, 384
Schischkin 896, 902
Schlanger 413, 421
Schlegel 176f, 584, 590
Schleiermacher 14, 177
Schleifstein 199
Schlesinger 108, 118, 574, 582
Schlözer 298, 320
Schluchter 592, 603
Schlüpmann 367, 370
Schlupp 1006, 1009, 1012
Schmid 655, 658
Schmid Noerr 892, 894
Schmidt, A. 251, 257, 366, 392, 522, 592, 601, 603, 744, 747, 762, 1091, 1110, 1117, 1128–31
Schmidt, C. 89, 107, 418, 593, 905
Schmidt, D. 264, 268
Schmidt, H. D. 38, 40
Schmidt, R. 953
Schmidt, S. 730, 733
Schmidt, U. 380, 384
Schmidt-Biggemann 237
Schmied-Kowarzik 522, 889f, 894
Schmitt, C. 527, 1203f, 1208
Schmitt, H.-J. 1168, 1179f, 1183
Schmitt, J.-C. 155
Schmollack 897, 902
Schmoller 908
Schmuhl 955f, 970
Schnädelbach 598, 603, 892, 894
Schneider, E. 1130
Schneider, M. 808
Schneider, W. 359, 363

Schneiders 227, 232, 237
Schoch 1117, 1119, 1122f, 1131
Schoeller 1197
Scholliers 58, 60
Scholz 497, 505
Schönbein 706
Schönberg 1171, 1204
Schopenhauer 206, 211, 233, 892, 1202f, 1208
Schorlemmer, C. 387
Schorlemmer, F. 900
Schott, E. 764, 776
Schott, R. M. 794
Schottlaender 897
Schrader 124, 126
Schramm, G. 1179, 1183
Schramm, S. 487, 490f
Schratz-Hadwich 735, 738f
Schrey 476, 480
Schröder, W. 373
Schröder, H. 47, 49
Schröder, R. 801, 808
Schrödinger 516, 522
Schröter 41, 49
Schucht 1089f
Schulte 190, 193
Schultz 830
Schulz 68, 72
Schulze 551, 553
Schumacher 497
Schumann, M. 286, 288
Schumann, W. 349, 362
Schumpeter 845f, 1007, 1066f, 1069, 1078
Schunter-Kleemann 1005, 1012
Schurig 243f, 566, 966, 970, 1065f
Schuster, F. 65f, 959
Schuster, J. 1012
Schütz 310, 314, 320
Schwartz 957ff, 964, 970
Schwarz 678, 680, 1067, 1078
Schweikle 262, 268
von Schweitzer 68, 73
Schwemmer 52, 54
Schweppenhäuser, G. 289, 598f, 601, 603, 891, 893f, 900, 902
Schweppenhäuser, H. 594, 604
Schyga 522
Scott, J. 734, 739
Scott, R. 50, 54
Scott, W. 1174
Scribner 422, 426
Scurrell 71, 73
Searle 970
Sedlmayr 1206, 1208
Seeman 468f
Segal 48f
Seghers 296, 1167, 1173f, 1176, 1178ff
Segre 993
Seidel 285, 289
Seidel-Höppner 21f
Seidelmann 1000, 1011
Seidl 71f
Seifert 511
Selden 228, 237
Sellars 325, 329
Semprún 375
Sen, A. 24, 31
Sen, S. 830
Seneca 228, 275
Sengling 62, 66
Senior 201, 204
Sennert 228
Serebowskij 963, 970
Serge 535
Sève 421, 468f, 475, 480, 566, 810, 825, 831, 839, 1117, 1131
Séverac 490f, 1099
Sextus Empiricus 639, 1037, 1051
Seyfarth 592, 604
Shakespeare 787, 1172

Shamsavari 88, 90, 94
Shapin 1160, 1166
Shapiro 979
Sharpe 396, 407
Shebrak 1073
Shiva 71, 73
Shotter 734, 736, 739
Sieburg 379, 384
Sieferle 519, 522
Sieyès 937, 943
Šik 459f, 478, 480
Silva Michelena 569, 581
Silver 1133f, 1136, 1140
Simmel 178, 441, 541f, 552f, 856, 937, 943
Simonis 366, 369
Simons 346
Simplikios 169
Sinclair 177
Sinowjew 194
Sirianni 240, 245
Sismondi 306
Sitnikow 476
Škredov 124, 126
Slansky 530
Smith, A. 56f, 95f, 175, 200, 203, 209, 252, 461, 516, 666, 699, 840ff, 844f
Smith, D. 47ff, 317f, 320
Smith, G. 150, 155
Soboul 20ff, 688
Soddy 365
von Soden 970
Sohn-Rethel 166, 193, 743f, 755, 762
Sokrates 523f, 715, 786f
Söllner 152, 155, 493, 501, 505, 873
Solomos 922, 924f
Solon 1198
Solow 516, 522
Solschenizyn 535
Sombart 89, 121, 126, 895
Song, Y.-B. 1026, 1032
Sophokles 56, 787
Sorel 143
Sorge 593
Spaemann 1030, 1032
Spencer 388, 1059f, 1063, 1066
Spengler 602, 1123
Spieker 993
Spinoza 175, 177f, 645f, 787, 1039, 1041, 1051, 1081, 1106, 1160
Sraffa 669
Stachel 648, 658
von Staden 1157, 1166
Stahl 1210
Stalin 8, 28, 36, 52, 38f, 147, 185, 193, 223, 241ff, 255, 413, 456, 481f, 490, 492, 528–31, 534, 544, 564, 620, 622, 668, 715, 718, 750, 770f, 805, 817, 853f, 918, 981, 997, 1029, 1064, 1072f, 1078, 1119, 1125, 1211, 1215
Stammler 904, 909
Stanger 1005, 1009
Stanislawski 629f
Stanley 734, 739
Statz 1003, 1006, 1012
Staudinger 742, 904, 909
Stedman Jones 392
Steedman 115, 118
Stefanek 637
Steffen 535
Stegerwald 1018
Stegmüller 1035, 1051
Stein, A. 1210
Stein, D. L. 85, 94
Stein, E. 133, 146
Steinberg 957, 970
Steinbüchel 908
Steiner, G. 852, 858
Steiner, R. 596
Steinke 511
Steinkühler, F. 1005, 1012

Steinkühler, M. 993
Stendhal 1174
Stengers 513f, 522, 1067, 1078
Stephan 516, 522
Stephenson 734, 737, 739
Stepin 1085, 1091
Stewart 85, 92, 94
Stiehler 564, 566, 898, 901f
Stier 569, 581f
Stinnes 1018
Stirner 31f, 40, 184, 409, 462, 753, 947, 955
Stolcke 966, 970
Stone 396, 407
Storch 203f
Strasser 807f
Strauss, D. F. 539
Strauss, F. J. 503
Streibel 368, 370, 522, 1144, 1147ff, 1152
Streicher 349
Stresemann 1019
Strittmatter 898
Ströbel 1210
Struve 306, 905
Sturm 229, 237
Stürner 79, 83
Šubik 157, 160f
Suchting 648, 658
Suc 766
Suffa-Friedel 490f
Sumner 931, 933
Suslov 336
Suvin 146
Sweezy 107, 112, 118, 393, 395, 672
Swift 931
Szondi 155, 624f, 627, 637

Tairow 629f, 637
Taubes 1080, 1090f
Tavernier-Courbin 851, 858
Tawney 397, 407
Taylor, Ch. 64, 66, 941, 943
Taylor, J. 228
Teague 1005, 1011
Teichert 67f, 73
Teichmann 1154, 1166
Tembrock 901
Tenbruck 592, 604
Terray 1128, 1131
Tetens 1154, 1166
Tetzlaff 486
Texier 914
Thalheimer 194, 199, 529, 531f, 534f, 960, 970, 1211, 1216
Thälmann 199
Thatcher 1008
Theissmann 776
Theophrast 169
Theunissen 940
Theweleit 766, 774, 776
Thier 468f
Thiersch 64, 66
Thirsk 397, 407
Thom 900f
Thomas, K. 396, 407
Thomas, W. I. 308, 320
Thomas von Aquin 172, 174, 939, 1159
Thomasius, Chr. 237
Thomasius, J. 228f
Thompson, D. 241, 245, 929f
Thompson, E. P. 8f, 12, 260f, 331, 344ff, 776, 1188–92
Thomsen 364, 366
Thomson 166, 193, 676, 681
Thorez 687
Thyen 598, 604
Tibi 486
Timm 696, 698
Timmermann 993
Tjaden 369, 1151f
Tlusty 320

Tocqueville 23
Togliatti 622ff, 687, 981f, 993
Tolstoi 142, 936, 1172f, 1176
Tomberg 469, 480, 1180
Tömmel 1007, 1012
Tönnies 307, 320
Tosel 914
Toti 475
Toulmin 656, 658
Trabant 1099
Träger 696, 698
Trautwein 993f
Treitschke 908
Trendelenburg 1043
Tretjakow 156, 1172, 1180
Trevor-Roper 396, 407
Trier 951, 953
Tristan 291, 296
Trometer 48
Trommler 698
Trotzki 241, 243, 245, 506–10, 530, 532, 534, 536, 672, 684f, 698, 867f, 873, 962, 970, 997ff, 1029, 1171
Tschagin 895, 902
Tschiang Kaischek 197
Tugan-Baranowsky 107, 306, 902
Tugendhat 939f, 943
Turchetto 256f
Türcke 1110, 1115
Turgot 55f, 58, 60, 608, 663, 946
Türk 10, 12
Tylor 926, 929f, 1059

Ueberschär 363
Ulbricht 266, 268, 459f, 496, 805, 1073, 1078
Ullrich 602, 604
Ulrich 392
Underdown 396, 407

Vaihinger 744, 762
Vajda 719
Valla 227
Valii 994
Vandervelde 235
Vargas Lozano 346
Vattimo 337, 340, 346
Veblen 272, 1067, 1076, 1078
Veerkamp 148, 155
de la Vega 894
Venetz 775f
Vereecken 506
Vergil 786
Vernadsky 368, 370
Vernant 676
Vichy 829
Vico 332, 665, 681, 905, 946f, 1061, 1160
Vidal-Naquet 973, 978
Vidoni 1062, 1066
Vielhauer 763f, 775
Vigier 825, 1126, 1130
de Vigny 262
Vilmar 807
Vint 57, 60
Vischer 134, 147
Vogel 350f, 363
Vogeler 1170
Vogt 233, 366
Völker 1178f, 1183
Vollgraf 122, 126
Vollmer 759, 762
Volpert 468f
Voltaire 332, 608, 931, 1025
Vorländer 742, 904f, 909
Vossler 950
Vranicki 468f

Wacquant 1134, 1140

Wagenknecht 623f
Wagenschein 1101, 1105
Wagner, A. 948, 1112
Wagner, H. 124, 126
Wagner, K. 716, 720
Wagner, S. 66
Wahse 107, 116, 118
Wahsner 190, 193
Walch 168, 193
Walden 1169f
Waldrop 85, 94
Wallerstein 344, 486, 920, 925, 1008, 1012, 1023, 1032
Wallraff 380
Walras 1066
Walser 67, 72
Walzer 64, 66
Wander 937
von Wangenheim 1170, 1182
Warner 1163, 1166
Warren 1025, 1032
von Wartburg 953
Wassner 54
Watlin 194, 199
Watson 656, 658
Watts 230
Wawilow 651
Wayand 927
Weber 52ff, 271, 378, 382, 541, 553, 590ff, 594–97, 600, 758, 763, 765, 774, 784f, 920, 1018, 1131
Wedekind 1174
Weggel 487
Wegner 683f, 698
Wehberg 1022
Weigl 1163, 1166
Weill, C. 296
Weill, K. 629
Weimann 694, 696, 698
Weindling 960, 970
Weiner, D. R. 242, 245
Weiner, K.-P. 1005f, 1010, 1012
Weingart 953, 964, 970
Weismann 1057f
Weiss, J. 591, 601, 604
Weiss, P. 50, 54, 263f, 268, 281, 533, 536, 593, 604, 620, 624, 635ff, 727f, 733, 770, 776, 1171
Weiss, U. 286, 289, 459f
Weissberg-Cybulski 536
Weissenenberg 765f
Weisskopf 925
Weitling 767
von Weizsäcker, C. F. 189, 193
von Weizsäcker, Chr. 67, 73
von Weizsäcker, E. 67, 73, 513, 522
Weilmer 346, 879, 889, 894
von Werlhof 67, 69, 73, 854, 858
Werner, H. 1100, 1104f
Werner, H.-G. 694f, 698
Werner, R. 899, 902
Wertheim 487
Wertsch 422, 424, 426, 734, 739
Wesel 82f
Weß 953, 957, 963f, 971
Westermann 79, 83
Weston 59
Wetzel 1099
Weydemeyer 649
Whewell 1042, 1051
White 24, 31
von Wiese 271f
Wiethold 544, 553
Wilhelm, H.-H. 363
Wilhelm III. von Oranien 403
Wilke 898, 900, 902
Wilkie 1157, 1166
Wilkinson 763, 776
Wilier, D. 327, 329
Wilier, J. 327, 329

Williams 663, 672, 681, 915, 925, 929f, 1105, 1115f, 1131, 1191f
Willis 318, 321, 929f
Wilimann 1058
Willoweit 83
Wilson 486
Winant 919, 925
Winckelmann 231, 592, 604
Winkler 802, 808
Winstanley 400
Winter 1074ff, 1078
Wirth 1211, 1216
Witt 1067, 1078
Wittfogel 668f, 681, 686
Wittgenstein 325, 329, 656, 759f, 823, 825, 938, 1047, 1051
Wittich 715f, 720
Wizisla 155, 161
Wolf, Ch. 380, 694, 727f, 733
Wolf, E. 487, 898
Wolf, Fr. 265, 633
Woif, W. 957, 971
Wolff, C. E. 1052, 1058
Wolff, Chr. 83, 174, 230f, 555
Wolff, F. 500, 505
Wolff, M. 167, 193, 656, 658
Wolfstetter 118, 124f
Wolkogonow 770, 776
Wollmann 739
Woltmann 905
Womack 286, 289
Woolf 262, 268
Worden 407
von Wroblewsky 371, 384
Wuketits 1059
Wulf 363
Wulff, Ch. 146
Wulff, E. 854, 858, 930
Wundt 143
Wygotski 142f, 147, 250f, 421–26, 735, 837

Xenophanes 169

Yakira 1160, 1166
Yerushalmi 148, 155
Young 932f
Yovel 774, 776

Zagorin 396, 407
Zahn 166, 194
Zamora 733
Zander 163f
Zech 116, 118
Zelený 120, 126f, 133, 215, 225, 249, 251
Zelikowa 895, 902
Zeller 745, 762
Zenon 169
Zetkin 683f, 698, 833, 839
Ziebura 1010
Ziegler 147
Zilsel 656, 658
Ziltener 1007, 1012
Zima 1092, 1094, 1099
Zimmer 155, 733
Zimmerli 237
Zimmermann, J. G. 206, 211
Zimmermann, M. 363, 957, 971
Znaniecki 308, 320
Zöberlein 774
Zoubov 1157, 1167
Zuckermann 1167
Zumthor 953
Zweig 1172

第二卷勘误表

第 212 页，“意识”词目中，同义词改为“S: conciencia”。[①]

第 717 页，是“第 279—280 页”，而不是“第 279 页”。[②]

① 见第二卷中译本第 191 页第一行。——中文版编者

② 见第二卷中译本第 629 页第一行。——中文版编者

中文版第三卷译后记

历经一年多的翻译、审校以及项目的各项支持工作的紧张有序开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第三卷即将呈现于读者面前。本卷编译工作依旧延续第一、二卷的工作机制，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在中德专家、译者、出版方等共同努力下完成。本卷编辑部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倪宇洁副编审负责，曹旸（现为慕尼黑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牧今（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任职于复旦大学）分担编辑部的主要业务工作。

在此致谢：

德方主编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先生（Wolfgang Fritz Haug）及夫人弗里加·豪格女士（Frigga Haug）对于辞典的中文版尤其重视，他们年事已高，但是积极参加了两次编译工作会。德国杜伊斯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海贝勒先生（Thomas Heberer）、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德方院长罗梅君女士（Mechthild Leutner），以及柏林自由大学《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编辑部的郝克先生（Hauke Neddermann），既是词条的撰写者，同时也是汉学家，他们为辞典的中文版编译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郝克先生，参与校对了大部分词条，提出很多中肯的意见。

值此卷付梓之际，本卷编辑部对所有为这个项目付出努力、提供帮助的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本项目亦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向编辑团队致谢，是他们在出版各环节的把关，才使得我们的成果得以完美呈现！

参与本卷翻译、校对的人员如下（以姓氏拼音排序）

阿思汗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蔡廷建　慕尼黑大学驻华代表，阿登纳基金会（德国）北京代表处研究员，慕尼黑大学政治学博士

曹　旸　德国慕尼黑大学德语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陈　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德语系讲师

巩天成　德国科隆大学托马斯研究所中世纪哲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侯振武　南开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副教授

胡晓琛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四级调研员

江　唯　德国洪堡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焦燕屏　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文学系硕士研究生（在读）

金　建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

李禅伶　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李靖新弘　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李牧今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

李　之　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文学硕士

林正昊　台湾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马　剑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毛明超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博士

沈红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恩列斯著作编译部主任

盛舒洋　德国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宋　珊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德法教研室主任，讲师

孙易晨　德国海德堡大学文化比较日耳曼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唐　婧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四级调研员

王　师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外国哲学博士

肖　瑶　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文学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在读）

虞皓然　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张　觅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张文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

张义修　南京大学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出站博士后

张志超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周　兵　深圳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

周驰博　德国伍珀塔尔大学先验哲学与现象学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朱更生　浙江大学德国文化研究所（外国语学院德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朱思聪　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助理策展人，艺术史硕士

朱渝阳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德国耶拿大学哲学博士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编辑部将继续做好项目的组织工作，不断为读者，尤其是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师生提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由于本项目工作繁重且我们的能力有限，难免有错漏或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文版编辑部邮箱：pku_hkwm@163.com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中文版编辑部

2023 年 9 月

引文版权说明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博大精深，因此辞典中诸多词目，不仅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也有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著名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的经典著作的原文和观点，比如罗莎·卢森堡、安东尼奥·葛兰西、卡尔·柯尔施、尤尔根·哈贝马斯、米歇尔·福柯等。为维持经典作家重要观点表述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对于著名学者的引文，本辞典力求与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著述中的译文相一致，又由于版式所限，我们无法一一将所引译文的出处标出，若有译者认为涉及自己的翻译版权，请与编辑部联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3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主编；俞可平 等编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ISBN 978-7-100-22576-2

Ⅰ. ①马… Ⅱ. ①沃… ②俞… Ⅲ. ①马克思主义—词典 Ⅳ. ① A81-61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9977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大辞典

第三卷

〔德〕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　主编

俞可平　等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22576-2

202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2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72¼

定价：368.00 元